

重访边疆的内与外

九色鹿 · 边疆史系列（全7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将历史的目光投向边疆，
更好的了解现实，理解当下。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九色鹿

重访边疆的内与外

九色鹿 · 边疆史系列（全7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将历史的目光投向边疆，
更好的了解现实，理解当下。

总目录

- 争霸西州：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
- 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
- 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
- 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滨下武志先生执教中山大学十周年纪念文集
- 寻找“世界岛”：近代中国中亚认知的生成与流变
- 区域视野下的中亚研究：范式与转向
- 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诸地



争霸西州

西汉为什么开拓西州？如何建立天下秩序？

东汉为什么被西州“羌患”步步紧逼，国势衰退？

两汉之间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

东汉后期的西州兵团何以傲视群雄？

枭雄董卓何以兴？又何以亡？

本书将引领你深入草原俯视农耕与游牧的互动纠葛，

深入西州寻求中央与地方的联动密码！

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



薛小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薛小林 1983年出生，湖北钟祥人，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史学月刊》、《社会科学》、《史学集刊》、《世界宗教文化》和《民俗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开设“秦汉史专题”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等课程。

薛小林 著

争霸西州

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序

薛小林博士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即将出版，我很高兴受邀写序。

小林的学术根基是在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打下的。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时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老师，特别是他的硕士导师乔健先生为了培养小林付出了许多心血。小林于201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响应母校的召唤，返回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六年之后，他的这部著作得以出版，同样也体现出兰州大学的老师们对他的期望与鼓励。

我和小林的师生情缘，开始于2009年9月，小林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博士生，研读秦汉史，我是他的导师。直到2012年6月他获得博士学位离校为止，先后三年的时间，从学术到生活，我们都可以从容交谈；当然也少不了把盏聚谈。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小林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两汉的“西州”经略与国势研究》。当初，我们两人商定这个题目之后，我曾经不无担忧：这个题目跨度和难度偏大，小林是否能够胜任？当他完成了大部分初稿给我审阅时，我就大为放心了。后来，在博士论文答辩时，果然获得了答辩委员会各位先生的一致好评，我心中充满欣喜。现在准备出版的这部著作，就是在当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经过修改和完善而形成的。我特意比较过两者的文本内容，欣喜地发现：小林的学术积累和学业进步，在这本书中体现得很明显。

小林在读书期间，就表现出对专业研究的全身心投入。他的阅读范围很广，敢于质疑问难，行文也有气势。我早就认定他是一个“读书种子”。在大学当老师、指导研究生的时间长了，在比较熟悉的老师之间，私下交流时会有一种说法：遇到好学生，是老师的幸运。就此而言，我很愿意说，有薛小林这样的学生，我确实很高兴。

小林毕业离校之后，我们也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和交流。他想到的学术论题，在动笔写作之前，时常会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写？他的文章初稿在向其他人征求意见时遇到批驳式的回馈意见，在郁闷之时，他也会打电话向我告知情况。近年来他发表的几篇文章，我都是文章修改过程的见证者。

我一直有个看法：作为大学老师，一定要有很好的课堂讲授能力，在授课效果方面应该有严格要求。提高科研能力与提高授课水平，应该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看待。就此而言，我曾经对小林的授课效果有所担心，因为小林讲话有轻微的“期期艾艾”。2015年夏季，我们一道在成都市参加秦汉史的一个学术讨论会，小林有一个会议发言，我在现场悉心静听。他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表达得近乎圆满。他的发言自始至终充满自信和激情，现场的“气场”很强大。我由此推知，他在大学的讲台上授课，也一定很受学生的欢迎。他一定可以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大学老师。

小林的这部学术著作出版之后，读者一定会予以关注。作为最早的读者之一，我感觉本书有几个亮点。

第一，讨论问题的视角很好。他注重以两点立论：一是深入草原去理解游牧，二是深入汉朝政治内部去理解边疆与中心的互动。他在“西州”这个古已有之的地域概念下，对草原部族与农耕国家的互动，对汉朝边疆与中心的互动做了较为全面的多层次研究。他论证了西州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交流和融合的典型区域，是影响汉代国势脉动的重要区域，是进行两个互动观察的很好对象。

第二，他研究问题的眼界比较开阔，对学界既往的重要成果多有学习和借鉴。他对欧文·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杉山正明、江上波夫、丹尼斯·塞诺等学者的内亚史研究的成果，从方法到结论都细心揣摩。唐晓峰对拉铁摩尔“将长城地带看做核心，思考它的双向影响，特别是到草原社会去‘发现历史’，其学术意义不容低估”的学术判断，对小林思路的开拓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王明珂先生的三部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小林完成研究课题更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如果说，小林的这部著作有理论研究深度的话，与他广泛地阅读学术经典，并据以展开自己的讨论，直接相关。

第三，小林的研究结论和表述，多有自己的心得，可以给人以启发。他认为，所谓的“西州”问题，既涉及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也涉及异族与汉族的关系，双重关系的交错使得西州问题显得异常复杂。“西州”在西汉和东汉均是朝廷面临的“大问题”，西州问题是一个可以将两汉四百年历史贯通起来的轴承。他侧重于透过西汉与东汉不同的西州经略及西州对中原腹地造成的不同反馈结果，以比较西汉、东汉两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

第四，我很欣赏他的两篇附文。特别是第二篇附文《边兵的失控——东汉董卓、北魏六镇及唐代安史三次边兵叛乱之比较研究》。这篇文章，是他六年前的博士论文中所不见的，也就是小林的最新研究所得，不仅是对他的博士论文的发展，而且应该被视为他研究思路的一种拓展和跨越。他的结论：“东汉西北的凉州兵团、北魏北边的六镇，以及唐代东北的军镇，在经略边疆、保境固土方面，都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后来都衍化成失控的边兵，对东汉、北魏以及唐政权分别造成致命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他进一步认定，这三次边兵失控引发的大变局，“三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对它们的发生以及背后复杂的边疆形势、内政局势及胡汉互动情形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或有助于深化对中古时期政治、军事、民族及文化问题的认识”。我很希望今后可以看到他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做出跨越断代史的研究成果来。

小林的著作，凝聚着他多年来的研究心得。我作为他的导师来写序言，自然有喜悦之情，更希望和感谢学界的朋友，对小林今后的成长多多给予关注和指导。

祝福小林在学术发展之路上，阔步前行。

孙家洲

- 绪论：从草原看农耕 从边缘看中心
    - 一 “边缘的西州”：争霸的中心
    - 二 多个角度看“西州”：民族史、地方史抑或边疆史地？
    - 三 重新审视两汉史：断裂的，还是连续的？
- 第一章 农牧交错：西州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
    - 一 西州的生态环境与人地关系
    - 二 西州的社会历史与周边形势
- 第二章 西汉西进：西州的开拓与经营
    - 一 开拓与经营：汉武帝经略西州
    - 二 继承与调整：西汉后期对西州的坚守与控制
- 第三章 汉化与胡化：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 一 西州的经济开发：农业的有限成长与牧业的优势发展
    - 二 西州的社会发展：地方豪族的形成及影响
- 第四章 东汉东移：西州兵团的兴起与东汉国势的衰退
    - 一 东汉的内部危机与外部忧患
    - 二 西州兵团的兴起及其对东汉的破坏性反馈
- 结语
- 附录一 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
- 附录二 边兵的失控
- 参考文献
- 后记

绪论：从草原看农耕 从边缘看中心

一 “边缘的西州”：争霸的中心

“西州”是汉代一个重要的地域概念，在当时天下的政治层级结构中，是处于京畿与西域之间朝廷能够通过郡县体制控制的区域。在两汉时期，西州的内涵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所指区域扩大；其次是内涵重心转移。西汉时人以西州专指西南益州地区，例如，由于广汉郡群盗横恣，汉成帝册免丞相薛宣时说：“西州鬲绝，几不为郡。”[1]汉成帝显然是在用西州指称广汉郡所在的西南地区。经历了汉武帝时期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汉朝收复河套、开拓河西并设立郡县后，西州所指称的范围渐次扩及西北。到两汉之际，西州成为涵括西南和西北的实行郡县体制的大西部区域概念。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另一个变化，即“西州”概念的内涵重心发生转移。在东汉时期，虽然“西州”有时仍被人们用来指称益州地区，但用之指代凉州、朔方等西北地区的用法后来居上，变得更为常见，甚至是当西南和西北同时出现时，西州被用来专指西北。[2]例如，东汉初光武帝以陇、蜀为忧，独谓来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3]隗嚣控制着凉州，但是他首鼠两端，所以刘秀说“西州未附”；占据巴蜀的公孙述（字子阳）称帝自立，所以刘秀说“子阳称帝”。在这个语境中西北凉州和西南益州同时出现，但是此处的“西州”显然仅指凉州而言，光武所说的“西州方略”，是指对付隗嚣的策略，当平定隗嚣“得陇”之后，光武才得以“望蜀”。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汉代的“西州”应该包括西南益州和西北凉州、朔方地区，但本书研究的“西州”暂不涉及西南地区，而是仅指西北的凉州和朔方地区，这是因为本书研究之重点在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国家之互动关系，而且越是往后人们使用“西州”指称西南地区的情形越少，“西州”一词反而主要被用来指称后进的西北之凉州、朔方，在对汉代国势盛衰脉动的影响方面，西北地区显然起着比西南重要得多的

作用，就整个西部而言，时人关注之焦点不在西南而在西北。

“国势”指国家的兴衰、国力的强弱形势，亦指立国规模、统治能力、社会风尚、时代气象等方面的综合体现。西州经略与两汉国势的脉动有着密切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国势”的强弱决定了朝廷经略“西州”的方式和力度；另一方面，经略“西州”的后果必定会对两汉“国势”之走向产生反馈作用。作为边疆地区的“西州”与汉朝中央之间的交互作用贯穿整个两汉时期，深刻影响着两汉史的走向，故而是一个重新梳理和思考汉代史的切入点，也是观察比较西汉、东汉两个时代特质的有效视角。两汉历史的演进有两条前后相继的线索，一条是西汉一代围绕“汉匈关系”展开的对西州之争夺、开拓和经营，另一条是东汉一代围绕“汉羌关系”展开的西州羌胡化、西州军事集团的崛起及其对东汉政权的冲击。本书将围绕这两条线索，对两汉的“西州”经略与国势盛衰之间的交互关系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多角度分析，以展现“西州”之开拓—“西州”地方力量之成长—“西州”武力对中原腹地的反馈冲击这样一个完整的互动过程，并探究西汉与东汉不同的时代特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

西州是汉帝国的西北边疆地区、华夏文明的边缘，是中原农耕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交锋的关键地区。在族群资源竞争的背景下，边疆地区与族群生存的资源边界和空间密切相关，边缘成为牵动整体的重要地区，有时候边缘地区的某些变动甚至可能促使中心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整体图景也因而需要重新定义。当然，这里只是强调边缘、边疆的某种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当然有其限度，它在很多方面还无法与中心腹地地区相提并论，但本书亦希望通过对边缘变化的观察来认识中心的某些动向，考察边缘与中心的互动关系。

两汉朝廷西州战略的形成、执行及其最终的效果，必然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战略上是进取拓边抑或徙边避寇，是驱逐蛮夷还是内徙夷狄，每一个被记录下来的决策都只是“冰山一角”，影响这“一角”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的因素，都潜藏在海平面之下。分析一个政权的边疆经略方针，需要从周边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两个方面考察。理论上而言，一个成熟的统治阶层所做出的决策，必定会仔细权衡内外各种因素及其利弊，然后做出最优的选择。但实际上做出正确决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情势可能复杂到当局者理不清头绪的地步；利更大些或弊更大些的界限，也可能模糊到即使最老练的政治家也难以做出准确的

判断；更重要的影响决策的因素需要从国家政权内部去寻找，比如综合国力的限制、皇权的禁忌，以及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掣肘等。虽然皇帝在理论上是乾纲独断、权力无限，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环境中也必须面对各种在他控制之外和意料之外因素的制约，雄才大略如高祖却困顿于白登，强悍刚狠如高后亦忍冒顿之辱，汉初边疆战略的谨慎和保守，非常明显地受制于汉匈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东汉在处理西北“羌乱”问题上的失败，一方面固然由于东汉国势衰落，但朝廷对西北豪族的顾忌和防范，朝廷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和掣肘，也是“羌患”长期无法解决的重要原因。某种边疆政策制定后，能否得到有力的执行，更是受制于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主持与执行边政者的素质，军队的征集、装备和训练，要塞、交通线和边防城市的修建，后勤物资的征调和运输，方方面面都考验着帝国的综合实力。边疆虽然只是一个边缘，却关乎整个帝国的安全，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得之未必有利，但弃之必定有害。

最初的“西州”只是中央政策执行的客体，无论是修筑长城、要塞、边城，还是屯田、设郡县、移民实边，抑或派军征伐，“西州”都是一个人力和物力的输入地。逐渐地，在这个输入的过程中，“西州”地方力量得到成长，待这种本土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被输入的客体，渐渐地亦获得一定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最终，在外部情势变化的契机下，“西州”力量会以某种形式反馈中心，这种反馈力量可以是良性的，亦可以具有非常强烈的破坏性。两汉之际“西州”的地方势力得到迅速的发展，河西窦融集团以边地骑士及羌胡劲兵佐助光武帝完成统一，可以视为一种有益的反馈力量；而此时割据陇右的隗嚣和占据朔方与匈奴连兵的卢芳却成为光武统一的障碍；后来因为帝国“西州”战略的接连失误，羌患愈烈，“西州”摇动，帝国东方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关系失去平衡，在平定羌乱过程中形成的“西州”军事集团在董卓的带领下进入洛阳，废立皇帝，残破两京，则是极具破坏性的反馈。我们看到，从西汉之初的“西州”开拓，到东汉末的“西州”边兵入京，一个中央与边疆互动的轮回完成了。“西州”，从一个遥远陌生的异族活动的异域，嬗变成一个能够积聚足够的力量反噬中央，强烈影响东汉帝国国势走向的地域，我们不禁要问，“西州”在这四百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们是如何发生的？

本书通过对两汉西州经略的研究，透过中央政府之西州战略的制定、执行和最终效果，力图从中窥视整个帝国政治、社会、经济、军事

的具体状况和特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西州”亦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两大文明体冲突与战争、和平与贸易的舞台，是双方历史演进的共同推进器。两大文明在这一地带持续的互动促使各自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与进程。我们通过“西州”这个视窗，庶几可以稍稍进入汉代历史之内部，同时也可以跳出中原中心论，以更宽广的视野考察农牧互动关系以及边缘与中心的关系。

二 多个角度看“西州”：民族史、地方史抑或边疆史地？

对汉代的“西州”这一地域观念，目前所见只有王海注意到了，“史籍中多次出现的‘西州’一词值得关注。十三刺史部设立后，‘西州’、西部便与‘凉州’有了密切关系。……‘西州’、西部乃是包括‘凉州’在内的更广阔的地域范围”[4]。如果我们将“西州”与“西域”两个概念做一个比较，或许更能突出“西州”的含义。相较而言，中央政府对“州”的控制比对“域”更强，当汉廷在河南地、河西设置郡县后，在理论上就可以说这里是“西州”了。与“州”相对，“域”是“羁縻”意义上的统治地区，郡县统治体制所不能及，当地原有的政治组织和权力结构得到维持，各有当地领袖进行统治，汉廷只是享有宗主的权力和地位。汉朝郡县体制最西扩展到敦煌，西出玉门后就进入“西域”，玉门关在区隔“西州”和“西域”时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所以从理论上而言，京畿以西、玉门关以内的地区，包括河南地、河西、陇右、河湟，是采用郡县体制统治的区域，被称为“西州”[5]。但实际上，“西州”要成为当时人习用的地域概念，尚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概念传播和共识形成，最后才能习用流行。巴蜀地区较早被纳入郡县体制统治的范围，《汉书》中出现的“西州”一词均指益州地区。到西汉后期，随着朝廷对河套、河西等地统治的巩固和经济的开发，特别是西域都护府设立后，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作为后方的河西成为经营西域的基地，人们对河西“国土”的感觉渐渐增强。两汉之际，绝大多数人普遍以“西州”指称西北，这一用法肯定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推测，这种用法出现在汉武帝拓土西北之后的某个时候，在西汉后期经过概念传播和共识形成，到西汉末期、两汉之际已经开始流行。

虽然秦汉史学界对“西州”地域观念留意不多，但“西州”所包括的河湟、陇右、河西、朔方等地区，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通过阅读和梳理，本书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分为三种范式。一是民族关系史研究范式。西州是汉族与西北少数族群交汇共处之地，汉、乌孙、月氏、匈奴、氐、羌、小月氏及各种杂胡在西州交汇、斗争、融合。西州还是西域与中原交通的孔道，是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走廊，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和民族史的研究得到国家的重视，西北少数民族史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众多的民族史专家对秦汉时期的西北民族问题予以了关注，名家辈出。翁独健[6]、黄烈[7]、杨建新[8]、王宗维[9]著有影响广泛的古代民族史，木芹[10]、田继周[11]则专论了秦汉时期的民族史，顾颉刚[12]、马长寿[13]、王明哲和王炳华

[14]、林幹[15]、冉光荣等[16]，对羌、匈奴、乌孙等做了专题研究。二是地方史研究范式，以地区为单位，或为“河西”、“河陇”，或为“陕西”、“甘肃”、“宁夏”，或为“西北”，在设定的地区单位之下，有的专门研究某一王朝，有的研究某一时段，亦有通贯古今的研究。刘光华[17]、谷苞[18]、田澍和何玉红[19]、王宗维[20]、李清凌和钱国权[21]、高荣[22]、张灿辉[23]等学者，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三是边疆史地的研究范式，着眼于王朝的边疆政策、边疆开发，以及与边疆事务有关的制度、机构与人事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涉及整个中国的四面边疆，并不是局限在西北地区。马大正[24]、李大龙[25]、赵云田[26]、厉声等[27]、于逢春[28]等学者，在这一领域长期耕耘，成绩斐然。总的来说，前辈学人对许多复杂的史实进行了梳理，对很多重要的问题也做了深入分析，是所有后学必须认真学习的，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由于视角、体例、研究套路的限制，难免对一些关键问题深入不够，对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背景和原因往往点到即止，缺乏精细的深度挖掘。当然，在以上著作各自设定的研究目标之下，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本书将更加注重两点：一是深入草原去理解游牧，二是深入汉朝政治内部去理解边疆与中心的互动。所以，本书尝试着在“西州”这个古已有之的地域概念下，对草原部族与农耕国家的互动，对帝国边疆与中心的互动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多层次研究。汉朝与西州，在四百年的历史中，恰恰完成了一个开拓与反馈的互动过程，西州是游牧与农耕文明战争与冲突、交流和融合的典型区域，是影响汉代国势脉动的重要区域，是进行两个互动观察的典范对象。

欧文·拉铁摩尔[29]、巴菲尔德[30]、狄宇宙[31]、杉山正明[32]、江上波夫[33]、丹尼斯·塞诺[34]等学者的内亚史研究，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深入草原去理解游牧，非常注重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关系，在理论、思路和观点上给予本书深刻的启发。拉铁摩尔超越了特定的立场，不是站在胡人的立场或汉人的立场去排斥另一边，而是对亚洲大陆的历史做整体宏观的俯视，在他的模式中，亚洲大陆的中心就在长城地带，长城两侧并立着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体，两大实体在长城沿线持久性地接触和互动，影响并反馈到各自社会的深层。用唐晓峰的话说，拉铁摩尔“将长城地带看做核心，思考它的双向影响，特别是到草原社会去‘发现历史’，其学术意义不容低估”。[35]巴菲尔德在论著中将历史的主体性还给游牧民，在深刻理解游牧的经济方式、组织形式的基础上，考察游牧民族与农耕国家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游牧民族参与了中原王朝的循环，在不同阶段采取外部边界战略或内部边界战略；另一方面中原王朝

的军事压力促使游牧民族自身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都注重深入草原去理解游牧，注重游牧与农耕的双向互动，对于纠正以往研究模式的细碎化和片面化，有重要的意义。[36]狄宇宙以世界史的眼光分析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互动，指出华夏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压力，刺激了游牧力量的整合，导致匈奴帝国的建立。狄氏具体考察了汉初“和亲”下的两极政治格局具有内在的不稳定因素，汉朝和匈奴都有突破和平局面的内在动因。杉山正明剖析和批判了认为游牧者落后、野蛮的一般观念，对游牧经济、政治和文化做了极具同情的研究。江上波夫提出“骑马民族国家”的概念，探究了欧亚草原上的原始牧民为何在公元前一千纪的时候突然变成好战的骑马民族，并为了进行掠夺战争而走向集团化和组织化的过程。“骑马民族国家”与农业地区的民族国家不同，后者是在土地和农业生产这一永久的基础上自然发生建立的，而前者则是由怀着夺取军事利益的共同目的而且不断流动的族群因应内外挑战而人为地构成的，免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但是骑兵军团在冷兵器时代拥有所向无敌的优势，有能力对农耕国家产生深刻的冲击和影响。内亚学专家丹尼斯·塞诺对北方草原游牧人及其政治组织、军事组织的特征，及其与草原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极具启发性的观点。

王明珂的研究，对本书的写作具有极大的影响和启发。其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37]出版以来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在批评了客观特征论的族群理论之后，强调了主观认同、历史记忆对于族群研究的重要性，并利用这一理论对华夏边缘的形成、延续、变迁等问题做了新的诠释，对北方及西北地区专化游牧经济的形成及特点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38]一书中，王明珂对自然环境、经济生态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分别对生活在蒙古大草原上建立游牧“帝国”的匈奴、在河湟高原河谷游牧的保持松散部落形态的西羌、在东北森林草原游牧的建立部落联盟政治形态的乌桓和鲜卑三大北方游牧部族及其与汉帝国互动的历史做了梳理，剖析了自然环境对其游牧经济形态及相应的政治组织形成的深层影响，最终决定了他们具有突破汉帝国资源封锁线的能力。在《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中，王明珂“把他的族群边缘理论藉（借）羌族的‘历史’演变铺陈得淋漓尽致”，“很巧妙而动人地把‘羌族’人漂移、模糊而至于‘定型’的故事刻画得丝丝入扣”[39]，书中提到的“毒药猫理论”，“一截骂一截”现象，“弟兄故事”与“英雄祖先”传说等，可以让我们深入羌人思维内部去更感性地理解他们的历史和思想。

欲对北方游牧民族与汉帝国的互动关系有深入的考察，那么在理解了草原和游牧之后，必须对汉帝国的政治权力、社会结构及军事体制有全面深入的理解，这已是得到精耕细作的领域，经典论著灿若星辰。杜正胜从征兵的扩大化、地方行政系统的建立、成文法典的颁布等角度讨论了秦汉帝国的政治和社会性质。[40]西嶋定生分析了国家如何自上而下用“爵”的秩序规训和改造乡里自古以来形成的“齿”的秩序，揭示了二十等爵制在秦汉地方秩序的重构和帝国建构中的作用。[41]刘泽华、雷戈讨论了王权主义、皇权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古代政治、社会、思想的全面深层影响。[42]阎步克对古代官僚的典型——士大夫阶级的特征及其在秦汉时期的衍生过程做了精彩考察。[43]何兹全对东汉政治与社会的变化做了考察，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论的观点。[44]陈启云对东汉相较于西汉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做了极具宏观性和启发性的论断。[45]

豪族是影响汉代政治、社会和经济的重要力量，杨联陞[46]、余英时[47]、邢义田[48]、王彦辉[49]、刘敏[50]、陈苏镇[51]、马彪[52]、崔向东[53]等学者对秦汉的豪族或宗族做了各有侧重的研究。汪受宽[54]、冯培红[55]、尤成民[56]等学者对于汉晋时期河西世家大族的发展演变做了出色的研究。川胜义雄对世家大族具有的两面性做了很有见地的研究，指出豪族自身的领主化倾向与其作为儒家理念的传承者所秉有的共同体秩序的维系者身份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有的张力，当汉末腐败的宦官势力与地方浊流势力结合，肆意进行领主化扩张的时候，清流势力与小农结合进行了抵抗，使得魏晋未发展成为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是成为一种以士人阶层为基础的贵族社会。[57]甘怀真从人际关系的形态与性质、礼仪与经典诠释的角度对东汉之后君臣关系的私人化、恩义感的强化做了研究。[58]

关于汉代国家拓边西北的运动，田余庆[59]、张春树[60]、管东贵[61]、尾形勇[62]等学者做了典范性的研究，对汉朝向西开拓的阶段、步骤、目的、意义，都做了全面深刻的研究。田余庆指出亭障在汉朝西进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轮台诏在汉武帝后期国策转向中具有重要意义。张春树对河西郡县的设置、地区开发和政治意义有深刻的论断，特别是张先生指出在汉武帝大肆征伐大宛时，“对河西来说，可能这是第一次汉人对它有了‘国土’的感觉。军队的调动频繁和补给线的联络便贯通了内地与河西的交通”，“真如司马迁所描绘是天下骚动了，而忽然之间河西竟成了汉家历史的中心，为举天下所注目之地”[63]。尾行勇提出屯

田与移民实边的密切关系，屯田是在徙民实边之前，先派屯田卒准备好安置移民的地方，开通沟渠，试行耕种为移民积储粮食，而提供军粮、供给使者只是派生的功能。总结开拓边疆的步骤，首先是通过军事活动打击异族势力，然后建立要塞和交通线，接着屯田筑城、移民实边、设置郡县，如果经营得当，“异域”也会慢慢变成“旧疆”。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为研究汉代边塞军事组织的制度和运作、边疆地区日常的军事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罗振玉和王国维[64]、劳榦[65]、陈梦家[66]、陈直[67]、永田英正[68]、迈克尔·鲁惟一[69]、王子今[70]、李振宏[71]、赵宠亮[72]等学者做了细致的研究，相关综述非常多，在此不赘述。

钱穆很早就指出了东汉迁都造成了帝国东西方之间的失衡与矛盾问题[73]，王勖进一步从羌患的原因和影响方面，讨论了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74]雷海宗[75]、陈连庆[76]、洪廷彦[77]、黄今言[78]、邢义田[79]、王子今[80]对东汉的兵制和军事思想有精当的研究，指出夷兵、募兵和刑徒兵越来越重要，对东汉政局造成深远的影响。陈勇[81]、杨永俊[82]、朱子彦和吕磊[83]、王北固[84]、方诗铭[85]、森本淳[86]等对东汉时期西州的军事势力和重要人物，做了精彩的分析和研究，西州力量的强大得益于羌胡劲兵，但是亦受累于羌胡兵的短视、劫掠和破坏性，二者的关系错综复杂。

三 重新审视两汉史：断裂的，还是连续的？

西汉时期，西州作为帝国一个开拓和经营的客体，接受中央对它的建设、改造，以及人力和物力的输入；随着西州地方力量的逐渐成长，当条件和时机成熟时，边缘地区也将对中央及整个帝国施以反作用力，特别是当这种反作用力以军事暴力的形式出现时，影响就更加剧烈和深远。所以，本书一方面试图对西州问题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力图展现两汉时期西州在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嬗变过程；另一方面将西州问题纳入两汉整体的历史变迁中进行考察。两汉国势兴衰的脉动决定了朝廷对西州经略的力度、效果和成败，西州自身的某些发展变化也不是中央能够预料和控制的，当西州地方势力形成、发展后，也将以某种形式产生反作用，影响汉朝的国势走向。本书的写作遵循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边疆的事”，较多地借鉴和学习三种传统研究范式，对西州地区的族群及族群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王朝的边疆战略等问题进行考察和梳理，所不同的是，本书更加关注“历史表相”背后的“历史本相”[87]，深入草原内部，更多地理解和同情游牧者，探讨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各自的特质，它们之间的和平、冲突与贸易，双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第二条线索是“从边缘看中心：西州边区与腹地中心的相互作用”，主要探讨的是两汉西州经略政策的调整与变化，造成这种调整与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调整与变化对汉朝国势造成的影响。

学界对西汉与东汉两个政权的结构与性质的差异渐渐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但重视程度还是稍嫌不够。两汉之际，汉代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能远超过我们以往的认识，秦及西汉以编户小民为帝国统治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有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长久地维持一种普遍的小农家庭形态的“商鞅式”设想低估了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结构的多重性及运转的复杂性。随着豪族世家的兴起及其在政治、经济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的“古代社会”也就渐趋终结。实际上，东汉与西汉之间的断裂似乎并不小于它们之间的连续。当然，两个时代之间是断裂性更明显还是连续性更强，是一个根据不同的论题或视角会有不同看法的问题，而且，在连续与断裂之间划出一条确定的界线是困难的，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很难取得共识。这里只是想强调，在使用同一个朝代名称的表象下，两汉之间某些很重要的区别极容易被人们忽视。豪族势力与汉代国家的关系是两汉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东汉时期，豪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分割了帝国的人力和物力，帝都东迁

之后东方势力的全面胜利使得关中及西北边疆得不到重视，一方面因为帝国在集权能力和动员能力上的衰退，另一方面因为东方势力对西部问题的漠视和缺乏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使得区区羌乱竟然成为拖垮东汉帝国的痼疾。本书力图将对西州的地方性研究，纳入整个两汉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发展之中，将整体与部分相互作用的过程展现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自然是运用“历史学家的技艺”，依靠对史料的掌握、考辨与理解和对历史脉搏、特质的整体性把握，来对所研究课题做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探索，这种“历史意识”正是史学论著与其他人文学科最根本的差别。约翰·托什指出，“历史意识”包含三个要素，即差别、背景和过程。所谓“差别”，是承认将我们的时代同所有以前的时代分隔开来的鸿沟的存在，历史学家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将时代错置；“背景”是指历史学家不仅要揭示过去的奇特之处，还要解释它，将它置于它的历史背景中，使得那些令我们感到奇异的或不可思议的东西变得能够被解释，即将它们解释为一个特定社会的表象；“过程”是指历史学家要重视随时间变化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比孤立存在的事件本身会赋予它们更多的意义。[88]笔者希望能在研究中贯彻这种“历史意识”。近年来史学研究因“理论饥渴”而被诟病，认为历史研究方法在多学科交叉结合的名义下渐失史学研究的主体性。但这种现象其实有可以理解之处，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人及人类社会”，一切当代的事情都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所以，但凡一切研究当代人及人类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为历史学者用以研究过去。历史学者吸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成熟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历史问题，毫无疑问可以丰富看待问题的维度，并使研究得以深入，唯因具体运用者天赋和能力的差异而有水平高下之别、圆融与否之分。

两汉时期的西州自始至终都是用兵之地、多战之方，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色彩，军事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深化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无疑极具参考价值。曾瑞龙充分吸收军事学中的战略思想，利用大战略理论架构，对宋辽、宋夏战争做了一个从具体军事技术到整个大战略及战略文化的全景式研究。[89]虽然曾先生研究的是北宋时期的战争，但对其他断代史学研究无疑具有示范和典范作用。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希望能把曾瑞龙的“大战略”和“战略文化”的研究方法学习到一二。曾瑞龙批判有些军事史的研究“偏重研究短线的现象，如某些决定性战役，对长期积累而成的军事信念及战略取向认识不深；及往往将批评

指向个人，而欠缺系统分析，是以往研究主要的不足之处”。提出要重视“大战略”，这一概念已经从涵盖军事业务扩展到整体国力。约翰·柯林斯认为“大战略所涵盖的范畴更超越了战时、平时的樊篱，而涵盖了一应有关国家安全的武力和非武力手段”[90]。战争所包含的层次，从低到高，分别为最基层的武器技术装备，打赢一场具体战争的战术，统筹一次战役的战役法，最高层次的是整个的大战略，大战略协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规定了国家基本和整体的努力方向。除大战略外，曾瑞龙还谈到了一个正在成形的战略文化层次，“战略文化”研究成系统的战略思想，也研究行为规范、身份认同、习俗和军事信念。研究者之所以逐渐注重战略文化的研究，是因为他们察觉到战略除了受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外，也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要素如价值观、行为规范和身份认同如何介入战略目标和手段的界定、如何介入政策的制定，及政策形成后如何反过来被升华为一种文化或传统，即所谓的军事信念或教条，对未来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应用大战略和战略文化的概念来研究两汉的西州经略问题，有助于对西州问题做出整体性的把握和认识。在武器装备的技术层面上，影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战争胜败的关键是骑兵，两汉能够发动对匈奴的反击或进攻的关键，是牧养了大量马匹，训练了众多骑士，当然汉民族本身的车兵、步兵在多兵种协同作战中亦发挥重要作用；战术层面，虞诩教任尚组织骑兵应对羌人的战术是很好的分析样本；秦汉的西北战事有较多可供从战役层面分析的例子，如卫青、霍去病的征伐，李广利的两次伐大宛，赵充国平羌的战役，凉州三明主持的平羌战争等；两汉的整个西州经略，就属于“大战略”层面的问题了；“夷夏观”、“天下观”、“隔绝羌胡”、“以夷制夷”等思想观念和战略思维就属于战略文化层面。总而言之，采用大战略的分析架构及战略文化的考察视角，对于多角度地把握西州的历史及其与中央的互动过程，一定会有所帮助。

本书也有几方面的研究难点。第一，是对两个主要概念“西州”和“国势”的理解和界定问题。本书提出的“西州”概念，是研究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但是这一地域概念还需要不断修正和完善。笔者将对两汉时期“西州”地理观念的思考，撰成《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作为本书的附录。“国势”的概念也不容易把握。国家经略西州的方式受制于国势，西州地方力量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国势，对于怎样避免把本书写成“两汉国势研究”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笔者心有疑虑，只能尽力而为。第二，对于羌的认识问题。羌与西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关于羌问题的研究

大多还是模棱两可的，有些问题人云亦云，有些则众说纷纭，有些问题却又无人论究。加之后现代史学观念对“民族”、“族群”等概念的讨论，使得汉代羌人问题更不易把握，因为羌人不仅分布在凉州，在西域、西南和青藏高原内部都有分布，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群体？相互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如何？如何总体性地认识这个“族群”？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民族”、“族群”、“部族”等概念，由于引用文献的差异、叙述语境的不同，在行文表达中随具体情况而异，但所指实体大致相同。第三，对豪族问题的把握。如果说东汉时期豪族控制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于是就采取了保守的边疆经略政策，这样的一个预设是否合理？豪族掌握了政权，在边疆政策上难道就一定是退让保守的？历史也可能由一些偶然因素改变，往往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背后并没有结构性的变化可寻，而只是一系列零散和偶然因素共同推动的。第四，东汉对于西州事务似乎根本没有一个大的战略规划，而只是随事而起、一切凑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东汉国力不如西汉，但是耗费巨额军费、不断命将派兵，为什么难以平息羌乱？以往的解释总觉得不够深入。这些难点有些或许根本不构成问题，只是笔者自寻烦恼，有些可能很重要，但是本书亦不能做出很好的回答。历史是一门古老而艰难的学科，需要研究者多年的积累沉淀才能在某个时刻洞悉幽微、融会贯通，但笔者功力尚浅，积累不厚，只希望通过本书的尝试，能有所发现，有所进步。

[1] 《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中华书局，1962，第3393页。

[2] “西州”一词在《史记》中尚未出现，可能在司马迁的时代这一地域概念尚未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但并未流行。在《汉书》中出现四次，均指称西南益州地区；在《后汉书》中出现三十六次，仅三次指称西南地区，其他均指称西北凉州及其邻近地区；在《三国志》中出现六次，有两次是指称西南地区。用“西州”指称西南地区的次数不断较少，指称西北地区的用法占据绝大多数，这一趋势是明显的。需要说明的是，在《三国志·吴书》注引的《吴录》、《吴书》、《江表传》中，出现的“西州”都是指西南，考虑到当时曹魏占据中原，吴国的主要盟友是占据西南的蜀汉，则吴国史乘中的“西州”沿袭旧说，就可以理解了。虽然《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不是当时人修纂的，但无疑使用了大量所写时代的一手资料，在具体行文中“西州”一词多次出现于当时之文件信札和人物对话中，所以仍可视为当时之重要观念。

[3]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中华书局，1965，第585页。

[4] 王海：《秦汉时期“北边”略说》，《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

[5] 笔者原本将西州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之“西州”指包括西南益州和西北凉州、朔方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狭义指凉州、朔方地区。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是鲁莽

和轻率的。我们只能说，“西州”所指的地域范围在西汉后期有了扩张，延及了凉州、朔方地区；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说，西汉之后，相比较而言，时人关注之焦点集中在西北凉州、朔方地区，史籍中出现“西州”时，更多的时候指西北凉州、朔方，隐隐感觉这个地域概念之重心有了转移。本书研究的“西州”，由于着眼于中原农耕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互动关系的考虑，故而限定于“西州”的西北部分，暂不及益州，仅此而已。

[6]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

[8]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9。

[9] 王宗维：《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论集》，三秦出版社，2009。

[10] 木芹：《两汉民族关系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88。

[11] 田继周：《秦汉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12]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13]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4] 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15] 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16] 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17] 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18] 谷苞主编《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19] 田澍、何玉红主编《西北边疆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0] 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昆仑出版社，2001。

[21] 李清凌、钱国权：《中国西北政治史》，人民出版社，2009。

[22] 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23] 张灿辉：《两汉魏晋凉州政治史研究》，岳麓书社，2008。

[24]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25] 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6] 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27] 厉声等：《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

[28] 于逢春：《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29]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0]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31]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2] 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

[33] 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承志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34] 丹尼斯·塞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中华书局，2006。

[35] 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

[36] 朱金春：《游牧帝国的历史循环——兼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5期。

[37]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8]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9]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李亦园序。

[40]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41]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武尚清译，中华书局，2004。

[42]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3]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4] 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三卷《中国古代社会》，中华书局，2006。

[45] 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陈启云文集》（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6]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大学学报》1936年第4期。

[47]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8] 邢义田：《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

[49] 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0] 刘敏：《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51] 陈苏镇：《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哲》2010年第6期。

[52] 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中国书店，2002。

[53] 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崇文书局，2003。

[54] 汪受宽：《两汉凉州士人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55] 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56] 尤成民：《汉晋时期河西大姓的特点和历史作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尤成民：《汉代河西的豪强大姓》，《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

[57]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8]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

[59]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

[60]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7。

[61] 管东贵：《汉代的屯田与开边》，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一分，1974；《汉代屯田的组织与功能》，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四分，1977。

[62] 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吕宗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63]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63～64页。

[64] 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

[65] 劳榦：《从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1939；劳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

[66]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

[67]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中华书局，2009。

[68] 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张学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9] 迈克尔·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于振波、车今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0] 王子今：《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71] 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

[72] 赵宠亮：《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屯戍生活》，科学出版社，2012。

[73]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

[74] 王勖：《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75]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

[76] 陈连庆编著《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77] 洪廷彦：《两汉三国的“夷兵”》，《文史哲》1958年第3期。

[78] 黄今言：《东汉军事史的若干特点和研究方法问题》，《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说东汉在军制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南都学坛》1996年第2期。

[79] 邢义田：《汉代的以夷制夷论》，台北：《史原》第5期，1974年；邢义田：《东汉的胡兵》，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28期，1973年。

[80] 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1] 陈勇：《凉州诸将与汉魏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91。

[82] 杨永俊：《略论汉代陇右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羌胡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

[83] 朱子彦、吕磊：《论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军事历史研究》

2007年第3期。

[84] 王北固：《凉州兵团在三国史上的特殊地位——从马超助刘备取蜀说起》，《开封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85] 方诗铭：《董卓对东汉政权的控制及其失败》，《史林》1992年第2期。

[86] 森本淳：《东汉末年的羌族与汉族》，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

[87]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88] 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9] 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0] 转引自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绪论。

第一章 农牧交错：西州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

一 西州的生态环境与人地关系

首先深入分析西州地区地理的和历史的相关背景，或许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不了解该地区地理、生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对整个北方长城地带游牧兴起之历程及汉初汉匈双方的关系、西州的民族及政治局势等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我们将很难对汉朝经略西州的方式、过程和意义有深入的理解，也将很难理解东汉之后这一地区的羌胡化倾向及其种种后果是如何影响历史走向的。

汉代之“西州”是京畿和西域之间实行郡县体制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但正如绪论中所说明的，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西州的西北部分，对应的是汉代的凉州和朔方，相当于今天的甘肃、宁夏、青海东北部、陕西北部及内蒙古西南部地区。这是两汉王朝的西北边疆地区，刘光华将汉代西北的地理范围定义为“大致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由秦、西汉王朝北地郡向北延伸，由陇西郡向西延伸，其西、其北则限以秦、西汉王朝管辖之西界、北界，其间的夹角就是西北的地理范围”[1]。刘先生的这个定义十分精妙，但需做两点说明。（1）刘先生定义的“西北”包括了西域，但本书研究的“西州”是指中央王朝设置郡县并实施直接统治的区域，所以不包括西域。两汉王朝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介入西域，但实施的是羁縻统治而不是郡县制，控制力有限。（2）刘先生探讨的屯田区域包括朔方、凉州和西域，其著作论及了朔方最东边之西河郡的屯田情况，这样的话就不应该说是从北地郡向北延伸，而应该是从西河、上郡向北延伸。[2]模仿刘先生的定义方式，我们可以说“西州”的范围是：以关中为参照，从西河、上郡向北延伸，从陇西郡向西延伸，两线所夹的以郡县制方式统治的地区。

西州属于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地带，是华夏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的前

沿和极限，自然生态差异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在这一地带骤然加剧。我们可以设想，在新石器时期的某个时候，当农耕文明在黄土高原西部某地取得第一个重大进展之后[3]，就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下游大平原和长江流域扩张，这些地方的水土、温度和光热对于发展精耕农业非常有利，扩张所做的只是一种“同化”工作。“可是，当他们走近草原时，环境却逐渐不利于中国人。它使少数民族——不论他是谁——能够更为有效地抵抗他们。因此，这里少数民族的落后制度，不但不能被克服，而且更形强化。先进的文化与落后的野蛮制度要在每一寸土地上争高下。”[4]地理环境对西州历史的进程及特点具有深度的影响，自然生态逐渐变得不再适合农业发展，直至最后不再能够支撑农业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高密度人口和高度阶层化的政治组织。历史在此走向另一条轨道，在这里逐渐发展起一种不再依赖农业而是依赖草原及食草动物的畜牧或游牧的经济类型及相应的政治组织。林沄提出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概念，“所谓‘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部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5]长城地带对于华夏来说是边疆，对于整个亚洲大陆而言却是一个中心。[6]西州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西段部分大致吻合。

西州的土壤、水热、地形等条件限制了精耕农业的发展，除了绿洲有发展灌溉农业的条件之外，其他地区则荒漠、戈壁、草原、高山草甸广布，只能发展畜牧经济和粗耕农业，形成了西州地区半农半牧、农牧交错的经济生业和人文生态。包括西州在内的北方长城地带是生态过渡带、交错带，形成的人地关系类型既不同于南方的湿润农耕地区，也不同于北方的干旱草原地区，地理环境对此区域内族群的生产、生活及交往的影响和形塑作用十分显著，所以欲理解西州，首先需理解西州的“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三大主题之一，其中的“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指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集团或集体；“地”指地理环境，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也是在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不断影响下形成的环境。[7]研究人地关系就是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在生产活动与生活活动两大领域中相互的与持续的关系。生产活动中的人地关系体现为：（1）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资

料，并决定着各种生产活动的内容；（2）自然环境以其提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程度；（3）自然环境以其资源的空间组合特点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地域分工；（4）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多方面的反作用，而且以负影响为主。生活中的人地关系体现为：（1）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们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2）不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理特征具有重大影响；（3）不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心理和精神也有一定的影响。[8]

环境史家J.唐纳德·休斯对“环境史”做了一个定义：“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对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使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9]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自然环境因素对人类思维、行动及其结果的影响，不同的自然条件给予人类的选择空间并不相同；第二大类是人类行为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反过来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引起的回响并对之产生影响的多种方式；第三大类是人类的环境思想史，以及人类的各种态度借以激起影响环境之行为的方式。[10]当前国际环境史学界倾向于一种“人”与“地”综合的、互动的多层次研究，但是国内以往的研究则较偏向于对某个单一地理要素的复原和分析，缺乏对某一地理空间内各自然、人文要素间相互作用及变化过程的总体认识，统一的地理对象往往被强行分割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块[11]，造成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和说服力的降低。

研究西州地区的地理环境，需要力图避免和克服“人”与“地”的分离，地理环境的研究不能只列述地形、山川、土壤、植被、水文诸因素，还应该在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互动中，在“人地关系”的框架下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王明珂对这种综合性的人地关系，特别是地理环境对人类政治组织形式的影响做出了卓越的示范研究。在回答为何匈奴能够形成“国家”组织，而西羌却“不立君臣，无相长一”的问题时，王先生强调了自然环境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环境资源上，匈奴各部落的领域（分地）资源不足以维生，而且这些资源难以预期。因此他们发展出超部落的‘国家’，将其经济生业领域扩张至与汉帝国、西域、乌桓、丁令等地人群相接的地区，因此得以由掠夺、贸易、贡税等‘对外’的辅助性经济活动中扩张其生存资源”。羌人生活在河湟地区，“由于河湟地区的地理封闭性以及高山河谷地形，使他们难以发展对外关系以取得远方的辅助性生活资源。更重要的是，一部落如能控制如大小榆谷那样的美好河谷，在谷地种麦，在附近的山地游牧、狩猎，生存所需大致无缺。

因此其游牧之外的主要辅助性生业，农业、狩猎，使得肥美的河谷、山谷成为资源可预期而值得倾力保护与争夺的对象。如此，羌人的资源竞争对手，或向外获取辅助性资源的对象，都是其他羌部落。如此'部落'成为保护本身利益及向外取得辅助性资源最重要的群体"[12]。通过匈奴和羌人的例子，可知自然环境对特定族群集团化和组织化的程度和强度有多么深刻的影响。

相对封闭的河谷、山谷地形和较为丰富的资源组合，使得以河谷或山谷为单位的部落成了羌人的基本政治组织形式，一旦出现匮乏，则以相邻的同类组织为掠夺对象，各部落间互有积怨，很难团结。但是，当汉帝国的扩张危及他们的生存空间时，他们往往解怨盟诅，组成部落联盟共同抵抗。然而，一旦危机稍微缓解，或在汉人刻意的分化政策下，联盟很容易崩解。匈奴能够形成"国家"，除了交通便利的大草原利于各部落交流往来、匮乏的游牧经济需要外来资源补充等因素外，还因为匈奴各部落较早地与农耕国家直接交往，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是匈奴"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匈奴与汉帝国的地缘政治形势也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匈奴活动的地区更靠近汉族的中心区域，相较于西部羌人的活动区更利于汉人开拓，所以较早地感受到了汉族的压力。战国中期匈奴的一些部落与秦、赵、燕等北方国家就发生直接冲突，蒙恬夺取河南地更是压缩了匈奴的生存空间，加剧了匈奴各部的危机感，促成了冒顿领导的匈奴帝国的形成，而西羌居于河湟，山水阻隔，晚至汉武帝的时候才感受到这种危机。

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中，二者究竟哪一个占支配性的地位，或者说，谁的作用更具有决定性？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人类有选择自由权的"文化决定论"之间，存在一系列各有侧重的意见。显然，僵化地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是互动的和持续的，事实上，环境决定论者也在研究中论证了人类的选择，而文化决定论者也开始重视自然的真实存在和力量。[13]深化研究的路径或许是，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自然区域中，是人类的发展更受限于环境因素，还是人类的选择更能改变历史。一般而言，在历史早期人类活动受环境因素影响的程度高，随着人类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其主动选择能力逐渐增高；在自然资源富裕的环境中，人类的选择性更多，而在资源匮乏的地区，并没有多少路可供人类选择。

西州处于生态交错区，也叫生态脆弱带，具有显著的"边缘效应"：

即一方面因为具有多样的生态条件，所以在温暖湿润时期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因为处于过渡和边缘地带，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过分敏感，界面抗干扰能力差且恢复周期长，所以当人类破坏作用增强或全球大气候环境恶化时，很容易引起灾变。[14]在这类地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及历史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研究西州的历史，特别是早期阶段的历史时，地理环境及生态变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西州处于三大地形区的边缘和交会处，包括黄土高原西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和内蒙古高原西南部，其地形为山地、高原、盆地相间，黄土、荒漠、绿洲错布，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1）西部河西区，包括祁连山脉、北山山地（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及其所夹的河西走廊，还包括流经阿拉善高原的弱水居延地区，这是连接匈奴与河西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内焉支山、黑山、宽台山将之分为三块盆地，即武威、永昌盆地，张掖、酒泉盆地和玉门、敦煌盆地，汉代在河西所设郡县主要位于这些盆地的绿洲地区。（2）从陇东地区斜向东北，北界到达阴山，东界至黄河南流段，是西州的东部地区，包括陇东黄土高原、陕北黄土高原、河套平原与贺兰山地、阴山山脉和鄂尔多斯高原，汉代有名的“河南地”就在这一区域内。（3）西州之中部位于祁连山东麓与六盘山之间，并延及青藏高原东南缘河湟谷地，主要地形区就是陇西黄土高原和河湟谷地。

在气候上西州处于东南季风湿润区、西北内陆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的交会地带，总体上以干旱、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为主。地理环境学者指出：“这一地区（指西北地区）接近欧亚大陆的中心，除了具有‘湿岛’效应的某些高中山地地区以外，广大的内陆盆地和高平地地区目前显示为干旱环境。干旱环境的形成时间人们普遍认为是从第三纪末或上新世开始的，还有人认为形成时间较晚，是第四纪期间内的环境事件。”[15]西州深处亚洲内陆，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要么在经过长途跋涉后势力减弱，要么被高大山脉阻挡无法到达，降雨从东到西逐渐减少。西州东部受到来自太平洋的季风尾闾的影响，年均降水量在400～600毫米，达到发展农业的要求，特别是河套平原有良好的引黄灌溉条件，是汉代主要的屯田区域，“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六盘山阻挡了湿润气流的西进，陇西地区降水量较少，属半干旱地区，且降水多以暴雨形式集中在夏季，不利于有效地利用；绕拉脊山脉分布的河湟谷地降水较丰富，两汉时期这里的黄河、湟水水量较大且水流比较平稳，沿河川的黄

土台地适宜发展农业，山地是优质牧场；河西地区的祁连山区降水较多，而走廊诸盆地和北山山地降水很少，且从东向西递减，但河西的山地冰川融水和地下水资源较丰富，发源于祁连山的三大内陆河系分别流经走廊中部的三块盆地，在山前冲积区和河流沿岸形成片片绿洲分布于荒漠戈壁中，具备发展灌溉农业的有利条件。[16]水资源在西州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镇番县志》写道："地介沙漠，全资水利，播种之多寡恒视灌溉之广狭以为衡，……此本邑所以论水不论地也。"[17]

气候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较复杂的变迁，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环境的面貌，对于处在生态脆弱地带的西州更是如此，这里的生态环境对于气候变迁的反应更加敏感。竺可桢指出，在最后一个冰川期结束后，气温虽然寒冷但在慢慢回升，到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暖期，西安和安阳生长有亚热带的动植物；周朝的气候，最初虽然温暖，但不久后就开始恶化，汉江有多次结冰的记录，气候变得寒冷干旱；从春秋开始直至西汉，气温又变得暖和了；东汉至南北朝气候转向寒冷，淮河竟然结冰，迫使曹丕取消了一次练兵行动；隋唐进入温暖期，但是宋朝之后直至19世纪，气温总的趋势是下降的，12世纪最为寒冷，之后有一个回暖期但十分短暂，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了厚达数尺的冰，而且此期最温暖的时期也没有达到汉唐的水平；20世纪以来气温开始上升，比较温暖。[18]气候的温湿和寒旱的交替变化，影响了农牧分界线的南北移动，对于游牧民族和中原国家势力的消长也有一定的影响。[19]

西州地区气候的变迁与中国总体气候的变迁趋势大体一致，但因为处在生态脆弱带，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强烈一些。从春秋开始的温暖期持续到西汉，当时西州地区的生态环境比现在好得多，气候更加温暖，降水也更多，生长有大片的森林和茂盛的草地，鄂尔多斯高原分布着大片的森林，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在汉代都是设县的屯垦区，当时自然环境一定较佳，而毛乌素沙漠地区在赫连勃勃建统万城时还是一片青山绿水。[20]两汉时期的河湟谷地是非常优美的暖温带草原，牧草茂盛，山地森林覆盖，水文条件优越，黄河、湟水水量大且平稳，可以行船漕谷和放运木排，"四月草生"，草场返青比现在要早一个月。[21]汉代河西地区的绿洲与现代相比，数量更多，面积更大，疏勒河、黑河、石羊河之径流量较大，哺育了流域内众多的绿洲。这些自然条件是汉朝拓土西州的前提，若是西州地理环境、资源组合状况恶劣，则根本无法容纳上百万人的移民队伍对之进行开发。东汉之后气候

转向干冷化，这种变化对于处在生态脆弱带的西州产生巨大影响，西汉时期大规模移民屯垦的破坏性作用在此时愈加凸显，“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波动性易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耦合，引发共振现象，使系统承载力超越临界阈值而严重失衡”[22]。从西汉后期开始，西州的自然条件开始恶化，人地关系出现恶性循环，“各大河中游的绿洲，在历史时期由于灌溉农田的不断扩大，用水量日渐增多，乃使各河下游由常流水变成季节河，终致成了干河道，原来的河道湖，变成终端湖，最后变成盐湖或盐碱滩”[23]。绿洲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戈壁荒漠增多，河南地的一些地方开始沙漠化，多个城邑淹没在沙漠中。东汉时西州羌患剧烈，与环境恶化导致的资源匮乏，进而引起汉羌间资源竞争加剧、矛盾冲突增多，是有一定联系的。

二 西州的社会历史与周边形势

（一）秦至汉初西州游牧族群的兴起

北方游牧民族是影响从秦到清2000年历史演进的重要力量。汉代的西州处于农耕国家与游牧民族接触互动的最前线，游牧族群的社会、经济、军事因素深刻地形塑了西州的地域社会特征。可以说，理解游牧，是理解汉代西州历史的一大关键。

殷周时期，在中国北方生活着众多被诸夏视为异类的族群，殷商时称其为鬼方、土方，周人名为猃狁、戎、狄，司马迁将这些族群视为匈奴的前身，这种认知方式影响深远，直至近现代王国维、白寿彝等学者仍作如是观[24]。但正如林沄、唐晓峰、王明珂、狄宇宙等学者指出的，这种认知模式忽视了半农半牧或农主牧副的经济社会形态与专化游牧经济社会形态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25]欧文·拉铁摩尔指出："草原游牧经济虽然也是这种高度专门化的结果，但不像是直接从原有的混合经济中产生出来的。它很可能是比农业更晚的专门化的形式。其晚出的原因大概是：人类先要学会驯化牲畜。在人类能够依赖放牧牲畜在广大草原上生活以前，必须先知道如何管理牲畜，而在知道这种管理牲畜的技术之前，又必须依赖其他方法生活。"[26]王明珂指出，游牧并不是介于从渔猎到农耕的中间进化阶段，它和农耕一样是从原始混合经济中进化而来的，需要很高的专门化技术，"事实上，正因为游牧所利用的是边缘、不稳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需要人们对自然（地理环境与生物）高度技术性的理解与掌握，并配合经济、社会各方面之种种精巧设计——此远非8000年前或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民所能企及。因此在人类历史上，世界几种主要类型的专化游牧都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400年之间，远较原始农业的出现为晚"[27]。

所谓"专业化游牧"并没有一个典型的面貌，游牧方式本身就是人类为了适应特殊的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即便是草原的生态环境，在不同的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很难确定以某一种游牧形态来作为标准或典范。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强调专业化游牧的两个根本性特征。第一是"移动"，游牧者依赖草食动物而生，所以必须追逐水草。根据地理地形和生态条件的不同，各种专业化游牧移动的方式和距离各有不同，但"移动"是必须的，这样就会造成游牧人的居无定所和部

落分散，考古上之所以少见游牧者的居址遗址而多见墓葬，随葬品多小型而少大型器具，正因为如此。第二是对“马”的使用，在专业化游牧业的兴起中，马的驯化与使用异常关键。马对游牧社会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马作为游牧人骑乘工具的使用，提高了游牧人对畜群的控制和保护能力，使他们可以放养更多牲畜，可以更有效地进行中长距离的游牧以追逐丰美水草和更有效地逃避自然或人为灾害，大大提高游牧经济的效率和规模。[28]（2）骑乘作战。游牧人都是优秀的骑射战士。在冷兵器时代，大规模骑兵军团在战争中所向无敌，骑射战术的使用使游牧人的军事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增强了抵抗农耕国家的扩张和从农耕文明获取资源的能力。游牧社会的兴起之所以晚至公元前1000年以后，一方面是因为利用草原地区不稳定资源的知识技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原因，是马的驯养和使用非常困难。马具有很强的野性，有些马种至今仍无法驯服。最初，驯养马作为肉乳的来源；然后，驯化马作为驮运或牵拽的畜力；接着，游牧人跨上马背进行骑乘；最后，将马驯化成骑射的战马。每向前跨越一个阶段，都需要极长时间的努力和积累。比如从驯化马骑乘到驯化马成为骑射的战马，林沄说：“掌握骑马术，用以发挥在放牧、狩猎和长途旅行上的优长，与在作战时使用骑兵队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在与马拉战车同时期的蒙古岩画中，只看到徒步搏斗的武士，而见不到骑马作战的武士。”[29]杜正胜引用敦斯（J.F.Downs）和格里尔（H.G.Creel）的研究指出：“马与其说是‘作战’（fight）的动物，不如说是‘逃跑’（flight）的动物，马的眼光敏锐，听觉清晰，嗅觉细腻，故反应特别灵敏，一有危险便逃逸，所以掌握骑术，驱使作战是高度的技术，战马的训练与一般马匹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同属战马，战车和骑射所具备的相关文化相也是截然不同的。”[30]

江上波夫提出“骑马民族国家”的概念，非常重视骑马对游牧者的意义。江上氏指出，北方草原从原始放牧的经济社会转变到游牧“国家”有两个契机，一是南方农耕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的繁荣，给予草原地区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影响；另一个契机就是骑马战术的运用，“骑马战术的出现，不仅是战争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人类史上，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不难想象，如果没有骑马战术的出现，人类的历史将变得非常不同。不能忽视，这种骑马战术在战斗中的优势地位，实际上持续了三千年左右，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和坦克出现以后，它才开始变得陈旧”。[31]当代阿尔泰学泰斗丹尼斯·塞诺也强调了马对于游牧人的重要意义，“有鞍的马的广泛使用，作为当时最快的运输方式，加强了

人们之间的联系，导致新的军事技术的发展”，这里指的新的军事技术就是骑兵军团的使用，“简单的说，通过聚合为大集团、有致力于征服的合格领袖、以及骑兵部队，骑马的游牧民就构成了一种军事力量，而这种军事力量——在火药兵器发明前——相对于定居人民同样规模的军队来说，具有相当大的优势”。[32]这种以骑乘马来放牧或战争的技术，是鬼方、戎狄等北方族群不具备的，他们的经济还处于混合经济阶段，对于牲畜的依赖性逐渐加大，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他们使用马拉战车或是步兵作战，马的使用还很不普遍。总之他们的社会缺乏游牧社会的根本特征，与游牧骑射的匈奴存在本质的区别。

战国时期的中国北方存在汉族农业经济地带、戎狄混合经济地带和匈奴草原游牧经济地带构成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33]战国时期随着秦、赵、燕等国的向北扩张和匈奴的南下发展，混合地带的戎狄无法再独立存在，面临两个选择，不是加入长城以北的游牧联盟中，就是融入农耕国家里。但是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长城地带依然保留着混合型的特征，汉帝国占据河南地、河湟和河西等地区后，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屯田农垦，也在适宜放牧的地方设苑养马，因此西州的居民崇尚气力、精于骑射、寡于学术，而且在东汉时出现羌胡化的倾向。西州无法发展出与内地同样规范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这里的百姓具有与内地农人不同的气质。长城注定不能成为一条“边界线”，而只能成为以之为标志的“长城地带”，来自纯农耕社会或者纯游牧社会的方法和规则，在这里多多少少都要妥协或变形。

北方游牧的兴起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究。首先，距今4200年以来气候的干冷化造成了原始农业的衰退和畜牧经济的兴起，形成了戎狄混合经济地带，这只是一个诱因，为以后的游牧化准备了条件；[34]其次，游牧技术的传播和北方游牧人群的南下带来的外来文化因素，给北方长城地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最后，农耕国家的扩张是最后的催化剂，迫使长城地带的人群必须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做出选择，一些族群融入南方农耕社会，另一些族群则向北迁徙，进入游牧社会。[35]相较于畜牧社会，游牧社会有更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来对抗农耕国家，在长城地带与之争夺并反复拉锯。

游牧兴起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杨建华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地带考古材料的细致排查、对比和分析，划分了“前双鸟回首剑时代”、“双鸟回首剑及其变体时代”、“立体和浮雕动物纹饰时代”三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是各地农牧混合经济类型向游牧经济过渡的完成，处于骑射的萌芽期，各地普遍出现带扣，但是以短剑为代表的武器和车马器都不发达，马和军事尚未成为这个阶段的主流；第二个阶段是游牧经济发达和相互间以战争形式为主的交往频繁的骑射时期，社会的阶序化得到发展，首领人物的墓葬形制大，随葬的殉牲、武器及其他随葬品数量多，说明当时游牧经济繁荣，而且战争成为各族群交往融合的主要方式，整个长城地带文化交流频繁，文化面貌趋于一致，动物纹饰的流行，说明他们接受了一种十分相似的意识形态；第三个阶段是匈奴联盟的初期，墓葬规模更大、随葬品数量更多，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开始随葬金银饰品，随葬的武器开始具有礼仪性功能，说明这时的贵族不再完全依赖军事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是开始依赖商业和贸易，或许还有来自统治家族血缘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36]游牧化不仅是一种经济方式上的逐水草，依靠草食动物的肉、乳、皮毛为生，也需要形成一定程度的权力集中、阶序化的政治社会。在经过第二阶段众多部落以战争为主的交流融合后，长城地带逐渐整合成几个主要的游牧部落联盟，进入较高级的政治阶段。第三个阶段墓葬中出土的金银饰品、礼仪性的武器说明当时的统治权威已经脱离了军事联盟首领的阶段，权力开始依靠传统和礼仪，阶序化的政治权力已经制度化。礼仪是维护这种权力的最佳手段，这应该是受到农耕集权国家的影响。诚如宫本一夫所说：“在鄂尔多斯高原之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立体兽性饰，其意义强烈显示为表示其社会地位的权威性，而较少实用性功能。而从战国后期开始完备化的金银制装饰品是比上述的威信物更向前一步的发展结果，这些东西说明了本地区的阶层次序逐渐迈向完备。……金银制装饰品的盛行，即正是代表了匈奴文化社会之重层阶层化社会之阶段，且此刻正好是匈奴游牧国家集结了北方系诸部族而成立之时。”[37]

战国至秦汉之际，在西州的土地上，生活着众多游牧化程度较高，组织化、阶序化也达到一定程度的游牧族群，这些族群主要有林胡、楼烦、匈奴、西羌、月氏和乌孙。林胡、楼烦从春秋时起就活跃在鄂尔多斯和阴山地带，大约在春秋晚期完成了从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转变，政治组织也发展到一定高度，林胡王、楼烦王是其最高首领。林胡游牧于鄂尔多斯高原，楼烦游牧于阴山南麓地带，春秋战国时期两地的考古文化除具备长城地带文化的共性外，亦有各自的特点，显示了不同部落间的差异。[38]战国中期，“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39]。长城地带的族群在春秋战国之际完成游牧化，并且建立起强大

的骑射兵团，使秦、赵、燕等国感受到来自北边的压力逐渐变重，赵武灵王决定采用胡服骑射的方式训练自己的军队。做出这一转变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因为改变先王制度而效仿一直在文化上被视为低等的夷狄，要承受国内保守势力的非议和反对。林胡、楼烦是长城地带的本土族群，在中原国家的不断扩张中生存空间被压缩到鄂尔多斯和阴山一带。他们虽然采取了骑射的武装形式，但是仍处在部落联盟阶段，游牧经济能够提供的经济总量是远远逊色于农耕经济的，充其量当时他们只是增强了抵抗中原国家的力量，使得中原国家的军事扩张行动不再像以前那样顺利，但是说到成为中原国家的“威胁”，还为时尚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凭借雄厚的国家实力，迅速组建了强大的骑兵队伍，击破林胡、楼烦并修筑长城。正在此时，来自大草原的匈奴部落也向南扩张到草原边缘地带，在长城之内的林胡、楼烦余部融入汉民族中，雁门郡设有楼烦县，可能就是安置楼烦余部的。隔在长城以外的林胡和楼烦则匈奴化，汉初有“匈奴白羊、楼烦王”，给楼烦冠以“匈奴”，说明其已成为匈奴联盟的一部分，林胡的情形大概与之类似。

从族属上来说，匈奴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北亚蒙古人种，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到草原边缘地带。此时长城地带的本土族群纷纷完成游牧化，在南方华夏和北方匈奴的双重挤压下，生存空间不断缩小，最后不是融入汉族，就是加入匈奴联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不复存在，中国北方形成农耕文明与草原专业化游牧文明二元并立的形势。

羌人分布广泛，在四川西部、河湟谷地、青海湖地区、河西祁连山北麓、新疆昆仑山北麓都有分布，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羌人发源于青藏高原，逐渐往边缘低海拔地带迁徙才形成今天的分布情态。[40]也有学者认为羌人是东部族群逐渐西迁而成的。[41]无论如何，在秦汉之际，河湟流域及祁连山麓地区分布着大量的羌人族群，河西的羌人被称为“南山羌”，月氏西迁后，与留在河西的被称为保南山羌的小月氏，形成共生关系。河湟流域的羌人被称为“西羌”，在秦汉之际已经游牧化，在河谷灌溉条件好的低地兼营农业，种落繁炽，不相统属，经常互相劫掠攻杀，多有仇怨。羌人是西州地区重要的游牧族群，经常与匈奴联结犯边，汉武帝出击河西的主要目的就是隔绝羌胡。

秦汉以前，月氏与乌孙是游牧在河西地区的族群，[42]月氏族盛，“始终奄有河西走廊的大部分地区，乌孙在河西充其量只是月氏的小

兄弟，其势力和范围根本不能同月氏相比”[43]。郝树声认为沙井文化是月氏的遗存，而沙井文化在兰州黄河沿岸也有遗存，据此认为月氏人的活动范围可能东达兰州附近的黄河沿岸。《汉书》中乌孙、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的说法，不宜理解得过实，[44]月氏强盛时势力范围东接匈奴南临华夏，贾谊曾设想臣服匈奴后，使之为汉守边以“备月氏、灌窳之变”，说明月氏在汉文帝时仍然是匈奴之外具备一定实力的游牧政治实体，[45]其活动范围绝不仅限于敦煌、祁连之间，当随着其部落之盛衰而有广狭之变化。乌孙游牧于月氏西侧，在张掖与敦煌之间的某个地区，由于月氏强盛，乌孙处在月氏的势力影响之下，后来在月氏的压力下不断西迁。[46]后来乌孙亡国于月氏，部分部落民依附于匈奴，最后，乌孙在老上单于死后复国于伊犁河地区。月氏和乌孙的族属问题在研究者中分歧较大，有的主张是从东部西迁而来，有的主张是河西本地族群，有的主张是东迁的高加索人种，目前第三种说法得到的支持似乎更多。[47]要解决月氏人的种属问题需要依靠对考古发现中属于月氏墓葬的头骨进行人种学鉴定，河西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遗存有沙井、骟马、火烧沟等。潘策等学者认为这些文化遗存属于月氏、乌孙人，[48]遗址的头骨鉴定结果表明这些古人无一例外都属于蒙古人种。但是对于这些文化遗存是否属于月氏人，意见并不统一，主张月氏、乌孙人为高加索人种的学者认为这些考古遗存并不属于月氏、乌孙，真正的月氏、乌孙人的遗存还没有被发现。[49]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河西地区除了有文献记载的强大的月氏人及乌孙人外，还有文献未记载的沙井、骟马、火烧沟人，他们属于东亚蒙古人种的游牧族群，河西地区种属、族群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了。总之，关于月氏和乌孙的所有问题都充满了争议，许多针锋相对的看法同时并存，现在尚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能说在秦汉之际，月氏是占据河西的一支强大的游牧联盟，乌孙游牧在河西走廊西端，比月氏弱小，属于不同的游牧族群，有自己的游牧地域，但在月氏的压力下不断西迁，后来月氏在匈奴的持续打击下也西迁，匈奴人占据了河西。

（二）匈奴帝国[50]的建立、发展及影响

战国后期，北方的游牧族群经过整合，形成了三个较强大的部落联盟，即月氏、匈奴和东胡。这三个游牧联盟虽然具有一定的实力，但是在与华夏诸国的较量中均未能占得优势。曾在东胡为质的燕国大将秦开，在熟悉了游牧族群作战的组织和战术之后，“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赵国的大将李牧与匈奴周旋，最后“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

秦国破义渠筑长城，从当时北方游牧族群势力分布看，其防守的对象当不仅是匈奴，还包括月氏，但从后来历史的发展来看，月氏并没有成为秦统一东方的掣肘。战国末期，匈奴乘中原战乱之机占领了阴山南麓及鄂尔多斯地区，匈奴的势力虽然有所发展，但“东胡强而月氏盛”，夹在中间的匈奴依旧艰难。当秦建立统一的集权帝国后，蒙恬率军夺回“河南地”，却匈奴七百里并重建了北边塞防。匈奴三面受敌，头曼单于北徙部落尽量避免与秦帝国冲突，将太子送到月氏那里当人质以缓解西边的压力，对待东胡想必也有类似的妥协措施，在北方三个较大游牧联盟中，匈奴看起来危机最深。但恰恰是危机最深重的匈奴，不久之后统一了草原并建立了第一个游牧帝国，进而与汉朝较量争锋。

据说匈奴联盟的首领头曼单于为了让另一个儿子能够继承单于位，故意与月氏制造摩擦，希望借月氏之手除掉在那里做人质的太子，不料这位太子机智勇武过人，在危急关头抢夺了一匹宝马逃回匈奴，头曼单于也被他的英勇折服，或许出于自愿，也可能是迫于其他方面的压力，比如太子的母家势力，头曼单于暂时放弃了先前的打算，并让太子统率骑士万人。太子一方面在父亲面前韬光养晦，另一方面如史书戏剧化记载的那般训练自己的万人队伍，使之完全听命于自己。当时机成熟时，他果断地采取行动，弑父自立，成为匈奴的新单于，即冒顿单于，这一年是公元前209年，中原秦朝的始皇帝刚于上一年驾崩。成功登位的冒顿单于开始展开扩张行动，向东，他首先示弱于东胡，后乘其不备大举进攻击破之；接着乘胜攻击河西的月氏，迫使有十万控弦之士的月氏开始西迁；向南，乘秦末天下战乱不休、北边防御体系崩溃之时，“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51]；最后向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52]。冒顿单于以其天才的军事才略[53]，极大地扩展了匈奴的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冒顿单于对匈奴的游牧部落联盟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使匈奴的政治体制超越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阶段，换句话说，冒顿单于创建了一个帝国，不再像他的父亲那样仅仅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而是成为一个集权程度较高，并且超然于各部落之上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作为“国家”的匈奴与作为部落联盟的匈奴，其政治结构有本质的区别。匈奴的各个部落“各有分地”，即每一个部落享有的游牧区域大致是固定的，并不是在大草原上毫无规律地任意迁徙。“分地”大致以高山或山脉为中心，包括山间盆地、山麓地带及山地四周的草原，“分

地”上必须有稳定的水源，比如一条河流或若干湖泊。水源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山地对于各个部落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山地的背风坡为部落族人提供躲避冬季风雪的“冬场”，山地的森林为他们制作穹庐、车辆、弓矢及其他生活用品提供了原料，山林是他们的狩猎场所，既补充了肉食，又训练了族人的骑射本领。在部落联盟的政治架构下，各个部落的酋长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力，对内全权处理部落内的事务，对外参加部落首长会议，推举联盟首领并议定重大事务。在不断的战争中，单于之位慢慢变得越来越重要，固定出自特定氏族，但单于权力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各个部落酋长对单于权力有较强的制约力，单于也无权干涉各个部落内部的事务。参加联盟的部落是平等的自主体，只是为了追求共同的目的，或者在面临共同的威胁时团结起来，并让渡部分权力给联盟的首领，以使联盟的行动更加协调有效。

冒顿单于对匈奴联盟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通过“二十四长制”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54]“二十四长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二十四长均是单于的近亲子弟，将他们分封到各处，统领若干部落，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单于的分封而不是底下的部落。第二，虽然同为被分封的地方诸侯，但是他们之间的地位并不一样，统领的部落也有多有少，其中最贵者为“四角”，即“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55]。“四角”对其他诸侯可能存在监督和统属的权力，如左贤王对左部就有总领之责。第三，二十四长制并没有改变原先各部落各有分地的地域分布格局，充分尊重了游牧经济的特点和部族的文化传统，所以改革遭遇的阻力也较小。在体制中，原部落酋长的地位和权力相对降低了，他们成为二十四长的下属，与单于的阶序距离拉大。谢剑指出：“二十四长虽名义上各有分地，但皆系出挛鞮氏，以单于近亲子弟的身份接受分封。因此不仅必须承认单于的绝对权力，且本身的升迁废立亦操诸单于之手。换言之，二十四长与其领地并无永久性的关系，亦非部落所产生的地方领袖，而是受制于中央王庭的扈从。”[56]二十四长制是在原先部落联盟的“单于——各部落酋长”的政治结构中添入一级，变为“单于——二十四长——各部落酋长”。二十四长出自单于氏族挛鞮氏，是单于的近亲子弟，有血缘纽带和共同利益，他们的废立升黜之权操于单于之手，在这种情况下，单于的权力毫无疑问是大大增强了。吕思勉认为此乃匈奴同姓分封之制[57]，然与周代封建制之差别在于，周之封建后，各封君代代相传，然二十四长却并非世袭。在各二

十四长领地内“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58]，什长、百长、千长是各级的军事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则是在二十四长庭帐内的诸政务军务辅佐官员，他们均由各二十四长辖区里的各级酋长和贵人担任，二十四长与领地内部落各首领之间，通常以婚姻关系加强凝聚。

这一政治结构尽可能避免破坏草原的原生部落单位，从而保证了游牧生产的正常进行，但同时又最大程度地集中了权力，单于通过听命于自己的二十四长实现了对各部落的权力支配，对各部落的人口、牲畜数量有了大致的掌握。军事权力掌握在号为“万骑”的二十四长手中，单于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更有效地指挥他们。狄宇宙指出：“二十四位大臣组成了一个高级政治参议会，由单于领导，单于对二十四王实行有效的管理。这不是一个‘部落议事会’，而是一个‘王’和军事指挥官的金字塔形结构。”[59]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在匈奴墓葬中有很明显的表现，研究者将发现的匈奴墓葬分为四个等级，墓葬的奢华程度逐级增高。[60]谢剑总结说：“匈奴并非简单的部落社会，其政治制度中，确已发展出相当程度的权限划分，固定的官位层次结构，及高度的中央集权体系，并以此对其领域内的人民行使权力。”[61]单于直辖的地区加上二十四长的领地，构成了匈奴“国家”的内圈核心地区。随着匈奴的扩张，东边的东胡，北方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西边的楼兰、呼揭、乌孙等西域三十六国均臣服，河西的月氏逃迁远方，匈奴占据其地，南边的河南地也被匈奴再次占领，这些地区有些被匈奴直接占领，有些则保持原来的政权组织，匈奴仅收取赋税特产，实行羁縻统治。[62]

关于匈奴“国家”形成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包括诸如自然环境、中原国家的压力、战争、生产的进步与社会分层、杰出领袖的个人威望等因素。[63]王明珂也列举了几种解释：“关于集中化、阶序化游牧政治体（我们且简称之为‘国家’）形成的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或将之归因于领袖个人魅力与成就，或认为是群体内部阶级分化、冲突的结果，或视之为游牧人群与其外在世界互动之产物。”王先生进一步指出，相较于“内部阶级分化演变说”，“外部互动说”在人类学游牧研究中更占优势，因为游牧社会的分支性结构和人群的移动性特征，难以从内部演化出稳固的阶级关系和胁迫性政治威权。[64]但必须指出，“外部互动”的因素在匈奴国家形成中之所以重要，还是根源于匈奴游牧经济的内在缺陷，即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根据哈扎诺夫、巴菲尔德、Peter Golden等学者的研究，“游牧社会能够独立于其他经济，特别是农业基

础的经济而繁荣昌盛的情况，如果曾经有过，也是很少出现的。而且对游牧民族掠夺定居民族的事件的描述，在历史资料中比比皆是。在上述各点的基础上，这种‘依赖’理论就要求，国家形成的现象要与游牧民族对他们的经济中所缺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无休无止的需求相联系”[65]。游牧社会向外部获取资源的要求是内在于其经济结构中的，政治组织必须顺应这种要求。战国后期至秦朝，如上文所言，是匈奴联盟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候，但恰恰是危机最重的匈奴统一了草原，建立了中国北方第一个游牧帝国。在东胡、月氏、秦朝三方的夹击下，匈奴联盟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从外部获取资源的能力十分微弱，此时的匈奴联盟，要么分崩离析、部落离散，分别加入其他游牧政治体中；要么改革制度、凝聚力量，向外扩张以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资源。

在这样的时势下适时产生了冒顿单于这个草原英雄，完成了匈奴从联盟到“国家”的转变。秦朝统一集权帝国的建立对匈奴帝国的成立所起的刺激作用也非常重要，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是匈奴人急需的，但是秦朝建立后夺走河南地，逐匈奴北走七百里，建立了完善的边塞防御体系，匈奴依靠战争方式获取农耕社会物资的能力骤减，而贸易交换则因为游牧经济能够有的盈余有限且不稳定，难以满足需求。为了对抗中原的农业帝国，提高匈奴政治体的集权能力，以便更加有效地突破中原国家的防线以获取资源，成为匈奴内部的普遍要求，冒顿单于以其卓越的才能改革了“国”内的政治体制并积极向外扩张，就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如果缺少秦帝国的刺激，而仅仅是月氏、匈奴、东胡三个游牧政治体之间互相竞争，匈奴的部落联盟体制仍能勉强应对，并不需要向更高形式的“国家”转变。所以，“若广大地区之游牧部落与定居人群国家有经常性的资源竞争，则许多部落凝聚为较稳定的大部落联盟或中央化国家，以长期与定居人群国家对抗。此便如有些人类学者所指出的，集中化、阶序化的游牧政治体，经常出现在游牧与定居人群的互动关系之中”[66]。说到底，游牧经济的内在缺陷决定了游牧群体必须和其他群体，特别是定居人群国家互动以获取补充性资源；随着其敌人政治组织力的增强，游牧群体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应对之，否则获取资源的能力将下降，一旦不能获取足够的外来资源，游牧群体的政治组织既丧失了所需的物质保障，也丧失了存在的必要，就将面临离散瓦解、依附于其他族群的命运。

匈奴“国家”建立后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67]，秦末的战乱使得秦帝国北边塞防体系瓦解，匈奴很顺利地重占河南地，并侵扰燕、代。河西

地区的月氏拥有强大的力量，匈奴与月氏的战争颇为胶着，到冒顿单于统治末期月氏才彻底放弃河西，迁徙到新疆伊犁河流域，匈奴占据河西走廊。匈奴政权的建立对西州的局势产生极大的影响：匈奴重新控制河南地，设置白羊王和楼烦王进行统治；占据了河西走廊，设置浑邪王与休屠王统领；祁连山地和河湟地区的羌人与匈奴结为同盟，对汉朝的西北甚至关中构成现实的威胁。

平城之战是新时代来临的标志，统一的北方游牧帝国与统一的中原王朝第一次正式交锋。匈奴对汉朝造成的压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边郡的侵扰和劫掠，匈奴小出则小获，大出则大获。第二，在占领河南地后，匈奴轻骑数日内可驰至关中，对汉朝的心脏地带构成严重威胁。第三，边将叛变与匈奴联合造成的威胁更是令皇帝寝食难安[68]。这种不安来自他们的联合进攻可能造成严重的边患，更重要的是，“汉朝的成败并不在于匈奴多占或少占一些土地。汉朝在中国内地是中央集权，是统一的。一个边将可以不尊奉皇帝的命令，并且在压力过大时投降匈奴，这就引起了一个极危险的问题”[69]。皇帝权威的完整性因为边将叛逃匈奴而随时遭到侵害，汉初即有韩王信、燕王卢绾、曼丘臣、王黄、赵利、陈豨等众多边将投靠匈奴，平城之战的爆发也是由边将叛变引起的。

刘邦的心情非常矛盾，他久经沙场，对于匈奴的实力、骑兵的威力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看不到他有收复河南地的谋划，可能是希望避免与匈奴发生大战。另一方面，他太渴望解决匈奴问题了，特别是当韩王信、曼丘臣等人投匈奴，对皇帝之权威造成损伤时更是如此。楚汉之争刚刚结束，战士固然疲惫，但也正是久经磨炼，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时刻，这使刘邦对战胜匈奴心存幻想。刘邦派遣使者往匈奴观察是否可击，冒顿单于隐藏实力，使者言可击，刘邦既高兴又疑惑，所以接连又派出十余辈使者，其矛盾心情由此可见。当他认为能取得胜利、大军已发的时候，娄敬提出了疑问，此时他又怒又骂的表现正说明娄敬击中了他心中的虚弱之处。此时刘邦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既有隐忧，又存在侥幸胜利的幻想，终于他成功地欺骗了自己，率军开拔到平城。平城之战的导火索只是一次普通的边境事件，随着汉朝皇帝的亲征和增兵，冒顿单于也决定扩大战事，征调了几乎匈奴帝国能动用的全部兵力。冒顿单于的目的并不是要俘虏汉朝皇帝，或是占领汉朝一块土地，而是要迫使汉朝屈服，以便获取更多的贡赋。战场上刘邦中了匈奴人的诱敌之术，被四十万（或三十万）匈奴骑兵围困在白登。汉朝此时连为天子坐

驾找寻四匹同色马匹都难，将相乘坐牛车，反观匈奴则是“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70]，此等阵势肯定给汉廷君臣造成了震撼性的心理冲击。陈平解围之秘计，其实就是遣使纳贡求和，大约也有贿赂阏氏的工作。当“和亲”协约达成，再加上阏氏进言“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71]，冒顿也就主动撤围。根据“和亲”协约，汉朝与匈奴结成“兄弟”关系，每岁向匈奴供奉絮缯酒米食物，并设立边境贸易市场。

东亚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秩序，汉文帝在予老上单于的国书中提到“先帝制”，即刘邦与冒顿单于达成的协议，“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文帝致单于书以“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开篇，单于的回书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立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虽然在文字上有争锋的意思，但还是表现了一种互相的尊敬与承认。邢义田指出，长城一带出土的“单于天降”带铭瓦当，表明当时中国甚至可能一度承认单于自天而降，也是拥有天命的统治者。[72]有研究者把从平城之战到呼韩邪向汉投降之间的“国际”关系称为“汉匈两极格局”，这一命题成立的三个前提假设如下。（1）汉朝、匈奴和其他政权的确是政治行为体，它们构成了一个“国际”体系；（2）汉朝和匈奴长期保持实力的大致相等，并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3）其他政权大多数受到汉朝或匈奴某种程度的控制。这三个前提条件在当时都大体成立。[73]狄宇宙也指出，当时汉匈“两个政权都确认了北方和南方地区的划分，并对此划分保证予以尊重”。“匈奴和汉朝的统治者彼此间不仅容忍对方对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有效的权力，而且还相互承认对方对生活在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其他独立社群和国家的霸主地位或者说霸权。”[74]

但是，这种格局对于汉人来说，乃是一种耻辱，因为皇帝本来是要泽被四夷、存定四极的，但是迫于现实的实力对比，竟要将天下一分为二，承认另一半在匈奴的统治之下，还要每年向匈奴提供贡赋，屈辱莫大于是，汉人传统的政治思想中蕴含着冲破这种局面的动力。而且从现实政治出发，西州的河南地、河西走廊被匈奴控制着，羌、胡连成一片，直接威胁汉朝心脏区域的安危，所以当汉武帝决定反击的时候，西州则是首当其冲。

[1] 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第3页。

[2] 顾颉刚和谭其骧曾反复讨论朔方的问题，最后认为汉武帝时朔方与并州同时存在，《汉书》注文中所谓的并州九郡，当以黄河为界，以西属于朔方，以东属于并州。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3] 欧文·拉铁摩尔指出，第一个主要发展的地区并不是最肥沃的，而是对文明初期发展阻力最小，并对最简陋的灌溉制度也能给予丰厚回报的地区。参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6页。

[4]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9页。

[5]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载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第39页。童恩正提出过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概念，从大兴安岭沿阴山、贺兰山到祁连山，再南折沿横断山脉到云南西北部，屏障着农业腹心地区，这样一个地带在生态环境和文化因素上具有很多相似性。参见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童先生定义的地带太长，容易忽视该地带内南北、东西的一些重要差别，相较而言，林先生的概念更具可操作性。

[6] 唐晓峰指出："所谓'中心'的概念是，在长城的两侧，并立着农业与游牧两大社会实体，两大社会在长城沿线的持久性接触，形成互动影响，反馈到各自社会的深层。"参见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

[7] 王恩涌：《"人地关系"的思想——从"环境决定论"到"和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8] 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第4～5页。

[9]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译者序。

[10]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3页。

[11] 邓辉：《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2]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93～194页。

[13]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王守春：《地理环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再认识——关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反思的反思》，《地理研究》1995年第1期。

[14] 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刍议》，载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第14页。1942年植物学家Beechar 提出过渡地带的"边缘效应"。

[15] 尹泽生、杨逸畴、王守春：《西北干旱地区全新世人地关系的空间表现与时序特征》，载尹泽生等主编《西北干旱地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人类文明兴衰》，地质出版社，1992。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引论文中的“西北”指阴山、贺兰山、乌鞘岭以西，昆仑山以北的地理区，相较于本书研究的西州，多出了新疆地区和青海柴达木地区，但是在气候特点上它们大体是一致的。

[16]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

[17] 道光五年修《镇番县志·水利考》，转引自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第4页。

[18]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9] 徐蕾如：《我国历史时期几次气候变动对社会的影响》，《大自然探索》1990年第1期；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20] 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载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但是一方面由于不合理的农牧开发，另一方面由于东汉以后气候逐渐干冷，植被覆盖率下降，沙漠形成并逐渐扩大，毛乌素现在已是不毛之地。

[21] 周宏伟：《两汉时期河湟地理环境探索——兼论汉羌战争的主要原因》，《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22] 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刍议》，载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

[23] 冯绳武：《甘肃河西水系的特征和演变》，《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1年第1期。

[24] 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载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中华书局，1959；徐喜辰等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5] 林沄：《戎狄非胡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两文都收录于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二）；唐晓峰：《先秦时期晋陕北部的戎狄与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地理研究》2003年第5期；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26]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08页。

[27]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前言第1～2页。

[28] 骑马对游牧经济的规模和效率意义重大，一位牧人徒步可放牧150～200头

羊，如果他骑在马上可以控制约500头羊，两个骑马的牧人则可控制2000头羊。Anatoly M. Khazanov，*Nomads and the Qutside World*（Lond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转引自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20页。

[29]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载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二），第63页。

[30] 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二分，1993，第312～314页。

[31] 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第9页。

[32] 丹尼斯·塞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391～392页。塞诺在1976年美国东方学会第186次年度宴会上所作会长致辞中说："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内亚战士都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同盟者，那就是他的马。比较矮的小体型马——在异国观察者看来是丑陋的——跟幸存至今的惟一的野马，即所谓的普氏野马有亲缘关系。这一品种的马坚韧顽强、需求不多，加上它相对良好的速度和非凡的耐力，使得它成为内亚军事力量中最令人畏惧的一个因素"。但是，内亚的骑兵如果要保持对农耕民族的军事优势，就必须留在草原地带，因为他们的技术及其所属的社会资源，都是由草原的生态环境决定的。参见丹尼斯·塞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142～156页。

[33] 唐晓峰：《先秦时期晋陕北部的戎狄与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地理研究》2003年第5期。

[34] 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载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年第10期；李非、李水城、水涛：《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考古》1993年第9期。

[35] 欧文·拉铁摩尔、王明珂、狄宇宙、杜正胜均持此观点。

[36]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第89～90页。

[37] 转引自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第90～91页。

[38] 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第305页。

[39]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第2885页。

[40] 管东贵：《西羌在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载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中华书局，2010。

[41]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46页。

[42] 国内学者多数认为月氏、乌孙活动的范围主要是今日的河西走廊，所争论者

为乌孙与月氏谁在东谁在西的问题，松田寿男认为乌孙的原居地根本不在河西，而在乌鲁木齐以东，车师后王庭所在的地方。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第35页。

[43] 郝树声：《论月氏在河西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44] 颜师古认为祁连指天山的说法受到了批评，这里的祁连，当指河西走廊的祁连山，杨建新认为指张掖西南的那一段。参见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但是将春秋战国时期河西的考古文化与月氏、乌孙对应的做法并没有取得共识，有学者认为月氏、乌孙的遗存尚未发现。

[45] 王子今：《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46] 关于乌孙，重要的研究有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钱伯泉：《乌孙的种族及其迁徙》，《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综述的文章有李芳：《建国以来月氏、乌孙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

[47] 林梅村认为月氏人是东进的吐火罗人，由于甘青地区汉藏语系羌人的崛起，才阻挡住了印欧人的东侵。参见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6页。邢义田也认为月氏人是东来的高加索人种，高鼻深目，汉画中头戴尖顶帽、高鼻深目的胡人，并不是对匈奴、羌、乌桓、鲜卑等部落民的如实刻画，而是一种对于胡人外貌类型化、格套化的表现，这种表现的渊源，可能来自战国时期画工对势力颇盛的月氏人的印象。参见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载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第300页。

[48] 潘策等：《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和匈奴及河西四郡的设置》，《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49] 韩康信等：《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248页。

[50] 本书在对匈奴进行分析时，有“匈奴国家”、“匈奴帝国”、“匈奴民族”、匈奴部族等不同的用法。当偏重指称“匈奴民族”建立的政权时，使用“匈奴国家”或“匈奴帝国”的用法，意指古代游牧民族建立的草原政权或草原帝国的一种类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并不相同。当指称作为具有共同文化、共同生活和自我认同的人群时，使用“匈奴民族”或匈奴部族，两者用法近似。

[51]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0页。

[52]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3页。

[53] 王庆宪：《匈奴冒顿单于的军事活动及其政治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4期。

[54]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0页。

[55]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第2944页。谢剑考证“四角”的次序，认为《史记》、《汉书》及《晋书》将右贤王置于左谷蠡王之前的做法与历史实例不符，《后汉书》肯定左谷蠡王贵于右贤王，可从。参见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二分，1969。

[56] 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

[57] 吕思勉：《燕石札记》，商务印书馆，1937，第123页。

[58]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1页。

[59]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208页。

[60] 四个等级为“两椁一棺墓”、“一椁一棺墓”、“单棺墓及石椁（棺）墓”、“无葬具的墓”。参见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61] 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第242页。

[62] 需要讨论的是河西浑邪王、休屠王的身份。谢剑认为他们是二十四长之一，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当月氏人迁离后，河西地空，残存的部落想必很少，而这里又是水草丰美的游牧地，匈奴战胜月氏后，应该派遣一些部落到此地游牧，大概包括浑邪王与休屠王等类似二十四长的地方诸侯，而且他们可能与二十四长一样，是单于的近亲子弟。但本书认为他们应该不在最初匈奴帝国设置的二十四长之列，月氏最后撤离河西已是公元前170年左右，距冒顿单于即位已近40年，说明匈奴与月氏的战争颇为胶着，此时在匈奴本部，二十四长制大约已经建立，而且他们分布在左右两部，名号前大都冠以“左”或“右”，浑邪王、休屠王与之不同。河西与匈奴本部交通便利，水草丰美，所以在战败月氏后，匈奴将其纳入“国家”的内圈核心区之中，将之分为浑邪王与休屠王两个诸侯领地，并离散若干匈奴部落迁到此地，二王与二十四长是同一性质，但是在新占领区另设置的，不在原先的二十四长之列。

[63] 冯世明：《匈奴国家产生原因探析》，《民族论坛》2010年第6期。

[64]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05页。

[65] 转引自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201页。

[66]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06页。

[67] 冒顿单于即位之初征伐的胜利不一定是匈奴政治结构重组的结果，重组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更可能是借着对外战争胜利的契机，冒顿单于才加强了对各部落的控制，完成了政治结构的重组，使之愈加阶序化和集权化。我们只能推测，冒顿单于大约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了对政治组织的重构，其新政体的优势在此后与汉朝长期的较量中显现出来。

[68] 邢义田指出："在中国天子眼中，这些人（指边缘独立势力）比真正的匈奴、西羌或乌桓等外族更可怕。边远的外族因饮食衣服不同于中国，文化远为落后，虽常入侵骚扰，但如无中土人士相助，无入主中原的野心，尚不足以动摇中国天子的地位。在边缘地域称雄的中原人士可就不同了。他们是中国人，有些曾在中土为官，知道中国的治术，如果坐大，即足以取天下而代之。"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130～131页。

[69]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07页。

[70]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4页。

[71]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4页。札奇斯钦对这次交锋的过程及前因后果有详细论述，参见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台北：正中书局，1973，第14页。

[72] 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第114～115页。

[73] 孙力舟：《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分析——基于汉朝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

[74]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224～225页。

第二章 西汉西进：西州的开拓与经营

一 开拓与经营：汉武帝经略西州

（一）文景时期的谋划和筹备

据管东贵的研究，战国中期中国的人口大约有2500万，经过秦的统一战争和虐用民力、秦末农民起事、楚汉争霸战争，中国之人力、物力消耗殆尽，汉初中国的人口仅为880万[1]，国力恰处于低谷，加之异姓诸侯王势力颇大，平城之战时刘邦能够动员的战争力量极为有限，且绝大多数为步兵。此时的匈奴完成了政治结构的重组，建立了中央集权程度颇高的草原帝国，败东胡、走月氏、臣北方诸族、重占河南地，盛极一时，平城之战更是调动了四十万骑，交战的双方分别处在各自国势的波峰与波谷。宋超指出，这一战对汉初朝野心态造成了重大影响，“从军事角度而言，双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交战，只是被困于冰天雪地的白登山中达七日之久，颇有些不战而屈的意味，唯因如此，汉朝野间普遍弥漫着对匈奴的畏惧之情。曲调低沉哀伤的民谣‘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正是这一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甚至连民风质朴、悍勇善战的陇西也“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2]。刘邦在国势对比最为不利的时候与匈奴作战，在战场上又轻易地中了敌人的诱敌之术，战略与战术的双重失误最终造成了不战而屈的惨败，不但要接受“和亲”输贡的协约，更造成民气沮丧，恐畏匈奴，这一战的消极影响十分深远，屈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

自古以来，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使命感，“知礼义诗书的中国人有责任将自己优越的文化向外推展，帮助那些禽兽般的四夷也能一体濡染德教，由野蛮进入文明。这叫‘王者无外’。天下虽有内外层次之别，理想的君王应该由内而外，化外为内，‘一乎天下’”[3]。这种观念沉淀为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信仰，秦始皇在琅琊刻石中宣扬“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

定四极”。贾谊在《新书·匈奴》篇中说：“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貊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4]额济纳汉简中的一条王莽诏令简：“☐父母为天下至定号为新普天莫匪新土索土之宾［莫］匪新臣明☐。”（99ES16ST1：14A）[5]可见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在秦汉时代具有深刻的和长期的影响。汉文帝迫于国力不振、军事不敌的现实，在给老上单于的国书中承认“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同时，他在国内的诏书里说：“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6]表达了不能做到王者无外、一乎天下的自责，逼于夷狄的耻辱感更是难以名状，这种状态不是中国的皇帝能长期容忍的。文景时期虽然维持着与匈奴的“和亲”关系，但已经在为对抗匈奴做若干筹划了。中国的皇帝对向匈奴进贡的政治地位充满了屈辱感和不甘心，而且匈奴索要的物资越来越多，并不遵守和平协定，边境的骚扰、入侵、劫掠时时发生。文景时期，贾谊与晁错发表了对匈奴的重要意见，影响了文景两位皇帝甚至后世当政者对匈奴的政策。

贾谊针对当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等问题发表了“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7]的政论，可谓立论深远，“为天下筹长治久安之策”[8]，深得文帝赏识。其中“可为流涕者二”就是针对匈奴而言的，贾谊从传统的夷夏观出发，认为当时“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9]贾谊坦言“和亲”表面上看似平等，实质上却是汉朝向匈奴供贡，华夏反居戎人之下，头足倒悬。而且，“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10]。满朝大臣对于倒悬的汉匈局势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不仁，在匈奴不可战胜的恐惧中不谋之且以为不可谋。

贾谊为对付匈奴提出了“三表”“五饵”之策，显露出他的书生意气。“三表”是以“信”“爱”“好”与单于争其民，“五饵”是以物质声色诱惑、败坏匈奴人的目、口、耳、腹、心，达到腐化、分化匈奴的目的，贾谊对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充满了臆想的乐观。虽然贾谊认识到汉匈局势的严重性，却没有充分认识到改变这一局势的困难程度。对外政策的改变需要建立在一系列内政建设和综合国力增长的基础上，贾谊的措施偏

重于依靠外交伎俩引诱、分化匈奴，缺少对内政建设的关注，更缺乏专门针对匈奴的军事、边防、财政等方面的具体意见，其策也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而非根本之策。后来匈奴的分化与汉朝在外交上的招降战术固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汉朝的军事打击[11]，班固认为贾谊“其术固以疏矣”[12]，并不是太苛责的评论。

晁错对匈奴的战略则具有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他十分重视对匈奴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对匈奴骑兵的作战方式有很深刻的认识，对匈奴与汉朝军事上各自的优势、劣势有准确的分析。

>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13]

晁错指出，汉朝应对匈奴之所以疲于奔命，是因为“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14]。狄宇宙对此赞叹道：“在晁错的时代，也许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家能够对中国的军事情况作出如此出色的论叙的。”[15]晁错在军事改革和边境防御建设方面的意见，都是建立在他对汉匈具体军事特点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

在军事改革方面，晁错主张建立一支可以抗衡匈奴的骑射兵团，他曾提出“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16]的建议，就是鼓励民间养马，为骑兵提供马匹，因为车骑者乃天下武备也。骑兵队伍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边郡的骑士，汉朝军队根据地域不同有材官、楼船、骑士的分别，边境地区地接胡虏，半耕半牧，百姓崇尚气力、精于骑射，充当骑士服役；另一部分是降胡义渠之属，其众数千，生产生活习性与匈奴同，收编为己所用，既可“以夷制夷”，亦借之提升中国骑兵的作战能力。晁错建议赐归附蛮夷“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

众，此万全之术也”[17]。既要学习胡人的骑射长技，建设能对抗匈奴的骑射兵团，也要充分发挥汉朝轻车材官的优势，联合作战，优势互补。

晁错最重要的贡献是制定了一套涉及经济、社会和军事的边境防御规划，以确保对匈奴防御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匈奴利用骑兵的快速移动，攻击汉朝北边塞防的薄弱点，戍卒一年瓜代，不知胡人之能，难以磨砺出战斗经验，在战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当汉廷每有增援，胡人即快速撤离，大军久驻耗费巨大，一旦撤军，胡人复又入侵，中国疲于应对却又无甚成效。针对这种情形，晁错建议“移民实边”。移民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为了使徙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新建移民点，要“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18]。简言之，国家要为徙民提供完备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使他们能在边境地区扎地生根，安居乐业。然后将边境居民组织起来，配发武器，教习战斗，鼓励杀敌，“建立一种以乡党宗族纽带联系起来的兵民合一的屯边防御体系”[19]。晁错对边疆防御体系的建设在武帝时收到了成效，司马相如以北边百姓为例来劝谕巴蜀长老曰：“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20]从司马相如劝谕巴蜀长老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边郡之士可谓人人皆兵，踊跃抗敌，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是晁错移民实边、建立兵民合一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成果。

文景二帝逐渐收夺诸侯王的权力，汉初功臣集团的权势也在一代代地递减[21]，汉朝的中央集权和皇帝专制均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文景二代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鼓励生产，民力渐复，国库渐充，人口滋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积极地对匈奴及其他游牧族群进行招降，“以夷制夷”的策略颇具成效；大力发展马政，在西边、北边设苑养马，以郎监苑，养马三十万匹，为发展骑兵军队进击匈奴准备了重要条件[22]；缮治塞防、移民实边，边境防御力量增强，对匈奴肆无忌惮的劫掠有所抑制。如此等等，都是汉武帝从其父祖那里继承的遗产，为他的大展拳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西汉对匈奴策略的新取向

《汉书·匈奴传下》赞曰："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23]文帝的壮志从他两次谋划亲征匈奴可以看出。第一次在即位后三年，当时已经驾临太原，但济北王刘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24]，文帝被迫返回长安应对。十四年时文帝又欲亲征，群臣谏不听，太后固要乃止。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文帝意欲亲征的姿态显示了他的壮志，但是受制于诸种内政因素未能成行，在政治、军事现实面前他既无奈亦沮丧，理论上权力无限的皇帝必须面对各种在他控制之外与意料之外的因素制约。文帝的壮志与沮丧，恰是内政因素制约对外政策的典型体现。第二，文帝的意图并不是要主动打击并消灭匈奴，而只是在匈奴入寇的情况下迎战驱逐，仍然是在"和亲"体系框架内的军事行动，尚未达到对外战略转变的程度。

景帝即位后与匈奴达成新的"和亲"协定，通关市，并且增加了物资供应的数量，匈奴方面对此也基本满意。景帝一代的北方边境除偶有小规模劫掠外，并没有发生匈奴大举入侵的事件，以至于汉武帝即位时史书称："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25]札奇斯钦指出"通关市"对于维持和平的重要意义："皇帝给遗单于，无论如何总是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这种物资是否可以使每一个领袖和他的部属都能得到，却是一个问题。所以，有时给遗，仍不能避免侵盗的发生。但是'通关市'则能在某种程度内，达到有限的，有无相通的可能。它的利益是比较普遍的，效果也比较大些。"[26]札奇斯钦以汉匈间物资流通是否顺畅来考察双方的战争与和平，当物资流通顺畅时和平就有保证，一旦流通受阻，战争将接踵而至。关市对双方互通物资确实起着较重要的作用，长城一线呈现和平和繁荣的景象。

札奇斯钦认为，在汉匈双方物资流通顺畅、匈奴和平主义抬头的时候，汉朝的对外战略却转向了军事进攻，发生了马邑之战。札氏颇有将破坏和平的责任归于汉朝一方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景帝至武帝初年和平景象之基础十分脆弱。第一，每隔一段时间，匈奴人对于贡品就会提出更高的索求，如果不能如意就会发动大规模的侵袭，以迫使中国皇帝

妥协，执行巴菲尔德所说的“外部边界战略”，所以和平是有周期性的，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匈奴对于农业国家物资需求的增长速度。第二，单于支配着“和亲”条约下汉朝供给匈奴的物资，依靠物资的分配权维持和加强其领袖地位，但是这种分配不可能使所有部族都感到满意。我们承认单于通过二十四长制建立了较大的威权，但这种威权并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在外来威胁减弱的情况下。匈奴的许多传统习俗和惯例，单于必须尊重，其权力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贵族群体的制约。也就是说，单于并不能有效地制约靠近边境的部落在对物资分配不满足或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发动对汉朝的劫掠，匈奴缺少一个绝对权威来保证和平条约的落实。[27]第三，通过关市贸易，大多数匈奴人对农业产品的需求可以得到相当的满足，但是我们别忘了，游牧经济依赖的是边缘不稳定的资源，游牧人主观上根本就没有“盈余”的观念[28]，大草原上影响游牧生产的灾害众多[29]，游牧族群很难积聚充足的剩余产品，供应关市贸易的能力极为有限。根据札奇斯钦的理论，因为游牧经济对农耕国家的农产品及手工产品有极强的依赖性，所以无论是战争还是和亲、互市，都是农业经济体的物资向游牧地区流动，这种流动通畅时，和平就得到维持，当流通受阻时，战争就会爆发。如果是这样的，因为游牧经济的内在缺陷，贸易受阻可能是经常性的，而受阻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汉人的原因，游牧人无法拿出可供贸易的物资也是贸易中断的重要原因。一旦和平方式的物资流通不能为继，匈奴人只能依靠战争方式来获取物资，战争难以避免。综合以上所论述的三个方面，可知汉匈之间的和平基础是非常脆弱的，景帝及汉武帝初期的暂时和平景象之下潜伏着众多危险的暗流。

“和亲”体系无法维持的更深层次原因是汉匈双方在政治文化传统和信仰上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中心主义和王者无外、一乎天下的政治理想，蕴含着冲破、颠覆汉初汉匈关系格局的内在动力。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便成为民族精神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在无形中强烈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汉初“和亲”关系格局的形成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即汉朝和匈奴恰恰处在各自国势的波谷与波峰时形成的，可以想见，当中国的国力恢复或匈奴“国”力衰退导致力量对比变化时，中国是绝不会甘心继续供奉匈奴，容忍华夏反为夷狄诸侯的倒悬局势的。另一方面，正如萧启庆指出的，“在心理上，北亚游牧民族自古便感觉与中国各有不同的文化，不应服属于中国，而应分庭抗礼。这一观念无疑成为把他们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障碍”[30]。老上单于致汉文帝的国书，一开始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31]，狐鹿姑致汉武帝书说：“南有大汉，北有强

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32]草原部族的这种心理传统后来发展为征服和主宰世界的野心，不过此时的匈奴尚未发展到这一地步。匈奴在政治上的要求至少是与汉朝平等并立，并且要稳定地从汉朝获取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等物资，而且还要掌握对长城以北引弓之国的霸权。宣帝时呼韩邪准备降汉，就此事询问国中大臣的态度，大臣皆曰：

> 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33]

在匈奴内乱、势力衰减的情况下，呼韩邪集团内的大多数人仍然持这样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匈奴必须保持与汉抗礼、臣服百蛮的地位，此一威名切不可失，否则就会为诸国笑，愧对先单于，玷污先祖的姓氏和民族的精神。匈奴强烈的民族自觉和自尊，与汉人的民族中心主义难以共存。无论是从经济结构上看，还是从政治文化传统上看，汉匈双方更可能发生的是战争而不是和平，“和亲”绝对不是一个能令双方均满意的可长久维持的国际关系体系。

具体到汉武帝个人而言，“复仇”心理可能起着重要影响。《史记·匈奴列传》记：“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34]《史记·匈奴列传》在此诏之后虽然还记载了天汉二年（前99）、征和三年（前90）李陵、李广利降匈奴事，但逯耀东认为这两则记事为征和三年，司马迁因巫蛊之祸，删削甫定稿的《史记》时所增补，司马迁其实是以太初四年（前101）的这一诏书作为对汉武帝征伐匈奴的总结，以此点明汉武帝征伐匈奴的真正原因。[35]“平城之忧”就是平城之战的不战而屈和城下之盟，“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指的是冒顿单于在给吕后的一封国书中写道“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36]，这被视为对寡居吕后的亵渎和侮辱，更是对中国伦理道德的公然践踏。[37]汉朝对匈奴政策由退让妥协向军事征伐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很难指出最根本最重要的究竟是哪一个。汉武帝远征大宛主要是为了与匈奴争夺西域，阻断匈奴从西域城邦国家获取资源，但在征服大宛后吐露的复仇之言，或许真的是他的心声。高帝的平城之辱和吕后收到的悖逆书简，这些历史记忆可能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武帝，促使他转变对匈奴的政

策。有时候主观情感因素对历史演进的推动作用并不低于客观理性因素，对于拥有决断乾坤权力的皇帝来说更是如此。

对匈奴的战略转变是由两次廷议及马邑之战开始的，主要人物是韩安国与王恢。第一次廷议发生在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驾崩之后，田蚡担任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史记·韩长孺列传》记载：

>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38]

匈奴此时的"请和亲"，具体所指不明，大概是要求汉朝再嫁一位公主，或者提高物资供应的数量。第一次廷议是遵循常例，君臣共议对策。当初吕后受冒顿轻侮后，樊哙要求率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被季布将军指责为面谀、欲动摇天下。樊哙的建议当然是冲动和莽撞的，自此之后，汉朝对匈奴的军事政策多为防御性的，鲜有主动出击的声音，成为汉初的政治气候和政策惯性。此时，王恢在廷议中提出兴兵击胡的建议，一反以往的政治风气和惯例。韩安国当即反对，其意见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匈奴"负戎马之足"，移动性强，建立在定居规范基础上的汉朝很难制伏之，即使胜利也很难管理和统治匈奴之地和匈奴之人；第二，汉军远征匈奴路途遥远，环境恶劣，尚未交战则军队已疲，在匈奴境内作战，自己的劣势和对方的优势都得到放大，切不可为。此次讨论的结果是"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有研究者认为，韩安国依附田蚡，而田蚡此时忙于巩固刚刚掌握的权力而无暇外顾，所以在对匈奴问题上暂时采取保守的态度。但是汉初以来形成的对匈奴的战略惯性是维持"和亲"，大臣多为保守派，倾向于维持现状，像王恢那样的主战派在此时刚刚抬头，势力和影响并不大。汉武帝即位之初就派遣张骞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很早就形成了征伐夷狄报祖宗之仇的决心，但此时他毕竟刚刚走出窦太后的权力阴影，立足还不稳固，在大多数臣僚以为出击不便的情况下，也只好许可和亲，但是王恢的建议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次廷议很快在次年到来，去岁关于对匈"和亲"已经议定，现在很快又再一次在廷议上讨论对匈奴的政策，这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这

次廷议是由于一个从事边境贸易及走私的边境大豪通过王恢献诱击匈奴之策引起的，显然是王恢在背后策划的。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在廷议开始时就表明了态度："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39]雷戈指出"廷议"的功能是重复性建构君臣秩序的合法空间，这个空间的基轴和原点是尊君[40]，汉武帝在廷议之始就已经表明"今欲举兵攻之"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廷议发展的方向和结论。

王恢、韩安国之间的论辩与商鞅和甘龙、杜挚的辩论，赵武灵王与公子成之间的辩论非常相似，争论的都是"变"与"循"之间的利与弊。王恢认为匈奴之所以侵盗不已、肆无忌惮，是因为对汉朝无恐惧之心。边境数惊，士卒百姓死伤甚众，诚为谋政者之痛，所以必须在军事上打击匈奴，使之恐畏，建立汉朝的威势。王恢是变革派，其理论基础与商鞅、赵武灵王等相似，即所谓"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41]。而韩安国说的"臣闻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42]，与杜挚说的"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43]，是所有保守派的立论基础。韩安国在夷夏观上持"文化区域分治"观念[44]，在论辩中他说道："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45]这种观念与王者无外、一乎天下的夷夏观长期并存，在华夏的思想世界里具有一定的影响。如上次廷议一样，他强调匈奴社会的特点及远征匈奴的不利因素，"且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飙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46]。"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47]王恢对深入匈奴境内作战的困难并非不了解，其实这次廷议讨论的是引诱匈奴到中国境内，然后设伏攻击，并不是要远征草原，韩安国却一再强调远征草原的种种不利，并没有击中要害，最后王恢建言："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48]廷议以武帝对王恢的意见曰"善"结束，汉廷对匈奴由防御向进攻的战略转变就此完成。虽然廷议时互有争论，但是最后的决策一旦达成，汉廷诸臣就都遵照新的决策行事，反对最激烈的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其他诸将皆属焉。我们看到，刚刚就在上一年汉匈达成新的"和亲"，现在汉朝却议定了一个企图擒拿单于、消灭匈奴主力的军事计划，而且在讨论中，群臣辩论的仅仅是攻击匈奴是否有利，而没有一

个人提到“和亲”协定，可以看出汉朝方面丝毫没有受“和亲”条约的羁绊。在马邑大豪聂翁壹许以马邑财物的情况下，匈奴立刻领军入塞，也是没有把去岁刚达成的协议放在眼里。汉匈双方缺乏互信，“和亲”下的和平之不可靠可见一斑。

有研究者认为马邑之战的统帅其实是汉武帝本人，只是此战劳而无功，天子恼羞成怒，汉廷上下对此讳莫如深，最后由护军将军韩安国代君受过。[49]王恢因为谋划不周，使得计划被匈奴察觉，更在匈奴遁逃时放弃了追击，使得汉武帝极为恼火，被下廷尉狱，于狱中自杀。值得体味的是韩安国此后的政治生涯。

> 安国始为御史大夫及护军，后稍斥疏，下迁；而新幸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安国既疏远，默默也；将屯又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乃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安国以元朔二年中卒。[50]

逯耀东抉发了《史记》篇章排列的深意，指出司马迁没有将《匈奴列传》与《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四夷”编排在一起，而是列在《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之间，并不是如赵翼所言“皆无意义，随得随编”，实际上是刻意为之，这些列传的传主均与匈奴问题有密切关系，从《韩长孺列传》到《平津侯主父列传》五篇构成了武帝时代处理匈奴问题的一个独立单元，更以《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贯穿之，司马迁这样处理有其深意，表明了西汉时期匈奴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51]这一小单元以韩安国开始，描述了韩安国政治生涯的三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老成持重、不主张轻开战端。韩安国在第一次廷议时获得了多数支持，汉初以来的政策得以维持。第二个镜头是第二次廷议，他的主张未获得皇帝的支持，对匈作战开始，颇能取合当世的韩安国成为护军将军，指挥了马邑伏击，只是计划被匈奴察觉而未达到预期效果。第三个镜头是在此后汉匈之间连年的战争中，战略思维还停留在防御的韩安国逐渐跟不上形势，稍斥疏，与匈奴作战又屡屡吃亏，被皇帝责备，最后在落寞和羞愧中呕血而死。韩安国的这三个镜头恰是汉朝对匈奴战略转折过程中的三个缩影，主动进攻匈奴需要另一批具备新战略思维和作战能力的统帅，于是卫青们益贵、韩安国们疏远，历史完成了转折，进入下一阶段。

（三）反击匈奴与拓土西州

匈奴在秦汉之际重占河南地、驱逐月氏、臣服羌人，势力发展到河西地区。在文帝四年冒顿予文帝书简中说："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52]匈奴此时完全控制河西，并且在追击月氏的过程中征服了西域。有学者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分析说："匈奴控制河西地区后，不但获得了大量优良的战马，战斗力大为增强，而且可以以河西和河套为基地，对汉之陇右、北地等边郡进行频繁侵扰，严重威胁着汉朝的统治中心长安的安全，迫使汉王朝疲于应付。"[53]匈奴控制着河南地、河西，并且与占据河湟的羌人结盟，关中腹地的西边与北部连成一片，河南地的白羊王、楼烦王的轻骑部队活跃在长安以北并不遥远的地方，烽火常通甘泉、长安，令汉朝的皇帝寝食难安，由此可见西州对汉朝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开边西州，一方面是要通过战争将匈奴的势力赶出河南地与河西，另一方面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增强汉朝在当地的力量，实现对这个地区的开发与巩固。我们先讨论汉武帝攻夺河南地与河西、打击匈奴的三大战役，然后再讨论为开发、巩固和管理新开拓地区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汉武帝转变了对匈奴的战略方针，韩安国一类保守派、防御型的老将在战略思维、军事才能上都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晋贵将军卫青、霍去病主导了汉朝对匈奴的军事进攻。欲打击匈奴就必须组建一支能够深入匈奴境内作战的骑兵军团，对这支军队皇帝必须交由完全信任的人统帅，是帝王的统御防范之术。汉武帝宠幸平阳主的女婢卫子夫，后来册封其为皇后，卫青是卫子夫之弟，霍去病是卫青姊子，他们卑微的出身和外戚的身份，再加上深悉侍君之道[54]和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所以深得汉武帝信任。汉武帝时期与匈奴最关键的三大战役是"河南之战"、"河西之战"与"漠北之战"，卫青指挥了"河南之战"，霍去病指挥了"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是二人共同指挥的。《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总结他们二人的功绩曰："最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一千八百户"；"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五千一百户。"[55]司马迁在总结他们的功绩时，分别强调了卫青"收河南地"和霍去病"开河西酒泉之地"，可见这两个地区的重要性。

河南之战载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56]《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大致相同，“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57]。林幹指出卫青的进军路线是“北出云中，趋向西北，沿外长城，直指高阙，然后向南折回，架桥渡过北河，沿黄河，傍贺兰山，返抵陇西。其进军路线大体上呈一马蹄形，把在这马蹄形内驻牧的匈奴属部楼烦王部和白羊王部击走，……卫青等进军之所以采取马蹄形的形式，主要因为右贤王驻地在高阙之北，卫青直指高阙，盖为截断右贤王南下河南援救楼烦、白羊二王之路”[58]。这一观察非常精准，卫青的战略是新时代的产物，天才般的大胆激进，不是韩安国等老成人能想象得到的。

对匈奴来说，河南地不但是水草丰美的游牧地，这里有一定规模的农业和手工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河南地战略位置重要，是进攻汉朝统治核心区的前沿跳板。故而，虽然当时匈奴发生对单于位的争夺内斗，伊稚斜战胜前单于太子自立，但还是立刻对汉朝采取了多次大规模军事报复行动。右贤王企图夺回河南地，“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59]。河南之战需要对付的不仅是盘踞在河南地的白羊、楼烦二部，还有他们背后的右贤王及整个匈奴，汉朝若想保住对河南地的占领，必须打击右贤王部，所以在元朔五年（前124），“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后去。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60]。这一战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使之再也无力反攻河南地。第二年卫青发动了同样规模的军队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这次打击的对象应该就是单于本部，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汉军虽颇有斩获，损失亦不小，而且先前降汉的胡小王赵信又降回匈奴。赵信深知汉军内情，建议单于远徙漠北以诱疲汉军，于是匈奴大部北撤。匈奴在漠南的力量大减，汉朝对河南地的占领得到巩固。匈奴主力的北徙，使得河西的浑邪王与休屠王孤立无援，为霍去病开拓河西创造了时机。

“有气敢任”的霍去病更得武帝宠幸，每次出征均率领精锐，敢于孤军深入，长途奔袭。元狩二年（前121），“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

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61]。汉军半年之内对河西发动两次高强度打击，匈奴在河西的力量受到重创，休屠王连祭天金人都丢失了。恼怒的单于欲诛浑邪、休屠二王，二王相谋降汉，虽然后来休屠王中途反悔，但凭着霍去病的果断处置和浑邪王的配合，河西平定，汉廷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外设立属国，安置投降或俘获的匈奴人。河西地空，汉廷原本谋划招乌孙回归故地，未果后直接经营河西，设置郡县，将之纳入行政版图。河西的丧失对匈奴的打击更大，《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云：“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62]此时匈奴大部移徙漠北，河西匈奴又投降了，“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63]。汉朝西北边郡的边防压力顿时大减，汉廷削减北地以西边郡的戍卒之半以休息民力。

在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中，韩安国等主要参与第一阶段，执行了马邑之役；然后转向了对匈奴的军事进攻阶段，卫、霍崛起。但卫霍之间亦有不同，卫青的战功主要是攻取河南地和打击匈奴右贤王，解决最为紧迫的外患威胁。霍去病的主要战功是拓土河西，汉朝对河西的进攻标志着其战略已经由“卫边”渐渐转向“胜边”。霍骠骑的崛起固然与汉武帝对领兵将领的平衡制约之术有关，但同时，正如张春树所言：“他的出现似乎也代表着武帝一代向外征伐的大转捩点”，“霍去病的出现具有以下的历史意义：（1）击破匈奴在汉西方的势力；（2）河西地区归汉；（3）有汉一代之向西的大扩张以此为起点，而汉之西向发展的成功缺了河西地区便不会成功。”[64]

河西之战后，为了彻底打败匈奴，甚至意图俘获单于，汉廷调动了十万骑兵，官私马匹十四万，步兵转输之士数十万，由卫青、霍去病分两路绝幕远征。对于此战，有研究者认为：“匈奴政权已经被迫退居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漠北无水草之地，完全没有了威胁西汉安全的能力”，“西汉武帝刘彻对匈奴伊稚斜单于做出的希望双方和好的表示，不但没有积极回应，反而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略匈奴战争，并且把矛头再次直接指向单于，这就是漠北战役。”[65]对于漠北之战在当时是否有必要性，我们很难判断，在此之前汉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

利，匈奴丧失了许多优质牧场和人口，实力有一定的削减。但是否已经衰弱到对汉朝没有威胁的程度则不易断言。事实上单于将主力移徙漠北是因为接受了赵信的建议，赵信深知汉军的实力和特点，认为不宜在边境地区与汉廷硬拼，移驻漠北是为了保存实力并“诱疲”汉军。请求“和亲”并不是代表匈奴真的希望和平，上文已经讨论过，汉朝和匈奴的文化、经济、军事结构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和平脆弱不堪，如果恢复“和亲”，给予匈奴恢复和休整的时机，不久之后汉廷必定又将面临匈奴的反攻，所以我们不能轻易说汉武帝决心一鼓作气彻底打败匈奴的决定就是穷兵黩武。经过“漠北之战”的打击，匈奴远遁，统治重心向西北迁徙，幕南无王庭。汉廷的损失亦非常惨重，汉匈间大规模的战争暂时停息。

（四）西州的建设与巩固

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汉朝夺取了河南地，清除了河西的匈奴势力，并且绝幕远征漠北，迫使匈奴向大草原的西北方逃遁，幕南无王庭。但“占领”只是第一步，从“占领”到“占有”还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去苦心经营，对一个地区占有的最高形态是设置郡县，纳入帝国的直接统治和管理之下，然而对边境新拓地区的统治要达到能设置郡县的程度，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在军事上征服了新土地之后，首先需要修建边塞亭隧防御系统，以求安全上的保障；然后屯田、移民实边，繁荣经济和社会；最后是设置郡县，纳入帝国统一的地方行政体制中。

河南地对于汉朝的国防安全特别关键，武帝对此地志在必得。在卫青夺取河南地当年，汉武帝立刻设置朔方、五原郡，并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对于河西，最初的方针是招乌孙回归，与之结盟共同对付匈奴，当时汉朝似乎并没有直接经营的打算。汉武帝最初并未打算直接经营河西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河西自古以来就是西北游牧族群的生息地，华夏势力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一地区，不像河南地在秦始皇时曾付出巨大的代价经营过，此时汉朝君臣可能就是顺着这个历史惯性而产生招乌孙回归的想法。第二，反击匈奴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是时通西南夷道，东至沧海之郡，北筑朔方”，国家财政已经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筑朔方。《史记·平准书》记载：“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66]国家财政的压力对直接经营河西的想法有一定的抑制。第三，如张春树指出的，“汉最忌匈奴，平城之耻，永刻在汉朝皇帝的心上成为一个‘结’，至于其他民族汉倒乐于联结以收以夷制夷之效”[67]。汉朝当时所有战略意

图均是为了对付匈奴，至于征服匈奴后，其他部族会不会成为新的外患，当时似乎考虑不多。[68]汉朝大概认为乌孙实力有限，不可能发展成为匈奴那样的威胁，但乌孙不能东归使这一谋划落空，汉武帝决心直接经营河西。田余庆说汉武帝对于开边之事其实心中无数，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69]是非常具有卓见的。汉武帝最初并没有打算直接经营河西，那时候他对于向西发展似乎设定有一个界限，但随后他的“心中无数”立刻暴露出来，乌孙不愿东归，他立刻决定大力向西发展，直接经营河西，设置新的郡县。再之后，更是着手经营西域甚至远征大宛，他的态度转变速度之快、程度之大，确实反映了他对向西开边的“心中无数”。

对新拓边地的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建造边塞防御系统，保障边疆地区的安全；第二是屯田和移徙人口，开垦土地发展生产。这两个方面互相依赖，只有边防体系有效运转，国防安全有保障，边民的生产和生活才能安定，才能吸引更多的人移徙过来；同时只有边地的人口增多，生产发展，为边疆防御体系提供更多的人力和物力，防御体系才能有效运转。修筑塞防城垣、屯田和移民实边等工作是设置郡县的主要筹备内容，郡县设置后的主要功能和任务是维护边塞防御系统的运转和主持移民、开垦、发展生产等，二者互相促进。无论是修建塞垣亭隧边墙，还是屯田和移民实边，都是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过程，所以无论是在河南地开置朔方、五原，还是在河西设置郡县，都是需要统筹安排、全国动员的大型工程。

我们先讨论汉代在西州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然后讨论移民实边与屯田的问题，以及二者与设置郡县的关系。北方边境的防御体系被称为“长城防御体系”，战国时期与胡接境的燕、赵、秦三国最早在其北方边境修筑了长城，但是这种“城墙”式的防御技术其实源于华夏的内部战争，国与国之间经常修筑城墙或在山水天险处修建相关设施来防御敌国。北边三国发现城墙也是对付草原骑兵的有力武器，于是竞相修筑，其防御的功效是显著的，之后的秦汉王朝继续修筑这种工事来防御北方敌人。长城似乎天然地与“防御”联系在一起，之所以如此，大概因为长城是固定的工事，修筑它的人守卫它、依靠它来抵御长城之外的进攻，长城代表的是“封闭”与“静态”。但这是一个假象。因为长城实际上修筑在原先游牧族群生存的空间中，长城的修筑发生在农耕国家将疆土向外扩张之后，是为了巩固对新占领区的控制而修筑的，而所谓游牧人的进攻，只是他们企图夺回自己以前生活的土地。在长城沿线，虽然进攻的

一方是游牧人，防御的一方是汉人，但是进攻者是领土遭到侵占的一方，防御者反而是扩张的一方。考虑到具体的修筑背景，我们可以说，长城其实是“进攻”的设施，而不是“防御”的。[70]只不过后来，农耕国家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守住了长城一线，长城内民族融合、经济发展，长城成为新的边界标志，人们渐渐忽视或遗忘了长城地带曾经是扩张的战利品。长城还是一条攻守兼备的军用道路，“不仅有联系长城防线各个据点以加强防务的作用，尤其对于在长城以外进击匈奴有重要意义”[71]，比如卫青出征以河南地为基地，李陵出征以居延塞为后方基地。狄宇宙指出：“长城就是华夏北方各国整个扩张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长城的建立是为了支持并且保护华夏各国向迥异于周族世界的外族地域进行政治和经济渗透。”[72]可谓一语中的。

秦始皇斥逐匈奴夺得河南地后，“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73]。“河”指黄河，“阳山”指黄河北岸的横贯河套北部的狼山山脉，“北假”据《括地志》是指黄河以北的一个地名。早在赵武灵王时期，汉人的势力就已经扩展到这里，当时“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74]，赵国曾将长城修筑到黄河以北的狼山。蒙恬督造的长城“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75]，可知他在黄河以北修建的长城塞隧，借用了不少赵国长城的遗存[76]。秦汉之际匈奴重占河南地时，这里的塞防自然颇有损坏坍塌。汉武帝再次夺得河南地后，“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因为此时尚面临匈奴反扑河南地的危险，所以汉武帝在重夺河南地后立刻修缮蒙恬在黄河以北修筑的长城。随着卫青沉重打击了匈奴右贤王，漠北之战又迫使匈奴远徙漠北，汉武帝进一步在阴山以北修筑长城。太初三年（前102），“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77]，这条长城被称为“外城”或“光禄城”。据唐晓峰的实地探查，“在包头北部阴山以外，仍可清晰地看到有两条近似乎平行的长城遗迹，蜿蜒西北而行……这两条长城遗迹的位置和走向，与《史记》、《汉书》所记载的汉武帝‘外城’相一致，它们应是武帝‘外城’的遗迹”[78]。秦汉两朝在黄河以北的阴山南麓及阴山以北地区修筑长城的历史与它们向北的扩张步伐相配合，长城的重要性及其“进攻”功能由此可见。

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79]。汉朝势力开始向黄河以西发展，在前不久的元狩四年（前119），“有司言

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80]，我们假设每一地所徙人口相同，则移入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的人口就达到58万，再加上筑朔方的10万人，则汉朝在短短几年间向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陇西一线共迁移68万人。张春树指出汉朝向新开发地区发展之前，必先巩固旧边地区，在渡河向西发展之前，向黄河以东地区大量移民，充实旧边是为拓展新边做准备。[81]

汉朝向西渡河之后选择令居为前沿据点，是因为此地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李并成指出：“令居在军事上、交通上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令居为汉代驻军屯田重地，又位处中原通往河西走廊、湟水谷地乃至西域的大道，控扼丝绸之路咽喉道口和津渡，并且还是汉室向北抵御匈奴，向西经略西羌地区的前哨基地和军防要镇，汉护羌校尉驻地，河西汉长城东端点。”[82]从朔方渡河到令居一线，汉朝开辟了大量的屯田，想必也修建了相应的军事据点，令居起初可能只是一个不大的塞障，到元鼎六年（前111），“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83]。面对河湟地区羌人的侵边，在发兵征伐的同时又征发了数万人修筑令居，经这次修筑令居城规模可观，此时汉廷又得知乌孙不返的消息，决定自己经营河西，令居在西州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汉廷的重视。

河西汉长城的修造始于公元前111年，是随着汉朝势力向西发展逐段建造的。《史记·平准书》说元鼎六年（前111）“初置张掖、酒泉郡”，《史记·大宛列传》说“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此时修筑了河西长城的令居至酒泉段。第二次修筑是元封四年（前107），当时武帝决意与匈奴争夺西域，于是派赵破奴攻击楼兰，把长城从酒泉修至玉门关。第三次修筑是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为了防备匈奴乘机南下，“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第四次修筑在天汉年间，“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除此之外，在祁连山北坡，为防备羌人亦修筑有障塞。[84]河西长城的向西推进与汉朝向西域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田余庆指出汉朝向西推进的程序，首先通过军事行动占领据点，然后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接着向据点的更西区域扩大声威。“亭障相连，构成防御线，构成交通线，也构成供应线。亭障还为汉向更西的地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保障。可以说，没有亭障，也就没有汉在西域的经营。”[85]所谓的长城防御系统，竟然是拓土西进的有力保

障了。

北边长城防御体系对于汉王朝的意义，汉元帝时期的一位名为侯应的郎中做出了非常深刻和全面的议论。那时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降汉，当陈汤等斩杀郅支单于后，呼韩邪上书愿为汉朝守边，让汉朝罢边备塞吏卒。侯应以为不可，他回答汉元帝的一大段话，可说是关于北边塞防体系功能的一篇深刻论文，值得全文引录。

>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86]

侯应首先指出，长城是汉朝在斥逐匈奴后建造的防御体系，南匈奴虽然暂时归附，但是匈奴人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如果自毁长城，则是示夷狄大利，难保匈奴不起异心，汉朝要安不忘危。即使单于真心为汉守边，但是在匈奴的政治结构下，单于没有约束其部下的绝对权力，其承诺未必可靠。长城防御体系的修建耗费巨大，一旦废弃，百年后猝然有变，难以缮复。而且如果让匈奴帮助守边，则是有德于汉朝，一旦索求无厌，事端又开。另外，汉朝与西羌的矛盾逐渐激化，不谨塞防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其次，长城对汉朝的国内统治也具有重大意义。拉铁

摩尔指出，汉朝的边疆管理目标是保持边疆人口的中国规范，帝国机构的运转必须保持向心的平衡。[87]侯应指出属国降民、滞留在匈奴的汉朝军士的子孙、生活艰辛的奴婢贫人、强人盗匪等均有亡逃匈奴的动机，塞防一旦撤除，将不可阻止。这些亡人“作为执政者无法控制的流动人口，具有与编户齐民社会结构定式背离与叛逆的身份”，其“生存方式和行为特征，往往对社会的稳定有所冲击”[88]。

防止“亡人越塞”是北边边塞系统重要的任务，居延新简中记有一桩严重的逃亡事件。

乃今月三日壬寅居延常安亭长王闳子男同攻虏亭长赵（E. P. T68：59）

常及客民赵闳范翕一等五人俱亡皆共盗官兵（E. P. T68：60）

臧千钱以上带（E. P. T68：61）

刀剑及铍各一又各持锥小尺白刀箴各一兰越甲渠当（E. P. T68：62）

曲隧塞从河水中天田出○案常等持禁物（E. P. T68：63）

兰越塞于边关徼逐捕未得它案验未竟（E. P. T68：64）[89]

出逃的五个人中有两个是亭长，而且携带了各种严禁出塞的武器，从甲渠当曲隧塞出逃。塞防的附属设施“天田”的设置不但是为了查知是否有敌人入塞，也是为了侦知是否有内部臣民逃出，一旦发现有“兰越出塞”的，要全力搜索追捕。

鉴于长城种种对外和对内的重要作用，侯应以为使南匈奴守边而自毁长城“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换句话说，保障长城防御体系的运转，乃是长治久安、威服夷狄的上策。元帝听了侯应的议论后，就下诏“勿议罢边塞事”，并让车骑将军许嘉口谕呼韩邪单于说：“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单于也以“愚不知大计”[90]谢。

移民实边和屯田是与长城防御体系并行的开拓新土的措施，后者只具有军事功能，而移民实边和屯田兼具军事和经济功能。无论是移民实边还是屯田，均增加了边疆地区汉族人口的数量，迁徙边疆后，移民无论是处在乡里组织中，还是处在屯田系统内，平时都会进行一定的军事训练，情况紧急时亦征调组织起来与敌作战。移民到边疆的平民和屯田（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上的劳动者，主要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发展

边地的农业生产对国防安全和国家财政来说意义重大。从内郡粮食产区运送粮草到边地，路途遥远道路坎坷，代价巨大，所谓“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汉武帝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91]。10万人筑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92]。按照主父偃的说法，秦始皇时“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93]。主父偃的这个数字确属夸张，但是远程运输损耗之惊人则当属无疑。有一支大湾出土的汉简讲到了转输折耗问题：“●右凡十二两输城官凡出入折耗五十九石三斗（505.36）”[94]，沈颂金根据此简得出远途运输的损耗率约为百分之二十，因为一般来说，每辆车装载25石，12辆共运300石，损耗了近60石，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95]这还不算运输费用和人工劳力的成本，从“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可以看出运输的人工费用也并不便宜。[96]所以说在边疆地区进行粮食生产，实现一部分自给，对于国防和财政来说都很重要。

屯田和移民实边具有相似的功能，使得有些学者将两者混同，认为移民实边就是屯田，只是不同于军队屯田的军屯，是一种民屯。如管东贵说：“民屯就是对移居边疆的人民，除使其能生产自给外，平时亦予以组织，授以战法，以备寇敌。军屯就是使戍守边疆的军队，就地生产，以减少对后方供应的依赖”，“汉自文帝十一年采晁错议募民耕戍塞下，是为农兼军的民屯之始，同时亦是汉代屯田之始”。[97]管先生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放大了晁错移民实边方案与秦代谪民于边的差别。在引用了晁错的《移民实边疏》后，管先生说：“在这一道疏里，有两个要点，都是用托古为说的方式说出的。一是善遇徙民，一是组训徙民。善遇徙民，在上一疏中已经说到，现在又作进一步的说明，目的无非是要增加徙民在边疆安家落户、生根滋长的可能性。至于组训徙民，这是一个新的意见，目的在于使所徙之民有应战的技能，并纳入组织，使成为一支民兵队。晁错提出了这一新的意见后，使他所建议的移民实边跟前代的大不相同；而屯田的基本构想，到此亦大体完成。”[98]但是仅仅抓住对徙民的军事训练，就说这种徙民是屯田，并没有抓住“屯田”概念的核心和关键。杨际平指出：“纵观历代屯田，大体都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屯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屯田兵民充其量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2）屯田兵民的组织形式，一般采取军事编制或准军事编制，不同于一般的编户齐民；（3）政府取之于屯田的，不是作为国税的田租地税，而是封建地租，或者是政府统收统支；（4）屯田的田土与劳力一般都比较集中。”[99]从晁错的建议来看，对所徙之民是

按照乡里制度进行安置管理的，他们的身份仍然是编户齐民，跟军屯里的士兵身份不同。他们并不是在屯田中的由专门的田官组织管理并缴纳大部分农产品的屯客，徙民向国家承担赋税义务，由郡县乡[100]的民政系统收取。刘光华也力辨“徙民实边”不是屯田。刘先生从三国时期典型的民屯出发，总结民屯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民屯由大农令下属之专门的田官系统管理；第二，对民屯客的剥削量，国家与屯客实行分成制，自有牛的按照五五分，国家提供牛的按照四六分，剥削量远远大于编户民的十五税一或者三十税一，但是屯客不承担国家的其他赋役。[101]我们认为杨先生和刘先生的意见值得重视。尾形勇指出，汉朝的向西推进，必首先在某地屯田，待土地开垦，生活和生产设施均具备一定基础，并有一年积粮之后，才逐步开展移民活动，屯田是为移民做前期准备的工作，并不能混为一谈。[102]

元朔二年（前127）攻取河南地后，汉武帝“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史书对于这次徙民记载简略，难得其详。关于立朔方，《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云：“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103]主父偃当初所奏九事，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他并不主张对匈奴大事用兵，但此时又盛言筑朔方灭胡虏，应当是揣摩汉武帝心思而为，献媚君主。当时外朝公卿考虑更多的是国家财政能否支撑开置朔方，多认为不便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104]公孙弘在置朔方事上持有更加理性的态度，当时汉武帝对于河南地势在必得，公孙弘自知反对亦无用，于是乘机建议罢当时正在开置的西南夷、沧海等地，专力于朔方，以免疲敝天下过甚。[105]徙10万人到朔方乃是直接移民，国家募民移往边地，往往要赐爵、供给行装钱、生产工具、武器、日常生活需要，还要修筑城市、道路、水利设施，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当时“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当时与匈奴的战争还正在进行，此时又要供应在河南地设置新郡的费用，国家财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元狩三年（前120）关东发生大水，“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106]。这次移民的数量特别巨大，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解决山东饥荒问题，但亦有意识地将贫

民迁往西北边疆地带。国家执行此次移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汉书·食货志下》记载："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107]这次往西北安置了大约60万人，加上移往朔方的10万人，总数超过了70万人，这里说的"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就是指此而言。这些人口都是移民实边而来的，并不是屯田。设置朔方、五原二郡，其下必还有县乡里等行政机构来安置管理十万移民，移往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的，或是在这些郡新设县乡里，或是纳入原先的县乡里组织中。这些移民仍然保持"民"的身份，在最初几年廪食县官，待具备再生产能力后，就要像其他编户民一样，开始向国家缴纳赋税了，并不是屯田的兵士或屯客。

与移民方式相比，屯田对国家财政造成的压力就小很多。西汉的屯田始于漠北之役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108]。汉朝决定开发河西地区，首先派遣五六万人在自朔方渡河至令居一线进行屯田，这些人的身份不是编户民而是"官吏卒"。元鼎六年（前111），"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09]。"田官"是进行屯田的组织机构，隶属于大司农，耕作者为"塞卒"，即士兵。汉朝对河西的开发是通过派遣士兵进行屯田开始的，因为自从北方游牧业兴起之后，河西一直在游牧人的控制之下，缺乏农业的基础，派遣军队来做拓荒的工作，才是最有效率和最经济的，待居住点、交通道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等建成并有一定的粮食储备后，再募民屯田或移民耕作，扩大开发的区域，加大开发的力度。这个程序在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上的"屯田策"中说得很清楚："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可）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110]在西域首先是派遣"屯田卒"由校尉分护，在捷枝、渠犁等地"通利沟渠"、"益种五谷"，这是军屯，待一年的耕种收获有积蓄的粮食后，就招募壮健之民来扩大屯田。因为处在绝域，远离国土，所以在军屯一年后

募民来扩大开垦，仍然处在“田官”的组织系统内，朝廷在西域屯田并不是为了最终建立郡县，而只是为了增强对西域的控制力。在河西地区就稍有不同了，当屯田有积谷之后采取的措施应当是移民，最终目标是建立实施直接统治的郡县。

尾形勇考察了赵充国在河湟屯田与设置郡县的关系，赵充国的《屯田策》曰：“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倅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111]一般认为，赵充国屯田河湟只是对西羌的威慑手段，其实未及收获就已罢屯田了。但是尾行勇注意到，这次屯田结束的神爵二年（前60）恰是破羌、允街二县设置的年份，而这二县的位置就在赵充国的屯田区域中，即临羌东至浩亹的湟水流域，这绝对不是巧合。赵充国当时发动兵卒花了很大的气力修缮邮亭，疏浚沟渠，修桥治路，一万多人每人耕作二十亩，开垦了二千多顷土地，这么多的成果没有理由白白放弃。尾形勇考虑到这次屯田与破羌、允街二县设置的关系，指出“如果重新来看一下上奏中的‘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县，益积蓄，省大费’这句话，就应把这句话解释为‘把耕田者作为游兵，以充实金城郡，日益增加积蓄，节省大宗费用’。意思是说，屯田结束后，把他们重新纳入郡的体制，让他们为边郡增加收入。因此，神爵二年充国上奏‘请罢屯兵’，虽是请求结束屯田，但这种‘罢屯兵’只是意味着‘把屯田兵由军事编制改归郡县编制’，绝不意味着停止开拓耕田。因为，我们决不可能认为，屯田兵们每人分到的二十亩地，到了那一年五月就马上归还了”[112]。当屯田地区由军事编制改为郡县编制后，应当有更多的编户民自发或者被迁徙而来。我们可以说，屯田是为以后的移民做预备性的工作，对于新土开发的程序，第一步是屯田，很可能首先是军屯，待打下一定基础且有积蓄的粮食后，就开始移民和设置郡县。当然，也不一定需要严格遵循这个程序，汉武帝设置朔方时，就是直接移民，并没有经过屯田阶段，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耗费巨大，公卿多以为不便。对河西的开拓首先是逐段向西修建亭隧塞防，接着派遣戍田卒进行屯田，之后才逐渐移民以实之，完全遵守着开拓新土的渐进程序。

设置郡县与屯田、移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当朝廷决定在某个新拓地区设置郡县时，一般首先修建塞防和进行军屯，并设置据点、修建道路和开垦土地，稍有规模后，就会开始移民和设置郡县。这个时候的“郡县”只是一个制度或者编制，实际力量仅仅存在于几个据点，郡县设立后，屯田和移民的工作仍然继续，逐渐由“点”连成“面”，当人口增多后，可能根据需要设置新县，甚至设置新郡。所以我们说，屯田和移民实边，既是设置郡县的预备工作，也是设置郡县的主要内容。河西四郡设置的年代问题，张维华、劳榦、张春树、陈梦家、日比野丈夫等学者都有深刻的讨论，但是得出的结论仍有歧见，暂时存而不论。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开发河西时，郡县成立的标准我们并不清楚，汉代人也未必有统一的意见，《武帝纪》与《地理志》的记载不同可能就是当时人也没有统一意见的表现。从朝廷颁发诏旨设立一郡，到此郡在实际上建置完成，是一个时日长久的过程，以其中的哪一个时刻作为郡县设置的准确时间，则不易确定。清代学者王骏指出：“《武帝纪》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元鼎六年又分置张掖、敦煌郡；纪、志年份互异。意者纪但记创置之年，志则因其营建城郭设官分治之岁乎？”[113]注意到郡县的创置之年与“营建城郭设官分治”之年之间的差距，这个意见值得我们重视。本书所论屯田、移民与郡县设置的先后程序也可为此说做一个补充，郡县行政级别的设置并不代表郡县实际上建设完成了。

二 继承与调整：西汉后期对西州的坚守与控制

（一）昭宣时期的国策调整

曾瑞龙指出："体系（systemic）、国家和领导层的分析，是国际关系分析的三个层次。分析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不但要从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入手，还要考虑其国内因素，而领袖的性格和世界观，也要作为一个重要变数来分析。"[114]传统史家习惯于将国家对外扩张的原因归于君主的好大喜功，在中国古代君主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下，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君主个人因素的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比如汉初受制于国力的虚弱和匈奴的强大，高祖在白登之围后也必须向匈奴低头，高后亦忍冒顿之辱。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又继承了父祖谋划匈奴的基础，才拥有了外事四夷的资本，可谓生逢其时。强调"体系"重要性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行为取向是由国际秩序决定的，这种观点也面临挑战，因为有时候一个政权对外政策转向的背后并没有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可寻，而有时候尽管国际体系结构变动了，国家的对外政策却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在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之前，汉匈刚刚达成了新的"和亲"条约，匈奴的实力仍然非常雄厚，汉匈两极并立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变化，但是汉武帝依凭强大国力及个人意志发动战争，改变了既有的"国际体系"。再比如陈汤攻灭郅支单于后，北方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汉朝本应该改变对呼韩邪政权的政策了，但因为传统战略文化的影响而继续扶持呼韩邪的政策，后来呼韩邪部坐大重返大草原，匈奴在两汉之际又成为北方敌患。

对外战略研究最新的取向是讨论政权的国内基础和战略文化的影响，指出在体系、国家和领袖三个层面的因素中，对对外战略起到更根本性影响的因素是国家内部因素，所谓"国家内部因素"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也包括观念、文化和传统。[115]这里，我们将主要从"国家内部因素"来考察昭宣时期对汉武帝扩张战略的继承与调整，当然，也会涉及"国际体系"及君主个人因素。

汉武帝征伐四夷的"辉煌战功"是以整个国家作为战争机器超负荷运转为代价的。[116]虽说当时发动战争有其必要性，但是在完成了反击匈奴、保障国防安全的必要军事行动之后，他仍然继续实行扩张主义，造成了严重后果。战争对经济的消耗和破坏是惊人的。为了赢得战争和巩

固新土，组建军队特别是骑兵军队、修建长城塞防、屯田、移民实边等均需要耗费巨量的人力、物力；此外，战争善后、赏赐将士、安置投降及俘虏的外族，也需要大笔的支出。老子早就以他冷峻锐利的思想指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117]"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118]汉初休养生息70年，史书有"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的记录，后来的战争和扩张则给汉帝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史记·平准书》中的一段记载把汉武帝外事四夷造成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揭示得非常深刻。

> 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119]

事两越、通西南夷和置沧海郡影响的只是"江淮"、"巴蜀"、"燕齐"这些局部区域，而与匈奴的战争则牵涉面广大，所谓"天下苦其劳"、"中外骚扰而相奉"是也，长期战争使得"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120]，移民边地造成了"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121]，"费以亿计，县官大空"，国家财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为了支撑战争和边地开发的费用，武帝时期逐渐实施一系列的敛财政策，所谓"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122]。自元光六年（前129）"初算商车"到太始二年（前95）"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三十五年间共计出台十三次九项财政政策。薛振恺将汉武帝出台的敛财政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公元前129年至公元前120年，政策包括算商车、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入羊为郎、卖武功爵、入钱免禁锢、减罪等，这些政策的特点是"与'民'协商，互为换利。基本上是'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123]。第二个阶段从公元前119年至前110年，政策主要有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不告缗等，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法治商，与民争利"。薛振恺特别强调了"不告缗"政策的出台，之前的"告缗"成为令天下恐怖震惧的政策，后来汉武帝又"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124]，商贾富民只要向甘泉入粟就能获取不被"告缗"的豁免权，自然积极踊跃，史称当年太仓、甘泉仓满，所谓"告缗"、"不告缗"政策的掠夺性质一目了然。因为第一阶段的政策效果不佳，商人富民不响应号

召佐国家之急，所以汉武帝在本阶段的敛财政策渐趋霸道，以国家的力量专利盐铁、垄断商业，并强行征收商人富民的财产税，这个阶段的各项政策后来显露出极大的流弊，造成严重后果。第三个阶段是从公元前98年至公元前95年，政策有榷酒酤和两次发布“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表现了一种极尽物欲，不计后果的特点”[125]。汉武帝的财政措施其实就是国家对社会的一种超经济剥削，充分展示了集权专制体制的威力，这些措施敛取的财富，不但支撑了对外扩张，还支撑了内改制度、郊祀封禅、兴修宫室等一系列“活动”。但这种对社会财富的攫取是竭泽而渔式的，算缗、告缗打击了正常的商业，不告缗又使得奸商横行，社会经济紊乱；国家对盐铁商业的垄断依靠的是东郭咸阳、孔仅这类大商人，实质就是有政府背景的商人与官吏联合，使得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盛行，官场之上人人言利逐利，世道人心败坏严重；公家供应的铁器多苦恶，农民无法用之耕种，生产倒退；入粟入钱买爵可以为官为郎，导致吏治不堪，至于入钱可以赎罪减死，更是践踏刑律，危害社会秩序。

敛财政策导致了社会经济紊乱、农业生产倒退、吏治腐败、奸邪充路、民不堪命，汉武帝后期百姓反抗事件增多，于是汉武帝重用酷吏，轻杀民命。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说：“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126]宣帝时路温舒谏曰：“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127]这种治狱风气是从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沿袭而来的。对外战争引发财政危机，为解决财政危机实施一系列敛财政策，这些敛财政策的实施导致国内严重的经济破坏和社会动荡，为了压制社会动荡又重用酷吏严酷刑狱，三者互为因果，最终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动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史载：“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中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128]面对严重的统治危机，汉武帝采取血腥的铁腕手段，“于是天

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129]。虽然之后仍有残部复聚，但汉武帝还是大体稳住了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

陈启云对于此时的叛乱有不同的解读，他认为“武帝集中国家政权，控制经济的努力一开始是比较成功的，因为那时只触及国家、社会的最上层，即那些诸侯王、中央政府周围的农村，以及政府机构所在的大城市内的大商人、大工业家。而这种努力波及郡县以下的地方时，波及土地所有者的耕田时，就受到了有土地利益的豪族的强烈反对。由武帝派往各地的酷吏扰乱了当地政权结盟的平衡，却又缺乏有力的措施来控制这一情况。这导致了武帝统治后期关东诸郡（华北平原的经济中心）广泛的不安宁”[130]。就是说山东群盗与各地豪族有密切的关系，当武帝的财政政策损害到豪族利益时，他们就武装起来制造事端。武帝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强力压制反叛之后放弃了财政的高压手段，并巡视东方进行镇抚，并在晚年以驳回桑弘羊等人的屯田西域奏议为契机，发布了轮台诏。田余庆指出汉武帝其实在元封年间已经有政策转向的意图了，他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131]这是汉武帝对于自身使命和当时政治局势的郑重思考而不是敷衍之辞，但由于他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再加上与戾太子的矛盾，使得这个政策的转向拖延至其统治末年。驳回桑弘羊的奏议只是引出“哀痛之诏”的由头，他要完成的其实是整个国家战略从劳民扩张到养民安内的调整。[132]

汉武帝之后虽然在国家战略层面不再以兴边扩张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对匈奴的态度从强硬转向妥协，他选择霍光辅佐昭帝，寄希望于他能继续休养民生，实际上霍光也大致符合武帝的期待。《汉书·杜延年传》记载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133]。班固总结昭帝之政说：“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134]孝文之政就是与民休息，霍光无疑很好地执行了养民安内的国策转向。盐铁会议

被视为这个转向过程中的一个标志，会议固然有霍光借以打击桑弘羊和引导舆论的意图，但是贤良文学们的意见不是豪族的呼声[135]，他们只是基于自身的儒学修养和信仰对武帝时期疲敝百姓的诸种政策予以批判，霍光的为政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间的这种呼声。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霍光对匈奴之态度仍然强硬，对武帝前期的政策仍有一定的继承。在边疆问题上，贤良文学们多发“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之类的德政万能论，他们主张“方今为县官计，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徐复观指出贤良文学们其实混淆了伐匈奴与备匈奴两件事，因为反对穷兵黩武而反对一切兵事，“贤良文学对边事的意见，实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利益。但他们所说的‘偃兵休士，厚币结和’及‘修文德以来之’这一套，依然是不顾现实的空论。匈奴不敢起侵陵之心，和亲然后有效。所以修边备及在某限度内的整军经武，是和亲所必不可缺少的先行条件，文学们乃并此等条件也要放弃，只成其为迂阔。事实上，霍光主政，既未听桑弘羊攻胡的主张，也未接受文学们撤除边备的谬见；大体上是守住武帝所得到的成果，备胡与和亲并用，终于得到匈奴屈服的效果”[136]。徐先生对霍光主政时期对外政策的分析和概括是准确的。

昭宣时期政策调整的大方向是行简约宽和之政，减少对百姓的压榨，但并不是意味着放弃武帝时期取得的成果，更不是放弃武备，对外妥协。事实上盐铁会议后，只是罢除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的盐铁平准均输政策仍然继续执行；在对待匈奴问题上，无论是霍光还是宣帝，仍继续与匈奴争夺西域，甚至直接发兵打击匈奴。霍光虽然对武帝后期酷疾之政有所扭转，但是在燕王谋反事后，仍以刑罚痛绳群下；宣帝虽然重视循吏，但仍然坚持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家法。[137]昭宣时期对汉武帝政策有调整也有继承，调整部分体现为重视内政和百姓生业，恢复武帝耗尽的国力民力；继承部分体现为对外政策乃是汉武帝时代政策的一个“弱化”版本，有节制但仍然强硬。

（二）西汉时期的“西羌”问题

羌人是活动在秦汉帝国西部的一支重要力量。《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记述秦帝国的疆域时说“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138]，“羌中”就是羌人居住活动的区域；《史记·货殖列传》说：“天水、陇西、北

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139]“羌中”所指区域主要是《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140]，亦即羌人的祖先无弋爰剑亡入的“三河间”，黄河、大通河及湟水交错纵横的地带[141]。后来羌人的一支向黄河河源之西迁徙数千里，在西藏、四川交界地带发展，与河湟地区的羌人几乎没有来往；河西走廊的南山地带也有羌人种落分布，《汉书·地理志》对张掖、酒泉、敦煌发源于祁连山的河流均说是“出羌中”，这里的羌人与河湟地区的羌人关系密切，在后来对抗汉朝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西域南道也有称为婼羌的行国，但是似乎与河湟、南山地带的羌人部落并没有亲密的联系；此外在高原深处还有发羌、唐旄羌，他们与诸部绝远，不常往来，但还是有微弱的联系，东汉时烧当羌战败后向高原逃窜，就是“远依发羌”。或许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羌人发源于青藏高原，后来沿着几条通道向高原四周边缘地带迁徙，所以沿青藏高原的四川、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均有羌人分布。[142]羌人从高原迁往低海拔地区，具有坚韧的品格，有一支不断向东扩张，与华夏争锋，另一支在西部抵御住了吐火罗人的东侵。[143]但也有学者指出“‘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144]。这两种意见反映出今人对于羌人渊源之真实状况缺乏了解，各个大的框架理论都是凭借着不完全的资料按照某种图式建构起来的，我们在吸收各种说法的合理成分时，也需要保持谨慎。

关于羌人的许多问题，在学者间分歧很大，很难得出具有共识的结论。比如，汉代的羌人与殷商甲骨卜辞中“羌”有什么关系？羌与氐的关系？羌的称号为什么在西周时期淡出，又为什么在秦汉时代重现？羌人、戎人是一种泛称还是特称？戎人与羌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每一个问题都有近乎针锋相对的意见。[145]特别是，近年来王明珂颇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的“羌族”研究，对传统典范的“羌族史”做了解构，提出了一系列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如“羌”是具有客观特征性的族群，还是一种依靠历史记忆建构的主观认同？历史上存不存在一个“羌族”？族群的本质是什么？虽然本书对王明珂的一些见解持保留态度，因为他的所谓“羌族”漂移说也是一种“建构”，但是他对族群客观特征论提出的挑战，却给我们极大的刺激和启发。巴斯（Fredrick Barth）及莫门（Michael Moerman）等族群主观论者批驳族群的客观文化特征论说：“文化特征在人群中的分布，经常呈现许多部分重叠但又不尽相同的情况。以各文化特征而言，它们的分布大多是呈连续的过渡性变化，族群边界似乎是

任意从中划下的一道线。”[146]李亦园在为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所作的序言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中肯：“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民族’、‘族群’这样的概念本来就像人类早期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分类一样，是把一个连续谱来作一种主观的切割，所以经常因认定者的基本立场的不同而异，因此民族的归类就有‘他人分类’与‘自我分类’之别。……不过在像中国或亚洲大陆东半这样大的一个区域中，又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其间族群的认同与分辨自然是极为复杂，确实很难用单一分类的观念就可以说明清楚。”[147]因此，我们在使用“民族”概念时，对其限制和局限要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我们受制于现代的“民族”观念，执着于“羌”这个名称，把西汉时期分布在青藏高原内部的发羌、唐旄羌，分布于四川西藏交界地带的牦牛种、越巂羌，分布于西域的婼羌及活动在河湟及南山山区的羌人视为一个整体的“羌民族”，那么研究将碰到许多困难，这个“羌民族”太过宽泛，很难做有针对性的研究。事实上，被称为“羌”的各部落之间并不具有如匈奴那样的自我民族认同、民族情感、共同信仰和统一的政治组织，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甚至不如鲜卑和乌桓。本书研究的两汉时期的“羌人问题”，主要限定为分布在西州范围内的羌人，即分布在河湟及南山地区的羌人部落及东汉以后迁入西州各地的羌人，而不包括他们分布于其他地区的“远亲”。这样限定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活动在西州的羌人种属更为亲近，地域接近、利益与共（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出现了汉朝这个更大的共同外部敌人），在对抗汉帝国的过程中相互支持。汉代的羌人问题，主要就是指西州区域内的羌人问题，而西南、西域和青藏高原深处的羌人对汉代的政治影响非常微弱。

在西州地区活动的各羌人部落之间，可能通过其祖先和弟兄传说建立了某种相互间的族属、血缘认同。范晔作《西羌传》，开篇所谓“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的说法，乃是出于中国正统史书对四夷族源想象的传统，虽然如此，范氏还是记载了羌人祖先无弋爰剑的传说，我们相信这个记载的原型应该就是羌人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和记忆，无弋爰剑乃是羌人的文化英雄、族群始祖。根据佐藤长的观点，无弋爰剑在羌藏语系中的意思是“懂灌溉的奴隶”，他在羌人中传播了农耕技术，此后生产发展，种落繁荣，受到敬信，其子孙世世为豪，构成羌人的主体。[148]

根据传说，西州地区的羌人都是无弋爰剑的后代，在其曾孙忍的时

候发生了一次大分化，因为秦人的压力，忍的季父、无弋爰剑之孙卬带领其部众南迁，“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忍及弟舞留下来，继续繁衍生息。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这个传说对于理解羌人种落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虽然羌人“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豪酋，弱则为人附落”，但众多“种”之间有共同的祖先传说。从无弋爰剑及卬、忍、舞的传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羌人均源于无弋爰剑这个共同的始祖。第二，在无弋爰剑曾孙的时候，发生了种落离散，卬带领一支族人南迁，留下来的两个主要分支忍和舞，都是无弋爰剑曾孙，忍的分支与舞的分支之间是兄弟关系，忍的子孙分成九个种，舞的子孙分成十七个种，我们可以推断，忍这方的九个种落组成了一个“种落圈”，舞的十七个种同样组成一个“圈”，“圈”内关系可能较“圈”与“圈”的关系更为亲密，但同时在“圈”与“圈”之间，靠着各自的祖先忍与舞之间的兄弟关系，存在着跨越“圈”互相认同的基础。第三，即使是西州地区的忍、舞种落与四川西藏交界地带的羌人之间，也因一个遥远的传说可以建立起某种血缘关系，因为南方羌人的祖先卬是西州羌人祖先忍和舞的季父。“圈”与“圈”是认同、联合的基础，但是在没有共同外部敌人的时候，在本地区资源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圈”也会成为互相敌对的阵营之间强化冲突甚至酿成战争的基础。

根据王明珂在今日“羌族”地区的实地调查，“弟兄祖先故事”在羌人中非常流行，“弟兄祖先故事的基本形式为：从前有几个兄弟到这儿来，……他们就是几个人群（家族、寨子与沟中人群）的祖先。在这种叙事中，共同的祖先（过去几个弟兄之一）凝聚一个人群；这样的几个人群，又因为相信彼此的祖先有‘弟兄关系’，因此也凝聚在血缘关系之中”[149]。王先生进一步指出，各种弟兄祖先的传说其实是一种有关“族群”的隐喻，表现出兄弟族群间“团结”、“区分”与“对抗”的关系。首先，弟兄关系表示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其次，弟兄关系也显示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区分——“亲兄弟，明算账”；最后，在区分之中，弟兄关系也隐含着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敌对关系。[150]“弟兄祖先”的传说构成一种“历史记忆”，在生存竞争中，某些部落需要联合以对抗其他部落时，他们之间的“弟兄祖先”记忆便会激发和放大，他们与敌对部落的不同和疏远关系也会得到强化；当情势变化，他们需要与之前敌对的部落联合时，有关敌对的历史记忆将被刻意遗忘，而更加遥远的共同祖先将被记忆起来作为团结的纽带。

汉代河湟和南山地区的羌人部落，不断地进行着联合与对抗的组合

分化，各部落之间相互劫掠攻击，历史积怨颇深，但面对强大外敌时，他们仍可以做到解怨盟诅、联合团结。在面对汉帝国、月氏、匈奴等强大外敌的时候，羌人能实现某种程度的联合，凝聚力量来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利益，但是当外敌消失或威胁减弱的时候，各个羌人部落又会重新回到相互之间“更相抄暴，以力为雄”的纷争局面。总之，西州地区的羌人种落繁多，依靠着各自的弟兄祖先传说，因应外部情势的变化，可以实现范围不等的联合团结，但是羌人认同仍主要局限在各自的小种落之内，经济生活、活动地域、情感信仰等都是依赖于小种落，跨越种落的团结是在面临共同的外部敌人、争夺生产资源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即使是这种联盟状态，也缺乏阶序化的组织和有强制力的领袖。

羌人松散的“族群”状态与他们生存的地理环境及资源组合情况有关。“由于河湟地区的地理封闭性以及高山河谷地形，使他们难以发展对外关系以取得远方的辅助性生活资源。更重要的是，一部落如能控制如大小榆谷那样的美好河谷，在谷地种麦，在附近的山地游牧、狩猎，生存所需大致无缺。因此其游牧之外的主要辅助性生业，农业、狩猎，使得肥美的河谷、山谷成为资源可预期而值得倾力保护与争夺的对象。如此，羌人的资源竞争对手，或向外获取辅助性资源的对象，都是其他羌部落。如此‘部落’成为保护本身利益及向外取得辅助性资源最重要的群体。”[151]前文我们讲到随着四千年前气候的突然干冷化，西州地区的原始农业退化，经济生业开始畜牧化，后来进而游牧化。随着东周以来我国气候第二个温暖期的到来，西州地区某些水土条件良好的区域又变得适宜发展农业了，无弋爰剑的传说发生在春秋时期，说明当时中原的农业技术传播到羌人部落中，在河湟及南山区域内的河谷、山谷低平土地上，羌人也从事农业耕作，后来赵充国在湟中屯田的基础就有“羌虏故田”。羌人的经济生业是农牧兼营，一般在河谷低地农耕，在四周高地、山地从事狩猎和畜牧业，充分利用环境资源，但还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方式，如辛武贤所说“虏以畜产为命”，在汉羌战争中汉朝每次都要俘获大量的羊马牛驴骡等牲畜。

汉武帝时期汉人的势力开始进入“羌中”。“羌中”有三个主要的经济区域，一是湟水及大通河流域，二为西海、盐池周边地区，三为黄河上游的两岸谷地，包括大小榆谷、大允谷等河谷，这些地区出产的马匹牛羊构成汉族政权垂涎的“羌中之利”。[152]有学者强调了汉朝势力进入羌人地区的经济原因，如周宏伟指出“西汉武帝开疆拓土，很大程度上就有寻找肥田沃土的动机，以便迁移中原人口，减轻中原地方人多地狭造成

的沉重负担”[153]。杨永俊提出“汉统治阶级对‘羌中之利’的贪婪，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汉政府对河湟羌地的进占与控制，而失去牧场则是羌族频繁发动反汉起义的根本原因”[154]。如果汉武帝侵占羌地是为了转移人口，减轻内地人口压力，那么我们就需要论证人口压力在汉武帝时期成为显著的问题，而且内地可供开发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值得汉廷付出巨大代价去用战争的方式获取土地，但是这两个条件都无法证明。在一般情况下，以经济作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没有错的，但是汉朝向羌中的扩张，却还需要结合当时整个西北边疆形势来考虑。事实上当汉武帝向西经略西州的时候，他主要针对的是匈奴，汉朝所有的战略计划都是针对匈奴而言的，如联合月氏、乌孙夹击匈奴，“断匈奴右臂”、“断匈奴左臂”等军事行动。那时羌人与匈奴互相联结，汉武帝经营河西、进占湟水流域，是为了执行“隔绝羌胡”的战略计划，防止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与西方青藏高原的游牧力量沟通联合。羌、胡交通经由两条主要通道，一条是从河南地渡过黄河至令居，然后沿黄河向西进入湟水流域。另一条是沿额济纳河进入河西走廊，通过祁连山的几个山口峡谷进入羌人地区。汉武帝时期夺得河南地，渡河筑令居塞切断了羌胡交通的第一条通道，接着又经营河西，修筑居延塞，切断了第二条通道。“隔绝羌胡”是这个时期形成的重要的战略方针，这种方针逐渐构成一种“战略文化”，是汉廷甚至之后的中央王朝在处理西北边疆民族问题时遵循的不二法门。

当月氏还在河西地区称霸的时候，羌人大概是臣属于月氏的，月氏当时主要的敌手是匈奴和乌孙，对于后方的羌人大概是拉拢怀柔，后来匈奴逐走月氏，一部分未迁离的月氏人投靠活动于祁连山地区的羌人部落，号小月氏，说明羌人与月氏之间的关系不错。汉初匈奴冒顿单于“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虽然是“臣服诸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匈奴对羌人深重的奴役[155]，匈奴当时更可能与羌人结成联盟关系，希望利用羌人的力量来牵制汉朝，当时不但没有见到所谓“匈奴奴役西羌，不断激起西羌人民的反抗”的情形，反倒是当汉朝力量介入这一地区后，羌人主动寻求与匈奴联合，以抗击汉人的扩张。

为了加强对羌人动向的监视控制，汉朝势力进入河湟流域，“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156]。令居是控扼河西地区的战略要地，东通中原，北接河西走廊，向西进入湟水谷地，既是汉朝经略河西的起点[157]，也是向西经略西羌地区的前哨基地和军事重镇。据说西宁附近的

西平亭乃是霍去病修筑的军事据点[158]，说明汉人势力已经深入到羌中内部了，这无疑使羌人感受到了威胁。元鼎五年（前112），“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159]。这一年匈奴入五原杀太守，太守战死，战事规模颇大，即匈奴人为配合羌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汉武帝立刻采取军事行动，派遣李息、徐自为率军平定羌人的进攻，并且将羌人逐出湟水流域，羌人向高海拔地方撤退，依西海、盐池左右。汉武帝在这些地方设立了几个新县，属陇西郡，并设置护羌校尉[160]（或类似的职位）掌管羌人事宜。昭帝时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取二县置金城郡。大部分羌人部落向西移徙，躲避汉朝政府的控制，也有一部分种落移居塞内，接受汉政府的管辖，为汉守塞，有时候还要被征调参加军事行动。昭帝的一封诏书追述了范明友的功绩：“度辽将军明友前以羌骑校尉将羌王侯君长以下击益州反虏，后复率击武都反氐，今破乌桓，斩虏获生，有功。其封明友为平陵侯。”[161]昭帝时期塞内的羌人就在“羌骑校尉”的带领下执行了平叛的军事任务。侯应也提到了“近西羌保塞”。吸引塞外游牧族群内附，“以夷制夷”，是汉朝处理边疆事务的常规手段。

“护羌校尉”一职的设立时间，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和宣帝神爵二年（前60）两种说法，本书同意谢绍鹢的意见：“神爵二年之前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处理羌人事务，后将军赵充国领军征羌，事关重大，所涉人物姓名、职务众多，独不见有护羌校尉。从元鼎六年（前111）至神爵二年（前60）的半个世纪里，史书也未见记载此官职的任免活动情况，元鼎六年说实在令人生疑。”[162]宣帝在赵充国平定羌人叛乱后，为了进一步加强监管，才正式设立了护羌校尉，而此前处理羌人事务的官职大约是临时性质的，如义渠安国行使西羌，是一种使职差遣，其本职是光禄大夫，他因处理羌人问题不善被赵充国弹劾，罪名也只是“奉使不敬”。使职是临时性的，事讫则罢[163]。范明友任羌骑校尉或许是因为他率领的军队征调了羌人，他处理的是益州、武都和东北的叛乱问题，羌骑校尉是一个军职，与河湟地区不一定有关系。东汉时班彪说：“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164]护羌校尉的职责包括控制安抚内降羌人和监视防范塞外羌人两方面，护羌校尉的职务至宣帝时才正式建立，在此之前处理塞内塞外羌人有关事务大概由陇西、金城等地方太守或其他临时官职负责。

河湟地区是羌人的主要生息地，“武帝开河西四郡，隔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诸羌，不使居湟中地”[165]。生息地被汉人侵夺，损害了羌人的根本利益，而塞内的羌人如元帝时侯应所说，“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处境凄惨，而且他们还要被征调参加南征北战，兵役繁重，塞内羌人的不满与怨恨逐渐积累。汉武帝处理羌人问题的目的是隔离羌胡，不使他们勾结联合，但是在执行这个战略目标的时候，却无视羌人的利益，无论是进军羌中向西驱逐诸羌还是管理内附的羌人，汉廷都没有重视、尊重羌人的传统利益，虽然对付羌人的主要动机不是拓殖土地和侵夺羌中之利，但是客观结果是把羌人从他们的生息地赶走，在羌人的故土上设置郡县，霸占了羌中之利，羌人不但保护不了妻子畜产，而且还要为汉朝去镇压其他族群。侵占羌人的土地，漠视羌人的利益，使羌人无法安生，是羌汉之间的根本矛盾，这是羌人问题持续不断，并且在东汉激化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源。

汉人拆解羌胡联盟的办法过于僵硬，对羌人没有实行拉拢怀柔的方式，反而使得羌人在反抗汉人的斗争中主动寻求与匈奴的合作。元鼎六年（前111）羌人的大反攻就寻求了匈奴的配合，到武帝征和五年（前88）的时候羌胡又有连谋的企图，“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166]。虽然河西五郡的建立有效阻断了羌胡交通的路线，但是汉人的扩张无形中强化了羌胡的共同利益，汉朝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羌人的这种动向一直没有改变，而且随着汉朝压迫的加重而更加深化。

宣帝时，先零羌要求渡过湟水，在汉民不田之处放牧。汉廷不许，但先零羌种还是不断渡河，郡县无法禁止，“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针对这一情况，赵充国说：“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167]，判断羌人有反叛之谋，而且根据以往羌胡多次连谋的历史，怀疑匈奴的使者已经到达先零部落。赵充国的判断没有错，“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168]义渠安国第一次出使没有制止住先零羌渡过湟水，也没有能对结盟的羌人实行分化。在羌人反谋、匈羌连谋已成的情势下，义渠安国第二次出使，其任务一是要豫为兵备，二是要瓦解羌人的联盟。但是当时的情形对于义渠安国已经非常困难了，他企图以诛杀“尤为黠桀者”的方法压制住反叛的苗头，但是失败，羌人反叛爆发。杨永俊很公允地说

道："宣帝元康年间发生的羌乱，看似是义渠安国滥杀羌酋引起的，而事实上在义渠安国巡抚羌地时，湟水一带的塞内羌与塞外羌早就酝酿着起事"，"义渠安国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再次出巡羌地，他杀羌酋的紧急处理法，只是加速了羌乱的到来。"[169]从义渠安国的姓氏来看，大约有义渠戎的血统，朝廷多次派遣他出使西羌，说明他对于边事也是谙习的，在当时反谋已经形成的严峻形势下想离间羌人部落，并不是容易的事，义渠安国采取强硬措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便会背上软弱不称职的罪名。

对赵充国平羌战役已经有非常多且深入的研究。赵充国在军事上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绝不冒险，另外对羌人实行分化瓦解，招降悬赏，并屯田以"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再加上宣帝同时支持了辛武贤的进攻方针，使得羌乱得到平息。"屯田"是赵充国平羌的重要策略，在上奏宣帝的奏章中有详细的说明，"留田便宜十二事"更是将其利弊说得淋漓尽致，得到后世关注边政者的重视。李大龙认为："屯田并不是'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的核心内容，而是针对西羌治理提出的一项综合性政策"，赵充国避免与羌人展开大规模战争，希望能坐得必胜之道，因此李先生对于赵充国的政策评价也比较高，"赵充国的'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之核心并不在于屯田，而是以'威服'为特点的综合性治羌政策，这一政策的成功实施是西汉能够较为正确地处理与西羌关系的重要表现"[170]。但是我们知道，在赵充国屯田的区域内，汉朝接着设置了破羌、允街等县，实际上是扩大了汉人对湟中地区的移民，而且根据赵充国的建议，设置了金城属国安置降羌，加强了对内属羌人的直接管制，造成汉羌之间矛盾的根本原因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杨永俊认为赵充国处理羌人的措施仍然是"隔绝羌胡"政策的延续，"与汉武帝逐羌措施相比，赵充国更注重对降羌的安置工作。这一政策的变化其实是对过去逐羌的轻微否定，只是这种变化并没有扭转为'隔绝羌胡'而治羌的政策偏失。汉武帝是以'逐'达到地域的'隔'，而赵充国是以控制羌来实现隔离，二者只是作法上的不同"[171]。如果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赵充国的措施也仅能平定羌乱于一时，朝廷处理羌人问题的方式存在许多容易引起冲突的隐患，而且生存资源分配这个导致双方冲突的根本矛盾一直未得到解决。元帝时西羌彡姐旁种反叛，集结了三万多人，汉廷派冯奉世出征，开始只派遣了一万二千人屯守，后来战不利，元帝又大发六万人增援，很快平定叛乱。在对冯奉世录功拜爵的诏书中对这次平叛有简洁的表述："羌虏桀黠，贼害吏民，攻陇西府寺，燔烧置亭，绝道桥，甚逆天道。左将军光禄勋奉世前将兵征讨，斩捕首虏八千余级，卤马牛羊

以万数。赐奉世爵关内侯，食邑五百户，黄金六十斤。”[172]元帝时羌人的反叛恰表明赵充国之策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总的来说，西汉时期的羌人叛乱尚处在汉廷可控制的范围内，还没有发展到东汉那样不可收拾的程度。究其原因，一是进入塞内的羌人人数并不是很多，汉廷的行政系统尚能有效地控制；二是长城塞防体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塞外羌人不敢轻易犯塞；三是西汉政治比较积极和健康，宣帝很重视对地方二千石的选拔，循吏政治兴盛，对羌人的压迫奴役得到一些消解和制约；四是汉廷的军队机制运转良好，一旦有叛乱，朝廷能迅速调集军队进行快速平叛；五是宣帝之后匈奴的威胁解除，羌人反抗汉朝失去了可以联合的力量。所以，西汉一朝羌人叛乱次数并不多，而且一旦有事也可以很快被压制，羌人并未构成西汉朝廷的主要威胁，“自彡姐羌降之后数十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173]。

到王莽辅政时，“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174]。王莽贿赂引诱西海附近的羌人内属，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需要。他在上给太后的奏章中说：“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175]阎步克将王莽改作制度的思维方式称为“制度浪漫主义”或“礼乐乌托邦”，将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发展到极致，追求官名和官职的整齐、和谐、对称、有序。王莽在王畿之外设东、南、西、北四部，在四部之外还设有东域、南域、西域和北域，框框和层级结构非常整齐。[176]因为当时已经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而缺少西海郡，所以王莽设计并表演了羌人内属和在西海地区设置西海郡的政治话剧。在今青海省海晏县发现了西海郡的城址，还发现了王莽的“虎符石匮”，其上有篆文曰：“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177]王莽为了制造四夷宾服、殊俗重译的太平盛世景象，贿诱西海附近的羌人内属，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扩大一块土地，而是为了营造西方宾服的景象和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四郡设置的对称与整齐，这些行动完全违反理性行政精神，王莽时期的大多数兴作都可以作如是观。羌人种豪良愿等究竟愿意接受什么程度的内属？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接受贿赂后就愿意把自己的生息之地让出来给汉人设置郡县，大概中郎将平宪开出

的条件是名义上的内属，平宪的报告中说“置属国领护”，而王莽后来却决定在其地直接设立郡县，自然引起羌人的怨恨。王莽居摄元年（6），“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二年春，窦况等击破西羌”[178]。虽然暂时镇压下去，但是待新莽末天下混乱时，羌人又重占西海地区。

甘肃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其中与羌人和羌汉关系有关的简牍有数百枚，张德芳对这些资料做了辑考，汪桂海、薛海波、谢绍鹢等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179]张先生将这些资料分为“护羌校尉及其他”、“西汉时期的羌人反叛以及破羌将军辛武贤、敦煌太守快”、“生活在河西的羌人部落”、“悬泉简反映的羌汉关系”等四类，未被归类列入附录的还有二十多条，这些简牍资料印证和补充了史书中关于羌人和羌汉关系的记载。如悬泉汉简中有“羌大婢”、“羌徒”、“羌人六人作”、“羌御”的记录，反映了羌人沦为奴婢、劳徒或者在邮传亭隧当差服役的境遇；还有被定名为《归义羌人名籍》的简册，记载形式如“归义聊藏耶茈种羌男子东怜”、“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唐尧”，汪桂海认为《归义羌人名籍》简册的编制反映了“汉朝政府对归附的羌人实行了严格管理，羌人男子都要登记造册。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对羌人征发徭役，为政府提供劳动力和兵员”。看来史书中关于羌人“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的记录不虚。对于宣帝、元帝、王莽时期羌人的三次反叛事件，悬泉汉简中都有反映，如编号为（I0309③：221）简的内容为：“御史中丞臣强、守侍御史少史臣忠，昧死言，尚书奉御史大夫吉奉丞相相上酒泉太守武贤、敦煌太守快书，言二事，其一事，武贤前书穬麦皮芒厚，以廪当食者，小石三石少不足，丞相请郡当食廪穬麦者石加……”。[180]简（I0309③：236）：“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甲戌，敦煌太守快、长史布施、丞德，谓县、郡库：太守行县道，传车被具多敝，坐为论，易□□□□到，遣吏迎受输敝被具，郡库相与校计，如律令。（A）”[181]前一简反映了酒泉与敦煌两位太守向朝廷报告，要求增加士卒口粮配额，辛武贤与敦煌太守快都是处理这次羌人叛乱的关键人物，另一个关键人物赵充国在此次平叛中的作用，1940年在青海乐都出土的《三老赵掾之碑》中有所反映。[182]后一简是叛乱平定后，敦煌太守快巡行郡内发现邮传系统的一些问题并加以解决的记录，此次巡行，如汪桂海所言是为了稳定全郡各地，防止出现变故[183]。简（II0216②：39）：“闻羌人买谷民间持出塞甚众，长吏废不为意，未有坐者，务禁防之。”简（II0216②：80）：

一封长史私印诣广校候趣令言羌人反状 博望候言羌王唐

▨□在广至 闰月庚子昏时受遮要御 杨武行东 调言并发兵在澹水

□趣令言羌反状　　水上

张德芳指出，在与这两枚简同层出的142枚纪年简中，只有1枚是甘露年，其余皆为元成时期年号，其中大部分又是元帝永光、建昭纪年简，前一简大概反映了元帝时陇西羌人反叛前夕，河西地区的羌人暗中大量购买粮食物资，简文要求地方严加禁防。后一简是关于邮书的收发记录，或许是陇西羌人反叛爆发，朝廷将此消息传递到河西，要求各郡严加防范。简（III0809④：35）："博望雕秩候部见羌虏为盗▨。"简（VIH11：1）："益广言校候部见羌虏将为渊泉南藉（籍）端□□▨。"这两简属于王莽时期，反映了羌人的某些动向，但是否与西海郡的羌人反叛有关，则不易断言。

（三）"华夏本位"天下秩序的成立

汉初"和亲"的政治体系确立了当时的两极政治格局，即所谓"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184]。汉匈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张骞出使月氏被匈奴截获，单于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185]单于的话从反面很好地诠释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李大龙称"当时在中华大地上分布着以西汉王朝、匈奴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汉初以来，汉朝逐渐建立了与闽越、东瓯、南越、朝鲜等边疆政权的藩属体系，而匈奴也构筑了与东胡、丁零、乌孙、西域城郭国家的藩属体系。[186]但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王者无外"天下观，蕴含着冲破这一格局的动力，因为理想的天下秩序是四夷宾服、殊俗重译，现在不但不能泽被长城之外，反而要向匈奴供贡，并处在其军事威胁与无厌侵掠之下，无论是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文化观念上，都使汉朝感到如鲠在喉。经过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持续打击以及昭宣时期与匈奴争夺西域，原本处在匈奴藩属体系之中的乌桓、西羌、乌孙、西域诸国等都逐渐加入汉朝的藩属体系，退居漠北的匈奴危机重重，后来匈奴分裂，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南北并立的局面，游牧于南半部而又处于弱势的呼韩邪在汉宣帝时向汉朝称臣纳贡，郅支单于在汉元帝时被陈汤斩杀，至此，长城以北的政治一极不复存在，匈奴臣属，以汉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确立。

匈奴的分裂及呼韩邪的投降，是内外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在的方面是匈奴游牧经济与国家政体自身存在的缺陷，外在的方面是汉朝持续的军事打击及长久以来执行的招降战术。匈奴政权的单于制及二十四长制具有的一定的集权和动员能力，正因如此匈奴政权才在汉初取得极大成功，成为两极格局的一极。但是匈奴政权建立的经济基础是游牧经济，政治基础是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织，游牧经济固有的分散性、移动性、不稳定性特征，传统部落组织具有的分枝性特点，从根本上阻止了绝对至上、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的出现。二十四长是单于宗族的成员，单于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取支持，但这也意味着单于要照顾他们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意见，不可能视他们为完全的从属者。[187]当单于凭借着个人魅力和辉煌战功，从外部获取充足的补充性资源的时候，匈奴政权的集权程度和凝聚力就强，单于也能凭借对物资的分配权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但是，一旦对外攫取资源的战争频频受阻，或者单于缺乏个人威望，政局动荡，形势就会朝反向发展，匈奴各部落的分裂性就会凸显出来。游牧经济依靠对畜群的照料以获取乳、毛、肉等出产，这种经济类型的每一个环节均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为了追逐水草还需要进行季节性游牧，所以大规模的战争对匈奴自身的游牧经济也会造成破坏，对于匈奴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如果战争胜利了，就能够取得补充性资源，不但能够弥补由战争导致的游牧生产的损失，还能够极大地提高游牧人的生活水平，加强游牧部族的团结和力量；但如若战争受挫，匈奴就将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其凝聚和团结的纽带就将断裂，政治结构中固有的分裂因素也会被激活。

毫无疑问，汉武帝发动的持续军事打击，使匈奴丧失了大量的游牧地和人口，更使其丧失了从外部获取补充性资源的渠道；昭宣时期汉朝继续对匈奴持强硬态度，夺取了西域，匈奴丧失了最后为其提供补充性资源的地区，匈奴左臂、右臂皆断，北部小国也纷纷叛离。在严重的外部危机下匈奴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匈奴史研究者牧仁指出，匈奴单于位的继承经历了从父死子继到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交替再到兄终弟及的演变过程，从冒顿建国到乌师庐单于的阶段基本实行父死子继，呼韩邪单于之后基本实行兄终弟及，而这之间的从公元前102年乌师庐单于死到呼韩邪与郅支并立时期，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交替。执行单一单于位继承制的时期政局就稳定，两种继承制交替则反映了内部政局的混乱。[188]即匈奴单于位继承制度混乱的时期，正是匈奴经受汉朝全面打击到呼韩邪投降汉朝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外部原因激发内部矛盾的因果链条很清楚。呼韩邪之后匈奴进入另一个平稳阶段，则是处在汉朝的援助与监视之下，被纳入汉朝的华夏本位天下秩序之中。

在促使呼韩邪投降汉朝的众多因素中，汉朝长期以来践行的招降战术所起的作用不应被忽视，应该说汉朝在招降匈奴方面是不惜代价的，《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记有安陵、垣、遒、容城、易、范阳、翕等七侯，均是“以匈奴王降侯”，当初这些匈奴王归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后”，遭到了丞相周亚夫的反对，周亚夫认为：“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189]其实周亚夫的理由对于要求臣下绝对忠诚的皇帝非常具有说服力，但是为了对付匈奴，为“劝”匈奴阵营中欲降者，景帝不惜暂时搁置对“忠诚”伦理要求的一贯性。后来浑邪王降，汉武帝发车两万乘迎接浑邪王部进长安，“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并贬黜了批评这种做法的汲黯，阎盛国评价说“汉武帝也借隆重迎接浑邪王降汉的场面表达了自己欢迎胡人归附，同时也巧妙表达了自己愿意招降匈奴部族军民的潜在用意。侧面也表明汉朝招降胡人的态度是积极的，是明确无疑的”[190]。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汉，武帝立即派公孙敖筑受降城，派赵破奴率二万人接应；后来左大都尉谋泄被杀，赵破奴的二万军队也没于匈奴，损失惨重，却表明了汉朝不惜代价招降的态度，给匈奴权贵阶层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他们在内部斗争失利后，归降汉朝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地位越高，带领的部众越多，给予的待遇也将越高。匈奴经过五单于争斗后形成郅支与呼韩邪并立的局面，处于南部的呼韩邪处于弱势，随时面临被郅支吞并的危险，诚如力主臣汉求助的左伊秩訾王所说：“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191]呼韩邪部附汉后，得到了汉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与郅支部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优势，郅支率部更往西迁徙，希望在西部发展，不料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发诸国兵[192]，攻没北匈奴，郅支也被悬首槁街。

围绕接待呼韩邪来朝的礼仪问题，汉廷进行了一次讨论。当时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认为“匈奴单于乡风慕化，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的意见是“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叛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193]。萧望之提出待呼韩邪以“不臣之礼”，这样的话即使后世呼韩邪子孙不再朝享，中国也不会背负讨伐“叛臣”之累，这是一种基于传统儒家夷夏之辨的考虑[194]。班固认为对待“夷狄”“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所以应该采取的方针是“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

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95]。“羁縻不绝，使曲在彼”，与萧望之意见的精神是一致的。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萧望之和班固的意见是封闭式的夷夏观，这种意见在当时并不是主流，汉朝实际的政治举措要积极主动得多，因为传统的王者无外、一乎天下的政治理想对于皇帝们的吸引力更大。汉代实际执行的“羁縻”政策与萧望之、班固所论有一定的差别，萧、班二人所持观念近于“文化区域分治观”，但在两汉时“华夏本位观”占主导地位，诚如孙家洲先生所论：“华夏本位观，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理念，它的本质不在于对非华夏文化给以排斥，而在于安置一个恰当的位置——自然是从属于华夏文化的地位。”[196]汉家实行的“羁縻”，是建立在华夏本位观的理念之上，意义深远，“汉代的羁縻理论付诸实践，使国家在其原有领土的范围之外，造成了新的文化影响区域。在这一范围内，国家的主权或许表现得并不充分，实际控制力的强弱也因时而异；但它对国家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它可以是消力池，用以化解周边各族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它可以是缓冲带，用以减轻边患对内地的震撼；它可以是中转站，用以保证由文化影响区向国家领土的平稳转移。”[197]这种观念与传统的天下一家观念是一致的，纳入汉家天下秩序中的边疆民族与政权，与汉朝皇帝之间均是某种程度的“君臣关系”，而不是敌匹国家之间的“不臣之礼”。

记载了萧望之的意见后，史书继续写道：“天子采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198]这段节录的诏书十分令人费解，需要仔细梳理。“天子采之”，意思是说宣帝决定对呼韩邪采取“客礼”。“客礼”实质上是一种“不臣之礼”，汉献帝禅让后，“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199]。因为曹丕曾是汉献帝之臣，现在受禅为皇帝，但是不将汉献帝视为臣，而是视为魏的宾客。后来晋受魏禅，封魏帝为陈留王，“诏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200]。《通典》卷74《礼三四》“三恪二王后”记有：“又诏王上书不称臣，答报不为诏，一如宾礼。”[201]如此看来，宾礼就是客礼，“客礼”与“不称臣”是对应的关系，待之以“客礼”的首要要求就是“不称臣”。

宣帝开始的时候接受了萧望之的建议，诏书中说“其以客礼待之，令

单于位在诸侯王上”，既然以“客礼”待单于，单于就不应对宣帝称臣，“客礼”意味着宣帝与呼韩邪之间并没有形成君臣关系；但是后文又紧跟着说“赞谒称臣而不名”，根据尾形勇的研究，“不名”只是一种殊礼的形式，是相对于“臣某”的称臣又称名的形式而言的，但还是一种称臣的形式。[202]这里让单于“称臣”，显然又是将呼韩邪视为“臣”了，只是给予了“不名”的特别礼遇而已。新莽末年卢芳请求匈奴援助，单于说“匈奴本与汉约为兄弟。后匈奴中衰，呼韩邪单于归汉，汉为发兵拥护，世世称臣”[203]。类似的话单于对更始使者也表达过：“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204]如此看来，呼韩邪对汉称臣是没有问题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待以“客礼”呢？对于这段令人费解的记载该如何看待呢？尾形勇提出一种解释，即在甘露二年冬十二月讨论的时候，当时汉宣帝接受了萧望之的意见，发诏书宣布以“客礼”待单于，但是很快宣帝改变了主意，决定令呼韩邪称臣，所以又发布了第二道诏书，最终的实际情况如《汉书·宣帝纪》中记载的“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就是《汉书·萧望之传》说的“称臣而不名”。以上那个令人费解的段落，如果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份诏书，则是漏了一个字，即“称臣而不名”应该是“不称臣而不名”，又或者“赞谒称臣而不名”是衍文；但如果是第二份诏书，则是漏掉了关于宣帝更改主意的相关记录[205]。

宣帝最终的决定表明他不希望将匈奴视为一个“敌体之国”，无论如何，匈奴的单于来朝见中国的皇帝了，要在长安的宫廷中通过“称臣”礼仪与皇帝结成君臣关系。无论其位次在诸侯王之上还是之下，一来，他自己已经做不了主了，都得听凭汉廷安排，即使位次在诸侯王之次亦无可奈何；二来，礼仪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和敏感的作用，汉朝的元会仪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这样特殊的场合，所有参与者都通过特定的礼仪与皇帝构成并强化某种“君臣关系”。实际上这次朝见，单于对皇帝“称臣”了，只是汉廷给予他“不名”的礼遇，这标志着汉朝将匈奴纳入自己的天下体系中了。

栗原朋信从汉代“内臣”和“外臣”有别说起，把服属的周边族群置于帝国内君臣关系外延的位置上来研究[206]，给我们极大的启发。无论是内臣还是外臣，都是与皇帝缔结了“君臣关系”。皇帝依靠“策名委质”的方式与官员建立君臣关系，以“二十等爵制”与一般的编户民建立君臣关系，这是内臣部分。与外臣，即臣服的边疆少数族群政权，君臣关系的确立依靠册封和朝贡。西嶋定生指出，在古代东亚存在着一个以中国王

朝为中心的册封体制[207]，受册封的外邦君主的义务是向宗主朝见和贡献。甘怀真认为："在一般正常的运作下，朝贡是外邦君主或其使节向中国天子献上礼物，而中国方面通常都会有更丰厚的回报；册封则是一种'名的授受'，中国方面授与外邦君主一个'名'，如王爵。而外邦君主之'臣名'也会被 登录在中国皇帝的名簿中。朝贡与册封的意义同于本书前文所论的'策名委质'，故'称臣'是这二项行动的关键。推而言之，中国方面所执着者是外邦君主须借由中国方面所认定的仪式，向中国天子称臣。对于中国方面而言，这种以君臣关系为主要内涵的礼仪本身的实践即为权力的本质。在许多时候，中国愿意付出物质资源以交换礼仪。总而言之，古代中国方面在东亚政治秩序的操作中，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建立君臣关系的秩序，且此关系是借由礼仪来表达。"[208]甘怀真所论鞭辟入里，这里再补充两点。第一，同样在册封体系中，因为距离的远近与控制力的强弱，各藩邦与汉朝联系的紧密程度有不同，这种不同是通过"名"的区别来显示的；第二，册封关系建立的仅是皇帝与外邦君主个人的"君长人身统治"，汉朝与整个外族的关系类型由皇帝与其君长的关系类型决定，君长仍然拥有治理其族其邦的自主权。[209]

西州地区归附汉朝的羌人和匈奴的部落头领，都依靠册封与朝贡的方式与皇帝结成了君臣关系，范明友率领的"羌王侯君长"，就是接受了汉朝册封的首领。被纳入属国的羌人或者匈奴人，虽然仍然保持着部落组织及其首领，依其故俗而治，但是汉朝派遣了属国都尉进行管理，属国都尉的权力越来越大，属国蛮夷的自主权逐渐被剥夺。汉朝安置浑邪王部的时候，就是强行将其拆成五部分，浑邪王则被安置在内地。护羌校尉总领羌人事务，开始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使职性质，理怨问苦，侦查异动，到后来又演变成专门镇压羌人叛乱的领兵将领。整个西州的行政建制与管理形式多样复杂，除了郡县体制的管理系统外，还有屯田系统、属国系统、护羌校尉系统，它们的头领是皇帝的"内臣"；此外，分布在边塞区域的表示臣服的各部落君长，是"外臣"。

[1] 管东贵：《战国至汉初的人口变迁》，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四分，1979。葛剑雄推测汉初的人口大约有1200万左右，参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第47页。

[2] 宋超：《汉匈战争对两汉社会心态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3] 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106页。

[4] 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139页。

[5] 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第6页。

[6]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31页。

[7]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30页。

[8] 方宗诚：《贾生论》，载《柏堂集》前编，转引自王子今《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9]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40页。

[10]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41页。

[11] 王子今认为后来匈奴的分裂衰落一一如贾谊所言，说明了贾谊预见的准确，这样说有些勉强。正确的预测是建立在对事件变化真正因素的理解的基础上的，而匈奴后来的分裂，主要原因在于匈奴自身，而不是贾谊的三表、五饵之策，从贾谊的政论中，我们其实看不出他对匈奴的实际情况有多么了解，他的预言，只是“偶中”而已。参见王子今《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12]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65页。

[13]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81页。

[14]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85页。

[15]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230页。

[16]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33页。

[17]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83页。

[18]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88页。

[19] 雍秉乾：《略论西汉文景时期对匈奴的积极防御政策》，《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20]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5页。

[21] 李开元对汉初的军功集团有专题研究，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

[22] 汉代马政的研究，参见汪受宽《两汉凉州畜牧业述论》，《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4期。

[23]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31页。

[24]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25页。

[25]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4页。

[26] 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第31页。

[27]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262~266页。

[28]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40~141页。

[29] 有研究者将草原地区的灾害分为“突发性灾害”和“缓变性灾害”两种，前者包括干旱、暴风雪冷冻、雷暴、狼害、蝗灾、瘟疫。后者如气候干冷化带来的草原退化沙漠化、环境污染等。草原自然灾害的特点是：（1）种类不多但是破坏形式多样，有一连串次生、衍生灾害；（2）频率高、持续期长、强度大；（3）季节性、关联性、群发性、并发性，危害特甚。参见梁景之《自然灾害与古代北方游牧民社会关系刍议》，载罗贤佑主编《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萧启庆先生也谈到了因为环境产生的经济匮乏导致侵略的问题，“草地对牲畜的包容力随气候而增减的幅度之大，实超出我们农耕社会人民想象力之外。换句话说，在一定面积的牧地上，如遇气候良好，水丰草美，几年之内畜群便可增殖一倍以上。如雨量减少，牲畜必因乏草而大量死亡。此外，对于瘟疫、风雪等意外，也缺乏适当的应急办法，牲畜死亡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参见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载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第304页。

[30] 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载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313页。

[31]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9页。

[32]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第3780页。

[33]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797页。

[34]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17页。

[35] 逯耀东：《对匈奴问题处理的限制》，载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三联书店，2008，第209页。

[36]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第3755页。

[37] 也有学者认为“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表达的意思并不是对寡居女人的求婚，而是在汉匈双方经济结构互补的情况下提出的贸易要求。或认为请婚并没有侮辱的意思，而是从匈奴习俗出发的，甚至认为有利于民族团结。参见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第一章；蔡敏慧：《冒顿请婚再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彭年：《冒顿请婚

新议》，《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些牵强，观看吕太后之复书，很明显是拒绝求婚的意思。吕后回信说："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第3755页。

[38] 《史记》卷一百零八《韩长孺列传》，第2861页。

[39]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2页。

[40]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第403、415页。

[41]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0页。

[42]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1页。

[43]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第4页。

[44] "文化区域分治"是孙家洲先生所做的一个概括，参见孙家洲《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泰山出版社，2001，第101页。

[45]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1页。

[46]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1页。

[47]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2页。

[48]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3页。

[49] 邢义田：《汉武帝在马邑之役中的角色》，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145页。

[50] 《史记》卷一百零八《韩长孺列传》，第2864～2865页。

[51] 逯耀东：《〈匈奴列传〉的次第问题》，载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第167～170页。

[52]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6页。此处的"二十六国"，当为"三十六国"之误。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9页。

[53] 贾文丽：《汉代河西军事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1，第37页。

[54] 卫青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当苏建建议他接纳推荐贤者时，卫青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且少言不泄。见《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46页。

[55]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41、2945页。

[56]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3页。

[57]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6页。

[58] 林幹：《匈奴史》，第48～49页。

[59]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7页。

[60]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7页。

[61]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8页。

[62]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9页。

[63]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7页。

[64]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56～57页。

[65] 王庆宪：《匈奴与西汉关系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3，第155～156页。

[66]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1～1422页。

[67]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61页。

[68] 目前只见贾谊考虑过这一问题，他设想制伏匈奴后，要匈奴为汉守边，防备月氏等，但是汉武帝时期，并没有人重提这一建议。

[69]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4页。

[70] 欧文·拉铁摩尔、狄宇宙均提出这个观点。

[71] 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载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第9页。

[72]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183页。

[7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3页。

[74] 据唐晓峰1970年代的调查，认为“高阙塞”在今狼山中部的石兰计山口，参见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5期；2005年经过魏坚与中央电视台摄制组的考察，基本确定乌拉特后旗狼山南麓达巴图沟口西侧的南北两个小城之北城是赵武灵王修筑的高阙塞，参见魏坚《河套历史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载王建平主编《河套文化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75]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86页。

[76]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5期。

[77]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1页。

[78]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唐先生还指出，“两条长城的走向和所利用的地形基本相同，修筑和保存的情况也很一样，长城内侧的小城又具有共同的形制特点。我们推测，这两条长城是在同一个时期内修筑的。因为，走向相同，正说明军事斗争的形势相同，如不是修筑于同一时期，很难有这样的巧合。修筑形制一样，正说明它们出自同样的营造图式。同时筑起两条长城，为的是加强防御的能力”。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对位于乌拉特后旗的这两条长城进行了考察，指出“两条长城东西延伸，南北并行，相距3～40公里不等。两条长城均东起今武川县境内，向西经固阳县、达茂联合旗和乌拉特中旗，在乌拉特后旗境内折向西北。其中南线长城终止于乌力吉苏木的沙日扎嘎，总长约400公里；北线长城则穿越蒙古国境内，再折向西南，与今额济纳旗境内强弩都尉路博德所筑之居延塞烽燧相接”。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共乌拉特后旗委员会宣传部编《阴山沧桑：乌拉特后旗历史文化遗存调查报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第71页。

[79]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11页。

[80]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8页。

[81]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59页。

[82]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第167页。

[83]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38～1439页。

[84] 吴礽骧：《河西的汉代长城》，《文博》1991年第1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第159～161页。

[85]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48页。

[86]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03～3804页。

[87]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08页。

[88] 王子今：《论西汉北边“亡人越塞”现象》，载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第83页。

[8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第459页。

[90]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05页。

[91]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1页。

[92]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第1158页。

[93] 《汉书》卷六十四上《主父偃传》，第2800页。

[94] 谢桂华等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第607页。

[95] 沈颂金：《汉简所见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及其相关问题》，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编《简牍学研究》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96] 王子今：《汉代河西长城与西北边地贸易》，载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第30页。

[97] 管东贵：《汉代的屯田与开边》，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一分，1974。

[98] 管东贵：《汉代的屯田与开边》。

[99] 杨际平：《西汉屯田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引文序号格式与原书不同，从本书格式。——作者注）

[100] 乡是主管收取赋税的基层单位，乡啬夫承担着关键责任，参见邢义田《汉代案比在县或在乡》，载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

[101] 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第22～24页。

[102] 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吕宗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3]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1～2962页。

[104]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0页。

[105] 但是公孙弘毕竟是一个圆滑的人，不肯力争此事。

[106]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8页。

[107]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第1162页。

[108]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11页。

[109]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39页。杨际平怀疑这里的“六十万”数字的真实性，认为当时汉朝国力无法承担这样规模的戍田卒，“六十万”或为“六七万”之误，或者衍一“六”字，其实是“十万”，抑或衍一“十”字，其实是“六万”，参见杨际平《西汉屯田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110]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第3912页。

[111]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86页。

[112] 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吕宗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其中引文有误，为与原文保持一致，不做修改。

[113] 王骏：《汉书正误》，转引自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28页。

[114] 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第2页。

[115] 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绪论第2～4页。

[116] 当然，他的内改制度、郊祀封禅、兴作宫室等也花费巨大，唯我们难以比较孰多孰少。常理推断，对外战争的影响面应当更广，耗费更多。

[117]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第191页。

[118]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188页。

[119]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0～1421页。

[120]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2页。

[121]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2页。

[122]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第2页。

[123] 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另外，吕世浩《平准与世变——〈史记·平准书〉析论》一文对汉武帝的财政政策与当时世变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考论，《燕京学报》新十二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24]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41页。

[125] 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126]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132页。

[127] 《汉书》卷五十一《路温舒传》，第2369页。

[128]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3151页。

[129]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3151页。

[130] 陈启云：《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载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陈启云文集》（二），第186页。陈先生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出于对汉代地方豪族地主实力的一个估计，他批评了许倬云的观念，许氏认为汉代的佃农比例很小，绝大多数是独立的小农，而陈氏认为，汉武帝时，至少有60%的土地在地主的掌握中，关东地区的乡里地

主势力很大，汉朝中央权力并不能绝对控制。

[131]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中华书局，2011，第736页。

[132]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辛德勇对田余庆论断的发难，引发了学界的一场激烈争论，相关论文和综述已有，不再赘述。本书的意见是，辛德勇的责难并不能成立，不能够驳倒田余庆的意见。参见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三联书店，2015。

[133] 《汉书》卷六十《杜延年传》，第2664页。

[134]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33页。

[135] 施丁：《秦汉豪族的呼声——读桓宽〈盐铁论〉》，《学术月刊》1999年第11期。施先生的这篇文章对《盐铁论》及盐铁会议的分析非常深刻，但他认为贤良文学们是豪族利益的代表，笔者不能认同，贤良文学们不一定是豪族利益的代言人，只是他们的主张客观上可能有利于豪族而已。贤良文学们提出如此主张的时候，并没有为豪族争取利益的预设。

[136] 徐复观：《〈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载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04页。

[137]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第293～303页。

[138]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139]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262页。

[140]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69页。

[141]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142] 管东贵、任乃强都持这样的观点。

[143] 林梅村持这种观点，参见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14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46页。

[145] 李绍明、黄烈、杨建新、马长寿、俞伟超、王俊杰等均有相关研究。

[146] 转引自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5页。

[147]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李亦园序。

[148] 佐藤长：《羌族的来源及其在前汉的活动》，梁今知译，《青海师范学院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149]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215页。

[150]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233～234页。

[151]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94页。

[152] 杨永俊：《论两汉时期羌汉战争中的“羌中之利”》，《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

[153] 周宏伟：《两汉时期河湟地理环境探索——兼论汉羌战争的主要原因》，《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154] 杨永俊：《论两汉时期羌汉战争中的“羌中之利”》，《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

[155] 王宗维：《秦汉时期匈奴与西羌的关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156]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6页。

[157] 日比野丈夫认为汉代开拓河西四郡，最先建立的其实就是以令居为中心的河西郡，见日比野丈夫《论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辛德勇等译，中华书局，1993。

[158] 谢绍鹢：《两汉护羌校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7。

[159]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6页。

[160] 关于护羌校尉设置的年代，学界尚有争论。

[161]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30页。

[162] 谢绍鹢：《两汉护羌校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7，第23页。

[163] 关于汉代使者的研究，参见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164]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8页。

[165]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第849页。

[166]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73页。

[167]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72～2973页。

[168]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73页。

[169] 杨永俊：《论西汉的“隔绝羌胡”政策对两汉西羌之“祸”的影响》，《宜春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170] 李大龙：《“屯田”并非赵充国治羌政策的核心内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

[171] 杨永俊：《论西汉的“隔绝羌胡”政策对两汉西羌之“祸”的影响》，《宜春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172] 《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第3300页。

[173]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7~2878页。

[174]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第4077页。

[175]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第4077页。

[176] 阎步克：《王莽官制改革新论》，载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初编》，三联书店，2007。

[177] 李零：《王莽虎符石匮调查记》，《文物天地》2000年第4期。

[178]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第4087页。

[179] 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载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后收入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薛海波：《试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羌》，《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80]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52~53页。

[181]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80页。

[182] 张得祖：《〈三老赵掾之碑〉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83] 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关于地方守令出行的政治意义，薛小林《从车驾出行看汉代地方官员的礼仪与权力》（《理论学刊》2011年第1期）中有详细的讨论。

[184]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2页。

[185]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57页。

[186] 李大龙：《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187]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209～220页。

[188] 牧仁：《再析匈奴分裂原因》，《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89] 《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2078页。

[190] 阎盛国：《秦汉时期招降战略战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第115页。

[191]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797页。

[192] 孙家洲：《“矫制”研究》，载孙家洲主编《秦汉法律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93] 《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第3282页。

[194] 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

[195]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34页。

[196] 孙家洲：《两汉政治文化窥要》，第106页。

[197] 孙家洲：《两汉政治文化窥要》，第109页。

[198] 《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第3282～3283页。

[199]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第390页。

[200] 《晋书》卷三《世祖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第52页。

[201]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第2026页。

[202] 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第136页。

[203] 《后汉书》卷十二《卢芳传》，第506页。

[204]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29页。

[205] 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141页。

[206] 转引自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138页。

[207] 转引自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学术研究》2008年

第8期。

[208] 甘怀真：《所谓“东亚世界”的再省思：以政治关系为中心》，载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511～512页。

[209] 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0页。

第三章 汉化与胡化：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 西州的经济开发：农业的有限成长与牧业的优势发展

（一）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经营西域对西州开发的意义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与大月氏联盟以夹攻匈奴，虽然张骞“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但发现了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1]张骞回国时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刚刚开始，胜负尚未可知，但是关于西域的信息已经激发了汉武帝致重译殊俗、布威德于四海的万丈豪情。河西之战汉朝将匈奴势力赶出河西后，张骞在元狩四年（前119）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他肩负了双重任务，第一是招乌孙东归河西故地，但是乌孙畏服匈奴，不欲移徙，张骞又不得要领。但乌孙以马数十匹报谢，并遣使数十人同张骞一起回国以窥探汉朝实力。出使的第二个目的，正是张骞向武帝所说的“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2]。张骞这次出使“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3]。派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4]

从此之后，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联系，但是“通”西域只是第一步，为“开”西域和“臣”西域奠定了基础。西域诸国此时都处在匈奴的统治下，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掌领西域，不但可以从西域各国获取大量农产品物资和铁制兵器，还控制着中国与遥远的西方之间经由西域的大规

模过境贸易。[5]汉廷清楚西域对于匈奴所具有的军事和经济意义，所以决心展开对西域的争夺，以断匈奴之右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建设作为通道和后方基地的河西。孟宪实指出汉朝此时主动经营西域具有多重目标："既有围困匈奴、减少匈奴西部之援的目的，又要切断羌胡联系的传统战略；又联络西域诸国，即使不能建立反匈奴联盟，但至少保证西域不要成为匈奴的帮手；联络西域，供应中国，而汉武帝对天马的热情则代表了汉朝的态度；更长远的政治目的是外臣西域，实现中国古人的徕远夷的理想。"[6]

张骞之后汉朝掀起了通西域的热潮，"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7]"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8]这个向西探索的热潮显示了西汉时期国风和民风的强健和勃勃生机，西域对于汉人来说是一个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的陌生异域，当时的交通和技术条件非常有限，长途出使极其艰险困苦，"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汉朝此时在西域之兵威未立，西域之国时常"禁其食物以苦汉使"，甚至拘禁、攻劫汉使，而且"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所以出使是一项需要特定的才能与素质，也需要勇敢和冒险精神的事业。[9]在张骞事例的激励和武帝政策的鼓励下，前赴后继的使者们展现了冒险和探索精神，孟宪实称赞道："这些很混乱很不正规的做法其实推动了汉朝对西域的经营。这种状况，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对外的基本态度，不论是皇上还是一般吏卒，因而可以与大航海初期的欧洲状况相比美，而与清朝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情况相反。这里贯穿着一种十分积极的态度和探险精神。"[10]他对西汉人展现出来的探索、开放和无畏精神，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西进"的热潮在李广利征伐大宛的时候达到最高潮，伐大宛是汉朝逐步经营西域的必然结果。跟随张骞回国的乌孙使者及随着众多副使到汉朝的西域各国使者，虽然见到汉朝的广大富厚，开始重视汉朝，但是汉朝在西域尚未建立实际的政治与军事影响，而匈奴设有僮仆都尉掌领西域，居于焉耆、危须、尉黎之间，匈奴的骑兵可以通过姑师的通道随时兵临西域各国城下，西域诸国畏服的仍然是匈奴，所以汉朝的当务之急是将实际的政治军事力量伸入西域。元封三年（前108）汉朝实施了对西域国家的首次进攻，赵破奴率军很轻松地夺取了楼兰和姑师，楼兰

地处西域南道与北道的交会处，且时常留苦汉使；姑师是匈奴的忠实盟友，地处从天山以北地区进入以南地区的孔道，汉朝控制了此处，向西可以威慑西域诸国，向北则控扼匈奴进入西域的通道。为了维持住这一胜利成果，汉朝在河西的亭隧系统自酒泉延伸到玉门。正如田余庆指出的，汉朝向西推进的程序是首先占领据点，然后在据点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11]，此时汉朝占领了楼兰、姑师两个据点，然后将亭障修到了玉门，而大汉国威则宣扬到姑师以西的区域，乌孙此后不久以千匹马娉汉女请婚就是这一战役影响的结果。

元封以后，匈奴帝国的重心移向西北，西域诸国感受到的匈奴压力增大，乌孙昆莫又娶了一个匈奴女子为夫人，以汉女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乌孙很可能与匈奴一样以左为尊，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汉朝在联姻战线上并没有真正赢得第一个回合”[12]。大宛以西的国家“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13]，单于使节凭一信，则各国传食送行，不敢怠慢，而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形成鲜明对比。武帝对此早已不满，加之遣使者往大宛求宝马不得，促成了李广利第一次远征大宛。大宛人认为“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14]。他们的有恃无恐是有道理的，李广利率领的属国六千骑和郡国恶少年万余人，尚未到达大宛王都就剩下不到数千人，险恶的戈壁荒漠造成的军队减员非常严重。在郁成惨败后，李广利撤军，还至敦煌时士不过十之一二。震怒的汉武帝发动了规模更加浩大的第二次征伐。

> 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驼）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15]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能充分感受到武帝的愤怒和他不惜代价对大宛势在必得的决心。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第二次远征征服了大宛。征服大宛是汉朝势力在西域的第二次推进，接着以大宛为据点，要向更西的地方宣扬威德，在后方修建亭障，“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

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16]。汉朝的交通线、供应线修到盐水，在仑头进行屯田，并大力在大宛以西的国家宣扬天朝兵威。

经营西域的军事行动带动了河西的建设和开发。因为河西走廊是中原与西域沟通的孔道，同时又面临匈奴与羌人南北两面的威胁，汉朝为了保障这条通道的安全，并供应来往使者、商团和军队，必须在河西修筑亭隧塞防、屯田移民、建城设郡。随着河西的发展，这里渐渐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每一次向西域出兵，均会带动河西地区交通的发展和经济的建设，特别是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时，六万人的军事人员，大量的负马私从者，还有不计其数的后勤转运者，牛十万、马三万，驴骡橐驼（它）以万数。张春树感叹道：“这是何等的一个局面，真如司马迁所描绘是天下骚动了，而忽然之间河西竟成了汉家历史的中心，为举天下所注目之地。这样的局面当然是加速了对河西的大开发了，流民随之而去者日增。”[17]此时在河西发生了所谓的“抽水机”效应，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从帝国的各个地方抽取到这里，这种经营和投入的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的，河西成为此时段历史的重心和焦点，以至于研究者感叹道，此时河西成为汉家历史的中心了。汉朝的势力随着这次征伐已经深入到西域内部了，汉家的亭障也越过敦煌到达盐水。另外，为了防止匈奴在李广利出征期间突袭后方，汉朝派出十八万戍卒在酒泉、张掖北修筑了居延和休屠两大南北走向的亭隧系统，扼守匈奴进犯河西的主要通道。居延和休屠的建设，不仅保障了河西的安全，也加速了河西的经济建设，这两个亭隧系统均设有屯田，而且随着移民和流民往居延和休屠的迁徙，一部分屯田配给平民耕种，最后设置了乡里县邑，如位于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县及位于今民勤附近的宣威市。

征服大宛的战争对于河西的发展意义重大，“敦煌已不再是汉家疆域的最前线了，其地盘在逐渐扩张，人口增加，汉廷便于太初末在敦煌设立了酒泉都尉以指挥管理一切。至此作为河西郡最西的敦煌郡初型已定。另外就全河西地域而言，在这次战争中它与内地的交通和联系都增进了许多，而其开发亦随之加速，河西从此便逐渐巩固下去了，因为不断地移民——包括有计划的移民与流民二者，河西也逐渐趋向繁盛。河西的初步开发工作至此完成”[18]。张春树指出正是在此时，汉朝人对于河西有了一种“国土”的感觉，这种判断真的是非常精到。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对西域的经营，没有不惜代价的人力物力投入，河西的发展会是

多么的迟缓和无力，西域的经营恰恰为河西的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将全国的人力和资源汲取到西北一隅来。此为西域对河西的第一个方面的意义。

经营西域对于河西还有第二个方面的意义，西域对河西起到安全拱卫的作用。昔人论天下战略大势有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19]西域对于保障河西的安全来说非常重要。汉朝的主要敌人是匈奴，进占西域则切断了匈奴右臂，并使之失去进攻河西的跳板，匈奴就弱，威胁就小；反之，如果西域被匈奴占领，匈奴可从西域诸国获取资源，且据有可随时进犯河西的战略要地，匈奴则强，河西则危。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班勇在劝说朝廷不要放弃对西域的经营，并建议设置西域副校尉时说：

> 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20]

西域是匈奴的府藏和手臂，如果放弃，则是将府藏归还给匈奴，将断臂给匈奴接上，则"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强调了西域对于河西郡县"国防"安全上的意义。东汉安帝延光三年（124），针对敦煌太守张珰的西域三策，尚书陈忠议曰：

> 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赀之费发矣。[21]

陈忠强调了如果西域复归匈奴则"虏财贿益增"，还指出匈奴势盛后可能造成胡、羌的再次联合，使得汉家长期执行的"隔绝羌胡"政策走向失败，一旦如此则河西四郡就立刻暴露在匈奴的攻击范围之内，危殆甚矣。张珰说："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22]河西与西域的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班勇、陈忠和张珰的分析可谓淋漓尽致。

河西是西州的西部地区，既是汉朝经营西域的指挥部和后勤基地，也是联结西域与汉朝腹地的主要通道。一旦西州发生叛乱，局势不稳，汉朝就将失去经营西域的跳板和补给线，而且还要耗费军力物力去平定西州的叛乱，使得经营西域的力量更加捉襟见肘，将严重影响汉朝对西

域经营的力度和成效。东汉时期国势渐微，国家能够掌控和动员的资源减少，而且武备不整，不教民战，对外经略不再像西汉那样积极有力；西州的“羌患”频繁，汉廷应对失策，西州局势渐坏到不可收拾之程度，汉廷与西域的联系变为“三绝三通”状态。有学者指出东汉与西域的“绝”或“通”，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外，与由“羌患”带来的西州摇荡和陇道中断有很大的关系。凡是与西域关系断绝的时候，均是西州局势动荡、交通断绝的时候；一旦西州的局面得到控制，东汉朝廷还是会采取有限的措施去经营西域，力图恢复对西域的控制与影响，虽然不再像西汉那样不惜代价地全力以赴。比如章帝罢伊吾屯田，放弃西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建初元年爆发了羌人的叛乱，烧当、封养、烧何、当煎等种落寇乱陇西、金城、汉阳等地，东汉朝廷此时需要收缩战线，调集兵力镇压羌乱，所以不得不暂时放弃西域；而“班超打通西域这一时期，正是东汉镇压西羌起义接近尾声的时期，这样，东汉政府不仅又可以从中原抽调军事力量重开西域经营，而且可以利用河西甚至西羌的力量去支持西域”。同样的，安帝永初年间放弃西域，是因为征发去远征西域的金城、汉阳、陇西羌人，不但没有派到西域，反而逃叛并激起羌人第一次大起事，西州动乱，汉朝自然没有力量越过西州去经营西域。[23]所以，西域与西州的战略关系是相互的，“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同样，如果欲开西域，自然要先固河西。

（二）西州的农业开发以及牧业和贸易的发展

河套地区的农业开发进行得比较早，秦始皇斥逐匈奴后，“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24]。不久后又迁徙三万家到此，大量中原农人的移入自然开垦了一定规模的农田，建造了若干水利设施，秦人称此处为“新秦中”，可见这里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不错的成就。秦在此新疆土内设置了44个县，由于边疆地区特殊的军事和社会形势，44个县大致就是44个城塞。高贝贝指出，在长城地带，发展模式一般是城镇先于农村，城镇重于农村，城镇更多地受到商业而不是农业的支撑，城镇显示自身的意义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功能。[25]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晁错的移民策非常注重营造城郭，谪犯、移民居住在城内或者城堡附近，平时则开垦附近的土地，一旦胡人来犯则聚保城中，发挥城塞的防御功能。随着秦朝政权的崩溃，北边防御体系瓦解，匈奴重占河南地，边民要么逃回内地，要么陷于匈奴的统治之下。匈奴重占河南地之后，是将此处一概恢复为牧场，还是保留了

一部分农田，役使汉人耕种，因为缺少直接的记载而难以论断，但我们推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匈奴可能保留了部分农业及城镇，作为游牧经济的补充。但无论如何，河套地区的农业发展肯定是出现了倒退。

待到一步步推进对匈奴的战争，通过河南之战夺回河南地后，汉武帝决心设置朔方，徙民10万口，这次移民没有依照首先屯田，待奠定一定生产基础之后再移民的程序，而是采取直接移民、一次性到位的方式。[26]以这种方式同时募徙10万口会使朝廷承受沉重的财政压力，故而受到群臣的反对，但汉武帝仍一意孤行。他之所以如此坚持，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地的战略位置太过重要，占领此地既拱卫了首都，也为进攻匈奴提供了跳板[27]，所以必须尽快加强控制；二是河套地区水土条件优越，在秦朝时期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农业生产基础，虽然匈奴人重占此地对之前的农田水利设施有一定的破坏，但是仍保留了一定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还能够动员人力修缮荒废的部分。

开发西州最关键的因素是移民，古代中国人安土重迁，移民恰是最易引起动荡的措施。淮南王刘安策划反谋时，伍被献计曰：

> 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田地广，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臣之愚计，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傥可徼幸什得一乎？[28]

淮南王事发在元狩元年（前122），开始往朔方移民在元朔二年（前127），伍被献此计应该就在元朔二年至元狩元年这五年之中的某个时候，伍被建议伪造朝廷政令，迁徙郡国豪杰任侠和耐罪以上者的家庭移徙朔方，借此制造民间的恐慌和骚乱。谣言能够流行，是因为有其流行的社会土壤，伍被建议伪造之政策必须有可信的因素，才可以蛊惑和动摇人心。伍被之策可从三个方面分析：首先，百姓安土重迁，轻易不会离开故土，豪杰任侠更是不愿意迁离自己的势力根基，强制催调会引发社会骚动；其次，朔方田地广，水草美，首次迁徙的10万人满足不了开发和巩固这里的需要，可以预见进一步组织迁徙是很可能的；最后，朝廷强制移民的对象包括罪犯、豪侠和富人，罪犯一般犯有死罪，减死一等发配边地，伍被将迁徙的罪名扩大到耐罪以上，是希望能够引起更大的恐慌，以便利用。

初期阶段西州地区汉族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移民。元朔移民10万人

之后，元狩四年（前119）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五千口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当时关东大水造成严重的流民问题，政府乘机将这些流民安置到边疆地区，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补充了大量的人口，均是中原地区习于农事的农民。《汉书·地理志下》："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29]，可知移民到边疆地区的人口多来自关东地区。此外屯戍的士兵大部分占著边区，再加上发配的罪犯和自发的移民，到平帝元始二年，朔方刺史部各郡人口分别为：北地，210688人；上郡，606658人；朔方，136628人；五原，231328人；西河，698836人，共计188万余人，绝大部分是移民和军人及其后裔。汉朝向陇右、河西移民的方式和移民来源与朔方的情形相似，只是规模不如那般大，而且移民的过程也较为缓慢，这大概与陇右、河西的地理位置更偏远，以及汉朝财政的紧张有关。东汉以后没有大规模往边疆地区移民的记录，一般情况下都是"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30]；"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诣敦煌、陇西及度辽营"[31]；"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32]。基本都是死罪者减罪一等，发配边地，开始的时候妻子自随尚是自愿，后来变成强制的，每次以这种方式迁入边疆地区的人口可能并不多。南匈奴的投降使得汉朝的西边、北边边境安宁，"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33]。在这种安定的环境中，西州地区人口、经济和地方社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平帝元始二年，凉州刺史部各郡人口分别为：安定，143294人；天水，261348人；陇西，236824人；金城，149648人；武威，76419人；张掖，88731人；酒泉，76726人；敦煌，38335人，共计有107万余人，加上朔方刺史部的 188余万人，西州的人口接近300万。而且这些仅是郡县掌握的登入户籍的人口，西州地区尚有大量未载在户籍册的流民、部曲、奴婢、游牧民、驻防士兵和各路使团、商旅，加上这些，活动在西州的人口数量就更多了。人力资源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朝廷不断向西州输入的人口以及由于地方安定、生产发展而带来的人口繁衍和增长，是西州开发和繁荣的基础。

西州的繁荣和发展，体现在农业、牧业和商业三个方面。

西州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方面是水利灌溉设施的修建，另一方面是农田的开垦和先进耕作技术的推广。水利工程是农业的命脉，对于西州地区更是如此。西州之所以能够发展农业，并不是因为降水、气温、日

照、土壤等天然条件非常适宜，而是因为这里有充足的天然淡水资源可供引渠灌溉，朔方地区的黄河及其支流水量充沛，还形成几个大湖泊；河湟地区也是水道纵横，水源充足；河西地区祁连山融化的冰雪为河西走廊中的大小河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流。西州农业的发展，就是建立在以这些水源为基础的灌溉设施发达的基础上，可以说没有引水灌溉，就没有西州的农业发展。武帝夺得河南地后，募10万人筑朔方，“筑”者，除了修筑城池塞防外，想必也包括修缮秦时的水利设施和新建一些水利工程，否则移民将无法开展农业生产。漠北之战后，“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34]。这里的记载很能说明问题，“置田”之前必须“通渠”，修建了水利设施才能“置田”。河西地区是论水不论地，在西州地区水利与农田的关系密不可分。

关于汉代河西地区的水利设施，《汉书·地理志》记载有张掖觻得的千金渠、敦煌冥安的南籍端水和龙勒的氐置水，这些工程“溉民田”，是发展农业的保障。除此之外，高荣根据敦煌文书和汉简材料，考证出多个水利设施。（1）敦煌马圈口偃（据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2）汉昭帝始元二年从淮阳郡征调了1500名戍田卒“为驿马田官穿泾渠”（H303.15＋H513.17）。（3）居延新简中残简“□□□军王门塞外海廉渠尽五月”（E. P. T52·783），可判断有一名为海廉渠的工程，在玉门塞附近。（4）居延新简中有“第五渠”（E.P.T52·363），水渠编号已经到“五”了。悬泉汉简中有“民自穿渠，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水门广六尺，袤十二里，上广……”（II0213③：4）“左”，“右内”表明水渠是复合型的，“第二”的编号可能说明同类的水渠尚有更多。亭隧的名称中有“广渠燧”、“临渠燧”、“石渠亭”、“临渠亭”，因渠而命名亭隧，说明水渠的广布及重要性。（5）水门是渠道的分水闸门，汉简中多次见到“水门”，还有“水门卒”、水门燧长、水门燧卒。（6）井渠，汉简中多有“穿井”的记载。同时，汉简中也常见“河渠卒”、“治渠卒”、“水工”等与河渠的修造与维护有关的专业人员名称。[35]

朔方地区也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据刘磐修的研究，朔方沃野县有渠东径城南，枝渠东注以溉田，银川平原上被认为是汉代水渠的有光禄渠、尚书渠、汉渠、高渠、御史渠、七级渠。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恢复朔方、西河、上郡，遣返徙民，“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修缮原本的水渠。[36]在现在的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发现了三座古城遗址，根据侯仁之的探查研究，认为均为汉代城址，保尔浩特土城是汉代

的窳浑城，麻弥图庙土城是汉代的三封城，布隆淖附近的土城是汉代临戎城。根据《水经注》记载同在此区域的沃野城，经过实地探寻尚未发现，可能在黄河改道中被狂涛吞噬了。[37]这些古城是朔方郡最西部的县城，是在元朔二年（前127）开置朔方郡后，向河套西北屯垦的过程中逐渐设置的，侯先生说：“在野外考察中，曾经注意寻访汉代渠道的遗迹而一无所得。这或者是由于后来流沙侵袭，故道已被掩埋，或者是由于强烈的风蚀作用，致使遗迹泯灭，不可复见。将来如果能够进一步详细考察，或许仍有可能发现一些汉代水利设施的旧迹。至于引山泉灌溉，今在乌兰布和沙漠的北部尚不乏其例。古代阴山林木丛茂，水土保持条件远较今日为好，估计当时山泉流量亦较今日为大，因此引‘山泉以溉田’也是完全可能的。”[38]当时黄河西岸决口形成的申屠泽，水面广阔，为附近的窳浑城提供充沛的灌溉水源。《史记·河渠书》记载：“自是之后（指塞瓠子），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39]《史记·平准书》记载：“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40]西汉时期对于西州的水利设施建设是积极的和富有成效的，降至东汉，因为国势不振，边疆经略政策偏于消极，边疆局势愈趋动荡，边疆叛乱接连发生，导致西州多次发生裁撤郡县、边郡内徙的情况，大量的匈奴人、羌人迁入西州境内，使得农人、牧人的比例发生变化，大量的耕地废弃，水渠淤塞，区域环境逐渐恶化，临戎、三封、窳浑等地逐渐沙漠化，最后被废弃。

对汉代的农业发展水平，多数农史和经济史专家都认为随着铁犁牛耕的普及，精耕细作已经普遍推行，农业生产力水平很高。但是这类结论，正如李伯重指出的，是通过“集粹法”和“选精法”而编织的虚像[41]，用先进代替了一般，用局部代替了整体。杨际平认为，在汉代，铁农具虽然得到一定的推广，但多为耒耜类的起土工具，铁犁远未普及，而且汉代的铁供应不能充分满足生产需要，木石农具仍被广泛使用；牛耕的推广也非常有限，到东汉后期和魏晋时代，才进入牛耕时代；产生了许多精耕农作的技术，但无论是代田法还是区田法，推广都非常有限，大多数农田的耕作仍很粗放，只是在人多地狭的地区，精耕细作可能得到了一定的普及。[42]对西州农业发展情况的估计，必须放在整个汉代农业生产水平的大背景下考虑。一方面我们可以推测，由于西州地处边区，人力物力短缺，土壤水热条件均不如中原，农业发展受到较多限制，即使国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农业发展水平可能还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但另一方面，因为西州农业开发一直是在国家整体规划、运用全国资源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些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可能得

到更有力的推广，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代田法在西州的推行。《汉书·食货志上》记载：

>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圳。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圳，长终亩。一亩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种于圳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43]

杨际平认为"代田法的优点是能防风抗旱，增加单产，代价是要投入更多的牛力、人力"[44]，但是《汉书·食货志上》中明明是说"用力少而得谷多"，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人力更少，而获得的谷物更多。从班固的行文来看，他是将代田法与缦田法做比较来说的，当时普遍实行的是缦田法，就是广亩散播；代田法将田分为六条，三圳三垄，在圳上条播，收获后犁田，圳、垄互换。"原来的广亩散播法，为了除草和整苗必须蹲在亩的两侧用短柄小锄作业。其整苗间距为六寸左右，这就需要格外谨慎和付出相当多的劳动力。而且，因整苗间距为六寸，不能将土充分地培到作物根上，故难于抗风。而且，培土少，土中水分蒸发就快，在抗旱处理方面也不如代田法。另外，代田法时可以每年互换垄圳（甽）位置，避免连作。"[45]相较于缦田法，代田法更节省人力，而且亩产量更高，这样就可以节省更多的人力用于开垦荒地，扩大生产。只不过，代田将每亩地分为圳、垄六条的耕作法，是以牛力犁耕为前提条件的，"用耦犁，二牛三人"，这种耕作方式需要更多的牛力和铁犁支持，在汉代农业水准一般的情况下很难推广，也不是一般编户小民可以负担的。

"代田法"的推广与汉武帝轮台诏后的"富民"方针相关，因为铁犁和耕牛不是一般小农能具备的，为了能让小农也能采用代田法，平都令光发明了人力挽犁的方法，百姓互相协助，挽犁耕田，每人每天多者可耕30亩地，少者也能耕13亩。西嶋定生指出，汉帝国的基本结构，是以皇帝直接统治自耕农即持有土地的农民为理念的，国家向他们征收税赋，

征发兵役、徭役，自耕农是国家生存的基础；农民如果破产依附到豪族门下，则是对国家生存基础的破坏，国家劝农的意义，就是促使持有土地的农民巩固其农业经营。当时百姓因为缺少耕牛无法采用代田法，平都令光发明的用人力代牛力的方法，对巩固自耕小农的稳定、维护皇帝统治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代田法要承担的政治目的，所以赵过提拔他做了大农丞。重点推行代田法的区域是三辅、河东、弘农，这是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加强这一地区小农的生存能力，对于巩固国家统治意义重大。除此之外还在三辅公田和边郡屯田中推行了代田法，西北边境地区国家有大量的屯田，直属大司农，与三辅公田一样是官有的，在这里推行代田法，应当具有与在三辅、河东、弘农等地编户齐民中推广代田法不同的政治意义。

通过算缗告缗，政府没收了大量的土地。根据盐铁论会议上贤良文学的发言可以知道，这些公田有许多假于权家，大夫们认为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民不加赋而国饶。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者是御史大夫桑弘羊，武帝虽然发布了轮台诏，但是仍重用桑弘羊，国家的经济大权仍然掌握在他手中，赵过得以出任搜粟都尉，应该得到了他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赵过隶属于桑弘羊阵营。代田法是以实行犁牛耕种为前提设计的，耕牛、铁犁对于一般小民来说不易具备，但对于政府部门及权豪之家来说是可以具备的。当时贤良文学攻击国家铁器专卖制造的铁器多为大器，对于小民并不适用，毫无疑问，桑弘羊掌握的铁器制造机构只制造了适合政府和权家使用的大铁犁，并没有为小农设计生产。西嶋定生总结说："赵过施行代田法从一开始就有两个目的：一是根据劝农政策保护和扶植小农；同时，将代田法施行于公田、屯田，以此谋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是，如前所述，三辅公田在当时已由权家假作，如果三辅公田也施行了代田法，即等于那些权家在公田假作中采用了代田法。不仅如此，如前所述，施行代田法所用各种农具的购置和使用均对豪富家有利。故可以设想，从结果来看，代田法在这些公田的实施进一步扩大了权家的实际收益。"[46]西嶋先生从汉帝国的基本结构及武帝末期的政局出发，发掘了代田法的深层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分析犀利独到。

桑弘羊是汉武帝向外扩张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他的政治地位与对外扩张紧密相连，代田法可以说是他在幕后推动的，除了按照武帝的"富民"要求向司隶校尉部的小农推广外，对于权家利益所在的三辅公田和与对外扩张有密切关系的边郡屯田，更是要利用国家资源不遗余力地推

行，所以，西州地区在国家掌握中的屯田生产水平应当较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西州一般百姓农田的生产水平可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屯田上实行牛耕犁田的代田法，只是西州广阔土地上的“飞地”，西州仍然需要靠中原转输粮食。有两条材料经常被研究者用来说明汉代西北边疆农业开发的成效：宣帝甘露三年（前51），西汉护送来朝的呼韩邪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47]；元帝初，呼韩邪单于上书言其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48]。这只是某些特殊情形下的特例，并不是说西州的农业生产已有富余可以调剂他处，甚至不能说明西州的粮食生产可以自给。西州的水热、土壤条件较差，农业虽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边疆经常屯驻大量军队，西州地区的粮食产量远不能满足需求，大多数时候仍需要从中原转输粮食。

至于畜牧业，西州的大部分地区原本就是游牧部族的放牧地，这里水草丰美、地域辽阔、气候适宜，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49]这里说的西有羌中之利，是指河湟地区羌人发达的农牧业，特别是牧业；北有戎翟之畜，则是指牛马布野的河南地及阴山地区；至于河西地区，《汉书·地理志下》说：“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50]《元和郡县图志》记：“祁连山，在县西南二百里。张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51]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月氏、乌孙、匈奴、羌人、楼烦、林胡等，都是主要依赖放牧牲畜为生的游牧部族，西州之“前身”，是一个马牛羊遍布的游牧世界。汉武帝开拓西州，河南地、河湟、河西等地都被纳入汉帝国的版图，虽然西汉积极地向新开拓地区移徙农业人口发展农业，但是所开垦的农田终究有限，西州的绝大部分土地仍然是用来发展牧业的。

汉廷在西州设置了国营牧场“牧师苑”，利用西北的水草资源经营畜牧业，“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52]。太仆掌管全国舆马，辖有两个马匹豢养系统，“一个是朝廷养马以供御用和国家重大活动用马，另一个是边郡六牧师苑的苑马系统”[53]。《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太仆”条下：“又边郡六牧师菀（苑）

令，各三丞”[54]，汉廷在陇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等六个边郡设有牧师苑令，故称为“六牧师菀（苑）令”，他们是太仆的属官。三十六所牧师苑大约就分布在此六郡中，平均每个牧师苑令主管六个牧师苑，每个苑的苑监是中央派出的郎官，劳力是官奴婢，主要任务是养马，同时也牧养牛羊，一般而言，马牛羊的畜养比例是牛倍马，羊数倍于牛，牧师苑养马就达三十万匹，其畜养的牛羊规模想必更大。除了太仆系统的牧师苑之外，朝廷的一些“部委”也在边郡设有牧场，如兒宽到北地郡视畜数年，就是管理廷尉府在边郡设置的牧场，颜师古注此事曰：“若今诸司公廨牛羊”，类似的制度到唐代仍然存在。东汉中后期羌患愈烈，金城、陇西、北地、上郡等多次内迁，甚至还多次发生弃凉之议，西州的官营牧场逐渐衰落。

西州地区除了官营牧业外，私营畜牧业也十分发达。司马迁记载“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55]，桥姚在帝国新开拓的西北边地区兼营田牧，个人拥有了大量的马牛羊。两汉之际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56]。马援田牧兼营，拥有大量的牲畜和谷物。桥姚和马援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可以想见在宜农宜牧的西州地区，必定有相当数量的田牧兼营或者专营畜牧的大业主，一般民众也会在田作之余，小规模地畜养马牛羊等，西州的畜牧业居全国之最是没有疑问的。

汉朝对西州的开拓和对西域的经营，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路线，开通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长泽和俊总结说：丝绸之路是贯通亚非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57]西州地处丝绸之路东段，丝绸之路的开通无疑极大地促进了西州地区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范晔论曰：

> 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58]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以所谓的“朝贡贸易”为主，同时也有大量的汉人商客、胡人商贾往来于丝绸之路上，河西、长安、洛阳有许多胡人商贩

活动的记载，而西域各地也有不少汉人商人，他们从事的是私人性质的贸易活动。[59]大致而言，西域输入中国的物品有奴隶、马匹、香料、各种毛织品和奢侈品，中国输出的商品则是黄金杂缯之属。

此外，西州地区的“关市”贸易也非常繁荣，农耕社会与毗邻的北方、西方游牧族群有强烈的商品交换需求。马邑之谋后，匈奴虽然绝和亲，“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60]。两汉之际，“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61]。王子今、李禹阶指出，“关市”是边地形成“富邑”的重要条件之一，“市日四合”更可见河西地区的人货殷繁。国家出于战略的目的，对于“关市”有诸多的限制，所以两汉时期的走私贸易，即所谓“间阑出物”，十分猖獗，走私贸易在贸易总额中可能占相当大的比重。[62]从居延汉简的有关资料来看，边境地区存在多样的贸易形式，边防戍卒、边塞亭隧与当地郡县居民之间也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经济关系，边地贸易的形式多样，参与的人群广泛，呈现与内地很不相同的面貌。

总之，西州地区的农业、牧业及贸易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虽然其经济水平与中原发达地区仍有一定的差距，却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而且每当政治混乱、中原战乱之际，河西往往因偏居一隅而免于战火，吸引大量的中原豪族、百姓的迁入，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河西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王莽末窦融求张掖属国都尉职，是由于他考虑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63]。光武帝给窦融的诏书中也说：“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64]在两汉之际天下残破的时候，西州地区的经济状况可谓一枝独秀。东汉中后期之后，朝廷腐败，宦官坏政，吏治不堪，西州地区的民族冲突、阶级冲突日益严峻，加之汉廷国势衰落无力控制，致使羌患愈烈，西州摇荡，羌人反叛和平羌战争接连不断，农、牧、商各业均严重受挫，西州经济逐渐萧条倒退。

二 西州的社会发展：地方豪族的形成及影响

（一）汉代的宗族、豪族、世家大族及其与政权关系的调适

“豪族”的定义比较复杂，众说纷纭，但是最基本的内涵是指有势力的宗族，宗族不一定会成为豪族，但是豪族必定由宗族发展而来。上古时期人群聚落以血缘纽带结合，同族之人生时聚居，共同劳动生活，死后共葬，即所谓“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族”是社会最基层的聚落单位，每一个族“族居、族葬、世业”，其组织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邢义田通过对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族居、族葬和世业的研究，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础的宗族或家族，在居住形式和生活手段上有十分强烈的延续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群体，不论称之为氏族、宗族或家族，即维持着聚族而居、族墓相连、生业相承的生活”[65]。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追求富国强兵而纷纷变法，改革措施大抵是按照县邑乡里的地缘结构加强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是将百姓重新编排进一个新的层级结构，以地缘取代血缘，而是在原有的聚落之上加上新的地缘性质的行政编制，非但不会破坏原有的聚落结构，甚至还希望强化传统血缘性聚落的团结精神，如齐国管仲的变法，寄军令于内政，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66]。一个聚落的人“祭祀同福”，说明他们有着或亲或疏的血缘联系，为同族之人；“卒伍整于里”，就是说军队基本战斗单位的士兵都来源于同一个里，也就是同一个宗族，这样在作战的时候就会“欢欣足以相死”，“守则同固，战则同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图，绘有不规则地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六十多个里；在同墓所出另一幅驻军图上，也是依山水之势分布着几十个里，显然，它们原本是一些自然形成的农村聚落，只是后来由政权加上了里名，纳入乡里组织而已，里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原来聚落内部的结构和形态。[67]

商鞅变法对秦国宗族组织的打击可能较为彻底，但并不是说宗族组织已荡然无存，秦国厉行分异法，以小家庭为主，但是分出去的小家庭与父母的家、兄弟的家、从兄弟的家，大概还是居住在同一个里中。而

且违反分异法的惩罚只是倍其赋，并不是太过严厉，很多家庭会出于各种考虑，宁愿承担倍赋而不分异。我们仍能看到秦国宗族存在的例证，比如跟随嫪毐作乱的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68]；秦王对樊於期也是“父母宗族皆为戮没”[69]；李斯、赵高都被“夷三族”。官方的法律仍以灭“族”作为最严厉的惩罚，其实是承认了“族”的存在和地位。山东的宗族势力可能更加根深蒂固，齐国田氏之族竟然庞大到需要分多次徙往关中，到第五伦家的分支时，已经是第五批了。即使经历秦始皇徙关东豪富12万家到关中，但秦末大乱时，关东的强宗大族仍能迅速集结力量群起反秦。一般百姓的宗族情况，可以从张良对刘邦说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70]那些跟从刘邦的谋士武将，原本都是过着与宗族亲戚故旧生死相依的生活，有着自己的宗族，刘邦一旦复立六国，他们就会各返其国效力，回归宗族组织之中。

编户齐民的家庭是五口核心小家庭，这点没有疑问，但是小家庭都会自觉地寻求更大的宗族组织的保护，其左邻右舍都是或亲或疏的宗亲故旧。[71]宗族是两汉基层社会的主要单位，或许比核心家庭还要重要。在某一里，或某一乡，或某一县，或某一郡，总有一些宗族因为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上的优势或其他机缘而支属众多、宗族强大，这样的宗族就是当地的豪族。那些跟从刘邦的游士，其宗族原本可能只是普通的小宗族，待逐鹿成功，他们拜官封爵，由于掌握着政治资源，其宗族就一跃成为当地的豪族了。“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宗族的规模与势力，往往与该宗族的核心家庭及其领袖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取得的成就相关。

诚如学者所言，“抛开豪族一词来谈汉代史甚至是不可能的”[72]。豪族在地方社会发挥的影响力及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交互作用，极大地影响甚至是决定了汉代历史演进的历程和方向。“豪族”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历两汉四百年，豪族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国家政权的互动模式也有不同。劳榦很早就以《汉代的豪强及其政治上的关系》为题，做过开创性的研究[73]。另外，汉朝辖境辽阔，不同地域之间的人文地理风俗差异较大，各地域的豪族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刘敏提出深化汉代豪族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注重从时间的阶段性上审视；二是深化从空间的地域性上观察[74]，指出了进一步细致研究的方向。

“豪族”是在“宗族”的基础上成立的，“豪”是指这个宗族的实力和势力而言，但还是“宗族”的一种。是否被称为豪族，固然与宗族的绝对实力有关，但也与其在所在地方的相对影响力有关。小者有乡里一级的豪族，稍大者是县一级、郡一级的豪族，此三者都是地方豪族；再大者是超地方的具有全国性声誉和影响力的大豪族。一个宗族被冠以“豪”，强调的是这个宗族在某一层次上具有超过其他家族、宗族的势力和影响，对地方事务甚至是国家政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汉代豪族的来源途径多种多样，有的是六国贵族孑遗，他们利用祖上遗留下来的财富和势力，在天下鼎革之际依然保持着家族相当的影响力；有的是从龙功臣，汉帝国建立，他们成为军功受益集团，各自的宗族逐渐发展成豪族；有的是依靠力农或经商而得的财富，虽然财富不是成为豪族的充分条件，却是必不可少的，一般而言，豪富之家更容易获得地方上的影响力，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权力，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权势和利益；有的依靠强力，主要是西汉初期的豪杰、豪侠一类的人物，但是这类豪族遵循的“义”的原理与国家的政治统治要求相悖，受到国家政权的严厉打击；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与国家权力的合作，通过入仕而光大宗族。宣元之后，国家对豪族的态度由打击抑制变为吸收容纳，入仕成为发展宗族最主要的途径，大部分豪族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自身，以适应政权的要求，家世、知识、财富、权力等因素逐渐合流，最终形成东汉的世家大族，世族是豪族在汉代发展的最高形态。必须指出的是，东汉的世家大族，即所谓士大夫阶层，在与宦官对抗的政局下被视为“清流”，世家大族是当时豪族的主流形态。但是宦官的子弟、婚姻、亲戚及投靠宦官的官吏，往往也获致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具有相当大的权势，宗族强大，虽是“浊流”，但他们亦是豪族。

在两汉四百年的历程中，豪族与政权的交互关系经历了复杂的调适过程。

从汉初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政权与豪族的关系比较紧张。汉初各级国家权力被军功受益集团这一特殊的豪族集团所垄断，从贾谊之际遇可见社会上升渠道之壅塞。汉武帝更化改制、征伐四夷，擢用大量能人异士，史书称赞当时之得人曰：“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75]但是许倬云指出，“这时期表面上似乎活泼的社会波动，事实上只是若干特例，影响只及于皇帝特选的个人，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上升通道，从社会基层作普遍的选拔”[76]，功臣集团的权力让渡给了皇

帝，但是政权的社会基础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汉帝国建立伊始就将关东残留的六国贵族及豪杰游侠视为政权的威胁。而且，豪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势力，他们力量强大，兼并土地，武断乡曲，役使贫弱，成为瓦解小农社会从而破坏帝国基础的危险力量。[77]所以，从高祖时候起实行“徙陵”制度，将六国王侯之后、世吏二千石、高资富人迁徙到诸陵，就是有意地压制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汉武帝除了厉行徙陵制度外，对于没有移往诸陵的豪族，利用酷吏和刺史给予监控和打击。大多数酷吏曾经担任过“御史”一职，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出身多为单寒的刀笔吏，是执行皇帝意志的理想工具。刺史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78]，由中央直接派出的刺史，毫无疑问代表着皇帝的意图，是皇权的得力工具。[79]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算缗告缗则是从经济上打击豪族。

但是汉武帝对豪族的打击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在国家的强力打压下，豪族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豪族势力为何如此顽强？这确实是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豪族作为当时最有势力的社会力量，如果政权对之打压过甚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国家未必有实力和决心不顾后果地打压豪族。比如武帝末年盗贼频起，陈启云的解读是当朝廷的敛财政策“波及郡县以下的地方时，波及土地所有者的耕田时，就受到了有土地利益的豪族的强烈反对。由武帝派往各地的酷吏扰乱了当地政权结盟的平衡，却又缺乏有力的措施来控制这一情况。这导致了武帝统治后期关东诸郡（华北平原的经济中心）广泛的不安宁”[80]。所以后期汉武帝调整了政策，与豪族势力达成了妥协；昭帝时期诏问贤良文学民间疾苦；宣帝时期重视二千石的选拔，禁止苛暴，循吏辈出，都是这种调整的延续。第二，豪族的基础是宗族，只要基层的宗族结构不变，即使一批豪族被打压下去了，但是留下的权力空间自然会有另外的宗族填补，形成新的豪族，故而豪族的势力虽经打压，却坚忍顽强，持续发展。

甘怀真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谈到西汉中期以后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问题：“秦及汉初虽然在政体上强调‘天下一家’，但其所建构的政治支配是一种虚像。其实国家权力并没有能力深入基层社会。西汉中期起，盘据中央的统治者藉（借）由选举制度，以州郡等地方长官为媒介，利用了既存的君臣关系的制度，由州郡长官辟召在地的精英。再透过长官与被辟召者之间的君臣关系，使皇权能够藉（借）由这层人际关系的网络，

由朝廷扩展及于基层社会。”[81]地方守令所辟召之人，多为地方豪族，所以说宣元之后，汉代国家政权开始寻求与豪族合作，打压豪族的种种政策也逐渐停止。

汉代国家的基础是编户小民，但是众多小民的五口之家并非孤零零地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并非以核心家庭的规模去直接面对雷霆万钧的国家机器[82]，绝大多数小民都生活在宗族组织之中，宗族主导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对祖先的祭祀是他们精神的归宿，地方的日常秩序由豪族支配。在这样的基层社会生态下，国家政权必须为其统治建立地方基础。汉代国家改变对豪族的政策，寻求与之合作，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基盘下沉、拥有重心的权力结构。但是在政权中容纳豪族是一把双刃剑，豪族具有的兼并和扩张倾向又会逐渐侵蚀国家的小农经济基础。正如川胜义雄所说，豪族既是乡里秩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这个秩序的破坏者[83]，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岁举孝廉制度的确立为国家政权与地方豪族的合作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这一制度创设于武帝时期，“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84]。汉武帝创设此制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与豪族合作，而是当时随着军功集团逐渐退出权力舞台，留下了较大的权力真空需要填补。汉武帝全力开动国家机器对内改制，对外征伐，需要大量人才，政权需要注入新的血液。通过岁举孝廉的制度，豪族子弟获得仕进之途，但制度的本意不是调和国家与豪族的关系，各地方并没有认真对待举孝廉，经常是“阖郡而不荐一人”。国家与豪族间的关系调整还要等待。到元帝时期豪族在汉廷已经取得重要的地位和发言权，汉廷开始主动调试与豪族的关系，寻求合作和融合，武帝时期创设的孝廉制度成为地方豪族进入国家政权的绝好通道，许倬云强调其意义说：“自此以后，地方上智术之士可以期待经过正式的机构，确定的思想，和定期的选拔方式，进入政治的权力结构中，参加这个权力的运行。纵然这时其他权力机构，如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都已经服属在政治权力结构之下了；一条较狭，但却远为稳定的上升途径反使各处的俊杰循规蹈矩（原文为距字，此处已修改——作者注）的循序求上进。于是汉初的豪杰逐渐演变成为中叶以后的士大夫。”[85]举孝廉之后仕途较为畅通[86]，豪族子弟大量进入政权之中。

宣元之后，地方长吏一般都会辟除地方豪族为掾属。武帝之后实行了严格的地方长吏本籍回避制度，出任地方郡守、县令的官员都是外

籍，这些外来者要想治理地方不得不依赖熟知一方风俗，而且在地方上拥有深厚关系和权力网络的豪族来出任掾属，辅佐政事。“这种守、相、令、长等长吏由朝廷任命外郡人士的制度，突出体现了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外部凌驾和强加性。与之相反，郡、国、县、邑的属吏以及大量的乡官里吏则都是由本地人充当，而豪族因其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特别是强大的宗族势力而成为主要人选。”[87]《宋书·恩幸传》追述汉代仕宦的身份背景为“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后汉书·朱穆传》引《谢承书》说朱穆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因为督邮是郡中显职，新太守见穆曰：“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势？为有令德？”虽然朱穆回答说：“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非颜回不敢以迎孔子”[88]，但是考其身世，祖父朱晖曾为太守、尚书令，父亲朱颉官至陈相，他年少为郡督邮，自然是因为族势了。朱穆答新太守的话虽然机巧，但终究也是奉承，所谓新太守甚奇之，遂历职股肱，自然是因为新太守需要倚重地方豪族治理一方，最后举朱穆为孝廉，此为出任地方掾史的豪族晋升的通常路径。黄留珠考得汉代307名孝廉，其中能确定家世者有184人，将家世分为官贵、富豪、平民、贫民四类，统计结果是官贵128人，占69.6%，富豪11人，占6%，平民29人，占15.7%，贫民16人，占8.7%。[89]邢义田考察了324位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从经济背景来看，孝廉极少来自贫寒之家，大多来自仕宦之族，多有曾为州郡佐吏的经历，习经或者律令。邢先生指出：“东汉仕宦不只是德行、才能和学识的角逐，也意味着财富、家族势力和政治关系的竞争。”[90]由此看来，宣元之后，豪族既掌握了地方的政治权力，也进入中央，在朝廷有了发言权。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结合，国家获得了豪族势力的支持，国家政权的基础更加稳固；豪族则进入国家政权机构，获得了政治权力，得以进一步维护自身的利益。

豪族势力的壮大，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元帝时期徙陵制度的废弃。元帝永光四年诏曰：

>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91]

此后成帝营昌陵又不成，“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

动摇之心”[92]。哀帝“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93]。可见元帝之后，徙陵没有再被执行。在成帝营昌陵时，陈汤上疏说：“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94]从皇帝的立场而言，地方势力的坐大、贫民的破产总会令他忧虑不安，在陈汤的劝愚下，成帝一度企图恢复徙陵制度，但是正如许倬云所说：“事实上，恐怕都是由于东方的大族不愿迁徙，而他们此时已在中央有发言权，不再像武帝时一样轻易的受人支配了。”[95]西汉后期，由于豪族势力的发展，小农破产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遏制国家的编户民沦为流民或豪族的依附民，朝廷尝试出台了限田制度，哀帝时期师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96]但即便出台的是较为缓和的限田政策，在哀帝时候的政局下也无法推行。不得罪巨室的为政原则，不但风行地方，连中央一级也开始奉之为圭臬。

国家政权发生动荡的时期，恰是地方豪族发挥影响力的时候。王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触及豪强大族利益的理想主义改革，无疑是失去支持的根本原因。王莽末年，“初，京师闻青、徐贼众数十万人，讫无文号旌旗表识，咸怪异之。……莽亦心怪，以问群臣，群臣莫对。唯严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黄帝、汤、武行师，必待部曲旌旗号令，今此无有者，直饥寒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莽大悦，群臣尽服。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说。莽闻之忧惧”[97]。王莽没有将有10万之众的饥民集团放在心上，但是当刘伯升起兵后，他则忧惧惶恐，是因为他对地方豪族拥有的实力、号召力、组织能力是非常了解的，豪族人物开始起兵反叛，王莽心知大势已去矣。

余英时作“两汉之际各地豪杰起事表”，考察各个豪杰的起事地点、初期兵力、社会身份及起讫时间，得出三点结论。（1）两汉交替之际的群雄并起，乃是全国性的，当时中国境内几无处没有豪杰聚众起兵之事。（2）就已有资料统计，当时起兵者实以宗室、士族、大姓作主要成分，而且其中有许多起事者的身份，历史上虽已无明确记载，据情形判断则仍似为豪强大姓。（3）边郡人口稀少，大姓不多，起事者亦少，少数士族大姓容易形成割据或独霸，而中心地区及东南诸郡，士族大姓林立，起事者极多，扰乱最甚。[98]刘秀集团就是这些蜂起林立的

豪族起事集团中的一个，“光武帝的建国，是地主政权即豪族政权的确立。他的左辅右弼，云台二十八将，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99]，如寇恂、岑彭、吴汉、耿弇、祭遵、刘植、耿纯、马援、窦融、李通、邓晨等。刘秀政权的建立就是凭借南阳、河北及河西三地豪族的支持，打败其他地区豪族政权的结果。

更始败后，“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刘秀对前去征讨的冯异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100]“平定安集”是刘秀对付豪族的主要手段。建武四年，“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101]。吴汉无疑是领会了光武帝对待各地豪族“平定安集”的要旨。同样，在对彭宠反叛的处理上，刘秀表现得顾虑重重，并没有全力镇压。这一方面固然与彭宠曾立有大功，叛乱是被朱浮激成有关；另一方面，彭宠是南阳人，又是北州豪族和功臣的代表，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不仅关系到光武帝本人的形象，也关系到皇帝与河北豪族的关系。孙家洲指出：“刘秀不得不‘放缓’处理彭宠之叛，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是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作出的姿态。彭宠控制渔阳，对河北的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秀的部下又集结了大批北州人士，甚至是彭宠的旧部，对彭宠的处置很可能会发生微妙影响。”[102]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环境存在，这个环境就是豪族的社会影响力与东汉政权的豪族背景。

豪族在东汉的进一步发展表现为“世家大族”的形成，世家大族是豪族发展的最高形态，权力、知识、财富实现了合流，世家大族讲究地望、郡望，门第观念逐渐强化。西汉时可能就已经有模糊的门第观念了，“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闳为贤弟驸马都尉宽信求咸女为妇”，被萧咸婉拒后，董恭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畏如是！”[103]。萧咸兄萧育，“是时，前将军望之子萧育、御史大夫万年子陈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104]，公卿子弟相交，互相荐达，闻名长安，令人艳羡，颇有后世世家味道。董贤家一时暴起，董贤父希望联姻萧家，就是看中了萧家的名望，而萧咸拒绝之，也颇有东汉高门不婚“浊流”的意味。[105]刘增贵从两个方面说明了东汉的门第风尚。（1）以族势大小分，但不再是西汉之尚富贵，而是包含了整个族势，门户的大小高寒为人所看重，“名族”、“著姓”之类的说法流行，与之相对是“寒门”、“单

门”。（2）以家族德望及家族性质来分。东汉儒家既盛，又尚气节，除家势富贵外，“名士”更是社会之所尚，士人每以特立独行赢得令名，德行亦渐成家风之重要成分。世家大族从一般豪族中分出，更与“浊流”相区别。当时三大豪族势力：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形成了三个相对封闭的婚姻圈，成为东汉门第的特征。[106]

综上所述，首先，我们应当明了，帝国的统治结构固然是以核心家庭的小农为基础，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小农并不是独自地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他们往往与同宗族的人过着聚居、共葬、世业的生活。一个聚落可能由一个或者多个宗族构成，这些宗族有的枝叶茂盛，有的可能相对零落。豪族是在地方上拥有相较于其他宗族更大的力量和势力的宗族，地方秩序主要由豪族主导。其次，国家政权的统治不可能永远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力维持下去，它必须建构统治的社会基础，寻求与地方势力的合作。汉武帝将专制国家机器的马力开到最大，展现了极大的动员能力，但这种做法毕竟不能长期持续，社会有其能够承受的极限，专制如皇帝也必须在社会的承受极限下妥协。汉武帝末年各地的盗贼，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地方豪强组织的，汉武帝的国家主义财政政策和高压手段迫使他们必须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极端行动。朝廷派遣绣衣使者，费了极大的气力才将动乱暂时平息，但如果国家的政策没有调整，对豪族的方针没有缓和，平息也只是暂时的，汉武帝下轮台诏之后的政策转向，昭宣的缓和政策，表明国家放弃了高压手段，开始寻求与豪族的合作。再次，豪族具有双面性，其既是地方秩序的领袖和维护者，也是小农经济的破坏者、帝国统治基础的侵蚀者。豪族与政权合作，通过进入各级政权机构掌握了政治上的发言权，从而使徙陵、限田、度田等有损豪强利益的政策都无疾而终，豪族最后发展到国家政权无可奈何的程度，或者说，将国家改造成豪族性质的国家。最后，豪族的兼并、领主化倾向并没有无限增长，这种恶性倾向受到来自豪族自身某些品质的抑制。宣元之后豪族与政权开始谋求合作，这个时候也是儒学开始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候，通经入仕，儒学世家更能保持世代为官，夏侯胜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107]桓荣族人说：“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108]儒家秉持的道德理想和对共同体秩序的追求，使得浸润儒学的豪族对自身的领主化倾向有反方向的抑制，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就是这种类型豪族的代表。他们非常重视在地域社会内的名望，自觉抑制了领主化倾向的发展。“浊流”豪强则肆意欺凌小民，灵帝时郎中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

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109]相对而言，“清流”更加顾及天下国家百姓，有道义理想和为政准则，而“浊流”只是钻营自身利益而不顾其他。

（二）西州地方豪族的成长及其对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

理解豪族是理解两汉史演进的一个关键，同样，理解西州豪族的成长和发展，也是理解西州地域社会及其历史的关键。西州豪族是两汉豪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具备豪族共有的结构和特征。但是还必须考虑到，由于成长在帝国新开拓的边缘地区的移民社会之中，西州豪族具有某些与中原豪族不同的特点。（1）西州的豪族形成相对较晚，虽然发展较快，但是他们的势力、修养及门望，均不如中原豪族，在豪族分布地图上处于边缘地位。（2）边疆地区为多战之方，羌胡杂陈，西州豪族具有明显的武质化倾向与羌胡化特征，依靠军功起家者较多。（3）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西州豪族较少涉入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争斗，大家世族的发展和延续较为平稳和长久。（4）由于地域偏狭和实力相对较弱，在天下动乱之时，西州豪族不会主动去逐鹿中原，具有强烈的自保特征，容易形成地方割据政权。[110]还必须说明的是，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只是西州豪族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到西晋及十六国时期，西州豪族的势力才达至鼎盛。[111]

西州是汉帝国在武帝时期渐次西进拓展而建立的“新疆土”，通过国家有计划的组织和民间的自然流动，西州地区的汉族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口成分主要包括招募的普通平民、安置的贫困流民、减刑徙边的刑徒及其家属、被贬抑放逐或是逃祸避难的官员以及因服徭役兵役而留滞者，来源非常复杂多样。东汉时西域都护班超归国时告诫新任都护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112]较多的重刑犯被减罪徙边，还有逃难避祸之人以及郡国恶少年之类大量涌入西州地区，想必定居在西州的大多数人的素质与西域吏士差不多，这造成西州之民风与内地相比更为强硬和彪悍。即使如此，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西州地方秩序就会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西州的移民实边、建置郡县是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汉朝早就建立了一套严格且成熟的移民实边模式。晁

错曾详细论述了移民实边的步骤和措施，国家须预先修筑城池、居所和相应的防御设施，从边疆屯田的步骤来看，首先实行军屯，待水利设施建设有成、田地耕作成熟之后，再募民前来。可以说，政府事先已经在边疆新区奠定了基本的框架、牢固的基础之后才开始移徙平民来接手。在这样的移民步骤和移民模式下，每一个移民都会严格地编入政府的户籍名册，处在政府有序有力的控制之下。如此一来，新疆土之上的社会秩序可能很快就建立起来了，而稳定的地方秩序为西州豪族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在伯希和带回法国的编号为P.2625的一件敦煌文书中，叙述了敦煌名族张、阴、索氏的系谱和事迹，其中追述了张氏和索氏的汉代先祖从中原迁徙到敦煌的经过，这对研究西州豪族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此文书头尾皆残，叙述张氏的部分前残，叙述索氏的部分后残，只有中间叙述阴氏的部分是完整的，可惜对阴氏的叙述并没有追述其先祖的迁徙情况。羽田亨将这一文书命名为《敦煌名族志》，据池田温研究，在唐中宗景龙年间，朝廷为编纂《姓族系录》向各地索取当地氏族的资料，《敦煌名族志》可能就是沙州官府按照要求向朝廷提供的本地氏族资料。[113]

张氏、索氏是敦煌有名的大族，《敦煌名族志》载张氏汉代先祖曰：“［　］时有司隶校尉张襄者，赵王敖［　］孙。襄奏，霍光妻显毒煞许后。帝以光有大功，寝其事。襄惧，以地节元年自清河绎幕，举家西奔天水，病卒。子□□年来适此郡，家于北府，俗号北府张。史籍□□，子孙莫睹。”[114]记索氏汉代先祖曰：“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徙边。以元鼎六年，从巨鹿南和，迁于敦煌。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初索抚在东，居巨鹿之北，号为北索。至王莽天凤三年，鸣开都尉索骏，复西敦煌。骏在东，居巨鹿之南，号为南索。莫知其长幼，咸累代官族。”[115]清河张氏为避霍难而举家西奔天水，后来又迁往敦煌，成为敦煌的大族。索氏的一支在汉武帝时期因忤旨徙边迁往敦煌，另一支在王莽时期也迁到敦煌，二支均出自巨鹿，根据在巨鹿时候聚居的方位而称为“南索”和“北索”，由于世系久远，不能分辨长幼，南索、北索“咸累代官族”，成为敦煌著姓。可以看出，敦煌大姓中的张氏、索氏在中原时期原本就是豪族，因逃难或贬谪而移徙到敦煌，迅速发展成为敦煌地区的豪族。

由于豪族拥有文化、经济及宗族优势，即使经过迁徙，也能在新居

地快速站稳脚跟，成为新居地的豪族。邢义田通过对豪族迁徙情况进行研究，认为豪族展现出来的生命延续力是惊人的。汉初刘邦将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和田氏迁入关中，他们入关后，仍能拥有极大的财势，维持宗族的生存和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颜师古注《急就》“田细儿”条说“汉兴徙田族关中。今之高陵、栎阳诸田是也”。注“景君明”条说：“汉高祖用娄敬之计，徙齐楚大族入关，景氏亦迁名数。今之好畤、郑县、华阴诸景是也。”[116]刘增贵考察了汉代的益州士族，将益州的外来移民分为四类，得出的结论是：“以上四种移民中原有不少东方或关中的社会上层阶级，他们移入后迅速在巴蜀生根，并融入当地的社会中。其中部分人掌握了当地的资源，重新成为有力阶层。”[117]清河张氏、巨鹿索氏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敦煌的大族，与其原本的宗族势力自然有密切关系。虽然不一定所有迁往西州的中原豪族都能在西州发展成为豪族，而且西州的豪族也不一定全是由外地迁入的豪族发展而成的，但是迁入的豪族的确成为西州豪族的主体部分。

敦煌的大姓还有汜氏、令狐氏、曹氏，他们之前均是中原豪族，因事徙入敦煌。汜氏，据敦煌文书S.1889号《敦煌汜氏家传并序》：“成帝御史中丞汜雄，直道见惮，河平元年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118]令狐氏，据令狐德棻撰《隋故□□□□□□□□桂州总管武康郡开国公令狐使郡碑铭（并序）》载：“公讳熙，敦煌□□人也。□大夫□□之后，……远祖迈为汉建威将军，与翟义连谋，为莽所害，子孙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载：“令狐氏……汉建威将军迈，与翟义起兵讨王莽，兵败死之。三子：伯友、文公、称，皆奔敦煌。伯友入龟兹，文公入疏勒，称为故吏所匿，遂居效穀。”[119]曹氏，据《郃阳令曹全碑》云：“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竟，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120]

汜雄在汉成帝时迁往敦煌，其迁徙的原因与张襄相似，皆为避祸，徙居敦煌后“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令狐迈在西汉末加入了翟义讨伐王莽的阵营，翟义起兵是豪族对王莽的一次反抗，令狐迈位居建威将军，自然是豪强大族。迈兵败身死，子孙逃亡，长子、中子皆逃入西域，季子称被迈的故吏保护，居于敦煌，后来发展成敦煌大族。曹氏乃曹参子孙，随着汉武帝的向西开拓，曹氏也向西迁徙，在陇右河西诸郡

都有分布，“枝分叶布，所在为雄”，迁入敦煌的一支成为敦煌大姓，而分布在安定、武都及陇右诸郡的曹氏也是当地的豪族，而且曹氏宗族分布西州各地，相互呼应，最为强盛。

敦煌是西州最西缘的一个郡，中原人向西迁徙，多是逐段迁徙的，比如一个宗族先迁入陇西、安定、北地等与三辅毗邻的地区，接着宗族的一部分继续向西到金城、武威、张掖，最后再往西迁到酒泉、敦煌等最西缘的郡县，“枝分叶布，所在为雄”的状况多是由这种迁徙方式带来的。我们看到，敦煌的大族，有的是为避难迁徙而来，如张氏、氾氏；有的是逃亡而来，如令狐氏；有的是被贬谪的犯官，如索氏；有的是主动迁徙而来，如曹氏。获罪的官吏被迁徙到西州的很多，武帝时因戾太子事件而被牵连的官吏，都被发配到敦煌，“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121]。陈汤、解万年“俱徙敦煌”。因罪徙往朔方的也很多，安帝时太子废为济阴王，“时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无罪徙朔方”[122]。顺帝时得罪梁冀的官员很多被徙往朔方。蔡邕“坐直对抵罪，徙朔方”，杨赐本来也是要徙朔方的，但以曾为帝师而得免。

王莽末年是中原豪族迁往西州的一个小高潮时期。“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也。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时为侍中。……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更始败，三辅大乱。……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哀平间以儒学显，征试博士……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会天下扰乱，茂素与窦融善，因避难归之。”“刘般字伯兴，宣帝之玄孙也。……王莽败，天下乱，……西行上陇，遂流至武威。”“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初为郡吏，王莽败，盗贼起，林与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将细弱俱客河西。”[123]汉代人的基本生活单位，既是家庭，也是宗族，这些人避难河西，绝不会是单个人只身前往，而是要携宗带族，如杜林那样“将细弱俱客河西”。虽然后来这些人大部分陆续东还，但正如尤成民所说，他们在河西的避难居住无疑增强了河西豪强的力量。[124]他们的迁徙过程也证明了豪族的迁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举族而迁，至少是某族的一个分支，而不仅仅是个人或者家庭。

两汉之际，在西州豪族的支持下，西州形成了窦融、隗嚣和卢芳三个地方势力。窦融父兄都曾在河西为官，在当地有一定的基础，他在王莽末年求任张掖属国都尉，到任后“抚结雄杰”，寻求与河西地方豪族联合，取得他们的支持。隗嚣起兵时的盟词为：“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125]表明他的主要支持力量就是陇右地区的十六家豪族。卢芳的核心支持力量是安定三水豪杰，起兵自称将军的五原李兴、随昱，朔方的田飒，代郡的石鲔、闵堪等，很可能都是朔方部各地的豪族代表，他们后来与卢芳连谋，并取得匈奴的支持，长期割据一方。西州这三股割据势力的兴起是两汉之际天下豪族纷纷起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了西州豪族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能够与中原及东部地区的豪族一样，凭自身力量建立地方政权以自保或者逐鹿。关于窦融、隗嚣和卢芳，下节还将详论，此处不赘。

光武帝中兴汉家，隗嚣、卢芳等势力被打击下去，投靠光武的河西窦融集团，在天下平定后，光武帝一方面出于对西北豪族的防范，另一方面出于制衡河北豪族及南阳豪族以伸张皇权，将窦、马、梁等西州豪族迁入洛阳，赏赐甚众，委以重任。[126]窦、马、梁等宗族与皇室通婚，成为东汉一流的大族，但是脱离了西州本土，西州的豪族势力无疑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但是，和西汉时期的诸种抑制政策一样，国家抑制豪族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东汉政权对豪族的妥协退让越来越多。西州位处帝国的西北边疆，东汉时期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人才格局仍然未变，经营西域、出击匈奴为许多西州豪族通过军功来发展和巩固宗族势力提供了机会。在东汉中后期，西州地区的“羌患”愈烈，朝廷迫不得已起用习知西州地理风俗且明于军事的西州豪杰，形成了西州军事集团，形成了西州豪族的又一个发展高峰。

上文所言的敦煌张氏、索氏、氾氏、令狐氏、曹氏家族，在东汉时期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东汉时张氏有“凉州三明”之一的张奂[127]，威震西州，闻名京师；据《敦煌名族志》，索氏在东汉有“索□明帝永平中，为西域戊己校尉，居高昌城。□子堪，字伯高，才明，举孝廉明经，对策高第，拜尚书郎，稍迁幽州刺史。其抚玄孙翊，字厚山，有文武才，明兵法。汉安帝永初六年，拜行西域长史”[128]。可见索氏多立功西域，依靠军功立族。氾氏在东汉的情况，据敦煌文书S.1889号《敦煌氾氏家传并序》记载，氾氏“孝廉纪世，声誉有闻”，氾吉为蜀郡太守，其第二子煚“高才通经史，举孝廉，擢拜为尚书，后迁左丞相”。氾孚，吉之孙，“通经笃行，州辟为从事。太守马艾甚重之，征为州辟司空，屡

辞不起”。关于令狐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令狐氏条说，令狐迈季子称由故吏保护，居于敦煌，“称六子：扶、坚、由、羡、瑾、猛。由字仲平，后汉伊吾都尉。六子：禹、霸、容、明、涣、淳。禹字巨先，博陵太守。四子：辉、洽、延、溥。溥字文悟，苍梧太守”[129]。王素指出，“东汉以后，令狐氏在敦煌繁衍生息，蔚成大族。他们仕郡宦州，累世荣华，冠冕西土，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地方豪强”[130]。曹氏的情况，据《郃阳令曹全碑》，曹全高祖父曹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其祖父曹述“举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其祖父曹凤“举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也是世代仕宦。安帝元初时的敦煌太守曹宗，可能就是出自敦煌曹氏，由于边郡的特殊性，没有严格执行本籍回避制度。盖氏在东汉时也发展成为敦煌大姓，东汉末的盖勋，“敦煌广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后汉书》注引《续汉书》曰：“曾祖父进，汉阳太守。祖父彪，大司农。”《谢承书》曰：“父字思齐，官至安定属国都尉。”[131]

东汉时期体现西州地方豪族势力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武威的田氏。建武年间，任延出任武威太守，“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132]。田绀大约是田氏宗族的领袖，出任武威的将兵长史，其宗族宾客放纵，为霸一方。任延一次收系了包括田绀在内的五六人，绀少子立即聚集了数百人攻打郡城，其宗族力量的强大可见一斑。郡大姓攻击官府的例子还有酒泉黄氏。建安中，酒泉太守徐揖诛杀郡中强族黄氏，“时黄昂得脱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数斛，募众得千余人以攻揖”[133]。武威的大族还有段氏，《通志·氏族略》：“汉文帝时段卬为北地都尉，成帝时段会宗为西域都护。”[134]段氏因为多在西州任官，所以落籍武威，东汉后期煊赫一时的段颎就是出自武威段氏。还有贾氏，在东汉末西州兵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贾诩，就是出自武威贾氏。

庞参为汉阳太守，去拜会当地贤人任棠，“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参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135]。如果任棠的微意真的如庞参领悟的那样的话，则可见汉阳强宗势力之强大，以至于任棠要采取这种“哑剧”的方式晓谕太守，其中有其避祸自保的因素。

即便是庞参过度联想了，但是他一下子联系到“欲吾击强宗”，也是因为他对汉阳强宗势盛的情况有所了解的缘故。

《三国志》记载了酒泉一桩豪族间的恩怨，“初，淯外祖父赵安为同县李寿所杀，淯舅兄弟三人同时病死，寿家喜。淯母娥自伤父仇不报，乃帏车袖剑，白日刺寿于都亭前，讫，徐诣县，颜色不变，曰：‘父仇已报，请受戮。’禄福长尹嘉解印绶纵娥，娥不肯去，遂强载还家”[136]。赵氏、李氏应该都是地方豪强，李寿杀赵安后，并不担心官府的追究，只是担心赵安儿子们会报仇，当赵安三子同时病死、赵家宗族的势力衰落时，李家大喜。后来赵家女儿刺杀了李寿，值得注意的是，县长感其孝烈，不肯追究其责任，地方政府对于豪族间恩怨所持的态度，颇可玩味。赵氏当时与庞氏联姻，庞淯尝以凉州从事守破羌长，庞氏想必也是酒泉豪族，赵家的女儿嫁给了同郡庞氏，是地方大族间通婚的表现，东汉后期豪族间形成了固定的婚姻圈子，非常注重门第的匹配，这种风气也传到了西州。

中平元年（184），羌人起义，北宫伯玉等劫金城人边章、韩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典略》曰：“遂字文约，始与同郡边章俱著名西州。”[137]边、韩俱是金城的大姓名族，著名于西州，在地方上颇具号召力。麴氏也是金城大族，“边章、韩遂为乱凉州，金城麴胜袭杀祖厉长刘隽”[138]，王宗维认为“祖厉，东汉时为武威郡辖县，位置在金城榆中东祖厉河下游，此麴胜大概就是金城榆中人”[139]。三国魏晋时期金城、西平涌现了许多麴姓将帅，想必金城麴氏在东汉时已经有一定的宗族势力基础了。两汉之际安定的卢芳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得以联合朔方，连谋匈奴。东汉时期安定最著名的大族是皇甫氏，皇甫规祖父棱出任过度辽将军，父旗出任过扶风都尉，兄为雁门太守，为官宦世族，东汉后期皇甫规平定羌乱，立有大功，皇甫族盛极一时。后来其兄子嵩平定了黄巾起义，威震天下。

安帝永初四年（110）朝廷因羌乱欲弃凉州，“议者咸同”，此时虞诩向太尉谏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

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140]此论一出，太尉大呼“微子之言，几败国事”[141]。虞诩指出当时实际上是壮勇无比、习于兵事的西州豪强牵制了羌乱的向东蔓延，如果朝廷抛弃他们的故土，一旦西州豪强聚谋起兵，朝廷将难以抵御。虞诩的话击中了朝廷公卿心中的“隐忧”，这一层利害一旦明了，弃凉之议遂告中止。朝廷按照虞诩的建议，辟西州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抚循，由此可见西州地区的豪杰势力及其武质化特征，使得朝廷不得不正视之。

东汉时期豪族逐渐世族化，实现文化、族势和仕宦的合一，家学渊源成为世家大族的主要特征。冯培红在考察了汉晋敦煌大族的发展历程后指出：“东汉后期，敦煌大族注重儒学文化建设，以经学传家，并谋求官宦仕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儒家世族。”[142]敦煌大族的这一演变趋势与东汉时期整个豪族的世家化趋向是一致的。西州表现出这一趋势的，也不仅敦煌一地。以“凉州三明”为例，皇甫规被梁冀排斥，“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143]。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144]。段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145]。张奂删定《牟氏章句》，著《尚书记难》；皇甫规教授门徒，表现出很高的学养深度；段颎武质倾向较强，但也是折节好古学；这种情况在西州豪族中可能并不少见。据《敦煌名族志》，虽然敦煌索氏以军功起家，但是至东汉中后期有索堪，甚有才名，举孝廉明经，对策高第；有索展，游学中原，师事太尉杨赐；有索翰，师事司徒王朗；由此可清楚看出索氏从军功型大族向儒学名族转换的痕迹。更典型的是氾氏，据《敦煌氾氏家传并序》，东汉中后期氾氏有氾煛，高才通经史；氾孚“通经笃行，州辟为从事。太守马艾甚重之，征为州辟司空，屡辞不起。孚志节尤高，耽道乐业，州累辟命，司空曹公察孝廉，皆不就。下惟潜思，不窥门庭，或半年百日，吟咏古文，欣然犹□，精黄老术。苍梧太守令狐溥与太常张奂书曰：‘仲夏居高笃学，有梁鸿、周党之伦。’其见重如此。病卒”。“氾咸，字宣合，为侍御史辅之玄孙也。咸弱冠从苍梧太守同郡令狐溥受学，明通经纬，行不苟合。初，咸当世非政不合，门无杂客。太常奂致书与令狐溥曰：‘宣合独怀白玉，进退由道，是以尤屈’。”[146]这里尤可注意者，是张奂与令狐溥之间关于本地人物的品评议论，沾染了中原士大夫之间好品评人物的风气。令狐溥官居二千石，张奂为九卿，均是敦煌大族的代表，他们之间互通书信，联系密切。令狐溥致书张奂，言氾孚“居高笃学，有梁鸿、周

党之伦”。张奂也曾致书令狐溥，言氾咸“独怀白玉，进退由道”，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个敦煌地方的士大夫交际网络，他们之间议论的主题是本籍人物的学养、修养、立身处世之道等。由于材料的原因，我们只看到了张奂与令狐溥对于本郡人物的品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有更大的西州士大夫之间的交际网络与更多的品评舆论的存在。东汉时人极重地域，史籍中常出现“名震西州”、“著名西州”、“名闻西州”的评价和“西州士大夫”、“西州豪杰”的泛称，隐约可见一个以“西州”作为地域单元的认同存在。张奂和令狐溥既是敦煌的代表，也是西州的代表，如果他们就西州其他地区的人物进行议论，当不无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会根据场合不同而取最小公约数，张、令狐同为敦煌人，相对于西州，敦煌可能是他们之间认同的基础，但是如果相对于中原士大夫，西州则是他们的认同基础。张奂与安定皇甫规交往甚笃，他们之间的“认同”想必就是整个“西州”了，在某些时候，他们之间就整个西州人物进行议论品评是非常可能的。

但总的来说，在中原士大夫的心目中，西州豪族的特质仍然是“习于兵事”、“壮勇无比”，凉州是“寡于学术”，西州豪族的文化成就不被中原士林看重，西州最顶尖的人物也没有进入当时士大夫社会的核心圈之中。以当时士大夫互相标榜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八元、八凯而言，无一西州人。皇甫规是西州豪族的代表，“及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时人以为规贤”[147]。皇甫规已经是西州第一流的豪族了，但是在中原士林中竟然“素誉不高”，党事起的时候，天下名贤皆列为党人，而规并不在党禁名单中，皇甫规在“清浊”对抗中是支持党人的，但当时无论是朝廷，还是士林，都没有将他视为党人。这里的“耻”字用得惟妙惟肖，皇甫规的“自首”也不被朝廷接受，只是这样的态度得到了党人的好感。张奂虽名列党籍，但是在窦武、陈蕃谋诛宦官时，“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以奂新征，不知本谋，矫制使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武。武自杀，蕃因见害”。[148]张奂带兵围剿窦武虽然是被宦官所骗，但是他“不知本谋”，说明他与士大夫核心圈的疏离。如果他与中原世族联系较为密切，对当时的政治动向有所了解的话，以张奂的政治倾向看，他是不会助纣为虐，破坏士大夫们诛除宦官的计划的。段颎则是“曲意宦官”，更为中原士大夫不齿。金发根列东汉党人地域分布表，将三辅与西北边郡合起来考察，其中所列属于西州的党人有张奂、皇甫规，如上所论，都

有些牵强；金先生还列了盖勋，但二次党锢均与他无关，而且他与贵戚还有说不清的关系，只是盖勋与刘虞、袁绍相谋诛除宦官，具有反宦官的政治倾向。但如果只是在政治上反对宦官，那么党人之定义则稍嫌宽泛了。[149]总的来说，西州豪族与党人的关系是很疏离的，西州豪族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化上相较于中原世族是滞后的。

邢义田考察了东汉孝廉的地域背景，东汉105个郡国中有41个无孝廉可考，属于西州的郡国有：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张掖、酒泉、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朔方、五原。安帝时，王符说："羌反以来，户口减少，又数易太守，至十岁不得举。"[150]虞诩说："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无人，宜令均平，以厌天下之望。"[151]举孝廉是当时豪族入仕的主要途径，这条路对于西州豪族来说，并不通畅。邢先生注意到，"边郡的孝廉完全集中在顺帝朝以后，这应该和顺帝以后，边乱日亟，习于边务的北边人士才有了表现和留名史册的机会"[152]。西北边乱的严重为西州豪族的上升提供了时机，刘增贵列《后汉各州公卿数量比较表》，凉州人口占全国人口之比例为0.88%，出有三公3人，占三公的比例是1.90%，三公比例÷人口比例＝2.16；出九卿11人，占九卿的比例是3.36%，九卿比例÷人口比例＝3.81，三公比数仅低于司隶，九卿比数高居所有州之首。刘先生解释这一现象说："凉州情况特殊，一方面人口甚少，另一方面外患频仍，立功边域者往往成为公卿。凉州公卿中期以前的皆为安定梁氏（梁统之族，卿占六人），梁氏为外戚，与一般士族有别。其余公卿如张奂、段颎、皇甫嵩、王邑皆在汉末，至于董卓、李傕更是情况特殊，故比率偏高。"[153]出自西州的公卿集中出现在后期，与孝廉集中于顺帝之后的情形是一致的。这与西州的战略地位及羌患有关，是特殊情况，并不能说明西州豪族的仕途有多通畅。

汉武帝之后，以迁徙到西州的原中原豪族为中心，形成了西州的豪族势力。王莽末年又有一批中原豪族避难西州，加快了西州豪族的发展，两汉之际形成的窦融、隗嚣、卢芳三个地方势力就是西州豪族势力得到较大发展的体现。东汉建立后，西州一流的大族都被迁往中原，与皇室联姻，成为外戚大族；西州本地豪族的发展受到国家政权的抑制，但是这些抑制措施效果有限，在东汉中后期利用羌患的加剧重新崛起，以其武力特征令中原大族侧目。西州豪族自身也出现世族化的发展趋势，涌现了一批通经好学的代表。虽然如此，西州地区的学术发展水平终究有限，并不被中原士人主流看重，西州第一流的大族人物也没有能进入当时士大夫网络的核心圈。东汉中后期羌患渐烈，朝廷大量起用西

州豪杰平定叛乱，不得不给西州豪族更多的入仕方便，因此西州可考的孝廉集中在顺帝之后，出任公卿的西州豪杰大多依靠军功而起。这一情况的改变要到西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变乱，五胡乱华，大量中原大族避难河西，河西的学术有了质的飞跃，乃至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之一。

（三）隗嚣、窦融与卢芳：西州三大豪族的割据与统一

本书在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动及汉朝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这两个互动模式下考察西州的历史。汉帝国的西北边疆扩展成“西州”，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互动的结果。在开拓西州的前期，无论是移民、屯田、驻军、征伐，西州都是作为一个“客体”，被中央王朝动员、组织的各种力量来“经营”、“开发”。待西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西州的地方势力逐渐发展、沉淀，西州亦获得一定的“主体性”，本地人士的地域观念逐渐增强，形成了特殊的地方利益要求，并具备了实现这种要求的力量。西州的“主体性”增强后，其能量将以某种形式反馈中央，两汉之际西州形成的隗嚣、窦融和卢芳三个割据势力，就是西州势力具备了一定主体性的表现，他们在光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扮演了或正或反的角色，发挥了或推动或阻挠的作用，构成了西州对中原腹地的第一次反馈与互动。

隗嚣是西州割据势力中力量最强的一支，隗氏乃天水豪族，隗嚣好经书，“少仕州郡”，后来得到王莽国师刘歆的赏识，可能是通过征辟途径，歆引隗嚣为属官元士。由于隗嚣有在京城做官的经历，他在家乡甚有名望。刘歆反莽被杀，隗嚣因为与刘歆的密切关系而无法在京城待下去，于是返归故里。如果王莽的新朝持续下去，隗嚣在政治上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但是新莽的覆亡使隗嚣的命运出现转折，正如荆邯所说的“隗嚣遭遇运会”[154]。

隗嚣成为陇右地方势力首领之过程颇为曲折。初，在王莽末年天下豪杰纷纷起兵的浪潮中，隗嚣季父崔、义及上邽人杨广、冀人周宗等策谋起兵，隗嚣劝阻说：“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155]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隗嚣并不倾向于投机冒险，他好经书，与刘歆趣味相投，是以一个儒生的面貌出现的；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隗嚣缺乏对天下形势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王莽之政已惹得天下怨怒，东方起义者甚众，王莽军队接连失败，有识者皆能看出天下大势，而隗嚣却表现得畏葸懦弱。隗嚣的

情形与光武形成对比，“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156]。光武也是儒生，但是面临与隗嚣大致相同的局面时，光武所展现出来的谋略与胆识不是隗嚣可比的。隗崔、隗义、杨广、周宗等不顾隗嚣的反对，聚众数千人攻杀了王莽任命的地方长官，反事已成，担心“宗族何辜”的隗嚣反倒成为可能被连累的宗人，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了。隗嚣虽然没有参与最初的起事，但是起事的豪杰们认为应该选一名素有威名的人来做领袖，才可以号召地方，统一众心，负有声誉的隗嚣于是被推举为上将军。史书的记载比较戏剧性：“嚣辞让不得已，曰：‘诸父众贤不量小子。必能用嚣言者，乃敢从命。’众皆曰‘诺’。”[157]

令人费解的是，隗嚣不但没有参加起兵的谋划，而且得知后还反对，为什么众人还要推举他为首领呢？隗崔、隗义既是隗嚣的父辈，又是起事的谋划者和领导者，在他们之中选择一位出来不是更合乎常理吗？推究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隗嚣在宗族中的地位，他可能继承了隗氏宗族之大宗的地位。隗嚣少仕州郡，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隗氏嫡宗的关系，史书没有其父的介绍，很可能其父较早去世，隗嚣继承了大宗地位。《后汉书》对隗崔的描述是“素豪侠，能得众”，虽然他是隗氏宗族的成员，但偏向于“侠”的一面，不见有仕宦的经历，只是纵横乡里的土豪，无论是在宗族中的地位还是在乡里的名望，皆无法与隗嚣相比。隗嚣是以儒生的面貌出现的，而且少仕州郡，在地方上具有影响力。后来征辟入京，成为国师的僚属，西州以一偏僻之地、文化落后之乡，竟能出一位得到刘歆这样当世最具学问名望者赏识的人物，自然是地方上的骄傲，隗嚣的名声可能遍于整个西州。第二，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即隗嚣曾参与反莽活动。隗嚣与刘歆有密切的关系，而刘歆的败亡恰是因为反莽之谋的失败，在当时天下纷纷起兵反莽的局势下，隗嚣是反莽的先行斗士，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隗嚣“移檄告郡国”中也强调了这一事件：“大臣反据，亡形已成。大司马董忠、国师刘歆、卫将军王涉，皆结谋内溃。”[158]隗嚣因为这一事件而返归乡里是众所皆知的事实，在起事檄文中对这一事件的宣扬，无疑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隗嚣曾经的反莽经历的记忆。由于具备以上种种条件，看来隗嚣确实是陇右可以推举出来的最有号召力的人选了。事实上，这个选择确实收到了成效，凭借隗嚣的号召力，陇右集团迅速集结了十万众，击杀了王莽的雍州牧和安定大尹，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隗嚣势力迅速达到鼎盛。

此后不久，更始政权进入长安，征召隗嚣等入京，其军师方望力劝阻之，嚣不听，执意进京。当时更始政权的形势看起来非常好，“是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159]。隗嚣并无逐鹿天下之心，见到更始政权统一天下似乎有了眉目，便决心投靠，却没有看见更始政权内部的重重问题及天下形势瞬息万变的可能性。这次离开自己的根据地贸然进入长安的经历非常强烈地影响了隗嚣之后的政治决策，后来他坚决不投降光武可能就是源于这次进京留下的心理阴影。到达长安后，隗嚣被封为右将军，隗崔、隗义保持旧有的封号。可能由于在长安受到了冷落，并亲身感受到了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和瓦解的危险，隗崔、隗义计划逃回天水脱离更始，隗嚣此时做出了一个并不高明的决定，向更始告发了自己的叔父，隗崔、隗义被诛，隗嚣因此升任御史大夫。隗嚣在长安的权位来自更始帝，但更始帝的权力终究是有限的，当时“赵萌专权，威福自己。……萌私忿侍中，引下斩之，更始救请，不从。时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160]。“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161]在这种政治局面下，隗嚣的不如意可想而知，当赤眉入关后，他竟与张卬等谋劫更始东走，而张卬等的计划是“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162]，与此等档次的人为伍，可见隗嚣的无奈和政治水平的平庸。后来事情败露，隗嚣逃归天水，召集旧部，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

在两汉之际的大动荡中，窦融的身份经历了多次转换。窦融宗族乃大姓豪族，祖上世代为官，到王莽摄政时，窦融是王莽阵营中的一员，以强弩将军司马的身份镇压了翟义、槐里赵明、霍鸿的反莽军事行动。莽末天下群起反叛时，窦融先后跟随王匡和王邑“平叛”，王莽败后窦融投降更始大司马赵萌，赵萌甚重之，为校尉，成为更始政权的一员。赵萌荐窦融出任巨鹿太守，窦融鉴于东方的混乱及更始政权的无力，不欲出关，因为其高祖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家族累世在河西为官，在河西地区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网络和权力基础，具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窦融与兄弟商议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163]可以看出窦融对更始政权的前景并不抱乐观态度，他怀着保全宗族的目的，选中了在经济上“殷富”，在武力上有“精兵万骑”，在地理上便于“杜绝河津”以守的河西，于是连日托请赵萌，得以改任张掖属国都尉。乘更始政权暂时掌控全国局势之时，窦融求得了张掖属国都尉的官职，其合法性来自更始政权。窦融来到河西，“抚结雄

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164]。河西各郡守令都尉一致认为：“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勠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165]此时的河西五郡应该都归属更始政权，其守、尉的任职与窦融一样都得自更始政权的任命，却都认为天下“未知所归”，河西应当团结，推举一位领袖以自我保存并“观时变动”，于是窦融被推举出来任河西五郡大将军。起初服属隗嚣，后来服属更始的河西五郡，此时团结成一个利益相连、进退与共的集团。隗嚣从长安逃归天水据故地后，河西五郡表面上仍然服属于他，但已经是自成一体了。

卢芳在王莽末活动在安定三水一带，利用当时人心思汉的状态，诈称是武帝曾孙刘文伯，结交当地豪杰和羌胡，乘莽末天下混乱之时，利用豪族及三水属国羌胡起兵，占据了安定及其周边地区。更始入长安后，卢芳接受征召，为骑都尉镇抚安定以西。更始败后，卢芳被三水豪杰推为上将军、西平王，连接西羌、匈奴，成为西州的一支重要地方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西州三股割据势力的兴起，既与当地的豪族有密切的关系，也与西羌、匈奴等游牧部族有密切关系。窦融到河西“抚结雄杰”，就是欲取得当地豪族的支持，后来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在河西孤立无党而自动解印绶去，可能就是由于他们本身不是河西的豪族，也未取得当地豪族的支持。此后，窦融对河西的政治权力进行了调整，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库钧为金城太守，这些太守要么本身是西州著姓，要么与窦融一样，曾有家族成员在河西为官，具有一定的权力关系网络，能够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通过此次调整，河西集团内部权力与利益得到了妥善调和，集团的凝聚力得到加强。陇右及其周边地区广泛分布着种类繁炽的羌胡。羌胡善骑射，是一支劲旅，隗嚣对之采取笼络招诱的政策，“初王莽世，羌虏多背叛，而隗嚣招怀其豪酋，遂得为用”[166]。“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嚣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众。”[167]窦融在河西“怀辑羌虏”，河西地区分布着大量的羌人、小月氏、匈奴人及各种杂胡，这些游牧者比汉人更加善战、勇猛，在军事上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后来耿恭在推荐窦固时说：“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168]，可见窦融对羌胡也是拉拢怀柔。

无论是隗嚣还是窦融，都必须对西州羌胡种落进行招诱和拉拢，西

州的经济、人口、文化等方面毕竟都落后于中原，之所以能在两汉之际发挥重要的作用，实由于其羌胡劲兵在军事方面的优势。窦融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就是看中这里可以征召羌胡“精兵万骑”，张掖属国的部族构成首先是匈奴浑邪休屠部未能迁往五属国的部分，还有秦胡、卢水胡等[169]，此外也有不少的羌人。卢芳起兵首先依靠的是三水属国的羌胡兵，并获得了安定地区豪族的支持。更始败后，也是三水豪杰共立他为上将军、西平王，此后他立刻做的事情是“使使于西羌、匈奴结和亲”。匈奴人立卢芳为帝，居于匈奴，其弟得以将胡骑返安定。后来他称帝于五原，也是匈奴策划，由先前各自起兵的五原的李兴、随昱，朔方的田飒，代郡的石鲔、闵堪等迎立的，卢芳势力“与胡通兵，侵苦北边”。和隗嚣、窦融一样，卢芳既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也寻求与羌胡的联合，但不一样的是，隗嚣、窦融招诱羌胡，能将羌胡兵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利用的主要是分布在属国及内迁到郡县中的外族，而卢芳却是寻求塞外匈奴本部的支持，其政权是匈奴所立的一个傀儡，对匈奴的依赖性较大。

更始败后，隗嚣示好光武帝，接受了光武政权册封的“西州大将军”，配合了邓禹在关中的军事行动，围剿赤眉，阻击公孙述。光武帝统一天下采取先东后西、远交近攻的战略，为了牵制公孙述而极力拉拢隗嚣，对他“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170]。这里虽然用“敌国之仪”，但隗嚣与光武之间并不是“敌体之国”的关系，光武接受了隗嚣的服属，构成了君臣关系，只是为了表示优厚慰藉之意才采用了“敌国之仪”的殊礼。后来当隗嚣首鼠两端的态度明显后，光武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恰说明先前已经形成了君臣关系，所以这里才“正”之。因为割据益州的公孙述并不比割据西州的隗嚣更有实力和正统性，所以隗嚣才“自以与述敌国，耻为所臣”[171]，而对于刘秀，虽然不一定甘心，但并不像对公孙述那样“耻为所臣”，故接受了封号，形成了正式的臣属关系，采用了光武政权“建武”的年号。

但是隗嚣在割据与统一之间摇摆犹豫，并没有坚定的立场。有史家将隗嚣的失败与他优柔、反复的性格联系起来，李景星《四史评议》说：“《隗嚣传》纯写其游移不定，忽止众人之起兵，忽从众命而自立，忽应更始之征，忽违更始而去，忽为汉击贼，忽拒汉讨蜀，忽上书诣阙，忽假辞不朝，忽遣子入侍，忽称臣邻封，自古有如此举动而能成事者乎？”[172]隗嚣的确缺乏对天下局势的清醒认识和对自身前途的明确定位。本来天下纷乱，英雄辈出，虽然天下思汉，但豪杰崛起，异姓未必

不可成功，荆邯评说隗嚣："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173]如果隗嚣不甘心臣属于人，自当抓住运会，凭借西州劲兵，招诱英雄主动出击以争天下。本来时局纷扰，武力相争强者胜，奉天承运只是胜利者的专利，结局亦未可知。但是隗嚣选择了"卑辞事汉"，"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174]，丧失了逐鹿中原的机会。既如此，他就应该专一事汉，以求功赏，但后来又叛汉依蜀，前功尽弃。

隗嚣与班彪对天下形势曾有一次讨论：

> 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羁之，时人复知汉乎？"[175]

从隗嚣的设问来看，他认为天下形势之走向要么是战国纵横之局复起于今，要么是重新统一于一人；从他反驳班彪的话来看，他似乎对刘汉复兴不以为然，认为他姓亦可如高祖一样创立新朝。从他的话我们似乎觉得他在为自己争夺天下寻找合理性，但是他没有高祖的雄心与才略，并没有出而争天下，似乎只是希望天下维持着分裂并立的局面，自己可以割据一方，重现战国的局面。但是隗嚣又没有为重现"战国"局面而行动，反而归附光武，为其平定东方赢得了时间。而且，经过秦、西汉二百多年的统治，皇权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统一天下是皇帝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诚如班彪所论，周末与汉末之形势截然不同矣，未来的皇帝绝不会允许任何割据者的存在，六国之局不可再现，隗嚣要么选择自己去争当那个统一天下的"一人"，要么选择一主归附，以望成功之日计功受赏。但是他既不出争天下，也不专附一主；既助光武稳住西州，使之可以专力平定东方；但是当东方平定后，又反欲脱离光武，与卢芳、公孙述联合对抗之，其选择不但反复不定，而且互相矛盾。《后汉书·窦融传》记载："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游说河

西曰：‘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176]张玄的话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隗嚣的心思和意图，但可笑可悲的是，隗嚣心中最高的谋划只是“可为六国”。这种谋划使得隗嚣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不愿看到光武统一，但是又为光武平东方赢得了时间；起初自耻臣属于公孙述而斩杀了其使者，后来为了对抗光武帝又接受了公孙述的爵号。

窦融曾经致书隗嚣，表达了自己对他选择的不解。

> 亲遇厄会之际，国家不利之时，守节不回，承事本朝，后遣伯春委身于国，无疑之诚，于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义，愿从役于将军者，良为此也。而忿悁之间，改节易图，君臣分争，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难就，去从义，为横谋，百年累之，一朝毁之，岂不惜乎！殆执事者贪功建谋，以至于此，融窃痛之！当今西州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计若失路不反，闻道犹迷，不南合子阳，则北入文伯耳。……今以小敌大，于众何如？弃子徼功，于义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节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谓吏士何？忍而弃之，谓留子何？[177]

窦融的话可谓句句击中隗嚣内心之要害，而且指出隗嚣此后不是依附于卢芳就是依附于公孙述，战国并立之局不会出现。无论是示之以利害，还是激之以亲情，隗嚣仍然执迷不悟，最后被光武政权消灭。

隗嚣的选择，主要归责于他个人。将之归于其他因素，比如陇右豪族的地方性，或是西州经济、军事、地理等因素的局限性都是次要的。他之起兵并不是主动为之的，性格犹豫反复，政治识见平平，对于天下形势和自身未来都缺乏正确的判断和定位，甚至还妄图倒退到战国分裂并立的局面中，尤其可见其对历史和政治的无知。隗嚣后来在阻挠光武统一的事情上表现出令人难解的偏执，我们或许可以从他之前两次长安之行的痛苦经历中寻找原因。隗嚣第一次进入长安是因为得到刘歆的赏识，被征辟为元士，但是随后刘歆因为阴谋反莽被杀，隗嚣被牵连而离开京师，其中具体的情形无从知晓，但是此事件给隗嚣留下了不小的阴影，长安的凶险、政治的阴暗使他心有余悸。影响更为深重的是隗嚣第二次长安经历，当时更始进入长安，招隗嚣等入京，隗嚣不顾方望的劝阻而入京，但进京后并没有在政治上获取更大的成功，反而受到冷落，以至于其叔父们阴谋逃归天水。隗嚣因为告发了叔父们的阴谋而升任御

史大夫，但是在更始政权的权力格局中，更始帝自己权力有限，遑论处于依附地位的隗嚣，而且告发自己叔父的行为必定让隗嚣承受着巨大的心理与舆论压力。赤眉入关后，隗嚣与张卬等阴谋劫更始，阴谋败露，“更始使执金吾邓晔将兵围嚣，嚣闭门拒守；至昏时，遂溃围，与数十骑斩平城门关，亡归天水”[178]。这次仓皇狼狈、险象环生的逃亡在隗嚣心底留下了重重的心病和阴影，在逃归天水的马上，隗嚣一定对自己当初没有听方望的话后悔不迭，为叔父的死自责不已，或许此时他就暗暗下定决心，不再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支配。当刘秀统一东方后开始经营西方，催促他进攻公孙述的时候，隗嚣直接面临的压力骤增，想到公孙述一亡，自己只能再一次入京，曾经受制于人的经历及历史上种种兔死狗烹的先例，令隗嚣对刘秀的统一前景惊恐不已，故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阻挠。如果我们说隗嚣患有某种精神上偏执的疾病，也不会离事实太远，这种偏执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张玄在河西游说时说的“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可谓隗嚣心事的真切表达，“虽悔无及”是隗嚣通过张玄的口说出了自己长安之行的切肤感受。王元说隗嚣时说：“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179]，隗嚣对此自然有刻骨的体会。总之，隗嚣不愿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不愿失去权柄而再一次受制于人，所以他后期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从此中寻找原因，面对窦融“于众何如？于义何如？谓吏士何？谓留子何？”的劝说，仍然坚执己见，顽固到底。

窦融虽然也像隗嚣一样，在两汉之际经历了身份的多次转换，但是相较于隗嚣的优柔反复、进退失据、偏执地阻挠光武的统一，窦融是目标明确的，政治识见高明，行动坚决，辅助光武完成了对西州的统一。当初更始政权败亡时，“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这些人大都劝说隗嚣归附光武，促进统一；当隗嚣叛汉态度渐明时，这些人有的东归光武，有的西走窦融。班彪当初从隗嚣时，就力劝隗嚣归汉，并作《王命论》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于是班彪西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河西以拒隗嚣”[180]。窦融到河西后，虽然河西五郡结合成一个集团，但名义上还是依属于隗嚣的，正是窦融对隗嚣所说的“从役于将军”，但此时窦融及其集团仍然处于观望状态，河西集团的自保性非常明显，当初五郡推举首领时的初衷本来就是“不同心戮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181]。窦融认为“西州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所以必须首先自保，然后观时变动，选择真主。鹈饲昌男通过居延汉简中出现的年号简对两汉之际河西

的政治动向进行了研究，从开始称“复汉”，到更始政权的“更始”，再到赤眉的“建世”，再到不知何以纪年而使用平帝的“元始”，再到光武的“建武”，河西地区使用的年号频繁更换，这既说明河西政治动向的不稳定，也表明河西采用的策略是不得罪任何一方势力，力争避免战祸，河西在不断变换年号的过程中自我保存，观察时局，以寻找真命天子。[182]

班彪到达河西后就劝说窦融归附光武，大约此时前后，隗嚣派遣的辩士张玄也到达河西，劝说河西联合陇右、巴蜀抗拒光武，当时“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融小心精详，遂决策东向。五年夏，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183]。由于班彪的劝说，更由于窦融精详小心，对天下形势深思熟虑之后，河西集团决心投靠光武政权，派出长史刘钧赴洛阳，所谓“奉书献马”就是策名委质，建立直接的君臣关系。在此之前，河西是通过隗嚣而归属光武的，此时隗嚣叛迹越来越明显，窦融有与隗嚣不同的政治判断与选择，所以不再通过隗嚣，而是直接通使洛阳。鹈饲昌男指出“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表明河西的“建武”年号是间接得自隗嚣的。至建武五年（29），“遣使获得成功，窦融自光武帝处得到玺书，授予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张掖属国都尉、凉州牧官职与黄金二百斤。至此，窦融与隗嚣作为不同的势力存在，得到了光武帝的正式承认，光武帝对西部的控制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在河西，‘建武’的年号在表面上虽然没有变更，但是以隗嚣势力影响下的建武三年至五年夏，与光武帝直接控制的建武五年秋以后相比，河西地区的政治状况应当是有所区别的”[184]。后来窦融率领河西的军队，配合光武帝两面夹击，消灭了隗嚣的势力，为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赐窦融的玺书中，光武说：“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185]虽然得到了窦融的投诚，但是之前双方毕竟没有直接交往过，光武心中并不是一点疑虑也没有，而且当此“臣亦择君”之世，光武的这些疑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光武在玺书中将这些话明白说出，既坦诚又高明。窦融等得书惊叹“天子明见万里之外”，复上书致款款之情：“臣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

利。”[186]窦融也非常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与选择。后来光武得到窦融责备隗嚣的书信，诏报窦融曰：“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叛臣见之，当股栗惭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蒙，非忠孝悫诚，孰能如此？”[187]对窦融是愈加的信任。李景星评议《窦融传》说：“又将光武与融往来之书详悉载入，以见其心心相印，无所用其诈虞。其尤得力者，则为融让隗嚣书，句句为嚣谋，却句句露出己之本谋。随又载光武诏书曰：‘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云云，见融之所为，朝廷无不周知。忽从两面叙，忽从一面叙，忽用暗写，忽用明写，千态百状，五花八门，总透出融之心事全在光武心事中，而光武心事又全在融心事中也。其善始善终，君臣交美处在此，而作者用笔之妙处亦在此，此真可谓写生妙手矣。”[188]此诚精彩之论，得其情矣。

卢芳的势力是与匈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汉更替之际，匈奴处在呼都而尸单于的领导下，趁着中国动乱无暇外顾，匈奴重新建立了在北方草原的霸权，又一次将西域纳入自己的支配之下，并恢复了对乌桓、鲜卑的统治，与冒顿单于时期匈奴达至鼎盛的模式很是相似。《剑桥中国秦汉史》分析：“但是相似之处与现实相比更多是表面的。主要由于地方主义在匈奴中间的增长，呼都而尸从来没有可能树立象冒顿那样的无可争辩的权威。”[189]虽然如此，但是此时匈奴实力的增长及中国内部战乱导致的实力分散与衰落，使得匈奴能够对中国内部战局产生一定的影响。更始二年，刘玄遣使使匈奴，单于谓使者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190]刘玄政权拒绝了匈奴的傲慢要求，但是起兵安定三水的卢芳却接受了匈奴的条件，匈奴于是遣数千骑迎卢芳至匈奴，立为汉帝，将卢芳留在匈奴中，使其弟领胡骑回安定活动。匈奴通过支持割据者来影响中原的政局，当彭宠反叛时，“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191]。北部边郡的起兵者，如五原、朔方、代郡等都与匈奴有联系。建武五年（29），在匈奴的协调和谋划下，“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192]。随着光武统一陇右、巴蜀，开始集中力量解决北方问题时，卢芳就面临巨大的压力了，光武的招降战术开始起作用，建武十二年（36），“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内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匈奴”[193]。十六年（40），卢芳入居高柳请降，被封为代王。后来因为光武突然中止了卢芳的朝见，令其忧恐，遂

又叛逃匈奴，最后客死大漠。

卢芳能长期割据于西州之一隅，首先是莽末天下战乱之局给他可乘之机，利用人心思汉，打着刘氏后裔的旗号，有一定的欺骗力；而且，他得到了三水、五原、朔方、代郡等地豪杰的支持；其起兵依靠了三水羌胡，后来成为匈奴的傀儡政权，每当势力不支时，都在匈奴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割据之地偏在北部，排在光武统一序列的末位，所以存在的时间较长。[194]无论是对卢芳还是对彭宠，匈奴的支持力度都是有限的，出兵最多时也仅七八千骑而已，反映出匈奴因内部的问题而力不从心，彭宠、卢芳势力渐次被光武消灭。光武末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明、章时期北匈奴在汉朝的打击下西去，南匈奴附汉，处在汉朝的保护和监视下，不再有威胁中原的实力。

隗嚣、窦融、卢芳三股势力在刘秀统一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视为西州力量对中原腹地的一个反馈，体现了西州力量的成长，是西州对中枢的第一次反作用。下一章我们讨论西州对中原腹地的第二次反馈。

[1]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6页。

[2]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8页。

[3]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8页。

[4]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9页。

[5]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250页。

[6] 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第30页。

[7]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71页。

[8]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第3876页。

[9] 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10] 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第31页。

[11]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12]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第247页。

[13]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73页。

[14]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74页。

[15]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76页。

[16]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79页。

[17]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64页。

[18]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64页。

[1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55，第2972页。

[20]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勇传》，第1588页。

[21]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12页。

[22] 《资治通鉴》卷五十，第1657页。

[23] 李正周：《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苗普生：《略论东汉三绝三通西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2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3页。

[25] 高贝贝还指出，由于军士们或多或少都要从事生产以自给，军镇向民镇的转化是普遍现象，许多军镇在转化开始以前便已多少具有了民镇功能。转引自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

[26] 当然，这并不是说朔方地区没有屯田，而是说这里的开发不是像河西一样遵循先屯田，然后移民设郡的步骤。国家对一般移民不但征收不了赋税，反而要供给生产、生活资料，财政负担较大。朔方田地颇广，国家亦会同时设置屯田，屯田实行供给制，所有的收获均上缴，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谷物，以备边疆的军事需要。

[27] 王子今：《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8]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90页。

[29]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1656页。

[30] 《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111页。

[31]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240页。

[32] 《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第257页。

[33]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33页。

[34]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11页。

[35] 高荣：《汉代河西的水利建设与管理》，《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

[36] 刘磐修：《汉代河套地区的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37] 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载《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有学者认为这一地区的黄羊木头乡脑高古城为沃野城，土城子古城为汉代临河城，这样朔方郡的河西五城都找到了，参见张郁《汉朔方郡河外五城》，《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

[38] 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载《侯仁之文集》，第298～299页。

[39]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1414页。

[40]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4～1425页。

[41]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伯重所论述的时代是宋代，区域是江南，但他指出的这种方法上的趋势，对于汉代经济史研究而言，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42] 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但是秦汉长达四百年，四百年内的生产水平不能用单一的论断概括。在2003年发现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有“排列整齐的十分明晰的高低相间的田垄遗迹，……田地内发现有车辙痕迹及牛蹄痕迹”。“三杨庄汉代遗址中发现的大面积耕作农田可以为我们真正理解汉代的‘代田法’提供真实的实物样本。三杨庄汉代农田遗址上，还留有清晰的牛蹄印记和车辙印记，说明牛耕已很普遍。”“主耕农具是全部为铁质铸就的犁，用铁量状况，可说明当时不再惜用铁材料，铸造业已经很发达。”参见刘海旺、张履鹏《国内首次发现汉代村落遗址简介》，《古今农业》2008年第3期。但是仅凭三杨庄的材料就判断整个汉帝国的农业发展状况，也是有困难的。三杨庄遗址属于两汉之际，在汉武帝推行代田法和犁耕后80多年，代田法在帝国内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西汉晚期之后的农业发展水平，或许没有杨际平判断的那么低。

[43]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38～1139页。

[44] 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45] 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农业出版社，1984，第67～68页。

[46] 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99页。

[47]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798页。

[48]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00页。

[49] 《汉书》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262页。

[50]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1644～1645页。

[51]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中华书局，1983，第1021页。

[52]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第90页。

[53] 汪受宽：《两汉凉州畜牧业述论》，《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4期。

[54]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29页。

[55]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280页。

[56]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第828页。

[57] 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3页。

[58]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31页。

[59] 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载陈连庆编著《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第636～637页。

[60]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5页。

[61] 《后汉书》卷三十一《孔奋传》，第1098页。

[62] 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载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

[63]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6页。

[64]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9页。

[65] 邢义田：《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432页。

[66] 左丘明撰《国语》，鲍思陶点校，齐鲁书社，2005，第113页。

[67] 邢义田：《汉代的父老、僤与聚族里居》，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453页；《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载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265页。

[68]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7页。

[69]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2532页。

[70] 《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041页。

[71] 弗洛姆对个人逃避自由、追求集体保护的心理动因有深刻的论述，参见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72] 稻叶一郎：《关于汉代民间秩序的形成——以所谓的豪族为中心》，载川胜义雄、砺波护编《中国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转引自刘敏：《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73] 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6，第295~316页。

[74] 刘敏：《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75]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卜兒传》，第2633~2634页。

[76] 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载许倬云《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第458页。

[77] 陈苏镇：《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哲》2010年第6期。

[78]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载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第742页。

[79] 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第464页。

[80] 陈启云：《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载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陈启云文集》（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86页。

[81]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269~270页。

[82] 邢义田：《汉代的父老、僤与聚族里居》，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451页。

[83]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84]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0页。

[85] 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第474页。

[86]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邢义田：《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286页。

[87] 刘敏：《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88] 《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第1463页。

[89] 黄留珠：《两汉孝廉制度考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90] 邢义田：《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326页。

[91]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2页。

[92] 《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20页。

[93]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第340页。

[94] 《汉书》卷七十《陈汤传》，第3024页。

[95] 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第480页。

[96]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42页。

[97]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第4179～4180页。

[98] 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245页。

[99]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大学学报》1936年第4期。

[100]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第645页。

[101]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第680页。

[102] 孙家洲：《东汉光武帝平定“彭宠之叛”史实考论》，《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

[103] 《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第3738页。

[104] 《汉书》卷八十三《朱博传》，第3398页。

[105] 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第166页。

[106] 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第167～187页。

[107] 《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第3159页。

[108] 《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第1252页。

[109]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传》，第2535页。

[110] 尤成民：《汉晋时期河西大姓的特点和历史作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111] 尤成民：《汉晋时期河西大姓的特点和历史作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尤成民：《汉代河西的豪强大姓》，《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冯培红：《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上）（中）（下），分别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第4期，2010年第3期。彭丰文：《汉魏十六国时期河陇大族势力的崛起及其在西北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赵向群：《河西著姓社会探赜》，《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

[112]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第1586页。

[113] 池田温：《唐朝氏族志研究——关于〈敦煌名族志〉残卷》，载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14]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29页。

[115]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331页。

[116] 转引自邢义田：《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403页。

[117] 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载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1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168页。

[119] 《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中华书局，1975，第3397页。

[120] 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第472页。

[121] 《汉书》卷六十六《刘屈氂传》，第2882页。

[122] 《后汉书》卷十五《来历传》，第591页。

[123] 这些材料都为尤成民所引用，分见《后汉书》的《王隆传》、《孔奋传》、《班彪传》、《蔡茂传》、《刘般传》、《杜林传》第2609、第1098、第1323～1324、第907、第1303～1304、第934～935页。参见尤成民《汉代河西的豪强大姓》，《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

[124] 尤成民：《汉代河西的豪强大姓》，《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

[125]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14页。

[126] 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127] 张奂所在的张氏与迁入敦煌的清河张氏可能不是同一支，而是属于南阳张氏。

[128]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331页。

[129] 《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第3397页。

[130] 王素：《高昌令狐氏的由来》，载《学林漫录》九集，中华书局，1984。

[131] 《后汉书》卷五十八《盖勋传》，第1879页。

[132]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传》，第2463页。

[133] 《三国志·魏书》卷十八《张恭传》注引《世语》，中华书局，1982，第552页。

[134]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第131页。

[135] 《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第1689页。

[136] 《三国志·魏书》卷十八《庞淯传》，第548页。

[137]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第45页。

[138] 《三国志·魏书》卷八《张绣传》，第262页。

[139] 王宗维：《金城麴氏的活动及其族属问题》，《兰州学刊》1986年第5期。

[140]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第1866页。

[141]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第1866页。

[142] 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143]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第2132页。

[144] 《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第2138页。

[145]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第2145页。

[14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3卷，第168～169页。

[147]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第2136页。

[148] 《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第2140页。

[149] 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下，1963。

[150]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第288页。

[151]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第1872页。

[152] 邢义田：《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323页。

[153] 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载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

[154]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第539页。

[155]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13页。

[156]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2页。

[157]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13页。

[158]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18～519页。

[159]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第469页。

[160]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第471页。

[161]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第472页。

[162]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第474页。

[163]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6页。

[164]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6页。

[165]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7页。

[166]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第588页。

[167]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804页。

[168] 《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第723页。

[169] 李并成：《汉张掖属国考》，《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

[170]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22页。

[171]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24页。

[172] 李景星：《四史评议》，岳麓书社，1986，第277页。

[173]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第539页。

[174]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39页。

[175] 《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上》，第1323～1324页。

[176]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8页。

[177]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801页。

[178]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21页。

[179]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25页。

[180] 《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上》，第1324页。

[181]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7页。

[182] 鹈饲昌男：《建武初期河西地区的政治动向——〈后汉书·窦融传〉补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249～254页。

[183]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8页。

[184] 鹈饲昌男：《建武初期河西地区的政治动向——〈后汉书·窦融传〉补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张忠炜通过对居延新简“捕斩匈奴虏反羌购偿科别”的复原和解析，补充了鹈饲昌男的观点。张忠炜指出居延新简“购偿科别”颁布的时间应该是建武七年，当时的政治背景是隗嚣与光武决裂，窦融集团选择归附光武，在此种政治形势下河西地区颁布新的购偿科别，否定之前隗嚣“西州书”的行政效力，来显示对光武帝归附和与隗嚣决裂的态度。参见张忠炜《〈居延新简〉所见“购偿科别”册书复原及相关问题之研究——以〈额济纳汉简〉“购赏科条”为切入点》，《文史哲》2007年第6期。

[185]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9页。

[186]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800页。

[187]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803页。

[188] 李景星：《四史评议》，第288页。

[189] 崔瑞德、鲁惟一撰《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90]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29页。

[191] 《后汉书》卷十二《彭宠传》，第504页。

[192] 《后汉书》卷十二《卢芳传》，第506页。

[193] 《后汉书》卷十二《卢芳传》，第507页。

[194] 窦连荣：《东汉初期封建割据者卢芳》，《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第四章 东汉东移：西州兵团的兴起与东汉国势的衰退

一 东汉的内部危机与外部忧患

（一）从历史分期看东汉的时代特征

光武帝重建了刘氏江山，但东汉不是西汉的翻版，时移世易，两汉建立的背景、面对的问题及政治的风格、社会的结构、国势的走向均有很大的差别。东汉一方面继承了西汉一代的政治制度、统治经验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背负了西汉二百年累积的政治、经济、民族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从多方面、多层次影响了东汉国势的走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两个均以“汉”为名的朝代之间的“异质”断裂并不少于“同质”延续。

历史分期体现了史家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和理解，在“魏晋封建论”，或称“汉魏之际封建论”的学者的历史分期中，东汉处在一个转折过渡期。东汉之前与之后是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结构和性质均有较大差别，前一个阶段在东汉逐渐终结，后一个阶段的新特征在此时逐渐形成。有日本研究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这样的分期借鉴了西方史学家对西欧历史划分的方法，但并不追求与欧洲、日本所用的上古、中世、近世的概念相一致的标准，并非对西方理论教条进行硬性套用，而是坚持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依据出发的立场，其成果与魏晋封建论的结论有可互相印证之处。历史研究一般依照朝代更替来区分，做法虽然方便但并无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应该遵照一定的立场和标准，对整体的历史演进动脉和节律有所把握，做出符合历史内在波动大势的历史分期。历史分期不是随意的和无关紧要的，而是反映了历史学家特有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体系，是“史识”的体现。中国历史上存在两次文化性、历史性的重大转变：第一次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第二次是唐宋之际。以这两个重大转折作为过渡期，有的日本学者对中

国历史做出如下分期：第一期上古，从开辟到东汉中期，是中国文化独立形成、发展并向外部扩展的时期；第一个过渡期，从东汉中期到西晋，是中国文化向外扩展的停止时期；第二期中世，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是“异族”觉醒，其势力侵入中国，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期；第二个过渡期，唐末到五代，是外来势力极盛的时期；第三期近世，从宋代到清代，是中国固有文化复兴和进步的时期。

真正有意义的时代区分，应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做内外两方面的考察。第一，从内部向外部发展的路径，即上古某时代中国某一地产生的文化，渐渐发展并向四方扩散的路径。宛如投石池中，水波向四方扩散的情形。第二，是反过来看，中国文化向四方扩散，由近及远，促进了其附近“野蛮民族”的觉醒，这些“民族”觉醒的结果，则时时出现强大的力量，向中国的内部产生反作用的势力。这就像水波受到池子周围堤岸的阻挡，又反作用于池中心一样。本书所讨论的两汉王朝与西州互相作用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由中心扩散到边缘，再由边缘回波到中原腹地的互动过程。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回波”作用主要发生于中原农耕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国家的回波作用要大于南方少数族群的回波作用。

对中国历史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唐宋变革论的相关讨论已经很多，但对发生在东汉时期的历史转折，学界讨论并不充分。谷川道雄认为，汉武帝的扩张使得汉帝国将匈奴、羌、氐等部族都纳入帝国的版图中。汉帝国扩张的完成也意味着民族冲突的复杂化和剧烈化，东汉时期的羌人动乱，就是由于不堪汉朝重负引起的，导致了东汉的衰亡。汉代的历史，就是帝国对外发展成功后，结果反作用于自身的典型例子。对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可从中国文化的对外发展，及由此而引发的周边族群向中国内部渗透这两个矢量来把握。由此两个矢量看来，汉帝国确实是一个对外发展的顶点，而帝国的崩溃则是向着由其自身产生的反动潮流转化的转折点。[1]谷川氏“两个矢量”的观点，对把握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启发性。第一个矢量是中国文化因素向周边的扩散发展，第二个矢量是周边“异族”在受汉文化影响觉醒后，反向对中国内部的渗透，中国古代历史之波动大势就是这两个矢量不断综合作用的结果。

东汉中后期帝国周边“异族”的“回波”作用之所以能深度影响国势兴衰，除了外部因素外，还需要从东汉帝国内部寻找原因，如皇权的衰微、外戚与宦官的乱政、豪族及地方离心势力的发展、关东关西政治军

事的失衡与矛盾等，这些因素与周边“异族”的反馈力量交互作用，促成了汉魏之际的重大历史转折。一般认为东汉光武、明、章时期是东汉的盛世，明章之治甚至可以与文景之治媲美，但是我们不禁产生疑问，“文景之治”留给汉武帝的是丰厚的遗产，汉帝国之国势在武帝时发展到高峰，但是明章之后东汉帝国一蹶不振，长期处在“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的局面。我们不得不追问东汉初期所谓“盛世”的真实情况，或许在“盛世”表象下潜藏着若干导致中后期国势走向不振的因素。笔者相信东汉中后期发生的各种政治、社会和民族问题，其根源早在光武、明、章三帝统治时期已经埋下了。从内在方面来看，帝国政治的紊乱腐败、豪族的膨胀及地方分离倾向的抬头，导致了东汉逐渐走向六朝贵族制政治和国家分裂；从外部因素来看，东汉帝国周边部族的反叛，最终演变成为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五胡占据中原，汉人政权逃徙南方。

西汉帝国在对外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与周边各族扩大了接触与交往，但并没有毫无原则地将“异族”纳入帝国内部，虽有部分匈奴、氐、羌部落迁入塞内，汉廷设属国安置之，但数量不大，管理有力，而且堠塞烽火严明，所以并未生出什么事端，在边防上不构成重大隐患。待到东汉时期，帝国周边族群内徙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逐渐失去控制。首先是匈奴，因为遭遇内部危机，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款塞内附，汉廷将南匈奴各部安置在北部缘边各郡，目的是“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2]。南匈奴布列“北边”各地，南单于居西河，“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3]。乌桓也徙入塞内，《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魏书》：“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4]邢义田指出：“东汉自建武九年、十年伐匈奴无功以后，即采取消极退避的政策，将雁门、代郡、上谷、定襄、云中、五原、朔方诸郡之边塞放弃，而将边民先后迁往常关、居庸关以东及河东之地。因此当南匈奴、乌桓归附时，立即填补了边地的空虚。”[5]较之匈奴和乌桓，西北地区羌人内徙的情况更加严重，内迁羌人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迁徙范围大。羌人叛服无常，内徙不久后又叛乱出塞，之后又接受招抚，徙居塞内，反复迁徙的情形并不少见，内徙的羌人不但在西州各郡均有分布，而且还深入到三辅，甚至是河东、河南一带。[6]

光武帝初年采取了收缩防线的边疆策略，内徙百姓，将捍御匈奴的任务交给了投降的匈奴，以夷制夷。后来光武帝虽然下令内徙的北边诸郡居民回归本土，但效果并不明显，东汉一代“异族”内徙的情况不断加剧，不但没能完成对徙入塞内“异族”的汉化，边境地区汉人的蛮夷化趋势反倒更加明显，汉帝国北部边缘地带布满“异族”，边民也都颇染胡风。谷川道雄把大量“异族”入据汉帝国边缘地区的情形称作“汉代世界帝国的成立”，但是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边境的豪族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找到与“异族”和平友好的相处之道，族群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谷川氏说：“汉代世界帝国的结构中必然存在的一些矛盾也日趋尖锐。华北各地虽有胡汉杂居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夷夏为对等的关系。早在东汉初，班彪就曾指出，那些利用言语、风俗习惯的不同而行欺压、剥削之能事的‘小吏’、‘黠人’才是投降羌民再次发动叛乱的原因。大家都知道，2世纪初爆发的羌族大叛乱拖垮了东汉国家，而导致叛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据说就是源于汉朝官吏及豪族强制性的苛刻役使。这一种族间的不平等，或者说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魏晋时代。西晋武帝时期，凉州的氐羌族叛乱据说也是由于汉人地方官‘侵侮边夷’、‘妄加讨戮’之故。”[7]

当时汉人尚没有“民族平等”的意识，传统的“夷狄观”将“夷狄”比作禽兽，随着汉文化的扩张，汉人的优越感和对“异族”的鄙夷意识越来越强，这种意识影响到汉人对待周边族群的态度和方式。内徙到塞内的“异族”，整体生存境遇越来越恶劣。以南匈奴为例，开始内附的时候，因为东汉需要借助其兵力守卫边疆，其部落组织大体得到保留，单于和各部落首领的威望勉强维系，但是单于却受到汉廷派遣的使匈奴中郎将的监视，汉朝官员也逐渐直接干涉匈奴内部的事务。降至汉魏之际，曹操分匈奴为五部，立五单于，无视匈奴的政治传统和部族利益。晋末匈奴人反叛时，宣称的理由就是“晋为无道，奴隶御我”[8]。魏晋时期匈奴的境遇不是突然就如此的，而是内徙后历经东汉、三国时期不断遭受汉人政权、地方豪民侵蚀、压迫，一步一步恶化的结果。

内徙羌人的境遇在一开始就非常糟糕，早在西汉元帝时，侯应谈及保塞羌人时就说“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绝”。自汉武帝时期汉人与羌人大规模接触以来，羌人受到汉朝官吏及豪民压迫、剥削、虐杀的记载连篇累牍。李吉和根据羌人内徙地距离原居地的远近，分类分析了徙居陇西、金城与徙居安定、北地、上郡和三辅的羌人部落组织情况，“被安置在陇

西、金城等地者，因接近羌地，汉朝统治力量薄弱，因而有较大的独立性”，所以部落组织较完整，而“徙入安定、北地、上郡以至三辅的羌人，则与属国民和保塞羌有较大区别。他们与汉民杂处，受郡县的制约，但与边民仍有别。这些羌人因都是多次迁徙，或在战争中被打散，种姓家支已不及原来完整”[9]。李先生的这种分类有一定的意义，越往帝国内部迁徙的羌人，其部落组织解体越严重，受到汉人压迫的程度越深。但是羌人与匈奴不同，匈奴曾经以草原帝国的形式出现，是汉朝的劲敌，汉人虽然也瞧不起匈奴，但是曾以“敌体之国”对待之，匈奴是汉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畏惧“心结”。羌人始终是以分散的部落组织形式出现，没有复杂的阶序和集中权力，与匈奴相比更不开化，汉人对之一直是轻慢、鄙夷的态度，毫无尊重与理解可言，所以羌人部落组织完整与否，与他们受到汉人压迫的轻重与否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内徙羌人的境遇从一开始就非常糟糕，不似匈奴在内徙前期境遇尚可，只是后来逐渐恶化。但是，二者的部落组织在内徙后不断解体的趋势是一致的。

东汉朝廷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太过于迷信“以夷制夷”的方针，使得布列在帝国边疆地区的“异族”保持了强劲的武力，而东汉自身却武备松弛，尚武精神不再，这对帝国安全构成巨大隐患。到魏晋时，这个严重问题引发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徙戎之论”。曹魏时邓艾基于大量内徙羌胡潜在的危险，提出“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10]。西晋武帝时侍御史郭钦上言：“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11]最著名的是江统所作《徙戎论》，其中有言：

>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

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12]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有两个截然相反的面相，既有开放的一面，同时也有封闭的一面。罗志田指出：“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犹如一个钱币之两面，共存而成一体。其主流是文化至上，体系开放，但就具体场合情景言则当下的政治考虑常能左右实际的开放与封闭。其开放性的一面，可以为有‘远略’之主为达‘王者一家’而用武的理论基础；但更多仍是允许夷变为夏，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其封闭的一面，虽源于‘夷狄是膺’的主动用兵的传统观念，实则渐多用于防御。其要点是中国之事不允夷狄参与，文化上亦不许夷狄可以变为华夏。”[13]夷夏观在最初只是一个表示地域差别的概念，后来演变成文化的观念，在文化上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是在不同的族群之间，不但存在文化的竞争，同样也存在资源、空间和生存的竞争，当种种现实的政治因素、利益利害渗入夷夏观之后，“夷夏之辨”就逐渐兼具封闭的一面了。[14]中原王朝国势强盛之时，夷夏之辨开放性的面相一般会占主导地位，而当中原王朝国势不振或夷夏势均力敌时，夷夏之辨封闭性的面相就会凸显。东汉中后期帝国周边“异族”势力愈益烈炽，东汉帝国接连遭遇内部危机，以至于末年时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最后亡灭。到魏晋之时，分布在北边各地的强悍“异族”“蕃育众盛”，中原敏锐之士感觉到了压力与危险，此时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在现实政治的刺激下占据主导，郭钦所言“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就是主张隔离“异族”。他认为“异族”此时虽然降服，但他们并非真心归附，一旦有风尘之警，必定会率先叛变作乱，处于帝国内部的“异族”必定是严重的安全隐患。江统更是明白地说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外江统也明白指出“异族”内徙后遭到汉人欺凌，“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夷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在江统看来，夷狄“以贪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所以，为帝国安全计，必须使各族返还旧土，达到“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的局面。无论是郭钦还是江统，都认为徙戎需要乘王朝兵威方盛之时，江统还提出要为“异族”的迁徙旅途供应粮食，无论是借兵威还是廪食道路，都说明此时帝国已经不能很有效地掌控这些“异族”了，迁徙政策执行起来既困难又危险，所以需要软硬兼施。

日本研究者与何兹全都注意到东汉中后期之后是中国历史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日本学者认为，汉魏之际是第一期“上古”到第二期“中

世”的过渡期；在何兹全的分期中，汉魏之际是“古代社会”的终结和向“中世社会”转变的时期。如上所论，日本学者着重从中国与周边“异族”的互动过程来说明这个转变，何兹全则是在对东汉时期三个方面变化的认识基础上立论的：（1）城乡经济的衰落；（2）自由平民、奴隶向依附民的转化；（3）积极的面对现世的思想、世界观，转化为消极的面向来生的宗教世界观。[15]从经济、社会身份、思想文化三个层面对汉魏之际发生的重大变化做了考察。

东汉时期经济的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农业衰落和人民流亡。东汉帝国重建后，光武、明、章三朝对经济的恢复成效有限，史书说此期“齐民岁增，辟土世广”[16]，大约是遵循惯例的溢美之词，明帝在诏书中说“田荒不耕，游食者众”[17]，章帝在诏书中说“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18]，而和帝之后农业失调、土地荒芜、灾荒屡见、农民流亡的情况史不绝书。农民流亡是乡村、农业普遍衰落的标识，又是农业进一步衰落的原因，王符观察到洛阳的情况是“浮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19]。不仅洛阳，“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20]，农民弃业大量涌入城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流民暴动，司徒杨赐认为对付黄巾，应该“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21]，此策得到刘陶的赞赏，从中可见流民是黄巾起义的主要参加者。经济方面的另两个变化——城市的衰败及金属货币的萎缩——都是由农村及农业的衰败引起的，失去了农业和农村的基础，市场、交易、城市、金属货币就会相随而衰。汉魏之际发展起来的坞壁替代了昔日繁华的城镇，十六国时期甚至一些州郡的治邑都是在坞壁旧址上草草建立的。论者多强调董卓之乱对经济的摧残作用，但“把东汉末年社会经济大破坏，归罪于董卓是不可以的；归因于董卓，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三国开始，社会经济衰落，一直几百年直到中唐没有恢复到战国秦汉时期的繁荣。这是不能简单地说是董卓破坏的”[22]。自王莽时货币开始杂用布帛金粟后，布帛这种实物货币在东汉时一直被使用，充分反映了东汉经济的萎靡不振，董卓之乱只是东汉几百年累积的经济、社会和军事问题的彻底爆发而已。这种衰败是内在的，根本性的。相较而言，无论是战国秦末的战乱还是唐末五代的战乱，破坏程度都不逊于东汉末年，但是西汉和北宋都很快迎来了经济的极大繁荣，而魏晋十六国则是长达几百年的持续低迷。

依附身份和依附关系在东汉后期获得了非常显著的发展，秦汉时期

百姓的身份是国家的编户民，而到魏晋时国家的编户民被寺院、大族的庄园大量分割，国家承认它们荫庇人口的合法性。何兹全原本习惯于使用“依附关系”表示魏晋以来的人际关系，但是考虑到战国秦汉时期也有依附关系，“战国秦汉的依附关系是以自由民的投靠为主，而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依附关系则以奴隶半解放仍不离主人者为多”，所以何先生后来使用“隶属关系”表达魏晋之后的人际依附关系，用“依附关系”表示战国秦汉时期自由投靠、来去随意的主客关系。从“依附”到“隶属”的变迁，经历了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是王莽时改奴隶为私属，第二是曹魏时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这个趋势从王莽时开始，到曹魏时完成。在王莽末年和东汉末年的动荡局势下，豪强大族建坞壁以自保，民众为了安全纷纷投靠，在战乱的局势下，投靠者与坞壁主之间的依附关系无形中强化，投靠者并不是战国秦汉时期来去自由的那种依附者了，而渐渐地成为隶属于坞壁主的佣客和部曲。

另外，何先生非常注意汉魏之际君臣观念发生的变化，除了皇帝与臣僚的君臣关系之外，又发展出多重君臣关系，如长官僚佐之间、旧君故吏之间、举主门生之间，何先生认为这是东汉以来地方势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上豪门强宗和属下依附关系强化的反映。[23]甘怀真也注意到这种君臣关系的变化，甘氏指出士大夫社会的形成对于中古时期君臣关系的影响很大。士大夫社会是由具有共同背景、知识、信仰、价值观的士人们通过交游品评逐渐形成的公共场域。原本官员只有两个活动场域，一个是自己的“私家”，一个是“公”的国家“汉家”，其身份在私家是家长，在公家是臣子。东汉中后期士大夫社会逐渐形成，在“汉家”与“私家”之外，官员又多了一个活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他们发展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共同价值观。“汉末以来，士人所重视的是士人间私人关系，而非公的职务关系。……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也受这种‘私化’的影响，一方面长官僚佐间的君臣结合强调彼此之间的士人身份，另一方面则是恩义感成为君臣纽带的力量所在。”[24]可以看出，士大夫社会的形成对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具有很重大的影响，而士大夫社会的形成又是东汉以后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思想文化逐渐变化的结果。

思想文化方面，何先生指出三点变化，即从儒学到玄学、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创立。吕思勉曾说过：“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汉、魏之间，玄学起，继以佛学，乃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25]陈启云也有相似的看法：“王莽改革的

失败，对东汉乃至中华中古思想文化更深沉的影响是儒家改革理想的幻灭。作为汉儒改革理想核心的‘今文经学’丧失了改革的信念精神以后，在东汉时徒存外表躯壳，其学术地位被‘述古、信古、好古’的‘古文经学’所取代。……改革理想和精神的丧失，决定了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朝政的‘保守主义’性质。不管是光武的崇儒，抑或明、章的尚法，他们的改革，只是对现实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反应。这种缺乏远大理想和宽宏视野的政策措施，是导致东汉衰落和终于灭亡的‘中距程’原因。”[26]

总而言之，从内、外两方面看，东汉都是一个转折的时代，自王莽之后，一些新的变化因素逐渐孕育成长，大约到董卓之乱后，新变化愈益明显，推动了社会整体面貌和性质发生变化，历史进入另一个阶段。

（二）东汉初期的内部危机

秦与西汉是中华文明发展初期的定型和兴盛，但是到东汉后期，这一文明盛极而衰，分崩离析，各方面倒退衰落。陈启云从宏观的文明角度指出：中华文明的缺失弱点表现在政治方面，其优点和韧力表现在文化方面，政治方面的弱点决定了东汉之后的国势衰微和帝国崩解，文化上的韧劲又决定了中世之后中华文明的重整与复兴。陈先生所言政治方面的缺失是“以一姓王室为核心的朝廷内部的权力结合（帝室、宗室、外戚和宦官）和对外的权力运作（帝室与官吏、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士人、帝国与边疆外族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均不足以维持数百年鼎盛帝国的局面”[27]。陈先生对从秦汉开始奠基成型的政治体制之内在缺陷的分析，诚为卓见，但这毕竟是站在既成历史的终点基于非常宏观的视角得出的结论，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时局中的人并不是无能为力，只是作为历史洪流的傀儡，不能有所作为。历史是人的历史，故而没有非如此不可或非如彼不可的必然。如果说既成的历史就是最合理的历史，那么就是庸俗的历史合理性。[28]对当时人来说，仍有努力和改变的可能，往高处说可以对制度做出纠偏或调整，往低处说可以对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进行补救，延缓危机的爆发。在西汉二百年的历程中，诚如陈启云所言，在朝廷内部的权力结合方面和对外的权力运作方面都出现很多问题，时人也察觉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努力谋求解决，王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王莽的改革及其失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他的失败对东汉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东汉不再具有改革的理想和精神，无论是内政问题还是民族边疆问题，东汉朝廷均缺乏一个

思虑周详的“大战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的是非常形象贴切地说出了东汉政治的一般状态。[29]导致东汉帝国逐渐走向没落崩解的政治、军事问题，比如外戚与宦官的专权与腐败、豪族势力的膨胀和地方分离主义的抬头、东西区域失衡、武力与文化的偏瘓、边疆与民族问题等，其根源均已经在初期光武、明、章三帝时埋下隐患。我们不能说东汉政治的走向一定会如此或如彼，但是光武、明、章三帝不但没有对统治机制进行纠偏以延缓危机的到来，其种种施为如抱薪救火，反而促成了危机的发生。

王莽的僭夺和莽末的群雄并起是光武帝巩固政权的反面教材，所以他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加强皇权，但这些措施都仅能收一时之效，缺乏长远的政治宏规，举其大者有四点。第一，定都洛阳，造成了关西的衰落、偏瘓和边患的浸漫，具有武力优势的关西与掌握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的关东隐隐形成对立之局。第二，在内政方面，光武帝削弱三公权力，事归台阁，造成外朝权轻。虽然他主观上力图压制外戚，却又与外戚保持亲密的关系，对外戚非常信任，为后世女主干政与外戚专权埋下隐患。外朝权轻，对此毫无补救之力。第三，光武帝在统一战争结束后行严猛之政，明帝更是将严猛之政发挥至极，到章帝改行宽厚之政时，又矫枉过正，宽纵太过，东汉初期的政治在张弛之间失去了平衡。[30]第四，在军事制度上，废除都尉官和郡国兵，不教民战，造成官无警备，王旅不振，过度迷信“以夷制夷”的方略，对“夷”兵过分依赖，为以后西州兵的肆虐种下祸根。关于第四点，下一节讨论胡兵时会有详论，此处先论前三点。

定都洛阳确实有诸多的不得已，比如基本经济区重心的转移。冀朝鼎指出：“河内（即现今的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与山东西部）在前汉末期，已由原来的次要地位上升为主要的基本经济区，从而取代了关中的地位”……“后汉（或称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刘秀，对主要基本经济区由关中向河内转移的意义是深有领悟的。……他就选定位于黄河下游的洛阳而不是渭河流域的长安作为首都。这一变化很有意义。虽然关中在经济上仍然很重要，但是，黄河流域下游以及汉水与淮河流域，已经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了。”[31]关中经济不足以支撑朝廷和驻军的用度，转运粮食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起于民间白衣的光武帝顾惜民力，而且河内是其统一天下的后方基地，选择洛阳为首都似乎势所应然。但选择洛阳为首都也是由于光武帝个人性格的缺陷和战略眼光的局限，往好处说是顾惜民力，务实守成，但往坏处说，就是缺乏

长远的政治眼光，缺乏进取开拓之心，对全国政治、军事、国防各方面缺乏统筹把握。廖伯源论曰：“光武从起事反莽，至自立争天下，皆形势所逼，命运如此，非其性格好捣乱，爱争雄长而强出头。光武性格务实，少冒险进取之空泛企图。洛阳地处帝国之内部中心，远离戎狄，较为安全，此为光武定都洛阳之重要原因。且光武既无西进拓地之企图，亦无必要西都关中。”[32]

后世局势之发展非光武所能预料，对他定都之选择过多地苛责并无太大意义，但是此举确实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钱穆指出定都洛阳使得东汉一朝表现出来的是“退婴”、“守成”的气象，不如西汉之进取和能应变，而且中国之地势西北高寒贫瘠，东南和煦丰饶，“若非有一种人力为之驱策，则东南常有沉淀壅滞之患，而西北则有寒荒剥落之象。西汉因建都关中，故东方人物经济不断向西输送，而全国形成一片，血脉常运，元气常调。东汉因建都洛阳，东方人物经济，其西上仅至洛阳而止。函潼以西，受不到东方暖气，其本土仅有之人物经济亦不断向东滑流，渐枯渐竭，终成偏痹之症”[33]。关中的衰落与之后的羌患不止、西州地方武力再次兴起及其对东汉政权的冲击，是一系列的连锁关系。当然，无论是羌患还是西州兵团的兴起、叛乱，都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不可完全归因于首都的东迁，但此举确实使得东汉立国的规模和气概小了很多，在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上造成很难克服的缺陷。如钱穆所言：“黄河西部的武力与东部的经济、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汉之全盛，东汉以来，东方人渐渐忘弃西方，西方得不到东方经济、文化之润泽而衰落。而东方的文化经济，亦为西方武力所破毁。”[34]

汉武帝时期一人专制政治极度发展，宰相制度受到破坏，尚书机构逐渐权重。光武帝性猜忌严刻，“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对大臣极度不信任，延续了汉武帝的做法，刻意压低三公地位，剥夺三公实权，破坏宰相制度。光武帝频用二千石长吏升任三公，这是从迁转程序上压低三公的地位；于建武二十七年（51）去三公的“大”字，在名号上轻三公；也不再对三公封侯，位三公者，皆不复有茅土之封等等做法，都是为了破坏三公的权力及其在朝臣中的权威。三公事权被夺的一个例子是不再拥有案验督责二千石长吏的权力，《后汉书·朱浮传》记载：“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35]三公事权削弱，但是光武仍然严督切责三公，建武十三年（37），司徒韩歆以言甚刚切获怒于光武，后被逼自杀，“后千乘欧阳歙、清河戴涉相代

为大司徒，坐事下狱死，自是大臣难居相任”[36]。范晔论曰：“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覈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任职责过，一至于此，追感贾生之论，不亦笃乎！”[37]礼敬大臣之古意荡然无存。徐复观指出对宰相制度的破坏是君主行专制必需的行动，因为专制者总是从权力的方面去看官制，而官制总有客观化的趋势，一旦客观化，权力也就客观化，专制者就会感到权力离开了他，就感到了危险，所以破坏官制的客观化，破坏官制能客观地发挥作用，是古今专制者所不知不觉共同遵循的路线。宰相是官制的首脑和骨干，一旦成为制度，即被赋予若干客观存在的意义。因此，两千年来专制者循环地破坏宰相在制度上的客观地位，而任用皇帝身旁地位低微的人去执行宰相的实权。执行久了，原来在地位上本是与宰相悬隔的，也慢慢地被承认为宰相，因而取得官制上的若干客观地位。于是后起的专制者又把它虚悬起来，再让低微的近臣代替。[38]权归尚书只是为了光武自身专权之方便，并不意味着尚书获得了尊崇的地位，伴君之侧的尚书动辄获咎，处境更惨，“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39]。

惩于前汉外戚的篡权，光武帝刻意压制外戚，《后汉书·孝明帝纪》注引《东观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40]“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41]也是明帝遵奉不改的“建武制度”，但后来外戚干政成为东汉一代最重要的政治特色，不能不说是对“建武制度”的一个讽刺，这套制度在防范外戚与政上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是光武帝还是明帝，虽然在“公”的领域限制外戚权位“不过九卿”，但是在“私”的领域与个别外戚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在皇帝专制政治下，所谓“公”与“私”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公与私统一于最高一人，常常混为一气。比如，光武帝对阴氏非常信任，建武十九年（43）立明帝为太子时，“以识守执金吾，辅导东宫”[42]，“拜（阴兴）卫尉，亦辅导皇太子”，将宫禁安全守卫之责交予阴氏。光武每次出巡郡国时，以阴识留守京师，“委以禁兵”。阴兴历任黄门侍郎、期门仆射、侍中等职，都是皇帝身边的亲近之职，“兴每从出入，常操持小盖，障翳风雨，躬履涂泥，率先期门。光武所幸之处，辄先入清宫，甚见亲信”[43]。明帝对马氏也非常亲近信任，马氏兄弟掌管宫廷禁卫，明帝病卧时国舅马防旦夕供养且一年，被信任的程度非同寻常。

无论是阴氏还是马氏，虽然没有在外朝官僚体系中占据高位，却是皇帝身边内朝的重要成员，深得皇帝宠信，这在专制政治体系中就是最大的权势。光武帝即使在主观上清楚应该抑制外戚的势力，但实际的作为却是宠溺外戚，并纵容了外戚权势的发展。以阴氏二舅掌管宫禁、辅佐东宫，王夫之评论曰："王氏之祸烈矣！光武承之，百战而刘宗始延，惩往以贻后，顾命太子而垂家法，夫岂无社稷之臣？而唯阴识、阴兴之是求。识虽贤，何知其不为莽之恭？识虽不伪，能保后之外戚皆如识乎？饮堇而幸生，复饮以冶葛，卒使窦、梁、邓、何相踵以亡汉。光武之明，而昏于往鉴如是者，何也？"[44]光武帝欲压制外戚权力却又不得其方，章帝之后接连幼主即位，皇太后以"母亲的权力"代行皇权，自然援引父兄子侄等娘家人辅佐为政。同时抑制三公权势，造成外朝权轻，无法制衡外戚专权。等到皇帝年长，不满情绪滋长之后，就通过身边的宦官以非正常的方式夺回权力，转而宠信重用宦官，于是形成了东汉中后期臭名昭著的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梁冀专权时，汉冲帝驾崩，李固等三公大臣欲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梁冀不从，立了八岁的质帝。当梁冀弑质帝后又议立帝，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一致主张立清河王，但朝会时梁冀仍能压服众议，用太后策免李固，再立桓帝。在议立新皇帝的斗争中，外朝处于完全的被动和弱势，无力对抗专权的外戚。值得注意的是，劝说梁冀不要立清河王的是宦官曹腾，宦官和外戚的利益都建立在皇帝的年幼或昏庸之上，如果年长有德又严明的清河王即位，则他们的富贵就不能长保了。

光武帝的政治以"柔道"著称，其保全功臣的做法比汉高祖高明。曹金华指出，在统一完成之后，"刘秀的'柔道'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他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在某些方面仍体现出'柔道'思想，但是从政治上来看，则逐步向'颇以严猛为政'转化"[45]。朱浮性格直率，指责光武帝说："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专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经盛衰，贻后王也。"[46]这种为政作风被明帝变本加厉地继承，特别是因为建武十九年（43）更换太子的事件，明帝与兄弟之间关系紧张，当时"旧防未立"、"宪章无序"[47]，诸王交通宾客，结交大臣。明帝即位后感受到了来自兄弟们或实或虚的政治压力，所以诸王之案频发，影响最广的是楚王英案，明帝刻意扩大事态，牵连甚广。王惟贞指

出："光武帝与明帝的严苛，对朝廷官员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是大小官员都战战兢兢，不敢违背明帝的旨意。严重所及，导致东汉政廷上下均弥漫一股严苛治国的风气。不只是中央政府，连地方官员在处理大小政务或是执行中央命令时，均以严苛为主。以楚王狱案为例，负责审查的官吏宁愿将所有被牵连的无辜者下狱考掠，都不敢有任何的疏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罪犯，否则下一个被牵连的就是自己。"[48]第五伦评论光武、明帝时的政风说："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49]可见当时严苛的政风在无形中影响到官吏任用的类型。章帝宽厚，欲纠严苛政风，但是苛政之积习不是皇帝一封诏书可以立刻改变的，恰如第五伦所说："然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称故也。"[50]章帝在诏书中也指出："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51]光武、明帝统治时期不断升级的严苛政风，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俗敝"和"办职俗吏"使得章帝试图扭转政风的行动难以收到成效。

有一种意见认为光武、明帝的严苛猛烈之政只是针对治吏，并不是用来治民的，广大的基层民众并没有受到严苛政治的影响。这种意见恐怕没能深刻认识到政治之恶，对政治抱有过多的温情与善意了。政治是不可避免的"恶"，历来为政，由仁厚入严苛容易，再由严苛返归仁厚则困难。所有专制君主的第一需要是加强权力而不是造福百姓，光武、明帝行严猛苛刻的政治，完全是出于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需要，然而"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52]，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章帝时，"世承二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53]，"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54]。袁安的例子很能表明此种影响："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55]颇可注意的是府丞掾史的态度，袁安上任后最先处理的是没有明显证据证明有罪者，即使是这样亦使得府丞掾史们惶恐不已，在严苛政风的影响下，唯一能令他们感到安全的，就是将所有牵连者，无论是真有罪还是被冤枉的，一律以有罪处理之，"否

则下一个被牵连的就是自己”。楚王英案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当时“群下苛能”成为普遍流行的风气，大多基层官吏都“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56]，在这种近似于恐怖的政治风气下，所谓的“盛世”是要大打折扣的，不可能不影响到普通百姓。

章帝长者，即位初就接受了第五伦、陈宠的意见，选宽博之吏，去惨酷无极之法，施惠于民。章帝力图转变严苛的政治风气，但政风的转变不是凭皇帝政令可立刻见效的，章帝在诏书中无奈地表示：“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57]但这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此处我们关心的是章帝对待官吏、豪贵、外戚的宽厚之政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光武、明帝严酷治吏，虽然最终还是伤及基层小民，但是官吏、豪贵、外戚还是受到严厉的监管和督责。但是在章帝“务从宽厚”的政策下，“宽厚”与“宽纵”之度并没有把握好，官吏豪贵们逐渐奢侈无度、骄纵无法，光武、明帝时期潜藏的外戚隐患也在宽纵之政下暴露出来。章帝先封马氏三舅为侯，当马氏势力极盛后，章帝又扶持窦氏，执行以外戚制外戚的方针。章帝在情感上欲厚待外戚，但不知所以安之，马防、窦宪先后势盛骄纵，第五伦两次上疏章帝，要求贬抑其权，帝竟不从。宠纵外戚最典型的例子是章帝对窦宪侵占沁水公主田的处置：“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后肃宗驾出过园，指以问宪，宪阴喝不得对。后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震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还主。虽不绳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58]章帝对于窦宪之事的处理严重不当，既然已经将之比拟为赵高的指鹿为马，但是竟然还是不绳其罪，章帝之“仁”，非仁也，想必大为震惧的窦宪自己都不敢相信竟能逃过这一劫。

章帝对窦宪的处置引发了后世史评家的严厉批评，司马光论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善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59]王夫之论之曰：“西汉之衰自元帝始，未尽然也；东汉之衰自章帝始，人莫之察也。元帝之失以柔，而章帝滋甚。王氏之祸，非元帝启之，帝崩而王氏始张；窦宪之横，章帝实使之然矣。……元帝之柔，柔以己也，章帝之

柔，柔以宫闱外戚也，章帝滋甚矣。讬仁厚而溺于床笫，终汉之世，颠越于妇家，以进奸雄而陨大命，帝恶能辞其咎哉？”[60]光武、明、章三帝有控制外戚之意却不得其道，“以外戚制外戚”的平衡之术的执行需要很强的政治手腕和权谋诈术，对君主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一旦君主庸懦无能，外戚之势就不可制矣。章帝的“宽厚”实际上成了一种“宽纵”，对扭转父祖时期严苛政风效果甚差，又为后期外戚的专权留下祸根。可以说东汉后期许多内政问题的根源均是东汉前三帝时期埋下的。

（三）东汉初期的外部忧患

东汉的“对外”政策就是指对待周边族群的政策，对当时而言，对外政策与民族政策大致可以互用。光武帝自诩以“柔道”治天下，虽然其对内政策在完成统一后渐渐走向严苛，但在对外政策、民族问题上，仍然坚持柔顺之道，贯彻“保境安民”的方针，尽力避免用兵夷狄，传统的“王者无外”理想对他似乎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两汉之际匈奴复强，乘机恢复了对西域以及乌桓和鲜卑的控制，并支持卢芳和彭宠，侵扰北边。面对匈奴的威胁，在政治上光武帝遣使匈奴，赂金币通旧好；在军事上命将驻守、固塞防、明烽火，并逐渐迁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徙民逃寇。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国乱，北方草原的形势发生巨变。一方面匈奴由此分裂为南、北两部，另一方面乌桓和鲜卑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光武帝采取了对应性的策略，一方面接受南匈奴的内附，采取“以南制北”的方针；另一方面“分化夷狄”，使乌桓和鲜卑直接归附汉朝，“使不得与匈奴交通”，而且以财物鼓励鲜卑攻击北匈奴。[61]东汉初期的边疆策略非常成功，保证了东汉初几十年的边疆稳定。

在西方，光武帝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光武帝最初本想利用莎车王来控制西域，但是又担心莎车王势大难制，所以先是授莎车王西域都护衔，后来又夺之，反映了他在西域政策上的模糊性。[62]建武二十一年（45），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遣子入侍，请都护，汉武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为由拒绝。后来，面对莎车王的侵略，鄯善王复请都护，光武帝竟回复说：“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63]，放弃了对西域诸国的权力和责任。整个东汉一朝对西域之经营并不热心，当初西汉经营西域的战略出发点是为了断匈奴右臂，但现在北方局势转变，匈奴不再是重大安全威胁；再加之东汉中期以后，西州羌乱频发，陇右道、河西道经常阻隔，经营西域有一定的困难。东汉经营西域最盛时是班超任都护的时候，但是东汉朝廷对班超的

支持非常有限，班超取得的成就依靠的是汉朝自武帝以来在西域的声威和他“以夷制夷”的娴熟手段，汉廷只是坐享其成。后来每当西域有事，朝廷则以不愿疲敝中国以事夷狄的说辞退出，不愿再投入人力物力去经营。

光武帝采取退避消极的对外政策，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从经济上说，大乱过后民生凋敝、国力衰微，经济不足以支撑积极的对外行动。“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建武之初军役亟动，牛亦损耗，农业颇废，米石万钱”[64]，东汉初经济境况比较艰难。从政治上说，光武的统一是与各地豪强妥协的产物，其政权并不稳固，各地豪杰仍然心怀不轨，相机而动，如果此时外兴征战，经营远方，必定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成长于民间的光武帝信奉“保境安民”的方针，急于恢复经济民生，加强对豪强的控制，以巩固新建立的政权。

平定陇蜀之后，“其猛夫悍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霍之事。帝方厌兵，间修文政，未之许也”[65]。陇蜀平后功臣们争言卫、霍之事，寻求建功立业的新战场是自然之事，但是这超出了光武政治目标的限定，也与光武帝退功臣进文吏以加强皇权的方针相左，必定不被允许。光武帝的政治目标只限定在统一中国，平定陇蜀后目标即已达到，所以建武十二年（36）后，光武帝开始改革将军制度，剥夺多数功臣的军权，将军成为“事讫皆罢”的临时之职，功臣们多以列侯奉朝请或加位特进，保持荣誉地位但不再预国政。[66]甚至在统一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光武帝即已撤销了内郡的都尉和郡国兵，统一战争结束后更是极力“偃武修文”：“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阵，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67]就建武十二年（36）的经济、政治形势而言，继续穷兵黩武于四夷对光武帝有百害而无一利，光武的避战正反映出他目的明确，能够量时度力。建武二十七年（51），北匈奴发生疾疫，臧宫、马武建议伐之，光武帝答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

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68]《黄石公记》、《黄石公三略》都是当时托名张良师傅黄石公的著作，内容大概是借用黄老道家思想而总结的为政处世之术，光武帝此处以“柔能制刚，弱能制强”阐明对外政策的原则，拒绝“舍近谋远”，因为“务广地者荒”。陈金凤评论说：“光武帝以‘柔’为主的民族政策的实施，既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与安全，又大大减少了对外战争。东汉政府精兵简政，休养生息获得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汉书·刑法志》称：‘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说明光武统治时期，东汉社会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与发展。‘光武中兴’与光武帝的民族政策分不开。”[69]这一评论是允当的。

南匈奴内附后，东汉确定了“安南定北”[70]、“以南制北”的策略：设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护卫、监视南单于。后来明帝接受郑众的建议设度辽营“以防二虏交通”，《续汉书·百官志》记：“明帝初置度辽将军，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71]，此为“安南”。对于北匈奴，汉廷不再接受其和亲，不与之发生政治关系，并招募鲜卑不断攻击。经过公元73年和89年窦固和窦宪的远征，北匈奴彻底地没落了，其部众很多逃往汉朝，留在草原的十万余落皆自称鲜卑。但北匈奴的没落和远遁并非意味着汉朝边患获得解决，彻底打垮北匈奴的战略是非常有问题的[72]，东汉的边患此后朝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明章之际，边患的重点由匈奴转向羌人和鲜卑，羌人的叛乱逐渐严重起来，鲜卑占据匈奴故地，势力大增，成为新的边患。

明帝即位后，国力有所恢复，政治局势较为稳定，对外用兵的呼声渐起。公元73年和89年两次对北匈奴的讨伐，最高将领是窦固和窦宪，但主要的军事工作都是由耿秉主持的。史载耿秉“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以父任为郎，数上言兵事。常以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盛王之道。显宗即有志北伐，阴然其言。永平中，诏诣省闼，问前后所上便宜方略，拜谒者仆射，遂见亲幸。每公卿会议，常引秉上殿，访以边事，多简帝心”[73]。永平十六年（73），明帝派祭肜、窦固、耿秉、来苗兵分四路出击匈奴，只有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其余三路无功而回。次年又派窦固、耿秉出昆仑塞击匈奴于蒲类海上，入车师，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值得注意的是，四路军队共四万四千骑，大部分是征调的南匈奴、鲜卑、乌桓和西羌等少数部族的士兵。明帝很早就有北伐之意，但直到永平十六年才发动战争，可见其小心谨慎，一来要为战争做好充足准备，二来等待内外局势

都有利之时。

章帝即位初期，西域的反叛引起了关于对外政策的讨论，当时杨终上疏说：“自永平以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74]建议章帝召回流放南方和远屯绝域者。此议得到第五伦的支持，但是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反对，以为孝子无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异。杨终复上疏反驳，首先说“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75]，来说明先帝之政如果不正确，固守之反而招致亡失天下，是为最大的不孝。接着又举“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的汉家故事，来说服章帝放弃西域，章帝最终听从了杨终的建议，“听还徙者，悉罢边屯”[76]。

和帝即位初窦宪征伐匈奴并不是东汉一贯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而是女主与外戚政治的畸形产物。章帝时窦宪侵占沁水主田，章帝大怒，但也只是不委任而没有严惩之。后来和帝即位，富于春秋，窦太后临朝听政，掌握大权，窦氏兄弟皆在机要之地，窦宪被任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诏令，权势大盛。窦宪明白他所有的权力都来自太后的信任，后来都乡侯刘畅也得到太后的宠幸，窦宪担心刘畅将分其恩宠，于是遣刺客刺杀了刘畅，此事最终被发觉，太后怒，闭窦宪于内宫。这本是权贵争权夺利之事，但恰巧当时朝廷有一场是否讨伐北匈奴的讨论。初，章和元年（87）鲜卑大破北虏，北匈奴有58部20万人降汉，北庭大乱，南单于上言希望借机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77]。耿秉力促此事，当时窦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此事受到了三公九卿的集体反对，司徒袁安、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78]。但是外朝已经权轻，无力对抗代行皇权的女主和外戚，反对的奏章被留中，后来“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79]，可见当时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们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最后只有袁安和任隗坚守，太后竟不听，遂有窦宪伐匈奴之役。“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80]在三公九卿均反对的情况下，朝廷仍然做出出兵的决策，不能不说窦太后之为娘家计的私心太重，希望借机给窦宪一个台阶，并依靠军功增强窦家的地位，光武压制外朝却又宠溺外戚政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

此次战争北匈奴惨败，但战争的结果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战争之后对大漠之地的处置。当初南单于极力请兵北伐就是为了重返草原本部，“破北成南，并为一国”。窦太后主张出兵只是为了给窦宪立功赎罪的机会，并未远虑到打败北匈奴后北方草原部族局势的问题，对南单于的要求“议欲从之”。当时宋意上疏反对：“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81]宋意上疏时窦宪的北伐尚未开始，此时他分析战后的北方形势，指出如果支持南匈奴返归北庭，就需要压制鲜卑，这将造成鲜卑无所获利起而为患。宋意认为使“夷虏相攻”，以夷制夷才是中国坐享大功的关键，“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82]。宋意指出了北匈奴、南匈奴、鲜卑三者之间互相制约的关系，出兵打败北匈奴，将使鲜卑失去抄掠对象和邀赏途径，破坏夷虏相攻、中国得利的局面。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对北匈奴的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83]。但是窦宪并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让南单于北返，而是扶植投降的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并如南单于故事置中郎将领护。窦宪这样做固然有欲施恩北匈奴以培植自己势力的企图，但或许也有预防南匈奴坐大难治的考虑，故继续维持匈奴内部的某种对立。袁安、任隗表达了反对意见，反对的理由首先基于经济方面：“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捍御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无缘复更立阿佟，以增国费。”[84]“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85]其次，扶植阿佟则失信于南单于，不免引起其不满，而且“乌桓、鲜卑新杀北单于，凡人之情，咸畏仇仇，今立其弟，则二虏怀怨”[86]。袁安等的意见也是退而求其次，因为当时出兵攻击北匈奴就是一个冒险的决策，袁安等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若如窦宪之策则耗费巨大，财政本就紧张的东汉朝廷难以承担，而且还将开罪南匈奴和乌桓、鲜卑，北方局势更将难以控制。

但是之后北方草原局势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永元四年

（92），和帝在宦官郑众的协助下发动政变，铲除了窦氏，窦宪扶立的北单于叛逃，被汉军剿灭，而南匈奴也由于与窦宪的关系，以及内部的纷争，没有能返回北庭。在这次大变动中获利的是鲜卑，“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87]。此后鲜卑之患渐起，成为东汉后期及魏晋时期主要的北方边患，西晋崩溃后，鲜卑是在北方建立政权数量最多的部族。

鲜卑和西羌，是东汉政权中后期面临的两个最大边患，檀石槐建立了强大的鲜卑联盟，北边郡县无岁不被其害，但是当檀石槐死后，鲜卑联盟随之瓦解，北部边境的压力减小。西羌在东汉中期成为西北主要边患后，一直持续到东汉的灭亡，是影响东汉国势的重要边境因素。东汉政权的衰亡，与西羌关系密切，与鲜卑反而关系较浅。光武末期匈奴分裂衰落，不再构成北边威胁，新崛起的鲜卑只是在檀石槐统治时，对东汉构成了暂时的威胁，之后就自动瓦解了。东汉一代最大的边患就是羌人问题。

两汉之际，“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88]，当时控制陇右的隗嚣并没有武力压制，而是尽力招怀羌酋、慰纳诸种，得到羌人的支持，羌人成为他手中重要的军事力量。建武八年（32），光武帝进军陇右，九年，隗嚣死，但是“五溪、先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堑自守，州郡不能讨”，光武帝派遣来歙将兵击之，“歙乃大修攻具，率盖延、刘尚及太中大夫马援等进击羌于金城，大破之，斩首虏数千人，获牛羊万余头，谷数十万斛”[89]。马援在平定羌人的战役中起到关键作用，马援先前依靠隗嚣，后来归附光武，为汉往来游说羌豪，对西州的地形要害十分熟悉，光武征陇右时马援曾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来歙对光武说：“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90]，对马援十分倚重。建武十一年（35），马援被任命为陇西太守，接连平定了先零种和参狼种的叛乱，陇右清净。

光武帝统治时期，羌人为祸尚浅，汉羌战争的规模也不大，前往西州的平叛军队一般在三万人左右，战争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几个月就结束了，与后来的平羌战争动辄征调10万人以上的军队、耗时数年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光武帝在建武六年（30）时曾任命温序为护羌校尉，其任务可能是招诱羌人以削弱隗嚣的力量，但是他尚未到职就被隗嚣的部下杀害。建武九年（33），在班彪的建议和杜林、马援的推荐下任命原

隗嚣部将牛邯为护羌校尉，但不巧的是牛邯病卒，光武一朝就再未设置此职。可见朝廷对设置护羌校尉的态度并不积极，只是视羌人问题为隗嚣割据势力的遗留问题，没有给予过多的重视，认为没有必要专设护羌校尉，而且在马援的经营下，羌人在光武时期尚算平静。

汉明帝时羌乱又起，“显宗初，西羌寇陇右，覆军杀将，朝廷患之”[91]，明帝征调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共计4万人的军队平叛，应对迅速有力，很快平复了局面。叛乱发生在明帝即位初，帝位尚不稳固，平定西北的边患对他巩固统治非常重要。战事结束后，窦林被任命为护羌校尉。窦林是窦融从兄子，窦氏一族习知西州情势，在当地拥有很深的根基和影响，在羌人中也颇具威信，所以窦林为诸羌所信，到任后羌人接连归降，西州安宁，但是不久后窦林因为欺罔及臧罪下狱死。窦林所犯之罪史籍记载混沌不清，说他先是将投降的滇岸上报为第一豪，接着又将后降的滇吾上报为第一豪，后来又诡辞自辩，记载之含混令人读来殊不可解。[92]当我们细察当时朝廷的政局时，发现窦林之死与明帝整治打击朝中贵戚官僚交通宾客、放纵乱法的政治行动有关，而窦林的欺罔、臧罪不过是口实而已。

窦林之死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与明帝接连打击朝中贵戚大族有关。[93]阴氏在明帝即位初期权势大盛，阴就结交宾客、大臣，贵骄不奉法，甚至曾干突禁卫，折辱东平王苍。永平二年（59），阴就之子阴丰杀妻郦邑公主，明帝借机严惩阴氏，阴就父子自杀，阴氏受到切责抑制。窦林之死发生在此年十二月，明帝因此事下诏严厉切责窦融，戒以窦婴、田蚡祸败之事；永平五年（62），借故下窦穆父子狱，窦穆父子俱死狱中，窦氏一族衰落。永平四年（61），梁松下狱死，梁氏也受到打击。帝王最忌讳之事就是臣下交通宾客，联络沟通、互为朋党。东汉初期禁防未立，皇子交通宾客、结交大臣之风颇盛，而阴就、梁松、窦穆等人都好交通轻薄，嘱托郡县干乱政事。明帝为了压制这种趋势，借阴丰事打击阴氏，借窦林、窦穆事打击窦氏，借梁松事打击梁氏，后来又借诸王案打击诸侯王和贵戚豪强，这些事件都是一脉相承的。窦林之罪只是明帝打击窦氏的一个由头，其所犯之罪无论是真是假都不重要，明帝只是需要一个借口而已。窦林下狱后，“谒者郭襄代领校尉事，到陇西，闻凉州羌盛，还诣阙，抵罪，于是复省校尉官”[94]。郭襄听闻羌乱严重后竟然不敢到任，我们对于郭襄的任命就感到不可思议了，窦林怀辑羌人的工作其实做得颇为出色，但或许正是这种出色，令明帝对窦氏在西州的根基和势力更加疑忌，加强了他打击窦氏的决心。郭襄的任命

显然没有经过精心考虑，他的不习边务及胆小畏惧令人惊讶，明帝草草任命他代替窦林，说明在明帝的心目中，羌人问题、边患问题的重要性都远远低于皇权的巩固，也显示了明帝对于羌人问题的淡漠，郭襄之后，明帝也没有再设护羌校尉了。

章帝即位，为政宽厚，对外采取收缩政策，不欲为夷狄而疲敝中国，召回戊己校尉，不复设置西域都护。奇怪的是，章帝一朝却恢复了盐铁专卖，和帝即位诏书中说："先帝即位，务休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95]这里的"务休力役"指的是章帝退出西域的政策，但诏书接着又说"深思远虑，安不忘危"，针对的其实是羌人问题，复收盐铁是为解决羌患问题筹措军费。章帝建初二年（77），爆发了羌人起事，一直延续到和帝永元十三年（101）才大体解决，在整个章帝统治时期，西州未获暂安。为了应对叛乱，章帝恢复了护羌校尉，任命前度辽将军吴棠出任，后来吴棠不任职被免，后来的继任者都没有能很好地怀辑羌人，即使是邓训也只能维持暂时安定。羌乱的根源问题没有获得解决，无休止的反叛、阴谋、镇压、屠杀，使得羌汉之间的矛盾积怨越来越大，护羌校尉自章帝恢复后就再也没有中断过，说明章帝之后羌人问题已经成为朝廷面临的主要边患。我们可以说，明章之际是东汉外患重点发生交替的时期，匈奴之患渐不重要而羌人之患逐渐酷烈。随着羌人大量内徙，遍布西州各郡，甚至延及三辅、河东地区，朝廷应对失策，羌人之乱演变成外患内忧并发，为患更深更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汉历史的走向。

二 西州兵团的兴起及其对东汉的破坏性反馈

（一）东汉军事对外族武力的依赖

古代中国周边环绕着众多异族，特别是帝国北边的游牧族群，精于骑射，勇猛善战，实乃中原王朝之劲敌、边疆之大患。边患与内政互相作用之关系是治古代史者尤需注意者，陈寅恪对唐代的边患与内政之关系做过精辟的研究[96]，不只是唐代，古代中国之边患与内政互相作用的关系模式在汉代就已形成。汉人议论中国与边疆的关系说："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心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相为赐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憯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97]中国与分布在周边的异族保持着多种类型的互动关系，边患的形式与特点既与外族的兴衰更替有关，亦与中原王朝的国势国运相关。朝廷以怎样的方略来处理与外族的关系？边疆与民族方略的执行力度及最终的效果如何？最终的结果是由一系列内政因素和外部环境综合决定的。在基本层面上，综合国力及军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有时候一个并不重要的甚至偶然的内政因素，会改变王朝的边疆方略并进而产生深远的影响，差之毫厘即失之千里，在处理边疆问题时一个小小的决策失误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西汉最主要的边患是匈奴问题，经过汉朝二百多年的经略，汉朝取得了对匈奴的优势和主动，东汉初匈奴分裂衰落，匈奴问题得到大体解决。但外族之盛衰具有连环性，匈奴衰落后羌人和鲜卑接连成为新的主要外患，鲜卑占据了匈奴故地，10万余落匈奴人自称鲜卑，鲜卑吸收消化这些力量需要一段时间。西州羌患在章帝之后就逐渐严重起来，东汉中期政论家王符所著《潜夫论》有《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所论边事全是针对羌患而言。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论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汉世方之匈奴，颇为衰寡，而中兴以后，边难渐大。……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呜呼！"[98]此诚为不移之论。羌人政治组织松散，从来没有强大到似西汉时匈奴那样事关中原帝国存亡的程度，但是羌人种落繁炽、叛乱此起彼伏、反复无常，羌乱一起朝廷不得不遣将派兵，与羌人历时百余年的无休缠斗，逐渐耗尽了东汉的元气。在平羌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关东将领和军队的无能表现迫使朝廷不得不放弃对西州地方势力的抑制政策，转而再次起用西州豪杰，并加

大对羌胡兵的使用，平羌战争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西州豪杰和羌胡兵的打击下羌患渐熄，但在这个过程中培育出强悍寡义的羌胡化西州兵团，董卓率领西州兵团平定西州边章、韩遂，平羌战争进入第三个阶段。但是西州官军与叛军竟然达成和解，在东汉中央变乱之际调转兵锋，西州兵在董卓的带领下进入洛阳，加速了东汉帝国的崩解。东汉时期西州与中央互动关系的发展脉络大致而言就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汉人武装力量的废弛退化以及朝廷对外族武力的过度依赖，是关键的原因。

对夷兵的使用，本书没有使用“以夷制夷”这一术语，而是直接称为“对外族武力的使用”。其实使用“以夷制夷”并不是不可以，只是稍有不妥，因为“以夷制夷”限定了利用外族力量的目的是“制夷”，虽然两汉史上运用外族力量以“制夷”的情形较多，但也有很多利用外族武力对付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外族的情形。“以夷制夷”又可具体分为多种情形，邢义田将之分为“以夷伐夷”、“联夷以制夷”、“以夷治夷”、“分化夷狄以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五种情形；上官绪智的分类法非常相似，为“以夷伐夷”、“联夷制夷”、“夷虏相攻”、“以夷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99]，但是本书强调的并非“以夷制夷”的多样性，而是关注东汉朝廷在军事上“依赖夷兵”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及造成的后果，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直白地称之为“对外族武力的使用”，倒也方便明了。当然，学者们对“以夷制夷”发生的背景、运作的方式、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这里都是适用的。

邢义田系统考察了汉代的以夷制夷论，以夷制夷的观念可以从先秦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中寻绎若干线索，但是将它具体化为一种政治策略并大规模实行是在秦汉帝国时期。在秦汉时代，以北方长城地带为界，中原农耕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形成壁垒分明的两个敌对世界，而农业社会在与游牧社会发生战争时，其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征兵方式和作战传统等方面都有不利之处，若能借助游牧民族的力量来抗衡游牧民族，不失为非常有效且省力的办法；再加上西汉后期儒家逐渐占据汉家政治观念的主流，朝野普遍反对“竭中国以事四夷”，则利用外族武力正符合“省中国之力”的原则[100]，对夷兵的利用越来越有扩大之趋势。

利用外族作战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先例。楚汉相争时，双方都使用了楼烦兵，刘邦还使用了板楯蛮，都是利用外族兵打内战。从汉代开始，对外族武力使用的规模和方式有很大的发展，这与大一统帝国成立后战争对象的变换及帝国内部经济社会变化造成的困难有关。首先，战国以

来作战主力是步兵，骑兵、车兵只起辅助作用，但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中原步兵远不能抗衡游牧骑兵，以步兵为主的传统军事系统渐不能适应需要，所以需要学习骑马民族的作战技巧和战法，甚至直接利用外族的力量。其次，因为朝廷对地方和百姓的防范，中国内郡之武备、武力大为削弱，不堪战斗。使用外族武力有诸多方便，朝廷也不愿地方和百姓拥有过强的武力，所以渐渐放松对汉人的武装要求，而汉人武力越不堪用，则越要依赖外族武力，二者恶性演进，先成汉末危乱之局，终成著名的“五胡乱华”。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东汉末羌胡化的西州兵残破两京，可以说是“五胡乱华”的前奏和预演。

战国以来实行征兵制，兵农合一、全民皆兵，但是“一统之后，疆理既恢，征戍之途弥远。夫地大人众，则不必举国皆兵，而后足以御侮；征戍远则民劳，不得不加以体恤”[101]。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战争的对象变成周边的异族，征兵制与新的战争要求之间的龃龉增大，战场转移到帝国的边缘，征发的中原士兵既要面对边缘地区的恶劣环境与复杂地形，又要面对剽悍善战、习于骑射的草原骑兵，军事上处于劣势，胡骑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每当胡人入侵，“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102]。征兵制在匈奴骑兵和战略面前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大帝国疆域广阔，征戍之途遥远，征兵一年一换，往往是新兵的军事技能刚有起色即轮换回乡；边疆经济落后，粮草物资转输耗费巨大，对朝廷而言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在这种情势下，利用外族力量（包括利用夷兵及学习他们的战法、战术）的要求增大，汉代最先阐述利用外族力量意见的是贾谊与晁错。

汉朝建立后在北方受到匈奴的压制，朝野普遍畏惧匈奴，文帝时的贾谊是平城战后首倡对匈奴用兵之人，他甚至还提出了制伏匈奴后的处置办法：“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皆属之置郡，然后罢戎休边，民天下之兵。”[103]在汉文帝时期，贾谊这个超前的设想不免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武帝之后汉朝对北方游牧族群问题的处理大致遵循了贾谊的思路。浑邪王投降后，将其部众分为五个属国，实质就是贾谊说的“令千家而为一国”，以此分散匈奴的势力，加强监控。宣帝时呼韩邪投降内附，匈奴代汉守边，当时汉朝本国军队势力尚强，边塞亭隧仍然严明，并没有完全委边于外族。东汉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汉以之守塞，南匈奴各部遍屯于北边要地。东汉后来又在

西北用降羌守塞，在东北用乌桓守边，渐渐地将北方边防全交由外族，贾谊期望的“罢戎休边，民天下之兵”庶几达成了。但是兵可弃哉？委边于人可能就是养虎遗患。

晁错明确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方针：“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104]为了组建可以对抗匈奴骑兵的力量，晁错一方面主张大力发展马政，另一方面主张利用降胡为兵。文帝时已有匈奴人降汉，在一封国书中文帝说：“朕释逃虏民，单于毋言章尼等”[105]，就是说汉朝不再追究逃亡匈奴的“亡民”，而匈奴也不再索要投奔到汉朝的章尼等人，文帝对投降而来的匈奴人给予了庇护。晁错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106]明确提出了利用内附的胡人为兵，“其众数千”，益之边郡骑士，共同组成朝廷可以控制的骑兵武装，增强抗击匈奴的力量。此时汉朝利用外族武力的规模有限，但是这种做法非常重要，为武帝之后的战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汉朝认识到了对付匈奴骑兵需要师夷长技，也认识到了以蛮夷攻蛮夷的方便。到汉武帝大举出击匈奴之时，对夷兵的利用规模逐渐扩大，武帝时封侯的匈奴人有22名，他们并不是只身南来，而是领有多少不等的部众，这些人中有的有参加对匈奴作战立有军功的明确记载，晁错当初以蛮夷攻蛮夷的想法被武帝大力践行了。

在持续的战争中，汉家兵制也逐渐变化，“武帝对周边民族（族群）的战争前后四十余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结果促成小农的破产流亡，而豪强殷富之家则多以（已）买到复除特权，不负担兵役，因之兵员十分缺乏，番上的旧制难以维持，于是刑徒兵、蛮族兵、奴兵、和募兵遂应运而生”[107]。这也正是吕思勉所说“于是罪人、奴隶与异族之降者杂用”[108]。武帝前期战争还是主要依靠汉人士兵，在后期对夷兵的利用有扩大的趋势。赵破奴曾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胡，他突袭楼兰、车师时使用的恐怕也是属国骑。李广利是武帝后期执行征伐的主要将领，他击大宛时“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以往”；击匈奴时“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109]。武帝设属国安置投降的匈奴人，依其故俗而治，以属国都尉管理，“属国骑，即属国境内的骑兵，而这些骑兵，多由胡人即匈奴人或隶属于匈奴国家下的其他部族所组成”[110]。武帝也改革了中央军制，外族士兵渐渐占得重要的地位，北军八校中的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越骑校尉

掌南方少数民族组成的骑兵队伍[111]，夷兵在北军的八校中竟占三校，其重要性一目了然。宣帝在对付霍家时，首先将霍山统领的胡越骑交由其亲信许史子弟掌管。金日磾的后代金涉在成帝时为侍中骑都尉，掌领三辅胡越骑，颜师古注曰“胡越骑之在三辅者，若长水、长杨、宣曲之属是也”[112]。

武帝之后，外族兵、募兵和刑徒兵的使用渐渐多了起来。宣帝时赵充国率领的军队构成很能说明这种变化，“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113]。军队的组成有征发的材官、骑士，有募兵，有刑徒兵，有胡越夷兵、羌骑，来源非常多样。元帝时冯奉世平羌，要求发兵4万，朝廷以民方秋收敛时，只征发了12000人前往，后战不利，天子大力发兵六万余人，包括三辅、河东、弘农越骑，迹射、佽飞、彀者、羽林孤儿及呼速絫、嗕种，后来又发募士万人准备参加战斗，闻羌破而未进。呼速絫、嗕种是宣帝时投降的匈奴种，这次战争除了没有提到刑徒兵外，军队组成与上次相同。从西汉后期这两场主要战争的士兵来源可以看出，募兵、外族兵、刑徒兵逐渐变得重要起来。

东汉对外族武力使用的规模远远超过西汉。早在两汉之际群雄相争之时，各个势力争相利用外族兵力从事内战。[114]东汉一代征发夷兵见于记载的有80多次，“乌桓、鲜卑、匈奴和诸羌都曾与汉为敌，但也都为汉之助力。乌桓作乱，汉借鲜卑之力。鲜卑为寇，南匈奴、乌桓又为汉之羽翼。同样汉又以南匈奴、鲜卑、乌桓对付北匈奴。南匈奴叛，汉发鲜卑、乌桓甚至羌人讨之。羌分多种，各不统属，汉更是以羌制羌”[115]。东汉对夷兵的利用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夷兵在军事中所占的比重极大。以东汉两次征伐北匈奴为例，永平十六年（73），“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太仆祭肜、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116]。和帝初年，窦宪北征，“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117]。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对军队的描述是“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乌桓、

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118]。在《窦将军北征颂》中，班固说：“羌戎相率，东胡争骛，不召而集，未令而谕”[119]。陈连庆细致考察了东汉对少数族群士兵使用的情况，指出东汉所征用的夷兵北边有南匈奴兵、属国兵、休屠兵、鲜卑兵、乌桓兵、夫余兵、西域兵、羌胡兵，南边有南蛮兵（武陵蛮兵、交州蛮兵）、西南夷兵（白马氐兵、板楯蛮兵、昆明夷兵、朱提夷兵）[120]。外族兵在帝国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灵帝中平二年（185），边章、韩遂与羌胡为寇，东侵三辅，朝廷商议应对，当时皇甫嵩主张发乌桓3000人，北军中候邹靖认为乌桓众弱，应该开募鲜卑。此事下四府议，大将军掾韩卓支持邹靖，而车骑将军掾应劭认为鲜卑不易约束，主张招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经过韩卓与应劭的反复辩难，朝廷官员们大都同意应劭的建议。东汉末年，群臣在计议军事时提出的所有方案，都是在征募夷兵上做文章，所不同者仅仅在于究竟应该征募哪种兵。朝廷上下绝无一字提及汉人本族的武装力量。朝廷不仅在对付少数族群边乱时使用夷兵，在内郡发生民变时，也征调夷兵去镇压，度尚就曾征调乌桓兵去对付零陵的朱盖、胡兰叛乱[121]。

令人震惊的是，参加朝议的大臣们没有一人提出使用汉人武装。汉人武力此时已经不堪使用，内郡忘战日久，在当时人眼中竟成为普遍共识。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一般都追溯到光武帝废弛国内武备的一系列措施：建武六年（30），罢郡国都尉官；建武七年（31），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建武九年（33），罢关都尉；建武二十三年（47），罢边郡亭侯吏卒。武备虽弛但军籍未废，百姓仍有服兵役的义务，一旦有事依然征发郡兵，劳榦在举出东汉使用郡国兵的大量例证之后说：“州郡兵的重要仍然不能疏忽的。……只是对于训练考察的都试，在建武初年废止了，兵多不练。而且尚有长期的屯兵。所以募兵的方式东汉末年更为显著。民兵越来越不堪用了。”[122]劳先生指出军籍虽然存在，但是缺少训练的郡兵已经不堪一击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123]，不经训练的征兵不堪使用，这些观察很是准确。

造成东汉征兵制的衰微不振、内郡武备废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征兵制不能适应在帝国边疆与外族作战的需要，这一点前文已经论及，所以募兵和夷兵就重要起来。与匈奴作战需要的装备是战马与强弩坚铠，制造这些装备很费财力，征兵遥远的戍途及后勤转输都是浩大的

开销，与其实行兵农合一的征兵制，不如集中力量训练一部分长期作战的募兵[124]；使用夷兵则更加方便，他们平日的生活就是军事训练，维持生计的工具就是作战的武器，而且就分布在边疆地区，不需长途更戍；使用刑徒兵也是出于经济上的方便，而且可以使中原罪人效命边疆，刑徒一旦充军就成为职业兵，朝廷十分乐意执行。这三种兵用得越多，征兵就自然越退化，成为一种时代之潮流后，不是轻易可以扭转的。

其次，与东汉政治、经济、社会内在变化有关。东汉时期征兵制难以为继，因为征兵制实行的基础——小农社会——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西汉后期奴隶和土地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改革没能挽救小农，帝国的统治基础严重削弱。东汉时期几乎每个地方都产生了拥有“良田千顷”和“宾客附从百家”的强宗大族，分割国家控制的土地和人口，东汉国家在财政上经常陷入困顿，以至于减公卿俸禄、假王侯租税，有战事时甚至让公卿出马弩。强宗大族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民，权倾一方，影响了国家的基层政治统治，仲长统论曰：“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125]小民大量破产，或是成为依附民，或是四处流亡，还有许多涌入城市，何兹全先生估计当时的城市人口或达到40%以上，这不是一个农业社会应该有的正常现象，城市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浮食者”。“流民也好，宾客也好，奴婢也好，浮食者也好，在征兵制的条件下他们都不可能为国家服兵役，国家的兵源，显然是减少了。”“如果实行募兵制，流民、浮食者、罪徒……则可能是它的对象。”[126]

东汉失去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雄心和能力，只能一切凑合，临时取办。孙毓棠认为汉人对于“兵”及“征兵”始终没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观念，在汉人的脑子里兵民不分，兵役与力役没有区别，使民打仗，或是后勤转输，或是漕运筑陵，在政府心目中都是笼统的“使民”，并未想到应该做什么训练与准备，等到发现一般人民不能打仗了，只好找寻另外一些人来代替，正好有三种人能代替，就是募兵、囚徒和属国兵。[127]孙先生提示的汉人在“兵”与“征兵”之间没有清楚的概念值得注意。征兵的渐渐衰微是多重原因作用的结果，当征兵一途困难而且所征之兵又颇不得力的时候，朝廷自然倾向于使用其他易得且善战的兵，朝廷在意的是可用的兵而不是兵的来源。这样的模糊观念潜伏着危险，兵制变化背后牵涉的深层问题，当局者没有清晰的认识，即兵制与兵农关系的问

题。征兵制下所有百姓在服役期间是兵，复员回乡就是民，兵民之间有很强的纽带关系，而募兵、刑徒兵和蛮夷兵，则是与一般的百姓有距离无情分，对国家的忠诚度有限，一旦反侧后果不堪设想。

导致汉人武力衰退的直接原因是光武帝废弛内郡武备的一系列决定。就光武帝初期的历史情形而言，他在罢内郡兵的诏书中说“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从最初的下邳郡兵到上谷、渔阳突骑，再到幽州十郡兵，再到收编的铜马，降服的董宪、张步部曲，此时他已经拥有一支历经百战且直属于他的强大军队，在军事上继续征发郡兵的需要不是很大。从民生经济来说，承莽末以来，天下战乱连年，百姓流亡，民不聊生。光武帝出自民间，对此时百姓之疾苦深有体会，“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亟欲息干戈休天下，在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后，光武一度想置隗嚣、公孙述二子于度外。停止对郡兵的征发，减轻人民的兵役，有利于恢复生产。[128]

但最重要的恐怕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即由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防范地方和加强皇权的要求。西汉时期就有“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129]的说法，宾客犯法入大姓之家，吏竟不敢追。这种情况到东汉后愈演愈烈，莽末强宗大族纷纷买兵弩、作坞壁，聚众自保，刘秀告诫出征的大将不要屠城略地而要平定安集，对各地大姓极尽安抚怀柔之能事。刘秀之功臣集团亦是清一色的大姓，检核天下垦田户口时官场潜规则就是“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130]。在这种情势下，地方的军队不但对于国家的征战毫无益处，反而可能成为地方势力利用的工具。光武废都试去郡兵的着意点就是对地方可能的反叛的防范，就光武帝本身的经历而言，他对地方军队潜藏的危险性非常了解，前有翟义利用都试起兵反莽，后来光武与李通兄弟策划起兵也是看中了都试大兵聚合的时机。所以光武出于防范地方、加强皇权的要求，废除郡兵和都试，是很能理解的。

光武在军事布局上依据“居重驭轻”、“强中弱枝”的思路来进行，保持强大的中央军，在战略要地设置屯兵，尽量削弱地方的武力。可是兵是无法去掉的，以后地方有事，仍然征发郡兵，临时设置都尉。光武政策的结果其实只是废除了都试，从而造成地方百姓武装训练的废弛，民间尚武之风衰落。一般而言，兵易散而不易聚，每年都试时郡国之兵汇聚比试，大兵汇集往往给反叛者提供机会，所以光武对于地方上的武力和每年一次汇集大兵的都试格外忌惮，废除之乃安全之道，但他没有料

到这只是暂安之道。不教民战，朝廷不再组织民众进行军事训练和比试，占汉朝绝大多数人口的内郡农人就愈加不能战斗，临到有事时仍然必须征调郡兵，所以战多不利。西汉时期尚武之风强劲，民兵训练有素，即使如此所征之兵在面对异族强敌时亦多有不敌，东汉时期缺乏战斗训练的农人组成的军队就更不论了。“连绵不断的战争，贯穿于东汉的始终，不仅连续时间长，而且战争的类型也多，出现了封建的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农民战争，还有军阀割据战争等”[131]，所以东汉对募兵、蛮夷兵、刑徒兵这些职业兵的使用越来越多。

上文提到集兵方式变化产生了兵、民关系的改变，征兵制下兵民是合一的，但是当募兵、蛮夷兵、刑徒兵的使用越来越多时，兵与民隔离的局面形成。雷海宗论曰：“募兵是少数或因喜好冒险、或因受厚赏的诱惑才入伍的人，是一种职业兵。屯兵有的出于强迫（囚徒），有的出于自愿，但到边疆之后就成了永久固定的边军，也是一种职业兵。胡越骑与属国骑是国家雇用的外族，更是以当兵为职业的。囚徒不是职业兵，乃是国家无办法时强迫入伍的，但一经入伍之后恐怕也就成了终身的职业。汉武帝虽然也发郡国的民兵，但这四种职业兵的地位比民兵的地位日趋重要。这四种兵，从兵的身份上说，都不是直接由民间产生的，大半都是民间的流浪分子，甚至外族的浪人。他们既不直接出于民间，与一般的人民自然没有多少情感上的联系。对于国家他们也很难说有多大的忠心，不过皇帝养他们，他们替皇帝卖死就是了。一般的民众处在大致安定的大帝国之内，渐渐都不知兵。这些既不肯卫国又不能自卫的顺民难免要遭流浪集团的军人的轻视。由轻视到侮辱，是很短很自然的一步。同时因为军人多是浪人，所以很容易遭一般清白自守的良民的轻视。”[132]兵、民之间不但没有情感上的纽带，甚至互相轻视、敌视。而且这些兵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趋向于一种交易关系，国家提供粮饷赏赐，军队拿赏办事，外族兵的雇佣兵性质更浓一些。“他们当兵是为了钱财，有利则向前，无利则后退，甚或倒戈相向。桓帝时募兵镇压长沙、零陵等地农民起义，豫章、艾县六百余人前来应募而‘不得赏值，怨恚遂反’，‘荆州兵朱盖等征戍役久，财赏不赡，忿恚复作乱。’这样的军队当然谈不上什么战斗力。”[133]整个东汉重文轻武，武人地位低，一般的人家是不愿意当兵的，募兵之兵员也是浮食者、流民、罪人充斥，当兵只是他们谋生之方式，长期的军队生涯不仅没有增强他们的战斗力，反而养成众多的兵痞、兵油子。总之，汉人军事力量衰退，到东汉中后期时，出现异族兵独强的局面，而异族兵大都分布在边疆，操控在羌胡化的边将手中，光武最初规划的“居重驭轻”反而转变为边兵（异族兵）独

强、外重内轻的局面，构成帝国的巨大隐患。

废除内郡武备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光武帝防范地方、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一人一家专制之私心[134]，也有东汉初年军事、经济客观形势的原因，但是废除内郡武备带来的诸多问题，光武之后的君臣们必定能够慢慢发觉，但竟为何一直没有采取措施补救之？待灵帝设置州牧加强地方权力，为时已晚，不但不能挽救危局，反而促成了军阀割据、地方分裂的局面。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在光武之后的继续发展呢？或许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考虑。第一，汉代比较重视祖宗故事，光武是东汉的创立者，他设立的制度后世君主不会轻易更改。第二，在王权支配一切的政治体制中，有一股隐形的力量存在，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凡是有利于加强皇权专制的政策就易于实行，而忤逆皇权、削弱专制的政策既难以提出，更难以执行。光武削弱内郡武装的政策虽然有诸多的负面作用，但是在专制君主看来，付出这些代价来获取皇权之稳固是值得的，臣子们更是在隐形力量的支配下难以提出纠改措施，否则无疑是要触犯政治忌讳的，而臣子们都明了，逆鳞不可触犯。第三，东汉之后儒家和平主义的思想占据了主流，夷虏相攻中国坐享成功、不以四夷累中国成为主政者信奉的信条，从而促进了利用外族兵的趋势。第四，财政方面的原因，使用夷兵“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藏”、“不动中国，不烦戎士”的优点不断被主张以夷制夷的人强调，国力较强的西汉既已如此，财政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状态的东汉对于利用异族兵自然就更有兴趣和动力了。这当然不是说使用夷兵开支就小，据袁安的说法，东汉朝廷每年供给南匈奴一亿九十余万钱，供给西域诸国的是七千四百八十万钱，根据其他材料，青、徐二州供应鲜卑每岁二亿七千万钱。这些归附的外族在遇到困难时朝廷要接济，征发他们打仗时还要按功给赏，虽然开销不菲，但相较于征兵，还是节省很多、方便很多。

在享受了使用夷兵的好处、暂保一时安宁之后，到东汉后期时，使用夷兵之副作用就渐渐显现，东汉国家亦将承受其代价。东汉后期，北方草原部族渐渐布列于帝国周边，为汉守边，东汉放弃了边境，内郡人远离战火，不能持干戈操弓弩，忘战日久。于是异族与汉族之间，同时也是边疆与内郡之间失衡对立的局面形成。外族索求不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西汉时期侯应的担忧在东汉末年全面爆发了，而汉族人武装废弛，无法与战，全面落败。待农人们经过战斗历练出来后，局面却已经不堪收拾了。袁绍等山东十八诸侯起兵，郑太对董卓说的一段话分析得很到位：“今山东合谋，州郡连结，人庶相动，非不强盛。然光武以来，

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数践战场，名振当世，人怀慑服。二也。……山东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贲之勇，庆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谋，可任以偏师，责以成功。四也。……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七也。”[135]郑太共讲了十点，归结起来就是山东武力远逊于董卓拥有的西州兵团。虽然郑太讲这些话是为了误导董卓，但句句在理，否则也很难迷惑住董卓。当时天下所畏者是并、凉边人及各种异族兵，边兵（大部分是异族兵）独强的现象很突出，边地的异族兵及羌胡化的边兵与东方集结的汉人武力交战，郑太比喻做驱虎兕赴犬羊，应劭将汉兵与边兵夷兵作战比作鸠鹊捕鹰鹯，豚羊弋豺虎。

应劭论曰：“盖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尚矣。《易》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时务农，一时讲武’。《诗》美公刘，‘匪居匪康，入耕出战，乃裹糇粮，干戈戚扬，四方莫当’。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辨，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136]应劭此处引用多处古典以责东汉对武备的放弃，“天生五材”是《左传》中宋国向戌发起弭兵之会，向宋公请赏，子罕论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也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137]应劭生活在汉末大乱之世，东汉一代过度依赖夷兵的弊端危害充分暴露出来，所以他对此深有体会。应劭接着说：“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以为己功，财货粪土。哀夫民氓迁流之咎，见出在兹。‘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迹其祸败，岂虚也哉！”[138]应劭与郑太同样引用了孔子“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古训，江熙注解云：“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即戎；况乎不及善人，而驰驱不习之民战，以肉喂虎，徒弃而已也。”[139]目睹了羌患之祸的王符也深有感触，汉军每与羌战，连连败绩，王符叹曰：“今观诸将，既无断敌合变之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则吏以暴发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敌巧。此为将吏驱怨以御仇，士卒缚手以待寇也。”“夫将不能劝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与无兵等。”[140]军队的将与兵，皆问题重重，不堪使用。

（二）西州摇荡：东汉“羌祸”酷烈

王明珂以历史的“本相”与“表相”这对概念来解释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关系，“历史事件，无论它们符合或不符合一些历史发展模式，都是一些历史表相，它们产生于一些历史本相；更正确的说，它们产生于某种历史本相下人们的企图与行动抉择。……历史研究的一个要旨是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探索中，尝试认识造成历史事件的历史本相，以及更重要的，‘人’在历史本相（对个人而言也是社会本相）下的顺服、违逆等行为抉择”[141]。王氏认为中国与周边异族多样的历史表相背后的历史本相，是双方对资源界限（这一界限大致沿长城东西延展）的争夺和维护，双方都力图保护和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资源，通过战争、和亲、贸易、移民等各种形式进行持久性的互动。王明珂的这一解释模式既充分考虑到经济因素的作用，又没有陷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还突出了人的抉择因素，具有较大的阐释力度。汉羌间的矛盾纠葛，从根本上来说亦是由资源的争夺决定的。杨永俊认为：“汉统治阶级所发动的一系列驱逐羌民、占有羌中牧场的战争，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羌中之利’有关系。汉统治阶级对‘羌中之利’的贪婪，是两汉政治斥逐羌胡、进据羌中牧场与掠夺羌人财富等一系列行为的原始动力。羌汉战争最深刻的原因是经济原因，操纵羌汉战争的真正动力是汉统治阶级对‘羌中之利’的贪婪。”[142]杨氏的说法虽不免有些绝对，但并不能说是错的。汉武帝进据羌地的直接原因是执行“隔绝羌胡”的战略，主要是基于政治、军事考虑，主要目的并非争夺羌地的经济资源。当时强大的匈奴突破了汉帝国的北方资源界限，通过战争劫掠、和亲及贸易从汉朝攫取大量的财富，汉武帝反击匈奴乃是顺应中国保护自身生存资源的要求，在政治上汉羌矛盾从属于汉匈矛盾，但根本上还是一个生存资源竞争的问题。汉人进据羌地的直接着眼点虽不一定是“羌中之利”，但客观结果是占夺了羌人的资源，压缩了羌人的生存空间，给羌人造成深重的灾难，只要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羌人之乱终将不止。

东汉以来，大量羌人入居塞内，甚至深入到三辅、三河之地，羌汉矛盾在新的情势下进一步激化，内徙羌人遭受到汉人官吏及豪民政治和经济的多重压迫，成为叛乱新的重要力量。每次边境一旦有事，塞内外的羌人往往互相呼应，互相支持，使得羌患成为外患内疾并发之症。

西汉时已有一部分羌人迁入塞内，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143]。武帝时

进据湟中，羌人西迁，“但西迁的并非全部羌人，至少已有部分羌人被安置在汉朝版图之内，并且至迟在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已置羌骑校尉，统率被收编的羌人武装”[144]。宣帝时赵充国将先零、煎巩等降羌迁到破羌、允街等地，并置金城属国以处之。王莽败后，羌人不但夺回故地，还侵入金城、陇西二郡，隗嚣、窦融均慰纳羌豪，利用羌胡兵，到光武完成统一，羌人已遍布凉州各地，与汉人杂处。

东汉时期羌人内徙的规模更大，据王力、王希隆的研究，与西汉相比东汉羌人的内徙具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活动范围广、以强迫性迁徙为主、与割据势力有很大关系、反复性等特点。[145]建武十一年（35），“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年，武都参狼羌反，援又破降之”[146]。将归服的羌人徙入塞内各郡是马援处理羌人问题的重要办法。他深悉羌人难治，将之分徙于各郡，意图分散羌人力量，将内徙羌人置于各地方的监控之下，甚至最后收到同化之功。马援的内徙之策是经过朝廷集议批准的，迁徙工作事关重大且涉及多个郡县，不是官居陇西太守的马援可以独自执行的，至少说明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将羌人内徙、分散安置是对付羌人的好办法。后来主持羌人事务的官员纷纷仿效，明帝时窦固、马武击败烧当羌滇吾，将七千降羌移往三辅；和帝时侯霸徙烧当羌迷唐部六千余口至汉阳、安定、陇西境内。这些记载当然不是羌人内徙的全部，而且羌人叛服无常，羌人内迁后有的反叛逃出塞外，然后投降又再次内徙，所以存在多次迁徙的情况。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地自西汉后期以来就已分布有羌人，他们是原先附属于匈奴，随匈奴投降而来的旧羌，东汉实行内徙羌人的政策，这些地方又移入了数量众多的新羌。东汉中期以后，当时人称分布于三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的羌人为“东羌”，称居于陇西、汉阳、金城及塞外的羌人为“西羌”[147]。

羌人内徙是东汉羌祸特别惨烈的原因之一，顾颉刚评论内徙羌人之策说：“这原是好意，想不到后来竟成了内地变乱的导火线。”[148]吕思勉认为：“羌兵不若匈奴之强，众不逮鲜卑之盛，而患转甚于匈奴、鲜卑者，以其居塞内故也。”[149]段颎批评内徙政策说：“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150]迁入到塞内各郡的羌人叛服无常，原本仅为边患的羌人顿时成为朝廷的肘腋之患，“鲠”字用得形象，如刺扎入咽喉，战火绵延到帝国内部，为害更深。范晔说“羌虽外患，实深内疾”，就是指羌人内迁后造成的危害而言，范氏又说：“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

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151]羌人广泛分布在西州各地为羌祸铺展于内部提供了契机，每当塞外羌种拥兵向塞时，边地保塞羌和内郡属羌往往起而响应，将战火从塞外烧及塞内，由边邑延及内郡。永初年间及其后所发生的“众羌内溃”，正是由迁徙并已广布于西州的降附羌众一同反汉的结果，有羌人分布之处就是羌祸延及之处，羌祸的愈演愈烈与众羌内徙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152]

但是，羌人内徙只是为羌祸在西州地区大范围爆发提供一个契机，羌人内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会反叛，否则赵充国、马援等亦不会采取这种做法了。赵、马之本意是将羌人分散内徙，拆解羌人的势力使之更容易对付，并期望内徙的羌人最终能被汉人同化，转变成帝国的编户民。西汉时武帝曾经将越人内徙，这些迁到汉人中的越人不但没有像羌人那样频频反叛，到东汉时内迁的越人已经同化融合，成为国家的编户民，内徙羌人的政策可能受到此成功前例的鼓舞。可是，内徙之策适合西汉时期的越人，却不一定适合东汉时期西北的羌人。与北方的游牧族群相较，南方的越人从来不构成帝国的重要威胁，而且吸纳越人的地区是江淮之间，地广人稀，越人的生存方式没有经过剧烈改变，故而内徙比较顺利。内徙的羌人却难以被同化融合，与徙入地区的汉人社会格格不入，矛盾冲突尖锐，汉人依仗优势地位对内徙羌人奴役压迫，徙入西州的羌人受到的压迫苦难越是深重，其族群意识就越是强化，越难以被同化融合。[153]

汉人在文化上有优越感，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发达的农业经济，具有强烈的大汉族意识，看不起夷狄外族，譬之如禽兽，歧视很严重。对所有的北方异族，汉人对匈奴稍微重视，但是对无君长上下、被发左衽的羌人是非常轻蔑歧视的，称之为“羌虏”，金城郡下诸县命名为“破羌”、“临羌”，将征讨羌人的将领封为“破羌将军”，汉人对羌人之恶劣态度可见一斑。早在西汉元帝时，侯应在谈及边塞问题时已经提到“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绝”[154]。西汉后期守塞的羌人被贪利的吏民侵夺辱折，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保塞羌人无法安生乐业，自然起而背叛，世世不绝。光武平定陇右后，班彪上书称：“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155]班彪先是依靠隗嚣，后投奔窦融，亲历西州两

大割据势力，对西州羌人的情况非常了解，他观察到内徙羌人反叛的根由在于受到汉人之侵夺压迫，所以建议复设护羌校尉以“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

光武帝并不重视羌人问题，仅视之为隗嚣割据势力的残余，护羌校尉也是旋设即废，羌人的受压迫处境在东汉时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愈加恶化。明帝时烧何羌逼于卢水胡，在贵妇人比铜钳的率领下来依郡县，后来因有种人犯法，临羌长竟收系比铜钳并诛杀其种人六七百人，可见汉人官吏从来不惮多杀羌人，手段狠辣。章帝建初元年（76），“安夷县吏略妻卑湳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156]。这次事件引发了章帝时期的羌人反叛，如上节所论，正是在章帝时期西州羌人问题逐渐取代匈奴问题成为帝国的主要边患。县吏夺略羌人妇，被其夫所杀，安夷县长不论事件原委就领兵追缉，由此可以感受到羌人之家庭、财产没有任何保障的境况，官吏完全站在汉人一方。值得注意的是“种人恐见诛”，说明一个羌人杀了县吏可能连累到整个种落，明帝时烧何部一个人犯法就使得种人被杀六七百人，类似的事件想必不少。李广曾经杀降羌八百余人，章帝时护羌校尉张纡设宴伏杀羌豪八百余人。动辄被屠杀数百人，羌人如惊弓之鸟，畏惧怨恨汉人，所以当安夷长出塞追缉时，犯事羌人的种落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抗争，于是共杀安夷长，联合勒姐、吾良等种反叛，这个事件的过程非常真切地体现了羌人受到郡县吏民压迫的境况。此事引发了章帝时期羌人的起义，这个导火索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内徙的羌人普遍地、长期地遭受汉人官吏和豪民的欺凌压迫，处处都是火药桶，此事不发，必定有其他层出不穷的类似事件来引发羌人的反抗。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轮流掌控朝政，腐败无能，任职西州主持羌务的官员大都贪残刚愎，只知压榨欺凌羌民，毫无定边安民之策。内徙的羌人处在郡县体制的统治之下，“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157]。马防主持羌务时，“多牧马畜，赋敛羌胡”[158]。顺帝时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他们任职之时梁商告诫说“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159]，但是天性虐刻的二人到州之日就多所扰发。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160]。皇甫规以中郎将平羌，“先是安定太守孙儁受取狼籍，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161]。东汉之吏治腐败，多

是贪残之辈、阉宦之党、无耻之人在位，张奂之前的八任属国都尉都好财货，自然免不了压榨盘剥羌人。西州之官员要么赋敛羌胡、受取狼籍，要么刚狠寡恩，残杀降羌，要么老弱不任职。皇甫规指出："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酋豪泣血，惊惧生变。"[162]内徙羌人还要被朝廷征召参战，安帝时朝廷强征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数百千骑前往西域作战，"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邀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163]。范晔在《西羌传》文末论曰："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164]"惊惧"、"鸟惊"、"愈惊"、"泣血"、"愤怒"这些文献记录在在呈现了羌人深受压迫、心惊胆战的处境。皇甫规、张奂等人主持羌务是在羌乱已非常严重、渐无法收拾之时，朝廷不得已才起用这些习知西州形势、羌人习性的西州本土豪杰，否则八都尉之后仍是贪残之辈，那些不遵法度的官吏仍会占据权位。汉人官吏、豪民对羌人在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全方位的压迫，是羌人叛乱的直接原因。

（三）西州兵团的形成与"凉州三明"的崛起

桓帝延熹二年（159），诛梁冀，单超等五人封侯，接着又封皇后家四人为侯，当时地数震裂，灾异频降，李云露布上书指责说："班功行赏，宜应其实。梁冀虽持权专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扼杀之耳。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闻之，得无见非？"在批评了皇帝大封宦官与外戚之后，李云提出当时朝廷面临的另一个潜在危险，"西北列将，得无解体？"[165]西北列将指皇甫规、张奂等掌握军事权力的西北籍官员。《后汉书》所载李云上书可能有所节略，否则看似在批评宦官外戚封侯的奏章中冒出一句对西北局势的担忧，实在显得有些突然。其实李云敏锐地指出了当时朝廷面临的两大忧患，即外戚宦官专权问题与西州问题，其中西州问题既涉及民族问题、边疆问题，也涉及中央与西州地方的关系问题。李云以露布上书的形式进谏触犯了桓帝逆鳞，死于狱中，但是他指出的问题点中了当时政局的要害，皇权壅蔽[166]和西州坐大是危及皇帝统治的关键问题，如若皇帝处理不当，还真就"帝欲不谛"了。

那么，李云所担忧的"西北列将，得无解体"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在之后又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西北的地方武力在两汉之际有过一次崛兴，卢芳、隗嚣、窦融借助羌胡的力量割据一方，对天下局势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光武帝对西北地区势力格外忌惮，陇右平定后隗嚣党羽及诸隗分徙弘农及京师以东，窦融、梁统、马援等人也都被调离西州另为他用，西州地区的二千石、刺史、守令几乎全由内地人出任，西州有事，派遣平叛的将领都是东方人，征调的郡兵也多来自内地，对西州地方势力的刻意防范成为东汉皇帝遵循的“祖训”和“故事”。然而，羌患的恶化为凉州地方武力的再次崛起提供了机会，东方将领和军队在羌乱面前的一败涂地使得皇帝不得不违背祖训，转而起用西州豪杰，重用西州军队。

羌人种类繁炽，或服或叛，时服时叛，主持羌务者对羌人也是时而强力镇压，时而抚慰招怀，没有一贯的方针。章帝时羌人之患取代匈奴问题上升为东汉首要的边患，护羌校尉一职自此稳定下来，虽然如此，章、和之时羌患并没有严重到使朝廷焦心的程度，朝廷并没有向西北大规模用兵。但是从安帝永初元年（107）起羌乱突然升级，接连爆发了三次“羌人大起义”[167]，整个朝野都为了羌乱而焦心郁闷，朝廷也开始对西北大规模调兵遣将，军费开支猛然剧增。

安帝永初元年（107），被强征前往西域作战的羌人逃散，此事本身并不严重，但是汉朝官吏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扩大了事态，各郡发兵拦截，甚至倾覆羌人庐落，致使诸种大豪惊惧奔溃，西晋时江统描述说“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168]，第一次“羌人大起义”就此爆发。羌人起事之始力量尚不强大，《西羌传》记载：“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169]亲历此次羌乱的王符反复念及：“羌始反时，计谋未善，党与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170]“前羌始叛，草创新起，器械未备，虏或持铜镜以象兵，或负板案以类楯，惶惧扰攘，未能相持。”[171]但是“郡县畏懦不能制”，致使羌人反叛之势坐大，王符归责于西州各郡县守令：“前羌始反时，将帅以定令之群，藉（借）富厚之蓄，据列城而气利势，权十万之众，将勇杰之士，以诛草创新叛散乱之弱虏，击自至之小寇，不能擒灭，辄为所败。”[172]王符认为地方守令拥握强兵却无守战之意导致了失败。王符评论地方长官们无守战之意，确实如此，但是他说守令们“将勇杰之士”，不一定符合事实。

为什么“郡县畏懦不能制”？汉代郡县体制的有效运作是以各地方豪强势力的支持为前提条件的，地方政权与地方势力有着较紧密的合作，但西州郡县与地方豪强的关系并非如此。杨永俊指出：“东汉政府对陇右豪杰与羌胡之间联系的过于严密的防范，及对陇右地方势力的过度削弱，在防止陇右地方势力趁‘羌乱’之机起事上很见成效，……但是这一强干弱枝的做法，在事实上却大大削弱了陇右地方政权的力量，致使陇右地方政权在‘羌乱’之际无所适从，既不知如何协调和解，又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陇右地方势力一旦被削过甚，那么陇右地方政权就失去基础，其有效的行政与军事职能也就难以发挥，陇右的秩序就无法经受住‘羌乱’的打击。”[173]由于朝廷对西州地方豪杰的防范态度，郡县机制在西州地区运作得并不顺畅。当羌人反叛的情势恶化后，由于西州的二千石、令、长皆内郡人，他们既无守战之意，亦无守战之力，皆上言徙郡县以避寇仇，他们之利益根本不在西州，也丝毫不顾及西州豪杰与西州人民的利益。在内徙郡县的过程中，“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174]。王符说得很明白：“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175]汉阳人杜琦、杜季贡、王信领导的汉人起事在此时兴起，与守令极其折残边民的徙郡是有一定关系的。先零羌别种滇零在北地建立政权，与杜琦等连谋合力，羌、汉反抗势力“遂云烝起，合纵连横，扫涤并、凉，内犯司隶，东寇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176]。

主持平叛工作的邓骘是和熹邓太后之兄，虽然征调了庞大的军队，但是平羌的战争进展不利，以至于邓骘提出“弃凉之议”，并辩护说：“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这个意见在朝廷一时占得上风，“议者咸同”。此时郎中虞诩提出反对意见，向太尉李脩[177]进言曰：

> 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

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178]

虞诩讲了三点理由，第一，对于先帝辛苦开拓的土宇不能轻易放弃；第二，如果放弃凉州则三辅为边，旧都的先帝陵园将直接暴露在外族兵锋之下，无论是对国威还是对皇室尊严都有不利；真正的要害是第三点，即抛弃凉州，很可能导致凉州的本土势力与叛羌联合起来。森本淳指出，虞诩所说的“士人”应该就是凉州当地汉族吏民中的实力阶层，即所谓“豪雄”。[179]凉州属汉，则凉州之人为汉之臣民，始终是牵制叛羌的一股有力力量。但如若放弃凉州，逼迫迁徙，意味着凉土之人要抛弃自己的家园和祖先坟墓，凉州人众必不乐意迁徙他处，群情不满、生发异志在所难免。羌人诸种分布于凉州各郡，种属不一，不相统属，有的种落经常反叛，亦有守善的羌种，是助汉平叛的羌胡兵。无论是叛是服，羌人与凉州本地的豪强势力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凉州豪强也深谙羌人习性和情实，莽末汉初凉州豪强与羌人势力曾有过密切的合作。一旦凉州被弃，凉州豪强与朝廷之间不再有臣属关系，他们必定招怀诸羌，“豪雄相聚，席卷而东”，凉土之人的壮勇远过关东诸州，羌胡之彪悍更是为平土之人所畏，他们一旦举兵东向，朝廷将无法阻挡。虞诩的话对朝廷中主张弃凉之议者而言，不啻振聋发聩、醍醐灌顶，这一层利害明了了，弃凉之议就作罢了。

虞诩进而提出了应对的办法，“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180]。李脩将虞诩的意见交由四府讨论，“皆从诩议”。前时邓骘提议放弃凉州，“议者咸同”，朝臣们也许是迫于大将军的威势，也可能是对弃凉州可以摆脱羌人烦恼心存幻想，但朝臣们心底未必真的那么“踏实”，当虞诩点破了他们心底都有的一层隐忧后，群议自然转向“弃之非计”。细究起来，虞诩提出的应对之策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对“彼州之人”，就是凉州本地的豪雄，另一个是对牧守令长，这些是内地人。令四府九卿各辟凉州豪杰数人为掾属，这样一来就将有数十位凉州人士进入中央政府机构，此举向凉州人表明朝廷仍然将凉州视为王朝的一部分，朝廷将继续尽力恢复凉州的秩序。凉州的牧守令长虽然是外地人，并且是主张放弃凉州的，但是他们毕竟掌握着凉州各地军政大权，现在朝廷已经认为凉州不可弃，平定羌乱恢复凉州秩序还需要依靠这些人，但是处在叛乱四起的地区，朝廷又不得不防备“非常之变”，所以对凉州守令既要激励也需防范，故除其

子弟为冗官，既是恩惠也是人质。

朝廷虽知凉州不可弃，但是羌乱之势越来越严重，王师连连败绩。永初四年（110），徙金城郡都襄武，五年，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边防线就是资源空间的界限，无论是放弃凉州还是徙郡逃寇，无疑是放弃了国家的资源空间，在族群资源竞争的局势下，一方的后退就意味着另一方的逼近。王符说道："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惑议。余窃笑之，所谓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尔，未始识变之理。地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今不厉武以诛虏，选材以全境，而云边不可守，欲先自割，示偄寇敌，不亦惑乎！"[181]王符指出地缘政治中的一个根本道理："地无边，无边亡国。"顾祖禹也说："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陇右，先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放弃凉州的提案不但不能解决羌患问题，反而可能使朝廷处于更危险的境地。虞诩只是否定了弃凉的主张，羌人问题之解决仍然需要朝廷在政治、军事上做出其他的努力，虞诩主张的"凉州不可弃"并不承担解决凉州问题的责任，只能说如果放弃凉州，局势将更加糟糕。虽然放弃凉州的提案未被执行，但是这种提议的提出本身就极大地伤害了凉州士人的感情，一种随时可能被抛弃的感觉幽灵般地缠绕着西土之人，催生了他们"自主自卫"的精神，不久后他们就转而向独立性发展。[182]徙郡的执行给凉州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逼迫许多人加入杜琦兄弟领导的反抗活动中，更多的不安定因素逐渐酝酿积攒着。

西州因为羌乱的严重而得到了朝廷的重视，朝廷派出大军前往平叛，邓骘和任尚率领的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兵合五万人，后来不断增兵，虞诩说"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183]，王符说"今数州屯兵十余万人"[184]；军费开支也非常浩大，"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185]；汉廷为了笼络凉土之人还令中央公卿府征辟了彼州数十人，说东汉朝廷对于羌乱问题持消极态度是不准确的。但是如前文所论，东汉废除郡县武备，百姓忘战日久，郡兵战斗力低下，禁兵虽然稍强，但兵力毕竟有限，还要负责拱卫京师。平羌将领不恤军事，贪腐成风，"诸将多断盗牢廪，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186]，皇甫规说"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悬师之费且百亿计，出于平人，回入奸吏"[187]。王符说："今观诸将，既无断敌合变之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然其士民又甚

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则吏以暴发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敌巧。此为将吏驱怨以御仇，士卒缚手以待寇也。”[188]所以，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邓骘败于冀西，任尚败于平襄，司马钧败于丁奚城，马贤败于射姑山，赵冲败于鹯阴河。为了改变西州战场上的劣势，东汉朝廷也顾不得立国以来对西州地方势力的防范限制之术，而不得不逐渐使用西州兵与西州将了。

陈勇注意到：“桓帝以前，东汉朝廷不断从关东州郡大量征兵，派驻关陇地区，与羌人作战，凉州兵往往只起配合作用；桓帝以后，东汉朝廷极少将关东兵（包括禁军）用于西北一带的对羌战争，凉州兵成为与羌人抗衡的主要武力。”[189]安帝元初二年（115），虞诩教任尚改变战术，罢步兵用骑兵，这成为平羌战争中逐渐倚重凉州兵的一个契机。从关东征调的兵多是步兵，而反叛的羌人却是精于骑射的骑马民族，任尚率领“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190]对此虞诩建议说：“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便人利事，大功立矣。”[191]任尚闻计大喜，上言用其计。这个战术的改变使得凉州兵地位重要起来，因为凉州处于农牧交错带，与骑马民族频繁互动，善于骑射，而且凉州的义从羌胡都是优秀的骑兵战士。陈勇认为经此重组的骑兵军队就是护羌校尉营兵，自永初二年（108）至建宁元年（168）的约六十年间，护羌校尉的营兵成了平羌的主要兵力，始终维持在万人左右的规模，又多是精锐骑兵，与虞诩所言“万骑之众”相合，护羌校尉营兵的成分就是“湟中义从兵”和“湟中义从羌胡”，也就是说护羌校尉营兵全部来自凉州。另外，凉州各郡的武力仍然在各太守的率领下对羌作战，所以，可以说东汉在对羌战争的后期，从兼用内郡、凉州武力转为专用凉州兵。[192]

随着凉州兵得到重用，凉州将领也在桓帝时崛起。朝廷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明白只有凉州兵能对付羌乱，也只有凉州将能指挥凉州兵。凉州将最著名的是“凉州三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三人“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云”[193]。顺帝时皇甫规多次上书言军事求用，或许由于皇帝对起用西北豪强仍有疑虑，故均未果。桓帝时皇甫规讨平泰山贼，显示了军事才略，延熹四年（161），先零诸种陆梁覆没营坞，皇甫规再次请战，他在奏疏中说：“臣生长邠岐，年

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豫筹其事，有误中之言。……以所习地形兵势，佐助诸军。”[194]是年冬，皇甫规即以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而在此前二年，段颎已经出任护羌校尉，是平羌战场上的主要指挥者，后来虽下狱，但又反复被起用。张奂在延熹九年（166）拜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主持整个北边事务。

凉州三明当然不是突然闪耀在桓帝时期平羌战争的舞台上，皇甫规年轻时被安定太守辟为功曹，太守知规有兵略，曾令他率甲士八百与羌交战。张奂曾担任安定属国都尉、武威太守等职，治理羌人甚有名声。段颎曾任辽东属国都尉，展示了军事才能，后以中郎将平定东郭窦、公孙举的叛乱。桓帝延熹年后，他们都回到西州平羌战场担任主要将领。虽然凉州籍的将领在平羌战争中取得领导地位是在桓帝时期，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在此之前必定有大量的凉州豪杰通过出任郡县掾属、护羌校尉从事、各领军将军府幕僚的途径，在平羌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虽然不是最高指挥官，但占据着大量中下级军事职务。如皇甫规就曾担任安定郡功曹，领甲士与羌战；陇西人董卓曾为州兵马掾，常徼守塞下，膂力过人，为羌胡所畏。像皇甫规、董卓这样，但是又没有被史籍记录下来的凉州籍中下层军官想必还有很多。[195]

凉州籍将领与邓骘、马贤、任尚、赵冲、司马钧等非凉州籍的将领相比，在领导平羌战争中有更多的优势。首先，他们对西州的地理山川、羌人习俗情实都非常了解。皇甫规在自荐中就说“以所习地形兵势，佐助诸军”，他对此显然是颇为自信；其次，自古以来山西出将，西北边人勇猛善战，通晓兵略；最后，凉州将领身先士卒、爱护士兵，与关东将领不恤军事、贪腐成风形成鲜明对比。[196]两汉时期的地域观念非常重，凉州士兵更听命、钦慕本籍出身的将领，凉州将领又身先士卒，爱护士兵，官将士卒打成一片，王符所说的“将恩不素结”、“吏以暴发虐其士”的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正因为如此，在“凉州三明”的指挥下，羌叛平息下去了，所谓“西羌于此弭定”、“东羌悉平”。关于“凉州三明”之间治羌政策的差异，杨永俊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197]，总而言之，段颎斩尽杀绝般的屠羌政策排斥了皇甫规和张奂稍显温和的治羌方针，得到朝廷的支持。段颎对桓帝说：“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198]段颎凡百八十战，杀羌人三万八千六百余级，俘生口万余。可见汉羌经过双方百多年的缠斗，双方间仇恨累积，东汉王朝在羌人的反复叛乱中失去了耐心，终于发展到企

图凭借强势武力彻底剿灭压服之的地步。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是羌人、西州吏民、东汉朝廷，还是关东百姓，没有一个受益者。

西北列将掌握了强大武力的指挥权，这对朝廷不啻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凉州三明”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像李云担心的那样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凉州三明”接连被朝廷调离西北，失去兵权的“凉州三明”只能依违于其他政治势力之间，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199]走上另一条道路的是他们的部将，董卓毫无疑问是吸取了“凉州三明”的教训，而且乘着汉末政局摇动之机，率领军队进入洛阳，完成西州力量对中原腹地致命性的反馈。

（四）董卓入洛：西州对东汉的破坏性反馈

西州力量对汉朝中原腹地致命性的反馈是由董卓领导完成的。在羌汉百余年厮杀中形成的西州力量，最终是以羌胡及羌胡化的劲兵形式表现出来的，本书称之为“西州兵团”[200]。安帝后期之后，西州兵及西州将领在平羌战争中崛起，李云之所以担忧西北列将，是因为西州列将与西北的军队结合在一起。在羌患平息后，“凉州三明”被征入京，这只是意味着西州将领与西州兵的分离，并不是说随着三位将领的离开，西州兵团就瓦解了，他们的下属旧部仍然维系着西州兵团的存在，一旦有新的时机，定会涌现出新的领袖。朝廷虽然成功地将“凉州三明”召入京城，但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西州武力的潜在威胁。董卓进京并操控朝政固然是因为他掌握着强悍的西州武力，但亦是多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如黄巾起义的爆发，东方割据势力的成长，西州羌汉联合叛乱的发生，朝廷中清流、浊流的斗争等；许多偶然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着作用，比如何进招并、凉武力胁太后的愚蠢决策和皇甫嵩踌躇不定的抉择。

董卓不是西州兵团的开创者，反而是既存的西州兵团为他的行动提供了可能。他在西州兵团的历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凉州三明”时期可以被视为西州兵团的形成期，此时董卓并不占重要地位，他曾是张奂的部下，西州兵团中一名中层军官，只是因为他的豪健和与羌人豪酋的亲密关系而具有一定的名声；借着黄巾起义和边章、韩遂叛乱的时机，董卓逐渐成为与皇甫嵩齐名的西州将领，随后乘朝廷内乱进入洛阳，制伏皇甫嵩、朱儁，吸纳何氏部曲和丁原的并州兵，废立皇帝，操控朝廷，逼迫迁都，西州兵团的势力达到鼎盛；董卓被杀之后，并、凉分裂，董卓的部下反攻长安，重新控制朝政，李傕、郭汜、樊稠、张济

联合组成“四头政治”[201]，并与凉州本部的“叛贼”韩遂、马腾达成和解。但是随后军事联合政权内部分裂，“四头”在互残中没落，后来凉州本部的韩遂、马超在曹操的离间下分裂，西州势力最终被曹操消灭。“凉州三明”——董卓——李傕、郭汜、樊稠、张济/韩遂、马腾，构成了西州兵团的承继关系。

董卓是陇西临洮人，其父曾任颍川的一个县尉，出身于典型的关西中下层武人家庭。董卓“性粗猛有谋”，“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202]。少时尝游羌中，与诸羌豪结交，以健侠知名。曾为郡吏，后来被州刺史辟为兵马掾，州兵马掾“应该专设在与少数族群邻接的地区，任务是作战时参与策画，并身临前线，交锋对阵”[203]，是边疆地区的重要基层武职。董卓常徼守塞下，数与羌人战，多有斩杀。出身郡县掾吏者若想进一步提升需要经过举孝廉一途，关西人被举为孝廉颇为不易，但是胜于武勇的关西人可以通过六郡良家子为郎之途谋得晋身之阶，汉代良将出身六郡良家子者颇多。董卓在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后来成为张奂的军司马，由此发迹。《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吴书》的叙述稍有差异：“郡召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并州刺史段颎荐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204]虽然所记具体职务有异，但是大致过程是相同的：首先董卓凭借家资和个人才力，在郡一级担任武职性质的小吏；接着被辟为州一级的掾属，主掌与兵马战斗相关的事务；然后在同州先达段颎的推荐下，或许是以六郡良家子为郎的途径，或者是以辟为公府掾属的途径，进入京城；最后，延熹九年（166），张奂为中郎将，永康元年（167）的春、夏、冬，东羌、先零五六千骑抄掠关中、三辅，“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205]。无论当时董卓在京师为郎也好，在公府任掾属也好，因为其出身、才能和过往的战绩被看中，被任命为中郎将张奂的司马，担当一面，平定了一场羌乱。

董卓后来历任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似乎要在二千石上终其一生。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的爆发给了董卓机会，当时朝廷派出四位将军领兵平叛，有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东中郎将董卓，四位将领中有两位是西州将，可见朝廷对关西将领的倚重。但是董卓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兵败抵罪，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声名大振的是皇甫嵩。皇甫嵩乃“凉州三明”之一皇甫规的从子，皇甫一门在东汉后期祖孙三代人连任重要武职，是西州著名的将门。皇甫

嵩于长社一战平定河南的黄巾，然后转战河北，于仓社、广宗、下曲阳破黄巾主力，当时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206]参与平定黄巾起义的西州将想必还有许多，平定羌乱的艰苦斗争锻炼出了许多能征善战的军官，比如北地人傅燮"为护军司马，与左中郎〔将〕皇甫嵩俱讨贼张角"[207]。傅燮之声名也由此而起，他不结交宦官，宦官忌惮其名而不敢害。

西州将领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声名大振，在军队中的威望骤增，历朝历代手握重兵的将领从来就是各种阴谋聚焦的中心，王朝末世更是如此。汉阳人阎忠此时劝说皇甫嵩抓住时机举兵向阙，"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群凶之积"，指出当时朝廷如朽败之木，已不可辅佐，"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208]。当时天下摇坠，皇甫嵩确实获取了很好的问鼎机会，当时天下重兵多由他掌控，一旦起事也能取得西州绝大多数武力的支持；而且与董卓不同，皇甫嵩已经融入当时主流的士大夫社会，又出身于西州将门，是协调关东政治文化与关西武力的最佳人选，凭借威名并以诛除宦官为口号，很可能赢得天下多数吏民的支持。如果皇甫嵩当时敢于迈出那一步，那么西州力量对中央的反馈就不会似董卓领导的那般极具破坏力，而会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所有的事情均具有两面性，皇甫嵩熟读《诗》、《书》，深浸儒家名教的意识形态，这是他能融入士大夫社会的原因，也使得他不能迈出那非常的一步，而只有留待不羁绊于名教伦常的羌胡化之董卓来完成。吕思勉说："顾虑名义者，莫敢为非常之举，而暴戾恣睢者，乃乘之而起。"[209]顾虑名义者，皇甫嵩也；敢为非常之举、暴戾恣睢者，董卓也。

镇压黄巾的不利使得董卓暂时失官，但是当年冬天西州边章、韩遂叛乱的爆发又给了董卓一个机会。"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210]与以往羌胡反叛不同的是，这次叛乱由金城豪杰边章、韩遂领导，羌胡终于与地方豪强势力结合，并且打出了诛除宦官的旗帜，东汉羌人的起事至此发展到最高水平。中平三年（186），韩遂杀掉边章、北宫伯玉和李文侯，完全控制了这支军事力量，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接着陇西太守李相如反叛并与韩遂连和，杀凉州刺史；凉州刺史司马马腾也拥兵反

叛，加上汉阳的王国也反叛，皆与韩遂合。各叛军首领的权力经过重组，推王国为首领，西州叛乱的规模、水平达到顶峰。刘陶上书说："今西羌逆类，私署将帅，皆多段颎时吏，晓习战阵，识知山川，变诈万端。"[211]也就是说，段颎当初的老部下，桓帝时曾平定羌乱的官军，朝廷显然没有对其做好安置工作，此时他们加入叛军队伍中。以前镇压叛乱的一方，现在成为新的叛乱者。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西州叛乱，朝廷官员反叛的很多，级别也较高，李相如是二千石的郡守，马腾是刺史司马，竟也加入叛军的阵营，想到安帝时虞诩建议把西州二千石令长子弟除以冗官留居京师作为人质，确实有其必要，但灵帝末这个办法恐怕早已废弛了吧。

边章、韩遂叛乱爆发，朝廷拜董卓为中郎将，副皇甫嵩击之，皇甫嵩因为得罪宦官，以无功免归，董卓则继续留在西州战场，朝廷拜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主持平叛，拜董卓为破虏将军，统于张温。董卓曾对张温不顺，孙坚建议张温杀之，张温曰："卓素著威名于陇蜀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212]西州将领在西州作战的优势上节已论，张温的话令我们想起当初来歙说的"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董卓在西州有许多旧部心腹，手下还有许多羌胡兵，这些兵战斗力强，又近似于是董卓的私兵，只有董卓能指挥得动这支军队，张温要完成平乱的任务必须依靠董卓。董卓在西州战场上还是颇有能力的，当时"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还"[213]。中平五年（188），朝廷征回张温，以董卓为前将军，以皇甫嵩为左将军，各率二万人平叛。由此，朝廷将西州平乱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西州将领，二人连战大捷，王国被韩遂等废，"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其诸部曲并各分乖"[214]。

当西州的叛乱之势被压制下去之后，灵帝回过头就要担忧手握重兵的董卓、皇甫嵩了。中平六年（189），皇帝征董卓入朝为少府，董卓如果奉诏入京，其命运则将如"凉州三明"一样落入任由朝廷安排摆布的境地。董卓深明其中的利害，决心不走"凉州三明"的老路，而是要将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于是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215]董卓显然是决心不奉诏了，但此时朝廷已经无力约制。不久灵帝病重，临驾崩前发出玺书拜董卓为并州牧，令其将军队交由皇甫嵩统率，董卓又一次拒不奉诏，上书言："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216]

当时灵帝即将驾崩，外朝士大夫与宦官关系紧张，京师的变乱一触即发，这些情况董卓自然有所了解。他并没有赴并州任，而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局走向，期冀非常。当时皇甫嵩从子皇甫郦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217]这里说的"怨隙已结"，是指在二人与王国作战时因战略的争执而引得董卓大惭恨而忌嵩，《后汉书·皇甫嵩传》注引《献帝春秋》："初，卓为前将军，嵩为左将军，俱征边章、韩遂，争雄。"[218]"争雄"两字透露出他们之前的不睦，西州的这两大将领之间合作并不愉快，更没有亲密的私人关系。安定皇甫氏属于西州的高级将门，文化素养高，皇甫嵩与关东士大夫关系更为密切，董卓则出身于西州的中低级武人家庭，粗暴少文，当时朝野对他的观感恐怕就是"凶戾无亲"、"强忍寡义"、傲慢骄横。洛阳的朝廷曾命令董卓将军权交给皇甫嵩，恐怕正是因为对二人的不和有所了解。皇甫郦此时的建议也颇为可行，董卓屡不奉诏已经是大逆不道，但是皇甫嵩拘于为臣之道、名教观念，坚持不肯无君命而专伐，失去了压制董卓的机会。

在京城宦官与外朝士大夫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刻，何进为了逼迫何太后同意诛除宦官，听取了袁绍的建议，招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当时这个计策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大将军主簿陈琳谏曰："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219]郑太也说："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亲德之重，据阿衡之权，秉义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且事留变生，殷鉴不远。"[220]陈琳说"大兵聚会，强者为雄"，各路军队进军后，游戏的逻辑就将转变为强者为雄，无法控制，此举无异于玩火自焚。郑太更是直接说董卓强忍寡义，不能授以大事，否则必定危害社稷，但何进不听。何进因为犹豫和无知被宦官抢先斩杀于宫内，袁绍立刻带兵攻入宫城诛杀宦官，此时董卓也领兵进京了。

当时洛阳确如陈琳所言是"大兵聚会"了。当时洛阳周近的军队，有董卓的凉州兵，袁绍掌握着西园八校尉的兵力，后将军袁术控制着何进的部曲，济北相鲍信募来了一支山东兵，还有丁原率领的并州兵[221]，

董卓在武力上并没有占得绝对优势，骑都尉鲍信说袁绍："董卓拥制强众，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及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222]董卓也"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所以玩弄了一个把戏，"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223]。或许正是被西州兵不断入京的假象所惑，再加上西州兵强悍无敌的战斗力，袁绍才不敢发难。后来，"何进及弟苗先所领部曲皆归于卓，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224]，袁绍出奔山东，西园军大概也被董卓接管，这样集结在洛阳的武力几乎都被董卓控制了。

何进兄弟的部曲归属董卓可能是通过董卓弟董旻，在董卓入京前，董旻已经在洛阳任奉车都尉，与何进部曲将吴匡、张璋往来密切，何进在宫中被杀，因为何苗数次反对何进诛除宦官，"吴匡等素怨苗不与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同谋"，"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225]。可见吴匡和董旻的关系比较密切。何进被杀，吴匡等无主，自然需要再择强主，威震西州的董卓此刻进京，而且又有董旻从中牵线搭桥，吴匡等最终选择归附董卓。吞并丁原的并州兵，则是依靠对吕布的拉拢，吕布叛杀丁原转投董卓。恰如陈勇所分析的，吕布投靠董卓反映的是并州集团与凉州集团的联合。袁绍劝何进招的四方猛将，主要就是董卓的凉州兵和丁原的并州兵，丁原不是并州人，并州军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吕布、张扬、张辽等并州籍的中层军官手中。董卓通过计谋虚张了凉州兵数量，使其他军队畏服，又以许诺擢吕布为骑都尉并接管丁原旧部为条件，引诱吕布倒戈。除了个人前途的引诱外，并、凉同属西州之地，是羌乱频发的地区，两州均有大量羌胡杂居，都具有浓厚的羌胡化倾向，吕布与董卓出身都是中下层的武人，生长于羌胡化浓重之地，具有相似的地域、文化、习俗和社会身份背景，自然气味相投。[226]董卓对吕布"甚爱信之，誓为父子"，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由于政治主张的一致。郑太说天下所畏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明公权以为爪牙"。董卓手下的兵多是凉州人和湟中义从、西羌八种，并州军中则多是并州人和匈奴兵及匈奴别种屠各兵，吕布归属后，这些统统成为董卓的爪牙。

大兵聚会，强者为雄。董卓控制了京畿几乎所有的武装力量，最为雄壮，于是轻易地废立皇帝，操控朝政。他亦尽力争取党人名士的支持，"卓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𫓧锧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227]"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珌、侍

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228]还征召了荀爽、蔡邕等名士，虽然如此，董卓却从来没有得到党人士大夫集团的支持。袁绍、曹操逃亡关东，组织了十八路诸侯联盟讨伐董卓，留在朝中者表面上依附董卓，实际却是一边暗助东方，一边密谋刺杀董卓。袁绍逃跑后，郑太、何颙、伍琼等不但劝阻董卓追缉袁绍，反而还诡辞令董卓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韩馥出任冀州刺史、刘岱任兖州刺史、孔伷任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刺史，都是周珌、伍琼建议的，这些人成为十八路诸侯的主要成员。难怪董卓回过味来后指责说：“卓初入朝，二子劝用善士，故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229]，遂杀周珌、伍琼；山东兵起后董卓欲扩大征兵，郑太又诡辞说天下精勇已被董卓掌握，山东之人不足一虑，郑太虽然说出了部分实情，但是其主要目的还是阻止董卓扩充军队。针对董卓的刺杀行动也是此起彼伏，荀攸与郑太、何颙、种辑、伍琼等相谋刺杀董卓，未发而觉；伍孚实施了刺杀行动，但是董卓一身武功，失败被杀；张温、王允也阴相谋划诛卓，未及发而张温因往怨被杀；最后王允交结吕布，利用吕、董之间的矛盾杀了董卓。

董卓及其西州兵团的某些固有特质和行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得到关东士大夫集团的认同。董卓对皇权的践踏与蹂躏，完全违背了士大夫们的皇权信念。董卓进入洛阳后，若是想要专权，必须排除临朝的何太后，当今皇帝是太后亲子，若是对何太后下手则与皇帝结仇，所以董卓若要专权，则何太后、少帝都要排除掉。董卓首先逼迫何太后废少帝立献帝，献帝生母乃是被何太后毒杀，年纪更小，容易控制。接着幽杀何太后，控制了朝政。董卓废少帝的举动受到了许多名士的反对，董卓同州人盖勋与书曰：“昔伊尹、霍光权以立功，犹可寒心，足下小丑，何以终此？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可不慎哉！”[230]盖勋还联络了当时驻兵扶风有三万众的皇甫嵩，希望起兵讨卓，但因为皇甫嵩不敢发动而未成功。朝堂之上董卓以“军法从事”威胁大臣废少帝，卢植仍然抗言：“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231]袁绍一向畏惧董卓，但是当董卓意欲废帝时，袁绍反对：“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当董卓说出“刘氏种不足复遗”的时候，袁绍竟然一时愤慨，勃然作色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232]，横刀长揖出，颇有英雄气概。

盖勋是敦煌人，家世二千石，属于西州高级豪族，西州虽然有浓烈的羌胡化倾向，但是这种倾向主要集中在中下层，西州的上层士人更紧密地向中原正统的礼教文化靠拢，皇甫嵩如此，盖勋也是如此，他们与关东主流的士大夫群体分享着共同的政治文化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对皇权的忠诚和对名分观念的执着或忌惮。阎忠劝皇甫嵩为非常之举，嵩答曰："人未忘主，天不佑逆。"王芬劝曹操废灵帝，曹操答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即使到后来曹操统一北方做了魏王，轻而易举就可以取献帝代之的时候，最终也没有迈出那似乎最轻而易举却又最难以迈出的一步，只做周文王；曹丕登基前也是极尽能事大费周章地制造各种天意和舆论。总而言之，虽然东汉末士大夫群体在与宦官的斗争中增强了群体自觉性和独立性，但是仍没有冲破皇权主义、名分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荀爽、荀彧叔侄的行动最能典型地表现出这种社会意识的影响。[233]皇权虽然衰落了，也有不少野心家想取而代之，但是明目张胆践踏皇权的行为，定会受到天下士人的反对。所以，董卓不顾群议，为了自己专权之需而废立皇帝、幽杀太后的行为，引起士人们心底的反对。而且董卓竟然在何太后下葬时开文陵，悉取墓葬中的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西迁长安时又掘发诸帝陵，这些行为在士大夫眼里是不可想象的大逆不道，严重践踏了皇帝及皇室的尊严，与士大夫群体接受的礼教名分君臣思想严重对立，岂能得到他们的合作？王允等一批朝廷公卿冒着极大的风险跟从董卓西迁，很重要的动因就是为了护庇献帝，跟从皇权，当董卓自立之势越来越明显的时候，王允果断行其谋，利用吕布诛杀了董卓。

西州集团不能取得关东集团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西州兵固有的残暴性，他们在关东的肆虐令关东人胆战心寒，人人不得自安。关东与关西的对立，不仅是地域问题，也是政治、文化、民族问题。史籍中关于董卓及其军队残忍暴行的记录简直连篇累牍，不排除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吸收了大量异族兵的羌胡化西州兵团，其残暴贪婪性不可否认。进入洛阳后，"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放纵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财，谓之'搜牢'"[234]。放任士兵抢掠，而且对象是贵戚豪富之家，每个人的财产和妻子都不能保全，当时"人情崩恐，不保朝夕"。"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最令人发指的事件是"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235]。董卓还经常公开进行虐杀表演，"卓所得义兵士卒，皆以布缠裹，倒立于地，热膏灌杀之"[236]。"卓施帐缦饮设，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

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案间。会者战栗，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237]这种残暴的行径自然令洛阳的贵戚、平民畏惧憎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均被西州集团的恐怖杀戮笼罩。迁都长安时，“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238]。其行为极大地破坏了中原文明和文化，掘坟墓更是伤害了注重家族、祖宗的关东人的感情，即使董卓有种种对士大夫的拉拢举动，其效果都被这些残忍暴行抵消得一干二净。

董卓能够逞凶于一时依靠的是手下强悍的羌胡兵。他得益于羌胡兵的善战勇猛，同时也要承受羌胡兵残暴、贪利和善变的弊端。董卓在拒绝朝廷征为少府的上书中说他所将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兵廪赐断绝，所以牵挽之使不得行，并说“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239]，这些话虽然是敷衍朝廷的遁词，但也讲出了部分实情。羌胡人有利则进，不利则退，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强者凌弱，转相抄盗。董卓能控制住这样的力量，除了需要个人魅力和才干外，还需要给予这些士兵足够的物质利益。羌胡处于中国边缘，粗鄙少文，凉州寡于学术，一旦他们肆掠在物质繁荣的中心之地，其贪婪残暴之性将难以约束。董卓说自己不能禁止，其实也不算谎言，只是董卓深悉羌胡本性，深知一旦禁止，轻则士卒离散，重则犯上反叛，他不能也不愿禁止。初，董卓驻兵河东以观时变，何进招他入京，最终跟随他入京的只有三千人，连他自己都嫌兵少，袁宏《后汉纪》记董卓自选五千骑自河津渡，但是到了洛阳只剩三千人了，二千部众在途中弃卓而去，从中可以看出这支羌胡军对董卓并没有那么忠心。当时，董卓进京毕竟前途未卜，大将军何进实力最强，董卓也不能预见到何进会被宦官斩杀，进京是否有利还尚未可知，部分羌胡或许觉得无利可图，加之留恋旧乡的羌胡也不愿意远离西州故土，所以途中离散了较多士兵，董卓对其中的缘由是清楚的，所以即使董卓深知要获取关东集团的合作至少要维护其利益和社会的秩序，但是又不得不放纵士兵在京师及周边抢掠，以满足这些贪利寡义的羌胡兵的要求，一旦无利可图，他们将立刻叛去而不旋踵。董卓死后，牛辅军营发生营啸，牛辅携带财物和素所亲爱的赤胡支儿逾城逃走，这些胡人背叛牛辅，夺其珍宝，并斩之送长安。后来在李傕、郭汜争斗时发生了这样一幕：“傕时召羌、胡数千人，先以御物缯彩与之，又许以宫人妇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来窥省门，曰：‘天子在中邪！李将军许我宫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诩为之方计。诩乃密呼羌、胡大帅饮食之，许以封爵重宝，于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240]李傕需要利用羌胡兵力，要先给予好处，还要许以之后的战利品，而贾诩也是利用这一

点，用更多的利益诱使他们去之，羌胡兵之雇佣性质应该说十分浓厚的。

董卓死后，并、凉集团分裂。并、凉当初的结合源于它们相近的地域、文化和社会背景，相对于关东士大夫集团，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董卓凭借其魅力、手腕勉强捏合这两个集团的合作。董卓手下亲信将校大多是凉州人，是跟随已久的旧部，然而吕布一来就甚得董卓宠幸，还誓为父子，凉州旧将当然心存不满，而且在有限的利益面前，凉州集团和并州集团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夺龃龉。董卓曾派遣吕布和胡轸一起抵御孙坚，“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布败走”[241]。《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英雄记》曰：“初坚讨董卓，到梁县之阳人。卓亦遣兵步骑五千迎之，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轸字文才，性急，预宣言曰：‘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诸将恶惮轸，欲贼败其事，布等宣言‘阳人城中贼已走，当追寻之；不然失之矣’。……而布又宣言相惊，云‘城中贼出来’。军众扰乱奔走，皆弃甲，失鞍马。”[242]胡轸是凉州人，他说当斩一青绶，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吕布而言的，吕布也心知肚明，所以多次惑言乱军，以败胡轸，凉、并之间的矛盾可见不浅。杀了董卓后，吕布畏恶凉州人，而董卓旧部李傕等也尽杀军队中的数百并州人，并、凉分裂不可避免。

董卓死后王允等获得了恢复中央政治秩序的一个机会，凉州军队处于巨大的恐慌之中，牛辅的军营发生“营啸”，就是当时凉州军队精神高度紧张，对前途非常悲观、恐惧的表现。当牛辅被身边的赤胡支儿所杀后，凉州军团更是群龙无首，当时“众恐惧，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243]。在牛辅死后，李傕等曾遣使诣长安乞求赦免，王允本来可以轻易地解决凉州兵问题，却以一岁不可再赦的理由不许。此时西州智士贾诩提出了建议：“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后也。”[244]众人皆以为是，于是率军而西，等至长安时汇集的凉州兵已达10万人，破长安，杀王允，凉州军再次控制了朝廷。

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人在凉州军团中的地位大致相当，没有哪一个拥有绝对优势的权威和实力，故而重新控制朝政后，凉州将领组成了一个联合的统治模式，日本学者石井仁提出的“四头政治”的称法比

较贴切。当时张济领军屯驻在外，李傕、郭汜、樊稠三人自立为将军，各开府，与三公府合称为“六府”，皆参选举。四人地位虽然大致平等，但也形成了某种默契的先后顺序，《献帝起居注》说：“傕等各欲用其所举，若一违之，便忿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举，先从傕起，汜次之，稠次之。”[245]当初董卓将朝廷西迁，就是为了回到西州故地，以补充更多的兵员和获取更多的支持，初入关时就谋求与韩遂、马腾和解以共谋山东，韩遂接受了镇西将军的职务，还镇凉州本土，马腾任征西将军屯郿。这样一来，原本的西州叛乱军与原本的镇压军之间结成了联盟，韩遂、马腾领导的军队大多也是羌胡及羌胡化的凉州人，军队之组成相同，还具有共同的地域情结，此时整个凉州的军事力量——曾经在战场上厮杀的双方——联合了起来。

但是这种联合比较松散，多头的格局从来不是稳固的，凉州兵团的最后覆灭主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源于内部的分裂和互相残杀。在暂时的联合中，董卓原先的部下是一个亚集团，原先叛乱现在被招安的韩遂、马腾是一个亚集团，最先的冲突发生在这两个亚集团之间：“兴平元年，马腾从陇右来朝，进屯霸桥。时腾私有求于傕，不获而怒，遂与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前凉州刺史种劭、中郎将杜禀合兵攻傕，连日不决。”[246]本来准备来调解的韩遂也卷入争斗，与马腾合，原先的叛乱军与镇压军在经过短暂联合后又分开了。但是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使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共同的地域情结，他们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那般激烈，双方都没有彻底消灭对方的打算，何况那样要消耗自己许多的实力。樊稠在追击韩遂时，韩遂使人语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与州里，今虽小违，要当大同，欲共一言。”[247]两人于是骈马交臂相加，笑语良久。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韩遂说的“今虽小违，要当大同”。

紧接着，董卓旧部诸将之间也渐渐分裂互斗起来，因为多头政治只可暂安一时，无法长久，当时李傕、郭汜、樊稠各有部曲和子弟势力，“时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傕、汜、稠乃三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248]。“三分城内”近似于对长安城分区占领了。势均力敌的三股力量不可能长期共存下去，变乱必定发生。《献帝纪》曰：“郭汜、樊稠与傕互相违戾，欲斗者数矣。”[249]虽然在贾诩的调解下暂时无事，但内斗最终还是爆发了。首先发难的是李傕，由于有人告诉李傕，樊稠曾与韩遂交语移时，傕、稠开始相疑，后来李傕借机杀掉樊稠，吞并了他的军队，“由是诸将各相疑异，傕、汜遂复理兵相攻”[250]。二人之间的相疑还只是部分原因，或许郭汜妻说出

了要害："一栖不两雄。"[251]董卓旧部之间的厮杀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252]。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凉州各军在互斗中实力削弱，最后被消灭。凉州本部的韩遂、马超后来中了曹操的离间之计，两人相疑，最后被曹操击败。

王北固先生说："凉州兵团用暴力摧毁关洛精华地区与东汉帝国中枢，有强悍难御的作战力，却没有能力建立政权或长期掌握所据地盘。这是因为在文化上受胡风影响的反覆（复）无常多疑易叛个性，其本身内部团队结构更是羌胡式的'莫相归服，军无适主'，所以暴起暴落，与中亚的草原沙漠民族性及生存方式很类似，难以稳固持久。""这最后一个世纪的历史演变，一方面是东汉历任护羌校尉在羌族区不时地斩首万余人或丧师三千人的长期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儒家思想初度烂熟，所熏陶出的士大夫矫激之气，演变出东汉末期的名士空谈误国与化身为割据军阀。这两个方向共同蚀朽了中国历史上最重儒术的东汉帝国，最后造就了羌化的凉州兵团在关洛精华地区摧残中华文化的大浩劫。"[253]王先生的这番总结是全面和深刻的，以此结束本章。

[1] 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第73~74页。

[2]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第716页。

[3]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第2945页。

[4]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传》注引《魏书》，第833页。

[5] 邢义田：《东汉的胡兵》，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28期，1973年。

[6] 王力、王希隆：《东汉时期羌族内迁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7]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0页。

[8] 《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第2648页。

[9] 李吉和：《秦汉时期羌族的内徙与经济社会的变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0]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邓艾传》，第776页。

[11] 《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第2549页。

[12]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第1531～1532页。

[13] 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

[14] 罗志田说："既然族群间的竞争已达到与生死相关的程度，则'对敌手总是恶言相向'，呼对手以带贬义的名称，也是自然的发展，原不必深论有无歧视的存在；退而言之，至少也是敌视大于歧视。但不论敌视歧视，这类实际政治考虑客观上都起到使夷夏之辨由开放走向封闭的作用。文化礼仪之选择既已由人我之别演化成敌我之别，《左传》所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遂变得斗争性十足，而成为攘夷的基本理论支柱了。"参见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

[15] 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史论》，中华书局，2006。

[16] 《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95页。

[17] 《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第115页。

[18] 《后汉书》卷三《孝章帝纪》，第132页。

[19]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120页。

[20]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120页。

[21] 《后汉书》卷五十四《杨赐传》，第1784页。

[22] 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三卷《中国古代社会》，第1571页。

[23] 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史论》。

[24] 甘怀真：《中国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载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310页。

[25]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97页。

[26] 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高专诚译，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中译版自序。

[27] 陈启云：《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第31页。

[28] 雷戈：《史学理念与史家生存》，人民出版社，2016，第3页。

[29] 用一个不太合适的比方，东汉朝廷似乎是在扮演一个救火队员的角色，但从来不知道如何防止火灾的产生，有的时候甚至引火烧身，置薪火上。最后，东汉在疲于应付的过程中慢慢走向终结。

[30] 王惟贞：《东汉"明章之治"论析——明、章二帝巩固政权的措施》，博士学

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2007。

[31]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76～77页。

[32] 廖伯源：《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33] 钱穆：《政学私言》，载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188页。

[34]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第209页。

[35] 《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43页。

[36] 《后汉书》卷二十六《侯霸传》，第903页。

[37] 《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46页。

[38]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第159页。

[39] 《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传》，第1017页。

[40] 《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注引《东观记》，第124页。

[41] 《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第124页。

[42] 《后汉书》卷三十二《阴兴传》，第1130页。

[43] 《后汉书》卷三十二《阴兴传》，第1130页。

[44]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光武》，中华书局，1975，第152页。

[45] 曹金华：《东汉前期统治方略的演变与得失》，《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

[46] 《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43页。

[47] 马援曰：“但忧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见《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第851页。而在光武帝的葬礼上，“旧典不存，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止同席，宪章无序”。见《后汉书》卷二十六《赵憙传》，第914页。

[48] 王惟贞：《东汉“明章之治”论析——明、章二帝巩固政权的措施》，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2007，第37～38页。

[49] 《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第1400页。

[50] 《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第1400页。

[51] 《后汉书》卷三《孝章帝纪》，第148页。

[52] 《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传》，第1549页。

[53] 《后汉书》卷二十六《韦彪传》，第918页。

[54] 《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传》，第1549页。

[55]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第1518页。

[56] 《后汉书》卷三《孝章帝纪》，第148页。

[57] 《后汉书》卷三《孝章帝纪》，第148页。

[58]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第812页。

[59] 《资治通鉴》卷四十六，第1523页。

[60]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章帝》，第171页。

[61] 杨懿、章义和：《东汉王朝的治边策略与“鲜卑”的族群认同》，《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9期。

[62] 陈金凤：《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63]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24页。

[64]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第622页。

[65]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第2966页。

[66] 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67]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5页。

[68] 《后汉书》卷十八《臧宫传》，第695～696页。

[69] 陈金凤：《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当然，陈金凤先生也指出了光武帝民族政策的一些不妥，比如“在当时的形势下，纳西域以助汉抗匈奴，是有可能实行的，但光武却最终置之度外，遂使西域与中国绝，造成了后来东汉经营西域的诸多困难与曲折”，还说“东汉由于以‘柔’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自己的军事建设”。这些指责并不妥当。

[70] 此语出自袁安，他上疏言：“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单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第1520页。

[71] 《续汉书》志第二十四《百官志》，第3565页。

[72] 杨懿、章义和：《东汉王朝的治边策略与“鲜卑”的族群认同》，《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9期。

[73] 《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第716页。

[74] 《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第1597页。

[75] 《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第1598页。

[76] 《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第1598页。

[77]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第2952页。

[78]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第1519页。

[79]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第1519页。

[80]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第814页。

[81] 《后汉书》卷四十一《宋意传》，第1415～1416页。

[82] 《后汉书》卷四十一《宋意传》，第1416页。

[83]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第1520页。

[84]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第1520页。

[85]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第1521页。

[86]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第1521页。

[87] 《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第2986页。

[88]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8页。

[89]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第588页。

[90]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第835页。

[91] 《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武传》，第786页。

[92] 也可能如王明珂说的，羌人的部族形态，并没有所谓的“第一豪”，各个游牧团是独立自主的，与匈奴不同，也许当时的汉人并不了解真实情况，即使习知羌务的窦氏也不例外，但也没有直接证据。

[93] 王惟贞：《东汉“明章之治”论析——明、章二帝巩固政权的措施》，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2007。

[94]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81页。

[95] 《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67页。

[96]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97]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88页。虽然此论只强调了边境之于中国的一方面，但不言而喻的是，腹心内溃则手足虚怔，“心”为四肢之主是当时常见的观念。

[98]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99～2901页。

[99] 上官绪智：《两汉政权“以夷制夷”策略运用的主要方式和特点》，《南都学坛》2006年第6期。

[100] 邢义田：《汉代的以夷制夷论》，台北：《史原》第5期，1974年。

[101] 吕思勉：《秦汉史》，第675页。

[102]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85页。

[103] 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134页。

[104]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81页。“中国之形也”一句《后汉书》注引《前汉书》为“中国之利也”。

[105]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第3763页。

[106]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82～2283页。

[107] 陈连庆：《汉代兵制述略》，载陈连庆编著《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第269页。

[108] 吕思勉：《秦汉史》，第675页。

[109]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第3779页。

[110] 贾敬颜：《汉属国与属国都尉考》，《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匈奴是民族的名称，也是国家的名称。匈奴国家疆土广大，民族众多（竟是想象不到的广大与众多），所以，匈奴国家的人民不一定都是匈奴民族。”

[111] 一般认为“越骑”是“取其材力超越也”，王子今指出对“越人内附以为骑”的意见也应该给予重视，因为经常有“越骑”与“胡骑”、“羌骑”并说的例子，而且后世利用越人为骑兵的例子也很多，在中央军中并置“胡骑”、“越骑”，才能显示“胡越宾服”的宣传效应。参见王子今《汉朝军制中的“越骑”部队》，载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

[112] 《汉书》卷六十八《金安上传》，第2964页。

[113]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60页。

[114] 刘秀军中的突骑就是乌桓骑兵，窦融拥有属国万骑和羌胡兵，隗嚣手下多羌、氐兵，公孙述有氐兵和西南夷兵，卢芳依靠三水属国的羌胡起兵，后又与匈奴连兵。

[115] 邢义田：《东汉的胡兵》，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28期，1973年。

[116]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固传》，第810页。

[117]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第814页。

[118]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第815页。

[119] 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第252页。

[120] 陈连庆：《东汉的少数民族士兵》，载陈连庆编著《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第444页。

[121] 洪廷彦：《两汉三国的“夷兵”》，《文史哲》1958年第3期。

[122] 劳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

[123] 军事训练非常重要，一万名由朴实农人匆忙聚合而成的军队与数量只有千人的老兵部队较量，也是必输无疑。

[124] “武帝之后有选募、有罪徒，其选募曰勇敢、曰奔命、曰伉健、曰豪吏、曰应募。”（钱文子：《补汉兵志》，收入王钟麒等编《二十五史补编》，开明书店，1937，第412页）光武帝是“国有众军，并多精勇”，是跟随刘秀打天下的庞大常备军，后来又设有黎阳营、度辽营、壅营等长期屯驻的营兵，长从募士多而郡国之兵坏。

[125]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第1651页。

[126] 洪廷彦：《两汉三国的“夷兵”》，《文史哲》1958年第3期。

[127] 孙毓棠：《东汉兵制的演变》，载《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第267页。

[128] 劳榦说：“光武并无改西汉旧制之意，在这个时候正当水旱为灾，又值中原残破之后，光武力图省吏减赋与民休息。征民和都试自然都是扰民的事，所以便一时罢去。”参见劳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第48页。

[129] 《汉书》卷九十《酷吏传》，第3668页。

[130] 《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传》，第781页。

[131] 黄今言：《东汉军事史的若干特点和研究方法问题》，《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

[132] 雷海宗：《中国的兵》，载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27页。

[133] 臧知非：《汉代兵役制度演变论略》，《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134]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第163页。

[135] 《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第2258页。

[136] 应劭：《汉官仪》，载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第151～152页。

[137]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1136页。

[138] 应劭：《汉官仪》，载孙星衍辑《汉官六种》，第152页。

[139]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第944页。

[140]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253～254页。

[141]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237～238页。

[142] 杨永俊：《论两汉时期羌汉政治中的“羌中之利”》，《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

[143]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6页。

[144]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232页。

[145] 王力、王希隆：《东汉时期羌族内迁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146]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8～2879页。

[147] 马长寿：《氏与羌》，第94页。陈琳国后来提出修正意见，但仍有商榷的余地，此处从马先生的意见。陈琳国：《东羌与西羌辨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顾颉刚认为：“所谓‘东羌’，原是东汉初年徙居于三辅、汉阳、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带的西羌，也就是安、顺二帝时扰乱关中的羌人”，参见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148]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149] 吕思勉：《秦汉史》，第317页。

[150]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第2151页。

[151]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901页。

[152] 杨永俊：《对东汉“羌祸”的重新审视》，《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

[153] 西周春秋时期是夷夏民族分化成立的关键时期，当时的夷夏观颇为开放，由夷变夏只需要转变文化认同而不一定需要转变政治认同，到秦汉帝国时期，由夷变夏在变换文化认同的同时还要改变政治认同。这对个人而言，变化或不那么大。对群体来说，是否维持其自身的认同就有很不相同的意义了。故秦汉以后，异族大规模归附中原均较困难。秦汉时期的夷夏之辨仍游移于开放与封闭之间，但已出现走向封闭的趋势。参见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

[154]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04页。

[155]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8页。

[156]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81页。

[157]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86页。

[158]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防传》，第857页。

[159]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95页。

[160] 《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第2138页。

[161]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第2133页。

[162]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第2129页。

[163]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86页。

[164]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99页。

[165] 《后汉书》卷五十七《李云传》，第1852页。

[166] 薛小林：《秦汉时期君臣关系中的“壅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167] 关于羌人起义有不同的分期说法，一般总言五次，大者三次，其实羌人之乱弥漫于整个东汉时代，羌人种类繁炽，叛乱彼伏此起。即使在典范的羌人起义划分的间歇期，亦有羌种叛乱和朝廷平定之事。

[168]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第1531页。

[169]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86页。

[170]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270页。

[171]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279页。

[172]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250～251页。

[173] 杨永俊：《略论汉代陇右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羌胡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

[174]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88页。

[175]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282页。

[176]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251页。

[177] 永初四年的太尉是张禹，此处暂从本传作李脩。

[178]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第1866页。

[179] 森本淳：《东汉末年的羌族与汉族》，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180]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第1866页。

[181]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258页。

[182] 森本淳：《东汉末年的羌族与汉族》，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

[183]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90页。

[184]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267页。

[185]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91页。

[186]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97页。

[187]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第2129页。

[188]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253页。

[189] 陈勇：《凉州诸将与汉魏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91，第5页。

[190]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90页。

[191]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90页。

[192] 陈勇：《“凉州三明”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93]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第2154页。

[194]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第2132页。

[195] 陈勇：《凉州诸将与汉魏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91。

[196] 陈勇：《“凉州三明”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97] 杨永俊：《试比较“凉州三明”的治羌政策》，《西北史地》1996年第2期。

[198]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第2148页。

[199] 陈勇：《“凉州三明”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00] 对东汉末年西北武装力量有多种称呼，有“凉州兵团”或“凉州军事集团”，有“董卓集团”，它们之间的区分不是很大，本书立足于汉代“西州”这一地域，董卓手下无论是并、凉劲兵，还是屠各、月氏、西羌八种，都是西州力量的集结，所以本书称之为“西州兵团”。

[201] “四头政治”是石井仁在《曹操：魏的武帝》一书中提出的，转引自森本淳《东汉末年的羌族与汉族》，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

[202]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19页。

[203] 方诗铭：《董卓对东汉政权的控制及其失败》，《史林》1992年第2期。

[204] 《三国志·魏书》卷六《董卓传》，第172页。

[205] 《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第2140页。

[206]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第2302页。

[207] 《后汉书》卷五十八《傅燮传》，第1873页。

[208]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第2303页。

[209] 吕思勉：《秦汉史》，第343页。

[210]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0页。

[211] 《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第1850页。

[212] 《三国志·吴书》卷四十六《孙坚传》，第1095页。

[213] 《三国志·魏书》卷六《董卓传》，第171页。

[214]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2页。

[215]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2页。

[216]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2页。

[217]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第2306页。

[218]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注引《献帝春秋》，第2307页。

[219] 《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第2249～2250页。

[220] 《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第2257页。

[221] 张大可：《三国史研究》，华文出版社，2003。

[222] 《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传上》，第2374页。

[223]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3页。

[224]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3～2324页。

[225] 《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第2252页。

[226] 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27]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5页。

[228]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6页。

[229]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7页。

[230] 《后汉书》卷五十八《盖勋传》，第1883页。

[231]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4页。

[232] 《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传上》，第2374页。

[233] 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

[234]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5页。

[235]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5页。

[236]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8页。

[237]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30页。

[238]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7～2328页。

[239]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2页。

[240] 《三国志·魏书》卷十《贾诩传》注引《献帝纪》，第327页。

[241]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8页。

[242] 《三国志·吴书》卷四十六《孙坚传》注引《英雄记》，第1098页。

[243] 《三国志·魏书》卷十《贾诩传》，第327页。

[244]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33页。

[245]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第2336页。

[246]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35页。

[247]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35页。

[248]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36页。

[249] 《三国志·魏书》卷十《贾诩传》注引《献帝纪》，第328页。

[250]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36页。

[251]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注引《袁宏纪》，第2337页。

[252]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41页。

[253] 王北固：《凉州兵团在三国史上的特殊地位——从马超助刘备取蜀说起》，《开封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结语

本书试图以“西州”这个地域为依托，对西州经略与两汉国势脉动之间的关系，做一中时段的观察和分析。在西州经略与两汉国势演变的关系中，包含了两个互动关系，首先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国家的互动，其次是帝国中央与边缘地方的互动，而且，这两个互动关系是相互交织，甚至可以融混为一的，这是因为汉代的西州既是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地方区域，也是一个与塞外游牧族群接壤，并且辖境内分布着众多归降异族的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所谓的“西州”问题，既涉及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也涉及异族与汉族的关系，双重关系的交错使得西州问题显得异常复杂。同时，本书亦试图通过“西州”这个视窗，对两汉史做一个通贯的重新观察和阐释，因为“西州”在西汉和东汉均是朝廷面临的“大问题”，西州问题是一个可以将两汉四百年历史贯通起来的轴心。将两汉史贯通起来，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西汉与东汉之间有着更多的延续性，恰恰相反，本书希望透过西汉与东汉不同的西州经略及西州对中原腹地造成的不同反馈结果，来比较西汉、东汉两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

“西州”是两汉时期人们经常使用的地域名称，本书对两汉时期的“西州”观念做了一个梳理，指出在西汉早期、中期专指西南益州地区，后来随着汉武帝扩土西北，西州的概念发生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所指区域从西南扩及西北凉州、朔方地区；二是词义的重心发生转移，虽然用之指益州地区的情形仍然存在，但渐有用之专指西北凉州、朔方地区的趋势。本书对“西州”概念做出的判断还有待完善，毕竟所谓“西州”只是当时一个非正式的区域观念，与之相类的“北州”、“南州”、“东州”等概念的使用都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本书研究的“西州”地区只是指西北凉州、朔方，不涉及西南益州，在对汉代历史演进的推动方面，西北地区显然起着比西南重要得多的作用，就整个西部而言，时人关注之焦点也多在西北。

拓土西州是在汉匈冲突的背景下进行的。西汉立国伊始就面临着来

自匈奴的严重威胁，所谓“和亲”实际上是白登之围的城下之盟，汉朝向匈奴供贡。但是无论在政治文化上还是国防安全上，汉朝方面都不会长期容忍这种境况。汉族“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政治文化传统蕴含着冲破反向夷狄供贡、首足倒悬之耻辱的内在动力；匈奴占据着河南地和河西，羌胡相连，对关中腹心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从边境安全上考虑也必须反击匈奴。文景之时贾谊、晁错针对匈奴问题提出一系列对策，文景在休养生息的同时，也在军事改革和边境防御建设方面下了功夫，为汉武帝反击匈奴打下基础。汉武帝时，通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汉朝夺得了河南地和河西。但战争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打败匈奴，还必须巩固对河南地的占领，这里不但是关中的重要屏障，也是进攻匈奴本土的前沿跳板；同时，需要巩固对河西的占领，以隔绝羌胡，为经营西域打通道路，断匈奴右臂。而巩固对新拓疆土的控制，首先要修建边境防御系统，然后是屯田积谷，接着徙民实边，最后设置郡县。

无论是与匈奴的战争，还是巩固“新疆土”的屯田、移民、设置郡县，都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武帝实施了国家主义的财政政策，攫取大量民间财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因此，在武帝后期发生严重的叛乱。叛乱平息后，武帝调整了政策，由劳民扩张转向养民安内，昭宣继续重视内政建设和百姓生业，努力恢复国家元气，但是在对外政策上仍较为强硬，继续保持对匈奴的压力，积极争夺西域。宣帝时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来朝并称臣，与汉朝皇帝建立了君臣关系，以汉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成立。

反击匈奴必须拓土西州，拓土西州后，必须巩固对西州的统治，才能隔绝羌胡、削弱匈奴，保持对匈奴的战略优势。为了与匈奴争夺西域，李广利两次远征大宛，当时可谓天下骚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输入河西，为河西的发展注入动力，时人对于河西也第一次有了“国土”的感觉。经营西域也为河西提供了安全屏障，保障了河西的生产发展。西汉往西州迁徙了数百万人口，为西州的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西州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优越，但是河西、湟中、朔方均有丰沛的水源来发展灌溉农业，西州地区修建了大量水利灌溉设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也得到传播，西州的农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亦不可高估。发展农业也破坏了西州脆弱的生态，一些地区开始了沙漠化进程。西州原本就是游牧族群的游牧地，有优越的水草资源，牧业发达，西汉官方在此牧马三十万头，牛羊不计其数。河西是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通

道，汉人与少数族群的边地贸易也非常繁荣。经济的发展为西州豪族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豪族是汉代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势力，豪族与汉代政权的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到容纳再到合作的调适过程，通过与豪族的合作，西汉的国家权力向下渗透到乡里基层。西州是一个移民社会，除了移徙的平民和安置的流民外，还有大量被中原放逐的秩序破坏者，但是朝廷建立了一套完善且严格的安置移民、建立新秩序的方案，在国家的主导下，在“新疆土”中迅速建立起地方社会，而稳定的环境对西州地区豪族的成长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原的一些大族由于罪谪、避难、逃亡等原因而迁徙到西州，他们凭借其政治、文化、经济、宗族等方面的优势，迅速在迁徙地重建了自身的势力和关系网络，成为西州的豪族。东汉时期豪族向文化、权力、经济合一的世家大族发展，西州的豪族也出现这一趋势，但是由于西州地处边缘，是与游牧族群反复拉锯交战之地，分布着大量的内徙羌胡，所以西州豪族具有武质化的倾向和羌胡化特征，与中原主流的士大夫社会有一定的距离。西州偏处一隅，豪族的实力相对较弱，在天下动乱之时具有强烈的自保特征，两汉之际西州地区形成了隗嚣、窦融、卢芳三个割据势力，均得到了当地豪族及羌胡的支持，在光武重建汉朝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西州力量对帝国中心的第一次重要反馈。

一般而言，西汉是中国文化因素向周边扩散发展的时期，西州的开拓、建设和巩固就是这种扩散的表现。到东汉中后期，周边族群在受到汉文化影响后，开始对中国内部做反方向的回馈，西州问题就是这种反馈的具体表现。东汉时期，帝国周边的异族大量内徙到塞内，朝廷在“以夷制夷”传统战略惯性的影响下，逐渐加大了对“夷兵”的使用，这反过来更加促进了外族的内迁。莽末汉初羌人已经在西州的郡县内广泛分布，东汉又多次将降羌内徙，导致塞内羌人数量大增，并有东、西羌之分。由于汉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以及东汉吏治的腐败混乱，内徙的羌胡遭受西州官吏和豪民的奴役压榨，羌人的反叛斗争不断发生，汉朝也是一味地坚持武力镇压。内徙羌人和塞外羌人经常联合反叛，战火延及西州甚至三辅各地，使东汉朝廷疲于应对。

东汉建立在与豪族势力合作的基础之上，朝廷定都于关东，这一选择造成关西地区迅速衰落，帝国东、西之间逐渐失衡，关东经济、文化发达，而关西胜于武力，这种失衡结构潜伏着巨大的危险。而且，东汉

豪族势力强大，朝廷能够动员和调动的力量有限，东汉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乡经济衰落，自由平民、奴隶向依附民的身份转化，积极面对现世的世界观也转向消极地面向来生，东汉之国势不断衰落颓废。光武、明、章三帝统治时期政治张弛失度，没有处理好外戚问题，为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的专权埋下隐患。在对外政策上也是全面收缩，匈奴由于自身的分裂不再成为汉朝主要的边患，但是章帝之后，西州羌人之乱逐渐严重起来，安帝永初之后的三次大羌乱，对东汉造成致命的影响。

东汉成立之初，皇帝由于对地方豪强的忌惮，废除了地方武力的常规训练，东汉民风渐弱，朝廷在军事上倚重夷兵、募兵和刑徒兵。光武在平定西州的过程中，对拥有羌胡劲兵的西州豪强十分忌惮，特别压制西州的地方武力。当西州羌患兴起时，内地郡兵不堪战斗，在镇压羌乱的战争中，关东的将领和军队屡屡败北。从汉安帝开始，朝廷不得不改变对西州豪族的政策，开始倚重西州本地的军队平叛，西州本地之军队主要是由羌胡及羌胡化的边郡汉人组成的骑兵，桓帝之后开始起用西州籍的将领。逐渐地，平定羌乱必须依靠西州的军队，而只有西州将才指挥得动西州兵。“凉州三明”在平定羌乱中声名显赫，威震一时。当羌乱大定后，“三明”被征召入朝，离开西州兵之后，他们的政治命运则完全操纵在朝中政治势力之手，迅速退出政治舞台。但是从“凉州三明”开始，西州军事集团已经形成，“三明”虽然入京，但是西州中层军官实际操控着西州兵团，一旦出现时机就会产生新的首领。

在镇压黄巾军和边章、韩遂叛乱的过程中，西州军事集团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董卓在这个过程中崛起，并乘朝廷发生变乱之时带兵入京，操控了朝政，整合了西州的力量以对抗关东十八路诸侯。并、凉军队，甚至包括叛乱的韩遂、马腾也接受招安，处在董卓的领导下，西州势力盛极一时。但是西州集团由于其寡于学术、羌胡化、残暴特性，不能得到士大夫的真心合作。西州内部各势力也互相猜忌、互不服气，王允挑拨了并、凉的分裂，导致董卓被杀，其余部继续残破关中。在内部争斗中，西州力量逐渐衰微，最终被曹操消灭。

西州尽管地处边缘，却与汉代军政格局的演变息息相关，并且可以折射出两汉时代不同的治国风格和国势脉动的基本趋势。汉代政权对西州持续的开发与经略，使得这个区域在人口、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诸方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慢慢融入成为汉代的国土。在边疆、民族问

题错综复杂的背景之下，这方土地形成了巨大的能量聚集。其影响所及，不仅仅表现为在两汉之交、汉魏之际对于中原腹地和政治中枢的巨大反馈作用，而且，从“长时段”历史观来考察，历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欲分析“河西文化”在天下大局中重要地位的形成，追溯其历史渊源，都会与汉代的西州开发及其结果产生关联。因此，本书所涉的问题，不仅对研究汉代历史举足轻重，而且对于其后的历史研究，也有不容低估的价值。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探索，对笔者而言，不仅有多重意义，而且饶有兴趣。

附录一 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

“西州”是两汉时期经常出现的地域名称，成帝在册免薛宣时说“西州鬲绝，几不为郡”[1]。王莽敕哀章曰：“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2]割据陇右自称“西州上将军”的隗嚣“名震西州，闻于山东”[3]。郑太说董卓曰：“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4]在上述各例中“西州”指代的范围并不一致，其“观念”在两汉时期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是所指区域的扩大，最初“西州”专指西南益州地区，随着汉武帝开拓西北边疆，“西州”所指称的区域扩及西北凉州、朔方地区；第二是观念重心的转移，东汉之后人们用“西州”指称西南地区的情形减少，反而主要用来指称后进的凉州及朔方。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不惜代价地经营朔方、陇右、湟中、河西地区，兵锋更是远及西域，西北一时成为历史之重心；两汉之际西州地区的隗嚣、窦融、卢芳在光武的统一道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东汉愈演愈烈的“羌患”更是耗尽东汉国力，“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5]；在平定羌乱中形成的羌胡化的西州兵团，在董卓的带领下残破两京，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覆灭。西北地区的经略及西北局势的演变，与两汉国势之走向密切相关，西南地区在这方面的影响就弱很多了，因此，东汉之后“西州”观念之重心转移到西北凉州、朔方地区就不难理解了。目前只有王海先生在《秦汉时期“北边”略说》中简单提到“西州”概念：“史籍中多次出现的‘西州’一词值得关注。十三刺史部设立后，‘西州’、西部便与‘凉州’有了密切关系”；“‘西州’、西部乃是包括‘凉州’在内的更广阔的地域范围。”[6]王先生的定义有待完善，而且，欲厘清汉代的“西州”观念，需要将之放入与“南州”、“北州”、“东州”、“中州”类似观念的框架中整体理解。我们相信，对两汉时期“西州”观念变迁的理解，可以为我们理解两汉时期的边疆与民族、地域与文化等问题提供若干帮助。

一 “西州”的构词及其政治文化的意义

“州”字，《说文·川部》云：“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岛。《诗》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畴也，各畴其土而生之。”[7]“州”的原始意思是指一种水周绕其旁可供人们居住的地形，初民选择这样的地方居住可避洪水灾患，亦可方便灌溉。由于州是一块块被水环绕的独立地域，彼此分界清楚，所以它又有“区域”的意思，一块水中高地构成一个区域，一“州”就是一个区域。“九州岛”最初大约就是指在晋、陕、豫交界处多个大小不等的被河川环绕的高地，“九”并非实指，表示“多个”的意思，这里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后来文明扩张至整个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九州岛”被人们扩大使用，将已知的文明世界分划为九个区域，“九”成了实指的数目，“九州岛”就是指文明世界的九个区域，九个“州”合起来就是天下，天下划分为九州岛。

“州”在春秋时期可能是城邦国家的一级地方单位，《周礼·地官·大司徒》规划的地方行政为“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管子·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管子·度地》：“故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这种整齐化的设计未必曾经实行过，其上下属关系也未必如此或如彼，但是“州”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反复出现，我们应该相信有其历史与现实的依据。《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晋国在败给秦国之后“作州兵”，其实就是征兵的扩大化，春秋时期本只有贵族和国人才有资格执干戈卫社稷，晋国在惨败后急需补充兵源，于是“作州兵”，把征兵的范围扩大到国人之外的野人。[8]春秋时期贵族和国人居住在国都及近郊，其外则是各个被征服的野人聚居地，“作州兵”就是征发野人当兵。这样看来，“州”是在野人聚居区域实行的地方行政单位，郑玄在注《周礼》时引《司马法》曰：“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国”——“郊”——“州”构成一个城邦国家的范围，但这种区别不仅是地域的差别，也不仅是国人、野人的差别，也包含文明程度的差异，“州”只是政治核心区域的外围，泽被的文明程度不是那么的高，但仍然是政治控制力所及的区域，城邦国家能够征发这里的人当兵。

“西”表示方向，是四方之一。两汉时期除了有“西州”之称外，还有北州、东州、南州等四方的其他方向与“州”搭配而成的地域概念。殷商时期已经有较成熟的四方观念了，论者已多，不复赘述。[9]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四方之所以成为四个方向，是因为要相对于一个中心而言，四方作为四个基本方向，它们是由一个中心向外发散而形成的，由四方内聚则汇集到这个中心，“四方”与“中心”构成一个意义系统。邢义田先生指出：“商人以方位结构了他们的世界，这个方位以东西南北四方为特色。”[10]孙家洲先生在讨论汉代的“区域”概念时指出：“在某些明言‘四方’的场合，实际暗含着‘五方’的意蕴，即以‘中土’为核心分置四方。究其成因，大概有两条：其一，出于一种政治地理意识。‘中土’的概念在周初经营洛邑时，就已经非常明确；秦汉时代视首都所在地为‘中土’，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汉人明言‘四道’，颜注指出其为‘据京师而言’，实际构成了‘五方’，是深得汉人思想真相的。其二，受‘五行’与‘五方’相配合的阴阳家影响所致。”[11]“西州”之构词，要素之一是方位，要素之二是地域，与北州、东州、南州、中州一起，构成了汉代一个重要的地域区划方式。

四方围绕中心的政治格局非常源远，中心、四方构成内外的层次。《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这里提出了“内服”与“外服”，内服是商王直接统御的地区，外服是与商王有统属关系的诸侯或者臣服部落控制的区域。在外服之外，还有不臣服或者敌对的部族，被称为“多方”。“内服——外服——不臣服”构成了一个内外有别的层级政治结构，王爱和先生指出：“晚商的政治中心地位，正是通过诸多异族政体的包围而突出的。商邑的地域由‘内服’和‘外服’组成。前者被称为‘中商’或‘中土’，包括商祖先所居住的都邑、现行都邑，以及王族猎区。‘外服’包括‘四土’，即东土、北土、西土、南土，皆为商侯领地。中心和其外围进一步通过‘多方’来界定。居住在四土之外的‘多方’通常是与商相对的异族政体。从这一点来看，‘方’代表‘他’和‘边缘’；与‘我’的中心相对照，异族的‘他’衬托出同宗的‘我’。”[12]商代政治秩序的核心特征是内外逐层区分，从中心向四方逐层发散，离中心越远，文明程度越低，对其的政治控制力度就越弱。这一结构后来演变为五服、九服模式，所谓“内京师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就是这个政治模式的体现。

汉代的政治内外层级结构自然是继承了商周模式，中心是三辅、三

河，外围第一层是东州、西州、北州、南州，这里行郡县制，中央控制力较强，拱卫京师，是“诸夏”世界，属于化内之地。在这个圈层之外则是由东域、西域、北域、南域组成的另一个圈层，是化外之地，汉朝对之仅实行松散的羁縻控制，夷狄居焉。王子今先生指出：“现在看来，‘西域’、‘东域’、‘北域’、‘南域’，都是指民族结构成分复杂，中原文化影响薄弱，中央政权行政力量已经介入，却不能有效全面控制的边远地方。”[13]我们可以对商代的政治结构与汉代的政治结构做一比况，商代的中心是商王直接控制，先王宗庙所在的区域，被称为中商或中土，第一个外围圈层是由“四土”组成的臣服于商王的各个部族，第二个圈层是没有统属关系或敌对的其他部族政权，被称为“四方”；汉代的核心区是三辅、三河，被称为“中州”，第一个圈层由“东州”、“西州”、“北州”、“南州”组成，相当于商代的“四土”。“中土”和“四土”构成了商朝的主体地域，“中州”和东南西北四州构成了“汉家”的主体范围。在“四州”之外的“四域”，相当于商代的“四方”，是影响力所及但控制力较弱的异族区域。汉家的疆域自然是商代无法企及的，对各个区域的控制力度也不在一个级别，但是这种内外层级和中心四方的结构，则是一脉相承的。

构成“东州”、“西州”、“北州”、“南州”的“州”字固然不是其原始的意义了，但是与从原始意义发展出的两个义项密切相关。第一个义项是“文明世界”，“茫茫禹迹，化为九州岛”，把天下划分为九个区域，这样的区域是文明世界的组成部分，之外则是蛮夷野兽杂处的荒莽之地。“九州岛”组成的世界是化内之地，之外则不论矣，“五州”的“州”毫无疑问吸取了“文明世界之组成部分”，“五州”与之外的“四域”的差别，首先是文化上的，其次才是地域和民族上的。第二个义项是作为一种地方行政区划的“州”，是诸国政治中心的外围野人聚居区。降至秦汉，国人野人之分早已泯灭，所有人都成为专制皇权统治下的编户齐民，郡县乡里制的普遍推行也使得作为在野人聚居区域实行的“州”制不复存在，但是作为“毗邻政治中心区的地域的单位”的含义遗留在“东州”、“西州”、“北州”、“南州”的序列中，它们环绕毗邻在“中州”四侧，共同构成了汉家“天下”的范围。“五州”的划分，显然是受到了“九州岛”区划方式的影响，但与“九州岛”系统有实质上的区别。九州岛之划分是依据各个区域的历史传统和自然地理特征，“五州说”则是在确立了政治中心区域后，以向四个方向发散的相对性而划分的，这个“五州”与“九州岛”之间的差异是本质上的，相对而言，“九州岛”与“十二州”的差异则是表面上的。

二 两汉“西州”观念的变迁

西汉时期人们用“西州”一词来指称益州地区，《汉书》中“西州”一词四现，均指益州地区而言。汉成帝册免丞相薛宣：“乃者广汉群盗横恣，残贼吏民，朕恻然伤之，数以问君，君对辄不如其实。西州鬲绝，几不为郡。”[14]这里的“西州”指广汉郡所在的益州地区。《汉书·孙宝传》：“会益州蛮夷犯法，巴蜀颇不安，上以宝著名西州，拜为广汉太守，秩中二千石，赐黄金三十斤。蛮夷安辑，吏民称之。”[15]这里说孙宝著名西州，是因为他曾在鸿嘉年间广汉群盗起时为益州刺史，奏免不任职的广汉太守，并亲自谕告群盗，消弭叛乱，为益州吏民所感怀，此时益州又有事发，朝廷派遣他去处理。王莽抑夺下权，“国将哀章颇不清，莽为选置和叔，敕曰：‘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16]。哀章为广汉郡梓潼县人，此处之“西州”无疑是指益州。

两汉之际，控制凉州的隗嚣自称“西州上将军”，史籍说他“名震西州，闻于山东”，此处的“西州”就不再指西南而指西北地区了。当时隗嚣掌握着羌胡劲兵和边郡骑兵，其向背直接关系到刘秀和公孙述争夺天下的胜负，一时为天下聚焦之地。隗嚣自称“西州上将军”，这里的“西州”当然是指凉州，这种用法在西汉后期就应当已经出现了。与“域”不同，“州”是中央直接统治的政治核心区外的第一个圈层，当汉朝逐渐在河西设置郡县之后，特别是贰师将军征伐大宛时，敦煌成为后方基地，大量人力物力输入河西。张春树先生指出，经此之役，人们对于河西“国土”的感觉渐渐增强[17]，理论上说，人们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用“西州”来指称新开拓的施行了郡县制的区域。其具体时间我们已经不能考证，但是可以推论出其出现大约在李广利征大宛之后，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后期。

在两汉之际，因为凉州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顿时显著起来，用“西州”来指称凉州地区的情形多了起来。如马援与杨广书言：“且来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独为西州言。”[18]窦融上书刘秀曰：“嚣扬言东方有变，西州豪杰遂复附从。”[19]朱勃诣阙上书曰：“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20]申屠刚与隗嚣书曰：“今东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发兵，人人怀忧，骚动惶惧，莫敢正言，群众疑惑，人怀顾望。”[21]杜林自凉州还三辅，光武拜为侍御史，“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22]。这里

的“经书”指的是“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23]。这些例子中的“西州”，都是指凉州地区而言。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以下两个例子，“平陵人荆邯见东方将平，兵且西向，说述曰：‘……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间使，招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24]。荆邯此话是在向公孙述分析隗嚣失败的原因，其目的是鼓动公孙述在天下未绝望之时出兵江陵、三辅以争天下，隗嚣的畏葸不前就成了反面的例子，“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指的是隗嚣手下的谋臣武将心向光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荆邯游说的对象是占据益州称帝的公孙述，而他言语中的“西州”指的是凉州。更明显的例子是刘秀与来歙的对话，光武帝以陇、蜀为忧，独谓来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25]隗嚣控制着凉州，因为他的态度首鼠两端，所以刘秀说“西州未附”；占据巴蜀的公孙述称帝自立，所以刘秀说“子阳称帝”。凉州、益州同时出现，此处的“西州”显然仅指凉州而言，光武所说的“西州方略”，理解成对付隗嚣更为合适，当隗嚣平定后，他方才“得陇望蜀”。

章帝建初二年（77），金城、陇西羌反，耿恭将兵镇压，其出陇西时上书言“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鸿胪固，即其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宜奉大使，镇抚凉部”[26]。这里将“西州”与“凉部”对言。永初元年（107），凉州先零羌反叛，庞参于徒中使其子庞俊上书曰：“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27]桥玄为汉阳太守，“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隐居，名闻西州”[28]。皇甫规上疏曰：“四年之秋，戎丑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泾阳，旧都惧骇，朝廷西顾。”[29]后来“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杰，耻不得豫”[30]。以上例子中的“西州”都是指凉州地区。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西州”指凉州在天象中亦开始有所体现，《续汉书·天文志中》：“太白者，将军之官，又为西州。昼见，阴盛，与君争明。荧惑与太白相犯，为兵丧。……其六年，征西将军马贤击西羌于北地射姑山下，父子为羌所没杀，是其应也。”[31]“西州”指代凉州地区的观念在当时已经纳入天人感应系统之中了，可见其深入人心。

当然，用“西州”来指称益州的情形依然存在，只是并不常见，《后汉书》中这样的情况凡三见。廉范，京兆杜陵人，祖父丹，王莽时为大司马庸部牧，庸部就是益州，“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32]。陈宠任广汉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宠到，显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以为腹心，讼者日减，郡中清肃”[33]。《后汉书·方术传》载任文公者，“公孙述时，蜀武担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当之。’……后三月果卒”[34]。任文公是巴郡阆中人，他说的西州智士就是自己。如果将《三国志》、《晋书》中“西州”的用法做一检讨，这种趋势更明显。《三国志》中用“西州”指益州的用法仅两见。一为《高柔传》：“高柔字文惠，陈留圉人也。父靖，为蜀郡都尉。……靖卒于西州，时道路艰涩，兵寇纵横，而柔冒艰险诣蜀迎丧，辛苦荼毒，无所不尝，三年乃还。”[35]另一为《是仪传》：“蜀相诸葛亮卒，权垂心西州，遣仪使蜀申固盟好。”[36]需要指出的是，《三国志·吴书》注引的《吴书》、《吴录》、《江表传》中的“西州”均指益州而言，因为当时三国分立，凉州地区是魏、蜀和凉州本地势力争夺之地，而与吴无涉。当时吴国外交的主要对象是占据益州的蜀国，所以记录吴国本国史的史乘中见到的“西州”多指益州就很好理解了，这种情况似乎不能推翻“西州”观念之重心已经移到西北地区的观点。《晋书》中所见的“西州”，均指凉州地区。

总而言之，西汉后期人们渐渐习惯用“西州”来指称西汉中后期新开拓的凉州及其周边地区，尽管继续用它来指称益州地区的情形仍然存在，但这种用法在史籍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当凉州、益州同时出现时，“西州”已经用来专指凉州地区了。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河西地区的开拓和开发，郡县的普遍设置和最终凉州刺史部的成立，使得帝国西部的领土范围得到扩张，所以指称政治中心区之西部的国土范围的“西州”的指称范围自然会扩大。而且凉州对两汉历史进程的影响应该说明显大于益州地区，所以，一方面基于前期的惯性，某些时候人们仍然使用“西州”来指称益州地区；另一方面，用它来指代以凉州为主体的西北地区的用法渐渐多起来并后来居上，因此，可以说，“西州”的地域观念经历了一个范围扩大和重心转移的过程。

三 “分域说”或“五州说”

那么“西州”所指的范围究竟包括哪些地区？问题可以进一步扩大为，“西州”、“东州”、“北州”、“南州”、“中州”把中国分为五个部分，它们分别指代哪些地区？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非常困难，一是因为资料有限；二是由于“五州”的区分方法，只是当时人们的一种习惯性的用法，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差别，各“州”所指区域多多少少存在差异。这种划分与依照国家政令进行标准分划的郡县制和十三州部有很大的区别，后者是国家行政性的划分，所以边界必须清晰确定，而“五州”是民间的而非官方的，是文化上的而非行政上的，区划并不严格确定，因人因时而异。虽然如此，“五州”却各有一个大致稳定的范围，在最低限度上人们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从而使他们在对话交流时不会产生误解，是当时人共同享有的一种对他们的世界进行某种范围区划的一般性知识。如果非要把“五州”中的某“州”与具体哪些郡县对应，与刺史部十三州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州对应，得出的结论必定是削足适履的。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五州”的范围做一个大致的厘清。在此之前我们先说明两则材料，以见“东州”、“西州”、“北州”、“南州”用法的灵活性，或者说不规范性。冒顿单于在致汉文帝书中说：“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37]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在秦汉之际完成了政治组织的质变，冒顿将松散的游牧联盟结合成为一个游牧帝国，东胡、月氏、丁零均被征服，此时又在追击月氏之时征服了西域，所以冒顿炫耀地对文帝说“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这里的“北州”显然是指长城地带以北的匈奴帝国统治的区域，这是一种两分法的地域观念，以长城为界，南方是由汉帝统治的城郭之民，北方是单于统治的游牧之民，当时的世界是由汉、匈两强主导并以长城为界划分的两极格局[38]，冒顿在自称自己统治的区域为“北州”的时候，暗定了文帝统治的区域是“南州”。在这种两强鼎立的格局中，只有南北之分，没有容纳“东”、“西”的空间。当时这样的两分法，还有如“关东”与“关西”的划分，将汉家的天下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而没有“南”和“北”的位置。

其实，所谓东西南北，都是相对的，某地之民，相对于自己的北方，自身就是南方，而相对于自己的南方，自身又是北方。《后汉书·刘焉传》：“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39]流入益州的南阳、三辅之民被益州人称为“东州人”，编成的军队被称为“东州兵”，南阳属荆州，属于“南州”，而三辅在西汉时期无疑是天下中心，东汉时期虽然迁都洛阳，但是三辅仍然属于司隶校尉部，即便后来因为西部沦落，扶风也被称为“西州”，但是与“东州”显然无涉，但是此处称三辅、南阳人为“东州人”，这里的“东州”就不是“分域说”或“五州说”体系下的“东州”，而是一种相对性的用法，三辅、南阳相对于益州，自然是在东边了。这样的情形在史籍中只发现这一例，但揣之情理，这样的用法当不会少。

两汉时期将中国五分，分别为“西州”、“北州”、“东州”、“南州”、“中州”，这种地域划分模式我们暂且名之曰“分域说”或“五州说”。先讨论“北州”，大略而言，“北州”所指的区域包括冀、幽、并三州。在光武众将的劝进书中述光武功烈：“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40]邯郸是冀州重镇，拔邯郸对于定“北州”至关重要，可见冀州是“北州”的重要组成部分。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41]。常山郡属冀州，伏恭之学遂流行北州。《后汉书·彭宠传》：“会王朗诈立，传檄燕、赵，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北州众多疑惑，欲从之。”[42]王朗在邯郸称帝，于是传檄燕、赵之地，这里使用了战国政治地域的旧称。燕、赵之地主要就是并州、冀州和幽州。渔阳、上谷是幽州的两大重镇，其突骑为光武平定天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汉书·朱浮传》中有：“光武遣吴汉诛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为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遂讨定北边。”[43]后来朱浮与彭宠产生龃龉并促成彭宠之叛，史书说“朱定北州，激成宠尤”[44]，这里的“北州”，当主要指幽州。汉廷为了解除董卓的兵权拜他为并州牧，董卓上书言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45]这里的“北州”就是指并州。《后汉书·独行传》：“建武二年，骑都尉弓里戍将兵平定北州，到太原，历访英俊大人，问以策谋。”[46]《后汉书·陈龟传》：“陈龟字叔珍，上党泫氏人也。家世边将，便习弓马，雄于北州。”[47]太原、上党都是并州重镇。

“东州”主要指原齐地，包括青州、徐州、兖州和扬州的一部分。

《后汉书·陈俊传》："时琅邪未平，乃徙俊为琅邪太守，领将军如故。齐地素闻俊名，入界，盗贼皆解散。俊将兵击董宪于赣榆，进破朐贼孙阳，平之。八年，张步叛，还琅邪，俊追讨，斩之。帝美其功，诏俊得专征青、徐。俊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数上书自请，愿奋击陇、蜀。诏报曰：'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48]这里的"东州"明显指青、徐地区，即以前的齐地，"专征青、徐"与"东州新平"对应。永初之初，水旱连年，郡国多被饥困，樊准上书曰："今虽有西屯之役，宜先东州之急。"[49]于是朝廷派遣樊准使冀州，吕仓使兖州，开仓廪食，救济灾民。这里的"东州之急"包括了冀州和兖州，兖州是原齐地，属于东州没有问题，但冀州呢？前文不是论说冀州属于"北州"吗？如果站在洛阳的位置看，冀州在其东北方向，正如前文所说，这种"五州"的划分法并不严格，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里称冀州为"东州"也可以说得通，但这种说法仅此一见，在大多数情形下冀州还是被称为"北州"。

《后汉书·方术传》载班固为文荐谢夷吾曰："窃见巨鹿太守会稽谢夷吾，出自东州，厥土涂泥，而英姿挺特，奇伟秀出。"[50]《后汉书·郑均传》："元和元年，诏告庐江太守、东平相曰：'议郎郑均，束脩安贫，恭俭节整，前在机密，以病致仕，守善贞固，黄发不怠。又前安邑令毛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洁之风，东州称仁。书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赐均、义谷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赐羊酒，显兹异行'。"[51]扬州的会稽、庐江都被称为"东州"，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说扬州就属于"东州"，因为有的时候提到扬州的豫章郡时称为"南州"。扬州在洛阳地区的东南面，有时被称为"东州"，有时被称为"南州"，或者有的地方被称为"东州"，有的被称为"南州"，都是可能的，随人因事而不同，这又一次证明了"五州"划分的不严格性。但是大体来说，齐国旧地的青、徐、兖州一般被称为"东州"，扬州更靠海的某些地方，有时候会被称为"东州"，这反映了这种地域划分的不规范性，不像行政区划那样必须非此即彼。

"南州"比较没有疑问的地区是交州、荆州。《后汉书·孝和帝纪》注引《谢承书》曰："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补临武长。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支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道经临武，羌乃上书谏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故天子食太牢为尊，不以果实为珍。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鸟

惊风发。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帝从之。”[52]交趾七郡的献物通过快马运往洛阳，而贵阳郡的临武县是贡道的必经之地。方物运到洛阳主要经过交州和荆州，毒虫猛兽出没的“南州土地”，就是指交州、荆州而言。桓帝时有诏书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53]这里的“南州”指长沙、桂阳、零陵等郡，均属于荆州。

《后汉书·张纲传》：“时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纲乃单车入婴垒，大会，置酒为乐，散遣部众，任从所之；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子弟欲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54]在扬州、徐州交界处活动的张婴贼等被抚平，于是“南州”晏然，这里是把扬徐间的一带称为“南州”了。《后汉书·黄宪传》：“郭林宗少游汝南，先过袁〔阆〕，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诸〔氿〕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55]同一件事《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书》记载为：“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氿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56]袁奉高和黄叔度都是汝南人，汝南属于豫州，《谢承书》称汝南为“南州”。可见徐扬之间，豫州之汝南地区，也有被称为“南州”的情形。

首先，我们必须再次澄清，“五州”这种将中国五分法只是大致的、模糊的，并不是严格的、非此即彼的，只是习惯上的，没有官方行政性的规定，跟十三州部及郡县制的设置有较大的差别，我们在研究中用十三州的某州，或郡县制中的某郡来比况“五州”，在方法上存在重大的缺陷，某些犬牙交错处尤其不容易说清楚。而且所谓“东”、“西”、“南”、“北”这些方位具有相对性。其次，虽然有上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是在最低限度上“五州”所指区域在时人心目中能够达成最低程度的共识，从而使得这种区域划分法能够得到使用和流行。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首先划分出“五州”所指的核心区域：“西州”主要指益州和凉州；“北州”主要包括并州、冀州和幽州；“东州”与原齐地大致吻合，有青州、兖州和徐州；“南州”的核心部分是荆州和交州；“中州”则与司隶校尉区大致一致。不易判断的情况是扬州、豫州和

朔方。

正如前面讨论看到的情况，在提到扬州的庐江、会稽时，称之为“东州”；而在一个提到扬州豫章郡的例子中，称之为“南州”。扬州地处东南，相对于洛阳所在的位置，扬州既是南方，也是东方，在这种不甚规范的区域划分下，称之为“东州”或“南州”都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南方开发尚浅，每一个郡所辖区域辽阔，会稽包含了整个沿海地区，在最东边，而豫章与荆州毗邻，也许人们在提到会稽的时候称之为“东州”，而在提到豫章郡的时候称之为“南州”。所以，处于洛阳东南方的扬州，有的时候可以被称为“东州”，另一些时候又可以被称为“南州”。或者是，扬州靠海一边的郡多被称为“东州”，与荆州毗邻的郡则被称为“南州”。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出现混乱是允许的，要之，在具体的语境之中，这种混乱对于当事人理解对方的话并不存在障碍。

豫州在“九州岛”体系下处于天下之中，但是两汉在政治核心区都设有司隶校尉部，是天下之中心，在两汉“十三州”政治版图上的豫州之地位远不如在“九州岛”体系下的豫州地位显赫。豫州因为与司隶毗邻又偏在东南，所以郭太游汝南被称为到“南州”。但是豫州的大部分为河南之地，河南之地历来被称为“中州”。东汉时期随着政治重心的东移和文化重心的西移，颍川、汝南、陈留盛极一时，在一些场合这些地区如果被称为“中州”，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相应的，随着西部的衰落，东汉中后期，三辅频遭羌患，渐渐沦落到被称为“西州”了。

东汉时朔方并入了并州，董卓在上书中以“北州”称之，但是我们在史籍中只能找到太原、上党、雁门等郡被称为“北州”的例子，而原朔方各郡在合并之前，甚至之后，是否被称为“北州”尚有疑问。虽然朔方诸郡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关中之北，但是在地理环境、战略地位、社会风俗等方面与凉州更为接近，朔方之北地、上郡、西河更是与凉州的安定、陇西、天水以出善骑射的“六郡良家子”而著名。隗嚣以天水、陇西为基地割据控制凉州时，“禹承制遣使持节命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57]。虽然隗嚣以西州大将军的身份专制凉州、朔方事并不必然意味着“西州”与朔方之间也存在对应关系，但是这种安排，无意中体现出时人对于区域或是政治地理的某种理解，朔方与凉州密不可分的关系。现有材料非常有限，我们无法说的更多，但是考虑到“五州”用法的随意性和模糊性，考虑到朔方与凉州更密切的联系，我们不能排除有时候人们称之为“西州”，将它与凉州划入一个政治地理单元的可能。

“西州”地域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无所谓的，而是时人根据自己时代的历史动向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地域观念，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诸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初，“西州”是中央政策执行的客体，无论是修筑长城、要塞、边城，还是屯田、设郡县、移民实边，抑或派军征伐，它都是一个人力和物力的输入地。当“西州”地方力量成长到某个阶段时，西州就不只是一个单纯被输入的客体了，渐渐地亦将获得一定的“主体”性格，并以某种形式反馈中央。这种反馈力量可以是良性的，亦可以具有非常强烈的破坏性。两汉之际“西州”的地方势力得到很快的发展，河西窦融集团以边地骑士及羌胡劲兵佐助光武帝完成统一，可以被视为一种有益的反馈。而后来因为帝国对“西州”的战略方针接连失误，帝国东、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失去平衡，“西州”军事集团的代表董卓进京，操控朝政，废立皇帝，残破两京，则是极具破坏性的反馈。从秦汉之初的“西州”开拓，到东汉末的“西州”边兵入京，中央与边疆的互动完成了一个轮回。“西州”作为一个地理观念的意义，蕴藏在这个贯穿两汉的互动过程之中。

[1] 《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中华书局，1962，第3393页。

[2]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第4135页。

[3]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中华书局，1965，第522页。

[4] 《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第2258页。

[5]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901页。

[6] 王海：《秦汉时期“北边”略说》，《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

[7] 许慎：《说文解字》，九州出版社，2001，第667页。

[8] 张玉勤：《晋作州兵探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9] 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王爱和：《四方与中心：晚商王族的宇宙论》，《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期。

[10] 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89页。

[11] 孙家洲：《论汉代的“区域”概念》，《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12] 王爱和：《四方与中心：晚商王族的宇宙论》，《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

期。

[13] 王子今：《“西域”名义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4] 《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第3393页。

[15] 《汉书》卷七十七《孙宝传》，第3259页。

[16]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第4135页。

[17]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7，第63页。

[18]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第833页。

[19]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805页。

[20]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第847页。

[21] 《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传》，第1016页。

[22] 《后汉书》卷二十七《杜林传》，第936页。

[23] 《后汉书》卷二十七《杜林传》，第937页。

[24]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第539页。

[25]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第585页。

[26] 《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第723页。

[27] 《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第1687页。

[28] 《后汉书》卷五十一《桥玄传》，第1695页。

[29]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第2134页。

[30]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第2136页。

[31] 《续汉书》志第十一《天文志中》，第3245～3246页。

[32] 《后汉书》卷三十一《廉范传》，第1101页。

[33] 《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传》，第1553页。

[34] 《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传上》，第2708页。

[35]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四《高柔传》，第682页。

[36] 《三国志·吴书》卷六十二《是仪传》，第1412页。

[37]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第2896页。

[38]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24页。

[39]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第2433页。

[40]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21页。

[41] 《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传下》，第2571页。

[42] 《后汉书》卷十二《彭宠传》，第502页。

[43] 《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37页。

[44] 《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59页。

[45]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第2322页。

[46] 《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传》，第2672页。

[47] 《后汉书》卷五十一《陈龟传》，第1692页。

[48] 《后汉书》卷十八《陈俊传》，第691页。

[49]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准传》，第1128页。

[50] 《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传上》，第2713页。

[51] 《后汉书》卷二十七《郑均传》，第946页。

[52] 《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94～195页。

[53]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317页。

[54] 《后汉书》卷五十六《张纲传》，第1818～1819页。

[55] 《后汉书》卷五十三《黄宪传》，第1744页。

[56] 《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第2227页。

[57]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22页。

附录二 边兵的失控

——东汉董卓、北魏六镇及唐代安史三次边兵叛乱之比较研究

凡立国中原的政权都必须综合考虑两个安全问题，一是防御北方游牧者的“边防安全”，另一是防范边兵武力失控的“政权安全”。为保障边防安全则必须设置强有力的边兵武装，但边疆武装势力坐大，一旦失控反戈，政权安全将遭受危机，二者间的平衡殊难把握。本文的“边兵”，并不单指戍守边疆的士兵，而是一个涵括边将、士兵以及相关军事体制的综合概念。当边兵反叛，且中央无法有效控制时，就形成边兵的失控。东汉西北的凉州兵团、北魏北边的六镇，以及唐代东北的军镇，在经略边疆、保境固土方面，都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后来都衍化成失控的边兵，对东汉、北魏以及唐政权分别造成致命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支边兵恰好分别分布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1]的西北部、中部和东北部，这一地带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长期拉锯、持续互动的舞台。边疆是族群生存的资源和空间边界，虽是边缘却能够牵动全局，农牧互动所产生的影响不会仅仅局限于边疆，还将以某种形式作用到各自社会的内部深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2]对农耕国家而言，边兵的失控可以说就是这种深刻影响发生的媒介形式之一。

东汉董卓、北魏六镇、唐代安史是三次典型的边兵失控，它们的发生与各自时代的边疆形势、内部军政局势以及胡汉互动特征密切相关。学界对三者分别已有深入的研究[3]，但尚未见到对三次边兵失控的综合比较研究。笔者认为三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对它们的发生以及背后复杂的边疆形势、内政局势及胡汉互动情形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或有助于深化对中古时期政治、军事、民族及文化问题的认识。

一 凉州兵团的形成与董卓的叛乱

凉州兵团的形成与贯穿东汉一朝的“羌患”紧密相关。东汉初匈奴南北分裂，南匈奴内附，东汉朝廷在公元73年和89年两次远征打击北匈奴，迫其向西逃遁，匈奴之患至此大体弥定。但与此同时，帝国西北的羌患浸盛，章帝后羌患逐渐升级，“众羌内溃”、“西州摇动”，不断虚耗着东汉帝国的元气。凉州毗邻羌人故地，民风彪悍，西汉以来大量的匈奴、羌人内徙，凉州的羌胡人口越来越多。两汉之际隗嚣、窦融利用善战的凉地边人与羌胡劲兵，对东汉政权的建立发生重要影响，故东汉朝廷一直刻意压制凉州豪族势力的发展，但由此而带来的副作用是凉州豪族与地方行政系统难以有效配合，朝廷在平羌战场上接连失败。汉桓帝之后，为了转变战场上的不利局势，朝廷被迫调整对凉州豪族的压制方针，开始重用凉州本土的兵和将，凉州兵团于是逐渐形成。在凉州兵团的镇压下，羌患逐渐得到弭平，但是东汉时期内地武备松弛、百姓忘战日久，强悍的凉州边兵对朝廷的政权安全构成严重危险。最终董卓掌握了这支力量并举兵向阙，东汉政权遭受沉重打击，从此以后就名存实亡了。

羌人种类繁炽，在青藏高原及沿高原的边缘区域均有分布，与汉王朝关系密切的是分布在河湟及河西地区的羌种。随着汉武帝扩张至河湟及河西，激化了汉羌矛盾。西汉时期皇权尚算强健、行政系统运转有效、军事机制运作正常、边塞烽火警备严明，羌人只在宣帝、元帝时爆发二次较大规模的反抗，赵充国、冯奉世率领的军队亦能有效压制。东汉初羌人为祸尚浅，汉羌战争规模亦不大，光武帝只是将之视为隗嚣势力的遗留问题，护羌校尉旋设即废。后来羌人问题逐渐严重，章帝时朝廷已开始重视，为之复收盐铁筹措军费，并恢复护羌校尉的设置，但尚未有大规模的用兵。安帝永初元年（107），羌乱突然升级，接连爆发了三次“羌人大起义”，[4]一直持续到桓灵之世，整个朝野为之焦头烂额，朝廷多次向西北大规模调兵遣将，军费开支剧增，大量国力虚耗于此。

西汉以来朝廷对羌人持续执行内徙政策，大量羌人分布于帝国的西北边疆地区，一旦汉羌冲突爆发则“众羌内溃”。东汉羌患的不断升级与羌人内徙固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根本的原因，是内徙羌人始终遭受汉人政权及豪民的残酷奴役和虐杀，汉羌之间不但没能融合，矛盾反而更加

激化。东汉初马援深知羌人难治，采取内徙羌人之策，将投降、归附及俘虏的羌人分徙于塞内郡县，其本意是拆解羌人势力，并期望内徙的羌人迅速被汉人社会同化，最终转变为帝国的编户民。内徙之策被后来主持羌务者纷纷效仿。但是，羌人内徙后，却遭受汉人社会的排挤和政权机器的严酷奴役，不但没有被同化，矛盾却愈加剧烈。两汉之际历仕陇右、河西的班彪指出：“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5]羌人内徙与汉人杂处后，不断遭受基层小吏及狡黠汉民的侵苦。地方郡县对待羌人的方式更为强横残暴，章帝时安夷县一名县吏霸占羌妇，被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不论事件原委就领兵追缉，导致“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6]。羌人之家庭、财产完全没有保障，霸占羌妇之类的行为恐怕并不少见，地方官府则完全站在汉人一方。这里的“种人恐见诛”颇可留意，一个羌人犯法可能祸及整个种落，明帝时烧何部就因一人犯法种人被杀六七百人，汉人官吏从来不惮多杀羌人。安帝永初元年（107），被强征前往西域作战的羌人逃散，此事本身只是普通的逃兵事件，但官府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扩大了事态，各郡发兵拦截，甚至倾覆羌人庐落，致使诸种大豪惊惧奔溃，“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7]，第一次“羌人大起义”爆发。

为弭平羌乱，东汉朝廷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很大的努力，却既没有触及汉羌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战场上也是接连兵败，这与东汉的内部军政局势有密切关系。东汉定都洛阳，造成关中地区的衰落；[8]对地方武备的限制及都试的废除，造成内郡兵不堪战斗；[9]章和之后中央政治更是陷入外戚宦官轮流掌权的状态，腐败丛生。以平羌军事为例，朝廷支出军费上百亿钱，府帑为之空竭，但“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10]。如此之将率领缺乏训练的军队，故而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邓骘败于冀西，任尚败于平襄，司马钧败于丁奚城，马贤败于射姑山，赵冲败于鹯阴河。

凉州地方豪族与东汉政权的关系，也许值得特别注意。杨永俊指出，正是由于东汉对凉州豪族的防范和压制，削弱了地方政权的基础，使凉州郡县的行政和军事功能难以发挥。[11]羌人初起时实力并不强，王符指责凉州地方官员手握重兵却畏惧避战，纷纷建议内徙郡县而导致羌患浸盛。[12]凉州地方官无守战之意，可能确实如此，但认为这些守

令拥有足以制敌的军事实力，却不一定是事实，郡县体制必须得到地方豪族势力的支持才能有效运转。“东汉政府对陇右豪杰与羌胡之间联系的过于严密的防范，及对陇右地方势力的过度削弱，在防止陇右地方势力趁‘羌乱’之机起事上很见成效，……但是这一强干弱枝的做法，在事实上却大大削弱了陇右地方政权的力量，致使陇右地方政权在‘羌乱’之际无所适从，既不知如何协调和解，又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陇右地方势力一旦被削过甚，那么陇右地方政权就失去基础，其有效的行政和军事职能也就难以发挥。”[13]凉州豪族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脱节，郡县机制在凉州地区运作得并不顺畅，地方守令并不能动员足够的力量来应对羌乱。

为了改变平羌战场的局势，桓帝时朝廷的政策逐渐发生重大转变。首先，加大了对凉州本地兵的使用。虞诩曾对汉军多败做了战术上的分析：“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14]数十万平羌军队绝大多数是来自内郡的步兵，虞诩建议罢步兵而多用边郡骑兵，这一建议看似只是战术的改变，实际上却关涉平羌军队士兵籍贯和身份的改变。凉州处在农牧交错地带，民风彪悍，百姓善于骑射。内徙的羌胡不但没有被汉化，凉州地区反而发生逆向的羌胡化。随着对骑兵的重用，大量凉州骑士以及归义羌胡逐渐成为平羌军队的主力。其次，起用凉州豪杰，凉州本籍将领逐渐崛起。朝廷在不断的军事实践中逐渐明白只有凉州兵能对付羌乱，也只有凉州将能指挥凉州兵。[15]凉州将对本地山川地形、羌胡习俗有深入了解；自古山西出将，凉州将勇猛善战、精通兵略；凉州将体恤士兵，由于同乡关系，凉州兵更愿意为本籍将领卖命，兵将结合更为紧密。征召凉州本籍的士兵、起用凉州将领，意味着朝廷压制和防范凉州豪族政策的废止，凉州地方军事势力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壮大。在战术、战斗力，以及兵将关系方面，凉州军队与内郡军队形成截然对比，很快逆转了战场形势，“西羌于此弭定”、“东羌悉平”。

在边疆安全与政权安全两者之间，东汉朝廷起初偏重政权安全，主要征发关东军队平羌，继续压制凉州势力。在平羌战争接连失利的情况下，朝廷不得已转而重用凉州兵以及凉州将，确实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羌患基本弭平，但同时也给自身政权安全悬上了一柄利剑。桓帝延熹二年（159），李云露布上书云“西北列将，得无解体”？[16]即表达了对凉州边兵的担忧，表明朝廷对凉州兵团的控制力是有限的。朝廷也意识到这一点，陆续将其将领“凉州三明”调离西北，但并不是说随着三位将领

的离开，凉州兵团就瓦解了，“三明”的下属旧部仍然维系着凉州兵团的存在，一旦有新的时机，则会涌现出新的领袖，因此，朝廷并未解决凉州边兵问题。

后来董卓抓住时机掌握了这支武装。在凉州三明时期，董卓只是张奂手下的一名中级军官，羌乱平息后调任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从羌患平息后董卓的仕宦经历我们可以发现，朝廷开始有意将凉州的中级军官调离，若沿着这个趋势发展，凭借中央的权威和全国的资源，或可逐渐解决凉州边兵问题。但是东汉末年起义、叛乱频发，没有解决该问题的大环境。不久之后黄巾起义爆发，朝廷派出四位中郎将领兵镇压，其中董卓和皇甫嵩来自凉州。同年冬天，凉州的边章、韩遂反叛，董卓又回到凉州战场。在平叛期间，董卓逐步建立了与凉州军队强烈的隶属关系，以至于只有他能指挥得动这支军队，甚至昏庸如灵帝也意识到凉州边兵对朝廷的严重威胁，在驾崩之前接连诏董卓入京。灵帝驾崩后，趁着洛阳士大夫与宦官争斗变乱的时机，董卓率军进京，废立皇帝，掌控朝政。之后袁绍号召讨卓，关东诸侯纷纷兴起，东汉政权又经历了迁都之劫，当献帝历经艰辛重回洛阳时，天下已经是诸侯割据的局面了，东汉政权在曹操的挟持下名存实亡。凉州边兵的失控，成为东汉政权衰亡的重要节点。

二 北魏的军镇制度及六镇的失控

拓跋珪重建拓跋政权之后积极进取中原，同时随着拓跋鲜卑势力的逐渐南移，北漠的游牧联盟柔然在社仑可汗领导下统一漠北，建立柔然汗国。当时拓跋鲜卑面临两个战略问题：一个是对中原各政权的战争与征服以统一中原；另一个是对柔然的防御与进攻，保障平城京畿的安全。到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北魏国家的南征北讨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原方面，渐次征服后燕、大夏、北燕、北凉，完成对中原的统一；在北方草原方向，面对柔然的进犯，北魏逐渐建立了北边防御体系。无论是经略中原，还是捍卫北土，军镇制度在其中都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军镇是一种军事化的地方统治体制，是在新占领区或边防要地实行的一种军事占领制度。

后燕、大夏、北燕、北凉等胡族政权在其统治区域内均或多或少取得了当地大族的支持，具备一定的政权基础。北魏征服后同时采取两方面的措施巩固统治。首先是徙民，正如谷川道雄指出的："在北魏征服华北过程中，一般都伴随着徙民。多数情况是将被征服民从旧政权的所在地迁徙到北魏政权首都平城。"[17]为了摧毁敌对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充实平城京畿，北魏每征服一个胡族政权，都会将其首都及主要州郡的守宰、民吏、豪杰强行迁徙到代地。其次是在新征服地设置军镇。北魏统治的区域类型复杂，对不同地域实行不同的制度，"其于东南汉人区域，则袭用汉人旧制，以州郡县治之；其于鲜卑本族，则以鲜卑旧俗之领民酋长治之；其于汉人以外之被征服族群，则常以护军治之"。在地方上虽然根据地区、族群的不同而有设置州郡县、领民酋长或护军的区别，但除此之外，军镇制则一律施行于全国各地。[18]北魏在地方实行一种双轨制的统治，以军镇制配以郡县制、领民酋长制或护军制。

严耕望将北魏军镇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设州郡县地区之镇；二是与州郡并置且同治所之镇；三是参间于州郡区域内，自统面积土地与人民，而无州郡与之同治之镇。[19]第一类主要分布在北方及西北边境地区，第二、第三类主要分布在中原新占领区。虽然在州郡县和军镇并置的地区，一般有军镇治军、州郡治民的区分，但"镇将例都督本州军事且或兼督附近诸州，并有兼本州刺史者。当时制度，既督军事，实即干预一切"[20]。所以镇将权力极大，统领军政诸务、威震一方。也就是说，在中原新占领区实行的其实就是军镇镇将统管总领之制。北魏政权在中

原新征服区建置军镇、派遣镇将、驻守重兵，其目的是加强对目标区域的军事控制能力，发挥武力威慑、勘定叛乱、抵御侵犯的军事功能。[21]

5世纪初柔然强大，不但对北魏北方边境以及京畿的安全构成威胁，对北魏统一中原的战争也构成牵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魏开始在北边修筑长城，并建立以六镇为核心的军镇防御体系。[22]所谓“六镇”，从西向东依次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个军镇，与六镇性质类似的军镇，还有赤城、御夷、薄骨律、统万、高平、凉州、敦煌、鄯善等。这些军镇属于严耕望所说第一类型的军镇，边疆的广阔地域内不设州郡县，专由军镇管控。

北魏沿着北边以及西北边疆设置了多个军镇，但为何只有沃野等六个军镇获得了“六镇”的专称？[23]其他相类毗邻的军镇为何不预“六镇”之列？据严耕望、康乐的考证，沃野等六镇的建置时间集中在太武帝延和至太平真君年间，六镇在这个时段集中设置，除了作为北边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之外，亦与神䴥二年（429）远征柔然，俘获大量高车、柔然人口有关。[24]429年，太武帝远征柔然取得重大胜利，大檀绝迹西走，“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前后归降及俘获的高车、柔然人逾40万。北魏将超过40万的降获之民安置在北方边境地区，他们成为北魏统治下的人口。《魏书·世祖纪》记载曰：“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25]“新民”就是这些新降获的游牧人，从阴山到濡源的区域，基本上与从沃野到怀荒六镇的分布一致。为了控御这些移动性很强的游牧族群，北魏规划并集中设置了“六镇”，六镇除了是北边防御体系的主要构成之外，亦承担着对超过40万高车、柔然人的统治任务，是为此专门集中设置的，故而“六镇”作为一个专有称谓出现在皇帝、大臣的谈话以及官方文书中。

北魏是凭借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集团通过武力征服逐步建立的。作为一个征服国家，北魏统治前期国家的军事化、部族化色彩甚为浓厚，驻扎在南北各地军镇的军事武力，是北魏政权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关键。驻扎在南北各地军镇武装的核心力量都来自“代人集团”。康乐指出，在4世纪末的平城及其邻近地区，以拓跋鲜卑为主，包括早先归附的各个北亚部族，形成了一个超越自然血缘的地缘集团，“代地”成为他们唯一的家乡，经过离散部落之后，他们之前的部族身份逐渐淡化，主要以“代人”的身份活跃于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舞台上，之前的部族酋长成为贵族，之前的部民成为普通代人，他们共同构成“代人集团”。“代人”掌握

着各地军镇的统治权力，构成武装力量的核心部分，是北魏依靠的基本军事力量。[26]驻扎在各军镇的代人被要求著籍当地，可视为首都平城“代人集团”的派出分支，是北魏国家在新征服区及边境区域最为倚重的力量，国家也给予这批人极高的待遇和荣誉，“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27]。

北魏国家的存在及其运作的原理机制，就是国家政权与“代人集团”及各军镇“代人分支”之间荣辱与共、密不可分的关系，平城和分派在各军镇的“代人”，构成一个共同体，北魏国家的稳定程度与这批人的忠诚度成正比。随着征服事业的扩大，各军镇军队中逐渐加入了新的成分，军镇的性质随着这些新成分的加入而开始出现某种变化。新加入的成分，首先是中原大族子弟。在征服的过程中，山东、关中、凉州等地的汉人大族被迁徙到平城，如西州名儒刘昞被迁徙到平城，其三子后来被调配到不同的军镇中。史籍中多这样的记载，传主家族本为某地大族，然后“魏世分镇北边，因家焉”，“以豪族徙北边”，随例迁入某某镇，因家焉，成为各地军镇的构成成分。其次是刑徒兵，秦汉以来一直有使用刑徒兵的传统，北魏也采取这种补充兵员的方法，这些人在军队中地位低下，主要从事杂役苦役，甚或在战场上充当炮灰。除此之外，六镇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构成，即高车、柔然的酋帅。如前文所述，六镇的设置与统治数十万降附的高车、柔然人有关。这些为数众多的降附人口仍然保持着游牧的生活方式和部落的组织形式，六镇官方只能通过原有的部落酋帅对他们进行间接统治，部落酋帅在军镇中担任中低级官职，他们的部民却是六镇机构管控的对象。

中原强宗、配军的罪犯、降服的部落酋帅是六镇的中下层，与鲜卑贵族及“代人”子弟所代表的北魏国家的利益并不一致。六镇地区众多的高车、柔然人，是六镇军队威慑的对象，是被统治者，但他们的部落首领，在六镇军政机构中却占有一定的位置，虽然可能是卑微的。[28]六镇的内部构成越来越复杂，不同利益要求的冲突和潜伏的矛盾逐渐交织累积。

为了加速汉化改革，建立魏晋型的文治政府，孝文帝迁都洛阳。迁都之后由六镇直接处理北疆事务。[29]表面上看六镇的地位似乎更重要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太和之后柔然由于自身内乱而衰落，对北魏政权不再构成重大威胁。南迁洛阳后北魏国家的战略重心转移到经略南方，六镇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更为关键的是，整个国家朝向文治型转

变，势必对前期形成的与军事征服一致的国家机制形成背反。从此之后镇将选举转轻，六镇甚至成为当权者贬黜异己者之所，包括六镇在内的所有军镇地位骤然降低。

孝文帝试图建立门阀主义的社会，制定姓族等级，官职的获取依据门阀，并逐渐限制武人的入仕及升迁途径。随着国家机制的变化，“代人”共同体开始分裂，迁洛的“代人”在门阀序列中占得较好的位置，较快适应了文治政府。各军镇著籍的“代人”是这一转变的失意者，“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30]。特别是在六镇，自从迁都洛阳后，“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31]。出任镇将的不再是“盛简亲贤，拥麾作镇”，而是“底滞凡才”，出镇边地不再是荣耀的事情，“代人”子弟多不愿出镇北边，犯罪配边者越来越多。北魏后期，整个六镇笼罩在萧条、失落、怨恨、不满的氛围之中。六镇整体的衰落、资源的匮乏，使得内部的利益矛盾愈加激化，镇将以及司马、戍主、军主等中高级将领对处在下层的汉人、酋帅及普通镇人的剥削与压迫越来越重，反叛的情绪和力量不断累积，爆发只需要一个契机。

正光四年（523），柔然对六镇发动劫掠，怀荒镇民向镇将请求赈济被拒绝，镇民愤而杀镇将。次年三月，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杀死戍主，发动反叛，六镇纷纷响应，整个六镇陷入战火。“六镇起义”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发生在六镇本土，后期发生在河北。前期起义在北魏政府及柔然的联合下勉强被弭平，20万镇民投降。围绕投降镇民的安置问题，对六镇问题认识较深的元渊建议于恒州北部新设郡县安置，朝廷最终却决定将他们安置在河北的冀、定、瀛三州地区。当时北魏朝廷本身深陷权力斗争之中，腐败丛生，国势衰败；河北地区连年饥荒，根本无力容纳如此多的降民，20万镇民携家带口而来，与河北本地势力的矛盾不可避免，元渊感叹：“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作。”[32]果然，不久后河北的六镇镇民杜洛周、鲜于修礼、葛荣等发动了“六镇起义”的第二阶段。六镇失控之后，关西地区亦暴乱不止，北魏朝廷已无力应对，游牧于秀荣川的领民酋长尔朱荣乘势而起，并乘胡太后毒杀孝明帝之机进入洛阳，掌控政局。尔朱荣出兵镇压了镇民起义，在镇压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的六镇力量，在增强本身实力的同时，亦使他的集团成分变得更为复杂。当尔朱荣被孝庄帝刺杀后，尔朱集团很快瓦解，六镇力量分化为怀朔与武川两个集团，在高欢和宇文泰的带领下，主导着北魏之

后的历史，北魏政权在东、西魏的分立形势下名存实亡。

三 唐代军政变局与安史之乱的发生

安史之乱如此重大的边兵失控，导致其发生的因素定然是多方面的，甚至包括某些偶然因素的作用。在众多原因之中，最具决定性的是唐代中前期军事、政治局势的一系列变动，唐玄宗对安禄山异乎寻常的信任，亦能从当时的军政情势变动中寻出缘由。

唐代中前期军政局势的变动，与周边外患之迭兴有密切关系。若论边疆外患之盛，周边族群迭相兴衰之剧，外族与中原王朝关系之错综复杂，无出唐代之右者，东突厥、薛延陀、吐蕃、南诏、后突厥、回纥、契丹、奚等边疆少数族群政权迭相兴起。《资治通鉴》将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追溯到唐玄宗的四夷政策，“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33]。但是细究起来，玄宗时期的四夷方针与太宗、高宗比起来，表现出的却是收拢，甚至是保守的趋向，很难说得上是“有吞四夷之志”。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战胜颉利可汗，接着平吐谷浑、讨薛延陀、定高昌、征高丽，四夷皆附，天下安定，太宗获得“天可汗”之号，自赋诗曰：“已知隆至道，共欢区宇一。”[34]诚如陈寅恪所论，这些胜利的取得固然由于唐朝君臣之奋发，但并不意味着承隋末丧乱残破之中国的唐廷本身军事实力有多强大，而是突厥本身遭遇严重的内外部困境，“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35]。高宗时期吐蕃崛兴，对陇右、河西、西域甚至关中构成威胁，高宗仪凤年间唐蕃之间爆发一场大仗，18万唐军惨败。吐蕃的崛起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降附的东突厥部民此时开始反叛，在默啜可汗的领导下后突厥复兴，契丹、奚等部族在突厥势力的影响下更加叛服无常。[36]概而言之，在高宗武后时期，随着吐蕃的兴起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原本四夷宾服的局面猝然崩解，从东北到西北，唐代漫长的边境线面临的压力骤然增大。为了应对新的边疆形势，唐廷逐渐对相应的军事体制做了变革：首先是兵，从兵农合一走向职业兵；其次是大军区的确立，以及兵将之间的关系逐渐固定密切。军事体制这两方面的变化，是安禄山能够发动叛乱的制度背景。

唐初基本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和兵募制，由国家掌控户籍的编户民承担军役，轮番服役，平时由折冲府负责训练和管理，战时命将率领出

征，战后兵归府而将回朝。府兵最重要的职能是宿卫和近戍，数量有定额，当国家发动大规模征讨时，需要另行兵募，兵募是府兵的重要补充。战争结束后，兵募解散归家，如果需要在征讨地镇守，亦有番代之制。不论是府兵还是兵募，都是兵农合一，征召自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其兵农合一和兵将分离的特征对农耕国家而言是非常理想的。但随着高宗武后时期社会形势的变化，兵农合一及兵将分离都不得不发生改变以应对。

府兵制实行的基础是国家直接掌握大量土地和人口，通过均田制和户籍制控制大量的自耕编户民，只有如此兵农合一的兵制才能有效运作。高宗武后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权贵豪强对土地的非经济强制占有，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不断侵蚀着国家的基层社会基础。张国刚指出，土地兼并发展导致唐朝基层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掌握土地的土豪富户需要劳动人手，失去土地的农民需要劳动机会维持生存，土地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唐朝坚持征兵制，势必与土豪富户发生人力争夺的冲突。土地关系的变化和赋役征收向“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人丁为本”的方向改革，兵役制度也势必要采取新的模式与之适应[37]。因此，招募的长征健儿等职业兵开始兴起，兵的身份开始发生变动，从兵农合一转向雇佣职业兵。

任何中原王朝都不是独自生存在亚洲东部的大陆上，始终是与周边众多的少数族群共生同存，立国中原的王朝都无法回避来自周边族群的冲击和压力。唐太宗乘东突厥内外交困的时机战胜之，在周边族群相对衰弱之时建立了唐朝在东亚世界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府兵制的缺陷并未暴露。高宗时吐蕃、后突厥、契丹、奚同时崛兴，唐朝的军事压力骤然猛增，府兵、兵募都是征自农民，平时的简单训练无法满足与善战游牧族群作战之要求，将领与士兵之间素不相习、恩情不接，整个军队的战斗力较低。同时，唐朝需要防御的边境线异常辽远，征召自内地的府兵和兵募，仅赴战场就需要奔波数千公里，耗费大量时月、军资，战士亦疲惫不堪。在边境的镇守时间也越来越长，兵士逃亡现象越来越严重。此外，朝廷在作战于西北时，就无法兼顾东北，反之亦然，往往顾此失彼，左右牵制。

唐廷的军事体制改革，一方面是招募自愿当兵长镇边境的健儿，健儿是以当兵为谋生的职业兵，不再是兵农合一下的征兵。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的正月迎气诏曰：“朕每念黎氓，弊于征戍，亲戚多别离

之怨，关山有往复之勤，何尝不恻隐于怀，寤寐增叹，所以别遣召募，以实边军，锡（赐）其厚赏，便令长住。今诸军所召人数向足，在于中夏，自可罢兵。既无金革之事，足保农桑之业。自今已后诸军兵健，并宜停遣，其见镇兵并一切放还。”[38]招募自愿镇守的职业兵，并给予厚赏报酬，内地百姓就可以不预兵革之事。另一方面是在边疆地区设置能统一军令、协调作战的大军区。[39]唐初在边疆设置的镇戍分散、军力弱小，战争爆发例由朝廷命临时性的行军大总管出征。外患压力并起之后，这种制度已经不再适用，唐长孺论曰：“为了避免远道调发，为了明确防御责任，为了在较大地区内有统一的指挥，高宗以后，临时性统率的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40]节度使作为大军区的最高长官在开元时期确定下来，沿帝国边疆形成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九个节度使及岭南经略史共十个大军区。新的外患形势及国内社会经济条件变化，逼迫出了以职业兵和大军区为特征的新军事体制。

唐初分散弱小的镇戍集结成大的边防军区，府兵制下的兵将分离彻底逆转，边防健儿与各级军将、各级军将与节度使形成了牢固的隶属关系，节度使的权力不断膨胀。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兵力总计57万，其中边兵49万，中央宿卫的彍骑数目为8万，且战斗力远逊于久经战阵的边兵。从唐初府兵时期的内重外轻之局，到玄宗时彻底衍为外重内轻。设置强大的边兵既然不能避免，玄宗亦应该有意识地使各军镇之间保持互相的制衡，但玄宗非但没有如此，反而使某节度使常兼任二区甚至三区，王忠嗣曾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节度使，哥舒翰后来兼任河西、陇右二节度使，所以安禄山兼范阳、河东、平卢三节度使，并没有显得有多突兀而引起注意。更有甚者，玄宗还使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河北支度营田使、河北海运使，成为控制河北道军事、政治和财政大权的最高长官，完全掌控一方。诚如岑仲勉先生所言，“其弊不在乎有边兵，而在节度使之权过重”[41]。强大的边兵是必要的，但如唐玄宗这般赋重权予节度使，却是自掘坟墓。

玄宗对边兵防范意识的淡漠，可能与唐初以来的政治危机例由皇室内部接连不断的宫廷政变而起有关，玄宗本人就是经由这种政变而取得统治地位的，这使他将防范的重心全部放在皇室及京师内部。天宝之后，盛世的表象使玄宗执政的骄傲和怠惰之情同时滋起，得到杨玉环之后更是沉浸到老年享乐的富贵温柔之中。[42]玄宗此时心态的微妙状况已经无法探知，但李林甫至少在表面上将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新的军

事体制也转型完成，效果显著，安禄山等边将亦保证了边疆的稳定。一种体制刚转型建立并运转正常，玄宗实在没有理由对之再做大的变动，于是一半出于事实、一半出于昏聩，玄宗认定天下运转进入了太平轨道。玄宗对安禄山异乎寻常的宠信，或许其中有一丝说不清的隐隐担忧，希图用对安禄山更大的优宠来化解这种担忧。章群指出西北系的军镇节度使与太子具有密切的关系[43]，这或是玄宗在昏聩晚年最后一步统筹大局的安排，后来拥立太子、对抗安史的军事力量，都是西北系的。其代价毕竟是中央权威已衰、中国已残破，并遗留下藩镇之患。

安史之乱的爆发还有其他缘由，比如李林甫建议节度使专用番将、安禄山与太子关系的紧张、杨国忠的逼反等，但最主要的还是安禄山能够在新的军事体制下聚集和控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下，朝廷对他的叛乱缺乏有效的压制能力。玄宗确实有好几个可以化解叛乱的机会，但都接连错失。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合聚在一起，造成了这出边兵失控的大戏。

四 结语

本文所论三次边兵失控，与各自朝代的周边族群局势及内部军政背景息息相关，具有各自的特征，同时亦具有某些结构上的共同之处。东汉董卓叛乱、北魏六镇反叛以及唐代安史之乱，都没有直接造成对应政权的灭亡，但毫无疑问地成为东汉、北魏、唐代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东汉政权并没有直接亡于董卓，但引发了一系列后续反应，关东地方势力在讨卓的口号下形成诸侯割据，汉献帝东归之后，东汉历史就进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尾声阶段，名存实亡。为了镇压六镇起义，北魏政权耗尽了最后的能量，六镇反叛的后续反应是尔朱荣的崛起，当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时，朝廷已经无能为力。尔朱荣镇压了镇民在河北的起义，同时也吸纳了大量六镇镇民，尔朱荣死后形成了高欢和宇文泰掌控的东、西魏，北魏政权分裂的同时亦是名存实亡。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廷迫不得已对安史残余势力多有妥协，唐后期之藩镇问题乃安史之乱引发的后续反应，虽然藩镇的类型可以有进一步细致区分，唐廷亦不是没有作为的余地[44]，但唐代后期政治始终笼罩在藩镇问题的困扰之中，国势不振，终致灭亡。

北方长城地带是历代中原王朝与游牧族群交往互动频繁的区域，凉州位于这一地带的西北部分，六镇位于中部，范阳、平卢位于东北部。三支边兵发展成为足以动摇天下的武装力量，并不是朝廷主动为之，而是在北方游牧族群的压力下，随着形势变化一步步转趋而成的。东汉朝廷对地方势力特别是凉州豪强的压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凉州处在西北边疆地带，当羌人反叛的压力越来越严重时，朝廷不得已转而重用凉州本土力量，才酿成日后凉州边兵的壮大强横。拓跋鲜卑本为游牧部族，当其逐渐立足中原向定居国家转变时，草原大漠新崛起的游牧帝国与之构成新的农牧互动关系。包括六镇在内的北边军镇，是北魏在柔然汗国的压力下渐次设置的，其中六镇还承担着管控数十万高车、柔然降附民的任务。唐代在高宗之后，从西北到东北，吐蕃、后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政权或部族同时强盛，职业兵、大军区以及节度使是在边疆持续的战争实践中逐步建立的，成为安禄山崛起的制度背景。拉铁摩尔说农牧互动的后果不会仅仅局限在边疆，还会影响各自社会的内部深层。三次边兵失控的发生及其对中古历史演进发生的重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拉铁摩尔的论断。

三次边兵失控都贯穿了某种形式的胡汉对立。东汉的凉州与游牧族群毗邻，民风颇受胡族影响。西汉政府将归附的、俘获的羌胡安置在凉州边境地带，东汉自马援以来一直执行内徙羌人政策，到东汉中期时据说内徙羌人数量已达数十万，而汉民数量却在持续下降。[45]将羌胡安置、内徙到凉州甚至三辅，本意是希望他们逐渐汉化、同化为编户民，但由于相互之间的矛盾处理不当，内徙羌胡的族群意识反而更加强烈，凉州边土之地的地理、人文环境也不利于其汉化的发展，整个凉州区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羌胡化[46]。羌胡化的凉州土人以及分布在凉州的归附羌胡，构成凉州兵团的主体部分，凉州兵团的反叛，与中央及关东诸侯的对立，也是胡汉对立的一种表现形式。拓跋魏本身就是游牧部族，其立国中原的过程充满了胡族征服国家的特征，在新征服地遍设军镇，北魏国家的存在原理与运作机制就是国家政权与各军镇“代人分支”之间荣辱与共和紧密团结，六镇与朝廷之间根本谈不上胡汉对立。但是当孝文帝迁洛，北魏朝向汉人文治型国家转变后，中央政府及迁洛“代人”转向汉化和文治化，各地军镇地位下降，镇人的荣誉和待遇降低，新的国家运作机制背弃了各地军镇。于是在仍然保持着民族旧风的六镇与汉化了的洛阳中央之间，形成了胡汉对立的形势。安史之乱体现出的胡汉对立，已是学界讨论详尽的问题。[47]安史之乱前，唐朝之夷夏观念异常开放，胡人风情文化成为流行的时尚。以东突厥衰落为媒介，大量胡族，包括西亚的昭武九姓胡移居到河朔地区。高宗后西北吐蕃的威胁大增，唐廷在东北采取退守之政策，周边的突厥、契丹、奚、回纥之人乘机大量移入，河朔之地之胡人数量空前剧增，而且河朔之最高军政权力掌握在杂胡安禄山手中，安史手下主要的将领皆胡人，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整个河朔地区之胡化倾向非常强烈，原本汉人血统的百姓也大多胡化，成为安禄山起兵的群众基础，于是在安禄山控制的河朔与唐中央之间，形成了胡汉对立的形势。

在东亚世界，立国中原的农耕国家必须面对与周边众多游牧族群共生共存的现实状况，需要不断地在与游牧者的互动中调整自身的政策和制度。边兵是中原国家边疆安全的保证，边兵失控对中原国家的政权安全又是极大的隐患，二者之间的平衡不易把握。东汉、北魏、唐朝在周边族群的冲击和压力下，不得已建立了强大的边兵，在边兵与中央之间又形成一定程度的胡汉对立，最终发展为边兵的失控。本文以“边兵失控”为切入点，一方面考察了三次边兵失控在背景、条件、契机及影响等方面各自的特征，另一方面从农牧互动、胡汉冲突的角度考察了三者在结构上存在的共性。对三次边兵失控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尝试，为加深

理解中古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以及文化问题或有所贡献。

[1] 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

[2] 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

[3] 关于东汉凉州兵团，主要的研究有：朱子彦、吕磊：《论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薛海波：《试论东汉中后期羌乱中的凉州武将群体》，《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报）2008年第5期；森本淳：《东汉末年的羌族与汉族》，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陈勇：《凉州诸将与汉魏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91。关于北魏六镇叛乱，主要的研究有：康乐：《代人与镇人》，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四分，1990；胡玉春：《北魏六镇起义的原因和启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3期；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薛海波：《北魏末年镇民暴动新探——以六镇豪强酋帅为中心》，《文史哲》2011年第2期。关于唐代安史之乱，主要的研究有：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中华书局，2011；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改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李鸿宾：《唐代的民族交融与政治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4] 关于羌人起义有不同的分期说法，一般总言五次，大者三次，其实羌人之乱弥漫于整个东汉时代，羌人种类繁炽，叛乱彼伏此起。即使在典范的羌人起义分期的间歇期，亦有羌种叛乱和朝廷平定之事。

[5]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8页。

[6]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81页。

[7]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第1531页。

[8] 廖伯源：《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9] 孙毓棠：《东汉兵制之演变》，载孙毓堂《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

[10]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97页。

[11] 杨永俊：《略论汉代陇右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羌胡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

[12]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第250～251页。

[13] 杨永俊：《略论汉代陇右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羌胡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

[14]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90页。

[15] 陈勇：《凉州诸将与汉魏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91。

[16] 《后汉书》卷五十七《李云传》，第1852页。

[17]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48页。

[18]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794页。

[19]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763～769页。

[20]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766页。

[21] 梁伟基：《北魏军镇制度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22] 胡玉春：《从柔然汗国与北魏的关系看北魏北边防务的兴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4期。

[23] “六镇”经常出现在当时朝廷的文件中，以及皇帝、大臣的谈话中，是作为一个“专称”而存在。

[24]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702～704页；康乐：《代人与镇人》，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四分，1990。

[25] 《魏书》卷四《世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75页。

[26] 康乐：《代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拓跋魏的国家基础》，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1本第2分。

[27] 《魏书》卷十八《元渊传》，第429页。

[28] 薛海波：《北魏末年镇民暴动新探——以六镇豪强酋帅为中心》，《文史哲》2011年第2期。

[29] 张金龙：《北魏中后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和战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30] 《魏书》卷十八《元渊传》，第430页。

[31] 《魏书》卷十八《元渊传》，第430页。

[32] 《魏书》卷十八《元渊传》，第431页。

[33]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中华书局，2011，第7008页。

[34] 唐太宗：《执契静三边》，《全唐诗》卷一，中华书局，1960，第3页。

[35]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第322页。

[36] 王义康：《唐代经营东北与突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7] 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改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38] 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一百三十五《帝王部》之“愍征役”，中华书局，1989，第151页。

[39]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第429页。

[4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第428页。

[41]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第227页。

[42] 石云涛：《安史之乱：大唐盛衰记》，中华书局，2007，第64～67页。

[43]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第250页。

[44] 张国刚：《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45] 邢义田：《东汉的胡兵》，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28期，1973年。

[46] 这种羌胡化在社会中下层可能更为明显，凉州的上层分子还是向中原世家大族靠拢，如皇甫家族，皇甫规自觉向中原士大夫社会靠拢，而皇甫嵩已经被中原士大夫社会接受。

[47]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12～230页。

参考文献

一 典籍、简牍资料类

1.班固撰《汉书》，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

2.陈立撰《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

3.陈寿撰《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

4.范晔撰《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

5.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

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

7.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8.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

10.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

11.陆贾著、王利器撰《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

12.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13.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2011。

14.司马迁撰《史记》，裴骃集解，中华书局，1982。

15.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

16.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

17.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周天游点校，中华书局，1990。

18.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

19.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

20.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

21.魏收撰《魏书》，中华书局，1974。

22.谢桂华等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

23.严可均辑《全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

24.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

2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26.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

27.左丘明撰《国语》，鲍思陶点校，齐鲁书社，2005。

二 论著

1.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2.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3.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4.陈连庆编著《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5.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

6.陈启云：《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7.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陈启云文集》（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高专诚译，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9.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10.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01。

1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2.陈直：《居延汉简研究》，中华书局，2009。

13.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华书局，2008。

14.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5.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6.崔瑞德、鲁惟一撰《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7.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崇文书局，2003。

18.丹尼斯·塞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中华书局，2006。

19.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0.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21.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2.傅乐成：《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23.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

24.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5.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26.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

27.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2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9.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

30.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1.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

32.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中华书局，2010。

33.韩康信等：《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4.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

35.何兹全：《何兹全文集》，中华书局，2006。

36.侯仁之：《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7.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8.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9.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承志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40.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2004。

41.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2.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6。

43.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2009。

44.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5.雷戈：《史学理念与史家生存？》，人民出版社，2016。

46.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

47.雷虹霁：《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以〈史记〉〈汉书〉〈方言〉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48.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49.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0.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51.李景星：《四史评议》，岳麓书社，1986。

52.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2009。

53.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

54.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5.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

56.厉声等：《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

57.廖伯源：《秦汉史论丛》，中华书局，2008。

58.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59.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60.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1.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

62.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63.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64.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65.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辛德勇等译，中华书局，1993。

66.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上古秦汉》，黄金山等译，中华书局，1993。

67.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

68.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专论》，

高明士等译，中华书局，1993。

69.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0.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

71.迈克尔·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于振波、车今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2.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三联书店，2008。

73.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4.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5.吕思勉：《燕石札记》，商务印书馆，1937。

76.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中国书店，2002。

77.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8.马长寿：《氏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9.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80.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

81.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2.木芹：《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83.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84.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85.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5。

86.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

87.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5。

88.钱穆：《政学私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89.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

90.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1.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92.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

93.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94.宋超：《汉匈战争三百年》，华夏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95.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

96.孙家洲：《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泰山出版社，2001。

97.孙家洲等：《宏观中国史》（衰世卷），大象出版社，2003。

98.孙家洲主编《秦汉法律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9.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

10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中华书局，2011。

101.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

102.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03.田澍、何玉红主编《西北边疆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0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05.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

106.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07.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

108.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09.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110.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1.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12.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113.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4.王子今：《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115.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116.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

117.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武尚清译，中华书局，2004。

118.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农业出版社，

1984。

11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20.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21.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

122.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三联书店，2015。

123.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

124.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

125.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

12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27.徐喜辰等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28.许倬云：《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

129.许倬云：《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130.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31.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32.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133.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三联书店，2009。

134.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35.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

136.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9。

137.尹泽生等主编《西北干旱地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人类文明兴衰》，地质出版社，1992。

138.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张学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39.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4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41.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142.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43.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144.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45.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台北：正中书局，1973。

146.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7。

147.张大可：《三国史研究》，华文出版社，2003。

148.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印群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149.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150.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51.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 秦汉卷），中华书局，2009。

152.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 先秦卷），中华书局，2009。

153.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

154.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55.Denis Sino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56.Michael Loews，Edward L.Shaughness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57.Sechin Jagchid，Van Jay Symons，Peace，War，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Bloomington and Indianat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

三 论文

1.曹金华：《东汉前期统治方略的演变与得失》，《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

2.陈金凤：《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陈琳国：《东羌与西羌辨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4.陈苏镇：《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哲》2010年第6期。

5.陈晓鸣：《筹边失当与东汉衰亡》，《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6.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7.陈勇：《“凉州三明”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8.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9.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10.邓辉：《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1.窦连荣：《东汉初期封建割据者卢芳》，《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12.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二分，1993。

13.方诗铭：《董卓对东汉政权的控制及其失败》，《史林》1992年第2期。

14.方诗铭：《剑客·轻侠·壮士——吕布与并州军事集团》，《史林》1988年第1期。

15.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16.冯培红：《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上），《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

17.冯培红、孔令梅：《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中），《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

18.冯培红、孔令梅：《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下），《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

19.冯绳武：《甘肃河西水系的特征和演变》，《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1年第1期。

20.冯世明：《匈奴国家产生原因探析》，《民族论坛》2010年第6期。

21.高荣：《汉代河西的水利建设与管理》，《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

22.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23.顾颉刚、谭其骧：《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24.管东贵：《汉代的屯田与开边》，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一分，1974年6月。

25.管东贵：《汉代屯田的组织与功能》，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四分，1977年12月。

26.管东贵：《战国至汉初的人口变迁》，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四分，1979年12月。

27.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年第10期。

28.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学术研究》2008年第8期。

29.郝树声：《论月氏在河西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30.洪廷彦：《两汉三国的“夷兵”》，《文史哲》1958年第3期。

31.侯甬坚：《西汉政府在西北边疆开发中的投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

32.黄今言：《东汉军事史的若干特点和研究方法问题》，《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

33.黄今言：《说东汉在军制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南都学坛》1996年第2期。

34.黄留珠：《两汉孝廉制度考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35.黄朴民：《“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6.贾敬颜：《汉属国与属国都尉考》，《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

37.翦伯赞：《董卓之乱与三国鼎立局面之序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38.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下，1963年12月。

39.金庆浩：《汉代边疆地区统治理念的传播和意义》，《唐都学刊》2009年第4期。

40.劳榦：《从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1939年。

41.劳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年4月。

42.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43.李宝通：《顺逆殊路 功罪异途——窦融与隗嚣》，《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44.李并成：《汉张掖属国考》，《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

45.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46.李大龙：《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47.李大龙：《“屯田”并非赵充国治羌政策的核心内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

48.李芳：《建国以来月氏、乌孙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

49.李非、李水城、水涛：《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考古》1993年第9期。

50.李吉和：《秦汉时期羌族的内徙与经济社会的变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1.李正周：《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52.梁景之：《自然灾害与古代北方游牧民社会关系刍议》，载罗贤佑主编《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3.梁满仓：《论吕布与董卓的关系——兼论吕布的“反复无常”》，《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54.廖伯源：《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55.刘敏：《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56.刘磐修：《汉代河套地区的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57.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载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58.吕世浩：《平准与世变：〈史记·平准书〉析论》，载侯仁之主编《燕京学报》新十二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9.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

60.苗普生：《略论东汉三绝三通西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61.牧仁：《再析匈奴分裂原因》，《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2.牛润珍：《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为纪念尚钺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63.潘策：《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和匈奴及河西四郡的设置》，《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64.彭丰文：《汉魏十六国时期河陇大族势力的崛起及其在西北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

65.彭年：《冒顿请婚新议》，《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66.钱伯泉：《乌孙的种族及其迁徙》，《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67.森本淳：《东汉末年的羌族与汉族》，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

68.上官绪智：《两汉政权“以夷制夷”策略的具体运用及其影响》，《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69.上官绪智：《两汉政权“以夷制夷”策略运用的主要方式和特点》，《南都学坛》2006年第6期。

70.沈颂金：《汉简所见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及其相关问题》，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编《简牍学研究》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71.施丁：《秦汉豪族的呼声——读桓宽〈盐铁论〉》，《学术月刊》1999年第11期。

72.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载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

73.宋超：《汉匈战争对两汉社会心态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74.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刍议》，载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

75.孙家洲：《从中江塔梁子崖墓“胡人舞蹈图”论巴蜀之地盛行“胡舞”的原因》，《四川文物》2008年第4期。

76.孙家洲：《东汉光武帝平定“彭宠之叛”史实考论》，《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

77.孙家洲：《“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

78.孙家洲：《论汉代的“区域”概念》，《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79.孙力舟：《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分析——基于汉朝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

80.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

81.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5期。

82.唐晓峰：《先秦时期晋陕北部的戎狄与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地理研究》2003年第5期。

83.鹈饲昌男：《建武初期河西地区的政治动向——〈后汉书·窦融传〉补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

84.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

85.汪受宽：《两汉凉州士人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86.汪受宽：《两汉凉州畜牧业述论》，《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4

期。

87.王北固：《凉州兵团在三国史上的特殊地位——从马超助刘备取蜀说起》，《开封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88.王恩涌：《“人地关系”的思想从“环境决定论”到“和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89.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载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中华书局，1959。

90.王海：《秦汉时期“北边”略说》，《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

91.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92.王力、王希隆：《东汉时期羌族内迁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93.王庆宪：《匈奴冒顿单于的军事活动及其政治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4期。

94.王守春：《地理环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再认识——关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反思的反思》，《地理研究》1995年第1期。

95.王素：《高昌令狐氏的由来》，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学林漫录》九集，中华书局，1984。

96.王勖：《东汉羌汉战争动因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2期。

97.王勖：《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98.王子今：《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99.王子今：《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00.王宗维：《金城麹氏的活动及其族属问题》，《兰州学刊》1986年第5期。

101.王宗维：《秦汉时期匈奴与西羌的关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102.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吕宗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3.吴礽骧：《河西的汉代长城》，《文博》1991年第1期。

104.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二分，1969年6月。

105.邢义田：《东汉的胡兵》，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28期，1973年。

106.邢义田：《汉代的以夷制夷论》，台北：《史原》第5期，1974年。

107.徐蕾如：《我国历史时期几次气候变动对社会的影响》，《大自然探索》1990年第1期。

108.薛海波：《试论东汉中后期羌乱中的凉州武将群体》，《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09.薛海波：《试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羌》，《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10.薛小林：《从车驾出行看汉代地方官员的礼仪与权力》，《理论学刊》2011年第1期。

111.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112.阎步克：《王莽官制改革新论》，载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初编》，三联书店，2007。

113.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

究》2001年第4期。

114.杨际平：《西汉屯田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115.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116.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大学学报》1936年第4期。

117.杨永俊：《对东汉“羌祸”的重新审视》，《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

118.杨永俊：《略论汉代陇右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羌胡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

119.杨永俊：《论西汉的“隔绝羌胡”政策对两汉西羌之“祸”的影响》，《宜春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120.杨永俊：《论两汉时期羌汉战争中的“羌中之利”》，《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

121.杨永俊：《试比较“凉州三明”的治羌政策》，《西北史地》1996年第2期。

122.雍秉乾：《略论西汉文景时期对匈奴的积极防御政策》，《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23.尤成民：《汉代河西的豪强大姓》，《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

124.尤成民：《汉晋时期河西大姓的特点和历史作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125.臧知非：《汉代兵役制度演变论略》，《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126.臧知非：《“偃武修文”与东汉边防》，《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

127.张得祖：《〈三老赵掾之碑〉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28.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载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29.张世明、龚胜泉：《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1949）》，《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130.张忠炜：《〈居延新简〉所见“购偿科别”册书复原及相关问题之研究——以〈额济纳汉简〉“购赏科条”为切入点》，《文史哲》2007年第6期。

131.赵明：《东汉对西羌长期作战的原因与教训》，《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32.赵向群：《河西著姓社会探赜》，《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

133.周宏伟：《两汉时期河湟地理环境探索——兼论汉羌战争的主要原因》，《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134.朱子彦、吕磊：《论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3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36.佐藤长：《羌族的来源及其在前汉的活动》，梁今知译，《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四 硕博论文

1.陈勇：《凉州诸将与汉魏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91。

2.贾文丽：《汉代河西军事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1。

3.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

花”为重心的探讨》，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

4.任宝磊：《秦汉长城防御体系与民族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

5.王庆宪：《匈奴与西汉关系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3。

6.王惟贞：《东汉“明章之治”论析——明、章二帝巩固政权的措施》，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2007。

7.谢绍鹋：《两汉护羌校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7。

8.阎盛国：《秦汉时期招降战略战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

9.易华：《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10.张帆：《汉魏之际的凉州兵团》，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

后记

2009年的春天，我在中关村图书大厦闲逛，随手翻阅到王明珂先生的《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立刻被吸引住，农耕与游牧的问题就此在我心中埋下。当时我刚参加完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入学考试，心中充满着期待和不安。半个月后，在兰州，我拨通孙家洲老师的电话，询问考试结果，孙老师说："小林，你已经被录取了，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份师生情缘，非常高兴。"我永远记得那一刻的欣喜之情。

2008年夏天，老石和汉辰来兰州，我刚完成硕士论文的初稿，主题是关于秦汉郊祀封禅与皇权建设，汉辰翻阅后，见我引用了孙老师的一篇文章，就说："你要不然考孙老师的博士吧！"汉辰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就读，上过孙老师的课，故极力建议。我兴奋而无畏地报考了。

2011年春，我到孙老师办公室谈毕业论文的选题，最初的想法是，秦汉帝国在向南和向北扩张时，遇到的环境与敌人不同，因而应对的方式、扩张的模式有异，最终的结果和影响也各不相同，所以打算做秦汉帝国南北扩张的比较研究。孙老师肯定了这个想法，但指出这个选题的工作量过大，也颇有难度，是一个可以长期耕耘的课题，但对于博士论文而言并不易驾驭。老师建议我以"西州"这个汉代已流行的区域概念为中心，讨论秦汉西北方向的扩张，这是秦汉国家用力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区域。孙老师的点拨使我确定了写作方向，刚刚落成、条件优越的新图书馆成为我的阵地，九个月的时间，论文初稿和肚子上的赘肉一起成长，真是十分奇妙的历程。

孙老师待学生极为温和，也极为严格。当我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遇到困惑向孙老师寻求帮助时，老师的辨析和指点每每令我豁然开朗。孙老师更教我待人处事之理，至今仍然清楚记得跟随孙老师去济南拜访学界朋友，真切感受到建立在真诚和友善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温

度。师母待我们只有温和，让我们在北京的求学生涯没有那么艰辛。今年夏天在烟台，与老师、师母漫步在金沙滩上，辽阔大海、清凉海风，令人沉醉。

2011年冬，乔健老师打来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回母校工作。我认真考虑之后，向兰州大学提交了求职简历。乔老师是我的硕士导师，本科时候在乔老师的课堂上，就被他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魅力深深吸引。当获得保研资格后，我立刻联系乔老师，表达了跟从学习的愿望，最终有幸进到乔师门下。乔老师专治中国古代思想史，对春秋贵族精神、老子思想和陶渊明诗有独到的认识和研究。特别是乔老师本人的贵族风范，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对讲道理、守规矩和重信义的价值执守，润物无声地影响到每一位学生。2012年我回到兰州大学任教，乔老师担任我的教学指导老师，在教学上对我悉心指点，令我很快适应了身份的转变。

我一直深感自己的幸运。借出版这本书的机会，我要感谢的太多。

2011年冬天，我和相恋五年的女友何洁在海淀区民政局领取结婚证，成为一名丈夫。2016年夏天，志谕出生，我成为父亲，这一转变让我更体会到家庭的珍贵。感谢我的父母、弟弟小清、弟妹艳杰。感谢我的岳父岳母，岳母在兰州照顾谕谕，对此我怀着不尽的感激。

1990年，父亲为了我上学，举家从潞市乡村搬到钟祥县城，我得以有机会在县城完成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特别感谢张忠老师、陈国仿老师、王祖荣老师、王成老师！

2002年我成为兰州大学榆中校区的第二批本科生。白虎山下孤独的校区，但拥有尽职尽责的老师、热情的师兄师姐、可爱的同学，使我的大学生活依然精彩无比。

感谢王子今、彭卫、吕宗力、宋杰、宋超、邬文玲、赵凯、张忠炜等先生，在博士论文开题、写作及答辩过程中对我的帮助和提携。博士研究生论文的部分内容曾在《西域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中国民族学》等刊物发表，感谢各位编辑部老师以及审稿专家。

博士论文的出版，得到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支持，杨红伟院长对年轻教师的成长非常重视，致力于打造历史文化学院自由而活跃的学

术氛围，我们对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充满信心和期待。非常感谢陈凤玲编辑，她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专业的意见和热情的服务。

我记得在大学读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杨国强先生的《百年嬗蜕》，惊叹不已，原来这就是历史研究！历史是由事实、智慧、价值和反思构成的综合体，历史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只有了解更多才会思考更多。我在兰州大学学习七年，工作近七年，与这所学府的情感羁绊已经深植。在高校从事历史学的研究和教学，个人的兴趣爱好成为工作，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尤当珍视。大学的进步和发展应该是润物无声、沉稳积淀的，兰州大学在西部办学不容易，更应该珍惜和守护优良传统。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也将加倍努力，践行兰大“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校训精神，为兰州大学的更好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薛小林

2018年冬写于衡山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争霸西州：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薛小林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

（九色鹿）

ISBN 978-7-5201-5745-2

I.①争… II.①薛… III.①羌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②中国历史-研究-汉代 IV.①K287.4②K23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9657号

·九色鹿·

争霸西州：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

著者/薛小林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陈凤玲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3.75 字数：30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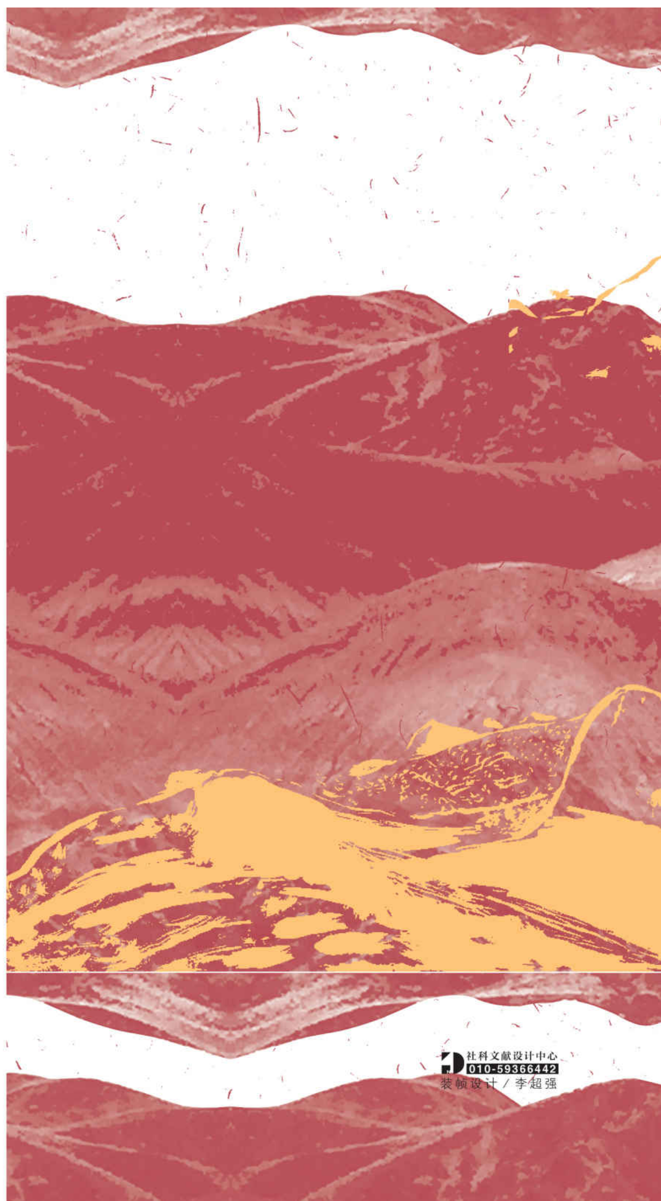
版次/2020年7月第1版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5745-2

定价/68.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6442
装帧设计 / 李超强

争霸西州

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

在两汉 400 年的历史里，“西州”是一个特别的地域，是汉廷、匈奴、西羌及诸多部族生活、战斗、贸易的中心，也是中央和地方势力军事较量、文化交融、相互影响的舞台，更是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体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多方势力持续的互动不仅使各自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与进程。西汉与东汉在西州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以及具体措施，因而产生了从西汉占据优势到东汉走向颓势以致最终亡于西州的强烈差异。

本书基于整个汉王朝演进的宏大背景，全面地呈现了两汉军事、经济、社会的变迁以及各自的鲜明特征。它带领我们深入汉代历史的内部，又跳出中原走向草原，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整个历史的进程，看中央王朝边缘的激烈交锋，边缘如何转化为影响中央王朝国势的重要力量。本书语言流畅、故事性强，内容丰富，读起来既有趣味，又可以收获丰富的知识，还可以了解更精彩的汉代历史。



出版社官方微信

九色鹿



www.ssap.com.cn


ISBN 978-7-5201-5745-2

9 787520 157452 >

定价：68.80元



九色鹿

付马 著

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

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付马　辽宁大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博雅博士后。学术专长为中亚史、古代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研究。

丝绸之路上的
西州回鹘王朝

9~13世纪
中亚东部历史研究

付马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序

丝绸之路在前近代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几大文明交流的桥梁，而今新疆所在的西域地区正处在文明交会的路口，生活在西域地区的各民族的先民在历史上共同承担着维护丝绸之路、传播东西方文化的重任。其中，公元9～13世纪立足于东部天山地区的西州回鹘王朝，就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知道，自唐代中叶以降，因为西北民族的隔绝，中原汉文史料对西域地区的记载较少，阿拉伯、波斯文著作也因为作者距离遥远，语焉不详；当地出土文书和文物比较零碎，又大多被外国探险队掠至欧美、日本，分散于各国。所以，这一时段的西域史号称难治，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断绝。付马博士知难而上，利用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进修学习的机会，系统收集了海外有关回鹘文等出土文献研究成果，并接触了芬兰、德国所藏新疆出土文书原件，全面把握国内外所藏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汉文、粟特文、摩尼文文书中的信息，以及传世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等原始文献，对相关研究成果经过仔细的阅读和消化理解，准确地把文书中的相关信息提炼出来，纳入其对西州回鹘王朝政治进程、族群认同、城镇建设的相关讨论当中，对前人的研究有了全面的推进。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他有力地论证了这一时段丝绸之路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西州回鹘王朝的经营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特别指出，西州回鹘对唐朝遗产的继承是丝绸之路延续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结论，是他对丝绸之路研究以及西域历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贡献。

付马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09年，他想跨专业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我开始以为“驸马”难教，不甚热情相待。但他执着于历史学，随即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先后随我攻读隋唐史专业的硕士学位和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在学期间，他曾赴赫尔辛基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进修深造，与国际同行切磋学术。现在，他又和我合作进行他的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研究。他英语能力超强，方便他接受阿尔泰学、突厥学和欧洲古典语文学的训练，逐渐掌握了回鹘语等古代民族语文，并能运用英、德、日、法、土耳其等现代外语阅读文献，符合今天国际学术交流的严格要求，是一个跨学科、多语言的学术人才。我越来越感到他治学态度严谨，时常有新的想法和发现，研究成果优异，而又年富力强，前途未可限量。

付马的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中古时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民族与文化上，这也正是我过去曾经着力研究的唐宋归义军史、西域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范围。与付马一起讨论西州回鹘王朝，听他讲述一个个新发现，我为他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日前付马拿来刚刚完稿的《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翻阅一过，欣喜莫名，因略述其学术研究之脉络及学术

贡献，聊以为序。

荣新江

2019年4月24日于朗润园

- 导论 西州回鹘史：史料与研究状况
  - 史料
  - 研究状况

- 第一章 前史：东部天山地区进入回鹘时代
  - 从“二庭四镇”到回鹘时代
  - 漠北回鹘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
  - 从回鹘西迁到西州回鹘政权的建立

- 第二章 西州回鹘建国史的重构
  - 西州回鹘王朝建立之初的挫折
  - 回鹘文历史文献xj 222-0661.09所记史事的性质
  - 西州回鹘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

- 第三章 回鹘不是“突厥”
  - 回鹘的自称
  - 漠北时代的回鹘与“突厥”
  - 回鹘文献中的“突厥”
  - 对“突厥”的贬低和对“突厥语”的接受：渊源初探
  - 小结

- 第四章 回鹘时代的北庭、西州与伊州
  - 回鹘时代的北庭城
  - 回鹘时代的西州诸城
  - 宋元之间伊州地区独立政权的出现

- 第五章 回鹘时代的丝绸之路天山南道诸城
  - 焉耆
  - 龟兹
  - 拨换
  - 巴楚（据史德）
  - 喀什

- 第六章 回鹘时代的丝绸之路天山北道
  - 隋唐时代天山北道的兴起
  - 回鹘时代文献所见天山北道各地
  - 从游牧带到城市带：回鹘时代天山北道的文化转型
  - 小结

导论 西州回鹘史：史料与研究状况

回鹘本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回鹘”一名最早见于唐贞元年间，但该族群此前已经先后以“袁纥”“韦纥”“回纥”等名称出现在汉文文献中。这些名字与“回鹘”一样，都是其本族语言自称“uyγur”在汉文中不同形式的转写。早在北魏时代，他们便以“袁纥”之名出现在史册中。当时他们是漠北高车部落联盟的一部。到隋代，他们在汉文文献中被记为“韦纥”，受突厥汗国统治。隋炀帝大业年间，韦纥与仆骨、同罗、拔野古等部族反叛突厥汗国独立，自称“回纥”。此后直到中唐，“回纥”一直是该族群在汉文语境中的名称。

公元8世纪中叶，回纥取代突厥，在蒙古高原建立起强大的汗国，成为威服诸部的霸主。762年，回纥汗国牟羽可汗率军进入中原与史朝义叛军作战，助唐朝最终平定安史之乱。次年，他携4名摩尼教僧人返回漠北，开摩尼教于回纥汗国。788年或789年，回纥上表唐朝，请求改名“回纥”为“回鹘”，获得唐朝的许可。从此，“回鹘”成为该族群在汉文语境中的正式名称。789年，吐蕃大军攻至唐北庭，回鹘出兵助唐，与吐蕃在东部天山地区展开了正面交锋。这场争夺的结局是回鹘汗国击败吐蕃，将东部天山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到9世纪初，回鹘汗国已经在东部天山地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并将势力范围辐射至中亚西部地区，成为欧亚草原东部最强大的政权。840年，回鹘汗国在天灾、内乱和外敌黠戛斯的进攻之下土崩瓦解，其部众向不同方向迁徙。回鹘贵族庞特勤率十五部西迁，后在原唐朝安西都护府的中心地区龟兹、焉耆一带建立政权。该政权被学界称为“安西回鹘”。866年，北庭的回鹘首领仆固俊异军突起，攻占西州等地，以西州和北庭为中心建立“西州回鹘”政权。大约在9世纪末，西州回鹘攻灭安西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

西州回鹘在汉文文献中又称“和州回鹘”“龟兹回鹘”“阿萨兰回鹘”等，亦常被学界称为“高昌回鹘”。在10～11世纪，西州回鹘是中亚东部最为强大的政权，是连接中原内地、中亚伊斯兰世界和草原地带的纽带。回鹘人本族语言是古突厥语的一种方言——回鹘语。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回鹘人最初沿用突厥汗国的官方文字突厥鲁尼文；后来也开始采用粟特文拼写其语言。他们以粟特文为基础创制本族文字回鹘文，至迟在9世纪将其用作官方文字。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地区陆续出土大量回鹘文写本、刻本资料，属于西州回鹘王朝及蒙古统治时代，反映了西州回鹘居民丰富的精神文化风貌。这些文字资料为学者研究西州回鹘历史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除回鹘文以外，汉文也是西州回鹘王朝早期通用的文字之一。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些西州回鹘时代的公文书上

可见西州回鹘宰相所用的一种印文，作："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反映了西州回鹘人对其政权的正式称谓是"大福大回鹘国"[1]。可知西州回鹘人在汉文语境下的自称仍是"回鹘"。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春二月辛丑，"西州回鹘遣使贡方物"[2]。是为该政权以"西州回鹘"之名首次见于史乘[3]。

12世纪初，辽朝王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中亚，建立西辽政权。西州回鹘逐渐丧失独立地位，成为西辽的属国。13世纪初，蒙古汗国崛起，西州回鹘背叛西辽而归顺蒙古，东部天山地区被纳入蒙古汗国势力范围。因其较早归顺且文明程度冠于西北诸部，西州回鹘的精英人士颇受蒙古统治者重视，多有入中原效力者。在元代的汉文文献中，逐渐固定以"畏兀儿""畏吾儿"等词指称西州回鹘地区的非穆斯林人口。本书所论说史事的年代主要在西州回鹘归顺蒙古汗国之前，因此笔者统一用"回鹘"指称该族群、用"西州回鹘"指称其政权，以求行文一致。在蒙古统治时代，西州回鹘所处的东部天山地区已经开始伊斯兰化。到15世纪，当地信仰佛教的人口已不占多数，佛教文化已然衰落。随着统一政治体的消失和文化信仰的转型，西州回鹘人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意识逐渐瓦解，该族群-政治体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西州回鹘人活动的地理空间是东部天山地区。天山山脉横贯我国新疆中部，向西延伸至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地理学意义上的东天山指天山山脉东部的博格达山、巴里坤山和喀尔力克山等山岭。在历史研究中，"东部天山地区"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东部天山地区所指正是东天山及其南、北两麓的盆地、草原地带[4]。处在其中的吐鲁番盆地、吉木萨尔以及哈密盆地恰是西州回鹘政权的核心地区。广义的东部天山地区则在狭义范围之外，再加入位于焉耆、库车和阿克苏以北的天山山脉及其南北的绿洲、草原地带，其大致范围相当于唐代北庭都护府辖境和安西都护府下龟兹、焉耆两镇所辖之地[5]。自8世纪末叶起，该地区落入漠北回鹘汗国的控制之下，后来又成为回鹘西迁的目的地。9世纪中叶，西州回鹘政权崛起，随后将该地区纳入势力范围。直到11世纪中叶，该地区几乎与西州回鹘政权的疆域重合。因此，近年来专门研究西州回鹘历史的学者多采取广义的东部天山的概念[6]。本书中的"东部天山地区"即取此广义概念。

西州回鹘王朝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历史与丝绸之路密不可分。抛开丝绸之路的背景研究西州回鹘历史，抑或在不理解西州回鹘历史的情况下讨论9~13世纪的丝绸之路东段，都很难准确地把握历史的全貌。厘清西州回鹘历史的基本问题，正是为进一步研究唐、元两代之间陆上丝绸之路历史打下基础。一般认为，陆上丝绸之路在盛唐时代一片繁荣，而随着唐朝势力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退出西域，陆上丝绸之路也随之衰落。在研究丝绸之路的著作中，唐代以后、元代以前的陆上丝绸之路往往被一笔带过，甚至忽略。这种现象的产生，跟中唐以后传世汉文史料对东部天山地区缺乏系统记载有关。而正是史料和相关研究的缺失，给世人造成了陆上丝绸之路在盛唐以后步步走衰的错误印象。通过对西州回鹘历史的重构及对9~13世纪丝绸之路东部天山段的复原，本书将展

现出这样一幅历史图景：丝绸之路东部天山段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在西州回鹘治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东部天山地区的城市文明在此期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正是丝绸之路经济繁荣的写照。

自8世纪末漠北回鹘汗国占领东部天山地区起，到15世纪末吐鲁番盆地居民主体伊斯兰化为止[7]，回鹘人作为主要族群在这一地区活跃了700年之久，发展出独特的西州回鹘文明。西州回鹘作为一支独立政权存续了约300年时间，是唐元之间中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民族政权之一。然而，在传世的汉文史籍和波斯、阿拉伯文历史地理文献中，有关西州回鹘的记载支离破碎，且颇多抵牾之处。这种情况使学界长期无法形成对西州回鹘历史面貌的整体把握。对其历史的具体细节，学界也颇多争议。甚至一些基础性的问题都尚未得到充分的回应。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属于西州回鹘时代的各种语文文字资料陆续被语文学家刊布。其主体虽为宗教文献，但其中钩稽出的史料已形成一定体量。这些资料已经足够与中原地区、伊斯兰世界的传世文献相互发明，为我们提供了补写甚至改写西州回鹘历史的可能。波斯文献记载，西州回鹘人已有本族的史书。在出土文字资料中就发现有这类文献的残卷（片），堪称其中最具史料价值者。本书旨在利用这些新史料，参照传世文献的记载，厘清西州回鹘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搜集、吸收、利用这些资料需要了解百余年来中国西北地区出土文字资料的流散、收藏和刊布情况，追踪国际语文学界的研究动向，掌握相关民族语文的语文学、文书学知识，且要熟稔相关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传世文献。上述要求限制了学者对于这类资料的系统利用，因此对西州回鹘历史的研究尚未充分获益于新资料的涌现。在正文论述开始之前，笔者尝试对出土文字资料，尤其是与西州回鹘历史相关的回鹘文资料做全面梳理，为学界提供这类史料的整体面貌。其后，笔者将梳理20世纪中叶以来各国学者对西州回鹘历史诸方面的研究史，尤其侧重介绍国内外学界利用出土文字资料研究西州回鹘历史所取得的成果，旨在为今后西州回鹘史、9～13世纪西北史地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史料学和学术史的铺垫。

史料

汉文传世文献和阿拉伯、波斯文历史地理文献对西州回鹘历史的记载都极为有限，其中还含有一部分辗转传抄的二手信息。传世文献提供的相关史料已经被前辈学者充分讨论。我国学者曾分别对不同时期汉文传世文献中有关回鹘、畏兀儿的史料进行整理、校注，方便学界研究利用[8]。阿拉伯、波斯文历史地理文献有关西州回鹘的记载也曾被学者系统归纳、讨论[9]。19世纪末20世纪初，鄂尔浑-叶尼塞古突厥语碑铭、敦煌-吐鲁番古突厥语文书和以《突厥语大词典》为代表的与古突厥语有关的抄本的发现使古突厥语语料的数量激增，为突厥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类资料中与西州回鹘有关的部分也为推进西州回鹘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笔者下面将以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新出文书、文献资料为中心，梳理其中与西州回鹘历史相关的史料。

1.《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 Luγāt at-Turk*）

此书由喀喇汗王朝贵族马合木·喀什噶里（Mahmud al-Kašγari）于11世纪70年代以阿拉伯语写成，是其献给黑衣大食哈里发、向其介绍突厥语族各部语言习俗诸方面之作。喀什噶里出身喀喇汗王朝统治阶级，据其书现存抄本中出现的4处纪年，学者考证此书的写作始于1072年1月，定稿于1077年1月[10]。词典中收录不少与西州回鹘有关的词条，是反映11～12世纪西州回鹘王朝历史的重要材料。此书抄本仅有一件孤本传世，现藏于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国家图书馆（Millet Genel Kütüphanesi），最早由土耳其人日法特（K.Rifat）重抄并刊印，得为世人所知[11]。此后，德人布罗克曼（C.Brockelmann）据日法特之抄印本编纂词典，首次将《突厥语大词典》所含词条以现代语言公布[12]。土耳其学者阿塔拉伊（B.Atalay）首次将写本完整翻译成现代语言（土耳其语），并刊布写本原卷的图版[13]。虽然阿塔拉伊可以看到原卷，但其翻译多借助于日法特的抄印本，并非基于对原件全面的语文学研究，因此脱讹较多。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者将《突厥语大词典》译成乌兹别克语出版[14]，所据应当是阿塔拉伊的土耳其语译本。克劳森（G.Clauson）在其名著《十三世纪以前突厥语词源词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中也援引《突厥语大词典》中所出现的词条，均参引自阿塔拉伊刊布的原件图版，但仍有讹误。1963年，胡振华、耿世民先生撰文向汉语读者介绍该文献及其作者[15]。1978年，张广达先生撰文全面介绍《突厥语大词典》的史料价值[16]。我国学者于同年开展该文献的翻译工作，先出版了维吾尔语译本3卷，后来又出版

汉译本3卷[17]。维吾尔语译本依据阿塔拉伊刊布的原卷图版，并参考其土耳其语译本以及乌兹别克语译本。汉语译本则是译自维吾尔语译本。1982年，美国学者丹科夫（R.Dankoff）出版《突厥语大词典》的英文本，包括所有突厥语词条的换写、转写、全书的英译以及原卷清楚的图版[18]。丹科夫的英文本建立在作者直接对原卷进行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堪称《突厥语大词典》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2005年，土耳其学者图巴（S.Tuba）又出版了最新的土耳其语译本[19]。

2.敦煌出土的回鹘文写本、刻本

在已知的回鹘文出土文字资料中，年代较早的一批出自敦煌藏经洞，属于9～10世纪的遗物。英藏和法藏的敦煌文书至今尚未全部刊布，其中回鹘文书的刊布和解读主要依赖于少数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方面成果最为丰富的是法国学者哈密屯（J.R.Hamilton）。他在《9～10世纪敦煌回鹘语写本》中刊布了英藏、法藏敦煌文书中出自藏经洞的共38个编号的回鹘文写本图版，并对文本做出转写、法文翻译和注释[20]。这些写本包括大量的世俗文书和包含历史信息的宗教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之前，他还曾刊布同样出于藏经洞的长篇回鹘文文献《善恶二王子的故事》（法藏Pelliot chinois.3509、英藏Or.8212/118）[21]，此文献应译自《大方便佛报恩经》的讲经文《双恩记》[22]。在英藏敦煌文书中，已刊布的出于藏经洞的回鹘文书还有Or.8212/104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长卷[23]，系年代最早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之一。此外，还有一些以其他文字写成的古突厥语文献，如以鲁尼文写成的册页装《占卜书》（Or.8212/161）[24]、以摩尼文写成的卷轴装《摩尼教徒忏悔书》（*Xwāstwānīft*, Or.8212/178）[25]、一件鲁尼文摩尼教文献残叶（Or.8212/78＋Or.8212/79缀合）[26]等。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在“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 IDP）[27]的网站中看到其中一部分文书的高清照片。然而，英藏文书尚没有全部公布，要看到其中全部的回鹘文书照片仍需时日。法藏敦煌文书中编为回鹘文的只有16个号。多数的回鹘文书抄写在汉文、粟特文和藏文文书的背面，因此被编在相应的汉文、粟特文或藏文文书的编号下。虽然现在法藏敦煌西域文书的照片大部分已经登在网上，但是使用“回鹘文”作为条件检索，只能检索到编为回鹘文的16个编号以及汉文编号Pelliot chinois.3509号《善恶二王子的故事》等几件文书，而编在其他语文目下的回鹘文书则无法通过检索引擎找到。日本学者曾在1978～1980年赴巴黎留学期间调查法藏、英藏敦煌文书，现可依据其在《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书》中的全面介绍了解两地藏回鹘文书的概况[28]。

除了藏经洞所出的早期回鹘文书外，英藏、法藏文书中还有出自莫高窟北区的晚期回鹘文书，年代属于蒙元时代。英藏Or.8212/109为一部草体回鹘文书写的册页装书籍，内容系蒙元时代所译藏传密教文献

[29]。法藏中有伯希和从莫高窟北区464窟中攫取的大量蒙元时代回鹘文书，大都没有刊布[30]。哈密屯曾刊布其中编入Pelliot ouigour 目下的一件（Pelliot ouigour 16 bis）[31]。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敦煌遗书以1910年自敦煌运来北京的藏经洞劫余文书为主体，加上后来陆续从各地收集而来的敦煌文书。这其中有若干回鹘文书，但它们未必都出自藏经洞。目前国图所藏敦煌汉文文书的图录和胡语文书的图版已经全部刊布在《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共计146册[32]。方广锠等编有总目录[33]。国图藏敦煌文书的照片也陆续刊布在“国际敦煌项目”网站，但目前还没有上传任何回鹘文书的照片。在国内各地散藏的敦煌文书中也有一些回鹘文书。2007年以前已经刊布图版者，可根据申国美所编散藏目录搜索[3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收藏一批敦煌文献。在2013年刊布的馆藏图录中有数件回鹘文书图版[35]。据笔者观察，其中两件为草体回鹘文，年代较晚，应当不是藏经洞所出。

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全面调查和发掘了莫高窟北区共248个洞窟，包括原本编在莫高窟名下的461～465窟和新编号的243个洞窟（B1～B243），收获相当数量的回鹘文书[36]。出土回鹘文书的总览和部分文书的释读分别附在三册考古报告中[37]。后来出版的研究论文集则收有学者对回鹘文书的整体研究、对具体文书的解读以及对前期研究的修订[38]。

俄国的中亚收集品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Sain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其中有大批回鹘文书，大多数出自吐鲁番，少量出自敦煌、酒泉、黑水城等地[39]。俄藏的回鹘文书没有全部刊布，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东洋文库陆续获得约4000件俄藏胡语文书的缩微胶卷，以回鹘文书为主、兼有粟特文和摩尼文文书，也夹杂有其他语言的文书，大都是SI大号目下的文书，少量是M（＝Manichaica 摩尼文）、P（＝Prilozheniye 附录，原件不存，馆藏仅余照片）和FB（＝Foto Box，原件不存，馆藏仅余照片）大号目下。这些文书绝大部分是科洛特科夫的收集品。日本学者因此有机会全面研究俄藏回鹘文书，并编有初步的目录作为内部资料[40]。该目录给出了文书的俄藏编号、文本的性质和行数、关键信息备注以及研究文献目录。别册一本则是以东洋文库照片编号为序，系上对应的文书编号。据该目录可知，其中有少量文书出自敦煌。这些出自敦煌的回鹘文书都属于奥登堡搜集品，包括SI O 77～88、90～105等号[41]，内容以佛经为主；有个别以草体回鹘文书写，说明它们不都出自藏经洞。也有少量世俗文书，如SI O 86号正面为一件回鹘文契约。

3.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写本、刻本

如前所述，各国所藏吐鲁番文书也正陆续在IDP网站刊布。但是，回鹘文书的数字化速度很慢，使用“回鹘文”为条件进行检索，目下仅可搜到559件文书，且大半没有照片或目录信息不全。要检索世界范围内的吐鲁番回鹘文书，仍须依靠《吐鲁番文书总目》的《欧美收藏卷》[42]和《日本收藏卷》[43]。尤其是《欧美收藏卷》参引了2007年以前出版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包含更为全面的胡语文书目录信息。另外，艾鸿章（J.Elverskog）所著《回鹘佛教文献》一书列举了1997年以前已刊布或比定出的回鹘佛教文献，可供学者在各国所藏的回鹘文写本、刻本中检索内容属佛教题材的回鹘文献[44]。

德国是收藏吐鲁番回鹘文书数量最多、整理刊布工作做得最为系统的国家。德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为其国内所藏各种东方写本编目，成果以《德国东方写本目录》（*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 VOHD）丛刊的形式陆续出版。其中的古突厥语写本系列（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计划刊布以各种文字写成的古突厥语文书的目录信息，是检索德藏回鹘文书的终极目录。该系列按照文书内容分册，计划出20册。在每册目录中，编者给出属于该类文献的写本（刻本）残片的目录信息、形态描述，并附有残片上首尾数行的转写，便于研究人员进一步拼缀残片。目前已完成19册，仅第4册由劳特（J.P.Laut）负责的《弥勒会见记》至今未见出版。第1～2、5～9册皆在2007年以前出版，均为《欧美收藏卷》编目所参引。2007年以来，又陆续出版了12册目录。第10册是佛教故事专题[45]，包括回鹘文本生故事、佛传和譬喻故事，其中属于《十业道譬喻蔓》的文书数量最多。第11、12和15册则涵盖了全部的回鹘文刻本文献。第11册的内容是密教文献[46]，第12册是伪经、大乘经、佛教故事、陀罗尼类文献、经论和题记[47]，而第15册则是头韵诗、历日、插画等[48]。第13、14册包含所有公私文书[49]。第16册是大乘佛教的经、论，其中大宗为《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和《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50]。第17册是医学文献、民间宗教和仪式[51]。第18册是《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专号[52]。第19册则是续完第1册以婆罗米文、藏文书写的古突厥语文书的目录[53]。目前丛刊已经覆盖德藏古突厥语文书的大部分编号，方便不同领域的学者按照各自所需的题材来查找文书信息。对于研究回鹘史的学者最重要的是威尔金斯（J.Wilkens）所编的第8册《德藏摩尼教突厥语文献目录》[54]和拉施曼（S-Ch.Raschmann）所编第13、14两册公私文书目录。跟《欧美收藏卷》相比，虽然这套丛刊包含更为全面的德藏古突厥语文书目录信息，但它对于历史学研究颇有不便之处。一是按内容分册的体例不利于按号查找文书信息。二是目录信息大都侧重在语文学、文献学和历史语言学方面，而不提示文书中所含的历史信息。

自1997年9月至2005年6月，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在“数据化吐鲁番图库”（Digital Turfan Archive）项目下将柏林国家图书馆藏的8500件古突厥语、5000件中古伊朗语和100件蒙古语文书的图片全部刊布在其网站上，但是图片只有编号，没有其他目录信息[55]。从2005年11月起，柏林藏的汉文文书和藏文文书也陆续刊布在

IDP网站上。原藏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编号在MIK目下的吐鲁番文书也陆续刊布在IDP网站上。

德藏古突厥语文书多数以回鹘文写成，编在U（＝回鹘文）、Ch/U（＝汉文/回鹘文）、Mainz和MIK（＝印度艺术博物馆，即今亚洲艺术博物馆）4个号下；少数以摩尼文写成，编在M（摩尼文）号下；还有一些以婆罗米文、藏文、叙利亚文和鲁尼文写成。在非回鹘文的编号之下，也夹杂有回鹘文书。比如，在M编号摩尼文文书中，M 112正面是摩尼文粟特语文书，背面就是著名的回鹘文摩尼寺被毁文书。又如，在Ch编号下的汉文文书中，Ch 2301的正面写的是汉文《四分律》，背面则抄有回鹘文《金光明经》。此外，还有若干回鹘文书被编在粟特文目下。因此，要全面把握德藏古突厥语文书，除了要注重U、Ch/U、Mainz和MIK这4个编号外，也应当将其他目下的文书过目一遍。M编号的文书早在1960年就由博伊斯（M.Boyce）统一调查编目[56]；近年则有前述威尔金斯的《德藏摩尼教突厥语文献目录》，涵盖了其中所有的突厥语文书，可供我们使用。用婆罗米文、藏文书写的古突厥语文献由茅埃（D.Maue）全部整理编目，方便检索[57]。德藏汉文文书中的佛教文献部分已有德国学者编纂的2册目录[58]和日本学者百济康义续编的第3册目录[59]，非佛教部分则先后由荣新江先生和西胁常记编有目录[60]；上述目录信息均被《欧美收藏卷》所参引，可借此检索Ch号下文书的信息。

20世纪初，在德国吐鲁番探险活动尚未完全结束之时，德国学者就已经开始刊布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书[61]。时至今日，相关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不胜枚举。荣新江先生曾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德国学者自20世纪初直至90年代初的研究成果[62]。关于德国学者的研究目录，除上文提到的《欧美收藏卷》、VOHD丛刊古突厥语系列各册以外，还应参看由劳特等德国学者于2000年出版的《古突厥语研究论著目录》[63]。这份目录按年代编纂，囊括1820年以降直到1999年各国学者对于伊斯兰化以前古突厥语言、文献以及突厥语族各部历史的研究。由于此研究目录系德国学者所编，所以很少遗漏德国学者历年来的相关论著。其后自2002年起，劳特还在乌拉尔阿尔泰学会的德文年鉴《乌拉尔阿尔泰年鉴》（*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上陆续发表对该目录的增补[64]，使这份目录能够与时俱进。鉴于上述情况，笔者在此仅择要介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对于德藏回鹘文献的刊布情况。

民主德国自1971年开始组织学者系统刊布收藏在柏林的吐鲁番文书，成果以《柏林吐鲁番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 ＝ BTT）丛书形式出版。两德统一以后，原藏于联邦德国美因茨科学院的吐鲁番文书也入藏柏林，《柏林吐鲁番文献》逐渐成为刊布德藏吐鲁番文书的“正途”，有些以前零散刊布的文书也重新按语言和题材结集在此丛书中出版。另外，丛书并不止于刊布德藏吐鲁番文书，也刊布散藏于其他国家的吐鲁番文书，尽量将分散各地的同类文书集结于一册中刊出。古突厥语文书在BTT丛书中占很大比重，内容以佛教文献为主。70～90年代出

版的一系列分册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第5册由茨默（P.Zieme）编纂的《摩尼教突厥语文献》[65]。书中首次刊布编在U、Ch/U、MIK以及当时藏在西柏林的Mainz号下的一大批突厥语摩尼教写本残片，内容包括忏文、赞文、教徒书信等，富含历史信息，至今仍常为学界参引。90年代中期以后，茨默又先后出版了回鹘文《金光明经序品和第一卷》（BTT 18）[66]、《维摩诘所说经》（BTT 20）[67]、《回鹘佛教陀罗尼类文献》（BTT 23）[68]。威尔金斯编著回鹘文《金光明经第三品》（BTT 21）[69]、《慈悲道场忏法》（BTT 25）[70]。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汇编了回鹘文般若类佛经及注疏数种，包括《金刚经》《心经》等（BTT 28）[71]。笠井幸代则刊布了回鹘文本《维摩诘所说经疏》（BTT 29）[72]。对于回鹘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一册则是笠井氏的博士论文《回鹘佛教文献题记》，2008年作为丛书第16册出版[73]。她在大作中全面研究了藏于德、英、法、俄、日、中、瑞典等国收藏机构的回鹘文佛经题记写本、刻本。其中既有首次刊布的文书，也有对曾经发表过的文书进行再研究，学者可以从中检索到丰富的历史信息。丛书在2015年最新出版两册。一册是小田寿典对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全面研究的英文版（BTT 33）[74]。另一册则是庄垣内正弘等对于回鹘文音写汉字现象的系统研究（BTT 34）[75]。后者归纳出了回鹘人读汉字的两套系统：沿用汉字读法的“音读”和“回鹘化读法”。书中还有对以回鹘文音写汉语的长篇文献德藏U 5335的首次全面研究。然而，吐鲁番文书中对于历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两类——法令文书和书信的汇编尚未能面世，日本学者松井太和正在分别筹备中，我们翘首以盼。森安氏研究的主要部分已经提前以日文发表在其2015年的著作中[76]。

乌拉尔阿尔泰学会丛书（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 Uralo-Altaica = VdSUA）以德语专著为主，作者大都是德国籍或有德国学术背景的学者，内容遍及乌拉尔阿尔泰学各个领域。丛书中常见针对某一类回鹘文书的整体研究，以前国内学界并没有充分注意到。丛书第34号是研究《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下称《慈恩传》）的专号“玄奘的生平与著作”（Xuangzangs Leben und Werk）[77]，现已经出版11种相关专著，内容涉及对汉文《慈恩传》各章节的译注[78]、对回鹘文《慈恩传》各章节的译注、对回鹘文《慈恩传》的词语研究[79]等。其中第3[80]、5[81]、7[82]、9[83]、10[84]、11[85]种分别是对回鹘文《慈恩传》第7、8、3、10、9、5卷的汇编和译注，所依据的是1930年在新疆发现，现分散在巴黎、北京和圣彼得堡三处的一种《慈恩传》写本，并参考了葛玛丽（A.von Gabain）当年对巴黎、北京藏残卷的研究。《慈恩传》汉文10卷本由慧立、彦悰著于7世纪，而回鹘文10卷本则由西州回鹘著名的胜光阇梨都统（ŋqo li Tutuŋ）于10世纪末期[86]对译汉文本10卷而成。前5卷记叙玄奘早年事迹及其途经西域赴印度求法之经历，其中第2卷和第5卷分别详细记载了7世纪早期玄奘往返印度过程中行经西域的见闻，对西域史地研究最为重要[87]。现存第5卷前12叶藏在巴黎，后88叶藏在圣彼得堡，保存较完整。而第2卷仅存残片24叶，是本卷最末部分，中亚地名大都不存；其中14叶由茨默发表[88]。丛书第44号是拉施曼的博士论文，全面研究了与棉（böz）有关的回鹘文吐鲁番文书

[89]。该书第6章讨论棉布（“官布”）在西州回鹘王朝的社会经济作用，最为重要。第71号是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对拉德洛夫（F.F.Radloff）曾刊布过的《四众经》中的一个传说的再研究[90]。最近的相关专著则是第74号zertural对于勒柯克当年刊布在Manichaica I、III两册中的回鹘摩尼教文献的再研究[91]。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保存有300件回鹘文书的照片，均系突厥学家阿拉特（R.R.Arat）于20世纪30年代从柏林拍摄带回。阿拉特1900年生于喀山，是喀山鞑靼人，本名Gabdurraschid Rachmatullin。1928～1933年，他在柏林大学随邦（W.Bang）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德国探险队所获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编目工作。当时他以热合买提（Gabdul Rašid Rachmati）之名刊布了《突厥语吐鲁番文献》（*Türkische Turfan Texte*）的第6、7两卷[92]。1933年，他受凯末尔邀请赴伊斯坦布尔大学任教，开创土耳其古突厥语文学，并以阿拉特之名著名。他本人研究的兴趣为回鹘文诗歌和经济文书。在离开柏林之前，他将此类文书拍照，随后带到土耳其。德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一部分在“二战”之后不知所在，其中包括阿拉特所摄照片中的80张照片的原件。这80张照片因此成为伊斯坦布尔独一无二的藏品。

阿拉特身后，这些照片保存在伊斯坦布尔大学。20世纪80年代起，由赛力海牙（O.Sertkaya）负责整理。赛力海牙本人陆续发表了对其中法律、经济文书的研究成果[93]。照片中与棉花有关的契约文书交由德国学者拉施曼研究，收入其博士论文暨前引专著中。在阿拉特遗留的材料中，还有邦、葛玛丽、缪勒和勒柯克等早期学者对一些文书的转写手稿，其中一些文书原件现已不存[94]。在阿拉特照片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7件原件不存的世俗文书。其中5件收入《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中（Sa11、Lo18、Mi30、Mi31、Mi32），另外2件则有松井太最新的研究[95]。阿拉特照片的目录业已由拉施曼和赛力海牙合作出版[96]。

俄藏回鹘文书大部分出自吐鲁番。拉德洛夫是最早刊布俄藏回鹘文书的学者[97]，其最重要的成果是专著《回鹘语学志》[98]，内容包含百余件俄藏、德藏回鹘文世俗文书。其中一些文书的原件已经失落。拉德洛夫之后，马洛夫（С.Малов）继续刊布俄藏回鹘文书[99]。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担纲整理、刊布俄藏回鹘文书的主力是土谷舍娃（Л.Тугушева）。在其刊布的俄藏回鹘文书中，对于研究西州回鹘历史较为重要的是：其1971年刊布的行政军事文书[100]、1996年刊布的两件入破历[101]以及含有“卜古”（γ）之名的早期回鹘文书[102]。她集中刊布的重要的大宗写本是俄藏回鹘文《慈恩传》。她于1980年出版专著刊布其中部分残片[103]。1991年，她将俄藏全部回鹘文《慈恩传》写本残片刊布，包含有第5（88叶）、6（46叶）、8（30叶）、10（24叶）卷，其中内容最全的第5卷对于历史地理研究最有价值[104]。她在大作中给出了全部188叶残片的转写、俄译和较为清楚的图版。可惜她不懂汉文，因此没有给出汉文本的对照研究。2008年，她刊布俄藏回鹘文《阿弥陀经》（＝白莲社经）的全部残叶[105]。2013年，其大作《新疆出土10—14世纪回鹘文世俗文书》以俄文出版[106]，代表了其对俄藏回鹘文

世俗文书的研究水平。书中新刊布多件俄藏文书，包括一些原件已丢失的文书照片；还对拉德洛夫等早期学者已刊布文献进行重新研究。该书为西州回鹘历史研究新添了一批重要资料。

另外，1992～2001年，中俄两国合作出版俄藏敦煌汉文文书的全部图录，共计17卷，涵盖俄藏Ф和Дх两个编号[107]。虽然名作“俄藏敦煌文献”，但是在这两个编号下还混有吐鲁番和西域其他地区出土的文书。在一些汉文文书的背面，还抄写有回鹘文等民族文字。这些回鹘文书并不包括在日本东洋文库所获缩微胶卷之中，尚没有被全面、充分地研究，值得注意。

黄文弼在1927～1933年中瑞西北联合考察中，曾于1928年、1930年两次在吐鲁番考古，其所获文字资料的图片刊布在1954年出版的考古报告《吐鲁番考古记》中[108]。图片中有以回鹘文书写的写本、刻本、石碑（拓片）以及石窟寺壁画题记碎片。这些资料既有他在吐鲁番当地收获者，也有从乌鲁木齐（迪化），甚至库车等地购入者，书中附录《古维吾尔文说明》介绍了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基本情况[109]。黄文弼所获回鹘文资料中的一部分收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经日本学者梅村坦的实地调查知共计16件[110]。其他文书、文物的保存状况不明。黄文弼所获回鹘文资料中最为重要者如《摩尼教寺院经济文书》（图87）、《土都木萨里修寺碑》（图99）、摩尼教历日（图88）等过去已有学者做过完整研究，这些重要文书的价值及最新研究情况可参看荣新江先生的概说[111]，此处不敷述。但是，《吐鲁番考古记》出版年代久远，其上刊布的照片质量不尽如人意，很难为学者利用；大部分原件又不能为一般学者所见，有些甚至不知所在。因此还有一些回鹘文资料至今没有被充分研究，甚至尚未被解读发表。前文提到梅村坦曾调查其中收在国家博物馆者，编有目录，并翻译了其中5件文书（图80、82、84、85和95），但是没有给出转写和注释。对于《吐鲁番考古记》所刊布回鹘文资料最新的目录信息，应当参看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先生2014年发表的简目，他还在论文中详细介绍了其中的宗教文献[112]。在上述三位的调查和总结的基础上，笔者尚有个别信息需要补充。图80现藏于国家博物馆，除梅村坦做了调查和大致翻译之外，曾利用梅村坦拍摄的照片做出更加细致和准确的释读。他在其大作《回鹘摩尼教史研究》中对文书做了换写、转写和翻译，准确比定出文书为某摩尼寺入历，并读出了文书中与摩尼教有关的词语和一些地名[113]。学界对《摩尼教寺院经济文书》（图87）的解读又有新的推进[114]。黄文弼在吐鲁番所获的回鹘文书或许并没有完全刊布在《吐鲁番考古记》中。比如，黄文弼在书中解说道：“第94图，系在库车搜购，共二件。一、宽61厘米、高41.5厘米，有签押。一宽60.5厘米、高24.5厘米。前件经冯家昇先生译出，系一卖地契”[115]。但是在图版中，图94（图版104）仅见其一，不见其二[116]。梅村坦在原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调查中也未见图94的另一叶。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曾在1959～1975年和1997～2006年（新获吐鲁番文书）先后两次大规模收获吐鲁番文书，但这两次所获的文书大

都属于西州回鹘时代以前，与本书内容无直接关系。与西州回鹘时代相关最大宗的文书收获当属1980～1981年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文书。1980年冬，吐鲁番地区文物局考古工作人员在清理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崖前积沙时发掘出约800件汉文、回鹘文和粟特文文书残片。1981年，又在65号窟清理坍塌积土时发掘3件粟特文、5件回鹘文摩尼教书信，最为引人注目。这批摩尼教书信以及窟前所出数件粟特文佛典残片由吉田丰和森安孝夫解读，解读成果与书信的照片一起结集成书出版[117]。另有一件编号为81TB10: 06-3的回鹘文书写于蒙元时代，但所记是8世纪回鹘人改宗摩尼教相关史事，引人注目，近年已由茨默解读并发表[118]。其他的回鹘文书主要由伊斯拉菲尔玉苏甫研究、发表。他和多鲁坤阚白尔合作刊布其中四种文献，包括《傅大士颂金刚经》残片1叶、《无量寿经》3叶、押头尾韵的诗歌1叶以及一种摩尼教经文，他们定为“美味经”[119]。后来，他又陆续刊布了其中的一些世俗文书和佛教文献[120]。1980～1981年柏孜克里克出土文书现存于吐鲁番博物馆，其中的回鹘文文书交由日本学者梅村坦编目。

在吐鲁番地区零散出土或征集的回鹘文书大都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但没有统一整理、刊布，整体情况不为人知。伊斯拉菲尔·玉苏甫曾陆续发表对这些文书的研究文章，学界得以逐渐知晓其内容。1965年，吐鲁番当地农民在安乐故城南的佛塔遗址中掘得一批文物，年代从魏晋直到蒙元，其中有一件写有回鹘文的木柱，现藏于自治区博物馆；伊斯拉菲尔·玉苏甫给出此木柱文书的转写和汉译[121]。1969年，高昌故城出土一件回鹘文领钱收据，其中含有汉文一行，属双语文书；20世纪70年代末在木头沟还出土有一件回鹘文《大般涅槃经》的译经题记残片[122]。

我国另外一家批量收藏回鹘文吐鲁番文书的机构是大连市旅顺博物馆。他们的此类馆藏继承自日据时代留下的大谷光瑞收集品。馆藏文书尚未全部刊布，整体情况未知。近年来该馆一直与龙谷大学合作整理、研究馆藏吐鲁番文书，工作重点在大件的佛教文献方面。2006年两家合作出版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共编，法藏馆，2006），刊布了一些汉文佛教文献，其中一些大卷的汉文佛经背面写有回鹘文。同年出版的对于这批文书的研究论集中有松井太对于其中回鹘文部分的初步比定[123]。2012年还出版了以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文书为主题的会议论文集《中亚出土的佛教写本》[124]。

日本所藏敦煌、西域文书大多为大谷探险队所获。大谷收集品今天分散在日、中、韩三国多家公、私机构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多数在日本[125]。大谷收集品中的文字资料（文书、木简等）主要收藏在京都的龙谷大学。其主体是战后由旅顺运回西本愿寺、再由西本愿寺交付龙谷大学的两大木箱资料。日藏的大部分回鹘文书就在这里。“二战”以后，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致力于整理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中的胡语文书。1961年，羽田明、山田信夫发表了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文书中编号1097～8131号的回鹘文书目录信息[126]。这批文书主体是佛教文献，但其中的契约文书和公文书对于历史研究极有价值。日本学者自护雅夫、山田

信夫一代即开始系统研究、刊布其中的契约文书，形成深厚的学术积淀，时至今日已经取得令国际学界瞩目的成绩。护雅夫于1958～1959年先后在伊斯坦布尔和汉堡留学，分别随当时顶尖的突厥语文学专家阿拉特和葛玛丽学习，掌握了以现代语文学方法解读回鹘文书的要领。自1960年开始，他接连发表数篇关于契约文书的研究[127]。山田信夫也从1961年开始陆续发表相关论文[128]。后来，他逐渐成为日本学界研究、刊布回鹘文契约文书的主要人物，其研究范围也扩大到世界各地所藏的回鹘文契约文书[129]。1984年，他率日本新一代突厥学家小田寿典、梅村坦和组成回鹘文契约文书整理小组，全面整理、刊布回鹘文契约文书。山田信夫于1987年去世，其学术事业则由小田、梅村和森安三位学者继承。他们在德国专家茨默的协助下编辑出版《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皇皇三卷巨作，包括山田信夫在这一领域发表的18篇论文（第1卷）、各国所藏的共121件契约文书的转写和日、德语翻译（第2卷）以及各件文书清晰的图版（第3卷）[130]。他们三位各自在回鹘文契约文书的研究方面都有所贡献[131]。除了上述羽田明、山田信夫的目录，以及《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所刊契约文书外，今天我们还可以利用的目录是前引《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日本收藏卷》覆盖了上述两书并充分参考了日本其他藏家2005年以前刊布的图录，但对于回鹘文书的研究文献收集仍不全面。此外，除已经编目的1097～8131号内的回鹘文书，龙谷大学所收藏的回鹘文书还有一些并没有被编入上述目录中[132]。近年来，又有一批橘瑞超私人收藏的西域文书在日本西严寺被“再发现”，其中有91件回鹘文残片，以前并不为人所知[133]。

4.其他地区出土的回鹘文写本

1911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获得出土于莎车县的15件文书。其中7件以阿拉伯文书写阿拉伯语，5件以回鹘文书写古突厥语，还有3件则以阿拉伯文书写古突厥语，均系11世纪晚期的土地买卖契[134]。8件突厥语文书均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点的写本，文书中所提及人物多有穆斯林名字，说明当时当地已经开始伊斯兰化。但是，文书有以回鹘文写成，且各件文书格式均采用汉文土地买卖契的格式，或暗示当时尚在伊斯兰化初期。

1960年，巴楚县托库孜萨来遗址出土一批古代写本，其中也有几件以回鹘文或阿拉伯文书写的古突厥语文书[135]，内容和年代可能与上述莎车县出土的文书类似。巴楚县位于喀什与库车之间，正是10～11世纪喀喇汗王朝与回鹘人的边界。最近，其中两件以回鹘文书写的文书由迪拉娜伊斯拉菲尔、伊斯拉菲尔玉苏甫释读、发表[136]。

1959年，哈密出土11世纪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经约300叶，主要由耿世民先生与德国学者合作刊布[137]。写经的题跋最具历史研究价值。一同出土的还有20多叶回鹘文《十业道譬喻蔓》，也由上述学者

刊布。

20世纪初，俄国学者马洛夫在甘肃肃南文殊沟收获一件回鹘文《金光明经》写本，抄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是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晚的回鹘文出土文献。同一写本的另外2叶由贝格曼（W.Bergman）在中瑞联合考察中获得，收藏于斯德哥尔摩。

5.同类型文书汇编

2008～2011年，亨特（E.Hunter）组织西方学者合作刊布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景教文书（以德藏文书为主）。其中，中古伊朗语文书由辛维廉（N.Sims-Williams）负责，叙利亚语文书由亨特和狄更斯（M.Dickens）负责，以回鹘文或叙利亚文书写的古突厥语文书则由茨默负责。茨默在2015年将其研究成果出版，包括德藏出自葡萄沟西旁遗址和库鲁克塔格的文书，以及出自黑水城的文书[138]。

美国学者克拉克（L.Clark）计划分类汇编迄今已刊部的古突厥语摩尼教文献。他将文献分为三大类——教义类、教仪类和教会类，计划分3册出版，并给出全部文献的换写、转写、英译和要注。第2册教仪类文献最早出版，内容分为忏文、赞文和祷告文三部分[139]。第3册教会类文献则包含大量与回鹘历史密切相关的文献，例如回鹘摩尼教教会史、摩尼教徒抄经题记、书信等[140]。

2015年，森安孝夫将有关回鹘摩尼教历史的重要文书集中刊布[141]。书中给出了作者对于这些文书最新的释读和注解，包括“牟羽可汗入教记”（德藏U 73、U 72）、“羊年回鹘可汗入高昌记”（德藏U 1）、MIK III 198以及英藏、俄藏的回鹘文摩尼教忏悔书（Xwāstwānīft）等。同时书中还收录作者据前人研究对两篇回鹘时代中古波斯语摩尼教文献MIK III 36（或 MIK III 6371）和M 1的日语译文。该书的第五章则刊布有属于11世纪以前的半楷体回鹘文书信。这部分内容也会出现在作者计划以英文出版的回鹘文书信集（Corpus of the Old Uighur Letters）中。

6.其他语文文字资料举要

敦煌汉文文书中直接与西州回鹘历史关涉者有国图藏BD11287《张淮深上唐王朝表》[142]、英藏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143]、法藏Pelliot chinois.5007《唐佚名诗集》残卷[144]。涉及沙州归义军与西州、伊州等回鹘部族关系的文书有法藏Pelliot chinois.2962《张议潮变文》[145]、Pelliot chinois.3451《张淮深变文》[146]、Pelliot

chinois.3672 Bis《廿二城都统大德致沙州宋僧政等书》[147]、Pelliot chinois.3569《光启三年四月官酒户龙粉堆牒、押衙阴季丰牒》[148]、Pelliot chinois.3552《儿郎伟》[149]等[150]。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中较重要者则有吐峪沟出土的《西州回鹘某年造塔功德记》（以下简称《造塔功德记》）[151]。

现存于阗语世俗文书中出于和田当地者大多数属于8世纪唐朝及吐蕃统治时代，最晚到9世纪初期[152]，因此没有与西州回鹘同时代的记录。但其中有数件文书内容涉及8、9世纪之交回鹘、吐蕃在西域的争夺。吉田丰将Hedin 20 于阗文书信的内容比定为802年回鹘吐蕃在喀什的争夺[153]；施杰我（P.Skjrv）据此又将英藏的3件于阗语文书的内容比定为同一事件[154]。这组材料可与《九姓回鹘可汗碑》相关记载互补。敦煌藏经洞所出的于阗语文书则大多属于10世纪。对于西州回鹘历史研究最重要者当属《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于阗国使臣出使河西各地之后，于沙州以藏文和于阗文写成此卷。卷子背面后被用来抄写汉文佛经。此卷1929年首次刊布，藏文部分由藏学家托马斯（F.Thomas）基本解读，而于阗文部分虽由科诺夫（S.Konow）完成转写，但限于当时的研究水平未能被全面解读[155]。1951年，贝利（H.Bailey）研究了此卷的于阗文部分，实现了逐词的详注和全文的英译[156]。根据贝利的研究，于阗文部分是由不同内容构成的“杂写”（Miscellany）。第7～24行依次记录：于阗使者自于阗国至沙州归义军之间所历城镇名目、沙州归义军所辖城镇名目以及西州回鹘所辖城镇名目（17～24行）。本段文字开头写有纪年“狮子王尉迟散跋婆（Via’ Saṃbhava，即李圣天）十四年、鸡年”，学者据此考订其年代为925年[157]。文书反映了当时河西、西域各地的政治形势和行政地理，是研究西州回鹘早期历史的重要一手材料。自《钢和泰卷子》刊布以来，于阗文地名表部分最受学者重视，迄今全面讨论过该地名表的学者就有贝利[158]、岑仲勉[159]、哈密屯[160]、黄盛璋[161]等数家。一些于阗王国与沙州归义军、甘州回鹘等政权之间往来的国书稿本保存在藏经洞中，是研究10世纪西域史的重要史料。法藏Pelliot chinois.5538a于阗语部分为970年于阗王致曹氏归义军书信，记有于阗军出征喀什得胜缴获舞象之事。Pelliot chinois.2958则是甘州回鹘可汗发给于阗王的信件。此外，还有一些于阗国使的报告，性质与《钢和泰卷子》雷同。

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文书中有一批属于9～10世纪的突厥化粟特语（Turco-Sogdian）文书，哈密屯和辛维廉合作刊布了其中8件，并以法文出版[162]。这批文书记录了回鹘-粟特商人在河西各地的活动情况，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的族群、政治情况。该书的英文版在最近出版[163]。吐鲁番出土的粟特语写本多为宗教文献，但一些摩尼教徒的书信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德藏M 112号正面摩尼文粟特语书信[164]以及前述1981年柏孜克里克出土三封粟特文摩尼教徒长信。德藏粟特文书信的整理和统一刊布由本卡托（A.Benkato）博士负责，作为“柏林吐鲁番文献”丛书一种出版[165]。龙谷大学藏中古伊朗语文书残片由百济康义、宗德曼（W.Sundermann）和吉田丰统一刊布[166]，可惜书后没有词汇索引。吐鲁番出土的粟特文书中还应提及德藏Ch/So.20166号粟特语《国

名表》（*nāfnāmak*），文书按自西向东顺序排列欧亚国族名目。文书由亨宁（W.B.Henning）释读[167]，但其年代尚不能确定[168]。吉田丰在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文书中也比定出一件《国名表》——7466号粟特语残片。他读出3个族名：fšwy、kwcyk（龟兹人）、'rkcyk（焉耆人）[169]。其中'fš'wy不见于Ch/So.20166，说明两者版本不同。两件《国名表》均以汉文佛经纸背写成，或可借此判断大致年代。

吐鲁番所出中古波斯语文书中最重要者首推以摩尼文写成的德藏M 1号《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āmag*）抄本。该复叶第1页正背面为赞美诗集最末的篇章，而第2页正背面为诗集编者的尾跋[170]。跋文记载了漠北回鹘汗国治下东部天山地区各地地名、人名，反映了当时西域各地统治阶级和摩尼教教团的历史信息[171]。德藏MIK III36（即MIK III 6371）号摩尼文中古波斯语题记中记有可汗称号和大量职官名目[172]。

和田地区曾先后出土两件属于8、9世纪的犹太波斯语书信，为现存最早之新波斯语材料。其中2004年国家图书馆新获一件内容涉及8～9世纪之交喀什一带的战事[173]，可以与《九姓回鹘可汗碑》、Hedin 20于阗文书等材料相互参照，复原回鹘、吐蕃在西域争霸时的历史。

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所获俄藏黑水城文书中有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西夏天盛年间（1149～1169）制订的法律条文。第18卷"他国买卖门"下有数条关涉回鹘、大食（即喀喇汗王朝）商人，值得注意。《天盛律令》最早由俄国学者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刊布，包括对西夏文全文的俄译和文书图版[174]。1994年，中国学者据克恰诺夫刊布的图版将其从西夏文直接译成汉文出版[175]。由于克氏所刊图版重复、遗漏或模糊不清者不在少数，所以此译本并不理想。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出版，尤其是第8（1998）、第9（1999）卷中的图版可补之前不足，中国学者得以于2000年出版修订版汉译本[176]。除上述两种语言译本外，日本学者佐藤贵保还直接利用原件研究了"他国买卖门"下诸条，并纠正了俄文、汉文两种译本的错误[177]。

7.其他类型的文字资料

（1）木柱文书

西州回鹘佛教徒修寺建塔时，会在奠基之刹木上书写功德愿文，今将这类文字简称"木柱文书"。此类材料最早引起学界关注者，当属由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现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三枚木柱（第一木柱编号MIK III 4672、第二木柱编号MIK III7295、第三木柱编号MIK III 7279）。19世纪初，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发掘高昌故城α寺遗址的过程中，掘得一枚下端削尖的八面体圆锥形木柱（即第一木柱），木柱上各面皆有半楷体回鹘文墨书文字。该木柱的出土信息刊布在格伦威德尔

（A.Grünwedel）所撰德国第一次吐鲁番探险的考古报告中[178]，书后附有拉德洛夫对回鹘文做出的转写和德文翻译[179]。远在圣彼得堡的拉德洛夫当时并没有机会接触原件，只是据格伦威德尔寄来的照片做出了释读，因此颇有错漏，但是吐鲁番木柱文书的主要内容得以为世人所知。文书记叙某回鹘贵族家族捐献敬修佛寺之事，透露了当时的回鹘可汗名号以及回鹘贵族人名、官号等信息，极具史料价值。德国探险队在第二次、第三次吐鲁番探险中，又分别在胜金乡购得汉文木柱一枚（第二木柱）、在高昌故城南城墙附近掘得回鹘文木柱一枚（第三木柱），两枚木柱的形制、其上文书的性质都与第一木柱相似。在三枚木柱被带回柏林后不久，著名的东方学家缪勒（F.W.K.Müller）即据文物实物全面研究了三件木柱文书。缪勒大幅度修订了拉德洛夫对第一木柱文书的释读，并首次释读了另外两件木柱文书，其研究成果于1915年发表[180]。缪勒在其著作中给出了第一木柱文书全文的转写、翻译和详备的注释；但是对于第二木柱汉文文书，他只给出文书的录文和翻译，而没有注释。至于第三木柱文书，他甚至没有给出译文，只给出转写和要注，作为“附录1”附在正文后。这或许因为文字漫漶难读之处太多。在“二战”期间，三枚木柱与其他一部分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一起不知去向，这使得学术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仅可依靠缪勒的解读来讨论木柱文书。其后，我国学者岑仲勉对第二木柱汉文文书做出要注[181]，也全面研究第二木柱文书[182]。二者均基于缪勒的录文。1991年，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访问研究期间，获邀前往印度艺术博物馆（今亚洲艺术博物馆）协助释读画幡、织物等艺术品上的回鹘文题字。在这期间，失落已久的三枚木柱被找到，得到利用原件再次研究的宝贵机会。2001年，森安发表其对第一、第三两枚回鹘文木柱文书的研究成果，给出完整的转写、英译和详备的注释，不但极大地推进了缪勒对第一木柱文书的解读，更是首次给出了第三木柱文书的完整释读[183]。2004年，哈密屯借助红外线技术，对第三木柱文书上漫漶难读之处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是为木柱文书研究的又一突破[184]。2015年，森安氏将其对三件木柱文书的释读一起发表，包括对第二木柱汉文文书的最新研究和在哈密屯研究的基础上对第三木柱文书的订正[185]，但其2001年论文中详备的注释并未收入此作中，因此旧文仍需参看。

1965年，吐鲁番当地农民在安乐城故城以南一座佛塔遗址掘土时发现一批文物，其中有一枚表面书有回鹘文的八角形木柱（第四木柱），形制与上述德藏木柱相同。木柱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号65G0064），其上回鹘文书由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在1996年刊布[186]。英藏斯坦因收集品中还有两枚木柱。一枚出土于吐峪沟（第五木柱），现藏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1/1787（Toy.VI 074），形制不同于其他木柱，为四面体，一面存9行草体回鹘文，应是蒙元时代遗物[187]。另一枚出土于焉耆硕尔楚克（Šorčuq）明屋（Miŋöi）遗址，形制与前四枚木柱相同，为八角形，每面墨书婆罗米题字一行[188]。遗憾的是，遗物今不知所在，目前可知的信息仅有当年斯坦因考古报告中的寥寥数语。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大谷收集品中有一枚库车出土的回鹘文木简，上残有两行题记，为梅村坦解读发表[189]。

（2）碑铭

黄文弼先生在新疆收获两种回鹘文石碑拓片。一种是著名的《土都木萨里修寺碑》的拓片（《吐鲁番考古记》图99），今藏国家博物馆。另一种有11行回鹘文的铭文（《吐鲁番考古记》图100），文字杂乱，应是题刻，黄文弼书中没有介绍，现不知所在。《土都木萨里修寺碑》于1912年前后出土于吐峪沟。黄文弼1928年在迪化（乌鲁木齐）政务厅发现此碑，时为油印机台石。碑上一面残存回鹘文24行，竖写，从左往右排行。黄文弼解说道："我于1928年到迪化时，从油印机下取出，手拓数纸。原石今已不知去向矣"[190]。此碑发现以后，黄文弼即请葛玛丽比定[191]。1976年，特勤（.Tekin）发表全部碑文的解读，他将年代定在漠北汗国时代（767～780）[192]。根据文中出现的统治者称号，他的断代显然有误。耿世民先生据拓片全面研究碑文，于1981年发表对全文的释读[193]。他根据字体判断碑文制于10～12世纪[194]。碑文记载回鹘佛教徒出资修寺之事迹及其发愿文，性质与前述木柱文书类似。

立于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于1933年在甘肃武威石碑沟出土。碑文为汉文、回鹘文双璧，追溯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家族历史。碑文汉文部分的录文早见于元人文集，黄文弼先生据实物对其进行复原和校勘[195]。碑文回鹘文部分首次为世人所知，内容与汉文碑文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耿世民先生首先释读全文[196]。后来他又与哈密屯合作发表了法文读本，修订了之前的读本[197]。之后，又有刘迎胜、卡哈尔巴拉提对回鹘文部分的校勘和再研究[198]。元代的回鹘文碑铭材料还有1326年立于甘肃肃南文殊山的《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碑文由汉文、回鹘文双壁书写，记录了进入河西的察合台系王族的历史[199]。

1996～1998年，日本学者与蒙古学者联合组队调查蒙古国境内现存突厥、回鹘和蒙古时代的遗址和尚在遗址处的石碑，对现存碑文进行最新释读。在日本学者刊布的考察报告中，给出了遗址、遗物的详细信息，以及对碑文的最新转写和英、日双语翻译[200]。其中与回鹘时代有关的遗址报告或碑铭释读依次有：喀喇巴拉哈逊（Qara Balγasun）第二碑[201]、铁兹（Tes）碑[202]、塔里亚特（Tariat）碑[203]、希乃乌苏（ine Usu）遗迹和碑文[204]、富贵城（Bay Balïq）遗址[205]、回鹘汗国牙帐城遗址[206]、九姓回鹘可汗碑[207]、塞富莱（Sevrey）碑[208]等。上述大部分碑文拓片的照片和另外一批由蒙古学者负责采拓的碑文拓片（包括回鹘文、鲁尼文双璧的乌兰浩木碑Ulangom）照片被刊布于大阪大学网站[209]。然而此次调查距离许多碑文的首次刊布已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久，这期间文物又有消磨，因此仍需参看早期的考察报告和释读结果。

（3）题记铭文

敦煌莫高窟的汉文题记已有系统的编辑和刊布[210]。伯希和在莫高

窟调查时曾摹写各洞窟中回鹘文、蒙文题记，其手稿已影印出版[211]。哈密屯和牛汝极集中研究了榆林窟的回鹘文题记[212]。根据牛汝极提供的照片，二人释读了榆林窟内20条题记，以法文发表，并刊布了照片的图版。此后又有两篇中文文章发表，但内容没有超出哈密屯、牛汝极法文论文所讨论的范畴[213]。2006年，松井太获得亲身调查榆林窟题记的机会。他发表了对第12窟的三条题记的重新释读，纠正了前述研究的一些读法[214]。2010～2012年，他全面调查了莫高窟、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共87个洞窟，研究了其中的回鹘文和蒙文题记。其研究成果已经陆续发表[215]。

德国吐鲁番探险所获艺术品收藏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统一编在MIK III的大号下。古乐慈（Z.Gulásci）专攻其中的摩尼教艺术品。她于2001年刊布馆藏摩尼教艺术品的彩色图版，内容包括带有插画的书叶、书卷，织物残片以及壁画，并给出比定结果和解说[216]。书后附录刊布上述艺术品中所见的文字材料，多数为中古伊朗语，由贝杜恩（J.D.BeDuhn）释读；也有数条古突厥语材料，由古乐慈释读（或援引克拉克的释读）[217]。帕塔查娅（Ch.Bhattacharya-Haesner）则有专著研究、刊布其中的佛教画幡[218]。画幡上保留的回鹘文和汉文题记分别由森安孝夫、茨默和荣新江先生释读，刊布在书后的附录中。

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西侧回鹘西大寺遗址出土一些回鹘供养人题记[219]。最为重要的一条是遗址正殿入口东侧墙壁上回鹘可汗的贴金供养人画像榜题，由梅村坦研究、发表[220]。龟兹石窟寺沿用至回鹘时代。回鹘时代新开的石窟集中在库木吐拉，留有回鹘供养人画像和回鹘文、汉文题记。其中最著名者为第75窟和第79窟。第79窟一僧人像旁有汉文榜题作“颉里阿其布（？）施城中识知俱罗和上”[221]。对龟兹石窟寺中题记的调查和研究情况可参见《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的“龟兹研究专题”[222]。

研究状况

1.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学者冯家昇等在1958年出版《维吾尔族史料简编》[223]。他们将回鹘视为维吾尔族的一源，在书中系统论说回鹘-畏兀儿人的历史。编者充分利用了汉文传世文献的记载，并在当时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引用了古突厥语材料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日后我国回鹘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学者陆续有专门论述回鹘史的著作问世，其中多数都涉及了西州回鹘王朝的史事[224]。程溯洛先生曾撰写一系列关于回鹘历史的论文，内容涉及漠北回鹘汗国、西州回鹘、甘州回鹘及喀喇汗王朝，研究领域广泛[225]。

耿世民先生一生著作等身，他在突厥语言学和古突厥语文学等领域长期代表着中国学者的最高水平。笔者在前文已经分散介绍了他所刊布的重要回鹘文献，现择要列举先生对回鹘史和西域历史研究的贡献。在季羡林先生组织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工作中，涉及帕米尔以东塔里木盆地的内容即由耿先生负责[22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编写的巨著《中亚文明史》第4卷第9章是《回鹘、黠戛斯和党项（8—13世纪）》，其中第二部分便是由耿先生执笔的《高昌回鹘王国》，概述西州回鹘王朝历史[227]。耿先生与张广达先生合作，利用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题跋，将一直不为人知的地名“唆里迷”与焉耆勘同，堪称利用胡语出土文书解决历史地理问题的经典之作[228]。其专著《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集中刊布了突厥、回鹘时代最重要的碑铭材料，为中国学界提供了标准的转写和汉译读本[229]。耿先生的读本虽然基于其早期的释读，但广泛吸收了后来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

华涛先生曾先后发表论文讨论回鹘西迁时东部天山地区的形势[230]、西州回鹘与契丹的交往[231]等重要问题。其专著《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在吸收上述论文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研究了8世纪至10世纪天山东、西部地区突厥语族各部的活动，其第3、第4两章的内容与西州回鹘王朝早期历史直接相关[232]。华氏著作的一大特点是能够充分利用伊斯兰世界的相关史料来讨论有关问题。作者梳理、甄别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史料对于漠北回鹘、西州回鹘的相关记载。其对于伊斯兰史料的运用代表着国内学界的最高水平。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未能充分地利用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胡语文书，尤其是回鹘文书。

刘迎胜先生的专著《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充分利用汉文史料和波斯、阿拉伯、回鹘、察合台等非汉文史料，全面探讨了13世纪以来西域地区的历史诸方面[233]。虽然其研究起点已是本书研究的时间下限，但

该书对西州回鹘及其周边部族的历史、东部天山地区的历史地理等问题均有涉及，故亦是本书必须参考的著作。

荣新江先生在研究归义军史的过程中勾检出一批与西州回鹘关涉的敦煌文书，从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史的角度开始其对西州回鹘史的研究。其最初的成果反映在1986年发表的论文《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中[234]。他在专著《归义军史研究》中进一步发掘和增补这类材料，形成其对归义军-西州回鹘交往史的全面、系统的论说[235]。2001年，他将这一方面的重要材料及研究成果以英文发表，贡献给国际学界[236]。在遍检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过程中，他陆续发现一些文书中与西州回鹘历史相关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解说，为学界提供了研究西州回鹘史的基本史料[237]。他利用敦煌文书的相关信息讨论了甘州回鹘政权成立的时间[238]。他对唐朝派出册封安西回鹘可汗的使者李浔的墓志进行历史学研究，证补了传世文献和敦煌文书的相关记载[239]。在各国所藏西域出土汉文文书中，德藏汉文文书与西州回鹘时代关系最大。荣先生据其对德藏文书的全面调查，尝试对西州回鹘时代西州地区的寺院藏书进行复原[240]。

杨富学先生在“回鹘学”方面著作等身，其研究领域涉及漠北回鹘、西州回鹘、甘州回鹘、“沙州回鹘”以及元代畏兀儿人的宗教、历史、文化各个方面，不胜枚举。其早期的专著《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分类介绍了回鹘文出土文献，系统梳理了回鹘文化的诸方面，阐述了回鹘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241]。其专著《回鹘与敦煌》第二章“高昌回鹘及其与敦煌的关系”专门论述西州回鹘的历史、经济、文化及其与敦煌的关系[242]。杨先生注意吸收利用国际学界的先进成果，而且能够敏锐地发现、利用新出史料。他与白玉冬合作研究了策勒达玛沟新获的鲁尼文木板，尝试解读其上文字，推测所记为10世纪史事[243]。大唐西市出土墓志中有若干件重要的回鹘墓志。杨富学全面研究其中的《米副侯墓志》，指出墓主人的摩尼教背景[244]。蒙、俄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中央省考古获得一方汉文墓志，与铁勒仆固部有直接关系。杨氏先后发表两篇论文研究这方墓志[245]。

笔者近年来陆续发表一系列论文，利用出土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的记载，讨论西州回鹘早期历史中的几个重要问题[246]。

2.欧美学者的研究

法籍美利坚学者哈密屯在回鹘历史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精通古突厥语、现代土耳其语、汉语，能够直接运用汉文、古突厥语文献，熟稔伊斯兰文献。其首部专著是1955年出版的《五代回鹘史料》[247]，以汉文史料为中心梳理西迁之后回鹘历史，可看作其系统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进行研究的准备工作。他在书中全面译注了《旧五代

史》、《新五代史》和《五代会要》中有关回鹘及其毗邻部族的传记，并结合敦煌出土的3封与回鹘相关的汉文书信，论说五代时期的回鹘历史。而在该书的第一章“导论：五代以前的回鹘史”中，作者也充分讨论了汉文史料中有关唐代回鹘西迁以后的内容。虽然名为“五代回鹘史料”，但该书实际涵盖了回鹘西迁迄至宋代几乎所有与回鹘相关的汉文史料。更兼作者能够直接利用汉文史料和当时中外最新的研究著作，使得该书成为学界研究西州回鹘早期历史不能不参考的重要论著。作者充分利用其突厥语言学和汉语音韵学的知识，将上述汉文史料中所见的突厥语音译词汇构拟还原，并在书后总结出汉语-突厥语对音表，供学界参考。其后，他陆续出版3部专著，分别刊布敦煌藏经洞所出、对于回鹘早期历史研究极富有旨趣的3类写本，即前述《善恶二王子的故事》、《9～10世纪敦煌回鹘语写本》和《9～10世纪敦煌突厥化粟特语文书》。

哈密屯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讨论回鹘史和9～12世纪中国西北史地的一些重大问题，不应为后来的研究者遗漏。1958年，他全面研究了《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正确比定出其中出现的多数地名，大幅度地推进了之前的研究[248]。1962年，他发表论文《九姓铁勒与十姓回鹘》（*Toquz-Oγuz et On-Uyγur*），论证了碑铭中出现的Toquz Oγuz即是汉文的“九姓”，所指即九姓铁勒[249]。1969年，他刊布斯坦因所获一件交河城所出回鹘文卖地契，指出回鹘文quanpo系借自汉文“官布”，在西州回鹘时代为一种通货[250]。1977年，他发表《十世纪的仲云国》（*Le pays des Tchong-Yun, ungul, ou Cumua au Xe Siècle*），征引西域各种语文的出土文书，将汉文文献中的仲云、回鹘文书中的ungul和于阗文书中的Cumua勘同，复原了10世纪活跃在西域南道和河西地区的仲云王国[251]。2004年，他借助红外线技术释读出德藏第三木柱上最难读的部分[252]。此外，他与牛汝极合作解读了叙利亚文突厥语景教徒墓碑铭[253]和榆林窟的回鹘文题记[254]，均属学界对这些材料的首次研究。

20世纪后半叶至今，德国学者茨默是古突厥语文学领域世界公认的权威。他于1960年进入原东德洪堡大学伊朗学系学习，师从伊朗学家施坦尼茨（W.Steinitz）；在学期间，他逐渐对突厥学产生浓厚兴趣，于是追随当时客座的匈牙利突厥学家哈扎伊（G.Hazai）学习突厥学。1965年，他提交关于中古奥斯曼语的论文从突厥学系毕业。恰在同年，由施坦尼茨发起、哈扎伊领衔的吐鲁番研究组在柏林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成立，他们共同的学生茨默顺理成章地加入这个团队，开始了其对德藏吐鲁番文书的研究生涯。他最初专攻古突厥语摩尼教写本残片，后于1969年以题为《摩尼教突厥语吐鲁番文书的语文研究》的论文从洪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从1966年起开始发表一系列论文，比定、刊布了大量柏林藏古突厥语摩尼教文献残片，包括《摩尼教徒忏悔书》（*“Xwāstwānīft”*）[255]、伊索寓言[256]等。他在这方面的大成之作是前述《摩尼教突厥语文献》。1968年，茨默与他的老师哈扎伊合作刊布一片刻本《傅大士颂金刚经》残片[257]。1970年，茨默先生正式成为科学院研究员，逐渐将其精力投入回鹘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刊布中。同年，他与哈扎伊合作汇编柏林藏《傅大士颂金刚经》残片，作为“柏林吐鲁番

文献”第1号出版[258]。其后，他陆续刊布大部头回鹘文佛教文献，包括：与卡拉（G.Kara）合作出版的三种回鹘文密教译经著作[259]，对回鹘佛教头韵诗的集中刊布[260]，与日本学者百济康义合作刊布的回鹘文《观无量寿经》[261]、回鹘文《金光明经》[262]、回鹘文《维摩诘所说经》[263]、回鹘文陀罗尼类文献[264]等。1971年，他与铁兹江（S.Tezcan）合作刊布两封回鹘文书信[265]。此后，他陆续刊布各地所藏的回鹘文世俗文书，内容包括卖地契[266]、借粮契[267]、租地契[268]、寺院免税令[269]、户籍[270]、卖房契[271]、寺院公文[272]等，为研究西州回鹘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他在这一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也体现在其与日本学者合作编辑的《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中。1974年，茨默发表论文全面介绍德藏吐鲁番文书中新比定出的古突厥语景教文献[273]，展现了他在比定、整理景教文献方面的水平。此后，他陆续刊布若干古突厥语景教文书[274]。2015年，他出版《中亚出土回鹘语景教文书》，汇编吐鲁番和黑水城所出的古突厥语景教文书[275]。在刊布了大量古突厥语文书的基础上，茨默还著有两部关于回鹘文化的专著：一是对回鹘文头韵诗的综合研究[276]；二是对回鹘佛教徒的译经、抄经题记的整体研究，并以此视角考察西州回鹘社会[277]。

茨默迄今已刊布的文书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下面笔者择要介绍其中对于推进西州回鹘历史研究意义较重大者。1975年，他首次向国际学界介绍了著名的《摩尼教寺院经济文书》，并利用《吐鲁番考古记》中所刊图版，释读了其中的片段[278]。1977年，他刊布三件回鹘文贩奴文书，其中第3件Ch/U 3917揭示了西州回鹘人在中亚的贸易网络[279]。1978年起，他陆续发表三篇论文刊布德藏回鹘文书中含有较多人名的世俗文书，旁征博引，讨论其中出现的突厥语人名及人物关系[280]。1989年，他发文讨论回鹘统治者的名号问题[281]。1991年，他汇集出土文字资料中所见西州回鹘统治者名号，并尝试比定这些名号所指[282]。他曾陆续发文探讨回鹘佛教徒的常见取名方式及其演化[283]。他还分别撰文总结了回鹘非佛教文献中的印度语借词[284]和各种回鹘文书中出现的阿拉伯语、新波斯语借词[285]。2009年，他刊布Mainz 354号文书，揭示了西州回鹘都城曾经历被毁和重建的史事[286]。他释读了1981年柏孜克里克出81TB 10：6-3号回鹘文书，为学界提供了回鹘人自己所写的摩尼教开教史料[287]。2010年，他刊布一片据说出自阿富汗巴米扬的回鹘文残片，文书中同时出现佛教徒、景教徒和穆斯林的名字[288]。英藏西域胡语文书至今尚未全面刊布，他全面调查了其中的摩尼教突厥语文书，并首次释读其中一些残片[289]。2011年，他分别撰文讨论了回鹘文献中出现的“巴楚语”（barčuq tili）[290]和“唐兀”（Taŋut）[291]。近年，他与张铁山先生合作释读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两叶回鹘文书，系现存篇幅最长的回鹘文历史文献[292]。

20世纪后半叶欧美学界在回鹘史研究领域较活跃的学者还有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林（C.Mackerras），其特长在于能够直接运用汉文文献。他从60年代末开始发表关于漠北回鹘汗国的论文[293]。1973年，他出版专著《两唐书所见回鹘帝国史——唐与回鹘关系史研究，744～840》[294]，奠定了其在欧美学界回鹘汗国史领域的地位。其主要贡献在于向

欧美学界全面译注了有关回鹘的汉文史料，尤其是两唐书《回鹘（纥）传》，并系统梳理了漠北回鹘汗国在744年到840年间的历史及其与唐朝的关系史。当然，其研究尚未能穷尽相关汉文史料，也没有与在此领域早有贡献的日本、中国学者展开对话。同时，他也没能充分运用在当时已有的突厥语碑铭、文书材料和穆斯林史料。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林的研究都代表了欧美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水平[295]。

几乎与马克林同时，俄国学者马廖夫金（А.Малявкин）出版其对汉文传世文献中有关回鹘的章节的汇编、翻译和注释[296]，将这类史料译介给俄语学界。该书涉及的文献范围是9～12世纪，涵盖漠北回鹘末期、安西回鹘和西州回鹘时代。他于1983年出版其关于西迁以后回鹘历史研究的专著《9～12世纪的回鹘国》（*Уйгур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IX-XII*вв*）[297]。其立论的基础即上述汉文史料及少量伊斯兰传世文献。或由于其时代所限，他几乎没有利用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属于9～12世纪的各种语文的文书资料。

美国学者张国平（M.Drompp）专攻中古时代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史，是当今美国学界在这一领域比较活跃的学者。其研究重心是840年回鹘汗国覆灭以后南迁的回鹘人[298]。2005年，其专著《唐代中国与回鹘帝国的崩溃》出版[299]。此书以《会昌一品集》所收李德裕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所拟一系列关涉回鹘、黠戛斯部的诏书为基础，讨论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南下至唐朝边境的回鹘人的历史。书后附有69件相关诏书的英文翻译。该书是学界首次全面讨论李德裕文集中与回鹘关涉的资料。遗憾的是，作者对于日本和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仍缺乏充分的把握。此外，作者还撰文讨论840年黠戛斯攻灭漠北回鹘汗国以后草原地区的形势[300]，反驳了西方学界传统的黠戛斯帝国假说。文章论证了黠戛斯并未移帐鄂尔浑河流域直接占领漠北高原，而是退守叶尼塞河谷故地；在辽朝入主之前，草原地区并未有霸权建立。

3.日本学者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于西州回鹘史的研究始于羽田亨。羽田亨能够独立释读回鹘文献，早在20世纪初，他就将大谷收集品中的一些重要的回鹘文书刊布解读，使日本学界在对这类新史料的掌握上完全不落后于欧洲[301]。其弟子安部健夫对西州回鹘史做出更为系统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安部氏推出著作《西回鹘国史的研究》[302]，全面讨论了回鹘西迁之后在安西、北庭（西州）、河西等地建立的各支政权的历史，论说的时间范围从8世纪直至蒙元时代。作者旁征博引，充分利用了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传世文献和当时可以获知的出土文字材料，讨论到了西州回鹘历史的大多数重要问题。虽然书中很多观点在今天已经得到修正，但该书仍不失为西州回鹘历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森安孝夫是当今学界在西州回鹘史领域最为权威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几乎涉及西州回鹘历史、宗教、语文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森安孝夫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大学期间接受过良好的史学训练。他能够熟练运用汉文史料，并通晓西方现代工具语言，可以掌握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开始陆续发表有关西州回鹘早期历史的论文。他将汉文史料的记载与欧洲学者对胡语材料、伊斯兰史料的研究成果相结合，讨论了回鹘西迁前后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回鹘与吐蕃在北庭大战之后西域的形势[303]、回鹘西迁东部天山地区之后的发展过程等[304]。这些文章至今仍为学界参引。他很早即注意到直接利用西域民族语文材料的重要意义。他先学习了古藏文，可以直接利用古藏文史料进行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些以古藏文文书为基础的研究文章[305]。他利用古藏文和汉文文献，尝试复原吐蕃帝国在7世纪至8世纪间在西域地区扩张进取的历史过程[306]。这段历史可视为回鹘与吐蕃北庭之战的前史。1978~1980年，森安氏获得法国政府奖学金赴巴黎深造，得以师从突厥学家哈密屯学习古突厥语文学，并开始调查英法等国收藏的敦煌、西域出土文书[307]。从此以后，森安氏开始系统利用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尤其是回鹘文书，开展对西州回鹘历史的研究。他释读、刊布了一些富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回鹘文、汉文世俗文书，从新的视角讨论了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308]。

森安氏的贡献几乎覆盖回鹘史的各个领域，其在如下几个方面用功最深：①森安氏最早涉猎并持续贡献的领域是对回鹘政治史的重构。如前所述，他早期的论文、著作多与西州回鹘王朝的前史有关。8世纪中叶，唐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西北地区的历史自此不见于正史的系统记载。森安孝夫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基本上复原了吐蕃进入西域、回鹘与吐蕃争雄、回鹘西迁等几个不同阶段的历史，形成了完整的叙述逻辑。2002年，森安氏发表论文《从回鹘方面所见安史之乱》[309]，将德藏回鹘文残文书Mainz 345复原，比定为回鹘摩尼教徒所记牟羽可汗出兵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之事，并探讨了牟羽可汗出兵的动机。他利用敦煌出土的汉文文书、回鹘文书和石窟题记等材料讨论回鹘与敦煌的关系[310]，并提出“沙州回鹘”问题，引发学界争鸣[311]。德藏三件木柱文书堪称回鹘文出土文字资料中最具史料价值，很早便引起了的注意。他在1974年据缪勒的录文全面研究了第二木柱所载汉文。在2001年发表其据文物实物对第一、第三两枚木柱所载回鹘文的释读。在2015年发表三枚木柱的最新修订版读本。②在学界影响最大的研究，当属其在回鹘宗教史（摩尼教史和佛教史）领域取得的成果。1991年，其专著《回鹘摩尼教史研究》出版，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此书后来还被译为德文出版，在西方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312]。此后他又陆续发表相关论文，逐渐完善其对于回鹘摩尼教兴衰和回鹘佛教兴起的系统研究，影响深远[313]。其最重要的结论是，回鹘摩尼教自10世纪下半叶起开始衰落，佛教逐渐兴起成为西州回鹘的主要宗教；到11世纪下半叶，摩尼教已经在吐鲁番地区趋于消亡[314]。③除此之外，还曾专门研究、刊布回鹘文契约文书和书信。在直接处理大量回鹘文书原件的基础上，他提出楷书体、半楷书体、半草书体和草书体4种字体划分及其年代属性，后来成

为学界判定回鹘文书大致年代的重要标准之一[315]。1984年，成为山田信夫领导的回鹘文契约文书整理小组的一员，开始系统整理回鹘文契约文书，参与《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的编纂。森安氏研究回鹘文契约文书的心得可参看其连续发表的4篇札记[316]。他与茨默合作刊布了4件珍贵的汉文-回鹘文双语契约文书，揭示了回鹘文契约书式的源流[317]。回鹘文世俗文书多为蒙元时代契约文书，对于此类文书学界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可以利用其中的蒙古语借词进行可靠的断代。森安氏则总结出对于早期回鹘文世俗文书（9～12世纪）断代的多种线索，包括标志性的字体、专有名词、固定的句式表达等，填补了学界的空白[318]。在巴黎学成之后所刊布的第一篇回鹘文书就是一封佛教徒的书信[319]。如前所述，他还刊布了柏孜克里克所出的5件回鹘摩尼教徒书信；由他编辑的《回鹘文书信合集》即将出版，将集中刊布现存已知的回鹘文书信。在编辑研究书信的过程中，他总结出回鹘文书信的书仪类型，形成理论[320]。他还利用上述两类世俗文书中提供的历史信息研究西州回鹘时代吐鲁番地区的社会史。比如，他从德藏、俄藏和芬兰藏的吐鲁番文书中钩稽出一组同出于赤亭地方的、属于蒙元时代的回鹘文书，其中出现的人物证明这组文书出自同一微观社会，可由此复原赤亭当地的社会生态[321]。④的另一个学术贡献是揭示了回鹘人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重要作用。1988年，他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属于蒙元时代的回鹘文书中读出“行在缎子”（Qïŋsai tavar）一词，揭示了河西地区的畏兀儿商人与江南地区的商业关联，提出了元代畏兀儿商人在河西、吐鲁番、大都和江南之间已经形成贸易网络的构想[322]。他发表一系列相关文章，逐渐勾勒出9～14世纪丝绸之路东段的发展嬗变过程：其商人主体从粟特商人转变为回鹘商人，再由此形成元代的斡脱商人[323]；其主要通货则从丝绸、棉布和银币演变为银锭[324]。

如今在研究回鹘文世俗文书方面最为活跃的学者是松井太。其博士论文题目是《蒙古时代畏兀儿地的税役制度和行政文书》。在蒙元史学界传统上所依赖的汉文、波斯文史料之外，松井太系统利用吐鲁番出土的、属于蒙元时代的回鹘文、蒙文世俗文书来研究蒙元时代当地地方行政制度，别开生面。其论文集中研究回鹘文供出文书，收录了当时可见的共54件供出文书；其中28件是学界首次研究，价值重大。在释读、比较这些文书的基础上，他的论文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论证了蒙元时代吐鲁番地区的税制继承了西州回鹘时代的制度，其根源则是唐西州时代的制度。二是归纳了文书所钤印章的类型，以此构成对文书进行断代的依据。三是归纳了供出文书的格式类型。四是通过供出文书的内容探讨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松井太陆续发表重要论文，讨论蒙元时代吐鲁番的税制[325]及其渊源[326]、公文书上的印章[327]、回鹘行政文书的断代[328]等问题，均得益于其博士研究的深厚积累。在研究大量文书的基础上，他总结出回鹘文书中的度、量、衡、货币单位与蒙、汉、波斯文中相应单位的对应关系，得出了蒙古帝国在其辖下各地统一度量衡货币的结论[329]。

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世俗文书多为蒙元时代的契约文书，仅有少数属于9～12世纪西州回鹘时代。此前，森安孝夫从《回鹘文契约文书集

成》所刊的121件文书中比定出12件属于西州回鹘时代[330]。在此基础上，松井太又比定出一件（Mi 29）；他还新刊布6件属于西州回鹘时代的契约文书，系学界首次释读[331]。2010年，他发表论文研究了3件西州回鹘时代的供出文书[332]。回鹘文世俗文书中含有大量地名、人名，为研究吐鲁番社会史提供了重要素材。松井太利用多地所藏的回鹘文书，结合回鹘文题记材料，考证出了今柏孜克里克一带在回鹘时代的名称源出唐代地名“宁戎”[333]。他利用蒙文和回鹘文书考出乌鲁木齐一名源自“白水镇”[334]。2015年，他发表《吐鲁番绿洲回鹘语地名》一文，全面讨论了回鹘文出土文书所见回鹘时代吐鲁番盆地的地名[335]。他敏锐地发现，分别藏于圣彼得堡和天津的四件回鹘文书在内容上皆与修士奴（Sivšidu）、药师奴（Yaqšidu）两人有关，可知这些文书所记乃是同时同地之事。他利用东洋文库的俄藏缩微胶卷又找到40件关联残片，考订出这批文书所反映的乃是13世纪吐峪沟某僧团的信息[336]。此后，他又补出9件相关文书[337]，并指出这个僧团礼拜的中心是一个阿弥陀窟[338]。在前引对“赤亭文书”的讨论基础上，他又重读了其中的U 5330号，深入探讨了蒙古时代吐鲁番地区农民与僧团之间的土地矛盾[339]。

本书正文分为六章，前三章分别论说西州回鹘历史的重要问题，后三章则分别论说西州回鹘时代丝绸之路东部天山地区各地的历史。

第一章将系统梳理8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东部天山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这一时期可视为西州回鹘的前史。东部天山地区此间先后经历了唐朝“二庭四镇”的统治、漠北回鹘汗国与吐蕃的争夺、漠北回鹘汗国的统治以及回鹘残部的迁入四个时期。本章首先论说东部天山各地在经历唐、吐蕃和漠北回鹘汗国三方较力后，最终进入漠北回鹘汗国版图的时间和经过。其次，笔者将对漠北回鹘汗国时代极具史料价值的出土文献德藏M 1中古波斯语《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做出历史学的解读，以此为基础论说漠北回鹘汗国在9世纪初叶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形式。最后，笔者将论述漠北回鹘汗国崩溃之后，西迁回鹘余部进入东部天山后的发展情况。

第二章将主要利用出土文字资料对西州回鹘建国史进行重构。汉文史料记载，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率部于866年攻取西州等城。学界普遍将此视为西州回鹘政权建立之标志。然而，西州回鹘此后的发展过程亡于史册。笔者将对两件新刊布的出土文书（献）依次展开历史学研究，考证其所记史事系西州回鹘建国时代。在此基础上，笔者再结合其他史料，论说西州回鹘在866年以后的发展过程，考证其击败安西回鹘、统一东部天山地区的时间。笔者还将描述西州回鹘建国以后疆域的变化。

第三章将探讨西州回鹘的族群认同问题。回鹘人在漠北时代即已形成独特的族群-政治体认同，其内核是十姓回鹘，外延是九姓铁勒。这种族群认同延续到西州回鹘时代。到11世纪，分布在西部天山和中亚西部的操突厥语各部已经普遍形成以突厥为共同祖先的文化认同。然而，通过检讨回鹘文献中出现的“突厥”一词可知，此词常被用以表达“蛮夷”之类的贬义，或用以指称同时代操突厥语的其他部族。显然，当时的西州

回鹘人并未形成突厥认同。在不同时期的回鹘文献中，可见回鹘以突厥为敌的历史记忆。11世纪，西州回鹘与中亚西部的喀喇汗王朝之间战事激烈，其西部疆域不断收缩。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使西州回鹘人不可能接受突厥认同，而其族群起源的传说也完全不同于中亚西部的突厥部族。

第四章将依次考察西州回鹘统治的核心区域，即原唐代北庭、西州和伊州三地在西州回鹘治下的历史，考证相关问题。笔者首先考证一件德藏回鹘文书所记回鹘可汗重修都城之事实系西州回鹘某可汗重修北庭城，其年代应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回鹘人进入西州以后，沿用了唐朝在吐鲁番盆地的城址，共有22座。到元代，当地城市的数目增至24座。笔者将钩稽出土文字资料中有关回鹘时代吐鲁番盆地城市的信息，由此考察从唐西州时代经西州回鹘时代到蒙古统治时代吐鲁番盆地各城的兴废发展情况。伊州自9世纪下半叶起进入西州回鹘的版图，开启了当地回鹘化的进程。但到13世纪时，哈密地方已经形成一个独立于西州回鹘的政权。笔者考证该政权出现的年代约在11世纪中叶。

第五章将论说西州回鹘时代丝绸之路天山南道各绿洲城市的历史。随着唐朝在西域统治的终结，这些绿洲城市的情况亡于正史记载，学界也鲜有针对这一时期的整体研究。笔者将依次钩稽各种史料中有关焉耆、龟兹、拨换、巴楚和喀什的记载，讨论相关的历史问题。

第六章将按照唐代城镇戍堡的分布顺序，依次论说自北庭以西丝绸之路天山北道各地在回鹘时代的发展情况。回鹘人西迁以后继承了唐朝在天山北麓建设的城址，并将这些原本服务于军事用途的基础设施发展为一系列城市聚落，使天山北麓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此种印文最早见于黄文弼先生所获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参见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第498页。后来学者又陆续在四件回鹘文书上发现此种朱印，参见松井太「西ウイグル時代の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書をめぐって」『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24、弘前大学人文学部、2010、35頁。

[2]《旧五代史》卷一一一《周书·太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5，第1710页。

[3]“西州回鹘”一名最早见于唐大中五年（851）前后所下一篇制文，但其所指乃是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后割据在西州一带的回鹘势力，而非866年建立的西州回鹘政权。详见下文。

[4]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増補版）』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70、40-42頁。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彙文堂書店、1955、564-565頁；（汉译本）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宋肃瀛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第413页。

[5]在回鹘时代的一些中古伊朗语和古突厥语文献中，这片区域被称为“吐火罗斯坦”（Tohristan）。此说由荣新江先生最近提出并做出有力论证，值得学界重视，参见荣新江《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兼论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斯坦”》，王炳华主编《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科学出版社，2017，第181～191页。

[6]华涛将东部天山地区等同于唐安西、北庭地区，参见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45页。森安孝夫认为东部天山地区包括“高昌、伊吾、焉耆、龟兹”等地，参见森安孝夫『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序文ii。

[7]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编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民族出版社，1958，第151～154页。

[8]陈高华先生曾汇编与元代畏兀儿人有关的汉文资料，包括大量取自元人文集、内容详于正史的一手史料，参见陈高华编《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同氏关于明代吐鲁番、哈密地区的史料汇编也于近日重刊，参见陈高华编《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2017。刘美崧先生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校注两《唐书》的回纥（鹘）传，参见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冯志文、吴平凡将唐代至元代汉文正史中关于回鹘的史料按年系录，方便学者检索，参见冯志文、吴平凡《回鹘史编年》，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杨圣敏先生曾校注《资治通鉴》中的突厥回纥史料，参见杨圣敏《〈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郭平梁、刘戈较为全面地总结、提示了迄至蒙元时代的回鹘史史料，参见刘戈、郭平梁《回鹘史指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9]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31·32、1991、159-174頁；T.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4, pp.192-209；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101～123页。

[10]R.Dankoff,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ed.and trans.by R.Dankoff,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82, pp.6-7.

[11]Mahmud al-Kašγari, Kitāb Dīwān Luγāt at-Turk, 3 vols, ed.by K.Rifat, Istanbul, 1917.

[12]C.Brockelmann, Mitteltürkischer Wortschatz nach Maḥmūd al-Kāšɣarīs Dīvān Lugāt at-Turk, Budapest-Leipzig, 1928.

[13]B.Atalay, Divanü Lûgat-it-türk Tercümesi, 3 vols, Ankara, 1939-1941.

[14]S.Mutallibov, Turkij sozlar devoni, 3 vols, Tashkent, 1960-1963.

[15]胡振华、耿世民：《〈突厥语大辞典〉及其作者》，《新疆大学》1963年第5期。

[16]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第29～42、89页；此据氏著《文书 典籍与西域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46～66页。

[17]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3卷，民族出版社，2002。

[18]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ed.and trans.by R.Dankoff,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82.

[19]Mahmud al-Kašγari, Divanü Lugati’ t-türk, ed.and trans.by S.Tuba, kabalcı yayınevi, 2005.

[20]J.R.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 ^{e} -X ^{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aris, 1986.

[21]J.R.Hamilton, 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e.Manuscrits ouigours de Touen-houang, Paris, 1971.

[22]藤枝晃：《敦煌学导论》，南开大学历史系，1981年油印本，第61页。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382～383页。

[23]W.Bang, A.v.Gabain und G.R.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 Das buddhistische Sūtra Säkiz Yükmäk, Berlin, 1934；小田寿典『仏説天地八陽神呪経一巻——トルコ語訳の研究』法蔵館、2010；J.Oda,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Sūtra called Säkiz Yükmäk Yaruq or Säkiz Törlügin Yarumïš Yaltrïmïš in Old Turkic, Turnhout: Brepols, 2015。

[24]T.Tekin, Irk Bitig: the Book of Om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3.

[25]A.v.Le Coq, Chuastuanift: ein Sündenbekenntnis der manichaïschen Auditores Gefunden in Turfan （Chinesisch-Turkistan）,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Klasse, 1910.

[26]J.R.Hamilton et L.Bazin, “Un manuscrit chinois et turc runiforme de Touen-Houang：BM.Or.8212 （78）, （79）”, Turcica: Revue d'Etudies Turques 4, 1972, pp.25-42.

[27]大英图书馆在1994年启动“国际敦煌项目”，最初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对英藏斯坦因所获敦煌文书、文物进行修复、编目。1997年开始文书、文物的数据化工作。文书、文物的高清图片和目录信息自1998年起开始公布到其网站上（http://idp.bl.uk）。

[28]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語文献」山口瑞鳳編『講座敦煌6敦煌胡語文献』大東出版社、1985、1-98頁。

[29]P.Zieme und G.Kara,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 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8212 （109）,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78.

[30]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語文献」、37-98頁；（汉译本）《敦煌出土蒙元时代的回鹘文书》，杨汉璋译，《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57～64页。

[31]J.R.Hamilton, “Étude nouvelle de la lettre Pelliot Ouïgour 16 bis d’un Bouddhiste d’époque mongole”, in: A.Cadonna, ed.,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Firenze, 1992.

[32]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14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

[33]方广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全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4]申国美编《中国散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91～92页。

[35]方广锠主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

[36]荣新江：《书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第178～180页。

[37]彭金章等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全3卷），文物出版社，2000～2004。

[38]参见彭金章主编《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全2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

[39]可能还有出自新疆其他地区者。俄藏文书没有原始编号，因此文书出土地点不明确。大部分西域出土文书仅以“西域”（S.I.＝Serindia）加上收集者的名字的缩写，再加上数字作为编号。参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欧美收藏卷前言”部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俄藏编号中收集者姓氏简写为：“Kr.”（＝Krotkov）、“K.”（＝Kokhanovsky）、“Kle.”（＝Klementz）、“D”（＝D’yako
年重新发现的Malov收集品）、“O.”（＝Oldenburg）、Uig（＝Uigur回鹘文，此号代表不知收集者为谁）。出自敦煌的汉文文书则编在Φ和Дх编号之下，但其中还夹杂有吐鲁番文书。

[40]梅村坦·庄垣内正弘·吉田豊·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編『東洋文庫所蔵St.Petersburgウイグル文字·ソグド文字·マニ文字写本マイクロフイルム仮目録·第一稿』2冊、中央大学総合政策学部·梅村研究室、2002。

[41]梅村坦·庄垣内正弘·吉田豊·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編『東洋文庫所蔵St.Petersburgウイグル文字·ソグド文字·マニ文字写本マイクロフイルム仮目録·第一稿』、161-162頁。

[42]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43]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4]J.Elverskog, 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 Turnhout: Brepols, 1997.

[45]J.Wilkens,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0: Buddhistische Erzähltexte, Stuttgart, 2010.

[46]A.Yakup und M.Knüppel,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1: Die uigurischen Blockdruck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Teil 1: Tantrische Texte, Stuttgart, 2007.

[47]A.Yakup,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2: Die uigurischen Blockdruck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Teil 2: Apokryphen, Mahayana-Sutren, Erzählungen, Magische Texte, Kommentare und Kolophone, Stuttgart, 2008.

[48]A.Yakup,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5: Die uigurischen Blockdruck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Teil 3: Stabreimdichtungen, Kalendarisches, Bilder, unbestimmte Fragmente und Nachträge, Stuttgart, 2009.

[49]S.-Ch.Raschmann,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3: Dokumente, Teil 1, Stuttgart, 2007; S.-Ch.Raschmann,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4: Dokumente, Teil 2, Stuttgart, 2009.

[50]Z.Özertural,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6: Mahayana-Sutras und Kommentartexte, Stuttgart, 2012.

[51]M.Knüppel,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7: Heilkundliche, volksreligiöse und Ritualtexte, Stuttgart, 2013.

[52]S.-Ch.Raschmann,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8: Buddhica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Teil 1: Das apokryphe Sutra Säkiz Yükmäk Yaruk, Stuttgart, 2012.

[53]D.Maue,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9: Dokumente in Brahmi und tibetischer Schrift, Teil 2, Stuttgart, 2015.

[54]J.Wilkens,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8: 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Stuttgart, 2000.

[55]http://turfan.bbaw.de/dta/index.html.

[56]M.Boyce, 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ean S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45, Berlin, 1960.

[57]D.Maue,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 Dokumente in Brahmī und Tibetischer Schrift, Teil 1, Stuttgart, 1996; Teil 2, 2015.

[58]G.Schmitt und Th.Thilo,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 in Zusammenarbeit mit Taijun Inokuchi, mit einem Anhang von Akira Fujieda und Th.Thilo, BTT 6, Berlin, 1975; Th.Thilo,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I, BTT 14, Berlin, 1985.

[59]K.Kudara, Chinese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 vol.3, ed.by Toshitaka Hasuike und Mazumi Mitani,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5.

[60]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饶宗颐编《华学》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第309～325页；荣新江：《再谈德藏吐鲁番出土汉文典籍与文书》，饶宗颐编《华学》第9、10辑（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854～877页；T.Nishiwaki, 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Chines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ücke Teil 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1。

[61]F.W.K.Müller, Uigurica, I, Berlin: G.Reimer, 1908.

[62]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73～76页。

[63]V.Adam, J.P.Laut, und A.Weiss （eds.）, Bibliographie alttürkischer Studie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2000.

[64]J.P.Laut, Bibliographie alttürkischer Studien: Nachträge und Neuzugänge I-IX,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Band 17, 2002, pp.234-239; Band 18, 2004, pp.202-207; Band 19, 2005, pp.229-232; Band 20, 2006, pp.228-232; Band 21, 2007, pp.224-229; Band 22, 2008, pp.268-273; Band 23, 2009, pp.175-178; Band 24, 2011, pp.259-263; Band 25, 2013, pp.208-217.

[65]P.Zieme, 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 Turnhout: Brepols, 1975.

[66]P.Zieme, 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 Turnhout: Brepols, 1996.

[67]P.Zieme,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Edition alttürkischer Übersetzungen nach Handschriftenfragmenten von Berlin und Kyoto.（Mit einem Appendix von Jorinde Ebert: Ein Vimalakīrti-Bildfragment aus Turfan）, Turnhout: Brepols, 2000.

[68]P.Zieme, 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 Turnhout: Brepols, 2005.

[69]J.Wilkens, Die drei Körper des Buddha （trikaya）: Das dritte Kapitel der uigurischen Fassung des Goldglanz-Sūtras （Altun Yaruk Sudur） eingeleitet, nach den Handschriften aus Berlin und St.Petersburg herausgegeben, 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Turnhout: Brepols, 2001.

[70]J.Wilkens, Das Buch von der Sündentilgung: Edition des alttürkisch-buddhistischen Kšanti Kılguluk Nom Bitig, Turnhout: Brepols, 2007.

[71]A.Yakup,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in Old Uyghur, Turnhout: Brepols, 2011.

[72]Y.Kasai, Der alttürkische Kommentar zum Vimalakirtinirdesa-Sutra, Turnhout: Brepols, 2011.

[73]Y.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Turnhout: Brepols, 2008.

[74]J.Oda,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Sūtra called Säkiz Yükmäk Yaruq or Säkiz Törlügin Yarumïš Yaltrïmïš in Old Turkic, Turnhout: Brepols, 2015.

[75]M.Shogaito （et al.）, The Berlin Chinese text U 5335 written in Uighur script: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herited Uighur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Turnhout: Brepols, 2015.

[76]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関係史料集成』『平成26年度近畿大学国際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近畿大学国際人文科学研究、2015、71-117頁。

[77]关于汉文《玄奘传》在国外的译介和研究情况，以及此专号的缘起，参见M.Knüppel所撰书评［Review: A.Mayer, Cien-Biographie VII, VdSUA Band 34 （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1,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7/2, 2003, pp.308-312］。

[78]A.Mayer, Cien-Biographie VII, VdSUA Band 34 （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1; U.Frankenhauser, Cien-Biographie VIII, VdSUA Band 34 （4）,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5.

[79]A.Semet, Lexikal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uigurischen Xuanzang-Biographie, VdSUA Band 34 （8）,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80]K.Röhrborn,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VII,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VdSUA Band 34 （3）,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1.

[81]K.Röhrborn,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VIII.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VdSUA Band 34 （5）,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6.

[82]M.Ölmez und K.Röhrborn,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III,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VdSUA Band 34 （7）,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1.

[83]A.Mirsultan,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X,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VdSUA Band 34 （9）,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84]H.Aydemir,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X,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VdSUA Band 34 （10）, 2 vol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3.

[85]S.Dietz, M.Ölmez, und K.Röhrborn,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V,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VdSUA Band 34 （1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5.

[86]P.Zieme, “Šıngqo Šäli Tutung: Übersetzer buddhistischer Schriften ins Uigurische”, Tractata Altaica: Denis Sinor sexagenario dedicata, W.Heissig et al., ed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76, pp.767-773.

[87]（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中华书局，2000。

[88]P.Zieme, “Xuangzangs Biographie und das Xiyuji in alttürkischer Überlieferung”, in: J.Laut und K.Röhrborn, eds., Buddhistische Erzählliteratur und Hagiographie in türkischer Überlieferun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0, pp.75-107.

[89]S.-Ch.Raschmann, Baumwolle im türkischen Zentralasien: Philologische und wirtschaftshistorische Untersuchungen anhand der vorislamischen uigurischen Texte, VdSUA Band 44,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5.

[90]A.Yakup, Disastvustik: Eine altuigurische Bearbeitung einer Legende aus dem Catusparisat-sutra, VdSUA Band 7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91]Z.Özertural, Der uigurische Manichäismus: Neubearbeitung von Texten aus Manichaica I und III von Albert v.Le Coq,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8.

[92]W.Bang, A.v.Gabain und G.R.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 Texte.VI.Das buddhistische Sūtra Säkiz yükmäk, SPAW, Nr.10, 1934, pp.93-192; G.R.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 Texte,VII,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2, Berlin: G.Reimer, 1936.

[93]O.Sertkaya, “Uigur para belgeleri （I Bölüm.kümüş）”,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Языковых Систем в Синхронии и Диахронии к70-летию Э.Р.Тенишева, Москва, 1991, pp.114-136; O.Sertkaya, “Eski Uygur Türklerinden hukuk belgeleri örnekleri”, Türklerde insani değerler ve insan hakları: Başlangıcından Osmanlı dönemine kadar, Istanbul, 1993, pp.131-148; O.Sertkaya, “Zu einigen neuen uigurischen Landverkaufsverträgen”, in: M.Ölmez & S-Ch.Raschmann, Hrsg.,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Festschrift für Peter Zieme anläßlich seines 60.Geburtstags, Istanbul/Berlin, 2002, pp.267-289; O.Sertkaya ve R.Alimov, Eski Türklerde Para （Göktürklerde, Uygurlarda ve Türgişlerde）, Istanbul, 2006.

[94]O.Sertkaya, “Die Geschichte der im Zweiten Weltkrieg verlorengegangenen und zerstörten uigurischen Texte und das altuigurische Bruchstück mit Sternnamen”, 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1996, Berlin, pp.279-281.

[95]松井太：《回鹘语 käzig与高昌回鹘王国税役制度的渊源》，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第196～202页；D.Matsui, “Uigur käzig and the Origin of Taxation System in the Uigur Kingdom of Qočo”,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18, 2008（2013）, pp.229-242；D.Matsui, “An Uigur Document Preserved in the Library of Istanbul University”,『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2, 2007, pp.61-70。

[96]S.-Ch.Raschmann und O.Sertkaya,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20: Alttürkische Texte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m Nachlass Reşid Rahmeti Ara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6.

[97]W.Radloff, “Altuigurische Sprachproben aus Turfan”, in: D.A.Klementz, Nachrichten ü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Petersburg in Jahre 1898 ausgeru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 St.Petersburg, 1899, pp.55-83; W.Radloff, Tisastvustik：ein in Turkische Sprache Bearbeitetes buddhistisches Sutra, Bibliotheca Buddhica 12, St.Petersburg, 1910; W.Radloff, Kuan-si-im Pusar.Ein turkische Ubersetzung des XXV Kapitels der Chinesischen Ausgabe des Saddharmapundarika, Bibliotheca Buddhica 14, St.Petersburg 1911; W.Radloff, Suvarnaprabhasa, Bibliotheca Buddhica 32 （1-3）, Leningrad, 1930.

[98]W.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Materialien nach dem Tode des Verfassers mit Erganzungen von S.Malov herausgegeben, Leningrad, 1928.

[99]С.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1.

[100]L.Tugusheva, “Three Letters of Uighur Princes from the MS Collection of the Leningrad S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 24-2, 1971, pp.173-187.

[101]L.Tugusheva, “Early Medieval Uighur Records from East Turkestan”, Manuscripta Orientalia, St.Petersburg, 1996, pp.8-15.

[102]L.Tugusheva, “Ein Fragment eines frühmittelalterlichen uigurischen Textes”, 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Berlin, 1996, pp.356-358.

[103]Л.Тугушева, Фрагменты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Москва, 1980.

[104]Л.Тугушева, 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Москва, 1991.

[105]Л.Тугушева, Сутра Общины белого лотоса: тюркская версия, Москва, 2008.

[106]Л.Тугушева, Уйгурские дел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X—XIV вв.из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Москва, 2013.

[107]孟列夫、钱伯城主编《俄藏敦煌文献》（全1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

[108]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

[109]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63～64页。

[110]梅村坦：《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吐鲁番考古记〉所收回鹘文古文献过眼录》，张承志译，原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收入荣新江编《黄文弼所获

西域文献论集》，科学出版社，2013。

[111]荣新江：《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的学术价值（代前言）》，荣新江编《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

[112]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黄文弼西域文书中的回鹘文文献综述》，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第276～287页；简目见第277～278页。

[113]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31·32、1991，85-88頁；T.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Wiesbaden, 2004, pp.105-109。

[114]茨默最早研究该文书，并发表文书重要片段的转写，参见P.Zieme, "Ein Uigurischer Text Über die Wirtschaft Manichäischer Klöster im Uigurischen Reich", in: Researches in Altaic Languages, L.Ligeti, eds., Budapest, 1975, pp.331-338;（汉译本）茨默《有关回鹘王国摩尼寺院经济的一件回鹘语文书》，付马译，收入荣新江编《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第92～97页。耿世民先生首次将文书全文转写、翻译，参见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第497～516页；（英文本）Geng Shimin, "Notes On an Ancient Uighur Official Decree lssued to a Manichaean Monastery",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35, 1991, pp.209-230。森安孝夫又在耿先生解读的基础上，对文书进行重新解读，参见氏著『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35-126頁；（德文本）T.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ss.39-147。最近森安氏又在其新作中对文书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参见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時代のマニ教隆盛：マニ寺院経営的実態」森安孝夫『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558-589頁。

[115]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63页。

[116]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110页。

[117]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吉田丰最近出版其对3件粟特文书信的增订读本和全面研究，参见Y.Yoshida, Three Manichaean Sogdian letters unearthed in Bäzäklik, Turfan, 臨川書店，2019。

[118]茨默：《有关摩尼教开教回鹘的新史料》，王丁译，《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3期，第1～7页。

[119]多鲁坤·阚白尔、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内陸アジア史研究』4，1989，第77-86页。

[120]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新发现的回鹘语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1999，第287～298页；Israpil Yüsüp,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s Bhaisajyagurusutra nach einem Blockdruck aus Turfan", in: 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lich Reimer, 2004, pp.411-415。

[121]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回鹘文中心木》，『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1，1996，第62～66页。

[122]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回鹘文文献二种》，《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4辑，1994，第110～119页。

[123]旅順博物館、龍谷大学編『旅順博物館蔵新疆出土漢文仏経研究論文集』、2006。

[124]旅順博物館、龍谷大学編『中央アジア出土の仏教写本』、2012。

[125]关于大谷文书的流散历史和收藏情况，参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157～160页。

[126]羽田明·山田信夫編『大谷探檢隊将来ウイグル字資料目錄』西域文化研究会編『西域文化研究第四·中央アヅア古代語文獻』法蔵館、1961、171-206頁、圖版11-37。

[127]護雅夫「ウイグル文葡萄園売渡文書」『東洋学報』42-4、1960、22-50頁；Mori Masao, “A Study of Uygur Documents of Loans for Consumptio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 20, 1961, pp.111-148，后收入其论文集《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第3卷第2章“回鹘文书诸论（ウイグル文書諸論）”中（護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3、山川出版社、1997）。

[128]山田信夫「大谷探検隊将来ウイグル文売買貸借文書」『西域文化研究』4、法蔵館、1961、207-220頁。

[129]他随后发表的相关论文包括：山田信夫「ウイグル文売買契約書の書式」『西域文化研究』6、法蔵館、1963、29-62頁；N.Yamada, “Uigur Documents of Sale and Load Contracts brought by Otani Expedition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 23, 1964, pp.71-118；山田信夫「ウイグル文貸借契約書の書式」『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11、1965、87-216頁；N.Yamada, “Four Notes on Several Names for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Uighur Documents”, in: L.Ligeti, ed., Studia Turcica, Budapest: Akadeniai Kiado, 1971, pp.491-498；等等。

[130]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从回鹘文契约文书整理小组建立到《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出版，具体介绍参见荣新江书评，《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第172～174页。

[131]小田寿典相关论文包括：J.Oda, “On baš bitig, ’ydyš bitig and čïn bitig: Notes of the Uighur Documents Related to a Person Named Turï”,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1991, pp.37-46; J.Oda, “A Recent Study on the Uighur Document of Pintung’s Petition”,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1992, pp.35-46; J.Oda, “Eski bir Türk şiirindeki Yol Temür adlı bir zat üzerine”, in: M.Ölmez, ed., Talat Tekin armağanı.65.doğum yılı dolayısıyla meslektasları ve öğrencilerinin yazılarıyla, Ankara, 1993, pp.139-146; J.Oda, “Eski Uygurlarda ög bitig üzerine”,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6, 1996, pp.57-62。梅村坦相关论文包括：梅村坦「イナンチ一族とトゥルファン-ウイグル人の社会」『東洋史研究』45、1987、90-120頁；梅村坦「ウイグル文書『SJ Kr.4/638』：婚礼·葬儀費用の記録」『立正大学教養部紀要』20、1987、35-87頁；梅村坦「ウイグル文家産分割文書の一例：中国歴史博物館所蔵K7716」『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唐代史研究会報告第VII集）刀水書房、1990、420-446頁；H.Umemura, “The Uyghur Document SI 4b Kr.71: Concerning the Sale of a Slave and the Loan of Silver”, in: 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pp.358-360。森安孝夫相关论文详见后文。

[132]信息参见百済康義·森安孝夫·坂本和子「大谷探檢隊收集西域文化資料とその関聯資料」『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35、1996、41-109頁。

[133]大木彰·橘堂晃一·吉田豊「大谷探検隊収集『西厳寺蔵橘資料』について」『東洋史苑』70·71、2008、59-79頁。

[134]M.Erdal, “The Turkish Yarkand Document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47, 1984 （2）, pp.260-301.

[135]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第172页。

[136]迪拉娜·伊斯拉菲尔、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出土的回鹘文记账文书二件》，『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9，2014，第137～156页。

[137]Geng Shimin und H.-J.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Wiesbaden; 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138]P.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s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iscataway: Gorgias Press, 2015.

[139]L.Clark, Uygur Manichaean Texts, VolumeII: Liturgical Texts, Texts, Translations, Commentary.Corpus Fontium Manichaeorum: Series Turcica II.Turnhout: Brepols, 2013.

[140]L.Clark, Uygur Manichaean Texts, VolumeIII: Ecclesiastical Texts, Texts, Translations, Commentary.Corpus Fontium Manichaeorum: Series Turcica III.Turnhout: Brepols, 2017.

[141]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関係史料集成』『平成26年度近畿大学国際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

[142]参见付马《唐咸通乾符年间的西州回鹘政权——国图藏BD11287号敦煌文书研究》，《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第76～81页。

[143]参见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24～36页。

[144]该号残卷抄有诗四首，第四首仅残留题目和首句，却暗示了西州回鹘在唐乾符三年（876）攻取伊州的重要史事，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33页。该号与英藏S.6234、法藏Pelliot chinois.2672应为同一写卷，共存诗31首，为同一人所抄。作者似为客游河西诸州的中原人士，时代在晚唐张氏归义军期间，参见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第650～651、656～657页。

[145]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115～117页。

[146]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21-127页。

[147]参见森安孝夫「敦煌と西ウイグル王国：トゥルファンからの書簡と贈り物を中心に」『東方学』74、1987、58-74頁；此据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336-354頁。

[148]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9-360页。

[149]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9～360页。

[150]其余敦煌出土记沙州与西州、伊州出使或民间往来的文书，参见森安孝夫「敦煌と西ウイグル王国：トゥルファンからの書簡と贈り物を中心に」、348-349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1～397页。

[151]陈国灿、伊斯拉非尔·玉苏甫：《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初探》，《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74～182页；荣新江：《〈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张定京、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主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第182～190页。

[152]P.Skjærvø, “Turks and Turkic in the Khotanese Texts from Khotan and Dunhuang”, in: É.Csató, L.Johanson, A.Róna-Tas, and B.Utas, eds., Turks and Iranians: Interactions in Language and History, 2016,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p.13.

[153]参见Y.Yoshida,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and the Khotanese documenrs”, in: D.Durkin-Meisterernst, Ch.Reck, D.Weber, eds., Literarische Stoffe und ihre Gestaltung in mitteliranischer Zeit: Kolloquium anlässlich des 70.Geburtstages von Werner Sundermann, Wiesbaden: Ludwig Reichert Verlag, 2009, pp.349-362。Hedin文书由贝利（H.Bailey）于1961年统一刊布，本文书的释读参见H.Bailey, Khotanese Texts IV,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1, pp.33-34, 121-125。

[154]P.Skjærvø, “Turks and Turkic in the Khotanese Texts from Khotan and Dunhuang”, pp.14-19.

[155]F.Thomas and S.Konow, “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huang”, Publications of the Indian Institute I, 3, Oslo Ethnografiske Museums Scrifter, III, 1929, pp.122-160.

[156]H.W.Bailey, “The Staël -Holstein Miscellany”, Asia Major, vol.2, 1951, pp.1-45.

[157]E.G.Pulleyblank, “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 Asia Major, vol.4, 1954 （1）, pp.90-97; in his: Central Asia and Non-Chinese People of Ancient China, 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Series, Ashgate, 2002.

[158]H.W.Bailey, “The Staël -Holstein Miscellany”, pp.1-45.

[159]参见荣新江先生对岑仲勉先生相关研究的整理，荣新江《岑仲勉先生与丝绸之路研究——以钢和泰藏敦煌写本于阗语行记为中心》，《纪念岑仲勉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第530～539页。

[160]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T’oung Pao, vol.46, 1958, pp.115-153.

[161]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1～18页；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续完）》，《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第1～13页。

[162]J.R.Hamilton et N.Sims-Williams, 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London, 1990.

[163]N.Sims-Williams and J.R.Hamilton, Turco-Sogdian documents from 9th-10th century Dunhuang, with an Appendix by Wen Xin, London, 2015.

[164]W.Sundermann, “Probleme der Interpretation manichaeisch-sogdischer Briefe”,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8, 1980, pp.289–316; （reprinted） in: J.Harmatta, ed., From Hecataeus to al-Ḫuwārizmī, Budapest, 1984, pp.289–316.

[165]A.Benkato, Studies on the Sogdian Epistolary Tradition, TurnHout: Brepols, 2018.

[166]百済康義·ヴェルナー—ズンダ—マン·吉田豊『イラン語断片集成·大谷探検隊収集·龍谷大学所蔵中央アジア出土イラン語資料』法蔵館、1997。

[167]W.B.Henning, Sogdica, London, 1940, pp.8-11; W.B.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9, 1938 （3）, pp.545-571.

[168]关于吐鲁番出粟特文书年代，参见W.B.Henning, “Mitteliranisch”, Iranistik: Linguistik, Leiden/Köln, 1958, p.77。

[169]吉田豊「大谷探検隊将来中世イラン語文書管見」『オリエント』28-2、1986、57-58頁；百済康義·ヴェルナー—ズンダ—マン·吉田豊『イラン語断片集成·大谷探検隊収集·龍谷大学所蔵中央アジア出土イラン語資料』、143頁。

[170]跋文实为尾跋，当在诗篇之后，此前学者一直将两叶顺序颠倒。此由德金（D.Durkin-Meisterernst）最早指出，参见D.Durkin-Meisterernst, “Late Features in Middle Persian Texts from Turfan”, in: L.Paul, ed., Persian Origin: Early Judaeo-Persian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Persian, Iranica 6, Wiesbaden, 2013, pp.1-13。

[171]F.W.K.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Mahrnāmag）,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2；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7，第129～153页。最新读本参见D.Durkin-Meisterernst, “Late Features in Middle Persian Texts from Turfan”, pp.1-13;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関係史料集成』、27-30頁。

[172]由缪勒刊布，参见F.W.K.Müller, “Der Hofstaat eines Uiguren-Königs”, Festschrift V.Thomsen zur Vollendung des 70.Lebensjahres, Leipzig, 1912, pp.207-213; 英文读本参见J.D.BeDuhn, “Middle Iranian and Turkic Texts Associated with Manichaean Art from Turfan”, Appendix I to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by Z, Gulásci, Turnhout: Brepols, 2001, pp.232-234; 最新日文译本参见『ウイグル＝マニ教史関係史料集成』、25-27頁。

[173]文书最早由张湛、时光刊布，见氏著《一件新发现犹太波斯语信札的断代与释读》，《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2008，第71～99页。二位作者将文书年代定在802年于阗历6月10日之后不久，认为文书所记乃漠北回鹘击败吐蕃收复喀什之事。后来张湛对文书进行重新解说，将文书年代定在791年前后，认为所记战事为吐蕃进攻喀什的唐军失利之事，参见张湛《粟特商人的接班人？——管窥丝路上的伊朗犹太商人》，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第661～672页。

[174]Е.И.Кычанов, пер., иссл.и прим., 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1149-1169）, Кн.1-4, Москва, 1987-1989.

[175]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西夏天盛律令》，科学出版社，1994。

[176]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177]佐藤貴保「西夏法典貿易関連条文訳註」森安孝夫編『ジ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大阪大学 21 世紀COE ブログラム「インターフェイスの人文学」報告書3）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197-255頁。

[178]A.Grü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a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München, 1906, p.60.

[179]A.Grü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a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pp.193-195.

[180]F.W.K.Müller, 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3, Berlin: G.Reimer, 1915.

[181]岑仲勉：《吐鲁番木柱刻文略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1947，第117～119页；收入氏著《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453～456页。

[182]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仏教史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史学雜誌』83-4、1974、38-54頁。

[183]T.Moriyasu,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De Dunhuang à Istanbul—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 Silk Road Studies 5, Turnhout: Brepols, 2001, pp.150-223.

[184]J.R.Hamilton, “Remarks concerning Turfan Stake Inscriptions III”, in: 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 pp.121-124.

[185]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森安孝夫『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678-730頁。

[186]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回鹘文中心木》，第62～66页。

[187]T.Moriyasu,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p.157.

[188]A.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1190.

[189]H.Umemura, “A Wooden Fragment with Uighur Inscription Preserved in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 41, 1983, pp.63-82；（日文本）梅村坦「大谷探検隊将来ウイグル銘文木片」護雅夫編『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山川出版社、1983、133-159頁。

[190]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64页。

[191]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64页。

[192]Ş.Tekin, “Die uigurische Weihinschrift eines buddhistischen Kloster aus den Jahren 767-780 in Toyoq”,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48, 1976, pp.225-230.

[193]耿世民：《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世界宗教》1981年第1期，第77～83页；本书引自氏著《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第304～311页。

[194]耿世民：《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第306页；森安孝夫赞同耿先生的断代，参见T.Moriyasu,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pp.166-167, footnote 33。

[195]黄文弼：《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文物》1964年第2期；收入氏著《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60～172页；载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第184～193页。

[196]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233～245页。

[197]Geng Shimin et J.R.Hamilton, “L’inscription ouigoure de la Stele Commemorative des Iduq qut de Qoco”, Turcica 13, 1981, pp.10-54.

[198]刘迎胜、卡哈尔·巴拉提：《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碑文之校勘与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辑，1984，第57～106页。

[199]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 第2期，第253～264页。

[200]森安孝夫、オチル編『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1999。

[201]大泽孝对此碑的释读参见森安孝夫·オチル編『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143-145頁。大泽孝推测碑文所记为生活在漠北回鹘汗国内的突厥余部的事迹。

[202]大泽孝对此碑的释读参见森安孝夫·オチル編『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158-167頁。大泽孝认为此碑为回鹘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的纪功碑；但由于同属磨延啜纪功碑的塔里亚特碑和希乃乌苏碑遗址处均不见石人，故此说存疑。参见前引书第158～159页。

[203]为磨延啜之纪功碑，片山章雄对此碑的释读参见森安孝夫·オチル編『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168-176頁。

[204]为磨延啜之纪功碑，森安孝夫对此碑的释读参见森安孝夫·オチル編『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177-195頁。

[205]回鹘西迁以后，此城又为契丹、蒙古相继使用，在蒙元时代作“百八里”。遗址踏查简报参见森安孝夫·オチル編『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196-198頁。

[206]森安孝夫·オチル編『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199-208頁。此节援引了拉德洛夫、克莱门茨（D.A.Klementz）等人在不同时期所做的调查报告。

[207]回鹘汗国时代汉文、粟特文、鲁尼文三体碑，吉田丰读粟特文部分，森安孝夫读鲁尼文部分，见森安孝夫·オチル編『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209-224頁。

[208]回鹘汗国时代汉文、粟特文、鲁尼文三体碑，吉田丰读粟特文部分，片山章雄读鲁尼文部分，参见森安孝夫·オチル編『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225-227頁。

[209]http://ir.library.osaka-u.ac.jp/web/SIAL/volume/SIAL_img.html.

[210]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出版公司，1955；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

[211]手稿影印本，参见P.Pelliot,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s, 6 vols, Paris, 1981-1992。

[212]J.R.Hamilton et Niu Ruji, “Inscriptions ouïgoures des grottes bouddhiques de Yulin”, Journal Asiatique 286, 1998, pp.127-210.

[213]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54页；牛汝极：《敦煌榆林千佛洞第12窟回鹘文题记》，《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20～129页。

[214]D.Matsui, “Revisiting the Uigur Inscriptions of the Yulin Caves”,『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3, 2008, pp.17-33.

[215]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関する箚記」『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30、弘前大学人文学部、2013、29-50頁；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関する箚記（二）」『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32、2014、27-44頁。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編『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7、1-161頁。

[216]Z.Gulásc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Corpus Fontium Manichaeorum: Series Archaeologica et Iconographica I）.Turnhout: Brepols, 2001.

[217]J.D.BeDuhn, “Middle Iranian and Turkic Texts Associated with Manichaean Art from Turfan”, pp.209-244.

[218]Ch.Bhattacharya-Haesner, Central Asian Temple Banners in the Turfan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3.

[219]供养人画像、题记照片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详细考古报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

[220]H.Umemura, “A Qočo Uyghur King Painted in the Buddhist Temple of Beshbalïq”, Turfan, Khotan und Dunghuang, pp.361-378.

[22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人民出版社编《库车库木吐拉石窟》，新疆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图版116。

[222]参见荣新江《近年对龟兹石窟题记的调查与相关研究》，《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第1～9页；台来提·乌布力《新疆库木吐喇石窟的题记、题刻和榜题》，《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15页。

[223]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编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该书下册在1981年出版。

[224]参见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7；毕长朴《回纥与维吾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林幹、高自厚《回纥史》第六至十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林幹《突厥与回纥》第八至十章，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李树辉《乌古斯和回鹘研究》第五至七章，民族出版社，2010；薛宗正《回纥史初探》卷十四及附文一至七，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最新的相关专著是杨蕤《回鹘时代：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25]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

[226]（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

[227]耿世民：《高昌回鹘王国》，阿西莫夫、博斯沃思主编《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上），华涛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第151～155页。

[228]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47～159

页。

[229]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230]华涛：《回鹘西迁及东部天山地区的政治形势》，《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第116～118页。

[231]华涛：《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第23～32页。

[232]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

[233]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34]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第33页。

[235]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1章“归义军与西州回鹘之关系”，第351～397页。

[236]Rong Xinjiang, “The Relationship of Dunhuang with the Uighur Kingdom in Turfan in the Tenth Century”, in: L.Bazin et P.Zieme, eds., De Dunhuang à 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 Hamilton, Silk Road Studies V, Turnhout: Brepols, 2001, pp.275-298.

[237]荣新江：《〈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第182～190页；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第24～36页。

[238]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32～39页。

[239]荣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专号），第128～132页。

[240]荣新江：《王延德所见高昌回鹘大藏经及其他》，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267～272页。

[241]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

[242]杨富学：《回鹘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243]白玉冬、杨富学：《新疆和田出土突厥卢尼文木牍初探——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对抗喀喇汗朝的新证据》，《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39～49页。

[244]杨富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78～86页，图版125页。

[245]杨富学：《唐代仆固部世系考——以蒙古国新出仆固氏墓志铭为中心》，《西域研究》2012第1期，第69～76、143～144页；杨富学：《蒙古国新出土仆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第5期，第77～82、88～97页。

[246]付马：《西州回鹘王国建立初期的对外扩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 222-0661.09号回鹘文书的历史学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8辑，2013，第145～162页；付马：《回鹘时代的北庭城——德藏Mainz 354号文书所见北庭城重建年代考》，《西域研究》2014年第2期，第9～22页；付马：《唐咸通乾符年间的西州回鹘政权——国图藏BD11287号敦煌文书研究》，第76～81页；付马：《黄文弼所获

文书中的回鹘时代高昌地区城郭名目——兼论回鹘高昌“二十二城”名实》，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03～311页。

[247]J.R.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 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Paris, 1955；（汉译本）《五代回鹘史料》，耿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248]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T'oung Pao, vol.46, 1958, pp.115-153.

[249]J.R.Hamilton, “Toquz-Oγuz et On-Uyγur”, Journal Asiatique, vol.25, 1962, pp.23-63.

[250]J.R.Hamilton, “Un acte ouïgour de vente de terrain provenant de Yar-khoto”, Turcica 1, 1969, pp.26-52.

[251]J.R.Hamilton, “Le pays des Tchong-Yun, Čungul, ou Cumuḍa au Xe Siècle”, Journal Asiatique 265, 1977, pp.351-379.

[252]J.R.Hamilton, “Remarks concerning Turfan Stake Inscriptions III”, in: 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 pp.121-124.

[253]J.R.Hamilton et Niu Ruji, “Deux Inscriptions funéraires turques nestoriennes de la Chine orientale”, Journal Asiatique 282, 1994, pp.147-164.

[254]J.R.Hamilton et Niu Ruji, “Inscriptions ouïgoures des grottes bouddhiques de Yulin”, Journal Asiatique 286, 1998, pp.127-210.

[255]P.Zieme, “Beiträge zur Erforschung des Xvāstvānīft”,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12, 1966, pp.351-378.

[256]P.Zieme, “Die türkischen Yosïpas-Fragmente”,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14, 1968, pp.45-67.

[257]G.Hazai und P.Zieme, “Ein uigurisches Blockdruckfragment einer Einleitung zum Vajracchedikā-sūtra”,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1, 1968, pp.1-14.

[258]G.Hazai und P.Zieme, Fragmente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s “Jinʾgangjing mit den Gāthās des Meister Fu”（nebst einem Anhang von Taijun.Inokuchi）, BTT 1, Berlin, 1971.

[259]G.Kara und P.Zieme, 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BTT 7, Berlin, 1976；G.Kara und P.Zieme, Die uigurischen Übersetzungen des Guruyogas “Tiefer Weg” von Sa-skya Paṇḍita und der Mañjuśrīnāmasaṃgīti, BTT 8, Berlin, 1977; G.Kara und P.Zieme,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 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8212（109）,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78.

[260]P.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TT 13, Berlin, 1985.

[261]ペーター·ツイーメ·百済康義『ウイグル語の観無量寿経』永田文昌堂、1985。

[262]P.Zieme, 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 BTT 18, Turnhout: Brepols, 1996.

[263]P.Zieme,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Edition alttürkischer Übersetzungen nach Handschriftenfragmenten von Berlin und Kyoto, Mit einem Appendix von Jorinde Ebert: Ein Vimalakīrti-Bildfragment aus Turfan, Turnhout: Brepols, 2000.

[264]P.Zieme, 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 BTT 23, Turnhout: Brepols, 2005.

[265]S.Tezcan und P.Zieme, Uigurische Brieffragmente, in: L.Ligeti, ed., Studia Turcica, Budapest: Akadeniai Kiado, 1971, pp.451- 460；（汉译本）《回鹘文书信残叶》，付马译，荣新江编《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第257～265页。

[266]P.Zieme, “Ein uigurischer Landverkaufsvertrag aus Murtuq”,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 1974, pp.295-308.

[267]P.Zieme, “Ein uigurischer Leihkontrakt über Weize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7, 1980, pp.273-275.

[268]P.Zieme, “Uigurische Pachtdokumente”,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7, 1980, pp.197-245.

[269]P.Zieme, “Uigurische Steuerbefreiungsurkunden für buddhistische Klöster”,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8, 1981, pp.237-263.

[270]P.Zieme, “Ein uigurisches Familienregister aus Turfa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9, 1982, pp.263-267.

[271]P.Zieme, “Eine uigurische Hausverkaufsurkunde aus Qočo”,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9, 1992, pp.359-371.

[272]P.Zieme, “An Uigur Monasterial Letter from Toyoq”,『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0, 1995, pp.1-7.

[273]P.Zieme, “Zu den nestorianisch-türkischen Turfantexten”, in: G.Hazai und P.Zieme, hrsg., Sprachen,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altaischen Völker: Protokollband der 12.Tagung der PIAC 1969 in Berlin, Berlin, pp.661-668.

[274]P.Zieme, “Zwei Ergänzungen zu der christlich-türkischen Handschrift T IIB 1”,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5, 1977, pp.271-272; P.Zieme, “Ein Hochzeitssegen uigurischer Christen”, in: K.Röhrborn und H.Brands, hrsg., Scholia: Beiträge zu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Annemarie von Gabain zum 80.Geburtstag am 4.Juli 1981 dargebracht von Kollegen, Freunden und Schülern, VdSUA 14, Wiesbaden, 1981, pp.221-232.

[275]P.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s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iscataway: Gorgias Press, 2015.

[276]P.Zieme, Die 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Studien zur alttürkischen Dichtung, Budapest, 1991.

[277]P.Zieme,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 Opladen, 1992.

[278]P.Zieme, “Ein Uigurischer Text Über die Wirtschaft Manichäischer Klöster im Uigurischen Reich”, in: L.Ligeti, ed., Researches in Altaic Languages, Budapest, 1975, pp.331-338；（汉译本）《有关回鹘王国摩尼寺院经济的一件回鹘语文书》，付马译，第92~97页。

[279]P.Zieme, “Drei neue uigurische Sklavendokumente”,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5, 1977, pp.145-170.

[280]P.Zieme, “Materialien zum uighurischen Onomasticon I”, 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 Yılığı Belleten 1977, Ankara, 1978, pp.71-86; P.Zieme, “Materialien zum uighurischen Onomasticon II”, 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 Yılığı Belleten 1978-1979, Ankara, 1981, pp.81-94; P.Zieme, “Materialien zum uighurischen Onomasticon III”, 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 Yılığı Belleten 1984, Ankara, 1987, pp.267-283.

[281]P.Zieme, “Titulaturen und Elogen uigurischer Könige”, in: K.Sagaster & H.Eimer, eds., Religious and Lay Symbolism in the Altaic World and Other Papers: Proceedings of the 27th Meeting of the PIAC, Walberbe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June 12th to 17th, 1984, 1989, pp.443-450.

[282]P.Zieme, “Manichäische Kolophone und Könige”, in: G.Wiessner and H.-J.Klimkeit, eds., Studia Manichaica,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ichaeism, St.Augustin/Bonn, August 6-10, 1989, Wiesbaden, 1992, pp.323-327.

[283]P.Zieme, “Sambodqu et alii.Einige alttürkische Personennamen im Wandel der Zeiten”, Journal of Turkology 2, 1994（1）, pp.119-133; P.Zieme, “Sur quelques titres et noms des bouddhistes turcs”, in: R.Dor, ed., Asie Centrale et ses voisins: Influences réciproques, Paris, 1990, pp.131-139.

[284]P.Zieme, “Indische Wörter in nichtbuddhistischen alttürkischen Texten”, in: S.Bretfeld und J.Wilkens, Hrsg., Indien und Zentralasien: Sprach- und Kulturkontakt, Vorträge des Göttinger Symposions vom 7.bis 10.Mai 2001, VdSUA 61, Wiesbaden, 2003, pp.153-163.

[285]P.Zieme, “Arabische und neupersische Wörter in den altuigurischen Text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in: D.Weber, ed., Languages of Iran: Past and Present: Iranian Studies in memoriam David Neil MacKenzie, Wiesbaden, 2005, pp.285-295.

[286]P.Zieme, “Ordo uluš, Solmı and Bešbalık”,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62（3）, 2009, pp.255-266.

[287]茨默：《有关摩尼教开教回鹘的新史料》，第1~7页。

[288]P.Zieme, “A Fragment from Bamyan”, in: D.Minutoli and R.Pintaudi, eds., Papyri Graecae Schøyen（PSchøyen II）: Essays and texts in honour of Martin Schøyen, Firenze, 2010, pp.275-277.

[289]P.Zieme, “The Manichaean Turkish Texts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 2010, pp.255-266.

[290]P.Zieme, “Was barčuk tili a Turkic Language?”，《敦煌吐鲁番研究》12, 2011, pp.69-84.

[291]P.Zieme, “Some Notes on the Ethnic Name Taŋut（Tangut）in Turkic

Sources”, in: И.Попова, отв.ред., Тангут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в честь 80-летия проф.Е.И.Кычанова, Москва, 2012, pp.461-468.

[292]Zhang Tieshan and P.Zieme,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64, 2011, pp.129-159; Zhang Tieshan and P.Zieme, “A further fragment of Old Uigur annal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66, 2013, pp.397-410.

[293]C.Mackerras, “Sino-Uighur Diplomatic and Trade Contacts（744 to 840）”,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3-3, 1969, pp.215-240.

[294]C.Mackerras, The Uighur Empire according to the Tang Dynastic Histories: A Study in Sino-Uighur Relation, 744-840, Columbia, 1973.

[295]C.Mackerras, “the Uighurs”, in: D.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1990, pp.317-324; C.Mackerras, “Uyghur-Tang Relations: 744-840”, Central Asian Survey 19-2, 2000, pp.223-234; C.Mackerras, “Relations Between the Uygur State and China’s Tang Dynasty, 744-840”, in: D.Christian and C.Benjamin, eds., Realms of the Silk Roads: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Studies IV, Turnhout: Brepols, 2000, pp.195-207.

[296]А.Малявкин,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уйгуров в IX-XII в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4.

[297]А.Малявкин, Уйгур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IX-XII в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3.

[298]M.Drompp, “The Uighur-Chinese Conflict of 840-848”, in: N.Di Cosmos, eds., 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500-1800）, Leiden/Boston/Köln: Brill, 2002, pp.73-103.

[299]M.Drompp, 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5.

[300]M.Drompp, “Breaking the Orkhon Tradition: Kirghiz Adherence to the Yenisei Region after A.D.84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 1999, pp.390-403.

[301]羽田亨对相关文书的研究及其对回鹘史具体问题的研究集中收入其史学论文集，参见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2冊、同朋社、1957·1958。

[302]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汉译本）《西回鹘国史的研究》。

[303]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奪戦及びその後の西域情勢について」『東洋学報』55-4、1973、60-87頁；（增订本）「增補：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奪戦及びその後の西域情勢について」流沙海西奨学会編『アジア文化史論叢』3山川出版社、1979、199-238頁；（法文本）“Qui des Ouigours ou des Tibétains ont gagné en 789-792 à Beš-balïq?”, Journal Asiatique 269-1/2, pp.193-205；（汉译本）《究竟是回鹘还是吐蕃在公元789—792年间夺据了别失八里？》，罗贤佑译，《民族译丛》1982年第3期，第38～41页；（最新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230-274頁。

[304]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東洋学報』59－1·2、1977、112-116頁；（汉译本）《关于回鹘的西迁》，陈俊谋译，《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第8～14页；（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276-298頁。

[305]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と HOR」『アシ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14、1977、1-48頁；（法文本）“La nouvelle interprétation des mots Hor et Ho-yo-hor dans le manuscrit Pelliot tibétain 1283”,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34-1/3, 1980, pp.171-184；（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49-131頁。森安孝夫「チヘット文字て書かれたウイクル文仏教教理問答（P.t.1292）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25、1985、1-85頁。

[306]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4（1983）、1984、1-85頁；（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132-227頁。

[307]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語文献」、1-98頁。

[308]T.Moriyasu,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 40, 1982, pp.1-18；（日文本）「元代ウイクル仏教徒の一書簡：敦煌出土ウイグル語文献補遺」護雅夫編『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山川出版社、1983、209-231頁；森安孝夫「敦煌出土元代ウイグル文書中のキンサイ緞子」榎博士頌寿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榎博士頌寿記念東洋史論叢』汲古書院、1988、417-441頁；（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490-510頁。

[309]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から見た安史の乱」『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7、2002、117-163頁；（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2-48頁。

[310]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榎一雄編『講座敦煌2 敦煌の歴史』大東出版社、1980、297-338頁；（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299-335頁。森安孝夫「敦煌と西ウイグル王国：トゥルファンからの書簡と贈り物を中心に」『東方学』74、1987、58-74頁；（汉译本）《敦煌与西回鹘王国——寄自吐鲁番的书信及礼物》，陈俊谋译，《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第117～127页；（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336-354頁。

[311]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323-328頁；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団と西ウイグル王国」『内陸アジア史研究』15、2000、21-35頁；（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355-374頁。

[312]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31·32、1991；T.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313]森安孝夫「コレージュ＝ド＝フランス講演録：ウイグル＝マニ教史特別講義」（“Four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in May 2003.History of Manichaeism among the Uighurs from the 8th to the 11th Centuries in Central Asia”）森安孝夫編『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大阪大学 21 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インターフェイスの人文学」報告書，第3巻）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23-111頁；森安孝夫「東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新展开」『東方学』126、2013、1-19頁。

[314]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仏教のクロノロジー：ベゼクリクのグリュンヴェーデル編号第8窟（新編号第18）の壁画年代再考」『仏教学研究』62·63、2007、1-45頁；（英文本）T.Moriyasu, “Chronology of West Uighur Buddhism: Re-examination of the Dating of the Wall-paintings in Grünwedel’s Cave No.8 （New: No.18）, Bezeklik”, Aspects of Rea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Silk Road Studies 16,

Turnhout: Brepols, 2008, pp.191-228;（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645-677頁。

[315]此类型学说初次提出，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語文献」、15-16頁；对其系统阐述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劄记（その四）」『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9、1994、63-93頁。

[316]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劄记（その一）」『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4、1989、51-76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劄记（その二）」『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5、1990、69-89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劄记（その三）」『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7、1992、43-53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劄记（その四）」『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9、1994、63-93頁。

[317]T.Moriyasu and P.Zieme, “From Chinese to Uighur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o Uighur Documents”,『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4, 1999, pp.73-102.

[318]相关总结参见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东部における通貨：絹·西方銀銭·官布から銀錠へ」森安孝夫編『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論叢』朋友書店、2004；此据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444-446頁。

[319]T.Moriyasu,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 40, 1982, pp.1-18；（日文本）「元代ウイクル仏教徒の一書簡：敦煌出土ウイグル語文献補遺」護雅夫編『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山川出版社、1983、209-231頁。

[320]T.Moriyasu, “Epistolary Formulae of the Old Uighur Letters from Central Asia.” Acta Asiatica 94, 2008/2, pp.127-153；（增订本）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東部出土古ウイグル手紙文書の書式（前編）」『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51、2011、1-86頁（日文本：1-31頁；英文本：32-69頁；参考文献目録：70-86頁）；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東部出土古ウイグル手紙文書の書式（後編）」森安孝夫編『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汲古書院、2011、335-425頁；（英文本）T.Moriyasu, “Epistolary Formulae of the Old Uighur Letters from the Eastern Silk Road （Part 2）”, Memoirs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Osaka University 52, 2012 （3）, pp.1-97。

[321]T.Moriyasu, “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Čiqtim in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in: M.Ölmez and S.-Ch.Raschmann, eds.,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Festschrift für Peter Zieme anläßlich seines 60.Geburtstags, Berlin/Istanbul, 2002, pp.153-177.

[322]森安孝夫「敦煌出土元代ウイグル文書中のキンサイ緞子」榎博士頌寿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榎博士頌寿記念東洋史論叢』汲古書院、1988、417-441頁；（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490-510頁。

[323]参见森安孝夫「オルトク（斡脱）とウイグル商人」森安孝夫編『近世·近代中国およびた周辺地域における諸民族の移動と地域開発』（平成7·8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2）研究成果報告書）大阪大学文学部、1997、1-48頁；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のウイグル商人：ソグド商人とオルトク商人のあいた」『岩波講座世界歴史11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九~一六世紀）』岩波書店、1997、93-119頁；（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407-435頁。

[324]T.Moriyasu, “From Silk, Cotton and Copper Coin to Silver: Transition of the Currency Used by the Uighur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8th to the 14th Centuries”, in: 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 pp.228-229；

（日文增订本）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东部における通貨：絹·西方銀銭·官布から銀錠へ」森安孝夫編『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論叢』朋友書店、2004、1-40頁；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645-677頁。

[325]松井太「モンゴル時代ウイグリスタンの税役制度と徴税システム」松田孝一編『碑刻等史料の總合的分析によるモンゴル帝國·元朝の政治·経済システムの基礎的研究』（平成12-13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1）（課題番號12410096）研究成果報告書）、2002、87-127頁；D.Matsui, “Taxation Systems as Seen in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 from Turfan: An Overview”,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50,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2005, pp.67-82。

[326]他在回鹘文书中检出与唐代文书中的“番”“大税”“长行马”“元券”等概念对应的词语，指出回鹘税制的渊源系唐西州时代的制度，参见松井太「モンゴル時代ウイグリスタン税役制度とその淵源：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書にみえるkäzig の解釋を通して」『東洋学報』79-4、1998、26-55頁；松井太《回鹘语 käzig与高昌回鹘王国税役制度的渊源》，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6～202页；D.Matsui, “Uigur käzig and the Origin of Taxation System in the Uigur Kingdom of Qočo”,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18, 2013, pp.229-242。

[327]松井太「ウイグル文クトルグ印文書」『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3、1998、1-62頁。

[328]D.Matsui, “Dating of the Old Uygur Administrative Orders from Turfan”, in: M.Özkan and E.Doğan, eds., VIII. Milletlerarası Türkoloji Kongresi（30 Eylül – 04 Ekim 2013 - İstanbul）bildiri kitabı, 4, İstanbul, pp.611–633.

[329]松井太「モンゴル時代の度量衡：東トルキスタン出土文獻からの再檢討」『東方学』107、東方学会、2004、166-153頁；（英文本）D.Matsui, “Unific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by the Mongol Empire as Seen in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 in: 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 2004, pp.197-202; D.Matsui, “Mongol Globalism Attested by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 from East Turkestan”,『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22，弘前大学人文学部, 2009, pp.33-42。

[330]分别是SUK Sa01、Sa02、Sa18、Sa19、Sa20、RH01、Lo01、Lo02、Lo03、Lo05、Lo17、WP03，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箚记（その四）」『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9、1994、70-79·82·83頁。

[331]D.Matsui, “Six Uigur Contracts from the West Uigur Period（10th - 12th Centuries）”,『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15，弘前大学人文学部，2006，pp.37-62.

[332]松井太「西ウイグル時代の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書をめぐって」『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24、25-53頁。

[333]松井太「古ウイグル语文献にみえる“宁戎”とベゼクリク」『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6、2011、141-175頁。

[334]D.Matsui, “Ürümçi̇ ve Eski̇ Uygurca Yürüngçin Üzeri̇ne”, in: H..User and B.Gül, eds., Yalım Kaya Bitigi.Osman Fikri Sertkaya Armağanı, Türk Kültürünü Araştırma Enstitüsü, Ankara, 2013, pp.427-432.

[335]D.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of the Turfan Oases”, in: E.Ragagnin und

J.Wilkens, hrsg., Kutadgu Nom Bitig: Festschrift für Jens Peter Laut zum 60.Geburtstag, Wiesbaden, 2015, pp.275-303.

[336]松井太「シヴシドゥ·ヤクシドゥ関係文書とトヨク石窟の仏教教団：ペテルブルク所蔵ウイグル語世俗文書箚記」森安孝夫編『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論叢』朋友書店、2004、41-70頁。

[337]松井太「西ウイグル時代の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書をめぐって」『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24、25-53頁。

[338]D.Matsui, “Uigur Manuscripts Related to the Monks Sivšidu and Yaqšidu at ‘Abita-Cave Temple’ of Toyoq”,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97～714页。

[339]松井太「モンゴル時代のウイグル農民と仏教教団：U 5330（USp 77）文書の再検討から」『東洋史研究』63-1、2004、1-32頁。

第一章 前史：东部天山地区进入回鹘时代

从“二庭四镇”到回鹘时代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伊吾地方粟特胡人首领石万年率七城来降，唐朝在其地设西伊州羁縻之。贞观六年，唐朝改西伊州为伊州，升其为正州，由此开始了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直接统治。贞观十四年，唐朝攻灭高昌国，于其地置西州，于天山北麓的可汗浮图城置庭州，在东天山南北两侧站稳脚跟，打开了进取西域的门户[1]。到7世纪中叶，唐朝的势力已经覆盖东部天山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四缘。7世纪下半叶，唐朝经过与吐蕃及西突厥部落的反复争夺，终于得以在西域建立稳定统治。武周长寿元年（692），武威军总管王孝杰率军击败吐蕃，克复安西四镇，以汉兵三万镇守。长安二年（702），唐朝又改庭州为北庭都护府，置瀚海军。此二事件标志着唐朝在西域的统治进入镇兵化时代。此后，北庭节度使、安西节度使先后设置，分别处置两地军政。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唐朝在东部天山和塔里木盆地分别以北庭、安西节度使为核心的军政体系最终确立[2]。北庭节度使为北庭、西州、伊州三地最高军政长官，承担着北庭暨天山北麓和西、伊二州的防务。安西节度使则负责安西四镇所在塔里木盆地的防务。因西州、北庭又被称为前、后二庭，北庭节度使辖下地区被简称为“二庭”；安西节度使辖下之地被简称为“四镇”。唐朝统治下的西域在安史之乱以后常被简称为“二庭四镇”[3]。

吐蕃乘安史之乱在西北地区崛起，蚕食唐朝领土，使“关、陇失守，东西阻绝”[4]。广德二年至贞元二年间（764～786），吐蕃自东向西接连攻取唐朝凉、甘、肃、瓜、沙诸州，侵占河西走廊。安西、北庭二地由此进入中原的道路断绝。此后两地与唐朝中央之间的通使往来只能借道漠北回鹘，东部天山地区渐渐被回鹘汗国的势力笼罩[5]。贞元五年（789）冬，“吐蕃因葛禄、白服之众以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于）迦斯将兵救之”[6]。次年，在吐蕃的急攻之下，北庭失陷，北庭节度使杨袭古奔走西州。此后，漠北回鹘国中精锐尽出，在颉于迦斯率领下反扑北庭，又被吐蕃击败。颉于迦斯反而诓杀杨袭古，“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亡，唯西州之人，犹固守焉”[7]。唐朝中央所任命的伊西庭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杨袭古之死标志着唐朝对当地统治的结束。此后，东部天山地区进入回鹘、吐蕃和唐军余部的权力博弈阶段。下面笔者概说东部天山

各地区在此之后的权力转移过程。

1.北庭

杨袭古死后，漠北回鹘再度出兵北庭与吐蕃作战，终于取得胜利。《旧唐书·回纥传》记：“〔贞元〕七年（791）八月，回纥遣使献败吐蕃、葛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畜”[8]。漠北回鹘在北庭击败吐蕃之事，还见于《九姓回鹘可汗碑》的记载。该碑为回鹘汗国第8代可汗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所立纪功碑，列举历代回鹘可汗名号，重点表记保义可汗及其前代怀信可汗的武功事迹[9]。碑文汉文部分第14、15行记有如下内容。

……复，葛禄与吐蕃连□天可汗□以偏师于匀曷户对敌。智谋宏远，□□□□□□□□□□□□□□□□□□□□□□□□□

北庭半收，半围之。次 天可汗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率土黎庶、含气之类，纯善者抚育，悖离者屏除……[10]

传世汉文史料与《九姓回鹘可汗碑》的互证，使回鹘击败吐蕃、收取北庭之事成为定论[11]。《旧唐书回纥传》记：贞元七年“十二月，回纥遣杀支将军献吐蕃俘大首领结心，德宗御延喜门观之”[12]。推测此事为回鹘在北庭最终击败吐蕃的反映[13]。

2.西州

贞元六年杨袭古被杀之后，西州“犹为唐固守”。《元和郡县图志》明确记载，西州在贞元七年“没于西蕃”[14]。但法藏敦煌文书Pelliot chinois.3918《〈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题记》似乎给出了另一个答案——贞元八年。现将文书内容摘录如下。

此《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近刘和尚，法讳昙倩，于安西翻译，至今大唐贞元九年（793）约卌年矣。……其经去年西州倾陷，人心苍茫，收拾不着，不得本来。乃有同行僧广林，先日受持，昨于沙州，略有讽诵。僧俗忽闻，欣欢顶戴，咸请留本，相传受持。今次届甘州，未有闻者。遂请广林阇梨，附口抄题，将传未晓。见闻之者，普愿弘持，广令流布。癸酉岁（793）七月十五日，西州没落官甘州寺户、唐伊西庭节度留后使判官、朝散大夫、试太仆卿赵彦宾写，与广林阇梨审勘校，并无差谬。普愿宣通，作大利益。其广林，俗姓田氏也。乙亥年（795）秋，得向西元本勘，头边阙三纸，来不得，余校竟。[15]

可知，贞元八年西州曾易手。唐伊西庭节度留后使判官赵彦宾被迁往吐蕃统治下的甘州作寺户。据此，日本学者上山大峻最早提出西州792年陷蕃说[16]。这种观点后来得到多数学者的肯定[17]。但给出了不同的解读。他认为吐蕃在790年攻陷北庭之后，很快就顺势攻下西州，时在790～791年。而文书所记792年这次易手，则是回鹘收复北庭之后，又从吐蕃手中夺下西州。西州官员赵彦宾为撤退的吐蕃人裹挟入甘州充寺户[18]。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无论吐蕃还是回鹘占领西州，对于当地唐人来说都属于“倾陷”。按森安氏的推测，如果先有吐蕃在791年前夺下西州，后又有回鹘在792年从吐蕃手中夺下西州，那么对于唐人来说，西州“倾陷”的年月应在791年前吐蕃攻下西州之时。这就不符合文书所记大唐贞元八年“西州倾陷”的含义。因此，笔者赞同西州792年陷于吐蕃的说法。

荣新江先生在静嘉堂文库所藏梁素文旧藏吐鲁番文书中检出一件官文书残纸，写有：“贞元十一年（795）正月 日 录事（下残）”[19]。他据文书用年号贞元十一年并出现唐地方官吏“录事”一职，推测唐朝的统治秩序在当年之前已经恢复[20]。这或可说明当时唐人势力重新获得西州的统治权。但其后不久，西州最终落入回鹘汗国手中。到803年，回鹘可汗已经亲赴西州[21]，显示回鹘汗国当时已经稳定地控制西州。

回鹘人统治西州最初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唐朝的地方统治制度。吐鲁番安乐城出土的属西州回鹘早期的《造塔功德记》中第3～4行记“其时牧主多害伊难主骨都禄都［ ］莫诃达干宰相 摄西州四府五县事”[22]。反映了回鹘在初治吐鲁番盆地时，对于唐西州时代四折冲军府、五县的军事、民政制度的继承。西州的统治大权在回鹘的多害伊难主骨都禄都［ ］莫诃达干（*taγay ïnanču [qu]tluγ tü[zün] [ ] baγa tarxan）宰相手中，但当地四府五县的基层运作和文书系统想必仍沿用唐西州时代汉人的一套制度。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回鹘时代的契约文书中，除了纯以回鹘文写成者外，尚有一些汉-回鹘双语文书[23]，反映了回鹘统治早期西州社会使用汉文文书系统的事实；而后来发展成熟的回鹘文书则继承了汉文文书的格式和术语[24]。吐鲁番出土的著名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经济文书》正是西州回鹘王朝早期由官府颁发给境内摩尼寺院的官文书。虽然文书现存部分全是以回鹘文书写，但其上盖有的十一方朱印却是汉文篆字，作：“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25]，可以视为回鹘人继承唐代官僚体制和文书制度的又一例证。982年，北宋使臣王延德出使西州，途径西州回鹘治下伊州，记其行程道：“次历伊州，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26]。如果此言不虚，那么直到10世纪末叶，西州回鹘还在沿用着当地唐朝遗留下来的汉人进行管理。陈氏所言其家数十世世袭领伊州之事当然史无凭据，不能信从。但这充分反映了在当时伊州的汉人社会内部，统治的合法性仍是部分地建立在唐代的任命之下。回鹘初占东部天山地区时，当地社会基层仍是汉人社会。从上述的例证推测，回鹘统治者最初应当沿用了原唐朝西州的基层官、吏，以汉文文书维持

日常统治秩序。

3.伊州

776年以前，吐蕃已经从唐朝手中夺取伊州。790年以后，吐蕃的势力一度深入北庭、西州等地，但旋即为回鹘击退。同时期伊州的形势不见明确的记载，但一些迹象表明，吐蕃的势力并没有退出伊州。德藏吐鲁番写本M 1摩尼文中古波斯语《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āmag*）跋文记录了漠北回鹘汗国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势力范围。该写本为摩尼教册页装书籍的一复叶（bifolio），保留赞美诗集的抄写题跋和目录的一部分。根据跋文内容，知此诗集最初于762～763年在焉耆开始抄写，但中途搁置，收于焉耆的摩尼寺中。后来由一位摩尼教呼嚧唤Yazadāmad发现，交由其子继续抄写，在其他书手的协作下于漠北回鹘保义可汗时代（808～821年在位）完成[27]。题跋为抄经完成之后，Yazadāmad所写之尾跋[28]。跋文列举了当时回鹘汗国自可汗家族以降的贵族、大臣名号以及回鹘治下东部天山地区各地的统治阶层、摩尼教团重要人物的名字，反映了当时漠北回鹘治下东部天山地区的情形。据跋文内容，当时回鹘治下东部天山地区有北庭、高昌、龟兹、焉耆和于术五个大区，在五大区之下还列有佉沙（喀什）和拨换（阿克苏）等地，囊括了回鹘治下东部天山各地区，却只字未提伊州。这暗示了当时伊州并不在回鹘人的治下。与之相呼应的是英藏敦煌写本S.367《光启元年（886）沙州伊州地志》。该文献记载，伊州"宝应中，陷吐蕃。大中四年（850），张议潮收复，因沙州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29]。其中并未提及回鹘曾占领伊州。综上，吐蕃在被回鹘击败后退出东部天山大部分地区，但直到850年前他们一直保有伊州。

4.安西

贞元六年杨袭古被杀之后，史家记道："安西由是遂绝，莫知存亡，而西州犹为唐固守"[30]。在此之前，河西诸州早已全部陷蕃，安西、北庭之事全依靠两地使者从北庭经回鹘道入长安通报。当北庭陷落以后，安西的消息自然断绝，对于唐朝而言，"莫知存亡"一说合情合理；那么，"西州犹为唐固守"的消息如何传入唐朝呢？只能通过回鹘。这则史料表面显示了唐朝对西域的了解，背后反映的是当时回鹘对西域形势的掌握，表明在790年时，安西与回鹘之间的交通已经被吐蕃阻断，北庭和天山北道一线全部在吐蕃及其盟军沙陀、白服突厥、葛逻禄等部的严密封锁之下。

但安西的唐朝孤军仍然在绝境中坚守，未曾陷于吐蕃。且看《九姓

回鹘可汗碑》汉文第16行所记内容。

□□胄遗弃。复，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畜□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山，以为京观，败没余烬。□□□□□□□□□□□□□□□□□□□□□

吐蕃在包围龟兹（安西）时，被回鹘大军击败，说明当时吐蕃尚未攻破安西。引文的前一行（第15行）所记正是791年回鹘在北庭击败吐蕃之事，说明龟兹之战在此之后。于术是位于天山南道龟兹与焉耆之间的一座守捉城。吐蕃在龟兹战败之后“奔入于术”，说明于术此前已在吐蕃的控制之下。这同时还说明，回鹘援军应当不是从东面杀到龟兹，而是从天山北麓南下龟兹。从790年至此时，龟兹一直在唐军的坚守之下。其他出土文字资料也印证了唐军在龟兹的坚守。黄文弼在1928年调查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时，曾在一洞窟中发现一件汉文文书残片，上书：“贞元七年西行牛二十一头”[31]。他推测这是一件过所文书。这显示，唐军在791年至少控制着龟兹西部地区。此外，克孜尔千佛洞第222号窟出土有纪年为“贞元十年”的题记[32]。

吐蕃在龟兹战败之后，敢向于术、焉耆方向奔逃，应当是希望与其在西州、伊州、沙州一线的势力汇合。因此笔者推测，此役应当发生在792年吐蕃破西州之后。另外，这时回鹘能在此地将吐蕃“四面合围，一时扑灭”，或可说明于术东面焉耆一带已经被回鹘的另一支军队攻占，吐蕃军队东撤的道路被堵死。

综上，791年回鹘在北庭战胜吐蕃之后，东部天山地区的战局开始转向有利于回鹘的方向。回鹘在攻下北庭之后，先后攻下天山北道、龟兹、焉耆、西州等地，而吐蕃的势力则收缩到伊州、沙州以东和丝路南道一线。

5.回鹘汗国在龟兹以西的军事活动

此后，回鹘汗国改向西部天山地区行军，进攻那里的吐蕃军队及其盟军葛逻禄等部。《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第17行记有如下内容。

□□□百姓与狂寇合纵，有亏职贡。天可汗躬总师旅，大败贼兵，奔逐至珍珠河。俘掠人民万万有余，驼马畜乘□□□□进部□余众来归……

珍珠河即锡尔河[33]，引文显示回鹘大军已经扫荡了锡尔河以北草原地带。据此行残存“百姓与狂寇合纵，有亏职贡”字样和作战地点分析，所记应是回鹘大军沿天山北道西入西部天山草原，攻伐曾与吐蕃结盟的葛逻禄、西突厥等草原部族。同碑第20行又有如下内容。

□□□□□□攻伐葛逻禄、吐蕃。搴旗斩䤋，追奔逐北，西至拔贺那国……

回鹘的追兵还深入到了河中地区，至少到达了费尔干纳盆地（拔贺那国）。而据同碑粟特文部分推测，回鹘大军在河中地区的进军还不止到达费尔干纳。粟特文部分的一块残片上记有如下内容。

〔他〕为选民和听众〔开创了〕和平盛世……又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上到Mumin异密（amīr），因为〔害怕〕有福的〔回鹘？〕国……[34]

回鹘大军在中亚西部的进军可能震动了伊斯兰世界。碑文中的Mumin异密可能正是当时出镇呼罗珊、后来成为黑衣大食第七任哈里发的马蒙（al-Ma'mūn）。《塔巴里史》（*Tariẖ al-Rusul wa al-Muluk*“先知与国王史”）中记有810年尚在呼罗珊的马蒙与其近臣的对话，曰：“但现在发生这样的事，呼罗珊已经残破，四处动荡，〔葛逻禄〕叶护摆脱了臣属地位，吐蕃统治者可汗怪僻不顺，高附君主准备入侵比邻的呼罗珊之地，讹打剌班君主拒付一直交纳的贡赋。我对这些都束手无策。我知道穆罕默德（阿明）要我前去用心险恶。看来，我只得放弃现在的地位，去追随突厥的君主可汗，求助他和他的国土的保护”[35]。华涛指出，其中的“突厥可汗”应指漠北回鹘汗国。从当时中亚的形势来看，此说不差。学者普遍认为，821年前后大食使者塔米姆出使回鹘汗国为伊斯兰世界带来了有关回鹘汗国的一手信息。但在此次回鹘进军河中的过程中，伊斯兰世界应当已经对这股势力有了清楚的认识[36]。马蒙从806年起出镇呼罗珊。如果上引《九姓回鹘可汗碑》粟特文部分所记Mumin异密正是马蒙，那么回鹘攻入河中地区应在806～810年。

另外，回鹘在天山南麓还攻下了疏勒（喀什），并意图向于阗进军。Hedin 20号于阗文书断代在802年，文书第3～6行记有如下内容。

唐人罗提杰（Lä thihä tcyenä）欲引2000军马入于阗境。今夜，佉沙（Khyesvā，疏勒）的Lunä tcabi ysamga来信报，曰：回鹘（Huna）已经进攻佉沙的Ttumga śem；但未明言回鹘进攻了几日，何日发动进攻，等等。你得令之后，将人、畜一遭引入媲摩（Phema，坎城）。[37]

文书写成之刻，回鹘进攻喀什的战事正在进行中，安西的唐军余部也在回鹘的配合之下准备南下于阗，阻断吐蕃军南撤的退路。而此役的最终结果则反映在国家图书馆藏犹太波斯语信札上，喀什被回鹘攻克，吐蕃驻军败亡。信札第33行写道：“喀什噶尔（Kašgar）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杀光了吐蕃人”[38]。

在攻灭龟兹、于术的吐蕃军队之后，回鹘一方面从天山北路出击葛逻禄、西突厥部落，平定锡尔河以北西部天山草原各部；另一方面，他们出兵喀什，在802年围攻喀什的吐蕃驻军，并意图派兵攻入于阗。同年或稍后，回鹘攻克喀什。其后，他们顺势西进，追击吐蕃残部进入费

尔干纳盆地；并有可能继续深入河中，并在806年之后与大食发生直接接触。

漠北回鹘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

——对德藏M1文献的重新解读

8世纪末9世纪初，漠北回鹘汗国击败吐蕃，将东部天山地区纳入版图。前述德藏M 1《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反映了漠北回鹘保义可汗治下东部天山各地的统治阶层和摩尼教徒的分布情况，为研究回鹘汗国在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方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笔者下面将依据文书照片，参照王媛媛综合前人研究所作的汉译本[39]，对文书相关内容展开讨论。

（1）所谓“城主”

跋文反映，回鹘汗国治下东部天山地区分为北庭、高昌、龟兹、焉耆和于术五个大区。在北庭、高昌、焉耆和于术四地的统治阶层名表中，位列第一位的人物头衔都是以地名的形容词形式加上xwd’y（主子）构成。譬如，高昌地区所列第一位人物头衔作cyn’ncknδ xwd’y，意即“秦城之主”。王媛媛将其汉译为“某某城主”，符合其字面意思，但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唐代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中屡见“城主”之名，所指乃是具体处理城一级行政单位庶务的低级别官员，反映的是敦煌、西域地区城、乡并存的情况[40]。而本文书中这个头衔所表达的应当是整个地区最高长官之意。上述两种级别的官员在西州回鹘时代也同时存在。德藏第一木柱文书MIK III 4672第18行记有：“qočo balïq bägi alp totoq ögä （高昌城主合都督于越）”[41]。这里的城主（balïq bägi）应类似于唐代之“城主”，其职责应是管理本城的庶务。与此相对的是，西州回鹘还有uluš（国）一级的区划，级别远高于城（balïq）。德藏第三木柱文书MIK III 7279第3、4行记有“el ögäsi alp totoq ögä qutluγ qočo ulušuγ bašlayur ärkän（颉于迦斯合都督于越领导有福的高昌国之时）”[42]。这里出现高昌国（qočo uluš）这一区划，其长官带有“颉于迦斯”（el ögäsi）这一头衔，系宰相一级的高官[43]。这个高昌国应指包括高昌城在内的整个高昌地区。在回鹘文献中还见有tört küsän uluš（四曲先国）、solmï uluš（三唆里迷国）等，均表示一个地区。M 1中所记的各地，应相当于回鹘时代“国”一级的政区，而非“城”一级的政区。中古波斯语xwdy意为“主人”，本是一种对有权之人的泛称。可以看到，在跋文第一段对可汗家族的赞颂中，作者称回鹘可汗及高官贵胄也用xwdy[44]。因此，M 1中东部天山各地区的最高统治称号“地名＋xwd’y”应是一种泛称。当时回鹘刚刚统治东部天山地区，还没有建立以颉于迦斯治理各地区的制度，仍以当地原有统治制度维持统治，保留

各地最高统治者称号。因此，M 1中的“地名＋xwd’y”应译作“××之主”。

下面将依次讨论M 1所显示东部天山各地的主要官员。

（2）北庭

北庭地区最高领导人（p’nzk’nδyy xwd’y“五城之主”）为：bg qwnkyy t’ys’ngwn syrtwš yg’n’ ’p’，可复原为突厥语bäg qwnkyy taysaŋun syrtwš yegän apa。吉田丰已经正确指出，syrtwš为汉文“节度使”之转音[45]。北庭为唐北庭节度使治所，总领伊西庭三地军政。Qwnkyy一词不见于伊朗语，因此被伊朗学家归为借自突厥语的外来词[46]；然而古突厥语中其实也没有同形的词语。王媛媛汉译此词作“呼诺鸡”，似解作一人名。笔者以为，此词有可能是汉文“权知”之转音，则qwnkyy taysaŋun syrtwš可对应汉文“权知大将军节度使”。前文已述，唐北庭节度使杨袭古在贞元六年（790）被回鹘宰相诓杀，标志着唐朝在伊西庭地区的统治正式结束。日本石井光雄旧藏敦煌文书《〈神会语录〉题记》记有“唐贞元八年（792），岁在未（申），沙门宝珍共判官赵秀琳，于北庭奉 张大夫处分令勘讫”[47]。这反映了回鹘汗国在统治北庭初期沿用唐朝的基层管理制度。到9世纪初M 1抄成之时，“节度使”这一官职为回鹘统治者所保留，仍是北庭地区最高长官的头衔。唐朝任命的节度使在790年已被回鹘人杀死，此后伊西庭不再受唐朝势力控制，那么此时北庭的节度使从何而来呢？可以推想，杨袭古死后北庭当地原有的唐人军长自立或被回鹘扶立为节度使，继续统治唐军旧部。因无法获得唐朝的册封，而戴有“权知”的头衔。这种安排维持了当地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的正常运转。后来，这个“权知”与“节度使”一齐被借入突厥语，成为北庭最高统治者的头衔。回鹘人对此称号的熟悉和使用可以在后代史料中得证。

《旧五代史·回鹘传》记：“后唐同光二年（924）四月，其（甘州回鹘）本国权知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释迦、副使田铁林、都监杨福安等共六十六人来贡方物，并献善马九匹。庄宗召对于文明殿，乃命司农卿郑续、将作少监何延嗣持节册仁美为英义可汗”[48]。甘州回鹘可汗仁美在遣使入后唐前已经登基称汗，但为谋求后唐皇帝的册封，在其称号前加“权知”二字。可知回鹘人已知汉文“权知”之意味，并会在称号中使用。同传又有：后唐天成三年（928），“其（甘州回鹘）权知可汗仁裕，遣都督李阿山等一百二十人入贡”[49]。可见回鹘人在称号中使用“权知”的现象并非偶然。可以想象，在回鹘统治北庭初期，保留唐代的官称有利于笼络当地原有的唐朝军民。在其扶立的最高官员节度使前加“权知”二字，显示其遥尊唐朝的权威，无疑有利于其在当地的统治。当然，Qwnkyy一词与“权知”的中古音在第二音节起首音上尚有一定差别，此词的最终同定尚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

此前学者将bäg qwnkyy taysaŋun syrtwš yegän apa分读作两人，即bäg qwnkyy taysaŋun syrtwš“匐呼诺鸡大将军节度使”和yegän apa“移健阿波”[50]。突厥语bäg“匐”是常见的称号，若再把qwnkyy t’ys’ngwn syrtwš读作“权知大将军节度使”，也是官号的话，则势必把后边的“移健阿波”连在一起读。则此人官号为“权知大将军节度使”，尊称为“匐”（大人），人名为“移健阿波”。整个称号直译为汉语应作“移健阿波权知大将军节度使大人”，是对此人的尊称。这反映了当时回鹘汗国治下北庭的最高军政长官是回鹘人，名作“移健阿波”，而他所戴的官号却是沿用唐北庭时代固有的官号“权知大将军节度使”。文献写成于回鹘保义可汗统治时，即808～821年。这暗示，回鹘汗国统治北庭以后，虽然改变了当地的统治者，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当地的统治制度。

（3）高昌

高昌地区最高统治者被称作t’pγlγ s’ngwn，可还原为突厥语tapïγlïγ saŋun。他只戴有“将军”（saŋun）的称号，而没有像北庭之主那样沿用唐代的官号。荣新江先生曾指出，吐蕃在短暂占领西州期间已经将当地官僚和高僧等具有社会号召力的人士迁往他处[51]。上文所引敦煌文书Pelliot chinois.3918《〈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题记》即反映了这种情况。贞元八年西州陷落于吐蕃之后，唐伊西庭节度留后使判官赵彦宾与和尚广林被吐蕃先迁往沙州，后再迁往甘州。赵彦宾甚至沦为寺户。后来回鹘从吐蕃手中夺下西州，当地已经没有强大的汉人组织力量，因此回鹘统治者可能不需要沿用唐西州的官号和统治秩序。

（4）龟兹

龟兹地区最高统治者被称作syrtwšyy yδδwγ cwr“节度使亦都啜”。其中，syrtwšyy即汉文“节度使”之转音，而yδδwγ cwr 则可还原作突厥语ïduq čor。ïduq意为“神圣的”，常见于回鹘统治者称号中。著名的称号“亦都护”即由ïduq与qut组成。回鹘（突厥）人亦都啜戴有原唐安西地区最高长官“节度使”的官衔，领当地军政大权，这和北庭的情况完全一样。安西地区曾是唐朝“兵马大都集处”。前文已论，在8世纪末的乱世中，安西并没有陷落于吐蕃，正是这些唐军抵挡住了吐蕃的围攻。在回鹘与吐蕃龟兹之战以后，安西的唐军被回鹘收降，并为回鹘所用。断代在802年的Hedin 20号于阗文书显示，在回鹘进攻疏勒时，“唐人罗提杰（Lä thihä tcyenä）欲引2000军马入于阗境”。这应当正是安西归降回鹘的唐军。

在龟兹地区统治阶级的名单中，最应引人注目的是k’šy xšyδ和

prw’nc jβγu这两个人物。k’šy xšyδ为中古波斯语k’šy（佉沙的）加粟特语γš’yδ（王）构成，意为“佉沙王”。唐代安西四镇实行唐军镇守军加土著政权统治的双轨制。在8世纪80年代，唐僧悟空经安西四镇返回中土，路经疏勒（佉沙），述当时情形作：“曲临渐届踈勒，时王裴冷冷，镇守使鲁阳，留住五月”[52]。之后，疏勒先没于吐蕃，又被回鹘攻取，此时当地最高统治者为“佉沙王”。这反映了当地唐人的势力已无足轻重，而土著力量更为强大。

prw’nc jβγu为粟特语“拨换”加上突厥语yabγu“叶护”。看来当时阿克苏一带的统治者戴有内亚民族小王之称号“叶护”。唐僧悟空叙述其从拨换到安西的行程作：“次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曰怖汚国，镇守使苏岑，次据瑟得城使贾诠，次至安西”[53]。悟空并未提到拨换和据史德城土著的统治者。但根据据史德城故地出土文书，当地土著统治者可能就戴有“叶护”的称号。图木舒克遗址出土一件属于7、8世纪的唐代官文书中提到“叶护”[54]。则与其毗邻的拨换的土著统治者，也有可能戴有叶护的称号。在唐安西时代以前，拨换、据史德等小国皆已被其强邻龟兹王国吞并，各小国王向龟兹王称臣。这种情况在唐安西时代没有发生实质改变。《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据史德城，龟兹境也”[55]。“叶护”正是内亚民族中“小王”的称号，恰好符合据史德王受龟兹王统领的情形。

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到M 1写成的时代，此地可能已经被操突厥语部族控制，甚至开始突厥化。英藏敦煌文书S.383号《西天路竟》为北宋乾德四年（966）受诏赴印度求法的僧人所写行纪，其中记有“又西行一千里至龟兹国，又西行三日入割鹿国，又西南十日至于阗国”，这里的“割鹿国”按其道里判断就在拨换（今阿克苏）[56]。写于982年的波斯语地理文献《世界境域志》也反映，这一带当时为葛逻禄居地[57]。上述文献说明拨换在10世纪确为葛逻禄部治下之地。同作于10世纪的英藏敦煌文书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和王延德《西州使程记》所记臣服于西州回鹘的“葛禄（割禄）”很可能就是分布在这一带的葛逻禄部。而葛逻禄的首领通常称叶护。《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第21行记有“毗伽可汗复与归顺葛禄册真珠智慧叶护为主”。反映的是怀信或保义可汗在征服曾与吐蕃联兵的葛逻禄后，复封其为叶护。又，前引810年马蒙与其近臣的对话中有“〔葛逻禄〕叶护摆脱了臣属地位”。看来葛逻禄首领对大食称臣时也称叶护（或被封叶护）。如果这种推测属实，则阿克苏地区的突厥化在9世纪初已经开始。

（5）焉耆

文献第5节焉耆地区统治阶层的名表开头写道：“此外，还有焉耆之主（’rkcyq xwt’y）’ycr’qyy ’ytmyš jymt’yšy ’wyγwr t’pmyš lyt βyr ’wyγwr t’pmyš yabγru tγrmyy cpyš ’wlwg fwšy t’ng fwšy”。此前学者将这组人名译、断作：’ycr’qyy ’ytmyš（内臣翳德蜜施）、jymt’yšy（任

大使）、’wyγwr t’pmyš lyt βyr（回鹘沓蜜施颉利发）、’wyγwr t’pmyš yabγru（回鹘沓蜜施叶护）、tγrmyy cpyš（铎曷弭车鼻施）、’wlwg fwšy（羽录副使）、t’ng fwšy（唐副使）[58]。

jymt’yšy被吉田丰读作“任大师”，由汉姓“任”加称号大师（tayši）构成[59]。王媛媛在注释中援引吉田丰读法，但在汉译时改作“任大使”[60]。二人的共同意见是将此人理解成一个汉人，将此称呼解作汉姓“任”＋称号构成的完整尊称。然而笔者认为这应是一个借自汉文的官号，可读作“镇大使”。由此，应与前面的’ycr’qyy ’ytmyš连读，指一人。’ycr’qyy ’ytmyš可复原为突厥语为ičräki etmiš，前一词为称号“内臣”，后一词为人名。则整个称呼ičräki etmiš jimtayši可解作“内臣翳德蜜施镇大使”，指称一位带有“镇大使”官号的回鹘（或突厥）人翳德蜜施。

① 历史学的解释

在唐朝统治东部天山地区的时代，焉耆位列安西四镇之一，是天山南道联系安西与西州、北庭的枢纽。唐僧悟空述其在焉耆的行程作：“次至乌耆（焉耆）国，王龙如林、镇守使杨日祐，延留三月，从此又发至北庭州”[61]。焉耆当地有土著龙姓国王，又有唐安西都护府辖下镇兵镇守，镇兵最高统帅为镇守使。北庭、安西两地为唐朝在西域地区统治中心，两地拥有大量的汉人军民。在回鹘统治之初，回鹘统治者沿用了唐朝在当地的最高官员“节度使”的官号，说明当地留有大量的唐朝军民。焉耆地区本为安西重镇，当地可能也留有强大的唐人势力。回鹘人为了镇抚唐军余部，或许沿用了唐军的镇守使，行羁縻统治。后来“镇守使”这一官号固定成为回鹘时代当地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在M 1写成的时代，焉耆的“镇大使”由一位名叫翳德蜜施的内臣担当，可知当时焉耆的统治者已经是出身回鹘或其他操突厥语部族之人，但“镇大使”这一称号仍在沿用。

吐鲁番吐峪沟出土一件属于西州回鹘时代早期的写本《造塔功德记》，记载某年四月“清信士佛弟子鄢耆镇牟虞蜜伽长史龙公”在当地敬造佛塔之事[62]。写本将焉耆称为“鄢耆镇”，引人注目。直到西州回鹘时代，唐代“焉耆镇”的建制还在汉文语境中存在。可想而知，在M 1写成的漠北回鹘汗国时代，焉耆镇应当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唐安西时代的统治结构，当地排名第一的官员当然应是“镇大使”。

焉耆地区汉人势力的强大或许还跟当地土著贵族流散有关。英藏敦煌写本S.367《光启元年（886）沙州伊州地志》记：“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健斗战”[63]。荣新江先生曾全面讨论了上述分布在河西、伊州等地的“龙部落”“龙家”，指出他们正是焉耆土著的龙姓势力迁徙流散形成的种落，一度在河西多地形成强大的

势力。荣先生据敦煌文书的记载推测焉耆人的大规模迁徙发生在840年回鹘西迁之后[64]。但从M 1所见焉耆地区统治阶层的名号判断，可能焉耆的土著贵族早在9世纪初即已不在当地占据统治地位。或许焉耆龙姓土著势力的外迁可能在8世纪末已经发生。

② 语音学的解释

“镇”字中古音可还原作/tşin/。据吉田丰研究，汉字中起首的/tş/音在粟特语等中古伊朗语中大多转写为c（/č/）[65]。据此，“镇”字更标准的转写方式应当是“cyn”。但是，同在M 1文书中就可以找到将汉字之/t/音转写为j的实例。第7节列女听者名目，其中有：twyzwn bylk’ xwncwy（都信毗伽公主）、twzwn sylyk xwnjwy（都信思力公主）、xwtyy xwnjwy（汩底公主）、t xwnjwy（遏公主）、dwxzd xwnjwy（蠹沙撒公主）、frym xwncwy（拂利凡公主）[66]。这些女听者的称号全为“公主”，但这些“公主”的转写有两种形式：一是xwncwy，“主”字起首的/tş/音以c转写；另一是xwnjwy，“主”字起首的/tş/音以j转写。这或可说明在M 1写本的时代，汉字中起首的/tş/音在中古伊朗语中也可以j转写。

汉字“镇”的尾音/n/与jym的尾音/m/并不吻合，但是在回鹘人借用的汉字中，也可以找到尾音/n/转化为/m/的实例。唐代地名“赤亭”后被回鹘人沿用，在西州回鹘时代作Čïqtïn[67]，其尾音改汉字中的软腭鼻音/ŋ/为齿鼻音/n/。后来此词发音再经变化，从Čïqtïn变为今日之Čïqtïm，尾音由/n/再变成唇鼻音/m/。因此，汉字“镇”虽以/n/音收尾，但在借入突厥语之后可能演变成以/m/收尾的音。综上，M 1文献中所见的jym一词完全有可能在语音上反映汉字“镇”，jimtayši因此可以与汉文“镇大使”勘同。

在文献所列焉耆地区统治者和摩尼教信徒名表中还出现一个人物名称“lywk l’t’ l’jyh”。吉田丰认为这三个词都出自汉文，但只对出l’jyh中l’为“罗”[68]。王媛媛分读作两人，译作胡人名“録罗咄”“罗而”。其实，这些词应读作一个人的称呼，汉文或可还原为“陆老大老者”。lywk l’t’可转写作liuk lata，或可对汉文“陆老大”，作人名；l’jyh可转写为lajih，或可对汉文“老者”，为尊称。这里的汉文“者”字的首音同样转写为j，与“镇”“主”二字首音的转写一致。

综上，jymt’yšy可视为汉文官称“镇大使”，应与前面的’ycr’qyy ’ytmyš连读作一人，即ičräki etmiš jimtayši（内臣翳德蜜施镇大使）。则M 1文献所列焉耆地区统治阶层人名表可以据此重新断句。笔者下面将此节人名表最先出现的一系列人物名称断句，复原成突厥语或汉语，并作解说。

文献原作：’ycr’qyy ’ytmyš jymt’ysy ’wyγwr t’pmyš lyt βyr ’wyγwr t’pmyš yabγru tγrmyy cpyš ’wlwg fwšy t’ng fwšy l’ fwšy。

I.’ycr’qyy ’ytmyš jymt’yšy =（突厥语+汉语）ičräki etmiš jimtayši“内臣·翳德蜜施·镇大使”。

II.’wyγwr t’pmyš lyt βyr =（突厥语）uyγur tapmïš eltäbär“回鹘沓蜜施颉利发”。突厥语动词tap-有“服务”“敬事”之意。uyγur tap-可理解为“为回鹘效力”。uyγur tapmïš为此动宾短语的形动词形式，修饰“颉利发”。整个称号可理解作“为回鹘效力的颉利发”。可能这位被回鹘统治者封为颉利发的人物并非回鹘人。

III.’wyγwr t’pmyš yβγw= （突厥语）uyγur tapmïš yabγu“回鹘沓蜜施叶护”。可直译作“为回鹘效力的叶护”，参看上一称号。

IV.tγrmyy cpyš = （突厥语）ta¨girmi čabïš“帖吉利迷车鼻施”。车鼻施一称号也是西突厥系统常见的称号，少见于漠北游牧政权中，不见于回鹘汗国。

V.’wlwg fwšy =（突厥语+汉语）uluγ fuši“胡禄副使”。早在20世纪初，缪勒（F.W.K.Müller）就已经准确地指出了fwšy为汉文“副使”之对音[69]。需要注意的是，这位副使的官称前有突厥语uluγ，应是其名，说明这位副使应出身回鹘或其他操突厥语部落。

VI.t’ng fwšy = （汉文）taŋ fuši“唐副使”。此称呼的结构完全符合汉人尊称的结构，姓在前，官职在后。

VII.l’ fwšy =（汉文）la fuši“罗副使”。排名V、VI、VII位的官员都戴有“副使”的官职，这可以证明排名首位的人物所戴头衔jymt’yšy应当就是“镇大使”。

通过对焉耆地区统治阶级名表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与北庭、龟兹的情况相同，在焉耆入回鹘之初，当地的唐军势力很强大，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是唐人的镇守使。回鹘人最初可能沿用唐朝的军官管理唐军余部。后来，管理人员逐渐由回鹘人充当，但“镇守使（镇大使）”“副镇守使（副使）”这些官号得到保留，成为回鹘时代当地的官号。第二，到了保义可汗朝（808~821），当地的最高统治者虽然已由回鹘人充当，但其下的官员应当仍出自当地。从官号看，排名2、3、4位的官员应出身其他操突厥语部族或焉耆土著势力，而排名6、7位的则显然出自当地原唐军余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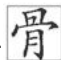
（**6**）于术

于术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是‘ysyγ trx’n“乙息记·达干”[70]。这个突厥语称号没有反映出当地土著的称号或唐朝的官称。于术在唐安西时代仅为

一座守捉城，但其地位在8、9世纪之交变得重要。回鹘汗国在安西击败吐蕃之后，在于术又全歼吐蕃残军。M 1文献将于术与北庭、高昌、龟兹、焉耆等重要城市并列，或因为当地拥有较强大的摩尼教团体势力。

通过上文对M 1文献所记东部天山各地统治阶级名号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漠北回鹘统治初期的情形做出合理的推断。自回鹘汗国夺取东部天山地区伊始，他们就沿用当地的势力和制度，对各地实行羁縻统治。各地高级统治者的官号反映了这种情况。北庭、龟兹、焉耆三地的官号反映了当地有较强大的唐军残部；而佉沙、拨换等地的官号则反映出胡族势力在当地占主导地位。到M 1写成的年代，各地最高统治者可能已经全由回鹘人充任。在高级统治者中，戴有突厥语名号的人物增加。他们或是回鹘派来的官员，或是来自臣属于回鹘的操突厥语的属部。这体现了回鹘汗国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逐渐加强，但统一的制度似乎仍未建立起来。

后来的史料显示，漠北回鹘汗国开始派宰相一级的官员来管理西州地区。杜牧《樊川文集》中收有一篇《西州回鹘授骁卫大将军制》，为唐朝册封“西州牧守颉干（于）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莫贺都督宰相安宁等”[71]而作。学者考证此文很可能成于唐大中五年（851）秋冬[72]。当时漠北回鹘汗国已经崩溃，西迁回鹘部众拥护庞特勤在安西一带建立政权。认为，安宁是安西回鹘庞特勤属下，为其镇守西州[73]。华涛先生指出，唐朝直到大中十年才从降人口中知悉安西回鹘政权的存在，因此安宁不可能是其属下[74]。荣新江先生推测安宁“可能是原漠北回鹘汗国的守土封臣”，他受张议潮招引一同入唐朝进贡[75]。

引人注目的是安宁的头衔“颉于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莫贺都督宰相”，其中“颉于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莫贺”皆为汉字音写古突厥语，可以还原为el ögäsi külüg alp ögütmiš baγa。回鹘的“颉于迦思”（el ögäsi）正相当于宰相一职，其头衔最后之“宰相”正是对“颉于迦思”的意译。可知，漠北回鹘汗国在灭亡前曾派遣宰相（颉于迦思）一级的官员管理西州地区。这种制度被后来的西州回鹘政权所继承。前引德藏第三木柱文书MIK III 7279第3、4行记领导高昌国（qočo uluš）的官员就带有颉于迦思头衔。森安孝夫考证其年代在1019年[76]，正是西州回鹘时代。前引吐峪沟出土《造塔功德记》第3～4行记：“其时牧主多害伊难主都禄都［ ］莫诃达干宰相 摄西州四府五县事”[77]。同样说明主管西州地区的官员是一位宰相。

有限的史料尚不能为我们提供漠北回鹘汗国统治东部天山地区的更多细节。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回鹘汗国对东部天山地区进行统治的三个发展阶段：任用当地势力、保留当地制度的羁縻统治阶段；任用本族官员、沿用当地制度的过渡阶段；任用本族官员、采用本族制度的直接统治阶段。这反映了回鹘人对于东部天山地区统治的逐步加强，标志着当地回鹘化的开始。在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之后，大批回鹘人选择东部天山地区作为迁徙的目的地，其背后的原因正是此

前回鹘汗国在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不断强化。

从回鹘西迁到西州回鹘政权的建立

唐武宗开成五年（840），称雄蒙古高原近百年的漠北回鹘汗国在内乱、天灾和外敌入侵的多重打击之下土崩瓦解。对于漠北这场大变局，《资治通鉴》记道：“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十万骑攻回鹘，大破之，杀

馺及掘罗勿，焚其牙帐荡尽，回鹘诸部逃散”[78]。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回鹘诸部主要向两个方向逃散。靠近牙帐的13部拥立乌介特勤为可汗，南逃至漠南地区，逗留在唐朝边境。到宣宗大中二年（848），这支回鹘政权便彻底破散，余众消散在其他民族之中[79]。另外15部回鹘人则在国相馺职和庞特勤的率领下向西奔逃。在西迁过程中，一部回鹘人折而进入河西地区；一部分进入西部天山地区，融入当地游牧部族中；其余部众则进入东部天山地区，拥立庞特勤建立政权[80]。

传世汉文文献大都笼统记载庞特勤所在为安西。而《新唐书·突厥传附突骑施传》则特别记载庞特勤在焉耆城建政一事，不见于《旧唐书》。传文记突骑施黑黄两姓衰微后事作：“大历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于葛禄，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特庬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岭），众至二十万”[81]。此“特庬勒”即庞特勤之讹误。成书于11世纪的波斯文献《记述的装饰》（*Zayn al-Aḫbār*）记有托古兹古思（Tuġuzuġuz）开国之主菊儿特勤（Kūr Tigīn）的传说[82]。发现了这则材料的重要价值。他通过分析该文献的史源指出此节所记应是9世纪后半叶的情况，托古兹古思应指西迁之后的回鹘[83]。文献提到该国早期的都城作Azal或Aral[84]，论证此为焉耆，反映的正是庞特勤所部在焉耆建政的事实[85]。

到大中十年（856）以前，庞特勤已经称可汗，成为当时回鹘各部的共主。在当年二月以前，先后有两批回鹘使者入唐朝请降，均报告庞特勤在安西称可汗之事。唐朝立即采取积极的态度，颁发《议立回鹘可汗诏》，写道：“……近有回鹘来款，朔方帅臣得之，送至阙下。又有回鹘随黠戛斯李兼至，朝廷各令象胥，征其要领，音尘可访，词旨必同，愿复本邦，仍怀化育。皆云庞特勒（勤）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众所悦附，飚宰相以忠事上，誓复龙庭，杂虏等以义向风，颇闻麇至，□（既）契素愿，慰悦良多，俟其归还衙帐，当议特举册命。今遣使臣，且往慰谕。……大中十年二月”。[86]华涛先生敏锐地指出，庞特勤由叶护称可汗的时间可能在大中二年南迁回鹘诸部破散，遏捻可汗不知所向之后[87]。次年十一月，唐朝正式册封其为怀建可汗，并遣使前往安西地区册封。此事今有传世史料与新出土墓志互证[88]。

虽然身在焉耆的庞特勤自立为可汗，并受到了唐朝的承认和册封，

但他或许并不能完全掌控东部天山地区的各部回鹘势力，只是名义上的共主。当时西州地区可能就不在庞特勤安西回鹘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上文提到，大中五年（851）随归义军一起入朝的西州回鹘牧守安宁应即原漠北回鹘汗国驻守西州的遗臣，他与归义军使者一起隐瞒了安西庞特勤的存在。

伊州一带的回鹘势力应当也不听从焉耆庞特勤的号令。据英藏敦煌写本S.367《光启元年（886）沙州伊州地志》记伊州“宝应中陷吐蕃，大中四年，张议潮收复，因沙州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89]。张议潮在大中二年于沙州崛起，赶走吐蕃势力之后，便向西北夺取伊州。但其在伊州地区的统治并不牢固，仅有少量沙州徙户和当地归降部落驻守。扼守伊州西向通往西州、北庭的门户纳职此时正掌握在一部回鹘人手中。法藏敦煌文书Pelliot chinois.2962《张议潮变文》记载：“敦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不经旬日中间，即至纳职城。贼等不虞汉兵忽到，都无准备之心。我军遂列乌云之镇，四面急攻……回鹘大败……走投入纳职城，把劳（牢）而守”[90]。大中十年六月，张议潮曾从沙州率军亲征，但仍然没有征服纳职回鹘势力。同年稍后，唐朝奉命赴安西册封庞特勤的持节使者王端章又在“雪山南畔，被背乱回鹘劫夺国信”[91]。十一年，又“有背叛回鹘五百余帐，首领翟都督等将回鹘百姓已到伊州侧”[92]。这些背乱（叛）回鹘显然就是盘踞在伊州、纳职一代的回鹘[93]。上文已经提到，归义军与西州的回鹘首领安宁关系密切，看来伊州纳职一带的回鹘应当不是安宁的手下。而他们又劫夺了唐朝封赏安西回鹘可汗庞特勤的“国信”，显然，他们根本不受庞特勤控制。

虽然西州、伊州一带的回鹘势力早已割据一方，但最终改变东部天山地区历史进程的则是出自北庭的一支回鹘势力。可能在漠北回鹘汗国崩溃之初，北庭当地的回鹘势力就已经割据一方，但后来在名义上接受了安西回鹘庞特勤的领导。《资治通鉴·唐纪》会昌二年（842）条记：十月，“黠戛斯遣将军踏布合祖等至天德军……又言‘将徙就合罗川，居回鹘故国，兼已得安西、北庭、达靼等五部落’”[94]。不论当时黠戛斯是否真如其所言征服东部天山地区[95]，这则史料都暗示了当时北庭地区的回鹘势力尚不从属于安西。唐咸通七年（866），北庭地区的回鹘势力在仆固俊的领导下崛起。《资治通鉴唐纪》咸通七年条记：“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仆〕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96]。此事件被视为西州回鹘政权建立的标志，并逐渐成为学界共识[97]。然而仆固俊崛起初期的情况，传世汉文文献中只记有此一事。后来，在《记述的装饰》中检出“菊儿特勤（Kūr Tigīn）的传说”，将其原型与汉文文献中的仆固俊勘同，指出该传说即仆固俊从北庭起兵后攻灭安西回鹘、统一东部天山地区的反映[98]。现据马丁内斯（A.Martinez）英译本将此节译出。

至于托古兹古思，其王被称为托古兹古思可汗。从前，托古兹古思可汗曾被称为菊儿特勤，其母出身中原。现在，他有一王兄，兄之母出

身阿热（Az，或译：其母出身为自由民）。其兄欲杀他。割其喉后，将其弃于乱葬之地。但菊儿特勤被其乳母救起送往摩尼教徒处，交至“选民”（摩尼僧）手中。他们于是施救，在其伤口用药，直至其好转。后来，他来到托古兹古思可汗的都城Azal（AZL）或Aral（ARL），藏匿其中。他曾数次实施计谋，因此他的消息被传至可汗处。可汗愿与他修好。最后，可汗命他前来朝见。可汗不许〔菊儿特勤〕留在身边，而任命其为五城（Banğkaṯ）之主。其后，菊儿特勤起兵叛乱。他在当地笼络人心，等候时机到来。当他得到托古兹古思可汗出猎的消息，他召集重兵，前去寻找可汗。

两军相遇即开战，菊儿特勤率部战胜可汗的军队。可汗逃往一城堡。菊儿特勤命人以水灌城墙，结果城墙崩塌。随后，他命人宣布赦免降人。现在，城〔中之人〕早因饥饿而士气全无，全部出城请降。他全部获准。托古兹古思可汗留在城中。菊儿特勤派人进城，缢杀之。随后，菊儿特勤登可汗之位。[99]

安部健夫认为，仆固俊是从吐蕃手中夺回西州[100]。据上引“菊儿特勤的传说”指出，汉文史料所记仆固俊夺取西州等城之事反映了东部天山地区回鹘势力之间的斗争；即仆固俊是从安西回鹘手中夺取的西州等城镇[101]。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到866年时，西州仍在安宁势力的掌握之中。如此，则仆固俊就是从安宁势力之后夺取了西州[102]。无论如何，到866年时，西州回鹘已经在东部天山地区崛起，以西州和北庭为中心形成一股势力。

[1]参见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東洋文化』68、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88；收入氏著《文书 典籍与西域史地》，第114～152页。

[2]参见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中西书局，2016，第254～297、363～364页。

[3]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415页。

[4]《旧唐书》卷一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第329页。

[5]《旧唐书·回纥传》（卷一九五，第5209页）记：“初，北庭、安西既假道于回纥以朝奏，因附庸焉。回纥征求无厌，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资，必强取之”。传世史籍多记建中二年（781）安西、北庭始与中原建立联系，但明代胡广所记《李元忠神道碑》则显示，早在大历二年（767）就有唐朝的使者借道回鹘到达北庭，参见刘子凡《北庭的李元忠时代——胡广记〈唐李元忠神道碑〉研究》，《文史》2017年第2辑，第129～131页。

[6]《资治通鉴》卷二三三，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第7641页。

[7]《旧唐书》卷一九五，第5210页。

[8]《旧唐书》卷一九五，第5210页。

[9]该碑立于漠北回鹘汗国的牙帐城，即今日喀喇巴拉噶逊遗址。石碑正面书有汉文半壁、粟特文半壁，背面书写鲁尼文。鲁尼文部分受破坏严重，文字漫漶不清，不

能卒读，而据汉文、粟特文内容可知，此碑为保义可汗时代所立之纪功碑，参见T.Moriyasu, “Manichaeism under the East Uighur Khanate with Special References to the Fragment Mainz 354 and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森安孝夫編『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大阪大学 21 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インターフェイスの人文学」報告書，第3巻）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60-61頁；Y.Yoshida,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and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in: D.Durkin-Meisterernst, Ch.Reck, D.Weber, eds., Literarische Stoffe und ihre Gestaltung in Mitteliranischer Zeit: Kolloquium Anlässlich des 70.Geburtstages von Werner Sundermann, Wiesbaden: Ludwig Reichert Verlag, 2009, p.349。

[10]本书所引《九姓回鹘可汗碑》碑文汉文部分依据森安孝夫、吉田丰和哈密屯（J.R.Hamilton）三人对碑文的最新复原，参见森安孝夫編『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图版1、2。汉文碑文的点校参见林梅村、陈凌、王海城《九姓回鹘可汗碑校释》，《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第70～82页。

[11]参见森安孝夫「増補：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奪戦及びその後の西域情勢について」流沙海西奨学会編『アジア文化史論叢』3、山川出版社、1979；此据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239-241頁。

[12]《旧唐书》卷一九五，第5210页。

[13]森安孝夫「増補：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奪戦及びその後の西域情勢について」、263頁。

[1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第1031页。

[15]池田温『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315-316頁。

[16]上山大峻「曇倩訳『金剛壇広大清浄陀羅尼経』：八世紀安西における末伝漢訳経典」『龍谷大学論集』399、1972、73-74頁。

[17]参见张广达、荣新江《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此据氏著《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262页。

[18]森安孝夫「増補：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奪戦及びその後の西域情勢について」、262-263頁。

[19]荣新江：《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资料简介》，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台北《南海》杂志社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第182～183页。

[20]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345页。

[21]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第342～343、348页。

[22]荣新江：《〈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第182～190页。

[23]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回鹘文双语文书，参见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回鹘文文献二种》，第110～119页；《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所收录 Em 01、Mi 10、Mi 27和Mi 33四件文书；T.Moriyasu and P.Zieme, “From Chinese to Uighur Documents”,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4, 1999, pp.73-102。

[24]参见T.Moriyasu and P.Zieme, “From Chinese to Uighur Documents”, p.97。

[25]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第498页；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第530页。

[26]《宋史》卷四九〇，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第14111页。

[27]文书最早的刊布、释读，参见F.W.K.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 Berlin: G.Reimer, 1912。其后百年间，多有学者对文书中的部分片段和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代表性作品，参见H.-J.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93, pp.274-275; 吉田豊「ソグド文字で表記されに漢字音」『東方学報』66、1994、271-380頁；D.Durkin-Meisterernst, “Late Features in Middle Persian Texts from Turfan”, in: L.Paul, ed., Persian Origins—Early Judaeo-Persian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Persian, Wiesbaden, 2013, pp.7-9。2007年，王媛媛综合前人研究结果，将全文汉译、注释，参见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第150～152页；另见氏著《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中华书局，2012，第43～68页。

[28]以前学者多认为此跋文为诗集开头，参见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第129页。

[29]该文献最新录文参见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76页。

[30]《资治通鉴》卷二三三，第7643页。

[31]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第36页。

[32]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第564页；参见张广达、荣新江《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第253页。

[33]W.Barthold, C.Bosworth, and C.Poujol, “Sir Daryā”, in: P.Bearman et al., eds.,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nd Edition, see online: http://dx.doi.org/10.1163/1573-3912_islam_COM_1088.

[34]摘译自吉田丰1999年对此碑现存粟特文残片的释读，参见森安孝夫·吉田豊·片山章雄「カラ＝バルガスン碑文」森安孝夫·オチル編『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1999、219頁。

[35]转引自华涛《穆斯林文献中的托古兹古思》，《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63页。

[36]华涛：《北庭之战前后回鹘与大食的关系》，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465页。

[37]H.W.Bailey, Khotanese texts IV, Cambridge, 1961, p.121; Y.Yoshida,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and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p.351.

[38]张湛、时光：《一件新发现的犹太波斯语信札的断代与释读》，第87页。文书刊布者之一张湛后来对文书进行重新解说，将文书年代定在791年前后，认为所记战事为吐蕃进攻喀什的唐军失利之事，参见张湛《粟特商人的接班人？——管窥丝路上的伊朗犹太商人》，第661～672页。

[39]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第150～152页；另见氏著《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第43～68页。森安孝夫在其2015年的新作中将M 1文书翻译成日文，但省略了文书所列东部天山各地统治者和摩尼教徒名表，显示其信从王媛媛的汉译，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関係史料集成』『平成26年度近畿大学国際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30頁。

[40]参见徐畅《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第95～98页。

[41]T.Moriyasu, “Uighur Budd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De Dunhuang à 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 Turnhout：Brepols, 2001, p.162; 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693頁。

[42]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695頁。

[43]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722-723頁。

[44]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第132页。

[45]吉田豊「カラ＝バルガスン碑文のソグド語版ついて」『西南アジア研究』28、1988、42頁、注29。

[46]D.Durkin-Meisterernst,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Turnhout: Brepols, 2004, p.63；参见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第136页。

[47]池田温『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315頁。

[48]《旧五代史》卷一三八，第2146～2147页。

[49]《旧五代史》卷一三八，第2147页。

[50]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第136页。

[51]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中国学术》第1辑，2000；此据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第347页。

[52]《佛说十力经》卷一，《大正藏》780号；此据CBETA, T17, No.780, p.716。

[53]《佛说十力经》卷一，《大正藏》780号；此据CBETA, T17, No.780, p.716。

[54]参见荣新江《所谓“Tumshuqese”文书中的“gyāźdi-”》，『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7，1992，第12页。

[55]《新唐书》卷四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第1150页。

[56]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第5～7页。

[57]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London, 1970, p.98.

[58]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第142页。其转写、翻译的错误在下文中更正。

[59]吉田豊「ソグド文字で表記されに漢字音」、370頁。

[60]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第142～143页。

[61]《佛说十力经》卷一，《大正藏》780号；此据CBETA, T17, No.780, p.717。

[62]文书内容及研究，参见荣新江《〈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第182～190页。

[63]参见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第176页。

[64]上述关于“龙部落”的考察，参见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1995，第144～160页。

[65]吉田豊「ソグド文字で表記されに漢字音」、349、351-353頁。

[66]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第147页。

[67]D.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of the Turfan Oases”, in: E.Ragagnin und J.Wilkens, hrsg., Kutadgu Nom Bitig: Festschrift für J.P.Laut zum 60.Geburtstag, Wiesbaden, 2015, p.276.

[68]参见吉田豊「ソグド文字で表記されに漢字音」、370頁。

[69]F.W.K.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 p.32.

[70]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第145页。

[71]参见《杜牧集系年校注》，吴在庆校注，中华书局，2008，第1132页。

[72]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43页。

[73]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東洋学報』59－1·2、1977；此据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286·289頁。

[74]参见华涛《回鹘西迁及东部天山地区的政治形势》，第116～118页；氏著《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43～44页。

[75]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4～355页；付马《唐咸通乾符年间的西州回鹘政权——国图藏BD11287号敦煌文书研究》，第77～78页。

[76]T.Moriyasu,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De Dunhuang à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 Silk Road Studies 5, Turnhout: Brepols, 2001, p.186；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678-730頁。

[77]录文参见荣新江《〈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第183页。

[78]《资治通鉴》卷二四六，第8069页。

[79]有关南迁回鹘人的最新研究，参见M.Drompp, 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Leiden/Boston: Brill, 2005。

[80]关于西迁回鹘人的情况，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

276-298頁。

[81]《新唐书》卷二一五，第6069页。

[82]本书所引阿拉伯语、新波斯语词汇统一按照德国东方学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的换写-转写体系进行拉丁化处理，凡例参见G.Herrmann, Persische Urkunden der Mongolenzeit, Wiesbaden, 2004；The Society for Near Eastern Studies in Japan, ed., Orient 50, 2015, p.7。本书所引以阿拉伯文拼写的古突厥语词汇则统一按照回鹘文的转写形式处理。

[83]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284頁。

[84]A.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2, 1983, p.133.

[85]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282-286頁。

[86]（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中华书局点校本，2008，第693页；参见荣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第129页。

[87]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40页。

[88]荣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第128～132页。

[89]参见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第176页。

[90]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5～116页。

[91]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6页。

[92]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7页。

[93]李军：《晚唐五代伊州相关史事考述》，《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8～9页。

[94]《资治通鉴》卷二四六，第8089页。笔者将原文“北庭达靼”中间点断。

[95]相关讨论参见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44～49页。

[96]《资治通鉴》卷二五〇，第8235页。《唐会要》《旧唐书》等其他史料均将此事与河西拓跋怀光斩杀尚恐热一事混淆，已由藤枝晃辨证，参见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二）」『東方学報』12-4、1942、54-56頁。

[97]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276-298頁；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第27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7页；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93页；P.Zieme, “The West Uigur Kingdom: Views from Inside”, Horizons, vol.5, No.1, 2014, p.2；付马《唐咸通乾符年间的西州回鹘政权——国图藏BD11287号敦煌文书研究》，第76～81页；付马《西州回鹘王国建立初期的对外扩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 222-0661.09号回鹘文书的历史学研究》，第145～162页。

[98]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282-286頁。

[99]A.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pp.132-134.

[100]安部健夫『西ウイゲル国史の研究』、247～255頁；（汉译本）《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179～185页。

[101]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289頁。

[102]李军：《关于晚唐西州回鹘的几个问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20～26页。

第二章 西州回鹘建国史的重构

西州回鹘王朝建立之初的挫折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文书BD11287提供了仆固俊建立政权初期的历史信息。文书图版刊布于2009年，正面内容被定为“敦煌归义军张淮深上唐王朝表”，解作沙州归义军首领张淮深向唐朝报告其对西州回鹘作战得胜的奏表[1]。在此以前，郝春文先生就曾对文书录文，并扼要讨论了其中的内容[2]。文书正面存四行完整文字，现转录如下。

（前缺）

1 城悉皆残破。回鹘狼性，绥抚甚难。仆固俊独

2 守西〔州〕，兵［力］甚寡，百姓离散，拾不壹存，虫蝗为

3 灾，数年荒歉。至于符印，亦早轮（沦）坠。降人归投，

4 因来送纳仆固俊银铸印壹面，臣已收得。不［欲］

（后缺）[3]

我们首先探讨文书的年代。

“臣已收得”字句表明此件文书确为上唐廷奏表，而文书中对于西州回鹘详细的报告显然只能出自阻隔于唐代中原和西州之间的归义军政权。文书第1、2行有“仆固俊独守西〔州〕”句。《资治通鉴》记，唐咸通七年（866），“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仆〕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4]。知文书所记发生在仆固俊攻取西州之后，则其年代上限应在866年。郝春文先生据文中“数年”字样，推测文书所记之事在仆固俊克西州后的“数年”，即866年以后的数年，适逢张淮深统治归义军时期[5]。荣新江先生赞同此说，并将此事系于869年[6]。但是，“数年”也可能指西州已经荒歉数年，并不一定指仆固俊治下的西州，因此不能排除此文书所记为咸通七年二月至七月间张议潮统治归义军时期西州之事。

“独守”字样表明当时仆固俊势力很可能仅占有西州一城，这里也许存在归义军统治者有意贬抑的成分，但是至少可以确定，此时仆固俊的

实力已经大不如866年初克西州之时，很可能坠入其势力的最低点。法藏敦煌文书Pelliot chinois 5007《唐佚名诗集》残卷所录第四首诗残题作：“仆固天王乾符三年四月廿四日打破伊州”[7]。此“仆固天王”应即仆固俊[8]。荣新江先生指出，诗题反映西州回鹘在乾符三年（876）从归义军手中夺取伊州[9]。此时西州回鹘的势力已经向东扩张至伊州，其疆域可能较866年时又有扩大，因此可将本文书所记之事置于876年以前。则对本文书相对保守的断代应当是866～876年。

下面我们将考释文书所记史实。

残文书的开头有“城悉皆残破”，后又有“兵［力］甚寡，百姓离散，拾不壹存，虫蝗为灾，数年荒歉。至于符印，亦早轮坠。”作为归义军上唐朝的表，文书在极力向唐朝统治者描绘一幅回鹘仆固俊势穷力孤、西州地区城荒人散的落败景象。作为与西州毗邻的势力，归义军政权最能够直接获得有关西州形势的确切信息，他们也是唐朝获取西域地区情报的媒介。也正因如此，归义军方面可能对这些情报进行渲染和夸大，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当时西州的情势相当惨淡，回鹘仆固俊的势力相对于归义军政权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归义军首领向唐朝上此表的目的是什么呢？《敦煌遗书》编者认为这是归义军在与西州回鹘作战得胜后向唐廷报功的奏表，并援引郑柄林、冯培红二位的说法，认为此战发生在乾符年间[10]。但是，在乾符三年以前，并无史料直接证明归义军与西州回鹘发生过战事，而与归义军发生过争斗的则是进入河西走廊一带的回鹘族帐[11]。本文书同样没有保留归义军与西州回鹘作战的直接记录。到乾符三年，西州回鹘势力已经向东面扩张到伊州，此后西州几无可能出现“城悉皆残破”“兵力甚寡”的情形。退一步讲，如果本文书所记真是归义军同西州回鹘作战得胜之事，而且西州的形势诚如此表所述“兵力甚寡”，那么归义军为何没有一举打下西州，反而让仆固俊继续“独守”呢？这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文书应不是归义军对西州回鹘作战得胜的请功表。相反，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件残文书是归义军首领希望用兵西州的“请战表”，或者是希望代领西州的“申请表”。

残文书第1行，有“回鹘狼性，绥抚甚难”句。

“绥抚”应指唐王朝对回鹘的“绥抚”。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唐朝对于西迁东部天山地区的回鹘部众所采取的是扶植、羁縻的政策，并且态度相当积极。《资治通鉴》大中十年（856）二月条记，唐宣宗得知西迁回鹘首领庞特勤“今为可汗，尚寓安西”，就打算“俟其归复牙帐，当加册命”[12]。大中十年条又记：“〔冬，十月，〕上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使者至灵武，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十一月，辛亥，册拜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以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13]然而，这批册封使者并没有成功抵达安西。《资治通鉴》大中十一年（857）条又记：“〔冬，十月，〕王端章册立回鹘可汗，道为黑车子所塞，不至而还。”[14] 而根据敦煌出《张义潮变文》记载，大中十年王端章等人“北入回鹘充册立使，行至雪山南畔，被背乱回鹘劫夺国信”[15]。西安最近出土的大唐西市墓志中，有大中十年随同王端章出使安西的使者之一李

浔的墓志。《李浔墓志》详细记录了此次出使安西遇盗的经历，其中正文第17～21行内容如下。

北狄乱，其种争立，宣宗问可使绝域者，宰相上公名，因得假尚书郎，赐绯衣，介王端章而去。未至虏帐，遇他虏遮我，留碛中，欲尽杀汉使者，劫取一切物，且伪言我为当立者，索展礼。公曰：“斯□□图之？”端章曰：“已在虎口中，尚谁与图！”公曰：“不可即允之。”端章手持册，与读未毕，虏噪而攻我，凡旗节、车马、玺币、装橐尽劫去。行人幸不死，脱归。公连坐贬郴州司马，移复州。侯固节制北单于府，生平慕公，因奏以自副，加宪丞，与金紫。未行，侯移治中山，复请公以副。币未至，得疾殁于复州，大中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也，寿五十八。[16]

通过《李浔墓志》的记载，我们看到大中十年的册封使不但要给安西回鹘带去唐朝皇帝的册命，还有象征统治合法性的印信“玺币”，并且带有可能非常厚重的“展礼”。虽然这次册封安西回鹘可汗没有成功，但是唐朝对于安西政权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又据《资治通鉴》咸通四年（863）条记载：“〔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难支表求经籍及每年遣使走马请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来悉归唐，不许。”[17]此事也体现了唐朝对安西回鹘政权名义上的支持。

唐朝不但积极支持自称可汗的安西回鹘庞特勤部，对于西迁回鹘的其他势力，唐朝也不加区分地一概“绥抚”，比如前文所引大中五年西州回鹘牧守安宁入朝请命受拜授骁卫大将军一事。安宁只是漠北回鹘汗国的遗臣，当时回鹘余部的共主遏捻可汗在大中二年时即已向西逃遁，不知所之，而唐朝直到大中十年才知道有安西庞特勤称可汗之事。当时唐朝是在没有找到回鹘可汗、不知道回鹘是否还有统一政权的情况下册封了安宁。这说明唐朝并不在意安宁的身份，只是在意安宁对于西州的实际控制。显然，唐朝是非常支持安宁控制西州的。咸通七年，名不见经传的仆固俊在北庭崛起，接连攻下西州等城，不但归义军遣使入朝报功，仆固俊也“使达干米怀玉朝，且献俘，因请命，诏可”[18]。无论当时西州的统治者是安西回鹘抑或安宁的势力，他们都是受唐朝认可的西州的统治者，安西回鹘的首领庞特勤甚至是受唐朝招揽册封的回鹘可汗。仆固俊从唐朝认可的统治者手中夺下城池之后，反而向唐朝报功请命，竟获“诏可”，这说明唐朝并不在意西州被哪一支回鹘势力统治，只是希望西州能稳定地控制在某一支回鹘人手中。文书中仆固俊的“符印”，很有可能就是这次“请命”、皇帝“诏可”之后敕赐的。更有甚者，据法藏敦煌文书Pelliot chinois.3451号《张淮深变文》记，曾有回鹘散众入侵瓜州，为归义军击败，但唐朝命令张淮深将“生降回鹘，尽放归还”[19]。即使对于回鹘的散帐游寇，唐朝也大行“绥抚”。在咸通二年（861），张议潮打下凉州，归义军的势力在东方影响到鄯州，在西方影响到西州，臻于鼎盛，已然成为唐朝经营河西地区的最大障碍。从咸通四年唐朝设凉州节度使起，唐朝对于归义军的政策主要是抑制和打压[20]。显然，

唐朝对于西北地区各部回鹘势力不加甄别地“绥抚”，应当是为了遏制归义军势力的扩张。

文书称“回鹘狼性，绥抚甚难”，应是归义军统治者建言唐朝停止对西州回鹘采取羁縻政策，收复西州。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众于沙州起义。及至大中四年，其势力扩张至沙、瓜、肃、甘、伊五州[21]。大中五年，张议潮遣使携瓜、沙、伊、西、肃、甘、兰、鄯、河、岷、廓十一州天宝旧图、户籍入唐廷进献，唐朝于是在沙州设归义军，授张议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22]。如前文所述，与张议潮使者一同入朝的还有当时实际控制西州的回鹘首领安宁。荣新江先生指出，很可能是张议潮招引安宁入唐朝请命，这样，张议潮便能留给唐朝一个他有能力掌控西州的印象[23]。唐朝在大中十年才从归降回鹘人口中知悉安西回鹘政权的存在，可知西州、沙州入朝的使者均未向唐朝报告此事。西州的安宁显然希望唐朝确立他在西州统治的合法地位，而沙州张议潮则希望唐朝看到他有能力“镇抚”西州甚至西域。二者都不希望唐朝知道并册封安西的回鹘可汗。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沙州、西州政权之间共同的利益关系。

在张议潮领受十一州观察使以后，他理应向唐朝报告侧近西州的安西一带的情况，却始终未向唐朝透露安西回鹘庞特勤的存在。但当咸通七年北庭仆固俊崛起之时，张议潮却立即遣人来报。仆固俊的角色可能一如之前的安宁，是张议潮眼中可以制衡安西回鹘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张议潮进西州地图、联结西州安宁入贡、隐瞒安西可汗、为仆固俊报捷等一系列行为中看出，归义军政权在崛起的初期始终试图在西州地区建立权威，并渴望得到唐朝的承认。文书反映当时西州“城悉皆残破”，仆固俊“兵［力］甚寡，百姓离散，拾不壹存，虫蝗为灾，数年荒歉”，实是夺取西州的大好时机，而收复西州的任务显然只能由邻近西州的归义军完成。因此，文书应当被看作归义军首领奏请夺取西州之表文。

残文书第3、第4行称仆固俊的“符印”早已丢失，其“银铸印壹面”已由降人呈交归义军手中。“臣已收得”，暗示了归义军节度使请求代领西州之意。这里提到的仆固俊的“符印”，则很有可能是唐朝授予的。在上文所引的《李浔墓志》正文第20～21行写有：“端章手持册，与读未毕，虏噪而攻我，凡旗节、车马、玺币、装橐尽劫去。”在大中十年唐朝册封安西庞特勤的使团中，便有唐朝赐给庞特勤的“玺币”，作为回鹘首领获得册封的物质凭证。在报告西州形势的表文中，归义军首领刻意加上对仆固俊“符印”下落的报告，可以说明此符印在他们心中是合法统领西州的象征，应是御赐之印。如果这只是仆固俊私自铸造之印的话，应当不会在归义军节度使心目中占据如此地位。

综上所论，这份残文书应是写于咸通七年（866）至乾符三年（876）间，归义军节度使上唐朝奏请攻打西州仆固俊的奏表抄本的一部分。残存奏文反映了当时西州的形势。其时仆固俊式微，势力仅限西州一隅，而归义军则是相对强势的一方，图谋攻取西州。结合咸通、乾符年间归义军史事，我们可以对本文书的断代有更大胆的推测。咸通八

年前张议潮执政期间，归义军处于势力不断扩张的时期。其后，在张淮深执政的初期，归义军依然四面出击，处于对外关系的主动一方。但是自咸通十年起，就有深入河西走廊的回鹘余部进攻瓜州的记载[24]。归义军开始在对外关系中转向守势。咸通十年与入侵瓜州的回鹘作战，张淮深已是亲自出战，此役虽然取胜，但沙州本地已然受到西迁回鹘骚扰。此后归义军更是被动应战不断[25]，终于在乾符三年被仆固天王打破伊州。因此，本文书所记归义军请取西州事可以继续上溯至咸通十年以前，归义军意图攻取西州的情况应当发生在沙州安稳、伊州在握的阶段。这件文书的断代很有可能是咸通七年到咸通十年。在咸通七年仆固俊崛起之时，他占据了北庭、轮台、清镇和西州四地；而在文书写成的年代，仆固俊的势力收缩到西州一地。仆固俊是在与西边的安西政权，或是在与自北方草原南下的其他游牧族帐，抑或与政权内部的反叛部众的争夺中，而不是在与归义军政权的争夺中丢掉了地盘。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咸通七年及其后一段时间内东部天山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过程。866年，原属于安西回鹘的仆固俊从北庭崛起，攻占了安西回鹘治下的西州等地。在崛起初期，仆固俊势力相较安西回鹘为弱势一方。其后不久，仆固俊可能在与安西回鹘的斗争中失掉大部分地盘，在876之前（有可能在869年之前）的某个时期甚至只剩下西州一地，势力降到最低谷。其时，他们受到西边安西回鹘政权和东边归义军政权两方面的压力。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仆固俊的势力开始回升。在876年，“仆固天王打破伊州”，其势力已经开始向东面扩张并对归义军政权施压。

回鹘文历史文献xj 222-0661.09所记史事的性质

现藏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号为xj 222-0661.09的写本系一种回鹘文历史文献的第22叶（本章以下称“文献”），保留了十姓回鹘国（On Uyγur Eli）建国初期的历史信息[26]。张铁山、茨默（P.Zieme）二位先生曾对写本内容展开细致的语文学研究，为学界提供了文献的转写、注释和英文翻译[27]。笔者在此基础上，对文献所记内容展开历史学研究[28]。写本的语文学特征显示，文献应当创作于13～14世纪蒙元时代。文献在语言风格上夹有散文体和头韵诗体，编辑者根据文体和内容对文献做出学术分节，分为A～Z共26个小节[29]。为便于展开讨论，笔者参考写本图版和张铁山、茨默二位的转写、英译，将文献内容转写、汉译如下，不同读法在脚注中注出[30]。

A节

1kičigkiyä bäšiktä yatur ärkän ök adïn alp alpaγut äränlär 2-niŋ küvänü sävinü sözlämiš savlarïn kirišin suqïmïš ünlärin särä 3umadïn yïdruqïn tügüp qatïγ ünin čarlayu kesar arslan änüki ač kičig 4-kiyä ärsär: yemä arïγtaqï adïn käyiklärniŋ ätinämiš ünlärin särä 5umadïn azïγlarïn tišlärin čïqratïp örü qodï sikriyü yügürür käčär 6tep anculayu yemä bu täŋrikänimiz.özi yašï taqï kičig türk yigit 7 oγlan yarlïqar ärkän ök: ačayan toŋa oγlïnča turïtmaz türk 8yüräklig yarlïqar üčün kesar arslan änükinčä keŋ kögüzlüg 9kigäysiz ädrämlig yarlïqar üčün atasï 天（täŋri） elig qutïŋa 10arqa berip alqatmïš elkä muyγa bolmïš toquz tatar bodunïn 11ögrätgü balïq saqasïnda ürkär čärig urup yatmaq üzä 12özkä sanlïγ qïlu yarlïqap öz eliniŋ basïnčïn ketärü yat ellig 13ayïγ saqïnčlïγ yaγïlarqa ešidmištä ök ïčanγuluq äymäŋülük 14qïlu yarlïqadï

当这个小家伙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他已不能忍受其他（外国？）的武士们骄横跋扈的话和扣动弓弦的声音。他握紧拳头，发出强硬的喊声——一如饥饿的幼狮无法忍受林中野兽的吼叫，紧咬利齿，上下翻跃，左右冲突——这就是我们的圣天（täŋrikän）〔王子〕。当他已是一位青年王子之时，他如同幼豹一般有仁慈、强大的内心，他如同幼狮一样有宽广的胸怀和无边的（？）品德。因此，他力助他的父亲天王（täŋri elig）。为了降服背叛了有福之国的九姓鞑靼（toquz tatar）部众，他通过在城外布置令人生畏的军队使他们称臣纳款，解除了本国〔所受〕的压迫，使外国的、怀有恶意的敌人们听闻〔此事〕时宾服胆怯。

B节

十（on） uyγur elindä ärigmä qamaγ bodun boqun 15udan qaŋïmïz oγlï uluγadtï: ondïn sïŋar yat yaγï basïnčïn 16körmägäy biz tep uluγ ögrünčlüg sävinčlüg boltïlar 17uluγ orunqa yarlïqamïšta basa käntü üküš tälim iš 18küč išläyü yarlïqadï

生活在十姓回鹘国（on uyγur eli）的全体人民说道："我们的父亲兀单（udan）之子已长大成人！我们将不会见到外国之敌从十面压迫！"他们欢欣雀跃。及〔王子〕登上王位之后，他亲自完成许多功业。

C节

qutluγ qočo ulušnuŋ yaγïsï bolmïš 19tarïmlïγ bodunïn yančγalïr üčün qop qamaγ süsi čärigi birlä 20atlanu yarlïqap

为了打败与有福的高昌国（qutluγ qočo uluš）为敌的塔林之人（tarïm），他和他全部的军队登上战马。

D节

solmï balïqqa qudulap tägimlig čärigin 21tarayu sačïp yer yüdüki qamaγ bodunïn enčkä tïnčqa tägürü yarlïqadï.

在迅速攻下唆里迷（solmï）城之后，他以其精锐的[31]军队驱散了〔当地势力〕，将他全部的人民带到这片土地上，带给他们和平安宁。

E节

22kerüki talaz yudun atlanu yarlïqap baγučaq sipasalar bašïn on 23artuq känt bäglärin közündürü yarlïqap : yititü yontdurup talaz 24atlïγ balïqïγ elig ičin alu yarlïqadï:

他行军到怛逻斯西城，他使以伯古察（baγučaq）将军为首的十余城主在他面前，他占领了这叫作怛逻斯（talaz）的城市和国家。

F节

qatïtïp turdačï yaïγqa 25qatïγ yarlïγ ta̓tu̓rma̓k qïnamaq:

施峻法惩罚强硬对抗的敌人，

G节

a̓ŋitip to̓pu̓n tu̓šdačila̓rig 26a̓sirka̓ma̓k tsuyurqamaq a̓rsa̓r: a̓rklig ku̓člu̓g eliglärniŋ xanlarnïŋ 27etigi yaratïγï čoγï yalïnï

对折腰、叩首之辈宽大仁慈。如此，他带来强有力的〔历代〕诸王诸汗的装饰和光辉——

H节

是（bu） teguc̆i rac̆as̆astir bitigtaki 28savïγ otig kalürü yarlïqap talaz bodunïn tarayu buzdurmatïn as̆ïn 29tükäl qodup yedä yarlïqadï::

这部被称为“是”的王法（rac̆as̆astir skr.rājaśastra）中的训诫[32]。他没有驱逐、命人迫害怛逻斯之民众，而将食物全部留下之后，领导〔他们〕。

I节

ol savïγ äs̆idmis̆c̆ä körmis̆c̆ä 30人kis̆ilär tolp c̆omaq bodunï ïraqdïn yaqïntïn ïduq täŋrimizkä 31eliglärin qavs̆urup ayïtu yükünü adïnu muŋadu inc̆ä tep sözlädilär

闻见此事之后，人们，全部的穆斯林（c̆omaq）民众从近处和远处对我们的圣天（ïduq täŋri）〔可汗〕合十双手，问候、礼拜，内心惶惶。他们如是说道：

J节

32el ärsär ïduq uyγur xan ärmis̆: elig eyin kirmis̆ bodunuγ irinc̆kämäk munda 33artuq mu bolur:

“国者，神圣的回鹘汗也（？）。他宽恕臣服的民众，此外还有什么？

K节

xan ärsär qamaγta yeg 圣天（ïduq täŋri）kän ärmis̆ qarasïn qaŋc̆a 34mundaγ bölmis̆ bar mu: tes̆ip

汗者，超群绝伦的圣天汗也。他像父亲一样分其家产，有〔此事〕么？”他们互相说道。

L节

tös̆lärin basa: töŋitü: ärinlärin 35yapïnu äŋitü alqïs̆lïγ yamγur yaγïtdïlar:

然后按着他们自己的胸脯鞠躬，按着他们的嘴唇鞠躬，他们赞美的话语像雨点一样落下。

M节

ïraqdïn es̆idigmä kis̆ilär: 36eltä ïduqï on uyγur eli ök ärmis̆ xanta saγlï yemä bo täŋrikän 37törümis̆ tes̆ip

从远方听到〔此事〕的人们相互说道：“国中最神圣者正是十姓回鹘国。汗中首屈一指者（？）生为此圣天（täŋrikän）”。

N节

ïduq täŋrikänimizniŋ ädgü atlïγ čavïn soruγïn kök 38-kä kötürdilär: yaγïzta käŋürü yaddïlar: irdäši s（a）lmïš yat ellig 39-lär etilmiš 三（üč） solmï uluš qïquzïn ulatï 大（uluγ） yultuzqatägi

他们扬我们圣天可汗之威名上至重霄。他们将〔其威名〕在大地上广泛传播：〔从〕受调查的、由外国之人建立的三唆里迷（üč solmï）国的谷地等，直到大裕勒都斯（uluγ yultuz）。

O节

özkä sanlïγ 40yerin suvïn ötükän bodunïn ornatu yarlïqadï

他将于都斤之民众安置在属于自己的领土上。

P节

ečüläri apalarï 41qïlmaduq išlämädük adïl adruq išlärin ükuš tälim išläyü bütürü 42 yarlïqadï：

他完成了许多其祖先们没有做成的丰功伟绩。

Q节

四（tört）tin sïŋar alp qatïγ ädgü atïn keŋürü yada yarlïqap 43tük tümän bodunuγ boqunuγ töpülärin töŋitdürü özkä sanlïγ 44qïlu yarlïqadï

他从（向）四个方向远播其勇武的美名，使万万民众稽首归顺。

R节

alqatmïš on uyγur eli turγalïrtïn bärü 45ïraqtïn adï ešidilür:

自十姓回鹘立国以降，其威名远扬。

S节

qïtay elkä sanlïγ altï tatar bodunï törüp 46此（bu） elkä yaγumadïn toquz buqa bägär:王（xan） birlä adïnčïγ ïduq alp 47xanïmïznïŋ atïn čavïn ešidip tapïnu ögränmiš elin xanïn tapla 48-matïn qodup ornanmïš yurtïn turuγïn oqšarča titip: udan 49ïduq 天（täŋri）känimizkä bodun bolup küč bergü tïltaγïntïn

属于契丹国的六姓鞑靼人出现了。尚未靠近此国时，他们已经听到托古兹不花（toquz buqa）王和我们绝伦的、神圣的、勇武的可汗的威名，他们不再接受原来臣服的国家和汗，弃之。他们爱惜其居住的营盘故地，〔但〕弃之。他们成为我们的圣天可汗兀单的子民。因为交出权力的原因，

T节

qoŋrulu {qutluγ} 50köčüp kälip qutluγ ïduq täŋrikänimizniŋ qurïŋa quurlaγïŋa 51sïγïnu kälip qodï bay taγ: qum säŋirkätägi qonup yurtlap

他们被驱逐，迁徙，来到我们有福的圣天可汗的襟带之地避难，南〔从〕北塔山（bay taγ）直到横相乙儿（qum säŋir）一带定居安营。

U节

52心（köŋül）läri oŋay kögüzläri qanmïš täg ädäm（lä）r

他们心满意足，

V节

üküš ayta artuq 53ïduq天（täŋri）känniŋ üdräglig käntläriŋä känt bulup ičikdilär 54ornašdïlar: öŋ tegit siravil taysi oγlanï turdï taysi: 七（yeti） buqa 55čaŋšï bašïn bantägi tegitlär:

随后的很多月里，他们陆续涌入我们圣天可汗繁荣的城市群，找到自己的城市并定居下来。以斯拉菲尔太子、其子吐尔迪太子、也地不花（yeti buqa）长史为首的诸特勤。

W节

yurtlaγu tüz yurtlarïn nä qodup 56yurtča örkä kälip ketip yaŋï balïq altïnïn 57yurtlap qonup: eltä tuγmïš bodunta artuq ičikdilär ornašdï 58-lar

离开他们的故地之后，迁徙到这里定居，住在仰吉八里的下方。他们的人数比当地原著居民还要多。

X节

七（yeti） buqa čaŋšï öztä tuγmïš kïzïn özi taplap yaγïz 59 yer ärkligi yalïnlïγ 圣天（ïduk täŋri）känimizniŋ yarïndïsï bolmïš :

也地不花长史满意其亲生之女，成为我们光辉的圣天可汗、褐色大地之主的姻亲（yarïndï？）[33]。

Y节

60 azlanču oγlï sügülüg teginkä: töpüsintä kötürüp kälürür 61-čä kišilärig yïγïp 金（altun）yipin arqašïp kümüš yipin kökläšip:

至于阿热兰主（azlanču）之子孙骨碌（sügülüg）特勤：当他带来人民（或妇女）时，他伏地稽首（字面作：他在其头顶举起〔自己〕）；人民（或妇女）被用金线、银线绑在一起。

Z节

62tümän yïlqatägi küč bergü üčün tükällig 圣天（ïduq täŋri）känimiz birlä

由于交出权力直到万年，与我们的十全的圣天可汗一起。

（下缺）

文献记载了十姓回鹘国在其开国之主兀单及其子两代可汗治下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事件。文献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A～Q节为第一部分，以兀单可汗之子为主人公（下简称“少可汗”），记叙从其少年时代助其父汗平定九姓鞑靼叛乱，到登上王位之后西征唆里迷、怛逻斯等地的事迹。R～Z节为第二部分[34]，主要追述兀单可汗在位时的功业：十姓回鹘国开国时威名远播，各部族远近来投。

张铁山、茨默二位先生已经准确指出，文献所记“十姓回鹘国”正是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西州回鹘[35]。文献作者在C节径称其国为“有福的高昌国”（qutluγ qočo uluš）。西州回鹘的开国可汗作兀单（Udan），正与元代畏兀儿人历史书写中的开国之主“兀单卜古”名字相符[36]，可知此写本所记事件应是回鹘国建国之事。关于文献所记一系列事件的年代，张铁山、茨默二位先生推测在10～11世纪的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但未给出具体的解说[37]。笔者下面将通过分析文献所记标志性事件，确定这一系列史事的年代范围。

1.C～D节所记攻克唆里迷之事

在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之后，西迁入东部天山地区的回鹘余部拥立庞特勤为首，在焉耆地区建立政权，是为安西回鹘。866年，又有仆固俊领导的一支回鹘势力在北庭崛起，从安西庞特勤手中夺得西州等地，建立西州回鹘政权。此后，东部天山地区进入安西、西州两支回鹘政权竞争的时期。文献C、D两节内容如下。

为了打败与有福的高昌国为敌的塔林之人，他（少可汗）和他全部

的军队登上战马。在迅速攻下唆里迷城之后，他以其精锐的军队驱散了〔当地势力〕，将他全部的人民带到这片土地上，带给他们和平安宁。

文献称西州为“有福的高昌国”，而其敌人则在塔林和唆里迷。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最早记录Tarïm一词，作：“Tarïm，流入沼泽和流沙的河道；Tarïm，地名，在回鹘的边境上，在苦叉（Quča）附近，被称作Üsmi Tarïm，有条河流经”[38]。安部健夫首先提出Tarïm可能对应元代汉文文献所见“曲先塔林”之“塔林”[39]。刘迎胜先生论证了这一猜测，并准确指出“塔林”在元代指称流经曲先（库车）地区的塔里木河及其流域地区[40]。而库车地区在唐代称龟兹，为安西都护府治所。Solmï作为地名出现在回鹘时代的文字资料中，一直沿用到元代。亨宁（W.B.Henning）推测其所指即唐代的焉耆地区[41]，后由张广达、耿世民二位先生利用不同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跋文证明了这一猜想[42]。因此，文献所记西州回鹘的敌人正在龟兹、焉耆一带，即唐安西都护府的中心地带。他们应当就是庞特勤以焉耆为都城建立的安西回鹘政权，这与汉文、波斯文传世文献的记载相吻合。文献记载西州回鹘在少可汗治下战胜了唆里迷的敌人，所反映的史事即西州回鹘攻灭安西回鹘的历史。

2.A～B节所记围城之难

据文献A、B两节记载，在少可汗继位之前，西州回鹘王朝曾遭遇到敌对势力的围攻，少可汗助其父汗靖难。相关部分记载如下。

为了降服背叛了有福之国的九姓鞑靼部众，他（少可汗）通过在城外布置令人生畏的军队使他们称臣纳款，解除了本国〔所受〕的压迫，使外国的、怀有恶意的敌人们听闻〔此事〕时宾服胆怯。生活在十姓回鹘国的全体人民说道：“我们的父亲兀单之子已长大成人！我们将不会见到外国之敌从十面压迫！”

上述记载反映了西州回鹘在其开国可汗兀单治下曾遭遇过一次危机，可能其都城高昌受到敌人围困。前节所引敦煌文书BD11287显示，在仆固俊建立政权以后不久，西州回鹘曾遭受严重挫折，领土仅剩西州一地，正可与此两节内容勘合。文献显示这次危机并没有影响西州回鹘王朝的发展趋势。平乱之后，少可汗登基，并率军西征开疆掠地。这与其他材料所见西州回鹘早期的发展情势吻合：在866年崛起之后，仆固俊势力即遭遇挫折。但他们很快恢复实力，到876年时已经再度向外扩张，并最终统一东部天山地区。A节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记叙围城之事时，兀单可汗被称为“天（täŋri）elig”，即“天王”。上节所引敦煌文书Pelliot chinois.5007反映，仆固俊的称号正是“天王”（仆固天王）。

文献记载，此次围城之役的发难者应是“背叛了有福之国的九姓鞑靼”。西州回鹘与九姓鞑靼之间的这次战争并不见于其他史料的记载，因此这批鞑靼人的来源难以确定。笔者首先提出，他们有可能是早先臣属于回鹘汗国、后来占据漠北草原的九姓鞑靼；也有可能是随西迁回鹘进入东部天山地区或河西的鞑靼族帐[43]。白玉冬认为，此九姓鞑靼只可能是当时分布在蒙古高原的九姓鞑靼[44]。《资治通鉴唐纪》记，乾符二年（875）十月“回鹘还至罗川，十一月，遣使者同罗榆禄入贡；赐拯接绢万匹”[45]。胡三省注其中的“罗川”为隋罗川县[46]，而现代学者则普遍认为此系“合罗川”脱字。至于“合罗川”所指，学界则有河西之合罗川与漠北之合罗川两说[47]。白玉冬取漠北之合罗川说。他据此认为西州回鹘曾于875年进入漠北故地，并进一步推测此系西州回鹘战胜居于漠北的九姓鞑靼之结果[48]。其说颇有过度推演之嫌。上引《资治通鉴》的记载不见于其他史料，仅为孤证，因此学界关于“罗川”所指的争议尚无定论。更为重要的是，上引史料所言“回鹘”并未明指是哪一支回鹘势力。而据相关史料判断，其指西州回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上引Pelliot chinois.5007反映，西州回鹘于次年四月从沙州归义军手中夺下位于西州东侧的伊州。据文献C、D节记载，西州回鹘又向西州以西进攻安西回鹘。总之，在击败九姓鞑靼叛乱以后，西州回鹘主要力量的活动范围是在东部天山地区。其次，上引史料显示，返回罗川的回鹘在同年11月即遣使入贡唐朝，获赐绢万匹，应是绢马贸易之反映。从“绢万匹”判断，回鹘方面输入的马匹至少在千匹以上。这更应是以蒙古高原为基地从事游牧生产的一部回鹘人所为，而不应是以吐鲁番盆地为基地的西州回鹘人所为。最后，如果西州回鹘曾重返漠北故地，如此重大的事件为何丝毫不见于其后世的历史书写中？譬如本文献中就毫未提及。综上，并无确切证据表明，西州回鹘曾击败处于漠北的九姓鞑靼并重返其故地。

九姓鞑靼的进攻直接威胁到了西州回鹘的都城，使回鹘可汗身陷包围。文献在写到都城解围时作：“使外国的、怀有恶意的敌人们听闻〔此事〕时宾服胆怯”。可能暗示九姓鞑靼背后另有敌手。文献下一节即写道，少可汗即位以后，立即发动了对“与有福的高昌国为敌的塔林之人”的西征。如前文所论，西州回鹘建国初期的主要敌手是安西回鹘，因此笔者推测九姓鞑靼或是在安西回鹘的招引或策动之下背叛西州回鹘并发动此次围城之役。

3.R～S节所记六姓鞑靼的迁入

文献第二部分记叙兀单可汗在位时的功业，R～S节写道：

自十姓回鹘立国以降，其威名远扬。属于契丹国的六姓鞑靼人出现了。尚未靠近此国时，他们已经听到托古兹不花王和我们绝伦的、神圣的、勇武的可汗的威名，他们不再接受原来臣服的国家和汗，弃之。他

们爱惜其居住的营盘故地，〔但〕弃之。他们成为我们的圣天可汗兀单的子民。

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鞑靼、契丹等部族一直臣属于回鹘。唐会昌二年（842），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契丹新立王屈戍等云：‘契丹旧用回鹘印，今恳请当道闻奏，乞国家赐印。’伏望圣慈允许。”敕旨：“宜依，仍以‘奉国契丹之印’为文”[49]。由此可知，契丹部首领一直使用回鹘汗国颁发的印信。直到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两年，他们才向唐朝称臣，乞求唐朝赐印。很难想象在漠北回鹘汗国称霸蒙古高原时，会有鞑靼部敢于先向契丹称臣，再归顺回鹘。这部分内容也证明了此文书所记史事应在西州回鹘时代。

回鹘汗国崩溃以后，黠戛斯并未在蒙古高原建立汗国[50]，蒙古高原呈现权力的真空，这为东方的契丹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到10世纪初叶，契丹已经在蒙古高原建立霸权。天赞三年（924）九月，辽太祖统军在漠北活动。十月，“遣兵踰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51]。此“浮图城”应即“可汗浮图城”，即北庭城。辽朝的西征军不但攻破了西州回鹘的夏都北庭城，还擒获了甘州回鹘的都督。《辽史萧韩家奴传》记：“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52]。辽金时代汉文史料中的“阻卜”即指鞑靼[53]，此次西征对蒙古高原的鞑靼部落和西域各国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此后西州回鹘一直与辽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为辽朝的属国[54]。在11世纪初，曾有鞑靼部落从蒙古高原向西逃亡，辽朝将领耶律化哥领军追击。《辽史耶律化哥传》记：“闻蕃部逆命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进。敌望风奔溃，获羊马及辎重。路由白拔烈，遇阿萨兰回鹘，掠之。都监裹里继至，谓化哥曰：‘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55]学者业已论证，《辽史》中的“阿萨兰回鹘”就是西州回鹘[56]。翼只水即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则这批鞑靼人是从蒙古高原迁至准噶尔盆地东北。从“此部实效顺者”的评价看，邻近的西州回鹘政权显然没有敢与逃亡的鞑靼部落发生接触。综上可知，在10世纪辽朝威震蒙古高原及西域诸部以后，西州回鹘不太可能接受背叛契丹的鞑靼部落进入自己领土内定居。

文献所记六姓鞑靼脱离契丹统治迁入西州回鹘境内之事应当发生在回鹘汗国崩溃之后到辽太祖西征之前。《通鉴考异》引《庄宗列传》记：“咸通（860～874）末，其王曰习尔〔之〕，疆土稍大，累来朝贡。光启（885～888）中，其王曰钦德，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57]。大约在9世纪70年代，契丹已经开始向外扩张。到80年代中叶，他们已经对周边部族建立霸权。六姓鞑靼脱离契丹统治向西迁徙的背景，很可能就是9世纪70年代以来契丹的对外扩张。当时契丹尚未在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建立霸权，因此其势力尚不能影响到东部天山地区。另外，仆固俊在866年建立西州回鹘政权，在经历短暂的挫折之后继续发展其势力，又在876年攻下伊州，成为东天山地区的主要力量。文献所谓“自十姓回鹘立国以降，其威名远扬”，应当正是这段时期。六姓鞑靼正是在这期间受契丹的压迫，

从蒙古高原迁入东部天山地区，投靠西州回鹘。

通过对文献所记标志性事件的分析可知，文献实际反映了866年西州回鹘开国以来的历史。A～B节所记围城之难可与BD11287所记史事勘同，反映西州回鹘政权在866～876年所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R～S节所记六姓鞑靼的迁入与汉文史料所见9世纪下半叶蒙古高原的形势相符，反映了9世纪60年代到80年西州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崛起之后，陆续吸收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C～D节所记攻克唆里迷之事则反映了西州回鹘在第二任可汗治下攻灭以焉耆为中心的安西回鹘的史实。综上，本文献所记多数事件的年代应在西州回鹘建国之初，即9世纪下半叶，反映的是西州回鹘开国之主仆固俊及其继承者治下发生的历史事件。

西州回鹘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

1.西州回鹘统一东部天山地区年代考

如xj 222-0661.09号文献和《记述的装饰》所记，西州回鹘后来攻灭以焉耆为中心的安西回鹘势力，统一东部天山地区。上述史料并未提供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xj 222-0661.09号文献B～D节记载，西州回鹘进攻焉耆的战争发生在少可汗登基之后。而据Pelliot chinois.5007知，到乾符三年（876）四月西州回鹘的统治者应当仍是仆固俊。可知，仆固俊势力在经历挫折之后重新崛起，先向东方攻取伊州，然后才向西方进攻安西回鹘。西州回鹘向东方的扩张活动至迟应在887年时已经结束。法藏敦煌文书Pelliot chinois.3569背面抄有《光启三年（887）归义军押衙阴季丰牒》，其第8～10行记：“西州回鹘使上下叁拾伍人，每一日供酒捌斗陆升，从三月廿二日至四月廿三日，中间计叁拾贰日，计供酒肆拾伍瓮伍斗贰胜”[58]。此时，西州回鹘向沙州归义军政权派出由35人组成的较大使团，他们在沙州逗留三十二日，受到归义军官方的款待，反映了当时双方政权良好的关系[59]。

据xj 222-0661.09号文献记载，少可汗在攻克焉耆（唆里迷）之后，继续向西方进军。文献E～H节记有如下内容。

他行军到怛逻斯西城，他使以伯古察将军为首的十余城主在他面前，他占领了这叫作怛逻斯的城市和国家。施峻法惩罚强硬对抗的敌人，对折腰、叩首之辈宽大仁慈。如此，他带来强有力的〔历代〕诸王诸汗的装饰和光辉——这部被称为“是”的王法中的训诫。他没有驱逐、命人迫害怛逻斯之民众，而将食物全部留下之后，领导〔他们〕。闻见此事之后，人们，全部的穆斯林民众从近处和远处对我们的圣天可汗合十双手，问候、礼拜，内心惶惶。他们如是说道：“国者，神圣的回鹘汗也（？）。他宽恕臣服的民众，此外还有什么？汗者，超群绝伦的圣天汗也。他像父亲一样分其家产，有〔此事〕么？”他们互相说道。然后按着他们自己的胸脯鞠躬，按着他们的嘴唇鞠躬，他们赞美的话语像雨点一样落下。

在西州回鹘少可汗攻下怛逻斯等十余城之后，善待了当地民众。这使得“全部的穆斯林民众从近处和远处”向西州回鹘称臣。这些信息暗示，怛逻斯等地当时已经属于伊斯兰世界。尤其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怛逻斯等十余城的首领伯古察带有“将军”（sipasalar）的头衔。此词来自新波斯语sipāh sālār，见于伊斯兰化以后的突厥语文献中[60]。这确证了怛逻斯等地当时已经伊斯兰化，或至少已在穆斯林势力的控制下。我们可据此判断此事发生的年代范围。回历225年（840），萨曼王朝向锡尔河

以北草原地区扩张，直到白水城（Asfīğāb）一带。白水城自此成为伊斯兰世界与草原游牧部落的前哨[61]，而白水城东北的怛逻斯尚在异教突厥人的手中。到893年，萨曼王朝攻下怛逻斯。据《布哈拉史》卷三一记载，萨曼王朝异密纳斯尔（Nar）死后，哈里发于回历280年（893）命易思麦里（Ismal）执掌河中地区。易思麦里立即出兵攻打怛逻斯（Ṭaraz），并陷入苦战。最终，怛逻斯的异密率领众多迪杭（dihqān）出降，并皈依伊斯兰教[62]。据此可知，xj 222-0661.09号文献所记西州回鹘少可汗攻下怛逻斯之事当在893年当地伊斯兰化以后。则其攻灭安西回鹘政权之事应发生在此前不久，可将其时间上限定在893年。

敦煌藏经洞所出《钢和泰卷子》保留有于阗国使者出使沙州过程中，以于阗文记录河西、西域等地区各城镇要地的地名表。该地名表第17～24行列有西州治下城市名目。第22～23行记有“在Argi中的城市”（argīñvā bisā kaṃtha）[63]，此地被学者考订为焉耆[64]。据蒲立本（E.G.Pulleyblank）考证，《钢和泰卷子》于阗文部分写于925年[65]。可知至迟在925年，西州回鹘已经控制了焉耆。则西征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925年。

英藏敦煌文书S.6551背面所抄《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可以为此事的断代提供又一证据，兹摘录其开头部分如下。

但少（小）僧生逢浊世，滥处僧伦，全无学解之能，虚受人天信施。东游唐国幸华都，圣君赏紫，丞（承）恩特加师号。拟五台山上，松攀（攀松）竹以经行，文殊殿前，献香花而度日。欲思普化，爰别中幸（华），负一锡以西来，途经数载；制三衣于沙碛，远达昆岗；亲牛头山，巡于阗国。更欲西登雪岭，亲诣灵山，自嗟业障尤深，身逢病疾，遂乃远持微德，来达此方，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莫不地宽万里，境广千山，国大兵多，人强马壮。天王乃名传四海，得（德）布乾坤，卅余年国安人泰，早授（受）诸佛之记，赖蒙贤圣加持，权称帝主人王，实乃化身菩萨[66]。

张广达、荣新江二位先生业已论证，文书所记“大回鹘国”正是西州回鹘[67]，其说甚是。文书中提到此僧人到达西州回鹘之前曾“东游唐国”，为文书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线索。张、荣二位先生注意到文书所反映的五台山文殊崇拜之风，敏锐地指出此“唐国”应指五代之后唐，因为西北地区往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之风始于后唐同光二年（924）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遣使入供。而该僧从中原西来“途经数载”，则文书的年代可以定在930年前后[68]。

文书称当时的西州回鹘王朝“莫不地宽万里，境广千山，国大兵多，人强马壮。天王乃名传四海，得（德）布乾坤，卅余年国安人泰”。如前所述，西州回鹘自866年建国以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中，这种国家安定疆域广大的景象只能出现在其攻灭安西回鹘、统一东部天山地区之后。其中“卅余年国安人泰”一句尤其值得注意。张、荣二位先生认为“卅余

年”系三的倍数，可能不是实数[69]。笔者认为此数应是实指，因为如果僧人想夸大西州回鹘“国安人泰”的时间，更应当使用百、千、万之类的数字。以930年为基准上推三十余年，可知西州回鹘在9世纪90年代就已经结束战争状态，建立起稳定的统治。以后唐灭亡的936年为年代下限，可知西州回鹘“国安民泰”的景象至迟应发生在10世纪伊始。前文已论，西州回鹘少可汗攻灭安西回鹘后西征怛逻斯之役发生的年代上限在893年，则西征结束的年代范围应是893年至10世纪初。

此外，还应提及法藏敦煌写卷Pelliot chinois 3552《儿郎伟》。此卷上抄有六首《儿郎伟》曲词及一段题记，其中四首创作于895年岁末，正值李氏家族操控归义军权柄之际[70]。第三首有词句赞归义军政权国力强盛、四方太平之势，作：“四方宴然清帖，猃狁不能犯边。甘州雄身中节，嗢末送款旌旟。西州上拱（贡）宝马，焉祁（耆）送纳金钱。从此不闻枭鸲，敦煌太平〔万年〕”[71]。甘州、西州两地名分别代指回鹘人在两地所建立的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政权，而嗢末则是盘踞凉州一带的部族。词中的“焉祁”应当就指以焉耆为中心的安西回鹘政权。诚如荣新江先生指出，此时归义军正处于内乱之际，根本无力征服周边部族，上引曲词显然是文学夸大之辞，可能仅仅反映归义军与上述政权有贸易往来[72]。值得注意的是，归义军时代的出土文书确实反映了该政权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甚至凉州嗢末有频繁的往来，却罕见其与焉耆方面的交往。此唱词或可说明安西回鹘在895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内曾与归义军政权有较为频繁的往来，因此被作为“四方”“猃狁”的代表写进唱词。唱词又专门将焉耆与西州并提，或暗示安西和西州回鹘曾分别遣使与归义军建交。这让人联想到，当时可能正值双方相互交战激烈之时，因此双方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争取邻近归义军政权的支持。因此，这件材料有可能反映西州回鹘西征安西回鹘的战事发生在895年前不久。

综上，西州回鹘攻灭安西回鹘、统一东部天山地区的西征活动结束于893年之后至10世纪初之前。

2.西州回鹘疆域的变化

如前所述，西州回鹘在第二任可汗治下攻灭安西回鹘之后，继续向西进军，直至怛逻斯一带，威震伊斯兰世界。但xj 222-0661.09号文献显示，这次对中亚西部的征服并不意味着西州回鹘将其版图扩张到当地。在记述西州回鹘西征震动伊斯兰世界之后，文献第N节紧接着写了如下内容。

他们扬我们圣天可汗之威名上至重霄。他们将〔其威名〕在大地上广泛传播：〔从〕受调查的、由外国之人建立的三唆里迷国的谷地等，直到大裕勒都斯。

裕勒都斯（Yultuz，意为“星”）是今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突厥语名称，地在焉耆西北、库车东北天山间盆地，为我国最大的高山草场。此地水草丰茂，适宜游牧，自古以来为游牧民族活动区域。草原因额尔宾山分为两部，东北为小裕勒都斯，西南为大裕勒都斯，开都河上游依次流过两部。从裕勒都斯沿开都河行进，即可进入焉耆盆地。森安孝夫曾提出，庞特勤所部西迁回鹘族帐出身游牧民族，其西迁首选的目的地应是东部天山地区最优的草场裕勒都斯，因此定都于靠近裕勒都斯谷地的焉耆[73]。其说甚是。文献将裕勒都斯和唆里迷国并提，所指应是安西回鹘统治的核心地带——以焉耆为中心的绿洲城国及其西北的裕勒都斯草原地带。文献称三唆里迷国为“受调查的、由外国之人建立的”。如前所述，此文献A节所提到的“外国（yat或yat ellig）的、怀有恶意的敌人们”应指与西州回鹘为敌的安西回鹘。“受调查的”可能指焉耆一带被西州回鹘占领后，留军队驻守。此节内容暗示，西州回鹘在少可汗西征至中亚以后，并未将怛逻斯一带直接纳入版图。在9世纪末、10世纪初，真正并入西州回鹘版图的地区应当只是原安西回鹘的核心地带：以焉耆为核心的天山南麓绿洲和以裕勒都斯为中心的天山谷地。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前引《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文书反映了925年或之前不久河西、西域各地的地理情况，自其刊布以来便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贝利（H.W.Bailey）[74]、哈密屯（J.R.Hamilton）[75]、黄盛璋[76]等学者曾全面讨论其中所列地名[77]，笔者现将地名表第17～24行所列西州回鹘治下地名及学者的系统比定汇总，具体见表2-1[78]。

表2-1 《钢和泰卷子》记西州辖下诸城

行/序	地名	贝利	哈密屯	黄盛璋	其他学者	所在区域
17/2	Secū bise kaṃthe	在西州的诸城	西州诸城	西州诸城		
17/3	’Īcū kaṃtha	伊州城	伊州	伊州		伊州

续表

行 / 序	地名	贝利	哈密屯	黄盛璋	其他学者	所在区域
17/4	Kau'yākä		鬼谷（《西州使程记》）	柔远县		伊州
17/5	Dapācī ka[ṃ]tha	纳职城	纳职	纳职县		伊州
18/1	Phūcạnä kaṃtha	蒲昌城	蒲昌	蒲昌县		西州
18/2	Śakāhä kaṃtha	Šögä 城	赤谷	萨捍戍		西州
18/3	Tsīräkyepä kaṃtha	色尔启布（Sirkip）城	色尔启布城	赤谷		西州或伊州
18/4	'Īśumä kaṃtha		桑园驿	于湛城	威神城*	西州
19/1	Ḍūkäcü kaṃtha	柳中城	柳中	柳中		西州
19/2	Yūśumä kaṃtha	=18/4	=18/4	=18/4	威神城	西州
19/3	Hve'tsverä kaṃtha			郝遮镇	横截**	西州
19/4	Ḍūkäcü	=19/1	=19/1	=19/1		西州
19/5	Ttiyākä kaṃtha	丁谷（Toyuq）城	丁谷城	特罗堡		西州或庭州
20/1	Tcyāṃ-tsvainä kaṃtha		长泉	咸泉镇		庭州
20/2	Kautaňai kaṃtha		古塔巴?			庭州
20/3	Secū mistä kaṃtha	西州大城	西州	西州		西州
20/4	Paṃjäkaṃtha	北庭城	北庭城	北庭		庭州

续表

行/序	地名	贝利	哈密屯	黄盛璋	其他学者	所在区域
21/1	Hä:nä bihä:rakä nāma kaṃtha	无	名作 *Xan bägräk（"可汗王子"）之城	凭洛守捉城		庭州
21/2	Śaparä nāma kaṃtha	沙钵	沙钵	沙钵		庭州
22/1	Yirrūṃcinä kaṃtha	乌鲁木齐城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庭州
22/2	Cạmaiḍä baḍaikä nāma kaṃtha	名作 Čamïl balïq 之城	名作 Čamïl balïq 之城	昌吉古城		庭州
22/3	Argīñvā bise kaṃtha	在焉耆的城	在焉耆的城	焉耆人的城		焉耆
23/1	'Ermvā bise kaṃtha	在 Erma 的城	在嗢末（凉州）的城	龟兹地区中的城		龟兹
23/2	Phalayākä kaṃtha	Bulayïq 城	Bulayïq 城	蒲类		西州
23/3	Tturpạnä kaṃtha	吐鲁番（Turfan）城	吐鲁番城	安乐城		西州
24/1	Bapạnä kaṃtha	无半城	无半城	无半城		西州

* 由荒川正晴比定，参见荒川正晴「麹氏高昌国における郡県制の性格をめぐって：主としてトゥルファン出土資料による」『史学雑誌』95-3、1986、40・68 頁。

** 由松井太比定，参见 D. 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of the Turfan Oases", in: E. Ragagnin und J. Wilkens, hrsg., *Kutadgu Nom Bitig: Festschrift für Jens Peter Laut zum 60. Geburtstag*, Wiesbaden, 2015, pp. 278-279。

虽然学界对地名表中一些具体地名的比定仍存疑问或争议，但一致认为其所列各地大都分布在原唐朝伊、西、庭三州境内；只有两个例外，即第22行出现的焉耆和第23行出现的'Ermvā bise kaṃtha（在Erma中的城）。藏文《于阗国授记》（*li yul lung bstan pa*）记载，Gu zan王妃为其女建一伽蓝名作"er mo no"[79]。贝利最早指出此er mo no应系音译自于阗语ermāna-，系地名Erma的形容词形式，意为"Erma的"[80]。他据此指出该地应位于Gu zan境内[81]。他认为Gu zan即汉文"古城"（即北庭故城）之音译，因此将Erma与"古城"勘同[82]。哈密屯将Gu zan解为"姑臧"（凉州），又据Erma的读音将其与9～10世纪活跃在凉州的"嗢末"部落联系起来，从而将其比定为凉州[83]。据当时河西的政治

形势，西州回鹘几无可能绕过沙州归义军、甘州回鹘等政权而控制千里之外的凉州嗢末。黄盛璋则推测其地当在龟兹[84]。另一方面，研究吐蕃史和古藏文文献的学者对Gu zan一名的比定已基本达成一致，认为此地即龟兹[85]。由此可知，《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所记Erma当指龟兹或龟兹境内某地。在征服安西回鹘之后，西州回鹘将安西回鹘统治的核心地区焉耆、龟兹皆纳入版图。

当时西州回鹘的疆域向西已达到龟兹的事实或可在阿拉伯地理著作《黄金草原》（*Muruğ al-Ẕahab*）的相关记载中得到印证。该书由生于巴格达的马苏迪（Masʻūdī）所作，初稿成于943年，后于947年和956年又完成2次修订[86]。原书第15章题作"中国和突厥人的诸王·阿穆尔后代的分布·关于中国的消息及相关主题的其他细节"。第312小节记有托古兹古思（Ṭuġuzuġuz，指回鹘）的情况，笔者摘译其后半节如下。

其他〔部族〕离开他们去草原生活，譬如突厥、葛逻禄和托古兹古思。他们（托古兹古思）占据了KWSAN，它属于呼罗珊和中国间的一个王国[87]；他们是当下，即332年（943～944），突厥各部族中最悍勇、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一种。其王戴有"回鹘汗"之号。在这些〔生活在草原的〕部族中，唯独他们崇信摩尼教法。[88]

此节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对地名KWSAN的比定。此词在英文本中被读作Kūsān[89]；在法文本中被读作Kūšān，译作"高昌"[90]。伯希和据西州回鹘以高昌为中心的史实，提出此词可能指"高昌"；但他同时指出这种勘同存在语音上的困难，即突厥语"高昌（Qočo）"一词并无收尾鼻音/n/。羽田亨据此名读音与回鹘语"曲先（Küsän）"一词勘合，论说此名当指龟兹[91]。安部健夫提出此词系汉文"五城"的音写，实指北庭[92]。其说实难令人信从。从语音看，此名显然与Küsän勘合，应指龟兹。华涛已指出，在《黄金草原》对回鹘（托古兹古思）的其他记述中混杂有漠北回鹘汗国时代的信息[93]。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上引片段可能反映的是8世纪末漠北回鹘汗国进取东部天山地区的史实。但作者在上引片段中特别写到这是"当下（943～944年）"的情况，让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作者同时代的史事。前引xj 222-0661.09号文献E、H～I节记有西州回鹘第二任可汗在攻灭安西回鹘后，率军西征至中亚西部，在伊斯兰世界引起极大震动。笔者已考证此事在893年后。上引《黄金草原》中有关回鹘占据龟兹之事应当就是对此的反映。

成书于回历372年（982～983）的波斯语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Ḥudūd al-ʻĀlam*）第12章详细记载了托古兹古思（Tuġuzuġuz）人的国家和疆域[94]，米诺尔斯基（V.Minorsky）考证此托古兹古思即西州回鹘[95]。该文献介绍了当时西州回鹘境内的区域与城镇，米诺尔斯基、哈密屯和华涛等学者曾系统讨论过这些地名[96]，笔者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兹将文献所记西州回鹘治下各地列表2-2如下。

表**2-2** 《世界境域志》记"托古兹古思"（西州回鹘）辖下各地

序号	换写*	米诺尔斯基	哈密屯	华涛	区域
1	ǦYNANǦKṮ	Jīnānjkath =西州	西州	西州	西州
2	TFQAN	天山	天山	天山	
	KWZARK		应作 *kwlwk (kūlūk) =*köllüγ= 俱六	俱六	庭州
	ǦMLKṮ	=*jumul kath 处密	=*Čamïl balïq =Cạmaiḍä baḍaikä	=10	庭州
	BNǦYKṮ	Panjīkath =北庭	北庭	北庭	庭州
	BARLĠ	Bārlugh	应作 *yārlgh =*yarlïγ= 耶勒	耶勒	庭州
	ǦAMĠR	Jāmghar			
3	KMSYĠYA		应作 *kmštgh(kumushtagh) =*kümüš taγ = 银山	桑园（系华氏误读哈密屯论文）	西州
4	STKṮ	=sīkand =sog.*šykant	张三城	张三守捉	焉耆
5	ARK	=azal =bügür 轮台	焉耆	焉耆	焉耆
6	KRARḪWN		应作 *lwkjwn(lūkjūn) =lükčün 柳中	柳中	西州
7	BKTGYN	Bek-tegin			
8	KWMS ART	Kūmas ārt 可能是塔尔巴哈台山南的 kamīz 或 kümi talas；抑或巩乃斯 künges			伊犁河谷
9	ḪMWD	Khumūdh = Qumūl 伊州		伊州	伊州

续表

序号	换写 *	米诺尔斯基	哈密屯	华涛	区域
10	ĞMLYKṮ	=*jumul kath 处密		处密	庭州或伊犁河谷
11	TNZAĠ ART 驿站	应作 tprāgh ārt =*topraq art 土岭进入伊犁河谷的山口		应作 sārgh ārt= sarigh 比什凯克东 32 公里	
12	MABNḤ ĞRABAS 驿站	=Yafinj 也云赤伊犁河谷		= 马保 + 阿忒八什	
13	BLḤMKAN 驿站			=lkhmān 楚河流域	
14	SDNK 驿站	=sidink kul（在楚河上游），但不符合西州回鹘的范围		=sidinkkul 在楚河上游	
15	MḤK ART 驿站				
16	AYRGWZ KWKṮ 驿站	=eki ögüz 双河伊犁河谷		双河巴尔喀什湖东南	
17	AĠRAĞ ART	Ighraj ārt 中部天山，或指 muz art 木扎特（夏特古道）		中部天山	

* 笔者据《世界境域志》波斯文校勘本换写，参见 Anon., *Ḥudūd al-ʿĀlam min al-Mašriq ila al-Maġrib*, M. Sutūda, ed., Tehran: Ṭahūrī, 1983。

《世界境域志》对西州回鹘领土的记载并不限于城镇，也包括山脉、山口、驿站、部族等信息。关于其中介绍的城镇和区域，大都包含在原唐伊西庭三州境内、焉耆境内以及伊犁河谷地。11～17地皆为驿站，学者对具体站名的比定存在较大争议。米诺尔斯基将这些站名大多考订在伊犁河谷或伊犁河谷进出天山之处，尽量将其置于文献所见西州回鹘城镇所在的范围内。而华涛则将一些站名定在楚河和伊塞克湖西、北等位置，超出了伊犁河谷的范围。华涛指出，这些驿站可能是作者混

杂了其他来源的信息而记下的原漠北回鹘时代的驿站[97]。考虑到前引xj 222-0661.09号文献所记西州回鹘对中亚直到怛逻斯一带的征服活动，这些驿站也可能位于西州回鹘建立的连接其国土与中亚西部地区的官道上。对于西州回鹘实际疆域的判断，还应当参考同书关于其邻近部族的记载。

同书第15章记葛逻禄的城镇，第11节介绍拔塞干（Barsẖān），写道：“坐落在湖岸的城镇，繁荣而宜人。其迪杭（dihqān）系葛逻禄，但其民众效忠于托古兹古思”[98]。这个坐落在湖边的拔塞干显然应是伊塞克湖东南岸的上拔塞干[99]。可知，当时伊塞克湖东南岸并未受西州回鹘的直接控制。当地民众效忠于回鹘之说反映出此地应当靠近西州回鹘领土，则当时西州回鹘的西部边界在天山北麓应到达伊塞克湖东南一带，其势力范围已经囊括了伊犁河谷地。

随后的记载印证了此点。同章第12节介绍ĞAMĠR，作：“ĞAMĠR，葛逻禄国中的一座小城，在沙漠边缘。过去它属于葛逻禄，现在其首领为托古兹古思可汗效力。其地有200个部落，下辖独立一区域”[100]。此城也出现在该书第12章所记西州回鹘的疆域中（见表2-2），是该国位于天山北麓的五城中最西边的一座。可知，此城应是西州回鹘在天山北麓向西扩张侵夺葛逻禄领地后新征服之城。

同章第15节还记：“乌什（Ūğ），地在山中，众至200人。……为葛逻禄所占”[101]。说明当时西州回鹘的疆域在天山南麓尚未包括阿克苏以西的乌什。文献对于天山南麓重镇龟兹的记载颇令人费解。作者将其置于第9章介绍中原（ ）的章节中，作：“苦叉（Kuč），地在边境，属于中原，但托古兹古思一直攻掠其民众”[102]。如前文所论述，龟兹地区在9世纪初叶已接受漠北回鹘汗国的统治，其统治阶层已经由回鹘人担任或回鹘化。文献称其地属于中原，应是受到更早期反映唐安西时代的文献的影响。但在唐安西时代，龟兹并未曾受到回鹘的持续攻掠。则文献所记其地受回鹘攻掠，应是当时的情形。

那么，《世界境域志》所描绘的西州回鹘的疆域反映什么时代呢？华涛先生认为，其与《钢和泰卷子》所记应是同时代的信息，反映10世纪20～30年代西州回鹘的疆域情况[103]。与《钢和泰卷子》对比可知，两者所反映的西部疆域有所不同。《世界境域志》反映：西州回鹘在天山北麓的疆域已经扩展到伊犁河谷，并影响到伊塞克湖东南一带；其在天山南麓的边界则应在龟兹以东。而《钢和泰卷子》反映的则是西州回鹘攻灭安西回鹘后所奠定的疆域：其在天山北麓向西只到达裕勒都斯一带，在天山南麓则到达龟兹。930年前后写成的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称西州回鹘在西征安西回鹘后“卅余年国安人泰”，或可据此判断其疆域自西征奏凯迄至当时并无较大变动。笔者由此推测，《世界境域志》所反映的疆域应是930年以后的情况。此时西州回鹘在天山北麓已向西扩张到伊犁河谷地，侵夺葛逻禄领地；在天山南麓则向西进攻龟兹。而其年代下限则应是10世纪50～60年代，因为文献在述及以喀什、阿图什为中心的样磨部和伊塞克湖西岸各突厥语部族时，完全没有提及

他们有伊斯兰教信仰。因此可将这种局面定在喀喇汗王朝统治者接受伊斯兰教、建立强大政权之前。此外，英藏敦煌写本S.383《西天路竟》记北宋僧人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辗转进入印度的取经行程[104]。学者已指出，此行记应是北宋乾德四年（966）诏遣赴西域求法的行勤、继业等一百五十七位僧人中某位所留[105]。写本记其一行进入塔里木盆地后的行程作："又西行三十里入鬼魅碛，行八日出碛，至伊州。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国。又西行一千里之月氏国。又西行一千里至龟兹国。又西行三日入割鹿国。又西南十日至于阗国。又西行十五日至疏勒国"[106]。比对传世文献对行勤、继业等人行程的记载可知，所谓月氏国应指焉耆[107]。而割鹿国正在今阿克苏一带。如果此时西州回鹘仍在不断攻掠龟兹一带，很难想象这些外来僧人会选取这条道路行走西域。因此，笔者认为《世界境域志》所反映西州回鹘的疆域应是10世纪40～50年代的情况，当时西州回鹘在天山北麓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发展到伊犁河谷一带，迫近伊塞克湖东岸。而在天山南麓则再度发展到龟兹。龟兹在930年以后的某时可能因叛乱或其他突厥部落的扩张而独立于西州回鹘，但在60年代以前被西州回鹘夺回。

960年，20万帐突厥部族在喀喇汗王朝阿萨兰汗穆萨治下改宗伊斯兰教，中亚局势因此发生重大变化。从963年起，喀喇汗王朝即向西域南道的于阗佛国发动战争，此战至少持续8年之久[108]。处于喀喇汗王朝和西州回鹘之间、尚未伊斯兰化的葛逻禄等部族转向与西州回鹘一起对抗喀喇汗王朝。传世文献对此没有明确记载，但出土文字资料透露了一些重要线索。法藏敦煌汉文文书Pelliot chinois.4065（3）为敦煌人杨定千习字，所抄习内容被学者考订为曹元忠回复于阗王的书信，其中写道：

西太子领大石兵马来侵大国，动天动地，日月昏沉；致于马甲人甲，刀枪斧钺，实填人怕。直回鹘、葛禄及诸蕃部族，计应当敌他不得。窃知皇帝陛下，天倍（培）天补（辅），圣得（德）神扶。若不如斯，岂德（得）万民顺化？作张良计教，设韩信机谋，不放官界之中，逆头便施作略如蛾赴火，寻即灰烬；片时似蓬，风吹飞出他方世界。贼军大败，兵马桃（逃）生。如此声名，传杨（扬）天下。[109]

信件透露，此役为喀喇汗军队进犯于阗，来势凶猛，但最终被于阗军击败。其中提到"直回鹘、葛禄及诸蕃部族，计应当敌他不得"。学者据此指出，"疏勒与于阗之间，生活有一些回鹘、葛逻禄和诸蕃部族。在这场战争中，这些部族自然是首当其冲"[110]。但从上下文看，这句话更像是一句假设：如果回鹘、葛禄或者其他任何蕃部遇到喀喇汗军队，他们应当都抵挡不住。作者借此反衬于阗王"天培天辅，圣德神扶"，称赞其力挽狂澜、击退来敌的壮举。没有任何史料显示，在10世纪疏勒和于阗之间分布着回鹘、葛逻禄和各种"蕃部"，且这些部族都受于阗驱策。信中专门提到回鹘、葛禄，暗示了西域北道的回鹘、葛逻禄等尚未受伊斯兰化的突厥系部族也与于阗一样面对喀喇汗王朝的兵锋。上文已述，在10世纪40～50年代，西州回鹘在天山北麓向西扩展到伊犁河谷地区，影响到伊塞克湖东南岸。其侵夺的区域主要是葛逻禄部的驻地。此时，

这一带非穆斯林的葛逻禄等部族可能在喀喇汗王朝的压力下彻底转投西州回鹘旗下，有史为证。982年出使西州回鹘的北宋使者王延德在其《西州使程记》中记当时西州回鹘所统部族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末蛮”[111]等。其中样磨、割禄显然是两部族中未受喀喇汗王朝统治的、靠近东方的非穆斯林部分。末蛮即《突厥语大词典》中的Barman，亦即《经世大典图》中的“八里茫”，指唐之拨换，今阿克苏一带[112]。

上述情况在年代稍晚的回鹘文文献中亦可得到印证。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共收获三枚木柱，系西州回鹘时代佛教徒修建佛寺时所打之刹木，上面以汉文或回鹘文书写功德主之发愿文。其中第三枚木柱系第三次吐鲁番探险中于高昌故城南城墙附近掘得，现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编号MIK III 7279。其上文字以回鹘文书写，前三行记有如下内容[113]。

1qutluγ ki ot qutluγ qoyn yïl ekinti ay üč yaŋï-qa：kün ay täŋridä qut bulmïš uluγ 2qut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arslan qutluγ köl bilgä täŋri xan [ ] orunqa olurmïš öŋtün šačiu 3kedin uč barsxanqatägi ellänü ärksinü yarlïqayur uγurda…

在火位的（ot qutluγ）己（ki）未年二月初三，君爱登里罗汨末蜜施胡禄汨斡那蜜施合奋爱登蜜颉咄登蜜施合阿萨兰骨咄禄阙毗伽登里汗（kün ay täŋridä qut bulmïš uluγ qut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el tutmïš alp arslan qutluγ köl bilgä täŋri xan）[ ]在位时，其统治东到沙州（šačiu），西到乌什（uč）、拔塞干（barsxan）之时。

由于木柱实物在“二战”间不知去向，学界长期以来仅能依靠缪勒的转写有限度地利用该材料。文字所记时间、地点曾引起学界长期的争议。现在据森安孝夫对实物的最新研究，“在火位的己未年”已可以被确定在1019年[114]。关于文书所记西州回鹘的西部疆界，学界也曾有不同的观点。一是由缪勒最早提出的nuč barsxan读法。他将nuč勘同于汉文史料中的“笯赤建”和伊斯兰文献中的Nuğkaṯ，地望在今塔什干附近；将barsxan比定为位于怛逻斯东的下拔塞干[115]。安部健夫接受缪勒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nuč的今地可能就在塔什干东北的Chirchik[116]。另一种读法由山田信夫提出、后为等人所接受的uč barsxan读法。Uč即今新疆乌什（Uč Turpan），而barsxan则应指离乌什较近的、位于伊塞克湖东南岸的上拔塞干[117]。从11世纪初的中亚形势看，西州回鹘显然不可能将其西界推进到笯赤建和下拔塞干。文字的正确读法只能是uč barsxan，即乌什和上拔塞干。可知，在1019年时原属葛逻禄部控制的拔塞干、乌什等地都已并入西州回鹘版图，从此以西的突厥诸部应当都是喀喇汗王朝治下的穆斯林部众。

西州回鹘在中部天山的统治并未能持续太久。在1006年前后攻灭于阗佛国之后，喀喇汗王朝已经可以从西、南两个方面给予西州回鹘压力。种种迹象显示，在11世纪下半叶，西州回鹘的疆域已大幅度向东收

缩。《突厥语大词典》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其中有关东部天山地区的词条可以视为对当时历史的反映。“轮台”（Bögür）词条记：“轮台，在山顶的戍堡，地在苦叉（Quča）和回鹘（Uyγur）之间”[118]。此条显示，龟兹（苦叉）已经不在西州回鹘的境内。可能西州回鹘当时的西部边界在天山南麓就到龟兹和焉耆间的轮台。“回鹘”词条记：“此公国由五座城组成，此五城之民乃异教徒中最为悍勇者，是最好的射手。这五城是：唆里迷（Solmï），由u-l Qarnayn所建；然后是高昌（ ）；然后是彰八里（anbalïq）；然后是别失八里（Bbalïq）；然后是仰吉八里（Yaŋïbalïq）”[119]。与高昌、北庭、焉耆等量齐观的大型绿洲龟兹和哈密已不在其中，暗示着西州回鹘可能已经失去这两地。“湖”（köl）词条下记有：“裕勒都斯湖（Yulduz köl），在苦叉、弓月（Kit）和回鹘的边境上的一湖的名称”[120]。可知，西州回鹘在天山北麓的势力范围也已从伊犁河谷收缩到裕勒都斯谷地。

综上，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10～11世纪西州回鹘疆域的变化过程。9世纪末或10世纪初，西州回鹘攻灭安西回鹘，将其统治的中心地带焉耆、龟兹纳入版图。其西部疆域在天山南麓包括龟兹，在天山北麓包括巴音布鲁克草原。这种情况持续到10世纪30年代。在10世纪40～50年代，其西部疆域有所变化。西州回鹘在天山北麓继续向西扩张，征服在伊犁河谷地的各部，影响到伊塞克湖沿岸地区；而其在天山南麓的城市龟兹则因为某种原因独立。到10世纪60年代，龟兹再度受西州回鹘统治。喀喇汗王朝崛起之后，原本受西州回鹘影响的、未接受伊斯兰化的突厥诸部彻底受西州回鹘统治，使西州回鹘的西部疆界在天山南麓扩展到阿克苏、乌什一带，在天山北麓扩展到伊塞克湖东南沿岸。11世纪初叶，喀喇汗王朝与西州回鹘即在上述地区展开争夺。到11世纪70年代，西州回鹘在西部的领土大片沦丧，其边境向东收缩到焉耆。

[1]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0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33、118页。

[2]郝春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第22～31页。

[3]文字前下角标数字表示原文书行数；〔 〕表示文书中未写、据文意补出之字；［ ］表示文书中不存或保存情况不佳、据文意推测出之字；（ ）表示前字、词之正字。

[4]《资治通鉴》卷二五〇，第8235页。

[5]郝春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第24～25页。

[6]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咸通七年—十三年）》，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编委会编《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71～294页。

[7]图版见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4140882309;recnum＝62340;index＝1；参见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656～657页。

[8]王重民：《〈补全唐诗〉拾遗》，氏著《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第54页；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第33页。

[9]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第33页；氏著《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8页；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咸通十四年—中和四年）》，《敦煌学》第27辑，2008，第259页。

[10]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09册，条记目录，第33页。

[11]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8页。

[12]《资治通鉴》卷二四九，第8181页。

[13]《资治通鉴》卷二四九，第8183页。

[14]《资治通鉴》卷二四九，第8188页。

[15]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4～120页。

[16]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952～953页；参见荣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第128～132页。

[17]《资治通鉴》卷二五〇，第8229页。

[18]《新唐书》卷二一七，第6133～6134页。

[19]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21～128页。

[20]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55～164、183～192页。

[21]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49页。

[22]《资治通鉴》卷二四九，第8171页。

[23]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4～355页。

[24]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7、299～300页。

[25]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289～302页。

[26]文书照片刊布于赫俊红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西域文献遗珍》，中华书局，2011，第276～277页。

[27]Zhang Tieshan and P.Zieme,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vol.64 （2）, 2011, pp.129-159；（汉译本）《十姓回鹘王及其王国的一篇备忘录》，白玉冬译，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2012，第157～176页。2013年，张铁山、茨默教授又刊布了该文献的第18叶，内容为从佛陀到阿育王时代的历史，暗示了信仰佛教的回鹘人将佛教发展史置于本民族历史叙述框架内的历史观，参见Zhang Tieshan and P.Zieme, “A Further Fragment of Old Uigur Annal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66, 2013, pp.397-410。

[28]笔者最早的研究成果反映在2013年6月提交答辩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参见付

马《西州回鹘王国早期政治与行政地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3，第26～44页。相关部分于同年稍后单独发表，参见付马《西州回鹘王国建立初期的对外扩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 222-0661.09号回鹘文书的历史学研究》，第145～162页。此后，白玉冬发表论文讨论相同主题，但并未提及拙文，参见白玉冬《有关高昌回鹘的一篇回鹘文文献——xj 222-0661.9文书的历史学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第134～146页。其2017年新出版的专著中亦有对本文献的讨论，间或提及笔者前引拙文，参见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203～210、218～220页。本节及下节内容据笔者上引拙文增订，并就白玉冬专著中对拙文的批评做出回应。

[29]Zhang Tieshan and P.Zieme,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pp.137-140.

[30]文献的学术分节遵照张铁山、茨默二位的划分。因本节重点讨论文献的历史学信息，对压头韵的小节在格式上不做特别的编排；而对写本中出现的语文学特征，笔者在转写时做如下处理：回鹘文未表记之元音全部按古突厥语完整形式补出；构型、构词附加成分不与词干连写者全部连写（因换行分写者加连字符）；汉字后括注古突厥语对应词语；齿音混同字符按正字转写。对写本的语文学研究应以张铁山、茨默二位先生的读本为基准。

[31]tägimlig原意为“有价值的”，此处据上下文译作“精锐的”。

[32]张铁山、茨默二位将ȫtig译作“清单”（list），从而将第26～28行句子译作：“〔我们的王〕将称为‘是’的王法中的话记在脑中”（Zhang Tieshan and P.Zieme,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pp.153, 141），白玉冬误译作：“（即）我们的国王带来Rājaśastra记录中称为‘是’的话语”（白玉冬译《十姓回鹘王及其王国的一篇备忘录》，第168页）。笔者认为，ȫtig应解作名词ȫt加宾格的形式，ȫt与sav构成同义反复，意为“建议”。

[33]本句中的关键词yarïndï不知作何解，但此节主体意思应是也地不花长史与可汗家族通过和亲建立关系。张铁山、茨默将此句译作“长史也地不花在接受其女出生以后，成为我们光辉的圣天可汗、褐色大地之主的yarïndï”（Zhang Tieshan and P.Zieme,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p.143）。

[34]文献编辑者认为Z节可能是下一部分内容的开头，见Zhang Tieshan and P.Zieme,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p.131。

[35]Zhang Tieshan and P.Zieme,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p.129.

[36]参见 Zhang Tieshan and P.Zieme,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p.145。

[37]Zhang Tieshan and P.Zieme,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p.129；白玉冬同意二位的10～11世纪的断代，参见白玉冬《有关高昌回鹘的一篇回鹘文文献——xj 222-0661.9文书的历史学考释》，第146页。

[38]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ed.and trans.by R.Dankoff,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82, p.302.

[39]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481頁；（汉译本）《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351页。

[40]刘迎胜：《元代曲先塔林考》，《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第243～252页。

[41]W.B.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9, 1938（3）, pp.545-571.

[42]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第147～159页；收入张广达《文书 典籍与西域史地》，第25～41页。

[43]付马：《西州回鹘王国建立初期的对外扩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 222-0661.09号回鹘文书的历史学研究》，第154～155页。

[44]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第220页。

[45]《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303页。

[46]《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303页。

[47]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278-279頁。

[48]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第219～220页。

[49]（宋）王溥：《唐会要》卷九六，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06，第2035页。

[50]参见M.Drompp, “Breaking the Orkhon Tradition: Kirghiz Adherence to the Yenisei Region after A.D.84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3）, 1999, pp.390-403。

[51]《辽史》卷二，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6，第22页。

[52]《辽史》卷一〇三，第1595页。

[53]王国维：《鞑靼考》，《清华学报》第3期第1号，1926；此据《观堂集林》第14卷，中华书局，1957，第12页；蔡美彪：《辽金石刻中的“鞑靼”》，《国学季刊》第7卷第3号，1952，第377～387页。参见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此据氏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第343～366页。

[54]参见华涛《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第30～31页。

[55]《辽史》卷九四，第1519～1520页。

[56]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95～100页。参见Liu Yingsheng, “A century of Chinese research on Islamic Central Asian history in retrospect”, Cahiers d’Asie centrale 9, “Études karakhanides”, 2001, p.121; M.Biran, “Unearthing the Liao dynasty’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 world: Migrations, diplomacy, commerce and mutual perception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3, 2013, pp.223-224。

[57]《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开平元年五月条《考异》，第8797页。据《旧五代史》校，参见《旧五代史》卷一三七，第2129页。

[58]录文据在线图版，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10756710116;recnum＝60921;index＝1；参见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伯四六四零背面文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455～458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9～360页。

[59]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9～360页。

[60]参见Zhang Tieshan and P.Zieme,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pp.145-146。

[61]参见C.Bosworth, “Asfījāb”, Encyclopaedia Iranica, online: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asfijab。

[62]Narshakhī, The History of Bukhara, ed.and trans.by R.Frye, Cambridge, 1954, pp.86-87；参见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156～160页；Y.Bregel, A Historical Atlas of Central Asia, Leiden: Brill, 2003, pp.21-22。

[63]H.W.Bailey, “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 Asia Major, vol.2, 1951, p.3.

[64]H.W.Bailey, “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 p.14;参见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pt Staël-Holstein”, T’oung Pao, vol.46, 1958, pp.115-153; 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续完）》，第6页。

[65]E.G.Pulleyblank, “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 Asia Major, vol.4, No.1, 1954; in his: Central Asia and Non-Chinese People of Ancient China, 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Series, Ashgate, 2002, pp.90-97.

[66]图版参见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59723873313;recnum=11505;index=1。录文参见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第24页。

[67]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第25～27页。

[68]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第27页。

[69]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第27页。

[70]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205～207页。

[71]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204、360～361页。

[7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61页。

[73]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284-285頁。

[74]H.W.Bailey, “The Staël -Holstein Miscellany”, pp.1-45.

[75]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p.115-153.

[76]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续完）》，第1～13页。

[77]高田时雄在其对于阗语与汉语对音的研究中也全面利用了《钢和泰卷子》地名表，但他对于地名表第17～24行地名的比定几乎全部接受哈密屯的研究结果，只是认为ḍūkäcū（19.1、19.4）不应是汉文“柳中”的转音，而是来自其突厥语名称

Lükčüŋ。参见高田时雄《于阗文书中的汉语语汇》，氏著《敦煌·民族·语言》，钟翀等译，中华书局，2005，第227页。

[78]其他学者对具体地名的新比定成果集中于一新列，加脚注说明。

[79]参见朱丽双《〈于阗国授记〉译注（下）》，《中国藏学》2014年S1期，第126～127页。

[80]H.W.Bailey, “Erma”, in his Khotanese Text 7,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5, p.18.

[81]H.W.Bailey, “The Staël -Holstein Miscellany”, pp.14-15；H.W.Bailey, “Erma”, p.18.

[82]H.W.Bailey, “Erma”, in his Khotanese Text 7, p.18.

[83]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p.149-150.

[84]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续完）》，第6～7页。森安孝夫此前已经猜测此地或为龟兹，但没有论证，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292頁。

[85]参见佐藤長『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東洋史研究会、1958、347-348頁；Ch.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50; B.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Wien, 2009, p.96；朱丽双《〈于阗国授记〉译注（下）》，第126～127页。

[86]C.Bosworth et al.,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vol.4, Leiden: Brill, 1991, p.785.

[87]法文本原作“它是位于呼罗珊和中国间的一个王国〔的都城〕”，参见Mas‘ūdī, Les Prairies d’Or, Tome 1, p.119。法文本译者补出“都城”之意。英文本作“他们在呼罗珊和中国间形成一个帝国”，参见A.Sprenger, tr., El-Ma‘ūdī’s Historical Encyclopaedia entitled “Meadows of Gold and Mines of Gems”, p.311。

[88]本书汉译以德梅纳尔（B.de Meynard）与德库尔代耶（P.de Courteille）翻译、佩拉（C.Pellat）校订的法文本（Mas‘ūdī, Les Prairies d’Or, Tome 1, B.de Meynard et P.de Courteille, tr., C.Pellat, re., 1962, p.119）为基础，并参考斯普兰格（A.Sprenger）早先翻译的英译本（A.Sprenger, tr., El-Ma‘ūdī’s Historical Encyclopaedia entitled “Meadows of Gold and Mines of Gems”, vol.1, London, 1841, p.311）。本书汉译与耿昇汉译本相应译文有所不同，参见〔古阿拉伯〕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159页。

[89]A.Sprenger, tr., El-Ma’ūdī’s Historical Encyclopaedia entitled “Meadows of Gold and Mines of Gems”, p.311.

[90]Mas‘ūdī, Les Prairies d’Or, p.119.

[91]羽田亨「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摩尼教徒祈願文の斷簡」桑原博士還曆記念祝賀會編纂『東洋史論叢：桑原博士還曆記念』弘文堂書房、1931、1357-1359頁；此据氏著『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同朋社、1958、343-344頁。

[92]参见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321-343頁；（汉译本）《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234～249页。

[93]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115～118页。

[94]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London, 1937; 2nd ed.: London, 1970, pp.94-95.

[95]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265.

[96]参见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p.271-277; 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p.115-153；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132～139页。

[97]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137页。

[98]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98.

[99]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p.292-293.

[100]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98.

[101]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98.

[102]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85.

[103]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138～140页。

[104]写本图版见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1251884149;recnum=383;index=1。

[105]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第1页。

[106]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第4～7页。

[107]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第5页。

[108]参见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第328页。

[109]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第332～333页。

[110]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第334页。

[111]《宋史》卷四九〇，第14112页。

[112]W.B.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9, 1938（3）, p.568.

[113]此木柱文书最早由缪勒（F.W.K.Müller）在1915年刊布，但只给出了文书的转写和要注，参见F.W.K.Müller, 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3, 1915, Berlin, 附录一。木柱在“二战”间不知去向，此后学界仅能依靠缪勒的转写有限度地利用该材料。1991年森安孝夫在柏林访问研究期间在亚洲艺术博物馆库房重新找到木柱实物，据此对文字进行转写，并给出了全面的翻译和注释。本书引用自森安孝夫的最新研究，参见T.Moriyasu,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p.186；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694-695頁。

[114]T.Moriyasu,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p.152.

[115]F.W.K.Müller, 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pp.1-38.

[116]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391頁；（汉泽本）《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283页。按：译文有误，第14行应作“东北”而非“西南”。

[117]山田信夫「トルキスタンの成立」山田信夫『北アジア遊牧民族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201頁；T.Moriyasu,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p.192。

[118]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279.

[119]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p.139-140.

[120]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2, ed.and trans.by R.Dankoff,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217.

第三章 回鹘不是“突厥”

——回鹘文献中的“突厥”与回鹘的族群认同

大量文字资料显示，回鹘人本族语言是古突厥语的一种方言。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属于西州回鹘时代的回鹘文献显示，回鹘人不但称其本族语言为“回鹘语”（uyγurča或uyγur tili），有时也称其为“突厥语”（türk tili或türkčä）。另外，大约与西州回鹘同时代的中亚突厥穆斯林各部已经形成共同的“突厥”认同，自认为突厥人，也将回鹘等操突厥语的非穆斯林部族看作突厥人。那么，西州回鹘人自认是突厥人吗？他们对待“突厥”和“突厥认同”的态度如何？他们为何将本族语言称为“突厥语”？本章将梳理回鹘人的族群认同，论说回鹘文献中出现的“突厥”一词及其含义，尝试回应上述问题。

回鹘的自称

在传世汉文文献中，回鹘曾先后被记作“袁纥”“韦纥”“回纥”等，皆系其本民族自称“uyγur”不同形式的汉文转写。在4世纪末叶，“袁纥”（EMC：*wuan ɣət[1]）作为漠北高车部落联盟之一部出现在北魏时代的汉文记载中[2]。到隋代，袁纥在汉文文献中被记为“韦纥”（EMC wuj ɣət；LMC yj xɦət）。到唐代，其在汉文文献中被记作“回纥”（EMC ɣwəj ɣət；LMC xɦəj xɦət）。这次改称可能与隋朝大业年间回纥等铁勒诸部反叛突厥独立有关。《新唐书回鹘传》记：“大业中，处罗可汗攻胁铁勒部，裒责其财，既又恐其怨，则集渠豪数百悉坑之，韦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自为俟斤，称回纥”[3]。岑仲勉先生业已指出，韦纥等部称俟斤之事早在其叛突厥前，《新唐书》的叙述改变了旧史之真意[4]。但《新唐书》作者将其部“称回纥”之事与此关联，值得注意。岑先生认为，汉地史家不知韦纥、回纥等皆系uyγur之音译，误以为其改号[5]。此说难以信从。更可能的情况是，韦纥在反叛突厥独立后，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并选择了“回纥”作为其汉文语境下的名称，才有“称回纥”之说，于是此后的汉文文献不再用“韦纥”而统一用“回纥”。此事还可从后来回纥改称“回鹘”之事得到印证。

公元8世纪中叶，回纥取代突厥，在蒙古高原建立起强大的汗国，成为威服草原诸部的霸主。唐贞元四年（788）或五年，回纥上表唐朝，请求改名“回纥”为“回鹘”，获得唐朝的许可[6]。从此，“回鹘”成为该民族在汉文语境中的正式称呼。840年，回鹘汗国在天灾、内乱和外敌入侵下土崩瓦解，引发回鹘部众西迁。进入东部天山地区的回鹘部众历经内部政治发展和重组，在9世纪下半叶逐渐统一在以西州和北庭为中心的西州回鹘政权之下。除了其本民族语文回鹘语文之外，汉文也是西州回鹘王朝的官方文字之一。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些属于西州回鹘时代的官文书上钤有回鹘贵族、高官的印章，均以汉文篆写。西州回鹘宰相使用的一种印文作：“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7]，显示了西州回鹘政权的正式称谓为“大福大回鹘国”。可知，西州回鹘人在汉文语境中的自称仍是“回鹘”。

回鹘人对于其族群-政治体的突厥语自称是“十姓回鹘”（On Uyγur），最早见于漠北回鹘汗国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的纪功碑《希乃乌苏碑》[8]。而在9世纪以后的回鹘文献中则大量出现这种自称，包括对其政权的自称“十姓回鹘国”（On Uyγur Eli）。12世纪，西州回鹘受到西辽的羁縻统治，部分地失去了独立地位。13世纪初，西州回鹘归附蒙古，被纳入蒙古汗国的版图。但直到13世纪以后，回鹘人对其族群-政治体的自称仍是十姓回鹘。德藏U 1864号背面所抄写的回鹘文头韵赞美诗第九行就出现onlar uyγur eli“十姓回鹘国”字样[9]。据文书第11行使用蒙古语借词boγta“神圣的”等特点，可以判断文字写成于蒙元时代[10]。

漠北回鹘汗国的统治基础除了其核心的十姓回鹘部落外，还包括九姓铁勒诸部，即古突厥语碑铭中所见的Toquz Oγuz（九姓）。《希乃乌苏碑》的相关记载体现了这点。该碑北面第5行有：toquz oγuz bodunïmïn terü quvratï altïm “我把我的九姓乌古斯人民集合起来”[11]。而这种部落政治体的自称反映在汉文语境中则是“九姓回鹘”，如《九姓回鹘可汗碑》上所书；它实际表达“以回鹘为首的九姓”之意。因此，9世纪以后的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在指称统一九姓铁勒诸部的回鹘汗国及其后继的西州回鹘王朝时，多称其为“托古兹古思”（Tuġuzuġuz、Ṭuġuzuġuz ＜ Toquz Oγuz“九姓”）[12]。

漠北时代的回鹘与“突厥”

9世纪中叶以前，回鹘是九姓铁勒一部，铁勒诸部长期役属于突厥汗国。根据属于第二突厥汗国时代的碑铭材料，突厥人并不将九姓铁勒视为“突厥”（Türk）。这时的“突厥”一词，明显是一个狭义的部族-政治集团概念，只指先后建立第一、第二突厥汗国的核心部族——蓝突厥（Kök Türk）[13]。《毗伽可汗碑》东面第29～31行写道：to（quz oγ）uz mäniŋ bodunum ärti.täŋri yer bulγaqïn üčün ödiŋä küni tägtük üčün yaγï boltï.bir yïlqa tört yolï süŋüšdüm.äŋ ilki toγu balïqda süŋüšdüm.toγla ügüzüg yüzäti käčip süsi…äkinti antarγuda süŋüšdüm.süsin sančďïm…üčünč čuš bašïnda süŋüšdüm.türk bodun adaq qamšattï.yablaq boltačï ärti…“九姓（toquz oγuz）〔铁勒〕本是我的人民。由于天地混乱，由于心怀嫉妒，成了〔我们的〕敌人。一年中我们打了四次仗。初战于都护城，我军泅过土拉河，〔消灭〕其军。第二次我们战于antarγu。我败其军。第三次，我战于čuš泉，突厥人民（türk bodun）动摇了，情况不妙……”[14]此处清楚可见，“九姓铁勒”和“突厥人民”是相对立的两个不同群体。

在突厥汗国时代，不但回鹘等铁勒诸部不是突厥，甚至与蓝突厥渊源颇深的西突厥诸部也在自立之后，被排除在“突厥”这一概念之外。这反映“突厥”这一概念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源出西突厥十箭部落（On Oq）的突骑施在8世纪初逐渐强盛，统一十箭部落，制霸金山以西草原地带，与蒙古高原的突厥汗国分庭抗礼。《毗伽可汗碑》东面第16行记有：türgiš qaγan türkim bodunïm ärti.bilmädükin üčün biziŋä yaŋïl（d）uqïn yazïntuqïn üčün qaγanï ölti.buyruqï bägläri yämä ölti.on oq bodun ämgäk körti“突骑施可汗曾是我的突厥人、我的人民。由于他们无知，由于他们对我们做了错事，其可汗死了，其梅录、其官员也死了。十箭百姓受到了痛苦”[15]。可见，突厥人称以突骑施为首的西突厥诸部为on oq“十箭”，在突骑施自立可汗以后，便不再是突厥。《暾欲谷碑》第一石东面第4～5行作：…türgiš qaγan anča tämiš.bäniŋ bodunum anta ärür tämiš.türk bodun yämä bulγanč ol tämiš.oγuzï yämä tarqanč ol tämiš“突骑施可汗这样说道：‘我的人民到那里时，突厥人民将乱，他们（治下）的乌古斯也涣散’”[16]。这则材料似乎可以反映，突骑施等部也将自己与“突厥”划清了界线。

从回鹘的角度看，他们的自我认同属于九姓铁勒系统，而与突厥截然不同。前引《希乃乌苏碑》北面第5行记：toquz oγuz bodunïmïn terü quvratï altïm “我把我的九姓乌古斯人民集合起来”。而“突厥”则只指蓝突厥部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突厥汗国。同碑北面第10行记回鹘攻灭突厥汗国之事作：türük bodun anta ïnγaru yoq boltï“突厥人民（türük bodun）从此以后消亡了”[17]。与《希乃乌苏碑》一样，《塔利亚特

碑》也是漠北回鹘汗国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的纪功碑。该碑东面第5行以第一人称口吻记磨延啜在28岁时攻灭突厥汗国之事，作：säkiz otuz yašïma yïlan yïlqa türük elin anta bulγadïm anta artatdïm“在我28岁，在蛇年，我搅乱了突厥国（türük eli），攻破了突厥国”[18]。

回鹘文献中的“突厥”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引发了游牧诸部的迁徙和重新分布。东部天山地区开始全面回鹘化，七河地区也吸收了更多来自东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因素。9世纪中叶起，中亚地区操突厥语各部开始大批改宗伊斯兰教，随后建立起第一个突厥伊斯兰政权——喀喇汗王朝。与此同时，以“突厥”认同为中心的族群-文化共同体也在中亚操突厥语各部间形成，最早的例证见于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在突厥穆斯林眼中，罗马以东、波斯-阿拉伯以北，包括中亚、北亚在内的内陆欧亚广大地域，都是突厥人的土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操突厥语的部族以及一些本不操突厥语的部族都被认为是“突厥”的后代，而“突厥”则是诺亚的第三子之后[19]。这种共同起源的观念中明显可见伊斯兰教的影响。另外，突厥统治者的世系被追溯到阿夫拉西亚甫（Afrāsiyāb）[20]，即波斯史诗《列王记》所记土兰人的最高领袖。这应是中亚操突厥语诸部在伊斯兰化过程中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将波斯文化系统内与伊兰文明对立的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土兰文明植入自身的文化谱系中。在当时中亚突厥人的眼中，从靠近拜占庭的佩切涅格人到东方的回鹘人，所有操突厥语的部族都是突厥人。此外，突厥化的部族或通突厥语的部族也被目为突厥人，譬如已经突厥化了的粟特人、阿尔胡人，长期与突厥语族密切接触的鞑靼人、拔悉密人等等[21]。甚至党项、契丹和摩秦（桃花石）人都被列为突厥人，原因或许是他们都通突厥语[22]。可见，能使用突厥语应是当时中亚突厥人的“突厥”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在众多突厥语方言中，回鹘语则被目为纯正的突厥语[23]。

上述突厥认同的出现还可在出土文书中获得佐证。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回鹘文书MIK III 198号为摩尼教《二宗经》抄经、读经题记。据原编号T II D 171知，其为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时于高昌故城攫得。文书内容显示，其抄经题记部分并非在高昌写成，而是在七河地区写成。背面右栏第24～26行作：ymä ögütmiš alqatmïš čärig türk uluš arγu talas kögüz ičintä“又，在受福佑的、常胜的突厥人的国家（türk uluš）阿尔胡和怛逻斯的中心”[24]。阿尔胡是阿尔胡部的驻地，而怛逻斯则是炽俟（Čigil）、独西（Tuxsi）和粟特人的所在地。而文书将这两地目为“突厥人的国家”内，显然与上述《突厥语大词典》所记中亚突厥穆斯林的突厥认同相符。

到11世纪，中亚突厥诸部全面伊斯兰化；而东部天山地区的回鹘人也弃摩尼教而改尊佛教为国教[25]。如前章所述，西州回鹘是喀喇汗王朝在中亚东部的主要竞争对手，双方曾在今乌什、库车一带展开长期激烈的争夺。从回鹘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的记载看，回鹘人以兀单卜古为始祖的族群起源传说也与当时中亚突厥穆斯林的族群起源传说并不相干[26]。有趣的是，在西州回鹘的文献中，我们也看到了“突厥”一词超越狭

义部族集团的泛指意味。这集中体现在回鹘人对其本族语言的指称上。

回鹘文献显示，回鹘人不但称其本族语言为回鹘语（uyγur tili或uyγurča），有时还称其为突厥语（türk tili或türkčä）。在多种回鹘佛教译经题记中可见译经的语言径被称为“突厥语”。有些佛经的译者并非回鹘人，他们可能就称回鹘语为突厥语。而另一些译经的译者则可以确定就是回鹘人。著名的回鹘文《慈恩传》约在10世纪末由出身西州回鹘都城北庭的胜光阇梨都统署名译成。现存抄本留有抄经题记，明确写道：tavγač tilintin yana beš balïqlïγ šïŋqo šäli tutuŋ yaŋïrtï türk tilinčä ävirmiš…“别失八里的胜光阇梨都统从汉语又重新译成突厥语的……”[27]这则材料说明，回鹘人本身确曾称其语言为突厥语。而在另一些文献中，还有“突厥回鹘语”（türk uyγur tili）这种指称。显然，回鹘人深知回鹘语与同时期其他突厥语的密切关系，而且他们也认可这一类语言的统称是“突厥语”，承认自己的语言属于“突厥语”。

那么他们是否也有着与同期中亚突厥穆斯林相同的突厥文化认同呢？

答案是否定的。

《慈恩传》第五卷记玄奘归国途中经过呬摩怛逻国，见到当地风俗类似突厥，原文作：“至呬摩怛逻国，亦覩货罗故地。风俗大同突厥……”[28]。回鹘文译本对应的译文作：xaimatare balïqqa tägdi: o[l] balïq y（e）mä toxrïlarnïŋ söki yeri tetir：törüsi toq[u]sï barča türk birlä bir ärip…“他到了呬摩怛逻国。据说此城也是覩货罗的故地。其习俗全部和突厥是一样的……”[29] 译文正是以türk对译汉文“突厥”。可知，到11世纪时回鹘人仍明确知道türk一词的原本含义——历史上的突厥部。

回鹘文译本第六卷则以türk对译汉文“突厥”以外的概念。雅森·吾守尔曾据俄国学者土谷舍娃的刊本，摘出相关段落译成汉文，对勘汉文本相关内容[30]，提出回鹘本译者以“游牧的突厥人”（türk yučul bodun）专门对译汉文名词“匈奴”[31]。德国学者茨默（P.Zieme）撰文回应了雅森的观点[32]。他指出，正在雅森所引的段落中，回鹘译者还分别用türk对译汉文“俗”、用türk yučul bodun对译“高丽”[33]。他还征引其他文献，准确指出回鹘译者实际是以türk翻译汉文“化外夷狄”的概念[34]。

而在另一种回鹘文佛教文献《弥勒会见记》中还使用骈词türk türgiš“突厥突骑施”来表达“化外夷狄”之意。哈密本保留有第一品开头部分多闻天王的三员大将雪山、七岳和圆满的谈话。雪山提起弥勒菩萨，圆满竟不识得。七岳于是说道：“由于我们这位兄弟来自东北蛮荒之地，请详细向他解释弥勒菩萨的善德”（bu biz-iŋ inimiz türk türgiš ulušta balïqta ut（a）rap-[urw] yïŋaq（aq）tïn yorïr üčün ayaγqa [tägim]lig maître bodiswtnïŋ ädgüsin… [ä]d[rä]m[in] anïn amtï muŋar kiŋürü ayu kiŋ[ürü ayu b[iri]ŋ]）[35]。ut（a）rap[urw]被还原作梵文

uttaraprva“东北”[36]。突骑施曾在8世纪上半叶统一西突厥十箭部落之地，也是回鹘汗国之前称雄草原地区的重要势力。到西州回鹘时代，突骑施汗国早已消失[37]。显然，这也是以历史上的部族突厥、突骑施来表达“化外夷狄”之意。回鹘文献有同义反复和压头韵的特点，türgiš与türk共同出现，也满足文句修辞和韵律上的要求。在回鹘文《慈恩传》第五卷也有对骈词türk türgiš类似的用法[38]。

综上，türk一词在西州回鹘时代的文献中带有明显的贬义。如果回鹘人与中亚的突厥穆斯林一样有着“突厥”文化认同，很难想象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如此使用突厥一词。

除了用以指称历史上的突厥部和表达“化外夷狄”的引申含义外，“türk”（突厥）一词在回鹘文献中还有现实所指。

德藏回鹘文书U 5968、U 5971号可缀合成一件卖奴契约。契约第6～7行有：taš q（a）ra atlïγ türk q（a）ra-bašïmïn an tiräk-kä tutuzu berdim“我已将我的名为达石喀剌的突厥奴隶交出托付给安地略”[39]。文书字体为半草体，将其年代定在9～12世纪西州回鹘王朝时代[40]。türk在古突厥语中除表示部族名称外，还有“力量”之意。在回鹘文献中，türk表“力量”时，大都与ärk（“力量”）连用，作其骈词（ärk türk）；偶尔与küč（力量）连用，作其骈词（küč türk）。此外，türk还有“青壮年”之意，但只在与 yigit作骈词使用时表此意。türk表示“力量”时，只是名词，如要起修饰作用，须以其形容词形式türklüg出现。而türklüg也几乎总与ärk 的形容词派生形式ärklig配对使用，表 “有力量的”。其形容词的否定形式则是türksüz，亦与ärksiz构成骈词使用。因此，上引文书中的türk不是“有力量的”或“青壮年”之意，而应是“突厥”之意。在回鹘文有关奴隶的契约文书中，并不需要标明奴隶的族属，这里专门标明达石喀剌的“突厥”族属，可能是为说明其非回鹘人的出身。可与此例相参照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Y828号回鹘文解放奴隶文书。文书第7～9行写此奴隶的来历作：qočo-taqï atay tutuŋ-nuŋ pintuŋ atlïγ qïrq yašlïγ qïtay oγlan-ïn nom bitig bilir üčün toquz yastuq čao berip yulup altïm“因其能读经，我付九锭钞买来高昌的阿台都统的名作斌通的四十岁契丹男奴”[41]。这位叫斌通的男奴因其出身汉人（契丹），而被专门标出族属。

在西州回鹘时代，突厥汗国的核心部族早已成为历史。前述那位名叫达石喀剌的“突厥”奴隶应该出身于当时被回鹘人称为“突厥”的群体。789年，漠北回鹘与吐蕃在北庭一带交战时，当地有沙陀突厥、白服突厥等冠有“突厥”名号的部族。据北宋使者王延德的报告，在10世纪末叶西州回鹘所统部族中有“南突厥”“北突厥”[42]。达石喀剌可能出身于这些名称中带有“突厥”的部族。当然，他更可能就来自自认为突厥的喀喇汗王朝治下的突厥穆斯林某部落。总之，“突厥”在回鹘文的现实所指，是当时不同于回鹘的某些操突厥语的部族。

对“突厥”的贬低和对“突厥语”的接受：渊源初探

综上可知，在西州回鹘时代，回鹘人并不以“突厥”自称。在其文学作品中，“突厥”一词反而有贬低之意。同时，他们又清楚自己与中亚的突厥各部在语言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也使用“突厥”作为操突厥各部的泛称，譬如称本族语言为“突厥语”。

1.为何回鹘没有形成“突厥”认同？

（1）有关突厥的历史记忆

回鹘人对“突厥”认同的拒斥和对突厥的贬低，可以从历史记忆和当时的中亚格局两方面寻求解释。突厥汗国称霸草原之时，包括回鹘在内的九姓铁勒部皆受突厥役使。在这期间，回鹘与诸姓铁勒屡次反抗突厥统治，与突厥作战。相关战事在汉文史料和突厥碑铭中多有记载。8世纪中叶，正是回鹘攻杀突厥白眉可汗，消灭第二突厥汗国的势力，并取代突厥成为草原霸主。回鹘对于击败突厥、代之成为草原霸主的历史记忆在不同时代的史料中皆有迹可循。前引漠北回鹘汗国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的纪功碑《希乃乌苏碑》和《塔利亚特碑》多次提及相关史事。立于9世纪20年代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第4、5行记有：“〔阿〕史那革命，数岁之间，复得我旧国。于时，九姓回鹘、卌姓拔悉密、三姓〔葛禄〕、诸异姓佥曰：前代中兴可汗并是……至高祖阙毗伽可汗……”[43]原文显然记载了回鹘汗国开国可汗阙毗伽可汗（即怀仁可汗骨力裴罗）以前回鹘等部族反抗突厥汗国统治之事。

同碑第6行起记回鹘汗国第三代可汗牟羽可汗事迹，主要涉及其出兵助唐朝攻灭史朝义叛军与改宗摩尼教二事。碑文第6～8行记：“……帝蒙尘，史思明〔之子朝义〕……使币重言甘，乞师并力，欲灭唐社。可汗忿彼孤恩,窃弄神器。亲统骁雄，与王师犄角，合势齐驱，克复京洛。皇帝……为兄弟之邦,永为〔甥舅之国〕。可汗乃顿军东都，因观风〔俗〕。……〔法〕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44]正是在牟羽可汗出兵助唐朝攻灭史朝义势力、收复洛阳之际，他在洛阳遇到摩尼教僧侣，皈依摩尼教，并将摩尼教引入漠北回鹘汗国，尊为国教。早在磨延啜可汗在位时，回鹘就曾出兵助唐朝对阵安史叛军。但碑文对此只字未提，只记牟羽可汗发兵之事。盖因此事与摩尼教开教有密切关联，才被大书特书，因此成为牟羽可汗的代表事迹，在回鹘人的历史叙事中与摩尼教开教史构成一个整体[45]。已有学者指出，回鹘在安

史之乱出兵助唐的根本原因是为防止安史叛军中的突厥力量趁乱重新崛起[46]。如果此说不差的话，则知回鹘与突厥的对抗延续到8世纪中叶，而相关历史记忆则在立于9世纪的《九姓回鹘可汗碑》中仍有反映。直到11世纪以前，回鹘统治者一直尊奉摩尼教为国教。牟羽可汗改宗之事在回鹘摩尼教史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现存有限的回鹘摩尼教历史文献残片大都与牟羽可汗有关。作为该事件的背景，回鹘出兵助唐朝攻灭史朝义之事应当也一直流传。最可能的证据是德藏回鹘文残片Mainz 345。依据《九姓回鹘可汗碑》等相关材料对文书残片提供了较为合理地复原方案，将文书内容解释为牟羽可汗应唐朝之邀欲出兵进攻安史叛军之事[47]。回鹘与突厥竞争的历史记忆甚至可能一直延续到蒙元时代。元人欧阳玄所撰《高昌偰氏家传》记：“偰氏，伟兀人也，其先世曰暾欲谷，本中国人。隋乱，突厥入中国，人多归之。突厥部以女婆匐妻默棘速可汗为可敦，乃与谋其国政。唐史突厥传载其事甚详。默棘速卒，国乱，婆匐可敦率众归唐，唐封为冑国夫人，而默棘速故地尽为回纥所有，暾欲谷子孙遂相回纥。”[48]当然，偰氏迁入中原以后，也有可能利用汉籍所记之事伪造其家世来源。

在回鹘文献中还可见以其他部族之名表贬低之意，也可归因于回鹘对该部族作为死敌的历史记忆。《慈恩传》第6卷有“单于引弓之人俱充臣妾”，在回鹘本中被译作qïrqïz ya miŋülüg kišilär yumqï ič ičräki boltïlar“黠戛斯和骑马引弓之人全体内属”，其中qïrqïz（黠戛斯）对译汉文“单于”[49]。汉文原文的语境为玄奘赞颂唐太宗威服北狄之武功，“单于引弓之人”显然是引汉朝故事，以匈奴代指北方草原民族，含有贬义。840年，黠戛斯趁回鹘天灾人祸之际，进军直捣回鹘牙帐，攻灭漠北回鹘汗国，迫使其余部西迁。此处回鹘译者以黠戛斯对译汉文“单于”，显然源于其作为回鹘人死敌的历史记忆，包含仇视贬低之意。汉文本同卷还有“东逾日城，西迈昆丘，南尽炎州，北穷玄塞”字样，回鹘本译作：öŋdün kün tuγsuqd[un] ulušlardïn ärtmiš ärür kedin kün batsïqqatägi tägmiš t[etir] küntün töpütüg tüzgärip[50] t[aγ]dïn qïrqïzïγ tüpgärip“在东边越过了日出（之地）的诸国，在西边直到日落（之地），在南边踏遍吐蕃（之地），在北边穷尽黠戛斯（之地）”[51]。回鹘文译文将表示南、北边鄙之地的“炎州”和“玄塞”分别用töpüt（吐蕃）和qïrqïz（黠戛斯）对译。从相对地理位置看，吐蕃在西州回鹘的南方，而黠戛斯约在其北方。而从历史上看，漠北回鹘汗国曾与吐蕃帝国在东部天山地区长期激战，并最终从其手中夺下北庭、西州等重要城镇。与黠戛斯、突厥一样，吐蕃也是回鹘历史发展关键时期的重要敌手。由此可见，回鹘人确实常在文学作品中以其历史上敌对民族之名表达贬义。

（2）与中亚突厥穆斯林的激烈竞争

除了因历史记忆而对突厥常怀仇恨之外，西州回鹘与自视为“突厥”后裔的中亚突厥穆斯林在现实中也处于竞争状态。11世纪正是双方争斗最为激烈的时期，从20年代到70年代，西州回鹘逐渐在竞争中陷入

守势，其西部边疆逐渐从今阿克苏退到库车，再退到焉耆。《突厥语大词典》“城”（känd）词条下记有一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双方战事之惨烈，作：kälginläyü aqtïmïz/kändlär üzä čïqtïmïz/furxan äwin yïqtïmïz/burxan üzä sïčtïmïz“我们如潮水般涌入，在各城上出现。我们拆毁佛寺，在佛头堆粪”。作者随后解说道：“此事描述他们突袭回鹘之事。当穆斯林攻占异教徒的领土后，会在他们偶像的头上屙屎以羞辱之。此为惯例”[52]。“战徽（bkäm）”词条下记另一首歌谣：bkäm urup atlaqa/uyγurdaqï tatlaqa/oγrï yavuz ïtlaqa/qušlar kepi učtïmïz“将战徽缚于马上，向着回鹘的异族、向着这群恶狗贼，我们像鸟一样飞扑”[53]。可知当时突厥穆斯林与回鹘之间战斗激烈，双方仇恨极深。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回鹘一方，一定会抵制中亚突厥穆斯林的文化影响。回鹘人到元代时已经层累地制造出起源于蒙古高原的兀单卜古可汗传说。有迹象表明，在西州回鹘时代，其族群起源传说的源头可能追溯到印度的佛教世界，完全异于中亚突厥穆斯林的伊斯兰、波斯传统。可与回鹘相类比的是内陆欧亚西端的可萨人。可萨人以旧约为圣经，尊犹太教为国教，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突厥语族的文化体系。而可萨人在指称与其临近的古思部时，就称其为“突厥”[54]。

2.接受“突厥”作为操突厥语各部统称的原因

普遍认为，以“突厥”作为操突厥语各部统称肇始于中亚突厥各部伊斯兰化之时，因为阿拉伯、波斯人以“突厥”之名指称游牧的突厥语族各部，“突厥”渐成为接受了阿拉伯、波斯文化浸染的突厥各部的自称。从上文谈及的11世纪前后中亚突厥穆斯林的文化观念看，这种观点尚能自圆。但从回鹘人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则难以成立。如前所述，回鹘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对“突厥”有所排斥，而且他们并未受阿拉伯、波斯文化浸染。那么，当他们指称突厥语族各部所具有的共性特征，譬如语言时，为何采用“突厥”作为统称呢？

不论是回鹘人还是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操突厥语各部，他们都深受粟特人影响。公元6世纪，突厥人建立起覆盖内陆欧亚的庞大帝国，开始与粟特人发生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突厥-粟特共同体（Turco-Sogdian Milieux）。粟特人与突厥及包括回鹘在内的突厥语族诸部在文化上的涵化关系从6世纪一直持续到10～11世纪[55]。粟特人对突厥语族总体的认识无疑影响着突厥语族各部的自我认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一件麹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女奴买卖文书记高昌国延寿十六年（639），粟特商人在高昌集市以120德拉克马购买一名生于“突厥斯坦”（twrkstn）的女奴[56]。这里的“突厥斯坦”被比定为锡尔河以北直到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57]。在7世纪上半叶，粟特人已经将突厥汗国控制下的内亚广大区域称为“突厥斯坦”，意指“突厥人之地”。而对于突厥汗国治下的操突厥语的各部族，粟特人或因其语言、文化的相似性而视其为同种。粟特语xwn一词原指匈奴，最早见于写于4世纪的古信札中。但在7世纪末8世纪

初，居住在河中粟特本土的粟特人以其指称突厥语族。在利夫希茨（V.Livshits）刊布的穆格山文书中，编号B-17者为片治肯特王Dwāšt发给哈赫萨尔（Khakhsar）统治者Afshn信件，第10行起记有："我们的使者到了，带来了可汗的高官。许多军队，匈奴（xwn）与秦人（cyn），也已经到达"[58]。利夫希茨已指出，文书中的"匈奴"就指突厥[59]，而"可汗"则指可能指东突厥或突骑施可汗[60]。当时河中的粟特人清楚知道突厥、突骑施等部族的自称无疑。在中亚和我国新疆皆有出土的突骑施汗国钱币上正是以粟特文刻有y twrkyš n"莫贺突骑施可汗"字样[61]。突厥、回鹘等草原政权均将粟特文作为官方文字（之一），因为他们多任用粟特人执掌书记事务；同时，突厥语族游牧政权的商贸活动也由粟特人操办。因此，突骑施汗国治下中亚流通粟特文钱币很好理解。立于蒙古高原的《布古特碑》属6世纪末第一突厥汗国遗物，碑文以粟特文写就，其中有粟特文"突厥"（tr'wkt）字样。在粟特人清楚地知道突厥语族各部自称的情况下，他们在内部交流时仍采用"匈奴"指称突厥语族，这无疑是将突厥语族各部同质化看待的表现。

唐代名将哥舒翰父系出自西突厥十箭部落的哥舒部，其母为于阗王女。安禄山之父为康姓粟特人，其母为突厥阿史德氏。《安禄山事迹》记二人对话道："〔安禄山〕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乎？'"[62]学者业已利用这条材料证明，当时粟特人将粟特、于阗等操伊朗语的民族皆目为胡[63]。而这条材料同时也表明，粟特人将西突厥十箭部落、东突厥等都目为突厥，而胡与突厥的对立正是突厥-粟特共同体内部的二元对立。在回鹘文献中，我们也找到粟特人将"突厥"作为突厥语族统称的痕迹。德藏回鹘文书U 73、U 72《牟羽可汗入教记》保留了8世纪中叶回鹘牟羽可汗改宗摩尼教的历史记录，以摩尼教僧侣与牟羽可汗对话的形式展开。文书由邦、葛玛丽刊布，其中U 73正面第8～11行记有摩尼教僧对牟羽可汗的话，作[64]：t（ä）ŋrim siz törüsüzün ödsüzkä k（ä）ntü [ätözüŋüz] yaz（ï）ns（a）r siz: ötrü qam（a）γ eliŋiz bulγanγ[ay]////bu qam（a）γ türk bodun t（ä）ŋrikä nom[qa yazuq] qïltačï bol[γay]lar "陛下！如果您自己以无法的方式对神不敬，您整个国家就会乱……全体突厥民众[65]就会对神、对教法行亵渎之事"。文书内容是从摩尼教徒的视角记录摩尼僧引牟羽可汗入教之事。刊布者邦、葛玛丽最早指出文书内容或非原创，应是译自粟特语或汉语[66]。阿西木森（J.Asmussen）指出文书中有用粟特语词语而不取突厥语词语之处（如"罪"用粟特语γ'wn而不取突厥语yazuq），从语文学角度论证了原文语言应为粟特语[67]。文书中"全体突厥民众"所指无疑是牟羽可汗治下回鹘汗国的回鹘、诸姓铁勒以及其他部族。如前所述，回鹘人不会以突厥自称，在指称回鹘部众时用uyγur bodun；在指称其治下包括回鹘在内的铁勒诸部时，则采用toquz oγuz bodun。文书中的用词应当是直接译自粟特语，反映了粟特人将回鹘及其统属的突厥语族部落视为文化同质的群体，按"突厥"一概称之。

由于现存粟特语历史文献极度匮乏，我们尚未见到粟特语语境下粟特人称回鹘为突厥的确凿证据。但上述例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粟

特人确以“突厥”来指称包括回鹘在内的突厥语族各部。粟特人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对回鹘和中亚突厥各部的影响之深远毋庸费词。粟特人对于突厥语族的认识无疑也会投射到回鹘人的观念中，回鹘人将“突厥”作为突厥语族各部的统称想必正是来自粟特的影响。因此，虽然在政治上刻意与突厥认同保持距离，但在回鹘文献中，我们仍能看到以“突厥语”或“突厥回鹘语”指称本族语言的现象。这种文化影响绝非孤例。荣新江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在摩尼教东方教区从吐火罗斯坦迁至东部天山地区以后，迁入当地的粟特摩尼教徒逐渐用“吐火罗斯坦”（twgryt’n）或“吐火罗”（twγr）来指称当地。回鹘人受其影响并接受此观念，在回鹘语中也用“吐火罗斯坦”（Toxrïstan）或“吐火罗”（Toxrï）指称东部天山地区[68]。

小结

回鹘在语言、文化上与突厥及其他操突厥语的部族有着紧密的关系。回鹘人在族群-政治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回鹘-九姓铁勒认同。10世纪，中亚操突厥语各部开始伊斯兰化，以“突厥”作为共同祖先和身份标志的文化认同在突厥穆斯林中逐渐形成。但回鹘人没有形成这种“突厥认同”，反而因为历史记忆和现实政治、宗教因素，对于突厥带有敌意。但他们无疑很清楚，在外界看来，其与突厥以及突厥语族诸部之间的同远大于异；而用以表达这种共性的词语，正是“突厥”。不论在回鹘还是突厥伊斯兰世界，以“突厥”作为操突厥语各部的统称的行为可能都源自粟特人的影响。

[1]本书所见中古汉语音的重构依据蒲立本的研究，参见E.G.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BC Press, 1991。

[2]《魏书·太祖纪》记：北魏道武帝登国五年（390），“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魏书》卷二，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7，第22页。回鹘作为一个族群政治体以“袁纥”之名首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

[3]《新唐书》卷二一七，第6111页。

[4]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第715～716页。

[5]岑仲勉：《突厥集史》，第716页。

[6]回纥改名回鹘一事在多种传世汉文史料中有记载，但分别被系在贞元四年（788）、五年（789）和元和四年（809）。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的两方墓志——《石解墓志》和《回鹘噶啜王子墓志》的记载排除了元和四年的可能，很可能在贞元四年回纥人上表唐朝要求改名回鹘。详细讨论参见杨富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第79页。

[7]此种印文最早见于黄文弼先生所获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参见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第498页。后来学者又陆续在四件回鹘文书上发现此种朱印，参见松井太「西ウイグル時代の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書をめぐって」『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24、35頁。

[8]北面第3行有on uyγur toquz oγuz üzä yüz yïl“在十姓回鹘及九姓乌古斯（九姓铁勒）之上，一百年间”。参见森安孝夫·鈴木宏節·齊藤茂雄·田村健·白玉冬「シネウス碑文訳注」『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4、2009、9頁；白玉冬：《〈希内乌苏碑〉译注》，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3，第82页。

[9]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304页。

[10]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第301页。

[11]森安孝夫·鈴木宏節·齊藤茂雄·田村健·白玉冬「シネウス碑文訳注」、10頁；白玉冬：《〈希内乌苏碑〉译注》，第83页。

[12]关于波斯、阿拉伯语史料中“托古兹古思”的具体所指，参见华涛《穆斯林文献中的托古兹古思》，第61～78页；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101～122页。

[13]1kök一词在古突厥语中指蓝天，进而指天蓝色。但与其同形的另一词kök指“根、起源”，有纯正之意。kök türk究竟意为“蓝突厥”还是“纯突厥”尚无定论，笔者权按汉语学界一般的理解译作“蓝突厥”。

[14]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60～161页。

[15]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55页。

[16]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99页。

[17]森安孝夫·鈴木宏節·齊藤茂雄·田村健·白玉冬「シネウス碑文訳注」、11頁；白玉冬：《〈希内乌苏碑〉译注》，第84页。

[18]片山章雄「タリヤト碑文」森安孝夫、オチル編『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169頁。

[19]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p.82.

[20]最明显的例子是xān“汗”词条：“他们（突厥人）最大的王。此名号授予阿夫拉西亚甫之后裔。他是合罕。关于此名号的来历说来话长”（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vol.2, p.229）。另见tärim“帖林”词条：“此号乃王子、公主或其他阿夫拉西亚甫后人的称号。此词只适用于合罕之子，余人纵高贵，亦不适用。呼公主时，说黄金帖林（altun tärim）”（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200）。

[21]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p.82-83.

[22]《突厥语大词典》记：“摩秦和秦人有自己的语言，但城国之人熟知突厥语，且与我们以突厥文字通讯”（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83）。其中“摩秦”即“桃花石”（Tawγač），指中原王朝；而“秦”指契丹（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82）。此“摩秦”（桃花石）人可能指10世纪沙陀突厥所建唐、晋、汉三朝。同书“桃花石”条即称其为“定居在这些地区的一个突厥人部落的名称”（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341）。

[23]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83.

[24]录文据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関係史料集成』『平成26年度近畿大学国際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47-48頁。

[25]参见T.Moriyasu, “Chronology of West Uighur Buddhism: Re-examination of the Dating of the Wall-paintings in Grünwedel’s Cave No.8 （New: No.18）, Bezeklik”, Aspects of Rea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Silk Road Studies 16, Turnhout: Brepols, 2008, pp.191-228。

[26]笔者曾指出回鹘人杂糅漠北回鹘和西州回鹘部分历史大事，层累地创造兀单卜古可汗始祖传说，参见付马《西州回鹘王国建立初期的对外扩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 222-0661.09号回鹘文书的历史学研究》，第151～152页；苏航讨论了一些有关卜古可汗的记载在内容上的不同及其原因，参见苏航《回鹘卜古可汗传说新

论》，《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第78～87页。

[27]此据现存抄本第九卷抄经题记，参见K.Barat, the Uugur-Turkic Biography of the Seven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t Pilgrim Xuanzang: Nineth and Tenth Chapters, Bloomington, 2000, p.158。

[28]（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116页。

[29]S.Dietz, M.Ölmez, und K.Röhrborn,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V: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Wiesbaden, 2015, p.179.

[30]雅森·吾守尔：《古代汉文文献中“匈奴”等名称的回鹘语译名》，《民族语文》2006年第1期，第15～18页。

[31]雅森·吾守尔：《古代汉文文献中“匈奴”等名称的回鹘语译名》，第19～20页。

[32]P.Zieme, “Were the Xiongnu identical with the Türk?” in: M.Ölmez et al., eds., From Ötüken to Istanbul: 1290 Years of Turkish （720-2010）, Istanbul, 2013, pp.35-51.

[33]笔者检视回鹘文本和汉文本后发现，回鹘文türk yučul bodun实际应对译汉文“高丽小蕃”四字。

[34]P.Zieme, “Were the Xiongnu identical with the Türk? ”, pp.48-51.

[35]哈密本第四叶背面1～4行，总第791～794行。转写、翻译参见Geng Shimin und H.-J.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Wiesbaden, 1998, pp.70-71；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第56页。

[36]Geng Shimin und H.-J.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p.71.

[37]张广达、荣新江先生认为10世纪汉文文献中的“独西”即波斯文《世界境域志》所记“tuxsi”，可能就是突骑施的余部，参见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第32页。

[38]P.Zieme, “Were the Xiongnu identical with the Türk? ”, p.48.

[39]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42-43頁。

[40]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箚记（その四）」『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9、1994、70-79·82·83頁。

[41]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130-131頁。

[42]《宋史》卷四九〇，第14112页。

[43]森安孝夫編『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图版1·2；林梅村、陈凌、王海城：《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第160页。

[44]森安孝夫編『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图版1·2；林梅村、陈凌、王海城：

《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第160页。

[45]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から見た安史の乱」『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7、2002；此据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28-31頁。

[46]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から見た安史の乱」、159-161頁；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广场出版社，2013，第257页。安史叛军核心以原属突厥汗国的粟特系突厥人构成，相关讨论参见森部豊『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関西大学出版社、2010、89-121頁。

[47]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から見た安史の乱」、17-28頁。

[48]陈高华编《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第75页。

[49]P.Zieme, “Were the Xiongnu identical with the Türk? ”, p.46.

[50]雅森·吾守尔、茨默皆读作tözgär-，此动词应派生自静词tüz“平”。今改为tüzgär-。

[51]参见P.Zieme, “Were the Xiongnu identical with the Türk? ”, pp.39-40。

[52]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270.

[53]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359.

[54]P.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Wiesbaden, 1992, p.205.

[55]关于“突厥-粟特共同体”参见É.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Leiden: Brill, 2005, pp.199-226。

[56]吉田丰在森安孝夫的协助下首先释读了文书全文，参见吉田豊·森安孝夫·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博物館「麴氏高昌国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隷売買文書」『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4、1989、5-8頁。林梅村对文书所记事件有不同理解，参见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第51页。根据吉田、森安二氏最新修订的读本（载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講談社、2016、234-239頁），该文书开头作：岁在高昌延寿年、神圣的大颉利发王〔治下〕的第十六年。在亥年、汉历五月即粟特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兹在高昌市集、在众人之前，张氏阿大（’wt’）之子延相，从康国人twδ’kk之子wxwšwβyrt处，以120枚高纯度的波斯德拉克马买女奴一人，姓cwwy’kk，名’wp’ch，生于突厥斯坦。

[57]吉田豊·森安孝夫·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博物館「麴氏高昌国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隷売買文書」、14-15頁。

[58]文书转写及翻译，参见V.Livshits, 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iech’e, London, 2015, pp.96-97。

[59]V.Livshits, 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iech’e, p.98；马小鹤提出，粟特人以“匈奴”指称突厥的习惯可能是受汉人影响，参见马小鹤《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第116～117页。

[60]V.Livshits, 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iech’e, p.94.

[61]蒋其祥：《新疆、甘肃等地发现的几枚突骑施钱币》，俄军主编《丝绸之路民族货币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第108～109页。

[62]（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第14页。

[63]参见荣新江《何谓胡人？——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乾陵文化研究》第4辑，2008，第3～4页。

[64]对文书的刊布、释读，参见W.Bang, und A.v.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 Manichaica, Berlin, 1929, pp.411-422。本书引自森安孝夫最新读本，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関係史料集成』、11-12頁。

[65]森安孝夫将türk bodun译作“无知的民众”，取türk之贬义，应是沿袭茨默的译法，参见P.Zieme, “Were the Xiongnu identical with the Türk? ”, p.49。笔者仍坚持学界一贯以来的译法，取其本意“突厥”，参见W.Bang und A.v.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 Manichaica, p.415; H.–J.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93, p.366; L.Clark, “The Convention of Bügü Khan to Manichaeism”, in: R.Emmerick, ed., Studia Manichaica IV, Berlin, 2000, pp.102-103。

[66]W.Bang und A.v.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 Manichaica, p.411.

[67]J.Asmussen, Xuāstvānīft: Studies in Manichaeism, Copenhagen, 1965, p.147。该文献原本的语言为粟特语这一结论基本为学界普遍接受，参见H.-J.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p.364; L.Clark, “The Convention of Bügü Khan to Manichaeism”, p.102。

[68]参见荣新江《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兼论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斯坦”》，王炳华主编《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第181～191页。

第四章 回鹘时代的北庭、西州与伊州

回鹘时代的北庭城

1.Mainz 354（T I 172）所见北庭城的损毁与重修

德藏回鹘文写本Mainz 354记载一位回鹘可汗重修都城（ordu uluš）之事。该文书正反面各书写10行回鹘文字（正面残存9行），原编号T I 172显示写本由德国探险队于第一次吐鲁番探险中获得。茨默（P.Zieme）首次给出写本的全文转写和英译[1]。他根据文书的字体和书写情况判断，这是一件早期回鹘文写本，可能写于10～11世纪[2]。笔者根据网络公布的写本照片[3]，参考茨默的转写，将原写本转写、汉译如下[4]。

（正面）$_{1}$ol opraq balïqïγ körü yarlïqap $_{2}$apalarïm etmiš ordu uluš oprap $_{3}$näčük turγay tep beš yüz išči är $_{4}$[miŋ] är ïγaččï birlä solmïlïγ ïšuγ $_{5}$[ ]nä kärgäkin $_{6}$[qatïγ]lanturu yarlïqap täŋri balïq $_{7}$[-nïŋ ü]zäki uluγ luu ekitin $_{8}$[ïsïr]qalarï täŋridäm qïšlïqlarï $_{9}$[ ]yirgäntäki ’[ ]ikin $_{10}$[ ]

（背面）$_{11}$töküglüg suŋmin uluγ qapïγlïγ $_{12}$uluγ titsi äv etdürü yarlïqadï küskü $_{13}$yïlïnqï yayqï üdüg beš balïqta $_{14}$ärtürü yarlïqap pravarik [p]o[sat] yaŋï $_{15}$künüg yemä beš balïq[ta]$_{16}$pravarik ärtmištä ekinti [kün] $_{17}$yarlïqap uluγ köč qon birlä[ ] $_{18}$-qa yarlïqadï säkizinč ay ičin[tä] $_{19}$el ičintäki ičtin ba[lï]qlïγ [ ] $_{20}$[ ]d[ ]n[ ]

（1～12行）当（可汗）看到这座残破的城时，他说道："在我祖先们建的都城（ordu uluš）破败之后，如何将它重建起来呢？"他派500名工匠和1000名木匠带唆里迷（solmï）的红土（？ïšuγ）［来重建此城］。他争取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圣城之上的高楼两侧，神圣的用来过冬的房屋……他使人修建了铁铸的城门和带有大门的宫殿。

（12～20行）他在别失八里度过了鼠年的夏天，并在那里度过了自恣日（prāvāraṇa）的布萨（poṣatha）仪式。他在自恣日过后的第二［天……］[5]，他带着羊〔群〕[6]［做］大迁徙，去了［……］在第八个月［他……］属于这个王国的内城……

茨默将文献内容分为两部分：前12行为第一部分，写一位回鹘可汗在其治下对都城进行重建；后8行为第二部分，记录回鹘可汗其后在北庭以及其他地方的活动。据文献记回鹘可汗在北庭城曾举行布萨斋戒活动，他推测文献所记事件应当发生在北庭城比较繁荣的10～11世纪[7]。

首先应当判断文献所记重建的都城所指为何城。生活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回鹘人在历史上共有四座都城：漠北回鹘时代位于鄂尔浑河谷的牙帐城（Ordu Balïq，即Qara Balγasun），回鹘西迁初期的都城焉耆，西州回鹘的冬都高昌和夏都北庭。这座都城不应是漠北回鹘汗国的都城牙帐城，因为没有任何史料或考古证据显示西州回鹘曾有实力重返蒙古高原鄂尔浑河谷地区，并重修其都城。西州回鹘可汗应当不会称焉耆为都城，而且文书中特意提到“唆里迷的红土”，则此城的位置应当不在焉耆。因此，这次重修的都城只可能是高昌或北庭。种种迹象表明，此次重修的都城应为北庭。

文献第2行提到此城为“我祖先们建的都城”（apalarïm etmiš ordu uluš）。西州回鹘的两座都城高昌和北庭都非回鹘人始建。北庭城曾为突厥之可汗浮图城，入唐后为庭州（北庭），在回鹘汗国控制东部天山地区以前存在久矣。但在西州回鹘人的记忆中，北庭城可能被视为其政权的起源。志费尼写于13世纪的《世界征服者史》记载了西州回鹘人起源的传说，其中记其先从蒙古高原迁往东部天山地区的部分作：“畏吾儿各部和各族，每逢传来马嘶声、犬吠声、牛鸣声、骆驼吼叫声、野兽咆哮声、羊群咩咩声、鸟雀喊喳声、婴儿呜咽声，都从中听见一种‘喝起、喝起!’（köč）的呼喊，因此，他们便从他们驻扎之地挪动。不管他们停留在何地，都听到‘喝起，喝起!’的呼喊。最后，他们来到后来兴建别失八里的平原，那呼喊才平息下来。他们在该处定居，筑成五个城镇，称之为别失八里：这五城逐渐发展为一条长而宽的镇区。从此后，他们的子孙当上帝王，并且他们称自己的君王为亦都护。”[8]北庭在西州回鹘人的历史记忆中有较高的地位，被视为其先祖西迁后所建，而回鹘西迁初期的安西回鹘政权已被从历史记忆中抹去。因此，虽然北庭城事实上并非回鹘人始建，但在西州回鹘人的记忆中可能将其看作其政权的起源。这与汉文史料中所记仆固俊从北庭崛起，波斯文史料所记菊儿特勤为五城之主相呼应。

2.考古发掘所见北庭城及其周边遗迹

北庭城今地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北约12公里的护堡子古城（亦被当地人称为“破城子”）。早在19世纪初，古城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清代学者徐松在其流放新疆期间曾调查古城遗址，并将相关信息记录在其名著《西域水道记》中[9]。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域探险浪潮中，大谷探险队和斯坦因（A.Stein）先后调查过护堡子古城，并分别画有古城的平面草图[10]。其后，我国的考古工作人员也多次对古城进

行考古调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是1979年6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对古城及周边的调查。考古队在这次调查中于古城西侧约800米处发现了西州回鹘西大寺遗址。

1979年6月至1980年9月，考古队对回鹘西大寺展开清理、发掘工作，全面调查了佛寺遗址的空间和构造，出土了大量塑像、壁画和题记[11]。通过对遗址内的五组C14测定数据的比对，西大寺建造时间的范围被定为960～1270年[12]。在遗址正殿入口东侧墙壁上，有一位回鹘可汗的贴金供养人画像和榜题[13]。梅村坦认为这位回鹘可汗的名号应读作kün ay täŋrilärtä （qut）（b）[u]lm[ï]š [buya]n ornanmïš alpïn [ä]（r）dämin il （t）utmıš üčü（n）č arslan bilgä xa（n）。通过分析比对西州回鹘可汗（亦都护）名号中的因素，梅村坦认为这位可汗在位的年代范围是10世纪末到12世纪初[14]。因此，西大寺建造的时间最晚应当在11世纪末。

除上述回鹘可汗的供养人画像和题记外，西大寺遗址还出土有其他贵族供养人画像和题记，结合佛寺的规模、出土艺术品的精美程度等因素考量，西大寺应当是西州回鹘的王家寺院[15]。而美国学者史南希（N.Sh.Steinhardt）在全面研究了西大寺遗址的空间结构和遗址所出艺术品的内容之后，甚至推断西大寺是回鹘王室为纪念一位王子所修，佛寺本身即是王子之骨冢[16]。作为王家寺院存在的北庭西大寺有力地印证了北庭作为西州回鹘都城（之一）的文献记载，但是由于西大寺出土文物中没有任何相关的年代记载，我们无法确定其确切的建造和使用时间。

在清理发掘西大寺之后，新疆考古队于1980年10月对北庭故城进行全面踏查。调查显示，北庭故城的形制是内外两重城，内、外城墙均系夯筑，但在建筑手法上有明显不同。外城墙的夯层结构为薄夯层，与唐代两京的城墙相似，反映了唐代的筑城方法；内城墙的夯层结构为厚夯层，比较松软，与当地其他西州回鹘时代的夯筑建筑相同。外城墙建成时间较早，有多处修补和增筑，而修补和增筑的地方则与内城墙的夯层类型相同；内城墙则没有修补的迹象[17]。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北庭城的形制，认为北庭城内外城共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外城、外城北的子城、外城西墙向外延伸的西延城、内城和内城中的小城[18]。外城的主体、子城和西延城属于一个系统，显示了唐代建筑的特点。内城、小城以及其中建筑物的基址则显示出与外城不同的建筑特点，其与吐鲁番地区西州回鹘时代的建筑相同，应属于西州回鹘时代的建筑。内城和小城中的建筑规格较高，有可能是西州回鹘的王城和宫城。综上可知，西州回鹘时代北庭城曾有大规模的修建：回鹘人修补了外城，新建了内城和小城。

前引Mainz 354回鹘文写本所记城市曾经是西州回鹘早期的都城，因故被毁，在回鹘可汗的主导下重修。文献第6～12行则明言，这次重建北庭城的主要工程包括“神圣的用来过冬的房屋”、“铁铸的城门”和修建“带有大门的宫殿”等。对比北庭城遗址的考古踏查结果可以发现，这

些工程正可对应回鹘时代对北庭城外城的修补和对王城、宫城的新建。

3.回鹘时代的北庭城市史

笔者下面将按时间顺序梳理各种文献对回鹘时代北庭城的记载，探讨北庭城被损毁的时间、原因，并论说西州回鹘治下北庭城的发展历程。

（1）9世纪

790年，吐蕃攻陷北庭城，唐朝管理北庭的最高军政长官杨袭古被回鹘人诓杀，标志着唐朝在当地统治的终结。此后，回鹘汗国在与吐蕃的反复争夺中最终获胜，占领包括北庭在内的东部天山地区。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贵族庞特勤率领西迁回鹘余部在安西建立政权，成为东部天山各支回鹘的共主。866年，北庭的回鹘首领仆固俊率部崛起，建立西州回鹘政权。

前引国图藏敦煌文书BD11287显示，仆固俊在崛起之后不久即遭遇重大挫折。在876年以前的某个时间，其势力范围一度仅限于西州一地。该文书前2行记有“城悉皆残破”“仆固俊独守西〔州〕”字样，反映出当时西州回鹘治下北庭等城市因战事受到破坏，正与前引Mainz 354文献所描述的情形相吻合。文献首行所谓此残破之城（ol opraq balïq）可能就是上述战争的结果：仆固俊最初的根据地北庭在当时已被敌人攻破、占领。据前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回鹘文献xj 222-0661.09内容知，仆固俊的敌人应是安西回鹘和背叛的九姓鞑靼部，而出兵围困西州的就是九姓鞑靼军队。

仆固俊的西州回鹘重新崛起，在876年向东“打破伊州”。根据xj 222-0661.09文献的内容判断，在仆固俊继任者的治下，西州回鹘向西夺取了原安西回鹘的牙帐所在地焉耆，并征服了安西以西直到怛逻斯地区的各部势力。该文献记述了这位可汗开疆拓土的过程，但没有透露有关北庭的信息。

（2）10世纪初

北庭城再一次出现在文字记载中已经是10世纪。《辽史·太祖本纪》记载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西征之事，道：冬十月，太祖“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城”[19]。北庭在唐朝置庭州之前即称“可汗浮图城”。许多学者据此推测此“浮图城”即北庭城，认为辽太祖西征已攻入西州回鹘境内[20]。如果这一比定准确[21]，则北庭城在天赞三年以前即

已重新投入使用。北庭城是否因为辽太祖此次西征而被毁坏、遭废弃呢？答案是否定的。

前引《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第20行出现Paṃjä kaṃtha（五城），即北庭城突厥语名称“别失八里”（Bešbalïq，“五城”）的于阗语对译。此卷写成的时间为925年，即辽太祖天赞四年。当时北庭仍被西州回鹘使用，说明天赞三年辽朝军队的进攻并未导致北庭城损毁。

从上述两条材料可以看出，至迟到924年，北庭城已重被西州回鹘使用。在9世纪90年代，至迟在10世纪初，西州回鹘结束西征战事，将其西部疆域稳定在焉耆、大裕勒都斯一带，进入国泰民安的稳定时期。前引Mainz 354文献正面第3～5行写有：“他派500名工匠和1000名木匠带唆里迷（solmï）的红土（？ïšuγ）[来重建此城]”。此事应当发生在西州回鹘占领焉耆、回鹘可汗完成西征以后。因此，北庭城重建的时间至少应当在893年以后，而其重建结束的时间下限应是924年。此事最有可能发生的时段是在西征结束后不久。ïšuγ一词尚未得到确定的解释，但应是某种建筑或装饰的材料。这种材料专门从焉耆取得，可以理解为西州回鹘可汗在攻灭安西回鹘之后派人从其都城焉耆取来建筑材料和装饰品，来重建被毁掉的国都北庭。

（3）10世纪中后期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得出一个可能的推论：北庭城在866～876年的战事中被毁掉之后，又在9世纪末10世纪初被重建并投入使用。随着西州回鹘王朝的兴盛，北庭城在10世纪中叶起进入日益繁荣的时期。现存史料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北庭城在10世纪中叶以后遭受严重损毁。

北宋使者王延德在982年出使西州回鹘。其时西州回鹘可汗正在其夏都北庭避暑。延德受其邀请往赴北庭，见北庭“城中多楼台卉木”[22]。Mainz 354文献第6～7行提到“圣城之上的高楼”（täŋri balïqnïzäki uluγ luu），正可与此呼应。这或许暗示北庭城中的楼台正是建于此文献所记的重修活动中。据波斯文献《世界境域志》记载，西州回鹘（托古兹古思）的都城为高昌，但其国王夏天住在北庭[23]。前文已论说，《世界境域志》所记内容反映的是10世纪40～50年代的情形，说明此时北庭已经是西州回鹘可汗固定的夏都。

法藏敦煌写卷Pelliot chinois 3071正面抄有汉文《妙法莲华经》，背面写有20行回鹘文，内容与摩尼教相关。第13～18行系西州回鹘摩尼教高级神职人员的名表，列有一位慕阇和五位拂多诞。其中，第17行记有一位“在别失八里的教法领袖、拂多诞Wispuhr”（beš bešbalïqta nom bašlaγučï ärmen wispuhr avtadan）[24]。

西州回鹘摩尼教团属于摩尼教东方教区，由一位慕阇统一领导。在摩尼教的神职体系中，拂多诞的地位仅次于慕阇，是慕阇指派到本教区

内各地方教团的主教。可能在漠北回鹘时代的后期，回鹘摩尼教团即开始实行慕阇-拂多诞管理体制，并沿用至西州回鹘时代。其慕阇可能在8、9世纪之交自漠北移驻高昌并在此常驻[25]。1981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65号窟出土三封属于同一时代的粟特文摩尼教书信，吉田丰转写并译注[26]。其中两封（编号81BT65：1和81BT65：2）钤有朱印，具有公文书性质，分别由两位地方教团的领袖拂多诞寄给驻锡高昌的慕阇[27]。吉田丰推断文书的年代在9世纪后半叶到11世纪前半叶之间，最有可能是在10世纪上半叶[28]。另外，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大谷探险队收集品中有一些吐鲁番出土的中古伊朗语文书。吉田丰从中检出与上述两件公函类似的用粟特文书写的摩尼教徒书信残片。比如，1967号文书就是一封盖有朱印的书信残片，收信人正是摩尼教东方教区的慕阇[29]；1979号文书则是盖有相同朱印的一件信封残片[30]。这些书信残片印证了西州回鹘早期摩尼教东方教区存在“慕阇-拂多诞”的管理体系：东方教区的首领慕阇驻锡高昌，他委派拂多诞到各地管理地方教团。前引Pelliot chinois 3071写卷出自敦煌藏经洞，其背面回鹘文部分应为9～10世纪所作。考虑到9世纪下半叶到10世纪初西州回鹘经历一系列战事，北庭曾经历损毁和重建，则写卷反映的应是10世纪中后期的情形。写卷中提到的这位拂多诞名叫Wispuhr，为帕提亚语借词，意为“王子”，则当时北庭地区摩尼教团的领袖可能具有伊朗的背景。

在10世纪，北庭不仅是摩尼教的地方性中心，也是回鹘佛教的一大中心。前引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中列举了西州回鹘统治阶层和佛教僧团人物，并歌颂其功德，其中记有：“更有诸都统、毗尼法师、三藏法律、僧政、寺主、禅师、头陀、尼众、阿姨师等，不及一一称名，并乃戒珠朗耀，法水澄清，作人天师，为国中宝。”[31]在佛教僧团中位列首位的“都统”正是西州回鹘佛教团体的最高领袖，为都僧统之简称[32]。此处明言“诸都统”，说明西州回鹘治下各地佛教团体各由一名都统领导。推测北庭、高昌、焉耆、哈密和龟兹五大地区的佛教团体应至少各有一名都统，而著名的胜光阇梨都统（Šïŋqo Šäli Tutung）很可能就是北庭地区的佛教领袖[33]。胜光活跃在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组织翻译了回鹘早期的几部大型佛教文献，如《金光明最圣王经》《慈恩传》等[34]。王延德受西州回鹘可汗之邀赴北庭时，即被安排在当地的“高台寺”休憩，其后又游览了唐贞观十四年所造的“应运太宁之寺”[35]。北庭的佛教自该城重修伊始可能就受到回鹘统治者的资助和扶持。前引Mainz 354文献在记叙回鹘可汗重修北庭城之后接着写道：“他在别失八里度过了鼠年的夏天，并在那里度过了自恣日的布萨仪式”。在修葺都城、兴建王宫的同时，北庭地区的佛教团体也得到恢复。

综上可知，在10世纪中后期，北庭不但是西州回鹘可汗的夏都，而且是回鹘摩尼教和佛教的一大中心，日益繁荣。显然，这种繁荣景象应始自9世纪末或10世纪初北庭城的重建。

（4）11世纪以后的北庭

前引北庭西大寺考古发现显示，该寺至迟建成于11世纪末。前引德藏第三木柱文书MIK III 7279反映西州回鹘的疆域在1019年达到极盛，其范围向东可以抵沙州，向西则包括乌什和拔塞干。在这一时期，北庭城应当不会受到外敌的威胁。《突厥语大词典》“回鹘”词条下记有：“此公国由五座城组成，此五城之民乃异教徒中最为悍勇者，是最好的射手。这五城是：唆里迷,由Ḏu-l Qarnayn所建；然后是高昌；然后是彰八里；然后是别失八里；然后是仰吉八里。”[36]这反映了11世纪70年代北庭在西州回鹘的重要地位。

1130年或1131年，耶律大石率军西征借道西州回鹘。此后，大石在中亚建立西辽帝国，西州回鹘逐渐成为西辽的附庸。这一时期北庭城的情况不见于文献记载。公元1209年，西州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背叛西辽，归顺成吉思汗，西州回鹘并入蒙古汗国的版图。1220年，长春真人丘处机受成吉思汗邀请，携弟子十八人启程往赴西域。其一行进入西州回鹘境内之后，在北庭城受到回鹘王族的款待。《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其一行在北庭的见闻如下：

西即鳖思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泊于城西葡萄园之上阁。时回纥王部族供蒲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其东数百里有府曰西凉，其西三百余里有县曰轮台”。[37]

所谓“鳖思马”，正是丘处机一行人对北庭城突厥语名bešbalïq的汉文音写。称其为“大城”应指其为都城。在北庭城中，丘处机受到了“王官”的迎接，并受到“回纥王部族”的款待，说明当时西州回鹘的王族住在北庭。此外，北庭城中还住有佛教、道教的出家人，以及被称为“儒”的汉族文人，会聚了当时西州回鹘的贵族和文化精英。当地的汉文化很昌盛，风俗上追唐代，除了道、儒之外，可能一些佛教僧人也是汉人[38]。在唐代龙兴寺基础上修建的回鹘王家西大寺中，丘处机应该还看到了汉文佛经。

前引史料反映了13世纪初叶蒙古统治之初北庭城的情况。然而，北庭城在此前一个世纪西辽治下的情况并不见于史册。欲了解这方面信息，还需从元代畏兀儿家族对其先世的记述中寻找线索。笔者现列举其中有代表性的案例，借此论说北庭城在12世纪的情况。

A 阿鲁浑萨理家族

《全公神道碑铭》记：“公讳阿鲁浑萨理，回鹘北庭人，今所谓畏吾儿也。以父字为全氏。曾祖讳乞赤也奴亦纳里，妣可吕竭失怙（帖）林。祖讳阿台萨理，赠保德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赵国公，谥端愿。妣张氏，追封赵国夫人。父讳乞台萨里，早受浮屠法智全

末利可吾坡地沙，圆通辩悟，当时咸推让之，〔故其师又名之曰万全。事世祖皇帝，历大同路僧众都提领、释教都总统、同知总制院事、统制院使，积阶资德大夫，号正宗弘教大师，〕累赠纯诚守正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谥通敏。妣李氏，累封赵国夫人。”[39]阿鲁浑萨理的祖籍正是西州回鹘北庭城。其曾祖乞赤也奴亦纳里名字最后成分“亦纳里”应可还原为古突厥语的ïnal，应为其官号或贵族称号[40]。其曾祖母名字应作可吕竭失帖林，其最后成分“帖林”可还原为古突厥语tärim，系其称号[41]。tärim应来自täŋrim，指王族后裔[42]。在西州回鹘时代的文献中常见täŋrim作为女性贵族的头衔出现，在汉文文献中记作“登林”[43]或“邓林”[44]。从其名号分析，阿鲁浑萨理曾祖夫妇应当是西州回鹘王朝的贵族，其曾祖母有可能是出身回鹘王族的贵胄。《元史阿鲁浑萨理传》记：“阿鲁浑萨理，畏兀人。祖阿台萨理，当太祖定西域还时，因从至燕。”[45]可知阿鲁浑萨理曾祖夫妇应系12世纪生活在北庭的回鹘贵族。同传又记：阿台萨理“精佛氏学。生乞台萨理，袭先业，通经、律、论”[46]。可知阿台萨理应以其精通佛学之故而入仕元朝。乞台萨理袭承其业，在元朝官拜释教都总统，成为佛教教团领袖。可以推测，其家族应是西州回鹘当地著名的佛学世家，阿台萨理在成吉思汗西征时应已是西州回鹘的佛学大师。

B 孟速思家族

《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记：“武都王，讳孟速思，别失八里人，世出畏吾儿族。大父讳巴里木（朮），妣曰月的干。父讳阿里息思，为本部都统，妣曰别古忽都花。王幼负奇质，年十五，尽通本国书。太祖闻其名，征至阙下。”[47]孟速思世居北庭，其在15岁时受元太祖成吉思汗征召，可知其家族至少在12世纪已定居北庭。其年少时便尽通本国书，应系出西州回鹘的硕学世家。碑文记其父为本部都统，指其为西州回鹘佛教僧团最高级僧官都僧统。德国学者福赫伯（H.Franke）曾研究一组由德国探险队于第三次吐鲁番考察时在木头沟石窟收获的刻本图像残片，比定其为孟速思家族画像[48]。其后学者进一步研究、拼合了全部断片，将这组图像比定为孟速思家族的供养图[49]。供养图显示其全家老幼均礼佛信教，亦是孟速思出身佛教世家的佐证[50]。

C 斡栾家族

《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记：“臣斡栾世为北庭名族，其曾大父讳哈剌，仕其国为哈剌罕里杂杂者之官。哈剌罕里者，保卫御患□称；杂杂者，国老之职。国初实辅翼其主，来归我朝，居官治民，克尽乃职，兴利去害，屡献嘉谋。……大父讳阿台不花，气刚力勇，临难不变……厥后亲王都瓦、不思麻□，从亦都护火赤哈儿宣力靖难。已而北庭多故，我弗获安，仍迁国火州……亦都护来朝，挈家以从，跋履险阻。行次永昌，相其土地沃饶，岁多丰稔，以为乐土，因之定居焉。”[51]斡栾家族自其曾祖哈剌一代起为蒙古汗国效力。到其祖阿台不花时，其家族随亦都护迁居永昌。显然，碑文所谓“北庭名族”，应当指其曾祖以上数代已在北庭定居经营。其曾祖曾是西州回鹘王朝身居高位的重臣，在13

世纪初扈从回鹘国主归降蒙古汗国。可知，斡栾一族至少在12世纪便生活在别失八里，是当地名门望族。

D 脱烈海牙家族

《元史·脱烈海牙传》记："脱烈海牙，畏吾氏，世居别失拔里之地。曾祖阔华八撒朮，当太祖西征，导其主亦都护迎降，帝嘉其有识，欲官之，辞以不敏。祖八剌朮，始徙真定，仕至帅府镇抚。"[52]脱烈海牙家族自其祖一代即迁徙内地，所谓"世居别失拔里之地"，显然是指其曾祖以上数代居住在别失八里。而其曾祖阔华八撒朮活跃在成吉思汗西征时期，即13世纪初期，显然其家族至少在12世纪就居住在别失八里。他能够导引其主亦都护归附蒙古，则其应是西州回鹘王室之近臣或王族贵胄，说明当时西州回鹘统治者就生活在别失八里。

有元一代入仕中原的畏吾儿人中，出身别失八里的人远不是上述案例所能穷尽的[53]。笔者以上所举四例皆可确定其家族祖辈至少在12世纪就生活在北庭。通过这些家族对祖辈的回忆，可以了解12世纪回鹘北庭城的一些情况。上述四个家族或有贵族血统，或为佛学世家，或为高门世族，均是在当地有政治、文化影响力的大族。元代入仕中原的畏吾儿人许多出身北庭；而在元朝身居高位或以佛学、文学著名的畏吾儿人中，北庭出身者更占绝对多数[54]。显然，这些为蒙元统治者所重用的畏吾儿人原本在西州回鹘就属精英阶层，这说明西州回鹘王朝之政治文化精英大多籍著北庭。

4.小结

866年，仆固俊从北庭崛起，建立西州回鹘政权。866～876年，西州回鹘曾在战争中失去包括北庭在内的大部分城镇。北庭城很可能在战争中被攻破、损毁。此后，西州回鹘重新崛起。在9世纪90年代的西征中，西州回鹘攻灭安西回鹘，并占领其都城焉耆。此后，西州回鹘进入疆域稳定、国泰人安的强盛时期。Mainz 354文献记载回鹘可汗重修北庭城之事应即发生在这一时段。这次重建不但修补了因战争损毁的外城，而且新建了内城和王宫。北庭成为西州回鹘统治者的夏都。自10世纪中期以后到13世纪初，北庭一直是西州回鹘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是西州回鹘摩尼教和佛教的中心，著名的回鹘西大寺即在这一时期兴建。这种繁荣景象一直持续到蒙元统治的初期。

回鹘时代的西州诸城

在792年之后不久，漠北回鹘汗国夺取西州。到803年，西州已经成为回鹘汗国的宗教中心，摩尼教东方教区最高领袖慕阇就驻锡于此。当时回鹘怀信可汗亲自从漠北来到西州，会见摩尼教慕阇[55]。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回鹘余部西迁至东部天山地区。庞特勤自立为可汗，成为东部天山地区回鹘共主。当时的西州在安宁的割据统治之下。安宁或为漠北回鹘汗国管领西州的遗臣，于856年入贡唐朝并受册封。866年，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崛起，攻占西州，建立西州回鹘王朝。

在西州回鹘时代，西州在汉文语境中仍作“西州”；在突厥语中作“Qočo”，伯希和首先指出此词来自汉文“高昌”的中古时代西北方言，反映出该方言尾音不含软腭鼻音/ŋ/的特点[56]56；在于阗语中作“Secū”，系汉文“西州”之音写；在粟特语中作“Cyn’ncknδ（秦人城）”[57]57；在波斯语中作“Ğīnānğkaṯ（秦人城）”[58]58。

西州与北庭为西州回鹘的两座都城，回鹘可汗冬季驻跸西州，夏季驻跸北庭。《钢和泰卷子》于阗文部分第17行以下记“西州的诸城”（Secū bise kaṃthe），其中西州城被记为“Secū mistä kaṃtha”（西州大城），意指都城。《世界境域志》第12章专门介绍托古兹古思的疆域和城镇，其中记西州作：“秦人城，托古兹古思之都城也。中城。其地为政府所在，靠近汉地。旁近有贪汗山（Tafqān）[59]，山北有五城：KWZARK、处密城、北庭、凭洛和ĞAMĠR。托古兹古思王夏季则居北庭城”[60]。这是伊斯兰史料中对西州回鹘冬、夏二都最完整的描述。

由于缺乏传世文献系统的记载，人们对于西州回鹘都城的行政地理缺乏系统的认识。本节将依靠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书材料，研究西州回鹘时代西州地区的行政地理，探讨相关的重要问题。

1.回鹘人对西州地区的管理

在回鹘时代，西州地区常被与“二十二城”联系在一起。森安孝夫先生业已指出，在西州回鹘早期吐鲁番盆地可能有22座城，因此以“二十二城”指称西州地区[61]。这种情况反映在多种语文的文献、文书记载中，笔者现将这些史料列举如下。

（1）原德藏吐鲁番写本 *T M 176号摩尼文古突厥语文献

写本系册页装书页一叶，双面书写摩尼文古突厥语，现不知去向。写本由勒柯克（A.von Le Coq）刊布、转写、翻译，背面第6～7行出现qočo uluš ekii otuz balïq（高昌国二十二城）[62]，明确写出高昌地区有22座城。写本内容赞颂摩尼教神灵以及信仰、保护摩尼教的回鹘可汗，显然应写于回鹘人占领高昌之后，很可能是9～10世纪的写本[63]。

（**2**）波斯语文献《记述的装饰》

11世纪伽色尼王朝作家加尔迪奇所著波斯文地理文献《记述的装饰》中有数节内容与“托古兹古思”有关，森安孝夫已考证此乃西州回鹘[64]。其中一节介绍高昌（nanka，“秦人城”），写道：“此地区（高昌）比苦叉（Kuā）小。它由22个村子（d）组成”[65]。指出，波斯语dih（d）一词在14世纪的文献中确定可以指称城市[66]，因此该文献所记当指高昌地区有22座城市。

（**3**）法藏敦煌文书**Pelliot chinois.3672 Bis**汉文书信

书信起首记发信人作：“赏紫金印检校廿二城胡汉僧尼事内供奉骨都禄沓密施呜瓦伊难支都统大德。”据森安孝夫考证，此书信应在10世纪下半叶从西州回鹘发出，寄往敦煌。书信起首的“廿二城”即指代西州地区[67]。

（**4**）德藏吐鲁番文书**Ch/U 8118**回鹘文摩尼教文献片段

森安孝夫指出，德藏吐鲁番文书Ch/U 8118背面回鹘文摩尼教文献片段中有qutluγ qočo uluš eki [ ] balïq字样，据前述文献（1）可以将其补全为qutluγ qočo uluš eki [otuz] balïq（有福的高昌国廿二城）[68]。该文献同样为摩尼教性质，年代应当在11世纪以前。

上述材料反映西州回鹘时代确以廿二城指称西州地区。但上述材料基本都属于西州回鹘时代早期，即9～10世纪。根据元代的史料可知，到13世纪中叶，高昌地区的城市数量可能已经是24座了。《通制条格》卷四《户令》“女多渰死”条开头写道：“至元十三年（1276）七月初二日，钦奉圣旨：‘亦都护根底，塔海不花、亦捏不花两个根底，火州、吕中、秃儿班为头贰拾肆个城子里官人每根底，众僧人每根底，也里可温每根底，百姓每根底，宣谕的圣旨……’”[69]其中，“火州”“吕中”“秃儿班”当分别指高昌、柳中和吐鲁番三城，而以此三城“为头贰拾肆个城子”显然就是吐鲁番盆地内的全部城市，共24座。看来，在元至元十三年，吐鲁番地区应当已经有城24座。

西州回鹘初期以“廿二城”指称西州地区的传统从何而来呢？

在历史上，吐鲁番地区曾同时有过22座城。根据王素先生的研究，在麴氏高昌国后期（613～640），高昌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是县，共计有22个县，其一县统治的范围往往只当于中原地区的一座城，故汉文文献中多称其地为“二十二城”[70]。唐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进攻高昌。“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71]。学者普遍相信，在麴氏高昌国后期到唐西州早期这一阶段，高昌地区确实是有城市22座。唐朝在高昌置西州，并推行中原体制的州县乡里制。唐朝在西州下设五县，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地城为柳中县，东镇城（白艻）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在五县以下共设24个乡，其中至少有21个乡的名称可以通过吐鲁番文书确定[72]。唐西州的县、乡，大多依麴氏高昌国的县（城）而设置[73]。高昌国晚期（613～640）的22县（城）在唐西州时期的州县乡里体系下的变革情况可参见表4-1。

表4-1 高昌国晚期至唐西州吐鲁番地区城的沿革

序号	高昌国晚期名称	唐代名称	唐代级别	所属
1	高昌（高昌郡）	高昌	县	
2	田地（田地郡）	柳中	县	
3	交河（交河郡）	交河	县	
4	白艻	蒲昌	县	
5	始昌	天山	县	
6	横截（横截郡）	横截	城	蒲昌县
7	南平（南平郡）	南平	乡	天山县
8	武城	武城	乡	高昌县
9	安昌	安昌	城	天山县
10	永昌	永昌	城（？）	高昌县

续表

序号	高昌国晚期名称	唐代名称	唐代级别	所属
11	威神	威神	废	地属柳中县
12	宁戎	宁戎	乡	高昌县
13	高宁	高宁	乡	柳中县
14	酒泉	酒泉	城	柳中县
15	临川	临川	城	高昌县
16	安乐	安乐	乡	高昌县、交河县
17	龙泉	龙泉	乡	交河县
18	洿林	洿林	里	交河县永安乡
19	永安	永安	乡	交河县
20	笃进	笃进	废	地属天山县
21	盐城	盐城	城	交河县
22	无半	无半	废	地属天山县

资料来源：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57~84页；荣新江《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的地理信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4页。

从表4-1可以看出，在唐西州时期，原来麹氏高昌国的22个县有的依旧置县，有的则被降为县下一级的乡或者城，甚至是再下一级的里（比如洿林），还有的则被撤废，改隶他县，情况各不相同。所以，麹氏高昌时代以22座城市为基础的地方行政制度到了唐西州时代已经完全被基于土地人口划分的州县乡里制度取代，“二十二城”并举的结构已被打破。因此，在唐西州时期的文献中没有以“二十二城”指代西州地区的说法。麹氏高昌末期“二十二城”并举的传统在唐西州时代应当已经中断。因此，西州回鹘时代以“二十二城”代指高昌的做法应当不是继承自前朝的传统，而是对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反映。而这种做法反映了西州回鹘在吐鲁番盆地的行政管理再次回归到以“城”为基本单元的方式。

西州回鹘时代将二十二城并举的做法暗示着唐西州时代吐鲁番盆地各城市之间严格的行政等级差别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但西州回鹘的地方管理制度可能仍在一定程度上沿用唐朝的制度，可在一些文献记载中见其端倪。

①出土于吐鲁番吐峪沟的汉文文书《造塔功德记》的第2～4行写有如下内容：

2 ］子四月 日，清信士佛弟子鄢耆镇牟虞蜜伽长史龙公及娘子温氏

男都典跋（？）达干

3] □□（寺）山门胜地，敬造佛塔。其时□牧主多害伊难主骨都禄都□

4] 莫诃达干宰相 摄西州四府五县事、清信弟子伊难 [

这件文书曾由陈国灿、伊斯拉菲尔·玉苏甫二位先生[74]和荣新江先生[75]先后录文、研究。荣新江先生准确地指出文书年代在西州回鹘早期[76]。文书第2行将鄢（焉）耆称为镇，显然是沿袭唐代安西都护府下辖焉耆镇的称号。而文书第4行有“西州四府五县”之称，亦是沿用唐代的名称：唐灭高昌国后改高昌为西州，下设四折冲府、五县[77]。虽然很难判断唐代的制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西州回鹘的地方行政制度，但是至少在称谓上，回鹘人继承了唐代的传统，以“西州四府五县”来指称整个高昌地区。

②北宋使者王延德所著《西州使程记》记载其于太平兴国六年（981）至雍熙元年（984）年间奉旨出使西州回鹘的经历，其中记载其在伊州的经历作：“次历伊州，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78]西州回鹘在876年从归义军手中夺得伊州，此后伊州一直是西州回鹘治下的一大重镇。在10世纪末期的时候，伊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沿用唐朝的管理制度。

③《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一行在前往中亚的途中经过东部天山地区，受到西州回鹘统治者的接待。其中写到其一行在“鳖思马”大城（别失八里）的经历，作：“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其东数百里有府曰西凉，其西三百余里有县曰轮台’。”[79]晚到13世纪，唐代的制度风物在回鹘的别失八里地区犹有遗存。时人对于别失八里的记忆尚可追溯到“大唐时北庭端（都护）府”；对于别失八里周边城郭的记忆，则可追溯至“唐之边城”。尤值得注意的是，别失八里以东的西凉府和以西的轮台县不但沿用了唐代的名称，而且在名称中保留了唐代“府”和“县”的建制。我们无法确定西州回鹘王朝在地方制度上还有无唐代的府、县之实，但至少其在地名上仍保留着唐代的传统。可见唐代的传统对于高昌回鹘的影响之深远。

综上，西州回鹘王朝继承了唐代在西州地区的22座大小城镇，因此在其统治初期常以“二十二城”指称西州地区。这种表达方式暗示着回鹘人对于西州地区的管理回归高昌国时代以城为基本单元的方式，但唐代的制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回鹘人对地方的管理。

2.出土文献所见回鹘时代西州地区各城的兴衰变迁

通过前文的论述可知，回鹘统治初期西州地区确实有22座城。但除了都城高昌城之外，其他诸城的名称均罕见于传世文献的记载，究竟当时高昌地区有哪22座城市，仍需要深入研究。笔者下面据前人的研究，整理文献、文书资料中出现的回鹘统治时代吐鲁番盆地的地名信息，讨论这些地区在当时是否为城市聚落，尝试还原西州回鹘时代高昌“廿二城”的名目。

（1）高昌（西州）城

高昌（西州）这一地名在西州回鹘时代既可指西州回鹘王朝、高昌地区，也可指具体的高昌城。西州回鹘治下不同时期的文书均可见到高昌城的有关记载。

写于925年的《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第20行记有Secū mistä kaṃtha（西州大城）[80]，明确指出高昌城。写于1009年的德藏第一木柱文书MIK III 4672第18行写有qočo balïq bägi alp totoq ögä（高昌城主阿都督于越）[81]。此处的qočo balïq明确指高昌城，当时高昌城的长官为“城主”（balïq bägi）。圣彼得堡藏回鹘文书3Kr.35属于蒙元时代，其第19～20行记有qočo balïq ayγučïqa bir kümüš yastuq berip（给高昌城爱护持一银锭）[82]。这反映出蒙元统治者在高昌城设置爱护持这样的官员管理该城。

（2）柳中城

《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第19行出现柳中城，写作Ḍūkätū kaṃtha。

982年，北宋使者王延德记其到达高昌前的行程，作：“高昌闻使至，遣人来迎。次历地名宝庄。又历六种，乃至高昌。”[83]此处的六种即柳中的对音[84]。

柳中在突厥语中还被称作“三柳中”（Üč Lükčüŋ）。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书B 140:5为回鹘文《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译经题记，第4行写有üč lükčüŋ [b]alïqlïγ čisön tutuŋ tavγač tilintin türk tilinčä ekiläyü ävirmiš（三柳中城人智全都统〔将此经〕自汉文译作突厥语）[85]。这里也明确反映回鹘时代的柳中仍以城为中心。

（3）交河城

交河在突厥语中作“yar”，本意为“崖”。交河城在早期的回鹘文书中就有出现。著名的摩尼教寺院经济文书写于9世纪末到10世纪[86]，文书第112行写有“yar manistanta”（在交河的摩尼寺）字样[87]，显示回鹘

时代早期当地有一重要摩尼寺院。交河城的考古遗存反映了此城在回鹘时代的繁荣景象。

明朝使者陈诚一行于永乐十二年（1414）奉诏出使中亚帖木儿帝国，有《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两种出使报告传世，分记其行程和西域各地风貌。后者记录当时交河城（崖儿城）“广不二里，居民百家，旧多寺宇”[88]，反映了交河城当时已然萧条，但仍为当地居民所使用。

（4）蒲昌城

《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第18行记有Phūcąnä kaṃtha，即蒲昌城。显示西州回鹘早期沿用了唐代的蒲昌城。蒲昌城在高昌国时期为白艻县，又称东镇城，是该国东境之门户。在唐西州时代改名蒲昌，依然保留县的建制。一般认为，蒲昌城今地在鄯善县东巴扎回族乡东巴扎古城遗址[89]。该地位于火焰山东端的鄯善绿洲，正当哈密西入吐鲁番盆地的道路，从此沿火焰山北麓西行经连木沁，出胜金口可达高昌；沿火焰山南麓西行经鲁克沁亦可到达高昌故城[90]。982年，北宋使者王延德出使西州回鹘，在西州回鹘使者的导引下，从蒲昌沿火焰山南麓西行过柳中进入高昌城[91]，反映了这条道路在西州回鹘时代依然是从哈密方向进入高昌的官道。1414年，陈诚一行从赤亭西行经必残（蒲昌）、鲁陈（柳中）城到火州城[92]，亦取同样路线。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行的《陕西通志》卷一○收有《西域土地人物图》，其文字部分《西域土地人物略》记从哈密方向西行至吐鲁番城的路线：“阿思打纳西北为把儿思阔，又西为脱合城儿，又西为北昌，又西为鲁珍城儿。城南有剌上，有芦蒌草墩。有懒真城，有半截土墩，有巴思阔山。鲁珍北为羊黑城儿，又西五十里为哈剌火者。又西五十里为我答剌城。城西百里为土鲁番。”[93]其中，北昌即蒲昌，鲁珍即柳中，哈剌火者即高昌城。原秘藏于日本藤井有邻馆的《蒙古山水地图》以中国山水画形式描绘明代从嘉峪关以西到小亚细亚的道路地理，近年得以刊布。据林梅村先生研究，此图成于明嘉靖三年至十八年间，或是《西域土地人物图》之底本[94]。在该图中，蒲昌城被记作比站，柳中被记作鲁城，高昌被记作火者[95]。从西州回鹘时代伊始直到明朝中叶，蒲昌一直是从东面进入高昌的必经之路，蒲昌城也应当一直是此路上的重要聚落。

（5）横截城

早在阚氏高昌王国时，横截城即已置县。在唐西州时期，横截由县降为城，而非乡或里，或可说明当地的聚落形态是以横截城为中心的城市聚落。在唐西州时代，“横截”这一地名始终与“城”联系在一起。《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第19行Hve’tsverä kaṃtha即被比定为横截城[96]，说明西州回鹘人沿用了唐代的横截城。

黄文弼先生在交河故城收获一件回鹘文书，系西州回鹘某摩尼寺院的入历，图版刊布于《吐鲁番考古记》[97]。在其专著《回鹘摩尼教史研究》中转写、翻译文书全文[98]。文书第18～19行写有如下内容：

18/////y[ir] yaqasï iki šïγ （ü）ür alp oγulta.XWNKDSYRta（qï）yir 19/////XW siŋtuŋta....

……处土地的地租〔系〕粟2石，由阿里普·斡兀立（alp oγul）出。XWNKDSYR处土地［的地租系……］由新统（siŋtuŋ）出。……

第18行出现的XWNKDSYR显然为地名，森安孝夫未能读出。松井太指出此词应转写作qoŋḍsir，即qoŋtsir，应为汉语地名“横截”之回鹘语音写[99]。同文书第1～2行记有如下内容：

1/////////////[y]aŋï（q）a.qo（č）[o] bašlap öŋdün [ke]din balï[q]lar 2/////////////[ya]qalar tarïγ （ü）[ür] [k]（i）gütin bitidimz....

在〔……年……月〕初〔……〕，我们如下记下〔从〕以高昌为首的东、西诸城〔的土地上〕征收的谷物（小麦）和粟地租……

根据文书第1行“高昌为首的东、西诸城”，地名qoŋḍsir（横截）应当指一座城，说明唐代的横截城在西州回鹘时代应当仍然被使用。

此外，松井太还在两件蒙元时代的吐鲁番文书中找到了“横截”的音写，均作“qoŋsir”。一件是德藏回鹘文书*U 9196记账簿，其中提到“qoŋsirlïγlarnïng lab”（横截人们的布施）[100]；另一件是德藏蒙文文书MongHT70（＝Mainz 865），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Tuγluγ temür）汗于1352年在高昌地区颁发的法令文书[101]。文书第5行出现地名 qoŋsir[102]，即横截[103]。

（**6**）临川城（懒真城）

学者普遍认为临川的今地在连木沁（Lämjin），Lämjin即汉文“临川”之转音[104]。上引德藏蒙文文书MongHT70记有地名limčin[105]，被松井太比定为唐代地名“临川”的音写，应当是蒙古语借自当地回鹘人对“临川”的称呼[106]。

在麴氏高昌国早期，临川城即已置县。唐灭高昌国以后，临川由县降为城，而非乡或里，说明当地的聚落形态是以临川城为中心的城市聚落。前引《西域土地人物略》记从哈密方向西行至吐鲁番城的路线，提到鲁珍（柳中）城儿附近有一座“懒真城”，应即位于柳中东北的临川城，则此地在明中叶以前仍是吐鲁番盆地东部的一个重要的城市聚落。在《蒙古山水地图》中，蒲昌被记作比站，柳中被记作鲁城，高昌被记作火者，在这些城之间亦标有懒真城[107]。

如前所述，回鹘时代从东面进入高昌的官道是自蒲昌沿火焰山南麓经柳中的路线，一直沿用到明代。在上述明代的地图中，除了表示出这条路线所必经的主要城镇外，都标出了临川（懒真）城。这或许反映，当时从蒲昌沿火焰山北麓进入高昌的道路已经崛起。这条道路途经临川，出胜金口，进入高昌，而临川则是其沿线重要的城市聚落。

（7）南平城（？）

南平城今地为让布工商古城，让布（Lampu）即南平之遗音[108]。

龙谷大学藏回鹘文书Ot.Ry.1696第1行写有nampïl（ï）γ taydu ačari（南平人大都阿阇梨）[109]，其中nampï即唐代地名“南平”在回鹘文中的遗音[110]。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藏第17号回鹘文书第11行写有lampïliγ älgüzniŋ qavlal[ïq]（南平人俺贵思的菜［园］）[111]，此lampï即唐代“南平”在回鹘文中的变体[112]。

（8）新兴城（？）

虽然学界对于新兴的今地有三堡、胜金台和胜金口三种说法，但学者基本认同今日地名“胜金”（音译自维吾尔语Säŋim）,即唐代“新兴”之遗音。松井太指出，此地名在西州回鹘早期写作singiŋ，反映唐代“新兴”之读音；后来此词首音节尾音被同化为软腭鼻音，于是演变为siŋgiŋ[113]。新兴城在麹氏高昌国前期已置县，但在其晚期被取消县的建制。到唐西州时期，新兴为城一级行政单位，说明当地的居民聚落应以新兴城为中心。到西州回鹘时代，当地主要的聚落形态可能依然是城市。

（9）威神城

《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中第18行记有’Īśumä kaṃtha，哈密屯比定为桑园驿[114]，黄盛璋比定为于湛城[115]。而在地名表中，’Īśumä kaṃtha写在Tsräkyepä kaṃtha和Ḍkäcü kaṃtha两地之间，Tsräkyepä kaṃtha被比定为斯尔克普（Sirkip）城，而Ḍkäcü kaṃtha被比定为柳中城。荒川正晴认为唐代威神县之地当在斯尔克普和柳中之间，那么《钢和泰卷子》中写于两地之间的’Īśumä kaṃtha当为唐代之威神县城[116]。如果荒川正晴的比定正确，则唐代威神城为西州回鹘所使用。

（10）宁戎城

宁戎城在麴氏高昌王国前期已置县，唐西州时期降为宁戎乡。宁戎

城遗址在今吐鲁番木头沟附近之乌江布拉克古城[117]。木头沟（Murtuq）古称宁戎谷，谷中有宁戎寺（宁戎窟），即今日著名的柏孜克里克（Bäzäklik）千佛洞。松井太通过研究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所见的回鹘文题记，考证出高昌回鹘时期仍然沿用着唐西州时代的地名“宁戎”，其突厥语的转音为nižüŋ、nišüŋ或lišüŋ。在14世纪以前，西州回鹘人称宁戎窟为“nižüŋ或nižüŋ aranya”（宁戎阿兰若），称宁戎谷为“nižüŋ qïsïl”[118]。

那么西州回鹘时代宁戎城是否还被使用呢？

前引黄文弼所获回鹘文摩尼寺入历第13行有“NYZWNKdäki ’WYNW T’M ya（qasï）”，森安孝夫没能读出其中的NYZWNK和’WYNW T’M[119]。松井太将此句读作nižüŋdäki örü tam yaqasï，将nižüŋ解作“宁戎”，将“örü tam”直译为“北边的墙”，但松井太认为这是一处地名[120]。如前所述，该文书开头两行作“在〔……年……月〕初〔……〕，我们如下记下〔从〕以高昌为首的东、西诸城〔的土地上〕征收的谷物（小麦）和粟地租……”，则此处列出的nižüng（宁戎）也应当是一座城，即宁戎城。笔者认为，文书中örü tam（北边的墙）很可能就是指宁戎城北城墙，nižüŋdäki örü tam yaqasï应译作：“宁戎〔城〕的北墙〔附近的土地〕的地租。”

还有一例或可证明回鹘时代宁戎城的存在。龙谷大学藏回鹘文书Ot.Ry.1696记有如下内容：

$_1$nampílïγ taydu ačari.kimqočo toyín.ala $_2$küz ačari.qotao ačari.qontsi toyín.T（.）[ ]MYŠ $_3$saŋun.bitgäči tiräk.buyruq el igälä[ ] $_4$bašlaγčí[ ]KYNK.biz munta beš （t）oyín kiši $_5$bašlap el bodun balïq qapïγda suv sayï $_6$sözläšür ärtimiz yana bodunnuŋ （...）[mí]š $_7$quanpuγ nižüŋ buyruq alïp täŋri YW（...）

南平人大都阿阇梨、金刚主道人、阿刺忽思阿阇梨、弘道阿阇梨、观慈道人。T（.）[ ]MYŠ将军、必阇赤地略、梅禄颉igälä[ ]、八什刺护持，我们，如此（上）五位道人（僧人）为首的百姓在城门商议了河滩〔有关的事宜〕。然后，宁戎〔的〕梅禄拿了百姓的[……的]官布，天……[121]

文书提到宁戎的官员（梅禄），很可能这群百姓就是宁戎地方的百姓。他们议事在“城门”，应当就指宁戎城之城门。可知西州回鹘时代宁戎地方的行政中心仍在宁戎城。松井太将第5行suv sayï译作“水和平原”。say原意为“碛”（布满砾石的平地），可指干涸的河床、河滩；其后加有第三人称领属附加成分，显然与前面的suv构成领属关系，表示“河滩”。这应当就指流经宁戎城、流入宁戎谷的木头沟河的河床（滩）。

（**11**）丁谷城（高宁城？）

高宁城在高昌故城东二十里，今地应在吐峪沟乡[122]。吐峪沟在唐代被称为“丁谷”，突厥语称之为Toyuq，即丁谷之转音[123]。《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第23行记“Ttiyākä kaṃtha”，一般认为Ttiyākä即Toyuq的于阗语转写[124]。这说明在925年前西州回鹘治下已有名作“丁谷”的城。目前无法确定此城系沿用高昌国、唐西州以来的高宁城，还是回鹘人新筑之城。

（**12**）土尔番城（安乐城）

安乐城在麹氏高昌国时置县，在唐代被降为乡。城址在今老吐鲁番城东两公里处[125]。该城即明代之土尔番城[126]。在明朝初年，土尔番城已取代高昌城，成为吐鲁番盆地的中心，是今天吐鲁番市的前身[127]。

《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第23行记“Tturpaṇä kaṃtha”，意即“吐鲁番城”，即唐之安乐城。回鹘人进入高昌地区以后，沿用了唐代的安乐城，但以突厥语turpan取代了原来的汉文“安乐”之名。法藏敦煌写卷Pelliot chinois 2988背面留有三则回鹘文杂写，系途经敦煌的回鹘使团成员在当地所写，年代当在10世纪中叶[128]。第二则杂写显示其作者为“吐鲁番人安恩珠”（turpan-lïγ an enčü）[129]。

陈诚等一行经过土尔番城时，当地“广有屋舍，信佛法，僧寺俱多”[130]。土尔番一带成为回鹘佛教徒的聚集之地。1965年，当地农民在安乐城南的一座佛塔遗址挖土取肥时掘得一根八面锥形木柱，表面写有回鹘文，系佛教徒功德主之发愿文。其形制、性质皆与三件德藏木柱相同，结合其出土地点，应可确定其为回鹘佛教徒修建或重修此佛塔时奠基之刹木。据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先生判断，该木柱文书应作于蒙元时代以前[131]。与此木柱同时出土一陶瓮，内有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十三种佛经写本残卷、桦树皮汉文文书、梵文贝叶两叶以及二十五条回鹘文占卜木简等[132]。回鹘文占卜木简的出现说明此陶瓮埋藏时间应在回鹘时代以后。回鹘佛教僧人将寺藏经籍图书埋藏。这些时代跨度极大的文献说明此佛塔所在之佛寺年代可能相当悠久，回鹘人继承唐代的佛寺之后也继承了寺中所收藏的文献。

（**13**）**Bulayïq**城（笒林城？）

唐代笒林城今地在吐鲁番葡萄沟（Bulayïq）[133]。《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第23行列有Phalayākä kaṃtha，学者考证Phalayākä为Bulayïq之对音[134]。在930年前后，西州回鹘有Bulayïq城。此城可能就是沿用唐代的笒林城，但西州回鹘人改用突厥语Bulayïq称之。

（**14**）盐城

盐城今地在距交河故城西南约10公里的也（雅）木什，突厥语作Yemši，为汉语“盐城”的转音[135]。盐城在高昌国后期为县，在唐西州时代由县降为城，反映当地的聚落形态为城市聚落。

德藏回鹘文书Ch/U 8175利用汉文佛经废纸背面抄写，第23～28行写有如下内容：

tört ot[uzqa …] ilči-kä yemšikä barγu üč [at-ta] qodïγa bir sävig bir iš（täm）[ür bir] at altï otuzqa sombuz elči-（k）[ä] yemšikä barγu üč at-ta T[…]bir altmïš bir sävinč toyïn [bir at]

二十四日，为赴盐城的使者某某备马三匹，qodïγ-a出一匹，sävig出一匹，ištämür出一匹；二十六日，为赴盐城的使者sombuz备马三匹，T［…］出一匹，altmïš出一匹，sävinč toyïn出一匹[136]。

文书中的地名Yemši当是指唐代的盐城，今之也木什[137]。西州回鹘时代当地应该仍是城市聚落，有后代史料为证。陈诚一行曾途经盐泽城，应即盐城，记当地风貌作：“盐泽城，在崖儿城之西南，去土尔番城三十里，城居平川中，广不二里，居民百家。”[138]说明了盐城一直被沿用到15世纪初叶。在《蒙古山水地图》中盐城作掩失[139]，位于土鲁番与脱辛（托克逊）之间。

（15）无半城

在《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第24行第1个出现，作“Bapaṇä kaṃtha”，即“无半城”[140]。

（16）羊黑城（酒泉城？）

高昌国之酒泉县，在唐代降为酒泉城，属柳中县。考古工作者将今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村洋海古墓群西南6公里处古城遗址比定为酒泉城遗址[141]。此城之名不见于后世文献和出土文书。《蒙古山水地图》在鲁城与火者之间绘有一城，标为“羊黑”[142]。《西域土地人物略》记：“鲁真北为羊黑城儿，又西五十里为哈剌火者”[143]。此羊黑城儿从读音和相对位置看，应在今吐峪沟乡洋海村内。说明迄至15世纪，在柳中和高昌之间的要道上已经有一个以羊黑城为中心的聚落。或许此城就是继承自唐西州时代的酒泉城，但其位置与考古工作者所定酒泉城遗址所在不能吻合。羊黑一名或来自突厥语yaŋï（“新”），也有可能此城是西州回鹘人新筑之城。

（17）洗儿启

此地不见于高昌国及唐西州的建制中，首见于《钢和泰卷子》于阗

文地名表第18行，作Tsīrākyepä kaṃtha，学者按对音还原作今地名Sirkip[144]，说明西州回鹘在当地有一城。维吾尔语今地名Sirkip可音译作斯尔克普，地在吐鲁番与鄯善县间，但当地迄今尚未发现城郭遗址[145]。

《蒙古山水地图》鲁城（柳中）右下、懒真上方绘有一城，标作洗儿乞[146]，但不见于《西域土地人物图》。林梅村先生将其还原为突厥语sarïčï，意为黄池，认为其地在今托克逊县西南，今称“阿克布拉克”，并可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阿父师泉”、《西域行程记》中的“奚者儿卜剌”勘同[147]。这种比定显然有误。首先，地图中明示此地为一城，而非一池或一泉。其次，托克逊县在吐鲁番盆地西陲，那里的地名不应出现在此局部。

洗儿乞元代音作/si rṛ khi/，与sarïčï第三音节起首有重大差别。除收尾清辅音/p/外，此名准确地反映了突厥语sirkip的读音。结合前引《钢和泰卷子》的证据，此城应当就是西州回鹘的Sirkip城。斯尔克普今地在连木沁与鲁克沁之间，这与地图中洗儿乞城与鲁城、懒真二城的相对位置完全符合。

（**18**）赤亭

赤亭地在鄯善东之小绿洲，唐西州时代始在当地设立镇城、馆驿和烽燧等军事邮驿设施。西州回鹘继承唐代的地名赤亭，在突厥语中转写作čïqtïm。种种迹象表明，唐代的军事据点赤亭镇在回鹘时代已经形成一个居民聚落。芬兰藏回鹘文书SUS 2.49.1系一件遗嘱。森安孝夫据文书内容和形式判断，其应与出自赤亭遗址的德藏U 5243（T II Čiqtim 5）为同一人写成[148]。这一推测后来被马达汉私人信件中的细节所证实：该文书的出土地点就是赤亭故城[149]。文书第11～16行记有如下内容：

$_{11}$mäniŋ qadïnlarïm tiräkä altïmïša bašlap $_{12}$ävtäki qadïnlarïm mäniŋ tuγmïšlarïm $_{13}$kim yemä čamlamazunlar čamlasarlar.$_{14}$ičgärü aγïlïqqa bir altun yastuq $_{15}$qočo bägiŋä bir at balïq bägiŋä bir $_{16}$ud berip aγïr qïynqa tägzün…

以我两妻tiräkä、altïmiša为首的在家中的姻亲们、我的子孙们：愿他们不再争执。如他们发生争执，则让他们交一金锭给内藏库（ičgärü aγïlïq），交一匹马给高昌〔城？〕主，交一头牛给城主，然后受严厉的惩罚……[150]

森安孝夫指出，文中的城主应指文书出土地赤亭城之城主[151]，其说甚是。但他据此推测唐朝赤亭之地就已经有城镇聚落，所谓赤亭镇是一城加一镇[152]，则实难信从。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代赤亭地方设有赤亭镇、赤亭烽，显然是西州之下远旷之地。赤亭地方镇兵需要营田自

给自足，应当没有居民聚落。当时的赤亭镇城是纯粹的军事戍堡，周围并无供民用的城址。回鹘时代的赤亭城显然是继承了唐代的军事戍堡赤亭镇城，将其作民用，并以其为中心形成聚落。此外，认为赤亭在西州回鹘早期就已经形成城市聚落，应当位列西州“廿二城”之一。但目前所见与赤亭有关的回鹘时代文书基本属于蒙古统治时代，前引文书即被学者比定在蒙古时代[153]。蒙古时代西州回鹘境内已有24座城，笔者认为赤亭更可能是在回鹘统治时代新发展出来的城市聚落，或许并不在西州回鹘统治初期沿用唐代的22座城之中。

（**19**）托逊（笃进、兔真、脱辛）

高昌国之笃进县在唐西州时代被撤销建置，改属天山县。到西州回鹘时代，笃进之名借入回鹘语，作“Toqsïn”。俄藏回鹘文书SI Uig 14由4件供出文书组成，其中第2件文书提到地名“Toqsïn”（笃进）[154]。

陈诚《西域行程记》记其一行从崖儿城（交河）向西行后，经过小城“托逊”[155]。《蒙古山水地图》标记掩失城西为脱辛城，再西为速巴失[156]。托逊、脱辛即唐代“笃进”，指今日之托克逊。《西域土地人物略》记从吐鲁番西行往叉力失（焉耆）的道路，作：“吐鲁番西二百里为俺石城儿：城南有俺鼻城儿，北有撒剌池。又西五十里为苏巴失：北有兔真城。又西二百里为昆迷失：其南有白山儿，其山东至俺鼻城，行六日。”[157]“脱辛”“兔真”两名反映突厥语“Toqsïn”，而“托逊”则显示出该名第二音节已受首音节影响变为圆唇元音，说明在15世纪左右，此地名出现“Toqsun”之读音，后来逐渐成为标准读音。

（**20**）脱谷思城

《蒙古山水地图》中在吐鲁番盆地东部的局部绘有一城，标作“脱谷思”[158]，该名不见于同期的《西域土地人物图》等地图和文献中，引人注目。林梅村教授考释该地名作：“突厥语地名，源于突厥语toquz（九），《蒙古山水地图》标在‘比站’（今新疆鄯善县）之北。”[159]将此名还原为“toquz”，在语音上毫无问题，但林先生没有在文献中找到对应的城市。地图中，此城位于比站（蒲昌）下方略偏左，其相对位置相当于同一局部懒真与鲁城的相对位置。林先生已经准确指出，懒真即今连木沁，鲁城即今鲁克沁。连木沁在鲁克沁东北方向，因此，图中“脱谷思”的实际方位应当在比站的东北方向。比站所在的鄯善绿洲是吐鲁番盆地东边较大的绿洲，其东北方向可能有城市聚落的地点只能是七克台绿洲，即古赤亭之所在。因此，脱谷思的地理位置应当定在赤亭一带。

笔者没有在汉文文献中检索到“脱谷思”这一地名，但在回鹘文出土文书中找到可以勘同此地的证据。原藏德国的回鹘文书*T II 3（Čiqtim 3?）系德国探险队于第二次吐鲁番探险所得，Čiqtim显示其出土地点当

在赤亭古城遗址。此件文书在二战中丢失，所幸土耳其突厥学家阿拉特在德国学习、工作期间曾摄有此件文书的照片，并在二战前将照片带回土耳其，使我们今日仍得见文书面貌。现将文书转写、汉译如下。

$_1$tavïšγan yïl aram ay bir yaŋïqa män aram $_2$q（ï）ya qïnïsun birlä yuŋlaq（?）-lïq čo k（ä）rgäk bolup $_3$töküz-täki tarïγ tarïmaq-ča yer-ni altmïš-aq-qa $_4$apam-qa on eki sïtïr čo yaq-a-sïn elig-tä $_5$alïp bertimiz tanuq sïsïdu tanuq toyïn bo $_6$tamγa biziŋ ol män qïna özüm bitidim

兔年正月初一，我阿蓝乞牙（aram qïya）与乞尼孙（qïnïsun）一起需要用钞，将位于töküz的、用于种庄稼的地给俺惕迷失（altmïš-aq）、给我的祖父，我们收其地租12两钞。见人慈氏奴（sïsïdu），见人脱因（toyïn），此印为我们的。我乞那（qïna）手书。

以“钞”作通货的事实透露文书写作的年代当在元朝统治吐鲁番盆地之时，其时间上限应为元世祖颁行中统宝钞纸币的1360年。文书提到地名Töküz，读音上可以勘合《蒙古山水地图》中所标“脱谷思”。更重要的是，该文书出土地点为赤亭故城，说明Töküz之地应当在赤亭故城不远，而地图反映出脱谷思正在鄯善东北方向。我们当可确定，脱谷思就在七克台绿洲。

那么，是否元代回鹘人就称赤亭城为Töküz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出土于赤亭故城遗址的德藏回鹘文书U 5330（T II Čiqtim 4）也属于蒙古统治时代，其明确写出当时当地名作“赤亭”（Čïqtïn）[160]。俄藏回鹘文书SI.O 39上书两件蒙古时代的赋役文书，写明从蒲昌、赤亭两地征税[161]。学者已经指出，唐代地名赤亭在回鹘文中的形式就是前述的Čïqtïn，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才演化为以唇鼻音收尾的čïqtïm[162]。另外，陈诚一行在1441年从哈密进入吐鲁番盆地，在鄯善绿洲（必残）前经停一地，地名即赤亭[163]。

陈诚在其行记中没有提到脱谷思城，而《蒙古山水地图》标鄯善（比占）东北为脱谷思，未记赤亭。这说明脱谷思城所在的位置应当就是赤亭绿洲。考古调查显示，古赤亭所在之鄯善县七克台镇一带不止一座城址。除南湖乡的赤亭守捉城以外，库木坎儿孜村二队西盐池南侧隘口西侧台地上还有一城址，有学者推测其为唐代之罗护镇[164]。《新唐书地理志》记：“自〔纳职〕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萁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罗护守捉；又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165]罗护守捉距赤亭守捉尚有190里，说明其地并不在赤亭绿洲内。而且《新唐书地理志》的文意也表明，到达赤亭守捉所在赤亭的绿洲时此路才与伊西路故道相合。可知，罗护守捉不可能在赤亭绿洲。我们有理由将这个同样位于赤亭绿洲的城址与文献所见的脱谷思联系起来。而考古调查显示，该城的遗存断代在唐到清[166]，很可能是唐代的基础设施被回鹘人沿用，发展成为一座城市。

（21）母六秃 ＝（10）宁戎？

《蒙古山水地图》土鲁番城左下绘有一城，标作母六秃，即突厥语地名Murtuq[167]。该城不见于唐代及以前文献的记载。土鲁番右下表牙儿，即交河。交河故城实际在吐鲁番市西北，据此判断，此城应位于吐鲁番市东北之木头沟一带，因地而名。

前文（10）论述了唐西州时代的宁戎城在西州回鹘时代得到沿用。唐代的宁戎城、宁戎谷、宁戎窟等地名也一并被保留。但宁戎这一地名后来被突厥语地名Murtuq所取代，并沿用至今。一种可能是，明代地图所记母六秃城就是宁戎城，只是其名称已经换作来自突厥语的Murtuq。

笔者从9～15世纪文献、文书资料中搜集吐鲁番盆地城市聚落的信息（表4-2），大致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高昌国-唐西州以来在吐鲁番盆地形成的城市多数都被西迁而来的回鹘人所继承，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城市的名称也大都得到保留。②除了唐西州时代的城市设施以外，西州回鹘人还在唐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吐鲁番盆地的绿洲资源。譬如，在吐鲁番东端的赤亭绿洲，他们以唐朝建立的军事设施为基础继续开发，在回鹘时代新增了赤亭和脱谷思两座城市。洗儿乞之地在鄯善、柳中的大道中，同时又在柳中与连木沁之间的要道上，是东方进入吐鲁番盆地的孔道。随着丝绸之路交通的发展，在回鹘时代这里悄然形成了一个城市——洗儿乞。这些新兴的城市体现着回鹘时代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兴盛，是吐鲁番绿洲被回鹘人进一步开发的标志。③一些唐西州时代的城市在后代的文字记录中悄然泯灭，但在其相同或相近的地点，有带有突厥语名字的城市出现。这有可能是突厥语城名取代了汉语城名，也有可能是当地绿洲聚落的发展导致原有城址变迁、更新。这种情况也应被视为回鹘对唐西州时代已开发的绿洲的继承发展。

表4-2 吐鲁番盆地城市源流7～15世纪

	高昌国后期	唐西州	西州回鹘王朝	13~14 世纪	15 世纪
1	高昌城	高昌县	西州、高昌、和州城＝Qočo	火州、合剌火者城＝(Qara) Qočo	火者城
2	田地城	柳中县	柳中、六种城＝Lükčüŋ	鲁古尘、吕中城＝Lükčüŋ	鲁陈、鲁珍、鲁城
3	交河城	交河县	交河城＝Yar	Yar	崖儿城
4	白艻城	蒲昌县	蒲昌城＝Pučaŋ	Pučaŋ	必残、北昌、比站城
5	笃进城	天山县	Toqsïn	他古新＝Toqsïn	兔真、脱辛、托逊（*Toqsun）城
6	横截城	横截城	Qoŋtsïr	Qoŋsïr	
7	临川城	临川城		Limčin	懒真城
8	南平城	南平城	Lampï ~ Nampï		？俺鼻城
9		新兴城	Singiŋ	Siŋgiŋ	
10	威神城	威神城	'Īśumä 城	Soim	
11	宁戎城	宁戎城	宁戎城	？Murtuq	？母六秃城
12	高宁城	高宁城	？Ttiyākä 城	？Tïyoq	
13	安乐城	安乐城	Turpan 城	Turpan 城	土尔番、土鲁番城
14	洿林城	洿林城	？Bulayïq 城		

续表

	高昌国后期	唐西州	西州回鹘王朝	13~14 世纪	15 世纪
15	盐城	盐城		Yemši	掩失城、俺石城
16	无半城	无半城	Bapąnä 城		
17	酒泉城	酒泉城			? 羊黑城
18			Tsīräkyepä 城	Sirkip	洗儿乞城
19		赤亭镇	泽田（*Čïqtïn）	Čïqtïm 城	赤亭
20				Töküz	脱谷思城
	永安县	永安			
	武城	武城			
	始昌	始昌			
	永昌	永昌			
	安昌	安昌			
	龙泉	龙泉			

注：确定为城者方标“城”字。

宋元之间伊州地区独立政权的出现

13世纪中叶，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由塔里木盆地进入河西走廊，再从张掖一带北行，经额济纳进入蒙古高原，到达哈剌和林。作为塔里木盆地东端的交通咽喉，哈密绿洲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有专门的章节记载。关于当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马可波罗行纪》写道："哈密（Camul）州昔是一国，境内有环以城垣之城村不少，然其要城即是哈密。此州处两沙漠间，一面是罗不大沙漠，别一面是一广三日程之小沙漠。居民皆是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土产果实不少，居民恃以为生。其人爱娱乐，只知弹唱歌舞。设有一外人寄宿其家，主人甚喜，即命其妻厚为款待，自己避住他所，至外人去后始归。外人寄宿者，既有其主人妻子作伴，居留久暂惟意所欲，主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妇女类皆美丽，全州之中皆使其夫作龟，其事非伪也"[168]。

上述记载可能是现存有关13世纪后半叶哈密地区最为珍贵的历史记录。它清楚地反映了在蒙元政权统治以前，哈密地区曾经有一个独立的政权，统治着以哈密城为中心的各城镇[169]。到13世纪后半叶，哈密地区的居民已经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和族群认同。马可波罗称哈密"居民皆是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在元朝颁布的诏书中，原西州回鹘地区的居民被称为"畏兀儿"；而哈密地区的居民则被称为"哈密里"，与"畏兀儿"并立[170]。哈密的首领称"的斤迭林"，可还原为突厥语Tegin Tärim，与畏兀儿首领亦都护不相统属。自9世纪中叶以来，以西州和北庭为中心的西州回鹘政权一直是东部天山地区的主要势力。其治下的回鹘民众以信仰佛教著称，发展出独特的佛教文明。而根据传世史料和出土文字资料可知，到蒙元时代，哈密地区的居民也同样操古突厥语、信仰佛教。笔者将钩稽9～13世纪各种资料中所见有关哈密地区的记载，梳理哈密地区族群成分变化的过程，并讨论当地独立政权出现的大致时间。

1.晚唐以降哈密地区族群成分的变化过程

哈密古称伊吾或伊吾卢，地处东部天山地区的最东端，同时扼守着中原地区和蒙古高原进入西域的要道，在历史上一直是制霸西域的必争之地。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171]，开始了中原王朝对哈密地区的直接经营。东汉一代，西域凡三绝三通，伊吾卢屯田也因之三罢三复。西晋起在当地置伊吾县。其后该地先后受前凉、西凉、柔然、北魏、突厥汗国的统治。隋炀帝大业年间遣军进据伊吾，在汉故伊吾城东筑新城，置伊吾郡。英藏敦煌写本S.367《光启元年（886）沙州伊州地志》记："隋末，伊州

复没于胡。”[172]由此可知，隋朝置伊吾郡以前，哈密地区的主体民族已经是粟特胡人。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朝攻灭东突厥汗国，促使伊吾地方胡人举城归唐，唐朝始在此地置西伊州。634年，伊州升为正州，下辖伊吾、柔远和纳职三县，成为唐朝经略西域的基地，汉人开始移居此地。此后，唐朝经营伊州百余年，直到安史之乱。到776年以前，唐伊州陷落于吐蕃之手，唐朝的统治结束。850年，归义军攻取伊州。据《光启元年（886）沙州伊州地志》记载，“大中四年（850），张议潮收复〔伊州〕，因沙州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173]。这反映出经过吐蕃近一个世纪的统治，伊州当地汉人势力已经大大减弱，而多有羌、龙家等部落分布。同文书又有：“风俗，有文字。田夫商贩之人，唯有平铁为鏊，冬夏常食饼，无釜甑之具，杯碗匙筯皆不蓄。……其俗又不重衣冠，唯以多财为贵。”[174]显然，当地土著居民的风俗、文字与汉人不同。荣新江先生已准确指出，上述记载所反映的正是粟特人的风俗，但他暗示文书所描述的应是隋末伊州的情形[175]。笔者认为，这则材料更可能是对归义军时代伊州情况的反映。自隋末以来，伊州当地多有粟特人居住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归义军统治时期。在9世纪中叶，伊州应当是粟特人、汉人以及羌、龙家等部族混居。

在归义军攻取伊州的同时，东部天山地区的其他地方突厥-回鹘化的进程加剧。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原本居于漠北草原地区的回鹘人大批进入东部天山地区，形成若干大小势力。归义军政权与这些回鹘势力之间和战不定。851年，归义军派出使者与西州的回鹘首领安宁同时入唐朝觐，反映了其与盘踞在西州的回鹘势力之间关系的密切[176]。与此同时，伊州下属的纳职县一带却已被另一批回鹘人攻占。法藏敦煌文书P.2962号《张议潮变文》记有：

敦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856）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不经旬日中间，即至纳职城。贼等不虞汉兵忽到，都无准备之心。我军遂列乌云之镇，四面急攻。蕃贼獐狂，星分南北；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煞戮横尸遍野处：

（唱词略）

仆射与犬羊决战一阵，回鹘大败，各自苍黄抛弃鞍马，走投入纳职城，把劳（牢）而守。[177]

则至迟在大中十年之前，伊州西边的门户纳职已经为回鹘人所占据。张议潮对纳职回鹘的亲征并没起到明显的作用；相反，回鹘人持续威胁着归义军对伊州的统治。同年稍后，唐朝奉命赴安西册封庞特勤的持节使者王端章又在“雪山南畔，被背乱回鹘劫夺国信”。[178]十一年，又“有背叛回鹘五百余帐，首领翟都督等将回鹘百姓已到伊州侧”。[179]这些背乱（叛）回鹘显然就是盘踞在纳职一带的回鹘[180]。敦煌藏文文书P.t.1109反映，归义军在同年8、9月间击败了这批回鹘人，守住了伊

州城[181]。根据上述材料可知，哈密地区的回鹘化至迟始于856年，回鹘人的势力首先盘踞在绿洲西侧的纳职一带。

公元866年，回鹘首领仆固俊率部在北庭崛起，其势力经过曲折发展，逐渐扩大至东部天山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起西州回鹘政权。本书第二章曾详细论说这一过程。876年，西州回鹘向东扩张，吞并伊州。到9世纪末或10世纪初，西州回鹘已经攻灭安西回鹘，统一东部天山地区，声势震动中亚。种种迹象显示，此后西州回鹘一直保持着对伊州的统治。唐朝灭亡以后，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建立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帝，图谋占有归义军名义上管辖的十一州之地。他曾遣精兵一千出击伊州，欲夺回此城，但未能如愿[182]。前引写于925年的《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第17～25行列有当时西州回鹘治下的地区名目，在第17行先后出现’Īcū和Dapäcī两地名，已被学界比定为伊州和纳职，表明当时伊州地区完全掌握在西州回鹘手中。

回鹘人自9世纪下半叶起占领伊州地区，逐渐改变了当地的族群成分和文化面貌。一件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书可以反映这一趋势。该文书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共有两叶残片（A、B）。B片末行（19）写有mani burxan（摩尼佛）字样，表明文书的摩尼教属性。文书列有摩尼教信众名目，A片前两行出现人物qamïllïγ küdägümüz oγul ïnanč tiräk känč（我们来自哈密的女婿——斡兀立·伊难·地略·见支）[183]。这位回鹘摩尼教徒出身哈密，带有“地略”的官称。前引S.367号《光启元年（886）沙州伊州地志》列举了伊州境内各地的寺、观等宗教场所，特别提到了伊吾县的火袄庙[184]，但并没有提到摩尼教。可能直到归义军占领时期，摩尼教团在伊州地区尚没有强大的势力。早在漠北汗国时期，摩尼教即被回鹘人奉为国教，直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方被佛教所取代[185]。这件文书很可能反映了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摩尼教随回鹘势力进入伊州的情形。

1959年，一位牧羊人在哈密天山区铁木耳图一处山坡上发现了一批回鹘文佛经写本，其中包括著名的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和《十业道譬喻鬘》，广受学者瞩目。《弥勒会见记》的题记写道：

yemä alqatmïš ayqa küsänčig künkä ödrülmiš ädgü ödkä qutluγ qïvlïγ qoluqa qutluγ qoyn yïl žiin üčünč ay eki otuzqa…[taqï] yemä bu buyanaγ äŋ öŋrä ävirär biz täŋri bögü el bilgä arslan täŋri uyγur tärkänimiz qutïŋa alqatmïš on uyγur eli: otuz tigit oγlanï：toquz elči bilgäsi: miŋ tapïnur tümän ičräkiläri birlä miŋ tümän yïlqa tägi el ašayu yarlïqamaqlarï bolzunlar :…

时在被赞之月、企盼之日，择良辰吉时，未年闰三月廿二日……复次，我们最先将此功德回向我们的圣天牟羽颉毗伽阿萨兰圣天回鹘大汗陛下。惟愿陛下与受赞美的十姓回鹘国的三十特勤王子、九大臣、一千仆人、一万侍臣一起享国，直到千秋万载……[186]

题记的纪年已由森安孝夫考订为1067年[187]。题记显示，抄经功德主应来自“受赞美的十姓回鹘国”（alqatmïš on uyγur eli），即西州回鹘王朝。所谓的“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应是在西州地区抄成，而后被带入哈密地区的。11世纪正是回鹘佛教兴盛之时，回鹘佛教显然随着哈密地区的回鹘化而逐渐在当地盛行。回鹘佛教文化传统应当一直延续到蒙元时代，如前引《马可波罗行纪》所载，当地“居民皆是偶像教徒”。

2.哈密当地独立政权出现的年代

自876年西州回鹘攻占伊州以来，哈密地区逐渐完成了族群成分和宗教文化层面的回鹘化。如前节所论述，其宗教文化上的发展变化呼应着西州回鹘王朝的中心吐鲁番地区的宗教文化发展轨迹。无论在族群认同上还是文化上，哈密地区的回鹘居民都与以吐鲁番、北庭为中心的西州回鹘居民区别不大。那么在政治上，哈密的回鹘人是从何时开始与西州回鹘政权分立而治的呢？

北宋使者王延德所撰《西州使程记》记录其一行于982年出使西州回鹘的经历，其途经哈密地区的行程作：“次历小石州。次历伊州，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188]敦煌出土的归义军时代文书中数次出现“伊州使”字样。比如，英藏敦煌文书S.1366号《归义军宴设司面、酒破历》同时提到“西州使”和“伊州使”，该件文书写成于980年[189]。一些学者据这两种材料推断，自10世纪后半叶以来，伊州已经是独立于西州的政权[190]。这种论断并不可靠。开元以后统领伊州的唐朝官员有史可查，并不见有陈姓州将世袭统领伊州者。王延德所见之事，应是当地汉人首领假托唐朝旧将之后，可能希望借此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回鹘人在攻占东部天山之初，就普遍启用各地土著势力维持当地固有统治秩序。在东部天山不同地区分别占有优势的汉人、突厥语族各部、佉沙人、粟特人等势力均有得到回鹘统治者重用的案例，他们原有的统治形式也被一直沿用。因此，伊州当时虽然有汉人州将主政，却未必是独立于西州回鹘的势力。另外，所谓“伊州使”也未必能说明伊州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在当时的汉文书写中，时常以派出地而非政权所属地来标明使者的身份。从属于沙州归义军政权的瓜州也曾与沙州同时派出使者入贡后唐[191]。喀喇汗王朝在11世纪多次遣使入宋，但其使者皆被宋朝史官归为于阗使，即因其使者自于阗进入中原[192]。

《契丹国志》《文献通考》等史料记载，向辽朝进贡贸易的诸小国中有“小食国”。黄时鉴先生曾将其考订为石国（塔什干）东北百余里的“小石城”，也即《大唐西域记》中的笯赤建国[193]。而胡小鹏先生则考订其应为哈密东部的“小石国”，即王延德往伊州的前一站小石州[194]。胡氏的考证依据的资料更加充实，因此其说更具有说服力。他在文中进一步指出，此小食国与高昌、甘州、沙州并列，说明其独立于西

州回鹘，且在甘、沙州没入西夏前已经独立。随后，他联系元代史料中哈密里作为独立政权的史实，指出伊州在当时即已是独立政权，此政权就是“小食”[195]。但这种论断有着逻辑上的漏洞：如果伊州及其东侧的小石城已经是独立的势力，此政权更应当以伊州或哈密得名。因为从唐代到元代的各种资料显示，伊州（哈密）城一直是哈密地区的中心城市，该地区的独立政权不应以其东侧边陲的一座小城而得名。而“小食”与高昌、沙州等并列的情况，很可能也只是表明进贡使者的出使地，而非其政权。

讨论伊州的归属问题，还需要充分考虑有关西州回鹘的历史资料。9世纪后半叶以降，西州回鹘势力在东部天山地区站稳脚跟，并不断向外扩张。到10世纪，它已然成为中原王朝与中亚伊斯兰世界之间最为强大的势力。英藏敦煌文书S.6551号《讲经文》记当时西州回鹘“遂得葛禄、药摩、异貌、达怛竟来归伏，争献珠宝；独西乃纳驼马，土蕃送宝送金；拔悉密则元是家生，黠戛私则本来奴婢。诸蕃部落，如雀怕鹰，责（侧）近州城，如羊见虎，实称本国，不是虚言”[196]，反映了930年前后西州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强盛。成书于回历372年（982～983）的波斯语历史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Ḥudūd al-ʻĀlam*）详细记载了托古兹古思（Tuġuzuġuz）的国家和疆域[197]。米诺尔斯基已准确指出，此托古兹古思即为西州回鹘[198]。该文献记道：“其东为中国；其南为吐蕃的数部和葛逻禄；其西为黠戛斯的数部；其北方，也有黠戛斯人沿其国分布。其国是突厥诸国中最大者……”[199]其后列有托古兹古思治下各地区，第9个写作ḪMWD（*ḪMWL），应指哈密[200]。

成于1019年的德藏第三木柱铭文则明确记载西州回鹘的势力向东已经影响到沙州[201]，则当时伊州应当在西州回鹘的版图之内。此木柱为新建佛寺的刹木，铭文第17行起开始列举奠基仪式随喜的西州回鹘高级官员的名字，依次有el ögäsi ata ögä el qaya（颉于迦思阿多于越燕海牙）、sr tarxan ögä qaym（色黑鲁达干于越海迷失）、qamïl ögä ïnal bürt（哈密于越夷男孛鲁特）[202]。可见为首的官员官职为颉于迦思，乃西州回鹘宰相一级的高官。而其余两人的称号中亦有“于越”，应当是同一级别的高官。第三人的称号为“哈密于越”，引人注目。9世纪以降，回鹘人便有以于越一级的官员管理西州地区的例子。851年入贡唐朝的西州回鹘牧守安宁便戴有“颉于迦思”的头衔[203]。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回鹘文书中，也可以看到颉于迦思掌管西州本地事务的证据——钤在文书上的“颉于迦思”朱印[204]。在《西州使程记》中，王延德记道：“时四月，师子王避暑于北庭，以其舅阿多于越（*Ata gä）守国。”[205]可见当时管理西州地区政务的最高长官是“于越”一级的官员。那么第三木柱中出现的名为夷男孛鲁特（ïnal bürt）的哈密于越（qamïl ögä），很可能就是当时西州回鹘所任命的伊州地区的行政长官，也是“于越”一级的官员。综上，考虑到西州回鹘9世纪末以来在天山地区的强势发展，笔者认为，直到11世纪上半叶第三木柱文书写成的时代，伊州在多数时间内都掌握在西州回鹘的手中；或许在某些时候，其东部的小石城曾有过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

伊州地区彻底脱离西州回鹘统治应当是在11世纪中叶以后。《突厥语大词典》“回鹘”词条记有：“此公国由五座城组成，此五城之民乃异教徒中最为悍勇者，是最好的射手。这五城是：唆里迷由Ḏu-l Qarnayn所建；然后是高昌；然后是彰八里；然后是别失八里；然后是仰吉八里。”[206]这五城中不但包括东部天山地区的主要地区高昌、焉耆（唆里迷）和北庭（别失八里），还包括此前不见于经传的新兴城市彰八里和仰吉八里，却没有提到东部天山东端的门户伊州（哈密）。《突厥语大词典》成书于10世纪70年代，或在此之前伊州已经独立于西州回鹘政权。

哈密独立的原因在传世的资料中虽然无迹可寻，但考虑到11世纪上半叶中亚地区政治环境的变化，这种情况的发生合乎情理。到10世纪末为止，西州回鹘王朝和喀喇汗王朝分别在中亚东部和西部建立起强大的政权，两支势力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到1019年以前，西州回鹘更占上风，他们的势力推进到乌什和伊塞克湖南岸的拔塞干一线，直逼喀什。此后，喀喇汗王朝不断向东进取，到11世纪70年代，他们已经将前线推进到龟兹一带。11世纪中叶，西州回鹘在与喀喇汗王朝的竞争中渐处下风，其西侧的领土不断失守，其军事行动的中心显然在王国的西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西州回鹘最东端的哈密不再受其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金史·粘割韩奴》记有：“〔天会〕八年（1130），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讨大石，征兵诸部，诸部不从，石家奴至兀纳水而还。余睹报元帅府曰：‘闻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与夏人合，当遣使索之。’夏国报曰：‘小国与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207]西夏的疆域向西直到沙州，这则史料暗示了当时在沙州和西州之间还有独立的伊州政权存在[208]。随着西辽在中亚建立霸权，西州回鹘本身也丧失了独立性。直到蒙古崛起之时，哈密都不再统属于西州回鹘。据《元史》记载，西州回鹘国主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归顺成吉思汗之后，“与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锁潭、回回诸国，将部曲万人以先”[209]。所谓“罕勉力”正是哈密回鹘语原名Qamïl的异译。

小结

8世纪末以来，伊州之地先后受吐蕃和归义军政权统治。回鹘人的势力从9世纪中叶开始向哈密地区渗透。876年，西州回鹘攻取伊州，从此开启了哈密地区全面回鹘化的时代。9世纪末至10世纪，西州回鹘政权称雄东部天山地区，并不断尝试向东西两个方面扩张，哈密地区一直受西州回鹘控制。这种局面至少延续到11世纪20年代。11世纪，西州回鹘一直处于与喀喇汗王朝激烈的竞争中。到70年代，其西面的疆域已经收缩到了焉耆一线。可能正是在这期间，哈密地区脱离了西州回鹘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哈密独立政权一直延续到蒙元时代。当地居民虽然同为信仰佛教的回鹘人，但已经形成了与原西州回鹘地区的畏兀儿人不同的族群认同。

[1]P.Zieme, “Ordo uluš, Solmı and Bešbalık”, pp.255-266.

[2]P.Zieme, “Ordo uluš, Solmı and Bešbalık”, p.256.

[3]http://turfan.bbaw.de/dta/mainz/images/mainz0354_seite1. jpg.

[4]笔者在转写时做如下处理：回鹘文未表记之元音全部按古突厥语完整形式补出；构型、构词附加成分不与词干连写者全部连写（因换行分写者加连字符）。

[5]茨默在转写中补kün（日），但又在译文中作：“在第二个［月？］，在自恣日过去之后，他……”（P.Zieme, “Ordo uluš, Solmı and Bešbalık”, pp.257-258）笔者认为在ekinti后补kün正确，原文应解作：在自恣日后的第二天。

[6]第17行qon应为qoyn～qoy（羊）的异写，uluγ köč qon birlä应作“带着羊〔群〕［做］大迁徙”。茨默将其译作“在大迁徙中”（P.Zieme, “Ordo uluš, Solmı and Bešbalık”, p.258）。

[7]P.Zieme, “Ordo uluš, Solmı and Bešbalık”, pp.255-266.

[8]〔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61～62页。

[9]（清）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朱玉麒校注，中华书局，2005，第172～174页。

[10]大谷探险队调查报告和平面图参见上原芳太郎编『新西域記』下卷、有光社、1937、491-492頁；斯坦因调查报告和平面图参见A.Stein, Innermost Asia, vol.2, Oxford, 1928, pp.553-558。

[11]回鹘西大寺的考古简报参见孙秉根、孟凡人、陈戈《新疆吉木萨尔回鹘佛寺遗址》，《考古》1983年第7期，第618～623页。供养人画像、题记照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详细考古报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第172页。

[13]图片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彩版10。

[14]H.Umemura, “A Qočo Uyghur King Painted in the Buddhist Temple of Beshbalïq”, Turfan, Khotan and Dunghuang, Berlin, 1996, pp.361-378.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第172～173页。

[16]N.Sh.Steinhardt, “Beiting: City and Ritual Complex 1”,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7, 2001, pp.223-262.

[17]上述1980年对北庭城的考古调查报告参见孙秉根、陈戈、冯承泽《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考古》1982年第2期，第165～175页。

[18]孟凡人：《论别失八里》，《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119～123页；N.Sh.Steinhardt, “Beiting: City and Ritual Complex 1”, p.228。

[19]《辽史》卷二，第22页。

[20]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1955、363頁；（汉译本）《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264页。嶋崎昌『隋唐時代の東隋唐时代の东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200-201頁；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2期，1978；此据氏著《蒙元史研究丛稿》，第27页；华涛：《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第25页。

[21]对此比定的不同意见参见前田直典「十世紀時代の九族韃靼：蒙古人の蒙古地方の成立」『東洋学報』32-1、1948；此据氏著『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250頁。

[22]《宋史》卷四九〇，第14113页。

[23]V.Minorsky, Ḥudūd al-ʻ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94.

[24]据J.R.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ecle de Touen-Houang, Paris, 1986, pp.58-59。参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第211～214页；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第80～82页。

[25]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第88～89页。

[26]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第7～199页。

[27]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第3～4页。

[28]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第5页。

[29]百済康義·ヴェルナー—ズンダ—マン·吉田豊『イラン語断片集成·大谷探検隊収集·龍谷大学所蔵中央アジア出土イラン語資料』、69頁。

[30]百済康義·ヴェルナー—ズンダ—マン·吉田豊『イラン語断片集成·大谷探検隊収集·龍谷大学所蔵中央アジア出土イラン語資料』、69頁。

[31]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第24页。

[32]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第24～36页。

[33]T.Moriyasu, “Chronology of West Uighur Buddhism: Re-examination of the Dating of the Wall-paintings in Grünwedel’s Cave No.8 （New: No.18）, Bezeklik”, p.209.

[34]K.Röhrborn, “Šıngqo Šäli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Übersetzungstätigkeit bei den Uiguren, Turkology Heute—Tradition und Perspektive”, Materialien der dritten Deutschen Turkologenkonferenz, ed.by N.Demir & E.Taube, Wiesbaden, 1994, pp.255-260.

[35]《宋史》卷四九〇，第14112～14113页。

[36]Mahmud al-Kašγari,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p.139-140.

[37]（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第572～573页。

[38]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557～558页。

[39]（元）赵孟頫：《全公神道碑铭》，《松雪斋文集》卷七；此据《赵孟頫集》，任道斌校点，杭州古籍出版社，1986，第154～155页。

[40]G.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84.

[41]G.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p.549.

[42]J.R.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Paris, 1955, p.156;（汉译本）《五代回鹘史料》，第172页。

[43]德藏第二木柱文书记"天公主居邪蜜施登林"，可还原为回鹘文"täŋri qunčuy küsämiš täŋrim"，参见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706-707頁。

[44]英藏敦煌文书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中记有"天公主邓林""邓林公主"，参见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第24页。

[45]《元史》卷一三〇，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第3174页。

[46]《元史》卷一三〇，第3174页。

[47]（元）程钜夫：《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程雪楼文集》卷六；此据《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洪武本影印本，1970，第278～279页；《元史·孟速思传》（卷一二四，第3059页）所记大同。

[48]H.Franke, "A Sino-Uighur Family Portrait: Notes on a Woodcut from Turfan", Canada-Mongolia Review, IV.1, 1977, pp.33-40.

[49]参见北村高「蒙速斯一族供養圖について」『神女大史学』5、1987、83-105頁；北村高《关于蒙速思家族供养图》，《元史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9～12页。

[50]党宝海：《十三世纪畏吾儿蒙速速家族供养图考》，《欧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2000，第139～152页。

[51]（元）危素：《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陇右金石录》卷五；此据陈高华编《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第147～148页。

[52]《元史》卷一三七，第3319页。

[53]安部健夫曾列表统计元朝有名畏兀儿人之出身，其中多数原籍为北庭，参见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304-307頁；（汉译本）《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219～223页。

[54]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310-315頁；（汉译本）《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227～230页。

[55]参见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第333～348页。

[56]伯希和：《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1957，第21～22页。

[57]此词最早见于阿斯塔纳出麹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女奴买卖文书，参见吉田豊·

森安孝夫·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博物館「麹氏高昌国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隷売買文書」、5·8頁；参见B.Gharib, Sogdian Dictionary, Tehran, 1995, p.132。

[58]参见A.P.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2（1982）, 1983, pp.136-137；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p.94, 271。

[59]米诺尔斯基推测其为“Turfan”的讹误（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271）；伯希和正确指出此名应对应汉文史料中的“贪汗山”，指吐鲁番盆地北天山山脉东段的博格达山（P.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1959, p.164）。

[60]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94.

[61]森安孝夫「敦煌と西ウイグル王国：トゥルファンからの書簡と贈り物を中心に」『東方学』74、1987；此据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341-342頁。T.Moriyasu, “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Čiqtim in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in: M.Ölmez & S-Ch.Raschmann （eds.）,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Festschrift für Peter Zieme anläßlich seines 60.Geburtstags, Berlin/Istanbul, 2002, p.168.

[62]A.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III, Berlin, 1922, p.40.

[63]森安孝夫「敦煌と西ウイグル王国：トゥルファンからの書簡と贈り物を中心に」、342頁。

[64]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281-286頁。

[65]A.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2, 1983, p.136.

[66]T.Moriyasu, “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Čiqtim in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pp.168-169.

[67]森安孝夫「敦煌と西ウイグル王国：トゥルファンからの書簡と贈り物を中心に」、341-342頁。

[68]T.Moriyasu, “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Čiqtim in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p.168.

[69]《通制条格校注》，方龄贵校注，中华书局，2001，第202页。笔者略有改动。

[70]王素：《麹氏王国末期三府五郡二十二县考》，《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3~32页；《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第26~57页。

[71]《旧唐书》卷一九八，第5295页。

[72]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第114~152页。

[73]孟宪实：《关于麹氏高昌王朝地方制度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第24~25页。

[74]陈国灿、伊斯拉非尔·玉苏甫：《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初探》，第174~182页。

[75]荣新江：《〈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第182~190页。

[76]荣新江：《〈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第185~186页。

[77]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第113~173页。

[78]《宋史》卷四九〇，第14111页。

[79]（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573页。

[80]H.W.Bailey, “The Staël -Holstein Miscellany”, pp.13-14; 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pt Staël-Holstein”, p.138.

[81]T.Moriyasu,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p.162.

[82]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146頁。

[83]《宋史》卷四九〇，第14111页。

[84]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142.

[85]Y.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2008, p.64.

[86]T.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Wiesbaden, 2004, p.167.

[87]T.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p.50.

[88]（明）陈诚、李暹：《西域番国志》，周连宽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108页。

[89]西村阳子、铃木桂、张永兵：《吐鲁番地区古遗址分布考——以麹氏高昌国、唐西州时期的古遗址的空间把握为中心》，《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36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古城遗址》，科学出版社，2011，第362页；荣新江：《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的地理信息》，第21页。

[90]巫新华：《吐鲁番唐代交通线路的考察与研究》，青岛出版社，1999，第31~32页。

[91]《宋史》卷四九〇，第14111页。哈密屯指出其中所记“宝庄”即“蒲昌”之转音，参见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139。

[92]（明）陈诚、李暹：《西域行程记》，周连宽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36~37页。

[93]《陕西通志》卷一○《西域土地人物略》，此据林梅村校勘本，氏著《蒙古山水地图》，文物出版社，2011，第99页。

[94]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2页。

[95]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234~236页。

[96]D.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of the Turfan Oases”, pp.278-279.

[97]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图版80。

[98]笔者以下所引本文书片段，依据森安氏转写，略有调整，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85-96頁；T.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Wiesbaden, 2004, pp.105-119。

[99]松井太「古ウイグル語文献にみえる『宁戎』とベゼクリク」『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6、2011、156-157頁；D.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of the Turfan Oases”, pp.279-280。

[100]松井太「古ウイグル語文献にみえる『宁戎』とベゼクリク」、156-157頁。

[101]H.Franke, “Zur Datierung der mongolischen Schreiben aus Turfan,” Orients 15, Leiden, 1962, pp.399-410.

[102]D.Cerensodnom & M.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er Turfantexte XVI, Berlin, 1993, pp.173-175.

[103]松井太「古ウイグル語文献にみえる『宁戎』とベゼクリク」、156-157頁；D.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of the Turfan Oases”, pp.278-279。

[104]胡戟、李孝聡、荣新江：《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第40页；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72～73页。

[105]D.Cerensodnom und M.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pp.173-175.

[106]松井太「古ウイグル語文献にみえる『宁戎』とベゼクリク」、156-157頁。

[107]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234～236页。

[108]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62～63页。

[109]羽田明·山田信夫「大谷探検隊将来ウイグル字資料目録」『中央アジア古代語文献』、1961、204頁。

[110]D.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for the Turfan Oases”, pp.288-289.

[111]H.Halén, “Die uigurischen Mannerheim-Fragmente （2）”, Studia Orientalia 67, 1991, p.164.

[112]D.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for the Turfan Oases”, p.291.

[113]D.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for the Turfan Oases”, p.281-283.

[114]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 140.

[115]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续完）》，第2页。

[116]荒川正晴「麹氏高昌国における郡県制の性格をめぐって：主としてトゥルファン出土資料による」『史学雑誌』95-3、1986、40-68頁。

[117]西村阳子、铃木桂、张永兵：《吐鲁番地区古遗址分布考——以麴氏高昌国、唐西州时期的古遗址的空间把握为中心》，第34页。

[118]松井太「古ウイグル語文献にみえる『宁戎』とベゼクリク」、141-175頁。

[119]T.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p.106.

[120]松井太「古ウイグル語文献にみえる『宁戎』とベゼクリク」、154-155頁。

[121]文书最早由羽田明、山田信夫转写，参见「大谷探検隊将来ウイグル字資料目録」『中央アジア古代語文献』、1961、204頁；本书据松井太最新转写，参见D.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for the Turfan Oases”, p.288。笔者在其转写基础上略有调整。

[122]荣新江：《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的地理信息》，第18页。

[123]岑仲勉：《吐鲁番一带汉回地名对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1947；此据氏著《中外史地考证（外一种）》，中华书局，2004。

[124]H.W.Bailey, “The Staël -Holstein Miscellany”, p.13; 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142。黄盛璋认为Ttiyākä也有可能是“特罗堡”的对音，参见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续完）》，第3页。

[125]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74页。

[126]（明）陈诚、李暹：《西域番国志》（第105～106页）记：“土尔番城在火州之西仅百里，即古交河县之安乐城。”

[127]胡戟、李孝聪、荣新江：《吐鲁番》，第83～84、117～118页。

[128]J.R.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ᵉ-Xᵉ siecle de Touen-Houang, Paris, 1986, p.83.

[129]J.R.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ᵉ-Xᵉ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85.

[130]（明）陈诚、李暹：《西域番国志》，第106页。

[131]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回鹘文中心木》，第66页。

[132]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回鹘文中心木》，第61页。

[133]胡戟、李孝聪、荣新江：《吐鲁番》，第41页；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76～77页。

[134]H.W.Bailey, “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 p.15; 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150; 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续完）》，第7页。

[135]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78～79页。

[136]S.-Ch.Raschmann,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3, Dokumente, Teil 1, Stuttgart, 2007, p.202.

[137]D.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for the Turfan Oases”, pp.292-293.

[138]（明）陈诚、李暹：《西域番国志》，第109页。

[139]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236页。

[140]H.W.Bailey, “The Staël -Holstein Miscellany”, p.15; 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150; 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续完）》，第8页。

[14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 新疆古城遗址》，第370页。

[142]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235～236页。

[143]《陕西通志》卷一○《西域土地人物略》，第99页。

[144]H.W.Bailey, “The Staël -Holstein Miscellany”, p.13; 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140.

[145]参见西村阳子、铃木桂、张永兵《吐鲁番地区古遗址分布考——以麴氏高昌国、唐西州时期的古遗址的空间把握为中心》，第28～55页。

[146]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234～235页。

[147]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134页。

[148]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劄記（その三）」『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7、1992、50-52頁。

[149]T.Moriyasu, “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Čiqtim in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in: M.Ölmez und S.-Ch.Raschmann, hrsg.,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Festschrift für Peter Zieme anläßlich seines 60.Geburtstags, Berlin/Istanbul, 2002, p.155.

[150]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136頁。

[151]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劄記（その三）」、52頁；T.Moriyasu, “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Čiqtim in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p.156。

[152]T.Moriyasu, “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Čiqtim in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p.169.

[153]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劄記（その三）」、51-52頁。

[154]参见D.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of the Turfan Oases”, in: E.Ragagnin und J.Wilkens, hrsg., Kutadgu Nom Bitig: Festschrift für Jens Peter Laut zum 60.Geburtstag, Wiesbaden, 2015, p.289。

[155]（明）陈诚、李暹：《西域行程记》，第37页。

[156]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238页。

[157]《陕西通志》卷一○《西域土地人物略》，第99页。

[158]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234～235页。

[159]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134页。

[160]P.Zieme, “Ein uigurisches Familienregister aus Turfa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vol.9, 1982, p.266；参见T.Moriyasu, “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Čiqtim in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in: M.Ölmez & S-Ch.Raschmann（eds.）,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Festschrift für Peter Zieme anläßlich seines 60.Geburtstags, Berlin/Istanbul, 2002, p.158。

[161]T.Moriyasu, “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Čiqtim in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p.159; D.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of the Turfan Oases”, in: E.Ragagnin und J.Wilkens （Hrs.）, Kutadgu Nom Bitig: Festschrift für Jens Peter Laut zum 60.Geburtstag, Wiesbaden, 2015, pp.276-277.

[162]参见Matsui, “Old Uigur Toponyms of the Turfan Oases”, 2015, p.276。

[163]（明）陈诚、李暹：《西域行程记》，第36页。

[164]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368页。

[165]《新唐书》卷四○，第1046页。

[166]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368页。

[167]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139、236～237页。

[168]《马可波罗行纪》，〔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111页。

[169]哈密地区在元代以前业已形成独立政权之事早为学者所指出，参见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511-513頁；（汉译本）《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374～375页；陈高华《哈密里二三事》，氏著《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第441～442页。

[170]参见元大德五年（1301）颁《畏吾儿等公事约会》［《元典章（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五三《刑部一五》，陈高华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第1782～1783页］、皇庆二年（1313）颁《都护府公事约会》［《元典章（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五三《刑部一五》，第1786页］。

[171]《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

[172]文献的最新录文参见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第176页。

[173]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第176页。归义军夺取伊州以后在当地的经营活动，参见李军《晚唐五代伊州相关史事考述》，第6～9页。

[174]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第176页。

[175]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第49页。

[176]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3～355页。

[177]文书照片见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4210766308;recnum=60172;index=1；录文参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5～116页。

[178]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6页；相关史事的最新研究，参见荣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第128～132页。

[179]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7页。

[180]李军：《晚唐五代伊州相关史事考述》，第8～9页。

[181]参见岩尾一史「9 世紀の歸義軍政權と伊州——Pelliot tibétain 1109を中心に」『敦煌寫本研究年報』10、2016、341-356頁。

[182]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62～363页。

[183]文书最早由羽田亨刊布，参见羽田亨「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摩尼教徒祈願文の斷簡」桑原博士還暦記念祝賀會編纂『東洋史論叢：桑原博士還暦記念』弘文堂書房、1931、1345-1368頁；收入氏著『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同朋社、1958、325-347頁。本书转写摘引自森安孝夫的最新转写，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187-188頁；T.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p.227。

[184]参见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第176～178页。

[185]参见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仏教のクロノロジー：ベゼクリクのグリュンヴェーデル編号第8窟（新編号第18窟）の壁画年代再考」『仏教学研究』、62/63（合併号）、2007、1-45頁；（英文版）T.Moriyasu, “Chronology of West Uighur Buddhism: Re-examination of the Dating of the Wall- paintings in Grünwedel’s Cave No.8（New: No.18）, Bezeklik”, in: P.Zieme（ed.）, Aspects of Re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In Memoriam Kōgi Kudara（Silk Road Studies, 16）, Turnhout: Brepols, 2008/3, pp.191-227；（增订本）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645-677頁。

[186]主要依据耿世民先生和笠井幸代（Y.Kasai）的读本，略有调整。参见Geng Shimin und H.-J.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Wiesbaden, 1988, pp.10-13; Y.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pp.195-199。

[187]森安孝夫「トルコ仏教の源流と古トルコ語仏典の出現」、642-643頁、注89。

[188]《宋史》卷四九〇，第14111页。

[189]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71页。

[190]类似论述参见胡小鹏《〈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考》，《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第11～15页；李军《晚唐五代伊州相关史事考述》，第13～17页；松井太「西ウイグル時代の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書をめぐって」『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24、27-28頁。

[191]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9～20页。

[192]《宋史》卷四九〇，第14107～14109页。

[193]参见黄时鉴《辽与“大食”》，《新史学》第3卷第1期，1992；此据《黄时鉴文集》卷2《远迹心契——中外文化交流史（迄于蒙元时代）》，中西书局，2011，第16～30页。

[194]胡小鹏：《〈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考》，第11～15页。

[195]胡小鹏：《〈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考》，第14～15页。

[196]参见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第24页。

[197]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p.94-95.

[198]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265.

[199]笔者据米诺尔斯基英文译注本汉译，参见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94；另可参见王治来汉译本（《世界境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00]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95.

[201]参见T.Moriyasu,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De Dunhuang à 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 pp.150-223；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683-694頁。

[202]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697頁。

[203]杜牧：《西州回鹘授骁卫大将军制》，此据《杜牧集系年校注》，第1132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54～355页。

[204]参见松井太「西ウイグル時代の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書をめぐって」、35-36頁。

[205]《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第14112页。

[206]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p.139-140.

[207]《金史》卷一二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第2637页。

[208]此为胡小鹏先生指出，参见胡小鹏《〈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考》，第11～15页。

[209]《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第3000页。

第五章 回鹘时代的丝绸之路天山南道诸城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中原进出西域的南北两道。南道沿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缘，北道傍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隋裴矩作《西域图记》时，中原进出西域的道路已有三条，汉代之“北道”变成“中道”。本章所谓天山南道，即循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各绿洲连通中原与西域的道路，相当于汉代的西域北道、隋代的中道。

漠北回鹘汗国在8世纪末、9世纪初相继将天山南道东起西州，西到疏勒的各地纳入版图。866年，仆固俊崛起，以西州、北庭为中心建立政权，逐渐统一东部天山地区，奠定西州回鹘王朝的版图。笔者将按自东向西的顺序逐一考索天山南道沿途各绿洲在回鹘时代史料中的记载，探讨这些绿洲文明在回鹘统治下的发展变迁。

焉耆

笔者在前面章节中已经详细讨论伊州、西州两地在回鹘时代的史事，本章的讨论将从西州以西的绿洲焉耆开始。焉耆在8世纪末被纳入漠北回鹘的版图，回鹘人沿用唐安西都护府焉耆镇最高军政长官“镇守使”这一官职，称“jimtayši”（镇大使），任命回鹘人管理焉耆。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庞特勤率十五部回鹘人西迁入安西地区，以焉耆为中心建立安西回鹘政权，加速了东部天山地区回鹘化的过程。据前引xj 222-0661.09号回鹘文献记载，西州回鹘在第二任可汗治下出兵攻灭安西回鹘政权，将焉耆纳入版图，此事应发生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

《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在西州治下的地区中列有“在焉耆的城”（Argīñvā bise kaṃtha），反映出925年西州回鹘占据焉耆的事实。《世界境域志》第12节列有托古兹古思（西州回鹘）的城镇，其中仍有焉耆（Ark）。前文已讨论，该文献实际反映的是10世纪40～50年代的情况。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回鹘条下列有西州回鹘的五大城市，焉耆（唆里迷）赫然在列。10～11世纪有关西州回鹘疆域的文献中都记有焉耆，应可说明焉耆一直稳定地掌握在西州回鹘手中。

《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记：“哈剌亦哈赤北鲁，畏兀人也。性聪敏，习事。国王月仙帖木儿亦都护闻其名，自唆里迷国征为断事官。月仙帖木儿卒，子八儿出阿儿忒亦都护年幼，西辽主鞠儿可汗遣使据其国，且召哈剌亦哈赤北鲁，至则以为诸子师。”[1]1209年，畏兀儿亦都护背叛西辽，举国归顺蒙古。可以推测，唆里迷国（焉耆）在12世纪仍是西州回鹘辖下之地。

这里所谓的“唆里迷国”并不指一个独立的政权，其对应的回鹘文形式应是solmï uluš，所指应为以唆里迷（焉耆）城为中心的整个焉耆绿洲。在回鹘文献中，此概念常以“üč solmï uluš”（三唆里迷国）的形式出现。xj 222-0661.09号文献N节记西州回鹘少可汗西征以后的疆域作：“他们将〔回鹘可汗的威名〕在大地上广泛传播：〔从〕受调查的、由外国之人建立的三唆里迷国（üč solmï uluš）的谷地等，直到大裕勒都斯。”这里的三唆里迷国正指当时已经被征服的焉耆盆地。同文献D节记：“在迅速攻下唆里迷城（solmï balïq）之后，他以其精锐的军队驱散了〔当地势力〕，将他全部的人民带到这片土地上，带给他们和平安宁。”此句中的唆里迷城（solmï balïq）则指具体的焉耆城。

回鹘统治时代的焉耆被称为唆里迷（Solmï），此名一直沿用到元代结束，是当地文化自9世纪以来发生回鹘化的一种反映。当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在早期回鹘文译经《弥勒会见记》胜金口本中，焉耆国

被写作agnides uluš[2]。其中agnides应借自梵文Agni Désa（意为“焉耆国”），为焉耆的梵文名，玄奘所记“阿耆尼”之名即源于此。前引吐峪沟出土的《造塔功德记》产生于西州回鹘早期，发愿人为“清信士佛弟子鄢耆镇牟虞蜜伽长史龙公”。可知，当时焉耆的汉文名称尚未被人们遗忘。这位龙姓供养人显然是接受西州回鹘统治的焉耆贵族；他在当时尚未彻底回鹘化，仍保留焉耆龙姓。

焉耆与龟兹之间还有两地见于回鹘时代的史料。一是唐安西都护府焉耆镇下的于术守捉城。前文所引《九姓回鹘可汗碑》记，漠北回鹘大军曾在于术围歼吐蕃军。此事应在792年后不久。到9世纪初保义可汗时代，于术当地已经有了势力很大的摩尼教教团，因此M 1《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将于术（Üčür）与北庭、高昌、焉耆、龟兹四座西域大城并列。

二是轮台。其地在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正当焉耆、于术西行入龟兹的方向。轮台在现代维吾尔语中作Bögür，此名最早出现在《突厥语大词典》中。第182叶“轮台”（Bögür）条作：“轮台，位于苦叉（Quča）和回鹘之间一座山上的戍堡。是边境前哨。”[3]该地见于经传的原因或应是喀喇汗王朝与西州回鹘当时正在龟兹焉耆之间激烈交战。

龟兹

在9世纪以前，龟兹地区的居民主要为操印欧语系龟兹语（吐火罗语B）的龟兹人。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唐朝攻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势力，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交河城迁至龟兹王城，在塔里木盆地置安西（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龟兹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军政中心，从此也以“安西”之名著于世。此后，唐朝与吐蕃在塔里木盆地拉锯交战。在692年夺回安西四镇之后，唐朝始在当地常驻大军守卫,安西四镇从此进入镇兵化时代，以军人为主体的汉人人口开始大量迁入龟兹等地。唐朝的统治并未使龟兹当地居民的语言、文化发生根本性的改变。8世纪末，龟兹落入漠北回鹘汗国手中，当地开始了突厥（回鹘）化的过程。

在现存的龟兹语文献中尚未见到“龟兹”这一地名的主格形式，仅见其属格形式kuśiñ和形容词形式kuśiññe。语言学家据此还原“龟兹”的主格形式为*Kuśi[4]。形容词形式kuie不但散见于晚期龟兹语文献中，还至少见于一件古龟兹语（Archaic Tocharian B）文书中（德藏THT 1179a.），这说明在古、古典和晚期龟兹语中，此词形式应全都如此[5]。则其主格形式在古、古典和晚期龟兹语中也应一致为Kui。在中古时期的汉文文献中，除“龟兹”外，此词还被记作“丘慈”“屈茨”“屈支”等，但各种写法的第二音节起首辅音均不反映咝音//，而反映一个塞擦音/ts/。同样，此词的梵文形式Kuci第二音节起首辅音也反映的是一个塞擦音/tʃ/。学者据此认为在更早阶段的原始龟兹语（Proto-Tocharian B）中，此词应作Kui，汉文和梵文是从这一阶段的龟兹语中借入“龟兹”一名的[6]。除汉代以来就出现的“龟兹”这种译法之外，汉文的其他译法，应当都来自梵文名Kuci。

分布在东部天山地区、信仰摩尼教和佛教的回鹘人以Küsän表示地名龟兹。而生活在中亚西部的突厥人则使用另一个词Quča表示龟兹[7]。后者一直沿用至今，在现代维吾尔语中继续使用，是今日汉文地名“库车”之来源。此词最早出现在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中。笔者现列举该文献中有关“龟兹”的条目，以便论说。

“曲先”（Küsän）条作：“曲先，苦叉（Quča）城之〔别〕名。是回鹘人的边界。”[8]

“轮台”（Bögür）条作：“轮台，在山顶的戍堡，地在苦叉（Quča）和回鹘之间。”[9]

“塔林”（Tarïm）条作：“在回鹘边境一地，近苦叉（Quča）。”[10]

“湖”（köl）条下记有：“裕勒都斯湖（Yulduz Köl），湖名，地在

苦叉（Quča）、弓月和回鹘三方交界处。”[11]

“富贵”（bay）条下记有：“富贵树（Bay Ïγač），乌什附近一地名，在乌什和苦叉（Quča）间。”[12]

上引内容说明，在喀喇汗王朝流行的突厥语中，表示地名“龟兹”更为常用的词应是Quča。在元代汉文文献中，地名“龟兹”可转写作“曲先”、“苦先”、“古先”或“苦叉”等[13]。其中“曲先”、“苦先”和“古先”等译音对应流行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回鹘语中的Küsän，而“苦叉”则反映了流行在中亚西部地区的突厥语中的Quča。正是蒙古汗国对上述地区的统一使这两种突厥语方言都反映在汉文文献中。现代维吾尔语以Quča指称该地，而13世纪以前一直在东部天山地区流行的Küsän则不再为人们日常所用。现代维吾尔语由察合台语发展而来，其源头则是喀喇汗王朝时代流行在中亚西部的突厥语方言，而非回鹘语[14]。随着15世纪以后回鹘佛教文明在东部天山地区逐渐走向消亡，而突厥人所说的察合台语在东部天山地区流行。Quča成为指称古龟兹地区的标准词，而Küsän一名则随着回鹘语的消亡而不再流行。

拨换

《新唐书·地理志》记“安西入西域道”作：“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州，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15]拨换城正当安西西面门户，从此可分三路进出西域。一是西北往大石城（于祝），过拔达岭，入西部天山，进入碎叶。二是继续沿天山南路西行，往疏勒。三是南走渡赤河（塔里木河），取“神山路”[16]，往于阗。到8世纪80年代，当地尚为唐安西军所守，有镇守使。到9世纪初回鹘保义可汗时代，统治者已经为叶护，当地可能已经开始了突厥化。前引英藏敦煌文书S.383号《西天路竟》记“又西行一千里至龟兹国，又西行三日入割鹿国，又西南行十日至于阗国”。此“割鹿国”就在拨换。10世纪中叶，拨换在葛逻禄势力的控制之下。

米诺尔斯基最早将M 1中的 prwanc比定为汉文之拨换[17]。亨宁又将《突厥语大词典》（第605叶）中的Barman和《经世大典图》中的“八里茫”两名与拨换勘同。[18]王延德《西州使程记》记西州回鹘所统诸部中有“末蛮”。[19]此“末蛮”即“Barman”，亦即拨换。值得注意的是，与末蛮并列的是“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等部族，大多为突厥系统。此时拨换的含义已经从地（城）名延展为族名。自8世纪末以来迁徙、定居于拨换的突厥部族已经在10世纪末形成一个新的族群“末蛮”。

今日贯通天山南麓的南疆铁路和314国道都经过柯坪县，连接着阿克苏和巴楚两地。这片区域在中古时代也受龟兹王国统治。《新唐书·地理志》记拨换向西往疏勒的路线作：“自拨换、碎叶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20]根据考古遗迹推测，唐代的这条官道应当就在今日314国道、南疆铁路稍南的喀拉库勒沙漠中。在柯坪县阿恰勒乡其兰村南约1.7公里的荒漠中有一座典型的唐代烽火台遗址——其兰烽火台[21]。其兰村西南约8公里的荒漠中发现有喀拉库勒戍堡，据遗物推测为唐代遗址[22]。在阿恰勒乡吐尔村东南11公里的荒漠中有都埃梯木烽火台和戍堡复合遗址，被认为是上引文提到的“济浊馆”遗址[23]。在吐尔村南8.7公里的荒漠中还有亚依德梯木烽火台，据采集到的遗物判断也是唐代遗址。阿恰勒乡正当今日314国道、南疆铁路之上，而这一系列唐代的戍堡、烽火台遗址都在阿恰勒乡南的荒漠，与今日的交通线大约平行。可知后世的交通线就是在唐代官道的基础上，随着当地沙漠化而逐渐向西北方向偏移。在这条唐代的交通线上，还发现一座古城的遗址——位于其兰村西南约7公里处荒漠中的阿克协尔故城。该遗址为一圆城遗址，据采集的遗物判断，年代在北朝至唐之间[24]。从位置判断，该城应当也在唐代的官道上，与喀拉库勒戍堡相去不远。吐尔村地

在其兰村西南，如果将吐尔村东南的都埃梯木烽火台及戍堡比定为唐代的济浊馆，那么很难解释其西北一线其兰村境内的唐代遗址。笔者推测其兰村西南的喀拉库勒戍堡或为济浊馆遗址，其附近的阿克协尔城遗址或为“故达干城”；该城圆城的特征正好符合西域“故城”的描述。

从唐代官道遗址与今日交通线路的相对位置推测，9世纪以后出拨换入疏勒的道路应当沿用了唐代的官道。9世纪以后的史料中没有对这一地区发展情况的具体记载，但这一带显然已经突厥化，并且存在一定规模的聚落。

巴楚县城东北60公里的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即唐代据史德城（详见下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79B.T采14号回鹘文书于1979年在当地出土。文书为一份麦子支出账目（破历），纪年为某可汗治下的蛇年。文书中含有许多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所用回鹘文字体与20世纪初莎车县出土所谓“叶尔羌文书”中的回鹘文书基本相同[25]，应属喀喇汗王朝统治早期。喀喇汗王朝在11世纪沿着天山南道向东推进。到11世纪70年代，他们已经从西州回鹘手中夺下龟兹。这件文书形成的年代可能就是11世纪。文书第17～19行记有一笔账，与上下文皆有结平符号σ分割，作：

kälpinlig šadiqa on eki yük altï käpči buγday bärilti

2驮子6凯弗奇小麦被给了柯坪人厦迪（šadi）。[26]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柯坪人厦迪”。Šadi为波斯语语汇,有“欢乐、喜庆”之意，此柯坪人显然是一位穆斯林[27]。这件文书反映出，大约在11世纪时，柯坪这一地名已经出现。

古往今来，过柯坪地区的大道都在阿恰勒之后取道柯坪山南麓向西南走。今日的柯坪县城则在柯坪山北麓、喀拉塔格山以东的谷地中。根据考古发现，这里也早有聚落人烟。柯坪县盖孜力克乡八格力克村西约3公里处有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的沙牙提古城遗址，考古遗存显示古城的年代在汉魏之间[28]。这一区域还有克斯勒塔格佛寺遗址，年代属北朝到唐[29]。因此，前引文书所显示的“柯坪”聚落可能是指今柯坪县城一带，也可能指正当官道的阿恰勒乡一带。不论其具体所指，当时柯坪地区已经有了成规模的穆斯林聚落。

巴楚（据史德）

位于阿克苏和喀什之间的巴楚县，维吾尔语名作Maral Bašï。今日之巴楚县城系清道光十二年（1832）所建之城[30]，汉语“巴楚”应为突厥语Barču的遗音。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在巴楚县东南设军台，称“巴尔楚克台”[31]。Barču最早见于《突厥语大词典》。恰卢克（aruq）条记：“恰卢克，突厥人一部，分布在巴楚（Barču）。”[32]巴楚（Barču）条记：巴楚，阿夫拉西亚甫（Afrāsiyāb）所建城市[33]。《突厥语大词典》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其时巴楚城应当已是一座有一定历史的老城。那么11世纪的巴楚城所沿用的古城为何呢？《新唐书地理志》记有拨换向西往疏勒的路线：“自拨换、碎叶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34]唐代据史德城址就是位于今巴楚县东北约60公里处的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35]。从《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看，自据史德城往西数百里的路途上没有城镇，直到三百四十里后方有一“馆”（葭芦馆）。可知今巴楚一带在唐代仅有据史德一座城。11世纪的巴楚城应当就是唐代的据史德城。

在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出土有大量文物、文书。除了属于唐代及以前的文物、文书外，还在1960年出土了一批以回鹘文和阿拉伯文书写的古突厥语文书[36]。上一节所引文书就是其中之一。到11世纪70年代，龟兹已经不在西州回鹘的治下，可知据史德一带已经稳定地掌握在喀喇汗王朝手中。这应是当地出土阿拉伯文突厥语文书的背景。

Barčuq一名还出现在回鹘文献中。德藏吐鲁番写本U 1917系一种回鹘文佛教文献的尾跋。跋文显示该文献被称作idiyut（’ydyywt）经。茨默还刊布另外三件回鹘文残片，属于同种文献，但仍无法与传世佛教文献勘同[37]。现将该跋文转写、汉译如下：

$_{3}$… qamaγ šastr $_{4}$-larïγ ötgürmiš alqu nomlarïγ keŋürü $_{5}$ača yada uqïtmïš sarvarakšte atlïγ $_{6}$uluγ ačari qonturmïš idiyut nom $_{7}$bitigniŋ ögmäkin küsän $_{8}$tilintin barčuq tilinčä ävirdäči $_{9}$vaybažike kalyanzene ačari idiyut $_{10}$körünčtäki alqu tïnlaγlaraγ qutγaru $_{11}$körkitmäk atlïγ nom bitig eki qïrq $_{12}$bölök bitiyü tükädi

贯通所有律部、教授过所有经部的大阿阇梨名叫一切护（Sarvarakšte < Sarva-rasita）。他有创作idiyut经之功德。修毗婆沙宗（Vaybažike < Vaibhāsa）的善军（Kalyanzene < Kalyāna-sena）阿阇梨将名叫“idiyut教一切众生得道”之经从龟兹语（küsän tili）译成

巴楚语（barčuq tili）。[38]

学界曾认为这里所谓的巴楚语（barčuq tili）是一种突厥语，但突厥语在回鹘文献中被称为türkčä或türk tili，回鹘语被称为uyγurča或uyγur tili，从未有过以barčuq tili指称突厥语的情况[39]。克拉克（L.Clark）提出巴楚语可能是一种吐火罗语，这部dyut经被先从龟兹语译成巴楚语，再从巴楚语译成突厥语[40]。茨默进一步论证此说，其主要依据是吐火罗语专家施密特（K.T.Schmidt）对吐火罗语的分类。施密特认为，吐火罗语的书面语可以分为库车、硕尔楚克和吐鲁番三种方言，而实际使用的口语则有库车和巴楚两种方言。茨默据此推测所谓的“巴楚语”指吐火罗语巴楚方言，而上述佛经则是从吐火罗语口语库车方言译成巴楚方言的。茨默的论证在逻辑上和史实上都存在漏洞。首先，写本佛经应当从书面语译到书面语；就书面语而言，流行在巴楚和库车两地者系同一种语言——龟兹语，即施密特所谓库车方言。

吐火罗语口语库车方言和巴楚方言之间的差别可能大到需要翻译么？前引《新唐书·地理志》记“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在唐代，据史德一带是龟兹的辖境。据史德在汉代被称为尉头，长期依附于其东边的大国龟兹。唐朝进入西域以前，龟兹国已经将拨换、于祝和据史德三地纳入版图。唐朝在西域实行羁縻统治，民政事务仍由当地政权管理。因此唐代龟兹镇的西界仍是据史德（尉头）。虽然据史德在唐朝之前就已经被龟兹吞并，但当地的民族成分并没有完全改变，关键的证据就是托库孜萨来据史德故城出土的据史德语文书和佛典残片[41]。其中属于唐统治时期的世俗文书明确反映当地土著民族有自己的国王[42]。据史德语文书和佛典的发现说明在龟兹统治之下，当地仍然流行本民族的语言。则当地流行的龟兹语实际上并非土著语言，而是龟兹王国统治该地时使用的官方语言。即使在据史德流行的龟兹语与龟兹本土的龟兹语有方言的差别，也绝不至于需要翻译，否则据史德的龟兹语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而进入唐安西时代以后，当地的民间契约和官方文书主要是以据史德语和汉文写就，迄今当地没有出土过属于唐代的龟兹语文书。当地也没有出土过任何的龟兹语佛典残片[43]。

排除了吐火罗语，则这种“巴楚语”很可能就是当地土著语言据史德语[44]。11世纪70年代前，巴楚地方已经突厥化，当地的居民为恰卢克（aruq）突厥人。上引U 1917号文书的字体为粗体楷体回鹘文[45]；语言上有在构词附加成分中保留低位元音的情况（如tïnlaγlaraγ）。该写本应属于早期回鹘文献，可能写在11世纪以前。目前尚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回鹘人曾从据史德语翻译佛经。但仍有旁证可以参考：目前发现的据史德语佛经残片中，有一件出土于吐鲁番的木头沟——西州回鹘佛教的重地[46]。因此，回鹘人曾翻译或参考据史德语佛经的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

综上，突厥语称据史德为巴楚，将据史德语称为巴楚语。据史德在11世纪以前已经彻底突厥化。

喀什

伯希和曾在其遗稿《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中详细讨论了喀什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言中的名称[47]。其长注几乎囊括了当时可见的各种史料中关于喀什地名的记载，实际讨论的范围涉及喀什历史的方方面面。此注代表了20世纪初学界对喀什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广为学界参引。伯希和之后关于喀什名义最佳的讨论当属贝利对于阗语文书中所见khyea一词的讨论，他给出了“喀什”和“喀什噶尔”两名的解释[48]。笔者在二位讨论的基础上，结合新出材料，梳理喀什的突厥语名称的来源及流变。

在汉文史料中出现的喀什之名已由伯希和系统梳理，现择要概述，以方便展开讨论。喀什最早出现在史乘的名称是汉代的“疏勒”。此名在汉唐之间一直是喀什的正式名称，沿用到宋代。喀什的第二类译名以唐僧玄奘所用的“佉沙”（《大唐西域记》《慈恩传》）为代表。类似的译名还有“碣石”（《魏略》）、“竭叉”（《法显传》）、“迦舍”（《孔雀王咒经》）、“迦师”（《新唐书》）等[49]。第三类译名是唐僧慧超采用的“伽师祇离”（《往五天竺国传》）和慧琳采用的“迦师佶梨”（《一切经音义》）。第四类译名则是蒙元以后的汉译名，包括元代的可失哈儿、可失和儿（《元史》），明代的哈实哈儿（《明史》），以及清代以后的喀什噶尔。这一类译名是在中亚地区突厥化以后直接译自突厥语地名Qašγar的。

第一类汉文译名在突厥语中没有体现，本书不做讨论。

第二类译名“佉沙”等和第三类译名的前两个音节“伽师”曾被儒莲（S.Julien）、伯希和与印度语中的khaṣa联系起来。此词在印度语文献中被用以指称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些山地部族[50]。在和田出土的属于8世纪末9世纪初的于阗语文书中，曾数次出现khyevā，其所本名词应为khyea，已被学者比定为喀什（佉沙），反映的正是第二类译名和第三类译名的前两音节的读音[51]。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记：“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祇离国。”[52]慧超这条记载的重要之处在于，在其行经当地之时（727年），喀什当地居民本民族语言自称便是“伽师祇离”。此是“喀什噶尔”所代表的音最早见于历史记载。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注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时记此地名作“迦师佶黎”，注作：“胡语，唐云葱岭镇。”[53]《一切经音义》序载，慧琳“俗姓裴氏，疏勒国人也”[54]，说明慧琳所记“迦师佶梨”正是其本族语言对喀什的称呼。在唐代汉文语境中，狭义的“胡”就指操伊朗语的各民族[55]。因此，第二、第三类译名所反映的是一个伊朗语地名，在突厥化之前，喀什当地流行的是一种伊朗语。贝利指出此地名的根词为kāša-，并列举了各种伊朗语中出现的以此派生出的地名[56]。最早的一

例是公元3世纪萨珊波斯君主沙普尔一世时代所造帕提亚语铭文中的地名k’š。9世纪吐鲁番中古波斯语M 1《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中有k’šy xšyd（“佉沙之王”）。

关于第三组译名的后两个音节，贝利认为其来自伊朗语-kara-（“城、堡”）。其首辅音经历两次变化k > g > γ，词形变作-γara-，再脱落末尾元音形成[57]。这与于阗语中的khyevā kara“佉沙城”（疏勒镇）的表达是一致的。并未信从贝利的还原和释义，但完全赞同“喀什噶尔”是从“喀什”派生出来的观点[58]。

伊朗语中以Kaš为地名的例子早在3世纪就已出现，而以“喀什噶尔”为地名的情况最早体现在上述8世纪的汉文材料中。在伊朗语文献中，这一叫法最早出现在一件和田出土的犹太波斯语信札中。这件文书系2004年国家图书馆新获和田文书中的一件，以希伯来文书写新波斯语。文书或写成于802年之后不久[59]，其中第31、32行出现地名“Kašgar”[60]。在后来的新波斯语材料中，此词被写作kāšġar（KAŠĠR）。

在突厥语中，Qašγar这一形式最早见于11世纪70年代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在吐鲁番出土的属西州回鹘时代的回鹘文书中，则出现Käš这种形式，而不见有Qašγar。确定无疑的一例是俄藏回鹘文《慈恩传》第5卷残叶,文献将“佉沙”（疏勒）对译作Käš[61]。回鹘文《慈恩传》由胜光法师自汉文本译成，时间大致在10世纪末，说明10世纪以前喀什在回鹘语中的固定名称就是K。另外还有一例则是德藏回鹘文书Ch/U 3917正面第24行出现的Qara K[62]。

有趣的是，在中亚的伊朗语材料中，除了年代较晚的新波斯语使用Kāšġar这种形式，喀什在其他语言的材料中则都以Kaš这种形式出现，比如帕提亚语的k’š（沙普尔一世铭文）、中古波斯语的k’š（M 1《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于阗语的khyeṣa等。考虑到kāšġar这种形式最早在8世纪才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笔者赞同Kāšġar是后来从Kaš演化而来的观点，喀什早期的地名就是Kaš。这可以解释为何至迟在8世纪当地已自称本地为“伽师祇离”时，其他伊朗语中仍保留较早的名称Kaš。喀什的地名一定很早就被引入古突厥语，回鹘文献中的Käš反映的就是早期进入突厥语的喀什地名。而《突厥语大词典》中的Qašγar反映的则是喀什突厥化以后，进入当地的突厥人采用当地已经变化了的新地名。还有一种可能是，喀喇汗王朝伊斯兰化以后，受新波斯语影响，采用了新波斯语系统中的地名。类似的例子有突厥语“龟兹”一词的变化。在回鹘文献中，“龟兹”作Küsän。但《突厥语大词典》显示，11世纪的喀喇汗王朝突厥语已使用波斯语中的Quča（Kučā）来指称“龟兹”。

[1]《元史》卷一二四，第3046页。

[2]Ş.Tekin, Maitrisimit nom bitig: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āṣika-Schule, Berlin, 1980，pp.214, 223；此据Y.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p.280。

[3]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279.

[4]D.Adams, A Dictionary of Tocharian B, Amsterdam-New York, 2013, p.198.

[5]M.Peyrot,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ocharian B, Amsterdam-New York, 2008, p.75.

[6]M.Peyrot,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ocharian B, p.75.

[7]哈密屯曾在敦煌藏经洞所出、属于9世纪或10世纪的法藏回鹘文书Pelliot Ouïgour 13的第3、4行读出一个人名küčä ïnal（J.R.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33）。他将其中的küčä与qučа勘同，认为此人名即来自地名quča（J.R.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34）。但这一比定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首先，quča一词在各个阶段的突厥语中都是后元音和谐词汇，这里出现的前元音形式难以解释。其次，地名龟兹在回鹘文献中都用küsän表示，küčä仅此一例，亦难说通。艾尔达（M.Erdal）否定了哈密屯的解释，认为该人名因素应源自名词küč，由küč加专有名词构词附加成分“＋A”构成。以“名词＋A”这种形式构成人名的情况在回鹘人名中并不罕见，譬如Toγana（＝toγan＋a）、Arïγa（＝arïγ＋a）等。参见M.Erdal, “Uigurica from Dunhuang”,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51, 1988, p.254。

[8]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308.

[9]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279.

[10]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302

[11]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2, p.217.

[12]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2, p.230.

[13]刘迎胜：《元代曲先塔林考》，第243、246页。

[14]参见L.Johanson and É.Csató, The Turkic Languag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168。

[15]《新唐书》卷四三，第1149页。

[16]参见陈国灿《唐代的“神山路”与拨换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8，第197～205页。

[17]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482.

[18]W.B.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9, 1938, p.568.

[19]《宋史》卷四九〇，第14112页。

[20]《新唐书》卷四三，第1150页。

[2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阿克苏地区卷》，科学出版社，2011，第103页。地名在此处写作“齐兰村”“齐兰烽火台”，其地即在柯坪县阿恰勒乡其兰村。

[2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

成·阿克苏地区卷》，第83页。

[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阿克苏地区卷》，第104页。

[2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阿克苏地区卷》，第23页。

[25]迪拉娜·伊斯拉菲尔、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出土的回鹘文记账文书二件》，第139页。

[26]迪拉娜·伊斯拉菲尔、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出土的回鹘文记账文书二件》，第143页。

[27]迪拉娜·伊斯拉菲尔、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出土的回鹘文记账文书二件》，第148页。

[2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阿克苏地区卷》，第22页。

[2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阿克苏地区卷》，第117页。

[30]杨东曦主编《巴楚县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第83页。

[31]杨东曦主编《巴楚县志》，第83页。

[32]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292.

[33]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349.

[34]《新唐书》卷四三，第1150页。

[35]荣新江：《所谓“Tumshuqese”文书中的“gyāźdi-”》，第1页。

[36]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第172页。

[37]德藏吐鲁番文书U 1916、U 2130可缀合为一叶，参见P.Zieme, “Was barčuk tili a Turkic Language?”, in: Journal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vol.XII, 2011, pp.75-81；新疆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67 TB 2为另一叶，参见P.Zieme, “An Old Uigur idiyut Text”, in: Academia Turfanica（ed.）, The History Behind the Languages.Essays of Turfan Forum on Old Languages of the Silk Road, Shanghai, pp.1-12。

[38]文书图版见http://turfan.bbaw.de/dta/u/images/u1917seite1. jpg；文书转写参考笠井幸代和茨默的研究，参见Y.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p.205; P.Zieme, “Was barčuk tili a Turkic Language?”, pp.74-75。

[39]P.Zieme, “Was barčuk tili a Turkic Language?”, p.69.

[40]L.Clark, Introduction to the Uyghur Civil Documents of East Turkestan（13th-14th cc.）, Bloomington, 1975, p.37; Y.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p.205; P.Zieme, “Was barčuk tili a Turkic Language?”, p.74.

[41]荣新江：《所谓“Tumshuqese”文书中的“gyāźdi-”》，第1～12页；荻原裕敏·

慶昭蓉「新出トウムシュク語契约文书につい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9、2014、7-55頁。

[42]荣新江：《所谓“Tumshuqese”文书中的“gyāźdi-”》，第7～11页；图木舒克市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新出三件据史德语契约》，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7辑，科学出版社，2014，第63～105页。

[43]参见庆昭蓉《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49页。

[44]吐火罗语专家贝明（M.Peyrot）和庆昭蓉均提到“巴楚语”可能是据史德语，参见M.Peyrot,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ocharian B, p.194, n.293；庆昭蓉《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第20页，注2。

[45]图版参见http://turfan.bbaw.de/dta/u/images/u1917seite1. jpg。

[46]荣新江：《所谓“Tumshuqese”文书中的“gyāźdi-”》，第2页。

[47]P.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1959, pp.196-214.

[48]H.W.Bailey, “khyeṣa”, in his Khotanese Texts V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50-54.

[49]参见P.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p.201-203;（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96页。

[50]参见P.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p.202-203;（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96页。

[51]参见R.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London, 1967, pp.70-71; H.W.Bailey, “khyeṣa”, pp.50-51; Y.Yoshida,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and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in: D.Durkin-Meisterernst, Ch.Reck, D.Weber, eds., Literarische Stoffe und ihre Gestaltung in mitteliranischer Zeit: Kolloquium anlässlich des 70.Geburtstages von Werner Sundermann, Wiesbaden: Ludwig Reichert Verlag, 2009, p.352。

[52]录文据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臨川書店、1992、25頁。

[53]（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大正藏》第2128号；此据CBETA, T 54, No.2128, p.927。

[54]（唐）顾齐之：《新收一切藏经音义序》，《大正藏》第2128号；此据CBETA, T 54, No.2128, p.311。

[55]荣新江：《何谓胡人？——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第3～9页。

[56]H.W.Bailey, “khyeṣa”, p.52.

[57]H.W.Bailey, “khyeṣa”, p.54.

[58]森安孝夫等:《〈往五天竺国传〉记载的西域史料研究》，广中智之等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2页。

[59]张湛、时光：《一件新发现犹太波斯语信札的断代与释读》，第79～81页。

[60]张湛、时光：《一件新发现犹太波斯语信札的断代与释读》，第85页。

[61]Л.Тугушева, Фрагменты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Москва, 1980, p.15.

[62]P.Zieme, “Zum Handel im uigurischen Reich von Qočo”,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4, 1976, pp.158, 166.

第六章 回鹘时代的丝绸之路天山北道

天山山脉横亘于我国新疆中部，阻挡了西北方向来自大洋的水汽，因此其南北两侧的自然环境截然不同。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普遍干燥炎热，降水稀少，仅在天山融雪形成的河流流经之地有若干绿洲可以发展灌溉农业。天山中部的谷地及其北麓气候则相对温润，水草丰富，自然条件较南麓地区更适宜人类活动。天山北麓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受草原游牧政权控制。对于来自农业定居文明的旅人来说，这片区域既缺乏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又没有系统的民政路政设施可供利用，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中原和中亚之间首要的交通路线。

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中原王朝与中亚地区的往来频繁发生。两汉时期中原的旅人皆取道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再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此即当时所谓西域“南道”和“北道”。汉籍中不见有以天山北道作为主要交通道路的记载。到汉末三国时期，从玉门关进入中亚的固定道路已经增至三条。《魏略·西戎传》记载：“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1]北新道先经吐鲁番盆地再往西，在龟兹与中道（即汉之“北道”）汇合。其体现的新变化在于高昌开始取代楼兰上升为联结玉门关和龟兹的枢纽，但其主要路径依然是傍天山南麓西走的原西域北道。同书又有：“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转西北则乌孙、康居……”[2] 东且弥国等臣属于车师后部的小国，已在东天山山北的谷地中，从此向西北前往乌孙、康居之路即天山北道。显然，此时中原人士对于天山北麓的情况非常清楚，但他们前往中亚的道路选择仍然是途经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的三条道路，并不取这条草原之路进入中亚。

隋唐时代天山北道的兴起

公元7世纪初，前述情况发生重要转变，天山北道悄然兴起，成为沟通中原汉地与中亚的交通干道之一。《隋书·裴矩传》引裴矩所作《西域图记序》记载，当时东西往来的商贾在敦煌和西域间行进的道路“凡为三道”。其中，“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正是天山北道[3]。此道经过突厥可汗庭，直接受西突厥汗国控制。当时正值粟特人与突厥人共同体（Turco-Sogdian Milieux）发育成型[4]，粟特商人依托突厥帝国在整个中央欧亚草原的霸权，通过草原之路四处通商。这条商路的兴起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反映。裴矩的记载中并不见“北道”有城郭、道路等属于定居文明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各地之间明确的道里数，则当时的“北道”应仍是一条草原之路。

天山北道在唐朝的经营之下得到了发展。7世纪上半叶，唐朝先后在哈密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东南部设置伊、西、庭三正州，开始了其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直接统治[5]。7世纪中叶，唐朝攻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反叛势力，将军事势力辐射至整个东部天山地区。唐朝随即开始在西域地区建立起一套适用于定居文明的交通体系[6]。《唐会要》记：“显庆二年（657）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定方悉命诸部，归其所居。开通道路，别置馆驿。”[7]贞观二十二年（648）贺鲁率部内属唐朝时，最初被置于庭州下。永徽二年（651），他率众西迁，于双河和千泉建帐，自立为沙钵罗可汗，统摄西突厥咄陆、弩失毕十姓。贺鲁势力在天山北麓地区称霸，数度侵扰西蕃诸部，并进寇唐庭州[8]。为剿灭贺鲁势力，唐朝先后三次西征，主要行军线路和交战地点均在天山北麓。永徽三年，梁建方、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率唐府兵、回鹘兵与贺鲁属部作战。行军涉及天山北麓的处月、处密、处木昆等部所在和牢山、凭洛水等地[9]。永徽七年，程知节于葱山道行军讨击贺鲁，唐军在鹰娑（今巴音布鲁克）与贺鲁部交锋。显庆二年，唐朝发两路大军，分别从天山北道和阿尔泰山南麓向西进攻贺鲁牙帐[10]，最终攻灭贺鲁势力。唐朝在击破贺鲁势力、收服西突厥地面后，为保证其军事控制而实行“开通道路，别置馆驿”的措施，应覆盖了天山北麓地区。

692年，唐朝从吐蕃手中夺回安西四镇，发三万汉兵驻守安西，标志着唐朝西域镇兵化时代的开始。702年，又改庭州为北庭都护府，从此形成安西、北庭两大军区防御东部天山和塔里木盆地的局面。随着唐朝屯重兵在东部天山地区，为了满足日常生活和驻防的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当地展开。天山北道正处在北庭都护府的防卫、经营之下[11]，它逐渐从一条几乎无迹可寻的草原之路蜕变成一条有着明确的道里、完善的路政设施和严密的驻防体系的“阳关大道”。《新唐书·地理

志》记北庭的情况如下：

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县四。有瀚海军，本烛龙军，长安二年置，三年更名，开元中盖嘉运增筑。西七百里有清海军，本清海镇，天宝中为军。南有神山镇。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金满，下。轮台，下。有静塞军，大历六年置。后庭，下。本蒲类，隶西州，后来属，宝应元年更名。有蒲类、郝遮、咸泉三镇，特罗堡。西海。下。宝应元年置。[12]12

唐朝沿着天山北道设立众多城镇，用以屯兵、供给行人。各城之间的距离里程明确，说明这时天山北道的道路已经固定下来。唐代天山北道不但联结着草原地带，更一跃成为中原进出中亚的首选道路[13]。

回鹘时代文献所见天山北道各地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陇右道各地精兵入内地勤王，吐蕃趁机攻占河西，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原的道路被切断。790年，北庭失陷，唐朝失去对天山北道的控制。在回鹘汗国与吐蕃的争夺中，回鹘汗国最终获得了天山南、北两道的控制权。此后，天山北道进入回鹘人统治的时代。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西迁至东部天山地区的回鹘余部逐渐统一在新兴的西州回鹘政权之下。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天山北道在今新疆境内的大部分地段由西州回鹘控制、经营。12、13世纪，西州回鹘先后受西辽和蒙古汗国的统治，但天山北道的实际经营者仍是回鹘人。回鹘时代的天山北道地理信息不再被中原王朝轻易掌握，因此长期处于正史的系统记载之外。在元代的汉文史料中，散见一些东部天山地区的地名，可据此向前回溯西州回鹘时代的地理。关于这些地名的考证，迄今最为全面的研究当属刘迎胜先生的相关论作[14]。关于蒙元时代天山南北两道的驿站交通，先有党宝海先生的系统研究[15]，最近又有西方学者的研究[16]，这些论著也是我们回溯回鹘时代天山地区交通地理的基础。本书第四章对回鹘时代北庭城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论说，下面笔者将按照唐代天山北道从北庭向西行进的路线，讨论北庭以西各地在回鹘时代的情况，尝试复原回鹘时代天山北道的历史面貌。

1.沙钵

唐沙钵守捉城在庭州西延城以西60里，其遗址被比定为今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双河村东北的古城[17]。《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的第17～24行列有西州治下城市的名目，反映925年前后西州回鹘的疆域。地名表第21行记有Śaparä城，学者普遍认为是“沙钵”。

胡三省最早提出沙钵守捉原为莫贺城，向为后世学人遵从，但被岑仲勉先生质疑[18]。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四月“乙亥，贺鲁帅其余众数千帐内属，诏处之于庭州莫贺城”[19]。知贺鲁所统突厥部落活动的中心正是莫贺城，而其时贺鲁已称泥伏沙钵罗叶护（Niwar Išbara Yabγu），该城因贺鲁所据而改称沙钵城颇有可能。莫贺为伊朗语词语，意为神，很早便被操古蒙古语（鲜卑）和突厥语的草原民族所借用，成为一种贵族称号。因此，此城名可能来自突厥语baγa（借自古伊朗语baga），亦有可能来自粟特语-。唐灭高昌以前，庭州为西突厥所据，称可汗浮图城。突厥部族以游牧为生，本无城居的传统。统治者虽在浮图城立帐，其部众很可能多在城外结庐帐而居。因此，可汗浮图城旁的小城莫贺城不似因突厥统治者入住而得名，它最初更可能是一座由

粟特人建造、命名和居住的小城。如前所述，在7世纪初叶，粟特商人依托突厥汗国的庇护，沿天山北麓开拓出往来河西走廊的通商衢道。粟特商人在原属草原之路的天山北麓建城殖民。630年，伊吾地区的粟特人首领石万年率七城来降唐[20]，可知伊州地面全为粟特胡人依城而居，则其西庭州地面或许也有类似的情况。综上，笔者认为沙钵城最初应为粟特商人所建，以粟特语βγ-命名，后来因唐朝以此城纳置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而改称沙钵城。唐北庭时代以此小城置沙钵守捉守御北庭西走之道路。唐以后，此城址为回鹘人继承使用。

2.凭洛

唐沙钵守捉城以西有凭（冯）洛守捉。一般认为此城遗址即昌吉吉木萨尔县三台镇冯洛村古城遗址[21]，东距沙钵城遗址直线距离约13.5公里。《钢和泰卷子》于阗文部分第21行记有“hä:nä bihä:rakä”城，伯希和以此对音“凭洛”[22]。

《世界境域志》第12节详细记载了托古兹古思人的国家和疆域[23]，米诺尔斯基考证其为西州回鹘[24]。此节记高昌附近山后有五城，依次为KZARK、处密城、北庭、、[25]。可还原作突厥语barl～barslïγ（“有虎的”），其地处高昌山后、北庭附近，无论对音还是地望都可以与唐凭洛守捉城相对[26]。唐代的凭洛守捉城在10世纪已经从一个小型军事据点发展成为天山北道一个重要的城市聚落。

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成书于13世纪60年代，记载作者在蒙古汗国的所见所闻。此书第2部第28章《阔儿吉思》记：“他的出生地是个叫八儿里黑（Barliġ）的小村子，离别失八里四帕列散远，在畏吾儿国西部，旅客经过该地的道路上。回历651年（1253～1254），我们从世界皇帝蒙哥可汗的斡耳朵返回时，暂时在该地停留作午休。”[27] “八儿里黑”一名在波斯文原文的不同写本中，或作，或作。英文译者波伊勒据《世界境域志》中曾出现过而取后者[28]。刘迎胜先生认为此地的原本写法也有可能为前者，还原作突厥语“yarl”，对应唐代地名“耶勒”[29]。据原文所记道里推断，笔者赞同波伊勒的读法，此地应是凭洛。帕列散（parasang）为波斯人计量里程的传统单位（阿拉伯语和后来的新波斯语中作farsakh“法尔萨赫”）。根据属于前伊斯兰时代的历史记载和考古证据，一帕列散的距离在4.48公里到5.35公里之间[30]。在现代的词典中，一帕列散或法尔萨赫的长度有5.49公里、6.24公里、6公里等不同说法[31]。可见，这一里程单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具体地区的使用中有过一定变化。本质上，帕列散这一单位反映的是1小时之内行人步行的路程，志费尼时代的数值应当与上述数值范围差距不大。笔者权且取上述数值中的极值公里4.48公里和6.24公里计算，则此地应在别失八里以西约17.92～24.96公里处。据前引《新唐书地理志》记，“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

耶勒城守捉”，则凭洛城据别失八里至少60里，而耶勒城距别失八里至少有140里。唐代里有大里和小里之分，1大里约合531米，1小里约合442.5米[32]。姑且按小里算，凭洛城已在别失八里以西26.5公里开外，尚与波斯史料所记里程相差不远；但耶勒城则至少在别失八里西61.9公里开外，与波斯史料中所记里程数差距太大，则此地不应是耶勒，而应是凭洛，志费尼原文所记应当是brlygh。在13世纪中叶，唐代的凭洛守捉城所在之处不但仍然扼守着天山北道从北庭向西走的道路，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居民聚落。在凭洛城遗址地表所采集的器物残片属于唐代至元代[33]，印证了文献所反映的情况。

3.耶勒

唐凭洛守捉以西80里有耶勒守捉。其遗址被认定为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滋泥泉子镇北庄子村的“北庄子古城”[34]，距上述冯洛村遗址直线距离约25公里。唐代以后，此城名还见于《海屯行纪》中。小亚美尼亚王海屯于1254～1255年自漠北草原进入天山北道西行，该段行程路线由哈密屯做过精当考证[35]。海屯从准噶尔盆地东缘的横相乙儿沿路南下，在北庭以东的白拔烈（独山城）西转，再沿天山北道西行，依次经过北庭、Yarhleγ、Kullug、Yengaγ、Jambaleγ、Xut‘ap‘ay、Yangibaleγ、T‘urk‘asdan、Yergop‘rug、Tingabaleγ、P‘ulad[36]。过北庭之后的Yarhleγ应当就是唐代耶勒城。哈密屯指出耶勒一名应源自突厥语yarlïγ，字面之意为“有崖之地”。唐代耶勒守捉城直到13世纪中叶仍为天山北道要冲。

考古调查显示，当地出土器物皆为唐元之间遗物[37]，与文献记载耶勒城繁荣的年代可相印证。

4.俱六

从唐耶勒守捉再向西（南）80里有俱六守捉。前文所引海屯西归路线中紧接耶勒之后的Kullug即为俱六。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九运街镇六运村的六运古城被学者认为是唐俱六守捉城遗址[38]。考古调查显示，古城始建时间不晚于唐代，沿用至清代，宋元是其鼎盛时期。这体现了唐代的守捉城在回鹘时代发展成为城市聚落的过程。六运古城距北庄子古城直线距离44公里，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记80里距离大致相符。

5.轮台（乌鲁木齐）

从唐俱六守捉城再向西南走100里到达轮台县城。轮台是唐庭州治下一县，说明其已是一处重要居民点；唐朝在此置有静塞军，因此轮台同时也是北庭都护府驻防系统中的重镇。轮台城遗址应是今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泊古城，其地为天山北道东西行走的要津，又扼守着西州、北庭间南北交通要道白杨沟的北面，是东部天山地区的十字路口[39]。866年，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崛起，占领天山南北西、庭二州之地，以此为基础建立西州回鹘王朝。《资治通鉴唐纪》咸通七年（866）条记："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40]清镇即北庭城以西700里左右的清镇军城，是北庭都护府下清海军的驻地。当地人口规模在8世纪中期时就已经发展到县一级别。宝应元年（762），唐朝曾在此置西海县。可见清镇既是唐北庭都护府在天山北道西部的驻防中心，也是庭州西部地区最大的居民点。分析前引史料可知，在西州回鹘崛起之初，仆固俊势力从北庭发兵，沿天山北道出兵，先攻下轮台。一面由轮台西出，继续沿天山北道攻城略地，直到北庭治下最西端的军事重镇清镇；另一面由轮台南下，进入吐鲁番盆地，控制西州。866年西州回鹘立国之时，他们手中已掌握了包括原唐北庭、西州两地治下的广大地区。

轮台自866年落入西州回鹘之手以后，其名再不见于史乘，直到蒙古时代。1221年，长春真人丘处机追寻着成吉思汗西征的脚步来到天山北道重镇鳖思马大城（别失八里），得知当地 "唐之边城，往往尚存。其东数百里有府曰西凉，其西三百余里有县曰轮台"[41]。到13世纪初，轮台之地、之名、之建制仍然保留，说明在9～13世纪之间的西州回鹘时代，这里仍然是天山北道上的一个重镇。

在属于回鹘时代的胡语材料中未尝见有"轮台"之名。《钢和泰卷子》于阗文部分第22行记有Yirrūṃcinä城，学者据读音推断此名应即Ürümči（乌鲁木齐）。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回鹘文书*U 9241（TM 69）[42]第2行结尾出现地名ywrwnkcyn，阿拉特曾将其读作"urumçı"[43]。松井太将此名读作"y̤r̤üŋčin"，指出其词源为突厥语ürüŋ～yürüŋ"白色"结合汉语"镇"（），实来自汉语地名"白水镇"。他进一步推测，回鹘人可能最初以此名指称白水镇，后来也以此指称白水镇及其旁近包括轮台城在内的整片区域[44]。如此，则回鹘文语境中的"乌鲁木齐"可对应汉文语境中的"轮台"。

6.张堡（彰八里）

从唐轮台县再向西北行150里有张堡城守捉。一般认为其遗址为今昌吉市附近的花园古城（昌吉古城），古城曾出土约1370枚窖藏蒙古时代钱币（主要为察合台汗国银币）[45]。张堡在突厥语中作Čambalïq，čam对音"张"，balïq对译"堡"，其在元代汉文史料中作"彰八里""昌八剌"。

《突厥语大词典》“回鹘”词条下记：“此公国由五座城组成，此五城之民乃异教徒中最为悍勇者，是最好的射手。这五城是：唆里迷，由Ḏu-l Qarnayn所建；然后是高昌；然后是彰八里；然后是别失八里；然后是仰吉八里。”[46]《突厥语大词典》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可知唐代的张堡城已经从一座军事戍堡发展成为可与高昌、北庭、唆里迷相提并论的大型城市，成为西州回鹘在天山北道的重镇。

13世纪初，东部天山地区归入蒙古汗国版图。1221年，长春真人沿天山北道西行经此地，“其王畏午儿与镇海有旧，率众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从此地“西去无僧，回纥但礼西方”[47]。在当时，彰八里是天山北道佛教世界的西界。在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白塔）第7层北面内壁西侧有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巡礼此塔时所留题记，作者留名作“彰八里人也先”（čam balïqlïγ äsän）[48]。

前引《海屯行纪》所记1254～1255年天山北道的交通线路中也出现了彰八里，作Jambaleγ[49]。《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记有：“至元十五年（1278），授朵鲁知金符，掌彰八里军站事。”[50]元朝在彰八里所设的驿站为军站。这种驿站由枢密院调派军户驻守维护，供输服役[51]。这反映了当时彰八里是元朝西北交通线路上的重要一站。

7 乌宰（古塔巴、呼图壁）

从张堡城守捉向西，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今昌吉市有两河流经，一为其东的头屯河，一为其西的三屯河。三屯河在昌吉古城以西，应为里移得建河。乌宰守捉在渡里移得建河后70里处，约合37公里（按唐大里算）或31公里（按唐小里算）。现在从昌吉市过三屯河后向西北行约37公里正是呼图壁县，应是唐乌宰守捉之所在。

乌宰守捉为唐北庭都护府辖下扼守天山北道的一处军事据点，在史乘中仅见于《新唐书·地理志》。经过回鹘时代，它同北道的许多唐代军事据点一样，发展成为城市。此地在《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和《经世大典图》中作“古塔巴”。在《海屯行纪》中位于彰八里以西的下一站，作“Xutʻapʻay”。

德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书U 5265系某回鹘商人借长行驮驴契约，文书学特点显示其创作年代属蒙元时代，其1～8行记有：

$_1$yunt yïl altïnč ay on yaŋïqa $_2$maŋa saraŋučqa uzunqa barγu $_3$äšäk ulaγ kärgäk bolup qïbrïdu$_4$-nuŋ äšäkin onarqa//toquz otuz$_5$-luq büzgäk（？） tärkä altïm $_6$qutabatïn yanmïšta bu äšäk$_7$-ni täri birlä köni birür$_8$-män...[52]

丑年六月初十，我撒兰古赤（Saraŋuč）因需要长行驮驴（uzunqa

barrγu äšäk ulaγ），以每10日付29（匹）棉布（？）的租金从九利奴（Qïbrïdu）处借驴一头。待我从古塔巴（Qutaba）返回之时，将此驴并租金一齐送还。

在蒙元时代，有高昌地区的回鹘商人前往古塔巴（呼图壁）一带从事贸易活动。其行商线路应当是从高昌北出白杨沟至轮台，由此入天山北道，向西北行至古塔巴。此地名目前尚未见于13世纪以前的史料之中。此词在词形上与阿拉伯语之Qutbah"呼图白"相近，本意为"演讲"，引申为宣讲教义之讲词。每周五聚礼前及开斋节、宰牲节会礼后，伊斯兰教士会对教众宣讲教义，即念"呼图白"。7世纪白衣大食威震中亚的名将屈底波并波悉林（Qutaybah ibn Muslim）之名Qutaybah也与之近似。如前所述，13世纪彰八里以西已经是伊斯兰世界，而彰八里向西的第一座城正是古塔巴。"古塔巴"一名或许就来自阿拉伯语Qutbah。可能原属于西州回鹘的乌宰城被突厥穆斯林占领之后，成为其在天山北麓的前哨。以"呼图白"命名此城，有向更远处宣教扩张之含义。

8.清镇

从唐乌宰守捉向西，"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今呼图壁县以西有呼图壁河，渡呼图壁河后西行约40公里可达塔西河畔。唐70大里约合37公里，则清镇军城当在塔西河东岸某处，"叶叶河"当为塔西河。

前文已提到，唐代北庭都护府所辖天山北道西部最大的军事和民用据点即清镇军城。866年，仆固俊曾沿天山北道自北庭打到清镇，但此后清镇之名不见于史册。

9.仰吉八里

前引《突厥语大词典》"回鹘条"所记西州回鹘五座大城中有Yaŋï Balïq，突厥语意为"新城"。此即后来元代汉文文献中的仰吉八里（《经世大典图》《元史·地理志》）。在10世纪70年代，此城已经是西州回鹘在天山北道最西端的大城。前引《海屯行纪》中记仰吉八里（Yangibaleγ）在古塔巴之西。刘迎胜先生认为此城遗址为玛纳斯河东岸的阳八勒噶逊古城。阳音译突厥语"yaŋï"，八勒噶逊音译蒙语"balγasun"（意为"城"，等同于突厥语balïq）[53]。

仰吉八里在西州回鹘立国初期就已经出现在天山北道。前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 222-0661.09号回鹘文献创作于13～14世纪，所记内容为9世纪后半叶西州回鹘前两任可汗建国、扩张的历史过程。文献第R

～W节写道：

自十姓回鹘立国以降，其威名远扬。属于契丹国的六姓鞑靼人出现了。尚未靠近此国时，他们已经听到托古兹不花王和我们绝伦的、神圣的、勇武的可汗的威名，他们不再接受原来臣服的国家和汗，弃之。他们爱惜其居住的营盘故地，〔但〕弃之。他们成为我们的圣天可汗兀单的子民。因为交出权力的原因，他们被驱逐，迁徙，来到我们有福的圣天可汗的襟带之地避难，南〔从〕北塔山（Bay Taγ）直到横相乙儿（Qum Säŋir）一带定居安营。他们心满意足，随后的很多月里，他们陆续涌入我们圣天可汗繁荣的城市群，找到自己的城市并定居下来。以斯拉菲尔太子、其子吐尔迪太子、也地不花长史为首的诸特勤离开他们的故地之后，迁徙到这里定居，住在仰吉八里（Yaŋï Balïq）的下方。他们的人数比当地原著居民还要多。

9世纪中叶西州回鹘立国之初，其疆域囊括天山北麓原唐北庭都护府控制范围和天山南麓的吐鲁番盆地。上引文献反映了当时有大批草原游牧部落归附西州回鹘，由漠北草原移居到天山北麓草原。六姓鞑靼部从漠北草原地区迁徙到北塔山（Bay Taγ）、横相乙儿（Qum Säŋir）一带，再迁至仰吉八里下方，在此驻牧。“Bay Taγ”在突厥语中意为“富贵山”，其地位于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东北角，今称“北塔山”。北塔山以北直到阿尔泰山东南部两山脉之间的豁口正是准噶尔盆地进出蒙古高原的孔道，为唐“回鹘道”的咽喉，在各历史时期都曾为草原游牧民族所使用。“Qum Säŋir”在突厥语中有“沙角”之意，地在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缘、乌伦古河河曲附近[54]。此地在13世纪中叶数次见于历史记载。《元朝秘史》记作忽木升吉儿。《元史定宗本纪》记：元定宗贵由汗“三年（1248）戊申春三月，帝崩于横相乙儿之地”[55]。《世界征服者史》第1部36章《贵由汗登上汗位》记：“当他抵达距别失八里一周之程的横相乙儿境内时，大限已到，不给他片刻时间从该地向前进一步。”[56]此地是海屯从漠北草原到天山北道间重要一站，在《海屯行纪》抄本中作Gumsghur[57]。可见一直到蒙元时代，经此地沿准噶尔盆地东缘南下的道路都是连接漠北草原和天山北麓的重要通道。文献所谓“我们圣天可汗繁荣的城市群”，很可能是指天山北道诸城。所谓“仰吉八里的下方”，应当指玛纳斯河北流下游的草原地带，在仰吉八里的北部。可知在西州回鹘王朝建立之初，大量漠北地区的游牧部族沿准噶尔盆地东缘南下，进入西州回鹘治下的天山北道，散布于北道诸城附近，在天山北麓北流河水下游草场驻牧。

10.弓月（阿力麻里）

在唐代天山北道通往碎叶的道路上，位置在碎叶之前的最后一个重镇是弓月。在弓月以前，行人须一路沿天山北麓西（北）行，直到赛里木湖附近越过天山，进入伊犁河谷地。这里的第一站便是弓月。继续傍

伊犁河西行，便可靠近碎叶。弓月城址在今新疆霍城北，在元代为阿力麻里城[58]。

西州回鹘同时代的史料中，弓月仅出现在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中。岑仲勉先生最早将其中出现的Küŋüt和Kiŋüt对为唐代的弓月[59]。《突厥语大词典》“湖”（köl）词条记：裕勒都斯湖（Yulduz Köl），在苦叉、弓月和回鹘的边境上。[60]“弓月”（Kiŋüt）条则记有：“弓月，回鹘边境上的一座城市”[61]。可知在10世纪70年代，西州回鹘王朝的疆域在天山北道的西界就到仰吉八里（玛纳斯）一带，弓月所在的伊犁河谷地已经不在其直接控制范围之内。前引德藏第三木柱文书MIK III 7279显示，西州回鹘王朝西部疆域在1019年时可达伊塞克湖东南岸的上拔塞干（Barsxan），包括弓月城在内的伊犁河谷地在当时应属于西州回鹘治下。在11世纪上半叶，西州回鹘与喀喇汗王朝曾展开激烈的竞争，其结果是西州回鹘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疆域从乌什一带退缩到焉耆一带。其疆域在天山北道的收缩应当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11.裕勒都斯

今巴音布鲁克草原在隋唐之际为西突厥部落驻牧之地。唐灭西突厥后在此置鹰娑都督府，领西突厥鼠尼施部。裕勒都斯并不见著于当时主要的道路记载中，但此地是从伊犁河谷地向东进入吐鲁番盆地、向东南进入焉耆绿洲的必经之路。考古调查和出土文书显示，从吐鲁番盆地西行经阿拉沟进入巴音布鲁克草原的道路就被频繁使用，沟通天山南北[62]。此道一直被后世沿用，明代陈诚出使中亚，也曾取此道。

在回鹘时代，巴音布鲁克草原曾长期是西州回鹘王朝西北边界，是西州回鹘防御、控制天山南北两道的防御重点所在。前引xj 222-0661.09号回鹘文献的第N节记：

他们扬我们圣天可汗之威名上至重霄。他们将〔其威名〕在大地上广泛传播：〔从〕受调查的、由外国之人建立的三唆里迷（Üč Solmï）国的谷地等，直到大裕勒都斯（Uluγ Yultuz）。

前引《突厥语大词典》“湖”词条记：裕勒都斯湖，在龟兹、弓月和回鹘的边境上。说明11世纪70年代，巴音布鲁克草原是西州回鹘的西部前线。

俄藏SI 2Kr 17号回鹘文书是一件写于西州回鹘时代的军事文书，文书第9～11行记有: Basmïlïγ yultuzqa önär tesär anï üzä yol yollarïγ tututruŋ tep yarlïγ ïdu yarlïqadïmïz（我们命令：若拔悉密向裕勒都斯方面移动，汝等当严守要道）[63]。可见西州回鹘对于裕勒都斯草原防

卫的重视，这反映出当时经裕勒都斯草原进入天山南麓的道路非常便利，常为伊犁河谷地的游牧民族所利用。

从游牧带到城市带：回鹘时代天山北道的文化转型

通过前文的讨论可见，唐代确立的沿天山北麓前往伊犁河谷的官道“弓月道”，在回鹘时代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唐朝沿此路修建一系列城镇戍堡，其最初的作用是守卫天山北道的军事据点。8世纪末，唐朝在西域地区的统治彻底终结，以回鹘为主的游牧部族开始迁入天山北道，他们并未将唐朝留下的城镇戍堡等基础设施弃置，反而以此为中心形成聚落。到9世纪中叶西州回鹘王朝建立初期，迁居东部天山地区的回鹘人已将这些城镇作为行政中心。前引xj 222-0661.09号回鹘文历史文献R～W节显示，当时草原游牧民族迁入东部天山地区的路径是从位于准噶尔盆地东缘的横相乙儿、北塔山一带南下到天山北麓的仰吉八里一带，则文献所谓“我们圣天可汗繁荣的城市群（ïduq天känniŋ üdräglig käntläri）”一定位于这片区域中。显然，这些城市的基础就是唐朝在天山北道沿线修筑的以北庭都护府为中心的一系列城镇戍堡。

前引《资治通鉴》所记866年“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之事亦可说明，迁入东部天山地区的回鹘势力之间相互争夺的焦点，正是唐代留存的城镇。其后不久，仆固俊势力遭遇重大挫折。前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BD11287记当时的情形作：“城悉皆残破。回鹘狼性，绥抚甚难。仆固俊独守西〔州〕，兵〔力〕甚寡，百姓离散，拾不壹存，虫蝗为灾，数年荒歉。”这反映了当时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回鹘势力以城市为中心的生存方式。仆固俊治下的城市皆是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并因此受到破坏。而他在形势危急之时仍然选择坚守西州城。文书还反映了其势力陷入低谷的一个重要原因——“虫蝗为灾，数年荒歉”，说明他治下民众的主要食物来源已经是农业产品。

唐代在天山北道留下的城镇戍堡等基础设施促进了新迁入的回鹘等游牧部族的定居化；此外，随着游牧部族的定居化和更多游牧部族的迁入，天山北道的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唐代以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的城郭逐渐变成了定居聚落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一条城市带沿着唐朝的故道发育成型。

到了11世纪中叶，天山北道的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前引《突厥语大词典》“回鹘”条记载，当时西州回鹘的五座大城为北庭、高昌、唆里迷、彰八里、仰吉八里。其中，北庭、彰八里和仰吉八里三座城市位于天山北道。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来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东部天山地区一直以天山为界大致划分为南北两片不同的文化区域：天山南麓绿洲农业定居文明和天山峡谷及其北麓的草原游牧文明。到此时，位于天山北麓的大城的数量已经超越了天山南麓，这标志着在西州回鹘的治理下天山北道文化生态转型的完成。

天山北麓地区文化转型的物质基础是唐代以交通与军事为目的建设的一整套基础设施，但促成这一转型的动力则是回鹘人口的迁入。在唐代，已有大量汉地定居人口被征发至天山北麓地区，并在北庭等城市形成较大的定居聚落，但当时天山北麓的居民主体仍然是操突厥语、受唐朝羁縻统治的游牧部族。继突厥后在蒙古高原建立汗国的回鹘人也属突厥语族游牧部族，但与其他游牧部族相比，回鹘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对城市定居生活和农业生活的熟悉和适应。回鹘人是漠北草原帝国中第一个建立大型城市聚落的族群。考古调查和文献资料显示，回鹘汗国在鄂尔浑谷地建筑的牙帐城规模宏大，以其为中心的地区显示出丰富的定居文明因素。除此之外，回鹘人还在蒙古高原草原地带建有富贵城等城市。普遍认为，这些城市-农耕定居文明因素由回鹘统治下的粟特人和汉人引入，但回鹘人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其统治阶级。

除了下令在草原地带修建大城定居之外，回鹘统治者还将农业和农产品视作本部经济的重要内容。回鹘第二任可汗葛勒可汗的纪功碑《塔利亚特碑》西面第4行记有：“在八〔条河流〕之间，那里有我的草场和耕地。色楞格、鄂尔浑、土拉〔等〕八〔条河流〕使我愉快。”[64]早在回鹘汗国建立初期，其在蒙古高原的核心地带就有了相当重要的农业生产，且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回鹘人在漠北时代对于城市-农耕定居文明的熟悉、接受，可以在逻辑上解释其西迁进入东部天山地区之后对于唐代遗留的基础设施的全面继承和使用。

小结

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发展，经历了唐代和回鹘时代两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唐朝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将原本属于草原游牧文化系统的天山北麓地区纳入定居文明的控制之下。唐朝利用其大一统国家的强大动员能力，在天山北麓地区开拓出一套服务于定居文明生产生活的军政、民政、路政设施，并向当地迁徙汉地农业人口，引入定居文明因素。8世纪末叶以降，回鹘取代唐朝成为东部天山地区的主导势力。本属游牧文化系统的回鹘人全盘接收了唐朝兴建的基础设施，并以此为中心发展定居文明。回鹘人口以唐朝城镇为中心的定居化进一步改变了天山北麓的文化生态。到西州回鹘王朝时代，唐朝遗留下的城镇戍堡体系已经发展成为一片以城市为中心的聚落群体，天山北麓地区真正展现出相当体量的城市定居文明因素，这不正是丝绸之路天山北道沿线经济发展的明证么？

[1]《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第859页。《魏略·西戎传》引文及地名考证，参见余太山《〈魏略·西戎传〉要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第127～145页；收入氏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商务印书馆，2013，第324～364页。《汉书·西域传》记："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阸。"（《汉书》卷九六，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第3924页）可知，"北新道"所记从玉门关经五船北直通吐鲁番盆地的路线早在西汉时代就受到注意，但这条更加便利快捷的路线一直没能被确立为官道，因为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绿洲时常受到匈奴等游牧政权的侵扰，中原王朝在当地的统治并不稳固。《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从两关出西域国的道路仍然是西汉时代的南北两道，而两道汇合的枢纽仍是楼兰一带，参见《后汉书》卷八八，第2914页。

[2]《三国志》卷三〇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62页。

[3]关于裴矩所记北道具体路线的考证，参见芮传明《〈西域图记〉中的"北道"考》，《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第48～55页；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16～24页。

[4]参见É.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Leiden: Brill, 2005, pp.197-208。

[5]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113～119页。

[6]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157-225頁。

[7]《唐会要》卷七三，第1567页。

[8]《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第5186页。

[9]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增補版）』、331-341頁；（汉译本）《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谋俊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第396～408页。

[10]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增補版）』、341-351頁；（汉译本）《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09～421页。

[11]荣新江：《7—10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北庭》，陈春声主编《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商务印书馆，2013，第64～73页。

[12]《新唐书》卷四〇，第1047页。

[13]参见王炳华《唐置轮台县与丝绸之路北道交通》，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51～168页。

[14]参见刘迎胜《元代维吾尔地名及其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第17～30页；《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576～619页。

[15]参见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第15～22页；《蒙元驿站交通研究》，昆仑出版社，2004。

[16]M.Vér, The Postal System of the Mongol Empire in Northeastern Turkestan,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zeged, 2016.

[1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古城遗址》，第402～403页。

[18]岑仲勉：《西突厥史料编年补阙》，氏著《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第26～27页。

[19]《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369～6370页。

[20]据英藏敦煌写本S.367《光启元年（886）沙州伊州地志》，录文参见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第176页。

[2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古城遗址》，第400页。

[22]伯希和：《塞语中之若干西域地名》，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商务印书馆，1962，第46页。

[23]V.Minorsky, Ḥudūd al-ʻ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p.94-95.

[24]V.Minorsky, Ḥudūd al-ʻ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265.

[25]V.Minorsky, Ḥudūd al-ʻ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94.

[26]据蒲立本对汉语中古音的重构（E.Pulleyblank, A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1991），“冯落”的唐朝音可以还原作/pɦiəŋ lak/，则其西北方音应近似/pɦiə lak/，与barlïγ可以勘同。

[27]〔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波伊勒英译，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548页。

[28]〔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558页，尾注1。

[29]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597页。

[30]A.D.H.Bivar,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Pre-Islamic Period”, in: Encyclopaedia Iranica,2010.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weights-measures-i.

[31]《波英大词典》“farsakh”条（F.J.Steingass, A Comprehensive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including the Arabic Words and Phrases to Be Met with in Persian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Paul, 1892，p.918）作“即1帕列散，相当于1里格（league），约18000英尺（feet）”，则约为5.49公里。《波斯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第1706页）“farsakh”条下作6.24公里。《简明波英词典》（*Concise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farsakh”条下作 6公里。

[32]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39～40页。

[3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古城遗址》，第400页。

[3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古城遗址》，第448页。

[35]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p.145-149.

[36]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p.145-149；乞拉可思·冈扎克赛：《海屯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2，第13～18页。

[3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古城遗址》，第448页。

[3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古城遗址》，第446页。

[39]关于轮台在唐代丝绸之路交通上的重要作用，参见王炳华《唐置轮台县与丝绸之路北道交通》，第151～168页。

[40]《资治通鉴》卷二五〇，第8236页。

[41]（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573页。

[42]此文书原件在二战中丢失，现仅存照片,藏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系阿拉特在柏林留学时所摄，编号为199/50。

[43]R.Arat, “Eski Türk Hukuk Vesikaları”,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65, 1964, p.36.

[44]D.Matsui, “Ürümçi̇ ve Eski̇ Uygurca Yürüngçin Üzeri̇ne”, p.428.

[45]古城调查报告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吉古城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文物出版社，1981。古城出土察合台银币的相关研究参见陈戈《昌吉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55～74页；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588页。

[46]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eds.and trans.by R.Dankoff, vol.1,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82, pp.139-140.

[47]（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王国维全集》第11

卷，第575页。

[48]松井太：《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和景教徒的网络》，白玉冬译，徐忠文、荣新江主编《马可·波罗、扬州、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286页。

[49]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p.145-149.

[50]《元史》卷六三，第1570页。

[51]参见党宝海《论元代的站户制度及其性质》，《元史论丛》第10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第155～172页。

[52]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巻2、81頁。

[53]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590页。

[54]P.Pelliot et L.Hambis, 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his Khan：Cheng-wou ts'in-tcheng lou, Leiden: Brill, 1951, pp.315-316.

[55]《元史》卷二，第39页。

[56]〔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284页。

[57]J.R.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p.146.

[58]（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576页；参见王小甫《“弓月”名义考》，氏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201页。孟凡人认为弓月城非元代的阿力麻里城，其址应是今日的吐鲁番吁孜古城，参见孟凡人《弓月城和阿力麻里城方位考》，《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此据《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元明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第169～177页。

[59]岑仲勉：《弓月之今地及其语原》，氏著《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86～187页。

[60]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2, p.217.

[61]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2, p.334.

[62]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323～346页；王炳华：《“天山峡谷古道”刍议》，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1～32页。

[63]参见L.Tugusheva, “Three Letters of Uighur Princes: From the MS Collection of the Leningrad S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4, 1971, pp.173–187; G.Clauson, “Two Uygur Administrative Orders”,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45, 1973, pp.213–222。本书录文据土谷舍娃最新的转写及翻译，参见Л.Тугушева, Уйгурские дел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X—XIV вв.из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Москва, 2013, pp.126-128。

[64]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208页。

参考文献

古籍（按汉文书名首字拼音顺序排列[1]）

1.汉文古籍

《册府元龟》，（宋）王钦若等编，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

《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李志常撰，王国维校注，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中华书局，2000。

《大唐西域记校注》，（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2000。

《杜牧集系年校注》，（唐）杜牧著，吴在庆校注，中华书局，2008。

《金史》，（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5。

《李德裕文集校笺》，傅璇琮、周建国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78。

《辽史》，（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6。

《宋会要辑稿》，（清）徐松辑，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宋史》，（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隋书》，（唐）魏征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9。

《唐大诏令集》，（宋）宋敏求编，中华书局点校本，2008。

《唐会要》，（宋）王溥撰，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06。

《西域番国志》，（明）陈诚、李暹撰，周连宽校注，中华书局，2000。

《西域水道记（外二种）》，（清）徐松著，朱玉麒校注，中华书局，2005。

《西域行程记》，（明）陈诚、李暹撰，周连宽校注，中华书局，2000。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5。

《元典章（大元圣政国朝典章）》，陈高华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

《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撰，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

《元史》，（明）宋濂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编著，胡三省注，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

2.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籍

《布哈拉史》

Narshakhī, The History of Bukhara, ed.and trans.by R.Frye, Cambridge, 1954.

《道里邦国志》，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注，中华书局，1991。

《黄金草原》

Mas‘ūdī, Les Prairies d’Or, tr.de Barbier de Meynard et Pavet de Courteille, re.par C.Pellat, Tome 1-5, Paris,1962-1997；（汉译本）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人民出版社，2013。

《记述的装饰》

A.P.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2（1982）, 1983.

《世界境域志》

V.Minorsky,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London, 1970；（汉译本）《世界境域志》，王治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波斯文校勘本）Anon., Ḥudūd al-'Ālam min al-Mašriq ila al-Maġrib, M.Sutūda, ed., Tehran: Ṭahūrī, 1983.

《世界征服者史》，志费尼著，波伊勒英译，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2016。

《塔米姆回鹘游记》

Tamim ibn Bahr, Tamim ibn Bahr's Journey to the Uyghurs, trans.by V.Minorsk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xii, 1948；《塔米姆·伊本·巴赫尔回鹘游记》，王小甫译，《中亚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收入氏著《边塞内外：王小甫学术文存》，东方出版社，2016。

《突厥语大词典》

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3 vols, ed.and trans.by R.Dankoff,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1984, 1985；（汉译本）《突厥语大词典》，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 民族出版社，2002；（土耳其语本）Dīwān Luγāt at-Turk, ed.and trans.by S.Tuba, kabalcı yayınevi, 2005。

3.西文古籍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注，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2015。

乞剌可思·冈扎克赛：《海屯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2。

今人论著

1.中文部分（按作者姓氏首字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黄文弼西域文书中的回鹘文文献综述》，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阿西莫夫、博斯沃思主编《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上、下），华涛、刘迎胜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

巴尔托里德等：《中亚简史（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白玉冬：《于阗文P.2741文书所见鞑靼驻地Buhäthum考》，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7。

白玉冬：《回鹘碑文所见八世纪中期的九姓鞑靼（Toquz tatar）》，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白玉冬：《十至十一世纪漠北游牧政权的出现——叶尼塞碑铭记录的九姓达靼王国》，《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白玉冬：《〈希内乌苏碑〉译注》，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3。

白玉冬：《有关高昌回鹘的一篇回鹘文文献——xj 222-0661.9文书的历史学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

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北村高：《关于蒙速思家族供养图》，《元史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毕长朴：《回纥与维吾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伯希和：《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1957。

伯希和：《塞语中之若干西域地名》，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商务印书馆，1962。

蔡美彪：《辽金石刻中的“鞑靼”》，《国学季刊》第7卷第3号，1952。

岑仲勉：《吐鲁番木柱刻文略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1947；收入氏著《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

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

陈高华编《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陈高华编《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2017。

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陈国灿：《八、九世纪间唐朝西州统治权的转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8辑，1986。

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元代杭州裹贴纸浅析》，《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陈国灿：《唐代的经济社会》，文津出版社，1999。

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前期户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1999。

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的镇戍与馆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2000。

陈国灿：《〈俄藏敦煌文献〉中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2005。

陈国灿：《唐代的“神山路”与拨换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

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陈国灿、伊斯拉非尔·玉苏甫：《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初探》，《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陈晓伟：《胡广〈记高昌碑〉与高昌麹氏、唐李元忠事迹丛考》，《文献》2016年第6期。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

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

茨默：《佛教与回鹘社会》，桂林、杨富学译，民族出版社，2007。

茨默：《有关摩尼教开教回鹘的新史料》，王丁译，《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3期。

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党宝海：《13、14世纪畏兀儿亦都护世系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党宝海：《吐鲁番出土金藏考——兼论一组吐鲁番出土佛经残片的年代》，《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1999。

党宝海：《十三世纪畏吾儿蒙速速家族供养图考》，《欧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2000。

党宝海：《魏公村考》，《北京文博》2000年第4期。

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昆仑出版社，2004。

党宝海：《论元代的站户制度及其性质》，《元史论丛》第10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迪拉娜·伊斯拉菲尔、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出土的回鹘文记账文书二件》，『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9，2014。

多鲁坤·阚白尔、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4，1989。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

方广锠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

方广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全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冯家昇：《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编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下），民族出版社，1958、1981。

冯志文、吴平凡：《回鹘史编年》，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

付马：《回鹘时代的北庭城——德藏Mainz 354号文书所见北庭城重建年代考》，《西域研究》2014年第2期。

付马：《唐咸通乾符年间的西州回鹘政权——国图藏BD11287号敦煌文书研究》，《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

付马：《西州回鹘王国建立初期的对外扩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 222-0661.09号回鹘文书的历史学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4。

付马：《黄文弼所获文书中的回鹘时代高昌地区城郭名目——兼论回鹘高昌“二十二城”名实》，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

付马：《两种回鹘语〈阿离念弥本生经〉写本比较研究——兼论西州回鹘早期的译经活动》，《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

府宪展：《圣彼得堡藏丝绸之路文献文物》，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

高田时雄：《敦煌·民族·语言》，钟翀等译，中华书局，2005。

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耿世民：《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耿世民：《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世界宗教》1981年第1期；收入氏著《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耿世民：《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研究》，《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耿世民：《回鹘文〈大白莲社经〉残卷（二叶）研究》，《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

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耿世民：《西域文史论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 年第2期。

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耿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哈密顿：《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耿昇译，《敦煌学辑刊》创刊号，1983；《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续）》，《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郝春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

赫俊红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西域文献遗珍》，中华书局，2011。

侯世新主编《西域历史文化宝藏探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论文集》第二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胡戟、李孝聪、荣新江：《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胡小鹏：《〈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考》，《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

华涛：《回鹘西迁及东部天山地区的政治形势》，《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

华涛：《穆斯林文献中的托古兹古思》，《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

华涛：《北庭之战前后回鹘与大食的关系》，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华涛：《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

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华涛：《〈萨剌姆东使记〉译注与研究》，《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续完）》，《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

黄盛璋：《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氏著《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黄时鉴：《黄时鉴文集》，中西书局，2011。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

黄文弼：《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文物》1964年第2期；收入氏著《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收入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民族出版社，2003。

李鸿宾：《唐朝的北方边地与人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

李军：《关于晚唐西州回鹘的几个问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李军：《晚唐五代伊州相关史事考述》，《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李树辉：《吐鲁番出土T.III号回鹘木杵文书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4辑，科学出版社，2009。

李树辉：《乌古斯和回鹘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

李肖：《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文物出版社，2003。

林幹：《突厥与回纥》，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文物出版社，2011。

林梅村、陈凌、王海城：《九姓回鹘可汗碑校释》，《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

林悟殊：《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氏著《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

刘戈、郭平梁：《回鹘史指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刘美崧：《论归义军与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7。

刘迎胜：《元代曲先塔林考》，《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

刘迎胜：《元代维吾尔地名及其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

刘迎胜：《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刘迎胜、卡哈尔·巴拉提：《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碑文之校勘与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辑，1984。

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中西书局，2016。

刘子凡：《北庭的李元忠时代——胡广记〈唐李元忠神道碑〉研究》，《文史》2017年第2辑。

柳洪亮：《柏孜柯里克新发现的〈杨公重修寺院碑〉》，《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

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罗新：《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

梅村坦：《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吐鲁番考古记〉所收回鹘文古文献过眼录》，张承志译，《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收入荣新江编《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科学出版社，2013。

孟凡人：《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孟列夫、钱伯城主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第1～1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1992～2001。

孟宪实：《关于麴氏高昌王朝地方制度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孟宪实：《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中华书局，2017。

彭金章等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全3卷），文物出版社，2000～2004。

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全2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

庆昭蓉：《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14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

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荣新江：《所谓“Tumshuqese”文书中的“gyāźdi-”》，『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7，1992。

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荣新江：《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资料简介》，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台北《南海》杂志社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荣新江：《王延德所见高昌回鹘大藏经及其他》，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饶宗颐编《华学》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

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荣新江：《何谓胡人?——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乾陵文化研究》第4辑，2008。

荣新江：《〈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张定京等主编《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荣新江：《九、十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龟兹学研究》第5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

荣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敦煌研究》2013第3期。

荣新江:《7—10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北庭》，陈春声主编《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商务印书馆，2013。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荣新江：《近年对龟兹石窟题记的调查与相关研究》，《西域研究》2014年第4期。

荣新江：《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的地理信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

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咸通七年—十三年）》，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编委会编《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咸通十四年—中和四年）》，《敦煌学》第27辑，2008。

荣新江、朱丽双：《11世纪初于阗佛教王国灭亡新探——兼谈喀喇汗王朝的成立与发展》，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科学出版社，2011。

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荣新江、朱丽双：《从进贡到私易：10—11世纪于阗玉的东渐敦煌与中原》，《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敦煌研究院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号）。

芮传明：《〈西域图记〉中的“北道”考》，《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

申国美编《中国散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松井太：《回鹘语käzig与高昌回鹘王国税役制度的渊源》，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松井太：《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书中所看到的七康湖和其灌溉》，广中智之译，《吐鲁番学研究》2010年第1期。

松井太:《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和景教徒的网络》，白玉冬译，徐忠文、荣新江主编《马可·波罗、扬州、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苏航：《回鹘卜古可汗传说新论》，《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

孙秉根、孟凡人、陈戈：《新疆吉木萨尔回鹘佛寺遗址》，《考古》1983年第7期。

台来提·乌布力：《新疆库木吐喇石窟的题记、题刻和榜题》，《西域研究》2014年第4期。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王炳华：《唐置轮台县与丝绸之路北道交通》，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王炳华：《“天山峡谷古道”刍议》，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王炳华主编《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科学出版社，2017。

王国维：《鞑靼考》，《清华学报》第3期第1号，1926；收入氏著《观堂集林》第14卷，中华书局，1957。

王素：《麴氏王国末期三府五郡二十二县考》，《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

王小甫：《从回鹘西迁到黑汗王朝》，《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辑。

王小甫：《安史之乱后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王小甫：《拜火教与突厥兴衰》，《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王小甫：《回鹘改宗摩尼教新探》，《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王小甫：《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中华书局，2012。

王小甫：《边塞内外：王小甫学术文存》，东方出版社，2016。

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7。

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中华书局，2012。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乌苏吉：《波斯文献中关于喀什噶尔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的记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谢稚柳：《敦煌艺术序录》，上海出版公司，1955。

辛姆斯·威廉斯：《从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陈怀宇译，《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人民出版社编《库车库木吐拉石窟》，新疆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阿克苏地区卷》，科学出版社，20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古城遗址》，科学出版社，2011。

徐畅：《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全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

杨富学：《关于回鹘摩尼教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杨富学：《回鹘改宗摩尼教问题再探》，《文史》2013年第1辑。

杨富学：《回鹘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杨富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杨富学、牛汝极：《牟羽可汗与摩尼教》，《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杨圣敏：《〈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收入氏著《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2001。

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回鹘文文献二种》，《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4辑，1994。

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回鹘文中心木》，『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1，1996。

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新发现的回鹘语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1999。

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张定京等主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张广达：《文书 典籍与西域史地》（张广达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张广达、荣新江：《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唐研究》第3卷，1997；收入氏著《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张铁山：《回鹘文献的结构与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张铁山、茨默：《十姓回鹘王及其王国的一篇备忘录》，白玉冬译，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2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

张湛：《粟特商人的接班人？——管窥丝路上的伊朗犹太商人》，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

张湛、时光：《一件新发现犹太波斯语信札的断代与释读》，《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2008。

朱丽双：《〈于阗国授记〉译注（上、下）》，《中国藏学》2012年S1期、2014年S1期。

2.西文（英、德、法、土耳其）部分（按作者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列）

Adams, D.Q., A Dictionary of Tocharian B, Amsterdam-New York, 2013.

Adam, V., Laut, J.P., und Weiss, A., hrsg., Bibliographie alttürkischer Studi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Alyılmaz, C., Orhun Yazıtlarının Bugünkü Durumu, Ankara, 2005.

Arat, R.R., “Eski Türk hukuk vesikalari”,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65-1, 1964.

Bang, W., und Gabain, A.v.,“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 Manichaica”,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2, 1929.

Bang, W., und Gabain, A.v.,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I: Der große Hymnus auf Mani ”,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3, 1930.

Bang, W., Gabain, A. v., und Rachmati, G.R.,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 Das buddhistische Sūtra Säkiz Yükmäk, Berlin, 1934.

Bailey, H.W., “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tsou”, Asia Major, n.s., I.1, 1949.

Bailey, H.W., “The Staël -Holstein Miscellany”, Asia Major 2, 1951.

Bailey, H.W., Khotanese Texts I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Bailey, H.W., Khotanese Texts V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Barthold, V.V.,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3.ed., 1968.

Bazin, L., and Zieme, P.,eds, De Dunhuang à Istanbul—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 Silk Road Studies 5, Turnhout: Brepols, 2001.

BeDuhn, J.D., “Middle Iranian and Turkic Texts Associated with Manichaean Art from Turfan”, Appendix I to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by Z, Gulásci,Tu rnhout: Brepols, 2001.

Beckwith, C., Empires along the Silk Road, Princeton/Oxford, 2009.

Bhattacharya-Haesner, Ch., Central Asian Temple Banners in the Turfan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3.

Biran, M.,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 Cambridge, 2005.

Biran, M., “The Qarakhanids’ Eastern Exchange: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Silk Roads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in: J.Bemmann, and M.Schmauder, eds.,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 Contributions to Asian Archaeology 7, Bonn, 2015.

Boyce, M., 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aean S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 Berlin, 1960.

Bregel, Y., A Historical Atlas of Central Asia, Brill, 2003.

Brose, M., Subjects and Masters: 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7.

Cerensodnom, D., und Taube, M.,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 1993.

Clark, L., Introduction to the Uyghur Civil Documents of East Turkestan (13th-14th cc.) , Bloomington, 1975.

Clark, L., Uygur Manichaean Texts: Volume II: Liturgical Texts: Texts, Translations,Commentary.Corpus Fontium Manichaeorum: Series Turcica II.Turnhout: Brepols, 2013.

Clark, L., Uygur Manichaean Texts, Volume III: Ecclesiastical Texts, Texts, Translations, Commentary.Corpus Fontium Manichaeorum: Series Turcica III.Turnhout: Brepols, 2017.

Clauson, G.,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Clauson, G., “Two Uygur Administrative Orders”,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45, 1973.

De la Vaissière, É., Sogdian Traders, Leiden: Brill, 2005.

Dietz, S., Ölmez, M., und Röhrborn, K.,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V: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Wiesbaden, 2015.

Doerfer, G.,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Älterer neupersischer Geschichtsquellen, vor allem der Mongolen- und Timuridenzeit, Wiesbaden, 1963.

Dotson, B.,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Wien, 2009.

Drompp, M., “The Uighur-Chinese Conflict of 840-848”, in: N.Di Cosmos, ed., 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500-1800）, Leiden-Boston/Köln: Brill, 2002.

Drompp, M., “Breaking the Orkhon Tradition: Kirghiz Adherence to the Yenisei Region after A.D.84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3）, 1999.

Drompp, M., 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Leiden-Boston: Brill, 2005.

Durkin-Meisterernst, D.,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Brepols, 2004.

Durkin-Meisterernst, D.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Monographien zur indischen Archäologie, Kunst und Philologie 17.Berlin: Dietlich Reimer, 2004.

Durkin-Meisterernst, D., “Late Features in Middle Persian Texts from Turfan”, in: L.Paul, ed., Persian Origins—Early Judaeo-Persian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Persian, Wiesbaden, 2013.

Ecsedy, H., “Old Turkic Titles of Chinese Orig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8, 1965.

Elverskog, J., 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 Turnhout: Brepols, 1997.

Erdal, M., Old Turkic Word Formation, 2 vols, Wiesbaden, 1991.

Erdal, M., “The Turkish Yarkand Document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47（2）, 1984.

Erdal, M., “Uigurica from Dunhuang”,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51 （2）, 1988.

Franke, H., “Zur Datierung der mongolischen Schreiben aus Turfan” , Orients 15, Leiden, 1962.

Franke, H., “A Sino-Uighur family portrait: notes on a woodcut from Turfan”, Canada-Mongolia Review 4 （1）, 1977.

Gabain, A.v., Das Leben im uigurischen Konigreich von Qoco: 850-1250, Harrassowitz, 1973；（汉译本）冯佳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邹如山译,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

Geng Shimin et Hamilton, J.R., “L’inscription ouigoure de la Stele Commemorative des Iduq qut de Qoco”，Turcica XIII, 1981.

Geng Shimin und Klimkeit, H.J., “Zerstörung manichäischer Klöster in Turfa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8, 1985.

Geng Shimin und Klimkeit, H.J.,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Wiesbaden, 1988.

Grünwedel, A., Bericht über archa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München, 1906.

Gulácsi, Z.,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 Brepols, 2001.

Halén, H., “Die uigurischen Mannerheim-Fragmente （2）”, Studia Orientalia 67, 1991.

Hamilton, J.R.,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Paris, 1955.

Hamilton, J.R.,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46, Livr.1/2, 1958.

Hamilton, J.R., “Toquz-Oγuz et On-Uyγur”, Journal Asiatique, vol.25, 1962.

Hamilton, J.R., “Un acte ouïgour de vente de terrain provenant de Yar-khoto”, Turcica 1, 1969.

Hamilton, J.R., 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e: Manuscrits ouigours de Touen-houang, Paris, 1971.

Hamilton, J.R., “Le pays des Tchong-Yun, Cungul, ou Cumuda au Xe Siècle”, Journal Asiatique 265, 1977.

Hamilton, J.R.,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aris, 1986.

Hamilton, J.R., “Calendriers manichéens ouïgours de 988, 989, et 1003”, Mélanges offerts à Louis Bazin, Paris, 1992.

Hamilton, J.R., “Étude nouvelle de la lettre Pelliot Ouïgour 16 bis d’un Bouddhiste d’époque mongole”, in: Turfan and Tun-huang:the texts, A.Cadonna （ed.）, Firenze, 1992.

Hamilton, J.R., “Remarks concerning Turfan Stake InscriptionsIII”, Turfan Revisited, 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Berlin,2004.

Hamilton, J.R., et Bazin, L.,“Un manuscrift chinois et turc runiforme de Touen-Houang.BM.Or.8212 （78, 79）”, Turcica: Revue d'Etudies Turques, 4, 1972.

Hamilton, J.R., et Niu Ruji, “Deux Inscriptions funéraires turques nestoriennes de la Chine orientale”, Journal Asiatique 282, 1994.

Hamilton, J.R., et Niu Ruji, “Inscriptions ouïgoures des grottes bouddhiques de Yulin”, Journal Asiatique 286, 1998.

Hamilton, J.R., et Sims-Williams, N., 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London, 1990.

Hansgerd, G.und Zimonyi, I., Oriental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ölker Osteuropas und Zentralasiens im Mittelalter.Die Gayhani-Tradition （Ibn Rusta, Gardizi, Hudud al-Ālam, al-Bakri und al-Marwazi）, VdSUA Band 54, Wiesbaden, 2001.

Henning, W.B.,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9, No.3 （1938）.

Henning, W.B., Sogdica, London, 1940.

Johanson, L., and Csató, É., The Turkic Languag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8.

Kasai, Y.,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Brepols, 2008.

Klimkeit, H.-J., 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 Leiden, 1982.

Klimkeit, H.-J.,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93.

Knüppel, M.,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7: Heilkundliche, volksreligiöse und Ritualtexte, Stuttgart, 2013.

Kochnev, B.D., “La chronologie et la généalogie des Karakhanides du point de vue de la numis- matique” , in: V. Fourniau , ed., Etudes karakhanides.Cahiers d’Asie Centrale 9, Tachkent/Aix- en-Provence, 2001.

Kudara,K., Chin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Teil 4.Chinese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vol.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2005.

Kudara, K., und Zieme, P., “Fragment zweier unbekannter Handschriften der uigurischen Xuanzang-Biographe”,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1（11）, 1984.

Laut, J.P., “Bemerkunge zur spätuigurischen Handschrift Mainz 713 （T II Y 58）” ,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33, 1983.

Laut, J.P., Der frühe türkische Buddhismus und seine literarischen Denkmäler, Wiesbaden, 1986.

Laut, J.P., Bibliographie alttürkischer Studien: Nachträge und Neuzugänge.I-IX,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Band 17, 2002; Band 18, 2004; Band 19, 2005;Band 20, 2006;Band 21, 2007;Band 22, 2008; Band 23, 2009; Band 24, 2011; Band 25, 2013.

Le Coq, A.v., Chuastuanift, ein Sündenbekenntnis der manichaïschen Auditores.Gefunden in Turfan （Chinesisch-Turkistan）,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Klasse, 1910.

Le Coq, A.v.,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III, Berlin, 1922.

Ligeti, L., ed., Studia Turcica, Budapest: Akadeniai Kiado, 1971.

Liu Yingsheng, “A century of Chinese research on Islamic Central Asian history in retrospect”, Cahiers d’Asie centrale 9, 2001.

Livshits, V., 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iech’e, London, 2015.

Mackerras, C., “Sino-Uighur Diplomatic and Trade Contacts（744 to 840）”,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3-3,1969.

Mackerras, C., The Uighur Empire （744–840） according to the T'ang dynastic histories, Canberra, 1968.

Mackerras, C., “the Uighurs”, in: D.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1990.

Mackerras, C., “Uyghur-Tang Relations, 744-840”，Central Asian Survey, vol.19, No.2, 2000.

Mackerras, 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ygur State and China’s Tang Dynasty, 744-840”，in: D.Christian and C.Benjamin, eds., Realms of the Silk Roads: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Studies IV, Brepols, 2000.

Matsui, D., “Unific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by the Mongol Empire as Seen in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 In: 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eds., 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lich Reimer Verlag, 2004.

Matsui, D., “Taxation Systems as Seen in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 from Turfan: An Overview”,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50,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2005.

Matsui, D., “Six Uigur Contracts from the West Uigur Peiord（10th-12th Centuries）”,『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15、弘前大学人文学部、2006。

Matsui, D., “An Uigur Document Preserved in the Library of Istanbul University”,『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2、2007。

Matsui, D., “Revisiting the Uigur Inscriptions of the Yulin Caves”,『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3、2008。

Matsui, D., “Recent Situation and Research Trends of Old Uigur Studies”，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 4, Tōyō Bunko, 2009.

Matsui, D., “Mongol Globalism Attested by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 from East Turkestan”,『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 22、弘前大学人文学部、2009。

Matsui, D., “Uigur käzig and the Origin of Taxation System in the Uigur Kingdom of Qočo”，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18, 2008 [2013].

Matsui, D., “Uigur Manuscripts Related to the Monks Sivšidu and Yaqšidu at ‘Abita-Cave Temple’ of Toyoq”,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Matsui, D., “Dating of the Old Uygur Administrative Orders from Turfan”，in: M.Özkan/E.Doğan （eds.）, VIII.Milletlerarası Türkoloji Kongresi（30 Eylül – 04 Ekim 2013 - İstanbul） bildiri kitabı, vol.IV, İstanbul，2014.

Matsui, D., “Ürümçi ve Eski Uygurca Yürüngçin Üzerine”, in: Yalım Kaya Bitigi.Osman Fikri Sertkaya Armağanı, Ed.Hatice Şirin User, Bülent Gül, Türk Kültürünü Araştırma Enstitüsü, Ankara, 2013.

Matsui, D., “Old Uigur Toponyms of the Turfan Oases”, in: E.Ragagnin und J.Wilkens, Hrsg., Kutadgu Nom Bitig: Festschrift für Jens Peter Laut zum 60.Geburtstag, Wiesbaden, 2015.

Maue, D.,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Dokumente in Brahmī und Tibetischer Schrift, Stuttgart, 1996.

Maue, D.,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9.Dokumente in Brahmi und tibetischer Schrift.Teil 2.Stuttgart, 2015.

Mayer, A.,“Die Gründungslegende Khotans” , Buddhistische Erzählliteratur und Hagiographie in türkischer Uberliferung, J.P.Laut and K.Röhrborn,ed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0.

Mori, M., “A Study of Uygur Documents of Loans for Consumptio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The Oriental Library）20, 1961.

Moriyasu, T.,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 40, 1982；（日文版）

「元代ウイクル仏教徒の一書簡：敦煌出土ウイクル語文献補遺」護雅夫編『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山川出版社、1983。

Moriyasu, T.,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De Dunhuang à 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 Silk Road Studies 5, Brepols, 2001.

Moriyasu, T., “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Čiqtim in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in: M.Ölmez und S.-Ch.Raschmann, hrsg.,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Festschrift für Peter Zieme anläßlich seines 60.Geburtstags, Berlin/Istanbul, 2002.

Moriyasu, T.,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Ouïghours et de leurs relations avec le Manichéisme et le Bouddhisme”, in:『コレージュ＝ド＝フランス讲演录 ウイグル＝マニ教史特別講義』（“Four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in May 2003.History of Manichaeism among the Uighurs from the 8th to the 11th Centuries in Central Asia”），森安孝夫編『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大阪大学 21 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インターフェイスの人文学」報告書，第3巻）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

Moriyasu, T., “Manichaeism under the East Uighur Khanate with Special References to the Fragment Mainz 345 and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in:『コレージュ＝ド＝フランス讲演录 ウイグル＝マニ教史特別講義』（“Four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in May 2003.History of Manichaeism among the Uighurs from the 8th to the 11th Centuries in Central Asia”），森安孝夫編『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大阪大学 21 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インターフェイスの人文学」報告書，第3巻）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

Moriyasu, T., “The Flourishing of Manichaeism under the West Uighur Kingdom.New Edition of the Uighur Charter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anichaean Monastery in Qočo”, in:『コレージュ＝ド＝フランス讲演录 ウイグル＝マニ教史特別講義』（“Four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in May 2003.History of Manichaeism among the Uighurs from the 8th to the 11th Centuries in Central Asia”），森安孝夫編『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大阪大学 21 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インターフェイスの人文学」報告書，第3巻）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

Moriyasu, T., “The Decline of Manichaeism and the Rise of Buddhism among the Uighur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Uighur Buddhism” , in:『コレージュ＝ド＝フランス讲演录 ウイグル＝マニ教史特別講義』（“Four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in May 2003.History of Manichaeism among the Uighurs from the 8th to

the 11th Centuries in Central Asia”），森安孝夫編『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大阪大学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インターフェイスの人文学」報告書，第3巻）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

Moriyasu, T.,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Wiesbaden, 2004.

Moriyasu, T., “From Silk, Cotton and Copper Coin to Silver.Transition of the Currency Used by the Uighur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8th to the 14th Centuries.” in: 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Moriyasu, T., “Epistolary Formulae of the Old Uygur Letters from Central Asia”，Acta Asiatica.Bulletin of the Far Eastern Culture 94: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 2008.

Moriyasu, T., “Chronology of West Uighur Buddhism: Re-examination of the Dating of the Wall-paintings in Grünwedel’s Cave No.8（New: No.18）, Bezeklik”, Aspects of Rea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Silk Road Studies 16, Turnhout: Brepols, 2008.

Moriyasu, T., “Epistolary Formulae of the Old Uighur Letters from the Eastern Silk Road（Part 1）.” Memoirs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Osaka University 51, 2011.

Moriyasu, T., “Epistolary Formulae of the Old Uighur Letters from the Eastern Silk Road（Part 2 ）.” Memoirs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Osaka University 52, 2012.

Moriyasu, T., and Zieme, P., “From Chinese to Uighur Documents”,『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4、1999。

Müller, F.W.K., Uigurica, I, Berlin: G.Reimer, 1908.

Müller, F.W.K.,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5, Berlin: G.Reimer, 1912.

Müller, F.W.K., “Der Hofstaat eines Uiguren-Königs”, Festschrift V.Thomsen zur Vollendung des 70.Lebensjahres, Leipzig, 1912.

Müller, F.W.K., 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3, Berlin: G.Reimer, 1915.

Nishiwaki, T., Chin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Teil 3.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Stuttgart: Franz Steiner, 2001.

Oda, J., “On baš bitig, ’ydyš bitig and čïn bitig.Notes of the Uighur Documents Related to a Person Named Turï”,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1991.

Oda, J., “A Recent Study on the Uighur Document of Pintung’s Petition”,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1992.

Oda, J., “Eski bir Türk şiirindeki Yol Temür adlı bir zat üzerine”, in: M.Ölmez, ed., Talat Tekin armağanı.65.doğum yılı dolayısıyla meslektasları ve öğrencilerinin yazılarıyla, Ankara, 1993.

Oda, J., “Eski Uygurlarda ög bitig üzerine”,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6, 1996.

Oda, J.,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Sūtra called Säkiz Yükmäk Yaruq or Säkiz Törlügin Yarumïš Yaltrïmïš in Old Turkic, Turnhout: Brepols, 2015.

Ölmez, M., und Raschmann, S-Ch., hrsg.,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Festschrift für Peter Zieme anläßlich seines 60.Geburtstags, Berlin/Istanbul, 2002.

Özertural, Z., Der uigurische Manichäismus.Neubearbeitung von Texten aus Manichaica I und III von Albert v.Le Coq.Wiesbaden, 2008.

Özertural, Z.,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6.Mahayana-Sutras und Kommentartexte, Stuttgart, 2012.

Pelliot, P.,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1959.

Pelliot, P.,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s, 6 vols.Paris, 1981-1992.

Peyrot, M.,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ocharian B, Amsterdam/New York, 2008.

Pinks, P., Die Uiguren von Kan-Chou in der frühen Sung-Zeit（960-1028）, Asiatische Forschungen 24,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8.

Popova, I.and Liu Yi, eds.,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敦煌學: 第二

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 St.Petersburg, 2012.

Pulleyblank, E.G., “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 Asia Major, vol.4, No.1, 1954; in his: Central Asia and Non-Chinese People of Ancient China, 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Series, Ashgate, 2002.

Pulleyblank, E.G.,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BC Press, 1991.

Pritsak, O., “Von den Karluk zu den Karachanide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e 101, 1951.

Radloff, W., “Uigurische Schriftstücke, in Text und Übersetzung”, in: A.Grü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a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München.

Ramstedt, G.J., “Zwei uigurische Runeninschriften in der Nord-Mongolei”,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30（3）, 1913, 63p.

Raschmann, S.-Ch., Baumwolle im türkischen Zentralasien.Philologische und wirtschaftshistorische Untersuchungen anhand der vorislamischen uigurischen Texte, VdSUA 44, 1995.

Raschmann, S.-Ch.,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3: Dokumente, Teil 1, Stuttgart, 2007.

Raschmann, S.-Ch.,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4: Dokumente, Teil 2, Stuttgart, 2009.

Raschmann, S.-Ch.,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8.Buddhica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Teil 1: Das apokryphe Sutra Säkiz Yükmäk Yaruk, Stuttgart, 2012.

Rong Xinjiang,“The Relationship of Dunhuang with the Uighur Kingdom in Turfan in the Tenth Century”, De Dunhuang à 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 Hamilton （Silk Road Studies V）, ed.by Louis Bazin et Peter Zieme, Brepols 2001.

Röhrborn, K., Uigurisches Wörterbuch—Sprachmaterial der vorislamischen türkischenTexte aus Zentralasien, 1–6, Wiesbaden, 1977-1998.

Röhrborn, K., “Šıngqo Šäli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Übersetzungstätigkeit bei den Uiguren, Turkology Heute—Tradition

und Perspektive", Materialien der dritten Deutschen Turkologenkonferenz, ed.by N.Demir & E.Taube, Leipzig 4.-7, Wiesbaden, 1994.

Russell-Smith, L., Uygur Patronage in Dunhuang.Regional Art Centers on the Northern Silk Road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Leiden-Boston: Brill，2005.

Rybatzki, V.,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2）, 2000.

Schmitt, G., und Thilo, T.,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Bd.1., BTT VI, Berlin, 1975.

Sertkaya, O.F., "Uigur para belgeleri （I Bölüm.kümüş）",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Языковых Систем в Синхронии и Диахронии к70-летию Э.Р.Тенишева, Москва, 1991.

Sertkaya, O.F., "Die Geschichte der im Zweiten Weltkrieg verlorengegangenen und zerstörten uigurischen Texte und das altuigurische Bruchstück mit Sternnamen", 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Berlin,1996.

Sims-Williams, N., "Sogdian-Turkish bilingualism and linguistic interference in 9th-10th century Tun-huang", Paper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B.Gharib, Tehran, 2008.

Sims-Williams, N., and Halén, H., "The Middle Iranian Fragments in Sogdian Script from the Mannerheim Collection", Studia Orientalia, 51-13, Helsinki 1980.

Sims-Williams, N., and Hamilton, J.R., Turco-Sogdian documents from 9th-10th century Dunhuang, with an Appendix by Wen Xin, London, 2015.

Sinor, D.,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1990.

Skjærvø, P., "Turks and Turkic in the Khotanese Texts from Khotan and Dunhuang", É.Csató, L.Johanson, A.Róna-Tas, and B.Utas（eds.）, Turks and Iranians: Interactions in Language and History, 2016, Wiesbaden.

Sokolovskaya, L., and Rougelle, A., "Stratified Finds of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Pre-Mongol Samarqand （Afrasiyab）,"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vol.4 （1992）.

Stark, S., Die Alttürkenzeit in Mittel- und Zentralasien: Archäologische und historische Studien, Wiesbaden, 2008.

Stein, A.,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Stein, A., 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5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Stein, A.,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

Steinhardt, N.Sh., "Beiting: City and Ritual Complex",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7, 2001.

Sundermann, W., "Probleme der Interpretation manichaeisch-sogdischer Briefe", i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8（1980）;（reprinted）in From Hecataeus to al-Ḫuwārizmī, ed.J.Harmatta.Budapest 1984.

Sundermann, W., Mitteliranische manichäische Texte kirchengeschichtlichen Inhalts, Mit einem Appendix von Nicholas Sims-Williams, BTT XI, Berlin, 1981.

Sundermann, W., "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 A.Cadonna（eds.）,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Firenze 1992.

Sundermann, W., "The Manichaean Texts in Languages and Scripts of Central Asia", S.Akiner & N.Sims-Williams（eds.）, Languages and Scripts of Central Asi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7.

Taenzer, G., The Dunhuang Region during Tibetan Rule（787-848）: A Study of the Secular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the Mogao Caves, Wiesbaden, 2013.

Tekin, Ş., "Die uigurische Weihinschrift eines buddhistischen Kloster aus den Jahren 767-780 in Toyoq",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48, 1976.

Tekin, T., Irk Bitig: the Book of Om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3.

Thierry, F., "Les Monnaies de Boquq Qaghan des Ouighours", Turcica 30, 1998.

Thilo, T.,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BTT

XIV, 1985.

Thomas, F.W., and Konow, S., “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huang”, Etnografiske Museums Skrifter I, 3, Oslo Ethnografiske Museums Scrifter, III, 1929.

Tugusheva, L., “Three Letters of Uighur Princes.From the MS Collection of the Leningrad S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4, 1971.

Tugusheva, L., “Early medieval uighur records from East Turkestan”, Manuscripta Orientalia, St.Petersburg, 1996.

Tekin, T.,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Umemura, H., “A Wooden Fragment with Uighur Inscription Preserved in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 41, 1983.

Umemura, H.,“A Qočo Uyghur King Painted in the Buddhist Temple of Beshbalïq”, Turfan, Khotan und Dunghuang, Berlin, 1996.

Umemura, H., “The Uyghur Document SI 4b Kr.71: Concerning the Sale of a Slave and the Loan of Silver.” in: Turfan Revis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Vér, M., The Postal System of the Mongol Empire in Northeastern Turkestan,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zeged, 2016.

Wilkens, J.,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8: 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Stuttgart, 2000.

Wilkens, J.,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0. Buddhistische Erzähltexte, Stuttgart, 2010.

Yakup, A., and Knüppel, M.,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1.Die uigurischen Blockdruck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Teil 1: Tantrische Texte, Stuttgart, 2007.

Yakup, A.,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2.Die uigurischen Blockdruck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Teil 2: Apokryphen, Mahayana-Sutren, Erzählungen, Magische Texte, Kommentare und Kolophone, Stuttgart, 2008.

Yakup, A.,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15.Die uigurischen Blockdruck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Teil 3: Stabreimdichtungen, Kalendarisches, Bilder, unbestimmte Fragmente und Nachträge, Stuttgart, 2009.

Yamada, N.,“Uigur Documents of Sale and Load Contracts brought by Otani Expedition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 No.23, 1964.

Yamada, N., “Four Notes on Several Names for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Uighur Documents”, Studia Turcica, Budapest, 1971.

Yoshida, Y., “Turco-Sogdian features.” in: W.Sundermann et al., eds., Exegisti monument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N.Sims-Williams, Wiesd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Yoshida, Y.,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and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in: D.Durkin-Meisterernst, Ch.Reck, D.Weber （eds.）, Literarische Stoffe und ihre Gestaltung in mitteliranischer Zeit: Kolloquium anlässlich des 70.Geburtstages von Werner Sundermann, Wiesbaden: Ludwig Reichert Verlag, 2009.

Yoshida, Y., “Some new readings in the Sogdian version of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in: M.Ölmez et al.（eds.）, From Ötüken to Istanbul: 1290 years of Turkish （720-2010）, Istanbul, 2011.

Yoshida, Y., “New Turco-Sogdian documents and their socio-linguistic backgrounds.”,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Yoshida, Y., “When did Sogdians begin to write vertically?” Tokyo University Linguistic Papers（『東京大学言語学論集』）33, Festschrift for Professor Hiroshi Kumamoto, 2013.

Yoshida, Y., “Buddhist texts produced by the Sogdians in China”, in: M.de Chiara et al., eds., Buddhism among the Iranian peoples of Central Asia,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3.

Zhang Tieshan and Zieme, P., “A 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64（2）, 2011；（汉译本）《十姓回鹘王及其王国的一篇备忘录》，白玉冬译，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2012。

Zhang Tieshan and Zieme, P., “A further fragment of Old Uigur

annal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66, 2013.

Zieme, P., "Beiträge zur Erforschung des Xvāstvānīft",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12, 1966.

Zieme, P., "Die türkischen Yosïpas-Fragmente",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14, 1968.

Zieme, P., "Zu den nestorianisch-türkischen Turfantexten", in: G.Hazai und P.Zieme hrsg., Sprachen,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altaischen Völker.Protokollband der 12.Tagung der PIAC 1969 in Berlin.Berlin. (Schriften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Alten Orients.5.)

Zieme, P., "Ein uigurischer Landverkaufsvertrag aus Murtuq", i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 1974.

Zieme, P., 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 BTT V, Berlin, 1975.

Zieme, P., "Ein Uigurischer Text Über die Wirtschaft Manichäischer Klöster im Uigurischen Reich", Researches in Altaic Languages, L.Ligeti, eds., Budapest, 1975.

Zieme, P., "Sïngqu Säli Tutong-Übersetzer buddhistischer Schriften ins Uigurische", Tractata Altaica—Denis Sinor sexagenario dedicata, W.Heissig et al., ed.,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

Zieme, P., "Zum Handel im uigurischen Reich von Qočo", i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4, 1976.

Zieme, P., "Drei neue uigurische Sklavendokumente",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5, 1977.

Zieme, P., "Materialien zum uighurischen Onomasticon I", 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 Yılığı Belleten 1977, Ankara, 1978.

Zieme, P., "Ein uigurischer Leihkontrakt über Weizen", i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7, 1980.

Zieme, P., "Uigurische Pachtdokumente", i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7, 1980.

Zieme, P., "Uigurische Steuerbefreiungsurkunden für buddhistische Klöster",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8, 1981.

Zieme, P., "Materialien zum uighurischen Onomasticon II", 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 Yılığı Belleten 1978-1979, Ankara, 1981.

Zieme, P., “Ein Hochzeitssegen uigurischer Christen” , in: K.Röhrborn und H.Brands, hrsg., Scholia.Beiträge zu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Annemarie von Gabain zum 80.Geburtstag am 4.Juli 1981 dargebracht von Kollegen, Freunden und Schülern.Wiesbaden.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 Uralo-Altaica.14.) , 1981.

Zieme, P., “Ein uigurisches Familienregister aus Turfan”, i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9, 1982.

Zieme, P.,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 1985. (Berliner Turfantexte.13.)

Zieme, P., “Materialien zum uighurischen Onomasticon III”, 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 Yılığı Belleten 1984, Ankara, 1987.

Zieme, P., “Titulaturen und Elogen uigurischer Könige”, in: K.Sagaster and H.Eimer, eds., Religious and Lay Symbolism in the Altaic World and Other Papers: Proceedings of the 27th Meeting of the PIAC, Walberbe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June 12th to 17th, 1984, 1989.

Zieme, P., “Xuanzangs Biographie und das Xiyuji in alttürkisher Überlieferung”, in: J.P.Laut und K.Röhrborn, hrsg., Buddhistische Erzählliteratur und Hagiographie in türkischer Uberliferung,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0.

Zieme, P., “Sur quelques titres et noms des bouddhistes turcs”, in: R.Dor, ed., Asie Centrale et ses voisins：Influences réciproques, Paris, 1990.

Zieme, P., Die 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Studien zur alttürkischen Dichtung, Budapest, 1991. (Bibliotheca Orientalis Hungarica.33.)

Zieme, P., “Eine uigurische Hausverkaufsurkunde aus Qočo”,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9, 1992.

Zieme, P., “Manichäische Kolophone und Könige”, Studia Manichaica,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ichaeism, St.Augustin/Bonn, August 6-10, 1989, eds., G.Wiessner and H.-J.Klimkeit , Wiesbaden 1992.

Zieme, P.,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co.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istischen Schrifttums as Zentralasien, Opladen, 1992.

Zieme, P., “Sambodu et alii.Einige alttürkische Personennamen im Wandel der Zeiten”, Journal of Turkology, 1994（2-1）.

Zieme, P., “An Uigur Monasterial Letter from Toyoq”.,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10, 1995.

Zieme, P., 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 Brepols, 1996.（Berliner Turfantexte.18.）

Zieme, P., Vimalakīrtinirdeśasūra.Edition alttürkischer Übersetzungen nach Handschriftenfragmenten von Berlin und Kyoto.（Mit einem Appendix von Jorinde Ebert: Ein Vimalakīrti-Bildfragment aus Turfan）, Brepols, 2000.

Zieme, P., Indische Wörter in nichtbuddhistischen alttürkischen Texten.in: S.Bretfeld und Jens Wilkens, hrsg., Indien und Zentralasien.Sprach- und Kulturkontakt.Vorträge des Göttinger Symposions vom 7.bis 10.Mai 2001. Wiesbaden, 2003.

Zieme, P., 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BTT 23, Brepols, 2005.

Zieme, P., “Arabische und neupersische Wörter in den altuigurischen Text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in: Dieter Weber（ed.）: Languages of Iran: Past and Present.Iranian Studies in memoriam David Neil MacKenzie. Wiesbaden, 2005.（Iranica.8.）

Zieme, P.,（ed.）, Aspects of Re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In Memoriam Kōgi Kudara, Silk Road Studies 16, Brepols, 2008.

Zieme, P., “Ordo uluš, Solmı and Bešbalık”,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62（3）, 2009.

Zieme, P., “A Fragment from Bamyan”, in: Diletta Minutoli and Rosario Pintaudi eds., Papyri Graecae Schøyen（PSchøyen II）: Essays and texts in honour of Martin Schøyen，Firenze, 2010.（Papyrologica Florentina.40.）

Zieme, P., “The Manichaean Turkish Texts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Third Series）20, 2010.

Zieme, P., “Was barčuk tili a Turkic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12, 2011.

Zieme, P., “Were the Xiongnu identical with the Türk? ”, in: M.Ölmez et al., eds., From Ötüken to Istanbul, 1290 Years of Turkish（720-2010）, Istanbul, 2011.

Zieme, P., “Some Notes on the Ethnic Name Taŋut （Tangut） in Turkic Sources”，in: И.Попова, отв.ред., Тангут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в честь 80-летия проф.Е.И. Кычанова, Москва, 2012.

Zieme, P., “The West Uigur Kingdom: Views from Inside”，in: Horizons 5-1,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014.

Zieme, P., “Eine Runeninschrift aus Kumtura”，in: I.Nevskaya and M.Erdal, eds., Interpreting the Turkic Runiform Sources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Altaic Corpus, Berlin, 2015.

Zieme, P.,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s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iscataway: Gorgias Press, 2015.

Zieme, P., und Kara, G.,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 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8212（109）,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78.

3.俄文部分（按作者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列）

Кляшторный, С.,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рун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1964；（汉译本）《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李佩娟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

Кляшторный, С.,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глазами рус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Алма-Ата: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1988.

Кляшторный, С., Степные империи древней Евраз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5.

Кляшторный, С., Рун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Уйгурского каганата и истор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епе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0.

Кочнев, Б.Д., Нумизма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Караханидского каганата （991–1209 гг.）, Москва 2006.

Кычанова, Е.И., пер., иссл.и прим, 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1149—1169）, Кн.1-4, Москва, 1987-1989.

Малявкин, 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уйгуров в IX-XII в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4.

Малявкин, А., Уйгур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IX-XII в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3.

Тугушева, Л., Фрагменты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Москва, 1980.

Тугушева, Л., 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Москва, 1991.

Тугушева, Л., Уйгурские дел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X—XIV вв.из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Москва, 2013.

4.日文部分（按作者姓氏首字五十音图顺序排列）

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彙文堂書店、1955；（汉译本）《西回鹘国史的研究》，宋肃瀛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荒川正晴「麹氏高昌国における郡県制の性格をめぐって：主としてトゥルファン出土資料による」『史学雑誌』95-3、1986。

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の伝馬坊と長行坊」『東洋学報』70-3/4、1989。

荒川正晴「トゥルファン出土漢文文書に見えるulaγについ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9、1994；（汉译本）《关于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中ulaγ》，李德范、孙晓林译,胡厚宜等编《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 中华书局，1998。

荒川正晴「唐代コータン地域のulaγ について━マザル＝ターク出土，ulaγ関係文書の分析を中心にして」『龍谷史壇』103/104、1994；（汉译本）《唐代于阗的“乌骆”━以 tagh 麻扎出土有关文书的分析为中心》，章莹译，《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荒川正晴「唐朝の交通システム」『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40、2000。

荒川正晴『オアシス国家とキャラヴァン交易』（世界史リブレット62）山川出版社、2003。

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帳研究』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79；（汉译本）《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铣译，中华书局，2007。

池田温『中国古代寫本識語集録』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岩尾一史「9 世紀の歸義軍政權と伊州——Pelliot tibétain 1109を中心に」『敦煌寫本研究年報』10、2016。

上原芳太郎編『新西域記』下巻、有光社、1937。

梅村坦「天山ウイグル王国と騎馬社会」『月刊シルクロード』5:8、1979。

梅村坦「大谷探検隊将来ウイグル銘文木片」護雅夫編『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山川出版社、1983。

梅村坦「イナンチ一族とトゥルファン-ウイグル人の社会」『東洋史研究』45、1987。

梅村坦「ウイグル文書『SJ Kr.4/638』：婚礼·葬儀費用の記録」『立正大学教養部紀要』20、1987。

梅村坦「ウイグル文家産分割文書の一例：中国歴史博物館所蔵K7716」『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唐代史研究会報告第VII集）刀水書房、1990。

梅村坦『内陸アジア史の展開』（世界史リブレット11）山川出版社、1997。

梅村坦『増補·天山ウイグル王の肖像をめぐって』高木豊·小松邦彰編『鎌倉仏教の様相』吉川弘文館、1999。

梅村坦「ペテルブルグ所蔵ウイグル文書SI 4bKr.71の一解釈：人身売買および銀借用に関する文書」『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7、2002。

梅村坦·閔丙勲「国立中央博物館蔵Bezeklik壁画Uighur銘文試釋」『美術資料』（Misul Charyo ＝ National Museum Journal of Arts）55、韓国国立中央博物館、1995。

梅村坦·庄垣内正弘·吉田豊·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編『東洋文庫所蔵St.Petersburg ウイグル文字·ソグト文字·マニ文字写本マイクロフイルム仮目録·第一稿』2冊、中央大学総合政策学部·梅村研究室、2002。

大木彰·橘堂晃一·吉田豊「大谷探検隊収集『西厳寺蔵橘資料』について」『東洋史苑』70·71、2008。

小田寿典『仏説天地八陽神呪経一巻——トルコ語訳の研究』法蔵館、2010。

上山大峻「曇倩訳『金剛壇広大清浄陀羅尼経』：八世紀安西における未伝漢訳経典」『龍谷大学論集』399、1972。

北村高「蒙速斯一族供養圖について」『神女大史学』5、1987。

百済康義·森安孝夫·坂本和子「大谷探検隊収集西域文化資料とその關联資料」『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35、1996。

百済康義·ヴェルナ—·ズンダ—マン·吉田豊『イラン語断片集成·大谷探検隊収集·龙谷大学所蔵中央アジア出土イラン語資料』法蔵館、1997。

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臨川書店、1992。

佐藤貴保「西夏法典貿易関連条文訳註」森安孝夫編『ジ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大阪大学 21世紀COE ブログラム「インターフェイスの人文学」報告書3）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

佐藤長『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東洋史研究会、1958·1959。

嶋崎昌『隋唐時代の東隋唐时代の东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

白須浄真「吐蕃支配期の東西交通：関隴朝貢道の途絶と西域朝貢使」『東洋史苑』6、1973。

高田時雄「ウイグル字音考」『東方学』70；（汉译本）《回鹘字音考》，收入氏著《敦煌·民族·语言》，钟翀等译，中华书局，2005。

高田時雄「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彙」『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報告）別冊；（汉译本）《于阗文书中的汉语语汇》，收入氏著《敦煌·民族·语言》，钟翀等译，中华书局，2005。

白玉冬「10世紀から11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国」『東洋学報』93-1、2011。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ト貿易」『史学雑誌』120-10、2011。

白玉冬「沙陀後唐·九姓タタル関係考」『東洋学報』97-3、2015。

羽田亨「回鶻文女子売渡文書」『東洋学報』6-2、1916；収入氏著『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同朋社、1975年第2刷。

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2冊、同朋社、1957·1958。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西域文化史』、平凡社東洋文庫、1992；（汉译本）《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

羽田明·山田信夫編『大谷探検隊将来ウイグル字資料目録』西域文化研究会編『西域文化研究第四·中央アヅア古代語文獻』法蔵馆、1961。

ペーター·ツイーメ·百済康義『ウイグル語の観無量寿経』永田文昌堂、1985。

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一）」『東方学報』12-3、1941。

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二）」『東方学報』12-4、1942。

藤枝晃「高昌回鶻と龜茲回鶻」『東洋史研究』7-2·3、1942。

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三）」『東方学報』13-1、1943。

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四）」『東方学報』13-2、1943。

前田直典「十世紀時代の九族韃靼：蒙古人の蒙古地方の成立」『東洋学報』32-1、1948；収入氏著『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

前田直典『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

松井太「モンゴル時代ウイグリスタン税役制度とその淵源：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書にみえるkäzig の解釈を通して」『東洋学報』79-4、1998。

松井太「ウイグル文クトルグ印文書」『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3、1998。

松井太「モンゴル時代ウイグリスタンの税役制度と徴税システム」松田孝一編『碑刻等史料の総合的分析によるモンゴル帝國·元朝の政治·経済システムの基礎的研究』（平成12-13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1）（課題番號12410096）研究成果報告書）、2002。

松井太「モンゴル時代の度量衡：東トルキスタン出土文獻からの

再検討」『東方学』107、東方学会、2004。

松井太「シヴシドゥ·ヤクシドゥ関係文書とトヨク石窟の仏教教団：ペテルブルク所蔵ウイグル語世俗文書箚記」森安孝夫編『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論叢』朋友書店、2004。

松井太「モンゴル時代のウイグル農民と仏教教団：U 5330（USp 77）文書の再検討から」『東洋史研究』63-1、東洋史研究会、2004。

松井太「ウイグル文シヴシドゥ·ヤクシドゥ関係文書補遺」『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13、弘前大学人文学部、2005。

松井太「西ウイグル時代の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書をめぐって」『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24、弘前大学人文学部、2010。

松井太「古ウイグル語文献にみえる『宁戎』とベゼクリク」『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6、2011。

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関する箚記」『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30、弘前大学人文学部、2013。

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関する箚記（二）」『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32、2014。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増補版）』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70；（汉译本）《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護雅夫「ウイグル文葡萄園売渡文書」『東洋学報』42-4、1960。

護雅夫「ウイグル文売買文書：とくにその卖主と买主とについて」、『遊牧社会史探究』9、1961。

護雅夫「ウイグル文売買文書に於ける売買担保文言」『東洋学報』44-2、1961。

護雅夫編『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山川出版社、1983。

護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3冊、山川出版社、1967-1997。

森部豊『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関西大学出版社、2010。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奪戦及びその後の西域情勢について」『東洋学報』55- 4 、1973；（増訂本）「増補：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奪戦及びその後の西域情勢について」流沙海西奨学会編

『アジア文化史論叢』3、山川出版社、1979；（法文本）“Qui des Ouigours ou des Tibétains ont gagné en 789-792 à Beš-balïq?” Journal Asiatique 269-1/2；（汉译本）《究竟是回鹘还是吐蕃在公元789～792年间夺据了别失八里？》，罗贤佑译，《民族译丛》1982年第3期；（最新增訂本）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仏教史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史学雑誌』83－4、1974。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東洋学報』59－1·2、1977；（汉译本）《关于回鹘的西迁》，陈俊谋译，《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増訂本）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とHOR」『アシ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14、1977；（法文本）“La nouvelle interprétation des mots Hor et Ho-yo-hor dans le manuscrit Pelliot tibétain 1283”,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34-1/3, 1980；（増訂本）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榎一雄編『講座敦煌2 敦煌の歴史』大東出版社、1980；（増訂本）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シア進出」『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4（1983）、1984；（増訂本）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チヘット文字て書かれたウイクル文仏教教理問答（P.t.1292）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25、1985。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語文献」山口瑞鳳編『講座敦煌6敦煌胡語文献』大東出版社、1985。

森安孝夫「敦煌と西ウイグル王国：トゥルファンからの書簡と贈り物を中心に」『東方学』74、1987；（汉译本）《敦煌与西回鹘王国——寄自吐鲁番的书信及礼物》，陈俊谋译，《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増訂本）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敦煌出土元代ウイグル文書中のキンサイ緞子」榎博士頌寿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榎博士頌寿記念東洋史論叢』汲古書院、1988；（増訂本）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箚记（その一）」『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4、1989。

森安孝夫「トルコ仏教の源流と古トルコ語仏典の出現」『史学雑誌』98-4、1989；（法文本）“L’origine du Bouddhisme chez les Turcs et l’apparition des textes bouddhiques en turc ancien.” in: A.Haneda（ed.）, 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Asie Centrale.Actes du Colloque Franco-Japonais organisé par l’Association Franco- Japonaise des Études Orientales, Kyoto: Dōhōsha, 1990；（汉译本）《突厥佛教的源流与古突厥语佛典的出现》，郁仲平译，《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增訂本）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箚记（その二）」『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5、1990。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31·32、1991。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箚记（その三）」『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7、1992。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书箚記（その四）」『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9、1994。

森安孝夫「オルトク（斡脱）とウイグル商人」森安孝夫編『近世·近代中国およびだ周辺地域における諸民族の移動と地域開発』（平成7·8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 2 ）研究成果報告書）大阪大学文学部、1997。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のウイグル商人：ソグド商人とオルトク商人のあいた」『岩波講座世界歴史11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九～一六世纪）』岩波書店、1997；（增訂本）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団と西ウイグル王国」『内陸アジア史研究』15、2000；（增訂本）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から見た安史の乱」『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7、2002；（增訂本）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編『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大阪大学 21 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インターフェイスの人文学」報告書，第3巻）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东部における通貨：絹·西方銀銭·官布から銀錠へ」森安孝夫編『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論叢』朋友書店、2004；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講談社、2007。

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仏教のクロノロジー：ベゼクリクのグリュンヴェーデル編号第8窟（新編号第18）の壁画年代再考」『仏教学研究』62·63、2007；（增訂本）収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東部出土古ウイグル手紙文書の書式（前編）」『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51、2011。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東部出土古ウイグル手紙文書の書式（後編）」森安孝夫編『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汲古書院、2011。

森安孝夫編『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汲古書院、2011。

森安孝夫「東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新展开」『東方学』126、2013。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関係史料集成』『平成26年度近畿大学国際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近畿大学国際人文科学研究、2015。

森安孝夫『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

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時代のマニ教隆盛：マニ寺院経営的実態」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森安孝夫·オチル編『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1999。

森安孝夫·鈴木宏節·齊藤茂雄·田村健·白玉冬「シネウス碑文訳注」『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4、2009。

山田信夫「九姓回鶻可汗の系譜：漠北時代ウイグル史覺書」『東洋学報』33-3·4、1951。

山田信夫「大谷探検隊将来ウイグル文売買貸借文書」『西域文化研究』4、法蔵館、1961。

山田信夫「ウイグル文売買契約書の書式」『西域文化研究』6、法蔵館、1963。

山田信夫「ウイグル文貸借契約書の書式」『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11、1965。

山田信夫「回鶻文斌通（善斌）売身契三種」『東洋史研究』27-2、1968。

山田信夫「9世紀ウイグル亡命移住者集団の崩壊」『史窓』42、1985。

山田信夫『北アジア遊牧民族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

山田信夫「トルキスタンの成立」氏著『北アジア遊牧民族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

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

吉田豊「ソグド語文献」山口瑞鳳編『講座敦煌 6 敦煌胡語文献』大東出版社、1985。

吉田豊「大谷探検隊将来中世イラン語文書管見」『オリエント』28-2、1986。

吉田豊「カラ＝バルガスン碑文のソグド語版ついて」『西南アジア研究』28、1988。

吉田豊「ソグド語雑録（II）」『オリエント』31-2、1989。

吉田豊「ソグド語雑録（III）」『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5、1990。

吉田豊「中世イラン語と古代チュルク語：マニ教文献の奥書2種」『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8、1993。

吉田豊「ソグド語のNāfnāmak『国名表』の2:3の読みについて」『オリエント』36-1、1993。

吉田豊「ソグド文字で表記されに漢字音」『東方学報』66、1994。

吉田豊「ソグド語雑録（IV）」『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0、1995。

吉田豊「漢語仏典と中央アジアの諸言語·文字：中世イラン語，特

にソグド語仏典の場合」新川登亀男編『仏教文明の転回と表現：文字·言語·造形と思想』勉誠出版、2015。

吉田豊·森安孝夫·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博物館「麴氏高昌国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隷売買文書」『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4、1989；（汉译本）《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柳洪亮译，《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

旅順博物館·龍谷大学編『旅順博物館蔵新疆出土漢文仏経研究論文集』龍谷大学西域研究叢書4、龍谷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西域研究会、2006。

[1]此据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40页。

致谢

2009年，我跨专业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随荣新江教授学习中国史，开始了全新的学术生活，于今正好10个年头。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先后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并即将完成博雅博士后的研究计划。本书内容即由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4章以及博士后研究期间发表的一篇论文修订组成，是我在西州回鹘历史研究领域不断进取的阶段性总结。在过去10年中，我从毫无学术根基的门外汉成长为历史学专业研究人员，我学术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与老师的培养密不可分。随着学识和阅历的增长，每过一个阶段，我对老师的学术理想、学识学养和治学态度都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愈发深刻地体会到：能在荣老师的门下开启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多么幸运和光荣的一件事。今天，我惶恐地呈上这部匆忙付梓的书稿，不敢奢求为师门添彩，但愿老师能看到我的理想和努力，并因此包容我的缺点和不足，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引领我成长。

西州回鹘史在东西方传世文献中的记载非常有限，相关研究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吐鲁番、敦煌等地回鹘文写本的刊布。在我研究生入学当年，荣老师便推荐我参加德国回鹘学家茨默（Peter Zieme）先生在京开设的回鹘文古突厥语课程。我幸运地在进入历史学专业的同时，获得机会窥探古突厥语和回鹘文献的门径。在此后的学习生涯中，我一直未曾间断对古突厥语和回鹘文的学习，并持续收集相关的研究成果。其后，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旁听了突厥学家耿世民先生和张铁山老师开设的相关课程。2011年，我获得前往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世界文化学院阿尔泰学系交换学习的机会，随芮拔辞（Volker Rybatzky）老师继续学习古突厥语。为了接受更为系统的学术训练，我在2014年申请到北大-柏林自由大学博士联合培养项目，赴德国留学2年。在德方导师德金（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和笠井幸代老师的指导下，我不但继续接受回鹘文献学的系统训练，还获得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从事研究的机会，并经常向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拉施曼（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芮珂（Christiane Reck）等前辈专家问学求教。在博士后工作期间，我受松井太教授的慷慨邀请，前往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访问研究，随他学习草体回鹘文献，并得以向森安孝夫、荒川正晴、吉田丰等前辈硕学问学求教。这样的学术经历让我具备了熟练运用回鹘文史料的能力，是我在研究中有所创新和突破的重要基础。我谨向上述老师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北大历史学系求学、工作的过程中，各位老师在我写作的不同阶段给予我学术上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与我研究领域相关的罗新、张

帆、朱玉麒、党宝海、叶炜、昝涛、史睿等诸位老师。刘迎胜、李鸿宾、孟宪实、王一丹、苏航、毕波等诸位老师或在不同时期审阅过本书不同章节的初稿，或对书中某些具体问题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我谨向上述老师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感谢我的学长、学友和同门在本书写作的各个阶段为我提供的灵感、鼓励和支持，尤其是罗帅、徐畅、刘子凡、陈春晓、陈晓伟、马晓林、罗帅、张湛、李雪、陈瑞翾、林丽娟、苗润博、求芝蓉、沈琛、胡晓丹、李昀、张凯悦、陈烨轩、严世伟等诸位。

本书能在极短时间内顺利出版，有赖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郑庆寰先生的大力支持。在书稿的编辑过程中，他和赵晨先生付出了极大的辛劳，谨向他们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至于那些陪伴我一起成长的知交好友们，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更不愿意将他们排出先后。他们的陪伴和支持早已变成我成长轨迹中的一部分。人各有志，他们中的多数可能并不在意我追求的是什么，惟愿他们欣赏我在追求理想时奋力奔跑的模样。

最后，感谢父母对我始终如一的爱与支持，希望他们依然以我为荣。

付马

2019年5月9日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集体办公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付马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5

（九色鹿）

ISBN 978-7-5201-4811-5

I.①丝… II.①付… III.①回鹘-民族历史-研究-吐鲁番地区-9世纪-13世纪 IV.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8885号

·九色鹿·

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

——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

著　　者/付马

出 版 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郑庆寰 赵晨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2.25 字数：277千字

版　　次/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201-4811-5

定　　价/68.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封面、封底文书：III 203 = M 1《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
图像：III 4979《回鹘摩尼教庇麻节图》
后勒口：III 4524《西州回鹘统治者供养人像》
三者均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版权：© 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公元 840 年，称雄蒙古高原近百年的回鹘汗国破灭。回鹘部众西迁至天山南北两麓，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西州回鹘王朝。原属游牧文明的回鹘人吸收汉人及当地族群的文化，发展出独特的西州回鹘文明，深刻改变了中亚东部的族群和文化面貌。他们在 9 至 13 世纪控制着丝绸之路天山南北两道，是唐元之间中原与西方交流的纽带。





出版社官方微信



九色鹿

www.ssap.com.cn



ISBN 978-7-5201-4811-5

定价：68.80 元



九色鹿

从“异域”到“旧疆”

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

温春来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温春来

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经济史、西南民族史、历史人类学，主要著作有《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2008）、《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2018），主编有“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

从“异域”到“旧疆”

温春来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导论
    - 一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
    - 二 区域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旨趣
    - 三 地域以及作为族类标签的“夷”与“彝”
    - 四 彝文献的性质
    - 五 本书基本框架

- 上编 从“异域”到“羁縻”：宋至清初改土归流前的黔西北社会
  - 第一章 王朝的“异域”：彝族君长国的制度与文明
    - 第一节 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
    - 第二节 “勾”政权与“则溪”制度
    - 第三节 文字及其传承与使用者
  - 第二章 地方传统对“羁縻”政治的制约
    - 第一节 元代的经营
    - 第二节 明代土官职名的规范化及土官文职武职考辨
    - 第三节 “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明代土司对王朝的基本义务
  - 第三章 驿道、卫所与教化
    - 第一节 朱元璋、奢香与川滇黔驿道
    - 第二节 “一线之外，四面皆夷”：卫所的设置
    - 第三节 卫所、移民与文化移植
  - 第四章 彝族制度在明代的变化
    - 第一节 承袭制度之演变
    - 第二节 汉人进入勾政权
    - 第三节 彝威与汉威：充满矛盾的统治认同

- 下编 从“新疆”到“旧疆”：改土归流后黔西北地方社会的变化
  - 第五章 开辟“新疆”
    - 第一节 彝制的崩溃
    - 第二节 进入“版图”：从则溪制到流官制与里甲制
  - 第六章 改流后的土目与布摩
    - 第一节 土目、家奴、佃户及土地关系
    - 第二节 主奴之争与主佃之争
    - 第三节 布摩阶层的变动
  - 第七章 移民、矿业与农耕的发展
    - 第一节 移民的潮流
    - 第二节 黔西北矿业的发展及其对全国的影响
    - 第三节 从畜牧到农耕的发展
  - 第八章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演变
    - 第一节 黔西北彝族族类界限观念的演变
    - 第二节 文化变迁与族群意识：普底黄氏家族的个案研究

导论

一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

近年来，随着Fredric Barth、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关于族群、民族的理论被引入中国史研究，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从血统、语言、文化等“客观”标准分析中华民族（或中国国族）形成的局限。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延续的国族实体，[1]人们先被灌输一套虚构的国族认同后，才会相信他们自己属于一个统一的“国族”群体。清末民初，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为了政治需要，通过重新诠释黄帝、郑成功、文天祥等一系列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建构了一部前所未有的“民族历史”，为“四万万”人民建构了同源同祖的集体记忆，并将本来表达“忠节”等意涵的英雄（如岳飞）诠释为寄托“民族魂”的英雄，从而也就建构起了中国的国族。[2]

民族国家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历史现象，上述研究说明，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国的国族具有经由“想象”而形成的特点。但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因为它们未能回答：如果说中国国族仅仅是一种近代建构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成功建构出一个横跨近千万平方千米、覆盖数亿人口的国族共同体？为什么梁启超等人振臂一呼，应者便“闻风景从”，在数十年间就成功建构起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联系到“二战”后在非洲等地区建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内部族群之间未能和平共处，以致内战持续不断的例子，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

依笔者浅见，国族建构论的缺失可能在于对传统的过度割裂。近来已有学者在赞同中国国族与民族经由近代想象而形成观点的同时，指出必须要注意“创造”与“想象”之前的历史事实与相关历史记忆基础，以及各种社会权力关系和资源分享、竞争背景。[3]本书则强调，早在国族主义兴起之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认同、经济等方面已经具有高度整合的一面，[4]没有这个深刻的历史根源，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构并成功维持一个庞大的国族是难以想象的。美国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或多或少触及中国的这一特质：

欧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来，一般地说不会多于中国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国更多的民族也是问题。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

差别，就不能忽视。

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5]

传统中国社会高度整合的情形及其内在机制，是国际汉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的不少学者也为此殚精竭虑，正如耶鲁大学萧凤霞（Hellen Siu）教授所云：

一个最能激发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的课题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政治实体，不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现代，有那么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又经过那么繁复的兴衰周期，它是怎样维系着人民共同的想象的呢？[6]

在过往的研究中，许多人类学家借用Redfield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架构，“找到了他们研究的焦点”，即把载于历史文献的复杂文化机制视为大传统，将其归于汉学的研究范围，人类学则退居于研究乡民与村落的小传统。[7]这种二分法忽略了传统中国社会整合性的一面，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8]

为了更好解释中国社会的统一性与差异性，1965年，英国人类学家华德英（Barbara E.Ward）通过对香港水上居民的研究，提出了动态的、多重叠合的“认知模型”（Conscious Model）。按她的描述，每个中国人的头脑里都有三类“认知模型”，一是“自制模型”（Homemade Model），即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社会及文化制度的构想；一是“内部观察者模型”（Internal Observer’s Model），即针对其他中国社群的社会文化秩序的构想。显然，因为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差异，“自制模型”是千差万别的，并且对其他社群的构想与当事人的自我认知之间也往往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变异并不妨碍中国社会的统一性以及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因为中国人的心中还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Model），这是对传统文人制度的构想。由于科举制度，中国的文人长期研习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很自然形成了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相同认知，凭借政治等方面的强势，文人的模型对其他模型有着规范作用，它提供了评估何谓中国方式的标准。该模型所强调的内容，各“自制模型”均较为遵守；而它不涉及的方面，各“自制模型”均有根据实际生活情况进行发挥的自由。[9]华德英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统一性、延续性以及变异性的解释，不仅超越了大、小传统的二分法，也超越了当时影响颇大的功能论架构。差不多同时，施坚雅参照中心地学说，发展出市场等级以及区域划分的模型，从经济联系的角度对传统中国的整合问题提出解释。[10]

上述研究大致从结构与共时态的方面展开论述。那么，大一统中国的制度、文化与礼仪是怎样在具体的时空领域推行开来的呢？不同的地

域社会，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国家的认同并维持这种认同的呢？1970年代，李国祁发表《清季台湾的政治及近代化——开山抚番与建省（1875~1894）》[11]和《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12]两篇论文，提出并阐述了“内地化”理论，认为自19世纪以来，随着番民的汉化、宗族的发展、神祇信仰的统一、人口流动所导致的居民融合、行政体制的完善、文教的推广等一系列“内地化”运动，台湾逐渐由“移垦社会”变成与中国内地各省完全相同的社会。这一理论涉及汉人、高山族、平埔人等多种族群，这些族群内部关系复杂，其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变迁呈现多样面相，相互间的互动更是千姿百态，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内地化”理论失之松懈。[13]除此之外，对土著民在历史变迁中所起作用的忽略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缺陷。

其实，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整合性，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成为相互交织渗透的一体两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明清时期，不论是士大夫文化，还是宗族和社区组织，抑或是民间宗教，都在合法化国家权威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定位，士大夫的价值观渗透到日常生活，成为国家构成不可或缺的部分。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国家既是行政组织的机器，更是文化理念。[14]

以民间宗教为例，许多学者发现，乡村社会中的信仰同朝廷的制度与礼仪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间有两种情况特别值得注意，一种是官府通过列入王朝祀典或加封赐匾等方式，将民间神吸收改造为官府认可的神明；另一种情况是民间将王朝祀典或官府提倡的神明接受过来，并改造成为民间神。[15]前者如天后，天后最初只是福建莆田湄洲的一个普通地方神祇，但自北宋到清中叶，她不断得到朝廷的敕封和提升，成为中国南部沿海极其显赫的神灵。在这种使神明标准化（Standardizing the Gods）的过程中，国家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介入了地方，民间信仰由此呈现出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交叉重叠的文化意义。[16]而珠江三角洲民间社会崇拜的北帝，则属于后一种情况。“北帝崇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传布，并形成为一种地方传统的过程，一方面是珠江三角洲的地域社会在文化上进一步整合到大传统之中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标准化的神明信仰地方化过程。”[17]但是，正如并非所有的地方神都能获得王朝的认同，[18]王朝祀典中的庙宇也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完成民间化，陈春声所描述的潮州樟林地方的乡民对官方神庙和地方神庙的不同心理体验（“份”的微妙感觉）以及两种庙宇的不同命运对此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不过，“传统的政治力量消退以后‘官方庙宇’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观念在乡民的信仰意识中无关紧要。实际上华南乡村社庙的出现，正是明王朝在乡村地区推行里甲制度，在里甲中建立‘社祭’制度变化的结果，理想化的‘国家’的‘原形’，始终存在于中国老百姓的集体无意识之中”。[19]

科大卫（David Faure）与刘志伟对宗族的思考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国家的制度和礼仪在区域社会推行与表达的历史。他们认为宗族不仅仅是一种血缘、亲属制度，更是一种用礼与法的语言来表达的秩序

和规范。明代以前是僧、道和巫觋在珠江三角洲的乡村中有着广泛和深刻影响的时代，但自北宋以来士大夫们已经开始积极运用理学所规范的礼教去改造地方的风俗，向佛、道、巫的正统挑战，虽然他们没有真正取代以神祇为中心的地方组织，但却在乡村礼仪方面取得了成功，而地方亦需要做出改变来应付明朝廷的赋役制度，并借此表达有利于获取更多资源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国家与社会的这种互动与妥协形成了华南地区常见的所谓宗族组织，这一深刻的变迁意味着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结合，边缘地区由此得以归入国家“礼教”的秩序中。[20]科大卫等学者还主张“视区域为一种有意识的历史建构”（region is seen as a conscious historical construct），[21]这种文化认同的视角以及对历时性的关注，超越了囿于具体地域的观念，发展了施坚雅的区域理论，并从方法论的层面指明了区域研究的意义。

既有的研究成果启发笔者意识到：第一，大一统中国并非一个先验的、不言自明的存在，不同的地域有着在不同的语境中与国家发生关系并整合进国家的历史，因而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地方性特色”，这个特色亦可视为“国家”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表达，不能用任何二元对立的概念来把握。对传统中国社会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特质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解，应建立在对这些特色的深入探讨之上。第二，典章制度在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性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2]上述研究表明，民间信仰、宗族的背后牵涉朝廷的祭祀、赋役等制度，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地方与国家的复杂关系。笔者近年来在广东、福建、江西、贵州、河北、河南、山西等地走马观花的田野考察中亦深切体会到，对历代王朝的基层行政、祭祀、赋役、科举等制度的了解是看懂传统乡村社会的必要条件，[23]对此一无所知，将导致田野工作失之肤浅，甚至近于观光旅游而远离初衷——如果预设的目标是进行具有历史深度的田野考察的话。第三，制度演变与文化认同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不同人群对朝廷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带有“地方性”色彩的认同，正是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形成并长期延续的关键，也是近代建构与“想象”中华民族的基础与根源。第四，具有鲜明问题意识并能够观照到大历史的区域性研究，可以深刻地揭示出传统中国社会的特质。

受此启发，本书拟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兼顾经济开发与文化及身份认同，描述贵州西北部地区（黔西北）整合进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并对此结构形成较高认同的历史过程，并试图分析这一过程所蕴含着的理论意义。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黔西北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能为既有观点提供一个新个案，它可能代表了中央王朝有效拓展统治范围、建立统治秩序的另一种模式。

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是，在中央王朝真正深入经营之前，黔西北的彝族已经建立并维持了具有深远历史根源的、别具一格的类似于国家的政权组织，而上述研究所关注的福建、广东、台湾等许多地区的原住民并没有自己的政权，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大量祠堂与庙宇，在黔西北则并不多见。其次，因为史料缺载或毁灭的缘故，我们甚至已不大清楚王朝渗透以及汉人大规模移入之前，闽、粤等地自身的社会结构与传统。

但在黔西北地区，彝族至少在宋代已有较为成熟的文字，掌握着文字的布摩与慕史[24]用吟诵或著述的方式传扬祖先的伟业，赞颂他们创下的美好制度，以张扬本族与本“国”的威荣（），[25]留下了大量以本族文字书写的文献，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宗教、文学、文艺批评、哲学观念、政治权力等，提供了与汉文文献不同的关于本地历史的解释。此外，较之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央王朝对黔西北的开发相对较晚，因此相关汉文史料亦相对容易留存，且许多往昔的传统、礼俗尚能被今日的研究者亲身观察与体验。黔西北的这些特点使得以下几种研究构想有实现的可能：

第一，重构黔西北社会自身的制度与传统，进而考察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一个有自己政权、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的过程，从而揭示王朝、周边族类两者的制度与传统怎样互动与交织，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区域真正整合进中国大一统的秩序中。[26]

第二，通过丰富的汉、彝史籍比较，结合田野调查，提供一个可深入揭示中央王朝和周边族类最初接触情形的个案。

第三，因为黔西北区域固有传统的有迹可寻，并且当地的族类有自己的形诸文字的历史表达，使现代的研究者有可能超越中国历史研究中“一点四方”的思考模式，[27]以所研究的区域为中心来进行探讨，特别是尽量从原住民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情景。

本书通过叙述宋至清黔西北的历史演变，实现以上三个研究构想，并利用“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等一套传统中国自身的话语，概括黔西北这样一个具有某种典型性的非汉族社会，在制度、经济、文化、认同等方面逐渐与内地紧密整合在一起的复杂历程。依本研究的视角，黔西北的所谓“典型性”主要体现在当地族类建立政权的传统以及这一传统的演变、消亡在文献中有迹可循，从中揭示出来的“从‘异域’到‘旧疆’”的模式，对于理解大一统中国在南方边远地区的拓展有着特别的意义。[28]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中国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其中有些学者的视角与本书主题有较多关联，较具代表性者有何罗娜（Laura Hostetler）等，她的《清朝殖民大业》一书把清王朝置于17～18世纪世界史的背景中，认为清王朝也像当时的西方列强一样积极开辟殖民地，其殖民方略包括领土扩张、汉人移民以及对贵州等地区的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等。与西方相似，清王朝为此引入了先进的地图学知识与制图方法，并且民族学（Ethnography）也不断发展，例如描述土著人群的著作与画册数量增多，刻画也越来越细致。[29]何罗娜的论述或有新颖之处，但笔者以为，若要把中国类比于西方列强，就必须考虑如下问题：为什么西方列强所经营的殖民地纷纷独立，而中国西南地区却与国家有着高度的认同与整合？

换句话讲，何罗娜的类比与论述在打开一个新视角的同时，可能模糊了明清中国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与西南地区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央王朝的复杂经营策略以及当地族类自身的传统与能动性等密切相关。对西南中国的历史稍加留意即可发现，清代西南地区的经营方略与自唐迄明的西南边政间的连续性与继承性相当强，很多边政思想、政策甚至还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历史。因此，笔者认为，与其以西方历史为标准，脱离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从复杂的清代边政体系中剥离出一二要素，在空间上将这些要素与同样从西方历史中剥离出来的一二要素进行附会比较，从而得出二者如何相似的结论，不如在时间的维度上发掘、揭示传统中国边政自身的特色。笔者并不反对比较研究，但一项比较研究的学理根据之一应该是对被比较对象的全面把握，而不是根据需要任意剥取一二要素。否则，关公比秦琼，孙行者比胡适之，牵强附会，无所不可比。

关于彝族、黔西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历史，已有很多杰出的学者做过相当精深的研究，笔者从这些成果中获益匪浅。但因为视角差异，本书在问题意识方面并未与之形成对话，因此在导论部分略过这些论著。对它们的引证或讨论，请参见正文的相应部分。

二 区域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旨趣

本研究是在区域社会史的视角中展开的。区域史研究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在充分展现地方性特色的同时，能对理解大历史有所启示，以免流于“鸡零狗碎”之嫌。笔者十分怀疑所谓解剖麻雀一类的说法——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不能简单类比。中国太大而需要分区研究，也不可以作为区域史研究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区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建构，不能用自然或行政的线条来界定。历史是研究“时间中的人”的学问，在社会史的层面上，可以把区域理解为一个与人的思想和活动有关的分析工具。[30]因此，区域的范围是随着人的活动以及研究者的主题而变化的，小至一村大至数国都可视为一个区域，不存在所谓“跨区域”的问题。区域史与地方史的真正区别在于能否贯穿历史学乃至其他学科所关注的问题，以及能否将所研究区域放进大历史的脉络中。有鉴于此，本书将围绕大一统中国的特质与形成问题，在元明清中央王朝开拓西南地区的宏观背景中叙述黔西北的故事，并希冀能够反思、回应土司制度等王朝边政研究中的若干重要议题。

在具体方法上，本书将呈现以下几个特色：结合少数民族社会的传统分析中央王朝的制度规定及其实践，注重古人自己的历史表达，文献分析与田野工作相结合。

土司制度在明代涉及滇、黔、蜀、两粤、陕西、湖广七个省，入清后更延及陇、青、藏等地。[31]许多研究把该制度笼统地作为一个整体

来把握，在涵盖广阔地域的材料中摘取二三论据来说明其内容，由此"归纳"出该制度的若干特点，这种研究取向固然在"宏观上"勾勒出了土司制度的框架，却未能揭示出不同土司地区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事实上，中央王朝对不同的土司区域所采取的政策很不相同，即便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实施，亦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和影响。有鉴于此，笔者将尽可能关注"蛮夷"社会固有的制度与文化，在特定的地域社会的场景中，通过具体的人的活动和事件的发展来展现制度性变迁，探讨制度变化与人的行动的相互关系。对前人忽略或论证失当之处，亦尽力考辨明白。

时空差异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造成了疏离与隔膜，今人对古人的理解与诠释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带上理论与现实的影子，笔者当然不会去奢望复原所谓"真实"的历史，只求做到少一点理论演绎的误导，少一点以今律古式的评判，少一点缺乏实证的大胆推测，尽量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各种文献材料及田野资料进行比勘、考辨和分析。与此目标相应，本书极其重视彝、汉文献中那些精炼且概括力极强的词和短语，诸如"族类""异域""新疆""旧疆""额以赋役""羁縻""彝威""彝荣"等等，尽管它们缺乏现代学术概念的精确性，但却更能贴近古人的心态、观念以及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与原则。事实上，笔者对一些制度、事件、礼俗、文化认同等的考察，正是围绕着对这些词语的解读展开的。较之于民族国家、族群等产生于西方学术语境中的概念，上述源于中国本土的词汇，若能被置于较长时期的地域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加以理解，对建立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或许会有所启示。

笔者从来认为，考据、编年与时间性是历史学的根本，是历史学能够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工作者应该在其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面前故步自封，或只能皓首穷经于书斋与图书馆。自1999年攻读博士学位以来，笔者常常游历于黔西北的千山万水间，走村串寨，访察古迹，搜寻文献，体验风俗民情，倾听村民们对家乡历史的解读，并向彝文专家、世袭布摩、乡村耆老们请教彝文、彝礼以及地方掌故。[32]有必要指出，田野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对一位有心的研究者，田野往往能呈现出另一个层面的历史——普通百姓眼中的历史。这种历史在一个仅习惯于解读文献的史学工作者看来可能失于雅驯，细小琐碎，甚至荒诞不经，但它却是乡民们心态的真实表达，是他们诠释过去与现实的方式，就此角度看，这与文献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并无高下优劣之别。不过，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展示这种历史，[33]田野工作对笔者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常常引导出新思路。在田野经历的刺激下，过去自己无动于衷、难以理解甚至误读的不少文献材料似乎都有了新的意义，许多只言片语、蛛丝马迹的记载，其实都蕴含着区域社会发展轨迹的信息。

在我看来，上述研究取向是区域社会史题中应有之义，无须再贴上任何时髦的标签。然而笔者的学术背景以及对田野工作的重视，可能会令读者把本书归入历史人类学作品之列，因此似有必要略做交待。过去三十多年来，广东、福建等地的一些史学工作者，在与海内外的历史学

者、人类学者的长期合作中所形成的研究风格，被视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然而根据笔者的理解，如果说这种研究风格可以用“历史人类学”名之的话，那么它并不同于西方学术界任何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所定义的“历史人类学”，[34]它是根植于中国既有的学术传统（主要是以梁方仲与傅衣凌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传统），同时又积极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而形成的研究取向。在我看来，它主要有如下特点：第一，鉴于国家制度与国家观念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必须重视对典章制度（尤其是关于赋役、祭祀、基层行政、科举、学校等方面）的了解与研究，这也是理解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前提。然而，制度史研究并不只意味着考辨条文，还要去考察其具体的实践过程与场景。第二，积极收集整理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书信等民间文书和地方文献，力图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第三，强调走向田野，在历史现场解读文献。相对于只在书斋或图书馆苦读，这种方式可达致对历史的更亲切认知，并有可能体验到历史在当代的延续与影响，从中激发出不一样的思考。此外，在阅读中遇到的困惑之处，如果联系田野场景并辅以实地调查和访谈，或可收到解惑之效。第四，在搜集、解读文献时强调不破坏文献本身的系统与脉络，并初步就此发展出了一套方法。[35]第五，对一个村落的历史与现实的仔细考察、体验与研究，可以深切感知一个具体的社会是怎样组织、延续与变迁的，这样的经验与感觉对研究历史是弥足珍贵的——即便研究者的兴趣是一个很大的地域甚至是整个中国。第六，对文献、口碑、仪式等各种文本，不但重视它们表达了什么，更重视它们为何如此表达，强调对历史当事人自己的认知与表达应持一种尊重的态度并尽量去理解，而非用他者的视角对之分类、评判、肢解与归纳。第七，不同类型的文献、口述资料、仪式活动等表达了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但并非全然无关的历史，应同时注重这些不同的历史表达，并将之整合在一起，以呈现更富整体感与立体性的历史。第八，要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在坚持历史学本位的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与其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话。建立从中国社会自身出发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是一个长远但却必须去追求的目标。[36]

有必要指出，这种“历史人类学”并不意味着一项研究必须以村落（或某个小的社区）为基础或至少要有村落的个案，也不意味着有族谱、碑刻、契约等民间文献，以及存在着较多的祠堂、庙宇等是选择研究区域的必要条件。[37]黔西北正好是缺乏这类东西的地区，而且本研究也基本不涉及具体的村落，但这并未给我带来任何困惑。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群体（社会）或社会意义上的个人（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并不存在纯粹的个人英雄史），在闽、粤等地区，祠堂和庙宇正好是群体活动的主要场所，是村落等社区得以组织、运转的枢纽，其重要性由此可见。然而研究者的目标应该是发现这类枢纽，而不是刻意去寻找祠堂和庙宇，如一味固执于后者，有时难免发现研究无法开展，或即便可以开展，也可能会掉入闽粤地区的模式而掩盖了所研究地域自身的特色。此外，虽然在田野中发现、搜集到民间文献是令研究者欣喜若狂的事情（文献毕竟是史学的根本），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

田野工作尚有其他方面的意义。笔者通过本研究得到的经验是，在这种缺乏民间文献的地区，可以先通过阅读图书馆中的相关史料，了解该地区历史的大致轮廓，再进行访谈、实地体验等田野工作，田野考察与文献阅读的工作反复进行几次，必然收获良多。当然，民间文献的缺乏，从材料上否定了对一个较小的社区（如村落）开展史学研究的可能性，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地域几近于半个贵州省的面积，相应的田野工作也就采用在一个较大的地域内走马观花、多点开展的方式进行。

其实，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而言，初涉学海之际不去进行村落的研究也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否则，以我的懒惰和愚陋，可能会忽略对大的历史、大的制度方面的学习和了解——在我看来这是历史学中比较根本的东西。[38]在内心深处，我宁愿视本书为一本在上述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风格影响下的政治史或制度史的著作。[39]

三 地域以及作为族类[40]标签的“夷”与“彝”

本书所讨论的黔西北区域，界邻川、滇两省，大致相当于清代大定府管辖的范围，包括今贵州省毕节市的全部以及六盘水市的一部分。该区域位于贵州省地势最高的黔西高原，崇山峻岭，峰峦起伏，地表崎岖破碎，海拔在1300～2900米之间，地势极为险要。境内虽有六冲河、三岔河等河流，但大都源自乱山丛中，地险水浅，难通舟楫。该区域气候高寒，山多田少，土壤贫瘠，清中叶以后玉米和马铃薯逐渐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人口密集而又生活贫困。

历史上，黔西北的绝大部分地区曾分属于乌撒（ ）与阿哲（ ）两个彝族支系统治，形成了乌撒与阿哲两个部落君长国。[41]元王朝进军西南，乌撒、阿哲先后降附，元廷设置了乌撒、乌蒙宣慰司与八番顺元宣慰司管理今黔西北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在当时的汉文献中，阿哲君长国通常被称为罗氏鬼国，其统治区域横跨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东西两岸，河西部分称亦奚不薛，又称水西（元代很少使用这一称谓，明代以后较为常用）。[42]

元明递嬗后，阿哲君长国首领霭翠于洪武五年（1372）归顺。明王朝仿元制，设贵州宣慰司，隶湖广，令霭翠等“世袭贵州宣慰使如故”，同年设贵州都司。九年后乌撒亦降附，明廷设乌撒土府，隶云南，寻改隶四川。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设省，贵州宣慰司改隶于黔。此外还于洪武十五年、十七年先后在黔西北设立了乌撒卫与毕节卫，分别隶于云南都司与贵州都司，永乐十一年后乌撒卫改隶贵州都司。

明代汉文献对阿哲部的称谓有较大变化，“罗氏鬼国”“亦奚不薛”基本上被弃用，“水西”之称则频频出现，并且衍生出新的含义，大致指三

个广狭不同的地域：（1）阿哲君长国的大本营在鸭池河以西，所以“水西”一词常泛指阿哲家的整个统治区域，包括水西与水外六目地，[43]这种用法最常见，又由于阿哲的统治者们在明代兼用汉姓“安”，所以被称为水西安氏；（2）阿哲家统治的鸭池河以西的地方，不包括水外；（3）最狭义者指阿哲家统治的比喇地方，即今黔西县。

天启、崇祯间，水西、乌撒与四川南部的永宁奢氏土司联手反明，迨动乱平定，阿哲的水外地区被割归朝廷，设置了镇西、敷勇等军卫。清康熙三年（1664），吴三桂平定黔西北，改土归流，水西地区设置平远、大定、黔西三府，乌撒地区设置威宁府，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改编，降府为州，改卫为县，在黔西北设置大定府，下辖平远、黔西、威宁三州与毕节县、水城厅。民国初年改州、厅为县，其中平远改为织金县。1941年前后，析黔西县北境置金沙县，大定县西南境置纳雍县，威宁县东境置赫章县。1954年，定威宁为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1958年，大定县更名为大方县。1970年，水城县被划出，并入六盘水地区（今六盘水市）。[44]

黔西北僻居天末，溪谷险阻，历来被视作夷蛮荒服之域。该地族类繁多，据汉文献的记载，有黑倮倮、白倮倮、仲家、花苗、蔡家、侬家、仡佬、六额子、羿子、里民子等，其中黑倮倮居统治地位。在1950年代进行的民族识别中，黑、白倮倮被划为彝族，其余则被定为苗族、白族、布依族、仡佬族等。明中期以前这些族类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马是黔西北的重要畜产品，至迟在宋代便开始被用来同内地交换物品。农作物以荞麦为主。

黑倮倮（黑彝）统辖黔西北的历史相当久远，据说在三国时期便建立了国家。首领们把辖土划分成若干个“则溪”[45]，交给宗亲们管理，水西与水外共有13个则溪，乌撒有9个则溪。则溪的职能有二：一是管兵马，二是管粮草，是一种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合而为一的制度。[46]

本书将以彝族为主要讨论对象，[47]揭示周边族类的制度与礼仪在因应王朝持续不断扩张中的演变。“彝”在古汉语中是一个颇具高贵色彩的词，除泛指各种青铜祭器外，还有“常道”“常法”之意。[48]清代的官员与文人们常常用“彝”取代“夷”，泛指周边族类，[49]经过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以后，“彝”才成为固定的族称。这一族称涵盖了众多族类，这些族类大都共享着相同的族源故事，并呈现一些相似的风情与习俗，但他们的自称却多种多样，计有诺苏、诺苏濮、阿西濮、格濮、聂苏濮、罗武、倮倮、所都、撒苏、六米、堂郎让、希期、罗罗濮等上百种，[50]其中没有一种是“彝”或与之音近，显然，彝是一种他称。[51]

黔西北的彝族自称“娄素”（，亦有译为纳苏者）或“娄素濮”（，亦有译为纳苏泼者），与凉山等地彝族的自称“诺苏”“诺苏泼”的发音极为近似，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纳苏泼”（娄素濮）亦

即“诺苏泼”，只是由于方言土语不同而稍有音变。[52]这种理解值得商榷，“诺”意为“黑”或“主体”，“诺苏濮”之意为“主体的族群”或“尚黑之族”，[53]“娄素濮”的含义与此大相径庭，资深彝文专家、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继超认为“娄素（濮）”意为大地中心或世界中心的人，[54]这是有相当见地的。“素（ ）”和“濮（ ）”都带有“人”之意，“娄（ ）”则隐含着“中间”的意思，如 可译作“中央”。黔西北彝文古籍同样表明，娄素认为自己是居住在大地中央的人，《彝族源流》云：

笃米的六子，如天上繁星，似地上茂草，遍布中央地。[55]

《支嘎阿鲁王》亦载：

（支嘎阿鲁）以星座，划天地界限，划内外界限，中间是彝家，四边外族人。[56]

与“娄”相对的词是“啥（ ）”，现在一般称汉族为“啥”，但世袭布摩、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子国告诉我，“啥”在古彝文中是“由中央向外发展的人”之意，并没有那么鲜明的民族界限。王先生的观点其实是彝文专家们的共识，他们通常不把古籍中的“啥”理解为“汉”，而是翻译为“外（人、族）”。当然，娄素也往往强调自己神圣高贵的身份，《彝族创世志》云：

彝人（ ，即娄素）天之子，道与度来抚。[57]

就汉文献来看，包括黔西北娄素在内的许多彝族支系，在元明清时期都被称为“罗罗”“倮倮”“㑩㑩”等。[58]但民族调查的结果表明，仅有极少数的支系自称“罗罗”，因此有理由相信，对大多数支系来说，“罗罗”是局外人强加的他称。[59]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罗罗”曾经是一种广泛的自称，后来逐渐被许多彝族支系弃用。

“罗罗”“倮倮”等称呼在日常生活中同样被频繁使用，成为最常见的他称之一。“娄素濮”等族类对此很不乐意，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性称号。但是，在某些场合下又却不得不使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例如嘉庆年间大定府平远州发生了一桩命案，彝人陈阿佃赴京控告，其供词中称：

我系贵州平远州倮倮，年三十八岁，在本州向化里居住。我们土司头目安达屡次向众倮倮派敛银两……[60]

娄素濮对“罗罗”之称的厌恶与排斥是有相当理由的，早在明代，士大夫们就给罗罗一词披上了歧视性的色彩，写作“猓猓”“猓猡”“罗鬼”等，并常常加上“性类犬羊”之类的评价。[61]

和“罗罗”一样广为人知的称谓是“夷”，这是一种他称，却逐渐被遍

布川、滇、黔等地的彝族支系认可和接受。至少在晚清时期，黔西北的娄素濮已被当地的汉人称为夷人或夷族，而且他们在汉语语境中也是如此称呼自己。文献的记载与此一致，始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定稿于民国13年（1924）的《威宁县志》云：

（我邑）其他种族除汉族不计外，以苗民为最多，黑白夷次之，齐细眉次之，土老又次之，阿乌子不多，蛮子绝无。[62]

其他彝区亦有类似情形。1943年，林耀华深入凉山考察，发现“罗罗”一词并不常用，边区汉人称“罗罗”为蛮子，“罗罗”谈话则自称“夷家”。[63]

如同“苗”“蛮”等词一样，“夷”所指对象常常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况下只能理解为对非汉族类的泛称。[64]这一泛称如何衍生出狭义的内涵以指称“罗罗”，目前尚难以回答。今天被划为彝族的众多支系，在古代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意识等尚有待考察，可以想见的是，随着相互之间的争战、交往以及改土归流、民族识别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他们的意识一定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例如，在古彝文中是指“由中央向外发展的人”，但现在已变成汉族的意思。有必要指出，视彝族为一在历史长河中延续实体之观点固然有可商榷之处，但笔者也很难同意彝族是中国政府经由民族识别建构出来的范畴的结论。[65]当然，不能假定古人与今人有着相同的认同意识与族别观念，在很多情况下，将本书中使用的“彝”字或“彝族”一词，理解为黔西北的娄素濮，或许更为贴切。

四 彝文献的性质

在研究边远地区特别是南方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时，我们所能利用的文字材料往往只是官员与士大夫的一面之词。幸运的是，黔西北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各种彝文历史、哲学、文学书籍以及族谱、契约、碑刻、歌谣等，同汉文材料（包括正史、实录、地方志、档案、族谱、私人著述等）一起为本书提供了一个较为坚实的资料基础。此外，1949年以后大量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材料以及笔者本人的田野笔记，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现存彝文献大都是明清时期的作品，在川、滇、黔等省的彝族聚居地都有发现，其中黔西北是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因为各彝区的政治、社会经济与礼俗不尽相同，且文字有较大差异，加上彝文献的某些特点，所以在讨论黔西北的历史（特别是关于制度与礼俗方面）时，笔者一般只使用本地彝文材料，其他地区的彝书仅作参考。

除金石材料外，彝文献一般未标明作者及著作时间。并且在叙述的

过程中，除极少数情况（往往是提到汉文史籍中都有记载的人物或事件时）出现干支纪年外，基本上也不说明人物的出生、活动时间或事件的发生年代。虽然其中涉及的许多人物出现在父子联名的谱系或女性谱系中，逻辑上似乎可以用“代数×每代平均时间（如20或25年）”的办法来确定年代，但在对谱系产生的时间及背景缺乏了解，又没有相关汉文献印证的情况下，用它们来建构彝族史（特别是远古史）的时间坐标必须慎重。[66]用某个时期产生的文献来揭示更早时期的历史，必须先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说明。对这一基本的史学规范，彝文献并不能享受豁免权。此外，用对音的方法将彝书中的人物对应于汉文献中的人物时，同样必须审慎。目前，在彝文献的使用甚至翻译的过程中，上述两点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相关研究结论虽然常有惊人之语，但却不能被学界普遍接受和认可。

彝文献大都用五言的形式写成，其中甚至还可看到口述传统的影子。许多叙述极为简略和隐晦，跳跃性较大，并且杂糅着神话与传说，只有充分掌握大量的彝、汉文材料，谙熟当地彝族的传统礼俗，才能真正理解其含义。本书一般不会单独利用彝书去考证、讨论具体的历史事件，但笔者始终认为，彝文献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汉文献的不足乃至纠正其错误，在了解黔西北的地方制度以及娄素濮的思想观念与礼俗方面，笔者从彝文献中受益匪浅。

五 本书基本框架

作为一本史学著作，本书基本按时间序列展开，同时也兼顾结构性与共时性的要素。导论部分在学理上阐明本研究的意义，并简明扼要地交代黔西北的地域、族类与材料。第一章论述中央王朝大举开拓西南地区之前，黔西北彝族政权的政治结构与行政区划。第二章分析从元到明初中央王朝建立并完善土司制度的过程，并探讨彝族自身的传统与制度对王朝开拓的制约作用以及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第三章考察与土司制度有密切关联的其他边政措施，主要是卫所制度、流官制度与科举制度等。第四章探讨在中央王朝开拓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彝族制度与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微妙变化。第三和第四章的内容大致可以理解为一个共时性的结构，它们虽然与第二章的大部分内容有着时间先后之分，但这三章之间逻辑方面的关联尤其值得注意。卫所、流官、教化是王朝控驭乃至逐渐削弱土司的重要制度性手段，彝族制在明代的嬗变与明王朝的这些边政措施息息相关。第五章论述彝族制度瓦解、新的统治秩序建立，也即黔西北进入王朝“版图”，成为王朝“新疆”的历史过程。第六章考察改土归流之后，以前在彝族政治结构中分享统治权力的土目与布摩两大阶层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的变化与延续。这一章表明，改土归流并不能一下子根除旧制度，新秩序是在与旧制度妥协与互动中建立起来的。第七章从康乾盛世的大背景中考察移民、矿业开发与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说明黔西北新疆在经济方面与内地紧密整合的过程。第八章揭示科

举教化、文化交融在塑造新秩序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许多原住民为了因应改流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迁，主动调整自己的礼俗与文化身份，黔西北地区由此出现了一些势力强大的宗族，并流传着许多“彝变汉”的传说。第六至八章呈现改土归流后黔西北社会的主要变化及其从“新疆”演变为“旧疆”的历史过程。结语部分总结全书，指出在从“异域”演变到“旧疆”所呈现的地方逐渐整合进王朝国家的过程中，王朝、周边族类的制度与传统互动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除导论与结语外，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大致分别论述改土归流前后的黔西北社会。在形式上，两编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先考察制度的建立及演变，然后再分别在上编第四章第三节、下编第八章分析黔西北社会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情形。讨论认同问题的篇幅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材料不同，但更重要的是改流前后地方社会的巨大变迁。这一变迁同时也导致了上、下两编的另一个更为重大的不同，即体现于移民、农业、矿业、交通等方面的区域开发，在上编仅在叙述卫所时略有涉及，而下编则用了整个一章的篇幅来讨论。

[1]费孝通的论述或许可视为有关中华民族实体论的一种极富启发性和解释力的经典表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并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4页。

[2]参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振大汉之先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中华民族（中国国族）形成的问题只是本研究的切入点，而非本书的主题。在我看来，“中国国族实体论”与“中国国族建构论”之间是一种学术范式（Paradigm）的转换，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兼容性，它们在深刻性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哪一种更具有解释力。

[3]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第xii-xiii、xvi-xxiii、367～390页。

[4]笔者此处强调的“整合”，是指传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个离散的社会，尽管不同人群间差异极大，但却并非一袋装在麻袋里面的马铃薯。政治体制的大一统、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对不同人群的规范等自不待言，即便在乡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许多边缘化的人群中，都往往可以发现朝廷制度与王朝意识形态的存在与影响，以及人们对这些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认同——尽管这些认同往往也呈现出“地方性”色彩。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极大差异的‘地方社会’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加上城乡之间并不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存在着功能与文化上的隔离和对立，而是表现为所谓‘城乡连续体’（urban-rural continuum）。”参见刘志伟、陈春声《历史学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1997》，三联书店，1998。“在（地方志等）最‘地方’的文本中，处处见到‘国家’的存在。”参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第317页。而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研究亦表明了传统中国的市场

在区域整合方面的意义。

[5]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4～15页。

[6]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1期。

[7]参见王崧兴《汉学与人类学：以家族与聚落型态之研究为例》，转引自华德英《从人类学看香港社会——华德英教授论文集》，冯承聪编译，大学出版印务公司，1985，第223页。

[8]前面对“整合”的描述，足以说明大小传统是相互渗透的一体两面，并非二元对立。大小传统的概念只具有分析性工具的意义，绝非传统中国社会的现实本身。下文的论述将更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9]参见Barbara E.Ward，“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Sociological Self-awareness：Some Use of the Conscious Model，”“Sociological Self-awareness：Some Use of the Conscious Models，”in *Through Other Eyes*：*An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Hong Kong*（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9）。文人官僚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作用同样被其他学者注意到，参见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14～17页。

[10]参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王庆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不像有的汉学家表现得那么直接，但施坚雅的论著仍然表明他想探究一个主要由农民构成的似乎应该是松散的社会，是如何聚合在一起并长期保持稳定性的，他发现了市场在整合中国这类农耕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之“序”中，他指出：“在（中国）这类重要的复杂社会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

[11]《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5年第12期。

[12]《中华学报》1978年第3期。

[13]参见陈其南《土著化与内地化：论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发展模式》，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1辑，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5。

[14]Helen F.Siu，“Recycling Tradition：Culture，History，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s of South Chin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4（1990），pp.765-794；萧凤霞：《传统的循环与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香港《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期；萧凤霞：《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5]刘志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16]James Waston，“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Empress of Heaven）along South China Coast，960-1960，”in 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and Evelyn S.Rawski，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292-324.

[17]刘志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的一个解

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2辑，第123页。

[18]我们在官方文献中常常能够看到的所谓“淫祠”即可证明这一点。

[19]参见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0]参见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科大卫《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科大卫《明嘉靖初年广东提学魏校毁“淫祠”之前因后果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周天游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David Faure，“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 15：1 （1989），pp.4-36; David Faure，“The Lineage as Business Company：Patronage Versus Law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siness，” in R.A.Brown，ed.，*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vol.1，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6，pp.82-121.

[21]Helen Siu and David Faure，*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2]典章制度在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方面的重要性其实已被学者明确指出，参见刘志伟、陈春声《历史学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1997》。

[23]特别是宋（包括辽、金）至清时期王朝的典章制度尤为重要。当然，不同的地域对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例如，华北地区很早就纳入王朝秩序，并且经历过不同的国家传统（既有汉人王朝，也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国家），在这些地区进行田野考察时往往感到需要熟悉自唐、宋（包括辽、金）至清的相关典章制度。而珠江三角洲一带虽然表面上在秦汉时期就纳入王朝秩序，但王朝真正能够控制的地区其实是相当有限的，自明代起王朝的力量才逐渐深入，因此在珠三角乡村考察所得到的印象是，似乎了解明、清王朝的相关典章制度就大致可以了。

[24]本书第一章将探讨布摩与慕史在传统彝族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25]，一般汉译作“威”，在彝书中是一个频频出现的词语，有威力、权威、威势的意思，常常用来形容宇宙、祖先、英雄人物、政权、制度等，如《彝族源流》第5～8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谈到天地产生时云：“阴阳相配合，苍苍的天影，茫茫的地影，铺盖六威荣。苍天接云端，在天道之上，产生了君道；地度数对天，下产生王道。以威荣经天，以威荣营地。”（第6页）出于对本族类的热爱与自豪，彝族知识分子常常在字里行间张扬着本族的彝威（ ），当彝制崩溃，汉礼盛行之时，彝族知识分子表达了对彝族权威消解的感慨，对彝族传统湮没的担忧。《水西地理城池考》云：“彝威、彝荣，不可丢下；汉威和汉荣，也不可要。彝威与彝荣，只能从根上去找，不能只招折枝叶。从头找到脚，彝威是存在的，汉荣也是不朽哩！有文化的人，管理土地，有不朽的威荣，嘴里虽是不说，心里却都是想着：天地保佑他，巩固他的威荣，百姓永远拥护着君长，功名不失，江山依旧。……对祖宗，须敬供，只是想这样的事业：今后彝威和彝荣，不可丢下它。”括号内是彝文，括号前是该彝文的音译或意译，下同。又，由于彝文没有经过统一与规范，同一字在不同的使用者、书籍中常常有不同的写法，异体字众多成为彝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如表达族类自称的“娄”，就有、、等写法。笔者力图在本书中避免使用较多异体字，如出现同一字有不同写法的情况，系因为引自不同的书，为了保持引文完整而又不能妄加统一所致。

[26]笔者的这一思路受到科大卫的启发，他在《告别华南研究》（华南研究会编

《学步与超越》，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声称："（我们）需要跑到云南和贵州，看看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同国家模式（我是指南诏和大理）的地区如何把不同国家的传统放进地方文化。"

[27]"一点四方"是一些所谓"西南学"学派的学者提出的概念，"一点"指中央，"四方"指周边地区，传统中国史研究把四方作为中央的附庸，这个学派声称要坚持"西南"中心取向，摆脱"一点四方"的思考模式。参见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一书的总序，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28]北方和南方少数民族迥不相同，北方（包括西藏）少数民族通常都有着自己的文字（南方少数民族有文字者则比较少），并且常常能够建立地域辽阔的强大政权，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方面，北方与南方少数民族是大不一样的（仅仅从前者常常能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威胁甚至入主中原就能直观体会到这种差异），因此黔西北个案的意义只能体现在理解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方面。

[29]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30]参见刘志伟《区域研究的人文主义取向》，即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序言，学林出版社，1999；陈春声《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关于潮学研究课题与方法的思考》，《潮学研究》第11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三联书店，2006。

[31]参见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第57～58、112～114页。

[32]笔者调查的地区、单位主要有：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赫章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威宁县民族事务局、大方县普底彝族白族苗族自治乡、毕节市清水镇、赫章县妈姑镇、兴发苗族彝族回族乡、雉街彝族苗族自治乡、珠市彝族自治乡、古达苗族彝族自治乡等，这些县、乡、镇全部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

[33]注意发掘这类历史，并将这类历史与文献中所揭示出来的历史进行比较的较为成功的例子，可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137～296页。

[34]同几乎所有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流派、风格与方法一样，"历史人类学"主要是西方学者所提出来并予以实践的，但西方学者对何谓"历史人类学"的见解并不一致，大致上可分为从历史学的角度予以说明者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明者两大类，而每一大类内部又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与黄国信、吴滔合作撰写的《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一文对这些问题略有涉及，可参考。

[35]这一点可以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对贵州清水江流域文献的搜集整理中体现出来。该中心并非简单到当地收购文献，而是同当地档案馆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合作，为他们提供资金与设备援助，并培训、指导他们进行搜集工作，要求搜集上来的每一件契约、族谱、碑刻等文献，都必须严格登记是在某县、某镇（乡）、某村、某户家庭（某处）搜集的，然后原件留在档案馆，该中心只需要复印件。这样，文献的脉络就基本被保存下来了，因为地点、人物清楚，研究者既容易了解文献之间的关联，也有足够的线索回到文献产生的现场，进行田野体验与调查。

[36]以上总结只是我的个人解读，并未征求过被总结的学者们的意见，对他们的误解误读之处概由笔者负责。从对赋役等制度的重视、积极搜集民间文书、实地调查、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等方面，显然可看出梁方仲与傅衣凌的风格与影响。

[37]笔者所描述的这种“历史人类学”，被有的朋友以略带戏谑的口吻简化为“进村找庙”“进庙看碑”，一些朋友甚至不无困惑地对我表示自己研究的地方没有庙宇和祠堂，或者庙宇和祠堂里面没有碑刻，找不到族谱等，不知该怎么办。其实，如果说庙宇、祠堂及碑刻、族谱等民间文献在这种“历史人类学”中显得重要，只是因为：第一，这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最初是在闽、粤二省进行实践的，闽粤地区恰好有许多庙宇、祠堂和民间文献；第二，在训练学生方面，存在这类东西的地区能够让学生在短时间内体会到上述研究取向；第三，对历史研究而言，选择有较多文献的地区做研究比较容易上手，也更具可操作性。

[38]当然，即便我一开始就选择做村落的研究，我的教育背景肯定会让我充分意识到大历史与制度的重要性，但意识到是一回事，真正有相关的研究经历与体验又是另一回事。

[39]说它是政治史，是因为本书研究的是两个彝族君长国的兴亡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说它是制度史，是因为本书的主线是讨论彝族君长国的制度、土司制度及其他制度（如卫所制度、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制度）之间的关系。此外，本书花大量篇幅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如宋代西南地区多“国”林立的局面、贵阳设府、朱元璋与奢香的关系、奢安起兵反明、土司制度中文职与武职、清代贵州铅矿业等，都是或对全国有巨大影响，或备受时人与后来学者关注的比较大的历史事件或重要制度。

[40]本书使用“族类”，而不使用“族群”“民族”等更为通行的现代概念，理由如下：首先，这是基于古代中国自身语境中的概念。族类、部族、部落等词常见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含义多样。《周礼·春官·钟师》：“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郑玄注：“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史记》卷78《春申君列传》：“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汉书》卷99下《王莽传》：“莽曰：‘宗属为皇孙，爵为上公，知宽等叛逆族类，而与交通。’”《魏书》卷58《杨播列传》：“又此族类，衣毛食肉，乐冬便寒。南土湿热，往必将尽。”显然，在这些语境中，族类的意义并不相同。但文人、士大夫们很多时候用族类一词来指称在自己眼中具有风俗、文化、种族等差异的人群，这种用法在唐以后尤其普遍。《左传》：“（成公四年）秋……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旧唐书》卷55《李轨传》：“凉州僻远，人物凋残，胜兵虽余十万，开地不过千里，既无险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类，此而可久，实用为疑。”《明史》卷320《朝鲜列传》：“倭虽遁归，族类尚在。”嘉靖《贵州通志》卷3：“贵州土著蛮夷，族类实繁，风俗亦异。”部族、部落等词的含义与族类相似，限于篇幅，兹不述其用法沿革，仅举数例。《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自三代以前，两汉之后，西羌、北狄，互兴部族，其名不同，为患一也。”田雯《黔书》（丛书集成初编本）则辟有“苗蛮种类部落”节目，专门论述贵州境内的各种“苗蛮”。又，元人脱脱所著《西南彝论》（《古今图书集成》卷1522）：“黔州、涪州徼外，汉牂牁郡，西南诸蛮也。其俗椎髻左衽或编发，随畜牧迁徙无常，喜险阻，善战斗，部族共一姓，虽各有君长而风俗略同。”其次，上述族类等词语同学术界常用的“民族”“族群”等概念虽然相似，但其实有着重大区别。族群（ethnic group）被认为是一个有着内部认同感的社会群体，许多人类学家还强调这个群体的成员们具有共同族源的信念。但传统文人、士大夫们从客位立场界定出来的各种族类，其内部是否具有这样的认同感我们已难以得知，所以，我们不能称这些人群为族群。最后，我们同样不能称这些人群为“民族”。西方学术与现实语境中产生的“民族”概念，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与主权要求相联系的共同体，或被视为可由一些标准加以辨识与确认的人们的共同体，认为这种共同体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很紧密的关联则是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民族主义”的根本特点之一则被认为是要求“政治的单位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参见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3；《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5～13页；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1～10页）而中国当代的民族，显然不具备这种意义，中国的民族是1949年之后，政府参照、变通斯大林的民族标准，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之上

识别出来的。因此一些西方人类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民族”一词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词语，应音译作“Minzu”（参见郝瑞《从“族群”到“民族”？——中国彝族的认同》《彝族史学史检讨》，均收入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中国传统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些非汉人群（“族类”），既非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内部是否具有共同体的主位想象，他们更与政治单位缺乏对应关系，同时也并非使用一整套民族学分析工具和方法，并结合深入细致田野调查识别出来的群体。因此在任何学理意义上，都不能称这些人群为民族。

[41]乌撒、阿哲均是彝族古代的著名首领，后被引申为支系名、地名与君长国的国名。

[42]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5《旧事志一·纪年上》；卷47《旧事志三·水西安氏本末上》。道光《贵阳府志》有过这样的解释：“水西部，蛮语曰亦奚不薛。”“亦奚，水也，不薛，西也。”此处的“蛮语”当不是指彝语，水西在彝语中称阿哲（），且彝文是单音节文字，称水为（音“夷”），西为（音“说”），不管是从语音上还是文法上看，亦奚不薛都不会是彝语“水西”的音译。有学者疑“亦奚不薛”系出自蒙古语（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贵州民院民族研究所印，1985，第18页），但查明代的外语字典《华夷译语》，蒙语“水”发音“兀孙”或“苏”，“西”音为“阿罗捏”或“克丁”，“亦奚不薛”似不大可能是蒙语“水西”之意。查《元史》可知，元初水西有一个首领名亦奚不薛（《元史》卷11：“壬辰，亦奚不薛病，遣其从子入觐。帝曰：‘亦奚不薛不禀命，辄以职授其从子，无人臣礼。’”），所以，亦奚不薛的地名有可能是因人名而转换过来的——正如乌撒、阿哲由人名变成了地名。

[43]阿哲君长国在鸭池河东岸尚有一些土地，由六个土目治理，称为“水外六目地”，这些土地与宋氏土司的领地连为一片，通称水东，亦称水外。“水外六目地”大致相当于今天贵阳市辖下的清镇市、修文县以及安顺地区平坝、普定等区、县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在地域上虽不属于黔西北，但阿哲支系长期统治该地，因为讨论的需要，本书有时将涉及这些相关地区。

[44]更详细的沿革情况，可参见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地理志》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第35～36、55、63～65、83～88、133～134页。

[45]则溪，彝语，即仓库之意，因每个则溪都会建立仓库，因此得名，详后。

[46]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32～35页。

[47]原因如下：第一，彝族是黔西北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第二，彝族在黔西北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土司制度时期主要是他们同中央王朝以及汉人打交道；第三，元明以来关于“倮倮（彝族）”有大量的汉文献记载，并且他们自己也有文字，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彝文典籍，而关于其他族类的文献则相对较少；第四，以彝族为中心已经可以回答笔者所关注的问题。

[48]参见王国维《说彝》，《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1959；《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第573页。

[49]例如明代首辅高拱记述安抚水西安氏土司经过的《靖夷纪事》，清代康熙笼春堂刻本就改作《靖彝纪事》。事实上，以“彝”代“夷”的情形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乾隆皇帝谕令四库馆不得改书籍中的“夷”字作“彝”（参见《清史稿》卷482《刘逢禄传》），但在时人的各种公文和书籍中使用“彝”字似乎不在禁止之列。

[50]关于这些称谓，可参见杨成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地学杂志》1934年第1期（抽印本）；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第7页；自文清《彝族自称考释》，贵州彝学会编《贵州彝学》，民族出版社，2000。

[51]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彝族内部支系繁多，但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具有内部认同感的范畴，而一些国外学者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彝族是1950年代中国政府的民族识别工作所建构出来的一个范畴。参见郝瑞《从族群到民族？——中国彝族的认同》《彝族史学史检讨》，《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

[52]参见易谋远《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6页。

[53]参见易谋远《彝族史要》，第6页。

[54]这是2000年9月笔者在毕节采访时，王先生亲口所述。

[55]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彝族源流》第13～16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第134页。笃米的六子即今天所称的彝族六祖，娄素濮认为自己是六祖的子孙。其他彝书亦有类似记载："阿鲁到中央，走遍中央各处，笃慕（即笃米）的子孙，分六支人居住。"参见《西南彝志》第11～12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第246页。

[56]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古籍办、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支嘎阿鲁王》，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第74页。支嘎阿鲁的事迹见于彝族典籍与口碑中，据说他是一位具有超凡能力的英雄，曾为天君调查天下各方部族、地理，定租赋，并镇压了各方为害人间的山精水怪。参见《西南彝志》第11～12卷，第217～313页。

[57]陈朝贤、杨质昌主编，王秀平等翻译《彝族创世志》谱牒志一，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第98页。

[58]原文一般写作"猓猓""猓猡""猡猡"等，带有侮辱性，本书改"猓"作"倮"，"猡"作"罗"，下同。因为士大夫们认为"猡猡""俗尚鬼"，故又称为"罗鬼"。清人田雯所著《黔书》卷1称："罗罗，本卢鹿，讹为今称……俗尚鬼，故又曰罗鬼。" 一些学者认为，"倮倮"本系彝族的自称，有"龙和虎的民族"之意，他们所持证据除了在很多彝语方言中"龙虎"发音与"罗罗"相近以及在彝族社会中广泛存在龙虎崇拜外，还有《山海经》《虎荟》等汉文献中"呼虎为罗罗"的记载。参见自文清《彝族自称考释》，《贵州彝学》，第236～245页。

[59]这种称呼从小范围扩展到众多支系可能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考"罗罗"的名称最早见于元代，当时中央王朝大规模经营西南，与这些地区的族类逐渐展开较为广泛的接触，官员、文人开始用自己的标准与眼光去界定并命名这些族类，他们起初或许从自称"罗罗"（或与此音近的称呼）的人群那里获得这一称谓，并顺理成章地把风俗习惯与这些人群相似的族类呼为"罗罗"。

[6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1084，嘉庆十三年闰五月二十九日宜兴、英和、多庆"谨奏为请旨事"。供词中的"倮倮"似乎并非做记录的胥吏擅自加上去的，因为如果陈阿佃不讲明自己的身份，京城的官员与胥吏是不会知道他是"倮倮"的。

[61]"罗罗"的称谓在其他彝区同样不受欢迎，如昆明一带的原住民最恨人呼为"罗罗"。参见江应樑《西南边疆民族论丛》，珠海大学出版，1948，第36页。2008年1月25日，笔者在四川雅安市内访问时年95岁的雷波彝族老人李仕安，他告诉我说彝族听到别人呼自己为"倮"会引起纠纷的，不过他也说，有的彝区对此不那么敏感，像四川甘洛县土司岭光电就主张在汉语语境中自称"倮族"。岭光电1943年写了一本《倮情述论》，之后四川凉山一些彝人在用汉语书写时也接受了"倮族"这一称号。另一个不受欢迎的称呼是"蛮子"［晚清时期进入四川凉山等地的传教士英译为Man-tsz，参见Samuel Pollard，*Tight Corners in China*：*Missionary among the Miao in Southwest China*（2nd ed.，London：Andrew Crombie，1910），p.59］。李仕安老人称，最侮辱的称号是把"蛮"和"倮"叠加起来，如果称彝人为"蛮倮倮"，那他一定要拔刀相向了。

[62]民国《威宁县志》卷17《杂事志·土司并苗蛮》。这里的“夷”显然是指娄素濮，直到现在，威宁的娄素濮（彝族）尚有黑、白的区分。

[63]参见林耀华《凉山夷家》，商务印书馆，1947，第1页。“夷家”一词应是凉山“罗罗”讲汉语时的自称。民族调查表明，在彝语语境中，凉山彝族的自称是“诺苏”或“诺苏濮”。

[64]甚至连“倮倮”一词都是如此，如洪武二十八年户部知印张永清云：“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啰啰。”（《明太祖实录》卷239，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壬申条）

[65]参见温春来《族别界限与族类互变——黔西北彝族之族类界限观念考察》，香港《历史人类学学刊》2004年第1期；《彝、汉文献中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斯蒂文·郝瑞商榷》，《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66]对彝书谱系与彝族远古史关系的论述，参见温春来《彝威与汉威——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第221～227页。

上编 从“异域”到“羁縻”：宋至清初改土归流前的黔西北社会

第一章 王朝的“异域”：彝族君长国的制度与文明

第一节 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

以通常所认定的中国疆域为标准，宋代中国无疑正处于复杂的分裂状态中。以宋王朝为中心，依照《宋史》中的观念，天下格局似可做如下简单划分：（1）路府州县区，为王朝直接统辖区域；（2）蛮夷区，包括两类区域，一是羁縻区，包括领于长江上游成都府路、夔州路、中游的荆湖路，珠江流域广南西路等路的几百个羁縻州、洞，其首领名义上效忠宋王朝，受宋王朝册封，实际上这些地区并不真正受王朝管辖，二是在广大西南地区的许多“蛮夷”，游离于羁縻制之外，与王朝之间甚至缺乏名义上的统属关系；（3）外国，既包括曾给北宋造成重大威胁的西夏，也包括大理、占城等较顺服的国家，还包括偶尔有联系的天竺等国，其实还应包括危及宋朝国祚的辽、金。因为元代统治者同时承认宋、辽、金的正统，因此辽、金另修正史，未入《宋史》。[1]

《宋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元朝对前朝历史的认知，但其中基于王朝中心的世界观，无疑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受这种传统影响的历史书写，周边族类与外国的形象，往往围绕朝贡、叛逆、征伐与奇风异俗来描述，用语极为简略。例如《宋史》中的蛮夷区，尤其是羁縻区之外的众多“蛮夷”，常常三言两语带过，一些有着较高文明程度的“蛮夷”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书中甚至连名字都未曾出现。关于它们，要么汉文献全无记载，要么只能在宋代极个别官员的笔记、文集、公文中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因为文献的缺载、简略或语焉不详，现代人对宋代西南地区复杂政权格局的认识，简化成了大理国与宋王朝的对峙，其余非汉民族大致皆被视为文明程度较低的部落，而未以政权视之。当代一些西南民族史的研究者，已经描述了宋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些情况。[2]这些研究在揭示出被忽略的历史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第一，着力论述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却未去分析它们为何可以被称为政权。一些著作甚至把见诸史籍的各少数民族部落概称为少数民族政权，把独立与半独立、有文字与无文字、有复杂政治结构与政治结构尚不清楚的部落等同视之。[3]第二，一些论著使用的文献

仅限于汉文而忽视了少数民族自己的历史表达，一些论著虽然使用了彝文材料，但却忽视了两个最基本的问题。首先，所用彝文献基本上都是成书于清代，为何可以用清代的材料去说明宋代的历史？其次，在彝文献所述与汉文献所述的地名、人名能否对应都尚未证明的情况下，何以得知两种文献叙述的对象是同一的？这两个疑问关系到合理使用彝文献的前提，对其置之不理将导致整个研究建立在一个非常薄弱的基础之上。

本书无意全面梳理宋代西南地区诸少数民族的内部权力结构，仅拟将焦点集中在黔西北及其周边地区，以揭示宋代西南地区复杂的政治格局。

南宋乾道九年（1173），著名诗人范成大赴任广西经略安抚使，两年后，他就自己任上的所闻所见，写就《桂海虞衡志》，其中有云：

南方曰蛮。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区落连亘，接于西戎，种类殊诡，不可胜记，今志其近桂林者。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张、大小王、龙石、滕、谢诸蕃，地与牂牁接，人椎髻跣足，或着木履，衣青花斑布，以射猎仇杀为事。又南连邕州南江之外者，罗殿、自杞等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4]而峨州以西，别有酋长，无所统属者，苏绮、罗坐、夜面、计利、流求、万寿、多岭、阿误等蛮，谓之生蛮，酋自谓太保。大抵与山獠相似，但有首领耳。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

押马者，称西南谢蕃知武州节度使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5]

尽管在《宋史》中仅简单提到过两次，[6]但自杞是在西南地区有着相当影响的政权，一度率兵攻占过大理国的中心鄯阐府。[7]罗殿在《宋史》中亦只出现数次，并且其内部情形我们一无所知，而范成大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罗殿有聚落，有自己的文字，有文书公文，首领称国王，而且是“化外真蛮”，宋王朝甚至不能在其地建立羁縻州县，连名义上的统治都不能维持，罗殿之为“国”可谓名副其实。总之，南宋西南地区的局势，是自杞、罗殿、大理等多“国”林立，而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有一个大理国与宋王朝对峙。尚有其他宋人的记载显示西南地区的复杂局面，淳熙二年（1175）十月，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张栻奏称：

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罗甸、自杞，而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8]

广西桂林通判周去非云：

欲至罗殿国，亦自横山寨，……一程至阿姝蛮，一程至朱砂蛮，一程至顺唐府，二程至罗殿国矣。凡十九程。[9]

曾参与修纂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的黄震亦云：

自羁縻州洞之外皆蛮也。其区连亘湖南，接于西戎，种类不可胜计。溪洞外依山林而居，荒忽无常者为獠，无酋长版籍，无年甲姓名……其南连邕州南江之外者皆成聚落，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此诸蛮之外又有大蛮落，西曰大理，东曰交趾，大理即南诏也。[10]

南宋淳熙年间官至丞相的周必大还提到了“罗鬼国”：

西南蕃、罗鬼国在真宗朝尝来鬻马，后为罗殿国所限。[11]

宋人简略的记载，隐约呈现出一个鲜为人知而又令人惊异的世界。但范成大等人毕竟是正统儒家思想熏育出来的官员，加上他们不可能深入宋王朝控制范围之外的地区进行调查，因此其描述离公正、详尽的标准相去甚远。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当地族类自己的历史叙述，就会发现西南地区的局势比宋代官员的描述复杂得多。

根据彝文献，除乌撒与水西外，在黔西北周边地区尚林立着若干个相似的政权，主要有：滇东北的阿芋陡家[12]、芒部家[13]、乌蒙家[14]、古口勾家[15]；黔西南的阿外惹家[16]；黔中的播勒家[17]；川南的扯勒家[18]。同水西、乌撒一样，统治这些地区的族类大都自元代起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中，并且一律被称为“罗罗”，[19]在民族识别运动中被定为彝族，而彝文献则表明他们都自称“娄”。[20]

古口勾部要人欧索父奕访问阿外惹部时曾与阿弥评点娄素君长国的胜地：“我的阿弥呀，九十彝（娄）君长，都住好地方，且听我来说。”接着便讲到了永宁扯勒部的柏雅妥洪、水西阿哲家的洛博迤略、芒部家的葛底翁妥、乌撒部的笃烘洛曲、阿芋陡家的举娄侯吐启、古口勾家的直诺祝雅流域、播勒家的大革滴索、阿着仇家的阿着地以及阿外惹家的住所。显然，在欧索父奕与阿弥的眼中，整个滇东北、黔西北、黔中、黔西南、川南都是彝人（娄）的住地，君长都是彝（娄）君长，柏雅妥洪等地方则是彝（娄）家胜地的代表。[21]将几大君长国并列叙述的情况在其他彝书中亦时常出现。[22]

君长国的首领们相信，笃慕（亦称笃慕俄）是他们共同的远祖。当笃慕之时，发生了大洪水，人类遭到了灭顶之灾。笃慕得到天神的指引，避难于撮匹山，成为唯一的幸存者。洪水退后，笃慕俄来到贝谷楷嘎的歌场，同天君的三位女儿结为夫妇，生下了慕雅苦、慕雅且、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等六个儿子，这就是彝族的六祖，彝族由此而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个支系。[23]他们辗转迁徙，分布于云、贵、川三省的许多地区。乌撒家是布祖慕克克后裔的一支，水西家的祖先则是默祖慕齐齐。六个支系先是与天上人通婚，后来天地亲路断绝，为了生

存发展，经过商议，决定武系与乍系、糯系与恒系；布系与默系相互开亲。[24]

这个故事广泛流传于上述彝区，并且在当地的彝文古籍上有明确记载。当然，对洪水发生的原因、避难的地点等细节问题有多种说法，但这些并没有动摇同宗共祖的坚定信念。通过《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彝书，我们可以拟出九大君长国的系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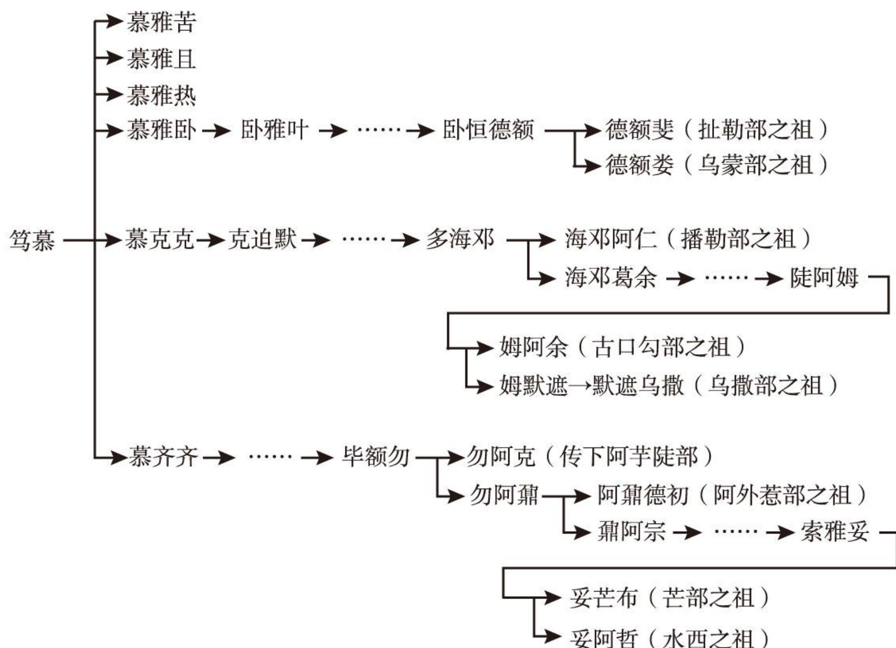


图1-1 彝族九大君长国系谱

说明：彝族谱书往往并非单线系谱，出于简单与清楚的目的，本谱将省略不相关的代数与支系。彝书可相互印证，一些人名、地名的细微差异系由于滥用同音字、同意字或方言所致。

资料来源：《彝族源流》第17～20卷，第150～154、305～341、365～369页；《彝族源流》第21～23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第193～199页；《西南彝志》第7～8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第7～89、265～269、270～312、361～386页；《西南彝志》第5～6卷，第302～310页。此外还可参见《赊豋榷濮》等书。

还有一些君长国，同样认同笃慕-六祖，但分支系谱没那么清楚，因此未列入上面的系谱图中。

甚至连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些君长国的情况都略有所知，洪武二十一年（1388）他谕称：

东川、芒部诸夷，种类虽异，而其始皆出于啰啰。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25]

彝、汉两种文献所叙述的西南地区政治格局有无关联呢？从人群与地理位置两个方面考察，二者之间是能够互证的。先看人群，范成大云：

（罗殿、自杞等等）诸蛮之至邕管卖马者，风声气习，大抵略同。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性好洁，数人共饭，一柈中置一匕，置杯水其傍。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钞饭一哺许，抟之柈，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食盐、矾、胡椒，不食彘肉，食已必刷齿，故常皓然。[26]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引旧志所载水西“罗罗”的风俗是：

旧志曰：罗罗，即古乌蛮，亦有文字，类蒙古书。其人深日（“日”当为“目”之误——引者注）长身，亦黑面白齿，挽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䌷臂，佩长刀箭箙，左肩佩一方皮，腰束韦索。性好洁，数人共饭，一盘中植一匕，复置盂水于傍，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抄饭一哺许，抟之盘，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食也，食已必漱口刷齿，故齿常皓然。[27]

明代贵州方志的作者在论述贵州“罗罗”的风俗时参照了《桂海虞衡志》，又根据明代的情形略加修改。可见，从体质特征与文化风俗方面两个方面判断，罗殿、自杞“诸蛮”与水西“罗罗”当系同一族类，因此宋人所述西南诸国与彝文献所载诸君长国间，在人群上似有相同的可能。下面再从地理位置考察之。

先谈自杞。按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宋代自杞国的中心位置在今贵州黔西南州首府兴义，[28]而这里正是彝族君长国阿旺惹部的核心区域。据尤中的论述，自杞国的范围包括贵州省兴义县及其西部的云南罗平、师宗、弥勒、丘北等县，[29]亦有学者认为自杞尚包括了今广西西北部的一部分地区。[30]学界对自杞疆域认知的差异，当系所据时期不同所致，史载自杞“本小蛮”，后来在与南宋王朝的市马活动中逐渐壮大。[31]不管怎样，黔西南是自杞国的重要疆域是没有争议的。阿旺惹君长国与自杞国，或系同一国，或曾经有着隶属关系。

罗殿国在何处？明代史料常称水西为罗殿（甸），水西君长亦常以罗殿（甸）国王自居。[32]虽然学界并不完全同意水西即罗甸，但罗甸国不在黔西北即在黔西北的周边地区，[33]不会超出上述几大彝族君长国的范围，这是可以肯定的。综合学者们对罗殿地域的研究，罗殿国最可能对应于水西君长国或播勒君长国。

除自杞与罗殿外，与范成大同时代，同样亲履广西的吴儆所著《竹洲集》中尚提到“阿者”国：

自邕北出功饶州、梵凤州，至横山，……渡都泥江、沿江而北，历罗幕州及诸山獠，至顺唐府、西南番、罗殿国、阿者国，皆汉西南夷故地。西与大理、自杞，东与黔南为邻，各有君长、姓氏，自言诸葛武侯所留戍卒后裔，有武侯碑在西南番境中。[34]

笔者怀疑这段引文中的“阿者”国即水西，因为水西的彝语名称为慕俄勾或阿哲，阿哲与阿者当系不同音译所致。[35]果真如此，宋代的罗殿国就不应当是水西君长国。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阿者与罗殿分属两国的情形仅仅维持了一段时间，在此之前或之后其实是同一国。[36]

正因为水西在宋代建立了政权，而元人对此亦很了解，所以元人所修史料在提及宋末元初的水西时要称为“罗氏鬼国”了：

甲辰，罗氏鬼国遣报思、播言：大元兵屯大理国，取道西南，将大入边。[37]

（至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遣千户张旺招罗氏国。[38]

甚至到了明代，还有官员与文人沿袭旧有的传统，称水西为国，如明人包汝楫云：

罗鬼国禾米佳过中国，……安酋（指水西安氏——引者注）国中甚富。[39]

必须再次申明的是，彝文献一般都未标明作者与写作时间，只能大致知道它们是明清时期的作品。本书在相关汉文献的印证下，敢大胆利用彝文献来证明宋代西南地区系多“国”林立，除了彝、汉两种文献所述的对象大致同一，且地理位置相符外，还基于以下考虑：（1）现存彝文献大都是明、清以来的抄本或石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反映明、清时期的历史；（2）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具有建立政权的悠久传统，早在汉代，司马迁已注意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40]（3）宋代黔西北及附近许多地区游离于羁縻制度之外，中央王朝甚至连名义上的统治都不能维持；（4）宋代文献表明黔西北或其周边地区有罗殿、自杞、阿者等国，元代文献也表明水西在宋末明初被称为国，而水西与其他彝族君长国在彝文献中是并立的，并且乌撒、水西、乌蒙、芒部、东川等在元代史料及《元史》中都有较多记载。[41]综上可知，即便当时并非恰好九大彝族君长国屹立在今天的川、滇、黔交界地区，但多个彝族君长国林立的局面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今人不能纯粹以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意涵来理解宋代的西南地区。本书关注的是，回到传统中国正统的话语体系，这些大大小小的“国”该如何定位？

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以天下观为核心，利用华夏-蛮夷、化内-化外等划分法，将这些“国”视为后者，与中原王朝相对。这类具有深远历史传统的认知方式，已被现代学者演绎成一套精致的理论，用以分析前近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体系。[42]

但这套理论在处理中央王朝与各“蛮夷”间亲疏各别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强弱不同的影响力等问题方面，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也不能说明许多“蛮夷”与王朝关系逐渐变化的历史过程。为了揭示黔西北等地区从宋至清的历史演变，笔者将采用古文献中常出现的“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等四个词汇。

万历《贵州通志》云：“黔于古始非异域也，入我版图，所从来远矣。”在这里，“异域”即意味着未入“版图”之地。必须注意的是，今日的“版图”一词着眼于地，即一个国家拥有主权的领土。但在古文献中，“版”指登记有户口的简册，“图”指舆图。[43]“版图”一词系土地与户口[44]并重，正如《清史稿》所云：“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45]事实上，在缺乏现代主权观念，以及国家之间不存在清晰疆界的情况下，古代“版图”的意涵可能更加侧重于人。[46]本书第五章将结合黔西北的例子对传统中国“版图”与“疆”的观念进行更详细的说明，此不赘述。

万历《贵州通志》声称贵州“始非异域”，将其进入“版图”的时间远溯自传说中的尧舜禹乃至高阳氏时期，实属一种对乡土的夸饰——这也是大多数地方志的共同特点。不过，“版图”之外与“异域”并不等同，中央王朝能够建立羁縻州县或土司制度的许多地区，尽管其田土、人口在官府的相关册籍上无载，但常常不被视为“异域”，而是被目为“羁縻”。只有在那些连名义上的统治都不能维持的地区，才通常以“异域”名之。[47]汉代李陵投降匈奴后，即在苏武面前自称“异域之人”；[48]金侵占宋王朝北方大片土地，宋朝皇陵未能南迁，因此宋高宗感慨“祖宗陵寝，久沦异域”；[49]而大理国也被宋朝皇帝目为“遐方异域”。[50]综上可知，将当时与大理国等并立的水西等彝族君长国定位为“异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果站在中央王朝中心观的角度，考虑到以一元等级世界秩序为特征的“天下”观念，将水西、乌撒等称为“王朝的异域”亦不为过。[51]

第二节 “勾”政权与“则溪”制度

本章第一节探讨了宋代西南地区多“国”林立的状况，本节将具体分析彝族君长国的制度。在彝语中，娄素君长国的政权称为“勾（ ）”，如乌撒称纪俄勾，水西称慕俄勾，播勒部称娄娄勾，磨弥部称古口勾等。[52]这种称谓含有某种神圣的意味，“勾”意译时又指白鹤，在彝书中频频出现，[53]被描绘为具有超凡能力的圣鸟。《西南彝志》云：

哎哺满十代，如白鹤在天。……白鹤栖十次，宇宙装饰十次，积累知识见闻。……梯阿武时代，如众多白鹤，一起往下降，进入知识宫，如众多锦帛，匹匹生美影。……高大白鹤，参加修天；花翅青鹃，参加补地。[54]

勾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称“祖”（，即“祖摩”，意译为“君”），其辅佐者有“摩”（，意译为“臣”）、“布”（，即“布摩”，意译为“师”，指祭师、经师），彝书中往往三者并称，学界对此已颇多阐述。在此要补充的是，在黔西北民间口耳相传的许多“曲谷”（，即情歌）中尚保留着对君、臣、布政权的记忆，如《谷邳赖》称：

情郎和情妹，进入了歌场。君长居左，臣子居右，布摩居上位，男女情人居四周，反复排列位置，把爱根建立，把情根建立，男女情人居一处，有位置可寻，有秩序可依。[55]

我在威宁调查时，世袭布摩李幺宁告诉我，鹤（勾）、鹃、鹰分别象征君、臣、布，这可从文献中得到印证。《彝族源流》云：“君声像鹤声，臣声像杜鹃，布摩鹰的声。”[56]《支嘎阿鲁王》亦载：

君像鹤一样高洁，臣像杜鹃般能言，布摩好比，凌空展翅的鹰。[57]

君、臣、布三者有一定的分工，据《苏巨黎咪》：

贤君发号令……贤臣做决断……贤布摩祭祖。

君长掌权，与臣问计，高明的布摩祭祖。

布摩祭祖，必须熟习谱系，所以“布摩的重要使命，理顺宗谱为上”。[58]

每个君长国都有若干布摩，或许只有知识渊博、“法力”深厚者才有为君效劳的机会，但各级官员甚至平民同样需要祭祖和理谱，所以其他布摩同样受到尊重与欢迎。彝书称：

宗谱有秩序，布摩先问主人才行。若布摩先问，布摩祭祖，有章有法，功是布摩的。[59]

或许彝书所载的君、臣、布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念，在政权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对此并不完全遵循，例如除祭祖、叙谱外，布摩还广泛行使着各种权力。

在传统彝族社会中，工匠亦享有比较高的地位：“君臣重匠人，匠人担重任。”[60]彝书中有时君、臣、布、匠并称：

作为君长，要有仇叩皮耐的风范……作为慕魁臣子，当效法毕余毕德……作为布摩，当效法始楚乍姆……作为工匠，当效法阿娄阿德。[61]

欧哲戛为君，岩阿洛为臣，武菊耿为师，堵阿德为匠。此四贤之世，赶着百头牛，在啥弭卧底杀。建庙牛祭祖，塑偶牛祭献。[62]

黔西北娄素濮的政权与族权往往交织在一起，[63]君、臣、布之间通常被认为具有亲缘关系。如彝书对乌撒部远祖有如下记载：

默氏那咪录，诺陇邓，诺克博，诺濮迂之母。君为诺陇邓，臣为诺克博，请莫布洛谷，在洛补夺朵，祭三代亡灵。

耐叟苦之女，叫叟苦咪嘎，嫁在德迤惹舍，是姆氏三子，即姆阿余，姆维遮，姆阿足之母。姆阿余为君，管古苦地方；姆默（默疑为维之误——引者注）遮为臣，名扬纪古地，姆阿足布摩，管文化礼仪。[64]

又如世袭布摩亥索家，是从水西开基君长勿阿纳的上一代分出的。[65]

臣与布可分为若干等级，形成了“九扯九纵”之制。在汉文史籍中，《明神宗实录》较早提及该制度的名称，[66]康熙初年亲履水西的官员彭而述则谈到了该制度的一些具体内容，[67]后来的许多地方志根据彝书，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梳理，“九扯九纵”即根据事权的不同，将辅佐君长的臣与布分为九个品秩，总理行政的长官曰“更苴”，品级最高，史称：

年高最贵者谓之庚尊（即更苴——引者注），……庚尊授木杖，鸠刻其上，往往宣慰有军国大事，则庚尊以鸠杖往决之，但首示可否而已，木皆用番书，多不可晓。[68]

“穆魁”“濯魁”辅佐“更苴”，参与军机大事，品级次之；“诚慕”“掌宗祠之祭祀，修世系之谱牒”，“白慕”“掌丧葬之斋醮”。两者并为第三等级；“慕史”司文书，“掌历代之阀阅，宣歌颂之乐章”，同“执事左右”的“诺唯”“祃葩”一起构成了第四品级；“骂初”“骂写”是兵帅，管军事，“弄余”掌礼仪、办外交，“崇闲”督农事、管生产，共为第五级；“濯苴”“拜书”管接待，“拜项”管门禁，“扯墨”管祭祀牲口，品级更次；“项目”管器物，同管礼物的“弄都”、管环卫的“初贤”、作为队长的“黑乍”列为一等；其余服杂役者又列为一等。以上共八个品级，“少一而不足九者，盖录彝书者脱漏”。[69]

娄素君长们亦会任命统治区域内的其他族类的首领为官，“苗、獠寨大丁强，亦为祃写（骂写）、祃初（骂初），自统其兵”。[70]

君、臣、布三者共秉国政的制度，各大君长国都基本相同。下文将

进一步论述乌撒、水西的行政体制。

黔西北的基本行政单位称为“则溪”（，又译作“宅溪”“宅吉”等），在此以水西阿哲家为例，《彝族源流》云：

慕俄勾，妥阿哲部，将十三则溪，设自家地盘。第一是嘎娄，第二是安嘎，第三是陇垮，第四是斗堵，第五是朵勒，第六是于底，第七是洛莫，第八是热卧，第九是以著，第十是化角，雄所第十一，慕柯第十二，火著第十三。妥阿哲部，则溪的顺序，这样排列的。[71]

彝书《水西制度》所载与此相同，13个则溪遍布水东、水西，直抵贵阳。今天贵阳市区内的一些地名，尚与则溪相关。[72]每个则溪都会设一个大仓库，用以保管征收来的钱粮，在彝语中则（）即仓库之意。[73]笔者甚至怀疑每个则溪都有一个小市场，因为溪（）意为集市。[74]

黔西北地区一些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的“出嫁歌”对十三则溪的特征有生动描述，《阿买恳》载：

妥阿哲境内，去来要翻山，是嘎娄则溪……以飞鸟命名，指安嘎则溪……高处出荞麦，中部出美人，指陇胯则溪……骑马好比打秋千，指的都则溪……步行路艰难，汗水不离身，指冬娄则溪……犹如象背上搓绳，似象毛蓬松，指迂底则溪……彝寨地势宽，汉寨地势大，指六慕则溪……高山日不照，壑谷露不干，指热卧则溪……彝家辖地内，掌权人辈出，指以著则溪……云雾遮盖天，称霸于白岩，指化角则溪……冬晴雪不干，夏晴露不干，指雄所则溪……好比用银装饰裙子，好比用金装饰裙子，指慕胯则溪……家中无丝绸，帐幔无限长，指火著则溪……十三个则溪，慕胯地盘广，则溪势力大。[75]

管理则溪者都是君长的宗亲，根据《水西地理城池考》等彝、汉史籍的记载，阿哲家共有十二大宗亲。[76]每个宗亲都占有一个则溪，加上君长自己亲领一个则溪，这正是十三则溪的由来。[77]但君长所拥有的绝非只是一个则溪，崇祯七年（1634），水西君长、宣慰使安坤病故，无嗣，属下各土目争权夺位，互不相让，结果纷纷献地归顺，时总督西南军务的朱燮元疏云：

臣查该司有宣慰之土、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还朝廷。各目私土，宜听分守。[78]

宣慰之土究竟指什么地方？崇祯九年，十二宗亲之一的卧这[79]头目安世呈称：

其宣慰公地，以著、则窝、化角、木胯、火掌、架勒、安架、的都、朵你、陇胯等十宅吉，插白、两朵、内庄、则你、雪革、化处、土

桥、哥落、比那、仲巳、本捏、仲女、租写、朵棋、沙垄、却垄、西黑、阿东普、以墨、四着、骂个等白勒庄寨，宣慰既以无嗣，地方应行归籍。[80]

可见，水西君主的土地遍及十个则溪，[81]但并非十个则溪全是其领地。事实上，每个则溪通常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宗亲的土地，即“各目私土”“目地”，另一部分即君长的土地，即“宣慰公土”“公地”，以木胯宅吉（则溪）为例：

木胯宅吉东至阁鸦驿，南抵女农革河，西连镇雄界，北搀蔺界，南北一百里，东西一百八十里，公地计五庄，人民共二十七寨，户口二百四十五房，秋粮每年共该仓斗米一千三百一十一石。目地大小头目共六十二处，秋粮每年共算该仓斗米六百五十八石六斗一升。[82]

则溪主要有两种职能，一是管兵马，二是管粮草，相应地设置了两种类型的官。[83]彝书《水西制度》云：

各仓库派有管兵马、仓库的负责人。负责管戛勒仓库与兵马的是扯老底苏，管安戛仓库与兵马的是卜俄必迭……

《大定府志》亦载：

水西十三则溪。木胯则溪：管钱粮阿户，兵马阿五；火著则溪：管钱粮归宗，兵马以义……宣慰时，管地方钱粮之夷目号六慕濯色，管操练兵马之夷目号慕苴骂色。[84]

但《土地民奴和则溪的管理》中提及的则溪官员有兵马元帅与城堡、营寨主管者两种，没有钱粮官，兹以陇垮则溪、戛勒则溪与朵能则溪为例：

主管戛勒则溪城堡和营寨的，是液额苦帕家笃额阿切的女儿，住于彻堵底苏……

陇垮则溪城堡和营寨的主管者，是妥阿哲（即济火，据说是水西君长国的开基者——引者注）的幼子阿哲阿琪。兵马元帅是节能以义。濮勺必迭，属于德布支系的鲁歹君长家。阿阔阿比，则是慕俄格君长正妻所生的儿子。他们都是陇垮则溪辖区的穆濯、奕续。

朵能则溪城堡和营寨的主管者，是纪启鲁洁。兵马元帅是阿施纳额。濮叶额增为兄，管理勿阿纳（妥阿哲的六世祖——引者注）家的地方，濮叶洛举为弟，是外甥家来当臣子，乃洛举土目。陇勺阿再，初次来管朵能。额拐额知、阿阔阿叶、阿阔木依、阿阔觉道、阿阔额迭、阿叶德初、忍额德直，他们都是朵能则溪辖区的穆濯、奕续。[85]

或许城堡和营寨的主管者即是钱粮官，《土地民奴和则溪的管理》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这段材料还表明，则溪的官员之间以及他们同君

长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有的是分封世袭而来，历史久远，如阿哲阿琪系古代水西君长妥阿哲的幼子；有的是后来的君长所封，如陇勺阿再；有的是君长的母系亲戚，如濮叶洛举兄弟；有的是女性，如笃额阿切的女儿；有的甚至来源于其他彝族支系德布系，如濮勺必迭。显然，统治权力的分享并不完全满足嫡长子为大宗，其余众子为小宗，层层分封的宗法制原则——这一原则长期以来被汉文文献和近代研究者用以解释水西的政治制度。[86]

上述引文同时揭示，在兵马与钱粮官下面似乎还有职位更小的穆濯、奕续、土目等。穆濯、奕续、土目[87]等有时还是一种统称，包括了城堡、营寨的主管和兵马元帅。如阿哲（阿）琪是陇垮则溪的城堡、营寨主管，[88]但《西南彝志》却称："陇垮地的三家，额迭和那知，以及阿哲琪，都是慕濯和奕索（续）。"该书介绍了水西君长国的几个则溪及其主管者，每一个则溪讲完时，都要强调一句："所有慕濯和奕索（续），其事迹不可忘记。"[89]

每个则溪都必须向君长缴纳贡赋，何种情况应缴何种物品以及数量多少等在书面上都有详尽的规定，管理上完全做到了有规可循（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此外，君长分布在各个则溪的土地或许是由各宗亲负责耕种、管理，这可能也是他们的一项义务。

乌撒地区亦实行则溪制度，这一制度据说是俄索折怒王建立的，折怒是乌撒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元史》载：

乌撒乌蒙宣慰司，在本部巴的甸。乌撒者蛮名也。其部在中庆东北七百五十里，旧名巴凡兀姑，今曰巴的甸，自昔乌杂蛮居之。今所辖部六，曰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閟畔部。其东西又有芒布、阿晟二部。后乌蛮之裔折怒始强大，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90]

折怒王的事迹在文献与口碑中多有叙述，彝书《俄索折怒王》称：

走路常要回头看，折怒王的故事有人传。布摩用文字记录，歌手们代代传唱。笃洪纳娄的山陷了，折怒事迹也留传。巴底的海水干了，折怒英名不失传。[91]

同书记载了他建立则溪制度的经过：

（俄索折怒王）以鲁旺的方位，依鲁补的数字，支格阿鲁定的标记，设置九大则溪。重振俄索蔺的雄风，再建立虎皮般的典章。绿竹茵茵的莫则洛那洪，设置第一则溪；稻花芳香的俄补甸吐，设置第二则溪；松涛呼呼的德珠杓嘎，设置第三则溪；山青水秀的六曲博果，设置第四则溪；巍巍笃洪木谷，设立第五则溪；雾霭像青纱般绕着的耐恩，设立第六则溪；荞花像彩虹落地般的辞吐，设立第七则溪；五彩索玛（索玛即映山红——引者注）簇拥的女武溢恒，设立第八则溪；好比斗柄绕着北极星，笃洪那娄是中央则溪。[92]

《彝族源流》《水西制度》所载与此同，可见乌撒实行了则溪制度。除此之外，川南的扯勒君长国亦将土地划分为重庆、合江、泸州、江门、纳溪、江安、隆文、海坝、杓朋、永宁、达佐、赤水、大摆、益朋、糯洛、几洛、果哺、毛坝等18个则溪，[93] 由于材料所限，尚不知其他君长国是否实行类似的行政制度。

第三节 文字及其传承与使用者

娄素有自己的文字，对文字的崇拜与文字的神秘性浸透在关于其产生的种种神话中。据说工匠的两名始祖——具有超凡神力的阿娄、阿德修天造地之后，天地间依然一片昏暗，“若不造文字，若不创文字，苍天无光彩，大地无光明，人难保性命”。于是够斯艺苦苦思索，创造出了无数的文字。从此九星、二十八宿出现在天空，“苍天花朗朗，大地明晃晃。”[94]

自杨成志、马学良、丁文江等开中国彝文字近代研究的先河，[95] 迄今已80余年，然学界尚未对彝文起源达成共识。[96]1972年，在黔西北的赫章县出土了一只重0.8千克的擂钵，据贵州考古所和省博物馆的专家鉴定，系汉代黄铜器具，钵上有一列竖书的五个阴文字符，据称是彝文，直译为“万根指擂是”，意译为“万古擂钵”。[97]但即便所有鉴定与识别无误，亦不能完全肯定这是汉代的彝文，因为存在后人在汉代器物上刻写的可能。此外，大方县境内曾发现一块“妥阿哲纪功碑”，叙述水西娄素远祖妥阿哲随诸葛亮南征之事，上有蜀汉建兴年号，[98]然尚无确切证据可证实此碑系三国时代所立。目前所能肯定的最早的彝文文献系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水西君长安贵荣所铸的铜钟铭文，字形同其他彝文献上的文字差不多，已经相当成熟，[99]因此我们绝不能由此得出成化时才出现彝文的结论。[100]

1982年，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拦龙河岸岩石上发现了一方彝文碑记，系世袭布摩毕额穆所撰，记述德赫布诺等四人为了获取租赋的方便而修桥之事，今人译成汉文，其中写道：

南宋（）开庆（）己未年，午月初三一日始，庚申年亥月，初三一日桥竣。[101]



图**1-2** 成化铜钟铭文

资料来源：贵州省毕节地区民委等编，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贵州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第**20**页。

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该碑记作于南宋开庆己未年（1259），距今七百余年，为最早的彝文文献。这个结论颇值得推敲，首先，南宋是后人的称谓，时人并不自称南宋。其次，南宋对今六枝一带鞭长莫及，甚至没有将其纳入羁縻州、县的系统，很难设想布摩毕额穆等人会奉宋朝的正朔。因此，如果翻译无误的话，这块碑记当系南宋以后的追述。但南宋时期的文献似乎暗示，今贵州地区当时确实已经使用彝文。上文曾引到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的两句话：

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

押马者，称西南谢蕃知武州节度使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

罗甸国不在黔西北即在黔西北的周边地区，当时已粗具国家规模，并且其统治者即“罗罗”族，所以其使用的文字应该是彝文。此外，因为该地是“化外真蛮”，游离于中央王朝的羁縻州县系统之外，不缴税，不服役，同宋朝廷的关系，仅仅体现在“市马”一类互惠的经济活动上。[102]罗殿国统治者们学习汉文的情况当极为罕见，将之作为国家的公文似更不可能，到明代后，中央王朝才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要求君长国的上层人物接受汉化教育。

黔西北地区的彝文古籍堪称汗牛充栋。早在1930年代，丁文江便在当年水西君长的驻地（今大方县），搜集到《帝王世纪》《宇宙源流》等彝书，加上从云南、四川搜集的彝籍，汇编成《爨文丛刻》。[103]截至1997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共发现6000余部彝文古籍，仅翻译整理出113部227卷，共2600余万字，出版了其中的90部，共1400余万字。[104]其中包括被学术界广泛征引的大部头巨著，如《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这两部巨著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爨文丛刻》。113与6000的对比表明，现在翻译整理出的彝籍仅仅是冰山之一角，并且6000之数远远未能涵盖黔西北曾经拥有的彝书数量，大量的彝文献已经在1950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灰飞烟灭。[105]

这些卷帙浩繁的彝书的内容主要包括：谱牒、创世及万物起始的神话与传说、祭祀与占卜经书、历史记录、政治制度、赋税册、天文历法、文艺批评、英雄史诗、情歌、民间故事、编译著作（如用彝语编译的《西游记》）等。此外，在田野乡村，还有为数众多的碑刻、岩刻与墓志。

彝文的使用与传承者系布摩（）与幕史（）。布摩简称布，在勾政权中掌管祭祀、叙谱。世袭布摩、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子国先生告诉我，布即师之意，摩意为老，含有教的意思。在彝书中，布摩被描绘成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创造文字、书籍、文化，编写历史，并为天地定秩序的人，正所谓“天地尊布摩”。《彝族源流》云：

哎哺先为布，哎阿祝布摩，奢哲吐布摩。吐姆伟布摩在上，为天定秩序。哺卧厄为布，厄洪遏为布，洪遏梯为布，奢娄斗布摩在下，理地上秩序。后为布僰氏，布奢哲为布，僰洪遏为布。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有布就有文，有布就有史……布摩创文史……布摩识天象，布摩识天文，布摩识地理，布摩能辨史……若有人生病，布来病即除，布摩到病愈……家道昌靠布摩，家规由布摩定，家兴靠布摩，家运由布摩护，家谱由布摩立。[106]

因为布摩是彝书的主要创作者，借助文字将自己神圣化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这些带着神话色彩的描述依然折射出布摩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跻身君长国的统治阶层，为国君、大臣乃至一般百姓叙谱、占卜、祭祀——在传统的彝族社会中，这些全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而各个阶层的人们亦承认布摩渊博的学识以及沟通三界四极的能力。

从某种角度上看，布摩的神圣形象与显赫地位源于彝族社会对文字、知识的神秘化与崇拜。在彝语中，知识写作，其实是两个词，意为知识，意为智慧，在黔西北娄素濮的观念中，知识产生于神圣的哎哺时代，“源于宇宙发展时”，其中娄师颖、郎多脑这两位亦

人亦神的圣哲起了重大作用。知识的重要与神圣是不言而喻的。《苏巨黎咪》云：

天地之间，各种本领中，有知识为大，有威势为强，有机遇为妙。知识造就人，如苍天辽阔，如青松伟岸。[107]

古代著名诗人布麦阿钮亦称：

有智者有力，无知枉为人。天下谁为大？大不过知识。知识力最大，万物它命名。[108]

这些知识主要涉及万物起源以及祖先历史，它们关系着个人以及君长国的尊严——在外事活动中常常有知识方面的竞赛，因此很多君长对学问都很热心。阿芋陡部有四只哺古，无人能道出其来历，芒部君长米毕德诺到古口勾部做客时，曾专门问起此事，他走后，额合德乌用十五锭金银、十五匹绫罗作礼物，前往拜访博学的阿布阿借，请他指点迷津，阿布阿借果然给了他满意的答案。[109]

对知识的崇敬与尊重在礼仪活动中同样有所体现。许多彝文专家如王继超先生等多次向我提及彝族的知识神，即知识智慧之神，也称书神。世袭布摩王子国先生称，每年除夕都要祭书神，其仪式是宰一只红公鸡，用鸡冠上的毛抹鸡血沾在书上。同举行其他祭祀活动一样，祭书神时要“打醋堂”——在妇女都没有去过的干净地方，捡三或六或九个石头，烧红后用清洁的水来淋，以表洁净。除每年祭书外，平时还禁止妇女碰书，不用的书要放在楼上，注意保持洁净，否则不利。布摩断代（因为无子，或儿子悟性不够，或一代比一代的知识差等原因）后，留下的书不准卖，不准送，而是要转给其他人祭拜，或放在岩洞里。

这种知识神崇拜其实亦是一种对文字及其载体——书本——的崇拜。我访问过的普通彝民都表示，布摩念经时，他们根本听不懂，但他有书，因此相信他有“根据”。有些人师从布摩，因为种种原因，布摩没有送书给他或让他抄书，其地位就比有书的布摩低了一大截，人们只会请他做些小事，大事绝不请他。因为没有书就没有根据。

知识、书本既然代表着神圣与威力，其创造、传承与使用者自然应该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正如彝书所称：“知识足者居高位，见识广者得富贵。”[110]这样，垄断着书本、象征着知识的布摩[111]自然而然地跻身统治阶层，成为君、臣、布中的一极，有自己专门的领地，《彝族源流》云：

克博祖基业，君领地斯迤姆，臣领地斯迤若，布摩地斯妥卓，三位是豪杰，就是这样的。

后来诺克博之孙维遮阿默迁往西边，按同样的模式建立基业：

君领地堂琅，臣领地鲁宾毕，布摩地鲁兔垢。[112]

中央王朝的官员、士大夫们很早就注意到布摩的特权地位。[113]元大德五年（1301）任乌撒乌蒙道宣慰副使的李京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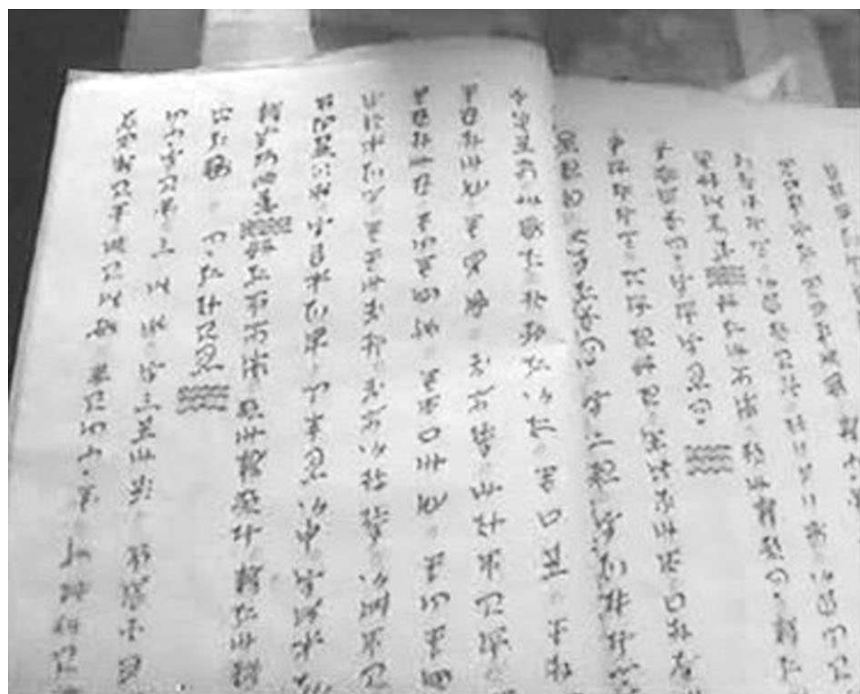
（罗罗）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曰大鸡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嶲，皆此类也。[114]

从正统文化的观念出发，士大夫们很自然地将布摩称为“巫”，[115]他们所从事的祭祀活动则属于对鬼怪的崇拜，是“做鬼”，嘉靖《贵州通志》卷三云：

（贵州宣慰司水西罗罗）图考云：古为罗甸鬼国，不晓汉语……病以羊革裹之，汗出则愈。信男巫，尊为鬼师，杀牛祀神，名曰“做鬼”。

黔西北彝人祭祀曰“嘎穆（）”，与鬼无关，“穆”即“做”之意，“嘎”与“鬼”音谐，“做鬼”可能是带有误解性的音译兼意译。至于“西南俗尚鬼”则更是想当然之语——娄素濮甚至没有汉人那样强烈的关于鬼的观念。熟读彝书的清代土目安国泰认为：

夷语谓巫为补（即布——引者注），最尊贵，丧祭用之，父子相继……其术惟祈禳、占卜，而无果报鬼怪之说。[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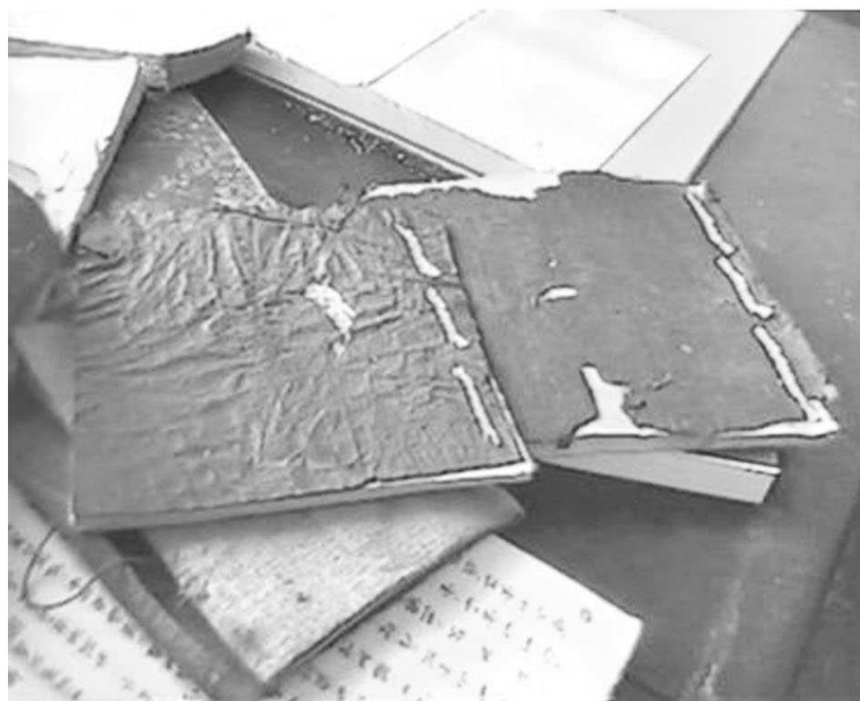


图1-3 写在羊皮纸上的彝书及其封面

资料来源：笔者2001年8月摄于威宁，李幺宁布摩提供实物。

《黔西州志》亦称：

夷之所祀者，皆其先祖名王，非鬼之祭。[117]

其实，布摩并不仅仅掌管祭祀、叙谱、占卜，当战事发生时，他们甚至会持戟披甲，成为三军统帅。例如乌撒部第二代王依孟德执政时，受到其他支系的侵略，于是布摩鄂鲁默与额仇哺祭祖誓师，披上战袍，点起兵将，备上骏马大犬，“布摩鄂鲁默作帅，在恒恒凯嘎，凯凯觉楚嘎，益鲁侯阿嘎，三山头迎战”。[118]又如明天启年间贵州巡抚王三善兵临水西，乌撒君长接到求援消息，立即召集布摩议事。清初吴三桂进攻水西，水西君长也是召集布摩谋臣商议。[119]汉文史料亦有类似记载。天启崇祯年间奢安之变时，水西君长安位的“鬼师”倮嘎即在战场上被擒获，其鬼书、鬼杖、鬼帽也被明军作为战利品带回，[120]鬼书、鬼杖、鬼帽可分别与布摩的经书、法杖、法帽相对应，这进一步表明汉文献中的“鬼师”即布摩无疑。

此外，君王及平民百姓生病时也常常请布摩诊治，这种诊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用法力驱邪的活动，其中绵羊、猪等牲畜经常被使用，[121]所以汉文史籍中常称乌撒、水西的族类“病不医药，惟祷鬼神”。[122]

幕史（又译作摩史）是另一类知识分子，据说彝文巨著《西南彝志》就是水西热卧地方的一位幕史编撰的。幕史的职能主要是在婚娶、外交等场合用朗诵、唱歌等形式宣讲历史、天文、哲学等知识。《黔西州续志》称：

幕史，掌历代之阀阅，宣歌颂之乐章。[123]

《雄书安氏谱序》亦云：



图**1-4** 布摩的法具

说明：法具上一般有文字。
资料来源：笔者**2001**年**8**月摄于威宁，李幺宁布摩提供实物。

（夷书）不惟一家有之，凡土司皆有之。掌其书者为幕施，每举大礼，则使幕施施颂于庭；两相宴会，各之幕施对颂之或作幕史。[124]

彝族古代在君主或权贵出访时要讨论知识乃至举行摩久（ ），即由双方的摩（幕）史展开诗赋竞赛活动，大家口诵五言诗，相互盘驳，有吟诵古诗者，亦有即席创作者，内容涉及自然知识与历史、社会知识，胜利者获得荣誉和尊严，往往受到君主的重赏。正所谓“有缘叙一场，吟诗作应酬，展开了比赛”。摩久活动在彝书中记载颇多。如芒部君长国的阿额麻访问水西妥阿哲部时，阿哲部陪同他的有阿毕阿玛、折尼阿鸽、阿待厄哲三位年青摩（幕）史。濮妥珠溢家的朴娄阿怯访问古口勾时，对方安排了几个摩史同他论学。而南部的额卧热立、北部的恒略阿怒、中部的阿沽布借等三大名人曾在阿芋陡部赛诗，连赛三场，不分胜负。[125]布史毕斗与额贷阿觉两位耄（幕）史则在举娄侯吐就教育、教化等问题进行了辩论。[126]

现在留存的一些彝文献尚带有幕史们说唱、辩论的痕迹。例如在《地生经》《婚姻歌》的结尾，唱诵经文的幕史向对方打招呼：“客位幕（耄）史们，请听着啊。”[127]《西南彝志》的许多章节中亦有“请幕（摩）史往下说”的句子。[128]

民间的许多仪式同样离不开幕史，王子国先生告诉我，举行婚礼时，男女两家都要请幕史，双方幕史各就经典书籍的内容对唱、对话，互相提问，就像举行一场学术辩论，失败的一方要罚钱，由请幕史的人

出。可以想见，除了渊博的学识外，敏捷的反应、伶俐的口齿同样是对幕史的基本要求。毕节地区民族研究所的马昌达先生称，小时候他遇到的幕史平常说话都很富有诗意和哲理，如“既然你去采藤子，何必背起索子去”“何必背柴进森林”之类。

以上论述中央王朝大规模经营黔西北之前该地的制度与文明，由于彝书一般不注明著者及时间，使我们难以对其间的人与事做清晰的时间判定。此外尚须指出，现存彝文献大都是明、清以来的抄本或石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反映明、清时期的历史，[129]结合上文所引的《宋史》《桂海虞衡志》《竹洲集》《云南志略》《元史》《贵州通志》等宋、元、明三代的汉文献，可以肯定在宋元甚至更早，彝文字已经开始运用，而各种制度亦粗具规模。元明以降，中央王朝对黔西北的开拓日益深入，在此过程中，朝廷在黔西北推行了哪些制度？它们与则溪制的关系如何？彝制是如何崩溃的？黔西北的社会经济与礼俗产生了何种演变？君长、布摩、土目的地位与角色发生了何种变化？以下各章将对这些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

[1]参见《宋史》卷485～496之《外国传》《蛮夷传》。必须注意，《宋史》分“蛮夷”“外国”，但有时却又忽略二者的界限，如“大理”入《外国传》，但卷496《蛮夷四》又称：“黎州诸蛮凡十二种……曰大云南蛮、曰小云南蛮，即唐南诏，今名大理国，自有传。”

[2]例如尤中所著《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叙述了自杞国与罗殿国的历史（第196～206页），《贵州通史》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在论述宋代时专辟了一章“地方民族政权”。

[3]参见《贵州通史》第1卷，第422～426页。

[4]《岭外代答》卷5《经略司买马》：“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罗殿、毗那、罗孔、谢蕃、滕蕃等。”这里把特磨、罗孔等概以“国”名之，当系行文的方便。

[5]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转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8《四裔五》。现在通行的一些版本的《桂海虞衡志》之《志蛮》，缺漏甚多，学界通常认为元人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所引《桂海虞衡志·志蛮》，与原书的本来面目最近，成为现在学者们使用《桂海虞衡志》时的重要参考。

[6]《宋史》卷198《兵十二》：“（绍兴）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自杞诸蕃本自无马。”

[7]关于自杞，可参见杨永明《滇东古长城是自杞国的杰作》，《学术探索》2002年第6期。

[8]《宋史全文》卷26上《宋孝宗五》。

[9]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

[10]黄震：《黄氏日抄》卷67。

[11]周必大：《文忠集》卷65《淮西帅高君神道碑》。

[12]在今云南东川、会泽一带，明代在此建立东川军民土府。

[13]在今云南镇雄一带，明代在此建立镇雄军民土府。

[14]在今云南昭通一带，明代在此建立乌蒙军民土府。

[15]即磨弥部，在今云南宣威一带，明代在此设立沾益土州。

[16]即娄娄勾部，在今贵州黔西南州一带，明代在此先后设立普安安抚司、普安州。

[17]在今贵州安顺一带，明代在此先后设立普定府、安顺州、安顺军民府。

[18]在今四川古蔺一带，明代在此设立永宁宣抚司。

[19]如朱元璋曾敕征南将军傅友德等：“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参见《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

[20]“娄”即“娄素”或“娄素濮”的简称，前者是书面语，后者是口语。前文已谈到黔西北彝族自称“娄素”，而彝文献表明其他君长国的族娄亦自称“娄”，如在流传于滇东北、黔西北一带的《彝族源流》中（第24～27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本书所列举的这些部落政权的君长都属“娄（彝）之君”（第272～297页）。

[21]《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268～297页。

[22]参见《物始纪略》第2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第262～267页；《苏巨黎咪》，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第70～78页。

[23]有的彝书认为乍祖是慕雅苦，并且是长子，武祖是慕雅克（），系次子。参见《彝族源流》第17～20卷之《乍氏史略》与《武氏源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24]参见《西南彝志》第5～6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第74～115页。还可参见《彝族源流》第13～16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赊[illegible]榷濮》（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夷僰榷濮》（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笃慕源流》（《增订爨文丛刻》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等，这些彝书所述六祖故事大同小异。

[25]《明太祖实录》卷192，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丁酉条。除了具有种类相同的坚定信念外，九个君长国还世代联姻，形成了一个大婚姻圈。参见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26]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转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8《四裔五》。

[27]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贵州宣慰司上》。

[28]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65～66页。

[29]参见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204页。

[30]参见杨永明《滇东古长城是自杞国的杰作》，《学术探索》2002年第6期。

[31]参见冈田宏二《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赵令志、李德龙译，民族出版社，2002，第231～235页。

[32]如明崇祯年间奢安之乱结束后，曾在水西搜出一颗罗甸国王大印。参见朱燮元《勘明水西各土遵照明旨分土授官以安地方事》，《朱少师奏疏钞》卷8。

[33]参见方国瑜《彝族史稿》，第506～507页；《贵州通史》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第407～417页；王燕玉《辨罗殿国与罗氏鬼国》、史继忠《罗殿国非罗氏鬼国辨》，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1985。

[34]吴儆《竹洲集》卷10《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

[35]阿哲系水西的远祖，由人名而变成国名、部族名、地名。

[36]尤中的研究可以作为这一推测的旁证，据其所述，罗殿国的地域时有变更，强盛时才占领了水西。

[37]《宋史》卷44《理宗四》。

[38]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39]包汝楫：《南中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

[40]《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41]参见《元史》卷35《文宗纪四》；卷162《刘国杰传》。

[42]参见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葛兆光《从天下到万国：重建理解明清思想史的背景》，《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何新华《“天下观”：一种建构世界秩序的区域性经验》，《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11月号。

[43]参见《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第1069页。

[44]户口可大致理解为官府能对之征赋派役的人口，即编户齐民，并非全部实际人口。

[45]《清史稿》卷283《何国宗传》。

[46]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编户齐民控制，是每一个王朝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确立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户籍的编制与使用。宋代以前，政府只编造户籍而没有地籍，土地赋税等都是在户籍中登记；宋代以后，虽有单行地籍的设立，但实际上，对于朝廷和地方政府来说，地籍的作用和意义，并不能与户籍相提并论。”“在一条鞭法改革之后，地籍的作用提高了，户籍似乎失去了意义，清代甚至停止过户籍编造，……其实对于州县衙门来说，最重要的册籍仍然是户籍册，只是这时的户籍所登记的已经不是人口资料，而是纳税资料。”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第2～3、14页。

[47]在古汉语中，“异域”有时也有“异乡”之义，如《后汉书》卷43《隗嚣传》，方望在给隗嚣的信中云：“异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从郭隗，想望乐毅。”唐代李贤的注解称：“望，平陵人，以与嚣别郡，故言异域。”本书中的“异域”不取“异乡”“别郡”之义。

[48]《汉书》卷54《李广苏建传》。

[49]《宋史》卷123《礼志第七十六》。

[50]参见《宋史》卷488《外国四·大理》。

[51]根据《史记》卷116《西南夷传》、《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史籍的记载，西汉王朝已在夜郎等西南地区置郡县，但夜郎国的中心区究竟在何处，

其统治范围究竟有多大，至今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此外，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汉代西南地区的郡县与内地的郡县性质上相同，由于史料太过简略，我们实难了解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的郡县机构真正能管辖地域有多广，真正能够控制的编户有多少。从夜郎国、滇国的首领被封王，以及他们经常能够召集当地人反叛的情况来看，“西南夷”的首领仍然有很大的势力，他们与王朝之间应是一种“羁縻”关系（关于“羁縻”的讨论详见本书第二章）。即便到了元、明甚至清代，尽管西南地区已经是流官机构遍布，王朝对地方已有相当强的控制力，但许多土著百姓仍然直接受少数民族首领管辖，并非向王朝输赋应役的编户齐民。从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南许多地区直接纳入了王朝“版图”，但包括黔西北在内的不少地区的与王朝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亦只能以“羁縻”视之，甚至较“羁縻”关系更为疏离。到宋代，王朝基本上放弃了对云南、黔西北等地的积极经营。明人谢肇淛所著《滇略》卷1《版略》载：“宋建隆三年，王全斌既平蜀，欲乘胜进取（云南），为图上献，太祖鉴唐之祸，以玉斧画大渡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段氏遂得世其国。”除《滇略》外，宋太祖玉斧划河以示放弃云南等地的故事在清人冯甦所著《滇考》卷上、倪蜕所著《滇云历年传》卷5等许多史籍中都有记载。不管此故事是否真实，宋王朝的消极无疑是黔西北等地成为“异域”的重要原因。

[52]参见《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109页之注释；阿沽社武《乌撒政权结构试析》，《贵州彝学》。

[53]参见《彝族源流》第1～4卷第110～111页之注释，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

[54]《西南彝志》第3～4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第73～74、84、133页。

[55]《谷邳赖》，《曲谷精选》，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第3～5页。类似的情歌尚有《陡朵》、《恒佑阿买》、《祖摩阿纪家》、《才尼》、《诃合曲谷》（以上均载《曲谷精选》）、《北方君长道》（载《阿买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第439～440页）等。据《曲谷精选》搜集整理者撰写的《前言》，由于现代文化的冲击，众多的“曲谷”词曲仅零星掌握在极偏僻山村50岁左右的人手里，其用语介于古代彝语和现代彝语之间。

[56]《彝族源流》第13～16卷，第192页。

[57]《支嘎阿鲁王》，第138页。

[58]《苏巨黎咪》，第9～10、16、24页。黔西北民间流传的“曲谷”对君、臣、布的权力分工亦有反映，如《陡朵》，载《曲谷精选》，第3～5页。

[59]《苏巨黎咪》，第3页。

[60]《物始纪略》第1集，第49页。

[61]《苏巨黎咪》，第1～2页。

[62]《彝族创世志》谱牒志一，第158页。

[63]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29～39页。

[64]《彝族源流》第17～20卷，第379～380、395～396页。

[65]参见《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38～45页。

[66]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35页。

[67]参见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9《水西记》。

[68]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9《水西记》。“番书”当指彝文。清人舒位所撰《黔苗竹枝词》之《猓猡》有云：“阿谁赐得银鸠杖，谢表签名曲似蚓。”这是对彭而述这段描述的简要概括。

[69]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35～38页。史继忠还认为：“‘九扯九纵’就是九种不同的官职按其地位而有九个品级，官职和品级互相对应，互为表里。”但水西职官种类远远超过九种，并且同一品级职官的职责可以完全不同，例如掌军事的“骂写”、掌礼仪与外交的“弄余”、管农事的“崇闲”都是第五品级，因此这种看法未必妥帖。此外，彭而述与史继忠都认为“九扯九纵”是仿效王朝的等级品官制，但他们并没有提出直接的证据，因此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

[70]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39《经政志一·官制略》。

[71]《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106～108页。

[72]如贵阳盐务街宅吉小区，“宅吉”即则溪的又一音译。

[73]参见胡庆钧《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32页。

[74]参见《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第120页。

[75]《诺沤曲姐》，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第211～218页。本段引文中的则溪名称与前文的差异系不同的音译所致。“陇胯”即“陇垮”，“的都”即“斗堵”，“冬娄”即“朵勒”，“迂底”即“于底”，“六慕”即“洛莫”，“慕胯”即“慕柯”。对不同则溪的描述未必都很准确，例如本段引文称慕胯在十三则溪中地盘最广，势力最大，但据下文所引的朱燮元的奏疏，木（慕）胯则溪南北一百里，东西一百八十里，无论面积、寨数、户数、粮米都不及一朵（于底）、则窝（热卧）等则溪。

[76]参见《水西地理城池考》，贵州省毕节专署民委会老彝文翻译组译，1966；道光《大定府志》卷49《得初土目监生安光祖所译夷书四则·其二》。

[77]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33、38～39页。

[78]朱燮元：《水西夷汉各目投诚献土谨酌近日情形条例措置事宜恭请圣裁事》，《朱少师奏疏钞》卷7。《明史》卷249《朱燮元传》亦有类似记载。

[79]道光《大定府志》卷49《得初土目监生安光祖所译夷书四则·其二》：“水西十二宗亲：阿五，德初，卧这……”是以知卧这为十二宗亲之一。

[80]朱燮元：《水西夷汉各目投诚措置事宜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87。

[81]安世的呈文作于崇祯九年，而早在崇祯三年阿哲家已被迫削减水外六目之地，共两个则溪，因此在崇祯三年之前，水西君长的土地当更加宽广，超出十个则溪的范围。

[82]朱燮元：《勘明水西各土遵照明旨分土授官以安地方事》，《朱少师奏疏钞》卷8。

[83]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34、41～42页。

[84]道光《大定府志》卷49《得初土目监生安光祖所译夷书四则·其三》。

[85]《土地民奴和则溪的管理》，《增订爨文丛刻》上册，第137页。

[86]例如光绪《黔西州续志》卷5《州属土司》称：“君长为苴穆，犹可汗、骠信之号。既附于朝，则为宣慰、宣抚，嫡子仍袭其位而分庶子为穆濯，译言名爵，今为大土目，穆濯之嫡子仍袭穆濯，而分庶子为祃衣，为衣苏。”1950年代以后胡庆钧与史继忠等学者都借用了这种宗法制的模式，用以论述水西的政治制度。参见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第31～32页；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29～32页。

[87]本书第六章第一节将对土目做更详细论述。

[88]参见《增订爨文丛刻》上册，第137页。黔西北彝俗喜在名字前或中间加一“阿（ ）”字，所以阿哲琪又称阿哲阿琪。

[89]参见《西南彝志》第9～10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第344～390页。

[90]《元史》卷61《地理志四·乌撒乌蒙宣慰司》。

[91]《支嘎阿鲁王·俄索折怒王》，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第210页。

[92]《支嘎阿鲁王·俄索折怒王》，第205～206页。支嘎阿鲁是传说中具有超凡能力的君王。据译者的解释，“鲁旺”“鲁补”相当于九宫八卦。本书第八章对“鲁旺”这一重要观念做了详细论述。

[93]参见王仕举《扯勒家支谱系及所属“则溪”译注》，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贵州省民族志资料》彝族卷，彝书《水西制度》、《彝族源流》（第24卷《扯勒的则溪》）所载与此同。

[94]参见《物始纪略》第3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第203～210页。这只是黔西北彝族文字起源神话中的一种。

[95]参见杨成志《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1931；《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地学杂志》1934年第1期抽印本；马学良《马学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丁文江《〈爨文丛刻〉自序》，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编译室编《彝文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96]参见马学良等《彝族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38～145页；廖正碧《两汉时期是彝文的约定俗成时期》，《贵州彝学》，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由于彝文献一般都不注明年代，这给鉴定彝书的创作时间造成了极大困难。尚须指出，民族识别时界定为彝族的一些族类并没有使用文字，不同的彝区所使用的文字在字形、读音等方面亦有较大差异。这是一些外国学者质疑中国的彝族认同的理由之一。又，据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铜器、西安半坡遗址的陶器上的符号可用彝文释读，因此许多学者相信彝文的起源甚早。参见《毕节地区民族志》，审稿本，第31～37页；余弘模《试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凉山彝族奴隶制》，1978年第1期。

[97]参见《彝文金石图录》（赫章专集），审稿本，赫章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藏，第1～2页。

[98]参见《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第3～7页。关于水西远祖妥阿哲的故事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99]参见《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第21～23页。

[100]有学者指出，彝俗每个毕（布）摩都要抄一遍前人所遗之文献，原书则供奉起来，不再使用，年久则用火焚之，因此很难看到明清以前的文献。参见廖正碧《两汉时期是彝文约定俗成的时期》，《贵州彝学》。

[101]《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第15页。

[102]参见史继忠《罗殿国非罗氏鬼国辨》。

[103]参见丁文江《〈爨文丛刻〉自序》，《地理学报》第2卷第4期，1935年。著名彝学家马学良组织人力，在《爨文丛刻》的基础上经过改、补、增、减、换、调，编成《增订爨文丛刻》。在序言中，马先生称《爨文丛刻》是一部“具有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研究价值的巨著”，“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它仍是中外出版的彝文经典著作中唯一的一部巨著”。参见《增订爨文丛刻·序》。

[104]参见王继超《功在千秋：将福祉留给后世》，《民族团结》1997年第11期。

[105]在田野调查时，许多人都告诉我家传彝书被成堆销毁的事。

[106]《彝族源流》第9～12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第406～424页。

[107]《苏巨黎咪》，第21页。

[108]布麦阿钮：《论彝诗体例》，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第61页。

[109]《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303～345页。译者注：哺古，本为盛酒的宝桶，演化为象征江山社稷、权势地位的标志，犹如中原鼎一类的物件。

[110]《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310页。

[111]彝书《阿诺楚》（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第452页）中的维帕克茨嫫大娘曾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彝谚：“奔跑数骏马，知识数布摩。”

[112]《彝族源流》第17～20卷，第244～245、388页。诺克博是乌撒部的一位远祖。

[113]许多学者认为，唐宋文献中记载的“鬼主”、元明清史料中的“大奚婆”“大觋皤”即是布（毕）摩。参见易谋远《彝族史要》，第770页。

[114]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罗罗》。

[115]余弘模等学者认为，布摩（布慕）在汉文献中的译称有“奚婆”“觋皤”“拜祃”“白马”“鬼师”等。参见余弘模《古代彝族布慕刍议》，《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3期；易谋远《彝族史要》，第770页。

[116]道光《大定府志》卷49《旧事志五·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

[117]光绪《黔西州续志》卷5《州属土司》。

[118]参见《彝族源流》第17～20卷，第402～403页。

[119]参见《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132～134、141～144页。

[120]参见明朱燮元《安酋业已投诚绅衿未肯罢战谨陈夷情士论仰请圣裁以决进止事》《奉职无状致有烦言直陈战功俘献始末恳祈圣鉴亟赐褫斥以无误封疆事》，《朱少师奏疏钞》卷6。

[121]参见《苏巨黎咪》，第125～143页。

[122]正德《四川志》卷23《乌撒军民府·风俗》。

[123]光绪《黔西州续志》卷5《州属土司》。

[124]清代《雄书安氏谱序》，光绪《水西安氏族谱》。

[125]参见《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203、208、356～358、364～386页。

[126]参见《海腮耄启》，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第17～40页。

[127]《地生经》，《增订爨文丛刻》上册。

[128]如“修建灵房”“龙的传说”“哎哺是万物根源”等章，《西南彝志》第7～8卷。

[129]首先，许多文献很可能传抄自前人的著述，其创作时间不一定是明、清时期，例如《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书都是汇编前人与时人著述，并非创作。前文指出，彝俗每个毕（布）摩都要抄一遍前人所遗之文献，原书则供奉起来，不再使用，年久则用火焚之，因此很难看到明、清以前的文献；其次，许多彝书记述的事情都发生于元、明以前，一些线索清楚的父子联名制系谱即是例证。

第二章 地方传统对“羁縻”政治的制约

本章着重考察元、明王朝在黔西北等地建立并完善土司制度的过程。一些学者认为中央王朝对南方边远地区的经营历经了从秦汉以降的羁縻政策到元明清土司制度的演变，[1]这一看法夸大了土司制度同此前的边政措施（如羁縻州县制）之间的区别，并且漠视了时人的观点。“羁縻”一词在《史记》中已经出现，司马相如欲坚定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的决心，假托了一场与持反对意见的蜀中长老间的辩论，其中有云：

（蜀都）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司马贞）《索隐》案：羁，马络头也；縻，牛韁也。《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2]

“羁縻”意味着边远族类在承认天子统辖权的前提下，保持着自身传统与较大的独立性，对于王朝而言这是一种控驭而非实际的统治，这也正是蜀中长老所希望的与汉王朝的关系。不过，“羁縻”一词所表达的仅仅是一种原则与精神，没有规定实现这种精神的手段与内容。基本上，凡是不能由王朝委派官员，并以编户齐民的形式进行统治者都可被时人视为“羁縻”。纵观自秦迄清的南方边政，大都表达了尊重未归“版图”族类之传统，承认其首领之地位，并要求他们朝贡、缴赋，但能否真正获得其贡赋或获得多少贡赋，并使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与多长时间内维持效忠，则要视朝廷力量、地方官员的能力以及边远族类自身情形及其与王朝的关系而定。因此，元明清土司制度与此前的边政措施间的界限实际上是相当模糊的，这种模糊导致了学界关于土司制度形成时间的争议，如西汉说、蜀汉说、北宋说、元代说；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土司制度与羁縻政策间划界的尝试是不明智的，[3]明清时期的许多学者其实已经非常灵活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如《明史》关于土司的序言中称：

（西南诸蛮）历代以来自相君长，原其为王朝役使，自周武王时孟津大会，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蛮皆与焉。及楚庄蹻王滇，而秦开五尺道，置吏，沿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4]

这段文字明确指出，土司制度的精神就是“羁縻”。

过往的土司研究，在制度考辨方面用力较多，初步勾勒了历代中央王朝向南方“蛮夷”地区拓展的图像，但对制度具体实施过程中王朝与地方社会间的复杂互动，以及地方社会变革中动态而又充满矛盾的实际场

景揭示不多。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大都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仅着力于论述王朝的各种边政措施，而对所谓“蛮夷”社会固有制度和文化的实际形态及其潜在且可能更为深刻的影响关注不够，甚至用带有较多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色彩的空泛探讨取代了必要的实证研究。[5]本书第二至六章将把王朝制度的变化、国家的礼仪和意识形态在区域社会表达的过程以及周边族类固有传统的因应结合起来考察，以期能够推进对土司制度的认识。

第一节 元代的经营

元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率兵攻灭大理国，次年班师，留兀良合台继续用兵扫荡西南各地。强大的元王朝并不仅仅满足于地方土酋名义上的效忠，云南甫定，兀良合台遣使献捷于朝，并提议：

西南夷汉尝郡县之，设官料民，俾同内地，此其时也。[6]

这一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但西南地区族类的强烈反抗，使元统治者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地方原有的权力格局，史载：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九月）诏遣使招谕西南诸蛮部族酋长，能率所部归附者，官不失职，民不失业。[7]

然而许多土酋仍然反对外来势力的介入，至元十六年（1279）十一月，当千户张旺前往招抚罗氏国时，愿意接受的仅贺宗一寨，“余皆迎敌”。[8]

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设官料民”的积极进取与“官不失职”的抚绥政策双管齐下，元王朝在黔西北等地逐渐设置了一系列统治机构。

乌撒方面：宪宗征大理时，“屡招不降”，至元十年始内附。十三年设乌撒路，十五年改为军民总管府，二十一年改军民宣抚司，二十四年升乌撒乌蒙宣慰司，除乌撒外，乌蒙、芒部、东川亦属该司所辖。此过程贯穿着持续不断的军事征剿活动，其中以至元二十二年的战争最为激烈。[9]

水西方面：乌撒内附五年后，罗氏鬼国主阿榨始归顺，诏以阿榨为安抚使，佩虎符，但罗氏鬼国的别部亦奚不薛立寨自保，拒绝降元，并且阿榨的降附亦非真心。至元十六年，云南都元帅爱鲁率兵征亦奚不薛。第二年三月，忽必烈下诏讨罗氏鬼国，共调兵3.6万人，分三路进讨。同年六月又遣使招谕，于是罗氏鬼国再次内附，元廷在此设立了顺元路安抚使。十月，以湖南兵万人往征亦奚不薛，迫使其归顺。两年后亦奚不薛再叛，元军往征，置顺元等路军民宣慰司，以速哥为宣慰使，“经理诸蛮”。第二年又设亦奚不薛宣慰司。至元二十九年，并顺

元、亦奚不薛、八番罗甸三宣慰司为一，称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兼都元帅府，[10]司治在贵州，即今贵阳。

除设官之外，元廷还在乌撒设立军屯，水西地区则驻军镇守。史载：

（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丁巳，征亦奚不薛（即水西——引者注），尽平其地，立三路达鲁花赤，留军镇守，命药刺海总之，以也速带儿为都元帅宣慰使。……（二十年七月）丙寅，立亦奚不薛宣慰司，益兵戍守。

（延祐七年七月）壬午，立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二千赴之。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立乌撒路军屯，以爨僰军一百一十四户屯田。[11]

乌撒屯：军百一十二户，民八十六户。[12]

在元王朝的行政架构中，宣慰司是行省与郡县之间上传下达的机构，[13]在全国广泛设置。通常每司设宣慰使三员，秩从二品。[14]即使在边远地区，这些宣慰使也大都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如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宣慰使兼都元帅斡罗思、也速带儿，[15]乌撒乌蒙宣慰使孛罗欢、牙耶木[16]、忙古带[17]等，但他们能够有效管治的地方大概仅限于宣慰司治与军队驻防地附近的区域，其余广大地区仍然掌握在地方土酋手中。元廷承认酋长们的统治，并依靠他们的效忠实行间接治理，这正是“官不失职”的精神。[18]但元廷并不接受“祖”“摩”“布”一类的职名，而是力图将地方酋长纳入王朝的职官系统中。有意思的是，水西君长国接受朝廷赐封者有时似乎并非君长，史载：

（至元十七年九月）丁卯，罗氏鬼国主阿察及阿里降，安西王相李德辉遣人偕入觐。……（十八年二月）诏谕乌琐、纳空等毋扰罗氏鬼国，违者令国主阿利具以名闻。

（至元十七年）德辉以其（指阿察——引者注）（愿降）言上闻，乃改鬼国为顺元路，以其酋为宣抚使。

（至元二十年七月）壬申，亦奚不薛军民千户宋添富及顺元路军民总管兼宣抚使阿里等来降。班师，以罗鬼酋长阿利及其从者入觐。立亦奚不薛总管府，命阿里为总管。[19]

（至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阿察及阿里降……阿察之后，复有阿利。[20]

综上可知，至元十七年（1280）九月鬼国降附后，置顺元路宣抚司，史籍并未明确记载出任宣抚使者是阿察还是阿里，但至迟在次年二

月，担任国主者已是阿利，而长期以来担任宣抚使兼总管者则系阿里。在元代品官等级中，宣抚使较宣慰使低一秩，正三品。[21]

乌撒酋长的职名在文献中亦有记载：

（至顺三年）禄余言于四川行省："自父祖世为乌撒土官宣慰使，佩虎符，素无异心。"[22]

可见，乌撒土酋亦很早就被纳入朝廷的职官体系中。

土酋"官不失职"还体现在朝廷对他们犯罪的宽容上，正所谓"土官有罪，罚而不废"。[23]此外，地方首领职位的承袭方式同样受到元廷的尊重，史称：

中书省臣言："云南土官病故，子侄兄弟袭之，无则妻承夫职。远方蛮夷，顽犷难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阙员，宜从本俗，权职以行。"制曰："可。"[24]

但权力的承袭在原则上必须上报元廷批准，以示臣子之礼，亦奚不薛曾因不按程序办事而遭受指责：

壬辰，亦奚不薛病，遣其从子入觐。帝曰："亦奚不薛不禀命，辄以职授其从子，无人臣礼。"[25]

总之，设官、屯田、驻军等标志着元王朝对黔西北的经营已具备一定的规模，但"设官料民，俾同内地"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朝廷采用授予土酋职衔、维持其既有权力的办法来换取他们的效忠，"流（官）、土（官）共治"的局面由此形成，土司制度粗具雏形。与此相应，元代"土官"一词在文献中已频频使用。但当时并未形成专门的土司职官，宣慰使、宣抚使乃至品级更小的招讨使等都是流官职名，[26]不过这些名称在用诸土酋时可能会加上"土官"或"蛮夷"二字，例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反叛的土官阿蒙的官名是"乌蒙蛮夷宣抚使"，[27]乌撒土酋禄余亦称自父祖起世为"土官宣慰使"（详上文）。此外，土官的职衔并不固定，朝廷会根据笼络或赏罚的需要加以升降，变化非常大，律条规定：

诸土官有能爱抚军民，境内宁谧者，三年一次，保勘升官。[28]

这条规定并非具文，例如至顺元年（1330）三月，录讨云南秃坚、伯忽之功，云南宣慰使土官举宗、禄余并遥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29]遥授一词似表明，朝廷仅仅是给予更高的品衔，土官的实际权力与统治范围并不会随之扩大。这种职衔的变化有时非常大，显示出元代土司制度的某种随意性。以水西为例，至元十九年，元廷授酋长阿那三珠虎符、昭勇大将军、顺元路总管。阿那病卒后，其弟阿画于至大元年（1308）袭授武略将军、顺元等处军民宣抚使，袭带原降虎符。泰定年间（1324 ~ 1328），赐名帖木儿卜花，奉大夫护国侍卫亲军都指

挥，八番沿边宣慰使，加龙虎大将军，封顺元郡罗殿国侯。至元元年（1335），阿那死于赴大都的旅途中，其侄霭翠袭授中顺大夫，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兼顺元等处世袭土官宣慰使，加镇国大将军三珠虎符。[30]

第二节 明代土官职名的规范化[31]及土官文职武职考辨

霭翠执政水西二十余年后，元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朱明王朝起而代立。在西南地区的经营方面，明代“踵元故事”，但又“大为恢拓”，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元代进了一大步。

一 朝贡：明王朝对归顺土酋的授权仪式

许多地方酋长统治权力的获得与维持其实与朝廷无关，但其合法性却往往被归因于中央王朝的恩赐。如土官不肖，朝廷即可收回敕封，削夺其爵。这样，能否“世长其土”就得看他们能否“谨守人臣礼”。清人田雯在分析安氏长期统治水东、水西的原因时云：

迨乎累世相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识机达变，宣力效忠，始终不失人臣礼，故得以长奉西藩，受恩罔替，非徒以为瓯脱而姑羁縻之也。[32]

在明代，朝贡是权力赐予的必经程序。因为土酋大都受过元朝的赐封，所以当他们初次朝贡时，明廷会重新授予“原官”，并根据其品级的高低，赐给不同的印信、朝服、冠带、诰敕等，[33]以示土酋的“官”是明廷所授。从此角度看来，初次朝贡无异于一场朝廷对土官的授权仪式。史载：

尝考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34]

来归即意味着来朝，虽然来朝者所辖土地、所管人户不会因之发生变化，甚至连官名都不加更改，但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明王朝正统的承认，政治方面的象征意义至关重大，因此朱元璋对此极其重视。

水西、乌撒对明廷的归顺同样从朝贡开始。洪武四年（1371），明军水、陆两路进取四川，盘踞于此的明升出降，[35]水西的北部、东北部直接面临着明王朝的强大压力。第二年，水西君长，故元贵州土官宣慰使霭翠同宣慰使郑彦文等赴京朝贡，朱元璋诏赐文绮袭衣，并命霭翠“世袭贵州宣慰使如故”，次年又诏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36]明廷对水西的笼络与优渥由此可知。

但在洪武前期，乌撒尚接受元王朝的正统，拥戴元宗室梁王据滇抗

明。[37]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亲自指示方略，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规取云南。征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胡海洋率领，从四川南部的永宁直捣乌撒，主力部队则从湖广西部的辰州、沅州挥师西进，一路势如破竹，诸部落望风降附，三个月之后，大军便进抵云南曲靖，大败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千里之外的朱元璋极为关心乌撒的向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遣使询问："乌撒、乌蒙果降否？"同一天又遣内臣敕谕乌撒、乌蒙诸部归顺来朝：

西南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贡中国。朕受天命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建昌诸部长犹桀骜不朝。朕已遣征南将军颍川侯、左副将军永昌侯、右副将军西平侯率师往征。犹恐诸部长未喻朕意，故复遣内臣往谕。如悔罪向义，当即躬亲来朝，或遣人入贡，亟摅诚款，朕当罢兵，以安黎庶。尔共省之。[38]

攻克曲靖后，傅友德立即亲提一支劲旅北攻乌撒，以应永宁之师，大败乌撒、芒部的联军于赤水河，乌撒女君长实卜逃遁，明军于是筑城乌撒，向东过七星关以通毕节，接着攻克可渡河，于是东川、乌蒙、芒部、乌撒等相继降附。[39]

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初八，朱元璋敕征南将军傅友德命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的首领入朝，一个月后，将乌撒、东川等设为土府，隶云南布政司。第二年，实卜同乌蒙、东川、芒部诸部首领共120人来朝，进贡方物。朱元璋诏"各授以官，授朝服、冠带、锦绮、钞锭有差，其女酋则加赐珠翠首饰"。[40]实卜从此由元朝的云南行省右丞变成了明王朝的世袭土知府。

土酋归顺成为明王朝的土官之后，其子孙或旁支袭职同样必须经过朝贡的程序，直到天顺（1457～1464）末年这一程序才逐渐废弛。[41]弘治（1488～1505）间，御史冯玘奏请恢复旧制，未能成功。[42]

二 明代土官职名的规范化及土司文职、武职考辨

明王朝在黔西北等西南地区"设官料民"的举措无疑远较元代完备与深入；与此相应，明王朝对土官的管理亦较为严密与规范，一旦对土官授职，便不再轻易更改其职名，对加封号一事亦极为慎重。终明之世，水西首领任宣慰使、乌撒首领任土知府的情形始终未变。更为重要的改革是，宣慰司、宣抚司等从内地行政体制中分离出来，同安抚司、长官司一起，成为专为土官设立的行政机构，专门的土司职衔在制度上得以确立，从名称上看，有特别建制[43]与仿流官建制两大类型，具体情况如下：

特别建制：

宣慰使司 正官：宣慰使一员，从三品；同知一员，正四品；副使一

员，从四品；佥事一员，正五品。首领官：经历司，经历一员，从七品；都事一员，正八品。

宣抚司 正官：宣抚使一员，从四品；同知一员，正五品；副使一员，从五品；佥事一员，正六品。首领官：经历司，经历一员，从八品；知事一员，正九品；照磨一员，从九品。[44]

安抚司 正官：安抚使一员，从五品；同知一员，正六品；副使一员，从六品；佥事一员，正七品。首领官：吏目一员，从九品。

招讨司 正官：招讨使一员，从五品；副招讨一员，正六品。首领官：吏目一员，从九品。

长官司 正官：长官一员，正六品；副长官一员，从七品。首领官：吏目一员，未入流。

蛮夷长官司 长官、副长官各一员，品同上。

此外尚有蛮夷官、苗民官、千夫长、副千夫长、土官中头目等，无专职品级。[45]《明史·土司传》并未提及这些未入流的土官，历代学者也似乎将他们遗漏了。

蛮夷长官司与长官司的区别有二，一是前者未设首领官，二是建置上的区别。宣德二年（1427），“兵部议以四百户以上者设长官司，四百户以下者设蛮夷长官司。……皆从之”。[46]

仿流官建制者有土府、土州、土县等，“设官如府州县”，“其品秩一如流官”。据此，可从《明史》卷75所列的流官府州县制中推知相应土官的称谓与品级，[47]此不赘述。

综上可知，明代的土司制度，本着“以夷治夷”的羁縻政治精神，利用王朝的等级品官制，对许多周边族类的统治结构进行了规范，从名义上将地方土酋纳入了王朝的职官体系。黔西北地区似乎由此出现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土司：乌撒仿流官建制，设立军民土府；阿哲家统治的水西、水东地区同宋氏领有的十二长官司一起，设立了贵州宣慰司，属特别建制。这是否意味着乌撒、水西的社会结构、开发程度、与王朝的关系等有所不同？此问题涉及两类土司的性质，值得深入讨论。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相信，宣慰、宣抚、长官等属武职，隶兵部，而土府、土州等属文职，隶吏部，[48]并且名称的不同蕴含着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差异，文职土司主要设置于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夷、汉杂居”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设置形式基本同于内地，标志着社会经济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改土归流正是从这类地区开始的。[49]有些海外学者还认为土知府、土知州等即土官，系文职，位于某个行省的边界内，政府往往会在其中设置一些流官；宣慰、宣抚等即土司，属武职，掌握着相当数量的军队，位于中国

可辨识的政治边界附近，其领导层中通常没有流官。[50]

杜玉亭则认为土官、土司可以混用，但要注意两个区别，首先，土司之称直到明嘉靖晚期才出现。其次，土官一般泛指土职其人，土司则不仅泛指土职其人，而且也指与土职相联系的政权机构或衙门，内涵较广。他还根据《明会典》《明史》《万历野获编》的相关记载，指出明初虽有宣慰使等官隶兵部的规定，但并未真正得到贯彻，因此土官、土司分属文、武职之说与基本史实不符。[51]

除对个别史料的理解以及土职隶属何部门外，笔者大体上同意杜玉亭的看法。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黔西北的具体情况，本书尝试回答下列问题：按明代制度，究竟哪些土官属武职？能否根据文献中的“隶”或“属”等字眼判定土官属于何部门并进而确定其系文职或武职？特别建制土司与仿流官建制土司之间的差别是否一定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周边族类本身的制度对土司制度有何种制约作用？

其实，虽然“土官以文武类编”，[52]但《明史》《明会典》《明实录》等书从未指出宣慰使、宣抚、长官等属武职。《明史》云：

凡武职，内则五府、留守司，外则各都司、各卫所及三宣、六慰。[53]

“三宣、六慰”并非泛指，《清史稿》称：“（陇川宣抚司）与干崖、南甸称为三宣抚。”[54]“（南明政权的将领）李定国、白文选等分住三宣、六慰。”[55]《滇云历年传》说得更为明白：

其土官之有分地者：长官司一，曰者乐甸；御夷府二，曰孟定、孟艮；军民宣慰司六，曰孟养、车里、木邦、老挝、缅甸、八百大甸；宣抚司三，曰干崖、南甸、陇川，所谓三宣、六慰是也。[56]

可见，只有云南的三个宣抚司、六个宣慰司被划为武职，而当时全国仅宣抚司、宣慰司便有57处之多，加上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更是多达四百余处。[57]或许正因为如此，明人沈德符认为宣慰、宣抚等在制度上是文职，但他同时注意到了实际状况的混乱，《万历野获编补遗·土司文职》云：

本朝设土司，除知府、知州、知县，俱文职，其品秩一如流官。此外夷官则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俱为文官，属吏部文选司除授，是宜竟为左列矣。然查《会典》则又不然，户部所开州县，凡宣慰司三，仅四川之播州属焉；四川宣抚司三，一属户部，二属兵部，长官十六司属户，廿九司又属兵，何也？至云南之宣慰司凡七，俱在徼外，即朝贡亦不尽如期，而亦载之户部版图中，抑异矣！至若湖广一省，则永顺、保靖二宣慰以至四宣抚、九安抚及诸长官司，又俱隶兵部，无一入户曹者。而贵州宣慰一司，则又属户部矣！似此职掌分裂，当以守土管军民者与掌兵不同耶？但自宣慰而下，既为文臣，何以俱属都司钤辖？又如云南之澜沧军民指挥使司，乃武官也，何

以又统浪蕖州文官耶？[58]

沈德符认为宣慰等俱系文官，这是有相当根据的，弘治《明会典》“末二卷为诸武职”，但并未涉及土官，仅讲都司卫所。[59]万历《明会典》亦将宣慰、宣抚、长官等系于“吏部·文选清吏司”条下。[60]至于名称的不同标志着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改流的先后等更是想当然之语。例如，位居入滇驿道，控扼入黔门户的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早在永乐十一年（1413）便被改流，贵州行省由此建立。又如，与乌撒土府相较，贵州宣慰司可称交通便利，经济、文化发达，并且早在隆庆年间便开始改土归流，[61]完全不符合“文职”土司区较“武职”土司区发达的逻辑。

芒部府的例子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理解文职武职的意义。芒部毗邻水西、乌撒，洪武年间傅友德征南后同乌撒一起归顺，设置了军民土府。嘉靖五年（1526），明廷乘陇政、陇寿为争袭知府仇杀之机，改芒部土府为镇雄府，设立流官，命重庆府通判程洸为试知府，掌府事，改置长官司四，以阿济等四人为长官。这样，芒部从“文职”土司区变为“武职”土司区。这一转变似乎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多大联系，事实上，因为芒部的武力反抗，加上乌撒、水西、乌蒙、东川等土官的支持，两年后明朝廷不得不废除流官，重设土府，芒部转而又成了“文职”土司区。[62]

对文职、武职的误解似乎是源于对一些零星材料的片面理解。为了得到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在此不嫌烦琐，征引几段相关史料如下：

材料一：万历《明会典》卷4《吏部·文选清吏司·官制三》：各宣慰使司：正官，宣慰使一员，同知一员……首领官，经历司，经历一员，都事一员……长官司：正官，长官，副长官；首领官，吏目。

材料二：万历《明会典》卷6《吏部·验封清吏司·土官承袭》：土官承袭，原俱属验封司掌行。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兵部。其余守土者，仍隶验封司。

材料三：万历《明会典》卷105《礼部六十三·主客清吏司》：郎中、员外郎、主事，分掌诸番朝贡、接待、给赐之事，简其译伴，明其禁令，凡百官恩赉，各省土贡，亦隶焉。

朝贡一 国初诸番国及四夷土官朝贡，具载职掌，其后慕化者众，事例日增，土官衙门添设，别见兵部，而事关朝贡者附此。

材料四：万历《明会典》卷118《兵部一·武选清吏司·铨选一》：土官额数及资格旧属吏部文选司，洪武三十年改属兵部。宣慰使司：宣慰使一员从三品，同知一员正四品……长官司：长官正六品，副长官从七品。

材料五：《明史》卷310《湖广土司传》：（土官）袭替必奉朝

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天顺末，许土官缴呈勘奏，则威炳渐弛。成化中，令纳粟备振，则规取日陋。孝宗虽发愤厘革，而因循未改。嘉靖九年始复旧制，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矣。

材料六：毛奇龄《蛮司合志·序》：按，有明洪武初年，凡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而稽其土官、土兵及赋税、差役、驻防、守御之制，但定铨选，不立征调，其定铨选法，凡土官名号曰宣慰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初皆隶吏部验封，而后以土兵相制，半隶武选。

材料七：《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其土官之朝贡符信属礼部，承袭属吏部，领土兵者属兵部。

综观以上材料，我们似不能断章取义，认为某类土官隶属于某个部门。文献中“隶”或“属”的含义，是指土官某些方面的事务由某部门掌管，[63]这些事务主要有：（1）承袭的审批（材料二、五、六、七）；[64]（2）职官名称、品级及人数的确定（材料四）；（3）朝贡（材料三、七）。朝贡方面一直由礼部职掌。前两项事务在明初统归吏部，分别由其属下的封部（洪武二十九年起改作验封清吏司）与选部（洪武二十九年起改作文选清吏司）[65]负责。洪武三十年（1397），以宣慰、宣抚、招讨、长官诸土官领有军队的缘故，将同他们相关的这两项职能都改隶于兵部武选清吏司（材料二、三、四、五、七），这是导致学界将宣慰等归入武职的最主要原因。但宣慰等官并未完全淡化文职的色彩，表现在：建置上设有正官与首领官（材料一）[66]，并且《明会典》的《吏部》与《兵部》都载有宣慰等土职（材料一、四），而都司、卫所等武职只载于《兵部》。[67]由此看来，仅根据名称便将土官分为文职与武职两大类似不十分妥当，更何况，许多“隶于吏部”的所谓“文职”土官，同样领有众多土兵，如嘉靖年间贵州独山州、普安州曾出土兵参与剿苗，[68]而乌撒、芒部等土府所统管的土兵远远超过了许多武职土官。[69]并且许多“武职”土官如贵州宣慰司等并不领于都司。[70]弘治《明会典·凡例》称：

土官衙门属吏部者列于府州县之次，属兵部者列于卫所之次。

检阅该版《明会典》可知，宣慰司、长官司等既有列于兵部者，也有列于吏部者，并不统一。至于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武职（即土司）”政权中几乎没有“中国”任命的流官[71]更是对制度的误解，因为土职中没有经历、都事之类的名称，所以宣慰司、宣抚司中的首领官如经历、都事、知事等应是流官（材料一），《明史》亦云：

洪武七年，西南诸蛮夷朝贡，多因元官授之，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渐为宣慰司者十一，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其府州县正贰属官，或土或流，大率

宣慰等司经历皆流官，府州县佐贰多流官。[72]

总而言之，土官的两类名称仅仅是一个符号，并不能真正表示隶属或性质上的差别。我们不能只是顾名思义，用演绎的办法自上而下来推论土司区域的性质，我们更应结合地方社会的实际，自下而上来探讨朝廷制度的内涵。

与布政司—府（直隶州）—县（散州）的流官制架构不同，宣慰司等高级土官政权中未必顺次设立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较低级别的机构，明廷赐封土官的行动往往会受到周边族类的制度制约，因此王朝对各个土司区渗透的程度大不相同。以贵州而论，黔东一带的原住民没有在一个广阔的地域内建立起严密的政权体系，各个小土酋各自为政，正所谓“有囤峒而无城郭，有族属而无君长”。[73]即便像思州、思南宣慰司这样的大土司，其领地内仍然被中央王朝分别赐封了22和27个长官司，在承袭、朝贡、赋役等一系列制度的约束下（对这些制度的论述详见本书第三章），思州、思南二宣慰使未必能够有效控制这些长官司。例如蛮夷长官司长官安逸指出：

虽二宣慰争占，于民并无相干。[74]

永乐十一年（1413），明廷借两宣慰司内斗之机，废除了宣慰使，设立府州县制及里甲制，对小土官则予以保留，“加意绥抚”，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整个改土归流的过程极为顺利，贵州行省得以建立。[75]

与黔东一带相反，黔西北地区有一套严密的、充满血缘关系的政治体系，对明王朝的土司制度产生了强大的制约作用，使其根本无法深入君长国的内部，更不可能像在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等地区一样，通过赐封小土官来侵蚀大土官的权力。[76]水西十二宗亲、四十八目中，只有沙溪被明廷封为宣慰司同知，后亦改安姓，[77]而乌撒八大部、二十四土目中，没有一个受中央王朝赐封。在制度上，土官政权中往往会任命一些流官，如经历、都事、同知之类，但这些官员形同虚设，难以对黔西北社会发生影响，例如万历年间巡按贵州御史杨鹤称：

乌撒道里本在黔中，去川南叙州府一千一百五十里而遥。所设同知一员，既无一事管理，亦无官舍可栖，土官更无一人为之弹压。[78]

黔西北的改土归流，是通过大规模的战争来实现的，远较思州、思南艰辛。明廷动数省兵力，费百万饷银，历十年之功，尚只能占据阿哲家的水东地区，直到吴三桂进军黔西北，才结束了改流进程。

第三节 “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明代土司对王朝的基本义务

除了土官名称方面的规范化之外，明代对土司的实际控驭也较元代深入。《明史·土司传》云：

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79]

这段引文对明代土司制度做了极为简练精当的概括。分别司郡州县与土司建制相关，假爵禄、宠名号涉及朝贡授权与土官职名，这些意味着王朝对土酋既有权威的认可以及对他们的笼络，上文对此已有较多分析。而土司对王朝应尽的义务，除朝贡之外，主要体现于“额以赋役，供我驱调”。万历《贵州通志》将朝贡、田赋、徭役等并列，统称为“贡赋”，[80]本节集中探讨明代黔西北土司的赋役情况，并简要涉及土司征调问题，朝贡上文已有讨论，不赘述。

明王朝的赋税征收与差役摊派，主要是通过里甲制来实现的，学界对此已有颇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并不能说明一些缺乏里甲体系的地区的状况，本节拟以黔西北地区为例，在彝族制度与王朝制度互动的视角中，展示明代赋役征派的另一种模式。

一 土司地区的里甲制

明王朝的赋役征派，原则上以人丁事产数为依据，制定里甲黄册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掌握地方人丁事产数额并据此征赋派役。《明史》云：“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81]但在一些土司地区，里甲黄册制度并没有真正推行，《明会典》载：

凡免造（黄册）地方，洪武二十四年奏准，凡云南各府攒造黄册，除流官及土官驯熟府分依式攒造外，其土官用事边远顽野之处，里甲不拘定式，听从实编造。贵州宣慰司不造。播州宣慰司附近通汉语者编造，其余夷民不造。景泰六年奏准四川威州并保县极边番夷，黄册免造。[82]

虽然引文中没有直接说明贵州宣慰司不造黄册的原因，但考察明初贵州形势，可知同其他“里甲不拘定式”或“免造”地方相似，贵州宣慰司也属于地处边徼且明王朝难以控制的地区。在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省）中，贵州置省最晚，直到永乐十一年（1413）废除今黔东一带的两个大土司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后才设立。在此之前，整个贵州境内没有府、州、县设置，明廷的势力主要体现在十多个卫所上，这些卫所全部排列在驿道两旁，大致勾勒出了中央王朝的实际控制区域。“黔本荒陬，夷多汉少”[83]的局面给入黔官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到万历年间黔省设立多年之后，贵州巡抚郭子章尚称：

贵州一省苗仲杂居，国初虽设贵州、新添、平越、威清等十四卫，分布上下，以通云南之路，而一线之外，北连四川，东接湖广，南通广西，皆苗仲也。[84]

这些“苗仲”地区，有的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被士大夫们视为“化外生苗”区，有的则被纳入了土司制度中，可称为“土司区”。在不同的土司区，明廷渗透的程度大不相同。正如前文所言，黔东一带的原住民没有在一个广阔的地域内建立起严密的政权体系，各个小土酋各自为政，即便像思州、思南宣慰司这样的大土司，其领地内仍然被中央王朝赐封了若干小土司。永乐十一年，两宣慰司改流，贵州行省建立，大量小土官依然存在，但被明廷进一步纳入里甲制度中，如水德江长官司编户四里，沿河佑溪长官司编户三里，乌罗（长官）司编户二里等。[85]许多原住民由此成为纳粮当差的编户齐民，如思南府蛮夷长官司“原管夷民四里”。[86]

作为明代有名的雄踞黔省的大土司，贵州宣慰司正宣慰水西安氏拥有自己的文字、文献、意识形态以及一套有着深远历史根源的制度化的政治权力架构，这套架构集军事与行政、血缘与地缘为一体，在其制约下，明王朝的制度、礼仪与意识形态仅仅影响到水西社会的上层，并不能深入水西地区，同时，明王朝也不能像对付许多大土司那样通过在安氏的统治区域内赐封一些小土司的办法来削弱安氏的势力。这些是我们考虑贵州宣慰司免造黄册时必须予以关注的。

里甲、黄册的阙如，意味着明王朝难以得知贵州宣慰司地区的人丁事产。明政府后来可能采取了一些措施，清查（或令土司上报）了贵州宣慰司的一些户丁数据。兹根据嘉靖《贵州通志》卷三，制成贵州宣慰司户丁数据（见表2-1）：

表2-1 明中期贵州宣慰司户丁数

土司	户	丁
贵竹长官司	676	1418
水东长官司	730	4971
中曹蛮夷长官司	86	494
乖西蛮夷长官司	107	711
青山长官司	55	724
龙里长官司	195	1807
扎佐长官司	55	830
白纳长官司	100	633
底寨长官司	88	733
养龙长官司	43	563
十长官司合计	2135	12884
贵州宣慰司（总计）	2145	12924

贵州宣慰司领有贵州中部的十个小土司，即贵竹长官司、青山长官司、龙里长官司、扎佐长官司、底寨长官司、养龙长官司、中曹蛮夷长官司、白纳长官司、水东长官司、乖西蛮夷长官司。上述十个小土司直接受明政府控制，与正宣慰水西安氏、副宣慰水东宋氏只存在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同样，安氏虽贵为正宣慰，但同样不能真正管辖副宣慰宋氏。由表2-1可知，贵州宣慰司登记在册的总户、丁数分别为2145、12924，其中贵竹、水东、龙里等十个小土司的户、丁数之和分别为2135、12884，可见贵州宣慰司的主体安氏土司所辖水西地区人口基本未包括在内。事实上，水西地区的户丁，是清王朝改土归流后建立里甲制时才开始清查的，当时的方志编撰者们感叹："大定户口，自我朝以前无考。"[87]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册上有名的这些丁、口可能大都是迁居土司地区的汉人移民而非土著。嘉靖《贵州通志》卷三在论述贵州户口时称：

贵州四面皆蛮夷，所可知者各府若卫军民之数，甚寥落也。

万历《贵州通志》卷四说得更直接：

（贵州宣慰司）隶籍人民多来自中州，风声气息一如中华。

除绝大部分人口没有登记在册外，贵州宣慰司的耕地直至弘治年间尚未丈量，因此方志称贵州宣慰司"田无顷亩"。[88]《万历会计录》对此

有更详细的记载：

弘治年间《会典》数，（贵州布政司）田土原无丈量顷亩，每岁该纳粮差俱于土官名下总行认纳。

万历六年巡抚册报数，（贵州布政司）田土除思南、石阡、铜仁、黎平等府，贵州宣慰司、清平、凯里安抚司额无顷亩外，贵阳府平伐长官司、思州、镇远、都匀等府，安顺、普安等州，龙里、新添、平越三军民卫共五千一百六十六顷八十六亩三分零。[89]

可见，直到万历六年（1578），黔省才开始丈量田地，但只涉及贵阳、普安、平越等府州卫。三四年后，清丈的范围扩展至铜仁等府，改变了这些地区“额无顷亩”的状况。[90]

在丈田过程中，地方官员们表达了在黔省推行内地计量耕地的方法与单位的意图。因为山多地少、长期以来中央王朝未能直接统治等原因，贵州各地的田土计量具有极其明显的地方特色。嘉靖《贵州通志》所载通省田土数据为：“官民屯田通共四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九亩七分五厘三分五坏，五万一千三百五十六秅，陆地通共五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七亩四分六厘一毫。”[91]以秅为单位，显然是黔省的独特办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据其实已经极大简化了贵州田土的计量单位，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例如黎平府“稻熟刈把为则，以四剪为手，十手为把，每把纳秋粮二升焉”。[92]计量单位的混乱显然给官府的管理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改变“土司苗寨，界限难分，峒箐坂坡，段坵易混”的状况，清丈田地时黔抚刘庠命令：

预将合省应丈免丈田地各照原指界址区划里图，并将原计把、计秅折算数目与原有顷亩者逐一丈量，复印以步弓，防其更换，加之竹索，绝其那移，立之标竿，以别界限而便登记，督以牌令，以禁骚扰而遏阻挠。[93]

尽管刘庠力图统一计量单位与方法，并且从万历以后所编修的方志可知，黔省大部分地区都有了田土数据，且用亩来计量，但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仅是一种假象，研究者不能受此误导。崇祯年间（1628～1644）毕自俨所撰《度支奏议》云：“黔中之田，原不论顷亩，而止论段落，犹未脱荒服之习俗也。”[94]直到1930年代，研究贵州田赋的李荫荞尚称：

田地种类，既有官民之分，田地亩数，亦应基此而述，惟以该省开化较迟，地未丈量，制赋征派，本无亩数可言；但为研究观察计，除将官田亩数，依财政厅第四科草拟之贵州省各县现有官匪绝逆产调查表核算检录外，民田亩数，昔本无征，升科既少，载数复无，故难举述。……官田亩数，因各县未能实查确报，故该表所载，率属待证，报填之县份不多，内载之情况大异。除务川以幅计，广顺以份、坵、幅计，岑

巩以坵、块、幅、股计，铜仁以坵、型计，无法核算，从略外，计及者，列于表一。……黔省地未丈量，故无亩分，不足言亩法也。……黔省地未丈量，田无亩分，赋额率属征派，税率漫无标准，虽按三等九则载于《贵州通志》，而谓某县某等田若干亩，每亩科米若干，然一经实查，某县以种计，某县以稨计，某县以出谷之挑数石数计，根本无所谓亩也；间有计亩者，如贵定之大亩小亩，仅为民田之代名，修文以百挑为二亩二分，镇远以亩或二十石、三十石、四十石不等，且仍以出谷之挑数石数为衡，不足言亩也。谓以跬步皆山，丈量不易，以谷数种数代亩法，诚不能谓非计之得。使果实力推测，则官收民负，尚不致锐减失平，而乃并所谓以种计，以稨计，以出谷之挑数石数计者，亦仅徒托空言，与贞丰、罗斛之按亭派征，下江、永从之苗民摊认，同出一辙，畸轻畸重，已坏始基。[95]

李荫荞的论述还提示我们，黔省在册地亩数与实际地亩数可能有较大差异，这一点其实已为许多官员注意，并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反对实行彻底的清丈。清人陈康祺称：

黔中多山少平地，田可耕者寥寥，其陂陀硗确，即丈量亦高下不可准。嘉庆十六年，巡抚颜公检以黔幅员辽廓，而粮数乃不敌一二县于江苏，虑多隐匿，请丈全省田。适山阳李芝龄宗伯宗昉（李宗昉系较熟悉黔省情形的官员，撰有《黔记》，本书有征引——引者注），以中允为贵州学政，闻之骇甚，而颜公锐自任，调属吏设官局，事行有日矣，苦无说以折之。初宗伯甫下车，檄各学校官，访乡士大夫藏图书金石歌谣涉黔事者，最上学政，为记一书，至是，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知乾隆初贵州学政邹一桂尝请丈田，而包驳之，事获寝。宗伯遂以示颜公，勿复言丈田事，黔民始庆再生。[96]

民国年间，贵州曾设立清查田亩总局，试图清查地亩，但以失败告终。[97]

明代的每一次丈田似乎都与水西无关。万历四十五年（1617），贵州巡按杨鹤欲得水西“户口扼塞之数，与头目汉把主名”，于是“檄下所司查取粮马册籍，中间四十八枝头目管辖地方土地、人民、贡赋钱粮之入，与汉把姓名、先世来历，备载无遗”。[98]但杨鹤只是让水西土官自己报上有关数据，并不是一次土地、人口的清查，《明史》云：

贵州土官以百数，水西安氏最大，而土地、户口、贡赋之属，无籍可稽。（杨）鹤乃檄宣慰安位尽著之籍，并首领目把主名、承袭源委，悉列上有司。自是簿牒始明，奸弊易核。[99]

三年后，“奢安之乱”爆发，长达十年之久，待动乱平息，明亦旋亡，终明一代，水西田土人丁始终是一个未知数。康熙时期平远州方志的编修者感慨：

平远初开，无衡量之可凭，无户丁田亩之可考。[100]

乌撒的情形与水西略有不同。乌撒初隶云南，洪武十六年（1383）改隶四川，根据前引《明会典》，乌撒不在免造黄册之列，编户二里。[101]按照110户为一里的规定，[102]二里之地应有220户左右。但在边远地区，实际的户数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可以肯定，“其土官用事边远顽野之处，里甲不拘定式”的原则并非仅应用于云南，以黔东一带为例，废除田姓二宣慰司后，设置八个流官知府，分管若干个长官司及县，每府编户五六里到二十多里不等，[103]但所管不过一二百户，“官多民少”。[104]乌撒系土府，明王朝所能控制的编户大概不会比黔东一带更多，二里之地可能也就几十户。相对于乌撒广阔的地域与众多的人口来说，[105]明廷的里甲制徒有虚名，仅具象征意义。

除了户丁不足额外，“里甲不拘定式”的原则同样体现在土地田产方面。例如思南、石阡、铜仁等府虽然自永乐年间便确立了里甲制，但万历十年之前，明廷尚未在这些地区丈量田土，赋税在土官名下总行认纳。[106]正如《明史》所称：“贵州田无顷亩尺籍，悉征之土官。”[107]难以想象这些府县能够编订像内地一样的黄册与鱼鳞图册。乌撒土府更加特别，尽管该府编户二里，但《四川重刊赋役书册》并未提及该府，更不用说登载其人丁、田土、赋役数据。[108]还应注意到，土司里甲中的隶籍人户有许多是汉人移民而非原住民，如前文所提到的贵州宣慰司“隶籍人民多来自中州，风声气息一如中华”。

二 额以赋役

但人丁事产数的阙如并不意味着赋役的豁免，土司地区的赋役征派有另一套方式。史载：

及洪武五年，贵州宣慰霭翠与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总管适尔等先后来归，皆予以原官世袭。帝方北伐中原，未遑经理南荒。又田仁智等岁修职贡，最恭顺，乃以卫指挥佥事顾成筑城以守，赋税听自输纳，未置郡县。[109]

“额以赋役”是明王朝与土司之间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洪武五年（1372）水西归顺之初，朝廷即要求其输赋，[110]最初规定赋额为税粮八万石。当时各土司反对明王朝“额以赋役”的行动比较普遍，逋负情况相当严重。朱元璋采取绥抚策略，水西赋额连年递减至三万石、二万石。[111]为了表达对朝廷蠲免多年逋租的感谢，水西方面曾专门贡马谢恩。[112]乌撒税额定于洪武十七年（1384）五月，岁输二万石、毡衫一千五百领。[113]

相对于周边的土司来说，水西、乌撒的税额是比较高的，如乌蒙、东川、芒部皆岁输粮八千石、毡衫八百领，而金筑安抚司密定仅岁输三千石。[114]税额高低可能反映了土司同王朝关系的亲疏以及贫富强弱之别，天启间贵州提学佥事刘锡玄感叹：“水西据黔之腹心，其地广而赋饶，凡瘠土皆我黔土，而酋壤无非沃壤也。”[115]《明史》亦称：“乌

蒙、乌撒、东川、芒部……乌撒富盛甲诸部，元时尝置军民总管府。”“贵州土官以百数，水西安氏最大。”[116]

水西等土司逋负、请求蠲免的行动一直持续不断，永乐一朝基本上继承了朱元璋时期的绥抚政策，当贵州宣慰使等以灾荒请求蠲免时，朱棣非常爽快便予以恩准。[117]成化二年（1466），面对贵州宣慰司等土司拖欠大量税粮的情形，黔抚李浩奏请用住俸等手段究治当事人的责任。布政使萧俨进一步指出，土官不支俸，住俸无任何意义，他建议：

其长官原系六品，就照流官六品以下拿问事例；宣慰宣抚系五品以上，免提，仍照违限杖罪，纳赎。若至三、四年不完者，许奏请提问如律监追，完日流官方许支俸，土官方许管事。

因为当时有不少土官目把随明军征苗，所以户部尚书马昂认为应姑暂免提，“俟至成化四年秋，过限不完，将土流官吏目把人等提问如律。其慰抚长官各取违限的本招服缴报，如违至四年不完，指名奏提施行”。[118]

不过惩罚措施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例如直到正德五年（1510），乌撒土府尚拖欠着弘治十八年（1505）应起运贵州的秋粮，明廷并未予以蠲免，但同意按弘治十七年的规定每石折银三钱缴纳（十八年每石折银四钱）。[119]嘉靖年间，亲历乌撒的熊过抱怨：“（乌撒）始定岁入粮二万石，今仓廪空虚，损原额四之三，使在官者乏代耕之禄，嗷嗷然执左契以责。既廪之负，毡本一千五百领，今课录其入，曾不得拔一毛焉。”[120]万历八年（1580），乌撒又被警告必须如数输赋，否则将受到参治。[121]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系列持续不断的逋负斗争，贵州宣慰司等土司的赋额得到较大程度的削减。兹据嘉靖《贵州通志》卷四，制定表2-2。[122]

表2-2 明中期贵州宣慰司赋额

单位：石

纳粮者	夏税（共 32.9066）		秋粮（共 8546.6799）		备注
	存留	起运	存留	起运	
宣慰安仁			1990	2000	1. 起运平坝仓秋粮195.5石,《贵州通志》未注明缴纳者，但本表秋粮总数已将其计算在内；
副宣慰宋夔	3.3233		1057.333		
同知安然			24.733		
贵竹长官司	6.95		151.5346		
水东长官司			462.2807		
白纳长官司			165.843		
札佐长官司	6.3		68.501		
养龙长官司	2.5		65		

续表

纳粮者	夏税（共 32.9066）		秋粮（共 8546.6799）		备注
	存留	起运	存留	起运	
底寨长官司	3		73.66		2. 夏税以小表为主，此外还有苦莜，本表统一计算，未加细分，《贵州通志》载夏税总数为 32.9166 石，但本表加总各纳粮者的赋额，为 32.9066 石，疑《贵州通志》有误； 3.《贵州通志》载秋粮总数为 8546.6673 石，但本表加总的结果为 8546.6799 石。疑《贵州通志》有误
乖西长官司			161		
中曹长官司			71.9		
青山长官司	6		122.6327		
龙里长官司	4.8333			150	
谷龙头目宋居宗			100.5	121	
头目黑冲			75		
水西七百房			199.5		
头目阿六			187.0417		
永侧头目			395.5		
头目阿登			93.5735		
头目促俄			97.175		
头目普杓			140.855		
头目阿洒			120.15805		
远地则溪头目阿高			79.8		
远地则溪把事阿抄			110		
头目种叶			64.895		
僧纲司			0.3459		
潮音寺			1.41775		
未知（起运平坝仓）				195.5	

整个贵州宣慰司夏税秋粮共8579余石，其中水西首领、贵州宣慰使安仁所纳赋额为3990石，远远低于上文所提及的两万石，更低于明初的八万石。万历八年，贵州宣慰司的秋粮又从8546余石减至8155余石。十七年后，增至8207余石。[123]乌撒在万历年间按规定应纳一万石，[124]同样远远没有达到洪武十七年所定的税额。

除赋税外，水西等土司尚须承担一定的徭役。按嘉靖《贵州通志》的记载，黔省的徭役名目主要有驿马铺陈、渡夫、馆夫、柴薪夫、马夫、皂隶、弓兵、刷历匠、站夫、门子、禁子、铺司兵、仓斗级、有马旗军、走递马、儒学斋膳夫等，其中对驿马铺陈的描述差不多占了整个《徭役》篇的一半内容，[125]凸显出驿传在官员、士大夫心中的独特地位。[126]

驿传徭役主要包括供馆以及提供马驴、铺陈等，供馆似指在驿站值日，提供服务；铺陈似指卧具等陈设。贵州宣慰司参与服役的驿站有贵州驿、龙里驿、新添驿、威清驿等。以龙里驿为例，由程番府与贵州宣慰司所领的水东、中曹、白纳、龙里四长官司共同应役，共提供马驴45匹（头）；铺陈30副，每三年照例征解；每年龙里司供馆193日，水东司供馆37日，中曹、白纳二司各42日，程番府属大谷龙、小谷龙长官司共46日。[127]

作为黔省最大的土司，水西安氏独立承办贵州北部、西北部共十三个驿站的徭役，或许正因为系独力应役，无必要特别说明供馆日数，所以方志中没有记载此项数据。（见表2-3）

表2-3 水西所承担的徭役

驿站名称	马、驴（匹、头）	铺陈（副）	供馆
札佐驿	马 20	20	未注明
底寨驿	马驴 20	15	未注明
养龙驿	马 15	15	未注明
渭河驿[a]	马 4	4	未注明
龙场驿	马 23	23	未注明
陆广驿	马 18	18	未注明
谷里驿	马 19	19	未注明
水西驿	马 22	22	未注明
奢香驿	马 17	17	未注明
金鸡驿	马 21	21	未注明
阁鸦驿	马 18	18	未注明
归化驿	马驴 24	24	未注明
毕节驿	马驴 24	24	未注明
总　计	245	240	未注明

注：a. 渭河驿于万历九年裁革。

资料来源：嘉靖《贵州通志》卷 4《徭役》。

三 “土官名下总行认纳”

在没有里甲制，人丁事产难以知悉的情况下，明政府在贵州宣慰司特别是水西怎样征赋派役？这是下文将探讨的问题。

与里甲制的阙如相应，朝廷在黔西北等地区并不实行按丁亩输粮应役的原则。史载：“贵州所管田无顷亩，粮无科则，止凭诸苗认纳。”[128]“（贵州布政司）每岁该纳粮差俱于土官名下总行认纳。”[129]因此地方志中记载土司地区的税粮时，往往会直接说明是某个土官所缴纳（见表2-2），嘉靖《贵州通志》论及水西承担的驿传徭役时亦称：“以上十二驿俱宣慰使安仁管下出办。”[130]可见，“额以赋役”的对象是土官，而非其所辖的田土人民，其原则是“认纳”，并无一定标准，只有一个笼统的“照地方广狭”的规定。[131]根据形势的变化以及地方官员同土司关系的差异，粮额似乎会出现一些波动，并无确切的定数。万历以来的耕地丈量，其目的是要用按丁亩输粮应役的精神来规范贵州地区的赋役征派，从而方便官府的控制与管理，减弱对土官的依赖程度，但这次变革并未涉及水西。

乌撒的赋税材料不如水西丰富。《万历会计录》记载乌撒岁纳秋粮米1万石，其中9400石起运贵州，存留600石，起运粮至少在弘治时已开始折银征收，每石三四钱。[132]但万历年间刻印的《四川重刊赋役书册》上并未登载乌撒、乌蒙、东川等土府的赋役数据，[133]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赋税征收与差役征派似按另外一套原则来进行，考虑到人丁事产数的不完备，对土知府的依赖似乎在所难免。

从逻辑上考虑，徭役不根据丁粮而由土官认办暗含着这样一种可能，如果朝廷能更深入地控驭土官，则可以责以更多的差役。事实正是如此，如安万铨任贵州宣慰使时，水西又额外应承了威清驿的铺陈。[134]

由表2-2可知，受中央王朝赐封的土司如贵州宣慰使安仁、同知安然等都承担了一定的赋役，而一些在制度与名义上与中央王朝关联不大的地方势力，也成了“额以赋役”的对象，如头目阿留等，在整个贵州宣慰司，这类头目大致有十来位，其中可以肯定在水西君长辖土内的有远地则溪头目阿高、把事阿抄以及永侧头目促俄等。[135]至于“水西七百房”的含义，笔者目前尚不清楚。

远地宅溪应是于底则溪的另一音译，属安氏的十三则溪之一，位于鸭池河以东，与洛（六）慕则溪一起构成了安氏管辖的水外六目地。[136]这些地区毗邻贵阳，与官府及汉人接触较多，所受影响较大，[137]这或许便是阿高、阿抄等纳粮的原因。除纳粮头目均位于安氏辖土的边缘地区外，尚可推知安氏所辖近50位土目，大部分未受明朝廷的控制。

虽然在名义上赋税“征之土官”，但乌撒、水西的君长们自有一套制度将其转嫁至属下及原住民身上。就黔西北来说，由土官总行认纳，“照

地方广狭以纳秋粮”的赋役原则并非明廷的创造。在则溪制度下，君长征税派役并不需要调查登记丁亩，而是向各宗亲、土目摊派，真正的承担者则是宗亲们领有的一般百姓。崇祯年间总督西南军务的朱燮元指出：

查宣慰地方原有九驿，除水外三驿臣久割其土地人民，不复责成外，今尚存谷里、水西、奢香、大方、阁鸦、归化六驿，向系宣慰支应，该司分派苗民，量地方大小出供马匹，又按日派夫走递。各管事目把多方掊克，苗民深苦其苛。[138]

彝书载有各土目的税额。据说在辛亥年，当乌蒙府家女儿禄宜仲默做大斋祭天地神祇时，水西君长阿亚奢知便开始着手制定婚丧礼仪制度，令子孙遵照执行。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各个仓库（则溪）的负责人慕濯、土目，在君长家婚丧时应缴纳各种妆饰品、银两、牲畜等。何种场合应进贡何种物品、数目多少等都有详细的记载。《水西制度》云：

第十三章 阿者君长阿亚奢知制定的婚丧制度

管戛勒仓库的扯老底苏家，应出做斋时的壮牛一对，应纳婚姻所需的骏马一对，金霞帔一件，头上前后佩带的金首饰、金飘带、金腰带一套，还有银亮的钗一支，金子十两、银子十两；另在还大愿时出银二十四两，还小愿时出银十二两；猪租一百二十个，鸡租一百二十对，另外还要骡马十二对；阿外阿诺家，应缴骡马六对，做斋时要出一对壮牛，娶媳妇时要出一对骏马，金五两，银五两。还大愿时要出银六两，还小愿时要出银三两；猪租六十个，鸡租六十对。阿外阿卜家……

管火者仓库的洛纳归宗家，应出骡马十二对，做斋时应出一条壮牛……

管六慕仓库的陇杓化那家，做斋时应出一对壮牛，应纳婚姻礼马雄壮的一匹……

第十四章 阿者君长家做斋追荐祖先、婚姻纳贡的总规章

……戛勒仓库方面为还大愿、还小愿应上纳的银两共是六十两另七钱；火著仓库方面为还大愿、还小愿应上纳的银两共是七十四两，两处仓库一共出银一百三十四两七钱。……慕垮仓库方面，应出一对雄壮勇马，另外上等马四匹，普通好马三匹，一共七匹马；做斋时用的牛一对壮牛，上等壮牛一条……迂底仓库方面，应出二对雄壮的牛并二锅（肉）……

第十五章 论阿者家婚丧所用牲畜与妆饰等

……各宗亲应出妆饰品名称如下：苴岂莫纪、阿达、阿户、阿孟、以几、卜杓必迭、阿波伍仁，以上八家出的有金霞帔、头上前后佩戴的银首饰、银飘带、银腰带。……以上这些，各宗亲必须上纳的。[139]

阿哲（者）君长的征税范围涉及水西、水东的13个则溪（仓库），摊派至各个头目，这正是“土官名下总行认纳”的精神。而各宗亲、土目上缴物品的多少，反映的可能是他们的贫富差别以及与君长关系的亲疏。除了迂底（远地）则溪的个别头目外，大部分土目不再向官府纳税，直到明末清初这一状况才发生变化。

同其他地区一样，明中叶以来贵州的赋役制度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嘉靖时部分徭役折银征收，如镇远驿的徭役由石阡、思南、思州、黎平、铜仁等府出办，其马、驴48匹（头），每马折白银35两，遇朝贡科举之年加五两，每驴价银18两；供馆，思南府负责100日，石阡府130日，镇远府70日，铜仁府66日，每日用银2两；铺陈18副，“照例征银解布政司制给”。[140]

在折银的制度下，所谓马多少匹、驴多少头之类已不再指具体的马、驴数目，而是一种计量赋税的方法与单位，通过一定的比率，马驴与白银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这样，文献中出现“（贵州驿）马四十六匹零一脚”“（清平驿）马驴四十一匹头，平越驿借去一匹半”等就不足为怪了。[141]万历年间黔省进一步实行一条鞭法，将所有徭役合并为银差、力差、公费三项，通省共条鞭银84506.19两。[142]

但徭役方面的改革并未波及水西，嘉靖《贵州通志》仅仅列举出龙场九驿、草塘四驿的名称以及应供给的马驴、铺陈数，然后以“俱宣慰使安仁管下出办”一笔带过，不像对其他驿站那样详细叙述驿马、供馆、铺陈的折银数。万历《贵州通志》载贵州宣慰司条鞭银共3417两9分，但这些银两全由龙里司、白纳司、养龙司等长官司出办，与水西无关。[143]换句话说，水西根本没有改行条鞭。

其实，在里甲阙如，赋役由土官名下总行认办的情况下，按丁亩摊派赋役并折银的办法没有必要，亦难以实行。并且除驿站之外，水西不再承担门子、弓兵、柴薪夫之类的杂役，徭役的合并无从谈起。而从朝廷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够有效控驭土官，同时土官又能够有效统率所属原住民的话，赋役由土官总行认办未必不是一个省事、省力的办法，水西正是这样一个范例，兹分析如下。

除了均平负担的目的外，贵州的赋役改革还有自己独特的背景，嘉靖《贵州通志》云：

贵州军民杂处，民固夷也。虽租赋徭役略仿中原，而椎髻鸟言，终骇官府。故有司之役惟汉人，军卫之役惟卒伍，而诸夷当役于官府者，又各目汉人、卒伍代之而取其直焉，是汉人、卒伍一身而众役萃矣。又其弊也，直不可得，役不能免，乃使众汉人、卒伍共佐之，是众人一身而众役萃矣。[144]

可见，尽管明廷在贵州的许多土司地区实行了里甲制，但语言、文化的隔阂，使得官员既不易役使原住民，也不愿役使原住民，这样，原

住民以钱（银）代役，官府另行雇汉人应役的办法应时而生。但随之而来的可能弊端就是无法向原住民征取折役的钱银，“直不可得，役不能免”，大量卫所士兵成为无偿为驿传服务的苦力，“军多被累，破产代办。畏患马馆有甚于征戍者，是驿传之弊也”。[145]

相对而言，由水西土官总行认办的驿站差役，不但完全省却了官员、汉人、卒伍的麻烦，并且效率之高、行路之安全在贵州诸驿中堪称榜样。曾游历黔省的王士性称：

贵州南路行于绿林之辈，防御最难。惟西路行者，奢香八驿，夫马厨传，皆其自备；巡逻干掫，皆其自辖，虽夜行不虑盗也。彝俗固亦有美处。[146]

直到崇祯九年（1636）总督朱燮元力图将水西之地纳入“版图”之后，水西的驿传之役才开始折银征收。

除了输赋应役外，当明王朝面临内忧外患时，土司须召集土兵随朝廷军队出征，粮饷可由明廷拨给。水西土司就曾参加过征播、征路苗的战争。[147]但明廷需要土兵之时往往亦是自己相对虚弱之时，一些土官会借从征之机需索甚至反叛，令形势雪上加霜。嘉靖年间湖广川贵军务总督张岳指出：“湖、贵节年用兵，俱调土兵，各该土官挟贼而为利，邀索无厌。”有的土司甚至“私募苗贼以充兵数，所支行粮分给各贼”。[148]所以《明史》称：“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149]后文论述奢安起事时将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1]龚荫所著《中国土司制度》第1～168页完整论述了这个演变历程。

[2]《史记》卷117《司马相如传》。

[3]彭建英亦将土司制度视为一种羁縻政策，参见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14页。

[4]《明史》卷310《土司传》。

[5]例如，1949年以后，学界对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变迁有了较多的研究，这些研究大致从社会形态更替（封建地主制取代农奴制或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等宏观的角度展开，并且大都或预设了生产方式演变的理论前提，或着重于描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先进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或流于泛泛而谈。对改流前后少数民族社会的实态特别是权力关系的变化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性研究，使我们难以真正理解改土归流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参见温春来《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以贵州西北地区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2分，2005。

[6]王恽《秋涧集》卷50《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乌兰氏先庙碑铭》。《元史》卷121《兀良合台传》亦载：“丁巳，以云南平，遣使献捷于朝，且请依汉故事，以西南夷悉为郡县。从之。”

[7]《元史》卷10《世祖纪七》。

[8]参见柯绍忞《新元史》卷248《云南湖广四川等处蛮夷·八番顺元诸蛮》。

[9]参见方国瑜《彝族史稿》，第470、500～501页。

[10]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5《旧事志一·纪年上》；《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四》，卷131《速哥传》。

[11]《元史》卷12《世祖纪九》；卷27《英宗纪一》；卷100《兵志三》。

[12]《经世大典序录·屯田》，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1。

[13]参见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第130～132页。

[14]《元史》卷91《百官志七·宣慰使司》。

[15]参见《元史》卷12《世祖纪九》；卷17《世祖纪十四》；卷134《斡罗思传》。

[16]参见《元史》卷18《成宗纪一》；卷19《成宗纪二》。

[17]忙古带系契丹人，参见倪蜕《滇云历年传》，李埏校点，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第208、210页。

[18]许多土酋手握重兵，其效忠并不总是可靠（特别是元廷向他们谋求经济方面的利益时），流官政权时时受到威胁。元代黔西北的反叛行动持续不断，较大规模者有：大德元年（1297），元廷征“八百媳妇”，取道顺元一带，沿途征调丁夫、马匹，并要求水西女酋长蛇节献金、献马，结果引起了水东酋长宋隆济与蛇节的联合反叛，攻陷贵州（今贵阳），杀知州张怀德，乌撒、乌蒙、芒部、东川诸部很快亦出兵响应，元王朝调集川、陕、滇、湖四省军队，卒两年之功，方戡定动乱（参见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180～183页）；至顺元年（1330），乌撒酋长禄余聚兵反叛，杀害乌撒宣慰司的官吏，并联合乌蒙、芒部、东川诸部，于次年袭杀宣慰使月鲁，并进攻顺元路。经过数次争战，至顺三年，元廷接受了禄余的降附（参见《元史》卷34～36《文宗纪》）。

[19]《元史》卷11《世祖纪八》；卷12《世祖纪九》；卷163《李德辉传》。道光《大定府志》卷47作：“亦奚不薛军民千户宋添富及顺元路军民总管兼宣抚同知阿里等来降。”今从《元史》。

[20]道光《大定府志》卷47《旧事志三·水西安氏本末上》。

[21]参见《元史》卷91《百官志七·宣抚司》。

[22]参见《元史》卷36《文宗纪五》。

[23]《元史》卷103《刑法志二·职制下》。

[24]《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5]《元史》卷11《世祖纪八》。

[26]参见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7页。

[27]参见《元史》卷13《世祖纪十》。

[28]《元史》卷103《刑法志二·职制下》。

[29]参见《元史》卷34《文宗纪三》。

[30]参见周洪谟《安氏家传序》（嘉靖《贵州通志》卷11、万历《贵州通志》卷23）。《安氏家传序》称：“至正十九年（1359），以阿那授三珠虎符、昭勇大将军、顺元路总管。疾卒，弟阿拂即阿画至大元年（1303）袭授武略将军……”疑至正十九年乃至元十九年（1282）之误。又，四库全书本《明一统志》卷88亦载有阿画、霭翠事迹，但较简略，且所任官职之名与所受封号与《家传》有不同之处。

[31]明代土司制度的规范化表现在：确立了专门的土司职官，并且不再随意变动其职衔、品级，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土官的律例；等等。当然，所谓规范是相对元朝的土官管理而言，即使不考虑制度具体实施的复杂性，明代土司制度依然有许多不“规范”之处，如“文职”“武职”的混乱等，详后。

[32]田雯：《黔书》卷3《人物名宦·济火》。

[33]参见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第162～163页。

[34]《明史》卷310《土司传》。

[35]参见《明史》卷123《明玉珍传》。

[36]参见《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正月乙丑条；卷84，六年八月戊寅条；《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就笔者所见史料，元代并未设置贵州宣慰司，或许因为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司治在贵州（今贵阳），所以又称贵州宣慰司。又，方国瑜根据水西与朝廷的紧张关系，认为霭翠于洪武初降明不可信，怀疑应是洪武十六年（《彝族史稿》，第535页），这是因为没有看到《明太祖实录》中的这两条材料而导致的误解。又，明人徐学聚所撰之《国朝典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丛书本）卷176《兵部·土官》云：“（洪武）五年八月，贵州宣抚使霭翠请讨部落陇居。”疑宣抚使系宣慰使之误，因为《明太祖实录》卷75洪武五年八月己卯条尚称：“贵州宣慰使霭翠上言：‘部落有陇居者……’”

[37]当时乌撒女酋长实卜仍然担任着元朝云南行省右丞一职。天启《滇志》卷18《特谕云南诏》云：“（乌撒等）西南诸夷，为云南梁王所惑，恃其险远，弗遵声教。”此外尚可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12《太祖平滇》；《明史》卷124《把匝剌瓦儿密传》，卷311《四川土司传一》；张紞《云南机务钞黄》，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条。

[38]《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尚可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40，洪武十四年十二月辛未条。

[39]以上关于明军征滇的论述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39，洪武十四年九月壬午、丁未条；卷140，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丁未，十二月辛酉、丙寅、辛未、戊寅条。明人王世贞认为水西霭翠在征滇之役中与明军对抗，称“其强首霭翠亦降，云南悉平”（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84《文部史传·韩宋颍三国公传》），今人亦有认为洪武十五年正月以前，霭翠已与明朝敌对者（参见黄彰健《明史贵州土司传记霭翠奢香事失实辨》，《大陆杂志》第68卷第2期，1984）。但前文所引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敕乌撒、乌蒙诸部的上谕中，仅称“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建昌诸部长犹桀骜不朝。朕已遣征南将军颖川侯、左副将军永昌侯、右副将军西平侯率师往征”，只字未提水西有何不恭顺，且未将其列为讨伐对象，笔者亦未见到征滇过程中水西与明军交兵的记录，因此水西与朝廷敌对之说似欠妥。

[40]以上叙述参见佚名《土官底簿》卷下；《明太祖实录》卷142，洪武十五年二月戊午条，卷143，洪武十五年三月己未条，卷152，洪武十六年二月辛卯条。明廷封实卜等为土知府，并未授予他们元代的“原官”。

[41]《明史》卷310云：“（土官）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天顺末，许土官缴呈勘奏，则威柄渐弛。”《明史》这段叙述可能本自郑晓的《皇明土官

志论》（载明人贺复征所编《文章辨体汇选》卷419），但郑晓的论述更为详细。除了授权方面的象征意义外，明廷还将朝贡视为土官是否恭顺的一项重要标志，要求他们按期入贡。万历《明会典》卷108《朝贡四·土官》载："湖广、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腹里土官，遇三年朝觐，差人进贡一次，俱本布政司给文起送，限本年十二月终，到京庆贺，限圣节以前。谢恩无常期，贡物不等。"土官（或其使者）到京后，鸿胪寺即与引见，"并投进实封奏本，其方物赴礼部验进"。但实际的朝贡次数却与制度规定有较大差异。水西与明廷的关系亲密，朝贡频繁，据《明实录》，洪武十一年之前，水西差不多一年一贡，停贡三年之后，自十五年起，朱元璋执政期间几乎一年一贡，洪武二十八年甚至达到一年三贡。永乐元年则一年两贡，之后一直到万历年间，基本上一年一贡。所以《明史》卷316称："（水西）自是每岁贡献不绝，报施之隆，亦非他土司所敢望也。"而乌撒不但要等到明军大张挞伐之后才归顺，并且缺贡、迟贡的情况屡屡发生，由此受到明廷在赏赐方面的惩罚。因为朝贡所蕴含着的政治象征意义，所以明廷不吝经济方面的付出，除了负担朝贡旅途上的主要开支外，还对来朝土官大加赏赐，特别是对贵州宣慰司（即水西安氏）这样的大土司，赏赐尤其丰厚。由于明廷对维持朝贡的付出太大，曾先后规定了限制朝贡人数、不必进京等方面的措施。总之，朝贡作为一种羁縻手段，其着眼点在于政治象征而非实际的物质利益。

[42]参见王恕《王端毅奏议》卷14《议御史冯玘奏状》。

[43]特别建制的意思是说这些官名都是针对土官而设，与流官无关。

[44]万历《明会典》卷4所载宣抚司首领官中无照磨，《明史》卷76中则有"照磨一员"的记载。

[45]参见《明史》卷76《职官志五》；万历《明会典》卷4《官制三》，卷118《兵部一》。

[46]《明史》卷309《湖广土司传》。

[47]参见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第160页。

[48]参见《续通志》卷136；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上），《边政公论》第2卷11期，1943；胡庆钧《清初以来彝族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第159～160页；龚荫《中国土司制度》，第57～62页；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第15页；陈耀祖《土司制度之研究》，第3～4页；John E.Herman，"Empire in the Southwest 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1（1997），pp.47-74。

[49]参见龚荫《中国土司制度》，第57～62页；白耀天《土官与土司称谓考辨》，《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3期。

[50]参见John E.Herman，"Empire in the Southwest：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1 （1997），pp.47-74。江应樑亦认为宣慰等即土司，土知府等即土官（参见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第2、4～7页）。这样的区分其实是有违史实的，文献上宣慰等称土官，土知府等称土司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贵州水西土官霭晖等进马。"（《明太祖实录》卷193，洪武二十一年九月辛卯条）"又土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有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蛮夷长官司五。"（《明史》卷40）"三十八年诏东川土司并听云南节制。"（按：东川本系土府，《明史》卷311）"蜀、黔之乌撒、乌蒙、芒部、沾益土司悉（水西）安酋姻连至戚。"（《明熹宗实录》卷79，天启六年十二月戊申条）

[51]参见杜玉亭《土官土司两类说考疑》，《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以下凡引用杜玉亭的研究，未注明出处者，皆来自此文。白耀天亦认

为“土官属文职，土司属武职”之说于史实未合，他还指出嘉靖二十五年文献中即有“土司”一词出现，较杜玉亭所说的嘉靖四十五年提前了20年。参见白耀天《土官与土司称谓考辨》，《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3期。

[52]《明史》卷74《职官志三》。

[53]《明史》卷71《选举志三》。

[54]《清史稿》卷74《地理志二十一·云南永昌府》。

[55]《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

[56]倪蜕：《滇云历年传》，第328页。

[57]参见龚荫《中国土司制度》，第58页。57个宣慰、宣抚并非同时存在，龚荫统计的应该是有明一代曾经分封过的土司。

[5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4《土司》。

[59]参见弘治《明会典》卷179～180。

[60]万历《明会典》卷4《吏部·文选清吏司·官制三》。

[61]贵州宣慰司地当川黔要道，控扼入滇一线，势力达到了交通便利的贵阳，宣慰使安氏、同知宋氏洪武年间已改汉姓，安贵荣、安国亨等有较高的汉文造诣，宋氏更是诗人辈出，有《联芳类稿》《桂轩拙稿》等诗集问世（参见郭子章《黔记》卷14《艺文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清人朱彝尊所编《明诗综》卷93即收录有宋氏土司宋昂、宋昱的诗。并且宋氏领地有许多仕宦经商者移入，汉化程度深，很早就设立了里甲制，隆庆年间开始小规模的改土归流，废除贵竹司、平伐司，设置了贵阳府、新贵县。（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3、万历《贵州通志》卷3）

[62]参见嘉靖《四川总志》卷16《经略中·夷情·芒部、乌蒙、东川、乌撒》；《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明世宗实录》卷87，嘉靖七年四月甲寅条；胡世宁《胡端敏奏议》卷9《抚处夷情以安地方疏》。

[63]甚至质疑土官文、武二类说的杜玉亭都根据文献（即材料二）认为所有土职在明初都是属于隶部，洪武末年宣慰等才改隶兵部，只是没有真正得到贯彻。

[64]杜玉亭根据“嘉靖九年始复旧制……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详细引文见材料五）的记载，认为嘉靖九年后，“土府州县承袭批准不必由中央吏部，而是改由行省政府决定了。宣慰、宣抚等司承袭的批准不再是由中央的兵部，而是各行省的‘军区司令’——都指挥使了”。事实上，布政使与都指挥使从来都只有勘查承袭人资格的职责，最后必须“报部定夺”。“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同中央下放土官承袭批准权是两回事，在此征引几则嘉靖九年及之后的规定以说明此问题。“嘉靖九年题准，土官衙门造册，将见在子孙，尽数开报，某人年若干岁，系某氏生，应该承袭，某人年若干岁，某氏生，系以次土舍，未生子者，候有子造报，愿报弟侄若女者，听，布政司依期缴送吏兵二部查照。”“（嘉靖）四十五年题准，各处土官病故后，勘报过一年者，行巡按官查究。二年以上者，听吏部径直查参。隆庆四年奏准，今后土官袭替，除愿赴京者，听，其余酌量嘉靖年间事例，各照品级输忠纳米，折银完日，布政司即呈抚按勘实具奏，吏部查对底册明白，照例查复付选。万历九年，停止输纳事例，令该管衙门，作速查勘明白，取具亲供宗图印结，具呈抚按勘实批允，布政司即为代奏，吏部题选，填凭转给土舍，就彼冠带袭职，如有情愿亲自赴京者，听。十三年题准土官病故，应袭土舍具告该管衙门，即为申报抚按勘明，照例代奏承袭，不得过三年之外，若吏胥勒索及承勘官纵容延捺，不行申报者，抚按官即据法参治。其土舍自不告袭，故违至十年之外者，即有保结，通

不准袭。”以上引自万历《明会典》卷6《土官承袭》，同书卷121《土夷袭替》尚有许多记载，类似的规定非常多，难以悉举。

[65]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以六部之属皆称部，混而无别，故改名。参见《明实录》卷246《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庚戌条。

[66]明制，凡文职衙门皆设有正官与首领官，而武职如都司、卫所则没有这种设置。参见万历《明会典》卷1～4、118。

[67]参见万历《明会典》卷118《兵部一·武选清吏司·铨选一》，卷1～4《吏部·官制》。鉴于宣慰、宣抚等并不一定领于都司，明人徐学聚称：“（土官）隶验封者皆领于布政司，武选所隶，或领于都司。”参见《国朝典汇》卷176《兵部·土官》。

[68]参见张岳《小山类稿》卷4《极陈地方苗患并论征剿抚守事宜疏》；卷5《苗贼突劫思州疏》。

[69]白耀天亦指出不论何种官称的土官都养有土兵，如泗城州土知州曾率一万二千土兵援黔。参见白耀天《土官与土司称谓考辨》，《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3期。

[70]参见万历《明会典》卷124《都司卫所》。

[71]参见前引John E.Herman的论文。白耀天亦认为宣慰司、长官司等土职政权中原则上没有流官吏目，而土府、土州中则有流官吏目，参见白耀天《土官与土司称谓考辨》，《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3期。

[72]《明史》卷76《职官志五》。

[73]《古今图书集成》卷1521《贵州总部总论·黔省总论》。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7。

[74]民国《贵州通志》第18册《前事志九·兵部议复思南府蛮夷长官安逸奏请筹边五事》。

[75]参见《明太宗实录》卷137，永乐十一年二月辛亥条。

[76]清人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卷43云：“贵州宣慰家水西所辖长官司四十八，每司锐卒数千。”按，明代史料中并无朝廷在水西赐封长官司的记载，孙承泽的错误来自他对水西四十八土目的想当然理解。

[77]参见郭子章《黔记》卷56《同知安氏》。

[78]《明神宗实录》卷556，万历四十五年四月己亥条。

[79]《明史》卷310《土司传》。

[80]参见万历《贵州通志》卷4《贵州宣慰司》。

[81]《明史》卷77《食货志一》。

[82]万历《明会典》卷20《黄册》。

[83]刘锡玄：《黔牍偶存·黔南学政·严禁妄攻（改）冒籍详文》。

[84]《明神宗实录》卷414，万历三十三年十月甲寅条。

[85]参见嘉靖《思南府志》卷1《地里志》；万历《铜仁府志》卷2《坊乡》。

[86]民国《贵州通志》第18册《前事志九·兵部议复思南府蛮夷长官安逸奏请筹边五事》。

[87]道光《大定府志》卷40《经政志二》。水西地区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在此设置大定府。

[88]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3《土田》。

[89]《万历会计录》卷14《贵州布政司田赋》。

[90]参见万历《铜仁府志》卷3《食货志》；刘庠等《丈田疏》，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郭子章《黔记》卷11《贡赋志上》。

[91]嘉靖《贵州通志》卷3。通省田土数据之后，嘉靖《贵州通志》还开列各地的数据，可以发现，地方官府所知道的其实主要是卫所的田地数，土司与府、州的田土数据并未记载。

[92]嘉靖《贵州通志》卷3《土田》。

[93]刘庠等《丈田疏》，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

[94]毕自严：《复贵州巡按恭报屯田新增谷石的数疏》，《度支奏议·贵州司一》。

[95]李荫荞：《贵州田赋研究》，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7，第20~23、384、385页。

[96]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3《李芝龄学使力阻颜巡抚丈量黔省地亩》，中华书局，1984。

[97]参见《贵州田赋研究》，第116~133页。

[98]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63，万历四十五年十一月癸亥条。

[99]《明史》卷260《杨鹤传》。

[100]康熙《平远州志》，转引自乾隆《平远州志》卷6《赋役》。

[101]参见万历《四川总志》卷17《郡县志·乌撒军民府》。

[102]参见《明史》卷77《食货志一》。

[103]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1《建置沿革》。

[104]这是曾出差贵州的吏部侍郎何文渊的说法（参见于谦《忠肃集》卷3《南征类·兵部为怀柔远人事》），蛮夷长官安逸的奏疏可与此相印证："贵州左布政使滕胧奏准，将湖广布政司旧管思州、思南两宣慰司地方分设八府，比较腹里，不满一县人民。"参见民国《贵州通志》第18册《前事志九·兵部议复思南府蛮夷长官安逸奏请筹边五事》。事实上，直到康熙初年，知思州府的陆世楷尚称："思州虽列为府，所属止四土司居民，附郭不满百家，丁粮不及一小县，而又商旅不通，营伍不设，供亿难与他府齐。宜仿黔西、平远近制，降为州，隶之镇远。"（朱彝尊《曝书亭集》卷78《中宪大夫知思州府事陆公墓志铭》）

[105]1942年划乌撒东部地区为赫章县，尽管如此，威宁县（乌撒西部地区）的面积仍然广达6295平方千米，为贵州省面积最大的县。参见《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第1~2页。乌撒的人口没有明确记载，但明人

徐学聚所撰之《国朝典汇》卷177称：“（洪武十五年）四月，乌撒诸蛮复叛，傅友德、沐英进兵击之，大败其众，斩首三万余级，获马牛羊以万计。”《明史》卷129《傅友德传》亦有类似记载，可见乌撒人口应当不少，否则也不会“富盛甲诸部”。（《明史》卷311）

[106]参见《万历会计录》卷14《贵州布政司田赋》；嘉靖《思南府志》卷3《田赋志》，卷7《拾遗志》。

[107]《明史》卷77《食货志一》。

[108]参见《四川重刊赋役书册》。笔者所见明代川省通志（包括正德、嘉靖、万历三种版本），虽然有专章论述乌撒府，但同样没有提及人丁、田土、赋役方面的数据。东川、芒部等土府的情形亦与乌撒相似。

[109]《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110]参见《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111]《明太祖实录》卷188，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条；卷230，二十六年十一月庚戌条。

[112]参见《明太祖实录》卷235，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甲辰条。明初对西南地区的怀柔、绥抚比较普遍，并非只针对贵州宣慰司，例如当乌撒、乌蒙、芒部、东川已经不按定额输赋时，朝廷诏令免征，并且申饬有司不得复征。参见《明太祖实录》卷241，洪武二十八年九月乙卯条。

[113]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62，洪武十七年五月辛丑条。

[114]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62，洪武十七年五月辛丑条；卷188，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条。

[115]刘锡玄：《黔牍偶存·围城日录·叛逆缘起》。

[116]《明史》卷260《杨鹤传》。

[117]《明太宗实录》卷51，永乐四年二月癸酉条。

[118]《万历会计录》卷14《贵州布政司田赋·沿革事例》。

[119]《万历会计录》卷14《四川布政司田赋·沿革事例》。

[120]熊过：《与黔国公》，黄宗羲编《明文海》卷188《书四十二·忠告》。

[121]参见《明神宗实录》卷105，万历八年十月辛亥条。

[122]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4《财赋》。还有一些头目如“头目阿登”“头目阿留”“谷龙头目宋居宗”等亦有纳粮的记载，《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云：“宣慰安氏亲领夷罗民四十八部，谓部长曰头目；宣慰宋氏亲领夷汉民十二部，谓部长曰马头；同知安氏亲领夷罗民一部，谓部长曰头目。”因此这些头目似属水西安氏所辖，但“头目”一词亦有泛指的可能，并非在任何情况都指安氏管属的土目，如谷龙长官司的宋居宗属宋氏所辖，但被称为“谷龙头目宋居宗”。因此除了远地则溪头目阿高可从则溪二字推知其属水西管辖无疑外，难以肯定“阿登”“阿留”等是否属水西头目。

[123]参见万历《贵州通志》卷4《贵州宣慰司·贡赋》。万历十四年，贵竹长官司改流，附郭贵阳，因此万历二十五年的秋粮数据未包括贵竹司。

[124]参见《万历会计录》卷10《四川布政司田赋·乌撒军民府》。

[125]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4《徭役》。

[126]明代开辟贵州，在贵州设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经营云南，在很大程度上，明政府对贵州的实际控制范围长期局限在驿道线附近，二十余个卫所、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大都分布于此，以维护入滇驿道的畅通。

[127]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4《徭役》。

[128]《万历会计录》卷14《贵州布政司田赋·沿革事例》。

[129]郭子章：《黔记》卷19《贡赋志上》。

[130]嘉靖《贵州通志》卷4《徭役》。

[131]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3《土田·贵州宣慰司》。

[132]参见《万历会计录》卷10《四川布政司田赋·乌撒军民府》。

[133]参见《四川重刊赋役书册》。

[134]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4《徭役》。

[135]万历《贵州通志》卷5《平坝卫·纪兵》称："景泰二年，水西永侧夷民破关攻卫城时顺风纵火，贼众遂溃。"是以知永侧系水西所辖。

[136]参见侯哲安等《明代贵州部分地名考释》，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5集，1980，第60页。

[137]参见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第38～39页。

[138]朱燮元：《西土分设已明下台议善后事宜列款具陈恭请圣裁事》，《朱少师奏疏钞》卷8。

[139]转引自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94～99页。

[140]嘉靖《贵州通志》卷4《徭役》。

[141]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4《徭役》。

[142]参见万历《贵州通志》卷1《省会志》；卷3《贵阳府·徭役》。

[143]参见万历《贵州通志》卷4《宣慰司·徭役》。

[144]嘉靖《贵州通志》卷4《徭役》。

[145]萧端蒙：《议处驿站事略》，嘉靖《贵州通志》卷10《艺文志》。

[146]王士性：《黔志》，丛书集成初编本。

[147]万历三十五年四川巡按孔贞一称："黔以安疆臣长诸蛮，专征调，输粮饷，供驿站，若视为必不可缺附庸之属。"（孔贞一：《核土舍之情形破两省之同异疏》，吴亮辑《万历疏钞》卷42）这是对水西土司所尽义务的简要总结。

[148]张岳：《小山类稿》卷4《论湖贵苗情并征剿事宜疏》。明人罗曰褧所撰之《咸宾录》卷8称："（水西）即听调从征，非邀重赏不行，所过村落杀无噍类。"正德

年间指挥平苗的王琼所撰《晋西本兵敷奏》卷12《为惩不职以安地方事》一疏中亦提到参与平苗的水西土兵溃败后四处抢掠，骚扰毕节等卫。

[149]《明史》卷310《土司传》。

第三章 驿道、卫所与教化

本书第二章的讨论表明，围绕着“宠之名号”与“额以赋役”而制定的种种政策，规定的只是朝廷与土司的关系，并且受到了彝制的制约，难以对普通原住民形成直接的影响。下文将考察卫所制度，该制度的主要内容，并非规定土司的义务及权利，但卫所是在对土酋的武力威慑或征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控扼驿道，形成了一条线状的、明廷可直接管制的区域，在此基础上，各种与土司相关的朝贡、赋役、土兵征调等制度才逐步确立与完善，正如贵州巡抚江东之所云：“贵州汉少夷多，不得不镇以兵威之重。”[1]此外，明代贵州的科举制度、移民潮流等都同卫所密切相关。因此，要深入理解土司制度以及彝族制度在明代的演变，必须对卫所制度有较多了解。

第一节 朱元璋、奢香与川滇黔驿道

贵州行省系永乐十一年（1413）建立，在明代十三布政司中设置最晚，在此之前，只有都司卫所而没有流官行政机构。从财政的角度看，贵州微薄的赋税远远不够维持基本的行政运作，要靠川、湖、滇三省的协济，“官戎岁给，全仰他省”。[2]协济数量甚至超过了黔省各种赋役税课收入之总和，尽管如此，依然“岁出浮于岁入”，“官军俸粮历一二年不支，无从措处”，[3]许多典目、仓丞等小官吏“饿死不得返”。[4]因此，明代开辟黔省的初衷不在于对贵州本地的重视，而在于维护入滇驿路的畅通。[5]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便指示黔西北境内的卫所必须“排在路上”，“如此分布守定，往来云南便益”。[6]明人郑大郁表达了一种普遍的观点：

愚按：贵州古无封域，皆罗施鬼国之地，界在川湖云广之交，地理蛮夷并同滇境，汉民间处其中，地纯夷俗，非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永乐十一年，田酋逆命，削夺其地，开设郡县，山多菁穴，地瘠民贫，官戎岁给，全仰邻省。实不当中土一县，以其取道云南，皆所必由……无贵则无南矣。[7]

传统上，中原通滇的驿路有三条：一由黔，据说辟于战国、秦代；一由蜀，途经金沙江；一由广西，经“粤之田州抵滇之广南”。但由于“蜀道险危，粤江瘴疠，行者视为畏途”，并且“由粤抵滇，取道未免纡远，由蜀抵滇，设邮不无繁费”，所以自元、明以来，“取道于滇者，必指黔中为首途，而粤蜀因之荒莆”，以致“黔有梗，则入滇者无途之从矣！”[8]

滇黔驿路又可分为两条，一条由湖广进入黔东平溪卫（今玉屏县平

溪镇），然后沿镇远府（今镇远县）、贵阳、普定卫（今普定县）、安南卫（今晴隆县）、普安州（今盘州）等地入滇，此为贵州东路，行人最多。西路由四川泸州、永宁进入黔西北的毕节卫、贵州宣慰司、乌撒府等地，抵达云南沾益。[9]西路完全处于水西、乌撒的控制中，又因为阿哲君长奄有水外六目地，直抵贵阳，所以东路也在其控扼之下。史称："水西僻处黔壤中，实蜀滇三省要害也。"[10]天启、崇祯间水西、乌撒、永宁三土司联手起事，云南与中原立即"声息断绝"。[11]

贵州驿道，至少在元代已大体定型，明军征滇路线，即与此基本一致。[12]然而自明代中叶迄今，官员、文人、学者们分析明代贵州驿路的开辟时，莫不提及当时执政水西的女君长奢香，她与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13]围绕着修驿的恩怨故事，长期为学界、地方官员与贵州民间所强调与传扬。1950年代以后，奢香故事又被赋予维护国家统一与各民族团结的时代意义，备受各级党政部门、学术界、民间社会的高度推崇，其故事被谱成诗歌，搬上舞台，其子虚乌有的墓地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建了"奢香博物馆"，声名之隆远远超过了助武侯南征从而奠定水西基业的济火。[14]

细究源流，奢香故事大致本于明嘉靖（1522-1566）进士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兹不惮烦琐，摘引其文如下：

洪武四年，（霭翠）与其同知宋钦归附。高皇帝嘉之，以霭翠为贵州宣慰使，钦为宣慰同知，得各统所部。……霭翠死，奢香代立。煜欲尽灭诸罗，郡县之。会奢香有小罪，当勘。煜械致奢香，裸挞之，欲以激怒诸罗为兵衅，诸罗果勃勃欲反。时宋钦亦死，其妻刘氏多智，谓奢香部罗曰："无哗，吾为汝诉天子，天子不听，反未晚也。"诸罗乃已。刘氏遂飙驰见太祖白事，太祖诏讯之。刘氏对曰："罗夷服义，贡马七八年，非有罪。马都督无故骚屑，恐一旦糜沸，反谓夷等不戢，敢昧死以闻。"太祖然之。还宫以语高后，且曰："朕固知马煜忠洁无他肠，第何惜一人以安一隅也。"命后召刘氏宫中，讯之曰："汝能为我召奢香乎？"刘氏曰："能。"即折简奢香，令速入见。奢香遂与其子妇奢助，飙驰见太祖，自陈世家守土功及马煜罪状。太祖曰："汝等诚苦马都督乎！吾将为汝除之，然汝何以报我？"奢香叩头曰："若蒙圣恩，当令子孙世世戢罗夷，不敢生事。"太祖曰："此汝常职，何言报也？"奢香曰："贵州东北间道可入蜀，梗塞久矣。愿为陛下刊山，开驿传以通往来。"太祖许之。乃召煜入朝议事。煜初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大恨曰："孰为马阎王乃为二妮子坑耶！悔不根薙，赭为血海也。"既入见，太祖数其罪状，煜一无所答，第曰："臣自分枭首久矣！"太祖怒，立斩之。以其头示奢香曰："吾为汝忍心除害矣。"奢香叩头谢恩。乃封奢香顺德夫人，刘氏明德夫人。高后赐宴谨身殿，遣归，赏赐甚厚。命所过有司皆陈兵耀之。奢香既归，以威德宣喻罗夷、岗夷，皆贴然慑服。奢香乃开赤水、乌撒道以通乌蒙，立龙场九驿，马匹廪铠，世世办也。[15]



图3-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奢香墓

资料来源：笔者1999年8月摄于大方县。

值得注意的是，在田汝成之前，成化年间已有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所撰《安氏家传序》提到奢、马冲突，[16]但其情节远没有《炎徼纪闻》那样波澜起伏，且没有涉及修驿之事，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的影响都极为有限。田汝成的叙述细节丰富，戏剧色彩强烈，他甚至坦承，“马煜功勋，史不既见，贵州人独能谈之”，[17]可见他有可能将传说当信史。[18]但除了明万历年间的学者王士贞指出其个别地方与史实未合外，[19]各种地方志、正史（如《明史》）、私家著述、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宣传材料皆大致沿袭其说，几百年间长盛不衰，俨然信史。1980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撰就《明史贵州土司传记载霭翠奢香事失实辨》，利用详实的史料，对《炎徼纪闻》等各种版本的奢香故事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证，[20]惜未被学界充分关注。直到近年，许多关于奢香的论文，仍然相信《炎徼纪闻》所述，一些论文试图去质疑鞭笞奢香事件，但却连基本的史实都弄错。

黄彰健论文涉及奢、马恩怨与驿路的观点主要有：（1）明太祖参加香军时，他的父母已去世。及即帝位，宫中自然没有太后，而高皇后死于洪武十五年八月，因此奢香无论是见太后或高后都不可能。（2）驿桥道路之毕工是在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其时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应还在任上，水西境内的驿路绝不是马烨死后由奢香创设的。（3）毛奇龄《蛮司合志》等版本的奢香故事称奢香开辟偏桥、水东之驿路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堂诸境，水东系宋氏土司所辖，偏桥为思南宣慰司地，均与奢香无关，容山草堂属播州宣慰司地，由播州宣慰司至贵州宣慰司驿路，系曹震委播州宣慰使杨铿等人“提调军民以开之”。

奢香故事的诸多漏洞有的已为后来的文人学者所意识到，并设法修补。如清道光时期的著名学者邹汉勋在撰《大定府志》时，将马烨由都督改为都指挥，高皇后则变成了淑妃，定故事发生的时间为洪武十六、十七年，在时间上符合刘淑贞、奢香先后入朝的记载，并把“霭翠死”改为“霭翠已老”，以便与《明实录》相统一。但百密一疏，邹汉勋在不知觉间还是留下了破绽。按其所述，至少在洪武十六年（1383）马煜已担任贵州都指挥使，[21]但据《明实录》，洪武十五年正月开设贵州都司，令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同月调陕西都指挥使陈暹为贵州都指挥使，直到二十九年，陈暹尚以贵州都指挥使的身份讨平都匀狄把的叛乱，马烨绝无在洪武十六年任指挥使的可能。[22]

细究史料，奢香与驿路之关系，虽并未如《炎徼纪闻》《明史》诸书所载，亦非全然无中生有之创造。奢香是彝族恒系扯勒部君长的女儿，其生年史不见载。近五百年后，清道光年间的黔西知州吴嵩梁作诗称她14岁嫁给水西君长霭翠，[23]疑系采自民间传闻，不足引以为信。奢香虽系一女流，但即使在其夫霭翠生前，她已在水西享有极大的威望，甚至连朝廷都有所耳闻。洪武十五年，征滇之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朱元璋谕令征南将军傅友德宣各土酋入朝，特意提到奢香：

自云南捷报至，朕念将军久劳在外，但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土酋当悉送入朝，盖虑大军既回，诸蛮仍复啸聚，符到之日，不限岁月，一一送来，霭翠夫妇亦如之。[24]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谕令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参与修筑通滇驿路：

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25]

被饬令参与修筑驿道的水西、芒部等全部位于黔西北及其周边地区，可见明廷开筑的应是经由黔西北连通蜀、滇的贵州西路。[26]周洪谟《安氏家传序》称：



图**3-2** 至今尚存的阁鸦古驿

（洪武）十三年，大将征讨云南，师至沅州……霭翠备马一万匹，米一万石，毡一万领，刀弩牛羊各一万，以助军资。蓝、傅二总兵官甚喜，度本司（应即贵州宣慰司）地方道路，开设十一驿、四巡检司而去。十七年霭翠及陇约赴京朝见，赏赐甚厚。十九年，霭翠殁，其事亦略见《大明一统志》。[27]

洪武十七年之前贵州宣慰司开设了十一驿，此或与上述朱元璋的修驿谕令不无关系。而奢香系在水西握有较大实权之人，参与其事应在情理之中。洪武十七年奢香入贡，朝廷赐给文锦、绮、帛、珠翠、如意冠、金环、文绮袭衣，赏赐之厚、恩遇之隆在诸土官中并不多见——同期入朝的普定土知府者额仅被赐予绮、帛、钞。[28]此或许与修驿效忠有关。这一猜测似乎亦可从洪武十六、十七年前后朝廷对水西的态度变化中得到印证。经营西南之初，出于猜疑，朱元璋对水西的态度极为强硬。洪武五年，霭翠以垅居部落拒官府为由，请求朝廷出兵镇压，朱元璋称："蛮夷多诈不足信也。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耶？宜遣使谕蛮中守将慎守边境，霭翠所请不从，将启边衅，宜预防之。"[29]征滇之役中，他对水西的向背尤为担心，甚至到洪武十五年正月攻克云南后，他在给征南将军傅友德等的上谕中仍然称：

比得报，知云南已克。……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30]

由于对水西首领霭翠的不信任，他一度认为："其水西霭翠地方，必会十万之上军数踏尽了，然后方是平定。"[31]

但自洪武十七年之后，朱元璋的态度似乎有了戏剧性的逆转，除当年对奢香厚加赏赐外，三年后，霭翠之弟安的贡马，朱元璋公开称赞：“安的居水西，最为诚恪。”[32]又四年，平羌将军何福讨平越州、毕节叛乱，请求乘势进讨水西奢香，立即被朝廷拒绝。[33]洪武二十九年奢香去世，朝廷不远万里，“遣使祭之”。史称：“自是（水西）每岁贡献不绝，报施之隆，亦非他土司所敢望也。”[34]这一系列变化或许应与水西开设驿传联系起来。

后人强调并相信奢香与贵州驿路的关系可能亦与明代贵州的赋役制度有关，本书第二章提到水西独立承办贵州北部、西北部由川经黔入滇的共十多个驿站的徭役，可能就是自明初定下来的。其中札佐驿、底寨驿、养龙驿、渭河四驿正好位于播州宣慰司境，这或许是后人认为奢香开驿直至播州宣慰司境内容山、草塘等地的理由之一。

奢香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贵州驿路的修筑，抑或仅仅是开设了十多个驿站，其真相或许已难以得知。但不管怎样，修整驿路对黔西北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贵州西路上的驿站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毕节等，史称“龙场九驿”。开道设驿之前，由贵阳经达水西之路只有间道一条，但梗塞未治。龙场九驿加上入播四驿，沟通了川黔、川滇驿道，极大地改变了水西交通闭塞的状况，[35]为经营云南创造了条件，同时亦促进了中央王朝文化、制度等在黔西北的渗透以及移民的进入，明人吴国伦已经指出开驿与改变风气的关系：

我闻水西奢香氏，奉诏曾谒高皇宫。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刊木穿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载，牂牁僰道犹同风。[36]

清人田雯更对奢香开驿之事做过精辟的分析：

乌罗之君长西土，非一日矣！一旦折而归我，岂其愿哉！终必为患，夫人而知之。即马晔之忠，明太祖亦谅之矣。乃不乘此而剪灭之，反自坏其长城，仅令置驿以为报者，计之非不审也。盖以诸蛮之强梗，由于山川之险阻，财力之富饶，则莫若置驿以通之且困之，通之而险失矣，困之而志驯矣，然后为我所制而无难，此胜算亦远猷也。故除马晔以为生事戒，而又以安远人之心也。[37]

黔西北的统治者们并非没有认识到朱元璋的深谋远虑，在他们看来，驿道的开通改变了整个秩序，乌撒彝书《彝地通驿道》云：

壬辰（疑为壬申之误——引者注）年间，彝地被占领，到了癸巳（疑为癸酉之误——引者注）年，开通了驿道。正因为如此，君长失宝座，虎豹戴铁链，鹤鹃被捕捉。这样一来后，汉皇帝家，使破铜烂铁，随意提去白银，此情不堪言。西边那替城，东边纪替谷，在这片范围，重徭厚赋，征如海租税。[38]

犹耐人寻味的是，水西君长驻地并非在驿路附近。《大定府志》称：

奢香置九驿，不欲道出于所居，故自黔西南门绕出大方之南而辏阁鸦。[39]

奢香的无奈与远见，在选择驿路与居所关系的苦心中表露无遗。到了正德年间，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又要求削减驿站数目，贬谪贵州任龙场驿驿丞的王阳明闻讯连忙致书晓以利害，威胁其不可擅改定制，减驿风波遂告平息。[40]

第二节 “一线之外，四面皆夷”：卫所的设置

入滇驿道，处于土司、“蛮夷”的重重包围之中，必须依赖大量军队维持其畅通，而驻军同时意味着粮草的需求，这些是历代治边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关系到王朝的权力能否深入。早在蜀汉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即因未能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不敢设置官吏治理其地，只得“即其（指南中）渠帅而用之”，“悉收豪杰以为官属”，他指出：

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41]

从某种角度上看，明代西南地区卫所制度的建立其实是在解决蜀汉曾经面临的难题。这种制度确定一部分人世为军户，屯田自给，既解决兵源问题，又解决兵饷问题，在立意上别出心裁。特别是在新开辟的边远地区，兵源、兵饷都难以措办，卫所制度在一定时期更显示出其有效性。朱元璋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洪武四年（1371），贵州卫（在今贵阳）、永宁卫（位于今四川叙永，毗邻黔西北）设立，明廷经营贵州迈出了重要一步。凭借贵州卫的武力，明廷东征西伐，降伏平伐、芦山各酋长，令其“岁输租赋”；平定谷峡、剌向关之乱，“蛮人震慑”，两三年间讨平反抗七八起，兵锋直抵四川播州（今遵义）。[42]

洪武十四年，明朝大军沿元代旧路，从湖广辰、沅往西，四川永宁往南，进取云南。一路所向披靡，诸部落望风降附，于是明廷设置贵州都司，沿贵州东、西路择地驻兵屯田。不到十年间，增置了毕节、乌撒、普定等17个卫所，加上先期建立的贵州卫、永宁卫，洪武二十八年建立的贵州前卫，以及位于贵州但领于湖广的平溪卫（今玉屏）、清浪卫（今镇远清溪）、偏桥卫（今施秉县）、镇远卫（今镇远县）、铜鼓卫（今锦屏县）、五开卫（今黎平县），[43]崇祯朝以前，贵州境内最多时曾经设卫26个，[44]其中绝大多数分列驿道旁边，大致勾勒出了明廷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明人万士和诗云：“军屯之外尽夷方，夷妇同争鼠马场。”[45]黔抚郭子章亦称：“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46]

卫所分布于驿道反映了明廷借道贵州经营云南的苦心。征滇之役中，朱元璋敕谕征南将军傅友德云：

等杀得蛮子畏服了，然后将东川卫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七星关立一卫……自永宁迤南至七星关，分中扎一卫……若如此道路易行，军势排在路上，有事会各卫官军剿捕。若分守诸处，深入万山，蛮人生变，顷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

无粮处休教军守，止于赤水立一卫，毕节立一卫，七星关立一卫，黑张迤南、瓦店迤北分中立一卫，如此分布守定，往来云南便益。[47]

26个卫所中，毕节卫、乌撒卫、水西卫、赤水卫设于贵州西路，位于乌撒、水西一带。在娄素濮等族类看来，卫所屯田不但对自己形成了威胁，而且还是一场大规模的土地与财富的掠夺行动。曾经，他们认为："彝地山神力强，水无法流过；彝地路神占强，汉人难通过。汉人到彝地，驻兵也困难，偶尔过一趟，也还得回去，返回汉地去。彝人是彝人，汉人是汉人。"[48]但这样的时代从此结束了，《彝地通驿道》表达了战败者的无奈：

南边那片地，全都丧失了，被划为屯地，被开通驿道。有一支汉兵，进攻纪俄勾（即乌撒——引者注），纪俄勾家，是尼德（应指女君长实卜——引者注）掌权。祖苻奢哺有过错，东边牟蒙迁甸［纪俄勾（乌撒氏）所辖整个东部盛产粮食的地区——译者注］，送给汉朝廷，归洪武皇帝。从此以后，丧失了权柄。荞谷为军粮，九千九百石，缴芍恒录姆（即现在的威宁城，明代乌撒卫——译者注）[49]……彝地被设屯，驿道通彝地，彝族人，被汉官统治。灾祸自天降，是怪高空的，六山羊星作崇，是怪低空的，兜保海猪星作怪……[50]

可以想见，原住民反抗土地、财富被掠夺的行动不会轻易停止，但这些行动大都以失败告终。水西卫似乎是明王朝做出妥协的少有例子之一。在贵州境内的19个卫所中，水西卫如昙花一现，不见于《明史》，长期以来似乎被人遗忘了。《明实录》称：

（洪武十五年正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令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置云南左、右、前、后、普定、黄平、建昌、东川、乌撒、普安、水西、乌蒙、芒部、尾洒一十四卫指挥使司。[51]

万历《贵州通志》亦载："洪武十五年，吴复击破西堡、阿驴等寨，城水西，守之。"[52]可见，征南战事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即设置了水西卫，隶贵州都指挥使司。水西卫究竟在何处？明代贵州境内只有阿哲家的领地被称为水西，且洪武十五年（1382）的敕谕说道："其水西卫兵，急宜调出，止留一千或五百足矣，霭翠之民，今必□（疑为'不'字——引者注）敢为乱。"[53]据此可知水西卫在水西安氏境内。但此处的"水西"并非指安氏的驻地慕俄格（今大方城），而是与其毗邻的比喇（今黔西县），[54]明初曾在水西（比喇）建城，安陆侯吴复《建城碑

记》云："洪武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至水西郭章，兴工筑城。"[55]可见十五年正月置水西卫，三月即兴建卫城。

水西卫所在地比喇是安氏的腹心地带，安氏的不满与反抗是可想而知的。或许正是这种反抗迫使明廷做出让步，废除了水西卫。其实朱元璋一直对在水西驻兵心存疑虑，洪武二十年，都督顾成甫讨平水西叛酋居宗必登，朝廷立即令其撤兵：

上以蛮夷见官军久驻，心必疑惧，故难猝服，欲姑缓之，以示绥怀之意也。[56]

水西卫废除的时间不详，但至迟到弘治年间，水西卫城已被视为古迹了。史载："水西故城，在治城西北二百一十里，本朝初所筑，垒门尚存。"[57]以后直到崇祯三年（1630）以前，卫所制度都未能深入安氏领有的水西、水东地区，其土地得以保全，不像乌撒那样失去了大片沃野。天启间贵州提学佥事刘锡玄感叹：

水西据黔之腹心，其地广而赋饶。凡瘠土皆我黔土，而酋壤无非沃壤也，故力能控驭诸土司及苗仲。[58]

卫所设立之初，黔地尚未置省，贵州都司成为明王朝在黔的最高机构，贵州境内的土司或隶于他省，或领于卫所，或直隶都司（如贵州宣慰司），形成了都司-卫所-土司、都司-土司的统治架构。与此相应，各级武官职责广泛，兼领民事，负责兴儒学、筑城垣、修驿道、控驭土官等重大事务。

永乐十一年（1413），隶属湖广的思州、思南二宣慰使内讧，明廷乘机改土归流，设置了乌罗、新化、铜仁等八府二县，建贵州行省，贵州宣慰司由此受到布政司与都司的双重节制。[59]行省-府-土司、都司-卫所-土司、行省-土司是当时最主要的权力体制。各级流官进入贵州，文武相维，明王朝对黔省的经营又推进了一大步。但卫所依然维持其主导地位，史称：

其地（指贵州）只借一线之路入滇南，两岸皆苗……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已矣。[60]

第三节 卫所、移民与文化移植

凌纯声曾对卫所与土司做过一个有意思的比较。他认为，明初土官铨选事宜归吏部，后改领有土兵的诸武职土司（如宣慰、宣抚等）属兵

部，此改制与卫所制度有关。改制后，大小土司分隶于都司卫所，宣慰司相当于卫，直隶于都指挥司，宣抚、安抚、长官司相当于千户所，直属于军民卫或宣慰司。总之，土司职官同于卫所，并且二者在实质上相同：

卫所制度，官为世职，屯田官有，舍丁世为军户。较之土司制度，土官世袭，土地公有，百姓为世民，在实质上二者相同。内地卫所则纯为军屯之制，至于边地之实土卫所，军民兼辖，已与土制无异。故明代之土司制度，实在利用土官世袭，土地公有，兵民不分三种旧制，而以卫所制度略加组织而已。[61]

按照他的观点，既然卫所同于土司，土兵顺理成章成为明代的主要兵源之一。

西北一带的许多卫所本身就是土职政权，卫所官员大多属归顺土官，[62]而东北奴尔干都司所辖的300多个羁縻卫所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疏远，[63]因此凌纯声所做的比较有给人启迪之处。但前文已表明，所谓隶属以及文职、武职等观点，其实是对明代土司制度及其实际运作状况的误解，许多宣慰司并不隶于都指挥司。更重要的是，凌纯声的结论掩盖了卫所与土司间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

卫所士兵籍隶军户，按朝廷法例，每一个军户家庭的人丁事产、籍贯年龄、充调来历在军籍黄册上都有详细登载，凭借这一套军籍黄册制度，明王朝有可能对军户进行严密的管理与控制。[64]史称："盖终明世，于军籍最严。"[65]王毓铨的研究详细揭示了这种管理与控制的具体情况，军户所承担的各种赋税与差役意味着他们受到粗暴的人身强制。[66]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里甲制在许多土司地区难以深入，原住民在官府的户籍册上并无记载，黔省的官员与士大夫们感慨："贵州四面皆蛮夷，所可知者各府若卫军民之数，甚寥落也。"[67]置身户籍制度之外意味着逃脱了明政府的人身强制，不用直接为明廷输赋当差。就受王朝控制的程度而言，土司与卫所之间的本质差异自不待言。

从政治、文化权利方面来看，原住民是"苗""蛮""猓"，"性类犬羊"，而军户作为当差纳粮的化内之民，应举做官是其不言而喻的权利，正是这种权利的实现过程带动了文教科举在贵州的兴起。

总之，卫所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武力后盾与军事控制，它还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与文化移植。有明一代，朝廷以卫所为据点，以点带面，逐步改土归流，扩大统治区域，其间的原因与背景颇为复杂，但移民（包括民间自发移民）以及文化渗透对地方社会的改造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进行探讨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一线之外，四面皆夷"的社会以及黔西北的制度与文明在土司制度建立后所发生的演变。

一 卫所与移民

卫所制度在贵州的建立并非把黔省原住民籍为军户，而是靠一场大规模的军事移民来支持。[68]明代军户的来源有“原报抄籍”“从征”“归附”“谪发”“垛集”“抽籍”等途径。[69]不管何种途径，在明初都与贵州原住民的关系不大。洪武时大举征滇，战争尚未彻底取得胜利，便开始令士兵屯守贵州驿道附近，[70]建立卫所，接着不断从各省“垛集”“谪发”军户加以充实。[71]这些士兵主要来自直隶、湖广、浙江、四川、江西、河南等省，由于史料所限，难以得知各省士兵的具体数量，但以（南）直隶为最多却是可以肯定的。嘉靖间贵州巡抚谢东山称：

贵州各卫军丁皆洪武初年直隶、凤阳、湖广、浙江等处民籍三户勾解应当，国初每卫正军五千余人。[72]

“民籍三户勾解应当”，属于“垛集”方式。[73]在建置上凤阳府亦属（南）直隶，[74]谢东山将两者分开，置于前两位，由此似可窥知南直隶在贵州兵源方面的重要地位，这可与地方志中所载的卫所指挥官的籍贯资料相印证。由表3-1可知，在万历《贵州通志》所载的103名武官中，来自南直隶者竟然占了68名，南直隶在明代贵州军卫移民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曹树基对洪武时期的包括贵州在内的全国军事移民做过研究。他认为，设置在今贵州境内的23个卫共127个所，以“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二百人为千户所”的标准兵力计，“应有14.2万士卒”，假定士兵家庭的平均规模是3口，则共有42万人口。因为在贵州尚未发现卫所士卒由土人充当的情况，所以这些人都是外来移民。[75]

表**3-1** 方志所见贵州卫所之武官籍贯

籍贯	南直隶	北直隶	湖广	江西	河南	陕西	山东	山西	四川	不详[a]	各卫合计
毕节卫	7	2									9
乌撒卫	9	1	1		1	1					13
赤水卫	4	1	1		1						7
永宁卫	7	1	3	1						1	13
贵州卫	13		2	1	4		1				21
贵州前卫	18	1	3				1			1	24
威清卫	10		1		2		1	1	1		16
各地合计	68	6	11	2	8	1	3	1	1	2	103

注：a. 书中未注明或笔者暂时不能判定籍贯者列为不详。

载入方志的卫所武官有指挥使、指挥同知、署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署指挥佥事等。本表只列举乌撒、水西（包括水东）附近的乌撒卫、毕节卫、赤水卫、永宁卫、贵州卫、贵州前卫，其他卫所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按《明史》卷 40《地理志·南京》，南直隶包括应天府、凤阳府、淮安府、扬州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庐州府、安庆府、太平府、池州府、徽州府等。判定籍贯的主要资料是《明史·地理志》，为了简便，在此不详细列出判定理由。

资料来源：万历《贵州通志》。

上述推算的数字与明人所记载的贵州军额不同，成化三年（1467）贵州巡抚李浩给出的额数为16万余名，[76]隆庆六年（1572）巡抚蔡文则称所属20卫所额军13.7万余名。[77]当然，由于版图的变化，李、蔡二人与曹树基所指的贵州在地域上有一定差异，曹氏列入计算的卫所有23个，较蔡文多了三个，但人数却只多5000人，曹氏的估值低于蔡文给出的定额，更低于李浩的16万之数。[78]

曹氏估计值与明代数据有差异的原因似有多种可能，例如可能5600人为一卫的标准或许并未严格执行等。最大的可能是，李、蔡等官员给出的数据或许包括了“余丁”，因而数值较大。按明代兵制，每一正军尚须携带户下余丁（又称军余）一名，在营生理，佐助正军，供给军装，甚至有一正军佐以三余丁的规定，而陕西都司更出现了正军一名在营，而有余丁3～30丁在卫的情况。[79]“户下余丁”并不一定是正军的儿子，兄、弟、叔、伯、堂兄、堂弟、侄子乃至其他族亲都是有可能的。所谓5600人为一卫，1220人为一千户所的标准兵力只是正军之数，正如谢东山所指出的，“国初每卫正军五千余人”。[80]如果加上余丁，这个数量当有大量增加，并且同正军一样，随营余丁多半也有家室，[81]因此研究明代贵州乃至全国军事移民似应把余丁考虑在内。

有必要指出，卫所士兵的逃亡在有明一代史不绝书。早在景泰年

间，贵州卫所的士兵已经是“十去八九”。[82]成化三年，贵州巡抚李浩奏称：“贵州军额旧十六万余，调遣亡叛事故，今止二万八千余人。”[83]黔省卫所士兵的大量失额并非只是由于卫官隐占或匿籍，否则嘉靖间的贵州巡抚刘大直绝不会感叹卫所凋敝、田地抛荒，以致不得不招集流民、原住民垦种（详后）。逃兵的去向是确定移民数量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些逃往他省的士兵只是贵州的匆匆过客，而非移民。

但不管怎样，明代黔省有大量的军事移民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此外，民间自发的移民也为数不少，如黔西北的毕节卫嘉靖间“城屯站铺官军二千八百八十五户，六千六百四十一丁口，万历二十五年报存官军、客民二千四百三十七户，四千一百三十二丁口”。[84]这些“客民”其实是官府认可的寓居贵州的“流民”。在士兵大量逃亡的情况下，贵州卫所抛荒田土的情形相当严重，嘉靖间巡抚刘大直入境后目睹了卫所的凋敝情形，于是令各卫所清查荒田，“招集军、民、流、商诸人芟秽耕种”，许以三年后纳粮。军籍册上由此出现大量“客民”，这或许是“流民”合法定居贵州的开始。屯地荒芜同时也是许多原住民成为编户的契机，如龙里卫“抛荒屯田七百九十八亩，招集仲苗七十二户”。[85]

除了日渐空虚的卫所外，许多府、县也吸纳了大量移民。如程番府“抛荒田亩不等，招集哨堡土流客民之人不一佃种”。[86]弘治以后，四川民人不断涌入思南府佃耕土地，亲戚相召，“有来无去”，日积月累，竟然造成了“客既胜而主人弱”的局面。客民们同时带来了棉花栽培术，土人争先仿效，粮食作物的种植大受影响。[87]嘉靖《贵州通志》称贵州境内充斥着来自江右、川、湖的“贩商、流徙、罢役、逋逃”之人，[88]其中有许多游离于户籍赋役制度之外，嘉靖《贵州通志》有这样的议论：

民数者，庶事所自出，以多为贵，不可不知也。贵州四面皆蛮夷，所可知者各府若卫军民之数，甚寥落也。蜀中、江右之民侨寓此者甚众，买田宅、长子孙，盖多有之。蜀中、江右既不得其用，而视贵州官府亦漠然若不相干，是并失之矣。谓宜分别税户、承佃营生等第而籍为见户，俾与主户错居共役，愿投军者亦编入行伍，庶乎户口增而军民不至重困矣。[89]

但也有不少流移之民被纳入了里甲体系中，如贵州宣慰司“隶籍人民多来自中州”。[90]

二 移民与文化移植

移民的进入同时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与礼仪的传播，士大夫们希望这种从“中州”移植的文明能够生根繁殖，改造蛮风夷俗。嘉靖《贵州通志》云：

贵州土著蛮夷，族类实繁，风俗亦异，大抵标枝野鹿，淳朴犹存。

各军卫徙自中原，因沿故习，用夏变夷，胥此焉恃？

虽然一些“至愚无知者反见变于夷”，[91]但大量“中原故习”还是在移民中被因沿下来，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这样描述宣慰司城（即省城）、贵州卫、贵州前卫、毕节卫、乌撒卫的风俗：

（贵州宣慰司与贵、前二卫）俗尚如实（旧志，郡人多中州之迁谪，故服食器用咸尚朴实，间有侈靡者，群訾笑之）。士君子秀而文，其氓勤而务本，人多气节（旧志，崇儒术，尚礼义，以节气相高而耻为污下之事，其仕于外者往往有廉介忠鲠之称）。不异中州。文教丕拯，风气和平，不喜争讼，乐于恬退，集场贸易（新志，郡内夷汉杂处，其贸易以十二支所肖为该市名）。[92]

（毕节卫）中州礼俗（一统志，戍此者皆中州人，其冠婚丧礼能不混于流俗。用夏变夷。庙学记，卫居乌蛮巢穴，然能读书循礼，用夏变夷），人多勤俭。

（乌撒卫）人性强悍（旧志，卫之士卒皆谪自中州，既久处边幅，皆强悍桀傲，岂风土之所致耶），衣冠礼乐，不输中土，风气刚劲。[93]

卫所之外，“四面皆夷”，在礼俗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贵州宣慰司之水西罗罗）罗罗即古乌蛮。亦有文字，类蒙古书……挽髻短褐，徒跣带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佩长刀、箭箙，左肩披一方羊皮……不晓汉语，有黑白二种……信男巫，尊为鬼师，杀牛祀神，名曰做鬼，以族人之子继立……[94]

（毕节卫附近）夷俗喻利（旧志，卫城内境皆乌蛮，毡裘椎髻，性狡悍而趋利，卜用鸡骨）。斗狠健讼（新志，卫俗迩来斗狠健讼，狙诈不情，盖渐染川南之苦也）。脱帽为礼（旧志，卫境罗罗见贵人必脱貌以为敬，盖乌蛮故俗）。[95]

在省城、卫城等汉人聚居之处，内地的岁时节日几乎被完整保留下来，如省城一带“士民裔出中州，最重元日”，从这天起直到元宵节是拜年、走亲访友的好时机。此外，立春、寒食、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冬至、除夕等都是重要的节日。乌撒卫、毕节卫等地亦与此相同。方志的编修者们感叹贵州“礼乐文物与中州诸大藩等，王化大行”，其间虽然充斥着夸耀明王朝文教武功的溢美之词，但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到驿道线上，便会发现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96]

两种礼俗之间并非全无影响。在驿道、卫所、府州县城周围，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接触颇为频繁，明人万士和称：

尽贵之地，山陵林麓居十之七，而可田者居其三；尽贵之田，罗鬼诸夷居十之七，而军居其三。军户自屯田，官赋外所余无几，其阖城老

幼俱俟苗民负粟入城郭，计升合贸易，有不足者出重息以称贷于人，故苗粟一日不至则饥，称贷不得则嗷嗷然待哺而已。[97]

胡庆钧注意到，在水西安氏的水外六目地等交通线附近，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风俗都有不少变化，各少数民族由于“与卫人错居，近亦颇为汉俗”，许多汉族农民成为贵州宣慰使的佃户，宣慰司署内从来“夷汉杂处”，彝族官员们“皆肥白有富贵容”。[98]文献上类似的记载颇多，如毕节卫“居乌蛮巢穴，然能读书循理，用夏变夷”，[99]备受推许。又如普安州的“罗罗”等原住民“近年渐染华夏之习，稍变其陋而近于礼”。[100]《明一统志》亦称：“（贵州宣慰司）冠婚丧祭颇效中华。”[101]许多原住民被籍为编户后，读书应举，[102]势必在礼俗方面产生重大改变。

当然也有不少“蛮化”情形，上文已提及一些卫所之民“反见变于夷”。同时，水西、永宁的土酋有时掳掠“中国男女”，令“中国儿学土语，易服左衽，习骑射击刺，令与诸蛮儿伍”。[103]

除礼俗方面的变化外，军卫等移民还直接带动了贵州科举的兴起。自明代以降，许多士大夫、学者们认定两汉时的盛览、尹珍是在贵州传播文教的拓荒者。[104]但其实元朝以前，贵州同中央王朝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时断时续的朝贡上，唐宋时期，包括黔西北的鸭池河以西地区甚至没有被纳入羁縻州县的系统中，形同独立状态。元代对贵州的开拓超越以往，曾设置顺元路儒学，[105]但元朝对教化一直有欠重视，科举制度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顺元路儒学的影响微乎其微。清代著名学者莫友芝称：

黔自元上而五季皆土官世有，致汉唐郡县，几不可寻。英流鲜闻，安问风雅？逮有明开省增学，贡士设科，文献流诒，乃稍可述。[106]

明代黔省科举兴起的背景，是上文所述的移民潮。来自“中州”的士民不但有着读书应举的习惯，而且包括卫所士兵在内的众多流移已被纳入王朝户籍赋役制度的系统，科举是他们应享的权利。几乎可以肯定，儒学在贵州设立的初衷，正是为了帮助卫所子弟实现这种权利。[107]嘉靖时贵州巡抚王学益云：

贵州地方，自元以前虽曾服属，尚属羁縻。入我国朝际蒙熙洽，建置军卫，播移中土，设立学校，慎择师儒，衣冠所濡，礼义渐同。[108]

明王朝在贵州设有四十余处儒学，[109]许多位于土司地区，如毕节卫学、乌撒卫学地处黔西北，有的甚至直接贯以土司名称，如贵州宣慰司学。但这些学校开办的诱因与动机都在卫所，与土司无直接关系。例如贵州宣慰司学的肇建者是都指挥同知马烨，洪武二十六年（1393）都指挥陈暹等置买学田八分，共706坵，[110]九年后都指挥金镇、汤清加修大成殿，“翼以两庑，奉圣人像于其中”，以后历次重修儒学，都指挥都起了重大作用，直到景泰年间宣慰使安陇富才捐资助修。[111]显然，这些武职官员是把宣慰司学当作贵州卫与贵州前卫的卫学来经营的。

[112]又如黔西北的毕节卫虽毗邻水西、乌撒，但这两大土司似乎对卫学并不热心，该学于正德三年（1508）由指挥唐谏修建，以后到万历年间的两次迁建都是由兵备负责，捐资者全系兵备和卫所官员。[113]

事实上，在缺乏里甲制，田赋差役“悉征之土官”[114]的情况下，乌撒、水西的绝大部分原住民没有直接为王朝纳粮当差，其名字、籍贯以及人丁事产在黄册与鱼鳞图册中缺载，因此他们既没有入儒学、考科举的权利，也没有这种必要。[115]毕节卫学、乌撒卫学的生员主要是卫所子弟，自不待言。甚至贯以土司名称的贵州宣慰司学亦如此。据嘉靖《贵州通志》，贵州宣慰司的及第者全部来自贵州卫与贵州前卫，[116]可见该司学在本质上是贵、前二卫的儒学，与水西原住民关系不大，并且水西的君长们一直在禁止原住民入学。宣慰司学设立后两百多年，当崇祯年间总督西南军务的朱燮元亲履水西时，发现“水西各夷披毡负弩，曾不知有礼”，上层统治者初通文理者仅有60人，其中许多还是汉目汉把。[117]

尽管洪武二十八年（1395）曾诏令诸土司皆立儒学，[118]但许多土官并未积极响应，例如乌撒府直到20年后才议设儒学。《明实录》载：

（永乐十二年）乌撒军民府经历钟存礼言：“府故蛮夷地，久沾圣化，语言渐通，请设学校、置教官，教民子弟，变其夷俗。”从之。[119]

前文已提到，乌撒土府面积广阔，原住民繁多，仅仅象征性地编户二里，其中有许多编户还可能是移民而非土著。且当时乌撒卫尚未设立儒学，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与宣慰司儒学相似，乌撒府儒学亦主要是为卫所子弟而设。到了洪熙元年（1425）四月，府学革去，[120]十七年后正式开设乌撒卫学。[121]

清人莫友芝所辑《黔诗纪略》收录了明代黔人所著诗篇2498首，并为每位诗人立了小传。这些诗人几乎都是儒学生员或科举功名的获得者，从其户籍差别上我们亦可看出卫所在明前期贵州的科举、文教中的重要性。见表3-2、表3-3。[122]

表**3-2** 宣德至正德年间贵州诗人的户籍类别

户籍类别	卫所	原住民	土著	移民	不详	合计
诗人数量	24	3	2	5	8	42

注：永乐十一年贵州始建省，但因为钱粮不济，贵州并未设闱开科。宣德四年（1429）起黔省生儒附试云南，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始开科。宣德年间中举的王训是《黔诗纪略》收录的最早的诗人。在本表中，来自卫所的诗人归入“卫所”，元代或元代之前移入者归入“土著”，明代的移入者（不包括卫所士卒）称“移民”，不能判定是否属于这三类者列入“不详”。所谓“不详”的情况通常是知道某诗人是某某府或某某州人，都属于民籍，但不知道他是土著入籍者抑或移民入籍者。

表3-3 嘉靖至崇祯年间贵州诗人的户籍类别

户籍类别	卫所	原住民	土著	移民	不详	合计
诗人数量	60	1	2	7	102	172

注:《黔诗纪略》卷 25 以后所列的诗人未入本表，因为他们都是南明的诗人，其时清朝已经建立。并且当时移入贵州的中原士大夫特别多，他们并不反映明代贵州科举的状况。

表3-2表明，在明前期，卫所堪称贵州文教的表征。正是卫所制度带动了黔省科举的兴起。在这种背景下，几乎被人遗忘了近千年的盛览、尹珍被视为贵州文教的拓荒者，备受士人们的推许，在他们看来，盛、尹二人不但意味着黔省文化的源远流长，同时亦表明贵州风土足以涵养英才。正统四年（1439）进士，黔西北赤水卫（卫地在今毕节市）人张谏[123]的《望古》诗云：

赋心既传盛，经术复开尹。并兴巴彭城，名德乃与准。牂牁处荒维，因此山巘嶙。如何初郡县，贤俊已连轸。人文张华夏，覆载讵畦畛。乃知豪杰士，不受山川窘。遥遥今几世，嗣响何泯泯。望古一长叹，负重愁绝髋。[124]

自嘉靖以降，非卫所士子在科场中崛起，卫所子弟则相对势微。这或许可反映出明代贵州社会变迁的几个趋势：

首先，军屯制度日趋衰落。明代军、民、匠、灶诸色户役中，以军户的差役为最重最苦，其身份几近于奴隶。[125]在贵州，因为民户稀少，四面皆夷，并且官府不愿役使在籍原住民而令其以钱（银）代役，结果钱不可得，差役转嫁至军户身上，使其负担更为沉重，[126]再加上卫官盘剥，导致“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妻、子冻馁，人不聊生”。[127]于是士卒大量逃亡，卫所日益空虚。隆庆六年（1572），十多万额军仅

剩下1.8万。[128]这样必然导致应举的卫所子弟减少。

其次，非军籍的编户增加。上表中所谓“不详”的情况通常是知道某诗人是某某府或某某州人，属民籍，但不能确定他是原住民入籍者抑或移民入籍者。明初贵州民户极为稀少，思南府蛮夷长官安逸奏称贵州八府“比较腹里不满一县人民”，[129]而曾出差贵州的吏部侍郎何文渊则指出每府不过一二百户。[130]曹树基据此估算当时全省民籍只有千户左右。[131]如此少的人口在科场中自然不能在总体上有出色表现。表3-2中，原住民、土著、移民、不详四者合计只有18名，并且其中宋昂、宋昱、杨斌三人分别是水东、播州的土官，不用参加科举。

不过民户的增加是相当迅速的。到了弘治四年（1491），民籍户、口分别达到43367和258693，之后增速放缓，万历六年（1578）户、口数分别为43405和290972。[132]曹树基指出这些民户的三种可能来源，一是洪武时期民籍人口的后裔，二是洪武时期由军卫带管的民籍人口的后裔，三是洪武以后历年流入者，并假定弘治年间25.9万人口中的5.9万为洪武后的移民。[133]曹树基对民籍来源的推测是有相当道理的，此外还有招原住民入籍的途径，前文已提及土司地区的里甲和招仲苗垦种，永乐《普安州志》之序言谈得更清楚：

普安军民指挥使司所辖地方本西南荒服之表，蛮夷部落，元世始授土豪，更置官署，顽风暴俗，仍习旧污，大略羁縻而已。幸入圣朝，城守屯戍，怀德畏威，尔来三十余载，垦田编户，趋事赴功，渐拟于华郡。[134]

民籍的剧增必然导致读书应试者的剧增，在表3-3中，民户出身者的风头完全盖过了卫所子弟。[135]

最后，以上两表还显示出文教在贵州的渗透与扩张。一是范围的扩张，表现在民籍士子的崛起上。一是量的扩张，嘉靖到崇祯间的100年左右，共有172位诗人入选《黔诗纪略》，较前一个100年增加了130位，这其中固然有史料愈近愈易搜集以及播州南部改属黔省的原因，但全省科举文教的日渐发达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由。黔省初开时，全省才三学，贵州生儒最初就试湖广，宣德四年（1429）附试云南，解额仅15名。弘治十年（1497）贵州巡抚邓廷瓒奏请于贵州设科场，礼部以人才未盛为由，不予批准，但同意将解额增至18名。弘治十三年、正德九年（1514）、嘉靖十四（1535）年贵州官员又三次疏请开科，终于如愿以偿。综览这一事件的来往公文，可发现官员们请求开科以及朝廷最终予以批准的首要原因是“今文教渐洽，遐方绝域，人才日盛”。嘉靖时合省士子已不下三千余人，“每科乡试，五经皆全，上春官、登膴士者先后弗绝”，“举人进士，科不乏人”。有鉴于此，朝廷终于抛弃钱粮方面的顾虑，同意贵州开科，并且不断增加解额，万历二十二年（1594）达到35名。[136]

但对黔西北等许多土司地区而言，明王朝文教的扩张与渗透大体上

只能波及上层统治分子，绝大部分原住民并非编户，[137]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去入学应举。[138]进社学的要求可能要宽松一些，但似乎也要以纳粮当差为条件。[139]明初诏令天下立社学，并禁止有司干预民间自发立学，朝廷甚至规定学业优异者可补儒学生员，以示鼓励。[140]但贵州各土司的反应极为冷漠，直至嘉靖年间，水西等地区尚未设学，力图“变夷俗、敷教化”的官员们对此极为不满，嘉靖二十四年（1545），贵州提学副使徐樾呈请建社学，“变夷俗”，巡抚王学益批示：

朝廷敕谕每乡每里俱设社学，原未分别土流衙门，正以人性皆善，习乃相远。凡系纳粮当差，俱为赤子，岂有弃而不教之理？该道所呈正遵奉敕谕以行，依拟备行宣慰司并各府、卫、州严督各所属长官司公处木料、灰瓦，于各衙门相近并村寨居民稠密去处建立学校。令土官、土舍、目把子弟及夷民子弟悉入社学。[141]

水西土官对此似乎置若罔闻，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宣慰使安国亨才在大方立了一所社学，[142]其具体运作情况以及是否维持等不得而知，但以水东、水西之辽阔，人户之繁盛，仅立一处社学，似有敷衍之嫌。事实上，历任宣慰使大都禁止原住民进儒学，对社学不可能有太多的热情。[143]

与普通原住民不同，土官等上层统治者必须经常和官府乃至皇帝打交道，朝廷对他们的教育要严厉得多，甚至以习礼受教作为授权的条件。明廷相信教化可稍减土官的“顽冥”，使其熟习“礼体”，方便管理。《明实录》称：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壬申，户部知印张永清言，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啰啰，朝廷与以世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设学校以教其子弟。上然之，谕礼部曰：“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144]

“化导”土司阶层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绝非朱元璋的一纸命令可以解决，到永乐皇帝时，云南各处土官仍然“不识中国文字”，“遇有奏报，不谙礼体”。[145]弘治五年（1492）曾令土官袭职后，“习礼三月，回任管事”。[146]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七年后，贵州巡抚钱越奏请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其不由儒学读书习礼者，不听保袭”：

贵州土官渐被圣化，百三十余年，污俗已变。但应袭子孙未知向学，请令宣慰、安抚等官应袭子孙年十六以上者，俱送宣慰司学充增广生员，使之读书习礼。有愿习举业者，比军职子孙补廪充贡出身。至袭职之时，免委官保勘，止取亲管并学官结状，其不由儒学读书习礼者，不听保袭，庶可以变夷俗之陋，杜争夺之源。[147]

四年后朝廷明确规定：

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华风，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148]

土官学习汉礼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许多土官为了显示忠诚，同时也为了同汉官接触的方便，曾积极派子弟入学。如洪武年间水西与播州土司曾遣子来朝，请入太学，朱元璋为此专门敕谕国子监官员“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149]不久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何能亦遣其弟忽山及啰啰生二人入监读书，朱元璋赐钞奖励。[150]

《明史》记载了对入监土官、外国生等的教育内容：

奉监规而训课之，造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各期以敦伦善行，敬业乐群，以修举古乐正、成均之师道。[151]

尽管明廷采取各种措施力求土司谙熟礼体，要求他们按品级着相应的冠服，但黔西北的土官们仍然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礼俗：

罗鬼服饰，其椎髻向脑，扎以青帕，下穿大裤，上衣齐腰，外罩毡衫，衫挂背羊皮一方。虽土司宣慰冠服见中国上司，其袍服后亦挂羊皮，出则仍卸冠服，椎髻短衣如常。[152]

至于一般原住民更是常年“披毡负弩，曾不知有礼”，而土官也严禁他们接受汉文教育。[153]

为了保持种类的纯洁，黔西北的娄素濮实行严格的族内婚制，其婚姻圈大致涵盖阿芋陡部、芒部、乌蒙部家、古口勾部、阿外惹部、播勒部、扯勒部等若干个娄素君长国[154]，非娄素濮的族类特别是汉族基本上被排斥在外，《南中纪闻》称：

罗鬼人掳中国男女，仍以中国男女配耦，并不给配本地人，云恐乱其种。[155]

但不管怎样，明王朝的“化导”政策还是取得相当效果的。[156]水东宋氏土官诗人辈出，[157]成化年间袭任贵州宣慰使的安贵荣“好读书史，通大义，设庠序以明礼义”，[158]大儒王阳明贬谪龙场驿时，曾受到一些官员的侮辱，而雄踞半个黔省的安贵荣却折节下士，数次遣人馈送粟、米、肉、鸡、鹅、柴炭乃至金帛鞍马，[159]这似乎源于他对汉文化的倾慕以及对内地学术界的了解。自安贵荣后的宣慰使大都通汉文，如万历二十年（1592）安国亨曾撰写《大渡河桥碑记》，显示出他的汉语写作已相当熟练。

土官采用汉姓亦是明廷教化的成果之一。许多学者及黔西北民间都认为朱元璋赐予水西土官汉姓，但未见《明实录》《明史》等有此记载，笔者不敢盲从。[160]事实上，洪武初年霭翠与宋蒙古歹归顺时，朝

廷只是赐后者名钦，从此宋蒙古歹便以宋钦之名出现。[161]霭翠卒后，其弟袭职，始以安为姓，成化年间周洪谟所撰《安氏家传序》称：

（洪武）十九年，霭翠殁……明年，弟安的袭职……安的亦能承继祖业，抚理地方，其后，子孙遂以安为姓。[162]

据《明实录》等史籍，自安的起，贵州宣慰使全都兼用汉姓汉名，[163]并且吸收了包括排行、字、号在内的取名方式，如史料记载了安万钟的两位从弟名为安万镒、安万铨，安万镒之子为安国亨，号龙源，其子安疆臣号泰阶，安尧臣号肖岳。[164]

相对而言，乌撒土官同明王朝更加疏离。其归顺要等到明军大张挞伐之后，朝贡愆期乃至缺贡等情况时有发生，学习汉文化似乎也缺乏积极性。女土官实卜之后，相继继位者有阿能、卜穆、凯班、阿达、能得等，直到成化十三年（1477）伯关袭职后，乌撒土官才兼用汉姓“安”。[165]

本书第四章第三节将通过分析明代彝、汉文献材料对则溪政权合法性的不同解释，进一步探讨明朝廷的经营对黔西北的文化、观念等的影响。

[1]参见江东之《责成川湖协济疏》，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

[2]郑晓：《吾学编·地理述卷下·贵州》。明人桂萼、沈昌世、杨博等亦有类似的看法，参见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2《兵部十一·职方·贵州》。

[3]参见《万历会计录·贵州布政司田赋》；万历《贵州通志》卷1《省会志·民赋》；《明神宗实录》卷411，万历三十三年七月丙申条。

[4]郭子章：《黔记》卷19《贡赋志上》。

[5]事实上，是否应在贵州设置行政机构并非没有争议，一些官员如何文渊、夏瑄等认为只要在贵州设置都司卫所就行了。参见于谦《忠肃集》卷3《南征类·兵部为怀柔远人事》；夏原吉《忠靖集》之《附录·遗事·明故中顺大夫南京大常寺少卿掌尚宝司事夏公行状》；章纶《吏部尚书何公行状》，收入徐纮《明名臣琬琰续录》卷7。

[6]张紞：《云南机务钞黄》，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八月二十九日敕谕。

[7]郑大郁：《经国雄略》卷4《贵州》。这种观点其实是明清时期许多官员、士大夫们的共识，明人章潢《图书编》卷42称：“（贵州）永乐年间始置省治，官则流土相参，民则汉夷错处，不当中土一大县，一线之路，外通滇南，官军月粮仰给于川、湖二省……大抵贵州开省，原为云南，无贵州是无云南也。”萧端蒙之《议处驿站事略》（嘉靖《贵州通志》卷10）云：“贵州藩省之议，本以扼云南之咽吭。”陆应阳辑，蔡方炳增辑《广舆记》卷22称：“第云南僻壤，必取道于贵州，无贵州是无云南也。”清人许缵会所著《滇行纪程续钞》亦云：“从来谈者皆谓滇南重地，而取道于黔中一线，设黔省总为通滇计。”

[8]参见天启《滇志》卷23《艺文志十一》中的《请开粤路疏》《请滇路粤蜀并开疏》；《广舆记》卷22《贵州》；倪蜕《滇云历年传》卷9。

[9]参见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2中的《北京至贵州云南二省路》《南京至贵州

云南西路》。

[10]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9《水西记》。

[11]参见天启《滇志》卷23《艺文志十一》中的《请开粤路疏》《请滇路粤蜀并开疏》。

[12]参见史继忠《元代贵州站赤考》。

[13]清代文献为避康熙姓名之讳，改马烨为马煜或马晔。

[14]奢香倍受各界推崇的状况参见余宏模《明代彝族女杰奢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114～124页。奢香研究是彝族史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在此挂一漏万，择要列举如下：余宏模《水西彝族爱国历史人物奢香》（《山花》1979年第2期）与《明代彝族女杰奢香》；俞百巍、何长凤《明代贵州杰出的女政治家奢香》（《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张捷夫《关于奢香的功绩和史料》（《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鉴真《维护民族团结的彝族爱国女杰——奢香 》（《贵州档案》1994年第1期）；魏绪文《奢香的传说 》（《贵州文史天地》1996第3、4期）；黄炯杰《奢香的历史贡献 》（《贵州文史天地》1996年第3期）；彭云鹤《“帐中坐叱山川走”的奢香夫人 》（《炎黄春秋》1996年第8期）；东人达《明代彝族女政治家奢香考评 》（《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期，《纪念奢香夫人逝世六百周年理论研讨论文集》，1996年8月）；龙志毅《奢香是中华民族杰出的女政治家 》（《贵州文史天地》1996年第3期）；罗世勋《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与水西及周边地区彝族的汉文化教育 》（《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王继超《奢香与安坤的历史抉择》、夷吉·木哈《元明贵州彝族奢氏女杰》、王明贵《论奢香精神》（以上三文均出自《毕节地区民族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李平凡《奢香爱国思想的形成与实施》（《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等等。这些研究赋予了奢香维护国家统一与各民族团结的时代意义，并且大体上以明人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奢香》为信史。

[15]田汝成：《炎徼纪闻》卷3《奢香》。

[16]《安氏家传序》载于嘉靖《贵州通志》卷11《艺文志》。据黄彰健考证，《安氏家传序》作于成化十年八月至十二年十二月之间。参见黄彰健《明史贵州土司传记霭翠奢香事失实辨》，《大陆杂志》第68卷第2期，1984。

[17]田汝成：《炎徼纪闻》卷3《奢香》。

[18]彝书《西南彝志》中的《奢香进京》所载与《炎徼纪闻》相似，但没有提到奢香受“裸挞”。《奢香进京》代表了彝族社会对此事的一种看法，但由于无法确定其写作年代，所以很难确定是这种看法影响了田汝成，还是田汝成的描述影响了《奢香进京》，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参见《西南彝志》第7～8卷，第316～320页。

[19]例如，奢香朝贡时间最早为洪武十七年，而高后已于两年前宾天，不可能接见奢香并赐宴。马煜未被杀等。参见王士贞《弇山堂别集》卷21《史乘考误二》。王氏的考误本身也有个别错误之处，如他认为贵州宣慰使是宋钦，而霭翠系水西宣慰使。但《明太祖实录》卷84洪武六年八月戊寅条载：“（洪武六年八月）诏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卷93洪武七年九月丙子条亦载：“（洪武七年）贵州宣慰使霭翠遣其下曹阿必解贡马。”

[20]黄彰健：《明史贵州土司传记霭翠奢香事失实辨》，《大陆杂志》第68卷第2期，1984。

[21]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7《旧事志三·水西安氏本末上》。

[22]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41，洪武十五年正月丁亥、戊戌条；卷246，二十九年五月乙丑条。

[23]参见吴嵩梁《明顺德夫人奢香墓诗》，民国《大定县志》卷21《艺文志·诗上》。

[24]《明太祖实录》卷142，洪武十五年二月戊午条，另参见《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

[25]《明太祖实录》卷142，洪武十五年二月癸丑条。

[26]如前文所述，贵州西路等贵州驿路在元代其实已大致定型，明初的开驿在很大程度上系开通梗塞之旧路，或修整旧有道路、添设驿站等，并非新开一条道路。

[27]周洪谟：《安氏家传序》，嘉靖《贵州通志》卷11《艺文》。

[28]参见《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明太祖实录》卷159，洪武十七年二月乙亥条。《明史》似乎由此断定奢、马冲突发生于洪武十七年。

[29]《明太祖实录》卷75，洪武五年八月己卯条。

[30]《明太祖实录》卷141，洪武十五年正月甲午条。

[31]张紞：《云南机务钞黄》，洪武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敕谕。

[32]《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33]参见《明史》卷144《何福传》。

[34]参见《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35]参见侯哲安、黄蕴环《明代贵州部分地名考释》，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5集，1980，第60～61页；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50～51页。

[36]吴国伦：《次奢香驿因咏其事》，民国《大定县志》卷21《艺文志》。

[37]田雯：《黔书》卷3《人物名宦·奢香》。

[38]《彝地通彝道》，《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125～131页。《彝地通彝道》写的是洪武年间事，朱元璋派兵征滇进入彝族地区系在洪武十四至十五年，以干支纪年应是辛未至壬申年，下令修驿是在洪武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应是癸酉年。

[39]道光《大定府志》卷15《山水记第四》。

[40]参见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21《外集三·与安宣慰书二》。

[41]《三国志·蜀志》卷5《诸葛亮传》。

[42]参见《明太祖实录》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丙申条；卷75，五年七月壬子条；卷87，七年二月癸卯条；卷95，七年十二月壬子条。

[43]参见杜拯《议以楚卫属贵州疏》，乾隆《玉屏县志》卷10《艺文志》。

[44]其中水西卫、层台卫不久被废除，崇祯初年平定奢安之乱，安氏所管的水东地区又开设了镇西、敷勇等卫所。

[45]万士和：《万文恭公摘集》卷1《乌撒即事》，四库全书本。

[46]郭子章：《黔记》卷4《舆图志》。一些学者已经指出明代贵州卫所排列驿道，以便通滇的情形。参见郭红《贵州都司建置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1期。

[47]天启《滇志》卷18《艺文志·御制类》。

[48]《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110～111页。

[49]汉文史籍亦有缴纳军粮的记载，张紞《云南机务钞黄》收录的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敕谕说道："其乌撒（卫）令乌撒人民供给，务要岁足军食。"

[50]《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125～127页。

[51]《明太祖实录》卷141，洪武十五年正月丁亥条。

[52]万历《贵州通志》卷6《安顺州·纪兵》。

[53]《明太祖实录》卷146，洪武十五年七月己巳条。

[54]前文已提到，水西可以指三种广狭不同的地域，最狭义者指安氏统治的比喇地方，即今黔西县。

[55]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8《古城墓冢第七·黔西》。

[56]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78《奏议·西南夷》。

[57]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3《贵州宣慰司下·古迹》。

[58]刘锡玄：《黔牍偶存·围城日录·叛逆缘起》。

[59]参见《明太宗实录》卷137，永乐十一年二月辛亥条。

[60]王士性：《黔志》。郭红指出贵州卫所的"实土"性质，指出卫所大多位于一府的中心，成为当地有效的管辖机构。他还认为，卫所治地附近统治力量较强，军队长期屯住此地，地方控制趋于成熟，使得府州的设置逐渐成为可能。参见郭红《贵州都司建置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1期。

[61]参见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上），《边政公论》第2卷第11期，1943年。

[62]参见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第83～95页。

[63]关于奴尔干都司的研究可参见杨旸等《明代奴尔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河南中州书画社，1982。

[64]参见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第54～72页。

[65]《明史》卷92《兵志四》。

[66]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

[67]嘉靖《贵州通志》卷3《户口》。

[68]正德年间巡抚贵州地方右副都御史萧翀奏称："贵州二十卫所，俱充发军人。"参见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4《兵部十三·清军》。

[69]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第224~233页。

[70]此即“从征”，明人孙承泽称：“从征者，诸将所素将之兵平定其地，因留戍者也。”参见《春明梦余录》卷42《兵部·兵制》。

[71]“垛集”即集民户三户为一垛集单位，其中一户为正户，应当军役。其他二户为贴户，帮贴正户。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第228页。

[72]谢东山：《贵州军伍考》，万历《贵州通志》卷20《经略志下》。

[73]其实贵州卫所士兵中有许多是通过“谪发”而来，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6称：“（乌撒）卫之士卒皆谪自中州。”马文升《存远军以实兵备疏》（《明经世文编》卷62）云：“查得陕西西安等府所属县分人民，先年为事充军，多有发编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处卫所者。”

[74]《明史》卷40《地理志一·南京》。

[75]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24、313~315页。曹树基正确地意识到，军人家庭的规模并不止于平均每户3人，但移民研究需要考虑的仅仅是军人从原籍带出的人口。

[76]《明宪宗实录》卷39，成化三年二月癸亥条。

[77]《明神宗实录》卷2，隆庆六年六月乙亥条。

[78]蔡文给出的军额明显低于李浩的额数，或许是因为两人统计的卫所数目不同。另一个可能是，明代卫所士兵逃亡非常普遍（李浩与蔡文都指出实际的士兵数量要远远低于他们给出的军额），蔡文的军额已经经过部分修正（当然，明代文献中的各种额数往往长期不变，与现实完全脱结，所以“修正”之说仅仅是一种猜测）。曹树基推算的是洪武时期的军额，当时逃军现象并不严重，其额数似乎不应低于两百年后（隆庆时期）的军额。

[79]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第52页；《明史》卷90《兵志二·卫所》，卷203《吕经传》。

[80]谢东山：《贵州军伍考》，万历《贵州通志》卷20《经略志下》。

[81]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第52、237、243页。

[82]《明英宗实录》卷225，景泰四年正月丁卯条。

[83]《明宪宗实录》卷39，成化三年二月癸亥条。

[84]万历《贵州通志》卷10《毕节卫·户口》，嘉靖间的2885户并非原额，而是士兵大量逃亡后所剩下的“实在”之数。

[85]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3《附录》。

[86]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3《附录》。

[87]参见嘉靖《思南府志》卷7《拾遗志》。

[88]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3《户口》。

[89]嘉靖《贵州通志》卷3《户口》。

[90]万历《贵州通志》卷4《贵州宣慰司·风俗》。

[91]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

[92]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贵州宣慰司上·风俗》。这段引文描述的是宣慰司城一带的风俗，《贵州通志》卷3又称“贵州卫、贵州前卫（风俗）俱同宣慰司”。

[93]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6《毕节卫·风俗》《乌撒卫·风俗》。毕节卫与乌撒卫位于黔西北境内，而贵、前二卫及宣慰司城与水东地区毗邻。

[94]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

[95]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贵州宣慰司·风俗》；卷16《毕节卫·风俗》。

[96]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

[97]万士和：《万文恭公摘集》卷6《贵州文明书院义仓记》。

[98]参见胡庆钧《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

[99]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6《毕节卫·风俗》。

[100]嘉靖《普安州志》卷1《舆地志·风俗》。

[101]《明一统志》卷88《贵州宣慰司》。

[102]如成化年间程番府知府邓廷瓒奏称：“本府新立学校，土官土人子弟在学者乞岁贡一人，如选贡例。”参见《明宪宗实录》卷221，成化十七年十一月己卯条。

[103]参见包汝楫《南中纪闻》；乾隆《毕节县志》卷8《艺文志·张氏传》。

[104]盛览其人正史不载，尹珍事迹见于《后汉书》卷86《夜郎传》以及《华阳国志》卷12《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据说盛览乃西汉牂牁名士，曾向司马相如请教作赋。尹珍系毋敛人，“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师从许慎学五经，从应奉“学图纬，通三才”。学成后还乡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参见莫友芝《黔诗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第11～12页。

[105]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6《学校·文明书院》。

[106]莫友芝：《黔诗纪略》卷1。在《雪鸿堂诗蒐逸·序》中，莫友芝称：“黔自明始有诗，萌芽于宣正，条衍于景成以来，而桐豫于隆万。”明人王直所著《抑庵文后集》卷9《赠黄训导诗序》亦称：“贵州古鬼方之地，其人皆夷獠，诗书礼义之习前古未有也。国朝洪武中始建学设官以教育之，将革其旧俗，俾同乎内地。”

[107]永乐十一年（1413）之前贵州尚未设省，境内全是卫所，没有府、州、县。

[108]王学益：《广解额疏》，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慎择师儒”一句并不意味着当时朝廷任命贵州地区的儒学教授、训导等学官时非常慎重。事实上，由于贵州在时人心中是自然与人文环境都极为险恶之地，许多学官都不愿赴任，明成化十九年贵州左布政彭韶奏称：“照得贵州所属卫、府、宣慰司共设有儒学二十一处，为因地方僻远，夷俗丑陋，铨选学官少有到任。见今贵州宣慰司镇远等府、兴隆等卫各该儒学共缺教授一十余员，以致士无专师，人不乐学，儒风不振，夷俗如旧。”参见彭韶《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等谨奏为荐举师儒事》，《彭惠安集》卷1。

[109]参见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第262～265页。

[110]万历《贵州通志》卷4《贵州宣慰司·学校》。

[111]参见王直《宣慰司儒学记》，嘉靖《贵州通志》卷6《学校·贵州宣慰司》。

[112]贵、前二卫本身没有设置儒学。

[113]参见万历《贵州通志》卷10《毕节卫·学校》；刘秉仁《毕节卫新迁儒学记》，万历《贵州通志》卷21《艺文志·簧序类》。

[114]《明史》卷77《食货志一》。

[115]贵州巡抚王学益称："凡系纳粮当差，俱为赤子，岂有弃而不教之理？"（嘉靖《贵州通志》卷6《学校·贵州宣慰司》）可见科举是对输赋应役者的回报，而水西的原住民也不愿渡过陆广河入司学，"各夷惧出痘疹，不渡六广"。参见朱燮元《西土分设已明下台议善后事宜列款具陈恭请圣裁事》，《朱少师奏疏钞》卷8。在贵州有的地区，入学的原住民生员稍多，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学习并接受儒家文化也需具体分析，明人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71《科试备考·试法·远方学生就近乡试》称："宣德二年六月，贵州布政司言，普安州儒学生员皆是猓猡、僰人，莫知向学，今选俊秀军生王玺等入学读书，以备贡举。"

[116]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6《科目·贵州宣慰司》。永乐进士刘球所撰《两溪文集》卷23《故贵州宣慰司儒学训导王公墓志铭》称贵州宣慰司儒学训导王玠到任时，发现"生徒半夷人，其非夷者多染于夷俗，公力变以中华礼义之习，未几而服饰渐更，揖让有规，甚得都帅镇远侯顾某重"。结合当时贵州宣慰司的及第者都是卫所子弟来看，刘球称"生徒半夷人"可能有夸饰色彩，以此凸出王玠的化导有方。对死者的夸饰通常是墓志铭这种文体的应有之义。

[117]参见朱燮元《西土分设已明下台议善后事宜列款具陈恭请圣裁事》，《朱少师奏疏钞》卷8。由于没有认识到儒学与卫所的关系，一些学者把贵州宣慰司学等理解成明王朝对"更多土官子弟以至广大彝族人民推行同化教育"。参见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第132～133页。有人甚至认为这些学校属土官开办，并且想当然地以为其对少数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见李家祥《奢香与明清黔西北儒学》，《纪念奢香夫人逝世六百周年理论研讨论文集》，中共大方县委宣传部等印，1996。

[118]参见《明史》卷3《太祖三》。

[119]《明太宗实录》卷147，永乐十二年正月戊戌条。

[120]参见《明仁宗实录》卷9，洪熙元年四月乙丑条。

[121]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6《学校》。

[122]莫友芝在黔西人潘文炳及门人胡长新的帮助下，历十余年之功，撰成《黔诗纪略》。其资料来源相当广泛，"逮于逸编断碣、土酋世谱，有足征文考献者，罔不穷力搜访，几于大备。"（参见《黔诗纪略》之《卷首题记》）该书虽不能说已搜尽明代黔省之诗人及诗作，但大体上已能反映明代贵州诗人、诗歌的面貌，本书以该书作为资料进行分析，应不会离史实太远。

[123]张谏家本"勾容旧族，因戍以家贵州赤水"，参见刘球《两溪文集》卷10《送张孟敬还赤水诗序》。

[124]莫友芝：《黔诗纪略》卷1。张谏是笔者所见最早尊盛览、尹珍为贵州文教拓荒者的士人（官员），此后许多诗、文都表达了这一观点，如清人何绍基诗称："学术孰始开黔陬，许君弟子尹荆州。图书业成授乡里，千载坠绪悬悠悠。"（《道光甲辰五月初一日奉命充贵州副考官》，《使黔草》）周鸣銮亦云："汉尹珍从许叔重受经，

为黔中学术之始。”（《五月十一日闻命纪恩恭赋二律》，《使黔集》）

[125]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第234～289页。

[126]贵州卫所士兵为劳役所困的情况，前文分析贵州赋役制度时已有涉及，明代许多官员、文人对此深表忧虑，嘉靖进士，曾贬谪贵州的陆粲称：“担夫来，担夫来，尔何为者军当差？朝廷养军为杀贼，遣作担夫谁爱惜。自从少小被编差，垂老奔走何曾息。只今丁壮逃亡尽，数十残兵浑瘦黑。可怜风雨霜雪时，冻饿龙钟强驱逼。手抟麦屑淘水餐，头面垢腻悬虮虱。高山大岭坡百盘，衣破肩穿足无力。三步回头五步愁，密箐深林多虎迹。归来息足未下坡，邮亭又报官员过。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贵州都来手掌地，焉用官员如许多？太平不肯恤战士，一旦缓急将奈何？噫吁嚱！一旦缓急将奈何。”（陆粲：《陆子余集》卷8《担夫谣》）

[127]王骥：《贵州军粮疏》，《明经世文编》卷28。

[128]参见《明神宗实录》卷2，隆庆六年六月乙亥条。

[129]参见民国《贵州通志》第18册《前事志九·兵部议复思南府蛮夷长官安逸奏请筹边五事》。

[130]参见于谦《忠肃集》卷3《南征类·兵部为怀柔远人事》。

[131]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316页。

[132]参见万历《明会典》卷19《户口总数》。

[133]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316页。

[134]永乐《普安州志》可能已佚，其序言载于嘉靖《普安州志》。

[135]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军平定四川播州以后，将播地一分为二，改土归流，编订里甲，许多原住民由此成为国家编户，并且南部的湄潭、龙泉、余庆等县改隶黔省。这也是贵州民籍增加的原因之一。

[136]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5《公署·礼部复议贵州开科取士疏》；邓廷瓒《开科取士》、王学益《广解额疏》、林乔相等《再广解额疏》，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莫友芝《黔诗纪略》卷1《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

[137]被政府籍为编户的原住民情况与此不同，不在本书讨论之列。

[138]在其他土司地区可能也有原住民接受汉化教育的情况，如川南的永宁宣抚司学的生儒“俱土獠夷人，朝廷所授教官语言下（不）通，难以训诲”。于是改令来自永宁的监生李源为司学训导。参见《明宣宗实录》卷115，宣德九年十二月甲辰条。不过我们依然不能肯定这些入学的“土獠夷人”是普通原住民。

[139]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6《学校·社学》中巡抚王学益对提学副使徐樾《议为建社学变夷俗以敷教化事》的批文。

[140]参见龙文彬《明会要》卷25《学校上·社学》；《明会典》卷78《学校·社学》。

[141]嘉靖《贵州通志》卷6《学校·社学》。

[142]参见万历《贵州通志》卷4《贵州宣慰司·学校·社学》。

[143]除了文化、礼俗方面的不习惯外，土官们对儒学、社学的冷漠还有着维护自

己统治的目的。朝廷任命土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边远地区的文化、礼俗的隔膜，因此在汉人移民较多或者汉化较深的土司地区（如贵竹长官司），官员们往往会考虑进行改土归流，详第五章第一节关于贵竹长官司改流的论述。

[144]《明太祖实录》卷239，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壬申条。

[145]参见《明太宗实录》卷35，永乐二年十月辛未条。

[146]参见万历《明会典》卷121《兵部四·土夷袭替》。

[147]《明孝宗实录》卷151，弘治十二年六月壬子条。

[148]《明史》卷310《湖广土司传》。

[149]《明太祖实录》卷202，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条。

[150]参见《明太祖实录》卷203，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戊申条。

[151]《明史》卷73《职官志二》。

[152]包汝楫：《南中纪闻》。

[153]参见朱燮元《西土分设已明下台议善后事宜列款具陈恭请圣裁事》，《朱少师奏疏钞》卷8。

[154]参见温春来《彝威与汉威——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第231～232页。

[155]包汝楫：《南中纪闻》。黔西北的上层人物为了扩大势力，有时亦与其他族类的土司通婚，如贵州宣慰使安疆臣与播州宣慰使杨应龙是亲家，参见沈一贯《言川贵总督揭帖》，《明经世文编》卷435。

[156]下文将讨论土司“向化”的情形，这些情形的出现必须同上文所探讨的整个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移民运动联系起来，明廷的“化导”政策只是原因之一。

[157]例如正德年间的水东土官宋昂与弟宋昱撰著诗集《联芳类稿》，嘉靖初年的土官宋炫则撰有诗集《桂轩拙稿》。宋昂还修建“会景亭”，以为宴乐之所，并选取所辖地中八处风景优美者，名为“洪边八景”，颇有中土士人的风雅。宋昂之从弟宋冕修有“世安堂”，明景泰进士、华盖殿大学士徐溥为之作记。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特别将宋氏作为土官“向学”的范例之一。参见罗玘《圭峰集》卷5《联芳类稿序》；王直《抑庵文集》卷1《会景亭记》；郭子章《黔记》卷14《艺文志上》；朱彝尊《明诗综》卷93，《曝书亭集》卷44《书土官底簿后》；徐溥《谦斋文录》卷2《世安堂记》。

[158]嘉靖《贵州通志》卷11《艺文·安氏家传序》。

[159]参见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21《外集三》中的《与安宣慰书》《答毛宪副》。

[160]道光《大定府志》卷47载：“乌蛮之俗，例不署姓，久之自忘其姓。”因此当正统年间贵州宣慰使陇富入觐时，英宗问其姓，陇富答云：“无姓。”英宗复问：“原籍何地？”答以“安西”。于是赐姓安氏。此事《明实录》《明史》不载，并且据《明实录》，自安的起，每一任贵州宣慰使都有汉姓，如安的、安卜葩等，疑《大定府志》采纳民间传说，误。

[161]参见《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正月乙丑条，卷108，九年九月丁丑条。

[162]周洪谟：《安氏家传序》，嘉靖《贵州通志》卷11。

[163]参见余宏模《明代贵州宣慰使“赐姓安氏”例证》，《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由于没有利用《明实录》与《安氏家传序》等史料，有学者认为直到正统七年皇帝赐姓，水西首领才改安姓，误。参见朱屏《贵州宣慰使是明正统七年赐姓安氏的》，《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4期。

[164]参见邱禾实《封亚中大夫贵州宣慰使安君墓志铭》，《大定府志》卷17《文征六》；《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165]参见《土官底簿》卷下《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道光《大定府志》卷50《旧事志六·乌撒安氏本末》。

第四章 彝族制度在明代的变化

以上两章探讨了土司制度、卫所制度、流官制度确立的历史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一过程，黔西北地区形成了“彝制”与“汉制”并行的局面。在这种更加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彝族勾政权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本章将着力探讨的问题。

第一节 承袭制度之演变

明王朝对土司的“宠之名号”“假予爵禄”主要体现在承袭制度上。[1]土官一般都能世袭，但为了显示驾驭之权，明廷在赐封土官时往往并不在书面上承诺世袭，“以是示驾驭之权”。对实力雄厚的土司，如水西、乌撒等，朝廷又常常做出一定妥协，明确规定予其世袭，以示绥抚。[2]

同元代一样，明廷坚持对土官袭职的批准权，并发展出一套严密的审批程序，要求取具土官宗支图本，对土官应袭子孙“预为勘定，造册在官，依次承袭”，整个过程都有地方官员监督，并由他们上奏朝廷批准。[3]有时抚、按等官不及时勘报，以致应袭土官长期不能承袭。[4]

关于承袭的具体条文，万历《明会典·吏部五·土官承袭》与《兵部四·土夷袭替》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吴永章等学者对此亦有较全面的讨论，兹不赘述。[5]本节旨在通过具体的个案，展现出在中央王朝向边远地区渗透的过程中，当地族类的承袭方式所发生的演变。

一 从“更迭而为”到嫡长子继承制

第一章已提到，在论述水西的政治制度时，以往的研究者们常常用宗法制模式加以解释，但从则溪官员的任命来看，权力的分配并不完全符合嫡长子为大宗，其余众子为小宗，层层分封的宗法制原则，许多女儿、母系亲属甚至其他支系的人都可以分享权力。本节将进一步讨论君长职位的承袭情况。

关于此问题有两份重要文献，一是正德年间王阳明致水西君长、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的书信，其中写道：

且安氏之职，四十八支更迭而为，今使君（指安贵荣）独传者三世，而群支莫敢争，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衅，孰不欲起而代之乎？[6]

另一份文献是成化年间安贵荣请两京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所撰的《安氏家传序》，该文对洪武初年至成化年间的每一位承袭人的身份都有简单介绍。[7]根据以上两份史料，方国瑜指出：

《黔南职方纪略》说："安氏非家嗣不能有其官，亦非家嗣不能有其土。"又《水西土官制度略》说："夷俗以嫡长为贵，宣慰之子，惟嫡室长子得袭职。"这是后来的事，在早期恰好相反。[8]

方国瑜的见解是富有洞察力的。下文将根据《安氏家传序》，结合其他史料，确定从元后期到明前期水西各代君长间的亲属关系，[9]并对君长职位从群支"更迭而为"到父子相传的背景进行简单考察。兹将水西土官系谱考证如下：

阿那

↓

阿画（阿那之弟）

↓

霭翠（阿画从子）

↓

安的（翠弟，《明史》卷316则云："子安的袭。"《家传》成文时间早，且必定利用了安贵荣所提供的材料，疑《明史》有误。）

↓

安卜葩（的弟）

↓

安纳洪（卜葩之叔辈。《家传》云："卜葩年老有疾，安纳洪替职，（永乐）十六年赴京进贡，回至襄阳江汉驿病卒。孙彬楫尚幼，从父安中借职。"此记载似未说明病卒者是卜葩抑或纳洪，《明太宗实录》卷233永乐十九年正月壬午条载："贵州宣慰使安卜葩来朝，贡马。赐钞币，遣还。"卜葩十九年尚在，可知死者系纳洪，安中是安纳洪之孙彬楫的从父，下文又考证出他是卜葩之弟，因此纳洪系卜葩之叔辈无疑。）

↓

安中（卜葩之弟。《明太宗实录》卷266永乐二十一年十二月甲戌条："贵州故宣慰使安卜葩之弟忠贡马六十匹，且奏兄安卜葩已卒，请袭职，从之。"可知中系卜葩之弟。《家传》为"安中"，《明太宗实录》为"安忠"。）



安聚（中从子。《明英宗实录》卷11宣德十年十一月辛未条云："贵州故宣慰使安中男聚，女直指挥若亦不花等来朝，贡马及方物。"卷14正统元年二月癸丑云条："命贵州宣慰使司故宣慰使安中侄聚，弗恩木卫故指挥使察罕贴木子木当哈俱袭职。"可知聚系中从子。但嘉靖《贵州通志》所载《家传》称："安中物故，从父安聚袭。"疑该版《家传》有误，万历《贵州通志》所载《家传》改为："安中物故，安聚袭。"）



安陇富（聚从子）



安观（陇富子）



安贵荣（观子）

长期以来，权力传承并未遵循父死子继的原则，[10]王阳明显然明白这个情况，所以称"且安氏之职，四十八支更迭而为"。自安陇富起才将君位传给儿子与孙子，"独传三世（即陇富—观—贵荣）"，[11]揭开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历史。这一制度的变更是明廷介入的结果，正所谓"今使君（指安贵荣）独传者三世，而群支莫敢争，以朝廷之命也"。

朝廷愿意扶助陇富一支垄断大权，或许有观念与习惯上的因素，[12]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后者的恭顺与效忠。陇富当政前后，明廷在西南地区有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可能是陇富改制的契机。他本人的承袭同其报效有关，继位后又积极为明廷东征西讨。《家传》云：

安中物故，安聚袭，正统二年授怀远将军诰命。五年病卒。六年，兵部尚书王骥同定西侯蒋贵征麓川，从子安陇富为舍人，纳马四百匹。七年，陇富袭职。十四年授怀远将军诰命。是岁，前湖广镇远、洪江等处苗贼作乱，攻围城池，烧劫屯寨，延及贵州，其势甚盛。贵州三司取陇富领兵赴贵州（这里的贵州指布、按、都三司的驻地，当时称宣慰司城，即后来的贵阳城——引者注）护守城池，议以母奢智保水西，陇富率兵万余至贵州北郭，据山为营，故苗贼不敢逼城。后苗贼恨陇富护官军，乃来水西攻宣慰母子。陇富急回水西，苗贼四维蜂起，度不能敌，挈家奔入硬寨，又被攻围。其子观虽拒贼，年幼，率诸酋与贼对敌，凡六十余阵。半载余，诸贼退散，地方以宁。朝廷闻陇富母子有保障杀贼之功，命行人刘泰赍敕并彩缎奖谕。其后，毕节卫诬欲加害，陇富奏陈冤枉，请为辩明，蒙降敕奖谕，以安其心。景泰三年，总兵官方瑛征紫江等处叛苗，陇富纳马一百匹给军。天顺二年，征东苗，又纳马二百匹

给军。四年，西堡蛮反，总兵官刘玉来讨其罪，陇富率土兵随征不次，杀贼有功，累赏银牌。[13]

《家传》所载并非空穴来风，《明实录》[14]、《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等可与之印证。陇富对中央王朝的效力之勤在水西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许是他获得明廷支持的重要原因。《大定府志》对水西内部争夺宣慰使一职亦有所反映：

陇富幼，诸罗欲择各目之年长者立为宣慰使。（陇富养母）奢氏入朝自陈，英宗许之，乃以陇富袭。[15]

陇富之后，父死子继之制得以确立，除非君长乏嗣，否则旁支绝难问鼎宣慰使之职。安万铨的故事对此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安万铨是宣慰使安万钟之弟，嘉靖七年（1528），万钟卒，其子阿写尚幼，于是兵部议以万铨暂领宣慰职务，管摄夷民，以待阿写长成。[16]以后安万铨虽有平定都匀阿向叛乱之功，却不得不在嘉靖十八年（1539）逊位，阿写袭职，改名安仁。[17]

乌撒君长职位的承袭情况，文献记载较少。但至少在明初，乌撒已经开始实行父子相传以及嫡长子优先继承的原则，由于史料的阙如，这一原则确立的过程与背景已难以得知。可以肯定的是，朝廷对此原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力图使其能够得到确实贯彻。《土官底簿》之“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条云：

实卜系妇人，洪武十六年除本府女知府。患病，男阿能应替，洪武十八年六月敬依准替。实卜病故，长男禄革先故，嫡孙卜穆年幼，保次男阿能替职。后卜穆年长，赴京朝奏，二十四年奉太祖皇帝圣旨：袭了。钦此。卜穆故，男凯班年幼，卜穆亲弟阿达借职，永乐十六年正月奉太宗皇帝圣旨：只着他亲男凯班做知府。钦此。阿达发回，凯班未任，病故，保阿达侄安铭，赴京告袭，中途亦故，又保卜穆弟能得袭职。宣德二年九月奉圣旨：著能得袭做知府。钦此。故，堂弟尼禄宣德五年六月奉圣旨：准他袭。钦此。故，堂叔公普茂系阿能长男，能得堂弟，正统四年四月奉圣旨：准他袭，还著三司保结前来。钦此。故，卜穆应袭曾孙福客患病，保前故知府阿能长孙陇旧借袭。成化四年三月，本部题准，行令陇旧冠带到任管事，福客病痊，照旧退还承袭。故，后陇旧患风病退还，福客亲弟安伯承袭。成化十三年八月奉圣旨：是。钦此。行令安伯就彼冠带袭职。故，男福沙亦故，户绝。三司奏保：舍人安得系已故土官知府实卜嫡派，土官知府尼禄长男宇通嫡长男，安得应袭。弘治三年六月奉圣旨：是。钦此。[18]

二 对“此绝彼继”传统的干预

即便父死子继之制确立，在君长乏嗣时亦会出现妻、弟、侄、叔、甥等亲属继位的情况。明王朝对此是予以承认的，《明会典》云：

凡土官袭替，洪武二十七年，令土官无子，许弟袭。三十年，令土官无子弟，而其妻或婿为夷民信服者，许令一人袭。

嘉靖九年题准，土官衙门造册，将见在子孙，尽数开报，某人年若干岁，系某氏生，应该承袭；某人年若干岁，某氏生，系以次土舍，未生子者，候有子造报，愿报弟、侄若女者，听。布政司依期缴送吏兵二部查照。[19]

黔西北的情形尤为复杂，前文提到，改流以前，在水西、乌撒周围尚林立着若干个部落政权，主要有滇东北的阿芋陡家、芒部家、乌蒙家、古口勾家；黔西南的阿外惹家；黔中的播勒家；川南的扯勒家。这些君长国的政治制度相似，具有同宗共祖的信念，并且互通姻媾，来往密切，形成了横跨川、滇、黔三省的族类认同团体。[20]因为血缘与姻亲关系的交织，所以当某个君长乏嗣时，继任新君极有可能来自其他君长国。《明史》载：

先是，四川乌撒军民府、云南沾益州，虽滇、蜀异辖，宗派一源。明初大军南下，女土官实卜与夫弟阿哥二人，率众归顺，授实卜以乌撒土知府，授阿哥以沾益土知州。其后，彼绝此继，通为一家。[21]

“彼绝此继”的实行，有时会出现父子同时担任君长乃至一人身兼两地君长的情形，此时尽管符合承袭制度，但已经与控驭土酋并削弱其权力的初衷相悖，难免会引起官员们的警觉甚至干预。如万历年间安绍庆、安效良父子分领沾益、乌撒，巡抚贵州御史杨鹤疏称：

乌撒者，滇蜀之咽喉要地也。臣由普安入滇境，七日始达乌撒，见安效良之父安绍庆据沾益，中当曲靖之门户，效良据乌撒，又扼滇蜀之咽喉，两雄并立，父子各据一方，且壤地相接，无他郡县、土司以隔绝之，将来尾大不掉，实可寒心。[22]

杨鹤据此提出将乌撒军民府改隶贵州，以便就近控扼。万历皇帝令“所司速议”，不料三年后奢安之乱爆发，此事不了了之。但在此之前，明廷已成功阻止了水西安尧臣对镇雄军民土府的统治。

镇雄在彝语中称芒部（，又译作“莫哺”），其远祖妥芒部与妥阿哲是亲兄弟，二人分别开创了芒部与水西的基业。明代设置镇雄军民土府，赐封芒部酋长世袭知府，后取汉姓陇。水西与芒部既是血亲又是姻亲，关系异常亲密。万历年间，水西君长安疆臣之弟安尧臣入赘芒部，改名陇澄，时逢镇雄土知府陇清及其弟陇源故绝，安尧臣遂行使知府之权。不过，面对这一符合制度的承袭，朝廷上下并没有“胥从其俗”，各级官员争相指责尧臣非陇氏之后、“冒姓陇”、“欲篡镇雄”等罪状。最后安尧臣不得不离开镇雄，返回水西。[23]

兵科给事中宋一韩的奏疏，集中表述了反对安尧臣任镇雄土知府的理由：

查土官事例，嘉靖二十三年（万历《明会典》卷121《兵部四·土夷袭替》作“嘉靖三十三年”——引者注）题准，土官土舍嫁娶，止许本境本类，不许越省，贻害地方，每季兵备道取具甘结，故违者听抚按从实具奏，兵部查究。是尧臣之赘，例所禁也。弘治十三年题准，土官袭替，其通事把事人等（万历《明会典》卷121《兵部四·土夷袭替》作“其通事把事人等及各处逃流军囚客人”——引者注）拨置不该承袭之人争夺仇杀者，俱问发边烟瘴地面充军，是尧臣之请袭，又例所禁也。夫不宜婚而婚，不宜袭而袭，与不宜听而听，一则纵虎逸柙，一则养虎遗害，黔固失矣，蜀亦未为得也。且尧臣犯例而婚，而请袭，而又立功，芳饵既不肯吐，重质又难卒悔。……方征播报效，人知为陇澄，不知为安尧臣耳，不名为安尧臣，不见为贵州土舍篡据之罪。[24]

宋一韩提到的有关土官通婚与袭职的禁令，大致可与《明会典》相印证，显非妄言。但以此反对尧臣，理据却未必充足。首先，由黔抚郭子章的奏疏以及兵部的议复可知，尧臣系“幼继陇姓”，[25]明制并未反对土司之间的跨省过继，在承继宗祧以及社会身份（而非血缘身份）的意义上，他可算是镇雄土官之后，与镇雄上层之间的嫁娶符合“本境本类”的原则，更何况，禁止跨省联姻并不等于禁止跨省袭职。其次，宋一韩所引弘治十三年（1500）的规定是要惩罚那些怂恿不该袭职之人争袭土官职位，以致引起仇杀争斗的“通事把事人等及各处逃流军囚客人”，而非反对土官的其他亲属袭位，与安尧臣任职之事风马牛不相及。并且，安尧臣任土知府并未引起任何争斗，甚至可说是深得镇雄民心。他将离开之时，“部落哀留未容出境”，他被迫离开之后，“诸夷目又执留其妻禄氏不肯放”，让他继续秉政。[26]复次，宋尧韩认为尧臣之所以能袭位，是官员们不知其真实身份，声称“方征播报效，人知为陇澄，不知为安尧臣耳”，这完全与事实不符（详后）。最后，从具体的执行过程来看，禁止土司间的跨境婚姻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文。例如，安尧臣后又娶四川所辖永宁宣抚使之女奢社辉为妻，官员们对此清清楚楚，却并未看到任何关于此事的记载。[27]万历年间参与处理播州事宜的官员的奏疏还表明，四川播州宣慰司杨氏与贵州宣慰司安氏“接壤世姻，声势依倚”。[28]宋一韩等人此时质疑尧臣婚姻的合法性，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有趣的是，当安尧臣初登知府位时，朝野上下并未觉得有何不妥，在公文中他被称为镇雄土官，其合法性并未受到质疑，他甚至得到三省总督李化龙的嘉奖。官员们的友好态度事出有因，当时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正面临着播州土司的挑战。

万历二十四年（1596），播州宣慰使杨应龙起兵反明，攻掠周边。二十七年，大败前来进剿的贵州都司杨国柱，九股生苗与黑脚苗应风响应。第二年杨应龙分兵五路，攻陷四川綦江，重庆危急，朝野震动。[29]当时叛兵已达14万之多，湖广巡抚支可大、贵州巡抚郭子章认为至少需要十四五万之兵方能与之相抗，而朝廷最后调集的军队来自陕西、甘肃、浙江、湖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30]多达30余万，运夫亦有30万之多，饷费则高达800万两。[31]可以说，镇压杨应龙已经是一项

极为沉重的负担，如果其他土官趁机起事，西南局面可能会无法收拾，因此明王朝千方百计对他们厚加笼络。特别是对比播州强大得多而又与其有姻亲关系的水西安氏，[32]朝廷更是极为担心，内阁大学士沈一贯指出："若安助杨，无论杨不可诛，而贵州省城亦不可保。"[33]黔抚郭子章"上遵皇上之旨，中受枢臣之画，下同前督臣之议"，为了争取宣慰使安疆臣的效忠，不惜诱以乌江六百里之地，并且赠以古剑，歃血盟誓，动之以私情。[34]

在平播之役的关键时刻，承认安尧臣的统治，不但可以赢得镇雄军民土府的效忠，并且可以稳定其兄安疆臣，关系到整个西南地区的安危。可以说，明王朝在此问题上的绥抚策略是相当成功的。史称："化龙先檄水西兵三万守贵州，断招苗路，乃移重庆，大誓文武。"[35]安氏兄弟虽然在平播战争中犹疑不定，[36]但最终还是与其母凤氏亲统大军，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十三日攻破了黑水关、大红关，接着又攻克洛蒙关大水田，距播州城仅十里之遥。主持平播战事的四川、湖广、贵州三省总督李化龙多次下令嘉奖安氏母子，并明确承认了陇澄的土官身份：

看得宣慰安疆臣、土官陇澄，深入巢穴，屡立战功，虽无首级之来献，实多矢石之交加。至于斩使激战，足见超距之勇；而馈仪不受，尤征清节之风。此土司中所难者，相应嘉奖，以示旌异。[37]

征播之役结束不久，贵州境内又发生了"路苗"之变，史称"仲苗劫掠道路"，谓之"路苗"。其实在驿道附近劫夺财物是贫穷苗仲的一种生存方式，由来已久，但平播后此风愈演愈烈，滇黔驿道几近瘫痪。"通路官商不敢往来，屯堡军民不敢出入，贵州数百里之境顿成盗薮。"而播州初平，"疮痍未起，库藏益竭"，出兵剿苗颇为困难，明廷不得不再次倚重贵州宣慰使安疆臣，令其出兵一万，辅以官兵五千，两路夹击。万历三十三年（1605），苗变基本平息。[38]而安尧臣也摇身从平播功臣、镇雄土官变成了以欺骗手段谋据镇雄的篡位者。

事情的诱因是永宁宣抚司内部的争权事件。永宁宣抚司即彝语所称的扯勒（ ）部，系九大君长国之一，属于六祖中恒祖的后裔。史称："乌撒与永宁、乌蒙、沾益、水西诸土官境土相连，世戚亲厚。"[39]万历初年，永宁宣抚奢效忠去世，其妻奢世统无嗣，而其妾奢世续则有二子崇周、罗哥，于是崇周袭位，因其年幼，实权掌于奢世续手中。奢世统早与奢效忠弟沙卜相通，二人欲掌永宁之权，起兵攻世续，世续奔入永宁卫躲避，其二子则寄居镇雄。总兵郭成、参将马呈文获悉后，以解决争端为名，率兵数千入永宁，将奢氏数代积蓄劫掠一空，但在归途中被水西、永宁的联兵打得一败涂地。此事惊动了四川巡按，经其奏报，郭成等被逮，同时朝廷则借机分裂永宁土地，让世统世续分地而治，待奢崇周长成后袭职。[40]

不料奢崇周早夭，奢世统所抚养的奢效忠之侄奢崇明袭位，但奢世续却匿宣抚司印不给，并依仗其女婿、镇雄土官安尧臣与世统仇杀。

[41]到了万历三十年代，平定了播乱与苗变的官员们终于集中精力来解决此事，经追问，奢世续称司印在镇雄陇澄处（陇澄即安尧臣，司印其实已被世续私授予阿利），于是官员们开始质疑陇澄的合法性，并称其应对永宁两土妇的仇杀事件负责，《明实录》称：

陇澄者，水西安尧臣也。陇氏垂绝，尧臣入赘，遂冒陇姓。方平播州叙大水田功状时皆称陇澄，不知其为尧臣也。尧臣既外怙播功，内伏水西，有据镇雄制永宁心，而蜀抚按以尧臣非陇氏种，无授镇雄意。尧臣以是怀两端，阴助世续，意世续得授阿利，则己据镇雄益坚。[42]

以后《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等书皆采纳此说，似乎安尧臣冒姓、“中朝不知”等事已证据确凿。[43]但其实这既是对责任的规避，亦是一种有意的谎言。在此之前，兵部在回复贵州巡抚郭子章的奏疏中已写道：“惟是尧臣幼继陇姓，已离水西，镇雄固其巢穴。”[44]可见安尧臣改陇姓时年龄尚幼，可能在入赘之前，与冒姓图任土知府似无关联。此外，官员们早就知悉陇澄系安疆臣之弟，所谓“历年播州叙大水田功状时皆陇澄，不知其为尧臣也”完全是抹杀事实，平播战争期间，左监军杨寅秋就提到安氏兄弟，[45]三省总督李化龙甚至下过一道题为“行奖安疆臣兄弟”的牌票：

看得二官（指安疆臣与陇澄——引者注）持重有谋，量敌善战，深入贼地，冒矢石而连克多关；直透虎巢，越山溪而尽歼群丑。伊母凤氏，性禀贞淑，躬履战场，有继夫之大志，有勤王之真诚，贤母贤子，难兄难弟，诚可嘉尚。[46]

而贵州官员在叙播功时亦称：

眚一目（安疆臣当时患眼疾——引者注）而神弥全，殒一女（安疆臣征播时正值其女病故——引者注）而家不顾，是母是子，难兄难弟。[47]

至于“以尧臣非陇氏种”而拒绝授其土知府，既有违惯例，于制度又无根据，前文所引《明会典》中的规定已表明亲戚旁支可以袭位，而宋一韩“引经据典”的质疑，其实是对制度的有意误读。《明史·职官志》亦云：

凡土司之官九级，自从三品至从七品，皆无岁禄。其子弟、族属、妻女、若婿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48]

水西安氏与镇雄陇氏既同宗共祖，而安尧臣年幼时即“继陇姓”，又系镇雄土官之婿，并且素受夷众拥戴，[49]完全符合袭职条件。

其实，官员们编制出来的种种阻止陇澄继位的理由，都只是一种表面之词，其真正用意，在四川巡抚乔壁星的奏疏中有所流露：

当此追印（指永宁宣抚司印——引者注）正严之时，（尧臣）占之

则辞不真，献之则心不甘，托为狐兔之悲，冀收蚌鹬之利，诚欲我杀（奢）世续，则既得以减寄印之口而快其私，又得为报复之言而惑其众，使阎宗传（奢世续之亲信——引者注）等情穷势极，必折而入水西，则安氏三窟之势成，而西南之患重矣。[50]

可见，官员们最担心的莫过于水西安氏势大难制，拒绝陇澄袭职，严禁他干预永宁宣抚司事务，都是在为抑制安氏势力的目的服务。乔壁星甚至提出动用武力来迫使安尧臣离开镇雄：

尧臣狡谋，欲篡镇雄，垂涎蔺地有年矣……倘尧臣稔恶如故，臣即移师击之，毋使弗摧之虺复为蛇，弗窒之罅复为河也。[51]

在蜀兵集结的强大压力下，陇澄上书贵州巡抚郭子章，一方面表示自己即将告退，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辩白：

陇澄之入继镇雄，致仕知府陇富承袭水西，名安陇富，则安陇之为一家旧矣。今陇已绝嗣，取澄继袭，司道互结，抚按勘明继立之，与私篡大不同科。且方征播之时，调取陇澄，奖率部落，澄屡奏战功，两奉题叙。……又以蔺州真印未出，疑澄助逆，今澄已追获真印于夷目阿夷处，验交两省给奢崇明矣。而川师久集不撤，将谓欲擒阎宗传等正法，则各恶乌合，不过匹夫，何烦大师？将欲驱逐陇澄，则澄素怀忠义，非梗化者比。今澄即栖栖不去，恐川兵临境，则镇雄无辜，难免池鱼。欲即行而镇雄印信接管无人，部落哀留未容出境。乞咨达四川两院，勿以陇澄之故劳费殃民，澄必不回视镇雄自取觊觎之戮矣。[52]

陇澄强调：第一，水西、镇雄本为一家，此绝彼继是惯例；第二，自己的承袭经过官员的查核，并非私篡；第三，征播时自己立有战功，“两奉题叙”，暗示当时并未有谁质疑自己的合法性；第四，永宁宣抚司印藏在夷目阿野处，与自己无关；第五，自己素怀忠义，蜀中欲用兵驱逐自己有违情理；第六，自己获得夷众拥戴，“部落哀留未容出境”。

可以说，陇澄的辩白是击中了官员的要害的。但他还是不得不表白自己“必不回视镇雄自取觊觎之戮”，“具文退避请官交待”。于是郭子章上奏朝廷，请求和平解决此事，他再次强调：“黔中连年师旅，库藏如洗，亦非用兵之地。”最后朝廷以“阎宗传来降，陇澄告退”，旨令四川撤兵。[53]

万历三十六年（1608）三月安尧臣回黔后，明廷“论征播前功”，授其土知府职级。但这只是一个虚衔，兵部又要求安疆臣“谊念手足，分割一隅。令尧臣率众安居，毋令两失所依”，这其实是明廷分割土司势力的老办法，“所以终圣恩而消隐祸者也”一句，道出了官员的良苦用心。[54]不过安氏兄弟倒并未因此发生龃龉，不数月安疆臣即病逝，无嗣，于是安尧臣继任贵州宣慰使。[55]

尽管律例明确规定亲戚、旁支可以袭位，并且在实践中亦不乏侄、

妻、婿、甥等承袭的例子，但无论从观念、习惯还是控驭土司的角度，“胥从其俗”都不是明廷乐于接受的，朝廷还力图确立一定的原则，以解决土官死后各支系因争袭而内斗的问题，从而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56]洪武年间的一些规定已经表现出了用父死子继、嫡长子优先的制度规范周边族类权力传承方式的倾向，只是在实践中没有强制贯彻而已，至于用“裂土众建”等办法削弱土司势力，防止土司因承袭而坐大以及以没有合法承袭人为借口而改土归流，更是明廷惯用的策略。[57]同时，一些地方首领亦会借助中央王朝的力量，获取、垄断更多的社会资源，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过程中，黔西北娄素濮的承袭方式逐渐发生演变，父死子继、嫡长子优先的原则得以确立，而各个君长国之间此绝彼继的状况亦受到了制约。

自朱元璋立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朝廷对黔西北及其周边地区的土官承袭其实是较少干预的，对安尧臣的成功干涉的背景是明王朝对西南地区拓殖的进一步深入，具体体现在卫所设立、黔东改流、贵州设省、贵阳设府、播州改流、移民进入等一系列事件上（详后）。到了崇祯年间，内忧外患交织，朝廷自顾不暇，对土官承袭事宜的影响力有所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接受土酋之间争战的结果。崇祯六年（1633），安边与其爵、其禄兄弟为争夺乌撒土知府、沾益土知州之职而争战不已，水西君长安位派兵支持姐夫安边，占据乌撒、沾益，其爵、其禄出逃，欲引东川土官为援，官员对此束手无策，根本无法按照是否嫡派、轮序亲疏的原则加以裁决，只能“且观彼此之情形而徐应之”，后来安位之姐去世，水西放弃了对安边的支持，其禄乘机重返沾益，“庙堂之上方急流寇，不复能问云”。[58]

第二节 汉人进入勾政权

除君长职位承袭方式的演变外，黔西北“勾”政权官员的身份也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嘉靖《贵州通志》云：

彼至愚无知者或反见变于夷，重以江右、川、湖贩商、流徙、罢役、逋逃多为奸诈，诱群酋而长其机智，而淳朴浸以散矣。[59]

这段简短的叙述颇值得玩味，随着贡赋、土兵征调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中央王朝的渗透日渐深入。地方土酋必须经常同官府打交道，土司政权急需通汉文、熟悉内地礼仪的人才，许多失意的移（流）民亦乐于为土司效劳，谋求更好的发展。在士大夫们看来，这无异于“淳朴浸以散矣”，嘉靖年间的湖广、川、贵军务总督张岳称：

又访得湖、川土官专一收留各处光棍无赖，成群潜住京城打听事情，或交通贿赂，或央求面分，或腾驾谤言，挟害上官，或捏传是非，诳惑愚民。[60]

张岳所说的虽是湖、川土司，但黔西北的情形亦与此相似。例如在抵制朝廷扩张，意图恢复贵竹长官司的行动中，陈恩、王嘉猷等汉人积极为贵州宣慰使安疆臣出谋划策，在京师营造了一张关系网络，连兵部尚书石星都被拉拢（详后）。

除了“贩商”“罢役”“逋逃”“光棍无赖”之流外，还有一些科场、宦海的失败者投奔夷地。例如何若海本系遵义府学廪膳生员，流落京师卖篆刻为生，曾蒙吏部咨送兵部授守备职衔，“用之不听，雄心落魄”，后见辽事孔亟，便赴各衙门条陈对策，未被采用。恰逢毗邻水西的扯勒部君长、永宁宣抚使奢崇明遣使进京，于是何若海便投奔永宁，参与策划反明，被永宁、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六司、府共封为丞相，权倾一时。[61]

文献上一般笼统地将为土司所用的汉人称为汉目、汉把，这使我们通常难以得知他们在土司政权中的任职情况，不过关于黔西北的著名汉目陈恩、陈其愚父子的记载保留尚多，足资参考。明代官员江东之、刘锡玄、杨寅秋等人的奏疏、谕帖、书信中曾多次提到陈恩、陈其愚以及他们在水西政权中的重要影响。[62]民国《大定县志》载有陈恩墓碑的部分碑文，今人余宏模等又实地踏勘了陈恩及其父母的墓地，抄录了不少碑文、墓志。综合这些材料可知，陈恩字槐亭，号无为道人，颇通文墨，来自闽浙一带，生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卒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其母吴氏、父陈文彬的墓碑分别立于万历二十五年和三十九年，可见其父母或已定居水西。至迟在万历二十年，陈恩已在水西勾政权中担任要职，与三省总督李化龙、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地方大员都有诗文往来。其墓在大方城东三十里之凰山下，墓碑云：

罗甸国更苴总理、两班慕魁扯事、槐亭陈公之墓。

墓志铭又称：

三聘仍出任慕魁辅事，辛亥以功德齿三尊。

官至“更苴”“慕魁”，权势之重可见一斑，墓联中“伊周得意笑谈李杜”一句亦反映墓主当年叱咤风云的豪情。恩子陈其愚，明末奢安之变时，曾设计重创孤军深入的朝廷军队，杀死了贵州巡抚王三善。[63]

到明代后期，勾政权中的汉把似乎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黔西北政局。前文已提到何若海参与策划反明，朱燮元在分析奢安之变时亦云：

查酋之造叛，实系安邦彦（水西君长安位的叔父）父子首倡而莫德主谋，汉夷各目，迫于威胁，不得不从。[64]

贵州提学佥事刘锡玄在谕安位的帖中亦称：

尔年甚小，便受国恩。非常遭际，乃被叛逆安邦彦及汉把夷目欺尔

孤寡，送尔及尔母奢社辉之命，公然谋反，兵围省城，大逆无道。[65]

崇祯年间安位去世后，汉把更是怂恿诸土目向明廷献土献印，明廷借机“裂土众建”，《朱少师奏疏钞》对此有详细叙述：

一汉把加衔副总刘光祚自安邦彦授首，诸夷目愈肆忿恨，谋动干戈。光祚独排众论，谕安位听抚，及位死而众目争继，光祚力主安良辅献印，忠顺之心，百折不回，其功甚伟，应荫指挥使，以风夷汉。

一汉把陈国是、李时芳、陈国基、杨启祥、周廷鉴、李奇芳，以上六名。安良辅与安陇璧互争，众皆分左右袒，独六人坚持一心，怂恿献印，招夷万众，应荫土百户。

一汉把杨启运、刘显祚、杨起凤、胡珽、陈万选、陈国本、黄朝凤、周士顺、吴道端、吴道弘、杨淮、黄德、李先春、陈国荣、黄恩、杨德、顾龙正、吴楚汉、孙应奇、杜应林、曹一龙、高中正、高明盛、高明旺、丁志明、赵廷宣、高仲文、罗士夔、万镇禄，以上共二十九名，俱效劳化谕，备殚心力，应各纪录，候别效有功再为题叙。[66]

可见，从奢安之变、安位受抚一直到献土献印，明末黔西北政局的重大变迁，无不有汉把、汉目的参与。

除了汉人进入勾政权外，中央王朝的职官与行政体制同样对娄素濮产生了影响。例如在奢安之变的过程中，永宁奢氏曾建国大梁，改元瑞应，并赐封许多彝、汉头目，名称一如内地职官，如丞相、总兵、给事中、中军都督等，[67]颇耐人寻味。

第三节 彝威与汉威：充满矛盾的统治认同[68]

以上两节从制度上考察了黔西北勾政权的变化，本节将从观念入手，揭示彝制在明代所发生的更为微妙的演变。

土司制度建立后，地方酋长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往往被认为来源于中央王朝的恩赐。如土官不肖，朝廷即可收回敕封，削夺其爵。这样，能否“世长其土”就得看他们能否“谨守人臣礼”。本节将结合水西安氏远祖济火的故事，对此进行详细的讨论。

济火，又称济济火或火济，即彝文献与彝族民间口碑中的妥阿哲，据载他是默祖慕齐齐的二十四世孙，[69]其兄妥莫哺是芒部（今云南镇雄）君长国的开基英雄。而妥阿哲则因诸葛亮征南中时“积粮信道助兵”而被封为罗甸国王，从此奠定了水西的基业。[70]

自明清以来，济火故事基本上被视为信史，史继忠是对此故事提出

质疑的极少数学者之一，他认为：第一，妥阿哲以前嫡长子继承制尚未确立，还不具备建立国家政权的条件；第二，蜀汉并无封王的惯例，虽然“即其渠帅而用之”，但多封刺史一类官名；第三，罗甸国之名最早见于《新唐书》，而不见于唐代之前；第四，罗甸国附元后改普定路，即今安顺地区，与“水西”无涉；第五，“水西”是默系阿者家，而罗甸是布系播勒家，支系不合。[71]除了将嫡长子继承制与国家政权挂钩恐怕有失妥当外，[72]史先生的论证是有相当道理的。本书关注的重点不在济火从武侯南征的真实性，而是此故事受到强调与广泛流传的背景。

妥阿哲其人其事不见于《三国志》《华阳国志》等较早期的史籍，[73]笔者所见的最早记载是明代成化年间宣慰使安贵荣请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所撰的《安氏家传序》：

其后有曰济济火善抚其众，时闻诸葛武侯南征，通道积粮以迎，武侯大悦，遂命为先锋，赞武侯以平南夷，擒纵孟获，及归，克仡佬氏，拓其境土，武侯封为罗甸国王。

济火英雄故事所蕴含的对中央王朝效忠的寓意，使它很快受到官员、士大夫们的欣赏与重视。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首先抄录了这个故事，此后数百年间，许多通志、府志、县志和私家著述不断转抄，形成了有关济火故事的众多史料，济火征南之事似乎证据确凿。[74]但细究这些材料，可发现后来者的描述细节更为丰富，“层累堆积”历史的痕迹相当明显。如康熙年间田雯所著《黔书》卷三云：

济火，汉牂牁帅，黑卢鹿（即罗罗），水西安氏远祖也。深目长身，黝面白齿，以青布为囊，笼发其中，若角状。习战斗，尚信义，善抚其众，诸蛮戴之。闻诸葛武侯南征，积粮通道以迎师，遂佐武侯平西南，禽孟获，封罗甸国王。世长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凡九扯更苴皆属焉。已乃攻普里诸种，拓其境地，赐镂银鸠杖。

与文献上广为流传相应，济火俨然作为贵州最早的乡贤之一被奉上了神坛，[75]甚至远在黔东南的古州厅都建祠供奉济火。[76]此外，济火在许多地方的武侯庙内成为陪享者，不少诗文记载了这一盛况：

曾佐七擒封汉爵，至今俎豆武侯祠。[77]

君不见（贵阳）鳌头矶上武侯庙，旁立遗像何峥嵘！卉衣椎结无官号，惟记南征济火名。[78]

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对济火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论曰：济火一荒陲土帅耳！武侯渡泸之日，孰为之计大义、明王章者？而毅然以助顺树勋，崛起一隅，为蛮王长。其亦賨叟青羌之俦乎？不可谓不豪矣。迨乎累世相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识机达变，宣力效忠，始终不失人臣礼，故得以长奉西藩，受恩罔替，非徒以为瓯脱而姑羁縻之也。[79]

事实上，《安氏家传序》中着墨较多的祖先，均与中央王朝有联系，是效忠的典范。例如普贵在宋开宝间纳土归附；阿画被元王朝赐名帖木儿卜花，封为顺元郡罗甸国侯、济国公；霭翠归顺明王朝，赴京朝见朱元璋等。

济火故事并不仅仅体现着士大夫们的价值观，还折射出这些价值观对周边族类的影响。在塑造济火忠义形象的过程中，水西安氏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早记载蜀汉赐封罗甸国一事的《安氏家传序》云：

（安）观卒，子贵荣嗣，好读书史，通大义，设庠序以明礼义，旧染陋俗，寝变华风，用夏变夷之功日见其盛。兹遣把事阿佐以其父遗命，谓谱系太简，恐有疏虞，遂致湮没，求作家传以遗后嗣，予故为次其梗概以为传云。[80]

在此之前，安氏已有家谱，当系用彝文撰写，彝文谱书一般比较简单，所以说“谱系太简”。[81]安贵荣请周洪谟撰谱的同时，一定提供了关于祖先的材料，这或许是士大夫接触济火故事的开始。[82]据《安氏家传序》，早在贵荣之前，水西君长已经在用汉文表述自己的历史，如其祖父安陇富“纂（贵州宣慰）司志、修家谱，遭时多变，不克如志”。到了安贵荣，已经被周洪谟称为“好读史，通大义”。此绝非只是溢美之词，安贵荣有相当的汉文功底，且倾慕诗书，尊重文人学士，这从他对地位卑微、受其他官员侮辱的龙场驿驿丞王阳明的尊重与礼遇可见一斑。[83]

彝文献同样记载了济火受封从而奠定水西基业的经过，《助孔明南征》云：

蜀汉皇帝时，孔明先生出兵，征讨南方，与叛帅交战时，祖先妥阿哲，出兵助汉皇，供给军粮，为其后援，攻无不克。汉皇帝说：“妥阿哲此人，是一位忠臣。”将长官职位，赐给妥阿哲，加上红印敕命，一并赐给妥阿哲。汉皇帝之时，妥阿哲成长官，皇帝又给晋爵，叫他攻打南方，其地一攻即破，北向扯勒推进，到恒那达的所属地方。到北部扯勒地方，从四方攻占其地。勿阿纛（妥阿哲之前五代祖——引者注）创建基业，妥阿哲发展基业，住在慕俄勾（即水西君长的驻地，今大方城——引者注）。[84]

与汉文史料不同，在这段材料中，济火是受到汉皇帝而非诸葛亮的敕封，其开疆拓土之举是奉皇帝之命。水西安氏还专门凿了一块《妥阿哲纪功碑》来铭记祖先的伟业，此碑碑文为彝文，至今尚存，但有残缺，其中写道：

帝师胜利归来，将彝族君长的功勋记入汉文史册。阿哲的邦畿可称兴盛的时代，犹如太阳的光芒闪耀一方，呈现安居乐业景象。帝旨传来，长者身穿锦袍，俨然是一代威严的君长。到了建兴丙午年，封彝君国爵以表酬谢。治理慕胯的疆土。[85]

此碑虽有建兴年号，但并非立于三国时代，而是明清时期所镌。[86]安氏乐于用汉文乃至士大夫的标准来叙述祖先的勋业，其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央王朝在此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权威，朝廷的敕封以及印信等相关证据对土司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拥有这些就等于拥有统治的合法性。《明史》云：

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87]

此绝非虚言，如嘉靖年间东川土知府禄庆死后，其属下阿得革父子欲篡位，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夺取明廷所赐的府印。[88]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济火故事呈现出了新的意义。水西安氏强调祖先对汉人朝廷的效忠以及受其封赏，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与正统性。这一点正好与持着大一统理念的士大夫们达成了共识，由于他们的介入，济火故事终于愈传愈广，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在承认与利用“汉威”的同时，水西安氏更加强调自己的彝威。与汉文家谱不同，彝文谱书全然没有提到祖先的归顺，亦从未将能够长期统治水西归因于“宣力效忠，始终不失人臣礼”。[89]结合《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彝书来看，统治的合法性无疑同远祖笃慕六祖有关，乌撒家是布祖慕克克后裔的一支，水西家的祖先则是默祖慕齐齐。因为乌撒、水西的统治者得到了祖宗笃慕六祖的美好根源，所以能够长享富贵，正所谓“六祖好根本，传给默德施（即德施耿俄，济火的第14代祖——引者注），德施就显赫”。[90]祭祀祖先因此显得特别重要，有关记载在彝书中比比皆是。

黔西北地区发现的一些彝汉文合璧的碑刻，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考察彝、汉两种“威荣”的材料。时间相同、立碑事由相同的两块（或一块）碑刻，刻着不同的文字，记载着不同的内容，表达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兹以大渡河桥碑为例。该桥位于大方城东40千米的大渡河上，为五孔石桥，高14米，长70米，宽7米，沟通大方、黔西两县，万历二十年（1592）土官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兴资修建，历四百余年而不毁。靠东黔西县界的桥头上，立有界碑一方，上阴镌“黔定交界”四个楷字。靠西大方县界桥头上并立有彝、汉文建桥碑记两方，白石质，碑身高2.23米，宽0.83米；碑座高0.5米，横长2.66米；碑帽高0.6米，横长1米。汉文碑竖立在右方，万历二十年立。碑左刊刻有“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九个篆字，两旁有彝族传说“白翅送日”和“根固彩岩”的浮雕两幅。彝文碑竖立在左方，在碑盖“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九个彝文字的两侧，亦有彝族传说中的“眉鸣红花”和“雁落青开”的浮雕。彝、汉文碑的上、左、中、右三周边皆宽0.03米，有“弯不断”图案。[91]

汉文碑文共681字，为水西君长、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所撰。其文如下：

水西大渡河建石桥碑记

贵州宣慰使司亚中大夫宣慰使龙源安国亨道隆甫撰文

属下长官槐亭陈恩篆盖

典史玉峰李孟骐书册

安邦者，予祖昭勇将军之裔，内露其首封也。[92]内露即我怀远将军之介弟，而水西诸地，实有带砺壤。奕叶守土，白芍、白叶、白着，世有奇勋茂绩，载在简册。历龙脉而至于邦者，盖五世焉。邦以少年失怙，举民间疾苦，险厄岖巇，畴为之耳提面命耶？实借禄氏教以义方，绳绳井井，若鱼贯然。一日迪邦曰："天根见而成梁，古道也。吾析壤之内，有土沙溃流之巨浸，号大渡河者，其来久也。往返于兹者，未尝不叹惜于徒杠舆梁之寥寥。夫司民命者，观民之溺犹己之溺，是知责在尔矣。"于是捐资募建，靡论寒暑，始于庚寅年八月，终成壬辰年四月，凡两经年，桥乃成。长二十丈，宽二丈余，高四丈有奇。约费银一千一百五十两有奇。继至今，无俟冰寒可渡者众，无俟乘舆利涉者众。曩所为咨嗟者，且熙熙皞皞，若登春台而入华胥也。夫邦弱龄，禄氏亦龙脉之箕帚妾耳，乃毅然吐非常之见，大王道，小私思，讵非吾诸目中所罕觏者耶？是举也，上以弼余不逮，可以观忠；下以济人病涉，可以观仁；远以扬祖烈而后以昭来世，可以观孝与慈；一举而众美具焉。邦与母真贤孝者也。在禄氏也，得是子而贤益彰，固相与有成。倘非天之惠我元元，赐之以此母若子也，又乌能成此美举哉！桥成，请志于予，予嘉其能行古道而福苍赤，并钦其世笃忠贞，为诸目倡，乃命勒之，以垂不朽云。

万历二十年壬辰岁，夏四月谷旦，亚中大夫贵州宣慰使龙源安国亨隆甫撰文。[93]

通篇贯穿的，是王道、忠、仁、孝、慈的观念，似乎与我们所看到的士大夫撰写的碑记没有什么区别。引人注目的是，水西土司一方面要理解与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一套价值观，对明廷称臣、朝贡、缴税并纳役；[94]另一方面，又将这些观念引进水西，"僭越违制"，俨然以君王自居，要求属下对自己忠，对百姓仁，对长辈孝，"大王道，小私思"。正如安国亨所云："是举也，上以弼余不逮，可以观忠；下以济人病涉，可以观仁；远以扬祖烈而后以照来世，可以观孝与慈；一举而众美具焉。……予嘉其能行古道而福苍赤，并钦其世笃忠贞，为诸目倡。"此外尚需指出的是，汉文碑虽表达的是士大夫的观念，但其中也交织着彝文化的影子，石碑上的浮雕"白翅送日""根固彩岩"都是彝族传说，即是一个明证，对于既不识彝文也不识汉文的普通百姓来说，这些浮雕可能更易引起他们的共鸣。

有趣的是，在彝文碑中，表达与强调的是另外一套规范和价值。大渡河桥彝文碑刻字数较多，达1972字，撰者为裔默，估计系布摩或慕

史。在此择要抄录译文如下：

开天辟地，六祖有好根，传到默德施（水西安氏的远祖——引者注）。德施九天君，遍居中部地带。

其他且不表，只叙慕齐齐、勿阿纳、妥阿哲，他们来自笃慕（六祖之父——引者注）之地，为一方贤君，兴了祭祀，解出了冤愆，还了愿信，以致昌盛，福运降临，人烟繁盛了。

承天神地祇的庇佑，道孟尼（笃慕的远祖——引者注）的后裔，为首传世系，行善地位高。他们根据古时赤陀创立的典章，说道：“东方帅主，创业得先祈祷。”又直括阿鲁的《俄莫》之卷，传于后世，他们进窥珠乍地方，有濮人在那里为主，治理其地。

默家为亲族之帅，甲胄显荣华，基业巩固，权势伸张，乃还愿作祭祀，天地神祇都庇佑啊。

神也喜欢，人也高兴，各地都奉默氏为主，这样归一姓治理。往事记载于雅颂篇章。

我祖默阿德，作了君主，权位很高。……到处设官治理。君的威荣很高，臣的权令很大。

彝创制权令，汉因势治理，所为很好啊。

经过占卜，看到气运正旺，如俄奎之鱼振翅，遍游于罢第恒吐。于是整备戈戟，向尼伍热显进攻。……

君长阿施之世，在木柯卧乍山，兴创了大业，后人应记住啊。……

龙脉降生后，到庚寅之年，阿格心里想：河上修桥以通路，用工不枉费呢。从桥上经过的人会说：是有道德的人家才作得到的。

这儿是阿哲家征集租赋必经之地，要修筑租赋必经之路。由妥舍益才家修筑，子孙增寿延龄。善者心怀于黎民，存了善念，为人诚朴心直，就增长寿龄，能享年九十九岁，就没有什么贪求了。

有一颗为善之心，欲势延，必让位与幼。……

在没有龙桥横跨江上之前，孽蟒兴妖作怪。彝虽有权位，举祭也无用；汉无爵禄，施礼更难看。三帅五高位，幸有布、默两家天运长久，居高位于宫廷，并有十二宗亲为帅。有了龙桥跨江之后，彝有了权位，兴祭则振兴；汉有了爵禄，施礼也悦目。三帅地位高，正如先贤的断言。

慕俄格一家，祖创有规章，子孙可以遵循去作。洛彼有九峰，慕作有七千寨；于底有五大坝；斗堵有七旷野；热卧地势高；以着地也大。

以上所有地方之间，是征赋收租之地。男的管征赋，女的管收租，在大河上运行。……

君民之间，有发号施令之道。师主之间，有安慰宗祠之理。嫡系甚繁荣，宫中有歌师宣诵，歌颂古往今来多么荣华，确实如此。……

妾（安邦之母自称——引者注）阿格深思：修桥通道，为善有盛名。扶助黎民，济之得生，使其有所繁衍；租赋通途，有利于子孙万代，永远征求不尽。吾生之幼子，步长者之迹，为善且修道。……

从此，租赋有来路，人行康庄大道，子孙增寿龄。……

建桥竣工于万历皇帝执政二十年，我斋墨二十七岁敬撰。……[95]

碑文的前半段，是讲祖先的历史，从笃慕、六祖、勿阿纳等一直讲到阿施，共有十多位贤明的祖先（有的在引文中已被省去），水西远祖德施能成为君主是因为“六祖有好根”。后半段讲造桥的缘由、经过及意义。碑文撰于万历二十年，据贵州宣慰司的设立已有两百余年，汉人王朝的影响已是不可忽略的事实，斋默用皇帝年号来纪年，并且在碑文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到了彝汉两种权威，如“彝创制权令，汉因势治理”之类。不过，在斋默看来，彝威并不是汉威所赐，彝权是自己创制的，汉权无非是在此基础上“因势治理”而已。文中提到了妥阿哲，但全然不提他同蜀汉的关系以及受封为罗甸国王之事，妥阿哲的“正统”是他来自笃慕之地以及六祖传下的好根，此外还有天神地祇的庇佑。因此，祭祀祖先天地是君长国的一件大事，慕齐齐、妥阿哲等“兴了祭祀，解出了冤愆，还了愿信，以致昌盛，福运降临，人烟繁盛了”。默家（即默系）权势伸张后，“乃还愿作祭祀，天地神祇都庇佑”。碑文没有指明祭祀对象是谁，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当知为天、地、祖先。其他彝书的叙述对此可做补充，《彝族源流》记载吴三桂平定黔西北后，乌撒家的一些权臣逃到古洛姆，“过了两三年，后来有一天，求古口勾家，若准拜祖祠，祭奠祖灵，要祭先君灵。插无数神座，都指向苍天，设无数神座，献祭了，整个苍天；祭奠了，整个大地”。[96]又如水西远祖勿阿鼐曾在鲁博嘎那举行三种祭祀，“用白马祭天，用乌牛祭地，用白羊祭祖”。[97]

彝文碑道出了造桥的真正理由：“这儿是阿哲家征集租赋必经之地，要修筑租赋必经之路。”至于捐资建桥所蕴含着的伦理方面的价值，较之忠孝仁慈等要朴实、简单得多，“从桥上过的人会说：是有道德的人家才做得到的”。“善者心怀于黎民，[98]存了善念，就增长寿龄，能享年九十九岁，就没有什么贪求了。”“从此，租赋有来路，人行康庄大道，子孙增寿龄。”文中几次提到寿龄，黔西北彝人的寿龄观非常独特，寿龄具有某种神秘性，其产生与阴阳（哎哺）相生有关，并且符合父子联名制的规则，[99]《彝族源流》云：“哎出寿龄出，哺生寿龄生。”“寿龄之父穿银衣，寿龄之母系金裙。”[100]《彝族创世志》记叙了寿龄的发展：

远古的寿龄，说是这样的。寿兴于宇宙，寿充溢于宇宙，哎哺乃有

寿。哎哺索鲁一，索鲁季乃二，季莫莫乃三……额武启于九，启于热夸十。热夸传十代，到了额武吐，到了索哲舍……寿增了白头，龄增了黄牙。九千猿人寿，八万猿人寿。富贵又繁衍，寿龄也增多，如此发展了，这样增寿了。[101]

同大渡河桥碑齐名的有千岁衢碑，系嘉靖二十五年（1546）贵州宣慰使安万铨捐资修建衢道而刻的岩碑。衢位于大方县城西25千米，长2000余米，系开山辟岭，削岩凿石而成，彝语称为“阿东钜”路。衢道旁边的岩石上刻有《新修千岁衢道碑记》，等分两幅，一幅刻汉文，一幅刻彝文。[102]汉文在县志中有载，约两百余字。其中提到安万铨被朝廷封为昭勇将军，并称赞他“敬贤乐善，节用爱民，百废俱兴。忠孝仁让之美，闻于朝廷，显于制诰”。[103]

彝文碑记史志缺载，因年久风化，碑文漫漶模糊，可识者仅三百余字。其体例与大渡河桥的彝文碑记相似，首先谈祖先历史，开篇云：“水西基业，最初由贤能的勿阿纳开创，后来又由他的后嗣妥阿哲来奠定。”对妥阿哲从诸葛亮南征受封之事则只字未提。后半部分谈建衢缘起及经过，但对修衢者的称道与祝愿并不是基于“忠孝仁让”的价值观。碑文云：“自古以来，修筑道路的人，财帛随之而至，寿命如繁星闪烁。况且兴建于山林之间的这条道路，艰险如引向高天的桥梁，皆是由君长倡导修筑。故其后嗣能够贤明，就是这个道理。”“修筑道路，能使人长寿。”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对寿龄的渴望与强调。祭祀亦是碑文所表达的重要思想。“笃慕、六祖的后裔，在普天之下，为人正直，为首□□□□□□祭祀祖先。”“首先将修慕格岩前这条道路的事祝告于祖灵，然后君民协力施工，使得福君甥舅之间造福于人民的这条道路能以修成。”[104]

综上所述，似可推知，在被王朝视为“异域”的时代，勾政权的合法性源自本族的传统，即君长们系六祖之后裔，具有合法根源。此时族群认同与统治认同可理解为是协调一致的。迨至土司制度建立及各项边政制度的逐步确立与完善，勾政权的合法性在许多场合被有技巧地归因于对王朝的效忠而非本族之传统，形成了彝威与汉威交织以及两种价值观并行不悖的情景，族群认同与统治认同之间似呈现出统一与分歧并存的局面。但此时中央王朝的礼仪与意识形态仅仅影响到黔西北社会的上层。因为王朝的制度并不能深入黔西北地区，汉人官员、科举考试对一般原住民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的事情，同时也只有土司等被要求学习汉文与汉礼。显然，对中下层社会来说，君长、土目的权威实实在在地渗透在自己的生活中，而中央王朝、汉人官员的权威则遥远而模糊，不用也不必过多理会。直到清王朝开辟“新疆”，彝制崩溃之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下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1]授予土酋宣慰使、土知府等职，承认他们的统治权力，这是最重要的“名号”与“爵禄”。此外，因为笼络的需要或因土酋有功，朝廷会赐予某种封号或物品，如水西君长安聚曾接受“怀远大将军”的诰命，安陇富被赐给金带，详后。

[2]参见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第169～170页；《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正月乙丑条；嘉靖《四川总志》卷16《经略中·夷情》。

[3]参见万历《明会典》卷6《吏部五·土官承袭》；卷121《兵部四·土夷袭替》。

[4]参见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76《兵部·土官》。

[5]参见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

[6]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21《外集三·与安宣慰书三》。

[7]周洪谟：《安氏家传序》，嘉靖《贵州通志》卷11。

[8]方国瑜：《彝族史稿》，第543页。

[9]下文探讨水西历代君长之间的亲属关系，如果是根据《安氏家传序》（以下简称《家传》）所判定的，不再注明。

[10]其他史籍的一些记载亦可窥知父亲并不一定传位给儿子。如《元史》卷11云："壬辰，亦奚不薛（元代水西地区的著名头领）病，遣其从子入觐。帝曰：'亦奚不薛不禀命，辄以职授其从子，无人臣礼。宜令亦奚不薛出，乃还军。'"

[11]清人毛奇龄显然不明白明正德以前水西有几位君长以及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他误以为霭翠死后，其弟安匀、孙安贵荣相继袭位。参见毛奇龄《蛮司合志》卷2，续修四库全书本。

[12]皇帝与官员们对父死子继的权力传承方式显然具有更多的亲切感与认同感，早在洪武年间朝廷便打算在土司地区推广这一制度，万历《明会典》卷121《兵部四·土夷袭替》云："凡土官袭替，洪武二十七年，令土官无子，许弟袭。三十年，令土官无子、弟，而其妻或婿为夷民信服者，许令一人袭。"从水西长期实行四十八支轮相继替来看，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强制实行。

[13]周洪谟：《安氏家传序》，万历《贵州通志》卷23。

[14]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86，正统十四年十二月丁巳条；卷192，景泰元年五月丙寅条；卷267，七年六月壬子条；卷293，天顺二年七月己亥条；卷323，四年十二月癸酉条等。

[15]道光《大定府志》卷47《旧事志三·水西安氏本末上》。

[16]参见《明世宗实录》卷96，嘉靖七年十二月乙未条，卷108，八年十二月庚午条；黎宇《续安氏家传序》，嘉靖《贵州通志》卷11《艺文志》。

[17]参见《明世宗实录》卷187，嘉靖十五年五月甲戌条；田汝成《炎徼纪闻》卷3；《明史》卷316等。

[18]《土官底簿》卷下《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

[19]万历《明会典》卷6《吏部五·土官承袭》；卷121《兵部四·土夷袭替》。《国朝典汇》卷176《兵部·土官》亦称："洪武中，土官无子弟，其婿与妻皆得袭。"

[20]参见温春来《彝威与汉威——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第228～236页。

[21]《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乌撒与沾益的血缘关系从彝书中亦可得到印证，参见《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173～174页。

[22]《明神宗实录》卷556，万历四十五年四月己亥条。

[23]参见孔贞一《核土舍之情形破两省之异同疏》，吴亮《万历疏钞》卷42；《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二》；《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明神宗实录》卷432，万历三十五年四月丁未条，卷438，三十五年九月癸巳条，卷444，三十六年三月戊子等。

[24]宋一韩：《西南祸端已开处置未有归着疏》，《明经世文编》卷467。

[25]《明神宗实录》卷444，万历三十六年三月戊子条。

[26]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38，万历三十五年九月癸巳条；卷445，三十六年四月乙丑条；卷459，三十七年六月辛未条。

[27]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70，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庚戌条。

[28]参见《明神宗实录》卷351，万历二十八年九月甲辰条。

[29]参见李化龙《平播全书》卷7《塘报夷情》；《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4《平杨应龙》。

[30]参见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第232～233页。

[31]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2，天启三年三月己酉条。

[32]播州不如水西强大似乎是时人的共同感受，三省总督李化龙称："播非水西之敌。"（《明神宗实录》卷343，万历二十八年正月己未条）贵州清平卫人、铜仁参将石邦宪亦云："水西宣慰安万铨，播州所畏也。"（《明史》卷211《石邦宪传》）

[33]沈一贯：《沈蛟门文集·言川贵总督揭帖》，《明经世文编》卷435。

[34]参见郭子章《看议播界疏》，《明经世文编》卷419；沈一贯《沈蛟门文集·言川贵总督揭帖》，《明经世文编》卷435；《明神宗实录》卷426，万历三十四年十月丙午条。

[35]《明史》卷228《李化龙传》。

[36]水西在平播战争中的狐疑态度在明人诸葛元声所撰《两朝平攘录》卷5中有详细记载，而官员的担忧与策略在左监军杨寅秋所著之《临皋文集》卷3中有所揭示。

[37]参见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0《行奖安疆臣兄弟》；卷11《奖赏水西镇雄官兵》。

[38]参见《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四年二月辛酉条；郭子章《题剿仲苗劫掠道路疏》，《明经世文编》卷419；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第243～244页。

[39]《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

[40]参见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5《土妇奢世统奢世续列传》；《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二》。

[41]安尧臣系奢世续之婿的说法见于贵州巡抚郭子章的奏疏，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38，万历三十五年九月癸巳条。

[42]《明神宗实录》卷432，万历三十五年四月丁未条。

[43]参见《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二》；《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

[44]《明神宗实录》卷444，万历三十六年三月戊子条。

[45]参见杨寅秋《临皋文集》卷3《上司马田东洲》。

[46]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0《行奖安疆臣兄弟》。

[47]道光《大定府志》卷56《文征六·封亚中大夫贵州宣慰使安君墓志铭》。

[48]《明史》卷72《职官志一》，《元史》中亦有类似的规定，详前。

[49]笔者目前尚未见到任何人同安尧臣争袭的记载（如果有的话，一定会被官员们记录下来，因为这将是驱逐安尧臣离镇雄的重要理由），并且当安尧臣被迫离去时，镇雄夷众尚挽留其妻，最后在朝廷的干预下才让她前往水西与安尧臣团聚（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59，万历三十七年六月辛未条），可见安尧臣在镇雄有相当的威信。

[50]《明神宗实录》卷434，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庚申条。

[51]《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二》。

[52]《明神宗实录》卷438，万历三十五年九月癸巳条。

[53]参见钱桓《土酋完局未尽西南隐祸堪忧疏》，吴亮《万历疏钞》卷42；《明神宗实录》卷438，万历三十五年九月癸巳条。在对待如何处置安尧臣袭职之事上，黔、蜀二省官员有一些分歧，黔抚郭子章等并不特别反对安尧臣继任镇雄土府，并坚决反对用兵。四川巡按孔有贞认为贵州官员的温和态度出于对安疆臣的笼络（参见孔贞一《核土舍之情形破两省之同异疏》，吴亮《万历疏钞》卷42）。但不管怎样，抑制土司势力的观点始终占了上风，甚至贵州官员都不真正支持安尧臣袭职。

[54]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44，万历三十六年三月戊子条；卷445，三十六年四月乙丑条。

[55]参见道光《大定府志》56《文征六·封亚中大夫贵州宣慰使安君墓志铭》；《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56]凌纯声在《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第3卷第1期，1944年）中引《明史》卷318："自古苗乱，起于土司；土司之乱，起于承袭。"笔者在《明史》中并未发现这一记载。但土酋因争袭而发生战事的情况在文献中记载颇多，明廷制定的按是否嫡派、关系亲疏来确立继承人的原则无疑有助于解决争端。例如，万历后期乌撒土知府安云龙物故后，土舍安效良与安云翔争夺土知府一职，结果朝廷"以嫡派立效良"，并强制安云翔接受这一裁决。参见《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

[57]吴永章利用崇祯年间明廷试图在水西赐封多个土官的例子来说明"裂土众建"之法始于明代，并非雍正皇帝所创。同时还谈到了以土司绝嗣而乘机改流、以没有明文规定世袭而改流的情况。参见《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第203～205页。其实，万历年间明廷令安疆臣分割一隅安置土知府安尧臣已可视为"裂土众建"。

[58]参见金毓黻编《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卷2《兵部尚书张为塘报地方夷情事（第四十五号）》，转引自余弘模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5集；《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

[59]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

[60]张岳：《小山类稿》卷5《参究主苗酉阳宣抚冉玄疏》。

[61]参见朱燮元《复渝献俘疏》，《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卷4。

[62]参见刘锡玄《黔牍偶存·黔南军政》；杨寅秋《临皋文集》卷3《上内阁沈蛟门》；江东之《瑞阳阿集》卷3《黔中疏草》。

[63]参见余宏模《明代水西慕魁陈恩墓碑探证》，《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创刊号；民国《大定县志》卷1《水道》，卷5《水西安氏本末中》，卷18《古迹志·冢墓》。

[64]朱燮元：《安酋业已投诚绅衿未肯罢战谨陈夷情士论仰请圣裁以决进止事》，《朱少师奏疏钞》卷6。

[65]刘锡玄：《黔牍偶存·黔南军政·谕安位帖》。

[66]朱燮元：《勘明水西各土遵照明旨分土授官以安地方事》，《朱少师奏疏钞》卷8。

[67]参见朱燮元《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卷9《扫蔺献俘疏》；《朱少师奏疏钞》卷1《恢复重庆略节》，卷2《恭报擒获有名巨恶并收降党羽以示招徕事》。

[68]本书中的“统治认同”指对统治合法性的认知。

[69]余达父等学者认为济火即彝族六祖之一的慕齐齐（济济）之二十五世孙妥阿哲，方国瑜等学者则认为，济火系慕齐齐之子。据说研究彝族历史的汉族学者，多从方国瑜之说，而彝族本族学者则多从余达父之说。参见余弘模《济火碑与济火碑史实探证》，《贵州文物》1983年第2期。

[70]参见《西南彝志》第7～8卷，第284～297、313～315页；《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71]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11、22～23页。

[72]嫡长子继承制与国家政权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例如商代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参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1959。事实上，水西的嫡长子继承制，直到明天顺、成化年间才确立，详前文。

[73]民国《大定县志》卷3谓蜀汉建兴三年济火助诸葛亮南征之事载于《三国志》，误。这一错误对许多学者造成了误导。

[74]正因为众多文献相互传抄，所以学者们不难找到丰富的史料来证明济火征南的故事，问题是这些史料无一例外都是出现于明清时期。

[75]参见民国《大定县志》卷6《秩祀志·附祀》。

[76]参见光绪《黎平府志》卷2下《公署·坛庙》。

[77]陈匡世：《水西杂咏六首》，民国《大定县志》卷21《艺文志》。

[78]蒋攸铦：《黔轺纪行集·济火行》，黔南丛书本。

[79]田雯：《黔书》卷3《人物名宦·济火》。

[80]嘉靖《贵州通志》卷11《艺文·安氏家传序》。余弘模亦认为有关济火故事的记载，最早源于贵州宣慰使土官安氏为向朝廷申报而撰写的《安氏家传》，参见余弘模《济火碑与济火碑史实探证》，《贵州文物》1983年第2期。从本书所引的这段文字来看，《安氏家传》的缘起并非是为了向朝廷申报。

[81]关于彝族谱系的书写体例与习惯，可参见温春来《黔西北彝书中所见之彝族谱系》，香港《华南资料研究中心通讯》2004年7 月。

[82]在周洪谟撰《安氏家传序》之前约二十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四库全书本《明一统志》提要"天顺五年五月书成"）亦曾收录了多位安氏祖先，但未提及济火。天顺版《一统志》已难以得见，但凡是安氏祖先在该版《一统志》上有记载的，如普贵、阿画、霭翠等，周洪谟都会在《安氏家传序》中予以注明，因此可知《一统志》并未涉及济火。笔者看到的四库全书本《明一统志》，是后人在天顺版的基础上改动而成的，但依然没有讲到济火，维持了原版的面貌。

[83]参见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21《外集三·与安宣慰书二》。

[84]《助孔明南征》，《西南彝志》第7～8卷，第313～315页。

[85]《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第7页。

[86]参见钟德宏《济火纪功碑》，《贵州文物》1982年第1期；余弘模《济火碑与济火碑史实探证》，《贵州文物》1983年第2期。

[87]《明史》卷310《土司传》。

[88]参见《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

[89]参见《西南彝志》第7～8卷《妥阿哲世系》，第284～312页；《彝族源流》第24～27卷《德施源流》《阿哲母祖谱》《阿哲君长谱》，第46～105页。

[90]《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46页。

[91]参见云南编辑组编《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186～187页。"黔定交界"石碑当为清代人所立，因为明代水西的行政区划实行则溪制，尚无大定府（县）、黔西州（县）之名。

[92]修桥者安邦，并非像一般的土目那样，仅仅受到水西君长的敕封，与朝廷无涉。其祖先沙溪曾在洪武初年归附，开设贵州宣慰司后令其世袭同知之职。参见郭子章《黔记》卷56。

[93]道光《大定府志》卷17；《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87～188页。两书所载碑文文字稍有差异。

[94]如正统七年水西宣慰安陇富自陈："祖父以来，累朝皆赐金带，臣蒙恩受职，乞如例。"（《明史》卷316）朝贡与赋役详前文。

[95]《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第65～68页。

[96]《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159～161页。

[97]《西南彝志》第9～10卷，第235～236页。

[98]笔者以为此处的翻译不甚确切，"心怀于黎民"，已经带上了儒家仁政的观念，彝文原文中并没有黎民一类的词，译为"善者关心其他人"可能更为妥当。

[99]黔西北彝族的父子联名制不仅仅是一种姓氏制度，而且还是一种观念与思维方式，参见温春来《彝威与汉威——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第221～227页。

[100]《彝族源流》第1～4卷，第58～61页。

[101]《彝族创世志》艺文志，第59～61页。

[102]参见《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91页。

[103]参见民国《大定县志》卷2《建置志·道路》。

[104]参见《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第29～30页。

下编 从“新疆”到“旧疆”：改土归流后黔西北地方社会的变化

第五章 开辟“新疆”

明末清初，经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水西、乌撒两大君长国终于被摧毁，其人口、土地被登入了王朝的册籍，黔西北由此被视为王朝的“新疆”[1]，新的社会秩序逐步确立。从表面上看，这一巨变的起点，是明末的奢安起事，但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变的爆发，往往有着长期积累的过程。自永乐以降，明廷在贵州持续不断地进行扩张与改制，水西安氏等土司显然感受到了朝廷咄咄逼人的压力，特别是改流进程从川南、黔东、黔南逐渐推进至安氏领地周围时，安氏与朝廷之间的冲突似乎已难以避免。下文对明末清初黔西北政局变迁的分析，即主要从万历年间水西与朝廷的矛盾开始。

第一节 彝制的崩溃[2]

无论出于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还是为了实际的利益，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土司政权都不可能是中央王朝的最佳选择。因此，改土归流成为皇帝与士大夫孜孜以求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这一目标是天经地义的，如万历年间水西的土目质疑改贵竹长官司为新贵县是变乱祖制，贵州巡抚江东之立即对其进行恫吓并辩称：

汝辈敢谓贵竹司之改县为皇上变乱祖制也？洪武年间，止一宣慰司，有布政使司自永乐十一年始，汝将谓成祖皇帝为变乱祖制乎？程番十七长官司之改府，自成化七年始，都匀邦水长官司之改府，自弘治十七年始，凯里安抚司之改属卫，自嘉靖九年始，汝又将谓累朝皇帝皆变乱祖制乎？贵省府卫并州县，俱系土司改置，其子孙为流官，各奉法无越志，汝欲废新贵县，将举贵州外而胥为夷也，安得妄兴此念？……前王所制即为律，后王所行即为令。[3]

改流为土则被视为不可思议的行为，明人王士性为此而批评贵州宣慰使安疆臣：

今安疆臣又复悖戾，不遵朝廷三尺。如贵竹长官司改县已多年，而疆臣犹欲取回为土司，天下岂有复改流为土者，故江长信疏欲剿之，未知廷议究竟何似。[4]

除了大一统的观念之外，各土司地区的改流进程都有其特殊背景。因为“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5]省城贵阳亦处于水西安氏等土司的包围之中，所以通过改流扩大控制区域，成为确保流官政府安全的措施之一。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在土官与流官两种不同的制度下，王朝在同一地区所能征派的赋役以及必须付出的经济代价（包括驻军费用、修建衙署、官员薪俸等）都是大不相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朝中大臣与地方大员对是否改流以及怎样改流的考虑，此外，文化因素对改流也不无影响。这些从贵阳府与新贵县的设置过程中可以清楚地呈现出来。

一 行政成本、汉夷风俗与改土归流[6]

1.从土司分地到卫城、省城

明代十三布政司（省）中，贵州置省最晚，直到永乐十一年（1413）废除今黔东一带的两个大土司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后才设立。通常省城附近都会置府设县，但贵州建省156年后才设贵阳府，又过22年后才设新贵县。同置省相似，贵阳府与新贵县得以设立同样与打击土司势力乃至改土归流有关。耐人寻味的是，设省时要对付的是两个实力雄厚的大土司，而置府设县主要对付的是两个势力弱小的小土司——贵竹长官司与平伐长官司，[7]但前者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完成，后者却曲曲折折，前后历八十余年。二者之间令人困惑的差异，其原因颇为复杂，下文试图爬梳相关史料，描述、分析贵州省城设置府、县的过程，对此做一简单回应。

在元代，今贵阳一带称贵州，是顺元路军民宣抚司的治所。[8]元明递嬗之际，明军尚未进入贵州，镇守云南的元宗室梁王对此地则鞭长莫及。[9]能够控制该地的是水西阿哲（明代取汉姓“安”）与水东宋氏两大土司，宋氏世居贵州，而阿哲的六慕则溪地则直逼贵州城，清人蒋攸铦称省城实系水西土司的分地，是有相当道理的。[10]

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贵州卫设立。一月之后，水西、水东的首领霭翠、宋蒙古歹归附，朱元璋依前朝惯例设置贵州宣慰司，命霭翠、宋蒙古歹分别世袭正、副宣慰使，明王朝在今贵阳一带站稳了脚跟。洪武五年，都指挥同知马烨修筑了贵州卫城。[11]永乐十一年（1413）位于今贵州东部的思州、思南两大土司被废除，贵州布政司设立，贵州卫城成为省城，城中最主要的权力机构有：布政司、都司、按察司、贵州卫、贵州前卫等。[12]

贵州卫、贵州前卫的设置以及省城地位的确立，意味着明朝廷对这

一黔中重镇乃至整个贵州的控制显著增强，土司力量实际上已从省城退缩。但流官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地方其实相当有限，并处于土司政权的重重包围之中，水西安氏所辖的六慕则溪距城北仅三里，[13]城南则密布着贵竹长官司、中曹长官司等势力较小的土司，且安氏在城南似乎也有领地，黔抚郭子章称：

（省城）自南门官道十里至龙洞铺，多通小路，四面皆夷，俱系乡宦私庄，此安宣慰地方，羊场司逼近。[14]

贵州这种独特的流、土分部状态让官员们感到了极大的威胁，直到万历年间，黔抚郭子章尚称贵州“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不窥吾路则窥吾城”。[15]为了因应这一复杂的状况，明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在省城附近设立贵州卫、贵州前卫，两个卫所紧密相连、互为犄角。此外，朝廷规定安氏土司必须改变世居水西的习惯，常年在省城办公，宣慰司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贵州宣慰使安氏的衙门，一是贵州宣慰副使水东宋氏的衙门，“而安氏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16]“即还须禀知守臣乃听”。[17]

清顺治年间进士许瓒会曾谈到明代流、土官员在贵州省城的辖地：

贵省城西隅有土著老人张姓言，宣慰司安氏向与流官中分而治，以城中十字街为界，西属宣慰，东属流官，故府西一带旧称老苗城。[18]

结合明代方志中的地图来看（图5-1），城西一带流官衙门密布，包括（贵阳）府、都司、布政司等的治所，宣慰司衙门反而在城东，“西属宣慰”之说或许只是一种传闻。明代前期甚至没有流、土官员分地而治的记载，贵州巡抚杜拯、巡按王时举疏请于省城设府治时称：

各省会城府县并置，岂徒备官哉！要以亲民事，悉下情耳。乃贵州独阙焉。军民之讼牒、徭役之审编、夫马之派拨、盗贼之追捕，藩臬不能悉理，往皆委之三司首领与两卫指挥及宣慰司官。夫三司首领类皆异选，操持靡定，政体鲜谙，间无非议，又多乖舛。卫指挥则尤甚矣！委牒方承，即怀私计，防缉未效，反贻厉阶。宣慰司则尤甚矣！逞其恣睢，日事讲罚，破人之家，戕人之命，往往如是。始臣等至省会，政悉以付之藩臬长吏，宣慰司有行必令白于布政司，两卫有行必令白于按察司，查无他弊，方许施行。然此仅能强制于一时耳，其势岂能持久哉！故缙绅乡士大夫及闾巷小民争欲增建府治。[19]

这段引文并未论述流、土官员的分工——可能这种分工从未在制度上明确规定，但宣慰使受到抚、布等官的节制却是毫无疑义的。万历年间设立贵阳府之后，有了“府辖城北，司辖城南”的规定，[20]宣慰使对省城事务的干预权必将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宣慰在省城办公，巡抚、布政使对之可行使监督与领导权，正如上文所引贵州巡抚杜拯、巡按王时举的联名奏疏中所称：

图5-1 明代贵州省城衙门分布图

始臣等至省会，政悉以付之藩臬长吏。宣慰司有行，必令白于布政司，两查无他弊，方许施行。

明廷要求宣慰在省城办公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将土司置于地方大员的监视之中。[21]水西安氏则一直设法规避这种控制。天顺年间，宣慰使安贵荣即因不在司管事，长期居住水西而受到朝廷警告，“毋得似前擅离衙门，旷职废事。如违，必重罪不宥”。[22]为了能够“合法”离开省城，安贵荣趁镇压狮子孔之乱立功的有利时机，一面请总兵官吴经为之说项，一面又指示属下头目阿则请自己回去催办贡赋，以经济方面的利益来打动朝廷，最后明廷终于做出让步，“有事听暂还水西”，“以印授宣

慰宋然代理”。[23]

在土司众多且流官系统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许多卫所兼起管理地方、带管土司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级行政单位。例如省城附近的贵州卫曾兼管金筑安抚司、平伐长官司、贵竹长官司以及从省城往南一直到黔粤边境的上马桥、大龙番、小龙番、程番、方番、木瓜、大华、麻响等二十来个长官司。

牢牢控制了贵州省城一带之后，明王朝接下来通过持续不断的改土归流，试图将更广阔的地域纳入直接统治，在省城及其附近地区设置贵阳府与新贵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

2.程番设府与初议改流设府、县

贵阳设府的先声是程番设府，而程番设府是从对贵州卫所辖的自省城往南至黔粤边界的十多个土司进行整顿开始的。这一过程最早可上溯至洪武年间（1368～1398），明朝经营贵州之初，就将韦番、卧龙番、小龙番等安抚司降为长官司，并废除木当、雍即客都等蛮夷长官司，编为木官、克度、通州三里。这些土司与里分布在偏离驿道的广阔地域内，名义上虽隶于贵州卫，但后者并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管辖。正统间（1436～1449）曾略加调整，将原隶贵州卫的金筑安抚司直隶贵州布政司，领木瓜、大华、麻响三长官司，其余长官司改隶于贵州宣慰司。但这些土司依然远离流官机构，难以节制。成化十二年（1476），程番长官司方勇声称愿意开设府治，于是明廷在地势平旷的程番长官司地设置程番府，统领金筑安抚司并上马桥等十七长官司，并修城池，设学校，编原住民入籍。五年之后，程番府学中已有不少土官、原住民子弟在读，甚至有“习礼土民”之设。[24]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明王朝对贵州中南部的弹压与渗透显著增强。随后，官员们又通过对省城附近的水东宋氏、贵竹长官司、平伐长官司的打击，进一步拓展流官政府的统治权力。

宋氏贵为贵州宣慰司副宣慰使，为黔省颇具实力的土司之一，其领地内聚集了众多汉人，史称其“（宋氏）亲领夷、汉民十二部，谓部长曰马头”。此外，贵竹、水东、平伐等十长官司在名义上也隶于宋氏。[25]正德八年（1513），在贵州正宣慰使水西安贵荣的引诱下，不堪宋氏暴虐统治的十二马头地方的苗民阿杂等作乱，叛乱平定后，朝廷欲将宋氏首领宋然问斩，后改为“依土俗量纳米谷赎罪，仍革其冠带为民”。次年，巡抚贵州都御史沈林欲乘此机会将宋氏所领的贵竹、平伐等七长官司以及十二马头地方、金筑安抚司等改土归流，总设一府，十二马头、贵竹各设县，“皆以流官抚理”，巡抚都御史陈天祥以及兵部等以“各长官司夷民不愿开设府、县”等为由，予以拒绝。[26]

其实除了原住民的抵制外，改流遭拒还有其他因素。设置流官意味着行政经费的大量增加，建设衙门官舍亦需许多花费。前文提到，贵州

财政一向极为紧张，微薄的赋税远远不够维持基本的行政运作，需要川、湖、滇等省的协济，“官戎岁给，全仰他省”。协济数量甚至超过了黔省各种赋役岁课收入之总和，尽管如此，依然入不敷出，“官军俸粮历一二年不支，无从措处”，许多典目、仓丞等小官吏“饿死不得返”。财政困难显然也是朝廷不愿改流的重要原因，这可以从以后官员们关于设府的讨论中看出来。

3.贵阳府与新贵县的设立

隆庆初年，杜拯巡抚贵州，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宣慰司的权力，规定其施行政令必须上报布政司批准。[27]隆庆二年（1568），黔抚杜拯与巡按王时举等官员再次疏请在省城设府，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保证王朝能够真正对省城及周边百姓进行有效管理。[28]似乎是有鉴于沈林设府之议遭到朝廷拒绝的教训，杜拯等人考虑到原住民的抵制以及经费等因素，提出了一个温和得多的方案，首先是保留了宋氏土官，其次是不再请求添设新府，只是要求将程番府治移至省城，并将平伐长官司与“所辖皆流寓者之子孙”的贵竹长官司改流，设二县，隶程番府。“庶经制全而体统不紊，民心顺而政务日臻矣。”[29]

杜、王二人的奏疏得到了朝廷官员的支持，但杜拯的继任者赵锦对此提出异议，他承认移府的可行性，盛赞其为“万世之利”，并乞请钦定府名，抛弃程番府这一带有蛮夷色彩的名字（后钦定为贵阳府），“以耸观听”。但对改流设二县之事他深表疑虑，甚至认为连设一县都不能操之过急：

其改设县治，原奉抚按衙门议将贵竹、平伐二司俱并改为县，今奉部议，改为二县。但地方窄狭，丁粮寡少，难设二县，请乞题请并作一县，待移府之后，行知府卢逵查将二司土民、客民、钱粮，再查各处空闲人民、土地，并为一大县，另议置里甲，均定粮差，庶地方广阔而丁粮差役可充足矣。[30]

身在贵州、明白地方情形的赵锦显然更为务实。他的意见是先移府，待条件（主要是指能征派到充足的丁粮差役）成熟时再考虑改土归流，并二司为一县。财政不敷的事实使赵锦占了上风，改流并县之事暂被搁置。

隆庆三年（1569），程番府更名贵阳府，府治北移至省城。《明史》称：“隆庆三年，移程番府为贵阳府，与宣慰司同城，府辖城北，司辖城南。”[31]从地理位置上看，城北刚好与水西安氏的辖地连成一片，城北为流官辖地的规定，或许与便于控制土司的目的有关。

囿于经费的困窘，没有添买地基，修建衙门，官员们因陋就简，尽量利用现有设施，将提学分司加以修葺，改作府衙。同时将龙岗书院内的阳明祠改为府学，与宣慰司学共一文庙，“学制、殿庑、祠祀与宣慰司

共之，而以司学右阳明书院为明伦堂”。直到三十多年后，这种“学官虽有专除，宫墙尚未专设，师生杂处司学中，斋舍依附司学之右”的状况才得以改变。[32]

省城设府后，程番旧治只设通判一员驻扎，明廷对此地的控驭相对削弱。例如府学远在贵阳，程番生员居住百里之外，“每遇朝祭大礼多不赴学”。[33]赋役征派的困难尤令官员们头疼。通判有官无印，并非专职，事权极轻，“威令不行，粮马率多逋负，剽劫肆其横行”。[34]万历十四年（1586），贵州巡抚舒应龙、巡按毛在疏请在程番设置定番州，并旧事重提，请求将贵竹、平伐二长官司改土归流，加上归化、新哨二里，并为一县，附郭贵阳。程番曾为府治，“城池、学校、公廨等项，依然具在，无烦改作，彼中人情似亦相安”，[35]因此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设州一事便获批准。[36]但置县附郭之议仍然受到兵科给事中顾九思等许多官员的质疑：

规制一更，其情或有所不便；体统少杀，其心或有所不堪。而番苗杂处，狼子野心，未必人人贴服，遵我文告，可为土人虑者一。县之设于会城也，尊官大吏环而临之，不下数十辈，而地当滇南孔道，轮蹄络绎，土司各分其疆，而县官拥一虚位，供亿烦冗，何以应之？此为县官虑者二。库贮之钱价有限，营运之费用不赀，能不挪借官帑取办民财乎！可为全省虑者三。且今滇南不靖，蜀复多故，而贵阳与二徼接境，其可虑不又有大哉！[37]

顾九思的三大忧虑中，有两条与改流将导致经费支出增加、地方难以应对相关。改流设县一事，遂“屡疏屡堪议，竟道傍不决”，历四五年而未果。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改流设县之事才得到朝廷批准，于是贵竹司更名为贵竹乡，编户南隅、西隅、北隅、谷也四里，此外新哨、归化二里亦归其管辖，平伐司更名平伐乡，编户上牌、下牌、江肘、谷广四里，两乡连同龙里卫合并为一县，附郭省城贵阳，钦定县名为“新贵”。贵竹司正长官宋显印授以土县丞，副长官宁国梁授以土主簿。经过这样一番调整后，贵阳府辖县一（新贵）、州一（定番）、安抚司一（金筑），终明之世，未有变化。[3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局与毛在、舒应龙的规划有所不同，“新贵”县不但包括了贵竹、平伐二长官司以及谷也、归化二里，还包括了原龙里卫，地域扩大或许是朝廷同意设县的重要原因。

4.行政成本与汉夷风俗

正如贵州设省是以思州、思南二宣慰司的改流为契机，贵阳设府与贵竹设县同样与贵竹、平伐二长官司的改流有着密切联系。从正德九年（1513）提议改流到万历十九年（1591）改流成功，经过了近80年的时间，考虑到贵竹、平伐二司弱小的实力，改流曲折的原因似乎主要不在于土官的反抗，经费困难等因素才是我们更应该予以关注的。从杜拯

等计划贵竹、平伐各设一县，到赵锦计划并二司为一县，再到舒应龙等并二司和谷也、归化二里为一县，最后的结果是并二司、二里与龙里卫为一县，县的规模不断扩大，个中缘由，或许与需要更多的地丁钱粮来支持新设县份的行政运作有关。从省城新置一府的最初规划，到移程番府治入省城，亦是出于行政成本方面的考虑，而定番州设置的顺利，显然是因为不需要太多的经费。

从逻辑上讲，设置流官意味着行政经费的大量增加，这对朝廷的扩张行为是一个重要制约。同时，原住民的抵制与反抗也常常使得中央王朝顾虑重重，甚至有收回成命、恢复土司的举动。[39]这两个因素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冲突——只有改土归流，将更多的原住民纳入编户才能开辟更丰厚的税源，从而获得较多的经费，但这通常又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因此，改流的进程常常伴随着武力。[40]

此外，移民的涌入与文化渗透也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41]在许多士大夫的观念中，“夷俗”与“中国之治”之间存在着矛盾，[42]“蛮夷之性”与土司制度之间有着某种必然联系，王阳明称：

盖蛮夷之性，譬犹禽兽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县，而绳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麋鹿于堂室之中，而欲其驯扰帖服，终必触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骇掷矣。故必放之闲旷之区，以顺适其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旧者，是顺适其犷野之性也。[43]

即便是设置了流官机构，将原住民纳入编户，但文化方面的隔膜依然形成诸多障碍，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对此已有论述，兹不赘述。

在移民及汉化程度较深的土司地区，土官存在的必要性则受到了质疑，毗邻省城的贵竹长官司的改流即与此密切相关：

贵竹司旧人，多出腹里中州，前代仕宦经商流移至此，岁久遂家焉。风俗纯厚，率多尚礼，以耕为乐，不喜华靡，尤重于婚丧，有中州遗风。……盖谓旧人者，以其男女服饰器用悉循古制，因号之。[44]

和其他土司区完全不同，明初一开设司治，朝廷便能在此地编定里甲，“自国朝开设司治，始有里甲之分”，共676户，1418丁口。[45]在贵阳设府的争论中，杜拯等官员打算在贵竹改流，其所持理由是：

贵竹长官司所辖皆流寓子孙，与夷民不同。[46]

贵竹地区改流设县后，水西土司试图恢复贵竹司，南隅、西隅、北隅、谷也四里有百姓联名反抗，声称：

四里百姓系流寓汉民，与本土苗仡佬不同。[47]

总而言之，省城置府设县这一在贵州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是在明王朝对贵州的开拓不断深化以及中原移民与文化不断渗透的背景下发

生的，同时还受到了财政困境的制约。在是否改流以及怎样改流的考量、辩论与实践中，行政成本与文化隔膜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前者在贵州这样的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的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5.恢复贵竹事件

眼看着王朝力量在广阔的贵州中部、南部地区扩张，甚至与自己毗邻的贵竹长官司也被改流，水西安氏的忧虑可想而知。万历二十四年（1596），安疆臣袭任贵州宣慰使，立即采取行动以图恢复。在此行动中，汉把陈恩、王嘉猷等是安疆臣的重要智囊，通过各夷目汉把的活动，安疆臣在京师营造了一张关系网，黔抚江东之称：

安疆臣差罗景春等，自京师来坐驿马九匹，臣委官拿解，除皮包衣段发布政司遣回外，搜得夷目李元育、陈敬圣各书一封，内称寄送张近泉衙门使用银四十两。审之张近泉，溷名张矮子，住长巷一条胡同，安差来京久住，皆其潜藏者也。又毛国康寄夷目张问达书一封，内云司主钦奖，皆年丈维持之功，在京行事罗西、田大才，弟不过指引代劳而已。审之毛国康，即毛懋康，系工部吏。与安酋夷目结为兄弟，备衙门打点，皆其指引者也。又宋汝奇书一封，内称谢厚赐。审之宋汝奇，系数万巨商，住武功坊西大街，与安酋父子相交，凡打点银有不敷，从之挪借者也。同行承差张鲸麟揭首，在京探得贵州应巡按参革安疆臣冠带，毛懋康引见该司承行吏章用吾，先送银二百两，转寻监生郑宾亭，送员外某银七百两，方得复本免革，进大木。毛国康引见节慎库吏万璟、都水司吏蔡贵宇，各送银一百两，托送郎中某银七百两，求得复本内旌奖数语。礼部国康引见吏卢荣惠，送员外某银一百两，求得题请宴赏。又送车驾司某银五十两，求勘合填钦赏字样。凡各部复本，承行吏俱窃稿与安酋差人先看，有毛国康邀帖约期可凭。安疆臣票仰在京气脉云：“李元育所禀欠使用银，知道了，汝放心，银后面带来还，不可擅用买办衣段银两。”有亲笔押字可证。罗凤坤等自去冬起身，今年五月方回，夷使在京之久，甚非理法之宜。[48]

江东之所言证据确凿，似非诬妄之词。其他官员亦有类似指责，“安疆臣贿副使，林乔楠则揭于通衢以拒之”。而贵州巡按应朝卿亦拒绝过汉把陈恩的贿赂。[49]

安疆臣的关系网络甚至包括了兵部尚书石星，后者在奏疏中请求“该属贵阳府者方属贵阳府，该还土司者还归土司”，[50]直接支持恢复贵竹司的行动。

此外，安疆臣还力图造成原住民不愿改流的局面，或诱使，或威胁，争取新贵县土县丞宋显印、土主簿宁国梁的支持。结果宋显印离开其久居安氏的驻地——大方，而拒绝合作的宁国梁则险些被刺杀。[51]

但除非经费难以措置或者朝廷无法妥善应对原住民的反抗，否则改

流为土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很难发生。在贵州巡抚江东之、巡按应朝卿、兵部侍郎李祯等众多官员的反对下，恢复贵竹司的计划以失败告终。明廷还要求安疆臣交出为其出谋划策的陈恩、王嘉猷等，江东之甚至建议率兵进剿水西。而安疆臣显然想庇护陈、王二人，水西与朝廷的关系渐趋紧张。[52]

贵竹司事件并不仅仅是水西与明王朝的较量，它同时还折射出明廷内部的斗争。虽然江东之在攻击支持安疆臣的兵部尚书石星时声称：“臣与石星素厚，今日之事，宁负石星，不敢负陛下。”[53]但其实他与石星早已是政治对手，并无多少私交可言。万历以来，内阁与言官之间似乎矛盾重重，势同水火。万历十二年（1584），在阁臣申时行、许国等与御史张文熙、丁此吕等人的争斗中，石星是内阁的坚定支持者，而作为言官的江东之则因疏劾申时行失败而遭贬。[54]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成功阻止了贵竹复司，但江东之并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他弹劾石星等官员受贿的奏疏被斥为“不根之言”，并且很快丧失了进一步展开攻势的机会。万历二十七年，黔军在进剿起兵反明的播州土司杨应龙的战斗中败绩，江东之的政敌乘机反攻，使其被削职回籍。[55]

二 奢安之乱与安坤事件

1.播州事变

播州事变暂时缓和了水西与朝廷因贵竹司事件而渐趋紧张的关系，却为更激烈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在平播战役中，水西的态度至为关键，大学士沈一贯称：

盖安氏与杨氏，接壤世姻，声势依倚，杨氏发难之时，天下疑安氏为助，而安氏又与贵州甚近，若安助杨，无论杨不可诛，而贵州省城亦不可保。[56]

在这种背景之下，在贵竹司事件的公文中桀骜不驯的安疆臣的形象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明廷同时放弃了勘问陈恩与王嘉猷的要求。贵州巡按宋兴祖疏称：

安疆臣颇守臣节，臣至其部，迎谒甚恭。虽土司形迹难凭，而中国驾驭贵善，且彼自谋杀安定，何与中国事，而必以汉法绳之？宜赦陈恩、王嘉猷，以结疆臣之心。[57]

万历二十七年（1599）十月，皇帝亲自制诏：

安疆臣既称忠顺，朝廷嘉与维新，其谕令感恩图报，如能歼贼，不爱非常之赏，陈恩、王嘉猷，俱许纳赎。[58]

安疆臣似乎还想进一步试探朝廷的态度，奏称：

播警方殷，令剿在即，谨陈忧谗畏讥之私以息群猜。[59]

万历皇帝立即“优诏答之”，称赞其“奋忠讨逆，奉公灭私”，许以在功成之后给予重赏。[60]在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官员的努力劝说下，狐疑不定的安疆臣终于率兵攻播，克黑水关，破大红关，夺洛蒙关，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若履无人之境”。当八路大兵会剿杨应龙的最后据点海龙囤时，水西兵马独当后路，而三省七路兵共30万则进攻前路。[61]

播州杨氏败亡后，改设遵义、平越二府，下设若干县，分属川、黔二省，里甲制顺利推行，播州成为王朝的“新疆”。[62]明廷对西南地区的渗透进一步深入，在水西东北面形成了扼制之势，而水西则失去了牵制中央王朝的一大力量。安疆臣很快发现，他实际上是被明廷利用与欺骗了。皇帝亲自答应的“非常之赏”成为泡影，“十年以来，兵部苦于蜀议，无尺寸之叙，国家亦无分毫之赏”。黔抚郭子章许诺赏给的乌江六百里之地也成了空中楼阁，不仅如此，以王象乾为代表的一批官员进而要求水西归还七十多年前所侵占的播州水烟、天望地方，郭子章等人表示反对，经过数年争论，最后水西以增输税粮为代价，保住了水烟、天旺两地。在这场论争中，蜀中官员甚至建议出兵水西。[63]

平播后水西遭受的另一挫折是，安疆臣之弟安尧臣被迫放弃了对镇雄的统治，返回贵州。

2.奢安之变

万历三十六年（1608）安疆臣去世后，水西与朝廷的关系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黔省官员在承袭之事上一拖再拖，勒索重金，安疆臣遗子安位数年不得袭。[64]当时安位年龄尚幼，贵州巡按杨鹤乘“寡妇孤儿仰我鼻息之日”，清查水西“户口扼塞之数，与头目汉把主名”，以图深化对水西的控驭，增加钱粮收入。[65]另一方面，大量饥饿不堪的“仲苗”聚集水西，抢劫官道，明廷接到巡抚李枟的奏报后，立即指示将贼党擒获正法，并要重处“抗违庇护”的土司。[66]当时因为土司之间的争斗，朝中以及地方官员积极讨论严惩水西、乌撒、镇雄的土官土目，甚至打算“合兵剿除”。[67]

这一系列事件与水西反明有着直接联系。天启间贵州提学佥事刘锡玄称：

水西据黔之腹心，其地广而赋饶，凡瘠土皆我黔土，而酋壤无非沃壤也。故力能控驭诸土司及苗仲。其视我黔省流官既若眼屑面疣，而流官之纵衙隶朘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言久矣。水西之必反，数十年来无智愚知之，而无一人敢言之，言则速之反耳。[68]

刘锡玄的叙述或许有夸饰色彩，但他对水西与地方官员紧张关系的描述可谓一语中的。天启元年（1621）三月，满州兵取沈阳，大败明军于浑河，直捣辽阳，京师戒严。[69]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水西土舍安邦彦借机起事，奢安事变爆发。

天启元年九月，奢崇明以愿提师三万援辽为名，聚兵重庆，杀害前来点兵给饷的四川巡抚徐可求，占据重庆，建国大梁，蜀中震动。[70]与播州之乱时相似，朝廷内外对水西的强硬态度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同年十一月，贵州巡按史永安疏请让多年未能承袭的安位立即袭任贵州宣慰使：

黔中土司莫大于水西，向累从征调，曾效忠勤。近奢社辉以妇人掌其事而呈详土舍安位应袭，臣屡催该道申详，而竟不报也。闻司道陋规，有黄金百两之说，署印副使邵应帧故避嫌卸担，不知何年何人作俑至此？堂堂藩臬立有受金定例，身之不法，下将何观！况奢酋发难，虑与水西百计联合，其间机括关系最巨，乞速催安位承袭，仍将土司袭谢陋规严行禁革，犯者听臣参劾，究赃治罪。此外各土官、土舍俱催次第承袭，庶砺臣子清修之节，亦坚夷官向化之心。[71]

朝廷以极快的速度批准了史永安的请求，一个月后，安位正式袭职，[72]但他年龄尚幼，掌握实权的是其叔父安邦彦。在受命剿永宁的幌子下，安邦彦拥兵至贵阳附近，领取饷银六千，然而他并没有立即出兵北上，饷银则被他用来笼络“苗仲”。[73]当时水西大兵虽聚集贵阳城外，但安邦彦尚狐疑不定。天启二年正月，奢崇明利用汉人军师何若海的计谋，传檄假称成都已被攻破。安邦彦听闻，立即率兵围攻贵阳。安氏“地大而力盛”，其甫一参战便引起了连锁反应，乌撒土官安效良、水东宋氏土司以及各路“苗仲”纷纷出兵响应，“绵互长驱，动摇数省”。时人称：“今天下两大患，东则辽，南则黔。”[74]与此相应，明廷在筹措经费方面专门设置了“京边”与“黔饷”。[75]

从天启元年（1621）到崇祯三年（1630），明王朝卒十年之功，动黔、川、滇、湖四省兵力，费百万饷银，终于攻占永宁，并消灭了安邦彦、奢崇明、安效良与水东宋氏，重创了黔西北、黔中、川南一带的土司势力。乌撒在安效良死后基本停止了与明军的对抗，而水西亦于崇祯三年乞降。[76]当时朝廷同样已精疲力竭，特别是经费艰难一直制约着军事行动，“京边”与“黔饷”难以兼顾，[77]在这种情况之下，总督军务的朱燮元同意招抚安位，[78]但附带了四个条件：

一、贬宣慰之爵；

二、削鸭池河以东的水外六目地给朝廷，但安氏在贵阳城外的旧宅予以保留；

三、交出杀害贵州巡抚王三善的凶手；[79]

四、开通毕节等驿道。

安位一一顺从，黔西北土司与中央王朝的较量告一段落。[80]

早在天启三年，明军已攻克永宁，在此地设置道、府，“与遵义、建武声势联络”。战事结束后，水东宋氏败亡，水外六目之地亦不复归水西土司所有，明王朝怎样看待这一统治范围的扩张？朱燮元的善后疏中有：

水西自河以外已悉入版图……诸将士皆身经数百战，咸愿得尺寸以长子孙，即割新疆（这里的“新疆”指水西河以外被割归朝廷之地——引者注）以授之，使知所劝。[81]

进入“版图”与成为“新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割“新疆”以授诸将则意指在“新疆”置卫所而非郡县。明制，卫所官员系世袭，此即“授”与“长子孙”之意，但卫所士兵是向王朝输赋应役的编户齐民，与土司土民性质迥异，因此与播州改流后所设的遵义、平越等府相似，水外新设卫所同样被视为王朝之“疆”，传统中国的“疆”与“版图”对编户的强调可见一斑。[82]

崇祯帝同意了朱燮元所请，于是在水外之地设立镇西、敷勇二卫，沿河要害，筑城36所，容纳了大批军事移民，同时立邸舍，缮邮亭，建仓廪，设卫学，增解额，“近控苗蛮，远联滇蜀”，封锁了水西“出犯”之道。[83]贵阳周围的土司基本上被肃清，“一线之外，四面皆夷”的贵州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水外六目地之田土、百姓既入王朝“版图”，水西土司向王朝所缴之赋，所应之役理应相应减少。崇祯九年（1636），朱燮元奏称：

查宣慰地方原有九驿，除水外三驿臣久割其土地人民，不复责成外，今尚存谷里、水西、奢香、大方、阁鸦、归化六驿。[84]

徭役的减少已如朱燮元所示，[85]但赋税方面，笔者所见明代材料并无相关记载。所幸光绪年间修的《水西安氏族谱》收录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已故宣慰使安坤之妻陇氏、应袭子安胜祖向朝廷汇报的钱粮清册，其中写道：

水西未设府制之前，每年载额秋粮京斗三千石，运付毕卫仓上纳，迨后地方残坏，人民故绝，于明季年间奉免一千石，止纳二千石。

水西各目承走谷里、水西、西溪、金鸡、阁鸦、归化六驿……[86]

据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所述，明中期水西所缴秋粮共3990石，远多于陇氏、安胜祖所报钱粮清册中的数目，只有把后者理解为明末水外六目地割归朝廷之后，清康熙三年（1664）改土归流之前（即未设府制之前）[87]的水西赋役数据，差距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如对比朱燮元与安胜祖所列六驿之名称，这一推测更有成立之可能，因为奢香驿即西溪驿，二人所列驿站完全相同。

播州事变使明廷在水西东北部对其形成了扼制之势，经过奢安之乱，永宁奢氏、水东宋氏被改流，水外六目地被割让（这里是阿哲家土地最肥沃的地方，是其重要粮仓[88]），水西的北部、东部、东南部的屏障全部丧失。中央王朝有了更深入控驭水西的基础。崇祯七年（1634），安位去世，无嗣。[89]属下各目争立，互不相让。朱燮元等官员采取“中立”态度，对争权各方所推举的承袭者皆以“于理法不顺”为由加以拒绝，并且派遣中军副将谭正修、守备李先跃等督兵直入大方、毕节，“谕以圣恩，凛以国法”，敦促各目归顺。在汉把陈国是、李时芳、陈国基、杨启祥、周廷鉴、李奇芳等人的怂恿下，各土目纷纷献土献印，以求封赏。当时朝中一些大臣亦主张在水西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但为了使“土汉相安”，朱燮元建议“因其故俗”，不设郡县军卫，对归附土目、汉把全部封给土知州、土千户、土百户、土总旗、正长官等职，“众建诸蛮”，将实力强大的水西分解为众多小土司。并且将以前宣慰亲领的土地“归还”朝廷，重新编定粮额。这样，既瓦解了土司势力，又增加了土地钱粮，且不至于激起原住民的抵制。这种一举多得的办法很快便被明廷采纳。[90]

接着，朱燮元进一步采取措施，力图将水西纳入王朝的直接控制中。他令副将方国安率兵两千，驻守原宣慰司的驻地——大方，刘镇蕃等率兵1100名进驻比那，并在两地筑城，准备设立两个卫，明初水西卫旧址则设一守御千户所。此外，筑城守卫的地方尚有谷里等五处。

原宣慰衙门则改设学校，置先师木主，习礼开讲，化导原住民，给予他们参加科考的机会。朱燮元还对驿递进行改革，以前赋役由宣慰总行认办，宣慰派诸土目，土目则派于原住民。原住民只对土目、土司负责。为了防止土目等苛派，朱燮元改令驿站徭役折银，并另派“官头代为支应”，“派马一匹折银十五两上纳，派夫一日折银三分，各责成该管输纳，敢有逋负者即行究罪加罚，各夷称便帖服”。朱燮元此举显然是想削弱土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并将土民纳入官府的直接统治。[91]

但这些措施很快激起原住民的反抗。崇祯十年（1637），化沙、杓佐、阿乌蒙等率兵攻陷大方城，副将方国安逃走。朱燮元为此“坐贬一秩”，同年四月，他与巡按御史冯晋卿等亲至大方，抚定叛乱。但内忧外患的明王朝不得不放弃诸城堡，并令前贵州宣慰使安万铨之孙世袭职，为延恩知府，统管诸部。安世很快去世，子承忠袭任宣慰使，“水西乃定”。[92]

朱燮元将水西本部纳入王朝“版图”的努力虽然最终功亏一篑，但他的驿传之役折银等改革却被保留了下来。康熙年间，安胜祖、陇氏所呈田粮清册云：

水西各目承走谷里、水西、西溪、金鸡、阁鸦、归化六驿，每驿站马三十匹，每匹价银三十两，共该价银九百两，六驿共该马一百八十匹，该价银五千四百两。

每驿每日站夫十名，每名该价银一钱，共该银一两。每年每驿夫三百六十名，夫价三百六十两，六站每年共该夫二千一百六十名，共该银二千一百六十两。

每驿搭应过往差员，日费米、盐、酒、菜该银一两，每驿每年共该银三百六十两，六驿共该日费银二千一百六十两。[93]

折银改革虽被延续，但因明王朝放弃了纳水西之地入“版图”的尝试，朱燮元当初欲“另佥官头”削弱土目的计划随之流产，驿站仍然由“各目承走”，这正是当初“土官名下总行认纳”的原则。

3.安坤事件：制造叛逆[94]

承忠去世后，其子安坤秉权水西，其孙安重圣则控制了乌撒。顺治十五年（1658），五省经略洪承畴率清兵进攻南明永历政权，被李定国的军队阻于沅州，于是遣使招抚安坤，“许以阿画、霭翠故事”。在安坤的带领下，清军由西路小道攻占了贵阳。此外，安坤还令汉把曾经、雄彦圣带领吴三桂取开州，降修文、广顺。滇黔平定后，清廷令安坤袭任水西宣慰使，并赏赐袍帽、靴带并采币二十匹，加都督佥事。而安重圣亦于顺治十六年归附，被授予乌撒土知府之职。[95]

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奉命兼辖贵州。[96]两年后，他以水西、乌撒联合南明旧将反叛为由，率兵平定黔西北。吴三桂在奏疏中称：

水西逆苗安坤等梗化，臣亲提师至毕节，由大方、乌西直捣卧这……[97]

《清史稿》亦云：

康熙三年，吴三桂督云、贵兵两路讨水西宣慰安坤之叛，平其地。[98]

清代许多私家著述如彭而述的《读史亭文集》、魏源的《圣武记》、刘健的《庭闻录》、李宗昉的《黔记》等亦持相同看法，[99]安坤叛清似乎已成定论。但令人疑惑的是，经过奢安之乱，水西安氏的实力已大为削弱，面对武功赫赫、所向披靡、刚刚消灭了南明政权的清王朝，何以敢自取灭亡之道？并且如果真要反清，为何不在南明永历政权未亡之时？

其实，讨平水西、乌撒是一个既定的计划，所谓反叛、梗化等只是一个表面的借口。作为实力较强的土司，水西遭到清王朝的疑虑系在情理之中，加上朝廷对黔西北彝族的许多礼俗相当陌生，误解极易产生。当永历政权覆亡之后，由疑虑、误解以及谣言所导致的矛盾便浮出水面了。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初二日，安顺府知府石天瑺声称水西不知

何故，在凤凰山驻兵数十营，黔抚卞三元接报后差人探察，获得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有人称水西正在举行婚礼，“苗俗，成亲多设兵马，备行粮”，有人称水西准备与郎岱土司仇杀，有人称水西正制造火药，有人称各土司齐于三月内举动，“分头取地方”等，卞三元便以“各处土苗窥伺贵州”奏闻朝廷，要求增加贵州军队。[100]但此后几年，并未有土司起事，显示所谓“三月内举动，分头取地方”系属谣言，考虑到卞三元一直试图增加黔省兵力，[101]选择有利于实现自己意图的信息上报朝廷似有可能。而他关于水西土司如何强悍，天启、崇祯间如何反明的叙述，同样易引起其他官员的共鸣与警惕。七个月后，平西亲王吴三桂又奏称：

贵州水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又马乃土目龙吉兆兄弟，私受李定国伪敕，缮器称兵，逆形已彰。臣念水西、马乃为用兵要路，未可容其窥伺梗阻，臣欲为先发制人之策；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又乌撒土司安重圣亦反侧叵测，所当并图收拾，以伸国威者也。[102]

所有认定安坤反叛的著者似乎都忽略了此疏。综观其文，同卞三元的奏折相似，所谓安坤、安重圣谋反全系推测，并无根据，于情理亦有未合之处，如果水西、乌撒顺治十七年就准备反叛，为何同年十二月黎平县归弓寨苗变、康熙二年（1663）丹平长官莫之廉、金筑土官王应兆起事、广西阿仲叛乱[103]时不乘机起兵，而要等到康熙三年这些动乱全被镇压后才采取行动？尤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吴三桂奏称水西欲反的头一年，安坤密报南明兴国公吕宏炀窜伏水西陇革，吕宏炀由此被擒。吴三桂奏称水西欲反的第四年，安坤将逃至水西的反清明将刘鼎擒获，送至贵阳处死。[104]

吴三桂所列举的水西反叛证据只有一条：“刑牲祭鬼，将为不轨。”此说极为隐晦，必须明白相关礼仪才能理解其含义。[105]按黔西北的礼俗，祭祀时亲朋好友都要组织人马队伍，如率兵出征一样前往赶祭，称为“节戛”。[106]如果是上层人物去世，场面更为宏大，如行军打仗一般，《黔记》载：

（罗罗）酋长死则集千人，被甲胄驰马若战。[107]

黔西北古彝书中记载了一场“节戛”的场面：

很古的时候，在益额古帕，笃色濮巧死。作斋献祭他，古苦底叟赞，祭仪举行了。在一天之内，南方的兵众，驻罗索发戛。北方的兵众，驻益古蒙布。东方的兵众，驻蒙岱热额。西方的兵众，驻濯朵俄各。绕灵转戛时，亮了半边天。[108]

将这种礼俗理解为“谋叛”可能是一种有意的误读，事出有因，内阁学士张玉书称：

（水西）初实无叛志，有大定总兵刘之福者，诛求未遂，心衔之。会其国有丧，其国俗皆被甲，之福遣人责问，水西大忿，遂杀来使。之

福因白平西王吴三桂，言倮倮有反状。三桂具疏请征。[109]

水西的娄素濮在祭祀时披挂铠甲，心怀疾怨的刘之福以此作为谋叛证据遣人责问水西，结果来人被水西所杀，这是事情的全部经过。刘之福、吴三桂便将正常的祭祀活动曲解为聚兵反叛上报，对毫无可责之处的乌撒则加上“亦反侧叵测”的帽子，一并打击。

乔云生分析了吴三桂疏请出兵黔西北的动机。

第一，当时全国基本统一，吴三桂需要制造一些动乱以维持、巩固自己的权势，“于时倡缅甸、水西之役以自固”。

第二，贪慕水西的财富。

第三，水西为西南要地，吴三桂欲控制此地，成就自己的野心。

第四，民国《大定县志》称：“坤有妾美而体香，三桂求之不得，三桂以此衔坤。”[110]

清廷亦想把黔西北纳归中央直接统治，同时让吴三桂与安坤争斗，彼此削弱，因此同意征剿水西。[111]

“妾美而体香”之说最早见于道光《大定府志》，带有民间传闻的色彩。除此之外，乔云生的分析是有相当根据的，在制造“安坤事件”的过程中，吴三桂利用了安坤的亲信车噶喇（又译作“叉戛那”“绰嘎拉”“察革喇”等），史称：

叉戛那为坤所信任，而有二心于三桂。三桂许平坤，以叉戛那袭宣慰。叉戛那信之，故为三桂所用。[112]

当清军进讨之初，安坤欲“引罪出降”，“车噶喇不听，遂偕坤走宜那噶”，联合南明旧将皮熊，形成了事实上的反叛。[113]彝书对此亦有记载：

绰嘎拉，心怀歹意，跟着吴王，吴王利诱他，打败阿哲家后，他想管阿哲地……绰嘎拉反叛，说起根源来，功名塞了他的口，富贵遮了他的眼……他给吴王带路，搜捕君长，交给汉军。[114]

安坤灭后，其妻禄氏及子安胜祖逃匿于乌撒、乌蒙的崇山峻岭中，迨三藩乱起，安胜祖与其母陇氏于康熙十六年（1677）起兵于威宁，协助清廷平叛，据安胜祖上报朝廷的清单，五年征战，水西共斩杀、招降、擒获叛逆官员105人、逆兵6494人，夺获“伪印”六颗与军器一批，[115]此外又于康熙二十年陆续捐粮共4000余石。[116]凭此功绩，安胜祖奏请恢复世土，承袭宣慰一职，[117]并为康熙皇帝详细算了一笔账，指出设立流官朝廷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以土司统治黔西北则可为朝廷节省一大笔行政成本及驻军之费。[118]

康熙皇帝自己也很清楚，当年的安坤事件是吴三桂的阴谋，因此在接到安胜祖的奏请后，曾一度思考过是否恢复“土司专辖”。[119]但正如前文所述，归流之地恢复土官旧制，与大一统观念、加强朝廷控制的目的都是南辕北辙的，皇帝、官员经过许多讨论之后，决定让安胜祖袭水西宣慰使，但所有已设流官行政机构全部保留，并规定宣慰使“不得擅预军民事”，安胜祖得到的只是一个虚衔。康熙三十七年，胜祖卒，无嗣，于是废除宣慰司。[120]

第二节 进入“版图”：从则溪制到流官制与里甲制

自明初建立卫所开始，经过黔东改流、程番设府、迁治贵阳、贵竹建县、奢安之乱、平定黔西北等一系列事件，“一线之外，四面皆夷”的贵州社会逐渐发生了变化，朝廷的力量不断向驿道之外的世界延伸。乌撒、水西的败亡标志着贵州势力最强大的土司的覆灭，在清代士大夫的眼中，这无疑意味着王朝教化的一次重大胜利。彭而述云：

前此一万八千年，中国王会不能宣，开山凿石逢今日，普天长贡水西篇。[121]

这同时也意味着王朝“版图”的扩张，康熙二十一年（1682）官平远通判的黄元治诗称：

安氏乌在哉？济火无遗族，山川隶版图，建郡设民牧。[122]

《黔西州志》亦载：

大定六属之土司，与别不同，均水西、扯勒、乌撒三部宣慰宣抚之后。盖三部既入版图，人民言语不通，风俗各异。[123]

清人许缵会所著《滇行纪程·水西四府》中亦有：

本朝乙巳命帅率师深入其地，讨平之，遂置四府，设流官，水西一带土地尽入版籍。

这些叙述意味着，改流之前的黔西北不被视为王朝的“版图”。古人所指的“版图”系指登载土地、人民的版籍，凡是土地人民载于户部与府、州、县版籍的地方即是王朝的“版图”与“疆”。因为土司所辖原住民大都不载于官府的户籍册，并非王朝编户，所以土司地区自然是处于“版图”之外。[124]进入“版图”意味着成为王朝的“疆”，[125]而刚被改流的黔西北因系新入“版图”之地，所以被时人称为“新疆”，即“新造之疆”。[126]

成为“新疆”意味着田土人民登载于王朝的版籍，“土其土而人其

人”，原来只对土司、土目负责的原住民开始直接为清廷输粮应役，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赋役由土官名下总行认派的原则宣告废止。《平远州志》云：

苗蛮以土司为长，初何知遵法度、输赋役、伏首屏息于长吏之庭哉！迨水西开拓，设官分职，宣布皇仁，敷扬威德，虎牙鹰眼，悉变化驯服而不敢动，此非建官之效欤？[127]

从“以土司为长”到“输赋役，伏首屏息于长吏之庭”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实现的，下文将对此进行具体的讨论。

一 流官制的建立

安氏败亡后，君、臣、布三者秉权的“勾”政权宣告解体，清廷利用内地的行政制度对则溪制进行改造，设置了四个府。木胯、火著、架勒、化各四则溪置大定府，治大方城（今大方县城）；则窝、以着、雄所三则溪置黔西府，治水西城（今黔西县城）；的独、朵你、要架、陇胯四则溪置平远府，治比喇坝城（今织金县城）；乌撒置威宁府，治乌撒卫城（今威宁县城）。[128]府名其实已暗示黔西北是“新造之疆”，颇具深意，清人宋起在谈论威宁风土时云：

……诸倮之俗如此，虽沐化已久，其桀傲之气犹未尽驯，昔以威宁命名，良有以也。[129]

耐人寻味的是，每一个府的下面都没有设置州、县、厅等，显然，设府的目的仅在加重地方官事权，以资弹压，并非黔西北的户丁钱粮足以支撑四府的规模，这种“名不副实”的建置正是许多“新疆”的特点。与此相应，清廷在黔西北的驻兵数量相当可观，共有平远、大定、黔西、威宁四镇总兵，兵员分别为2220名、2400名、2220名、2220名，共9060名。[130]朝廷还进一步设立平大黔威守道一员，驻扎大定，总领四府。[131]康熙十九年（1680），贵州巡抚杨雍建声称：

平、大、黔、威四府，境多乌罗，俗尚强悍，素系苗蛮巢穴，乃黔省肘腋要区也。旧制设有巡道一员，以资弹压。[132]

这种远远超越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行政与军备规模自然难以持久，随着局势的稳定，控驭的深入，“新疆”逐渐向“旧疆”演变。[133]三藩之乱结束不久，贵西道杨大鲲疏请：

贵州平、大、黔、威四府，原系水西一隅，吴逆务张其功，设立四府，并设流知府、通判、经历各四员及三镇一协。其实民少官多，请将四府酌改二府，其粮差各务仍设土官分掌。至协、镇官兵，亦行裁并，量留二镇。[134]

其实在杨大鲲上疏之前，清廷已开始改革黔西北的行政建置，平大

黔威道已于康熙二十年被改为分巡贵州西道，辖贵阳、安顺、平、大、黔、威等处，驻安顺。[135]杨大鲲的奏疏刚好迎合了这一趋势，朝廷很快批准改平远、黔西二府为州，属大定府，四年后又改大定府为大定州，与平远、黔西二州共属威宁府。[136]康熙二十年代同时又是废卫改县的重要时期，二十六年裁毕节、赤水二卫置毕节县，裁永宁卫置永宁县，乌撒卫亦裁，全部并入威宁府，雍正五年（1727）改永宁县隶四川，七年改大定州为府，以威宁府为州，属大定，十一年设大定通判驻水城，设水城厅，乾隆元年（1736）割四川叙永厅之岩上、岩下地属黔西州，编为平定里，四十一年，割平远州之崇信、时丰、岁稔三里属水城通判，于是大定府领厅一、州三、县一。终清之世，不再有变。[137]

与此同时，驻兵数量也在不断削减。康熙二十三年（1684）平远、黔西改镇为协，各裁兵一千多名，第二年威宁镇裁兵七百多名。雍正三年，大定改镇为协，兵员逐渐减至1200名，一镇三协遂成定制。[138]

二 里甲与户口丁银

流官制建立后，清廷接着将则溪制下的自然寨改造为里甲。与明代贵州行省建立之初，为弹压土司而设府、每府只有两三里、每里只有寥寥几户的状况不同，清廷在黔西北地区的府州制、里甲制已不再徒有象征意义，如平远州共有向化、怀忠、兴文、慕恩、太平、敦仁、崇信、时丰、岁稔九里，威宁州则编户十里，即全化、遵化、德化、性化、宣化、归化、顺化、致化、广化、大化。里甲的名称显示出清王朝对“新疆”教化的期望。[139]

这些里甲涵盖了黔西北数目众多的自然寨，但原有的聚居状况得到了新制度的尊重，里甲正是在则溪制与自然寨的基础上建立的。每个则溪编二里、三里不等，如大定府将原来的四个则溪各编二里，共八里。每里通常含十甲，但也有含七甲、六甲的（如黔西州）。每个甲由数目不等的寨组成，多则六七十寨，如大定府亲辖地的乐贡里一甲；少则一二寨，如黔西州永丰里的四甲只有黄土坡一寨。[140]与里甲制不同，后来的保（牌）甲制明显有对自然寨进行划分的痕迹，如平远州向化里共有10甲1049寨，编为145牌。[141]

毕节县主要由毕节、赤水二卫合并而成，情况有所不同。卫所本来就是王朝“版图”与“文教”之区，官员们规定里甲名称时似乎注意到了这个特点，没有炫耀“开疆”之功，也没有寄寓对教化的殷切期望。该县有东、南、西、北、长乐等里，而新纳入“版图”的八个夷屯，则被命名为平定里。这些里主要由屯、堡、铺、伍构成，甲的数量极少，带有明显的军卫痕迹。如东里含十八伍；南里由七伍、二屯组成；西里有十一伍、十铺，只有北里含六个甲、十七个伍，长乐里似乎全由甲组成。[142]

夷屯原非毕节县的土地，系雍正七年由四川割归而来。夷屯的来源

通常是，土目随朝廷从征有功，授其土千总等职，其领地便被称为夷屯。[143]与此相对，毕节、赤水二卫原有的屯地被称为军屯。2001年9月，当笔者在毕节县清水镇等地调查时，老人们尚能清楚地说明哪些地方是夷屯，哪些地方是军屯。夷屯的主管者主要是彝族人。[144]

明初编订里甲的原则是，“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145]不管实际执行过程中是否严格遵循此原则，其着眼点无疑在人不在地。清初黔西北的里甲制以寨为基础，虽然一里十甲的规则可以大致遵照，却无法拘泥于固定的户数，并且指导思想与前朝亦有差异。例如平远州“境内颇多田，因田制里，里有九”，[146]田土而不是户丁成为划分里甲的依据。大定府的情况与此颇有相似之处，首任知府宁云鹏称：

爰度地方远近，亦划东西南北为四乡，分八里：府城东，旧伐戈则溪，编悦服、乐贡二里；府城南，旧火著则溪，编大有、嘉禾二里；府城西，旧架勒则溪，编永顺、常平二里；府城北，旧木垮则溪，编仁育、义渐二里。里各有甲，甲各有户。[147]

这段引文透露出来的另一重要信息是，与流官府、州的设置相似，大定府的里甲与原来的则溪制度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户丁没有成为划分里甲的依据，这或许与明清时期整个赋役制度的变革有关，但与当时“夷多汉少”的情况似亦不无联系，改流之初为官平远的黄元治称：

（平远）城中皆兵，惟东南二门外，流氓落落十数家。至群苗，则皆僻居溪洞、笼箐中，如鸟兽之巢穴，不能以近人。[148]

但“不能以近人”并不意味着清廷不清查原住民，事实上，清初原住民拥有黔西北的绝大部分田地，“因田制里”同样离不开对他们的调查，因此，原住民的户数官府是有记载的，作为对新入“版图”之民的绥抚，官府编户而不审丁——这意味着丁差的豁免。[149]兹根据有关方志，编成表5-1。

表**5-1** 清初威宁府的户、丁原额

单位：户，丁，两

地区	户数	人丁	征差人丁	丁差银
府亲辖地	6782	3995	434	799
大定州	6663	无	无	无
平远州	2359	无	无	无
黔西州	3867	无	无	无
毕节县	4408	8036	343	1040

资料来源：主要参见康熙《新补贵州通志》卷10；道光《大定府志》卷40。

考虑到毕节县系由毕节卫、赤水卫改制而成，而威宁府亲辖地既包括原来的乌撒土府，又包括后来并入的乌撒卫，因此有充分理由相信，编丁的对象主要是原来的卫所。卫所系“旧疆”，军户本来就是王朝的编户齐民，明朝廷早就在此编丁征银，[150]清代的政策仅仅是延续前朝而已。

明清时期里甲制的演变以及赋役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使得许多地区的户、丁含义已不再是实际生活中的家庭与成年男子，“丁”甚至是一种与人口脱钩的计税单位。而“户”并非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单纯的税额登记单位，是一定的田产或税额的集合体。[151]由于手中材料有限，笔者目前尚不能完全探明清前期黔西北地区户、丁的编订原则及其意义，但这是一块新纳入王朝“版图”的地区（由卫所改县的毕节除外），没有明代的“定额”可资利用，即所谓“大定户口，自我朝以前，无考”。[152]地方志中的“原额”，必然是改流之初通过调查而来，与实际生活有较大的一致性。特别是“户”并非征税的客体，不用经过各种复杂的折征与换算，因此方志中的户数有可能就是当时官府所能掌握的家庭数。

水西、乌撒的改流进程结束不数年，长达九年的“三藩之乱”爆发，黔西北正当战乱之地，“丁绝田荒”，灾伤惨重。[153]迨战事结束，威宁府所存丁数不到原额的一半。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开始清编抵补，当年新编164丁，三十五年新编305丁。

值得注意的是，大致从康熙三十年代起，丁数缺载的州也逐渐开始编丁，如大定州康熙三十一年新编35丁，三十五年新编71丁，共征丁差银21两3钱。黔西州则于此两年分别编113丁和200丁，征丁差银62两6钱。[154]这些丁及银不但数量寡少，并且丁数亦不能理解为实际的人数，同一时期的贵州巡抚阎兴邦曾指出黔省有征差人丁、不征差人丁、随田带派亦不征差人丁等，当时全省逃亡人丁为42863丁7分1厘1毫6丝。[155]随着“摊丁入亩”的推行，黔西北的丁银也并入了地亩中。[156]

三 田赋、额外赋税与耗羡

道光《大定府志》称：

我朝田赋，率从明旧。故天下府州厅之田，类征条饷泊。至并丁于田，则又曰地丁银矣。而大定实异是，盖大定收于安坤叛灭之后，开辟较迟，土田租税，率鲜明制也。[157]

大定府“新疆”与“旧疆”并存，赋役制度呈现出许多特点，上文所述平远、黔西、大定等府州长期没有编丁即是一例，田赋的情形则更为复杂。

里甲建立的同时，清王朝开始在黔西北丈田，如大定知府宁云鹏“丈

地受业，得田三万三千七百八十九亩，……得地二万一十一亩”。[158]由于“新疆”、“旧疆”（主要是卫所地方）并存，田赋制度显得异常复杂。改流之初，曾命令大定、平远、黔西、威宁四府“地亩照卫田征粮”，[159]但并未真正得到执行。实际情形是，“新疆”田地不分等则，田每亩科米三斗，地每亩征荞八升。原毕节、赤水、乌撒三卫地方则基本上沿明旧制，田有屯、科之分，《大定府志》认为屯田即前明的军田，科田即前明的民田。[160]这种解释似乎有误，明代贵州巡抚王缉曾指出：

该省应丈民田三十二万八千五百二十九亩，屯田三十三万五千九百六十四亩，科田八万八千二十六亩，……至于普安、永宁、赤水、毕节、乌撒五卫被夷占去屯田，计其丈出之数，不足抵补，就于丈出五卫新垦科田七千二百七十七亩内摊粮拨补足额。尚有贵前、龙里等卫余剩科田一千九百一十五亩，查系军舍新垦，不在屯田数内，该起粮一百三石零。[161]

可见，科田通常是卫所正军家属或余丁等人所垦种的荒地，明初只有屯田，科田是后来才出现的，[162]其税则往往较屯田为轻。在明代方志中，卫所的田地常常分为屯田、科田两部分，分别统计，在税目上相应设立了屯粮、科粮二项。[163]

清代沿明旧例，屯、科分别征收，则例不同。乌撒屯田有三则，上田、中田、下田，分别亩征米0.235石、0.079石、0.054石，每米一石，带征岁用银1分6厘多；“逮乎（康熙）三十九年减则之令而垦复者，上田乃减为一斗一升七合有奇云”；屯地以分计，每分科荞麦5.003石；科田则不分等则，每亩科米0.049石。综上可知，前乌撒卫地的科则竟有六种之多。毕节卫的情形要简单一些，屯、科均不分等则，屯田亩征米0.185石；减则田征米0.123石；科田亩征米0.05石。赤水卫屯田有水、旱之分，每亩均科米0.094石，但水田每米一石带征岁用银一钱。[164]

以上是黔西北田赋税则的大致情形，通计全府成熟田地230433亩，[165]实征米及荞折米27488石，折粮、条鞭、岁用三项共银501两。此外尚有各种“额外赋税”，主要是盐课、杂税、牙帖年额银，而原卫所地方沿明之旧，另有官庄赈租、学田学租等项。兹据《大定府志》，将黔西北各州厅的田赋与额外赋税收入制成表5-2。

表**5-2** 清代黔西北的田赋与额外赋税收入

单位：石，两

地区	实征米	实征银	额外赋税				合计	
			盐课银	杂税银	牙税银	赈学租	米谷	银
府亲辖地	4067	无	111	118	6	无	4067	235
平远州	6116	无	36	57	无	无	6116	93
黔西州	7153	222	288	97	4	无	7153	611
水城厅	2940	无	36	57	无	无	2940	93
毕节县	3280	266	306	264	3	谷 14	3294	839
威宁总额	3930	11	242	97	6	谷 71	4001	356
其中原乌撒卫数额	1226	10	不详	不详	不详	谷 14	1240	不详
总计	27486	499	1019	690	19	85	27571	2227

注：为了计算方便，本表所有数据都是约数。由四川叙永拨归地只有原额，且数目不大，因此不予考虑，云南宣威、镇雄拨归地地方狭窄，税粮非常少，忽略不计。乌撒卫指的是原乌撒卫地方，清代已改属威宁。

资料来源：道光《大定府志》卷 40《食货略上·田赋》。

将府亲辖地、黔西、平远与水城厅的数据相加，可知原水西地实征粮20276石、银1032两；用威宁州的数据减去原乌撒卫地方的数据（假定原乌撒卫地方所征额外赋税银约占威宁总额的一半，为170两），即可得出：原乌撒土府地征粮2761石，银186两。“新疆”地方共计征米23037石，银约1218两。

同其他地区一样，额外摊派合法化后所形成的耗羡银米是“新疆”政府的一笔重要收入。兹据《大定府志》与《黔南识略》的相关数据，制成表5-3。

表5-3 大定府的耗羡米与耗羡银

单位：石，两

地名	耗羡米		耗羡银	合计
	本色米	折征银		
府亲辖地	610	336	1380	1716
水城厅	440	242	507	749
威宁州	471	259	5540	5799
平远州	774	426	515	941
黔西州	894	492	1330	1822
毕节县	423	233	3318	3551
总计	3612	1988	12590	14578

资料来源：道光《大定府志》卷41，并参考了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4（清刻本）。

耗限米、银总额合银14578两，此外还有一些“尽收尽解”的“税契”，数目不多。[166]

四 改流后清王朝在黔西北的收入与支出比较

显然，清廷从黔西北获取的财富比前朝多得多，但清廷必须承担在黔西北设官驻兵的庞大开销——当时的经费开支主要有官役之费、弁兵之费、礼仪之费、赈恤之费，合计每年约需银106183两、米16861石。[167]除了米的数量低于黔西北的每年的征收数外，需用银数量远远超过了黔西北每年征银数。为了得到一个更直观、准确的理解，在此利用表5-2与表5-3中统计出来的相关数据，制定表5-4，其中实物米粮，按每石折银五钱五分换算成银两数据。

表**5-4** 清王朝在黔西北的收入与支出对照表

单位：石，两

收入					支出			
米粮	折银	银	耗羡	总计（银）	米粮	折银	银	总计（银）
27571	15164	2227	14578	31969	16861	9274	106183	115457

注：据道光《大定府志》卷41，实物米粮折银征收时，折换率是“每石折银五钱五分”。根据表5-1，清廷还在黔西北征收有一千多两的丁差银，但雍正以后此项已合并在田赋中，所以本表不予考虑。

支出几近收入的四倍，单从经济角度而论，清廷在黔西北的改土归流是得不偿失的，这也正是当初安胜祖请求恢复土官的理由之一：

水西既设府制，三府秋粮虽三万有零。乃吴王夸功踏丈，尽将旱地亦作田亩征粮，致小民无处出办上纳，逃窜无休。又于吴王举事之后，粮重差繁，又遭贼兵蹂躏，以致人绝田荒。今逢三府官员亲临踏验，造册详报，三府秋粮合算，其数不过千数，是有其名而无其数。实设有三镇官兵戍守，每镇每年动支饷银三万三千有零，以三府之官兵饷银马乾俸薪，合算十万之数。若以秋粮为论，三府之粮稍增于水西之额；以饷为论，国帑之金钱反靡费甚多。况今三府秋粮不敷三镇兵食，尚于他郡议补，是以有用之钱米，岁给官兵守无用之瘠地。[168]

据表5-2，水西地征粮20276石，银1032两，此外还有耗羡银1万余两（这个数据包括了乌撒），安胜祖此处只提到征粮3万余石，此外水西还应六驿之役，折银共9720两（前文叙奢安之变的善后措施时已有六驿之役的分析），考虑到安胜祖的清册呈于康熙二十一年，表5-2所据《大定府志》修于道光年间，前者反映的显然是改流之初的赋役情形。

黔西北经费方面的入不敷出在贵州并非特例，同明代一样，清代维持贵州行政、军事机构运转的费用有赖于他省的协济。早在顺治十五年（1658），黔抚赵廷臣就抱怨：“贵州从来荒穷，通省额赋钱粮不及腹里一中县，向皆仰给协济于楚、蜀、滇、粤。……本省民赋既难骤得，则本省经费无所出，兵马粮饷无所出，驿递钱粮无所出，官员廪俸衙役工食俱无所出，司道府厅州县卫所束手无策。”[169]如果说，清初贵州战事尚未彻底结束，经费艰难在所难免，那么康熙五十年（1711）贵州巡抚刘荫枢的奏折则可让我们窥知和平时期的情形：

黔省山多民少，地丁税课每年征收仅八万有奇，止足驿站俸工等项支用。各镇协营兵饷岁需三十八万，俱系邻省协济。……臣不揣冒昧，念切长计，去年连具二疏，请于三十八万之外，多拨二十万两到黔，前后融通接济。[170]

雍正二年（1724）黔抚毛文铨亦奏称：

窃惟贵州处于边末地方，各官实非他省可比；更有山僻州县，四面

环彝，钱粮不过百十余两，即县署州衙亦惟草屋数间，似觉更苦。故凡任前项地方之州县，率多弃父母，捐妻子而来，顾此荒凉，类生怠惰，遗误地方。[171]

因为地瘠民贫，经费不敷，清代仕宦者往往视宦黔为畏途。[172]而贵州地形西高东低，地处黔西高原上的黔西北跬步皆山，更是堪称穷省内部的穷地区。上文所述的行政规模压缩以及驻兵数量削减除了意味着“新疆”的逐渐平定外，亦是对财政困难的一种因应。总之，清王朝对水西、乌撒的改土归流并非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但地当川、滇、黔三省要通，可谓西南地区腹心的黔西北，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逐渐整合进了中央王朝的“版图”，对加深清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控驭具有战略性意义。大致从雍正以降，在大定府的崇山峻岭中逐渐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藏并将其开采，其中铅的产量在全国遥遥领先。在清王朝开始得到经济方面的实惠的同时，黔西北也以此为契机，更加紧密地与内地整合为一体（见本书第七章）。

[1]下文将证明，“疆”的含义是与“版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入“版图”即成为王朝的“疆”。

[2]陈耀祖认为，土司制度的本质是消极的（指中央王朝的治边政策消极而被动）。“明成祖着意于西南（黔东改流、贵州设省等行动——引者注），恐与惠帝之亡命有关，清初之经营苗疆，亦与吴三桂遗孽有关，清末之用兵川边，乃迫于藏族之骚动。以上各例，无一而非出于被动。”（参见陈耀祖《土司制度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64）。限于篇幅，本书暂不质疑陈文所列举的事例是否适当，但本节所讨论的黔西北改流过程表明，用“被动”一词实难贴切描述土司制度与治边政策的变动。

[3]江东之：《瑞阳阿集》卷3《黔中疏草·清治本疏》。

[4]王士性：《黔志》。

[5]郭子章：《黔记》卷4《舆图志》。

[6]关于贵阳府与新贵县的设置，笔者撰有《行政成本、汉夷风俗与改土归流——明代贵州贵阳府与新贵县设置始末》［《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本小节即在该文基础上改写而成。

[7]明制，宣慰司从三品，为品级最高的土司，思州宣慰司与思南宣慰司是明初贵州有名的大土司。长官司从六品，为级别较低的土司，一般势力都比较弱小。“某某长官司”又往往简称为“某某司”，例如贵竹长官司简称贵竹司，平伐长官司简称平伐司。

[8]参见蒋攸铦《黔轺纪行集·贵州考》。元代有两个贵州，另一个在今广西。本章的贵州专指今贵阳一带。

[9]当梁王据滇对抗明军时，除了乌撒外，今贵州境内的土司很少有支持他的。

[10]参见蒋攸铦《黔轺纪行集·贵州考》。

[11]明初应是重修城墙，因为元代已筑有贵州城。《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云：“戊午，贵州猫蛮三十余人作乱，劫顺元路，入其城。”元代顺元路的治地贵州即今贵阳一带。

[12]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1之“地图”；郭子章《黔记》卷4之“舆图”。

[13]明人刘锡玄所著《归余闲纪·龙新露宿》云：“宅溪去省城三里。”刘锡玄的另一本书《黔牍偶存·围城日录·叛逆缘起》云：“而近在三里之宅溪（则溪），千万人扬鞭伐木者，尚无一人敢逆其颜行也。”在《围城日录》之“第一局”中刘锡玄亦透露：“锡玄于正月三十夜先宿北城，盖北城正临宅溪贼窟。”据此，省城北面三里即安氏的则溪。又安氏的十三则溪中，六慕则溪距贵阳最近，是以知刘锡玄指的是六慕则溪。直到今天，贵阳市北的云岩区尚有一些地名同则溪（宅溪、宅吉）有关，如则溪坝、宅吉小区等。

[14]郭子章：《黔记》卷4《舆图志》。

[15]郭子章：《黔记》卷4《舆图志》。

[16]《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17]《明宪宗实录》卷278，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己巳条。

[18]许瓒会：《滇行纪程续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9]杜拯、王时举：《议联近属移府治疏》，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

[20]《明史》卷316《贵州土司》。

[21]正如方国瑜所称：“明朝限定安氏居于首府，用‘就食长安，而不至国’的办法，加以防范。”《彝族史稿》，第485页。

[22]《明英宗实录》卷299，天顺三年正月丁未条。

[23]参见《明宪宗实录》卷278，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己巳条；《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24]参见毛奇龄《蛮司合志》卷2；《明宪宗实录》卷155，成化十二年七月壬子条，卷221，十七年十一月己卯条; 万历《贵州通志》卷3 《贵阳府·沿革》，卷19《改拨定番州学议》；嘉靖《贵州通志》卷3《户口·程番府》；杨正泰《明代驿站考》，第124页《贵州驿路分布图》。程番首任知府邓廷瓒，为官声誉颇佳。参见李东阳《怀麓堂集》卷9《邓程番遗爱图》；郑纪《东园文集》卷8《送黄太守之程番序》；吴宽《家藏集》卷77《明故资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谥襄敏邓公神道碑铭》；《明史》卷172《邓廷瓒传》。

[25]参见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贵州宣慰司上》；《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26]参见《明武宗实录》卷101，正德八年六月壬寅条，卷116，九年九月戊辰条；《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较诸《明实录》《明史》的记载，明人文徵明所撰《甫田集》卷26《明故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行状》所载沈林要求在贵州改土归流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其文云：“宣慰使宋然桀骜首祸，公奏革其职。仍奏建总府于省城，令贵竹、水东等五长官司，洪遥等十三马头及程番府所属金筑安抚司、上马桥长官司、龙里卫所属大小平伐二长官司并隶焉。置二县分治其故地，其四十八枝头目、青山等寨、龙筑等长官司、毕节等驿仍隶宣慰使万钟，改置诸长官为流官，悉隶贵前二卫，诸土舍悉令占数为编户。”

[27]参见杜拯、王时举《议联近属移府治疏》，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

[28]参见杜拯、王时举《议联近属移府治疏》，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

[29]参见《明穆宗实录》卷21，隆庆二年六月己卯条；杜拯、王时举《议联近属移府治疏》，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

[30]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议迁府治疏》。

[31]《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32]参见万历《贵州通志》卷3《贵阳府·学校》；卷19《经略志上》之《议迁府治疏》《建贵阳府学议》；卷22《建修类·迁建贵阳府治记》。

[33]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改拨定番州学议》。

[34]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议设州县疏》。

[35]《明神宗实录》卷170，万历十四年正月辛酉条。

[36]《明神宗实录》卷172，万历十四年三月乙卯条。

[37]《明神宗实录》卷170，万历十四年正月辛酉条。

[38]参见江东之《瑞阳阿集》卷3《黔中疏草·黜陟边臣疏》；万历《贵州通志》卷3、22。据说当时叶福堂当国，其原籍为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三福相连，于是疏请仿效之，遂定县名为新贵，贵州、贵阳、新贵三贵相连，参见李澄中《滇行日记》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9]例如嘉靖年间曾将四川芒部土府改流，结果引起了乌撒、东川、水西等土官、原住民的反抗，经过几次武力较量，明廷不得不恢复土官知府（参见《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一》）。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正统时贵州的“苗乱”曾导致一些官员建议废除贵州行省并各府大小官吏，全面改流为土，原住民反抗、米粮艰难是这些官员所持的主要理由。参见于谦《忠肃集》卷3《南征类·兵部为怀柔远人事》。

[40]对一些实力弱小的土官如贵竹司、平伐司等进行改流则常常采取和平方式。

[41]沈梅梅注意到了科举教化的兴起与改土归流的关系，参见沈梅梅《明清云南改土归流的文化条件》，《思想战线》1997年第5期。

[42]例如明人郑大郁称：“（贵州）地纯夷俗，非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郑大郁：《经国雄略》卷4《贵州》。黄仲昭《未轩文集·补遗》卷上《贵州左布政使黄琏列传》亦云：“吏部先已擢琏参政贵州矣，琏至，以其地夷獠杂居，不可以中州文法绳之，为政务简静，不事苛扰，论者以为得体。”闵珪《论抚讲岑应疏》（汪森编《粤西文载》卷5）亦称：“况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各处蛮夷边境，地皆炎瘴，人皆顽梗，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

[43]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14《别录六·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康熙皇帝在写给黔抚陈诜的朱批中亦称：“土司种类最繁，风俗各异，自古王法不能绳。若以内地民情治之，断不能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档案出版社，1985，第601页。

[44]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户口》。

[45]嘉靖《贵州通志》卷3《风俗·户口》。

[46]《明穆宗实录》卷21，隆庆二年六月己卯条。

[47]江东之《瑞阳阿集》卷3《黔中疏草·乞赐生还疏》后所附四里百姓之呈状。

[48]江东之：《瑞阳阿集》卷3《黔中疏草·塞邪径疏》。

[49]参见应朝卿《参处安酋疏》，万历《贵州通志》卷20《经略志下》；江东之《瑞阳阿集》卷3《黔中疏草·清治本疏》。

[50]参见江东之《瑞阳阿集》卷3《黔中疏草》中的《清治本疏》《黜陟边臣疏》《乞赐生还疏》。

[51]参见江东之《瑞阳阿集》卷3，《黔中疏草·清治本疏》；应朝卿《参处安酋疏》，万历《贵州通志》卷20《经略志下》。

[52]参见江东《瑞阳阿集》卷3《黔中疏草·清治本疏》；应朝卿《参处安酋疏》，万历《贵州通志》卷20《经略志下》；《明神宗实录》卷320，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丙申条。

[53]江东之：《瑞阳阿集》卷3《黔中疏草·清治本疏》。

[54]参见《明史》卷218《申时行传》，卷236《江东之传》；江东之《瑞阳阿集·明故中议大夫都察右佥都御史念所江公墓志铭》。

[55]参见《明神宗实录》卷324，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丁亥条，卷333，二十七年四月庚午条，卷337，二十七年七月癸酉条；江东之《瑞阳阿集·明故中议大夫都察右佥都御史念所江公墓志铭》。

[56]沈一贯：《言川贵总督揭帖》，《明经世文编》卷435。

[57]《明神宗实录》卷333，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庚午条。

[58]《明神宗实录》卷340，万历二十七年十月戊子条。

[59]《明神宗实录》卷346，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己丑条。

[60]参见《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明神宗实录》卷346，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己丑条。解读相关文献可发现，判定一个土司是否叛逆往往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许多时候取决于朝廷与地方官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官员们在治边思想方面的个人偏好，这些问题与偏好同土司本身无直接关系，但却影响到官员对土司是否效顺的判断，安疆臣形象的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此外尚可参见高拱《靖夷纪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温纯《温公毅集》卷1《将臣轻率失律抚臣谋虑太疏致损军兵乞赐严究并图善后事宜以振军威疏》中关于水西叛服与朝廷该如何应对的讨论。

[61]参见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0《行奖安疆臣兄弟》，卷11《行水西兵不得全占囤后》；《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二》，卷316《贵州土司传》。

[62]例如朱燮元的奏疏中有：“臣惟遵义新疆，路逼水、蔺，内则旧民助逆，外则安酋屡犯郡城。”朱燮元：《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卷6《残边加升道臣弹压疏》。

[63]参见吕邦耀《土司恶形渐彰乞责成黔省抚臣疏》，吴亮《万历疏钞》卷42；郭子章《看议播界疏》《题夷情疏》，《明经世文编》卷419；《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明神宗实录》卷374，万历三十年七月癸亥条，卷378，三十年十一月庚申条。

[64]参见《明熹宗实录》卷16，天启元年十一月丁巳条。

[65]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63，万历四十五年十一月癸亥条。

[66]参见《明熹宗实录》卷2，泰昌元年十月癸亥条。

[67]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96，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庚寅条；《嘉宗天启实录》卷3，天启元年三月辛亥条。

[68]刘锡玄：《黔牍偶存·围城日录·叛逆缘起》。

[69]参见《明史》卷22《熹宗纪》。

[70]参见朱燮元《朱少师奏疏钞》卷1《逆贼奢崇明父子造叛杀占重庆节略》《恢复重庆节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

[71]《明熹宗实录》卷16，天启元年十一月丁巳条。土官承袭时需向有关官员送礼在明清时期是一个普遍现象，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高其倬称："云贵两省土司承袭之事，皆有规礼。"《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6之一《朱批高其倬奏折》，四库全书本。

[72]参见《明熹宗实录》卷17，天启元年十二月壬辰条。

[73]由于卫所制度的败坏，当时在整个贵州甚至省城贵阳，明军的力量都相当薄弱。清人胡文学认为当时黔抚李枟同意安邦彦剿蔺并发给饷银是缓兵之计，与此同时，李枟加紧征集兵马及军用物资，以防安邦彦之叛。参见胡文学《甬上耆旧诗》卷25，四库全书本。

[74]参见刘锡玄《黔牍偶存·围城日录·叛逆缘起》；朱燮元《朱少师奏疏钞》卷1《恢复建武叙南六县泸纳合江等处节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明熹宗实录》卷79，天启六年十二月己亥条。

[75]参见《明熹宗实录》卷74，天启六年七月己卯条；卷75，六年八月丁未条。

[76]参见《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卷249《朱燮元传》。关于奢安反明的经过，在《明熹宗实录》，《明史》卷249、311、312，《明史纪事本末·平奢安》以及明人刘锡玄所著《黔牍偶存》，清人李珍所著《明季水西纪略》，道光《大定府志》中有极为详细的记载，而朱燮元的《朱少师奏疏钞》与《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则保存了关于这一事件的许多公文。

[77]参见《明熹宗实录》卷74，天启六年七月己卯条；朱燮元《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卷6《催饷辞衔免扇疏》、卷9《议留钱粮疏》。

[78]其实自叛乱初起，明王朝就没有放弃过招抚安位与其母奢社辉的努力。

[79]天启四年，黔抚王三善率军深入水西地区，在回师途中遭到伏击，兵败身亡。

[80]参见朱燮元《朱少师奏疏钞》卷6《安酋业已投诚绅衿未肯罢战谨陈夷情士论仰请圣裁以决进止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

[81]刘宗周所撰《朱公墓志铭》（《朱少师奏疏钞》卷首）以及《明史》卷249《朱燮元传》都摘抄了这份奏疏，文字略有出入。

[82]关于传统中国"版图"与"疆"，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已有论述，本章下一节亦将有分析。

[83]参见《明史》卷249《朱燮元传》，卷312《四川土司传二》；朱燮元《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卷8《恭报蔺地善后机宜疏》；《朱少师奏疏钞》卷6《列城扼险守御粗备敬陈善后事宜建卫所久任世守以固边圉事》，卷7《议建学校请广制额以作新

遐方永固疆圉事》。

[84]朱燮元：《朱少师奏疏钞》卷8《西土分设已明协同议善后事宜列款具陈恭请圣裁事》。

[85]前文指出水西支应13个驿站之役，渭河驿已于万历九年裁革，养龙、底寨、札佐三驿不在湖广—贵州—云南交通干线上，并非太重要，可能这或许是朱燮元称“宣慰地方原有九驿”的原因。

[86]《贵州水西宣慰司土妇禄氏应袭子安胜祖谨将新旧钱粮备造清册呈报伏乞查考施行须至册者》，光绪《水西安氏祖谱》。

[87]水西改土归流在康熙三年，后陇氏、安胜祖等助朝廷平定吴三桂，得重新袭职，但权力受到极大限制（详后文）。

[88]例如天启间的兵科给事中胡永顺称安氏“良田沃壤尽在水外六目”，《明熹宗实录》卷39，天启三年十月丁卯条。

[89]关于安位去世的时间，《明史》卷249、《明史纪事本末》卷69均作崇祯十年，道光《大定府志》卷48则作崇祯六年。但长期驻扎贵州的当事人朱燮元疏称：“七年十一月安位病故，无嗣，各夷纷纷争立。”疑《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大定府志》均误。

[90]参见朱燮元《朱少师奏疏钞》卷8《勘明水西各土遵照明旨分土授官以安地方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91]参见朱燮元《朱少师奏疏钞》卷8《西土分设已明协同议善后事宜列款具陈恭请圣裁事》。

[92]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8《水西安氏本末中》；《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93]《贵州水西宣慰司土妇禄氏应袭子安胜祖谨将新旧钱粮备造清册呈报伏乞查考施行须至册者》，光绪《水西安氏祖谱》。

[94]学界对安坤事件已有一些讨论，其焦点在于确定此事件的性质，有“少数民族抗清斗争”“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破坏统一的叛乱”“为维护自身民族利益，反对吴三桂阴谋割据”等观点，参见乔云生《试论安坤事件的性质》，《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贵州古代史》，第292～295页等。

[95]参见《清世祖实录》卷122，顺治十五年十二月辛卯条，卷126，十六年六月癸丑条；《清史稿》卷515《贵州土司传》；道光《大定府志》卷49《水西安氏本末下》，卷50《乌撒安氏本末》。清王朝进军西南之初，即认识到“进取西南要著首在收拾人心”，例如主持进军西南军务的洪承畴认为云贵“山川峻阻，林丛深密，大路仅通一线，四周尽属险峒，苗蛮族多，民人绝少，风俗全然不同，性情殊不相类，古称难治……必先得土司苗蛮之心而后可为一劳永逸之计”［洪承畴：《揭为进取西南要著首在收拾人心谨陈末议仰请上裁以期蚤奏太平事》（顺治十五年一月十八日），《明清档案》第31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第B17789页］。明对黔西北土司的招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96]《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

[97]《清圣祖实录》卷12，康熙三年闰六月丁卯条。

[98]《清史稿》卷512《湖广土司传》。

[99]参见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1《水西条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魏源《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中华书局，1984；刘健《庭闻录》，上海书店，1985；李宗昉《黔记》卷4，光绪十二年刻本等。

[100]参见卞三元《谨揭为塘报事》（顺治十七年三月），《明清档案》第36册，第B20611～20613页。

[101]参见卞三元《为黔省咽喉重地谨循各省之例请设城守之兵以备不虞以固疆圉事》（顺治十七年正月）、《谨揭为土苗叛念欲逞黔兵势弱可虑亟需添兵严防以备不虞仰祈敕部议抽调邻省官兵勒限移黔防御以保危疆以策万全事》（顺治十七年三月），《明清档案》第36册，第B20203～20205、B20615～20619页。

[102]《清世祖实录》卷139，顺治十七年八月辛亥条。彝书对吴三桂上疏请求平定水西一事有简短记载："陀尼吴三桂，到西边吉娄家，他眈眈注视，到了丑年呢，上京奏本说：'水西要造反，我可以征服，我可以平定。'"《彝族创世志》谱牒志二，第306页。

[103]参见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第293页。

[104]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9《水西安氏本末下》。

[105]乔云生利用《贵州通志》《黔记》等史籍，指出丧礼时披甲驰马若战是彝族的礼俗，吴三桂等故意曲解为"将为不轨"，诬陷水西反叛（参见《试论安坤事件的性质》，《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本书将引证相关彝文献，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106]参见《赫章县民族志》审稿本，赫章县民宗局，1993，第161～162页。

[107]郭子章：《黔记》卷59。

[108]《彝族创世志》艺文志，第89～90页。

[109]张玉书：《张文贞集》卷7《纪平水西事》，四库全书本。

[110]道光《大定府志》卷49《水西安氏本末下》。

[111]参见乔云生《试论安坤事件的性质》，《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112]道光《大定府志》卷49《旧事志五·平水西逸事》。

[113]参见张玉书《张文贞集》卷7《纪平水西事》；道光《大定府志》卷49《旧事志》中的《水西安氏本末下》《平水西逸事》。

[114]《西南彝志》第7～8卷，第342～348页。《增订爨文丛刻》上册之《吴三桂侵入彝地》（第142～151页）亦有类似记载。长期以来，在黔西北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当年吴三桂平定水西后，许多彝族支系渡过金沙江，迁往凉山定居。1949年后在凉山的调查亦显示，一些凉山彝族声称自己的祖先原居住在黔西北，吴三桂平水西后逃到了凉山（参见四川省编辑组编《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1页）。

[115]参见《贵州水西宣慰司应袭安胜祖为报闻追杀逆贼等事》，光绪《水西安氏族谱》。

[116]《贵州水西宣慰司土妇禄氏应袭子安胜祖谨将新旧钱粮备造清册呈报伏乞查考施行须至册者》，光绪《水西安氏祖谱》。

[117]参见《水西宣慰司土妇禄氏子袭（疑“袭”前脱一“应”字——笔者注）安胜祖祈为缕晰陈情恳恩垂念九泉抑郁之冤数载竭蹶之劳题复世土以宏再造事》。“九泉抑郁之冤”指吴三桂捏造水西叛逆而加以征讨，胜祖之父安坤因此而死之事。

[118]《贵州水西宣慰司土妇禄氏应袭子安胜祖谨将新旧钱粮备造清册呈报伏乞查考施行须至册者》，光绪《水西安氏祖谱》。

[119]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06，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癸未条；卷108，二十二年三月己巳条。

[120]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06，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癸未条，卷108，二十二年三月戊午、己巳条，卷113，二十二年十二月戊申条；道光《大定府志》卷49《水西安氏本末下》。

[121]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卷9《水西行》。

[122]黄元治：《抵平远有感》，乾隆《平远州志》卷16《艺文》。

[123]光绪《黔西州续志》卷5《州属土司》。

[124]又如贵州普安州土州同被改流后，“其版图、赋税归并普安州知州管理”（《清圣祖实录》卷210，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丁卯条），可见土司有自己的“版图”，改流是朝廷所不能控制与管理的。

[125]“版图”与“疆”的关系在明以前的文献中已有所反映，南宋王朝恢复对河南的统治后曾把河南视为“新疆”，史载：“癸卯，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故地复归版图，父老苦刘豫烦苛久矣，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蔬果，宿债未偿，欠牍具在，欲望明诏新疆州县，取刘豫重敛之法焚于通衢。’诏如所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8，绍兴九年五月癸卯。

[126]参见吴三桂《请设新疆三府疏》《请设水西三府总兵疏》，民国《大定县志》卷3。清人吴伟业《梅村集》卷15《滇池铙吹》其三亦云：“霭翠奢香祠总荒，芦笙吹彻障云黄。纵擒有策新疆定，叛服何尝旧史亡。”不独水西，明代遵义改流之初亦被称为“新疆”，清代许多原土司所辖之地在改流之初被称为“新疆”的例子就更普遍了，如雍正年间的黔东南、滇东北等地。参见刘起元《奏陈地方政务管见几条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776～781页。

[127]康熙《平远州志》，转引自乾隆《平远州志》卷7《职官》。

[128]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1《疆土志一·沿革表》；卷46《旧事志二》。安氏本有13则溪，但奢安之变结束后水外六目地共两个则溪被割归明廷。

[129]宋起：《威宁风土记》，道光《大定府志》卷54《文征四》。

[130]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3～44《武备略》。

[131]《清圣祖实录》卷37，康熙十年十一月庚午条云：“复设贵州平大黔威守道一员，驻扎大定府。”

[132]杨雍建：《抚黔奏疏》卷1《题为急请补授道员以资弹压事》。

[133]到了雍正年间，官员们已很少称黔西北为新疆，当时的“新疆”是刚平定不久的黔东南一带。

[134]《清圣祖实录》卷108，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丙寅条。

[135]参见《清圣祖实录》卷97，康熙二十年八月戊戌条。

[136]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13，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条；卷130，二十六年六月庚申条。

[137]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1《疆土志一·沿革表》；卷46《旧事志二》。

[138]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3～44《武备略》。

[139]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1《疆土志一·沿革表》。

[140]或许方志中所载的寨数并非实际的寨数，因为存在着方志编修者们调查不周或漏录的可能。此外，一些边远地区的寨可能处于王朝的里甲制之外，寨民没有向政府输赋应役。笔者发现，府亲辖地的寨数明显多于其他地区，或许正是方志编修者调查较详与政府控制较强的原因所致。

[141]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2～14《疆里记》。

[142]参见同治《毕节县志稿》卷2《疆域志·乡里》。

[143]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4《疆里记·毕节疆域里居》。

[144]笔者的调查对象主要有赵廷林，1928年生，汉族，清水镇居民；许明九，1919年生，汉族，生机乡天桥村村民。

[145]万历《明会典》卷20《户口二·黄册》。《明史》卷77《食货志一》的表述有所不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

[146]黄元治：《黔中杂记》，丛书集成续编本。

[147]宁云鹏：《大定舆图说》，道光《大定府志》卷53。

[148]黄元治：《黔中杂记》。

[149]《清圣祖实录》卷26，康熙七年七月己亥条称：“以贵州新设大定、平远、黔西、威宁四府均属苗户，暂免编丁，其地亩照卫田征粮。”贵州少数民族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有其独特之处，咸丰年间知贵阳府的刘书年称：“黔中古荒服地，苗獠所居。自改土归流，若人任赴一邑举租税就纳之，因而占籍焉。后遂著为令。”这样就从制度上造成了户口在此县但田土却远在数十里上百里之外，被其他县（府）所包围，形成了众多插花地的情况，“故邑所辖地，至有越境三四程遥为控制者，遇命盗案辄互诿，经旬累月，不一勘验”。刘书年：《刘贵阳遗稿》卷1《黔乱纪实·总论》。

[150]参见万历《贵州通志》卷10《毕节卫·乌撒卫》。

[151]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葛剑雄译，三联书店，2000，第28～41页；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第221～224、244～274页。

[152]道光《大定府志》卷40《经政志二·食货略》。

[153]参见杨雍建《抚黔奏疏》卷3《题为甫出汤火之民复罹灾害之惨吁恩题请破格优恤稍延残喘事》；卷5《题为造报康熙二十年考成民赋本色秋粮事》。

[154]参见康熙《新补贵州通志》卷10《户口》。

[155]参见康熙《新补贵州通志》卷10《户口》。

[156]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0《食货略·户口丁银》。

[157]道光《大定府志》卷40《食货略·田赋》。

[158]宁云鹏：《大定舆图说》，民国《大定县志》卷20《艺文志》。

[159]《清圣祖实录》卷26，康熙七年七月己亥条。

[160]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0《食货略·田赋》。

[161]《明神宗实录》卷126，万历十年七月壬戌条。

[162]刘庠、傅顺孙：《丈田疏》，万历《贵州通志》卷19《经略志上》。

[163]参见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中有关卫所的部分。

[164]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0《食货略·田赋》。此外，由四川叙永，云南宣威、镇雄拨归大定府的田地又有不同的税则，因数量不多，兹略而不论。

[165]这个数据并不能视为当时黔西北地区的实际耕地亩数，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关于丈田的论述。

[166]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1《食货略中·耗羡》。税契一项《大定府志》寥寥数字带过，恐数目不多。

[167]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1《食货略中》。

[168]《贵州水西宣慰司土妇禄氏应袭子安胜祖谨将新旧钱粮备造清册呈报伏乞查考施行须至册者》。

[169]赵廷臣：《为黔疆虽开时艰堪忧谨将地方真切情形据实敬陈天听仰俟皇恩鉴裁事》（顺治十五年十二月），《明清档案》第33册，第B18715～18718页。

[170]刘荫枢：《奏请敕部多拨饷银折》，《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266～268页。曾经游历过数省的威宁镇总兵石礼哈于雍正二年奏称："贵州情形较之各省迥不相同。据臣所知者，如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处，钱粮俱不下二三百万，火耗羡余亦不下二三十万余，除各员养廉之外，尚有盈余。……贵州通省钱粮带杂项税规不过七八万两，最大州县所征正项不过二千余两，其耗羡可知。小州县所征正项有一二百两至数十两者，其耗羡不待言矣。"参见石礼哈《奏为奏明黔属情形敬抒管见仰祈睿鉴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770～772页。雍正时贵州提督赵坤的奏折中亦写道："黔省山高土瘠，苗多民少，地之所出，不敷所需。凡官吏之俸工、兵马之饷乾，皆仰给于它省之协济，赋税有限，耗羡无几，养廉未均，是诚不可不有以调剂之也。"参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1《朱批赵坤奏折》。贵州财政的匮乏从官员的文集中亦可见一斑，蓝鼎元《鹿州初集》卷6《送劳尊三令昭文序》称："昭文距姑苏未百里，分常熟故邑之半，似无难治，然岁征租赋较贵州一省尚加其倍有奇。"

[171]毛文铨：《奏为谨陈末议仰祈圣鉴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119～120页。

[172]参见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1《贵州全省总论》。

第六章 改流后的土目与布摩

雍、乾以降，黔西北已逐渐被视为清王朝的“旧疆”，“新疆”一词则被用来指称刚平定不久的贵州东南部等地区。[1]这一用语转变所折射出的深刻社会变迁颇耐人寻味，不过，由于古人通常不会对这类词做出精确界定，因此在造成模糊感的同时，也为后人的诠释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大体而言，初入王朝“版图”即成为“新疆”，“旧疆”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礼俗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法律适用。本书第六至八章拟分别从制度变迁、经济整合、身份认同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黔西北“旧疆”的形成过程。笔者的另一意图是，希望以这样的探讨推动对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变迁的认识。

第一节 土目、家奴、佃户及土地关系

一 土目身份的变更

“土目”是一个在文献中频频出现的词语，具有多种含义，有时甚至等同于土司。[2]据李世愉考证，史籍对土目的解释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土人之头目；第二种是隶属于土司的佐治之官；第三种是土司职官体系中的一个等级，无职衔，无品级。[3]下文结合彝、汉文献与田野调查所得，对此问题做一稍微详细的探讨。

彝语中未见有“土目”一词。改流前，黔西北地区的政治权力往往与家族的权力交织在一起，君长通常会分封其亲属作为慕濯、奕续、峨等。如前文所述，慕濯、奕续既是具体的官职，又泛称所有的受封者。“峨”亦是如此，乌撒土目安光祖所译彝书称：

君长曰蔺，称为苴慕，犹可汗、标信之称。大部曰慕濯，次曰祃裔，次曰奕续，通称为峨。苴慕立，分其诸弟为峨，授以土地，分以重器，而以黑、白夷各数族分之。[4]

“峨”即，直译为“官家”。后来意译为“土目”，这显然是受了土司制度的影响。光绪《黔西州续志》称：“峨，译言贵胄，今为小土目。”[5]黔西北的老人告诉我，1949年前依然是土目与官家并用，根据辈分，对土目及其亲属的称呼有一定变化，如“官爷”“官奶”“官叔”“官小姐”等。土目的孩子尽管只有两三岁，也必须对他表示尊重，称其为“官少爷”。

笔者在乡村做调查时，常常听人谈起水西有四十八土目，此可与文献相印证。《明史》称："初，安氏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6]王阳明亦云："安氏之职，四十八支，更迭而为。"[7]

四十八是一个概数还是确数？水西真有48目吗？万历年间贵州巡按杨鹤曾清查"四十八枝头目管辖地方土地以及人民贡赋钱粮之入"，[8]据此四十八应该是一个确数。《广舆记》与《黔南识略》甚至详细列举出了四十八目的名称。[9]彝书似乎没有"四十八目"这样的说法，但《西南彝志》记载了水西土目分封的过程，从妥阿哲幼子阿哲琪任土目开始，到鲁铺布局君长封布局珐舍为土目止，刚好产生了四十八目。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一代君长都会赐封土目。[10]

乌撒分为四大部、24小部，共有土目32位。[11]

以上讨论表明，土目（峨）系君长所封，获此身份相当不易。改土归流后，君长不复存在，而清廷在制度上、法律上并没有承认黔西北的土目。乾隆初年贵州布政使陈惪荣称：

伏查威宁系前明盐仓土府旧治，其土目乃土府之枝派，归化已久，并无印信号纸，只不过如民间之大户耳，但各有分管地方。[12]

没有任何官方凭证，犹如民间之大户，可见在制度上并无土目之设。《威宁县志》亦称："我邑向有土目数十家……均无所谓袭荫公文。"[13]土目显然并非朝廷或官府所封，他们的来源是对习惯的延续，系"自封"，乾隆前期的贵州巡抚爱必达对此有清楚的论述：

今之自谓土目者，皆安氏裔也。……均系报亩入册，与齐民等，无所谓土司，亦无所谓土目也。其支庶错居府属者，沿其夷俗，凡其祖报垦之田土，悉归长子承受，名曰"土目"；其或以私积别置田产者，亦概谓之土目。

土目多安姓，大约田多而佃户众者，即称土目，非官设也。[14]

虽然官方不承认土目，但它作为一个曾经代表着权力与财富的名称，依然深入人心，有田土的权势者大都愿意自己戴上这一顶耀眼的光环。勾政权已经瓦解，从前严格的、规范化的土目产生程序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许多并非土司后裔的权势者同样自称或被他人称作土目，爱必达的描述对此已有所暗示。在田野调查中，赫章县雉街彝族、苗族自治乡发达村的陈朝龙、陈朝华先生[15]说，许多土目并非官府所封，而是自己"呼"的，他们家族中有一个哥子，家大财大，同村或其他村的人都说："哎呀，你也像土目一样了。"结果人人喊他陈土目，他也就同土目差不多了。两位老人讲的虽是民国年间的事情，但或许也能反映出清代的情况。

权势者对土目这一名称的追求以及获得这一称号的随意性，导致了土目数量的扩张。据府志，府亲辖地、水城厅、平远州、黔西州的土目

数分别为48家、30家、11家、3家，共计92家，而明代这些地区仅有42位土目。[16]威宁州（原乌撒地区）共计57位土目，远远超过了明代的32位。[17]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黔西县仅沙窝区便有土目8家，比道光时期全州的土目数还要多。[18]

二 基层社会中的土目

清王朝虽然废除了土司制度，却无法立刻改变黔西北地区“夷多汉少”的局面。平定之初，除了城中数以千计的驻兵之外，广袤的山箐中居住着人口众多的原住民，只有城市附近寥寥落落地分布着几十家流民。[19]后来移民不断涌入，极大改变了黔西北的人口结构，但原住民的数量依然相当可观。道光时期方志编修者的调查显示，大定府亲辖地虽然出现了众多的汉民大寨，但各种黑夷大寨、夷民大寨、革老大寨、仲民大寨、苗民大寨、羡民大寨、蔡民大寨、裸罗大寨、六额（子）大寨、侬民大寨、僰夷大寨仍然星罗棋布，其数量甚至超过了汉民大寨。此外尚有少量的汉夷大寨、汉苗大寨、僰民黑夷大寨、羡民僰民大寨、汉夷苗寨、夷侬汉苗寨等，[20]各族类大聚居、小杂居，情况极为复杂。

《大定府志》虽然只记载了府亲辖地的族类分布状况，但其他州县的情形大概亦与之相似（原卫所地区除外），而威宁州（原乌撒府）的汉文化相对落后，1949年后是黔西北地区唯一的民族自治县，由此推测，清代威宁州的原住民在人口中似应占有更高的比例。

复杂的族类构成无疑使官员们头疼，在他们眼中，原住民所居之地“如鸟兽之巢穴，不能以近人”。历史与文化的隔膜，使得清王朝对黔西北的施政较内地犹难。朝廷未能迅速培植起一个忠于自己的基层力量（如绅士阶层）协助官府治理原住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借助既有的势力集团——土目。这样，虽然土目在制度与法律上不被承认，但官府在事实上默许了他们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曾亲履黔西北的赵翼云：

贵州之水西倮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孙为头目如故。凡有征徭，必使头目签派，辄顷刻集事。流官号令，不如头目之传呼也。倮人见头目，答语必跪，进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头目或有事，但杀一鸡，沥血于酒，使各饮之，则生死惟命。余在贵西，尝讯安氏头目争田事。左证皆其所属倮人，群奉头目所约，虽加以三木，无改语。至刑讯头目已吐实，诸倮犹目相视不敢言，转令头目谕之，乃定谳。[21]

黔抚爱必达同样注意到：

（水城厅）土司久革，其子孙私称为土目者，喜争讼。凡官勾摄，必先檄土目会役传提，否则逃不赴案也。

（威宁州）夷民俱听土目约束，地方有命盗案及征粮等事，皆责成

土目协差分办如乡约。[22]

由此可见，黔西北原有的勾政权体制并未完全在原住民的心中消亡，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土目就是管自己的官（峨），清王朝的流官反而缺乏权威，各种征徭与命盗案件，只有委托土目，才能够顺利处理。直到1949年前，许多地方的土目依然代收税粮，甲长、保长收齐后交给土目，再由土目上交县里，甚至许多汉族、苗族上税时都要先交给土目，这样就给土目提供了一个吃虚额的机会，[23]赫章县古达乡的王定芳老先生称，古达官家就是他们的政府，连打官司都要找他。但雉街乡发达村的陆开良等人则称，据老人讲，他们种的是自己的地，清朝时就直接到威宁上粮，不用缴给土目。[24]

“家大钱大”是今天的黔西北老人对当年土目的总体评价，这是土目雄踞一方的物质基础。土目的财富首先表现在土地上，例如黔西黑彝土目安辉武家的土地遍布黔西、大方、金沙、毕节、织金五县，主要租给别人耕种，清末时每年收租四千多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能收1700多石。而威宁牛棚子土目的土地则横跨滇、黔二省，以牛棚子为中心，东至70华里的里子沟，西达70多华里的江底老桥，南抵30多华里的雨朵，北至70华里的石门坎。[25]

土目的土地来源多样，或继承，或购买，或“寄名”。在一些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的地方，一些百姓上粮困难，并且素未同流官政权打过交道，隔膜很深，于是在“报亩入册”时将自己的土地登记在土目名下，请其代为上粮，给予一定钱粮以示酬劳，此即“寄名”。这样，在土目一家的户名下，可能包括若干户人家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寄名”地无形中成为土目的土地，原来的地主则沦为佃户。在水城，土目的田地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土目原有或购买的土地称为“庄上地”，通过“寄名”方式获得者称“册上地”。[26]



图6-1 毕节大屯土司庄园

说明：该庄园始建于清道光年间，为余姓土目所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资料来源：http://travel.gzinfo.net/pictures/2002-09-04/p564.htm。

为了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土目任命了许多助手，例如水城县的一些土目手下设有总管、管事、队长、头人、老寨等。总管负责统筹安排土目家内外一应事务，深得土目信任，对许多事务都有决策权，所有家下人等，包括管事、队长、头人、老寨以及佃民奴仆，都得听从其指挥。在总管之下，大的土目家一般还设有内外管事。内管事管钱粮收支账目及全家生活安排以及婚丧节庆的典礼等事务；外管事则专处理—切外务，上对官府及外界的应酬，下对头人、老寨及佃民的催租和派工派款等。

在各个所属庄子和领地，根据具体情况分设“头人”或“老寨”，分管庄内土地及催缴租佃等事宜。一般在彝族和汉族杂居村寨设“头人”，其他民族寨子设“老寨”。对“头人”和“老寨”，土目都给予—定待遇。有的划给头人、老寨田地，让其自种自收自吃；有的则是由所属佃民按上交租谷数另加10%作为头人、老寨粮；有的土目将田土统一安排给头人、老寨，向他们收取租谷，佃民则向头人、老寨交租，这种头人、老寨在土改时往往被划为“二地主”。[27]

其他地区的情况和水城差不多。如黔西县沙窝水淹坝土目手下同样设有“内、外把事”“掌柜”“头人”“寨老”。[28]赫章县雉街乡发达村的陈朝华老先生称他们陈家曾长期担任土目的头人，听老人讲已有十多代了，并没有直接捞到经济上的好处，但因为替土目做事，在地方上的威望比较高。甲长、保长遇到难题时，往往会说：“哎，那个是官家头人，我们保长处理不了，我们把头人请来。”

土目往往养有私人武装，民国时期聘请专门的军事教官进行训练，设有正、副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及小队长等职。此外，监狱、法庭也是土目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工具，由断长、大队长、管事等负责审理案件，刑具有铁链、脚镣、手铐等。[29]

1949年以前，黔西北地区的土目以及富有的彝人都普遍养有许多供自己役使之人，女性称为“柏（ ）”，男性称为“者（ ）”，在讲西南官话时，称为“丫头”“娃子”，汉语书面语一般统称“家奴”。乾隆八年（1743），威宁镇总兵曾长治奏称：

土目之家各蓄有家奴，以供使唤。多者百余户，少者亦有数十户不等。[30]



图**6-2** 威宁陆土目衙门

资料来源：《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页首插图。

家奴的族类成分包括彝、苗、汉等，其来源主要有：强迫佃户、帮工为奴；购买贫穷人家无力养活的子女为奴；收养亲人亡故的孤儿寡女为奴；将欠土目之债无力偿还者沦为奴；此外，丫头、娃子所生子女世为“柏者”。[31]乾隆年间的贵西道赵翼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至家中婢女，率皆无夫，听其与人苟合，生子则又为奴仆，是以苗、倮家奴仆皆无父也。余尝在毕节籍一马户，家有老婢名大娃者，问其夫，则曰：“未嫁。”及点奴子，有二童，皆其子也，可为一笑。然其俗大概如此，不为异也。[32]

黔西北民间并无“婢女”之说，文中“婢女”当即女家奴——丫头，赵翼所见似乎并不全面，许多主人都愿意为自己的丫头或娃子婚配，早在明代已经如此，包汝楫称：

罗鬼人掳中国男女，仍以中国男女配耦，并不给配本地人，云恐乱其种。[33]

此外，在前引曾长治的奏折中，家奴的单位是户，可见他们大都有

家室。曾长治还提到，土目安巡如的家奴者厦、白革等胁迫家奴19家一起叛主，其中白革已娶妻，并生有两个女儿，其他家奴亦有妻小。[34]

为“柏者”婚配其实是主人增加财富的手段之一。无需聘礼嫁妆，主人一句命令，将丫头配给娃子，这是最常见的婚娶方式。又因为家奴没有亲权和婚权，所生子女全归主人所有，主人既可让其为自己劳作，亦可将其卖出。甚至有将奴户一家拆散，分卖给不同人家的情况。[35]

家奴住在主人家中，常年为主人服务。有的娃子成婚后，得到主人允准，另立门户，成为“家外娃子”，彝语称为“陆外”。有的“陆外”非常能干，能换给主人一定身价或被主人重用，成为“半身奴”。这种人可自由经营自己的土地，有的甚至发展到有自己的佃民和奴仆，但在土目面前他依然还是奴仆身份。有时“半身奴”拥有的家奴成家后，又养有家奴，这样层层蓄养，在水城等地产生了“七道娃子”的说法。

土目拥有的宽阔土地可分为自营地与出租地两个部分，前者主要由家奴、“陆外”耕种。出租地一般占土目田土的绝大部分，承租人有“陆外”和自由民等，交租的情况非常复杂，货币、实物、劳役、人租四种地租并存，因地、因时、因人而产生种种变化。租地时一般都要交押金，称为“顶银”，多少视土地质量与广狭而论。但“册上地”原非土目之地，这种地免交“顶银”（即押金），租子也比较轻。

家奴成为“陆外”时往往能够得到一小块地，不交押金，不纳租子，但每代都必须交纳“人租”，即由主人从自己的子女中挑选一人作奴，主人可任意处置被选中者，父母不能过问。除此之外，“陆外”还有为主人服劳役的义务，服役时主人供给饮食，但无薪酬。“陆外”如无子女，“人租”自然免除。但如生育较多，再向主人租地以维持生存时，必须交纳押金和租子。且下代儿子分居后，兄弟几人每户每代尚须交纳人租一个。

实物地租的形式很多，有定额租、活租、羊租、鸡租、马租等，定额租即不论收成好坏，每年交纳额定的粮食，活租即分成。除了粮食之外，在有的地区，土目还要求佃户交羊、猪等，即羊租、猪租。在威宁龙街等地，家外娃子建房时占用主人家的地基，不交押金和粮食，但每年必须交一只会叫的公鸡或会生蛋的母鸡，称为鸡租。据说苗族人善于饲养牲畜，土目要求他们以马代租，即马租。在威宁牛棚子，交劳役地租的田土称为伕地，主要是苗族耕种，押金少，租子轻，但须承担砍柴、抬滑竿、种地、背粪、割草等劳役。

除土目、娃子、佃户外，地方社会上还有一些自耕农以及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如前面提到的赫章县雉街乡发达村的陆开良一家耕种自己的土地，直接到威宁上粮，不用交给土目。地主也常常蓄养家奴，并将土地租给佃户，但地租形式相对简单，没有人租、羊猪、马租等名目，多为伙种，种子由地主负责，佃户则承担犁地、耙地、施肥、薅锄等一切劳作，收获后五五分成。此外，有些佃户还要为地主提供无偿劳役。

许多地主其实是二地主，他们从土目那里租入土地，然后再用押金更高、租额更大的方式转租他人，从中渔利。直接从土目家租入土地者称“正佃”，转租者称“花佃”，前者在土目家有名，后者则无名。

还有一种类似转租的土地关系称为“出当”，二者的区别在于，当地的押金额很高，但租子非常轻。当主抽当时，须将押金退还承当户。出当土地的情形通常是，佃户从土目家租入的土地较多，自己种不了就当出一部分，有时租入的田土虽不多，但因手头紧张，也将租入的土地当出一部或大部。当然，有时土目、地主急需用钱时，也会将土地当出。[36]

三 土地关系的渊源

以上叙述主要根据1949年后的调查，但清代的情况亦与之相似。主、佃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有时会以彝文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曾搜集到六份乾、嘉时期的彝文田契，它们所反映的租佃关系完全可与1949年后的调查相印证，余宏模对此已有所阐释，兹不赘述。[37]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文献中有关于黔西北土目与家奴、佃户相争斗的记载，这些记载使笔者更加确信民国时期的状况与清代有很大的一致性与延续性。

参照明代彝、汉文史料，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权观念以及各种土地关系在改土归流之前至少已初具雏形。黔西北彝语中租作，赋作。在《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彝籍中常常讲述远祖交（收）租、交（收）赋的事情。[38]彝书《水西制度》第十三章中已有“猪租”“鸡租”等名目，不过交、收这些租的并非佃户，而是土目、土司，并且我们不能确定这些租是否与土地有关。[39]在织金县木汪乡保山村有一方彝、汉文岩刻，錾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彝文部分记载了一次买卖田土的过程：

经官允许记载于此。

我从阿育觉家购置的田地，时于丁未年冬月。撰写这幅彝文岩碑，时为庚申年四月初六，从卯时到未时写完，刻写在岩碑上的文字不会脱落，识字人一看就懂其意思了。

为的（了）使阿叉阿育的子孙们知道这片田地的情况，我把买地和当地中的等等过程刻在岩碑上，也让众人明鉴我是如何用牲畜折合银两□买成的。

早在丁未年冬月初五那天，格纳我说明要把当给丫口上阿育觉家满六年期限的土地赎回来。阿育觉说：“你要赎回土地呢，要把当价归还我。不然，我三哥今年要租种。”

为此，我拿了紫马一匹议价折银五两；银鹤母马一匹议价折银三两；青毛驴一头议价折银一两；黄骟牛一头，红骟牛一头，壮牛犊一头，共议折银七两；山骟羊四只，绵羊一对，共六只议价折银一两；母山羊一只，山骟羊一对，绵羊骟羊一对，共五只议价折银一两；肥猪一对，母猪一头共议价折银一两。以上牲畜折价赎回我七升种田地。另外又给阿育觉银一两，山羊、绵羊五只。

但是，阿育觉又提出阿索地方的那片土地要归他长期掌管，用以向阿督慕魁交赋；向阿育叉交军粮；我也同意了。到庚戌年，阿育觉已分了一季庄稼。

看来，没有文字依据，恐怕今后输理。阿取等三人传话，说我无权管祭祀田了。无奈，我又给银一两；山羊、绵羊一对，加上一只鸡。然后，由我承买土地。于己未年冬月初五日，我用黑公马一匹折合一两银，经阿罕把马牵交卖主。付阿取书写买契费六钱银。给三位凭中人山羊、绵羊一对。卖契写好后画了押。该我子孙万代，永远管业。

另外一点，阿礤原不是播勒辖区的人。此地是阿啥婚前一人到这里所置。他是我们家的人，阿礤是外面来的。阿礤说他本人婚前也是一人到这里来的，不能嫌弃当外人。而且，是经阿取介绍，阿罕允许入赘的。

阿礤无钱难理事，是他转当买给我的。我以枣骝马一匹议价折银六两；青骡马一匹议价折银四两；紫马一匹议价四两；花母牛一头折银一两；红牸牛一头、灰牯牛一头、半紫色牛一头，共议价折银三两；绵羊六只折银一两三钱；山羊七只□□；红骟牛一头折银一两；合计折抵田价银二十二两。经阿罕点交前后共计牲畜五十四条。

另给阿礤三只羊、三对鸡和一两银。阿礤我俩和阿罕一起办理播勒辖区土地的事，我又用了一头红骟牛。卖契是阿礤经阿罕于当天交给我的。然后，除五十四条牲畜而外，我又加了山羊、绵羊三只，分别给了阿礤和阿盲（育）觉二人及阿罕。

可是，阿叉提出阿礤不是业主。他说：“阿啥是我的外甥，如果阿礤不与我外甥媳上门成亲则罢，阿啥是我帮他成家立业的。现在你阿礤要卖地，格纳要买地，你们买卖田地的价钱应该归我；当初，这片地是我拿一头红牛和一只黑骟羊给外甥添补买的。”

我只好又拿与阿盲（育）当年收获量相等的一份粮食给了阿叉。阿礤的田地我才最后买成。特将前后经过刻在岩上永作依据。

卖地人：阿礤

买地人：格纳

丁未年冬月初五日[40]

格纳显然是想借助岩石不易毁损的特点，借助文字来公开声明其土地所有权，他还强调自己是“经官允许记载于此”，表明交易是经过官府（土司或土目）认可的，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文中多次提及书写买契、卖契，似乎说明用文字契约确定土地的买卖等关系已是当时通行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格纳与阿育觉之间发生的是土地出当与抽当的关系，尽管六年的期限已满，但如果格纳不给还当价，阿育觉依然可以耕种——但仍然要给租粮，估计租额会比较低，这与民国时期的当地并无区别。

第二节 主奴之争与主佃之争

在许多地区，土目-官家在家奴以及佃户心中代表着一种不能冒犯的权威。据李建成老先生的回忆，官家如生小孩，佃民奴仆无论老幼都要来“认主”，拜上三拜，尊称为“官哥哥”或“官姐姐”。佃民及属下进入土目官房或见到官家，都得蹲着，绝不能站着同官家讲话。开口时须先说：“小的跟官家回……”然后方谈正题。佃民在官家面前如想抽烟，须先禀明：“回官爷爷话，小的嘴酸，想抽杆烟秋秋马屁股。”要得到允许后方能抽，否则即属“不敬”，要遭到惩罚。[41]

笔者的调查同李老先生的回忆相似，文献上对此亦有反映，道光时期曾亲履水西的宋翔凤诗云：

蛮山路百折，倮罗生其间。群苗此种贵，约束如汉官。各私一土地，奴使诸苗蛮。有女不敢嫁，有粟不敢餐。皆以奉头目，毋许少畏难。争讼均金输，曲直两不宽。咂酒盛牛角，拜跪拖银环。借问此风俗，积久非一端。云皆霭翠裔，至今多姓安。[42]

明代亲履黔省的官员、文人已经注意到土民对土目、土司的服从，并将其归结为安氏能够长期统治黔西北的原因。嘉靖进士田汝成云：

安氏有贵州，千余年矣。岂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诸蛮哉！何其祚之绵永也？罗鬼憨而恋主，与诸夷异，即暴虐不怨，其他强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虽授官给印，直名羁之，不能令也。[43]

这是一个经典的解释，被明清时期的士大夫广泛引用，直到乾隆初年鄂尔泰等人编修《贵州通志》时仍然持同样的观点。[44]这种见解在明代可能有其合理性，但清代黔西北的整个社会制度已发生了巨大变迁，原住民“憨而恋主”“暴虐不怨”的鲜明形象亦随之淡化，士大夫带有感性化的描述只揭示出他们顺从的一面。其实，许多家奴、佃户已懂得怎样利用现行的制度争取自身利益，他们与土目之间的冲突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一 主奴之争[45]

乾隆四年（1739），在大定府威宁州，经过策划，数百名家奴突然一起离开主家，逃匿山箐之中，歃血结盟，“踞产背主”，希冀“出户”，获得自由之身。愤怒不已的土目纷纷赴官控告，呈请提究叛奴。官员们清楚地认识到，破天荒的叛逃行动标志着土目权威的衰落，这正是朝廷及地方官历年打压、干涉的结果，贵州总督兼巡抚张广泗对此有精辟的分析：

臣查黔省地方，苗倮环居下游一带，尽属苗蛮，散处山谷之中，并无酋长统率。上游则倮夷最为繁盛，……其中头目夷民各畜有家奴，以供驱使。而头目中畜家奴多者每至百余户，少者亦有数十户不等。夷俗于主仆之分甚严，而各土目之役使家奴，酷虐异常，迥非情理，或勒派家奴子女为陪嫁，或强夺家奴之妇为侍妾，稍不遂意，轻则拆卖全家，重则立毙情命，任意欺凌，生杀自主。而各夷奴亦遂甘心忍受，在伊等又岂知上下之等？威冠履，立名分，盖积威所致，不敢稍有抗违。自昭通、镇雄等处改土设流以来，屡用兵威，官法严肃，各夷目等始知凛畏法纪，不敢生杀自由，肆行凌虐。而各夷奴中之凶狡者及又唆使各户家奴，结党背主。[46]

彝人实行等级婚制，主奴之间联姻或媾合为道德、伦理所不容，甚至会遭族人惩处，[47]“强夺家奴之妇为侍妾”或系想当然之语。但张广泗有关土目凌虐、拆卖奴户以及改土归流对土目势力的打击等分析却是有相当的根据——几乎所有当事官员都持此看法。

官员们当然不能对主奴之争放任自流，破坏地方秩序。张广泗接到呈控后，立即指示贵东道王玠、大定府知府牛天申、护威宁镇印务大定协副将马似龙赴威宁州调解，最后主奴双方达成协议，土目从此不准非礼、凌虐家奴，而家奴等不得复行背主，甘结在案。用书面形式保证家奴的权益，反映了地方官员削弱土目力量的目的以及人道方面的考虑。[48]

经过调解，啸聚山箐的数百名家奴很快解散，由主人领回服役，但大化里土目安巡如的家奴者厦、白革等却阳奉阴违，“占据伊主庄田，抗不遵断”，由此引出了一场不算太大的风波。

安巡如名疆，字巡如。其先祖原系乌撒君长所属的扯处乌土目，其后裔包括1949年前威宁北部山区的大官寨土目、补块土目等。自康熙十年（1671）正月俄凹、阿蜡等归顺以来，扯处乌土目积极顺应新的形势，效忠清朝，为朝廷东征西伐。自雍正四年（1726）起，鄂尔泰开始在滇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安巡如“自备鞍马，纠集属夷，为王师前驱”，被改土归流战争的重要将领哈元生赐给“叛产”540亩，昭通镇总兵徐成贞亦授予其“为善最乐”的匾额，而署贵州巡抚陈悳荣（乾隆五年，陈悳荣以布政使署理巡抚）更是对其赞赏有加。像安巡如一样不但没有受到改流运动的重创，其势力在某些方面反而有所扩张的情形并不

多见，正如其墓碑碑文所称：

然以余所睹，记改土以来，他氏子孙半多衰歇，独公□□，今方兴未艾，岂非凭借者厚欤！[49]

有意思的是，对这样一位恭顺土目与家奴的斗争，官员们的态度却颇为暧昧：

然而夷目、家奴自相携二，只宜从缓化导，不便遽加咸惩。[50]

看来，只要家奴的"抗不遵断"维持在适当的限度内，官员们是可以稍加纵容的。在控诉"叛奴"时，由于安巡如"词涉不检"，震怒不已的贵州总督张广泗甚至打算将其法办，幸得陈惪荣的劝解才使其躲过一劫。[51]但事态的发展要求官员们采取进一步的干预，者厦、白革等纠集了几十户家奴，占据了安巡如的白素寨，情形开始变得严重，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因为威宁毗邻原来的芒部（即清代的镇雄州）、乌蒙（即清代的昭通府）君长国，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威宁土目的许多家奴就是来自这两个地方。官员们相信，者厦等区区20余户家奴，"敢于负固不服"，除了高山密箐、险阻可恃外，自以为昭通、镇雄的"夷猓巢穴可为退步"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判断并无差错，者厦等人确实有联络昭通、镇雄的企图。尤令官员们忧虑的是，者厦、白革的叛主行动可能会引起滇、黔二省家奴的连锁反应，导致地方"缉事无已"。于是张广泗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命令该管地方文武官员实行更深程度的干预，酌量派兵解散啸聚家奴。他特别指示，改流前地方缉捕事务原系土目自理，但现在绝不容许他们插手：

现今法纪严明，断不便复令各夷目逞其故智。

由于事关滇、黔两省，所以云南方面亦积极协助办理此事，冲突很快平息，啸聚家奴纷纷投首，态度强硬的者厦则在昭通落网。[52]

威宁州叛奴事件并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它却蕴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主、奴之争是在彝制崩溃、流官政权建立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折射出改土归流后土目权势的衰落。官员们无疑想借此机会进一步规定、限制、削弱土目的权力，例如书面保障家奴的权益、纵容他们适当程度的背主、禁止土目参与缉捕事务等，但官员们亦非常清楚，在一块新近纳入"版图"的地方，完全抛弃土目将难以维持社会秩序，上文对此已有所阐释，此处再引证一段曾参与处理叛奴事件的威宁镇总兵曾长治的奏折：

窃臣驻扎之威宁州，自改土归流，即编立八里，纳粮隶于地方官管辖。缘夷倮数目难稽，向有土目约束，一切钱粮讼狱，俱责成土目提唤。[53]

这样，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事态扩大时，张广泗等人立即应土目之请求，出兵搜捕、解散结党之家奴。既要打击土目，但又不能使其完

全丧失权威，官员力图在其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这种苦心在他们关于善后事宜的奏折中表露无遗。贵州按察使宋厚奏称：

臣查黔省威宁与滇省昭通、镇雄接壤，该处猓夷最称繁盛，半为夷目家奴。但其中实系夷目之世仆者固多，或因佃其田土，附其管辖，久而遂成家奴者亦有……因其结党背主，即断令为良，不特凡有家奴之头目、夷民心不甘服，抑且凶狡夷奴得遂其意，势必闻风效尤，滋事无已。如仍概令为奴，其中不无亦有屈抑。臣愚以为家奴既有不同，办理亦当各异。如果系实在该夷目等佃户，或因向附管辖，遂致为奴者，即应开放为良，以免其子孙之累，且可渐分土目之势，免致日后尾大之虑；其实在该夷目之家奴，确有证据，我固不可遽令出户，以长刁风。惟是各奴已有离心，家主更增嫌隙，若仍断令东主领回，必致别生事端，决无相安之势。应将该夷奴照律惩治外，仍按其人口之多寡，当官定价卖给别夷目为奴，所得身价交与东主收领。为此，在夷奴肆其凶狡，徒犯法纲，终不免于为奴，咸知背主之无益；在夷目刻待家奴，激成背主，使不得复有家奴，亦知残虐之有损，使彼此各有顾虑。[54]

释放一部分家奴，让其“出户”，以收“渐分土目之势”的效果，同时又要惩治一些凶狡之奴，并转卖给其他土目，以表明“背主之无益”。宋厚的平衡策略深得乾隆皇帝赏识，朱批云：“所见是，知道了。”

同年十一月，云南按察使张坦熊进一步提出，应敕令云、贵、川、广的督抚各官禁止土目强迫佃户、帮工为奴，不得拆卖奴户家庭，违者依律惩治。[55]

二 主佃之争

1.安国瑞控案[56]

在各级流官的积极干预下，大化里土目安巡如与家奴者厦、白革等人的争斗终于在乾隆八年（1743）告一段落。60多年后，安巡如之孙安秉健又卷入与佃户的长期冲突中，特别是与佃户安国瑞的诉讼竟然惊动宸阁。

据说安国瑞的祖父阿固亦属土目，最初居住在威宁州致化里，康熙年间迁居四川乌蒙土府。阿固与安巡如的命运大不相同，雍正四年（1726），云南巡抚兼管总督事务的鄂尔泰进兵乌蒙、镇雄，改土归流。[57]阿固在这场战争中被杀身亡，其妻携幼子阿木云逃回威宁州大化里，佃耕土目安巡如在发嫩扣坡的田土，每年交莜麦若干。阿木云长成后，继续以佃为生，并为两个儿子取了汉姓，大儿子名安国瑞，小儿子名安国荣。嘉庆五年（1800），阿木云身故，安国瑞又向安巡如之孙安秉健请求开垦别鲁块地方，照例交租。安秉健素来怀疑安国瑞的人品，虽然答应增佃田土，但要求订立一份总契约，将旧佃、新佃土地全

部写明，每年交莜租一石。安国瑞表示同意。

安秉健显然是想用书面形式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保证自己的土地不被侵占，租粮能够按时征收。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改土归流后黔西北社会经济的变化之一。租佃关系至迟在明代已经出现于水西安氏所辖地区，[58]在勾政权体制下，惮于土目的权势，佃户绝不敢霸占田土，抵赖租粮——土目根本不需要契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彝制崩溃后，文契的必要性逐渐被认识到。在水西地区，土目与佃户间的租佃契约可能出现得比较早，也较为普遍，并且娄素没有抛弃自己的文字传统，结果产生了许多彝文契约。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曾搜集到六份并译成汉文，兹抄录一份如下：

官家下的契约是真的，写这个约给老五。老五用十七两银给官家，卜那（即白泥塘）的田一段，老五得了这段田，是一辈子的好处。如果不犯事，子孙万代永远耕下去，永不扯土另安。如有犯事、差租，官家的田由官家扯。六大升租谷，另外的租子四大斗。

木纳木土　　五钱

助其不土　　五钱

纳尾尼尾尼　　五钱

助其母首　　五钱

木开马推　　五钱

写字人　锁甲　三钱

乾隆三十年　乙酉　腊月十四写[59]

这份契约所反映的权利与义务相对简单，有的文契则直接规定佃户必须上“人租”或“随唤随到”，服无偿劳役。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承佃人没有欠租或犯事，可以子孙世代永远耕种，官家（即土目）无权“扯土”另佃，几份彝文契约对此都特别提及。在这种习惯之下，清代黔西北的租佃关系应该比较稳定，安国瑞家祖孙三代，租种安巡如的土地长达60多年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安秉健怀疑安国瑞的人品，但仍然没有另招佃户，只是要求将自己的财产与权利合法化、书面化。

安秉健对佃约的要求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订立租佃契约在乌撒地区可能出现得比较晚，安秉健曾深受其害，乾隆五十七年（1792），佃户苏友松、阿鲁约、杨受保曾联名告官，称他们被安秉健“强压为佃”，以图赖租。

但安秉健的“创新”举动引起了安国瑞的猜疑，在他看来，“猓夷”地区的惯例，佃种土目田土从来不需要写立佃约，安秉健此举或许包藏祸

心。他进一步联想到，自己的祖父阿固同样是土目子孙，肯定承袭了祖遗的大笔产业，雍正年间乌蒙、镇雄改土归流时，安秉健之祖安巡如可能借帮助官兵征剿的机会，霸占了阿固的家业。而安秉健显然是想利用佃约将祖父不光彩的行为合法化，以杜日后的争端。[60]

不过安国瑞自己也清楚，这些想象与推理欠缺确凿的证据，所以他并不真正准备打一场官司。后来因为贫困，他将所佃土地陆续“出当”给汪老满、陈老三、傅小二等人，获“地价银”180两。一场惊动圣听的诉讼由此引发。

结合上文所讨论的“当地”，可知这里的“地价银”当指押金，并不意味着土地已被卖出。但这显然激怒了安秉健，嘉庆十四年（1809）十二月，当他风闻自己的土地被当后，立即派儿子安觐光前往查问。安国瑞拒不承认，并斥责东家不应诬赖。安觐光一面回骂，一面声称待查访确实，将赴官具控，扯土另佃。看来，尽管对承佃人的行为极端不满，但地主并不能轻易解除租佃关系，除非能找到恰当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安国瑞不但出当田土，而且将部分土地转租他人，安秉健对此似乎并未加以反对。容忍转租而禁止出当，或许是因为当地的押金太高，一般出当者难以偿还，容易导致地权纠纷的缘故。安秉健后来找到了安国瑞的转招佃户阿戈，终于获悉承当人姓名及当银数目。安国瑞听说后，认为官司已不可避免，决定先发制人，他选择了一个超逾规矩的方式——京控。

安国瑞并没有足够的盘费，他从威宁起程后，沿途算命，风餐露宿，抵京时已是嘉庆十五年九月。他自己写了状子，拦住某位军机大臣的仪驾，控告安秉健几大罪状：

第一，齐家沟坡、发舍块、载茹、发嫩扣、别鲁块、别苏、猴子岩、狮子硐、法盖、以云等十处田地本系自家祖业，被安秉健之祖安巡如霸占并骗去执照，自己的祖母、父亲则被强押为佃户；

第二，安秉健招引匪徒、霸占民业，杀人放火，引起安士照等人的控告；

第三，私自科敛、摊派，强迫苏友松、阿鲁约、杨受保为佃户；

第四，私派廖文富为乡约，作恶害民，滋扰村庄，而安觐光每年巡边一次，强令各佃户宰牛杀马款待，如有违抗，即将该佃户佃耕之地另佃他人；

第五，招养讼师，控占他人田地，勾通书役，掩饰朦胧，出入州道衙门；

第六，安秉健之子安觐光拷打白磨鲁固致死。

这位军机大臣接过状纸后，立即上奏嘉庆皇帝，把安国瑞交刑部讯供，之后又奉谕旨，将其递解回黔审办。黔抚鄂云布当即委候补贵阳知府孟正笏、大定知府安嘉相亲赴威宁州，同该州州牧郑五典一起调查、审理安国瑞状词中所提及的案情。

嘉庆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护理贵州巡抚印务布政使齐布森遵旨向嘉庆皇帝汇报审理情况：

第一，齐家沟坡、发舍块、载茹坐落在云南镇雄州，原系逆犯法漏在约的产业，被收归官府变价发售，雍正十年，安秉健之祖安巡如当官承买，执有镇雄州给予管业的印照，每年纳税粮五石八斗一升，在镇雄州完纳。发嫩扣、别鲁块、别苏、猴子岩、狮子硐、法盖、以云等七处田地系安秉健祖业，额粮21石，在威宁州实征册内有安巡如的户名，并有每年在威宁州、镇雄州的完粮串票。发嫩扣、别鲁块系安国瑞佃种，有双方订立的佃约可凭。

第二，所谓招引匪徒、霸占民业、杀人放火之罪名，原系安士照与安秉健争产，“告官被责”，遂起意陷害，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赴官诬告，经审明后安士照已被判处充军。至于强押苏友松等为佃以及科敛等情，系黄美伟从中唆讼，各教唆、诬告之人已于乾隆五十八年依律惩处。

第三，廖文富并非乡约，而是安秉健任命的头人，每年负责向各佃户家催收租粮，如果安觐光每年强迫佃户供应，廖文富作恶乡里，滋扰乡村的话，为何并无别人控告，安国瑞必系诬赖无疑。

第四，招养讼师勾通书役一节，经讯据，安秉健供称延请云南岁贡柯春在家教读，并非讼师。而柯春亦称只在安秉健家教读，并无干预州事。安国瑞对此无可指证。

第五，白磨鲁固向在铅厂佣工，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因患病回家，医治无效，于十三日病故。

第六，以上事实安国瑞无从狡辩，理屈词穷，对私当地土、将银花用、畏惧控追、捏词诬告等情供认不讳。

最后，齐布森建议，安国瑞系边省夷人，冲突仪仗，妄行奏诉，所控全虚，应从重处罚，杖一百，发遣黑龙江给军人为奴。其所私当之田土，令安国瑞家属给还承当人银两后收回。至于发嫩扣地土，系安国瑞之祖母向安秉健之祖佃种，已经数代，应由安国瑞之弟安国荣继续耕种，安秉健不得另佃他人。

2.陈登云控案 [61]

就在威宁州安国瑞控案发生之前的头两年，平远州亦发生了一起土目与佃户的争斗案件。

嘉庆十三年（1808）闰五月，38岁的平远州“猓猓”陈阿佃来到北京，叩阍控告土目欺压佃户、地方官庇护等情，其状词称：

我们土司头目安达屡次向众猓猓派敛银两，我胞叔陈登云赴总督伯大人前控告，批委贵西道檄提审讯。安达闻信，于去年正月率领大龙窝等数十人抢去我家牛马，陈登云追捕，大龙窝等各自放火将安达房屋烧毁，陈登云赴州呈报，许知州并未究办，反将陈登云押禁，断赔银两，也不详解道辕。我连次赴贵西道呈催，批委大定府审讯，许知州仍不详解。安达等将我众猓猓肆行掳劫，并奸淫妇女。九月十一日安达又率领曾守易等三百余人到我家抢劫，安文星等用枪将陈登云之子陈三扎伤身死，陈三之兄陈二赴州呈告，安文星买出吴荣顶凶承认。州役陈燕等押令和供，陈二不允，邵知州反将陈二收禁。陈登云情急，在狱写了呈词一张，叫我来京呈告……

陈登云、陈阿佃等人显然还不太熟习礼仪，状词中居然出现了“具奏”字样，[62]不过这种冒昧越分之举并未受到过多谴责，宜兴、英和、多庆等官员奏请降旨将陈阿佃交与云贵总督，并要求该督提取有关该案的人犯及卷宗，秉公详审。

三个月后，云南巡抚永保遵旨将陈登云一案的始末以及各次审理情形上奏朝廷。这份长长的奏折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土目与佃户的曲折故事，展现出清代黔西北社会的某些片段。

陈登云系“猓民”身份，与金阿好、李士魁等人世代租种土目安达家的田地。由于租额很轻，所以当初就声明佃户除缴租外还须完纳税粮，历来相安，并无争议。陈登云与东家的关系非常密切，自安达之父安文陇时开始担任佃头，负责经管催收租税。

乾隆五十七年，安文陇物故，安达年幼，由母亲禄氏带回娘家居住，孤儿寡母，不能遥制，各佃户应交租粮每年均未能如期如数上纳。后来安达长成，回家后发现历年催收佃租账簿等俱已遗失，各佃户完欠细数无凭清查，决心将租石细加清理，主佃双方的矛盾由此产生。

安文陇未故之时，曾委托陈登云向一夏姓佃户借银52.32两，其中有10两系陈登云所出。双方言明，将应交租粮扣作息银，因此到偿还银两之前，陈登云每年不用交租。安达不知其事，仍向其催租，经解释，安达疑心借银之事系伪造。到嘉庆六年（1801），陈登云又代安达承借傅姓银20两，年给息米2石，并打算代东家收租，以便从中扣出息米。当时各佃户尚未上缴租粮，安达疑为陈登云唆使，遂同母亲安禄氏赴官具诉。

陈登云对此颇不甘心，只待寻觅时机发作。嘉庆八年，安禄氏为安达订婚，财礼无出，与众佃户相商，要求帮助，各佃户遂凑银230两给

东家。以此为理由，陈登云同金阿好等人赴衙控告安达滥派，并声称他们现在耕种的田土系祖先开垦，只应上粮，不应交租。大定府知府周有声讯明后，断令钱粮照旧完纳，陈登云与东家的积怨进一步加深。嘉庆十一年十月，安达查知果木郎田土内有系“老佃”（估计是长期耕种安达家土地的佃户）耕种之田，该老佃已户绝，安达打算另行招佃，双方的矛盾由此激化。

原来，陈登云曾出银向各老佃“顶种”得一些土地，他担心安达会将这些土地一并招佃，决定阻拦此事。正巧安达新招佃户内有“猓民”李二与大陇窝，居住在安达祖遗房屋内。陈登云立即联想到，从前在马厂地方居住的“夷人”刘陇窝曾偷窃都寨“狆苗”的牛只，大陇窝必系刘陇窝无疑。于是邀同佃户金阿好赴总督衙门控告安达招匪，列名同告者尚有余在成、李阿本等。

陈登云、余在成等人显然是想以此迫使安达不敢招佃。但不知什么原因，当总督委派贵西道伊汤安审办此案时，陈登云等原告却传不到案，此事不了了之。

嘉庆十二年正月初十日，陈登云喝得醉醺醺的，邀约金阿好、李士魁以及儿子陈光宗、陈三等前往烧毁李二、大陇窝的居所。金阿好、李士魁不肯同行，陈登云强逼前往，接着又邀弟陈登科、侄陈光绪、王肐瘩、张曾宝同行，但未告知他们放火之事，只是声称要窃去牛只，赶跑贼匪。陈光绪、陈登科等劝阻不依，一行人来到李二等人的住屋门前，陈登云大喊：“大陇窝在此为匪，特来驱逐。”

当时屋内有李二、大陇窝以及安达雇来修房的木匠敖老大、敖老二等人，见来者不善，闭门不理。陈登云遂将随身携带的火煤点燃茅草把，抛至房顶上，顿时火光冲天，安达祖遗的七间草房并衣物器具很快化为灰烬。李二、大陇窝及敖家兄弟从缺墙逃出，未被烧伤。

安达获悉后，立即具报到官，陈登云亦遣侄陈光绪赴州衙称安达自行放火烧房，以图陷害。知州许云霄传集人证，审明原委，即将陈登云、金阿好拿获关押，并责令二人赔偿安达银66.5两，陈光宗等人则已逃逸。

后陈光宗潜回家中，嘱咐母亲朱氏带同儿媳罗氏以及金阿好之妻谢氏等10余人赴贵西道衙门喊冤，禀诉安达纠抢佃户家财，并放火诬告陈登云等情。道尹伊汤安见案情重大，请示督臣提人犯至省城，让贵阳府知府程卓棵、平越直隶州知州王汝琛参与会讯。陈登云对放火烧房一事供认不讳，于是行催平远州严拿陈光宗、陈三、李士魁等到案，并提解在贵西道衙门喊冤之朱氏等人，以便质询。

平远州州牧邵孟竣当即令州差水源、王遂捉拿案犯。平远州显然有依靠土目处理地方事务的传统，邵州牧在传票中明白指示：“协同土目查拿。”这样，水源、王遂找到了土目安文星，安文星即带领佃户王阿贵等

10余人于九月十一日赴陈登云家，陈光宗兄弟已闻风逃匿，于是将其母陈朱氏等五人带至八寨，歇于安文德佃户张仁家。州差水源、王遂认为，陈三之妻杨氏及其亲戚朱李氏年龄较轻，不便押带至省城，即令张仁领文，让陈登云邻居陈朝举、罗十斤送回家中。次日，将陈朱氏等三人送州解省。

陈光宗、陈三藏匿在附近的山洞中，见风声很紧，欲远逃他乡。途中巧遇外出回归的兄长陈二，三人决定结伴出境。九月十三日，行至坉上地方，闻州差正在前方截拿，于是改道至素有交往的金老大家，金老大不知有放火烧房之事，遂留供食宿。十四日，金老大入山砍柴，恰逢州差张登奉，陈光宗兄弟的行迹就此泄漏。张登奉找到土目安文星，后者因病不能同往，令其佃户汪二、吴荣帮同捕拿。当时吴荣正用防兽枪在山上打雀，张登奉便安排他在路口堵截，自己同汪二上前叫门。

看见差人上门，陈光宗手提金老大家铲草刀，陈二抄起防夜铁标，开门冲出。汪二上前拦截，被铁标戳伤左胳膊，当即倒地。张登奉持棍喝拿，陈二、陈光宗立即用刀、标劈面砍杀。陈三乘机逃出，冲至路口，守候在此的吴荣举枪点放，铁砂击中陈三左额等处，延至半夜身亡，陈光宗则顺利逃脱。当时安文星恐汪二等生事，曾扶病来到现场。已被捉拿的陈二据此认为其弟是被安文星唆使佃户枪杀。州牧邵孟竣讯问之后，认为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经过官员们的会审，陈登云依恶徒挟仇放火延烧未伤人例拟斩监，金阿好依逼胁同行例拟徒，吴荣依罪人不拒捕而格杀律拟绞监，陈二依刃伤人律拟徒。陈登云由省发回平远州，与子陈二同禁在监。陈二向父亲言及几点冤屈之处：

第一，陈三被枪毙时，安文星在场，疑系其唆使，只是吴荣未吐实情；

第二，州差邀同安文星佃户传提喊冤妇女，将陈三年轻的妻子杨氏并其亲戚朱李氏一并带去，次日始归家，疑已受玷污；

第三，妇女们均被传解，家中无人，牲畜等物有遗失。

陈登云亦认为，自己因放火被拿到官，知州许云霄既断令赔偿银两，何以又将自己问罪？会审时判定安达可将田土自行招佃，但其中有自己向“老佃”顶种之地，有安达家当给并抵借银两之土，不应一并“掣”去。

由于心怀不甘，嘉庆十三年四月妻朱氏前来探监时，陈登云遂令其遣工人陈阿佃请人作呈，将金阿好列名，赴京叩阍，控告安达派敛银两、窝匪抢劫、奸淫妇女、烧房诬陷以及安文星用枪扎毙陈三，买吴荣招认等罪。

于是嘉庆皇帝降旨令地方有关大员秉公重审此案。负责办理此事的

云南巡抚永保传集相关证人调查之后认为，陈登云所控率皆虚妄之语，但州差水源、王遂及土目安文星传唤妇女时不应将年少之陈杨氏带去，而安达借陈登云之银未付息米，众佃户不交租石，赖为陈登云唆使，致生嫌隙，水源、安文星、安达均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陈登云向老佃顶种之土，以及当给并抵借银两应俱赎取退业，未赎时照例耕种，陈登云向安达佃种之土，本应撤佃，但恐其家属别无生业，应准照旧佃耕。

三 旧疆的法律实践

“安国瑞控案”与“陈登云控案”均发生在嘉庆年间，这并不意味着直到此时土目与佃户的争斗才开始激化成一个引起关注的现象。至少在乾隆九年（1744），毕节县已经发生了一起惊动黔、蜀二省的“猓民”佃户与土目苏文玉的争斗案。[63]这一系列案件均记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文献中，由于材料单一，我们很难弄清个中的是非曲直，但不管文献制造者的立场如何，他们的笔下无疑已“真实”地展现出清代黔西北的一些社会关系，其所反映的家奴（丫头、娃子）状况、土地出租、出当、转租等情形完全可与1949年后的田野调查印证。围绕着以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为中心的种种争斗以及家奴的“出户”抗争，我们看到了改流后土目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他们不但政治特权受到诸多限制，并且许多人的经济地位已有所下降，例如土目安达一家长期向佃户借银，以租粮作抵，安达甚至无钱完婚，等等。

“猓民”佃户积极利用流官政权向土目挑战本身便蕴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我们需要联系明代地方政府的状况，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此问题。传统时代的政府大概有两种主要任务，一是保证赋役的顺利征派，一是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各种形式的动乱固然要予以制止并镇压，平常百姓的矛盾升级时同样要予以调解乃至裁决，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诉讼活动。这些活动的背后隐含着两个前提：一是百姓承认官府的权威，愿意通过官府来解决争端；二是官府有能力召集当事各方并保证判决的执行。从这个意义上看，司法权的有效行使其实是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走向深入的标志之一。曾亲履贵州的明人王士性谈道：

（贵州）只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而已矣。[64]

可见，明代贵州的地方政府尚不能很好地执行调解地方争端的职能。在流官当权的地方尚且如此，水西、乌撒等土司地区可想而知。[65]在政权与族权交织在一起的君、臣、布三者秉权的严密政治体制下，土司、土目是地方事务的最高裁决者，是原住民心中唯一的权威，这正是“罗鬼憨而恋主”“即暴虐不怨”的制度基础。

彝制崩溃后，各级流官政权逐渐深入人心。官员们不但行使征赋派役的职责，并且积极处理各种诉讼活动。而原住民亦开始懂得怎样利用现行制度打击对手，获取资源，在他们心中，土目已不再是最高权威。土目之上有各级官府，最高的仲裁权掌握在远在北京的皇帝手中，所以他们知道逐级告状乃至京控。

案件的处理结果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汉文化在黔西北的扩张与渗透。清代曾经对“土酋猺猓”犯罪实行“宽恤”政策，如犯徒流军遣等罪，援照古例免予发遣，改为枷责完结。原因是“苗猓与内地民人语言不通，服食各殊，实徒实流恐断其谋生之路”。[66]乾隆二十七年（1762），贵州按察使赵孙英认为这一政策已经过时，应予改革，他声称：

臣查贵州一省，除遵义府系雍正年间由川割归，并无土苗外，所有上游之贵阳、大定、安顺、南笼四府，下游之平越、都匀、镇远、思州、铜仁、黎平、石阡、思南八府苗人皆系前明虚入版图，历年已久。后蒙我朝重累熙洽，一百二十余年来，熏育教化，凡土苗人等服饰语言多与汉同，如猓猡、狆家、洞苗、宋家、犵老之类，读书游庠，援例捐纳贡监及职衔者，在在有人，至于得中武科者，间亦有之。此等苗寨，风气既与民人无异，而所犯之罪则与民人殊科。狡黠抗法之徒既易于尝试，有江楚川广游民窜入苗寨，尤易控冒滋事……臣愚请嗣后除贵阳府属之长寨，黎平府属之古州，铜仁府属之松桃，镇远府属之台拱、清江，都匀府属之都江、八寨、丹江各厅，俱系雍正四年及六、七等年开辟之新疆，各苗人有犯，该徒流军遣等罪仍照旧例分别枷责完结，其余各府所属，凡系旧疆版图，苗人有犯徒流军遣等罪者，均照民人所犯徒罪，经请定驿摆站军流遣罪，按照道里表开载，定地充发。[67]

在赵孙英看来，康熙初年改流的黔西北已属“旧疆”，不在宽恤之列。[68]此言并非毫无根据。随着科举、教化的推行，黔西北地区的文化与礼俗逐渐发生了变化（见本书第八章），安秉健请云南岁贡柯春在家教读，安国瑞、陈登云、陈阿佃、金阿好等人均能操汉语，甚至可以书写——安国瑞的状词就是自己写的。官员们在判决的时候，实徒实流，不再考虑“民”“苗”之别，安国瑞被发遣黑龙江，在此之前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十八年，诬控安秉健的安士照、阿鲁约等人同样被拟充军，陈登云一案中金阿好、陈二等人则被拟徒。黔西北地区在观念与实践上都成为清王朝“旧疆”。

在更早的乾隆三十五年，吏部曾讨论过贵州威宁州官员的升迁问题。威宁州“因辖猓夷，为苗疆要缺”，官员任职五年俸满后，“加衔留任”，续任三年，再行升用。这其实也是湘、黔、滇等地许多“苗疆”“夷疆”地区通行的制度。[69]这一年正月，吏部赞同黔抚良卿的建议，以威宁“番民向化日久，抚绥较易”为由，建议删去“报满加衔即升之例”，改行内地官员的升迁办法。皇帝予以了批准。[70]

总而言之，成为王朝之“疆”的关键，是人民被纳入“版图”，向王朝缴赋应役。初入版图之地即为“新疆”，而“旧疆”则进一步强调礼俗的同

化以及与内地一体的法律适用。

四 土目力量的地区差异

除了官员们的限制、家奴的“出户”、佃户的抗租与争地外，移民、绅士阶层的成长同样是土目面临的重大挑战，[71]而土目的内斗也不断消耗本阶层的实力，咸同年间遍及全省的“苗乱”亦使土目力量遭受重挫。[72]完全可以认为，改土归流虽然没有立即对土目造成毁灭性打击，但其权势却不断遭到削弱，例如到民国后期，水城地区比较大的土目，仅剩下玉舍钱闻达、平寨安荣光、田坝苏发朋、常明杨银武、龙场禄仲云等几家，其余大都走向衰落，湮没无闻。[73]

土目受到的挑战与冲击存在着地区上的差异，到1949年前夕，纳雍、织金、金沙等地的土目几近绝迹，赫章等处土目的实力大为衰减，大方、黔西土目尚有残存，只有威宁的土目依然强盛。[74]在某些边远之地，如威宁的凉山地区，土目的势力尤为雄厚，形同独立，直到民国时期政府尚对其鞭长莫及，甚至连征收赋税都办不到。我的外公许明九先生民国时期曾在毕节、赫章、威宁等地担任税务官员，他给我讲过一段向大凉山土目征税的经历：[75]

那是1942年或1943年的事情，当时我在威宁管直接税——我是在贵阳考取直接税政务人员训练班的。有人密报到中央，说威宁大凉山的安家逃掉了一笔数额巨大的遗产税。安家的老母亲最初是嫁给龙家，第一胎养的就是龙云。龙云的父亲去世后，她又嫁给卢家，生卢汉。卢汉家爹死掉以后又嫁安土目家，安家的土地宽广，跨昭通、威宁、水城，在县里面还有公馆。这个女的死了，有人密报，说安家财产横跨几县，无人清楚，[76]中央如果把这笔遗产税收活了后就大得很。结果上面派人到贵州省税局来，省局专门派一个姓唐的科长到毕节。当时安家、龙家、卢家财产都很大，但一般征不到税。这个唐科长在毕节很难办通，所以他又专程赶到安家所在的威宁县，蹲在我的所里面，要我负责。我找不到推的，就接手办这个。以后办活，他马儿乎之的，我也只要求把这件公事销掉。

从威宁要直爬三十里才到凉山，安家就住在凉山上。碉堡一座连一座，两排很粗的大树夹道，直到他家门口。我们不敢去，因为他的势力太大了，怕他不服。以后得到威宁县政府的支持，派兵护送我前往。我又找到传教的牧师，他在威宁崇石（音）中学办学，这个牧师是外国的，他说：“没关系，不带兵都不要紧，我同你去。”我就和他带着兵去凉山。去时是九月、十月，山上面已经覆盖着雪。离土目家还有三四里路就要事先通知，他家派人来接才敢进去，喂的狗有两百多条，牛羊马匹上千。

安家是黑彝，有三弟兄，但都住在昭通县的公馆里，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头目人。我不懂彝语，牧师帮我们翻译，他家势力太大了，啃不

动，去两个人只是去查账，账他给你查，钱他不交，你把他无法，税没有办活。

又适逢姓王的黑彝土目，老爹刚死，顺便办他家，竟然办活了。我把政策交待以后，把税按税率算出来，数字较大，牧师帮我说话："在这个非常时期，国家需要的是钱，不服的话政府是不容许的。"王家一再要求要减免，大家讨价还价，减到一个数目就确定下来了。王土目家有几兄弟，一个拱一个的，这有助于我们把税办活。大儿子对我说："先生，你追我家这个幺兄弟吧，他是后娘养的，财产全是后娘掌握，小兄弟有金子，你不要讲我说的。就说从外面了解的，你诈一诈他。"我对幺兄弟一说，他果然就交出金子来了，但我不知道真假。他也说，金子是我家家传下来的，是真是假我们也不晓得，好几代人的事情了。我就说，我们带到毕节去，到金店去鉴定。

我们收到的税有鸦片、大板、枪、银子，还有金船、金梭子，上面有"上上足赤"几个字，金子一坨是一斤多，王家亲自派人送到威宁。那时国家的税，什么东西都可以要，只要是打成入库，拿到毕节，就可通过县里面的保警大队来卖。可恨金梭子拿到金店里一下签，结果是假的，就追责任，我又不敢转回凉山去找土目要，怕活不回来。结果就由我来赔金梭子，其余的东西卖来入库。金梭子我赔不起，就扣我的工资。不久货币贬值，后来一个月的薪水不要就赔掉了。[77]

许明九的故事表明，当时政府对某些土目的控制还比较弱，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国家税收制度之外，向其征税变成了一件充满危险的差事。尽管有教会的支持，政府士兵的护送，但许明久仍然无法使安土目纳税，在收到王土目的假金子后情愿自己赔偿——尽管这超出了他的经济承受能力，也不敢再回去找土目。但我们不能把许明久的故事当成一种普遍的现象。他所讲的大凉山位于今天赫章、威宁交界处，这是贵州省海拔最高的地区，崇山峻岭使政府对此地鞭长莫及。2001年9月我在黔西北采访时，此地尚未通公路，必须翻山越岭才能抵达。

第三节 布摩阶层的变动

在勾政权中，布摩与幕史垄断着书籍与文字，他们是知识与文明的象征，跻身统治阶层，受到全社会的尊重。特别是与君、臣并列的布摩，掌管祭祀，沟通天、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神化了。彝制崩溃后，布摩的政治特权随之丧失，而科举教化、移民的涌入，对他们造成另一种重大打击，布摩阶层的身份构成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 文教的兴起

贵州科举兴于明代，主要是由于卫所的带动，当时入学者以屯戍子弟与汉人移民为主。黔西北地区的广大原住民并非编户，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入学应举。因此明王朝文教的扩张与渗透大体上只能影响上层统治分子，虽然朝廷力图推广社学，但土官并不热心，社学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布摩所宣扬的各种价值观仍然是土司政权的意识形态。

改土归流在制度上为推行科举创造了条件。黔西北平定后不到数年，黔西、平远、大定等府相继设学，而旧有的乌撒卫学则改为威宁府学，此外各种书院、义学、社学亦渐次设立。[78]这些学校除了解决汉人的入学、科举问题外，还担负着化导原住民的重任，正所谓“苗彝新附之地，尤当诱之以诗书，使其勉强礼义而不敢为非”。[79]清代入泮者确实有不少新近入籍的原住民子弟，雍正十年（1732），贵州学政晏斯盛提到大定府亲辖地有许多“目、夷”列于学宫，“尤明于顺逆之义”，随从太守赴军前讨贼。[80]平远州有“苗民”九种，“不拘愚智，但年幼者，俱解从师读书，近列黉宫者颇众”。[81]曾为官贵州的查慎行在诗中谈到贵州原住民时亦称：“其中一二稍秀拔，略解诗书诵贤圣。”[82]

威宁被描述为“汉夷合一，文教顿兴”，康熙四十八年（1709），佟铭迁府学时，“自总镇、副守、厅学、举贡，以及汉民苗夷之有志学者，咸赞励以光其事”。[83]到雍正年间威宁府改州，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以该处“读书向学之士不少”，建议“仍准进学二十名，免其减额”。[84]

据乾隆《黔西州志》，当时各族类都有“读书入泮”者，因此该书称：

（黔西）旧属夷地，种类非一，语言文字概不相通。我朝改土设流，建立学校，文教大兴，习俗丕变，冠婚丧祭渐循于礼。[85]

道光《大定府志》同样提到罗罗、宋家等族类进学的情况。[86]虽然方志编修者的言语难免夸饰，但改流后王朝教化对地方社会的日益渗透却是毋庸置疑的。彝文献对此亦有所反映，如麻博阿维家的一支迁到水西阿哲家的地盘后，“取了汉姓，在清康熙年间，读汉书，使用汉文，一度有功名，中了举，做了汉官”。[87]原住民获取科举功名并非罕见，本书第八章对此将有更加深入的探讨。

二 布摩阶层的变动

科举文教的扩张，强烈地冲击着原来勾政权中的正统文化。这种文化的载体——彝书，面临着逐渐散佚的危险，乾隆三十九年（1774），一位叫黄继的彝人曾发出感慨：

余上世祖考世系，往往迭出于夷册书籍，而当今圣朝专以四书三坟五典之道统一天下，而夸册字迹恐愈久而磨灭殆尽，后世之子孙即欲考而失据，能不私心悼叹而隐忧先世之失传哉！[88]

《（彝族）杨氏支谱》亦称：

自改土而后，夷书之散佚多矣。[89]

政治特权与正统性的丧失，使彝书的传承者布摩的神圣光环逐渐黯淡，布摩成为一种单纯从事祭祀、占卜、看风水的职业，与统治权力无关，并且这种职业在许多地方还面临着佛教的挑战，请和尚做道场、解生、预测在大方普底等地逐渐普遍化。在这种背景之下，跻身布摩阶层的途径变得多样化起来。

1.黑布（）与白布（）

同其他彝区一样，黔西北彝族的构成相当复杂，大致有黑彝、白彝两种，此外还有红彝等。通常认为黑彝是贵族，在经济上与政治上都有雄厚的势力，而白彝等则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即所谓的“黑贵白贱”。许多被访者声称土目全是黑彝，[90]但也有人将土目、黑彝、白彝自上而下分成三个等级，[91]有一些人甚至告诉我白彝、黑彝都有当土目的。不过从总体上看，1949年以前黑彝占有经济优势，而白彝人口众多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92]

我遇到的很多彝人都反对“黑贵白贱”之说，他们认为，彝书中有青、黄、黑、白、红五种彝人，这是按五行方位的颜色属性来区分的，没有包含等级的意思。彝族社会只有职业分层，如红彝即匠人。[93]

黔西北的黑、白彝之间并非在种族或文化上有多大差异，二者的区分可能是在某个历史阶段君长国的掌权者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所导致的。[94]至迟在明代，已出现了黑、白的等级差别，嘉靖《普安州志》云：

罗罗则有黑白之异，黑者贵，白者贱。[95]

这是比较早的记载，之后许多士大夫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康熙前期贵州巡抚田雯称：

何谓卢鹿？水西之罗鬼是也。族众而地广，故力亦强。所辖四十八目，八目之下又有九扯九纵，百二十夜所，皆黑种为之，而白者则其部落也。……（罗罗）有黑白二种，居平远、大定、黔西、威宁者为黑罗罗，亦曰乌蛮，黑大姓，俗尚鬼，故又曰罗鬼。……白罗罗，永宁州慕役司及水西皆有之，一曰白蛮，与黑罗罗同而为下姓。[96]

因为统治阶层以黑为标签，所以与君、臣并列的布摩应当是黑彝。但现在的布摩世家大都是白彝（即白布），而黑彝布摩（即黑布）则非常少。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是，改土归流后布摩的社会地位日益衰微，其职能从为整个部落祭祀逐渐变成为家庭或个人祈福免灾，黑彝贵族因此

不屑为之，布摩的角色遂主要由白彝担任。于锦绣等人还声称发现了这一变更的种种痕迹，他们在威宁了解到，黑彝家做法事，如请白布（摩），必须同时请黑布，如果请到高明的黑布，则不用再请白布。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因为黑布大都不愿认真钻研经书，手段并不高明，但黑布即使不会念经，也是名义上的正式布母（摩），白布只能算其助手。黑布在祭场上什么也不做，但报酬要分享。[97]

其实，改土归流不仅冲击了布摩的地位，而且还悄无声息地瓦解着黑、白彝的观念。上文提到，黑、白的区分并非建立在种族与文化上，而是统治阶层表达与强化优越感的一种方式。改流运动摧毁了原有的权力结构，然而土目在很大程度上还握有基层社会的实权，并且黑彝的经济优势不可能很快消失，因此黑、白彝的“贵贱”之分还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但几百年间的势力消长，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陈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大方、毕节、黔西、金沙、织金、纳雍等县自清末以来已无黑、白之分，只有威宁、赫章一带尚有此概念。[98]史继忠的论文则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纳雍、织金、金沙等地的土目几近绝迹，赫章等处的土目的实力大为衰减，大方、黔西土目尚有残存，只有威宁的土目依然强盛，[99]对比两项研究，可看出土目势力兴衰与黑、白彝的观念强弱之间的关系。

2.世袭与师承

改土归流前，布摩的职业以世袭方式被某一特定的阶层所垄断。文献中对布摩世系的记载比比皆是，[100]正如《大定府志》所称：“夷语谓巫为补（即布），最尊贵，丧祭用之，父子相继。”[101]《彝族源流》云：

罗氏有七子，罗婺毕任，与毕氏连姻，世代为布摩。

姆阿足布摩，管文化礼仪。不愿作布摩，姆阿足不作祭，足迫默不作祭，迫默维不作祭，维德勒不作祭，勒俄索不作祭，索陇邓不作祭，陇邓阿仇之世，到卧扎女恒，设署苦妥姆（署苦妥姆，布摩的座位——原注），更名陇邓阿仇。布摩的根种，来源都清楚，因而做布摩。[102]

《苏巨黎咪》亦载：

有三种灾难：君位虽世袭，让人用武力篡夺；臣位虽世袭，让人用武力夺去，子孙不继承权位，把毕濯丧失；布摩子孙不承袭祖业，维庹（布摩的一种法具——引者注）成朽木。[103]

“布摩的根种，来源都清楚，因而做布摩。”对布摩世系的强调，表明这一职业的家族垄断性，而布摩子孙不能承袭祖业则被视为一大灾难。这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所形成的观念，在君、臣、布三者秉权的政治结构中，布摩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权力、一种高等身份、

一种财富，既得利益者当然愿意世代维持自己的特权，普通人断难通过学习而跻身布摩阶层。

改流后，随着彝族政治制度的崩溃，布摩变成了一种单纯从事祭祀、占卜活动的职业。除世袭外，一般人也可以通过从师成为布摩，而布摩亦乐于通过收徒获得经济利益。在田野调查中，我了解到，黔西北的许多布摩都开设类似私塾的学堂，收徒授业。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彝文专家、世袭布摩王子国先生称拜师的学费并不固定，他的爷爷办学时，学生交3块或5块小板，交粮食的也有。王先生的父亲曾于1963年收过徒，学生每年交40斤玉米。

王先生家的学堂还培养幕史，如果是学幕史，还要进一步分专业，大致有历史、天文、哲学三种。布摩的学制一般是三年，学的书主要有：（1）祭天（如日月星辰）、地（山神土地之类）和祖宗的书，在彝语中，祖指父系，宗指母系；（2）祭福禄神的书；（3）祭山祭水之类的书；等等。因为要求通背经书，所以三年时间往往不够。毕业后须跟着老师实习，神位怎样安，法器如何摆，书怎样读，这些都有讲究。实习合格后，要举行一个仪式：设师神位，让弟子跪拜，然后师傅念先师的名字，说某某学徒已通过学习。在此过程中，徒弟坐，师傅跪，意即把我师傅给我的神力交过去。彝人用酒通天地，祭祀时不烧香烛纸钱，但要将酒倒在地上。经过这种仪式后，该弟子做法事滴酒时便有先师助威。出师后，师傅会送弟子一些书或让他抄一些书，弟子在自己家中设师神位，且每年都要祭书。世袭布摩不需要举行出师仪式，因为自己家中已经有师神位，有神力。幕史出师亦不必举行仪式，但每年祭书如布摩。[104]

我在赫章县雉街乡还了解到，有的徒弟因为学习时间不够等原因没有得到师傅的经书，其法力与威信大打折扣，只能做一些小事，遇到做斋等大事时没有人会请他们。

王子国先生称，布摩、幕史的所有儿子都可以参加学习，但要用下列标准进行检测，遴选一个合格的传人。

第一，洁净清白。不侮辱文字，讲究个人卫生，这是洁净之意。[105]清白指品德，踩到虫虫蚂蚁都是过失，要念解冤经解冤。只有走天地人道之路，保持自身的根本，才能通到天乐之处。

第二，温柔忍耐。脾气暴躁的儿子不能传给他某些书，如使法的书。

第三，孝顺善忠。这是对父母和君主的基本准则。

本章的论述表明，改土归流并不能一下子创造出新秩序——尽管表面看起来似乎如此。勾政权在清初的军事行动中被瓦解之后，彝族制度虽遭受重大打击，但依然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变化、延续。制度的变更开启了经济、礼仪演变的新方向，下一章将从经济开发的角度揭示

改流后黔西北对清王朝的意义及其与内地整合的情形。

[1]例如《清世宗实录》卷117，雍正十年四月辛卯条中称黔东南一带“新疆辽阔，直通楚粤”。“旧疆”除了与“新疆”相对的含义外，也有“固有的领土”“故土”等意思，如《宋史》卷368《魏胜传》记载，南宋将领魏胜与金对阵时称：“汝主叛盟失信，无故兴兵，我朝以仁义之师，来复旧疆，汝主渡淮必败。尔等宜早来归，必获爵赏。”此处之“旧疆”即固有领土之意。清乾隆四十三年秋，乾隆皇帝先后谒永陵、福陵，因谕：“眷怀辽沈旧疆，再三周历，心仪旧绪，蕲永勿谖。”此处之“旧疆”应理解为故土。本书中的“旧疆”仅取与“新疆”相对之意。

[2]参见蔡毓荣《筹滇第二疏》，乾隆《云南通志》卷29《艺文》。

[3]参见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第172～179页。

[4]道光《大定府志》卷49《旧事志五·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安国泰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做了一些诠释，土目分封由此带上了浓厚的宗法制色彩。

[5]光绪《黔西州续志》卷5《州属土司》。

[6]《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7]《王文成公全书》卷21《外集三·与安宣慰书三》。

[8]《明神宗实录》卷563，万历四十五年十一月癸亥条。

[9]参见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4《大定府》。

[10]参见《西南彝志》第7～8卷，第284～312页。清人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卷43误解了水西的制度：“贵州宣慰家水西所辖长官司四十八，每司锐卒数千。”按，土目绝不等于长官司，前者是水西君长所封，只对君长负责，后者是朝廷所封，有朝贡、输赋、应役、从征的义务，并且其承袭须经地方政府与朝廷审批。

[11]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50《旧事志六·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七则》；《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97～103页。

[12]陈惪荣：《匿匪黄山及者厦白革等并黔粤两省民苗争田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1867。

[13]民国《威宁县志》卷17《杂事志》。

[14]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4《大定府》；卷26《威宁州》。

[15]笔者2001年9月在该村调查，当时陈朝龙60岁，陈朝华64岁，都是彝族。

[16]水西安氏属下共48目，其中有6目在水东地区，水西地区有42目。

[17]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2～14《疆里记》。

[18]参见田曙岚、胡积德等调查整理《黔西县沙窝区沙井乡罗都寨解放前的社会经济特征和解放后的发展变化》，1963，第4页。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即道光年间府志的编修者对黔西州土目的统计并不完全，但从道光迄民国黔西土目数量的增加是可以肯定的。

[19]参见黄元治《黔中杂记》。

[20]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2～13《疆里记·大定府亲辖地》。

[21]赵翼：《檐曝杂记》卷4《黔中倮俗》，中华书局，1982，第68～69页。

[22]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4《水城通判》；卷26《威宁州》。

[23]例如按规定只交100斤粮食，但土目要求交150斤，50斤被私吞了。这段叙述来自笔者在赫章县古达乡、雉街乡的调查。

[24]王定芳，彝族，1938年生；陆开良，彝族，1937年生。

[25]参见贵州省编辑组编《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第22、52页。

[26]参见李建成《水城的彝族土目》，《水城文史资料·少数民族专辑》第3、4辑合刊。

[27]以上叙述参见李建成《水城的彝族土目》，《水城文史资料·少数民族专辑》第3、4辑合刊。

[28]参见《黔西县沙窝区沙井乡罗都寨解放前的社会经济特征和解放后的发展变化》，《贵州省仡佬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1964。

[29]参见《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第50、71～72页。笔者的调查可与此相印证。

[30]曾长治：《谨奏为奏闻事》（乾隆八年闰四月十三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1068。

[31]参见张坦熊《谨奏为请禁边夷冒占拆卖之风以广皇仁事》（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95-2116；《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第58页。笔者的调查与此大致相符，丫头娃子的民族成分以及欠债沦为丫头、娃子系黔西北的一些老先生告诉我的。

[32]赵翼：《檐曝杂记》卷4《苗倮陋俗》，第70页。

[33]包汝楫：《南中纪闻》。被掳掠的汉人一般都沦为家奴，可随意买卖。据明人所著《张氏传》，奢安之乱时期，赤水卫千户张大壮之子张常庆、张常春遭掳掠后，被奢寅分别赏赐给手下的两位头目，后常庆又被卖给“银河蛮”。参见乾隆《毕节县志》卷8《艺文志·张氏传》。

[34]参见曾长治《谨奏为奏闻事》（乾隆八年闰四月十三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1068。

[35]参见曾长治《谨奏为奏闻事》（乾隆八年闰四月十三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1068；《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第57～58页。

[36]以上叙述参见《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第50～68、89～91页；李建成《水城的彝族土目》，《水城文史资料·少数民族专辑》第3、4辑合刊。

[37]参见余宏模《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创刊号。

[38]如布系的一位远祖糯克博在率领族众迁徙的过程中就曾租种过其他支系的土地，“在洛婆博所，牵出牛来杀，租种大片土，专管种土地”。参见《彝族源流》第17～20卷，第287页。

[39]参见《水西制度》第十三章，转自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94～

98页。

[40]《彝文金石图录》第2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第6～21页。这块岩刻蕴含的信息相当丰富，如地权、契约、土地买卖、出当以及白银货币的通行；等等。

[41]参见李建成《水城的彝族土目》，《水城文史资料·少数民族专辑》第3、4辑合刊。

[42]宋翔凤：《记水西风土诗》其一，道光《大定府志》卷59《文征九》。

[43]田汝成：《炎徼纪闻》卷3《安贵荣》。

[44]参见郭子章《黔记》卷59；罗曰褧《咸宾录》卷8；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7；乾隆《贵州通志》卷7等。

[45]本小节讨论土目安巡如与家奴的争斗，胡庆钧在《清初以来彝族奴隶制度的变化》（《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中对此案有简单涉及，他认为这是一场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其背景是改流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出现。

[46]张广泗：《威宁州夷目家奴者厦等不服伊主役使业经派官兵招捕等情》（乾隆八年四月三十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95-2026。

[47]1949年后有关黔西北的各种调查报告与回忆录把土目描绘得非常凶狠，但从未提及强占、强奸丫头或家奴妻女之事，甚至连土目家的娃子都不和地主的娃子开亲。参见《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李建成《水城的彝族土目》，《水城文史资料·少数民族专辑》第3、4辑合刊。

[48]参见曾长治《谨奏为奏闻事》（乾隆八年闰四月十三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1068。其他地区如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府，娄素同样建立过勾政权，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官员们亦同样积极考虑如何打击土目的势力，如乌蒙镇总兵奏请“裁彝目名色”时称：“土府既已改流，彝目名色尚在。如抒诚之始，彝情散漫，似可假借其名目以收拾人心；今归命既久，若赋役差徭仍听其派遣，则重饮繁苛，势所难免……嗣后应请于乌治之东南西北设为四乡，将现在各土目名色削去，尽数编入乡甲之内，另择其彝人中忠厚诚实者充当乡约保长，以资约束，务使斯民尽属流管。”参见刘起元《奏陈地方政务管见几条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776～781页。

[49]对安巡如家世及功业的叙述参见余弘模《威宁乌木屯安巡如墓碑残文探证》，《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余弘模于1979年4月在威宁自治县狗街公社踏勘了安氏祖茔，发现了安巡如墓碑残文。

[50]张广泗：《威宁州夷目家奴者厦等不服伊主役使业经派官兵招捕等情》（乾隆八年四月三十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95-2026。

[51]安巡如墓碑碑文云：“公控叛奴，词涉不检，时军略张广泗震怒，将置公法，陈为解之，释其叛奴。”转引自余宏模《威宁乌木屯安巡如墓碑残文探证》，《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

[52]以上叙述参见张允随《获解逆犯者厦等奏》（乾隆八年六月初七日）、曾长治《谨奏为奏闻事》（乾隆八年闰四月十三日）、张广泗《威宁州夷目家奴者厦等不服伊主役使业经派官兵招捕等情》（乾隆八年四月三十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1076、585-1068、95-2026。

[53]曾长治：《谨奏为奏闻事》（乾隆八年闰四月十三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

奏折，缩微号585-1068。

[54]宋厚：《审办夷奴案情形由》（乾隆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95-2048。

[55]参见张坦熊《谨奏为请禁边夷冒占拆卖之风以广皇仁事》（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95-2116。

[56]有关安国瑞与安秉健争讼的文献可参见齐布森《跪奏为遵旨审明定拟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嘉庆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1099。

[57]参见魏源《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

[58]按胡庆钧的观点，改流前水西的社会形态是奴隶制，而史继忠则认为应当是封建领主制。他们都提到了租佃关系，但解释有所不同。参见胡庆钧《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第16～18页；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69～75页。

[59]转引自余宏模《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创刊号。

[60]这一推测或许并非毫无根据，上文提到，安巡如因从征有功，获得了五百多亩“叛产”，在改流战争中，阿固系“叛逆”者，其土地有被作为“叛产”处理的可能，甚至被其他有功土目直接霸占，亦未可知。

[61]关于陈登云控案的文献请参见宜兴、英和、多庆《谨奏为请旨事》（嘉庆十三年闰五月二十九日）、永保《审办倮民陈登云控案》（嘉庆十三年八月初六日），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1084、585-1087。

[62]宜兴、英和、多庆的奏折中称：“陈登云系苗疆猓猓，而原呈内擅称‘具奏’字样，实属冒昧越分。”

[63]参见纪山《谨奏为奏闻事》（乾隆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0026。胡庆钧在《清初以来彝族奴隶制度的变化》（《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中对此案有所涉及，他所用材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云贵总督张广泗等人的奏折，并将此案解释为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

[64]王士性：《黔志》。

[65]但明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预土司、土目之间的争斗。例如首辅高拱与贵州巡抚阮文中成功调解了贵州宣慰使安国亨与土目安定的冲突。参见高拱《靖夷纪事》。

[66]参见下文赵孙英的奏折。民人冒充“土苗”以图免徙要受到惩罚，《大清律例》卷5《名例律下》载：“凡苗疆地方，如军流徒遣等犯内民人有捏称土苗，希图折枷免徙者，事发之日，除按其本律治罪外，仍先于本地方枷号一个月，再行充发。”清代对“土苗”犯案的特殊处理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署理贵州巡抚印务的广西巡抚祖秉圭奏称：“窃查贵州苗彝烧杀劫掳事件，向日多系照彝例以牛马偿息外结。嗣经督臣鄂而泰题请凡苗疆案件，俱照内地所定限期，按律审拟具题，不许外结。经部议奏于雍正五年九月十七日奉旨依议，通行钦遵在案。”祖秉圭：《奏为黔省未参案件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1册，第407页。

[67]参见赵孙英《跪奏为酌定苗人犯罪以肃法纪事》（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2085。在次年的另一份奏折中，赵孙英再次“新疆”“旧疆”并提，《清实录》云：“贵州按察使赵孙英奏，新疆苗民，较淳于旧

疆。治之之法在严惩汉奸。”《清高宗实录》卷689，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壬寅条。

[68]参见赵孙英《跪奏为酌定苗人犯罪以肃法纪事》，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2085。《大清律例》卷5《名例律下》特别提到对汉化程度较高的“苗人”犯法的惩处：“云南、贵州苗人犯该徒流军遣，仍照旧例枷责完结。其情节较重或再犯不悛，将本犯照例折枷后，仍同家口各就土流所辖一并迁徙安插。至苗人中有剃发，衣冠与民人无别者，犯罪到官悉照民例治罪。”

[69]《吏部铨选则例·汉官则例卷七·拣选》，续修四库全书本。

[70]《清高宗实录》卷851，乾隆三十五年正月癸卯条。

[71]本书第八章谈到黄氏家族改变文化身份，通过科举获得较高声望与地位后向土目挑战的事情。

[72]咸同“苗乱”时，许多土目参与反叛，亦有不少土目协同政府平叛，致使不少土目家毁人亡。参见民国《大定县志》卷4《前事志·纪年二》。光绪《黔西州续志》卷5《州属土司》云：“故兵燹以来（土目）捐躯御敌、毁家纾难者比比而然。”

[73]参见李建成《水城的彝族土目》，《水城文史资料·少数民族专辑》第3、4辑合刊。李建成老先生在文中回忆了（有的是他听老人说的）水城土目之间及其与政府、汉人地主争斗的情形。

[74]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71页。

[75]我的外公许明九先生系汉族，生于1920年。以下叙述是根据我2001年9月采访时的录音整理。

[76]许明九所描述的土目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形在民国时期的川滇黔交界地带并不罕见，凌纯声说：“据最近《大公报》之通信：‘一个作农业推广的朋友，在黔西工作之后，回来对我说到，真正的大地主在黔西可以找到，那就是横贯三省边界的土司土地，连土司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中），《边政公论》第3卷第1期，1944年。许明九关于龙云和卢汉系同母异父兄弟的记忆有误，或许这是当时的传闻。

[77]后来我向母亲询问起这件事，她说她小时候父亲还把那个假的金梭子给她当玩具。

[78]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20《治地志·学校上》；卷21《治地志·学校下》。

[79]张大受：《重修平远州学记》，乾隆《平远州志》卷16《艺文》。

[80]参见晏斯盛《大定府学记》，民国《大定县志》卷10《学校志·学宫》；晏斯盛《奏为请旨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9册，第37页。

[81]乾隆《平远州志》卷11《风俗·苗民》。

[82]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6《毕铁岚佥事将督学贵州枉问黔中风土短章奉答兼以送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3]管遴：《中宪佟公改建威宁府学宫记》，道光《大定府志》卷20《治地志·学校上》。

[84]《清世宗实录》卷110，雍正九年九月乙酉条；晏斯盛：《奏为请旨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9册，第37页。

[85]乾隆《黔西州志》卷2《地理志·风俗》。

[86]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4《疆土志·风俗》。

[87]《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479～480页。

[88]《（大方）黄氏族谱·序》。

[89]《（毕节）杨氏支谱》，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藏。翻译组组长王继超先生慷慨让我复印全书，在此深表谢意。

[90]例如赫章县古达乡政府的卢照光，雉街乡的陈朝寿、陈朝华、陈朝松等人都属白彝，他们告诉我土目全是黑彝。《黔西县石板、金坡两乡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亦将土目认定为黑彝。

[91]一些人告诉我土目就是土目，和黑彝不同。民国《威宁县志》卷14《风土志·风俗》亦云："土目最贵，黑种次之，白夷最贱，婚姻往来丝毫不容假借。"此外，《威宁县龙街等地解放前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将等级关系分为土目、黑彝、自由民（有白彝、红彝、干彝）、娃子等。不过该调查并未讲土目不是黑彝，把土目从黑彝中分出来或许是其财产比一般黑彝多。

[92]在田野调查中，我仅碰到寥寥数户黑彝。

[93]这些是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子国先生告诉我的。陈英亦认为，白彝是掌管内务的，黑彝是带兵打仗的，干彝是工匠，他们职业分工不同。参见陈英《关于"六祖"、"罗甸国"等问题的调查》，《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94]按陈英的观点，彝族尚黑，以黑为贵，并且（黑）与（看管之意）同音，这正是社会地位高者称黑彝的原因。参见陈英《关于"六祖"、"罗甸国"等问题的调查》，《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95]嘉靖《普安州志》卷1《舆地志·风俗》。

[96]田雯：《黔书》卷1《苗蛮种类部落·苗俗》。清代曾有不少专门描绘贵州少数民族的图册，地方志中也有不少类似的图画，从中可以看到，"黑猓猓"往往以打猎的形象出现，被画得比较凶悍，而"白猓猓"通常是在劳动，特别是背茶的场面出现较多。清人舒位《黔苗竹枝词·猓猡》亦云："红泥坡下白罗罗，下姓相逢唤阿和。一带青山横作黛，春风吹遍采茶歌。"

[97]参见马学良、于锦绣、范惠娟《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79、180、186页；易谋远《彝族史要》，第775、776页。

[98]参见陈英《关于"六祖"、"罗甸国"等问题的调查》，《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笔者的调查可与该文印证，2000年8月，当我打算在大方县了解黑、白彝的状况时，许多人告诉我："我们这里没什么分别，要到威宁才有。"第二年，我带着这个问题来到前乌撒地区的赫章、威宁二县，果然感受到了黑、白的区分。

[99]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71页。

[100]例如《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38～45页专门记载了世袭布摩亥索家的谱系；第17～20卷，第353页亦提到毕（布）家世袭布摩。

[101]道光《大定府志》卷49《旧事志五·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

[102]《彝族源流》第17～20卷，第206、396、397页。

[103]《苏巨黎咪》，第37页。

[104]改流后，幕史衰落得更加厉害，现在幕史家庭已寥寥无几。

[105]道光《大定府志》卷49《旧事志五》中对补（布，即布摩）有这样的叙述："饮食起居务洁净，以感神明。"此可与王先生的讲述相印证。

第七章 移民、矿业与农耕的发展

康、雍、乾三朝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农产品种类及产量、矿产开发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商业活动充分发展，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1]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场景中，黔西北等“新疆”地区同内地发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与整合。这些地区对“盛世”的贡献在于，它们不但提供了养活更多人口的可能，并且银、铜、铅等矿的大规模开采改善了清军的装备，扩大了货币的供给来源。清代对黔西北的开发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许多今天习以为常的现象，正是发育于这场革命埋下的种子。

第一节 移民的潮流

以兴建卫所为契机，贵州在明代出现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毕节、赤水、乌撒三卫的设立意味着上万汉民进入了黔西北，他们可能主要来自南直隶。但无论是屯守士卒还是民间自发的流民，都主要居住在驿道附近。定居于乌撒、水西土司辖地的汉人数量不多，[2]其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被掳掠，[3]一是作为土官的智囊担任汉把、汉目。康熙五年（1666），首任大定知府宁云鹏看到的情况是：

城内居民解少，惟卒伍比户而居。夷民散处山中，僻就耕耨。[4]

或许与不久即爆发的“三藩之乱”有关，17年后，平远府书判黄元治依然未发现多少汉人移民：

城中皆兵，惟东南二门外，流氓落落十数家。至群苗，则皆僻居溪洞、箐中，如鸟兽之巢穴，不能以近人。[5]

不过，几乎就在黄元治感慨的同时，闽、粤、湖广等地已掀起了移民四川的浪潮。[6]贵州在明代是四川移民的接收地（详前），但在清初，人口的流向似乎发生了变化，以黔省向蜀省迁移为主，[7]这或许是由于四川农耕条件远较贵州优越而又地广人稀的缘故。但随着四川人口的日益繁盛，“土苗人稀地广”[8]且矿业兴起的贵州很快吸纳了邻省众多富余人口。在19世纪中期的文献中，该省已被描绘成：

至于各属居民，土著甚少，半多江楚川滇民人，客久成籍。[9]

即迁客行商寄居者，亦复不少。[10]

黔西北同样是移民的重要接收地。今天该地区的许多汉人都声称自己是清代移居者的后代，家谱对此有所反映。如金鸡彭氏在清初由蜀入黔，在大定府悦服里的德初土目家教读，后创业于金鸡，“报亩入册”。[11]《陈氏族谱》称先祖明末清初来到平远州，康熙二十三年（1684）向大定府交地价银，获得开垦执照，垦田定居。[12]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大桥头则被众多移民追认为祖籍地。如胡氏于康熙三十九年自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大桥头木匠街迁至平远州吉普，从事木工，兼营农业，逐渐分迁至织金、大方、黔西三县的十余个乡镇。[13]大方姚氏亦声称自己祖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其中鼎新则溪支系住在大桥头，于清代来到了大定府。[14]有意思的是，一些彝族在伪报汉人身份时，亦称祖籍是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大桥头。[15]

这些真真假假的记载与故事折射出了清代黔西北的移民潮。时人的叙述可与此相印证，贵州巡抚爱必达称：

（大定府）关厢内外多豫章荆楚客民，乡则夷多汉少。[16]

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行的《黔南职方纪略》记载了全省移民数字，但该书所反映的可能是道光初年的情形。道光二年，麋奇瑜任贵州布政使时，曾奏请编查通省客居汉民户口。后来贵州布政使罗绕典发现了这批人口资料，于是将其整理出版，并根据地方志补上已散失的遵义、思州、仁怀等地的资料，定名为《黔南职方纪略》（以下简称《纪略》）。[17]该书把客民分为有产客民、无产客民、居住城乡各场市不填丁口客民三种，现将大定府的数据制成表7-1。

表7-1 道光初年官府登记的大定府客民数

单位：户

地区	有产客民	无产客民	居住城乡各场市不填丁口客民	合计
府亲辖地	2243	212	430	2885
水城厅	439	284	29	752
威宁州	3605	887	10	4502
平远州	150	238	34	422
黔西州	516	503	无	1019
毕节县	无	468	无	468
总计	6953	2592	503	10048

资料来源：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3《大定府》。

曹树基在研究清代贵州“自由迁入移民（与黔东南一带的军屯移民相对）”时，也充分利用了《纪略》。他提到，贵阳府的明代客民“今日皆

成土著”，曹氏据此认定《纪略》中省城的“客民”全是清代移入。他进而假定其他地区的情况与贵阳府相似，即清代两百多年间全省的移入者没有或极少成为土著，全属“客民”，并假设《纪略》能够对他们做出大致完整的统计，这样，该书中的“客民”户数就应大致等于道光以前贵州的实际移民户数，再采用“户数×户均人口”的办法便可建构从清初迄道光黔省非军事移民的大致数量。[18]

在曹氏的基础之上，本书拟对清中期以前黔西北的移民情况展开进一步的研究。首先必须明确，《纪略》所载“客民”数能否反映道光之前的清代非军事移民规模？该书卷一提到，安顺府归化厅的“客民”有成为土著，“聚族结寨而居者”，清人李宗昉亦称：

凡他省人客黔，娶妻生子，名“转窝子”，转窝所生名“门斗子”，再传则土人也。转读去声，江西人犹多。[19]

康熙时期编修的《平远州志》亦云：

自康熙三年讨平安氏，建郡建官，流氓入籍，各长子孙，渐成土著。[20]

可见土著中有不少人是清代移民，《纪略》中的“客民”只是清代移民的一部分。分析方志中的人口数据，我们对此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兹以府亲辖地为例。按乾隆《大定府志》的记载，乾隆十四年（1749），该地的汉人已高达11628户，15588口，户、口比例为1：1.34。[21]其中主要应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土著汉户及其所滋生的新户，一是移民及其后裔。但土著汉户应该是不多的，前文已表明，明代移居水西、乌撒土司辖地的汉人极少。康熙五年（1666），大定府知府宁云鹏尚感叹“城内居民觧少，惟卒伍比户而居，夷民散处山中，僻就耕耨”，因此原有汉户相当少，户、口比例亦显示移民社会初期家庭规模小的特征。[22]在此不惮烦琐，再引证一段材料：

大定自康熙三年平定以来，士民皆外省流寓，土著旧民，不数户焉。犹是汉多夷少。[23]

因为土著汉户极少，如果我们对之忽略不计，则府志中所载府亲辖地的11628户汉户，大致可理解为清代的移民，这一数量远远超过了70多年后《纪略》所载的2285户客民数。如果我们夸大清初土著汉户的数量，以2000户计（其实绝不可能有这么多），根据曹树基所推测的大定府8.7‰的汉户年均自然增长率，[24]到乾隆十四年（1749）可达到4104户，移民户则应有7524（11628-4104＝7524）户，同样远远超过《纪略》所载的“客民”数量。

总之，《纪略》所反映的可能只是乾隆后期至道光初年的移民情形，清代移民的实际规模远远超过了该书的描述，这对整个贵州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一线之外，四面皆夷”，“土苗人稀地广”状况成为历史，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人口密度相当高的社会逐渐被塑造出来。

下文将对此进行量化评估。

乾隆初年起清廷开始清查全国人口，据皇帝本人的说法，其目的是“验闾阎繁庶之征”，而非增税或均税，[25]因为与赋役等负担没有关联，有意规避登记的人口应不多，学界亦公认这一时期的人口数字有相当高的可靠性。[26]黔西北地区最早的数据出现于乾隆十四年，当时大定府亲辖地（即原来的大定府、大定州）的户口数为：汉户11628户，男妇15588口；苗户（包括黑罗罗、白罗罗、革佬、木老、仲家、宋家、蔡家、侬家、苗子、羿子等）共9780户，男妇30845口。[27]较之清初汉人稀少的状况，此时的汉民口数已相当于原住民的一半，黔西北人口的族类构成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造报户口无疑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特别是原住民由于文化与历史的原因同官府非常疏离，对他们进行清查尤为艰难。因此贵州漏报户口特别是原住民户口的情况相当严重，乾隆四十一年，贵州巡抚裴宗锡曾奏请对此加以改革：

臣查黔省地处苗疆，在在汉苗杂处……滋生日盛，向来岁报民数有仅报汉民并无苗民者，亦有仅报苗民并无汉民者，甚有汉苗民数全不造报者，率略相沿，由来已久……严饬确查实在户口数目，分别汉苗，一体开报。[28]

这一建议遭到朝廷拒绝，乾隆皇帝谕称：

各省岁报民数，用以验闾阎繁庶之征，原止就内地编氓而言，其边徼苗猺本不在此列，只应以镇静抚驭为主。伊等寄居峒处，滋息相安，不知有造报户口之事，忽见地方有司逐户稽查，汉苗悉登名册，必致猜惧惊惶，罔知所措。甚或吏胥保长借此扰累，致滋事端，于绥缉苗疆之道甚有关系，断不可行。着传谕裴宗锡，所有汉苗一体查造之处即速停止。[29]

这一指示在许多地方得到贯彻，但大定府亲辖地、平远州等地依然汉苗一体造报，见表7-2。

表**7-2 1840**年代大定府的户、口数

州、厅名	汉户	“夷”户	汉口	“夷”口
府亲辖地	27193	17831	133270	86980
水城厅	7121	无记载	29906	无记载
黔西州	28907	无记载	125305	无记载
毕节县	15862	无记载	84339	无记载
威宁州	15294	无记载	87569	无记载
平远州	11145		44350	

注：这些数据大都是道光二十六（1846）、二十七、二十八年的调查，只有水城厅是道光十六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道光《大定府志》卷40《食货略·户口丁银》。

或许直到清朝覆亡，黔西、毕节、威宁等地的原住民户口都是一个未知数，光绪时编修的《水城厅采访册》尚称：

水城汉夷杂处，遵照章程，止清客户，不清夷户，恐夷民猜疑惊惧也。[30]

通过简单的计算可得出，府亲辖地的汉户户、口比例为1：4.9（其他地区的户、口比例亦与此相似），较之乾隆十四年（1749）的1：1.34，家庭规模无疑“正常”得多，这可能意味着道光以降移民潮已渐趋平息，先前的移入者已正常定居、繁衍。

从乾隆十四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府亲辖地的原住民从30845口增至86980口，年增长率高达1%，这或许可视为自然的人口滋生。汉人的增加则更为迅速，乾隆十四年时汉人口数为15588，大致为原住民的一半，如果按照1%的速度，到道光二十七年应达到41331口，但实际的人数多达133270口，相当于原住民的1.53倍，其中有大约9万人可视作乾隆十四年后的新移民及其所繁衍的人口。这一数据远远超过《纪略》中大定府亲辖地的客民数。[31]“夷多汉少”的格局在府亲辖地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因为数据的失载，不可能对其他地区进行量化分析，但毕节县本系卫所，汉民占优势自无疑义，威宁半系卫所，加上移民，汉民似亦较原住民为多，其他州、厅的情况则难以判断。不过，在移民运动已暂告一段落的道光时期，汉民人数的绝对优势地位尚未完全体现出来。要理解今天黔西北地区汉族在人口中的高比例，[32]还必须研究咸丰、同治年间的贵州“苗变”，这是黔省原住民同中央王朝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力较量，其结果是汉民与原住民的人口都遭受了重大损失，移民潮流再次掀起，平叛后的安插“夷民”对省内的人口分布亦是一次重要调整。[33]总之，“咸、同苗变”是贵州人口史上的又一次关键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省人口的族类构成。不过本书不打算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清初以来的移民运动彻底改变了黔西北人烟稀少的面貌，对今天的人口状况有着深远的影响。据1987年的统计，毕节地区平均人口密度为208人/km²，而同期全省的人口密度仅为174人/km²。[34]人口密度位居全省前列的局面应该是清代以来形成的。如果仅考虑今天该地区在贵州经济排行榜上的位置，我们对此将难以理解。黔西北高原为贵州地势最高处，座座山峰拔地而起，使得整个高原面崎岖不平，无“原”可言，山间盆地（俗称坝子，是贵州重要的产粮区）数量稀少，面积狭窄，是全省交通最落后、农业条件最差同时也是最贫困的地方。这一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地区何以能够吸引并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答案是极其复杂的，其中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清代这一地区所提供的谋生机会不会比贵州省的其他地方少。下文将讨论矿业的兴盛、农耕的发展及其与移民潮的互动关系。

第二节 黔西北矿业的发展及其对全国的影响

一 黔西北的铜铅产量

似乎是相信开矿与地方社会的失序有紧密联系以及担忧扰民等原因，明代许多官员乃至皇帝对此事都持审慎态度。[35]为反对明神宗积极遣使寻找矿源的活动，河南巡按姚思仁曾总结了开采的八大弊病。[36]即使是对开矿情有独钟的神宗皇帝，也因不愿看到“棍恶夷汉盘据为乱”的情形而驳斥毕节、乌撒二卫军民王应星等奏请开铅厂的请求。[37]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土官同样反对朝廷开采自己领地内的矿藏，乌撒土知府安效良对开厂的反对即是一例。[38]

在这种背景之下，贵州丰富的矿产仅有铜仁府一带的水银与朱砂得到有效开发，黔西北地区的矿藏几乎不被朝廷重视，天生桥、稻田坝、奈童场等银矿似乎曾经开采，旋因“矿脉细微，且密迩夷境，恐生边患”而予以封闭。[39]但某些原住民与卫所官兵无疑已从开矿中获利，包汝楫称水西安氏“国中甚富，有水银坑二处，岁获银亿万”。[40]正统年间的乌撒卫都指挥佥事干羽则因“役军盗矿”而遭到惩罚。[41]天启年间，因为军饷匮乏，贵州提学佥事刘锡玄曾建议开挖奉旨封闭的乌撒天生桥银厂，并向水西安氏所辖的水银厂征税。[42]不过当时正值奢安之变，迨动乱平息，明亦旋亡，这些措施似乎没有真正付诸实施。

清初沿袭明代的矿业思想，轻言矿利。围绕是否弛禁矿山的主题，各级官员的争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虽然因为财政、军饷的困扰，朝廷常有寻矿、开矿的举动，但时禁时开，皇帝、官员对地方社会秩序稳定的担忧之情常常见诸各种公文与著述中。[43]

但官府的疑虑并不能真正阻止民间私开矿山的行为。雍正时期似乎承认了许多私采活动，将其合法化，纳入官方的管理中，征收赋税。

[44]乾隆皇帝对矿业的态度更为开明。在他继位的第三年，贵州总督张广泗曾疏请封闭大定府属之马鬃岭铅厂，原因是该厂“洞老山空，炉民日渐稀少”。[45]三年后，张广泗又以同样的理由请求封闭威宁府属之白蜡厂银矿。[46]在这两个例子中，开矿与地方社会秩序的关联已不再被强调，[47]请求闭矿的理由集中在蕴含量是否丰裕等问题上。[48]这种变化与乾隆皇帝的战略有关，事实上，从1680年代到1770年代，中国矿业在一百年间的增长率能够大大超过此前两千年，[49]各朝皇帝特别是乾隆皇帝的推动是一个重要因素。据《清史稿》，乾隆继位之初即谕令弛禁：

凡产铜山场，实有裨鼓铸，准报开采。其金银矿悉行封闭。[50]

鼓铸即铸钱。其实，银矿的开采同样得到鼓励。乾隆二年（1737），贵州提督王无党奏称：

夷地开厂，米粮食物垄断丛奸。铜、铅二项为铸局所需，自不可禁，银、锡等厂，宜因地因时以为开闭。

乾隆帝对此不以为然：

据云铜、铅为铸局所需，不可禁，则银、锡亦九币之一，其可即行禁采乎？且禁银、锡之厂，则为此者，将转而求之铜、铅之厂矣！游手耗食之人如故也。此奏虽是，而未通权。[51]

君臣二人的对白揭示出，清廷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矿产品本身，寻找货币材料、扩大货币供应量才是最为迫切的问题。[52]其背景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晚期生机勃勃的中国经济，这一时期的农业、官私手工业都迈上了新的高度，国内、国际市场也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发展。[53]不断增长的人口与扩大的市场，意味着相应的增加货币供给的需求。[54]1644～1830年间，通过对外贸易的出超，中国的白银存量增加了两倍，并且每年可能有上千万的西班牙银元流入福建沿海。铜钱作为另一种货币，有其特定的流通场合与范围，对清王朝同样至关重要，海禁解除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铜钱数量跟不上白银的增长，导致钱价上升，这成为当时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55]有学者指出，18世纪，中国的人口与可耕地都翻了一番，但大多数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仍然主要是零星交易，而支持这类零星交易的等价物就是铜钱。[56]与白银不同的是，自雍正晚期以后，铜钱就主要靠国内矿业来支持。所谓铜钱，其实是铜、铅（即锌，文献上称为白铅）合铸，最初是铜七铅三，康熙二十三年（1684）后改为铜六铅四。乾隆五年（1740）后又掺入少量的黑铅（即铅，文献上称为黑铅）、锡铸造青钱，但铜六铅四依然占据了主体地位。[57]前所未有的铜铅矿业兴旺，正是康乾盛世的表征之一。

矿产对盛世的促进并不仅仅体现在货币上，清王朝的武功可谓极一时之盛，使我们不能过于忽略清军装备的改善——火器的大量运用。[58]史称：

清代以弧矢定天下，而威远攻坚，亦资火器。故京营有火器营、鸟枪兵之制，屡命各省防军参用枪炮。[59]

清代宫廷中有鸟枪处，京城一带先后设有汉军火器营、八旗火器营、内火器营、外火器营，并且每个行省都有不少使用抬枪、鸟枪的兵弁，沿江、沿海、沿边等要害处炮台林立。雍正时期似乎有许多满洲人沉湎于火器，以至朝廷担心他们荒疏了骑射。乾隆五十年进一步命令各省旧式藤牌兵兼习鸟枪，并要求军机大臣会同兵部，审定演放炮位步数及惩劝之例。[60]

火器的运用与矿业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枪、炮的铸造离不开铜、铁，（黑）铅子则是最常用的弹丸，工部专门设有铅子库。为了节约铅弹，清初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平常演练多放空枪。雍正七年（1729）令各营“以铅子演准”，但要求士兵演枪时尽量捡回铅子。[61]

正是在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以对矿产的强烈需求为动因，黔西北地区无论在地理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成为国家的战略要地，同内地的联系与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水西、乌撒的崇山峻岭中埋藏着多种货币、军器材料，如银、铜、铅、铁等，清初的改土归流从制度上为中央王朝取用这些宝藏创造了条件。康熙前期战事频仍，为了筹集军饷，朝廷曾下令寻找矿源，但贵州巡抚杨雍建却声称未发现何处可产铜铅，康熙二十一年（1682）、二十三年，他先后奏称：

黔地不产铜铅，所属各府州县苗多汉少，不谙使钱。其废铜贼钱，自恢复以来，远方商贩陆续赴黔，收买已尽，无从收取，难以开炉鼓铸。[62]

黔地不产红铜铅锡，已无捐助之人。[63]

直到17世纪晚期，地方官尚认为黔省不产铜铅，可见自明代以来从未有过大规模的开采。杨雍建之后的官员可能在黔西北发现了银铅等矿，并加以开发。雍正二年（1724），贵州巡抚毛文铨提到黔省威宁地区的阿都、腻书、猴子等地的银厂系经题报准开，[64]其中猴子厂系于康熙五十七年具题开采，[65]其余二厂的开采时间似亦应在雍正继位之前。除此之外，黔西北地区的银矿尚有白蜡、羊角、柞子等处。[66]总体而言，黔西北银矿远远称不上丰旺，其产品在全国流通银两中所占比例非常小，[67]铜的产量亦不突出，铅产则甲于全国。

黔西北的铜矿主要集中在威宁州。格得、八地、果木果、以朵、拖克、落州、女罗等处，至少在雍正时期已经开采。[68]而当时大定府属地已经开办马鬃岭等处铅厂。这就为铸造制钱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贵州巡抚张广泗于雍正八年奏请复开宝黔局，局址由贵阳移至毕节县城，设炉十座，每年铸钱36卯，数年后又添炉十座。[69]不过当时铜产不敷，每年须向滇省购买铜40万斤。为了刺激铜斤的生产，张广泗奏

请将果木果厂的税率从20%减至10%，即“一九抽收”。[70]乾隆六年（1741）、十六年在威宁州先后发现了规模较大的铜川河、勺录等铜矿，清廷均采用“一九抽收”的税率以资鼓励。其后数年内，铜产基本上已敷本省鼓铸之用，滇运停止。[71]二十四年钱局移至省城，在威宁铜厂兴旺的鼓舞之下，抚臣周人骥奏请加铸钱23卯，共69卯，结果铜斤又告匮乏。二十八年抚臣刘藻声称黔省鼓铸铜斤向系威宁州承办，年产仅30余万斤，不敷铸钱所需之78万余斤之数，只有向四川或云南采购。随着威宁等处铜厂的衰微，自三十五年起铸钱数又减至46卯。[72]

在黔西北，具有全国性战略意义的当数铅（含白铅与黑铅）矿。根据马琦的研究，在清代不同的时期，黔铅约占全国铅总产量的67%~84%不等。[73]清人所编《皇朝政典类纂》（以下简称《类纂》），曾列出全国最主要的几个铅产基地的年产量（见表7-3）。

表7-3 清代晚期全国主要铅产基地的产量

单位：万斤

地名	贵州	云南	广西	湖南	四川	广东	合计
白铅产量	669.62	51.34	22.33	20.81	18.97	1.2	784.27
黑铅产量	104	3.9	6.12	8.21	9.84	无	132.07
小计	773.62	55.24	28.45	29.02	28.81	1.2	916.34

资料来源:《皇朝政典类纂》卷 132《矿政二 · 厂课》。

《类纂》称材料来自会典，但笔者在清代历朝会典中尚未发现相应记载。笔者以为，《类纂》所列举的产量可能只是清代晚期的情形，并且其数据亦有不确之处。[74]在18世纪矿业全盛之时，全国每年的铅产量要比上表高得多，黔铅曾维持1400万斤的年产量近20年，[75]即便黔西北一地的每年所出，可能也不止916.34万斤之数。[76]不过，表7-3足已表明黔省铅矿业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贵州黑、白铅主要产自黔西北，该地较早得到开发的铅矿有柞子、大鸡、大兴、马鬃岭、齐家湾、羊角、砂朱等处，除大兴在大定，大鸡位于毕节县外，其余均在威宁，这些矿藏至少在雍正年间已被开采。[77]我们可以对当时黔西北的铅产量做一个大致的估计。雍正七年（1729），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称每年马鬃岭厂约可出铅100万斤；大鸡厂约可出铅一百五六十万斤；砂朱厂约可出铅二三十万斤；柞子厂可出铅100余万斤；[78]大兴与砂朱两厂在一年内纳课铅20.8791万斤，当时通行“二八抽收”，因此两厂年产量应为104万余斤，减去砂朱厂的约30万斤，则大兴厂年产铅74万斤；齐家湾按“二八抽收”，年纳课铅2.4万斤，产量应为12万斤。[79]仅此几厂，总产量已近500万斤，如果

加上笔者目前尚不能获悉产量的其他矿厂，这一数字应当更加可观，黔西北无疑成为全国最大的铅产基地。

自雍正晚期迄乾隆初年，大兴、大鸡、马鬃岭等厂逐渐衰落乃至封闭，[80]但规模更大的妈姑（亦名“莲花”[81]）、福集等厂开始兴旺，黔西北在全国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例如从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初一日到二十九年五月底，按照“二八抽收”的税率，政府共在妈姑厂获取课铅122.1167万斤，可见该厂的年产量已达到了610.5835万斤。妈姑厂开办于雍正十二年（1734），乾隆三十七年又将新开的倮布戛作为其子厂，[82]在开办70年后，该厂每年尚能调运白铅450万斤供应京楚。开采已达60余年的福集厂同样能提供180万斤之数。[83]福集、妈姑两大厂再加上柞子等大大小小的矿厂，黔西北铅工业在最兴旺时的年产量应达1000万斤左右。

二 矿产的调拨与运销

根据全国铸币与军用的需要，清王朝每年都对铅产进行分配与运销。目前笔者对黔铅军用的情况了解尚不多。据有关记载，贵州各营操演所用黑铅主要来自黔西北威宁州柞子厂、黎平府清平县永兴厂等。[84]自乾隆中期以来，四川军队所需黑铅基本上由黔省柞子厂供应。[85]

铜铅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金属，长期以来处于清廷的牢牢掌握之中，主导其分配与运销的力量是官府而非市场。清廷的原则是，按20%（二八抽收）的税率征税，缴税之后炉户所余产品由官府以低价收买。这一标准无疑太过苛刻，特别是许多矿埋藏较深，开采成本较大，即便易于开发的浅矿在时间长久后亦会出现“峒老砂深”的情形，因此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特别是当金属供应紧张时，往往因时因地而有所放松以刺激生产，例如降低税率，允许出卖税后所余产品的一半给商人等。黔西北的铜矿不多，浅矿较少，清廷很早就予以优惠以资鼓励。雍正八年（1730），抚臣张广泗奏称威宁果木果铜厂二八抽收，炉户不敷工本，请仿滇省汤丹厂例一九抽课。[86]乾隆六年（1741），在威宁州致化里发现了贵州最大的铜矿（疑即铜川河厂），当初议定课以20%的税率，余铜官为收买，每百斤给价七两。[87]但一年之后，立即改照该州的格得、八地二厂之例，一九抽课。[88]有清一代，黔西北并无余铜可供外调它省，抽课及收买之铜全部运至宝黔局供铸。

贵州系产铅大省，特别是黔西北富矿颇多，清廷的标准长期以来得到严格执行。雍正年间开采之初，齐家湾、砂朱等厂就定下了二八抽收的税率。[89]厂民每产铅百斤需上缴官府20斤，此为“课铅”，税后之铅称为“余铅”，理论上系由炉户自行处理。当时贵州未开钱局，“课铅”主要卖给云南钱局铸钱，每百斤铅价银1.4～1.6两不等，此项所得即“课铅变价银”。如“课铅”不敷滇省鼓铸，官员们还要购买炉户手中的部分“余铅”以补足，价格与购“课铅”相若。有的厂之铅课未经发卖，即为“存厂未变课铅”。此外，尚有“课银”一词，这主要是由于黑铅与银往往伴

生，“课银”当是对黑铅厂出产的银所征。如雍正七年四月初一日至八年三月底止，抽收威宁州柞子黑铅厂课银24328.4两，铅课变价银2189.6两，存厂未变课铅338062斤。[90]

存厂未变课铅表明，云南并不能尽数消耗贵州所征实物铅斤。并且威宁、大定等地的马鬃岭、齐家湾、砂朱、妈姑、大兴等矿日渐兴旺，岁获铅高达数百万斤，而贵州普安丁头山、云南罗平等铅矿亦经题报开采。[91]甚至大定府之毕节县开钱局后，黔铅供应二省，仍然颇多盈余。当时课铅、炉户余铅的数量越来越多，黔省官员们非常明白这对于财政以及个人收入的意义。早在宝黔局设立之前的雍正五年，他们便借帑银二万两收买马鬃岭余铅前往汉口销售，每百斤净赚银一两。[92]雍正八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贵州巡抚张广泗等以炉户未能尽快发售铅斤，造成产品积压为由，奏请将黔西北以及普安丁头山厂每年税后所余300多万斤铅发官帑尽数收买，转运自四川永宁、湖北汉口等地，销售各省。所获价银扣还原借工本，余息银两归公，“帮补本省一切养廉公费”。而供铸之后所余课铅，按每百斤价银一两五钱扣归藩库后，“听其与收买余铅一总运售”。[93]

该奏疏表达的其实是由官府控制铅斤的愿望，它剥夺了炉户通过市场处理产品的自由，并且使他们蒙受了经济上的损失，因为官方收买价格是相当低廉的。这不但保障了清王朝的货币材料供应，对黔省财政亦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当时通省每年赋税仅11万余两，各种耗羡及官庄租谷等亦只59200两，[94]余铅官收官卖无疑缓解了财政的拮据状况，并且为官员们增加了上下其手的机会。[95]

鄂尔泰等人的奏请获准后，余铅官收的政策正式确立。但官府往往会注意以下情况：首先，官方收买价对生产者的影响；其次，当产品供过于求时，尽数收买余铅是否会导致严重积压；最后，官员们还会考虑炉户自行销售时的运销活动是否会导致夫马供应紧张，以致影响铜铅京运。清王朝正是根据这些情况适时调整政策。乾隆九年（1744），为了缓解黔西北京运驿道的压力，官府改变遵义府月亮岩铅厂余铅一半通商的做法，停止炉民私销，概归官买，全由贵阳解送至京，以减少大定府京运的数量。[96]第二年，威宁州倮木底新开铅矿照莲花厂之例二八抽收，向例每百斤给价一两三钱，不敷工本，酌增一钱。[97]十四年，铅矿业进入了鼎盛时期，贵州一省的年产量便高达1400万斤，而供应北京、川、黔二省鼓铸以及运往汉口发售各省共计需900万斤，于是抚臣爱必达奏请每百斤铅抽课20斤，官买50斤，剩余30斤准商人购买。[98]乾隆四十六年，为了刺激开采年久、硐远矿深的威宁州柞子黑铅厂的生产，照乐助、新寨、兴发等厂白铅例，每百斤抽课20斤，官买40斤，通商40斤，“俾厂灶均沾余润，以裕鼓铸”。[99]五十三年，福集、莲花二厂䃚硐日深，且需雇工淘水，工费更增，原定福集厂每铅百斤价一两四钱，莲花厂一两五钱，又每百斤抽课20斤，请照滇省加增铜价例，每百斤加价三钱。[100]道光八年（1828）又允准妈姑、福集二厂降低税率，从二八抽收改为一九抽收。[101]

雍正以降，黔西北日益丰旺的铅产似乎影响到全国的铅价，并从此改变了京城铸钱局的采购方式。康熙五十四年（1715）曾议准，京城铸局额需铅3956799斤，“由部给发价银，向商人铅矿买用，每一斤定价银六分二厘五毫，水脚银三分”。[102]照此，每一百斤清廷需用银9.25两。随着市场铅价上涨，康熙六十一年每斤价银增至八分二厘五毫。[103]

黔铅的兴起，直接拉低了全国的铅价。雍正十一年（1733），供应京局铅斤的商人们因铅价平减，自愿将价格从原定每斤六分二厘五毫减至四分七厘五毫。但户、工二部的官员已经非常清楚黔西北远远领先全国的铅产量，议称：

贵州之莲花、砂朱等厂所产白铅岁不下四五百万斤，各厂定价每百斤银一两三钱，较之商办，实多节省。请自雍正十三年为始，令贵州巡抚委员照额收买，分解户、工二局。每百斤给水脚银三两，照办铜之例分为上、下两运，上运于四月起解，十月到部；下运于十月起解，次年三月到部。[104]

每百斤价银1.3两，加上水脚银3两，共4.3两，较之商办的9.25两，节省4.95两，当时京城户、工二部所开的宝泉、宝源二局岁需铅366万余斤，共节省银181170两。京局铅斤由官府采办的制度从此取代了商人买运。这一更改意味着贵州官方运售铅斤的数额较从前少了数百万斤，导致了官府公费的减少。从另一个角度看，省抚衙门同样在调取府州衙门的收入，因为转运铅斤的收入全部解送司库，府州县无权分成。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在矿业兴起之后，黔西北的地方财政依然非常拮据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出任贵西道[105]道台的清代大儒赵翼曾比较过他的仕途经历：

余出守镇安，万山中一官独尊。鼓吹日数通，出门炮声如雷。冬月巡边，舆前骑而引者凡十余，队后拥纛驺骑又十余，可谓极秀才之荣矣。……忽调广州，乃大豪富。……然仅一年，迁贵西，署在威宁万山巅。冬月极寒，下凌经月不止，弥望皆冰雪。自书吏、差役、门子、轿伞夫，皆仰食于官，否则无人执役矣。书吏行文书，每日纸几番、封几函，俱列单向官请给，天下无此贫署也。两年之间，寒暄顿异若此。[106]

赵翼在广州自然可以“大豪富”，即便在同样是清代才改土归流的“新疆”广西镇安，他也可以“极秀才之乐”，但他以更高级别的身份道员出镇黔西北的威宁时，却感受到了仕途中前所未有的清贫。

尽管如此，铅厂所在州县的财政状况还是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地矿业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因为黔西北地当川滇黔孔道，滇铜进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须借道黔西北，交通要道带动了商业兴起，官方的税收相应增加了。雍正年间威宁镇总兵石礼哈奏称：“如思南、威宁等府，黔西、大定、毕节等州县，俱有过往牛马铜盐之税并落地等税，一年俱可收八九千金至二三千金不等。”[107]同一时期的贵州

布政使刘师恕亦云："威宁府之乌撒、永宁、毕节、黔西、大定、平远等税，近因道路坦平，商贩络绎。正课之外，颇有余羡。"[108]

矿业与地方财政状况的关系从耗羡、养廉银上也可以体现出来。雍正三年（1725）八月，石礼哈奏报了黔省官员的养廉银数目，在全省12个府中，威宁府知府的养廉银为1100两，仅低于贵阳府知府（1300两），与镇远、安顺两知府并列第二。[109]威宁州是最大的铅产基地，据方志记载，其耗羡收入占了整个大定府的一半多。[110]

乾隆八年（1743），京局加卯鼓铸，议定贵州所办铅额增至510万余斤。[111]除供应京局外，贵州还担负着供应其他省份鼓铸或军事所需铅斤的任务，通常是从黔西北运至湖北汉口发售各省——主要是江南九省，所以又称"楚运"，与"京运"相对。"楚运"属官府控制下的商品销售，黔省官员从威宁等地以每百斤一两三钱至一两五钱收买余铅，到汉口后通常以五两的价格出售。[112]这是鄂尔泰、张广泗等官员首创的办法。有清一代，京、楚二运大体上在700万斤以上，基本上由黔西北的矿厂供办，[113]下文对此将有更详细的说明。

先谈黑铅的情况。清代的铅产以白铅为主，黑铅厂只有寥寥几处，且产量不大。威宁州的柞子厂是最大的黑铅生产基地，湖南的郴、桂二州亦较为著名，此外，大定府属平远州的达磨厂、思州府属之枫香厂亦有出产。[114]铸币所需黑铅并不多，所谓铜七铅三、铜六铅四等系指白铅与铜的比例。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黑铅的需求并不大。例如威宁柞子厂黑铅，开始亦照白铅例，由官府收买，动支银9279两余，作收买工本。但获息甚少，行销甚难，不得不终止。[115]

自乾隆五年（1740）起，为了防止将钱改铸器皿，[116]京局开始配铸青钱，其成分是：红铜50斤配白铅41.5斤、黑铅6.5斤、点锡2斤，据说这种钱熔铸成器皿后一击即碎。青钱引起了对黑铅需求的增长，于是议定贵州大定府威宁州的柞子厂岁供京局黑铅50万斤，黔省岁办白铅相应减少50万斤。乾隆七年，京局加卯鼓铸，令贵州加运白铅125万斤，黑铅200571斤。[117]

青钱一直未能广为流通，黑铅产量的制约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年供七十万余斤对柞子厂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乾隆八年，该厂已经"矿砂较薄，工本较重"，朝廷一面将收买价从每百斤1.2两加至1.5两，以刺激生产，一面又减去该厂办运定额，令湖南承办30万斤。到十三年，京局黑铅全归湖南郴、桂二厂办解。二十九年，湘抚乔光烈奏称郴厂因硐老矿竭而封闭，于是贵州又额办黑铅35万斤。[118]四十年威宁无铅可运，于是归湖南全数承办。但四十六年又发现了新的矿引，抚臣李本奏请实行优惠政策刺激生产，[119]京运很快恢复。自四十九年始，威宁铅厂再次承担一半京运任务，并且很快增至50万斤，运至四川永宁，作为底铅，供应北京及各省。五十九年，议定京局鼓铸改为红铜六成、白铅四成，黑铅相应停止办解。但嘉庆四年（1799）又恢复"三色配铸"，黔、湘二省照原额供应黑铅。[120]据嘉庆八年抚臣福庆的奏折，当时贵州京

运黑铅额数为47万余斤。[121]

与黑铅不同，黔西北的白铅产量极为丰旺，可以从容供应京局及许多行省鼓铸所需铅斤。但从交通方面考虑，由黔西北供应京局并非最佳选择，不但路途险远，夫马供应亦相当困难（详后）。我们不难理解官员们时时想利用其他铅矿分担京运任务的举动。官府采办制度确立之初，以威宁州的莲花、砂朱二厂为主体，此外办运京局的尚有湘铅，雍正十三年（1735）以湖南铅厂矿砂渐微，题请暂行封闭，“其京局鼓铸，全用黔铅”。[122]乾隆五年（1740），遵义府绥阳县月亮岩兴旺，每年收买连抽课可获铅百万余斤，于是从月亮岩分路解运京铅，莲、砂二厂每年仍然要承办两百多万斤。[123]月亮岩很快衰落，十四年时官员们已经疏称该处铁星坪厂“硐老山空，炉民星散”，但大定府属水城厅之福集厂已经兴起，于是解京任务落实在莲花、砂朱、福集三厂上。二十四年砂朱厂停采，由莲、福二厂办运京铅。[124]此后直到四十二年，官员们尚称“京、楚两项，俱取给于威宁州属之莲花、水城厅属之福集厂，历年办运，固无贻误”。不过当时已发现遵义府所属新寨大铅矿，而新寨至重庆路途较易，从川、黔接壤的二郎滩起全是水路，于是议定新寨参与供应京铅，年拨解110万斤，莲花、福集二厂相应减运。[125]然而新寨厂同样不能持久，莲花厂亦因开采年久而衰落。嘉庆年间的贵州巡抚鄂元布奏称：

黔省每年额办京、楚、川及本省鼓铸铅八百余万斤，系在妈姑厂每年额办铅四百五十万斤，福集厂每年额办铅一百八十余万斤，从前有新寨、架勒、连发等厂同时兴旺，且有积铅，是以历年供兑，均无贻误。嗣因新寨等厂出铅衰薄，陆续详请关闭，额需不敷，经前臬司贺长庚于嘉庆元年详明，妈姑厂除正额外每年加办铅一百三十万斤，福集厂除正额外每年加办铅四十万斤。嗣后妈姑厂仅据威宁州郑五典、贵西道吕云栋、伊汤安领过嘉庆五、六、七年加办铅为一百三十余万斤，福集厂仅据水城通判元靖领过嘉庆五年加办铅四十万斤，均未采办足额……今妈姑、福集两厂，自嘉庆六年、八年以来，除加额铅斤未经领办，福集厂已缺办正额铅三百余万斤。[126]

新寨、连发等大矿陆续封闭，福集厂也不能完成定额。其实早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贵州巡抚李庆棻已在抱怨福集、莲花（妈姑）等厂开采日渐艰难，必须提高炉户工本，以便刺激生产。[127]嘉庆八年（1803），湖南郴、桂二州出产铅斤“递形短缩”，贵州威宁、平远等地的黑铅厂要么已经封闭，要么日形竭蹶。[128]道光四年（1824）甚至出现了因矿产不旺而导致的“炉户缴铅濡滞”现象。[129]清代的铅矿业，经过18世纪中期的鼎盛，到该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已经开始衰落了。

三 铜、铅运道

黔西北是清代最大的铅产基地，通过京、楚二运，每年七八百万斤黑、白铅从此地起解，马驮人背，经过崎岖不平的山间驿道，经毕节县

运至四川永宁，然后在此地上船，沿永宁河驶入长江，一路东下，直抵汉口，这里是楚运的终点；京运铅斤从汉口继续北上，向京城进发。除了这些官方的运销外，尚有商人的贩运活动。因为每年产量很大，官府无法收尽并卖出所有余铅，所以允许部分余铅通商，同时运售食盐等货物的商贩亦有不少。

此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滇铜进京必须借道大定府的威宁州，然后沿黔铅京运路线经毕节县、四川永宁、湖北汉口抵京。其他各省赴滇购铜亦需经由威宁，乾隆初这里云集着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四省的承办铜斤人员。[130]黔西北驿道，关系着全国的币材供应，堪称清王朝的一条经济生命线，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与繁忙起来。乾隆七年（1742），贵州总督兼巡抚张广泗奏称：

……黔属威宁州地方，上至滇省交界之三家村，下至毕节县以至川省交界之赤水河而达永宁县，系三省通衢，凡桥梁道路偶遇有损坏之处，从前原系地方官自行随时修补。自黔省办运京局铅斤以后，人马经由较多于前，道路易于坍塌，地方官不能捐修，即另委杂职人员时时查勘，遇有难以行走之处，量拨本省充公银两前往修补，姑尚易于为力。迨至滇省办解运京铜斤，人马众多，往来转运，数倍于昔，非大加修补不可。先经会同滇省议将自东川府起至滇黔交界之三家村止，系滇省委员修理。自三家村起自威宁州止，系黔省委员修理。此段山势平衍，可通车运，现在通行无阻，即提臣潘绍周所云由云南以至威宁道路稍平犹易行走之处也。自威宁州由毕节县赤水河以达川省之永宁县，计程一十四站，则系崇山峻岭，亦诚如提臣潘绍周所云云雾弥天，淫雨不绝。曩因土路泥泞，砌成石道，年久土路既多坑陷，石路又被雨水冲塌。臣查土路尚易修理，而石路绵长，如逐段拆修，所费不赀。且滇黔两省解京铜铅同途并运，加以各省采买铜铅均由此路拨运，更兼以商贾行旅往来不绝，既无他途行走，只此一路，甫经修平遽遭践踏，旋修旋坏，徒滋靡费。[131]

如何维持驿路畅通，保证京局及其他省的鼓铸成了各级官员必须关心的一件大事，除了运务繁忙以致道路随修随坏外，夫马供应艰难同样令人头疼。矿业不仅使大量百姓可以通过开采、冶炼谋生，并且为许多人提供了从事运输业的机会，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组织，头领称为“马柜”，马柜直接与官府打交道，由其总领运费，分发各脚户。每百斤一般给运脚银一两五钱，有时由于马柜的侵吞，脚户所获极为鲜薄。[132]

因为铜铅的数量太大，夫、马常常穷于应付，于是在运输最繁忙时远离运道的州县亦被要求雇拨夫马协济，如黔西州必须帮助地处运铅总路的毕节县。这种“协济”不仅仅是一种官府的雇佣行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强制性的差役。或许是地遥路远，而脚费又遭官府克扣，黔西州百姓有时情愿“凑银帮贴”，而不愿亲身应役。乾隆四十一年（1776）州牧谭秀侪因支持州民的行为而被革职。[133]

尽管有其他州县协济，但夫马供应仍然相当紧张。“威宁以下又当三

省通衢，不能多雇驮脚”。[134]乾隆三年，为了纾缓夫马不敷的压力，清廷不得不命令黔省铅斤停运一年，而在此之前的头一年，官员们已将正耗铅斤改由贵阳直运楚省解京。[135]

清廷很早就着手解决运道易损、夫马艰难的难题，分道运输是最主要的办法。乾隆四年，开辟了东川—镇雄—永宁驿道，于是京铜两路办运，威宁一路，实运316万余斤，[136]仍与黔铅同路，“马匹仍属不敷”。十四年，金沙江河道开通，铜斤从寻甸等地运贮威宁后，再雇夫马驮载至罗星渡上船，直抵四川泸州。[137]这样，滇铜、黔铅在威宁分路，沿不同运道进入长江。但在上船之前均需在威宁雇运马匹，威宁至罗星渡十站，每马一匹驮载168斤，给脚价银2.06两。威宁同时还承担着铅运任务，马匹供应相当紧张，大概在乾隆四十八年将铜店移至云南镇雄州。[138]

除了开辟新路办运滇铜外，官员们还试图在黔西北境内新辟驿道分运铅斤。最初的运道大概与今天的毕（节）—威（宁）公路相合，横跨今毕节、赫章二县交界的六冲河七星关，此地相传为蜀相孔明征孟获时祀七星处，故名。这是连接水西、乌撒前往云南的要道，从明初开始便修建铁索桥或木桥。入清以后，滇铜黔铅，途经此处，络绎不绝，木桥极易毁坏，频繁的修复工作令官员们大伤脑筋。[139]乾隆初年大定知府牛天申、威宁知州李有先等重勘新路一条，经毕节县属之木瓜冲、天生桥、梅子沟等地抵达威宁，道路较平，且绕过了七星关，于是贵州总督兼巡抚张广泗奏请一面整修旧路，一面启用新路，两道并行。[140]

铅运的紧张还使跬步皆山的黔西北首次开通了水运。乾隆十年（1745），张广泗疏称：

黔省威宁、大定等府州县，崇山峻岭，不通舟楫，所产铜、铅，陆运维艰，合之滇省运京铜，每年千余万斤，皆取道于威宁、毕节，驮马短少，趱运不前。查有大定府毕节县属之赤水河，下接遵义府仁怀县属之猿猱地方，若将此河开凿通舟，即可顺流直达四川重庆水次。委员勘估，水程五百余里，计应开修大小六十八滩，约需银四万七千余两。此河开通，每年可省脚价一万三四千两，以三年余之节省，即可抵补开河工费。再黔省食盐，例销川引，若开修赤水河，盐船亦可通行，盐价立见平减。大定、威宁等处，即偶遇丰歉不齐，川米可以运济，实为黔省无穷之利。[141]

赤水河为川、黔两省的界河，疏浚工程结束后，滇铜、黔铅运至黔省边境即可上船。工程实际所用银为3.8万余两，官员们估计两年即可从节省的运费赚回此数。这一估计无疑太过乐观，从十一年六月开通后到十五年正月，仅节省水脚银1.4万余两。[142]赤水河工程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使川盐入黔变得更加便捷，《仁怀厅志》称：

乾隆初，开赤水河，盐艄直抵茅台，于是盐价减而盐引增。[143]

但河道开修并非一劳永逸之事，[144]或许是当初疏浚未彻底，并且维护不力，乾隆十九年时官员们已声称河道险阻，大家更愿选择陆运。[145]后来此河甚至废弃不用，直到光绪四年（1878）才重新开凿，[146]因此不能过高估计赤水河工程对黔西北乃至整个贵州社会的意义。乾隆二十四年（1759），黔抚周人骥又奏请开浚贵阳附近的南明河以便运铅，[147]但最后被证明徒劳无益，周人骥由此被革职。[148]

从主要铅产地威宁州与水城厅将铅陆运至四川永宁上船，起初全系该州、厅的官员负责，由于路途遥远，“马易疲毙”。因此解运官自发采取分段承运的办法，在毕节县暂停，另雇夫马接运。但因毕节非其所辖，往往会出现“呼应不灵”的情况。乾隆二十九年，贵州巡抚刘藻采取措施将分段承运的办法制度化，奏请铅运至毕节后，交给上级官府大定府，由该府经管督催至永宁。[149]但大定府显然不堪重负，七年后即因“驮马稀少，中途交卸，转多迟滞”，仍令威宁、水城二处直送永宁。四十六年，重新改为毕节县中途接运。[150]

官员们还采用了其他办法缓解京运压力，如上文已提到的铅斤停运、绕道贵阳等，但这些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开发其他地区的铅矿，从而分担黔西北的京运压力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如遵义府的月亮岩铅厂就曾承担每年一百万斤的任务，由贵阳运汉口。但这些铅矿产量相对较小，且不能持久，所以黔西北驿路在清代始终是一条极为繁忙的运道。

四 铜、铅、盐、政府与市场

自17世纪晚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清王朝对矿产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矿禁逐渐松弛，除了将以前私开的矿厂合法化外，清廷还鼓励地方官与商民寻找矿源。由于改土归流使国家行政力量深入了黔西北地区，所以这一新政策能够有效刺激该地区铜、铅等矿的开采，其中铅的产量在全国遥遥领先。大量的铅产平抑了铅价，为黔省开辟了新的财源，并使京局的采购方式从市场（向商人购买）转向官府调拨，而众多行省亦依赖楚运黔铅进行鼓铸，再加上滇铜出省必须借道威宁、毕节等地，黔西北地区前所未有地变得重要起来，整修驿路、开辟新道成了地方政府的一件大事，黔西北与内地更加紧密地整合为一体。

这一宏伟变迁的背后，政府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官府每年以低价从炉户处收买大量余铅，运赴永宁、汉口发售各省，所获作为公帑运贮司库，用于养廉及办公开销。自雍正晚期起，这一利润被中央以调拨铅斤的方式分享。楚运铅斤似乎在永宁、汉口一带进入了市场，这是在黔省官府的操纵下实现的，并且其销售对象主要是各省前来采购货币材料的官员。在黔西北从事生产的众多矿丁炉户和市场的关系并不大，他们得到的主要是官方付给的低廉售价。

从乾隆十四年（1749）开始，在繁忙的黔西北驿道上奔波的，除了

铜铅的采办官、押运官以及运夫、马匹外，应该还有各类采购铅、铜的商贩——威宁、水城等铅厂的丰旺，使得政府允许部分余铅通商，而赴滇购铜的商人往往途经此地。又因为黔西北是川盐入黔的重要通道之一（详后），所以往来贩运的盐贩自当不少。由于材料的阙如，我们难以得知铅商是否将其他商品输入了大定府，也无法论述部分余铅商买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黔西北与全国市场的联系。

从逻辑上考虑，铅是黔西北输出的最主要产品，输入品则以盐为大宗，这两种货物之间似乎应存在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交换关系。为了分析这一问题，必须对黔省盐政做一简要论述。贵州素不产盐，明代水西、乌撒之地并非王朝“版图”，游离于王朝的食盐运销制度之外，其盐业情况不得而知。清代的大部分时期，贵州除黔东南古州一带食粤盐，镇远、铜仁、思州三府听民就便买食淮盐外，其余各地全系食川盐。川盐入黔道路主要有两条，一由四川永宁县运至赤水河入黔西北的毕节县，再由此转运上游各府销售；一由蜀省合江县运至遵义府属仁怀县茅台村，再转运下游各府销售。[151]与全国其他地方相较，贵州盐政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这里没有在官府注册登记的盐商，没有额定的应销引数，没有法定的专卖地点。康熙二十五年（1686），黔抚慕天颜题称：

至黔属各府、州、县、卫所分销盐引细数，经臣屡次驳查，坚称黔地在万山之中，所食盐斤原系商人随地发卖行销，引票多寡盈缩，原无一定。考诸明季《会典》，止载两淮官盐听商人于贵州地方货卖承载，行销川滇二处，盐引定额，或因蛮乡荒瘠，难比他省计户按口限额行销，亦未定。其《盐法》一书，黔省未有颁行，而一切文案悉兵燹毁失，实无凭稽考。[152]

雍正十二年（1734），川陕总督黄廷桂等试图在黔省推行计口派引、设埠卖盐的办法，引起了一场大辩论，结果仍然维持了原有状况。[153]乾隆晚期黔抚额春奏称：

臣查川省行销黔省盐斤，系川商由叙永、合江、彭水、涪州、綦江各州县照验，换给引纸，运至黔省连界处所贮店发卖，听小贩接买行销，其盐厂引张即在川省截缴……臣细加查察，黔省卖盐小贩皆系背负肩挑，分赴各府厅州县场集零星售卖，以资食用，随地均有关隘盘验，照例完税，并无一定界址，非若他省按引食盐，有不准越界买食之例，所以黔省从无缉私之事。[154]

《大定府志》亦载：

贵州各府，近湖广者食淮盐，近四川者食川盐。不通商，不颁引，小民就近负贩，而输税于官。[155]

显然，长期以来黔省通行的并非官府干预过多的专商引岸制，而是一种自由运销制。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值得思索，贵州布政使冯光裕等称：

黔省地瘠民贫，夷多汉少，夷民食盐在可有可无之间，家道稍丰者向商贾买盐以资食用，其穷夷则概食山菜所酿辛酸之物，或曰辣子，或曰酸浆，竟不食盐。黔省夷苗穷困者多，且黔地跬步皆山，舟车不通，并无富商大贾，不过穷民谋生，肩挑背负，或养一二牛马，从川省富顺等处驮盐至本地贩卖，少觅蝇头。视天时之晴雨，较农务之忙隙以为贵贱，原无一定之价，亦无过为低昂之时，愿买者听之，不愿买亦不能强。今若计口授盐，按地行引，势必招商领运，设店开行，其一切人工火食费用必多，盐价必增，是黔省夷民先受食贵盐之累矣。贵则贫民买食，势更不能行销矣，且既定引认额，官顾考成，必加催比，夷民又受催比之累矣。催比不行，势必派散计口受食，夷民又有压派烟户之累矣。[156]

类似的议论非常多，冯光裕的看法代表了一种普遍观点。长期以来，黔人（特别是原住民）不吃盐或少吃盐早就引起了官员们的注意，明人江盈科《黔中杂诗》中就有“鱼盐便是珍奇味，那得侯鲭比尚方”的记载，[157]乾隆五十七年（1792）典试贵州的蒋攸铦亦提到土著民用蕨灰替代食盐：“（苗人）醅菜珍同旨蓄藏，无盐巧用蕨灰香。”[158]正是黔省的贫困与落后，许多黔民无力购盐才使得官府放弃了计口派引、设埠卖盐的方法，[159]使商贩们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自由贩卖。这些商贩大都是本地普通小民，并非专业商人，本小利微，其中有许多还是居住在山箐中的原住民，[160]很难设想他们能够有资本贩运分量沉重、价值不菲的铅斤。《大定志稿略》称：

大方之民，幼者十二三，老者五六十，无不以负盐为业也。数步而肩换，三里而息喘，日食玉黍蜀之爆花，夜眠粗白菅之短席。一生无被，终岁衣缕。头鲜布巾，足惟草履。……此亦生民之奇苦者也。[161]

这些小贩赴川买盐时甚至没有携带任何货物。清代文献对此缺乏记载，但民国的情况或许有一定参考作用，与清代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食盐采购与售卖已经被有钱、有枪的权贵把持——至少黔西北是这样。他们雇用贫穷百姓作背夫，这些背夫在荷枪实弹的解夫的监督与保护下（防土匪抢劫），前往四川背盐，运回毕节、大方、赫章野马川等地的盐号，盐号再批发给小贩发买。值得注意的是，购盐时往往是背着空框赴川，极少存在商品的交流活动。[162]显然，清代的小商贩们更加不可能在川黔两地往来运销。

综上可知，清代黔西北输出、输入的最大宗产品铅与盐之间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大规模的互易关系。它们的联系隐晦地潜伏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铜铅开采的兴起改变了许多普通民众的从业方式，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并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详后），从而扩大了川盐等其他商品在黔省的市场。康熙前期的贵州巡抚田雯曾谈到黔省吃盐的困难：

黔独无（盐），仰给于蜀。……又不可以舟车通，肩疮蹄血而后至，其来也不易，则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艰食者比比矣！……当其

匮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咸，只诳夫舌耳，非正味也。即遇其饶，亦止沾唇而量腹……盐之直取于谷，谷且贱而盐不肯平，十钟不能易一斛，安得而不苦其乏。[163]

就此看来，康熙时黔民吃盐艰难的原因在于资生乏术，只能以粮去换取远道而来、价格高昂的川盐，然而粮价低廉，并且贵州农业条件极差，百姓手中并无多少余粮，自然只能望盐兴叹。雍正以后贵州矿业兴起，尽管朝廷和地方政府掠取了大部分产品，但黔民的购买力在总体上有了较大提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吃盐的困难。例如黔东南凯里永兴铅厂“俱系附近苗民零星采获，赴城市易换盐米，其课系向承买之各商铺就近抽收”。永兴厂或许是一个特例，因为该厂出铅不旺，官府并未干预矿务，甚至不直接向生产者征税。[164]但矿业普遍提高了全省百姓的购买力却是不争的事实。乾隆时期的贵州巡抚图思德称：

黔省全区山多田少，矿厂开济，实为闾阎日用攸资。[165]

另一位黔抚裴宗锡亦认为：

黔处荒裔，连山丛莽，绝少平旷。野无百谷之繁殖，市罕估客之鲜华，数十万井田，赋所出才比江南一大县，全资铜、铅矿厂，裕课利民，向来铅为众，铜次之。[166]

云贵总督张允随这样描述矿业兴起前后的贵州：

黔省地方辽廓，土旷人稀，……其地幅员日广，加以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有十余处，每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游民日聚。现今省会及各郡县，铺店稠密，货物堆积，商贾日集。[167]

矿业的兴盛不单只是提高了黔省民众的收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货币观念。虽然自朱元璋开始，明代皇帝常常赐给前来朝贡的水西、乌撒等土司大量的钞，[168]甚至用钞向他们购马，[169]但纸币仍然未能深入人心。明廷在黔西北的采购很多时候是用“物物交易”的方式，洪武十七年（1384）曾规定每年用茶、盐、布匹同乌撒易马6500匹。[170]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在明前期普遍流行于贵州许多地方，钞法则阻滞难行。

至迟在宣德、正统年间，银已经作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货币进入了黔西北。正统三年（1438），乌撒土知府陇旧曾在辖境内修筑了一段驿道，刻崖作记，彝汉文合璧，彝文崖刻写道：

为拓路铺筑石阶建石桥，哲娄募银三十两；鲁吐、尼丽、凯洪、克野、岳则主修石桥，募银十两，大米十一石，绵羊十只，价值十六两银；谷恒、布鲁募银十两，大米十石；鸠诺、鲁局、才恒募银六秤零五两，大米三十石，羊五只，奉献二十石大米酿造的白酒。[171]

这段引文表明，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货币，甚至连绵羊之类都要

用银两来评估其价值。水西用银的历史同样很早，该地区的兴工修作似乎都是用银子计价、付款。例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宣慰使安贵荣铸造了一口大钟，付给匠人20两银子。[172]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一次田土买卖中，所有用来买地的牛、羊、猪等都被折合成银两来计算。[173]水西用银的另一重要证据是，《水西制度》中所载各宗亲向君主应纳贡赋额数中专门提到银两的数目，并在地租种类中有“门户银”一项。[174]除银之外，当时流行的等价物尚有盐和布，弘治时户部曾打算在贵州等地推行钱法，但其可行性遭到了一些官员的质疑。[175]

明清递嬗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贵州被广泛认可的货币仍然是银和盐，雍正元年（1723），黔抚金世扬曾以黔人不愿用钱为由请求禁矿：

黔省地处荒陬，铜斤原无出聚。间有一二矿厂，久经封闭，若令开采鼓铸，无论工费浩大，一时难以获效。且贵州汉苗杂处，每逢场事贸易，少则易盐，多则卖银，令使钱文，汉苗商贾俱非情愿。若以配充兵饷，领运既难，流通无时，黔省用银沿习已久，请照例停开，下部知之。[176]

但矿业关系着国计民生，清廷绝不可能真正停止寻找、开发矿产，也不能完全阻止民间的私采活动。此外，一些为财政拮据所困扰的黔省官员也力图寻找新的财源，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黔抚张广泗等对铜铅都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兴趣。雍正七年，受鄂尔泰委派前往各处查勘矿情，“劝民苗开采”的粮驿道杨斌禀称，威宁府的性化里、顺化里都有铜矿，当时大定府的铅矿已经丰旺，于是鄂尔泰、张广泗等立即奏请毗邻铜、铅矿源，据川、滇、黔三省通衢的毕节县重开宝黔局，设炉10座，年铸钱36卯，搭配银两供给通省文武各官、兵弁的俸薪与养廉。雍正皇帝览奏后极为欣喜，朱批云：

欣悦览之。向闻黔省从来不用钱文，今似此得毋通行乎。[177]

到了乾隆九年（1744），在贵州总督张广泗的奏折中已可看到制钱流通的情形：

黔省自添设炉座以来，兵民称便，即向不用钱之苗疆，亦知以钱交易。请加铸十卯，为四十六卯，岁可添钱二万四千九百三十串有奇，增搭兵饷及养廉俸工等项。[178]

制钱在黔省的通行，可能同市场以及官府的鼓励有关，是改土归流以后贵州社会的重要变化之一，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忽略铜铅开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此外还必须注意到，移民潮流同样是制钱流通的强大推动力。鄂尔泰称：

贵州一省，汉少彝多，素无钱文行使，惟用散碎色银分厘交易。[179]

可见，原住民长期以来使用银和盐作货币的习惯使制钱不易流通。而移民来自湖、广、赣等地，以汉人为主，有使用制钱的习惯。我们不难理解毕节设局之初，官员们搭放钱文数量时参考汉人所占比例的苦心。在“省会通衢”所搭钱文最多，新辟“苗疆”暂缓配搭，而“汉夷相间”之地则少搭钱文。[180]

移民与矿业的关系并不仅仅体现在促进制钱的流通上，黔西北等地移民浪潮的涨落与铜、铅等矿厂的兴衰紧密相关。雍正七年（1729），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曾谈到在威宁州勘矿的事情：

查得原有之铜厂现多发旺，其新报者如稻田坝之八地厂，性化里之以朵果厂、拖克厂……前缘该地彝民未设天地自然之利，致多委弃，以故抢掠为生。[181]

这段话表明，原住民对矿藏勘寻、开采、冶炼的一整套技术是相当陌生的，从事矿业的砂丁、炉户、炉丁等主要是外地徙入者。[182]雍正三年，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允祥等官员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担心客民会破坏地方社会秩序。[183]

威宁州是黔西北矿藏量最丰富的地方，对移民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史称：

（威宁）州境颇宽，且滇省昭、东各厂运铜，陆道解至泸州，必由州境，人夫背负，牛马装驮，终岁络绎于途。兼之州属所产黑白铅厂林立，砂丁炉户悉系客民，虽其地尽属夷疆，而客民之落业其间因而置产者不少。[184]

每个矿厂少则数千人，多则几万人，矿业移民的规模相当可观，在乾隆初年甚至导致了物价的攀升，贵州提督王无党打算通过禁开银、锡等矿来平抑粮价：

至威宁接连滇之昭通，不独价贵，且无米可买。近见云南督抚竭力赈济，而有银无米，啼饥如故。盖缘各处俱有银、铜、铅、锡等厂，每厂少者数千人，多者二三万人，皆系外来无艺游民，食指增而所产有限，宜其贵也。……臣愚以为，铜、铅二项为铸局所需，不可禁也。银、锡等厂，宜因地因时以为开闭。[185]

在威宁数量众多的移民中，以来自湖广桂阳州的人居多。[186]这并非偶然，桂阳亦是清代的矿产基地，且开发历史悠久，宋代便有采矿记录，康熙时以税铅的形式供应京局鼓铸。[187]当地许多人都拥有开矿及冶炼所需的技术与经验，矿藏更为丰富而又开采未久的黔西北对他们的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许多桂阳人甚至举（家）族迁徙进入威宁等地。乾隆十六年（1751）威宁州妈姑厂曾发生一桩命案，考察官员的奏报公文可以发现，死者罗奇雄本系桂阳州铁匠，与他一起在妈姑谋生的亲族弟侄至少有罗奇玉、罗应先、罗世洪、罗宗尧、罗朝汉、曾高则等人。[188]

随着矿业的兴盛，官府在黔西北设局铸钱，一些有冶铸才能者借此移入，如大方臧氏于乾隆三十五年随同“宝黔局”来到大定，以铸钱为业，定居南门城外桥边。[189]

移民前来开矿，往往会占用原住民的土地，必须付给一定的租金，例如威宁州属妈姑厂议定每设炉一座，“岁给倮民租价银三钱”。[190]从事矿业发家后，许多移民可能会购买田土，这样就导致了原住民与移民之间的地权转移。据道光初年的调查，威宁州共有客民4502户，其中有产客民3605户，未典买租佃苗产客民887户，附居城市不填丁口有产客民10户。[191]

总之，清代黔西北的矿业与移民有着紧密联系。18世纪晚期，当矿业开始衰落时，移民的浪潮亦逐渐平息，或许并不是一个巧合。但并非所有的移民都从事矿业，在黔西北的城市乡间，还有众多外来者或从事贸易，或以农为生，下文将论述移民对黔西北农业的深远影响。

第三节 从畜牧到农耕的发展

一 黔西北的农牧业传统

《大定府志》在论及本府农桑时称：

大抵黔南山峻，少平地，土薄而多石，溪水陷下，大川之旁无广衍之地。……而大定又甚焉。[192]

在农耕条件欠佳的黔西北，长期以来畜牧业是极为重要的生产部门。牧产中以良马著称，[193]宋代即已成为中央王朝的采购对象，元代水西则成为全国十四个大牧场之一，牧养“国马”。[194]胡庆钧甚至认为，直至明中期以前，农业在水西、乌撒等地只占辅助地位。其证据有：明初朝廷军队在乌撒等地掳获的最大宗战利品是马、牛、羊；对主动归顺的水西，明廷则用钞、帛等同其交换大量的马匹；文献中有“（乌撒）土宜羊，土人皆牧以为生”的记载。[195]史继忠同样描述了水西畜牧业的盛况，但他认为该地是“农牧并重”。[196]不管怎样，直到明代，牧养在黔西北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嘉靖进士熊过途经乌撒，发现“马牛被山谷”，甚至有不少卫所屯田被占为牧场，[197]礼部尚书万士和亦称乌撒“满地夷人生牧盛，远驱虎豹放牛羊”。[198]彝文献还有关于乌撒主要牧场的记载：

色翁第一大牧场，牛马染得遍地红；鲁洪第二大牧场，羊群铺得遍地白；米嫩第三大牧场，牛羊荞麦相映衬；色图第四大牧场，九十九座山，山山牧歌传。[199]

水西、乌撒的农业同样很悠久，《史记》云：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200]

或许秦汉时生活在黔西北地区的并非娄素濮，而是另外一个族类，但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正是司马迁所描述的“耕田，有邑聚”的地方之一。即便娄素濮是“随畜迁徙”的移入者，到此地后亦有学习农耕的机会。

按照彝文献的记载，农事是由具备神奇力量的够阿德、乌阿庇兴起的，在此过程中，女性祖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这些传说所叙述的最重要的作物是荞，其次是麻，而水稻、麦子、玉米、土豆等则几乎未被提及。这表明较早种植的作物是荞与麻，除畜牧外，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娄素濮的衣、食所系，[202]其发现与种植带有神圣的色彩，《物始纪略》称：

很古的时候，够阿德管天。他管理天门，开一道天门，拿出种子来，大抓小撒的，撒到岩旮旯，山上长出树，平地长出荞，山脚长出麻，人们来耕种。[203]

除了饭食之用外，荞还大量用来酿酒，而酒又是彝人极其钟爱的饮品，[204]荞的地位可想而知。“有荞即财富，一度威势大，唯荞子而已。”[205]又有传说称实奢哲与勺莫额两位先贤偶然发现了八株苗并撒播四方，从此彝地有了数也数不清的荞粒。“荞租”成了天上向人间所征收的三大租税之一，与畜租、戈甲租并称。一位具有超凡神力的君王阿鲁告诫其部众云：

世间的人们，大量地种荞，天天要勤耕，以荞为主粮。

古代彝人甚至比照现实生活，赋予不同品种的荞相当高级的地位：

荞君为青荞，荞臣为黑荞，荞师黑节荞。[206]

长期以来，“刀耕火种”是黔西北农业的主要方式，彝文献反映出这种方法兴起的历史，女性对此的贡献尤大：

很古的时候，混混沌沌的，不会做农活，食物也不多。有的女人啊，她带领大家，她领去烧坡，烧了许多坡。带领去播种，播了许多种。女的有知识，女的有智慧。从此以后，知道种荞了。女人掌大权，就是这样的。[207]

到了明代，刀耕火种依然盛行。正德《四川志》云：

（乌撒）俗类吐蕃，刀耕火种，不事蚕桑。[208]

这种农耕方式在黔省广泛流行，万历二十年代恤刑贵州的大理寺寺正江盈科看到的情况是：

耕山到处皆凭火，出户无人不带刀。[209]

二 卫所、移民对黔西北农业的影响

以上论述或许可揭示出黔西北少数民族具有自身特色的农、牧业传统，至少从明代开始，这一传统与迁徙到此的汉人移民的耕作传统相互影响。这是与中央王朝对黔西北等西南地区的开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文所述，中央王朝对贵州的大规模开拓始于元代，当时朝廷曾在黔西北等地“设官料民”，赐封土酋，驻军屯种，但就笔者目前所见史料，尚难以弄清屯军的耕作方式及其与当地农业传统之间的关系。明代承元之旧，大为恢拓，在贵州地区建立行省与府、州、县，设置20多个卫所，大批官员进入贵州，特别是卫所官兵主要来自南直隶、北直隶、湖广、江西、四川、河南等地，意味着一场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明代置于水西、乌撒境内及附近的卫所有毕节卫、乌撒卫、水西卫、赤水卫、贵州卫、贵州前卫等。此外，民间自发组织的移民数量也为数不少，一方面是地广人稀的环境吸引着外省民众前来垦种，另一方面，随着贡赋、土兵征调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中央王朝的渗透日渐深入，地方土酋必须经常同官府打交道，土司政权急需通汉文、熟习内地礼仪的人才，于是许多内地移（流）民甚至有功名者投奔土司，寻求更好的发展，例如水西政权中就有不少汉把、汉目。

外来者同时也带来了内地的农耕器具与技术，并且对原住民产生了影响。万历年间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深具远见，他大力推广各种先进的耕作技术，贷给贫民牛具、种子，受其招抚开垦土地的“流夷”多达1518人，特别是在肥沃的水外地区，犁耕可能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天启三年（1623），明军攻占安氏靠近贵阳的一个宅溪（则溪），“得其粮三四万石”，显示出这些地区农业的发达。[210]

农作物方面，燕麦似乎取代荞成为水西地区的最重要作物，包汝楫称：

罗鬼国禾米佳过中国，彼地人又以燕麦为正粮，间用禾谷。燕麦状如麦，外皆糠糗，内有芥子一粒，色黄可食。群苗以此为面，每人制一羊皮夹袋，装盛数升，途中遇饥，辄就山涧调食，谓之香面。燕麦在罗鬼遍地有之，利赖甚多。[211]

嘉靖年间，当贵州提学副使吴国伦途次水西驿时，驿官能够提供的饮食就是这种香面：

驿亭跪进燕麦虀，饱食且忘行役苦。[212]

乌撒兴起了大麦的种植，但荞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乌撒）卫人所以资生者，惟苦荞大麦而已。[213]

燕麦、大麦等可能是军卫移民所引进。除麦类之外，水稻亦有种植，但没有占据重要地位，就地理条件来说，阿哲家的本部地区只有今黔西县等地可以大面积种植水稻，水外一带土地平衍肥沃，历来是安氏的粮仓，水稻栽培应较普遍。[214]至于乌撒，是贵州省典型的高寒山区，地势崎岖，日照时间少，阴雨天多，明人杨慎诗称“易见黄河清，难逢乌撒晴”，[215]当地谚语则云：“乌撒天，常披毡，三日不雨是神仙。”所以该地直到清代还是“所种宜荞，稻谷不登”。[216]

农业传统之间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可能是由于当时土地尚多，且山地难于耕作，许多军卫移民便入乡随俗，习用原住民的耕作方式，[217]例如乌撒卫“地在万山之中，刀耕火种以给食”。[218]明代大儒王阳明谪贬贵州宣慰司所属之龙场驿时，曾亲身领略了这种粗放经营的风味：

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山荒聊可田，钱镈还易办。夷俗多火种，仿习亦颇便。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219]

三 改流后黔西北农业的转型

“安坤事件”后，黔西北成为清王朝的“新疆”。移民大量涌入，彻底改变了当地“地广人稀”的状况。在移民运动持续不断以及人丁滋生的情况下，畜牧业、粗放经营的农业显然不能提供足够的食品。但从清迄民初，在该地输入的商品中，盐、布为大宗，米粮极少。[220]这反映该地的食物基本上能够自给，据史料记载，在丰年时甚至可以少量外销。[221]

粮食自足的基础，是清代以来农业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包括荒山与荒地的开垦、农田水利的建设、高产作物的引种、精耕细作方式的采用等，这些变革至少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移民所引进的技术与新作物，二是改土归流之后，直接统治黔西北的政府官员的鼓励和劝导。

自进入清王朝的“版图”伊始，改变兵燹所导致的田土荒芜、人民流离就成了贵州各级官员的首要任务，《清实录》等文献中不断有以赋税等方面的优惠劝民垦辟的记载。[222]贵州四境皆山，“地鲜平畴”，[223]坝子等宜农地很快开发完毕，垦辟活动向山坡扩展。但或许是山区垦辟的工本大，成效微，[224]并且当时移民与本省的人口增殖还不至于造成太大压力，因此康熙时期的官方公文给人的印象是黔民对开荒并不太积极，康熙四十年代巡抚贵州的王个庵在奏疏中称黔省荒田“十居三四”，要求用免税六年的措施激励开垦。[225]康熙五十五年（1716）护理贵州巡抚事务布政使的白潢在奏折中亦陈述了自己劝民垦辟的努力：

但黔省田地，俱在万山之中，土薄石积，固属难开，亦因此地民贫，实无工本。奴才现今率属捐备牛种，招民尽力开垦，俟有成效，另疏题报。[226]

雍正七年（1729），鄂尔泰描述的已是另外一番景象：

黔省田土向来原有荒芜，迩年人烟渐广，陆续首报开垦已多，今臣赴黔，目睹高低山坡俱已开挖成田，大道两旁空土亦俱耕犁种植，若以捐纳银两再招民开辟，将来自无旷土。[227]

到乾隆初年，官员们已开始采取措施鼓励开垦地头、山脚的零星土地，根据垦种的难易程度给予不同的优惠：

凡山头地角零星地土，及山石搀杂，工多获少，或依山傍岭，虽成丘段而土浅力薄须间年休息者，悉听夷民垦种，永免升科。至有水可引，力能垦田一亩以上，照水田例六年升科，不及一亩者亦免升科。无水可引，地稍平衍，或垦为土，或垦为干田，二亩以上照旱田例十年升科，不及二亩者亦免升科。[228]

可以想见，在乾隆年间，贵州的土地开垦已经接近当时的农业技术所允许的极限。从坝子、山脚一直到山顶，耕地呈阶梯状分布，被形象地称为“梯田”。时人的诗文对此有所描述：

山田垦益宽，沟水无妄争。[229]

梯田上峰头，垦自山脚起。山田垦辟，层垒而上，远望之如梯级。胼胝乱石间，土确田无水。[230]

这两首诗还表明，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垦辟活动受到水资源的严重制约，这一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官府的重视，乾隆四年（1739）就任布政使的陈惪荣有感于“贵州民不知渠堰之利，率多旷土”，曾请帑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包括威宁的稻田坝。[231]民间自备工本开挖的沟渠亦不少，道光时期的大定知府黄宅中称：

（大定府亲辖地之）嘉和里，山多泉水，引以溉田种稻，农利颇饶；山中堰塍畦畛，修治亦勤。[232]

黔西知州吴嵩梁也提到他劝民力耕的事：

循行历阡陌，诱劝开沟渠。[233]

高山垦辟毕竟是一种生存压力下的选择，[234]山地农业受到恶劣环境的制约，不但亩产量低，而且极不稳定，《大定府志》称：

山民垦种，岭脚坡头层叠而上，远望如阶梯之级。然地高而确，绝少流泉，农人终岁勤动，日胼脂乱石间，惟恃天雨以活。[235]

农田水利的建设、梯田的形成标志着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已基本被放弃。这一转变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清初黔西北地广人稀，基本上沿袭前代的耕作方式。康熙二十二年（1683），黄元治赴任平远书判，发现该地“冬则沿山而焚，千嶂如炭”，[236]联系明人江盈科“绝壁烧痕随雨绿，隔年禾穗入春香”的记载，[237]易知这是关于刀耕火种的描述。即便到了民国时期，在自然条件较差、耕者又比较贫困的地区，烧坡的方式依然没有被完全放弃，但主要限于种荞。[238]

精耕细作的另一个标志是农具的改变。文献对此没有详细记载，但时人的诗文中有零星叙述。乾隆四十四年（1779）任黔西州学训导的余上泗所著《蛮洞竹枝词一百首》描述了狆家的农事：

妇女惯操机杼事，云山四壁挂犁锄。

冲烟锄土最高峰，雨汉如珠色倍浓。

日日撩裙浸水田，横担榼篓插秧还。[239]

使用犁、锄，“冲烟锄土”，浸水插秧，显然已非粗放式的耕作，仲家如此，内地移住汉人的稼穑水平可以想见。事实上，先进的农耕工具正是由移民所引入。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黔西县石板、金坡，威宁县龙街、法地区等彝族、苗族聚居区的调查，1949年前少数民族已广泛使用的农具有羊耳锄、挖锄、犁头、耙、镰刀、弯刀、斧头、风簸、连枷以及种类繁多的竹制工具。龙街的犁分为琵琶犁、狗腿犁，用于耕种不同类型的土地。锄则有板锄、条锄、夹耳板锄等，可根据土质、作物选用。众多的农具反映出农业水平的发达。但这些工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都是从市场上向汉族购买的。[240]

与农具的改进相应，耕作技术亦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民国《大定县志》记载了许多农谚，民国《威宁县志》则描述了前卫所地区从开垦到耕作的复杂方法，如挖沟洫、犁土打田、放水淹渍、一道薅、二道薅、三道薅等步骤，轮作、套种的应用亦非常普遍。1950年代的初调查报告所记载的技术其实与《大定县志》《威宁县志》的描述差不多，但更为详细。例如黔西县金坡乡种植苞谷的工序有十道，每亩地需“人工22个，牛工3个”。[241]

民国方志与1950年代的调查反映的显然不仅仅是民国的情况，黔西、威宁的被访者都声称至少近百年来已经是这样。联系到前文所述的水利工程等，可以肯定清代的农具与耕作方法同民国时期差不多。据乾隆《黔西州志》，当地的农业显然已经放弃了粗放经营：

曩时所称刀火耨之乡，今皆人浮八口，大有频书盈宁，富将埒中州矣！[242]

农作物的移植与推广或许更具革命性的意义。改流以后，荞、燕麦、大麦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在清前期，稻谷在平远、黔西等地似乎已

经有较广泛的栽培，在诗文中经常被提及：

田家何所事，终日在耕桑。朝课瓜果实，夕餐禾稻香。[243]

过腰菽粟长，齐肩谷穗钩。[244]

水西之地兮有郭有城，水西之野兮有稻有粳。[245]

据《黔西州志》，当时稻谷的品种非常多，有百日早、羊毛谷、雷早谷、早稻、白晚谷、糜粘、大红谷、小红谷、白香糯、香糯、贵阳早、红脚早、叉脚粘等十多种。[246]

囿于自然条件，稻在大部分地区并非主要作物。真正给黔西北带来深远影响的是玉米（即玉蜀黍，黔人称苞谷、玉米）和土豆（黔人称洋芋、阳芋）。玉米在10～26℃的温度下即能良好生长，所需雨量一般是每年500～1000毫米，对土壤要求不高，最适宜于黔西北的自然环境，其产量相当可观，一般亩产在300斤左右，个别地区竟达六七百斤，而黔西北原来的主要作物荞的亩产量仅为七八十斤或百斤。[247]玉米为移民的涌入、人口的激增提供了食物方面的支持。

玉米、土豆原产美洲，传入黔西北当与移民运动有关，但具体时间已难考证，估计不会太早。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任黔抚的田雯所著《黔书》以及十年后成书的《新补贵州通志》对此都未提及，乾隆前期编修的《贵州通志》《黔西州志》《平远州志》亦未见记载，可见它们可能没有引入，至少没有大规模种植。随着人口的激增，乾隆时期或许已逐渐推广。嘉庆十五年（1810）贵州巡抚鄂云布叙述了发生在大定府的一件命案，其中写道：

嘉庆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夜晚，便么把从邻寨阿二把地边走过，见其地放有收割包谷，无人看守，起意窃取一捆，背回家中。[248]

至少在道光时期，玉米已广泛栽培，《大定府志》称：

大方之民……日食玉蜀黍之爆花，夜眠粗白菅之短席。

时任知府的黄宅中的《蹲鸱颂》亦云：

春分种荞麦，谷雨种苞谷。不如栽阳芋，一亩收百斛。……我闻嘉禾里，培莳遍山谷。四乡勤菑畲，八口佐饘粥。[249]

当时土豆在大定府亲辖地的嘉禾里已普遍栽种，黄宅中作《蹲鸱颂》正是为了将其推广，“以充民食”，可见在其他地区土豆或许尚未普遍种植。这首诗还表明一些地区的土豆产量相当高，甚至超过了玉米，因此才有“不如栽阳芋，一亩收百斛”之说。黄宅中的推广并未取得显著成效，甚至到了1949年，土豆还只占毕节地区粮食总产量的3.15%，而玉米则达到了54.7%。[250]1949年后，土豆种植面积显著增加，成为继

玉米之后的第二大作物。

粮食作物的构成以及土豆较玉米的后起，与当时黔西北的生态与人口密切相关。黔西北在地理上属黔西山原山地区，毕节、大方一带，为黔西北高原向黔中山原的过渡地段，海拔约1400～2000米，威宁赫章及水城一带，为滇东高原的东延部分，海拔约2000～2400米，最高处达2900米。[251]与今天相比，清代至民国时期黔西北的人口尚不十分稠密，主要的生产活动应在较低海拔地区进行，海拔1250～1790米的地区又被称为黔西北高海拔生态区，属于玉米高产区。突出的生态特点是春暖迟，秋寒早，春干夏湿，玉米从拔节、灌浆到成熟期间气候温凉，昼夜温差大。随着人口的大幅增长，人们逐渐向更高海拔的地区垦殖、生产，到了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寒冷生态区，春暖迟，秋寒早，夏季温凉，春旱严重，虽然昼夜温差大，物质积累多，但玉米可生长的季节短，玉米的个体发育不充分，产量往往较低。[252]与玉米相较，土豆性喜冷凉，在海拔5000米及北纬70°的地区都可种植。并且黔西北的高寒山区气温年较差小，日较差大，光照充足，例如威宁县的气温年较差为15.2℃，为整个毕节地区最低，而日较差达12.8℃，为全区最高，这些为土豆的栽培提供了较优越的自然条件。[253]因此随着生产活动逐步向高山地区展开，土豆的种植就会越来越普遍。这一过程在1949年后伴随着人口的激增明显加速，土豆逐渐成为继玉米之后的第二大作物。例如毕节县1949年土豆播种面积1.56万亩，产量127万公斤，占夏粮总产的14.8%，1990年代初增至33万亩，产量4200万公斤，占夏粮总产的59.4%，《大方县志》中亦有类似的记载。[254]反过来亦可认为，土豆的广泛栽种为1949年后的人口激增提供了可能，根据笔者在黔西北多年的生活经历，土豆直到改革开放后依然是许多贫穷农家的主粮之一，1996年出版的《大方县志》称：“洋芋成为境内增产潜力较大的高产粮食作物，部分高寒乡村作为主粮。”[255]

上文揭示了黔西北这块典型的民族地区，从农、牧并重发展到精耕细作农业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黔西北的移民运动与中央王朝对该地区的开拓紧密相关，王朝军队的屯种、直接统治机构的设置以及移民的涌入又对该地区的农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农业发展的模式，在明清时期的西南地区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1]参见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第5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第1～27页；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34～36页。

[2]这一判断的主要理由如下：（1）在明代史料中几乎没有移民记载。而清初史料常说此地汉人稀少。（2）黔西北崇山峻岭，为贵州地势最高处，地理环境较为险恶，并且土司、土目势力强大，他们常常会掳掠汉人为奴，很少有汉人愿意历尽旅途艰辛，自投虎口。（3）在我读到的家谱中，很少有讲明代汉人进入乌撒、水西的。（4）根据乾隆十四年的数据，大定府亲辖地的汉人户、口比例仅为1：1.34，显示出移民社会初期家庭规模比较小的特征。说明这些汉人主要是清代移入的。

[3]参见包汝楫《南中纪闻》；朱征舆《张氏传》，乾隆《毕节县志》卷8《艺文志》。

[4]宁云鹏：《大定舆图说》，民国《大定县志》卷20《艺文志》。

[5]黄元治：《黔中杂记》。

[6]参见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第84～85页。

[7]参见张广泗《办理入川人民奏》（乾隆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19-0068。

[8]良卿：《请改拨郡县分辖地方奏》（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23-1324。

[9]方世儁：《黔省地方情形奏》（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23-1133。

[10]良卿：《请改拨郡县分辖地方奏》（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23-1324。

[11]《（大方）金鸡彭氏家乘·彭氏黔谱序》。

[12]参见《（大方）陈氏族谱·大方雍睦堂陈氏》。

[13]参见《（大方）胡氏族谱·胡氏入黔源流序》。

[14]参见《（大方）姚氏族谱》。

[15]最典型的例子是大方县普底彝族、白族、苗族自治乡的黄氏家族，他们在清代甚至专门修了一所“江夏祠”以表明自己是江西的汉人移民。这是2000年10月我在该地调查时了解到的。

[16]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4《大定府》。

[17]参见《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点校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8]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第156～164页。曹树基并未直接表述出所有这些假定，但这些假定潜伏在他的论证过程中。

[19]李宗昉：《黔记》卷1。

[20]康熙《平远州志》，转引自乾隆《平远州志》卷6《赋役》。

[21]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0《食货略·户口丁银》。

[22]同一时期该地的苗户为9780户、30845口，户、口比例为1：3.15，比汉户“正常”得多。

[23]《大定志稿略》，转引自道光《大定府志》卷14《疆土志·总叙》。

[24]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第164页。

[25]裴宗锡：《奏为钦奉上谕事》，《滇黔奏稿录要》第3册，清抄本。

[26]乾隆五年，皇帝谕令清查人口，但直到乾隆四十年后才形成较为可靠的人口登记制度。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第42～76页。

[27]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0《食货略·户口丁银》。

[28]裴宗锡：《查办民苗户口数目确实再行造报由》（乾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45-1060。

[29]裴宗锡：《滇黔奏稿录要》第3册《奏为钦奉上谕事》。

[30]光绪《水城厅采访册》卷4《食货门》。

[31]《纪略》中大定府亲辖地的客民户为2885户（见表7-1），假定户均5口，则客民数应为14425，远远低于9万人之数，何况9万人仅仅是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年间的移民数。总之，《纪略》中的客民数不能反映清代贵州移民的规模，《纪略》一书不能作为研究清代贵州移民的主要材料，只能提供某些参考。

[32]例如在黔西北唯一的民族自治县威宁，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汉族人口分别为203700、664500人，前者为后者的约30.7%。参见李平凡等《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第1、2页。又如大方县（大致相当于清代的大定府亲辖地）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汉族的人分别为188336、522460人，前者仅为后者的36%，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为250150人，汉族为570798人，前者为后者的约43.8%，参见《大方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第121～122页。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快的原因，一是对他们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困难相对较大（我在乡村采访时，许多乡、村干部都抱怨民族地区的计生工作很难开展），二是一些人愿意申报或改变成少数民族以获取政策上的优惠。

[33]参见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文海出版社，1967。

[34]参见《大方县志》，第123页。

[35]参见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96《工部·开矿》。

[36]参见《明史》卷81《食货志五》。

[37]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67，万历四十六年三月乙丑条。

[38]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72，万历四十六年七月辛亥条。

[39]《明宪宗实录》卷176，成化十四年三月辛巳条。

[40]包汝楫：《南中纪闻》。包氏所言或许过于夸张，但水西安氏领地内有水银矿则是可以肯定的，据万历《贵州通志》卷4，当时贵州宣慰司的方产有朱砂、水银、铅、毡、马、茶、铁等。

[41]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30，正统十年六月辛亥条。

[42]参见刘锡玄《黔牍偶存·黔南军政·临出黔条陈黔事禀王军门》。

[43]《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一书搜集了部分关于矿业政策争论的资料，参见该书第1～71页。清人王庆云所著《石渠余纪》卷5《纪矿政》对清代开矿的过程与争论有简要记载。

[44]例如雍正二年黔抚毛文铨奏称普安钉头山、威宁州的齐家湾、滥木桥等铅矿银矿，昔日俱属私开，无分文归公之处，“今臣逐一清查，现檄藩司议定抽收之数”。《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3上《朱批毛文铨奏折》。

[45]参见《清高宗实录》卷39，乾隆二年三月甲寅条。

[46]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13，乾隆五年三月戊辰条。

[47]一些固守成见的官员甚至受到惩处，如乾隆三年广东提督张天骏以“矿山开采恐滋聚众”为由奏请禁采，结果遭到粤督鄂弥达乃至皇帝本人的驳斥：“聚则为工，散则为农，并无易聚难散之患。”最后张天骏被“交部议处”。参见钟琦《皇朝琐屑录》卷32《钱法附矿务二十二则》，文海出版社，1970。

[48]又如乾隆八年张廷玉奏称：“取矿之家必系有力之人，岂肯窝容匪类以自取祸？又何有易聚难散之患？”转引自《清代的矿业》，第15页。

[49]参见《清代的矿业》前言。

[50]《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矿政》。

[51]《清高宗实录》卷37，乾隆二年二月戊子条。

[52]康熙皇帝同样因为货币供应的紧张而弛禁铜矿、铅矿，《清史稿》卷7《圣祖本纪二》载：“以钱贵，更铸钱，减四分之一。听民采铜铅，勿税。”

[53]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第5卷对康乾时期的这些经济成就有详细论述。

[54]Anna See Ping Leon Shulman，Copper，Copper Cash and Government Controls in Ch’ing China（1644-1795）（Ph.D.diss.，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1989），pp.244-245.

[55]Suan Natuin and Evelyn S.Rawski，*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p.105.

[56]Man-houng Lin，*China Upside Down*：*Currency*，*Society*，*and Ideologies*，*1808-1856*，（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4-5.

[57]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第521～556页。

[58]例如平定金川的战役中，京城之健锐、火器二营的功绩最多，以至于乾隆皇帝下令在全国推广火器营的操练方法。参见《清史稿》卷139《兵志十·训练》。

[59]《清史稿》卷140《兵志十一·制造》。

[60]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94《兵十六·军器·火器》；《清史稿》卷139《兵志十·训练》。

[61]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94《兵十六·军器·火器》；《清史稿》卷114《职官志一·工部》；卷139《兵志十·训练》。放枪是清代士兵平常训练的重要内容，雍正二年，黔抚毛文铨抱怨贵州抚标兵丁懈怠的主要理由之一便是操练时“每兵不过放数枪、射数箭辄各回家”。参见毛文铨《奏为谨陈行伍情形仰祈睿鉴事》，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辑，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1977，第715页。威宁镇总兵石礼哈则称通省兵丁差不多都如此，为了整顿，他督令士兵“日日操演，教以鸟枪进步连环之法”。参见石礼哈《奏为奏闻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774～777页。遇到较大的战事，黑铅供应就会成为相关官员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例如平定两金川之役中，觉罗图思德奏称：“所需枪子原系黑铅铸造，川省采办恐不敷臣接济。请于黔省存贮黑铅内动拨四十万斤解川应用。伏查黔省黑铅出产威宁州属柞子厂，向系由厂运至四川永宁县，设局委员收兑。以供京楚铅斤之用。若将该局存贮黑铅尽数运往，较为迅速。臣飞饬局员将现存局黑铅先行拨运，奏入报闻。”参见阿桂等《平定两金川方略》卷79，十月壬子条。

[62]杨雍建：《抚黔奏疏》卷4《题为铜斤无可采买等事》。

[63]杨雍建：《抚黔奏疏》卷7《题为进贡红铜事》。

[64]参见毛文铨《奏为奏明矿厂事》，《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辑，第718页。

[65]该厂康熙五十七年具题开采，康熙六十一年就已衰微，到雍正三年毛文铨已奏请关闭此厂，可见猴子厂或许在得到正式的批准开采之前已私自开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参见毛文铨《奏为奏闻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第871页。雍正三年贵州大定镇总兵的奏折中称："大定地方所开矿厂，多无部文。"参见丁士杰《谨奏为奏闻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第1～2页。颇疑自康熙二十年代以后黔西北已有不少人私自开矿，而地方官员实际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他们亦可从中获利。

[66]参见《清代的矿业》，第594页。

[67]中国银的产量并不大，国内流通的银两、银元主要来自日本、美洲、缅甸、安南、云南等地。参见《清代全史》第5卷，第176～179页。

[68]参见《清代的矿业》，第201～204页。

[69]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5《钱币考三》。据同书卷14，宝黔局设于康熙七年，地址在贵阳，但两年后即停。

[70]参见《清代的矿业》，第202页。

[71]参见仲永檀《黔楚诸矿宜抽课或收买以裕国便民由》（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定长《查办贵州铜厂情形》（乾隆十九年十月初四日）、周人骥《新于南笼等处试矿由》（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廿一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76-1878、076-2072、069-1766。

[72]参见刘藻《请照旧采解滇铜由》，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76-2195；裴宗锡《奏为请拨滇铜之有余补黔局之不足酌复炉座以裕钱法仰祈圣鉴事》（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滇黔奏稿录要》第3册。

[73]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第294～298页。

[74]例如，《皇朝政典类纂》卷132称贵州出产黑铅104万斤，抽课变价银196两，湖南出黑铅8.2万余斤，征税银168两，云南、贵州的黑铅产量与税收完全不成比例，这绝不符合清代的矿税政策。根据笔者对清代贵州矿业的研究，贵州黑铅产量通常情况下是难以达到100万斤以上的，到了清代后期更不可能。所以，笔者怀疑贵州出产黑铅应为10.4万斤而非104万斤。

[75]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第298～299页。

[76]因为矿藏有限，经过长期开采后便出现"硐老山空"的情况，产量剧减乃至入不敷出，导致关闭，所以清代晚期的铅工业已大不如前。直到现代的采矿及冶炼技术引入后，矿业才迎来了新的振兴。1949年后，国家在毕节地区赫章县妈姑兴办冶炼铅锌的大型国有企业，属地市级单位。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私人小冶炼厂遍布威宁、赫章、水城等县，20世纪末政府利用征高税等办法迫使污染、浪费都很严重的私人小厂纷纷关闭，结果导致经济滑坡，人民收入锐减，地方政府的财政极为拮据。

[77]参见《世宗宪皇帝批谕旨》卷35《朱批何世璂奏折》；《清高宗实录》卷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己卯条，卷39，二年三月甲寅条；《清代的矿业》，第327～328页。

[78]参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5之十二《朱批鄂尔泰奏折》。

[79]参见《清代的矿业》，第314、323～324页。

[80]参见张广泗《为详请封闭铅厂事》（雍正十年二月十日），《明清档案》第50册，第B28725～28728页；《清高宗实录》卷113，乾隆五年三月戊辰条；《清代的矿业》，第327～328页。

[81]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第211～213页。

[82]参见《清高宗实录》卷904，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壬寅条。

[83]鄂元布：《请裁减妈姑、福集二厂铅额》（嘉庆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157-1572。

[84]参见裴宗锡《开采铜铅》（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十二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76-2406；福庆《查明黔省铅厂情形》（嘉庆八年九月十六日），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157-1381；《清高宗实录》卷37，乾隆五年七月甲午条。

[85]参见韦谦恒《动拨川省黑铅》（乾隆四十年正月初六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76-2347。

[86]参见《清代的矿业》，第202～203页。

[87]《清高宗实录》卷150，乾隆六年九月己巳条。

[88]《清高宗实录》卷167，乾隆七年五月庚辰条。

[89]参见《清代的矿业》，第314～316页。

[90]参见《清代的矿业》，第322页。

[91]参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5之十二《朱批鄂尔泰奏折》。

[92]参见鄂尔泰《奏为奏明借动库项收铅运售获息情由仰祈睿鉴事》，《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第585～586页。

[93]参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5之十二《朱批鄂尔泰奏折》；《清代的矿业》，第320～322页。

[94]参见《清代的矿业》，第321页。

[95]例如雍正三年威宁镇总兵石礼哈的奏折中提到湖广荆州府“恶棍”王日生同贵州巡抚勾结，在威宁开矿大发横财，不纳国课之事。参见石礼哈《跪奏为奏闻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第813页。雍正、乾隆等皇帝非常清楚并在一定程度上默许官员们在矿务中以公济私的行为。雍正二年，贵州巡抚毛文铨奏报黔省开矿情形并表示“不许地方官染指分文”，皇帝朱批云：“司事之员若令分文不染指亦是难事……朕意仍宜为少留余地，俾司事之员微有沾润，庶几贾勇向前。”参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3上《朱批毛文铨奏折》。乾隆十三年，当抚臣爱必达奏报前任张广泗的账目有问题时，乾隆帝指示：“朕亦不过欲悉此事之梗概，不必过于张扬，急为综核稍露形迹也。”《清高宗实录》卷322，乾隆十三年八月癸巳条。

[96]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14，乾隆五年四月己卯条，卷221，九年七月戊戌条。

[97]《清高宗实录》卷247，乾隆十年八月丙寅条。

[98]《清高宗实录》卷342，乾隆十四年六月乙酉条。

[99]《清高宗实录》卷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己卯条。

[100]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311，乾隆五十三年八月戊午条。

[101]参见《清宣宗实录》卷148，道光八年十二月丙寅条。

[102]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74《户部·钱法·办铅锡》。

[103]参见《皇朝政典类纂》卷66《钱币九·办铜铅锡例》。

[104]《清朝文献通考》卷15《钱币考三》。

[105]清王朝在黔西北改土归流之初，设大定、平远、黔西、威宁四府，寻又设平大黔威守道一员，驻扎大定，总领四府。康熙二十年改为分巡贵州西道，辖贵阳、安顺、平、大、黔、威等处，驻安顺。乾隆十七年，贵西道移驻威宁。光绪五年移驻毕节。参见《清圣祖实录》卷97，康熙二十年八月戊戌条；《清高宗实录》卷395，乾隆十六年七月己丑条，卷419，十七年七月丙戌条；《清德宗实录》卷100，光绪五年九月己亥条。

[106]赵翼：《檐曝杂记》卷4《仕途丰啬顿异》，第71页。

[107]石礼哈：《奏为奏明黔属情形敬抒管见仰祈睿鉴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770～772页。

[108]刘师恕：《谨奏为敬陈地方事情仰祈睿鉴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第49～50页。

[109]石礼哈：《奏陈黔省文官养廉银两数目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第683～685页。

[110]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41《食货略·耗羡》。

[111]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考四》。

[112]参见《清高宗实录》卷342，乾隆十四年六月乙酉条。

[113]参见图思德《奏为开铅矿已著成效仰祈圣鉴事》（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76-2466。

[114]参见福庆《查明黔省铅厂情形》，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157-1381；《清代的矿业》，第352～354页。

[115]《清代的矿业》，第325页。

[116]上文已提到，清代的货币有银、钱两种，为了维持二者之间的比价，清廷经常增减钱的重量，这样就造成了名义价值相同的制钱，所含金属量并不相同，销熔大钱，改铸小钱的现象随之发生，甚至有销钱为器（皿）者。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66～569页。

[117]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考四》。

[118]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6～17《钱币考四》《钱币考五》。

[119]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己卯条。

[120]参见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74《户部·钱法·办铅锡》。

[121]参见福庆《查明黔省铅厂情形》，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157-1381。

[122]《清朝文献通考》卷15《钱币考三》。

[123]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14，乾隆五年四月己卯条。

[124]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考四》；《清高宗实录》卷338，乾隆十四年四月庚寅条。

[125]参见裴宗锡《新开铅厂试采有效预筹改拨由》（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76-2424。

[126]鄂元布：《请裁减妈姑福集二厂铅额》（嘉庆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157-1572。

[127]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311，乾隆五十三年八月戊午条。

[128]参见福庆《查明黔省铅厂情形》，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157-1381。

[129]参见《清宣宗实录》卷74，道光四年十月丁丑条。

[130]参见《清高宗实录》卷82，乾隆三年十二月癸未条。

[131]张广泗：《谨奏为钦奉谕旨据实奏闻仰祈睿鉴事》（乾隆七年四月十六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81-0261。

[132]参见图思德《跪奏为请定铅务章程以防流弊仰祈圣鉴事》（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01-296。

[133]参见裴宗锡《奏为特参挟诈误公之州牧以肃功令事》（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滇黔奏稿录要》第2册。

[134]《清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考四》。

[135]参见《清高宗实录》卷82，乾隆三年十二月癸未条。

[136]参见《清高宗实录》卷85，乾隆四年正月丁丑条，卷221，九年七月戊戌条；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滇川运河》，中华书局，2001，第67页。《清朝文献通考》卷16将分两路运铜之时间定为乾隆二年，误。

[137]参见《清高宗实录》卷341，乾隆十四年五月壬申条。

[138]参见永保《审拟廖友周代父廖文昭申冤一案》，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此折系永保任贵州巡抚时所上，据《清史稿》卷345，永保任黔抚系乾隆四十九年，五十一年即擢陕甘总督，又据《清高宗实录》卷1159乾隆四十七年六月甲午条，该年铜店尚在威宁州，所以知移店时间大概应在乾隆四十八至五十年之间。

[139]参见同治《毕节县志稿》卷4《营建制》。

[140]参见张广泗《谨奏为钦奉谕旨据实奏闻仰祈睿鉴事》（乾隆七年四月十六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81-0261。

[141]《清高宗实录》卷239，乾隆十年四月庚申条。

[142]参见《清高宗实录》卷268，乾隆十一年六月癸酉条；卷357，十五年正月

辛未条。

[143]转引自道光《大定府志》卷42《食货略·盐法》。

[144]例如光绪年间四川巡抚丁宝桢重开赤水河后，每两三年便有淤阻，不得不每年淘修，史称“岁修”。参见林辛《贵州近代交通史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第48～49页。

[145]参见《清高宗实录》卷473，乾隆十九年九月乙巳条。

[146]参见林辛《贵州近代交通史略》，第48～49页。

[147]参见周人骥《开浚黔省运铅水陆路程》（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69-1866。

[148]参见《清高宗实录》648，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丙午条；卷653，二十七年正月己未条；卷655，二十七年二月丙戌条。

[149]参见《清高宗实录》卷705，乾隆二十九年二月辛亥条。

[150]参见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74《户部·钱法·办铅锡》。

[151]参见福康安《跪奏为遵旨查明复奏事》（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宫中档朱批奏折，缩微号26-2498。

[152]慕天颜：《题请黔属准行滇盐》，《抚黔封事》，康熙刻本。

[153]清王朝仍然设定了贵州每年应销的引额，共5896张，贯以“黔引”的名称，实际上却是由川省奏缴。每年按引数运盐至黔蜀边界的叙永、合江等地，分别“引根”与“引纸”，引纸给前来购盐的黔商，作为官盐凭证，黔商能否卖完5896张之数并不重要，因为引根留四川，奏部缴销。参见光绪《四川盐法志》卷10《转运五》。

[154]额春：《跪奏为复奏黔省食盐情形仰祈圣鉴事》（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宫中档朱批奏折，缩微号27-162。

[155]道光《大定府志》卷42《食货略·盐法》。

[156]光绪《四川盐法志》卷10《转运五·元展成疏略》。

[157]江盈科：《黔中杂诗》其二，收入郭子章《黔记》卷59。

[158]蒋攸铦：《黔轺纪行集·黔阳竹枝词》。我采访的老人们都清楚地记得吃盐难的情景，直到1950年代中期后食盐才真正走进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59]在云南亦有许多贫民特别是原住民很少吃盐，曾为官滇省的田榕诗称：“县僻人烟稀，十户八九贫，况又杂猓彝，盐味罕入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盐商曾向田榕哭诉专商引岸，计口销盐的制度对他们的损害。参见田榕《碧山堂诗钞》卷7《定边土盐商》，黔南丛书本。

[160]清人李云沾的《乌撒秋日杂咏》其三云：“仡佬负盐归峒去，僰童驱马向村还。”余上泗《蛮洞竹枝词一百首》七十四亦云：“（六额子）晓出山头结髻尖，负煤归去更担盐。”道光《大定府志》卷58《文征八》。

[161]《大定志稿略》，转引自道光《大定府志》卷14《疆土志四·总叙》。

[162]民国时期盐的情况来自我在毕节、大方、赫章等地的调查。

[163]田雯《黔书》卷2《盐价》。

[164]参见福庆《查明黔省铅厂情形》（嘉庆八年九月十六日），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157-1381。

[165]图思德：《奏为开铅矿已著成效仰祈圣鉴事》（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76-2466。

[166]裴宗锡：《谨奏为请广采山矿以裕民生仰祈圣训事》（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十二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076-2406。

[167]《清高宗实录》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条。

[168]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闰二月壬辰条，卷152，十六年二月辛卯条；《明太宗实录》卷90，永乐七年四月癸未条，卷108，八年九月辛卯条；等等。

[169]参见《明太祖实录》卷246，洪武二十九年七月丁丑条。

[170]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62，洪武十七年五月辛丑条；卷163，十七年七月丁巳条。

[171]《彝文金石图录》（赫章专集），审稿本，第28～29页。

[172]参见《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第21～71页。

[173]参见《彝文金石图录》第2辑，第6～21页。

[174]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50页。史先生在该文中亦论述了明代水西等地区的货币情况，包括盐、布、银的使用等，他认为明末清初银才逐渐在水西盛行，但彝文金石材料表明，银的通行时间要比这早得多。

[175]《明孝宗实录》卷197，弘治十六年三月戊子条。

[176]《清朝文献通考》卷30《征榷考五》。

[177]《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5之十二《朱批鄂尔泰奏折》。

[178]《清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考四》。

[179]《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5之十二《朱批鄂尔泰奏折》。

[180]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5《钱币考三》。

[181]《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5之十二《朱批鄂尔泰奏折》。

[182]当然原住民开矿的情况也有，但非常少见，如上文提到的黔东南凯里的永兴厂因出铅不旺，“俱系附近苗民零星采获，赴城市易换盐米，其课系向承买之各商铺就近抽收”。参见福庆《查明黔省铅厂情形》（嘉庆八年九月十六日），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157-1381。

[183]参见《清代的矿业》，第314～315页。

[184]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3《大定府·威宁州》。

[185]《清代的矿业》，第60～61页。

[186]《清代的矿业》，第332页。

[187]参见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20《货殖》；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74《钱法·办铅锡》。

[188]参见《清代的矿业》，第332～334页。

[189]参见《臧氏大方支谱·概述》。

[190]参见《清代的矿业》，第334页。

[191]参见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3《大定府》。

[192]道光《大定府志》卷42《食货略》。

[193]水西地产良马，明代皇帝、官员对此都有耳闻，洪武时水西贡良马，朱元璋赞不绝口，令宋濂作《天马赞》以歌之。正德进士杨慎亦作有《养龙坑飞越峰天马歌》（《升庵集》卷23），其中有："高皇御天开大明，龙马出自养龙坑。房星夜下鹿卢寨，天驷晓来骠骑营。殿前重瞳回顾盼，奚官仗外争相迎。鸡鸣牛首试控纵，凤师麟仪无逸惊。归风绝尘羡迅疾，逮日先影羞翾轻。四蹄翩然不蹍地，六飞如在空中行。是时雄酋有奢香，左骖牡骊右牝黄。贡上金陵一万匹，内厩惟称此马良。宸游清燕幸鸾坡，学士承旨赞且歌。"按，鹿卢与罗罗音近，系明清时期对黔西北彝族等许多族类的一种称呼，"学士承旨赞且歌"指宋濂承旨作《天马赞》，诗中还提到了水西女君长奢香贡马之事。不过，诗中所言的养龙坑明代虽属水西辖地，但位于鸭池河以东。鸭池河以西黔西北所产良马，可以从其他官员文人的诗文中得知，亲履乌撒的明人熊过称乌撒马"腹干肥实，骄嘶相嗅"（熊过：《与黔国公》，黄宗羲编《明文海》卷188《书·忠告》），与明末清初人陈鼎所描述"高猛殊他产"可相互印证（陈鼎：《黔游记》，黔南丛书本）。同样亲履贵州的康熙年间人许缵会所撰《滇行纪程·黔马》记载了黔马的特征："黔中多产良骑，质小而蹄健，登高山若平地，故水西之骏，滇黔多贵之。"晚清檀萃所著《黔囊》亦称："黔马小而习险，其形步收敛，不敢放蹄，故蹀峻驰危，稳骤不蹶，水西、乌蒙最良。"

[194]参见史继忠《亦溪不薛考》，《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

[195]参见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第8～14页。

[196]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9、17～18页。

[197]熊过：《与黔国公》，黄宗羲《明文海》卷188《书·忠告》。

[198]万士和：《万文恭公摘集》卷1《乌撒即事》。

[199]《支嘎阿鲁王·俄索折怒王》，第208页。

[200]《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201]参见《种子的根源》《农事的根源》，《物始纪略》第1集，第24～27、40～41页。

[202]直到今天，荞依然是威宁等地的重要作物之一。今天黔西北彝族已很少穿麻布所制衣服，但在姑娘出嫁的头一天晚上，亲朋好友们要唱（跳）通宵的酒礼歌舞，称为"阿妹肯"。当晚上十一时左右，女家的队伍开始唱（跳）"蒙书书（即撒麻舞）"，以歌舞形式再现"撒麻""薅麻""泡麻""刮麻""绩麻""纺线""洗线""织布"等劳动过程。参见《中国民间舞蹈集成·赫章县资料卷·彝族舞蹈》，贵州省地矿局113队印刷厂印刷，1992，第16～17页。

[203]《物始纪略》第1集，第25～26页。

[204]我在彝族乡村做调查时，因为不会喝酒，不少彝族同胞善意地同我开玩笑："你不喝酒怎么研究彝族？"

[205]《物始纪略》第3集，第258页。

[206]以上叙述参见《荞事记》，《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470～472页。

[207]《农事的根源》，《物始纪略》第1集，第40～41页。

[208]正德《四川志》卷22《乌撒军民府·风俗》。明人万士和所著《万文恭公摘集》卷1《乌撒道中》亦云："夏半火刀方布种，晚来牛马不归家。"

[209]江盈科：《黔中杂诗》其二，收入郭子章《黔记》卷59。

[210]参见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第9～11页；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45～46页。

[211]包汝楫：《南中纪闻》。

[212]吴国伦：《饭水西驿》，道光《大定府志》卷57《文征七》。

[213]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6《乌撒卫·风俗》。

[214]例如天启间的兵科给事中胡永顺称安氏"良田沃壤尽在水外六目"，《明熹宗实录》卷39，天启三年十月丁卯条。

[215]杨慎：《升庵集》卷19《五言律诗·乌撒喜晴》，四库全书本。

[216]道光《大定府志》卷14《疆土志四·总叙·形势》。当地直到今天，水稻亦只有零星栽种。总体说来，黔西北大部分地区是不宜种植水稻的，《贵州省地理》（贵州师范大学地理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第161页称："（水稻）多分布于黔中丘陵盆地和黔东、黔南、黔北的河谷坝子一带。在地区分布上呈现出从黔东南逐渐向黔西北递减的趋势。"

[217]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宣德十年正月庚寅条。

[218]《明英宗实录》卷260，景泰六年十一月甲申条。

[219]《王文成公全书》卷19《外集一·居夷诗·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

[220]例如1925年成书的《大定县志》卷14《经业志·商业》称："进口货物以盐、布为大宗，余若海味、油、糖、药材、丝器、杂货及各种消耗物品，输入甚多，其名不得而悉数也。"同一时期编写的《威宁县志》卷9《经业志·商业》中，亦只提到盐商与布商。

[221]据民国《威宁县志》的记载，岁丰时玉米、麦类、荞、豆类等都可运销云南昭通。

[222]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5，康熙四年四月戊辰条；《清世宗实录》卷48，雍正四年九月甲寅条；《贵州巡抚赵廷臣揭报黔省初辟请准借动兵饷招民开垦》（顺治十六年二月），《明清档案》第33册，第B18947～18989页。

[223]明人万士和称："尽贵之地，山陵林麓居十之七，而可田者居其三。"参见万士和《万文恭公摘集》卷6《贵州文明书院义仓记》。

[224]雍正二年贵州布政使刘师恕奏称："黔俗水田谓之田，山田谓之土（在今天的黔西北，讲到田时指水田，无水者称为地——引者注）。土气冷瘠，必先火煅，乘暖布种。所种亦止杂粮，二三年后土力渐薄，种或无收，又即弃置，俟草根盘固，复用火种，日久方得成熟。开垦既艰，收获甚微，实非他省可比，所以黔农每惮于开垦。"刘师恕：《奏为敬陈地方事情仰祈睿鉴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第47～49页。

[225]王个庵称："全黔荒田，十居三四，屡谕垦辟而民不辄应。盖垦经数载，然后收获，所入薄，不足输税，故人怀观望。倘悉依减则，宽以六年，未有不鼓舞争赴者。"张玉书：《张文贞集》卷11《诰授通奉大夫巡抚贵州兼理湖北川东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个庵王公墓志铭》。前揭刘师恕的奏折中有："今臣宣布谕旨，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复饬各属听民自垦自报，不许乡保胥役假公滋扰，民皆鼓舞。"由此可知，王个庵的奏请似得到了朝廷批准。

[226]白潢：《奏请设学课读开垦田地折》，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6辑，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1976，第546～550页。

[227]《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5之十《朱批鄂尔泰奏折》。

[228]《清高宗实录》卷150，乾隆六年九月壬申条。

[229]吴嵩梁：《留别黔西士民》其二，道光《大定府志》卷58《文征八》。

[230]黄宅中：《嘉禾里》，道光《大定府志》卷59《文征九》。

[231]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30《惠人志九·陈惪荣》。

[232]道光《大定府志》卷59《文征九》。

[233]吴嵩梁：《留别黔西士民》其二，道光《大定府志》卷58《文征八》。

[234]这种压力并不单由人地比例失调造成，族类冲突亦是重要原因。就今天的黔西北民族分布而言，汉族多居住在坝子等耕作、交通条件优越的地区，彝族往往分布在山腰，苗族则主要聚居在高山上。这是长时期经济、武力较量造成的结果，其中亦有文化与心理的因素。1999年8月我在赫章县兴发苗族、彝族、回族自治乡调查时，祝佳文（苗族）告诉我，1949年前他家尚居住在低处（今天的公路旁边），因周围都是汉族，不习惯，于是迁到高山上的苗寨里。

[235]黄宅中：《垦山土·序》，道光《大定府志》卷59《文征九》。

[236]黄元治：《黔中杂记》。

[237]江盈科：《黔中杂诗》其七，收入郭子章《黔记》卷59。

[238]参见民国《威宁县志》卷11《屯垦志》；《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第5、39、85页。

[239]余上泗：《蛮洞竹枝词一百首》其八、十三、二十一，《大定府志》卷58《文征八》。

[240]参见《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中关于生产力的叙述；民国《大定县志》卷14《经业志·农业》。

[241]参见民国《威宁县志》卷11《屯垦志》；民国《大定县志》卷14《经业志·农业》；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贵州省黔西县石板、金坡两乡社会经济调查资料》，1964，第4页。

[242]乾隆《黔西州志》卷4《食货志》。

[243]孙奏：《平远田家》，乾隆《平远州志》卷16《艺文》。孙奏，康熙二十二年官平远知府。

[244]赫霖泰：《秋日观农台成晚眺》，道光《大定府志》卷58《文征八》。赫霖泰，乾隆四十二年官黔西知州。

[245]何思贵：《水西赋》，道光《大定府志》卷56《文征六》。

[246]参见乾隆《黔西州志》卷4《食货志·物产》。

[247]参见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53页。

[248]鄂云布：《审办逆伦重犯由》（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1099。

[249]道光《大定府志》卷14《疆土志四》，卷59《文征九·蹲鸱颂》。

[250]参见《毕节地区农业地理》，转引自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第52页。

[251]参见贵州师大学地理系《贵州省地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第31～32页。

[252]参见彭忠华等《贵州不同生态条件下玉米育种目标及杂种优势组配模式探讨》，《种子》2003年第2期，第66页。

[253]贵州省扶贫开发技术指导中心特约刊登《土豆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农村经济与技术》2002年第4期；熊书益等：《毕节地区农业气候条件评价》，《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77年第3期。

[254]参见《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第455页；《大方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第213页。

[255]《大方县志》，第213页。

第八章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演变

前文提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贵州按察使赵孙英对黔省“新疆”“旧疆”进行了区分，雍正年间才进入王朝“版图”的黔东南一带属“新疆”，而黔西北等地区虽有许多非汉族类，但“蒙我朝重累熙洽，一百二十余年来，熏育教化，凡土苗人等服饰语言多与汉同，如倮猡、狆家、洞苗、宋家、狇老之类，读书游庠，援例捐纳贡监及职衔者，在在有人，至于得中武科者，间亦有之。此等苗寨，风气既与民人无异……”，因此应归入“旧疆”之列，在应用刑法方面不应行“宽恤”之策。由此可见文化、礼俗方面的演变深刻影响了他者的观感，模糊了族类之间的界限，成为判定“新疆”与“旧疆”标志。当然，风气的演变并不是孤立发生的，移民运动、铜铅开采、流官政权作为一种力量与观念的渗透，形成了这种演变的背景、诱因与动力，对此前文已有详述，本章将正面论述文化、习俗、认同方面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第一节 黔西北彝族族类界限观念的演变

黔西北浩如烟海的彝文献中，有不少表达族群观念、描述族群交往的材料，它们对于研究彝族的认同是极其重要的，但迄今为止，除了翻译整理者之外，这些材料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与利用。结合汉文献与田野资料，这类彝文材料将极大推进我们对彝族文化、身份认同等方面的认知。

一 “鲁旺”：文化与族类的弹性边界

彝族族称的演变相当复杂，本书导论对此已有所阐述，兹不赘述。长期以来，只有“娄素”“娄素濮”才是黔西北彝人的自称，也是他们最乐意使用的称呼。今天的黔西北彝语中已经大量借用了当地西南官话中的词汇，[1]但“彝”或“彝族”这个词却只有在讲汉语时才被使用，彝语语境中的自称仍然是“娄素”“娄素濮”。值得注意的是，“娄”意为“大地中央的人”，而“啥”在古彝文中指“由中央向外发展的人”，两者之间并非界限森然，暗示着“娄”与“啥”的区分可能存在着某种弹性。下文将引入一个在当地彝书中频频出现的词——鲁旺（，亦写作等），对此予以更深入的阐释。

彝文专家对“鲁旺”的理解似乎有差异，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彝族创世志》中有：

古老的时候，天开地辟了。有邑落（）之前，按啥（）的说法，叫开夫辟地，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万物生于卯。有邑落（）之后，按彝（）的说法，天产甲子年，子年子月，子日子时生。天产了之后，日月亮晃晃，众星花朗朗，雾罩腾腾升，雷雨阵阵降，天象一起产。[2]

这段话表达的是“娄”（，即彝）与“啥”（，即外族之意，现在专指汉人）对天地产生的不同认识，翻译者显然是将意译成“邑落”而非音意为“鲁旺”，并将其作为时间分界的标志。这样的译法给人一种难以理解的感觉，类似的处理还有：

有鲁旺（）之先，汉族（）的礼仪，建庙塑偶像……有鲁旺（）之后，彝（）乃效旧规，孝敬父与母。[3]

这段文字同样在论述“娄”与“啥”的不同，译者仍然将鲁旺诠释成时间标志，但采用音译方式，避免直接将其意译作“城池”或“邑落”。然而疑点尚存，为什么彝（娄）与外族（啥）不能同时存在？

《西南彝志》与《彝族源流》的翻译者对鲁旺的解释可能更加贴近古人的原意，同时也更为合理。他们认为鲁旺是一个方位标志，《西南彝志》之注释称：

古代彝族按八卦方位将自己居住的区域分为八个片区，每一片区即为一个鲁旺。[4]

许多彝书都载有八鲁旺的名称，兹举一例：

南部宰鲁旺，宰拜赫鲁旺……施阿那子孙，聚居在东部。……彻彻安鲁旺，安武吐鲁旺，在这两鲁旺，武基业兴盛。……鲁底素地方，补果四房人，迷阿娄为首，迁木苦安鲁旺，到了安鲁旺……西部武补果，色斗凯鲁旺，凯额簸鲁旺，来到两鲁旺。[5]

此外，当掌扎卧勾部强盛时，向四十七部彝人声称：

四大方位，五大河流域，八鲁旺以内，原野属于我，土地属于我，水钱草钱，都要交给我。[6]

由此看来，彝人似乎确实将所居地域划为八个鲁旺。可是有些彝书却记载了10个乃至12个鲁旺的名称，[7]因此以八卦定八方八鲁旺的说法似乎太过理想化。

鲁旺不仅仅是一个方位概念，它蕴含着丰富的族类与文化地理的信

息，在观念上（而非地理上）将娄素与外族（啥）区分开来，昭示着两种礼俗的分野。彝文献对此的记载举不胜举，上面的引文已有所涉及，在此不嫌烦琐，再征引几段史料：

鲁望分野外，祭祖仿外族。修庙多如云，塑俑大如岩；鲁望分野内，以彝俗祭祖，用牲牛马猪。

在鲁望外面，习外族祭祀，建塔如黑云，庙修如大岩，烧香烟袅袅，油灯明晃晃，跪叩头点点，口里念喃喃。在鲁望以内，祭祀以彝俗，建丧房灵房，牛马牲成群，青木插神座，魂马多如云，打牛红如柿，《那史》连云霄，《伦布》如瀑布，甲胄挂如岩，戟缨遍地白，师声如鹃鸣。[8]

是否建庙塑偶像是“娄”与“啥”最重要的文化差别，《苏巨黎咪》亦载：

外族的追求，塑美丽的像，树在世界上，把偶像崇拜，照着书本做，就是这样的；彝人的追求，跨上大骏马，登上山顶，见而后识，实践而后知，就是这样的。[9]

当然还有其他的礼俗区别，阿外惹君长国的战将那待可娄阵亡于与乌撒君长国的战争中，《彝族源流》就此写道：“鲁旺外之俗，战死了的人，用黑绸裹尸。”但那待可娄是娄素，所以按鲁旺内的习俗，“先母而死者，用豹皮垫尸，用兵器抬着，朝惹家（即阿外惹部）兵营，径直进去了”。[10]

娄素认为自己是笃慕（米）、六祖的后裔，系天之子，居住在鲁旺之内，并且是大地的中心。与此相应，居住在鲁旺之外的啥（外族）则是“由大地中心向外发展的人”。外族有时也被称为“武（ ）”，如称蜀汉皇帝是啥武米，诸葛亮是武孔明，刘氏建立的蜀国为武刘啥。明天启年间率兵进攻水西的贵州巡抚王三善为武三善，其所领军队称“武兵”，吴三桂率领的清兵为“武骂”，[11]清王朝则被称为“武达子”。[12]

以上几处引文表明，彝族的识字阶层并不真正在地理上讨论鲁旺的具体范围，甚至对究竟有多少个鲁旺都没有取得一致看法。鲁旺更像是一种在观念中区分族类的方位，其核心问题在礼俗而非种族。这样，礼俗变则族类变，“娄”“啥”“武”的身份并非不可更改。《西南彝志》云：

乍的基业，兴盛一时，衰败之后，迁往西部去，祭祀仿外族，彝（ ）变外（ ）族了。[13]

类似的记载很多，如罗纪家的一支因为习武陀尼之俗，所以被称作武陀尼。[14]乌撒部的一位远祖诺迁濮，迁往北部，“住则堵法嘎，塑像多如云，塑俑大如岩”，由“娄”变成了“啥”。[15]

综上可知，鲁旺是一条动态的、有弹性的文化与族类边界，而种种变外族的记载意味着黔西北古彝人族类观念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强调族类之间的具体差别并给予细致的分类，除了鲁旺内的自己——娄，鲁旺外的人都可以称“啥”。

二 传说与故事：族类互变

族类界限的弹性与包容性观念可能并非识字阶层所独有，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与彝文献所表达的族类观念相应，今天黔西北的普通彝族百姓常常以平常而又自然的口吻告诉我族类身份变化的传说，“某某家本来是彝族”，“某某是彝变汉的”，有时还要加上一两句评论：“说汉人的话，穿汉人的衣，自然就是汉族了。”对这些传说我怀有强烈的兴趣，遗憾的是未能搜集到比较详细、完整的族类互变传说，只能在众多传说中略举一二例以供分析。

2000年8月，我在毕节地区大方县做调查时，曾听到一个传说。江西吉安府某家三弟兄清代迁到大定府，分别娶了汉族、彝族、苗族的姑娘为妻，其后代就此分化为三个民族，至今他们仍有来往，并相信大家同宗共祖。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虚构故事，但现实却能佐证它在共性方面的真实。当时75岁的大方县人民银行退休干部陈云舞告诉我，他们陈姓支系相当复杂，彝、苗、汉都有，居住在织金县者多为苗族，大方县白纳、安乐等地者为彝族，响水一带则为汉族，但大家都知道是来自同一祖先。黔西北彝族学者马昌达也向我提起，他们家族在黔西有一支变为苗，一支变为汉，大家心照不宣。现在有的汉族来找他们协商，想重新变为彝族。

也有的彝变汉不是通过婚姻，而是隐瞒身份。据说大方县城有一杜家，原是彝族，进城后怕被歧视，改为汉族，而其乡下亲戚仍然是彝族。俞家的情况与此相似，城里全是汉族，乡下则全是彝族。

与大方等地区相比，威宁作为黔西北唯一的民族自治县，到现在依然强调民族差别，民族间通婚的情况也不是太普遍。笔者有一个粗浅的田野印象，即威宁似乎没有那么多族类互变的传说，但我仍然搜集到一些，例如苏家分为汉族与白彝，但因为有共同祖先，所以至今不通婚。还有一户姓杨的，虽然被认为是汉人，但其家里供奉的是竹主，[16]这显然是彝文化的遗留。

在大多数族类互变的传说中，婚姻是一个主体情节，其中有的可能是虚拟，但联姻是改变族类身份的重要契机是毋庸置疑的，黔西北苗族至今还在很大程度上严守不和他族联姻的禁忌，苗、汉与苗、彝互变的传说相应就少得多，[17]与此相似，民族间较少通婚的前乌撒地区的族类互变传说也没有那么普遍。

三 “啥”即汉：族别观念的变化

尽管族类互变传说所反映出的极富弹性的族类界限观念与古彝书十分相似，但还是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故事的主角从群体（如某支某系）变成了一家一户。其次，不再是笼统的从“娄”变“啥”，而是具体的“彝变汉”“汉变彝”“汉变苗”“苗变汉”“苗变彝”等。再次，在关于娄变啥的记载中，主体情节往往是迁徙到外族之地学了外族的习俗，而“彝变汉”等传说的核心常常是婚姻。最后，或许是作为一种口碑文本，没有“鲁旺”等书面化与抽象化的概念。

这些差别不能只理解为文献与口碑两种载体的不同所致，它们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必须结合黔西北区域的历史，才能得到理解。

笔者曾注意到一则在族类观念方面与本书多次征引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有较大差异，而与当代彝族社会有更多相似的彝文献，《水西地理城池考》云：

西边的汉族佐洛举，是彝族变汉族的；东边的汉族武脱尼，也是彝族变汉族的。都是一样的，古人的典范，没有二样哩。实杓家有个知识丰富的人，他说今后要把人的发展清理，彝（）是彝，汉（）是汉，仡（）是仡，佬（）是佬，还有濮古和白汉人，都是同源的。后来如树分枝，一户分十户，十户分百户，百户分千户，千户分万户，就这样分开了。……慕俄格，又名阿者家，住在慕垮白扎果，是德施氏的子孙。做彝语说，是叫慕垮白扎果，做汉语说，是叫大定府；纪俄格，又叫乌撒家，住在那勒，是德布氏的子孙。做彝语说，是叫为第杓迷，做汉语说，是叫威宁州。[18]

在这则材料中，啥（）已成为对汉人的专称。这是与《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书的不同之处，为了理解这种差异，有必要弄清楚这几部书的成书时间。

黔西北彝文字至少在南宋时期已开始使用，现存彝文献则大都是明清时期的创作，本书多次征引的《西南彝志》成书于清康熙三年（1664）至雍正七年（1729）之间，而《彝族源流》在明末清初即已广泛流传。[19]但这些书并非创作，而是汇编前人的书、文所成，并且记述的往往并非作者所处时代的事情，因此书中所载的不少事件与观念当早于明清时期。《水西地理城池考》提到大定府、威宁州，写作年代及其所反映的事情相对较晚。改流之初，清王朝在黔西北设立了大定、平远、黔西、威宁四府，此后经过一系列分合升降，雍正八年改威宁府为威宁州，隶大定府。据此可知，《水西地理城池考》当成于雍正八年之后。

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后的历史发展在彝书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笔

者怀疑，“啥”成为汉人的专称，可能与改流后移民大量涌入、汉人政权作为一种力量与观念不断渗透有关。事实上，黔西北大量彝族变汉族的传说，必须放到这一宏观的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

彝文献表明，至少在君长国的大部分时期，汉人并没有成为对黔西北娄素濮造成极大影响的他者，非“娄素”者即为“啥”，因此“彝变汉”无从说起。并且在本族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难以想象有众多的“娄素”愿意变为外族，彝书所记的族类变化大都是其迁徙到外地之后模仿外族习俗造成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彝变汉”传说的主体情节是跨族婚姻，这在君长国时期是难以设想的，当时黔西北地区“四面皆夷”，汉人极为稀少，并且彝、汉联姻遭到禁止，明人包汝楫所著《南中纪闻》称：

罗鬼人掳中国男女，仍以中国男女配耦，并不给配本地人，云恐乱其种。

清初改土归流后，大量汉人从内地涌入黔西北。乾隆十四年（1749）大定府亲辖地的汉民口数已相当于原住民的一半，到道光二十七（1847）年则相当于原住民的1.53倍，然而对于汉人与边地族类的交往及婚姻作何处置，清王朝内部长期没有达成共识。许多官员认为，汉夷相通是边远社会难于治理的根源之一。他们既担心汉人将铅斤、硝磺运售边地从而改善“夷人”武备，又忧虑在汉人的教唆下，土司、土民更加狡诈凶顽，由此引起社会秩序的动荡。此外，由于族类接触而引起的土地争斗等涉讼事件也颇令官员们头痛。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奸一词被频频用来指称那些同边地族类打交道的汉人。[20]正如清人陆次云所称：

汉人潜入苗峒者谓之汉奸。[21]

但在讲夷汉之防以靖边圉的同时，士大夫同样认识到，要化导“刁风”，使苗蛮俱听教化，习礼义，又少不了鼓励汉人移民边地，并允许他们同“夷人”接触，以收移风易俗之效。早在雍正十二年（1734），云南布政使陈宏谋便将滇、黔、桂等地生苗“恃顽梗化”的原因归结于他们“不与汉人习近，不谙官语，不识条告，一任夷目指使播弄”，因此他建议：

欲化夷风，莫若使夷方多汉人，欲使汉人居夷地，莫若先定入籍考试之例。[22]

在更早时侯，贵州贵定人丁允煜曾向黔抚何世璂上过类似的抚夷之策，并指出民、苗联姻的重要性。其文称：

今苗性难治，无非习俗使然，欲治其性，先破其俗，欲破其俗，则惟使之变汉而已。……使有一寨彝居即有一村汉户，互相观感，互相制伏。彝之妇女杂以汉之妇女则廉耻易晓，川楚江广之民不必禁其娶彝女为婚，读书入学之苗择小户汉女为配，不必有强压之条。[23]

丁允煜的建议还有严教化、设塾师、编保甲、设塘汛等，何世璂读后，“奇之。已而世璂去职，厥后当世闻之，间采用其言，然不能尽从也”。[24]

结合清代贵州广泛实行保甲制、普遍安塘设汛等情况，可知“不能尽从”的部分主要是用汉户同化“彝户”的策略，它反映了清王朝在“夷乡”的两难选择——是否允许“夷”汉交往？这种矛盾心理在对待跨族类联姻的政策中表露无遗，但不管官府的态度如何，“夷”汉之间的通婚现象已经难以禁绝。乾隆二十六年（1761），湘抚冯钤成功使朝廷同意禁止湖南“民苗结婚”，兵部打算将这一政策推行至贵州，黔抚周人骥立即质疑其可行性：

贵州通省皆系有苗地方，旧疆熟苗四十余种，散处于各府州县村落之中，久入户籍，更有薙发冠履与汉俗无殊者，其与民人比屋杂居，互结姻亲，由来已久，势所难禁。新疆（指贵州东南部一带新近设置流官的地方——引者注）一带全系生苗，即附近城汛者亦各结寨，向与汉民异籍，于雍正十三年经原任古州总兵官韩勋奏准，古州等处附近城汛寨苗准照楚省之例与兵民彼此结姻，原欲使之亲睦观感，化苗为民。……臣复查治苗不外镇静立法，首严汉奸。所谓汉奸者，盖指外来流匪交通勾结者而言，其土著农民，往来洽比，原无他虑。臣任黔四载，稍知地方情形，务在汉奸绝迹，自可久安长治，原不在民苗为婚之禁与不禁也。[25]

既想化“苗俗”，又要禁“汉奸”，偏重于前者的周人骥谙熟朝廷的一贯策略，他巧妙地将二者区分开来，结果赢得了乾隆皇帝的支持。朱批云：“所见甚是，如议行。”

周人骥的奏折还描绘了包括大定府在内的“旧疆”民苗联姻的普遍情形，这正是彝变汉等传说产生的背景。[26]其实，不管中央王朝是否有意推进，在客观上，从明代的卫所到清代的移民潮流，总是由移民带动文化移植，从而改变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社会面貌。族类互变的传说仅仅是这场宏观变迁中的一些片段而已。

族类变化的传说似乎还表明，黔西北从“四面皆夷”演变为“汉少彝多”，或许不能仅仅从移民潮流这样一个种族迁徙或其他种族人口消长的角度去理解，今天在黔西北地区广泛流传的种种“彝变汉”的传说暗示，一些“汉人”其实是原住民转变族类身份的结果，但由于时间不长（有些据说发生于晚清、民国时期），所以别人还能够明白其由来。“汉变彝”的传说没有“彝变汉”那么普遍，但其含义可能更为复杂。一方面，其反映了汉人“彝化”的情况；[27]另一方面，许多“彝人”其实是借此证明自己本非“彝、苗”，以改变被动的处境，获取更多的资源。[28]就此角度看，如果社会场景不出现大的变更，他们或许最终会直接强调自己是“汉人”，这样的“汉变彝”无异于“彝变汉”的过渡形态。[29]离开了从汉、彝文献中梳理出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就难以真正理解族类互变的传说。

第二节 文化变迁与族群意识：普底黄氏家族的个案研究[30]

本章第一节分析了彝人动态而富于弹性的族类界限观念，以及改土归流后族群认同方面的演变情形，下文将叙述大方县普底黄氏家族的个案，一方面更清楚地展现彝人转变文化身份的努力与策略；另一方面也想说明，文化认同的转变并不一定意味着族群认同的转变，对王朝的认同不一定意味着对汉人身份的认同。[31]本节的内容或许与第一节的论述稍有不协调之处，因为笔者所看到的历史是一个矛盾而又和谐的过程，难以用任何单一的模式来叙述。

一 彝谱与汉谱

普底位于大方县城东约30千米处，以满山遍野的野生杜鹃花和优质煤矿闻名。根据文献和当地人的讲述，普底又名普康底、普根底、普坑底等，都是彝语的音译，意思是“仡佬人居住的坝子”，这似乎暗示仡佬人是该地区较早的居民。但在清初甚至更早，这里已生活着多种族类，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杂居或聚居着汉、彝、苗、仡佬、回、京、白等民族，其中以彝族人口为最多。据说，在清代，彝族人已拥有大部分土地，而苗族、京族等则世代都是彝族的佃户。

普底最具声望的大族是黄姓，约有四千五六百户，今普底乡政府一带，由此而被称为“黄家坝”或“黄坪”。黄氏系彝族，但曾经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黄姓是从江西吉安府六能大桥头迁至大方的，[32]还有认为黄家是“汉父彝母”的。而忙着组织族人续谱和修祠堂、在当地享有较高威望的黄克璲老先生则说黄家是地地道道的彝族，和江西毫无关系，本来也不姓黄。

黄先生的说法在《黄氏族谱》中可得到印证。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黄氏家族中的一位读书人黄继便力图梳理本族的世系：

余上世祖考世系，往往迭出于夷册书籍，而当今圣朝专以四书、三坟五典之道统一天下，而夸册字迹恐愈久而磨灭殆尽，后世之子孙即欲考而失据，能不私心悼叹而隐忧先世之失传哉！……余鼻祖自安顺府属巴南之宣慰司奔投水西罗甸国王宣慰安氏即额部下建业设家以来，历年久远，而余先祖世系书籍简略，难以粤稽。又恨上世夸风，六代以前之祖考俱皆超荐升送，不留神主、竹主，而书册又不著名号排行，此所以升送以前之祖考痛恨追溯无自，惟旁搜水西安氏之世纪，自即额宣慰以至水西灭没之代号冥遭，其世纪三十有二代。按，水西主安氏冥遭与余先祖开、体元同时，自少祖升送以后可考而知者，又经十二代矣。以此推求，则升送以前之先祖约有二十余代矣。窃思有子有孙而族支大略繁众，使上世始祖湮没二十余代而子孙能无伤心隐忧哉！余为此惧升送之

后出祖考昭穆之序又恐复蹈前辈，万不得已，故以刍荛出见，不顾旁人之是非而妄叙族谱及图，以待将来之子孙再加斟酌笔削，历续于后世，以递传于后世之后世也云尔。[33]

“巴南”即“播勒”的另一音译，又称娄娄勾，在今贵州安顺一带，是九大娄素君长国之一。[34]按族谱所叙，黄氏先祖本属播勒支系，后来投奔水西。彝族有自己的文字传统，但谱系并非采取汉人那样的树枝图模式，虽然有时会叙述旁枝，但并不完整，大体上可以称为直线式谱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彝人只有家谱而无族谱，历年久远，有些没有坚持续谱或谱系遗失的家庭与个人便很难再查阅先祖的名字及源流，这正是黄继面临的麻烦。

但即便没有谱系，黄继还是有其他资源可以利用——竹主或神主，这涉及彝人的丧祭礼仪，必须略加交代。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彝族认为人有三个灵魂，一个在墓地，一个回到老祖宗的地方，一个进祠堂，享受子孙的供奉。[35]人死后，要把一个灵魂招附在草根上，以此取代已逝的躯体，用红、绿丝线分别代表男和女，根据死者的性别，选择恰当的丝线。同草根一起装入刺竹做的竹筒里，此即竹主，同时放入竹筒内的，还有一些食物、猪牛羊三牲的一点肉、些许盐巴、茶叶、羊毛等，接着把竹筒装进篾里。也有的地方刻木，将魂招在木板上，此即木主。木主、竹主都要放进祠堂，逢年过节用酒、茶、肉祭祀。祠堂一般都比较小，和汉人完全不同，例如赫章县雉街乡发达村的陆开良老人声称他看见的祠堂都只有1～2平方米大小，祭奠时也就在外面烧烧香而已。[36]

许多竹主或木主上都会写上逝者的名字，若把其汇集起来无异于一部家谱或族谱。但竹主、木主在祠堂里安放六代后，要置入蜂筒状的大木桶里——彝语称“维补”，一起装入的还有锅、碗、斧子、农具、弓、箭、刀等器物的模型，接着进行祭祀，“超荐升送”，移往岩洞里或挂在岩上。九代以后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之后便不再祭了，子孙们可以重新分支分类，相互联姻。通婚后是姻亲，不通婚则依然视作家门。[37]

或许是因为“维补”已被破坏，或许是因为辗转迁徙而无法弄清楚“维补”的所在，或许是因为禁止重新打开“维补”，总之，黄继无法搜集到更多的竹主，因此对祖先的追述只能到阿进为止。有鉴于此，黄继决心进行改革，用汉文并采用汉人谱书的模式，撰写本族的图谱，“以递传于后世之后世”。

黄继开创了叙谱的新模式，他是黄氏家族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但其撰写的族谱已佚，我们今天只能从道光十年（1830）编修的《黄氏族谱》中看到这篇序言。道光族谱还收录了另一篇重要文献，即嘉庆己卯（1819）科举人、宦游福建的黄思永所作的《世系考》：

粤考我始祖巴南之季子主器者，名芝阿陶，为南国之王；次曰芝阿感，爰居左相；三曰芝阿隮，爰居右相。当其先，巴南与水西二国兵争

不息，我始祖阿隮睦邻有道，订为秦晋之好。由是西王即额聘我始祖归辅水西，祚之土，名曰恩饬化岚，即今之清镇所属鸭池河茶店，城郭犹存，是以德粗田边有岳家坟也。其他疑以传疑，皆为无稽之言耳！佐理甸国（甸国即罗甸国，据说为水西祖代所建，因此常用罗甸国称水西——引者注），屡有功绩，后封于咸麻乐期，即今平远属金家坝，名为隮早登，其地有二冢祖墓。嗣后吴贼（指平定水西的吴三桂——引者注）假道并吞，水西祖迁居定郡，我祖屡战屡捷，护卫御驾，又封于老包加更，即今之黔西制下类庄也。自是罗甸国王欣慕忠臣勇将，复封于乐贡里七甲，因名其地曰隮密，此阿进以前事也。彼处有元章本，上有一洞，迁竹主于其中，崇山峻岭，亦定郡之胜景，是以传之万世，不可斩伐其上之树木，亦后人之所宜严持者矣。迨阿进传阿陇，其长子名阿保，守隮密。本支次子名老哲，西主秀封，始创建于普康底……传至白嫩，生子四人，总摄六路祃写，犹今之协镇长。曰康足，承普底之宗祀；次曰弟哥，分封沙架；三曰额约，创业革勒作达，生一子而早夭，遂乏其嗣；四曰白臧，业在以那，其子恒备，才力兼全，居总兵之职，此房分之所由始也。康足生子二人，以弟哥无子，长男整兴爰守本支，官普务而相臣。仲子即擢出继二房，官补目而藩王室，煌煌之勋，述不胜述。整兴又乏后，以即擢之长子绍述大宗，官化阁目籍之职，与今之提督一般。次子守沙架，内相西王落叶额区，各主二人，功业炫烂，所由咸镇当时，各传后世也！自此开元子四人，体元子六人，上下十房，皆康足后裔，较为亲近，故相与恭续族谱，以结万年之谊焉。[38]

由此可知，从播勒（巴南）投奔水西的祖先是阿隮，并且阿进之前的一些竹主放在大定府亲辖地一处风景优美之地的山洞内。此外，黄氏在水西的发展史，黄继仅以“自安顺府属巴南之宣慰司奔投水西罗甸国王宣慰安氏即额部下建业设家”一笔带过，而在黄思永的《世系考》中，却有了更加丰富与辉煌的叙述，先祖系播勒君长国君长之兄，又在水西屡立殊勋，获得了大量赐封，土地遍及贵阳附近的清镇、黔西州以及大定府亲辖地。这类当时文献并不见载的祖先勋业，在汉人的族谱中比比皆是，研究者已经不能从是否真的曾经发生过这些事这一面来理解其真实性，加上黄氏并非黑彝，且族谱所述史实有不尽准确之处，笔者对其先祖的这些故事自然更多了一层审慎。不过，黄氏的这种表述所潜藏的含义却非常发人深思。即便到了嘉庆十九年，改土归流已经150余年之后，黄思永仍然把自己家族在普坑底的定居与土地权利，归因于水西君长的赐封，而非叙说另外的故事，将其与王朝拉上关系；更不会为本家族寻找一个汉人的根源，相信这是当时普底整个黄氏家族共有的历史记忆。[39]可见，勾政权虽然瓦解了，但其权威性并未随之彻底消亡，而黄家仍然在坚持着自己的娄素身份，即便在科举上已经有所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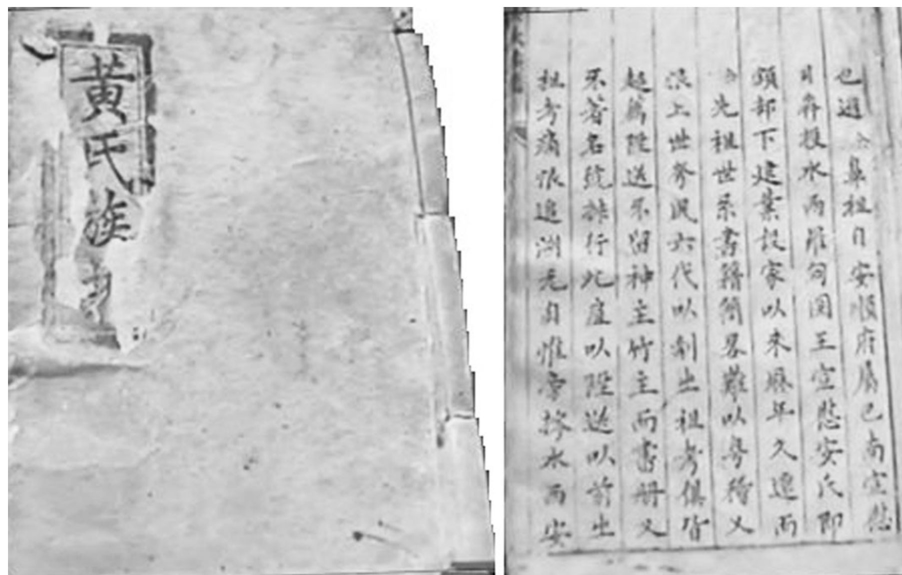


图8-1 《黄氏族谱》封面及黄继所撰序文

同黄继一样，黄思永仍然无法弄清从阿蹅到阿进之间的20余代世系，[40]只能一笔带过。阿进以后的世系则非常清楚，到开元、体元时发展到上、下十房，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命名。这一格局至今未变。我们还可以参看家谱中的“黄氏族谱世系联次”：

黄氏族谱世系联次

一代　阿进

二代　阿陇

三代　阿保守随枝 老哲创业普根底

四代　白二

五代　[illegible]足守普康底 弟哥创业沙架 额约革勒作达

　　白臧创业以那

六代　振兴　即濯（肇本 肇基）

七代　黄开元顺治庚寅年生　黄体元康熙戊午年生

八代　武举黄显庸[41]　　康熙甲子年生　　甲

黄显先	康熙丁卯年生	乙
武庠黄显绪	康熙己巳年生	丙
武庠黄显众	康熙乙亥年生	丁
武庠黄显祚	康熙丁丑年生	戊
黄显遇	康熙庚辰年生	己
黄显承	康熙壬午年生	庚
黄显谟	康熙乙酉年生	辛
黄显亮	康熙己亥年生	壬
黄显名	雍正癸卯年生	癸

九代　　……

又，族谱所载排行诗如下：

肇元显系崇 应思正道中 克家承祖泽 辅国述宗功

从彝文谱牒到汉文族谱，不仅意味着文字的改变，在形式上，树枝式谱系取代了直线式谱系；在文化内涵上，这一变更更为复杂，其中甚至暗含着性别观念的改变——女性的名字不再出现在家谱或族谱中。而在传统的彝族社会中，女性并不仅仅是男性的附庸，她们可以参加各种公共事务，甚至出任君长之职。[42]如几百年间备受士大夫推许，直到今天依然受政界、学界高度评价的水西君长奢香是女性，此外反抗元朝的蛇节、归顺明廷的乌撒女君长实卜等在历史上都曾鼎鼎有名。[43]

对女性的重视同时体现在母党的重要地位上。舅舅在彝人的亲属网络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在天地之间，以舅舅为大”。[44]《苏巨黎咪》称：

人生占三种条件，依托舅舅为上，有衣穿为中，有饭吃为下。[45]



图8-2 “罗鬼”女官出行图

资料来源：康熙《新补贵州通志》卷30《土司·蛮獠》。

与男尊女卑观念的淡薄相应，彝族的家谱不仅记录男性，同时亦记录女性，正如《雄书安氏谱序》所云：“夷书有二，曰哺蔡，纪父族也；曰睦蔡，纪母党也。”[46]就笔者所见彝书谱系，父族之谱与母党之谱在形式有一定差异。在黔西北彝人的历史记忆中，最早的祖先是笃慕，他有六个儿子，即彝族的六祖，他们的后代形成了武、乍、糯、恒、布、默等六大支系。彝族的谱书往往利用父子联名制的形式，将世系上溯至笃慕、六祖之一或六祖之后的某位祖先。例如：

布祖弭克克，弭克克为一，克迫默为二，后裔默遮俄索（即乌撒的缔造者——引者注）。

德阿木为一，木默遮为二，默遮俄索三……曲阿娄为十。

娄濮野为一，濮野阿蒩二，阿蒩阿舍三……阿乃哪洛十。

哪洛阿诗一……[47]

这是乌撒君长的世系系谱，从弭克克一直到末代君主共50余代。子名前接父名的最后一个或两个音节，由此形成了代代相连的父子联名制。十代为一节，之后又从一世算起，其中的承接关系是一目了然的。极少数谱系并不十代一转，如《彝族源流》所载水西君长世系：

笃米俄（即笃慕，六祖之父——引者注）一世……洛阿勺十世。

勺阿默十一，……鲁代额非八十三，额非恒宗八十四。[48]

父子联名制的记谱方式并不意味着彝族谱系总是单线的，虽然在彝书中很少看到汉人家谱中那种复杂的树枝式系谱，但不少谱书还是记载了两支以上的谱系，如《乍氏源流》：

米雅苦一代，苦雅窦二代……阿娄乍五代

乍雅苦一代，苦雅伟二代……纣窦阿吉八代。纣窦阿吉为君，纣窦阿得为臣，乍阿立为布摩。这三贤时代，建主笃祖祠，用两条大牛，设鹤形祖祠，设鹃形灵位，以松象征天，以桃象征地，以额居阳位，以索居阴位，男祖居鄂位，女祖居莫位，设置祖灵位，按顺序供奉……君臣各一位，布摩史官各一，都各司其职，实在是这样。

乍雅摩一代，摩阿祖二代……西部的乍氏，境首人成千，境中人上万，境末连着阿得葛，就是这样的。

米雅苦一代，苦雅卓二代，卓雅待三代……[49]

乍雅苦与乍雅摩是两兄弟，系苦雅窦的后代，而苦雅窦又与苦雅卓是兄弟，都是米雅苦之子。《乍氏源流》记载了米雅苦之后的三支系谱。

女性谱有多种形式，一种可称为“母谱”或“妻谱”，以男性父子联名制世系为中心，将他们的母亲或妻子的名字、出身记录下来，这其实也是一种男女混合谱，是最常见的女性谱系。如《君代母系》：

忍额佐的女儿，名额佐能冬，是脑雅洛的母亲。恩雅叶赫，是洛雅杓的母亲。细额能仰，是杓雅默的母亲。显额咪录，是默阿德的母亲。鲁歹妥的女儿，名妥雅尼套，是德阿施的母亲。……[50]

一种是奶奶—儿子—孙女型的谱系。《关于母系的叙述》称：

娄额能冬出嫁，住在旨布那额，是策耿纪之母。耿纪娄哎出嫁，住姆雅苏底，是格杰杰之母。杰杰珠汝出嫁，住且耿博委，是知那那之母。那那卧色出嫁，住姆雅苏嘎，是窦赤叩之母……[51]

从这种谱系还可推知，父女之间亦有联名关系。还有一种母亲—女儿型的谱系，除了母女不联名外，和通常的男性谱系已没有区别。例如：

尼堵珠汝出嫁，住点默俄嘎，是大额咪汝之母。大额咪汝出嫁，住抹耿苦勾，是阿诺噜吐之母。阿诺噜吐出嫁，住毕杰俄委，是阿布苏克之母。阿布苏克出嫁，住叟苦俄委，是阿维汝歹之母……[52]

与女性入谱相应，祠堂中的神主牌或灵桶中亦有女祖先之名。但笔者始终没有发现母女联名式的谱系，并且一些女性谱其实依附于父—子谱系，这说明男性还是处于比较中心的位置——出任君长者同样以男性为主，女性君长往往是继承了丈夫的君位。

除了某某氏之类的记载外，《黄氏家谱》已经没有女性的位置，但其他一些彝族的汉文家谱尚遗留有一些痕迹。《杨氏支谱》（毕节）对远祖的追述全部抄录自彝文谱牒，并贯以考、妣之名称：

一　　世　考：穆阿卧（）；妣：伦元（）

二　　世　考：卧阿烨（）；妣：都素（）……

五十二世　考：陇智陇格（）；妣：奢乐（）

五十五世　考：阿玉阿姑（）即奢展公；妣：龙氏

考：阿玉位基（）即化龙公；妣：安氏

……

镇西支派：

杨德妻氏 生子四，长其福，次其禄，三其策，四其贤

其福妻氏 生子二，长天钦，次天钊……

天钊妻氏 生子，长绍清，次绍滨，三绍溥……

杨氏对远祖的追述全部源自彝文谱牒，同前文所引的彝文谱系相较，可以看出族谱编修者并非原封不动地抄录，而是在形式上做了不少变动，从中可看出汉人记谱方式的影响，例如考、妣名称的出现等。五十五世阿玉阿姑与阿玉位基被称为奢展公、化龙公，似乎已有汉名，这有可能是后人所取。自阿玉阿姑、阿玉位基之后，彝名消失，只有汉名，且母系的名字不再出现，只有“某氏”字样，女儿则根本不上谱。[53]

二 彝名与汉名

《黄氏家谱》中的好几代祖先都没有汉姓，如阿进、阿陇、阿保。“阿”在彝语写作 ，彝俗喜欢将此字加在名字或称呼中。如《西南彝志》中的“纪阿甫”“泰阿姆”，在《彝族源流》中分别作“阿纪（祖）阿甫”“阿泰（太）阿姆”。乌撒部的始祖名乌撒侬，又称乌撒阿侬，其后裔阿博杜又称阿博阿杜。[54]在叙事诗《阿诺楚》中，女主人公时而叫穆仇诺楚，时而叫穆仇阿诺楚，其父本名叫穆仇雨腊，但书中常常称其为“穆仇阿雨腊”。在称谓前加阿亦非常普遍，如称父亲为阿爸，母亲为阿妈，穆仇雨腊称其表妹史煮漏哲为“阿表妹”，后者称他为“阿表哥”。[55]直到今天，黔西北彝族社会在称谓中使用“阿”的情况还十分常见，他们认为这样要亲切一些。[56]加“阿”的习惯使得有些父子联名谱看起来似乎不联名，如《彝族源流》第17～20卷第135页所载：“……麻堵补三代，补雅侯四代，阿侯恩五代，恩仁仁六代……”

自第七代开始，黄氏家族开始采用汉姓，其原因家谱中没有记载。有一种解释是，黄开元彝名老赦，汉译为“黄龙”之意，故将黄定为本族之姓。[57]但黄克璲先生告诉我的是另外一种说法，康熙年间，开元公的长子同一个姓黄的汉人是同学，这同学后来死了，此长子便顶其名，以黄显庸的名字参加科举考试，中了武举，从此便以黄为姓。[58]这个汉人同学的后人即今大方县城附近的核桃湾黄家，黄克璲先生还说：“现在核桃湾黄家还和我们认本家，我们不认也不可能，但我们和他们不是同一系统。”

黄显庸得汉姓之后，其父亲与叔父也改名为黄开元、黄体元，而祖父辈的振兴、即濯则被追认为（黄）肇本、（黄）肇基。

像这样因科举而取汉姓的情形并非罕见。虽然早在顺治十七年（1660）黔抚卞三元便奏准文理稍通的苗民可赴学道考试，优秀者取入附近府州县学肄业，酌量补廪、出贡，[59]但长期以来，非汉族类的科举权利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康熙四十年代，贵州巡抚于准曾质疑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奏请加以改革：

伏念六合苍生，尽属赤子，何分苗、汉？岂有已入版图之苗民而忍令弃之化外耶？官斯土者，视苗如草芥；居斯地者，摈苗为异类。既不

鼓舞，又无教习。即间有一二苗民志切上进，又以“土人无用流官”之例，不准考试科举。[60]

这样，取汉姓，甚至冒充汉人身份应考就成为原住民的一种策略。同普底黄氏一样，威宁猴场镇下藤桥的陈姓本是彝族头人，因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反抗朝廷，不能入仕，一位姓陈的秀才遂劝其改陈姓。[61]

地方政府其实也在积极推动原住民改革姓氏制度。改流之后，彝人同官府发生了直接联系，需要登记人丁事产，缴纳赋税。在官员们看来，原住民有名无姓，不但有违自己的习惯，而且极易造成混乱，因此积极促使他们改用汉姓。[62]毕节地区民族研究所的马昌达（彝族）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清初有一彝户从云南沾益迁至大定府，在登记缴税时，官员问：“你叫什么名字？”回答说：“我叫阿哲。”“原来你姓安（阿、安谐音——引者注）。”从此该彝户便以安为姓。这些故事看似于史无征，但却折射出当时的历史片断。[63]

一方面是官府的推动，一方面是原住民试图通过接受汉人的礼俗以争取更多的社会文化资源，改流后汉姓在黔西北很快普及，彻底改变了明代水西、乌撒两大土司辖区只有统治阶层中的极少数人兼用汉姓的状况。[64]获得汉姓的途径多种多样，王继超先生归纳为几种方式：一是意译，如彝名叫阿待，待是田的意思，于是以田为姓；再如阿景，景意为玩，谐音为王；阿举，举意为萝，谐音为罗。另一种是音译，如阿维的维与文音近，于是姓文，阿余改姓余，沙玛则姓沙或姓马。还有一种是结盟，如过继给汉人做义子，遂取义父之姓，再如彝汉两户关系好，彝户便跟着汉户姓。因为改汉姓的情形多样，所以同姓者未必同宗，异姓者可能血缘相近，这样就造成了同姓开亲、异姓禁婚等现象，外人往往难以理解。[65]

像普底黄氏一样，现在有不少彝族虽早已采用汉姓，但他们依然记得一些用彝名的祖先。毕节地区师专艺术系的安亚先生说他家原住乌撒盐仓（盐仓是当年乌撒土司的驻地——笔者注），阿保公时迁至毕节青场，开始排字辈：“正中大文明，英贤定嗣生。传家唯有道，主德永华新。”

许多彝人虽使用汉姓，但彝名并未就此放弃，由此形成了彝、汉双姓制，直到今天尚有许多地区保留着这种习惯。但普底黄氏对本族名字已经彻底放弃，这一变化不仅仅是姓名符号的更改，它还意味着文化认同方面的演变。

上文已提到，彝人没有统一的族谱，父子联名制给人一种有名无姓的感觉，当然更谈不上排行，我们通过名字似乎无法确定人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但深入考察黔西北彝人的姓氏制度，却可以发现其中已体现着一个家支或比家支更大的家族的认同。彝人完整的姓名由三部分组成：能彝（　）+父子联名而来的名字+侯读（　）。通常只出现中间的名字，但能彝与侯读却是每个彝人都非常清楚的。[66]往往

以历史上某一著名祖先的名字作侯，如水西安氏以著名远祖、从武侯南征的妥阿哲的名字为侯读，被称为阿哲家，乌撒安氏则是以著名远祖默遮乌撒为侯读。一个侯发展壮大，人口越来越多，于是在满九代后举行盛大的祭祖活动，开始分支，这种活动称为“尼目维弄”，正如《彝族源流》所云：

兴盛做尼目，昌盛行维弄，一户生十户，十户生百户，根生在中部，枝叶覆四方。[67]

分出的家支要取一个标记，往往以迁居地名或水名乃至动植物名为记，这种标记即能彝。[68]侯读相同，能彝不同者可互相通婚，尚未通婚的侯读间依然彼此视为本家。可见一个侯读往往包括若干个能彝。

以上是我在田野调查中得到的材料。[69]彝文献对此亦颇多记载，《阿玉哭嫁》云：

赫海珠舍家，分大支小支。史吐能彝一支，有一位淑女，叫乃恩舍伟，嫁纪俄勾地方，一户大姓家，称马嘎能彝。[70]

赫海珠舍即侯读，而史吐则是能彝，有了它们，我们就可以确定乃恩舍伟的具体身份。《彝族源流》记载了许多从取得侯读到分支后形成能彝的例子。此处以麻博阿维家为例，阿维家是黔西北地区有名的四大白彝之一，[71]取汉名后有文、黄、杨、安、余等若干姓。据载麻博阿维是彝族六祖中武支系后裔，但从武祖到麻博阿维的谱系似乎已有些模糊。史载：

米阿克（即武祖）一代，克雅恒二代……保雅谷十代。谷德伟一代。[72]

谷德伟时住在洛武博所（在云南省昆明与路南、罗平一带之间），因受到毕（布）部诺克博的攻击而被迫迁徙至沾扎甸（今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沾益坝子一带），在此修建祖祠，敬奉祖灵。在此能追述的最早的祖先是谷足濮。他和谷德伟是何关系已无法弄清，从谷足濮到麻博阿维的世系很清楚：

谷足濮一代，足濮舍二代，濮舍濮德三代……默遮确九代，确苦足十代。苦足苦弄一代，苦弄麻珠二代……濮色鲁足十代。鲁足米一代，米署奋时代，有君长称号，始建布摩根。奋镏颖三代，镏颖麻博四代，麻博阿维五代。[73]

麻博阿维是一个有作为的祖先，他“建立好秩序，实现好愿望。清理宗谱，大祭祖灵，祭历代祖宗”。并且担任卓罗纪部的勾则官，因此其后代以其名为侯读，称“麻博阿维家”。发展若干代后，在勺恒足姆作“尼目维弄”祭祖分支，长子纠补阿勺，始住巴底（贵州省威宁县草海镇一带），后移居阿鲁卯（威宁县草海西岸西凉山一带），是阿芋部的领兵官，其支系以“博所”为能彝，称“博所能彝，麻博阿维家”；次子始居姐

嘎（威宁县盐仓镇东腊寨一带），后迁姆史嘎（威宁县板底乡雄英村境内），为乌撒部的弄初官，管理粮草，以“珐吐”为能彝，称“珐吐能彝，麻博阿维家”；另外一支从巴底、博邹启（威宁县城北葡萄井）分出，迁至尼目甸凯（贵州省赫章县境内），以“芍吐”为能彝，称“芍吐能彝，麻博阿维家”。这一支系后来似乎又分支，不但产生了新的能彝，还产生了新的侯读，出现了“麻伟能彝，阿蒙甸凯家”；此外先后分出的尚有“史吐能彝，麻博阿维家”“甸吐能彝，麻博阿维家”“洛那能彝，麻博阿维家”等。还有一支迁居水西的，接受了汉化，取汉姓，读汉书，用汉文，甚至有人在康熙年间中了举，其能彝不得而知，或许他们像普底黄氏一样，放弃了取能彝侯读的习惯。[74]

像麻博阿维家的这种情况在黔西北极为普遍，布所阿铺家同样是武祖后裔，在布所阿铺时获得极大的发展，“得以受肥田，得以受沃土”。于是“兴盛做尼目，昌盛举维弄，祭历代祖宗”。迁徙分支由此开始，在很长的时期内，先后产生的新家支有妥尼能彝、芍吐能彝、博所能彝、益德能彝、史吐能彝、侯吐能彝、马嘎能彝等，遍布米嫩、色脱、鲁洪、色翁四大山脉及五大水系，居住范围涉及滇东北、黔西北、川南、黔中的阿芋陡部、芒部、陡靡部、古苦勾部、扯勒部、水西部等几大君长国，他们都奉布所阿铺为共祖，以其名为侯读。[75]

以上讨论揭示了黔西北彝族姓氏制度中所蕴含着的家支（族）认同，直到今天，能彝与侯读在社会生活中尚有重要意义。联姻时，男女双方必须报上能彝，如相同则是本家，不能开亲。许多人告诉我，能彝称号属于家支的秘密，不能外传，以防别人混入本支，分享权利，能彝、侯读相合即属一家人。

综上可知，普底黄氏家族对彝姓的彻底放弃，绝不仅仅意味着姓名符号的变化，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或许更值得思考。支系认同的主要载体，显然已从姓氏制度转向树枝式的族谱（自己或祖辈的名字载于谱书的才可能被家支认可），以及宏伟的祠堂等。

三 汉人身份的伪装与绅士化

明清时期的官员与士大夫相信，风规礼俗与社会治乱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因此在“夷乡”推广汉俗，改变“蛮风陋习”成为地方官府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所谓“欲治其性，先破其俗，欲破其俗，则惟使之变汉而已”。[76]但是，移风易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采取暴力逼迫的方式，对那些严守传统的族类，官府往往不会强行干涉。[77]清王朝甚至允许西南地区的“苗夷”保留自己的发式。乾隆四十五年（1779），和珅途经湘、黔、滇一带，见该处“苗民”当差供役，极为恭顺，但沿袭旧俗，不行薙发，于是奏请改变旧习。乾隆皇帝批云：

滇、黔一带民、苗杂处，且有苗多于民之处，伊等耕凿自安，输诚服役，久与内地民人无别；徒以不行薙发，尚循旧俗，遂尔显示区分；

但已相沿日久，若一旦悉令遵制薙发，未免心生疑惧，办理转为未协。著传谕该督、抚等明白宣导，出示晓谕，所有各该省苗民，其有愿薙发者，俱准其与内地民人一例薙发，以昭一视同仁之意。[78]

这一段话代表了清廷对“夷乡”风俗的态度。直到晚清乃至民国时期，黔西北的许多彝人在语言、衣着、发式、婚丧仪式等方面尚维持自己的传统，大量的地方志材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同治《毕节县志》称：

（猡罗）男子剃髭留髯，以青布缠头，短衣大领，袖长及膝，腰系蓝裙，行则披毡戴笠，大布缠脚，蹑草履。女子分发为二，亦用青布缠之，积发如盘，作梅花以饰额。耳戴大镯，垂至项，……病不延医，惟用鬼师，以牛羊豕鸡禳之。……既死，杀羊取皮以覆尸，已用竹席裹之，以长木二横合之若梯状，侧置尸其上，男左女右，不葬而焚，将焚，族党咸来，……鬼师披虎皮坐其上，作法念咒。[79]

咸同年间平定黔省“苗乱”之后，曾责令苗人薙发改装，但“经营数年，卒不能一律如约”，士人们感慨：

异俗贯常，积重难化，用夏变蛮，诚不易也。[80]

与许多地方的原住民努力维护自己的传统不同，普底黄氏的策略是积极抛弃自己原有的礼俗，全方位接受包括汉姓、族谱、祠堂在内的汉文化，以扩张本族的势力。他们很早就留辫子，改穿汉装，并且主动地、用自我强制的方式学习汉语。黄克璲先生生于1937年，完全不懂彝语，他说父辈也不会讲，爷爷辈可能会听。他听老人们讲，以前在家中大人自己不说彝话，也不允许孩子学，并且在讲汉语时力求地道，不能让别人听出彝语的痕迹。时间一长，彝话就被整个家族遗忘了，所以在大方有这样的俗语：“好个黄家坝，彝人说汉话。”[81]

除了学习汉语、汉俗外，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黄氏还试图虚构祖先历史，以表明自己系汉人身份。他们声称自己祖籍江西吉安府六能大桥头，属“汉父夷母”。与这一说法相配合，他们放弃了彝族原来面积只有1～2平方米的祠堂，修建了若干宏伟的宗祠，其中有一个被命名为“江夏祠”。作为读书风气浓厚的大族，他们完全清楚“江夏”位于湖北，是黄姓的主要郡望之一，如此命名的目的正是为了伪饰自己的汉人根源。一些老人告诉我，直到民国时期他们外出时都声称自己是汉族，而别人也无法从外表、谈吐中辨认出自己的真实族别。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受汉人的欺侮，“公鸡没有肥的，汉人没有好的”。这是从前在黄氏族人中流行的一句俗语。这句俗语表明，一方面彝人需要伪装汉人身份，与此同时，他们内心也在自己与汉人之间画了一条族类的界线。

事实上，不管风俗与文化如何改变，黄氏并不曾忘记自己的彝人根源，上述道光年间所修家谱已经清楚交代了自己的族类，并以自己同播勒、水西二君长国辉煌历史记忆为荣，甚至把定居普底的权利归因于水

西君长的赐封。光绪年间黄氏族人又重抄了道光时的家谱，并恭恭敬敬、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此外，在有意无意之间，黄姓还在祠堂中遗留了彝族文化的影子。在我的请求下，黄克璲先生和安亚先生带我去看了几座祠堂，有新修的，也有民国以前保留下来的。所有祠堂供奉的都是木制神主牌位，搭着红布，堆成金字塔形。神主牌插在一小方木头底座上，插槽内有一张折叠着的纸，纸上有“赞词”，由有学问的人来写，主要是追述死者的事迹，颂扬其美德。但目前旧祠堂里的神主已经很少附有这种“赞词”，据说是“文革”期间丢失了。总之，普底的祠堂内陈设给我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很像我在珠江三角洲等地看到的祠堂，但我注意到，在建筑风格上，所有黄氏祠堂屋檐的四角都分别雕有四条龙，屋脊上则雕有一对虎，这显然与黔西北彝族崇拜龙、虎有关。[82]在普底迎丰村，我们还发现一块看上去时间很久远的神主牌，正面是彝文，背面是汉语，拂拭去牌面的尘土，努力辨认，汉文内容如下：

考黄公讳体元老大人

皇清待诰显　　　　　　　　　　　　之位

妣金氏　　老大孺人

周围的人告诉我，“上面”曾派人来翻译过此牌的彝文，是阿赫公的神主，体元公是黄氏第七代，而阿赫公则要早得多，显然，汉语和彝文所讲的不是同一人。这样一块彝汉文合璧的神主牌表明，黄氏仍然珍惜其彝人的身份。

黄克璲先生说“人宜离，神宜合”，所以要修祠堂，让祖先有地方聚在一起。同时，“神要清静，人要热闹”。因此祠堂应修在四周无人居住的地方。1949年前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到祠堂祭祀，经费来源于族中公款，安放神主亦不需要交钱或其他财物。黄姓在分家时，要分一笔钱财搁起来作公款，不给儿子，这笔钱往往用来购置田地，租给别人耕种，收租子以作修坟、祭祀之用。黄家的族田很多，有一百多亩，主要是第八代显字辈十弟兄置下的，清明节、寒食节、十月初一都要杀猪，全族聚餐，费用全从公款中出。

相对于祠堂的建筑风格，在丧祭礼仪方面，彝文化的遗留更为突出，形成了彝礼与汉礼并行的局面。虽然我在祠堂中只看到神主牌，但据说直到民国年间黄姓还是神主与竹主并供，竹主是一个竹筒，夹一片扁竹叶。安放竹主要做七天以上的彝家斋戒，神主则要请和尚做七天道场。后来只做道场，竹主渐少，1949年后竹主才消失。此外，解生、预测可以请布摩，也可以请和尚。[83]

遵循旧有习俗的另一个表现是正月间请“蜂子神”——请者的灵魂在蜂神的指引下来到祖先的归宿地，并暂留在此代替祖灵，而祖灵则依附在请者的身上预告阳间人的祸福。请神时讲的第一句话是关于彝族六祖的，神请来后即开始指路，一直指回到祖先的宿处云南。[84]这种仪式

无需布摩等专业人员，谁都可以请，用张青布帕子把脸蒙住，点燃一炷香，在手上摇来摇去，口中念念有词，请神活动就开始了。[85]这一活动在1949年后已被逐渐放弃，黄克璲先生说他看到的最后一次请神活动的时间是1953年。

“想学祭祀读彝文，想找官当读汉文。”黄氏家族很清楚扩张势力的途径，读汉书、考科举成为举族的大事。族人常会凑钱供孩子读书，外人常用这样一句话来说黄姓：“家有六仝（仝是当地的一种测量单位，六仝等于一升——引者注）米，两仝给姑娘学针线，两仝给儿子学文化，两仝留给自己吃。”黄家先后修建了六七所祠堂，大部分其实都是私塾。[86]民国时期被改作中、小学，转成了官办，但校领导都是黄姓。1949年后，一所祠堂被征用为乡政府办公室，一所被改造为省立民族小学。现在的普底乡民族小学，校长之职不再由黄姓垄断。此外，该乡所属的迎丰村小学同样是黄氏的祠堂，至今尚有神龛和一些看起来时间很久的神主牌位。

甚至有很多人家送女儿进私塾读书，因此不少女性都会吟诗作对。据说民国时期就有一位才女，许配给陈家，但未婚夫在快娶亲时去世了，于是她戴孝结婚，作文哀悼亡夫，大家都公认文采出众，她始终恪守妇道，寡居一生。像她一样守节的女性并不罕见，老人们告诉我还有一位嫁到黔西县的，21岁开始守寡，熊子英县长亲自为她题写了贞节牌坊。这些例子显示出汉人价值观念的影响。《黄氏族谱》中开列的宗规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黄姓所尊崇的道德规范：

余族于道光十年续修族谱，会议宗规，以为法守。因念王公讳士晋，其宗规十六条，凡孝友睦姻任恤持身处世，赅括无遗，爰抄于谱，每年正月初五讲读一遍，凡我族人，尚其敬听而体行焉。

乡约当遵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这六句包尽做人的道理，凡为忠臣，为孝子，为顺孙，是圣世良民，皆由此处。……今于宗祠内仿乡约仪节，每朔日族长督率子弟，齐赴听讲，各宜恭敬体认，共成美俗。[87]

此外尚有祠墓当展、族类当辨、名分当正（指兄弟叔侄等名分）、宗族当睦、谱牒当重、闺门当肃、蒙养当豫（指严加训迪子弟）、姻里当厚、职业当勤、赋役当供、争讼当止、节俭当崇、守望当严（指保甲）、邪巫当禁、四礼当行等15条规戒。这些规诫抄录自明人王士晋的《宗规》，代表的是正统的道德规范。例如“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系明太祖亲拟的六条圣谕，明代即已被许多“宗规”“乡礼”之类的书籍收录，康熙皇帝又将其扩展为十六条圣谕。所谓“乡约”的基本功能就是定期向百姓宣讲圣谕的内容。[88]

道光十年（1830）续谱订宗规的黄氏家族其实已经士绅化，翻开

《黄氏族谱》，贡生、增广生员、廪膳生员、附生等比比皆是，举人则有黄显庸、黄思永等。在走向士绅化的过程中，黄姓逐渐转变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利用这一身份扩张势力，向地方豪强（如土目）挑战，争夺更多资源。虽然据现有材料难以对此过程展开全面论述，但文献中不乏相关记载：

（黄伟）公生于康熙四十四年丙戌，……乾隆四年己未岁试，邹学称赏，即取以冠童军进学。……吾族文科，自公伊始，由是教泽长留，功业永播。得额土目充乐贡里一甲总约，已经讨照，假总约之名，俾乐贡人民尽归宇下，任其驱使。惟公爱遍一里，忧深百世，出头诉讼，造退土目，追回约照，振济四民。……乐贡一里，至今犹颂。[89]

黄氏通过接受汉人礼俗、积极读书应举等举措走向绅士化，确立了本家族的优势地位。1950年代“土改”前，普底的土地基本上属黄氏所有，其他民族（包括许多汉人）或其他姓的人大多是黄家的佃户。黄姓的威望还来自比周围的汉人还要高的汉文化，祠堂修得好，谱也修得好——我在大方县乃至毕节县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90]然而，从黄氏家族对自己彝人来源的珍惜可以看到，他们改变的是自己的文化认同，而非族群认同，他们在很多场合声称或伪装出汉人的身份，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认为自己是娄素，他们认同的是王朝及其所认可的礼俗与正统儒家思想，而非认同于汉人的身份。

彝制崩溃后，彝威亦随之消解，彝、汉两种身份在黔西北社会中所象征着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作为“旧疆”标志的礼俗与认同方面的演变，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改流后社会经济方面的种种变化是另一个促成演变的力量，盛世背景下的铜铅开采与运销使黔西北与内地更加紧密地整合为一体，矿业、农业的发展与移民运动之间则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而汉人移民所持的为官府所认可的种种文化与风俗，为力图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获得更大利益的彝人提供了效法的对象，清代的许多官员正是试图通过“夷”汉之间接触与交流来改变原住民的礼俗。总之，本书第六至八章呈现了黔西北进入“版图”，并从“新疆”演化为“旧疆”过程的一体多面，改土归流后黔西北社会的深刻变迁，可以从此过程中得到理解。

[1]这种借用其实就是直接使用，像我这种会讲贵州话但不会说彝语的人都能听得懂当地彝语中的“户口”“板凳”等词。赫章县稚街乡的彝族朋友告诉我，他们所借的并非只是彝语中本来没有的词汇，现在很多词本来彝语中是有的，但也向汉语借用，彝语反而不用了，“板凳”就是一例。

[2]《彝族创世志》艺文志，第327～328页。

[3]《祖源碑》，《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

[4]《西南彝志》第5～6卷，第145页。

[5]《西南彝志》第5～6卷，第134～139页。

[6]《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240页。

[7]参见《彝族源流》第13～16卷，第335～340、461～465页。

[8]《彝族源流》第9～12卷，第147、316～317页。

[9]《苏巨黎咪》，第6页。

[10]《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167～168页。

[11]《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110～124、132、135、141页。

[12]参见《吴三桂侵入彝地》，《增订爨文丛刻》上册。

[13]《西南彝志》第5～6卷，第107页。

[14]参见《彝族源流》第9～12卷，第275～276页。

[15]《彝族源流》第17～20卷，第221～222页。

[16]黔西北彝族祖先神灵的载体往往与竹有关。

[17]由于“苗变汉”“汉变苗”的情况较少，并且笔者手中的文献材料亦不充分，下文对此将不再加以讨论。不过，“彝汉互变”的分析对此应有一定参考作用。

[18]贵州省毕节专署民委会老彝文翻译组译《水西地理城池考》，油印本，1966。

[19]参见《彝族源流》第1～4卷之“后记”；《西南彝志》第3～4卷之“序”。

[20]参见王钟翰《谨奏为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乾隆三年六月初一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4-3535；《康熙圣训》卷21《恤民》，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壬午条；《清世宗实录》卷52，雍正五年正月壬子条；《清高宗实录》卷291，乾隆十二年五月戊午条；张文焕《谨奏为微臣遍历黔疆目击要地情形敬陈未议仰乞睿鉴事》，《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第243～251页；贺长龄《复奏汉奸盘剥苗民疏》，民国《大定县志》卷20《艺文志》；徐家干《苗疆闻见录》，黔南丛书本。

[21]陆次云：《峒溪纤志》中卷，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22]尹继善：《谨题为请定夷乡入籍之例以资化导以移风俗事》（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内阁汉文题本（北大返还），缩微号49-2870。

[23]道光《贵阳府志》卷77《耆旧传二·丁允煜传》。

[24]道光《贵阳府志》卷77《耆旧传二·丁允煜传》。

[25]周人骥：《谨奏为敬筹黔地民苗结婚之例仰祈睿鉴事》（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缩微号585-2083。其实，即便冯钤所奏准的禁止湖南民苗结婚，似乎也没有能够真正贯彻。事实上，清廷可能在之后不数年便有条件允准湘省民苗婚姻，乾隆三十三年所修《大清律例》卷10称：“湖南省所属未薙发之苗人与民人结亲，俱照民俗，以礼婚配，须凭媒约写立婚书，仍报明地方官立案稽查。如有奸拐贩卖嫁妻逐婿等事，悉照民例治罪。其商贾客民，未经入籍苗疆，踪迹无定者，概不许与苗民结亲。如有私相连结滋事者，按例治罪，失察之地方官，照例议处。至溪峒深居苗猺，有愿与民人结亲者，亦听其自便，悉照前例办理。”

[26]晚清时期进入贵州的西方传教士也发现，该省的许多“中国人”有苗妻、苗妾，这种婚姻所生的子女通常自称并被认为是“中国人”。参见Samul Klark，*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Taipei：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70）p.4。Klark所谓的“苗”泛指非汉族群。

[27]通常是彝人势力强大，外来汉人人少力薄，由此而被彝化。道光《大定府志》卷14《疆土志四·风俗》对此有所暗示：“夫苗俗固宜改正矣，汉俗而有近苗者，方志不能明言，明达之士，见必知之，知之必知速反矣。”但“汉变彝”的情况在改流后并不多见，我听到的绝大部分是“彝变汉”的传说。

[28]这些资源包括较高的社会地位、科举考试的权利等。

[29]1949年以前少数民族强调自己汉人身份的情况在西南地区相当普遍。江应樑发现，昆明境内的土著居民最恨别人呼他们为“罗罗”，许多人甚至声称自己的祖先原系汉人，明洪武年间从南京句容县大柳树湾迁来，习染了当地未开化土人的文化，结果被后来的汉人看作异族。参见江应樑《西南边疆民族论丛》，珠海大学出版，1948。

[30]我在普底的采访能够顺利进行，要归功于欧家祥、黄克璲、安亚、罗亮恒、李在田等人的大力相助，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黄克江、黄克学等人曾撰有《浅谈黄氏族谱及黄氏家族源流》一文（《贵州彝学》，民族出版社，2000），将黄氏世系一直上溯到六祖时期，本节的立意与二人不同，论述的角度与侧重点亦有差异。

[31]本书所指的文化认同转变系指接受、认同并积极去学习某个族群的风俗（如汉人的服饰、语言、姓氏、婚丧礼仪等）、文化（如汉字、儒家经典、科举考试等）。族群认同的转变指由原来自我认定是某个族群（如娄素）的身份，转变为认定自己是另一个族群（如汉人）的身份。认同某个族群（如汉人）的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认同自己就是该族群的一员。这是本节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32]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33]《（大方）黄氏族谱·序》。

[34]咸丰《安顺府志》卷22《纪事志·纪事·普里本末》讲述了播勒土司的历史。

[35]许多彝文墓碑碑文上明确表达了人有三魂的观念，可为田野调查提供佐证。例如立于乾隆十七年的安定国墓碑碑文称：“人死有三魂，一魂守坟茔，人们都这样说。”立于乾隆十八年的安四斤墓碑碑文称：“人死有三魂，一魂守火葬场，人们都这样说。”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参见《彝文金石图录》第2辑。

[36]笔者的调查可与于锦绣等学者的调查相印证，据他们在乌撒的调查，祠堂大小约为1平方米。参见马学良、于锦绣、范惠娟《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第177页。该调查报告中亦提及人死有三魂之说。

[37]关于丧葬习俗的叙述主要是根据笔者本人的采访，并参照了一些彝族文献及其他学者所做的田野调查。黔西北各地的彝俗大体如此，但有一些细微差别，此不多述。

[38]黄思永：《世系考》，《（大方）黄氏族谱》。据道光《大定府志》卷32《俊民志·选举簿上》记载，黄思永系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举人。

[39]黄思永系有科举功名并宦游异地的士大夫，如果其家族流传的定居故事同王朝有关的话，他应该不会改成与水西君长相关。

[40]1991年，在黄思永《世系考》中所提到的黄氏家族曾定居的老包加更，发现

了一块彝文碑，经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专家翻译，正好是阿隮到阿进之间的父子联名世系，共26代。从中可知，阿隮全名陇再阿隮，阿进全名侬阿进。参见黄克江、黄克学《浅谈黄氏族谱及黄氏家族源流》。

[41]道光《大定府志》所载为黄显荣，疑《大定府志》有误。在贵州话中庸、荣都念Yong，庸是阴平，荣是阳平。

[42]参见李平凡《论彝族古代的女土官》，《贵州彝学》。

[43]康熙年间的贵州巡抚田雯曾赋诗描述彝族女土官："我观女官如观画，阎立本（更早期的贵州巡抚）绘职贡图。我观女官如异梦，奇形诡状非一徒。我观女官如破寺，阴风惨淡魑魅呼……女官气概伟丈夫，火浣大布缠其躯。九真藤杖红珊蝴，金环两耳垂玭珠。腰下斜挂双湛卢，绣裙拖地莲花襦……"参见田雯《古欢堂集》卷7《东川女官歌》，四库全书本。东川即阿芋陡部，与水西、乌撒毗邻，互通姻媾，来往密切，并且有着血缘方面的认同。

[44]《彝族源流》第13～16卷，第128页。

[45]《苏巨黎咪》，第22页。

[46]《雄书安氏谱序》，光绪《水西安氏族谱》。

[47]《彝族创世志》谱牒志二，第317～318页。这节谱系中克迫默与德阿木间有断代，但有的谱系则没有断代，如与乌撒同属布系的古苦俄勾君长的世系为："布祖慕克克，一世慕克克，二世克迫默，三世迫默卓，四世卓鲁谟……"《西南彝志》第7～8卷，第14页。

[48]《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97～105页。

[49]《彝族源流》第17～20卷，第19～28页。

[50]《君代母系》，《增订爨文丛刻》上册。

[51]《关于母系的叙述》，《西南彝志》第7～8卷。

[52]《关于母系的叙述》，《西南彝志》第7～8卷。

[53]《（彝族）杨氏支谱》（毕节）。

[54]参见《西南彝志》第7～8卷，第17、55页；《彝族源流》第17～20卷，第308、365、399页。

[55]参见《阿诺楚》，第68～69页。

[56]其实称呼前加"阿"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中都非常普遍。

[57]参见黄克江、黄克学《浅谈黄氏族谱及黄氏家族源流》。

[58]道光《大定府志》卷33《选举簿第一下·武举》载："黄显荣，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科。"黄显庸的墓至今犹存，颇有气派，墓碑乃嘉庆十一年二月所立。碑文中有一对联："地脉于今盛，人文滋此隆。"

[59]参见《清世祖实录》卷135，顺治十七年五月壬申条。

[60]于准：《苗民久入版图请开上进之途疏》，乾隆《贵州通志》卷35《艺文志·奏疏》。查该志卷18，于准在任时间为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由此可推知于准上

疏的大致时间。

[61]这是我2001年在毕节调查时，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组长王继超先生亲口所述。

[62]其实明代已有官员试图将汉姓推广到土著地区，弘治十七年巡抚贵州都御史刘洪奏：“所属土、苗族类渐蕃，混处无别，乞以百家姓编为字号，赐之汉姓。”但没有得到明孝宗批准。参见《明孝宗实录》卷207，弘治十七年正月壬辰条。下文将详细论述黔西北彝族的姓氏制度。

[63]当然，原住民即使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也未必一定得取汉姓，曾为官贵州的查慎行所著《敬业堂诗集》卷6《毕铁岚佥事将督学贵州枉问黔中风土短章奉答兼以送行》诗云：“呼同山鸟似有名，籍隶官司总无姓。”此外，前文论述玉米在黔西北的栽培时提到一桩命案，其中提到两个彝人一个名便么，一个为阿二把，他们受到流官政府的管理，应该已经入籍，但使用的显然是彝名。

[64]明代甚至连许多向朝廷纳赋的土目都只有本族名字。如远地宅溪的目阿高、把事阿抄等。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4《财赋》。

[65]这是我2001年在毕节调查时，王继超先生亲口所述。彝族同姓开亲、异姓禁婚等情况，我在黔西北地区经常听说。

[66]这是2001年我在毕节调查时，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子国先生亲口所述。

[67]《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514页。

[68]关于取得能彝的具体情形以及前乌撒地区现在的能彝状况，可参见阿洛兴德《威宁赫章部分彝族（能彝）姓氏调查》，《贵州省民族志资料》彝族卷。

[69]在了解黔西北彝族姓氏制度方面，王子国先生给了我许多指导。

[70]《阿玉哭嫁》，《乌鲁诺纪》，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

[71]在黔西北彝族社会，“家”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指家庭，而是指家族或家支，阿维家的意思是指以麻博阿维为共祖的众多家庭、家支组成的共同体。

[72]《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453～454页。

[73]《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461～464页。

[74]参见《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453～483页。

[75]参见《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484～498页。

[76]道光《贵阳府志》卷77《耆旧传二·丁允煜传》。

[77]这里所讲的只是一般情况，并非没有例外，例如大定府六额子开棺洗刷尸骨的风俗似乎曾遭到厉禁，参见道光《大定府志》卷14《疆土志四·风俗》。

[78]民国《贵州通志》第28册《前事志二十》。

[79]同治《毕节县志稿》卷8《风俗志·夷俗》。尚可参见光绪《水城厅采访册》卷4《食货门·土俗》；民国《大定县志》卷13《风土志·苗俗》；等等。

[80]徐家干：《苗疆闻见录》。

[81]在普底，我接触的所有彝族都坦然承认自己已经彻底“汉化”，他们不识彝

文，讲的是西南官话，从不穿彝装，几乎忘记了本民族的节日。当我行走在普底街上时，完全没有身处民族自治乡的感觉。

[82]关于彝族的龙、虎崇拜，学界论述颇多，兹不赘述。黔西北地区有祭龙的经书，参见《祭龙经》，《增订爨文丛刻》上册。

[83]我开始听到的是请道士，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名称，这些“道士”其实用的是佛教的礼仪。现在已经是专请和尚，事实上，普底已经找不到一个布摩。

[84]前文已提到，彝族认为人死后有三魂，其中一魂要回到祖先的宿地，所以在丧礼中布摩要念“指路经”，将亡灵引到该处。贵州省各地彝族的指路仪式一般都把云南作为终点，威宁则是一个重要的中点，其他省区的彝族指路经中也有很多指向云南，所以许多学者相信云南是彝族的发祥地，并认为指路经是研究彝族迁徙史的重要材料。参见《彝族指路丛书》贵州卷一，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指路经》，《增订爨文丛刻》上册。

[85]请蜂子神是黔西北地区彝族的习俗之一，但有地区差异。参见王继超《威宁板底乡乌洛村彝族“杜艾诃”活动调查》，《贵州省民族志资料》彝族卷；马学良、于锦绣、范惠娟《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第172～175页。据于锦绣等学者的调查，下阴人必须是童男童女，一方面取其洁净，一方面亡亲不会拉住父母双全的人。这一活动通常由布母（摩）主持。王继超的调查则提到，下阴人多半是女性，最好是少女，他没有讲到布摩。

[86]私塾办在祠堂内，这一点黄氏家族同许多汉人地区的宗族是很相似的。

[87]《（大方）黄氏族谱·宗规》。

[88]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第273～274页；黄佐《泰泉乡礼》卷2《乡约》，四库全书本；王士晋《宗规》。

[89]《黄伟碑记》，黄氏宗族修谱轩搜集《黄氏文献录》（下），抄本，不分卷，无页码。该书封面有“中华民国三十年春三月十二日”字样，但第二篇序言的落款日期为“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五日”。该书搜集清代以来黄氏族人所撰文章，现藏于贵州省大方县普底乡黄氏家族。土目阶层与士绅阶层间为争夺资源、主导基层社会而发生的斗争非常复杂，绅士阶层的兴起会导致土目势力衰落，而官府在依靠何种力量统治基层社会的考量中也有了较多选择，这些必须用丰富的史料以及详细的个案来加以说明。由于材料所限，在此难以详尽论述。

[90]从某种角度上看，黄姓的优势一直延续至今，1949年后乡、区、县乃至整个毕节地区的党、政部门领导有很多都来自普底黄氏家族。

结语 从“异域”到“旧疆”：对周边族类进入王朝秩序的思考

华-夷、内-外、中国-非中国、化内-化外等一系列频频见诸古代文献中的概念，在天下观、朝贡秩序等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格局的讨论中已得到较多阐释，但这类二元观念模糊了中央王朝与各“蛮夷”间亲疏各别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强弱不同的影响力。本书的研究表明，王朝另有“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等一套更接近实践层面的话语来描述与外部世界的动态关系。黔西北地区所呈现出来的从“异域”到“旧疆”的模式，广泛存在于中央王朝向南方边远地区不断拓展的历史中，对之进行深入分析与揭示，有助于我们理解周边族类是怎样整合进大一统秩序的。

从“异域”到“旧疆”

与一个国家所拥有主权的领土的现代含义不同，传统中国的“版图”是土地与编户并重，甚至更加侧重于后者，正如《清史稿》所云：“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在明清时期甚至更早，“版图”在许多情况下已被用来界定王朝的“疆”，改土归流之地因户口、土地开始登载于官府的册籍而进入了王朝“版图”，所以常常被称为“新疆”，并且一般不再被视为“化外”——尽管“化外”一词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1]随着“夷”、汉族类的交往与互动、对正统儒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深化、“汉威”的逐渐渗透等原因，周边族类在礼俗、文化上被认为呈现出“与民人无异”的趋势，而他们自己亦不断通过各种策略改变自己的身份与认同，“新疆”由此逐渐完成了向“旧疆”的演变，相应地，法律的适用也被要求与内地一体。未入“版图”之地则可分为“异域”与“羁縻”两种，前者通常指中央王朝连名义上的统治都不能维持的地方，后者意味着周边族类对王朝的效忠，并受制于贡赋制度，但其原有的制度与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尊重，而普通原住民也大都并非王朝的编户齐民。质言之，所有人户在制度上（不是事实上）均要向王朝缴赋应役之地，在观念上属王朝的“版图”与“疆”；只有一个人或一些代表向王朝缴赋应役之地，即可视为羁縻区域，如大部分土司地区；所有人都不被要求向王朝缴赋应役之地，则可目为王朝的“异域”。

作为王朝的“异域”，宋代水西与乌撒是西南地区众多独立政权中的两个，拥有自己的文字、礼仪制度和政治法律传统。元、明两代大力开拓西南地区，建立并完善了土司制度，形成了能够控驭西南地区上层统

治者的“羁縻”政治，君长国统治者在不同的语境中，富有技巧地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或继续归因于本族的传统，或归因于王朝的恩赐，而地方原有的制度依然能够维持。例如在黔西北，以则溪制度为核心，君、臣、布三者秉权的彝制仍然有效地运行着。绝大多数普通土民并未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也没有直接为王朝输赋应役，只有土官、土舍等才被要求接受王朝的礼仪与儒学教育。自明初以降，朝廷的各种边政措施以及移民潮流逐渐对彝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关于嫡长子继承君长之职的规定、彝汉文合璧碑刻的出现、汉人跻身勾政权、朝廷对各君长国之间“此绝彼继”习惯的成功干预等，都可视为彝制嬗变和汉威渗透的重要例证。

勾政权在康熙三年（1664）的军事征剿中被瓦解，清王朝变更则溪的区划，置府设州，建立里甲制，将普通土民籍为编户，黔西北由此纳入王朝“版图”，成为王朝的“新疆”与“化内”之地。但土目在地方社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改流后土目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有权势者仍乐于自称土目，反映了土目这一名称所象征的权威与荣耀并未因改流而消失。官府在制度上未曾明确承认过土目的地位，但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容许他们在地方社会控制中继续发挥作用，赋役征派、勾摄犯人等事务，往往需通过土目去办理。还有一些土目设立衙门，拥有私人武装。在某些偏僻闭塞的深山地区，土目及其控制的人群，仍然置身于国家的税收制度之外。所以，勾政权瓦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土目”权威的存在也可被视为“彝制”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的延续。地方官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富于技巧性的政治策略，既通过各种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推行限制土目的势力，又容许其权威存在以使地方社会不至于失去秩序。

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仍然在许多层面逐步显现出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对普通土民来说，改流后他们逐渐认识到了新的制度及其权威。各级官府直至皇帝的存在，也出现了借助新的制度向土目的固有权威挑战的情况。各种主奴之争、主佃之争的案件，反映的正是彝制崩溃后地方社会的重大变化。随着科举制度在“新疆”的推行，在新的制度下具有更多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绅士阶层也开始成长起来。可以想见，许多接受儒学教育并获得功名的士绅，就是在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土目的后代，但也有一些普通土民在成为绅士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了自己的身份并扩大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移民潮流也对土目的权威产生了冲击，来自内地的移民没有效忠土目的习惯，在黔西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移民不但促进了山区的开发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且导致了频繁的地权纠纷、族类居住格局的变化，不少土司、土目正是在此过程中走向衰落。此外，一些地方动乱（特别是咸同“苗变”）对土目的巨大打击，亦是不容忽视的。

在绅士阶层开始成长为地方社会的重要力量之时，由于丧失了文化上的正统性与政治上的特权，原来在勾政权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布摩阶层不断走向衰落，其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动，身份（布摩须是黑彝）与出身（布摩是世袭）两个方面的垄断都被打破，许多白彝通过拜师学习成为

布摩。

在经济方面，改流后，以农耕为主导的经济方式代替了畜牧与农耕相结合的经济方式（此过程在明中期已经开始），玉米、土豆的传入为人口的急剧增长提供了可能。在清政府矿业政策的刺激下，黔西北成为国家重要的货币材料、军器材料的生产基地，所产黑铅、白铅每年车载马驮，络绎不绝，进入长江，再沿江而下，抵达汉口，供应全国各地。道路整修、河道疏通成了政府的一件大事，而矿业、农业的发展又与汹涌的移民潮流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黔西北融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

在种种变更的背景下，黔西北地区上演着各种“彝变汉”的故事，而王朝的价值观念、汉人的风俗习惯则在地方原有观念和习惯的因应中日益渗透。一些彝族家庭因应新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态势，用百余年时间逐步改造彝族传统的礼俗、文化与家支组织，制造自己的汉人根源，完成了建立宗族与绅士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了彝、汉两大族群以及与之相关的两种制度、文化的碰撞与互动，向我们展示了传统中国中央王朝在非汉族社会建立统治秩序的一种模式。到了清代中期，黔西北在观念上与实践上都演变成了清王朝的“旧疆”与“内地”。可以说，文化与礼俗的同化是官员们认知“旧疆”的主要标准，与此相应的是与内地一体的法律适用。

民国时期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黔西北的这一深刻变迁。抗战期间，大夏大学西迁贵阳，由著名学者吴泽霖、岑家梧等组织开展贵州少数民族调查，他们重点考察了花溪、安顺及黔东南一带，黔西北地区则基本上被排除在外。学者们的选择可能与黔西北社会“苗夷”色彩的淡化有关，对不少民族学家和民族史家来说，这一块地方不像四川凉山彝家、黔东南苗族、云南摆夷等那么具有魅力。正如当时的一些学者所称：“在云南贵州倮族宗教生活的痕迹，却很少存在，因为该地的倮族早趋向汉化。惟可在该地老年的巫师处，略能调查些资料而已。”[2]政界的态度与学界有相似之处，1935年，蒋介石因“督剿”红军来到贵阳，时有苗民唐明贵上书委员长，要求“解除苗民痛苦，提高苗民文化”，于是蒋介石将此信批交贵州省政府转教育厅参考，并拨出经费10万元作为发展贵州民族教育的专款。后来地方官员果然办了一批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师范学校，但没有一所在黔西北地区，[3]这里显然已不再是黔省民族问题的重点。

黔西北的故事展现了从“异域”到“旧疆”的完整过程。这一过程并非特例，中国西南许多地区的历史都与乌撒、水西相似，如本书第一章提到的乌蒙、芒部、东川君长国等。[4]当然，许多有相似历程的区域在文献上并不一定都直接使用了“新疆”“版图”一类词语来描述，历史也不一定按线性序列发展，中央王朝在许多边远地区的秩序建构可能会省略其中的一些环节，[5]并且古代官员士大夫使用这些词语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6]但无论如何，从历史文献中发掘出来的这些词语，对我们理解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以及大一统中国的形成过程与机制无疑是有相当

意义的。

内部竞争引导王朝扩张

过往对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的研究，或视为一种“强迫民族同化”，或持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与滥杀无辜、破坏民族关系相伴随的“半否定论”，或持废除封建农奴主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与巩固封建国家统一的“基本肯定论”。[7]不管何种角度，其实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预设了王朝主动征服与地方被动接受的前提，即便间或有“广大被剥削少数民族百姓渴望改流”之类的表述，也只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观点，并未在机制层面上以实证性的研究来予以说明。

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台湾岸里社的个案研究指出：“所谓‘帝国版图的扩张’，不一定是来自于帝国中央强大武力或文化的向外征服，也不是帝国在衡量财政收支、战略考量下的总体规划；事实上，帝国边区会有一股很强的民间力量促使帝国版图的扩张。”[8]如果说，周边族类内部真的具有一种能动性来促使王朝扩张的话，一种可能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呢？

事实上，一个看似统一的周边族类的部落或政权，其内部往往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呈现出内部竞争的状态。当与中央王朝发生接触之后，某些团体或其领袖人物可能会积极因应新的政治情势，借助王朝的力量介入本部落或政权的事务，在此过程中，他们和中央王朝各自或多或少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一些新制度或新秩序甚至可能就此产生。以水西为例，即便勾政权这样有较强凝聚力的强大政治实体，内部四十八支间都并非铁板一块。这造成了一个复杂的现象，一方面，勾政权的强大与统一性制约了王朝的扩张，使得王朝不但难以在其领地内赐封小土司，甚至连“不拘定式”的里甲制都不可能实行，这与许多土司地区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为了本支乃至本家庭独揽君长之职，安陇富通过为朝廷东征西伐换取其支持，于是嫡长子继承制得以确立，而这一制度不但符合明王朝的观念，而且有助于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9]王朝同时还得到了安陇富的效忠。此外，崇祯年间一些土目争相献地形成“裂土众建”的格局，是因为君长安位去世无嗣，各土目为袭职争得不可开交，在不能相互妥协的情况下，纷纷献地以求获得赐封，王朝则借此机会削弱水西力量，甚至在短时间内将水西纳入了直接统治。我们也不能把地方的这种由内部竞争所吸引的王朝扩张理解为仅仅与周边族类上层分子有关，在清代大定府，改流后土目势力的削弱以及官府对地方事务更多发言权之建立，其契机正是土民和土目的斗争，而且前者已经懂得了如何借助官方的力量。

这种内部竞争引导王朝扩张的机制可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并非仅局限于黔西北一隅。[10]此外，在这种扩张中，有时王朝并没有介入（至少没有明显的介入），形成一种“（王朝）未出场的扩张”。例如在前述台湾岸里社的个案中，岸里社熟番康熙年间响应政府鼓励垦荒的政策，取得了大甲溪南垦地的权利，但在18世纪末，因为部落内部的权

力斗争以及外部汉人的农垦压力，各关系人通过各种办法，竞相把地权来源追溯到帝制时代最能象征合法、正统权力来源的皇帝身上。这使得一个边远的地区，成为充满符合帝国象征与规范的地域。[11]在这样一种“未出场的扩张”中，王朝所获得的，主要不是新的土地或更多的编户，也不是能够更有效控驭周边族类的制度，而是地方上更多的人群对自己权威、象征的认同。笔者认为，这种扩张通常应该发生在“新疆”“旧疆”等已纳入王朝“版图”的地区，[12]在改土归流前的黔西北，这样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原住民所认可的权威是勾政权中的君长以及由布摩等所操纵的意识形态，只有君长等极少数个人，才会在某些场景中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与王朝扯上关系。

本书并不认为王朝的扩张必然遵循这种“内部竞争引导”的模式，但这一机制的存在，提示研究者在思考周边族类与王朝之间的关系时，必须持一种复杂和辩证的态度，地方的能动性，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新秩序中的旧传统

在正史、地方志等古代文献中，从“异域”向“旧疆”的演变，呈现出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大获全胜的过程，在此层面上，今日学界内外所熟知的“汉化”等概念，与传统官员文人的论述可谓遥相呼应。这一类论述与概念无疑是建立在大量经验事实基础上的，并且与我们通常的观察相符合，但“异域”社会自身传统的延续性及其在塑造新秩序中的作用，却被这些论述与概念忽略了。本书表明，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黔西北这样一个“边缘”地区推广和表达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边缘”地区的许多惯习、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行为和关于自身历史的解释，在王朝的意识形态中逐步获得“正统性”的过程。由于黔西北地区在实行土司制度之前，已经存在着一套以则溪制度为中心的、有着深远历史根源的制度化的政治权力架构，所以，直至清代末年乃至民国时期，中央在当地的统治，从形式到实际内容都带有明显的“地方性”色彩。元明土司制度规范的主要是土官与王朝的关系，彝制制约了王朝的扩张，使得王朝很难在勾政权的领地内赐封小土司，在水西甚至连“不拘定式”的里甲都未曾出现。即便清初彝制瓦解后所建立的流官制与里甲制，也是在改造则溪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非一个全新的创造，而土目的影响更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因此，土司制度乃至改土归流等任何举措，都不能一下子创造出新秩序，尽管表面看起来似乎如此，从“异域”到“旧疆”的演变，是两种不同制度与传统间互动与妥协的结果，直至1950年代以后，由于剿匪、土地改革等群众性运动的巨大冲击，土目阶层及其政治影响才最后消亡，这也许意味着彝制的彻底崩溃。

不过，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黔西北民间风传“吴王剿水西”[13]时逃往凉山等地的彝人即将重返贵州，要夺回他们的地盘与“政权”，这一传闻在许多地方引起了恐慌。毕节、赫章、大方、威宁等地的许多百姓（包括汉族、彝族、苗族）甚至已经准备变卖家业，到异乡谋生。[14]可见，尽管改土归流已过去了300多年，但彝

制并未从历史记忆中消失，仍然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鉴于旧传统在塑造新秩序中的作用，对土司制度等王朝边政的研究似应采取一种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土司制度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内涵乃至表现形式，即便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实施，亦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和影响。仅着力于制度条文考辨以及笼统概括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周边族类的不同传统，考察制度在具体地域实施过程中王朝与地方社会的复杂互动，以及地方社会变革的动态而又充满矛盾的实际场景，才能把土司制度的研究引向深入。

族群认同与统治认同的统一与分歧

制度的变化，是官员们认定“新疆”的标准，对“旧疆”的认知，强调的则主要是周边族类礼俗与文化的演变，即所谓“风气既与民人无异”。但制度与礼俗之间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黔西北的例子表明，“风气与民人无异”并不意味着周边族类认为自己就是汉人（尽管他们在有些场合不得不这样声称），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有时会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正如普底黄氏家族，他们积极去改汉姓、穿汉服，学习汉字与儒家经典，并在科举中获得了成功，从其不轻易示人的族谱所载的《宗规》中，我们也可以窥知他们对正统儒家道德规范的认同。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自己家族系彝人来源的记忆，并且引以为荣，甚至把占有普坑底的合法性归因于水西君长的赏赐。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条线把本族群与汉人分隔开来——尽管他们会根据需要伪造汉人的身份。这一点很符合著名人类学家Fredrik Barth关于是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而非文化内涵（cultural stuff）界定族群的著名论段。[15]这样的文化认同转变虽然没有族群方面的意义，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对王朝统治的认同。认同王朝与认同汉人身份间并不总是一致的，从此角度看来，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矛盾”就不再成为矛盾了。

以上论述表明，族群认同在很多时候有其稳定的一面，而并非总呈现出随意性与工具性。然而，在广阔的西南地区，我们也确实不难发现很多少数民族认同汉人身份的例子（在黔西北，这种情形的发生很多时候与跨族类的婚姻有关，而非虚拟一个汉人的祖先），甚至许多土司的也声称自己的汉人来源（无论在明代还是清代都是如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黔西北的土司、土目等却未发生这种现象，甚至在改土归流之后，笔者也尚未发现有彝族土目自认为是汉人的例子。这种族群认同的相对稳定性与随意性间的差异要如何解释呢？

笔者以为，政权以及文字传统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水西与乌撒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建立了别具一格的独立性的政权组织，并且有自己的文字。关于本族的来源以及统治本地的合法性——这一切当然都与汉人无关——早就书写在用本族文字所创作的家谱、历史书籍以及宗教文书中，仅仅从现在已出版的只占彝文献总量极少部分的彝书来看，这些书籍不但叙述了君长的谱系，甚至连许多布摩、土目的来源都做了交代。文献与口碑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且这

些文献的内容经常要由布摩、慕史在不同的场合宣讲、传授。这样就对本族的来源及其在此地的合法性形成了牢固的记忆，并且这种记忆受到固定化了的文献的规范（本书第一章提到了彝人对书本的崇拜）。元、明王朝的势力介入西南地区，水西与乌撒建立了土司制度，但勾政权制约了王朝的扩张，王朝的势力无法深入，不管是土司还是普通彝人都珍惜娄素的高贵身份，绝不可能声称自己的汉人根源。变化仅仅出现在关于统治合法性的认知方面，黔西北的上层分子一面继续将其归因于本族的美好根源，一面又与王朝扯上关系。这又是一种充满矛盾的认同。清康熙年间改流之后，对族源的那种强大而牢固的记忆仍然不易消亡，并且原勾政权中的土目与布摩仍然存在，大量的彝书也还在民间使用与流布，所以黔西北的土目等上层分子（或许还包括许多普通彝人）并不轻易转向汉人的身份认同——即便他们在科举上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乾隆年间普底黄继称“余上世祖考世系，往往迭出于夷册书籍”，可见彝书在维持娄素族类身份方面的重要作用。

认同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管窥黔西北社会变迁以及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窗口。在被王朝视为“异域”的时代，君长国统治的合法性源自本族类的传统，族群认同与统治认同是一致的。随着土司制度的建立以及各种王朝边政制度的确立，君长国统治者在维持既有统治合法性认知的同时，在一些场景中富有技巧地将其归因于对王朝的效忠，族群认同与统治认同间出现了统一与分歧并存的局面。勾政权瓦解之后，文化礼俗方面的演变意味着对王朝统治的认同，对本族类身份的坚持与之形成了看似矛盾的情形。这些分歧与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应理解为学术分析的结果，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以及当事人的认知中，它们可能是自然而又和谐的。

从明代黔西北统治者对政权合法性的双重解释，到改流后种种更为复杂的文化与族群认同，背后都可看到彝、汉两种制度间的互动与消长，制度与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联系。

总之，在南方地区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在从“异域”到“旧疆”演变所呈现出的周边族类逐渐整合进王朝国家的宏伟过程中，上演着的并不只是刀光剑影的暴力征服与枯燥乏味的儒家道德说教，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能够根据形势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的空间，这一看似姑息“地方主义”的灵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推行与渗透，促进了新秩序的稳定以及地方对王朝的认同。清末民初以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等，导致了革命性的新变局，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怎样想象与建构自己的族类身份以及更高层次的国族或中华民族？相对于学界研究较多的汉人官员与知识分子关于民族国家的表述与实践，这类想象与建构可能会呈现出哪些特色？[16]这些问题关系着对传统中国如何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理解与认识，笔者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回答。可以肯定的是，近代的想象与建构不会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只有联系“异域”进入王朝“版图”的历史，在“彝威”“汉威”“洋威”[17]交织的过程才能得到妥帖的理解。

[1]检阅文献可以发现，“化内”“化外”等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呈现出种种不确定性，同样一个地区，在渲染王朝的文治武功时被标榜为“与中州等”的化内之地，在强调其风俗粗陋、难于治理时则被贴上“蛮夷”“化外”等标签，有些明代称为化内的地方，清人则认为其明时尚属化外。通常而言，建立了流官政府并能将当地百姓籍为编户的地区，往往不会再以“化外”视之，但也有些新纳入王朝版图之地，如清代湖南的凤凰、乾州、永绥，由于在法治方面还援用当地的“苗例”等原因，所以在一些场景中仍然被视为“化外”。参见嘉庆《湖南省例成案·名例》卷1《化外人有犯》。

[2]陈宗祥：《倮倮的宗教》，《边政公论》第7卷第2期，1948年。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外彝学研究的热点地区仍然是大、小凉山——尽管黔西北是彝文献数量最多的彝区。

[3]参见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青年书店，1940）之《教育政策》中关于贵州的部分。

[4]例如乌蒙君长国在宋代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元明时期在此建立了土司制度，清代改土归流，建昭通府，乌蒙立即被认为进入了王朝“版图”，成为“新疆”。《清世宗实录》卷96雍正八年七月乙酉条云：“乌蒙系改土新疆，与威宁接壤。”昭通总兵徐成贞《大阅堂记》（民国《昭通县志》卷8《艺文志》）亦称：“国家改土设郡，原有全备之规模，新疆因时建制，是当循序而布置。”民国《昭通县志》卷1《疆域》云：“雍正五年改土隶云南，设流官，其地列入版图。”这种表述显然是沿袭了清人的看法。

[5]例如对台湾、今贵州东南部等许多地区的经营显然就未经历过“羁縻”阶段。黔东南是清前期著名的“新疆”，清朝统一台湾之初，台湾也曾经被视为“新疆”，如康熙三十四年，台湾府知府靳治扬为《台湾府志》撰写之序言中有：“时公辑郡志告成，治扬未能有所兴革，无可载笔；聊附姓名于简末，以志承乏之期。亦以见新疆待治，贵乎不扰；惟当遵画一之法云尔。”当然，进入“版图”而成为“新疆”并不意味着某地区所有的人都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即便在内地甚至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都有不少人游离于国家的户籍之外。

[6]例如本书第一章曾提到，万历《贵州通志》中有：“黔于古始非异域也，入我版图，所从来远矣。”作者把贵州进入“版图”的时间远溯自大禹划九州时期，这显然是为了夸饰大一统的需要。

[7]参见龚荫《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

[8]李文良：《清代台湾岸里社熟番的地权主张》，香港《历史人类学学刊》第3卷第1期，2005。

[9]纵观明清两代的土司制度，可以看见一个趋势，即王朝力图把各种亲戚、旁支都可袭职的复杂的土司承袭制度改造成单一支系的继承，这样可以使土司地区不会因争袭而失序。参见John E.Herman，“Empire in the Southwest 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1（1997），pp.47-74。王朝在土司地区有赋役方面的利益，而且很多土司地区其实是王朝的战略或交通要地，所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王朝一般不会坐视土司地区失序。

[10]例如清代驻藏大臣衙门的正式设置，源于前藏贵族与后藏贵族于1727年发生了战争，后藏贵族颇罗鼐上奏雍正皇帝派兵进藏支持自己，“以安西藏”。在清廷的支持下，颇罗鼐不仅赢得了战争，而且还巩固并强化了自己在西藏的统治。与此同时，清王朝也趁机正式设置驻藏大臣衙门，加强了对西藏的控驭。清王朝在此过程中关注的并非是战争双方的是非对错，而是如何稳定西藏政局。（参见顾祖成《明清治藏史要》，西藏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1999，第157～165页）

[11]参见李文良《清代台湾岸里社熟番的地权主张》，香港《历史人类学学刊》第3卷第1期，2005。

[12]例如上文所提到的台湾岸里社番众是归化“生番”，已经向官府呈报了丁口数量和税额。

[13]黔西北民间通常把吴三桂率兵平定黔西北之事称为“吴王剿水西”。

[14]笔者在毕节、赫章、大方、威宁等地都听到这种说法，据说彝族恐慌的原因是怕被当作叛徒。

[15]参见Fredrik Barth，“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9），pp.9-38。Barth这里所指的boundries不一定是地理边界，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边界，按笔者的理解，它还是一种存在于心中的边界，即我们在自己的心中强调某些特征，以此作为边界把本族群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

[16]已经有学者以“苗族”为例，分析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不同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如何因应新的政治、文化环境，积极利用地域、文化、历史以及中国传统的族类标签，并夹杂着自己在特定地区、全国甚至跨国语境中的个人生活体验，来想象与定义一个在范围上超越了自己所属群体的“苗族”，力图使“苗族”的少数民族地位在政府的民族建构计划中获得认可。参见Cheung Siu-woo（张兆和），“Miao Identities，Indige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ppropri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Asian Ethnicity* 4：1（2003），pp.85-114。据笔者所知，这一类研究目前尚不太多。

[17]这里的“洋威”系模仿彝文献中的“彝威”“汉威”而创造的一个词，指西方的优势性的权势、威荣，也指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扩张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在全球产生深远影响的观念等，如民族国家观念。

征引文献

一 正史、政书

《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

《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

《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

《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

《新元史》，中国书店，198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

《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苏天爵：《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明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弘治《明会典》，四库全书本。

万历《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缩印本。

俞汝楫：《礼部志稿》，四库全书本。

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万历四川重刊赋役书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商务印书馆，1939。

龙文彬：《明会要》，中华书局，1998。

锡珍：《吏部铨选则例》，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6。

《大清律例》，四库全书本。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文海出版社，1992。

《清朝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四库全书本。

《皇朝政典类纂》，文海出版社，1982。

《四川盐法志》，光绪八年刻本。

二 方志

常璩：《华阳国志》，嘉庆十九年廖氏题襟馆刻本。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收入《说郛三种·说郛一百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李京：《云南志略》，收入《说郛三种·说郛一百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明一统志》，四库全书本。

郭子章：《黔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嘉靖《贵州通志》，上海书店影印本。

嘉靖《普安州志》，上海古籍书店，1961。

嘉靖《思南府志》，上海古籍书店，1962。

嘉靖《四川总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天启《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万历《贵州通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万历《四川总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万历《铜仁府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正德《四川志》，明正德刻嘉靖增补本。

道光《大定府志》，中华书局，2000。

道光《贵阳府志》，咸丰刻本。

道光《平远州志》，光绪十六年重刻本。

顾炎武：《肇域志》，续修四库全书本。

光绪《黔西州续志》，光绪十年刻本。

光绪《水城厅采访册》，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复制油印本。

康熙《新补贵州通志》，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复制油印本。

康熙《台湾府志》，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复制油印本。

潘文芮：《乾隆贵州志稿》，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复制油印本。

乾隆《毕节县志》，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复制油印本。

乾隆《贵州通志》，乾隆六年刻本。

乾隆《平远州志》，贵州省图书馆1964年复制油印本。

乾隆《黔西州志》，贵州省图书馆1966年复制油印本。

同治《毕节县志稿》，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复制油印本。

《大定县志》，大方县志办1985年铅印本。

《贵州通志》，贵阳文通书局，1948年铅印本。

《水城县志草稿》，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复制油印本。

《威宁县志》，毕节地区档案局等1964年复制油印本。

《昭通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

《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大方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

《贵州省志·地理志》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李平凡等：《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

龙正清等：《赫章县民族志》审稿本，1998。

马昌达等：《毕节地区民族志》审稿本。

三 档案

乾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乾隆朝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内阁汉文题本（北大返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991。

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1976。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1977。

四 笔记、文集、诗集

黄震：《黄氏日抄》，四库全书本。

吴儆：《竹洲集》，四库全书本。

周必大：《文忠集》，四库全书本。

周去非：《岭外代答》，丛书集成初编本。

王恽：《秋涧集》，四库全书本。

包汝楫：《南中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

毕自严：《度支奏议》，崇祯刻本。

曹学佺：《蜀中广记》，四库全书本。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高拱：《靖夷纪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四库全书本。

胡世宁：《胡端敏奏议》，四库全书本。

黄汴：《天下水陆路程》，杨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黄仲昭：《未轩文集》，四库全书本。

黄佐：《泰泉乡礼》，四库全书本。

火原洁：《华夷译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江东之：《瑞阳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李东阳：《怀麓堂集》，四库全书本。

李化龙：《平播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刘球：《两溪文集》，四库全书本。

刘锡玄：《归余闲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刘锡玄：《黔牍偶存》，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复制油印本。

刘锡玄：《扫余之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陆粲：《陆子余集》，四库全书本。

陆应阳撰，蔡方炳增辑《广舆记》，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罗玘：《圭峰集》，四库全书本。

罗曰褧：《咸宾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彭韶：《彭惠安集》，四库全书本。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

田汝成：《炎徼纪闻》，四库全书本。

万士和：《万文恭公摘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王琼：《晋西本兵敷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王士性：《黔志》，丛书集成初编本。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四库全书本。

王世贞：《弇州续稿》，四库全书本。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王恕：《王端毅奏议》，四库全书本。

王直：《抑庵文集》，四库全书本。

王直：《抑庵文后集》，四库全书本。

文徵明：《甫田集》，四库全书本。

吴亮：《万历疏钞》，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吴宽：《家藏集》，四库全书本。

夏原吉：《忠靖集》，四库全书本。

谢三秀：《雪鸿堂诗蒐逸》，黔南丛书本。

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徐溥：《谦斋文录》，四库全书本。

徐纮：《明名臣琬琰续录》，四库全书本。

徐学聚：《国朝典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丛书本。

杨慎：《升庵集》，四库全书本。

杨寅秋：《临皋文集》，四库全书本。

佚名：《土官底簿》，四库全书本。

于谦：《忠肃集》，四库全书本。

翟九思：《万历武功录》，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张潢：《图书编》，四库全书本。

张紞：《云南机务钞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张萱：《西园闻见录》，哈佛燕京学社，1940。

张岳：《小山类稿》，四库全书本。

赵汝濂：《平黔三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郑大郁：《经国雄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本。

郑纪：《东园文集》，四库全书本。

郑晓：《吾学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朱燮元：《少师朱襄毅公督蜀疏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朱燮元：《朱少师奏疏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阿桂等：《平定两金川方略》，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

爱必达：《黔南识略》，清刻本。

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陈鼎：《黔游记》，黔南丛书本。

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中华书局，1984。

陈子龙选辑《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文书局，1979。

何绍基：《使黔草》，清光绪刻本。

胡文学：《甬上耆旧诗》，四库全书本。

黄思永：《慎轩诗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黄元治：《黔中杂记》，丛书集成续编本。

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

蒋攸铦：《黔轺纪行集》，黔南丛书本。

蓝鼎元：《鹿洲初集》，文海出版社，1977。

李珍：《明季水西纪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李澄中：《滇行日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李宗昉：《黔记》，光绪十二年刻本。

刘健：《庭闻录》，上海书店，1985。

刘书年：《刘贵阳遗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陆次云：《峒溪纤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文海出版社，1970。

罗文彬、王秉恩：《平黔纪略》，黔南丛书本。

毛奇龄：《蛮司合志》，续修四库全书本。

莫友芝：《黔诗纪略》，同治十二年遵义唐氏刻本。

慕天颜：《抚黔封事》，康熙刻本。

倪蜕：《滇云历年传》，李埏校点，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裴宗锡：《滇黔奏稿录要》，清抄本。

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舒位：《黔苗竹枝词》，丛书集成续编本。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檀萃：《黔囊》，黔南丛书本。

田榕：《碧山堂诗钞》，黔南丛书本。

田雯：《古欢堂集》，四库全书本。

田雯：《黔书》，丛书集成初编本。

王庆云：《石渠余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汪森：《粤西文载》，四库全书本。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

吴伟业：《梅村集》，四库全书本。

吴振棫：《黔语》，咸丰四年刻本。

徐家干：《苗疆闻见录》，黔南丛书本。

许瓒会：《滇行纪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许瓒会：《滇行纪程续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杨雍建：《抚黔奏疏》，文海出版社，1976。

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张澍：《续黔书》，续修四库全书本。

张玉书：《张文贞集》，四库全书本。

赵慎畛：《榆巢杂识》，中华书局，2001。

赵翼：《檐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

钟琦：《皇朝琐屑录》，文海出版社，1970。

周鸣銮：《使黔集》，民国线装铅印本。

朱彝尊：《曝书亭集》，四库全书本。

朱彝尊：《明诗综》，四库全书本。

《黄氏文献录》，抄本，大方县普底乡黄氏家族藏。

五 族谱

《水西安氏族谱》，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本。

《（毕节）杨氏（彝族）支谱》，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藏。

《（大方）陈氏族谱》，大方县志办藏。

《（大方）胡氏族谱》，大方县志办藏。

《（大方）黄氏（彝族）族谱》，抄本，大方县普底乡黄氏家族收藏。

《（大方）金鸡彭氏家乘》，大方县志办藏。

《（大方）姚氏族谱》，大方县志办藏。

《（大方）臧氏大方支谱》，大方县志办藏。

六 社会调查材料

《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

《贵州省威宁县龙街等地区解放前社会经济情况调查资料》。

《贵州省威宁县地区东关寨和别色园子解放前社会经济调查资料》。

《贵州黔西县石板、金坡两乡社会经济调查资料》。

《贵州省赫章县海确寨苗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贵州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1964。

《黔西县沙窝区沙井乡罗都寨解放前的社会经济特征和解放后的发展变化》，田曙岚、胡积德等调查整理，1963。

《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王继超：《威宁板底乡乌洛村彝族“杜艾诃”活动调查》，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贵州省民族志资料·彝族卷》。

马学良、于锦绣、范惠娟：《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笔者在毕节、大方、威宁、赫章等县的采访材料。

七 彝族典籍

《阿买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

《阿诺楚》，李幺宁收集整理，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海腮耄启》，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

《娄仇阿朵与朵姆格鲁》，李光平搜集整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

《论彝诗体例》，布麦阿钮著，王子尧等译，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

《诺沤曲姐》，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

《曲谷精选》，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

《曲谷走谷选》，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赛特阿育》，王继超等编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

《赊窦榷濮》，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

《水西地理城池考》，油印本，贵州省毕节专署民委会老彝文翻译组，1966。

《苏巨黎咪》，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物始纪略》第1～3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1993。

《西南彝志》第3～4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西南彝志》第5～6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西南彝志》第7～8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西南彝志》第9～10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西南彝志》第11～12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叙事诗》，毕节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

《叙祖白》，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

《夜郎同亭》，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夷僰榷濮》，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彝文金石图录》第1～2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1994。

《彝文金石图录》赫章专辑，油印本，赫章县民宗局藏。

《彝族创世志》谱牒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

《彝族创世志》艺文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

《彝族源流》，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1997。

《彝族指路丛书》贵州卷，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

《益那悲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

《增订爨文丛刻》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支嘎阿鲁王》，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八 其他文献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

嘉庆《湖南省例成案》，湖南按察司衙门。

《〈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贵州人民出版社，1964。

《清〈圣训〉西南民族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

余弘模：《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五集，1980。

杜玉亭：《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

九 研究论著

巴莫阿依等编《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白耀天：《土官与土司称谓考辨》，《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3期。

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陈春声：《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关于潮学研究课题与方法的思考》，《潮学研究》第11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陈秋坤：《清代台湾土著地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4。

陈耀祖：《土司制度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64。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4。

陈宗祥：《倮倮的宗教》，《边政公论》第7卷第2期，1948年。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

丁文江：《〈爨文丛刻〉自序》，《地理学报》第2卷第4期，1935

年。

杜玉亭：《土官土司两类说考疑》，《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段超：《试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开发》，《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范同寿：《清代各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方国瑜：《明代在云南的卫所制度与开发生产》，《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第1集，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印，1980。

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冈田宏二：《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赵令志、李德龙译，民族出版社，2002。

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

葛兆光：《从天下到万国：重建理解明清思想史的背景》，《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龚荫：《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龚荫：《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

顾祖成：《明清治藏史要》，西藏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1999。

关汉华：《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贵州省扶贫开发技术指导中心特约刊登《土豆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农村经济与技术》2002年第4期。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系：《贵州省地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贵州通史》编委会编《贵州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贵州彝学研究会编《贵州彝学》，民族出版社，2000。

郭红：《贵州都司建置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1期。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三联书店，2000。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三联书店，2006。

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黄彰健：《明史贵州土司传记霭翠奢香事失实辨》，《大陆杂志》第68卷第2期，1984。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嘉弘：《试论明清封建皇朝的土司制及改土归流》，《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

江应樑：《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

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与土官》，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

江应樑：《西南边疆民族论丛》，珠海大学出版，1948。

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

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李国祁：《清季台湾的政治及近代化——开山抚番与建省（1875～1894）》，《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8卷第12期，1975。

李国祁：《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中华学报》第5卷第3期，1978。

李汉林：《文化变迁的个例分析——清代“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的影响》，《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李建成：《水城的彝族土目》，《水城文史资料·少数民族专辑》第3、4辑合刊。

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李文良：《清代台湾岸里社熟番的地权主张》，香港《历史人类学学刊》第3卷第1期，2005。

李荫荞：《贵州田赋研究》，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7。

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第2卷第11期，1943年；第3卷第1期，1944年；第3卷第2期，1944年。

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文海出版社，1967。

林耀华：《凉山彝家的巨变》，商务印书馆，1995。

寥正碧：《两汉时期是彝文的约定俗成时期》，《贵州彝学》，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

刘尧汉等：《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刘志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刘志伟：《区域研究的人文主义取向》，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序，学林出版社，1999。

刘志伟、陈春声：《历史学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1997），三联书店，1998。

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马长寿：《彝族古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马学良：《马学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马学良等：《彝族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潘先林、潘先银：《“改土归流”以来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变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普忠良：《彝族自称与彝语氏族地名》，http：//www.yizuren.com/article.asp？Newsid＝782&page＝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彭忠华等：《贵州不同生态条件下玉米育种目标及杂种优势组配模式探讨》，《种子》2003年第2期。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

乔云生：《试论安坤事件的性质》，《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1944。

佘贻泽：《清代之土司制度》，《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5期，1936年。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

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史继忠：《亦溪不薛考》，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1985。

史继忠：《元代贵州站赤考》，《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第1

集，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印，1980。

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1。

沈梅梅：《明清云南改土归流的文化条件》，《思想战线》1997年第5期。

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

王继超：《功在千秋：将福祉留给后世》，《民族团结》1997年第11期。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王晓卫：《改土归流前西南土司的仇杀之风》，《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1期。

王缨：《鄂而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第5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温春来：《彝威与汉威——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温春来：《“族别界限”与“族类互变”——黔西北彝族之族类界限考察》，香港《历史人类学学刊》第2卷第1期，2004。

温春来：《行政成本、汉夷风俗与改土归流——明代贵州贵阳府与新贵县设置始末》，《中山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温春来：《黔西北彝书中所见之彝族谱系》，《华南资料研究中心通讯》，2004年7月。

温春来：《改土归流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以贵州西北部地区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2分，2005。

温春来：《彝、汉文献中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1期。

萧凤霞：《传统的循环与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香港《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2003。

萧凤霞：《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晓根：《拉祜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熊书益等：《毕节地区农业气候条件评价》，《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77年第3期。

杨成志：《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1931。

杨成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地学杂志》1934年第1期，抽印本。

杨旸等：《明代奴尔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河南中州书画社，1982。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易谋远：《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尹庆葆等编译《从人类学看香港社会——华德英教授论文集》，大学出版印务公司，1985。

尤中：《简论“土司制度”》，《学术研究》1964年第5期。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余弘模：《古代彝族布慕刍议》，《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3期。

余弘模：《济火碑与济火碑史实探证》，《贵州文物》1983年第2期。

余弘模：《威宁乌木屯安巡如墓碑残文探证》，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1985。

余弘模：《明代水西慕魁陈恩墓碑探证》，《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创刊号。

余弘模：《明代彝族女杰奢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青年书店，1940。

张永国：《也谈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64年第3期。

朱祖明：《中国西南土司问题》，《光华大学半月刊》第2卷第5期，1933年。

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编译室：《彝文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Anna See Ping Leon Shulman，Copper，Copper Cash and Government Controls in Ch’ing China（1644-1795），Ph.D.diss.，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1989.

Barbara E.Ward，“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in Barbara E.Ward，ed.，*Through Other Eyes*：*An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Hong Kong*，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9.

Barbara E.Ward，“Sociological Self-awareness：Some Use of the Conscious Models，” in Barbara E.Ward，ed.，*Through Other Eyes*：*An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Hong Kong*，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9.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3.

Cheung Siu-woo，“Miao Identities，Indige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ppropri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Asian Ethnicity* 4：1（2003）.

David Faure and Helen F.Siu，*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David Faure，“The Written and the Unwritten：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Written Genealogy，”《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David Faure，“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Modern China* 15：1（1989）.

David Faure，“The Lineage as Business Company：Patronage Versus Law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siness，” in R.A.Brown，ed.，*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vol.1，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6.

Fredrik Barth，“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9.

Helen F.Siu，“Recycling Tradition：Culture，History，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s of South China，”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4（1990）.

James Waston，“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Empress of Heaven）Along South China Coast，960-1960，” in 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and Evelyn S.Rawski，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John E.Herman，“Empire in the Southwest 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1（1997）.

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Man-houng Lin，*China Upside Down*：*Currency*，*Society*，*and Ideologies*（*1808-1856*），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Samul Klark，*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Taipei：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70.

Samuel Pollard，*Tight Corners in China*：*Missionary among the Miao in South West China*，London：Andrew Crombie，1910.

Suan Natuin and Evelyn S.Rawski，*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Hartford：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附录 小说还是历史？——对*Amid the Clouds and Mist*：*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1200-1700*的一点评论

拙著初版于2008年，本次再版，尽量保留原貌，除明显错误与表述不清之处外，不做更改，初版后新出现的相关史料与论著，也不再征引与对话。但乔荷曼（John E.Herman）的*Amid the Clouds and Mist*：*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1200-1700*一书[1]（以下简称“乔著”），却令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思索再三，决定“画蛇添足”。

乔著出版于2007年，彼时拙稿已送交北京三联书店，故无缘对话。十余年后，笔者更无意对之进行全面评价——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已由李林完成。该书的主旨、材料、论证乃至若干细节，李林均有较为允当的把握，诸如乔著错误地将乌蛮等同于黑彝，从而建构起唐代水西黑彝的历史；[2]缺漏了大量彝文史料以及一些重要的前人研究；[3]用征服与殖民的话语将学界已有的“彝族史＋土司制度”重述一遍；并未真正贯彻地方视角等评论，可谓一针见血。[4]不过，这些均在正常的学术范围之内，遗憾与缺陷存在于任何史学作品，无足深怪。此外，笔者还发现乔著中误读史料之处甚多，[5]但这仍不足为奇，即便以汉语为母语的笔者，也不敢保证对水西史料的解读完全正确。推动我“画蛇添足”的，是乔著中居然存在着大量毫无史料根据的内容，这就超越学术与学者的边界了！就随便挑几处来说说吧。

表面上，乔氏的叙述大都有注释，而且注释很丰富，看上去似乎言之有据。但细究之下，很容易发现，许多内容与注释之间毫无关系，那些内容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编造。例如，乔著第72～73页提到，贵州水西宣慰使霭翠归顺明王朝后，被迫向明王朝提供了一份报告，内容包括他的宗支图册、领地范围、如何统治领地以及领地内的人群状况（包括总人口数、族群差异）等。霭翠还特别指出，元王朝在1283年在水西创设了八个府和三路指挥（eight prefectures and three route commands），其分布恰好与慕俄格君长国的传统领地相合。这段话的注释极为丰富，计有七篇（部）：（1）侯绍庄等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按：作者漏掉了“关系史”三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第180～198页；（2）1987年出版的《贵州通志》第9～11页；（3）唐代樊绰的《蛮书校注》（向达校注，中华书局，1962）卷4，第92～108

页；（4）凌纯声《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38年，第23～41页（按：作者标的是第57～86页，而且漏掉了“与白蛮考”数字）；（5）胡庆钧《宋代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度的繁荣发展》（按：作者漏掉了“先民地区奴隶制度的繁荣发”数字），《思想战线》1980年第5期；（6）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Expansion*，*Settlement*，*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ong Times*，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7，pp.24-38；（7）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按：作者漏掉了“史论丛”三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5～7页。看见这么翔实的注脚，一般读者自然深信不疑。只可惜，注释与内容风马牛不相及——这种情况在乔著中并非孤例，而是普遍情形！我很想知道，这份所谓的霭翠报告，究竟出自什么史料？！

作者接着又写道，根据霭翠的回忆，蒙古在八个府与三个路退出后，元朝官员让水西阿哲家族的首领阿里帮助组建这八府三路的行政班子，结果阿里选择了在蒙元进入之前曾在某个则溪有职务的官员以及纳苏军事贵族成员。此外，阿里迅速清除了元王朝在八府三路的痕迹，复活了更为家族化的则溪组织以统治该地域的人群（第73页）。注释与内容无关的情况，我不想重复指出。我只是想知道，这所谓的霭翠回忆，根据何在？

乔著第76页写道，为了管理则溪的日常事务，十三则溪的每一位“兹莫”都有一套由九位官员组成的班子（即九扯），他们都是他的家庭成员。九扯的首席官员在兹莫的寓所附近工作和居住，就像是兹莫的顾问，但他们的职责也通常要求他们到则溪的其他地方去。作者能找出史料来支撑这些叙述吗？

乔著第78～94页叙述明初水西历史，其中包含了著名的奢香故事。十多页篇幅，大多是由不可靠的史料加上作者凭空添加的许多细节构成，对在他之前许多学者诸如明代的王世贞、近人黄彰健以及笔者本人已经辨伪、考证清楚的诸多史实，作者完全忽略。重要学术史的遗漏我可以理解，将明人田汝成错误百出的《炎徼纪闻·奢香》误为信史我也可以理解，我不能容忍的是，作者为何要凭空编造许多内容？我们仅仅看第80～83页吧。乔著写道，霭翠在一次与明朝官员的餐会中被毒死（第80页）；霭翠死于1382年（第80页）；马烨将奢香几乎鞭打至死（第81页，《炎徼纪闻·奢香》中有鞭笞情节，但没有讲几乎打死）；奢香被鞭打后，其手下组织了一支超过10万人的骑兵队伍向贵州进发（第81页）；这支骑兵跨过鸭池河进入水东之前，被刘淑贞所阻拦，她告诉水西的将领，马烨给他们设置了一个陷阱，而他们居然直接就想跳进去（第81页）；刘淑贞说，她将进京抗诉马烨的罪行，她向水西军队保证，如果她不能让皇帝革马烨的职、纠正加于奢香以及贵州人民身上的不公并且调查霭翠的神秘死因，她从京城返回后就领导水西、水东的军队反对马烨和明朝（第81页）；刘淑贞向皇帝控诉马烨征发民力建设贵州各项政府工程的不当行为，如修筑贵州城，伪造政府公文将奢香骗进

其办公室（第82页）；刘淑贞总结说，在马烨未到贵州任职前，皇帝享受着乌蛮的支持，他们将协助皇帝对西南的蒙古势力作战，而霭翠的神秘死亡以及马烨残暴对待奢香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乌蛮不再相信明朝（第82页）；洪武皇帝命令他最信任的马皇后负责调查贵州的事情，这是马皇后生前的最后一次官方行动（第82页）；马皇后传唤马烨和奢香进京并让刘淑贞在京等待他们（第82页）；对马烨、奢香、刘淑贞的讯问持续了好几天，好几次皇帝本人也亲自参与了（第82页）；马烨反复辩称自己在贵州的所为符合明朝的政策，朝廷的上司了解他的每一步行动，如果这些行动不正确，上司有很多机会进行批评，但他们都没有（第82页）；洪武皇帝被激怒了，传唤几位朝廷高官，让他们澄清政府的对黔政策，结果他们的解释证明了马烨所言非虚，这进一步激怒了皇帝（第82页）；对马烨事件的调查持续了几乎两周，越来越多的官员被牵连，皇帝发现他们错误且鲁莽地执行政府的政策（第82页）；皇帝怒斥马烨："我需要乌蛮的支持，我努力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但你们这些官员却努力破坏这种信任！"（第83页）；皇帝下令拘捕马烨与几位京城的高级官员，并威胁对他们处以极刑（第83页）。这些绘声绘色的情节，乔氏能够提供相应的史料吗？哪怕是像《炎徼纪闻·奢香》这种不可靠的史料也好！

所述于史无征是一个方面，乔氏还有直接伪造史料的嫌疑。兹举四例：

第五章名为"恢复吾祖之荣光"（To Reclaim Our Ancestor's Glory），这是水西统治者向明王朝宣战的誓言，被用作全章标题，足见作者对这句话的重视。乍看之下，笔者很羡慕乔氏抓住了这么精彩的一句话，也深怪自己读书粗心，遗漏了重要史料。看毕全章，知道了这句话有两个出处，第一处位于第158页，作者写道，整个滇东、川南以及黔西的纳苏彝人首领越来越多地转而寻求水西宣慰使安国亨的指导和帮助，而不再求助于明朝的官员。正如一份纳苏彝文献所指出的："安国亨（1562～1595年统治着水西）说话如此有权威，以至明朝官员也为之战栗。在安国亨的领导下，我们能够恢复吾祖之荣光。"（Nasu Yi leaders throughout eastern Yunnan，southern Sichuan，and western Guizhou turned increasingly to the Shuixi pacification commissioner for advice and assistance instead of seeking out Ming officials.As one Nasu Yi source put it，"An Guoheng [who ruled Shuixi from 1562 to 1595] speaks with such authority that even the [Ming] officials shudder in fear.Under Guoheng we can reclaim our ancestors'glory."）

所谓安国亨威震川南、滇东、黔西彝人首领的描述，完全超出笔者的知识范围，不知乔氏的根据何在？我掌握的基本史实是，不管是在水西内部还是在水西之外，均有彝人首领与安国亨仇杀！[6]尤为滑稽的是，作者称那段直接引文来源于彝文献，但注释却是明人瞿九思所著的《万历武功录》（台北艺文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更加讽刺的是，注释中标明这段引文来源于《万历武功录》卷23第15页a面，但整部《万历武功录》却只有14卷。让人更加难以容忍的是，《万历武功录》中根

本没有这段引文，而笔者曾逐字逐句阅读过2007年之前所有公开出版的水西彝文献，也未注意到这段话。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粗心遗漏，希望乔氏能明示我出处。

“恢复吾祖之荣光”在乔著中有另一个出处，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安邦彦越过大渡河桥，刚踏上水西土地，就转过身向贵阳进发，正式宣告他摧毁明王朝在慕俄格存在的意志。对着站在眼前的众多随从、顾问以及几位杰出的兹摩与穆濯，他宣布：

为恢复吾祖之荣光，我们除了战斗别无选择。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诸多战斗中死去，但这将是高贵地死去。自兹以后，明朝廷委任的水西宣慰使不复存在，慕俄格古国的旗帜将高高飘扬。我们决意将汉人（中国人）驱逐出我们的王国。（第178页）

（As An crossed the Dadu River Bridge and set foot in Shuixi，he turned toward Guiyang and formally declared his intention to destroy the Ming presence in Mu’ege.With a large entourage of advisers and several prominent zimo and muzhuo standing before him，An announced：

To reclaim our ancestors' glory，we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fight.We may not survive the many battles that lie ahead，but our deaths will be noble deaths.From this point forward the Ming designation of Shuixi pacification commissioner shall be replaced by the ancient Mu’ege banner.It is our intent to drive the Han [Chinese] out of [our] kingdom.）

这番描述，场景生动。但根据笔者对水西彝、汉史料的了解，此情此景、此言此语，不大可能于史有征。这段话的注释是五部论著：（1）1987年出版的《贵州通志》，第635页；（2）许明德《论奢安事件》（按：应为《论奢安事件之起因及其影响》），第20～23页；（3）胡承宁《也谈奢安起义的性质》，第26～27页；（4）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按：作者漏了“论丛”二字），第93～101页；（5）《西南彝志》，第328～332页（按：《西南彝志》是多卷本，通常两卷一本，出版时间不同，且每本页码重新排列，作者只写页码不写卷数是不规范的。笔者查核了一下，最接近者应为《西南彝志》第7～8卷之《奢安反明》，但应该是第328～331页）。这几个注释中，何曾涉及安邦彦的这番战前动员？！我深深怀疑作者有伪造史料的可能！伪造之后，堂而皇之用作标题，其胆识令人惊服！

《西南彝志》第7～8卷，第335～337页，倒是有恢复慕俄格政权的话，但时间已到了清初，针对的是平西王吴三桂，而且也没有“恢复吾祖之荣光”“死得高贵”之类的豪言壮语，更没有面对着兹摩、穆濯以及随

从起誓的场景。

乔著描绘了水西末代土司安胜祖被清王朝剥夺实权后的生活：他被限定在贵阳居住，只有在向已故祖先致敬以及参与彝人的节日时，才能前往水西（第219页）；安并没有被囚禁在房间里，他可以在贵阳城中自由走动，并且经常同地方官员交往，但他不能离开贵阳，除非得到巡抚的允许——这种允许是很罕见的（第219页）；官员们注意到安胜祖在这个城市多族群社区中的权威性存在（commanding presence），他与其直系亲属居住在城市西北部的一个院落里（第220页）；这是一块被纳苏彝人精英统治着的地域，长期生活着非汉人群，当地官员们怀着一丝惊讶记录下他的办公室如何常常访客盈门，其中有汉人，也有非汉人，他们前来寻求他的帮助（第220页）；正如一位官员所言："来自水西的客人前来致敬，其他人寻求处理蛮夷事务的指导，还有的人只是单纯在外面排队，希冀得到赏赐。宣慰使衙人来人往，门庭若市。"（As one official noted，"Travelers from Shuixi come to pay their respects，others seek guidance in matters concerning the barbarians，whereas others simply line up outside his headquarters hoping to receive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money].The pacific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s a beehive of activity."）安当然是贵阳社区中备受尊重的一员，如果不挑剔他的纳苏彝人出身，他的声望会激起清朝官员的嫉妒（220页）。这些绘声绘色的描述，不知根据何在？更为严重的是，第220页中那段官员的叙述，注释是1741年出版的《贵州通志》（即乾隆《贵州通志》）卷35，第29页，但其实整个《贵州通志》均无这段话。

乔著第220页征引了康熙皇帝的圣谕：明季以降，水西之地迭遭兵燹摧残，现在此地已大异于往昔。苗蛮已经向化，我们须协助他们满足改善生活的渴望。我们是时候在水西的日常事务中扮演主动角色了。我们的官员将承担这一责任。但是，在短期内官员仍然需地方精英（土司）的协助。但最终，土司将会消失，水西也将变得和内地一样。（Since the closing years of the Ming，armies have repeatedly trampled the earth [in Shuixi]），so that now it is a very different place from before.The Miao have turned toward civilization，and we must assist them in their desire for a better life.The time has come [for u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day-to-day affairs of Shuixi.Our officials will carry out this task.But，they will need the help of the local elite [*tusi*] in the short term.Eventually the *tusi* offices will disappear，and Shuixi will b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China proper.）

这段叙述的注释是《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24，第16b～17b页。恕笔者眼拙，在该卷并未发现这段话。而且以笔者浅陋的阅读所及，也对此段圣谕毫无印象。究竟来自哪里？还要请作者明示。

乔著中于史无征之处，俯拾皆是，触目惊心，远远不止上文所举。笔者初读乔著，非常震惊，自忖对水西史料与史实均较为熟悉，为何该

书中那么多内容我居然闻所未闻！而且，这些内容大多与我长期研究水西历史形成的感觉相悖，因此我的第一反应除了惊讶，还有怀疑。于是挑选乔著中若干引起我的怀疑之处，查核其注释，结果，无一例外，我的怀疑均得到了证实。不过，要把乔著中的凭空臆想一一辨明，将是长篇大论，不值得我浪费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因此姑举数例，以示笔者所言非虚。在很大程度上，乔氏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小说。当然，也许乔氏所述均于史有征，只是遗漏了注释或注释写错而已。如果真是这样，我很希望乔氏能正面回应，痛斥我的错误，使我从中受益。

2019年6月9日

[1]John E.Herman，*Amid the Clouds and Mist*：*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1200-170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2]拙著所述的时间上限是宋代，在此之前的历史付诸阙如，就是因为：（1）我不敢轻易将历史文献中的那些族类标签实体化；（2）我更不敢认为，不同时期的族类标签是同一实体人群的不同称呼。

[3]乔著对前人研究的遗漏，除了李林所列举的例子外，史继忠1980年就完成的硕士论文《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是无论如何都应该参考的。

[4]李林：《“开化”与“殖民”两套诠释话语的论争与困境——兼与John E.Herman教授商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0期，2013年6月，第151～170页。

[5]拙文《水西彝族谱系之性质——兼论彝族的嫡长子观念》（即将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辑的《新史学》），对乔著误读误解水西谱系做了分析。

[6]可参见明代高拱《靖夷纪事》（收入《四库存目丛书》，不分卷）；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卷5《土妇奢世统奢世续列传》，卷6《安国亨列传》；《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跋

吾生也愚，驾一叶之扁舟，临学海之浩渺，茫茫然不知其所措，飘飘乎迷于堂奥之所在。拙稿虽耗时数载，何足观哉！然恩师训诲之情，恒萦于怀；诸友相助之谊，岂敢少忘？业师陈春声、刘志伟二教授学极浩博，于南国红尘中辟一方净土，丁丑岁忝列二师门下，五年亲炙，春风化雨，吾虽愚陋，于学问亦有所感焉！科大卫（David Faure）、郑振满、赵世瑜、程美宝诸教授虽非余冠名之导师，而余实系诸师教外别传之弟子。黄公国信、张公应强、邓公智华、黄公志繁、陈公永升、鲍公伟、韦公锦新、胡公海峰、古公南永、马公木驰、吴公滔、刘公正刚、黄师姐海妍、贺师妹喜、谢师妹晓辉、陈师妹丽华诸师兄姐弟妹，惠我以友情，启我以智识，今虽已星散，或三五成群，或形单影只，怀抱利器，天各一方，然寄雁传书于网络，杯盘草草于相逢，江湖夜话，把酒高歌，亦无聊人生之一大快事耳！

呜呼！天地无情，人生易老。忆癸酉秋舍万里晨昏，负笈羊城，忽忽已是十四载。曩时沐浴待冠之少年，洎余已及壮而有室之年岁。昔日同窗，厦屋渠渠，宝马香车，饫甘餍肥，儿女承欢。念吾一身，茕茕孑立，伈伈睍睍，苟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盛世。持四围立壁之萧然，梦玉金屋之缥缈。默念“何陋之有”之古训，窃笑德馨君子之高风；低咏“不改其乐”之圣言，虚矫不堪其忧之真情。

呜呼！少而先衰，镜中已见多情之华发；困且益弱，余心早坠凌云之伟志。吾方高驰而不顾，奈何为学虽非吾所长，舍此更无稻粱谋之别策。已矣哉！庸人安贫，富贵于我如浮云；鲰生知命，学问于我系宿缘。诵汉赋唐诗，通幽思于千载；述往事前哲，换斗米于今朝。抚琴弄箫，寄闲情于暇日；漫步游目，观风云于当世。人生如此，夫复有求，求而不得，唯余自嘲：

戚戚贫贱，

汲汲富贵。

瞻前顾后，

跋胡疐尾。

辱教康乐，

别无所能。

醉卧书山，

以永此生。

丁亥炎夏于中山大学康乐园蜗居

再版后记

蒙庆寰兄好意，将拙作再版。再版，作者照例要饶舌几句。

首先是惭愧。十年过去，居然没有对旧作大加修订，这当然由于自己学殖荒疏，走不出十年前的陋见。在获取史料与海外成果方面，现在较十多年前我写作此书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广搜博取，丰富史实并不难，但义理的更新却非猥陋之智所能及。索性偷个懒，除了若干表述不清之处与明显错误外，其他的一仍其旧吧。

其次是广告。本书的姊妹篇《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两书实为姊妹，形则迥异，体现了我对历史呈现方式的一种探索，感觉不大成功，不说也罢。

最后是感谢。拙作虽不足观，但其中含有我两位恩师的心血以及诸多师友的无私帮助。十年来，与同道切磋琢磨，受益良多，学术之剑虽仍黯然钝锉，但感激之情何敢稍忘？谨将情谊铭记心间，名单则略了吧。

十年一觉，梦醒茫茫。书生无用，蹇蹇前行。

2018年12月15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温春来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0

（九色鹿）

ISBN 978-7-5201-5031-6

I.①从… II.①温… III.①政治制度-研究-贵州-古代 IV.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11463号

·九色鹿·

从“异域”到“旧疆”：

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

著　　者/温春来

出 版 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郑庆寰 陈肖寒

文稿编辑/陈肖寒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7.75 字数：356千字

版　　次/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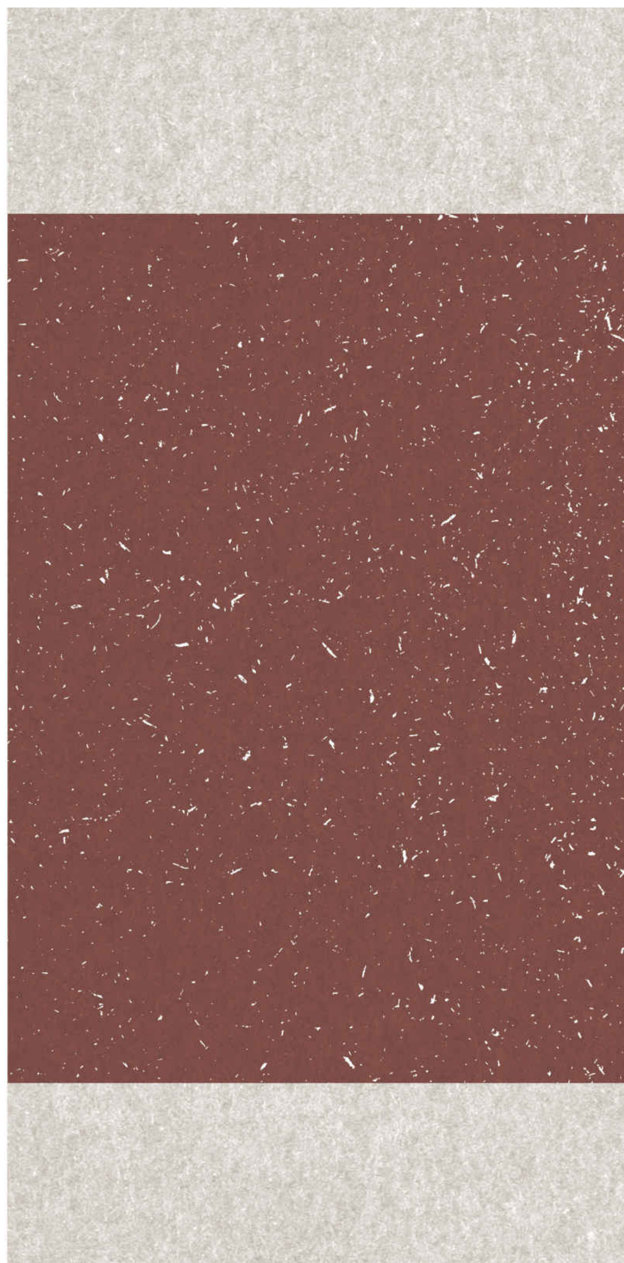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978-7-5201-5031-6

定　　价/78.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长期维持着大一统体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现象，也是中国史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本书考察水西、乌撒两大彝族君长国自宋代至清中叶逐渐整合进王朝大一统秩序的历史过程，进而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与话语中提炼出“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的分析模型，用以理解王朝中国在南方地区的展开过程，并从中发掘出非汉人群的主体性，以揭示被“王朝中心观”的宏大叙事锁遮蔽的复杂历史面相。



出版社官方微信

九色鹿



www.ssap.com.cn

ISBN 978-7-5201-5031-6



定价：78.80元



九色鹿

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

魏志江 等 著

滨下武志先生执教中山大学十周年纪念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魏志江

现任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持工作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副会长；先后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延世大学国际学大学院、建国大学韩国史学系、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担任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韩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区域史研究。

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

滨下武志先生执教中山大学十周年纪念文集

魏志江 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序言：从东亚发起的国际秩序论

滨下武志

魏志江教授主持编纂的《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即将付梓，欣喜之余，嘱我为其编纂的书稿撰写一篇序言。魏教授是我在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担任院长时的同事，其主持工作的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又是原亚太研究院的继承和延续，尤其是本书稿的内容一部分是于2018年3月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由魏教授主持的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谢湜教授任职系主任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共同为我执教中山大学十周年举办的“全球与区域史视域下亚洲的区域与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思虑再三，盛情难却。于是决定以全球化时代地域-海域研究与“亚洲地政论”为中心，从东亚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历史演变来谈谈欧亚区域史的研究。

近年由东亚所发起的国际秩序论的讨论和以非西欧型国际秩序论等议题的研究，现已逐渐受到重视。但这些问题，若脱离历史上的东亚地缘政治论，恐怕终究无法成立。这些课题即检讨在东亚历史上共时存在的多元地域主体、重层地域运作以及广、狭义的民族主体，抑或多元民族主体的理想形态等，从整体上理解非欧洲地域中历时存在的宗主型地缘论，并试图寻求与现代国际体系相联结的研究议题。此外，西欧本身即奠基于主权国家间相互关系而成立的国际体制的背景，实际上也存在着王权或教会等“宗主型地缘关系”共时且历时性的作用影响。反过来说，国家主权的意义所在，乃是为了对这些作用进行抵抗及批判，而主权国家的出现，恐怕也未必是历史发展或近代化的必然结果，只不过是由西欧地缘环境内部首先创造出来的而已。

以往国际秩序的研究，往往尊奉西欧国际秩序为规范，但是，非西欧世界的国家建设与近代化，应借由对应于各地地域史上错综复杂的复合地域统治与多元地域经营的地缘论，从当下开始努力反省所谓的“近代”国际秩序。

首先，在东亚体系中，存在着多层周边与多元中心相互转换的模型。非西欧世界的地缘究竟如何？即便此一研究课题尚未清楚辨明，但在东亚，似乎可见透过地缘路径进行自我认知的情形日益增加。其表现为地缘文化的地缘论，即试图借由历史上的中心与周边、南北地域等，说明其与周边诸国及诸地域之间的地域和国际关系；而更进一步从海洋观点讨论内陆与沿海之间的历史联系，则又是另外一项特征。即便历史上内陆与海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至今却依然未受到充分重视。相异于传统的“一点四方”即由中心点朝东西南北四方呈放射状扩展其影响力的中心主义，地缘论则企图讨论系统性地域体系的理论架构。地缘政治本来就不只将国家视为唯一的对象。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为调整地域间均衡或互相关系的地域论，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国家或民族等具有排他性向心力的主权意识的渗透，反而导致地域国家化，并以超越国家的形式发挥作用。地域论与地域研究的课题，同时包含相关且相对地定位东亚多样地域之间的关系，而在方法论上有所交集，同时，也提示历史研究中东亚体系研究的可能性与课题性。

其次，关于全球化时代中的东亚地缘文化的重新登场问题，特别是，随着现代世界朝向全球化的方向前进，环境、气候、金融等超越国家规模分析架构的问题也大量出现。当讨论全球化议题时，国家已是个过小的单位。然而与此同时，地方的地域性、地方的地域世界也再次登场。即便依然维持从前地方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国家位居高位的上下关系，但现在地方上也开始提出地域的独自性格，或是从大地域分离出来的独特社会文化特色。创作并书写地方史、讨论如何形塑新的地方“世界图像”，乃是近年逐渐兴起的现象。对于持续掌握这些状况，并从中寻找其关联性来说，国家又是个过大的单位。换言之，随着全球化“地方”的出现，研究者应透过全球规模的宏观视野，思索跨地域的构想与融合边缘或地方视点的地域实像。为此，“网络”这个能够兼容并蓄且加以概念化的方法，在地域分析上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今后东亚历史研究应将地缘文化论的中心设定为地域，并以地域内在与外在的均衡与变动、地域间关系的平衡与动态、长时段视野下的地方—地域—世界三个层次为基础，阐明地域中多元而重层的实态。

最后，关于海洋亚洲与东亚体系的越境网络。海洋与文明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马上都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与此相比，我们更为期待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将“海洋”加以概念化，它不是分析性的，而是综合

性的；不是对比性的，而是融合性的。总之，它与19世纪以来的国家学基础下所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析型细分化的思维角度正相反。我们期待这一“海洋”概念成为寻求对全球化与地方化相互融合发展的现代世界进行阐明的线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源、环境、能源、人口等现代社会所直接面对的全球性的问题，不仅不是与海洋毫无关系，而是存在着直接密切的联系。

但是，海洋与陆地一直就是被置于一个对比的、对立的角度下论述的。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说一直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试图通过边界，即民族与国家以及文化的边界，有意识地忽视海洋的一个历史动机。“海禁”以及与此相对的“展海”的方式，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到东亚的海洋在理念上，而且是在思想上被分割开来的，而这样的分割具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它的历史背景表现出一种儒教与国家、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合型结构，是针对这一结构下的迁移与移民的一个过度防范。而且，东亚的地缘政治-文化论，即便是要将海洋纳入自身，大概也必须具备这样一个基本逻辑，即要首先阐明它的历史背景。

所以，本序言的结论是：东亚地缘文化——横跨东亚的多文化的地域网络模型。因此，亚洲研究的方法，过去一直以国家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根本，而今，则要求把海洋亚洲、沿海城市网络的出现、跨越国家的网络的活跃现象等综合起来，对亚洲研究进行把握。而且，通过将长时段的亚洲的历史演变纳入研究的视野，今后的亚洲论将会以“海洋”的思想为基础，开始探索地域、地方、城市网络间的相互作用与海域、地域之间的关系。因此，将海洋包容进来的地域论，即海洋与陆地的交往论，将会进一步得到具体论述。例如，“港口”不仅是海洋与大陆的联结点，也是陆地通向海洋的出口，跨过这一边界，就可以明确海洋与陆地二者是处于一种历史的循环结构之中。长期以来，被总括为“东亚”这一名义下的历史演进，若是从以地缘政治文化论为出发点的空间主体这一角度来加以认识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更为基于地域认同（identity）的、一种网络性的地域间的关系与交换。我们有必要将“东亚”从历史上合理地分为不同层面的地域，并探明各地域间在相互交涉的同时，跨海与亚洲相联结的历史。

- ·理论研究·
  - 全球史视野下的东亚区域关系史
  - “一带一路”、“丝路学”与区域研究
  - 建立中国周边学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初步探索
  -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和区域研究的新路径
- ·欧亚区域史·
  - 中国出土粟特人墓志所见墓主的祖源追溯与入华记忆：中古入华粟特人中国化进程析论
  - 义理与时势：澶渊之盟后辽圣宗对高丽政策探析
  - 蒙元史研究与蒙元历史叙事的构建
  -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图本性质和绘制目的
  - 认识偏差，态度摇摆：以壬辰战争时期为中心看朝鲜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特性
  - 从交通枢纽到避暑胜地
  - 巴黎和会上的赤道以北德属太平洋岛屿问题研究
  - 近代朝鲜民族的人口流动
  - 整体史观下的历史书写：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史研究及其启示
  - 后冷战时代中亚的“文化真空”与“地缘文化想象”
  - 从“内陆欧亚”到“东部欧亚”
- ·海丝与陆丝·
  - 早期海上丝路与海陆两道联通
  - 中文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中的“一带一路”
  - 回鹘时代：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特点与内涵
  - 10～14世纪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
  - 浅析宋元时期东亚海域各国间的“医师外交”现象
  - 海上丝绸之路朝鲜史料中的山东海商
  - 郑和时代前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水域的海事活动
- 后记

·理论研究·

全球史视野下的东亚区域关系史

——多层/多角性的区域关系

滨下武志[1]

序言 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分化与互动

从来被视为现代世界特征的是一方面朝着“全球化”的方向急速前进，但另一个动向却是“地方化”。这种两极的分化与互动，将居于其中的“国家”定位为另一种历史性的区域空间，并且提示历史研究有必要检讨“国家”的角色如何在历史上形成。数世纪以来，无论是重层且多元发展的历史主体，抑或复杂而多层次的历史空间，都局限于民族或国家，因而使国家成为历史发展主要的主体。本文所谓的“区域性”（regional），乃是用一种从现代回顾历史的视点，重新检讨这段所谓“国家时代”的历史时期。换言之，“区域性”的视点透过历史长时段的区域变动，试图寻找出相应于现代世界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分化与互动的分析架构、理念结构与历史研究框架。为此，有必要系统性地检讨“区域”这个多样而多层次的空间。同时，能够将全球化与地方化两者纳入研究视野，并重新检讨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空间的21世纪“地缘论”也相应而生。

一

1.地缘论与区域研究

就一般概念而言，所谓“地缘”者，可以定义为与区域统治相关的各种政策内容及其实践。毋庸置疑，区域统治的讨论虽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统治政策面向，但由于区域乃是统治的对象，故除了重视地理空间的政治层面之外，也包含经济、文化及军事等层面。然而，此处所谓的地

理空间并非单指自然地理，其所重视的政治地理，更是以自然地理为前提，并从而与人类社会诸集团相互联结而成的区域空间。从当代议题来看，例如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医疗问题、人口问题、海洋问题等，都是地缘政治的重要项目。

另外，相异于地缘论，政治地理学将视点置于区域空间，以地理关系来处理国家等各种政治主体的互相利害关系；但若单就以区域为“社会主体”这点而言，两者也有所共通。然而在历史上，地缘论也时常出现在支撑国家或民族向心力的议论中，特别是强调政治及军事的议论；而在针对这类议论进行反省时，政治地理学也主动在理念与目标上与地缘论有所区隔。政治地理学与地缘论之间的重叠与分歧，乃至分析现代世界时所运用的世界体系论，自然也是地缘论的一种延伸。

在东亚与东北亚地缘关系中，所谓“经济”并非意指“homo economica”概念的“经济”，而是“经世济民”的社会经济政策；“文化”亦非“culture”，而是“文治教化”意义上的文化政策。两者皆与广义的统治策略有所关联，不局限于政治。因此，历史研究中的地缘关系史研究，也不该再将“军事”“政治”只理解为基于国家利害关系而实行的政策。地缘关系史研究不但要考察统治政策的主体，更应该透过高层次的区域秩序或内外区域关系的视点，检讨作为统治政策的前提，甚至检讨其造成影响的区域空间（包括海域）的历史构造与变动（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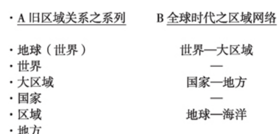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化—区域关系之网络化

此外，自然资源、气候条件、人口等属性，都是地缘关系所欲探讨的重要议题。地缘论不仅重视自然地理、地形、地势、气候，也认为各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对区域的政治有间接的影响力，借此强调地缘政治的开放性，或区域关系的重要性。

2.全球化与地方化——地缘性与网络性

非西欧世界的地缘论究竟如何？即便此一研究课题尚未清楚辨明，但在亚洲，似乎可以发现透过地缘取径进行自我认知甚或自我主张的情形日益增加。这表现为地缘政治的地缘论，试图借由历史上的中心与周

边、南北关系等，说明其与周边诸区域之间的相互利害关系。

相异于传统“一点四方”（由中心点朝东西南北四方呈放射状扩张其影响力）的中心主义，地缘论则企图讨论单一区域体系的理论架构。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为调整区域间均衡或互相利害关系的地缘论，但在20世纪前半段，国家或民族等具有排他性向心力的主题参入，反而导致区域国家化，并以超越国家的形式发挥力量。地缘论与区域研究的课题同时包含“相关且相对地定位国家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方法论上有交集，并且提示历史研究中区域研究的可能性与问题性。

特别是，随着现代世界朝向全球化的方向前进，环境、气候、金融等超越国家规模分析架构的问题也大量出现。同时，随着全球化之中“地方”的出现，研究者应透过全球规模的宏观视野，思索跨区域的构想，与融合边缘或地方视点的区域实像。为此，“网络”这个能够兼容并蓄且加以概念化的方法，在区域分析上也具备其效力。

二

我们在看历史时，经常是以陆地为坐标轴，而海洋只被视为这个坐标轴的变数。以陆地为中心来看，海洋是被当作联结大陆、岛屿及半岛的东西。西洋史的大航海时代这样的说法，或是航运史上快速帆船（clipper）时代对茶、羊毛及鸦片等的搬运，都意指海洋缩短了陆地间的距离，海洋是连接陆地的手段。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出现很多把海洋看成陆地的用语。例如，海道、海上丝路等，把陆上的构想用到海上。

海域世界由以下三个要素所构成。

第一，沿海地域，也就是海洋与陆地交接的地域及海域。沿海是海民跟陆民交易/交涉/冲突的地方，可见沿海地区是构成海域世界的要素之一。

第二，由上述沿海地区所形成的环海地区。在这个世界中，以海域为中心，而于周缘形成贸易港及贸易都市。这些贸易港，与其说是内陆往海上的出口，不如说是海域世界中互相联结的交点。例如，从历史上看，中国沿海海域地带的宁波商人，其财富的累积，与其说来自与内陆的交易，不如说是来自与沿海海域地区的交易或跨海域间的交易。尤其

是宁波商人集团在对长崎贸易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第三，可以将海域与海域之间联结起来的连海都市。例如琉球的那霸，中国的广州、澳门以及19世纪以后取而代之的香港。这些港市联络东海及南海，使海域间互相联动，使海域世界更多角化、广域化。又如，联络南海及印度洋的港湾都市，有马六甲或其后取而代之的新加坡或印尼的Aceh。由上述“沿海”“环海”“连海”三者所构成的海域世界，和陆地不同，可以说是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包摄性之开放的、多文化体系的世界。

以往从属于陆地的海洋，只是被解释为联结陆地的一个手段，但是，实际上也有必要反过来对它加以考虑，也就是要提出包括海洋的亚洲认识，以及树立以海洋为基础的亚洲论是否可能这一问题。而且，还要质疑迄今为止海洋是如何被摄入文化或文明论，以及思想、行为之中的这一问题。就以往的研究而言，和辻哲郎的《风土》（1935年出版）一书尽管将季风性气候设定为形成生活圈的条件，但是并没有将海洋纳入生活圈之中。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1957年、1967年出版）一书虽然关注到了内陆的沙漠，但是海洋是处于他的研究对象之外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的特征大多是按照一般意义上的海洋来加以描述的，而很少认识到海洋关系到形成文化与文明的边界这一固有的地域性特征。

这种海洋与文明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马上都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与此相比我们更为期待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将“海洋”加以概念化，因此它不是分析性的而是综合性的，它也不是对比性的而是融合性的。总之，它与19世纪以来的国家学基础上所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析型细分化的思维角度正相反。我们强烈期待这一“海洋”概念成为寻求对世界化与地域化相互融合发展的现代世界进行阐明的一个线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源、环境、能源、人口等现代社会所直接面对的所有问题不仅不是与海洋毫无关系，而是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但是，海洋与陆地一直就是被置于一个对比的、对立的角度论述下来的。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说一直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试图通过边界（即民族与国家以及文化的边界），有意识地忽视海洋的一个历史动机。“锁国”与“海禁”，以及与此相对的“开国”与“展海”的方式，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我们必须首先要考虑到亚洲的海洋在理念上而且是在思想上被分割开来的，而这样的分割具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它的历

史背景表现出一种儒教与国家、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合型结构，是针对这一结构下的迁移与移民的一个过度防范。而且，东亚的地缘政治文化论即便是要将海洋纳入自身，大概也必须具备这样一个逻辑步骤，即要首先阐明它的历史背景。

三

1.东亚区域网络——近代海关与港口网络

海关报告里有“II特种系列”（Special Series）和“III杂项系列”（Miscellaneous Series）的分类，共有95（44＋51）种的报告。这些资料既有文化方面，也有社会方面的报告，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由下面的几个例子可见一斑：

①医疗报告（Medical Report），1871～1911年（No.2）；

②中国音乐（Chinese Music），1884年（No.6）；

③气象观察与东南风暴（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Storms in the Eastern Seas），1887年（No.7）；

④汉口和其他长江港口药材出口清单及汉口出口药材约收关税数量（Medicines from Hankou），1888年、1909年（No.8）；

⑤万国博览会（No.18）。

海关资料中有多种的人物传记、回忆录、日记、信稿、访谈口述资料等，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海关关员后代所搜集、经过编辑和出版而留下的他们父亲的资料，现在已有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英国Bristol大学Bickers教授正在推动和搜集这些资料，并开始研究海关关员和他们的家族。据笔者所知，像美国加州大学的Perry Anderson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的Benedict Anderson教授（2015年逝世）都是蒙自海关税务司安德森（J.C. Anderson）的儿子，他们两人均在蒙自出生，表示希望访问父亲曾在云南蒙自海关工作过的地方。安德森于1914～1940年服务于中国海关。Perry Anderson教授曾亲自撰写了他们兄弟二人和父亲一起在云南时代的回忆录。

2.第二代的海关研究

近十几年来，陆续出现了新的海关研究与海关洋员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妨把这一时期出现的研究与海关洋员第二代的海关研究综合起来。从研究史和学术资料的角度来看，日记/回忆录无疑属于私人文书性质，笔者认为个人历史研究更能展现海关人事史研究的特色。

一些海关洋员称得上汉学家，他们对中国古典的研究为海关史研究展开了一个新的文化史/文化比较史研究领域。不可不提的是，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对海关进行全球性的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绝对可以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来提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新题目。

海关除了有本来管理的海外贸易、课税/收税的任务以外，还要处理跟关税直接有关的财政问题，财政问题往往又牵涉外债问题，而收税问题又涉及华侨汇款与交通和通信问题。海关建立了天津—上海之间的电信网络，经营轮船航运、邮政等。为了扩大收税的条件，又兴建港口和灯塔及派遣医生。

从海关洋人个人的角度看，他们对“清朝”或“中国”的感觉是沉重的，可以说是一种主仆的关系。从这样的历史视角上看，洋人认为清朝是大帝国，反而西洋只代表近代知识而已。在阿林敦（Arlington）的《青龙过眼》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鲜明的中西对比的关系。

需要指出，海关还经营邮局。按照海关人事统计来看，邮局的职员人数最多。[2]从1907年的外国/中国海关关员的人数统计来看，中外合计共9500余人，其中，内税部5300人，邮政部3600人，海事部630人。此外，海关还有税务学堂。总的来说，海关需要多种多样的内外人才。可以想见，不管海关内外，海关关员一般都有全球性的专业背景。[3]

以赫德时代的最后时期建设了邮政系统最具代表性。从1896年开始，海关便开始了邮政事业。1906年，清朝也开始兴办邮政事业，到了1911年，清政府的邮传部正式接收了海关的邮政事业，使之统合为全国性的邮政系统。

综合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海关资料和海关研究的内外成果，足以让我们去理解中国海关的国际运作。除了研究海关本身的机构/组织外，整理和研究海关与财政、海关关员的资料，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史的内涵与外延，甚有帮助。

这里所说的近代海关制度及行政管理，有其丰富的内容，包括近代海关的贸易管理与缉私、税收征管等，我们需要提出更多更深入的对档案本身的研究。[4]

3.“地方＝全球性”的海关研究与中国近代的“全球性”

虽然历史上我们容易把英格兰（England）、爱尔兰（Ireland）和苏格兰（Scotland）混在一起，统称为英国或大英国（Great Britain），但实际上三者之间各有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爱尔兰对英国一直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在经济上，像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mpany）等不少的老牌英国洋行来到东亚，其中多是爱尔兰商人。其实，我们应该把英国商人和爱尔兰商人区分开来。爱尔兰属于周边性国家，有比较独特的历史文化。赫德是爱尔兰人，而且他一直标榜自己是爱尔兰人，由此可见他在这一方面的地方性的特色。也有不少海关洋员来自其他欧洲周边性国家，像挪威、丹麦和瑞典等。总的来说，边缘地方的人，通过全球性的航海和移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了博大的中华文化。他们透过当时世界使用的关键语词如“中国问题”（Chinese Question），发现了中华文化具有世界中心文化的吸引力。莫理循（G.E. Morrison）把英格兰人（English）和英国人（Briton）区分开来，用边缘地区的角度来描述爱尔兰人赫德的性格。

从大小区域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大整体里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制度性的海关史的角度来看，海关就是一个涉及国内/国际行政和国内/国际经营的机构。[5]

结语

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社会人类学与区域研究，一直皆是采取一种“个别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对一系列专业性强的主题进行深刻的研究。由此，也就一直存在一种与整体性、综合性、比较性这一视角毫不相关的“学术研究”。而且在此，可以说无论意识到了与否，皆存在一个相互间已然了解的前提。这一前提也就是被认为极具强大向心力的、以村落为代表的地缘性地域社会与以区域为标志的区域的关系。进而到了所谓的近代，它表现为与二者也密切相关的“国家”“民族”这样的向心力概念。也就是说，在19世纪以来的世界史里面，这样的个案研究几乎都是以国家的一体性与民族的单一性为前提的。尽管民族是不断接近国

家的一个形式，但是另一方面，在强调“在地性”的时候，它是通过“族群”（ethnicity）这一表现形式来强调它自身结合的一体性的。在这种出发点与结论固定下来的一个极为稳定的框架下，个案研究进一步得到加深，个案研究也更为趋向细化。换句话说，比较与综合、周边研究这一切在此皆是不必要的。但是，这种核心向边缘、不断地弱化思维的方法，一旦面临外延界定内涵、周边代替核心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会遭遇到一个巨大的壁垒，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全球化过程当中，若是不去论述这一框架的整体性，就无法描述个别性的存在。

在此，就要求必须进行名副其实的“比较史”研究。而且，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使这一比较成为可能并赋予它存在依据的复数的比较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共通性进行思索。我们必须知道，在信息全球化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以个别研究为名的研究成果也必然要成为以共通性为基础的比较研究的比较对象。因此，笔者在本文提出了东亚地域研究与海域研究中基于多样方法性视角的问题意识。

[1] 滨下武志，中山大学。

[2] Weipin Tsai，“The Qing Empire’s Last Flowering：The Expansion of China’s Post Office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Asian Studies*，2015. 邮政有关资料；《哈佛大学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56、282册。

[3] Catherine Ladds，*Empire Careers*：*Working for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1854-1949*（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3）.Chiang Chihyun，*Government*，*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its Chinese Staff*（Routledge，2013）.

[4] Hans van de Ven，*Breaking with the Past*：*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 Donna Brunero，*Britain’s Imperial Cornerstone in China*：*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1854-1949*（Routledge，2006）.

[5] Catherine Ladds，*Empire Careers*：*Working for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1854-1949*（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3）. Chiang Chihyun，*Government*，*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its Chinese Staff*（Routledge，2013）.

“一带一路”、“丝路学”与区域研究

昝涛[1]

7年前，笔者曾发表过一篇长文，题为《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当时，还没有如今在国内外皆人气大旺的“一带一路”，笔者亦仅从历史上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地缘政治的角度，尝试性地探讨了中国文明与中亚［其实也是“内亚”（Inner Asia）］文明的内在关系。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是从西汉张骞（公元前164年～前114年）的故事说起，也是以某种意义上“呼唤”新时代的“张骞”（尤其是其精神）收尾的。本文的落脚点则意在阐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和需求下，中国学人需要思考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尤其是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国家有关的研究，在这个方面，本文力图提供一个理论和宏观意义上的初步思路。

一 历史/时代背景

自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洋枪洋炮强迫着“睁眼看世界”。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半个世纪，这个初生的“现代世界”曾以所谓“马戛尔尼访华”的形式来到乾隆帝统治下的大清王朝。不过，那个偶发的历史事件并未对中国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结果，鸦片战争其实是把马戛尔尼曾经主动送来而时人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主动把握和参与的事物，换了一个令人感到疼痛的方式呈现出来了。中国近代史的这个所谓“睁眼看世界”，其实质无非是要加入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简而言之，也就是被迫开放和学习西方。

“马戛尔尼访华”可以被看成一个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即仍处于盛世的大清王朝统治阶层与以英国为代表、那个生长中的近代文明及全球秩序的零距离接触；同时，那确实也是一个历史性、“不经意的”错过。历史地看，这个“错过”只是一个平淡的事件，不能成为后来者苛责古人的理由。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国人终于开始严肃地对待那个秩序。在此意义上，马戛尔尼就是一个较早地叩响晚期帝制中国大门的外国人，至于他是否心怀良善，姑且不论。

近现代中国不只是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遭受欺凌和压迫，沦为新生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在文化上也遭受压迫。最为典型的是，与丝绸之

路有关的敦煌等地的国宝级文献和文物大批量地遭到强盗式掠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没有学术和思想上的崛起与强大，一个国家难称强国。由此来看，黄文弼先生那一代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和拳拳爱国之志，是多么令人钦佩和感怀。

直到今天，中国文明经历磨难，通过主动的改革开放，以前不见古人的气魄成为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倡导者、捍卫者。2017年1月，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和日内瓦先后发表了两次演讲，其中多次提及并阐述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世界媒体把中国称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引领者。历史地看，这其实是标志着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秩序中角色的转换。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中国自近代以来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 “丝路学”的当代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学科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意义上，使得中国的“丝路学”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新历史阶段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共时性。也就是说，历史的丝绸之路研究与现实的丝绸之路设计/建设共存，这是史无前例的。直言之，通过使用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概念符号，当代“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建设呈现出显著的共时性。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要求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更加深化。

丝绸之路是19世纪末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von，1833～1905）提出来的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主要指陆上的中国与西方尤其是中东之间经过内陆亚洲的贸易路线。至今，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已然形成了一个有着深厚学术积淀、涉及多个传统基础学科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涉及欧洲东方学、中西交通史等多个领域。从中国学界的基础研究领域来看，对传统丝路的研究更为发达，在国际性的学术竞争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但放眼世界，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美的丝绸之路研究，他们的研究重点更多地转向了8世纪以来直到今天的时代范畴，也就是8世纪以来，出现了大量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打通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的努力大部分也是由外国人做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很多优质、可读性强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陆续被翻译、引进，迅速赢得了中国读者的青睐，比如韩森

的《丝绸之路新史》就是代表。另一个例子是国外学界围绕新疆8世纪以来的历史与现实，也产出了很多研究成果，根据濮培德（Peter C. Perdue）最近一篇评论文章的介绍，美国的新疆研究已经迎来了第三波浪潮。

此后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其意义在于，它跟我们所生活的当代世界息息相关。很多学者都讨论过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最大的共识似乎是“相互理解少、研究不足”，这正反映了我们的学术研究/传播与中国迅速发展的现实之间不相匹配的格局。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发挥后发优势、推进中国丝绸之路研究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犹如一束强光，重新为我们照亮了这个领域。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传统丝绸之路研究的“过去之学”也成为“现实之学”，要求当代丝绸之路研究者不断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往复对话。

今天的丝绸之路研究，将成为过去与现在不断对话的学问。过去的丝绸之路研究可以是纯粹的关于逝去之过往的研究，可以和现实关系不大；当然，在西方，除了作为学院中的高深学问，它也是一种配合帝国主义策略的“东方学”之一部分，这是它在当时的某种现实意义。但与今天不同的是，“东方学”的丝绸之路研究与现实意义上“一带一路”建设关系不大。也就是说，过去的丝绸之路研究，不是为了重建丝绸之路，就算仅在象征的意义上也不是；而今天的丝绸之路研究，因为有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而变成了一门现实之学，而不再只是过去之学。

基础研究服务于民心相通，应用研究服务于倡议的具体落地，是与具体的项目、资金紧密结合的。所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丝绸之路研究与建设同步进行、同时存在的时代，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特征。

一两百年后，今天这个时代就成了可被研究的历史。后人研究我们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一带一路”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他们一定会发现“丝绸之路”这个词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出现率突然暴增。他们会问为什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怎么看待和建设“一带一路”的？这个时期的丝绸之路与更久远的过去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一个视角使我们发现，我们在今天已经主要因为“一带一

路”而把自身置于2000多年的丝绸之路历史之中。我们的研究和建设，将成为一系列绵延不断的丝路故事之中的一环或一幕。未来的叙述，或许还要从张骞凿空或更早开始，还会关心粟特商人的历史角色，会有怛逻斯之战、郑和，还有很多很多，一直延续到“一带一路”。21世纪的这一代中国人，或许也会在未来的丝绸之路历史上占据一个篇章。如果说过去的人是丝绸之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自觉的。

统计显示，新的丝绸之路研究在中国已起步，但学科建设有待于完善和加强。当代的丝路学，不只是面向过去的，也是立足现实、发掘过去、面向未来的。

在今天，丝绸之路研究既是学术，也是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学者应该倍感这个时代丝绸之路研究人才培养的紧迫性。“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很多了解和懂得当地情况的人才，既要有语言基础，也要有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学科支撑；不只是东方学家那种象牙塔式、不与本地社会发生实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更需要具有实地经验、具备当地常识性知识结构（也就是熟悉和研究当地）的区域研究型人才。

三 中国的区域研究

学者的实践就是做好“天下之公器”。接下来，笔者将重点讨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区域研究。

现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迎来了一个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在学术资源日益丰富的条件下，需要考虑如何做好中国的区域研究这一问题，也有对此的全称，即“区域与国别研究”。因为区域内包含国别，下面笔者只说区域研究（不是说不要做国别研究）。这个区域研究，首先是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地区有关的学术研究。

改革开放的意义，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体制、教育、文化、思想等多个层面上，开始接触和尝试性地加入西方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秩序，从而开始产生新的自身意义和价值体系。改革开放即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内含“合而不同”：在文明上，中国终将与世界合一；在文化上，中国当然还是自具特色。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趋势。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审视自我？一方面，承认中国是全球化秩序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就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长期是西方的他者，这个他者是在后殖民批评的意义上来说的。这里，自我和他者之间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主体-客体的关系。实际上，中国在西方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属于被研究的客体/对象，这是一个从属关系，不是一个平等意义上的关系。所谓“他者”，从来如此。

中国承认自己是全球化秩序的受益者，就意味着不是这个秩序的革命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潜在的改革者。西方说中国正在成为引领者，中国有志于成为改革者，但终归不是一个革命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不大可能成为前述意义上的中国的他者，西方不大可能——像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一样——成为中国的他者，至少从短期来看不会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想说，中国的区域研究，重点应该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

近代以来，创造性地引领这个世界的思想、制度、文化的，当然也包括科学与技术，主要不是中国，现在也不是，未来一段时期也看不到中国的全面引领性地位的做实。这需要清醒认识，此亦为不同学科的学者需要认真考虑的。当下，中国在技术、科学、思想、制度、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世界性影响，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一个地位还不相称。这是很现实的，无论是多么民粹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煽动，也不应该使学人丧失理智。

当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中国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给中国在加入既有世界秩序/体系的过程中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国人从自身的角度意识到了这个不确定性，西方也意识到了这个不确定性。对国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是一种谨慎的忧虑，比如官方的提法是“不要西化”，要有“中国特色”。为什么要提这一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加入既有世界秩序/体系的过程，就是主动开放、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在制度、教育、法律、思想、文化包括科学与技术的创造上，很可能面临着被别人（主要是西方）“同化”的危险，这种危险带有很大的诱惑力，从而难免会产生某种忧虑意识。中国要加入而且也已经正在加入的这个世界秩序有着巨大的吸纳和同化能力，只不

过由于中国自身体量巨大、文化根基过深，这个吸纳的过程不会很快。它将引发秩序某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革，但它潜在地也可能是中国内部失序的催化剂，因而，中国希望加入这个世界秩序的过程是缓慢、可控的，同时也不能自绝于其外。

基于以上思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更积极地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方所主导的那样一个世界秩序的他者被逐步接纳的过程，同时也是其渐渐自我成长的过程。短期内，它不会完全被吸收，也不可能马上就出现一个中国所引领的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中国讲的“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版本的全球化，是对原有世界秩序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潜在的改革，而不是一个革命的思路。现在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越来越多，其包容性越来越强，这就是表现。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区域研究，尤其是在高校，需要意识到，我们还很难让西方成为我们的他者，因为国人仍然在使用着几乎所有的由西方生产的知识框架、学科、理论和概念，这些都是现代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的体系。我们没有一个自主、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从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区域研究，仍然是一个积极学习西方的过程，研究西方也会存在，但实事求是、谦虚地说，主要还是学习西方，力争使我们的研究达到西方的水平，还是要加入那个变化中的秩序，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他者意义上的对西方的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虽然不是西方，但与我们密切相关。这是当下中国区域研究的重点。由于我们提出了平等、多赢的价值观，又由于我们主要仰赖基于西方供给的知识体系，中国的区域研究具有双重使命，既要学习西方、加入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又渴望有所不同，比如尽量避免西方意义上（东方主义式的）对非西方的他者化。当然，这是中国的区域研究在方法上、概念上、理论上有可能进行创新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够提出中国的区域研究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的某种可能性，因为我们还在探索，才刚刚起步。

余论

就研究对象看，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中西交通史和唐中期（8世纪中期）之前的西域研究；就学科参与看，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考古、历史、文献等学科唱主角。在新的时期，中国学者的丝绸之路研究或可在如下几个领域取得进展。

第一，对8世纪以来的丝绸之路进行深入研究（需要多语种资料和多学科及跨学科的方法）。

第二，在全球史的视域下同时研究海洋和陆地丝绸之路贸易。

第三，从区域/国别、经济、金融、国际法、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涉及的重大现实问题，做智库工作。

第四，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高度上，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其能够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学理内涵，服务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

第五，近年来源于美国、在中国颇有市场的“新清史”研究，也与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密切相关，但显然学者们关心的都是非常近代的主题，比如族群、中国的特性和构成等，这也是它能够引发那么多国内争议和批评的原因之所在，当代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也需要探讨和回应类似的问题。

第六，在比较研究的意义上，通过探讨“一带一路”相关问题，最终回归到关于建构中国自身的认同/身份（identity）的问题上来。

[1]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建立中国周边学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初步探索

陈奉林[1]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历代执政者十分重视的问题，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从历史上的实践经验来看，中国对周边国家关系的处理无非就是抚伐二端。中国历史悠久，周边国家众多，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上积累了相当多的实践经验。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些经验缺乏系统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没有建立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的周边学理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理论建设的缺失。有了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并不等于有了完备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有学者指出："中国一脉相承的对外关系史，铸就了睦邻友好的优秀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大而不霸的民族风范。这种独特的民族风范具有三大基本特征：止戈为武、兼容开放、协和万邦。"[2]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提出建设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周边学学科的这一艰巨课题，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的，是为中国国家和平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与精神力量，也是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学以致用传统的伟大实践，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件不得不做的基础工作。

一 围绕建立中国周边学学科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在历史上，中国强调"和为贵""协和万邦"，可以说这是古代版的"和平共处"原则。要建立中国的周边学，首先必须弄清周边学的概念与内涵。既然要把它提升到"学"与"学科"的高度来建设，就应该在相应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上下功夫，进行大胆地尝试和构建，说出一个道道来，不然就不能成为一个"学"或一个"学科"。《新编现代汉语词典》将"学科"定义为以学问的性质划分的门类。[3]按照笔者的理解，学科是一门独立科学的分支，是分化的科学领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质与理论深度。具体联系到周边学，就是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套概念、方法与原则，以及相应的理论体系。这样理解不一定很准确，但基本上已经触及它的实质性内容。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传统是重实证而轻虚理，造成科学研究上的理论不足。理论的不足是制约学科发展的瓶颈。随着东方国家崛起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向前推进，现实的形势已经向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建立周边学的紧迫任务。我

们现在已经具备开展这个艰巨课题研究的基础条件，应该从学科建设和国家战略需要的高度予以重视和筹划。

开辟任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首先必须明确概念，从学理的角度考虑寻找构建的素材，找到相关的材料，笼而统之或大而化之是学术研究的大忌。周边学的创建也是如此。从科学建设出发，把周边学作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提出来加以建设，不仅是因为这个课题与现实有直接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需要认真地思考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中国与世界几个主要大国的关系已经基本定型，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力量结构。把对大国关系的关注适当转向对周边国家的关注是合适的，也是明智的，符合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目前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领海面积广阔，而且存在领土领海争端，地缘关系之复杂远甚于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季羡林先生说："中国立国亚洲，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时间内，我们同我们的邻国和比邻国更远的许多国家，一直在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虽然时高时低，时断时续，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是总起来看，可以说一直没有完全断绝。这对我们彼此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起了促进的作用，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彼此文化的内容，为我们的人民造了福利。"[4]近代欧洲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上乏善可陈，也没有留下太多可供参考的有益经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经验亟须总结、概括和升华，去腐生新。所以，中国周边学已经到了需要总结、深化与建立学科的关键阶段。根据建立中国周边学的需要，拟提出几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周边学的理解问题。周边学不等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双边或多边关系，也不同于按照民族与国家序列写出的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而是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体系，是一项高难度的学科建设，其内涵远比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深刻得多、具体得多。长期以来，人们对周边学的认识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恐怕一直没有人能够把它说清楚。过去并非没有人注意到建设中国周边学问题，但是由于开辟这个新的学科在理论构建上所具有的难度，使许多人望而生畏，所以迟迟没有人完成这个艰巨课题。人们对周边学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周边学就是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学，主要研究如何与周边国家打交道。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虽然不能说不对，但是无法涵盖中国周边学的广泛内涵。（2）周边学就是国际关系学，在

本质上与国际关系学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是周边视野下的国际关系。这种看法也存在问题，不能真正反映周边学的内涵，其局限是明显的。（3）周边学就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传统的国家关系，其研究目的重塑历史上的中国大国地位。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观点也不完全正确。（4）周边学是缔造一个新的学科，是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形势下对世界形势的重新审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关系。这可能是对周边学的最合理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对外关系与交流，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世界观，代之以新的利益观和发展观。面对新的世界潮流和不断出现的诸多挑战，我们根据国家提出的“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推进与周边国家合作，也是我们的应有之义。

第二，周边学的体系问题。周边学作为着手建设的一个新学科，除了要在学科性质、功能、结构与基本理论等方面进行学理性探讨外，还要在学科的体系上下功夫、说清楚。建立任何一个学科，首先要弄清体系问题，笼而统之或大而化之，无助于学科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好周边学的体系问题就等于解决了周边学的科学性问题。按照笔者的理解，体系就是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主体与各个侧面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按照这个标准，并不是任何内容都可以构成周边学体系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内在联系的内容也构不成周边学体系。因此，构建科学的周边学体系成为研究者必须考虑的问题。笔者在《东方外交史研究初探》一文中曾指出：“不解决体系问题就容易陷入把历史写成零碎材料堆积的窠臼，把历史看作杂乱无章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过程，找不到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总规律。就外交史而言，构成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间的相互联系与交流，因此只有在对世界历史进程整体把握上开展研究才不至于陷于表面化，才能构成严谨、周密的编写体系。”[5]

周边学不等于国际关系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学。正因为如此，它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发展规律与机理。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有全球视野、熟悉地区事务、合理的知识结构，还要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关系指出发展的路径与方法，从时代的高处研究和处理问题。目前，建立中国周边学的倡议已经得到国内学者的积极回应，反映出大家对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设的深切期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国际地位、角色与作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益突出，目前世界

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发挥巨大作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有着特殊的内涵与逻辑，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中国周边学的特殊性和学科建设的复杂性。

第三，周边学的主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他还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6]这个论断对于我们建立建设中国周边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与发展都有自己的主线。不突出主线，就容易把周边学看成杂乱无章的问题的集合体，看不到它的发展总规律与总过程。根据中国周边学的任务与要求，我们拟提出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纵向发展为经、横向发展为纬的历史主线，一经一纬构成周边学的主体内容，以此来构建中国周边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早在1984年国内学者就已经推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一书，集中探讨了中国与日本、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南亚各国、伊朗及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总结，对于今天建立中国周边学有启示意义。该书在总结中国与南亚各国传统友好历史经验时写道：“中国人民睦邻求友，谋致和平的高尚情操，得到了南亚各国人民的良好反应。”[7]构建周边学必须注意总结和借鉴中国与各国交往互动的历史经验，把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移民、安全等活动引入研究的视野，体现周边学的丰富性和时代性特征。这个提法是否妥当，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在讨论中逐步构建中国周边学的理论基础，形成对问题的清醒认识。

第四，周边学的编写原则。我们所说的编写原则，是指在研究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问题。因此，确立什么样的编写原则直接关系研究的深度

与广度。中国的周边国家虽然不是很多，但地域广阔，关系悠久复杂，几乎囊括了整个亚洲国家与地区，分散性的、断裂性的或支离破碎的研究显然是无法完成周边学面临的重大问题研究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本地区历史的、地理的和文化的视角出发，考虑编写原则，以中国人的史观撰写东方人的历史，从域内与域外的联系中形成对周边学的健全把握与构建，而不是过多地强调外来的影响。中国的周边国家处于东方，大部分国家又处于发展与崛起的过程中，这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及其展开。因此，进行整体性、连续性和包容性研究可能比断裂性、分散性研究更有意义，更符合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与总要求。

周边学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在研究周边国家时必须把中国与周边国家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既看到它们间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它们多样性的统一。长期以来，中国主导和影响的东亚国际关系，对周边各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只是发展到近代以后被西方国家抛到世界的边缘。美国学者费正清曾经指出："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久而久之，便在东亚形成一个大致相当于欧洲国际秩序的中外关系网络。"[8]我国学者也指出："只有东亚外交圈，始终稳定地以中国的中原皇朝为中心，不论是在中国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都未曾改变。由于中国在整个古代世界中一直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加以有着相应的连绵不绝的史籍记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使得中国古代外交成为世界上体系最为恢弘、完备，而又独具东方特色的古代外交典范。"[9]今天，中国、东盟、印度面临着新的崛起机遇，正处在一个空前伟大的变革时代。现在把周边学作为一个新学科提出来加以建设，无疑拓展和开阔了我们的思维空间和眼界。

二 东方历史与现实中具有丰富的周边学构建材料

我国具有重视周边国家的历史传统，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经验与材料。中国正史当中一般都设有"外国传"，记载其历史及其与我国的交往活动。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的《史记》设有《大宛传》，《后汉书》中的"西域传"、《旧唐书》中的"东夷传"以及《宋史》《明史》中的"外国传"，记录的就是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西亚中东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足以说明中国对于国家间交往的重视。中国外

交以其农业文明时期特有的模式存在了数千年，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不同于游牧和工业文明国家，其外交思想和行为多少带有某些农业文明的乡土味特征。有人说过，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就是以中国王朝正统观念来看待四夷发展变化的。费正清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组成……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10]因此，中国的对外关系仍然有重等级、重人伦和重秩序的特点。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有感于亚洲国家关系，认为："从这种意义上说，亚洲史也是一种乡土史。"[11]进入近代国际社会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方国家都面临如何进入国际社会、适应世界潮流、与周边各国建立新型关系的问题。

找准自己在近代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对于各国来说既是生疏的，也是痛苦的，更是一个付出代价的过程。欧美国家的冲击打破了东方传统的国家关系行为与格局，在西方的武力冲击下东方国家普遍落伍，接受了他们的外交行为、理论与规则。外交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很大，很少有一国外交不受国外政治影响的情况。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国外政治与政局的变化导致外交重大变动的情况；同样，外交也受国内政治、经济与舆论的影响。因此，研究周边外交就必须对国内外政治与经济有清晰的了解。这些问题都是建设周边学时需要认真总结和研究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和周边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这个课题所关注的重点，就是大范围、长时段的周边国家重大的外交活动，显然单一的学科、琐碎的研究是不能够完成这个艰巨课题的。

主权平等、国家独立和常驻外交代表机构制度传到东方，给东方的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和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是君主、国王掌握外交权力，它的外交体制、行为模式、内容与近代西方迥异，对西方外交体制与理论还需要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近代以前，东亚、南亚和西亚各地，是以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西方是以基督教教义文化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基本上能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各自的区域。进入近代以后，全球性的人口流动、贸易与殖民掠夺使东西方矛盾加剧，出现了许多重大问题，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亟须调整。有学者指出："惟自西力东渐后，以基督教文明为国际秩序原理的欧美国际体

系，挟其船坚炮利的优势，带来了规范其国际体系的近代西方《万国公法》，强迫信奉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之'中华世界原理'的东方国家改宗《国际法》。于是，东西国际秩序原理开始接触，因而爆发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这就是'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在国际体系相互冲撞下所爆发的统治原理管辖冲突。"[12]确实，西方国际秩序传入中国后，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受到很大冲击，东亚传统的国家关系秩序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换。

构建中国的周边学，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处，汲取人类文明最优秀的思想精华，实现对东西方两种合理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吸收东西方之长，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都是不妥当的。近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中奉行的更多的是"强权即公理"的实力原则，不顾国家间的平等与正义，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弱肉强食原则应用到国际关系当中，充满黩武与血腥，少数国家掠夺压迫多数国家，造成了国际关系中的极端不公和世界发展的扭曲与失衡。亨利·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有这样的评论："在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众多实际上独立的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亚洲在进入近代时没有这样一套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是有几个文明中心，周边围绕着较小的王国，文明中心之间的互动靠的是微妙而不断变化的机制。"[13]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糟粕的东西，但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礼记·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思想，墨子提倡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以及佛教宣扬的"众生平等"思想等在今天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构建周边学必须完成对传统思想的扬弃与超越。今天的国际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继承什么，摒弃什么，应该根据时代需要进行取舍，最大限度地吸收东西方两种精神文明成果的精华。

东方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强调综合平衡，注意到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建立周边学可以考虑这个思想。这个思想的最大好处，就是重视整体协调，把一切相生相克的关系转化成共存共荣的协调关系，避免了军事征服、黩武和单方面攫取利益的此消彼长的利益争夺模式，以及"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政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给我们建立建设中国周边学以诸多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

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4]这个思想不仅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也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对建立周边学很有启发意义。中国周边学的目标就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屋顶下实现共同发展，向新的文明演进升华。

在古代，由于自然的、技术的以及社会的多方面条件限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相对松弛，基本上奉行“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政策，或者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夏”与“夷”，但只要和睦相处，不发生战争，大家都能相安无事地过日子，共享天下太平。明代朱元璋时期编纂的《皇明祖训》把周边的朝鲜、琉球、安南、日本、暹罗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以求得边境的安宁与稳定。他们懂得内忧与外患往往会互为因果，给国家造成政治经济危机。尽管今天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和”一直是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梁漱溟先生甚至认为“中国人性好调和”，[15]可谓通人之言、见道之论。中国历史上的睦邻友好、协和万邦思想，虽然未必都为周边国家所理解，但是它所昭示的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思想却是可贵的。我们不可小觑这些传统思想对于今天的积极意义与不朽价值。任何一个重大理论与学术范式的提出，都必须适应时代发展与社会的重大需求，反映的是理论为国家外交大局服务的一面。

三 中国周边学学科的新定位

周边学是一个内涵广泛、时代性鲜明的概念，面对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世界，既有历史上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也有今天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俄罗斯、日本、蒙古国、朝鲜、韩国的关系，各种关系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中国面临的周边形势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复杂，多种挑战和多种机遇并存。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思维，既要继承学术传统，又要不断地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因为任何一项学术活动都不是凭空发展出来的，都有自己的历史传承性，都要反映时代要求。中国具有研究周边各国的历史传统，每个时代都留下不少的著作，但是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发展出一个完整的周边学科。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研究周边国家的著作，例如1984年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重点探讨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当时还没有提升到建立建设周边学学科的高度。

突破传统国家关系的旧框架，将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与人员往来纳入周边学的研究视野是我们的想法。传统的国际关系史多是政治史的框架，关注的重点是上层政治人物的对外交往、交流活动，基本上是记述和叙事，缺少对事件的理论分析和深层次考察，这可能是它的最大不足。我们关注国家与地区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人员往来，力图在编写体系、框架、内容与主线上有所突破。近年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已经有了中国人的史观，研究内容空前地丰富起来。重新思考国家关系，是当前东西方关系发生变化以及东方国家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的体现，传统的国家关系已经无法适应今天的国际形势发展。现在世界大国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有重大国际问题都有中国的参与和作用。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观念到外交决策机制都面临全新的课题。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误解、曲解的地方太多了，也太久了，我们现在有能力也有责任为当今社会提供一部信史和良史，尽到中国学者的责任。

加强国际间的横向联系，从单一的国别研究走向对周边国家的整体研究，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国的学术研究长期受苏联影响，除以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外，再就是对历史纵向发展关注较多，对国家间的横向联系关注较少，这恐怕与苏联所处长期孤岛状态的国际冷战大环境有关，更与苏联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特点有关。冷战结束后中国学者不满于这种状况，力图突出各国的相互联系与互动，从整体上把握东方各国，特别是周边各国的发展进程，既照顾到各国的纵向发展，也突出各国的横向联系、东西联系、南北贯通、古今结合。只有如此，才能反映当今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映人类发展互动的周边学。

确立周边学编纂体系的基本框架，要重点解决好周边学构建的体系问题。在看待周边国家发展的动力方面，既要考察外部因素的作用，也要考察各国内部因素变动的作用以及外交活动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周边学研究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有学者指出："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要素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交通往来。"[16]只有相互交往交流，才能使人类文明的成果实现共享，缩短各

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我们须知，当一个民族或国家打破沉默而开始有所行动时，常常是以与外界的接触为前提的，而世界史的发展契机也正在于此”。[17]在视野上，我们将着眼于国家政治统一后的外交活动，如秦汉帝国建立后的外交活动范围及影响实非以前所能比拟。秦汉以来历代王朝都追求“大一统”，在这一观念下，所有的土地都是王土，所有的居民都是臣民，因此中国建立的外交模式也就是朝贡制度，形成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才逐渐为西方近代条约制度所取代。

就周边国家关系而言，构成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各民族、各地区与国家的相互联系与交流，因此只有在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把握上开展研究，才能构成严谨、周密的编写体系。从周边学内涵而言，它不仅研究现状，也研究历史，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哲学、思想、考古、绘画、艺术以及当前的国际关系与世情、国情，单一的学科是无法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既然建立周边学就应该从学术上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构建周边学体系可能要重新考虑以往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反思，发挥中国学者的长处和各国材料丰富的优势，重视使用近年的解密材料和档案材料，以及摆脱周边学构建中欧洲中心论倾向的影响等。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合解释中国周边学的实践，但可以适当地加以借鉴和有选择地吸收，经过抛光磨垢之后再应用于中国周边学的实践，以吞吐百家、汇通古今的胸怀从容处之。总之，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周边各国正面临着有史以来空前伟大的历史变革，应该以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待周边的形势，用全球视野撰写包括整个亚洲在内的统一的周边学。

以往的周边国家研究基本上属于中外交通史或东西交通史的范围。把周边学从中外交通史中独立出来，是周边学研究的深化与行动的具体展开。因为研究刚刚起步，从复杂众多的历史问题当中理出个头绪来实为不易，理论的不足，本土资源整理与挖掘上的困难，体系、理论以及分析模式的建立都可能对研究工作带来一些限制。对于复杂万千的学术研究来说，我们的态度是“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已，选择极有难度的周边学作为我们研究的课题。十几年来国内已有学者执戈前驱，开榛辟莽，终于在这块荆棘丛生的土地上拓展出一块园地，树起了一面旗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为建立中国周边学学科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物化条件，如上海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出版的《中国周边国家概览》、《中

国周边外交十四讲》、《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中国周边外交学刊》（主编）、《中华民国外交新著》等多部奠基性著作，作为前期的理论准备与学术积淀，为开辟中国周边学这一崭新学科敲响了晨钟，也使中国周边学进入了全面总结与创立阶段。任何一个新的学术范式的兴起都是以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作为深层次原动力的，反映国家急剧变革时代对理论的迫切需求。以此观之，组织力量对中国周边学进行总结与创建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大体具备。现在的问题，是对周边学的编纂体系、框架、基本理论等进行理论升华，完成创造性的转换工作。

长期以来，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外交史）对欧美日发达国家关注较多，对周边国家的关注较少，把周边研究作为大国研究的依附性的点缀，或者局限于分门别类的研究，或者局限于双边关系研究，始终没有向更高一级的梯级——建立中国周边学学科的高度升进，至于提出建设“中国周边学”的设想更是凤毛麟角。中国经过40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完全应该重新思考和建设同周边国家的新型关系，把对外关系的重点由大国转向周边，解决好周边问题。过去讲“远交近攻”，今天完全可以“远交近通”，把邻国关系这盘大棋搞活。只有如此，方能推进“一带一路”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多年前，中央提出过“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战略布局。从这个战略布局而言，提出建立周边学的设想可以看作国家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中国周边学”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提出来，不管现在人们对它认同与否，但是它作为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一项文化建设是有其重要现实意义的。

今天，我们主张返本开新，吞吐百家，吸取中外历史上处理与外国关系的成功经验，为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倘不能真正科学地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中的思想精华，就容易走回历史的怪圈。当今世界不同于以往之处在于，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地区性重大问题和不确定因素增多，各种挑战空前集中，竞争加剧，许多问题具有国际性特征，如今天的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一带一路”的建设与推进问题，还有复杂的历史因缘屡屡昭示于前的与北方俄罗斯、南面印度、东面日本关系问题，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分析视野与哲学理论，从国家安全、全球治理、大国担当的高度思考现实问题。“一带一路”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可以为中国处理周边关系提供良好的合作机遇与典范，在利己、利人的过程中走向人类文明的高处，贡献中国的智慧。

四 在历史的传承中创建中国特色的周边学学科

以上对周边学问题的简要探讨，可以认为是对周边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设想，有助于深化对周边学的作用与功能、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华夷秩序”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协和万邦”思想，以及划疆自守、不谋远图的思想都应该作为珍贵的精神遗产加以研究，经过剖垢磨光之后再应用于今天的治世实践，历史上中国不重视周边国家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命中注定要与其他国家相处。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处就形成了国际关系。有两个国家共存，彼此之间就有一种双边的关系；有多个国家并存，相互之间就是一种多边的国际关系，这些关系相互连接，从而形成了一种国际关系。相关的国家通常就在这种体系内处理相互关系。”[18]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出周边学这一明确概念，但它所涉及的内容恰恰都是今天周边学实质性的内容。历史发展不能随意曲解割断，也不能随意抹杀，尤其在像中国这样具有悠悠5000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历史经验的积淀极为深厚，思想的发展又极为复杂，因此梳理、借鉴与继承历史上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摄取工作。传统思想中的一些惰性如何被克服，如何建立新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利益观，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理性成长与发展的程度。现在的工作是克服历史中的一些惰性，去腐生新，把握发展的契机，不失时机地推进21世纪中国周边学建设。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注意。长期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一直从属于外交史学科，一直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我们反思过去并不是割断历史，也不是忘记过去的教训，而是通过深入探讨彻底看清千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为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的理论借鉴。经过千百年曲折发展之后，我们已经形成对周边国家重要性的清醒认识，进而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关注周边国家的国情研究和周边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建设21世纪海陆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的重大课题。在中国历史上，既有视其他国家为“夷”的传统，也有向其他国家学习的传统；既有严“夏夷之防”的传统，也有天下一家的传统；因此，当务之急是吸收中外历史上的合理思想成分，结合当前形势发展创造周边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把我们的思维水平提高到世界先进者的地位，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的周边学学科发展。

任何一项理论创新都是在继承和发展中向前迈进的，今天提出的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设也必须从重新认识过去开始。中国崛起有利于建立建

设中国的周边学学科。虽然这一课题提出较晚，但经过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与学术积累，今天已经具备完成这一艰巨课题的主客观条件。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应该立足于东方国家崛起的现实，注意吸收中外历史上国家交往中成功的经验，摒弃原来以利益换和平的陈旧思维，在义、利、理、力的结合上下功夫，保持中国强大的战略定力，力图使周边学在体系、内容、框架和主线上有所创新，真正体现世界巨变形势下周边学的强大社会功能。根据这些设想可以设计出周边学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系统性和体系的严谨性，体现大变革时代中国周边学的书写特征。我们对此持有信心。

[1] 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 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7页。

[3] 《新编汉语词典》，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

[4] 北京大学历史系亚非拉史教研室、东语系亚非历史组编《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序”，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5] 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初探》，《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第58页。

[6]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2日。

[7] 北京大学历史系亚非拉史教研室、东语系亚非历史组编《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第124页。

[8] 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页。

[9]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前言”，第7页。

[10] 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页。

[11] 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谢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绪论”，第9页。

[12] 张启雄：《中国国际秩序原理的转型》，五楠图书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第11页。

[13]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社，2015，第285页。

[14]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3，第127页。

[16] 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绪论”，第6页。

[17] 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绪论”，第8页。

[18] 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266页。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和区域研究的新路径

罗卫东[1]

一 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所面临的基本矛盾

无论我们如何来定义社会科学的性质和方法，都不应该将其与社会理论的功能分离开来加以讨论。近代社会科学自产生之日起都是既传承学统，又呼应时代要求的。任何性质的社会理论都应该面对和解决当代社会的实际问题。所谓方法的创新总是起因于旧理论不敷解决新问题的需要，因而出现了一种理论上的困难。所以，无论是在问题还是在方法的维度上，社会科学都应该是面向现实、面向其他知识体系开放的。唯其如此，社会科学才有可能获得前进的推动力，理论创新也才能得以实现。

如果说，社会科学前进的基本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即方法创新和问题拉动，那么，前者更多地得益于向其他知识体系的开放和借鉴，后者则是起源于向现实世界的开放。不过，从今天的情况看，在所有这两个方面，社会科学都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

在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飞速发展后以后，现代社会科学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学科系统。各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系统。与此相伴随的是两个必然的副产品，首先是社会科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疏离，任何现实问题不再是社会理论整体面对的问题，而是只有被转化成其中每个分析性学科各自单独面对才能解释和应对的问题；更有甚者，问题的分化并没有在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上停止下来，而是不断地分解成二级学科以下的更加专门的问题。在学科专家既定的思维模式决定下，今天，似乎已经不应该再有所谓的社会科学问题，有的只是学科性的问题，如经济学的问题、政治学的问题……甚至，在一个经济学专家眼里所看到的只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的问题，经济学问题似乎也消失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所面对的任何问题，都必然首先是存在于人及其相互关系之中的问题，人自身具有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人自身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社会问题内涵的丰富性。由人及其彼此的关系构成的所谓“社会实在”，本质上是无数交互相关的事实（事

件）的集合。

在大陆哲学传统中，研究者所面对的社会实在作为社会关系的集合，从来都是整体性和动态性地给予的。实证和分析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其价值也是相当有限的。认识和把握社会实在，需要有超出实证科学以外的其他思维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研究商品经济关系，既不能用化学试剂，也不能用显微镜，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从韦伯开始的一代社会科学家对社会实在的可分析性有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哲学家柏格森甚至完全否定了社会实在具有可分析性的一面。同样，社会问题从未使自己服从于某个学科的逻辑，或者按照某些专家的意图来呈现自己。如果哪门学科的专家敢于断言一种社会问题的性质，那么他必定高估了自己的神性，而低估了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无限性”。总之，社会问题总是整体性地给予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联系的多个因素之中的一环，我们无法使现实问题按照学科来给予或者提出。

当整体性社会问题被分解成单学科问题以后，其性质很可能已经发生了转变，已经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问题了。由于对问题整体性的强行专门化乃至粗暴肢解，学科之间彼此应该有的互补关系转化为彼此独立甚至对立的关系。学科专门化赖以存在的方法专门化导致了不同学科的专家彼此缺乏基本的理论认同，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经济学和社会学。这种专门化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社会科学成果的用户也被专门化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甚至以复数个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整体性政治实践就无法指望得到社会科学知识系统的支持，就像大型工程技术系统得到科学系统的全面支持那样。这样一来，在现代社会，当政府的功能被要求必须提升和扩大的情况下，政治技术的科学基础则不断削弱，政治活动不确定性的方面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现代社会由此而陷入某种巨大的潜在危险的威胁之下。这样，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科学活动通过其专业化有助于消解人类自我认识的盲目性，但与此同时，也在制造着某种新的盲目性。这一点颇类似于经济分工过程，它在导致单件物品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可能也加剧了经济生活的盲目性。因此，协调是非常必要的。

从学术发展和现实之间关系的互动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越是基础性问题越是具有整体性；越是重大问题越是具有综合性；越是关键问题越是具有集成性。因此，解决社会问题要求我们具有动员整体性知识的能力和机制，通过推进学科交叉和融合，发展社会科

学的综合性和一体化范式具有越来越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国际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若干重要现象

在经历了胡塞尔、沃勒斯坦等人的批判性反思以及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之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乃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整合和综合化的新阶段。

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社会科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跨学科发展趋势。在若干重大的基础性社会理论问题上，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开始合作研究。

例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围绕心灵、意志、精神、人类合作与竞争、人类学习和决策等重大基础性问题，不仅社会科学家而且自然科学家也开展了彼此之间的合作，涉及包括经济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生态学、神经科学、计算科学在内的多个学科。这一研究趋势打破了传统学科之间判然有别的格局，引进了计算机仿真、社会实验、虚拟现实等新的方法，以重大基础性整体性问题为导向，展开了多个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如通过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科学家已经发现人类的利他行为具有神经科学的依据，道德感也是进化的产物等，这些研究一举解决了历代以来在学者之间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

从原创性成果分布情况可以发现，社会科学跨学科领域的分布密度在迅速提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马太·多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帕尔合作撰写的一篇文章列举了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而产生的丰硕理论成果。[2]另据不完全统计，2000～2006年，在《科学》和《自然》两大国际顶尖学术杂志上刊载的社会科学类跨学科研究的论文和评论已经多达百余项，主题大多集中在若干认识和理解人类行为的最困难的领域，如心智问题。

适应跨学科研究的内在要求，旨在打破学科体制禁锢、推进科学范式转型和促进文理大交叉的综合性前沿研究机构的异军突起。其中，地处美国新墨西哥州偏远地区的桑塔菲研究院具有突出的代表性。[3]一批关注自然和社会领域中复杂系统内在机理同构性的科学家聚集在这个原来人烟稀少的地区，潜心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其影响迅速扩大到国际学术界。

在这样的学术发展内生性动力的强大影响下，国家学术体制也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机构在大学和其他国家资助的研究系统内部建立起来，瑞士苏黎世国家经济实验室、美国斯坦福大学语言与信息科学研究中心以及MIT的认知科学研究所等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发达国家政府对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和法国研究部都以递增的幅度加大了对相关领域的支持。在2004财政年度NSF向国会要求的41.1亿美元的研究及相关的活动（RR&RA）的预算中，7.65亿美元用在学科交叉研究领域，比2003年增加了16.5%，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基金总量的增长幅度，更是大大高于GDP增长幅度。这些经费分配在4个优先领域：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技术研究；纳米科学与工程；人类和社会的动力。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在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索和发展之后，已经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创新成果，并且为统一社会科学的形成提供了某种可能。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大多具有跨学科性质。近年来一大批使用跨学科方法或从事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的科学家陆续获得诺贝尔奖（据不完全统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1/4颁给了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三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内涵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虽然非常活跃，但是至今为止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形成为大家所认可的概念域。

皮埃尔·德·拜认为，跨学科研究包含了多学科并置和学科间一体化的多种情况。从多学科到跨学科的过渡是渐进的，至少有五种情况。第一，分属于各门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平行地研究同一个课题的不同方面，并阐述研究的不同关系；这种针对某一个共同问题的学科并行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阐述问题的特征。第二，各门学科的研究者不仅同时研究同一个问题，还要对彼此研究的结果做出协调，试图将其整合成为一个共同的结果。这种共同研究在跨学科程度上要比第一种情况深。第三，研究者共同研究同一个问题，比较各自提出的假说，以批评方式互相评估各自的方法，并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共同的结果。第四，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或者技术，以为更好认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

提供新的范式或者视角。第五，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业已取得的成熟成果以便得出新的系统的创见。这五种情况中，前面三种以多学科并置为特色，更像是共同研究，后面两种才具有跨学科性质，因为存在着学科间的借鉴和相互渗透。[4]

拜所涉及的五种情况，就其未能将某种意义上的超学科研究纳入其中而言，内涵显然过窄了；但是他把形式上的共同研究纳入跨学科范畴，则又把跨学科研究定义得过宽了。在我们所接触的范围内，从三个方面来定义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内涵是比较妥当的。首先是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这个研究一般以某类定向的问题作为对象，以两个以上学科门类的理论资源为依托开展解决同一问题的共同研究。任何以共同问题为对象的多学科定向研究都属于此种情况，典型的事例就是组织研究，不论是家庭或者是企业，都可以运用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知识来将其进行处理，而得出的结论是有利于形成关于组织的全面认识的。其次是狭义的跨学科研究，也就是不仅有学科之间的合作和互补，而且发生了相互之间的融合与渗透，尤其是在方法层次上的互相借鉴和综合。在这个方面，法学与经济学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领域，交易费用分析方法被引进法学之后，形成了具有内在整合性的系统理论框架。最后是超学科研究，这指的是已经形成了超越具体学科方法和问题的更加一般化的理论范式，任何具体的学科只是这种一般范式的体现。从多学科研究到超学科研究的整个跨学科研究链条，其递进关系的关键变量是方法的抽象性。近代以来，从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等的理论体系到莱维·斯特劳斯、福科、布尔迪厄等人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便具有明显的超学科特色。在这个方面，不同于分析哲学的理路，它们是问题和方法、历史和逻辑的高度统一。而在桑塔菲学派之后，社会的自然基础成为超学科研究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组成部分。因为，非线性复杂系统动力学以及模拟社会实验方法被大量引进了社会研究。

严格意义上的跨学科社会研究既不应该包含多学科共同研究，也不应该包括单学科方法的扩散式的应用。它应该被理解为超学科社会研究，因此必然是基础性（不是学科性）问题、统一方法和“现象学”意义上的数据三者结合的产物。

多冈等人认为，从单学科研究到学科交叉或者跨学科研究的道路是由概念、数据、方法、理论、观点等多个元素网状的相互作用而开辟的。其中，概念的借用或交互使用，指的是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学科向

水平较高的学科借用成熟的概念，或者两个水平接近的学科共用某些重要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借用和互用往往扩展了视野，并且拉动了低水平学科的分析水平。“资本”概念从经济学向社会学的借用，形成了“社会资本”这类极为重要的新概念，就是很好的例证；数据（证据）的借用也有助于推进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创新，弗农·史密斯和丹尼尔·卡尼曼等人长期从事的心理学实验所获取的数据对改进经济学若干基本的假设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方法的借用被认为是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最活跃的方面。此外，还有理论的借用和观点的借用等。[5]

四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能性

今天，除极少数持帝国主义态度的学科专家外，人们对推进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必要性的认识都在不断加强、走向统一。与此同时，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内部整备工作也在加强，这使得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大大加强。

从理论方面来看，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合法性”不仅来自日益增强的现实需求和学术前进的要求，更有赖于相应科学范式和统一方法的确立。前者自不待言，后者呈现出了相当乐观的趋势。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指出了五种跨越传统学科界线的学术潮流和科学方法。这就是：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国民统计数据的长时间序列多变量分析、运用软数据（民意测验、访谈和问卷调查）以及制度范式。[6]虽然科尔奈是基于一个经济学家的立场来对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基础进行评价的，但他指出的这五个方面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的学术影响确实不断扩大，尤其是理性选择模型、博弈论方法和制度方法在各个学科之中的应用正在形成令人兴奋的成果。

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科学内部的跨学科研究在西方社会开始加速，而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种知识体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产出新的理论成果。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系统模拟、仿真和虚拟现实，基于电子科学的大脑扫描技术等先进研究手段的引入，使得人类对自身的心智和社会集体行动的宏观动力学机制得到不断深入的了解。在某种意义上，计算机运算速度和电子扫描速度的每一次跃升，都在为我们逼近人类自身和社会复杂系统的奥秘创造条件。自然科学实验手段正在以空前的规模被运用于人及其社会研究，不仅传统的描述性社会理论已经日显粗陋，即使基于数理方法的分析性社会科学所享有的统治地位也正在动摇，实

验社会科学的兴起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不论人们对此持何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我们都不应该轻视它所具有的方法论的意义。实际上，它是科尔奈所说的五种可能性之保障。没有实验的方法，这五种方法都缺乏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学科认同的可能。因此，所谓的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正是这种融合了先进技术和突出社会问题意识的实验方法。

五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困难及其对策

即使是在发达的国家，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进展无论是就解决现实问题对它提出的强烈而迫切的要求而言，还是就它自身蕴藏着的学术张力而言，都是显著滞后的，更不必说在中国了。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跨学科研究概念和内涵不清、缺乏统一范式和可操作的方法系统等自身的原因，也有观念、体制、投入等外部原因。

体制 目前我们的学科体制基本上还是沿用苏联模式，学科划分过细，彼此间的内在联系被强行割断。围绕学科目录来运作的管理体制显得非常僵化。学术职务晋升、学术成果的发表、科研奖励评审、科研项目申请以及各种科研拨款的审批都是以一级学科为轴心来运作的。在一级学科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对学科间公共论域的介入缺乏应有的激励。一些受过严格学术训练而又具有跨学科研究兴趣的专家因为得不到体制化的资源投入保障，很容易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往往选择重新返回到学科内部。体制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尚未形成常规运行的激励机制。基于现行学科管理体制的跨学科社会研究，必然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或者缺乏可持续的稳定的激励机制，或者是激励扭曲的。

学者 跨学科研究要求学者必须同时具备三个重要的条件：至少某一学科的专业训练、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视野和问题意识以及跨学科研究兴趣。要培养具备这样三个方面条件的跨学科人才，需要的投入更多、时间周期更长，同时风险也更大。与专业型学者的生产系统相比，投资于跨学科学者的生产体系是更有可能失败的。因此，没有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和激励机制，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将会出现严重的激励不足。事实上，在现行的人才培养体制和学科体制下，跨学科人才难以批量出现正是因为缺乏相应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在人才供给机制尚未建立和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目前国内的跨学科研究多半出于可遇不可求的状况之中。

与专业性和学科性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面临的人才瓶颈最为严重。

学术组织模式 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组织方式与学科性研究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学科性研究可以在科层制模式下有效运作，旨在动员学术资源的指挥、命令等机制可以畅行无阻。也就是说，学术权威的领导作用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是，跨学科研究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合作更加类似于平行生产单位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纯市场化的和纯计划方式都难以有效运作。这意味着在各学科之间建立起某种常规性的协调机制和共同的学术平台是非常重要的。适应跨学科研究要求的领导体制，要么应该是集体领导，要么应该是倾向以协调为主导功能的。但从目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组织模式看，科层制仍然占主导地位。研究所和科研团队内部通行权威服从关系，彼此之间又很难进行有效的协调。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尤其如此，实际科研组织模式在研究者单打独斗和准自然科学式的研究团队两极之间波动，而与跨学科研究的要求相适应的组织模式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缺乏有效的组织方式成为各学科之间难以开展跨学科社会研究合作的实际缘由。

资金投入 与学科性研究显著不同的一点是，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由于其所面对的大多是整体性、基础性、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其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是学科性研究无法胜任的。一般来说，跨学科研究都需要运用基于海量数据和现代实验条件的方法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方法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的硬科学特征，其研究活动发生的费用不仅单项强度大而且发生面广，这意味着其需要的资金投入是远大于学科性研究活动的。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模式和资助强度基本上无法满足跨学科社会研究的要求。

鉴于此，我们需要对现行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研究体制进行反思，要在借鉴先进国家推进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已取得的有效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对策。

我们发现，NSF对跨学科研究的支持模式，表明美国的科学管理当局正在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来消除前面所述的跨学科研究发展的瓶颈制约。

他们的主要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推动跨学科研究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目标和长远的计划以

及持续的支持。为此，国家资助机构应该把支持学科交叉研究放在一个战略位置，根据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采取相适应的方式，进行长期支持。NSF支持学科交叉具有明确的目的：（1）瞄准解决国家需要的复杂问题，汇聚众多学科的视野；（2）激励知识在大学、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转移；（3）促进不同领域的自然联系，因为相互联系对于成功是关键的。

第二，支持跨学科研究应该与优先资助领域结合起来。优先资助领域是科学发展的新机会、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间协调发展等因素的反映，这些领域与学科交叉有着内在联系和相互促进关系。优先领域集中在知识的前沿领域和具有重要国家利益的领域，在其中做出的发现和创新有可能会产生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如2004年增加“人类与社会动力学”（Human and Social Dynamics），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各个层次上人类和社会行为的动态变化，包括人类的智力和精神，增加对社会变化的复杂后果的预见能力。法国政府特别重视对人类语言生成以及进化机制的研究，也是基于语言问题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基础性特点。

第三，对跨学科研究的支持应该与人才培养和教育相结合。促进学科交叉研究的关键是培养具有多学科知识、素质与合作精神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需要紧紧地与研究活动结合在一起，采取新的教育手段和机制。NSF整合研究生教育和研究教育津贴，其目的是资助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时获得技术、职业和其他技能。它强调学科交叉的支持途径，研究计划力图为研究教育提供创新的模式。

第四，探索多种不同的资助机制。跨学科研究表现在不同的方向，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发展方式，因此应该根据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主题，采取多种资助机制，探索新的资助模式。

第五，注重对研究中心的支持。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可以会聚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教师和学生，并可以与世界组织建立灵活的合作关系，是支持跨学科研究的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科学技术中心（STC）作为一种新的资助模式进行试验探索，NSF于1989年和1991年分别支持第一、第二批中心，共25个。实践证明，它是很成功的模式。1997年在经过评估后，NSF决定继续支持STC。2000年和2002年又支持第三、第四批，共11个。2005财年计划支持6个。

第六，积极支持促进学科交叉研究的平台建设（论坛、网络、研讨会等），促进学术交流，创造促进多学科交流与合作的氛围和环境。

六 推进我国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建议

1.学科规划

一方面，由于现有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和庞杂，新的领域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跨学科研究往往需要长时间、持续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和要素支持，因此，几乎没有哪一个大学或研究机构具有覆盖全部跨学科研究问题域的资源保障。任何一个单位都必须对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和主攻方向做出选择，集中攻关，长期支持。为此，必须搞好学科规划，寻求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合理定位，寻求工作的突破口。前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资助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所采取的领域遴选方式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笔者认为，在从事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工作方面，我们需要考虑四个非常重要的遴选标准：第一是现有资源和可得资源的状况，也就是现有学科自身的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第二是成果需求的性质，即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用户，其需求水平、需求强度及其持续性；第三是学科连锁度，即跨学科研究能否得到相关学科的有力支撑，能否反过来对相关学科的发展产生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第四是同行之间的竞争状况，即能否产生单位之间的良性的学术竞争和合作关系。除此以外，还要考虑的重要一点是对发展机遇的判断和把握。

2.改革和完善现行学科体制

鉴于现行学科体制是发展跨学科研究的重大障碍，必须尽快予以改革和完善。学科制度自身具有路径以来的特点，全面取消并不现实，只能进行改良。可行的办法：一是取消申报表必须填写的“所属学科”一栏或者增加“跨学科”或“其他”一栏；二是压缩学科数量。前者要求设立与跨学科研究相适应的特别评审委员会，后者则要求对学科目录做出调整。我国目前实施的学科目录是1997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虽然，与1990年的原目录相比，二级学科（学科、专业）由原来的654种调整为382种，但增加了管理学学科门类，授予学位的学科门类增加到12个；一级学科则由原来的72个增加到88个。该目录作为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核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范围划分的依据，也是学位授予单位授予相应的学位和制定培养研究生的规划，进行招生、培养工作的依据。这个新目录中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的增加，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跨学科研究的难度。21世纪的四大重要的研究领域，即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和认知科学，没有一个可以归入其中任何一个一级学科甚至学科门类的。因此，按照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重新调整学科设置，这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可行的办法是在现有的学科门类中，取消部分内容过窄、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门类，增加包含了四大领域的综合学科领域。

3.构建以研究中心为主要形式的跨学科开放研究平台

迄今为止，科学研究的各种组织类型，即中心（center）、实验室（lab）、研究所（institute）、项目（project）、论坛（forum）、计划（program）、研究组（group）中，研究中心是最适合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组织方式。正因为如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最近一轮资助计划中，特别注重对研究中心的投入。研究中心的设立以及运作可参照斯坦福大学独立研究机构的模式。研究中心应该是以知名教授为品牌、重大项目为纽带、先进的科研服务体系（网络、资料、实验）为支撑、产出重大原创性成果为目标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十五”计划期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已经初步形成了这类研究中心的特色，但目前看来仍旧难脱学科体制的束缚，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4.设立跨学科社会研究专项基金

跨学科研究很容易受到学科研究的挤压，在按照专业申报项目的体制中，跨学科研究项目的中标率普遍较低。为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可以考虑在现有基金资助框架内进一步明确招标研究指南，或者设立专项研究基金予以保证。前者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跨学科研究的领域、方向和问题都是很难事先予以明确的，形成指南有一定的困难或者滞后性；后者当然也存在操作方面的问题，因为跨学科研究和学科研究两者之间的边界常常不是那么清晰，很难避免两种研究之间的混淆。美国的经验是确定优先资助的研究领域，一个研究领域一般包含了若干比较重要的方向和问题，这样既可以避免一般资助体系对跨学科研究的挤压，也可以相对减弱跨学科与学科研究边界不清带来的操作困难。几年前，中国科学院系统为自然和社会复杂性建立专项研究资助计划的做法

与此类似。

5.推动研究者的跨学科交叉学习

跨学科研究最大的障碍是研究者的学科观念和学科思维所导致的彼此隔阂，要消除这个隔阂就必须鼓励研究者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例如，可以在大学启动跨学科课程的交叉学习计划，使教师对不同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该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关性，现有交叉结合情况，前瞻性问题和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等都有系统性、综合性的了解，从而培养交叉研究的自觉意识，拓展教师的学科思维，开阔教师的研究视野。通过交叉学习计划的实施，还可以在机构内形成一种多学科交叉研究和交流的学术氛围，进一步促进自然科学领域学科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之间的沟通、融合和渗透，推动不同学科间教师开展科研合作，提高协作攻关的能力，推进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亮点，促进学术创新和交叉性研究成果的涌现。但是，要推动研究者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一方面是要提高这种学习的乐趣，另一方面还需提供一定的外部激励，例如，对某些具有跨学科特性的研究岗位的应聘者明确提出需要两门一级以上学科的教育背景等。

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促进跨学科研究还需要重视举办各类跨学科论坛、学术沙龙以及创建相关网站等，要投资于必需的实验设备以及投资于跨学科研究必需的社会资本，发展各相关学科研究者之间的“有机团结”。

[1] 罗卫东，浙江大学。

[2] 马太·多冈、罗伯特·帕尔：《社会科学中的杂交领域》，王爵鸾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0年第3期。后被编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 对桑塔菲研究院的全面而生动介绍的最著名作品当属Mitchell Waldrop撰写的*Complexity*一书，该书已经于1997年被翻译成中文，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4] 皮埃尔·德·拜：《定向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周昌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542页。

[5] 马太·多冈、罗伯特·帕尔：《社会科学中的杂交领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

[6] 雅诺什·科尔奈：《社会科学各学科分离还是融合？》，《比较》第27期，第3～7页。

·欧亚区域史·

中国出土粟特人墓志所见墓主的祖源追溯与入华记忆：中古入华粟特人中国化进程析论

杨晓春[1]

入华粟特人引起现代中外研究者的高度注意，是和一批又一批的粟特人墓志及墓葬的考古发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华粟特人墓志资料的数量，已经公布的总数超过100种，颇具规模，值得做综合的研究。另外，这些资料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大，以墓主葬年显示的墓志时代而论，从北周至北宋初年，前后达400年（以所涉墓主先世、子孙而论，则达500年），正展现了变迁的过程。

在华粟特人的墓志资料，就资料公布而言，从早期的金石著作到晚近的考古报告、石刻资料集，形式多样；就研究而言，不管是单件的考释还是综合的研究，都业已形成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文献。[2]总的来说，在华粟特人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伴随新的粟特人墓志资料的公布，便会很快形成相应的考释论文的基本趋势。而最近十多年国内考古工作的蓬勃展开，又形成了粟特人墓志新资料的公布几乎是年年更新的研究现状。当然，对于在华粟特人的聚落、宗教信仰、接纳汉文化（通常用汉化一词来概括）等问题的研究，也是继续深化的，并在粟特人与乡团等新问题的展开方面，也不断有所突破。

就在华粟特人的中国化进程而言，中国学者通常用“汉化”一词来概括，程越先生较早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关注，他利用石刻资料，从婚姻状况、丧葬习俗、宗教信仰三个主要的方面进行了探讨。[3]陆庆夫先生则从职业分布、婚姻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四方面考察了唐宋间敦煌粟特人的汉化，对敦煌粟特聚落从化乡的打破在汉化方面的促进作用的角度给予了重视。[4]陈海涛、刘惠琴两位学者的《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一书给予了最为集中的关注，从通婚、

姓名、葬俗、家世渊源观念的变化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研究中主要的依据也是粟特人的墓志资料。[5]有关晚唐五代粟特人，则有高文文《唐河北藩镇粟特后裔汉化研究——以墓志材料为中心》一文。[6]

做粗略的归纳，可知关于入华粟特人的中国化进程的研究，主要的观察角度如下：名字、祖源[7]追溯、通婚、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多数可以归纳为文化心理。其中名字、祖源追溯、通婚三个方面，在墓志资料中有集中的记载。此外，墓志中对于进入中国的过程也有较多的记载。

本文试图在比较全面地收集在华粟特人墓志资料的基础上，对粟特人墓志所展现的在华粟特人的祖源追溯和入华历史两个方面做集中的讨论，同时辅以时间因素的观察，考察入华粟特人及其后裔的中国化进程。

一 在华粟特人墓志概况

很早就有学者试图集中地收集已经公布的粟特人墓志资料，并展开综合的研究。如李鸿宾先生收集了《唐代墓志汇编》中公布的粟特人墓志22种。[8]荣新江先生关于粟特人分布的研究，系统地利用了当时已公布的绝大多数粟特人墓志。[9]陈海涛、刘惠琴所著《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的相关研究，主要根据唐代粟特人的墓志资料，做了十分全面的收集。[10]

本文主要以《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补遗》作为主要的粟特人墓志资料的来源库，同时参考荣新江的《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陈海涛、刘惠琴所著《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已经做过的收集工作，并增加近些年的新发现，获得在华粟特人墓志的资料表，[11]作为后文分析的基础。除了墓主姓名、首题、卒葬年代、资料来源等常规项目，主要就墓志中有关墓主的名与字、籍贯、祖源追溯、父祖等先世状况、进入中国的方式等内容进行摘录，其他与中国化进程有关的内容也酌情进行摘录，通婚状况则做必要的说明。表格按照墓主葬年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列。

在华粟特人墓志的收集，首先便面临着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算作粟特人？

当然，有明确记载说明墓主出自中亚昭武九姓各国（或者用历史上的大夏、西国等更为宽泛的表述）的，是最明确、有效的标准。同时，入华粟特人以国为姓，常见的有康、安、史、何、米、石、曹等姓（尤其以康、安两姓最为主要），所以有时又以姓氏来判断；而在粟特人墓志的收集过程中，学者也往往是从粟特人姓氏入手的。但是入华粟特人的汉姓，与汉人等的姓氏多有雷同，所以在粟特姓氏的人物中，又常常要加上其他的具有特征性的名字、职官、婚姻等证据。名字如直接音译（“盘陀”等）和带有“延”“芬”等后缀，[12]职官如“萨宝”“天主”等；婚姻则是根据夫妻双方都是粟特姓氏（少数是一个粟特姓、一个其他的胡姓）来判断，这一判断方法在研究中最常遇到。表格中的史善法等人被认定为粟特人，是考虑到史善法、康郎二人夫人为康氏，康哲夫人为安氏，翟氏丈夫为康国大首领，何氏丈夫为契必氏，康氏丈夫为康姓，又一康氏丈夫为安文光。除了夫妻双方的粟特姓氏作为辅助标准，还有根据粟特姓氏的原籍，如武威安氏，便认作粟特人了。但是，还有一些带有典型粟特姓氏的人物判断为粟特人是根据其他的因素，典型的如史道德族属的判断，根据的便是他的活动地点以及墓葬中的一些器物的特征。[13]最近还有关于史孝章族属的争论。[14]

本文的收集，基本以上述各方面的某一项标准为依据。另外，空间上以甘肃及其以东的中国内地为限。

以上的标准选择，也便造成这么一种现象——没有足够的粟特人具有特征性的名字、职官、婚姻等证据，也就不能认定墓主为粟特人，这就先然把可能完全接纳汉文化而只留下特征性不明显的使用粟特汉姓的粟特后裔，剔除在研究对象之外了。这实在是方法论上的内在的矛盾，但是这个问题又无法克服，所以表中同时酌情收录了一些学者通常认为是粟特人但是还没有明确证据的少数的一些例子。但是可以估计，没有包含在内的应该更多。

我们都知道，粟特侨民在中国最终都融入了以汉人为主的其他民族，那么粟特人的后裔，到怎样的程度可以排斥在粟特人之外呢？特别是有一些粟特人的后裔虽然明确知道他源出粟特人，但是又不能找到他们的“粟特人”的特征，该如何来对待呢？或者说，一个家族数代人中，发现其中有一人具有“粟特人”的特征，那么是否可以将其他的家族成员也看作粟特人呢？

这实在也是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本文试着以郑岩家族和安重遇家

族为例，对此做初步的回答。也许，这正是入华粟特人中国化进程讨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华粟特人墓志资料，可以按时间分布做一统计（见表1）。

表1 在华粟特人墓志时间分布统计

时间段	墓志数量（方）
北周（557~581）	3
隋（581~618）	5
唐高祖、太宗（618~649）	2
唐高宗、武周（650~704）	43
唐中宗至玄宗（705~755）	17
唐肃宗至德宗（756~804）	10
唐顺宗至武宗（805~846）	11
唐宣宗至哀帝（847~907）	9
五代（907~960）	5
北宋初年（960~）	1

表1的统计，考虑到历史时代的同时，大致以50年为一个间隔，目的是看出粟特身份的人物的活跃时期。时间分布，总体上呈纺锤状。显然，唐高宗、武周时期是最为集中的时期，远远超过其他的时段。考虑到各墓志的时间是以墓主的葬年为准的，多数人寿命超过60岁（明确记载卒年在60岁以上的占比达到50%以上），并考虑到几乎所有的墓主所记父祖两代均已在华，可以估计粟特人在社会上的活跃时期为550～650年的大约一个世纪。

墓志是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质的古代石刻之一，当然也便可以说墓志的采纳是入华粟特人接受中国文化的表现之一。墓志也是中国丧葬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粟特人采纳墓志是其采纳中国丧葬习俗的一个具体的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原北方地区集中发现了一批具有明显的祆教文化内涵石葬具（石棺椁、石室、石榻、石屏、石门楣等）的粟特人墓葬，如安伽墓、史君墓，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也连带讨论了一批非发掘品的石葬具，形成了一大批论著。不过，杨泓先生就此指出，“强调所谓‘粟特文化’特征，从而将无法全面地去观察这些墓葬所表露的完整的信息”，并以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北周大象二年（580）史君墓、隋开皇十二年（592）虞弘墓、唐永徽四年（653）至上元二年（675）阿史那忠墓、唐光宅元年（684）安元寿墓、唐景龙三年（709）安菩墓为对象（其中阿史那忠墓似可剔

除），从墓葬形制、葬具、墓志或墓铭、石葬具的图像四个方面进行了综合的分析，认为："所有的墓葬形制均是北朝至唐时中国的典型样式，主要是前设带有天井和过洞的长斜坡墓道，设有石门的甬道，基本是方形的砖筑或土洞墓室……在墓葬最重要的墓葬形制方面，丝毫看不到这些来自西域的不同民族的死者，在构筑墓葬时显示出表明族属特征的任何暗示。""上列西域来华人士的葬具形制，一概为中国传统的葬具，无任何域外色彩。""（墓志）从形制到志文内容和写刻规范，完全按中国墓志通例。"有的石葬具带有西域图像特征，但分别选用不同的粉本，各有来源。[15]杨泓先生的总体观察，给研究者以很好的启发。陈海涛、刘惠琴两位学者也设想由墓葬入手，从葬俗的变化来讨论入华粟特人的汉化问题。考虑到的墓葬个案有宁夏固原史索岩夫妇墓、史诃耽夫妇墓、史铁棒墓、史道德墓，宁夏盐池何姓粟特人墓，陕西西安何文哲墓，河北大名何弘敬墓，河南洛阳安菩墓，陕西安元寿墓、安宝墓、何刚墓，不过对墓葬本身的分析比较简单。他们主要从葬式由粟特本土之天葬向中原之土葬转变、墓葬中墓志铭的流行、夫妻合葬之风的盛行、家族墓地的存在和归葬先茔的流行、丧礼形式的表现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已逐渐摈弃了中亚本土的葬俗而开始接受中原传统的葬俗"的结论。[16]

通过墓志的采纳来总体上观察在华粟特人接受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分析采纳中国式样的墓志与粟特人入华代数之间的关系。如果以发现墓志的这一代作为开始使用墓志的一代，很可能有点偏晚了，毕竟不能排除此前的某一代使用了墓志的可能性；如果以墓志中记载的墓主父祖等在华的情况来确定墓主入华的代数，也很可能有点偏少了，毕竟没有记到的先祖也已经有可能已经入华。不过综合起来，两相抵消，一般就以墓志使用的一代作为采纳的一代，以墓志记载的墓主父祖等在华情况估计墓主入华的代数，应该还是可以反映基本的历史情况的。[17]

附表把至8世纪中叶为止比较明确记载了入华世代的状况和根据对父、祖等先世的记载而做的最低限度的入华代数的推测添加在备注栏中，现根据入华代数统计如下（见表2）。

表2 在华粟特人采纳墓志的入华代数统计

入华代数	墓志数量（方）	墓主姓名
入华第二代（？）	1	安伽
入华第三代	1	康业
至少为入华第三代	14	康阿达、安延、何盛、安静、安度、史氏、安娘、康武通、康元敬、何氏、安神俨、康枚、康宜德、康仙昂

表2 在华粟特人采纳墓志的入华代数统计-续表

入华代数	墓志数量（方）	墓主姓名
入华第四代	2	康老师、史多
至少为入华第四代	21	史射勿、安师、康达、史铁棒、史诃耽、康敬本、史道德、康续、何摩诃、康留买、康磨伽、安元寿、安怀、康哲、安菩、安思节、康威、曹明照、康庭兰、史思礼、翟氏
入华第五代	2	康婆、安万通
至少为入华第五代	1	康智

由表2可知，多数在华粟特人采纳墓志是在入华三四代之后。也就是说，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入华粟特人的后裔才采纳了墓志。其实，在华粟特人的名字中，也有不少反映了三四代之后还保留者粟特人名特点的。墓志中记载父、祖为最低限度，也可能不记曾祖、高祖的情况而曾祖、高祖已经入华，因此实际上入华的代数还会更久一些。

以上的粗略统计，也说明粟特人入华，主要在北朝时期，与表1通过现存墓志时代所做的统计结果是一致的。

在华粟特人采纳墓志的入华代数总体状况的揭示，有助于总体上说明入华粟特人后裔接纳汉文化可能没有我们一般想象的那么快。

二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记载的分析

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的叙述，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追溯祖源为华夏，一是记录源出西域的情况。[18]追溯祖源为华夏的，或者追溯到黄帝、炎帝等华夏先祖，或者追溯到具体的汉人家族，偶尔会有比较模糊的表述；记录源出西域的，或者写出源出西域某国，或者具体到源出西域某国的君主。表3则是把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先世）的叙述在时间上的分布作一展示。

表3 在华粟特人墓志祖源追溯西域来源与华夏来源时代分布比较

时代	墓主	西域来源	华夏来源
天和六年（571）	康业	“其先康居国王之苗裔也”	
大成元年（579）	翟曹明	“西国人也”	
大象元年（579）	安伽		“其先黄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
开皇九年（589）	安备	“其先出于安居耶尼国”	
大业六年（610）	史射勿	“其先出自西国”	
大业十一年（615）	翟突娑		“祖晋上卿之苗裔。翟雄汉献帝尚书令、司徒公文海之胤”
贞观廿一年（647）	康婆	“本康国王之裔也”	
贞观	康阿达	“西域康国人也”	“其先盖出自造化之初，藤苗大唐之始，公即皇帝之胄胤也”
永徽四年（653）	何盛	“其先出自大夏之后”	
永徽五年（654）	安万通	“先祖本生西域安息国”	
显庆二年（657）	安静		“昔夏后承天，派隆基于朔北；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
龙朔三年（663）	安师	“十六代祖西华国君”	
麟德元年（664）	安娘	“安息王之苗裔也”	
总章二年（669）	康达	“十六代祖西华国君”	
咸亨元年（670）	史诃耽	“史国王之苗裔也”	
咸亨元年（670）	康敬本	“康居人也”	

表3 在华粟特人墓志祖源追溯西域来源与华夏来源时代分布比较-续表1

时代	墓主	西域来源	华夏来源
仪凤二年（677）	曹氏		“汉相曹参之后，实当涂之苗裔”
仪凤三年（678）	史道德		“正辞直道，史鱼謇谔于卫朝；补阙拾遗，史丹翼亮于汉代”
调露元年（679）	康续		“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
调露二年（680）	何摩诃		“原夫含章挺秀，振清规于汉朝；硕学标奇，展英声于魏阙”
永淳元年（682）	康磨伽	“其先发源于西海”	
光宅元年（684）	安元寿	“妫水导源，凉土开国”	
垂拱三年（687）	康老师	“其先康国人也”，“曾祖宝，康国王之第九子也”	
垂拱三年（687）	康敦	“其先康居国人也”	
天授三年（692）	康宜德	“西域康居人也”	
长寿三年（694）	康智		“本炎帝之苗裔，后有康叔，即其先也”
久视元年（700）	何□□	“大夏月氏人也”	
长安三年（703）	史善法		“肆拾三代祖霸，并□□□□大夫。叁拾捌祖良，后汉征南将军，封济北侯。故□□济北望族矣”
神龙元年（705）	安令节	“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	
景龙三年（709）	安菩	“其先安国大首领”	
开元四年（716）	安思节	“家世西土”	
开元七年（719）	史多	“西域人也”	
开元九年（721）	史诺匹延	“祖父西蕃史国人也”	

表3 在华粟特人墓志祖源追溯西域来源与华夏来源时代分布比较-续表2

时代	墓主	西域来源	华夏来源
天宝三载（744）	史思礼		“其先辅周克殷，展九鼎之宝；佐魏理邺，绾百里之印。自是以来，含章间出，柔嘉挺生。西汉全盛之时，丹以外戚居宠；东京陵夷之日，弼以直臣见知”
天宝四载（745）	康令恽		“昔武王伐殷，康叔封卫，耿光烈以文著□绩，蔚其康兴。周之宗盟，异姓为后。世济其美，因而氏焉。汉、魏踵继，晋、宋肩仍，皆佩宠光，不剿堂构”
圣武二年（757）	曹公、康氏	“邾䫙之系，康居之裔”	“曹氏之先，盖六终之别族，邾䫙君之远裔也”
贞元十一年（795）	李元谅	“其先安息王之胄也”	“轩辕氏二十五子在四裔者，此其一也”
贞元十八年（802）	何澄		“粤若寻阳公源流自远，水部则词华于梁代，都尉则名重于汉朝。膳费齐于宰臣，风烈光于后嗣”
永贞元年（805）	米继芬	“其父米国人也，代为君长”	
太和四年（830）	何文哲	“公本何国王丕之五代孙”	
咸通七年（866）	何弘敬		“周唐叔虞之后，十代孙万食采于韩，封为韩氏，至韩王安，为秦所灭，子孙流散，吴音轻浅，呼韩为何，因以为氏。汉时比干于公为始祖。比干生嘉，为庐江郡长史，罢居灊县南乡临贵里，遂以庐江为郡望”
咸通十二年（871）	曹弘立		“其先汉相之裔，□□大魏之后，令业清勋，不□□纪”
天复元年（901）	石善达		“承司徒□□□，□季伦之胤绪。是以宗族芳荣，枝连勋业”
天福二年（937）	安万金		“公本自稷契之苗裔也，始因周平王治国，六蕃来侵。将军奋剑一挥，万夫碎胆；操戈直指，八表晏清。上旌功劳，乃命氏焉，公即将军二千年后玄孙也”

以上记录祖源状况的粟特人墓志，约占所能收集到的粟特人墓志的2/5，应该说已能比较充分地反映在华粟特人祖源认识的基本状况。不过，从另外一面来讲，也可以说祖源的认识不是构成粟特人墓志的必备内容。但是，考虑到一般的汉人墓志也并不都记述其华夏来源，仍然可以认为粟特人墓志的这一类记述是其比较明显的特点。

根据表3，可以得到如下的几点认识。

第一，华夏来源和西域来源在粟特人墓志中是并存的。从数量上来讲，西域来源的叙述稍多，但并无某一种来源的叙述占据主导位置的迹象。

第二，除了两例同时叙述西域来源与华夏来源，其他的例子都是只叙述其中的一个方面。说明总体而言两方面的叙述是互相排斥的。

第三，西域来源与华夏来源并无时间上先后集中分布的规律，两类

表述，几乎同时出现，并均衡分布在6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的近300年间。

第四，9世纪中叶之后，则不再见将祖源追溯到西域的例子。可以认为9世纪下半叶是在华粟特人中国化完成的时间。

具体追溯到汉人先祖，往往是攀附名门大族。例如曹氏便比附谯郡曹氏，或追溯到汉代的名相曹参；何氏便比附庐江何氏，典型的如何弘敬、何文哲称庐江人，何弘敬墓志还颇费笔墨来详述庐江何氏的来源——“周唐叔虞之后，十代孙万食采于韩，封为韩氏，至韩王安，为秦所灭，子孙流散，吴音轻浅，呼韩为何，因以为氏。汉时比干于公为始祖。比干生嘉，为庐江郡长史，罢居灊县南乡临贵里，遂以庐江为郡望”。中古时期流行郡望，一般汉人也多有比附的，粟特人的墓志应是受到了这一社会风气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墓志记载了墓主源出西域，不是汉人，但是同时对墓主倾慕华夏文化的情况也是直言不讳。如《安备墓志》载：“其先出于安居耶尼国。”又载：“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此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善于白圭之术，蕴而不为，玄、高之业，弃而不慕。讷言敏行，唯事安亲。室名龙驹，乡号指南。孝悌之响，闻于邦国。”白圭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史记·货殖列传》《汉书·货殖列传》均有载，谓“天下言治生祖白圭”。[19]“玄、高”指东汉末年入华弘传佛法的安玄、安世高二人，普遍地被安姓粟特人认作入华的先祖。此处意为安备家族善于经商，但他放弃不为，先世则是弘传佛法的，他也不向慕，而是服从儒家的教导。《康宜德墓志》载：“西域康居人也。”又载：“然则贝玉柱基，必资于外域；虬龙鸾凤，亦□于中都。由是百代衣冠，变高胡之骨气；先王礼乐，嗣伯禹之家声。……王衍之洛中名士，自识胡雏；陈安之庬（陇）上健儿，实非汉种。精诚□日，已发迹于东南；骏足追风，即来仪于西北。”“百代衣冠，变高胡之骨气；先王礼乐，嗣伯禹之家声”云云，说明其文化已经完全中国化了。“胡雏”即指十六国时的石勒，《晋书·石勒载记》云：“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20]陈安为十六国时的秦州刺史，不但作战勇猛，还能与战士同甘共苦，死后陇上人思之，为之作《壮士之歌》。[21]李白还作《杂歌谣辞·司马将军歌（代陇上健儿陈安）》来赞扬他。这两个例子，似乎说明族源上的西域认识并不与文化上的华夏认同相矛

盾。

有的墓志明确对来源不是汉人的情况还做了详细描述。

荣新江先生曾收集大量的在华粟特人墓志，研究了安史之乱前后粟特人墓志显示的祖先追溯的差异。他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是不讳言出身的，有些直接说是某国人，有些已经在中国入籍，但也在墓志中表示自己的本源”。“在安史之乱以前，也有一些我们认为是粟特人的墓志没有特别声明自己的胡人来历，这一般都是汉化较深的胡人，有的则是因为墓志较短，或有缺文，而不得其详。”“安史之乱后，生活在中原的大多数粟特人的墓志有个明显的变化，即讳言出身，他们力图用改变自己的出身和郡望的做法，来与胡人划清界限。”对于安史之乱后仍然明言自己粟特人出身的三例墓志——《石崇俊墓志》《米继芬墓志》《何文哲墓志》，他则认为都有特殊的原因。[22]笔者觉得，这样的看法可能过分强调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差异，也许可以把安史之乱看作一个进一步促进在华粟特人在祖源追溯方面发生变化的因素。而且，李元谅墓志也记到了“其先安息王之胄也”。陈海涛、刘惠琴两位学者也通过康、安两姓粟特人墓志关于家世叙述的统计，认为安史之乱后绝大多数入华粟特人已经完成了汉化的转变。[23]不过，统计的安史之乱后的墓志只有11件，而因为以康、安两姓为对象恰恰把米姓、何姓反映保持西域来源认识的墓志摒弃在外了。

晚唐五代河北粟特人力量强大，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祖源追溯固定在西域，而是普遍地采纳华夏的说法，正说明其中国化已经完成。

三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入华过程记载的分析

有一些在华粟特人的墓志，对于他们家族进入中国的历史，也会有所陈述。

有的会具体陈述入华的史实，如《康敦墓志》载：“晋太始年中奉表献真珠宝物，因留子孙，遂为河南洛阳人焉。”《安令节墓志》载：“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安师墓志》载：“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康达墓志》载：“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康敬本墓志》载：“元封内迁，家张掖郡。”《米继芬墓志》载：“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遨质京师，永通国

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质子，身处禁军，孝以敬亲，忠以奉国。”《何文哲墓志》载：“前祖以永徽初欺塞来质，附于王庭。”其中，《米继芬墓志》记载的是父辈的情况，离得很近，应该比较可信；《何文哲墓志》记载的是五代祖的情况，也相去不远，同样比较可信。《安令节墓志》《安师墓志》《康达墓志》所载时隔600年以上，《康敬本墓志》更时隔近800年，并不可信。安息王子入侍和永平中西华国君遣子入侍，可能说的都是一回事。据研究，唐朝的安姓粟特人出于伪托，往往说自己是安息王子安世高的后人。[24]《康敦墓志》的记载，也有明确的时间，但是像从中国史书中脱胎而来的，《晋书》载“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25]

有的则是泛泛而言，如《翟曹明墓志》载：“受命来朝，遂居恒夏。”《安备墓志》载：“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名沾典客。”《史索岩墓志》载：“其先从宦，因家原州。”《康婆墓志》载：“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康磨伽墓志》载：“其先发源于西海，因官从邑，遂家于周之河南。”《史诺匹延墓志》载：“本乡首望，总号达官，渴仰长安，来投朝化。”

综合起来，可知多数粟特人墓志中记载的入华历史，都与西域来华出使、入贡和入质等外交活动有关，使者和质子留居中国，也便成了活动在中国的粟特侨民。也有少数来中国做官，或者迁徙进入中国的。

粟特民族是丝绸之路上的经商民族，经商来华是他们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墓志中却几乎不见相关的信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难道经商者就没有留下墓志吗？

笔者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应该把墓志中出使、入贡和入质等进入中国的方式，多数看成入华三四代之后因为书写墓志的需要而重新寻找历史的结果。一般的史书中所载北朝隋唐与中亚的关系都是关于外交活动的记载，从中所得，也便如墓志所记述的那般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26]说明此类认识在唐代是非常流行的。

其实，也有墓志隐晦地表达了家族本来经商的情况。如前引《安备墓志》载：“善于白圭之术，蕴而不为。”

但是不管怎么说，墓志中有关粟特人进入中国的记载，首先说明了这些粟特人对于自己的侨民后裔身份的认识是非常鲜明的。那么，不再出现此类记载，则可以看作中国化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表现。以上所列举的在华粟特人有关入华历史的记述，最晚的一例是太和四年（830）《何文哲墓志》，大致可以把9世纪下半叶看作入华粟特人中国化完成的时期。

四 从郑岩家族和安重遇家族墓志看粟特侨民后裔“粟特身份”的消亡

中晚唐郑岩家族和晚唐五代安重遇家族，一文一武，都出土了数方墓志，且其中仅有的一两方墓志中显露出些微与粟特人关联的内容，生动地展现了粟特侨民后裔“粟特身份”的消亡过程，也即入华粟特人中国化的完成过程。

郑岩家族已出墓志有六方，[27]据墓志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以列出郑岩家族世系（如图1所示，有墓志出土的以▲注后）。

墓志中能确定郑岩家族出自粟特人的，只有《郑岩墓志》中的“君六代曰盘陁”，盘陁是粟特人常用名。传世文献则仅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行谌，萨宝果毅。”郑岩家族先世在北魏入华，至郑岩祖父郑行谌，还大致任职萨宝府，至郑岩一代则还存关于先世与粟特人相关的一点简单的记忆，而郑氏家族已经光明正大自认为荥阳郑氏，远溯周代，娶名相张说之女，此后则连此简单的记忆也没有了。

安重遇家族出土墓志两方，另有《旧五代史·安重诲传》《新五代史·安重诲传》可以参读，[28]但是关于其家世的内容很少，据墓志可以列出安重遇家族世系（如图2所示，有墓志出土的以▲注后）。

学界普遍认为安重诲系出粟特，[29]然而他的传记及其弟、侄的墓志中，除《安重遇墓志》所载“次女见侍康氏”似乎还有一点粟特人内部通婚的痕迹外（这一点尚不能完全肯定），已几乎不见出自粟特人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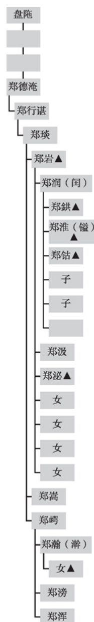


图1 唐代郑岩家族世系

说明：空白栏为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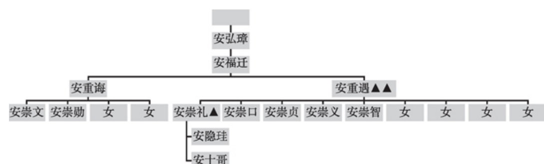


图2 晚唐五代安重遇家族世系

说明：空白栏为不详。

既然已经连粟特人的记忆也已了无痕迹，大概也便不能再称之为粟特人了。

小结与余论

在华粟特人墓志关于祖源追溯与入华过程的记载，是粟特人墓志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墓志的书写，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得到墓主家族成员认可的，是家族乃至民族群体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塑造的一种主要的表现方式。在华粟特人墓志的此类书写，事实与想象并存，既把祖源追溯到西域，也把祖源追溯到华夏，入华的历史也多出伪托，这都是中国化过程中主动应对的结果。

当然，作为丧葬准备工作的一环，一般人的墓志往往出自固定的写作者（撰志者）之手，墓志书写本身对于墓志文的内容也是有影响的，最明显的莫过于墓志用词的普遍雷同。这在在华粟特人墓志中也多有表现，其中也包括祖源追溯和入华历史两方面的叙述，如《史诃耽墓志》与《安娘墓志》、《康枕墓志》与《安神俨墓志》、《安师墓志》与《康达墓志》，也许这一现象更有助于说明墓志所展现的粟特人祖源追溯和入华历史的认识是当时社会中的普遍认识。

从祖源追溯与入华过程的一些迹象看，入华粟特侨民后裔中国化的完成在9世纪下半叶，郑岩家族的个案同样也显示了9世纪是发生本质变化的时期。

最后，就在华粟特人墓志所能反映的另外几个与接纳汉文化有关的问题做简略的说明。

第一，虽然在华粟特侨民往往经过三四代之后才会采纳中国的墓志，但是在两三代之前，就已经普遍采纳中国式样的名和字了。

第二，在华粟特人或保持源出西域的认识，或接受华夏来源，但都在较早的时期就入籍所居住的中国地方了。

第三，在华粟特人的通婚问题，也是学者关于粟特人中国化的研究中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从粟特人汉化的角度，研究者可能会关注粟特人与汉人——特别是世家大族——之间的通婚关系。不过，我们根据表1也很容易发现另外两个现象：一是入华三代之后还多见粟特人内部、粟特与其他胡人之间的通婚；二是甚至直到晚唐五代时期，还多见粟特侨民后裔之间的互相通婚。[30]这两个现象，该如何看待呢？笔者觉得粟特人内部通婚长时间的保持，并不意味着抵触汉文化，而是说明粟特群体作为活动圈子持续的保留。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1	康业	无	天和六年（571）卒（春秋耳顺） 天和六年（571）葬	陕西西安	君讳业，字元基，其先康居国王之苗裔也。父魏大天主、罗州使君，去魏大统十年，车骑大将军、雍州呼药翟门及西国胡毫望等举为大天主云。祖世忠孝，积叶义仁，年德敦厚，且恭且慎。水清玉洁，堪为轨范；谐和物情，称允众望。乃降诏许至。大统十六年，尚书又奏性行廉平，勤敬职事，请除大天主。……大周保定三年正月薨。天和元年，蒙诏以君积代蝉联，门传忠孝，授世掌大天主。……次子槃陁，次子货主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报告》,《文物》2008 年第 6 期 程林泉、张翔宇、山下将司:《北周康业墓志考略》,《文物》2008 年第 6 期 吕蒙、张利芹:《北周〈康业墓志〉释文校正》,《宜宾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	入华第三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1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2	翟曹明	大周大成元年岁次己亥三月癸巳朔四日乙未夏州天主仪同翟君墓志	［春秋九（下缺）］ 大成元年（579）葬	陕西靖边	君讳曹明，西国人也。祖宗忠烈，令誉家邦。受命来朝，遂居恒夏	荣新江:《中古中西交通史上的统万城》，载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 榮新江著、森部豐翻訳解説「新出石刻史料から见たソグド人研究の动向」『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4、2011 年 4 月、121-151 頁（荣新江:《中古时期来华胡人墓志研究的新进展》，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 11 辑《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 200~220 页）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2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3	安伽	大周大都督同州萨保安君墓志铭	大象元年（579）卒（春秋六十有二） 大象元年（579）葬	陕西西安	君讳伽，字大伽，姑臧昌松人。其先黄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世济风门，代增家庆。父突建，冠军将军，眉州刺史，幼擅家声，长标望实，履仁蹈义，忠君信友。母杜氏，昌松县君，婉兹四德，弘此三从，肃穆闺闱，师仪乡邑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	只记父亲的情况，姑且认为是入华第二代
4	安备	故开府长兼行参军安君墓志铭	开皇九年（589）葬（时年卅有四）	河南洛阳	君名备，字五相，阳城县龙口乡曹刘里人。其先出于安居耶尼国，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名沾典客。父知识，齐车骑大将军，直荡都督，千乘县散男。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此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善于白圭之术，蕴而不为，玄、高之业，弃而不慕。讷言敏行，唯事安亲。室名龙驹，乡号指南。孝悌之响，闻于邦国	王绣主编《洛阳民间收藏精品集》，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2009，第 126 页； 毛阳光:《洛阳新出土隋〈安备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5 期	大魏入朝，记其父任北齐职官，姑且认为是入华第三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3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5	史射勿	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故史府君之墓志铭	大业五年（609）卒（时年六十有六）大业六年（610）葬	宁夏固原	公讳射勿，字槃陀。平凉高平县人也，其先出自西国。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父认愁，蹉跎年发，舛此仕途	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第17页	至少为入华第四代
6	翟突娑	无	大业十一年（615）卒		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日月以见勋效，右改宣惠尉，不出其年，右可除奋武尉，拟通守。祖晋上卿之苗裔。翟雄汉献帝尚书令、司徒公文海之胤	赵万里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9，图版484，科学出版社，1956 赵力光编《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秦出版社，1995，第218页	
7	李陁		开皇十九年（599）卒 大业十二年（616）葬	河南洛阳	皇朝将军姓李讳陁，出陇西，河南郡雒阳县归淳乡人也。……但陁父，甘州刺使，讳娑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第17、317页	夫人安氏 从其名作陁、父名作娑，夫人安氏，疑为粟特人
8	李吁典		大业六年（610）卒 大业十二年（616）葬	河南洛阳	皇朝将军姓李讳吁，出陇西，河南郡雒县归淳乡人也。……但吁典祖为甘州刺使。父皇朝将军	《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第18、317~318页	李吁典为李陁子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4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9	康婆	大唐故洛阳康大农墓志铭	贞观廿一年（647）卒（春秋七十有五）贞观廿一年（647）葬	河南洛阳	君讳婆，字季大，博陵人也，本康国王之裔也。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祖陁，齐相府常侍。父和，隋定州萨宝，又迁奉御。并英风秀出，器局沉明，率下有方，事君以礼。虽日磾归汉，由余适秦，无以仰则忠贞，取侔荣观	《唐代墓志汇编》贞观139，第96页 《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240页	长子须达 入华第五代
10	康阿达	大唐上仪同故康莫量息阿达墓志铭	贞观	甘肃武威	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其先盖出自造化之初，藤苗大唐之始，公即皇帝之胄胤也。盘根万顷，王叶千寻，宗继皇基，枝连帝业。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宝。……父莫量，同葬安乐里	《唐代墓志汇编》贞观182，第124页	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11	史索岩	唐故平凉郡都尉骠骑将军史公墓志铭并序	显庆元年（656）卒（春秋七十有八）显庆三年（658）葬	宁夏固原	公讳索岩，字元贞，建康飞桥人也。其先从宦，因家原州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45页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5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12	史盘陀	唐呼论县开国公新林府果毅墓志	贞观七年（633）卒 显庆四年（659）葬	河南洛阳	公讳陀，字景□，□会稽人□	榮新江著、森部豐翻訳解説「新出石刻史料から见たソグド人研究の动向」『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4、2011年4月、121–151頁	为安怀夫人史氏、康君夫人史氏祖父
13	史氏（女）	大唐康氏故史夫人墓志铭并序	显庆六年（661）卒（春秋卌有六）显庆六年（661）葬	河南洛阳	夫人姓史，洛州洛阳人也。……祖□□，呼论县开国公、新林府果毅。父英，左卫郎将，袭封父邑	《唐代墓志汇编》显庆169，第335~336页	夫康氏
14	支茂	大唐故户曹骑都尉支君墓志铭	永徽二年（651）卒（春秋七十有六）永徽二年（651）葬	陕西耀县?	君讳茂，字德荣，京兆华原人也。崇峦峻远，共东岳以俱高；陂水洪深，与南溟而齐浚。门传冠盖，代袭琳琅，史籍备诸，可略言矣。曾祖、祖和、父元集	《唐代墓志汇编》永徽016，第140页	夫人康氏、王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6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15	安延	唐故上开府上大将军安府君墓志铭并序	贞观十六年（642）卒（春秋八十有三）永徽四年（653）葬	河南洛阳	君讳延，字贵薛，河西武威人也。灵源浚沼，浪发昆峰；茂林森蔚，华敷积石。跃银鞍而得俊，飞白羽而称雄。故得冠冕酋豪，因家洛涘。祖真健，后周大都督。父比失，隋上仪同、平原将军	《唐代墓志汇编》永徽076，第180页 《全唐文补遗》第4辑，第328页	夫人刘氏 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16	何盛	大唐故处士何君墓志	永徽四年（653）卒（春秋八十）永徽四年（653）葬	河南洛阳	君讳盛，字多子，洛阳人也。其先出自大夏之后。物产珍奇，邑居填衍。自张骞杖节而往，班超旋旆以来，命氏开家，衣冠礼秩，备诸国史，可略言焉。祖德，齐仪同三司，朝野具瞻，人伦仰式。父那，北道和国大使，文武是资，威恩允著	《唐代墓志汇编》永徽088，第187~188页	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17	安□（字万通）	缺	某年卒（春秋六十有九）永徽五年（654）葬	陕西西安	君姓安，名□，字万通，雍州长安人也。先祖本生西域安息国□□□化内太然，同归一姓。……大魏初王，君高祖但奉使入朝，帝恭其□□□□□□□三品，位至摩诃萨宝。子孙频让冠带□□□□□□□华阴县开国公、鄀州刺史。父巡，隋任上开府通议郎	《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129页	墨书砖铭 入华第五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7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18	安静	大唐故处士安君墓志铭并序	显庆二年（657）卒（春秋七十有七）显庆二年（657）葬	河南洛阳	君讳静，字处冲，河南洛阳人也。昔夏后承天，派隆基于朔北；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或济俗康朝，功参微管；或鸿名盛德，才同王佐。文宗令望，标映一时；忠规素范，胜芬百代。岂止金门七叶，杨代五公而已哉。祖嶷，齐河阳镇将，□高□下，气凌云甸。父远，隋文林郎，楷模人伦，师表雅俗	《唐代墓志汇编》显庆058，第267~268页 《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149页	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19	安度	大唐故培戎副尉安君墓志铭	显庆四年（659）卒（春秋七十有八）显庆四年（659）葬	河南洛阳	君讳度，字善通，长沙人也。其先弈叶相承，根扶疏而不朽；洪源远派，等松竹而长荣。祖陁，齐任滁州青林府鹰击郎将。父定，隋任河阳郡镇将	《唐代墓志汇编》显庆116，第302~303页 《全唐文补遗》第2辑，161页	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20	史氏（女）	大唐康氏故史夫人墓志铭并序	显庆六年（661）卒（春秋卅有六）显庆六年（661）葬	河南洛阳	夫人姓史，洛州洛阳人也。家承缨冕，代袭珪璋，可略而言，备诸简册。祖□□，呼论县开国公、新林府果毅。父英，左卫郎将，袭封父邑	《唐代墓志汇编》显庆169，第335~336页	夫康氏 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8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21	安师	唐故蜀王府队正安君墓志铭	显庆二年（657）卒（春秋五十有七）龙朔三年（663）合葬	河南洛阳	原夫玉关之右，金城之外，逾狼望而北走，越龙堆而西指，随水引弓之人，著土脾刀之域，俱立君长，并建王侯，控赏罚之权，执杀生之柄。天孙出降，侍子入朝，日殚隆于汉辰，由余重于秦代，求之往古，备在缣缃。君讳师，字文则，河南洛阳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曾祖则，齐任武贲郎将。祖仁，隋任右武卫鹰扬。父豹，隋任骁果校尉	《唐代墓志汇编》龙朔075，第384~385页 《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294页	夫人康氏，隋三年川府鹰扬、邢州都督康府君之女。龙朔三年（663）卒（春秋五十有四），龙朔三年（663）合葬 从明确的记录看，入华在东汉永平中；从有记录的世代看，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22	安娘（女）	大唐故平凉郡都尉史公夫人安氏墓志铭并序	龙朔元年（661）卒（春秋七十有二）麟德元年（664）葬	宁夏固原	夫人讳娘，字白，岐州岐阳人，安息王之苗裔也。夫弈弈仙基，分轩台而吐胄；悠悠别派，掩妫水而疏疆。从层构于天街，族高西域；系芳蕤于地绪，道映中区。瓜瓞滋绵，羽仪纷蔼，斯并焕乎家牒传，刊夫国史。祖显，周上仪同、掌设府车骑。父石生，隋上开府，本州中正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47~48页	安娘为史索岩夫人 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9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23	康达	唐故上骑都尉康君墓志铭并序	总章二年（669）卒（春秋六十有二）总章二年（669）葬	河南洛阳	原夫玉关之右，金城之外，逾狼望□□走，越龙堆而□指，随水引弓之人，著土脾刀之域，□□君长，并建王侯，控赏罚之权，执煞生之柄。天孙外降，侍子入朝，日磾隆于汉辰，由余重于秦代，求之往古，□在缥缃。君讳达，自（当作字）文则，河南伊阙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以□为并州刺史，因家河□焉。曾祖勖，齐上柱国。祖逵，齐雁门郡上仪同。父洛，隋任许州通远府鹰击郎将	《唐代墓志汇编》总章033，第503页 《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150页	夫人曹氏 用词同安师志 从明确的记录看，入华在东汉永平中；从有记录的世代看，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24	史铁棒	大唐故司驭寺右十七监史君墓志铭并序	乾封元年（666）卒（春秋卌有四）咸亨元年（670）葬	宁夏固原	君讳铁棒，字善集，原州高平县人也。若夫曾构巍峨，西峙昆仑之阜；遥源浩淼，东滨析木之津。云霏霞布，腾光华于汉室；叶茂条分，郁蒙密于河右。曾祖多思，周京师摩诃萨宝、酒泉县令。祖槃陀，皇朝左领军、骠骑将军。父大兴，皇朝上骑都尉、左卫安化府军头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82页	史诃耽子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10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25	史诃耽	唐故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公墓志铭并序	乾封二年（667）卒（春秋五十有四）咸亨元年（670）葬	宁夏固原	君讳诃耽，字说，原州高平县人，史国王之苗裔也。若夫弈弈崇基，分轩丘而吐胄；悠悠远派，掩妫水而疏疆。从层构于天街，族高河右；系芳蕤于地绪，道映中区。瓜瓞滋绵，羽仪纷蔼，斯并焕乎家牒，刊夫国史。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祖思，周京左师萨宝，酒泉县令。父陀，隋左领军、骠骑将军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69页	史射勿子 志文与安娘墓志多有雷同之处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26	康敬本	大唐故康敬本墓志铭	某年卒（春秋卌有八）咸亨元年（670）葬	河南洛阳	君讳敬本，字延宗，康居人也。元封内迁，家张掖郡。酋率望重，播美河西。因地命氏，派流不绝。故知东南擅竹箭之美，西北蕴球琳之珍。莫不事藉□腴，兼耳望□。昔金行失驭，水德未□。五马跃而南浮，六龙矫而西坠。自戎居□，世袭簪裾。曾祖默，周甘州大中正。祖仁，隋上柱国、左骁卫三川府鹰扬郎将。□□挺剑，栏□□清。戴鹖弯弓，钩陈外警。父凰，隋起家右亲卫，加朝散大夫	《唐代墓志汇编》咸亨029，第530~531页（缺字较多） 《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234页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11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27	康武通	唐故陪戎副尉康君墓志铭并序	贞观廿三年（649）卒（春秋六十有五）咸亨三年（672）合葬	河南洛阳	公讳武通，字宏达，太原祁人也。远派洪流，导长澜于汉浦；崇基峻址，擢远条于邓林。芳声与史册俱传，珪组与图缃并载。祖默，周任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父仁，隋任左卫三川府鹰扬郎将	《唐代墓志汇编》咸亨051，第545页 《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243页	“夫人唐氏，即酒泉单王之之胤。” 咸亨三年卒 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28	康元敬	唐故处士康君墓志	某年卒（春秋六十有六）咸亨四年（673）迁厝	河南洛阳	君讳元敬，字留师，相州安阳人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祖乐，魏骠骑大将军，又迁徐州诸军事。父仵相，齐□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昔由余入秦，日磾归汉，流芳简牍，誉擅缣缃，彼乃一时，未可同年而语	《唐代墓志汇编》咸亨085，第571~572页 《全唐文补遗》第4辑，第371页	北魏孝文帝时入华，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29	史氏（女）	唐故夫人史氏墓志铭并序	咸亨五年（674）卒（春秋五十有三）咸亨五年（674）葬	河南洛阳	夫人史氏，郸人。…祖诃，隋陈州刺史。……父仁，朝议郎	《唐代墓志汇编》咸亨103，第584~585页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12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30	何氏（女）	唐故夫人何氏墓志铭并序	咸亨五年（674）卒（春秋五十）咸亨五年（674）葬	河南洛阳	夫人太原郡人也。远祖因宦，今家洛阳焉。……祖湛，隋河内令。……父乐，皇朝上柱国、朝散大夫、游击将军、鄜川府果毅	《唐代墓志汇编》咸亨104，第585页	“年甫十七，归□曹氏。”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31	曹氏（女）	大唐故康君夫人曹氏墓志铭并序	仪凤二年（677）卒（春秋八十有五）仪凤二年（677）葬	河南洛阳	夫人曹氏者，沛郡谯人也。汉相曹参之后，实当涂之苗裔。元功上将，晖映一时；代载羽仪，声流万叶。祖樊提，周上大将军。父毘沙，隋任胜州都督	《唐代墓志汇编》仪凤011，第633页	夫康君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13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32	史道德	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府君墓志并序	仪凤三年（678）卒（春秋六十有六）仪凤三年（678）葬	宁夏固原	公讳道德，字万安，其先建康飞桥人氏。原夫金方列界，控绝地之长城；玉斗分墟，抗垂天之大昴。稜威边鄙，挺秀河湟。盟会蕃首，西穷月窟之野；疏澜太史，东朝日域之溟。于是族茂中原，名流函夏。正辞直道，史鱼謇谔于卫朝；补阙拾遗，史丹翼亮于汉代。龙光迭袭，龟剑联华，绵庆缔基，斯之谓矣。远祖因宦，来徙北平，其后子孙家焉，故今为县人也。曾祖度，河渭鄯三州诸军事；祖多，隋开府仪同、左卫安化府骠骑将军。并横陂万顷，直峰千仞，宅仁心境，垦义情田。气逸秦中，轻良金而重一诺；神交圯上，降祯石而叶三期。阐化六条，决胜千里。旍旗动而蔽天外，鼓角鸣而振地中。出玉塞以鹰扬，下金城譬逝。考皇朝正议大夫、平凉县开国侯，陶冶中和，发挥闲气，壮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仪凤015，第238~239页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93~95页 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赵超:《对史道德墓志及其族属的一点看法》,《文物》1986年第12期 罗丰:《也谈史道德族属及相关问题——答赵超同志》,《文物》1988年第8期 马驰:《史道德的族属、籍贯及后人》,《文物》1991年第5期 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14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32					志陵於寒水，劲节冠於严霜。利见龙飞，绩宣鳌极。遇千年之圣祚，应五百之贤人。砺岳带河，疏封食邑，銮银章而照耀，响玉佩以铿锵。光通德之重扃，骇高阳之故里。英灵不绝，何期盛欤！		
33	康续	大唐故平□□□戍主康君墓志铭并序	仪凤二年（677）卒（春秋五十有五）调露元年（679）葬	河南洛阳	公讳续，字善，河南人也。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当作叶）传支胤。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祖暹，齐任京畿府大都督。父老，皇朝左屯卫翊卫	《唐代墓志汇编》调露008，第657~658页 《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448页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34	安神俨	唐故安君墓志铭并序	咸亨五年（674）卒（春秋五十有八）调露二年（680）葬	河南洛阳	君讳神俨，河南新安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强魏。英贤接武，光备管弦。祖君恪，隋任永嘉府鹰扬。父德，左屯卫别将	《唐代墓志汇编》调露026，第669~670页 《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449页	夫人史氏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15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35	何摩诃	唐故何府君墓志铭并序	调露二年（680）卒（春秋五十有二）调露二年（680）葬	河南洛阳	君讳摩诃，字迦，其先东海剡人也，因官遂居姑臧太平之乡。原夫含章挺秀，振清规于汉朝；硕学标奇，展英声于魏阙。其后珪璋叠映，槐棘骈阴，详诸家素，可略言矣。曾祖瞻，齐为骠骑，七札居心。祖陀，梁充校尉，六奇在念。父底，隋授仪同，弯弧写月，矫矢飞星。惟君不以冠缨在念，轩冕留心，悊襟定水之前，栖志禅林之上	《唐代墓志汇编》调露025，第670页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36	康杦	唐故康君墓志铭并序	显庆元年（656）卒（春秋六十有五）永隆二年（681）葬	河南洛阳	君讳杦，字仁德，河南巩县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东周；因土分枝，建旟西魏。英贤接武，光备管弦。祖安，翼赞周朝。父陁。匡辅隋室	《唐代墓志汇编》永隆016，第680页 《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452页	夫人曹氏。永隆二年（681）卒（春秋六十有五）用词同安神俨墓志 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16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37	康留买	大唐故游击将军守左清道率频阳府长上果毅康府君墓志铭并序	永淳元年（682）卒永淳元年（682）葬	河南洛阳	粤若汉图方运，西河称有地之君；晋祚中微，东洛窃非常之号。岂如声高十角，名官分圣政之朝；气拥三边，冠冕列皇唐之代。猗欤盛欤！信康君之谓矣。公讳留买，本即西州之茂族，后因赐命，遂为河南人也。曾祖感，凉州刺史。祖延德，安西都护府果毅。父洛，皇朝上柱国	《唐代墓志汇编》永淳014，第694~695页 《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453页	与康磨伽为兄弟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38	康磨伽	大唐故游击将军康府君墓志铭并序	永淳元年（682）卒	河南洛阳	君讳磨伽，其先发源于西海，因官从邑，遂家于周之河南。簪裾累代，遂为雄族。自昔文王作圣，启迹于西周；夏禹称贤，降灵于东国。永言前古，君子无隔于华戎；详之后叶，英不殊于中外。遂使公侯继出，玉塞以握铜符；考绩无穷，誓山河而锡茅土。曾祖感，凉州刺史。祖延德，安西都护府果毅。……父洛，皇朝上柱国	《唐代墓志汇编》永淳014，第694~695页 《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454页	与康留买为兄弟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17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39	安元寿	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安府君墓志铭并序	永淳二年（683）卒（春秋七十有七）光宅元年（684）葬	陕西礼县	君讳元寿，字茂龄，凉州姑臧人也。川横玉塞，人多刚悍之风；地枕金方，俗负坚贞之气。关西骑士，武贤之代习兵符；陇右良家，充国之门传剑术。曾祖弼，周朝服侯；幼挺人英，夙标时望。丹山绛羽，响振朝阳；紫阙腾鳞，光流下稷。祖罗，周开府仪同三司，隋石州刺史、贵乡县开国公；质表珪璋，器惟瑚琏。衣冠佐夏，道叶调梅。锺鼎迁周，化口分竹。父兴贵，皇朝右骁卫将军、左武卫将军、冠军将军、上柱国、凉公，别食绵、归二州实封，六百户克施在封，六百户克施在操，匪躬成节。以功诏爵，爰颁锡壤之荣；以德命官，载启衔珠之秩。公庆门贻祉，华宗诞秀。践忠信以立身，执恭谦而待物。博通才术，备闲道艺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光宅003，第271~273页 《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67页 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陈志谦:《安元寿及夫人翟氏墓志考述》,《文博》1989年第2期 牛致功:《〈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	夫人翟氏墓志同出（《全唐文补遗》第2册，第40页）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18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39					星飞楚剑，见水裔之浮蛟；月上燕弧，睹云衢之落雁。聚壤为阵，少怀军伍之心；裂帛成旗，早习兵戈之用。年始弱冠，时属经纶。效款河西，同宝融之归国；韬光陇右，等葛亮之须期。……妫水导源，凉土开国，星垂兽象，地分龙勒		
40	康老师	大唐登仕郎康君墓志铭并序	垂拱二年（686）卒垂拱三年（687）葬	河南洛阳	君讳老师，其先康国人也。以国为姓，燕齐赵魏之流；因官命族，司马司徒之号。况乎卅六国，枕白山之北隅；万四千里，当赤泉之东裔。金方辟境，乌弋控于龙沙；玉胜临庭，槐江接于葱岭。曾祖宝，康国王之第九子也，周游击将军，以西诸国首领。祖和，周明威将军。父祇，隋鹰扬郎将	《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第54、343~344页	夫人史氏入华第四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19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41	康敦（女）	大唐故处士安公康夫人墓志并序	垂拱二年（686）卒垂拱三年（687）葬	河南洛阳	夫人讳敦，其先康居国人也。晋太始年中奉表献真珠宝物，因留子孙，遂为河南洛阳人焉。远叶散而弥芳，长□委而逾浚。惟祖惟父，志笃忠贞。夫人禀秀芝田，含芬兰畹。体韵凝寂，襟神朗悟。进退合轨，析旋成则。亦既有行，作嫔君子。闺闱允睦，蘋藻虔修，试为善于施矜，励断机于废业。加以薰修净行，究毗梨之奥旨。专精内典，披妒路之幽宗。安公洁志山泉，不构俗尘。舍兹名利，证彼慧舟。转读大乘，夙夜匪懈。岂谓徒闻预善，奄促遐龄	毛阳光:《新见四方唐代洛阳粟特人墓志考》,《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 吕建中:《从〈安公康夫人墓志〉看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吕建中、胡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夫安公，亦粟特人 记载为晋太始中入华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20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42	康宜德	大周故右卫翊一府卫康府君墓志铭并序	天授三年（692）卒（春秋六十有六）天授三年（692）葬		君讳宜德，字有邻，西域康居人也。原夫上图景宿，实列天街之野；□　物土，还分古月之城。然则贝玉柱基，必资于外域；虬龙鸾凤，亦□于中都。由是百代衣冠，变高胡之骨气；先王礼乐，嗣伯禹之家声。代有其人，可略言矣。祖良，定州刺史、上柱国。……父寿，鄜州洛川府左军车骑将军、上柱国。……君阆蒍瑰琦，昆丘宝玉。王衍之洛中名士，自识胡雏；陈安之陋（陇）上健儿，实非汉种。精诚□日，已发迹于东南；骏足追风，即来仪于西北	《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336页	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21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43	安怀	□周故陪戎副尉安府君夫人史氏合葬墓志铭并序	永淳二年（683）卒（春秋五十有三） 夫人长寿二年（693）卒（春秋六十有四） 长寿二年（693）合葬	甘肃张掖	君讳怀，字道，河西张掖人也。祖隋朝因宦洛阳，遂即家焉。曾祖朝，前周代任甘州司马。……祖智，隋任洛川府左果毅。……父昙度，……唐代任文林郎。……夫人史氏，陇西成纪人也。……祖盘陁，唐任杨州新林府车骑将军，呼仑县开国公。父师□朝左□卫	《唐代墓志汇编》长寿019，第845~846页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44	康智	大周故康府君墓志铭并序	长寿二年（693）卒（春秋七十有一） 长寿三年（694年）葬	河南洛阳	君讳智，字感。本炎帝之苗裔，后有康叔，即其先也。自后枝分叶散，以字因生，厥有斯宗，即公之谓矣。五代祖颍川郡侯、青州刺史凤，国史家牒备详焉。祖仁基，陈宁远将军。……父玉，隋朝散大夫	《唐代墓志汇编》长寿031，第855~856页 《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449页	夫人支氏 至少是入华第五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22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45	康氏（女）	洛州偃师县洛城乡白社里故翟公妻义丰县太君康氏之铭	证圣元年（695）葬	河南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证圣003	夫翟公 内容极简略
46	康氏（女）	大周故□州□□□夫人康氏墓志铭并序	万岁通天二年（697）卒 万岁通天二年（697）葬	河南洛阳	夫人康国人大首领之女也。以本国为氏。祖祢英杰，雄据一鄙，威惠相资，远近怀伏。夫人早敷四德，夙奉三从，以桃李之芳姿，应凤皇之贞繇。辞父母之国，适夫子之家。岂只妇德内彰，固亦母仪外著。夫子即安国之首领，以皇风憬扇，帝道遐融，恐后越常，希先肃慎，倾宗举族，稽颡来王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万岁通天008，第353页 《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231~232页	夫安国首领
47	何□□	大周□□□都尉何府君墓志铭并序	久视元年（700）卒（春秋八十有五） 久视元年（700）葬	宁夏盐池	君□□□，□□□，大夏月氏人也。……祖乙未，唐上柱国……父盘池□□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23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48	史善法	唐故恒州中山县令史君墓志铭并序	长安二年（702）卒（春秋七十有五） 长安三年（703）合葬	甘肃泾川	君讳善法，字丑仁，济北郡人也。肆拾三代祖霸，并□□□□大夫。叁拾捌祖良，后汉征南将军，封济北侯。故□□济北望族矣。祖、父咸任昭武校尉	《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35，第1016页	夫人康氏（享年六十三）
49	康郎	大唐故同州隆安府左果毅都尉康府君墓志铭并□	长安二年（702）卒（春秋卌有三） 长安三年（703）	卒于冯翊县	君讳郎，字善庆，魏州贵乡人也。植性中鲠，立志清勤。或葱岭尘惊，唯欣逐鸟；蒲山雾起，情切鹰鹯	《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36，第1016~1017页 《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426页	夫人康氏
50	安令节	大唐故公士安君墓志铭并序	长安四年（704）卒（春秋六十） 神龙元年（705）葬	陕西西安	君讳令节，字令节，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洛京，故今为豳州宜禄人。……祖瞻，皇唐左卫潞川府左果毅。……父生，上柱国	《唐代墓志汇编》神龙004，第1045~1046页 《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36页	大约北魏入华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24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51	康哲	大唐故处士康君墓志铭并序	神龙元年（705）卒 神龙元年（705）葬	河南安阳	君讳哲，字慧哲，其敦煌郡人也。昔因仕邺，今卜居焉。匡后魏而尽忠，辅齐邦而献鲠，故乃霏英绣篆，洒绚瑶图，门阀家风，可略言矣。曾祖□，北齐金紫光禄大夫。祖君政	《唐代墓志汇编》神龙016，第1052~1053页 《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280页	夫人安氏 北魏入华 至少入华第四代
52	安菩	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	麟德元年（664）卒（春秋六十有四） 麟德元年（664）葬 景龙三年（709）合葬	河南洛阳	君讳菩，字萨。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首领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首领如故。曾祖讳钵达干。祖讳系利。君时逢北狄南下，奉敕遄征，一以当千，独扫蜂飞之众，领衙帐部落，献馘西京	《唐代墓志汇编》景龙033，第1104~1105页 《全唐文补遗》第4辑，第402页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赵俪生、温玉成:《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	“夫人何氏，其先何大将军之长女，封金山郡大夫人。”长安四年（704）卒（春秋八十有三），长安四年殡 安菩子安金藏,《旧唐书》卷187上、《新唐书》卷191有传。 叙述为汉代入户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25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52						沈睿文:《重读安菩墓》,《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 李鸿宾:《安菩墓志铭再考——一个胡人家族入居内地的案例分析》,《唐史论丛》第12辑（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第二次会议暨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三秦出版社，2009	
53	安思节	故岐州岐山府果毅安府君墓志	开元四年（716）卒（时年五十有八） 开元四年（716）葬	河南洛阳	府君讳思节，其先长沙人也。家世西土，后业东周，今为河南人也。曾祖瓒，隋左卫大将军。……祖迪，任左金吾卫弘仁府折冲。……皇考睐，上柱国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038，第1180页 《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426页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26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54	史多	大唐故冠军大将军史北勒墓志铭并序	开元六年（718）卒（春秋一百有一） 开元七年（719）葬		公讳多，字北勒，西域人也。建土鹿塞，代贵龙庭；交赍往来，书于曩策，公其后也。曾祖达官，本蕃城主，自天纵知，神朗宏达，不由文字，晤暗古今。率彼附容，远钦皇化。祖昧嫡袭，不坠忠贞。父日，夙使玉关，作镇金塞。乃礼遣长子削衽来庭，公之是也	赵振华:《唐代粟特人史多墓志初探》,《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	入华第四代
55	康远	大唐故左监门校尉上柱国康君墓志铭并序	长寿元年（692）卒（春秋六十有二） 开元九年（721）合葬	河南洛阳	君讳远，字迁迪，其先卫康叔之门华,《风俗通》之叙述，祖宗累美，子胄光扬	毛阳光:《洛阳新出粟特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夫人曹氏
56	康固	大唐故正议大夫易州遂城县令上柱国康公墓志铭并序	开元八年（720）卒 开元九年（721）合葬	河南洛阳	君讳固，字义感	毛阳光:《洛阳新出粟特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从撒马尔干到长安》列作粟特人。毛阳光考为康远子，康远志中作贞固 夫人赵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27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57	史诺匹延	故游击将军史诺匹延字义本墓志铭并序	开元七年（719）卒（春秋五拾有八）开元九年（721）葬	河南洛阳	祖父西蕃史国人也。积代英贤，门称贵族，本乡首望，总号达官，渴仰长安，来投朝化。将军生在大唐，京兆人也	毛阳光:《两方唐代史姓墓志考略》,《文博》2006年第2期	
58	康威	大唐故下管令上柱国康府君墓志铭	开元十年（722）卒（春秋六十）开元十一年（723）合葬	河南洛阳	君讳威，字宾，卫人也。昔八表浑中，元台鼎遐逐□，魏道武历通五运，爪牙同凑，迁兴大豫，今为河南人焉。曾祖讳远，后魏左龙相将军、寿阳县开国公。祖讳满，隋右卫郎将、寿阳侯。父讳达，皇朝金谷府统军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64，第1269~1270页 《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399页	夫人韩氏。太极三年卒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59	曹明照（女）	曹氏谯郡君夫人墓志铭并序	开元十一年（723）卒（春秋不或）开元十一年（723）葬	陕西西安	夫人曹氏，讳明照。曾祖继代，金河贵族，父兄归化，恭惟玉阶，惟孝惟忠，允文允武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52，《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7册，第4835~4836页	夫折氏。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28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60	安孝臣	大唐故翊卫副尉泽州太行镇将骑都尉安府君之墓志铭并序	开元廿二年（734）卒（春秋卌有六）开元廿二年（734）葬	河南洛阳	夫三教之法，与天地合兴，圣演流传，俱当是一。君讳孝臣，太原郡人也。……惟灵生母茔内，敬造尊胜石幢，高二丈五尺。又就墓所写《花严经》一部。愿灵承尘沾影，往生净土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01，第1433页 《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503页	
61	康庭兰	大唐故右威卫翊府左郎将康公墓志铭并序	开元廿八年（740）卒（春秋六十有五）开元廿八年（740）葬	河南洛阳	曾祖匿，皇朝游击将军守左卫翊府左郎将。……祖宁，归德将军行右领军卫将军。……父颁陁，云麾将军、上柱国。……暨乎晚岁，躭思禅宗，勇施罄于珍财，慧解穷于法要。冥冥舟壑，同舍筏而不留；嫋嫋风林，与焚芝而共陨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517，第1511页 《全唐文补遗》第4辑，第438页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29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62	史思礼	唐故壮武将军右龙武军翊府中朗将武威郡史府君墓志铭并序	天宝三载（744）卒（春秋七十有七）天宝三载（744）葬	陕西西安	君讳思礼，字伯珪，武威人也。其先辅周克殷，展九鼎之宝；佐魏理邺，绾百里之印。自是以来，含章间出，柔嘉挺生。西汉全盛之时，丹以外戚居宠；东京陵夷之日，弼以直臣见知。代不绝贤，门休厥德。曾祖爽，皇任翊麾校尉、右卫中候。……祖感，皇任昭武副尉、右卫司戈。……父岳，皇赠青州司马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019 《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75~76页	夫人武功苏氏 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63	和守阳	唐故中大夫持节江华郡诸军事江华郡太守上柱国和君墓志铭	开元廿九年（741）卒（春秋六十有五）天宝四载（745）葬	河南洛阳	君讳守阳，字守阳，扶风人也。始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尝居北地，逐丰水美草以自恣。迨代为酋长，至突跋从后魏入都河南，拜龙骧将军，封日南公。其本为素和氏，后魏文帝分定氏族，因为和氏焉。高祖士开，北齐中书监、尚书左仆射，封淮阳郡王、尚书令，谥曰文贞。曾祖士达，唐朝散大夫、尚舍奉御。祖侃，光禄丞。考礼，仆寺东宫使、广成监	《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71，第1580页 《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158页	和守阳族属，或据素和氏一位系鲜卑，然据《北齐书》卷五十《和士开传》"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的记载，则可以认为是粟特人的可能性很大 夫人京兆杜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30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64	康令恽	大唐范阳郡节度副使都知兵马使冠军将军左威卫大将军上柱国山阴县开国子康府君墓志铭并序	天宝四载（745）葬	陕西西安	君讳令恽，字善厚，其先汲人也。昔武王伐殷，康叔封卫，耿光烈以文著□绩，蔚其康兴。周之宗盟，异姓为后。世济其美，因而氏焉。汉、魏踵继，晋、宋肩仍，皆佩宠光，不剿堂构。本枝百代，桑梓永怀。虽三秦汉京，而漆沮周土，不忘旧国，家于长安。曾祖朝，王佐岳秀，侯度玉立。属随季天压，唐初日跻，天子龙飞于晋阳，诸侯骏奔于寰宇。亦犹高祖起沛，先议萧何之功，成汤自阿，必酬伊尹之效。以公折冲樽俎，拜为骠骑将军。……祖慈，孝廉擢第……解褐拜西平郡掾曹	王育龙:《唐长安城东出土的康令恽等墓志跋》,《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学者以为粟特人，大概考虑到康令恽封为山阴县开国子，而粟特康姓多伪托会稽康氏的缘故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31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65	翟氏（女）	大唐故酋长康国大首领因使入朝检校折冲都尉康公故夫人汝南上蔡郡翟氏墓志铭并序	天宝八载（749）卒（春秋七十有八）天宝八载（749）葬	河南洛阳	夫人翟氏，汝南上蔡郡人也。……曾祖瓒，隋朝议郎、检校马邑君司马。祖君德，皇朝朝散大夫、太常寺丞。父方裕，清河郡清河县尉	《唐代墓志汇编》天宝146，第1634页《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382页	夫康国大首领至少是入华第四代
66	康仙昂	大唐故河南府慕善府果毅都尉省城副使魏郡康府君墓志铭并序	天宝八载（749）卒（春秋卌有八）天宝九载（750）葬	河南洛阳	公讳仙昂，字昂，魏郡昌乐人也。祖瑱，酒泉郡司马。父芬，党郡无恤府果毅。皆代袭名籍，累践班荣。君乃砥节厉行，弘器包量。敬亲和室，恭兄友弟。在家必达，在邦必闻。浩浩焉，汪汪焉，奥于不可恻也已。至若文标秘篆，武擅韬钳。蕴德足以润身，擢才而方从仕。解褐灵武郡鸣沙府别将，虽才高而位卑，寔鸿渐之翼也	毛阳光:《新见四方唐代洛阳粟特人墓志考》,《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	至少是入华第三代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32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67	安思温	大唐故安府君史夫人墓志铭并序	开元九载（721）卒 夫人天宝八载（749）卒 天宝十载（751）合葬	河南洛阳	府君讳思温，夫人并洛阳人也。……君德高业广，风猷众钦。孝友仁慈，淑善温克。博学聪惠，遇物多能。儒释二门，特加精意。篆隶得迴鸾之妙，庄周自天性之奇	毛阳光:《洛阳新出粟特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68	郑岩	唐故少府监郑君墓志铭并序	天宝十一载（752）卒（春秋六十有五）天宝十一载（752）葬	河南洛阳	君讳岩，字良石，河南荥阳人。周之胄系，昔宣王封友于郑，氏之以国。自□武善衮职，兴众阐微言，英猷弈绪，世为冠族。君六代曰盘陁，当后魏练次名宗，尤推北祖之盛。烈考齐州历城丞。……郑本周出，周迁郑依；史伯谋盛，延州识微	赵振华:《唐代少府监郑岩及其粟特人祖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5期 赵振华:《唐代湘乡县令郑钴及其八代祖盘陁——再论唐代少府监郑岩及其粟特人祖先》,《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第三子长安县尉郑泌墓志、二孙金吾卫录事参军郑墓志、京兆府三原县尉郑淮墓志亦出土洛阳。另郑岩家族其他成员墓志还有出土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33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69	何德	唐故云麾将军右龙武卫将军同正员庐江县开国伯上柱国何公墓志铭并序	天宝十三载（754）卒（春秋七十有一）天宝十三载葬	陕西西安	公讳德，字伏德，庐江潜人也。分邦於晋，授姓於韩。远祖避难江淮，韩何声近，因以命氏。故汉有武，魏有夔，晋有劭，宋有偃。衣冠锺鼎，奕叶蝉联。祖仙，诞粹岳灵，冥心尘外，浮云世禄，贲帛丘园。父罗，贞□傅家，英明动俗；子道攸长，义方益荣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 094 《全唐文补遗》第 3 辑，第 97~98 页	太夫人酒泉安氏
70	康氏（女）	大燕游击将军守左威卫翊府左郎将员外置同正员内供奉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曹公故太夫人康氏墓志铭并序	圣武元年（756）卒（春秋八十有六）太夫人圣武二年（757）卒（享年七十有一）圣武二年（757）葬	河南洛阳	曹氏之先，盖六终之别族，邾郟君之远裔也。厥初稽讯图谍，或云邾有天下；尔后风云际会，果令魏建大名。子孙无穷，公侯必复，散在海内，列于士流。是生先考嵩禅师。肇锡灵均，始以仁贵命字；晚悟寂灭，复以定住为名。岂唯浮生大千，亦将深入不二。禅林澹如以自得，释门宗之以为主。每见大师趺坐，缁徒骈立，卑身而伏，耸耳而听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圣武 003 《全唐文补遗》第 6 辑，第 88 页	夫曹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34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70					虽演说无我，而雾露需人。器世火风，生涯泡幻，以圣武元年八月廿六日遘疾灭度，春秋八十有六，僧腊卅余年。太夫人康氏，贞淑明懿，第一流也。耶殊美色，积成五百之因；童子虔心，长结一花之愿。……邾郟之系，康居之裔		
71	康氏（女）	大唐故康夫人墓志并序	乾元元年（758）卒（春秋五十有七）乾元三年（760）葬	陕西西安	游击将军、上柱国、赏绯鱼袋康府君夫人康氏，会稽人也。……夫人幼而明慧，长而温柔，平生交善，恭近谅懿，宣慈惠和，妇德母仪，克合古训，建国承家。余风聪叡，习康娥之灵迹，其始，则衣冠礼乐尽在是焉。常得法缘相户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乾元 009 《全唐文补遗》第 3 辑，第 107 页	夫康君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35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72	康晖	大唐故左武卫翊府左郎将康府君墓志铭并序	上元二年（761）卒（享年七十有四）永泰元年（765）葬	陕西西安	公讳晖，字怀智，其先颍川人也。昔成武封康叔于卫，其后枝派，因为氏焉。故前燕有归义侯康迁，从此因官卜居，今为长安人也。祖仕斤，皇江州别驾。父弘哲，皇左领军卫将军。公即元子也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永泰 001 《全唐文补遗》第 5 辑，第 408 页	夫人卫氏
73	曹闰国	唐故试光禄卿曹府君墓志铭并序	大历十年（775）卒（春秋四十有七）大历十年（775）葬	河北灵寿行唐	公字闰国，含州河曲人也。□启钜鏕，分支周后	《唐代墓志汇编》大历 043，第 1787~1788 页	夫人石氏、刘氏、韩氏
74	曹惠琳	唐故游击将军守左领军卫翊府郎将上柱国曹府君墓版文	（载五十四）大历十四年（779）葬	陕西西安	公讳惠琳，本望燉煌康氏也。曾祖鍠，秦州清德府果毅。祖澄芝，居高不仕。考宁，游击将军、邠州嘉阳府折冲。……未龆龀，舅氏赠绵州刺史元裕见而奇之，毓为后嗣，礼均天属，遂称曹氏焉。乂毕恩终，宜归本族，君子韪之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历 041 《全唐文补遗》第 1 辑，第 209 页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36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75	康氏（女）	唐故中散大夫河州别驾安公夫人康氏墓志铭并序	建中三年（782）卒（春秋七十有七）建中三年（782）葬	陕西西安	夫人姓康氏，其先会稽人也。祖校尉，隋朝左武卫大将军。父石，皇朝左金吾卫大将军、开国男、长州刺史。……夫人孀缀膏沐，于兹十年。况归心释教，先于昼哭；虽衣不缁械，而心弥诸缘	《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466页	夫安文光
76	李国珍（安晫）	唐故宾应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兼射生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兴元元年（784）卒（春秋六十）兴元元年（784）葬	陕西西安	公将门令族，本姓安氏。讳暐，字暐，武威郡人也	《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30页	夫人独孤氏、杨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37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77	李元谅（安元光）	唐故华州潼关镇国军陇右节度度支营田观察处置临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捡校尚书左仆射兼华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康郡王赠司空李公墓志铭并序	贞元九年（793）卒（享年六十有七）贞元十一年（795）葬	陕西潼关	公本安姓，讳元光。其先安息王之胄也。轩辕氏二十五子在四裔者，此其一也。立国传祚，历祀绵远。及归中土，犹宅西垂，家于凉州，代为著姓。三明盛族，每联婚媾；五凉霸图，累分圭组。……寻（贞元三年）又赐姓李氏，同属籍也，改名元谅，昭诚节也	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鉴定组、潼关县文管会办公室：《唐李元谅墓志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8年第2期 《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128页	并参《旧唐书·李元谅传》 至少第四代 夫人阿史那氏
78	石崇俊	唐故张掖君石府君墓志铭并序	贞元十三年（797）卒（享年八十有一）贞元十三年（797）葬	陕西西安	府君石氏，讳崇俊，字孝德。其盛族徽烈，家谱著焉。府君以曾门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祖讳宁芬，本国大首领散将军。皇考讳思景，泾州阳府左果毅	《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78，第1892~1893页； 《全唐文补遗》第4辑，第472页	“而后迴向释氏，克胜崇因转读真乘，冥合旨趣，了然悬解，觉性圆明。” 夫人洛阳翟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38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79	何澄	有唐故寻阳郡何府君墓志铭并序	贞元十八年（802）卒（享年六十有五）贞元十八年（802）葬	河南洛阳	夫虏有达官，汉称盛族。但才生于世，即命为贤。是以元圭受玉玺之尊，日磾袭貂蝉之贵。苻于天运，岂人事之图哉。粤若寻阳公源流自远，水部则词华于梁代，都尉则名重于汉朝。膳费齐于宰臣，风烈光于后嗣。府君祖父承其胤焉。公讳澄，迁为洛阳人也。天假纯和，体资凝邈。言涉忠信，谋当适时。仁礼冠于家邦，惠恤周于姻族。悟色空之繁想，修彼岸之真宗。睹白月以清心，慕青莲而擢质	毛阳光：《新见四方唐代洛阳粟特人墓志考》，《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	同出夫人墓志 夫人墓志载：“有子男一人，名绾，婚康氏。”
80	米继芬	大唐左神策军故散副将游骑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同正兼试太常卿上柱国京兆米府君墓志铭并序	永贞元年（805）卒（春秋九十有二）永贞元年（805）葬	陕西西安	公讳继芬，字继芬。其父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口，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邀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质子，身处禁军，孝以敬亲，忠以奉国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永贞003 阎文儒：《唐米继芬墓志考释》，《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 葛承雍：《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夫人米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39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81	史然	大唐故云麾将军特进康城郡史氏墓志铭并序	元和六年（811）葬	河南洛阳	公康城郡人也。曾讳、祖讳、父讳任洪州别驾，皆以孤廉清风，家不坠乎良基	毛阳光:《洛阳新出粟特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毛阳光以为康城郡即河西建康郡，此处多史姓粟特人，因此将史然也看作粟特人
82	□（何）氏	唐故庐江郡夫人墓志铭并序	元和七年（812）卒（享年六十九）元和八年（813）葬	河南洛阳	夫人庐江人也。祖考胄绪载于谱牒，此不繁述	毛阳光:《新见四方唐代洛阳粟特人墓志考》,《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	毛阳光据庐江人考为何氏
83	石神福	大唐故成德军节度下左金吾卫大将军试殿中监石府君墓志铭并序	元和八年（813）卒（春秋五十有五）元和八年（813）葬	河北获鹿	府君讳神福，字忠良，金谷郡人也。曾祖试鸿胪少卿□用，祖授左翊府中郎将臣恩，父何罗烛，试云麾将军蔚州衙前大总管	《唐代墓志汇编》元和061，第1991页 高文文:《〈石神福墓志〉考释》，载李鸿宾主编《中古墓志胡汉问题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第309~320页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40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84	康昭	大唐故康府君墓志铭并序	元和十年（815）卒（享年七十有一）元和十一年（816）葬	河南洛阳	公讳昭，字德明。自卫康叔初封于康，其后氏焉。曾祖讳裔，王父讳庶，并素有才行，高道不仕。烈考讳晋，信行修身，志性廉直，贞洁清慎，道业尤高。隐迹闲居，不求名位。结托朝要，往还英旄。中外尊崇，悉皆顾遇。有三子，长曰昕、次曰皓，亦荣并前亡矣。至于德业才艺，各载其本志，此不录也。季子昭，即公也。聿行孝道，恒守父规。器度恢弘，性宽志直。言之与行，不妄不邪。忠信内修，仁义外著。智谋深远，礼乐周身。交结往还，有终有始。至于父母未餐之物辄不先尝，珍异之衣辄不先服。孝敬和顺，内外钦风。屏迹遁居，不乐荣贵。加以静心三业，躬勤释门。持戒修斋，广为胜福。自曾后四代，兄弟同居。衣服共椸，馔非两味，卑幼一等。痴骇无遗，亲族孤贫，亦皆分惠	郑友甫:《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郑友甫据康昭居嘉善里，而嘉善位于洛阳南市的正南面，附近里坊多粟特人居住，而认为康昭应是唐代洛阳粟特移民后裔 夫人杨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41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85	石默啜	唐义武军节度易州高阳军故马军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兼监察御史乐陵郡石府君墓志铭并序	元和十二年（817）卒（享年七十有三）元和十二年（817）葬	河北易县	府君讳默啜，字默啜，得封氏于娲皇之时，振芳猷于晋赵之代，富可以击破珊瑚树，贵可以建赵称至尊，史籍具列，读何匪虚	《唐代墓志汇编》元和106，第2024~2025页 尤李:《唐〈石默啜墓志〉考释》，载李鸿宾主编《中古墓志胡汉问题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第298~308页	夫人康氏
86	康志达	唐故幽州卢龙军节度衙前兵马使朝散大夫检校光禄卿兼监察御史赠莫州刺史会稽康公墓志铭并序	长庆元年（821）卒（春秋五十四）长庆元年（821）葬	陕西西安	公讳志达，字志达，本会稽郡人也。自曾祖曰延庆，皇朝左威卫大将军，徙居为京兆长安人也。祖曰孝义，皇朝万安府折冲，累赠户部尚书。考曰日知，皇朝兵部尚书、左威卫上将军赠尚书左仆射，以忠信奉上竭诚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长庆002 《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431~432页	夫人元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42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87	安氏（女）	唐故安氏夫人墓志铭	长庆元年（821）卒（春秋五十有八）长庆元年（821）葬	河南洛阳	夫人安氏苗裔，安定郡人也。世祖讳晟之女也	毛阳光:《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献及其妻子安氏墓志初探》,《西域研究》2014 年第 2 期	夫花献墓志亦出土，为景教徒，知为西域来华人士，但不知来自西域何国
88	石忠政	唐故石府君墓志铭并序	长庆二年（822）卒（寿年八十有二）长庆二年（822）葬 宝历元年（825）合葬	陕西西安	府君曰忠政，字不邪，生于京兆府万年县人也	《唐代墓志汇编》宝历 008，第 2086 页	夫人何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43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89	何文哲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守右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庐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太子少保何公墓志铭并序	太和四年（830）卒（享年六十）太和四年（830）葬	陕西西安	葱岭崛秀于西陲，归邪耀芒于北极。应图而梯航委质，诞粹而英髦特生。……公讳文哲，字子洪，世为灵武人焉。泊根彼长源，穷其发地，则又辉于我门矣。公本何国王丕之五代孙。前祖以永徽初欵塞来质，附于王庭。簪缨因盛于本朝，爵赏由光于中土。曾祖怀昌，皇中大夫守殿中少监赐紫金鱼袋，权兼六局，职备大朝。肴膳无废于供储，劳绩共多于修举。祖彦诊，皇正议大夫行丹州别驾上柱国。王祥屈居别乘，诸葛枚展良材。稽功尚袭于遗芳，积善果征于余庆。列考游仙，皇宝应元从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行灵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赠尚书右仆射。禄山潜盗，肃宗幸边。毒志方肆于狼心，义勇共歼于泉师。功均正始，褒典自颁于夏书；光被承家，追级寻高于汉历。公即仆射之第三子也	《全唐文补遗》第 1 辑，第 282 页 魏光:《何文哲墓志考略》,《西北史地》1984 年第 3 期 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 年第 9 期 李鸿宾:《论唐代宫廷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 年第 6 期	夫人康氏、康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44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90	米九娘（女）	唐故米氏（下缺）	会昌六年（846）卒 会昌六年（846）葬	江苏扬州	米氏九娘□，其先盖□□□郡人也。父讳宁。米氏即公之室女	《唐代墓志汇编》会昌 047，第 1244~1245 页	
91	何氏（女）	唐左卫大将军兼御史中丞契必公妻何氏墓志并序	会昌六年（846）卒（享年五十有八）大中元年（847）葬	振武军（内蒙古和林格尔）	夫人何氏，望在庐江郡。曾，皇不仕。祖，苏州法曹参军讳源。考单于府兵曹参军讳□甫	《唐代墓志汇编》大中 012，第 2260~2261 页	夫契必
92	米文辩	大唐魏博节度故步兵左厢都知兵马使兼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侍御史米公墓志铭并序	大中二年（848）卒（享年五十有五）大中三年（849）葬	河北大名	米氏源流，裔分三水。因官食菜，胤起河东，为王为侯，轩盖不绝。至于王父品秩，家谍备诸。公讳文辩，即其后也。大父讳梓，皇宁远将军、上柱国。……烈考讳珍宝，皇魏博节度诸使、马军都知兵马使兼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右散骑常侍、食邑三百户	《全唐文补遗》第 9 辑，第 408~409 页 孙继民、李伦、马小青:《新出唐米文辩墓志铭试释》,《文物》2004 年第 2 期	夫人扶风马氏 高文文以为三水指中亚的三条河流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45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93	安珍	唐故内五坊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试鸿胪卿上柱国安府君墓志铭并序	大中四年（850）卒（享龄八十有四）大中四年（850）合葬	河南荥阳（广武）	府君讳珍。……先祖安，世为东平郡人也。曾祖，祖，父讳昌	《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43，第2281页 《全唐文补遗》第4辑，第186页	夫人费氏
94	何少直	唐右神策军押衙朝散大夫襄王府谘议参军上柱国何少直墓志铭并序	大中九年（855）卒 大中九年（855）葬	陕西西安	公讳少直，字子质，陈留郡人也。父惟升，任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试太常卿、陈留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紫金鱼袋	《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581页 马洪路:《唐何少直墓志铭考释》,《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 许自然、张蕴:《西安市周围出土的三合唐墓志》,《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李鸿宾:《唐兰夫人、何少直墓志铭再考》,《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李鸿宾考为粟特人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46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95	安士和	唐故车营十将定远将军试太仆卿武威安公墓志铭	咸通七年（866）卒（春秋七十有三）咸通七年（866）葬	山西长治	公讳士和，上党潞城人也。祖以上衔讳，阙而不录。考讳良素，儒林鸿业，学富九经。实德长材，闻一知十。不趋名利，靡谒王侯。公禄不窥，安闲乐道，时人号三教通玄先生	郭桂豪:《〈唐车营十将安士和墓志铭〉考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9年第4期	夫人赵氏、任氏
96	何弘敬	唐故魏博节度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楚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一百户赠太师庐江何公墓志	咸通七年（866）卒（享年六十）咸通七年（866）葬	河北大名	公讳弘敬，字子肃，庐江人也。周唐叔虞之后，十代孙万食采于韩，封为韩氏，至韩王安，为秦所灭，子孙流散，吴音轻浅，呼韩为何，因以为氏。汉时比干於公为始祖。比干生嘉，为庐江郡长史，罢居灊县南乡临贵里，遂以庐江为郡望。至公九代祖妥，仕隋为国子祭酒、襄城公；文德辉赫，冠绝当时，厥后因称襄城公房。又六代祖令恩，忠勇迈世，武艺绝伦，以中郎将统飞骑，破薛延陀于石堡城，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32，第1057~1060页 《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39页 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第8期	夫人武威安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47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96					与将军乔叔望执失恩力，争功为叔望所诬，兼并部曲八百人，迁于魏相贝三州，功名震曜，代济其美。繇是公家于魏。曾祖俊，赠左散骑常侍，生太保讳默，太保生太师讳进滔。公太师之嗣也，卫国太夫人康氏出焉		
97	曹弘立	唐故□州押衙靖边将中大夫检校太子詹事□□郡曹公武威石夫人合祔墓	咸通五年（864）卒（享年五十有九）咸通十二年（871）葬	河北元氏	公讳弘立，字弘立，望族谯郡人也。其先汉相之裔，□□大魏之后，令业清勛，不□□纪。曾祖治，皇易州□将。祖玉，皇□州衙前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烈考长，皇易州衙前将、试太仆卿	《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92，第2450页	夫人武威石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48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98	安玄朗	唐故容州经略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上柱国武威安府君墓志铭	乾符二年（875）卒（享年四十有七）乾符二年（875）葬	广西容县	夫士之处世，各有其志，或艺文以取荣达，或讲武以建功名。然后移孝资忠，自家形国，积善余庆，岂□□哉！公讳玄朗，字子远，其先武威人也。其命氏启胤，则国史家谍之所详焉，今可得而略也。曾祖密，奉天定难功臣、华州镇国军同关镇遏使。大父靖，朝散大夫、检校秘书监、使持节潘州诸军事、守潘州刺史、兼监察御史。烈考贯言，守容州普宁县，又招讨巡官、知顺州军州事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乾符006，第1122页 《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53~154页	夫人河东柳氏
99	石善达	大唐北京太原府朔州兴唐军石府君墓志	光化二年（899）卒（年六十八）天复元年（901）葬	山西应县	府君善达公。高皇本自凉州武威郡人也。承司徒□□□，□季伦之胤绪。是以宗族芳荣，枝连勋业。国官随□，□□□地	殷宪：《唐石善达墓志考》，《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夫人经州安定郡安氏。龙记（纪）元年（889）卒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49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100	石彦辞	梁故静难功臣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前守右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武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石府君墓志铭并序	开平四年（910）卒（享年五十有八）开平四年（910）葬	河南洛阳	曾祖饶，唐左神策军司隶兼右威卫中郎将。缵戎前裔，起家之道忽兴；启迪后人，嗣世之光间出。祖贞，袭曾大父之职，累迁兼御史司宪。荣能选振，建邦将万石君同；谋有必谐，殖货与千户侯等。皇考盛，雄略沉毅，首冠麾下，列土外荐，名级内升，累迁检校左散骑常侍、越州别驾、赠刑部尚书	《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70~173页 陈忠凯：《石彦辞墓志探疑》，《文博》1997年第5期 虞万里：《〈石彦辞墓志〉文句正读和史事索隐》，《史林》2009年第6期	夫人昌黎韩氏
101	康赞美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前金吾卫将军兼御史大夫太原郡康公府君墓志铭并序	天成元年（926）卒（享年三十有三）天成元年（926）卒葬	河南洛阳	曾祖□，检校工部尚书。祖琮，检校司徒。父怀英，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康公讳赞美，字翊圣	《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60页	夫人卢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50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102	安万金	晋故均州刺史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安府君墓志	天福二年（937）卒（享年七十有六）天福二年（937）合葬	河南洛阳	公讳万金，字宝山。……曾讳德升，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故镇武马军指挥使、索葛府刺史……祖讳重胤，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静塞军管内都游弈使、索葛府刺史。……皇讳进通，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守应州别驾、索葛府刺史，长兴二年，赠司空。……公本自稷契之苗裔也，始因周平王治国，六蕃来侵。将军奋剑一挥，万夫碎胆；操戈直指，八表晏清。上旌功劳，乃命氏焉，公即将军二千年后玄孙也	《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72页	夫人何氏、米氏、王氏、张氏、赵氏 女一人事石家
103	何君政	大晋故鸡田府部落长史何公墓志铭并序	长兴三年（932）卒 夫人天祐年（904~907）卒 天福四年（939）葬	山西阳曲	公讳君政，家本大同人也。公主领部落，抚弱遏强，矜贫恤寡。家崇文武，世袭冠裳	《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439~440页	夫人安氏 新妇三人，长安氏，次康氏，次康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51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104	安重遇	大周故护国军节度行军司马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武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安公墓志铭并序	广顺元年（951）卒（享年六十有一）显德元年（954）葬	河南洛阳	公讳重遇，字继荣，雁门人也。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讳弘璋之孙也。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讳福迁之子也。推忠致理佐命保国功臣、河中护国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行河中尹、上柱国、汧国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讳重海之弟也	《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450~451页	夫人彭城刘氏次女见侍康氏
105	安崇礼	故郑州衙内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君墓志铭并序	开宝四年（971）卒（享年五十七）开宝四年（971）葬	河南洛阳	君讳崇礼，字同节，其先雁门人也。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讳弘璋，君之曾祖也。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讳福迁，君之王父也。推忠致理佐命保国功臣、河中护国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赠尚书令、行河中尹、上柱国、汧国公、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图版1246，文物出版社，1989	安重遇子夫人高氏、张氏

附表 在华粟特人墓志有关祖源追溯、父祖世系、入华历史等叙述一览-续表52

序号	墓志主人	墓志首题	卒葬时间（按葬年先后排列）	出土地点	关于祖源等叙述	资料来源	备注
105					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讳重海，君之孟父也。郑州防御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讳重遇，君之烈考也		

[1] 杨晓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2] 研究史概况及最近的研究动态，可以参看程越《国内粟特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9期；榮新江著、森部豐翻訳解説「新出石刻史料から见たソグド人研究の动向」『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4、2011年4月、121～151頁；荣新江《中古时期来华胡人墓志研究的新进展》，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1辑《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00～220页；车娟娟《2000年以来国内粟特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1期。

[3] 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4] 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5] 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第377～425页。

[6] 高文文：《唐河北藩镇粟特后裔汉化研究——以墓志材料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

[7] 与“祖源”关联度很大的一个词是“族源”，前者强调个体的来源，后者强调群体的来源，但是两者又有交叉。就墓志本书所陈述的看来，有的描述偏重“祖源”，有的描述偏重“族源”，以下行文统一使用“祖源”。

[8] 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献》1997年第1期。

[9]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收入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7～110页。

[10] 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第426～437页，附录“唐代墓志所见康、安两姓粟特人基本状况表”。

[11] 表格篇幅太大，作为附表附于文后。在此按照墓志时代先后简单记录墓主的姓名情况。
北周：康业、翟曹明、安伽。
隋：安备、史射勿、翟突娑、李陁、李吁典。
唐：康婆、康阿达、史索岩、史盘陀、史氏（女）、支茂、安延、何盛、安□（字万通）、安静、安度、史氏（女）、安师、安娘（女）、康达、史铁棒、史诃耽、康敬本、康武通、康元敬、史氏（女）、何氏（女）、曹氏（女）、史道德、康续、安神俨、何摩诃、康枚、康留买、康磨伽、安元寿、康老师、康敦（女）、康宜德、安怀、康智、康氏（女）、康氏（女）、何□□、史善法、康郎、安令节、康哲、安菩、安思节、史多、康远、康固、史诺匹延、康威、曹明照（女）、安孝臣、康庭兰、史思礼、和守阳、康令恽、翟氏（女）、康仙昂、安思温、郑岩、何德、康氏（女）、康氏（女）、康晖、曹闰国、曹惠琳、康氏（女）、李国珍（安𬀩）、李元谅（安元光）、石崇俊、何澄、米继芬、史然、□（何）氏、石神福、康昭、石默啜、康志达、安氏（女）、石忠政、何文哲、米九娘（女）、何氏（女）、米文辩、安珍、何少直、安士和、何弘敬、曹弘立、安玄朗、石善达。
五代：石彦辞、康赞羡、安万金、何君政、安重遇。
宋：安崇礼。

[12]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第38～41页。

[13] 赵超：《对史道德墓志及其族属的一点看法》，《文物》1986年第12期；罗丰：《也谈史道德族属及相关问题——答赵超同志》，《文物》1988年第8期；马驰：《史道德的族属、籍贯及后人》，《文物》1991年第5期；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14] 郭茂育、赵振华：《唐〈史孝章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高文文：《唐河北藩镇粟特后裔汉化研究——以墓志材料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

[15] 杨泓：《北朝至隋唐从西域来华人士墓葬概说》，饶宗颐主编《华学》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收入杨泓《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第297～314页。

[16] 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第398～411页。

[17] 已发现的墓志中，很少有不止一代在华粟特人的墓志，史射勿、史诃耽、史铁棒三代人的墓志都已经发现，是个难得的例外。这三方墓志都追溯到曾祖，则说明

父祖等先世追溯一般比较有限。

[18] 陈海涛、刘惠琴两位学者在唐代粟特人家世渊源观念变化的研究中，以康、安两姓墓志为例，将之分为自觉类型（明确讲述其家族为异族来源）、过渡类型（不再明确言其家族源于异域，但对家世的叙述亦可以看出异族特点，主观上向汉族传统渊源靠拢）、认同类型（完全没有异域特点，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中原传统渊源）。参见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第411～422页。

[19]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第3927页。

[20] 《晋书》卷104，中华书局，1974，第2707页。

[21] 崔鸿：《十六国春秋》卷10《前赵录十·陈安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3册。按《陈安传》不载《十六国春秋辑补》（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卷10《前赵录十·陈安传》，《丛书集成初编》本）。按传世《十六国春秋》出自明代后期屠隆等人，历来对此本评价不一，但是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其资料实有所本，并利用了当时尚见流传的《十六国春秋》的残本。参见王薇《〈十六国春秋〉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3期；汤勤福《关于屠本〈十六国春秋〉真伪的若干问题》，《求是学刊》2010年第1期。

[22]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23] 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第422～423页。

[24] 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荣新江：《安世高与武威安姓——评〈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黄时鉴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第366～379页；收入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427～440页。

[25] 《晋书》卷97《四夷列传·西戎·康居》，第2544页。

[26] 《新唐书》卷75下，中华书局，1975，第3445页。

[27] 关于郑岩家族，参考赵振华《唐代少府监郑岩及其粟特人祖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5期；赵振华《唐代湘乡县令郑钴及其八代祖盘陁——再论唐代少府监郑岩及其粟特人祖先》，《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8] 《旧五代史》卷66，中华书局，1976，第873～881页；《新五代史》卷24，中华书局，1974，第251～257页。

[29] 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史林》1999年第3期。

[30] 关于粟特人内部通婚问题的研究，参见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年第9期；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

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111～168页；刘惠琴、陈海涛《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第378～387页。

义理与时势：澶渊之盟后辽圣宗对高丽政策探析[1]

陶莎[2]

11世纪伊始，伴随着辽宋“澶渊之盟”的缔结，双方战争、对立的状态也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辽宋互称“南朝”“北朝”，约以“兄弟之盟”的新局面。澶渊之盟的确立，令辽朝不得不终止南征计划，重新寻找主导东亚秩序的突破口，表面臣服、实则不驯的高丽便成了新的战略目标。

在中韩关系史领域，一般认为双方的宗藩关系确立于辽圣宗时期，并一直为后世王朝所延续。[3]深入探讨澶渊之盟后辽圣宗对高丽政策的转变，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传统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以及东亚秩序的理性认识，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描绘辽朝对“中国”身份的定位及追求。在此基础上，笔者拟就辽丽双方宗藩关系形成未稳的一段时间内，辽朝落实宗主权利的努力以及背后动因进行探讨，力争加深对古代中朝关系、东亚秩序的认识。

一 澶渊之盟后辽朝对高丽政策的变化

10世纪晚期，在宋朝的协调下，自西向东，包括西域、漠北、宋朝、高丽等政权在内，一个环绕辽朝边疆的多政权反辽同盟渐趋形成。[4]年幼的耶律隆绪在这种情况下即位，是为辽圣宗。政治经验丰富的承天太后奉遗诏执掌国事，在耶律斜轸、韩德让等人的尽力辅佐下，辽朝对反辽同盟各个击破，在外交困境中突出重围。在此过程中，为切断高丽同宋朝联系，以确保南征不被掣肘，辽朝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成功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此后，辽便鲜少东顾，专意南征，直到澶渊之盟缔结后才又着手调整对高丽政策。

1.讨逆宣威、欲正宗藩

统和二十八年（1010）五月，承天太后丧葬完毕43天后，辽圣宗下诏：“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擅立诵从兄询。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5]随后遣使高丽“问前王（穆宗）之故”，[6]并以“自将伐高丽，遣使报宋”，[7]又遣枢密直学士高正、引进使韩杞至高丽“告兴师”。[8]一系列动作在几月之间完成，并对高丽“乞罢师”[9]不予理会，可见辽圣

宗整理辽丽关系决心之坚定。

十一月，辽朝大军渡过鸭绿江，双方展开了历时近60日的交锋。具体战争细节《辽史》《高丽史》均有描述，前辈学人亦做过细致梳理，此不赘述。翻阅《高丽史》，发现在辽军推进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双方关于“退兵”的交涉，本文便就几次交涉做一分析，从而厘清辽朝出兵的目的及其高丽政策。

（1）第一次交涉

辽朝大军渡过鸭绿江后，辽圣宗下谕降书与敕书明告兴化镇守军：“逆臣康兆弑君立幼……汝等擒康兆送驾前，使即回兵，不然，直入开京，杀女妻孥。”“朕将精锐来讨罪人，其余胁从，皆与原免。况汝等受前王抚绥之惠，知历代顺逆之由，当体朕怀，无贻后悔。”兴化镇守军不为所动，上书请求辽人撤兵。辽圣宗复又下敕书，重申出兵讨逆的目的，并导之以为臣之道，依旧无果。于是圣宗下旨：“汝等慰安百姓而待之。”遂解兴化镇之围，移军铜山之下。[10]辽丽双方关于退兵的交涉告一段落，交战正式拉开。

由双方互动交涉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辽圣宗几番下诏均申明发兵旨在讨逆，希望高丽履行臣子义务，同时说明不予配合的后果；其次，诏书中屡次强调辽丽间宗藩关系，指出辽朝作为宗主国发兵讨逆的合法性，又点明显宗王询为逆臣所立，且此时未获辽册封，王位继承程序并未完成；再次，兴化镇守军上表之言多有不恭，然辽圣宗只是围而不打，尽力晓以君臣之道，告之以利害关系，证明辽朝大军压境确无占领国土之意。

（2）第二次交涉

如辽圣宗诏书所言，辽军擒获康兆后，一路进军，高丽西北城寨皆为辽军所下。[11]辽使刘经携檄文至西京谕降，为城中主战派智蔡文等暗中击杀。随后高丽显宗以“州郡陷没，上表请朝”，[12]辽圣宗遂“以政事舍人马保佑为开京留守，安州团练使王八为副留守。遣太子太师乙凛将骑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13]此即为高丽第一次“请朝”。但西京守将智蔡文等人见韩杞询问刘经谕降一事，恐暗杀事发，于是击杀韩杞等人，又击退乙凛、马保佑。“请朝”遂成“诈降”。

由这一次交涉可以看出辽圣宗对于以高丽“请朝”作为退兵条件是满

意的。此时不仅开京未遭兵戈，甚至西京也在固守顽抗，辽圣宗派出官员远赴开京的举动完全建立在相信高丽显宗“亲朝”承诺的基础上。[14]辽军挟大胜之势却并未拒绝退兵的请求，显然未将攻城略地作为主要目的，更多的是将兵威视作要求高丽履行臣下义务的手段。

（3）第三次交涉

高丽诈降令辽圣宗震怒，于是绕开西京，派兵直奔开京。高丽显宗王询听从姜邯赞“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寡不敌众，当避其锋，徐图复兴耳”[15]的建议，率众南行。观姜邯赞之言，显然高丽君臣中不乏对辽朝出兵有清醒认识之人，然而依旧不敢直面辽圣宗而南逃，除对诈降一事心怀忐忑外，亦难免有高丽显宗王询对辽圣宗另择他人而立的担忧。[16]“直入开京”本是辽圣宗于兴化镇谕降时做出的警告之言，如今高丽显宗王询避而不见更令圣宗坚定了决心，于是萧排押率兵入开京，“焚烧大庙宫阙”，[17]“大掠而还”。[18]

当此危急之际，河拱辰上奏：“契丹本以讨贼为名，今已得康兆，若遣使请和，彼必班师。”[19]显宗遂令其赴辽军请和。“拱辰行至昌化县，以表状授郎将张旻、别将丁悦先往契丹军。……旻等未至，契丹先锋已至昌化，拱辰等俱陈前意。契丹问国王安在？答曰：‘今向江南，不知所在。’又问远近。答曰：‘江南太远，不知几万里。’追兵乃还。”[20]时至今日，有关“江南太远”这一说辞，学界大多抱相信的态度，认为河拱辰利用辽圣宗对高丽具体情况的无知，轻易骗其退兵。然细检史料，统和二十年，高丽曾“贡本国地里图”，[21]说明辽圣宗在出兵前便已获取了解朝鲜半岛地理环境的渠道。实际上辽军南下过程中遭遇的抵抗从未中断，且战线愈拉长，后勤补给愈吃紧。若坚持南下，则恐将陷入难以为继的局面。故辽圣宗借口“江南太远”，退兵还朝。

检讨三次关于“退兵”的交涉，辽圣宗始终站在宗主国立场上整理辽丽关系，无论是讨伐逆臣还是要求国王亲朝，都没有超出宗主国的权利范围。辽军深入高丽腹地，亦并非对高丽抱有领土要求，主要还应归因于高丽对辽朝宗主国身份的不断挑战。

2.兵并举、重塑宗藩

（1）“亲朝”的交涉

辽军班师后，高丽多次遣使，或谢班师，或贺冬至，或贺生辰，虽有示好之态，却丝毫不言“亲朝”。又兼前番征讨辽朝损失巨大，辽圣宗不满更甚。圣宗开泰元年（1012），高丽遣蔡忠顺“乞称臣如旧”，[22]仍不提“亲朝”，辽圣宗于是下诏明令高丽显宗亲朝。显然，此时“亲朝”已经成为辽丽双方继续宗藩关系的条件。

高丽随后“告王病，不能亲朝”，辽圣宗遂下诏“取兴化、通州、龙州、铁州、郭州、龟州等六城”。[23]六城是高丽于统和十一年（993）在辽圣宗所赐鸭绿江女真地上所建，赐地的条件是高丽必须向辽朝称臣纳贡，同时断绝与宋朝的联系。高丽日后并未履行承诺，不仅私下遣使如宋，后又“至者无时”。[24]前次辽圣宗大举征伐高丽，究其根本便在于此。

讨回六城可以看作辽圣宗对高丽的提醒与警告，其意在使高丽认识到辽丽间的宗藩关系及对应的权利、义务。申明“亲朝”乃双方宗藩存续的条件，宗藩关系破裂，则高丽必须交还辽朝赠予的六城之地。

（2）关于“六城”的交涉

高丽接到收回“六城”的要求后，数次遣使与辽朝进行交涉，试图使辽朝接受高丽言而无信的现实。辽圣宗亦“遣中丞耶律资忠使高丽，取六州旧地”。[25]伴随着使者的交涉，辽朝开启了新一轮军事征伐。开泰二年十月，详稳张马留献通晓高丽事的女真人，向辽圣宗介绍了高丽开京附近详情，并为辽军规划了前进路线。次年，辽朝又“造浮梁于鸭渌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26]为出兵高丽做了充分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双方虽然剑拔弩张，但聘使往来并未断绝。《高丽史》记载高丽显宗四年（1013）五月，“契丹来告改统和为开泰”，六月，高丽“遣借尚书右丞金作宾如契丹贺改元”。[27]可见虽然纷争有愈演愈烈之象，但双方此时均未放弃宗藩关系。那么可以认为，辽圣宗对高丽战与和的抉择，其意仍在于在宗藩关系内部对辽丽双方的权利及义务进行调整。

（3）破而后立的宗藩关系

自开泰三年至开泰八年，辽朝对高丽发动的四次征伐均未有收效。这次大规模的征伐“历时六年，数易将帅，仍以契丹在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28]外交上的情形同样不容乐观，索要“六城”屡次被拒，开泰四

年，高丽甚至扣留了使者耶律资忠，其强硬态度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为抵御来自辽朝外交、军事方面的压力，高丽寄希望于宋室方面的助力。开泰四年（宋大中祥符八年），高丽致表北宋“请求赐历日及尊号，且言契丹于其国西鸭绿江头创浮桥，又于江东筑寨”。[29]但宋自澶渊之盟以来已无与辽开战之意，故仅遗诏书以示安抚。面对辽方的巨大压力，高丽宣布“复行宋大中祥符年号”，[30]以示与辽决裂。此举更加激起辽圣宗的怒火，是以遣使愈频，屡败屡战。

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对国力的巨大考验，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但作为主战场的高丽损失极为惨重，大有虽胜尤败之态。于是开泰七年，高丽遣“元永如契丹请和”，希望结束战争状态，却同时又“行宋天禧年号”，显然没有恢复宗藩关系的意愿。[31]辽圣宗自然不能容忍高丽既不归还“六城”，复又重行宋朝年号的悖逆之举，于是再发大军，又一次尝试以兵威重整宗藩关系。是役辽军大败，高丽也再无力支撑战局。开泰八年辽朝先后遣使入高丽，随后高丽遣李仁泽如辽“乞贡方物”，[32]意味着一直态度强硬的高丽放弃与辽朝对抗。

高丽遣使令陷入战争困境的辽朝决定不再继续征伐，开泰八年八月，“遣郎君曷不吕等率诸部兵会大军讨高丽”[33]之举终未有下文。随后，高丽归还了被扣留六年之久的耶律资忠，并奉表称藩纳贡。辽遂释王询之罪，同意其称臣纳贡的请求。此后双方宗藩关系逐渐修复，但由于辽朝军事上未占上风，其所要求的“亲朝”“六城”问题遂不了了之。

澶渊之盟后辽圣宗对高丽政策的调整给两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让他背负了穷兵黩武的名声。如此巨大的代价却并未令高丽显宗亲朝，也未能收回江东六城，十年兵燹及外交博弈仅令双方回到刚刚缔结宗藩关系的状态。但经过十年纷争，高丽君臣深刻认识到辽圣宗规范宗藩关系的决心，此后终圣宗一朝始终与辽朝保持较为频繁的往来。双方重修旧好后，辽朝对高丽的政策强化了文化因素，其目的主要在于“德化”高丽。[34]随着辽圣宗转而实行较为和缓的对高丽政策，辽丽双方得以保持稳定的宗藩关系直至辽圣宗去世。

二 政策调整原因探究

元朝史官在修撰《辽史》时尝发“辽自神册而降，席富强之势，内修法度，外事征伐，一时将帅震扬威灵，风行电扫，讨西夏，征党项，破

阻卜，平敌烈。诸部震慑，闻鼙鼓而胆落股弁，斯可谓雄武之国矣。其战胜攻取，必有奇谋秘计神变莫测者，将前史所载，未足发邪？抑天之所授，众莫与争而能然邪？”[35]之疑问。吴凤霞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认为元朝史官在未能找到辽朝战胜攻取原因的情况下，甚至将“众莫与争”归之于“天之所授”，同他们信奉“仁者无敌”，主张“兵者凶器也，可戢而不可玩；争者末节也，可遏而不可召”有很大关系。[36]元朝史官在《辽史·兵卫志》中也指出拥有强大军力的辽朝之所以“长世”，根源在于不轻易用兵。[37]

诚如史家所言，“耀德”胜于“观兵”。为何辽圣宗在澶渊之盟，确切地说是在萧太后去世后旋即改变对高丽政策，不顾萧敌烈“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抏敝。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疮痍未复。岛夷小国，城垒完固，胜不为武，万一失利，恐贻后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问其故。彼若伏罪则已；不然，俟服除岁丰，举兵未晚”[38]的谏言，执意发兵？这不外两种原因，于内要树立个人威权，于外则要使高丽认同辽朝的正统地位。

1.内立威权

（1）强化皇权

辽圣宗即位时年仅十二岁，其母承天太后“临朝称制凡二十七年”。[39]承天太后在景宗时期便已经开始参与政事，政治经验丰富。圣宗年幼时，“国事取决于其母”。[40]至其成年，遇事仍然“拱手”母旁，聆听母训“略无怨辞”。[41]学界基本上可以对承天太后在圣宗时期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达成一致，认为其“执政前期，正是圣宗年幼之际，她当然要站在第一线，随着圣宗的成长，萧太后的作用要有所减少。但是根据情况，完全可以断定，她仍不失为当政者，这一时期的政绩和存在的问题，当然不能完全归于萧太后，但首先应写在她的名下”。[42]承天太后作为“辽朝复兴的主要决策者”，[43]圣宗成年以后，朝政亦多决于太后。

承天太后摄政的四十余年政绩斐然，圣宗长于其侧，“益习国事，锐意于治”，[44]自然不甘心做一个守成之君。太后去世后，已即位二十八年、年过不惑却刚刚脱离太后视线的辽圣宗急切地想要提升权威，加强皇权。但承天太后虽然辞世，余威仍在，后族依然有着与皇族分庭抗礼的实力。辽圣宗欲在此时加强皇权必须创下足以服人的文治武功，才能在太后长久的政治影响中有所突破，进而对后族进行有效遏制。前文所

述萧敌烈之谏言不可谓不客观务实，虽然《辽史》中将圣宗的不予采纳归因于命令已下，但其中亦难免有对其国舅详稳身份的疑忌。再观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征高丽的阵容，主要将领中皇族耶律氏占去大半，除去少数几名汉臣与渤海臣，后族中仅萧排押一人而已，这与统和十年（992）征伐高丽时一应大事放心交于萧恒德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辽圣宗倚重皇族、削弱后族的意图已经初现端倪。

（2）效法英主

辽圣宗“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服”，并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45]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时，亦令臣下“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46]鉴于《契丹国志》内容多来自《资治通鉴》及《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书皆为宋人所著，故辽圣宗赞宋太祖、太宗之语未必可信，然对照《辽史》可知辽圣宗对唐太宗、唐玄宗的钦佩乃是实情。

唐太宗、唐玄宗皆是对外强势的君主，对朝鲜半岛政权亦然。辽圣宗常以唐太宗、唐玄宗行事为参考，且当时承天太后仍在，政令多出于太后之手，那么将“‘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的错误决定”[47]完全归因于辽圣宗显然不妥。考察承天太后去世后辽圣宗对高丽政策的几番调整，可以看出其对高丽诸般表现不满已久，甚至深以“鸭绿江东数百里地”割让一事为憾。当日将土地赐予高丽实为利诱，目的在于建立辽丽间的宗藩关系，断绝宋朝东部的羽翼。然事与愿违，高丽得此地后立即驱逐女真人，兴建城池，在辽丽接壤之处更是着重防御。更有甚者，高丽违背承诺遣使如宋，日后又“贡献不时至”，[48]与辽朝逐渐疏远。如此一来，辽朝赐地可谓得不偿失。辽圣宗多次兴兵征伐，又屡屡遣使讨回“六城”，初时不过是以“六城”相挟以使高丽显宗亲朝，后来不提“亲朝”只索“六城”，似可以证明当日赐地一事辽圣宗其实并不认同。承天太后去世后辽圣宗立即着手整理辽丽关系，或许就是对昔日自己并不认可的政策进行修正。

2.外正中华

辽自太祖开国，便已为日后辽朝发展奠定了“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49]的基调。欧洲著名学者沙畹认为在辽太宗时，辽朝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汉族王朝”，[50]此说或许尚存争议，但历经百年的发展，至圣宗时，辽朝疆域辽阔、势力强劲，儒化程度更深，已呈一片蔚然华风乃

是不争的事实。辽太祖、太宗时期，皆以“中国”自居，待辽宋签订澶渊之盟，辽朝的“中国观”开始变化，产生了“中国正统”的思想。[51]在儒家文化的作用下，辽朝统治者意识到若天子至尊地位得不到外部承认，则其国内统治的合法性也将遭到挑战。[52]于是在辽朝内部对“中国”的身份已经确认无疑的情况下，其对于外部认同的需求便愈加迫切。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辽朝帝王所努力追求的除现实意义上的“广土众民”之外，一直未曾放弃争取“中国”身份的外部认同。

清人赵翼曾言：“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以时势。”[53]受澶渊之盟所限不能继续筹谋南伐的现实，同不断壮大的国力、日益深入的“中国”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统”观不断碰撞，在东亚范围内取得超越宋朝的地位并获得道统上的认同就变得十分迫切。高丽是东北亚地区少有的以儒治国的“礼仪之邦”，向来礼敬中原、恭奉正朔，若能令高丽承认辽朝为“中国正统”，则对于辽朝所追求的“中国认同”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辽圣宗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熏陶，好读《贞观政要》等书，可谓深谙汉唐盛世治边之法，为何不效法前贤“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之“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54]而强行征伐？非不明义理，实乃时势使然。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55]其所依靠的是包括文化影响力、意识影响力、制度安排的影响力等在内的软实力。[56]而对于辽王朝来说，此时依靠“软实力”怀柔受儒家文化熏染日久的高丽，无异于缘木求鱼。是故欲达成祖辈构建“中央之国”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以辽朝为中心的宗藩体系，唯有通过征伐使“强朝弱附”。[57]

结语

辽圣宗对高丽的连番征伐以及屡屡遣使所进行的交涉，归根究底是希望得到高丽的认同，希望高丽对辽的臣服不是“畏威”而是“归心”。但持续十年之久的交锋，给两个国家及双方的百姓造成了巨大负担。在这场国力的比拼中，高丽率先妥协，也为辽朝结束战争提供了理由。双方重新建立宗藩关系之后，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没有就“亲朝”“六城”等问题再做过多交涉，这对高丽来讲自然求之不得，对辽圣宗来说却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无论如何，双方宗藩关系经此十年之役逐渐步入成熟。[58]此后辽朝再未兴大兵讨伐高丽，盖因“时势”已经通过武力得

以变化，遵循“义理”多修文德已经上升为主要任务。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族士人与辽代社会研究”（17BZS133）、广东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辽帝国对高丽政策与东亚秩序研究”（GD18YLS01）阶段成果。

[2] 陶莎，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3] 参见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26页；杨军、王秋斌《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63页。

[4] 杨浣：《辽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10，第82页。

[5] 《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中华书局，2016，第184页。

[6] 郑麟趾：《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韩）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上册，第88页。

[7] 《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第184页。

[8] 郑麟趾：《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一》，第88页。

[9] 《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第184页。

[10] 郑麟趾：《高丽史》卷94《杨规传》，（韩）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下册，第103页。

[11] 韩国学者曾有“既已诛杀康兆达成目的，理应撤军，却直向南攻，则其兴师的侵略行为已昭然若揭”之论断，不知是否有考虑到谕降书中所透露的信息。参见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华世出版社，1981，第90页。

[12] 郑麟趾：《高丽史》卷94《智蔡文传》，第104页。

[13] 《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第184页。

[14] 王民信先生认为此处开京应为西京之误，并且在王询未请降时，西京已经为辽军攻下。（王民信：《王民信高丽史研究论文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第116页）但《辽史》《高丽史》均明确记载，在辽朝接受请降并派出马保佑等人后，才发生高丽西京守将杀害辽朝使者之事。且《高丽史·智蔡文传》中对之后辽丽双方围绕西京展开的交锋还有诸多记载，直至智蔡文逃奔开京，统军录事赵元依旧率众闭门固守，王民信先生此说似不成立。有韩国学者指出辽圣宗派出开京留守及副留守是在占领区建立了行政体制的一种表现。（卢启炫：《高丽外交史》，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第75页）此说同样值得商榷。无论此处所言确是开京，还是如王民信先生认为之西京，此时均未被辽军占领，则“占领区”一说便不攻自破了。

[15] 郑麟趾：《高丽史》卷94《姜邯赞传》，第100页。

[16] 王询母景宗妃皇甫氏，乃太祖王建孙女、戴宗之女。景宗去世后，皇甫氏与

太祖子安宗王郁私通而生王询。虽然高丽王室从头到尾都维持族内婚制，并通过族内婚制维持嫡庶之身份制度，以确保王权（朴延华、李英子：《高丽王室族内婚制及其变化》，《东疆学刊》2003年第1期），但王询私生子的身份仍然尴尬。穆宗无子，当时太祖后人可继承王位者仅有王询一人，故王询得以为穆宗及大臣所选择。康兆用事后，流落民间的孝隐太子之子王琳、王祯得以恢复宗籍。二人的出现，改变了王询作为高丽王室仅存硕果的局面，王询避辽军唯恐不及，恐怕更多的是担心辽圣宗另择他人而令自己无立足之地。

[17] 郑麟趾：《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第88页。

[18] 《辽史》卷88《萧排押传》，第1476页。

[19] 郑麟趾：《高丽史》卷94《河拱辰传》，第109页。

[20] 郑麟趾：《高丽史》卷94《河拱辰传》，第109页。

[21] 《辽史》卷14《圣宗本纪五》，第172页。

[22] 《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第187页。

[23] 郑麟趾：《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第91～92页。

[24] 《辽史》卷115《高丽传》，第1672页。

[25] 《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第189页。

[26] 《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第191页。

[27] 郑麟趾：《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第92页。

[28] 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第26页。

[2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中华书局，1995，第1957页。

[30] 郑麟趾：《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第95页。

[31] 郑麟趾：《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第99页。

[32] 《辽史》卷16《圣宗本纪七》，第209页。

[33] 《辽史》卷16《圣宗本纪七》，第208页。

[34] 姜维东：《辽使儒化现象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5期。

[35] 《辽史》卷95《耶律弘古、耶律马六等传》，第1532页。

[36] 吴凤霞：《辽朝何以“雄长二百余年”——〈辽史〉论赞相关议论探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3期。

[37] 《辽史》卷36《兵卫制下》，第4889页。

[38] 《辽史》卷88《萧敌烈传》，第1473页。

[39]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中华书局，2014，第71页。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太宗雍熙三年春正月戊寅，第602页。

[41]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第80页。

[42] 孟广耀：《肖太后考评——兼论〈澶渊之盟〉》，《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43] 苗泼、曹显征：《论辽代的母后摄政》，《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44] 《辽史》卷61《刑法志上》，第1041页。

[45]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第80页。

[46] 《辽史》卷80《马得臣传》，第1409页。

[47] 郑川水：《辽圣宗及辽与高丽藩交考略》，《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48] 《辽史》卷88《耶律资忠》，第1478页。

[49]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12《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中华书局，1986，第260页。

[50] 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参见王承礼等《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1990，第7页。

[51] 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第393页。

[52]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41～56页。

[53] 赵翼：《廿二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489页。

[54]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中华书局，1960，第3834页。

[55] 《论语·季氏》，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250页。

[56] 方铁：《论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2期。

[57] 《辽史》卷32《营卫志中》，第427页。

[58] 杨军、王秋斌：《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第163页。

蒙元史研究与蒙元历史叙事的构建

沈卫荣[1]

一

20世纪90年代初，在德国波恩大学读书的时候，笔者曾经读到过一本书，它的主标题叫作《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与影响》（*Ursprung und Ausprägung des Abendländischen Mongolenbildes im 13. Jahrhundert*），而其副标题是《［欧洲］中世纪思想史的一个尝试》（*Ein Versuch zur Ideen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这本书是亚琛（Achen）工业大学哲学系1990年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由德国著名的东方［亚洲］研究出版社Harrassowitz Verlag于1993年出版，作者是Axel Klopprogge。记得这本书出版后得了奖，获得了很多好评，故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当时读了以后觉得很受触动和启发，至今记忆犹新。这本书的主题讲的是欧洲人是如何期待、理解和接受蒙古西征，或者那个被人称为"蒙古旋风"的历史事件的。蒙古对欧洲的征战发生在1241年，延续时间不长，蒙古西征最远点也不过是到达了波兰和德国边境地区的Liegnitz和Schlesien，于此逗留的时间一共也不到两周，果真是一场转瞬即逝的风暴，可它在欧洲思想史上却留下了长期和深刻的影响。

这本书的作者提出对蒙古西征历史的研究应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研究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蒙古西征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但这显然不是作者这本书要关注的重点，对它的研究需要比他更专业的蒙古史学家来完成；而另外一个层面则是研究当时欧洲人是如何期待、理解、解释，甚至是设计了蒙古西征这一历史过程的，以及蒙古西征在欧洲思想史上带来过什么样的影响。这正是这本书的作者所要关注的重点。这个层面的"历史"研究跟作为一场军事行为的蒙古西征本身关系不大，它基本上属于欧洲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作者的研究表明，令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早在蒙古西征这一历史事件实际发生以前，欧洲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有关蒙古人的传说，事实上欧洲人早已经期待着鞑靼人（蒙古人）哪天真的会在欧洲出现，并帮助基督徒们来惩罚和消灭异教徒，甚至征服全世界。所以，当时的欧洲人对这场旋风式的蒙古西征的历史的描述基本上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期待、想象和设计来完成的，它们与那段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过程严重相脱离，这是

在欧洲中世纪思想史的结构中来重现和讲述的一个蒙古西征的故事。

与欧洲人对蒙古西征的想象和设计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在中世纪欧洲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是自12世纪开始曾经在欧洲广泛流传的一个有关约翰长老的王国（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的故事。这是一个纯粹由好事的基督教教士捏造出来的故事，表达的是他们希望联合来自东方的力量来消灭威胁到他们的异教徒穆斯林的愿望。这个故事说，在遥远的东方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基督教王国，它的领袖是约翰长老（Presbyter Johannes，或称Prester John），他是72个国家的君主的君主，统治着东方所有广大的地方，有朝一日他将率领势不可当、强大无比的军队打回西方，以帮助他的西方基督教兄弟们去消灭异教徒穆斯林。这个传说在当时的欧洲流传非常广泛，所以，即使像马可波罗这样少小离家、没有多少文化的商人，显然也已经受到了这个故事的深刻影响。在由他叙述的东方游记中，马可波罗可以对他习以为常的那些真实的东方故事忽略不谈，却对约翰长老和他的王国念念不忘，曾经多次提到，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与他同时代的西方读者们大概不会对那些完全超越了他们想象范围的中国故事，如中国有万里长城或者中国女人裹小脚等，有很多的兴趣，却十分期待能够从他那里听到更多他们早已经耳熟能详却又亟待证实的事情，例如这个关于约翰长老的故事。以往曾有不少历史学家非常用心地去考证这位约翰长老到底是谁，他的王国到底应该是在印度、蒙古国、中亚还是在埃塞俄比亚等，而在专门研究《马可波罗游记》的中外学者中，也有一些人很关心马可波罗所说的这位国王到底是指成吉思汗还是指克烈部的王罕。考证来考证去，却不知道或者忘了这位约翰长老就像西方人一直觉得东方世界有他们所没有的一种“独角兽”（unicorn）一样，本来就是一位虚构出来的人物，子虚乌有。对约翰长老及其王国的研究与蒙古史或者东方史完全没有关系，它理所当然地也应该是中世纪欧洲思想史的一部分。[2]

读《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与影响》这本书的时候，笔者正随导师Klaus Sagaster先生阅读德国学者整理出版的欧洲传教士们留下的多种蒙古行记，同时也正被“约翰长老的王国”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曾花了不少时间去搜罗有关这个传奇的各种学术的和非学术的作品，想彻底搞清楚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整个这段有趣的读书过程，使笔者对蒙元史研究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和影响，开始注意到蒙元史研究不管是论其内容，还是论其方法，原来都比笔者以前所理解的要丰富、广阔和复杂得多，它至少应该从两个或者多个不同的层面、维度或者视角

来展开，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蒙元史不只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元王朝曾经是一个跨越欧亚的大帝国，它连接了东西方世界，打破了原有的以欧洲或者以汉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格局，所以，它的历史既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是欧洲历史或者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不只是一些被人认为是蒙元史学家们在做的事情，它甚至也可以是欧洲思想史学家们所研究的主题。还有，以前笔者觉得历史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事实的考证和重建以及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顺序的建构，而比较忽略如何对自己所研究的这段历史用某一种故事的形式作整体地叙述和再现（presen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现在则开始明白从揭露历史的事实（facts）到形成一种历史的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之间有一个十分精致和微妙的转换过程，而历代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往往不是一个简单地寻找历史资料和发现历史事实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地对它进行重塑的过程，他们采用哪一种叙事形式来表述和重现某一段历史，通常都与史家们当时所处时代的现实关心有关，体现出历史研究与当下现实社会和文化的联系，以及它对于当下的价值和意义。

二

有了前述这一段特殊的读书经历，再来回顾笔者自己此前在国内学习蒙元史的经历，不难发现笔者自己和国内的大部分学术同行们，至少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显然主要是把蒙元史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部分来研究的，关注的更多的是考证和研究蒙元历史上的各种具体问题和具体史实，而较少在意如何整体地来讲述蒙元史，或者说采用哪一种视角、用哪一种故事形式（叙事模式）来构建一套关于蒙元王朝的历史叙事。特别是我们这些当年曾经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学习过、工作过的师友们，大都是傅斯年先生的崇拜者，推崇他所主张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认定研究历史最要紧的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或者说得更远一点，我们都是被伯希和先生等于汉学和中亚研究领域内发挥到了极致的西方历史语言学（语文学）传统的崇拜者，笔者的老师陈得芝先生和老师的老师韩儒林先生都是在这个传统下训练出来的优秀的蒙元史大家。韩先生有句流传极广的名言叫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写一字空”，显现了语文学家甘为学术做苦行僧的坚定不移的学术精神，这曾经是我们很多人的座右铭。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在中国的各个断代史研究领域中曾经是一个很强、很特别的学科，与当时整个学界要拨乱反正、而历史研究则重

点要反对以论代史的学术风气合拍，蒙元史研究的主流一直是站在历史语言学（语文学、考据学）这个高度，延续了韩儒林先生等老一辈蒙元史学家们所积极倡导的语文学传统，提倡十分细致、扎实的学风，强调蒙元史研究者必须要掌握汉语文以外的诸如蒙古、波斯、阿拉伯、西藏等语言文字，有能力充分利用多语种写成的历史文献资料，并重视吸收西方和日本学术同行们的研究成果，令自己的研究“预流”，具有国际化的水准。所以，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哪怕是从今天的“大元史”或者“新清史”的角度和主张来衡量，中国蒙元史研究的主流至少在利用非汉语文文献资料和具备国际学术视野这两个方面，均不落后于世界学术的水准，从事的也从来都是“大元史”的研究。

可是，最近这一二十年来，世界上先后出现了众多重新讲述蒙元史的著作，它们从世界史、全球史或者欧亚史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关于蒙元王朝的历史叙事。在这一套新的历史叙事中，蒙古对世界的征服被当成近代世界新秩序之建立的开始，或者说它甚至是全球化的开始。与此同时，蒙元王朝的历史被从传统的中国古代王朝不断变换更迭这一历史框架中挪移了出来，蒙元王朝是一个跨越欧亚、连接东西方世界的大帝国，它的历史意义相应地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提升，人们普遍地认为蒙元帝国的崛起整个地改变了东西方世界的原有格局，它为整个世界史创造了一个“蒙古时代”（和一个与之相连接的“后蒙古时代”），这个时代不再由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世界两个互相分离的世界组成，而是合成了以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蒙古时代对世界格局的这种改变影响巨大，它一直延续到了我们今天所生存的这个当代世界。这一套新的蒙元历史叙事，令人耳目一新，它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也反对汉族中心主义，在这个全球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的大时代深得人心，故引起了超越学术界的世界性反响。[3]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这一套新的蒙元历史叙事也出人意外地受到了广大读者们的欢迎和欣赏，这一类重新讲述蒙元史的著作都十分畅销。颇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蒙元史学家们不但没有能够参与到这一套新的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之中去，而且他们几十年来对蒙元史的研究和成果多少因为这一套新的历史叙事的出现而黯然失色，显得有点陈旧和落伍，甚至遭受忽视或者无视。用现在流行的一句俗话来说，中国学者似乎在蒙元史研究这一领域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了“话语权”。

对于这一套新的蒙元历史叙事对于中国知识界带来的巨大震撼和影

响，我们或可以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先生的一系列关于蒙古史、元史和中国北方民族史的通俗类学术著作的引进、出版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巨大反响作为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杉山先生应该说是最早尝试从全球史、世界史的视角出发，将蒙元王朝作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帝国而赋予其以新的历史定位和历史意义的一位著名的专业蒙元史家。他提出出现在中华本土北方的蒙古帝国本来是一个有着军事共同体传统的游牧部落，在成功征服和统治中华大地之后，拥有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一方面将中华作为其统治的核心地区，另一方面活用中华本土的经济、产业和技术力量，实行对东亚、中亚和中东、欧亚地区的军事扩张，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帝国。所以，他认为，"'元并非中国王朝'这一观念或许可以说是对错各半。但作为接收中华领土的结果，蒙古政权进一步充实、扩大了中华本土，这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也正因为这一点，蒙古以后的明清两代政权，才得以保持了辽阔的版图。而另一方面，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联合体，领土确实远远超过了中华国界，横跨了由四个属国构成的超大区域。或许可以说，在13、14世纪有关蒙古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一种二律背反的侧面"。[4]

因为杉山先生与中国的学术同行们有很深的学术渊源，所以，他的一系列宏观叙述蒙元历史的作品既激发了中国学者们的浓郁兴趣，同时也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刺激和挑战，故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争议。[5]杉山先生是中国蒙元史学界的老熟人，记得1986年秋在南京大学召开了首次国际蒙元史学术讨论会，当时的杉山先生风华正茂，不但外表年轻俊朗，而且他的远大的学术抱负也溢于言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当时国际蒙元史学界公认的后起之秀。作为日本蒙元史学界之青年一代的杰出代表，他受到了中国学术同行们热忱的欢迎和由衷的尊敬。当时大家对杉山先生肃然起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听说他已经搜集了波斯大史学家拉施特丁的历史巨著——《史集》的所有波斯文抄本，并正在着手整理和译注这部对于研究蒙古历史来说至关重要的波斯文历史文献。可以说，中国的蒙元史学者从清代学者洪钧注译《元史译文证补》开始，就已经具备"大元史"的学术眼光，一贯重视域外非汉语史料对于研究蒙元史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中国之学术与国际学术有了几十年的脱节，在当时中国的蒙元史家当中，还没有人能够直接利用波斯文文献，更没有自己去海外搜集所有现存《史集》波斯文抄本的可能性，所以，杉山先生当年所具备的这种卓越的学术能力和优越的学术条件令人望尘莫及，故格外受到中国学术同行们的推崇。令人想不到的是，近三

十年过去了，杉山先生让人期待已久的《史集》的精校本和译注本至今未见出版，但他却以他所建立的一套对蒙元历史的十分独特的新的历史叙事而名满天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蒙元史学界，这让他的中国学术同行们多少有点感到错愕和不解。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蒙元史研究可谓成绩斐然，其研究领域在不断地拓宽，对很多具体课题的研究也已经做得非常精细。几十年来，中国学者们也一直在追赶杉山先生的脚步，希望同样能够在利用多语种非汉语文献研究蒙元史这个领域内达到杉山先生这样高的学术水准，但这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能够达到的事情。按照杉山先生自己的说法，“在研究蒙古、元朝史时，只能说学习多种语言是必要条件”。“在进行蒙古时代史研究时，汉语、波斯语不消说，阿拉伯语、突厥系语、俄语、梵语-巴利语、藏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都必不可少。坦率地说，如果想鼓足勇气进行蒙古时代及其前后的历史研究，那一生都得进行语言学习。同时，当然有必要从世界各地搜集蒙古时代以前的各种历史、语言文献。我自己从儿时开始一直到今日的大约四十年间，每天都纠结于此。”所以，他认为“挑战研究蒙古时代史，或许根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事”。[6]不知道这是不是杉山先生最终改弦更辙，从对学究式的语文学研究的专注中突围出来，而全身心地投入重构蒙元历史叙事的尝试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在后一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显然盖过了作为一名曾被世界蒙元史学界寄予了厚望的出色的语文学家、蒙元史家的成就和影响力。

三

上述杉山先生于学术上的这种华丽转身，除让中国的同行们觉得惊讶外，同样也应该给人以启发，或许我们今天也应该把眼光放宽一些，或者也像杉山先生一样变换一下视角来重新审视和思考蒙元史，也来考虑一下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应当如何来讲述蒙元史，探讨一下蒙元史对于我们当今这个全球化了的世界的现实意义。

历史研究的进步与历史叙事的建构并不是同一回事，二者常常不是同步的。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或者话语的出现多半是与一个时代、社会的特殊的兴趣和关注相关，而并不见得一定要依靠优秀的历史学家的努力，也不见得一定是建立在优秀历史学家们所做出的扎实可靠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蒙元历史研究和蒙元历史叙事、话语建构这两者之

间，并不存在一条直接的通道。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的蒙元史家或已经把蒙元历史研究得很好、很专深了，可是，他们好像没有像别人一样尝试去把蒙元史这个故事讲得更好，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努力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为一种可以让非专业读者也能听得进去的历史叙事。与此同时，别人却正在讲述这个故事，而且已经建立起了有关这个故事的一套有影响力的叙事和话语。尽管别人讲的这个故事不见得一定正确，它与我们的研究成果也不一定相符合，但是，他们说的故事讲得多了，流传广了，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权威意义，并演变成为一套固定的历史叙事，随之而产生巨大的话语霸权。这样，我们自己不但失去了有关蒙元史的“话语权”，而且还会时刻受到这套既定叙事和话语的强烈的压迫和限制。所以，任何蒙元史学者在认真研究蒙元历史的同时，也应该对目前全球化或者全球史背景下出现的种种有关蒙元历史的叙事予以更多的关注，也有必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讲述这个故事，参与到全世界层面的有关蒙元史的叙事和话语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建立起我们自己对蒙元史的历史叙事和话语。

如前所述，中国老一代的蒙元史学者都相信“史学就是史料学”，觉得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所说的，“就像它实际发生的那样”（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来重构历史。我们曾经充分相信，只要我们把史料都找齐了、穷尽了，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弄清楚了，那么，这个我们所寻求的“历史的真实”就自然而然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尽可能地去寻找别人还没有利用过的新的文献资料，然后对这些资料进行仔细的整理和研究，从而对已经十分成熟了的蒙元史研究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当笔者初学蒙元史的时候，笔者就知道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对蒙元史研究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明白是大量域外的、非汉语文献资料的发现给元史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但是，于今天看来，这个层次的历史研究固然十分重要，应该说它依然还是蒙元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工作，但它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史料总有一天会被穷尽的，但历史研究是不会停止的，对历史事实的重构不但本身永远难以达到十分理想和完美的境界，而且它也不足以完全满足一个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并圆满地实现其从事历史研究这个职业的价值和意义。怎样从对历史事实的探求当中同时求得历史对于我们眼下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文明的意义？怎样构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表述和再现，并通过这种叙述建立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解释？这或许应该是历史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步骤。至少具备了这两个步骤，我们的历史

研究或方可达到司马迁所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

毋庸讳言，能够从前述历史研究的第一个步骤跳跃到第二个步骤，或者说能够同时兼擅这两个步骤的历史学家并不多见，而杉山正明教授则是蒙元史研究领域内一个非常少有和典型的例子。他同时重视蒙元史研究的两个不同层面，从学术生涯前期对多种语文能力之训练的执着和成就，到后来对建构蒙元历史叙事所做出的创造性的发明，可以说他在语文学和理论两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并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这对于一位杰出的蒙元史学家来说，无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京都大学访学三年期间（2002～2005），笔者和杉山先生曾经非常熟悉，常有来往。记得有一次晚上和他一起喝酒喝得多了一点，几近半夜时被他拉到家里去喝茶。我很惊讶地发现他家里的藏书和他办公室的藏书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世界。他在京都大学的办公室以前为羽田亨先生所有，据说京大著名的学术前辈如佐藤长先生等，即使在他们晚年到了杉山先生这间办公室门口依然会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起来，而它到了杉山先生这里则成了日本关于蒙元史或者说欧亚史研究的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因为它收藏了波斯文《史集》的所有版本。有几次，我在京大图书馆没找到的书，在他的办公室却全找到了，可见其名不虚传。可是，在他家里我看到他也有一间很大的书屋，其中堆满的却全是“岩波文库”一类的普及性读物，以及各种各样的理论类书籍。看起来，杉山先生在学校和在家里从事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研究，他同时驰骋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世界之中，而且皆得心应手、收放自如。

笔者曾经很冒昧地问杉山先生为什么他现在不专心做《史集》的研究了，他颇带自嘲和无奈的解释是，他目前已经和出版商签下了很多的出书合同，故暂时没法停下来做别的，他还必须继续写这一类面向大众读者的学术作品。但笔者猜想，杉山先生在学术取向上的这种巨大变化，很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即他对我们以前信奉的学术理念——研究历史就是要把历史像它过去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呈现出来——也产生了动摇。据说杉山先生给学生上课时，常常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像伯希和先生这样的一众超级学术权威，尖锐地指出这些权威们所犯的各种各样的错误。他大概觉得语文学的、实证性的历史研究最终还是很难达到十分精确和完美的理想境界的。即使是像伯希和这样不世出的伟大的语文学家、历史学家也难免会犯各种各样的低级的错误，所以，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是很难得到完全的保证的。事实上，语文学研究本来就应该是一

个前赴后继、不断进步的过程，后代学者依靠新的学术手段、凭借新发现的资料，可以不断地对其前代学者的研究和成果进行持续的更新和改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前一代人的学术正是后一代人学术之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但是，历史研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种再现和构建，它必须要建立在一种叙述和解释的框架和范式之上，每一段历史必须借助这些框架和范式才能被讲述、重现出来。所以，哪怕你能做最好的考据，当你要把它讲述出来的时候，依然还会受到某一种观念或者历史叙事模式的影响，更不用说它也可能会受到政治、权力和利益等世俗因素的严重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后现代史学对杉山先生或许曾经有过一定的影响，促使他实践了这种学术研究方向上的大跳跃。

四

几年前，笔者曾经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在讨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论历史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的翻译问题。我查阅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Die Geschichte ist Gegenstand einer Konstruktion”，相应的英文是“History is object of construction”，有人曾把它翻译成“历史是建构的客体”，另有人认为这译错了，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历史是建构的主体”。实际上，德文的原意很简单，说的只是“历史是一种建构的东西”，“Gegenstand”指的就是一种东西，并没有所谓“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历史或都是人为地建构出来的东西，没有纯粹客观的、不受任何观念影响的历史。这样的说法后来就成了后现代史学的一个主题思想，虽或被认为有点矫枉过正，但确实对史学家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也对今世的史学研究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不但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历史研究很难达到百分之百的精准、客观和科学，而且就是历史书写、叙事的范式、模式、框架等，它们也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学术工具，而是通常都连带着一种基本的历史观，它常常可以设定历史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基本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解释。

多年前，笔者曾经读到过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史教授Christian Wedemeyer先生的一篇讨论密乘佛教历史书写的文章，当时读来真的是振聋发聩，印象非常深刻，故以后常常会提到和用到它。这篇文章指出，我们一直长期在使用的一种历史叙事模式是黑格尔最早提出的所谓“有机的历史发展模式”，即认为任何一部历史就像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an organic process），它必须经历出生、成长、鼎盛到衰落、灭

亡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不管是研究希腊、罗马史，还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城市史、宗教史等，大家都必须遵循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于是，开国君主无一例外都是英明伟大、雄才大略的，而末代皇帝必然是荒淫无度、腐朽堕落的，所以这个国家才会由兴盛走向灭亡，完成它从出生到死亡的一个完整的自然过程。在这种有机历史发展观的影响下，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目的无非就是要从我们手中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中找出这种具体而又有规律性的东西，以帮助我们来描述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所经历的生、老、病、死这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譬如说，我们讲述印度佛教的历史，那么释迦牟尼出生是佛教的诞生，小乘佛教是成长，大乘佛教是鼎盛，到了密乘佛教则一定是腐朽衰落，要走向灭亡了。可是，密乘佛教最晚至少也应该在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它的起源实际上远比人们所设想的要早得多，虽然它常常被人与佛教的腐朽、堕落挂上了钩，但它实际上是一种十分精致、复杂的宗教信仰和修习形式，而且即使到了今天它依然方兴未艾，丝毫没有要消亡的迹象。显然，这个有机发展的历史叙事模式在佛教史的构建和叙事中是不合适和无法令人信服的。但很不幸的是，长期以来研究佛教历史的学者们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摆脱这种历史叙事模式的约束，所以即使是最好的语文学家也都难免不自觉地受到了这种叙事模式对他们的影响和限制，所以有意无意地要把密乘佛教的仪轨，如男女双修等，设想和规定为佛教进入腐朽、堕落之末路的象征。

Wedemeyer先生这篇文章中批评了很多当今很有名气的佛教语文学家，包括笔者在京都大学工作时的合作导师、杰出的印藏佛学语文学家御牧克己先生。Wedemeyer先生想借此说明的是，即使是像御牧先生这么优秀的语文学家，因为受到了这种有机历史观叙事模式的影响，严重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以致错误地认定了某部密教经典出现的年代。因为密教必须要到佛教衰落、灭亡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它不可能出现得很早，如果这部经典出现早了就和这种既定的历史叙事不相吻合了。[7]笔者想在其他任何历史研究领域里，我们也都会见到这类历史研究因受叙事模式的影响而出现种种类似的错误和问题的现象。

这种有机发展的历史叙事模式对于当代历史书写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在蒙元史研究中找到一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它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传统中对藏传佛教于元朝蒙古宫廷传播历史的叙述。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西番僧于元朝宫廷中所传的“秘密大喜乐禅定”、“演揲儿法”和“十六天魔舞”等藏传密教的修习仪轨，当成导致元朝

末年急速败亡的罪魁祸首，认为正是西番僧所传的这些实际上不过就是淫戏、房中术的藏传密法，彻底蛊惑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及其亲信大臣们的心，导致了元末宫廷的极端腐朽、堕落，最终使得蒙古人很快败亡漠北，失去了江山。显然，这样的历史叙事完全符合有机发展史观的叙事套路，与所有其他皇朝的末代君主一样，元顺帝的宫廷必然应该是腐朽、堕落的，而那些听起来很有异域情调的藏传密教修法不过是为历朝末代宫廷腐朽叙事提供了更让人觉得新奇、刺激的新材料。而把藏传密教修法巫化和色情化为淫戏、房中术，又完全符合这种有机发展史观下建构起来的佛教历史叙事，在这种叙事结构中，密教必然是腐朽、堕落的，它的出现即预示着佛教走向衰亡的开始。可是，我们近年对这段历史所做的文本研究却明确地告诉我们，上述“秘密大喜乐禅定”、“演揲儿法”和“十六天魔舞”等密教修法，根本不是在元朝末年才开始出现的，它们早在忽必烈汗建立元朝以前就已经由八思巴帝师亲传而在蒙古人中间传播开了，它们甚至早在蒙古帝国兴起以前就曾经在西夏王国内传播过，所以，这些密法的传播不应该是导致元朝骤亡的直接原因。而且，我们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还告诉我们，上述这些密教修法事实上大部分不涉及密教双修或者多修的内容，即是说，它们中的大部分与密教的双修法并无直接的关联，故不能将它们说成腐朽、堕落的代名词，并把它们作为佛教或者元朝走向衰亡的必然的原因。

显然，当我们表述和再现蒙元史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会受到各种历史叙事模式/范式的影响和限制，而当我们面对来自日本和西方的“大元史”历史叙事的冲击和影响时，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怎样的一种历史叙事框架来叙述蒙元王朝的历史，或者说我们应该从哪个视角、哪个立场出发来叙述和理解这个由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的历史以及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迄今为止，更多人主张的是从中国王朝更迭史的视角来叙述蒙元史，但也有的人主张要从蒙古族历史这个视角来叙述蒙元史，而眼下则有很多人更倾向于从世界史、全球史的视角或者从欧亚史、帝国史的视角来叙述蒙元史，他们各有各的一套说法，使得蒙元史的研究和再现变得十分丰富多彩。但是，这些角度不同的叙事和说法每每各有侧重、各有利弊，以致彼此之间形成了很多的意见分歧、冲突和争论，甚至牵涉到了当今蒙古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牵涉到中国古代历史的定位和当代中国的边疆归属等敏感和难解的问题。

于蒙元史研究领域，笔者自己长期从事的是元代西藏历史的研究，

对蒙元与西藏的关系有比较多的了解，也因此而深刻地体会到如何来叙述蒙元史，如何给蒙元史以一个合适的历史定位，对于研究和解释元代西藏历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对于蒙元时期西藏历史的研究，中外学界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如意大利著名藏学家Luciano Petech先生对这段历史的精湛研究，理清了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其成果绝对堪称世界一流。[8]中国学者中，也有像笔者的业师陈得芝先生这样世界一流的蒙元史大家，对这段历史从对蒙元制度史的整体把握出发也做过一系列非常出色的研究。[9]他们的研究明确表明，蒙元王朝有效地统治了西藏百余年，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并非从此所有人都会服从上述中外学术权威们所得出的这一结论，能够自然地接受从元朝开始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说法。相反，依然还常听有人问元史、蒙古史，跟“中国史”“中国”有什么关系呀？二者难道就是一回事吗？因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曾经统治了西藏，今天的西藏就应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吗？这些都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人在海外经常会被人问到的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与它们相类似的问题也经常出现于最近对清史的讨论中，清代对西藏、蒙古和新疆等所谓内亚地区的统治也是一个学界所公认的历史事实，可是“清帝国史”“大清帝国”与“中国史”“中国”又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清等同于中国吗？这大概也是有关“新清史”的讨论和争议中，最让人纠结和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说到底，掩藏在这些争议背后的一个更关键和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义“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来界定历史上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中国，如何来认识今日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形成历史的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对“何谓/何为中国？”这样的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大元史”或者“新清史”等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由非汉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的历史所建构的一套新的历史叙事的回应和批评。

不难发现，杉山先生率先提出的对蒙元史的新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从传统的“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的叙事框架中分离出来，转而把它放入全球史、欧亚史的叙事框架中来叙述，形成一种可称为“大元史”的叙事模式，这和近年来于中国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的“新清史”的观念大同小异，异曲同工。“新清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把清朝的历史从传统的基于汉族中主义史观的中国古代王朝史的建构中解放出来，然后从一个同时包括了一个“中国的帝国（汉人的帝国）”和一个“内亚的帝国”的跨越欧亚的大帝国的视角来叙述它的历史，由此而超越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传统叙事方式。所以，同样从不同的视角、层面

来看待蒙元王朝的历史，或者换一种方式来重新讲述蒙元史、建立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自己的关于蒙元史的历史叙事，这是一个因海外“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出现，而给中国的蒙元史研究者带来的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学术挑战。毫无疑问，中国的蒙元史学家们现在或许也应该从研究具体史实、具体问题的学术路径中暂时游走出来，大家也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大元史”和“新清史”的挑战、如何来重新讲述蒙元史、如何来重新建构我们自己对蒙元王朝的历史叙事。[10]但是，历史研究虽然需要，也难以摆脱今人的视角和关心，但它绝不能完全被今人的立场和观念所左右和支配，我们依然必须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放回到它们原来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分析和解释，而不能严格按照当下人们之政治、思想和利益的趋向和关注，把它们统统写成一部当代史，否则，历史学就必将失去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而存在的基础和必要。

五

前文已经提到，历史研究的进步与历史叙事的建构二者并不是同一回事，一种历史叙事或者话语的建构经常不是由优秀的历史学家们来完成的。于今日之世界，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叙述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莫过于美国的人类学学者Jack Weatherford先生，他的那本《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11]自2004年初版以来十余年间一直是一本世界级的畅销书，一版再版，至少已经发行了三十万册，具有十分持久的影响力，并且还被翻译成了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持续畅销、流行。而且，在随后的这些年间，他又相继出版了另外两本世界级的畅销书，即《最后的蒙古女王：成吉思汗之女如何拯救蒙古帝国》和《成吉思汗：比武力更强大的是凝聚力》。[12]今日任何人要谈论蒙古和蒙古的历史，大概谁也无法忽略他的这三部著作的存在。

可是，令人十分吃惊的是，这位Weatherford先生根本就不是一位专业的蒙古史学家，他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在他动手写作《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这部著作时，他是地处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Macalester学院的人类学系的教授和主任，是一位十分著名的畅销书作家。21世纪之初，笔者也曾在Macalester学院历史系教过一个学期的书，和Weatherford先生有过短暂的同事之谊。记得有一天，他专门邀请正在同州的Carlton学院人类学和社会学系教书的蒙古族学者纳日碧力戈先生和笔者一起吃晚饭，郑重地告诉我们他正在计划写作一

本关于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新书。当时我们听了以后觉得非常吃惊，问他以前研究过蒙古史吗，他说从来没研究过。笔者知道他写的前一本书是《钱的历史》，这是一本世界级的畅销书，笔者先前在学校橱窗里展出的在校教授优秀作品中见到过这本书，据说它已经被翻译成12种语言，后来他也曾经送给过笔者这本书的汉译本，读过之后对他汪洋恣肆的文笔有过极为深刻的印象，但书的内容基本没有进笔者的脑子。[13]而他最初的成名之作是一部研究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著作，题为《印第安施主们：美国的印第安人是怎样改变了世界的》，据说也曾风行一时，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14]

我们很好奇地问他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要写一本关于成吉思汗的书呢，笔者还历数了我自己所知道的各种成吉思汗的传记，还特别提到了俄裔德国学者、曾任洪堡大学汉学教授的Paul Ratchnevsky最初用德文所写的那本经典的成吉思汗的传记。[15]Weatherford很坦率和自信地告诉我们他想写这部书纯粹就是觉得成吉思汗这个人很有意思，而且蒙古人当年对世界的征服与近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有很大的关联，所以，这本书写出来就一定会很畅销。虽说他以前对蒙古史素无研究，但他计划花五年时间进行专心的研究，每个假期都去蒙古国做实地的调查，直接在蒙古人中间感受蒙古人的古代文化和习俗，五年以后就一定能够把它写出来。

虽然Weatherford先生当时说得很轻松，也很自信，而且他作为多部世界级畅销书的作者，他的出色的写作能力也是早已经得到了证明的，但笔者和纳日兄心里还是直犯嘀咕，觉得这位原先对蒙古史一窍不通的人类学家凭啥用五年时间就能写出一部让全世界都叫好的蒙古历史书来呢？因为笔者自己可以算是蒙元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逃兵，当时正是觉得从事蒙元史研究太难、门槛太高而不得不改做西藏研究的。正如杉山先生所说，仅仅学习和掌握研究蒙元史必需的多种语文就会消耗掉一位学者大半辈子的时间和毅力，更何况还要利用这些多语种文本在吸收众多前辈大师们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研究呢？而纳日兄则多次告诉笔者，他硕士毕业时曾去内蒙古大学求见中国蒙元史研究的神一级的大人物亦邻真先生，希望随他继续深造、工作，但亦邻真先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像他这样只有人类学背景而缺乏多语种语文学训练的人是做不了蒙古历史研究的。所以，我俩对能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都坚守着一份特别崇高的敬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以后正是这位Weatherford先生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蒙古历史专家了。

2004年的某一天笔者在美国的一个国际机场的书店里第一次看到了Weatherford先生的这部新作《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惊讶和佩服之情实在难以言表，他居然真的完全按照他的计划在五年不到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有关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之形成的世界级的畅销书。从那以后，笔者不止一次地开始阅读他的这部著作，但迄今为止一直未能平心静气地把它读完，心里似乎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我认识那么多的蒙古史学家，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位本来与蒙古史完全不搭界的人类学家Weatherford先生写出了这部目前世界上最畅销、最有影响力的蒙古历史著作呢？不得不说的是，与其说《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倒不如说它是专门为当代人量身打造的一部现代蒙古史诗。首先，这部书不是从书斋里产生出来的，它不是以文本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蒙古历史的，而是以所谓的“运动考古学”（Archaeology of Movement）的方法所做的研究，是骑在马背上追随成吉思汗的脚步、行程万里而感悟出来的一部著作，它具有明显的人类学的性质；其次，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中有一半并不是成吉思汗本人的故事，而是他的子孙、后裔们的作为，故说它是构建“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的历史是不恰当的；再次，作者于书中对成吉思汗的作为和个人品质做了能够完全满足当代读者之好奇和期待的设计和夸张，与历史上的那位成吉思汗本人的作为和品质相差很远。作者说成吉思汗在短短的25年内完成了比罗马帝国花了400年才完成的一项更伟大的征服事业，建立了一个于世界历史上举世无双、史无前例的伟大帝国，成吉思汗不但不是一位血腥、残暴的军事征服者，而是一位比欧洲或者亚洲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君主更加开明和进步的统治者、一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他不但废除了酷刑，摧毁了封建贵族特权制度，鼓励自由贸易，扩大了欧亚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往来，准许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地推动跨文化的交流，促使了世界文明的繁荣，甚至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因为不够称职而常懊悔不已的好父亲、一位尽管多妻多妾但富有爱意的好丈夫等。这样的一位成吉思汗实在可以是后现代人十分渴望拥有的一位理想型的世界领袖、一位千古一遇的转轮圣王。可是，谁敢相信如此出类拔萃的雄才大略和如此众多的卓越品质竟然都曾集中于成吉思汗这一位前近代的蒙古部落领袖身上。Weatherford先生在书中努力想说明，催生了文艺复兴、推动了近代世界之形成的很多观念和发明实际上都来自成吉思汗和他的后裔们，虽然这样的努力显然还不够成功，一时还很难为所有读者所接受，但至少从此人们将对成吉思汗及其所创立的大帝国、对他所留下的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遗产，以及对保留至今的蒙古民

族文化刮目相看，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Weatherford先生的成功让笔者不得不承认，对于蒙元史的研究和历史叙事的建构而言，它不只是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写一字空”的语文学家精神，而且还需要他们具备更宽广的视角和维度，历史研究除了要从其原初的历史语境中来揭示其历史的真实，也必须从当下的视角和关心出发来考察其历史定位和其于现实世界的意义。总而言之，如果人们能够调整一下视角、变换一种研究方法，那么，即使不是训练有素的专业的蒙元历史学家，或许也能够写出一部给我们这些专业的蒙元史学家们以新知和启发的优秀历史作品。Weatherford先生仅用五年时间就写出了一部世界级的畅销书，建构起他对蒙元历史的一种新的叙事，作为专业的蒙元史家，我们或也可以从他这里获得一些积极的启发。虽然我们绝不能把历史叙事与历史、历史叙事的建构与历史研究等而视之，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只研究历史而不关注历史叙事的建构，因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只是要揭露历史的真实，而且还要诠释历史的意义。

[1] 沈卫荣，清华大学中文系。

[2] 关于“约翰长老的王国”的传说及其在欧洲历史上的影响的著作非常丰富，可谓不胜枚举，兹仅列蒙古学家Igor de Rachewiltz（罗依果）教授的一部著作：*Prester John and Europe’s Discovery of East Asi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2）。此外，已故意大利小说家、学者Umberto Eco先生曾著作一部学究式的小说，题为*Baudolino*，发表于2000年，专门讲述“约翰长老”这个传说如何被制造出来的经过，故事委婉曲折，引人入胜。

[3] 这类著作很多，此仅列举其中几部比较有影响的作品，例如Jack Weatherford，*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roadway Books，2004）；Michal Biran，*Chinggis Khan*（London：Oneworld Publications，2007）；Timothy May，*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London：Reaktion Books，2012）。

[4] 《杉山正明谈蒙元帝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中华书局，2016，第176~177页。对杉山先生这种观点的评论参见吕正惠《杉山正明教授的中华文明观——〈疾驰的草原征服者〉〈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张志强主编《重新讲述蒙元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5] 杉山先生的通俗类学术著作大部分已经被翻译成汉文于近年出版，它们是：《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游牧民的世界史》，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蒙古颠覆世界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杉山先生唯一的一本纯学术的专著是他的学术论文集，『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東洋史研究叢刊、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这部论文集为杉山先生赢得了2007年日本学士院奖，这是日本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可他的这部著作在中国的学术界却并未得到重视，尚无汉译本出版。值得充分强调的是，杉山先生是一位十分有创造力，而且非常勤奋的优秀学者，进入21世纪以后，他的学术兴趣又转移到了对蒙古时代绘制的世界地图的研究，其中对包括汉文、阿拉伯文、拉丁文等多语种地图的研究；与此同时，他又参与了新成立的“日本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多个历史学与地球环境学研究的项目的前期规划和企划立案等工作，领导一批年轻学者参与该所所组织的绿洲项目、伊犁项目等大型研究课题，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也因此而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从事欧亚历史和人文、环境研究。他自己出版的成果也有很多种，例如，杉山正明「文明圏をこえて--モンゴル時代の世界像（特集 古典学研究——現代における古典学の役割）」『学術月報』53（11）、2000、1164-1168頁；杉山正明「東西の世界図が語る人類最初の大地平」藤井讓治·金田章裕·杉山正明編集）『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

[6] 《杉山正明谈蒙元帝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第183页。

[7] 参见Christian K. Wedemeyer，“Tropes，Typologies，and Turnarounds：A Brief Genealogy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antric Buddhism，” *History of Religions*，Vol.40，No.3，2001，pp. 223-259。此文的汉译文见沈卫荣主编《何谓密教？关于密教的定义、修习、符号和历史的诠释与争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

[8] Luciano Petech，*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The Yüan-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Rom，1990）.

[9] 参见沈卫荣《陈得芝先生与蒙元时期西藏史研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6辑，科学出版社，2014。

[10] 近年来，陆续有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回应海外“大元史”的讨论，参见罗新《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第165～174页；《张帆谈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第185～199页；张志强主编《重新讲述蒙元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11] Jack Weatherford，*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roadway Books，2004）。此书于2004年问世后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并一版再版。迄今为止，它的英文本至少已经再版了五次，其汉译本见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出版社，2006。

[12] Jack Weatherford先生在出版了《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接连又出版了两部有关蒙古历史的著作，都是世界级的

畅销书，它们是：*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Queens*：*How the Daughters of Genghis Khan Rescued His Empire*（Broadway Books，2011）；*Genghis Khan and the Quest for God*：*How the World's Greatest Conqueror Gave Us Religious Freedom*（Penguin Books，2017）。

[13] Jack Weatherford，*The History of Money* （Crown Business，reprint edition，1998）.

[14] Jack Weatherford，*Indian Givers*：*How the Indians of the Americas Transformed the World*（Ballantine Books，1989）.

[15] Paul Ratchnevsky，*Genghis Khan*：*His Life and Legacy*（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图本性质和绘制目的

杨雨蕾[1]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现存的朝鲜半岛最早的单幅世界地图，也是东亚地区留存下来的年代最早的单幅世界地图，集当时中国、伊斯兰世界和朝鲜半岛的地理知识而成，因为其确切的制作年代和丰富的内容备受关注。根据时为朝鲜议政府赞成事权近（字可远、思权，号阳村，1352～1409）所做的跋文，[2]可知该图制作于1402年，由朝鲜当时一品大员左议政金士衡、右议政李茂主导，并由检校李荟负责，根据元代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和清浚《混一疆理图》，增加朝鲜图、日本图制作完成。

相关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已展开，1910年，小川琢治对龙谷大学藏本进行说明，这也是首次在学界公开并介绍这一地图。[3]之后随着其他藏本在日本陆续被发现，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综合来看，迄今的讨论较多针对地图本身，涉及各图本的形式、来源、制作年代、制作特点、所载的地理信息等。近年来，该图的制作背景也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如日本宫纪子、中国汪前进、韩国林宗台等学者的一些讨论。[4]本文则基于相关研究成果，综合列述现存图本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图本的内容，并主要就该图的性质和绘制目的提出不同的看法，以期深化认识该图的特点，展现其在明代东亚国际秩序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从周边的视角理解明代东亚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一 图本的内容和性质

目前《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原本不知去向，今可知唯有日本现存有四幅摹本，均为彩绘：其一藏于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此本原藏于京都西本愿寺；其二藏于九州长崎本光寺；其三藏于九州熊本本妙寺；其四藏于奈良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其中前两本题有图名，图上部列出历代帝王国都，图下部有权近的跋文；后两本则无这些内容。一般认为，日本龙谷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本年代最早，为16世纪之前的摹绘本，当与原图最为接近；而本光寺藏本出现在龙谷大学藏本之后；本妙寺以及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的摹绘时间则在1549年之后（见表1）。

表1 现存《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四本比较

		龙谷大学藏本	本光寺藏本	本妙寺藏本	天理大学藏本
制作时间（推测）		1480~1534 年	1480~1560 年	1549~1567 年	1549~1568 年
尺寸		153cm × 163cm	219cm × 277cm	136cm × 170cm	136cm × 174cm
制作材料		绢本彩绘	纸本彩绘	纸本彩绘	绢本彩绘
图题、权近跋文、历代帝王国都		有	有	无	无
标注国都	中国	燕都、皇都	燕都、皇都	北京、南京	北京、南京
	朝鲜	朝鲜	朝鲜	汉城	汉城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国都	日本国都
	琉球	无	琉球国都	琉球国都	琉球国都
整体内容的特点		日本位置颠倒；非洲南部没有绘制岛屿	对马岛和壹岐岛位置正确	大陆北部绘有海岸线；南部海上诸岛多数绘出	大陆北部绘有海岸线；南部海上诸岛多数绘出

资料来源：本表主要参照吴尚学《조선시대세계지도와세계인식》（坡州：창비，2011，第 102 页表 1-1）之成果，并根据相关研究做一定修改制作而成。

以龙谷大学藏本来看，这幅图的地理范围横跨亚非欧大陆，东部绘制出日本、朝鲜半岛，西部绘制出非洲大陆和欧洲地区，北部到大泽（今贝加尔湖）以北一线，大陆南部海域则绘出渤泥、古里门、雁答蛮、马八儿等诸多岛屿。该图的中国底本从权近的跋文中可知是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关于李泽民及其《声教广被图》，元代乌斯道在《刻舆地图序》中论及李汝霖《声教被化图》，并称“舆地图”是在李汝霖图基础上绘制；[5]明罗洪先《跋九边图》则提到李泽民之《舆地图》。[6]有学者根据这些资料认为李泽民和李汝霖为同一人，泽民、汝霖盖一为名一为字，而上述《声教广被图》《声教被化图》《舆地图》也为同一图。[7]然而因为没有其他的文献记录对证，也没有相关图本传世，目前情况难以明确。

至于清浚（1328～1392），元末明初天台僧人。根据宋濂《天渊禅师浚公还四明序》、南石文秀《增集续传灯录》等文献，可知道他出生于台州黄岩，俗姓李，别号随庵，法号天渊。明叶盛（1410～1474）《水东日记》收录有清浚《广轮疆理图》的摹本。[8]从摹本作者严节的记载看，此图为清浚在元至正庚子年（1360）所绘，计里画方，原有“中界方格”，摹绘时删去，并修改了路府州的颜色和部分元代地名。[9]《广轮疆理图》东绘制出朝鲜半岛、日本，西南到通西、江头城，西北到阴山、瓜州以西，其西部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远不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值得关注的是，该图还有对外交通的说明文字。[10]学者对于该图是否就是《混一疆理图》看法不一。[11]不过两图作者

均为清浚，应该还是存有一定的关系。

就地图的主要内容而言，《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参照的是元时期的地图，所绘制的主体是元代的行政内容，包括路、州、府，乃至部分县，图上部“历代帝王国都”后也是在元代行省体制下列出部分宣慰司及其治所。汪前进分析龙谷大学藏本中这些宣慰司和行省的内容，认为这些资料基本反映的是元至正十二年到十六年（1352～1356）的内容，但也使用了“福建行省”“江东道”“淮西道”等当时已经废止的行政地名。[12]宫纪子则通过分析认为该图大致绘制出了1329～1338年的地名内容，[13]同时也指出其中没有反映元仁宗时期（1311～1320）变更的一些地名。[14]总体来看，学者们基本认同该图主要绘制出了元后期的地方行政内容。

不过需要注意，除上述地名，该图还存在之前不受关注的较为特殊的内容。首先是专门绘出“皇都”和“燕都”。“皇都”在南京，是明初建时的首都；“燕都”为北京，是明成祖作为燕王时的封地所在。“靖难之役”（1399～1402）后，初时首都仍在南京，1421年迁都北京。此无疑是朝鲜绘制者所增绘。根据权近的跋文，《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制作时间，正是在朱棣7月攻下南京废建文帝之后。所以特别标出“燕都”，可见朝鲜对此十分关注。其次东北地区标绘出金代的一些行政建置，如大金古都、女真南京、东京路等，尤其当为金上京的“大金古都”和“女真南京”，以与“燕都”同样的符号标绘。朝鲜半岛高丽时期（918～1368）奉行与宋、辽金同时朝贡的“二元”朝贡体制。而相对于之前的辽丽关系，金丽关系更为和谐稳定，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15]直到金为蒙古所破。地图中所出现的这些金地名应当并非中国底本所有，而是朝鲜绘制者所加绘的，显现出朝鲜对当时双方所存在的这种密切联系的认识。“燕都”也曾是金朝的中都，所以大金古都的标绘符号与燕都相同应该与此有关。

东北地区其他值得一提的是在东京路西部、两条大河之间的“五国城”。该地是“靖康之耻”后，金人囚系宋徽、钦二帝之处，遗址今人考证位于今黑龙江省东部松花江下游南岸、依兰县城北门外，是宋人心目中最著名的地名之一。元代虽有文人提及此地，但多为追念宋事的诗文，已全然无宋时期的情结。刘迎胜关注到图上这一地名的知识来源，探究后提出或与突厥语有关，[16]但这是基于此为元人绘制的认识。看《水东日记》所收录的元清俊《广轮疆理图》摹绘本，鸭绿江以北除了标

出“女真”，并无金代的行政地名；又《大明混一图》此处仅有“奴儿干”和“兀者乞例迷”。[17]所以“五国城”和前述金代的其他地名一样，应当均来源于朝鲜人的知识谱系和地理认识。实际上，15世纪朝鲜对“五国城”的故事多有提及。例如成宗二十三年（1492）一次有关《中庸》“鬼神章”的御经筵中，侍读官强调崇佛老无益时，便提及了终死五国城的宋徽宗；[18]燕山君三年（1497），有大臣台谏燕山君勿听信小人之言，以免造成国家混乱，为此特别提及宋代史事：“崇、观以下，宰相以调停之说，援引熙宁小人，相继复起，其势既盛，君子皆退，国政坏乱，二帝见执，卒死五国城，可胜痛哉？”[19]之后一直到18世纪对此的记载依然不断，可见“五国城”作为一个历史地名，对朝鲜所带有的政治警醒意义。

再次是在有关的地名附近标绘出“商都”“尧都”“舜都”“禹都”“秦都”“汉都”等曾为都城的说明。这无疑是和地图上方“历代帝王国都”的有关文字相呼应，具体化一些古都城所在的位置。最后就是“雍”“冀”“豫”“徐”“唐高昌国”“古西州”等历史地名。这部分地名除了雍、冀、豫、徐、梁等古九州名，西部大致从吐蕃之地和云南边外到印度河流域，唐代的地名尤为丰富，如唐瀚海军、[20]古伊州、唐燕然都护府、[21]古铁勒地、唐黑鲜卑等。姚大力认为这些地名的出现是因为该图绘制者对此地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被迫使用基本来源于此前一个“国际时代”，即唐代的资料，来填补图上的空缺处。[22]此说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图中还能看到其他一些历史地名，如西南思陵州附近有“古环洲”“古龙州”，镇远府西有“古夜郎且兰地”。这些地区同时还绘制有路府，不存在绘图者缺乏认识的情况。所以结合前面绘制历代国都的情况，再加上图中还绘出一些历史遗迹，如始皇庙、函谷故关等，应该说，该图具有一定的读史地图的性质，标绘出唐代地名实乃地图本身的性质使然。

该图的读史地图性质还可以从黄河河源以及洞庭湖的绘制中反映出来。作为最接近《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原本的龙谷大学藏本所绘制的黄河河源和《大明混一图》以及清浚《广轮疆理图》摹绘本明显不同，并没有反映出元代潘昂宵《河源志》以及朱思本河源书等相关文献的最新成果，即表现出星宿海、阿剌脑儿、忽阑河等河源所在，[23]而是延续了过去“河出昆仑”“导河积石”的观念。黄盛璋曾指出，中国唐以后古地图发展可以分为三个系统：贾耽系、朱思本系、清初测绘系。三系的分界恰恰都以黄河河源知识的发展为标识，判断古地图属于哪个系

统，河源部分的鉴定是很好的一个标准。[24]若以此来看朝鲜古地图，与《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地图》以及之后的地图属于朱思本系不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更多属于贾耽系，反映出历史时期对黄河观念上的认识。至于洞庭湖，可以看到地图上湖体明显，其内的地名有洞庭、巴丘、云梦泽、君山、青草。洞庭湖虽然与江北的古云梦泽没有关系，但因为位置接近，所以常常会被看作早在西汉就逐渐解体的古云梦泽的延续；而巴丘本是江南洞庭湖之古名，君山是洞庭湖中的一小岛，青草则是原本独立的湖泊，后与洞庭湖相合。这些可以说都是历史时期洞庭湖曾有的称呼。

二 “混一”概念之延续

前已述及，除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内容，《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基本上反映的是中国元代的世界地理知识，继承的是元代的世界地图传统，同时标绘出一些包括历代帝王国都在内的历史地名，带有读史地图的性质，且部分内容来自朝鲜绘制者的知识谱系。“混一”意为统一。南宋时曾刊行过《混一内外疆域图》，该图和《历代地理职掌图》的制作颇类似，“汇列区析江，而淮襄而蜀，河之南北，山之东西，若关四州，若陕五路，以至不毛之地，穷发之乡，隐抉显披无所匿”。[25]地图所反映出的南北一统局面，是时人面对宋室南渡现实的一种期盼。[26]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忽必烈东征西伐，最终兼并金、夏、西辽、宋、大理、吐蕃诸政权，完成前所未有之大一统，疆域得到很大扩展。《元史》中，“混一”通常用于元世祖，如《仁宗本纪》记元仁宗曾对侍臣说：“朕惟太祖创业艰难，世祖混一疆宇，兢业守成……”[27]《祭祀志》载：“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文宗凡七世，而南郊亲祀之礼始克举焉，盖器物仪注至是益加详慎矣。”[28]《舆服》则有记：“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远法汉、唐。”[29]由此彰显其最终一统不同制度和文化之力。

元代的地图似乎也多用到“混一”，除前述清浚的《混一疆理图》之外，还有《事林广记》中的《大元混一图》。该图为示意性质，标绘出37道，以及天竺、交趾、吐蕃界、鞑靼界等，右下角有“泛海之外，日出日没之地，小国万余见，今并皆混一”字。又，《翰墨全书》收录有《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其中有《混一诸道之图》。以上种种均显现元代的“混一”概念。明初一些地图采用“混一”之名，无疑是对元代这一用词的延续。

现存的同样具有元代世界地图特征的还有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明混一图》以及罗洪先《广舆图》中的《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大明混一图》绢本彩绘，纵长347cm，横宽453cm，所绘的地理范围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类似，东至日本、朝鲜，西至西欧、非洲西海岸，北至贝加尔湖以南。关于该图的成图时间，汪前进、刘若芳等依据中国部分政区地名的情况考证为1389年。[30]图上的地名原来均为汉文，清康熙年间贴上了对应的满文红签。至于《广舆图》中的《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这两幅图连起来就是一幅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地图，东起朝鲜半岛、日本，西面绘出三角形的非洲大陆，南部海域绘制出麻逸、三屿、浡泥、三佛齐、满剌加、马八儿等岛屿。

比较《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大明混一图》，整体上两者很相近，尤其是传统中国以外各区域的地理形态（除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无论是非洲、地中海部分，还是欧洲、中亚，虽然细节上存在差异，但基本的图形轮廓类同，只是《大明混一图》将印度绘成形状突出的半岛，《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则不明显。而《广舆图》的《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大明混一图》南半部的图形轮廓和内容也基本相似。由此这些地图存在一定的同源性，有学者也因此将之都归在“李泽民图系”中，认为它们继承了受伊斯兰地理学知识影响的李泽民图的描绘特点。[31]随着清浚《广轮疆理图》的发现，因为《广轮疆理图》在地理范围、内容表现方法等方面不同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种观点似乎进一步得到肯定，[32]学者还推测《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更接近李泽民之《声教广被图》。[33]然而，前已述及，有关李泽民的文献甚少，而且其所绘制的地图散佚，至今未见流传，所以其实很难做出确定的相关结论。但是很明显的是，《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与《大明混一图》等明初地图一样，延续着元代“混一”的概念。当然，此时的“混一”已更多超越王朝直接统辖之地的含义，而是在明朝建立朝贡体制的基础上将“天下”的观念纳入其中，扩展大一统的观念，展现出当时所了解的世界景象，因此也就成为那个时期的所谓世界地图。

再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上方“历代帝王国都”的文字，根据龙谷大学藏本的记录内容，可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元代政区下列出各朝各代的都城，二是在元代行省体制下列出宣慰司及其治所。所以实际上只有前一部分才属“历代帝王国都”，而后一部分只是当时的地方行

政区划。汪前进考证后发现“历代帝王国都”的部分和《事林广记》中“历代国都”内容基本相同，他指出其内容强调了王朝正统的史观，[34]这种看法不无道理。至于之所以列出元代行省、宣慰司等地方行政区划的内容，笔者以为很大程度上也是强调反映元代大一统之局面。

三 绘制目的

关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绘制的目的，宫纪子强调其具有彰显朝鲜王权的作用，汪前进认为是为太宗李芳远建立新政权而献礼，同时也为朝鲜王朝迁都汉城提供历史与理论依据。虽然该图的制作无疑具有称颂朝鲜王朝之本意，但是笔者以为这并非主要的目的。早在高丽恭愍王时代（1352～1374），罗兴儒曾“撰中原及本国地图，叙开辟以来帝王兴废、疆理离合之迹”，以为“好古博雅君子览之，胸臆间一天地也”，[35]并将地图进献给恭愍王。罗兴儒所撰之图并未有留存，从上述文献可知此图具有历史地图的特征，将此进献给恭愍王，供其一览天地，自颇有颂赞之意，不过更重要的恐怕还在“叙开辟以来帝王兴废、疆理离合之迹”，强调元代的兴盛和其疆理统合无疑是其应有之意。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制作在1402年，正是朝鲜王朝建立后的第10年。尽管朝鲜王朝建立之初，太祖李成桂积极推行亲明事大政策，多次派遣使臣出使明朝，希望获得明朝的支持和信任，但是这10年，朝鲜和明朝的关系却多有波折。先是明太祖严厉诘责朝鲜延续高丽末期诏谕女真的政策，并不惜以东征相威胁，后因朝鲜所上表笺用词而发生所谓“表笺风波”。[36]洪武年间，朝鲜一直没有得到明朝的正式册封。直到1398年，两国当朝的最高统治者先后退出政治舞台，双方的关系才开始出现转机。

这一年6月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其孙朱允炆登基，年号建文；9月，朝鲜李成桂逊位，让国于其次子李芳果，是为定宗。建文帝即位后，面对国内藩王林立的复杂局势和朝鲜的多次请求，开始积极促进和朝鲜关系正常化，不仅表示遵循太祖旧旨，让朝鲜“仪从本俗，法守旧章，听其自为声教”，而且表示“今后彼国事务，亦听自为”。[37]建文二年（1400），礼部主事陆颙、鸿胪行人林士民等人受命出使朝鲜，不仅对朝鲜礼义及事大之举称赞有加，还特别“赍赐建文三年《大统历》一卷，文绮纱罗四十匹”。[38]建文三年正月，建文帝打算向朝鲜“遣使赍印诰往正其名”。[39]然而朝鲜已在建文二年十一月，李芳远代其兄成为朝鲜国

王，是为太宗。考虑到朝鲜国君易位，“印诰则立者未定，未可轻付”。[40]于是直到陆颙、林士民使行回国，朝廷确定相关情况后，才又派出通政寺丞章谨、文渊阁待诏端木礼持节入朝，宣布诰命，赐以金印，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41]至此明和朝鲜终于正式建立册封朝贡关系。此次的册封活动，太宗两次宴请明朝使臣，前后礼节甚备，气氛也极其庄重，可以说是朝鲜开国以来的首次盛事。因为在朝鲜看来，得到明朝的册封才算真正完成了立国事业。

这应该才是朝鲜之所以绘制《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就在双方正式建立册封朝贡关系的第二年（1402）五月太宗诞辰日，朝鲜举行了颇为隆重的庆贺典礼，“各道观察使、节制使、巡问使进贺笺方物。议政府献本国地图”。[42]议政府进献朝鲜图无疑是表达对太宗治国的称颂之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具有一定读史性质的地图。朝鲜制图者以之前所能获得的颇能体现大一统格局和天下观念的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为底图，列出强调中原王朝正统和大一统局面的历代国都及相关行政区划，增加内容十分详细且形状与中原颇为类似的朝鲜地图，同时附以日本地图，不仅彰显明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所谓“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43]而且尤其反映出朝鲜在此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其和明朝的紧密关系。权近在跋文中写道：“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观图籍而知地域之遐迩，亦为治之一助也。”[44]由此亦可见该图的绘制很大程度上带有对明代天下秩序的称颂，是朝鲜王朝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历史和现实的展现。

这幅地图之后传入日本，从前述现存的彩绘本可知该图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被多次摹绘。摹绘过程中，制作者陆续对日本、琉球等地做出增补修正，同时对一些旧有的地理知识也做出一些修改，尤其是本妙寺藏本和天理大学藏本这两幅16世纪中叶的摹绘本明显详细化对海洋世界的描绘，即绘出大陆北部的海岸线以及多数南部海上诸岛。日本为何多次摹绘这幅地图迄今并没有发现具体的文字描述，过去也少有讨论。不过我们知道，就明代中国、日本、朝鲜东亚三国内部而言，虽然15世纪后半室町幕府已恢复和明代的外交关系，但是“应仁之乱”[45]后，日本与明朝的勘合贸易为不同势力集团所争夺，部分导致了1523年的“宁波争贡”事件，日本和明朝的外交关系和贸易活动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日本和朝鲜之间的贸易活动经常出现争端，如1510年的“三浦之乱”，[46]两国的外交往来和贸易活动也是日益衰

落。

至于东亚地区外部，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开启，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之后占领马来半岛西南端的马六甲，在整个东方商业活动中居有利地位，到1543年，一艘葡萄牙商船被吹至日本南部的种子岛，双方的直接交往和贸易活动渐次展开。1570年，长崎领主大村纯忠实行了港口的对外开放，日本与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所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作为当时东亚社会能提供最大范围世界地理知识的地图，在1570年前之所以被多次摹绘，且绘制时特别关注到海洋世界，极有可能就是日本面对与明朝、朝鲜不断紧张的外交关系和日趋衰落的贸易活动，意欲广泛了解世界，进一步拓展对外关系和海上贸易活动的举措。如果说朝鲜王朝制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出于其对明初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认同以及对自我所据重要地位的强调，那么西方大航海前后，日本对《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多次摹绘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出现的部分内在变化。

[1] 杨雨蕾，浙江大学历史系。

[2] “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燮理之暇，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观图籍而知地域之遐迩，亦为治之一助也。二公所以拳拳于此图者，其规模局量之大可知矣。近以不才，承乏参赞，以从二公之后，乐观此图之成而深幸之。既偿吾平日讲求方册而会观之志，又喜吾他日退处环堵之中，而得遂其卧游之志也，故书此于图之下云。是年秋八月日志。”文字据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本录出。参见权近《阳村先生文集》卷22，跋语类，《历代帝王混一疆理图志》，《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7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第220页。

[3] 小川琢治「近世西洋交通の以前支那地圖に就て」『地學雜誌』258卷160号、1910。

[4] 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7，217-279頁；汪前进：《〈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绘制与朝鲜太宗迁都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梨花史学研究》第45卷，2012；林宗台：《議政府의세계지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문화역사지리》第27卷第1号，2015。

[5] 《春草斋集·文集》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32册，第226页。

[6] 《念庵文集》卷10，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75册，第206页。

[7] 参见高橋正「“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再考『龍谷史壇』56、57、1969；杨晓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凤凰出版社，2010，第87页；高桥正《元代地图的一个谱系——关于李泽民系地图的探讨》，朱敬译，载《国际汉学》第7辑，大象出版社，2002，第386~399页。

[8] 根据陈佳荣的调查，《水东日记》有5个较重要的版本系统：一是明弘治间（1488~1505）常熟徐氏刻本，38卷；二是明嘉靖癸丑年（1553）叶盛玄孙叶恭焕以家藏本补刻本，40卷；三是明万历间（1573~1619）昆山叶重华刊本，40卷；四是叶重华赐书楼刻、清康熙十九年（1680）叶方蔚重修本，40卷；五是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标为两淮盐政采进本），38卷。其中康熙版未收录地图，嘉靖版和万历版地图相同，弘治版版刻略有不同，相比而言，乾隆版地图是简略摹本。宫纪子也论及明弘治间版、清康熙十九年版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见陈佳荣《〈水东日记〉版本及载录清浚广轮疆里图情形》，南溟网，2013年12月22日，http：//www.world10k.com/blog/？p＝1005，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29日；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20頁。

[9] 参见陈佳荣《〈水东日记〉版本及载录清浚广轮疆里图情形》，http：//www.world10k.com/blog/？p＝1005。

[10] 如在西南方面提到“自特摩（道站）入交趾界”，标出占城和（缅国的）江头城，提到由西南“北接西域天方诸国”。又，在东南的福建海岸外，明确标记有：“自泉州风帆，六十日至爪哇，百二十八日至马八儿，二百余日至忽鲁没思。”

[11] 宫纪子认为两者当为一图，陈佳荣则以为非也。参见陈佳荣《现存最详尽、准确的元朝疆里总图——清浚〈广轮疆里图〉略析》，《海交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7页；陈佳荣《清浚“疆图”今安在？》，《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2] 福建行省于至元十五年（1278）由福建道宣慰司改名而来，后经至元二十八年废省设司和二十九年废司立省，最终在大德三年（1299）确定为福建道宣慰司都元帅府，隶属江浙行省；江东道即江东道宣慰司，设立于至元十三年，1299年废罢；淮西道即淮西道宣慰司，设立于1275年，1299年废罢。参见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汪前进《〈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绘制与李朝太宗登基和迁都事件》，《梨花史学研究》第45卷，2012。

[13] 如洞庭湖以南的天临路、以北的中兴路是1329年分别由潭州路和江陵路改名而来；而位于大都北部的奉圣州和宣德州1338年8月已分别改为保安州和顺宁府，地图中依然是旧名。参见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7-9頁。

[14] 如1312年隆兴路改为兴和路、1316年元仁宗诞生地缙山改为龙庆州、1319年河南怀孟路改为怀庆路等在地图中都没有反映出来；而1322年陕西开城路降为开城州、1324年南宁路改名为邕州路则均有反映。参见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

[15] 参见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250～251页。

[16] 刘迎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五国城等地》，刘迎胜等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凤凰出版社，2010，第51～75页。

[17] 此处汉文地名根据满文发音转写“nu a gen”“u je gi li mi”而来。兀者乞例迷为女直军民府，又被称为“兀者野人乞例迷”，洪武二十年（1387）十二月始设，与三万卫同治斡朵里，在今珲春地区。参见李治亭等《明代辽东都司及其卫的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6期。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王桂东博士在满文认读上的帮助。

[18] 《成宗实录》卷261，成宗二十三年一月癸未。

[19] 《燕山君日记》卷24，燕山君三年六月甲午。

[20] 684年唐于庭州所设置。

[21] 647～663年唐为管理铁勒诸族而设立的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的前身。

[22] 姚大力：《“混一疆理图”中的南亚和东南亚》，刘迎胜等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第25页。

[23] 需要说明的是，本光寺藏本所绘制的黄河河源与之相同，但是本妙寺藏本和天理大学藏本则与之不同，反映出了当时的新认识。参见宫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31-38頁。

[24] 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第22卷第1期，1956年3月，第111～119页。

[25] 姚勉：《雪坡集》卷38《混一内外疆域图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84册，第262页。

[26] “地之有图，尚矣。周司徒辨封域，知广轮。姑勿论鄚、高密二侯开东西两都，汉亦以秦府所收图城楼。所披之图，为图非直，为观美也。伏波聚米而画山川，文饶建楼而筹险要，意类是。仆尝爱坡翁作《指掌图》，自分野画州。至我朝《元丰九域》，靡不载古今疆域之广狭，南北形势之分合。皆具一览四海，一日万古，盖天下奇书也。虽然此图建炎以前，可也。中更丙午、丁未之厄，龙渡江而南之，我艺祖皇帝与赵韩王雪炉之。所经营如高祖鄚侯之规者，已非复前日旧。而我高宗皇帝与魏沂诸公克意恢复，如光武高密之为者有指疆土，亦政有望于后之人也。士有志于天下国家，岂容诿曰度外事。仆尝过程君澥于西山，酒间出书一编，视其目，则曰《混一内外疆域图》。问其自，则曰，得之蜀，爱而刊之。其法如坡翁《指掌图》，汇列区析江，而淮襄而蜀，河之南北，山之东西，若关四州，若陕五路，以至不毛之地，穷发之乡，隐抉显披无所匿。伏历而阅之，某险可据，某罅可亘，敌情不可以遁也。某郡我境，某县我疆，故物不可以委也。仆为是可以续坡翁图，为二书，任人家国者，当人置一编几案。程君与仆同中癸丑南宫试，今兹行且入对上。方考图数贡，冀兴复

于君。宜进之，一览慨发睿衷。近之，则聚伏波之米，吾蜀可收奚扼吭之忧；筹文饶之楼，吾广可定奚干腹之病。大之，则鄚侯以一图而开赤帝子之火德，高密以一图而启白水真人之中兴，皆分内事也。是图岂直为观美哉。图之首编曰，禹迹六合掌运，必能运天下于掌。复禹之迹，而后可汉唐。四子，吾犹小之。宝祐四年，岁在丙辰二月初吉同年生姚某序。”姚勉：《雪坡集》卷38《混一内外疆域图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84册，第261～262页。

[27] 《元史·仁宗本纪》，延祐六年春正月己卯，中华书局，1976，第588页。

[28] 《元史·祭祀志·郊祀上》，第1781页。

[29] 《元史·舆服·仪卫附》，第1929页。

[30] 参见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第51～55页；刘若芳、汪前进《〈大明混一图〉绘制时间再探讨》，《明史研究》第10辑，2007，第329～355页。

[31] 参见高桥正《元代地图的一个谱系——关于李泽民系地图的探讨》，朱敬译，《国际汉学》第7辑，第386～399页。

[32] 参见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65-68頁。

[33] 参见姚大力《“混一图”与元代域外地理知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东方出版社，2010，第458～465页。

[34] 汪前进：《〈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绘制与李朝太宗登基和迁都事件》，《梨花史学研究》第45卷，2012，第25～29页。

[35] 《高丽史》卷114《列传第二十七罗兴儒》，第27页。

[36] 参见朴元熇《明初朝鲜关系史研究》，一潮阁，2002，第5～61页。

[37] 《定宗实录》卷1，定宗元年六月甲寅。

[38] 《太宗实录》卷1，太宗元年二月乙未。

[39] 《太宗实录》卷1，太宗元年三月乙丑。

[40] 《太宗实录》卷1，太宗元年三月乙丑。

[41] 《太宗实录》卷1，太宗元年六月己巳。

[42] 《太宗实录》卷3，太宗二年五月戊戌。

[43] 权近：《阳村先生文集》卷22，跋语类，《历代帝王混一疆理图志》，《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7册，第220页。

[44] 权近：《阳村先生文集》卷22，跋语类，《历代帝王混一疆理图志》，《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7册，第220页。

[45] 是1467～1477年室町幕府管领细川胜元和守护大名山名持丰等为将军继嗣问题发生争斗，结果细川得胜，日本自此进入战国时代。

[46] 三浦指朝鲜半岛熊川的乃而浦（济浦）、东莱的富山浦（釜山浦）和蔚山的盐浦。15世纪上半叶，朝鲜开放此三浦为对马岛和日本其他各地倭人来往贸易之地。到15世纪末，随着此三地聚居倭人数量的增加和私贸易的盛行，与当地朝鲜人时常发生冲突，为此朝鲜开始禁止倭人的私贸易行为，从而引发三浦倭人不满，于1510年得到对马岛岛主的支持发动叛乱，朝鲜史称“三浦倭乱”。因这一年为庚午年，又有“庚午倭乱”之称。“三浦倭乱”后为朝鲜军队平定，之后，朝鲜关闭了这三个贸易场所，两国一度断交。

认识偏差，态度摇摆：以壬辰战争时期为中心看朝鲜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特性

刘永连[1]

16～17世纪，伴随东亚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朝鲜外交政策亦充满变数。特别在壬辰战争前后，朝鲜王廷由于对当时国际关系环境产生了认识偏差，对明、日两国态度摇摆不定，政策一度严重失误，结果造成其本身损失惨重，亦导致东亚国际秩序动荡。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既可增进我们对传统中韩和东亚国际关系的理性认识，又能对我们认识和把握当前中韩关系和国际秩序产生借鉴意义。不过，关于这一时段的朝鲜外交至今尚待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在中韩关系史领域，人们一般比较关注两国友好的一面，多称道朝鲜对明“事大至诚”，并将两国关系评价为“典型性的朝贡贸易制度”，而忽视其丰富多样的层面和复杂多变的发展特点。正是从此出发，笔者专就壬辰战争前后朝鲜外交态度和政策问题进行探研，力图增进对古代中韩关系乃至东亚国际秩序的认识。[2]

一 壬辰战争前后朝鲜外交政策的变化

经14世纪末与明短期磨合之后，朝鲜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再度明确，对明、日亦形成稳定的交往政策。在此后近二百年里，朝鲜王朝作为明帝国的藩臣对明大致能尽“事大至诚”，同时遵守“臣子无外交”的宗藩关系原则，与日本等国保持一定距离。然而到16世纪末期，这一态势悄然发生变化。特别在壬辰战争爆发前后几年时间里，朝鲜先是出现了“背明通倭”的离心异动，后来遭遇战争威胁转而走向“事大抗倭”路线。由此，出现以下两个阶段、几个节点的政策变化。

1.沿“背明通倭”离心倾向的异动

本来明廷并不顾忌朝鲜与日本交往，有时反而鼓励有加，因为长时期内朝鲜与日本同是以明朝为核心的东亚朝贡贸易圈内的藩国成员。然而，自1546年起日本退出了这个朝贡贸易圈，朝鲜与日交往就变成了与圈外国家之间的外交。如果此时朝鲜仍与日通使，那就违反了“臣子无外交”的原则。16世纪末，朝鲜非但接纳并厚待倭使，而且瞒着明廷报聘日本，构成严重的离心倾向。

（1）倭使初来，贸然接纳

1587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阴谋对外扩张，派遣使节试探朝鲜的对日态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朝鲜王廷竟然在对日本国情和外交意图未做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就贸然接待了日本使节。该年十一月倭使橘康广等泛海而至，通报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消息，并要求与朝鲜通使。由于丰臣秀吉取代织田家族而立，弑其幼主，违反礼制，最初朝鲜国王尚能谨慎处事，认为“不可接待其来使，当以大义开谕入送”。然而在随后的廷议过程中，不少人却以为“化外之国不可责以礼义，使臣出来则依例接待为当”。[3]

这时有人提醒当政者提防日本阴谋。如侍读洪麟祥、参赞黄暹分析，丰臣秀吉刚刚建立政权，派人来使不过是想借重朝鲜巩固其权位。别坐李命生认为，丰臣秀吉“兽心难测，将来之患，未知如何，宜拘留来使，告于天朝”。[4]公州提督赵宪则指出：“以其君则凌暴而无忌，以其邻则修睦之永远者，自古及今必无之理。”如果接纳倭使，“其心必以为吾之兵力可以胁服上下，而朝鲜亦有南北丧师之虞”。“若因（秀吉）革命之威交使相贺，则国家亦必屈意从之，而矫诬天人之助，以骄于彼此，内掩放弑之迹，外索征求之渐，以为兴兵做贼之衅者也。”[5]另外，日本国书自称“东皇”，自署年号，分明欲与明帝国抗衡，而“天无二日”，朝鲜不可能同时尊奉两个宗主，与日通使属于违礼。为此，赵宪劝诫国王谨守侯度，奏报明廷，并指出遵礼之益，“若今具故显绝，而上告天王，则皇上亦必悦豫之深，以为圣主事大之诚，常谨于不睹不闻之地，宗系之改必促史馆印颁，不劳更烦陈请矣”。[6]

不过当政大臣又提出所谓疑虑：如果拒绝与其交往，将会“绝物而生乱”。还有人认为拒绝倭使为时已晚，因为其已“发轫向国，不可峻拒”。结果始终“未闻有倡议告绝之谋”，[7]朝鲜王廷决定接待倭使。

（2）瞒报倭情，厚待倭使

同年十二月，朝鲜王廷将倭使迎入汉城，安置在“东平馆”内，而且加以厚待；同时对赵宪、李命生等人的呼吁置若罔闻，反倒打定主意瞒报倭情，把明廷撇在一边。

据赵宪奏疏和实录资料记述，自倭使入境以来，朝鲜接待规格不亚于明朝使节，当局和接待官员也一概曲意逢迎，不敢稍有怠慢。倭使经

过闻清县界时，有桥梁突然崩塌而致其落水。当政者连忙将闻清县监赵宗道及尚州判官赵希澈等罢职。[8]星州八莒县惧倭使来，“色吏皆为逃散不现”，当局叱令宣慰使将其“拿致严拘”。[9]再后，日本使团中有猛平镰者在忠州被杂役小吏打伤，王廷又将忠州牧官、判官罢职，涉案人员一律严惩。

然而，朝鲜的一味厚待反使得倭使骄纵起来。例如，倭使在宴席之上故意抛洒胡椒等稀罕之物让朝鲜伎工争抢，导致宴席一度陷入混乱，随而猖言“此国纲纪已毁，几亡矣”，[10]对朝鲜国情冷嘲热讽。“今其馆待极厚，请宴之日（倭使）又问固要通价，而后乃始赴阙，不惟不能责其无礼，而方将为彼所制”，结果“道路供意，屡闻州县之竭；罍爵不丰，恐将行旅之伤”，朝鲜已出现供应疲敝现象。更有甚者，倭使“少不称意，怒形于色，以至杀我（此指朝鲜）市人，激我边患”，给朝鲜带来恐怖气氛。[11]

对于朝鲜王廷这种态度，赵宪颇不理解，“乃徒步诣阙，又裁一疏”，[12]深刻论述对日政策失误及其严重后果。他指出，“日本素称反复而无信义之国”，现在王廷厚待倭使，反而为彼所制，必将后患无穷。当务之急是处置倭使一行，须“亟发铺马而止之”，“如其不可，则继援之将，就差申恪、李宗仁等从事行阵者，分伏于归路要害处，以为万一援活之计”。[13]

对于这次倭使通使要求，朝鲜决定“但答其书契，而称以水路迷昧，不许送使”。[14]尽管尚未答应与日通使，但是朝鲜背着明朝接纳并厚待倭使，而且答复了丰臣秀吉国书，显然已经背离明朝，违反了宗藩礼制。同时当政者严厉打击持不同意见者，尤其将呼吁拒绝倭使和奏报倭情的赵宪流放到东北偏远的吉州之地，可见当政者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在“背明通倭”的迷境中愈陷愈深。

（3）有意报聘，私自通倭

戊子至己丑年（1588～1589），丰臣秀吉又两次遣使朝鲜，以出兵相威胁，强使朝鲜通好。特别是乙丑（1589）倭使入境，留馆半年之久，不但窥探朝鲜兵力虚实，而且因见朝鲜可欺而屡施恐吓，动辄以“兴兵犯境为辞”。[15]此时朝鲜当政者为倭人威胁所吓倒，担心“万一凶逆躁骄之竖，自知不容于礼义之邦，惭恨羞耻，一朝绝和，侵轶疆场，以释其憾，则他日边患有不可当”。[16]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国王李昖召集大臣边协等人讨论日本军情，惶恐追问倭船是否“有数三万出来之势乎？”[17]这时有人倡议：“我国近有旱贼之忧，民力疲尽，备御无策，须议通信之事可弭一方之兵。”[18]经筵官许筬认为，从为生灵安危、边境安全考虑，鲜日交聘“亦无不可”。[19]于是，王廷决定有条件地答应与日本通使：要求日本惩办前不久骚扰竹岛沿海的倭寇头目，并归还朝鲜被掳边民以及叛贼。

恰巧这次日本使者平义智正为维护对马岛利益而极力斡旋。见两国通交有望，随即痛快答应朝鲜条件，并说服丰臣秀吉将朝鲜叛民沙火同和几名倭寇押来，交给朝鲜处置。朝鲜以为取得了外交胜利，“朝廷动色相贺”，“赏义智内厩马一匹，又引见一行赐宴，义智、玄苏等皆入殿内，以次进酌而罢”。[20]左相李山海、右相郑彦信以及大提学柳成龙等趁机倡议与日通使，“启请速定，勿致生衅”。[21]次日朝会，众臣随声附和，建议借机观察日本动向。己丑（1589）六月，教令“黄允吉、金诚一差日本通信上、副使，许筬差书状官”；[22]庚寅（1590）三月，通信使一行启程。朝鲜私通日本遂成定局。

然而形势发展并非如朝鲜王廷所料。由于抱定对外扩张的野心，丰臣秀吉通使本来意在将朝鲜驯服为藩国，故而对其通信使刻意慢待，制造各种“违礼”事件，最后回复一封措辞傲慢、野心毕露的国书。辛卯（1591）三月，通信使黄允吉、金诚一还朝复命，使得形势明朗。这时赵宪再次上疏，强调“（日本）狼贪之欲实不在于一个使命，不过欲知山川险易、道路远近以为蹂躏我土之计”，[23]呼吁斩杀倭使，积极备战。

然而，朝鲜王廷企望侥幸避祸，照旧款待跟随而来的倭使玄苏等人，毫无备战之心。通信使复命时，尽管皆已明了日本侵略野心，但是出于党争动机金诚一竟然浪称丰臣秀吉“其目如鼠，不足畏也”，[24]谅其必不敢来。结果受其影响当政者随便派遣一二庸将巡视全罗道地方，弃庆尚道等战略要地而不顾，全无周密布置和准备。在“事大”问题上，朝鲜王廷仍然执迷不悟。辛卯（1591）三月，朝鲜从倭使玄苏等人处证实了丰臣秀吉的侵略计划，然又担心向明廷奏报倭情一会开罪于日本，二会暴露通倭隐情，结果主流意见坚持继续瞒报或观势缓报。可见，朝鲜“背明通倭”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2.向“事大抗倭”政策的转化

朝鲜这种政策被日本利用。丰臣秀吉看到朝鲜背离明廷甚远，一时

难以得到宗主国的武力保护，于是悍然出兵，击溃其军，焚荡其都，俘虏王子，践踏八道，在短短数月之内几乎灭亡其国。与此同时，朝鲜“背明通倭”之举给鲜、明之间造成隔阂，关于朝鲜通倭的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地传入中国境内，使得明朝上下对朝鲜产生各种猜疑。面对这一灭顶之灾，朝鲜王廷幡然悔悟，一方面迅速再向明帝国靠近，修复关系，请兵援救，另一方面与日本决裂，积极抗倭。这是朝鲜向其“以诚事大”政策的回归。

（1）议报倭情，恢复沟通

辛卯（1591）三至五月，由于战争危险业已逼近，主流态度出现反转。大司宪尹斗寿首先倡议，朝鲜历来“事大至诚”，倭情一事关系明朝安危，不该隐瞒，“当直上闻为是”。[25]副提学金睟认为丰臣秀吉乃狂悖之人，“其言出于恐动，未得实状”，如果以其不实之言上奏明朝，恐怕会引起日的仇恨和侵犯。兵曹判书黄廷彧则驳斥金的看法，认为只要陈奏倭情，提前准备必定无害，况朝鲜事大明朝二百年，一直“忠勤至矣”，焉有不报之理！[26]

不过，承旨柳根认为事情颇难处理，稍有不慎则“惊动天朝，致怨邻国”，照实禀奏恐怕会产生很多不利因素，“从轻奏闻似当”。这一建议获得领议政李山海、右议政柳成龙等人的赞同，遂决定借口收到逃自日本的朝鲜百姓金大玑的报告，将日本计划发兵外侵的情报通报给明廷。同时强调措辞一定要谨慎，不要让日本方面产生“狠怒”情绪。[27]

五月初，朝鲜决定派遣圣节使金应南出使明朝，相机奏报倭情。临行前，备边司官员告诫金应南，如果明廷无所觉察，就“停止咨文，切勿宣泄”。[28]这一举动显示出朝鲜态度仍有模棱两可之处，实乃观望时局，以求利好。不过四月朝鲜已在国书中规劝日本“交邻以义”，不要“假道入明”。这时平义智又提议“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鲜为之转奏，则岂不幸甚？不然则两国失和，民兵多死”，[29]朝鲜亦断然拒绝回书。可见朝鲜态度和做法还是有了一定转变。

（2）前后辩诬，澄清谣言

就在金应南出使前夕，关于朝鲜“通倭”的各种消息已经传入中国。朝鲜史料记载：“辽东八站民，一日无故相惊曰：有寇从朝鲜至，朝鲜王子十亭轿子到鸭，传相告语。老弱登山，数日乃定。我国使臣，自北京

还宿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鲜译官谓我曰，尔有三年酒五年酒，毋惜为也，不久兵且至矣，尔辈虽有好酒，谁与共饮之。以此辽人疑朝鲜有异志，多所荧惑矣。”[30]朝鲜已有人泄露了倭情，使辽东首先警觉起来。金应南一入辽东，当地民众“一路哗言朝鲜谋导倭人入犯”，对朝鲜使节充满警惕和敌意。金应南见势不妙，“即答以为委奏倭情来”，才使“华人喜闻，延款如旧”。[31]

辛卯（1591）七月，金应南到达北京。恰有中国商人陈申的情报传来，声称倭寇“令朝鲜为之向导”，将要侵入北京。琉球则报告：“朝鲜亦已屈伏，三百人来降，方造船为向导。”[32]明境瞬间“国言喧藉”，疑云密布。见事危急，金应男迅即递交准备好的倭情咨文，并阐明朝鲜立场。在其解释之后，方得“群疑稍释”。[33]

九月，又有旅日华人许仪后向福建督抚传递了一份关于日本谋划侵略战争的情报，披露了朝、日交通和日本外犯的诸多细节，如云“今秋七月初一日，高丽国遣使入贡为质，催关白速行”[34]等。明廷为之震惊，迅即质问朝鲜通倭之事。朝鲜王廷狼狈之至，被迫于十月再派陈奏使韩应寅入京辩解。由于通倭隐情已无法掩饰，朝鲜辩称为了刷还人口或者侦探倭情而不得不偶尔派人赴日；继而诉冤：“自臣祖先有国，世笃忠顺敬畏。”“乃以向导之名归之，言亦丑辱，臣何不幸！”[35]基于二百年友好关系，明廷宁信其真，反过来对朝鲜慰奖有加。朝鲜遂加派谢恩使申点入明，“令奏倭情，比前加详”。[36]朝鲜态度大有转变，双方关系亦趋融洽。

壬辰年（1592）四月，壬辰战争爆发，朝鲜在倭寇凌厉攻势下官兵一触即溃，国土迅速失陷，但其王廷担心明军入境不好控制，迟迟不向明廷求援。这时传言又起：“朝鲜与日本连结，诡言被兵。国王与本国猛士避入北道，以他人为假王，托言被兵，实为日本向导。”[37]五月底明廷派崔世臣等入鲜勘查，朝鲜本想将其敷衍过去，但风言日炽，舆论汹汹，已经逃至平壤的国王不得不接待明使当面辟谣。

六月中旬，朝鲜八道尽失，国王向明朝请求内附避难。当时辽东都司率先起疑，“朝鲜号称大国，世作东藩，一遇倭贼，至望风而逃”，怎么这种败法？再者，“倭奴谲诈异常，华人多为向导，若携诈阑入，贻害非常，则作何处置？”[38]兵部尚书石星亦曾质问朝鲜使臣：“你国乃天下强兵处，何以旬日之内，王京遽陷乎？”[39]为此，辽东都司和明廷兵部先后派遣专人勘查朝鲜国王真伪。至此危难时刻，朝鲜不得不真正郑重

应对，让明朝彻底了解实情，乃至国王面对明使哭诉遭难实情，终于洗清了导倭入犯的嫌疑。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关于朝鲜通倭的各种谣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明、朝两国之间形成严重的隔阂，这都是朝鲜背明通倭的恶果。不过，朝鲜当局由被动敷衍辩解到主动澄清事实，明朝亦屡次询问勘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宗藩关系，为明、朝联合抗倭铺平了道路。

（3）诚心请兵，佐谋抗倭

由于亡国危机袭来，朝鲜不得不派使求援。在李恒福、李德馨大力倡议下，朝鲜王廷被迫排除顾虑，于五月初“遣人移咨辽东，告急请兵。此请援天朝之始也”，[40]同时派出圣节使柳梦寅，兼向明廷告急。

查清倭寇入侵实情后，五月十五日辽东都司就已派出参将戴朝弁、先锋游击史儒带兵1029名、马1093匹渡江入朝，着手支援。不过由于屡受假王导倭等传言干扰，明廷对于是否大规模派兵援朝争议激烈。于是，明廷派人勘查虚实，朝鲜亦再派两拨使臣，一由李德馨到辽东都司，一派郑崐寿到北京，算是专门请援。这段时期朝鲜“请援之使络绎于道”，[41]不过最为主要的是郑崐寿的请兵活动。

九月二十日，郑崐寿到达北京，迅即通过与石星“相厚”的玉河馆副使施允济求见兵部尚书石星。石是主战派领袖，亦主动通过施允济索求朝鲜陈奏草本，并招通事李海龙询问战况。廿八日，郑得见石，“痛哭一场，恳乞兵马”，而石亦为之动容，“泣下沾襟”。然而反战派气势正盛，强烈抨击主战言论。石星遭到弹劾，以至于无法坐堂办公。直到十月中下旬，明廷通过多次派使勘察朝鲜战况和听取朝鲜奏报倭情，对倭兵来犯的情况有了准确的把握，同时阁臣赵志皋等强力主战，石星亦“自请东征，词直义壮”，明廷遂决定大举东征。郑崐寿趁机再见石星，为其指点朝鲜地理，佐助谋划战略，而朝鲜王廷亦开始尽力筹措粮饷，使得明廷很快做好出兵准备。

至此，朝鲜为了抗倭大计最终又与明朝走到一起，修复了宗藩关系，回归到“忠诚事大”的轨道上来。

二 朝鲜外交的摇摆性特征及其背后因素

考察这一时期朝鲜的对外交往，可知其态度和政策变化巨大，呈现

出“摇摆性”特征。

1.何谓“摇摆性”特征？

首先，它在内涵上包括了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朝鲜在宗藩关系和朝贡贸易体制内固守本分，显示其遵循“事大”礼仪，同时与日本保持一定距离的向心态势；另一方面，则力图摆脱朝贡贸易体制和宗藩关系向外游离，显示出其笼络日本、背离明廷的离心倾向。

之所以言其复杂，是由于这两个极端对立的层面经常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例如，在面对日本通使要求时，朝鲜王廷一边在其欲纳日本为藩国的企图促动下毫不犹豫地接待了倭使，一边则在华夷观念的影响下认为日本是不可交往的篡弑之国。再如，在明确丰臣秀吉外犯企图和计划、商讨准备向明廷奏报倭情时，它一方面重拾对明“事大”的基本礼仪，决定派出使节奏报倭情；另一方面又不打算明确和彻底地说明实情，生怕泄露其通倭内情，暴露其经营秩序圈的隐情，而妨碍其发展大计。

其次，它在时间上表现出朝鲜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的变化特性：在与明、日关系正常化的时段特别是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其向心态势稳定，由此号称“事大至诚”；然而至16世纪末，它则明显朝离心方向游走；与日关系破裂、壬辰倭乱爆发使其面临亡国危险之际，则又迅速回归，向宗主国靠拢。

比较突出的是，朝鲜的外交态度经常是首鼠两端，频繁摇摆。例如，从最初朝鲜国王打算拒绝倭使入境，到王廷决定接待倭使，巨变竟在一天之内；从很多人反对而不打算与日本通使，到王廷决定派出通信使，前后也是很短的时间。再如，辛卯（1591）五月朝鲜委任圣节使金应南奏报倭情，金出发时备边司又嘱其先观察形势，不到明人发觉就干脆隐瞒不报。

如果扩大范围来看，我们会发现朝鲜外交摇摆的态势并非仅限壬辰战争时期。在17世纪早期建立起来的光海君政权，尽管刚得明廷再造之恩，但推行背离明朝通款后金的两端外交。十几年后仁祖反正，则转化为表面上屈服于金（清）而内心亲近明朝的外交策略。如果再远一点看，王氏高丽末期就曾在亲近北元或投靠明朝之间数次游移。在前后其他诸多时段，朝鲜处理诸多外交事件也曾呈现出不断摇摆的态势。

因此，“摇摆性”亦算是整个朝鲜外交政策的明显特征。

2.朝鲜外交为何摇摆？

在朝鲜外交摇摆的背后，深藏着多种影响因素，主要可由以下三点来认识。

（1）经营自身华夷秩序圈的潜在动机使其“背明通倭”

关于朝鲜经营自身小型华夷秩序圈问题，学界成果已多。其中刘永连等曾将其与具体的朝鲜外交活动和政策结合起来研究，如以庚寅通信为例考察壬辰战争前夕朝、日之间矛盾激化的背后原因，认为朝鲜以改使号等方式继续与日本私自往来，暴露了其不甘于藩国地位，而力图建立自身小型华夷秩序圈的内在动机。[42]如果考察壬辰战争前夕朝鲜对日政策及其一系列活动、措施，我们就可发现其背后一直隐藏着这种动机。

当倭使初次入境之时，朝鲜当政者认为“化外之国不可责以礼义”。这颇类似中华帝国看待四夷的态度，俨然一副宗主国的高姿态。考察朝鲜发展史，可知其在自视为中国藩臣的同时，亦视其周边民族或政权为蛮夷，女真、对马乃至日本、琉球在其眼里都是“野人”或野蛮国家。在日本游离出明朝主导的“册封-朝贡”体制之后，朝鲜认为日本“自甘为夷狄”，自然亦视其为“化外之国”，不能与自己同等地位。有些人反对接纳倭使，认为“日本臣逐其君而我受之”，是“侮辱我礼仪之君臣”。尽管其主张与当政者相左，但其自视甚高的心态并无二致。正是基于这种自以为宗主国的心态，朝鲜内心充满将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民族或政权纳入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型华夷秩序圈的冲动和欲望。

后来朝鲜报聘日本，则是将其冲动和欲望付诸实施的重要表现了。兹有直接证据可见，如对于庚寅（1590）之行，朝鲜王廷自称“传命”。“传命”何意？传达王命也。朝鲜把日本当藩属，意甚明了。之前刷还之事，本属朝鲜要挟，而在平义智周旋下得到日本积极奉行，在朝鲜看来日本已经屈节，认同了藩属身份。因此朝鲜王廷倍觉体面，痛快遣使。再如，朝鲜使节到达日本国都后拒绝观光丰臣秀吉凯旋仪式，拒绝为日方活动派出乐队演奏，拒绝以贿赂途径早见丰臣秀吉，亦完全以“传达王命”的姿态与日交涉。通信副使金诚一明确表示：“堂堂大国之使，奉圣主明命，不能宣扬威德，使之稽颡于朝台之下，其屈辱亦已大

矣。”[43]可见朝鲜使臣亦以传命姿态出使日本，期望使得日本俯首归化，经营其华夷秩序圈的意图表露无遗。

不过，朝鲜毕竟处在以明朝为核心的东亚华夷秩序圈内，而其自身也一直把自身小型华夷秩序圈置于东亚华夷秩序圈框架之下，因而朝鲜不敢将其经营华夷秩序圈的努力表露出来，而一直暗藏于内心，或私下里实施。庚寅通信过去之后，朝鲜王廷一直隐晦不露。即使面临明朝上下各种和多次质疑，而自己到了亡国关头需要紧急救援，甚至在请来大军而需要协同抗倭的时候，朝鲜王廷也不肯坦白出来。

（2）认识偏差导致朝鲜自招祸乱，迫使其回归“事大”

刘永连等曾就庚寅通信事件初步分析了朝鲜与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认为朝鲜和日本都存在经营自身华夷秩序圈的企图，在外交过程中各自抱定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感，而意欲将对方纳入自身的华夷秩序圈，由此导致庚寅通信过程中发生多次的礼仪冲突。[44]同时从赵宪五篇奏疏来考察，刘永连指出，朝鲜王朝多年执念于这一企图，在“背明通倭”道路上愈走愈远，使日本赢得了出兵侵略朝鲜的机会。[45]如果进一步深究这一时期朝鲜在外交上的认识偏差问题，则可以从以下三点来分析。

一是对日本国情的认识不足。从全国上下将日本视为“化外之国”等表现可知，朝鲜对日本同样上千年来大力吸收中华文明成果而不断进步的国情认识不足，更不了解华夷秩序扩大化在日本的重大影响及其态势和性质。其实日本早就私以“中国”自称，而视虾夷、奄美等为夷狄，视新罗、渤海等为藩国，并尝试从制度上构造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型华夷秩序圈。[46]特别是在与朝鲜关系上，认为朝鲜历来臣属日本已成观念。如川口长儒《征韩伟略》开篇即引《日本书纪》云：“往古朝廷之盛，三韩朝贡。其服也，绥怀抚安；其叛也，征讨声罪。或置日本府其地以统驭，遇之以藩国之礼。”而朝鲜最难意料的是日本经营自身秩序圈的野心更强，力度更大，而且方式不同。在日本所谓中华概念里，不仅仅吸取了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成分，而且以其神道思想为基础，宣扬日本中心主义，崇尚武力征服。[47]到16世纪末，重新统一起来的日本已打算挑战明帝国建立起来的庞大华夷秩序圈，出兵朝鲜是其计划中既定方针和必要环节。

二是对丰臣秀吉的错误评价。在壬辰战争前夕，朝鲜对丰臣秀吉个

性知之甚少。赵宪等少数人蔑视其为弑君贼子，觉察其可能武力外犯，然对其战国枭雄之个性、野心以及掌握的军事实力缺乏准确考量。而作为使者曾亲眼见到丰臣秀吉的金诚一等，竟然浪称“其目如鼠，不足畏也”，可见会给朝鲜造成多么严重的误导。由此可以理解，朝鲜王廷为什么即使在获悉丰臣秀吉出兵计划之后仍然未予以足够重视，而只是派遣一二庸将到全罗道巡查，弃庆尚道等更为重要的关口而不顾；而当遭遇倭寇凌厉攻势的时候又是如何惊慌失措，望风溃散，短短数月之内几近亡国。

三是对“背明”后果缺乏估量。在经营自身秩序圈的过程中，朝鲜除因私纳女真部落受到明朝边将和使者的一些质问外，长时期内并未引起明廷的激烈反应。这给朝鲜意识造成某种惯性，私下通倭时未能预料其严重后果。然而，尽管自嘉靖年间起中日两国中断了朝贡关系，但借助密切的民间往来仍然分享着同一个“世界”。朝鲜通倭尽管做得隐秘，然而还是很快就通过辽东、福建、琉球等地民间往来风传到北京。加上各种传播者的各种理解和摹写，类似朝鲜“导倭入寇”的信息不断涌入明境，结果使得明朝上下震动，猜疑重重，引发明朝“信任危机”。[48]这一危机严重妨碍了中朝沟通协调，使得御倭反应迟钝；而同时倭寇乘机猛进，摧残八道，几乎占领整个朝鲜。

正是这些认识偏差和政策失误，使得朝鲜自招祸乱，堕入危难。为了挽救国家，朝鲜不得不转变态度和政策，积极向明廷靠拢，重返“事大”轨道。

（3）国家利益是朝鲜外交摇摆变化的始终轴心

陈尚胜曾从明朝对壬辰倭乱的反应出发，指出明朝大举东援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国家利益重于“字小”情怀。[49]孙卫国、解祥伟在分析明鲜信任危机根源时指出朝鲜决策将“国家利害”置于“事大大义”之上。[50]如果审视朝鲜从背明通倭到回归“事大”的摇摆变化，那么国家利益就是朝鲜外交政策变化的始终轴心。

朝鲜王朝的国家利益因其个体特征而复杂。作为长期处在大国强国夹缝中的弱小国家，一方面其发展欲望比之其他国家强烈得多，另一方面其危机意识也比其他国家严重。可以说，生存和发展是其最为主要而且至高无上的利益。因此，尽管它由于处在宗藩关系体制中而不得不行“事大”之礼，但是在发展欲望驱动下更为重视经营其自身华夷秩序圈

的目标。这就是朝鲜背明通倭的最深动机。不过，当其发现根本无法实现将日本纳为藩国的目标，相反招来日本武装侵略而面临亡国之灾的时候，为了获取明帝国靠山之力，它不得不重新回归到认真“事大”的轨道上来。由此看，无论私下通倭，还是回归“事大”，都是为了更为重要的国家利益，无论外交政策怎么摇摆，都离不开其国家利益这一轴心。

余论：重新认识16～17世纪明朝关系及东亚华夷秩序

考察壬辰战争前夕朝鲜外交之变化，我们获得了比前人研究更为丰富的认识。进而探讨东亚政治秩序下的朝鲜外交之常态和规律，笔者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思考。

1.全面看待16～17世纪明朝关系

关于中朝国家关系研究今天可谓硕果累累，对于16～17世纪的明朝与朝鲜关系论述尤其之多。该时段是中国与朝鲜宗藩关系最为稳定和友好的时期，以至于学界主流认为朝鲜王朝对明帝国“事大至诚”，将其朝贡关系称为“典型性朝贡关系”。不过，历史问题客观上的内容往往远比我们的主观认识更为丰富，认识上失之全面就会导致以偏概全而无法准确把握问题实质。为此，在了解朝鲜王朝对明帝国“事大至诚”的一面后，我们不应疏忽其“事大”不诚的一面，由此可看到朝鲜外交以自身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和标准，无论对明、日态度和政策如何变化都不会偏离这一轴心。这样，我们看待其朝贡关系也不会简单化，即使相比之下这种朝贡关系更为密切和友好，但是仍然存在矛盾、隔阂，有时不乏猜疑、背离乃至激烈冲突。这一朝贡关系好像也不是册封、入贡等内容所能概括的。在遵守册封、贡赐这些常规礼仪之外，也需要其他手段来解决诸多负面问题。例如，当朝鲜“假王”“导倭”等谣言风传的时候，明廷会主动派出使节质问、勘疑；而当明廷误会和猜疑的时候，朝鲜也会想方设法辩诬或谢罪。

2.对传统东亚华夷秩序的再认识

进一步看传统东亚政治秩序，可知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框架之下，朝鲜、日本等国也在分别经营以其自身为核心的各种小型秩序圈，并且伴随华夷观念影响加深和其发展欲望的强化华夷秩序扩大化现象亦愈加突出。如果从内容结构上看，传统的东亚政治秩序其实是多圈

层的，只不过这些小的圈层特别是朝鲜所要构建的秩序圈有许多想象成分。由于其主观与现实的距离有时相差甚远，导致其认识偏差、政策失误，结果带来壬辰倭乱等巨大的祸患。如果从时间脉络上看，16～17世纪华夷秩序扩大化态势逐步严重化，出现了日本脱离朝贡贸易、朝鲜背明通倭等离心乃至解体现象。那么，传统的东亚华夷秩序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到了19世纪晚期才瞬间解体的，而是有着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接续着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并予以深远的影响。日本构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朝鲜遭到日本吞并和殖民统治，这些变化背后都有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外交认识和态度的习惯之影响。

为此，我们有必要充分认识传统明朝关系及东亚秩序的复杂性和变化特征。

[1] 刘永连，暨南大学历史系。

[2] 本文主要考察1587～1592年这一时段，亦涉及17世纪早期光海君至仁祖朝。

[3]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卷21，宣祖二十年十一月丁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1968，第21册，第439页。

[4]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卷21，宣祖二十年十一月丁亥，第21册，第439页。

[5] 赵宪：《重峰先生文集》卷6，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1册，景仁文化社，1990，第550～551页。

[6] 赵宪：《重峰先生文集》卷6，《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1册，第555页。

[7] 赵宪：《重峰先生文集》卷6，《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1册，第553～554页。

[8]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卷22，宣祖二十一年四月癸亥，第21册，第446页。

[9]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卷22，宣祖二十一年四月乙亥，第21册，第446页。

[10] 《朝鲜王朝宣祖修正实录》卷21，宣祖二十一年九月丁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1968，第25册，第570页。

[11] 赵宪：《重峰先生文集》卷6，《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1册，第558～559页。

[12] 金集：《慎独斋先生遗稿》卷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82册，景仁文化社，1989，第426页。

[13] 赵宪：《重峰先生文集》卷6，《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1册，第577～578页。

[14] 《朝鲜王朝宣祖修正实录》卷21，宣祖二十年九月丁亥，第25册，第570页。

[15] 赵宪：《重峰先生文集》卷7，《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2册，第53页。

[16]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八月己卯，第21册，460页。

[17]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八月丙子，第21册，459页。

[18] 赵宪：《重峰先生文集》卷7，《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2册，第56页。

[19]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八月丙子，第21册，459页。

[20] 申炅：《再造藩邦志》卷35，韩国古典数据库，http//db.itke.or.kr/index.jsp。

[21] 柳成龙：《惩毖录》卷1，第273页。

[22]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十一月壬戌，第21册，第466页。

[23] 赵宪：《重峯集》卷8，第95页。

[24] 《朝鲜王朝宣祖修正实录》卷25，宣祖二十四年三月丁酉，第25册，第601页。

[25] 《朝鲜王朝宣祖修正实录》卷25，宣祖二十四年四月丙申，第25册，第605页。

[26] 《朝鲜王朝宣祖修正实录》卷25，宣祖二十四年五月乙丑，第25册，第606页。

[27] 黄廷彧：《芝川先生文集》卷3，《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22册，第91页。

[28] 《朝鲜王朝宣祖修正实录》卷25，宣祖二十四年五月乙丑，第25册，第606页。

[29] 《朝鲜王朝宣祖修正实录》卷25，宣祖二十四年五月乙丑，第25册，第606页。

[30] 申炅：《再造藩邦志》卷1。

[31] 《朝鲜王朝宣祖修正实录》卷25，宣祖二十四年五月乙丑，第25册，第606页。

[32] 《近报倭警》，侯继高：《全浙兵制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

册，齐鲁书社，1955，第174页。

[33] 《明神宗实录》卷238，万历十九年八月癸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第56册，第4423页。

[34] 《许仪后陈机密事情》，《全浙兵制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180～181页。

[35] 崔岦：《简易集》卷1，《韩国文集丛刊》第49册，第16页。

[36] 《朝鲜王朝宣祖修正实录》卷25，宣祖二十四年五月乙丑，第25册，第606页。

[37]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卷26，宣祖二十五年五月戊子，第21册，第489页。

[38] 《朝鲜王朝宣祖修正实录》卷26，宣祖二十五年六月己丑，第25册，620页。

[39]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卷28，宣祖二十五年七月戊午，第21册，第512页。

[40] 《朝鲜王朝宣祖修正实录》卷26，宣祖二十五年五月庚申，第25册，616页。

[41] 《明史》卷320。

[42] 参见刘永连、解祥伟《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43] 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6《客难说答上使》，《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902册，第5页。

[44] 参见刘永连、解祥伟《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45] 参见刘永连《朝鲜招祸论——从赵宪五疏看壬辰战争的成因》，壬辰战争工作坊“战争史料和历史记忆”研讨会论文，济南，2017。

[46] 参见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02页）、罗丽馨《日本型华夷观——七至九世纪日本的外交和礼仪》（《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5期，2006年6月）、谷庆涛《日本华夷思想与华夷秩序体系》（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第6～16页）等。

[47] 参见罗丽馨《十九世纪以前日本人的朝鲜观》，《台大历史学报》第38期，2006年12月，第159～218页。

[48] 参见解祥伟《壬辰之前明鲜的“信任危机”及其处置》，《前沿》2014年第2期。

[49] 参见陈尚胜《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

[50] 参见孙卫国、解祥伟《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古代文明》2017年第1期。

从交通枢纽到避暑胜地

——晚清花鸟山的兴衰变迁

薛理禹[1]

花鸟山，亦称花脑山，[2]是长江口外的一座小岛，据大陆最近点66千米。岛形似鸟，头东尾西，东西长3.7千米，南北宽2.2千米，陆域面积3.617平方千米，当下是浙江最北端的有居民海岛，行政上属于浙江省嵊泗县花鸟乡。[3]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个今日舟山群岛中一座普通的海岛，在清代晚期一度成为中外各方势力关注的热点，也引发了诸多的国际争端与涉外交涉，而在当下仍具有研究关注的价值。

花鸟山清初原属定海县，康熙二十九年（1690）浙江分洋汛，划归江苏崇明县管辖。[4]在传统的中央集权统治下，花鸟山乃是远离行政中心的荒僻岛屿，定居者寥寥，主要发展捕鱼业，浙江沿海渔民在渔汛时前来捕捞乌贼等海产，“在四月、五月和六月上半月，群岛一片繁忙景象，满是来自宁波和温州海岸的渔民。各处可见数以千计的舢板和渔船，展现了生动热闹的活动场景。遍布这一海域的大量乌贼（墨鱼）是主要的渔获物，它们被晒干后运往大陆”。[5]政府除实施海防、海禁与征收渔税外，对其未加重视。[6]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宁波及长江内河港口陆续开埠，国际航线日益繁忙，花鸟山地处航运要道，且靠近大陆，无形中成为上海出洋的第一道门户，同时也是通往日本、美国等地远洋航线的途经要冲，随即受到外部势力的关注。鸦片战争中航海到此的英国人，因岛上山形似马鞍，称其为“北马鞍岛”（North Saddle Island）。在以往国内的史籍文献中，涉及花鸟山的记载寥若晨星，而在19世纪以来的英文著述、报刊中，却时常论及北马鞍岛，本文的研究，即极大得益于当时外文文献的相关记述。

一 花鸟山灯塔的修建

上海开埠不久，一篇为1850年6月17日《旧金山先驱报》（*San Francisco Herald*）所撰写的报道所述，“航路上有件事亟待解决以确保安全——应当在荒岛（Barren）或西北马鞍岛建造一座灯塔，作为扬子江的导航标。无疑英国政府将承担部分建造费用，而如果没有政府支援，为确保航线建成，上海的美国、英国和中国商人将捐款修建”。[7]

可见，在花鸟山修建灯塔的设想由来已久。

而花鸟山北端灯塔的建成，则在20年之后。晚清的海关由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长期担任总税务司，在其治下，一系列重大工程付诸实施，包括在重要海港、航运枢纽等处修建灯塔，维护航行。花鸟山地处远洋航运要冲，故此花鸟山灯塔成为首批建设项目之一。

根据文献记载，“花鸟山灯塔，为护卫扬子江口三大灯塔之一。距大戢山东偏北约二十六浬，对于取道近海航线，经由舟山群岛而南驶之船只，虽无直接功用，然其指导由上海直达日本以及经过太平洋之远海航路，厥功则伟，而为绝不可少之标识也。且该灯适居航路分野交叉之地，北往船只固得恃以测定航行正路，以避鸡骨礁（英文作Amherst Rocks——引者注）之险。即驶入扬子江口之船舶，亦可藉以照耀于后焉”。[8]这一灯塔在茫茫海上非常引人注目。“一个强有力的旋转灯屹立于岛的最北端，将其强光投向海上，达20英里之远。所有来自日本和美国海岸的船舶在抵达中国海岸时都能看到此光。有时浓雾笼罩这一海域，灯塔配备两门炮，向船只发炮以避免其触礁。”[9]花鸟山灯塔给往来海上的中外船舶提供了巨大便利。

花鸟山灯塔自建成后，一直由中国海关管理维护。“该站建于同治九年（1870），亦为海关海务科筹设灯塔计划中首先所筑之一也。该灯设置之初，即具特殊优点。原为旋转镜机，每一分钟旋转一周，且用四芯灯头，燃以植物油，烛力38000枝。迨光绪二十五年（1899）改置十二加仑压油灯，并配以六芯灯头，烛力增为45000枝。洎民国五年（1916），复改置头等镜机，旋转于水银浮槽之上，并装置煤气灯头，配以五十五公厘白炽纱罩，每十五秒钟闪光一次，烛力增至五十万枝。嗣于民国十七年，又将所用之微小纱罩三个撤销，而易以110公厘‘自燃式’大纱罩一个，于是烛力增为74万枝矣。该站建筑，异常坚固，自成立以迄宣统二年（1910），越四十载，始行大加修葺。”[10]这一灯塔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航运导向功能，同时也是花鸟山上首屈一指的历史人文景观。

二 花鸟山电缆的接通和电报站的设置

1885年，在中法战争尚未平息之际，英国与俄罗斯因争夺远东利益，引发国际外交争端。当年4月，英国出兵占领朝鲜南端的巨文岛（英文文献中称汉密尔顿港，Port Hamilton），进一步加剧了与俄国的

军事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出于战略考虑，“英署使拟在扬子江外大七山（即‘大戢山’——引者注）相近之花鸟山北岛接线上岸”。[11]英国的举动引起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重视，立即就英国连接电缆线的目的向英国使节做出询问。“查阅海图，花鸟山距洋子角约一百二十里左右，不通陆路。今英使忽有此请，似非为侵夺利权起见。虽驻津英领事璧利南来谒，询其花鸟山设线之意是否出于英廷，抑系（英商）大东公司所为。该领事称系外部主意，大约为英、俄如有战事，俄则有大七山丹（麦）线为之传电，俄、丹素昵，大北公司向由俄保护，恐临时不肯代英传电，英亦必预备一处，以通兵船消息。”

无疑英国指使本国企业大东电报公司在中国领土上连接电缆线，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当时清政府内外交困，同法国的冲突早已使其疲于应对，唯恐再生事端。出于列强势力制衡的考虑，李鸿章认为：“今春大七山丹线屡为法国传电，即饬盛道电属[嘱]上海邵道派员往诘，该公司不肯遵阻。鄙见大七山既有丹线上岸，则花鸟山英线上岸势难驳斥。该岛孤悬海中，不通陆路，于华北局权利无损，彼既为俄事请设，殷勤询商，似应暂准其海线展至花鸟山北岛，设一电房，以示敦睦。但与议明，俟俄事了结，仍行拆去，庶于通融之中稍有限制。”

因清政府未做出任何抗议或干涉，大东电报公司得以顺利将电缆接上花鸟山，除此以外，“在北马鞍岛上英国人修筑一些平房，建立一处电报站，若干名电报生在此驻扎。大东电报公司连通欧洲的电缆比邻岛屿经过，其时一根电缆于东南海湾处接上岸。国际争端解决后，岛上的电报站撤除，但此地仍由电报公司占有，可在任何时候重新架接电缆”。[12]英国的举措一方面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而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提升了花鸟山的战略地位，使这一原本少有瞩目的荒僻岛屿越发受到世人的关注，进而引发了游览业的兴起和有关中国主权的交涉争端。

三 花鸟山外侨游览业的兴起与主权之争

1.外侨度假地的构想

英国在花鸟山连接电缆线3年之后，上海英美外侨中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搭乘‘仙女’号轮船游览北马鞍岛”的较长篇幅的文章。作者一行乘坐轮船，周五晚间9点从上海出发，周六早上10点多到达北马鞍岛，周日晚间9点开始回程，周一早晨5点半回到上海。在两天多的旅行中，作者领略了花鸟山的优美景色和风土人

情。作者对花鸟山景致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

> ……风光美丽，蔚蓝色的海水使人惬意，与滚滚东流、长达一二哩的长江泥泞水纹形成明显对比。在我们右侧，是780英尺高的高耸山丘，覆盖着碧绿油亮的青草，左侧则是花岗石覆盖的荒山——一块孤立的巨石，看上去稍一推动足以将它沿着旁边险峻的沟谷抛下。[13]

在奇山丽水之间，作者一行开展了海水浴、攀山等运动。游玩之余，作者亦留意观察岛上的生产活动与风土人情。

> 山的两侧处处栽种岛上的主要谷物——玉米，还有御谷、芋头、甜薯、南瓜、花生等作物。山上有四五条清澈的小溪流下，在其中之一的溪口，可看到小块的稻田。有三个定居点，居民共约150至200人，主营渔业，兼营种植业，他们对我们非常客气。这一季节初始，人们把墨鱼放在裸露的花岗石块上晒干，但在七月的第三周都收走了。常年的鱼腥味使岛的北端成为不适宜外国人居住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就买到味道鲜美的鱼类。我们看到四英尺长的巨大鳕鱼，重达三四十磅，但我们更喜欢小些的幼鱼。……岛上没有官员，牲畜仅限于一些猪、几十只山羊和家禽，没有马和牛。每个村落有一间小庙，屋舍都是泥地的简陋棚屋。

当时岛上“有两座西式建筑可眺望沙湾，如果我们能进入，那就更好，然而我们获悉钥匙在上海”，由此可见似乎已有上海的外国侨民在岛上短期居住。作者从中意识到岛上发展度假观光产业的潜在价值。

> 炎热、疲乏中的上海居民，其假期或偏好不能使之前往烟台或日本度假，难道不能有机会去这个宜人的小岛做一次难得的暑期旅行吗？偶尔的从周六到周一，从上海炎热压抑的氛围到上述清新富氧的环境，对于诸多疲乏虚弱的躯体，将有巨大价值。有一处悬崖可眺望两个邻近的海湾间的分水岭，它可以微不足道的价格租下，于此建造价格适中的石木材质的房屋。可以租一艘小轮船来做一周一度的岛屿旅行，有闲暇的人士可以耽搁一周或数周。我敢肯定，比起烟台，许多人会更喜欢这里。如有人能联手筹集款项，无疑此事就能得以筹办。

尽管这篇文章将花鸟山描绘得自然迷人，但其刊登之后，并未产生明显影响，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岛上观光业也并无进展，5年后《字林西报》有了关于花鸟山的新报道，在岛上兴建度假疗养地的计划方才提上日程。

> R.E.C. Fittock 在最近的考察中拍摄了北马鞍岛的迷人照片，这次考察与在当地建立一处疗养地有关。这些山丘、港口、海滩的照片，充分印证了这一目的的适当。我们殷切期待明年夏天计划能付诸实施。[14]

2.外侨避暑度假的黄金时期

上海的外国侨民组织较大规模的花鸟山度假观光始于1904年夏季。当年6月及8月，《字林西报》均有周末前往花鸟山度假的报道，游客周五夜间或周六中午出发，周一白天返回。6月那次旅行每人的全程资费为40元。[15]

1905年，上海的英文期刊《亚东杂志》刊登了一篇详细探讨花鸟山各方面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近乎该岛的地方志，从地形地貌、历史沿革、自然气候、风土民情、生产方式、岛屿景观等方面对岛情加以叙述，重点亦是描绘该岛的迷人景致和避暑度假的优越性。

> 岛上有肥沃的土壤，广植红薯，遍生芳草，景色多样而美丽。有些地方能看到硕大的石洞；不断变化的海岸线上，礁石被潮水冲刷成天然的海湾。有些地方200英尺多高的陡峭悬崖矗立海边，其下朵朵白浪冲刷翻腾。当攀登到岛的高处，可以看到山脊和溪谷交替，以海水为绝佳背景，呈现变化的景致，将许多迷人的图景展示于眼前。
>
> 岛上的气候非常理想。从气象局的数据看，夏季北马鞍岛和上海有15～20度的温差。海上经常凉风习习，给岛上带来凉爽的影响，而在上海及周边的低平大陆则不明显。冬季岛上温度较上海高，也就是在寒冷的季节较大陆气候更温和。岛上夏季更凉爽，冬季更温暖，可能归结为这里完全为大海包围，从而使全年都有更为平和的气候。
>
> 岛上没有蚊子，苍蝇是最大的害虫，尽管它们并不比上海的情形恶劣，且仅在五六两个月，也就是鱼汛期间为害。六月后，大部分的苍蝇随着渔民一同离开。
>
> 我们的图片和说明旨在展示这个岛屿的自然特征，但如要欣赏，那就必需在六月到八月离开上海酷热的街道，沉醉于这海陆美景带来的欢愉中。吸引游客之处众多，攀山、海水浴、钓鱼、航海以及其他极具自然特色的诸多娱乐活动提供给疲惫的城市居民，或许会在碧海中的气垫船上心驰神往。避开酷暑，妇孺的脸上绽放健康之花，而病患则能重归生命和力量。
>
> 这一疗养地将是上海和沿海居民的福音。中国其他著名的疗养地都相隔太远，多数居民难以受惠。有个把月闲适的人可以从容拣选地方，而多数辛勤忙碌的人至多挤出一个周末或数日的闲暇，故此去不成什么地方。而现在在八小时内，就能来到美丽的海滨、清新的气候，如同家乡最佳度假地的自然景观和类似家乡的气候。男人们可把家眷送到这一胜地，利用周末探访他们，在周六中午离开工作，在周一早上及时回到岗位。一次海上航行，气候与环境的全然改变，周末的海水浴，恢复一周体力消耗的远足，使一年的剩余时间保持健康良好的状态。几年后，如果没有马鞍列岛的避暑胜地，上海人恐怕将不知如何应对酷暑。孩童以往抱怨呆在上海闷热的街道上和花园

里，面色苍白，无精打采，今后将在如同故乡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获得健康和蓬勃生机。[16]

这篇文章的作者李德立（Edward S. Little）是英国来华传教士，同时也是成功的地产开发商。19世纪晚期，他作为一位外国人，在江西庐山购置土地，修建别墅，进而发展成为华中地区闻名遐迩的外侨避暑度假胜地——牯岭镇。李德立颇具商业眼光，他认为花鸟山毗邻上海、地理位置优越、气候宜人、环境优美，且远离中国政府统治中心，中国官府在岛上的行政控制力薄弱，极其适合成为上海及周边地域外侨的避暑度假地。

与十余年前不同，李德立的构想并非单纯的空中楼阁，他与一批外侨，将其积极付诸实践。李德立在庐山等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规避中国官府的法规禁令。由于花鸟山并非通商口岸，中国政府不允许外侨在此租地、购地，故此他们不经中国政府批准，在花鸟山私下同当地居民订立土地转让契约（为躲避政府干涉制裁，外侨往往隐匿身份，以华人名义签约交易），修建房屋，营造避暑地。《字林西报》报道："北马鞍岛明年将成为上海居民喜爱的避暑胜地，游客规模会大大超过今年。我们获悉八项于明年春季在岛上建造平房的契约已经订立。"[17]

次年5月，上海至花鸟山之间开通定期班轮"山水"（Samshui）号，该轮船拟"夏季一周航行两次，可载客30人，安装电灯，设施完善"。[18]1906年5月26日，该轮花鸟山之旅首航，因时值圣灵降临节，乘客为数不多，票价为每人25元（含船上伙食）。[19]

从现有资料看，"山水"号班轮的营运时间似乎不长，未能持续。两年后，《字林西报》刊登报道，表明将把花鸟山到上海的接驳交通定期化与常态化，"北马鞍岛与上海间需要定期持续的运输交通，我们满意地得知这一目标已在规划实施中"。另一项重要的举措是在岛上修建一座较大规模的旅馆，供避暑游客居住。"将成立一家公司来提供这一服务，并在分隔西北和南部海湾的狭窄地峡处建造一栋大型旅馆。亨利·莫里斯（Henry Morris）先生将把靠近海岸的100亩土地，连同所有建筑物，无偿（除常规地税外）移交给公司。该公司资本将达15万元，每10元作为一股，其中50000元用于新旅馆建造，16000元用于维修、修路、建造浮码头及其他适宜工程。有关本地轮船公司的资金筹备将提供一艘头等舱的轮船，在一年中的三四个月提供运输。如这一计划得以完全实施，北马鞍岛将成为一处更好的疗养与避暑之地。"[20]按照李德立等在

沪外侨（尤其是英侨）的筹划，花鸟山将继牯岭、莫干山等地后，成为华东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深受旅华外侨群体喜欢的独具海洋特色的热门避暑胜地。

3.有关主权的争端与交涉

在外侨着力打造花鸟山避暑胜地的同时，国人也意识到这一举动对于中国主权的现实影响和日后的潜在威胁。庐山牯岭、莫干山等地，自外侨大规模租地购产、建造屋宇，建成避暑胜地以来，中国官府在当地的行政管辖权不断被外侨攫取，进而外侨自行设立管理机构，在当地实施“自治”，最终成为法外“飞地”，对中国领土主权造成侵犯。花鸟山孤悬外海，人口稀少，中国官府在岛上的行政力量原本就相当薄弱，如若听任外侨置产建屋，营造避暑基地，势必将迅速步牯岭、莫干山等处的后尘。更重要的是，与牯岭、莫干山等内地山区不同，花鸟山地处国际航道要冲，具有灯塔等重要交通设施，既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上海的一道海上门户。门户若失，全局震动。晚清国势疲弱，领土日渐丧失，主权不断为列强削夺，图存救亡、维护主权的民族意识日渐深入人心，官府也无法坐视外侨在花鸟山的行径而不管。外侨在花鸟山的举动很快引起中国官府的关注与交涉。

1906年9月，官府获悉了外侨在花鸟山营建避暑基地之事，“前由领袖领事照会江督、苏抚转札上海道瑞观察照准，观察于初二日（9月19日——引者注）札委崇明县魏大令并咨苏松镇陈军门请委熟悉沙岛之守备黄吉三同往勘查，以凭上复”。[21]经调查，“崇明县属之马鞍山，前被该处居民盗卖与洋人建造房屋，以为避暑之地。兹因洋人来往较前愈多，崇明县魏大令以该处系属内地，自应设法禁止。爰于昨日禀请沪道转禀江督、苏抚咨请外务部照会驻京公使设法禁止”。[22]

外侨在花鸟山置产建屋属于非法，然而鉴于当时国际地位不平等，西方国民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官府无法直接对外侨施加处分之情况，只得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惩处私自向外侨出卖土地的国民，二是将卖出土地设法赎回，“责成该县（即崇明县——引者注）勒令原业户退价赎回，将契注销，并由江督札行苏松、狼山、福山三镇台查禁沿海各山岛不准私售在案”。[23]

从资料上看，惩处卖地国民的行动并不顺利。晚清的封建官府官僚作风盛行，行政效率低下。次年，官府查获倒卖土地给外侨的浙江人李

召南，李召南供出同案犯鲍五水，随即“所有供出之鲍五水即鲍宝钟，曾由沪道移请宁绍台道提解崇明县。经魏大令讯明，鲍五水并非鲍宝钟，鲍宝钟另有其人，家住宁波陈家埠朱家湾地方，当即饬令李召南指认，据称亦非鲍宝钟。前日魏大令禀请道台拟将鲍五水交保释放，瑞观察以鲍宝钟既未逮案，应先将鲍五水保释，以免拖累，昨已批饬魏大令遵办，一面移请宁绍台道饬再查拿鲍宝钟解崇讯究矣”。[24]这成为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乌龙事件。另外，官府又查获犯罪嫌疑人黄仁林，但此人迟迟“尚未获案，无凭讯究”。[25]惩处私卖土地国民之事不了了之，私卖土地的赃款也大都无法追回。

赎回卖出土地的行动更是举步维艰。州县官府因循苟且，赎回土地的行动长年毫无进展。主管官员甚至敷衍推说“本年春季沿海各山岛基地查无私售情事，惟只有各国洋人前来游猎，亦均时来时往，并不久驻”。[26]而其时，外侨在花鸟山开通班轮、营建旅馆之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件事为《字林西报》披露后，“沪道蔡观察以崇明县之马鞍山前被乡民盗卖与洋人李德立建造避暑房屋，经瑞前升道札饬该县勒令退价追缴原契在案，迄今多年，曾否将契追回，未据禀报，爰于日前札行崇明县，饬令迅即查复”，[27]赎买私卖土地的举措在耽搁长达三年后方才展开。

另一方当事人——以李德立为代表的外侨，为维护自身利益，对于中国官府的举措自然百般抵制，英国方面也诸般推诿。“迭经沪道勒令赎回，（李德立）迄未就范。兹又照会英领，将原立契据送道查阅。昨据复称，此项印契早经该商人寄回本国，无从检交。蔡观察以该处究非通商口岸，洋人照章不得置产因，又函商英领迅饬收回原价，将契注销。”[28]

在中国官方的压力下，李德立表示“既奉道宪一再商劝，愿为和平了结，惟所出地价及造屋等费均须偿还”。“兹由沪道饬据崇明县何大令查复，谓黄仁林所售之花岛山地八亩，计得价银一百二十两，又鲍宝宗即鲍五水售卖之璧下山、陈钱山渔地二方，共得价银一百九十两，此皆税契所填之价。”[29]加上建房费用，“兹崇明县何大令查得该洋商共卖山地及造房原价计有一万二千余两，业已会同绅董筹款赎回，禀陈沪道转致该洋商收价退还，以免纠葛”。[30]

然而此事可谓一波三折，李德立并不打算放弃到手的利益，因而拒绝将花鸟山土地由中方按价赎回，原本的旅馆和班轮项目也照旧开展。

上海道员蔡乃煌不得不就此再度进行交涉："今该洋商不知华官体恤外人，反欲在该山开设公司、旅馆，实属有意违约，因特函致该洋商，嘱勿前往营业，以免交涉。"[31]针对李德立来函抗辩，上海道员两度依法依理公开予以驳回："乃该县早已查报（原租地价及房屋造价），而贵商迄未将实价开示，亦不将税契取回送道，反谓本道未将办法示悉。试问凭何而定办法，且该处租地造屋既为约所不准，法当充公。贵商乃不谅本道前拟估价偿还系属出于格外通融，贸然再租轮船，再设旅馆，置产为要索重价地步，竟置两国钦定约章于不顾，此岂愿于和平商办者所应出此？"[32]"若欲仍归旧议，情愿和平商结，则地价房价及贵商贴与乡民迁费，早据崇明县会绅确切查明，为数仅银一万三百十两，洋二千余元，似尚可会商地方公正绅士筹款付给，或收回之后能否租与避暑，照纳例捐，详请上宪核示。如仍不顾约章公理，意外滥案，本道实属万难照办，纵便来函晓渎，本道亦不再作复函，惟有按照条约听候贵国领事行文交涉而已。"[33]

从行文措辞不难看到官方就此事的坚决立场，最终李德立等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官方的意见，将土地由中方照价赎回，度假地的营建工作也随之中止。从此外侨不复再来，其留在岛上的建筑物也日益坍坏。待到民国中叶，除灯塔依旧屹立，花鸟山已完全重归荒僻萧条的渔村景象，"清光绪二十七八年间，英人马立司（似即上文提及的亨利·莫里斯——引者注）建洋房四座，利德立（即李德立——引者注）建二座，戴先生建一座，分布于龙舌嘴、黄胖嘴、外山嘴等山沿，现只存沙滩埂中部中冲角马立司洋房一座，余均湮灭，无迹可寻。马氏房八间，东南向，整方石块叠砌成墙，亦以年久失修，屋顶已损毁。如再任其朽败，二三年后恐将空存圈墙矣。马氏死已十余年，七八年前马子曾到山视察一过，与就地卢姓订立委托照管之约……花鸟地瘠民贫，岁收丰歉，全视墨鱼汎之鱼获。去岁墨鱼渔荒，今年鱼价倾跌，他岛贮釜以待善价，而花鸟之渔民则已釜罄易食矣。长日漫漫，民生可虑"。[34]喧嚣一时的花鸟山在外侨离开之后，又逐渐重归荒凉沉寂。

结论

花鸟山的兴起，得益于近代以后国际交往的不断增加和全球化的日益紧密。鸦片战争之前，清代统治者长期推行海禁政策，花鸟山虽毗邻江南繁盛之乡，但始终是地处外洋的荒僻岛屿，人烟稀少，更无开发建设可言。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打开，尤其是远洋航路的开辟，花鸟

山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备受外来势力关注，地位瞬间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花鸟山成为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一者，以其地当航运要冲，是上海通往外洋的必经门户，成为修筑航道灯塔的首选之地；再者，花鸟山成为越洋电缆的转接地。另一方面，花鸟山以其凉爽宜人的夏季气候，加之地理优势，吸引上海及周边地域的外侨乘船前来消夏度假，发展成为避暑观光胜地。不可否认，晚清花鸟山的繁荣，与西方势力的渗透以及对中国的主权侵犯存在密切的联系。近代中国不自觉地步入全球化，积极的意义和负面的后果兼而有之，花鸟山这一小岛经历的兴衰变迁，便是具体的印证。而随着外来势力的离开和主权的恢复，花鸟山一度拥有的潜在发展机遇迅速消失，重归萧索沉寂，又不得不令后人为之深思。

[1] 薛理禹，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2] 如“而崇明上锁长江，下扼吴淞，东有洋山、马迹、花脑、陈钱诸山”，见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校注》，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第20页。乾隆《崇明县志》载：“花鸟山，亦名花脑。”

[3] 参见《中国海岛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岛志·浙江卷》第1册《舟山群岛北部》，海洋出版社，2014，第207页。

[4] 《中国海岛志·浙江卷》第1册《舟山群岛北部》，第208页。

[5] Edward S. Little，“The Saddle Islands，Shanghai，”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Vol.4 （1905）.

[6] 在清末外国人眼中，“中国的浩繁史籍对这一群岛从未实质性提及，甚至其当归属何省亦存疑问。其看来是由江苏和浙江两省分别管辖。厘金局的吏役无处不在，在每年渔汛时前往捕鱼的各处地点征收税金”。见Edward S. Little，“The Saddle Islands，Shanghai，”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Vol.4 （1905）。

[7] *The San Francisco Commercial Press on a Steam Mail Across the Pacific*（San Francisco：Towne & Bacon，Printers，Excelsior Office，1860），p.92.

[8] 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李廷元译，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3，第211页。

[9] Edward S. Little，“The Saddle Islands，Shanghai，”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Vol.4 （1905）.

[10] 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第211页。

[11] 李鸿章：《复总署议花鸟山接海线》，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

全集》（33），第487～488页。本段与下一段引注均出于此。

[12] Edward S. Little，“The Saddle Islands，Shanghai，”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Vol.4（1905）.

[13] “A Trip in the S. S. ‘Fairy’ to the North Saddle Island，” Shanghai：*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Aug. 1，1888，Col. 107.后几段引注亦出于此。

[14] Shanghai：*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Aug. 24，1893，Col. 3.

[15] Shanghai：*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Jun. 7，1904，Col. 5. & Aug. 5，1904，Col. 5.

[16] Edward S. Little，“The Saddle Islands，Shanghai，”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Vol.4（1905）.

[17] Shanghai：*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Sept. 26，1905，Col. 5.

[18] Shanghai：*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May 18，1906，Col. 7.

[19] Shanghai：*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May 30，1906，Col. 7.

[20] Shanghai：*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May 26，1908，Col. 7.

[21] 《纪委勘马鞍山租与洋人》，《申报》1906年9月23日，第4版。

[22] 《禀禁马鞍山民人盗卖山地于洋人事》，《申报》1906年9月21日，第3版。

[23] 《查复并无售卖山岛情事》，《申报》1908年7月1日，第18版。

[24] 《沪道批准省释无辜》，《申报》1906年5月17日，第19版。

[25] 《道批二则·李孙氏禀批》，《申报》1906年10月17日，第19版。

[26] 《查复并无售卖山岛情事》，《申报》1908年7月1日，第18版。

[27] 《追回洋人买地契据》，《申报》1908年7月11日，第18版。

[28] 《沪道坚请收回地价》，《申报》1908年10月4日，第19版。

[29] 《批饬崇明官绅筹还地价》，《申报》1908年10月13日，第18版。

[30] 《崇明官绅筹还地价》，《申报》1908年12月29日，第19版。

[31] 《函阻洋商违约营业》，《申报》1908年12月29日，第19版。

[32] 《沪道为马鞍山事复李德立函》，《申报》1909年8月11日，第18版。

[33] 《沪道对于马鞍山交涉之复函》，《申报》1909年8月18日，第18版。

[34] 程梯云：《江苏外海山岛志·花鸟山》，《江苏研究》第1卷第6期，1935，第9页。

巴黎和会上的赤道以北德属太平洋岛屿问题研究

彭鹏[1]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媾和会议，也是决定一战后世界格局的重要会议。其中，在赤道以北德属太平洋岛屿[2]的归属问题上，日本提出将该群岛交由日本管辖。日本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岛屿本身具有经济交通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对比变化对日本十分重要。因此日本也是不遗余力地想要争取南洋群岛的合法统治权。

关于一战前后日本对海洋的扩张，国内学术界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来说有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对日本“南进论”的探讨；[3]二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近代日本海洋政策的研究。[4]但是针对日本对南洋群岛的占领，目前国内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有相关探讨，[5]但是主要是从微观方面进行论述，对史料的发掘比较多，但是宏观方面的研究有限。

本文试图从微观视角切入，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来论述日本为何对南洋群岛十分重视，又如何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方式和巴黎和会的谈判方式获得了南洋群岛的委任统治权，以及日本获得该群岛委任统治权对日本及东亚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 南洋群岛的经济及交通通信价值

南洋群岛有种植橡胶的自然优势，并且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另外，这一地区地理位置重要，是太平洋地区的交通枢纽，也是海运和空运的中转站，并且有海底电缆经过这一地区，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通信十分重要。

其一，南洋群岛有着橡胶种植及矿产开发等经济价值。日本《神户新又日报》中报道了一篇关于日本政府欲在南洋群岛种植橡胶的文章。文章首先肯定了这些岛屿的经济价值，“在我国委任统治之下的南洋诸岛包括八百余岛屿，其经济价值有目共睹，贵族院方面想要增进这些岛屿的经济开发，南洋厅[6]长官横田乡助提出了南洋经济价值开发增进计划”。[7]为了发展南洋经济，日本政府决定在南洋诸岛开展橡胶种植，

其中在《神户新又日报》中提到了“需要七千万元日币来帮助南洋诸岛的橡胶栽培事业”。[8]从以上的报道可以看出，日本十分重视南洋群岛的经济开发，并且结合该地区的热带气候，采取了发展橡胶种植经济的措施。

1914年日本《时事新报》[9]曾刊登过关于南洋群岛的矿产资源优势的报道，其中指出南洋群岛“地域广袤，物产丰富，这是世界最富饶的地区，只可惜很多土著人还处在未开化的状态。马里亚纳群岛中的瑙鲁岛磷矿石品质好产量高，每年出口达到四五百万吨，比德属新几内亚和俾斯麦群岛的出口总额还高”。[10]

无论是出于发展橡胶种植的考量，还是基于矿产业的价值，南洋群岛对于日本来说，都是一块风水宝地。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试图大力发展本国经济，而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做后盾，日本国土面积狭小，矿产资源不丰富，耕地资源匮乏，缺少热带气候区，很多热带生长的植物都无法在日本本土实现种植。因此，日本非常希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寻找陆地资源，发展本国的渔业经济。南洋群岛不仅可以为日本提供丰富的热带气候区，而且还有很多未开垦的土地。“南洋诸岛在地理位置上与日本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11]距离日本较近。所以，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经济价值的角度出发，日本对南洋群岛都十分有野心。

其二，南洋群岛位于太平洋海运航路的交通枢纽位置。在南洋群岛中有很多适合船舶靠岸的港口，如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另外还有特鲁克岛、帕劳群岛等。这些岛屿都有优良的港口，能够容纳大型舰队。在对美国方面，马绍尔群岛处于日本与美国海上联络的中转站位置；在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方面，穿越特鲁克岛可以缩短日本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岛航线。获得南洋群岛的统治权可以方便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海上联络。因此，这一地区对于日本来说，无疑是在太平洋海域的重要根据地。获得这一地区，有利于日本打开对外交流的窗口，便于日本的出口贸易，也有利于进口原材料。

海运航路与贸易紧密相连。“交通运输的便利与否直接决定了物资的价格，贸易与交通运输唇齿相依。南洋群岛交通便利，拥有世界商圈活动的船舶交通系统，以群岛或以特定地点为中心的船舶交通系统，各群岛路上的交通设备，如汽车电车等。南洋群岛位于澳洲与世界的航路、荷属东印度与世界的航路、菲律宾群岛与世界的航路、夏威夷与世界的

航路以及德属新几内亚及其所属岛屿与世界航路的交通枢纽位置。”[12]南洋群岛正好位于这五大航路的中间位置，表1所列是这五大航路1911～1913年入港和出港的轮船数量和吨数。

表1 五大航路1911～1913年入港和出港的轮船数量和吨数

航路	时间	入港	出港
澳洲	1912 年度	2035 艘、5163357 吨	2017 艘、5111957 吨
荷属东印度	1911 年度	6519 艘、4480742 吨	不详
菲律宾	1912 年 6 月至 1913 年 6 月	794 艘、1831212 吨	781 艘、1868811 吨
夏威夷	1913 年度	483 艘、1582255 吨	476 艘、1577102 吨
德属新几内亚	不详	980 艘、848182 吨	不详

资料来源：由「南洋（1-11）」（六、南洋の五大交通系各特殊の関係あり）『時事新報』1914 年（大正 3 年）11 月 3-5 日上的信息整理制作而成。

从表1中可以看出，澳洲的贸易往来是在五条航线中最多的，日本控制了南洋群岛，就相当于掌握了澳洲与外界的联络通道。在环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和日本分别占据南北两个位置，对于日本来说，控制了南洋群岛，会使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大增，从而增强对澳大利亚的控制力。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澳大利亚还属于英国的自治领，因此澳大利亚对英国也有重要意义。“澳洲的对外交通航路包括澳洲到欧洲、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北美（美国、加拿大）以及澳洲各群岛之间共六大航路。其中澳洲到英国的贸易输入大约占英国总输入量的一半。”[13]由此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与英国往来十分密切，并且对英国贸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控制了南洋群岛，在一定程度上对英国也有牵制作用。

此外，表1中菲律宾航线也是出入港较多的航线之一，在五条航路当中排名第三。“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港口是外国以及沿岸航路的重要港口，日本邮船、东澳线、北美线、澳洲香港之间往来的澳洲东洋船等均在此停靠。此外，与美国本土联络的日本邮船、东洋汽船、大阪商船、太平洋汽船，以及加拿大太平洋等美国航路和东洋汽船的南美航路均在马尼拉港口停靠。”[14]

其三，南洋群岛是空中航运的中转站。与海上航运相似，日本与美国方面的空中联系，必然要经过这一地区的上空，这是日本与美国之间最近距离的航空路线，而且取得南洋群岛的统治权后，日本便可以建立海上中转站，这样一方面可以给飞机提供燃料和维修服务，并且能够建立通信基地、提供往来人员的食宿，以及进行气象观测等。另一方面可以加强自身的海上防卫力量。在对澳大利亚方面，经过这些岛屿的空中

航线是日本到达澳大利亚的最优航线。此外，在对欧洲方面，日本也可以通过穿越太平洋岛屿，实现与欧洲更近距离的接触。

因此可以看出，南洋群岛的地理位置对于日本十分重要，无论是海运还是空运，这一地区都是优良的中转站。并且，在国防防御方面，日本可以通过控制这一地区来加强自己本国的海上防御能力，日本的舰队可以直接驶入太平洋各岛屿的港口。“如果南洋诸岛没有交由日本统治，那么对于日本来说太平洋地区就会成为重要的安全威胁据点。”[15]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获取了南洋群岛的统治权，这也是日本为日后争取南洋群岛委任统治做的铺垫。巴黎和会成为日本争取这一地区统治权合法化的竞技场，因此，日本代表团不遗余力地想要争取到南洋群岛的委任统治权。

其四，在通信方面，日本占领的加罗林群岛中的雅浦岛位于海底电缆的中间枢纽位置，是连接关岛、上海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中继站。在一战以前，德荷电信公司[16]控制着关岛与雅浦岛、雅浦岛与荷属西里伯斯岛[17]以及雅浦岛与上海之间的海底电缆线，美国通商太平洋公司则控制着马尼拉到上海之间的海底电缆线。一般来说，从美国本土到菲律宾和中国的通信是通过旧金山到夏威夷，再转到中途岛和关岛，经马尼拉到达上海的。但是，在这段通信传播路线中，因为海底地震等原因，如果关岛到马尼拉之间的电缆线中断，那么美国就会改用德荷电信公司所控制的雅浦岛到上海之间的电缆，也就是说通过关岛到雅浦岛，再由雅浦岛到上海。如果美国到菲律宾以及中国的电信业务繁忙，也会启用经由雅浦岛的这段海底电缆线。所以雅浦岛对于美国来说，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10月，日本占领了雅浦岛，“一度中断了德荷电信公司所控制的以雅浦岛为中心的三条海底电缆线”。[18]这也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并且使美国意识到，日本控制南洋群岛对于美国来说，是巨大的通信威胁，如果日本在与美国的贸易竞争中也采取类似的手段，那么美国将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损失。在战争期间，这一通信渠道就更为重要，一旦丧失可能会直接切断美国与菲律宾及中国的联系，而菲律宾作为美国的军事重地，失去通信联系将会给美国造成致命的打击。正是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雅浦岛成为日后巴黎和会美日争夺的重点地区。

二 日本对南洋群岛的占领

一战爆发以后，日本迅速占领了南洋群岛，1914年10月3日，占领马绍尔群岛，10月5日进入加罗林群岛，10月8日占领雅浦岛，4日之后又占领了特鲁克群岛。到10月19日，日军便全部占领了赤道以北原德属太平洋诸岛。12月1日，日本政府向英国政府发出秘密备忘录，“要求永远占有赤道以北的德属上述岛屿”。[19]但是英法要求日本出兵欧洲时，却被日本拒绝了。日本大隈内阁面对英国政府要求给予军需品支援的请求，表示日本的军事行动只针对东亚及太平洋区域内，如对山东以及德属太平洋岛屿的占领，超出这一范围日本不会再使用兵力，因此拒绝了英国的要求。“1914年9月2日，英国格雷外相对日本驻英大使井上表示，希望日本派遣军舰到地中海地区，日本加藤外相致电井上拒绝了英国政府的要求。同年11月15日，驻日的英国大使致电加藤外相，因为德国的舰队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希望日本派遣一舰队给予支援，但也被日本拒绝了。”[20]

在战争初期，日本一再拒绝英国的派兵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在一战开始初期，日本虽然以英日同盟为借口对德宣战，但是并不是真心想帮助英国打败德国。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中国山东，以及德属赤道以北太平洋岛屿，这与一战前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密切相关，而欧洲战场之形势发展，并不在日本的切实关心范围之内。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英国方面不断要求日本出兵地中海，俄国方面也要求日本提供大炮等军需物品。1916年11月，日本的本野外相上任，面对协约国方对日本的战争要求，本野认为应该改变以往的外交策略。他在提交政府的报告书中详细分析了当时战争的情况，认为战争的结局无外乎三种情况，一种是战争双方打成平手，第二种情况是同盟国的胜利，第三种情况是协约国的胜利。而针对第三种情况，他分析道：“如果是第三种情况，那么日本取得山东及南洋群岛的控制权相对容易，但是也应看到，如果是协约国方面胜利，在战后的媾和会议上，协约国成员之间肯定会就某些问题做出让步，而这时对战争贡献最小的国家就会成为让步最多的国家。”[21]因此他认为，“日本应该对协约国提供军需品，并且在财政方面给予援助，以表达日本的诚意，与协约国保持良好的感情，为快速取得战争的胜利做最大的努力”。[22]

本野的这一报告对战后的局势做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认为日本应

该未雨绸缪，早点为战争结束后的媾和会议做准备，而如何使日本在太平洋岛屿的控制权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尤其是其他协约国成员国的认可十分重要。因此，日本改变了一战初期的外交策略，打破了只向东亚及太平洋派兵的地域界限，向地中海派出舰队，并且在印度洋、南非、地中海和澳大利亚一带护航，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承认了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既得权益。对于英国来说，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已经很难控制太平洋的各岛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也希望在远东寻找自己的盟友。

在战争期间日本出兵地中海就是考虑到了战后德属太平洋岛屿的瓜分问题。“寺内正毅内阁1917年2月10日在内阁会议上，以承认日本在南洋群岛的权益为条件，决定向地中海派遣海军，派遣巡洋舰1艘，驱逐舰12艘，以马耳他岛为基地，担任输送护卫任务。英、法、俄、意作为交换条件，承认日本在南洋诸岛领有权的既成事实。”[23]

日本利用英国要求日本向地中海派遣舰队的机会，提出英国政府要保证支持日本在中国山东省及南洋群岛的权益。1917年1月27日，日本驻英大使珍田在对英报告中写道：“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是山东省及已经在日本占领下的南洋诸岛，日本政府在对敌国政府提出控制这些地区的要求时，希望英国政府能够保证站在支持日本利益的一方。”[24]针对日本的这一外交请求，2月13日，英国政府回复了珍田，回复中写道：“在媾和会议的时候，英国政府将按照日本所期待的那样，支持日本在山东省以及南洋诸岛的权益，对日本提出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25]

三 巴黎和会上日本与英美的协商

日英的关系早在一战前就已经非常密切了，1902年1月30日，日英两国在伦敦缔结了第一次同盟条约，接下来在1905年和1911年又相继签订了同盟条约，英日同盟一直维持到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因为《四国条约》的签订，英日同盟解散。英国之所以与日本结成同盟，就是因为在英帝国的扩张过程中，日本在远东的优势地位明显增强，为了在远东建立盟友，英国需要与日本缔结同盟，“德国在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海军，很大方面受日本海军牵制，故英国欲与日本达成同盟”。[26]而日本方面，希望自己在远东的权益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也需要英国的支持。这种同盟的关系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山东问题、

德属太平洋岛屿归属等问题上，英国同日本站在了同一立场。

一战中关于中国是否参战问题，英日发生过争论，起初日本反对中国参战，认为中国一旦参战会影响日本在中国扩张势力。由于欧洲战场交战十分激烈，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英国方面则希望中国参战，以便达到遏制德国的目的。于是，日本向英国提出了同意中国参战的条件，即要求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山东的权益。

1917年2月16日，英国驻日公使奉英国政府之令照会日本外向本野一郎，表示英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并且满足日本对南洋群岛的领土要求，“上个月（1917年1月）在与阁下（本野一郎）会谈之际，阁下要求在媾和会议上，英国能够支持日本在中国山东以及南洋群岛的权益，我已经将日本政府的要求呈交给英国政府，现在英国政府方面已经给了答复，我非常荣幸向阁下传达这一决议：关于日本在中国山东以及南洋群岛的权益，英国政府同意在媾和会议上支持日本。同时，也希望日本能够以同样的精神支持英国在赤道以南德属岛屿的权益”。[27]不久，日本方面也回复英国公使，表示日本同意英国的要求，同样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德属岛屿的占领要求。

针对英国与日本之间的秘密协定，美国方面在事后也得到了消息，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声明“知道日本已经与欧洲某些大国签订条约，要求他们支持日本占有南洋群岛以及在山东的特殊权益，兰辛也声称他已经获得了这些协约的内容”。[28]威尔逊总统提出了针对巴黎和会的“十四点”原则，也就是呼吁各国摒弃以前签署秘密协定的外交手段，本着平等、公正的原则召开巴黎和会，这也被称作“新外交”。

关于太平洋岛屿的问题，美国与日本一直存在争夺。一战中日本趁机扩张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这威胁到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对太平洋岛屿的占领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通信是一大威胁。“原德属北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在一战中被日本所占领，这些岛屿包括科洛、玛丽安娜、雅浦岛等，主要集中在东经130°～170°、北纬1°～21°之间，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岛屿就是关岛，关岛北部是玛丽安娜岛，南部是科洛岛，东南是雅浦岛，美国在太平洋的通信连接是通过马尼拉到关岛，然后由关岛连接旧金山、中途岛和夏威夷，而且美国与日本横滨之间的联系也要通过关岛北部。”“这些岛屿对美国来说有很大的价值，一旦战争，日本很容易就能切断关岛的通信，那么美国在整个菲律宾地区的通信也就终止了，任何船只想要进入菲律宾群

岛，也会受到日本方面的阻拦。”[29]

在贸易方面，日本对关岛的占领使美国忧心忡忡，“关岛这个被众多岛屿所包围的地方，现在被日本所占领，这对美国来说是极大的威胁，悬挂着美国国旗的船只在原德属太平洋群岛上有大量的椰子贸易，现在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在经过日本占领地区时会阻碍美国船只的靠岸以及贸易”。[30]

对此，美国方面希望在巴黎和会期间，不要瓜分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和权利，让德国保留一些岛屿的控制权，这样在和会以后，美国可以单方面与德国方面协商，将这些岛屿的权利让与美国。“在和会期间，美国要坚持将太平洋上部分或是全部岛屿归还德国，在会议结束后，美国与德国单独订立协约，将萨摩、加罗林、玛丽安娜等岛屿的权利让与美国，来抵消德国对美的赔偿。”[31]

美国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当时的局势下，美国认为德国的海军力量在一战中已经被摧毁，在短时间内无法与美国相抗衡，即使将这些岛屿归还给德国，德国由于失去了海上优势，也无法控制住这些岛屿，这时美国就可以乘虚而入。而英国和日本，有与美国相抗衡的海军势力，尤其是日本的海军，在一战中得到大大的加强，已经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新的竞争对手，美国希望通过巴黎和会，来抑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增长。“英国和日本有强大的海军力量，他们会在太平洋地区的岛屿上建立海军基地，这是对美国极大的威胁。”[32]

针对美国的想法，日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不应该把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归还德国，理由是德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十分失败，他们虐待岛屿上的土著居民，为了德国的利益榨取当地人的血汗，这也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抗，如果把殖民地归还德国，那么不仅违反当地居民的意志，也将为德国建立军事基地、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提供便利，因此坚决不能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归还给德国。在这一点上英国与日本站在同一立场。

日美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了巴黎和会。在十人会议上，日本作为协约国的五强之一，提出“要求吞并太平洋上前德国所属岛屿，其中包括对美国具有特殊权益的关岛，寸步不让”。威尔逊总统则坚持“将原德属太平洋岛屿转让日本时，必须把关岛除外，并且认为这一条件必不可少”。[33]最终德属太平洋岛屿问题通过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得以解决。

四 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

1919年1月24日，五大国会议决定剥夺德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权。日本代表于1月27日提出，将赤道以北的德属太平洋岛屿交给日本，同时，英帝国也提出了自治领的要求，法国提出了合并殖民地的要求，但是这些都被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否决。为了防止谈判陷入僵局，1月29日英国驻国联代表对美做出了妥协，在承认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前提下，提出了A、B、C三种委任统治的等级，太平洋岛屿问题被划分到C类，即委任国权限最大的一种情况，一旦被授予委任统治权，岛屿就属于被委任国的领土组成部分。1月30日，这一方案经五大国会议讨论后，威尔逊也做出了让步，日本全权代表牧野虽然在会议上一再强调要完全获得太平洋岛屿的统治权，但是由于大国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牧野认为已经没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于是同意了这一主张，但同时也表示最终的决定要征得日本政府的同意才可以。

日方代表很快将委任统治的方案传达给了日本政府，日本国内完全没有预想到“委任统治”方案的提出，因此2月3日，日本国内的外交调查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就这一方案展开了讨论，最终政府给在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发出的决定是“日本政府为了避免使日本在和会上陷入孤立地位，同意了英国方面提出的委任统治方案，但是要确保日本对南洋群岛的委任统治权”。[34]

此后关于委任统治的问题，国际联盟委员会展开了讨论。2月8日，英国方面又提出了委任统治的修正案，将原案中的“as integral portions”改为了“as if integral portions”，原案的意思是把德属岛屿以国际联盟的名义交给日本统治，并且将这些岛屿作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修正案中是把这些岛屿“临时”作为日本领土的构成部分。日本方面强烈反对英国的这一修正案，牧野提出“原来的方案是五大国会议上的决议，日本方面已经一再让步，既然是各国之间商议的结果，那么这一结果就不可以随意修改，况且这样的修改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意思”，因此日本方面要求维持原案。美国方面，威尔逊认为如果将岛屿作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那么与领土合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比较倾向于支持修正案。但是牧野坚决反对，认为“日本作为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国，已经在行政方面面临种种限制，而且还背负了很多义务，完全区别于领土合并”。[35]在日本的坚持下，美国的威尔逊和英国的塞西尔商议后决定接受日本的要求，维持原来的方案。

英国方面起草了关于德属殖民地问题的解决方案。5月7日，将此方案予以公布，即赤道以北地区交给日本统治，赤道以南的地区归属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都是以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名义对这些岛屿进行统治。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联盟还没有完全成型，法律、规章方面还不健全，所以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统治，实际上还是按照日本的模式进行。关于日本要在太平洋岛屿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当时日本众议院议员尾崎行雄表示，“传言日本要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对美国和澳大利亚造成军事威胁，这是荒唐的，尤其是在其他大国努力消除军事协定的时候”。[36]但是，当南洋群岛真正落入日本手中时，这一传言便成为了事实。

关于南洋群岛问题，最终以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方式交给日本管理，“受委任国对委任统治地有行政和立法的全权。该领土应按照受委任国的法律予以管理，作为受委任国领土的构成部分，因此受委任国有权在委任统治地区使用日本法律”[37]。由此可见，日本方面虽然名义上还是国际联盟的受委任国，但是实际上在赤道以北太平洋岛屿的权益已经得到了认可。但是，由于日本在对南洋诸岛实施“委任统治”期间，与美国在雅浦岛问题上发生过争执，而且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美国也未加入国际联盟，因此巴黎和会上日本的“委任统治”并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认可。巴黎和会后，日本与美国进行交涉，1922年2月11日，日本币原喜重郎和美国国务卿休斯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雅浦岛及其他赤道以北太平洋委任统治岛屿条约》，根据条约“美国不再质疑日本对赤道以北的原德属北太平洋岛屿的委任统治权，换取了日本对美国在雅浦岛的自由出入权、居住权、财产权、电缆通讯权、无线通讯权以及其他特权的认可”。[38]

从整个德属太平洋岛屿的归属问题谈判来看，日本方面通过外交协商，尤其是跟英国、美国的协调，使日本在一战中占领的德属太平洋岛屿权益合法化，对日本来说这是在巴黎和会上的一次成功外交。另外，关于这些岛屿的归属问题，完全没有征求岛屿居民的意见，他们的声音已经被完全忽略，虽然日本打着尊重原住民意愿的旗号，但是实际上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一样，都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结语

对南洋群岛统治权的争夺，实际上是对太平洋地区控制权的争夺。

一战后的美国，势力大增，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其霸权地位，太平洋地区是美国的必争之地。而日本因为在一战中发挥的作用，国际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虽然还没有办法跟美国、英国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抗争，但是在太平洋地区，日本有着美国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对南洋群岛的争夺，不仅是日本势力扩张的需要，更是扩大自身国防安全的需要。因此，日本趁着一战期间德国势力衰落，率先出兵，夺取了南洋群岛的控制权。

因为一战中日本对南洋群岛的占领以及一战后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博弈，南洋群岛的归属权发生了改变，由德国统治变为日本管辖，这同时也使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格局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衰退，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增强。英国在一战后势力衰落，已经无力再与日美争夺太平洋地区的权益。一战中英国需要远东的盟友来牵制德国，因此与日本签订了英日同盟，在条约中也承诺，会在战争胜利后将南洋群岛的权利交由日本。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国站在了日本方面。会议最后，虽然是以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方式将南洋群岛交由日本管辖，但日本获得了这一地区的实际统治权，这对日本来说，实现了其外交目的。

其二，美日矛盾激化，使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日趋激烈。日本通过巴黎和会确定了对南洋群岛的控制权，虽然在委任统治的条款中规定了不得在这些岛屿进行军事方面的部署，但是日本在一战后并没有遵循该约定，当日本法西斯势力上台之后，赤道以北太平洋岛屿变成了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据地之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埋下了伏笔。

[1] 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 赤道以北德属太平洋岛屿：日文中又称为“南洋群岛”或“南洋诸岛”，指的是位于太平洋中部地区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也就是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所在地，主要包括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等。该地区先后被西班牙、德国、日本、美国所占领。1979年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成立，1990年联合国安理会终止了部分太平洋托管领土协定的决议，正式结束了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托管地位，1991年9月17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本文主要论述的时间段为日本对该群岛的占领时期，为了表述方便起见，文中使用“南洋群岛”来代指这片区域。

[3] 对南进论的研究，可参见李小白、周颂伦《日本北进、南进战略演进过程述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周俊《二战前日本南进政策形成的历史脉

络》，《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胡德坤《中国战场与日本的北进、南进政策》，《世界历史》1982年第6期；王启生《关于日本南进与北进扩张战略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这些研究主要将日本的南进政策锁定在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没有关注到日本对太平洋岛屿的占领问题。事实上，日本占领南洋群岛也是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学者的研究还不充分。此外，在日本南进战略的确立时间上也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是明治初期日本就已经确立了南进的战略，也有学者认为南进战略是确立于1936年前后，即日本发动法西斯战争以后。因此，关于这一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

[4] 从现代国际关系角度出发，关于日本海洋政策的研究，可参见康德瑰、金永明《日本海洋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修斌《日本海洋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王键《日本海洋战略与东亚海洋安全》，《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6期；高兰《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这些研究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冷战以后，更多的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属于现代国际关系的范畴，对二战前日本的海洋政策论述比较少。

[5] 相关研究专著类：等松春夫『日本帝国と委任統治——南洋群島をめぐる国際政治1914-1947』名古屋大学出版會、2011；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千倉書房、2009；浅野豊美『南洋群島と帝国·国際秩序』慈学社、2007、平間洋一『第一次世界大戦と日本海軍——外交と軍事の連接』慶應義塾大学出版會、1998。論文類：今泉裕美子「日本軍政期南洋群島統治（1914～1922）」『国際学研究』第17号付録、1990；酒井一臣「南洋群島委任統治制度の形成——日豪関係の視点から」『二十世紀研究』第7号、2006年12月；高原秀介「ウイルソン政権と旧ドイツ領南洋群島委任統治問題——米·英·日·英自治領の認識と政策的対応をめぐって」『アメリカ史研究』第27号、2004。

[6] 南洋厅（なんようちょう）是日本1922年根据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合约》设立，主要负责日本委任统治下的赤道以北太平洋岛屿事务。该厅所在地设在帕劳群岛的科罗尔岛。南洋厅在1945年因为日本二战的失败而被取消。

[7] 《神户新又日报》1923年（大正12年）5月1号，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新闻纪事文库经济政策（10-061）。

[8] 《神户新又日报》1923年（大正12年）5月1号，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新闻纪事文库经济政策（10-061）。

[9] 《时事新报》创刊于1882年，是明治维新以后福泽谕吉为了在日本普及西方文化从而创办的杂志。中国也有《时事新报》，前身是1907年创刊的《时事报》，以及1908年创刊的《舆论日报》，1909年合并，定名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18日改名为《时事新报》。

[10] 「南洋（1-11）」（一、膨大なる地域天産甚だ豊富）『時事新報』1914年（大正3年）11月3-5日。

[11] 等松春夫『日本帝国と委任統治——南洋群島をめぐる国際政治1914-1947』、120頁。

[12] 「南洋（1-11）」（六、南洋の五大交通系各特殊の関係あり）『時事新報』1914年（大正3年）11月3-5日。

[13] 「南洋（1-11）」（七、濠洲対外航路発達蘭領群島間の航路）『時事新報』1914年（大正3年）11月3-5日。

[14] 「南洋（1-11）」（八、巴運河と南洋航路——大変化来らん）『時事新報』1914年（大正3年）11月3-5日。

[15] 等松春夫『日本帝国と委任統治——南洋群島をめぐる国際政治1914-1947』、87頁。

[16] 德荷电信公司，全称是Deutsch-Niederlandische Telegraphengesellschaft，该公司是由德国政府和荷兰政府主导，属于德国企业。

[17] 西里伯斯岛（Celebes），是现今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Sulawesi）旧称，该岛位于印度尼西亚中部。

[18]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0年第三冊上巻第二六七文書。

[19]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原書房、1989、“年表”、203頁。

[20] 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十巻）』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1、173頁。

[21] 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十巻）』、175頁。

[22] 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十巻）』、175頁。

[23] 季武嘉也『大正社会と改造の潮流』吉川弘文館、2004、106頁。

[24]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三册第六六八文書。

[25]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三册第六七一文書。

[26] 季武嘉也『大正社会と改造の潮流』、101頁。

[27] 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十巻）』、431頁。

[28]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9-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Vol. II（Washington D.C.，1952），p.79.

[29]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9-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Vol. II，p.513.

[30]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9-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Vol. II，p.514.

[31]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9-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Vol.II，p.515.

[32]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9-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Vol.II，p.515.

[33]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第195页。

[34] 外務省百年史編纂委員會『外務省の百年』原書房、1979、723頁。

[35] 外務省百年史編纂委員會『外務省の百年』、724頁。

[36]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Vol. 12，p.4.

[37] 《国际条约集——1917-192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556页。

[38]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19頁。

近代朝鲜民族的人口流动

——以中国东北延边地区的社会变迁为中心

朴敬玉[1]

前言

战前，中国东北地区产出的农产品对日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东北生产的豆粕在日本的农村被作为一种肥料广泛使用，其产出的杂粮则成为满足在日本维持低米价政策的朝鲜大米的饥饿出口以及缓和朝鲜国内粮食紧张的情况而使用的重要物资。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东北的农产品在关东军推进重工业开发过程中，成了不可缺少的外汇创汇源。而且，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本国的粮食产量骤减，东北的大豆、杂粮成为日本国民的宝贵粮食。另外，大米、小麦、棉花这些军需农产品，作为在东北日军的自用农产品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与朝鲜半岛相邻、中俄边境地带的延边地区（现在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带）的农业以1909年日本领事馆的开设以及1910年韩国合并为界，急速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1925年旧天图轻便铁路的开通，导致了当地社会急剧的商品市场化。

延边地区是中国、朝鲜、俄罗斯接壤的国际上非常重要的地区，作为中国东北的一部分，成为日本战前侵略亚洲的据点。因此关于延边地区的各领域有着诸多研究成果。在抗日运动史、教育史领域，可以列举出金美花、许寿童的研究。[2]金美花以延边地区杨城村为例，阐明了农村学校教育的变迁过程；许寿童阐明了围绕着朝鲜人的教育，维护民族教育的朝鲜人与日中两国，以及欧美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之间利害冲突不断发生的事实。

此外，关于农村和城市等地区社会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先行研究者有金周溶、王国臣、权哲男等。[3]在韩国，作为抗日运动根据地的延边地区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因此对于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城市基础社会也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金周溶将在东北朝鲜人的主要居住地延边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当地通信体制的建立、农业金融机关的设置和运营，同时论述了近代延边地区的经济被日本从

属化的演变过程；通过朝鲜人的日货排斥运动和青年团体的活动来考察了当时的对日经济斗争；同时，对直接影响朝鲜人生活基础的金融问题进行了探讨，列举分析当时的各种金融机关，其分析内容对于考察在东北朝鲜人的生活史具有很大意义。王国臣从人口、农业、工商业、金融、贸易等方面，利用统计资料分析了近代延边地区的变迁过程。另外，权哲男关于伪满洲国时期农业方面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成果。他详细分析了农业相关的数据，包括劳动力、营养学等领域的内容，阐明了伪满洲国时期农业停滞的状况。但是，由于其研究对象是整个东北地区，所以无法深入地探讨地域性特征。另外，在考察东北粮食流通时，中国商人所掌握的粮栈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也受到了关注。[4]但是，由于约占在东北朝鲜人70%的延边地区并没有存在粮栈，因此对于从民国前期至伪满洲国时期的延边地区农业结构以及粮食流通过程的分析，是为了阐明在东北农村社会里，应当如何定位延边地区这一研究内容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本文以上述先行研究为基础，概述了从朝鲜半岛移居到延边地区的朝鲜移民的状况，分析了从民国前期到伪满洲国时期，延边地区以旱田农业为主的农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并且，通过对粮食流通过程中主要承担人的分析，考察了延边地区的特殊性，揭示了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一个侧面。

一 延边地区朝鲜移民的移居趋势

（一）九一八事变以前的朝鲜移民

1883年，清朝政府废止了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的“封禁政策”，开始鼓励朝鲜移民。1894年，移居到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有6.5万人，1904年增加到7.8万人。针对这些朝鲜人，李朝（朝鲜王朝）从1870年开始到1907年为止，在鸭绿江对岸实施朝鲜的面里制。[5]这些朝鲜人虽然持有出外做活的性质，也有很多人再次回到朝鲜，但是定居者从第四年开始就必须缴纳40%～50%的地租，成为佃农，同时被纳入当地地主的管理之下。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中国人地主—朝鲜人佃农这一民族别租佃关系。

另外，根据1909年的《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韩国称“间岛协约”），朝鲜人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保障。因此，延边地区在东北社会里

形成了朝鲜人约占70%的特殊的朝鲜移民社会。[6]因土地所有权得到了保障，所以在延边地区以归化朝鲜人的名义，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能够拿到一张地券，这就是所谓的佃民制度。[7]20世纪20年代，虽然延边地区的朝鲜移民的增加率有所下降，但是移民数却持续增加。1930年，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人口数量达到583403人，其中居住在延边地区的有388366人，约占全体人数的66%以上（见表1）。[8]

因为延边地区交通不便，加之东北其他地区人口稀薄，相比较之下从山东等地迁徙而来的中国人移民数就比较少。但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由于吉敦铁路的开通，交通的便利化再加上军阀战争，来自山东等地的流民逐渐增加。

表1 延边地区的人口推移

单位：人

年份	中国人	朝鲜人	日本人	合计
1907	23500	71000	100	94600
1908	27800	89000	250	117050
1909	31900	98500	270	130670

表1 延边地区的人口推移-续表

年份	中国人	朝鲜人	日本人	合计
1910	33500	109500	200	143200
1911	35200	126000	170	161370
1912	36000	143000	200	179200
1913	36900	161500	240	198640
1914	38100	178000	230	216330
1915	38500	182500	295	221295
1916	43896	183426	551	227873
1917	48466	195611	619	244696
1918	56247	214500	823	271570
1921	72746	307806	—	—
1922	70698	323806	—	—
1923	77709	323011	1942	402662
1924	82730	329391	1956	414077
1925	82470	346194	1978	430642
1926	86347	356016	1950	444313
1927	94960	368827	1965	465752
1928	100165	382930	2115	485210
1929	116666	381561	2083	500310
1930	117902	388366	2256	508524
1931	120394	395847	2436	518677
1932	112135	406341	3882	522358
1933	116083	408887	6922	531892
1934	118479	454977	10969	584425
1939	173334	548331	15749	737414
1940	171004	585214	18963	775181
1941	191893	612989	24077	828959

资料来源：崔昌来等『延邊人口研究』、8頁（1907-18年）；天野元之助『間島に于ける朝鮮人問題に就いて』、4-5頁（1921-22年）；中谷忠治『間島に于ける農業机构の變迁』、16-17頁（1922-34年）；『間島省概況』（1939年）『昭和13.14年満洲農产統計』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查部、1940年；『間島省統計年報』（1940-41年）。

（二）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朝鲜移民

九一八事变以后，延边地区朝鲜人人口持续增加，1934年末激增到454977人。从出生地来看，咸镜北道出身的人占大多数，共有325377人（占延边地区朝鲜移民总数的71.5%），其次是咸镜南道有44091人（9.7%），之后是江原道（4.5%）、平安南道（3.3%）、平安北道（2.2%）、黄海道（1.8%）、京畿道（1.7%）、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忠清北道、全罗南道、忠清南道，按照这样的顺序，延边地区朝鲜移民中全罗北道的人口数是最少的。这些朝鲜人居住在延吉、和龙两县的人口高达70%，居住在汪清县的朝鲜人口是最少的。[9]

延边地区的朝鲜移民1933年时约为6.1万户、408887人，到了1942年增加到11.4万户、622627人。

二 延边地区的农业结构

（一）民国前期的农业构造

延边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为大豆、小米、玉米、高粱、小麦和其他一些杂粮，但是与其他地方相比，高粱的产量比较少，小米的产量较多。将1910年延边地区栽培的农作物，按照其面积排序如下：谷子（32%）、大豆（14%）、大麦（11%）、高粱（8.6%）、小麦（8%）、水稻（约为100町）。[10]也就是说，朝鲜移民移居的初期，小米的种植面积最大。那是因为，延边农民的大部分是朝鲜农民，而他们的常粮就是小米。

在咸镜北道的移民占大多数的延边地区，大豆是第二大农作物。大豆的产量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虽然有所变动，但总体上看呈现逐渐增加态势。1926年到1930年的大豆生产量，从763100石（27.7%）增加到784655石（30%），在整个农作物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小米（1930年占26.6%）从而跃居第一位。其中，88.9%的大豆上市销售，具有很高的商品价值（东北地区的平均剩余率为82.1%）。

如上所述，在延边地区旱田农作物占绝大多数。水稻作为一种新的农作物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11]1915年，从朝鲜水原实验农场引进了一批适应气候的早熟品种——青森县的“小田代”被引进到龙井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米价格的暴涨，使得水田面积急剧扩大。[12]1926年前后，随着延边珲春地区的朝鲜移民的增加，且设法改进灌溉方式，水田耕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3]因此，延边地区的水田面积，在1908年为98町，1912年为185町，1915年增加为334町，但从20世纪1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剧增加，到1925年增长到7537町。但是，水田占耕作总面积的比率只有4%，到1929年也只占6.7%。[14]

（二）伪满洲国时期的农业结构

东北的农业以大豆为中心实现了高度商品化，而且农产品的消费对于国外市场的依存度也非常高。因此，由于世界恐慌导致的国外市场的狭隘化，在导致了农产品出口不振的同时也使得农产品价格暴跌。[15]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满铁调查会制定的农产品增产政策以从大豆到各种特殊作物的转化为基调。[16]另外，遵从“日满经济一体化”的确立与国防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对东北的农业进行了调整，同时制定了有助于摆脱恐慌、主导农业以及农作物增产的法案。虽然实施了农产品增产计

划，但是由于从1932年至1936年的农业投资金额微小，农产品增产计划的推进受到了限制。[17]

从延边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构成比例来看，大豆从1931年的32%下降到1943年的26.9%；与之相反的是，玉米从6.9%上升到12%，水稻从5.9%上升到8.2%（见表2、表3）。水稻所占比例的增加是由于日本和朝鲜移民的增加，如果将水稻所占比例的变化作为一个例外，那么剩下的构成比例的变化则是从商品作物向自给作物的转变的表现，尤其是主要商品作物的大豆由于价格暴跌导致了播种比例的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农家自家消费作物的玉米的播种比例的上升。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的1934年，将延边地区命名为间岛省。间岛省的《农业振兴计划》的重点是大豆和水稻的品种改良。农业试验场的水稻品种改良进展顺利，栽培品种也随之多样化。延边地区地形复杂，山岳地带多，即使在同一个县里，不同地方的气温以及无霜期的差异也很大，所以因地制宜，平原地区一般种植小田代5号·津轻早生，山间地带则种植井越早生·北海之类的品种。到1941年，大豆品种的改良率已经达到65%，水稻品种的改良率则达到了80%。农村的追肥场也陆续建设起来，自给肥料的利用率也增加了。同时根据计划，马铃薯以及麻和烟草的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尤其是根据军事工业发展的需求，烟草种植面积扩大了两倍以上，并给予技术指导。[18]

表2 延边地区耕地面积累年指数

年份	大豆	水田	粟	小麦	玉米	高粱	其他合计
192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25	110.5	110.0	106.0	88.5	104.0	102.3	105.3
1926	131.8	118.0	105.7	77.5	93.1	93.0	108.9
1927	139.0	115.0	109.3	193.1	145.7	92.3	111.5
1928	171.1	122.0	116.5	77.0	88.7	91.5	123.1
1929	183.2	142.0	114.6	68.9	92.0	86.9	128.1
1930	189.7	151.0	114.1	64.3	92.0	83.0	131.0
1931	194.2	168.0	116.3	62.0	94.3	83.4	134.1

资料来源：广濑『間島及東邊道地方に于ける鮮農の特殊性』、124 頁。

表3 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

单位：%，町

指标		1931 年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大豆	面积	77575	72152	78395	87954	76110	72929	65949
	占比	32.0	29.6	29.8	31.5	28.4	27.9	26.9
粟	面积	65084	59471	57579	58120	57238	58501	47980
	占比	26.9	24.4	21.9	20.8	21.4	22.4	19.6
玉米	面积	16736	25466	30071	29907	30391	30169	29419
	占比	6.9	10.4	11.4	10.7	11.4	11.5	12.0

表3 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续表

指标		1931 年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稻	面积	14284	23634	25326	25944	24505	22072	20084
	占比	5.9	9.7	9.6	9.3	9.2	8.4	8.2
麦	面积	10730	14030	17633	15569	16620	17688	18093
	占比	4.4	5.8	5.9	5.6	6.2	6.8	7.4
土豆	面积	10872	13238	13614	13952	15519	16266	17666
	占比	4.5	5.4	4.6	5.0	5.8	6.2	7.2
黍	面积	7332	4218	6544	9506	10056	7320	6734
	占比	3.0	3.7	2.2	3.4	3.7	2.8	2.7
麻	面积	—	85	761	2463	2579	2490	3563
	占比	—	—	0.26	0.88	0.96	0.95	1.50
烟草	面积	—	753	1136	1247	1600	2626	2727
	占比	—	0.3	0.38	0.4	0.6	1.0	1.1
其他	面积	39597	—	56113	34486	32933	31552	32994
	占比	16.3	—	18.9	12.4	12.3	12.1	13.5
总播种面积		242210	243769	263071	279148	267148	261613	245209

资料来源：吉林省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设课『延边地区农业・系統計表』、1943 年。『昭和 13.14 年　滿洲农产統計』南滿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查部、1940（1938 年）。

三 粮食的流通

（一）农产品的流通过程

在延边地区的总生产额中，农产品的比例达到95%左右。其中，小米、玉米、高粱成为农民主要的粮食，在市场上的流通率较低；相反，大豆的消费量很少，大部分大豆销往国外。对于延边的农民来说，特产大豆的销售是生活在货币经济当中的主要的营生手段。

表4 延边地区农作物输出金额占比

单位：%

	大豆	粟	小麦	玉米	高粱	籾
1925	82.9	4.9	0.0	0.0	0.0	0.0
1926	63.2	22.6	0.0	0.1	0.0	0.6
1927	74.0	13.0	0.0	0.0	0.7	0.8
1928	76.7	12.3	0.1	0.0	0.2	0.0
1929	76.5	6.6	0.0	0.0	0.0	0.0
1930	71.5	6.3	0.1	0.0	0.1	0.7

资料来源：广濑『間島及東邊道地方に于ける鮮農の特殊性』、125 頁。

在延边地区的局子街、龙井村，每个月大约有6次集市，近乡农民拿着杂粮谷类或者家畜来交换必要的生活物资。[19]农民的农作物（大豆）销售路线，大致存在两种主要的方式。（1）农民自行进行销售。在市场或集散地向特产商销售或者直接到油坊去销售。（2）特产商的收购。特产商去农家的院子里，或者到集市，或者在前往集散地的路上进行收购。也有生产者带进的方式，但是最常见的收购方式是特产商在集市上的收买（见图1）。

生产者→地方特产商→集散地特产商→输出商
生产者→集散地特产商→输出商
生产者→输出商
生产者→油坊

图1 延边产大豆的流通路线

在东北其他地方，粮栈具有农产品的收集、储藏以及金融功能，在农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在朝鲜移民占大多数的延边地区，是不存在粮栈的。延边产大豆的交易，主要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和作为产地批发商的日本特产商之间进行的市场交易或者直接交易。产地的地方特产商通常是小规模经营，其交易并不以自己的计划去收购，反而是受到集散地特产商或出口根据地特产商的委托而进行购买的情况是最多的。[20]延边地区的特产商主要为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日本的商业资本与以清津、雄基为根据地的朝鲜北部商人。

伪满洲国初期，由于农业恐慌的影响，生产力大大降低，导致农村社会贫穷化的状况更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战祸之下，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得恶化，同时大豆出货量也减少，因此导致了东北农村极为疲敝的情况。为了对应这样的状况，伪满洲国、关东军着手制定农产品增产政策以及农产品流通过程的控制、合理化政策。伪满洲国凭借增产政策，设法恢复东北的农业，同时通过控制以及合理化流通过程减少其中间费用，且增加销售农产品的农民收入，最终实现农民生活的稳定。

1934年12月，间岛省公署成立，省公署与向来有联系的日本领事馆方面合作，决定在1935年实施大豆共同销售计划。但是，汪清县为了尽量提高共同销售业绩强制性地发表了告示，结果导致农民们心怀恐惧。[21]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伪满洲国开始了对农产品的严格控制。1938年成立了满洲制粉联合会（小麦·小麦粉控制）和满洲粮谷公司（米谷·粮食控制），1939年设立了满洲特产专管公司。1941年，上述三个控制机构实现了统一，成立了满洲农产公司，实现了对大豆、小麦、大米以及包括杂粮在内的农产品的统一管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农产品的收购成为伪满洲国重要的政策，甚至成为在战争体制下必须完成的至上命令。

（二）商业资本

1908年在龙井村里设置的邮局具有金融和通信功能。1917年3月20日，朝鲜银行办事处在龙井村开设，与之相伴的是延边出入口贸易的繁荣，1918年总存款额为6785417日元，总贷款数为1925744日元。

20世纪20年代，延边地区主要的特产商多为日本的商业资本，尤其是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持有最大的资本。他们将本部设置在龙井村以联结各地，收购各地的粮食。

农产品的收集销售是在东北的三井物产的主要经商活动。1937年，农业合作社成立，并在农产品的金融贸易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由此，三井物产这样的商社向内地发展变得极为容易。

1941年成立的满洲农产公司将19个公司指定为特约收购人，并分配了各自的收购地区和收购量。在满洲农产公司的收购人当中，三井物产依旧占据着绝对性地位。三井物产与其子公司三泰产业一起收购了东北农产品总收购额五成的产品。到了1944年，满洲农产公司废除了特约收购制度，在农产品收购上三井物产被排除在外。[22]

（三）贸易

根据1909年的《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等地被开放为商埠地。1910年之前，延边地区的商品流通有三种途径：（1）通过吉林的进出口贸易路径；（2）通过符拉迪沃斯托

克（海参崴）和珲春的路径；（3）通过清津—会宁的路径。贸易量到1909年为止，通过吉林的占60%，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占35%，通过会宁—清津的占5%。

1917年12月，清津—会宁铁路建成后，通过会宁、清津到延边贸易达到了八成。天宝山轻铁开通缩短了货物运输的时间。当时，清津被认为是连接延边与日本的重要的海上通道。扩大的交通路线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成为商业发展的原动力。

延边地区生产的大豆被运输到朝鲜，作为朝鲜产或者咸镜北道产的大豆再次被运输到日本。并且，在延边地区的贸易中，对朝进出口贸易占绝对多数。延边地区将朝鲜作为中转地，形成了对日的原料供给市场。

进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占据了绝大部分，仅次于农产品的林产品也只占6%。农产品中，大豆占总数的90%以上，对总出口额而言也占77%的比例。因此，延边地区不是作为粮食供应地而是作为原料供应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延边地区特产物的出口有两种途径：（1）经过京图线（新京-图们）、朝开线（朝阳川-开山屯）、图佳线（图们-佳木斯）往北朝鲜南回线延伸向清津港的路线，延吉县、和龙县、汪清县、安图县的特产主要利用这个路线；（2）往北朝鲜北回线延伸，向雄基港的路线，珲春县的特产品利用此路线。前者的路径与后者相比，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1936年，东北从朝鲜的进口额为363万日元，出口额为960万日元。在进口产品中，主要的商品大米其价值达149万日元，苹果及其他水果达187万日元，但出口产品中主要的商品小米其价值达1749万日元，大豆达508万日元。进口品中的大米基本都是朝鲜生产的，但是水果中除61万日元的朝鲜产的苹果以外基本都是日本产的柑橘类产品，出口产品中的大豆是往日本出口的，而小米则全部都在朝鲜境内被消费。[23]

结语

九一八事变以前，延边地区的水田面积极少，主要是以小米、大豆为主的旱田农业。在朝鲜移民移居的初期，小米是最重要的农作物，但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米的生产引起了关注，水田面积也随之增加。随着农业经济商品化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大豆的商品化也急速发展。

九一八事变以后，延边地区作为原料供给地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占70%的延边对朝鲜的贸易，揭示了延边地区将朝鲜作为中转市场，完全隶属于日本帝国经济圈的这一事实。

与朝鲜接壤、居住人口70%以上为朝鲜人的延边地区很早就被日本的商权所渗透，在农产品的流通过程中日本的商业资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或者是朝鲜北部的商人（日本人、朝鲜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与以粮栈为媒介进行农产品流通的东北其他地区相比，具有很大的区别。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农产品的流通受到了控制，同时还实施了强制性的粮食出货政策。从日本进行的亚洲侵略的整体来看，确保粮食流通、掠夺农产品等物资是战争的中心课题。在确保物资方面，军部依赖于日本的商社——尤其是三井物产。具体解明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公司，在延边地区的大豆流通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将是今后的研究课题。

[1] 朴敬玉，日本一桥大学。

[2] 金美花『中国東北農村社会と朝鮮人教育——吉林省延吉県楊城村の事例を中心として（1930-49年）』お茶の水書房、2007；許寿童『近代中国東北教育の研究——間島における朝鮮人中等教育と反日运動』明石書店、2009。

[3] 金周溶『日帝の間島経済侵略と韓人社会』先人出版社、2008；王国臣『近代延邊経済発展史』延邊大学出版會、2010。权哲男：《伪满洲国农业经济分析》，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

[4] 風間秀人『満州民族資本の研究——日本帝国主义と土着流通資本』绿荫書房、1993。

[5] 玄奎焕『韩国流移民史（上卷）』语文阁、1967、139-140頁。

[6] 根据日本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当时的调查，当地人约有2800户，1.8万人。与之相对比，朝鲜移民有1.47万户，7.25万人。玄奎焕『韩国流移民史（上卷）』、171頁。

[7] 東洋拓殖株式会社『間島事情』、1918、255頁。根据1926年的调查，间岛地区的地主占7%、自耕农占37%、自耕兼佃农占23%、佃农占32%，自耕农的比例是最大的。东洋协会編『満蒙の米作と移住鲜农问题』、1927、62頁。

[8] 「在満各领事馆内鲜人人口調查（1930年度末）」船桥治編『満洲移民関系資料集成』第13巻、307頁。

[9] 中谷忠治「間島に于ける农业机构の概要」『満鉄調查月報』第15巻第11号、116-117頁。

[10] 統監府間島臨時派出所編輯『間島产業調查報告』、1910、181-188頁。

[11] 清末民国初期聚居在延边地区的移民，大多为没有稻作经验的朝鲜北部的移民，因此当时的农作以旱田农业为主。后来，来自咸镜南道定平郡的有稻作经验的朝鲜移民利用低洼地进行水田耕作并获得了良好的收益，以此为契机延边地区的水田耕作开始盛行。但是，由于寒冷的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制约，收成并不多。而且，水稻的价格和陆稻的价格基本差不多，因此水田耕作并没有广泛普及。上冢司『間島に于ける水稲』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1914、5頁。

[12] 水原试验农场是朝鲜总督府的劝业模范农场，1929年改称为朝鲜总督府农事试验场。朴京洙：《延边农业经济史》，第6～12页。《在延边地区的初期水田开发》，朴昌昱主编《中国朝鲜民族历史足迹丛书1 开拓》（朝文），民族出版社，1999，第335～339页。

[13] 在間島末松警稿「朝鲜人ノ間島·珲春同接壤地方移住二关スル调查」、1926（金正柱編『朝鲜统治史料』第10卷、1971、351-352頁）。

[14] 『満蒙の米作と移住鲜农问题』、62頁。《延边农业经济史》，第8～9页。「間島ニ于ケル朝鲜人所有（小作ノモノヲ含ム）水田ト畑地トノ歩合调（1929年10月30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満蒙各地ニ于ケル朝鲜人ノ农业关系杂件（1）』、1927-1930年、E-4-3-1-6。

[15] 饭冢靖·风间秀人「农业资源の收夺」浅田乔二·小林英夫『日本帝国主义の満州支配—15年戦争期を中心に』时潮社、1986、429頁。

[16] 饭冢靖·风间秀人「农业资源の收夺」浅田乔二·小林英夫『日本帝国主义の満州支配—15年戦争期を中心に』、441頁。

[17] 饭冢靖·风间秀人「农业资源の收夺」浅田乔二·小林英夫『日本帝国主义の満州支配—15年戦争期を中心に』、441頁。

[18] 朴京洙：《延边农业经济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7，第105、107页。『間島省烟草作地帯の农业経営事情』満洲烟草株式会社、1942。

[19] 上冢司『間島事情』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総务部調查课、51-52頁。

[20] 中谷忠治「間島に于ける农业机构の概要」『満鉄調查月報』第15巻第11号、87頁。

[21] 池田和夫「間島に于ける特产物配给组织の特殊性」『満鉄調查月報』第16巻第7号、1936、96-99頁。

[22] 坂本雅子『财阀と帝国主义——三井物产と中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3、374-376頁。

[23] 朝鲜银行調查科『朝鲜对满洲贸易の推移と其の将来』1937、6-7頁。

整体史观下的历史书写：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史研究及其启示

宋婉贞 张振江[1]

在《历史是什么？》中，爱德华·卡尔告诫读者：在你研究事实之前，先要研究撰写这些事实的历史学家，这对于你更深入地把握和理解事实极为重要。[2]因此，在国内外东南亚区域研究日趋加紧之际，除对具体史实事例进行分析以外，对东南亚区域研究中独特而杰出的历史学家所秉持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念的梳理和探讨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要发展进步，必然要充分了解国外的东南亚研究动态，以希借鉴国外学者的不同方法与思想。基于此，本文选取澳大利亚著名的东南亚史学家安东尼·瑞德（Anthony John Stanhope Reid，1939～）的东南亚区域史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希冀在这一方面做出些微尝试性研究，抛砖引玉，以求引起国内学界对此议题的重视。

一 概念阐释及研究综述

不论关注于地区国别的研究，还是立足于整体探寻东南亚的发展理路，瑞德在50余载的治史生涯中同东南亚历史研究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与其他学者依循传统政治史，聚焦政治进程、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的研究路径不同，他服膺年鉴学派提倡的综合研究整体的“人”的历史的学术宗旨，集中关注那些最能影响一般平民百姓生活的特征与变迁。[3]因此，对瑞德研究史观与方法的梳理与分析对依然侧重传统史研究的中国学术界有着特别的意义。

清晰的概念是一切讨论的前提。[4]因此，在正式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所涉及的核心术语即整体史观进行阐述和界定。作为一种史学观念，整体史观的概念是由法国年鉴学派（Annals School）创立者之一的马克·布洛赫最先提出的，后经费尔南·布罗代尔（Braudel）得到了充分发展。布罗代尔曾指出：“整体性并不是要写出完整的世界史[historie totale du monde]……而只是当人们面对一个问题时，一种有系统地超越局限的愿望。”[5]此即意味着，不论是从宏观上考察历史，还是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和科技、民族交往等微观方面去研究，历史学者都需要持有整体的眼界与关怀。换个角度说，整体史是布罗代

尔史学写作的指导原则：只有总体性地分析叙述研究对象，才是有意义的历史理解。[6]

系统来看，整体史这一理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不断扩大历史研究内容的全面史；二是以整体史观指导具体或碎片研究；三是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这三个层次之间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共生共存的。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就是最大限度地将历史的各个方面加以综合考察。[7]法国学者乔治·赛代斯、英国学者D. G. E. 霍尔、美国学者约翰·F. 卡迪，以及法国学者德尼·隆巴德等都尝试从整体史的角度探寻东南亚，相比之下，瑞德不但依循整体史观的理念指导，而且更进一步拓展了整体史的研究领域，并且将“人”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平民百姓置于其研究重心，这一做法更推动和提升了整体史观的发展。本文所述的整体史观即是以此为基点。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瑞德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国外有关瑞德的研究成果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当属由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那烂陀—室利佛逝国中心[8]（Nalanda-Sriwijaya Centre）的高级研究员杰夫·韦德（Geoff Wade）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研究员李塔娜（Li Tana）合编的《安东尼·瑞德及东南亚研究》（*Anthony Reid and the Study of the Southeast Asia Past*）[9]一书。该书是由瑞德的学生、同事及学界同仁为肯定和庆祝瑞德在东南亚史各个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就其研究的某一方面进行学术探讨的论文集。国外对瑞德的研究还集中体现在一些访谈资料上，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展现了瑞德在生活、学术工作等方面的发展历程。[10]另外一部分有关瑞德的研究则糅合在各学者对其著作的评介中，以其学术研究为主，此方面成果最为丰厚。各学者在肯定瑞德在各领域的学术贡献的同时，也就相关问题指出了不同的见解。[11]

总体来看，国外对瑞德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也较为全面，但研究相对较为分散，较多是单方面地论述其整体性的研究思想及其整体史观，但对于瑞德这一史观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运用到实际研究之中的这一问题尚未有人涉及，且对这一研究的基础——印尼史研究——很少有人触及。

相比国外，由于国内的相关资料较少，学者主要围绕瑞德的整体史观进行评述。相关研究主要分散于学者著作的篇章之中，而且以书评和论文形式居多。贺圣达主要从文化角度对瑞德有关东南亚的整体性研究

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尽管我很赞赏瑞德的名著《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中对东南亚15～17世纪经济发展、对外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深入研究，却不能认同他对东南亚文化特质以及以这些文化特质来确定东南亚文化整体性的观点，尤其是从文化史的角度，不能认同他对于东南亚整体性的看法”。[12]针对这一问题，庄礼伟则提出了不同看法：“安东尼·瑞德教授和贺圣达教授强调的是不同的层面，并未有直接的交锋。瑞德当然知道东南亚那些宗教‘大传统’之间的鲜明差异，但他关注的是东南亚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实践’，尝试探索东南亚社会形态的一般特质，从而为贸易时代的东南亚诸态势、事件提供一个整体性（但不是一致性）的结构背景。东南亚文化（包括宗教信仰）诚然不存在文化一致性，但具有（大范围的）社会形态的相似性与（某个长时段中）历史发展的整体性。”[13]此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鑫对瑞德的整体史观也有一定的研究。[14]整体而言，国内学者对瑞德的研究与国外学者存在的不足类似，除此之外，对瑞德整体史观缺乏集中关注，更罕有对瑞德这一史学观念的发展路径的研究。

认识瑞德整体史观的学术价值固然重要，但仅停留于相关概念的界定还很不够。深入剖析整体史观在其学术思想中的发展历程，即如何从印尼史研究中萌生并被运用到印尼史及东南亚史研究之中的这一心路历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在结合业已掌握的较为全面的资料和中外视角的比较，以及对瑞德及其学生、同事的直接访谈等基础上，本文拟通过对瑞德的东南亚区域史学研究方法与史学观念进行系统剖析，旨在将其学术思想与史学训练方法引介到国内学界，希冀促进历史研究的革新。

二 瑞德东南亚史研究的基础：印尼史研究

学界对于瑞德整体史观的认识和分析多是从他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15]一书开始的，但这并不代表瑞德在此时才发展出了这一史观。他在学术初期并非直接关注整体东南亚，而是最先聚焦于亚齐地方问题，随后关注点逐步扩展到印尼，最后才扩至整个东南亚，其中印尼史研究一直是他研究的重心所在。正是由于已掌握的扎实的国别地区研究，使他具备了研究区域整体的基础以及从世界格局审视东南亚发展的治史理念，由此发展出了重要的整体史观，并将国别史与区域史研究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相互贯通，融为一体。因此，将瑞德关

于印尼国别史的研究作为考察基础十分必要且重要。

（一）安东尼·瑞德印度尼西亚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根据传统认知，史学研究方法通常是在历史认识和研究这一特定活动中形成的，并由人们自觉提炼，为实现一定认识和研究目的而采用的调整和建构主题认识与客体历史关系和活动的范式。[16]此部分对研究方法的概括与分析也是基于这一基本概念，但又不完全相同于惯常的文献分析法、历史比较法等几种方法，而是在对瑞德印尼史研究文本的综合性分析基础上，依据其独特的视角和整体史观的指导而概括出的相应的研究方法。因此，对此处所提方法的理解需要具体分析。

1.微观研究法

年鉴学派推崇的“整体史”视角下的微观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与随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微观史学有一些相似之处，即均把研究视线投向了历史中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个人和群体，主张“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贴近生活，深入观察人类历史。[17]瑞德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史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微观研究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关注小国历史，给小社会以大话语权。给小国历史以充分的自主权，这一点在瑞德对亚齐的研究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瑞德在剑桥大学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对象是北苏门答腊的亚齐，论述了北苏门答腊从一系列的独立国家过渡到荷属印度统辖的一部分的艰难过程。[18]他对亚齐史书写的关键在于他以亚齐为视角分析了外域势力竞争形态下亚齐社会的发展变化，而非以欧洲视角将亚齐视为西方殖民大国相互角逐的产物，以该国本身的困境和对抗斗争来说明纵然是小国，其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具有充分的参与权和塑造历史的责任。这种微观研究法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亚齐历史的发展脉络，更为充分地理解欧洲帝国主义的整体历史。

挖掘被人忽视的历史细节，还原发展的整体性。瑞德所擅长的联动性思考和发散性思维使其得以更为准确地抓住不易被他者所注意到的环节，丰富历史书写，并使之变得愈加具有趣味性。这是他的一个研究特色，使其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能够更好地运用其整体史意识。在研究1945～1950年的印度尼西亚民族革命的过程中，瑞德关注到了该时期的学校教育这一议题。他指出，对于该时期的印尼民众而言，地位和成功的关

键在于具有荷兰式教育背景，而这一背景反之推动了当地的民族主义发展。在荷兰教育的影响下，印尼人的受教育机会有了很大的提升。在荷兰政权结束之际，仍有约7000名印尼人青睐于选择荷兰中级教育。第一代接受荷兰教育并顺利在20世纪20年代从中学或大学毕业的印尼人在随后的40年代成了主要的政治家，他们深感自己似乎因一种独特的自由和特殊的责任而受到了种族分离，因此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坚决支持者。瑞德从这一角度出发，论证了荷兰殖民统治所带来的殖民教育在另一个层面推动了印尼本土自我意识的觉醒。[19]

寻求被忽视主题，编织历史整体画面。瑞德有关印尼史的研究选题部分偏非主流性，他摆脱传统主题的束缚，挖掘被主流历史所忽略的主题，以广阔的研究视野关注印尼社会的不同层次和领域，进而使得其历史研究更加全面化和整体化。在研究过程中他注意到，印尼一直有咀嚼槟榔的传统，直至17世纪，吸食香烟逐渐取代了这一传统方式。根据20世纪的相关研究，此时有85%的成年印尼男性吸食香烟，而仅有不到1.5%的印尼女性选择该方式。这一社会行为的变化引起了注意，由此开始探究印尼消费方式的重大转变，以作为对热带亚洲整体研究的一个案例研究。通过考察咀嚼槟榔这一方式在印尼几近所有仪式中的向心性作用以及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他意识到健康、消费模式以及社会和仪式互动的大规模转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20]

2.文化考察法

“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广义的文化史”，它着力于从社会变迁中探讨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给人们以发展的和整体的观念。[21]随着二战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新兴国家和地区文化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东南亚即为实例之一。瑞德在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各地的长期考察和生活也使他切身感受到了这一地区深远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形式，并以文化为视角分析印尼历史——主要为前殖民时期即13～17世纪的历史。

物质文化考察法。瑞德对印尼各地物质文化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前殖民时期，即13～17世纪，探究房屋寺庙等建筑、家具与照明、经济产生与交易等方面的发展。[22]瑞德另外还注意到该时期印尼各地的经济生产和贸易往来这一问题，称该地区乃至整个东南亚主要以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著称于世。尽管有高度发达的专业技能，但由于受制于社会的特殊

条件，这些专业工匠们最终未能发展成资本雄厚的大规模制造商。[23]

制度文化考察法。瑞德对前殖民时期印尼的制度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制度、家庭制度等方面。他提到，在印尼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与表面松散的政治结构相吻合，这种体制造就了强势的国王，但他们对广大地区的统治是通过非凡的人格力量和繁荣港口的财富进行的，其中最基本的模式是各个继嗣集团之间为了获取权力而对依附人所进行的永无休止的争夺。尽管如此，用于维护王权的司法制度在印尼仍具有一定影响力，《摩奴法典》等法律典籍被尊崇为解释自然法则的权威文献。[24]

心理文化考察法。瑞德主要以此来分析印度尼西亚社会中的宗教问题。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并行发展，使得印尼当地的宗教问题相对复杂，并启发我们要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去理解这一现象。在他看来，这种宗教多元主义早已植根于亚洲传统，更确切地说就是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传统，印度尼西亚的多元化主义依赖于一个非常安全的历史基础和意识形态。[25]此外，他还关注到印尼当地所信奉的原始宗教，主要表现在祭葬和巫术方面，并由研究得出，东南亚的传统宗教很有可能为多神论或一神论的神秘推论提供了温床。[26]

由以上简述可见，瑞德对印尼史的诸考察法是在其整体理念的框架下进行的，不论是关注被主流历史忽视的历史，还是注重文化因素的研究，都遵循其整体史意识的指导。毋庸置疑，瑞德研究中对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仅局限在以上所具实例中，此处但求以有限篇幅探究一二。

（二）安东尼·瑞德印度尼西亚史研究中的主要史学理念

由对瑞德在印度尼西亚史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的梳理可知，他推崇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法，主张对社会各方面各领域进行整体性、全面性的研究，这也是对其整体史观的切实实践。[27]因篇幅受限，在此遴选较为重要的理念做简短阐述。

1.整体理念

在年鉴学派整体史研究的影响下，瑞德形成了自身的整体研究理念，并贯穿其对印度尼西亚史研究的始末。从研究内容来看，首先，瑞德对印度尼西亚史的研究正式开始于其博士选题，即分析19世纪亚齐与

英荷的权力角逐之缘由。在这一过程中，他意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因此不仅关注荷兰人以及荷兰和印度的军事机构的变幻无常，还深入考察英国方面的资料，以分析英国的态度及其在东南亚的贸易利益、印尼和马来在这些事件中的观点和利益、土耳其的地位等。在构建了事件的大体框架后，瑞德开始陆续将一些局部元素“填充”进去，以充实整体性。[28]

从他对印尼社会其他领域的研究来看，他不仅仅关注传统的政治、经济层面，对宗教、地理环境、女性、宗族、社会贫困及诸行为方式的转变等问题也都进行了研究，以求全方位地理解和认知印尼历史。其中，对环境和女性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在印尼史的研究中也最具特色。[29]另外，瑞德还注重运用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相关学者的研究资料来辅助研究，以使研究更加具有整体性，同时使得结论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30]

由此可见，瑞德的整体研究理念早在其正式从事历史研究之际便已萌芽，并随着对印尼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渐发展和巩固。这种理念使得他既有立足于世界的开阔视野，又有深入社会底层体察风土人情、感知人文环境的细微关照，致力于将爪哇外部的事件和个人的历史也视为整体历史，因而从小到大而又从大到小地全面思考历史的演进变革，规避了片面性、狭隘性的历史理解。

2.女性理念

对女性历史角色的研究也是瑞德有关印度尼西亚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在他看来，政治、经济等传统题材下的历史书写大多数是男性历史，因此女性史是补足整体史的必要研究部分。另外，同时代的一代人通常对书写社会史更感兴趣，因此他们不得不寻找一种不仅仅关乎以男性为主的国王和强者的方式来谈论历史。基于此，瑞德意识到十分有必要给予女性历史以充分的关注。

在20世纪70年代末，瑞德受一位同事即从事马来西亚女性史研究的丽诺尔·曼德森（Lenore Manderson）的影响，开始进一步思考女性史研究的重要性。随后在写第一篇关于亚齐的文章时他发现，早在17世纪该国便有了女王。他逐渐意识到女性统治时代是最好的时代，这一制度也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女王所统辖的政府更加追求协商一致性。此外，他还发现在传统上女性多控制着贸易：在亚齐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管控贸

易资金通常是女性的工作。因此，鉴于她们以投资来促进贸易的方式，他开始视女王为更为务实的重要人物。[31]在2000年以后，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他发现女王也是伊斯兰教的一个调节因素。他通过具体案例指出，女性统治似乎也是解决伊斯兰教分裂问题的一个途径——在女王的统治下，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妥协性的伊斯兰教。[32]

瑞德在研究印尼史中的这种女性观念使得他以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视角去探究该地区的历史脉络，进而挣脱了传统史学对历史书写的禁锢，进而为他更扎实地走向整体史观奠定了基础。

瑞德以印尼史研究为学术研究之起点并持续关注了50余年，由此在国别史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厚的基础和研究经验。他以广阔的视野连通性地将印尼置于整个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历史发展链条中进行思考和探究，书写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历史，使人能够深受鼓舞并深入其中，由此所得的更为全面整体的印尼史书写体系也凸显了他对历史研究的造诣之深厚。

三 安东尼·瑞德印尼史研究背景下的东南亚史研究

从对安东尼·瑞德有关印度尼西亚史方面的著述的分析可知，他擅长书写一种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所不同于传统领域的本地历史，关照研究对象的自我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探索东南亚整体史的研究过程中，印尼史研究仍是其研究的基础和重心，而这一扎实的国别史研究无疑进一步塑造和延伸了其宏观的区域史研究。因此，在印尼史的研究背景下探究瑞德东南亚史研究的具体表现和发展对于全面地把握其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从印尼到东南亚：国别研究与区域整体研究的互通性

二战以来，受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文明史观”以及后殖民理论与现代性批判思潮的影响，注重全球视野的“全球史”成了历史研究领域的大潮流。在这一趋势下，国别史研究与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性仍不可小觑。瑞德基于二者的异同性与互通性，从印尼史研究到东南亚史研究的治史理路在很大程度上以实例印证了国别史研究与区域史研究在全球史思潮中的重要性，同时在其自身的研究中也具体阐释了二者互通性的表现。这种区域与国别的互通性研究也正是在他的整体理念的大框架

下进行的，二者的联动性过程无疑成为其对整体史观娴熟运用的具体写照。

1.国别研究为区域研究提供扎实的实证基础和本土意识的关照

历史叙述是可以被用来培养人们的归属意识的，这在19～20世纪主权民族国家成立的历程中已得到充分证明。[33]瑞德的国别研究并非单对某一国别的整体研究，而是具有循序渐进的特点。在瑞德的研究界定中，地区是隶属于国别之下的较小分析单位，同理，次地区则是位于地区内的地理称谓。他有意识地遵循从小到大、由次地区到地区再到国别的分析层次，依次推进研究。

需说明的是，瑞德在国别史研究中所运用的从次地区到地区再到国别的层次分析方式并不是孤立出现并存在的，而是在一个整体分析框架中进行交叉和融合，且相互影响和互动，由此才得以使其国别史研究显得越发具有层次性和整体综合性。他的国别史研究为其日后的东南亚区域史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同时，对自主的本土意识的关照的延续性思考和发展也使得他在区域研究中更注重“在东南亚研究东南亚，为东南亚人研究东南亚”的情怀和理念。

2.区域研究为国别研究提供范式的验证和整体视角下的理解

跨越国界的区域史研究突破了国别史的边界，不仅使跨越国境的区域性特征得到凸显，而且也使国别史研究多了一种区域视角，即把国别史置于区域的背景中加以考察。[34]

对区域整体史的探究和思考，又进一步促进了他对国别史研究中的相关议题进行反思和重新理解，如革命问题、民族主义问题和宗教问题。就革命问题而言，经过十年的思考，他意识到了印度尼西亚的理念在本质上是革命性的，追求毫不妥协和绝对化。由此，他将革命界定为暴力手段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中寓意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苏加诺所说的“埋葬过去，构筑未来”一样，同时注意到了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不同和革命后的法国与英国的不同存在一定的相似性。[35]再如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他不仅关注到多元化社会对二者的影响，也注意到了宗教的发展对民族主义塑造和形成的推动作用，同时将印尼的民族主义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及邻国联系起来分析其同质性，进而分析民族主义在东南亚的多元性发展。

3.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相融贯通，共同构成有机整体性的全球史研究

随着史学研究的逐渐深入和全面化，历史学家意识到，要抛弃过去普遍持有的有关1500～1800年“西方崛起”的历史叙述，代之以从地区内部动态发展来看待东南亚的视角。从这一点来看，只有将国别史与区域史研究真正实现相辅相成、相互贯通，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才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全球史研究才更生动、具体。

瑞德在研究东南亚整体史的过程中，并非将印尼国别史弃置他处，而是在研究中相互贯穿，同时进行。他从印尼史研究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随后于中晚年开始涉猎东南亚整体史的研究，同时对研究中所发现的新的国别议题深入分析。因此，在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印尼国别史研究始终作为一条研究主线，而东南亚区域史研究则是一个大的指导性框架，这也是为何本文要从瑞德的印尼史研究开始探究的原因之所在。瑞德在东南亚史研究中所呈现的一些史学理念同时在其印尼史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而且部分甚至萌生于他的印尼史研究中。

（二）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史研究

瑞德的东南亚区域史研究主要有两部代表性力作，分别是其于1988年和1993年相继出版的两卷本《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一书，以及于2015年出版的另一部东南亚整体史著作——《东南亚史的一种解读：举足轻重的风云交汇之地》（*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Critical Crossroads*）。[36]

就前者来看，与早期东南亚的区域史研究者或者跨社会体系研究者（如赛岱斯、卡迪和霍尔）不同的是，瑞德继承了法国年鉴学派的传统，特别是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地区历史的研究方法，注重研究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所谓“决定历史”的大人物和大事件。在该书中，瑞德力图展现在他所说的贸易时代中，东南亚所扮演着的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角色，同时在当时的世界体系中所起着的举足轻重的作用。[37]在他本人的治学生涯中，该著作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强烈批判殖民主义历史，了解新兴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掌握他们的语言，探索新的方法，以撰写以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等为中心的历史。[38]后者与前者的不同主要在于研究时段的不同，前者关注于15～17世纪，而后者则是一部立足于东南亚整体的通史性著作，以经济、文化内容为主

体。基于此，他的东南亚区域史研究思想主要经历了两大层次的演变。

（三）以整体观念为大框架：逐步构建

就目前学界对瑞德史学研究的认知来看，多数学者将以《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一书为典范的整体观念视为瑞德的一种研究方法，称其遵循年鉴学派的“整体史”倡导，绘制了一幅布罗代尔式的东南亚整体图景，并以此作为瑞德史学研究的最大特色。而从对其相关著述的整体梳理来看，瑞德这一整体观念并非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更多的是其学术研究生涯中逐步构建起来的一个大框架。因此，对其史学研究思想演变历程的梳理需从该层次着手分析。

瑞德整体观念的形成并非在他书写近世时期的东南亚时一蹴而就的，而是根植并发端于他最初的学术研究之中，并被运用到几乎所有的研究思考。早在大学期间，受幼年在世界范围内的游历以及年鉴学派日渐流行的影响，瑞德开始有意识地以整体观念思考问题，即将问题放在大背景下分析，而不是独立、片面地看待问题。在最初研究亚齐史时，他便有意识地以整体观念将亚齐置于整个东南亚的视野中，分析大国角逐下的区域风波和反应，突出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并尽可能全备地以多边史料勾勒亚齐的外交图景。

逐渐地，他意识到了海岛东南亚和大陆东南亚的相通性，并主张将东南亚视为一个整体。随后，他对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国别的研究便都以东南亚整体为背景，探讨整体之下的地区互动和发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向东南亚整体史研究后，他又进一步以世界体系为背景，分析东南亚这一整体与东亚、亚洲、澳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与联系，并坚持将东南亚视为一个“区域”，强调其整体性以及在世界范围的重要性，这一主张在其晚年的东南亚史研究中愈加强烈。而在之后的国别研究中，他也更为倾向将国别问题置于东南亚乃至全球的背景下进行联动性思考，探究其中的关联。

这种整体意识从其最初的学术研究开始，层层深入，不管是特定历史事件的国别研究还是区域研究，他都有意识地将其置于一个大的整体框架之中进行分析，进而更好地把握前因后果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在本文看来，更恰当地说，这种整体观念并非瑞德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抽象的、早已潜移默化在他的思想之中的意识，是他为自身的学术研究有意识地设定的一个宏大的分析框架，所有的研究都在这一框架之

下进行。

（四）东南亚研究的自主性与重要性：点—面—域的结合

印尼史研究始终是瑞德史学思想的基础，并由此发展出了东南亚整体研究思想，与国别研究同时进行。他的东南亚研究从断代史开始，探究1450～1680年这一前殖民时期充满活力的东南亚社会，而后进行东南亚通史研究，强调时间上的“整体史”同样重要。瑞德致力于用过去警示现在——以一种鼓励可能性存在的方式，而不是提出一种恐惧或丧失机遇的方式。他极力倡导东南亚历史的自主性，尽管该地在高度殖民时期曾经历了欧洲殖民主义的迫害，但东南亚始终作为一个核心的商业中心而存在，直至今日。[39]他的研究表明，东南亚并非西方殖民主义的被动产物，而是进行了自我调适和斗争的独立区域。尽管殖民主义曾摧毁或抑制了使东南亚在全球史中成为一个特殊地区的因素，但他并不认为要全部归责于殖民主义，而是更多地指出了该地区所具有的本土生成的自主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潜力。

近年来，随着思想的不断深化和认知的逐渐调整，他不断认识到东南亚历史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东南亚历史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主要有三。[40]

一是当地女性对经济和公共领域的贡献比历史上其他前工业社会的女性有更大的贡献，这是对亚洲文明中高度重男轻女的正统观念的直接挑战。直到19世纪，东南亚女性仍享有与男性同等但又有所差异的经济地位，因此她们比欧洲、中国、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女性拥有更为广泛的活动范围和更大的代理权。她们垄断了纺织和陶瓷生产，还与男性共同分担农业事务（在其中主导种植、收割和觅食等事务），最重要的是她们还承担了市场和商业领域的大部分工作。他对东南亚女性的历史地位的考察为论证提供了一个持续性的基础，即当代东南亚对女性自治权的通常限制是新近创造的一种传统形式，而不是根深蒂固于东南亚的文化之中。

二是东南亚危险的构造界面能够影响世界气候以及全球物种的生存。在现代时期，世界上共爆发了两次最具破坏性的火山喷发，即松巴哇的坦博拉火山喷发（1815年）和喀拉喀托火山喷发（1883年），后者位于爪哇、巴厘岛和龙目岛极端爆发区的另一端，也因土壤的高肥力而赫赫有名。这两次喷发使得整个地球变得黑暗且寒冷，并导致了欧洲

多年无夏，然而这种因果联系直到近些年才被人们完全理解。自非洲起源扩展至苏门答腊岛以来，唯一危及人类（智人）生存的严重灾难当属74000年前多巴湖火山口的喷发，其迫使全球经历了一段长达六年的寒冬时期。此外，近来的气候研究表明，其他突发性的降温事件也在北半球引起了相应的危机，尤其以发生在535年、1258年（可能是由龙目岛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引起的）和16世纪80年代的事件的影响为最。这些也许是由于以盛行的风力模式来影响整个地球的热带火山的活动所导致的。

三是东南亚人在没有强权国家的情况下发展了一种管理“天赋”。他关注到无国家地区的发展这一议题，意识到后民族主义时期的历史学家多遵循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模式，通常将那些不具备民族国家特征的主题和行为体边缘化。出于对传统的“国家史观”的挑战，他提出这些无国家群体的社会形式也是自主选择的结果，同时认为，在试图理解东南亚根深蒂固的多元主义的同时，必须要放弃欧洲或中国历史（即使曾被质疑过）中关于将文明和国家相结合以实现崛起的假设，承认这些非国家选择的重要性，肯定除国家以外其他形式的存在。

从亚齐次地区到苏门答腊地区，再到印尼国别，最后扩展至东南亚区域研究，这一点—面—域的循序渐进层次研究法使得瑞德的史学思想逐渐深化，并不断巩固其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他在关注东南亚整体研究的同时，仍注重国别史与区域史的连通性，将二者相融贯通进行思考。直到近年来，印尼地区问题仍是他的一个关注点。21世纪爆发的一次亚齐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在2004年海啸的余波中得到了解决，进而使其在印尼获得了高水平的自治权，这一事件使得瑞德重新回到了他最先研究的东南亚地理区域上。在他的总结中，他强调了亚齐的例外主义：亚齐是受荷兰殖民统治的国家中最后一个获得独立的大国，也是印尼唯一一个跨入现代时期的地区，拥有历史遗产和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形式以巩固独立的政治特性。尽管他认为这一历史鉴定了亚齐独特的特性，以保证其政治认同，但他仍坚持认为这种认同应当发生在一种创造性的、分层的政治结构中，而这种结构使得前殖民时期的东南亚政体更具独特性。

四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区域史研究的当下启示

多年以来，瑞德一直致力于摆脱殖民体系对东南亚分裂、被动、落

后、凋敝等形象的传统刻画，挑战“国家史观”的权威，突出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的独特性和多样化，分析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在追求学术研究多元化、关注全球背景下地区自主性的当下，瑞德的史学研究理念对学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注重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联动，实现多元化与同一性的统一

随着全球史研究的日益加强，区域史和国别史的研究意义在学界引起了众多热议。部分学者强调整体研究，认为全球史研究的升温对以国家为单位的地区国别研究的冲击使得国别研究的意义已今非昔比，然而多数学者则仍坚持认为，二者的研究尤其在全球史日盛的背景下更加重要。区域史不是国别史的简单叠加，国别史也不是作为区域史中相互独立的单位而存在，二者实质上具有联动性关系。具体来说，国别研究为区域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和本土意识的观照；区域研究又为国别研究提供了范式的验证和整体视角下的理解；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相融贯通，共同构成了有机整体性的全球史研究。

瑞德在研究东南亚整体史的过程中，并非将印尼国别史弃置他处，而是在研究中相互贯穿，同时进行。他从印尼史研究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随后于中晚年开始涉猎东南亚整体史的研究，同时对研究中所发现的新的国别议题深入分析。因此，在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印尼国别史研究始终作为一条研究主线，而东南亚区域史研究则是一个大的研究领域。

在实例研究中，他从印尼国别史转向东南亚区域史研究，并注意到二者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互通交叉性，以及在研究结论上的相互补充和印证，由此合理地运用二者的联动性关系，将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因此，他的区域史研究得以具有较为扎实的以国别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此外，其国别研究也以整体性的区域背景为分析前提。瑞德也擅长从研究议题上将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相整合，他在国别单位中寻求同一议题在各地的发展异同，进而在区域整体的范围上总结该议题在整个区域的发展概况，由此对国别研究议题进一步深化，通过对比分析把握其在区域中的发展特点。

由此分析可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将区域史研究与国别史研究相整合，并置于整体史观的研究视域之下进行分析，而不是将其分裂、

孤立，这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因此，现今的历史研究需要充分调动二者的联动性关系，积极推进研究的多元化与同一性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国别史、区域史、全球史的共同发展。

（二）大事件与小人物相结合，关注线性历史外部的隐性历史

对大事件中小人物的关注以及对隐性历史的研究等，都反映了对微观历史的研究。全球化的背景下，微观史的研究方法目前正在全球受到关注。[41]因此，历史研究除关注大方向的主要议题以外，还可以探究微观因素在历史中的互动与角色作用，以此加强对历史的整体性理解。

瑞德在研究中关注小国历史，给小社会以大话语权。他对亚齐史书写的关键在于他以亚齐为视角分析了外域势力竞争形态下亚齐社会的发展变化，而非以欧洲视角将亚齐视为西方殖民大国相互角逐的产物，以该国本身的困境和对抗斗争来说明纵然是小国，其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具有充分的参与权和塑造历史的责任。这种微观研究法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亚齐历史的发展脉络，更为充分地理解欧洲帝国主义的整体历史。

另外，他注重对宏观叙事与微观细节的结合。立足于东南亚整体史的研究背景，瑞德同时擅长把握未被纳入主流研究范畴的议题，挖掘被人忽视的历史细节，还原发展的整体性，为读者提供常规历史书写中所缺乏的新元素。他所擅长的联动性思考和发散性思维使其得以更为准确地抓住不易被他者所注意到的环节，丰富历史书写，并使之变得愈加具有趣味性。他关注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由此分析社会整体的演变历程，给人以不同的历史感知。瑞德通过对这一方法的使用，将隐性和不易被察觉的历史元素呈现在了历史书写中，进而使得历史研究愈加生动丰富，也为读者理解历史开拓了新的视角和思维路径。

全球史庞杂的研究内容和广阔的研究领域使得历史研究变得愈加具有挑战性，一些学者推崇大历史的书写，而另一些学者则呼吁展开微观历史的研究。事实证明，微观历史凭其趣味性、具体性、可操作性等特性逐渐在学界活跃起来。瑞德虽没有系统提出这一史学研究方式，但已开始进行了潜在的尝试，他的身体力行也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三）发挥地方主体性和能动性，以东南亚为中心研究东南亚

世界史学科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要求将历史事件置于世界范围的视野下加以考察，注重把对各个独立社会内部的发展与各社会间接触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42]这种宏大的视野赋予了历史研究以整体性，挖掘大历史中的小事件，阐述其间的联动性关系。历史研究基于史料，立足于史实，但从史料的选取与组列、史实的分析和阐述等方面来看，史学家仍在其中握有较大的主动权。

在长达50余载的学术生涯中，瑞德一直致力于在宏大的历史题材中观照与现实相关的枝枝叶叶。从对东南亚地区、国别、区域史的梳理中，他得出了东南亚历史的自主性特点，这也是他长期极力倡导的一个思想。他认为这种自主性根源于东南亚的历史深处，并在当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因此，东南亚的书写体例应摒弃西方视域下的殖民体系，发挥本地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探寻自己的历史书写模式。他一贯主张“在东南亚研究东南亚，为东南亚人研究东南亚”，因此，他注重实地考察和调研，经常前往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进行实地走访，感知其社会的风土人情。此外，他还坚持给予东南亚历史以自主性的理念，以东南亚为视角进行分析，给予东南亚历史“同情之理解”。在研究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东南亚研究必须要以该地区为中心来研究，亦即以该区域为视角进行研究。

尤其需注意的是，瑞德的研究工作是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关东南亚历史发展的悲观情绪的一种否定。正是在这种“同情之理解”的学术观照的影响下，他关注东南亚历史的自我发展，深入探析在不同历史阶段东南亚历史的独特性和多样化，以修正传统学界对东南亚历史的认知。不论是远古时代、殖民时代、贸易时代还是现代化发展时期，他都认为东南亚并非外域事物的被动接受者和落后者，而是具有本土特性和发展模式，它有意识地对外来事物进行甄别，“为我所用”。与此同时，在他看来，东南亚具有可观的自我调适能力，不论在殖民体系下还是全球化浪潮中，它都能够积极调整出一套符合自我条件和需求的运行模式，进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史学研究中，学者的理解力从本质上说更多地倾向于理解，而不是知道，由此便产生了真正的科学，即成功地以自己的方式在现象之间建立起解释性关系的科学。[43]这种解释性关系的建立具体用什么方法，以及学者如何运用方法，可能都带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44]因此，在知识加速更新、史学研究追求高效出产的当下学界，

史学研究对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秉持初心的研究理念，坚持“同情之理解”的学术观照。

通体来看，在全球与区域史研究日趋加紧之际，对瑞德整体史观视域下的东南亚区域史研究进行系统分析这一议题不仅有助于国内学界从整体视角把握瑞德的治史理路，对更深入地理解其著述思想大有裨益，而且，其研究方法的运用、分析视角的选取、研究思想的渐成以及写作模式的调适等方面也对国内的全球与区域整体史研究学者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而另外一点同样重要，即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区域史研究中对史观引介的不足，尽可能全面地向国内学界阐述国际知名学者的区域史研究方法和史学理念，以求同国际学界共同促进。

[1] 宋婉贞，暨南大学文学院；张振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2] 参见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9～21页。

[3] 周鑫：《〈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评介》，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25～362页。

[4] 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410页。

[5] 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204页。

[6] 赖建诚：《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第2页。

[7] 李金铮：《以整体史观统摄碎片研究》，《北京日报》2012年11月12日，第23版。

[8] 此翻译参照《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室利佛逝国中心落成启用》一文中的翻译，详见佛缘网，http：//www.foyuan.net/article-18896-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月10日。

[9] Geoff Wade and Li Tana eds.，*Anthony Reid and the Study of the Southeast Asia Past*（Singapore：Mainland Press Pte. Ltd.，2012）.

[10] 参见Blusse and Carolien Stolte，“Studying Southeast Asia in and for Southeast Asia，an Interview with Anthony Reid，” *Itinerario*34，No. 2（2010），pp. 7-18；Claire，“Interview Anthony Reid，” *Lettre d' Afrase*，No. 78（2011），pp. 3-6；Azis Anwar Fachrudin，“Tracing the Roots of Pluralism in Indonesia：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nthony Reid，” 8 March 2016.

[11] 此部分文献较多，因篇幅有限，此处仅选取以下几篇较具代表性评述：M. C. Ricklefs，“Reviewed Work（s）：The Contest for North Sumatra：Atjeh，the Netherlands and Britian，1858-1898 by Anthony Rei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 34，No. 2（1971），pp. 437-438；William H. Fredrick，“Reviewed Work（s）：Indonesian National Revolution 1945-1950 by Anthony Rei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35，No. 1（Nov.，1975），pp. 173-174；C van Dijk，*Reviewed Work（s）：The Blood of the People：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raditional Rule in Northern Sumatra by Anthony Reid*（Kuala Lumpur etc.，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288；Victor Lieberman，“Reviewe：An Age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Problems of Regional Coherene—A Review Artic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54，No. 3（1995），pp. 796-807。

[12] 贺圣达：《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第18页。

[13] 庄礼伟：《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视角下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6期。

[14] 周鑫：《〈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评介》，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2辑。

[15] 参见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一卷《季风吹拂下的土地》，吴小安、孙来臣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二卷《扩张与危机》，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商务印书馆，2013。

[16] 马卫东主编《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12页。

[17] 参见周兵《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第89～95页。

[18] Anthony Reid，*The Contest for North Sumatra：Atjeh，the Netherlands and Britain 1858-1898*（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19] 参见Anthony Reid，*Indonesian National Revolution：1945-1950*（Hawthorn Longman，1974），pp. 1-3。

[20] 参见Anthony Reid，“From Betel-chewing to Tobacco-smoking in Indone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44，No. 3，pp. 529-547。

[21]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11、335页。

[22] 参见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一卷《季风吹拂下的土地》，第93～105页。

[23]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一卷《季风吹拂下的土地》，第146～147页。

[24]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一卷《季风吹拂下的土地》，第173～205页。

[25] Anthony Reid，“Introduction：Muslims and Power in A Plural Asia，” in Anthony Reid and Michael Gilsenan，eds.，*Islamic Legitimacy in A Plural Aisa*（Abingdon：Routledge，2007），pp. 1-13.

[26] 参见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二卷《扩张与危机》，第189～200页。

[27] 在此需说明的是，本节所涉及的“史学理念”是基于史观的传统定义而对瑞德学术观念的概括性论述，因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所述的范式史观。

[28] 参见Anthony Reid，*The Contest for North Sumatra*：*Atjeh*，*the Netherlands and Britain 1858-1898*（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29] 参见Anthony Reid，“The Origins of Poverty in Indonesia，” in J. J. Fox，J. A. C. Mackie & Peter Mccawley，eds.，*Indonesia-Australian Perspectives*（Canberra，RSPacS，ANU，1981）；Anthony Reid，“Shiraishi Saya，Rural Unrest in Sumatra，1942：A Japanese Report，” *Indonesia* 21，pp. 115-133；“A Great 17th Indonesian Family：Matoaya and Pattingalloang of Makassar，” *Masyarakat Indonesia 8*：*1*，pp. 1-28；“History and Seismology in the Ring of Fire：Punctuating the Indonesian Past，” in David Henley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eds.，*Environment*，*Trade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A Longue Duree Perspective*（Brill，Leiden），pp. 62-77；“From Betel-chewing to Tobacco-smoking in Indone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44，No. 3，pp. 529-547；“Charismatic Queens of Southeast Asia，” *History Today* 53，vi，pp. 30-35；Asian Studie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C. R. Boxer，Genevieve Bouchon and Pierre-Yves Manguin，“Female Roles in Pre-colonial Southeast 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2，No.3，pp. 629-665。

[30] 这一点几乎在瑞德有关印尼史研究的所有著述中都有所涉及，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31] 根据笔者对瑞德教授的采访：《从“贸易时代”到“风云交汇之地”：东南亚史的续写与传承》。

[32] 参见Anthony Reid，“Female Roles in Pre-colonial Southeast Asia，” in *Asian Studie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C. R. Boxer*，Genevieve Bouchon and Pierre-Yves Manguin，*Modern Asian Studies* 22：3，pp. 629-665；Charismatic queens of Southeast Asia，*History Today* 53，VI，pp. 30-35；笔者对瑞德教授的采访：《从“贸

易时代”到“风云交汇之地”：东南亚史的续写与传承》。

[33] 羽田正：《新的世界史和地区史》，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复旦、东大、普林斯顿三校合作会议论文集》，中华书局，2016，第27页。

[34] 董少新：《从“东亚”到“东亚海域”——历史世界的构建及其利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复旦、东大、普林斯顿三校合作会议论文集》，第37、43页。

[35] 根据笔者对瑞德教授的采访《从“贸易时代”到“风云交汇之地”：东南亚史的续写与传承》整理而得。

[36] Anthony Reid，*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Critical Crossroads*（Oxford & New York：Wiley/Blackwell，2015）.

[37] 李伟华：《大东南亚时代——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吴杰伟主编《未名亚太论丛》第4辑，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第152～157页。

[38]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一卷《季风吹拂下的土地》“序言”，第5页。

[39] Anthony Reid，*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Outside China*：*A Partly Personal Narrative*（Lecture in Jinan University，2017）.

[40] 参见Anthony Reid，*The Future of Asia and Pacific Studies*（Lecture in ANU，2014）；Anthony Reid，*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Critical Crossroads*（Oxford & New York：Wiley/Blackwell，2015）；安东尼·瑞德《东南亚历史之所以重要的三个原因》，黎嘉玲译，《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第4～10页。

[41] 参见汉斯·梅迪克《转向全球？微观史的扩展》，董欣洁译，《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第132～139页。

[42] 刘馨：《何炳松史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第183页。

[43]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35页。

[44]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8页。

后冷战时代中亚的“文化真空”与“地缘文化想象”

张建华[1]

史学研究的要务不仅仅在于还历史以本原和真实，而且应该以史鉴今，以史观世。史学应该参与国家现实重要决策，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借鉴和建议。笔者是研究俄国历史和中俄关系史的，一个偶然机会，使笔者能够真正地把历史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2015年9～12月，笔者受国家汉办委派在哈萨克斯坦的国立阿里-法拉比大学（Казах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Али-Фараби）东方系任职教书3个月。这是笔者第一次去了中亚，因为以前的中亚在笔者的印象里面不过是帝俄版图上的一块殖民地、苏联时代的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去了哈萨克斯坦，并且去了其境内的一些城市，看了一些社会人文和自然景观之后，笔者的许多想法发生了变化。在这里，笔者简单谈两个观点和一个想法。

第一个观点：从历史学，尤其是从学术史的视野来看，中亚是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空间和地缘文化空间。

我们谈到中亚不管是说中间亚洲（Middle Asia/Средняя Азия），还是中央亚洲（Central Asia/Центрапьная Азия），都是从不同的自然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经济地理来思考这块与世界其他地方在文化形态、宗教形态、语言形态、种族形式等方方面面不一样的土地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国家也包括东方的日本用另外一个概念称呼这块土地——“内亚”（Inner Asia），欧美学者即“内亚学”学者强调所谓的“内亚性”。什么是“内亚性”？即生活方式为游牧民族生活方式，语言上基本是突厥语系，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宗教信仰基本上是信仰伊斯兰教。

再谈一谈国内学术界比较熟悉的俄国欧亚主义思潮，在欧亚主义思想体系中对中亚有更深入的论述。笔者这里只介绍代表人物——萨维茨基（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авицкий，1895～1968）。他与其他著名的欧亚主义者特鲁别斯科伊、维尔纳茨基、苏符钦斯基等不同，他是俄国的第一个地缘政治学家。

萨维茨基的观点很多，但是他有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就是他在深入研究游牧民族并建立了游牧学（кочевниковедение）之后，认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1000年到今天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中心从年平均温度20℃上下的地区（非洲、拉丁美洲），然后逐渐地向年均温度15℃上下的地区转移（特罗依、雅典和罗马），公元12～19世纪，世界文化中心转到年均温度5℃上下的地区（英国、荷兰）。由此他推论出，从公元2000年至3000年，世界文化中心将向年均温度0℃上下的气候区域移动，也就是将移到“欧亚俄罗斯”和北美。因为人类文明和文化中心的条件在改变。他创造了两个概念，即“文化迁移”（миграция культуры）和“发展位置”（место развитии）。这意味着，在他的笔下，中亚就是未来的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的中心所在。

古米廖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умилев，1912～1992）自称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曾长期被流放于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他是萨维茨基学说的直接继承者，他对欧亚大陆的定义与萨维茨基的欧亚大陆概念很接近。古米廖夫认为，三大洋环绕着一个广博的大陆，该大陆的西边是大西洋，东边是太平洋，南边是印度洋；这个大陆的西部是欧洲，东部是欧亚大陆；东部的特征是严冬、干旱的草原和单一的地理景观——北方的森林和南方的草原。在他看来，地理景观的相似性决定了如今居住在俄国、蒙古和中亚地区的各民族的性格。他在去世前接受采访时回答：“我悄悄地告诉你，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救俄国。”纳扎尔巴耶夫是他思想的继承者，1996年建立欧亚国立大学（Евраз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Л.Н. Гумилёва），并以列夫·古米廖夫命名。在“去苏联化”和“去俄罗斯化”的背景下，这很说明问题。

苏联解体之后在俄罗斯转型包括中亚国家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向东向西的困惑，最终还是选择了欧亚主义路线。在俄罗斯国内，有著名学者兼政治家亚历山大·杜金（А.Г.Дугин，1962～），以及著名电影导演米哈尔科夫等人主张欧亚主义；在哈萨克斯坦有著名的作家苏莱曼诺夫（Олжас Сулейменов），在吉尔吉斯斯坦有已经去世的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在塔吉克斯坦有著名学者拉希姆·马索夫等大力鼓吹欧亚主义。而且我们注意到，1994年纳扎尔巴耶夫访问莫斯科大学的时候第一个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倡议，只是当时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亚各国都无人呼应。但是，在纳扎尔巴耶夫的不懈努力之下，2000年执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予以了响应。欧亚联盟的地缘政治想象克

服重重困难，逐渐变成现实。2000年欧亚经济共同体创建，2007年俄罗斯、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2009年三国签署了《关税同盟海关法典》，2011年7月三国统一关税空间成立，2012年1月1日起开始运行欧亚经济空间，2014年5月29日三国领导人在阿斯塔纳正式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并宣布该联盟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启动。这样，欧亚主义理论的最大实践——欧亚经济联盟在中亚和俄罗斯成为现实。正如普京所称赞的：“哈萨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实质上是在后苏联空间实施一体化的主导力量和领袖。在一体化方面的许多成果都是根据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倡议取得的。”

第二个观点：苏联解体之后，中亚不仅出现了暂时的“外交真空”和“政治真空”，其实也出现了“文化真空”。在暂时的“文化真空”和长久的“文化空间”的背景下，中亚国家就出现了“地缘文化想象”。

这里借用英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约翰·阿格纽（John A.Agnew，1949～）的观点。他认为，未来的世界将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发展水平并不平等，有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分。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一方面是民族国家概念更加鲜明，另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考虑如何解决自己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才行，因此就需要一个预设的“地缘政治想象”（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оображение/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我们知道冷战结束之后，的的确确在中亚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文化真空”，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苏联时代推行了将近70年的无神论退出了，伊斯兰教以及“双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回来了，甚至在塔吉克斯坦出现了伊斯兰复兴党合法登记并且长期执政的现象。中亚自己原生的伊斯兰苏菲主义——亚萨维教团影响越来越大。第二，中亚各国亟须回答“亨廷顿之问”，亟须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第三，中亚各国出现了“双去”浪潮——“去苏联化”和“去俄罗斯化”。

例如，笔者工作过的哈萨克国立阿里-法拉比大学，原来学校名称的缩写为КазНУ，现在是КазНУ，即把苏联时代乃至现代俄罗斯通用的“国立的”（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改为“国立＋民族的”（национальный）。走在哈萨克斯坦大街上你会发现，那些带有“国家”标志的都是национальный，这里边除了национальный和英文的national比较接近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笔者曾经问过哈萨

克斯坦的学者，他们回答说：在这里，национальный既有民族的意思，也有国家的意思。这表明哈萨克斯坦人既要确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概念，又要确定民族意识的概念。

再如，苏联式的唯物史观和苏联史学著作退出后，中亚出现了"史学真空"和"历史教科书匮乏"。

哈萨克斯坦政府动员大学和科学院编写12卷本的哈萨克斯坦通史，到现在仍未彻底完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时间太短，不论是从并不具备现代国家形态的哈萨克汗国（1456年建立），还是从1936年建立的哈萨克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开始算起，其民族国家的历史都太短。于是，哈萨克斯坦先后出现了德语、阿拉伯语、中文、俄语、英语、法语著作所涉及的哈萨克斯坦历史，它不得不借助别人的历史经典来反映它的历史。

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原苏联境内的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加上高加索的阿塞拜疆，再加上土耳其，这六个国家找到了一个地缘文化的共同想象——"突厥文化"和"突厥化"。当然不能简单地把这个"突厥化"理解成泛突厥主义。因为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政教分离背景之下的"突厥化"。

[1] 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从“内陆欧亚”到“东部欧亚”[1]

——区域视域与契丹—辽史研究

孙昊[2]

近年学界围绕“内陆欧亚”区域史的讨论亦有所推进，尤其是日本学者中间流行的“东部欧亚”思潮，都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因此，笔者以《“内陆欧亚”视阈与古代东亚世界：日本学界的“东部欧亚”思潮》为题在2018年3月的中山大学“全球与区域史视域下亚洲的区域与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同年4月于北京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欧亚视域与古代中国：中华、边地与域外的交错史”工作坊与参会学者进行交流。此文主要以学术综述为主，尚缺乏深度的评析，不敢以此完稿公开示人。因此将之进行拆分，纳入笔者的研究文章之中，拟在具体研究语境中进行深度剖析。现在的小文即是在《内亚史视野下的辽史研究》（《文汇报》2016年）文章基础上整合了“东部欧亚”思潮的10～12世纪研究部分，形成对国外（由于视野所限，仅以日本、欧美为主）契丹—辽史研究区域视域的综论性讨论，并以辽朝历史为切入点，阐释内陆欧亚区域史研究对于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意义。至于日本“东部欧亚”思潮关于10世纪之前历史的理论评述，将会在后续拙稿《中古东北边疆形塑与内陆欧亚的区域联动性——从渤海国史研究的“东部欧亚”论说起》中有所涉及。[3]

“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近年在中国，乃至东亚学术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争议。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概念的界定颇为复杂，诸家观点并存。据程秀金梳理，学界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是由自然地理范畴（欧亚大陆腹地的干燥草原—森林带）衍生出文化和生态特性的外延。有“内亚大汗”之称的丹尼斯·塞诺则将之表述为一个政治体制、民族、宗教文化高度相似的“内亚”世界，并尝试在阿尔泰语文学基础上，建立一个“内亚”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研究范畴。[4]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内陆欧亚”的地理范围与历史文化特质往往纠葛不清，这也是引起颇多争议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内陆欧亚”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大致有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范畴。首先，从历史区域角度看，内陆欧亚是以欧亚草原为中心，东至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森林地带，西抵欧洲多瑙河流域，南则与世界主要定居文明区相毗邻。因其地理位置特殊，且无地理险阻，从史前时代以来就是古代欧亚各文明区资源、文化流通的天然

通道，也是历史互动与交融的广阔舞台。从历史文化的范畴看，内陆欧亚区域是游牧、复杂渔猎社会的发源地，往往与定居农业区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如何看待这种历史文化差异的有机联系，也是摆在“内陆欧亚”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以往历史书写中多将两者置于二元对立面，充斥着征服与被征服的母题叙述。这些叙述或者是将内陆欧亚视作野蛮落后的文化象征来看待，或者是将其视作“腐朽”定居文明的“伟大征服者”，无论褒贬，都脸谱化地片面割裂了内陆欧亚区域与其他历史区域的有机联系。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辽王朝是由蒙古草原东部松漠地带的契丹人建立的，其疆域向西深入内亚腹地，东抵太平洋，南则深入中原定居文化地带与宋王朝相邻，至少将草原游牧、森林采集、定居农耕三种社会类型涵盖其中。在二十四史之中，独《辽史》专设《营卫志》《部族志》来记述带有内亚游牧政治特征的斡鲁朵制、部族制。目前经过箭内亘、[5]傅乐焕、[6]杨若薇[7]等多位学者的探索，已经基本能够确认辽朝政治中心是随着皇帝“斡鲁朵”在捺钵地之间进行四时移动的。这种政治现象承自契丹建国前的可汗牙帐随时迁徙的传统，具有典型的内陆欧亚游牧政治风格，又被古代中国历史学家称作“行国”。[8]然而，对于如何对辽王朝的历史文化与影响进行定位，学界颇具争议，其背后实则体现出相关研究视野与方法论的分歧。很多研究者虽然没有“内陆欧亚”意识，但在论述契丹本俗与国家性质、契丹—辽王朝对外关系等重要问题时，都会不经意触及上述问题。如契丹历史文化的特质是与中国历史对立还是相融；如何看待契丹—辽王朝存在的地域特质，是“北族”还是“中原”；如何阐释契丹—辽王朝的对外关系；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贯穿了契丹—辽史近百年的研究历史，从整体研究趋势上看，大致是由早期历史文化脸谱化二元对立的讨论，转向强调区域互动的多元一体。“内陆欧亚”作为一个历史区域被逐渐得到认可，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思考契丹—辽王朝是如何将“内陆欧亚”区域与传统的东亚区域整合起来的。因此，近年多有论者提出“东部欧亚”，用以阐释契丹—辽王朝存在与发展的历史空间区域，用以消弭脸谱化、非历史性的文化二元对立的负面影响。

学术史往往是理论思考的起点，在梳理的基础上更值得对其背后的学理进行讨论。笔者仅就视野所及，围绕上述学术历程的观念与方法论，及其与契丹—辽朝史研究之纠葛略做评述。

一 “征服王朝”论与日本的满鲜史、北亚史观

20世纪初，日本为服务于“满韩经营”，实现殖民扩张的需要，成立了“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开始所谓“满鲜史”研究。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松井等、田村实造等学者纷纷先后加入研究队伍之中，形成研究热潮。这也开始将契丹—辽朝史置于“满鲜史观”之中进行阐释。从学术史角度看，日本学者最早采用了近代实证史学与阿尔泰语文学方法对契丹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基本理顺了契丹诸多史事、地理等问题，津田左右吉提出的辽朝二元统治体制论一直影响至今。然而，这种研究的最终指向却是要通过强调契丹—辽朝的内亚特征，来否认与中国之联系。日本“满鲜史”研究的开创者白鸟库吉在1937年提出了“东洋史南北对立论”，[9]即认为东洋史的发展是以南方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两者的对抗、兴衰更替为主线的。从方法论角度看，其立论依据正是从当时流行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认为中国是由汉族地区构成的，具有文化构成的单一性，中国北部边疆的其他民族皆不属于中国之范畴。

在二战之后，美国学者魏特夫与中国学者冯家昇合作撰写了《中国辽代社会史》一书。[10]在该书导论之中，作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征服王朝”论，即将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民族进入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分为征服王朝和渗透王朝，辽金元清被归为“征服王朝”，与典型的唐宋等王朝分属中国帝制王朝的不同类型。[11]作者认为契丹的军政中心在于部族地区，而不在中原，契丹社会皆维系着游牧部族政治传统与军事组织形式。契丹人不可能被汉文化完全同化，更可能是形成混合契丹与汉文化的第三种文化形式。[12]“征服王朝”论注意到中国历史发展中北族王朝不同于汉制的社会传统，对契丹入主汉地之后的两大文化类型的交融与适应进行了分析，首次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与唐宋社会发展相并行的北方王朝类型，在学术史上具有积极意义。又因其内容引证翔实，加之辅有德国学者门格斯对辽史中契丹语汇的研究成果，使得该书至今仍是西方学者讨论辽朝历史所参考的最主要著作。

征服王朝论在强调辽朝游牧文化特征这一点上，与日本学术传统不谋而合，在二战以后很快引起日本学界的巨大反响，日本学者在“征服王朝”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北亚史的研究立场。田村实造著有《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三册，在详细介绍魏特夫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引入北亚史与中国史相结合的观点。他认为征服王朝多是由北亚民族进入、征服、支配

中原而建立，属于北亚游牧国家发展的高级阶段，[13]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形成了部族—州县的二元体制，北亚民族与中原民族经过广泛的社会接触与适应，形成了很多新的文化特征。而在辽史研究领域著作等身的岛田正郎则更为彻底地坚持了北亚史立场，他一直称辽为胡族国家，属于中国史序列之外。其基本理由在于强调辽朝政治、经济中枢是皆由契丹人掌控，农耕汉民主要是契丹获取财赋的来源而已，而政治文化方面契丹也具有自身的特征，与汉制并不相同。[14]日本学界在吸收魏特夫征服王朝观点的同时，也抛弃了魏特夫中国研究的立场，将辽朝史视作北亚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他们视北亚世界是具有自身历史逻辑的地域，将勃兴于北亚的匈奴至突厥、回鹘诸帝国视作北亚世界的古代，这些帝国本质上是部族联合体国家，社会氏族制传统浓厚。田村实造认为辽朝所代表的征服王朝则是对部族社会进行了重组，通过封建关系确立了新的部族体制，消灭了旧有氏族制的影响；在国家体制上，引入中国君主专制与官僚制度，确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15]护雅夫认为征服王朝的特征是农牧混合政权，发源于回鹘帝国，而兴盛于辽朝。[16]所以，在日本北亚史论者看来，辽王朝代表了北亚世界的发展进入了中世阶段。

日本北亚史观注意到内陆欧亚游牧部族社会政治文化形态的共同特征和连续性，并结合社会形态演化学说将辽朝二元王朝体制描绘成北亚社会的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其区域史研究的取向与西方学术界流行至今的内陆欧亚社会研究有共通之处，皆强调从内陆欧亚历史的延续性来讨论。然而，日本北亚史观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盛行的民族国家思潮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有近代思潮的时代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北亚史观将古代中国刻板地理解为汉民族文化为主的定居农耕社会，将中国历史范畴与内陆欧亚区域完全隔绝，这无疑是混淆了区域史与国别史之间的区别。这种史观的基本趣旨是通过突出、强调内陆欧亚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国古代王朝在内陆欧亚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毫无疑问，这与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框架内讨论的“征服王朝”模式存在本质的区别。

总而言之，20世纪在辽史研究界较具影响的日本满鲜史观与北亚史观前后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将辽朝的“契丹”文化特质割裂出来进行特别强调，以至于内陆欧亚社会这样一个中性的区域研究单位逐渐被贴上了非中国的污名，即使此后中国的部分辽史研究者也认为要力图将辽王朝置于汉化语境之内，与契丹传统划清界限，才算是论证辽朝属于中国历

史。[17]对辽史二分对立、非此即彼的刻板理解，致使学术界出现了颇为吊诡的现象：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地将魏特夫关于多元文化涵化的观点也列入日本的“征服王朝论”一并加以评述或抨击，有甚者认为魏特夫“分裂中国”之心可诛；韩国学者尹荣寅则认为魏特夫坚持汉族中心史观，魏氏将辽朝置于中国史范畴是的“错误”的，[18]这又与日本北亚史观相类。东亚中日韩三国学术界对魏特夫学说出现截然相反的评价，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需要读者注意的是，上述史观产生的时期正值蛮族征服史观、近代民族国家观、社会进化论、文化涵化理论盛行之时，契丹—辽朝史研究也仅限于基础文献、史地与制度的精致考订方面，故在理论构建上尚缺乏有效中层理论的支撑与切实资料的印证，不可避免地存在史论衔接不当、定性多于实证等问题。随着二战以后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人类学、考古学对游牧社会的精致研究，使得学术界越发地重视内陆欧亚与中国农耕地域的共生互动之关系，将相关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向前极大地推进，那种“内亚”、中国水火不容，带有鲜明近代学术烙印的学术研究也逐渐成为历史中的一段往事了。

二 内陆欧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与区域转向

内陆欧亚研究在二战前后的问题意识逐渐社会科学化，倾向于采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阿尔泰语文学多学科交叉进行研究。游牧社会结构稳定与变动机制的研究、游牧人群的文化适应与族群变迁、游牧社会在古代世界体系中的影响等诸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范式的转变也成为重新认知内陆欧亚社会与中国历史进程关系的契机，辽史研究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节点之一。

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社会存在紧密的共生和互动关系是学界较早达成共识的命题。这种认识在西方学术界自拉铁摩尔于20世纪40年代首次进行系统论说以来，[19]此后在近70年的时间内，巴菲尔德、[20]哈扎诺夫[21]等多位学者结合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对拉铁摩尔之假说进行了发展与补充，形成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体系。他们多认为游牧经济人口密度低、各部落之间流动性与离散型极强，单纯的游牧社会缺乏维系高级政治形式的凝聚力，亦不具备相应的物质资源保障。游牧国家的发展不是因内部需求的推动，而是在他们被迫持续性地与具有更高组织程度的定居国家社会接触时所造成的结果。[22]游牧与定居的过渡地带，或者

邻近定居社会之地区往往成为内陆欧亚游牧帝国（或联盟）的发源地，其天然的地域优势有助于吸收南方农耕社会的资源，长期维系政治统治，打破游牧社会离散循环的宿命，这就决定了游牧社会的兴衰往往与南部定居社会相呼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3]

该学说所提倡的游牧与定居社会的区域共生关系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是对于游牧政治组织演化的认知仍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在近30年内日益受到美国、俄国的考古学、人类学学者的质疑。美、俄考古学界通过对内陆欧亚游牧社会史前史至匈奴时代的研究，证明了内陆欧亚腹地自身存在游牧、农耕等多种生产方式。[24]自青铜时代以来，不同经济地域内已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经济分工与社会资源的交换系统。在管理长距离的社会移动、不同地域的物资交换的分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层级的政治权威，能够长期将移动人口聚集起来，形成复杂的政治组织。威廉·霍尼彻奇2015年的新著《内亚与帝国的空间政治：考古学、流动与文化接触》根据对蒙古国境内匈奴考古遗址的研究，结合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提出“空间政治”这一概念总摄之，较为系统地论证了这一思路。[25]

另外，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较早地对扭曲、贬低边缘文化与异文化民族为野蛮者的欧洲话语霸权进行了反思与批判，[26]在游牧社会研究中引起较大反响。多数研究者目前已基本明确，以前被视作原始社会象征的“部落”、“氏族”（或世系群）实际上是古代游牧社会进行社会整合而出现的政治组织，其出现与消失皆与特定游牧政治体的兴衰相关，[27]因此他们研究的关注点也转向部落、氏族在政治体建构与维系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由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变为结构性的过程研究。在此基础上，20世纪俄国学者所持的游牧封建论被西方文化人类学学者进行发展与改造，形成游牧贵族论。[28]大卫·斯尼思在2007年出版的颇具争议的著作《无主之国：贵族秩序、亲属社会，以及对游牧内亚的歪曲叙述》，[29]在系统批判内亚野蛮论歪曲部落社会本质的基础上，提出游牧国家的政治基础是由多个层级的游牧领主结成的权力网络构成，其社会基础是围绕游牧领主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存在类似定居社会那样的稳定的集权式政治中心。此后艾骛德的《中世中国“部族”考》一文在大卫·斯尼思学说基础之上，对中国中世“部族”一词的语源进行了考证，认为该词是以特定望族为核心，吸纳依附人口之“部”而形成的组织形态。[30]

至此，在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努力之下，一个较为清晰的区域社会轮廓已经基本勾勒出来：内陆欧亚社会是一个涵盖多种生业方式的游牧综合体，社会流动性与分散性促使地域内外广泛形成了社会互动网络。内陆欧亚游牧政治体的经济基础就在于对社会互动网络内的资源与人口进行控制和分配；其政治组织的基础则在于游牧贵族及其依附人口形成的部族组织。较定居社会的国家组织而言，内陆欧亚政治组织结构以不同地域游牧领主阶层的协商与联合为主，故贵族身份制以及相应的人身依附关系发达。没有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机构，不强求存在整齐划一的社会行政管理模式，政治体制相对多元化。可以说中国史家常说的“因俗而治”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内陆欧亚游牧政治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31]

西方内陆欧亚研究开展历史较早，积累深厚，基本明确了古代内陆欧亚区域研究的内涵与外延，这对于深入理解契丹—辽朝史之中的“内亚性”无疑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在内陆欧亚游牧与定居社会互动网络中阐释古代国家文化多元性、因俗而治的问题，实际上是从区域互动视角消解了长期困扰辽史学界游牧—汉化二分对立偏激思维的立论基础，为进一步客观阐释辽朝多元体制的特征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中层理论。同时，内陆欧亚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比较的方法，也能够促使辽史研究更重视探讨中国历史在欧亚大陆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然而，众所周知，辽史研究者在二战以后的内陆欧亚研究领域内基本上是“不在场的在场者”，虽然有时被引用（主要是魏特夫著作），且两个领域之探讨多有暗合之处，但辽史研究没有参与到内陆欧亚区域研究的讨论与理论建构之中，问题取向自然不同，在一些语境中甚至无法进行对话。加之西方辽史研究远不如中日学者之系统、精深，内陆欧亚区域史的综合研究仍缺乏对契丹社会的定位进行准确把握。所以，辽史研究亦不能完全照搬欧美研究的方法与具体结论，仍需结合历史语境进行辨别，有所扬弃。笔者仅结合近年阅读视野所及，对辽史与内陆欧亚视域结合之具体研究，略做介绍。

三 区域转向视域下的辽朝及其边疆

当代内陆欧亚史研究视野从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较好地解决了辽朝历史的定位问题。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皆意识到中国东北边疆民族地处游牧与中原农耕两大区域互动的过渡地带，能够吸收两大社会区域的资源与文化，形成与内陆欧亚草原民族存在差异的混合文化类型。[32]巴菲尔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认为往往在内陆欧亚游牧帝国与中原统一

王朝处于衰落期时，像契丹、女真等东北民族就会崛起，建立东北边疆国家。[33]这一类型的边疆国家基本特征是实行内陆欧亚与中原混合的二元体制，对中原有所关注，以草原腹地为边缘地域。实际上，东北边疆国家大体等同于魏特夫所称的“征服王朝”的范围，但其内涵却与“征服王朝”、北亚史观所论有所不同。既然东北边疆国家形成之基础在于中国北疆两种经济区的边缘过渡地带，那么所谓“征服”二字就无从提起。巴菲尔德认为“辽朝从未拓展至中原腹地，并通常联合或者在其对手崩溃后而获得土地”，“东北王朝与其是征服者，倒不如说是拾荒者”。[34]这一学说主要是据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脉络归纳、演绎而来，故能够较为明确地区分出东北混合地带与典型游牧地带的区域差异，并看到了以辽朝为代表的东北王朝内向中原地区，以内陆欧亚草原为边疆的发展趋势。匈奴、突厥等典型游牧帝国与辽朝等东北边疆王朝在体制、结构方面，并不是处于同一社会进化脉络之下，也不是前后相续的关系，而是一种地域发展的差异。

据此，我们即可以发现目前对辽史“内亚性”因素的研究存在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学界关注辽朝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社会政治现象共同性的研究，多对一些政治文化形式进行简单的描述与归纳，或者将辽朝作为一种模式与其他游牧帝国进行类型学的比较。2015年，德国波恩大学《亚洲考古论丛》第7辑《公元第一千纪欧亚草原地带互动之复杂性》上刊载的俄国学者瓦斯尤丁的长文《蒙古中世早期草原帝国权威结构进化一种变型：大辽政治演进模式》，[35]即认为辽朝作为草原游牧帝国能够利用中国定居社会之体制，使得政权较匈奴、突厥更为稳固。然而，这种过度追求归纳与描述共同性的研究，实际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模糊了作为辽王朝的独特性及其与典型内陆欧亚社会的区别。

契丹人曾长期夹在突厥—回鹘与隋唐王朝之间，同时吸纳了内陆欧亚地区与中原的政治文化。经过门格斯、[36]傅海波、[37]爱新觉罗·乌拉熙春[38]等学者的研究，已经能够明确契丹官号之中即有大量源自回鹘，也有很早以前借用自汉地的名号。笔者通过对契丹名号“舍利”的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契丹人吸纳大量的外来政治文化，进行融合与改造后，产生与自身社会语境兼容的新功能，[39]即使能够通过阿尔泰语文学考证得出语汇的同源性，也无法说明该语背后所代表的特定社会、政治意义具有共同性。另外，契丹长期游牧于农耕社会边缘，其政治体制的社会基础自然与崛起于蒙古草原腹地的匈奴、突厥等帝国存在较大差

异。虽然契丹行政中枢存在与其他游牧帝国相似的四时捺钵现象，但此时辽朝之稳定主要依靠“五京”、军镇进行控制，那么此捺钵的社会意义就与纯粹草原游牧政体所有不同，应当另做探讨。

鉴于辽朝历史发展的特征，从内陆欧亚区域史视野审视辽史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简单寻求契丹与所谓“内亚”民族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共同之处，亦非将辽史置于“内亚性”的解释框架之内，而是要注重探讨游牧—渔猎综合体作为一种社会元素，在辽朝社会体制的建构与维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傅海波曾在1987年发表《多族群社会中国家作为结构元素的作用》一文，[40]该文主旨后改写入《剑桥中国史》第6册《异族政权与边地国家》之导言。[41]傅文指出，辽、金、元超部落与民族的复合制国家要素能够将不同文化群体整合在一起，并且游牧部族政治传统能够在王朝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辽朝通过强化斡鲁朵人身依附关系的亲卫制度，扩大了皇帝直辖的人口与军队，形成“国中之国”，与中原皇帝制度一同形成压制其他部族酋长的中央集权体制；其次，因游牧部族社会长期流行的贵族合议制度，致使国家长期无法形成有效的集权决策机制，又因贵族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大，国家决策缺乏官僚群体的监督与权力制衡，故在有些情况下，皇权专制较中原王朝更为严重；最后，在军政管理体制方面，对游牧部族与定居社会采取不同的二元管理体制，并基本维持国家内多族群的文化独特性，多种文字并行使用。

综合傅海波之概述大体可知，在辽王朝国家体制建设过程中，契丹源自内陆欧亚区域的政治传统主要体现在贵族人身依附制度的运用、游牧部族军事组织及其背后的社会基础上，这些内容与中原的皇帝制度、官僚制度一同融合为辽朝国家体制的组成部分。在此前提下，辽朝保留了各部族酋长贵族身份，又利用官僚制对治下的各个部族进行了改组，使其能够成为听命于辽帝的重要军事力量。日本学者岛田正郎于此着力最多，[42]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又运用出土的契丹文献对辽朝部族制、皇族帐、房之制有深入探讨。[43]从这些研究亦可推知，辽代契丹氏族与婚姻制度更应被视为统治集团组织的一种现象而进行重新理解。如早年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曾在契丹早期社会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状态的预设之下展开研究，故将耶律与萧氏视作半族，下分八部。[44]近年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契丹文墓志所见辽史》、[45]武田和哉的《萧孝恭墓志所见契丹国（辽朝）的姓与婚姻》[46]基本能够说明耶律、萧二姓之分野形成较晚，是与国家体制的建构息息相关的。这都能

够提醒研究者，辽史所见部族传统，并非是原始社会之残余，而应作为国家政治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受到关注。

辽朝混合了内陆欧亚游牧与中原定居的社会体制，故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互影响与融合的现象。其中，游牧民与定居城市之间的关系是近期西方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俄国学者哈扎诺夫《欧亚草原地区与邻近国家的游牧者与城市：一个历史概述》、[47]美国学者J. 丹尼尔·罗格斯等人合著的论文《城市中心与内亚东部帝国的出现》、[48]丹尼尔·C. 沃的《游牧者与聚落：蒙古考古中的新视角》[49]等文都涉及了契丹筑城的问题。目前基本的认识是游牧民会因军事防御、物资交换、行政管理等需要修筑城镇，契丹筑城现象上承回鹘，下接蒙古，其社会在建国之前就已是一个混合形态了。此外，林鹄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城市景观与政治：内蒙古东南辽代都市的形成》[50]则将契丹腹地的城市建设视作一种向中原宣示正统性的政治策略进行讨论，也体现了美国考古人类学在研究辽代城市时所持的一个视角。

辽朝不仅在国家体制内存留了大量内陆欧亚部族政治传统，同时将统治领域扩展到内陆欧亚草原腹地。因此，辽朝的内陆欧亚领域也是从区域视域看辽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一般认为，在与宋订立澶渊之盟后，辽朝得以集中力量实施北进之政策，捍御阻卜，经略室韦、羽厥等部，逐渐在蒙古草原腹地建立了点线结合的军镇体系。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今，蒙古国学者与俄国学者一直对蒙古国境内的契丹遗迹进行发掘与研究，此后日本、中国学者也加入研究之列，近年蒙古国契丹考古已成为又一个国际辽史研究的主要增长点。目前的研究能够确认，在图勒河与鄂尔浑河流域一带分布的契丹遗址，自北向南构成了三道完整的军堡、城镇复合体系，其中居中者是由青陶勒盖城、哈拉布和城构成的行政与手工业中心，用以支持附近的军事镇戍。多数学者认为辽西北路招讨司治所即在青陶勒盖城。[51]在蒙古国西部戈壁沙漠契丹与阻卜胶着地带，亦发现有很多契丹系文化遗迹，是辽朝西向活动的重要证据。这些考古研究可与文献相印证，展现辽朝对蒙古草原地区的经略采取了军镇移民与游牧部族军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大量迁徙东北地区的渤海、女真以军屯的形式进行镇守，[52]另一方面又以蒙古草原东部的乌古、敌烈诸部牵制阻卜人，构成相对稳固的内陆欧亚边疆地带。

四 “东部欧亚”视域下的辽朝与世界

内陆欧亚研究区域转向促使学界将问题意识转向草原、农耕、渔猎多元社会形态的整合、互动的区域研究，促使21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研究者改变了传统西方中心史观的叙述方式，日益关注欧亚大陆范围的历史互动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重要作用。在欧亚历史的叙述框架中，超越“内陆欧亚”“东亚”这种传统的区域范畴，关注点不在于国别、单一文明区域的独特性，而在于重视异文化群体的跨文化联动、交通与比较。[53]在这种视域下，世界体系论方法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贡德·弗兰克等人在20世纪就对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论加以发挥，认为人类社会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广泛存在世界体系。这种世界体系最初是区域性的联通网络，其关注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的流通、积累与再分配，以及为了维持上述过程的顺畅而形成的地域中心—边缘的秩序格局，进而通过长时段的历史社会学过程，关注中心、边缘的地位转换以及各主要地域兴衰周期的规律。[54]

近年在日本中青年学者中流行的“东部欧亚”（東部ユーラシア）论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实践。他们认识到“东亚”与内陆欧亚地区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简单划一的文化圈，存在广泛影响的游牧社会也同样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划定的“东部欧亚”区域，主要考虑到传统东亚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及其与内陆欧亚区域相互结合的问题，所以其基本标准是以帕米尔高原为线，其东部的中国、朝鲜半岛、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以东、中南半岛等地区都属这一区域的范围。[55]因此，他们力图从世界体系角度将“东部欧亚”解释为一个政治多中心（中心—边缘），附于其上的文化多样化的网络格局。[56]

10～13世纪的中国处于“第二次南北朝”时期，契丹—辽朝立足中国北方，其发展的区域舞台处于传统东亚文化圈与内陆欧亚地域的过渡地带，并与宋朝、西夏等国并立，这正为“东部欧亚”论者提供了一个重要实践场域。古松崇志等学者重视辽宋澶渊之盟确立的外交准则，将盟约及多国对等外交制度称为“澶渊体制”，并将之视作构成“东部欧亚”区域多国关系的基本核心框架。以“澶渊体制”为基础，“东部欧亚”区域以辽与宋的友好关系为主轴，高丽、西夏、吐蕃、回鹘、喀喇汗王朝并存，实现了和平而稳定的结构。[57]在这种基本理念之下，很多日本学者重视各国之间的外交文书（誓书—誓表、牒文、诏书）的格式、传递仪式，以及往返外交使节的接待礼仪、边境交涉等能够体现多元外交体制基本元素、文化符号的研究课题，在21世纪掀起日本研究辽、宋、金、西夏、高丽等国外交制度的热潮。[58]

日本学者对“东部欧亚”区域体系讨论的最终趣旨在于展现带有东方视角的世界历史。其中的辽金史研究者更是要在讨论跨文化区域体系的基础上，去强调辽朝在10～12世纪世界历史中的意义。《契丹（辽）与10～12世纪的东部欧亚》[59]这部书汇集了日本契丹—辽朝史研究政治、文化、考古、周边民族等各领域专攻学者的概述，可以认为是遵循“东部欧亚”多元社会格局理念对契丹—辽朝史撰写的一次尝试。高井康典行在其著作《渤海与藩镇：辽代地方统治研究》书尾结论中以“世界史中如何对辽史进行定位”为题，从“东部欧亚”的视角对其主要研究对象——辽代地方统治体制中的东北“渤海”因素以及藩镇进行阐释，其主旨在于强调辽朝东北地域秩序是“东部欧亚”国际秩序的一种延伸，至于辽朝的主要地方体制“藩镇”则是杂糅沙陀“北流”与汉地“南流”因素而形成的。[60]从作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是将多国并立的区域秩序，以及北族、汉地异文化要素皆视作“东部欧亚”世界历史的构成内容，进而阐释这些要素如何促成辽朝地方区域体制的形成与嬗变的。

从隋唐王朝史专攻参与到讨论的妹尾达彦以“都市”“环境”“交通”三个基本关键概念，构建起一个生态—社会网络区域阐释体系，进而用以阐发自己的全球史理论。他认为欧亚大陆可以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域，每个地域都存在自北而南的渔猎、游牧、农耕、沿海完整的广域经济圈，在这一相对自足的圈内，形成多国秩序、思想文化圈、区域内的生产分工。从动态发展而言，推动欧亚历史进程的关键在于“境界”地带，即推动古代历史进程的农牧过渡地带以及近代化开端的沿海与农耕过渡地带。[61]仅就本文讨论的中世历史范围而言，农牧过渡地带是欧亚大陆大型农牧复合制国家的发源地，这种国家类型是欧亚大陆4～15世纪的主要组织形式。妹尾达彦在论述欧亚东方的空间概念时，实际上是围绕中国的空间地域来讨论的。他利用其分析模型着重探讨了中国古代历史空间的转变，提出了“大中国”（农牧复合的多民族王朝）、“小中国”（游牧—农耕社会分离的多国并立状态）两种组织形式循环发展的命题，在每个阶段的具体论述中，又着重考察了不同形态下中国都市群网络分布的差异及变化特点。

总的来看，持有“东部欧亚”思潮的日本学者虽然研究领域与学术方法各异，但都力图尝试解决两种社会（东亚—“中央欧亚”）的南北整合与联动问题，从区域社会的网络链接与国际秩序方面去界定“东部欧亚”区域史。这种思考方式打破了日本关于东亚汉字文化圈与“北亚”游牧民世界的臻域之分，强调区域网络内的多元文化互动、互通。原来在东

亚历史书写视野外的边缘地带、人群开始进入聚光灯之下，传统的边疆过渡地带则成为区域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动力源泉。这一思路无疑为契丹—辽朝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史乃至全球史领域的思考空间，促使我们去探讨契丹—辽朝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定位与意义，研究方法论则由简单的两点一线的国别关系史研究升级为区域联动视野下的网络体系分析。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从欧亚世界历史范围内思考契丹—辽朝史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同时，“东部欧亚”思潮颇具理论雄心，欲勾勒一部东方多元文化的古代世界历史图景。这一思潮注重搭建多极中心的网络与秩序，不仅力图解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册封秩序论，也欲以“世界史”的名义解构传统的东亚国别史叙事体系。然而，“东部欧亚”思潮因存在一些逻辑上的矛盾而无法自证。首先，其思路强调以多国网络秩序“去中华中心化”，但支撑其多国秩序的基本架构都是典型的中国王朝的政治话语、仪礼、汉文书仪，没有提出更为坚实的证据去否定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核心地位。概言之，新建区域体系的核心内涵表述不明。其次，“东部欧亚”思潮的另一重要支柱是强调“中央欧亚”政治文化在区域构造中的重要作用，仅就宏观概述而言，笔者表示赞同。但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相关方法论存在诸多问题，笔者不敢苟同。其主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在于以“种族”辩归属，反而忽略了其体制与文化形式等更为核心与重要的标准。譬如有的学者将活跃在中国王朝体制内的北族出身的官僚与将领皆视作“中央欧亚”的代表性因素则未免背离了社会理论的基本常识。如本文前述，契丹—辽朝史中的“内陆欧亚”基因应当是区域政治、文化、制度的元素；与之同理，其中原汉地的基因也是以制度元素与文化来界定的，而非历史参与者的族属或“种族”差异决定的。

就目前的研究程度而言，“东部欧亚”思潮主要着力于契丹—辽朝与世界关系的阐释问题，即契丹—辽朝与周邻发生关系的区域秩序与体系（如澶渊体制），并涉及欧亚范围内的跨区域比较与联动，将阐释带入了世界历史范畴。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凝练出一个区域性的核心内涵，尤其是在国别史观念盛行的东亚范围之内，区域研究更需要观照到如何处理与国别史叙事的关系。考虑到这一点，形成一个妥帖的、有别于传统东亚区域理论的核心内涵可能是“东部欧亚”由新思潮向成熟区域史理论转变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五 从辽史研究看古代中国与世界

国内外区域史研究在契丹—辽朝史近百年的研究历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功地解决了以族属辨国别、北方民族与汉地对立、征服与被征服的争论难题，明确了辽王朝是在区域整合的基础上由多元文化共同凝聚而成的古代王朝。在此前提之下，本文概述的主要研究成果，大致从三个思考层面审视契丹—辽朝的历史。首先，辽王朝整合内陆欧亚东部地域、东北亚的森林渔猎、华北汉地的定居农耕社会等三大区域为一，将之前与隋唐王朝若即若离的东北边疆地域凝聚在王朝的统治体制之下，开启了中国东北边疆地域的内地化进程，这一进程在金王朝最终完成。其次，将辽王朝的发展置于10～12世纪多国并立的欧亚东部区域环境之内进行解读，从国际体系的层面对辽王朝的存续环境与历史地位进行阐释。最后，隐含于两个层面背后的世界历史视角，则是将辽朝历史置于古代欧亚大陆历史范畴内，探讨其历史作用，并与其他的区域社会进行比较。

在以契丹—辽朝史为中心的研究过程中，必然会触及中国历史与内陆欧亚区域史视域的纠葛。从国外学者的立场而言，他们不存在对于“中国”的焦虑，在区域叙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历史范畴。这也引发了很多中国学者的不满，并引起他们对于古代区域史研究的种种误解。实际上，从前述研究内容来看，所谓欧亚东部历史的核心范畴主要是中国历史架构内的多区域整合与互动。辽朝本身崛起于唐王朝的东北边疆地带，与之并存的中原其他政权、王朝都是承续了隋唐王朝的历史遗产。10～12世纪处于欧亚东部核心地带、起到区域轴心作用的辽宋王朝都立足于中国政治、文化之内进行发展，并对欧亚东部范围内的朝鲜半岛、东南半岛，以及北方的内陆欧亚东部区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澶渊体制”外交话语为中心的仪礼、汉文国书书仪，无一不是这一辐射的重要体现。因此可以说，辽朝历史的研究能够证明，10～12世纪欧亚东部国际秩序地缘空间的轴心在中国。从这一点看，妹尾达彦并没有回避中国之于欧亚东部区域的中心作用，从社会区域网络的视角阐释中国空间格局之于欧亚东部的历史地位，值得中国学界进一步关注。

另外，在世界历史中界定古代中国的历史意义与地位，往往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方面。世界历史的区域史研究为这一问题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基本的着力点与方法论。近年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的书写体系“去西方中心化”，强调以欧亚大陆区域作为关注的中心对象。近年出版的《剑桥世界史》正是以此为趣旨，以大篇幅介绍欧亚大陆范围内的中国与其他文明地域的共同性、联通性，并将各文明区的历史、文化置于一

个网络互动与比较的视野进行介绍。[62]在世界历史欧亚区域研究方兴未艾的时代，尤其是在近年“一带一路”研究热潮的推动之下，我们如何去理解古代中国在欧亚区域范围内的联通网络与历史定位，就值得国人进一步思考了。

契丹—辽朝史无疑为这一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视角。辽王朝是古代中国向内陆欧亚地域扩展历史影响的主要中介者之一。众所周知，辽朝在保持内陆欧亚边疆相对稳固统治的基础上，也开始利用内陆欧亚区域向西扩展影响，与欧亚地域的其他文明发生了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联系。“Khitai”在9世纪以后就已经传播至阿拉伯世界，此后则逐渐取代“桃花石”成为中国的代名词。金安雅（音译，Anya King）的《早期伊斯兰文献对契丹辽的记载：贸易的作用》一文则探索了“契丹”之意义在西方伊斯兰世界的传播、演化史。[63]彭晓燕的一些文章亦讨论了契丹—辽王朝经由内陆欧亚与西方发生的关系。[64]从更为深入的历史层面来看，以契丹为代表的蒙古语族诸民族在9世纪前后开启了内陆欧亚第二次大范围的连锁迁徙浪潮，改变了内陆欧亚地域的历史格局，这一进程在蒙古帝国建立以后达到高潮。由于契丹等蒙古语族民族的故地多在中国古代王朝的边疆地带，这场西迁浪潮也成为古代中国进一步融入欧亚世界互联互通的重要契机。因此，就契丹—辽朝史研究而言，内陆欧亚区域视域不仅对于探讨王朝历史特性不可或缺，而且亦是探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区域平台与学理基础。探索古代内陆欧亚多民族、多文化联动的独特社会发生机制，就是在探索古代中国王朝通过北部边疆与广阔的欧亚腹地发生互动与交流的运作机制。通过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不仅能够证明中国历史的区域基础在于不同文化区的网络联结与整合，亦能证明中国是塑造欧亚历史格局的重要参与者，而不是自绝于欧亚区域之外的旁观者。

总而言之，区域史视域是阐释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位于内陆欧亚东缘与南部中原定居区域结合点的契丹—辽朝史就成为讨论这一问题重要的参照节点，也由此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诸多关注与讨论。涉及契丹—辽朝史的两种区域研究视域“内陆欧亚”与“东部欧亚”既有其共同的学术背景，也各有阐释的侧重之处。中国学界对相关国外讨论的具体观点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无法回避这一重要问题——阐释古代中国与欧亚区域内的地区、政权或部族之间的密切历史关系，这就需要一个动态、开放、包容的区域阐释体系，在这一层面上与国外学界的相关讨论进行积极对话。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丝绸之路’与女真政治文明研究”（16CZS032）阶段性成果之一。

[2] 孙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3]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贾衣肯老师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意！

[4] 程秀金：《“内亚”概念源流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20～25页。日本学界使用“内陸アジア”，或者“中央ユーラシア”的概念，其基本内涵与塞诺的论说类似，皆重视在阿尔泰语文学基础上对内陆亚洲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森安孝夫对此有系统的介绍与梳理，参见森安孝夫「内陸アジア史研究の新潮流と世界史教育現場への提言」『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6）、2011、3-34頁；小松久男、荒川正晴、岡洋樹編『中央ユーラシア史研究入門』、山川出版社、2018。近年美国学者David Christian 提出的“Inner Eurasia”的概念，认为欧亚内陆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塑造了兼具多样性与特殊性的区域历史进程，且不认同塞诺等人力图论证的阿尔泰文化共同体范畴的“Inner Asia”。参见David Christian，“Introduction，” in *a History of Russia*，*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Vol. I.*（Blackwell Publishing，1998），pp. xv-xxi；David Christian，“Preface：The Idea of Inner Eurasia，” in *a History of Russia*，*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Vol. II*（Blackwell Publishing，2018），pp. xxi-xxxv。

[5] 箭内亘『遼金時代に所謂糺軍について』、刀江書院、1930、79-85頁（原刊于『史学雑誌』26（7）、1915）。箭内亘「元朝斡耳朵考」『蒙古史研究』、刀江書院、1930、663-752頁（原刊于『東洋學報』19（1·2·3）、1920）。

[6] Fu Lo-huan，*Napat and Ordo*：*A Study of the Way of Life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the Khitan Emperors and Their People*（Ph. D. Thesi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 University，UK，1950）.

[7]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8] 司马迁将乌孙和康居称为逐水草而居的“行国”，参见《史记》卷123《大宛传》，中华书局，2011，第3161页。

[9]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対立」『白鳥庫吉全集』岩波書店、1970。

[10] 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 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9）.

[11] Karl A. WittfogelandFeng Chia 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24.

[12] Karl A. WittfogelandFeng Chia 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p.18-20.

[13]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第一巻、東洋史研究会、1964、44-56頁。

[14] 島田正郎『遼代社会史研究』三和書房、1952、34-56頁。

[15]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第一巻、45頁。

[16] 護雅夫「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展開」『世界歴史』9、岩波書店、1970。

[17] 宋德金：《评“征服王朝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林鹄：《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兼论非汉族政权之汉化命题》，《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8] 윤영인，《서구 학계의 거란 금 연구-한화，이원적 통치 체제와 대외 관계를 중심으로》，《학계의 정복왕조 연구 시각과 최근 동향》，동북아역사재단，2010.

[19] 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该书最初在1940年由美国地理学会出版。

[20] Thomas J. 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Basil Blackwell，1989）. Thomas J. Barfield，“Inner Asia and Cycles of Power in China’s Imperial History，” in Gary Seaman and Daniel Marks ed.，*Rulers from the Steppe*：*State Formation on the Eurasian Periphery*（Ethnographics Pres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1991），pp. 21-62.

[21] Anatoly M. 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 该书最初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22] Anatoly M. 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pp.228-302.

[23] Thomas J. Barfield，“Inner Asia and Cycles of Power in China’s Imperial History，” pp.21-62.

[24] See Nicola di Cosmo，“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53，No. 4，1994，pp.1092-1126.

[25] William Honeychurch，*Inner Asia and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Empire*：*Archaeology*，*Mobility*，*and Culture Contact*（Springer，2015）.

[26] Eric R. Wolf，*Europe and People without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27] Rudi Paul Lindner，“What was a Nomadic Trib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4，No.4，Oct.，1982，pp.689-711.

[28] in Herausgegeben von Jürgen Paul eds.，*Nomad Aristocrats in a World of Empires*（Dr Ludwig Reichert Verlag，2013）.

[29] David Sneath，*The Headless State*：*Aristocratic Orders*，*Kinship Society*，*and Misrepresentations of Nomadic Inner As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30] Christopher P. Atwood，"The Notion of Tribe in Medieval China：OuyangXiu and the Shatuo Dynastic Myth，" in *Miscellanea Asiatica*：*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Françoise Aubin*，edited by Denise Aigle，Isabelle Charleux，Vincent Goossaert and RoberteHamayon，InstitutMonumentaSerica·SanktAugustin，2010，pp.594-618.

[31] 《辽史》卷45《百官志》，中华书局，2016，第773页。

[32] 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pp.542-549. Thomas J. Barfield，"Inner Asia and Cycles of Power in China's Imperial History，" pp.41-48.

[33] Thomas J. 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pp.165-185.

[34] Thomas J. 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p.167.

[35] Sergey A. Vasyutin，"The Model of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Da Liao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Structures of Authority in the Early Medieval Pastoral Empires of Mongolia，" in Jan Bemmann，Michael Schmauder ed.，*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Archäologie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2015），pp.391-436.

[36] Karl. H. Menges，"Titles and Organizational Terms of the Qytań（Liao）and Qara-Qytaj（Śi-Liao），" in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tomo XVII（1951-1952），pp.68-79.

[37] Herbert Franke，"Bemerkungenzu den SprachlichenVerhältnissenim Liao-Reich，i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1969-3，pp.7-49.

[38]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遼金史與契丹文、女真文』東亞歴史文化研究會、2004。

[39] 孙昊：《说"舍利"：兼论突厥、契丹与靺鞨的政治文化互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增订版收录于《辽代女真族群与社会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

[40] Herbert Franke，"The Role of the State as a Structural Element in Polyethnic Societies，" in S.R. Schram ed.，*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1987），pp.87-112.

[41]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1-42.

[42] 島田正郎『遼代社會史研究』、1-170頁。

[43]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契丹文墓誌より見た遼史』松香堂、2006；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新出契丹史料の研究』松香堂、2012。

[44] 愛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東洋史研究会、1959。

[45]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契丹文墓誌より見た遼史』、12-53頁。

[46] 武田和哉「蕭孝恭墓誌よりみた契丹国（遼朝）の姓と婚姻」『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0）、2005、1-21頁。

[47] Anatoly M. Khazanov，“Nomads and Cities in the Eurasian Steppe Region and Adjacent Countries：A Historical Overview，” in Stefan Leder and Bernhard Streck ed.，*Shifts and Drifts in Nomad-Sedentary Relations*（Dr. Ludwig Reichert Verlag，2005），pp.163-178.

[48] J. Daniel Rogers，Erdenebat Ulambayar and Mathew Gallon，“Urban Centres and the Emergence of Empires in Eastern Inner Asia，” in *Antiquity* 79，pp.801-818.

[49] Daniel C. Waugh，“Nomads and Settlement：New Perspectiv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Mongolia，” in *the Silk Road*，Vol.8，2010，pp.97-124.

[50] Lin Hu，*Urban Landscape and Politics*：*The Making of Liao Cities in Southeast Inner Mongolia*，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2009）.

[51] Sergey A. Vasyutin，“The Model of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Da Liao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Structures of Authority in the Early Medieval Pastoral Empires of Mongolia，” pp.423-424.

[52] Nikolai N. Kradin，Alexandr L. Ivliev，“The Downfall of the Bohai State and the Ethnic Structure of the Kitan City of ChintolgoiBalgas，Mongolia，” in Jan Bemmann，Hermann Parzinger，Ernst Pohl，DamdinsürenTseveendorzh ed.，*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Paper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held in Ulaanbaatar*，*August 19th-23rd*，*2007*，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2009，pp.461-476.

[53] 例如近期会聚拜占庭史、内陆欧亚游牧社会史、中国史、印度史、波斯史多个领域的学者围绕“古代晚期欧亚历史”的整体状况进行的对话与讨论。Nicola Di Cosmo and Michael Maas ed.，*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Rome*，*China*，*Iran*，*and the Steppe*，*ca. 250-7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54] 详见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ed.，*The World System*：*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1993。

[55] 上田信『海と帝国』講談社、2005；古松崇志「10-13世紀多國竝存時代のユーラシア東方における國際關係」『中國史學』第二十一巻、2011、113-130頁；廣瀬憲雄『古代日本と東部ユーラシアの国際関係』勉誠出版、2018。

[56] “东部欧亚”是近年日本史学界流行的一种思潮。其首倡者是研究明清史的上田信，其论著主张以西太平洋为中心的海陆整合研究。古代日本对外关系史学者铃木靖民等人从渤海国关系史的角度推进“东部欧亚”的理论化，参见鈴木靖民「東アジア交流史と東アジア世界·東ユーラシア世界」『古代日本の東アジア交流史』勉誠出版、2016、399-414頁；廣瀬憲雄『古代日本と東部ユーラシアの国際関係』勉誠出版、2018。

[57] 古松崇志「10～13世紀多國竝存時代のユーラシア東方における國際關係」『中國史學』第二十一巻、2011、113-130頁；「契丹·宋間の澶淵體制における國境」『史林』90-1、28-61頁（汉译《契丹、宋之间澶渊体制中的国境》，《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28～170页）；毛利英介「澶淵の盟の歷史的背景：雲中の會盟から澶淵の盟へ」『史林』89-3、413-443頁。

[58] 这一热潮是由多个方向专攻的学者共同促成，他们在各领域的主要研究介绍可参见Endō Satoshi，Iiyama Tomoyasu，ItōKazuma，Mori Eisuke，“Recent Japanese Scholarship on the Multi-State Order in East Eurasia from the Te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in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Vol.47，2017-2018，pp. 193-205。

[59] 荒川慎太郎·澤本光弘·高井康典行·渡辺健哉編『契丹［遼］と10～12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アジア遊学』160）勉誠出版、2013。本年5月，日本学者还出版了其姊妹版。『金·女真の歴史とユーラシア東方』（『アジア遊学』233）勉誠出版、2019。

[60] 高井康典行『渤海と藩鎮：遼代地方統治の研究』汲古書院、2016、433-443頁。

[61] 其基本概念与思路详见妹尾達彦『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中央大学出版部、2018、9-58頁。

[62] 可参见Benjamin Z. Kedar and Merry E. Wiesner-Hanks ed.，*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Vol. V*，*Expanding Webs of Exchange and Conflict 500 CE-1500 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63] Anya King，“Early Islamic Sources on the Khitan Liao：The Role of Trade，” in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Vol.43，2013，pp.253-271.

[64] Michal Biran，“Unearthing the Liao Dynasty’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 World：Migrations，Diplomacy，Commerce，and Mutual Perceptions，” in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Vol.43，2013，pp.221-251.

·海丝与陆丝·

早期海上丝路与海陆两道联通

王小甫[1]

六年前，笔者承担了“阿曼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课题，[2]具体时段是从有史以来迄至郑和下西洋时代。当资料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到达一定阶段后，笔者发现了一个史实：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这里主要指古代中国与西亚间的沟通和交流过程中，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地域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经由阿曼的海道交通并非陆道交通的附庸分支，而是大秦[3]与中国乃至西亚与东亚间的一条交通主干道。本文即以此为中心对早期丝路海陆两道联通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有以下论点。

（1）古代海丝主要是一条近海航线。打开地图可以看到，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阿曼是西亚最接近东方的地点，这就使它在技术有限（主要是缺乏机械动力）的古代，在传统东西方海路交通中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就东、西方交通而言，从阿曼哈德角附近的苏尔（Sur）向北偏东直航对岸伊朗的恰赫巴哈尔港（Chah Bahar Port），[4]这是横渡印度洋阿拉伯海的最近航线。[5]

罗马商人直到公元1世纪中发现利用信风以前，沿海岸航行一直是海道交通的唯一办法。《红海周航记》（*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第27～57节逐段描述了从亚丁和虔那（Kane）到柯枝（Muziris）和故临（Nelkynda）的航程，作者最后说：“刚才描述的这整个沿海航线，从亚丁和虔那至此，人们从前习惯于用较小的船只，顺着那些海湾的曲线航行经过。希帕洛斯（Hippalos）船长用测绘贸易港口位置和海洋形态的办法，首次揭示了跨越浩瀚洋面的航线。”[6]

由此可见，古代印度洋周边的交流绝大多数是遵循地方传统的近海航线来进行的。公元8世纪末唐德宗朝宰相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广州通海夷道”所记印度洋西岸路，以及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时在印度

以西的几次航行路线，都表明《红海周航记》第27～57节描述的近海航线一直是古代印度洋周边交流的主要航路。

（2）《三国志》卷30裴注引《魏略·西戎大秦传》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此处即指阿曼，当时为安息属国。《后汉书·西域大秦传》略云：“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3）上述《魏略》所记丝绸之路在西亚的交通信息，应该主要来自东汉初年的甘英使大秦。因为甘英到了安息西界，亲身经历了解到很多信息，所以纠正了一些传闻错误，譬如《魏略·西戎传》云：“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条支、乌弋。乌弋一名排特，此四国次在西，本国也，无增损。前世谬以为条支在大秦西，今其实在东。前世又谬以为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后汉书·西域大秦传》则明确说：“《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后汉书》所谓“前世”就是指西汉（前202～公元8）。

（4）《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欢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的记载则是：“骞卒（前114）。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而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牦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汉书·西域传》同）这里的“牦靬”即《史记》所载的“黎轩”（《汉书·西域传》作“犁靬”），两传所记为同一事。问题是，为什么司马迁（前145～约前87）所著《史记》里献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的安息会被《汉书》作者班固（32～92）改成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诸国？仔细阅读上引《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出使安息的汉使其实并未至其王都，而只是到了

安息东界。而此时的安息东界，应该就是未被《史记》明确记载而始见于《汉书》的乌弋山离。

（5）那么，乌弋山离为什么没有被《史记》提及却被《汉书》记载，它和大宛又是什么关系呢？这涉及当时中亚地区的复杂政局并影响到中西交流尤其是丝绸之路径途走向的形成。据权威研究，乌弋山离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伊朗高原东部的一个地区或半独立国家”。由于大月氏西迁，中亚的塞人（Sakas）各部受到很大的打击，大约在公元前128年或前127年纷纷南下闯入安息境内，乌弋山离这个国家的产生形成与中亚塞种的迁徙活动密切相关。南迁的塞种主要有三支：除了上述向西南到达锡斯坦的一支和另一支向东南进入葱岭（今帕米尔）附近地区，最主要的一支向南进入印度西北并以罽宾（今克什米尔）为中心建立政权。据研究，这一身毒—塞种王朝（Indo-Scythian dynasty）从其第一位国王Maues（约公元前120～前85）开始一直存在到公元1世纪中期；而塞种国王Mause（Moa/Moga/Mauakes）一名见于巴基斯坦所领克什米尔地区修建中巴友谊公路时于奇拉斯（Chilas）发现的摩崖石刻，他很可能与《汉书·西域传》记载李广利伐大宛时的该国国王毋寡（Miwo/Miu-kwa°/kwa，死于公元前101年）同属一人或同为一家。这很可能就是《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把《史记·大宛列传》安息（东界）云云改成“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犛靬眩人献于汉”的由来。

（6）塞种入主印度西北共有三批，毋寡之后的两批入印应与大月氏灭大夏（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乌弋山离后期的扩张（公元1世纪前期）有关。迁入印度的塞种以联盟或同盟（federations or alliances）方式形成帝国，[7]继续向南迁徙和扩张势力到达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古吉拉特，甚至影响到印度中部的部分地区。总之，正是毋寡及其后继者构建的塞种联盟（帝国）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中叶提供了从中亚腹地到印度河口的交通，才使得张骞通西域开辟的中外交流孔道即丝绸之路得以为继，进一步经海路发展成为与西亚、北非和地中海东部世界的交流联系网络。公元1世纪中叶撰成的《红海周航记》有关当时从亚丁经阿曼到印度西北沿岸航线、航程、港口及进出口货物的记载正是这一交流网络的见证。这一重要的中西沟通桥梁随后又为取代塞种联盟的贵霜帝国所继承。

（7）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可以肯定，当时由控制着印度河交

通路线的塞种联盟献给中国西汉王朝的“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是从阿曼辗转而来的。“大鸟卵”即鸵鸟蛋。研究表明，普通鸵鸟（common ostriches）主要分布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往南的低降雨量的干燥地区，以及从塞内加尔到厄里脱利亚的非洲东部沙漠地带和荒漠草原；阿拉伯鸵鸟（the Arabian ostriches）近代曾分布于亚洲叙利亚与阿拉伯半岛，但至20世纪中叶已经因捕猎而完全绝迹。以色列企图重新引进普通鸵鸟也已失败。[8]因此，非洲特产鸵鸟等在古代要经安息境域向东前往中国。

当然，无须绕道波斯湾头的条枝，波斯湾口的阿曼就是最合适的转口地点。有利于我们对史实做这种理解的就是当时和“大鸟卵”即鸵鸟蛋一起献到中国汉朝的正是“黎轩善眩人”，众所周知，这就是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魔术演员。当时“亚历山大城是埃及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前305～前30）的都城，是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东部商业极繁荣、文化很发达的地方”。[9]托勒密王朝的希腊人早在《红海周航记》把信风知识公之于世之前已经进入印度洋利用近海航线开展沿岸贸易。[10]所以，来自埃及的“黎轩善眩人”和来自非洲的鸵鸟蛋一起作为礼品献到中国并不是偶然的，它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两样不同来路的物品经由各自通常转运的途径都到了安息境内一个交易点或集散地，然后一起向东转运到中国。显然，这个转运港口（entrepot）非阿曼莫属。

有充分证据表明，早期传到中国的乳香、珠玑、珊瑚、玳瑁都是阿曼特产，而玻璃、琥珀、苏合香、祖母绿、长颈鹿（符拔）等多半也是经阿曼传来的。当然，经由阿曼也是中国特产蚕丝、绢帛、锦缎传往西方世界的主要路径。因此，作为东西方交通枢纽的同时，阿曼其实也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

（8）自从得知公元1世纪中叶写成的《红海周航记》披露有信风信息以后，人们对信风赋予了太多诗意的想象，导致一些学者将信风在古代跨印度洋航行中的作用视为不言而喻的利好，从而夸大东西方直航的意义，忽视传统常规航线，乃至掩盖了许多历史真相。其实，《红海周航记》的权威研究者对信风作用有很客观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两种季风的性质不同。（夏季的）西南季风是喧嚣吵闹的狂风暴雨，有着丰富亲身经历的阿兰·魏乐思（Alan Villiers）写道：‘倾盆大雨持续不断，天气常常如此糟糕，印度海岸的作业港口全都关闭，较小的商船纷纷避难。’”[11]“冒险前往印度——至少我们的史料（即《红海周航记》）认为最重要的是，好在直接越过开阔水域，只需要一年，投资资本就能产

生回报。但所需资金数额巨大，而且存在相当的风险因素。这种贸易机会只对能够承受西南季风力量的强大船只的拥有者开放，以及对于有钱的商人，他们买得起印度出口的昂贵货物——香料、丝绸等，以填满宽敞的货舱。印度贸易是针对大型经营者的，无论他是船东还是贸易商。”[12]

然而，奢侈品贸易毕竟只占航海活动和商业交流的很少一部分，海上更多的活动还是有关大宗商品即日用物资的运输交易。“总之，仔细分析起来，《周航记》揭示了超出著名的东方奢侈品运往埃及各港口活动（那最重要并最受注意）的更多贸易航线。据此我们能够明确地区分出从印度往波斯沿岸、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商品贸易，那和西方毫无关系；其中某些可能偶尔由埃及的罗马船只运载，但大部分由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操控。我们甚至能区分出某些地方贸易形式，之所以是‘地方’的，因为其运输工具是快艇和筏子。”[13]这方面的情况，是我们今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以及古代丝路海陆两道联通运作有必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1] 王小甫，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2] 全称为“香丝之路：阿曼与中国关系史（迄至15世纪）”，为阿曼卡布斯苏丹讲席教授项目北京大学管委会的委托工作，由笔者主持，从2012年开始持续至今，目前正在撰写结项成果。

[3] 学界通常认为，中国古籍中的“大秦”是指古代罗马帝国（公元前30～公元476）所属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埃及、叙利亚等地，参见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文集》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28页。

[4] 这很可能就是《红海周航记》[Casson，Lionel，*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第36节记载的Ommana港，参见该书第180～181页注36：12.3-4和第182页注36：12.10-12。

[5] 实际上，从《红海周航记》第33～36节对这一段近海航线的描述可以看出，除非是利用信风，前往印度洋对岸的传统航路是绕过哈德角，先向西北到苏哈尔（Suhar），然后再从那里向北，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实现横渡。

[6] 参见《红海周航记》，第85～87页；赫德逊《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第47页。

[7] 国际学界有关这一塞种联盟（帝国）或者说身毒—塞种王朝持续存在的依据除个别文献和石刻材料之外，主要是当地出土的一系列有关钱币及其铭文。《汉书·西域

传：安息国》有关“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的记载得到了印证。断代为该联盟中期的秣菟罗（Mathura）Rajuvulas女王狮子柱头纪功碑里提到了“显赫的毋寡（Muki/Maues）王”，表明当时仍然保留着对毋寡的尊崇和敬畏。该碑文还提到了其他王公和总督并以“凭整个塞种国家的荣耀”（in honor of the whole Sakastana）作结，这表明，无论制度情况如何，塞种据有的地域被视为一个整体（the Scythian-occupied territory was seen as an entirety）。直到末期，乌弋山离（Indo-Parthian）的国王“Gondophares-Sases还在致力于统一他那些显赫的前辈毋寡、阿泽斯和贡多费尔斯一世（Maues，Azes，and Gondophares I）曾经拥有的领土。然而，公元45年后的某个年头，由毋寡（Maues）开始的塞种对身毒的统治彻底结束，那片地带为贵霜帝国所占领”。参见《伊朗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Iranica*），R. C. Senior，“INDO-SCYTHIAN DYNASTY，” Encyclopedia Iranica，online edition，2005，available at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indo-scythian-dynasty-1 （accessed on 30 April 2017）。亦请参见R.C.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上册第8章“摩揭陀帝国的瓦解和来自中亚和伊朗的侵略”，张澍霖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127～130页。

[8] 参见维基百科Common ostriches条，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on_ostrich#Distribution_and_habitat，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6日；搜狗百科“鸵鸟”条，http：//baike.sogou.com/v747398.htm？fromTitle＝%E9%B8%B5%E9%B8%9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7日。

[9]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黎轩”条。

[10] 参见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第47页。

[11] 《季风海》（*Monsoon Seas*），纽约，1952，第7页。此外，影响印度洋上航行的还有海洋环流因素：北印度洋由于受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形成了特殊的北印度洋季风环流：从10月至来年的3～4月，亚洲大陆被强大的高压笼罩，在北印度洋海面，盛行东北季风，孟加拉湾的海水流向西南，南绕斯里兰卡岛，与阿拉伯海流向西南的海水一道，形成了东北季风洋流；5～9月，在索马里沿海，由于西南季风的作用，形成相当强大的上升流，形成北印度洋地区的顺时针环流。

[12] 见《红海周航记》附录3《前往非洲、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航程》，第283、291页。

[13] 《红海周航记》，“导言”，第21页。

中文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中的“一带一路”[1]

华涛[2]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张骞出使西域，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张骞凿空”。司马迁记载说，“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后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再次西使，“骞既至乌孙……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狭义的“西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即天山南北及其以西一些地方；而广义的“西域”则泛指河西四郡最西端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广大的地域。虽然指代古代和中世纪东西方各国各地区之间人员交流、物产交换、知识传布通道的“丝绸之路”很早就存在于所谓的旧大陆上（亚、欧以及北部非洲），但是作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东方起点“中国”与中国以西各地区的正式交往，开始于公元前138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自从张骞凿空，不仅欧亚大陆最东边的中国人与西域各地有了人员往来，而且相互开始有了比较直接的了解，也有了物品的东西流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东西文献都有不少关于伟大的“丝绸之路”的记载。本文主要介绍和分析中文古籍和阿拉伯—波斯古籍两个方面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

一 唐代陆海丝绸之路繁荣和相关中文古籍

莫高窟第323窟[3]是敦煌比较著名的壁画洞窟之一，“张骞出使西域图”便是其中的一幅。这个洞窟的壁画曾经被美国人华尔纳剥离了一些，幸运的是华尔纳没有剥离张骞出使西域图，让这幅“研究丝绸之路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保留了下来。敦煌研究院的介绍说：北壁的《张骞出使西域》，讲述的是霍去病在攻打匈奴胜利后获得了两个“祭天金人”，于是汉武帝建造了“甘泉宫”供奉这两个“祭天金人”。虽然每日带领群臣焚香礼拜，但不知金人的名号，故而派张骞赴西域问金人名号的故事。画面中汉武帝骑在马上，群臣持伞盖相随与张骞告别，张骞一行人马穿山越岭，长途跋涉已近大夏国，远处城垣在望，城内寺塔林立，城外已有比丘出城迎接。[4]

这幅图“虽有许多牵强附会之说”，但可以让我们看到唐代人对张骞“凿空”的理解。不过笔者这里要问的是，为什么初唐的壁画将张骞出

使西域与佛教挂上钩？

将“金人”与佛教挂上钩开始于北齐《魏书·释老志》。[5]从目前存世的古籍看，魏晋和唐代前期最集中的“丝绸之路”活动是中印之间与佛教相关的交流，敦煌壁画中的传说虚构大概与此有关。今天存世的多部典籍反映了这些与佛教传布相关的交通，除最著名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外，还有义净的（635～713）《西域南海寄归内法传》，慧超的（新罗人，唐前期）《往五天竺国传》《悟空入竺记》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隋唐时代中西僧人的往来有两个特点：一是西域高僧东来翻经者渐希，而中土高僧赴印度求法者激增，如唐代见于记载的外国译经师约三十四五人（其中印度约20人），中国赴印度求法的高僧多达60人；二是唐代求法高僧大多走海路前往印度，在赴印度的60人中有30多人走的是海路，说明唐代海上交通已经相当发达。[6]可见，丝绸之路在张骞的时代主要是走陆路，但随着人类对海洋了解的加深，对海洋驾驭能力的增强，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步发达起来。可以说，唐代是“一带一路”或者“陆海”丝绸之路全面繁荣的时代。当然，海上丝绸之路全面超越陆上丝绸之路，那还要到宋代。

中国古籍中有一些关于古人亲身经历“陆海”两路的记载。比较早的是东晋法显（334～420）和他的《佛国记》。到唐代，和法显一样从陆路西行，再由海路而归的是高僧义净。当然，反映唐代陆海丝绸之路繁荣的不仅有高僧们留下的亲身行纪，还有政府官员的史书记载。贾耽（730～805）所著的《边州入四夷道里记》就是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羁縻州”所载如下：

> 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若将臣之所征讨，敕使之所慰赐，宜有以记其所从出。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

贾耽是唐朝贞元年间（785～805）的宰相，《旧唐书·贾耽传》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根据

《新唐书》记载，贾耽当时不仅列出了唐朝通往四面八方的七条主要大道的名称和大方向，而且还详细说明了各条大道沿途的主要城池关隘、河流山川，并且提到了七条大道之外很多其他道路，充分展现了汉文化世界与四方交通的知识。下面是《新唐书·地理志》详细说明的第七条大道“广州通海夷道”的详细情况：

>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船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䫻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䫻国，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䫻国北，入于海。又自提䫻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刺】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刺】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

> 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刺】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歌磨难国。又一日行，至乌剌【刺】国，与东岸路合。

贾耽能够在《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中比较详细地描写中国通往西亚的海路，自然得益于唐与西亚的交通，而这些交通中，除了使者、商旅等，一个名叫杜环的战俘也以自己的《经行记》做出了重大贡献。杜环的详细情况不清楚，但是唐朝著名史学家、宰相杜佑（735～812）在《通典》（卷191“边防七”）中提到了杜环，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751）至西海。宝应初（代宗李豫，762～763），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由此可见，杜环参加了丝绸之路历史上著名的怛罗斯[7]之战，被俘往西亚阿拉伯，后从那里脱身，乘商人船舶返回东土大唐。至于怛罗斯之战时他在唐军中身居何职，被俘后的经历，何以脱身，最后所乘之船是经由直返还是辗转几次返回中国，我们没有具体材料。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杜佑在《通典》中

摘录了《经行记》部分内容。

杜佑《通典》卷193“边防九”“大食”引用了杜环《经行记》[8]的内容：

> 杜环《经行记》云，【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郛郭之内，鄽闬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凑，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蜜为卢舍，有似中国宝轝。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钵，盖不可算数。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枣。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圆，味甚美，余菜亦与诸国同。蒲陶大者如鸡子。香油贵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没匝女甲反师。香草贵者有二，一名查塞蓁蒲孔反，一名葜芦茇。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𬮿、吕礼。又以橐驼驾车。其马，俗云西海滨龙与马交所产也，腹肚小，脚腕长，善者日走千里。其驼小而紧，背有孤峰，良者日驰千里。又有驼鸟，高四尺以上，脚似驼蹄，颈项胜得人骑，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二升。又有荠树，实如夏枣，堪作油，食除瘴。其气候温，土地无冰雪，人多疟痢，一年之内，十中五死。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

怛逻斯之战是唐与大食的唯一战事，大食虽胜，但因正处于内部政权更迭之际，无暇顾及东扩；而唐朝不出两三年即遇到安史之乱，兵力内调勤王，安西四镇不保，更无法西进。不过怛罗斯之战的后果之一是大食将俘虏的唐人带回，而这些俘虏则将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知识带到阿拉伯、波斯。杜环《经行记》记载了“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𬮿、吕礼”。历史是复杂的！一个战争和冲突会带来灾难，也会促成有益的知识交流。我们在古籍中会读到不少这样的丝绸之路历史。

二 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和阿拉伯“翻译运动”

杜环的记载最有意思、最生动的内容或许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日常生活的介绍，如穆斯林每日的五次礼拜、礼拜的清真寺、礼拜中讲经的内容、穆斯林妇女戴面纱的习俗等。

伊斯兰教是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初创立的，是世界三大一神教之一（另外两个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穆罕默德生活在阿拉伯半岛西岸的麦加，约于610年得到“真主”天启后，向自己的亲人好友传播，标志着伊斯兰教的兴起。虽然穆罕默德开始传播信仰时并不顺利，被迫带领最初的信仰者从麦加迁徙（hijra）到麦地那，但在632年他去世时，伊斯兰教已经得到阿拉伯半岛大多数人的信奉。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四位继承人（“哈里发”，阿拉伯语意为“继承人”）相继带领穆斯林向外发展，之后，倭马亚王朝（又作伍麦叶王朝，661～750，汉文古籍作“白衣大食”）、阿巴斯王朝（749～1258，唐代称其为“黑衣大食”）很快扩展成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包括西亚（今叙利亚、伊拉克等地）、波斯、埃及、北非马格里布、西南欧比利牛斯半岛以及印度西部等地。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政权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巨大发展，当然有很深刻的原因，但就文化而言，这个征服了亚非欧广大地域的大帝国，不是摧毁各地的文化，而是接触、吸收并消化成自己的文化。这种接触、吸收、消化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自觉，[9]而这个吸收和消化的最重要行动是阿拉伯历史上著名的“翻译运动”。

其实在多民族、多语言的中东地区，甚至在整个丝绸之路上，翻译从来就必不可少。例如佛教东传中土，佛经的翻译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大事。在中东，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波斯萨珊王朝的统治者都曾经开展过翻译活动。阿拉伯人走出沙漠，征服了广大地区，那里的民众基本上不会说阿拉伯语，所以阿拉伯征服者不论是政府管理还是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翻译。倭马亚王朝时期的翻译，就是这样零散的、应时的。

在广大帝国需要翻译的语言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西亚流行的中古叙利亚语（Middle Syriac Aramaic，4～8世纪流行于中东，是基督教世界拉丁语、希腊语之外的第三种古代主要语言）和波斯萨珊王朝的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传入中国的祆教/拜火教就是讲这种语言）。但是到阿巴斯王朝取代伍麦叶王朝后，翻译的政治内涵越来越大。阿拉伯统治者不仅需要在理论上说明伊斯兰教在人类历史秩序上的位置，而且要向世界表现出伊斯兰教对人类文明的继承，证明西欧的堕落和东拜占庭的无知。所以从阿巴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开始，政府公开鼓励、资助、组织系统的翻译，阿拉伯社会教内教外也积极回应。从叙利亚语并通过叙利亚语从希腊语，从中古波斯语（巴列维

语）、梵语等，用阿拉伯文翻译了大量的希腊罗马、波斯、印度著述，包括哲学、逻辑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10]参与其中的不仅有阿拉伯人，也有其他民族的人；不仅有穆斯林学者，也有非穆斯林的学者。

这个持续了两百年的“翻译运动”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是丝绸之路上光辉的一页，伊斯兰文明不仅由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文明之一，而且将那个时代欧洲人不屑一顾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通过翻译保存在阿拉伯文著述中，稍后还保存在新波斯文的著述中。[11]正因为此，几百年后欧洲人才有机会重新找回失落的文明，使之成为文艺复兴和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资源。

前面中文典籍中贾耽提到的“大食国”“茂门王”和杜环谈到的“号暮门”的“大食王”，便是阿巴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马蒙（813～833）。这位哈里发是支持“翻译运动”的最重要的阿拉伯君主之一。[12]830年马蒙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集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于一体的机构，即著名的“智慧馆”（Bayt al-Hikmah），推动翻译工作。虽然马蒙之后，这个“智慧馆”的重要性大减，但是此后建立“科学馆”（Dār al-`Ilm，一种类似图书馆的藏书、学习场所）成为伊斯兰社会官私各界、教内教外的风尚。再后来，这种风尚结合进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i）。今天，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古老清真寺的图书馆中还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古籍。

这里用一个具体的与典籍相关的事例说明阿拉伯“翻译运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今天我们看地图，或者绘制地图，都会使用经纬度，每个地点都有经纬度数据。这样的制图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初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地图学家、数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绘制的世界地图。[13]在地图的极东地区，北部有“塞里丝”，南部有“秦/支那”。一般认为“塞里丝”是与“丝”相关的一个词，是经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到西方的，而“秦/支那”应该是通过印度传到西方的与“秦”“秦人”相关的知识。这一反映丝绸之路知识传布的托勒密著作《地理学》和托勒密地图，以及按经纬度进行的制图法，在欧洲进入神学取代科学的黑暗的中世纪以后，逐步被欧洲人忽略甚至遗忘了。然而令人庆幸的是，托勒密的著作和他按照经纬度绘制的地图被阿拉伯人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保存了下来，并且影响了阿拉伯—波斯学者对地球的了解和地图的绘制（如花拉子密的书和伊德里希世界地图）。

总之，公元8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文明的繁荣，亚欧大陆出现了两个交相辉映的文明体，即东亚的中华文明和西亚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一样，都产生了大量的古籍文献。这些阿拉伯—波斯古籍文献从西亚北非的视角，记载了人类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而此时，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瓦解后，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不仅军事政治、人文科学一落千丈，而且忘却了自己的先人在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成就。也就是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甚至到公元1500年之前，除了中文典籍，阿拉伯—波斯古籍是关于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古籍文献群。

三 阿拉伯—波斯古籍中的“一带一路”

（一）阿拉伯—波斯游记文献中的中国知识

中国著名学者张星烺在1930年编写出版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中“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14]共摘引了10种著作，第一种《苏烈曼游记》是著名的阿拉伯东方游记之一。张星烺先生之后，刘半农父女合译了法国著名东方学家、穆斯林文献研究家费琅（Gabriel Ferrand）1922年的法译本。这部著作的手稿是17世纪法国人在叙利亚阿勒颇收购的，目前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18世纪初开始有法国学者进行研究，包括手稿的公布和翻译等，此后有多种语言译本。目前最好的译本是1948年法国学者J.索瓦杰（Jean Sauvaget）的法文译注。20世纪80年代穆根来、汶江、黄倬汉根据索瓦杰的译注本做了翻译，书名为《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写成于伊斯兰历237年（即851年7月5日至852年6月22日）；后一部分大致写于公元916年，[15]因为后一部分的作者提及了黄巢起义军于伊斯兰历264年（即877年9月13日至878年9月2日）攻陷广州，并提及自己于伊斯兰历303年（即915年7月17日至916年7月4日）在巴士拉见到了另外一位著名的阿拉伯学者。关于书的作者，学者们都同意后一部分的作者是阿布·赛义德，但前一部分的作者，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并不是所谓的“苏莱曼”，因为书中只是在一个地方提到这位“苏莱曼”，而且那一段的叙述突然从第一人称转为第三人称；同时，中世纪阿拉伯—波斯其他著作家提到这部书时，都是只说书名，而没有作者名。所以这本书是当时伊拉克社会流行的茶余饭后消遣性传闻的汇集，成书不久其编者的名字就被遗忘了。

虽然是公元9～10世纪的传闻，但是学者认为其内容非常重要，因

为内容表明，它的信息是从那些很可能到过中国的人那里搜集汇编的，反映了当时大食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与中国的往来及获得的信息，并且不少内容能够与其他阿拉伯—波斯文献，甚至是与中文文献相对勘。例如，《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谈及的从阿拉伯半岛前往中国的海路线路和沿途岛屿，与贾耽描述的第七条大道“广州通海夷道”的情况基本吻合；描述的“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第7页），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在广州设立的“蕃长”，这些“蕃长”是政府设立来管理当年在广州“住唐”、等待季风返回阿拉伯、波斯的商人。目前虽然在唐代文献中尚未发现非常明确的关于“蕃长”的记载，但北宋《萍洲可谈》的记载非常清晰。《萍洲可谈》卷2记：“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16]当然《中国印度见闻录》的有些记载比较容易与历史对接，如记载了中国使用带孔的铜钱（第99页），又如中国男人“总是留着满头长发”（第120页），再如中国人婚姻注意到“凡是亲属，或同一血统关系的男女不能结婚，只能到本族以外去求亲”，“中国人公认，避免同族通婚，可以生育出优秀的后代”（第120～121页），[17]有些则需要做更多思考。

总之，虽然《中国印度见闻录》的作者很可能并没有到过中国，但其中记载的中国信息，应该是亲身经历者在巴格达流传开的，有些可以补充中文文献中缺少的内容。目前研究认为，真正抵达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是14世纪的伊本·白图泰。其实即便伊本·白图泰真正到过中国，他游记中的某些内容也不合情理。不过作者在亲身经历的记载中添加了一些道听途说的内容，还有事后补充时的错简、讹误，大概是几百年前旅游文献的通常毛病。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有类似的问题。

虽然真正到过中国的阿拉伯—波斯旅行家很少，或者说历史并没有留下他们的记录，但不少阿拉伯—波斯著作家曾经从西亚往东旅行，有丝绸之路的亲身经历，并且留下了一些重要的记载。如著名的阿拉伯地名词典学家雅库特（1179～1229）主要活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曾经在伊斯兰东方广泛旅行：1216～1217年游访了你沙不儿和马鲁；1219年游访了巴里黑、马鲁察叶可等；1219年游历了花剌子模。这些游历让他感受、了解到蒙古成吉思汗的兴起和西征，不仅为他自己著名的《地名词典》增添了一线的材料，也为那个时代生活在西亚阿拉伯核心地区的著作家们提供了信息。

当然，到蒙古西征灭亡巴格达的阿巴斯政权，在伊朗建立了蒙古政权“伊利汗国”后，伊利汗国君主不久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斯兰的蒙古政权又用波斯—阿拉伯文编纂了一些古籍，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这些古籍是笔者所在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重要研究内容。

（二）阿拉伯—波斯地图知识在“一带一路”上的传播

阿拉伯地图学继承了欧洲的传统，有圆形世界地图，有分区地图，也有世界全图。阿拉伯地图学知识在蒙古元朝时期东传中国。这个知识后来的具体体现，不仅有明朝的《大明混一图》，而且还有朝鲜李荟、权近在1402年绘制出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根据地图上权近的题跋，我们知道建文元年（1399）明惠帝登基时，朝鲜贺使金士衡在中国见到了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并将这两幅图的复本带回国。建文四年（1402），经金士衡和李茂研究，由李荟详校后合为一图，又由权近增加了朝鲜和日本，合成新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两幅《混一图》上都有很多中亚、西亚、北非、欧洲的地理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东方汉地典籍以前没有记载的，想必一定是由蒙元时期阿拉伯—波斯地区东传来华的。现在中国和日本一些学者对《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上的部分中亚、西亚、北非地名进行了研究，已经肯定了上述看法。

阿拉伯—波斯地理学、地图学对中国的影响，还体现在一幅维吾尔族古代地图上。在公元10世纪以后，以今天的喀什及喀什以西为中心，建立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权“喀喇汗王朝”。[18]这个王朝一直到成吉思汗兴起后才最后灭亡。今天一般认为该王朝王室是维吾尔族的先人。出身于喀喇汗王朝王室的著名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大概受到王室内部矛盾的影响，离开中亚，前往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在那里编写了《突厥语大词典》，该书实际上是一部百科全书，用阿拉伯文介绍、解释了突厥人的语言、文学、生活、传统、地名、风俗等。书中附有一幅阿拉伯—波斯式的圆形世界地图，不过阿拉伯—波斯传统的圆形世界地图是以伊斯兰的圣地麦加为中心，而喀什噶里的圆形地图以中亚喀喇汗王朝为中心，不仅有继承，而且有创意。

（三）阿拉伯—波斯航海技术对中国航海事业的推动

古代中国人发展出很好的航海技术，掌握了很好的航海知识，郑和

船队的七次下西洋就是很好的证明。关于郑和航海，中文古籍中有三本重要的亲身经历者的记载，即随郑和航海的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明正统元年定稿）、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宣德九年，即1434年）。费信随船队四次下西洋（第一次于永乐七年，即1409年；第二次于永乐十年；第三次于永乐十三年；第四次于宣德五年）；马欢三次下西洋（第一次于永乐十一年；第二次于永乐十九年；第三次于宣德六年）；巩珍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此外还有《郑和航海图》和《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这些都是关于那个时代航海技术的记载。

根据《郑和航海图》和《顺风相送》，我们可以看到，大致以苏门答腊岛为分界线，从苏门答腊岛往西与苏门答腊岛往东航行，航海技术是不同的。从中国到苏门答腊岛的航行基本上是根据中国自古以来在东亚海域航行的经验，包括“针路”（罗盘方位）、“更数”（水上的里程，即一昼夜分为十更，一更合六十里），当然还有日月出入、风云变幻、海流潮汐进退等。[19]但是从苏门答腊岛往西（往北至孟加拉国不同）前往斯里兰卡/锡兰、印度、马尔代夫（溜山国），甚至更西，除了所谓的“针路”和“更数”，还使用星辰定位的方法（牵星过洋）。所以中国的商船以往只到印度西海岸古里、柯枝一带。古里，《明史》称其为“西洋大国”，“诸蕃要会也”。[20]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描绘“古里佛，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剌密迩，亦西洋诸番之马头也”。[21]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大食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卷3，航海外夷）。又说，“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而1343年伊本·白图泰在古里等传来中国时说，“该地与中国往来，殆由中国船任之”（《岛夷志略校释》，第7页）。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重要？当然，当地政权政治军事力量的原因重要，但从航海技术上讲，这里是东西航海技术的分界线，因为印度洋与东亚海域地理海洋面貌不同、季风不同（东亚海域为南北季风；印度洋为东西季风）、星座不同（东亚海域航海观察北斗星；印度洋海域航海观测布司星、水平星、北辰星、华盖星、灯笼骨星等）。所以我们看到郑和船队在苏门答腊岛以西的航行中，使用了“牵星过洋”的技术。而这个航海技术不是中国人自己的，是蒙古元朝时期色目人经丝绸之路带来的。

笔者的导师陈得芝先生在元代文献中发现蒙古元朝政府在福建沿海一带征收“海道回回剌那麻”，并要求征收到了之后，“具呈中书省行下合属取索者”。这里的“剌那麻”是阿拉伯文“rāh-nāma”的音译，意思是“航

海书”。[22]由此看来，元朝从回回那里征收到的“剌那麻”航海书是明朝得到阿拉伯—波斯航海技术的重要来源。虽然今天留存下来的元代和明代文献中，没有更多的史料说明“海道回回剌那麻”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件历史事件和历史典籍中看到它的身影。

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9～1524）于15世纪末从欧洲绕好望角到达非洲东岸，准备横跨印度洋航行至印度，但是苦于不了解印度洋航行情况，于是找到阿拉伯航海家伊本·马吉德，伊本·马吉德带领他们成功渡过印度洋，从而开辟了新时代——欧洲大航海时代。伊本·马吉德使用的航海书今天仍然存世，是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上阿拉伯—波斯航海技术的重要古籍。元代从福建沿海搜集的“海道回回剌那麻”应该类似于伊本·马吉德航海书。

总之，阿拉伯—波斯古籍和中文古籍一样，保留了大量东西各国人民在“一带一路”上活动的历史记录。2014年6月习近平在“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讲话中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23]那么如何才能够实现习近平所说的“民心相通”呢？我们今天研究中文古籍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中有关“一带一路”的记载，研究东西各国人民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就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之间民心相通的重要工作。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古时代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文献中有关中国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1&ZD132）的成果之一，原刊于《元史研究暨集刊回顾与展望（南大元史1956～2016）》论文集。

[2] 华涛，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南京大学南海中心。

[3] 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近代美国著名的探险家、考古学者，也是臭名昭著的敦煌文物偷盗犯。1881年他诞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律师家庭，1899年入哈佛大学学习，1903年毕业，1905年重返母校哈佛大学深造考古学一年。1906年后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10年在朝鲜和日本调查佛教美术，1913年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1916年来华为新成立的克里夫兰美术馆收集中国文物。1923年回到哈佛，曾任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随即组织考古队远赴中国敦煌，剥离莫高窟唐代壁画精品十余幅，并盗走第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等。

[4] “莫高窟第323窟”，敦煌研究院，2008年10月22日。http：//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 895297935318，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8月16日。

[5] 马世长：《莫高窟第323窟佛教感应故事画》，《敦煌研究》1980年第1期。

[6] 陈佳荣、钱江、张广达编《历代中外行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第247页。

[7] 怛罗斯位于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以西塔拉斯。

[8] 《经行记》及杜环情况，参见陈佳荣、钱江、张广达编《历代中外行纪》，第311～319页。这里的“亚俱罗”“或谓大食早期都城Akula之对音，阿拉伯语称al-kufah，今之库法”。

[9]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357页。

[10] Encyclopedia of Islam，2nd Ed. Brill，“翻译”词条。

[11] 在“翻译运动”时代，即公元8世纪后期到9世纪，阿拉伯语是阿巴斯王朝境内各个地区的通用语言。到公元9世纪后期，阿巴斯王朝逐步衰落，在阿巴斯王朝东部地区出现了一些地方政权，如塔希尔王朝（Tahirid Dynasty，820～872）、萨法尔王朝（Saffarid Dynasty，860～903）和萨曼王朝（Samanid Dynasty，874～999），这些地方政权名义上奉阿巴斯王朝正朔，政治上实际各行其是。在这些地方政权统治下，新波斯语开始兴起，并且逐步成为伊朗甚至中亚地区的通行语，也为今天留下了许多波斯文古籍。阿拉伯文古籍和新波斯文古籍是那个时代留给今天的重要遗产。

[12] 据公元10世纪末的《书目》记载，哈里发马蒙在梦中看见亚里士多德对他保证，理性和教典之间没有真正的分歧。参见希提《阿拉伯通史》，第362页。

[13] 关于地图的绘制，中国古代有类似经纬度的制图法，即所谓的“计里画方”。一般认为这种“矩形网格”制图法是西晋裴秀提出的。现存最早以“计里画方”之法绘制出的地图是《禹迹图》。虽然中国古代的这种制图方法有重要意义，但近年来学者研究发现，中国采用这种制图法制图时，实际上缺少或者根本没有具体的测量资料。参见成一农《对“计里画方”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地位的重新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

[14] 参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编《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五章。张星烺先生编写《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时参考、引用了亨利·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的相关内容，此处不赘述。

[15] 《中国印度见闻录》包括了从法文翻译的前一部分和从日文翻译的后一部分。

[16] 朱彧撰《萍洲可谈》，中华书局，2007，第134页。

[17] 这一段中的页码数为《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相应页码。

[18] 参见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 西辽史》，人民出版社，2010。

[19] 参见《两种海道针经》“二 关于两种海道针经内容的介绍”，向达校注，中华书局，1982，第5～8页。

[20] 《明史·外国传·古里》，中华书局，1984，第8439～8440页。

[21] 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庼校释，中华书局，1981，第325页。

[22] 陈得芝：《元代海外交通的发展与明初郑和下西洋》，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后收入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第422页。

[23] 《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网，2014年6月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606/clo24-2511060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13日。

回鹘时代：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特点与内涵

杨蕤[1]

10～13世纪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的时期，群雄争霸，一统难继。唐朝中期以后，随着吐蕃入侵西北等事件的发生，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形较前就有所不同，“无数驼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2]已往丝绸之路繁荣的盛景不复存在了。元朝结束了纷乱割据的政治局面，东西交往孔道顺畅，陆上丝绸之路似乎出现了一段“回光返照”式的繁荣与兴盛。依此看来，10～13世纪则处于两个统一帝国的过渡时段，政治上的纷乱局面使得东西交往受到一定影响，甚至有学者曾持有这一时段陆上丝绸之路断绝的观点。与此同时，西域及中亚等地区也出现了若干分裂割据政权，如喀喇汗王朝、西辽、于阗、高昌、回鹘等。在分裂割据的政治形态下，陆上丝绸之路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内涵？本文拟从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物品、贸易方式、贸易主体三方面来阐述上述问题。

一 贸易物品：丝绸之路的输入品与输出品

通过检索史籍，可以归纳出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输入品主要有动物及其相关产品、药品及香料、纺织品和装饰品、矿石及其他等类别。为方便讨论，兹成表1如下。

表1 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输入品

类别	输入品
动物及其相关产品	野马皮、白鹘、羚羊角、牦牛尾、羱羊、貂鼠、驼峰、象、狮子、大尾羊、独峰驼、橐驼、马匹
药品及香料	乳香、硇砂、琥珀、木香、安息香、黄矾、牛黄、梧桐律、龙盐、鸡舌香、龙脑、黄连、腽肭脐、麝香、阿魏
纺织品和装饰品	兜罗锦、花蕊布、白氎、火浣布、波斯锦
矿石及其他	玉狻猊、琉璃、玛瑙、镔铁、鍮石、椰枣、蔷薇水、珊瑚

从丝路贸易的视角看，这一时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输入商品较前朝没有大的变化，依然以畜产品、香料、珍奇异宝为主（见表2）。

表2 唐宋朝丝路进贡物品及外来物种之对照

比较类别	比较细目	进贡者或引进地	
		唐代	五代、宋代
人	战俘（突厥人、回鹘人、高丽人等）	战争掳掠	
	奴隶（波斯人、突厥人、高丽人、斯拉夫人、新罗人、马来人、黑人等）	有的进贡而来，有的贸易而来	
	侏儒（俾格米人）	康国等	
	人质（突厥人、高丽人等）	政治手段	
	贡人（突厥人、吐蕃人、西域胡僧等）	回鹘、吐火罗等	
	乐人和舞伎	于阗、安国、曹国、日本等	
家畜	马	回鹘、突厥、薛延陀、昭武九姓、大宛、吐蕃、大食等	回鹘、沙州
	骆驼	回鹘、吐蕃、于阗等	回鹘、于阗、龟兹回鹘
	牦牛	吐蕃、吐谷浑等	回鹘
	绵羊和山羊	突厥等	回鹘、龟兹回鹘
	驴、骡、野驴	吐蕃、波斯、吐火罗等	
	犬	康国、龟兹、波斯等	
野兽	大象	林邑等东南亚国家	于阗（虽然有史料记载，但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
	狮子	康国、米国、波斯、大食等	吐蕃、于阗、回鹘
	豹与猎豹	天竺、米国、史国、珂咄罗国、安国、康国、波斯、大食等	
	黑貂或白貂	东北地区等	回鹘
	瞪羚或小羚羊	吐火罗等	回鹘
	叉角羚	吐蕃、突厥、薛延陀等	
	天铁熊	伽毗叶等	
	土拨鼠	吐蕃	
	猫鼬	罽宾国	
	鼬鼠或白鼬	波斯	

表2 唐宋朝丝路进贡物品及外来物种之对照-续表1

比较类别	比较细目	进贡者或引进地	
		唐代	五代、宋代
飞禽	鹰和鹘	高丽、沙州	
	鹦鹉	南天竺、山国、尸利佛誓、吐火罗等	
	鸵鸟	安息国、吐火罗等	
	貂及貂类动物皮	乌罗浑部	
	狮皮	西突厥	
	牦牛尾	吐蕃等	回鹘、吐蕃、于阗
	狐尾	西域、中亚	
植物	椰枣树	波斯国	
	菩提树	摩揭陀国	
	郁金香	天竺、安国	
	水仙	罗马	
食物	葡萄和葡萄酒	西域	
	诃子	突骑施、石国、史国、米国、罽宾国	
	千金藤	突骑施	
	阿月浑子	粟特、呼罗珊等	
	胡椒	摩揭陀国	
	石蜜	安国、火寻国等	
香料	沉香	东南亚、波斯等	
	安息香	波斯、东南亚	
	乳香	波斯	回鹘、于阗、大食、
	没药	波斯	
	丁香	东南亚	回鹘
	木香	曹国、狮子国	于阗、回鹘
	茉莉油	天竺、波斯	
	阿末香	大食	

表2 唐宋朝丝路进贡物品及外来物种之对照-续表2

比较类别	比较细目	进贡者或引进地	
		唐代	五代、宋代
药物	质汗	印度、突骑施、石国、米国、罽宾国、吐火罗等	
	底也迦	拂菻	
	肉豆蔻	昆仑大秦国	
	木蜜	西域交河	
	吉莱阿德香膏	拂菻	
	波斯树脂	波斯、大秦	
	阿魏	西域、中亚等国	回鹘、于阗
	鹤虱	波斯	
	膃肭	新罗、西域	回鹘、于阗
	绿盐	中亚焉耆等	
纺织品	金衣	吐火罗	
	毛织品	吐蕃	回鹘
	毛毯	安国、米国、突骑施、石国、米国、史国等	
	石棉	大秦	回鹘
	波斯锦	骨咄罗、罽宾国	回鹘、于阗、大食
	棉布	西域、林邑、狮子国等	回鹘
	骨螺贝	波斯	
	青黛	曹国、拨汗那国、波斯	
	婆罗得	波斯、西海	
	栎五倍子	波斯	
工业用矿石	黑盐、红盐	突骑施、石国、米国、史国、火寻国、罽宾国	回鹘
	明矾	波斯、高昌	回鹘
	硇沙	西域	回鹘、于阗
	硼砂	西域	回鹘
	硝石、朴硝、芒硝	西域	
	密陀僧	波斯	
	金刚石	东南亚、东罗马、中亚等地区	

表2 唐宋朝丝路进贡物品及外来物种之对照-续表3

比较类别	比较细目	进贡者或引进地	
		唐代	五代、宋代
宝石	玉	于阗、康国、吐蕃等	回鹘、于阗、吐蕃、大食等
	水精	康国、罽宾国	大食
	光玉髓（玛瑙）	康国、吐火罗、波斯等	
	孔雀石	于阗、大理国等	
	天青石（瑟瑟）	于阗、石国等	
	金精	拂菻、吐火罗、五识匿国等	
	玻璃	西域、中亚、罽宾国、吐火罗等	
	象牙	东南亚、狮子国等	大食
	珍珠	罽宾国、天竺、林邑、狮子国等	
	车渠	拂菻	
	珊瑚	波斯、狮子国	回鹘、大食
	琥珀	波斯	回鹘、沙州、于阗
	煤玉	高昌	
金属制品	黄金	吐蕃、回鹘、石国、米国、史国、新罗等	
	银	吐蕃、新罗、突厥	
	黄铜（鍮石）	米国	于阗
	金币与银币	西域、大食	
世俗器物	鸵鸟蛋杯	安国、康国	
	玛瑙器皿	拂菻、吐火罗	于阗、龟兹回鹘、回鹘、大食
	宝床子	安国	
	盔甲	突厥、百济、康国等	龟兹回鹘、于阗
	佛像	于阗、新罗	
书籍	贝叶书	俱兰国、狮子国、西域等	
	宗教书籍	天竺、于阗等	回鹘

注：出于对比研究的需要，仅将唐代从陆上丝绸之路而来的物品列出。由于资料极其有限，本表只是一个略显粗浅的对比。

资料来源：据美国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提供的信息制成。

就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输出品而言，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茶叶外销的问题。

饮茶之风在唐代还尚未普及，入宋以后茶坊酒店大量涌现，表明茶叶在城市居民中大受欢迎。[3]宋代更常见的是城乡居民直接买茶回家饮用，[4]可见宋代饮茶之俗在民间广为普及。宋代茶叶的生产也较唐代大大提高。唐代的茶叶生产地总体范围辽阔，但分布较散，犹如一个个孤立的点散布于南方各地茶产地的大体轮廓颇有漫画式的简洁；到宋代以后，每个产茶区内部茶叶产地比重不断提高，茶产地就有了浓笔浓抹、色彩鲜明的水彩画意味了。[5]概受茶叶产量、饮茶的普及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茶叶并非唐代大宗的丝路出口商品："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6]此为德宗贞元（785～805）之事，是茶马互市见于史书的较早记载。由此可见，在唐中后期以后，西域诸胡才开始了茶马贸易，而且由于饮茶之风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尚未普遍形成，唐代的茶马互市还是零

星的、小规模的。

宋时情况则大不一样，茶叶成为丝路贸易中的大宗商品。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相当普遍。宋太宗曾云："赍茶于蕃部中贸易，以给军食，未尝发民输送也。"[7]宋朝与辽、夏的"岁币"中，首先是布帛，其二便是茶叶。游牧民族因为肉食习惯，又地处高寒，对茶叶有着高度的兴趣，唯茶最为所欲之物。[8]知延州庞籍曾向宋廷报告说："诸路皆传：元昊为西蕃所败；叶勒族叛；黄鼠食稼，天旱；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国内疲困，思纳款。"[9]茶叶除为游牧民族自身消耗外，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丝路中转商品："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10]"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11]著名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就曾指出：茶叶等商品是西夏和西域、中东之间贸易的主要物品。[12]宋朝在西北的茶叶输出量极大，徽宗朝仅陕西缘边用以同诸蕃交易的茶叶量，每年就达二万驮以上。[13]宋朝在秦、泾、熙、陇等地设立了32处卖茶场。[14]茶叶贸易的兴起，给衰落中的丝路贸易增添了几分生机。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茶叶还有可能输入更远的中亚地区。黄时鉴推断，公元10～11世纪，茶叶肯定继续传至吐蕃并传到高昌、于阗和七河地区，而且可能经于阗传入河中以至波斯、印度，也可能经由于阗或西藏传入印度、波斯。[15]

二是丝织品的输出问题。

丝绸之路的得名主要出于中国丝绸在西方的巨大影响，宋代时期是否继承了汉唐帝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出丝绸织品的传统？宋代我国的丝绸生产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宋代部分桑蚕丝织生产已脱离农业生产，作为独立的家庭手工业已趋于专业化、商品化，而桑蚕丝织生产的商品化又促进了其内部桑、蚕、丝、织生产过程的加工——"机户"的出现，标志着家庭丝织业向手工业作坊丝织业的转变，表明了宋代丝织业商品性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6]宋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丝绸生产的规模也有发展，尤其是民间生产规模空前扩展。这一点也可以从北宋与辽夏金政权的求和赔偿中体现出来，这一时期大量丝织品被输往北国。在公元10世纪伊斯兰著作中，也有提及中国的丝绸："在上帝所有造物中，该帝国（中国——引者注）的居民是在绘画和所有艺术中手最灵巧者。任何一个其他民族在任何伙计方面都无法超过他们……有一个人在一块丝绸织物上绘制了一谷穗和落在上面的一只麻雀，其作品的精致使观众的目光也肯定会发生错觉。"[17]《突厥语大词典》中也有

一些关于中国丝织品的词条或信息，如“锦缎。秦制造的红色的绣有金丝线的丝织品”；[18]“绢子。一种秦绸，有红、黄、绿等各种颜色”；[19]“缎，绸缎。桃花石汗的绸缎多，也不能不量而裁”。[20]该书中多次出现来自“秦地”的丝绸或丝织品的专门词汇。此外，从宋代海外贸易的角度看，无论是对南海诸国还是东亚的日本和朝鲜，丝织品都是必不可少的贸易品。[21]此外，在巴黎所藏的宋初和田文书P.2958明确记载了使人带回大量丝绸的信息：“我已把这二百匹丝绸的东西从很远的地方带到夏国，现在我不能送这样大的一分礼物了，因为我作为信使在这里周游。至于这些二百匹丝绸东西，我把一百五十匹丝绸作为贡品献给王庭，五十匹丝绸给您。”[22]加之丝绸制品适宜陆上驼队运输，综上判断，丝织品应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输出品。

三是瓷器在陆上通道的西传问题。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瓷器已经成为宋代海上贸易的重要输出品，出现了一批专供出口的外销瓷器。这些情况在伊斯兰古籍中也有所反映，不少古籍中记载了中国瓷器在伊斯兰世界大受欢迎的情况。例如成书于宋代时期《地名词典》记载：“某国王遗留的大批金银财宝和稀世珍品中有……14箱中国瓷器和精致豪华的玻璃器皿。”[23]成书于公元9世纪的伊斯兰著作《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伊历134年（756）条下记载：“艾布·达乌德在杀死国王及其下属时，得到许多他从未见过的镶刻黄金的中国瓷器，以及全部用锦缎所做的中国马鞍，还有大量中国的奇珍异宝。”[24]在成书于9世纪的《乐府集成》中同样提到中国瓷器：“这精美绝伦来自中国的瓷器，上有巧夺天工者描绘的画图。刚刚还是件旷世难觅的珍宝，转眼便成羊犄角下几片碎物。”[25]成书于13世纪的《名人全传》载：“当他的女儿语素丹的儿子阿努克大婚之际，我（作者）正在开罗，看到了从他家向城堡走去的送礼队伍。脚夫的数量是：抗绣花锦缎扶手椅40个……中国瓷器33个，镏金玻璃（器皿）12个。”[26]现在尚不能判断上述文献中中国瓷器是通过何种途径进入中亚地区的，但不排除从陆路传入的可能，这是因为一些考古发现表明瓷器也应是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输出品，例如在青海阿拉尔宋墓中也曾出土过一只白瓷碗，是宋代黑白瓷碗中常见的一种，[27]应该是通过陆路辗转而来。另外，近年来在辽代墓葬中陆续发现了来自西方的玻璃器皿，显然是经陆路传入的。三上次男曾经考察了伊朗的内沙布尔一、赖伊等遗址，并发现了9～13世纪的中国陶瓷。他同时指出，9～10世纪以后通过陆上交通路线把若干中国陶瓷运往西方，但把大量中国陶瓷普及到西方世界主要

还是依靠海上交通。[28]玻璃与瓷器均属于易碎、不易携带和运输的产品，既有西方玻璃器皿通过陆路进入中国，瓷器也应是陆上丝路的输出品。当然，这还需要更多考古和文献资料的证实。

二 贸易方式：中继贸易的兴盛

政治情势的变化是影响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方式的重要因素，中继贸易的兴盛显然是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涵之一。五代以后，西北地区丝路贸易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长途贩运不逮前朝。隋唐时期，中原政权不仅与西域诸胡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且还与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以及阿拉伯人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有史可征的波斯帝国与唐朝的朝贡就达27次。[29]宋时，有迹可循的只有“大食”从陆路朝贡2次；而且，如前文所述，宋时的“大食”恐非唐时之“大食”也。如此来讲，西域诸蕃（于阗、回鹘等）就成宋朝（辽）最远的丝路贸易的“顾客”了。中继贸易取代长途贩运，这一结论可以从公元9～13世纪西北丝路所流通的外来商品中得出，在此不做详解。

通过本研究中丝路商品的考察，我们知道在丝路贸易中存在着一些为数不少的外来商品，因此在丝路贸易中确确实实存在着中转贸易的问题。尤其是唐以后，丝绸之路被不同政权或民族所“瓜分”，中转贸易的兴盛正是这种政治“割据”的结果。公元9～13世纪的西北地区已经是一个大的中转贸易市场，从上述商品的考察中可以得知，这种中继贸易带有浓郁的国际色彩，一些本产于欧洲、红海沿岸、阿拉伯半岛乃至印度半岛的物品（如香料）成为这一大市场中的“常客”。不仅西域诸政权、回鹘、吐蕃是这种中继贸易的受益者，扼控丝路要道的西夏政权也从中渔利不少，北宋环庆路经略使范纯粹对此感受颇深：“臣闻（西夏）累遣使入货贩，滋广同约，所得不减三百万数。”[30]这则史料记述了西夏与北宋的贸易之发达，“滋广同约”，间接地反映出西夏与北宋的贸易额十分可观。南宋门下侍郎耿南仲也曾认识到西夏通过丝路中转贸易获利的现象：“臣窃见陛下即位之初，夏国贺正人袭用前例，持珠玉而来，欲邀厚利。三省同奉圣旨，夏人赍到珠玉更不收买，赐钱一万贯。”[31]西夏人所持珠玉等物显然是经过转手而得的商品。其他民族也在中原地区大肆贸易：北宋大观四年（1110）西夏国遣使入贡，“诸西人入贡，诸色人私有交易编栏，使臣不觉察者，徒两年”。[32]文献中的“诸色人”恐为西北及西域之异族，如回鹘、吐蕃之流。从前引的文献中可知一些回鹘人长期驻足于中原地区进行商业活动，北宋政府不得不下“逐客令”。

大致来讲，西北地区的中继贸易存在着榷场、互市贸易、民间贸易、贡使贸易以及民间走私等多种形式。这主要可以从贸易商品中体现出来，一些外来商品通过不同中继贸易形式进入宋朝境内，如从西夏输入的硇砂、玉石、羱羚角等商品显然非西夏的物产，这一点前已叙及。从地理空间上观察，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一批中继贸易的据点，一些商品在边境的贸易据点“就近处理”：“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二十五日，诏熙河路经略司指挥，熙州自今于阗国入贡，唯赏国王表及方物，听赴阙，毋过五十人、驴马头口，准此余勿解发。止令熙州、秦州、安泊差人主管买卖。”[33]元祐二年（1087）十月十三日“诏于阗国使，以奉表章至则间岁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34]又元祐七年（1092）二月二十八日，熙河兰岷路经略安抚司言：“于阗国进奉而蕃现在界首内……今来两蕃进奉人，缘已有间岁许解发，指挥欲只止熙、秦州实买卖索讫，约回大蕃。”[35]可以看出，位于宋朝西缘边境的熙、秦州对进入内地进行丝路贸易的商品种类、贸易规模、贸易期限甚至人员状况等内容做出“规范性”的限制和要求，同时又作为进行丝路商品贸易和交易的重要据点，发挥着类似于今天贸易口岸的作用。这些贸易据点往往处于丝路或交通要冲之地，宋夏边界的一些城寨也具有相似的功能，如顺宁寨。[36]正是由于依托于丝路贸易，宋代西北城寨发挥着商业功能，这对于今天西北城镇分布格局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中继贸易的主体，即贸易者的成分也十分复杂，既有官方的贸易，也有民间和蕃商的贸易，甚至一些僧侣也加入贸易的行列，[37]这一点台湾学者有为详细的论述，兹不赘述。

公元10～13世纪西北地区的丝路中继贸易之所以较为兴盛，缘于两点原因。

第一，10～13世纪西北地区在政治上的割据性。五代以来，西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吐蕃、回鹘、党项为中心的割据集团，并且瓜分了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导致了商路的不畅。然而，这并不能阻挡诸蕃与中原发生商品交流的客观经济要求；在长途贩运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外来商品就像接力棒似的辗转进入中原市场，中继贸易就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所出现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

第二，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缘关系。西北地区不仅是中国内陆的西大门，而且是连接北方民族的纽带，具有联系东西南北的地理特征。公元10～13世纪的西北地区，犹如一个处于十字路口的大转盘，边缘盘旋着

吐蕃、回鹘、西夏、于阗、鞑靼、辽、宋等民族及政权。河西回鹘、吐蕃、于阗、鞑靼、西夏与辽朝或宋朝的贸易都是通过西北这一中枢区域而实现的。长泽和俊指出，五代宋初河西地区存在着中继贸易。[38]事实上，在蒙古完成统一之前的西北地区莫不如此，[39]因为只要在西北地区存在着政治上的割据局面，中继贸易就不会停歇。

需要指出的是，有研究认为，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是在宋夏对峙的军事形势中发展起来的。北宋在西北地区屯集大量的军队，为解决军队的供给，政府鼓励商人入中粮草，商人的入中带动了军需商品的流通，由军需商品的流通带动了民用商品的流通。[40]也有人认为西北地区自身经济的发展也是促成宋代西北区域市场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论断为人们思考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也应当看到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是宋代西北丝路发展到一种特殊形式之下而接出的一颗硕果。唐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可以使西域胡商往来长安，大肆贸易，唐长安城中的西市便是胡商们贸易的场所。在这一政治形势之下，丝绸之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掌握丝绸之路主动权的那种气魄和景象不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则是“山河惨淡关城闭，人物萧条井市空”的凄惨画面。公元10～13世纪群雄角逐于西北地区，共同瓜分了这一区域的丝绸之路，分区的中继贸易取代了盛唐时的长途贩运，这就为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前述秦州贸易支点的形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试对宋代西北市场的流通商品做一番考察，不难发现它们基本囊括在丝路贡使贸易商品的范围之内，大部分商品似乎与军事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如香料、药材、玛瑙、珊瑚等珍奇异宝以及上等的毛棉织品等。不可否认，军事形势以及经济发展在宋代西北区域市场形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应当看到，以丝绸之路为依托是宋代西北区域市场形成的大背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继贸易又促成了西北区域市场的发育和形成。客观地讲，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是几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中继贸易在其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三 贸易主体：关于“回鹘时代”的提法

再从公元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主体或者主导者的角度看，回鹘民众在沟通中西物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主要有三方面的体现。一是从官方朝贡贸易的内容看，西域九姓胡（昭武九姓）主宰了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时期，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一点

也可以从西域诸胡与唐王朝的朝贡状况中看出来：从唐武德七年（624）到大历七年（772）共148年间，九姓胡朝贡130次，占朝贡总数（134次）的97%。[41]但到五代时期，这一状况就发生了变化。回鹘、吐蕃、于阗以及瓜、沙地方政权一跃成为与中原朝贡的主体，[42]九姓胡人基本退出了丝路贸易的舞台。从本文中的朝贡表也可以发现，宋代以降，官方的朝贡贸易基本以回鹘民众为主体，其几乎控制了西北地区或丝路东段贸易。二是从丝路的地理空间看，回鹘商人的足迹遍及华夏中原和塞北草原。值得注意的是，公元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塞北掀起了一股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浪潮，一些西方学者将之称为“第二次复兴”（A Second Flowering）。[43]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唐末以来陆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的缺憾。同时必须承认，这种局面与回鹘人的积极参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回鹘人不仅控制着北方丝路的贸易权，在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和交往中也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这一点也为学界所认识，如罗丰指出，唐末以后回鹘人已经完全取代了隋唐间操纵丝绸之路贸易的“昭武九姓”人，成为控制国际商贸活动的一股新兴势力。[44]三是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内涵看，回鹘积极参与陆上丝绸之路不仅仅局限于商业贸易的范畴，而是已经扩展到文化交流的层次。前文所述回鹘对契丹文化的影响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回鹘文化在中原地区亦有一定影响。一些回鹘商人迁居内地不归者有之。“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得回纥种人数万。”[45]大量回鹘民众内迁，以致宋明道时期朝廷下了“逐客令”：“河西回纥商人多缘互市，家秦陇间，请悉遣出境，戒守臣使稽察之。”[46]甚至不排除内迁回鹘人与汉人通婚的可能：“其（指回鹘——引者注）居秦川时，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47]《宋史》卷142《乐志》“小儿乐队”中有“射雕回鹘队，衣盘雕锦襦”的表述。今河南开封市郊的兴慈塔，兴建于北宋初期，其二层内壁上嵌有20方伎乐塑像砖。塑像砖上刻画的就是一些菩萨手执羯鼓、曲项琵琶等外来乐器进行演奏的形象，有研究认为其内容反映的就是北宋时期专供朝廷欣赏的龟兹乐队。[48]这反映了回鹘文化对中原的渗透和影响。因此，大致从唐末、五代始，丝绸之路贸易便进入了由回鹘人发挥突出作用的“回鹘时代”（见表3、表4）。

表3 北宋时期诸蕃朝贡频度统计

单位：次

朝贡者/时间	甘州回鹘	西州回鹘	回鹘	龟兹	于阗	鞑靼	瓜、沙州	大食	总计
961~1036 年	24	7	14	13	10	2	8	10	88
1037~1084 年	0	0	3	6	10	0	3	5	27
1084~1127 年	0	0	0	1	23	0	0	1	25
总计	24	7	17	20	43	2	11	16	140

表4 《辽史·属国表》所载的诸蕃进贡状况

进贡者	进贡时间（年）	次数（次）
和州回鹘	907、1112	2
阻卜	918、932、933（2 月、6 月、7 月、10 月）、939、940、941、942、986、990、994、1014、1016、1048、1049、1050（7 月、8 月、11 月）、1053、1054、1056、1066、1070（2 月、7 月）、1074、1078、1079、1081、1082、1083、1084、1086、1092（1 月、4 月）、1095（7 月、8 月）1096、1097、1099、1100、1101、1106、1110、1112	46
党项	918、933、934、986、989、994、997（2 月、6 月）、1003、1005（4 月、7 月）、1021、1066	13
回鹘	918、924、937、945、946、952、971、977、989、990（2 月、12 月）、991、992、993、994（2 月、6 月）、995（10 月、11 月）、1001、1005、1041、1043、1071、1072、1073、1077、1078、1089、1091（6 月、7 月）、1113	31
西北诸蕃	918	1
波斯国	923	1
大食	924、1020、1021	3
甘州回鹘	924	1
突厥	928、991	2
辖戛斯国	931、952、973	3

表4 《辽史·属国表》所载的诸蕃进贡状况-续表

进贡者	进贡时间（年）	次数（次）
吐浑（吐谷浑）	933、935（4 月、6 月）、936（6 月、8 月）、938（5 月、7 月）、939、945、953、971、994	12
阿萨兰（又作阿思懒）回鹘	933、973、978、988、989、990、991、995、996、1005、1045、1047、1052	13
敦煌（沙州回鹘）	939、1006、1014、1020	4
吐蕃（铁不得国）	953、1048、1051、1054、1069、1071、1075、1103、1104	9
于阗	989（2 月、3 月、11 月）、990、1015	5
高昌回鹘	1049	1

用“回鹘时代”来概括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东段的基本特征和内涵，[49]这既有地缘政治与民族格局变化的因素，也与回鹘民族本身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商业素质、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检阅该时期西北民族关系格局，不难发现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党项在河套地区的扩展和兴起，极大地改变了西北地区的政治格局；二是漠北回鹘的西迁加速了西北地区回鹘化的进程。诚如耿世民先生所言，回鹘人迁居西域

后，通过通婚，一个不同族群的同化融合过程发生了。由于回鹘在政治上和人数上都占有优势，所以当地原居民逐渐被回鹘化，同时回鹘语战胜当地居民的语言。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当地民族也在人种、文化和语言方面给予回鹘人影响。[50]《马卫集论中国》中讲中国领土分为三部分："秦、契丹（Qitāy）——人常呼之为Khitāy、回鹘。"[51]这反映出中古时期一些"西人"眼中的东亚地区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足以看出回鹘西迁后在地缘政治上的影响，而逐渐回鹘化的西域地区又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加之异军突起的契丹民族将中国东北与中亚之间的狭长地带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北中国不再有割据之碍。这些因素无疑给回鹘民众对于丝绸之路的操控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此外，回鹘的经济形态及其自身的商业素质也促使其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着积极作用。魏特夫指出，回鹘人继承了这一地区（高昌）悠久历史的传统，他们都成了商贾。他们在这个时代的诚实威望与唐代史学家们为他们勾勒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唐人把回鹘人形容为极度蒙昧和粗暴、只知盗窃和不懂礼义廉耻之辈。相反，穆斯林作者们却强调指出，在他们之中，作为钱币使用的棉布匹上面盖有可汗的印玺以证明其真实性，每隔七年就要重新洗刷一遍以便重加印鉴。[52]虽然魏认为唐代史学家对回鹘的描述有夸大之嫌，如在《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就有不少回鹘经商贸易的记述，但回鹘西迁以后其商业色彩渐趋浓重的现象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公元10～13世纪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承接了唐代丝绸之路繁盛的余晖，也为后世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千余年来，陆上丝绸之路虽然经历了汉唐的兴盛和宋明的低落，但两千多年以来或者更长的时间，以沟通中西物质文化交流为主要内涵的丝绸之路并未有过中断，其顽强的生命力未减。只是随着政治形势和民族格局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对域外交往的意愿有所不同，中西交往的形式与表征亦有不同体现。两千多年来，陆上丝绸之路在不断地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公元10～13世纪的陆上丝绸之路即是如此。

[1] 杨蕤，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2] 张籍《凉州词三首·其一》："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凉州词三首·其三》："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

[3] 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4] 孙洪升：《唐宋茶叶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99～100页。

[5] 孙洪升：《唐宋茶叶经济》，第65～66页。

[6]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第5612页。

[7]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第575页。

[8] “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弊书五》“四川备录”中“王廷相严茶议”，《四部丛刊三编》（二十三），上海书店，1986。

[9]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330页。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614页。

[11] 《宋史》，中华书局，1985，第4479页。

[12]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280页。

[13] 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第5352页。

[14] 《宋史》，第4499页。

[15] 黄时鉴：《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

[16] 李卿：《略论宋代丝织生产的商品化》，《河北学刊》2001年第2期。

[17] 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89页。

[18]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1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第346页。

[19]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1册，第446页。

[20]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1册，第450页。

[21] 陈高华、吴泰同：《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54～61页。

[22] 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23] 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三），《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1期。

[24] 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五），《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3期。

[25] 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九），《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1期。

[26] 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十二），《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4期。

[27] 李遇春：《阿拉尔发现木乃伊》，《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28]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李锡经、高喜美译，文物出版社，1984，第94～100、155页。国内学者创办的《丝瓷之路》学刊，研究内容为内陆欧亚史、地中海与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创刊词”，商务印书馆，2011）。足以看出瓷器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29] 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第373～374页。

[30]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006页。

[31] 《靖康要录》，中华书局，1985，第102页。

[32]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761页。

[33]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7857页。

[34]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7722页。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7860页。

[36] 前田正名『陝西横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十世纪、十一世纪におるオルドス沙漠南缘の白于山付近山地に關する歴史地理学的研究』學術出版教育書籍刊、1962。

[37] 江田健：《北宋陕西路商业活动》，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第45～52页。

[38] 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321页。

[39] 姜伯勤先生从吐鲁番文书中发现粟特商人在高昌等地也进行着中继贸易。队商依贩运能力、市场价格等因素，在各贸易中继站买进抛出。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第179～180页。

[40] 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2009，第960～961页。

[41] 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第191页。

[42]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第121～122页。

[43] Irene M. Franck and David M. Brownstone，*The Silk Road：A History*（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1986），p.185.

[44] 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

[45] 《宋史》，第14161～14162页。

[46]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584页。

[47] 洪皓：《宋元笔记小说大观》，阳羡生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791页。

[48] 赵为民、黄砚如：《开封宋代繁塔伎乐砖析评》，《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49] 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50] 耿世民：《中国吐鲁番、敦煌出土回鹘文献研究》，《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第17页。

[51] 《马卫集论中国》，胡锦州、田卫疆译，周锡娟校，《中亚研究资料·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1985。

[52] Wittfogel K.A. &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Philadelphia，1949），p.170.

10～14世纪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

魏志江[1]

10～14世纪的高丽时代，是中日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也是中日韩三国与东亚乃至西亚、非洲、欧洲海洋交涉网络正式形成的时期。所谓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略称海丝路或MSR），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内涵迄今仍然众说纷纭，但是，本文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其内涵应该是从中国东部沿海港口出发，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并沿半岛西海岸南下，经日本博多湾、九州和西南诸岛、琉球群岛一带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南海向西南延伸，经中南半岛南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红海、地中海沿岸乃至东非的航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必须以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为输出或枢纽港，并形成常态的海上航线；二是以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土特产品为主要输出品，并承载相关的人员往来和经济、人文的交流；三是海上丝绸之路并非单一的航线，而是沿相关航线区域形成的呈交叉形态的海上交通网络。因此，10～14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以及日本之间的海上航线和海洋经济文化交流，无疑构成了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高丽时代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主要代表是中国学者方豪、宋晞、陈炎、陈高华、吴泰、王文楚等学人；[2]国外代表性学者，公认为韩国东亚大学金庠基，高丽大学史学科李镇汉教授，东国大学的尹明哲教授、曹永禄教授以及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木浦保存处理所崔光南所长等，他们撰写的一系列研究高丽时代中韩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3]奠定了中韩海域史研究的基础。而中日海域交涉史的研究，是东亚海域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森克己、村井章介、嘎本涉、市村宏、东野治之、大日方克己、铃木靖民、岸俊男、山里纯一、保科富士男、长岛健等学者对此一时期的中日海域交涉史，做过一系列深入的探讨，[4]尤其是木宫泰彦、森克己先生有关遣唐使大洋路开辟的研究，几乎成为日本学术界的不刊之论，并被载入日本《国史大辞典》。但是，由于史料的匮乏，作为中日海域交涉史研究的航路问题，迄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而言，关于10～14世纪中日海域交涉航线，大体可分为北路、大洋路

和南岛路三条航线。关于北路，学界意见较为统一，基本上没有太大疑义。但关于大洋路和南岛路，特别是南岛路的存在与否及其具体情况，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10～14世纪中日韩海上航线的演变、中日韩海上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东亚海洋交涉网络的形成等问题加以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中日韩三国海域交涉航路之变迁

10～14世纪的高丽时代，是中日韩海上航路演变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中韩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此一时期，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和发展。

第一阶段（918～1071），此一阶段，中韩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918年，高丽王朝建立，其与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主要是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交往。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也是利用此航线，《宋史》载：淳化四年（993）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陈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高丽王遣使白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5]考宋之登州，郡名东牟，今山东蓬莱市；八角海口，即今山东福山县西北八角镇；芝冈岛，即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而高丽翁津即今朝鲜海州西南翁津；阎州，今朝鲜延安；白州，今朝鲜白川。[6]《宋史》谓：“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7]故登州一直是五代、宋初以来与高丽往返的海上航线，《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谓：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8]宋仁宗时亦谓：“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9]故自高丽建立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宋丽海上交通主要利用此段航线，这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中韩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以及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进行往来的主要航线。此外，作为此航线的网络支线尚有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至高丽翁津口登陆，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第二阶段（1072～1270），此一阶段，中韩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由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其具体航线，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39《海道》有明确的记载，学者王文楚教授也做了深入的考证。[10]简言之，即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宁波市镇海区）、过虎头山（今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东北虎蹲山），东至昌国县（今定海县）沈家门、补陀洛迦山（即今普陀山），自此出海，入白水洋、黄水洋（今浙江沿海、长江以北至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亦称黑水沟，今马里亚拉海沟洋面，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洋面），经夹界山（亦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11]今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为中国、朝鲜领海分界处，即为中国与高丽海上分界线），过白山（今大黑山岛东南之荞麦岛），经黑山（今韩国大黑山岛，为中韩海上丝路南路之枢纽，船舶往来停歇地），过黑山岛后沿群山列岛海岸北上，抵紫燕岛（今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位于首尔东南，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今仁川西之永宗岛），[12]至急水门水道，进至礼成港，于碧澜亭上陆，再由陆路抵达高丽都城开城。碧澜亭，今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由此舍舟登陆，去开城。自宋神宗熙宁后至南宋，宋丽之间海上航路盖经由此路。如趁季风便利，五六日即可抵达。此外，南路航线还有泉州港，亦为与高丽贸易之重要港口，[13]如苏轼谓：“切问泉州多有海船入高丽，往来买卖。”[14]南宋时，海外贸易发达，有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商舶常往来泉州，并成为北上连接明州与高丽，以西连接粤东、广州通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不过，其与明州港相比，主要还是南洋、印度洋以西的船舶往来的港口，并不能取代明州在对高丽海上往来中的地位。

第三阶段（1270～1357），此一阶段，中韩明州海上航线衰落，元朝海运兴起，其主要以太仓（今江苏太仓）为起点，沿海岸线北上，经山东半岛到沙门岛，入莱州洋，再由渤海湾北上，经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西海岸。元丽运粮以及海上贸易往来，多由此条海运航线北上，并由山东莱州湾至辽东半岛到高丽西海岸；而元丽官方朝贡贸易往来，则主要是从辽东陆路往返，即由大都（今北京）沿陆路经山海关抵辽东半岛，渡鸭绿江南下，抵达高丽都城开城。此外，元代海运虽然逐步取代了明州对高丽贸易的地位，但是，泉州港却仍然是与高丽往来的重要港口，如元代时来华的马八国王子孛哈里“居泉州”，娶高丽女子蔡氏为妻，高丽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曾遣使向高丽王献礼物。据陈高华先生考证，其即是由泉州从海路到高丽。[15]

第四阶段（1357～1392），此一阶段，由于元末中国战乱频仍，南北交通隔绝，海运无法继续，所以以庆元（今宁波，即宋代的明州）、泉州和太仓为中心的江南航线成为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南方割据势力张士诚占据以苏州为中心的浙西地区、方国珍占据以杭州为中心的浙东地区，这些割据政权继续与高丽进行海上贸易往来。张士诚政权与高丽的贸易以及明初高丽使者往返两国，主要是通过苏州太仓作为两国的港口；而浙东方国珍政权则主要通过庆元港与高丽往来。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发现刻有“庆元路”字样的秤砣，一般认为该沉船即是由方国珍割据浙东时从庆元路起航的。[16]

10～14世纪中日海上航路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般而言，关于10～14世纪中日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唐末五代以来直至元代中后期，此一时期主要是大洋路航线；后期主要是元末至明初，此一时期，随着方国珍、张士诚等势力割据东南沿海以及明初实行海禁政策，大洋路基本废弃，遣唐使后期开辟的南岛路航线，成为明初与琉球、日本交涉的主要航线。

10世纪以前中日海域交涉的航路，主要就是中日学术界所说的北路。所谓北路航线，主要是指从日本难波津，经濑户内海到达博多湾，北上经过对马岛、壹岐岛、济州岛，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抵达辽东半岛的东海岸，横渡渤海湾，抵达山东胶东半岛沿岸登陆。此条航路，为日本与魏晋、南朝交涉的传统航路，也是遣隋使和初期遣唐使往来中日两国海域的航路。据《隋书》卷81《东夷传》载：“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于倭国，渡北济，行至竹岛，南望耽罗岛。经都斯麻国，回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17]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竹岛（韩国称“独岛”）为全罗南道珍岛西南的小岛，耽罗国即济州岛，都斯麻国为对马，一支国即壹岐国，竹斯国即是博多湾沿岸之筑紫。此为隋朝册封使抵达日本的海路，也是遣隋使航行的海路。

唐朝与新罗、渤海以及日本的北路航线，《新唐书》论及唐辽东方面的海路谓：“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乌、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

岛、得物岛千里，至鸭绿江唐恩浦口。”[18]遣唐使前期的航线，大体从博多湾出港，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经仁川港北上，抵达黄海道丰州，过鸭绿江，横渡渤海湾口，抵达辽东半岛东海岸，然后到达山东登州上陆。而从中国返回日本的海域航路，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也是如此[19]。如日本承和十四年（847），高僧圆仁从唐朝返回日本时，即自楚州沿海岸北行，到山东登州文登县赤山莫琊口（山东靖海湾附近），然后横渡黄海，沿新罗西岸南下，经过济州岛、值嘉岛（今平户列岛），再到筑前的博多。[20]故北路航线曾经是中日海域交涉的主要传统航线，从日本舒明二年（630）八月第一次派遣遣唐使，到天智八年（669）遣唐使的派遣，除白雉四年（653）遣唐使外，大体上亦是沿此航路往返中日海域。

北路航线中另外还有一种经由渤海国的情况，这与传统的北路是有所区别的。由渤海至日本的航路，可分为沿朝鲜东部海岸南下的朝鲜沿岸航路、横渡日本海的航路和经由库页岛、北海道的北环航路三种情况。[21]例如，天平五年（733）遣唐使的回程，大使多治比广成走的是南岛路，但判官平群广成回国时走的其实是经由渤海国的北路。据《续日本纪》和唐朝国书《敕日本国王书》的记载，平群广成等人最初试图和大使多治比广成一样走南岛路从海上直航回国，但却不幸遭遇恶风漂到昆仑国（唐朝文献称“林邑”，即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历经九死一生方回到唐朝。其后由在唐为官的阿倍仲麻吕（日本文献又称“阿倍仲满”，唐名“朝衡”）的奏请，获允取道渤海国回国。其当时的路线为：先到山东半岛的登州，横渡渤海进入渤海国境内，再从渤海国东部口岸出发沿海岸北上，经库页岛、北海道南下，抵达日本东北的出羽国（今山形县和秋田县），最后回到平城京（在今奈良县）。[22]又如，天平宝字二年（758）赴日的渤海使次年（759）回国时，带同当年的遣唐使（迎入唐大使使高元度、判官内藏全成一行）先到渤海，嗣后由渤海经陆路再入大唐。而这批遣唐使中的判官内藏全成一行回国时亦先到渤海，再回日本。其当时的航路，因日本与新罗、虾夷（日本东北和北海道一带的原住民，为阿伊努族）交恶，故而采用了横渡日本海的航路（但内藏全成一行回国横渡日本海时遭遇暴风漂至对马岛）。[23]

所谓南岛路，主要是由九州南部南下，经西南列岛、琉球群岛，横渡东海，抵达江苏、浙江、福建沿岸的航路。[24]此一航路，中国学者多认为开辟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明朝派册封使杨载出使琉球。[25]其实，中日间南岛路之开辟可以上溯更早。日本学者对此航路已有较多

的探讨。

南岛路之说，最早由森克己提出。他把此路线析离大洋路（南路），将之正式命名为南岛路，并全面考述了南岛路航线，指出南岛路自筑紫的大津浦出发，迂回肥后国的松浦郡庇良岛（即今平户岛），继沿天草岛、萨摩国沿岸南下，再经多褹（种子岛）、夜久（屋久岛）、吐火罗（宝七岛）、奄美（奄美大岛）、度感（德之岛）、阿儿奈波（冲绳岛）、球美（久米岛）、信觉（石垣岛）诸岛南下，到海面相对狭窄的地方方始横渡东海，到达中国长江口附近港口。[26]森克己的南岛路之说后来成为定论，在论文、辞典、教科书中多被沿袭，但在学术界仍多异议，其中市村宏、东野治之、大日方克己等人否认南岛路作为遣唐使路线的存在，认为此路线并非遣唐使预设路线，而是将之看作遣唐使取道南路时遭遇海难时偏移大洋路的漂着路线，只是从属于大洋路（南路）。[27]但从史料来看，中日海域交涉的南岛路是应该存在的。[28]

从日本史籍来看，遣唐使其实早在7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在了南岛路上。日本白雉四年（653）的遣唐使分两路入唐，其中吉士长丹一行经北路到达唐朝，但另一路高田根麻吕一行却在九州南部的萨摩一度遭难。[29]木宫泰彦和森克己据此推测高田根麻吕一行有可能是试图开辟南岛路的先驱。[30]而据《续日本纪》的记载，日本庆云元年（704）的遣唐使粟田真人“初到唐时”的地点是“大周楚州盐城县”。[31]倘若取道北线的话，本应该在山东半岛的登、莱一带登陆，不太可能着岸于长江边的盐城。可见，此次遣唐使的航线，如果不是漂着路线的话，则在当时也有可能已经开始取道南岛线。再考此次遣唐使使节团成员山上忆良后来为日本天平五年（733）的遣唐使大使多治比广成送行的《好去好来歌》，其中有期待其“自值嘉之岬直泊回到御津海边”[32]之说。“御津”指的是大阪的南波津，“值嘉之岬”指的是值嘉岛（五岛列岛）中的福江岛三井湾所在的海角，此地是遣唐使取道南岛路的必经之路。可见，山上忆良根据自己往年的遣使经历，可能将多治比广成一行的回路预设为从大唐直航回到值嘉，再由值嘉回到南波津。而值嘉为南岛路的必经之所，在当时被认为是日本的最西端，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了传统的北线了。事实上，在次年（734），这批遣唐使返航日本时的着陆地恰为九州南部的种子岛，[33]而种子岛就是南岛路航线上的一个重要岛屿。

其实，中日间经由琉球群岛的南岛路之开辟，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最早当始于唐天宝十二年（日本天平胜宝五年，753）。此

次遣唐使的回程启程于唐天宝十二年（753）十月底，“大和尚于天宝十二载十月二十九日戌时，从龙兴寺出……乘船下至苏州黄洫浦……十一月十五日壬子，四舟同发。……十六日，发。二十一日戊午，第一、第二舟同到阿儿奈波岛。在多弥岛西南，第三舟昨夜已泊同处。十二月六日，南风起，第一舟著石不动，第二舟发，向多弥岛去。七日至益救岛，十八日自益救发……二十日乙酉午时，第二舟着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二十六日辛卯，延庆师引大和尚入太宰府”。[34]“阿儿奈波岛”即冲绳岛，“多弥岛”又写作“多禰岛”，即今种子岛，“益救岛”又写作“夜久岛”，即今屋久岛。盖其时西南诸岛已经归附日本，如多弥岛、益救岛、奄美大岛等，同时，由于“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35]鉴真一行自冲绳岛登陆，沿这些岛屿北上，经过萨摩国，最后回到大宰府。此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东南沿海到琉球群岛的航路记载，盖其时西南诸岛已经归附日本，如多弥岛、益救岛、奄美大岛等，同时，由于“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36]故日本从任命藤原清河为大使，大伴古麻侣、吉备真备为副使的日本天平胜宝四年（752）遣唐使开始，日本遣唐使不得不放弃沿朝鲜半岛北上抵渤海湾和山东半岛的传统航路即北路，基本上走的是南岛路航线，其比1372年明朝册封使杨载至琉球册封时所开辟的中国福建东南沿海至琉球的航路早6个世纪。故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这个时期的遣唐使，“先从肥前、肥后、萨摩的海岸南下，经过夜久、吐火罗到达奄美附近，从此更西航，渡过东中国海，到达扬子江口附近，返航也是经由这条航线”。[37]《续日本纪》就称这批遣唐使返回日本时“举帆指奄美岛”。[38]

据上可知，中日海域交涉的南岛路应当起源于公元8世纪。而经由琉球群岛的南岛路之开辟，当最早起源于唐天宝十二年（日本天平胜宝五年，753）鉴真搭乘遣唐使船第六次渡航日本。

中日海域大洋路的开辟，迄今为止学术界一般多认同日本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专家木宫泰彦氏的说法，即“到了第四期遣唐使时代［光仁天皇朝（770～780）至仁明天皇朝（834～850）年］，就不再经由南岛了。即先从筑紫的大津浦（博多）出发，到达肥前国松浦郡值嘉岛（平户岛及五岛列岛的旧名），在那里一旦遇到顺风，就直接横渡东中国海”。[39]接着，木宫氏提出了两项证据：其一是“光仁朝的遣唐使舶曾在松浦郡合蚕田浦等待信风；桓武朝遣唐使第一、第二舶从松浦郡田浦出发和第三舶自庇良岛（平户岛）出发；仁明朝的遣唐使舶指向松浦郡旻乐崎出发等，都足以证明上述说法”。[40]考上述史料先后记载于《续日

本纪》《日本后纪》诸书，然并无此三次遣唐使经松浦郡平户岛直航东中国海之记录，其实，即使沿传统的中日北路航线也有经松浦郡值嘉岛北上新罗西海岸的情况，并不能证明遣唐使是直接横渡东中国海。其二是日本“《三代实录》所载贞观十八年（876）三月初九日参议太宰权帅在原行平的两条请求中，谈到庇罗（平户）、值嘉（五岛列岛）两岛的情况时说：‘庇羅、值嘉……地居海中，境邻异俗，大唐、新罗人来者、本朝入唐使等莫不经（历）此岛。’”考作者原著所引原行平二条请求内容：“（一）在壹岐岛置水田百町，充对马岛年贡；（二）在庇羅（平户）、值嘉（五岛列岛）更设二郡，理由‘是大唐、新罗人来者、本朝入唐使者等，莫不经历此岛’。设郡是为了加强管理。”[41]显然，“新罗人来者”需要经历此岛，也恰恰证明值嘉岛即平户列岛为大唐和新罗、日本遣唐使往来中日海域之枢纽岛屿，亦即经此岛北上新罗境，沿传统海域北路航线往返大唐和日本，而非大唐、新罗和日本遣唐使节均需要经过平户列岛横渡东中国海，其实木宫氏自己也认为值嘉岛“奈良朝以后，此岛便处于日唐交通的要冲，取道南路的自不待言，就是取道北路的，也大都在此岛停泊”。[42]故遣唐使时代，由于季风和洋流的知识并未被航海人所掌握，尤其是缺乏指南针在航海中的使用，早中期遣唐使是无法越过黑水沟洋流的阻滞直接横渡东中国海的，木宫氏认为遣唐使后期已经开辟中日大洋路航线的论断恐难以成立。

中日海域交涉从明州（今宁波）横渡东中国海抵达值嘉岛，再到博多湾的大洋路之开辟，最早应该始于遣唐使废止以后。据《大日本佛教全书》引《安祥寺惠运传》载，唐朝商人张友信（一作“张支信”）的船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六月二十二日，从唐朝明州望海镇出港，于同年六月二十四日，仅三日即抵达日本值嘉岛那留浦，谓：“得西南风三个日夜，才归著远值嘉岛那留浦，才入浦口，风即止。”[43]据木宫氏考证，所谓那留浦，即日本五岛列岛中的奈留岛。又据《日本三代实录》载日本清河贞观七年（865）七月，唐朝商人李延孝等亦是从明州望海镇出港，仅三日，即抵达日本值嘉岛，日本高僧宗睿即搭乘此船回国。[44]而返程，亦据此书载：“得正东风六个日夜，流着大唐温州乐城县玉留镇府前头。”[45]即日本承和九年（842）八月二十四日，唐商人李处人等从日本值嘉岛那留浦出港，历经六日，抵达大唐温州东城县玉留镇。取道大洋路从日本返回唐朝的史料，尚有《行历抄》《智证大师传》等所记载的日本高僧圆珍等所乘的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船于文德仁寿三年（853）八月九日，从值嘉岛鸣浦出港，经六日航行，于同年八月十五日抵达唐朝福建连江县的记载，这些均为中日大洋路海域交涉之

较早明确之记载。而据《头陀亲王入唐略记》关于日本真如亲王于清河贞观四年（862）九月三日入唐时的航路记载，则表明此一时期，往来大洋路的唐朝商船已经掌握了利用季风出港的规律，其谓：“（真如亲王）僧俗合六十人，驾舶离鸿胪馆，赴远值嘉岛。八月十九日，著于远值嘉岛。九月三日，从东北风飞帆，其疾如矢。四日三夜，驰渡之间，此月六日未时，顺风忽止，逆浪打舻，即收帆投沉石，而沉石不着海底，仍更续储料纲下之，纲长五十余丈，才及水底。此时波涛甚高如山，终夜不息，舶上之人皆惶失度，异口同声祈愿佛神，但见亲王神色不动。晓旦之间，风气微扇，乃观日晖，是如顺风乍嘉行碇挑帆随风而走。七日五尅，遥见云山，未克，着大唐明州之杨扇山，申克，到彼山石丹奥泊，即落帆下碇。”[46]日本真如亲王入唐，也是利用前述唐朝商人张友信的商船，张友信为往来大唐明州和日本博多湾的著名唐商，其搭载日本真如亲王入唐的航线，也是从博多湾出港，经值嘉岛，横渡东中国海，抵达唐朝明州的大洋路。虽然，其时唐人尚不能使用指南针，但可以肯定的是唐商船基本能够利用季风和洋流航行，故仅需四日即横渡东中国海，抵达大唐明州。

宋元时代，日本虽然与宋朝并无外交关系，甚至由于元朝忽必烈两度入侵日本导致元日关系恶化，但是，日本与中国的海域交流往来却仍然十分密切，而且中日海域交流的航路主要是大洋路。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宋朝商人经常从明州出港，有的携带《大宋国牒状》送达日本太宰府，宋商往返大体上是从明州横渡东日本海，抵达日本博多湾，尤其是日本永观元年（983），日本高僧奝然即是搭乘宋商陈任爽、宋仁满的船横渡东中国海，抵达宋朝浙江台州沿岸；奝然入宋朝拜天台山后，赴宋都参拜宋太宗，向宋太宗献上《日本年代记》《职员令》等有关日本的资料，花山天皇宽和二年（986）七月回国时，亦是乘宋商郑仁德的商船沿大洋路回到博多湾，并带回太宗所赐的宋版《大藏经》等。日本长保五年（1003）八月，日本高僧寂昭从肥前值嘉岛出港，横渡大洋路，九月抵达宋朝明州，并于次年（1004）抵达宋都东京，拜谒宋真宗，获赐圆通大师称号。据《历代皇纪》载：是年“八月二十五日，参州入道寂昭、僧元灯、念救等离日本，进发西海。九月十二日，着大宋国明州府”。[47]而入宋僧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则进一步明确记载了大洋路的航线、行程，其谓：“（日本）延久四年（1072）三月十五日寅时，于肥前国松浦郡壁岛（即加部岛，今属佐贺县唐津市），乘唐人船……船在壁岛西南浦……十六日寅时，依有东风，出船，上帆。无几，有西风，船还著本泊了……十九日天晴，寅

时，东北顺风大吹……即以舻进船。卯时，上帆，乱声击鼓，出船。爰东风切扇，波涛高猛，心神迷惑。不修行法，心中念佛，随波上下，船亦转动（弟子）圣秀、心贤、长明，不觉醉卧……二十日天晴，飞帆驰船，云涛遮眼，只见渺渺海，不见本国山岛。午时，比[48]过高丽国耽罗山……申时，少雨下，入夜不晴，不见星宿，只任风驰船，不知方角。由唐人所申，终夜雨气不散，只以非大雨为悦。闻风浪声，犹如鸣雷……二十一日，风吹如故，雨气不散……二十二日，天晴，艮风大吹，唐人为悦……林皋告云：‘昨日未时入唐海了’。‘以绳结铅，入海底时，日本海深五十寻，底有石砂；唐海三十寻，底无石有沼。’……林皋，但马唐人林养子也。予见四方无山无际，三人犹醉卧。终日竟夜飞帆驰船……二十三日，雨下，艮风大吹，波浪高扇。午时，天晴风止。海中留船，待顺风吹……戌时，得顺风，驰船。终夜飞帆。二十四日，天晴。风吹如故，驰船不止。午时，风止，船留。令人登桅，见山。戌时，南岛称不见。风吹来，终夜向北驰船，人人竟夜叹息，雀犹在船。二十五日，天晴。东北风吹，大悦。进船。巳时以后，四方大翳，不辨东西。午时天晴，顺风如故。未时，始见苏州石帆山，大岩石也，无人家。船人大悦。丑时，至苏州大七山宿。从日本国至大唐苏州，三千里。（自注：弘法大师云：‘南路间，三千里到苏州。’）二十六日，天翳，不知东西。不出船。依无顺风，以舻进船。申时，著明州别岛徐翁山。无人家，海水颇黄。西南见杨山，有人家。三姑山始相连，有人家。将著徐翁山间，北风大吹，骚动无极。殆可寄岩石，适依佛力，得著别岛宿。诸僧皆醒，如死亦苏。二十七日丁未，天晴。巳时出船，依有北风，以舻进船。未时，著明州黄石山，山石并土，其色如红。大海水大浊，最黄。‘从此岛得顺风，一日至明州’云云。北见北界山，有人家。依南风，吹去黄石山，回船著小均山，黄石西南山也。有四浦，多人家，一浦有十一家，此中二宇瓦葺大家，余皆萱屋……小均山东南有桑子山……桑子山南，隔海数里有大均山，有二十四澳，各人家多多也。大均山西畔有隋稍山，有港，无人家。小均山顶有清水，法师等以瓶三口取水来，献佛。”[49]以上成寻将从日本平户岛至宋朝明州的航路及其行程记载得十分详细，此亦是12世纪中日海域经大洋路交涉的重要史料，虽然其记载中提及的有关地名、山名争议较多，但毋庸置疑，成寻入宋时，大洋路已经成为中日海域交涉的主要航路。

南宋时，由于只有明州设置市舶司，故日本与南宋的交涉往来，几乎全部是从博多湾出发，经平户岛，横越东中国海，抵达明州的大洋航路。值得注意的是，大洋路史料明确提到的平户岛，即位于遣唐使时代

往来大洋路的值嘉岛，南宋时已经成为中日大洋路航行的主要停泊地，如四条天皇嘉祯元年（1235），荣尊大师和东福寺开山辨圆一行赴宋，其航路为“（荣尊）师岁四十一，与辨圆共乘商船，出平户，经十昼夜，直达大宋明州”。[50]此外，《元亨释书》中亦载日本著名高僧荣西于后鸟羽天皇建久二年（1191）回国时航路，谓：“西趋出到奉国军（今改庆元府，即宁波），乘杨三纲船，抵平户岛苇浦。”[51]故木宫氏亦谓：“日宋商船往来于日本博多和宋朝明州之间，而来往的时期则是，从日本开往宋朝似乎多在三、四月，从宋朝开往日本似乎多在五、六月。”[52]这表明，南宋时期，中日两国商船已经充分掌握了季风规律。盖东中国海季风，一般是每年的九月到次年的四月常刮东北季风，因此，日本商船一般利用此季风从日本博多驶往庆元；每年五六月间常刮西南季风，则有利于利用西南季风从庆元港返抵日本博多。此外，中国海船自北宋末年已经开始使用指南针。宋代文献《萍州可谈》和《梦粱录》都说到了指南针的重要性，指出在白天和阴天，舟师就是靠指南针去认识方位。[53]作为全天候的导航工具，指南针的使用，使得宋日商船能够顺利地在海上辨别航向，通过大洋路进行海域往来交流。木宫氏专门整理了入宋僧和入籍宋僧往来宋朝的出港和抵达宋朝的上陆地点以及渡海年月，颇值得参阅。[54]

日本平清盛时代，日宋贸易日渐频繁，南宋商船也不断通过大洋路驶往博多湾，而承安二年（1172），南宋明州刺史致书和方物于日本国王，平清盛不顾众卿大臣反对，亦致答礼回赠。[55]此外，日本商船也通过大洋路往来博多湾与明州进行贸易，据《开庆四明续志》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56]镰仓时代，虽然元朝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但是，不仅未能阻隔两国的海上往来和贸易，而且，还随着元丽联军海上对日本的征伐，元江南军从庆元港出发，直接开辟了由庆元抵达平户岛的航线，从而形成了以平户岛为枢纽的东亚海上交涉网络。

据木宫氏列举《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统计，从日本建治三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到正平十九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日本商船多是由博多，沿大洋路往来元朝庆元（明州，即今宁波）进行海上贸易，至少达四十余次，且多是日本商船，尤其是弘安之役结束后，元大德二年（日本永仁六年，1298）元成宗命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持国书前往日本，以重新修好两国交往；次年，一山一宁即是搭乘由博多驶往庆元的日本商船，横渡大洋路，抵达日本博多，被日本尊为“国

师”。[57]元船驶往日本却并不多见，据史料记载，日本正平五年（1350）三月，元商船送还入元僧龙山德见等十八人抵达博多。故元代的中日海上交涉航路几乎全部是沿大洋路，从日本博多出港，横渡东中国海，抵达元朝的东南沿海主要是庆元港，并从庆元港往返日本。元至治元年（1321），对沿海市舶司加以裁撤，改设庆元、广州、泉州三个市舶提举司，直到元末未再发生改变，因此，木宫泰彦谓：“宋代以来，庆元一直就是对日的贸易港，在这三港之中距日本最近，所以，日本商船开往元朝的几乎都驶进此港，仅有一、二个例外。”[58]而日本前往元朝的商船，也和前代一样，在博多港启航，并横渡东中国海，抵达庆元港，航海日数一般只是十天左右。因此，博多—庆元构成了此一时期中日海域主要的贸易和人文交涉港口。

1368年明朝建立，朱元璋为了防止东南沿海的倭寇骚扰和消除方国珍、张士诚等割据势力的海上威胁，决定实行海禁政策，“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59]洪武十四年（1381）十月，朱元璋再次下禁海令，规定“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60]尤其是胡惟庸、林贤谋反案爆发后，朱元璋痛恨与谋反案勾结的日本，决定切断与日本的一切贸易，并将其列为“不廷之国”，永绝与日本的贸易。故洪武末期，海禁甚严，明朝海商禁止前往日本、东南亚等海外诸国贸易。除琉球外，几乎海外诸国与明朝的朝贡贸易也一律禁绝。此举不仅使中日海域交涉基本中断，而且使自遣唐使废止后10～14世纪的中日海上大洋路交涉也几乎中断。中日海域交涉不得不透过琉球王国进行。这样南岛路在遣唐使后期被废弃后，随着明朝与琉球朝贡关系的建立，再次成为东中国海海域交涉的主要航路。琉球王国于洪武五年（1372）正月与明朝建交；是年，朱元璋派杨载由福州出港，经南岛路，出使琉球；同年十二月，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其弟泰期亦经此道赴明朝朝贡，“由是琉球始通中国，以开人文维新之基”。[61]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赐给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62]直至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中国与琉球的交涉，一直使用南岛路航线。而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再度严厉实施禁海令，并将其扩大到东南亚诸国，乃致“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63]中日之间的海域交流基本上完全中断，不得不利用琉球进行转口贸易。一方面，琉球从东南亚购进明朝需要的朝贡品，以维持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琉球从明朝购进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所需要的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以与日本、东南亚诸国贸易。所以，14世纪末期，在东亚海域的交涉网络中，琉球成为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中心，并承担了枢纽贸易的地位和作用。

综上所述，10～14世纪，中日海域交涉网络大体经历了北路、南岛路和大洋路的变迁，其中宋元时代，亦即日本平清盛政权崛起到镰仓幕府以及南北朝时代，中日海域交涉的航路主要是大洋路，宁波和博多成为中日海域交涉的主要港口。随着明朝海禁政策的实施，中日海域交涉基本停止，大洋路航线也几乎被废止。14世纪末，明朝和琉球的朝贡关系建立后，中琉海上朝贡贸易逐步取代了中日海域交流，而琉球则成为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中心，并发挥了东亚海域交流枢纽的作用。

二 中日韩三国海上丝绸之路与人文交流

10～14世纪，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承载着物质文化的交流，也承载着精神文化的交流。

首先，中日韩之间的海洋物质文化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中韩的朝贡贸易和三国民间贸易两个方面。朝贡贸易是高丽时代中韩两国最传统也是最基本的贸易形态，两国都设立了一系列管理朝贡贸易的机构，如宋元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板桥镇设置市舶司，此外，还在澉浦、华亭、温州等地创置了市舶场或市舶务，市舶机构掌管“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64]其中，广州和泉州市舶司，主要掌管往来南海诸国的海上贸易品，而明州和杭州市舶司，则主要掌管往来高丽、日本等东北亚海上的船只物货。所以，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所进行的贸易往来，主要是由明州和杭州市舶司管理。市舶司主要负责对高丽朝贡物品的检验、解运、收纳、交易和处理等贸易事务。但是，元朝统一中国后，随着海运的兴起和陆路贸易的开拓，元朝与高丽之间的朝贡贸易由海上贸易转为陆路贸易为主，即从元大都出发，经辽东半岛，渡鸭绿江，趋平壤南下，抵开京。不过，民间贸易却仍有沿袭海上丝路者，如《朴通事彦解》记载高丽商人赵舍就是从海路来到元朝进行贸易的。[65]只是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实行海禁政策后，元丽的民间海上贸易被迫中断。迄元末战乱、方国珍割据浙东，才开始重新启动宋朝明州（元改称庆元）至高丽的海上航路。

此外，高丽王朝不仅对中国海商设置有专门的驿馆，而且，也相应地制定了有关管理王室朝贡贸易的制度，主要是掌管中国皇帝颁授的诏书和领受皇帝的恩赐，而高丽大、小府寺则负责收纳、处理中国皇帝赐予的物品以及向中国王朝进献方物等事务。中国从海上输往高丽的贸易品主要是各种绫罗绢纱等丝织品和赐予高丽国王的衣带等服饰、鞋靴之

类物品以及瓷器、茶叶、药材、沉香、玉器、金银器、乐器、鞍马、笔墨纸砚等，而高丽对中国的输出品则主要是衣褥、银、铜器、人参、麝香、松子、药材、苎布、香油、草席、折扇、松烟墨、狼尾笔、螺钿漆器等。显然，双方交易以土特产品和手工产品为主，当然也有部分物品如香料等为少数从南洋转运而来的交易品，反映了10～14世纪东亚海上贸易网络的形成。日本虽然没有与宋元王朝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朝贡贸易，但是，宋日、元日商旅和高僧的往来，往往承担着为两国递交书信和进行贸易的功能，而日本回赠宋朝礼物的举动，也往往被宋朝视为是日本对宋朝进行朝贡的行为，如《宋史·日本传》载“天圣四年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国太宰府遣人贡方物，而不持本国表，诏却之”即是如此。[66]

其次，中日韩三国民间海商经营的贸易活动异常活跃。新罗时代，在东亚海上航行的最大的贸易集团是崛起于朝鲜半岛东南端莞岛海上的张保皋贸易集团，其一度垄断了东亚的海上贸易。10～14世纪，活跃在东亚海域的海商主要是宋朝海商，他们从东南沿海横渡东海，组成中、小型船队前往高丽、日本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抵达高丽之后，宋商在高丽礼宾省的安排下，住于高丽清州、忠州、四店、利宾等馆驿中。这四座馆驿为高丽专门接待宋商的客馆，宋商在高丽的贸易活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与高丽王室进行的所谓“朝贡”贸易，在《高丽史》中多被记载为“献方物”等，高丽国王再以“方物数倍偿之”；[67]另一种是民间进行的自由贸易。对于宋商进行的民间贸易，由于高丽并无统一固定的市场，“唯以日中为虚，男女老幼、官吏工技、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68]而且，高丽也无抽解和征税的制度，只是宋商回航时，高丽监察御史要对商船进行检视，以防止携带违禁物品出境。除宋商来高丽贸易外，高丽商人以王室为首也经营对中国的海上贸易，丽商主要依附于高丽使团和搭载宋商船进行贸易，其贸易品主要是银、铜器、螺钿器、苎布、绸缎、人参、麝香、松子、药材以及香油、草席、折扇、松烟墨、狼尾笔、高丽纸、漆器等，以换取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织品和药物、香料、书籍、佛教用具、玉器、木器、文具等各种物品，而明州则是丽商在宋进行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而宋商与日本的贸易，一般是到达博多后，由太宰府检查公文，将宋商安置在太宰府鸿胪馆内供应食宿，由京城派出交易唐物使与宋商交易。日本商人到达明州后，也是先由市舶司进行检查是否携带违禁品，然后进行抽分和博买，再允许商人进行交易。值得注意的是，从宋理宗

宝祐六年（1258）开始，宋朝便对日本商船载运的黄金豁免抽分、博买，听其与民间自由贸易。宋商向日本交易的土特产品主要是锦、绫、香药、茶具、瓷器、文物等；日本商人向宋朝的交易品则主要是螺钿、莳绘（描金画）、金银漆器、水晶、红黑木、扇子、屏风等，尤其是螺钿漆器和日本折扇，深受宋人喜爱。据宋人方勺《泊宅编》载："螺钿器本出倭国，物象万态，颇极工巧，非若今世人所售者。"[69]即日本所制螺钿漆器等，其工艺十分精致，而日本折扇之倭绘，亦被作为艺术精品，受到宋人称赞。《皇朝类苑》作者江少虞论及日本折扇时亦云："熙宁末，余游相国寺，见卖日本国扇者，琴漆柄以鸦青纸，如饼楪为旋风扇，淡粉画平远山水，薄敷以五彩。近岸为寒芦衰蓼，鸥鹭并立，景物如八、九月间。舣小舟，渔人披蓑钓其上。天末隐隐有微云飞鸟之状。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70]此外，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对日本刀剑的工艺水准也赞不绝口。[71]由于宋朝和日本平氏政权均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故日宋民间贸易日益发达，不仅大量宋商横渡大洋路赴日本博多，而且日本商船也学会了使用指南针，并熟练地根据季风和洋流横渡东中国海，抵达明州贸易。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陷临安（杭州），次年，元朝在庆元、泉州和广州、上海、澉浦设置市舶司，后又在温州、杭州设置司舶司。然屡经裁撤合并，至至治元年（1321），改为庆元、广州、泉州三个司舶司，直到元末未再改变。其中，庆元港仍然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元朝与日本虽然发生了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但是两国民间贸易并未受到重大影响。木宫泰彦先生说："日本驶往元朝的商船，除兴国三年（1342）派遣的天龙寺船是特殊例外，其余都是私人的商船，往来极为频繁，几乎每年不断。元末六、七十年间，恐怕是日本各个时代中商船开往中国最盛的时代。"[72]所谓天龙寺船，主要是由足利幕府派出的官方船只，是为修建天龙寺募集经费和贸易而经官方特批的商船，而日本对元朝的贸易港也和宋代一样，仍然在博多港出港。日本从元朝的输入品主要是以铜钱、香药、佛教经卷等为大宗，而随着禅宗在日本的兴起，与禅宗有关的茶具、什器、禅僧语录、诗文集、诸子百家的书籍等亦广泛流入。此外，文具、唐画和金丝制品、纱、绢、唐锦、毛毡等，也是日本输入的主要贸易品。而日本输往元朝的物品，则主要是黄金、扇子、刀剑、描金、螺钿、漆器等为主。

最后，中日韩海上的精神文化的交流形式多样、影响深远。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交流，也是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中日韩海

上丝绸之路在人文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科举制度和理学传入高丽与禅宗传入日本，这是此一时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中日韩人文交流最重要的成果。首先，10～14世纪，中国宋、元王朝都有大量士人移居高丽，并出任高丽的官职，而高丽也派出大量留学生进入宋朝国子监求学，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化，有的还参加宋朝的科举考试，并一举及第。高丽光宗七年（956），后周进士双冀入居高丽，并于光宗九年（958），正式将中国的科举制度引进高丽，效法中国，以进士、明经科为主，开科取士，从此，科举制度成为高丽教育培养人才的主要制度，其极大地促进了高丽文教事业的发展。其次，高丽儒士安珦在元朝留学，将宋代兴起的程朱理学传播到高丽，从而成为朝鲜王朝的主要意识形态，对朝鲜王朝的思想和文化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而禅宗在日本的兴盛，则是此一时期中日海上人文交流的重要成果。禅宗虽然早在唐代就已经通过遣唐学问僧传到日本，但是在日本影响并不大。宋元时期，随着禅宗在中国的日益兴盛，日本入宋僧亦颇受禅宗影响，回到日本后大力弘扬禅法。如入宋僧荣西于建久二年（1191）回国传播禅宗，在博多修建圣福寺，在镰仓创立寿福寺，在京都创建建仁寺，大力宣扬禅法。镰仓幕府的执政北条时赖于宽元四年（1246）延请宋朝高僧兰溪道隆来日，在镰仓创立建长寺，与荣西法孙圆尔辨圆在京都开创的东福寺遥相呼应，使日本禅宗大为兴盛起来。这不仅对于日本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于日本儒学、文学、书法、绘画以及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的传播和交流。高丽忠宣王时，高丽使节文益渐出使中国元朝，将棉花种子带回高丽，从而在高丽大面积种植和推广，推动了高丽棉织业的兴起，并改变了高丽人的生活方式；而日本僧人圆尔辨圆的弟子弥三入宋时，则学习了宋朝的纺织广东绸和缎子的技术，回国后在博多创制了“博多织”，从此，日本丝绸纺织业开始发展起来。仁安三年（1168），日僧荣西入宋，除朝拜天台山和阿育王山，并带回天台新章疏三十余部以外，还将宋朝的茶种带回日本，并著有《吃茶养生记》二卷，提倡吃茶养生之道，使日本饮茶之风盛行，尤其是饮茶与禅宗的流传相结合，所谓“茶禅一味”，极大地改变了日本朝廷、僧侣和贵族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神风尚。

第三，音乐、舞蹈和诗词文学的交流，主要是《高丽史·乐志》保留有宋雅乐，而雅乐在中国已失传矣。宋神宗时，有高丽乐人随使节来东

京献艺舞蹈，宋丽音乐交流主要是宋徽宗时期。此外，宋元和高丽使臣间也进行诗词唱和和交往，如高丽使朴寅亮《使宋过泗洲龟山寺》“门前客棹洪涛急，竹下僧棋白日闲”等深受宋人赏识，宋人将其与金觐二人的诗文合刊为《小华集》，而宋人苏东坡词更为高丽文士所喜爱。高丽忠宣王留居元朝大都，筑万卷堂，高丽文士李齐贤等与元朝名士阎复、姚燧、赵孟頫、虞集等文人多有诗词唱和与交流，尤其是元代赵孟頫的书法——松雪体风格亦颇受高丽文士喜爱，并流行于高丽。

10～14世纪，中日文学交流最主要的成就是随着入元僧大量来到元朝参禅和领略中国的名山大川，其汉文学水平亦大为提高，并出现了汉文学的高峰——“五山文学”。如入元僧携带日本禅僧义堂周信的诗稿来中国，嘉兴天宁寺主持楚石梵崎称赞其谓：“不意日本有此郎耶，明人皆云：疑是中华人，寓其人者之作也。”[73]杭州中天竺的如兰，看到绝海中津的诗集《蕉坚稿》后，也赞不绝口，谓：“虽吾中州之士老于文学者，不是过也。且无日东语言气习。”[74]尤其是五山文学的创始人雪村友梅，其在德治二年（1307）入元，到元德元年（1329）回国，久留元朝22年。其著名的《岷峨集》即是其被当作间谍流放西蜀期间所作，其诗文水平并不低于宋元诗人。此外，被元僧清拙正澄评为“概得大唐音调，话意活脱，如珠走盘”[75]的入元僧别源圆旨所撰《南游东归集》、天岸慧广的《东归集》、中岩圆月的《东海一伛集》、愚中周及的《草余集》等，均以五山文学而驰名一时。而且，入元僧带回的元朝名僧的语录和诗文集，不仅对日本五山汉文学的兴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以五山版为代表的文学出版业的发达。此外，入元僧还带回大量的史学、儒学以及书法、绘画等作品，并将宋元时代的中国的唐式茶会仪式传入日本，成为今天日本民间所谓“茶之汤”的渊源，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社会生活。

第四，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来华，所进行的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版《大藏经》《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以及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方国珍主政浙东时，还专门向高丽赠送《玉海》《通志》等典籍；而高丽由于“异书甚富，自先秦以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家几千集”。[76]因此，也有大量高丽书籍输往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77]此外，宋本已不全的《说苑》，幸赖高丽所献方得以补全；而已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

等古籍，也是由高丽重新输入宋朝。高丽忠肃王元年（1314），高丽博士柳衍奉高丽国王之命赴中国江南购买书籍一万零八百卷，同年，元仁宗赠送给高丽宋秘阁所藏善本书4371册、达一万七千余卷。[78]中日典籍交流最重要的成果当是佛教典籍的交流，入宋僧和入元僧均带回大量的佛教经卷，如入宋僧重源陆续将宋版《大藏经》输入日本，而且唐版《一切经》和宋版《大般若经》等也由其输入日本。[79]入宋僧除了带回宋版《大藏经》外，还带回了大量的佛教经论章疏以及禅宗典籍、儒家经典、诗文集和医书等，尤其是东福寺开山圆尔辨圆自宋带回典籍达数千卷，并亲自撰写《三教典籍目录》，[80]涉及儒释道经论、章疏、语录、诗文集、医书、字帖等，是日本文化史上的珍贵资料；而入宋僧俊芿不仅将南山律宗传入日本，其与儒士亦多有交流，时值南宋理学大兴，俊芿将朱熹所著《四书集注》带回日本，对日本宋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五，宗教文化的交流。因高丽、日本举国信佛，故宋元与高丽、日本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佛教的交流。其中，影响较大者有中日韩三国《大藏经》的互赠和交流；高丽僧人谛观、义通和高丽王子义天来宋朝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尤其是天台宗有关典籍的回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丽僧义通也被尊为天台宗第十六祖嫡传祖师。而高丽王子义天在宋哲宗时期来中国，遍访名山古刹，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其带来的华严宗大量的典籍足可以补中国华严宗典籍之缺，其从杭州慧因院净源法师学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义天还向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请教天台教观之道，义天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余卷，并主持高丽国清寺，在高丽弘扬天台、华严二宗，提倡教观兼修，还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而元朝高僧绍琼应高丽僧人邀请去高丽弘法，高丽僧冲鉴拜元僧绍琼为师，以《百丈清规》为高丽禅宗寺院的法规，而绍琼被尊为“瑝明国师”；高丽僧宝鉴国师混丘与中国僧人也多有交往，元禅师“尝作《无极说》，附海舶以寄之，师默领其义，自号无极老人”。[81]可见，高丽时代，两国高僧经常通过海上航路进行文化交流。

日本来访中国的高僧，称为入宋僧和入元僧，其初期代表性高僧主要是奝然、寂昭和成寻，他们不仅巡礼宋朝的佛教圣迹，而且还先后受到宋朝皇帝的接见。此外，为了重振律宗，正治元年（1199）四月，俊芿率领其弟子入宋，师从明州景福寺僧如庵学习律宗三年，然后登明州雪窦山、临安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学禅。此外，还赴嘉兴府（元代称为松

江府）的超果教院，从北峰宗印学天台宗等，其久住临安，与禅宗、律宗大师谈教论道。其在宋朝凡十三年，于建历元年（1211）回国，得到高仓、后鸟羽、顺德天皇的皈依，在京都创立泉涌寺，大力弘扬律法。盖自奈良时代，唐朝鉴真大师将律宗传到日本，律宗一度兴盛外，到平安时代中叶，律宗在日本日趋没落，至此，律宗方得以重新复兴。当然，宋日宗教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是禅宗在日本的传播。宋初，入宋僧奝然回国时，即以三学宗的名义，宣讲戒、慧和禅法。承安元年（1171），比睿山觉阿大师率领弟子入宋，继承了临安灵隐寺佛海慧远的法统回到日本，亦在日本宣传禅法。荣西则是日本禅宗的集大成者，其于文治三年（1187）第二次入宋时，因赴印度未果，遂师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怀敞移居天童山后，荣西亦跟从前往，并继承了怀敞的法统。宋孝宗赐予其“千光法师”的封号。回国后，其接受平政子、源赖家的皈依，分别在京都和镰仓修建建仁寺和寿福寺，主张“以戒为始，以禅为究”，[82]大力宣扬禅风，成为日本禅宗的始祖。而入宋僧觉阿，不仅继承了灵隐寺佛海慧远的法统，还赴天台山学禅，回国后庵居比叡山。日本高仓天皇闻知其高风大德，特向其请教禅宗指要。故几代天皇均皈依禅宗，从而对禅宗在日本的弘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弘安之役后，两国佛教文化交流虽一度中断，但是随着元成宗命高僧一山一宁持国书渡日，元日僧侣间的交流也逐渐恢复起来。据木宫氏引《竺仙梵仙语录》谓：“壬午（兴国三年，1342）秋，海舶既发，春夏间欲南游者，竞乞赠行，师乃信笔应之若干首，今以一类录之。”[83]由此可见入元僧渡海之盛况。据木宫氏统计，史册留名的入元僧竟多达二百二十余人。[84]这些入元僧或久居元朝，与元朝高僧大德进行禅、律经论之切磋交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入元僧主要有龙山德见、雪村有梅、中岩圆月等人，他们参访元代江南名刹，修习禅法，回国后大都继承元朝禅宗名师的法统，主持京都、镰仓等地的巨刹，并将元朝时中国之儒学、文学、书法、绘画、建筑、印刷等文化技术带回日本，尤其是雪村友梅、中岩圆月还成为日本五山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从而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除了入宋、入元僧以外，宋元两代均有一些高僧大德来到日本弘法，甚至有的入籍日本。宽元四年（1246），宋朝大觉禅师兰溪道隆率领其弟子义翁绍仁、龙江等来到日本，在镰仓幕府北条时赖的支持下，成为建长寺开山之祖。兰溪道隆依中国宋朝的禅林清规，在日本讲授禅法，这不仅是宋朝禅僧来到日本之始，而且以兰溪道隆主持建长禅寺为

标志，日本的禅宗始真正从天台、真言宗混杂的旧的佛教体系中独立出来，从而对日本禅宗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宋朝南禅福圣寺僧兀庵普宁在兰溪道隆的劝诱下，于文应元年（1260）来日本，并继道隆之后执掌镰仓的建长寺，深得执权北条时赖的赏识，对于禅宗与镰仓幕府武士的结合即所谓“武家禅”的出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弘安二年（1279），南宋灭亡后，禅僧无学祖元应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之邀来到日本，主持建长寺，受到北条时宗和幕府武士的膜拜。弘安四年（1281），其以“毋烦恼”三字激励时宗，终于击败了元军对日本的进攻。次年，镰仓圆觉寺建成，无学祖元成为开山之祖，并被尊为“佛光国师”。在入籍日本的元代高僧中，普陀山名僧一山一宁在弘安之役后，于正安元年（1299）受元成宗的派遣，持元朝国书抵达日本，以表达两国和好之意。其弟子虎关师炼记载当时情形云：“伏念堂上和尚往己亥岁，自大元国来我和域，像驾侨寓于京师。京之士庶，奔波瞻礼，腾踏系途，唯恐其后。公卿大臣，未必悉倾于禅学，逮闻师之西来，皆曰：‘大元名衲过于都下，我辈盍一偷眼其德貌乎！’……见着如堵，京洛一时之壮观也。”[85]其先住镰仓建长寺等，后宇多天皇遥慕高风大德，特下诏关东，邀请其主持京都南禅寺，并向其请益禅法。其去世后，上皇赐以“国师”的封号，并亲撰像赞，谓：“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一山一宁在日本先后在镰仓、京都弘扬禅法，不仅为以镰仓为中心的“武家禅”的兴起做出了贡献，而且也促进了日本禅宗由“武家禅”向“朝廷禅”的过渡。一山一宁对儒家《易经》和宋学等也颇多研究，他不仅为其弟子虎关师炼解疑释惑，而且敦促虎关师炼留意收集日本佛教史籍和高僧遗事，终于撰成日本佛教史上的巨著《元亨释书》三十卷。在渡日元僧中，清拙正澄是另一位成就杰出的高僧，其于嘉历元年（1326）应镰仓幕府执权北条高时的两度邀请，偕同日本入元僧来到日本，先后入住建长寺、懂理净智、圆觉寺，并奉后醍醐天皇诏旨，赴京都主管建仁寺、南禅寺，又受日本武家礼法创始人小笠原贞宗之邀，在其家乡信浓创建开善寺，成为开山之祖。《本朝高僧传》对其评价谓：“大凡东渡宗师十有余人，皆是法中狮也。至大鉴师（正澄）可谓狮中主矣。”[86]其对日本禅宗最大的贡献是依据《百丈清规》，整肃日本丛林禅规，并仿照杭州灵隐寺制度，重修僧众寮等，对日本社会武家礼法的制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入籍元僧中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也对元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明极楚俊和竺仙梵仙于元德元年（1329）来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和幕府的礼遇，其中明极楚俊先后主持建长寺、南禅寺和建仁寺等著名的禅宗名刹，竺仙梵仙也主持过竞妙寺、净智寺、

南禅、建长寺等。建武元年（1334），明极楚俊主持南禅寺时，曾奉敕以南禅寺为天下第一山，位在五山之上。公卿大臣、幕府武士等纷纷皈依明极楚俊、竺仙梵仙，参禅受法，对日本社会精神风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六，陶瓷文化的交流。中国自唐末五代以来，浙江越州（绍兴）龙泉窑烧制的青瓷，薄如纸、声如磬，为瓷器中之珍品，深受朝鲜半岛和日本民众的喜爱。新罗末，张保皋的贸易船曾经从越州带回陶工，开始了朝鲜半岛烧制青瓷的过程，故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认为，韩国烧制瓷器是“通过掠越州窑工来实现的”。[87]故高丽时代，浙东烧制青瓷技术已经传播到朝鲜半岛，韩国的康津成为青瓷的烧制基地。在学习宋人技法烧制青瓷的基础上，高丽陶瓷工匠进一步进行改良，将青瓷颜色由真绿色变为影青瓷釉，烧制出蜚声中外的高丽翡色青瓷，其器形、纹饰也多有变化，纹样有细阴刻草花纹、刻菊唐草纹、阴阳刻莲瓣纹等，[88]被宋人徐兢赞誉为“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唯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89]由于高丽烧制青瓷技术的提高，高丽时代成为韩国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转型时期，高丽也由瓷器的输入国一跃成为对日本乃至东南亚瓷器的输出国。10～14世纪，中日瓷器制造工艺的交流，主要是日本人加藤四郎引进了中国宋朝的制瓷技术，在尾张的濑户开窑，创制了所谓“濑户烧”，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烧制的陶瓷，对日本的饮食文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 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

10～14世纪高丽时代的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是东亚海域交涉网络形成的关键时期，以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初步形成了连接东亚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地中海和非洲的海上航路，而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10～14世纪，东亚海域形成了一系列港口群，除山东半岛的登州和东南沿海的杭州、明州、泉州和广州港外，韩国翁津、开城、仁川、群山列岛、黑山岛、济州、合浦等和日本博多、平户等都成为东亚重要的对外交涉港口。12世纪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港崛起，并与明州港、广州港相连接，成为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海域交流的枢纽港口，泉州港以东、以南，以广州为集散地，主要是与东南亚诸国进行海

上交易；泉州港以北，主要是与明州港对接，连接高丽、日本进行海上贸易和人文往来。随着印度、阿拉伯商人从东南亚以及印度洋海路来华，并渡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泉州遂成为连接东、西部海上航路的枢纽港，并以明州、泉州、广州为中心形成东亚海域的贸易网络和区域集散地，如中韩海上贸易的沉香等香料和象牙、玳瑁、犀角、珍珠等海产品以及部分药材等，均产自西亚或东南亚诸国，而非中国与高丽本土所产，其中，泉州市舶司就经常收入大量从西亚、东南亚进口的乳香、西洋药材以及犀角、玳瑁等海产品，而大部分香料会运到京城香药库，通过中韩海上转赐贸易等形式进行交易。东亚大量港口群的出现，是东亚海上区域交涉网络形成的重要标志。

第二，10～14世纪，不仅形成了连接中日韩三国的海洋航路，而且也形成了东亚海洋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涉的网络。新罗后期，东亚海域的交涉，基本上为张保皋海上贸易集团所垄断，但是，即使是张保皋经营的东亚海洋贸易，仍然是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经过渤海湾抵达山东半岛的航线，其时，中韩之间的南路航线，即明州航线并没有成为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路。但是，高丽中后期，明州至仁川的东海航路已经成为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而高丽对日本的航线，除由高丽西南海岸沿群山列岛南下，经济州岛抵达博多湾航线外，还有由釜山合浦南下，抵达日本对马岛、壹岐岛、博多湾和九州的航线。

10世纪以来，横渡东中国海的明州与博多的大洋路，则成为中日海域交涉的主要航路。因此，日元之间的贸易航线，“在元朝是庆元（宁波），在日本是博多。因此，所有的商船都往来于这两港之间，从而航路一般也是横渡东中国海，航海日数似乎只是十天左右”。[90]此外，随着高丽三别抄抗蒙和琉球王国的建立，也促进了中日韩三国东亚海域网络的形成。随着蒙古对高丽的入侵，高丽三别抄奋起抗争，但是，由于遭到蒙古和高丽联军的镇压，三别抄军不断向西南海域败退，其先后从珍岛撤退至济州岛，随着1273年济州岛被蒙古军攻占，并改为耽罗招讨司，三别抄军残余部分不得不退入日本西南海域琉球群岛。

根据近年来日韩两国的考古资料，在日本冲绳中部浦添市中山王墓遗址中，不断发现刻有莲花纹的高丽瓦当。现今日本冲绳列岛，还残存着琉球王国建立时的城郭遗址，其建筑技术与高丽时代三别抄在珍岛的龙藏城建筑技术十分相似。[91]此外，出土的陶瓷器皿等亦均是高丽时代的遗物。据此，可以推测三别抄军抗蒙失败后，应该是沿日本九州西

南海域撤退至琉球群岛，并在岛上建立了琉球王国，而琉球王国也成为14世纪末期东亚海域交涉网络中的重要枢纽。

因此，10～14世纪，中日韩三国和东亚的海域交涉航线基本上形成，其一即大洋路，由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经平户岛、五岛列岛，到达浙江、江苏沿海；其二即北路，由九州北部经对马岛、壹岐岛、济州岛抵达朝鲜半岛，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渡过黄海，到达山东半岛，遣隋使、遣唐使前期均沿用此航路；其三即南岛路，由九州南部南下，经西南群岛、琉球群岛，抵达福建、浙江沿岸。[92]大体上，10～13世纪以前，日本与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海洋交涉，基本上是采用北路和大洋路，而琉球群岛成为东亚海域的枢纽并作为日本直航福建沿海的所谓南岛路，至迟应该在14世纪已经形成。

第三，10～14世纪，随着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以及中东、西亚、北非等国贸易联系的加强，东亚海域交涉网络得以正式形成。此一时期，出现了东亚海上跨区域贸易的明显特征，尤其是从交趾、占城、真腊、三佛齐、大食等东南亚、中东诸国转运来的香料、象牙、玳瑁等物品，通过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等形式运到中国，除部分留在当地的市舶司以外，大量运到京城的香药库，如宋太平兴国初年“犀象、香药、珍异充溢府库”，[93]并成为中国转赐高丽的重要奢侈品，表明东亚海域贸易网络已经在逐步形成。此外，泉州商人孙天富、陈宝生二人“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阇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亡虑数十万里”。[94]显然，元代的泉州，已经成为连接东南亚和东北亚海域贸易网络的中心。此外，14世纪末期，琉球国遣使向高丽献方物，其中包括从东南亚转输的胡椒300斤，表明以琉球为中介的东亚转口贸易已经形成。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韩国在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发现亚洲最大的古代沉船后，从1976年至1984年，从新安沉船打捞出两万多件中国元朝陶瓷器，28吨、800多万枚中国铜钱，以及1000多件紫檀木制品等众多水下文物，根据学界研究，新安沉船的瓷器等物品的输入地应是输往日本，从而也佐证了东亚中日韩三国已经形成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到高丽群山列岛西海岸，并南下经济州海峡到日本对马岛、博多湾沿岸的海洋区域贸易网络。

结语

10～14世纪的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洋区域交涉网络的形

成，于东西方海洋交涉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随着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10～14世纪，东亚海洋世界真正形成。由于海洋世界的边缘性特征，大陆中央王朝的权力往往难以控制海上世界。海上居民的自由流动和海洋的物质文化交流使得东亚海域形成了由山东半岛经黄海，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经济州岛、博多湾、九州和琉球群岛到中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等地的海洋交涉网络。海上世界具有完整的地域关联性和共同的海上信仰、宗教、民俗等文化生态特征。但是，随着近代民族和主权国家的构建，阻碍了东亚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海洋地域文化的主导地位。”[95]因此，东亚海域相互关联的海上世界，随着各主权国家海洋权力的扩张，海上世界的完整性被打破。由主权国家制定的领海、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法将海上世界分割为隶属于各自主权、民族国家的范畴，并导致了海域世界的纷争。海上世界作为人类未来发展的相对完整的区域，打破岛屿和有关海域权力的纷争，恢复海洋世界本身的相对完整性，并实现海洋沿岸国居民在海上的自由流动和物质、文化的交流，无疑是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败的关键基础。

[1] 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 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宋晞《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陈高华、吴泰编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

[3] 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景仁文化社，2011；金庠基：《东方文化交流史论丛》，乙酉文化社，1948；尹明哲：《韩国海洋史》，海洋文化社，2013。

[4]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66；森克己「遣唐使と新羅との関係—鈴木靖民氏の批判に答う—」『続日宋貿易の研究』国书刊行会、1975；市村宏「第七次遣唐使船の航路——山上憶良研究ノート」『続万葉集新論』樱枫社、1972；青木和夫『日本の歴史』（3）中央公論社、1973；东野治之「正倉院宝物と万葉の歌」周刊朝日百科『日本の歴史』53、古代9；大日方克己「古代における国家と境界」历史学研究别册特集『歴史認識における「境界」』；铃木靖民『古代対外関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85；岸俊男「『吴·唐』へ渡った人々」『日本の古代』（3）中央公論社、1986；山里纯一「遣唐使航路『南島路』の存否をめぐって『立正史学』」71、1992；保科富士男「遣唐使航路の北路変更事情に関する予備的考察——『新唐書』日本伝の記事をめぐって」『白山史学』23、1987；长岛健「遣唐使使船の唐におけ

る接岸地·出帆地と道昭の帰朝年次」『海事史研究』20、1973。

[5] 《宋史》卷487《高丽传》。

[6] 光绪《山东通志》卷27《登州府·山川》，参见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第33页。

[7] 《宋史》卷487《高丽传》。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甲戌。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六年（1046）五月。

[10] 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第31页。

[11]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5《海道门二》，《知不足斋》本。

[12] 参见津田左右吉《朝鲜历史地理》卷2《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

[13] 《宋史》卷331《罗拯传》："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

[14] 《苏东坡奏议集》卷6《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

[15] 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第379页。

[16] 参见崔光南等《东方最大的古代贸易船的发掘——新安海底沉船》，《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7] 《隋书》卷81《东夷传》。

[18] 《新唐书》卷43《地理志》。

[19]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85页。

[20] 参见圆仁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21] 上田雄「渤海使の海事史的研究」『海事史研究』第43号、1986；上田雄·孙荣健『日本渤海交涉史』六兴出版、1990；日下雅义「ラグーンと渤海外交」『謎の王国·渤海』角川書店、1992；新野直吉「古代日本と北の海みち」『芸林』第41巻1号、1992；谷内尾晋司「対渤海交涉と福良港」『客人の湊 福浦の歴史』『福浦の歴史』編纂委员会、1991；古畑徹「渤海·日本間航路の諸問題：渤海から日本への航路を中心に」『古代文化』第46卷第8号、1994。

[22] 『續日本紀』卷13、天平十一年（739）十月丙戌条、十一月辛卯条、十二月戊辰条，张九龄《敕日本国王书》（《全唐文》卷287所收）。古畑徹「渤海·日本間航路の諸問題：渤海から日本への航路を中心に」『古代文化』第46卷第8号、

1994。

[23] 『續日本紀』巻22、天平宝字三年（759）十月辛亥条。古畑徹「渤海·日本間航路の諸問題：渤海から日本への航路を中心に」『古代文化』第46巻第8号、1994。

[24] 参见中島楽章「序論·宁波と博多-東アジア海域の二つのクロスロード」中島楽章·伊藤幸司編『序論·宁波と博多』東アジア海域丛書11、汲古書院、2013。

[25] 谢必震：《中国与琉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26] 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66。

[27] 市村宏「第七次遣唐使船の航路——山上憶良研究ノート」『続万葉集新論』櫻枫社、1972；东野治之「正倉院宝物と万葉の歌」周刊朝日百科『日本の歴史』53、古代9；大日方克己「古代における国家と境界」历史学研究别册特集『歴史認識における「境界』。

[28] 参见山里純一「遣唐使航路『南島路』の存否をめぐって」『立正史学』71、1992。

[29] 『日本書紀』巻25、白雉四年（653）七月条。

[30]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81页；森克己『遣唐使』、48頁。

[31] 『續日本紀』、慶云元年（704）七月甲申朔条。

[32] 『萬葉集』巻5。

[33] 『續日本紀』、天平六年（734）十一月丁丑条。

[34] 李尚全：《慧灯无尽照海东：鉴真大和尚评传》附录引真人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51页。

[35] 《新唐书》卷220《东夷传》。

[36] 《新唐书》卷220《东夷传》。

[37]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83页。

[38] 『續日本紀』、天平勝宝六年（754）三月癸丑条。

[39]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84页。

[40]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84页。

[41]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84页注释5。

[42]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20页。

[43] 『大日本佛教全書』引『安祥寺惠運傳』。

[44] 『日本三代實錄』卷45、元慶八年（884）三月廿六日丁亥条。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13页。

[45]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13页。

[46] 『大日本佛教全書』引『頭陀親王入唐略記』。

[47]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62页引《日本历代皇纪》。

[48] 一作“北”，参见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1，白化文、李鼎霞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第3页。

[49]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1，第3～7页。

[50] 『續群書類從』第9辑上『傳部』卷226『神子禪師榮尊大和尚年譜』、續群書類從完成会、1958、298頁。

[51] 虎關師錬『元亨訳書』卷2『榮西傳』。

[52]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98页。

[53] 朱彧：《萍洲可谈》卷2：“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吴自牧：《梦粱录》卷12：“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参见曾昭璇《我国宋代横渡印度洋的航行》，《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6年第1期；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东疆学刊》2000年第4期。

[54]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98页。

[55] 《宋史》卷491《日本传》。

[56] 梅应发、刘锡：《开庆四明续志》卷8。

[57] 《妙慈弘济大师行纪》，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12页。

[58]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00页。

[59] 《明史》卷205《朱纨传》。

[60] 《明太祖实录》卷139，洪武十四年十月。

[61] 『球陽』卷1、角川書店、1982。

[62] 《明会要》卷77《外藩一·琉球》，中华书局，1956。

[63] 《明太祖实录》卷254，洪武三十年七月。

[64] 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中华书局，1957。

[65] 《朴通事谚解》卷中。参见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66] 《宋史》卷491《日本传》。

[67]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6。

[68]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

[69] 方勺：《泊宅编》。

[70] 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卷60《风俗杂志》。

[71]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5。

[72]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94页。

[73] 《空华日工集》，应安八年三月十八日。

[74] 《蕉坚稿跋》，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93页。

[75] 《南游东归集跋》，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93页。

[76]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之十二。

[77] 《高丽史》卷10《宣宗世家》，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78] 《高丽史》卷34《忠肃王世家》。

[79] 《上醍醐类集》建保六年三月载："爰造东大寺上人大和尚重源聊依宿愿，从大唐凌沧海万里之波浪，渡七千余轴之经论。"

[80] 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53页。

[81] 李齐贤：《宝鉴国师碑铭》，《益斋集》卷7。

[82] 《兴禅护国论》卷3《世人决疑门》。

[83] 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20页。

[84]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20页。

[85] 虎關師錬『濟北集』卷6『上一山和尚書』。

[86] 《本朝高僧传》卷25《正澄传》。

[87] 转引自朴永锡等《张保皋的新研究》，时事出版社，1992，第105页。

[88] 参见尹龙二《韩国美术史的现状》，汉城艺耕出版社，1992，第239页。

[89]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2。

[90]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01页。

[91] 参见『日本と朝鲜半岛2000年下』日本NHK出版、2010、41頁。

[92] 参见中島楽章「序論·宁波と博多-東アジア海域の二つのクロスロード」中島楽章·伊藤幸司編『序論·宁波と博多』東アジア海域丛書11、汲古書院、2013。

[93] 《宋史》卷268《张逊传》。

[94] 王彝：《泉州两义士传》，《王常宗集》续补遗，转引自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陈高华文集》，第379页。

[95] 安成浩：《东海海洋文化研究与海洋文化再认识》，金健人主编《韩国研究》第1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348页。

浅析宋元时期东亚海域各国间的“医师外交”现象[1]

赵莹波[2]

有关东亚医学交流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明代以后以及近代东亚各国间的医学交流。中岛乐章、町泉寿郎和陈明等学者主要关注明清以来东亚医药的交流；[3]王勇、程永超和郭秀梅等学者主要关注明清东亚各国医师的交流；[4]刘士文、王文基等学者合著的《东亚医疗史——殖民、性别与现代性》（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7），书中以东亚整体为范围，探讨18世纪以来东西方医疗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不过以笔者管见，其中对宋元时期东亚海域各国间医师和医学交流方面的研究甚少，尤其对利用医师移动开展灵活外交方面的研究尤为缺乏。本文拟利用《宋史》《元史》《大宰府天满宫史料》[5]《高丽史》等中日韩多国史料，探讨宋元时期医师在各国外交活动中的作用。

一 早期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医师移动

东亚海域各国间医学交流最早可追溯到5世纪，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414年春，日本倭王患病遣使向新罗以求良医，“三年春，西朔，遣使求良医于新罗”。[6]同年秋天，新罗医师抵达日本，为倭王医治并受到厚赏，“秋八月，医至自新罗，则令治天皇[7]病，未经几时，并已差也。天皇欢之，厚赏医归于国”。[8]另外，在公元553年，朝鲜半岛的百济向倭国派遣五经博士和医博士，“百济送五经博士医博士”。[9]以上表明朝鲜半岛名医辈出，且与日本医学交流由来已久。

公元650年，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一起遣使赴日，其中随高句丽使者前往的就有医师，“甲申，朝庭队仗，如元会礼仪。左右大臣乃率百官及百济君-丰璋，其弟塞城、忠胜，高丽侍医毛治，新罗侍学士等，而至中庭”。[10]公元675年，百济、新罗遣使向日本奉献医药和名贵礼物，“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大学寮诸学生，阴阳寮及舍卫女、坠罗女、百济王-善光，新罗仕丁等，捧药及珍异类等物进”。[11]由此可见，5~7世纪，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医师交流可谓络绎不绝，其医师的移动与交流，主要是前者向后者派遣医师。

但是，日本也很重视发展自己的医学，并常对医师予以奖励和赐爵。公元602年，日本朝廷对包括医师在内的二十多人进行奖励，“甲

寅，召诸才人、博士、阴阳师、医师者并二十余人，赐食及禄”，[12]而且还授予包括医师在内的三十多人爵位，“庚午，工匠、阴阳师、侍医、大唐学生及一二宫人并三十四人，授爵位”，[13]并赐予医师等每人银子二十两，“十二月，戊戌朔己亥，赐医博士-务大参-德自珍、咒禁博士-木素丁武、沙宅-万首，银人二十两”。[14]

二 宋朝时期宋朝与高丽、日本的“医师外交”

宋元时期，东亚各国彼此间无正式的外交关系，高丽向辽奉正朔。日本自唐末以来，就停止派遣持续二百多年的“遣唐使”，断绝了与唐朝的正式外交关系。[15]东亚国际秩序处于重塑阶段，权力处于真空。虽然宋朝与日本、高丽彼此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文化交流却很频繁。此时东亚各国大多通过宋商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而医师的交流也并未中断。不过与早期朝鲜半岛向日本不断派遣医师不同的是，宋朝以降，高丽则不断向日本和宋朝寻求医师，并通过医师移动交流，推动政府间的高层交流，开展所谓的“医师外交”。宋太宗淳化元年（990），高丽王后派遣周文德和杨仁绍二位宋商，携带国书作为高丽使者出使日本，为其寻求治疗白发的医师，“大宋淳化元年，宋商二人来，一台州人周文德，一务州人杨仁绍。二商曰：百济国后有美姿，国主爱重，未迈壮龄，其发早白。后愁之，服灵药求法验，二事无效。王又忧之，一夕后梦，日本国胜尾寺千手大悲，灵感无比，汝其祈之。觉后，后悦甚，便向日本国，作礼祈求”。[16]高丽王后梦到日本有能治疗其白发的医师，于是就派遣宋商周文德和杨仁绍赴日本寻医师。这是自朝鲜半岛各国向日本派遣医师以来，首次由日本向朝鲜半岛的高丽派遣医师，表明日本医师水平已有很大进步，并得到东亚各国的认可。

高丽在向日本寻求医师的同时，也对来自宋朝的名医求贤若渴。宋嘉祐四年（1059），宋商黄文景、萧宗明和医生江朝东等一行要归宋回国，但被高丽政府强行留下，不准其回国，“秋八月戊辰，宋泉州商黄文景、萧宗明、医人江朝东等将还，制许留宗明、朝东等三人”。[17]究其原因，或因高丽医师人才难得吧。于是，宋神宗在宋、丽无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借此时机，积极开展特殊的“准外交关系”。[18]宋熙宁五年（1072），宋派遣医官王愉、徐来赴高丽，“六月庚戌，宋遣医官王愉、徐先来”。[19]一年后两人回国。[20]而且，于宋熙宁七年，再次派遣马世安等八位医师赴高丽，“丙子，宋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来）”。[21]宋朝通过“医师外交”这种“准外交关系”的方式，为进一步

发展与高丽的友好互信关系打下了基础。

宋元丰元年（1078），高丽国王患风疾，于是就利用宋朝使者安焘来高丽之际，向宋上表求医："臣年衰所自，风痹忽婴，当国医寡术而功迟，药不灵而力薄。伏望听卑在念，拯弱推仁。选周室之十全，就加诊视；分神农之百品，许及饵尝。所敷悃悰，恭俟俞允。"[22]高丽国王患风疾，而本国医师医术不高明，于是向宋朝请求医师和药材，"秋七月乙未，安焘等还，王附表谢之且自陈风痹，请医官药材"。[23]

应高丽国王请求，宋神宗立刻派遣一个由翰林院医官组成的八十多人庞大医疗代表团，携带一百多种名贵中药前往高丽，"宋遣王舜封、邢慥、朱道能、沈绅、邵化及等八十八人来"。[24]此事在《宋史》也有记载："二年，遣王舜封挟医往诊治。"[25]另据《高丽史》记载，宋朝庞大医疗代表团还向高丽赠送了一百多种各地的名贵药材。其数量、名称和地域现摘录如下：

> 今差合门通事舍人王舜封、翰林医官邢慥等往彼看医，兼赐药一百品。具如别录，至可领也。琼州沈香、广州木香、康宁府铁粉、广州丁香、东京鈆霜、邕州自然铜、广州血竭、阶州雄黄、西戎天竺黄、并州石膏、郓州天麻、西戎安息香、寿州石斛、怀州牛膝、齐州天南星、郓州阿胶、益州芎□、广州肉荳、齐州半夏、银州柴胡、夏州肉苁蓉、蜀州大黄、广州没药、代州鹿角胶、原州甘草、郓州赤箭、真定府薏苡仁、台州乌药、广州槟榔、苏州麦门冬、定州枸杞、商州枳壳、广州余甘子、北京山芋、广州荜发、东京郁李仁、柳州桂心、西京菖蒲、广州蓬莪茂、蔡州丹蓼、西京槐胶、海州海桐皮、东京远志、汉州蜀椒、威胜军黄耆、益州升麻、齐州防风、郓州天门冬汉、汉州防己、益州独活、同州熟干地黄、蜀州附子、定州续断、陈州白殭蚕、益州羌活、蜀州天雄、滁州山茱萸、蜀州乌头、定州狗脊、苏州吴茱萸、蜀州侧子、广州藿香、真定府车前子、西京踯躅、郑州麻黄、西京赤芍药、汝州泽泻、潞州杜仲、西京生干地黄、庐州秦皮、蔡州白芷、西京旋覆花、德州白薇、泽州地母、并州酸枣仁、东京牵牛、泾州秦艽、东京蒺藜子、宕州膏本、蜀州当归、东京蔓荆子、益州干漆、潞州前胡、东京兔丝子、泗州葛根、泽州茵芋、潞州胡麻子、泽州黄芩、蔡州地榆、定州五灵脂、西京莽草、定州大戟、汉州五茄皮、梓州厚朴、定州茜根、西京仙宁脾、定州地骨皮、西京何首乌、商州威灵仙、西京牧丹皮。别赐牛黄五十两、龙脑八十两、朱砂三百两、麝香五十脐。已上各用间金镀银钑花合一具盛，共重四百两，朱漆外匣全。下药供御杏仁煮法酒一十瓶，用间金镀银钑花瓶十一只盛，重一千两，朱红漆明金雕花外匣全。[26]

由上可知，宋朝赠送高丽医药的地域，其中包括首都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在内的东到台州、西到陕西西戎、南到琼州、北到定州，范围几

乎涵盖了北宋的天南海北所有地区。除中药外，神宗还向高丽赠送了“朱砂三百两”和供下药的“御杏仁煮法酒一十瓶”。由此可见，宋朝的“医师外交”可谓不惜血本，其良苦用心，足见宋朝对高丽关系的重视。

不仅如此，公元1080年，宋神宗第三次派遣医官马世安赴高丽，“宋遣医官马世安来”。[27]以致高丽，“王及国人欣庆，曰：‘时与宋绝久，不见中华使久矣。’”[28]宋神宗在宋丽两国“政治真空”的情况下，抓住历史的瞬间，采取务实外交，开启了“政治互信外交”的模式。[29]而高丽国王文宗，也于第二年的宋元丰四年（1081），派礼部尚书崔思齐、吏部侍郎李子威赴宋献方物，以谢赐医药，“庚辰遣礼部尚书崔思齐、吏部侍郎李子威如宋献方物兼谢赐医药”。[30]两国外交互信互动可谓你来我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元1079年，即高丽国王向宋请求治疗风疾医师和药材的同时，利用一位“日本商人”回国之际，[31]令其为高丽使者，携带礼宾牒赴日求医。据日本史料《朝野群载》记载：“高丽国礼宝省牒，大日本国大宰府当省，伏奉，圣旨访闻，贵国有能理疗风疾医人，今因商客王则贞回归故乡，因便通牒，及于王则贞处，说示风疾缘由，请彼处，还择上等医人，于来年早春，发送到来，理疗风疾，若见功效，定不轻酬者谨牒。己未年十一月 日牒。”[32]高丽礼宾省牒与高丽给宋朝的上表求医内容大致相同，希望日本能于来年春天，派遣治疗风疾的医师，并许诺一旦有效，定当重谢。接到高丽请求医师的国书后，日本朝廷立刻召开会议，并决定由日本都督大江匡房回复高丽国国牒，并于公元1081（宋元丰四年，日承历四年）八月，向高丽派遣医师。事后，大江匡房还作诗自赞日本医术如扁鹊再世，“双鱼离达凤池之月，扁鹊何入鸡林之云”。[33]这里的“鸡林”特指高丽。大江匡房是日本著名的汉文学家、汉诗诗人，饱读中华诗书。宋神宗曾以千金求他一篇诗作，“宋朝贾人云，宋天子有钟爱赏玩之句，以百金换一篇之句也”。[34]他的和歌还被收录在《百人一首》中。[35]由此可见，高丽在东亚国家之间，同时以求医师为名，对宋朝和日本展开“医师外交”，旨在在宋日两国之间保持外交平衡。而宋朝和日本也积极加入，并积极推动这种灵活的“医师外交”。

到宋徽宗时期，宋丽两国医师互动外交依旧不断。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在高丽使臣任懿、白可臣回国之际，向其派遣医师并赠送药方。高丽国王肃宗受昭于宣政殿，“甲申，任懿、白可臣等还

宋，帝赐神医补救方。王受诏于宣政殿”。[36]另外，徽宗还派遣国信使户部侍郎刘逵、给事中吴拭来，赐王衣带、匹段、金玉器、弓矢、鞍马等物，[37]并诏曰：“卿世绍王封，地分日域。奏函屡达，常怀存阙之心；贡篚存丰，远效旅庭之宝。载嘉亮节，特致隆恩，辍侍从之近臣，将匪颁之异数。事虽用旧，礼是倍常。宜承眷遇之私，益懋忠勤之报。”[38]同时，宋徽宗还应高丽请求，派遣四位医师对高丽医师进行培训，“牟介、吕昞、陈尔猷、范之才等四人来，从表请也”。[39]同年，宋朝医师牟介等人在高丽兴盛宫，开始对高丽医师进行培训，“宋医官牟介等馆于兴盛宫，教训医生”。[40]高丽肃宗对牟介等宋医师，款待有加，宴请赐酒，“以宋帝天宁节，命太子设斋于奉恩寺。医官牟介等往观之，赐牟介等酒币”。[41]牟介等宋朝医师历经一年，为高丽培养医师，于翌年二月归宋，“二月戊申，宋医官牟介等还”。[42]

宋朝通过对高丽医师的培训，不仅提高了高丽医师的水平，还加强了两国政府间非正式的特殊关系。而高丽通过与宋朝和日本的医师交流，积极在东亚各国开展特殊的“医师外交”，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互信。在东亚海域权力真空的大的国际环境下，宋朝、高丽和日本都不约而同地在推行“医师外交”，旨在探索一种新的外交模式。

后来，高丽把这种“医师外交”模式，又推向了新的高度。宋重和元年（1118），高丽求宋派遣医师为其培训治疗疮肿科医官，“省知明州楼异奏，高丽国王世子王子王某书，乞借差大方脉疮瘇科等，共三四许人，使存心医疗，式广教习事”。[43]于是，宋徽宗立刻向高丽派遣杨宗立等七位医师前往高丽，“秋七月辛巳，宋遣阁门祇侯曹谊、医官杨宗立等七人来”。[44]但是有关此次宋朝向高丽派遣医师的数量，有不同的记载。据《宋史》记载，宋朝其实只向高丽派遣两名医师，“俣之在位也，求医于朝，诏使二医往，留二年而归”。[45]而且，高丽向宋请求派遣医师，也并非为本国培训医师，而是以求医师交流为借口，实为向宋朝传递情报，“国家方与女真和时，高丽遣使来求近上医师二人。上召老医，择二人遣往。至则日夕厚礼，皆不问医，而多问禁中事。二医怪而问之，高丽主曰：我有紧密事，欲达宋皇。恐所遣使不能密，故欲得宋皇亲近之人而分付之。所以问公禁中事者，欲以见公是所亲信耳”。[46]

由于此时高丽向奉金正朔，宋丽之间并无正式国交，只保持着非政府间由宋商推动的“准外交关系”。[47]不过，宋朝在与日本和高丽开展由宋商推动的“准外交关系”的同时，也在积极缓和与金的外交关系。但

是，高丽并不希望宋金之间出现这种和谐关系，这就直接促使了此次的高丽对宋朝的“医师外交”。高丽国王于是告诉两位前来的医师，女真不可交：“谕二医曰：‘寡人非病也。顾有诚款，愿效于上国，欲得附卿奏之，幸密以闻！’二医许诺。则曰：‘女真人面兽心，贪婪如豺狼，安可与之共事？今不早图之，后悔无及！’”[48]两位医师随后回国禀告徽宗。[49]

由此可见，宋朝利用对高丽医师的培训机会，推行这种“医师外交”，取得了与高丽的外交互信。这种“医师外交”可谓自东亚海域各国利用宋商携带国书在东亚开展“准外交关系”后，又一种灵活的外交手段。

三 元朝时期元丽之间的医师交流

元朝以降，高丽成为元朝的附属国，双方的医师交流依然频繁，公元1271年（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患足疾，高丽的达鲁花赤沈浑听闻高丽前大卿闵昉能医治，就命高丽速派遣闵昉前来，“闻前大卿闵昉能治人手足疾，可速遣来”，[50]并授予其尚书左丞一职，“闻帝有足疾，见达鲁花赤沈浑，妄言能医术，浑信之，达于帝而召之，授尚书左丞，以遣之”。[51]这或许是宋元以来，中国首次向朝鲜半岛寻求医师的记录。不仅如此，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高丽尚药侍医薛景成赴元，元朝借此机会，向其寻求医师，于是高丽应元朝请求，向其派遣良医，“戊子，遣尚药侍医薛景成如元。元求良医，故遣之”。[52]

元朝连续向高丽求医，可由此推断，此时高丽的医师水准已有较大提高，或已超过元朝。另据《高丽史》记载，公元1271年，高丽达鲁花赤脱朵儿患重病，高丽医师进药，被脱朵儿拒绝，怕若饮此药而亡，连累高丽，后不治而亡，“及疾作，国医进药，脱朵儿却之曰：‘我病殆不起，若饮此而死，则谗构尔国者必曰高丽毒之。’遂不饮而卒国人惜之”。[53]脱朵儿虽身患重病，但并未从元朝调来医师，这是否也印证了，高丽的医师水平，较之以前已有了长足进步？其实，早在宋朝时期，高丽就通过医师的高超医术，成功地与当时的东女真建立了外交关系。[54]宋崇宁二年（1103），东女真太师盈歌突然遣使，送还高丽医师回国。究其原因，当时滞留在女真完颜部的高丽医师，医治好了盈歌太师亲戚的疾病，被如约护送回国，“甲辰，东女真太师盈歌遣使来朝。有本国医者居完颜部，善治疾。时盈歌戚属有疾，盈歌谓医曰：‘汝能治此人病，则吾当遣人归汝乡国。’其人果愈，盈歌如约，遣人送至境上”。[55]此医师回国后，向肃宗报告了女真的真实情况，“女真居黑水

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56]于是高丽开始与东女真开始通交，“王乃始通使，自是来往不阻。盈歌既破萧海里，报捷于我，我复使人贺之。盈歌遣其族弟斜葛报聘，王待之甚厚”。[57]这进一步印证了高丽医术在宋朝医师的培训下，已经今非昔比。

另外，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74年和1281年，分别发动了两次对日战争，日本史称“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由于战争需要大量的军医和医疗救护，因此，对军医做出了严厉的赏罚措施：“军前若有患病军人，随令手高医工对证用药看理，各翼选好人服侍，仍仰本翼额设，首领官不妨本职，专一司病看理。病军将养复元，方许轮当差使，逐旋具数开呈本翼。若较考时，验病死军人多寡，定夺司病官赏罚施行。”[58]这也意味着，战争对医师的需要，直接促使了高丽医师水平的提高。

至元二十年（1283），元朝在高丽设立了征东行省。征东行省为旨在控制高丽和远征日本的机构，“至元二十年，以征日本国，明高丽国置省，典军兴之务，师还而罢”。[59]后来又在征东行省设立了专门管理医疗和医官的“医学提举司”：“切惟世皇征东，令国王为丞相，行省官吏委国王保举，不入常调，非他行省比。其后续立都镇抚司、理问所、儒学提举司、医学提举司。”[60]元朝的“医学提举司”为掌管医药疗治事宜的机构。据《元史》记载：“医学提举司，秩从五品。至元九年始置，十三年罢，十四年复置，掌考校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验药材，训诲太医子弟，领各处医学。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61]

当然，元朝时期，也有高丽向元朝求医师的记载。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高丽遣将军卢英求医师，“辛未，遣将军卢英如元请医”。[62]同年，卢英携二位医师回国，“辛丑，卢英与医二人还自元”。[63]但是，纵观元朝时期，两国之间的医师移动或医师交流，主要是高丽向元朝派遣医师，高丽已经很少再向中国王朝寻求医师，这说明高丽的医师水平已经有大大提高。

结论

纵观宋元时期东亚各国医师的移动，各国通过“医师外交”，发展睦邻友好，增加了互信。宋朝时期，在东亚处于权力真空，新的东亚国际秩序还没形成，各国处于无正式外交关系的状态下，高丽为打破外交僵局，同时以求医师为名，对宋朝和日本展开“医师外交”，推行“连横合

纵”的灵活外交，向宋朝传递外交情报，还与日本恢复了睦邻友好关系。高丽旨在在宋日两国之间，以保持外交平衡，而宋朝和日本也积极回应，并大力推广这种灵活的“医师外交”。高丽甚至还通过“医师外交”与东女真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宋朝利用对高丽医师的培训机会，推行这种“医师外交”，取得了与高丽的外交互信，还缓解了北方辽金带来的压力。这种“医师外交”可谓自东亚海域各国利用宋商携带国书在东亚开展“准外交关系”后又一灵活的外交手段。

元朝时期，随着高丽医师水平的提高，其东亚海域医师的移动方向，逐渐演变为由高丽向元朝移动，改变了千百年来医师移动的方向。宋元时期东亚海域的“医师外交”，是继“佛教外交”和“宋商准外交”后，又一政府间的非正式“灵活外交”形式，是东亚海域宋元时期的特殊外交现象。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朝与日本、高丽之间‘准外交关系’研究”（15BZS012）阶段性成果。

[2] 赵莹波，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3] 中島楽章「龍脳の道—15－16世紀の琉球王国と龍脳貿易」；町泉壽郎「明治漢方医家と清末文人の筆談」；陳明筆談と近代東亜薬物知識的環流互動。详见浙江大学、二松学舍大学于2018年12月7日举办的「近世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医師の国際移動や学術交流—医学関係の筆談記録を中心にー」国际研讨会。

[4] 王勇「明使と竹田定加」；程永超「通信使筆談と日朝医師情報収集活動」；郭秀梅「清医趙松陽と日本医師の交流記録などについて」。详见浙江大学、二松学舍大学于2018年12月7日举办的「近世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医師の国際移動や学術交流—医学関係の筆談記録を中心にー」国际研讨会。

[5] 竹内理三：《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大宰府天满宫藏版，1964。大宰府和大宰府天满宫所珍藏的史料，分上世编、中世编、续中世编，共计17卷，除大宰府天满宫本身所珍藏的原始史料外，还囊括了日本各个时期的史书和寺庙馆藏文献，并收有《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汉语文献中有关中日交往的史料。

[6] 《日本书纪》，第78页。

[7] 日本最高统治者正式称天皇起于公元701年。参见NHK《日本与朝鲜半岛2000》第四集《日本的诞生》。

[8] 参见NHK《日本与朝鲜半岛2000》第四集《日本的诞生》。

[9] 申叔舟：《海东诸国纪》，田中健夫译注，岩波书店，1991，第60页。

[10] 《日本书纪》，第160页。

[11] 《日本书纪》，第184页。

[12] 《日本书纪》，第197页。

[13] 《日本书纪》，第198页。

[14] 《日本书纪》，第206页。

[15] 日本右大臣菅原道真以“大唐凋敝之具矣，度度使等或有渡海不堪命者，或有遭贼逐亡身者，唯未见至唐，有难阻饥寒之悲”为由，上书请求中止“遣唐使”。参见《菅家御传记》，《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3，第74页。

[16] 《元亨释书》二十八寺像六，《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4，第191页。

[17] 郑麟趾等：《高丽史》卷8《世家八·文宗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第242页。

[18] 赵莹波：《宋朝与日本、高丽之间“准外交关系”初探》，《史林》2014年第5期。

[19] 《高丽史》卷9《世家九·文宗二》，第220页。

[20] “丁亥，遣太仆卿金良鉴、中书舍人卢旦如宋谢恩，兼献方物。宋医王愉、徐先等还。”见《高丽史》卷8《世家八·文宗三》，第248页。

[21] 《高丽史》卷9《世家九·文宗三》，第249页。

[22] 《高丽史》卷9《世家九·文宗三》，第258页。

[23] 《高丽史》卷9《世家九·文宗三》，第263页。

[24] 《高丽史》卷9《世家九·文宗三》，第258页。

[25] 《宋史》卷487《列传第二四六·外国传三》，中华书局，1977，第14079页。

[26] 《高丽史》卷9《世家九·文宗三》，第258~259页。

[27] 《高丽史》卷9《世家九·文宗三》，第262页。

[28] 《高丽史》卷9《世家九·文宗三》，第257页。

[29] 赵莹波：《宋朝与高丽间的‘政商双轨制外交’及东亚关系》，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科学发展，增进人类的福利”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8。

[30] 《高丽史》卷9《世家九·文宗三》，第258页。

[31] 所谓“日本商人”其实是归化的宋商。参见赵莹波《浅析东亚海域中日本、高丽的“归化宋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探索”会议论文，2018。

[32] 《朝野群载》二十异国高丽牒，《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5，第324页。

[33] 《江谈抄》，《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5（第350页）记载：“都督又云，取身自赞又十余，又云，自高丽申医返牒云，双鱼离达凤池之月，扁鹊何入鸡林之云，是则承历四年事也取身自赞又云：自高丽申医返牒云。”

[34] 《江谈抄》五诗事，《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5，第352页。

[35] 大江匡房的和歌在第七十三首：“高砂の/をのへのさくら/さきにけり/とやまのかすみ/たたずもあらなむ/”（汉译：高砂山顶樱花开，山外霞光莫阻碍），三木幸信·中川浩文評解「新小倉百人一首」。

[36] 《高丽史》卷11《世家十一·肃宗一》，第327页。

[37] 《高丽史》卷12《世家十二·肃宗二》，第336页。

[38] 《高丽史》卷12《世家十二·肃宗二》，第336页。

[39] 《高丽史》卷12《世家十二·肃宗二》，第336页。

[40] 《高丽史》卷12《世家十二·肃宗二》，第337页。

[41] 《高丽史》卷12《世家十二·肃宗二》，第338页。

[42] 《高丽史》卷12《世家十二·肃宗二》，第339页。

[43] 《高丽史》卷12《世家十二·肃宗二》，第418页。

[44] 《高丽史》卷14《世家十四·睿宗三》，第418页。

[45] 《宋史》卷487《列传第二四六·外国传三》，第14049页。

[46]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3，中华书局，1986。

[47] 赵莹波：《宋朝与日本、高丽之间“准外交关系”初探》，《史林》2014年第5期。

[48] 赵莹波：《宋朝与日本、高丽之间“准外交关系”初探》，《史林》2014年第5期。

[49] 徽宗恐其泄露消息，后将其杀害，“二医归，具奏本末。徽宗闻之，滋不乐，且惧其语泄。丞相童蔡辈乃为食于家，召二医以食之，食毕而毙”。参见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3。

[50] 《高丽史》卷27《世家二十七·元宗三》，第847页。

[51] 《高丽史》卷27《世家二十七·元宗三》，第847页。

[52] 《高丽史》卷30《世家三十·忠烈王三》，第952页。

[53] 《高丽史》卷27《世家二七·元宗三》，第853页。

[54] 东女真，高丽人对我国辽代部分女真人的称呼，大体指居住在今松花江以东至日本海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道一带包括完颜部在内的女真人。《高丽史》等朝鲜古籍，有时也称其为东北女真。公元1115年阿骨打建立大金帝国后，其名不见于史。

[55] 《高丽史》卷12《世家十二·肃宗二》，第337页。

[56] 《高丽史》卷12《世家十二·肃宗二》，第337页。

[57] 《高丽史》卷12《世家十二·肃宗二》，第337页。

[58] 《高丽史》卷29《世家二九·忠烈王二》，第925页。

[59] 《元史》卷91《志第四十一上·百官七》，中华书局，1976，第2307页。

[60] 《高丽史》卷39《世家三九·恭愍王二》，第1211页。

[61] 《元史》卷88《志第三十八·百官四》，第2222页。

[62] 《高丽史》卷29《世家二九·忠烈王二》，第914页。

[63] 《高丽史》卷29《世家二九·忠烈王二》，第914页。

海上丝绸之路朝鲜史料中的山东海商

袁晓春[1]

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至少滥觞于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源于中国山东半岛的“石硼文化”（支石墓），越海传播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韩国、日本的“石硼文化”史前遗迹有的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东亚众多的同类史迹越来越多地表明，东亚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人类历史上最早兴起的海洋贸易与人文交流航线之一，推动了东亚各国的文明进步与发展。

中国与韩国通过海洋交流密切，史料记载丰富，韩国的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即为其中之一。《备边司誊录》所载时间起自朝鲜李朝光海君八年（1616），下至高宗二十九年（1892），其中缺载54年，现存273册。备边司最初是朝鲜李朝为临时处理女真与日本对朝鲜王朝的侵扰问题，后为处理朝鲜王朝国政诸般事务的最高决议机构，议处事项相当广泛，一般界定范围为朝鲜内政、中朝关系及朝日关系。明宗十年，备边司划为常设机构，人员从正一品的都提调到从正六品的郎厅人员，主要誊写的是郎厅人员。备边司主要记录会议，接收下面上报的文书、高层传达的指令、国王对事情的处理意见。备边司人员熟悉汉语并以汉语记叙，从而留下了罕见的域外汉文文献资料。《备边司誊录》中记载有国内史料未见的40艘中国海船遭遇风暴漂流到朝鲜半岛的航海史料，其记录的细节是国内史料中的盲点，这为我们研究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另外的观察视角。

《备边司誊录》中记载的11艘山东海船分别是：清朝康熙四十五年（1706）莱阳船、乾隆三十九年（1774）福山县曲亮工船、乾隆五十一年荣成县张元周船、乾隆五十六年福山县安永和船、乾隆五十九年登州府（今山东省蓬莱市——笔者注）蒋顺利船、嘉庆十三年（1808）蓬莱县张成顺船、道光九年（1829）文登县王箕云船、道光十九年黄县刘增三船、咸丰二年（1852）登州府朱守宾船、咸丰八年荣成县刘青云船、咸丰九年黄县赵立果船。目前，关于古代山东海洋贸易的史料难称丰富，像《备边司誊录》这样详细记载11艘山东海洋贸易船船主、船长、舵工、副舵工、管账、水手、商人、乘客的姓名、年纪、籍贯、贸易货物以及携带银两铜钱等具体海洋贸易资料实属罕见。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记载的清朝山东海洋贸易与航海史料，可以填补山东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史料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应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

一 山东海船乘员结构

清朝山东海船的乘员人数。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记载有山东11艘海洋贸易漂流船，其具体船载人数：康熙四十五年莱阳船13人、乾隆三十九年福山县曲亮工船25人、乾隆五十一年荣成县张元周船4人、乾隆五十六年福山县安永和船21人、乾隆五十九年登州府蒋顺利船51人、嘉庆十三年蓬莱县张成顺船40人、道光九年文登县王箕云船2人、道光十九年黄县刘增三船11人、咸丰二年登州府朱守宾船5人、咸丰八年荣成县刘青云船10人、咸丰九年黄县赵立果船12人。虽说11艘山东海船不一定代表全部的海船，但以此为案例可以看出其中大船载人在40～51人，其他船载人多在20人以下，据此分析，清朝时期山东从事海洋贸易的大型海船，与福建道光年间海船“金全滕”号可载100多人的大型福船相比，其海船规模有一定的差距。

山东海船的船员年龄。山东海船可分官船、民间私船两类。官船如刘增三官船、张成顺官船，船员年龄分别主要集中在40～55岁、25～35岁，所占比例各半，显示出官船比较注意选择40岁以上富有经验的船员，个别船员的年龄甚至达到了60多岁。民间私船如蒋顺利私船、曲亮工私船、莱阳船等，船员年龄范围相对扩大，在20～70岁，但年龄段多集中在20～40岁，呈现出相对年轻化的情况（见表1、表2）。

表1 道光十九年黄县刘增三官船

姓名	身份	年龄（岁）	籍贯
徐天禄	舵手（代船主）	52	登州府黄县
由永成	水手	43	登州府黄县
张永成	水手	59	登州府黄县

表1 道光十九年黄县刘增三官船-续表

姓名	身份	年龄（岁）	籍贯
姜志祖	水手	28	登州府黄县
由士国	水手	54	登州府黄县
王付玉	水手	46	登州府黄县
刘永齐	水手	40	登州府黄县
张培五	水手	39	登州府黄县
马其清	水手	44	登州府黄县
马其源	水手	26	登州府黄县
肖日红	水手	36	登州府黄县

资料来源：〔朝鲜〕《备边司誊录》第23册，宪宗六年庚子，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第175~176页。

表2 康熙四十五年莱阳民间私船

姓名	身份	年龄（岁）	籍贯
车瑄	管账	39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
崔凌云	管买卖	52	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
韩永甫	扶舵	55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人，苏州府城里住
陈五	水手	37	江南省松江府华亭县
袁六官	小水手	27	江南省松江府上海县
王三	小水手	24	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
王五	小水手	26	山东省莱州府即墨县
刘及成	小水手	35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
程元	小水手	27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
宋宗德	客商	55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
梁已美	客商	24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
蒋彦盛	客商	42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

资料来源：〔朝鲜〕《备边司誊录》第23册，肃宗三十二年丙戌，第538~540页。

山东海船雇用南方船员。康熙四十五年莱阳民间私船出现了雇用南方船员的现象，该船水手长陈五是江南省松江府华亭县人，水手袁六官是松江府上海县人，水手王三是绍兴府山阴县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山东莱阳县人船长韩永甫从事南北方海洋贸易，常年居住在苏州城内，与南方的船员熟悉而就近招聘，所以出现了山东海船却雇用南方水手的情况。

据《备边司誊录》记载，山东海船的船主绝大部分居住在陆地，不下海随船贸易。官船的船员年龄有一半在40岁以上，而占山东海船大部分的民间私船，其船员年龄多在20～40岁，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与广东广船的船员年龄相似。如广船许必济船，船长许必济年龄在34岁，其他船员多在20～40岁，只有一位船员较为年长，年龄在45岁。山东海船、广东广船船员的年龄似乎较年轻，与福建福船船员有一定差异。在《备边司誊录》中记载万历四十五年（1617）福建林成商船漂流到朝鲜时，林成商船上有船员41人，船主林成未随商船出行，船长薛万春年龄55岁，其他船员年龄在20～50岁，50～60岁的船员为个别现象。其中年

龄最大的林太70岁，年龄最小的船员萧晋刚14岁。从全国沿海各地海船船员年龄来看，福船船员年龄跨度最大，不像山东海船、广东广船的船员普遍比较年轻。

二 山东海船乘员中未有知识分子参与

朝鲜官方与民间百姓推崇并善于学习中华文化，朝鲜也是中国周边国家中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朝鲜备边司的官员，一直关注来自中国的海洋贸易漂流船上是否有秀才、举人等知识阶层的船员或乘客，像《备边司誊录》正祖十八年甲寅（蒋顺利船——笔者注）就有逐一查询。

问：今年你们地方年事何如。

答：诸处都好，只有登州不好。

问：乘客中，有秀才举人否。

答：没有。[2]

备边司官员在多年的问询中，终于碰到船载乘客、登州府福山县的秀才于华国，因此《备边司誊录》正祖十五年十二月辛亥（安永和船——笔者注）对此着墨较多。

问：你们四个客，因何事同船，而女人是何人，头戴顶子者，又是何人。

答：于华国，本是秀才，丁亥年生员，得了顶子，而数奇不做官，因家兄光国，在奉天省旅顺口水师营，开设买卖，故戊申往依家兄，仍往舍内，营中诸官员，请为门馆先生，教授其子弟，今欲回见家眷，将所得束金，买了谷物，以为过活之资，不幸遭风到此。[3]

于华国是《备边司誊录》所载40艘清朝中国海船乘客中唯一搭船探亲并被记录下姓名的秀才，他的兄长于光国在辽宁旅顺水师营经商，他投奔兄长，在旅顺常年开设私塾，教授水师营官员的子弟，在回福山县探亲旅程中遭风漂流到朝鲜。

朝鲜官方不仅关注随船而来的秀才于华国，对于华国携带的各种书籍也相当重视，《备边司誊录》正祖十五年十二月戊午（安永和船——笔者注）记载：

《罗经解定》四卷 《英华集》一卷

《入泮勾》一卷 《金函玉册》一卷

《嫁娶书》一卷 《十二月花甲全窨》一卷

《鼓吹风雅》一卷 《精选修造吉曰》一卷

《会试元魁卷》一卷 《澄怀阐课稿》第一册一卷

《泮勾英今学必读》一卷 《圣谕文修》一卷

《衍释万言教化天下》一卷[4]

可见，朝鲜官方对船载中国书籍不厌其烦，一一记录书名、卷数，显示了对中华文化的重视。

《备边司誊录》记载了40艘中国海洋贸易船，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海洋贸易船的船长、船员等航海人员中，尚未发现有秀才、举人等知识分子的加入，船上识字的人亦是极少数。不论是商贸，还是航海等领域，如果缺少知识分子的参与，其行业经验积累传承、理论总结形成以及未来的发展必定会受到影响。

三 山东海船贸易货物

《备边司誊录》记载，清朝山东海船的贸易货物主要输往两个方向。（1）向南方地区输出柞蚕茧（柞蚕指北方地区把蚕种放养在野外的柞树上，又称野蚕。柞蚕丝略粗，其蚕丝质量不及家养的桑蚕丝）、粮食（黄豆、玉米、高粱）、烟草、中草药（紫草、杏仁、防风、白蜡）、咸鱼、生猪，并运回棉花、棉布、桐油等。（2）向东北地区贩运棉布、棉花，并购回玉米、高粱等粮食。

前往南方贸易的山东海船主要有莱阳船、赵立果船，它们各具特色。

莱阳船为民间私船，作为驶往南方的贸易海船，船上分工明确，按照其职能重要程度分别载有职掌财务的车琯、职掌买卖的崔凌云、职掌驾驶的韩永甫、职掌水手杂务的陈五等，像这样明确分工的情况在山东海船中并不多见。船载货物见《备边司誊录》肃宗三十二年丙戌：

问：你们将何样物件，贸来何样耶。

答：俺们持黄豆、紫草、杏仁、防风、白蜡、猪等物，往苏州贸来青

蓝、各色布、瓷器、棉花物耳。

……

问：你们大船所载物种，多少几许耶。

答：黄豆二百四十担，白蜡二百四十斤，红花二百四十斤，紫草三百九十八包，防风一包，杏仁一小包，猪十二口耳。[5]

可见该船的主要货物是黄豆、中草药，也可说明产自北方的紫草、白蜡、红花、防风、杏仁等中草药颇受南方市场的欢迎。

赵立果船同为民间私船，船上载有两名客商王相眉、张绍德，船主赵立果随船贸易，船上分工明确，正舵工为曲会先，副舵工胡玉令年已七十，如此高龄仍驾船显然是想要借助其丰富的航海经验。除此之外，还有指示方向的向导张凤高、专司烧香的香童王乃福以及厨师曲成林。其贩运货物见《备边司謄录》哲宗十一年庚申：

问：你们，何年月日，因何事，往何处，何以到此。

答：去年九月初二日，由荣成俚岛口，装盐鱼，到海上（上海——引者注）县发卖，候风留住，十月初七日，往江北营船港，装棉花一百八十二包，桐油二篓，初八日发船回家，猝遇西北大风，二十三日漂到贵国。

……

问：你们带来棉花、桐油，换银拿去么。

答：拿去。[6]

该船是将北方出产加工腌制好的咸鱼，贩往南方；返程时采购棉花、桐油，带回北方销售。

去往东北贸易货物的山东海船主要有朱守宾船、安永和船、张成顺船。

朱守宾船是登州府的私船，专门贩卖腌制的咸鱼，销往辽宁金州。据《备边司謄录》哲宗三年壬子：

问：你们因何事，何月何日，开船往何处，何日遭风，漂到我境么。

答：俺等以卖鱼为业，本年九月初六日，开船往关东老口滩，装鱼发卖于各处，十一月初六日，将向关东金洲（州——引者注）地，忽遭大风，同月十一日，漂到贵境。

问：鱼价为几何。

答：二百四十二吊。[7]

朱守宾船卖鱼销售收入为铜钱242吊。

张成顺船属于官船，是一艘大型货船，船上商人较多，其装载货物见《备边司誊录》纯祖九年己巳：

问：船中所载者，何物耶。

答：雇与宁海州商人，装茧包高粮包米。

问：此外更有何物。

答：银与钱及杂粮包衣服包等物。

问：银与钱及茧包高粮包米等物，是何人之物耶。

答：王兰若、邹琏玉、杨魁明、王琳庵茧包一百四十二包，高粮六十包，包米四十石，孔化亭菊包六十—包，董悦候茧包五十七包，谭志远茧包五十八包，王喜安茧包四十七包，李梦龙茧包二十一包，而漂荡之际，几书失去，银钱则无失。

问：茧包何物。

答：是蚕虫在山食柞案，至秋成茧，则人揉而卖之。

问：高粮包米何谷。

答：高种杯也，包米玉林也。

问：高粮、包米、茧包，以何物贸来。

答：以银子买来于奉天府地方。

问：茧一斤价为几许，高粮包米一石，价为几两。

答：熟茧一斤价银四钱，生茧一斤价银五分，高粮一石价银四两，包米一石价银三两五钱。[8]

该船的牟平商人，从沈阳地区采购柞蚕茧、高粱、玉米，采购各种货物的价格均记录明白，甚至包括一斤熟茧价值四钱银子、生茧一斤价值五分银子等价格差异，可谓记载详尽。

四 山东海船的资金

《备边司誊录》中清朝山东海船单船资本是多少？与广东、福建海洋贸易发达地区相比有何不同？

山东海船中大型海船单船携带资本较多的有曲亮工船、张成顺船、安永和船、刘青云船，中小型海船携带资本较多的有安永和船、刘青云船等。

先从山东海船曲亮工船着手分析。曲亮工船是福山县的大型私船，该船装载黑布480匹、白布26匹运往沈阳销售，除贩卖布匹外，该船还携带了大量铜钱用于购买粮食，《备边司誊录》英祖五十年甲午中记述道：

> 问：你们既要买米往奉天府，将甚么货物换买耶。
>
> 答：小酌将钱一千二百七十吊零，白布二十六匹，黑布四百八十匹换也。[9]

该船装运用于购物的铜钱1270吊，1吊为1000文铜钱，共装运铜钱127万文，加上506匹黑布、白布，该船的整船资本约14000两，是山东海船中单船资本最高的商船。

张成顺船是载有40人的大型官船，船上有10名商人，从山东牟平出发，过海前往沈阳采购柞蚕茧、高粱、玉米等货物，《备边司誊录》纯祖九年己巳记有：

> 问：钱几两银几两而果是何人之物耶。
>
> 答：奉天钱，以八十二文，为一两，山东钱，以十钱为一两，以奉天钱计之，则为一千八百八十四两二钱三分，银则二百十三两二钱，而都是各人带来者。[10]

10名商人携带铜钱折银1884两，白银213两，共计白银近2100两。

安永和船是私船，船号为福第11号。船上21人，有福山县4位粮商，船载谷子、棉花、柞蚕茧、烟草，自山东福山县发往辽宁金州府，据《备边司誊录》正祖十五年辛亥：

> 问：带去者何物件，变卖者何物件。
>
> 答：杂粮及凉花、山茧、烟草等物，以卜重难运，从愿换卖，其余随身要紧东西，尽数带回，此皆贵国恩典，感激不尽。

问：你们变卖之价，共为几许。

答：价银总为六百四十七两零。[11]

安永和船上4位粮商的货物资本为白银647两。

刘青云船上10人，从山东荣成县装载青豆到沈阳贩卖，货物资本为白银535两，详见《备边司誊录》哲宗九年戊午：

问：带来的钱有么。

答：五百三十五两八钱八分有。[12]

在中小型山东海船中，有的船携带资本不多，例如刘增三船、王箕云船。

刘增三船的船主并未上船，以52岁的船长徐天禄代替，船上11人，从山东黄县出发，见《备边司誊录》宪宗六年庚子：

问：你们既要装粮，则有甚银货带来么。

答：带得银子一百两，铜钱一百一十吊，是船主刘增三的东西，船破时都落下水里，尽失无余。[13]

该船带有白银100两、铜钱110吊，去辽宁买粮，不幸遭遇风漂到朝鲜。

王箕云船船籍是山东文登县，据《备边司誊录》纯祖三十年庚寅记述：

问：何月日因何事往何地方，何月日漂到我境。

答：我们带钱十四吊六百零，贸棉布凉（棉——引者注）花次，去年十月十七日自文东县，乘船往南城，当日到中洋，风浪大作，折帆竿缺锭枝。[14]

该船仅携带铜钱14吊600文，计划去南城购买棉布、棉花，属于山东小型海船单船资本最少的一类海船。

山东海船单船资本最多为14000两，根据朝鲜李朝的《备边司誊录》记载，广东商人60岁的李光、50岁的罗五搭伙贩卖，他们不顾年龄已长，远赴辽宁营口港、山东烟台港经商贸易。船载主要货物为棉花，货值白银3230两。此外以福建的明朝林成商船、清朝黄宗礼商船为例，

福建商船单船货物资本在白银2000两至1万两之间。与其相比，山东海船最高单船资本与广东、福建的最高单船资本不相上下，但是山东海船中有的中小型海船单船资本并不多。

五 山东海船的乘客、商船运费

清朝山东海船的乘客、商船运费怎样呢？以《备边司誊录》11艘山东海船中2艘大型海船蒋顺利船乘客价格、张成顺船雇船价格为例，略做考察。

《备边司誊录》记载山东的海船贸易中，出现了以运输乘客为主并收取运费的海运营利方式，如乾隆五十九年登州府蒋顺利船即是一例。蒋顺利为登州府的船主，他没有随船贸易，其船编号黄字19号。当时登州府遇到天灾，粮食歉收。因当地粮食供应出现问题，许多登州府与原籍沈阳的百姓，乘船前往沈阳以躲避灾年。《备边司誊录》正祖十八年甲寅记述道：

> 问：那乘客们，是借乘是雇船。
>
> 答：都收雇钱。
>
> 问：一人船雇钱多少。
>
> 答：船雇钱也不一样，或收大钱一百，或收小钱一百。
>
> 问：大钱一百为几何，小钱一百为几何。
>
> 答：大钱一百个为一百，小钱以十六个为一百。
>
> 问：乘客船雇钱共计为何。
>
> 答：以大钱记账为十吊，以小钱记账为四十三吊。
>
> 问：船雇钱现在带来否。
>
> 答：带来。[15]

蒋顺利船共承运51人，其中船员7人，乘客44人，包括4个妇女、3个儿童。该船从山东蓬莱发往辽宁旅顺一带。因遇到灾荒年，该船向乘客收取的运费为：有的乘客收取大钱一百，有的乘客收取小钱一百，44名乘客运费总共是10吊大钱。他计划用此次运费和向亲戚借的钱在沈阳地区购买粮食，再将粮食贩运回山东登州。蒋顺利船留下的清朝北方灾

荒年山东乘客前往东北避灾的最低运费价格，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清朝山东商船雇用整船运费怎样呢？张成顺船为官营大型商船，船载40人，其中商人10人、船员26人、乘客4人。该船从辽宁沈阳购买了柞蚕茧、高粱、玉米等货物，渡过黄海回到山东半岛北部牟平。那么10名牟平商人雇用这艘大船的运费是多少呢？详见《备边司誊录》纯祖九年己巳：

问：你船载来商客空人，各捧雇钱几许。

答：众商则有货物，故雇价大制钱一百三十四千四百八十个，空人则无货物，故水力价大制钱一千个或一千三百二十个或一千六百四十个。

问：大制钱，数几何。

答：一千文，谓之大制也。[16]

该船从山东半岛的牟平发往辽宁，4名乘客运费为每位大钱1000文至1640文铜钱。那么雇用一艘26名船员的大型商船的10名商人，此程的运费是多少呢？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装货来回运费竟然高达134吊480文铜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清朝时期山东前往辽宁的商船乘客与货运的运价差别会如此之大，颇值得仔细研究。

六 山东海船的船具

《备边司誊录》中记载了荣成县张元周海船、福山县安永和船2艘船上载有船具的情况。

张元周海船是1艘小船，海船的船籍地为荣成县南40里民屋石村。船主张元周与冯才孝、张元瑞、李凤同4人留在船上忽遇海上风暴，与下船吃饭未及返船的5人漂散。

《备边司誊录》正祖十年丙午记载：

问：你们船中物件，无遗失么。

答：后桅、布蓬、两橹、铁锚、木舵五件，漂洋时失了。

问：你们在两岛中及登陆后，带来物件，或有给人之事么。

答：没有。[17]

张元周船虽是小船，船上安有前桅、后桅，遭遇风暴后，后桅与船帆、两只大橹、一件铁锚、一个木舵等均损毁，海船漂到朝鲜黑山岛，得到了一位戴大帽子朝鲜人的帮助，给了张元周等人10斗米、3块木材，对船舵进行了必要的维修。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张元周海船属北方海域使用的沙船，船设双桅双橹，可以有风使帆、无风用橹，也可以帆橹同时使用。

此外，《备边司誊录》正祖十年丙午还记载：

> 问：你们有甚么物件带来的么。
>
> 答：俺们带来木桶、空柜、火炭，及破伤船只，在灵岩已尽烧火，今此带来物件随身衣服外，只有钱二十两二钱九分。[18]

木桶是船上必用的物品，木炭用来烧火做饭，冬日取暖。空柜带上船，可装粮食等东西。有意思的是，张元周船留下了空柜等家具上船的记录。

福山县安永和私船是一艘大型帆船，船员18人，船主安永和不随船贸易。《正宗大王实录》卷33正祖十五年十二月戊午记载：

> 船长十五把，广四把，皆用铁钉。第二间撑铁鼎二座，第三间别加涂灰，造水仓盛水。前帆竹十一把，今番逢风漂流时，腰折。中帆竹九把，后帆竹五把，皆用白木帆。板屋中有书帙赞里，而舟什棚索，汲水小船一只，皆如我国船制样。硫索、龙层索、倒入索、旨索等属，或黑或白，问是何物，曰棕树皮也。
>
> ……
>
> 又问：船上器械，能无亏损。
>
> 答云：头桅损坏，大锚去之一顶，小锚去二顶，三顶锚的丁缆俱以去了。所载粮舍去数多，二棚俱破，别无损伤。祈长首将器用周济，过了新年，我等乘船回家去矣。[19]

该船上安装3桅白帆，前桅白帆用11根撑条，中桅白帆用9根撑条，后桅白帆用5根撑条。船设水仓，来解决乘员的饮水。船上配备3把铁锚，分别是主锚及两把备用小铁锚。另外，船上携带小舢板船，以方便近岸取水。安永和船的前桅被风暴摧毁，舱面2个舱棚被风吹破。

结论

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史料弥足珍贵，从《备边司誊录》记载来看，清朝山东海船的船主绝大部分居住在陆地，不下海随船贸易。海船中大船占50%，乘员40～50人；中小型海船占50%，乘员在20人以下。海船船员呈现年轻化趋势，有的海船雇用南方船员。海船航海人员中未有秀才、举人等知识分子参与，贸易货物往南方输出柞蚕茧、粮食（黄豆、玉米、高粱）、中草药（紫草、杏仁、防风、白蜡）、烟草、咸鱼、生猪等，运回棉花、棉布、桐油等。海船携带资本在铜钱14～1270吊、白银100～140000两。海船从山东半岛北部过海前往辽东半岛，灾荒年乘客价格在大钱100文，常年乘客价格1000～1600文铜钱，整船雇船价格134吊铜钱。山东海船为3桅或2桅船，船上配备3把铁锚，分别是主锚、两把备用小铁锚（见图1）。

本文引用的海外史料为国内首次发表。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记载的明清史料属于珍贵的域外汉文文献，其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值得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



图1 美国人拍摄的清朝山东海船

附录：

丙戌四月十三日[20]

济州漂到人问情别单

问：你们居在何地、而姓甚名谁耶。

答曰：俺们十三人姓名。

管账车琯年三十九岁、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人。

管买卖柴米崔凌云、年五十二岁、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人。

问：你们在本土时，有何身役，而以何事为业耶。

答：俺们素无身役，只以农商为业耳。

问：你们因何事往何地，缘何漂到我国。

答：俺们以买卖事，往苏州地方，洋中遇风，漂到贵国耳。

问：你们几月几日开船，几月几日漂到我国耶。

答：俺们今正月初二日开船，于山东莱阳县，初四日大洋中，猝遇恶风，失舵折樯，几乎沉没，仓惶中远见山色，疑有人家，俺等十三人，持牌標急下，汲水小船，欲为救护大船之际，又遭东北风，俺等十一日，漂到贵国，其余二十一人，在大船，不知去处耳。

问：你们离发山东莱阳县时，作伴向苏州者，几船耶。

答：俺们莱阳县开船时，无作伴船矣。

问：你们将何样物件，贸来何样耶。

答：俺们持黄豆、紫草、杏仁、防风、白蜡、猪等物，往苏州贸来青蓝、各色布、瓷器、棉花物耳。

问：曾前上国，海禁极严云矣。不知何年，弛禁行商耶。

答：古海禁之令矣，今则有旨弛禁，任意行商，而弛禁年月，未能得知矣。

问：標帖成给之官，是何样官司，纳税何司，而以何物纳税耶。

答：標帖则莱阳知县成给，而纳税则随其所持物种之多寡，以银子计纳于本县耳。

问：莱阳之于苏州，相距几许耶。

答：旱路则两千一百里，水路则不能得定里数，而遭顺风，则四天三夜，可能以得达矣。

问：你们只行商于苏州而已，别无往来他国之事耶。

答：别无他国行商之事，而只于浙江、福建、江西、湖广、潘阳等处行商耳。

问：你们年年行商，而往来海洋之际，必有可闻奇异之迹，可得闻耶。

答：海中往来之路，别无奇异可闻之迹耳。

问：你们藏载货物海路来往之时，其无海贼掠夺阻搪之患耶。

答：无记入。

问：山东近处，有三山岛，而颇称奇异云，可得闻耶。

答：果有三山岛，而自登州府晴明日，则可能望见，而自莱阳县、贝水路颇远，三山列立间通海水，往来商船耳。

问：既有三山岛，则其民几何，往来船只，常常止泊耶。

答：此岛，小而险恶，且无可耕地之地，故原来无居民船只，往来之时，若遇风则时时止泊，而多恶石，且狭隘，故仅容三四只耳。

问：此外，又有他岛，而民人入居者耶。

答：登州府西北间四十里许，有庙岛、芙蓉岛、长山岛皆有居民，而长山岛最大，居民几至千余户，登州府及莱阳县主管耳。

问：此岛孤立海中，无水贼依险过发之患耶。

答：海防至严，故元无此患而曾闻五六年前，广东省有水贼云云之说矣。今则太平无事耳。

问：你们虽业农商，既为民丁，则似不无身役，可得详闻耶。

答：俺们则非军丁，故一年每口，纳丁徭银子一钱六分，而农者纳田税，商者纳商税，此外无他身役耳。

问：山东地方，农事何如。

答：进来农事，连丰大收耳。

问：你们十三人中，曾有往来皇都者几人，而程途几里耶。

答：俺们十三人中，一人曾有往来皇都者，而途里则一千四百四十里耳。

问：山东所属州县，共几何耶。

答：山东一省有登州、莱州、青州、兖州、东昌、济南六府，而其所属州县，则未能详知耳。

问：登州府有几个官人耶。

答：文官则有太府、二府、三府、学官，武官则有总兵、副将、参将、守备、千总、把总等官耳。

问：所谓文官则所管何事，武官则所管何事耶。

答：所谓太府管知县、生员、学生，二府管监察耳目，三府管匪类、赌博，总兵则管山东一省军兵，而衙门则在于登州耳。

问：总兵所掠城池周遭及所管兵曹几何，而水军耶，陆军耶。

答：城池周遭，自东门至西门七里许，南北亦如之，兵数不知几许，而都总水路之军耳。

问：既有军兵，则有时训练之事耶。

答：陆军则一朔内九次操练，水军则一年四季月操练耳。

问：操练时，所用器械，可以指耶。

答：陆军所用器械弓箭、刀枪、火炮，而水军操练时曾无目击，未知器械之何如耳。

问：贵省尚文耶，尚武耶。

答：文武俱尚，而俺们，以商农为业之人，试取之规，未能详知耳。

问：你们大船所载物种，多少几许耶。

答：黄豆二百四十担，白蜡二百四十斤，红花二百四十斤，紫草三百九十八包，防风一包，杏仁一小包，猪十二口耳。

[1] 袁晓春，山东省蓬莱市蓬莱阁景区管理处。

[2] 〔朝鲜〕《备边司誊录》第18册，正祖十八年甲寅，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第291～295页。

[3] 〔朝鲜〕《备边司誊录》第17册，正祖十五年十二月辛亥，第914～918页。

[4] 〔朝鲜〕《备边司誊录》第17册，正祖十五年十二月辛亥，第914～918页。

[5] 〔朝鲜〕《备边司誊录》第5册，肃宗三十二年丙戌，第538～540页。

[6] 〔朝鲜〕《备边司誊录》第25册，哲宗十一年庚申，第489～490页。

[7] 〔朝鲜〕《备边司誊录》第24册，哲宗三年壬子，第505～506页。

[8] 〔朝鲜〕《备边司誊录》第20册，纯祖九年己巳，第15～19页。

[9]〔朝鲜〕《备边司誊录》第15册，英祖五十年甲午，第270～272页。

[10]〔朝鲜〕《备边司誊录》第20册，纯祖九年己巳，第15～19页。

[11]〔朝鲜〕《备边司誊录》第17册，正祖十五年辛亥，第914～918页。

[12]〔朝鲜〕《备边司誊录》第25册，哲宗九年戊午，第312～313页。

[13]〔朝鲜〕《备边司誊录》第23册，宪宗六年庚子，第175～176页。

[14]〔朝鲜〕《备边司誊录》第22册，纯祖三十年庚寅，第103～104页。

[15]〔朝鲜〕《备边司誊录》第18册，正祖十八年甲寅，第291～295页。

[16]〔朝鲜〕《备边司誊录》第20册，纯祖九年己巳，第15～19页。

[17]〔朝鲜〕《备边司誊录》第16册，正祖十年丙午，第645～650页。

[18]〔朝鲜〕《备边司誊录》第16册，正祖十年丙午，第645～650页。

[19]〔朝鲜〕《正宗大王实录》第17册，正祖十五年十二月辛亥，第914～918页。

[20]〔朝鲜〕《备边司誊录》第5册，肃宗三十二年丙戌，第538～540页。

郑和时代前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水域的海事活动[1]

刘迎胜[2]

一 从红海到远东

罗马帝国在中国古籍中多称大秦，因其地处地中海东岸以西，有时又称为“海西国”。希腊人把连接两大陆的狭窄陆地称为isthmus，即地峡，最初指的是地处欧亚非三大陆之间的埃及苏伊士地区，由于这里是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最短陆路通道，自古以来就是来自印度洋的商贾进入地中海地区、泰西水手前往亚洲的必经之地。

红海在古代希腊被称为“厄立特里亚海”（即埃塞俄比亚海），其沿岸诸地与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奥古斯都执政时，埃及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东汉时罗马帝国的海洋活动已越出红海进入印度洋水域。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一位名叫伊巴露斯（Hippalos）的希腊船长曾偶然到达印度西海岸。公元1世纪初，一位商人阿尼尤斯·普洛卡姆斯（Annius Plocamus）扑买了罗马帝国红海领土的税收，他派出一名获得自由的奴隶布勃里乌斯（Publius）作为他的监税官前往红海地区。这位监税官在航行中遇风，在海上漂流15日后，偶然抵达斯里兰卡（即我国史书所记的“狮子国”），在那里停留了半年，然后与斯里兰卡出使罗马的使臣拉西亚斯（Rachias）一同回到欧洲。[3]据老普林尼（23～79）的《自然史》记载，这位斯里兰卡的使臣拉西亚斯的父亲曾去过“赛里斯国”，即汉帝国。[4]这两位罗马水手航行所依靠的，实际上是印度洋上的季风。后来在相当长时期内，印度洋季风便被欧洲人称为“伊巴露斯风”（the Winds of Hippalos）。这一两次偶然的航行使罗马商贾发现了前往东方的水路。罗马商人们越来越多地出入于印度洋。[5]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提到，永宁元年（120）掸国（缅甸）国王雍由调“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6]这条通过掸国前往中国的道路早已有之。公元前2世纪，当张骞“凿空”西域，到达阿姆河南岸之地，曾发现当地有经印度运来的蜀地出产的竹杖与布。这些蜀地的产品必定是经过云南、掸国，至孟加拉

湾，再溯印度河北上贩至中亚的。

兹后汉籍中有关大秦的消息也渐增多。《后汉书》记载：“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7]这里提到的“犂鞬”即今埃及地中海之滨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得名于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8]足见东汉时有关罗马帝国的消息是通过地中海—红海水道转来的。同书又记：“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9]

从汉末三国至隋统一的三个半世纪中，中国南方对西方诸国的陆路交往因南北分割而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海路与海外诸番联系。三国时期，吴的疆域向南一直延伸到今越南北方，当时称交趾。吴人了解到，大秦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换言之，当时东南亚（包括吴辖区内的交趾）的船只很少赴大秦者，而主要是大秦人东来。“孙权黄武五年（226），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10]

孙权还派出朱应与康泰出使海外，[11]访问了东南亚许多地方，收集了有关大秦、安息（今伊朗与土库曼斯坦南部）、天竺（印度）等一百余国的地理、风俗、物产消息。归回后康泰撰《吴时外国传》，朱应则写有《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又称《吴人外国图》、《吴时外国志》、《扶南土俗传》（《扶南土俗》）、《扶南传》或《扶南记》等；《扶南异物志》又称《扶南以南记》或《扶南异物》。这两部书至北宋时尚存，但后来亡佚，其中内容在《水经注》[12]《艺文类聚》《梁书》《通典》《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中均有所摘引，尽管篇幅不大，但却是后世学者了解东汉以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资料。与康泰和朱应齐名的是当时丹阳太守（辖地包括南京）万震，他在任上悉心采集资料，著有《南州异物志》，又称《异物志》《南方异物志》《南州志》《南州异志》《南州异状志》等，也记载了当时吴通过海路获取的奄蔡（今黑海北）、黎轩（罗马帝国）、大月氏（印度与中亚的贵霜王朝）、身毒（印度）及其他国家的各种消息。可惜这部书北宋以后也已不存，通过南北朝时的《齐民要术》、唐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和唐释道世的《法苑珠林》

及北宋时的《太平御览》诸书中摘引的文字，我们还是能了解到当时江南士人对“海上丝路”充满了兴趣。

留存至今的两晋时代与海外诸国交通的资料虽然较少，但当时记载异域外国的书籍已经开始大量出现。据《隋书·经籍志二》记载，唐初可见这类书籍尚有：《交州杂事》9卷（记士燮及陶璜事）、[13]虞孝敬撰《高僧传》6卷、释宝唱撰《名僧传》30卷、[14]沙门释智猛的《游行外国传》1卷、[15]释昙景的《外国传》5卷、[16]释法盛的《历国传》2卷、[17]无名氏的《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5卷、《诸蕃国记》17卷、无名氏所著《交州以南外国传》1卷、后汉议郎杨孚著《异物志》1卷和同一作者的《交州异物志》1卷、吴丹阳太守万震撰《南州异物志》1卷、无名氏的《日南传》1卷、无名氏的《林邑国记》1卷、无名氏的《诸蕃风俗记》2卷、无名氏的《诸蕃国记》17卷、许善心撰《方物志》20卷、朱应的《扶南异物志》1卷[18]等。[19]

与印度洋交通的发展便利了东西往来，来华外国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他们带来的异域奇货也越来越多。吴时交趾太守士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20]《艺文类聚》卷85记载，西晋太康二年（281）大秦国使臣自广州来贡，“众宝既丽，火布尤奇”。[21]三国时外国人在东南港市已经不再罕见，据《三国志》记载，当时交州地方官出巡时，“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22]

由于地理知识的增长，海商、水手们已经注意记载航行所经海区的情况。从东汉时期开始，我国南海水域在历史文献中已经开始被称为“涨海”。《尔雅》记：“蠃，小者蜬（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涨海中，可以为酒杯）。”[23]此后不仅许多汉文文献提到“涨海”，域外史料也提及这个海名。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苏莱曼曾记载前往中国的航路，他提到“从昆仑岛出发，船队进入涨海水面”。[24]除了苏莱曼，还有其他穆斯林地理学家提到过涨海。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航船离开中国大陆赴东南亚时，已经不再紧靠东亚大陆海岸航行，所以在途经南海时，水手们开始注意到南海诸岛。康泰等人出海时，《扶南传》载：“涨海中，列珊瑚洲，洲底在盘石，珊瑚生其上也。”[25]这里所提到的涨海即今之南海。南海诸岛如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均是由珊瑚礁构成的。1957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沙群岛考古时，曾采集到南朝时代的六耳罐、陶环等物。不仅中国水手，来往于中国与印度洋之间的外国航海家也了解到南海的

珊瑚礁，阿拉伯人苏莱曼在叙述涨海时描写道：船只进入“涨”（即“涨海”）后，暗礁浸没在海水之下，船只从暗礁之间的隘道通过，安全航行要靠真主护佑。[26]提到南海诸岛的穆斯林地理学家并不止苏莱曼一人。这说明航海技术的进步是世界性的。

据文献记载，南朝宋齐时有十余国沿海路入华。梁时许多海外番国奉中国南部政权为宗主国，“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27]日益增多的交流使中国人对前往西亚的海路和各国地理方位有了更为准确的整体认识，即所谓“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28]刘宋时代，其疆界伸及今越南中部一带，与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的关系十分密切。林邑、扶南（今柬埔寨）曾数度遣使入贡，位于今印尼境内的诃罗陀国则请求与刘宋建立互市关系，要求建立关系的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个时期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之间的海路交通变得更为频繁。元嘉五年（428）狮子国“国王刹利摩诃南奉表曰：‘谨白大宋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29]可见中国南方与锡兰岛之间已经保持着经常的官方联系。

南齐永明二年（484），时扶南王姓侨陈如名阇耶跋摩，听说齐朝新立，派天竺道人那伽仙上表入贡，陈述其国叛臣鸠酬罗窃据林邑，聚凶肆掠，请求中国派兵助讨。齐武帝答复，交州的兵力会给以支援。[30]当时中国南疆及于交州，在东南亚影响甚大，所以才有扶南向中国请兵相助之事。

南朝时，因为海外贸易兴盛，广州的地位日见重要，已经取代两汉时代的徐闻、合浦。梁武帝在国内兴佛，当时与林邑、扶南贸易的物品中有许多是佛事用具，例如扶南曾赠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等。梁武帝听说扶南有长一丈二尺的佛发，特派沙门释云宝往迎之。[31]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如盘盘（今泰国南部万伦湾一带）、丹丹（今马来西亚之吉兰丹）、干陀利（今马来西亚吉打）、狼牙修（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婆利（婆罗洲）与梁朝的海上交通也很密切。

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水域以今马来半岛为界。马来半岛深入海中，其东面的暹罗湾属太平洋水系，其西面的安达曼海属印度洋水系，半岛最窄处仅数十公里。在信风为主要动力的时代，绕过马来半岛的航程是漫长的，而在半岛边卸货转运却不失为一种节省运力的办法。这条“海—陆—海”联运路线见之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32]自魏晋时代起，许多

从中国出洋的海船便把目的港定在马来半岛以东的暹罗湾。在暹罗湾边的小河湾里，来自中国的商人们把从国内运来的货物过驳到当地的小船上，然后开始采购回头货，装船后等待信风回乡。这些载满过驳货物的小船，沿小河驶抵马来山脊脚下，用人力或畜力运过山岭，在山脊另一侧的小河边再载上小船，运至安达曼海边。在这里有许多来自印度、西亚、东非、大秦的商人，他们也卸下自己运来的货品，等待购买从山岭那一边运来的中国货。他们的番货被当地商人贩运过马来半岛，转售给来自中国的商人。

西汉时中国海船已能航达南亚次大陆的南端，即今斯里兰卡。东汉时罗马帝国的商人也开始从红海直航远东。《宋书·蛮夷传》说，大秦、天竺地处西溟，两汉的使臣均视前往大秦、天竺的使命为畏途。但在贸易的重利诱惑下，“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异”的各国贾客携“山琛水宝”、“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及其他“千名万品”的货物，“泛海陵波，因风远至”。[33]

对于中国舟人来说，前往印度洋西部航行的关键，在于掌握自今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至阿拉伯海沿岸诸地的航路。东汉以后，中国与南亚之间的交通日益频繁，在中国僧人赴西天求法、印度法师入华传扬佛教的同时，中国人对印度地处中国与泰西之间的地理位置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了解到从印度前往阿拉伯海诸地的海道。刘宋时僧人竺枝在以自己亲历见闻为据写成的《扶南记》中说：“安息去私诃条国二万里，国土临海上……户近百万，最大国也。”[34]这里的安息即指波斯的帕提亚（Parthia）王朝，但其实当时帕提亚王朝已经灭亡，波斯已为新兴的萨珊王朝统治，而中国人仍然以传统的名称安息称呼之。“私诃条”即三国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所提到的“海中州名”——斯调，[35]这是巴利语“狮子国”（Sihaladipa）的音译。这时中国人已经了解了从印度前往波斯湾的海路。

二 法显与南海佛教之路

从汉末开始，中国分裂，战祸四起。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有关灵魂不灭、因果报应与转世轮回之说，在此时的中国南北迅速得到传播。晋室南迁后，中国南方相对比较安定，各地纷纷动用财力兴建佛寺，传授佛法。来自异域的僧人受到普遍的欢迎。当时因前往西天的陆路为北方割据政权阻隔，海路在中印交通之间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

据唐代和尚义净记载，在印度那烂陀寺以东40余驿的地方，沿恒河而下，有一鹿园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当室利笈多大王时，有“支那国”即广州僧人20余人至此，室利笈多大王为他们建寺，“以充停息”，并赐给“大村封地二十四所”。直至唐代，还有3个村子的人属于此鹿园寺。唐时当地的东印度王提婆摩跋还有为新到来的中国僧人重建此寺的打算。[36]据义净记载，室利笈多大王上距义净时代已经500余年。据学者研究，印度笈多王朝王统中最早的一位国王就叫Srigupta，即“室利笈多”，他曾被称为Maharaja，即“大王”。义净提到的室利笈多大王，很可能就是他，其在位时间应是3世纪末。[37]这20余位中国僧人可能是从四川先沿水路至广州，然后乘船行至东印度的。[38]

在这一时期为数众多的前往天竺取经的和尚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法显（337～420？）。法显是中国最早到天竺（今印度）取经求法的佛教大师之一，也是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他是十六国时代山西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人，本姓龚，出身贫寒，有兄三人，但都因灾荒连年、瘟疫流行而夭折。父母害怕“祸以次及”，当他刚刚3岁的时候，就把他度为沙弥（即送他到佛寺当了小和尚）。399年，63岁的法显从长安出发，沿陆路去天竺，历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葱岭、中亚到达印度。他在摩揭陀国都城巴连佛邑，即今印度比哈尔邦（Bihar）之巴特那（Batna）留学3年，学习梵语，抄写经律。然后沿恒河而行，到古印度东北部著名海港多摩梨帝国，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加尔各答西南之坦姆拉克（Tamlak）。对研究亚洲航海史的人来说，法显在历史上最伟大的贡献是他从天竺求学的后半段开始，选择了海路来继续他的旅行，并继而乘海舶踏上归程。

义熙五年（409），法显“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狮子国”。法显此行时正值初冬北风之时，扬帆顺风，沿印度东海岸南行。从加尔各达到斯里兰卡的当代航行长度约1200海里。法显所乘之“商人大舶”大约是印度船，平均每昼夜可行85海里（约157公里）。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义熙七年秋，又乘另一条商舶自狮子国启程，计划横穿孟加拉湾东返故国。这是一条巨大的海舶，可载200余人。启程之初，“得好信风”，船顺利东行。但秋季乃印度洋东南季风与西北季风交替的时节，风向不稳定，船启行后两日便遇风暴。[39]法显一行被迫漂至一岛。[40]待潮退后，修补船只破损处，然后继续前驶。行90日方至耶婆提。[41]估计法显因为风暴和风向的改变，偏离了正确

航道，沿苏门答腊岛的西南海岸而行，到达此岛的东部。法显在耶婆提停留了5个月等候季风。义熙八年春，法显再一次搭乘一艘可载200人的商船，携50日粮朝广州开航。因途中再一次遭遇风暴，海船误期错过广州，最后到达今山东海岸。法显开始从长安西行时，有宝云、慧应、慧景、道景等多人同行，归国时只剩下他一人。

法显归国后，与佛驮跋陀罗合译经、律、论共六部24卷。他还把自己在异域14年的经历写成《法显传》一书，此书又有《佛国记》等其他名称。法显在其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南亚、东南亚的风土人情，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印度洋海上交通的诸方面，如船舶、航海术、航线、东南亚及南亚海上贸易等，都有重要价值。法显63岁从长安启程时是十六国中的后秦人。他沿陆路从中国走到印度，由海上乘船返归故土，前后历时14年，游历了31国。义熙八年法显在东晋控制下的山东登陆回到中国，所以后人又称他为“晋法显”。

法显取海道归国开辟了南海佛教传播之路的新纪元。这一时期往来于中国、南亚之间的僧人中取道海路的人越来越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国僧人首次从中国动身时，往往沿传统的陆路西行，但归国则常取海路。西凉僧人智俨曾赴克什米尔，与当地高僧觉贤一同从印度启航回中国，与法显一样在山东青州登陆。后来智俨又一次乘船赴天竺。[42]同一时期还有幽州李勇，他也是沿陆路赴印度求学，后“于南天竺泛海达广州”。[43]高昌僧道普在印度随船舶回国，在青州登岸。[44]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僧人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对中国与南亚之间的海上交通尚不够了解。所以当他们启程赴西天时，首选的是传统的陆路。而当这些求法僧人到达印度之后，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中国与南亚之间已经有着相当频繁的海上交通时，往往舍陆路而求海道回国。这也是为什么南北朝时入华的外国僧侣中，有相当部分是泛海而来的原因。

与之不同的是许多域外僧人首次前往东方便循海路。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先至狮子国，然后由此国“随舶泛海”，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45]甚至一些远居内陆的克什米尔僧人也弃陆路而求海路，前往东方。前面提到的高僧觉贤，就是在克什米尔遇到中国僧人智俨后，决定来华的。他们先行至交趾，再附海舶泛至山东。克什米尔王子求那拔摩先赴狮子国，从那里乘船到达爪哇岛，在那里传授佛法，名扬周邻，为刘宋僧人所知。宋文帝命交趾刺史泛舟至爪哇邀请，求那跋摩因此来

华。[46]西天竺僧拘那陀罗（真谛），于梁中大同元年（546）取海道经狼牙修、扶南至南海郡（今广州）。后来他曾打算乘舟返回狼牙修国。[47]南天竺人菩提达摩亦从海路入华，后来被尊为禅宗之祖。除印度佛僧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东南亚僧人从海路入华，其中著名者有扶南人僧伽婆罗（僧养）、曼陀罗（宏弱）等，[48]这说明两汉以后，在中国与东南亚和印度的交通中，海路日见重要。

除了法显之外，赴西天求法的僧人中还有许多带来了印度文化的新知识。梁人慧皎的《高僧传》是记述东汉至梁初著名僧人事迹的传记集。僧人传记杂录著作在晋梁之际已经出现多部，如宝唱的《名僧录》等。慧皎在前人的基础上，收集群作，比其异同，记载了许多天竺、东南亚各地来华的僧人和中国赴海外求学的和尚的事迹，受到各国研究佛教传播史的学者的重视，被公认为是研究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和文化的最重要史料。

三 艰险的旅途

尽管航海技术取得了许多进步，但蹈海远行仍然是一件充满不可知因素的事。古时泛海行船，海难发生的频度相当高，其中主要的风险是风浪、触礁和海盗。《汉书·地理志》便已经记载：西汉时前往印度的航程中有杀人越货的强盗，使臣畏惧“逢风波溺死”。

据法显记载，他于411年从狮子国启程东还。当时舟人已知在舟后系一条小船，“以备大船毁坏”时用。他们的船行至第二天遇大风时，船破水漏，情形万分危急，乘客、水手纷纷上小舟逃生。上了救生艇的人恐人多翻船，遂强行砍断缆绳。留在船上的人为求生只得把货物投入海中，当时法显也被迫留在商船上自救，在海中漂流13日后方到一个荒岛上。至于那些跳到小船上的逃生者的下落，法显没有提到。在这种风暴中，一叶小舟在汪洋大海中漂泊，很可能是凶多吉少。除了风暴之外，法显说，“若遇伏石，则无活路”。所谓“伏石”就是暗礁。另外“海中多有抄贼”，遇则人货全无。[49]离开耶婆提以后，法显搭商船趁东南风回国。原计划行50日，但因风暴，偏离航线，船行百日有余，不见广州，食、水俱尽，日常饮水以淡水、海水掺半，每人每日配给2升，历经种种险情。

另一位西凉州僧人智俨的经历与法显近似。他在今克什米尔之地延请当地高僧觉贤一道附海舶入华传佛法，途中在中国南海一海岛候风。

一日遇顺风，同泊诸船中许多纷纷拔锚启航，唯智俨、觉贤等人的海船暂泊继续辨认风向。结果风暴突起，先出航各船均遇难。待觉贤等人启程后，留下诸船又遇海盗，均遭难。[50]

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有缘东方”，他“随舶泛海，中途风止”。海上行船的主要动力是信风，失去风力之后，船舶只能在海上漂泊，原先携带的给养再多也只能维持有限的时间，到“淡水复竭”时，“举船忧惶”。后来“信风暴至，密云降雨”，才安抵广州。[51]

在海难中丧生的，除水手、商贾、佛僧以外，有时还有南海诸国的王公贵族。据《南齐书·东南夷传》记载，林邑王诸农仰慕中国文明，亲自乘舟来华，不幸在“海中遇风溺死”。

四 航海科技的进步

从2世纪末东汉灭亡，到13世纪70年代元统一以前的约1200年中，中国历史上数次出现分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陆路东西交往受阻，海外诸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而持续地上升，中国与波斯湾和地中海周围地区的交通越来越倚重于海路。航海术正是在这些时期有了巨大的进步。

（一）船使八面风

两汉以后，海外交往的发展促进了航海技术的迅速进步，这个时期航海术上最重要的成绩是风帆的改进。三国时，吴国丹阳太守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叙述了南海上船舶的风帆，说：“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城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52]

万震所述是“外徼人”的船舶所装置的风帆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种由卢头木叶编成的帆已经能用于偏风航行。在航海中遇到正顺风的情况并不很多，在航行中如遇左右后侧风、横向风与前侧风时，帆面还是正前向布置，就非但不能有效地利用风力，而且会使船偏离预定的航向，甚至造成危险。因此在偏风的情况下，必须相应地调节帆的角度，利用风在帆面上产生的推进分力，并在舵的配合下克服横向漂力，使船按预

定航向前进。

万震还记载道，这种前后设置的双道风帆中的后帆，当遇到横向风时，可以45度角迎置，将风反射到前帆，借以推进船行。如欲船行加速，可置满帆，若欲降速，可落半帆。这种帆做得下大上小，使帆下部受风面积较大，降低了重心，船舶有良好的稳定性。这些“外徼人”的船，由于风帆技术的改进，行船已能“不避迅风激波”，故航行速度大增，也因而将这种多桅帆航的使帆技术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航海业的进步。

风帆的进步与航海家世世代代运用季风来驱动海船是分不开的。舟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信风的掌握有了巨大的进展。印度洋—太平洋海区内的主要港口之间，已有一定的船期。法显从印度的恒河口前往狮子国时，依冬初信风，昼夜14日西南行而达。而他从耶婆提启程归国时，按正常的航期，携带了50日粮，前往广州。当时从“迦那调洲”出发；船张7帆，行一月余可达大秦国。

（二）海外地理知识的扩展

随着中印两国交往的日益密切，有关印度的地理学也传入中国。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因之而扩大了。中印两国虽隔喜马拉雅山为邻，但两大民族的文化传统却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人讲究科学和实际，印度人则富于幻想。古代印度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寓言和神话极为发达，但却没有写下有价值的历史著作。而中国人却恰恰相反。中国历朝历代的官私文书、佛家著述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印度和南亚次大陆的记载，2000年来绵绵不绝。

中国以外的国家也有一些与印度历史有关的文献，例如古罗马阿里安的《印度志》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中，保留了一些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时代有关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的描述。但这些资料无论就丰富程度，还是翔实性来说，都无法与中文史籍中的印度资料相比。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讲：印度的历史保存在中国历史著作之中，如果没有这些中文资料，研究伊斯兰时代以前的印度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唐以前汉文史籍中有关印度洋地区的史料范围已经极其广泛，既包括了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记载，也有当地历史、风土民情、物种土产、商业贸易、地理交通、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传

播、文化艺术等资料。从分类上说，既有正史中的相关记载，也有稗史和其他著作。

正史中有关印度的记载首推《汉书·地理志》中的有关从华南前往南亚的航路的记载，这在上一节中已引，兹不赘述。范晔所著、成书于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的《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贵霜王朝征服印度北部、与大秦国交通、在西域交通受阻后频从日南徼外来华的事迹。沈约在永明六年（488）春成书的《宋书·夷蛮列传》中，保存了两封外交文书的汉文译本：一封是元嘉五年狮子国国王刹利摩诃南致宋文帝的国书，[53]另一封是同年天竺迦毗黎国（即迦比罗卫，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国王月爱致宋文帝的国书。[54]萧子显的《南齐书·东南夷列传》记载了天竺道人那迦仙从广州乘扶南海舶归国，途遇大风，至林邑遭劫后，引出扶南、林邑与南齐之间一段交往的故事。[55]

杂史和其他官私著作中有关印度洋地区的记载亦很多。三国时魏国京兆人鱼豢的《魏略》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书中记载了西亚、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相关情况。例如，书中提到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临儿国”（即今尼泊尔之洛明达）和“天竺东南三千余里”的“车离国”、印度东部的“盘越国”，并提到蜀地的贾人与这个“盘越国”有往来。鱼豢还记载了“循海而南”，经过“交趾七郡”可与大秦往来，此外大秦尚有水道通益州、永昌。这显然是指从云南经缅甸出海的商道。鱼豢的著作已经亡佚，如今只有片段保存在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成书的《三国志注》中。

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中还有一些志怪小说，如张华的《博物志》、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和郦道元的地理名著《水经注》等。《博物志》记载范围极广，包括山川地理、奇花异木、鸟兽虫鱼、神话传说等。《水经注》是三国时成书的《水经》的注疏。《水经注》最可贵之处，就是保存了大批有关印度、东南亚的重要资料。郦道元在叙述域外河流时所用的资料，如康泰的《扶南传》、郭义恭的《广志》、支僧载的《外国事》、释道安的《释氏西域记》和《佛调传》、竺枝的《扶南记》等，均已经亡佚，只有片段保存在郦道元的注文之中。20世纪以来，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唐以前中外交往历史在世界学术界已经蔚为风气。

（三）导航术

唐宋时代的中国导航术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除过去传统的航海导航术，如海外地理学、地文定位、天文测星、船舶操纵技术等继续发展外，以量天尺为测星工具的大洋天文定位术和全天候的磁罗盘导航的使用，是这一时期中国导航术发展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国航海术得以发展、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通过指南针可以测定航向，观星术则可确定船在海中的纬度，两者配合使用可确定船在海中的位置。

1.唯望日月星宿而进

天文导航的产生先于指南针导航，在指南针导航术发明后，天文导航仍然是远洋航行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两者相辅使用。

东亚大陆的海岸线大致上呈南北走向，而隔海相望距大陆不远处，分布着南北走向的西太平洋岛弧：库页岛、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及吕宋列岛。西太平洋岛弧与东亚大陆之间的几个西太平洋边缘海，如日本海、黄海、东海与南海，自北向南排列，形成一条狭长海道。这一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古代东亚地区的航海的天文导航相对较为容易。当中国海船启航时，无论是采用沿海还是近海航行法，都是大体沿南北向航行。天文导航在白昼主要依靠的是太阳，而在夜晚则是北极星。晋代葛洪提到“失群逆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返”。[56]就是说，在内陆湖泊中航行时，已经应用了指南针；而在沧海中航行时，如果不观测北极星是无法返回的。

当海船进入东南亚、印度洋后，地理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海岸线变得极为曲折：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间隔着暹罗湾，马来半岛与印度之间隔着孟加拉湾，印度与东非之间则是阿拉伯海。且因这些海纬度皆不高，北极星出地高度有限，夜间仅靠北极星已经无法导航。从先秦时代起，东南亚、印度洋航海的传统方法是沿东南亚、南亚大陆的曲折海岸线而行。这种航行法虽然较安全，但绕道而行，航期很长。

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海船脱离陆地的能力越来越强。从事东南亚—印度洋航海的人们开始尝试穿越大洋的航行。在远离海岸的情况下，传统的陆标定位术已经不起作用，需要一种新的从已知船位推算未知船位的航迹推算术。天文导航术的历史就是朝满足这种需求方向发展。晋代法显曾经陆路赴印度、斯里兰卡，然后取海路返回。他在自己的游记中写道：“大海弥漫无边，不知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

风去，亦无准。”这说明他所乘坐的海舶是从斯里兰卡直接向东航往苏门答腊。这就是说，在南朝时期，在印度洋上航行的海船已经脱离了主要依靠地文导航的初级阶段，能够在远离陆地的大洋中航行。在天气晴朗时，白天依日定向，夜晚则靠星辰指引；唯阴雨时节，只能随风而进。

据道藏中《太清金液神丹经》记载：

> 出日南寿灵浦，由海正南行，故背辰星而向箕星也，昼夜不住十余日，乃到扶南。扶南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自立为王，诸属国皆君长。王号炮到。大国次王者号为鄱叹，小国君长及王之左右大臣皆号为昆仑也。扶南地多朱砂、珍石。从扶南北至林邑三千里，其地丰饶，多朱丹、硫黄。[57]

据此可知，当时中国海舶从日南等地出发沿海南行时，采用的是天文导航法，即逆北辰所指方向，朝箕星即二十八宿之箕宿而行，昼夜不息，十余日可到扶南。这些记载证明，中国航海家在当时已经掌握了西太平洋—印度洋的天文定位的技术，即已经脱离了单纯依靠沿海陆标导航的阶段，在必要时可根据某些星辰的出地高度与观测视角来确定海船在大洋中的位置。这是航海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

唐代天文定位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利用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差，来确定南北距离变化的大地测量术上。唐开元年间（713～741），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俗名张遂，673～727），曾率领南宫说等人，对唐朝的疆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一行创造了一种简便的仪器“复矩”，来测量北极星距离地平的高度，即所谓“以复矩斜视北极出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北极差一度半，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相当于129.22公里）而差一度”。[58]这与现代天文大地测量值111.2公里虽有一定距离，但已经具有航海的实用性。

1973年在福建泉州市后渚的宋代海船尾仓（第13仓），即舟师所居仓中，发现一把竹尺，残长20.7厘米，宽2.3厘米，尺内一半分五格，每格长2.6厘米。未分格的部分，可能是手持时用。这应当就是一把“量天尺”，即测量“星高”的尺。使用时伸臂竖握此尺，使其下端与水天线相切，以观测天体的视线与此尺相交的寸、分读数为测天之高度。这种尺使用捷便，如用以测量北极星，可依照测高读数，判别海船所在地理纬度。

2.指南浮针

天文导航术的关键在于观察日月和测定星高，其目的是确定船的纬度和方向。但天文导航受天气影响大，阴雨天无法观天，无从根据日月方向和星高来判明船所处位置，从而限制了其使用范围。指南针的使用使导航不再受制于气候，是世界航海史上一项重大的发明。

指南针最初是为确定朝向风水而发明的，后用于水上航行。据前引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外篇》提到的“失群逆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一语，可知至迟在公元4世纪以前，使用指南针来确定船舶在浩瀚水面上的位置的方法，已经为许多人所知。

成书于1041年的相墓著作《茔原总录》一书中记载：

> 客主的取，宜匡四正以无差，当取丙午针于其止处，中而格之，取方直之正也。盖阳生于子，自子至丙为之顺，阴生于午，自午至壬为之逆。故取丙午壬子之间是天地中，得南北之正也。此丙午针约而取于大概，若究详密，宜曲表垂绳，下以重物坠之，照重物之心，圆而为圈，一如日月之晕。绳以占号，二晷渐移，逢晕致臬，自辰巳至于未申，□□两旁真东西也。半拆之，望坠物之下，则知南北之中正也。[59]

这是说，欲定东西南北，必须让磁针指丙午之间的方位，则午向为正南。这说明当时已经发现了磁偏角为南偏东7.5度。从发明磁针指南，到认识到磁针所指方向（即地磁极）与地球自转轴的北极之间方向并不完成吻合（即磁偏角的存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据成书于1088～1095年的《梦溪笔谈》记载：

>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60]

沈括将安置磁针的方法概括为4种，即（1）浮置水面，（2）置于指甲上，（3）置于碗唇上，（4）以丝线系磁针腰部，使平悬于无风处；并说明最后一种方法最妥。

1044年泉州曾公亮（999～1078）、丁度在其主编的《武经总要》中记载：

> 令识道路或出指南车及指南鱼以辨所向。

指南车法世不传。鱼法，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61]

曾公亮等描述了一种“指南鱼”，是用薄铁片剪成鱼形，将其磁化后成为指南鱼，浮置水面即可指示南北。

约11世纪下半叶，指南针作为航海的导航仪器已见于记载。1124年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也说，当宋使船队驶过蓬莱山，在半洋礁水域夜间“洋中不可住，维视星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62]也就是说，在天气晴朗的夜间凭星斗航行，晦冥则全靠“指南浮针”。“指南浮针”这个术语说明当时采用的是《梦溪笔谈》中提到的水浮法。宋吴自牧《梦粱录》也云：

且论舶商之船，自入海门，便是海洋，茫无畔岸，其势诚险，盖神龙怪蜃之所宅。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愚累见大商贾人言此甚详悉。

又曰：“但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63]所谓“针盘”，当即罗经。据明李豫亨撰《推篷寤语》描述，“术家针盘用水浮针，视其所指以定南北。近年吴、越、闽、广屡遭倭变，倭船尾率用旱针盘以辨海道，获之仿其制，吴下人始多旱针盘，但其针用磁石煮制，气过则不灵，不若水针盘之细密也”。[64]可知宋以来中国舟师传统所用之针盘为水罗经，由经验丰富的火长专职掌管。

指南针导航术在发明后不久便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海外，为外国航海家所知。在宋代这一先进技术已经传到欧洲。据李约瑟考证，欧洲最早记载有关指南针导航术的，是英国人亚历山大·尼科姆（Alexander Neckam，1157～1217），他在1190年已经提到航海罗盘。1205年法国古约·德·普洛文（Guyot de Provins）在其《经书》（*La Bible*）中提到，航海者有不致迷航的技巧：针用磁石触磨过后，借助于麦秆浮在水上，针锋就转向北极星，能在黑夜里知道正确的航向。[65]阿拉伯人应用指南针早于欧洲人，但文字记录指南针却晚于欧洲人。欧洲人是通过大食人的中介学会指南针导航术的。在成书于1282年的《商人辨识珍宝手鉴》中，大食矿物学家贝拉克·卡巴札吉（Bailak al-Qabajaqi）说，他曾乘船从的黎波里（位于今利比亚）到亚历山大城（位于今埃及尼罗河入海处）。在航行中，他看见船员们使用借助木片或苇箔托浮在水面上

的磁针来辨别方向。他称："海员们说航行于印度洋上的船长们不用这种木片托浮的指南针，而用一种中空的铁鱼，投于水中，浮在水面，鱼之头尾指向南北。"[66]早期欧洲与阿拉伯人所使用的这几种借助于木片或芦管浮在水上辨别方向的磁针与磁鱼，显然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国的浮针与指南鱼，应当是通过不同渠道从中国传过去的。

指南针传入欧洲后，其装置方法得到改进，发明了有固定支点的旱罗盘。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到达日本，日本航海家学到旱罗盘。前引明代李豫亨的《推蓬寤语》提到，中国原先所习用的针盘用水浮法，视其所指以定南向，以后因东南沿海倭寇入侵，中国人发现日本人用旱罗盘，才因之学得。旱罗盘通过日本传到中国时在16世纪下半叶，此后水罗盘逐渐被淘汰。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9章中高度评价了指南针的发明。指南针的应用是航海技术的巨大变革，它象征着原始航海时代的终结和航海新时代的开始。只有在掌握了指南针后，大洋才不再是人类不可逾越的障碍。

3.《海岛算经》与海图的产生

唐代具有航路指南性质的资料已经出现。从唐宰相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中可知，当时亚洲海舶在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区内已经有相对固定的航线，航海家对这一海区内某些重要的目的港之间的航程也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和记载。地文导航的关键在于正确地辨识航线沿途所经的地理坐标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学的进步，汉以后航海家已经能在勾股定理与相似比例关系的原理基础上，运用两次观测计算的"重差法"来测量陆际。这一科学进步使海岸测量术迅速发展起来。三国时著名数学家刘徽在其《海岛算经》一书中，曾举出一道应用题云：

> 今有望海岛，立两表，齐高三丈，前后相去千步，令后表与前表参相直。从前表却行一百二十三步，人目着地取望岛峰与表末参合；从后表却行一百二十七步，人目着地取望岛峰，亦与表末参合，问岛高及去表各几何？答曰岛高四里五十五步，去表一百二里一百五十步。
>
> 术曰：以表高乘表间为实相多，为法除之，所得加表高，即得岛高。

唐代数学家李淳风对此作注：

此术意宜云，岛谓山之顶上，两表谓立表木之端直（案，此句讹舛。据术意，言立两表，齐高三丈，相去千步者。谓立木为表，两表各高三丈，其地相去千步，必准之使平，则表端齐平，然后可测望也。又言令后表与前表参相直者，自海岛至前表，自前表退至后表，三者令其参相当也，非木之端直。），以人目于木末望岛参平，人去表一百二十三步，为前表之始，后立表末，至人目于木末相望，去表一百二十七步，二表相去为相多，以为法（案，此亦讹舛。据术意，人去前表一百二十三步，以目着地，望表末，斜与岛峰参合，又去后表一百二十七步，以目着地，望表末亦与岛峰参合，非于木末望岛也。前后去表相减，余四步为相多，非二表相去也。当由传写失眞，后人妄加改□，遂不可通。）前后表相去千步为表间，以表高乘之，为实，以法除之，加表高，即是岛高。积步得一千二百五十五步，以里法三百步除之，得四里余五十五步，是岛高。[67]

这清楚地证明，南北朝时期以前，我国航海家的地文导航术已从目视记录发展到理论计算，水平之高令人惊叹。

（四）海船

1.南海番国船

当时往返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与东南亚、印度洋诸地之间的船舶既有外国船，又有中国船。外国船也有多种。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提到，唐代海南万安州（海南岛万宁县、陵水县）大首领冯芳：

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68]

他还提到，广州珠江中停泊有婆罗门船、昆仑船和波斯船，为数众多。[69]这大致代表了当时番舶的种类，即东南亚船（昆仑舶）、南亚船（婆罗门舶）和西亚船。这些外国船因多从南海而来，又统称为“南海舶”，即《唐国史补》卷下所谓“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在婆罗门船中，有一种“狮子国舶”，即斯里兰卡船。《唐国史补》说：

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70]

“昆仑舶”（东南亚船）在东南亚、印度洋航海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代义净赴印度时，从广州启程时乘坐的是波斯船，这可能是指东南亚的“波斯”，即今之缅甸的勃。[71]义净到达室利佛逝以后，换乘室利佛逝船前往末罗瑜，即今马来半岛南端，再由此往东印度。他沿途换乘的几乎全是东南亚船。昆仑舶来华数量多，次数频繁，所以《旧唐书·王方庆传》记载他“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当时“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72]

西亚船中之大者称为“大食巨舰”，其中以“木兰皮”舟为最。“木兰皮”即阿拉伯语Maghrib的音译，意为“极西之地”，指今北非利比亚以西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地，今译作“马革里布”，所以“木兰皮”舟意为西大食舟。据南宋周去非记载，大食巨舰“一舟容数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机杼之属。言舟之大者，莫木兰若也，今人谓木兰舟，得非言其莫大者乎？”[73]其书中还专有一节题曰《木兰舟》，记：

>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入阻碧，非复人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

又曰：

> 盖其舟大载重，不忧巨浪而忧浅水也。又大食国更越西海，至木兰皮国，则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谓木兰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74]

宋代沿海港市人民对异域船除了以地方命名以外，还以载重量分等，分别命名。马端临提到，蛮夷船：

> 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也。次曰牛头舶，比独樯得三之一。次三木舶，次料河舶，递得三之一也。[75]

这里表示载重量的单位“婆兰”，看来是一种外国重量单位，其确实含义尚有待于研究。周去非说，南海中的“蕃舶大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万里，千百人之命，直寄于一柂”，可行数万里，载千百人。载重万斛的番舶，其舵长三丈。按一斛为一担计算，重92.5宋斤，合今制约118.4斤。[76]所以万斛之舟载重量已有约600吨。

数万斛之舟相当于排水量一两千吨的船。在以木材为基本造船材料的时代，这恐怕已是船舶载重量的极限了。建造这种巨舟单靠一国之力

难以完成。仅就其船舵而言，因船体过大，一般木材难以胜任，“卒遇大风于深海，未有不中折”。唯有使用钦州（今广西钦州）出产的乌婪木，才可制成长达五丈的巨舵，“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据说这种巨舵在钦州一双不过值钱数百缗，一旦运到番禺，立即升值十倍。[77]换句话说，这种巨舟是以中外合作的方式建成的。

印度洋的番船制造工艺与中国船大相径庭。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提到，当时“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78]唐代僧人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也描述道：

> 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郁子皮为索连，总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鍱，恐铁热火生。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非人力能动也。[79]

这是说，“昆仑舶”以椰子皮为索连接，葛览（橄榄）糖灌塞，使水不入，而不用钉。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也提到过这种船，他在叙述甘埋里国[80]时说，“其地船名为马船，大于商舶，不使钉灰，用椰索板成片。每舶二三层，用板横栈，渗漏不胜，梢人日夜戽水不使竭”。[81]这种船就是缝合式木船。马可·波罗也提到，当时这种船在印度洋上比比皆是。缝合船船体强度较差，抗风浪能力弱，易渗漏，汪大渊已经指出其弱点。

2.中国海舶

相较之下，唐代中国造船早已脱离了印度洋船舶的这种原始简陋的工艺，而大量采用钉榫接合技术。我国考古学者曾分别于1960年3月和1973年在江苏扬州施桥镇和江苏如皋县的遗址中发现过唐代木船，其船型虽然不同，但均使用钉榫接合技术。如皋唐船还建有9个水密隔仓，这就大大增强了船舶的横向强度与抗风浪和抗沉能力。还有一种名曰“海鹘”的海船，船舷左右置浮板，形如鹘之翅，以防止侧倾。这种浮板实际上是舷侧防浪板。

唐代我国已经能建造巨大的远洋海舶。据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苍舶，大船也，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者是也。”[82]一些阿拉伯旅行家曾描述过唐代航行在印度洋水域中的海舶。因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冲积，波斯湾中浅滩很多，中国海舶体积大，吃水深，航行不

便。因此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说，波斯湾中诸港之间的航线多由当地小型船舶担任，它们把各地的土产运抵尸罗夫港（Siraf，位于今伊朗），再转驳中国船运往东方。印度西南部的故临是各国海船加注淡水的地方，对中国船每次要收费1000迪尔汗，而对其他诸国船仅收10～20迪尔汗。[83]这种收费上的差别除了对不同地区船征收不同税率的因素以外，显然是因为中国船特别大的缘故。

在宋代，海船制造的工艺与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结合文献记载与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的宋船残骸及1976年在韩国新安发现的元船可知，宋代中国海船的基本特点如下。

第一是载重量大。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84]载重五千料约相当于300吨位。中型的海舶载重达1000料至3000料，可载二三百人。那时应用得最普遍的是"可载二千斛粟"的中型海船，称为"客舟"，"长十余丈，阔三丈五尺"。而长阔高大皆3倍于"客舟"的海船，叫"神舟"，望之"巍如山岳，浮动波上"。[85]按长阔高皆扩大3倍，体积便增至20余倍。据此推算，这种"巍如山岳"的"神舟"的载重可达五万余斛，相当于3000吨。如果的确如此，真是十分惊人的巨舰。前引周去非所述宋代在南海中航行的一种巨舟，其"帆若垂天之云，柁长数丈。一舟數百人，中积一年粮"，舟人们甚至还在船上养猪、酿酒。这种巨舟应当就是"神舟"。大舟巨舰在航海中"不忧巨浪而忧浅水"，因吃水深，"漂至浅处而遇暗石，则当瓦解矣"。[86]

第二是船体坚固，结构良好。船体"以巨木全方，搀叠而成"。[87]考察泉州古船可知，这条船的龙骨由两根松木接合而成，采用体外龙骨的设计和直角榫合的工艺，增大了船的纵向强度。海船的船壳、船底用二重板叠合，舷侧则用三重板叠成。自龙骨至舷有侧板14行，其第1至第10行由两层板叠合而成，第11至第13行由三层板叠合而成，采用搭接和拼接两种结构工艺，以钉榫为主要构件。里层船壳板的上下板之间都用子母衔榫合。尖底造型使船壳弯曲弧度大，多重板工艺使取材、建造和维修较为容易，二重或三重木板加固的侧板与船壳板使全船的强度大为提高，更耐波浪，利于远航。[88]

泉州湾海船使用铁钉，大钉极长，并用桐油、麻丝、石灰等嵌缝，以防渗漏和钉头锈蚀。当时中国的东亚近邻国家虽然学习中国造船工

艺，但技术上与中国仍有明显差距。据明《日本考》：

> 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缝；不使铁钉，惟联铁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费功甚多，费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国者皆其岛贫人，向来所传倭国造船千百只，皆虚诳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舰难于仰攻，苦于犁沉。故广福船皆其所畏。而广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之偏。桅机常活，不似中国之定。惟使顺风，若遇无风、逆风，皆倒桅荡橹，不能转戗。故倭船过洋，非月余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买舟于外海，贴造重底，渡之而来，[89]

总之，船板采用榫联和铁钉加固，并用桐油灰塞缝是我国唐宋以来发展起来的先进造船工艺，直至今日仍在木船建造中普遍使用。

宋代中国海船船体一般有十几个水密舱，泉州湾海船用12道隔板把船体分为13个水密舱，水密程度很高，即使在海难中破损一两个船舱也无倾覆之虞。这种13舱的木船直至近代还为福建沿海人民所沿用。据学者调查，这13个舱位各有专门的名称和用途。[90]

宋代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提到，宋代海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刃”。[91]1974年泉州市东南郊后渚港出土的宋末海船，根据造船学家研究，其船形特点是：底尖，船身扁阔，长宽比小，平面近椭圆形。我国南方海船的这种V型船体结构设计，不但可增强船舶的稳定性与回舯扭矩，而且能减少水下阻力，使海船在遇到横风时横向移动较小，适于在风力强、潮流急的海域航行。在顶风行船时更显优越，“贵其可破浪而行也”。[92]为改善船舶的摇摆性能，宋代水手还在船腹两侧“缚大竹为橐以拒浪”。[93]

元末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描述中印度洋上的中国海船，他说，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等，大者有船员千人，即水手600人，卫兵400人，有3帆至12帆，皆以篾编成，并有随行船相随。随行船有三分半大、三分之一大、四分之一大3等。像这样的大船仅产自广州和泉州。船底系用3层板以巨钉钉合而成。舱分4层，有公私舱房多间，船员常在木盆中种植蔬菜。橹大如樯，[94]每橹缚有铁链两条，摇橹时有10人至15人，分两排对立。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有翔实的描述。

五 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广州通海夷道》

（一）大食航海

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代之而起的是大食帝国。罗马帝国时代开辟的红海—印度洋航路后来为阿拉伯人所继承。629年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之后，他的继承者创立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食帝国，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航海活动的中心。穆罕默德本人早先曾多次参加过商旅，对中国有所了解。他曾训示自己的信徒说："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也应去求寻。"[95]据汉文史料记载，自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首次正式遣使入唐起，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大食向中国遣使达39次。阿拉伯帝国的地理学极为发达。正像汉文文献记载了从中国东南沿海前往西方的航路一样，存留至今的大食文献也详细记载了大食航海家从大食前往东方的路线。

伊本·忽尔答兹贝（Ibn Khrudadhbah）是大食最早的地理学家，他生于820年或825年，约卒于911年。他的著作《道里邦国志》写于846～847年。唐代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描述了从广州通往波斯湾巴士拉的航线，而伊本·忽尔答兹贝则记载了反方向的航线——从波斯湾的巴士拉通往中国的航线，其详细程度可与贾耽的记载相媲美。《道里邦国志》把前往中国的航路分为3段。

第一段，从末罗（今伊拉克巴士拉Basra）到细兰（今锡兰）：末罗至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海峡中之霍尔木兹岛），法尔斯沿海至提□（Daibul）共8日程，由此至弥兰河（按：即新头河，今印度河）河口为2日程。再航行17日至没来（Mulay），行2日至副临，[96]再行1日至细兰。

第二段，从副临向东航行10～15日，横渡孟加拉湾到达郎婆露斯（Langabalus，今尼科巴群岛）。复东行6日，至箇罗（Kalah，今泰国所属马来半岛之吉打）。由此行至婆露师（Balus，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西海岸大鹿洞附近），再经马六甲海峡（Salahit）至诃陵（Harang）。

第三段，从苏门答腊岛北部不远处的Mayd，航向潮满岛（Tiyuma，今马来西亚彭亨州东南）。由此岛至吉蔑（Qimar）行5日，复行3日到占婆（Sanf）。再航行一段便到中国。伊本·忽尔答兹贝甚至提到位于朝鲜半岛的新罗（Sila），说那里盛产黄金。[97]

唐末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苏莱曼除叙述从波斯湾到东南亚的航道外，还介绍了从今阿曼的马斯喀特（Muscat）到中国的航路。他说，从马斯喀特到故临—没来，顺风行约1个月，由此到箇罗，再行十余日至潮满岛，复航行十余日至奔陀浪（Pan-duranga，占城南部）。由此行十余日到占婆，经涨海到广州。[98]

751年唐朝与大食在中亚的怛罗斯发生冲突，唐军战败。大食人将俘获的大批唐朝随军文武人员押往后方，杜佑族子杜环也在其中。杜环在大食各地留居12年后，于宝应初年乘商船回到广州。[99]杜佑所搭乘的，也应当是大食海船。

（二）广州通海夷道

1.南海航线网络

隋统一以后，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业初年（605～606），隋炀帝派兵平定交州，隋水师沿印度支那半岛东岸南下，航达林邑，击破林邑王梵志的象军，[100]使东南亚地区与隋的关系密切起来。据《隋书·南蛮传》记载，大业三年（607）冬十月，隋使臣常峻等人奉命从南海郡（今广州）乘北风出使赤土国。常峻的船队经两昼夜的航行，过焦山石（今越南占婆岛），暂泊于其东南的陵伽钵拔多洲（今越南归仁以北的燕子岬），复南行至师子石（今越南昆仑岛附近），再西行，接近马来半岛沿岸之狼牙须（Langkasuka，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再南航抵赤土国。赤土国王派出30艘小船前来迎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常峻回国时，赤土国国王遣其王子随行入贡。[101]

唐代前往印度取道海路的人越来越多。据义净记载，他所知道到的赴西天求法的僧人，连他在内共有56名，其中有34名是从海路去的。书中所附之《重归南海传》还提到了另外4位从海道赴西天的僧人。海路赴印度的航线很多，起点也不尽一致。这些中国僧人有的从广州启程，有的从交州开航，更有的从占婆动身。途中停靠的港口各不相同，有的经位于今印尼的佛逝和诃陵，有的经今马来半岛。南亚境内也有为数众多的中转港，或在狮子国，或在南印度，或在东印度，或在西印度。

以义净为例，他于咸亨二年（671）离开广州光孝寺，随波斯舶出海南行，经约20余日，到达室利佛逝（Srivijaya），即今印尼苏门答腊之巨港，在当地停留约半年。次年复乘当地国王的船舶，向西航行15

日，到达末罗瑜国（Malayu），即马来半岛的南端，于此再停留约2个月，换乘其他船北上航行15日，抵羯茶国，即今泰国所属马来半岛之吉打（Kedah）。同年十二月，由此经安达曼海，越孟加拉湾，航向东印度。[102]

2.贾耽与《皇华四达记》

贾耽（729~805），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曾任鸿胪卿（职掌接待外国使臣的官员）、检校司空（专管校勘书籍、纠正讹误的宰相）等职，是唐代中后期著名地理学家和地图制图学家，著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陇右》《山南图》《贞元十道录》《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岛等图》等，[103]其中最著名者为《海内华夷图》与《皇华四达记》。《海内华夷图》继承了晋代裴秀制图六体，全图幅面约10平方丈，耗时17年完成，其两大特点：一是注重边疆与域外国部分，二是注重历史地理的考证，古今地名分色绘制。可惜此图已失传，但它的缩印本在南宋刻石为《华夷图》。

贾耽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为宰相长达13年，因职务关系，负责接待各国来唐使者，有机会调查使节下番和入唐的路线。《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和《皇华四达记》10卷这两部书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可惜现已失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地理志》时，摘录他的《皇华四达记》，其中的“广州通海夷道”的主要内容因之得以保存至今。

《广州通海夷道》详述了下番船舶由广州出航后前往西域之途，为《旧唐书·地理志》所无。它是一份详细的有关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东西交通的说明资料。[104]

提到从广州前往大食的航海路线是：从广州出航后先向东南行驶出珠江口，转向西南方经数日绕过海南岛东岸，再西南行贴近越南沿海，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岘港以东之占婆岛），南行经陵山（今越南归仁以北的燕子岬）、门毒（归仁），然后西南行经奔陀浪（今越南藩朗）、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岛），航行5日越暹罗湾至海峡（今马六甲海峡）。沿海峡西北行，出峡后经婆国伽兰洲（今印度之尼科巴群岛），向西驶过孟加拉湾，抵达狮子国。

由此往大食有两条道：一道沿印度西海岸北上，经至弥兰大河（今

印度河）河口，复西北行入波斯湾，至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河口；另一道从狮子国沿西北向横渡阿拉伯海至三兰，由此沿阿拉伯半岛南岸东北行，绕阿拉伯半岛东北角达波斯湾口之没巽（今阿曼东北之苏哈尔），驶入波斯湾，沿波斯湾东岸而行，至弗利剌河河口与第一道相汇合。

这一段航程中，从狮子国启航时的目的港“三兰”最为引人注目，史文曰：“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105]关于其今地，研究中国航海史的专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106]日本学者前岛信次考出今也门亚丁（Adin）的古名为Sāmrān，即此“三兰”。[107]可见贾耽记载的航路中，从狮子国启程时，并非如一般人所设想的沿印度次大陆西海岸北上，再沿阿拉伯海北岸西行，进入波斯湾，而是从斯里兰卡直航红海海口，这是特别值得注意之处，这证明在这个时代中国海船的远洋直航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984年4月，陕西省泾阳县文物工作者从事田野文物调查时，在泾阳县扫宋乡（2002年并入云阳镇）大、小杨户村附近，发现了一通《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该碑身首一体，碑首六螭下垂，碑首高85厘米，碑身高190厘米，现藏泾阳县博物馆。碑文提到：

> 贞元初，既靖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泽入覲。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於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遐迩无惮险之容，凛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灏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於异俗，被声教於无垠。德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仗忠信之明效也。[108]

早在魏晋时代，法显归国时，所乘海船就有从狮子国横穿孟加拉湾、直航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记录；隋代常峻出使赤土国时，也曾从越南南端的昆仑岛向西横穿暹罗湾直达今马来半岛；贾耽时代往来于远东与红海的海船不但在暹罗湾和孟加拉湾继承了前代水手的航海术，而且进一步具备了从狮子国向西横越今阿拉伯海的能力。杨良瑶出使所乘应是唐船。因此可以说，在十六国至唐代，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水域中的各国海船已皆无远而弗届。

贾耽所记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广州为起点不是偶然的。唐代全国均以布帛、铜钱为交换媒介，而广州因为外夷人口多，经济深受国际贸易影响故以贵金属金银为货币。外番人聚集广州日久形成自己的居住区，史称“番坊”，[109]其地点在今广州火车站向南数站地之处、今怀圣寺（清真寺）“光塔”所在地附近。[110]外夷人集中的蕃坊的存在不仅见于汉文记载，也见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述。

居于此处的侨民多为来自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从事贾贩。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阿拉伯著名学者扎希兹（al-Jah.īc.，776～868）撰《商务的观察》（又译为《生财之道》），[111]开列了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麝香、肉桂，动物中的孔雀等。穆斯林学者撒阿里比（al-Tha’ālibi，961～1038）在《珍闻谐趣之书》中说：“阿拉伯人习惯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112]

不仅外国商人以广州为出入中国的出入点与登陆点，中国人也是如此。法显从爪哇归国时，原先的目的港就是广州，只是因为风暴，船只偏离了航向，才在山东登岸。[113]

六 蒙元水师的海外征服

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是我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这样伟大的航海壮举不是突然产生的，其直接背景便是元代的航海。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军事远征。经过近40年征战，蒙古人已经控制了东起高丽，北达北极圈，西至东欧与地中海，南及印度、吐蕃、四川、云南、安南及淮水—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蒙古人成为亚洲大陆上的超级强权，由于元灭宋后，南宋水师落入元手中，加上原先已经掌控的金与高丽的水师，所以当时不仅在欧亚大陆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抗蒙元铁蹄，而且蒙元水师也是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最为强大的水上武力，成为元朝海外扩张主要依托。因此在郑和航海之前的13～14世纪，西太平洋-北印度洋已经进入了中国时代。

（一）征日本

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原本不习水战。随着蒙—高丽与蒙—宋战争的进行，蒙古军在战争中熟悉了水师与水战。元世祖忽必烈灭宋后，蒙古军在东亚大陆的边疆延伸到海上，有了海外邻国。南宋的灭亡使宋军水师落入元世祖忽必烈手中，使蒙古统治者掌握了庞大的海上力量，遂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海外征服，即征日本，征占城、安南与征爪哇之役。

1.“文永之役”

忽必烈登位之初，便企图使日本通聘朝贡。其时蒙古虽然与南宋处于南北对峙阶段，但与日本相望的高丽已被征服。至元二年（1265），高丽人赵彝向元廷称“高丽与日本邻好”。[114]于是世祖于至元三年（1266）八月，命黑的、殷弘等赴高丽，并诏高丽元宗曰：“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与通和。”[115]

使团所携之《大蒙古国皇帝奉书》，在《元史》卷6《世祖纪》至元三年八月丁卯、同书卷208《外夷传·日本》、《高丽史》卷26《元宗世家》八年八月丁丑、《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八年八月、《异国出契》等资料中皆有收录，但日本宗性《调伏异朝怨敌抄》（东大寺图书馆藏）所收抄本，因保留文书的抬头等，为目前最好的版本。该文书的发出者为“大蒙古国皇帝”，发送对象为“日本国王”，所署日期为“至元三年（1266）八月”，[116]其文曰：

> 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至元三年八月。[117]

翌年（1267）正月蒙古使节黑的、殷弘在向导高丽人宋君斐的带领下，航至巨济岛（今济州岛），无功而返。六月，忽必烈再派遣黑的等前往日本。同年九月，高丽元宗王禃也向日本国王发出国书，命人与元使同行，于次年（1268）正月到达九州岛的太宰府，但日本朝廷决定不回复蒙古国书，蒙古、高丽使团只得再次无果而返。当年九月，忽必烈

第三次派遣黑的等出使，至元六年（1269）三月，抵达对马岛，掳掠两名日本人归国。此后，元与高丽送还两名日本人，并一再遣使，发出文书与日本联系，但终未能获取日本回复。[118]

至元十一年（1274）元廷在高丽设征东元帅府，命高丽造船。同年冬蒙、汉、高丽军二万余人渡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对马海峡，发动征日之役，蒙古水师进入九州的博多湾，但遭失败。

有关此次征日的过程，中国史料记载简略。《元史》卷8《世祖五》至元十一年三月庚寅载：“敕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将屯田军及女直军，并水军，合万五千人，战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119]同书卷208《日本传》所记略同，在结尾处曰：“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120]

《高丽史》的记载集中于卷28《忠烈王世家一》与卷104《金方庆传》中。《忠烈王世家一》列举高丽所出各军后，提到：

> 高丽军于冬十月与元都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征日本。至一岐岛，击杀千余级，分道以进。倭却走，伏尸如麻。及暮乃解。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金侁溺死。

同书《金方庆传》亦于列数高丽参战诸军之后曰：

> 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留合浦以待女真军。女真后期乃发船，入对马岛，击杀甚众。至一歧岛，倭兵陈于岸上。之亮及方庆婿赵抃逐之，倭请降，复来战。茶丘与之亮抃击杀千余级。舍舟三郎浦，分道而进，所杀过当。倭兵突至，冲中军。长剑交左右，方庆如植，不少却，拔一嗃矢，厉声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禄、申奕等力战，倭兵大败，伏尸如麻。忽敦曰：“蒙人虽习战，何以加此？”诸军与战，及暮乃解。方庆谓忽敦、茶丘曰：“兵法，千里县军，其锋不可当。我师虽少，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船，淮阴背水也。请复战。”忽敦曰：“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乏之兵，敌日滋之众，非完计也，不若回军。”复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还。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侁堕水死。到合浦，以俘获器仗献帝及王。

日本史料《日莲圣人注画赞》（京都本圀寺藏）卷5《蒙古来》载：

> 同年（文永十一年）十月五日卯刻，自对马国府八幡宫假殿中，大火焰出。国府在家人等，见烧亡幻，是何事浇处。同日申刻，对马西佐寸浦，异

> 国兵船四百五十艘，三万余人乘寄来。六日辰克，合战。守护代资国等，虽伐取蒙古，资国子息等悉伐死。同十四日，壹岐岛押寄。守护代平内左卫门景隆等构城郭，虽御战，蒙古乱入间，景隆自杀。二岛百姓等，男或杀或擒，女集一所。彻手结，付舷，虏者无一人不害。肥前国松浦党数百人伐虏，此国百姓男女等如壹岐、对马。[121]

参与抵抗蒙古入侵的九州肥后国御家人竹崎季长事后绘制了《蒙古袭来绘词》。虽然画中主要描绘的是他个人的功绩，但图文提供的信息十分珍贵。由于他在“文永之役”中单骑攻入敌阵立功，被赏赐一块土地，从无收入的下级武士而成为小领主。[122]

在《蒙古袭来绘词·前卷·文永之役》中，竹崎季长画出他率四骑在鸟饲滨与元登陆水师交战的情景：当他在与三名元军交手时，元军不但发矢攻击，还有一颗圆形爆炸物在竹崎季长头顶不远处爆炸，使他几乎摔下马。[123]幸而白石通泰援军及时赶到，季长方保性命。此役季长有冲锋在先之功，白石通泰有解围之功，遂互为证人，据实上报，但未获赏赐。1275年竹崎季长亲往镰仓向幕府申诉，获赐海东乡之地和黑栗毛骏马一匹。按《蒙古袭来绘词》所描述，“文永之役”完全是九州地方武装在对抗元军，至九州领主上报后，日本朝廷才得知蒙古军队进攻的消息。

尽管元、高丽与日本方面的史料对元军水师的装备皆语焉不详，但《蒙古袭来绘词》所绘正在爆炸中的那个差点炸死竹崎季长的圆形炸弹却有重要意义。虽然画面中没有绘出发射炸弹的兵器，但由于其外形被明确绘为圆形，故不太可能是手掷炸弹（手掷炸弹没有必要制成圆形），[124]更不可能是“阿拉伯工匠制造的抛石机抛出”的，[125]而可能是管形火器中发射的。[126]换而言之，这证明首次征日时，蒙古军水师已经装备了能发身圆形弹丸的火炮。

现存最早火炮实物说法不一。火炮何时从陆战兵器转变为水师装备，也即水炮最早何时装备在船上，史无明文。故而《蒙古袭来绘词·前卷·文永之役》所绘者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证明在元灭宋之前，元军水师已经装备了火炮。[127]

当时日本天皇的年号为“文永”，所以日本人又称此次征日之战为“文永之役”，而兹后的第二次征日则被称为“弘安之役”。而两次征日之役在日本又被合称为“元寇袭来”，或“蒙古袭来”。[128]

2.“弘安之役”

南宋灭亡后，元军收编了南宋水师，使元朝的海军力量大为增强。据《元史·日本传》记载，“文永之役”后，元廷派杜世忠等使日，无果而返。但至元十七年（1280），杜世忠再度出使时，却于二月间被日方杀害。镇守高丽的元征东元帅忻都与高丽降将洪茶丘“请自率兵往讨，廷议姑少缓之”。同年五月，忽必烈召南宋水师将领范文虎入大都议征日本事后，遂开始征调兵力。

至元十八年（1281）夏，他命大将忻都等率南宋降将范文虎以下十余万水师分乘数千艘海船分道从高丽与江南出动，向日本进攻，航行7日后到达日本九州岛近海的鹰岛。因元水师诸军将领不和，对进攻策略意见不一，迁延逾月，将战船缚系为一体，形成水寨。至八月，台风突起，兵船相互碰撞，造成大量毁坏，军士大批溺死。忻都、范文虎等高级将领择好船逃回，遗下的元军将士在鹰岛登岸，遭到日本人的进攻，全军覆没。征日本之役遂告失败。[129]此次征日之战被日本人称为“弘安之役”。近年来在日本九州的鹰岛近海，学者们发现了元军征日水师的沉船与元军留下的大批遗物，[130]其中有些遗物证明元军中包括收降的南宋水师。[131]

这场台风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上天在护佑他们，遂将这场突如其来掀没元军水师的台风称为“神风”。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军国主义都还组织所谓“神风”突击队，认为自杀飞机暴风骤雨式的打击会如同当年的“神风”一样拯救日本。

（二）远征东南亚

1.征占城、安南

占城（Champa）又称占婆，即今越南南方，地扼经南海连接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太平洋与印度的海上通路。灭宋之后，元廷一再强使占城为元廷过往船舶提供给养，引起占城的强烈不满，不断反抗。至元十九年（1282）冬，元大将唆都率数千元军从广州登船向占城出动，抵占城港（今越南南方归仁）。占城守军拒绝唆都的招降，筑水寨抵抗，元水师经过苦战破城。占城王退入山中据险不降，唆都率领元军占据海岸亦不解去。至元二十一年占城被迫向元廷上表请降。此年，忽必烈皇子脱欢率军沿陆路进入安南，唆都奉令由占城北上会攻。安南军队坚决抵

抗，使元军遭到重大伤亡，水军统帅唆都战死。三年后，脱欢再度进攻安南，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仍未能得手。安南方面因力量对比悬殊，也希望以向元称臣来换取停止战争，双方才恢复和平。[132]

2.征爪哇

爪哇是印尼人口最为稠密的一个岛屿，为当时南海强国。在唆都出征占城的同时，元廷开始不断向爪哇遣使招谕，要求爪哇国主亲自来朝，但始终未得同意，其中一次爪哇还将元使黥面逐回。[133]元廷以国使受辱为由，决定出动水军远征。至元二十九年冬，元水师在史弼、高兴与亦黑迷失率领下从泉州启程，航行2个月抵爪哇北岸杜并足（今厨闽），元军随船马步军登陆，水军仍取水路，期于八节涧会师。其时爪哇国内乱，其贵族麻喏巴歇首领土罕必阇耶（即满者伯夷王朝创始者）企图利用元军的力量，遂遣其相呈献户籍与地图请降。元水陆两军在八节涧会合后，协助土罕必阇耶击败对手。战后，土罕必阇耶借口要回麻喏巴歇（满者伯夷）取所藏物献进给元廷，秘密组织抵抗。元军轻信土罕必阇耶，派200士兵送其归回，在途中土罕必阇耶发动突袭，并会集诸军进攻准备班师的元军。元军仓促应战，退回海边登舟撤回。[134]征爪哇之役以失败告终。

元代的海外征服是13世纪末以前亚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明代郑和航海的先驱。虽然诸役均以失败告终，但却显示了中国水师已经具备大规模远洋行动的能力，包括大规模船队的海上编队、各船之间的联络、海上补给、登陆作战等。

七 舟师导航法的进步

以陆标作为导航的主要依据是最原始的导航法，也是中国舟师的主要导航法之一。即便是在其他更先进的导航法出现之后，这种陆标导航海也为中国舟师沿用了很长时间。

（一）陆标导航

在海图出现以前，水手们在海上判断航向的主要方法是地文导航术和天文导航术。所谓地文导航术，即航舶不远离大陆或沿海岛屿海岸线，舟师以所见地理标识确定船舶所在方位。南宋人周去非曾描述过当时水手辨识地理的情景：“舟师以海上隐隐有山，辨诸蕃国皆在空端。若

曰往某国，顺风几日望某山，舟当转行某方。或遇急风，虽未足日，已见某山，亦当改方。”[135]

这就是说，舟师在运用地文导航术时，基本上以沿海岛屿或陆地上高耸的山峰为标志。当海上隐隐有山时，便努力辨认，以图确定是什么地方。当商船计划前往某国时，舟师对航线所经各地的时刻，对船舶何时应转变航向已经大体有数。顺风行船当风速高时，船行速度快，按预定时辰推算，虽然尚不应转向，但只要已见预定的地理座标，水手也果断转舵。如错过陆标，丧失转向时机，则称为“舟行太过”，船舶会陷入险境，“无方可返，飘至浅处而遇暗石，则当瓦解矣”。[136]

（二）海图

现存最形象地表现中国地文导航术的资料是《郑和航海图》，但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应当有海图存在。《新唐书·地理志》载有《广州通海夷道》里所详述的唐时海舶由广州出航前往大食之途，为《旧唐书·地理志》所无，当由贾耽《皇华四达记》中录出。“通海夷道里”虽然逐站述明了从华南到大食的海途，但尚不能算海图。我们虽未发现最初的海图，但南宋人周去非所述中国舟师们在海中辨识地理的情况，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古代水手们在世世代代的航海生涯中，积累了无数的实践经验。

这种经验最初是在航海的旅程中，在现场以口口相传的办法师徒相授的。在漫长的航线上，沿途各地地理标志物特征各异，转变航向的方向也各异，稍一不慎，辨识有误，或航向有偏，就可能“舟行太过，无方可返”，[137]极易造成舟毁人亡的惨剧。因此稍识文字的舟人都会以纸笔记下航线和沿途标志物及应转的航向，以利下一次航行。航路指南及海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中国的海图至少在宋代已经出现了。海图的出现可谓海外地理学的一大进步。北宋咸平六年（1003），广州地方官曾向朝廷进呈《海外诸蕃地里图》；[138]宣和五年（1123），徐兢奉使高丽时，曾在“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139]他在随宋使团回来后，撰绘《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可见此书原本有图。《诸蕃志》的作者赵汝适在自序中提到：“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140]这里的“所谓‘石床’、‘长沙’之险”，即指南海诸岛。可见这种“诸蕃图”应当就是海图。可惜的是，这些早期的海图早已亡佚，其原

貌已不得而知。

（三）周公之法

在西方现代导航法传入之前，中国舟师一直沿用古来的导航法。这种导航法因为历史久远，后来的舟师已经不能言明其来源，只能将之归于周公。除了《郑和航海图》一类官藏海图之外，明清时期的舟师海商还有一些世代流传的航海通书。清《台海使槎录上》提到，“舟子各洋皆有秘本，名曰洋更”。现存明代各种文献中提到过不少这类书簿，如《日本一鉴》和《桴海图经》提到的《针谱》《渡海方程》《海道经书》《四海指南》《航海秘诀》《航海全书》等，《指南正法》提到的《罗经针簿》，《东西洋考》提到的《航海针经》，《西洋朝贡典录》提到的《针位篇》等。这些多为舟师世代相传的秘本，很少见于著录，[141]具有极高的价值。正因为有了这些在民间流传的舟子秘籍，中国的航海业才世世有替。

现存最重要的中国私家舟师往来于东南亚及北印度洋的航海秘籍，是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的两部手抄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这两部书虽然都出自私家舟师之手，是普通航海者自己的记录，毫无夸张之处，但却客观反映了明代至清中期中国海舶的船主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的前往东南亚和北印度洋时使用地文导航法的实际状况，为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顺风相送》应成书于明中期以后。作者在前言中说，他的著作本于周公的《指南之法》。《指南之法》大约是一部假托周公之名的航海针路书，至明中叶尚存，《顺风相送》的作者说它“能自古今，流行久远”，其中“有山形水势”，但传抄描绘有误，又迭经增减，足见这部《指南之法》由来已久，在出洋的海商与舟子中代代流传。他们在航海中或归来后，曾对照过它，所以才会发现“传抄描绘有误”，并在验证时不断有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与见闻有所增补。《顺风相送》的作者还说，他将“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等处更数、针路、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攒写于后”，还提到“宝舟”“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等语，足见《顺风相送》在编写时还参照了《郑和航海图》。

《顺风相送》的作者在评价《指南之法》的作用时说它是一部航海者的必备针簿，“行路难者有径可寻，有人可问。若行船难者，则海水连接于天，虽有山屿，莫能识认。其正路全凭周公之法，罗经针薄为准”。

这里“虽有山屿，莫能识认”一句清楚地说明了传统的地文导航术的局限性，若不假以“罗经针薄”，远航的风险是很大的。《顺风相送》的作者在“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一节中在描述“外罗山”[142]时，提到这里“远看成三个门，近看东高西抵。北有椰子塘，西有老古石。行船近西过，四十五托水。往回可近西，东恐犯石栏”。[143]这说明，即便在磁罗盘广为应用以后，当海舶驶近目的港时，舟人仍努力依靠陆标辨识。

按向达先生的研究，《指南正法》成书于清康熙末年。此书的序言如同《顺风相送》，提到周公的《指南之法》，并有一节题为“大明唐山并东西二洋山屿水势”，[144]说明书中许多资料至少可以上溯至明代中期。此节在描述“外罗山”时，提到“东高西抵，内有椰子塘，近山有老古。打水四十五托。往回可近西，东恐犯石栏”。[145]对比《顺风相送》的相应记载，可知两者在相当程度上有某种共同的资料来源。

八 地理新知

郑和远航西洋有赖于中国海外地理知识的增加。元代是中国历史版图空前辽阔的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动的军事远征极大地扩大了当时中国人的视野。

（一）回回人入华

从宋代起已有大批回回番商移居中国沿海。南宋时我国东南地区最著名的番商是福建的蒲氏。据元《心史》和明《闽书》记载，蒲氏是回回人，其先世自西域经南洋迁居广州，后又落籍于泉州。蒲氏家族专长于航海贸易，历受统治者重视，负责海外交往。南宋时，蒲氏家族曾有成员出使海外，其中有的甚至于淳祐七年（1247）卒于渤泥，其墓志至今尚存于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Bandar Seri Begawan）附近小山上一处名为“郎加斯”的穆斯林墓葬区（Rangas Muslim Cemetery），1972年被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发现。因傅吾康教授所摄照片墓碑字迹不清，马来西亚学者陈铁凡（Chen Tieh Fan）先生又从吉隆坡来此重读并制作拓片，因此才准确读出铭文，[146]其文曰：“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1264）男应甲立。”[147]

元军攻陷临安后，蒲氏后人蒲寿庚所控制的海军力量向元军倒戈，加速了南宋小朝廷的灭亡。元代蒲氏家族在泉州仍然很有势力。据周密

的《癸辛杂识》记载，“泉南有巨贾佛连（Burhan），蒲氏之婿也。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死后真珠达一百三十石”。[148]

成吉思汗在击败金朝占领华北大部之后，于13世纪20年代发动了征西之役，蒙古骑兵的铁蹄横扫中亚、西北印度、波斯北部，以及高加索山、里海以北的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草原。这些地区降服后，其男丁中许多人被编入军队随蒙军出征，这种军队被称为回回军；其地归降的官僚、知识分子、科学家、神职人员、工匠也为蒙古人所用。西征回师时，大批回回军与回回人随蒙古军来到汉地，在中原与江南定居下来，形成回族的先民。

回回人的入华带来了西域的天文、地理、历算、医学与工程技术新知，回回人的海外地理知识也随之入华。

（二）回回图子与剌那麻

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创造的蒙元帝国辽阔的疆域，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地理视界。按元人自己的说法就是“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未闻”，“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诞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149]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建立后，绘制帝国疆域全图的工作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欲完成此项工作的必要条件是收集当时的中外图籍。宋元时代，汉地与伊斯兰世界均是制图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所以汉地舆图与回回图籍是元政府收集的重点。阿拉伯人在8世纪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疆域空前的大帝国。阿巴斯王朝时代，回回地理学得到极大的发展，地理著作层出不穷，所记西尽大西洋东岸，东达日本，南越赤道。回回人所积累的地理资料，是人类宝贵的科学财富。这些知识虽然在宋时已经回回舟师之手万里迢迢传到中国，但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只是到了元代，回回地理图籍的内容才大量被介绍到中华。

欲绘制元疆域全图，在将前人图籍汇拢后，还要对各图的方位、比例、地名加以鉴别，然后在拼合的基础之上重绘。至元二十二年，元政府“乃命大集万方图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这就是说，元政府组织学者，汇集天下“万方”的图册，编成一部元帝国疆域图，以显示元朝旷古未有之版图。

受命负责绘制元帝国全图的是在秘书监任职的不花剌（Bukhārā）的回回人，著名的天文、地理学家札马剌丁（Jamāl al-Dīn）。由于其母语为波斯语，不识汉文，所以元政府专门为他配备了翻译人员。[150]在此之前，中书省兵部收集了一些地图，但不全。此外，蒙元帝国建立后，行政区划与前朝（西夏、金、宋）有所变化。秘书监接管此事后，通知各地官府呈上当地的舆图。为此，札马剌丁专门向元世祖忽必烈奏报，要求收集各朝地图和地理论著，请求各路呈送有关当地行政区划、“野地、山林、里道、立堠”的图籍资料。在元本土，征集各地舆图的工作一开始进行得很缓慢。元政府一再通知各地方当局重视此事，迅速呈报。

札马剌丁计划在《至元大一统志》这部书中，绘制一幅元朝全图，包括元朝皇帝的直辖地（即元朝本土）、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在内的地图。因此，元政府在向各地催要图籍时，还特别强调“边远国土”的主管当局，应尽早将所在地的资料送来。

在收集了资料之后，札马剌丁向元世祖奏报：“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里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这就是说，札马剌丁和他的同僚们汇集了汉文地图四五十种，此外还有边远地区的回回图子，即西域穆斯林地图。值得注意的是，札马剌丁收集的回回地图中包括了回回海图。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回回多聚居在福建沿海。秘书监专门向福建行省行文，要求福建当局向泛海行船的回回人调查，看是否有人识“回道回回文剌那麻”。“剌那麻”即波斯语rāh-nāma的音译，意为“行路指南”，[151]即地理志一类的图籍。秘书监要求福建当局将调查的情况向中书省呈报。

他要求把汉地的图与回回舆图拼接起来，绘制出一幅从“日出处”，即太平洋之滨，到“日没处”，即西域的大地图。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汉族传统上相信天圆地方，而回回人则接受了古希腊的大地球形说；汉族人采用方格法画图，而回回人则使用圆形地图。要想把两种地图纳入同一个体系，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

郑和本人和他的船队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回回人，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的西域，有不少人在入居汉地后，还经常往来于东西之间，或奉使，或经商，或朝圣。在他们的旅途中，回回图子必定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即便是郑和的船队中，想必也携有“海道回回文剌那麻”一类的海

图。

（三）《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藏有一幅明初绘制的绢绘本巨型世界地图（含欧亚非三大陆），题为《大明混一图》，长3.47米，宽4.53米，学者考定其绘制时间为洪武二十二年（1389）。该图地理覆盖范围包括全部旧大陆，即亚、欧、非三大陆，具体来说即东起日本，北达西伯利亚，西抵大西洋，南至非洲南部的好望角。

1644年清军入关后，此图落入清政府手中。在清代有人将此图上所有汉文地名转写为满文，写成小纸条，贴在汉文地名之上。从图中域外地名的汉文译音看，遵循的是元代音译的规律。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其原图应是一幅元代世界地图，或取材于元代材料。

此图或其所据之底图，很早就流传到朝鲜与日本。传入朝鲜的最初称为《明国图》。1404年朝鲜学者权近与李荟绘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其基本形制同于上述《大明混一图》，其重要区别之一是朝鲜部分更为详细，今韩国首尔的奎璋阁藏其摹本。1599年日本侵略朝鲜时，从朝鲜宫中掠取了《明国图》。而权近与李荟摹绘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也通过种种渠道传入日本。因为《明国图》（即《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海外地理知识，故而此后在日本迭有人摹绘。因此在日本宫内厅、京都龙谷大学、九州水原寺等处，都能找到《明国图》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绘本。

在《大明混一图》出现之前，世界上从未有过一幅正确地画出欧亚非三个旧大陆的整体形状的地图。摩洛哥地图学家亦得里昔（al-Idrisi）1154年为西西里[152]国王罗杰（Roger）绘过一幅当时西方人所了解的世界之图。亦得里昔的地图的地理范围也覆盖欧亚非三大陆，在地理方位中继续古希腊地图的传统，南北方向与今天的地图相反。其最明显的特点是，非洲的南端向东拐去，印度洋被包围在非洲与东亚大陆之间，如同地中海被包围在欧洲与非洲两大陆之间一样。这种对非洲大陆认识的错误，在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延续了上千年之久，从古希腊时代直至15世纪葡萄牙人开始大航海以后才得以纠正。

《大明混一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绘出了非洲大陆形状的

地图，表明元代世界地理知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153]应归功于东西知识交流的大发展，也是郑和远航的最重要的地理知识背景。

九 汪大渊与往来东西的海内外旅行家

（一）海外旅行家

元代东西交通大开，循海路往来于中国与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些旅行家中，有许多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其中最为著名的外国人有以下几位。

1.不阿里

元代另一名著名回回海商是马八儿［Ma‘abar，阿拉伯语，意为“码头”（复数），即西洋国，又称南毗、锁里］人不阿里（Abū‘Alī），其本名撒亦的（Sa‘id），祖籍西域哈剌哈底，[154]其祖先是专营波斯湾与南印度贸易的回回海商。他一家于宋末离开故土，移居西洋，即印度南部东南岸之马八儿，以贾贩为生，积累了大量财富。撒亦的之父名不阿里，受到马八儿国王五兄弟的信任，被接纳为“六弟”。马八儿国王习惯于以其父亲名字“不阿里”称呼他，而他的本名撒亦地反而不大为人所知。

不阿里的家族居于印度南端，目睹了东亚的宋朝与西亚的黑衣大食这两个强大一时的政权竟然均被蒙古人消灭。印度的回回海商无论赴波斯湾，还是到中国贾贩，都必须与蒙古当局打交道，因而感到极为震动。为保护他自己的海外商业利益，他自作主张派出一名回回人札马剌丁入元朝贡，此外还向远在波斯的蒙古伊利汗阿八合、哈散遣使通好。凡元廷或伊利汗国的使臣航海往来途经马八儿候风时，不阿里均为之准备舟楫，补充给养。不阿里私下向元朝遣使的做法，引起了马八儿统治者的不满。他们抄没了不阿里的家产，甚至准备处死他。不阿里以诡辞狡辩方得幸免。

不阿里在海外为蒙古政权效力的事迹，由航海往来于途的元朝使臣传到元世祖忽必烈那里。至元二十八年，元廷命使臣别铁木儿等人携诏书赴马八儿召不阿里入元。不阿里舍弃家产，率百名随从来到中国。因不阿里在马八儿曾被其国王称为“六弟”，故入元后以马八儿王子自居，忽必烈还在抄没权臣桑哥的家产后，将桑哥的高丽妻子赐给他。后来不

阿里逝于福建泉州。[155]

2.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Venice）的一个商人家庭，其父尼科洛和叔父马泰奥都是商人。马可·波罗年幼时，其父亲和叔父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并朝见过元世祖忽必烈，还带回了元世祖致罗马教皇的信件。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其父亲和叔父携马可·波罗带着教皇的复信再赴中国，途经中东、中亚与新疆，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17年，游历了许多地方。1292年，因波斯的蒙古宗王妃子去世，1292年元世祖下令选取女子阔阔真送赴波斯成婚，马可·波罗一家随行。同年深秋，他们从泉州乘元朝官船启行，历经南海、印度南部、斯里兰卡、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波斯登陆。马可·波罗归国所行的路线，几乎就是一百余年后郑和与他率领的宝船队的主要航线。

1295年，马可·波罗一家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闻见录》）。

《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各种文字的119种版本。《马可·波罗游记》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游记，也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它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促进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后来欧洲人大航海的动因之一，就是为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东方所吸引。

3.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是摩洛哥丹吉尔城人，伊斯兰教教徒。1325年，他离乡赴麦加朝圣，后决意周游世界。数年中，曾三至麦加，并游历了波斯、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各地，并曾至

伊利汗国。1332年，经西亚、中亚各地旅游后于1333年秋抵印度河，至德里，在那里留居约8年。

1342年，元顺帝遣使臣至德里通好，德里算端命伊本·白图泰率领使团随同元朝使臣回访中国。使团启航后，遇风漂没，伊本·白图泰未及登舟，得免于难。元朝使臣脱难后搭本国商船回国。伊本·白图泰因失去随员、礼物，不敢回德里复命，在外辗转两三年后，才抵泉州。他在中国南至广州，北上杭州。后来从泉州乘船西还，于1347年到达印度，再途经阿拉伯半岛东岸、波斯湾、报达、叙利亚、麦加后返国。1349年底伊本·白图泰抵摩洛哥都城非斯。此后他又去西班牙和中非、西非各地旅行。1354年，奉摩洛哥国王之命回到非斯，口述其旅行见闻，由国王所派书记官伊本·术札伊用阿拉伯文笔录，著为旅行记一书。白图泰行踪几遍元帝国全境，对所到之处都有详细记述，其中国行记部分记载了泉州、广州、杭州及所经沿途各地状况，尤详于这些地区的穆斯林情况；对中国与印度、波斯湾和阿拉伯交通、贸易往来，也有不少极可贵的记载。

由于卷帙浩繁，此书一直以节本流传，有多种欧洲文字译本。19世纪中，法国人在摩洛哥发现其全文手稿，由德弗列麦里与桑格提奈校勘并译为法文，分四卷出版。[156]吉伯据此本译为英文，做了详细注释（剑桥，1956～1971，未完成）。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据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中的英文摘译本，译出了一部分关于中国的内容。近年，马金鹏将埃及出版的阿拉伯原文本译为汉文，[157]为全译本，但有些错误。

4.回回人的朝圣旅行

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穆斯林在条件许可时应当在一生中赴圣地麦加（天方、天房）朝一次圣。伊斯兰教传至各地后，各国的穆斯林均保持了这一风俗，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通过各种途径赴麦加朝圣。在蒸汽机发明之前，没有铁路与轮船。对于生活在中国这样遥远的东方的穆斯林来说，赴天方朝圣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情，但仍有虔诚的穆斯林不辞千辛万苦，沿陆路或海路往来于天方与汉地之间。完成朝圣壮举的穆斯林是极为荣耀的，被称为Hājj，在当时的汉语中译称为“哈只”（今称为哈智，维吾尔族称为阿吉）。

郑和的父亲与祖父都称为“哈只”，足见其父祖两代人都曾经赴天方

朝圣。云南赴天方朝圣通常是从缅甸出境，再登船经孟加拉湾，绕过印巴次大陆，进入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或红海至天方。回回人往返于海湾与东亚的航行使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航道变得更为知名。

（二）遥远的马合答束与刁吉儿

在元《经世大典·站赤》中，保留了如下记载，大德五年十二月（1301年末至1302年初）：

>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术丁等，钦赍圣旨悬带虎符，前往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往回应付二年分例……又爱祖丁等使四起，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应付三年分例。[158]

这里提到的“马合答束番国”，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مقديشو）］，郑和时代的资料称之为“木骨都束”。元使臣答术丁前去的目的是购买狮、豹等名贵动物，由于路途遥远，需要预支二年差旅费用；而前往刁吉儿的使臣爱祖丁使团一行为的是取豹子等物，全团计正使随员共37人。他们所需预支的钱比前往马合答束番国的使团更多，要准备三年花费，可见其路途更为遥远。刁吉儿应当就是摩洛哥航海家伊本·拔图塔的故乡丹吉尔，位于地中海南岸。爱祖丁的使团是从红海西岸登陆至地中海再乘船前往刁吉儿，还是由海路绕过非洲南部经直布罗陀海峡抵其地，尚不得而知。

（三）汪大渊和他的远航

汪大渊（1311～？），字焕章，南昌人，元代民间航海家。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至元五年返回泉州。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当时泉州路正在修郡志，泉州地方长官（称达鲁花赤）与主修郡志的人见此书极为赞赏，即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后

来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这本书才得以广为流传。[159]

汪大渊自述其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今查《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

《岛夷志略》可以说是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搓胜览》等重要历史地理著作，而其重要性又远远超过这些宋明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诸史（指二十四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汪大渊两下西洋，游踪的广远，著述的精深，直到清代中叶以前，还是名列前茅的。

《岛夷志略》对后世航海家有深刻的影响。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在出海时，曾将此书带在身边，随时随处对照，他说：“随其（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汪大渊曾说：“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该书“大佛山”载：他们的船到大佛山（今斯里兰卡）附近，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汪氏很兴奋，“次日作古体诗百韵，以记其实”。这部书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渤泥“尤敬爱唐人”；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乃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160]这些记载均不见于任何其他史料，可见其珍贵性。

以上所述证明，明初郑和航海，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基础是古代中国与东方的海上活动传统。

[1] 本文原题为《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郑和时代以前中国航海家的足迹与亚洲

的海洋活动传统》，刊于上海海事大学、中国航海日活动办公室、中国海洋学会编《海洋——我们民族留下的记忆》，海洋出版社，2008；后收入笔者论文集《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此次修订后改现名。

[2] 刘迎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3] 过去学者们根据普林尼的记载，把布勃里乌斯远航斯里兰卡的史实系于喀劳狄一世（Claudius，41～54）在位时，后根据发现于科帕托以南100公里处通往贝仑尼塞港的道路上的希腊、拉丁文碑铭，才知布勃里乌斯返回的日期是公元6年7月5日。

[4] 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第11～12页。

[5] 有关这一问题近期研究详见张绪山《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6] 《后汉书》卷86。

[7] 《后汉书》卷88《西域传·大秦国》。

[8] “黎轩”的名称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附安息》，唐代的杜佑曾在其著作《通典》“边防九”中又称“犁轩”，说其地“有幻人，能额上为炎烬，手中作江湖，举足而珠玉自堕，开口则幡毦乱出”。他还说，“前汉武帝时，遣使至安息，安息献犂靬幻人二”，并描述这些“犁靬”“幻人”的相貌“蹙眉峭鼻，乱发拳鬓，长四尺五寸”。黎轩又音译为“阿荔散”。佛藏中《那先比丘经》记中亚希腊化王朝弥阑陀国王自称“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是亚历山大之更贴切音译。

[9] 《后汉书》卷88《西域传·大秦国》。

[10] 《梁书》卷54《中天竺国传》。

[11] 《梁书》卷54：“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

[12] 《扶南异物志》在《水经注》中分别称为《扶南传》或《扶南记》，如“康泰《扶南传》曰：‘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径西行极大秦也。’”（《水经注》卷1，恒水）“康泰《扶南记》曰：‘从林邑至日南卢容浦口，可二百余里。’”（《水经注》卷36）

[13] 按，当时交州尚属中国。

[14]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敕沙门宝唱撰《名僧传》三十一卷。”（卷3，金刻赵城藏本）

[15] 据慧皎《高僧传》卷3记载：释智猛，雍州京兆新丰人，禀性端明，励行清白，少袭法服，修业专至，讽诵之声，以夜续日。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国土有释迦遗迹及方等众经，常慨然有感，驰心遐外，以为万里咫尺，千载可追也，遂以伪秦弘始

六年甲辰之岁（404），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阳关，西入流沙，凌危履险，有过前传。遂历鄯鄯、龟兹、于阗诸国，备瞩风化。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至波伦国，同侣竺道嵩又复无常，将欲阇毗忽失尸所在。猛悲叹惊异，于是自力而前。与余四人共度雪山，渡辛头河，至罽宾国。国有五百罗汉，常往返阿耨达池，有大德。罗汉见猛至欢喜。猛谘问方土，为说四天子事，具在猛传。猛于奇沙国，见佛文石唾壶，又于此国见佛钵，光色紫绀，四际尽然，猛香华供养，顶戴发愿，钵若有应，能轻能重，既而转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时复不觉重，其道心所应如此。复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毗罗卫国，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迹炳然具存，又睹泥洹坚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树。猛喜，心内充设供。一日兼以宝盖大衣覆降魔像，其所游践究观灵变天梯龙池之事，不可胜数。后至华氏国阿育王旧都，有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家举族弘法，王所钦重，造纯银塔高三丈。既见猛至，乃问秦地有大乘学不。猛答，悉大乘学。罗阅惊叹曰："希有！希有！将非菩萨往化耶？"猛于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余经梵本，誓愿流通，于是便反。以甲子岁（404）发天竺，同行三伴，于路无常，唯猛与昙纂俱还于凉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十六年（439）七月造传，记所游历。元嘉末卒于成都。

[16] 除译述佛经以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昙景还撰有《京师寺塔记》二卷。

[17] 据慧皎《高僧传》卷2《昙无谶》第七记载："时高昌复有沙门法盛，亦经往外国，立传，凡有四卷。"其传卷数与此不同，慧皎所记法盛与这里提到的《历国传》作者是否为同一人，待考。

[18] 前已提及，《扶南异物志》又称《扶南以南记》或《扶南异物》。这两部书至北宋时尚存，但后来亡佚。

[19] 《隋书·经籍志二》。

[20] 《三国志》卷49《吴书四·士燮传》。

[21] 《艺文类聚》卷86《菓部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火布"即以石棉织成的布，火烧不坏。

[22] 《三国志》卷49《吴书四·士燮传》。

[23] 《尔雅》卷下，四部丛刊景宋本，郝懿行：《〈尔雅〉郭注义疏》下之四《释鱼之十六》。

[24] G.费琅辑注《八至十八世纪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游记及地理文献辑注》卷1，巴黎，1914。汉译本见《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耿昇、穆根来译，中华书局，1989，第41页。

[25] 李昉：《太平御览》卷69《地部三十四》，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26] G. 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第57页。

[27] 《梁书》卷54《诸夷传·海南诸国传序》。

[28] 《梁书》卷54《诸夷传·海南诸国传序》。

[29] 《宋书》卷97《蛮夷传》，“师子国”。

[30] 《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扶南国》。

[31] 《梁书》卷54《诸夷传·海南·扶南国》。

[32] 韩振华：《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研究——兼论横越泰南、马来半岛的路线》，《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第235~245页。

[33] 《宋书》卷97《蛮夷传》。

[34] 《水经注》卷2《河水》。

[35] 《南州异物志》曰：“斯调，海中洲名也，在歌营东南可三千里。上有王国、城市、街巷，土地沃美。”李昉：《太平御览》卷787《四夷部八·斯调国》，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36]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88，第103页。

[37]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105~106页。

[38] 杨鹤书：《从公元3~7世纪佛教在广州的传播看中外文化交流》，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第114页。

[39]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0] 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认为可能是今印度洋东部尼科巴群岛（Nicoba Is.）中的一个岛。见其书《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的研究》，第220页。

[41] 印度史书《罗摩衍那》（Ramayana）提到，东方有一个大岛名Yava-dvipa（大麦岛）。托勒密的地理书提到过这个岛，他写作Iabadiou。《汉书》卷6、卷116也提到“日南徼外叶调国”，当即此耶婆提。章巽先生认为，古爪哇、苏门答腊两岛相连，耶婆提为其共名。见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70页注29。

[42] 慧皎：《高僧传》卷2，《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20页。

[43] 慧皎：《高僧传》卷3，《高僧传合集》，第19页。

[44] 慧皎：《高僧传》卷2，《高僧传合集》，第15页；卷3，《高僧传合集》，第17页。

[45] 慧皎：《高僧传》卷2，《高僧传合集》，第24页。

[46] 慧皎：《高僧传》卷3，《高僧传合集》，第20～21页。

[47] 道宣：《续高僧传》卷1，《高僧传合集》，第111页。

[48] 均见于道宣《续高僧传》卷1，《高僧传合集》，第106页。

[49] 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67页。

[50] 慧皎：《高僧传》卷2，《高僧传合集》，第15页。

[51] 慧皎：《高僧传》卷2，《高僧传合集》，第24页。

[52] 李昉：《太平御览》卷771《舟部》，四部丛刊三编子部。

[53] “师子国，元嘉五年，国王刹利摩诃南奉表曰：谨白大宋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覆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外，无往不伏，方国诸王，莫不遣信奉献，以表归德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正，不严而治，奉事三宝，道济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在己，欲与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难化。故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台像以为信誓，信还，愿垂音告。至十二年，又复遣使奉献。”（《宋书》卷97《夷蛮传》）

[54] “天竺迦毗黎国，元嘉五年，国王月爱遣使奉表曰：伏闻彼国，据江傍海，山川周固，众妙悉备，庄严清净，犹如化城，宫殿庄严，街巷平坦，人民充满，欢娱安乐。圣王出游，四海随从，圣明仁爱，不害众生，万邦归仰，国富如海。国中众生，奉顺正法，大王仁圣，化之以道，慈施群生，无所遗惜。帝修净戒，轨道不及，无上法船，济诸沈溺，群僚百官，受乐无怨，诸天拥护，万神侍卫，天魔降伏，莫不归化。王身庄严，如日初出，仁泽普润，犹如大云，圣贤承业，如日月天，于彼真丹，最为殊胜。臣之所住，名迦毗河，东际于海，其城四边，悉紫绀石，首罗天护，令国安隐。国王相承，未尝断绝，国中人民，率皆修善，诸国来集，共遵道法，诸寺舍子，皆七宝形像，众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检，不犯道禁，臣名月爱，弃世王种。惟愿大王圣体和善，群臣百官，悉自安隐。今以此国群臣吏民，山川珍宝，一切归属，五体归诚大王足下。山海遐隔，无由朝觐，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达，使主名尼陁达，此人由来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诚。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反使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反，所白如是，愿加哀愍。奉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弥并为建威将军。”（《宋书》卷97《蛮夷传》）

[55] 《南齐书·东南夷列传》。

[56] 葛洪：《抱朴子·外篇》卷1《道藏·太清部》。

[57] 张道陵：《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明正统道藏本。

[58] 《旧唐书》卷35《天文志上》。

[59] 《茔原总录》卷1《主山论篇第八》，元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此处详尽描述了如何通过丙午壬子针来判断南北之正。严敦杰先生云："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杨惟德说，要定四正的方向，必须取丙午方向的针，等到针摆动停止时，中而格之，才能得到正确的方向。"（《中国史稿》编写组编《中国史稿》第5册，人民出版社，1983，第620～621页）并据此认为在北宋沈括（1031～1095）著《梦溪笔谈》之前已发现了磁偏角现象，并将《茔原总录》作为研究指南针及磁偏角的早期材料。汪建平、闻人军云："北宋司天监杨惟德于庆历元年（1041）奉命编撰的相墓大全《茔原总录》卷一为磁偏角的发现订了下限。"（汪建平、闻人军：《中国科学技术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第259页）但余格格查《茔原总录》一书未见载于宋代书志目录，杨惟德同时期奉诏撰修的地理书籍《地理新书》亦未提磁偏角或指南针的问题，推论《茔原总录》一书中关于磁偏角之内容大概产生于南宋时期。（余格格：《〈茔原总录〉与"磁偏角"略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427～438页）

[60] 《梦溪笔谈》卷24，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

[61] 《武经总要》前集卷16上，明金陵唐富春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62]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第120页。

[63] 《梦粱录》卷12，清学津讨原本。

[64] 李豫亨：《推篷寤语》卷7《订疑篇》，明隆庆五年李氏思敬堂刻本。

[65]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lion in China*，V.4，Part1，pp.246-247.

[66] 《大英百科全书》卷6，第807页，转引自闻人军《考工司南：中国古代科技名物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200页。

[67] 《海岛算经》卷1《六府文藏·子部·天文算法类》。其算法说明见李金寿《〈海岛算经〉简介》（上），《数学教学研究》1987年第3期，第37～38页。

[68]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中华书局，1979。李言恭、郝杰：《唐大和上东征传 日本考》，汪向荣、严大中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68页。

[69] "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参见真人开元《唐大和上东征传》，第74页。

[70]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傅增湘校并跋。

[71]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159页注13。

[72] 《旧唐书·王方庆传》。

[73] 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卷3，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2006，第107页。

[74] 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卷6，第216～217页。

[75] 《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一》。

[76] 沈括：《梦溪笔谈》卷3《辩正一》："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梦溪笔谈》，胡静宜整理，《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三册，大象出版社，2006，第19页）司马光撰、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引："今人乃以秔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中华书局，1995，第191页）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80页）谓：一宋斤等于今640克，即1.28斤。兹据黄纯艳《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31页。

[77] 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卷6，第219～220页。

[78] 刘恂：《岭表录异》卷下，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书一百三十八种本。

[79] 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61，《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奉耶律》第32卷，日本元文三年（1738）至延亨三年（1746）狮谷莲社刻本。

[80]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该地即今伊朗波斯湾口处之忽尔模斯岛，见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庼校释，中华书局，1981，第365～366页。

[81] 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第364页。

[82] 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20，《华严经》卷50，"船舶"条。

[83] 《苏莱曼游记》，见穆根来等汉译本《中国印度见闻录》，第9～10页。

[84] 《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条。汉代郑玄注《仪礼》说："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则是一斛。"（郑玄注、贾公彦疏、陆德明音义《仪礼注疏》卷28，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中国古船表示大小的单位"料"是一个学界讨论的老问题。黄纯艳总结论证如下："天圣三年（1025）诏书说到漕运装运载转般仓斛斗'并以船力胜五十石为准，实装细色斛斗四十石'（《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第7037页）。这里力胜以'石'计，表示的也是一石容积的装载能力。政和三年（1113）两浙转运司奏章说道，两浙路三百料纲船，许二分附载私物或加装斛斗，'每船一只装米二百四十石外，有六十石升（胜）'。（《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五，第7013页）建炎

四年发运副使宋辉上奏说到北宋时自真州至开封纲运，以五百料船为率，依条八分装运，留二分揽载私物。如愿将二分力胜加料装粮，听。'八分正装计四百硕。每四十硕破一夫钱米。二分加料计一百硕。旧法每二十硕破一夫'。（《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七，第7062页）这二分私载又称为'二分私物力胜'。（《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七，第7061页）从以上两条奏章可总结三点：一是纲船实际载米的正装（八分）与加装（二分）之和正好是船舶全部力胜（十分，三百料或五百料）；二是三百料或五百料的力胜指的是纲船从总带了位中减去不能用于载运货物的容积后的有效载货容积，即净吨位，而非船舶的总吨位，即船舶内容总容积；三是一'料'等于一'石（硕）'的容积，在表示船舶的装载能力时可以互换使用。由此我们得知，宋代表示船舶大小即力胜的'XX料'就是指船舶的净吨位。"（见氏著《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第31～33页）

[85]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第116～117页。

[86] 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卷6，第217页。

[87]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第117页。

[88] 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

[89] 李言恭、郝杰：《倭船条》，汪向荣、严大中校注，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合刊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2006，第28页。

[90] 庄为玑、庄景辉：《泉州宋船结构的历史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

[91]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第117页。

[92] 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159～160页。

[93]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第116～117页。

[94] 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第490～491页。

[95] 苏赫拉瓦尔底（Abudullah al-Mamun al-Suhrawardy）编《穆罕默德圣训》（*The Saying of Muh.ammad [h.adīth]*），伦敦，1941，第273条。转引自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793～794页注31。

[96] Bullin，应即贾耽所提到的"南天竺国大岸"。

[97]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与邦国志》，宋岘译，中华书局，1989，第64～74页。华涛：《伊本·忽尔答兹贝关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及其在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文献中的地位》，《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31～135页。

[98] 索瓦杰：《苏莱曼游记》，见穆根来等汉译本《中国印度见闻录》，第8～9页。

[99] 杜环撰，张一纯笺注《〈经行记〉笺注》，《〈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合刊本，中华书局，2006。

[100] 杜佑：《通典》卷161《兵十四》；《隋书》卷81《南蛮·林邑》。

[101] 《隋书》卷81《南蛮·林邑》。

[102]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152～153页。

[103] 《旧唐书·贾耽传》："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岛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自吐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曰：'……虽历践职任，诚多旷阙，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图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岛，必藉精详，乃可摹写，见更缵集，续冀毕功。然而陇右一隅，久沦蕃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岛等图》一轴。伏以洮、湟旧墟，连接监牧；甘、凉右地，控带朔陲。岐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如圣恩遣将护边，新书授律，则灵、庆之设险在目，原、会之封略可知。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谨撰《别录》六卷。又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帅，臣并研寻史牒，翦弃浮词，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成十卷。'"
"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献之，曰：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棋布；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中夏则五服、九州岛，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丘出师，东铭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条支；奄蔡乃大泽无涯，罽宾则悬度作险。或道理回远，或名号改移，古来通儒，罕遍详究。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臣幼切磋于师友，长趋侍于轩墀，自揣孱愚，叨荣非据，鸿私莫答，夙夜兢惶。去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镇东洛、东郡，间以众务，不遂专门，绩用尚亏，忧愧弥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闻见，丛于丹青。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前地理书以黔州属酉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凡诸疏舛，悉从厘正。陇西、北地，播弃于永初之中；辽东、乐浪，陷屈于建安之际。曹公弃陉北，晋氏迁江南，缘边累经侵盗，故墟日致堙毁。旧史撰录，十得二三，今书搜补，所获太半。"
《新唐书》卷166《贾耽传》："耽嗜观书，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与使夷狄者见之，必从询索风俗，故天下地土区产、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强，盗有陇

西，异时州县远近，有司不复传。耽乃绘布陇右、山南九州岛，且载河所经受为图，又以洮湟甘凉屯镇额籍、道里广狭、山险水原为《别录》六篇、《河西戎之录》四篇，上之。诏赐币马珍器。又图《海内华夷》，广三丈，从三丈三尺，以寸为百里。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其中国本之《禹贡》，外夷本班固《汉书》，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以朱，刊落疏舛，多所厘正。帝善之，赐予加等。或指图问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贞元十道录》，以贞观分天下隶十道。”
参见卢志良《隋唐图志图记的繁荣与贾耽对制图理论的继承与贡献》，《国土资源》2008年第3期，第52～55页；丁超《唐代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及其地图学成绩再评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期，第146～156页。

[104] 参见周运中《唐代南海诸国与广州通海夷道新考》，纪宗安、马建春主编《暨南史学》第16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第119～134页。

[105] 《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

[106] 许永璋：《三兰国考》，《西亚·非洲》1992年第1期，第54～57、53页。

[107] 前岛信次「カスピ海南岸の諸国と唐との通交」『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刊行會、诚文堂新光社、1971、103頁。（此承于磊博士协助查核，谨志谢意）张广达亦取此意见，参阅氏撰《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周一良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750页。

[108] 张世民：《杨良瑶：中国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此文最初于1998年刊于《唐史论丛》第7辑，标题为《中国古代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杨良瑶》。

[109] “番坊”之名始于何时？有唐宋两说。唐说者所据为明末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四引唐房千里《投荒录》语：“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惟烧笋一味可食。先公至北边，日供乳粥一盘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
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中亦有一段关于广州“番坊”的史料：“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虽甘旨，而腥臭自若也。唯烧笋苴一味可食。先公使辽日，供乳粥一碗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参见黎小明《广州“番坊”一名始见于宋》，《开放时代》1985年第6期，第64～66页）
两则史料除个别字眼外，大部分内容相同。《天下郡国利病书》指明是转引自《投荒录》，《投荒录》可能就是唐人的《投荒杂录》，而《萍洲可谈》却是宋人著作。“番坊”之名一说始于唐，一说始于宋。两者中应有一误。
《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引《投荒录》是否就是唐代的《投荒杂录》？较早的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他在唐宋两代的书目中未查到《投荒录》而在《新唐书》卷58和《文献通考》卷205中查到房千里的《投荒杂录》信息。桑原骘藏根据宋《太平广记》和元末陶宗仪《说郛》里分别收入一些从题目到内容均一字不差的相同条目，但其出处则分别为《投荒录》和《投荒杂录》，故而推断《投荒录》即是《投荒杂录》，再进而证明，《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引《投荒录》即是唐人房千里的《投荒杂录》，因而“番坊”一名当始于唐代。黎小明以为，单凭几段相同的史料，就推断《投荒录》就是《投

荒杂录》犹嫌证据不足。
黎小明从分析上述史料内容入手辨析。由于述者口气为第一人称，故他分别查唐房千里与宋朱彧是否到过广州，查的结果是无史料说明房千里到过广州，但朱彧之父曾任职广州，故认为他也很可能同行。而今各书所引《投荒杂录》内容多为岭南事，无更多番坊信息，但《萍洲可谈》则在几处提到番坊，内容相当丰富，故而判断有关“番坊”的记载出自《萍洲可谈》可能性较大。
黎小明进一步将讨论焦点集中于顾炎武所引《投荒录》中的“先公至北边”与《萍洲可谈》中的“先公使辽日”一句。他未能查到房千里之父曾出使回鹘的记载，但查到朱彧之父朱服曾在绍圣初使辽事，进而举证顾炎武引书出处的其他谬误，得出有关广州“番坊”的记载实出自《萍洲可谈》的结论。

[110] 黄文宽：《宋代广州西城与番坊考》，《岭南文史》1987年第1期。

[111] 佩拉（Charles Pellat）：《扎希兹研究工、商的观察之书》，*Arabia*，1954年第2期。转引自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周一良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751页及792页注18。

[112] 撒阿里比（al-Tha’ālibi）：《珍闻谐趣之书》（Latā if al-Ma‘ārif），德·荣格（P.de Rong）刊本，莱顿与哥达，1867，第127页；博斯沃斯（C. E. Bosworth）英译（The Book of Curious and Entertaining Information），爱丁堡，1968，第141页。转引自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周一良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761页及792页注18。

[113] 汉代岭南对外交往的主要港口在合浦与交趾，交、广分治后，广州渐成为海道交通的重镇。见黄文宽《宋代广州西城与番坊考》，《岭南文史》1987年第1期。

[114] 《高丽史》卷130《赵彝传》称，其“初名蔺如，咸安人，尝为僧，归俗，学举子业，中进士。后反入元，称秀才，能解诸国语，出入帝所”。（明景泰二年朝鲜活字本）但苏天爵《宣慰张公（张德辉）》称其“本宋人”：“有旨令赵彝使日本，命都堂议，敕高丽诏以进。公曰：‘赵彝本宋人，万一所言不实，恐妄生边衅，贻笑远邦。’明日同宰执奏之，遂止。”（《行状》，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10）赵反丽入元的时间，《元史》卷208《日本列传》载：“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115] 《高丽史》卷26《元宗世家》，明景泰二年朝鲜活字本。

[116] 船田善之：《从元日外交文书看大蒙古国公文制度——与碑刻文书之比较》，于磊汉译，《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32页。

[117] 于磊博士据NHK取材班编『大モンゴル3大いなる都巨大国家の遺产』（角川書店、1992）所收影印件抄录，见氏撰《〈元史·日本传〉会注》，《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6年第1期，第140页。

[118] 元首次征日之前两交交往的详细过程，见于磊《〈元史·日本传〉会注》，《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39～152页。

[119] 《元史》卷8《世纪本纪五》。

[120] 《元史》卷208《日本列传》。

[121] 于磊：《〈元史·日本传〉会注》，《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辑，第152～153页。

[122] 张岩鑫：《元日海战绘画研究》，《艺术探索》2015年第1期，第14～15页。

[123] 小松茂美·源豐宗·荻野三七彥『日本絵巻大成14：蒙古襲來絵詞』中央公論社、1978（昭和五十三年）。

[124] 有日本学者注意到，画面中“在日本军官战马的前方有铁炮爆炸的情景，战马似乎受伤流血，并且受到惊吓跳了起来”。（佐伯弘次『モンゴル襲来の衝撃』中央公論新社、2003、109頁。转引自乌云高娃《〈蒙古袭来绘词〉的史料价值及其运用》，《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第74页）日本学者所称“铁炮”就是所谓的震天雷。铁炮有铁制或陶制两种。如韩国崇实大学博物馆藏“铁炮”为陶制，目前未发现铁制者。2001年10月在日本长崎县鹰岛发现四个陶制的铁炮，铁炮直径为14厘米，厚度为1.5厘米，中空，装上火药，点火后投向敌方，威力很大，元军在后撤时会向敌方抛掷，因此，铁炮有点像手榴弹的性质。“在鸟饲奋战的竹崎季长”这一图中，除手持弓箭的三个蒙古人装束者在向骑马的竹崎季长射箭之外，还有几名高丽官兵向反方向逃跑，这几个逃跑者很有可能就是抛掷铁炮的高丽兵。（乌云高娃：《〈蒙古袭来绘词〉的史料价值及其运用》，《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第74页）

[125] 张岩鑫：《元日海战绘画研究》，《艺术探索》2015年第1期，第15页。

[126] 日本有学者对现存画面的可信性提出质疑。佐藤铁太郎分析，画面上站在季长前方放箭的三个蒙古兵，画风与其他的蒙古兵很不一致而应系是后来添加，而画中当空爆炸的“铁炮”，因爆炸碎片的颜色与三个蒙古兵的胡须和剑的颜色完全一致，应是与三个蒙古兵在同一时期添加画入。但他表示这一判断并不意味元军当时没有使用过“铁炮”。在伊万里湾鹰岛冲的海底调查中，近年来确发现了当时“铁炮”的残片。换言之，后世的画师是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才添加了“铁炮”画面的。（参看佐藤铁太郎「蒙古襲来絵詞の改竄と手直しについて」『中村学园研究纪要』第36号、2004。转引自马云超《〈蒙古袭来绘词〉的基本内容与研究概况》，《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27] 海内外科技史学者普遍认为，现存的中国元代铜火铳（年代不早于13世纪末），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火炮。1988～1989年，国内多家大报先后报道，在甘肃武威发现了一门西夏时期（1038～1227）的铜炮。这门铜炮的面世，似乎将中国创制金属火炮的时间大为提前。然而，所有报道都没有提供确定该炮年代的依据。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正组织编写《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的军事技

术史条目，便向发现火炮的武威市博物馆有关同志去信询问详情。回信提供了如下情况：“1980年5月，武威县（后改为市）针织厂在厂房扩建中发现一批西夏窖藏文物，出土瓷器、铜器、铁器等十多件。这些器物中比较重要的是一尊保存完好的铜火炮和炮内遗存的火药、铁弹丸。铜炮长100厘米，重108.5公斤，由前膛、药室和尾銎三部分构成。……与铜炮共存的有两件敞口、卷沿、腹两侧圈足（或凹足）、双平（或四平）的豆绿釉扁壶，这是武威及宁夏等地多次出土的具有明显民族特点的典型西夏器物。共存物中未见后代遗物。因此，这是一件无可置疑的西夏铜火炮。”相关专家研究后认为，其断代依据是有问题的。钟少异撰《“西夏铜炮”说质疑》，提出尽管“宋、金的火药火器技术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但终金、宋之世，管形火器仍处于以纸、竹为筒的低级阶段，迄今未发现任何有关金属铳炮的记载。在西夏与各方的战争中，更从未见使用管形火器的事例，自不用说金属的铳炮了。科技文物的断代，必须考虑到技术发展的一般水平，尤其在缺乏确凿的根据的情况下。存世的元代铜火铳，身长均不超过40厘米，体重皆不足7公斤，且多是发射散弹，1974年西安发现的元铳，膛内仍遗有铁砂子。武威铜炮，形体远为硕重，且能发射独枚大弹丸（膛内遗有一枚直径约8厘米的铁弹丸），其技术水平，超出了元铳，更非南宋的突火枪可比”。并云：“鉴于上述情况，《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没有采用因武威铜炮的出土而出现的西夏已有金属火炮之说。1995年初，国内报刊又有报道，现已证实，武威铜炮确系西夏之物。但直至今天，尚未见论证文字发表，而报道中提供的断代依据，仍只局限于不可靠的共存物比较。尽管如此，由于媒体的连续报道，武威‘西夏铜炮’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年常有人据此对《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的写法提出质疑，我们还见到一些文章引据了有关的报道，故而略述我们对这门炮的认识。供大家参考。”（原文载《光明日报》1996年4月16日、《史林》第125期，收入氏著《古兵雕虫·钟少异自选集》，中西书局，2015，第331～332页）

郑绍宗先生近期发表的《河北发现元明时期管状火器——铜炮、铜铳的研究》（上、下，分别刊于《华夏考古》2016年第1期与第2期），也未提及此西夏铜炮。

杜应芳《钓鱼城记》，钓鱼城：“东有沟曰天涧沟，东北有山曰天涧岭、龟山，与鱼山对峙，城上呼语相闻。元宪宗蒙哥以此驻跸。王坚去任之后，继任乃安抚张珏也，有谋略，应敌出奇制胜，尤有过人。其时北兵大营驻汉中、利、沔。初冬严寒，则来攻围；春夏暄热，则复退去。已来岁值大旱，自春至秋，半年无两。北兵围逼其城，意城中无水，急攻之。一旦至西门外，筑台建桥，楼楼上梂桅，欲观城内之水有无。城内知其计，置炮于其所。次日，宪宗亲率其兵于下，珏命城中取鱼贰尾，重三十斤者，蒸面饼百数。俟缘桅者至其竿木，方欲举，首发炮击之，果将上桅人远掷，身殒百步之外。即遗鲜活之鱼及饼以赠，谕以书曰：“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时北兵遂退，宪宗为炮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至愁军山，病甚，遗诏曰：“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补续全蜀艺文志》卷26，明万历刻本）

按此记载，宋军的炮发射的应为圆形炮弹，爆炸后发出巨大冲击波，所以才能将“上桅”蒙古军人“远掷，身殒百步之外”，而这种冲击波，即气浪，史文中称为“炮风”。这足见宋军不但有炮，且可发射炮弹。应以此角度来看待《蒙古袭来绘词》中的爆炸物。

除火炮本身的发展之外，火炮装置在船上是另一个问题。《蒙古袭来绘词》有关元军的首次征日时使用发射“独枚大弹丸”的画面，说明蒙古军水师在从朝鲜渡海征日时，

船上已经携带或装备了发射弹丸的火炮，这不但对火炮发展史，而且对水师何时从冷兵器过渡到热兵器时代的研究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28] 日本学者森平雅彦提议，以更具中立性的“甲戌之役”和“辛巳之役”来称谓之。参见船田善之《从元日外交文书看大蒙古国公文制度——与碑刻文书之比较》，于磊汉译，《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31页。

[129] 有关此次征日的详细研究，见于磊《〈元史·日本传〉会注》，《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辑，第154～156页。

[130] 王冠倬：《简谈日本平户、鹰岛现存宋元碇石》，《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47～48页。

[131] 中岛乐章、四日市康博：《元朝的征日战船与原南宋水军——关于日本鹰岛海底遗迹出土的南宋殿前司文字资料》，郭万平译，《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39～50页。

[132] 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1《政典总序》，“安南”及“占城”，四部丛刊景元至正本。《元史》卷129《唆都传》，卷209《安南传》。

[133] 事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见元明善《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5，四部丛刊景元至正本。

[134] 元明善：《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元史》卷162《高兴传》《史弼传》，卷131《亦黑迷失传》。

[135] 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第217页。

[136] 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第217页。

[137] 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第217页。

[13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第1195页。

[139]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第116页。

[140]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第5页。

[141] 向达：《两种海道针经序言》，无名氏《两种海道针经》，向达校注，中华书局，1982，第3页。

[142] 在越南新州港外，入新州港以此为望山。今地无考，见无名氏《两种海道针经》，第219页。

[143] 无名氏：《两种海道针经》，第33页。

[144] 无名氏：《两种海道针经》，第114页。

[145] 无名氏：《两种海道针经》，第83页。

[146] Franke，Wolfgang & Chen Tieh Fan，“A Chinese Tomb Inscription of A. D. 1264 Discovered Recently in Brunei，” *Brunei Museum Journal*，3，1 （1973）。此文被译为中文，见《泉州文史》第9期刊傅吾康、陈铁凡《最近在文莱发现的一块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的初步报告》，温广益译，第150～154页。根据笔者在现场的认读，发现此碑完全可以读出。傅吾康教授认为照片不够清晰或为制版的缘故。

[147] 已故庄为玑先生所发现的清乾道间学者蔡永蒹的《西山杂志》中，有一段题为“蒲厝”的文字，其中提到：沧岭之东有蒲厝，隔江与铺中相望。宋绍定元年（1228），有进士蒲宗闵司温陵道通判，后升都察院，端平丙申（1236），奉使安南，嘉熙二年（1238）春，奉使占城，淳祐七年（1247）再使渤泥，后卒于官也。（按：第一段）
其子有三焉，长子应，次子甲，三子烈。蒲应入勃泥，甲司占城西洋转运使，大食、波斯、狮子之邦蛮人喜谐。（按：第二段）
《仁和诗社》云：温陵都院有蒲公，三使蛮夷渤泥山。远卒异乡铭葬志，千秋魂魄入端桐。（按：第四段）（兹据庄为玑《文莱国发现泉州宋墓考》，《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1期；并见氏著《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47页）
庄为玑先生根据德国傅吾康教授在文莱发现的“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与上述蔡永蒹的《西山杂志》记载结合起来，推定“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的墓主蒲公应为《西山杂志》所记蒲宗闵；而文莱碑的立碑者“男应甲”，则对应为《西山杂志》所记蒲宗闵之子蒲应与蒲甲。此说不可信从，详见拙文《有关宋末泉州蒲氏史料的几个疑点》，初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0辑；后收入拙著《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48] 《癸辛杂识》续集下，佛莲家资，中华书局，1988，第193页。

[149] 汪大渊：《岛夷志·后序》，《岛夷志略校释》，第385页。

[150] 王士点：《元秘书监志》，高荣盛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第28页。

[151] 陈得芝：《元代海外交通与明初郑和下西洋》，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199页。

[152] Sicily，赵汝适在其《诸蕃志》中称为“斯加里野”。

[153] 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2010。

[154] 即今阿曼东南角之故城Qalhat遗址，哈剌哈底为Qalhat之音译。

[155] 刘敏中：《不阿里神道碑铭》，《中庵集》卷4，《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

刊》第9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第302～305页；《元史》卷208《马八儿等国传》。有关研究参见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拙文《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历史地理》1990年第7期，第90～95页；Liu Yingsheng，“From the Golf via India to Yuan China：Sources on the Omanian Merchant ‘Abū ‘Alī’，”《海表方行——海上丝绸之路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of To Seas and Beyond*：*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香港历史博物馆及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编制，2018，第184～190页。

[156] *Voyages d'Ibn Batoutah*：*Texte Arabe*，*accompagné d'une traduction*，par C. Defremery et B.P. Sanguinetti。1853～1858年初版于巴黎，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重印。

[157] 《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158] 解缙等纂《永乐大典》卷19419，中华书局残本影印本，1986，第7220页。

[159] 有学者根据宋代有泉州人编过题为《岛夷志》的书，判断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是在此书的基础上补充了自己的航海见闻而成。参见廖大可《〈岛夷志〉非汪大渊撰〈岛夷志略〉辩》，《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60] 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庼校释，中华书局，1981。

后记

滨下武志先生，日本静冈县人，专攻东洋史，曾先后担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前身）教授、院长及历史学系教授。现任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兼任教授。2018年3月，为了纪念滨下武志先生执教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历史学系十周年，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历史学系联合举办了以“全球与区域史视域下亚洲的区域与网络”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本论文集，除部分特邀作者论文外，主要就是该研讨会的若干论文成果汇编。

滨下武志先生长期致力于欧亚世界区域史之研究，其提出的“亚洲历史区域模式论”，包括亚洲区域的地域模式、海域模式和网络模式等对亚洲区域史研究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其提出的亚洲区域朝贡体系和亚洲朝贡贸易圈理论，对英国学者汤因比和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以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所主张的“冲击-回应”说进行了质疑和批判，指出亚洲区域的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自有其内在之发展动力，亚洲区域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圈和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互市经济贸易圈，主要由诸如上海、香港、琉球、新加坡和马六甲等地作为“中枢地”连接起来，并形成了亚洲区域经济贸易网络。故本次研讨会亦以亚洲区域史研究作为中心议题，并希冀进一步探讨历史上作为空间范式的欧亚区域历史进程及其体系如何演进以及欧亚世界秩序的变化对丝绸之路的影响等。此外，本论文集还特邀若干学者就亚洲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探讨，以进一步深化作为全球史一部分的欧亚区域史的研究。

由于本论文集编纂时间较为仓促，编纂体例和内容未必尽如人意，可能存在不妥之处。若以此论文集之编纂出版为契机，能进一步加强我国学界有关全球史和区域史之研究，是为编者所愿。

魏志江

2019年4月6日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滨下武志先生执教中山大学十周年纪念文集/魏志江等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9

（九色鹿）

ISBN 978-7-5201-4857-3

I.①欧… II.①魏… III.①欧洲-历史-文集②亚洲-历史-文集③丝绸之路-历史-文集 IV.①K500.7-53②K300.7-53③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9052号

·九色鹿·

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

——滨下武志先生执教中山大学十周年纪念文集

著者/魏志江 等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赵晨

文稿编辑/胡安义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1 字数：414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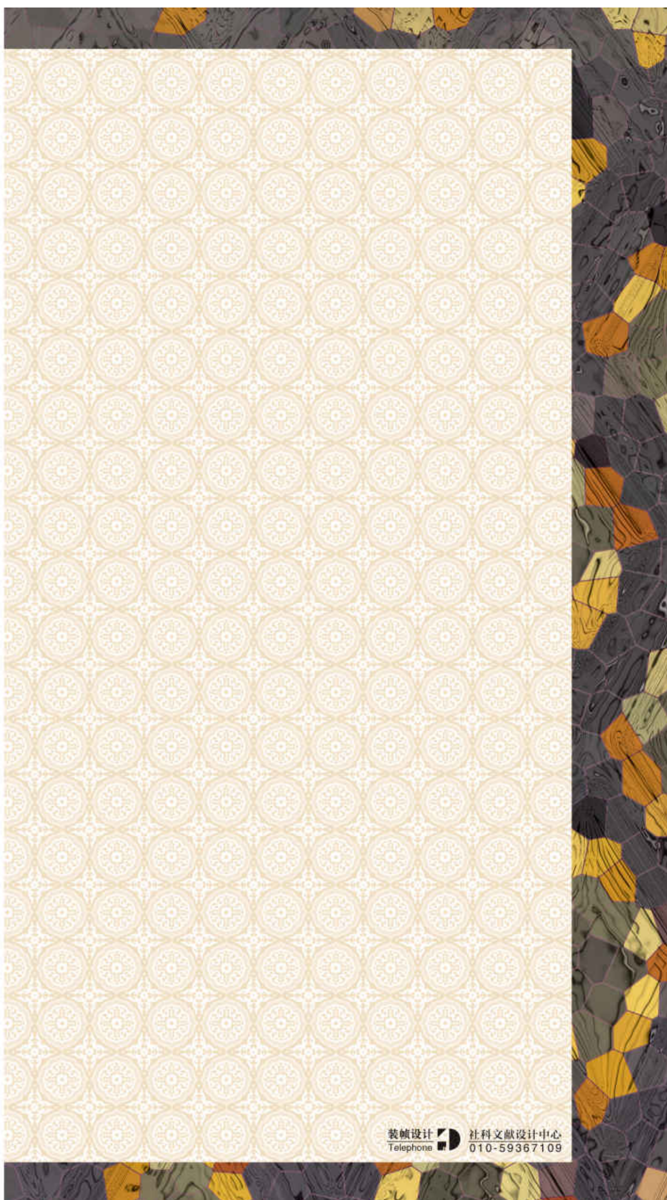
版次/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4857-3

定价/128.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装帧设计
Telephone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本论文集收录了 2018 年 3 月在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相关论文，该会议以纪念日本著名的亚洲区域史研究专家滨下武志先生执教中山大学十周年而召开，为了推动丝绸之路区域综合研究，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奠定学术理论基础，论文集还收录了国内学术界著名的有关研究欧亚区域史和海陆丝绸之路史以及区域研究方法论的专家论文，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欧亚区域史和丝绸之路史研究的有关成果，也体现了当代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欧亚区域史和丝绸之路综合研究的前沿水准。



出版社官方微信

九色鹿



www.ssap.com.cn



ISBN 978-7-5201-4857-3

定价：128.80 元



九色鹿

寻找“世界岛”

近代中国中亚认知的生成与流变

袁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袁 剑

1981年生，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边疆与中亚问题研究。著有《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译有《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编有《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重新发现中亚》等。

寻找“世界岛”

近代中国中亚认知的生成与流变

袁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亚是中国的“世界岛”（代序）

“中亚”（Central Asia）位于世界最大的连片陆地——欧亚大陆的中心，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袁剑为何称其为“世界岛”呢？从地理位置上看，中亚地处世界屋脊的边缘，以纵横的高山、大沙漠、小绿洲和干旱气候为主要景观。古代世界各大文明中心都视之为遥远、偏僻和荒凉之地。这造就了中亚在历史上长期独处一隅的现象，像一个不受关注的小岛。但我们纵观人类数千年喧嚣的历史，中亚也从未缺席，它对世界舞台中心的那些活动一直发挥着虽然悄无声息，却也不可磨灭的影响，至今如此。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中亚是欧亚大陆东西方经济政治交流必经的桥梁，就像大海中可以周转四方来船的海岛。这种角色，在古代的丝绸之路时期曾充分显现。如今，中亚又再次展现出这种特色。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复兴来说是如此。袁剑此书专门讨论中国眼中的中亚，恰逢其时。

作者在全书开头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话，强调了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一切都在变，不会变的只有陆地和海洋。这句话强调的是地理环境对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至今不可忽视。

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西方学者从地理和历史传统的角度，将世界上的大国分为海洋国与陆地国两类。在公元11世纪海上交通发达以前，不同区域人类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陆上交通进行的。那是陆地国家的时代。世界的两级，东方的中国与欧洲之间也是靠陆上交流的。在那个时代，中亚扮演了中西之间中介的角色。中亚人善于经商的本性因此得以养成并在那个时代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也为中西交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作为古代世界最大的陆地国，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繁荣的国家之一。[1]根据麦迪森教授（Maddison）等人的研究，公元1世纪时，中国的汉朝和统一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罗马帝国虽然强大，但与中国相

比，欧洲的统一是短命的。从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直至今天，欧洲再也没有统一过。而东方的中国则在秦朝以后两千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统一的。在一个统一的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9世纪前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人均收入领先于世界的时间一直持续到15世纪。直到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仍占世界份额的32.4%。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实现了快速增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欧洲GDP从1820年占世界比重的26.6%迅速上升到1890年的40.3%，而中国在整个近代史中经济一直停滞，人均GDP在1820～1952年甚至还下降了，同期GDP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则从32.4%下滑至5.2%。[2]这种下滑与中国的陆地国特点是有关系的。

按照西方学者陆地与海洋国家的划分法，陆地国的特点是封闭的、保守的、内向的、以农业立国而安土重迁的。海洋国则相反，倾向于外向发展、有冒险和开放的精神，重视商业和海外市场。海洋国的典型是英、美两个相继主导世界数百年的国家。二百多年来，海洋一直是由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的英美两个国家所主导的。英国的主导持续到20世纪前半段，此后是美国主导时期。其间曾有几次大陆国家对这一秩序的反抗，包括法国通过“大陆封锁”对抗英国、苏联对抗美国等，但结果都是反抗者被主导者所主导的秩序包围和压倒，也就是说，海洋国一直主导着世界的秩序。

在历史传统上与美英相比，数千年来，中国确实是内敛的、保守的、重农抑商的。这个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末。到了1840年，这个内敛的国家被西方的炮舰打开了大门。中国是在海上被攻破的，从那以后中国被迫向世界开放，向西方的海洋国家学习。

中国历史上一贯内敛的传统，从其对中亚的态度可见一斑。在清代以前，中亚曾多次被中国政府控制，但仅被视为中国的藩篱。经营中亚，是为了保蒙古、保新疆。保住蒙古和新疆，才能保住中原腹地。这个思想，在左宗棠给清朝皇帝的奏折中讲得十分明确。汉唐曾远征中亚，控制中亚，但最后都退回来了，没有竭力守卫，认为那是藩篱而已，不值得消耗太多国力。如此对待中亚，还因为中国人自古的哲学思想也是内敛的。在对待邻人，对于远方藩篱性质的国家、土地，中国的态度一向是招徕远人，宣扬国威，不会竭力去争夺占有。核心目标始终是互相依存，安济天下。如明代郑和所率舰队周巡世界，却没有扩张过一寸土地。进入近代，中国受到西方侵略，开始饱尝科技落后和这种内

敛哲学之苦，才认识到世界并不都是如此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清代末年，面对俄罗斯的东扩，中国丢掉了西域大片国土和中亚属国。到了19世纪中叶，新疆也陷入乱局，伊犁等地陷入俄罗斯之手，其他地区也大多被来自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受奥斯曼帝国支持的阿古柏之流占领。左宗棠竭尽全力，才收复新疆。从那以后，中国在新疆一直采取守势，对于在中亚丢掉的国土，再无恢复的意图。

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改革开放，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到2008年，中美之间的发展态势出现了关键性转折。2008年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转折点？需要回过头来说说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历史。海洋国最初是依靠工业品和炮舰占领全球市场，主导全球商业，进而主导全球秩序的。199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只有美国的12%左右，2000年仍不到美国的30%，然而2010年工业制造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2015年已是美国的1.3倍。美国失去了制造业的优势，虽然感到不快，但他们称霸世界，控制全球市场，获取超额利润的根本能力，即军事和经济的能力并没有失去。他们凭借航空母舰称霸海洋，达到金融资本以及尖端科技的世界性垄断。他们不再依靠工业品去获得利润，而是依靠在全球的投资，用金融资本来控制和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当第三世界的工人们辛苦劳作，用血汗去挣取微薄的工资时，他们生产的那些产品的大部分利润却流入了投资者和技术垄断者之手。金融资本加上所向无敌的航空母舰保驾护航，西方的金融家们何乐而不为呢？他们这样轻而易举地挣得盆满钵满，为什么还要建工厂呢？当然，炮舰加金融资本也有不如意的时候，其中之一就是海洋国在对付内陆国家时，往往力不从心。

十几年前，我与美国一位资深的中亚问题外交官交谈，我向他谈到美军驻扎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用飞机可以在十几分钟内就飞到新疆上空，这对中国是个威胁，该外交官告诉我，中国不必担心，因为美国没有能力长期负担如此长的路上运输费用和保卫该运输线安全的费用。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的话是有道理的。美国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都是因为难以继续维持其在内陆国家的消耗。海洋国家强大，但并不是在深入大陆腹地时也能够一直强大。美国不断加强海上力量，海洋和沿海陆地是他们的力量所在。金融资本和海上霸权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根基。海洋是广大的，但世界并不仅仅漂浮在海上。陆上大国也有其优势，即在广袤大陆上的优势。他们可以在远离海洋的辽阔大陆上纵横捭阖，或互相沟通，或向四处发展。大陆国家的基础和力量在陆上。科技的发展，使得陆上交通与海运的差距不断缩小。这不断增加着大陆国家

的力量。近些年运力快速扩张的中欧班列即其一例。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断了西方大国永远称霸的美梦。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倒退和社会危机使得他们感到已难以无限期地称霸下去。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使他们看到了中国可能赶超的前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只有5%，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不到1.5%。到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已上升到12.3%，出口额所占比重上升到12%。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有数据显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2014年为27.8%）。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近英国的4倍，是德国的3倍和日本的2倍多。[3]

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在全球范围经济影响力上升，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这意味着“亚洲世纪”的到来。同时，美国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消长明显。针对这一形势，美国及其盟国开始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美国迅速从中东和阿富汗撤兵，制定了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把自己军事力量的一半以上布置到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已在中国东南方形成包围。美国的包围堵截，不仅给中国向东部亚太地区的发展带来较大压力和阻碍，也给中国经济的前途带来威胁。

外贸对于中国来说，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石油已有60%以上依靠海外的进口，大多通过海上运输。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也很大程度上依靠海上通道。所以，中国必须打破美国的封锁，建立与世界各国更安全畅通的联系。

为了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一方面积极构筑友善的周边环境，以图缓解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不将眼光局限于东部沿海，而开展西进的战略谋划。中国不谋求势力范围，不谋求全球霸权，只希望与全球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更亲密的政治互信、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也一直在朝这方面努力。为了这个目标，中国除了东南方向的海上道路之外，还有一条与世界联系的大通道，这就是西北方向的陆路通道。我们的丝路战略就是打通和扩展这两条通道。

所以，在这个大战略中，中亚再次处于中国发展的关键路口。对于中亚国家来说，西方的海洋国家是靠不住的。正如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所说，该国面临两个海洋，西边的俄罗斯和东边的中国。继承历史的传统，用路上丝绸之路与世界联通，是中亚诸国，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关注公众号：【奥丁读书小站】

【奥丁读书小站】一个专业推荐各种书籍的公众号，推荐的这些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

杨圣敏

[1] 林毅夫：《李约瑟之迷、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 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onance in the Long Run*，Paris：OECD，1998，p.40.

[3] 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

- 导论 地缘身份、内部结构与复线历史：中亚的定位、中国认知及其当代转型
- 第一章 “一带一路”中的中国-中亚关系：常识重建与互为契机
- 第二章 连续性与断裂性：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范畴流变
- 第三章 草原之域：哈萨克斯坦的历史论述与形象构筑
- 第四章 “白金”之邦：乌兹别克斯坦的近代形象及其流变
- 第五章 欧亚之枢：吉尔吉斯斯坦的在华认知与历史变迁
- 第六章 高山之国：塔吉克斯坦的形象生成与认知塑造
- 第七章 国运之镜：阿富汗形象的历史之变
- 结语 区域、文明，还是历史连续体
- 附录一 中亚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历史、现状及特质
- 附录二 固化与流动：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
- 附录三 国家感与边疆性：中亚国家间的边界问题及其观念折射
- 后记

导论 地缘身份、内部结构与复线历史：中亚的定位、中国认知及其当代转型

所有无关紧要的事物终将消散，

只有海洋与大地于此长留。

——歌德

“中亚”（Central Asia）位于世界最大的连片陆地——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经长期扮演着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交往桥梁的重要角色，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与信息交流的重要周转地区。“例如吸收欧洲的许多发明，传播至于中国的，就是中亚人；而许多中国的发明，也由他们带回欧洲。由此之故，假如印度和中国可包含于世界史的范围内，则中央亚细亚显然也应受同样的待遇。”[1]到了近代，随着整个世界力量中心从陆地转向海洋，这一区域又成为世界列强大博弈的舞台。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构成的当代中亚，开始形成新的身份认同与对外认知框架，从而为这一区域的未来发展打上新的时代烙印。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正如英国学者汉布里所指出的，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通道（中亚多数大河注入北冰洋），其主要作用是隔开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边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正是依靠这些渠道，中亚周围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贵重商品之外，还得到了一些关于对方的有限知识。如果不存在中亚商路的话，它们就得不到这些，或者至少要困难得多。[2]封闭性与联系性共存的状态，构成了中亚在亚欧大陆乃至整个前近代世界的基本图景，并成为我们面对当代中亚及其区域定位的过程中所必须理解的基本前提与基础。

长期以来，作为欧亚大陆东西段之间的交流通道，中亚缺乏自身稳定的政治结构、历史传承与族群结构，动荡与流动成为这一区域的显著特质，在文明史的脉络中无法形成具有连续性的整体认同，因此往往作为周边文明历史的“附属区”而存在，而该区域自身在与周边诸文明力量的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则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中亚一方面始终在吸引着历史和现实的目光，另一方面却吞噬着我们对于这个地区的既有认识，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一区域内部秩序的不断变动与外部界限的混沌不清。这种形态，塑造了中亚在欧亚大陆认知框架中的基本状态，也构成了公众层面中亚认知的基本样态。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与地缘身份相关的几个问题：中亚是什么？中亚不是什么？中亚会变成什么？

中亚是什么？

中亚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于中亚区域及其地缘定位的问题，只有理解了中亚与更大的外部世界的关联性，我们才能理解中亚本身。从历史与地理的视角来看，中亚可以是中国古代王朝历史视野下广阔的西域地带，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西域地区，在中国历代正史中构成了中原核心叙事的重要补充，其内容的丰富与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正史叙述及其相关王朝是否为大一统王朝的重要标志。中亚也可以是欧洲文明中的亚历山大东征曾经接触过[3]，但同时又长期没有关注的东部世界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认知中，中亚成为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空间的一部分。著名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不朽名著《历史》中曾这样记述中亚的场景："直到这些秃头者所居住的地方，这一带土地以及居住在他们这边的民族，我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为在斯奇提亚人当中，有些人曾到他们那里去过，从这些人那里是不难打听到一些消息的。从波律斯铁涅司商埠和黑海其他商埠的希腊人那里也可以打听到一些事情。到他们那里去的斯奇提亚人和当地人是借着七名通译，通过七种语言来打交道的。"[4]这条关于斯奇提亚人绕里海、咸海往东前行的道路，正是丝路北道的西段路线，是汉代之前的东西方商队逐步走出来的。[5]中亚同样可以是近代以前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内部交流的中介区域。在汉代，位于中亚区域"中央位置的贵霜帝国所拥有的财富和它的重要性，可以说这里成了一个中心。这个巨大的十字路口独霸着向西穿过帕提亚国，通向巴尔米拉、佩特拉和地中海沿岸的道路，东边通向喀什噶尔、和阗和中国大都市的道路，向南的道路直通塔克西拉、旁遮普边境。游客从这里可以抵达巴里伽扎港，然后乘船驶向阿拉伯半岛、埃及，最后从这些地方取向罗马。一路上，从印度北部的东方港口开始，佛教文化就一直伴随着它的前进步伐，途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府南（今柬埔寨）和安南（越南北部沿海）的印支王国。大部分商人、使者、艺术家、冒险家、医生……在穿越贵霜领土时都经历了从叙利亚或从埃及到中国的那段艰难路程。在这块文艺繁荣的交融地上，贵霜帝国力图保留和吸收每种文化最精华的部分，这使得印度艺术和思想的魅力从西到东大放异彩"。[6]近代中亚更是成为俄国与英国彼此竞争的内陆亚洲区域，并从地缘角度影响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政治军事形势。正如俄苏中亚史研究大家巴托尔德（又译巴尔托里德——笔者注）在1920年撰写的《中亚简史》中所指出的："19世纪，当欧洲最终确立其文化的领导地位时，

中亚作为伊斯兰化的亚洲区域距离欧洲最远的部分，在文化发展上又低于其他伊斯兰国家。在俄罗斯来到这里以前，中亚没有印刷业，不论是石印或是活字印刷，而那时土耳其和波斯早就有了印刷业。在土耳其和波斯的国家、社会生活中，早在18世纪时已见有欧洲的影响，而中亚在这方面仍完全处于中世纪的状态中。只有蒙古入侵后首次复工的金币铸造厂表明，通过波斯的中介，它和欧洲曾发生过某种经济上的联系。但是，如果认为俄国征服者在中亚碰到的只是野蛮愚昧和没有什么可以赞成的文化活动的话，那是错误的。在俄国征服时，中亚大部分的经济状况比起一个世纪前，已有很大发展。希瓦和撒马尔罕又再次成为重要城市。比起16和17世纪，在19世纪，希瓦和浩罕汗国在文化（尤其是历史学）和建筑方面呈现出一幅比布哈拉更为生机勃勃的局面。费尔干纳首次成为一个大国的中心，它几乎包括了整个锡尔河流域。浩罕汗成功地把锡尔河省东部和七河省西部的一部分游牧民置于其统治之下。在中断了数世纪之后，又恢复了对草原地带的垦殖活动，并在浩罕汗国新建堡塞的保护下，恢复了农业生产……费尔干纳首次在中亚取得了经济上的首要地位，并在俄国统治下一直保有这种地位……像别的地区一样，中亚的未来决定于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地位。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地区，中亚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完全有赖于铁路的发展（它恢复了与海路贸易有同等重要性的陆路贸易），中亚大概将不再起它以前起过的那种与远东贸易上的作用，并且也似乎不可能在西伯利亚铁路外，又修建一条贯穿中亚到中国的铁路。不管怎样，未来修筑欧洲-印度铁路的问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知道在这一规划中中亚将起什么作用。为此，俄属中亚不但有其过去，同样也有其未来。”[7]在这里，巴托尔德预测到了中亚有可能在铁路互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却没有预想到中国在新的世界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当然，中亚同样可以是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的俄国-苏联中亚区域，更可以是当代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更为广大的区域。从总体来看，它是一种经历过几个阶段变迁的文化-生态共生区域，是一种与周边文明与国家力量有特定关联的区域，也是一块我们在思考自身社会与文明发展过程中无法全然回避的区域。比如说，当我们在思考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迁徙问题以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力量之间的南北互动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意识到中亚在这些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外部角色。

中亚不是什么？

中亚不是什么？从严格意义上说，中亚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独立单元，在可观察的一段时间内，它无法确立起自身的整体性话语与认同，而必须附属于欧亚大陆周边的某一力量单元，方能展现自身的能量。从现实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层面而言，中亚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它自身在经济和生态上的脆弱性使其无法在长时间内形成一致性的力量，在认同层面，在可预期的时段内，也难以出现一种共同的、稳定的“中亚人”意识。

例如，在中亚的漫长历史上，我们还找不到一个真正囊括这一区域的，并以本地区为政治中心的长期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便是在著名的蒙古帝国时代，中亚也并没有成为蒙古帝国的中心，而只是整个帝国的一个部分。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俄争夺中亚的时代，中亚在英国殖民政策的定位上也处于某种边缘位置，其地位无法与当时作为英国南亚战略支点的英属印度相比。而在其内部，由于后来苏联因素和宗教、族群因素的巨大影响，当代中亚五国的共同区域身份认同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远不及先前苏联的苏维埃共同体认同，以及当代基于特定宗教与种族身份的共同体认同，当然，更比不上中亚各国自身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亚更多的是一个外部附加的区域概念，而较少成为这些区域及其国家的内生认同概念。所谓的中亚国家联盟（The Union of Central Asian Nations）更多的是一种哈萨克斯坦单方面的构想，人口密度与历史传统居于优势地位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未必愿意承认哈萨克斯坦的主导地位，而且现实状况也表明，这种构想始终处于悬置状态，在具体的发展层次上，甚至不如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更不用说形成类似的更具共同性的东盟甚至欧盟结构了。

中亚会变成什么？

有意思的是，虽然中亚在印度殖民帝国体系中的地位比不上英属印度，但历史上的中亚曾经以独特的方式重塑了印度乃至整个南亚的历史，莫卧儿帝国及其创始者巴布尔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正如莱恩普尔所指出的："巴布尔是中亚和印度之间、以掠夺为生的游牧民族与帝国政府之间，以及帖木儿与阿克巴之间的桥梁。亚洲两大雄主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血液融合在他的血管里，他把波斯人的教养、温文尔雅与鞑靼游牧民族的勇敢和好动结合了起来。他将蒙古人的活力、突厥人的勇敢和能力带给了懒散倦怠的印度教徒。他本人是一个幸运的战士，并不是帝国的缔造者，然而他给他的孙子阿克巴所建成的辉煌建筑物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他对印度的征服为一个帝国世家开辟了道路，这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不朽地位；而他早期的英勇冒险和不屈努力，以及他追述这些英勇冒险和不屈努力的回忆录，奠定了他在传记写作和文学上的地位。"[8]这种经由特定的人物与帝国关联而形成的区域性联系，为我们思考中亚的未来转变提供了基础与可能。

正如卡尔·施米特所揭示的，一战及其后果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走向："在先前的数个世纪中，都是由欧洲会议决定世界空间秩序，但是在1918～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第一次乾坤颠转：由世界决定欧洲的空间秩序。这意味着人们试图在一个完全失序的世界里为欧洲创设一种新秩序。在国际联盟的护卫下，世界大会对欧洲大陆的土地进行强行的重新分配。"[9]欧洲秩序在这之后，已经无法塑造整个世界框架并明确地缘角色。而随着历史的推进，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及其地缘政治变迁为中亚赋予了新的角色。正如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20世纪初指出的，欧亚大陆内部区域，因其身处内陆以及海上力量无法渗透，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带。但在他的眼里，中亚只有在附属于俄国（以及之后的苏联）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而在苏联走向瓦解之后，中亚又面临着新的抉择。它是成为所谓的土耳其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还是继续留在俄罗斯的影响下，抑或是寻找美国这样的"域外"大国作为其平衡外交的支点，或者与中国、印度、伊朗等周边邻国形成新的睦邻合作关系，这些不同的选择，都将决定中亚的未来定位，而在中亚内部，各国之间也将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内部发展路径。

总之，作为世界空间秩序的一部分，中亚的这种内部结构将形塑其

外部走向的持续性与整体性；而其本身，则会更多地受到欧洲之外区域与国家的重大影响。

内部结构

漫长的20世纪，不但是一个世界历史的真实舞台，而且是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地缘政治实践场域。它不仅塑造了当今的世界整体秩序，而且对各区域内部结构形成独特影响。意大利学者阿瑞基提示我们：“就像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霸权角色对于一个像尼德兰联邦那样大小的国家来说变得太大了一样，在20世纪早期，霸权角色对像英国那样大小和资源量的国家来说也变得太大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霸权角色都转交由另外的国家来承担——18世纪是英国，20世纪则是美国。这两个国家开始享受丰厚的‘保护费’，也就是独享（绝对或相对的）与地缘政治学上的岛国特征相联系的专属成本优势……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两个国家也要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占有足够的分量，以便能够根据它所认为的合适方向改变竞争国家间的权力平衡。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在19世纪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展，所以在20世纪早期成为霸权国家就需要比18世纪多得多的领土和资源。”[10]俄国在中亚的推进及苏联在这一区域的制度改革，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领土与资源的结构性变化。

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过程，不仅是其帝国结构在中亚的延伸，还是其边疆观念在中亚这一新的历史与生态空间中发展与立足的过程。从历时性角度而言，中亚被纳入俄国的实践成为俄国边疆理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对俄国来说，其自身独特的“边疆性”正是在其与东部蛮族的对抗中逐渐形成的，而且在其自我叙述中，俄国本身也成为整个欧洲的屏障。正如捷连季耶夫所指出的，从17世纪开始，“俄国在战胜了一个敌人之后，就得马上对付另一个敌人：打败金帐汗国之后，马上就要制服喀山，制服喀山之后，又得去制服巴什基尔人等等；战事不绝，好像这就是俄国今后的使命。各汗国一个接一个地窜向俄国边境，可以说是在敲打欧洲的大门，但严峻的守卫者毫不客气地撵走了这些不速之客。从这时起，欧洲听不到武装的民族‘大迁徙’的不祥的喧嚣声，也听不到我国边境村民的呻吟，只有一个俄国倾听这种呻吟声，并为他感到痛苦。希布察克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他们挨个儿在俄罗斯人民坚不可摧的威力前碰得头破血流。俄罗斯人民不仅使自己，而且同时也使欧洲摆脱了类似阿提拉和拔都那样的野蛮鞑靼军队入侵的恐怖……俄罗斯就是采用这种不断往前伸展的一条条防线，向东推进，劳而无功地去企求安宁。在她还没有遇见一个能尊重条约、开

化到不靠劫掠为生，而且强大到足以禁止属下匪帮对我国边境进行强盗式侵袭的民族以前，她是得不到这种安宁的。由各个草原和各野蛮汗国所促成的，而我们不得已予以采纳的这个计划……只能决定构筑要塞来遏阻他们”。[11]而随着俄国版图向东拓展，欧洲文明的屏障才越发深厚。到了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俄国进一步向中亚方向推进，“设置一系列类似当时帝国内部已建立的机构，把半野蛮的臣民拴在共同的国家制度上，深入亚洲草原，开辟一条通向进步和文明的道路”。[12]在这种思想认知之下，俄国本身向中亚的扩张同时是一种其内部“流动性”被渐次消除的过程，并在“文明开化”理念引导下被纳入整个帝国的内部治理当中。正如后来的苏联学者H. M. 休金娜在总结俄国在中亚的地图绘制历史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对中央亚细亚的考察来说有代表性的是继承性和坚定的目的性。考察队有计划地开辟路线，以便把中央亚细亚地图上的空白点分成越来越小的地块。由于考察的这种坚定的目的性，中央亚细亚在很短期限内在地图上就不再是‘未踏勘地区’，而是具有了清楚的图形。”[13]中亚地图的绘制，正是这种理念初步深化和实践的重要产物。[14]

从历史进程上看，俄国逐渐征服哈萨克草原的过程是从镇压哈萨克诸汗政权开始，中玉兹、小玉兹和大玉兹分别在1822年、1824年和1848年被征服。“沙皇统治在哈萨克草原的确立，是一个缓慢而审慎的过程。彼得堡政府并没有给予哈萨克人以臣民的地位，他们还仍然保持着‘外侨’（inorodtsy，allogénes）的身份。”[15]在一开始，俄国的中亚政策更多地采取保留当地原有社会秩序的方式来实现间接治理，“沙皇在中亚的对内政策是，打算用维持住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秩序，而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尽量少加干涉的方法，来保证持续的统治”。[16]但之后的棉花、剩余土地和市场需求，改变了俄国之前的中亚政策。以1822年颁布的《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为标志，俄国对中亚地区既有的政治结构进行了系统调整，这一调整首先以哈萨克草原区域的中玉兹开始，俄国将其领地纳入鄂木斯克省的外围区，受西伯利亚总督的直接管辖。[17]随着俄国在19世纪后半叶逐步吞并中亚地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在中亚北部设立草原总督区，驻地为鄂木斯克，在南部绿洲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驻地为塔什干，从而确立起“北部草原＋南部绿洲”的中亚治理格局。从周边生态与政治态势而言，这一治理格局尽管在组织方式上呈现多种形式，但其内在基础始终是中亚在气候、土地、水资源方面已形成的分布格局，其南—北结构始终未变。从总体上说，一直到20世纪初期，即便是在俄国控制这一区域之后，当时的行政治理

格局基本上依然保持了这种状态，符合当时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格局及相关的人口与群体分布态势。[18]长期以来，在中亚的这种南—北结构中，位于费尔干纳的南部主体区域在经济、人口、历史文化等方面占据优势。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中亚社会内部的主体性意识逐渐高涨。作为苏俄国内战争的后果之一，苏维埃政府在当地渐渐掌握权力，并在之后苏联的整体政治实践和治理框架中形成新的“平等”话语，进而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转变了长期以来南—北结构中以南部为中心的历史图景，以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为中心的北部草原区域逐渐成为当代中亚新的南—北结构中的北部中心，并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中亚内部国家叙述历史与理解边界的方式。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继承了苏联时期划定的行政结构，继续维持现有边界，共同奉行不破坏边界的原则。这种在苏联政策中基于平等原则塑造的中亚国家“并行”结构，在苏联解体之后成为一种被“继承”的内容，并在随后各国的国家认同建设中成为某种基本共识。1993年8月，独立不久的中亚五国签署声明，进一步确认了维系各国间现有边界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中亚各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迫切想要解决自身与周边各国的边界争议问题，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历史遗留特征，以及其在中亚各国自身民族国家建设中所扮演的政治动员工具，因此在具体的解决方面进展缓慢。有研究者指出，中亚各国的公民认同感建立在民族的和领土-文明的认同感基础之上，“与公民认同感相联系的民族性在中亚大的民族中都占优势，除了老的文明中心的居民之外，民族性作为公民自我意识的基础，在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中也占优势。老的中亚文明中心（乃是代表国家的核心）的居民，主要分布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有费尔干纳谷地、布哈拉、撒马尔罕、塔吉克斯坦南部地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区（苏尔汉河州），他们正形成类似非命名的中亚土著民族的公民自我意识，如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在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人，他们是在中亚传统的领土-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因为这些领土的大部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从总体上讲，该国的公民认同感是在古老的中亚国家体制强力影响下的产物，与该国邻国的居民在很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形成了中亚新独立国家边界冲突的潜在根源”。[19]这种中亚国家在疆域及边疆结构方面呈现的复杂性，不仅在现实政治层面影响着中亚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也将在各自历史叙述的层面得以呈现。

复线历史

与当代中亚内部疆域结构的复杂化相对应的，则是各国在自身作为“历史连续体”的叙述方面呈现出的复线特征。“复线历史”在中亚各国的历史话语创制中成为一种基调，它既意味着基于俄国-苏联空间的统一的中亚历史叙述就此终结，也意味着在中亚各国的历史叙述中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互相竞逐的局面。了解和认知这些国家的叙事风格及其历史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区域内部国家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的自我定位与走向。

以当代中亚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为例。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历史叙事服从于苏联历史的整体架构，以某种公式性的方式呈现。（1）哈萨克斯坦同俄国的联合，是16世纪末期以来哈萨克人民最著名、最有远见的统治者所一直追求的目标。（2）哈萨克斯坦同俄国的联合，防止了其他野蛮国家奴役哈萨克人，并使其与一个比一切亚洲邻国都“更为文明”的国家形成了密切关联。（3）哈萨克斯坦归并于俄国，制止了周边力量瓜分这一区域，并为其进入更进步的经济形态开辟了道路。（4）哈萨克人在他们全部历史中都从未有过一个真正有组织的国家，只是一些联结得很松散的半国家组织。苏维埃政权使哈萨克得以有一个真正的自己的国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0]到了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建立和发展作为主权国家的哈萨克斯坦战略”中，指出了历史因素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建构中的巨大作用，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现有疆界是历史上后来定居的、控制了整个哈萨克斯坦疆域的民族部落的领土。此外，他还指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是哈萨克人的礼物，而是其历史的家园。当局将采用一切手段来确保统一国家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这也是这一不稳定时期哈萨克斯坦关于其国家定位的重要声明。这种理念，体现在哈萨克斯坦自身的国史叙述中，表现为其彻底抛弃了苏联时代的框架，开始以自身作为欧亚历史运动的中心之一来定位：“塞人时代的文化表明，作为中亚一部分的欧亚大草原是独立于黄河文明和多瑙河文明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明单元。欧亚草原文明集各时代各地区文化特点于一身……在世界上，各个时期都有若干非常活跃的族源中心，其族人就像大锅里的开水沸腾后水花四溅一样向四处扩散迁徙，最终改变整个大陆的面貌……哈萨克斯坦始终是欧亚大陆上这些不规则迁徙运动的中心地带。”[21]从认知角度而言，这种叙述在中国自身对于中亚的认识框架之外，形成了新的“历史连续

体”叙述，值得关注。

目前，在寻找“历史连续体”的目标之下，对国家感与历史性的塑造，已然成为中亚国家认同建构的基本内容。但在这一目标之下，必须进行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妥协，各国自身所试图追寻的帝国荣耀及其历史记忆，与这些国家在苏联时期的划界现实始终存在着某种错位。实际上，中亚地区这些历史上的荣耀帝国与现实中的国家疆域无法形成一一衔接的关联，“独占的”与“切割的”国史叙述及其帝国想象无法在中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彻底贯彻。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复线历史”基础上的“共享”与“交错”都将是中亚各国历史版图与现实疆域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势。在未来，中亚各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依然任重道远，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是一个构筑不同于苏联时期的自我同一性的过程。由于中亚各国构筑其国家公民认同感的基础不同，各国推进民族国家的进程、力度与方式也各有差异；与之相应，其“历史连续体”的书写也各不相同。

最后，让我们回到大地与海洋的命题。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经说过的：“中亚虽然是内陆，但我们有两片海洋，一片叫中国，一片叫俄罗斯，只要打通陆路运输，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海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中亚所具有的地缘身份、内部结构与复线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并思考以之为对象的大地与海洋。它们同样永恒，也同样久远。我们认知中亚的图景与视角，也正是在这种结构变动中得以推进与深化。

[1] 〔美〕W. 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章巽译，中华书局，2004，第3页。

[2] 〔英〕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7页。

[3] 余太山：《亚历山大进军中亚主要政军策略例证》，《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

[4]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75页。

[5] 莫任南：《从〈穆天子传〉和希罗多德〈历史〉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西交通》，《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

[6] 〔法〕让-诺埃尔·罗伯特：《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马军、宋敏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3页。

[7] 〔俄〕维·维·巴尔托里德、〔法〕伯希和：《中亚简史》，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第74～75页。引文略有调整。

[8] Stanley Lane-Poole，*Babur*（*Rulers of India Series*），Clarendon Press，1899，pp. 9-10.

[9]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22页。

[10] Giov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oney*，*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Verso，1994，p.62.

[11] 〔俄〕M. A.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3～15页。

[12] 〔俄〕M. A.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86页。

[13] 〔苏〕H. M. 休金娜：《中央亚细亚地图是怎样产生的》，姬增禄、阎菊玲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第202页。

[14]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有专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15] 〔英〕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265页。

[16] 〔美〕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陈尧光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14～15页。

[17] 王希隆、汪金国：《哈萨克跨国民族社会文化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第25页。

[18] 袁剑：《区域、文明，还是历史连续体？——中国的中亚叙述及其话语分类》，《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19] 王尚达：《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五届学术年会论文集》，2008，第924页。

[20] 〔美〕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79页。

[21] 〔哈〕坎·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哈萨克斯坦简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丝绸之路研究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22～24页。

第一章 “一带一路”中的中国-中亚关系：常识重建与互为契机

重建我们的“中亚”常识

近代以来海洋文明的强势地位，使我们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往往将目光更多地转到欧亚大陆外围与沿海地带的文明与社会，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以及古巴比伦文明等，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璀璨辉煌的中华文明。不可否认，这些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奠定了所在地区社会与生态未来发展的基石，并且在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在本区域内确立起巨大的引领与辐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将整个欧亚大陆的发展与互动仅仅局限于或者说等同于这几大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欧亚大陆内部其他区域的相关状况，以及这些地区曾经有过的并且如今依然在继续进一步发展着的与外围文明的互动与交流，也忽略了欧亚大陆内部区域的社会与族群对外围社会与文明所产生过的冲击与影响。这无助于我们确立起对欧亚大陆的整体性认知，而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中亚”。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从历史到当下欧亚大陆的地位与结构问题，就有必要重新认识“中亚”这一区域本身，尤其是这一区域内部的历史与社会发展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更客观理性地去看待中国与这一区域的历史、当下与未来关系问题。

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对外域的认知永远也比不上对自己祖国——中国的认知，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是，我们至少也不应该使中亚完全成为我们的知识空白。一方面，我们目前对美国、欧洲的认识水平要远远超过对处在中国周边的中亚地区的认识水平，这固然跟我们与欧美国家在各个层面上的交往更多有关，同时体现了欧美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对于欧美之外诸多地区尤其是中亚地区的认知空白，也暴露出我们对周边情况认识的不足，这与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所应具有的全球视野，与我们在处理好自身问题的基础上

认识和面对来自域外的机遇与挑战的反应能力是难以契合的。在很多情况下，公众层面对于中亚的认知往往更多是神话性的，而不是知识性的，中亚在这种语境下成为一种遥远而又神秘的东西。让中亚不再遥远，让中亚不再神秘，厘清中亚在中国对外认知图谱中的位置与特征，进而更好地加深对自我的理解，这就是我们重建“中亚”常识的目的与关键。

从“大博弈”到“新棋局”

中亚这一区域在历史上曾经是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之间交流互动的重要枢纽，既是各个族群彼此往来移动的地理通道，又有“丝绸之路”的文化美名。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千年来，中亚地区本身在历史上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以本区域为核心的稳定统一政权，而始终处在欧亚大陆外围文明的争夺之中。在这种争夺中，19世纪中后期英、俄之间对中亚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最终奠定了1991年之前中亚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并深刻影响当今的中亚地缘政治。

英、俄两国间的这场“大博弈”源自英国和俄国分别北上和南下过程中的帝国利益冲突。1839年，英军从印度北上，发动阿富汗战争，而俄国则从奥伦堡南下进军希瓦汗国，两大帝国力量发生碰撞，冲突随即展开。这场“大博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最终以阿姆河—帕米尔一线划定双方势力范围。而在这之后，我们如今所称的中亚五国区域全都被纳入俄国版图之内。

当然，在具体的争夺过程中，政治与军事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但俄国通过外交层面的活动，在夺取中亚的过程中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恩格斯曾经这样论述沙俄在外交方面的优势：“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耶稣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足以任自己内部取缔贪污腐化，而在周围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1]俄国对中亚的逐步控制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军事力量支撑下，利用外交手段逐步将其纳入俄国版图并进行内部治理的过程。

随着冷战的结束，原先苏联中亚地区诸加盟共和国实现了自身的独立建国之路，打破了原来这一地区国家间的力量平衡结构，中亚开始进入新一轮国家与国际力量博弈阶段，地缘政治的“新棋局”正在形成。

中亚的这种“新棋局”不同于之前的“大博弈”，除了原先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争夺之外，还有着更多因素与力量的介入，例如文化软实力、国家认同、族群关系等，这些都使“新棋局”中的可变因素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一地区在认知层面有新的积累。

中国与中亚的“互为契机”

从整体结构上看，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在地缘政治层面上标志着中亚从一个大国（苏联）内部的区域问题转变为欧亚大陆各大力量都必须面对的区域问题。与此同时，中亚本身也面临着一个从作为苏联组成部分的整体向具有各自国家与民族特征的多元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一地缘政治局面的变迁所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果说，从1991年底至21世纪初，中亚各国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民族国家认同与建构的话，那么，从2001年美国以反恐为由进入中亚，中亚各国开始进入一个国家建设与对外战略并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寻找大国支持和避免对抗成为中亚各国对外关系的主轴。

从中亚各国的国家建构方面来看，独立并不意味着中亚各国内部问题的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独立之后的中亚各国，很多问题才刚刚开始。对于它们来说，需要在“中亚”这一概括性标签之外形塑各自独特的国家身份与发展契机，并开始认真面对这些国家之间所存在的诸多未解难题。对此，美国中亚问题专家奥卡特（Martha Brill Olcott）在《中亚的第二次机会》一书中为我们列出了中亚国家在国际、地区和国家等几个层面上所面临的问题：其一是各国在管理公共水源方面持续不断地出现紧张关系；其二是各国间存在的边界问题和少数民族待遇问题；其三是中亚地区内部贸易困难的问题；其四是毒品贸易和有组织犯罪的威胁问题；其五是极端思想的扩散问题。她进而指出，中亚有可能出现一个或多个失败国家，这是最危险的潜在问题，而随着权力向后苏联时代的领导人移交，这种危险在不断增加。因此，这些“独立后遗症”问题处理恰当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中亚各国的未来命运，也将对周边大国的政治军事战略造成巨大的影响。

中亚因为自身所处的内陆地缘环境，为了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更广阔的全球经济互动过程中，就必须与欧亚大陆周边的大国相联系。而在中亚各国的具体选择中，除了继续维持与俄罗斯的传统政治和经济联系之外，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亚各国新的合作方向与通道。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重新寻找东—西轴向的发展通道也成为中国未来的重要依托。因此，从中亚的角度看，在俄罗斯这一战略依

托之外，中国日益成为其在经济领域内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中国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大调整，以及整体安全环境的需求，主动建立起与中亚各国的良好互动关系也将有助于上述问题的推进与解决。可以说，中亚与中国在相关关系的构建方面有着各自的需求，双方“互为契机”。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在建立中国-中亚区域性合作的过程中，双方的需求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对于彼此文明与文化的理解与包容成为合作的基本前提。我们必须注意到，如今的中亚已经不再是苏联的一个地区，而是具有诸多独立国家的庞大地区，而这些独立国家之间也有着各不相同的复杂关系，因此，中国-中亚合作关系的推进是无法单纯依靠中-俄、中-美等大国关系就可以解决的，还必须时刻考虑到中亚地区乃至其中各国本身在关系建构方面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说，要倾听它们自己的声音，了解中亚和中亚各国的真正需求，只有这样，中国与中亚彼此之间的合作才能有可持续性，当代“丝绸之路”及其所展现的互利合作精神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总之，深刻变动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使“一带一路”中的中国-中亚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这种机遇将使我们的陆向轴线重要性日益凸显，并得以大幅度改善中国的陆向生存环境，欧亚大陆各大国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共同发展也变得更加迫切与可能。在对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明确中亚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了解中亚国家的自身关切，将有助于我们更为科学地构建当代中国-中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1]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16～17页。

第二章 连续性与断裂性：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范畴流变

中亚的位置特质

从地缘上来看，“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经长期扮演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交往桥梁的重要角色，又在近代成为世界列强争夺博弈的舞台。正如汉布里所指出的：“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凭借（中亚多数大河都向北流入北冰洋）的结果，中亚的主要作用是隔离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围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正是依靠这些渠道，中亚周围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贵重商品之外，还得到了一些对方的有限的知识。如果不是中亚商路的话，它们就得不到这些，或者至少要困难得多。”[1]可以说，中亚的这两种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对这一区域认知的基本前提与基础。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任何试图对世界体系史进行的系统分析来说，中亚同样具有中心地位。对于世界体系的研究而言，如何对冷战之后新出现的区域进行有效的定位与分析，是确立世界体系理论当代有效性的关键所在。正如弗兰克所言，中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黑洞”，它必须引起世界体系史研究的关注甚至热情。但是，中亚可能仍然是世界及其历史当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视的部分。之所以造成这种忽视，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历史绝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将其胜利合法化的胜利者所书写的。而中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些胜利者的家园，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要么记述了一些历史，要么留下了一部分历史遗迹。而自15世纪以来，中亚民众几乎一直是失败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别人，他们所在的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此外，这些损失迅速在彼此间关联起来——富有吸引力的世界历史中心转移到了外围、海洋和西方，[2]这种充满历史性的变动，最终形成了目前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结

构中的中亚现状。

尽管对于中亚的具体范围依然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但目前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界普遍认同的中亚范围是指如今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区域。这一区域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古代丝绸之路穿越其间，成为沟通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交流共荣的桥梁与纽带。15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海上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力量所控制的海路运输越发繁忙，而曾给这一地区带来繁荣的驼队贸易则日渐衰退。到了18世纪，中亚进入停滞阶段，面临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多重衰退，最终被纳入俄国-苏联的政治版图当中。[3]随着1991年中亚五国的独立和苏联解体，这一区域又开始以新的面貌进入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当中，并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中努力寻找自己的新定位。

中国“中亚”认知的连续性与断裂性

正如中国的对外认知视野数千年来发生过巨大变化一样，中国对于“中亚”及其指涉地区的认识也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从而在对于“中亚”概念认知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殊性，即古代中国在“西域”认知层面的长期传统以及二战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中亚”认知中占据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中亚”认知的两种连续性。而在这两者之间，则存在着一种断裂，即传统“西域”认知与二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亚”论述之间的断裂。这涉及传统的“西域”认知是如何转变为“中亚”认知的，同时涉及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民族国家及国家边界日渐明晰化问题，即从一个主要包括中国西部地区在内的“西域”概念向一个基本上将中国西部地区排除在外的“中亚”概念的演变及用语问题。

与同一时期或在稍后时期出现的亚洲其他主要区域概念如“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相比，“中亚”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出现与使用更具波动性与模糊性，这一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运用在很长时间内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至今尚未完全明晰。这就使得我们需要细致考辨分析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从而动态性地说明认知的具体流变过程，揭示出这种内在的“断裂性”。

中国古代的中亚认知框架

作为与中亚有着长期历史联系的大国，中国历史上对于中亚的认知十分悠久，传统的“西域”认知范式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了中国古代王朝对中亚的认知，成为历代官方正史对中亚地理、政治、文化等整体面貌加以梳理与概括的主要方式，并构成了我们认识历史上的西域地区的一种总体视角。在这当中，《汉书·西域传》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西域传”，其文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这一叙述成为此后历代王朝正史西域叙述的基本框架，即强调其东部与中原王朝接壤，而对其西部界限则没有明确说明。

具体而言，“西域”的范围大体而言存在着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西域”指玉门、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而狭义的“西域”则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4]在这种认知基础上，中国古代对于中亚的认知主要侧重于其与中原地区相邻区域的交流互动，对于其具体的地域范围以及内部社会生态分布，并不是十分的关注。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古代中国周边及其对外需求特征紧密相连的。1884年清廷在新疆正式建省以及19世纪晚期中俄之间一系列边界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语境下广义“西域”概念出现了分化，传统的对中国西部边界的模糊印象随之逐渐清晰，并进一步标识出“中亚”的明确东界及其具体空间范畴。

近代知识界的“中亚”意象变迁

19世纪中叶，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入中国，西方列强既用枪炮与商品改变了中国内部的政治与经济秩序，也带来了系统性的西式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在知识和思想的层面上挑战着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并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西方力量进逼与渗透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对外认知视野和世界秩序逐渐瓦解，新的对外知识视野和区域观念在曲折变幻中逐渐形成，其中就包含了中国对于中亚的认知，尤其是对其概念范畴的新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西域”认知正逐渐被更为清晰化的“新疆”和“中亚”认知所取代，而这一过程，又鲜明地体现为从古代中国一种相对模糊的对外视野向近代民族国家结构逐渐成形之后基于政治边界划分得更为明晰的认识框架转变。

当然，这种认知转变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缓慢的演变过程。总体而言，在清末，报章和文人笔端所出现的“中亚”，更多地指波斯、阿富汗一带，有时甚至还指以印度为主体，并受其影响的周边区域。当时，随着英俄“大博弈”的展开，双方的势力范围逐渐明晰，中国国内对此也开始有所报道，并在部分报刊文章里面形成了对于近代意义上的“中亚”的初步定义。

在晚清洋务运动的大背景下，早在1879年，位于上海的《万国公报》就刊发了关于俄国在中亚经营并进行地理勘察和地图绘制的报道，分别题为《各国近事：大俄：论中亚西亚之权力今非昔比》[5]和《各国近事：大俄：查勘中亚细亚舆图》。[6]898年，《时务报》第62期编译《俄国经营中亚细亚情形》一文，称：“俄国蚕食中部亚细亚，欲以抚英属印度之背，孜孜匪懈，思遂其雄志，其奏效之绩，颇可观焉。唯中部亚细亚之地，僻处亚洲之中央，故其事不易入人耳目，于是俄国南下之势，虽骎骎不已，世人知其情形者却少。”[7]899年，《知新报》报道英俄两国派员勘探中亚地理的情况，文章题为《亚洲近事：英俄派员测探中亚洲地势》，[8]其中以“中亚洲”指代这一区域。

进入20世纪，整个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1907年，张嘉森撰《外国之部：外国半年记事：中亚细亚之政况》一文，列举了阿富汗、波斯的相关情况，并指出随着日俄战争俄国惨败，其在中亚被迫退让，转而同意与英国一起治理波斯，以防止德国势力乘虚而入。[9]同

样是在这一年，《外交报》刊载《论阿富汗之关系于中亚细亚问题》一文，认为“阿富汗者，当亚细亚大陆北部及印度之要冲，自古由大陆一面，以进印度者……然自进取之俄国言之，不甚重视阿国，犹可言也，而自防御之英国言之，则阿于防御印度之关系，要不能轻视耳”。[10]

次年刊发的《论英俄之于中亚细亚》一文指出：“所谓中亚细亚者，自地理上言之，范围颇广。盖以印度为主，而与之接壤，或与其治安相关之国，将来政治上应受印度之大影响者，皆是也。察其情事，实错综而复杂，利害所系，普天之下，实无伦比。按毗连印度者，首为亚细亚土耳其，其国坚忍活泼，不可思议，而诸大国又常以之为政治目的，互相竞争。某国几欲托名以庇护之，故土耳其案实为关系尤巨之件。次为波斯，其政府疲软，他日国内分裂，固可预知。然与其互有往还之诸国，不能不为之扼腕。若顾全友谊，赞助波斯，令其异日得所依据，实为我英之所深愿，而吾尤望政府勿以近事而弃其在波之利益，尤必力为之助，使保其独立政治也。至于阿富汗，历五十年，久为中亚重要之问题。其国介于英俄，故其天然形势及国民财富，尤不容有所漠视……若夫中亚，又有中国西境领土。夫中国，大国也，立国最久，屡经革命之乱，而仍不解体，故亦不可轻视……”文末译者按语称：“中亚细亚为英俄所必争，他日变故，正不可知，而我国之新疆、西藏，实当其冲，西望边陲，能不为之怵然耶！”[11]在这一叙述中，中亚的范围主要指以印度为主体并受其影响的周边区域。

随着知识界对外视野的扩大，尤其是在民族国家知识范式逐渐进入公众知识领域之后，国内知识界对于中亚范围的认知就逐渐清晰起来，开始形成关于俄属中亚的一般性共识。

在1911年佩玉所撰《俄国中亚经营策》一文中，作者指出：“俄领中亚细亚之地域，北接西比利亚及欧俄，东连蒙古、新疆，南亘阿富汗及波斯，西邻戛斯卞海，广袤约当德国之七倍。至于人口，不过八百万……俄国获得中亚细亚之领域，悉为战争之结果，系最近八十年间之事。”[12]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报章中，有许多类似的叙述与介绍，兹不赘述。

但是，由于中亚地缘与历史的复杂性，即便到了对中亚范围认知较为固定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对于中亚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例如，1940年的《译刊》刊发《伊拉克：中亚的枢纽》一文，认为“摊开地图一看，伊拉克雄当波斯湾的首冲，显然地控制了中亚”。[13]文中就

将波斯湾地区及周边地区看成中亚，而这一区域在当今显然是西亚。此外，同年刊发的《苏联：中亚苏联》一文则将“中亚细亚”限定为苏联穆斯林及游牧民族生活的区域，也即我们现在所称的中亚五国区域，文中这样描述：“中亚细亚（Central Asia），人口约千五百余万，大部分属土耳其族（Turkestan），信奉回教，派别甚多，北部为游牧民族，南部从事耕种。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时代，即将该地并入版图，南与阿富汗（Afghanistan）接壤，一部直达印度西北边境，帝俄势力膨胀如此，所以世界遂赐之以‘北欧之熊’的别号。至十九世纪末，英人恐俄、防俄心理日长月增，几乎把她当作恶魔一样看待。十月革命后，此地因民族复杂的关系，扰攘不宁，直到1924年，内乱方告平息。苏联在中亚各区的划分，完全是以民族为单位的，计有：乌兹白克（Uzbek）、塔吉克（Tajik）、土可曼（Turkman）三个共和邦；可萨克（Kazak）及吉尔吉斯（Kirghiz）原为自治州，后亦改为共和邦。此外尚有喀拉喀尔巴克（Kara-Kalpak）自治州，则包括于乌兹白克之内。”[14]持同样观点的还有1942年的《退到中亚细亚去》一文，该文认为“中亚细亚位于亚细亚之中部，北接西伯利亚，西北连欧俄，西濒里海，南界伊朗、阿富汗，东南与我国新疆省接壤，为一完全腹地。中亚细亚之面积人口，以政治区域为标准，即包括整个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及南部各共和国、各自治共和国，计面积三百九十八万二千八百方公里，约得苏联全国五分之一强，人口计一千五百四十余万人，尚不及苏联全国人口之十分之一，密度甚稀，平均每方公里不足四人，但该地的天然资源，蕴藏极丰”。[15]

在同一年的《中央亚细亚》杂志创刊号中，有《中央亚细亚概观》一文，作者在文中自述写作目的：“当亚洲人自决潮流澎湃之今日，余本诸亚洲人自力团结之精神，将中亚之概况介绍于国人，使国人了解此等地方而加注意，则笔者之愿即已称足。”他进而写道：“中央亚细亚之名称，有广狭二义。普通所称之‘中亚细亚’或‘中央亚细亚’，乃专指以咸海、里海为中心之亚细亚中心部凹地，此乃地理学上所用之狭义中亚细亚，仅包含北方之启尔吉斯草地，本部之土耳其斯坦，南部之土兰平原，及中部西部之咸海、里海而已；而本题所谓之中央亚细亚，乃包括上述之中亚细亚、新疆、伊犁、青海、西藏、蒙古等地之广大地域，此乃广义之中央亚细亚，吾人竟称之为‘中部亚细亚’可耳。此广大地域，约占北纬三十度以北、五十度以南，东经五十度以东、一百二十度以西之位置，面积约占亚洲全面积三分之一，即一四七七〇〇〇〇方公里，合中国里约四四一七〇〇〇〇方华里。”该文并以（狭义上的）中亚细亚、新疆、伊犁、青海、西藏、蒙古分别加以介绍说明，并指出“中亚细

亚地方，除中部为咸湖、盐荒地及沙漠外，其余之周边地方，均为良好之农牧地，而尤以河川沿岸山麓地方，为最丰饶之农牧带。牧畜之外，最适于耐干植物之栽培，与外高加索同为苏联唯一之低纬温暖地，棉、麦、毛、皮革等之国防资源之重要出产地也。常人对于中亚细亚所抱‘苦寒地’之观念，实则大谬不然者也。俄人不独在资源上重视此地，且对其边疆之经略上，亦极重视此地”。[16]该文可以说较为明晰地界定了中亚的范围，将中亚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上的中亚与国际学界的“内陆亚洲”（Inner Asia）范围接近，不仅包括如今的中亚五国区域，还包括当时中国的新疆、蒙古、西藏、青海等地，而狭义上的中亚则专指苏联中亚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由于研究视角和关注领域的差异，有些研究者依然对中亚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王寒生在其《中国与中亚细亚》一文中就认为：“中亚细亚在昔日为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大秦等国，今日为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地中海东岸克利特岛及俄属西土耳其斯坦。若从实际讲，西土耳其斯坦一带为中亚细亚是不通的。所谓亚洲者，它的疆域北至北冰洋，南包南洋群岛，东抵白令海峡，西至土耳其。试看地图便知亚洲的中部实在中国陕甘一带，外国学者以前不明了亚洲的面积，认西土耳其斯坦为中亚细亚，正如外国学者以蒙古人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同一道理……中亚细亚本不是亚洲的中部，亚洲的中部原在中国。”[17]在这种情况下，中亚甚至就是一个错误的名称，亚洲的中部应该在中国。

总体而言，在清末民国时期，国内知识界对于中亚的具体范围有不同的看法，中亚这一称谓本身也存在“中亚细亚”“中央亚细亚”“中部亚细亚”等不同的竞争性名称，而“中亚”一词在使用中逐渐胜出，成为今天人们广泛采用的用法。从时间轴上看，国内对中亚所指涉范围的认知存在一个大致的变迁过程：在清末时期，中亚主要指波斯、阿富汗地带，有时甚至指以印度为主体并受其影响的周边区域；民国时期，知识界对俄属中亚和后来苏联中亚地区的认知逐渐清晰，该区域逐渐成为狭义上中亚的基本范畴，当然，即便是在这一时期，依然存在着其他对中亚范围的不同看法。

作为一个至今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共同界定的区域，中亚在历史和当代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边界的模糊性而被忽视，同时使得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认识一直处在一种“黑洞化”的状态中。也就是说，这一

区域一方面像传奇之地一样始终吸引着我们的兴趣和目光，另一方面则无情地吞噬着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美好想象，这是一块希望与失望并存之地，也是一块魅力与斥力并行之地。[18]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于中亚的认知始终在发生着变化，很难说存在着一个全然不变的中亚形象。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的具体内涵的认知也就很自然地会出现变动，而这种变动又进一步影响着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更大范围内的周边与外域的认知，并反过来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本身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中亚认知中的动态性，这种动态性是中亚自身的常态。

此外，中国在历史上与中亚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并且长期以来在传统知识体系中形成了某种范式性的“西域”认知，近代则随着西方知识体系的强势渗入而出现了认知领域的近代转型，对中亚概念及范畴的认知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而这种新变化又进一步影响着现当代中国对于中亚的整体认知。因此，在重新面对中亚与中亚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中亚认知中的语境问题，尤其是中亚认知中的中国历史关联性问题。以中国为本位，这是中国的中亚研究与欧洲中亚研究、美国中亚研究、日本中亚研究不同的地方。

此外，近代地缘政治中日渐崛起的民族国家结构及其边疆-边界的明晰化，也使得近代中国知识界在看待和认识“中亚”的时候，一方面往往将其与传统的“西域”认知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较“西域”有更明确的外域或外国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有边界性的、中国之外的“中亚”概念和范围认知，这种认识随着对苏俄/苏联中亚政治与经济形势的介绍而日渐清晰，最终又反过来促使国人形成了对本国西部地区界限更为清晰的认识。可以说，从历史角度而言，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变迁摆脱了传统的西域视野，开始采用地缘政治的视角，成为接续后来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下的中亚主流认知的概念基础。

总之，梳理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过程，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日益重要的区域，而且能够使我们形成对中亚更为完整和更为连贯的认知。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中，在中国对外知识视野形成极大新需求的当下，这种完整而连贯的认知显得尤为迫切。

中亚认知背后的知识框架

不管是从历史层面看，还是从认知内容上看，在中国对外部世界区域的认知中，中亚空间的呈现方式更具波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欧亚大陆本身数千年来的历时性变迁，尤其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世界地缘格局的转变中，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历史舞台的欧亚-非大陆及其代表性的陆地文明逐渐被海洋力量超越，曾经作为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文明交流中介区域的中亚也逐渐丧失其长期以来的中心性，世界历史的主角开始转向外围、海洋与西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然面临一个如何重新发现和认识中亚的问题。

“中亚认知”的重新确立并不是个简单的过程，在其背后存在着一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困境，需要我们去分析和思考当代中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连带性问题。张蕴岭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这种区域性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区域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归纳它的重要性：一是区域的地缘视野，始终把周边地区作为基础；二是把周边地区作为利益攸关区；三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一套相处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所谓‘君临天下’，其核心价值是要对与中国密切相连的周边国家负责”。[19]可以说，不管是从中国本身还是从世界角度出发，中亚都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区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影响甚至改变着我们既有的认知与框架。

中国古代对于中亚区域的认知有其历史记述层面上的丰富性，同时必然打上了历史和时代的烙印，存在着单一“中原”观的限制，因此在回望的时候有必要结合其他文明对中亚的叙述来综合分析和思考，这样才能对中亚本身有更为清晰的认识。而到了近代，随着中亚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舞台，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关注的议题。随着中亚大部分区域成为俄国以及后来苏联的组成部分，我们对这一区域的看法又成为俄国研究和苏联研究的一部分。如今随着中亚各国的独立，我们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认识这一地区，就有必要超越原先的历史叙述以及国际关系认知，以更为全面和连续的视角去看待和认识中亚，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新的“中亚认知”。[20]

中国视域与“西域-中亚”框架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一个国家对外认知框架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适应周边地缘环境的整体变迁，至少需要近百年的过程。它既是本国知识界域外视野日渐深化的过程，也是该国与周边及域外邻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逐步推进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众多邻国的东亚大国，中国在认识自身内部区域的同时，逐渐形塑了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在古代，中国对外域的认知较为有限，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从总体上服从于国内政治与思想秩序的需要，存在一种内部秩序决定外部行为方式的传统。顾颉刚、童书业先生曾撰文指出：“战国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是非常狭小的，他们不大理会四边的情形；在那时只有一种空泛的‘九州’和渺茫的‘四方’的世界观念。到战国后才有具体的‘九州’和‘四极’说出现，这种‘九州’和‘四极’所包括的世界约同宋明两代的中国差不多大。直到战国晚年，才产生出理想的大世界说——‘大九州说’和‘大四极说’与‘海外三十六国’等记载——来，那是受了域外交通和哲学思想，以及天文学等的影响而成立的。古代的域外交通以东西两方为盛，因域外交通而构成了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里的地名，更因此而反映出上古西方交通的一件大故事——周穆王西游的故事——来。”[21]

但总体而言，中国在欧亚大陆东侧所处的独特环境因素，使其在域外认知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传统。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中国古代关于域外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幻想系统和以《诸蕃志》为代表的藩属系统。《山海经》在海外南、西、北、东经中所罗列的交胫国、反舌国、三首国、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一目国、深目国、无肠国、大人国等，尽管国人深知该书属于幻想的产物，但对后代的创作影响深远。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堪称第一部较全面地反映世界地理的著作……而这一系统的关于域外的著述都是由国人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在‘天朝中心主义’的‘虚幻环境’内完成的——是以中国为中心、周边藩属为边缘所形成的藩属系统的地理沿革考订和风土人情的记述。因此，在上述两个系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一个真实和具体的‘异域’。”[22]而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历代正史的叙述中，人们对于域外的认知主要服从于大一统秩序的现实需求，往往围绕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的相互关系展开。“现实关联性”构成了中原政权关注周边力量的最主要动力，并在正史叙述中得以展现。

这种“现实关联性”，在古代的周边地缘政治方面，还以其他的形式得以呈现。以唐朝-吐蕃关系为例，陈寅恪先生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借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重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23]可以说，唐代乃至之后历朝的西南、东北政策取向，都与其先前的西北（西域）政策有着直接的关联。

进入蒙元时期，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军事胜利，传统中原王朝在对外政策层面这种既有的“现实关联性”结构被彻底重置。中亚在蒙古力量的控制下，有效地扮演着欧亚之间人员、货物来往枢纽区域的角色：“在蒙古统治中亚这段时期里，商业和贸易发展的整体状态已经是经济全球化兴起的表现。丝绸之路再次复兴，沿途出现许多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边陲小镇也能够通过集市与遥远、陌生的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在蒙古宗主国的庇护下，各种各样的商业团体在亚洲、欧洲诸国设立营业点和代理商，沉浸在一片繁荣的商业活动之中。”[24]可以说，“亚洲和欧洲遥远的陆地上的货物交换为商人和他们的蒙古保护神带来了繁荣。蒙古这个游牧民族很快体验到城市定居生活的益处，并最终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最终，蒙古帝国分崩离析形成不同的新兴帝国，其中以乌兹别克斯坦、莫卧儿和奥斯曼帝国最为强盛”。[25]之后的明清时代，随着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渐次崛起，西亚和中亚被帝国势力所控制，欧亚大陆之间曾经的频繁互动逐渐消退。但与此同时，新的世界态势正在形成，趁着西方殖民帝国大扩张的步伐，传统的世界力量重心历史性地由内陆转向外围，从陆地转向海洋。它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中国视野下游牧与农耕力量之间的周期性关系框架，进而也影响到以这种周期性关系框架为基础的外围想象和认知，其中就包括中亚区域。

从作为现实地域存在的中亚本身到中国视野下的“中亚问题”的凸显，19世纪是一个重大转折。我们注意到，清朝后期经历了一个对西域认知的分化过程，即开始将河西走廊以西直至欧洲的广大区域的广义西域认知，转变为更为明晰化的狭义西域（新疆地区）以及作为域外的中

亚地区的认知，并最终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关于疆域空间的理念日益深入，传统的“西域”认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消解，继而转变为关于作为国内组成部分的中国新疆地区和作为国外区域的中亚的分类认知。[26]在这个时代，曾经作为中国对外秩序基本结构的朝贡网络日趋解体，取而代之的则是在东南、西北、东北等各个地理方向上，在各帝国主义列强外来压力的侵扰之下，经由政治、军事等博弈而被迫承认和接受的近代民族国家与国际关系框架。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中亚地区成为英、俄帝国力量的重要争夺区域，最终大部分区域被俄国吞并，成为俄国连贯性疆域版图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周边区域的独特现象，即中国的其他周边区域基本上成为列强的殖民地，而中亚则成为与俄国本土连成一体的区域；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西北地区因阿古柏之乱等，处于政治与社会动荡当中。两相对照，就形成了更为明显的“彼”“我”认识图景，中亚尽管已经退出了丝绸之路大辉煌的舞台，但在当时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却成为中国对外认知的一面镜子，折射出近代中国在面对自身困境时，对周边区域历史走向的关注与思考。从这时起，“西域”话语退回到历史文献当中，“中亚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全面呈现。这是中国中亚认知过程中的第一次整体性断裂。

纠结的“他者”：近代语境下的中国中亚认知

认知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分类问题。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以及殖民探险的推进，人们对于世界各大区域内部空间的认知逐渐充实，在西方知识框架中那些未知的“空白地带”被一块块填满。近代中国在域外认知上也逐渐受到这些西方“域外者”观念的影响，开始对周边和域外各国的情况有了更多基于西式分类的认知。这种情况，正如钟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所写的那样：“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27]在这一过程中，受外部知识引介渠道的影响，国内近代知识界对外域的认知主要围绕当时的欧美列强展开，而对俄国来说，主要关注其欧洲部分的情况。此外，对其他周边国家的国情介绍则主要集中在朝鲜、日本、暹罗（泰国）、阿富汗等国，对于其他区域国家的认知还较为缺乏。

我们注意到，在殖民时代认知世界的过程中，西方殖民者逐渐形成了对于东方世界的认知，并确立起“西方”高于“东方”的分类倾向。“东方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既被用来指称欧洲内部的巴尔干问题，也被用于指称俄国问题。俄国在整个近代都被看作欧洲的“他者”，这导致在英俄争夺中亚的“大博弈”过程中，随着俄国逐渐掌握主导权并最终吞并中亚大部分区域，中亚也从一个历史意义上的“东方”转变为一个欧洲“他者”的边缘性组成部分。在当时中国的对外知识视野中，这一区域既附属于俄国，又与中国历史有紧密关联。对此，1894~1895年受命出使俄国的王之春就这样描述俄属中亚的情况：“其里海部地本膏腴，然陆地四塞，人民五方，鞑鞑里之遗孽今虽衰替，然蒙回情性易变，非绥之以德意，柔之以文教，未易治也。喀复喀斯部本匈奴遗种，即唐突厥之可萨部，颇长武力，亦如我中国之锡伯、索伦，而部众顽梗，犹未尽洽于海米勒之治化……俄其尚知此意乎？”[28]可以说，这一区域对当时的近代中国而言形成了一种既与历史相连，又成为域外列强一部分的内在紧张，构成了一种所谓中国的“他者”形象。在这种欧洲与中亚、中国与中亚的对视中，作为“他者”的中亚成为既折射欧洲和西方，又衡量近代中国的重要对象。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转型，在文化层面改变了知识阶层的认知框架，专业化开始具有更高的地位。正如列文森所指出的："当国家代替文化而开始成为中国人关切的焦点时，要求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终于被废除）的呼声也不断增长起来。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并使官吏不能获得保卫国家所需要的有用的专业知识的文学形式，八股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即从原来官绅文化繁荣时期的'天下'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概念。随着国家概念的变化，官僚教育的目的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在韦伯看来与资本主义以及职业化取向相对立的美学价值和儒家君子'自我满足'时代的结束。"[29]由此而来的是，近代真正意义上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创立，并取代理藩院处理对俄事务，一批受过专门培训的官员开始进入对俄事务处理领域中。

1917年相继爆发的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中亚的这种"他者"角色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激变。作为俄国范围内被动反应的区域，包括民族识别、加盟共和国划界在内，诸多新知识与新分类对包括欧洲和中国在内的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后续影响甚至波及当时英法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改革事务（如印巴分治等）。与此同时，中亚在苏联建设中的高速发展以及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巨大支持，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广为关注的议题。这个急速变动的"他者"、令人纠结的"他者"，形塑着近代中国对中亚认知的基本图景与变化趋势。

理解“连续性”：从旧“中亚”到新“中亚”

中国总是在关注周边的过程中反观自身，也始终以周边的经验教训来回望自身。杜赞奇提醒我们：“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被我们视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结果，其背后的意义反而为我们所忽略了。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而生存了下来。在早期地方自治实验的整个过程中，各省份和都市的许多政治活动家们是用民族危亡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行动的。甚至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岁月中，从来没有什么将某一省份分离出去的行动或建立邦联的建议，能够同中国人民关于国家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相匹敌。”[30]这种对本国疆域与政治的统一性认知，使中国知识界在对20世纪以来中亚的社会与政治转变的认知中形成了自身的特性，并塑造了认识框架中的旧“中亚”与新“中亚”的断裂性格局。

所谓旧“中亚”，这里指的是俄国尤其是苏联治理时期的中亚，这是一种附属于苏联统一体的、具有内部联系畅通性的20世纪20年代至1991年的中亚结构。这种认知结构，附属于对苏联的认知，并以“苏联问题”的形式被囊括进来。在二战结束，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巨大变革和中苏关系的后续发展，“苏联问题”也从一个世界革命阵营的问题转变为一个与“第三世界”相对的问题。与之相应，中亚也从苏俄革命话语下联系俄国本土革命与远东被压迫民族与殖民地的桥梁和纽带，转变为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西北局势的工具，更成为使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淖的跳板与通道。

1991年底中亚五国的相继独立，折射着二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作为世界两强之一的苏联以联盟国家彻底解体的方式，将一个世纪之前英俄“大博弈”的胜利果实几乎全数吐出，这意味着原本从属于苏联内部秩序的中亚区域越出了国内秩序层面，开始进入世界秩序领域，体现在中国的认知框架中，则形成了某种程度上依然在发展的新“中亚”。如果我们观察中亚五国庆祝独立的时间点（1991年底）和同样脱离自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庆祝独立的时间点（1917年或1918年），就可以发现，这种新“中亚”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中亚五国国际政治时间“开始”于1991年底，而不是1917年或1918年。它是以中亚五国作为独立政治单元的正式出现以及统一中亚社会、经济和政治空间的瓦解为

前提的，是以脱离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和内部分工格局进而全面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为方向的。我们对中亚认知层面上的诸多“连续性”断裂，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得以显现的。

对中国而言，中亚五国的独立，意味着原本附属于中苏关系的中国与苏联中亚地区的关系正式转变为新的对外关系；同时，由于中亚五国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存在漫长的边界线以及民族、宗教方面复杂微妙的联系，因此，在原先的“苏联问题”基础上，形成了以中亚国家为主体和对象的新的“中亚问题”。可以说，这是中国在二战后所面临的一种全新的区域性周边态势，也是区域方向上所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变迁，与原有的“东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南亚问题”等相区别。而折射到中国的对外认知领域，则形成了鲜明的特殊性：一方面，作为与中国西北边疆相邻的区域，其在中国的历史认知层面曾被长期关注，甚至在某些阶段其部分区域还曾纳入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范围，因此我们对这一区域具有某种历时性的认知与传统认知图景；另一方面，由于中亚古代、近代与现代的政权区域范围并不重合，也往往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尤其是苏联在中亚进行的民族划界，将原有的汗国结构彻底打碎，进而在区域民族语言文化基础上形成新的中亚各共同体认同，因此可以说，中亚区域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当代中亚各国本身历史（民族国家史）的历时性变迁无法形成一种具有整体连续性的叙述，进而使其在与中国关系的外部表现方面，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表现形式，即其“在当代政治事务中的新生性与其在历史传统中的古老性并存，以此就不同于那些国名一直延续至今的老牌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也不同于二战之后摆脱被殖民状态，实现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非洲的诸多国家等，更不同于与中国长期共享历史并逐渐形成自身主体性的国家，如蒙古等国”，[31]从而在与中国古代历史的部分互嵌性及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完全脱嵌性之间形成了历史认识与现实认知之间的新“断裂”。这也成为我们如今在面对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时，在认知层面所呈现的基本特征。

中亚认知的时代变迁及其旧有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周边视野及其未来趋向。中亚历史依旧在发展，未来的道路如何，取决于其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倡导的超越以往任何地缘和政治纽带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史无前例地影响了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各国，并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重新理解中亚的可能。

[1] 〔英〕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7页。

[2] 参见Andre Gunder Frank，“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in History*，Vol.8，No.1，1992，pp. 43-97。中译文参见〔德〕贡德·弗兰克《中亚的中央性》，袁剑译，《全球史评论》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 Denis Sinor，“Rediscovering Central Asia，” *Diogenes*，Vol. 51，No. 4，2004，pp. 7-19.

[4]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2013，第122～126页。

[5] 《万国公报》第530期，1879年，第20～23页。

[6] 《万国公报》第542期，1879年，第22页。

[7] 《时务报》第62期，1898年，第21页。

[8] 《知新报》第88期，1899年，第6页。

[9] 《政论》第1卷第1期，1907年，第91～93页。

[10] 《外交报》第7卷第1期，1907年，第19～21页。

[11] 《外交报》第8卷第23期，1908年，第13～14页。该文译自日本明治41年7月4日《东京日日新闻》。

[12] 《地学杂志》第2卷第11期，1911年，第18～20页。

[13] 《译刊》第1卷第1期，1940年，第59页。

[14] 《长风》第2卷第1期，1940年，第77～78页。

[15] 《国民新闻周刊》第46期，1942年，第17～18页。

[16] 王谟：《中央亚细亚概观》，《中央亚细亚》第1卷第1期，1942年。

[17] 王寒生：《中国与中亚细亚》，《新中华》复刊第7期，1943年，第113～121页。

[18] Andre Gunder Frank，“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in History*，Vol. 8，No. 1，1992，pp. 43-97.

[19]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

[20] 袁剑：《“一带一路”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认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21] 顾颉刚、童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禹贡》第5卷第3、4期合刊，1936年。

[22] 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286～287页。

[2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133页。

[24] 〔印度〕古拉提：《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刘瑾玉译，魏曙光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150页。

[25] 〔印度〕古拉提：《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第164页。

[26] 袁剑：《“中亚”在哪里？——近代中国人笔端下的“中亚”范畴变化》，《文化纵横》2017年第2期。

[27]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2002，第4页。

[28] 王之春：《使俄草》，岳麓书社，2016，第121页。

[29]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36页。

[30] 转自〔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第121页。

[31] 袁剑：《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第三章 草原之域：哈萨克斯坦的历史论述与形象构筑

问题与思考

1991年底，随着苏联解体和哈萨克斯坦正式独立，后者开始以全新的身份参与到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中，并凭借其重要的地缘位置在中亚和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与中国相邻的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九的大国，哈萨克斯坦对于当代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对外视野中，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广，哈萨克斯坦因其在中亚的重要战略位置以及与中国接壤的独特性，正成为中国重新构建对外认知新视野中的重要节点国家，其当代价值也正日渐受到关注与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在当代政治事务中的新生性与其在历史传统中的古老性并存，因此不同于那些国名一直延续至今的老牌国家，如英国等，也不同于二战之后摆脱被殖民状态实现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非洲的诸多国家等，更不同于与中国长期共享历史并逐渐形成自身主体性的国家，如蒙古等国。可以说，历史与现实形成了观察和认识哈萨克斯坦的两大基本维度。作为哈萨克斯坦的历史与当代邻国，中国既在历史上存在着与哈萨克汗国以及作为俄国-苏联一部分的哈萨克斯坦的交流互动关系，又在苏联解体后形成中哈之间实质性的当代双边交流关系，这两个层面都在积累并形塑着中国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形象。

但历史总是具有连续性的，当我们在分析和认识哈萨克斯坦在当代中哈关系史中的具体图景，尤其是当代哈萨克斯坦在知识界中的形象时，历史的图景本身必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内容，也是形成中国关于当代哈萨克斯坦认知图景的重要基础。因此，在这种认知的连续性过程中，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去梳理和分析当代之前的中国的哈萨克斯坦认知

图景，尤其是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形象。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丰富自身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多方面认知，才能进一步建立起对于哈萨克斯坦的整体性认知，进而形成具有连续性与整体性的中国“哈萨克斯坦观”。

近代历史语境

哈萨克斯坦本身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家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使外界对于这个国家的认知形成历史与现实两种维度的取向，而且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两种维度之间往往还存在着某种竞争与冲突。此外，作为一个与中国相邻的重要国家，其本身主体民族哈萨克族与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之间的复杂的跨界民族特性，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知。在这当中，中国在近代（清末与民国时期）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知具有较为鲜明的代表意义。

在讨论这一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溯哈萨克斯坦在近代的政治变迁史以及同时期中国的政治变迁情况，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一个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同时性图景，从而更为客观、全面地了解哈萨克斯坦形象在中国语境中变迁的时代背景。

哈萨克斯坦尤其是“哈萨克”这一名称的正式确立，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叶建立的哈萨克汗国，当然，哈萨克民族的形成要早得多，并且因地域、政治等因素而形成了传统的大、中、小三玉兹。在1718年头克汗去世之后，哈萨克汗国逐渐陷入分裂，并受到当时正在崛起的准噶尔和俄罗斯帝国的双重压力。1729年，哈萨克联军在安拉凯战役中击败准噶尔部势力，稳定了局势，但与此同时，俄国力量趁机入侵哈萨克土地。1732年，哈萨克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因内外形势所困，归附俄罗斯。而清廷于18世纪中叶平定准噶尔，之后为追剿准噶尔残部，清军进入中玉兹和大玉兹区域，与当地的哈萨克首领产生了密切的政治联系。

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逐步征服并控制了整个哈萨克斯坦地区，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清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其东南地区开始受到来自英国等殖民力量的入侵，源自华南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又进一步威胁到清廷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使其对西域事务无暇顾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逐渐将其统治秩序拓展到整个中亚地区，通过军事部署对清朝西北边疆形成巨大压力，并在哈萨克人问题上与清廷形成激烈交锋。随着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等几次划界，留在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裔以克烈、乃曼、瓦克、阿勒班、素宛以及托热贵族等几个部落为主，其中尤以克烈、乃曼部落的人数为多。[1]在这之后，其余哈萨克人生活的地区全被纳入俄国版

图。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与地缘格局，在“十月革命后，中亚各民族共和国的划分带有很大的政治因素和人为因素，与当地的民族分布不相适应，其特点是每一个中亚民族在任何一个中亚民族共和国内部都未构成人口的多数。苏联的建立，也为中亚各民族国家按照不同民族分布和他们的愿望重新划定彼此的分界创造了条件”，[2]最终便形成了当今中亚五国的基本结构，而哈萨克斯坦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较为复杂的政治与行政变革。1922年12月30日，第一次全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首批加入苏联的为俄罗斯联邦、外高加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四个加盟共和国。当时的哈萨克斯坦仍以“吉尔吉斯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名义，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存在。1925年4月，吉尔吉斯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更名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仍属俄罗斯联邦），1928年，其首府从克孜尔-奥尔达迁至阿拉木图。1936年，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名为哈萨克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从该时一直到1991年底，中哈关系完全服从于中苏关系的总体安排。

在这一时期，阿古柏在西域发动叛乱，清廷命左宗棠前往平叛，后者于1878年收复阿古柏侵占的天山南北地区，并在1882年迫使俄国正式归还伊犁地区。清廷为更好地处理西域军政事务，1884年在新疆建省。随着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的疆域版图，也就相应地继承了与哈萨克斯坦的地缘与政治关系。但由于新疆偏处西北，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先后掌握当地实权，直至盛世才于1944年被调至南京，民国政府才更多地掌握当地控制权。在盛世才掌控新疆的十年里，他最初利用苏联来维系自己在新疆的控制力，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又与苏联公开决裂，倒向国民政府。在中国抗战后期，苏联再次介入新疆事务，并在1944年制造了伊塔事件。在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成为苏联开展对华相关行动的前哨站，也是当时中国新疆与苏联联系交往的中间纽带。

国内知识界的哈萨克斯坦认知

随着俄国势力逐渐深入中亚地区，以及清朝对西域事务的关注，当时的国内知识界开始形成对哈萨克斯坦的初步认知。在这种初步的认知当中，既有对哈萨克人历史与文化的描述，也有对当时俄国势力进入并控制哈萨克斯坦相关情况的报道，但总体而言，与关于其他列强如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信息相比，甚至与俄国欧洲地区和远东地区的信息相比，关于当时俄属的哈萨克斯坦的信息还是十分零星的。

1879年的《万国公报》记述了哈萨克人反抗俄国压迫的情况。文中指出："俄京来信，谓哈萨克地方向为中国疆土，为俄人勒令隶入版图者也。今哈萨克有人见伊犁与喀什喀尔情形，遂纠约一千五百人，各持军械，保护老小，暗投华营。驻扎界内俄人知之，发兵截其去路，不准前进，因寡不敌众，俄兵死者二十六人，受伤者十三人，哈萨克人又将俄兵中战马砍伤一匹，以刀剁而誓之曰：永不为俄人凌辱矣。俄营中将军得此风信，遣炮队追之，而哈萨克人已全行奔出俄界云。"[3]这是对当时俄国势力逐步控制哈萨克斯坦，进而蚕食中国西北边疆状况的一种侧面叙述。在这种叙述中，哈萨克人不堪俄国控制的心态表露无遗。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在俄属中亚地区的后续影响逐渐铺开，当时的中国对这一北方邻国的认识也逐渐增多，其相关的革命思想与实践被大量译介到国内，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股重要潮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苏俄信息的引介，涉及的主要是革命思想以及苏俄欧洲部分和远东部分的信息，对于苏俄中亚部分基本没有相关的介绍。

1922年苏联的成立是当时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哈萨克斯坦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中国知识界对其的认知被包含在对于苏联的整体认知当中，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当时的民国外交部驻苏联新西比利亚（即新西伯利亚）总领事馆在1935年《外交部公报》上刊载题为《哈萨克斯坦之开拓》的报告，这是民国时期报章首次正式向民众介绍哈萨克斯坦的相关情况。文中指出："哈萨克斯坦，一名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其东北境为我国新疆旧壤，西临里海，隔海与高加索相对峙，南接塔德延因、乌兹拜克及土耳克门三共和国。土地广大，在苏联境内，位次雅库次克自治共和国而列第二，奄有二百余万方里，人口稀少，仅达七百万人。帝俄时代，视哈萨克斯坦为边陲地方，对于教育实业，极少注

意，仅视为原料供给区域而已。苏联政府成立后，即努力开拓。”[4]从这些记述中可以发现，即便是外交部门，当时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识程度也非常有限，其周边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名称如塔德延因、乌兹拜克、土耳克门也跟如今的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有所不同。

随着中苏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友关系的影响下，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国内出现了更多关于哈萨克斯坦的信息，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的紧密程度，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地区的知识需求正在增加。例如，有一篇文章就将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西南各省做了类比，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自成为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哈萨克共和国的首都，名字很怪，叫做‘阿尔玛·阿塔’，那里地势很高，附近的山上常有雪盖着。这地方离新疆省的边界，不过一百五十英里，是西北国外交通一条必经之路。既然是一座国都，当然很热闹，这里是全国的工业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里是苏联的难民收容所，就像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难民们都集中到西南各省一样。那时候，西南各省是我们的大后方。在苏联和德国打仗的时候，这哈萨克共和国便是他们的大后方……当人们不再受交通的限制的时候，那条铁路经过的地方，人口便也多了起来，农人们在开荒，把草原变成良田；工人们在开掘荒山，让山里的宝库打开门，不管是黄的金子，黑的煤块，都可以掘出来，让人们使用，不再永远埋在地下了。哈萨克人顶喜欢唱歌，他们便编了歌子赞美这条铁路。这便是‘哈萨克’，我们新疆省西边的一个邻居。因为是邻居，所以目前新疆省还有不少的哈萨克人，他们有的是来作生意，住久了。有的就是流落在外边的。可是有很多哈萨克人，已经成为新疆人，所以在中华民族里面，也还有一些哈萨克人在内呢。”[5]此外，文中还提到了哈萨克这一民族的跨界属性，并专门指出了中国国内生活的哈萨克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随着中国国内对于苏联内部政治经济结构的认知需求逐渐增长，对哈萨克斯坦相关领域信息的介绍也日渐增多。在这种背景下，张西曼译介了《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译者在按语中这样写道：“哈萨克，一称哈萨，为突厥族西北支之一；据我所研究、发现，即古代‘乌孙’之音译，其详可参阅本年十一月《语文月刊》五卷一、二期所载鄙著《乌孙即哈萨克考》一文。苏联十六结盟共和国之一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位于新疆北角，而民族之分布及活动，从公元前一二世纪起，即与我国发生密切关系。尤其在今日，与我国同为歼灭法西斯瘟疫

及争取世界人群民主自由之得力盟友。我译此富强繁荣之盟邦宪法竟，仅以此寿哈萨克伟大诗人藏布儿（Djambul）先生。——九·一八国耻十三周年志于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6]

1947年，《瀚海潮》刊载了《饶于畜牧和石油的哈萨克共和国》一文，详细介绍了哈萨克斯坦的相关信息。文中写道：“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The Kazakh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幅员广大，西自伏尔加洼地而东至阿尔泰山脉，北自西伯利亚铁道而南至天山山脉，以面积而论，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共有二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平方公里，这比起整个西欧的面积来，要大一个半多。人口共有六百一十万人，其中除以哈萨克人为主要之居民外，尚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乌孜别克人、维吾尔人、回回人等居住于这个共和国内。”[7]文中最后指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既为苏联之盟员国，以其地理方面论之，整个与我新疆省之伊犁、阿山、塔城三区为界，长凡千余公里；以民族成分而论，整个中亚均为回教民族，与我新疆所有之民族，一切尽同，可谓之‘一家人’也。就历史上之经过而言，帝俄时代，新疆即在其侵略之内，伊犁为被侵略而后收回之失地，目前之‘友邦’，以扶持弱小民族作幌子，对我新疆亦始终不能放手。因此数十年来新疆受特殊环境之限制，中央鞭长莫及，国防废弛，不堪言状；内部民族复杂，一切落后，层出不穷之民族问题，造成了历年混乱不靖的新疆，无法解决。多少年来，新疆这块国土，是任人在欺侮，到处有异邦之马在驰骋。直至今日，在新疆因民族问题及种种政治上之失策，致使伊、阿、塔三区由暴乱而特殊化，已近两年矣，随之形成了严重的新疆问题。新疆过去在问题中，目今在问题中，将来恐亦在更在问题之中。究竟新疆之所以成为问题者，不外：（一）炎黄子孙太不争气，无国家民族之意识，一切为个人利己，使国家不成为国家，民族不成为民族；（二）所靠之近邻，与我境界毗连，达数千公里，中亚各共和国，均有常备训练之大批民族军队，伊犁事变以后，哈萨克斯坦在今日邻邦之地位随之而重要起来。故吾人欲解决新疆问题，巩固边防，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应力图自振，整饬内政，加紧建设，而对于比邻之情况，亦应详加研究，始可免去未来之祸患也。”[8]我们可以发现，该文除了介绍哈萨克斯坦的基本国情之外，还专门提醒当局要关注新疆的问题，因为该问题事关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作者指出，哈萨克斯坦在苏联内部重要性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的伊犁事变，因此有必要对苏联的这一加盟共和国进行深入研究，以做到有备无患。这种看法在当时可谓未雨绸缪、一针见血。

当然，随着中国国内对于哈萨克斯坦认识的深入，哈萨克斯坦正负各方面的信息都逐渐受到国内知识界的关注。同样是在1947年，当时的国内学者就注意到了苏联内部存在的哈萨克民族反对力量，并撰有《中亚哈萨克族反苏运动述评》一文，提醒我们注意哈萨克斯坦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苏联中亚地区内部所存在的未来有可能激化的历史与民族矛盾。[9]此外，在20世纪40年代，国内还译介了外国学者所撰写的关于哈萨克斯坦的文章。[10]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对于哈萨克斯坦的知识获取与国情认知。

结语：时局、地位与对外视野

因为历史背景的差异，每个时代的中国都形成了对外域的独特认知，其中，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知就鲜明地体现着这种时代性。由于哈萨克斯坦本身在历史和现实国际政治舞台中的断续性以及相关信息的缺失性，中国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形象一直比较模糊，无法形成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认知轴线。

总体而言，在整个近代时期，中国知识界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形象基本上被囊括在俄国-苏联形象之内，是整个俄国-苏联认知图景中的一部分，与古代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哈萨克斯坦图景相比，缺乏清晰的可辨析度。分而言之，清末国内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知还处于基本知识介绍阶段，没有进入深入讨论的阶段。这既跟当时中国国内主要对外关注点为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有关，也跟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自身较为低下的国家地位有关。这种情况造成了某种"马太效应"，一方面使得知识界的视角在当时往往更偏向于欧美和日本，对中国西部邻国的认知相比之下更显薄弱；另一方面，使我们对于俄国这一对象的认知也不那么完整。在俄国十月革命尤其是苏联成立之后，中国国内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识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限制，较少为知识界所知。这一区域当时是苏联的一部分，因此当时的中国舆论与知识界对于这一地区的认识是建立在对苏联认知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以对苏联欧洲部分的认知来衡量和替代对苏联中亚地区的认知，这使得国内知识界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识始终非常有限。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除了对哈萨克斯坦的基本国情有了一些认识，缺乏对哈萨克斯坦更全面、更深入的认知，在总体上仍然无法超越清末时期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认识水平。随着这一时期中国新疆与苏联哈萨克斯坦之间经贸联系的增多，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细节性认知正在增多，但从知识获取的角度而言，这种细节性认知并没有通过报刊等途径为更多的读者所知，也就无法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形成新的认知图景。

此外，在这种认知当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哈萨克斯坦历史与现实复杂性的困惑与纠结。这一方面体现着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中国自身受压迫、受宰割地位的深刻体认，另一方面也反映着知识界在认识和面对历史上的中国对外秩序以及当时的国际秩序时，所存在的某种冲突与困境。这种冲突与困境，在当代的某些事务中也依然

会凸显出来。

因此，要更好地确立当代中国的哈萨克斯坦视野，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的相关认知，在此基础上去反思曾经出现过的相关认知层面上的冲突与困境，从而更好地认识当代哈萨克斯坦，以更具前瞻性和发展性的思维来审视和发展全新的中-哈关系。

[1] 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第34页。

[2] 厉声、石岚：《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第283页。

[3] 《万国公报》第537期，1879年，第20页。

[4] 外交部驻苏联新西比利亚总领事馆：《报告：哈萨克斯坦之开拓》，《外交部公报》第8卷第11期，1935年，第153页。

[5] 郑鸣：《哈萨克（国际常识）》，《民众》第2卷第6期，1948年，第12页。

[6] 张西曼校译《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中华法学杂志》第3卷第9期，1944年，第62页。

[7] 厉卓：《饶于畜牧和石油的哈萨克共和国》，《瀚海潮》第1卷第9期，1947年，第13页。

[8] 厉卓：《饶于畜牧和石油的哈萨克共和国》，《瀚海潮》第1卷第9期，1947年，第15页。

[9] 王仁南：《中亚哈萨克族反苏运动述评》，《现代（南京）》1947年第3、4期合刊，第6～8页。

[10] 如〔美〕安娜·鲁易斯·屈朗（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万歌翻译的《哈萨克人在苏联》（《大学月刊》第4卷第5、6期合刊，1945年，第71～78页），〔美〕拉芒特著、伯庸翻译的《塔兹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毗连我新疆省的三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附照片》，（《中学生》第197期，1948年，第37～41页）。

第四章 “白金”之邦：乌兹别克斯坦的近代形象及其流变

理解特殊性

作为苏联中亚五国之一，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国家，在中国的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上看，乌兹别克斯坦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其费尔干纳地区曾是汉武帝寻求“西极马”所在的大宛，布哈拉则是7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向东方传播的一座圣城，撒马尔罕更是见证了盛唐对于“金桃”所代表的异域文明的想象。但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又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自1991年正式独立至今不到30年，即便是上溯到苏联时代存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其成立距今也不到百年。乌兹别克斯坦作为苏联中亚五国中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以及族群最为多元化的国家，其历史上的繁荣局面与现实中的改革与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乌兹别克斯坦当代形象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从中国的角度而言，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多重性与复杂性。历史中的乌兹别克斯坦因丝绸之路与中国联系在一起，而近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则因苏联与后苏联时代的转型与当代中国形成新的互动和关联。

正是由于乌兹别克斯坦自身蕴含的多重性与复杂性，要想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中国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就不仅要继续推进当下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联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局面；还需要回到历史中梳理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历史认知的形成过程。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厘清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乌兹别克斯坦是如何在近代逐渐孕育，又是如何被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所逐渐认识的，这也是从历史中更全面地把握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认知过程的应有之义。经过学者的不懈努力，目前国内对乌兹别克斯坦历史的研究正逐步推进，其中不乏诸多细部的历史考辨。[1]例如，潘志平的《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一书将清朝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浩罕汗国联系在一

起，以区域研究的眼光来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涉及中国对于浩罕的观念生成与相应互动问题。刘迎胜的《丝绸之路》一书将中亚与中国历史演进联系在一起，以丝绸之路为纽带，将中国对中亚异域的认知与想象呈现出来。除此之外，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虽然并非国内学者的作品，但流传甚广。作者通过对唐朝多元文化相互交融景象的详细描述，阐明了外来物品如何进入中国，如何影响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中国又是如何理解和想象这些异域之物的。但总体而言，我们对于中国视野下乌兹别克斯坦形象的形成过程缺乏了解，在传统中西交流史层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和在当代国际关系层面对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关系的认知之间，形成了某种“空白”。这启发了笔者就近代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图景形成的背景、认知及其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并回答这样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形象在近代中国是怎样逐渐清晰起来的？近代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这种认知对于我们当代的乌兹别克斯坦认知具有怎样的意义？限于资料，本章将主要围绕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相关记载进行梳理和分析。

近代史进程中的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

从历史上看，乌兹别克这一概念作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明确下来，至少要追溯到15世纪中叶。在帖木儿帝国衰败之后，在如今哈萨克草原上生活的乌兹别克人南下到河中地区开始定居生活，逐步形成了如今的乌兹别克民族。当时的乌兹别克人在中亚河中地区并未建立起统一政权，而是在16世纪初形成了希瓦和布哈拉两个汗国对峙的状况。到了18世纪初，乌兹别克族首领沙赫鲁又建立了浩罕汗国，从而形成了至19世纪下半叶初一直保持稳定态势的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大汗国并存的局面。[2]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在基本控制哈萨克地区之后，开始向中亚南部进一步推进。1865年浩罕汗国的塔什干被俄军攻陷，两年后此地建立了俄属突厥斯坦总督区。1868年布哈拉陷落，布哈拉汗国成为俄国的保护国。1873年，希瓦汗国也成为俄国的保护国。1876年，俄国在镇压了浩罕起义之后，将其直接并入俄国版图，布哈拉和希瓦表面上的独立性则被保持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乌兹别克斯坦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8年，苏联红军攻占浩罕，建立了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920年，希瓦和布哈拉也先后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建立了花剌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以及布哈拉人民共和国。1924年，也就是在苏联成立两年之后，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与布哈拉人民共和国、希瓦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共同组成了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36年，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的塔吉克自治州成为独立的加盟共和国。1932年建立的卡拉卡尔帕克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则于1938年划归乌兹别克。上述的这些政区划分形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基本行政格局，这一格局在苏联解体之后保持了下来，最大的变化则是服从于苏联整体政治经济安排的乌兹别克斯坦在1991年底成为新的独立主权国家。

在基本同一时期的中国，出生于中亚浩罕汗国的张格尔利用浩罕与清朝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于1820年潜入南疆地区，借用宗教旗号发动叛乱。虽然这一叛乱很快被清军击退，但他在之后的八年中屡次入侵新疆，并一度占领喀什噶尔，给清王朝造成极大威胁。这种威胁直到1828年清军将其擒获，方才解除。[3]但从此开始，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

浩罕一直成为新疆局势的一大不稳定因素。1865年，在俄国入侵塔什干的同时，浩罕伯克阿古柏在新疆发动叛乱，并借助俄国势力与清朝抗衡。1878年，清军在收复阿古柏所侵占的天山南北地区之后，俄国对浩罕的直接统治变为对清朝新疆地区的直接威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1884年新疆建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在新疆先后掌权，民国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力较为有限。而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属中亚地区的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乌兹别克斯坦地区迅速蔓延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改变了当地的政治军事局面，并从思想和社会层面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乌兹别克斯坦认知：两次高潮及流变

近代以来国内知识界最早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认识是在中国西北边疆危机和俄国向中亚扩张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形成的。当时中国国内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并不是指向如今作为独立民族国家或者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兹别克斯坦，而是指向其前民族国家时代，也就是三个汗国时期。1925年之前的国内知识界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概念，有的只是希瓦（当时多称基法）、布哈拉（当时多称布哈剌）以及浩罕（当时多称霍罕）三个分立的汗国政权概念，而且这种认知在地理上存在着断裂性与不均衡性。在俄国进攻希瓦汗国之时，正值中国近代报刊业开始兴起（清末的《教会新报》创刊于1868年，并于1874年9月改名为《万国公报》，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之一），因此受到一定关注。浩罕汗国因为与中国新疆毗邻，而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注目，相比较而言，布哈拉汗国则更少被提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地理位置和认知程度上的相关性与差异性，正是源于前文提及的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亚局势以及中国自身西北边疆状况的变迁。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相关性和差异性的背后，又存在着某种认知上的一致性，即当时国内知识界正广泛意识到俄国作为一个强大的邻国，将对当时的中国尤其是中国边疆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资料上看，早在1873年，俄国入侵希瓦的消息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当时国内对于希瓦的认知几乎是缺位的，有的仅仅是对俄国军事行动的报道。当年的《教会新报》就报道“俄军往攻基法前分三队，由三路而进兹”，[4]几乎没有任何对希瓦本身的介绍。可见，当时国内对于希瓦的认知，不仅还保留着天朝上国的心态，而且对于俄国帝国主义性质的入侵也缺乏认识，这与后来中国知识界在认知浩罕时所显示的焦虑和关切形成鲜明对比。面对当时俄国派遣大军前往希瓦，国内报章认为“不知基法弹丸之地何所恃耶”，[5]而关于希瓦为何会遭受俄国入侵这一问题，国内舆论则认为是“基法酷带所获恶人，所以俄国人恨同切齿”。[6]对于俄国占领希瓦，迫使之成为附庸国，则被解读为“欧洲各国深佩俄国之德，欣喜之至”。[7]这些报道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于构成乌兹别克斯坦的希瓦区域缺乏基本的了解，存在着认知上的巨大偏差。

相较而言，国内舆论对于浩罕的认知有着另一种心态和情境。这种

状况，一方面推动了国内知识界对浩罕的逐步了解；另一方面，认知上的偏见和片面也依旧存在。从1874年起，《万国公报》开始持续关注浩罕，其写道："俄之属地名霍罕，即古大宛国也，在喀什噶尔城之北。"[8]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对于浩罕的了解还是依据汉代正史的只言片语，十分模糊。而在同一年的《申报》中，对于同样的事件也有报道，并且对浩罕的介绍更为全面，不过依据的仍然是正史记载，在认知层面并无超越："考今霍罕，即古之大宛地，汉武帝时由匈奴走月氏始至其境。"并一直梳理到"康熙中年改为霍罕，乾隆二十四年师平回部，博罗尼都之子萨木克逃霍罕，旋其地隶入版图，乃建八城，而霍罕其一也"。并承认"西域舆图沿革知之者少，因近日其境与俄有事，特为考之"。[9]这些报章中也有对浩罕地区民众的描述，认为其"风俗淫逸无人伦，尤重男色，人人皆有狡童。童之袴皆紧束，以细锁锁之，以防外遇。其人种类不一，有与内地回人相似者，有与土尔扈特诸处相似者，有鬓发卷曲与俄罗斯相似者。又有一种亦回族，但目益深、鼻益高，睛碧色，须绕颊如猬面，赤如丹砂。劣而横恣，遇有战阵辄为前锋，无火炉锋矢，专用木矛冲突于矢石之间"。[10]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在当时国内报道中，传统天朝上国的心态依然较为明显，对于当地社会文化的细部叙述过于离奇，缺乏具体的实地调查。而从时间轴的角度看，当时中国国内对浩罕的关注主要源于1874年浩罕爆发反抗沙俄统治的起义，所以在接下来的六年中，俄国在浩罕的一举一动都相当及时地传入中国。无论是1875年起义被镇压，还是同年爆发的新起义，抑或是1876年三度爆发起义的消息都在第一时间分别以《霍罕复乱》[11]、《霍罕又乱即行剿尽》[12]和《霍罕平而又复乱》[13]为题被报道。1876年俄国最终将浩罕汗国吞并的消息也被国内报章详尽报道，并分析了其中的利弊。[14]

除了报道上的密集和及时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报道中，浩罕总是被与新疆联系在一起加以评述："霍罕一区屡服屡叛，大费俄国经营。喀什噶尔与霍罕为邻近之地，其风俗人情大约相去不远。"[15]同时，国内舆论也倾向于将新疆问题的解决与俄国在浩罕的行动联系起来，认为可以借俄国东进给阿古柏政权带来的压力，迫使其倒向中国，即如果"阿古柏为俄国所忌，则中朝可乘此机会收复喀什噶尔矣"。[16]同时警觉到，俄国可能在控制浩罕之后图谋新疆，"且中国、俄国于喀什噶尔一地相互为敌，未知鹿死谁手。喀什噶尔应早派人辨明，或可保之，亦未可料"。[17]等到俄国将浩罕完全纳入其直接管辖后，国内舆论则感到借用俄国军事行动平定新疆叛乱的机会被耽误了，认为"俄兵争平霍罕

为俄属国，则霍罕人之不服于俄者势必前往喀什噶尔助阿古柏抗拒华兵，恐华兵难以取胜矣”。但同时认为“中国不取喀什噶尔久之，必为俄国所得。是又中国急宜从速进兵，不可再失机宜之候矣”。[18]同一年，倡议新疆建省以应对俄国威胁的观点，也开始出现在国内报章对浩罕的认知中，认为“将其地分设两省建立郡县，徙关内民兵以实之”。[19]由此可见，俄国在浩罕的军事行动在给中国新疆的地方治理造成巨大压力的同时，间接推动了国内知识界去更多思考西北边疆与中亚问题，因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俄国在浩罕修筑铁路和开通轮船的消息会迅速传入中国，并直接与边疆局势联系在一起。例如，《万国公报》1877年就刊载道：“俄国现有轮船可由里海驶往阿母江，经至霍罕境界，复由乌拉江驶往俄京。水路轮船、旱道轮车可称攸往咸宜矣。”[20]《申报》也就俄国铺设铁路到浩罕这件事情简要提醒：“此路若得以经达印度直通北口，不独便于商务，即行师旅战军装亦无不利，岂英与中国之福哉？”[21]在题为《论俄人拟增建铁路至霍罕》一文中，作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泰西富强之计首在通商，而其要则以电线、铁路为本务。”俄国“心存昌盛，必欲阔其铁路以期收效于将来，彼其志岂徒在于通商便民哉？”并想要“用霍罕扰我边陲”，进而等到新疆“一有意外震动非常，俄之乘势以筑路于此者……无事则便于互市，有事则利于行师”。最后告诫道：“觇国者可勿因其举动而先为筹划欤？”也正是在这篇1880年的报道中，曾经模糊的浩罕汗国形象逐步清晰起来：“查霍罕一名浩罕，俗称为安集延，地在葱岭之西。回回部落中有城郭之国也。毗连布鲁特。其人长于服贾，心计缜密。卡内之南北各城，卡外之回部，各国足迹无不到之处。性贪而狠，习为攻掠。凡子女玉帛所在，刻刻垂涎。”[22]该文认为，近代以来新疆的乱局都是浩罕的张格尔和玉素普等人造成的。总体而言，尽管国内知识界对浩罕的认识越发深入，但是依旧带有中心对于边缘的偏见，对新疆问题的认识也依然较为表面化。这说明当时国内对于构成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区域的认识还是相当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早在中国近代报业兴起之前的1868年俄国就占领了布哈拉，并将其作为属国控制起来，以及布哈拉的地理位置又不如浩罕那样在中国近代边疆事务上如此重要，因此其在国内知识界很少被提及。例如在一篇介绍布哈拉为俄国海军捐赠军费的短报中，仅仅提到“该国在俄国监督之下中亚细亚一独立国”。[23]概言之，国内对于构成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区域记述最为简单。

总的来说，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媒体和其他信息

传播方式的发展，国内知识界开始形成对构成当今乌兹别克斯坦范围的三个汗国——希瓦、布哈拉和浩罕汗国的相应认知，并将其各自在那一时期的境况，及其与俄国、中国的相互关系联系到一起考虑，从而形成了对乌兹别克斯坦区域的总体认知。但在认识程度方面，还处于基本的事实介绍和简单评述阶段，尚未对乌兹别克斯坦区域内部三个汗国的具体政治、社会与文化状况进行深入的探究。在这一时期，基本事实的介绍以及三汗国与中国边疆问题的简单关联，是国内知识界认知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方式。

随着俄国对中亚的控制日益稳固以及中国新疆局势的逐步稳定，国内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注度开始下降。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布尔什维克思想作为一股重要的时代思潮传入中国，再次推动了中国知识界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关注。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乌兹别克斯坦所在区域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国内的相关关注也主要围绕这些议题展开。

1920年的《共产党》杂志以《红色化后之布哈拉国》为题，报道了布哈拉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24]923年《法律周刊》则提到布哈拉土地国有的消息。[25]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国内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相关认知受到当时俄国苏维埃革命的极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又促进了中国国内对于苏维埃革命和共产党的认知。

1922年苏联的成立在世界史上是一件大事，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成立自然也受到关注。以此为起点，国内知识界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开始走向地理上的全面性（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与领域上的多元性（超越了传统的军事政治领域）。同时要注意的是，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国内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往往与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叠合在一起。1925年的《外交公报》就刊载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一个国家被首次介绍到中国。[26]而此前，国内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往往被切分为布哈拉、希瓦和浩罕三个区域，没有真正的整体性。但即便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整体性的认知开始出现，国内当时依然没有针对这一国家的全面介绍。直到1934年，《礼拜六》杂志连续三期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进行了“鸟瞰”式记述，才真正首次较为具体地介绍了这个国家的情况。但有趣的是，虽然文中对布哈拉已经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部分做出了说明，但是依旧放在“各国鸟瞰”这一版块之下，并仅仅对过去布哈拉汗国所在

范围做了介绍，[27]并未涉及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地区，这表明当时国内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了解在空间方面依然有所局限。1935年的《外交部公报》花费了41页的篇幅报道了“乌孜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行政院长法子拉本正月十一日在乌孜别克斯坦第五次苏维埃大会之报告”。[28]这是国内报刊对乌兹别克斯坦相关事务首次进行长篇报道。事实上，这也反映了1932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之后，国内对于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更大范围内对苏联事务兴趣的恢复和增长。这一报告主要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建国十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使当时国人有机会第一次全面了解十月革命之后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状况。在此之后，国内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长篇幅的全面介绍越来越多，涉及的方面也越来越广，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认识越发深入。另外，不同于以往仅仅通过文字资料认识乌兹别克斯坦，1931年的《俄国五年计划画报：活跃的苏俄》则以图片的形式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主义成就，其主题集中在科学教育和社会生活领域。[29]此后，图片这种更为直观的形式一直被保留下来，成为当时中国认识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战之后，随着苏联国际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国对于苏联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生活方式的认知需求也快速增长。1945年《中苏文化杂志》所刊载的《乌兹别克斯坦——白金之国》一文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全面介绍。文中虽然没有对当时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基本状况进行直接说明，但是详细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发展，从“这里最早的人是塔什克人（Tadjiks）”开始，历数了阿拉伯人的到来、“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完全征服这块地方”、乌兹别克人的到来、俄国沙皇的统治以及最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对乌兹别克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也是在这篇文章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形象开始与棉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塑造了如今中国对于乌兹别克斯坦这一“棉花之国”的印象。有趣的是，作者甚至从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旅行出发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其中谈到了火车上遇到的穆斯林乘客、塔什干欧洲区的街景等，这与之前人们往往通过二手资料了解乌兹别克斯坦有很大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也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女性解放和农业合作进行了说明。作者谈到，在过去“女孩子在九岁或十岁就卖给人家结婚，她便成为她丈夫的父母的财产”。而现在，1928年乌兹别克斯坦发起“大露面”运动之后，每年的国际妇女节的时候“乌兹别克所有的会议厅那一晚只能留给妇女们开会使用”。作者认为乌兹别克斯坦过去十年的发展中，“合作农业制度所造成的变化最大，它自1932年以后是所有的农民平等地使用到灌溉的水和新的机器”。[30]

1947年《瀚海潮》的《棉产居全苏第一位的乌孜别克——附喀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一文，对乌兹别克斯坦也做了全面的介绍，并侧重于叙述当时苏联的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文中写道："乌孜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The Uzbek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位于苏联中亚细亚中央，在人口数量方面，以及在经济实力上，它均居于中亚各共和国之首。其面积为四十一万零五百平方公里，人口共有六百三十万，除乌孜别克族为共和国之基本居民外，尚有喀拉卡尔帕克人、俄罗斯人、土克曼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以及其他族之居民。乌孜别克斯坦是全苏联棉花的基本产地。"该文不仅围绕苏联的棉花种植和棉花工业进行了细致的介绍，而且专门对喀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进行了介绍。"位于阿穆达利亚河的下游。该自治共和国的居民为：喀拉卡尔帕克人、乌孜别克人和哈萨克人，那里建设有新的城市，这边是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努库斯（Nucus），这个自治共和国耕种棉花和生产优良籽种苜蓿……在1934年全共和国共有牛马等畜八十八万一千头，至1940年共有一百六十二万四千头；羊只在1934年共有一百九十八万七千只，至1940年共有四百八十五万二千只矣。"可以说，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认识在不断深入、不断具体化。值得提到的是，文中再次专门针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女性自由和农业合作等问题发表了看法，认为相较于革命前"女人无有权利的，像物品一样，她不能敞着头面，在街市上行走"，"今天的乌孜别克妇女，都参预着国家大事"，都"完全平等了"，并且提出"集体农庄制度的继续稳固……使得棉花的收成，比较战前（第一次大战前——引者注）的时期的乌孜别克斯坦增加了三倍"。[31]女性解放和农业合作话题的一再出现，表明国内知识界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当时自身问题意识的折射，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思考中国自身现代化改革的一部分。

20世纪40年代，一系列有关乌兹别克文学的介绍也开始出现，其中甚至不乏出自名家之手，例如诸候在1947年的《少年读物》上用相当篇幅翻译了乌兹别克斯坦三兄弟的传说；[32]而茅盾更是在1947年和1948年分别对乌兹别克文学和乌兹别克戏剧进行了介绍。[33]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当时国内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与前一时期相比，国内在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议题上出现了一次巨大转变，即从军事政治向社会文化转变，这既是认知逐步深入的结果，也是中国自身问题意识发生转变的结果，即国内知识界开始从关注边疆的军事政治建

设到关注更大范围内的国家独立与富强问题。

结语：不均衡特质与时代折射

在中国认识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诸国的时段性方面，在关注古代的中外关系史层面和关注现当代的国际关系学层面，往往存在着一种时空上的缺失与断裂，即近代中国对于中亚的认识往往并不细致，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单化了。近代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就是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乌兹别克斯坦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中亚国家名称，而且是一个有其自身历史、同时又在近现代逐渐分化成型、最终脱离苏联独立的历史-政治实体名称，这一名称本身在认识层面存在着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进而形成具有明确疆域、人口等诸种特征的认识对象的过程。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本身具有某种时代性，也就是说，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是与对中国古代历史和近代境遇的认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了近代语境下的独特性。

总的来说，近代中国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碎片到整体、从狭隘到全面的过程。这种认知变化一方面与相关信息和知识不断积累，通信、交通条件不断改善，近代报业不断发展等因素关联在一起；另一方面，随着近代中国世界地位和自我认知的不断变化和调整，尤其是近代中国西北边疆问题的凸显，使得在近代转型中被忽视的中亚区域开始受到新的关注。但在这种对中亚的新认知的过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不仅是碎片化的，而且是不均衡的。乌兹别克斯坦东部（浩罕汗国所在地）在地理上与中国新疆毗邻，历史上则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中国西北边疆危机密切相关，从而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了持续关注。而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布哈拉汗国）和西部（希瓦汗国）由于与19世纪末的中国几乎没有直接关联，很少受到国内知识界的重视，直到1925年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在中国广布之前，国内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长期以来是由对三个汗国的认知所组成的，而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攻占浩罕的密集报道所反映的正是国内知识界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西北边疆危机的焦虑。

20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中亚地区行政结构的大调整，中国国内新一轮关注乌兹别克斯坦的潮流开始兴起，一方面，逐渐呈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乌兹别克斯坦形象并稳固至今（无论是地理区域还是经济类型上）；另一方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认知又主要是在对苏联和社会

主义认知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这使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国内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认识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意味，又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

总之，近代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认知过程中时间段的变化（两次高潮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的低谷）和议题的不断转移（从单纯的军事行动到社会文化），不仅表现了中国对外认知视野的拓展与新转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近代中国自身的内在变革。这不仅将启发我们如今的对外认知，也将更好地使我们注意到中国边疆议题方面所曾经有过的外部因素。

[1] 参见蓝琪《论中亚希瓦汗国》，《史学月刊》2012年第12期；蓝琪《论沙俄保护下的布哈拉汗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潘志平《中亚浩罕王统考》，《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

[2] 参见〔法〕恰赫里亚尔·阿德尔、伊尔凡·哈比卜主编《中亚文明史》第5卷，蓝琪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第5～54页。

[3] 参见王希隆《张格尔之乱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3期；朱亚飞、李瑶《从张格尔叛乱看清朝边疆防御之得失》，《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

[4] 《教会新报》第246期，1873年，第8、9页。

[5] 《教会新报》第231期，1873年，第11页。

[6] 《教会新报》第231期，1873年，第11页。

[7] 《教会新报》第244期，1873年，第10页。

[8] 《万国公报》第314期，1874年，第23页。

[9] 《申报》第1127号，1875年。

[10] 《申报》第1179号，1876年。

[11] 《万国公报》第368期，1875年，第18、19页。

[12] 《万国公报》第369期，1875年，第21、22页。

[13] 《万国公报》第373期，1876年，第20页。

[14] 《万国公报》第374期第16页，第386期第17页，1876年。

[15] 《申报》第1381号，1876年。

[16] 《万国公报》第361期，1875年，第22、23页。

[17] 《万国公报》第363期，1875年，第16页。

[18] 《万国公报》第374、386期，1876年，第16、17页。

[19] 《申报》第1383号，1876年。

[20] 《万国公报》第428期，1877年，第17页。

[21] 《申报》第2440号，1880年。

[22] 《万国公报》第574期，1880年，第2、3页。

[23] 《海外丛学录》1904年第1期，第149页。

[24] 《共产党》1920年第2期，第48、49页。

[25] 《法律周刊》第23期，1923年，第16页。

[26] 《外交公报》第50期，1925年，第40、41页。

[27] 菲菲：《各国鸟瞰：布哈拉》，《礼拜六》第557期第14~15页，第558期第16页，第559期第13页，1934年。

[28] 《外交部公报》第8卷第11期，1935年，第173~213页。

[29] 《俄国五年计划画报：活跃的苏俄》，1931年，第17、106、156、165页。

[30] 〔美〕安娜·路易·斯特朗、庄寿慈：《乌兹别克斯坦——白金之国》，《中苏文化杂志》1945年第9、10期合刊，第53~59页。

[31] 章文超：《棉产居全苏第一位的乌孜别克——附喀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瀚海潮》1947年第9期，第7~9页。

[32] 诸候译《三兄弟——乌兹别克木棉底传说》，《少年读物》第4卷第4、5期合刊，1947年，第16~27页。

[33] 茅盾：《乌兹别克文学概略》，《大学》第6卷第5期，1947年，第31~34页；茅盾：《乌兹别克的第一个歌剧蒲朗》，《文艺生活（桂林）》海外版第1期，1948年，第33~35页。

第五章 欧亚之枢：吉尔吉斯斯坦的在华认知与历史变迁

问题域与时代性

吉尔吉斯斯坦，全名吉尔吉斯共和国（The Kyrgyz Republic），位于中亚东北部地区，原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年8月31日宣布独立，同年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该国国土面积20万平方千米，其东南部和东部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接，北邻哈萨克斯坦，西部与乌兹别克斯坦接壤，西南部与塔吉克斯坦相邻，人口589.5万人（2015年数据），共有80多个民族，其中吉尔吉斯族人口为429.2万人，占总人口72.8%，其次为乌兹别克族和俄罗斯族、东干族。该国共分为7个州、2个直辖市（比什凯克和奥什），最大城市为位于该国北部的首都比什凯克，人口93.7万人（2015年数据），第二大城市为位于该国南部的奥什，人口约50万人（2012年数据）。该国70%以上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国语为吉尔吉斯语，官方语言为俄语，乌兹别克语也广泛通行。

吉尔吉斯斯坦历史较为久远。已知最早的考古遗存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的青铜时代，在该阶段末期，畜牧业和狩猎业开始成为当地居民主要的经济活动类型。公元前3世纪起，逐渐形成乌孙游牧部落，后受到匈奴人的打击，逐渐解体，移居到天山的一部分人跟当地居民融合，形成吉尔吉斯部族的雏形。从建置沿革上看，其政权前身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至13世纪的吉尔吉斯汗国，至15世纪后半叶，吉尔吉斯民族逐步形成，在16世纪，该民族自叶尼塞河上游迁居至中亚；17世纪起，居住于叶尼塞河流域的吉尔吉斯人臣属于蒙古土尔扈特部和准噶尔部，之后又在俄国压力下，逐渐从叶尼塞河流域西迁至伊塞克湖附近，形成比较稳定的共同生活地域。18～19世纪，吉尔吉斯人开始与浩罕汗国结盟。18世纪中叶，在清朝平定准噶尔以及新疆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中，大部分吉尔吉斯人臣属于清朝，浩罕汗国本身也成为清朝的藩属之一。19世纪20年代之后，浩罕的力量逐渐扩张，并侵入清朝传统的控制区域，将

原先臣属于清朝的一部分吉尔吉斯人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1]从历史疆域来看，该国西部在19世纪上半叶为浩罕汗国的一部分；在俄国向中亚推进的过程中，1868年，吉尔吉斯斯坦区域北部归并于俄国；1876年随着浩罕汗国的灭亡，吉尔吉斯斯坦区域南部被改为费尔干纳省，纳入俄国版图。1881年，清廷在沙俄压力下，被迫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国失去了伊犁以西包括吉尔吉斯人长期生活的大片领土，这一区域构成了如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东部区域。1917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1924年成立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隶属于当时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25年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改建为吉尔吉斯自治州；1926年2月又改建为吉尔吉斯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仍属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年5月，首府比什凯克改称伏龙芝。1936年12月成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作为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1990年12月12日发表主权宣言，1991年2月5日，其首都伏龙芝恢复历史名称比什凯克，同年8月底正式独立。1992年1月5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作为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在欧亚区域安全与合作方面占据枢纽位置，同时成为周边和域外大国关系协调的主要着力点之一。正是由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彼此互为陆地邻国的地缘现状，了解和认识吉尔吉斯斯坦，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亚、欧亚甚至更大范围中的国际关系进程，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和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边疆问题。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层面上看，在我们传统的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阶段性认识框架，一种是基于历史学维度的中西交流史或中外关系史的认知，另一种则是基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维度的中苏关系、中国-中亚关系认知。在前一种认知框架下，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理解和分析主要侧重于对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的相关区域的认知；而在后一种认知框架下，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则基本服从于对苏联的认知以及之后与新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具体空间上的断裂以及时间线上的空白，这种情况不利于我们形成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体性认知。随着中国对外视野的逐步扩大，我们对于中亚的认知也将逐渐超越这种断续性的局面，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更具有连续性和前瞻性的阶段。正因如此，笔者力图通过对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及其所在区域情况的梳理与勾勒，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吉尔吉斯斯坦这一形象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社会及其知识人在复杂动荡的近代转型中所忽略的中亚认知的具体场景与细节问题，从而使我们的对外

认知图景更为全面和完善。

时局与认知：近代中国视野下的吉尔吉斯斯坦区域

19世纪下半叶，近代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漫长而又苦涩的转型期，这种转型不仅表现为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在帝国主义力量面前节节败退，而且体现在当时中国人认识外部的范围与心态波折过程之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认识纷繁变幻的外部世界，尤其是与当时中国接壤的周边力量，就成为当时国内知识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这当中，如何重新去认识当时地缘政治变化之后的“西域”，并形成近代中国自身关于中亚区域的新认知，就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重要议题之一。

当然，由于思想和认识层面的迁延性，人们对于中国西北周边区域及其内部政治单位的认知转变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认知框架的影响，因此，要清晰了解这种转型的过程，就需要将时间轴进一步前推到清朝前中期，唯此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关于中亚及其相关具体区域的认知，以及在这背后国家政治与地缘环境的变迁。

早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因清廷重新统一新疆地区，乾隆帝特诏命重修《大清一统志》。对此，御史曹学闵奏请将西域、新疆增入《大清一统志》。曹学闵称：“《大清一统志》……久已颁行海内，近年来平定准噶尔及回部，拓地二万余里，实为振古未有之丰功。前命廷臣纂修《西域图志》，并令钦天监臣前往测量各部经纬地度，增入舆图。惟《一统志》尚未议及增修，请饬儒臣查照体例，将西域新疆敬谨增入。再查《一统志》自成书以后，迄今又二十余年，各省府厅州县添设裁并多有不同，亦应查照新定之制逐一刊改。”[2]在乾隆年间续修的《大清一统志》中，首次为新疆地区设立了“西域新疆统部”。这是“西域”与“新疆”两个指称首次并用，而这种并用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清廷当时已经逐渐意识到“西域”与“新疆”之间的不同，由此逐渐形成了各自含义与范围上的分疏。

进入19世纪，随着当时知识界对外部真实世界的认知逐渐深入，西域开始脱去其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泛指西部疆域版图的一般性意义，而成为一个既容纳国内行省又包含周边藩属国的庞大区域。当时国内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龚自珍于1820年在《西域置行省议》中这样写道：“天下有大物，浑员曰海，四边见之曰四海。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

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其实居地之东，东南临海，西北不临海，书契所能言，无有言西北海状者。今西极微，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唐努海总管治而止。若干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此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我大清肇祖以来，宅长白之山，天以东海界大清最先。世祖入关，尽有唐尧以来南海，东南西北，设行省者十有八，方计二万里，积二百万里。古之有天下者，号称有天下，尚不能以有一海……今圣朝既全有东、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尔喀部落，于北不可谓逾。高宗皇帝又应天运而生，应天运而用武，则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远者距京师一万七千里，西藩属国尚不预，则是天遂将通西海乎？未可测矣。然而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然而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不可谓劳；八旗子弟，绿旗疏贱，感遇而捐躯，不可谓折……然则一损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必由是也，无其次也。”[3]他在文中将广阔的“西域”空间大致分解为“行省”、“西藩属国”和“西海”，大致对应如今的中国新疆、中亚诸国和中亚以西区域。这一划分方式，体现了国内知识界开始有意识地将“西域”空间加以区隔处理，进而为更好地认识疆域空间上的“中”与“外”提供思想基础。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清末知识界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这样写道：“《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4]这一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表达了当时知识界在认识外部世界方面的重大转变，即在对外认知图景的形塑方面，逐渐摆脱仅仅以传统的中国知识来描述外部世界的方式，开始对用外域语言描述的外域知识加以系统性的介绍，从而形成了一个与以往基于中国语境的认知图景截然不同的认识框架，在当时意义深远。[5]

上述两方面的准备使近代中国知识界逐渐接受了外域知识及其塑造的世界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及其周边。到20世纪初，在当时中国的地理教科书中，有的已经专门说明了亚洲诸国饱受殖民侵略的总体形势：“方今独立之国，自日本外，惟清、韩、暹罗、波斯四国，基

础未固，多为强国所乘。其余各地，皆为欧米各国占领，为藩属及殖民地。欧米之人，竟以此洲为扩充之场也。”[6]并进一步将其中的亚洲部分区分为“露领”（俄国占领）、“英领”（英国占领）、“佛领”（法国占领）以及“和兰领”（荷兰占领）等，其中中亚地区主要为“露领”。[7]鉴于教科书的使用普及度，我们可以说，20世纪初的国内知识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中亚地区所发生的地缘政治大变革，那就是俄国对这一区域的整体性控制已经成为现实。到了1912年，在孙毓修、朱元善所编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地理讲义》中，第二章“亚洲俄罗斯”叙述了中亚（中亚细亚）的情况：“中亚细亚，亦称土耳其斯坦，介于西伯利亚、波斯高原之间，东邻中国，西滨里海，面积凡一千二百余万方里。”在这个叙述中，就已经把传统的西域与中亚区分开来，“中亚细亚”专门指称俄国中亚区域，这种叙述将中亚与俄国控制区域内在地联系到一起，也成为后世对于中亚政治地缘所属的一般性认知。

与此同时，当时中国与俄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及其相伴而生的一系列边界条约则在现实政治层面形塑了中亚版图新的样态。清廷与俄国在1864年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位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以及斋桑淖尔（今斋桑泊）南北共44万多平方千米土地割让给俄国；在1881年、1884年又被迫分别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先后失去伊犁以西以及帕米尔地区吉尔吉斯人长期生活的大片领土，其中一部分区域构成了如今吉尔吉斯斯坦领土的重要部分。尽管这些条约无疑是中国方面在沙皇俄国强权压力之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在客观上成为近代中国认识吉尔吉斯斯坦的现实基础。

正是在上述的空间认知基础和现实基础之上，中国知识界开始逐渐有了对于构成如今吉尔吉斯斯坦疆域的相关地域的基本认识框架，进而形成了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与现实的新认知。

如果说19世纪的中亚历史相对封闭，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主动权在后期主要掌握在俄国手中的话，那么20世纪的中亚历史则充满着动荡与转折。20世纪初期，“经济的发展、新思想的传播以及1905年的革命动乱，都预示着变革的到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旧制度的灭亡已经迫在眉睫了。俄国中亚也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前十年的许多理想和价值都被置于一旁或者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许多思潮都被窒息或歪曲。人们很快就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8]俄属中亚地区经历着各种思想的洗礼，深受来自俄国欧洲地区政治形势的影响。1916年，为扭转

欧洲战场的不利局面，沙俄当局强征中亚吉尔吉斯人服兵役，引起吉尔吉斯人大规模的反俄起义。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属中亚地区也逐步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918年4月，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塔什干正式成立，中亚吉尔吉斯人分属于该自治共和国不同行政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联政府开始逐步在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和民族划界。1924年5月，当时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专门组建了三个分委会——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土库曼分委会，讨论相关事宜，其中吉尔吉斯的自治问题由哈萨克分委会负责。1924年成立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隶属于当时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其首都由塔什干迁往比什凯克。1925年改建为吉尔吉斯自治州，1926年2月1日又改建为吉尔吉斯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依然从属于俄罗斯联邦。1936年12月5日，吉尔吉斯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改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9]这一事件是吉尔吉斯斯坦在苏联内部地位的一次根本性变化，其开始从附属于俄罗斯的次级政治体转变为与俄罗斯平级的加盟共和国，从而开始形成延续至今的吉尔吉斯斯坦基本国家结构。

清末之前国内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决策层对吉尔吉斯人分布情况的了解与掌握方面，这些认知服从于清廷对蒙古准噶尔部以及俄国的总体政策。当时留下的相关记述主要是吉尔吉斯各部首领与清廷（经由边地将领）的往来文书。例如，在1758年，清军将领兆惠、富德等在深入中亚伊塞克湖、塔拉斯河等地追击准噶尔阿睦尔撒纳残部的过程中，曾派乌尔登等人向在纳林河中游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部落头人图鲁起拜等宣读乾隆帝的招抚谕文。在1759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曾派员赴安集延等地招抚吉尔吉斯人，当时的首领阿济比代表西布鲁特十五部向清军将领兆惠表示归属，在信件中说道：“当率诸部，自布哈尔迤东20万人众，皆作臣仆。”[10]此举影响深远，标志着清朝对浩罕以东整片吉尔吉斯人的生活地域实现了有效治理。在一般知识界，对吉尔吉斯人及其所在区域的认知尚付之阙如，更不用说对这一区域的专门讨论了。

随着国内近代报刊媒介的兴起，知识界对中国周边事务的认识渠道和讨论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对当时俄-苏属中亚的介绍与讨论也逐渐展开。但20世纪初至30年代上半叶吉尔吉斯斯坦政区结构的频繁调整以及中国对苏联中亚地区事务疏于关注的现实，使得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了解十分有限。国内知识界真正开始有意识介绍吉尔吉斯

斯坦的情况，是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尤其是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开始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本身已经基本完成本国在苏联内部行政层面的大调整，开始以较为明晰的形象对外展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大背景下，作为援华大通道的中亚地区，其政治、社会发展状况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

就笔者所见，国内较早专文介绍吉尔吉斯斯坦的汉文报刊是1938年的《申报》，该报记载了当年苏联苏维埃各级代表选举的相关情况，其中专门提到了吉尔吉斯斯坦。[11]

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苏联援华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本国卷入苏德战场，中苏双方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成员，彼此互动更为频繁；与之相应，中国对苏联中亚地区（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的介绍也更多、更密集。1940年，《新华日报》以《吉尔吉斯水利工程》为题，介绍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水利建设发展情况。[12]943年6月15日，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分院成立，当时出版的《中苏文化杂志》记载了吉尔吉斯设立苏联科学院分院的情况："（傅隆兹十五日电）苏联科学院在吉尔吉斯首都设立之分院于八月十三日开幕。开幕典礼由苏维埃党政代表、科学家、作家、美术家及其他弟兄共和国之来宾参加。苏联科学院主席比亚拉夫发表演说，高级科学研究所之成立——我国内之第九所……证明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各族人民斗争力量估计之错误，在吉尔吉斯之科学院分院将在弟兄共和国中之各科学中心中占光荣之地位，并对于人民之文化进步与对于此共和国不能枯竭与甚少发现之天然富源之开拓有极大之贡献。"[13]

1944年，随着二战进入后期，国际战场胜负大局已定，中国对于苏联后方建设情况的兴趣逐渐增强，当时的报章开始出现对吉尔吉斯斯坦工农业生产的相关报道。例如，当年的《时代杂志》就以《日用品产量激增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为题，记载道："这个共和国地方工业的工厂，今年的产量到年底可望达到一九三九年时百分之六百九十。因为在战时，他们以一部分的力量致力于促进这类工业，其中大都是出产大众日用品的小厂家。今年，由于生产率高，与利用地方上的原料开办新生产业，产量增加得惊奇的迅速……促进地方工业中大部分的工作是由入厂代替参加军队的男人的妇女担当。广大的教育与训练工作保证工厂有了必要的技术人员。"[14]

经由二战，苏联作为欧洲战场的决定性力量和亚洲战场的重要力

量，成为雅尔塔体系确立的世界两大力量中心之一，开始产生国际性的政治军事影响。对其内部事务的关注自然也成为当时对战后世界秩序和国内重建充满期许的中国知识界的关注重点。顺应这种形势，大批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书籍陆续出版，其中就包括对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详细介绍。例如《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一书介绍了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的相关情况，其中就包括当时的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位于北纬四十三度二十分与三十九度四十分之间，东经三十九度六分与零度五十五分（此处似有误——引者注）之间。面积二十万方公里，约等比利时、荷兰、澳大利（即奥地利——引者注）与瑞士四国的总面积。东南与新疆交界，北与卡萨赫斯坦接壤，西南与塔吉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为邻……帝俄掠夺吉尔吉斯是在一八五五年开始的，当时游牧于伊绥克库尔湖东南的鲍古族决定向俄皇投诚。越过卡斯契克山隘的俄国军队遇到塞累巴布希族的吉尔吉斯人的武装抵抗，俄军击溃吉尔吉斯人于托克马克，可是吉尔吉斯人并不立即投降，要完全征服吉尔吉斯并将它从科冈王国版图内分割出来不是一两年能做到的。沙皇为掠夺新殖民地曾蓄意利用种族间与民族间的内讧。一八七五年斯科贝列夫将军利用反对科冈王国的土人起义，掠夺了费冈流域的许多大城市，后来在一八七六年又对未屈服的阿拉斯基和柴阿拉斯基的吉尔吉斯人实行进攻。这次进攻实际上完成了帝俄征服吉尔吉斯民族……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全苏联第八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斯大林同志所作的关于宪法的报告之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即加入苏联为第十一个加盟共和国……忠实于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原则的吉尔吉斯共和国正在一天天的生长和发展。"[15]945年，《苏联十六国的经济》一书在战时陪都重庆出版。该书编纂于抗战即将最终胜利之际，编者记中这样写道："这本小册子，是根据苏联M.库特里阿佛佐夫（Mikhail Kudriavtsev）所著《苏联各民族友爱的经济基础》文，库尔斯克（A. Kursky）所著《苏联计划经济》一书，1945年日历以及其他几种文章和书籍写成的。内容只是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对于认识及研究友邦苏联可作为一初步的读物。当兹国人努力抗战准备建设新中国之际，编者特将此书贡献给我国一般读者，想来是必要的。"[16]书中记述了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其中写道："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The Kirghiz S. S. R.）在苏联中亚之中部，与中国为邻。过去没有大规模的工业，现在已建立起大的炼糖工业、缫丝工业、制革厂、烟草工业、制造新的纤维制皮的工厂、农业机器修理厂、轧棉厂、煤矿、金矿以及其他工业企业。

吉尔吉斯是中亚各共和国中的一个重要的煤站。该共和国农业中主要的一个部门，就是牧畜业，在山地及山麓有许多肥美的牧场。大部分牧畜的人们，已过到一种定居的生活。共和国中的可灌溉的田庄大大发展了，因为还有马群的牧畜。有一半耕种的土地，是种着棉花以及在吉尔吉斯新近种植的东西，如甜菜、南方的苎麻、长织线麻、烟草、罂粟，此外还有果木园、葡萄园以及许多英亩的谷类。旱田主要是种植五谷。在苏维埃政权下，已建设了一条铁路将该国的首府佛福兹（Frunze）和苏联的铁路网联结了起来。在过去，在吉尔吉斯的朱伊（Chui），是一个与世界孤立的小国，它有它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它自己耕种土地的制度。在今天，在集体农场的田园上，已用不着采用过去的原始工具了。原始的木犁及木耙，不论是杜干（Dungan）的、吉尔吉斯的或俄罗斯的，现在都搁置不用而陈列在博物馆中以作为往日生活的证明了……吉尔吉斯现在已被称为中亚的一个汽锅房。中亚四个共和国的铁路及工厂，都是用这里的煤工作。每年有二百余万吨煤，是在佛尔哈纳（Ferghana）盆地出产的……”[17]947年，该书以《苏联的经济》为题在中外出版社重新出版，内容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1947年，时值俄国十月革命三十周年，中国报章频繁刊载关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信息。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刊出的报道多达15条，如《吉尔吉斯的东干集体农场》、《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艺人推荐斯大林为候选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三十周年的苏维埃吉尔吉斯》[18]、《吉尔吉斯集体农产的财富》、《吉尔吉斯的赶马老人：照片》[19]、《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吉尔吉斯国营畜牧场的羊群：照片》[20]、《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傅龙芝的医学院：照片》[21]等。此外，《战时苏联地理学者之总动员》一文则指出：“中亚细亚之地理研究，除哈萨克外，更从事其毗连区域之调查，如南之吉尔吉斯北部，北之鄂木斯克、车里亚宾斯克、吉尔干，同时对于阿尔泰山区及汾甘纳低地，亦均有贡献。”[22]同年11月，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在南京以中文编印《三十年来的苏联》一书，其中收录了时任吉尔吉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伊莎耶夫所写的《苏维埃政权给了吉尔吉斯青年些什么？》一文，其中写道：“在那天山插入云端的地方，苏联的东南部，有一个非常美妙的国家。这便是我的祖国——苏维埃的吉尔吉斯。永远披着白雪的山峰，辽阔的阿里比草原，都是非常伟大的，高山上的湖泊格外的美丽。河流和哗然的瀑布挟着它们的水猛烈的流下。吉尔吉斯的森林广大无边，它的植物世界的多样性令学者们感到惊异。而且到处都可以看到自由的吉尔吉斯人民创造劳动的成绩：工厂的烟筒在

冒着烟，矿井的挖掘机和石油采掘机高耸着；百花怒放的盆地纵横着运河；深谷上面悬着建筑良好的桥梁；耕作过的田野宽阔地平铺在那儿；数千的畜群在山地的牧场——阿里比的草原上放牧着。不久以前我的祖国还是落后而且贫苦的。它的巨大的富源——煤炭、石油、稀有的及有色的金属，任何人都不知道。农业处于未发育的状态。牧畜便是这国家中基本居民的主要工作。吉尔吉斯人带着自己的畜群在山谷之间游牧，从一个牧场走到另一个牧场。土地和畜群都是属于极少数人的。绝大多数的吉尔吉斯人民大众都为富人而工作。这里从来没有过学校，更不要说俱乐部和剧院了。吉尔吉斯人通常都是文盲，人民因为疾病而死亡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吉尔吉斯人民的生活中奠定了新时代的开始。这是他们的民族复兴和社会繁荣的时代。沙皇俄国过去的殖民地的面貌已经认不出来了；青年们的情况已经根本地改变。苏维埃政权给了他们学校、学院、俱乐部和剧院、自由而愉快的劳动、无限的发展的机会与前途……我属于吉尔吉斯人在苏维埃政权的时期长成的那一代。关于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青年们从前怎样生活这一件事情，我是从书籍上和老人的故事中知道的。我的父亲是一个牧放畜群的，不识字而无知的人。然而我的生活多么不像我父亲的生活。靠了苏维埃国家的关怀，我受了高等的教育，我积极地参加了国家的工作，帮助改建祖国吉尔吉斯的生活……吉尔吉斯的青年们坚定地相信着自己的光明的未来。他们非常的明白，这一个未来是属于劳动的人们，这些人们热爱着自己社会主义的祖国，自己贤明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的领袖斯大林。”[23]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也出现了对之前从中国西部迁居出去、如今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及其社会组织活动的相关介绍，这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一群体更为细节化的日常生活场景。1947年《吉尔吉斯的东干集体农场》一文这样写道：“很难想象出来，在二十年以前，这些被尖锥形的白杨围绕着的景物如画的村落，这些茂盛的花园与田野之处，不过是一片荒芜，遍布着烧过的野草的斑迹……除了当地的吉尔吉斯人以外，哥萨克人、鞑靼人、乌克兰人、东干人移居到这个迄今无人烟的乔斯克盆地。他们在自己新的土地上成立了丰富的集体农场。不久以前我们曾到过东干人的村子，那是乔斯克盆地的东部。东干这一民族是革命以前从中国来到这儿的。但他们十五年以前才定居在乔斯克盆地。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在他们的小屋子的平顶上开放着罂粟，燕麦也在发绿。沿着街道伸起一排粘土和麦秆做成的围墙。小小的院子中长着桃树杏树，小村的四周像丘地一样降下稻田，由于水和反映在水中的天空闪着蓝色。东干的集体农场名字叫作弗隆兹集体农场，我们曾访问过它，

是吉尔吉斯最大和最富足的农场之一。当你走进集体农场的时候，好像跌进了一个不大而整齐的镇中。村中央有一所石头建的戏院，大厅可容三百人，有为演员预备的房间和休息的走廊。并排有两所学校，一个有淋浴和浴池的澡堂，集体农场经理部的红色的房子……东干人是一种有很古的中国文化的民族。他们曾怀想过真正的农民劳动，在吉尔吉斯得到了土地以后，他们仔细地开垦每一小块田地，整理好灌溉用的运河网，在土壤上施肥，并且开始播种自己的民族文化——稻米……乔斯克盆地有九个东干人的村子。大多数的农民早已团结成集体农场。这使得他们有巨大的优先权共同用机器耕地，和正确地分配稻田里的水。集体农场的收入，除了在农民们之间照劳动日的多寡去分配以外，用在建设学校和农民的新房子，给图书馆买书，和电影放映机上。集体农场用自己剩余的钱买减轻耕作劳动的工具与机器。这些来自中国的人们工作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和定居在苏联的其他民族享受同等的权利，并且享有苏维埃政权赋予他们的一切特权。”[24]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介绍又进一步拓展到社会改革、边疆史地、艺术生活等议题，吉尔吉斯斯坦的形象与认知也在向多元与立体发展。1948年的《塔兹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毗连我新疆省的三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附照片》一文记载道：“图画一般的塔兹克和吉尔吉斯两共和国都在中央亚西亚，而且是紧紧相邻的。疆域全是山地，在苏联各邦中地势最高。各拥有人口一百五十余万。给乌兹别克、土尔克曼及哈萨克等国供给水源及灌溉田地的大河如阿穆·达亚、塞尔·达亚等河流，均由塔兹克及吉尔吉斯的高峰中发源。这两国的土地只有极小部分是谷地及山坡……本邦东西区有个地方相传是古代亚当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之后住居的所在，他在山外建设了诺史城（Osh），那是世界第一古城。现在是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丝织业中心。据说，亚当曾带了几条蚕在身边，给他的赤身露体织了衣服，这便是该城丝业的起源（译者按，中亚及欧洲的蚕种和丝，约在前汉时从我国经西域各国向西传去）。这个传说使许多人相信人类最早的住处也许就是吉尔吉斯。可是没有人敢信吉尔吉斯人就是最原始的人类。在十三世纪以前，当这些面孔扁平的鞑靼人到来之前，是什么遗迹也没有的。在这之先，他们曾经游行全亚，有一时期，甚至到了中国的北京。稍后，鞑靼人被蒙古的大汗国所征服，最后又以苦战反抗俄国的沙皇。俄国大革命前一般人都误称它为加拉吉尔吉斯（Karakirgiz），而北面的哈萨克人反混称为吉尔吉斯人，因此到如今，哈萨克共和国北面的大草原还袭旧称，叫作‘吉尔吉斯大草原’。吉尔吉斯人是山居的游牧民族，住在黑色的帐幕或泥土的小房子里，屋顶

是平的，顶上可以存积冬天用的干草……和别的落后民族一样，吉尔吉斯人在帝俄时代的生活充满着贫困污秽和疾病。据说他们大多数人一生只洗过两次浴，生下来的时候一次，死的时候一次。革命之前，人口锐减，一九零三年到一三年的十年间减少百分之十，当时识字的人，还不到百分之二……今天的吉尔吉斯可大不相同了，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参加苏联以来，它就有着飞跃的进步。它起初是自治共和国，到一九三六年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这些年间，吉尔吉斯人的生活，已大半由游牧转为农业，生活比前安定许多……但今天的吉尔吉斯可也不会忽略了工业，电力厂到处都是，煤及其他矿产大量开发，近年科学家发现这里是全苏联稀少金属蕴藏最富的区域……吉尔吉斯的文化教育，也和工业农业有相同的进步。最显著的成功就是制定了方言字母。一九三九年，本地识字人数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不过本地人的旧习俗一时尚不能完全去掉，例如他们还是穿那填了棉花的袄裤，白色沿有黑边的毡帽。”[25]在同一年的10月1日，《大公报》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主办“版图”栏目第20期刊发张其昀的文章《北方边外》，其中写道：“中国建国的前途，首先要看北方局势的安危，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近二十年来，世界地理上最大变迁，是苏联国力的骎骎东向……苏联的边疆便是我国的边疆……吉尔吉思国在乌孜别克之东，热海（Issyk Kul，面积约二千四百方英里）、吹河（Chu）即在是国境内。首都日夫伦士（Frunze）位于吹河沿岸。全国面积七万六千方英里（犹五倍于瑞士），人口一百余万，吉尔吉思人占三分之二。此族在新疆称布鲁特人……其生活多在山上放牧，现在本地只大尾羊与美利奴种交配，本地体格较小而以耐劳著称的良马，与阿剌伯与英国种交配，成绩至佳。吹河流域现有织布、制糖等业……我们环顾中苏边界，得到几点深刻印象。第一，这些地方大都本是中国旧壤，八十年来，几度划界，几次失地，至今大片版图仍在变色之中。第二，中苏两国的边疆民族……种族同、语言同，彼此互有吸力，苏联一贯的扩张政策，深堪注意。第三，苏联确能启发边疆的宝藏，例如天山、阿尔泰山之麓，自从农牧改良、工矿振兴而后，均已一变而为精华荟萃之区，而我国方面空虚落后之状，自不免相形见绌。第四，苏联的铁道网已经环绕我边界一周，并有多数支线及公路线、航空线，深入我国门庭重地，演成目前我国边疆政治、经济及文化上外重内轻的现象，瞻念前途，真有不胜忧惧之感……”[26]该文在对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苏联与中国接壤地区的社会建设状况的介绍中，提出要重视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建设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与稳定。此外，当时还有关于吉尔吉斯斯坦艺术方面的相关介

绍，例如《吉尔吉斯的演剧生活》一文这样写道：“……几盏水银灯在山丘上燃亮起来，照着低低的用毛毡铺着的木台。指挥者举起指挥棒，弦乐队振动弓弦。美女爱依·朱列克走到舞台上去，唱着诀别的歌曲……前面的观众坐在草地上，后面的站着，骑着马的人从后边看着舞台。二千五百多个康特斯基区的吉尔吉斯农民倾听着‘爱依·朱列克歌剧’。响亮的广播机在狭窄的山谷上传播着音乐的旋律和歌曲的字句。在夏季的时候，吉尔吉斯的歌舞剧院就举行这样的旅行演剧。乘载着演员和音乐家的汽车，装满舞台装置和道具的卡车都往矿坑和集体农场驶去。通常在五月，剧院的管理人就开始接到邀请旅行的申请书。在夏天，吉尔吉斯的剧院、木偶戏院和吉尔吉斯音乐爱好会的音乐团体都分别出发到各村庄、各工厂和各矿场去……”[27]到了1949年，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舆论对苏联中亚地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现代化发展开始加以特别关注。《苏联近事：其他：吉尔吉斯共和国过去一年间的成就》一文就介绍道：“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杜拉巴伊·库拉托夫去年十二月廿八日对塔斯社记者说，吉尔吉斯的劳动人民在过去一年中遭逢了许多愉快的事件。许多企业早在预定限期之前，就完成了他们的全年计划。煤矿工业在十月一日，达到了五年计划中的一九五〇年度水准。集体农人们获致了丰收。吉尔吉斯共和国在限期以前完成了谷物储藏计划。畜牧发展计划亦已超额完成。大规模工业建设正在着手进行中。在集体农场上，建造了许多电力厂。公众教育也有飞跃的进步。本年肄业的学生，约增加二万人。最近又开设了一所新的师范学院。医药机构的数目也大见增加。去年，吉尔吉斯共和国庆祝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分院的第五周年，这个机关对于从共和国当地人民中间培养科学干部的一点，贡献极大。”[28]在同一年，著名作家茅盾还专门写有《吉尔吉斯共和国京城之街景》一文，记述了当时伏龙芝城的情景。[29]

结语：认知热点与中国议题

总体而言，近代中国在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方面，经历了如下几个较为明显的阶段。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这时期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主要局限在最高决策层，其认识服从于当时清朝与俄国的双边政治军事关系和地缘议题，普通知识界对吉尔吉斯斯坦所在区域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更无从知晓当时中俄之间围绕边疆问题进行的交涉与博弈。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内部的政治变革，知识界的关注重心转向欧美和日本，加之苏联中亚地区频繁的政区调整，国内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识多有波动，总体的认识图景尚不明晰，并存在较长时期的信息滞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中亚政区调整的完成和吉尔吉斯斯坦基本疆域、政治结构的确定，以及苏联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苏联中亚-中国新疆这一苏联对华援助大通道日渐重要，国内知识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更为深入，并且开始对该国的政治、社会情况进行系统性介绍。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后期，随着二战的结束和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关于中国国家重建和现代化的话语开始成为国内知识界的讨论热点，作为苏联国内建设一部分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建设及其现代化发展情况也相应成为国内介绍和认知的重点。

中国对周边国家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对自身问题关注的一种折射，近代中国的吉尔吉斯斯坦认知就是鲜明的例证。随着中国对外视野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实践，中国对于中亚的认知也将逐步超越官方和知识精英的层面，而逐渐在一般知识界和公众层面加以展开。这种新的“一般”中亚观的出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中亚认知流变以及更为具体的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转变过程，也将进一步为中国-中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彼此交流与互视提供新的契机与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得以更好地认识和思考中国本身。

[1]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第113页。

[2] 《清高宗实录》卷722，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

[3]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辑，中华书局，1975，第105～111页。

[4] 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第1页。

[5] 韩子奇（Hon Tze-ki）：《“开眼看世界”——论晚清地理教科书中的全球图像》，载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第3～16页。

[6] 吴闿生：《改正世界地理学》第1卷，文明书局，1903，第3页。

[7] 吴闿生：《改正世界地理学》第1卷，第40～50页。

[8] 〔英〕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297页。

[9] 〔苏〕卢宁等：《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韩高译，民族出版社，1957，第103页。

[10] 傅恒等：《西域图志》卷45。

[11] 《申报》1938年6月28日。

[12] 《新华日报》1940年7月17日，第3版。

[13] 《苏联文化消息：发明与发现：吉尔吉斯设立科学院分院之贡献》，《中苏文化杂志》第14卷第3、4期合刊，1943年，第49～50页。

[14] 〔苏〕E. 柯夫斯基：《日用品产量激增的吉尔吉斯共和国》，译者不详，《时代杂志》第4卷第1期，1944年，第20页。

[15] 〔苏〕杜勃洛夫斯基等：《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叶文雄译，商务印书馆，1946，第100～107页。

[16] 焦敏之编《苏联十六国的经济》，中外出版社，1945。

[17] 焦敏之编《苏联十六国的经济》，第29～33页。

[18] 〔苏〕苏耶尔库洛夫：《伟大十月社会主义三十周年的苏维埃吉尔吉斯》，译者不详，《新闻类编》第1619期，1947年，第21页。

[19] 《吉尔吉斯的赶马老人：照片》，《时代杂志》第7卷第10期，1947年，封一。

[20] 《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吉尔吉斯国营畜牧场的羊群：照片》，《时代杂志》第7卷第38期，1947年，第1页。

[21] 《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傅龙芝的医学院：照片》，《时代杂志》第7卷第38期，1947年，第2页。

[22] 严德一：《战时苏联地理学者之总动员》，《申报》第24960号，1947年8月11日。

[23] 苏联大使馆新闻处编印《三十年来的苏联》，1947，第91～94页。

[24]〔苏〕伊里契娃：《吉尔吉斯的东干集体农场》，译者不详，《新闻类编》第1616期，1947年，第25～27页。

[25]〔美〕拉芒特：《塔兹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毗连我新疆省的三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附照片》，伯庸译，《中学生》第197期，1948年，第37～40页。

[26] 张其昀：《北方边外》，《大公报》1948年10月1日，第7版。

[27]〔苏〕S. 彼克屠尔苏诺夫：《吉尔吉斯的演剧生活》，苏联大使馆新闻处编《苏联建国三十一年：新闻类编特刊》，1948，第123页。

[28] 作者不详：《苏联近事：其他：吉尔吉斯共和国过去一年间的成就》，《新闻类编》第1683期，1949年，第31页。

[29] 茅盾：《杂谈苏联》，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

第六章 高山之国：塔吉克斯坦的形象生成与认知塑造

中国视域与“中亚问题”

一个国家对外认知图景的形成，既是本国知识界域外视野日渐深化的过程，也是该国与周边及域外邻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逐步推进的过程。作为一个拥有众多邻国的东亚大国，中国在认识自身的同时，逐渐形塑了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在古代，中国对于域外的认知较为有限，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从总体上服从于国内政治与思想秩序的需要。这种内敛性的认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外部视野的有限性与层层递进特质，不管是“九州”还是“四方”观念，都代表了其认知空间的边界所在（不管这种边界是否真实存在）。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对外认知中又存在着一种“无外”的原则，蔡邕《独断》曾称：“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司马迁在其著名的《史记·高祖本纪》中亦指出：“天子以四海为家。”在赵汀阳看来，在这种“无外”原则的指称下，“无论如何，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排除了把世界作分裂性理解的异端模式和民族主义模式。至于在实践上，‘无外’原则虽然不能完全克服作为人之常情的地方主义，但也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天下/帝国与其他地方的矛盾。清朝许多学者都自觉地利用‘无外’原则来解释规模空前的帝国内部的复杂民族关系，可以看成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应用”。[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历史话语中，中亚在近代经历了一个与“西域”逐渐剥离并清晰化的过程。而与此同时，当面临俄国这一来自欧陆方向的不同于以往游牧力量的传统威胁时，清代中国曾经秉持的“无外”原则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涉及曾经的地理空间与分类话语，又涉及人员群体的现实跨界联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管辖权问题。在这一背景下，长期以来的西域认知逐渐分化为一种基于近代地理知识与地缘政治的“中亚”问题认知，并在中国西北等问题上形成新的分析与解释框架。

作为塔吉克斯坦历史与当代邻国，中国既在历史层面存在与波斯帝国、萨曼王朝、帖木儿帝国、布哈拉汗国以及作为俄国-苏联一部分的塔吉克斯坦的互动关系，又在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中塔之间的现代双边关系，而这两个层面都在积累和形塑着中国视野下的塔吉克斯坦形象。由于学科话语的割裂以及中亚历史时段方面存在的区隔特征（即前文所说的部分互嵌性与完全脱嵌性并存），目前国内知识界对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重要国家——塔吉克斯坦的认知在连续性中存在着某种“断裂”，这种断裂主要表现在对近代塔吉克斯坦形象变迁的认知缺失，我们无法较为清晰地认识和把握从认知的部分互嵌到完全脱嵌之间的转变过程。这种认识缺失不利于我们对塔吉克斯坦整体形象的认知，因此有必要对近代中国视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区域的认知流变过程加以呈现，而这正是本章努力的方向。

古代至20世纪上半叶的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全称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面积约14.3万平方千米，人口820万人，位于中亚东南部，东部与中国新疆接壤，南部与阿富汗交界，西部与乌兹别克斯坦毗邻，北部与吉尔吉斯斯坦相连，东西长700千米，南北宽350千米，是中亚诸国中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境内山地和高原占国土总面积的约4/5，素有“高山国”之称。全国分为2个州（索格德州、哈特隆州）、1个自治州（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1个区（中央直属区）、1个直辖市（杜尚别）。首都杜尚别是该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73万人（2012年数据）。此外，国内主要城市还有胡占德（或称苦盏）、库尔干秋别、霍罗格等。

1924年10月14日，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属当时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9年10月，成立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联盟一级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1990年8月24日，该国发表主权宣言。1991年8月，更名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9月9日宣布独立，同年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塔吉克斯坦全国共有86个民族，其中塔吉克族人口占68.4%，乌兹别克族占24.8%，俄罗斯族占3.2%，其他民族占3.6%（2013年数据）。主要宗教为伊斯兰教和东正教，其中绝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塔吉克语为国语，该语言与现代波斯语极为接近，俄语为族际通用语。

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塔吉克斯坦所在区域文明开化较早。这一区域在被沙俄吞并前的漫长历史阶段中经受过外部的多次入侵，波斯、亚历山大、贵霜、匈奴、突厥、阿拉伯和蒙古等先后进占该地区，从而使其在社会、文化和宗教层面经历多次变革。如加富罗夫所言：“塔吉克民族的形成过程，完成于萨曼王朝统治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的时期……早在七世纪时，汇合成一个塔吉克民族的诸部落，在地域、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共同性，就大为增加了，并且具备了形成统一民族的一切前提。阿拉伯人的入侵和他们实行的强迫同化政策，曾经阻挠这一过程，但是结果并没有能消除形成塔吉克民族的历史趋势。”[2]值得注意的是，塔吉克人作为唯一属于东伊朗语族的民族，其生活地域在历史上曾经是波斯帝国以及伊斯兰化的萨曼王朝（874～999）的一部分，因此在文化层面上受到波斯-伊朗因素多重影响，深深打上了波斯-伊朗文化传统的烙印。从公元5世纪起，萨珊波斯帝国为抗衡在中亚崛起的嚈哒帝国，开

始与当时位于中国中原地区的北魏政权频繁交流。[3]在萨曼王朝时期，其东北部边境与回鹘所建立的王朝（喀喇汗王朝）接壤并产生联系。[4]

长期以来，塔吉克人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泽拉夫善河流域的布哈拉河费尔干纳的浩罕汗国各地，一部分居住在希瓦汗国和哈萨克汗国奇姆肯特等地。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吉萨尔、喀拉提锦等地，存在着一些半独立的小公国，有时是布哈拉等汗国的附庸。因此，这一时期塔吉克人的历史是和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希瓦汗国等的历史分不开的”。[5]13世纪，这一区域被蒙古人所征服，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14～15世纪属于帖木儿帝国，16世纪开始成为布哈拉汗国的一部分。到19世纪，随着阿富汗王国的建立，原来居住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大部分塔吉克人，被人为地与居住在中亚的塔吉克人分隔开来，而中亚的大部分塔吉克人则又居住在布哈拉汗国与浩罕汗国的各个城市、费尔干纳盆地和绿洲当中，此外，也有一些人居住在现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山区的半独立领地中，少数居住在希瓦汗国的赫尔哈萨克汗国的城市，如奥李阿塔、奇姆肯特以及中国新疆等地，在北印度和现属伊朗的呼罗珊也有相当多的塔吉克人居住。[6]

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亚塔吉克人的发展轨迹。在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在欧洲方向西进的势头被逆转，遂转而将扩张的矛头转向东方，中亚就是其中的一大方向。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对当时中亚诸汗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征服。1864年9月，俄军攻占浩罕汗国重镇奇姆肯特，次年占领塔什干，1866年又先后夺取忽毡（今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以及乌拉秋别等战略要地。1868年，俄军控制塔吉克斯坦北部区域和帕米尔地区。1876年2月，俄国彻底攻灭浩罕汗国，改建为费尔干纳省，随后逐步控制哈萨克斯坦中部和南部地区。1892年，俄国彻底完成对塔吉克斯坦地区的征服。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生活在中亚地区的民众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族群的区别，还没有清晰的民族-地域认知。[7]

苏联在中亚地区的行政改革真正确立了明晰的中亚民族-地域认知，并从行政层面固化了中亚的民族区域结构，塑造了塔吉克斯坦的当代疆域与认同。1918年，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随后，根据苏联中亚民族区域划界的相关原则，1924年10月14日成立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隶属于当时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该自治共和国的领土面积为13.56万平方千米，人口约82.6万人，其中塔吉克人

有62万人，约占自治共和国人口总数的75%。1929年6月，苏联政府将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同年10月16日，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脱离乌兹别克共和国建制，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平行，同年12月5日完成加入苏联的全部程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这是历史上首次在这一地区建立以塔吉克命名的国家。就塔吉克斯坦当代国家形成的地缘结构而言，苏联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亚地区进行的民族划界对塔吉克斯坦造成了多重影响，一方面塑造了延续至今的塔吉克斯坦版图，并在此基础上为塔吉克斯坦参与当代国际事务奠定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则造就了苏联中亚诸加盟共和国中唯一一个以非突厥语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共和国，其与其他四国在文化与宗教认同层面形成了微妙的差别。此外，塔吉克斯坦“虽地处丛山之间，但它扼东西交通之要冲，又处当时苏联边防前哨，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可能是苏联政府决定把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的重要原因”。[8]

1929年起，塔吉克斯坦按照苏联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开始推进农业集体化。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得到联盟中央政府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苏联政府还从俄罗斯等地派出大量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前往当地进行技术指导。在前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2，1933～1937）期间，当地经济发展的近80%资金由联盟中央政府提供。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又有计划地将许多工厂设备和技术专家从西部地区迁徙到中亚地区，其中就包括塔吉克斯坦。而与此同时，塔吉克斯坦也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支援苏联西部战场。在政治层面，1933年塔吉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克苏姆遭到批判和罢免，这揭开了斯大林在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最高领导层中进行清洗的大幕，一直持续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

在古代，由于塔吉克斯坦的区域认同尚未形成，因此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其的认知，都以对当时西域乃至波斯帝国、萨曼王朝、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希瓦汗国的认识而表现出来，这种认知往往与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当代中亚诸国的历史认知杂糅在一起。

近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塔吉克斯坦的认知形成是较晚近的事，基本上是伴随着塔吉克斯坦作为一个同时具备较为明确的族群与地域指向的名称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从总体来看，近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于塔吉克斯坦的认知框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对塔吉克人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认知，这种认知相对而言比较连贯，并且中国国内已存在被称为“塔回”的部分塔吉克族（即便当时还没有正式认定），因此其成为构筑近代塔吉克斯坦认知的主要载体；另一部分则是在对俄国-苏联整体认知的空间下，对于其下属行政单位的塔吉克斯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发展状况的认知，这种认知建基于俄国-苏联国情以及当时中俄、中苏关系的总体状况，并受国际地缘环境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近代中国视野中塔吉克斯坦形象的呈现是一个由粗略到详细逐步递进与展开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从传统王朝视角的边地叙述向中苏关系总体框架下的对苏联中亚区域的相应认知的转变。

从具体的时间线来看，由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一级的塔吉克斯坦直到1929年才正式建立，因此，该信息反馈回中国知识界自然也是较为晚近的事情。就笔者掌握的信息，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国内出版物中，才正式出现塔吉克斯坦的零星信息。在著名的边疆研究学者华企云所写的《中国边疆》一书中，第三章“边疆邻接各地之地理概况与最近民族运动之鸟瞰”对“中亚细亚”做了专节介绍，并列出了中亚的三个共和国，分别为吉尔吉思（Kirghiz）自治共和国、土可曼（Turcoman）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乌兹伯克（Uzbek）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并指出，在土可曼东内有达辑克（Tadzhik）自治共和国，后面又在注释中称，达辑克一译托辑克，即Tadzhik。[9]该书敏锐地注意到中亚对中国边疆稳定的重要性，但在当时的中亚行政区划方面，所呈现的信息有所滞后，将当时已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塔吉克斯坦归并到土库曼斯坦境内，而实际上，即便是在升格为加盟共和国之前，塔吉克斯坦也是从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内知识界对塔吉克斯

坦乃至中亚行政区划知识的缺失与误差，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与域外知识之间存在的某种断裂与脱节，这也正是当时贫弱的中国无力有效拓展对外视野的一个例证。

尽管当时的知识界对于苏联中亚的情况所知甚少，但依然有一些报纸文章为当时的国内知识界提供部分信息。例如，在1935年，《大公报》刊登名为《中央亚细亚一带的民族》的文章，记述了苏联中亚的自然环境以及历史上的中亚民族状况，并在“各民族小史及其现状”下的“印欧族”部分记述了中亚塔吉克民族的情况。文中写道：“一提到亚洲内陆，往往使人想到重叠的山岭、辽阔的草原、荒凉的沙漠，以及常年跋涉的骆驼队。这种印象也可说有相当的正确，然而近若干年来经各野心国家的积极经营，虽说尚是开发初期，然已大改其本来面目了……塔吉克人（Tadjik），多在阿富汗及塔吉克苏维埃共和国，奉回教，为依兰族之一支，业游牧或半游牧。中国人皆以其为缠回同宗。其交通方法，驴骡较骆驼更重要，盖居地多山岭故也。在新疆境内者称为塔回，语言属伊兰语系。”[10]该文在对苏联中亚现状加以介绍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境外塔吉克民族及其信仰的基本信息，并顺便介绍了中国境内的相关跨界民族状况。

随着中国抗战的全面爆发和苏联对华援助的推进，中国知识界对苏联国情的认识也日渐增多，国内报刊开始大量刊载关于苏联革命、外交与建设的文章，其中就包含对苏联中亚及内部各加盟共和国情况的介绍，部分内容涉及塔吉克斯坦。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中国关于苏联政治军事时局的报道猛然增多，开始出现对位于苏联中亚地区的塔吉克斯坦相关信息的专门报道。

1941年，《新闻类编》转引苏联《消息报》刊载的由时任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加福罗夫（也译为加富罗夫）撰写的《抗战中的塔吉克斯坦》一文，其中写道：“塔吉克人民的儿女们，正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乔治亚（即格鲁吉亚——引者注）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兹伯克人，并肩携手，英勇地对希特勒股匪作战，或者在后方，以光辉的劳动帮助创造红军的胜利。”[11]1942年，中国译介出版了苏联学者杜勃洛夫斯基等著的《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一书。该书分述当时各加盟共和国（含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自然地理、历史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状况，其中专章叙述了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情况。1943年，《中央亚细亚》杂志刊发《苏领中亚经济地理》

一文，其中写道："大食共和国。'大食'（Tadghik），普通地图多译作'达辑克'，其面积约与中国河北省相等，为中亚面积最小之国。位于中亚之最东南部，东接中国新疆，南接阿富汗，北邻启尔吉兹，西邻月即别；其区域因系从民族的条件，故国境曲折很大，尤其北方远及斐加纳峡谷，深入月即别领内。"[12]之后又进一步对该国的自然环境、住民与产业、主要城市等相关信息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同年，《大公报》刊发总题为《发展中的中央亚细亚一瞥》的系列报道，该报道译自曼得尔（W. M. Mandel）的英文文章（原文刊发于1943年2月号《太平洋杂志》），全面介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相关情况，其中写道："中央亚细亚是乌兹贝克、卡查赫（即哈萨克——引者注）、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土克曼人民历史上的定居地，并且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地方。这些民族住着整整同半个美国大的领域。它在东方一千英里和新疆毗邻，往西一直张伸到距史达林格勒不到一百英里，距阿斯特拉罕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没有什么疑义，德国的炸弹早已落到过卡查赫共和国的地面上了。"[13]

二战结束之后，作为同时遭受巨大战争损失的同盟国家，中国和苏联同样面临着艰巨的战后重建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苏联在社会建设方面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建设经验，就成为当时中国报章关注的主要议题。在这当中，就有对一度处于落后局面的塔吉克斯坦建设与发展情况的专门介绍。例如，1947年《瀚海潮》杂志刊发《特辑：苏联中亚细亚五共和国展望：突飞猛进中的塔吉克斯坦：附山地巴达赫山自治省》一文，全面介绍了塔吉克斯坦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这是近代中文报刊中关于塔吉克斯坦状况介绍最为详细的。该文写道："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The Tadjik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位于中亚细亚之东南部，在此地，苏联跟印度的交界，仅仅距离十五公里之遥，只有属于阿富汗的一条很窄狭的地方，在他们中间分隔着……塔吉克斯坦（Tadjikstan），也就是塔吉克共和国，面积共有十四万二千三百平方公里，人口共有一百五十万人，在全国居民之中当以塔吉克人为主，其次有俄罗斯人、乌孜别克人、柯尔克孜人等杂居。首都为斯塔林那巴德（Stalinabad），全城共有居民八万三千人，过去此地旧名为邱单璧（Diushanbe），乃一穷僻之乡村，如今一变而为全共和国之政治、文化、经济、工业等之中心……文化方面，塔吉克斯坦在苏联革命前，居民之中仅有百分之零五认识字的，而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在文化方面的情形，是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的确，这也是苏联对于小民族，特别文化低的民族，所惯用的文化政策。塔吉克人是土厥

种，原有其阿拉伯的经典文字，今天的塔吉克人，便直接由拉丁化的塔吉克文而一跃为俄罗斯化的塔吉克文矣；在这方面的成功，自然是苏联文化思想统制政策的结果，这是可想而知的。这里在全国实行着全民教育，建有各种文化教育机关、戏院、电影院等。并有苏联科学研究院的支部之设……在帕米尔，有山地巴达赫山自治省，也在塔吉克共和国组织之内。目前在帕米尔扩大了耕种面积，首先在东部帕米尔建立了农业，栽培萝卜、白菜、土豆和大麦。在四千公尺高度的地方，组织了'帕米尔'国家牧畜农场，建设有学校、医院、电影院。直到如今，在帕米尔所用的燃料，还是野草的茎根之类，仅仅不久的时候，在穆尔干布地方附近，才开始挖掘煤矿，也同时发现出了其他有价值之矿产（如光学上用的弗素F）……总之，塔吉克斯坦是苏联中亚共和国之一，更是接壤与我国新疆、阿富汗，以及经阿富汗走廊觊觎印度之基地，因此该共和国之一切，均有积极之努力与发展，就一点而论：帕米尔之地为迄今中英俄尚未经明定界务之处，而苏联不但已有自定之界，且该处一切早为详细考究矣。故该共和国之突飞猛进，亦有其鹄的也。"[14]947年也是俄国十月革命30周年，当年11月，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在南京以中文编印《三十年来的苏联》一书，对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1948年的《塔兹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毗连我新疆省的三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附照片》一文则系统介绍了苏联中亚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情况，在关于塔吉克斯坦的部分这样写道："图画一般的塔兹克和吉尔吉斯两共和国都在中央亚西亚，而且是紧紧相邻的。疆域全是山地，在苏联各邦中地势最高。各拥有人口一百五十余万。给乌兹别克、土尔克曼及哈萨克等国供给水源及灌溉田地的大河如阿穆·达亚、塞尔·达亚等河流，均由塔兹克及吉尔吉斯的高峰中发源。这两国的土地只有极小部分是谷地及山坡。塔兹克共和国，面积等于瑞士的四倍，从前属于布哈拉土酋，后来成为乌兹别克共和国的自治邦，到一九二九年方成立为完全共和国，居民和中亚别的国家不同，不是鞑靼而是伊朗血统，一般都认为他们是中亚最古的民族。高身材，直鼻子，往往是蓝眼睛，也许他们和雅利安人的关系比日耳曼人或西方其他诺曼地人（Nordic）更为接近一些……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塔兹克在全俄中还是最贫穷最落伍的民族，例如，仅就他们城市的名字而论，像寇得干（Khodzhent）——现称列宁哈巴特（Leninabad）——那时候就被称为'永远负债的地方''吃牛粪的地方''永远不知面包味道的地方'，等等，这就可以充分证明他们的穷困生活。那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是用野菜做的饼子。沙皇统治下仅有千分之五的人民是识字的，沙皇统治以

前大约也是如此，到了今天识字人数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了……塔兹克人有一句奇怪的话：‘我们的南方就是北方。’这却真是事实，因为只有北境气候比较温和，土地比较平坦，埃及棉及各种果品产量甚富。南境全是高山，天山山脉横亘其间，帕米尔高原就在最南方。帕米尔像一个巨人，站在那里，把中国、印度和苏联三国分开。它是全中亚的分水岭，有‘世界屋脊’之称。”[15]

总体来说，近代中国的塔吉克斯坦认知经历了这样几个主要阶段。（1）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塔吉克斯坦区域成立单独政区（1924）或建立加盟共和国（1929）相关信息在中国传播的滞后性，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区域的相关认知主要建立在对历史上的波斯帝国、萨曼王朝、帖木儿帝国及布哈拉汗国的基础上，此外还包括对如今部分属于塔吉克斯坦的帕米尔地区的历史认知，国内知识界还没有形成对塔吉克斯坦区域的清晰认知。（2）20世纪30年代，随着1929年塔吉克斯坦升级为联盟一级的加盟共和国，以及国内对苏联国情介绍的深入，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认知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有了对该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基本认知，但这种基本认知的信息量较少，主要还是在对苏联中亚地区的相关介绍中顺带提及。（3）20世纪40年代，随着二战中中苏同盟关系的深化，以及战后国内重建的需要，苏联形象和苏联经验成为当时国内报章的一大关注重点，受此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塔吉克斯坦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尤其是对其社会建设和改革有重点的关注。当然，这一时期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相关认知，基本服从于当时中苏关系的总体状况，尤其是两国间的外交关系格局。

结语：重新关注与重新发现

中亚曾经具有其自身的中心地位，但长期以来，它在生活在中亚之外的人的眼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黑洞”式景观，既让人着迷，又让人惧怕，并往往让我们忽视了其在历史与地缘秩序中曾经扮演的世界性角色。正如贡德·弗兰克在其著名的《中亚的中央性》一文中所提示我们的：“中亚之所以是一个黑洞，就在于它必须引起世界体系史研究的关注甚至热情。但是，中亚可能仍然是世界及其历史当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视的部分。之所以造成这种忽视，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历史绝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将其胜利合法化的胜利者所书写的。而中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是一些胜利者的家园，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要么记述了一些历史，要么留下了一部分历史遗迹。随后，自15世纪以来，中亚民众在两方面几乎都成为失败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别人，而他们所在的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16]如今，作为一个正在重新崛起中的大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外认知视野的拓展不应仅局限于对欧美诸国的既有认知，还应对欧亚大陆乃至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域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唯此方能确立起当代中国的整体国际视野。在新的“中亚问题”语境下，如何在更大的世界体系范围内认识中亚，如何以更具连续性的视野来观察和认识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诸国，进而形成一种兼顾民族文化主体认知与民族国家主体认知的新中亚认知图景，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中亚四国兼具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国家在近代历史中的形成，既有其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也跟苏联当时的中亚政策息息相关，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塔吉克斯坦的正式独立，新世界体系与欧亚地缘政治格局下的塔吉克斯坦国家认同正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强化，这也将反过来对塔吉克斯坦自身的历史书写与认同产生影响。作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邻国，中国正在逐步面对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其自身历史与现实认同的国际法意义上的新生国家，也必然会面临与塔吉克斯坦在国家-民族历史、历史-现实族体身份认同等相关议题方面的分歧与挑战，因此我们本身的塔吉克斯坦认知同样需要丰富和完善，需要建立起兼顾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整体认识图景，唯此才能形成一个具体而全面的塔吉克斯坦形象。从本质上说，认识他者即在认识自我，探究近代中国视野中的塔吉克斯

坦形象变迁，是一个重新“发现”塔吉克斯坦的过程，也必将是一个全面认识中亚、进而重塑中国对外认知完整图景的必经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将深化对中国本身的思考与认知。

[1]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35页。

[2] 〔苏〕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上古—十九世纪上半叶）》，肖之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76～177页。

[3] 张绪山：《萨珊波斯帝国与中国—拜占庭文化交流》，《全球史评论》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 马雍：《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5期。

[5]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140页。

[6] 参见〔苏〕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上古—十九世纪上半叶）》，第363页。

[7] Geoffrey Wheeler，*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5，p. 7.

[8]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第239页。

[9] 华企云：《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1932，第99～100页。

[10] 李秀洁：《中央亚细亚一带的民族》，《大公报》1935年3月22日，第11版。

[11] 加福罗夫：《消息报专文：抗战中的塔吉克斯坦》，《新闻类编》第126期，1941年，第2页。

[12] 魏聿宏：《苏领中亚经济地理（续完）》，《中央亚细亚》第2卷第4期，1943年，第79页。

[13] 《发展中的中央亚细亚一瞥（一）》，《大公报》1943年6月15日，第4版。

[14] 马迅如：《特辑：苏联中亚细亚五共和国展望：突飞猛进中的塔吉克斯坦：附山地巴达赫山自治省》，《瀚海潮》第1卷第9期，1947年，第11～13页。

[15] 〔美〕拉芒特：《塔兹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毗连我新疆省的三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附照片》，《中学生》第197期，1948年，第36～38页。

[16] Andre Gunder Frank，“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in*

History , Vol.8 , No.1 , 1992 , pp.43-97.

第七章 国运之镜：阿富汗形象的历史之变

> 这个帝国的疆界：北部和东部有高大的山脉，南部和西部则有辽阔的沙漠，构成一种使外来的敌人望而生畏的天然防御。这个国家的总貌是荒凉可怕的；在人们的想象中，它是妖魔鬼怪经常出没之所。但这种印象并不是没有变化的，因为在山谷中和平原上也还有着比较优美的景色。在那里，栽种着农作物的田野笑脸迎人，农夫在忙碌地劳作。[1]

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阿富汗，这个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缘背景下具有不同面相的中国陆上邻国，如今在诸多媒体中被贴上“帝国坟墓”的标签，并以其战争与混乱特质而成为当代公众认知的一般性基础。

认知的构筑既在于现实，又关乎历史。如果我们从时间维度来加以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对于阿富汗的一般性认知在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极大的转变。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与中国、阿富汗两国之间政治、社会的“双速发展”有关，同时与两国所面临的不同内外部环境有关。近代中国的对外认知，受当时整体环境的影响，“揖欧追美”自然成为主流观念，对于在这之外的其他区域的认知则往往附属于欧美认知，或者干脆处于边缘甚至遗忘的位置，处于整个对外认知链条的末端。近代中国视野下的阿富汗，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近代中国周边与世界认知的不同面相，又反过来印证着中国近代自我认知内部的不同路径。

作为“分隔空间”的阿富汗：理解的起点

阿富汗位于广义上的中亚区域，是一个内陆国家，领土面积约65万平方千米，其北部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东部与中国接壤，东南与巴基斯坦相接，西部则与伊朗相邻，人口约3500万人，首都为喀布尔。

不管是在历史时期还是在当代，阿富汗一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因此成为周边和域外大国力量博弈的重要舞台，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周边和域外大国的历史进程。这种态势，随着整个欧亚格局的调整，越到近代，表现得越明显。正如恩格斯所言：“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征，使这个国家在中亚细亚的事务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作用。”[2]例如，英俄之间围绕阿富汗等地所展开的“大博弈”就深深影响了英俄两强在世界其他区域的扩张步伐甚至内部政治走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阿富汗的政治军事“泥淖”更是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的内部资源，为其90年代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及其后续行动更是影响至今，深刻塑造了中亚甚至东亚的当代政治地缘结构。

当然，阿富汗这一关键地缘位置的确立并非外部力量“压力”的产物，而是其内部发展的外溢性结果，正如英国学者珀西·塞克斯所指出的：“从某种观点来说，阿富汗是个把幼发拉底河文明同印度河文明和乌浒河文明互相分开的山区地带。还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连接中亚细亚与印度平原的许多商路的必经之地，那里有着喀布尔、赫拉特和坎大哈这些通常被称为印度锁钥的城市……再有，骁勇的阿富汗人不仅屡次侵掠过富庶的印度平原，而且还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开拓过王国。他们还曾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支配过波斯。”[3]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富汗自身的主体性更多地体现为其充当了大文明“分隔空间”的角色，其连接中亚与印度平原的“中介空间”特质处于附属地位，这与一般意义上我们对诸多国家（如苏联中亚五国）主要表现为“中介空间”的定位截然不同。

此外，“由于其位置正好横跨东亚、南亚和中东地区之间的古代贸易和军事通道，致使阿富汗一度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地。然而在现代，阿富汗却充当了英、俄这两个膨胀帝国的终结点。由于其令人生畏的地形

和贫瘠的自然资源，两大帝国最终都满足于使阿富汗作为缓冲国继续存在，将其置于他们的正式控制之外，也置于当时已经延伸穿越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铁路、电信和文化的基础设施网络之外”。[4]

可以说，阿富汗国家自身的独特历史与传统，以及其地缘区域特质，成为我们认识和思考阿富汗形象变迁的重要基础。正因如此，当我们试图分析和认识阿富汗在当代中国视野中的具体图景的时候，历史的脉络必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过程。而同时，我们注意到，在近代中国对外认知的流变中，中国本身存在着两大政治上的“断裂”。首先是清朝从包有天下的传统国家结构转为受外部列强压制并被迫接受现实政治的现代国家结构，其次则是从帝制的清朝向共和的中华民国的国体变革，这两方面的转变体现在对外视野方面，就出现了从传统帝国视角向一般民族国家视角的转变，这种转变本身使得关注重心也渐次转移，从维护既有的宗藩秩序与天下格局逐步转变为认知外域空间及其地缘动态，所关注的群体也逐渐“下沉”，从最高领导层逐渐向君主领导下的中高层群体转变，从而逐渐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外部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阿富汗所处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与如今的周边态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内部动力相比，外部压力在形塑阿富汗国家性方面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有着漫长历史与传统的国家，阿富汗具有自身的独特性，“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他们只从事畜牧业或农业，想方设法避开手工业和商业，他们抱着鄙视的态度让印度人和其他城市居民去从事这些行业。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遣和摆脱单调的营生的休息。阿富汗人分为若干克兰，大大小小的首领对他们实行类似封建的统治。只是他们对国家政权深恶痛绝，爱好各自独立，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而正是这种自发性和反复无常的行为使他们成了危险的邻居，他们受一时的情绪支配并且容易为那些能巧妙地引起他们激情的政治阴谋家迷惑”。[5]从民族与语言构成上看，它不像意大利或日本那样具有统一的民族或者语言，其内部存在数十个种族集团，并拥有许多不同的语言，它也不像澳大利亚或者希腊那样具有天然、可明显辨识的地理界限，甚至也没有像埃及尼罗河那样的著名标识。从地理上看，阿富汗的疆界被河流所限，没有海洋或者山脉作为天然疆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喜马拉雅山脉天然延伸的兴都库什山脉在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提供北部天然疆界的同时，将阿富汗一分为二，这种情况就使得阿富汗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很容易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侵扰，而移民得以从四面八方进入这个国家。直到1747年艾哈迈

德-沙赫建立杜兰尼帝国之前，除了作为更大的外来帝国的组成部分外，阿富汗本身从未被作为单一的国家加以统治过。在这之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阿富汗及其统治者一直努力避免受波斯、俄国和英国的控制，而这种抵抗常常会使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可以说，“这种对抗性独立本身为超越种族或部落忠诚的独特的阿富汗国家认同奠定了基础”。[6]

当然，正如笔者在本书第三章指出的，当我们在分析和认识哈萨克斯坦在当代中哈关系史中的具体图景，尤其是当代哈萨克斯坦在知识界的形象时，历史的图景本身必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过程。与之相比，阿富汗的情况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所谓相似性，是指阿富汗同样属于广义的中亚地区，在19世纪同样成为英俄帝国博弈的主战场，并在近现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先后成为英国、苏联的势力范围；所谓差异性，是指阿富汗所处的独特的地缘位置，使其在欧亚大陆尤其是大中亚的结构中成为帝国力量博弈的关键区域，也成为外域力量对本区域施加影响的重要着力点。

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在涉及阿富汗的形象认知方面，主要集中在中外交流史视角下对古代中国与阿富汗之间交流互动层面的研究，以及国际关系层面对当代阿富汗问题的研究。了解和认知近代中国知识界对阿富汗的态度观念变迁，并理解阿富汗在近代中国对外认知视野转变过程中的独特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时期的中国与周边空间。

从“爱乌罕”到“阿富汗”：叙述结构的转折

在传统中国的历史话语中，阿富汗往往以“爱乌罕”等名称出现。在近代中国的对外认知框架形塑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知识拼接”的阶段，即以外国的相关叙述为基础，再结合中国的历史记载以及外国的地图、语言信息，形成近代意义上最初的对外世界认知。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曾以“西南洋”为名来展现传统历史中对阿富汗的连续性叙述：“《皇清四裔考》曰：爱乌罕在巴达克山西南，部落最大。《汉书》：西逾葱岭，有北两道，北道出大宛，南道出大月氐，此当为大月氏地。有三大城，曰喀奔，曰堪达哈尔，曰默沙特。喀奔城南北西面山，东面平旷。堪达哈尔城四面俱山，其汗爱哈默特沙居之。默沙特城旧属伊兰，爱哈默特沙征取之，统治三城。事耕种，无游牧。胜兵十五万，军器鸟枪、腰刀之属，无工矢。善田作，户有余粮。少物采，自兼并温都斯坦部后，资其金丝缎匹，物力加丰。亦有奄竖，多取诸温都斯坦。商人不至其国。乾隆二十四年大兵逐霍集占，将入爱乌罕境，为巴达克山酋素尔坦沙擒献，其属下有奔爱乌罕者，唆其兴师问罪于巴达克山，素尔坦沙惧，遣使具言诸不得已状。爱哈默特沙云：大清国地广人稠，见于记载，未知道路远近，今拟与尔部偕往投诚。遂屡贡焉（案：爱乌罕，亦作阿布额尼，亦作甲布尔）……”进而又叙述道：“阿附干国即加布尔，在亚细亚洲中，印度之西北，北极出地二十八度起至三十六度止，经线自东五十七度起至七十度止。东至塞哥国，西连白尔西亚国，南接北罗吉国，北界达尔给国，长三千二百余里，宽约二千里，地面积方约五万二千七百余里，烟户四兆二亿口。本国地势，东南、西南平原坦阔，其余各方峻岭重叠。”[7]

上述的记述，从具体的叙述模式来看，鲜明代表着中国近代西式的分国叙述方式，正是在“开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中，这种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官史叙述方式被糅合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由藩属叙述向外域叙述转变的标志性文本类型。在这里，原本主要强调延续性的历时性叙述结构，在一个已经面临地缘政治挑战并逐步失却中心位置的亚洲新秩序及其历史现实面前，开始逐步让位于主要强调差异性的共时状态下的分国叙述结构。这种由叙述结构转变而形成的文本类型，实际上成为我们后来认知周边各国所惯常采用的叙述模式，那就是将在古代中国羁縻治理下的藩属国（或地域）历史的线性叙述纳入近代逐步形成的、基于地理区域划分（如亚洲内部的次区域划分等）的并与中国具有相同

结构性位置的民族国家的结构框架中。这种叙述结构的转变意味着“历史中国”及其传统外围秩序的叙述中心性正在逐步消解，而“现代中国”及其周边世界的叙述模式正在形成。关于阿富汗叙述的变化，正是这种叙述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例证。

三次流变：近代阿富汗的中国“投影”

漫长的18世纪，世界格局出现新的调整，中国与世界各自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在欧洲，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洪流，欧洲殖民帝国正全力推进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工业与军事输出，并将大片区域转变为各自获取原材料并倾销制成品的殖民地。中国则经历了明清鼎革，开始进入“康乾盛世”的漫长稳定期。进入19世纪，欧洲国家在亚洲的力量进一步拓展，随着俄国对中亚地区的逐步控制和对清朝形成巨大的北部压力，以及英、法等殖民帝国力量在东南、西南方向对清朝形成巨大冲击，东亚传统政治秩序逐步松动、瓦解，这一情况反过来刺激着近代中国的知识界“开眼看世界”，开始全面关注周边国家的情况。

同一时期的阿富汗，经历了国家正式形成和王朝更替的两大转变。之前的“阿富汗曾先后受莫卧儿和波斯人的统治。在不列颠人来到印度海岸以前，印度斯坦平原受到的外敌入侵总是来自阿富汗。马茂德大苏丹、成吉思汗、塔梅尔兰和纳迪尔-沙赫，都是走这条道路。1747年，纳迪尔死后，在这个军事冒险家的手下学会了兵法的阿罕默德-沙赫（即艾哈迈德-沙赫——引者注），决心挣脱波斯人的枷锁。在他治理下，阿富汗达到了它在近代最辉煌和繁荣的地步”。[8]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实际上扼要概括了阿富汗在18世纪关键性的统一进程。在1747年，阿富汗普什图酋长艾哈迈德-沙赫开始拓展其控制区域，并在随后的岁月里成功统一了所有普什图部落，普什图民族意识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他以个人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真诚的宗教情感赢得了大批追随者，但他缺乏对行政事务的兴趣，而这恰恰可能是把一个部落联盟转变成一个真正民族国家的关键所在。”[9]

到了19世纪，阿富汗开始逐步与英俄力量接触。1809年，舒贾成为首个接待英国正式使团的阿富汗统治者。而与此同时，俄国于19世纪20年代吞并了哈萨克草原，并开始觊觎杜兰尼王朝控制下的阿富汗土地。1839～1842年，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1863年，多斯特·穆罕默德去世，其子希尔·阿里继位，一直统治到1868年。1872年，在英俄大博弈的背景下，为避免双方的直接冲突，英俄确立了阿富汗的北部边界。1878～1880年，第二次英阿战争爆发。从1880年至1901年，阿富汗处于阿卜拉·拉赫曼汗的统治之下；1893年，阿富汗与英属印度之间的“杜兰德边界线”得以确立。总体而言，到1878年，随着英国占领阿富汗，

清朝官方与阿富汗的交往遂告中断。当中国进入近代之际，阿富汗也开始与周边的殖民帝国发生重大冲突，而这些冲突所导致的后续影响则一直持续并不断发酵；与此同时，随着近代媒体的出现与发展，中国知识界开始了解近代阿富汗的具体国情与变革动荡。

1.1875～1880年：近代阿富汗认知的起步期

早在1875年，《申报》即以《波斯与阿富汗失和》为题，记述了阿富汗的相关情况。文中写道："昨得一电音，述悉波斯国现与阿富汗有失和之信，不知所启何衅，且未知其用兵与否，容后有信来再述。该处居印之西北，与回部、准部各地似有犬牙相错之势，未知与喀酋军事有无交涉耳。"[10]这是笔者查到的国内中文报纸首次以"阿富汗"为名进行的相关报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一报道将近代阿富汗与历史上中国对于阿富汗（爱乌罕）的认知第一次区分开来，并成为之后国内认知阿富汗及其地缘国情的基础。在接下去的几年里，《申报》多次就阿富汗与英国势力之间的冲突进行报道。此外，1879年的《万国公报》也记载："电报云，英兵至阿富汗，王亲至营垒，京城颇有乱意，未知日后如何。"[11]

可以说，1875～1880年，是近代国内媒体关注阿富汗的起始阶段。正如《综论阿富汗事》一文中所指出的："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理易明，千古不易，故有国者欲治其国，必先靖内乱而后外患可除。承平之世，君明臣良，法立政理，可以无忧矣，而庙堂之上，尚有忧盛危明之意者，以其宴安无事，祸患隐于无形，不早防维，一旦猝发，其势往往不可收拾也。欧洲列国数十年间，渐有中国风气，政治之要，大概知之。盖通商以来，文书图籍，自东而西，一二儒者，遂举中国列代兴废之迹，与其国事参考，知其同异之故，于是为政大旨，亦不外此，往往著为议论，法戒昭然，与中国先儒之言，相为表里，故近来英法德美诸国，政事日臻美盛，惟其所尚者得其道也。然僻处之小邦，未能常与上国往来，识其政治之所法戒者，亦尚有之。如阿富汗之在西藏之西，而印度之西北也，地当两大沙漠之中，尚在亚细亚洲界内，而远与欧洲之英国有盟，永为属国……"[12]到了1891年，国内出现了第一本专门介绍阿富汗的作品——《阿富汗考略》[13]。在这之后，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当时的学部又编印了《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志》、《阿富汗斯坦志》和《阿富汗斯坦新志》，对阿富汗的相关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介绍。[14]

对近代阿富汗国情的认知，不仅是对外知识的简单拓展，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所折射出的正是中国在外部世界观上的重要转折。这是从作为道德空间的、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在外力压迫下确定了边界但依然拥有“天下想象”的以“大清”为国号的中国，开始承认自身处于一个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1898年以后，就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曾作为‘中国’不可避免的形式和保证人的王朝国家结构，而去设法解决中国与日俱增的危机的办法的时候，他们也首次开始将现代世界视作一段进行中的历史进程。”[15]而就事件的指示性而言，“它们帮助中国指明了一个基本问题和一个新的机遇。这个问题是：一个由历时性的达尔文主义所展示的世界，如何能够在势不可挡的欧美、日本强权的环境下被建造为全球重建的活跃场域。这个机遇是：这个世界如何能够被转变为一个普遍存在的舞台，来供中国人和同伴们反抗构成他们的共同世界的全球不均衡性。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上有意识地进入和建造的有关认同和接近的世界舞台的复杂形势；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种族、斗争、革命和关注亡国的意识，合并为一个共时的现代全球的时间性及不均衡的全球空间性，这便允许了中国和全球空间性的非中心化，并使得亚洲、太平洋、非洲和其他地方进入视野，它们不是作为惰性的地理名称或不幸的亡国之地，而是作为创造和表演崭新的全球、国家和地方的意义、实践、历史的具体场所出现的”。[16]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理解和认知外部及周边国家的历史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理解自身内部进程的一种重要折射。

2.1919～1923年：近代阿富汗认知的第一次高潮

进入民国时期，中国对阿富汗的认知出现了新的变化。之前有学者注意到这一时期国内对阿富汗认知存在缺失的问题。[17]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加以细致梳理和分析的话，就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对阿富汗的认知依然在进一步推进。当然，这种认知推进，其关注议题本身也往往与中国国内的政治社会变动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从1901年至1919年，阿富汗处于哈比布拉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阿富汗在政治、社会与思想层面开始出现新的转变。其在1903年建立了第一所近代中学，次年与波斯明确了陆地边界；与此同时，阿富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持中立。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近代中国也经历着深刻的政治、社会与思想变迁，清末新政艰难推进，辛亥革命爆发，清

朝覆灭，中华民国建立。这些接踵而至的急速变革为近代中国知识界催生了新的对外认知需求，并使中国试图在对外域各国的认知中获得改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1912年，《东方杂志》记述了阿富汗内乱的情况：“阿富汗之内乱……阿富汗之蒙古人及番民等约一万人，忽起叛乱，其势甚盛。阿富汗政府束手无策。此种乱民，不惟有极精之枪械，且系集尔硕族（阿富汗诸种族中人数最多之族，其势力独厚）为之倡始，其他各族，将不免为所煽动云。”[18]915年的《东方杂志》则有这样的记述：“……阿勒富海之左右岸，既为英突之战场，而波斯复有侵入俄境之谣。阿富汗亦有加兵印度之举，直接虽为不利于俄英，而间接则不利于法。吾国山东半岛中立之苦况，攒眉忍受，余痛未忘，自无暇游目西注，然而西北之危，亦不可不思患而预计之也。盖阿富汗者，与吾新疆仅隔一波谜罗者也。世界最高之山，既起顶于波谜罗高原，余支四颓，阿尔泰山、天山、昆仑，既定震旦山河两戒，其东南行者为希玛纳雅，是为藏卫印度之界山，西南行者曰因都哥士山，因都哥士又有支岭，曰苏里曼山，则南行而稍西者也。二山之交，印度河之西源发于是。是地即为阿富汗……清官书或谓之爱乌罕，爱乌罕之离波斯而唱独立也，在十八世纪之十年。是时俄人既下突厥斯坦，英人亦挟全力经营五印度，而波斯适当中央亚细亚之咽喉。英俄方交恶，各争其地，以为己屏翰。以一孱国介于狞狮猛鹫之间，而又不善应付，致丧其北鄙数州，而波谜罗高原，亦为俄所蚕食。俄英属地，仅阿富汗支格其间……”[19]该文将阿富汗所处的历史与现实地缘重要性凸显了出来，并注意到了该国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影响。1918年，《英语周刊》刊载了阿富汗国王的照片，这是国内报章首次刊载该国元首的照片。[20]

1919年，哈比布拉遇害，其子阿马努拉继位。从1919年到1929年的十年，是其在马赫茂德·塔尔齐（1865～1933）协助下对阿富汗进行改革的十年。马赫茂德·塔尔齐是阿马努拉的岳父，他作为20世纪初亚洲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在创立现代阿富汗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919年的第三次英阿战争中，阿富汗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同年，阿富汗与新生的苏俄签订友好协定，稳定了其北部形势。1923年，阿富汗通过了历史上首部宪法。1926年，其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后来还爆发了北伐战争，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改革和革命期待，促使中国知识界极大扩大了对外域知识的认知范围。阿富汗的十年改革，因其同为被压迫国家的地位以及重要的

改革成效，而经由中国报章的介绍被知识界所知晓，并在民众对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深切期待中，形成近代中国认知阿富汗的第一波高潮。其最主要时限为1919～1921年，并延续至未来的几年。

例如在1919年，当时的报章就专门报道了英属印度与阿富汗之间的协议。[21]到1921年，《东方杂志》连续报道阿富汗问题，其中指出："阿富汗位于中亚细亚，虽为一蛮荒之国土，然在地形上，则为近东外交之门户，其地向为英俄两国所争逐，大战之后，形势又复变易。"[22]921年3月17日又记载道："俄劳农政府近与阿富汗签订一约，俄国承认阿富汗之完全独立，并允每年以金卢布或银卢布一百万枚津贴阿富汗政府。约中与英国有关之重要条款，为双方不得与第三国缔结与今缔约国一方面有害之军事或政治条约。"[23]923年，《外省警务实录：新省知阿富汗局部通商》中记载"新疆杨督军近与阿富汗国王订立局部通商之约，内容共分十项"等事宜。[24]同年，《社会学杂志》刊载陈绍南所写的《研究社会学与社会问题之资料：阿富汗人婚娶之礼》一文，该文可以被视为国内专门研究阿富汗婚礼习俗的最早文献。[25]925年，《记阿富汗王国》一文写道："阿富汗为我国之西邻，乃亚洲西部之独立王国。其地……西界波斯，居民除阿富汗人外，有蒙古人、印度人及波斯人，奉回回教为正教。其人民与外界甚少往还，禁止外人自由往其国内游历，故能言其风土人情者甚少。其首府喀布尔，地当交通孔道，军事商务，均关重要……"[26]同年的一份报道还专门论述了阿富汗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问题："中亚细亚阿富汗国与我国派使议约一事，喧传已久，迄未实现。兹据外交方面消息，中阿两国间距离最近，关于商务关系，甚为密切，两国派使议约，颇有刻不容缓之势，顷闻新阿局部通商条约，现已议定妥协，兹觅得双方条约全文，照录如下。关于新阿临时局部通商条约条件草案，中华民国新疆官府、阿富汗国政府欲互通商，增进双方人民利益，以互相获益之临时条约规定之，因是互派专员，在新疆哈什噶尔（即喀什噶尔——引者注）道属之莎车县开议论云"。[27]

3.1927～1931年：近代阿富汗认知的第二次高潮

1927年，阿富汗首次发行统一的货币阿富汗尼，同时在政治社会层面呈现全速发展态势。而当时的中国，经过北伐战争，随后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知识界对于国家建设的期待日渐深化，这同样反映在对周边邻国的认知层面。从1927年至1931年，国内大量报道了阿富

汗的相关问题，形成中国阿富汗认知的第二次高潮。

在1927年的相关报道中，有文章指出："阿富汗向取闭关政策，但现在已派遣领事一名驻扎印度，经理对外商业、国内道路，近两年大有进步，本年度拟添筑大路若干条，以便输运，铁路尚未举办，近来已有意从事建筑，并向美国访问铁路材料市况。至于天然富源之地藏，尚无详细调查，就已知者而言，铁矿、煤矿及宝石矿颇为丰富，又可供耕牧之地，面积甚大。国内无银行，商业买卖大都用卢比，每年进出口货各约值银币一千万元，主要出口货为瓜果、羊毛、手巾及地毯，主要进口货为棉制匹头货、棉纱、革制品、五金制品、衣饰、燃料、汽车及漆。"[28]同年的《东方杂志》则以更直白明了的语言，介绍了阿富汗所处的独特地缘位置："苏俄的外交，真来得厉害，以英国张伯伦那样的手腕，然而到处碰壁，现在苏俄的外交，又在阿富汗方面得胜了，是怎样一回事呢？据莫斯科官报称，苏俄与阿富汗的协议成立了，已于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喀布尔阿米尔夏宫签字。这自然是一桩外交上的重大事件，是英国报纸所认为最可注意的事件，因为阿富汗是介在印度与俄领土耳其斯坦间的一个缓冲国，现在折而入于俄国一方面了。"[29]同样在当年发表的《现代史料：阿富汗的现状（附图）》一文，对阿富汗的历史、政治、经济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这是国内报章第一次全面介绍阿富汗基本国情。文中这样写道："阿富汗的地位，在历史上向来是重要的。马其顿人、波斯人、蒙古人他们想远征以达繁富的印度，皆取道于阿富汗，近代自英人并印以后，阿富汗便在印度帝国的规划之中。自俄国获得河中地区之后，以英俄接触的关系，阿富汗又处在缓冲国（Buffer State）的地位，于远东问题有重要关系，所以阿富汗独立国家的成立和存在是有国际的意义的。"[30]到了1928年，有报章开始将阿富汗看成一个"没有条约规定的新兴国"，文章指出："现时分散于欧洲、亚洲和其他各地的许多新兴国，除了由俄国分出来另外创立一国的芬兰、爱沙尼亚、立陶宛、莱多尼亚（即拉脱维亚——引者注）等国以外，不是经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便是由洛桑条约承认了。不过这多少也有除外的例子……那便是这里要说之中央亚细亚的新兴国阿富汗了。这也是和埃及一样，由脱去英国的羁绊而加入到独立国之例，并且也一样是没有条约上规定的独立国。这是新兴阿富汗和其他许多新兴国所不同的一个重要地方……一九一九年的战争，据英国方面的宣传是英军胜的，但我们从英国在战争后所缔结的条约上，完全承认了阿富汗的独立一点上说，也可见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属于英国方面的了。参加一九一九年英阿战争的英国将校说，一个阿富汗兵能够敌过四个英国兵，这大概不是欺

人之谈吧。总之，阿富汗的独立，不是由他们所恩赐下来的独立，而却是以铁和血夺得来的独立。”[31]《东方之又一土耳其：阿富汗》一文则更是不吝对阿富汗的称赞：“为了一个黄色面孔的小国王轰动了世界两个大城——巴黎和柏林的人民，法国政府挂灯结彩，给他包了巴黎第一个大旅社……柏林城中好像中了狂毒一般，我们想阿富汗一个新独立的无名小国，何以能这样受睥睨一切的德法政府的欢迎呢？德国有一个左党的报，说得好：‘我们不是欢迎别的，乃是欢迎阿富汗将来好做帝国主义者殖民地呵！’这确是一针见血的话！阿富汗是亚洲一个小国，界在苏俄、波斯、印度之间，本是英国的保护国。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才由今王‘阿麻奴拉’利用英俄正有事他方的时候，宣布独立。那时英国不肯承认，由印度出兵侵入阿境，想以武力征服，但是阿富汗得了俄人、德人的暗助，把英兵打败了。本年八月八日，订了和平条约；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英国正式承认为独立国家……阿富汗本是闭关自守、实业不振、交通不便的国家，虽经阿王数年的经营，至今还没有一条铁路在国内，但我们不能说是阿麻奴拉的能力薄弱，要知阿王登位才九年，中经阿英战争，虽时间不久，然耗费国力，一定不少，以一个闭塞不知近代工业为何物的国家，在八年中有了这种成绩，已经是可惊了。现在阿富汗的马路已满布全国，此外如近代工业、发电厂、机械厂、织造厂、军械厂都应有尽有，全国人民穿的都是本国工厂的布。阿王有次对一个新闻记者说：‘我国人民原来都是用英货，本国工厂初出货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购用。我后来以身作则，我的衣服完全采用国货，并且一面禁止政府的人员购用英布，上行下效，于是一般人民，都竞穿本国布为时髦了。’近年阿富汗的人民，差不多全用本国货。我写到这里，不免回想到我们祖国从前的情形，我们旧政府中的人，却和阿王的思想相反，而提倡的方法，则是一样。因为中国的大人先生们，未尝不以身作则，却是反转来提倡洋货。我记得有一种报上，记载关税会议的情形，说以‘印度绸’做桌布，表示中国政府的阔绰，我不知参加议税会议的委员，坐在这方阔绰的布前，做何感想呢！”[32]语气中充满着对作为小国的阿富汗独立自强的赞赏，以及对中国疲弱无能的“恨铁不成钢”之意。1928年的《阿富汗民族及其独立后的政治状况》一文则从革命救国的角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展开现代亚洲的舆图，就看见中国的地形像一片海棠叶儿摆在图上，附近这叶片的两端，各出现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叶柄这一端，是东邻日本，在叶尖那一端，是西邻阿富汗。阿富汗虽然还比不上日本那样富强，得到全世界人士的重视，但他的民族，勇敢强悍，却不在以‘武士道’自雄的大和民族之下。他们从奴隶的地位，追求

解放的幸福，不顾一切的牺牲，向大英帝国主义宣战，以铁以血，争得国家的独立自由。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中，他们是先驱者，并且是胜利者。他们近代的历史比起日本民族的，实在较为光荣。假使东邻是使我们畏惧，西邻却值得我们崇敬了……我们沦于'次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民众，正在国民革命斗争之中，西望帕米尔高原，庆幸得到一个英勇的邻族，我们革命的工作，不感着寂寞。虽然目前我们是孤军奋斗，但总希望将来彼此能联合战线，向着共同的敌人反攻，以求得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33]同年的《粉墨登场的阿富汗》一文则更是从国家比较的角度，凸显了阿富汗独立自强的重要意义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阿富汗国王这回访问亚欧两洲的各国，已引起世界政治家间的重大猜测了。这是因为阿富汗王是一个有作为并且有进步的思想的人，这回游历的目的，并不是为个人娱乐和靡费国帑，像许多印度王和其他人们一样。他的离开本国，实在是做一个世界政治的很认真的学生，要亲自得到这个问题的报告，和世界大政治家握手见面，使他以后能够对他的祖国服务格外有效力……阿富汗王是很明白一件事实，就是英俄两国倘若协力压迫阿富汗，阿富汗就不能保持它的独立，除非亚洲各民族和欧洲的若干国一致起来反抗这种举动。所以阿富汗王近来曾经说过，他相信国际联盟的原则是保障一切民族的领土完整后，可是他以为要保障亚洲独立必须组织一个亚洲的国际联盟。阿富汗王的这个信心好像就是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间积极友睦的根本，也就是阿富汗注意和印度、中国、日本接近联络的原因。讲到这里有一件应该注意的事，就是去年十一月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亚大会，本年第三回大会已经决定在卡布尔开了……阿富汗已经成为世界政治里边的一种原动力，它的重要将逐渐增加，所以和阿富汗没有土地接触的欧洲列强像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和亚洲的大国像日本、中国也都将特别注意于阿富汗对世界政治的态度，至于那土耳其和印度是不必说了。"[34]

但好景不长，1929年阿富汗内战爆发。哈比布拉短暂执政，随后进入那第尔统治时期。1931年，该国颁布新宪法。从1933年起，进入查希尔的漫长统治时期，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973年。1934年，阿富汗加入国联，同年与美国建交。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内战与建设交织的阶段，同时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与之相应，国内知识界的关注重心也转移到对阿富汗内部冲突的认识上。

1929年《阿富汗内战记》一书出版，这是中国国内第一本专述阿富汗内战的书。[35]在书中，作者记述了阿富汗由乱而治的历史。时任军

政部部长的陈仪在序中这样写道："在一八四二年间，猛听得锻银银一声铁链响，大英帝国主义者伸展他的魔手到亚洲来，既锁住了亚洲中部的中国，又键紧了亚洲西部的阿富汗。于是中国与阿富汗，丧失了自由，破损了主权，被人束缚了将近百年，喘不过气来。可是人类心力发动起来，什么东西也锁他不住的。'我们有我们的主权，我们有我们的自由，一二三，开步走，走，走，走。'走到一九一二年，中国武昌城轰的放出一声大响来，'国民革命！'一九一九年，阿富汗喀勃尔城中轰的放出一声大响来，'宣布自主'，主权么，要独立。国土么，要完整。不平等条约么，要取消。国际地位么，要平等。近十余年来，中国与阿富汗打着鲜明旗帜，泼剌剌向前奋进的，都是这回事。中国因为情势复杂，期望厚大，到于今尚在挣扎之中；阿富汗呢，自从一九一九年五月战胜英军，同年八月英阿两国在拉窝彭地签订了对等的和平条约后，卒能达到自由平等的目的。奏乐，鸣炮，成功，凯旋，万岁，阿富汗万岁，一片庆祝声，好不快乐！……国民革命军军事杂志社宁李泰同志，近编《阿富汗内战记》一书，启示国人，属为之序……"[36]该书在记述"阿富汗在亚洲之形势"时，这样写道："展读世界地图，我国形势，恰似秋海棠叶。叶之尖端，即西邻阿富汗。然与西陲新疆，相隔仅咫尺。阿境北部、兴都库什山以北，接近帕米尔高原，西北境内之山地约千余里，在清初原为我国所辖，迨至末叶，英夷印度，俄并费尔干省，该地遂成为阿国所有，中阿关系不啻唇齿之重要焉。"[37]在结论部分，作者写道："阿富汗为亚东新之国家，然革命风潮，声势赫弈，阿王阿玛努拉被迫下诏，取消其改革计划，迨后殷纳雅图，又不能继承王位，一再复辟战争，而以克占特一役，全军覆没，废王不得已，出亡于法，王室崩溃，斯为自然之气数耳。"[38]

4.1934～1947年：近代阿富汗认知的第三次高潮

从1933年起，阿富汗进入查希尔国王的漫长统治期，由于其秉持相对中立的政策，因此得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际纷争与战争中保持国家的完整与独立。而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国内建设的逐步推进，以及抗战在边疆地区的渐次展开，中国知识界对阿富汗的认知也进入了第三个主要阶段。因具体关注点的转移，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较小的认知关注期，分别为1934～1936年基于国家内部建设和外部交往的关注期、1940～1942年基于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的关注期。这两个关注期的转折点为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的爆发。

1937年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同年出版了《亚洲弱小民族剪影》一书[39]。该书共13篇，分别概述了朝鲜、台湾、菲列宾（菲律宾）、马来亚（马来西亚）、暹罗（泰国）、越南、缅甸、印度、阿富汗、伊兰（伊朗）、伊拉克、巴力斯坦（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等亚洲弱小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情况。其中的阿富汗部分这样写道：“我们检阅地图上的阿富汗，东南两面与英属印度相毗连，北面跟苏联的疆界仅隔一条俄克萨斯（Oxus）河。在地理上，它显然是英帝国主义与苏联两大势力的接触点；在事实上，英帝国主义与苏联却也都欲维持它的缓冲地位。正因为如此，阿富汗在最近十余年来，才能够逐渐走上维新的道路，粗具现代国家的形态……阿富汗脱离英帝国主义的保护而独立，还是一九二一年的事情，即在对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一年之后。真正的建设工作，则开始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被暗杀的奈迭尔国王（Nadir Khan）。奈迭尔国王统治阿富汗只有短促的四个年头，他无情地扑灭各部落的反抗，以全力维持国内的和平，他所造成的安定局面，揭开了阿富汗历史的新页。他以渐进的方法，致力于阿富汗的发展，改革旧的制度与习惯，避免刺激原始的回教徒的情感……”[40]945年，《亚洲谈薮》一书出版，其中有《改造中之阿富汗》一文，文中写道：“阿富汗和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一样，近来都动员以防侵略，倘‘北方之强’飞渡了号称天险的兴杜库什山，则大好河山将夷为喋血鏖兵之地。该国为印度门户，所以英国对之非常注意。”[41]946年译介出版的《亚洲之地与人》一书，专门阐释了阿富汗的自然环境及其地缘态势，其中写道：“阿富汗与印度、苏联均有密切的地理关系，故应将其合并在印度或苏联内叙述较为合宜，但在气候和文化上该地与伊朗又不可分，因之我们将其列入西南亚洲来叙述。在气候上，本区是冬雨式的地中海气候最东分布的极限，雨量是地中海气候中之最少者。地势平均高度超过伊朗，但地形和土地利用，与伊朗殊为类似。阿富汗之世界重要性，在其为英、苏两大势力间之一缓冲国。该国本身并无招致外人征服之吸引力，唯因其当印度北进中亚、欧洲之通衢而显其重要。在其边境两侧，一面是帝国主义者，而另一面则为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阿富汗英明的统治者拉曼（Amir Alxhir Rahman）曾在其自传中说过：‘阿富汗像一只可怜的山羊，一面是凶猛的狮子，而另一面立着一只可怕的大熊，他们都在待机吞下此牺牲品。’面对着此种事实，阿富汗仍能奋勇维持其独立地位。环列于印度西北边区的阿富汗各部落，一世纪来给英人极大的烦扰，较之印度沿边任何其他民族来得强悍。在过去若干世纪中，阿富汗人曾越过山岭阻塞征服伊朗、布卡拉（Bukhara）和俾路支，而且也曾

占领过印度一部分领土。对于阿富汗自由生存的最大威胁多来自北方，由于从北部侵入该国在地形上较为方便。”[42]1947年出版的《西部亚洲地理》一书[43]，在第二章专门介绍了阿富汗的相关情况。作为这一时期认知阿富汗的尾声，1948年出版的《三十二国风土记》中，则以《阿富汗——山人国》为标题介绍了阿富汗的相关情况，其中总括道：“第一次大战以后，亚洲有着两个值得注意的民族，各自跟帝国主义的势力光荣地斗争了一番，因而提高了国际的地位。这就是土耳其和阿富汗（Afghanistan）。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Kemal Rarha），收回了许多失地，便在国内竭力推行着新政。土耳其的国势一步步强盛起来了。阿富汗的故王阿马努拉（Amanullah）为本国争得了独立，也用同样彻底的精神打算着除旧布新，然而他的新政刚才开始，国内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却就把他的王位推翻了。阿富汗的封建状态大半是它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连绵的山岳使这高原国的各部分差不多彼此隔绝。全国这才分成了若干部落，各有酋长统治着。部落间为了争权夺利，往往发生凶残的仇杀，然而每逢国家的大敌当前，各部落也能够联合起来，一致抵抗……阿富汗的国王也许竭力要使这国家能现代化，可以使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始终成着现代化的阻碍。阿富汗前途的命运是难以捉摸的。然而有一点可以断言，就是今日的苏联和不列颠帝国都要维持它的缓冲的地位。”[44]

“发现”阿富汗：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国运期待

中国作为拥有众多邻国的大国，认识自身与认识周边是一体的两面。古代中国人尽管交通条件有限，但已经开始对周边进行不懈的探索与认知，进而逐步累积起关于整个外部世界的认知框架，构筑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观念。进入近代，随着外部世界秩序的变迁以及内部社会思想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对外认知视野也经历了一个激烈动荡的过程，并逐步形成了新的对外认知侧重点。在这中间，不可讳言，对外认知的主轴已经转向了对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和区域，曾经有着丰厚历史积淀的对于西部邻国的认知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忽视，从而形成了近代对外认知层面的不均衡状态。

“发现”近代阿富汗，不仅是一个在认识层面将阿富汗从中国近代对外视野中抽绎出来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比较过程中认知中国近代变革与转型的过程。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国运起伏的关注，也在对中国周边邻国兴亡史的关注中得以体现，这种背景就使阿富汗成为一个很好的媒介聚焦点，并从19世纪后期开始被中国数十年地持续关注，进而形成了关于阿富汗形象的几次认知浪潮。

从破碎小国到统一小国，再到独立自强之国，这是一面国运的镜子，既反映了近代阿富汗的改革与困顿，更折射出近代中国在巨大的社会转折与动荡时代的知识与思想期待。揭示中国知识界认识阿富汗及其国家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周边邻国，进而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历史关联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周边认知视野也必将得到拓展和提升，包括对阿富汗认知在内的中国对外认知也将更具历史性和语境感。“发现”近代阿富汗在中国知识界的投影，也正是笔者拓展中国对周边和中亚认知视野的一点尝试。

[1] 〔英〕凯伊：《在阿富汗的战争》，转引自〔英〕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第1卷上册，张家麟译，潘庆舲校，商务印书馆，1972，第1页。

[2] 恩格斯：《阿富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77页。

[3] 〔英〕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第1卷上册，第9页。

[4] 〔美〕沙伊斯塔·瓦哈卜、巴里·扬格曼：《阿富汗史》，杨军、马旭俊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第1页。

[5] 恩格斯：《阿富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77页。

[6] 〔美〕沙伊斯塔·瓦哈卜、巴里·扬格曼：《阿富汗史》，第3页。

[7] 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第733页。

[8] 恩格斯：《阿富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77页。

[9] 〔美〕沙伊斯塔·瓦哈卜、巴里·扬格曼《阿富汗史》，第80页。

[10] 《波斯与阿富汗失和》，《申报》1875年1月7日。

[11] 《各国近事：阿富汗：英兵至汗》，《万国公报》第559期，1879年，第14页。

[12] 《综论阿富汗事》，《申报》1879年1月31日。

[13] 龚柴：《阿富汗考略》，收录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上海著易堂铅印本，清光绪十七年（1891）刊行。

[14] 张安：《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史研究述略》，《高校社科动态》2012年第3期。

[15] 〔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21页。

[16] 〔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第21～22页。

[17] 张安：《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史研究述略》，《高校社科动态》2012年第3期。

[18] 《外国大事记：民国元年五月初三日：阿富汗之内乱》，《东方杂志》第9卷第1期，1912年，第8页。

[19] 《内外时报：阿富汗与中国回教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2卷第1期，1915年，第12～13页。

[20] Doo Fonyay：《Current Events：阿富汗之国王》，《英语周刊》第158期，1918年，第1256页。

[21] 《印度与阿富汗之协议》，《世界大势》1919年第12期，第151～152页。

[22] 《世界新潮：阿富汗与英俄势力之消长（附图）》，《东方杂志》第18卷第23期，1921年，第65页。

[23] 《外国大事记：民国十年三月十七日：俄国与阿富汗缔约》，《东方杂志》第18卷第8期，1921年，第137页。

[24] 《外省警务实录：新省知阿富汗局部通商》，《甘肃警务周刊》1923年第17期，第14～15页。

[25] 陈绍南：《研究社会学与社会问题之资料：阿富汗人婚娶之礼》，《社会学杂志》第1卷第5期，1923年，第4页。

[26] 受百：《记阿富汗王国》，《国闻周报》第2卷第38期，1925年，第12页。

[27] 《时事采集：国内之部：中亚细亚阿富汗国与我国派使议约一事》，《来复》第345期，1925年，第12页。

[28] 《杂纂：阿富汗放弃闭关自守主义》，《中外经济周刊》第212期，1927年，第45页。

[29] 从予：《现代史料：苏俄与阿富汗的新结合》，《东方杂志》第24卷第2期，1927年，第53页。

[30] 文宙：《现代史料：阿富汗的现状（附图）》，《东方杂志》第24卷第8期，1927年，第53页。

[31] 圣：《新兴阿富汗的国际关系》，《北新》第2卷第20期，1928年，第2113～2119页。

[32] 德新：《东方之又一土耳其：阿富汗》，《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附刊》1928年第46期，第8页。

[33] 大均：《阿富汗民族及其独立后的政治状况》，《东方杂志》第25卷第5期，1928年，第21～22页。

[34] 世新译《粉墨登场的阿富汗》，《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附刊》第47期，1928年，第9～11页。

[35] 宁墨公编译《阿富汗内战记》，国民革命军军事杂志社，1929。

[36] 宁墨公编译《阿富汗内战记》，陈仪序，第1～2页。

[37] 宁墨公编译《阿富汗内战记》，第17页

[38] 宁墨公编译《阿富汗内战记》，第39页。

[39] 张弼、吴清友主编《亚洲弱小民族剪影》，生活书店，1937。

[40] 邵宗汉：《阿富汗》，张弼、吴清友主编《亚洲弱小民族剪影》，第96～98页。

[41] 陶菊隐编译《亚洲谈薮》，中华书局，1945，第73页。

[42]〔美〕葛德石：《亚洲之地与人》，张印堂、刘心务译，商务印书馆，1946，第330页。

[43] 陈正祥编著《西部亚洲地理》，正中书局，1947。

[44] 胡仲持：《三十二国风土记》，开明书店，1948，第262～270页。

结语 区域、文明，还是历史连续体

——中国的中亚叙述及其话语分类

中亚类型与中亚问题

当我们谈论中亚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与中国有历史和现实紧密关联性的区域，中亚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是我们在思考中亚的时候始终需要关注的，因为中亚虽然有其欧亚腹地的地理学特征，但其历史本身往往处于外部的关联影响中。因此，要理解中亚，中亚与中亚之外的世界都必须了解。

目前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构成的中亚，作为当代世界版图上的一个重要单元，以及作为中国西部的重要周邻区域，不论是对欧亚大陆的稳定，还是对中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地缘意义。因此，理解和认知这一区域本身在近代以来的变迁，将为我们提供认识这一区域当下与未来的基础与可能。正如美国学者苏塞克（Soucek）所言："因其处于'中央'位置，中亚地区过去曾是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网络的中心。现代黎明时分发现的大西洋欧洲和东方诸国之间的海路航线，将这一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优势转化为身处逆境的内陆地区。随着冷战的谢幕，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关于一个解放的中亚恢复其往昔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传闻，往往与'丝绸之路'和重新发现这一地区地处'中央'的优势有关。现在，在第三个千年到来之际，难以接近海运的不利条件看来再次困扰着地处内陆的中亚，其中心位置可能成为一个包袱而非一项资产。一种强有力的补偿应当是一项改进的强化措施，那就是大力发展中亚与其近邻，即俄罗斯、中国、印度次大陆和伊朗的贸易和其他关系。"[1]

作为中国的周邻区域，中亚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邻国类型。考察当代中国周边邻国的地理位置及其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关联性，可将其大致分为如下几类：（1）域外海岛型，如菲律宾；（2）儒家文化圈型，如朝鲜、韩国、越南等，日本大致也可归入此类；（3）佛教文化圈型，如缅甸、老挝、尼泊尔、不丹等；（4）其他文明型，如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5）某些阶段共享历史型，如蒙古国；（6）部分互嵌型，如中亚五国。在叙述中国与这些邻国关系史时，往往会体现相应的分类学特征，并因此影响到整个知识界对这些邻国或周邻区域的整体认知框架。中亚五国所在的区域，作为一种独特类型，在与中国的历史和当代互动中，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周边与外域认知。

与此同时，受19、20世纪以来地缘政治的现实影响，我们认识中亚时，往往会将其放到俄国扩张-苏联治理的整体背景中加以考量，这当然能够使问题域变得集中，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19世纪俄国扩展的过程中，中亚议题本身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与部分，它在俄国-苏联问题的整体空间中并不占据关键性的部分，但对俄国-苏联之外的其他区域与国家在整体结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中间，“东方问题”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切入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俄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时候，曾指出俄国与“东方问题”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个老是反复出现的问题必定要冒出来，这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东方问题’。例如，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风雨过去，拿破仑和俄皇亚历山大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亚历山大利用了暂时平静的时机，把军队开进土耳其，向那些正在从内部摧毁这个衰败中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再如，西欧革命运动刚被莱巴赫会议和维罗纳会议镇压下去，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古拉就又给了土耳其一个打击。几年以后，当七月革命以及随之发生的波兰、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起义已经过去，于1831年经过改造的欧洲看来已经摆脱了内部风暴的时候，东方问题于1840年又几乎把‘列强’卷入一场大战。现在，正当目光短浅的当权的侏儒们因成功地使欧洲摆脱了无政府状态和革命危险而自鸣得意之时，这个永恒的题目，这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又来了。”[2]可以说，19世纪的欧洲及其周边区域的问题通过“东方问题”的方式得以呈现，进而影响了俄国与土耳其对西部欧洲的认知以及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结构性的三角关系决定了俄国在欧亚大陆中的自我定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中叶的俄国扩张，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过程，东方问题在这里与中亚问题联系到了一起，成为俄国在欧亚大陆推进的两大方向。它要在西部瓜分土耳其，进而夺取君士坦丁堡，从而彻底控制黑海周边地区，打通通往地中海和征服巴尔干半岛的通道。这一计划随着1856年俄国克里米亚战争的彻底失败而瓦解，并削弱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俄国从哈萨克草原南下的势头，打断了俄国以包抄的方式夺取中亚的计划。[3]只有在放弃了对土耳其方向的战略进取策略之后，俄国才将扩张力量的重心转移到亚洲方向，进而使原先欧洲的“东方问题”转变为欧亚大陆的“东方问题”；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亚地区经历了其自身最为关键的转折期，一个从千年历史互动的中心与枢纽区域

向帝国力量中心的边缘区域的转折，一个从草原世界秩序的原生区域向新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属区域的转折。我们如今对于中亚及其未来定位的思考，实际上都建立在对这一转变的认知与理解之上。

中亚从地理上而言，有其具体的定义，笔者曾有专门文章加以阐释，此处不再赘述。[4]而随着中亚在近现代进入俄国-苏联的政治经济空间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各国独立，作为连接地带的中亚，以及作为“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等主体问题边缘附属地位的区域发展与区域关系之下的“中亚问题”随之形成。这一问题的形成，一方面在于中亚本身所具有的亚洲次区域的定位，另一方面则涉及中亚本身与近代帝国主义力量及其势力范围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问题。由于中亚在近代作为俄国版图一部分以及与俄国本土相区别的双重性，在认知层面就形成了与一般意义上的俄国语境所不同的独特空间。结合到具体的研究空间，我们常常会发现，在相关的研究领域称谓上，我们有接续苏联东欧研究传统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有对整个欧亚大陆北部区域加以关注的“欧亚研究”，有针对具体国别进行的“俄罗斯研究”，而很少有专门针对中亚议题进行的“中亚研究”。在欧亚板块方面，与此相类似的实际上还有“高加索研究”等。这种情况表明，中亚虽然作为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一个连接地带，但在具体的问题域方面实际上并不处于中国域外知识的连接性地位，而是处于边缘附属的位置。这种边缘附属性特征，构成了我们如今认知中亚历史进程的整体性背景。

在俄国、苏联以及之后的历史空间中，中亚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这其中既有内部秩序的因素，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概括而言，沙俄时期的中亚，尽管已经成为帝国版图的一部分，但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依然属于编外地域，与其欧洲核心区块存在巨大的差异，当地原有的汗国结构遗存与省制依然混杂在一起。对于当时的俄国沙皇及其政府而言，中亚区域与内在群体的“忠诚”是最为关键的。早在16世纪，俄国就力图与中亚形成某种关联。自从16世纪50年代俄国征服位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其势力就推进到了里海区域，开始真正面对一个广阔的中亚地带。[5]但由于当时贯穿伏尔加河与里海之间的贸易商道被哥萨克人所控制，这一时期俄国与中亚之间的交流还存在一定的阻碍。随着17世纪的到来，俄国在东进西伯利亚的同时，开始了向中亚的推进步伐。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亚各汗国依然处于繁荣时期，因此俄国在介入中亚的方式上采取了独特的手段，他们给予中亚商人以特权，准许其为俄国贩卖当地奴隶。当时的哈萨克

人不仅将卡尔梅克人和西伯利亚的鞑靼人贩卖到俄国的奴隶市场上，而且将俄罗斯人卖到中亚各汗国为奴。基于这一原因，当时的俄国高层常常将哈萨克人看作导致当地动乱局面的根源以及向中亚地区扩张的阻碍，是俄国着力征服的对象。[6]而随着1847年俄国控制哈萨克草原，加之1861年美国内战的爆发所导致的全球棉花供需失衡，当时适合棉花种植、人口稠密的费尔干纳地区逐渐进入俄国的视野，对这一地区的最终控制是建立在对当地的三个汗国——希瓦汗国（始建于1512年）、布哈拉汗国（始建于1501年）和浩罕汗国（始建于1710年）——的征服基础之上的。作为15～16世纪帖木儿帝国的历史遗存，这三个汗国控制了人口众多的费尔干纳谷地。俄国对费尔干纳谷地的最终控制，拓展了俄国的版图，更重要的是俄国也通过控制和发展当地的棉花种植和出口，真正参与到美国内战所造成的世界棉花短缺的贸易契机当中，最终有力地推动了19世纪后期俄国经济的大发展。此外，为了消除当时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顾虑，1864年，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宣称，俄国的动机实际上非常简单，只是需要保证一条有效的边界，俄国只有在推进到定居国家的边界时才会停止；而一旦俄国在这些地方停下来之后，就会修筑一条堡垒线来保护它的疆域，从而使习惯于劫掠的游牧群体意识到贸易要比劫掠更合算，俄国也将会赐予他们“西方文明”的荣光。[7]可以说，在此基础上获得的中亚“忠诚”，不仅在于保障俄国政治结构和帝国框架的稳定，而且在于借由这一区域，俄国得以成功地在近代世界分工和世界体系中获得一个有利的经济角色，并进而在经济成功的基础上，奠定更为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这种基础要远胜于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俄国。

苏联脱胎于俄国既有的地理空间，但其本身是一种力图超越俄国历史与传统的新尝试。它试图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和苏维埃结构来整合原来俄国内部的群体、宗教与认同，并以一种超越斯拉夫主义的超国家架构来搭建之前未曾有过的共和国联盟结构。虽然这种理念最初诞生于当时的革命领袖对于俄国欧洲部分的思考，但在这种大背景下，中亚区域成为一片更大的“试验场”。通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识别和加盟共和国的划界，苏联在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在中亚推动了其群体平等话语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平等”成为这一时期苏联中亚及其在苏联内部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层面的关键性定位。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结构本身必须以苏联中央政府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以及总体资源的富集为基础，一旦整体资源缺乏，再加之中央政府权威弱化，其具体实践就会受到严峻挑战，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状况鲜明地体

现了这一点。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相继独立，中亚本身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俄国、苏联法定继承国——俄罗斯联邦版图空间的一部分；俄罗斯也在政策实践中放弃了苏联时代的一些理念。中亚本身也转变为新的独联体和俄罗斯对外关系框架下的安全、外交与合作问题的对象，政治和国家层面的“安全”成为这一时期俄罗斯在中亚着力追求的主要内容，其政策走向都围绕这一关键内容展开。

总体而言，在俄国、苏联和后苏联时代中，中亚地区分别代表了“忠诚”、“平等”和“安全”三个不同的关键词，而“中亚问题”也相应地呈现为不同的形式：俄国时代的中亚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帝国-边缘”结构及其如何维系与治理的问题；苏联时代的中亚问题，实际上指向的是“革命-桥梁”结构及其如何在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加以实践的问题；而后苏联空间中的中亚问题，则转变为“国家-关系”结构及其在内部关联性断裂的情况下如何保障稳定国际关系和自身发展的问题。理解这些阶段性特征及其结构变化，将为我们更好地认知和思考中亚在中国叙述中的定位及其未来走向问题提供必要的前提与基础。

中国叙述中的“中亚问题”及其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如何认知与叙述周边区域的历史及其与自身的关联性，始终是各个时期的中国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如果说古代的王朝兴替构筑了中国自身对于东亚世界及其内部秩序的整体认知图景与实践逻辑的话，那么随着西方近代化和殖民力量的崛起，新的洲际性力量（如英、法、俄）进入了原本较为稳定的东亚和中亚秩序之中，使包括中亚在内的亚洲区域出现了整体性的近代转折，殖民体系替代了传统的朝贡体系，并为后来的亚洲国家地缘新结构奠定了基础。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自身的周边认知及其框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具有自我中心性的天下空间开始让位给当时现实存在的万国体系，中国本身在认知层面也被内缩为万国体系序列下的一个国家。与之相应，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对疆界空间及域外区域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从混沌想象到模糊同一，再到清晰分界的整体过程。

具体到对于西北方向的认知层面，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认知与叙述中，同样存在着一个从“西域”到“中亚”的话语演变过程。在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历代王朝官方正史中，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现实的关联性也成为中原王朝认知和处理周边事务的主要动力。在汉唐时代，西域成为中央王朝对外力量投放的重要区域，开拓西域的过程也成为体现汉朝与唐朝进取心的重要标志。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即使在唐朝的大力进取时期，“吐蕃人一直骚扰着唐朝通往西方的通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高丽族大将军高仙芝将他们打败为止。但是在天宝十载（751），形势急转直下，高仙芝这位英雄在怛罗斯河目睹了自己的军队在阿拔斯朝军队的猛烈进攻之下，被打得分崩离析的境况。此后，伊斯兰势力控制了中亚，大食人也开始在唐朝各地出现了：大食军队曾经帮助唐朝政府镇压了安禄山的叛乱，而（相反的）在短短数年之后，大食海盗却卷入了对广州的劫掠”。[8]进入宋代，中原王朝逐渐内敛，到了元明清时期，大一统王朝从实践层面确立起了“西北-东南”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尤其是清朝，最终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广阔版图。与疆域空间内部“西北-东南关系”的逐步确立相同步，元明清三代尤其是清朝对于“西域”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向清晰转变的过程。到了清末，随着对俄国占据中亚相关事实的逐渐了解，中国知识观念中原有的“西域”空间逐渐发生分化，“西域”被分为俄属中亚区域与中国西北区域，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在西北方向上的本国与域外空间认知框

架，并一直延续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对中亚的认知，所体现的不仅是当时中国对外视野的转变，更是这一区域本身在中国理解自身内部发展时所具有的对照性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亚与东亚一样，是中国与中国知识界对自身相关问题及发展理念的区域性折射，只不过东亚部分指向的是中国东南部的区域性认知视野与期待，而中亚所指向的是中国西北部的区域性认知视野与期待。

在具体的政策指向层面，如果我们按时间轴线加以概要分类的话，就会发现，在中国的中亚叙述中，存在一个基于现实政治的维度，那就是“中亚问题”在近代才形成其特定的问题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我们对“中亚”的域外定位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在近代，中亚作为明确的域外空间方才确立。在俄国控制中亚的时期，“中亚问题”附着于俄国研究，而到了苏联治理中亚的阶段，“中亚问题”则附着于苏联研究，长期以来并不单独形成中国关于“中亚问题”的总体话语。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这些新国家成为正在转变中的世界秩序的参与者，作为中国周边最大的地缘政治变迁版块，其内外变动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中亚问题”在当代中国话语中逐步形成，并在特定的问题域上呈现出独特性。

在这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对中亚的认知中，存在着“连续性”与“断裂性”并存的局面。所谓连续性，一是指从古代中国对西域认知开始，一直到1840年，这是中国传统西域叙述的古代史序列，具体以中西交流史的形势呈现出来。在这种连续性中，所强调的是西域文化传统与文明交往的历史延续特征，具体的政权结构及其相关关系并不是其关注的中心。二是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以来，中国对于中亚的相关叙述。这种叙述呈现的是国际关系的底色。在这种连续性中，所强调的是当代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延续发展问题，中亚区域文化传统与文明交流问题并不是其关注的中心。在这两种“连续性”当中，呈现出一种内在的“断裂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古代史（中西交流史）框架和当代国际关系框架之间，在叙述逻辑和关注中心方面，形成了某种错位与断层。这种错位与断层，不仅使我们对中亚在近代中国的知识认知过程中出现阶段性的缺失，还使我们在对中亚问题的整体性思考与叙述方面，在内在逻辑和阐释结构上无法形成系统性的衔接。这种情况使得近代中亚的图景无法形成，进而使大众对中亚尤

其是近代的中亚形成了独特且近似于白板式的异域想象，这又进一步折射出我们在中亚话语层面的知识空白。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描述近代中亚的图景，如何对这种图景进行全局性的理解与把握，从而揭示其与中国本身内部变迁的具体关联，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思考的问题。

区域、文明、历史连续体：关于中亚的叙述及其分类

中亚在欧亚大陆的人类互动中占有一个相对特殊的位置，其内在的阻隔性与联通性并存。以“时-空”背景为基础，我们关于中亚的叙述，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如下三种基本的认知框架：（1）作为区域的中亚认知；（2）作为文明的中亚认知；（3）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认知。这三种框架类型的共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下我们对中亚认知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依然在这一区域的历史空间与当下范围、文明发展的既往道路与当下传统、政权延续的历史资源与当下书写之间存在的理念和实践层面的差异与冲突，这些差异与冲突还将反过来影响我们中亚整体观的生成。因此，如何理解作为区域的中亚、作为文明的中亚以及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就显得十分必要。

1.作为区域的中亚认知

在这种认知框架中，中亚主要作为“区域”被定义和存在。在具体的学科叙述和话语分类方面，中亚往往是国际关系、经济学等学科阐释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框架下，“中亚”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等作为具有同质性的亚洲次区域单元，形成自身的孤立性特质、板块化特征，并在具体的地缘性研究中被视为均质体加以对待。而在事实上，这些在我们看来是均质体的区域内部，由于不同的地理、生态与人群分布，具有其自身的内部分界逻辑，且其本身作为次区域名称的形成与公认时间也并不相同。“中亚”的称谓及其内在歧义既是欧洲东方学与近代殖民扩张的产物，也跟近现代的英俄大博弈以及美苏争霸、冷战背景息息相关。上述要素都被添加到中亚的区域认知当中，最终使这一区域本身具有了超出于一般化区域的多重内涵。

当然，当下作为民族国家区域的中亚，其空间范围直接源自俄国与苏联时期，因此，历史性地理解这一区域及其内部分界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区域的近现代转变。在历史上，除了费尔干纳盆地之外的中亚地区多为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当地民族群体的划分往往按照其居住地的海拔高度、自然地理区域和经济作物类型进行，并不具有明确的地域界限。随着俄国逐步吞并中亚地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在中亚北部设立草原总督区，驻地为鄂木斯克，在南部绿洲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驻地为塔什干，从而确立起“北部

草原＋南部绿洲”的中亚治理格局。与这一治理格局相应的则是基于地域与生态而形成的中亚人口分布格局。从总体上说，一直到20世纪初期，即便是在俄国控制这一区域之后，其行政治理格局依然基本上保持了这种状态，这种状态符合当时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格局及其相关的人口分布态势。

中亚各国当前的边界状况，是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识别和加盟共和国划界的结果，这一结果也使得既有的“北部草原＋南部绿洲”的地域格局转变为“哈萨克斯坦＋苏联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Казахстан и Средняя Азия）的加盟共和国格局。早在1924年，当时的苏联政府就开始着手在原俄属中亚地区进行民族识别和加盟共和国划界，这种划界行为打上了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的地理特点和既有的行政区划，也没有对当时族群的历史居住格局和文化特征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分类，只是基于政治治理和全联盟“一盘棋”的经济规划需要所采取的相应措施。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继承了苏联时期的行政结构，继续维持现有边界，共同奉行不破坏边界的原则。1993年8月，中亚五国签署声明，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原则。在此基础上，中亚各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迫切想要解决自身与周边各国的边界争议问题，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历史遗留特征、多边状况，以及在中亚各国自身民族国家建设中所起到的政治动员工具作用，在具体的解决过程中进展缓慢。有研究者指出，中亚各国的公民认同感建立在民族的和领土-文明的认同感基础之上（见本书导论）。当代中亚问题的诸多方面，都与其近现代的空间形成有关。

同理可推，在近代之前的中亚，同样存在着不同时段的区域空间构筑逻辑，这些逻辑在当时语境下也会影响各个群体对中亚区域具体范围及其内部各个政权之间的认知。总而言之，作为区域的中亚事实上充满着范围与空间上的变动，当下的相关认知有必要注意并揭示这其中存在的流动性。

2.作为文明的中亚认知

自区域认知之外，我们对于特定区域会有文明的认知框架。“中亚”除了具有一般区域的特征之外，还附着了宗教、民族、文化方面的独

特性，进而构成“文明”的基本单位。在相关的学科叙述与话语分类中，包括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研究，以及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等，主要关注这一方面的议题。

在对中亚的文明定位方面，汤因比曾将中亚的很大一部分的游牧文明区域视为“停滞的文明”。他认为停滞的文明与社会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因为尝试并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行动而停滞了，并对恰好介于刺激与过分刺激之间的挑战进行了应对。在他看来，那些“流产的文明”，在试图出生的时候，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困难，因而不幸夭折，而“停滞的文明”则赢得了第一个回合，却在接下来的竞争中遭受挫败。如果游牧民族不抛弃自身的游牧标记，就无法超越文明层级，进而向更高一级发展。[9]当然，对中亚文明的认知，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论者认为：“新的发明，新的思想，和新的风俗习惯，仍继续由欧洲或近东传至东方、印度及中国；然而印度，尤其是中国，常能居西土之先，以贡献其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实具远大影响。从这许多东、西文化刺激力的不断交换，才可以进言世界史，以别于其他分疆划界的区域史。于此有特别重要的一点：这些文化特征的互相交换，多数皆经过中央亚细亚。例如吸收欧洲的诸多文明，传播至于中国的，就是中亚人；而许多中国的发明，也由他们带回欧洲。因此之故，假如印度和中国可包含于世界史的范围中，则中央亚细亚显然也应受同样的待遇。”[10]从历史的层面来说，这种认知的差异及其多元，正是中亚在古代和近代整体定位转变的表现，它本质上是一个文明的“黑洞”，既吸收其他文明的养料，也吸引其他文明的艳羡目光，但在近代变得黯淡，让人有所畏惧、空留想象。目前，世界的整体状况有所改变，但尚未逆转，因此，作为文明的中亚及其定位依然处在思考与争论当中。

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层面，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中亚地区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一是农业生活方式，二是游牧生活方式。“第一种生活方式，是由存在于河流沿岸，例如泽拉夫尚河和塔里木河，或者绿洲地区的农业社会构成的。完备的水利设施，为这些地区的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这样一些定居地区（卡拉库姆沙漠中的木鹿绿洲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形成了被沙漠和草原包围的很小的农业岛。虽然这些农业岛通常是相互孤立的，但一般说来，在多数日用必需品方面，它们还是可以自给的。在这样的绿洲和河流渡口，形成了一些乡镇。这些乡镇不仅发展成了当地一些贵重产品的制造和传播中心，而且还在横贯大陆的商队交通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这些乡镇所处

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在其居民中产生了一种公认的‘绿洲思想’，这种思想的特点，就是缺乏智力上的求知欲，这种情况仅仅由那些来往从事商队贸易的人，部分地得到了补偿。至于那些都市的名流学者们，他们的文化，通常不外乎是中国或伊朗文化的延伸。至少在中亚西南部，正是这些中心都市扮演了伊斯兰教文明渗入中亚的先锋的角色。”[11]第二种生活方式则是草原游牧部族的生活方式：“游牧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总是显示出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由于缺乏定居社会因素的影响，中亚游牧生活有它自身发展进化的历史，这不仅可以从游牧生活内部的紧张关系中反映出来，而且也可以从与中亚接壤的诸文明对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上反映出来。”[12]理解这两种生活传统在数千年中亚历史中的持久性与延续性，将为我们理解中亚作为文明背后的社会经济基础提供必要的前提。

在此基础上，当我们有针对性地面对中亚各个阶段的文明样态及其表现形式时，就必须呈现这一区域农耕与游牧及其所在区域之间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联。此外，这一区域及其外部关联过程中曾经有过的诸如佛教文明、俄罗斯文明、苏维埃文化及其相关遗产等问题，也需要我们客观全面地认知（见本书附录一）。

3.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认知

除了区域与文明论述之外，现实中的中亚还存在一种“历史连续体”的叙述。在世界史的实践中，往往通过叙述主体自身文献及周边文献，以欧洲史的时段性来重构“中亚”的历史脉络，并与周边的区域与历史进程加以对比。而在中国史的实践中，也往往表现为以中国王朝史的时段性来重构“中亚”的历史脉络。在当下，则更多地表现为中亚各国对自身历史的选择性重述。在这些过程中，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往往被各种需求主体所捏合，并存在着各种被捏合的叙述之间彼此冲突与调适的问题。在学科叙述与话语分类上，则主要涉及世界史中的中亚史论述、民族史中的西域史叙述以及中亚国家自身的历史书写等。

在叙述的连续与范围方面，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与“丝绸之路”的实践性地域形成某种内在关联。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丝路地区”，其特征在于联系性，而非单一性。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丝路地区的特点是，它把伊朗、印度和中国的文明结合成一体，而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区，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上述三种文明的影响，而

且正如生活在中亚大草原和半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文化一样，沿着丝绸之路的那些绿洲，也构成了这个地区的特色。”[13]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没有哪个大国在中亚地区长期存在过，而如果说在大草原上曾经建立过这样一个国家的话，那么，通常在数代之后就灭亡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中亚绿洲中的一些城邦曾经形成过相对稳定的政治实体，但在历史上，其往往会受到游牧或其他大国力量的威胁，常常扮演某个外部力量的藩属角色。在历史的实践中，这些绿洲城市很多也是某些较高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体现者，既吸收了外部文明的成果，又成为其他文明的接力传递者。因此，理解这种文明互动过程中的历史进程及其呈现图景，就显得十分关键。而在这个过程中，当代的中亚国家也在进行自身的历史叙述，了解和认知这些新的国家叙事风格及其整体历史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区域内部国家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的自我定位与走向（见本书导论）。

总体而言，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相对自洽的历史书写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中亚域外各国相关论述的整体面貌，而随着当今中亚各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一步推进，在内部叙述方面形成新的历史连续体模式。在可见的未来，在不同的叙述主体存在的情况下，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框架是多元的，也会是竞争性的。中国叙述中如何面对和处理中亚作为历史连续体的结构与逻辑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寻找整体的“连续性”：构筑我们的一般中亚观

由于中亚所在的作为区域、文明或历史连续体的不同定位，及其在不同学科视野之下不同的认知框架，作为区域的、文明的和历史连续体的中亚议题之间所存在的某种错位与缺漏，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亚及其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中的整体定位。这种状况，需要我们更为系统地找到区域、文明与历史连续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现实可能性。

我们需要找回区域的“时空感”。在将中亚视为一个区域的过程中，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这个区域的时空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无法以当前中亚各国的国家疆域去界定整个中亚的历史性疆域范围，有必要更全面地考量本区域的动态变化过程，不仅关注当代中亚的整体变迁，而且应该对这一区域在不同时段的具体范围加以较为明确的界定，从而知晓和理解中亚在人类有史以来的不同时期所扮演的地缘角色及其跟周边区域的独特关系。

我们需要找回文明的“时代感”。在认知中亚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更全面地探究中亚作为文明的阶段性演进历程，不仅关注当代的宗教与社会样态，而且应该正视古代的宗教与文化变迁及其社会文化形态，从而理解这一区域文明同样存在的阶段性及其历史的“非终结性”，以及中亚在当代和未来的世界文明交往交融中拥有的新位置与新可能。

我们需要找回历史连续体的“边疆感”。我们有必要更好地理解历史和当代阶段中亚地区及其内部国家在构筑自身历史连续性空间过程中的主体与边界所在，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在中亚历史书写中存在的空间外溢与边疆定位问题，结合中国的相关议题，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与处理中亚国家历史话语与中国自身的区域叙述之间存在的差异，并以此来理解当下的“丝绸之路”及其话语实践。它所指代的不仅是一种关于欧亚大陆既有互动与交往的历史与现实，其当代内涵更是对整个欧亚东西方交流与互动的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新的世界视野。我们说，这种视野既跟传统中国在东亚世界的朝贡秩序有所差异，又不同于殖民时代列强竞逐下的帝国秩序，它所展现的是中国认知当下与未来世界的新框架与新实践。[14]

为此，我们需要确立起“一般”（general）中亚观。这种观念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中亚的单一化叙述，不应该局限于对中亚当下历史、文化

与宗教现状的描述，而应该形成一幅中亚内部农耕区域及游牧区域互动发展、历史文化演进变迁的完整图景，并揭示其在古代欧亚与当代世界格局中的结构性角色及其内在发展逻辑，从而为构筑我们自身的中亚认知与解释框架提供必要的基础。

[1]〔美〕斯瓦特·苏塞克：《内亚史》，袁剑、程秀金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27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1853年3月11～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5页。

[3] 王治来、丁笃本编著《中亚国际关系史》，湖南出版社，1997，第149页。

[4] 袁剑：《“中亚”在哪里？——近代中国人笔端下的“中亚”范畴变化》，《文化纵横》2017年第1期。

[5] Edward Allword，*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 1930.

[6] 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102～103页。

[7]〔英〕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279～280页。

[8]〔美〕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47页。

[9]〔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13～115页。

[10]〔美〕W. M. 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第3页。

[11]〔英〕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14页。

[12]〔英〕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第16页。

[13]〔德〕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赵崇民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第1页。

[14] 袁剑：《丝绸之路、地方知识与区域秩序：“丝绸之路”的概念、话语及其超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附录一 中亚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历史、现状及特质

当代中亚一般包括随着苏联解体而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有时还包括阿富汗等国。在历史上，这一地区是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枢纽；在现实层面，这一区域又是当代世界地缘政治的重要舞台。

由于近代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主义世界扩张，整个世界力量的重心从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转移到了海洋和西方世界，曾经辉煌一时的丝绸之路贸易逐渐衰落，相伴而来的是经历过欧亚大陆兴衰起伏的中亚辉煌时代逐渐消逝，其最后的荣光在19世纪后期的英俄“大博弈”中彻底黯淡下去。此后的中亚作为俄国-苏联的一个内部区域被纳入俄国-苏联的国家治理与文化建设框架当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最终独立。[1]

文明在互鉴中发展，在交流中前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亚地区日益成为中国西向开放的重要区域，中亚与中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和深入，双方在文化遗产方面的互动与合作也跃上了新的台阶，并在诸多方面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有鉴于此，认识和了解中亚文化遗产的历史、现状及其区域特质，将更好地丰富我们对周边国家和区域社会文化状况的认知，进而更好地促进中亚地区国家与民众对中国的理解与认知。

保护历史

进入19世纪，随着俄国逐渐侵入和吞并中亚地区，以及在十月革命后的20世纪20～30年代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民族识别和加盟共和国划界，这一地区之前的汗国结构被彻底打破，全新的民族及其区域认同得以塑造。与中亚政治经济秩序被纳入俄国-苏联体系相应而生的，是历史与认同层面的俄国化与苏联化，这表现为这一区域的历史被叙述为俄国-苏联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后续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确立起了一个在中亚历史叙述层面的俄国-苏联时间线，其他被摧毁的各汗国时间线以及各群体的时间线被降格甚至掩盖。随着中亚新加盟共和国的建立，在发展这些新的区域化民族性过程中，为了将这一区域的民族群体及其分类合法化，就有了将其进行历史性叙述的内在需求。在中亚地区民族识别、加盟共和国划界与当地民族解放事业等同化的过程中，当地的文化遗产扮演了一种关键性的角色。[2]表现在文化遗产层面，这一区域原有的俄国文化时间线被苏联文化时间线所取代，与此同时，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各自的文化时间线也逐渐形成。这些时间线彼此之间是并行的，同时是从属于更高层级的，还是主轴的苏联文化遗产时间线叙述。在这一语境之下，中亚文化遗产只是俄国-苏联历史文化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4年苏联政府颁布《保护古物补充法令》，将重要古物分为“禁止类古物”和“登记类古物”两类，其中前者由国家负责保管，列入国家预算，后者则由所在地苏维埃机关负责保管和维持，列入地方预算。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诸多历史建筑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因为受到意识形态、世界大战等因素的影响，其具体保护过程跌宕起伏。[3]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苏联文物保护单位的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经济水平、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任务的影响，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最具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是由“战斗的无神论”这个意识形态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化建筑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战后最为突出的就是国家文物保护方面不断变化的政策：某一时期对文物保护问题极为关注，然后就转变为冷却状态，这就导致了一些文物被列入保护范围，而另一些则被撤销。[4]在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文化遗产（基本上是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属于加盟共和国级的文物保护单位。长期以来，在苏联的具体实践中，对包括中亚在内的各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其主要内容是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当时的苏联学者这样写道：“我们是值得为我们民族的艺术作品而夸耀的。而保存最好的方法是收集在博物馆或文物库

房中。当然，这些博物馆的陈列品，那就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但是在博物馆中所保存的，只有个别分散的不同世纪的作品，但是像石制或木制的建筑文物和它不可分离的艺术品，它们共同组成了重大的历史、艺术和文化的遗产，那却是不能搬动的。”[5]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国际文物保护运动和遗产体系的逐步建立，其对当时苏联的影响也日益增强。苏联国内学界开始引入“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并将“文物”作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重新思考相关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1988年，苏联文化基金会主办的《我们的遗产》杂志创刊，传统的“历史文物”概念被“遗产”概念所取代。[6]但在具体实践层面，苏联官方依然主要采用“历史文物”的名称。例如，1976年10月29日公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历史文物保护和利用法》总则第一条就规定：“历史文物是指那些与人民生活中的历史事件有关的，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有关的建筑物、纪念地和纪念物，以及具有历史、科学、艺术或其他文化价值的物质和精神创造的产品。”并在内容方面进一步细分为历史遗迹，有考古价值的遗迹，城市建筑和建筑艺术遗迹，艺术遗迹，文献性的遗留物以及其他具有历史、科学、艺术或别的文化价值的实物。[7]

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以缔约的方式，推动各国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进一步完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苏联对于签署《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一度持谨慎态度，于1988年方才加入，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各国开始以新的主权国家参与到新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当中。本附录所指称的“文化遗产”，既包含物质性的，也包含非物质性的。

现状

1991年底，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相继独立，中亚各国在政治上实现自主的同时，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面临一个如何塑造与原有的苏联内部空间所不同的、全新的、唯一的民族国家问题。当没有了苏联这一民族身份创造者之后，中亚各国既有的民族及其国家空间以怎样的方式来加以维系和巩固，成了各个中亚国家必须回应和处理的问题。长期以来，这些曾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文化与历史是由莫斯科来主导叙述和梳理的。而在独立后，各国既有的国家时间线得以进一步强化和延伸，并开始抛开苏联时间线这一原先的主轴，通过动用本土曾经存在的古老政权遗存及传统资源的方式，来重构各国的时间线叙述。在这种态势下，中亚各国的历史与文化时间线开始出现交错与冲突，并通过相应的文化遗产与历史叙事影响着周边邻国的认知。[8]

在这一时期，“文化遗产”概念在独立后的中亚诸国逐渐被接受，逐步取代了原先较为狭义的“历史文物”概念，并成为中亚各国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的基本共识。中亚各国相继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亚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也在国际合作的大背景下日益推进。中亚自身的文化遗产空间在这些年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并日益成为构筑中亚国家、社会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经与当代俄罗斯的文化遗产空间相分离，两者形成各自发展的新态势。

哈萨克斯坦在中亚诸国中目前发展形势较好，社会政治环境较为稳定，并逐渐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地，哈萨克斯坦在推进互联互动、互利合作等方面与中国的交流日益深入，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也与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例如颁布了《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法》，并对既有的《文化遗产法》进行了相应的修订。此外，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哈萨克斯坦政府逐年增加对文化领域的投入，至2010年达到3.5亿美元。在具体的考古研究和文化遗址保护方面，哈萨克斯坦文化部筹建了民族文化中心和阿里·法拉比陵园，分别设立了伊塞克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列别尔历史文化保护区。此外，泰姆格里考古景观岩刻和霍贾·艾哈迈德·亚萨维陵墓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4年丝绸之路联合申遗成功，该国境内入选遗址共有八处。

作为中亚地区的交通枢纽，吉尔吉斯斯坦由于地缘的关系，较为重视丝绸之路区域的文化遗产保护，主要依靠政府来推动保护工作，其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和国际支持。该国正计划对阿克·贝希姆遗址、布拉纳遗址进行保护和修复工作。在2014年中、哈、吉三国丝绸之路合作申遗成功后，该国有三处遗址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分别为中世纪古遗址阿克·贝希姆遗址、克拉斯纳亚·瑞希卡遗址和布拉纳遗址。[9]

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拥有四处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其内容有重叠之处，但也有所不同。在1990年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希瓦（Khiva）古城遗址，保存着一个长方形的中古时期堡垒；1993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哈拉（Bukhara）古城，在帖木儿帝国时期是第二大城市，但现有部分主要建成于16～17世纪，当时是昔班尼王朝的首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定意见书认为：（1）布哈拉的城市布局与建筑对中亚广大地区的城市规划与演变起到了深远的影响；（2）布哈拉至今仍然完整地保存了其城市肌理，是中世纪中亚城市最完整、保存最完备的典型地区；（3）9～16世纪，布哈拉是近东地区穆斯林神学，特别是苏菲派禁欲主义神学的最大中心，拥有200多座清真寺、100多个伊斯兰学院。目前，关于保护布哈拉古城的法规主要反映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于2005年编制的《布哈拉城市总体规划》（*The Master Plan of Bukhara City*）中。此外，2010年3月23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颁布了第49号特别法令——《关于布哈拉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修复与适应现代用途的改造的国家计划（2020）》，为古城保护进一步提供保障。在布哈拉文化遗址的管理方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等级化的管理体系。国家层面由乌兹别克斯坦文化与体育部负责，地区层面则由布哈拉地区文化遗产遗址保护与利用监察会及地方政府负责。[10]000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沙赫里撒布兹市（Shakhrisyabz）历史城区在帖木儿时代还只具雏形。以上三座城市后来在蒙古人的征服时代遭到破坏，之后得到重建。

在2000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撒马尔罕（Samarkand）古城，是乌兹别克斯坦第四座世界文化遗产古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定意见书专门指出了撒马尔罕古城所具有的三大价值：其一，撒马尔罕的建筑和城市风貌体现了伊斯兰文明的伟大创造力；其二，以大清真寺（Bibi Khanum Mosque）和雷吉斯坦广场（Registan Square）为代表的建筑群显示了从地中海到印度次大陆整个区域伊斯兰建筑的强大生命力；其三，撒马尔罕古城以它的文化、建筑和结构展示了从13世纪到今天的中

亚文化和政治历史最重要的阶段。[11]这座被称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城市，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连接中国、欧洲、印度、伊朗和其他游牧力量等不同文化的重要枢纽，也是早期佛教、伊斯兰教、拜火教、基督教等各大宗教交汇的熔炉。作为帖木儿帝国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自18世纪以后，随着中亚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和英俄大博弈的深化，撒马尔罕逐渐衰落，其古城开始受到破坏，其中包括近代以来一些防御工事和王宫建筑的消失，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传统住宅区的破坏。此外，撒马尔罕古城内的一些古代清真寺等宗教遗迹也年久失修。从19世纪开始，相关的文物修复工作逐渐展开，其中包括对撒马尔罕古城及其相关遗址的恢复与重建，而近些年来对于帖木儿陵墓等相关遗迹的保护是一大特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确立作为独立国家的乌兹别克斯坦自身的历史合法性具有特殊意义。当然，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发展水平和保护理念的限制，撒马尔罕古城的系统保护与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相关技术手段方面也还有待完善与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撒马尔罕古城的相关保护工作参考了意大利、法国等相关国家的先进经验，后续发展态势较好。在目前情况下，通过国际合作组织与当地专业人员的密切配合，撒马尔罕建立起一整套源自当地并适应当地具体情况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技术体系。基于独特的历史与现状，撒马尔罕理应成为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古城保护的杰出案例。[12]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在2015年12月2～4日于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将15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其中就包括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同申报的“阿肯弹唱”（Aitysh/Aitys）即兴诗歌说唱。这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多民族社会内部的一种流行文化形式和身份标志，在独立后的中亚社会内部认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2017年12月于韩国济州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哈萨克斯坦申报的传统民族游戏“阿斯克”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哈萨克斯坦文化和体育部的统计，自2011年至今，哈萨克斯坦共有8个项目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冬不拉演奏艺术”（2014）、“哈萨克式摔跤”（2016），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入选的“毡房建造方法”（2014）、“阿肯弹唱”（2015），2016年多国共同申请的“纳乌鲁兹”（12个国家）、“驯鹰”（18个国家）、“土耳其帕特尔面包”（5个国家）以及“阿斯克”（2017），并计划将“哈萨克驯马春季传统”和“阔尔库特阿塔遗迹”（同土、阿、吉三国联合）申请

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乌兹别克斯坦的“博恩逊区的文化空间”则作为中亚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于2001年被列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文明在互鉴交往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中亚与中国在当代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同样推进了双方彼此间的理解。2014年6月15～25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一项目涵盖“丝绸之路”东段，全长5000千米，包括以中国河南洛阳为开端，经新疆天山走廊并延伸至哈萨克斯坦南部沿线的33处遗迹点，其中哈萨克斯坦8处，吉尔吉斯斯坦3处，中国22处。[13]这一联合申遗项目的成功获选，成为中亚与中国在文化遗产领域亲密合作的典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走出去的当代实践中，有若干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因独特的文化标签而受到中亚各国的广泛关注。2005年11月，中国申报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流行于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各种木卡姆的总称，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以“十二木卡姆”为代表。这种木卡姆音乐形式除了中国新疆，还广泛分布于中亚等地区。2009年，中国申报的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玛纳斯》与《格萨尔》、《江格尔》共同构成中国三大史诗，其演唱异文繁多、篇幅宏大，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玛纳斯及其后世共8代英雄的谱系式传奇叙述，共有23.6万行，被称为柯尔克孜人杰出创造和口头传承的“百科全书”。此外，相关社区的传统节庆和民俗活动，构成了《玛纳斯》中亚的文化空间。中亚与中国新疆地区生活着一些拥有共同历史、语言和宗教文化传统的跨界民族，如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中国国内称为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因此，诸如《玛纳斯》之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自然在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亚地区基于民族、地缘联系而形成影响的重要例证。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开始受到中亚各国民众和研究者的关注。例如，2010年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医针灸”，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

济文化交流的推进，以及相互间人员交流的增多，其良好的疗效受到中亚各国民众的广泛欢迎，并成为中亚各国开展对华医学交流的主要推动力。据相关报道，在哈萨克斯坦，中医按摩、中药理疗等被视为健康、环保的治疗方法，不少政府官员和家属经常到中国来理疗治病，甚至邀请中医专家赴哈诊疗。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非常鼓励设立中医诊所，为此专门设立了相应机构，负责管理中医诊所和中草药、中成药市场。首都比什凯克市拥有数十家个体中医诊所，一些吉国民众甚至专程来华接受中医针灸推拿治疗。此外，一些更侧重艺术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随着国际交往的进一步推进在中亚大地得以呈现。例如，在2017年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来自中国多个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此亮相，江苏的南通扎染、苏州核雕和苏绣三大谱系之一的常州乱针绣位列其中，尤其是核雕艺术家带去了以花卉、人物、核舟等为主题的多件作品。小巧的核舟玲珑剔透，还能打开窗户，让现场的哈萨克斯坦游客大为惊叹。

区域特质

总体而言，由于中亚地区在古代所呈现的欧亚交流枢纽作用、近现代作为俄国-苏联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以及当代作为独立国家的独特性，其在文化遗产方面，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特区域化特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亚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在构筑和维护自身国家认同的方面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中亚各国真正独立建国的时间较短，而且在之前缺乏基于民族-国家的长期认同，文化遗产方面的保护与实践，不仅是中亚各国政府层面的客观需要，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维系中亚各国社会与族群内部历史和现实凝聚力的重要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依然在影响着社会民众的、曾经存在过的、如今消失了的苏维埃文化及其遗产，面对苏维埃文化共同体的存在历史，就成为其需要认识和面对的重大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重大社会变革后，文化共同体发生解体甚至灭亡，会导致许多需求的消失……更多情况是，文化共同体的观念改变，导致了对某种活动的不想、不说、不写，乃至对相关的物不用、不造。而'不造'最直接和客观地反映了需求的终止。"[14]

其二，中亚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更多在于凸显这些新生民族国家内部主体民族的地位和重要性，并通过历史名城和重要遗迹来构筑古代王朝与当代国家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从而为各国不同的历史与传统构筑最重要的文化性基础。但值得反思的是，正如1979年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区的宪章》（巴拉宪章）所指出的，"各个时期对该地区所做的贡献均应得到尊重。一个地区如有不同时期的建造物，显示一个时期的建造物而牺牲另一个时期的，唯有在被去除的建筑物所含文化意义甚微，而将被展示的所含文化意义重大得多的情况下方可证明是合理的"，[15]因此，如何更好地处理中亚各国文化遗产中所涉及的古代和近代相关遗迹，如佛教的相关文化遗存，[16]就需要中亚各国政府和学界有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认知。

其三，由于中亚地区各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以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周边国家的独特地缘关系，跨界因素成为中亚各国文化遗产的重要关键词。这种跨界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中亚各国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邻国形成巨大影响，在中国

西北地区产生尤为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更容易在中亚地区推广和形成影响力。中亚各国文化遗产的这种“跨界性”因素，超越了我们在文化遗产领域一般意义上的东西方之分，在当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与认知挑战。

[1] 袁剑：《从“西域”到“中亚”：中国的中亚认知及其历史变迁》，《文化纵横》2018年第2期。

[2] Jonathan Levin，“From Nomad to Nation：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Contested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of Central Asia，”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Vol. 50，No. 1，2017.

[3] 王运良：《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制度与国外类似经验——新中国文物保护制度的背景考察之四》，《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1年第4期。

[4] 《苏联不可移动文物：文物的登记和分级问题》，http：//www.kulturnoe-nasledie.ru，访问日期：2018年6月5日。

[5] 《苏联不可移动文物：文物的登记和分级问题》，http：//www.kulturnoe-nasledie.ru，访问日期：2018年6月5日。

[6] 程殿梅：《俄罗斯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

[7] 袁剑：《镜像性、时间线与整体观——近代以来中国对中亚诸国的认知观念流变及其特征》（待刊）。

[8] 严敬敏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历史文物保护和利用法》，《中外法学》1983年第4期。

[9] 刘珺、郝索、余洁：《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困境与合作研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10] 旷薇、邵磊：《丝绸之路商贸城市布哈拉古城保护与利用》，《中国古城》2013年第12期。

[11] UNESCO，“Samarkand-Crossroad of Culture，” http：//whc.unesco.org/en/list/603.

[12] 钱云、张敏：《撒马尔罕城市历史与古城保护》，《中国名城》2013年第10期。

[13] 紫苏：《驼铃声声丝绸飘飘——“丝绸之路”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中外文化交流》2014年第7期。

[14] 蔡达峰：《物质文化遗产的几个基本特征》，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编《文化遗产研究集刊》（5），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11页。

[15] 《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区的宪章》（巴拉宪章），《中国石窟遗址管理培训班国际文化遗址管理参考资料》，1992，第185页。

[16] Sunita Dwivedi，“Cultural Heritage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 *Himalay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Vol. 21，No.1，2017.

附录二 固化与流动：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

中亚的位置与独特性

区域即分类。自从世界上各大洲及其内部区域名称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常识，其在历史与学科的框架中就已经被标定了位置。了解这种位置的生成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包括中亚在内的各区域在整个世界结构中的独特性，以及这些区域在学术与知识体系中曾经和将来可能扮演的角色。

在黑格尔的笔下，亚洲被视作一个与欧洲相对应的代表历史上升阶段的区域："亚洲构成历史的上升。每一块陆地对另一块陆地都是东方，然而亚洲自身就是东方大陆，同时欧洲却部分地是世界史的中心，部分地是世界史的终点……在亚洲这里，主要的对立面是一个高原与宽广无垠的大平原。这两个地区是必然的，也是构成人们的完全对立的素质和对立的行为的一个起源（和）基础。在这里，独特的东西是山区居民与峡谷地带居民的实质性的交互作用，山区居民在自身有好动的特点，峡谷地带居民则有其扎根本土的习性，（他们）都不像（在）埃及那样离群索居。恰恰这些相互完全独立的素质的关系独具特色。"[1]结合他本人对欧洲作为中心的定位，亚洲及其次区域就构成了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其世界历史哲学框架的必要分类与阶段特质：欧洲是世界史的中心和终点，而亚洲则是世界史的上升阶段；在这一上升阶段，中亚与东亚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新的二元分类，塑造了我们当下的一些刻板印象。从内在逻辑角度而言，东方学的实践也正生成于此。

1.近代及其转型

当代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构成的中亚，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在历史上是连接欧亚大

陆东西两端文明的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经过区域，长期以来，这一区域在欧亚文明互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影响着欧亚东西方对彼此的认知。

但是，中亚地位的转变与世界的近代相比，要早上两百年，其影响至为深远。进入近代，随着欧亚地缘政治的变迁，这一区域本身经历了重新定义的过程，在俄国-苏联的内部分工体系中扮演了较为独特的角色。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渐次征服中亚之前，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与南部的费尔干纳地区构成了这一区域的两大基本生态类型。其中，位于南部的费尔干纳地区作为浩罕汗国的一部分，其内部并不存在严格的行政区划，当地民众主要以农耕为生，其身份认同主要建基于日常生活的分类，如社会等级地位、宗教信仰类型、经济文化样态以及所在生活地域、血缘关系、氏族-部落等，族类的区分在这一时期并不是很明显。[2]这一状况出现显著变化，要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中亚进行民族识别与加盟共和国划界之时。

2.两段历史、两种“域外”与海陆传统

西方殖民时代的到来在一般意义上代表着世界近代史的展开，但如果我们对当时的陆海格局进行细致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一所谓的世界近代史开端期，在知识获取与生成方面实际上存在两段并行发生的历史：对海洋与欧亚外部区域的人类学考察以及对近东、中东和中亚区域的东方学考察。这两段并行发生的学术史既塑造了当时两类区域的知识特质，又在之后直至当代的学术版图中，打上了基于地缘与区域的独特烙印。

与此同时，随着近代西方力量的崛起，海洋通道取代陆地通道成为世界物质交流的主要方式，欧亚地缘态势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在这过程中形成了知识领域的两种“域外”空间，即所谓殖民区域的“域外”和作为陆权帝国内部边缘区域的“域外”。近代中亚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这两种“域外”的交集。一方面，这一区域是英属印度的“域外”；另一方面，随着俄国这一陆权帝国的东进和南下，这一区域开始成为逐步扩大的帝国边缘区域的“域外”。作为英俄大博弈的结果，俄国空间下的中亚这种“域外”状态最终消失，成为俄国版图空间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中亚的这两种“域外”状态的重叠，为这一时期该区域的研究涂抹上了多样的色彩，英式传统与俄式知识与学科框架在此重叠碰撞，并经由海权

与陆权、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的竞争，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将一个有待我们重新理解与认知的新中亚带入当代世界与当代秩序中。

3.新中亚的出现：苏联解体、全球化与“一带一路”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以及全球化潮流的到来，新的中亚空间正在逐渐形成。这种空间已经不限于之前苏联一部分的整体设定，而呈现出新的结构。在这种新结构中，中亚不再是古老丝绸之路关联区域的简单复归，也不再是既有帝国殖民框架下的传统再造，而是一种基于对区域、文明与历史连续体统一性认知与实践的新方向的探索，解释与重构历时性的政治、宗教与思想资源成为中亚各国在独立后不约而同的行动逻辑。[3]在这种大背景下，以中亚各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认知与知识实践，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路径，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直到中亚各国本身与域外各国知识界重新确立起对这一区域及内部各国的稳定认知框架为止。

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的一种基本关系与趋势，不仅驱动了中亚的历史记忆，而且进一步激发了中亚各国的未来可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将历史性地激活欧亚之间曾经的丝路纽带，还将确立起基于我们自身的对内地-边疆-周边的整体性认知框架，从而经由理解欧亚中心区域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形成中国的新边疆观、新世界观与新全球观。

学科格局及其内在变迁

中亚在人类的认知空间中并不是空缺的，但在记述空间中存在阶段性的疏密状态。在前近代时期，关于中亚地区社会与人群的相关记述，主要来自外界到此的旅行者。这种旅行的副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我们对当地社会与文化状态的基本认知图景："旅行，尤其是穿越文化或政治边疆的旅行，总是令人激动……旅行也揭示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不仅牵涉运输系统，还有政治组织结构和贸易方式，甚至宗教信仰。旅行者本身的动机就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还有更为直接的，旅行者的游记有时就是我们了解过去某个社会，比如在中亚广阔地域中生活的游牧民族的唯一途径。"[4]这种前近代的知识记述，因其对区域叙述的不平衡状态，构成了我们在中亚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的错位、遗漏、重复和缺失，但即便如此，这些记述本身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区域社会与生态变迁的古典资源。

例如，在作为中国历代正史开篇的《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西域三十六国的情况，其中就涉及当代中亚地区的社会历史。随着这一叙述框架的确立，中国对中亚域外知识的记述逐渐形成传统，并得以延续。唐代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就记述了位于如今中亚地区的素叶水城（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附近）至羯霜那国（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撒马尔罕附近）等诸城邦的相关情况，其中有些记载涉及当地的社会与人文状况："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服毡褐，衣皮□，裳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形容伟大，志性恇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5]其认知和理解中亚区域进而构筑古代中国的周边与世界观的内在驱动，为我们积累起了足够丰富的关于中亚的域外民族志信息与资料。[6]

在19世纪，在认知中亚及其周边空间方面，欧洲的东方学传统是一种具有垄断性的知识框架，在法国、英国、德国和俄国等欧洲殖民帝国，有一批东方学家专门关注中亚议题，并形成了世界性影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由各国各类人物所进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中亚探险之旅，其目的纷繁各异，其中既有学术研究的，也有获取军事情报的。

但不管怎样，正如中亚史研究的前辈丁笃本所指出的，进入近代，中亚的探险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兼具科学调查的客观效果：“其一，探险活动从一般的观察描述为主转向以严密细致的科学考察为主，特别是对中亚独特而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考察取得了空前丰硕的成果。其二，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考察研究中亚深厚的历史遗产和丰富的人文景观，18～19世纪欧洲和俄国兴起的东方学就与中亚的探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7]对俄国来说，18～19世纪是其考察活动的丰收期，在这一过程中，1714年彼得大帝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是一个重要开端，随后出现了一批中亚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1819～1820年穆拉维耶夫在里海东岸地区和希瓦汗国的考察、1820年列夫申在哈萨克草原的考察。1845年，俄国地理学会民族学部创立，这开启了俄国民族学的新篇章，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它主导了一系列重要的田野调查，其中包括由Н. В. 哈内科夫与Я. В. 哈内科夫等率领进行的中亚调查，以及由拉德洛夫进行的对阿尔泰萨彦高原、西南西伯利亚和中亚的田野调查。到了19世纪70～90年代，“进化学派”代替原先的“神话学派”，开始在俄国民族学中占据主流地位。

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英俄大博弈的展开，中亚地区进入了帝国争夺的中心舞台，随后，以阿富汗的中立化为基础，英俄之间实现利益妥协，中亚在地域上基本被纳入俄国版图，进而俄国在基于文明等级的世界地理观念上重构了中亚的历史与叙述空间。[8]以此为基础，俄国对于中亚的外域化的东方学研究开始转变为国内研究。在这一时期，以1863年俄国博物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成立为标志，俄国民族学逐步形成了与人类学、考古学以及历史主义相结合的特色，而Н. М. 普尔热瓦尔斯基、Г. Н. 波塔宁、В. В. 彼夫佐夫、П. К. 科兹洛夫等人关于中亚的探险游记作品进一步促进了俄国知识界和公众对中亚内部生活着的各群体的认知。进入20世纪，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新的联盟国家的建立，苏联民族学作为一种具有合法性和垄断性的学科类型与研究路径，“在成立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的年代里就已决定了苏联民族学的特点：民族学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和根本改造苏联各族文化和生活任务相结合”。[9]从学科源流而言，它是从地理学中发展出来的，是一门研究民族的起源、区别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形成特点的科学，被认为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以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为例，其最早被放在地理系，之后又转到东方学系，从1950年起改设到历史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民族起源与历史民族、各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家庭问题。[10]“这些问题（民族学资料对解决这些问题占有重

要地位）在苏联科学界是吸取相邻学科（考古学、人类学、语文学）的资料来进行综合的研究的。”[11]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中亚进行的民族识别和加盟共和国划界，中亚地区也成为苏联民族学研究最大的田野对象和最重要的“资源库”。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设有专门研究中亚民族的部门，在1962～1963年由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中亚部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民族学家共同编著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各民族》（两册）中，对位于如今中亚范围内的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多民族居民及其生活状况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此外，还有诸如C. П. 波尔科夫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民族学》（莫斯科，1980），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著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民族集团的民族过程》（塔什干，1987）、《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亚与哈萨克斯坦民族的遗产继承》，等等。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还定期出版年刊《中亚民族学文集》，这一刊物的出版工作在苏联解体之后依然在继续进行。[1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由于东西方冷战的外部环境，除了作为同一阵营成员的民主德国等国学者之外，其他国家的学者无法进入这一区域进行研究工作。当然，在中苏关系融洽的时期，中国学者也曾有机会与苏联同行一起在中亚进行相关研究：“苏联古人类学家与其中国同行进行的最重要的合作项目是中苏古生物考察。这个项目是计划用更先进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完成中亚考察团在20年代所进行的工作。新考察工作的前半部分是1959年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主要在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和青海等省区，而后半部分即苏联境内的考察工作则一直没能完成。”[13]

1991年底，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传统的苏联民族学范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在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存在，但由于联盟国家的瓦解，涵盖原先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学知识框架不再具有垄断地位，中亚各国开始恢复其自身的历史学、东方学学术资源，并不同程度地在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引入欧美的人类学研究框架。以此为基础，新的中亚人类学话语正在逐步形成。

从整体状况而言，在中亚人类学研究方面，我们可以认为，19～21世纪，其学科演变脉络呈现出东方学—民族学—人类学（与传统苏式民族学并存）的总体特征。在研究的主客位方面，以俄国为例，也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阶段性转变：在俄国吞并中亚之前，中亚研究是一种域外研究；随着俄国逐步控制中亚以及后来苏联的成立，中亚民族学研究本身

成为苏联国内研究的一部分；到了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之后，原本作为国内研究的中亚研究又重新转变为俄罗斯的域外研究，与此同时，中亚各国内部对于中亚的研究也在逐步兴起。随着中亚认知面相的多样化，中亚人类学的研究也呈现多元发展态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人类学研究概览

在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初期，西方学者短期内存在着将中亚人类学加以概念化的倾向，即忽略中亚区域本身的独特地理与生态特质，而将其他区域人类学的命题贴附到中亚议题之上。[14]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西方人类学者长期无法进入中亚进行田野研究以及苏联解体之初西方人类学急于填补这一话语空间有关，在内在逻辑方面带有某种“殖民性”的色彩。

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将中亚确立为“区域研究”对象的过程，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对此，正如戴维·L. 桑顿（David L. Szanton）所指出的：“‘区域研究’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拥有共同承诺的学术领域与活动群集的一个涵盖性术语：（1）高强度的语言学习；（2）用当地语言深入实地调查；（3）对当地历史、档案、材料以及阐释的密切关注；（4）用细致观察来检验、制定、批判或发展基础理论；以及（5）经常超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边界进行多学科交流。”[15]他并进一步指出，在进行上述这些准备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如下一些具体的因素：（1）研究者所在国家与那些问题缠身的国家之间不断变化的政治关系；（2）公共与私人资助方不断改变的兴趣；（3）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学科以及学术方面的个人与政治承诺；（4）在所研究国家或地区内部的学者的不断变动的关系、争论与合作；（5）研究领域的成熟度（也就是说，这是在研究者所在国家新建立起来的，还是建立在这一地区的文化之上的，抑或是被欧洲殖民学者所确立起来的）；（6）学习这一地区语言方面的难度；（7）这一区域内部的戏剧性事件或冲突（革命、战争、叛乱）；（8）从那个地区移居到研究者所在国家的民众的知识与政治诉求；（9）进入田野、获得档案或进行合作研究的难易程度。[16]他在此所强调的研究区域的成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亚研究在人类学层面上展开时无法回避的内容。

随着中亚田野空间的对外开放以及相关研究的日渐展开，西方学界逐步脱离了对中亚区域的本质化认知，开始对上述倾向进行反思，将中亚作为一个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志地区，而抛弃了传统东方学视野下对这一地区的异域想象，但这些研究依然主要通过揭示这一地区多元性和流动性的路径展开。[17]在20世纪90年代的诸多研究作品中，以中亚

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表明西方学界尤其是英文学术世界对中亚区域的研究处在一个“重新出发”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几方面的动向值得关注。其一，中亚虽然被纳入人类学的认知区域中，但在分析中往往被用来被动适应在其他地区发展出来的理论，其本土原生概念生成不足，这与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概念与范式频出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人类学的中亚研究无法离开既有的历史学和东方学、民族学研究成果和相关概念，要推进相关研究，就必须认知和承认历史学与东方学、民族学等学科在历时性和区域性层面所取得的成就，而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另起炉灶的所谓“纯粹”的中亚人类学框架。其二，中亚各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陆续独立，其时间上的较为晚近使得对民族国家建构及其相关仪式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是以国家为基本对象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而后续研究能否持续推进也与研究者所在国家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以及中亚国家相关学术资源的支持力度息息相关。其三，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全球化和世界体系中被重新定位，形成了新的移民等流动性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中亚各国民族国家建构策略、主体民族政策等都存在密切的联系，同时涉及全球化语境下的劳动力流动等问题，这些都挑战了人类学既有的关于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主流表述，构成了大规模人口流动中独特的中亚类型。其四，由于历史原因，尤其是苏联时代的加盟共和国划界，这一区域内的新生民族国家往往存在独特的跨界民族现象，而一些跨界民族本身又是周邻国家的主体民族，这对既有的区域人类学叙述的内在逻辑一致性问题提出了挑战。其五，鉴于中亚各国新历史的书写需要，中亚区域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国家的形象建构存在着长期的冲突与张力，这些都从新的层面凸显中亚问题本身的政治性特质，并在以特定国家为对象的相关研究中鲜明地表现出来。[18]

以下将结合中亚各国近期人类学研究的相关状况，对以中亚诸国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以及相关趋向进行初步分析与梳理。

（1）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各国中，哈萨克斯坦因其国土面积的优势及其在当代中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领导性地位，代表了这一区域独特的地理、地缘政治、文化和历史实体的现状。[19]概括来说，有关哈萨克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民族与族类群体问题。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哈萨克斯坦内部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需要从比较其古代史与周邻国家的历史出发，对哈萨克

国家的历史形成从语言和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系统分析，从而揭示历史与文化传统在哈萨克国家建构和民族形成中的重要意义。[20]其二，城市与社会转型问题。对哈萨克斯坦是如何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转型的，有研究者曾对一座工业城镇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破产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民族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个案。[21]我们注意到，由于后苏联时代的社会转型依然没有完成，哈萨克斯坦的城市与社会转型问题将是学术界后续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三，边缘群体的认同问题。这既是中亚国家的普遍现象，也与单个中亚国家的具体国情息息相关。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有研究者指出，除了在哈萨克斯坦的边缘性民族群体，如俄罗斯族等，还有位于哈萨克斯坦邻国如蒙古国境内的哈萨克人问题。这一问题在苏联时代由莫斯科来处理，但随着哈萨克斯坦的独立，该问题转变为哈萨克斯坦与蒙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这些哈萨克人如何认识和面对蒙古国、哈萨克斯坦，既涉及他们的认同问题，也涉及国家间的关系问题。[22]

（2）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的一个双重内陆国，也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以来，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所在的费尔干纳地区一直是中亚人口聚居的中心区域，当地社群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热点问题；此外，宗教复兴问题以及社会记忆问题也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议题。[23]概而言之，有关乌兹别克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家建构问题。如何建设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这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必须首先面临的问题，而如何面对既有的机构和组织遗产，也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有研究者指出，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亚独立的新国家被迫调整其机构，以适应新的象征性边界以及1991年以来的独立性。吉尔吉斯斯坦原先的大学和科学院均被要求重新考虑其研究政策并加以调整，以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建立国家叙事是中亚各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目的。1991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变化，需要相关机构和知识分子将当代研究与历史需求连接起来，对古代历史的偏爱、对人民的独创性和悠久传统的赞美以及对民族起源的痴迷，都源于苏联政权的当代叙事。在新的语境下，乌兹别克斯坦需要以更细微的方式重新审视过去的二十年，并重新解读苏联时期的历史，从而更好地认知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自从乌兹别克斯坦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以来，这个进程已经进行了大半个世纪，并将继续下去。[24]其二，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尽管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当代乌兹别克斯坦民众依然保留着对苏联的浓厚记忆，认识、记录和分析这些社会记忆，是研究苏联与后苏联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的切入点。有研究者对当代乌兹别克斯坦

普通公民对苏联时期玛哈拉社区的记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并指出，社区在历史上代表了乌兹别克斯坦仅有的几种有效的传统结构之一，这些结构可以通过基于对共同的居住身份的塑造来团结各个民族和宗教团体的代表。但是，在这些社区的历史中，当局经常试图操纵这些机构以增强国家的合法性，这种操纵方式挑战了居民对社区依恋的本质，并质疑了玛哈拉结构的权威性和合法性。[25]此外，乌兹别克斯坦的性别[26]、宗教和社会转型问题，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方面。[27]

（3）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历史上是东西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独立与发展，其历史上的繁荣局面与现实中的改革和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吉尔吉斯斯坦多重与复杂的当代形象。[28]因此，关于当代社会转型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的研究，是吉尔吉斯斯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概言之，有关吉尔吉斯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经济与发展问题。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发展既涉及国家政策，又与其国内的民族关系息息相关。有研究者指出，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异有时被认为是导致其内部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了解这种差异的程度及其内在根源对于帮助制定旨在避免进一步冲突的政策至关重要。研究者通过使用2005年的家庭调查数据，分析了最近发生冲突的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之间的经济差距之后发现，与公众的看法相反，城市地区的吉尔吉斯族家庭的支出略高于乌兹别克族家庭，而农村地区的吉尔吉斯族家庭支出水平与乌兹别克族家庭大致相当。城市地区差距的出现主要在于吉尔吉斯族的家庭较小和受教育程度较高。此外，就住房财产的价值而言，乌兹别克族家庭比吉尔吉斯族家庭要高。研究者最终指出，其房价的差异可以用乌兹别克族人拥有较大房屋来加以解释，这些房屋是较大家庭的住所，也是经营小企业的基础。[29]其二，历史认同与民族主义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在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结合了对名义上的族裔及基于国家身份的公民认同、公民主权受到削弱的感觉以及在选举中不断崛起的政治势力的相关叙述。因此，民族主义已成为关于吉尔吉斯斯坦治理失效的解释框架中的一种内在动力。这一研究首先分析了阿卡耶夫政权的双重身份叙事——公民和民族，然后叙述了政权在巴基耶夫领导下向以民族为中心的吉尔吉斯爱国主义的转变。奥什事件表明民族主义在当代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中成为影响政治议程和公众认同的关键要素。[30]其三，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开发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与中亚其他国家相比，吉尔吉斯斯坦的水资源较为丰富，其主要来自融雪以及山顶冰川，这些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被视为有治

病的神力。但是，当吉尔吉斯斯坦决定利用这些水资源开发水电站时，便与下游水资源匮乏的乌兹别克斯坦产生了冲突，双方试图通过交换天然气的方式加以协商。在为能源进行协商的同时，水也具有自己的能量。当地的玛扎斯人常常到瀑布或泉眼边取水，以期治愈身体疾病。在苏联时期，这些具有治疗效果的泉水被开发为疗养温泉，而在现代吉尔吉斯斯坦，同样有类似的举动。[31]此外，其他自然资源的相关政策及其在地化执行问题也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32]

（4）土库曼斯坦。作为中亚最为封闭且油气资源相对富裕的国家，土库曼斯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认同与治理模式。概而言之，有关土库曼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家与区域治理问题。有学者对土库曼斯坦游牧生活方式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基于田野调查的比较研究。[33]其二，语言与认同问题。有研究者对包括土库曼斯坦在内的苏联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进行了独特而有深度的分析。作者将这些政策与国家建设、语言规划和多语言使用等问题联系起来，并揭示了在苏联时代和苏联解体之后土库曼斯坦语言政策中所呈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认同与意识的不同面相。[34]

（5）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最贫弱的国家，也是苏联解体后长期饱受内乱困扰的国家，对于该国社会重建以及国家建构的相关研究，是塔吉克斯坦人类学研究中的重点内容。简而言之，有关塔吉克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转型问题。有研究者对塔吉克斯坦农村地区的女性化现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分析了影响塔吉克斯坦农业劳动力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因素，注意到塔吉克斯坦农村地区存在的女性化现象，并指出，土地改革、季节性的男性劳动力外流以及随之而来的妇女劳动参与度的增加，促进了性别职业隔离状况的改变。作者通过深入的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进行了以案例为基础的定性分析，并提供了诸多先前未观察到的重要数据。相关的结果表明，由于男性劳动力的外流，现有的地方权力体系和男性主导关系正受到挑战，剩余劳动力逐渐女性化。虽然妇女从事的工作仍然较为低下，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为扩大劳动机会提供了契机，这提高了妇女在初级农业生产以及服务供应部门中的作用，并赋予了她们对自己生活的一定程度的控制权。[35]其二，国家建构问题。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一个陷入长期内战的国家，这与苏联时代的历史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有研究者对苏联时代在中亚国家领土方面的相关政策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这些领土变动给塔吉克斯坦造成的深远影响。[36]

总体而言，在中亚人类学的当代研究中，在国家的层面，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在领土与人口上有突出优势，因此以关于这两国的研究为多，关于吉尔吉斯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研究次之，关于塔吉克斯坦的研究最少。在研究的议题方面，国家认同、族群政治与宗教等相关议题依然占据主流位置，水资源、环境与生态、社区治理、性别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37]在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对诸如“东干人”等中亚内部少数民族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与传统，新的研究领域与对象也正在逐步拓展。[38]由于中国有与中亚接壤的便利条件，加之研究力量和规模占据优势，如果高校与相关研究机构能持续性地给予相关的支持，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研究必将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生产空间，也将为我们填补一片巨大而重要的世界视野缺漏，并可能为世界人类学提供新的概念、框架与范式。

结语：古典传统、学科互惠与中国立场

认知周边是中国认知自我与世界的一个必由路径。中亚与中国西北紧密相连，而中国西北方向的认知在历史上存在一个被称为“西域”的整体框架，且“中亚”概念本身也存在区域上的弹性，因此，基于中国学术本位出发的对中亚区域的认知也必然会受到中国内部自身认知框架的影响，这种“内外交织”的连带性特征构成了我们认知和理解中亚议题的关系基础。此外，中亚与中国的这种历史连带性关系，与其他以中国周边区域为对象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具有一种与理解中国历史变迁主轴息息相关的所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一“司马迁定律”相对应的历史与哲学维度。这一维度，为我们后续理解和认知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背景。

基于对中亚历时性发展的认知，如果仅仅从当代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则始终存在着某种“断裂”，很难形成一种关于中亚地区民族学与人类学发展历程的整体认知图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跟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有关，也与整个欧亚中心地区在知识形态与学科型构方面与民族学、人类学原生区域的特质不同有关。也就是说，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历代官方正史已经积累起关于整个西域地区的众多记录，这些记载虽然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粗略，但如果放到当时的历史中，就可以发现其已经涉及这一区域的众多信息，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中文语境下的整体性与连贯性叙述；另一方面，随着近代西方殖民帝国逐步控制中亚地区，这一区域原有的历史知识传统及其呈现方式逐渐被基于比较语言与比较文献研究的东方学所取代，成为这一时期中亚社会及群体研究的基本知识形态。随着俄国革命和之后苏联的成立，中亚地区也逐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了民族识别和加盟共和国划界，这些基于联盟国家制度的相关配套举措也影响到学术领域，这一区域的东方学研究开始在影响力上让位于后期的民族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为中亚人类学新范式的引入提供了新的田野调查与研究的可能。但是，这种新范式不可能是全然新创的，而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和运用既有的中亚知识资源，并实现与近邻学科间的互惠、协调与合作。

有鉴于此，理解中亚地区曾经有过的古典传统，接续性地发掘与利用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在中亚领域的既有资源，将为当代中亚人类

学研究提供必要而有效的知识资源，也能够有效地弥合这些学科之间的资源竞争与紧张关系。在具体的研究层面，如何处理包括历史学、东方学等在内的中亚研究古典传统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路径的关系，将直接决定以中国为主体和立场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基于对区域特殊性与历史积淀性的理解，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研究中的殖民色彩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又必须汲取既有的东方学、地理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需要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取径与分析框架。以此为契机，结合古代与近代中国对中亚的已有认知基础，我们将形成当代中国关于中亚的认知新图景。它不同于西方研究的既有框架，也不同于中亚各国的自我认知，而始终带有回应中国议题的内在动力与学术自觉。在未来，配合原创研究，还可以系统筹划并推进具有针对性的“中亚古典学译丛”和“中亚人类学译丛”，这也将为学界进一步推进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提供更为坚实厚重的外部基础与参考资源。

[1] 〔德〕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刘立群等译，《黑格尔全集》第27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2014，第95～97页。

[2] 袁剑：《国家感与边疆性：中亚国家间的边界问题及其观念折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3] 袁剑：《区域、文明，还是历史连续体？——中国的中亚叙述及其话语分类》，《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4] 〔美〕斯蒂芬·S.戈斯、彼得·N. 斯特恩斯：《世界历史上的前近代旅行》，苏圣捷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2页。

[5] 玄奘著，董志翘译注《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2012，第44页。

[6] 王文光、曾亮：《中国正史中的古代海外民族史志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7] 丁笃本：《中亚探险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前言，第5页。

[8] 黄达远：《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9] 〔苏〕列文：《什么是民族学》，罗致平译，《民族问题译丛》1958年第8期。

[10] 〔苏〕P. 伊茨：《关于苏联的民族学》，阮西湖、穆立立译，《世界民族研

究》1987年第3期。

[11]〔苏〕列文：《什么是民族学》，《民族问题译丛》1958年第8期。

[12] 张娜：《中亚现代民族过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第13～14页。

[13]〔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54页。

[14] Liu，M.，“Central Asia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 40，2011，pp. 115-131.

[15]〔美〕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袁剑译，刘新成主编《文明研究·第一辑：多元文明与区域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102页。

[16]〔美〕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刘新成主编《文明研究·第一辑：多元文明与区域变迁》，第113页。

[17] Marsden，M.，“Southwest and Central Asia：Comparison，Integration or Beyond，” in Fardon，R.（ed.），*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Anthropology*，Los Angeles：Sage，2013.

[18] Kandiyoti，D.，“Post-Colonialism Compared：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No. 34，2002，pp. 279-297；Kandiyoti，D.，“How Far Do Analyses of Postsocialism Travel？The Case of Central Asia，” in Hann，C.M.（ed.），*Postsocialism*，*Ideals*，*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Eurasia*，Routledge，London，2002. pp. 238-257.

[19] Gulmira Sultangalieva，Paul W. Werth，“The Place of Kazakhstan in the Study of Central Asia，” *Kritika*：*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Vol. 16，No. 2，2015（New Series），pp. 345-358.

[20] Amanzhol Kalysh，Aliya Isayeva，“Ethnogenesis and Ethnic Processes in Modern Kazakhstan，”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Vol. 131，2014，pp. 271-277.

[21] Gulmira Sultangalieva，Paul W. Werth，“The Place of Kazakhstan in the Study of Central Asia，” *Kritika*：*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Vol. 16，No.2，2015（New Series），pp. 345-358.

[22] Diener，A.，*One Homeland or Two？The Nation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Mongolia’s Kazakhs*，Washington，D. 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9.

[23] Finke，P.，*Ariations on Uzbek Identity：Concepts，Constraints and Local Configurations*，Berghahn Books，2006.

[24] Marlène Laruelle，“National Narrative，Ethnology，and Academia in Post-Soviet Uzbekistan，”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Vol. 1，No.2，2010，pp. 102-110.

[25] Timur Dadabaev，“Community Life，Memory and a Changing Nature of Mahalla Identity in Uzbekistan，”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Vol. 4，No.2，2013，pp. 181-196.

[26] Kandiyoti，K.，Azimova，N.，“The Communal and the Sacred：Women’s Worlds of Ritual in Uzbeki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Vol. 10，No.2，2004，pp. 327-349.

[27] Fathi，H.，“Gender，Islam，and Social Change in Uzbekistan，” *Nationalities Papers*，Vol. 25，No. 3，2006，pp. 303-317.

[28] 袁剑、刘玺鸿：《近代中国视野中的乌兹别克斯坦：背景、认知与演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9] Damir Esenaliev，Susan Steiner，“Ethnic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lfare：Evidence from Southern Kyrgyzst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 42，No. 4，2014，pp. 970-982.

[30] Marlène Laruelle，“The Paradigm of Nationalism in Kyrgyzstan：Evolving Narrative，the Sovereignty Issue，and Political Agend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 45，No. 1-2，2012，pp. 39-49.

[31] Stephanie Bunn，“Water as a Vital Substance in Post-Socialist Kyrgyzstan，” *World Views Environment Culture Religion*，Vol.17，No.2，2013，pp. 125-137.

[32] Farhod Yuldashev，Bahadir Sah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ineral Resource Use：The Case of Kyrgyzstan，” *Resources Policy*，Vol.49，2016，pp. 266-272.

[33] Kerven，C.，*Prospects for Pastoralism in Kazakhstan and Turkmenistan：From State Farms to Private Flocks*，Routledge，London，2003.

[34] Landan，Jacob M.，kellner-Heinkele，Barbara，*Politics of Language in the Ex-Soviet Muslim States：Azerbaijan，Uzbekistan，Kazakhstan，Kyrgyzstan，Turkmenistan，and Tajikistan*，London：Hurst and Company，2001.

[35] Mukhamedova，Nozilakhon，Wegerich，Kai，“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Post-Soviet Tajikista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Vol. 57，2018，pp.

128-139.

[36] Ubaidulloev，Zubaidullo，“The Russian-Soviet Legacies in Reshaping the National Territories in Central Asia：A Catastrophic Case of Tajikistan，”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Vol. 6，No. 1，2015，pp. 79-87.

[37] 〔英〕凯瑟琳·亚历山大：《中亚人类学概述》，袁剑、刘润蛟译，《亚非研究》2018年第2期。

[38] 李如东：《身份变换与权威再造：苏联解体后中亚东干人精英的社会组织化过程》，《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

附录三 国家感与边疆性：中亚国家间的边界问题及其观念折射

随着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国家结构的现代化，当代国家的一大特征就是存在明确的疆域及边界。在此背景下，边界问题成为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重要议题，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边界本身既成为塑造民族国家自身传统和认同的重要符号，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整个国家与外部的区隔性特征，各国进而形成自身边疆观的整体图景。理解边界及其相关的边疆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国家及其所在区域在特定时期的边疆特征，[1]而且能够进一步推进我们对于中国周边地区的深入理解和认知。

从现实政治而言，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组成的中亚区域，是当代世界政治版图的重要单元，也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西边出现的新地缘政治板块。这一区域，不论对于欧亚大陆的稳定还是中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亚各国在各自国家认知和边疆态势方面所呈现的不同特质及其内部应对方式，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各国在自身国家结构及边疆特征方面呈现出的区域特质和历史印迹。在当今域外和周边研究的“边疆”转向中，认识和理解中亚及其内部各国边界问题生成的整体背景、历史演进及相关解决逻辑，将为我们提供认知中亚整体性的更为全面的视角。

需要指出的是，本附录所涉及的中亚国家边界问题，仅指中亚各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不包括中亚国家与域外邻国（如俄罗斯、中国）的边界问题。

中亚区域的生态与前近代特质

中亚有其自身的特质，这种特质鲜明地体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其自身的孤立性和联系性并存。理解和认知这一区域本身在近代以来的变迁，将为我们提供认识这一区域当下和未来的基础和可能。

在历史上，除了费尔干纳盆地之外的中亚地区多为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当地民族群体的划分往往依据其居住地的海拔高度、自然地理区域和经济作物类型来进行，并不具有明确的地域界线。[2]北部的草原区域和南部以费尔干纳盆地为核心的绿洲区域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轨迹。北部区域由于缺乏足够的水源和人口，在近代之前处于边缘和附属的位置，因此，中亚“南—北结构”中的南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占有压倒性优势。理解这一整体结构，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之前中亚历史的整体走向。

从“继承”的结构到“重塑”的国家

中亚各国当前的边界现状，是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识别和加盟共和国划界的结果。作为一种“继承”的结构，这一结果使既有的“北部草原＋南部绿洲”的地域格局转变为苏联区域分类上独特的“哈萨克斯坦＋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加盟共和国格局。如果我们进行历时性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早在1924年，当时的苏联政府就开始着手在原俄属中亚地区进行民族识别和加盟共和国划界，这种行为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既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的地理特点和既有的行政区划状况，也没有对当时部族群体的历史居住格局和文化特征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分类，而是基于政治治理和全联盟“一盘棋”的经济规划进行识别和划界。在实际操作方面，这一地区原本自然形成的经济区域和民族传统聚居地域被新设立的中亚各加盟共和国边界所切割，这在形塑了当时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并行结构的同时，为当今中亚国家之间的边境争议和冲突埋下了隐患。例如，在1924年苏联对加盟共和国划界时，将乌兹别克人聚居较多的锡尔河省卡扎林等几个县划给了后来的哈萨克斯坦，而在1925～1930年隶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在之后又被划给了乌兹别克斯坦。有学者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新共和国和地区之间的边界划分争端是在当时新的政治背景下部族与族裔之间敌对行动的延续。[3]时至今日，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影响着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国家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的大量飞地现象，实际上也是当年苏联为了平衡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相关利益，在人口密集、自然条件优良的费尔干纳盆地进行人为划分所造成的后果。在苏联时期，这些边界线作为整体上的内部群体分类和经济分工框架的一部分，实际上是苏联内部行政管理、经济活动等的行政界线，但由于存在更高层级的协调，在苏联统一空间内部并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没有了苏联结构下的整体性协调，各国开始以各自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原本被遮盖的边界争议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继承了苏联时期划定的行政结构，继续维持现有边界，共同奉行不破坏边界的原则。这种在苏联政策中基于平等原则塑造的中亚国家“并行”结构，在苏联解体之后成为一种被“继承”的内容，并在随后各国的国家认同建设中成为某种基本共识。1993年8月，独立不久的中亚五国签署声明，进一步确认了维系各国间现有边界的既

有原则。在此基础上，中亚各国都迫切想要在短期内解决自身与周边各国的边界争议问题，从而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历史遗留性、多边性及其在中亚各国自身民族国家建设中所充当的政治动员工具特征，涉及具体的解决层面，显得困难重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基于中亚各国特殊的建国背景和相关传统，其公民认同感建立在民族的和领土-文明的认同感基础之上（见本书结语）。

这种认同分野直接体现在费尔干纳盆地内部的中亚国家边界冲突方面。这一面积约为2.2万平方千米、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地区是历史上东西方交通要冲，水土丰美，人口稠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地区，作为苏联时期划界的结果，三国的边界线在这一区域彼此犬牙交错，形成了诸多飞地。由于这一地区生活的主要民族为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塔吉克族，彼此在国家利益和群体认同方面有诸多冲突。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边界问题，早在2001年，吉尔吉斯斯坦就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谈判，希望能通过领土交换的方式将一块名为“索赫”的飞地转给乌兹别克斯坦，以换取一块与自己国土相邻的区块，但被乌兹别克斯坦以自身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回决。此外，对于“沃鲁赫”飞地，吉尔吉斯斯坦从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非常渴望能够获得该地区领土主权，而实际控制这一地区的塔吉克斯坦则基于自身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坚决不放弃这一地区。

边界问题近况与新进展

苏联解体之初，由于中亚各国忙于各自国家的机构设置与内部权力关系调整，其边界在最初的几年中依然延续着苏联时代的状态，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亚各国纷纷在原先的苏联内部行政界线基础上设立新的国家边界和海关哨所，形成新的国际边界格局。但总的来说，这些调整主要涉及国家机关和对外交往，对各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较小[4]。

但在现实层面，由于同处费尔干纳核心区，且经济形态较为接近，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边界问题较为突出，双方长期以来对位于费尔干纳的领土的争端一直影响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一些边界上的突发事件甚至直接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从1998年下半年起，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加强对边境的控制，严格限制人员和物资的跨境流动。最引人注目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开始沿着山谷边界的大片区域，在两米高的带刺铁丝网周围筑起围墙，并在其他地方开矿。这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普遍指责乌兹别克斯坦实际上是在隔离数万公顷的吉尔吉斯斯坦土地。与此同时，两国之间关于自然资源分配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吉尔吉斯斯坦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乌兹别克斯坦，在冬季的数月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经常关闭天然气供应。由于相对贫困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无力支付天然气账单，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此甚为不满。在吉尔吉斯斯坦，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在财政上帮助维护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水坝和水库，而这些水坝和水库主要是为费尔干纳河谷的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核心产区提供水源。因此，两国的边界争端在1999年和2000年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关键因素。当时的一些评论者将其描述为一场“低烈度的边境战争”。[5]十多年之后，两国间的这一问题依然不时发酵。例如，2016年3月18日，乌兹别克斯坦向吉尔吉斯斯坦提出，准备向双方争议地区派遣施工队进行维修作业，但随即遭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拒绝；随后，约40名乌兹别克斯坦士兵在装甲车的护卫下，分批进入两国存在争议的阿拉布卡地区，并在当地采取限制性措施，禁止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入境。吉尔吉斯斯坦方面随即做出回应，同样在这一地区进行兵力部署，在三处边境检查站对乌兹别克斯坦公民采取限制措施，并要求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将军事人员和物资撤出。乌方则表示，这一争议地区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其没有理由从自己的国土上撤出。双方关系一度剑拔弩张。作为相对弱势一方，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的阿

坦巴耶夫甚至考虑取消前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参加上合组织峰会的计划。到了2016年夏天，双方的边境危机再次升级。同样是在费尔干纳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2014年也在双方争议地区多次发生边境交火事件，在事件的僵持阶段，为扭转局势，塔吉克斯坦方面甚至还一度动用重武器。这次边境冲突最终导致数十人受伤，受此影响，两国边界完全关闭达数月之久，双方正常贸易和人员往来受到严重影响。

随着中亚各国逐渐意识到和平稳定关系的重要性，各国在边界问题上逐渐开始寻求协商共赢的解决方案。2017年3月10～19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政府工作组在双方交界区域继续开展联合勘察。这次勘察活动为第17次联合行动，持续10天，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共同巡视了彼此间存在重大争议的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安集延州、纳曼干州，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巴特肯州、贾拉拉巴德州之间的12处区块，并进行了相关的实地测绘和踏查工作。此外，双方还进行了4次工作磋商，最终签署了相关的成果性纪要。[6]5月25日，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热尼什·拉扎科夫宣布，随着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跨政府委员会开始有效工作，两国现有的1379千米边界争议线，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已有1054千米在划定问题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现存的争议边境线970千米当中，同样有510千米的划定已经达成一致。同年7月16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工作访问，这是两国间8年来的首次政府高层间交往，旨在进一步破除双方关系中历史性的冰点，解决诸如边界划定等争议性问题。出访当天，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理热恩别科夫共同出席了乌吉两国政府间双边合作委员会及乌吉两国政府间勘界、划界合作委员会会议。通过双边协商，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就消除贸易壁垒、继续加强两国经贸合作，以及两国边境勘界初步协议草案达成了共识。9月5日，新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同吉国时任总统阿坦巴耶夫就边界问题签署双边协议。至此，吉乌两国 1379千米的边界线中有超过80%的部分得以勘定，仍余217千米的边界线有待最终确定。同年12月25日，出访哈萨克斯坦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阿斯塔纳签署《哈吉边界划分条约》，以条约的方式确定两国边界线的最终走向及相关细节。根据条约规定，哈吉两国边界线总长为1257.07千米，在边界线附近，双方共设置边防哨所1055个，其中哈萨克斯坦方面533个，吉尔吉斯斯坦方面522个。

截至2017年，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尚有250多千米长的边界线未勘定，在关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归属问题上也存在深层次矛盾。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之间则存在60多处争议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尚有近1/5的边境地区未得到明确的划分，尤以关于奥什州的归属最为关键。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边界问题则基本解决。除此之外，中亚各国之间，尤其是在费尔干纳盆地地区，还存在着更为棘手的飞地问题。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有4块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飞地（索赫、卡拉恰、莎希马尔丹、庄贾尔）；塔吉克斯坦有2块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飞地（沃鲁赫、西凯拉哈奇）；塔吉克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则有一块飞地（萨万）；吉尔吉斯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一块飞地（巴拉克），其面积为230公顷，是中亚最大的飞地之一。总体来说，在这一地区，各国边疆治理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依然存在。

2018年，中亚国家的边界问题总体而言有所缓解。一方面，相关国家开始通过协商互换的方式，寻求作为边界问题一部分的“飞地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积极推进边界问题的解决。例如，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于3月9日在首都杜尚别与来访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塔乌两国部分边界地段的条约以及塔乌两国关于睦邻友好的联合声明，为彻底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提供了契机和可能。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2018年8月14日，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界委员会成员、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驻奥什州第一副全权代表巴依什·尤苏波夫表示，吉乌两国已经就双方边界划定和划界完成相关例行谈判工作，双方决定互换边境附近的土地。具体而言，吉尔吉斯斯坦准备将飞地巴拉克移交给乌兹别克斯坦，而作为交换，乌方将把靠近奥什州卡拉苏地区的阿克-塔什村中与巴拉克等面积的土地转交给吉方。据相关报道，巴拉克的居民已同意这一方案。多年来巴拉克居民在过境问题上深感不便，他们要绕行近600千米才能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其他地方。据吉尔吉斯斯坦媒体报道，居住在巴拉克地区的人几乎都是吉尔吉斯人，而由于过境问题的困扰，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数年前提议将该地区居民迁出，受此影响，当地人口锐减。目前，所有相关议定书都已起草好，只等两国总统批准后付诸实施。对此，俄罗斯《独立报》的评论指出，在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地区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飞地，吉乌两国间的这一尝试若能成功实现，不仅将全面改善吉乌两国双边关系，而且将为中亚其他国家处理相关问题提供必要的经验和现实操作方案。同年11月5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签署批准了关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边境协议。[7]

但是，由于中亚各国之间边界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各国间依然存在爆发冲突的可能。例如，2018年2月8日，与吉尔吉斯斯坦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塔吉克斯坦突然单方面宣布，从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的两处口岸，并封锁了附近的一座浮桥，禁止人员通行，同时决定向当地增派边防军人。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的消息称，塔吉克斯坦方面的这次行动，导火索是吉方在双方边界争议地区修建浮桥，而这一区域尚未进行明确的勘界。据悉，此次被塔吉克斯坦方面封锁的浮桥由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地方政府主持修建，其主要目的在于缩短当地学生的上学路程。[8]在整个2018年，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边界爆发数起冲突，而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也有数起边境冲突。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边界问题依然是影响中亚国家间关系的一大重要因素。

国家感与边疆性：中亚国家边界问题的未来走向

在苏联解体后的数十年间，中亚各国依然在努力构筑自身国家的历史和政治合法性，并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确立更为具体的民族国家认同基础，正是这种基础形塑了国家感的主要内涵。具体而言，这种国家感有助于中亚各国内部认同的凝聚和整体对外身份的生成，其过程既是建立在对苏联时代既有疆域空间及边界走向的认同基础之上，又必须抛却苏联时代的加盟共和国历史叙述，建立起新的更具古老性和连续性的叙述框架。但在这一目标之下，有一个方面必须进行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妥协，那就是各国自身所试图追寻的帝国荣耀及其历史记忆，与这些国家在苏联时期的划界现实始终存在着某种错位。在具体的边疆治理层面，中亚地区这些历史上的荣耀帝国与现实中的各国国家疆域无法形成一一衔接的关联，诸如帖木儿汗国这样的“独占的”与“切割的”国史叙述及其帝国想象无法在中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彻底贯彻。正是这种理想叙述与现实疆域之间的差异，形成了当今中亚各国的边疆性特征，即各国都无法彻底在现实层面真正塑造一个具有整体连贯历史与单一族类空间的国家空间，中亚各国在边疆上的历史和群体复杂性，塑造着其显著的边疆特质。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享历史”和“交错历史”都将是中亚各国历史版图与现实疆域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势。总体而言，这种国家感与边疆性，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认识中亚国家划界问题生成和解决的两大关键。

历史终在行进，在未来，中亚各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依然任重道远，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中亚各国构筑其国家公民认同感的基础不同，各国推进各自国家建设的进程、力度及方式也就各有差异。总体而言，中亚国家的边界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并呈现出如下的特征。

其一，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后获取新的认同感的过程与各国国家制度化建设相伴而行。由于各国认同空间与国家行政空间存在不重合之处，在可见的将来依然还会导致各国在边界与领土方面的冲突，并在中亚各国历史叙述层面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但总体而言，这些冲突和竞争不足以摧毁当下中亚各国间的既有边界格局，也不会从总体上影响中亚地区的稳定。随着中亚各国认同空间与国家行政空间的逐步整合，以及未来新的跨国经济合作的展开，这种冲突的烈度和频度将会降低，最

终形成相对稳定、有序的中亚国家间合作交往格局。

其二，由于费尔干纳地区既有作为农耕区的地理条件，又存在长期以来形成的文明中心城市（如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其将继续成为中亚各国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界纠纷的重点区域。关于费尔干纳地区的文化遗产及其当代阐释的独占性和共享性，也是摆在这一区域各国面前的一道难题。此外，因为涉及具体的历史认同问题，中亚地区存在的飞地状况在短期内也无法得到解决。而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等问题作为费尔干纳周边各国边界问题的衍生问题，也将日渐凸显。如何协调和处理这一问题，将考验中亚南部诸国政治决策层的智慧。

其三，“三股势力”的跨界传播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等问题正逐渐成为导致中亚国家边界冲突的新因素。如何在保证本国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不以邻为壑，从而从整体上保障中亚各国的安全和稳定，将成为未来考验中亚各国领导层政治智慧的关键所在。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亚整体性的安全空间其及南部边界安全问题，有效防止“三股势力”对中亚南部边界安全的挑战，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加强与中国、俄罗斯等成员国的合作，将是中亚各国达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

[1] 袁剑、刘玺鸿：《“科学边疆”及其实践：19世纪后期英国围绕印度西北边疆的治理策略与影响》，《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

[2] 王尚达：《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五届学术年会论文集》，第916页。

[3] Hirsch，F.，Empire of Nations：Colonial Technologi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Union，1917-1939，Unpublished.

[4] Nick Megoran，“The Critical Geopolitics of the Uzbekistan-Kyrgyzstan Ferghana Valley Boundary Dispute，1999-2000，” *Political Geography*，Vol. 6，2004.

[5] E. McGlinchey，Powerless in Kyrgyzstan，RFE/RL Newsline 13-07-2000，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Prague，2000.

[6]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快联合边界勘察进程》，http：//www.ite-china.com.cn/lian-he-bian-jie/，访问日期：2018年11月19日。

[7] 《哈总统批准哈土乌三国边界交界处协议和哈吉边境划分协议》，http：//www.siluxgc.com/kz/kzNews/20181106/15591.html，访问日期：2018年11月17

日。

[8] 高寒：《塔吉边境事件再现中亚边界之怪象》，《文汇报》2018年2月9日。

后记

本书的写作，缘于笔者在认知层面的关联性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对区域问题的重新思考。

人是生活在区域中的。在进行了数年关于拉铁摩尔及其相关议题的研究之后，如何更好地理解时代语境下的区域问题，成为笔者在充分理解“人的问题”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地思考和认识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连接区域，中亚在历史和当下都对中国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世界历史与地缘政治意义，因此，如何理解中亚并认识其在整个文明认知层面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就成为我们理解具有整体性的中国的关键所在。

中亚之所以影响世界历史，在于它本身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并在东西方历史文明交往中扮演关键性的中介角色；中亚之所以影响地缘政治，在于它是欧亚陆权的关键区域，其贯通与否直接关系欧亚陆权能否获得超越海权的稳定与优势；而中亚之所以影响中国，则不仅在于其与中国的地缘关联，更在于其在文明、生态、宗教和民族等相关方面与中国存在的历史与现实连接。这种互嵌交织的独特关系既影响了中国古代史，又深刻塑造了近现代中国西北边疆的形态及特征，从而对作为整体的中国本身产生新的价值与意义。因此，理解中亚及我们对其的认知变迁，将是从整体上理解中国的应有之义。

本书各章的相关内容，大部分已经在学术期刊或报纸上发表过，在收入本书时，笔者在行文论述方面做了必要的补充与调整。其中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专论乌兹别克斯坦的相关内容，最初的论文由笔者与刘玺鸿同学共同完成，在收入本书时做了专门的修订与补充。

本书的顺利面世，离不开我所在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诸位师友的大力帮助，也要感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及诸位同人在笔者2019年春季访学期间所给予的学术交流契机与空间，这些支持与交流为进一步推进我对本书议题的思考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

源。特别感谢杨圣敏教授百忙之中为本书写序，提携后学，润物耕心。此外，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郑庆寰社长以及本书责任编辑陈肖寒博士给予的支持与帮助，他们的专业素养与高效有力推进了本书的出版。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长期以来对我的物质与精神支持，为了支撑我这一不怎么有直接回报的知识追求，他们牺牲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

人生之路，总要行走。理解中亚，认识中国。

2020年5月30日于北大万柳公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世界岛”：近代中国中亚认知的生成与流变/袁剑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

（九色鹿）

ISBN 978-7-5201-7310-0

I.①寻… II.①袁… III.①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东亚-近代 IV.①D82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75771号

·九色鹿·

寻找“世界岛”：近代中国中亚认知的生成与流变

著者/袁剑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陈肖寒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3.25 字数：166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7310-0

定价/78.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装帧设计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Telephone 010-59367109

作为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重要区域，中亚在古代、近代和当代呈现出不同的文明生态与地缘政治意义。作为与之存在密切历史与地缘关联的中国，如何在历史的连续性维度中构筑起我们对于中亚认知的整体性，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西北方向域外认知框架的丰富与完整。基于对中亚地缘重要性和中国对外认知整体性的考量，本书从整体和分区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的中亚认知流变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力图在我们既有的西域认知和当代中亚区域认知之间，补充近代中亚认知的缺漏环节，从而构筑一幅历史连续性的中亚认知图景，并通过认知中亚更好地理解作为“共同体”的中国。



九色鹿



www.ssap.com.cn


ISBN 978-7-5201-7310-0

定价：78.80元



九色鹿

区域视野下的中亚研究

范式与转向

黄达远　李如东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黄达远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跨境民族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国家民委基地）/“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河西学院“祁连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丝绸之路区域史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李如东

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中亚研究所吉尔吉斯斯坦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从事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侧重中国西北与中亚民族、社会、文化研究。

黄达远
李如东

主编

区域视野下的中亚研究

范式与转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导论
  - 从域外与周边重新理解中国
- “一带一路”与区域研究
  - “一带一路”、“丝路学”与区域研究
  - 欧亚时空中的西北：“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地缘区位观
  -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 丝绸之路、地方知识与区域秩序
  - 试论区域关系史视域下的“西域”
- 重思“中亚”
  - 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
  - 历史哲学视域下的西域—中亚
  - 从“西域”到“中亚”
  - 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
  - 从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看俄罗斯帝国穆斯林的社会阶层状况
  - 19世纪初俄国对中国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
- 转型中的“中亚研究”
  - 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
  -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 身份变换与权威再造：苏联解体后中亚“东干人”精英的社会组织化过程
- 附录
  - 从朝贡体系到地缘体系：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历史关系概述
  - 第一批探险家
- 后记

导论

从域外与周边重新理解中国

——以丝绸之路研究的区域转向为中心

黄达远[1]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转为核心区，这种空间转向与近年来史学发展变化的趋势相符：区域研究与世界体系（全球史）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对边疆、边界、区域这些议题必须加以重新思考，中国需要自身的区域研究。近年来，笔者就“西北研究的空间转向”问题反思了以往西方单一民族主义知识体系下的“去地域化”，使得地域社会特点长期被掩埋和忽略，[2]而区域研究则能恢复地域的中心性：以草原、绿洲、农耕、森林、沙漠空间地域上的关联性视野进行观察，也就意味着避免使用早期西方的“有色透镜”进行文化解读。全球史家威廉·麦克尼尔指出，围绕跨文化这一概念，似乎存在着某种共识，这种现象使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浮出水面——否则，研究单个社会或文明的历史学家看不见这些联系。因此，未被发现的联系网最终会展示以往被单独考虑的“区域”历史之间存在的“系统关系”。[3]这就需要采用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一 丝绸之路的区域转向：恢复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地缘关联

当下的丝绸之路研究依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观，且尚深陷于民族国家模式中。发源于欧洲后来又成为全世界所遵循的民族国家模式，以固化的王朝国家形态——单一中心的历史形态，将人群和地域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以至于人们形成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记忆和以王朝架构为中心的认同记忆。李鸿宾教授指出，对丝绸之路的历史理解和阐释模式，“无非就是以通道的方式联结两端或中间的若干点域，但本质上仍

旧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历史的发展演变”。[4]这仍然跳不出以民族国家为预设的背景。这一问题的实质依然是单一民族主义知识体系的“去地域化”。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申遗文本，体现了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新理解，申报文本首创了丝绸之路区域研究的范例。“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是指“丝绸之路”东段由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遗址点串联而成并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的跨国系列文化遗产，属文化线路类型。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和中亚区域性文明中心之一的“七河地区”之间建立起直接的、长期的联系，[5]这一区域体现出游牧与定居、东亚与中亚之间从未间断的联系，极大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静态视野，以一种欧亚整体史观衡量“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与特征。四个异质性区域构成了这一路网的地理基础：中原地区（农业核心区）、河西走廊（绿洲区）、天山南北（南为绿洲，北为草原绿洲）和七河流域（草原核心区）。它们共同组成了南北跨度5000多公里，东西长度8000多公里，由33处遗产点联结起来的巨大路网。三国学者提出区域共性的一面是：持久的沿用时间、丰富的各类遗存及其相互间的内在动态关联、丰富的文化交流内容、联系和途经的多样地理环境。这清晰地展现出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在亚欧大陆上所发生的不同文化区域间的广泛互动，其中在游牧的草原文明与定居的农耕、绿洲或畜牧文明之间表现尤为明显。[6]“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文本明显采用了年鉴学派的观点，关注长时段的日常生活。

20世纪60年代，布罗代尔以及年鉴学派的“整体史”，将地理时间纳入史家的关注当中，体现了对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的重视；1985年，西域史家张广达先生较早吸收了年鉴学派的观点，将山脉、沙漠、绿洲对于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纳入欧亚交通史研究当中。[7]2008年，张广达进一步指出中古“西域”是当时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处，汉族中国的儒家与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另一个陆上“地中海”。[8]葛兆光提出，一方面，汉文明在那里与其他各种文明互相激荡，因而使“西域”形成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世界”；另一方面，“西域”虽然是汉代文献中已经有的地理词，但对这一特殊地域进行考察，将其作为一个连接各国历史、语言和宗教的“历史世界”，

是随着19世纪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的兴起才得以实现的。[9]“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重建了中原、绿洲、游牧之间密不可分的区域联系，超越了西方中心观，也超越了中原中心观，呈现了世界性的区域关联，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陆上地中海”。

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景观丰富多样，农耕区、游牧区与绿洲区构成了核心的环境支撑。公元前2世纪，汉朝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大宛一带，看到既有“行国”，也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的农耕民。[10]一直到17世纪末的布哈拉文献资料中，还记载农村、冬营地和草原居民之间的区别，也即定居农民、半游牧民和游牧民之间的区别。[11]可见，从日常生活看，尽管族群发生迁移变化，但是在“千年”的尺度下，中亚的环境和人群的生计方式并没有变化。要将丝绸之路置于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关系中理解，“自然现象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唯有对人类影响最大的那些地理现象才是最重要的”。[12]游牧与农耕两大类型的出现，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适应以及对资源与能源的使用是分不开的。世界史名家吴于廑教授指出，“自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发展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后，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形成”，一方面农耕与游牧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13]另一方面形成相互对立的关系，表现在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内部阶层分化而发生矛盾。“游牧世界诸部族向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必须从超越地区和国别的广度，来考察它们在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史这个漫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限度。”[14]这就超越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分期，提出了欧亚古代世界体系的问题。特别是吴于廑先生提出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按照人与环境的类型可以划分出农民、游牧民、绿洲民、森林民等。对于游牧民而言，苏联学者哈扎诺夫提出，“将牧民游牧定义为食物生产经济的一个特殊形式，依据的应该是那些经济特性的总和，就是在这些经济特性上，牧民游牧与其他性质、形式甚至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有所不同”。同时，“还要基于数世纪以来牧民自己的传统观念和标准”。[15]可见，文化也是一条重要的标准。

那么，绿洲是否也能构成一种食物生产经济的特殊形式呢？长期以来，在农耕与游牧的两大力量之间，绿洲“能量级”较小，长期从属于游牧形态或农耕形态，是依附性的存在。不过，绿洲具有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意义。随着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绿洲作为“通道”的意义才受到重视。张广达先生深刻阐述了绿洲在“通道”环境下呈现的能量：草原游牧民族也好，农耕定居民族也好，都因为崇山峻岭和浩瀚沙漠之间存在着绿洲而获得了莫大便利。绿洲是广阔沙

漠之中的绿色生命“岛屿”，这些“岛屿”的存在打破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16]绿洲的能量不能以宜农或宜牧的环境为尺度衡量，而应在沙漠尺度下体现其生物能量的意义和价值，由此也可以划定以绿洲为生计方式的“绿洲民”。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中、苏、日等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竞争中高度重视中亚与新疆的地缘价值。绿洲作为“通道”与“枢纽”的双重性质被拉铁摩尔、松田寿男等学者引入中国史与世界史之中。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逐步缓和后，苏联的中亚地区与中国新疆地区的丝绸之路再次受到关注。民族学家谷苞先生提出西汉王朝将河西走廊绿洲改造为农耕区后，形成了与天山绿洲桥的连接，并进而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绿洲打通，共同促成丝绸之路开通，对中国史与世界史产生重大影响。绿洲具有作为历史空间单位的意义。[17]20世纪9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先生发表《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一文，认为绿洲作为一种专门的食物生产经济类型是存在的，要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两个层面结合起来研究，倡导将“绿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18]21世纪初，谷苞先生撰文指出，西北地区文化有三个重要的体系：一是以蒙、藏、哈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二是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绿洲农业文化（包括河西走廊地区）；三是以汉族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中西部的旱作农业文化。他明确将绿洲作为与游牧、农耕并立的三种文化之一。[19]2011年，人类学家崔延虎教授则提出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需要重视一个小型生态区域的生态环境过程，同时需要揭示相关小型社会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式提出社会学、人类学范畴下的“绿洲社区研究”。

绿洲作为历史空间单位被学界逐渐认可。美国史家芮乐伟·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一书则提供了“绿洲史”研究的范例。从长安到撒马尔罕沿线不同的绿洲如吐鲁番、敦煌、和田等，出土了多语文献和实物，由此恢复了丝绸之路上“走卒商贩”等最普通人群的衣食住行、情感以及地方市场网络。这些看似烦琐细小的“日常生活”，其实反映了“丝绸之路”除商业贸易外，还有绿洲人群的存在，他们本应是历史在场者，可是过去史家重点关注的是“物”，这些普通人则被埋没了。[20]在全球史家纳扬·昌达看来，世界全球化从未停止，普通人如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夫是几千年来四种对全球化起重要推动作用的人群，是他们把世界联系到一起。[21]芮乐伟·韩森重视绿洲在丝绸之路时空中的节点作用，重视绿洲的日常生活，使该书获得较大的社会声誉。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文本提出了对该区域性质的共性理解：中原、草原、绿洲三大异质性区域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区域叠加，而是整体意义超过其所有组成部分的个体相加之和。在“长时段”视角下，形成这一区域的关键动力在于区域之间或地缘空间上的“共生互补”关系。[22]这体现了丝绸之路区域研究与内陆欧亚区域研究之间的问题意识基本是同质的：关注点不在于国别、单一文明区域的独特性，而在于重视异文化群体的跨文化联动、交通与比较。[23]在欧亚历史的叙述框架中，超越“内陆欧亚”“东亚”这种传统的区域范畴。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力图摆脱旧有史观的束缚，将问题意识转向草原、农耕、绿洲、森林、渔猎、采集等多元社会形态的整合、互动，强调异质性文明之间的共生，形成以地缘关系、地缘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视角。

二 绿洲与丝绸之路：从区域史连接世界史与国别史

全球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最好是把‘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看作通往规模较大的世界历史观念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看作是一种把那些相互有关的研究单位中的历史知识组织起来的实际手段。”其意义在于“这些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补充了国别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国别史的错误”。[24]有学者发现：在晚清，面对来自海洋帝国的“冲击”，时人不仅发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感叹，而且也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即加入世界万国之林的过程（持此观点者以梁启超最具代表性）；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史视为世界史之外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实际上将传统中国史内含的“世界史”及其书写的主体性让渡出去了，同时将现代西方变成了一个近似“绝对他者”的角色。[25]现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知识体系进而形成了“中国史＋外国史＝世界史”或“中国史＋世界史”的学科模式，这是早期的欧洲中心观与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影响的后果，忽略了“中国”本来就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区域史研究是联系世界史与国别史的重要纽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不得不让学界重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国际化的路网、广义层面的“西域”“陆上地中海”，说明历史中国始终是世界性文化空间的重要一维。过去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观照下，“丝绸之路：长安—天山的廊道路网”提供了一个实证性的文化遗产网络，体现了“周边与域外”曾经与“中国”共享一个历史空间的意义，围绕丝绸之路的“陆上地中海”展开。近代以来帝制中国的落后与

崩溃趋势，不仅导致了日本对于中国东北、俄人对于中国蒙古与新疆、英人对于中国西藏的领土要求，也特别容易促成人们对于“中国”的重新界定。[26]这种话语权的丧失导致我们在叙述“域外”和“周边”的时候不得不采取“外国史”的立场，这无疑是退回到“欧洲中心观”中。我们不得不将中国历史研究的空间范围局限在主权国家边界内，形成“边疆史”或“民族史”，而“边界外”则成为中亚史、南亚史等，成为“外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范畴；中亚、南亚各民族成为世界民族的研究范畴。这就难以反映他们与中国历史曾经拥有共享的历史空间与历史过程。

通过区域史研究，我们或可打通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内部关联。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是区域研究的大师，他研究的“边疆”不是限定在主权国家边界内，而是广义的，具有“内亚”形态的中国利益边界一直延伸到欧亚腹地的黑海。[27]从政治地理的态势上看，中国内陆“边疆”与“边界”的定义并不重合，影响边疆的事件本身更远远溢出了现代国家边界。18世纪和19世纪中叶至少在黑海区域发生了若干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其一是18世纪中叶在黑海附近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俄国征调土尔扈特部众为其征讨土耳其，引发不满。在伏尔加河流域游牧的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带领下回归中国，并引起了欧亚草原的地缘形势的连锁反应：俄国与哈萨克对土尔扈特的围追堵截以及势力范围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欧亚腹地的地缘格局和民族分布。其二是19世纪中叶黑海地区的鞑靼新兴工商阶层发起的近代革新运动“扎吉德运动”，对于中亚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近代中国内陆边疆的问题源头不追溯到黑海附近欧亚大陆的博弈，那么仅靠国别史将无法深刻理解这些问题。其三是俄国与之后的苏联在其欧亚腹地开展的现代化进程，如铁路的修建、现代城市的建设、现代教育与现代社会阶层的形成等，对于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形成了地缘空间优势和影响力，中国不得不被迫调整政策予以回应，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疆域形态。这些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必须在欧亚史的区域视野中才能予以发现。

拉铁摩尔总结出“亚洲内陆研究法”：“在研究整个中国社会全部所及区域发展和社会自身各阶段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在地理单元的大小和占有并利用它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平衡。”[28]这种以“亚洲内陆”为单位的“区域研究法”借鉴了物理学和生态学的概念，是一种能量守恒状态：一个系统总能量的改变只能等于传入或者传出该系统的能量的多少。拉铁摩尔使用“平衡”一词，将其转化到以欧亚历史为背景的中国历史的观察中，这种共时性研究就带有了强烈

社会科学的含义，不过，拉氏的研究范式中也蕴含着强烈的“结构-功能论”的意义。这种区域研究法，已经有了一种社会科学的意义。借助于上述研究视角，清代乾隆时期天山北麓“伊犁九城”，古城—乌鲁木齐城镇群，巴里坤的满、汉双城的开发体现了地缘空间的剧烈变化，表达了双重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史的重大事件，而且是欧亚史的重大事件。如果按照拉铁摩尔区域研究法的“平衡”原则，从中国史看，伊犁河谷的绿洲资源匮乏不能保障和维持数万驻防将士及其家属的巨大开支，只有通过北京调剂江南的财赋“协饷”输送才能维持军政费用，而当地军民也必须进行屯田贸易以补充财政费用，这就导致了“长城—天山走廊”的出现。[29]从八旗驻防捍卫主权、威慑中亚的意义看，天朝“惠泽远方”的天下秩序观，更体现在伊犁将军的驻防之城——号称“小北京”的惠远城。这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对冲和平衡俄国在欧亚腹地扩张的影响。正是因为清朝打败了准噶尔，才使得在黑海附近伏尔加河流域游牧的土尔扈特部进一步坚定了东归的决心。

哈佛大学傅礼初（Joseph Fleteher）教授的遗作《整体史（Integrative History）：早期近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1500～1800）》是以欧亚史为背景展开的，认为相对于此前各地区的独立性历史进程而言，欧亚大陆在16～18世纪的早期近代阶段终于具有了共同的一体化历史，而中国也在其中。他总结出内陆亚洲这一区域的相互联系性自16世纪以来明显加强，以新兴城市为基础的定居国家实力的愈加强大使以往由定居世界和游牧力量维持的势力均衡遭到破坏，传统的游牧人也越来越多地向定居化过渡。[30]傅氏提出的“异地共生”概念引起学界极大兴趣。

赵世瑜教授将“整体史”理论与中国研究做了重要尝试，他重新考察了明朝历史上的“北虏南倭”与隆万年间的族群关系问题：在明代的南部山区、西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族群关系的动荡，其动因与前者是大体相同的，甚至是相互关联的。明朝隆万之际的主政者或许是被动地触摸到时代变化的脉搏，所以尽管是短暂的，他们仍采取了积极应对的策略，使此时期的国家边略具有了时代性和整体性。[31]这一成果意味着将“整体史”视野纳入明史研究，不同的异质性边疆、不同的族群关系和全球史、东亚史时空联系起来，寻求这一时期不规则的历史脉动，这是王朝史、区域史、民族史、全球史的融通之作，将边疆研究和民族研究的“边缘”视角转到全球史和中国史的“中心”视角，极大丰富了中国北方社会史的内容，是一次将边疆“内外”整合的极

佳研究案例。正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献中解释了他的研究旨趣：与只关注游牧政权和王朝政权不同，他更关注游牧与农耕政权是如何营造出一个（也许是多个）位于他们之间的地域社会，关注这个由两大力量板块“夹击”而成的地域社会是如何形成，或者说“结构”的。[32]实际上，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中亚两河流域的绿洲都是在游牧与农耕两大板块力量的夹击下形成的，绿洲或是游牧力量占主导，或是农耕占主导，或是半农半牧的形态。绿洲因腹地的狭窄，物资的补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远距离转运贸易，形成复合型的空间形态，也形成自己的特色。[33]

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反映了全球史、整体史与区域史的关系，既是游牧与农耕关系的世界史（全球史）的一部分，又有相对独立的“整体史”或“专门史”的意义：丝绸之路汇聚了古老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中亚文明以及其后的诸多文明，沟通了亚欧大陆上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成了人类历史上多元文化的发展。[34]同时其也作为彼此关联的国别史的一部分，具有相对主体性的问题意识和区域意识，其中与欧洲史最具差异的部分就是绿洲史，丝绸之路区域特色就是草原、绿洲与农耕的交互性。

近代中国学术界在学习西方民族国家经验、按照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国民族国家史的时候，开始进行学科分类，“陆上地中海”从“历史世界”逐步变为主权国家的区域和边界，这就要重新划定时间、空间和社会，将其纳入主权国家可识别的时空范畴。这与历史书写、建构有关。从连续的时间长河中按照特定标准切出一段加以研究，是分期史的做法，例如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以及以王朝为单位的断代史等；将互相紧密联系的人类社会按照特定标准分类研究，是专门史的做法；在绵延的地球表面上按照特定标准划出一定范围进行研究，是分区史的做法。[35]“陆上地中海”的“历史世界”被切割到不同学科的研究范畴中，仅仅是在历史学中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研究的就有边疆史、民族史以及中亚史；超越“民族国家”研究单位之外的跨文化、跨社会、跨国家研究的有丝绸之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边疆史和民族史从时间上又分成不同的断代史：汉代边疆史、唐代边疆史、清代边疆史等；从研究内涵上又分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这些历史分析方法大多借助于西方的学科体系，没有兼顾历史的整体性。如果从“陆上地中海”的整体性和历史延续性看，其实无论汉、唐、元、清朝是否在场，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在农耕、游牧、绿洲的区域关系史中，“中国”一直都在那里，从未离开。对这一整体史的把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体现在学者们

对不同层次空间关系的关注中。由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影响，以往的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其重要性被淡忘了。如美国学者近期关注清朝在欧亚腹地投入的大量白银、茶叶和丝绸对周边区域经济的深刻影响，认为这是带动中亚区域经济市场的重要动力。[36]

采用区域视角研究边疆，并不是说国别史下的边疆研究不重要，而是说跳出线性的时空框架，以丰富和补充国别史视野下的边疆研究，形成更精细化的研究视角。诚如学者的反思，“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不能仅仅局限在边疆区域史范围来研究边疆史，更不能以静态的、粗放的方式来对待边疆史”。[37]研究者需要考虑早期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适用性，比如“绿洲”作为特殊的历史空间单位，并没有受到重视。

三 丝绸之路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视野的创新

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一次从“汉学”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一次重大“范式”转换。从重视语言文献考据的汉学转向了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区域研究——中国研究。区域研究是一种文化翻译，即“一种谋求通过一个跨学科的透镜来了解、分析和阐释外国文化的事业”。这首先要求外来的研究者努力理解另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假设、含义、结构和动态，但也为他们创造了机会，去扩展甚至挑战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理解。“跨学科的透镜”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任何单一的学科都无法充分理解另一种社会或文化。[38]长期以来中国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属于被研究的对象，这是一个从属关系，不是一个平等意义上的关系。[39]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静态的历史地理学和近代欧洲对于这片区域的定义：中亚、南亚的观念是一种僵化封闭的空间地理观念，“这种历史地理学和东方专制主义观念一起，塑造了作为正统印度史学基石的印度文明观念”。[40]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使中国开始成为现代化的发动者，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追求的是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构成了新一轮开放的基本特征。实现五通之一的“民心相通”，就要破除欧洲中心观与中原中心观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知识遮蔽，该理论完全将其视为静态的地理空间，将域外和周边视为“外国”；或者将域外和周边视为“野蛮”“边缘”之地。早期以西方民族国家为背景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对于周边与域外采取博物学、民族志的划分以安顿其世界秩序，这都是以欧洲为

中心的安排，具有淡化和切断与中国的共时性联系的特征。[41]而从地缘关联性和地域社会的特征看，中国历史与周边、域外的影响持久而深远。因此，不能陷入近代欧洲区域研究陷阱中。区域研究不过是“东方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深含着西方的扩张“话语”。不管多么强调中国中心观，历史学家始终无法摆脱局外人的立场。[42]因此，需要以新的社会科学视野进行丝绸之路区域研究。

第一，考虑以当代的社会科学体系为基础，以中国与周边、域外共商、共建、共享的视野重建丝绸之路的社会科学体系。与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视角的将“丝绸之路”视为单一的自然区域和统一而封闭的文明区域不同，我们应将“绿洲”“游牧”作为历史研究的空间单位，以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关系重新释放“通道”“走廊”的意义，将“丝绸之路”建构为一个开放和多元的地理和历史空间。自史前至现代，不同的路网和通道以纵横交错的机动地带将亚欧大陆的东部和中部、西部等异质性区域联结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区域的活力和内在的有机联系。

日本学者应地利明在耕种与畜牧关系中论述欧亚的生态、生存方式和民族的兴亡。其背景是“从网络建构原理的角度来看，沙漠与海洋甚至是同一类型，一个是广漠的沙砾世界，而另一个则是浩渺的水世界，都是人类不能居住的广袤空间”。绿洲和港口散落各地，连接绿洲与绿洲之间的线路是商路，连接港口与港口之间的线路是航线：“此构造是把绿洲和港口作为点，把商路和航线作为边的网络。‘沙漠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均属于‘由点和边构成的网络和网络流量’构造，显示了百分之百的同型性。”[43]区域比较研究是跨文化解读的重要方法。

第二，重视不同层面的关联，特别是日常生活的空间关联。丝绸之路只是一个跨区域交往的贸易网络代名词，其实还有茶叶之路、大黄之路、瓷器之路、布匹之路等关系沿线民众日常生活的贸易往来；除了贸易之外，与日常生活连接的还有“医药之路”“植物之路”“动物之路”等。如从唐代开始，回回先民对香药推广应用颇多贡献，如用香药防治疾病、熏洗衣物、化妆美容、调味食品、祛邪防腐等。到唐末五代时，最负盛名的回回医药家李珣（人称李波斯）著有一本独具风格的药学著作《海药本草》，其所收录的药物多来自海外。[44]中医采用的芳香型药物用药方法大多是从古代丝绸之路的中亚和波斯传入的。

第三，重视人类学方法，开展海外民族志调查。丝绸之路区域研究面临的问题，一是持续的民族群体迁徙使这一地区历史发展轨迹曲折复

杂，社会组织形态多样且缺乏稳定形态；二是语言文字文化多样起源和不均衡发展导致该地区缺乏统一持久的历史记忆和区域认同；三是各种宗教信仰以及相关文化传承的互渗并存使内亚地区各民族群体间价值体系保持着非常突出的异质性。[45]以文化人类学的社区调查方法来理解中亚、周边与域外的各民族群体、宗教群体的异质性，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不过，除了专业的人类学训练之外，因为丝绸之路沿线的绿洲社会异质性极强，而且族群宗教群体相当复杂，所以还要辅以语言文化研究人才的储备。

第四，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综合。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既有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又必须汲取东方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46]中国学者组织的“中亚游牧考古”率先取得了重大进展。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的游牧人群的生活状态是“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的普遍认识，直接影响到考古实践，导致考古学主要进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忽视了居住遗迹和聚落遗址的存在及岩画与聚落遗址的共存关系。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团队在长期考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对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基本要素——居住遗迹、墓葬、岩画进行“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极大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国际领先水平。[47]提到游牧就要提到农耕与绿洲，因为单独的游牧是无法生存的，而这种共生互补的区域特色也是丝绸之路得以长期延续的基本经验。

丝绸之路区域研究需要超越线性的民族国家观念，把世界性的眼光重新寻找回来，认识到中国是内在于世界体系的单元，由此丰富对中国自身的认识，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与欧亚体系其他国家相比亦有特殊性的一面。要建设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体系，就要重建历史-文化和空间视野，必须考虑不同弹性的区域尺度和历史空间单位，并以此重新思考周边、域外与中国的关系。“在任何一个区域建立历史关联，都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区域历史过程中发现尺度不一的历史关联，以充满弹性的方式来对待全球性或者区域性。”[48]

总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只有加强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区域研究，对异质性社会形成新的理解，才可以更好地认识自身。“西北

的非边疆化与中心化”这一命题包含着重新释放游牧、农耕和绿洲在中国史以及欧亚史中地位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以历史上汉唐为中心书写的内陆“中国”与近代史上以西方为中心参照的海洋“中国”影像并不一致，今天如果将二者“重叠”为现代中国，就必须将知识视野放宽到欧亚腹地，而非局限在现代国家的边界之内，这就必须超越“中国史＋世界史”的知识体系。这就要求中国具有自身主体性的区域研究，成为“一带一路”的研究大国和知识大国，才能更有效获得沿线国家内部各民族各群体的支持与认同，以“民心相通”来更好地“筑路”，这有助于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感谢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教授的绿洲社会研究与陕西师范大学李如东副研究员的中亚人类学调查的启发。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2期

[1] 黄达远，陕西师范大学西北跨境民族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国家民委基地）/“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河西学院“祁连学者”特聘教授。

[2] 参见黄达远《欧亚时空视野中的西北：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地缘区位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 William McNeill，“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34，1995，p.14.

[4] 李鸿宾：《从全球史语境看唐史研究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5]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国文物报》2014年6月25日。

[6] 王建新：《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遗产》2015年第1～2期。

[7] 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载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8] 张广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自序。

[9] 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文史哲》2010年第1期。

[10] 《史记·大宛列传》。

[11] 〔俄〕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上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第467页。

[12] 〔英〕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胡坚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第8页。

[13] 谷苞：《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载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8辑，1986，第179页。

[14]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15] 〔苏〕阿纳托利·M.哈札诺夫：《游牧及牧业的基本形式》，贾衣肯译，朱新审校，《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

[16] 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载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381～382页。

[17] 谷苞：《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载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8辑，第173页。

[18] 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

[19] 谷苞：《关于西北历史文化的特点》，《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0] 〔美〕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21] 〔美〕纳杨·昌达：《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8。

[22]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国文物报》2014年6月25日。

[23] 孙昊：《从“内陆欧亚”到“东部欧亚”——区域视域与契丹-辽史研究》，载魏志江等《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16页。

[24]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39～242页。

[25] 李如东：《民族国家与地方知识》，见《拉铁摩尔会议：边疆议题、知识焦虑与中国方案》，http：//www.sohu.com/a/145448683_467440，2017年6月2日。

[26] 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

《文史哲》2010年第1期。

[27] 〔美〕拉铁摩尔：《历史的疆域》，载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第373页。

[28] 〔美〕拉铁摩尔：《历史的疆域》，载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第407页。

[29] 黄达远：《“长城—天山走廊”上的国家记忆》，《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2017年12月29日。

[30] 〔美〕傅礼初：《整体史（Integrative History）：早期近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1500～1800）》，载于沛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商务印书馆，2013。

[31] 赵世瑜：《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2] 赵世瑜：《如何深化中国北方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载赵世瑜主编《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3] 黄达远、王鹏：《多重复合的绿洲空间：区域视野下的“内陆边疆城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4]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国文物报》2014年6月25日。

[35] 董少新：《从“东亚”到“东亚海域”——历史世界的构建及其利弊》，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复旦、东大、普林斯顿三校合作会议论文集》，中华书局，2016，第33页。

[36] 赵佳文、张莉：《评Borderland Capitalism：Turkestan Produce，Qing Silver 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 （By KWANGMIN KI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6卷第2期，2018年。

[37] 田澍：《互动与融通：新时代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客观要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38] 〔美〕D.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和挑战》，耕香摘译，《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39] 昝涛：《一带一路、丝路学与区域研究》，载魏志江等《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第18页。

[40] 王立新：《从历史文明到历史空间：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地理学转向》，《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

[41] 黄达远：《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

理考察与空间建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42] Benjamin I.Schwartz，*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98-113.

[43] 〔日〕饭岛涉：《窪田顺平〈中央欧亚环境史〉》，欧文东译，《当代日本中国研究》2014年第2期。

[44] 潘伯荣、刘文江、束成杰、张丹：《古丝绸之路对我国民族医药学的影响》，《中国野生植物资源》2016年第5期。

[45] 王建新：《丝路发展视域下的内陆亚洲社会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46] 袁剑：《固化与流动——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47] 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

[48] 赵世瑜：《在中国研究：全球史、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一带一路”与区域研究

“一带一路”、“丝路学”与区域研究

昝涛[1]

2011年，笔者曾发表过一篇长文，题为《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2]当时，还没有如今在国内外皆人气大旺的“一带一路”提法，笔者亦仅从历史上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地缘政治的角度，尝试性地探讨了中国文明与中亚［其实也是内陆亚洲（Inner Asia）］及伊斯兰文明的内在关系。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是从西汉张骞（公元前164年～前114年）的故事说起，也是以某种意义上“呼唤”新时代的“张骞”（尤其是其精神）收尾的。本文的落脚点则意在阐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和需求下，中国知识人需要思考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尤其是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国家有关的研究。在这个方面，本文力图提供一个理论和宏观意义上的初步思路。

一 历史背景

自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洋枪洋炮强迫着“睁眼看世界”。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半个世纪，这个初生的“现代世界”曾以所谓“马嘎尔尼访华”的形式来到乾隆帝统治下的大清王朝。不过，这一偶发的历史事件并未对中国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3]结果，鸦片战争其实是把马嘎尔尼曾经主动送来而时人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主动把握和参与的事物，换了一个令人感到疼痛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近代史的这个所谓“睁眼看世界”，其实质无非是要加入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简而言之，也就是被迫开放和学习西方。

“马嘎尔尼访华”可以被看成一个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即仍处于盛世的大清王朝统治阶层与以英国为代表、那个生长中的近代文明及全球秩序的零距离接触；同时，那确实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不经意

的”错过。历史地看，这个“错过”只是一个平淡的事件，不能成为后来者苛责古人的理由。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国人终于开始严肃地对待那个秩序。在此意义上，马嘎尔尼就是一个较早叩响晚期帝制中国大门的外国人，至于他是否心怀良善，姑且不论。

近现代中国不只是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遭受欺凌和压迫，沦为新生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在文化上也遭受压迫。最为典型的是，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敦煌等地的国宝级文献和文物遭到强盗式掠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没有学术和思想上的崛起与强大，一个国家难称强国。由此来看，黄文弼先生那一代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和拳拳爱国之志，[4]是多么令人钦佩和感怀。[5]

直到今天，中国文明历经磨难，通过主动的改革开放，以前不见古人的气魄成为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倡导者、捍卫者。2017年1月，习近平在达沃斯和日内瓦先后发表了两次演讲，其中多次提及并阐述他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6]世界媒体把中国称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引领者。[7]历史地看，这其实是标志着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秩序中角色的转换。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中国自近代以来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 “丝路学”的当代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学科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意义上，使得中国的“丝路学”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新历史阶段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共时性。也就是说，历史的丝绸之路研究与现实的丝绸之路设计/建设共存，这是史无前例的。质言之，通过使用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概念符号，当代“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建设呈现出显著的共时性。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要求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更加深化。

丝绸之路是19世纪末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来的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主要指陆上的中国与西方尤其是中东之间经过内陆亚洲的贸易路线。至今，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已然形成了一个有着深厚学术积淀、涉及多个传统基础学科的丝绸之路研究，包括欧洲东方学、中西交通史等多个领域。从中国学界的基础研究领域来看，伊斯兰化之前的传统丝路研究更为发达，在国

际性的学术竞争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但放眼世界，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美的丝绸之路研究，他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伊斯兰化以来直到今天的时代范畴（也就是8世纪以来），出版了大量的高水平研究成果。[8]同时，打通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的努力也大部分是由外国人做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很多优质、可读性强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陆续被翻译、引进，迅速赢得了中文读者的青睐，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9]就是代表。另外，根据濮德培（Peter C.Perdue）近年一篇评论文章的介绍，美国的新疆研究已经迎来了第三波浪潮。[10]

转向伊斯兰化之后的历史和现状研究，意义在于，它跟我们所生活的当代世界息息相关。很多学者都讨论过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最大的共识似乎是“相互理解少、研究不足”，这正反映了我们的学术研究/传播与中国迅速发展的现实之间不匹配的格局。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发挥后发优势、推进中国丝绸之路研究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犹如一束强光，重新为我们照亮了这个领域。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传统丝绸之路研究的“过去之学”成为“现实之学”，这要求当代丝绸之路研究者不断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往复对话。

今天的丝绸之路研究，将成为过去与现在不断对话的学问。过去的丝绸之路研究可以是纯粹的关于逝去之过往的研究，可以和现实关系不大；当然，在西方，除了作为学院中的高深学问，它也是配合帝国主义策略的“东方学”之一部分，这是它在当时的某种现实意义。但与今天不同的是，“东方学”的丝绸之路研究与现实意义上“一带一路”建设关系不大。也就是说，过去的丝绸之路研究，不是为了重建丝绸之路；而今天的丝绸之路研究，是因为有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才变成了一门现实之学，而不再只是过去之学。

基础研究服务于民心相通，应用研究服务于倡议的具体落实，是与具体的项目、资金紧密结合的。所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丝绸之路研究与建设同步进行、同时存在的时代，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特征。

一两百年后，今天这个时代就成了可被研究的历史。后人研究我们

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一带一路”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他们一定会发现“丝绸之路”这个词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出现频率突然暴增。他们会问为什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怎么看待和建设“一带一路”的？这个时期的丝绸之路与更久远的过去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一个视角使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因为“一带一路”而把自身置于2000多年的丝绸之路历史之中。我们的研究和建设，将成为一系列绵延不断的丝路故事之中的一环或一幕。未来的叙述，或许还要从张骞“凿空”或更早开始，还会关心粟特商人的历史角色，会有怛逻斯之战、郑和，还有很多很多，一直延续到“一带一路”倡议。21世纪的中国人，或许也会在未来的丝绸之路历史上占据一个篇章。如果说过去的人是丝绸之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自觉的。

统计显示，新的丝绸之路研究在中国已起步，但学科建设有待于完善和加强。当代的丝路学，不只是面向过去的，也是立足现实、发掘过去、面向未来的。

在今天，丝绸之路研究既是学术，也是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学者应该倍感这个时代丝绸之路研究人才培养的紧迫性。“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很多了解和懂得当地情况的人才，既要有语言基础，也要有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学科支撑；不只是东方学家那种象牙塔式、不与本地社会发生实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更需要具有实地经验、具备当地常识性知识结构（也就是熟悉和研究当地）的区域研究型人才。

三 中国的区域研究

学者的实践就是做好“天下之公器”。接下来，笔者将重点讨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区域研究。[11]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笔者想先讲一个日本的例子，或有镜鉴意义，这就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的经历。

白鸟库吉在33～35岁时即发表了北亚民族史方面的考证论文，得到了欧洲学界的认可；他在36～38岁用两年时间游历欧洲学界（1901～1903）。其间，白鸟发现欧洲学界已经在中国（包括蒙古）、中亚的研究上建立了权威，因而，他从“学战”的视角提出了日本学术战略的进路，即让日本学者转向欧美学者较少关注的“满鲜”历史地理研究，并提

出了具体的任务规划：地理学调查、人类学调查、遗迹调查、文书记录及遗物调查。可见其立足于“学战”之雄心。

白鸟回国后到处奔走游说，力图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但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响应，直到他遇到了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并得到后者的大力支持。后藤关注殖民政策的“生物学”基础，也就是在熟悉当地民俗习惯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政策。

1908年，满铁东京分社成立了以白鸟库吉为主任的“历史调查部”，后因机构改革降格为调查课。调查课网罗了一批历史学者参与其中，修撰不同时期的“满洲”历史地理，白鸟担任监修。白鸟在后来出版的多卷本著作的序言中强调其研究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历史地理的必要性：一是学术的，二是“满韩”经营。1915年，调查课被撤销，但经过白鸟的努力，满铁把这个事业委托给了东京帝国大学，一直由满铁出资。截至1941年，一共出版了16卷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此外，白鸟库吉还在机构建设、刊物建设、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学术的角度说，白鸟库吉在满蒙史研究上贡献巨大，其学术追求无非是要把日本的东洋学研究（区域历史地理）提高到欧洲的水平。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政治上，白鸟的学术研究又与日本当时的“大陆政策”密不可分。[12]

现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迎来了一个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在学术资源日益丰富的条件下，需要考虑如何做好中国的区域研究这一课题，或者说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区域包含国别，下面笔者只说区域研究（不是说不要做国别研究）。这个区域研究，首先是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地区有关的学术研究。

改革开放的意义，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体制、教育、文化、思想等多个层面上，使中国开始接触和尝试性地加入西方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秩序，从而开始产生新的自身意义和价值体系。改革开放即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内含“合而不同”：在文明上，中国终将与世界合一；在文化上，中国当然还是自具特色。这是一个复杂的趋势。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审视自我？一方面，用中国领导人的话说，就是承认中国是全球化秩序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就是努力调适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长期是西方的他者，这个他者是从后殖民批评的意义上来说的。这里，自我和他者之间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而是主体-客体的关系。实际上，中国在西方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属于被研究的客体或对象，这是一个从属关系，不是一个平等意义上的关系。所谓他者，从来如此。

中国承认自己是全球化秩序的受益者，就意味着不是这个秩序的革命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潜在的改革者。西方说中国正在成为引领者，中国有志于成为改革者，但终归不是一个革命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不大可能成为前述意义上的中国的他者——像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一样，至少从短期来看不会如此。

笔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区域研究，重点应该放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

近代以来，创造性地引领这个世界的思想、制度、文化的（当然也包括科学与技术），主要不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也看不到中国全面引领性地位的确立。这需要清醒认识，此亦为不同学科的学者需要认真考虑的。当下，中国在技术、科学、思想、制度、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世界性影响，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一个地位还不相称。这是很现实的。

当然，中国的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给中国在加入既有世界秩序/体系的过程中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国人从自身的角度意识到了这个不确定性，西方也意识到了这个不确定性。对国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是一种谨慎的忧虑，比如要有“中国特色”，为什么要提这一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加入既有世界秩序/体系的过程，就是主动开放、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在制度、教育、法律、思想、文化包括科学与技术的创造上，很可能面临着被别人（主要是西方）“同化”的危险，这种危险带有很大的诱惑力，难免会产生某种忧虑意识。中国要加入而且也正在加入的这个世界秩序有着巨大的吸纳和同化能力，只不过，由于中国自身体量巨大、文化根基过深，这个吸纳的过程不会很快，中国希望加入这个世界秩序的过程是缓慢、可控的，同时也不能自绝于其外。

基于以上思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更积极地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其渐渐自我成长的过程。短期内，它

不会被完全吸收，也不可能马上就出现一个中国所引领的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中国讲的“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版本的全球化，是对原有世界秩序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潜在的改革，而不是一个革命的思路。现在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越来越多，其包容性越来越强，这就是表现。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区域研究需要意识到，我们还很难让西方成为我们的他者[13]，因为国人仍然在使用着几乎所有的由西方生产的知识框架、学科、理论和概念，这些都是现代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的体系。我们没有一个自主、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区域研究，仍然是一个积极学习西方的过程，研究西方也会存在，但实事求是、谦虚地说，主要还是学习西方，力争使我们的研究达到西方的水平，还是要加入那个变化中的秩序。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虽然不是西方，但与我们密切相关。这是当下中国区域研究的重点。由于我们提出了平等、多赢的价值观，又由于我们主要仰赖西方供给的知识体系，中国的区域研究具有双重使命，既要学习西方，加入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又渴望有所不同，比如尽量避免西方意义上（东方主义式的）对非西方的他者化。当然，这是中国的区域研究在方法上、概念上、理论上有可能进行创新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够提出中国的区域研究在世界历史上占据某种位置的原因。

余论

就研究对象看，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中西交通史和唐中期（8世纪中期）之前的西域研究；就学科参与看，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考古、历史、文献等学科唱主角。在新的时期，中国学者的丝绸之路研究或可在以下几个领域取得进展：第一，对伊斯兰化以来的丝绸之路进行深入研究（需要多语种资料和多学科及跨学科的方法）；第二，在全球史的视域下同时研究海洋和陆地丝绸之路贸易；第三，从区域/国别、经济、金融、国际法、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涉及的重大现实问题，做智库工作；第四，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高度上，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其能够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学理内涵，服务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第五，在比较研究的意义上，通过探讨“一带一路”暗含的“欧亚主义”理论，[14]最终回归到关于建构中国自身的认同/身份（identity）的问题上来。

[1]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2] 昝涛：《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载高全喜主编《大观》第5期，法律出版社，2011。

[3] 关于马嘎尔尼使华，参见〔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关于该书所引发的争议，特别是其后现代取向的史观对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笔者亦有所思考，对其否定现代性的立场笔者不敢苟同。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讨论，已另具文论述。

[4] 有人评论黄文弼先生说："他不仅仅是新疆考古的拓荒者，也不仅仅是学识渊博的历史、地理学者，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把现代中国的印记深深嵌入祖国西部苍凉大地的伟大的爱国者。"以黄文弼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积极参与1927～1930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这件事在中国学术史和文物保护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的知识界已经理解了国际科学规则，既捍卫国家权利，又参与国际科学合作，西方列强盗掘盗买中国文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黄文弼在第一天的日记中，就明确写了自己被赋予的任务："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察科学。"参见李寻《黄文弼的多重意义》，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cc3b260102eebu. html。

[5] 2017年12月23日，"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和"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开幕。主办方坦陈："1927年，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首次呼吁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它也是中国学者开始科学意义的西北考察的里程碑，在维护中国主权、开展西北考察等方面，开中国学术之先河。首批10位中方团员，北京大学参加者达8人。他们从红楼发轫西行，显示着新文化运动在丝绸之路上引领中国学术潮流的重要信息……"新闻如是报道："90年后，为纪念这支科考队伍的不畏艰难、捍卫主权的奉献精神……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历史学系、人文学部和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以'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为主题的高峰论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博物馆、兰州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和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日本京都大学、日本东洋大学等国内外高校与机构的近百名学者参加论坛。"《"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高峰论坛在北大举行》，http：//www. zjww. gov. cn/news/2018-01-25/1222962678. shtml。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1-18/8127455.shtml；《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贡献"中国方案"》，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1-20/8130716.shtml。

[7] 《让思想之光引领世界前行之路——习近平主席2017年达沃斯、日内瓦主旨演讲的世界意义》，http：//www.xinhuanet.com/2018-01/25/c_1122310687.

shtml；《海外舆论解读习近平达沃斯演讲展现大国担当》，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1-18/8127875.shtml。

[8] 关于日本的伊斯兰-中亚研究，参见Kazuyuki Kubo，“Central Asian History—Japanese Historiography of Islamic Central Asia，” *Orient*，Vol.38，pp.135-152。

[9]〔美〕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10] Peter C. Perdue，“Xinjiang Studies：The Third Wave，” https：//cross-currents. berkeley. edu/sites/default/files/e-journal/articles/perdue_1. pdf.

[11] 关于这个问题思考，还可参考昝涛《发展区域和国别研究，离不开基础学科建设和顶层设计》，《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0日。

[12] 参见N.哈斯巴根《白鸟库吉的满族史研究》，载赵志强主编《满学论丛》第6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7。

[13] 并不是说“非我”即他者，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

[14] 布鲁诺·玛萨艾斯可能是第一批探究这一发展之重要性的作者之一。他指出中国和俄罗斯都已在使用欧亚术语进行思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通过最近创造的“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Gideon Rachman，“Does the Rise of Eurasia Herald a New World Order？” *Financial Times*，January 17，2018.

欧亚时空中的西北："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地缘区位观

黄达远

当代主流的历史叙述，总是不自觉地把中国历史等同于中原史或者汉族史。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现代性进入历史时空叙述的一个后果，现代民族国家往往形成以单一中心为时空坐标来叙述历史的话语体系与认知结构，这就导致了地理与区域观念出现了某种断裂。地理学家最易发现这一现象："近代中国史上一种最重要的地理事实，就是对于海洋的新关系。以前面向西北，而太平洋是后门。离长城不远的玉门就是中国的正门。对于亚洲内陆和西北诸省的接触，它在国家历史上克尽了重要的任务。但今日的情形都已改变了。中国的大门是朝着太平洋。上海、广州、天津取代了西安和北平的地位，玉门关只不过是供诗意的凭吊与回忆。"[1]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从以内陆为中心转向以海洋为中心的历史时空视野转换。这种转换长期影响中国的区域感。2003年，民族学家谷苞先生在给《西北通史》写序时，针对长期以来人们观念中的"西北边疆"质疑说，人们对于西北的含义存在着不同理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不能把西北地区统称为西北边疆，在西北虽有边疆地区，但西北的很大一部分不属于边疆。他对西北文化的三个特征进行思考并提出不能把西北"边疆化"的观点：第一，西北地区的文化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源头；第二，西北地区一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第三，西北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道所经过的地区。[2]西北不是"铁板"一块的均质化区域，不是文化落后、野蛮的地方，也不具有地理、文化与行政边界重合清晰的"区域"。如兰州是国家几何地理中心，陇东一带是华夏文化诞生地，"嘉峪关外"还有举世闻名的敦煌——丝绸之路的文化中心。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视野下，国家提出以"新疆为核心区"的战略，"西北"战略定位也在同步发生变化。围绕着"化边疆为中心"的理论命题，学界已经展开了一些讨论，笔者的思考是"西北"作为一个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空间，长期被另一种视角遮蔽，这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地缘策略具有相当的阻碍。

一 "欧洲中心观"与世界史的时空断裂：被遮蔽的"游牧史"

近代中国的时空转向与全球史（世界史）的产生密切相关，在全球史中产生了一种社会科学化的视野，就是将欧亚大陆划分为不同的区域，以便现代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需要下识别出不同的文化-地理空间。正如华勒斯坦指出，社会科学实际上也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性观念为基础的。按照社会科学家的假定，人类生活必须要通过一组空间结构来加以组织，而这些空间结构便是共同界定世界政治地图的主权领土。这些政治疆界确定了其他关键的互动领域——如社会学家眼里的社会、宏观经济学家眼里的国民经济、政治学家眼里的国家、史学家眼里的民族——的空间参数。[3]源于西方的现代世界秩序与国家体系，是以西方的经验来重组世界秩序，这就确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认知视角。基于对殖民主义地理与文化传播论的反思，布劳特分析指出，西方对于欧洲以外地区认识的迅速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殖民主义的发展，它特别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是获得了关于欧洲以外地区人们的大量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是被高度歪曲的；另一方面是关于欧洲以外地区的世界和人民的情况，证实其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这具有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两个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按照西方殖民世界的需要，重新绘制世界地理，以海洋为中心的构图成为一个大趋势，这就势必要“去大陆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全球殖民体系中，“现代全球历史是作为在时间上彼此为历时性关系的陆续的单独时刻被描述的，在空间上它们只与西方有关，它们与地球其他部分的共性关系未被考虑”。[5]著名社会学家戴维·哈维则认为：“世界的空间……都被去地域化了，剥去了它们原先的意义，然后依照殖民和帝国主义政权的需要重新地域化。”[6]这造成的后果就是时间与地域（空间）的分离。

中国学界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的局限表达了不满。[7]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史学者吴于廑先生提出纠正性的“整体史观”，将被“海洋史观”屏蔽的欧亚大陆的历史“空间性”释放出来。整体史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方面考察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主张世界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在各自和不断交往的发展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最终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8]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一文认为，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并非存在于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民之间。无独有偶，吴于廑先生发表这篇著名文章的次年，在天山南北深入田野实践数十年的民族学家谷苞先生于另一个学科领域中指出，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广大的农业区和游

牧区一直是同时并存的。农业区诸民族与游牧区诸民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我国最重要、最持久的民族关系问题。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的主流关系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农业区经济与游牧区经济的结合，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统一的整体。[9]两位不同学科的著名学者无意中形成了一种默契共识：农耕和游牧的关系是世界史上最普遍、最“日常”的一种关系，既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一种地缘关系，更是一种交往关系。既要在更为广阔的欧亚大陆整体史、文明史基础上，也要从最普遍的“日常生活”中理解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与“民族关系”。这也是古代欧亚世界体系中的“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的基础。中国史、“民族史”也毫不例外，农耕与游牧的关系同样是理解其历史的基本线索，由此恢复出被海洋时间压抑的、遮蔽的游牧社会“空间”性意义。

中东史专家彭树智先生则在“整体史”的基础上阐发了“文明交往论”，在畜牧农耕的自然经济时期，交往的地缘关系上升为主导地位，地域空间的交往范围越来越大。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交往特别频繁。交往主体随着地域的扩展而表现为种族、民族乃至社会、宗教共同体，而等级制、宗法制、伦理道德体系成为文明交往的社会、政治和精神中枢。[10]文明交往论强调地缘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突破了对于游牧社会“野蛮”的想象。以往的“中亚史地研究”同样受到“欧洲中心观”的强大影响，具有“时空断裂性”。俄国学者巴托尔德将中亚衰退的原因归结为海路的兴起取代了陆上贸易以及乌兹别克游牧人瓦解了中亚帝国的完整性，这造成了中亚游牧力量终于被欧洲人所取代。这一传统经典论断近期遭到了中国学者质疑，褚宁和马建春认为，16～17世纪“布哈拉人”依旧奔走在欧亚大陆，这一时期以“布哈拉人”作为一个泛化的商业群体纽带，通过教缘与地缘关系，将中亚诸城镇、草原以及印度、波斯、俄国、中国联系在一起，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欧亚内陆贸易网络。[11]苏联时期的东方学家也并不否认这一点，M.库特鲁科夫认为海路的开辟并没有破坏旧的商道，它继续使中亚、印度、俄国与中国保持联系，而中亚和叶尔羌的商人仍是这些国家之间贸易的中间人。他援引16世纪4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土耳其旅行家赛菲的著作指出，“（叶尔羌汗国）开采玉石绝大部分运往中国。吐鲁番是各国商人云集之地，这里集结了数千名来自亚洲各国而准备去中国的商人，他们选出自己商队的首领，经叶尔羌汗批准后前往中国；因担心居住在此地的卡尔梅克人的抢劫，许多商队不能前往中国”。[12]不止一份穆斯林文献证实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与商贸交流一直没有中断，从上述文献中也可以窥见，草原、绿洲与农耕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这种商贸和文化交流

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亚史地学者潘志平先生等认为，所谓15世纪后丝绸之路断绝的说法，很可能是受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说法影响。基督徒视之为畏途，并不能证明此路不通。如果将丝绸之路理解成东西文明的交流之路，则东西文明的交流不存在中断问题。[13]他质疑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背后有一种基督教的文明观念在起作用，使得“丝绸之路”呈现出一种对东方的“想象”。由于19世纪是西欧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国家观及文明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普及过程，因此对于西方中心观书写下的世界体系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中央欧亚”——这一区域的游牧社会历史几乎被遗忘，如弗兰克指出的，中亚仍然是一个天文学观念上的“黑洞”。中亚对那些外围民众所在的文明而言，也处于中心位置，而这些民众的生活空间被吸入中心的黑洞当中。中亚也是所有那些外围民众及其文明彼此交会互动的地方。中亚真正成为欧亚和世界历史的“缺失一环”。[14]华勒斯坦尖锐批判欧洲社会科学研究是以“区域研究”为基础的，而划分这一区域的方法确实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学者反思，“我们对于世界历史与各大区域文明的认识与定位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在对欧亚大陆的认识上也有鲜明体现，历史叙述的主要内容都给了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侧，而忽视了这一大陆的中间地带”。[15]

然而，要填补游牧社会历史的“黑洞”和历史的缺位，必须放宽知识的视野，包括突破建立在西方知识范式下的“区域研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是被纳入西方的“区域研究”当中的，“区域地理”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就出现了“西北”被如何定义的问题：“西北”作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与农业民彼此交会的力量中心，也是世界四大文明交流的中心，是被以大陆史观中的“前门”为中心书写，还是被以海洋史观的“后门”——“边疆”来书写？

二 两种世界文明交往体系的碰撞：作为区域的“西北”

两种不同的世界文明交往体系，一种是以游牧区与农业区互动的欧亚大陆为主体的文明交往体系；另一种是自海路大发现时代以来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全球化体系。在第一种欧亚大陆的文明交往体系中，“游牧区”有了特指的“中央欧亚”[16]定义。中原农业区是欧亚大陆最大的农业区，在游牧与中原农耕力量的互动中讨论“西北”的区域中心性，日本都市史学者妹尾达彦做出了重大的知识贡献。他高度重视生态与人文环境

的互动性，特别是以农业与游牧力量互动的欧亚大陆世界史的视野来讨论“西北”的中心性——聚焦点是唐代长安城。他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其中不乏启发性。

第一，妹尾达彦界定了人类历史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就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农牧区的物质交换刺激并促进了城市的诞生。城市主要诞生在与农牧交错带接壤的农业地域的一方，功能主要是交易和军事场所，由此发育出不少城市，“到了纪元前1000年时，联合起来形成了国家，遍布中国内地的城市网络由此诞生。由此而诞生的城市网络的至今3000年间的变迁，汇集在中国五个历代都城变迁的形式之中”。[17]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古都，也分别是城市网络的中心。

第二，妹尾达彦注意到，自4世纪至7世纪，北半球进入一个寒冷期，从而导致北方人口向游牧、农业的低纬度地带南迁，游牧民大规模越过农牧交错地带而进入以农业为中心的地域，人类与文化的移动导致历史时期的又一次显著性的变化，这就是建立了游牧人的“征服王朝”。长安恰恰处于这一次人口大迁徙之路的东端，正是这样跨越亚欧大陆的人口流动，加大了长安都市文化的国际意味。在南北方向上，长安地处农业区与游牧畜牧业区的交叉地带，有利于统合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在东西方向上，长安处于亚欧大陆人口迁徙之路的东端，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联结点。这两方面共同造就了长安的国际大都市地位。[18]长安城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交流推动了长安国际化都市地位的形成。向达也说，“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19]

第三，妹尾达彦还进一步指出中国都市网络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逐步转移，即到了9世纪以后，东亚的主干交通线逐渐由陆路向海路转移，主要游牧民的政治据点由中国内地西北部移向东北部，粮仓地带由中国北部移至中南部。这使中国的城市网络由内陆的以长安为中心向沿海的以北京为中心转变。[20]这种城市中心的转变并不一定意味着长安在游牧与农耕社会的区域联系中意义的降低。

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就意识到西北民族格局形成中的“吐蕃北上、蒙古南下”因素的重要性，周伟洲教授继承并发扬了这一观点，西北疆域特

征受到四大文化区的相互影响：周秦文化区（即中原文化区，今陕西、甘肃东部及宁夏南部，黄河中游一带）、甘青文化区（即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以游牧为主，农业为辅）、新疆北部天山文化区（也包括今天甘肃西部一直延伸到蒙古北方的游牧区）、新疆南部天山文化区（绿洲的农业定居生活为主，射猎生活为辅）。由此，这些区域在地缘上彼此互动，“西北”出现了不止一个“游牧-定居”的区域形态，不过以吐蕃与蒙古两股游牧势力影响最大，特别是蒙古，其是奠定今日西北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民族互动也带来了文化的互动，汉族传统文化，中亚、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均从四周不断沁润着、影响着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促使其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异，而最终定型。[21]这说明以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域是由游牧与农耕、大小不一的绿洲空间统合而成的，这就突破了中原黄河流域单一性的“游牧-定居”形态分布视角。

地缘关联性不是断裂的，而是持续的。一方面，长安曾经长期作为东亚都城体系的中心，具有高度国际化的地位，其意义超出了“中国”；另一方面，即使在农牧交错的中心城市转到更大的北方中心城市北京以应对东北方向“游牧-森林”力量的崛起时，西安仍不失为一个具有国际中心意义的都市。从政治上看，西安始终保持着作为游牧与农耕交会地带的中心城市作用。“大中国”虽然是由不同层次的空间统合而成，必须保持对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和文化类型的影响力，为了更为有效地同时控制这两个地区，王朝的都城必须设立在农业区与游牧区的交叉地带，所以从唐王朝建都长安就可以断定它是“大中国”，而只控制农业区，就可以称之为“小中国”。如洛阳、开封、南京、杭州等所对应的王朝，无一例外都是统治空间局限于农业区的。[22]无论是在“大中国”还是在“小中国”，西安联系周边游牧与农业区的地缘位置不会变化。即使在明清时期，西安依然是北方的统治中心之一。明季的西安是秦王的驻藩之地，而秦王的地位仅次于燕王，被称为“塞王”；而清代则在西安驻扎八旗，修筑满城，由西安将军节制，显示其军政地位的重要性。

从文化上看，西安仍然承担着部分中央政府维护大一统——“扶绥蒙藏”的功能。妹尾达彦指出大中国的统治者多来自游牧民族，或者具有非汉族血统，而这样的“大中国”，为了使政权正统化，需要能够包容汉族和非汉族两者的某种意识形态。所以，“大中国”的王朝，都特别重视不问民族、出身的世界宗教——佛教。长安就是整个欧亚大陆最大的“佛都”，起到了整合游牧民与农业定居民精神世界的作用。即使在明清时

期，王朝的行政中心转移至北京，西安作为佛教中心城市的重要性依然受到统治者的关注。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巡视陕西时，拨专款敕建广仁寺，使之成为像灵鹫山一样的灵山圣境、香城净土，借以吸引“五陵六郡之众”和“外藩属国”，从而达到“助王化”“锡民庥”，使边疆乃至整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修建广仁寺也是为长安“满城”内的蒙藏上层人士王爷贝勒等提供信仰服务，康熙皇帝赐名为广仁寺，同时又为之亲书“慈云西荫”横匾和撰写《御制广仁寺碑》文。[23]广仁寺位于西安明城墙内西北角，有中国唯一的精品千佛殿，同时也是文成公主在长安的奉地。这一寺院也是达赖和班禅、西北康藏一带大喇嘛、高僧在西安的行宫和驻锡、朝觐之地，至今寺中还保留有达赖和班禅的住房。广仁寺为内地唯一绿度母主道场，也是陕西地区现存唯一的一座藏传格鲁派寺院，香火旺盛，体现了蒙藏汉满“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文化。

从经济上看，以西安为中心的商业市场辐射范围仍遍及藏、蒙，并通过河西走廊达到天山南北、七河流域。明代陕甘大道、清代陕甘—甘新大道仍然是以西安为中心形成的辐射整个西北的市场网络。以西安、泾阳、三原为全国性货品的加工与转运中心，以兰州为二级货物分销点，以西宁、哈密、宁夏、古城等地为三级批发市场，形成西北地区大宗茶叶、布匹、海鲜杂货以及毛皮、药材的东输西运中心。[24]明清时期，虽然以“嘉峪关”为界，有“关内”和“关外”的区分，出关还要有官府出具的“过所”，但实际上在官方视野之外，民间贸易一直存在，前往天山南北“走私”玉石、大黄的陕甘商贩始终不绝于途。无论“大、小中国”时期，西安始终是维系中国北方草原、西南藏区和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相互联系的一个中心节点城市。

随着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来的海路大发现，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坚船利炮也冲击到欧亚大陆，原来游牧民与定居民的流动-定居共生体关系逐渐演变为一种更大的尺度与更复杂的结构。俄国不仅成为新的“草原帝国”，而且还具有新的工业技术因素支持下的武力和机动性，通过南下和东征使得欧亚大陆基本连为一体。同时，西欧国家的海上力量向东方世界扩展，其流动性是以流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海洋权力实现的，这更是一支全球性的力量，绝不限于一隅。[25]英国越过了印度一直扩张到阿富汗、帕米尔高原。清朝也通过对准噶尔的战争，再次统一天山南北。拉铁摩尔指出，这三重进程标志着近代世界历史的汇合。[26]中国、俄国与英国势力交汇的轴心就是中国西域、俄属中亚与阿富汗。

英、俄殖民力量进入中亚，首先导致的就是中国西部朝贡体系瓦解。魏源记述说："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乌兹别克）；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阿富汗）；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以东之郡县矣。"[27]清朝西部朝贡体系其实也是一个内外之间有多重划分的防御体系，新疆与内地以天山为界，而"东新疆西属国"，则以帕米尔为界线，天山、帕米尔代表了不同层次的内外关系，可见晚清时期多层次多中心的疆域体系——行省、新疆、属国（外藩），在俄国和英国的殖民入侵下，"外藩"以及伊犁将军管辖的西域部分疆域被强行纳入了英、俄帝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

殖民入侵过程打断了欧亚世界史中的"游牧-定居"原有的转换关系，在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知识的传播和塑造下，"游牧-定居"关系被"民族主义化"。正如弗兰克评价说，自15世纪以来，中亚民众在两方面几乎都成为失败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别人，而他们所在的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此外，这些损失迅速在彼此间关联起来：富有吸引力的世界历史中心转移到了外围、海洋和西方。[28]另一方面，在英、俄、日等国家的压力下，中国不得不进入新的世界体系当中，仿照西方体制实现民族国家的建设，现代地理边界被条约体系限定以后，"也正是在这种无奈的权力关系格局下，我们不得不学着用西方的概念来转述和表达我们自古沿袭的领土诉求，重整清帝国之后破碎的河山。而中国的国家建设进程也就是重塑民族、创制人民的过程"。[29]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西北自然成为边缘、边疆。[30]以东南的时空经纬为准绳，不自觉地降低了游牧与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对整个中国历史重要性的影响，"西北"文化被破碎化，区位被边缘化。

吴于廑先生指出，原来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接壤地区，并不存在一条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古代国家的疆界，离中心越远越模糊，不能用近代的有精密地图为据的国界线的概念去看古代国家的疆界。总有一个两方都可出入的、两不相属而又两皆相属的所谓边界。边界对于古代国家，是一个沿其领域而延伸的狭长的面的概念，而非线的概念。[31]现代民族国家强调的是主权边界，"由边界定中心"取代了"由中心定边疆"。边疆与"华夷界限"的意义开始分离，转而成为"中外之

防”的意义。现代民族国家书写的历史视角紧缩于被边界条约束缚的版图内，游牧社会的一维被碎片化，从而使游牧力量与农耕力量之间的互动历史也被“去空间化”。在这两种不同的世界文明体系中，“边疆”与“边界”的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西北”区域意味着地理坐标、均质化的国土面积与人口；而在大陆史的“国家”与“民族”传统中，“疆域”依然存在着“面”的概念。

三 接续中国处理“游牧社会”的历史经验

“日常”的历史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地域和空间是历史经验的基本概念。[32]中国的近代就是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即被纳入全球史的过程。由此，中国从“天下观”转入“民族国家观”，按照民族主义的要求书写历史，显然这很容易落入西方的“时间优于空间”的历史书写“陷阱”。这种时空断裂性体现在中国史叙述中心上——从内陆的西安、北平和玉门关转向了上海、广州和天津。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念下，中国近代史基本上在“冲击-回应”理论框架下被写成回应海洋危机的历史，大陆史从而成为海洋史的附属。即使在“大陆史”的写作中，也是以居民（农民）为中心，而不是游牧-定居互动的历史。

“国族缔造”的核心就是“国史”建构，历史与区域差异造成的“中心-边缘”“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等二分的方式，无形中是以历史叙述的话语权重来表达的。费正清提出朝贡体系分为三圈，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汉字圈、内亚圈和外圈——形成了不同文化等级和亲疏关系，构成中国的世界秩序。[33]这种以儒家汉文化为中心形成的“环形”圈层无疑是西方“文化传播论”的翻版，同时也预设了文化的等级秩序。此外，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资本、新技术、新知识与市场网络主要在沿海地区传播，也刺激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导致地理区域中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铁路路网基本上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广大的西北内陆地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除了正在修建的兰州—天水铁路外，兰州以西“无一寸铁路”。不仅造成西北经济严重落后于沿海地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加深了人们对沿海与西北的认知断裂。“沿海地区空间剧烈的缩减，在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里已反映出来。……但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人事现象，并未反映出同程度的空间收缩。在地理上的距离，沿海地区之离新疆比离欧美近得多，然而沿海人民对新省边事，还不如对欧美事情了解的真切。”[34]民国时期的知识界大多接受了

从西方引进的知识观念，如时人的见解："盖所谓西北，第一论其方位，当在中国全境之西北隅；第二目的在于开发；必须中国势力所能达到之地；第三非荒凉不需开发，所开发者必比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之地，则西北之地域，当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及绥远之地。"[35]国民政府高参蒋君章等人认为："我国领土的几何中心是在甘肃省之凉州（武威），其地之纬度为北纬38度，经度为东经103度，以此方位将中国分为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个部分，蒙古西部和帕米尔的北部属于西北部，西北边疆则包括蒙古和新疆的全部。"[36]游牧-定居在西北土地上的少数族群也被"一视同仁"地视为落后和想象"民族"。"西北"被固化为一个地理-行政区域。不过，由于文化与行政边界的不一致，对于陕西、包括兰州是否应划分到"西北"区域中，一直存在争议。[37]

抗战前就来到中国考察的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象，他形象地用"前门"与"后门"来比喻大陆观与海洋观下的新疆地缘角色，"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其人口的绝大多数是非汉族的其他民族。它地处古老印度帝国的后门，现在在该地起作用的是印度自治领和巴基斯坦自治领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新疆又是苏联的前门之一——对于在美国外交政策支配下种种类型的势力、威望和影响来说，是最难以接近的前门。最后，新疆还处于连续几个世纪被认为是中国后门的内地边疆的一角的地位。但两千年前它就是中国通往亚洲心脏地带的前大门，而且今天又一次成为中国陆地最重要的前大门之一"。[38]拉铁摩尔强调"亚洲心脏地带"的重要性，需要再次识别"中央欧亚"的历史空间性。"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通过的地区并不是西方所指单向意义的"中央欧亚"历史区域，而需要注意其与中原农业力量相互交汇的历史面向，注意其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特征。以往单中心的"西北区域史"导致了这一疆域当中的空间多样性被淹没，导致了本文开篇中谷苞先生的质疑。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晚年的时候语重心长地提示我们，"在历史上的两个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一提就是汉族的东西，其实西部不仅仅是汉族；一提就提西方的力量，不重视本土的力量。在这两个中心主义之下把西部的这一广大地区的人文资源给掩盖起来了。西部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我们要承袭它的文化的多元性，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都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不同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的文化历史和汉族一样长、一样重要和一样珍贵"。[39]在游牧社会与中原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理解费先生这段话再合适不过了。

历史上的地缘关联性——游牧、农业区和绿洲构成的大小不一的空间形成了“大中国”，其历史一直有其延续性的一面。“西北”历史是农耕、绿洲与游牧的族群关系史，它几乎等同于中国史，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在中原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力量交会处，才能看到西安（长安）的真正意义——中国大历史形塑的中心之一，而非与“东南”对应的“西北”——指向“落后”与“边疆”的意义。历史中国根本不缺乏与“中央欧亚”互动的经验，历史上的“大中国”在包容和处理不同异质性空间方面具有娴熟的经验，无论是游牧政权还是农业政权，都重视和使用佛教的象征性资源来弥合游牧民与农耕民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便利了政权正统化。唐代长安城作为佛都来统合四方之民，清朝康熙在西安修建广仁寺抚绥满汉蒙藏就是生动的一例。“游牧社会”作为历史的一维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中，只不过在当代民族国家历史的书写中被“淡忘”了。因此，正如弗兰克所提示的，“只有反思‘欧洲中心观’，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连续性远比任何不连续性重要得多”。[40]

西北长期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互动最为频繁的区域，形成了深厚的历史传统。尽管中亚历史上的游牧民不断南下，人群与文化的变动性很大，相当多的游牧人与农业人混合了，但是不变的是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在物资上的相互补充与互相支援的关系。从地缘关系和文明交往看，这种空间延续性体现在农牧交错带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必须超越“欧洲中心观”对“西北”“边疆”“野蛮”文化等级的偏见，并在与欧亚大陆整体史观的互动中重新恢复“大中国”接续和处理游牧社会的历史经验，这就需要在欧亚时空中重新将“西北”定义为欧亚大陆的重心所在。一方面，这有助于在“整体史”视角中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性”；[41]另一方面，农牧交错带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交流的部分共性特征从西北延伸到中亚，借助历史经验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地缘战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李如东副研究员，四川大学韦兵副教授给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和意见，特此致谢。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3期

[1]〔美〕葛勒石：《中国区域地理》，湛西达译，正中书局，1947，第34页。

[2] 谷苞：《关于西北的历史文化特点》，《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3期。

[3] 〔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第28页。

[4] 〔美〕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6页。

[5] 〔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三联书店，2008，第272页。

[6] 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London：Blackwell，1989，p.264.转引自〔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第272页。

[7] 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8]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9] 谷苞：《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此后谷苞又在《关于西北的历史文化特点》一文中重申了这一观点，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0] 彭树智：《世界历史：人类文明交往的新自觉时期》，《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

[11] 褚宁、马建春：《16～17世纪"布哈拉人"与欧亚内陆贸易网络的构建》，《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

[12] 〔苏〕M.库特鲁科夫：《15世纪至17世纪叶尔羌汗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苗普生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年第5期。

[13] 潘志平、王智娟：《鸟瞰中亚宗教、民族之历史与现状——兼评亨廷顿的"文明模式"》，《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14]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中亚的中央性》，袁剑译，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17页。

[15] 袁剑：《中央欧亚、游牧民与世界秩序》，《晶报》2014年9月7日。

[16] "中央欧亚""内亚""中亚"地理范围讨论意见不一。以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决定出版《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时的界定为准，对Central Asia的研究应针对有关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苏联的几个中亚共和国的文明。自远古时代起，该地区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其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里海到蒙古高原这片广大地区延续不断来自草原、沙漠、绿洲和

山区的各族人民。参见潘志平、石岚《新疆和中亚及有关的地理概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17] 〔日〕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4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

[18] 〔日〕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4辑。

[19]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7，第44页。

[20] 〔日〕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4辑。

[21] 周伟洲：《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及变异》，载朱士光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辑。

[22] 〔日〕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高兵兵译，三秦出版社，2012，第72页。

[23] 《广仁寺：陕西唯一的藏传佛教寺院》，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50432003-1.htm，2017年2月19日。

[24] 张萍：《官方贸易主导下清代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形成》，《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

[25] 施展：《西北望长安》，《领导者》2015年第6期。

[26]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50，p.16.

[27] 《圣武记》卷4，《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11，第175页。引文中括注为引者所加。

[28]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中亚的中央性》，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1辑，第17页。

[29] 高杨：《主权的地理之维——从领土属性看中国民族国家之形成》，载许章润主编《历史法学》第3卷，法律出版社，2010。

[30] 有学者研究了“西北”一词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使用情况，明清时代的水利论所用的“西北”往往指大运河北段地区，有时包括北京周边。到了19世纪后半叶，清朝官僚为了对付回民起义或者处理伊犁问题，将陕西、甘肃、新疆地区称为“西北”。“西北”成为中国国内的地区名称是20世纪初期的历史现象，作为“方位”与“区域”结合起来。参见〔日〕吉泽诚一郎《明清以来“西北”概念的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31]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32] ［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第71页。

[33] ［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页。

[34] 杨庆堃：《中国近代空间距离之缩短》，原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部分学生编印《纪念社会学家杨庆堃教授》，2005，第74页。

[35] 王金绂：《西北之地文与人文》，商务印书馆，1935，第18页。

[36] 蒋君章等编著《中国的边疆地理》，文信书局，1944，第9页。

[37] 彭南生、邵彦涛指出，抗战后期，知识界爆发了关于民国建都问题的第四次争论。北平与南京的南北之争多集中于政治斗争，而西部各地与南京的东西之争则更多的是理念和原则的冲突。东西之争的表面是“陆防”与“海防”的冲突、开发西北与发展东南的争执，而其实质则是近代以来的“海国精神”与传统的“陆地中国”观念的对抗。参见彭南生、邵彦涛《陆地中国还是海洋中国》，《人文杂志》2014年第2期。

[38]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39] 方李俐：《关于西部开发的人文思考：费孝通访谈录》，《中国文化》2001年Z1期。

[40]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321页。

[41] 谷苞先生从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互动角度的讨论较为完整，亦可参见黄达远《边疆的空间性：区域中国的一种阐释路径——对“中华民族共同性”论述的新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施展[1]

一 美国主导下的当代世界秩序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讨论要从世界秩序谈起，因为任何政策都不是凭空，而是要在一个外部约束环境当中展开的，不理解外部环境，便难以理解政策本身。“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个经济方案，必须在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市场[2]当中落实其可行性。卡尔·波兰尼曾经提到现代世界的一大特征，就是“脱嵌”。这一现实使得一切政治方案都要顺应经济的逻辑，否则便无法落实；所以政治-法权意义上的世界秩序也必须与世界市场的逻辑有同构性。这正是美国所主导的当代世界秩序的根本特征，也是我们讨论“一带一路”倡议时，绕不开的约束条件。

当代全球秩序是由美国所主导的，但它却不仅仅是美国的，而是超越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单个国家之上的普遍秩序。它以世界市场作为其最基本的约束条件，以国际安全秩序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以全球几大经济组织为世界市场提供基本的法权架构，约束、引导着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这些法权架构又伴随着现实的国际商品、资本的流动过程而缓慢地调整着自己。国际价值观体系则为前述所有这些内容提供正当性辩护，同时作为外在的衡量标准，国际舆论依此对于现实状况加以评判。

放大一些历史纵深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秩序，一直是由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所主导的，它在缓慢变迁着，但是变迁中却总是可以看到类似前面所说的一种超越于主导国之上的普遍秩序特征。该特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前半叶的英国主导阶段，以及嗣后的美国主导阶段。其间曾经有几次大陆国家对于这一秩序的反抗，包括拿破仑法国通过大陆封锁对抗英国、德国对抗英国、苏联对抗美国等，但其结果都是反抗者被主导者所主导的秩序所包围，而从未发生过主导者被包围的情况。

问题是，为什么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与苏联的经互会体系都是一种自我封锁，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于对抗者的封锁却能成为世界对它的封锁呢？仅仅用军力的强弱或得道、失道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这背后

有着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有着不同的国家建设历程及不同的法权叙事结构，它们带来了大不相同的政治空间观、财政汲取手段，以及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从而在其内政、外交的贯通性上，以及其政治行为与世界市场的协调性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两种政治空间观在1648年建立起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开始显现。

一种空间观是欧陆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多元并立的非连续政治空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次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主权国家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其指导着威斯特伐利亚诸条约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为了使战争具备万国法所要求的形式，必须具备两个要件：第一，它必须是双方基于国家主权权力进行的；第二，它必须附带一定的形式。"[3]格劳秀斯力图通过对战争之正当性的论证，来克服中世纪以来的无序混乱状态，要为战争确立规则，从而为和平找到前提。在这个体系中，主权国家与战争是共生的，或者说是相互规定的，法权主体为主权国家，世界由多个对峙的实体构成，形成一种割裂的空间。各国的法律"是来自国内权力的。国内权力就是指国家的主权权力"。[4]个体的权利以主权权力为前提。这与此前欧陆思想家所构造出来的主权学说相匹配，是对于欧陆诸多主权实体这一现成事实的法权认可与规范。

另一种空间观是海洋上以个体自然权利为基本单位的连续性政治空间。在主权国家关系之外，格劳秀斯还提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面向，即主权并不是覆盖全球的。"根据自然，海洋似乎是抵制所有权的。"[5]因为不同于陆地，海洋无法被占有，而占有是主权存在的前提。海洋分隔开了大陆与大陆、国家与国家，格劳秀斯进一步提出，"我们称之为头等重要的法则或首要的原则，其精神不证自明且永恒不变，即每个民族均可与另一民族自由地交往，并可自由地与之从事贸易"。[6]那么，作为全球贸易所必需之通道的海洋，就不能服从主权国家的管理原则，而应依照自然法来进行管理。"自然法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本性的理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7]各国主权权力所颁定的国内法律在此失效；人类在海洋上所拥有的是自然权利，这包括出于自然理性而非主权意志的自由权、财产权[8]等，这些权利的主体是无差别的人类个体。所以，海洋秩序与无差别的人类自由（权利）是天然结合的，海洋的自由本性同时也就意

味着秩序的个体性基础。这是一种区别于陆地上的主权国家秩序的海洋自由秩序，其所构造出来的是一个连续的、无差别的均质空间，以全球为单位，国际法权依托于个体以及个体自由结合起来的诸种共同体而存在。

这样一种连续性的空间秩序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割裂性的欧陆主权国家秩序并立。盎格鲁-撒克逊传统，通过普通法实践理性构造出来，国家在其叙事结构中表达为一种司法过程，而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实体。在其顶层蕴含着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普遍性取向，在其底层则是通过陪审团一案一议的方式，将权利落实到个体与个案上来理解，恰与追求连续空间与个体自由的海洋秩序相匹配。在美国国际政治学者鲁杰看来，海洋秩序是超越于单个国家之上的多边秩序最早的起源，[9]这种所谓的超越，会使规则超越其制定者，消解掉主权的硬度，使得在某种意义上去国家化的一种普遍秩序，亦即连续空间成为可能。

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陆传统的非连续性陆地空间观，其思考是国家-政治本位的，主权的意志决断是其基础，主权者的垄断暴力为其提供支撑；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连续性海洋空间观，其思考则是个体-法律本位的，规则的一般实施过程是其基础，贸易的广泛扩展为其提供支撑。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其政策最终都要通过某种财政方案获得落实，而财政方案又是基于该国具体的经济状况制定的。但一国的经济状况却不是这个国家自己的政策能够直接控制得了的，它基于这个国家内部的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运转。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内政，面对着一个非常硬的外部约束条件，就是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又是超脱于任何国家的控制力之外的。世界市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最大的“自生秩序”，在其中活动着的既有国家，也有个体。各种各样的力量都在为自己所认定的利益而努力着，但是所有的活动都会在一个超越于所有人、所有国家之上的网络当中才得以展开。于是，其结果便无法事先预料与规划。因为对于特定的行为主体而言，其他主体的行为是在自己的规划能力之外的，而后者的行为恰好成为前者行为的外部约束条件。

相应地，这也就要求，对于世界秩序的主导国家来说，其诸种政策制定与战略规划，必须与世界市场的运转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从而使得它们在内政层面的各种政策都与世界市场的变化近乎同步地波

动，其外交政策也就能够依托于世界市场的波动而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形成前述的对于对抗者的包围。

对主导国来说，这样一种与世界市场的契合关系，一方面在政治空间观上需要前面谈到的那种合作式的、连续性的海洋空间观，而非对抗式的、断裂性的陆地空间观；另一方面，它也需要基于特定的法律技术而衍生的政策生成机制。

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来说，由于其政治思考规则是个体-法律本位的，因此其国家利益便不可以预先定义出来，而是其社会内部各种各样的微观力量、利益、矛盾等彼此冲突博弈磨合出来的，每一次的磨合结果都被识别为当下的国家利益。磨合过程需要一个共通的规则平台，就是普通法法律平台；同时其最高层面的博弈，体现在国会的辩论当中。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以去雇用院外游说公司去替自己游说国会议员，使自己的利益在议会当中得到表达。[10]游说公司可以受雇于任何人。而作为主导国，其经济利益遍及全世界，世界市场上的各种声音都可以通过游说的方式在主导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发声，使政策的生成反映世界市场的变化；同时，外国政府也可以雇用游说公司来做游说，这种游说也要参与到其他各种力量的辩论、博弈过程当中。这就使得主导国——在今天就是美国——的政策生成过程，已经内在地包含着其他国家的政策在内。这些政治过程便几乎是对世界秩序的一种模拟，美国的内政、外交因此便打通起来，并且对于世界市场的变化有着最敏感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国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

当然，这种主导国的政策生成机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经常是走后手棋——不是它刻意要走后手，而是其政策生成过程中独特的“刺激-反应”机制，使得其政策的变化很多时候是以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化为前提的，从而使其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时，往往显得应对很缓慢、笨拙。但只要给其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则其应对又一定是恰如其分的，在比拼耐力的过程中落实自身的主导地位。[11]

二 断层国家的困境与海洋国家的不足

从其政治-法权逻辑上来说，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具有普遍取向的。但在迄今为止的现实世界当中，它却无法普遍地覆盖所有人。

美国战略学家托马斯·巴尼特在21世纪前十年里相继出版了两本姊妹

著作《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12]和《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13]，在书中他提出了理解世界秩序的一种新视角。巴尼特将世界分为两类国家，一类是充分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的“核心国家”，包括西欧、北美、日本等“老核心国家”，以及“金砖四国”、东欧国家等“新核心国家”，这些国家的内部规则与正在出现的全球性的民主规则、法治以及自由市场接轨，从而可以保证产品、资本、信息、人口等的有序流动。另一类国家则是由未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断层国家”构成，它们集中在中东、中亚、东南亚、非洲、中美洲以及安第斯山脉，在那里，几乎一切都与核心国家相反。一个国家究竟属于核心抑或断层，与意识形态和政体无关，只与其对全球化的参与程度有关。

基于这种思路，巴尼特绘制出以下“五角大楼的新地图”。

通过自己对于世界的新划分，巴尼特建立了在根本上区别于冷战原则的新战略。他认为：未来世界真正的威胁在于断层国家中隐匿的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它们想要使得断层国家永远隔绝于全球化的世界，方法就是通过各种恐怖活动来打击核心国家，以及威吓断层国家的居民。那么，美国的战略就应当是努力帮助断层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其方法就是要帮助断层国家建立有效率的政府，形成明确的、与全球秩序接轨的内部规则，吸引资本的流入，实现断层国家与全球化地区在政治、经济、安全秩序等方面的全面融合，从而掏空极端势力的生存土壤。最终“要把‘我们人民’变成‘我们这个星球’”。[14]“我们这个星球”这个说法，便是对普遍秩序的一个绝佳隐喻。

对照这个“新地图”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断层国家，尤其是“一带”，覆盖了差不多整个中亚地区，这是亚欧大陆的最深处，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陆地。而这块地方，正是美国推动的普遍秩序最难以有效落实的地方，或者更准确地说，亚欧大陆深处的秩序建构，超出了美国这个海洋国家的能力范围。事实上巴尼特也明确承认，建设“我们这个星球”这一工作不是仅凭美国一国便能够完成的。

要清楚地讨论这个问题，还得再回到对于政治空间的讨论。前面谈到过的非连续性的陆地空间观与连续性的海洋空间观，会进一步导致两种不同的财富积累与财政汲取手段。[15]

对陆地国家而言，陆军和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是其生存的关键。陆

军因自卫或征服而生，以对土地的有效占领为制胜原则。在历史上，绝对主义国家的中央财政则是以对土地和农民的强制，以及对城市特权的售卖来汲取财政资源的。农业生产天然地分散经营，这就必须有大量的官员来完成税赋征收，从而强化了其中央集权机构，这为后来的民族主义政治提供了制度基础。后来的陆地强国，是以制造业为主导，而不像海洋国家一样同时也主导着国际金融秩序。制造业是以能够带来规模效应的区域性集聚为前提的，基于非连续性政治空间观的民族主义政治不会太过影响制造业的效率。金融资本则天然地以全球为单位，倘若是民族主义政治，则无法有效地主导金融秩序。对民族主义的陆地国家来说，陆军的行动是纯消耗的，经济过程与军事手段并不足以互为促进，需要中央集权机构高效地完成财政汲取来支撑军事行动。这就带来一个后果：陆地国家的财政半径以中央集权机构的效能半径为前提，其军力控制半径不可能大大超过财政半径，因此陆地国家所能有效调动的资源、其政治意志的有效范围一定是有限的，无法扩及全球。

对海洋国家而言，海军和海外贸易是其生存的关键。海外贸易所需即海上航线的畅通，此亦海军的制胜原则，于是海洋国家的经济过程与军事手段互为表里。[16]海外贸易就是商业和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它们是天然地具有普遍性取向的，不依托于任何特定的国家和土地，与农业和制造业大不相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海洋国家的普遍特性，与这些经济、军事特性在原则上是同构的，可以相互促进。海军也需要很大的财政支撑，在近代早期的历史上，大规模的远洋贸易是海洋国家的重要税基，特许公司经营权的售卖是早期海洋国家的另一个重要财政来源，东印度公司之类的特许公司与远洋贸易又是互为促进的。这两种税赋易于征收，无须强大的中央集权机构便可实现，[17]因而在其开端处便不会像陆地国家那样生成民族主义所必需的制度基础。远洋贸易及获得特许公司许可往往是由私人性质的企业或团体来完成的，它们在大海上顺应格劳秀斯所提出的海洋自由主张，是自然权利之运用的现实体现。这一切都带来一个后果，就是海洋国家的财政半径不以中央集权机构的效能半径为前提，而以国民自由活动的范围为前提。国民的商业和金融资本，其基本原则是要以全球为单位的，于是海洋国家的军力半径原则上来说便是以全球为单位，其财政原则可以支持这样一种军力半径。

由于前述的海洋国家之政治叙事传统——法律高于政治，故从原则上来说，这样一种全球军力覆盖并不以本国的政治意志之强力推行为目

的，而以一种普遍规则的维系为目的。这种普遍规则直接表现为全球的自由贸易规则，19世纪的大英帝国就是这种自由贸易规则的推动者与执行者，[18]到了20世纪，则是由继承了英国地位的美国来推动这一秩序。

但重要的是，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海洋国家主导的普遍规则的全球性特征，都是“原则上”的。在现实当中，该普遍规则的覆盖范围，必定与海洋国家的贸易、金融活动的覆盖范围直接相关。海洋国家建立秩序的努力也难以超出此范围太多，否则会超出其财政能力，违背其自身的生存原则。

也就是说，海洋国家意图主导的是一个普遍秩序，但是由于海洋国家特定的财政约束，该秩序无法以它为主导而深入亚欧大陆的腹地深处，从而在事实上又成为非普遍的。从19世纪后期的英俄中亚“大博弈”，可看出这一点。主导世界的英国将阿富汗变为自己事实上的保护国，但它自己的力量却局限在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中亚秩序就留给沙俄和清朝来处理了。冷战时期的中亚是由苏联来掌控秩序的，但苏联的陆地空间观，使得它无法有效应对世界市场，而只能通过经互会的模式来拒绝世界市场，这种经济方案反过来强化了其陆地空间观。对世界市场的拒绝会带来严重的伦理与财政压力，无法长时间持续，苏联最终解体。但针对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地区，美国也并未实质性地进入其中来主导秩序，除了它要顾虑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反应之外，更根本原因还在于，深入中亚在根本上违背其财政逻辑。美国对于阿富汗的战争只是个特例，但财政逻辑的约束决定了它不会在此地持久存在，最近美国筹划的从阿富汗撤军便已说明了问题。

于是，后冷战时代的中亚便陷入断层状态，这有多重原因：第一，由于地缘上的特征，中亚难以凭借自己之力有效地融入世界秩序，而必得倚仗外力，但是外力或因其生存原则（如美国）、或因其自身的经济特征（如俄国）而无力提供融入的路径，又或因其战略模糊而未曾意识到此种需要（如中国）；第二，中亚的绿洲地理，使其在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是能源产业，但是能源产业获得的巨额财富，倘不能通过一种有效的分配机制转化为一般国民的福利分享，则会带来巨大的贫富分化，从而引发社会问题，这正是中亚所面临的现实；第三，这些社会问题在激进主义教派的解释下，会被转化为一种对既存世界秩序的敌视，从而构成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活动的温床，这会令中亚越发困于断层状

态之中。实际上，这种演化在苏联统治的后期便已开始出现，如今越发具有更大的动能。[19]

而世界秩序的稳定是不能脱离开中亚秩序来考虑的。一方面，任何人都应该享有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这正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普遍秩序所承诺的，倘若它始终不能覆盖中亚，则将彻底堕入虚伪当中，限于自我否定的逻辑。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的活动也不会自我局限在特定的地方，而是以全球为单位的，倘若中亚秩序不能安定，则外部世界的秩序也必定无法真正地获得安定，本·拉登最终落脚于中亚便是一个例证。而美国擒杀本·拉登，对打击恐怖主义而言只不过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并且由于其在中亚的撤退，很可能会带来混乱，这更坐实了前面所说的外部世界对其所主导的秩序的虚伪性的指责。

所以，中亚正是亟待重建的大陆秩序的轴心地区，它是世界秩序这个木桶上的短板。而任何安顿中亚秩序的努力，倘不依托于世界市场，则该努力在财政上便是不可持续的。海洋国家主导着世界市场，却无法主导中亚秩序的建设，民族主义的大陆国家则无法真正通过世界市场形成一整套可行的方案。有可能担负起此种历史责任的，只能是大陆国家，但又必须是一个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大陆国家。我们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个海洋化了的大陆国家，它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场，并积极地作为世界市场之自生秩序演化当中的能动性要素来活动。只有这样，中亚秩序的建设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可欲又可行的路径。[20]

“一带一路”倡议，就其在大陆方向上的努力而言，在此种视野下，才能真正揭示出其历史意义。

三 “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秩序

前面述及的需要海洋化的大陆国家，就是中国。所谓海洋化，是指中国需要更加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场，基于此而定位自己的内政-外交战略；同时，在对世界市场的深入参与中，获得各种战略的财政基础，使战略本身成为可行。

这个过程，实际上在19世纪后期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19世纪后期的回民起义之际，阿古柏也进入了新疆，这个时候差不多整个西北都已经脱离了清朝的管制，喀尔喀蒙古一时也岌岌可危。60年代中期，左宗棠开始谋划平定西北，而清朝国库空虚，军费不足。在历史上，每当逢

此大乱，朝廷拿不出军费，西域也就脱离而去，汉唐故事皆是如此。但是在晚清，东南方面海上贸易力量的到来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朝廷批准左宗棠在1867年向通商口岸的各大洋行贷款以充军费，以关税作为抵押，筹得款项安定了陕甘局势。1877年，左宗棠再次向汇丰银行贷款，仍以海关关税为抵押，汇丰银行则向社会发行债券以筹措向左宗棠提供的贷款，依凭这笔贷款，左宗棠击溃了阿古柏政权，安定了新疆的局势。[21]想象一下，倘若没有这样一种基于东南海疆贸易的融资手段的出现，则西北必将不保；没有一个有效率的海关的存在，融资的成本必将大幅上升，恐怕西北也将不保；而海关却是在英国人赫德的掌管之下才能高效率运转的。

这一系列条件，都提示着我们，在海洋时代，作为传统的大陆国家的中国，必须通过海洋秩序汲取力量才能够稳定中亚。传统的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需要以一个开始向海洋转型的大陆国家作为中介，由此中亚才能得以安顿，整体的世界秩序才能得以完成。今天的中国与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当时的历史所揭示出的世界秩序之构成性特征，还是值得今人思考的。

巴尼特对于断层地区也做出过类似的思考。他提出，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敌人不再是有形的国家，而是散落于无形的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它们通过“第四代战争”来打击核心国家的力量。因此，未来的军力安排应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打垮支持极端势力的“无赖国家”；另一部分则是在铁血战争结束后，用来帮助建设新国家、引领其步入全球化的和平力量。后一部分力量的基础仍是军力，但它实际上更多地类似于一种警察力量。于是，包括金砖五国在内的“新核心国家”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巴尼特说，美国有足够的力量去打赢战争，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建设和平。“我们必须明白断层带内地理状况决定着国家的命运。”[22]新老核心国家应该携手合作，由美国提供铁血部队打败“无赖国家”，由新核心国家来提供宪警部队，支持对其的改造。“老核心国家推动了新核心国家的起航，未来很有可能是新核心国家推动断层国家的起航。”[23]

中国之所以成为巴尼特意义上的“新核心国家”，正是由于中国于改革开放之后加入了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这标志着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再度转向海洋视角，中国因此而实现了迅猛的经济崛起。此过程带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以这种方式拉动了以非洲为代表的断层国家在21世纪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断层国家新问题的出

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

极端主义无法为现实问题提供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它的出现却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一种在当下框架内无法获得有效化解的普遍怨恨的存在。为什么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秩序，却会在断层国家诱发无法化解的普遍怨恨呢？原因在于，美国所主导的普遍秩序，是以形式正义作为其基本追求的，因为只有形式正义才能让各种不同的信仰共同体找到共存的基础。但是由于美国独家垄断了这一形式正义秩序的执行权——既包括它在安全层面上的各种单边行为，也包括其在经济层面上的垄断性行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否决权等，这种垄断地位使得它能够掺杂一些自利的行为，从而导致形式正义之下蕴含着一系列的实质不正义。这是当下的一种制度性矛盾，是诱发普遍怨恨的原因之一。那么，如何克服这种实质不正义，使得形式正义真正地成为形式正义，或者说，让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最终形成一种合题呢？

这需要通过国际政治中的均势才有可能实现。问题是，这是在何种意义上的均势呢？19世纪的欧洲列强之间曾经有过一种均势结构，英、法、德、俄等国通过不停地变换结盟关系来寻找势力均衡。对它们来说，寻找到均势结构就是其终极目的，没有什么超越于均势之外的秩序可以追求。但在20世纪中期，尤其在冷战以后，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均势的可能性，那就是，在执行机制层面形成一种均势。此时的均势只是工具性的，这是与19世纪均势的根本区别。但新的均势也必须以实力的对冲为基础，这又是与19世纪相同的地方。尽管美国在当下垄断着对于普遍秩序的执行权，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由于其生存逻辑，美国的执行权在有些地方力有不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执行权的垄断便无法避免美国的自利行为，这反过来会使得其所推动的普遍秩序的公共性受到伤害。倘若在执行机制的层面上形成了势力均衡，令任何单个国家的自利行为能够在此结构中受到有效的约束，便有可能使得所有这些大国的自利行为最终达成类似于亚当·斯密所讲的每个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增进了国际社会的福利。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近期在国际政治上引人注目的一些事情：无论是中国所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金砖银行、亚投行等，还是美国的各种活动，如推动TPP、重返亚太等，再比如日本或俄罗斯的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各国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推动的，同时所有这些活动也都是在作为“自生秩序”的世界市场以及国际政治互动当中展开

的。自生秩序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如哈耶克所说的，是人的行为而非人的设计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之最终结果，都不会按照它最初的设想展开，因为它始终要面对其他国家所形成的外部约束条件。在各种约束彼此互相冲突博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达成某种新的势力均衡的过程逐渐展开。如果从一个短时段来看，均衡的过程可能会呈现为各国之间的关系不友好或过度友好，而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的话，所有这些看上去不友好或者过分友好的行为，都只不过是要达成执行机制层面的均势所必需的历史过程而已。

巴尼特也意识到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所存在的问题，所以他提出，在前述的新老核心国家合作的过程当中，要积极地把制定规则的程序向新核心国家开放。全球化进程就像一列火车，“旧核心国家要引导，断层国家要跟随，但是必须由新核心国家掌握节奏，使得整列火车保持完整”。[24]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其实际的展开过程，因国际政治的博弈与互动，也许会与人们起初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别。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此过程当中，中国的活动逐渐推动着世界秩序的普遍化，克服现有国际秩序形式正义之下掩盖着某种实质不正义的缺陷，从而最终真正实现超越单个国家利益之上的普遍秩序，增进国际社会的普遍福利。

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哲学意义。

原载《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

[1] 施展，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2]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4，第149页。

[3] 〔荷〕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83页。

[4] 〔荷〕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第38页。

[5] 〔荷〕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马忠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3页。

[6] 〔荷〕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第9页。

[7] 〔荷〕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第32页。

[8] 格劳秀斯认为，“根据自然法，在财产权被引入之前，每个人都有权使用他所发现没有被占有的任何东西；在法律被制定之前，每个人都有权通过武力报复其所受到的人身伤害”（《战争与和平法》，第35页）。自然法之下人们可以有某种对于人与物的权力，但它与成文法意义上的那种财产权和自由权并不是一回事。

[9] 参见〔美〕约翰·鲁杰《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16～17页。

[10] 参见〔美〕奥恩斯坦、埃尔德《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订》，潘同文、陈永易、吴艾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11] 比如人们曾经批评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对二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把情境还原到局中人的位置，则张伯伦的政策实际上正反映了各种微观博弈的均衡结果，也反映着当时英国人的普遍心态。在德国还没有真的燃起战火的时候，英国的政策生成机制不会做出超出刺激力度之外的反应，于是看起来英国对于德国的应对便是极为笨拙而又迟缓的。但我们更应看到，一旦德国真的发动了战争，刺激力度陡然提升，则英国也能迅速地选择出丘吉尔来形成新的应对政策；一俟德国失败，则丘吉尔又被选下了台，反应仍然是与刺激相匹配的。在人们感叹英美总能在正确的时间把正确的人放到正确的位置上的时候，也必须看到，丘吉尔与张伯伦，不过是同一体制面对不同世界环境时的两种不同呈现而已。颂扬丘吉尔的伟大抑或贬斥张伯伦的糊涂，都不是对于英国体制的恰当理解；赞美其应对的得当，便必须接受其应对的缓滞。

[12] 〔美〕托马斯·巴尼特：《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王长斌、汤学武、谢静珍译，东方出版社，2007。

[13] 〔美〕托马斯·巴尼特：《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孙学峰、徐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14] 〔美〕托马斯·巴尼特：《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第30页。

[15] 下面对于陆地国家与海洋国家之差异的叙述，是一种纯理想型的叙述，真实的历史过程要比这复杂得多，这里不过是为了指出一些关键的原则性差异而做的极简化处理。

[16] 斯密便曾经说过，“通过扩展殖民地渔业来增加我国航运业和海军的力量，似乎是我国议会经常怀抱着的一个目的”。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第149页。

[17] “我们也许可以想象一个从帝国俄罗斯到荷兰共和国的连续体，从俄罗斯成长出臃肿的国家机构来从庞大的但没有商业化的经济中谋取武装人员和军事资源，而荷兰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军，拥有在由城市为主的省份临时批准基础上的自己的武装力量，容易从海关和国产税上收取税款，而且从来不需创立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可以放入像法国和普鲁士的例子，在那里，国王们有权利用农业和商业资本主义，但是为了获得对其军事活动的支持，不得不和强大的地主们讨价还价。从长远来看，军事对人力、资金和供应的需求增长如此之大，以致统治者们也要和大多数人口讨价还价。”参见〔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05页。

[18] 参见R. Robinson and J. Gallagher，“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814-191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53。

[19] 在国内几个期刊网上检索“中亚”“极端主义”几个关键词，可以见到大量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这提供了相当多的实证思考。但是既有的研究多还是就中亚来论中亚，未能将视野展开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这是其不足之处。

[20] 于此可见，所谓陆地国家抑或海洋国家，并不单纯是指其地缘状况，同时更是指其国家的世界秩序观。所以，即便是岛国，也可能是个陆地国家，比如二战前的日本；即便位于大陆，也可能是个海洋国家，比如16、17世纪的荷兰。

[21] 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264～285页。

[22] 〔美〕托马斯·巴尼特：《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第198页。

[23] 〔美〕托马斯·巴尼特：《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第189页。

[24] 〔美〕托马斯·巴尼特：《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第164页。

丝绸之路、地方知识与区域秩序

——“丝绸之路”的概念、话语及其超越

袁剑[1]

一 问题的提出：欧亚互动的旧世与新时

回望过去的人类文明史，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都诞生在欧亚大陆，到大航海时代为止，欧亚大陆始终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在这片土地上，既成就着赫赫君王的帝国霸业与征服雄心，也演绎着芸芸众生的日常生计与爱恨情愁。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海洋力量的崛起，始终占据历史主导的欧亚陆上力量逐渐受到压制，并在之后的殖民帝国时代被排挤到世界舞台的边缘位置，以海洋、西方和外围为核心与主轴的世界体系逐渐形成。这种体系影响深远，它不仅形塑了大国力量格局，更深入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并使“丝绸之路”在长时期内成为一个极富历史感而基本上不具有未来感的词汇，它所代表的是欧亚大陆曾经的荣光。

政治地理学的视野提醒我们，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欧亚大陆将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角色。且不论本身就强调欧亚大陆中心地位以及陆权的英国学者麦金德等人的看法，即便是强调海权的美国学者马汉也同样敏锐地意识到亚洲东西划分与南北运动之间存在的交织关联，他在著名的《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一书中指出，亚洲在地域上分为东部和西部，而其内在的运动则是南北向的，而就相关争夺的程度和地域稳定性而言，则往往会有持续性的调整，直到新的稳定状态达成为止。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画一条南北分界线，撇开西部来思考亚洲东部的情况，实际上只会在具体实践中割裂一方与另一方的重要关联，而实际上，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都使纷繁复杂问题中的因素得以增加。故而，必须思考一方与另一方以及双方与整体之间的关系。[2]可以说，正是通过“中亚”这一节点，欧亚大陆东西方、南北方之间彼此互动，形成了一张具有文化与政治张力的联系网络。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广阔的内部空间下，借助着边疆这一重要的中介性区域，外域与中原的文明与文化交流联系互动，这成为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演进以及欧亚文明交往的重要视角。

正是在这张整体性的联系网络中，由于相关文献记载中对某些重要

交流通道有意无意的重复与强调，逐渐在当时及后来民众的知识空间中形成了对于欧亚之间互动所形成的历时性通道的概括与认知，在这之中，“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其中的一大标志。“丝路所经之地，许多国家和帝国之间不知发生过多少腥风血雨的战争，但是，和平往来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因为大家都懂得，这条世界贸易中最伟大、最丰富多彩的大动脉是最有利可图的，是极端重要的。”[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在继续保持历史感的同时，正在展现出全新的未来感，而这种未来感不仅直接提升欧亚大陆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且还将在更深的层面形塑所经地区的地方知识与区域秩序。

二 作为事件、传统与名称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并不是一个固化而生硬的词，它是在历史中逐渐生成和展开的。如果从知识建构的角度分析，“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个欧亚东西方交流的多种意义的集合，存在着从事件、传统到概括名称这样几个递进的层次，而在各个层次当中，又形成了各自的意义空间与指向。这些多级的意义空间与指向，从不同层面上塑造了我们头脑中的“丝绸之路”观，并以之与历史、当下和未来形成关联。而在这当中，我们也将面临一个对既有范式的回应与反思的问题。

（一）作为事件的“丝绸之路”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两汉时期是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和域外知识需求迅速拓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域知识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汉朝实现国家整体利益以及对外战略的紧迫需求。从西汉建元三年（前138）起一直到元鼎二年（前115），受汉武帝“断匈奴右臂”之命，张骞在西域活动了二十余年，通过不懈努力，“其后岁余，骞所遣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4]进而完全打开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不仅有助于汉朝在西域地缘政治力量的展开，而且还有力地拓展了当时中原对于西域的知识视野。[5]“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6]到隋唐时期，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更为密切。在蒙元时代，随着蒙古人在欧亚的大力征伐与蒙古世界帝国的形成，欧亚中心大片地域统一在蒙古政治军事力量之下，“圣朝既平宋，经画遐迩，大都小邑，枝疏脉贯，际天所覆，犹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迁，水浮陆驰，舟

格梁济，荒陬僻壤，无远不达”，[7]在此基础上，欧亚东西方的商贸交流进一步扩大，所交流的商品已经不再局限于丝绸，而是拓展到更为广泛多样的商品门类，如瓷器、漆器、香料、宝石等。

（二）作为传统的“丝绸之路”

当然，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的整个贸易商道往往并不是由一批商人全程走完的，而是分段、分批进行，在各个阶段由当地不同的族群主导。以汉代为例，“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沿途交易设想为三段进行：在最东方的是中国人，他们一直到达蒲昌海（罗布泊），也可能只到达敦煌；在最西部的是希腊人、叙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从罗马帝国到叙利亚；从叙利亚到贵霜帝国，甚至一直到达帕米尔一段，则是波斯人；从波斯—印度边境穿过整个西域，一直到达甘肃边境的是贵霜人，在特定情况下，贵霜人可能是指粟特人”。[8]总体而言，在不同的时期，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与经济交往以沿线各族群“接力”的方式一直在进行着，并且逐渐成为维系东西方互动的一种历史传统。

随着航海大发现以及西方殖民时代的到来，丝绸之路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失去了当初的作用，其作为东西方交流通道的传统也逐渐成为历史。“侵略成性的欧洲不断派遣他们的舰队和海军陆战队，侵犯从孟加拉湾一直到日本的东方国家的海岸，而派向西域的仅仅是一些空想家、诗人和文人等等。丝绸之路——它已不复存在——此时进入了传奇故事的时代。这些传说又会把一些云游四方的骑士吸引到那里去，以寻求新的冒险，而一些寻找新鲜趣闻的人，如考古学家、记者和旅行家，也会涌向那里。”[9]一批批的西方探险家取代了曾经繁盛的骆驼商队，传奇与探险逐渐成为书写欧亚互动尤其是西域故事的新途径。

（三）作为名称的“丝绸之路”

恰恰就是在传统的“丝绸之路”走向没落之时，作为名称的“丝绸之路”开始凸显，并反过来成为概括和书写之前欧亚东西方之间交流史的最重要标志。

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著作《中国》中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Seiden strassen）的名字，并为其下了这样的定义：“指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之间，连接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的，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地区交通线

路。”[10]他将丝绸之路的起始时间定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正是因为张骞的活动开辟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通道，并进一步与外部世界有了关联。在这之后，德国学者赫尔曼（Albert Hermann）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进一步阐释了“丝绸之路”的内涵，他写道：“我们应把该名称的含义进一步拓展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总之，在与东方的大帝国进行贸易期间，叙利亚始终没有与它发生过直接的关系。但是……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而获得生丝的。”[11]这一名称之后为欧美学界所广泛使用。[12]日本则从昭和十九年（1944）开始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这些事件本身在后来的意义被进一步认知，从而逐渐形成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传统，进而在事件与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概括性的称谓。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名称的“丝绸之路”将之前的中西交流史重新加以标记，成为西方对于从中国出发到达欧亚大陆西段的商贸事实、传统以及具体内容的一种指称。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少其他文明维度的观察视角，这种指称又反过来将曾经多样和丰富的欧亚东西方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纳入一种西方式的观察视野当中，并在事件、传统和名称等三个维度上形成了欧洲关于“丝绸之路”的基本话语。

三 “丝绸之路”的主体性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李希霍芬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提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之后逐渐被西方学术界所采纳并沿用，但中国学界本身却并没有直接沿用这一概念。不但传统的中国古籍中没有这个称谓，而且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中国学者的一些重要中西交通史作品，如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所著的《中西交通史》当中，也没有使用这个词。[13]直到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之后，国内媒体与学术界才逐渐接受并使用这个名称。中国学术界最早使用“丝绸之路”这一术语的可能是夏鼐先生，他于1958年在《考古学报》第1期上发表《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其中就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此外，他于1963年发表在《考古学报》第1期上的文章《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更是多次使用了这个词。孙培良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指出：“‘丝绸之路’一词，通常是指汉唐间我国丝绸经中亚、伊朗西运至地中海东岸各地的那条陆路交通线而言。这条陆路交通线在中途歧出若干支路，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并不是仅仅一

条路。再者，还有一条陆路交通线是沿天山山脉北麓西去，经中亚沙漠地带和东南俄草原至黑海，那也是一条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之路，在特殊情况下，它起着代替前者的作用。在较晚的时期，这一条路上甚至商旅络绎不绝，十分兴旺。”[14]到80年代初，有学者进而认为丝绸之路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15]并开始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16]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外经济和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这一名称的使用也更为普遍与频繁。可以说，“丝绸之路”这一指代符号进入中国学术与社会语境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从西方学者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到中国学界接受并使用这个名称之间的这段时间，不能看作信息滞后性的后果，而应该看作西方对作为事件、传统和名称的“丝绸之路”及其相关知识的分类与定义被处于丝绸之路历史与现实地域的中国所采纳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本身接受了西方对于“丝绸之路”及其所附属的历史脉络的叙述。但是，这种接受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约翰·戴维斯在反思欧洲话语对于非欧洲地区历史事件与过程的标记与概括时提醒我们：“制作知识的方式必然会影响到知识的本身——其形式与内容——而如果知识又会影响到人们的决定，那么在我们企图解释某个社会群体是如何演变成它们今日的面貌时，我们势必得去了解这群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过去……在欧洲这个情境脉络中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对于过去的看法，大致是由一组欧洲式的概念和想法所主宰。一般来说，我们指望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推出的历史，总是要以因果关系做纪年排列，而且其中有一个逐渐发展的故事，而这似乎是一条直线时间（linear time）的观念。这些主要的因素——因与果、纪年次序、直线时间、一个故事——不一定以同样的混合形式出现在所有的历史思维中。”[17]如果我们考察“丝绸之路”概念及相关叙述的接受过程就会注意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内在对“丝绸之路”话语的运用中，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中国本身在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展现以及主体视角的凸显；另一方面，在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词的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将之用作整个欧亚东西方交流的代名词，并将其历史范围和地域范围进一步往外拓展，从而成为涵盖整个历史时期和欧亚地域范围的概念，将这个原本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的概念泛化了。应该清楚的是，“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西方认识论视野下形成的对于欧亚东西方交流的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是由欧洲概念语境下的“事件”、“传统”和“名称”综合构成的，并在具体的叙述中纠缠在一起，难以截然划分。而欧洲之外其他国家如日本对于“丝绸

之路”这一概念的使用，一方面是对这种欧洲语境和叙述的接受和采纳，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个对这一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和补充的过程，并且将欧洲“丝绸之路”话语中的“事件”、“传统”与“名称”以新的形式加以编织。因此，我们在梳理欧洲学者的“丝绸之路”论述的时候，必须时刻对其话语当中蕴含的知识霸权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才能确立起中国自身的“丝绸之路”叙述话语，进而确立起“丝绸之路”的中国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为宏大和全面的关于欧亚乃至整个世界的认知框架。

四 关于边疆的地方知识：“丝绸之路”话语的重要基础

如前文所述，我们在反思既有“丝绸之路”话语的过程中，还有必要注意到其中所隐含的西方既有的“丝绸之路”研究视角。对这种视角的认知一方面固然可以节省研究精力，能够较为迅速地确立起对于“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基础，并在短期内建立起某种整体论述；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视角缺少其他研究主体的参与，所观察到的整体场景是不全面的、单薄的。

总体认知都是建立在对地方知识的综合掌握基础之上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认知以及整体图景的形塑都因之而成。随着当代通信与相关研究技术的高度成熟，在对“丝绸之路”的重新关注与研究当中，离不开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其中既关注历史时期围绕着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所呈现的丰富图景，也必将涉及当代欧亚大陆及其内部各文明、各文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建构与维系。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我们必然会面对“丝绸之路”的地理基础问题，那就是，在中国古代王朝位于中原的政治中心与域外进行交流互动的历史语境中，当时中国的边疆区域在其中实际上扮演了东西方互动的现实中介者的角色，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决定和维系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互动的关键区域。而在当代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下，“丝绸之路”话语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也必然需要处理如何认知广阔的中国边疆地区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边疆地区在地理层面上是丝绸之路经过的区域，而且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过程中，还必须认识到中国边疆与中国内地之间在社会、文化和现实发展等方面所存在的异同，进而更好地形成关于中国内部结构和中国-周边关系的系统性认知。可以说，在对沿线国家的整体性知识加以把握的基础上，了解和认识关于边疆的地方知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内部以及各国内部文化和民众认知层面所具有的独特性，处理好中国内部的中心-边疆结构关系以及中国与外域的国际

性结构关系，进而避免以一种文化单一性的思维去思考和想象“丝绸之路”的整体图景，在体认“多元一体”的中国基础上，构筑“和而不同”的“丝绸之路”整体认知。对这一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专述，在此不一一展开。

五 “多点互动”的区域秩序：“丝绸之路”话语的当代呈现

“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丝绸之路”这一指称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关于互动与交往的历史与现实，其当代内涵更是对整个欧亚东西方交流与互动的一种整体建构，构成了一种新的区域秩序。这种区域秩序既有别于传统中国在东亚世界的朝贡秩序，更不同于殖民时代列强在欧亚诸殖民地所形塑的帝国秩序，它无法用单一的实例来加以描述，而必须通过对其所经过地域族群、社会与文化当中更多事例的描述与分析，方能一层层地“编织”出完整的历史图景。

这种区域秩序的构建，不仅是对“丝绸之路”这一词语的沿用，还需要我们走出既有的知识范式，实现丝绸之路的“在地化”，进而迈向更具互相理解性的“丝绸之路”观念，在“丝绸之路”的延续性之外强调其内部与外部的连续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多元视野的“丝绸之路”空间与网络。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言：“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18]一方面，中国视角下的传统“西域”，作为边疆的重要区域和资源，正被纳入对“丝绸之路”的新思考中，并在新的观念图景中形成与当下“中亚”乃至“西亚”的互动与关联，进而形成更具整体性的知识图景；而与此同时，丝绸之路周边地带的社会与文化也正在进入相关的观察视野，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历史时期西域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这一区域的当代社会与文化生态特征也得以进一步揭示，并在当下的时代维度上得到全新的思考与关注。

除此之外，“丝绸之路”研究也需要通过多点互动，避免相关学科研究间的隔阂，更全面地整合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的长处，从而更好地挖掘和研究“丝绸之路”内部的学术与思想资源。日本学者长泽和俊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东西关系史和中亚史，本来是应该互相合作的领域，作为以东西关系史为中心主题的‘丝绸之路’的研究，是愈来愈重要的问题。在要求东西方文化相互理解，要求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理解的现代，对东西关系史及其核心问题丝绸之路史的研究，今后会愈来愈受

到重视。”[19]有鉴于此，对于欧亚东西方之间交流的关注就不应局限于对“丝绸之路”本身的关注，应该更为多样而全面地关注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各种材料和各块地域，形成一种基于“路”（link and road）的连续性、关联性互动认知网络。

在材料方面，考虑到目前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材料的分散，如研究者所言，“事实上，丝绸之路的材料包括雕塑、巨大的壁画、旗幡、木俑，尤其是17种不同语言和24种不同字体的经文（手写的和印刷的，完整的和残缺的）！这些材料分散在世界各地（巴黎、伦敦、柏林、哈佛、列宁格勒、新德里、汉城、日本等等）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20]因此，其研究必然是多点的，而由于每种语言都代表了当时写作者的主观视角，因此在对这些语言材料进行研究的时候，又必然是多视角互动的。在相关地域研究方面，随着东亚、中亚、西亚、南亚等相关区域研究的深入，各区域研究之间围绕“丝绸之路”逐渐形成新的互动与对话。林梅村先生指出：“今天，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固然比李希霍芬时代深入得多，虽然他和赫尔曼对丝绸之路的经典定义已不能概括目前所知丝绸之路的全部内涵，但是他们提出的基本概念并未过时。他们把丝绸之路的研究放在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基点就是不可动摇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研究中国和罗马是不够的，必须兼顾两者之间的中亚、印度、伊朗和欧亚草原游牧人所起的中介作用。”[21]这就提示我们，在新地缘格局展开的当下，既要重新去认识和思考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乃至欧亚历史中所构筑的时空与观念，也要更好地确立起对于欧亚大陆内部结构与网络的新认识、新的时空哲学。

新的时代正展现新的知识图景，这种知识图景既是对之前知识结构的一种超越，也是对之前历史场景的超越，更是对之前欧美“丝绸之路”话语及其叙述背景的超越。斯文·赫定在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域考察的回忆中，向我们展现了丝绸之路古道上一幅破败没落的场景：“见不到一点生机，商业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镇，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在一贫如洗和朝不保夕的惨境中，人口越来越少。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看到过去那一幅幅丰富多彩、辉煌繁盛的画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队和旅行者为每抵达一个新的绿洲而雀跃欢腾的景象。”[22]“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令他嘘唏不已，而他也期待：“人们会去探索比起今天要容易理解得多的新领域，最落后的亚洲也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上现代交通手段，并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23]时代契机正在为这

种努力展现最大的可能，而借助于视角的转变与多点互动研究的推进，我们将有可能形成对这一历史空间与区域的新知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全新的中国欧亚秩序框架与话语，同时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本身的认识以及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在这里，“丝绸之路”为我们创造了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可能。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4期

[1]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

[2] 〔美〕阿尔弗雷德·塞尔·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14～15页。

[3] 〔瑞典〕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第230页。

[4]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5]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第360～361页。

[6] 《汉书》卷96《西域传》。

[7] 许有壬：《圭塘小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625页。

[8] 〔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第79页。

[9] 〔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第255页。

[10]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Bd.1*，Berlin：D.Reimer，1877，p.454.

[11] Albert Herman，*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910，p.10.

[12] 例如在法国学者格鲁塞1939年出版的《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es*）一书中就有一节题为“丝绸之路”。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就有一本以“丝绸之路”为名的书。

[13] 贾应逸：《丝绸之路初探》，《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14] 孙培良：《丝绸之路概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15] 卢苇：《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开通》，《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

[16] 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7]〔丹麦〕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贾士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6～17页。

[1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182页。

[19]〔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冯佐哲译，《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5期。

[20]〔苏〕R.J.兹维·韦布洛夫斯基：《大陆间的交往：丝绸之路》，冯韵文译，《第欧根尼》1989年第2期。

[21]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页。

[22]〔瑞典〕斯文·赫定：《丝绸之路》，第227页。

[23]〔瑞典〕斯文·赫定：《丝绸之路》，第230～231页。

试论区域关系史视域下的“西域”

李如东[1]

一 有关“西域”的“单向历史叙述”

学界对今日中国新疆与古代“西域”的历史表述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单向叙述。不少国外学者从近代地缘政治眼光自西向东将近代中国新疆与古代“西域”置于“中亚史”中来叙述。反之，部分中国学者则以“中原中心观”从东往西看“新疆”，将其历史表述为古代“西域史”的延续；持前论者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弗莱彻（也译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1934-1984）、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等。在弗莱彻看来，1800年前后清政府的政策是将新疆和“中原”分隔开来；清廷“征服亚洲内陆是出于战略而不是利润的考虑，目的是想防止敌对强国的兴起”。[2]弗氏对“西域”与“中原”之间关系的表述虽有“内陆亚洲史”视觉的观照，但其论述中的地缘政治基调还是比较明显。这说明弗氏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此后，弗氏的“征服论”被米华健进一步发挥。米氏认为，1759～1864年，“清朝根据新疆的情况逐步在新疆发展了清帝国主义”，今日中国人的“大中国观”即源于“清帝国主义”。[3]米氏以美国的西部“拓边史”为参照考察“清”在“西域”的经济与民族政策，其“西方中心观”和地缘政治眼光不难被发现。[4]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将中亚划分为西部中亚和东部中亚，前者指今中亚五国，后者指中国新疆。[5]对“中亚”的这种地理划分无疑受到近代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

显然，弗莱彻、米华健等西方学者是以混杂了地缘政治眼光及或隐或显的“西方中心观”自西向东论述历史上之“西域”的。与之相反，部分中国学者在表述新疆历史时则受到王朝国家时代表述“西域”的“中原中心观”之影响。1923年，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陆续发表了其《元西域人华化考》前四卷。书中，陈垣先生认为虽然“西域人”受到希腊、印度、波斯、阿拉伯等诸多文明之影响，但他们“复曾睹中国文明之一线，其渴望身亲见之之情可想也”。[6]陈垣先生此处并没有掩饰其“中原中心观”。1936年，顾颉刚、史念海先生以“中原中心观”为基调写就《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试图论证中国版图的历史延续性。[7]1937年，曾问吾在论述“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关系时，更是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中的“西域”界说与现代地理学知识将“西域”分为山北

（天山以北）、山南（天山以南）和岭外（葱岭以西）三部分，逐一论述中原王朝在此区域的经营史。[8]当然，陈垣、顾颉刚和曾问吾诸先生的表述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流布和日本侵华的时局也有密切关系。陈垣先生曾说他是在“中国最被人看不起之时”以及“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写作《元西域人华化考》的。[9]而顾颉刚、史念海二先生则直接表明他们写作的动机是“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以使时人明晓“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10]这说明民国知识分子在表述新疆时，“中原中心观”与“民族-国家”观念相互同构，他们的论述同时也多少具有地缘政治的观照。此种复杂的态度在何子复论述中国“边疆危机”的文字中流露得更为明显。在声明其时（1937）中国边疆包括东三省、外蒙古、新疆、西藏以及西康、云南和广西之后，何子复认为邻近的“强国”与中国“不是因为界限的划分发生纠纷，就是因为要想强占某一块土地，以扩张他们自己的疆界而发生战争。现在我国既然是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指抗日战争——引者注），我们应该赶紧注意边疆的问题才好。并且我们还应该积极的开发边疆，省得外人再来觊觎”。[11]在新疆史叙述中，“中原中心观”被不自觉地沿用下来。如杨建新指出的那样，在近代国家观念成为常识的今天，对中国与中亚的认识仍然混杂着来自传统的“中国”（中原）和“西域”观念。[12]

不难看出，自西向东表述“西域”与从东向西表述中亚、中国新疆均有其局限。从文化地理与历史过程来看，今日之中亚、中国新疆在历史上与周边诸人群和文明有着持续的互动；“中国”与“西域”在不同历史时段有不同所指，具有流变性。[13]人们在认识和表述“西域”历史时所蕴含的“文化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观”与“中原中心观”）恰好体现出“民族国家”时代历史表述的困境。在“民族国家”时代，人们常不自觉地以单一民族为单位思考历史，并以民族或“民族国家”为主体对历史展开叙述。此种历史观以西方的分类思维为基调，在认知表述“多民族国家”和“多文明区域”的历史时，都有其局限，且容易进入“文明冲突”的话语之中。如王铭铭教授所言：“在过度分类依旧引发矛盾的今天，立足于一个新的平台，以专注于‘融合’的文明人类学为技艺，对既有的关注历史与关系的宏观人类学研究加以‘招魂’，已成为必要。”[14]如此，欲全面展示“西域”、中亚和中国新疆历史的内在丰富性及其与诸文明复杂的历史关系，我们有必要在“区域关系史”视域下来认识和表述“西域”。

二 对“单向历史叙述”的诸种反思

“单向历史叙述”较为明显的特征是以自我文化为中心，并将表述对象的历史过程单一化。这种遮蔽论述对象内部丰富性及其与外部多元互动关系的叙述方式已受到不同层面的反思。我们将先讨论几本反思自我中心主义与封闭性历史叙述的代表作，然后再转入对单向“西域史”叙述反思论述的梳理（从而避免将其视为孤立性的学术反思）。在1982年出版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埃里克·沃尔夫（Eric R.Wolf）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和人类学界将社会（文化）整体性视作民族志书写“最大单位”的倾向展开反思。[15]沃尔夫的研究显示，那些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叙述中被认为“没有历史的人民”实际上也参与到了1400年之后现代世界体系建构的过程中。这说明，“人类世界是一个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这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个整体分解成彼此不相干的部分，其结局必然是将之重组成虚假的现实”。[16]沃尔夫的论述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不同地区如何参与到世界体系建构过程中的历史图景；稍有遗憾的是，因其论述的世界体系由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他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中心观”的束缚。[17]1996年，杰克·古迪（Jack Goody）对“西方中心观”做出更为彻底的反思，他将欧亚大陆作为一个关系性整体来考察，认为应把看待历史的眼光放到超越1600年之前的时空中，对西方固有的二分思想（欧洲—非欧洲、理性—非理性、现代—传统等）进行检视；展示东方世界（印度、中国、近东）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彼此间的关联性。[18]显然，沃尔夫与古迪将世界史作为政治经济或文明关系体的表述，检讨的正是“西方中心观”的历史叙事模式。差不多同时，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也对“中国研究”既有研究范式的“西方中心观”和“中原中心观”展开了反思。

美国“中国研究”的两个影响深远的范式分别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开启的“儒家中国”和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开创的“边疆中国”模式。前者集中论述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具体表现为对朝贡制度的研究），后者则从“长城过渡地带”来审视中国整体史。[19]1977年，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用以区域经济大区为基础的城市体系来理解传统中国。[20]他将中国分为九个地文区，认为每个主要地文区都发展着“一个合理的分离的城市体系”，并成为配置该区资源的中心；对每个区域城市的时空变化进行的分析是理解中国历史及其空间演变的关键。施氏的区域研究取向和将中国研究“社会科学化”的努力，间接对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学术传统中“传统—现代”两分的“西方中心观”做出了反思；但他无力处理各区域文化地理因素的差异对其模型构成的挑战，而且在施坚雅的论述中，“边疆中国”未得到应有的讨论。1986年，

柯文（Paul A. Cohen）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号召则更为直接地反思了费正清“中国研究”传统；他认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应当注意中国内部的差异，尤其是东西部差异。[21]柯文的努力将美国的中国研究导向了区域研究取向，并使费正清（农业）“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与拉铁摩尔“边疆中国”研究传统逐渐汇流。1995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提出以复线历史代替单一主体的“民族史”叙述，这加速了费正清传统与拉铁摩尔传统的合流。[22]以“清”为叙述中心的研究者对中国研究（含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中原中心观”进行最为直接的调整，并以“新清史”学派的面貌出现于学界。[23]不过，如米华健的论述所体现的那样，新清史不仅没有清除“地缘政治眼光”，也没能摆脱“单向历史叙述”的窠臼。故此，我们有必要梳理中国学者对“西域”叙述的建设性讨论。

1992年，张广达先生认为研究古代“西域”历史文化应该像布罗代尔研究地中海世界一样，“进行一番架构，进行综合研究”。[24]此后，“陆上地中海”的“西域”研究路径被一些学者引入讨论。如葛兆光先生就提出将地中海、“西域”与东海视作“文明交错的空间”，进行历史比较研究。[25]潘志平在梳理国内外中亚研究的大致脉络时也提倡“地中海式的区域史”研究，认为应从区域史视角来论述中亚史。[26]昝涛则认为地缘与文明两个视角（他尤其强调了后者）可能有助于人们摆脱历史上形成的“中原中心观”的中亚认识，建立起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27]近来，对民族国家话语和“中原中心观”的“西域”认知较为集中的反思出现在2013年《学术月刊》的一组笔谈文章中。[28]在笔谈中，学者们对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观”进行了反思，认为当从区域内部和多元视角认识和表述“西域”（新疆）；提出以“多史叙述”讲述中国，架构以“天山史”为中心的“西域史”叙述等建设性观点。[29]此后，于逢春撰文呼应了此次笔谈，认为当站在边疆立场体察边疆，以“文明板块”的视角破除既有“西域”叙述中的“中原中心观”，勾勒包括边疆在内的中国历史画卷。[30]我们将沿着上述学者的论述取向，在“区域关系史”的视域下进一步认识和表述“西域”的内在丰富性和外在开放性。

三 多元互动：区域关系史视野下的“西域”

在“区域关系史”视野下，作为“陆上地中海”的“西域”既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历史世界。张广达先生在讨论古代亚欧陆上交往时指出，历史、社会的变化速度远超地理环境，后者解释不了“历史现象变化的终

极原因”。[31]葛兆光先生则认为：“‘西域’虽然是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的地理词，但是，作为一个有意识地连接各国历史、语言和宗教来研究的历史世界，却是近代的事情。”[32]二位先生对“西域”的论述提示我们在选择“区域关系史”视域的同时，不能以“地理决定论”为基础来表述“西域”。我们将综合历史地理学、文明史等相关的研究成果来呈现“西域”诸文明多元互动、彼此交融的历史面相。

据日本学者羽田亨的研究，以帕米尔（Pamir）高原为中心，“西域”可分为东、西、北三个区域进行文明史的论述；东面是天山以南的塔里木河流域，西面是楚河（Chu）、怛罗斯（Talas）河和注入咸海（Aral）的河流流域，北部是伊塞克湖（Issik kul）、巴尔喀什湖（Balkashnor）、阿拉湖（Ala-kul）流域，也即伊犁、准噶尔盆地等天山北路地区。[33]从地理学来看，这一被称为“中央亚细亚”的地区似乎构成一个封闭的内流河区域，但若综合地理、人种、文化等因素来看，则可视为三个开放的区域中心。即“第一为天山南路地方；第二为葱岭以西，以锡尔、阿姆两河之间为中心的地方；第三为天山北路和俄属七河省地方”。[34]三个中心彼此关联，与周边诸国密切互动。如此一来，它既成为周围诸大国的缓冲地带，又是各大文明的联结地带，使它们“建立了互相不可分离的关系”。[35]B.A.李特文斯基与张广达也认为，“西域”是一个“文明的交汇地”，并指出该区的社会形态“可分成三个部分——城镇和城市人口，村庄和乡村农业人口，以及草原（有时是山地）及其游牧人口”。[36]草原和半荒漠地带以游牧社会为主，绿洲地带则以乡村和城镇社会为主，在绿洲与游牧社会中间又存在不少大城市。[37]综合羽田亨与张广达等先生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西域”存在“三个区域中心”，它们以城市、村庄和游牧“三种社会形态”为基础，构成彼此关联的整体；作为“文明交汇地”的同时，又在与周围诸文明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种“复合式文明”。我们将在“三个区域中心”“三种社会形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呈现“西域”文明互动的情景。

历史上，天山以南的“西域”以塔里木河流域的绿洲为基础，形成了高度文明的“城市国家体系”。[38]“陆上丝绸之路”以绿洲为基础，传播着来自各文明的物质、技艺、经典与宗教；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源于印度的佛教以及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皆由西向东传播。同时，中原的汉文明也自东向西传播；无论是汉唐的西域经略，还是回鹘的西迁，都促成（或促进）了中原文明的西向；[39]葱岭以西，锡尔、阿姆两河间的“西域”受两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影响颇多。除此之

外，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则为这一地区带来了希腊文明因素。“这个马其顿世界帝国，虽在亚历山大死后不久即告崩溃，然而希腊的影响，却仍成为土耳其斯坦地方最为重要的因素，如此逾二百年；至其间接影响中亚细亚之文化生活，则更多若干世纪。”[40]古代印度文明也曾广泛地影响了“西域”，佛教一度成为“西域”最为主要的宗教；天山北路的“西域”是典型的游牧文明形态。麦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根据考古与历史文献的研究表明，中亚北方游牧的斯基泰人与萨尔玛提亚人向欧洲与中国传播了他们的骑马术、裤子、弓箭等技术与器物；[41]而其多色艺术（即在一块金板上镶嵌各种颜色的彩石，构成一幅图画）则对后世的印度、波斯和欧洲的艺术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42]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asily Vladimirovich Bartold，曾译“巴尔托里德”）根据语言学和考古学资料的研究证实，伊犁地区的乌孙与阿姆河的大月氏（也称大月支，大小月支也被统称为吐火罗）在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7世纪间进入中亚后，也对该地区历史与东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43]

通过以上描绘不难看出，以彼此关联的整体参与到诸文明多元互动关系中的“西域”，逐渐形成了一种“复合式文明”。羽田亨对此文明样式有非常形象的比喻：“文明传播，当然依据交通。这西域犹如自来水的水管，介在水源和龙头之间。水源的水经过水管时，看水管的性质如何，总不能不受某种影响。”[44]显然，诸文明的多元互动（包括物质文明、宗教甚至战争）在“西域”持续展开的同时，也塑造了一种“复合式”的区域文明。尽管历史上“西域”历经“突厥化”“伊斯兰化”“俄罗斯化”过程，[45]但这“三化”无疑也是在诸文明多元互动关系中渐次展开的历史过程。即便是从“西域”中分化而来的今日中亚（含西部中亚与东部中亚），也依然有着其历史上作为“文明交会地”和“复合式文明”的特点。[46]

结语

历史上，“西域”处于诸文明互动的关系之中；而在当代，地理层面的“西域”已被划分到不同的国家领土之中。如果我们仅以“民族国家”眼光去看历史上的“西域”，则难免将其历史表述为不同政治体之间的冲突史（如部分西方学者的中国征服“西域”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小心历史叙述中的“文化中心主义”，避免将“西域”表述为某种文明要素的“播化史”，从而忽略西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面相。因此，以“区域关系史”视域来认识和表述“西域”显得必要。在“区域关系史”视域下，“西域”内部

在生态、社会形态和文明要素的多样性及其与周边文明的互动关系等方面，将被更好地呈现；我们对“西域”诸文明的互动过程，及其在互动中所形成的融合内部丰富性与外部多元性为一体的“复合式文明”，也将得到更为直接的认知。显然，“区域关系史”视域不仅有助于将“西域”的历史叙述与世界史关联起来，也有助于揭示“西域文明”的“本地要素”。

原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1] 李如东，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2] 〔美〕约瑟夫·弗莱彻：《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载〔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98~99页。

[3] 〔美〕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贾建飞等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刊印，第22~25页。

[4] 〔美〕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第22~25页。

[5] A. H.丹尼、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芮传明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6]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页；该书后四卷发表于1927年，木刻全本在1934年出版。参见《元西域人华化考》，陈智超前言，第11页。

[7]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2004，第3页。

[8]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7。

[9]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陈智超前言，第1页。

[10]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3页。

[11] 何子复编纂《中国的边疆》，商务印书馆，1937，第4~5页。

[12] 杨建新：《“西域”辩正》，《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13] 从西周到民国，“中国”一词的内涵大概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其所指逐渐从具有“华夷之辨”的文化等级观念、多主体的政权方位感、“正统”或“非正统”之国的辨析转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与之相类，“西域”也有一个从“方位”、辖地流变为“边疆”的过程。据杨建新的研究：（1）历史上大部分时期，西域均具有明确的地理

含义；（2）“在‘西域’一词还在流行的时代，‘西域’从无专指现在的新疆之义”；（3）在汉、唐、清，西域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具有地方行政单位的含义；（4）应该将西域的使用和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结合起来；（5）为了避免对此“西域”一词使用的混乱，将清代西域所指的范围（也即新疆地区）作为其含义或许为“最好”。另据魏长洪、管守新的研究，“西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西域指阳关、玉门关以西地区，包括今新疆和中亚、西亚、南亚、北非、中东欧等地；狭义西域指天山南北及帕米尔、巴尔喀什湖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日的新疆”。荣新江的研究则认为，“西域”在唐朝有两次西移，其所指分别从“敦煌以西”变为“高昌以西”，再从“高昌以西”变为“于阗以西”。参见杨建新《“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杨建新《“西域”辩正》，《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魏长洪、管守新《西域界说史评》，《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荣新江《“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4] 王铭铭：《超社会体系——对文明人类学的初步思考》，载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5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第48页。

[15] 〔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7页。该书英文版1982年出版。

[16] 〔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7页。

[17] 〔美〕马歇尔·萨林斯：《资本主义的宇宙观——“世界体系”中的泛太平洋地区》，赵丙祥译，张宏明校，载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362页。

[18] 〔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沈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10～12页。

[19] 〔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1～17、277～293页；〔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0]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徐自立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第244～248、251～252页。在书中，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以及满洲九个农业地文区，并对除满洲之外的八个农业地文区进行了讨论。

[21]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

[22] 在对启蒙历史的反思中，杜氏认为此种历史叙述以“民族史”的面貌出现，试图以单一历史主体的线性演进为表述对象，消弭了“民族-国家”“内部他者”之历史，有很强的历史目的论；应当“将民族国家理解为一种有意义的实体，理解为对于社群的不同看法和不同表述”，以之反思那种强调主权、领土、人民的结合亘古至今的民族国家

形式；以复线的历史叙述来释放民族实体叙述中蕴含的多重历史。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26、229页。

[23] 关于“新清史”学派的更多论述，请参考党为《美国新清史三十年：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4] 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页。

[25]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第254～255、257页。

[26] 潘志平：《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

[27] 昝涛：《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载高全喜主编《大观》第5期，法律出版社，2011。

[28] 关凯、纳日碧力戈、王东杰、韦兵、黄达远等：《边疆中国：从地域族群到文化政治（专题讨论）》，《学术月刊》2013年第6期。

[29] 王东杰：《多文明共生的中国与“多史叙述”之可能》，《学术月刊》2013年第6期；黄达远：《区域史视角与边疆研究——以“天山史”为例》，《学术月刊》2013年第6期。

[30] 于逢春：《边疆研究视域下的“中原中心”与“天山意象”》，《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31] 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兼论山脉、沙漠、绿洲对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载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388～389页。

[32]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254～255、257页。

[33] 〔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第79～81、103～118页。

[34] 〔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第79～81、103～118页。

[35] 〔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第79～81、103～118页。

[36] 〔俄〕B.A.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至750年）》，马小鹤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第409、411页。

[37] 〔俄〕B.A.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

至750年）》，第409、411页。

[38]〔俄〕B.A.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至750年）》，第239～256页。

[39]〔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第79～81、103～118页。

[40]〔美〕W. 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章巽译，中华书局，2004，第35～64、77～78页。

[41]〔美〕W. 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第35～64、77～78页。

[42]〔美〕W. 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第35～64、77～78页。

[43]〔俄〕维·维·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第4～5页。

[44]〔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第79～81、103～118页。

[45] 昝涛：《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载高全喜主编《大观》第5期。

[46] 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里（中亚）既有早已融合、同化了古代中亚不同民族文化的本土文化及社会力量，还有新近进入的外来文化因素及社会力量，如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及其引导的社会力量……未来中亚社会的发展将可能同它昔日的历史出现许多相似之处，同样可能成为该地区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中各种重要文化和社会力量交流与冲突的一个复杂过程，成为多种文化和社会力量的集散之地。"见汪金国《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第226页。

重思“中亚”

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

——“世界历史上的中亚”会议发凡

昝涛

中国向西就是狭义上的中亚，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亚。为了行文上清晰起见，需要从地理上界定一下中亚。广义的中亚就是古代的“西域”，狭义的中亚就是现在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均加入了独联体）。广义的中亚具有文明史的重大意义，狭义的中亚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中亚五国的范围是：西到里海和伏尔加河，东到中国的边界，北到咸海与额尔齐斯河的分水岭，并延伸至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南部，南到伊朗、阿富汗的边界。五国面积共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0万。

认识一个对象，经常难免将其客体化、他者化。若对此认识过程的局限性没有一个反思，那么，基于这种认识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就很有可能反过来成为蒙蔽认识者自身的障碍。因此可以说，认识一个“他者”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亦是认识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从国人对中亚的认知来说，与“自我”有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对中亚如此无知？“我”认识中亚的主要局限性是什么？我们认为，这种自身的局限性主要就在于我们的认识总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原）出发，没有把我们对中亚的认识置于“世界历史”的高度和进程中。

引子：从“张骞凿空”说起

西汉时，张骞分别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通西域，历经千辛万苦对西域的情形进行了详细考察。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的情况是：“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

国，然西不过临洮。”“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1]

班固说：“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际。”[2]张骞因功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博望侯“大大地开阔了我们古人的地理视野，改变了汉朝以前的地域观念，使人们知道了新的天地”。[3]在中国史、亚洲史，尤其是在东西交通史上，张骞“凿空”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历史学家翦伯赞甚至将其与哥伦布“发现”美洲相提并论：“张骞在公元前127年发现西域，其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刺激，就像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对欧洲人的刺激一样。”

没有张骞，很难想象汉朝能够成功经营西域。公元前102年，汉将李广利远征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府，辖区包括今中国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南、帕米尔和费尔干纳盆地。“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4]张骞死后，汉朝派出的使者“皆称博望侯”。汉朝与西域邦国之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当时，汉朝派出的使节，每批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多则十余起，少则五六起；路程远的往返要八九年，路程近的也要三五年。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汉朝边塞。”汉宣帝不仅亲自接见、宴请匈奴贵族和使者，还把汉朝官属侍御上百人集中在上林苑，专门学习乌孙语言。[5]

张骞通西域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中原—华夏文明在欧亚大陆中西部进行经营的开始。在近代欧西强势文明渡海而来以前，中原文明的对外交流主要就是通过西域陆路进行的，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佛教和伊斯兰教皆循此路而来。后文将提到，中原文明向西的经营，与其在东亚的典型的“朝贡贸易”体系具有不同意义。

在游移中前行了很久之后，人往往会迷失自我，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我们必须回到起点。对于需要讨论的中亚这个主题来说，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应是我们的起点。时过境迁，谈论张骞不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且是为了探寻张骞身上所投射出来的某种穿透历史的力量和魅力。这不仅仅是指张骞与“蛮夷”交往的个人魅力——如司马迁所言，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6]更重要的是他体现了那个时代华夏精英阶层自信的精神、魄力与气象。

在中国主流知识界存在一个知识上的盲区，那就是希腊以东、中国新疆以西这块大区域，即中东与中亚。这种“无知”状态既是历史、语言、文化、地缘等方面的，更是将那里变成了“东方学”意义上的异域情调，对主流知识界而言，那里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疆，而且也是心理-文化上的边疆与边缘地带。人们一方面在膜拜着欧西，一方面又没有突破那个知识盲区的动力和主观意愿。在这种状态下，就难以生产出关于这个地区的有效知识，更谈不上建立关于中亚的常识性认知结构。

一 地缘：东—西格局的演变

论当代之形势，不可独拘泥于现世，尤不可不察上下数千年之历史大势。对中原王朝而言，西域问题其实就是草原帝国与农耕帝国长期南—北对峙/并立格局下出现的“西向战略”问题。近代以来，历史上的草原与农耕对峙的传统南—北问题已转变为中俄两个大陆性国家并立的局面，这是新的南—北问题。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应将西域问题置于南—北对峙下的西向战略框架内审视。迄今，中国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三种类型的“东—西格局”，分别为“西高地—东平原”、“西域—中原”以及“中国—中亚”。“东—西格局”的层层外扩，反映出中原华夏文明/政治体的壮大与拓展。

1.西高地—东平原

自夏商周三代至秦灭六国，华夏/中原王朝的朝代更替属于典型的“西高地与东平原对峙”。对此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有过非常精妙的论说。傅先生早就在其名篇《夷夏东西说》（1933）中指出：“东西对峙，而相灭相争，便是中国的三代（夏商周）史。”傅斯年还申论说，中国古史自三代至东汉时期，主线为东西对峙。“秦灭六国是西胜东，楚汉亡秦是东胜西……曹操对袁绍是西胜东。不过，到两汉时，东西的混合已很深了，对峙的形势自然远不如三代时之明了”，“到了东汉，长江流域才普遍的发达。到孙氏，江南才成一个政治组织。从此少见东西的对峙了，所见多是南北对峙的局面”。

傅斯年说的“西高地与东平原对峙”，这里的东与西是以太行山和豫西群山为界，把中国的版图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这主要是根据地形差别划分的。东边是大片的冲积平原，西边是夹在山中的高地，傅斯年分别称之为“东平原区”和“西高地系”。东平原区“是绝好的大农场而缺少险要

形胜，便于扩大的政治，而不便于防守”。西高地系是几座大山夹着几条河流造成的一套高地系，其中以关中高原最大，这里主要就是今天的山西、陕西，在经济上不如东平原区，但也不是很差，关键是地形好，“攻人易而受攻难”。另外，这个地方虽然不便于农业，但水草利于畜牧，“这样的地理形势容易养成强悍部落”。“西高地系还有一个便利处，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处，就是接近西方，若有文化自中央亚细亚或西方亚细亚带来，他是近水楼台。”[7]

“西高地与东平原对峙”的结束标志着中原地区华夏族群主体融合的完成和定型。

2.西域—中原

在西汉时期，西域的范围不仅包括现在的中国新疆地区，而且还包括跟这一地区山水相连的葱岭以西，一直到巴尔喀什湖一带，甚至更西、更远的地区，故广义的西域是指我国玉门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中国新疆及中亚等地。西域进入国人视野，源自汉与匈奴的对立。从史书记载来看，“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和《大宛列传》中。

在汉代前后时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中亚两河流域至帕米尔到塔里木盆地的今中国新疆大部分地区以及河西走廊地区，“覆盖状地活动着四大支塞人以及大月氏人和乌孙人等，他们均为欧罗巴人种，操印欧语”。[8]这些人都属白种人，另外，由于广大北部草原地区也一直活跃着游牧的操阿尔泰语系不同语言的蒙古人种，两者也一定存在交流和渗透，只是仍以印欧人为主。战国时期的秦国在西边所要防御的就是印欧人。

关于这片大的区域带的自然地理特征，亚洲史研究专家墨菲说：“世界最大的半干旱及沙漠地区覆盖着欧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它从乌克兰及今土耳其开始，跨越前苏联南部、伊朗大部、阿富汗和今巴基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满洲辽河中段以北和东京约75°以东的中国领土的大部。从气候和植被方面看，西藏也属于同类型干草原-沙漠范畴，尽管它的自然环境主要由它的高海拔决定。在欧亚大陆的这片广大地区的大部分，永久性耕地的农业只在几处拥有可用于补充灌溉的水源的有利地区才有可能，比如分散很远的绿洲。”[9]

“西域—中原”时代的到来是以南—北对峙的加剧为背景的。傅斯年把南—北对峙说成东汉以后的事，自有他的出发点；但如果把南—北问题看作北方草原游牧帝国与中原农耕帝国的对峙，就可以发现，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匈奴帝国就活跃于北亚草原，其给南方的农耕-定居帝国以不断的压力。这一草原-游牧与农耕-定居的南—北对峙模式是一条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主线。张骞“凿空西域”表面上看是一个东—西问题，而实际上其最直接的动因在于解决南—北问题。当时，西汉人从战俘的口中偶然得知西域诸国与匈奴间的复杂关系，遂有联合西域国家以对抗北方匈奴的战略考虑，即“断匈奴右臂”。这也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直接原因。

拉铁摩尔曾提出理解草原与农耕民族关系的一个关键，即他们对西域绿洲地带的竞争与控制。他指出，汉代人对中亚不是“为征服而征服”，而是一种政策考虑：“或者是控制中亚的绿洲及部落，以建立对抗草原游牧民族的同盟；或是对绿洲进行防御性占领，以免游牧民族利用它们作为根据地。”拉铁摩尔认为，这两种政策考虑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征服”，“中国政治家们真正需要的……是造成一种情势，使绿洲小国王们认为依附中国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10]基于此，“了解绿洲本身的政治独立性，以及汉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对绿洲的不连贯的统治，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的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11]

张骞“凿空西域”后所形成的东—西与南—北互动模式一直贯穿此后的王朝时期：南—北对峙总是与“西域”分不开，南与北都以争夺“西域”（尤其是绿洲地带）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西域对于南—北问题的解决往往又是关键。对中原王朝而言，争夺和经营西域的战略意义在于：对方的包围和己方的反包围，生死攸关。

唐朝在北方先解决了东突厥问题，将大漠南北并入唐朝版图，置安北都护府；公元640年大败高昌国，在西域交河城设立了安西都护府；659年，大败西突厥，使唐朝得以据有西域，统归安西都护府管辖；702年，唐又设立北庭都护府，主理天山北部诸地事务。唐中期开始，西突厥复强大，严重威胁到唐在西域的统治。此时，大食（阿拉伯）帝国正向中亚地区东扩，与唐王朝的矛盾日益激化。751年，唐将高仙芝的军队与大食军队在怛逻斯一带遭遇，唐军败，中亚广大地区归属大食。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控制西域的军事实力减弱。后来，西域

不少地方又落入吐蕃之手。宋时国力较弱，西部和北部都为游牧帝国。蒙古帝国的版图非常辽阔，西域地区多受辖于察合台汗国。元朝重用西域来的穆斯林，使伊斯兰文明在中国获得空前发展与繁荣。明朝国力又变弱，国威不过长城以北，向西只能达到西域的东部部分地区。当时，西域的察合台汗国已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西边的后来演化为帖木儿帝国[12]，东边为东察合台汗国（亦力把里），后又叫叶尔羌汗国。

典型的是清朝，先解决南—北问题（蒙古），后解决西部问题（新疆）：从定都北京至康熙中期的近五十年间，清廷平三藩以定南方，后用兵北遏沙俄，无暇西顾；而1696年，清军在漠北击溃噶尔丹军；1757年，乾隆派兵收复北疆，乘胜南进，平定南疆叛乱，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统一，“自13世纪以来，从西安到伊犁这片土地第一次由一个单一的政府来管理”，此时的清朝感受到天山以西以阿富汗的杜兰尼王朝为主的伊斯兰教的威胁，决定停止西进。[13]19世纪后期，左宗棠驱逐来自中亚浩罕的阿古柏势力，收复新疆，1884年新疆设省。

清朝解决了传统的南—北对峙问题。在政治上针对北方的草原部族建立盟旗制度，以“发展了的部落联盟形式”联合起长城内外，使清朝皇帝居于最高盟主地位，遂使长城逐渐失去了边界意义。在清代，长城内外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长城内外在经济上日益一体化；更多的汉民移居关外，在内蒙中南部开垦，部分牧民也开始了定居化，转而从事农、工、商业，逐渐失去了移动性。[14]但就本质而言，与其说是有着同时治理游牧、森林和农耕经验的满族解决了传统的南—北问题，不如说是现代技术变革几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游牧”问题。[15]

西域总是与南—北对峙问题纠缠在一起。左宗棠说：“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但在工业时代之前，经营西域耗资巨大，几乎完全属于“烧钱”型，因为那里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其在传统社会中的经济价值不大，仅具战略价值，故可以理解汉唐以来，中国经营西域的典型战略就是“以夷制夷”。而西域对传统中国来说，也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放弃的“负担”：“为了获得回纥以及后来的阿拔斯王朝的帮助，（唐）肃宗放弃了中华帝国的中亚地区，因为地方反对朝廷经营西域耗空国库，总的说来，西域是一种负担，而不能给中央提供任何收益。”[16]可见，传统中国对西域的经营主要不是开疆辟土的“帝国扩张”，而是综合地缘战略和经济因素的理性考虑。

清朝基本上解决了南—北问题之后，才使中国人首次严肃地对待西

北（西域）问题，亦即不再将其仅作为战略上的边疆，而是作为一块自己的土地经营。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中国太多机会。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1759～1820年，清廷虽然在新疆维系了约六十年的和平，但此后又是中亚给清廷带来长达六十年的祸患。19世纪20年代后，清朝内部叛乱日增，军力不足，张格尔乘机作乱。平定张格尔后，清朝就面临着浩罕汗国的直接威胁。由于国力日衰，清廷采取守势，欲以中亚贸易笼络浩罕，可惜收效甚微，直到新疆建省，清王朝才逐渐恢复新疆的秩序。但此时，中国面临的是新的南—北问题了：俄罗斯已南下而据有中亚。

二 文明：东—西文明格局下的中亚

在南—北对峙/并立的格局下，西域对中原王朝而言，主要还是向西的地缘战略问题，但其中亦逐渐具有了文明碰撞的元素。从中国的角度说，它先后遭遇了两种从西方而来的、带有帝国政治扩张特征的大文明形态：伊斯兰文明与欧洲现代性文明。[17]故在近代之前所谓的文明碰撞就是：世俗的华夏文明与一神信仰的伊斯兰文明的接触。

1.西域（中亚）的伊斯兰化与突厥化

在文明史的意义上，“西域—中原”的东—西格局可以分为两个重要阶段：大体以公元751年为界。751年之前的一千年是华夏文明的进取期，中间数百年的分裂期亦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不知多少族群同化于华夏文明之中，这一时期以汉唐盛世为其两端。751年后，华夏力量回撤至葱岭以东，而伊斯兰文明越过葱岭，逐渐覆盖了西域的大部分地区。

751年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文明史的意义高于政治史的意义。在751年以前的一千年中，华夏文明在西域几乎没有碰到过堪与匹敌的文明-政治力量，西域人了解中原王朝的强盛和繁荣，莫不仰慕华夏文明。在被伊斯兰征服的过程中，西域人渴求中原王朝的救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时，波斯王曾多次向唐乞援。705～720年，阿拉伯人开始蹂躏整个中亚地区，西域诸国纷纷向唐廷求救。在一封给唐玄宗的表文中说：“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慈泽，救臣苦难。”此类表文，言辞恳切，然此时的唐朝军力虽未衰退，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吐蕃、西突厥和大食同时强大，尤其是吐蕃的军事威胁近在眼前，唐军无法给予中亚属国切实的援助。[18]

“回教之传入中国，始于唐而盛于元。”伊斯兰教传入新疆，是在10世纪末及11世纪初喀喇汗（即黑汗）王朝时期，后逐渐向东扩展。[19]唐代长安已多见西域穆斯林商人往来、定居。《甘宁青史略》记载：“终唐之世，甘、凉、灵州有回族。”元朝是伊斯兰化在西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蒙古征服西域诸国后，众多穆斯林归附蒙古。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中亚陆路畅通无阻，被征服的中亚操伊朗语族语言和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族人民中，有不少人被派到中原各地开荒、屯田，也有不少穆斯林军士和工匠东来，充当炮手、工程技术人员或天文学专家，也有少数人到中原任政府高官。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当时都被称作“回回”）在中国定居下来，分布于全国各地，他们中许多人娶汉女为妻，或同其他民族通婚，生息繁衍，人口日渐繁盛。《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满天下，及时居甘肃者多。”

蒙古入主中原后，为统御汉人和南人，故借助于文明水平较高的色目人（主要为穆斯林）的帮助。色目人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在汉人、南人之上。伊斯兰文化高于蒙古，故蒙古人同化于伊斯兰者日多。至明代，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回族。明朝回族与其他各族穆斯林更严格地区别开来，居住地域稳定下来，经济上有了发展，通用汉语言文字，吸收了汉族文化，充实了自身的文化，生活习俗已经定型。明代虽以种族之别立国，强调华夏与夷狄之分，但其建国有赖于回民者甚多，开国大将即有很多回民，故在有明一代，伊斯兰教颇受礼敬。至清朝，满族在政治上借重于蒙、藏佛教势力，又自命为中国道统的继承者，在此情况下，作为回族、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的地位无法与儒、佛、道相比。不过，清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禁止过伊斯兰教，尤其是清前期诸帝还是比较尊重伊斯兰教的。

中亚处于古代世界四大文明的中心地带。在伊斯兰化之前，在古代中亚影响最大的是佛教。根据巴托尔德的观点，中亚在13世纪时完成了伊斯兰化。[20]“中央欧亚的历史就是一部蛮族的历史”，[21]蛮族注定要被它所征服的更高级的文化所征服。当突厥人被伊斯兰化以后，它比阿拉伯人更虔诚。现在，中亚五国中操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族语言的各民族以及“东干人”都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部分塔吉克族属什叶派。

突厥化也是中亚历史上的大事，并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中亚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地，这里也自然地成为不同种族会聚融合之

地。公元6～13世纪是中亚突厥化的时期，蒙古人的到来和统治是突厥化实现的关键，因为跟随蒙古人来到这一地区的大部分游牧部落都是突厥人。突厥化主要是指语言上的同化。按照近代语言学的分类，突厥语是阿尔泰语系的一个语族，该语族下又包含很多不同的方言，现代土耳其语就是突厥语族的重要方言之一，其他的突厥语族方言还包括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等数十种。语言的相近使这些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之间交流起来障碍比较小。在中亚地区，只有塔吉克人躲过了突厥化的进程，成为中亚当地主要民族中唯一操印欧语系的现代民族。

突厥化是游牧的突厥人在军事上征服，并在语言和习俗上同化中亚至小亚细亚本地民族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伊斯兰化合流后就更为迅速了。因为共同皈依伊斯兰教以后，方便了突厥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混血。我们无法确定在当时的历史过程中到底有多少“突厥人”，但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个过程并不是多数的突厥人同化少数的其他民族的过程，而是突厥人凭借其军事的强大和统治，使其治下的各民族被同化的过程。操突厥语各族在军事和政治上曾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与其有关的大的王朝/帝国有：以伊朗为中心的塞尔柱王朝（1037～1194）；作为雇佣军进入了阿拉伯帝国的核心，并在埃及建立的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创造的帝国（1370～1507），以及帖木儿后代创建的印度莫卧儿帝国（1526～1857）；伊朗的萨法维帝国（1501～1736）；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3）。从突厥化的结果来看，它造成了一块从中亚至中东的操突厥语各民族连在一起的大区域。

2.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遭遇

伊斯兰文明在西域的扩张和传播造成了两大不同性质的文明的遭遇：世俗的儒家与宗教信仰的伊斯兰。对中原王朝来说，它所遭遇的第一个大的神圣宗教文明-政治体不是近代基督教的西方诸国，而是来自中东的伊斯兰。

中亚的伊斯兰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阿拉伯人是在亚历山大后从西方侵入中亚的第一个民族。”[22]在伊斯兰到来之前，中亚是东西方大国扩张的终点与极限。无论是亚历山大帝国还是汉唐，都在中亚达到了它们对外用兵的最后终点。无论建立城市还是设置都护府，东西方的大国

都没有真正地在文化/文明上彻底征服过中亚。唯有来自中东的伊斯兰在文明上比较彻底地征服了整个西域，并且使此后的一千多年再也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取代伊斯兰文明。伊斯兰已经内化于西域文明的骨髓与血液之中。伊斯兰力量为什么能够在中亚胜出？

首先，从生产力角度来说，伊斯兰帝国的创立者阿拉伯人大规模地使用骆驼，“在摩洛哥到药杀水（如今中亚的锡尔河——引者注）之间的地区，骆驼已经代替马车成为最便宜、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就是在这个地区，伊斯兰帝国的基础得以最快捷、最完整、最永久地建立起来”。直到中世纪，骆驼在帕米尔以东都不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在帕米尔以西则相反，前述汉将李广利远征费尔干纳时，主要的运输任务是由10万头牛完成的。唐朝时期骆驼并不是穿越戈壁的主要运输工具。伊斯兰教在中亚的成功，部分地可以通过大规模地使用骆驼来解释，也就是说，在西域，伊斯兰的骆驼战胜了甘肃马车，对此，后来的左宗棠有深刻认识。[23]

其次，最重要的是文明拓展的路径。为什么希腊、波斯和汉唐文化这些古代文明的伟大文化代表纷纷在伊斯兰文化面前退出了西域的历史舞台？代表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帝国，统治中亚不过短短两三个世纪，却使中亚发生了全盘的伊斯兰化，有学者指出：“主要是积极进取并以先进经济为基础的伊斯兰优质文化对缺乏主体意识的附属性中亚政治文化的胜利，也是对虽具有悠久古文明，但在进取性及先进经济结合方面却相对保守的当时希腊、波斯、汉文化的局部胜利。……希腊、波斯、中国汉唐等文明古国，却恰恰只有自身文明的一般性传播与辐射，而像伊斯兰文化那样自觉地以大规模积极的覆盖性手段来弘扬悠久的文明传统，却是十分缺乏的。这对中国来说，教训十分惨重。关键性原因之一，是中国历代虽重视边疆的民族政策与适应当地民族要求的羁縻式的仁政管理体制，但未能有效增强与发挥儒家文明竞争力的决策与文化经营。原因之二，是中国在中亚的行政管理没有明确纳入中国古代版图的国家结构。”[24]

上述学者对伊斯兰文明扩张的成功提出了经济的和文化策略的两个维度的解说，但并未触及文明的“内核”因素。对文化策略方面的强调，只是指出汉唐等文明在伊斯兰文明面前的退缩是政策上的失败。这其实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

汉—唐儒家文化乃是一种世俗的、依托于特定农耕-定居社会的人-

地关系的文明形态。儒家文明的天下观与大同主张，体现出其普遍性；但是由于它对具体的地理空间的依附——儒家天下观只有在中原汉地才可展开其所必需的物理空间的想象，脱开这里则难以落实——其学理上的普遍性在现实政治中又是“欠普遍”的，具有特殊性。而伊斯兰教是与犹太教、基督教同源的一神教信仰，它是不以特定的现世空间秩序为依托，而以对超现世的唯一真神（安拉）的信仰为号召和旨归的文明形态，其绝对意义上的普遍性要大于儒家学说——当然，这与文明的优劣无关。从启示宗教的角度说，伊斯兰教也是发展最为完善、形式/逻辑最为简约的一神教信仰，它在宗教自身的逻辑内达到极致。且不管伊斯兰文明复杂的实质是什么，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一神教信仰的。这两个文明对社会影响和塑造的不同，实质是世俗与信仰的不同。[25]

儒家文明是产自中原黄河流域定居-农耕社会的一种文明形态。冯友兰曾就中国儒家文明的经济基础说：中国是大陆国家，华夏民族以农业为生；农民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儒家学说大部分是为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对这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儒家的五常就是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反映。[26]由于同样的原因，祖先崇拜也发展起来了，经济条件打下了它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儒家文明以特定地理空间下农耕-定居社会的人-地关系为依托，只要这种经济-地理基础存在，它就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只有打破儒家文明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改变其存在形态。对于游牧者来说，他们的生存方式本就是流动性的，与儒家的定居性相反。征服了中原的游牧帝国最终通过定居化接受了儒家文明。

三大启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根源上说都产生于中东沙漠的游牧民之中。沙漠与草原的环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头顶是天，四周是开阔空旷的贫瘠土地，几无屏障。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发展的顶峰，它形式简约，反对偶像崇拜，且由一个充满活力、文化层次较低的游牧民族以征服性的“圣战”形式扩张开来。“圣战”与游牧民族劫掠传统的结合，使伊斯兰教更易于被游牧民族所接受。在广大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是通过苏菲神秘主义的渠道进行的，苏菲主义强调与神的直接沟通，更适合文化层次较低、放荡不羁的草原游牧民族。

在伊斯兰势力征服西域之前，这里盛行佛教。伊斯兰教取代佛教也

经过了非常残酷的、长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伊斯兰教对待“有经人”（即拥有《圣经》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是宽容其宗教社区的存在，条件是缴纳一定数额的税，而对佛教则视之为偶像崇拜，必欲彻底铲除之。所以，伊斯兰教在西域取代佛教，不能单凭历史的结果就说伊斯兰教比佛教更具有吸引力。同样都是游牧民族，西边的蒙古人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北边的就接受了喇嘛教。历史上，征服了中原的游牧民族最终都被汉化，而作为“落后民族”的阿拉伯人却没有被它所征服的高级文明（如波斯）所征服。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华夏要理解西域，就必须正视历史上不同文明“覆盖”西域及彼此竞争的结果。要理解伊斯兰文明征服西域，不能仅仅看到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策略，也要看到文明的“内核”因素。

伊斯兰是理解一千年来西域历史的关键。西域伊斯兰化之后，传统的东—西格局中已经加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文明因素，故非常有必要了解这一文明的历史及其特征。伊斯兰教对中亚的意义就在于使这里的人民建立起一种主体性意识。不过这种主体性与近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不同，前者是弥散性的，以对超自然神的信仰和皈依而获得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高贵、自信与骄傲为主要内容，它不以特定的人-地关系为依托；而后者恰恰相反，尤其强调建立以人-地关系（民族/人民-疆域）为基础的政治实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自我认同的肯定。这是历史地认识中亚的一个重要视角。迄今为止，“中原史观”还没有严肃地对待和处理过这个问题，这也是当代国人认识中亚的常识性知识障碍。

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实际的、偶然性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西域的伊斯兰化这个问题。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讲，伊斯兰文明已成为该地区一种本土化了的文明。要深层次地理解中亚问题，就必须把伊斯兰文明与当地人民的主体性结合起来。唐玄宗时，阿拉伯使者来进献贡品，见到玄宗皇帝时，“立而拒跪拜”，由此差点引起一场外交风波，这不免使人联想起近代史上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拒绝在乾隆面前下跪的场面。到了明代，西域的伊斯兰化已经基本完成，此时的西域人已获得了对中原王朝的“蔑视资格”，亦即因为皈依了一神信仰而产生了一种无比的高贵感。当明朝把主要精力放在长城以北的蒙古身上时，中亚人也并没有认真注意过明朝。“到明亡为止，中亚人多把中国视为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亚商品的市场，拥有数量庞大的异教

徒，而总有一天他们将成为穆斯林。中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虽然很发达，但比中亚文化逊色，而且他们发现中国人对世界一无所知。”[27]

从东部海洋秩序的角度说，朝贡体系是以中国为宗主的（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但不能用这一完全想当然的框架来理解中国与西域的关系。实际上，10至13世纪，中国的官员们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朝贡系统，开始奉行一种现实有效的外交政策，即将邻国作为平等的对象。然而，对诸多强大邻国的现实评价，并不能阻止官员们将外国人视作“野蛮人”。“与这些国家外交关系中的互惠原则不过是一种被迫的让步，而这一让步只是由于宋王朝军事上的软弱才勉强赐予的。”国内的官方记载和私人信件里充满了仇恨的情绪，外国人被说成低等的民族、“野蛮人”、“卑鄙的人”或者“禽兽”。[28]已有研究指出：明、清与中亚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其实，这只不过是宋代传统的一种延续罢了。而中亚人甚至非常瞧不起中原人，这一点应与西域的伊斯兰化密切相关。但在中国的内部，仍然要维持一种“世界宗主的神话”，明代设立“回回馆”，是专门负责接待来自西域各地穆斯林客人的机构，而回回馆属“四夷馆”，就是说，尽管明代君主在实际中承认中亚穆斯林君主的平等地位，如永乐大帝在给帖木儿后裔的信中说“西域乃伊斯兰地界，大智大善之人颇多，然无有超越苏丹者”，[29]但在国内仍然以“夷”称之。对古典国家而言，在其自我叙事结构中坚持对于其他文明的自傲是一种必须，并且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自傲与对其他文明的研究未必矛盾——一为叙事结构，一为现实政策，两不冲突。至于现实中是否总是愿意低下头来研究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我们的古典国家曾经做过相关的思考。

更进一步，我们今天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古典帝国的理念已经被我们今人放弃了，以至于我们面对基督教文明时经常丧失自我，失去自傲，这是文明自立的深重危机；而中原叙事的思维结构在另一个角度仍深入我们的骨子里。思考西域问题，有必要重温中国古人的智慧，再探求古典帝国的奥秘，这方面的努力，其重要性不亚于我们努力去理解现代国家之建构理念的工作。

3.中亚的俄罗斯化

18世纪中叶开始，沙俄不断向中亚地区扩张，不少部落被先后“合并”进了俄国，希瓦、布哈拉、浩罕三个汗国也先后被征服。原先属于我国管辖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以及帕米尔的某些地方，在沙

俄与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也被沙俄占去。到19 世纪70年代时，沙俄已经征服了整个中亚地区。另外，以印度为基地，英国也介入在中亚的博弈。

沙俄为什么要吞并中亚？过去的研究从沙皇帝国开疆拓土、地缘安全等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甚至认为沙俄有南下印度洋寻找出海口的考虑。但从实际历史的进程来看，俄国对中亚的兴趣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30]俄国是把中亚地区当作自己的殖民地来经营的。这种经营不光是在经济上获取利益，而且还在政治、人口和文化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殖民化。

有学者最近指出，单一型经济生活的地理学特征决定了帝俄的地理扩张方式，这种单一性经济生活的地理学特征就是俄罗斯族人的生活区域与联邦财政收入区域是不一致的。[31]如果说早期俄人在西伯利亚的扩张是为了寻找皮毛，那么，进入近代工业化阶段以后，帝俄在中亚的扩张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对原材料及商品市场的需求。在这一点上，帝俄对中亚的殖民与西欧人的海外殖民是相似的。

中亚的费尔干纳谷地土地肥沃，于1884年移植美国棉花获得成功，遂使棉花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产品，用来满足俄国和波兰纺织工业对廉价棉花的需要。为了满足俄国的需求，当地植棉业的勃兴致使农业畸形发展，棉产量增长的同时，粮食产量锐减，粮食从自足变为日益依赖从俄国输入。植棉业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亚向俄国商品打开大门奠定了基础。由于无法同西方的商品竞争，俄国就将中亚地区作为一个保护性市场，倾销谷物、糖、木材、钢铁制品和其他制成品。[32]中亚遂成为俄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后来的中亚穆斯林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停止种植美国棉花的要求，亦即要摆脱俄罗斯的殖民主义，使中亚从对俄国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33]

俄国是典型的大陆型帝国，它的扩张是在陆地上连续进行的，它所征服的土地都与母国相连。按学者的解释，这一大陆型帝国的特征决定了俄国对所征服之地的殖民化程度之深（将每一块扩张而来的土地及人民都尽可能地“同化”）。[34]除了经济方面，帝俄对中亚的殖民化主要表现为大量欧洲移民的涌入以及对本地土地的剥夺和占有。中亚地区地广人稀，尤其是哈萨克草原、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有大量“剩余土地”，随着俄国农奴制的废除，大量无地农民进入中亚，俄国移民人数激增，而本地人受到了排挤。此后，俄国开始有序地对中亚地区进行殖民

化，并制订了剥夺当地人土地的计划和法令。从人口学的观点看，俄国在中亚的移民已经改变了那里的民族成分。欧洲血统的民族人口的总数最终超过了当地任何一个本地民族集团的人数。欧洲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哈萨克斯坦是65%，在苏维埃中亚约为25%（1959年普查）。[35]

沙俄造成了中亚经济的单一化以及对母国的依赖。苏维埃政府虽然指责沙皇政府的经济殖民政策，但其在中亚所执行的政策是一样的。这也是由前述俄罗斯人“单一型经济生活的地理学特征”决定的。诚如季诺维耶夫在1922年所说，虽然俄国已经抛弃了剥削附属国的政策，但“……我们若没有阿塞拜疆的石油或土尔克斯坦的棉花是不行的，我们不是作为过去的剥削者而是作为手持文明火炬的老大哥，来取得这些我们所必不可少的产品的”。[36]

苏联在中亚推行的政策是强化地区专业化分工，“它把俄罗斯联邦经济的单一性与其他联盟主体的经济单一性相互结合成一个自洽的经济组合体，从而克服了沙俄帝国的传统特征。其实，这种联盟经济后来发展为经互会体系，是对未来终极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体的一个模拟”。[37]苏联把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四个共和国划为一个经济区，称中亚经济区；把哈萨克共和国划为一个经济区，称哈萨克斯坦经济区。根据苏联的专业化分工，中亚地区主要生产矿物、燃料、谷物、棉花、羊毛、肉类等初级产品。这些产品主要运往苏联的欧洲地区，因此，中亚各共和国之间经济交流并不密切，而与俄罗斯联邦的物资交换很紧密。

帝俄在中亚的对内政策是，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秩序，尽可能多地获得经济利益，而对该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尽量少加干涉。到苏俄时代，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被引入中亚。在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之后，中亚成为其未来社会主义联盟布局中的一部分。列宁所设想的“苏联”，建立在一套完全不同于任何国家和帝国的“国家理由”之上：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及这个共同利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世界无产阶级共和国，在其中实现了各联盟主体的平等。列宁对自己的理想设计是乐观的。而到斯大林，他以“共产主义新人：苏联人”作为苏联的灵魂。[38]

苏俄首先是对中亚进行了民族划分，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统辖中亚，其实质是以（社会主义版本的）“现代性文明”对中亚进行覆盖与重新整合。首先，对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中亚五国这一“创造”是

其“苏联”理想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框架下，中亚各国首先就在理论上从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跑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根据斯大林的民族观，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产物）。这是一个先进入“现代性”，再达到社会主义的方案。其次，民族划分也具有打击泛突厥主义的重要战略考虑。加盟共和国体系的建立，击溃了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政治诉求。中亚新民族国家的创建，培植了一批新的民族主义精英，并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宣布效忠于共产主义的苏联，他们立刻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尽管当时是形式大于内容。

俄国吞并中亚后，对中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俄罗斯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移民和推广俄语。苏联继承了帝俄的俄罗斯化政策，实行的是分而治之：划分民族+俄罗斯化。他们用“苏联人”即忠于莫斯科的、讲俄语的人来取代众多的民族，最终导致了中亚地区社会结构的改变。在苏联以前，中亚主要有三种语言：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苏联通过多种措施改变中亚地区的语言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将西里尔字母强加给中亚人，这种做法不仅打击了中亚的本土语言，确保了俄语的“超民族”语言的统治地位，使俄语成为苏联公民的交流工具，而且还割断了中亚人的历史，割断了中亚人与其他地方讲波斯语和突厥语人的联系。苏联时期，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伏尔加的德意志人被安排到中亚定居，俄罗斯人又被政府安排到领导岗位上，让他们训练年轻的中亚人，努力造就一批俄罗斯化的本地精英。[39]俄罗斯化是成功的，它的影响不只是体现在大量俄罗斯人口在中亚的存在，也不只是此后俄罗斯以保护中亚俄罗斯族人利益为借口来干涉中亚事务，而且体现在俄罗斯化造成了一批具有亲俄意识的当代精英，他们直接决定了当下中亚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加之于中亚的实际上是俄罗斯化与苏联化（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俄罗斯化最终是服务于苏联化的，苏联化的最终理想是要在此岸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新人为主体的神圣共同体。总体而言，俄罗斯化取得了较大成功，而苏联化实际上只是部分地成功，并停留在其社会主义化的初级阶段，即民族划分与建构的阶段。苏联解体后，中亚的民族国家建设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初级阶段开始搞起的。这也正是中亚不稳定的根源，因为，俄化和不成功的苏联化已经直接冲击和动摇了它的历史主体性。

结语

“世界历史上的中亚”是一个文明逐渐纵向沉积、地域逐渐横向缩小的地方。西域是“大中亚”，中亚五国是“小中亚”。要理解中国的西北、现在的中亚，就需要有一个“大中亚”的概念，这个“大”不仅是指空间-地理意义上的大，还包括时间意义上的历史长时段。要理解当代中亚，就必须做几次合与拆：西域是合，民族国家是拆开西域、划定人为的疆界，中亚又是拆去疆界、合起来看。合是历史，是深度；拆是现实，是表层。两种思路不可偏废。这就如同剥洋葱一样，要一层层深入。中亚文明有其内核，中亚又是地缘战略的内核与枢纽。

1.中亚的主体性问题

到底中亚是什么？这只是我们习惯性发出的一个疑问，在真正了解中亚之前，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这是不是个伪问题。在这里我们大胆断言：中亚是一个主体性不稳固的、依附性较强的存在。主体性是自我认同，是超越理性的激情，是紧抓住历史深处某种灵魂本质的冲动，是自信的源泉，是创造性的发动机。这些正是中亚在其历史中失去的东西。

主体性不稳固与依附性较强两者互为因果。中亚的历史命运就是在文明和政治上被大的力量所控制、掌握和引导。外部力量多次塑造中亚。从文明的角度说，当代中亚文化深受外来“三化”的影响，即突厥化、伊斯兰化与俄罗斯化。历史上，中亚地区一直是周边强大政权统治者们的争夺之地，先后有希腊、波斯、古代中国、阿拉伯、突厥、蒙古等王朝或汗国的统治者管辖过这里；西汉时，楼兰国王说出了其处于汉与匈奴之间的两难境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40]古代国王的这句话点出了整个西域诸小国的历史命运。

当代中亚延续着其特殊的历史命运：内部不稳定，外部有多个国家试图影响、控制该地区。近代以来，俄罗斯掌控中亚命运一百余年。一百年前沙俄与英国为争夺中亚展开“大博弈”（big game），如今已经换了一个主角：美国取代了英国。

独立后的中亚力图重建其历史主体性。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命运，这种重建带有很强的悲情色彩。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斯坦获得独立。独立被民族主义的悲情叙事赋予了新的意义。1992年8月29日，全世界吉尔吉斯人代表大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召开。总统阿卡耶夫发表讲话说：“由于历史上遭受众多不幸事件，吉尔吉斯人口数目越来越少。最后成为定居在亚洲中央的一个小民族。但是，我们最大的遗憾是

自伟大的吉尔吉斯汗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之后的1000年之内，未能再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41]可以说，中亚的历史悠久绵长，但中亚国家却太年轻了。

如果说苏联的解体与中亚国家的“被独立”是（美、苏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现代性竞争的结果，那么，在这样的一场现代性竞争的大游戏中，1990年后获得独立的中亚国家才刚刚起步。工业化方面苏联时期片面的地区专业化分工体系，致使其至今未建立起能够满足自我需要的轻工业体系，因此，它非常需要中国的电子产品、配件、纺织品等。独立的中亚国家正借助于虚弱的国际法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来重建其主体性，而其复杂性就在于长期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建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切都还没有被搞定的情况下，中亚又引入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制度，它是建立在以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为底色的国家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较为稳健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这一切便是中亚认同危机所在，亦是当代中亚政治危机的根源。

2.中国面对中亚的挑战

布热津斯基预言过中国与中亚地区关系发展的可能模式：“目前，中国的作用比较有限，它的目标也不那么明朗。有理由认为中国更希望在其西部面对一群相对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俄罗斯帝国。”但就算是这已经成为现实，中亚对中国在根本的政治问题上似乎依然是“铁壁铜墙”。

今天，中国的南—北问题已经从过去的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的对峙，转变为中俄并立。对中国而言，尽管仍然有过去的南—北和东—西格局的影子，但其意义已经非常不同。新的因素已经加入进来，这就是来自南部的美、印，西部和西南的突厥-伊斯兰（土耳其、伊朗）。这里面，突厥、伊斯兰因为与中亚的历史主体性相关，而有一种软力量，弹性极大；北部的俄罗斯因为有帝俄和苏俄经营中亚的大陆型帝国经验，而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美国以强大的全球军力布局、资本帝国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具有软硬两方面的实力，它在此地不断掀起种种“颜色革命”。[42]甚至连日本人都在构想从日本经太平洋、印度洋到中亚的对中国的所谓“民主包围圈”。

中亚对于中国的地缘战略、能源安全、交通运输、西部贸易、陆权以及战略纵深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是毋庸赘言的。但是，作为一个大

国，中国不能成为“买卖国家”，也就是说，不能轻易地认为，似乎只要有了强大的经济，就可以享有相应的国际地位（这曾经是二战之后日本的梦想）。在新的格局下，仅有一个经济-资源的头脑是不够的。尤其是在俄罗斯转型以后，其对于“俄化”中亚所具有的软实力，以及目前在形式上的体制优势和地缘优势，使俄罗斯可以在中亚与美国一决高低，这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根本性问题。

作为中亚博弈局中的一个新来者，中国的优势限于世俗成就，即经济方面。如何避免政治因素剥夺技术带来的进步，是两千年来中亚交通和贸易历史的最大教训。[43]中亚不仅是曾经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的软肋，也是中国的软肋。在承认区域合作的良好前景和巨大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如何建立一个“内在地克服了分离主义倾向的区域政治过程”（于向东语）需要被提上议事日程。

文明的因素亦不可忽视。儒家文明的普遍性消解于其依赖于特定的中原地理这一特殊性。在古典帝国时代，其或可容纳西域问题，但是随着全球视野的展开，以儒家文明来统合对西域的理解则捉襟见肘。更何况，经20世纪不间断的革命洗礼，现在的中国已经彻底世俗化了。在认识和理解中亚时，我们需要对自身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反思。

历史并非仅仅发生在过去的事，而是一种积淀和惯性，它存在于当下，并且是当下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存在于地理和人文之中，地理者，乃是地表的自然环境；人文者，则是文明的传统。在地图上，西北是中原的边疆，中亚是中国的边缘，但它们又同时是内亚大陆的核心，是麦金德意义上的地缘枢纽。如果只是从中原的立场上去理解和认识中亚，那是不够的。我们同时需要地缘和文明的视角，而后者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重读西域历史，让我有了以上千思万绪的追索。今天，我们需要再出发，就像两千多年前的张骞一样。

原载高全喜主编《大观》第5期，法律出版社，2011

[1] 《汉书·西域传上》。

[2] 《汉书·西域传上》。

[3] 冯惠民：《张骞通西域》，中华书局，1979，第14页。

[4] 《汉书·西域传上》。

[5] 冯惠民：《张骞通西域》，第30～31页。

[6]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7] 以上论述参见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54～57页。

[8] 马曼丽主编《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第252页。

[9] 〔美〕罗兹·墨菲：《亚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2004，第273页。

[10]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315页。

[11]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27页。

[12] 帖木儿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其帝国鼎盛时期疆域包括今天从格鲁吉亚一直到印度的西亚、中亚和南亚地区，1507年亡于突厥的乌兹别克部落。帝国末期，帖木儿五世孙巴布尔兵败逃至印度，建立莫卧儿王朝。

[13] 〔英〕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8页。

[14]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228～229页。

[15]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7页。

[16] 〔英〕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第116页。

[17] 佛教的传播并不以帝国的政治扩张为推力，故未列入考察范畴。

[18] 〔法〕张日铭：《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姚继德、沙德珍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第3～14页。

[19] 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第18～19页。

[20] 〔苏〕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200页。

[21] 〔美〕丹尼斯·塞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中华书局，2006，第3页。

[22] 〔苏〕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第13页。

[23] 〔英〕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第140～141、376页。

[24] 马曼丽等：《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民族出版社，2003，第101～

102页。

[25] 我在此所做的有关宗教与世俗的两分，只是为了突出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并没有否定和贬低儒家文明自身亦具有“神圣性”的意思，只是儒家以天道、宗庙、仁、义、德、理、性等为主要内容的“神圣性”，基本上还是以对现世的人伦、政治关怀为旨的。

[26]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27页。

[27] 〔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19～220页。

[28] 〔英〕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21页。

[29] 〔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11页。

[30] 〔美〕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陈尧光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5～7页。

[31] 于向东：《关于俄罗斯问题的对谈》，载高全喜主编《大观》第5期，法律出版社，2011。

[32] 〔美〕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15～16页。

[33] 〔美〕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20、22页。

[34] 于向东：《关于俄罗斯问题的对谈》，载高全喜主编《大观》第5期；〔美〕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64页。

[35] 〔美〕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61-62页。

[36] 〔美〕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137页。

[37] 于向东：《关于俄罗斯问题的对谈》，载高全喜主编《大观》第5期。

[38] 于向东：《关于俄罗斯问题的对谈》，载高全喜主编《大观》第5期。

[39] 石婧：《中亚历史进程中伊斯兰化、突厥化和俄罗斯化及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40] 《汉书·西域传上》。

[41] 潘志平主编《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第78页。

[42] 陈达：《颜色革命：中亚面临的现实抉择》，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尤其参见第三章。

[43]〔英〕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第374页。

历史哲学视域下的西域—中亚

施展

一 边疆何以成为问题？

新疆古称西域，这两种称呼都内含着一种边疆性。但是，何谓“边疆”？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被理解。“边疆”身份的意涵，在古代与现代有着很大的区别，这是我们理解新疆-西域问题时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1]

在古典帝国的视野下，世界秩序首先不是一种政治秩序，而是一种文明秩序。帝国是文明之道德理想的世俗担当者，其眼中的世界秩序呈现为一种中心—边疆—蛮荒的差序格局。帝国中心区是文明的制高点，“边疆”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明概念，正是通过边疆，文明从帝国中心不断向外流溢，传播向蛮荒之地，边疆是文明向外扩展的前沿。在这种差序格局下，诸区域的等级高低是从中心向蛮荒逐层递减的。但是，边疆的地位虽然比中心要低，却并不会使边疆的尊严被剥夺。相反，在整体的秩序结构中，各个部分都有着各不相同、彼此无法替代的功能，都不可或缺，各自的尊严都来自这种不可或缺性。等级差异所带来的不是尊严的区别，而是责任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帝国中心肯承认边疆的“成比例的”尊严，边疆是可以接受自己相对于中心的次等地位的。在古典帝国的视野下，个体的意义与价值也必须在超脱任何个体——包括作为个人的君主在内——之上的整体秩序中才能获得体认，整体秩序是世界的根本意义框架，是思考政治正当性的出发点。

但是，在现代国家中，那种对于世界秩序的差序性理解被普遍的平等置换掉了；思考政治正当性的起点，也从整体秩序转换为个体的主体性。在现代国家的叙事结构中，不再有什么基于等级差异的比例性尊严，尊严是寄托在每一个平等个体身上的，基于个体彼此之间对对方之主体性的普遍承认。从国家的空间结构角度来看，古典帝国时代，帝国中心不认为边疆有独立于自己之外的主体性，边疆只有通过中心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到了近代一系列的革命之后，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区域群体，不需要通过任何人为中介，每个人和每个区域群体都拥有自足的价值和意义。[2]

正是经历了政治正当性的这种“古今之变”后，边疆开始成为一个问

题。由于现代叙事中，预设了所有人、所有地区的平等，边疆不再像古典时代一样首先是个文明概念，而是被还原为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边疆的主体性应该是自足的，国家的政治叙事也承认这一点，从而在文明意义上不再有边疆；但是此种叙事却在事实上取消了边疆的历史主体性，将边疆与国家中心地区的平等性表达为边疆同化于中心，以及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国家的中心区对于边疆具有各种优势，以至于中心区在政治实践中总是有着不自觉的对于边疆的居高临下之感。那种有着等级之分的“边疆”又被隐性地继承了下来。

于是我们便可以说，在古典时代，是有边疆、无问题。边疆在整体秩序当中的地位名实相副，对边疆来说不存在什么生存困境。在现代性诞生之后，则是无边疆、有问题，与中心地区有着高低之分的“边疆”在理论上不存在，在实践上却隐性存在。理论的承诺与现实的感受之间的张力，在现代世界构成了边疆地区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边疆地区的主体性，在现代国家的政治叙事和历史叙事当中，虽在原则上被承认了，但在事实上却迷失了。

对大国来说，边疆的存在是一种必然。但倘若边疆不能在国家的叙事当中获得一种主体地位的承认的话，则前述的生存困境将无法获得化解，而国家对于边疆的治理也很有可能会处置失当。从西域视角来看，对其主体地位的承认，首先意味着重新定位其在中国历史当中的意义。一个国家的历史叙事是有整体性的，对于边疆的历史意义的重新定位，必定意味着对于国家的历史叙事的一种深刻反思，或者说，对于“何谓中国”的反思，这是我们重新思考西域历史意义的一个前提。[3]

任何历史都是在具体的地理空间当中展开的。不同的地理空间，可能有非常不同的自然条件，约束生活在当地的人群只能选择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产生大不相同的对于秩序的想象。这里面最重要的变量就是山-水分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关系。

一旦进入这样一种地理空间视角，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历史所发生的空间，并不是一个单一均质的空间，而是一个多元复合的体系。它包含着因400毫米等降水线（大致重合于长城）的划分而形成的游牧生态经济区与农耕生态经济区、因连续的沿海丘陵导致相对隔绝于中原的破碎地理所形成的海洋生态经济区、因极度远离海洋的干旱地理形成的不连片的绿洲生态经济区、因平均海拔的高度而形成的高原生态经济

区，等等。这些彼此差异甚大的经济区，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首先是因为不可克服的自然生态原因，但由此会进一步产生这些地方对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与秩序想象的亲和性差异。比如，基于稳定的人际关系结构才得以展开的儒家之伦常秩序，在草原游牧区居无定所的生态下，是不可能落实为日常的伦理实践的；儒家未明言，但内在隐含的“中原正统论”，[4]使得西域也不大可能无条件地接受儒家的秩序想象。伴随着不同的文化资源与秩序想象的，便是不同的自我认知。所以，这些地区差异化的主体性有着其深刻的地理-历史基础。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区域，在历史上逐渐演化为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其相互间的互动过程改变着彼此。[5]此一互构历程，形成了一种超越于诸多亚区域之上的共享的历史记忆。这样一种共享的历史记忆，正是共同体之心理边界的基础；但是它需要通过恰当的历史叙事被表达出来，才能化作共同体的精神自觉。这样一种历史叙事应当能够呈现出，中国历史并不是汉族中心的一元实体不断扩大为今天的领土与人口的过程，相反，它是一部由诸多亚区域互动的历程所构成的体系史。这个体系在不断寻找一种均衡的政治存在样态，它有时表现为准列国体系的外部均衡，如汉-匈、宋-辽关系；有时表现为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如元、清。这个体系的生老病死起承转合，才是完整的中国历史。

中国的自我意识的充实与成熟，必须以对于自身作为一个体系的理解，以对于自身与世界之相互关系的理解为前提。而我们对于西域的关注与思考，在这样一种体系史的视角下，便会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历史意义。

二 作为自由通道的西域—中亚

要探究西域的历史哲学意义，首先还是要来看一下其历史赖以展开的地理空间。西域属于地理意义上的广义中亚，广义中亚大致包括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几个“斯坦”以及阿富汗等地。在中亚地区沿着天山—锡尔河大致画一条线，这条线以南是定居性地区，兼营农耕与商业，以北是游牧地区；这条分界线向东大致可以与分隔游牧、定居区的长城连起来。中亚与东亚的游牧-定居之共生体关系有个重要区别，就是东亚的农耕区的规模足够大，从而足以支撑农耕区与游牧区的长期对峙，或者在游牧者入主中原以后，可以用中原的庞大财富赎买游牧部落

当中的军事贵族，从而破解了因游牧帝国周期性继承危机所致的“胡虏从来无百年”。但是中亚地区的散落绿洲，既不足以独立对抗游牧帝国，又不足以让入主的游牧者能够完成对军事贵族的赎买，于是其历史节奏便会与游牧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有共振关系。大致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大中亚亦可进一步区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这两个亚区域在历史上很少处于同一王朝的持续统治下。因为帕米尔高原的存在，使得跨越高原进行统治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难以持久。强大如西突厥，重心在西部亚区域，其统治中心位于七河流域，却也难以持久地占据帕米尔以东。后来一度囊括几乎整个大中亚的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等，都是统治没多久，便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重心在帕米尔以东的准噶尔汗国、大清，则都没有持久地统治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可以说，帕米尔高原构成了帝国的天然疆界。高原的东、西两边，各形成一个次级的游牧-定居共生体。

中亚的地理因此是很破碎的，但中亚的历史哲学意义，正是出自其破碎性。就中亚的游牧地区而言，破碎性基于草原帝国无法克服的周期性继承危机，可以说是时间意义上的破碎性；就中亚的定居地区而言，破碎性则完全是地理所决定的——绿洲彼此是不相连的，中间都被大漠戈壁所隔开，同时每个绿洲的规模又都很小，这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破碎性。

中亚的破碎性使得其定居地区无力保护自己，总是需要外部力量的某种进入，以在当地形成政治秩序。外部力量的进入，可能来自北部的游牧地区，但是这又不断遭到时间破碎性，绿洲城市仍处在周期性的失序之下；也可能是来自更远地方的轴心文明所形成的帝国，如中国、波斯、俄罗斯等，周期性失序或可化解。但是对远方的轴心文明帝国而言，中亚本就遥远，再加上其空间破碎性，使得在中亚的统治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必定是入不敷出的。所以，远方轴心文明帝国对于中亚的统治，若欲持续，必定要采行间接统治方式，这样才能够把统治成本最小化。

于是可以说，无论外部力量是如何来的，它都要服从大中亚的一种亚区域特征，即它在政治上有着不同于周边区域的主体性——间接统治实际上就意味着承认了当地进行自我治理的必要性，从而就是对当地的主体性有了一种承认。这并不是周边的轴心文明帝国有着足够的雍容乐于承认中亚的主体性，而是轴心文明帝国面对政治地理所带来的硬约

束，所不得不接受的统治原则。即便轴心文明帝国派遣自己的人马去征服当地，欲做某种直接统治，前去完成征服的大将军也会迅速地从该帝国中自我剥离出来进行割据，再次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自治。前秦大将吕光，曾被苻坚派去征服西域，结果吕光到了龟兹（今库车）一度就不想回来了，意图割据当地，即为一例。[6]至于帕米尔以西的中亚，我们可以看到，它被阿姆河以南来的轴心文明帝国进行统治的时间更是有限。公元前300多年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次，8世纪初期的阿拉伯帝国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一次，这两次持续的时间都很短暂，此后的再次出现就要到来自北方的俄国征服中亚的时期了。

中亚的地理破碎性，使得不仅外部难以持续地统治它，在其内部也始终保留着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传统帝国中被消弭掉的自由。这种自由集中体现在中亚定居地区的诸多城市，彼此互不统属，也不长久地被外部世界直接统治上。集权秩序在这里难以持续，一个个互不统属的自治共同体推动着一个超越单个绿洲城市之上的自生秩序。这不是在政治哲学意义上建构出来的自由，而是一种社会-风俗意义上的源初自由。

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天然地适合于贸易对自由秩序的要求，可以说，“自由通道”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其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中亚因此有了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定居城市；中亚的商人群体在古代到中世纪大有能量，虽然他们要依赖于游牧帝国的保护。比如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中亚商人群体粟特人，他们依赖于突厥的保护，但正是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得突厥各种基于商业过程的军事后勤运输工作乃至战争融资活动成为可能；唐朝也经常以同样的方式受惠于粟特人的活动。以至于，粟特人成为突厥人最重要的参谋，他们帮助突厥人制订外交方案，规划军事战略，因自己的商业需求，而试图引诱突厥去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关系以打压萨珊波斯帝国，或是帮助回鹘策划如何压榨安史之乱后国道中落的大唐，等等。[7]在中亚逐渐伊斯兰化之后，信奉摩尼教、祆教等波斯宗教的粟特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中亚的萨尔特人。据巴托尔德的研究，11世纪，萨尔特人形成庞大的商人团体，其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以至于check（支票）这个词最初是在这里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的。[8]

这个庞大的商人群体，不受中亚走马灯般的政治变换之影响，一直在进行跨境的商业活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商品可能很多是产自中原，但真正从贸易上控制这条道路的，是中亚商人。这种基于贸易的世

界史，更呈现出历史在政治与战争之外的一种深层结构，让人们意识到，轴心文明地区以及游牧帝国与中亚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

从文明传播的角度讲，中亚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中亚绿洲地区贸易发达，人均财富量很大，但由于其太过破碎，总财富量却很少。于是，它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生发之地，轴心文明只能生发于大片农耕区域财富总量很大的地方。但是这些轴心文明生发之地又一定会建立起轴心帝国，集权秩序的政治力量会对文明本身发展的逻辑构成一种压制，使得文明内在的各种可能性无法被充分释放。中亚地区同样有对文明的需求，伴随着贸易和战争等，各种轴心文明都会传播到作为自由通道的中亚地区，这为中亚带来了世界性的眼光，较大的人均财富量也让中亚人有余裕来思考这些文明所提出的问题。[9]诸文明在这里各施解数自由竞争，同时由于中亚无法被强大的轴心文明地区持久地直接统治，这又使诸文明在这里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政治性的压力，从而充分释放出各种可能性，这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比如，诞生于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过中亚才传播到中国的，而它在中亚的发展却呈现出与印度本土的诸多不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这些鲜活的精神要素传入东亚地区，对东亚的影响与改造是全方位的。再如，公元3世纪诞生于伊朗高原的摩尼教，在波斯帝国本土命运多舛，无法摆脱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忽而被捧杀忽而被打杀，始终不得其正。摩尼教逐渐传播到中亚的河中地区，在公元6世纪后期，中亚摩尼教宣布与巴格达的总教会脱离关系，独立出去，号称电那勿派，[10]这只有在中亚这种注定自由的地方才有可能。嗣后的摩尼教反倒在东方获得了更大的世界，以至于成为回鹘的“国教”——当然，这又重新与政治形成勾连了，但我们毕竟还是在中亚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的出现。

最具象征性的是伊斯兰教。它在8世纪开始传播于中亚，到10世纪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据巴托尔德的研究，世界上最早的独立伊斯兰经文学院，不是出现在作为伊斯兰教大本营的中东，而是出现在中亚。[11]除了这里在佛教时期便有着经文学院的传统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远离伊斯兰教的中心，不受哈里发的控制。哈里发由于其统治的正当性完全系于对《古兰经》的解释，便不能容许解释权外落到他人手中，所以有可能形成独立解经力量的经文学院便会受到压制，只有官方学院才能成立。再一次，只有在中亚这种注定自由的地方，伊斯兰教

更加丰富的可能性才浮现出来。正是伊斯兰教在中亚的这种自由发展，结合于此地流传已久的古希腊哲学，才孕育出了几位历史上最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如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等。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工作后来辗转传入西方世界，对阿奎那等经院神学家产生深刻影响，奠定了后来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美国学者斯塔尔评论道："在数世纪的文化繁荣中，中亚是世界的知识中心。……在约公元1000年的前后四五个世纪中，是中亚这个地区推动了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中心走上前台。"[12]

虑及此，可以说，中亚正是以其无，成其有。中亚虽然不产生轴心文明，但它却构成轴心文明的挪亚方舟，轴心文明的精神力量在这里真正获得释放与壮大，并在轴心文明的母邦因帝国的衰朽而陷于颓靡之际，予其反哺，为人类的文明重新带来活力。

更有趣的是，作为"自由通道"地区，中亚需要一种稳定的秩序，这在很多时候是靠外部轴心文明的帝国来提供的。但是只有在外部轴心文明帝国对中亚不表现为直接统治（而是间接统治）的时候，中亚对于轴心世界的价值才最充分地体现出来。其功利性的价值体现在中亚作为贸易通道的高效率上。贸易的高效率依赖于一种自由的环境，只有在中亚不被外部轴心世界直接统治（而是间接统治）的时候，一方面有了秩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才能存续；一旦它被直接统治，自由不再，则其贸易的效率受损，而轴心帝国还得投入大量资源去进行吃力的统治，所有的价值都变成负数了。这也是为什么轴心文明对于中亚的直接统治往往得不偿失、难以持久。就非功利性的价值而言，"自由通道"地区可以呈现出轴心文明的更多可能性，这可以反过来构成对于轴心地区的文明启示。在这一点上，中亚与东南亚有着可以类比之处——两个地方都有着天然的地理破碎性，从而注定要担当起"自由通道"的历史命运。多种轴心文明在此处的延伸与碰撞乃至变化，可以构成该文明之母国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某种启示。

三 近代西域与大陆帝国

包括西域在内的大中亚地区，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东西方贸易、交通的重要通道，因此积累起丰厚财富，使得中亚地区的文化极为兴盛。但地理大发现扭转了这一切。海洋将东西方直接联系了起来，通过海上进行远途贸易比通过中亚更有效率，原本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处于世界中心的中亚地区，被剥离到了世界的边缘，伴随贸易而来的滚滚财富不再

可持续。随着经济格局的变迁，中亚的游牧-定居共生体的财政逻辑完全改变了，这终于使中亚地区的游牧力量对于秩序的建设性意义大幅缩水，不再有如喀喇汗国、西辽一般的文化之盛，中亚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开始进入一种失序的状态，中亚如同回鹘西迁之前一般，又一次需要外部世界帮助提供秩序。大清与俄罗斯入主中亚，将其重新整合进东、西边两大帝国的秩序当中，便成为嗣后的历史主线。这样一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嗣后的任何中亚秩序都必须在这样一个不可逆的新的秩序逻辑之下才能获得理解。

再纳入陆权、海权这个视角，可以看到，19世纪中期以后，亚洲大陆上也发生着陆权-海权极其复杂的博弈，博弈的主战场之一就是中亚，主角是英属印度、俄罗斯两国，还有个介于主角与配角之间的角色中国。在这个博弈中可看出陆权帝国与海权帝国的行事差异。俄国对于中亚是步步蚕食，占住就不放弃。英国则担心俄国会威胁到英属印度，于是向北抵御，几次入侵阿富汗，将其变成自己的保护国以形成对俄国的缓冲。这也可以说是对阿富汗进行的一种间接治理，然后英国就撤回印度，并不以占领中亚的更多土地为目的。[13]

前文曾经述及，中亚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可以区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即使在现代治理技术下，这种东西疆界也天然存在，但可能有更复杂的因素掺杂进来。在“大博弈”的过程中，还发生过来自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攻占中国新疆的插曲。他一路进占南疆，在即将席卷北疆之际，俄国人不愿再旁观了，在1871年攻占了伊犁，阻止了阿古柏控制这块七河地区的战略要地。但俄国又不说要割走伊犁，只说是替清朝暂时守住伊犁，因为它还有另外一重战略考虑。阿古柏进入中国新疆的使命原本只是护送白山派和卓的后裔抢夺南疆，但是他迅速架空了后者，谋得宗教身份，独掌南疆大权，接下来又以“圣战”的名义攻入由来自陕甘的回族“东干人”所占据的北疆，指责后者的哲合忍耶派是异端。基于这种宗教热情，阿古柏的力量在南北疆几乎所向披靡。俄国很担心阿古柏的宗教热情会促使他反过来去支持俄国正在力图征服的中亚国家，一旦中亚的伊斯兰力量因此大盛，则会加大俄国入主中亚的难度。所以它一方面不能让阿古柏占据伊犁，一方面又不愿独自面对伊斯兰力量，一定要把清朝拉上以分担风险。在它看来清朝收复新疆无望，那么以代管为名做个顺水人情，又把清朝拖在这摊浑水中不让它走，便是最佳策略。正是因为俄国对中国新疆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稳健的政策，清朝才有机会在后来又收复伊犁。

进一步挖掘的话，我们在这里又可以看到政治秩序当中的定居性与两种不同的流动性的对比。区别于大陆帝国，海洋帝国的力量来自流动性，商品的流动、资本的流动、人员的流动、知识的流动、海军的流动等，但所有这些流动都有一个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法权秩序。法权秩序使得所有的流动打破了定居性，打破了传统，却不会产生混乱，而是产生巨大的活力与生机，并形成一种有巨大扩张力的现代秩序。而中亚地区有着另一种流动性，就是阿古柏为代表的带有某种宗教性质的流动性，它有着高度机动的骑兵队伍，有着沿丝绸之路行进的商人，有着不固着于特定土地的信仰，这种信仰跨越国界、族群，有着普遍的动员力，但是这些流动性背后却没有一套法权秩序来形成约束条件。这就使这种流动性本身不能带来秩序与生机，而是带来混乱。这样一种流动性在古代中世纪也存在，但是那个时候中亚还是世界贸易的中心通道，其绿洲城市地区富裕繁荣，从而有能力在精神上对锡尔河北部冲过来的游牧者进行驯化，使中亚成为高度文明的地方。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中亚沦为世界的边缘，巨量的贸易财富不再，对游牧者的精神驯化也很难再做到，于是中亚就进入了比较长期的文明退化阶段，并逐渐陷于混乱之中。

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近代以来的中亚无力自立，而是需要外部世界的大陆帝国来帮助提供秩序。中亚混乱的流动性需要先被大陆帝国的定居性所克服，形成秩序，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融入现代流动性。由于伊斯兰这种普遍性精神要素的存在，对深入中亚的大陆帝国来说，另一种样式的“分而治之”——由两大帝国来分别面对它——不啻是一个更优选项，如此方可摆脱伊斯兰力量全部针对自己的危险，否则大陆帝国将被卷入一种具有普遍属性又充满了动员力量的反抗当中。[14]

于是，理解中亚的另一条线索便浮现出来了，这就是中亚的大陆命运。这种命运仍然是地理条件的硬约束所致，它使得中亚难以参与到海洋帝国的自生秩序当中，海洋帝国也无力深入内陆去做太多的事情。而中亚则反过来在一种消极意义上对周边的轴心文明帝国构成启示，它启示着轴心文明帝国必须作为一个能够安顿中亚秩序的大陆帝国存在，如果它不能安顿中亚，它甚至无法成就自己。左宗棠在清末的塞防-海防之争中谈到的“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就是此意。倘若不能安顿中亚秩序，则清朝作为以北京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东亚大陆多元一体的体系化结构，将难以成立，东亚的普遍帝国难以成就它自身。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亚通过大陆帝国的秩序输出获得安顿，而大陆帝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依靠了源自海洋的力量。典型的例子便是，左宗棠平定西北，其军费是依靠来自汇丰银行的贷款；这一笔贷款的担保物是清朝的海关税收，而关税之所以能成为大规模贷款的担保物，是因为清朝被迫打开国门加入了世界经贸秩序，从而大大提高了海关税收的规模；汇丰银行也不是依靠本金发放此项贷款，而是通过到伦敦金融市场发行债券。[15]如此一来，海洋帝国建立起来的全球性的经贸秩序和金融秩序，以大陆帝国为中介而转化为向中亚内陆输出的政治秩序。就沙皇俄国来说，其得以入主中亚，也是有赖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西方资本进入俄国刺激其经济发展，从而获得了向中亚扩张的财政基础。整个世界秩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深刻的一体联动。

结语

前述大陆帝国、海洋帝国与西域—中亚深刻的一体联动关系，不仅仅在近代世界是如此，在当下同样是如此。甚至如果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深入思考的话，也会发现此一历史逻辑的延续。“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依托于既存的世界秩序这一外部约束条件，并与世界秩序之间会有相互构成性的关系。作为海洋国家的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有着较为完整的政治哲学论证以及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但由于美国的生存原则，其所主导的秩序却无法有效覆盖亚欧大陆的内部地区。对这些地区的有效覆盖，需要有海洋化的大陆国家来完成。这个过程会重新定义世界秩序，同时也伴随着对于相关各国的重新定义。[16]

通过历史哲学层面的反思，我们对于西域—中亚这片土地的历史意义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它在古代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到整个欧亚大陆秩序的生成中，在近现代则以消极的方式激活出大陆帝国的历史意识。可以说，这片土地就像一面镜子，大陆帝国正是在这里才能看清自身的本质。

原载《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2期

[1] 就一个给定的政治体而言，其正当性基于两种理论叙事的构建。一是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其所要追求的正义之目标；一是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心理边界，确认何者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两种叙事加在一起，会带来政治体的精神凝聚力。本文首先会讨论政治哲学当中关于正义/正当秩序的

古今之变，提出现代国家对于正义/正当秩序的理解框架；接下来会讨论在现代国家的秩序观念框架下，政治共同体的心理边界是如何确定的，这就过渡到本文的核心关注——历史哲学视角。

[2] 列奥-施特劳斯曾对这样一种古代与现代的秩序观念的差异做过极为深刻的讨论。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

[3] 由于边疆问题近年来具有越来越大的关注度，所以在“何谓中国”这个话题上，近几年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浮现出来。例如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礼》等著作，赵汀阳先生和许纪霖先生关于“天下体系”的诸多思考，姚大力先生和罗新先生的一系列关于草原史的论述，王明珂先生从边疆着眼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等。海外的新清史研究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尝试。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思考“何谓中国”的问题会有很多启发。不过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它们所打开的新领域，主要是从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这一视角展开，对于西域的讨论相对较少，仅有的一些也未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本文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做一些尝试。

[4] 历史证据之一是，三国末年，邓艾攻蜀时，先致书于蜀国君臣曰：“王纲失道，群英并起，龙战虎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兴洪业，其不由此，未有不颠覆者也。”参见《三国志·蜀书三·后主传》，此信实言出国人共享的隐含信念：苟非地据中原，则正统不与焉；出身皇族同宗并不更具优势。

[5] 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等人对于草原与中原的历史互构关系的研究，相当具有启发性。参见〔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6] “（苻）坚闻（吕）光平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道绝不通。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见《晋书·吕光载记》。

[7] 〔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王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27~168页。

[8] 〔苏〕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34页。

[9] 值得一提的是，中亚先后流行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唯独儒教未曾流行，虽然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曾经努力过，甚至在当地开科取士，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回想到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儒教对地理的依赖性，这可为又一例证，嘉峪关差不多就成了儒教向西北传播的地理极限。

[10] 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中华书局，2012，第25页。

[11] 〔苏〕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61页。

[12] S. Frederick Starr，*Lost Enlightenment*：*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p.4.

[13] 英国对印度的占领，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对于一个特殊岛屿的占领，因为南亚次大陆是个独立的地理单元，高山的阻隔使英国对这里的占领并不会构成其蚕食亚欧大陆主体领土的前进基地。

[14] 对伊斯兰世界来说，一个非伊斯兰的政府统治并不是不可接受的。这种可能性早在公元800多年阿巴斯王朝的马蒙哈里发时期就已萌生了。由于马蒙哈里发得位不正，便试图通过对于经义的控制来正当化自己的统治，这意味着要用权力来干涉信仰，他为此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异端审判。异端审判失败了，但是它却带来了意外的影响，在主流的神职人员乌里玛中，此后没有任何集团还想利用国家来强化信仰了（参见〔英〕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安维华、钱雪梅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176～179页）。乌里玛对于国家干预信仰的拒斥，形成了一种知识的自治，他们确信这种自治是使得信仰纯净的一个前提，他们甚至由此发展出对于哈里发权威的质疑。这样，对于穆斯林来说，只要允许信仰层面的自治，则外在秩序是一个可以让步的东西。乾隆朝对于新疆的统治政策，也证明了这一点（参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73～175页）。

[15] 参见〔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75～80页。

[16] 参见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

从“西域”到“中亚”

——中国的中亚认知及其历史变迁

袁剑

“如果用近现代眼光来看亚洲腹地这块广阔的地方，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特别是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等方面更是不值一提……（但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岁月里，由于中国、印度以及西方文明的交互影响，在这片天广地阔的历史舞台上曾经演出了无数重要的历史剧目和民间故事。”[1]斯坦因的这段叙述，概括了中亚在过去曾经扮演过的衔接与贯通欧亚文明及其交融互动的中介特质。而在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所构筑的新地缘背景下，作为欧亚板块地理中心区域的中亚，将在大国政治的外部环绕下扮演怎样的角色、获得怎样的认知甚至是世界历史书写地位，将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和思考的问题。

不管是从历史层面看，还是从认知内容上看，在中国对外部世界区域的认知中，中亚空间的呈现方式表现出更多的波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欧亚大陆本身数千年来的历时性变迁，尤其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前后所经历的世界地缘格局转变，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历史舞台的欧亚—非大陆及其代表的陆地文明逐渐被海洋力量超越，曾经作为欧亚大陆东西端文明交流中介区域的中亚也逐渐丧失其长期以来的中心性，世界历史的主角开始转向外围、海洋与西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然面临一个如何重新发现和认识中亚的问题。

“中亚认知”的重新确立并不是个简单的过程，在其背后存在着一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困境，需要我们去分析和思考当代中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连带性问题。张蕴岭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这种区域性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区域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归纳它的重要性：一是区域的地缘视野，始终把周边地区作为基础；二是把周边地区作为利益攸关区；三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一套相处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所谓‘君临天下’，其核心价值是要对与中国密切相连的周边国家负责”。[2]可以说，不管是从中国本身，还是从世界角度出发，中亚都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区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国。

中国古代对于中亚区域的认知有其历史记述层面上的丰富性，但同时也必然打上了历史和时代的烙印，存在着单一“中原”观的角度限制，因此在回望的时候有必要结合其他文明对中亚的叙述来综合分析和思考，才能对中亚本身有更为清晰的认识。而到了近代，随着中亚进入帝国主义争夺的舞台，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也就更多地成为国际关系的关注议题。随着中亚大部分区域成为俄国以及后来苏联的组成部分，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看法又成为俄国研究和苏联研究的一部分。如今随着中亚各国的独立，我们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认识这一地区，就有必要超越原先的历史叙述以及国际关系认知，以更为全面和连续性的视角去看待和认识中亚，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新的“中亚认知”。[3]

一 中国视域与“西域—中亚”框架

一个国家对外认知框架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适应周边地缘环境的整体变迁，至少需历经近百年的过程。它既是本国知识界域外视野日渐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国与周边及域外邻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逐步推进的过程。作为一个拥有众多邻国的东亚大国，中国在认识自身内部区域的同时，也逐渐形塑了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在古代，中国对于域外的认知较为有限，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从总体上服从于国内政治与思想秩序的需要，存在一种内部秩序决定外部行为方式的传统。顾颉刚、童书业先生曾撰文指出：“战国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是非常狭小的，他们不大理会四边的情形；在那时只有一种空泛的‘九州’和渺茫的‘四方’的世界观念。到战国后才有具体的‘九州’和‘四极’说出现，这种‘九州’和‘四极’所包括的世界约同宋明两代的中国差不多大。直到战国晚年，才产生出理想的大世界说——‘大九州说’和‘大四极说’与‘海外三十六国’等记载——来，那是受了域外交通和哲学思想，以及天文学等的影响而成立的。古代的域外交通以东西两方为盛，因域外交通而构成了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里的地名，更因此而反映出上古西方交通的一件大故事——周穆王西游的故事——来。”[4]

但总体而言，中国在欧亚大陆东侧所处的独特环境因素，使得中国在域外认知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传统。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中国古代关于域外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幻想系统和以《诸蕃志》为代表的藩属系统。《山海经》在海外南、西、北、东经中所罗列的交胫国、反舌国、三首国、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一目国、深目国、无肠国、大人国等，尽管国人深知该书属于幻想的产物，

但对后代的创作影响深远。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堪称第一部较全面地反映世界地理的著作……而这一系统的关于域外的著述都是由国人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在‘天朝中心主义’的‘虚幻环境’内完成的——是以中国为中心、周边藩属为边缘所形成的藩属系统的地理沿革考订和风土人情的记述。因此，在上述两个系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一个真实和具体的‘异域’。”[5]而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历代正史的叙述中，对于域外的认知则主要服从于大一统秩序的现实需求，往往围绕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的相互关系展开。“现实关联性”构成了中原政权关注周边力量的最主要动力，并在正史叙述中得以展现。

这种“现实关联性”，在古代的周边地缘政治方面，还以其他的形式得以呈现。以唐朝-吐蕃关系为例，陈寅恪先生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借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重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

可以说，唐代乃至之后历朝的西南、东北政策取向，都与其先前的西北（西域）政策有着直接的关联。

进入元代，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军事胜利，传统中原王朝在对外政策层面既有的这种“现实关联性”结构被彻底重置。中亚在蒙古力量的控制下，有效地扮演着欧亚之间人员、货物来往枢纽区域的角色：“在蒙古统治中亚这段时期里，商业和贸易发展的整体状态已经是经济全球化兴起的表现。丝绸之路再次复兴，沿途出现许多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边陲小镇也能够通过集市与遥远、陌生的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在蒙古宗主国的庇护下，各种各样的商业团体在亚洲、欧洲诸国设立营业点和代理商，沉浸在一片繁荣的商业活动之中。”可以说，“亚洲和欧洲遥远的陆地上的货物交换为商人和他们的蒙古保护神带来了繁荣。蒙古这个游牧民族很快体验到城市定居生活的益处，并最终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最终，蒙古帝国分崩离析形成不同的新兴帝国，其中以乌兹别克斯坦、莫卧儿和奥斯曼帝国最为强盛”。[6]之后的明清两代，随着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渐次崛起，欧亚大

陆之间曾经的频繁互动逐渐消退。但与此同时，新的世界态势正在形成，乘着西方殖民帝国大扩张的步伐，传统的世界力量重心历史性地由内陆转向外围，从陆地转向海洋。它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中国视野下游牧与农耕力量之间的周期性关系框架，进而也影响到了以这种周期性关系框架为基础的外围想象和认知，其中就包括中亚区域。

从作为现实地域存在的中亚本身，到中国视野下的“中亚问题”的凸显，19世纪是一个重大转折。正如笔者曾经撰文指出的，清朝后期经历了一个对西域认知的分化过程，即开始将囊括河西走廊以西直至欧洲的广大区域的广义西域认知，转变为更为明晰化的狭义西域（新疆地区）以及作为域外的中亚地区的认知，并最终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成型，关于疆域空间的理念日益深入，传统的“西域”认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消解，继而转变为关于作为国内组成部分的中国新疆地区和作为国外区域的中亚的分类认知。[7]在这个时代，曾经作为中国对外秩序基本结构的朝贡网络日趋解体，取而代之的则是在东南、西北、东北等各个地理方向上，经由政治、军事等博弈而被迫承认和接受的近代民族国家与国际关系框架。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中亚地区成为英、俄帝国力量的重要争夺区域，最终大部分区域被俄国吞并，成为俄国连贯性疆域版图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周边区域的独特现象，即，中国的其他周边区域基本上成为列强的殖民地，而中亚则成为与俄国本土连成一体的区域；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西北地区因阿古柏之乱等，处于政治与社会动荡当中。两相对照，就形成了更为明显的“彼”“我”认识图景，中亚尽管已经退出了丝绸之路大辉煌的舞台，但在当时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却成为中国对外认知的一面镜子，折射出近代中国在面对自身困境时，对周边区域历史走向的关注与思考。从这时起，“西域”话语退回到历史文献中，“中亚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全面呈现。这是中国中亚认知过程中的第一次整体性断裂。

二 纠结的“他者”：近代语境下的中国中亚认知语境

认知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分类问题。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以及殖民探险的推进，人们对于世界各大区域内部空间的认知逐渐充实，在西方既有知识框架下那些曾经的“空白地带”被一块块填满。近代中国在域外认知上也逐渐受到这些西方“域外者”观念的影响，

开始对周边和域外各国的情况有了更多基于西方式分类的认知。这种情况，正如钟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所写的那样：“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8]在这一过程中，受外部知识引介渠道的影响，国内近代知识界对外域的认知主要围绕当时的欧美列强展开，对于俄国主要关注其欧洲部分的情况，此外，对其他周边国家的国情介绍则主要集中于朝鲜、日本、暹罗（泰国）、阿富汗等国，其他区域国家则较少。

我们注意到，在殖民时代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西方殖民者逐渐形成了对于东方世界的认知，并确立起“西方”高于“东方”的分类倾向。“东方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既被用来指称欧洲内部的巴尔干问题，也被用于指称俄国问题。由于俄国在整个近代都被看作欧洲的一个“他者”，而富有连带性的是，在英俄争夺中亚的“大博弈”过程中，随着俄国逐渐掌握主导权并最终吞并中亚大部分区域，中亚也从一个历史意义上的“东方”转变为一个欧洲“他者”的边缘性组成部分。在当时中国的对外知识视野中，这一区域既附属于俄国，又与中国历史有紧密关联。对此，1894～1895年受命出使俄国的王之春就曾这样描述俄属中亚的情况：“其里海部地本膏腴，然陆地四塞，人民五方，鞑靼里之遗孽今虽衰替，然蒙回情性易变，非绥之以德意，柔之以文教，未易治也。喀复喀斯部本匈奴遗种，即唐突厥之可萨部，颇长武力，亦如我中国之锡伯、索伦，而部众顽梗，犹未尽洽于海米勒之治化……俄其尚知此意乎？”[9]可以说，这一区域对当时的近代中国而言形成了一种既与历史相连，又成为域外列强一部分的内在紧张，构成了一种所谓中国的“他者”形象。在这种欧洲与中亚、中国与中亚的对视中，作为“他者”的中亚成为既折射欧洲和西方，同时又衡量近代中国的重要对象。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转型，在文化层面改变了知识阶层的认知框架，专业化开始具有更高的地位。正如列文森所指出的：

> 当国家代替文化而开始成为中国人关切的焦点时，要求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终于被废除）的呼声也不断增长起来。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并使官吏不能获得保卫国家所需要的有用的专业知识的文学形式，八股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即从原来官绅文化

> 繁荣时期的“天下”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概念。随着国家概念的变化，官僚教育的目的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在韦伯看来与资本主义以及职业化取向相对立的美学价值和儒家君子“自我满足”时代的结束。[10]

由此而来的是，近代真正意义上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创立，并取代理藩院处理对俄事务，一批受过专门培训的官员开始进入对俄事务处理过程。

1917年相继爆发的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中亚的这种“他者”角色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激变。作为俄国范围内被动反应的区域，包括民族-加盟共和国划界在内诸多新知识与新分类对包括欧洲和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后续影响甚至波及英法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改革事务（如印巴分治等）。与此同时，中亚在苏联建设中的高速发展以及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巨大支持，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广为关注的议题。这个急速变动的“他者”、令人纠结的“他者”，形塑着近代中国对中亚认知的基本图景。

三 连续性断裂：从“旧中亚”到“新中亚”

中国总是在关注周边的过程中反观自身，也始终以周边的经验教训来回望自身的时代。美国著名学者孔飞力提醒我们：

>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被我们视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结果，其背后的意义反而为我们所忽略了。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而生存了下来。在早期地方自治实验的整个过程中，各省份和都市的许多政治活动家们是用民族危亡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行动的。甚至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岁月中，从来没有什么将某一省份分离出去的行动或建立邦联的建议，能够同中国人民关于国家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相匹敌。[11]

这种对本国疆域与政治的统一性认知，使中国知识界在对20世纪以来中亚的社会与政治转变的认知中形成了自身的特性，并塑造了认识框架中的“旧中亚”与“新中亚”的断裂性格局。

所谓“旧中亚”，这里指的是俄国尤其是苏联治理时期的中亚，这是一种附属于苏联统一体的，具有内部联系畅通性的20世纪20年代至1991年的中亚结构。这种认知结构，附属于对苏联的认知，并以“苏联问题”的形式被囊括进来。在二战结束，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

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巨大变革和中苏关系的后续演变，“苏联问题”也从一个世界革命阵营的问题转变为一个与“第三世界”问题相对的议题，与之相应地，中亚也从苏俄革命话语下连接俄国本土革命及远东被压迫民族与殖民地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转变为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西北局势的“工具”，更成为使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淖的跳板与通道。

1991年底，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相继独立，不仅折射着“二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而且作为世界两强之一的苏联以联盟国家彻底解体的方式，将一个世纪之前英俄“大博弈”的胜利果实几乎全数吐出，这意味着原本从属于苏联内部秩序的中亚区域越出了国内秩序层面，开始进入世界秩序领域，作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周边国家的中亚议题，体现在中国的认知框架中，形成了某种程度上依然在发展的“新中亚”。如果我们观察中亚五国庆祝独立的时间点（1991年底）和同样脱离自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庆祝独立的时间点（1917年或1918年），就可以发现，这种“新中亚”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中亚五国国际政治时间“开始”于1991年底，而不是1917年或1918年，它是以中亚五国作为独立政治单元的正式出现以及统一中亚社会、经济和政治空间的瓦解为前提的，是以脱离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和内部分工格局进而全面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为方向的。我们对中亚认知层面的连续性断裂，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得以显现。

结语

对中国而言，中亚五国的独立，意味着原本附属于中苏关系的中国与苏联中亚地区的关系正式转变为新的对外关系，同时，由于中亚五国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存在漫长的边界线以及民族、宗教方面复杂微妙的联系，所以在原先的“苏联问题”基础上，形成了以中亚国家为主体和对象的新的“中亚问题”。可以说，这是中国在二战后所面临的一种全新的区域性周边态势，与原有的“东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南亚问题”等相区别，而折射到中国的对外认知领域，则形成了鲜明的特殊性：一方面，作为与中国西北边疆相邻的区域，其在中国的历史认知层面曾被长期关注，甚至在某些时段其部分区域还被纳入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范围，因此具有某种历时性的认知延续性与传统认知图景；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中亚古代、近代与现代的政权区域范围并不重合，也往往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尤其是苏联在中亚进行的民族划界，将原有的汗

国结构彻底打碎，结果在区域民族语言文化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中亚各共同体认同。因此可以说，中亚区域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当代中亚各国本身历史（民族国家史）的历时性变迁无法形成一种具有整体连续性的叙述，进而使其在与中国关系的外部表现方面，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表现形式，即其“在当代政治事务中的新生性与其在历史传统中的古老性并存，以此就不同于那些国名一直延续至今的老牌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也不同于二战之后摆脱被殖民状态，实现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非洲的诸多国家等，更不同于与中国长期共享历史并逐渐形成自身主体性的国家，如蒙古等国”。[12]其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部分互嵌性[13]及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完全脱嵌性[14]之间形成了历史认识与现实认知之间的新“断裂”，这也成为我们如今在面对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时，在认知层面所展现的基本特征。[15]

中亚历史依旧在发展，未来的道路如何，取决于其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倡导的超越以往任何地缘和政治纽带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史无前例地影响了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各国，并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新“中亚”的新可能。

原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2期

[1] 〔英〕奥里尔·斯坦因：《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巫新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2、18页。

[2]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

[3] 袁剑：《“一带一路”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认知”——关于边疆、周边与外域认知空间关联性的思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4] 顾颉刚、童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禹贡》第5卷第3～4期，1936年。

[5] 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286～287页。

[6] 〔印度〕古拉提：《蒙古帝国征服中亚史》，刘瑾玉译，魏曙光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150、164页。

[7] 袁剑：《“中亚”在哪里？——近代中国人笔端下的“中亚”范畴变化》，《文化纵横》2017年第2期。

[8]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2002，第4

页。

[9] 王之春：《使俄草》，岳麓书社，2016，第121页。

[10]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36页。

[11] 〔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第121页。

[12] 袁剑：《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13] 所谓部分互嵌性，意指中国古代历史（1840年以前）记述中所涉及的位于如今中亚五国区域的相关边疆治理与实践方面的内容，从历史空间上说，这些内容与中亚历史的部分内容形成了部分重合。

[14] 所谓完全脱嵌性，意指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中亚叙述在1991年之前实际上是对苏联这一整体叙述的组成部分，在1991年之后则是对中亚五国的叙述，因此从总体上看，这是对现当代外国区域及历史的叙述，为避免可能导致的争议，话语叙述中的中亚空间与中国空间是完全分隔开来的。

[15] 对于中国知识视野下的中亚区域及国家认知变迁状况，笔者已有部分文章发表，如《连续性与断裂性——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范畴流变》，《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近代中国的吉尔吉斯斯坦认知：背景、过程与特征》，《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国运的镜子——近代中国视野下的阿富汗形象变迁》，《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可供参考。

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

黄达远

中亚的地理范围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中亚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定义”。[1]“中亚”概念的含混性成为一种知识理解障碍。近年来空间研究的兴起，揭示了空间的等级性，启示“中亚”作为“地域”，其中内含着一种等级结构。“域”这个字，不只是地理，而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某个范围。决定这个范围的，是生活在那个特定区域之内的人的社会，是族群，是文化，是某种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个“域”的存在，完整的地理便有了种种人为的界限。[2]顺着这个所谓的“人为”界限，无外乎就是掌握了知识与权力的人群。对于东方主义与中亚知识建构的反思，才刚刚开始。[3]笔者也拟从这个视角对“中亚”的概念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

一 地理大发现与俄国对“鞑靼利亚”的科学考察

理解“中亚”，必然要从理解“亚洲”的意义开始。亚洲概念的生成离不开地理大发现或大航海时代。新航路的开辟是15世纪到17世纪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那两三百年，欧洲经历了知识系统的大破大立大重建，知识系统的变化正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最鲜明的分水岭。[4]对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影响是复杂而矛盾的，是一场对原土著居民的掠夺和屠杀。不过，航海大发现作为“双刃剑”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有促进的一面，特别是物资交换与全球世界体系的形成，带来了世界知识的重大革新。

首先，地理大发现破除了欧洲当时将印度洋作为“伊斯兰之海”的认知。哥伦布的航行是以哥白尼太阳中心说为起点，航海大发现则更进一步证明了地球乃一自转球体的主张，遂引发人们对欧洲传统教会观念的强烈质疑。“新大陆”（美洲）印第安人的存在以及东南亚诸国的发现与认知，对基督教《旧约圣经》“创世记”有关人类起源的说法提出了挑战，冲击了基督教对于历史表述的垄断性。欧洲人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于新的全球空间和各种文明的想象与观感。地图和地理书就是其中一种独特的工具。[5]其次，在新大陆发现的大量气候海洋交通等资料、搜

集到的大量动植物标本、民族志资料传入欧洲，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陆地和前所未知的生物描述，这刺激了博物学的发展。大量新发现的动植物以及民族志资料要被分类和识别。英国剑桥大学约翰·雷最早提出了有机体分类方法，以及植物分类法的大纲，同时其著作中还提出动物分类法。[6]洪堡与李特尔则是19世纪地理学方面的开创性学者，作为新地理学的重要人物，他们都试图阐述一套“人类家园”的知识，而非神学体系的知识，新的科学世界观正在替代旧的神学世界观。再次，欧洲学者在将“神的世界”改造为“人的世界”的过程中，要对这个“世界”进行重新解释和认识，这就要提供一整套的知识框架，从而促进了“东方学”的发展。东方学素来被西欧人视为对异己者的研究；它不是研究某个传统学科（如法律）的学问，而是以“东方”这一有别于西方的地理区域为认知对象。一般而言，东方学的学者可以是任何对中东或亚洲的某个地区或国家有深刻认识的人，内容包括地理、历史、语言、民族、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医学等。[7]18世纪至20世纪初是欧洲殖民主义的高峰期，也是“东方学”得到长足进展的时期。

欧洲学者对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成为主导性的知识体系，取代了神学的世界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建构这一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欧洲中心论”被潜移默化地移植进来。如黑格尔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号称光芒的“希腊”就源于此，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就无从谈起。[8]这种地中海中心论，体现了以欧洲文明作为中心，距离地中海文明越近的区域就是文明程度越深的区域的观点，由此形成一个文化等级的差异区。如以欧洲为“西方”和非欧洲地区为“东方”进行划界，形成现代地区/发达地区/发达社会和非现代地区/欠发达地区/传统社会的分野，这构成社会科学的二元图景，也是进化论观念展开的后果，形成了线性的历史观念。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属于“其余”者（the others）；在“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地理格局中，“东方人”的身份地位属于政治上及文化上的异类。由此，欧洲进步之快，不仅远超古人，而且将东方伟大的文明（中国、印度与伊斯兰）远远甩在了后面，西方建构了现代性。[9]这种现代性渗透到历史写作和地图绘制的空间之中。

17世纪末，欧洲学者已经开始将“文明”欧洲与“野蛮”亚洲互为参照，里海北边、多瑙河西边及奥克苏斯河东边的地带，以古代宇宙志学者的“西徐亚”来称呼，是历史的源头。到19世纪，历史学家兰克将这种二元历史观视为一种历史原则。[10]随着进化论的普及，与文明欧洲相对的“蛮族”成为处于转型与定居、开始建构制度之中的游牧民族，以及

没有文字与高等艺术，只具备“近代社会与国家体制之雏形”的农业民族。农业民族没有长途奔袭到欧洲，游牧民族则多次深刻影响了欧洲。13世纪，欧洲人以“鞑靼人”来称呼分布于西亚、中亚和北亚的许多游牧部族。Tar-tar原是对古代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称呼，Tartarus则是希腊神话中的幽冥地府“塔尔塔罗斯”，13世纪中叶当蒙古人兵临欧洲之时，英国本笃会士编年史家马修·帕瑞斯怀着恐惧与憎恨之情创造性地把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称这些蒙古人是“撒旦麾下令人厌恶的民族，像来自塔尔塔罗斯的恶鬼一样不断涌现，所以他们该被称为鞑靼人（Tartars）”。从此，“鞑靼人”成为欧亚大陆草原地区各游牧民族的通称，于是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地理学想象中，鞑靼地区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威胁文明世界的蒙昧主义的温床。[11]17～18世纪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和亚洲地图上，鞑靼地区都占据一个主要部分，由独立鞑靼（西鞑靼）和中国鞑靼（东鞑靼）组成。这块占据欧亚大陆一半以上面积的广袤空间在当时欧洲人的观念中没有政权归属，纯然是个文化区域。[12]鞑靼的“野蛮”形象深入欧洲的历史观中。鞑靼人居住的区域被称为“鞑靼利亚”（拉丁文为Tataria，词根是Tatar，该词最早出现于唐代的阙特勤碑）。据考证，中世纪犹太人拉比和旅行家图德拉的便雅悯（Benjamin of Tudela）于1173年在其著作中首用Tartarie一词称呼蒙古人及其地方。[13]13世纪前期蒙古西征后，欧洲开始以拉丁文Tartares称呼蒙古人，以Tataria（鞑靼利亚）称呼东方蒙古人发源地及其势力范围。

1719年，彼得大帝建立俄国官方制图局。18世纪30年代，沙皇的地理顾问才将这一条线向东划至乌拉尔山区。乌拉尔河至里海最后才约定俗成为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这个划分具有重要意识形态意义，西伯利亚被亚洲化，成了彼得大帝转向西方寻求认同，也就是在国家机构、统治意识形态领域及精英文化细化下的“欧陆”俄国的殖民储备空间。这结合了从西方知识体系中借用而来的“大鞑靼”概念。[14]如果俄国想要被认定为一个西方国家，那它需要构建一条更清晰的文化界线将其和亚洲其他东方国家相区分，所有归降沙皇的非基督教部落都被划为“鞑靼人”，不管他们原有的信仰是伊斯兰教、基督教或是佛教。[15]“作为一种人为的地理区划，古希腊人最早使用亚洲一词，原意指太阳升起的东方（the east，Orient），当时主要指波斯帝国。18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欧诸国的全球殖民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地理学发展，构建出‘欧洲文明’与‘落后’非欧洲的地理学，因而欧洲与亚洲的‘界限’也逐渐被固定化：以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高加索山作为欧洲与亚洲分隔的想象界线，自

此成为人们区划欧亚两洲的公式。”[16]欧洲列强在欧亚腹地探险的过程，就是化“鞑靼利亚”为可识别的现代地理的过程，最早就是从西伯利亚开始。[17]

18世纪初地理学家菲利普·布亚赫（Philippe Buache）发展出一种地形学的描述方法，主要用于归纳山脉特征与河川网络。地理学家发现构成亚洲中央的不是无尽的草原，而是不适合人居住的沙漠、盐湖及寒冷的高原。亚洲的中央有一个河流遍布的高原，亚洲的大型山脉从这里扩散开来，主要河流也发源自其边缘。这个贫瘠的地区确是大河文化的自然源头，这种空间观产生了一种新的北亚、中亚及南亚的自然划分。原先统一的“鞑靼地区”被分割为中亚及北亚、南亚，西伯利亚在地理上被分割出去。[18]另外，广袤无垠的鞑靼地区有了更为细腻的面貌，中央高原的知识逐步被欧洲学者接受，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及兴都库什山脉作为世界屋脊成为亚洲的一个地理标志，受到了关注。这种新的空间图像对历史哲学的鞑靼论述有影响。欧洲的历史哲学家开始将信仰喇嘛教的藏人从鞑靼人中区分出来。[19]17世纪至20世纪初东方学家、地理学家共同绘制了“亚洲俄罗斯”，其中出现了一个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的过程。

随着沙皇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殖民考察，西伯利亚不再是一个垦殖地区，而是帝国之内与欧洲领土相对称的部分，依据帝国意识形态来扮演自己的角色，区分帝国的版图为亚洲及欧洲部分，首次成为地理上及政治上的问题，将顿河（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笔下的“塔内斯河”，Tanais）及和黑海相间的亚速海视为欧亚间界线的古希腊罗马传统，在17世纪仍具影响力。俄国1701年出版的《列麦佐夫地图集》中收入的第23幅地图名为《关于托博尔斯克城、其他城镇、居民区和草原以及整个西伯利亚的领土与边界现状地图》，该图是在西伯利亚大主教科内利乌的指导下于1673年绘制的。这幅图精度虽然不高，但是已经将东部俄罗斯、中亚、北亚地区居住的各民族部落的地点、区域、领土标志清楚。这幅地图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最大的特征是民族志的标注：如博格多（满洲人）、使用马和驯鹿的基里亚克人和布里亚特人、拉穆特人、堪察加人、科里亚克人、楚克奇人、尤卡吉尔人、雅库特人、通古斯人、达呼尔人、乌梁海人、奥斯佳克人，以及土尔扈特、和硕特、准噶尔与杜尔伯特等部。图上还标出车列米西人、沃佳克人、沃古尔人、楚瓦什人、巴什基尔人、卡拉卡尔帕克人、捷普佳尔人等。这幅图中的地理标注错误很多。[20]不过，“鞑靼利亚”已经具体化了，变成了众多民族的居住

地。

二 东方学与地理建构："亚洲俄罗斯"与"中亚"的形成

俄国将欧洲俄罗斯与亚洲俄罗斯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土部分。"亚洲俄罗斯"指的是俄罗斯的亚洲版图，在绘制地图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借用西方的眼光描述亚洲。乌拉尔山以西俄国是基督徒，而山脉以东是野蛮人。为了使其更加亚洲化，俄罗斯采取西方对西伯利亚的称呼"大鞑靼"（Great Tar-tary）。大草原被塑造成一个荒野粗蛮之地，这是一块与欧化俄罗斯截然相反之地，等着俄罗斯去开发。[21]这就决定了"亚洲俄罗斯"文化等级低于欧洲俄罗斯，比如地理学家谢苗诺夫指出，"在亚洲俄罗斯，在乌拉尔和阿尔泰之间的幅员辽阔的西西伯利亚南部低地上，我所看见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草原。西伯利亚草原和南俄罗斯黑土草原，有着共同之处，即：在它们的整个幅员上，没有一点山地，它们同样也有着极其丰富的草本植物，它们的植物群和我们草原的植物群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是，虽然西伯利亚草原也有着富饶美丽的草地，而这些草地经常交叉着面积相当大的小森林地带（小树林）。这些小树林是由宽叶树（桦树、白杨树、杨树等）构成"。[22]亚洲与欧洲在景观上呈现出很大差异，亚洲俄罗斯与欧洲俄罗斯具有不同的生态学特征。

亚洲俄罗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体现在多元化的宗教上，特别是与基督教世界相对立的伊斯兰世界。18世纪以前基督教世界的人民首先用宗教的名称而非民族名称来称呼他们的邻居，一般土耳其人及摩尔人等民族名称也具有和"穆斯林"相同的宗教意味。[23]亚洲不是基督教传统的地区，在克里米亚半岛，欧洲学者又对奥斯曼的东方专制制度和克里米亚鞑靼汗国进行了研究，鞑靼人不信仰萨满教和佛教，而是伊斯兰教，这个克里米亚的汗国有一个中央政府，一个结合了奥斯曼及中亚部分的法律体制，一个有大量城市人口的阶层区分的社会制度，一个活络的外貌，一个并不逊于奥斯曼及莫斯科公国的教育体制。甚至还有"鞑靼"的编年史学家为伊斯兰史学做出重要的贡献，由此可证明克里米亚鞑靼人并非"野人"，俄国和奥斯曼不比他们的文明强多少。[24]欧洲与奥斯曼土耳其的长期对立，已经使欧洲将其近邻视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域，而且这一原则深刻影响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学者。日本学者羽田正已经分析了东方学家们何以将伊斯兰世界作为与欧洲对立的部分，而且证明了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同样采取了将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对立的学术

观点。[25]

“亚洲俄罗斯”的第三个特征是“黄种人”为主的居住区。[26]16世纪欧洲人认为亚洲居住的主要是蒙古人与鞑靼人，都是“蛮族”，也就是“黄种人”。似乎从西徐亚人、匈奴人到土耳其人、蒙古人，再到征服中国的满族人等所有历史上的“上帝之鞭”，都来自那个“亚洲”内陆的可怕大地。[27]俄国科学院院士B.B.拉德洛夫，曾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区、中亚各地、蒙古鄂尔浑河流域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考古发掘和民族学田野考察。在他的倡议之下，俄国成立了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俄国著名学者Д.Н.阿努钦利用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考古学等方面的材料撰写了上百种历史著作。他创造的“三位一体法”即综合利用民族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解决历史民族学和当代民族学的问题。

生态、宗教与种族是构成“亚洲俄罗斯”的重要特征。随着调查和统计的开展，人口密度、区域划分、气候、水文、土地资源、降水量、海拔、植物等标注取代了原来的“鞑靼利亚”地图。中亚三汗国作为原鞑靼利亚的“西鞑靼”地区也被纳入新的地理科考范围中。

随着19世纪世界地理轮廓的日益清晰，西方强国围绕新的战略要冲的竞争日益白热化。俄国与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围绕着黑海进行博弈，俄国失败后，将目光转向了亚洲内陆腹地，对于哈萨克草原与中亚浩罕、布哈拉、希瓦这三个汗国提出战略利益诉求，俄国驻奥伦堡的总督则致力于扩大从奥伦堡经锡尔河的咸海入海口和克孜勒库姆沙漠到布哈拉进行贸易，巩固俄国与布哈拉的外交关系，并深入了解中亚三汗国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状况。[28]各路考察队员的考察报告为俄国的中亚扩张奠定知识基础，并使欧洲学界认识到：中亚和新疆贸易路线的开辟和发展可促使下诺夫哥罗德和阿斯特拉罕成为亚欧大陆桥的贸易枢纽，以联通里海、黑海和波罗的海贸易网，加强欧亚与黎凡特地区的商品流通。俄国报告亦引起英法东方学界的关注，不仅激发了英俄的中亚竞争，更推动了欧洲东方学界“中央亚细亚”概念的确立及其知识体系建构。[29]由于俄国的地缘优势和极力南扩，因此，它对这一区域的地理考察走在了前列。

1856～1879年，俄国地理学会出版了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著、谢苗诺夫翻译的《亚洲地学》1～4卷，其中第4卷内容主要涉及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和居住史，并将原来最不为人知的“西鞑靼地区”各种地理要素和民族志描绘出来。1888年，地理学家谢苗诺夫完成了外里海及费

尔干纳盆地考察旅行。在谢苗诺夫、格里戈里耶夫等人的建议下，俄国地理学会理事会拨款给另一位地理学者拉德罗夫，支持其进行中亚地区的考察。谢苗诺夫等人亲自为此次考察写了详细的指南手册，并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中亚民族学研究上，而对当地“鞑靼人”的研究也成为该次考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得到当时当地总督的支持，拉德罗夫在考察过程中到达了之前从未有旅行家踏足的地区，并走遍了整个布哈拉汗国的东半部地区。[30]俄国地理学会还委托哈内科夫绘制有关亚洲腹地地区的地图。哈内科夫与另一位地图绘制专家波洛托夫一起绘制中亚西北地区图，哈内科夫将该地区分为咸海和希瓦汗国地图、伊塞克湖及其周边地区图、北波斯地图、里海地图四部分，逐一绘制并分别出版。第一部分咸海和希瓦汗国地图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地理学界的关注，被法国巴黎地理学会翻译成法语出版。而哈内科夫本人也因此图被普鲁士国王授予二等红色英雄勋章。[31]除了搜集和整理地理信息外，俄国考察报告对布哈拉、希瓦和浩罕汗国的种族构成、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军事力量和文化习俗进行了详细研究，为俄国政府及其驻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的总督们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俄国对中亚汗国的征服奠定知识基础。1911年的亚洲俄罗斯划分为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远东区、草原区与“突厥斯坦区”，土地面积为1453.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969.34万人。[32]1914年，俄国官方出版的“亚洲俄罗斯地图集”的族群统计，有吉尔吉斯人450万人，萨尔特人近200万人，乌兹别克人60万人，塔吉克和土库曼人150万人。此外，还有希瓦人和布哈拉人250万人。他们都是从“鞑靼-突厥人”中被识别和标记出来的“民族”。[33]

俄罗斯东方学家塑造的“中亚”属于亚洲俄罗斯部分，在文明等级上低于“欧洲俄罗斯”，由于中亚三汗国复杂的社会结构，使得中亚的文明等级又高于西伯利亚地区。正如俄国学者巴托尔德指出，“突厥斯坦与西伯利亚不同，俄罗斯政府在突厥斯坦完全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政策。国家疆界向西伯利亚的扩张是与人民群众的自发活动相连的”，西伯利亚是一块“无主地”，俄罗斯人的扩张是“合理”的，“人口比较稠密、文明水平相对比较高的突厥斯坦不能以西伯利亚那样的方式并入俄罗斯，占领突厥斯坦是根据政府当局的命令来进行的，被占领地区及其居民的命运也是根据政府的命令来进行的”。[34]这就为俄罗斯文明统治“落后”的中亚进行了政治辩护。梅彦多夫认为，曾经跻身世界知识中心的布哈拉文化没落，教条主义盛行，社会发展仍处于低级阶段，需要用欧洲文明来启蒙，并通过布哈拉带动中亚的进步。“俄国文化启蒙的发展进步使这个大国有责任促使那慷慨的观念成为现实。俄国有义务给中亚各汗国带来有

益的促进，在这些国家推广欧洲文明的成果。”[35]这也为俄罗斯统治中亚地区提供了政策依据。

俄国考察报告清晰地展现了欧洲东方学从侧重语言、历史和民族志的研究模式向对中亚区域自然状况、政经制度和社会文化进行多学科全面和实用研究的演进趋势。在一批学者如纳扎罗夫、穆拉维约夫、梅彦多夫、克拉普罗特和洪堡等人的推动下，术语“中部亚细亚”（Средияя Азия，Middle Asia，Asie Dumilieu）和“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Central Asia，Asie Centrale）开始取代流行了数百年的“鞑靼利亚”，成为俄国和欧洲学界用以称呼亚洲内陆地区的地理和地缘政治概念。[36]来自东方学的知识填补了对内陆亚洲的地理环境和族群、人群认识的空白，但这不过是以西方或俄罗斯的“镜像”来认识中亚。“虽然这种具有一致性，但又经常被重写的理论和实践只是存在于西方之东方的荒诞故事、神话，以及对现实的有目的的再创造，但是，对于西方而言，这是一种常态（normality）与理性（reason）的循环。这种理论和操作模式就是东方主义。”[37]这种具有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知识建构长期主导了人们对于“亚洲”和“中亚”的认知。

三 反思东方主义：空间建构背后的文明等级观

“亚洲俄罗斯”以及“中亚”的出现，既是欧洲列强扩张乃至地缘竞争的后果，同时也是西欧诸国展开所谓的“地理大发现”而创造出的近代主流地理观的后果，“世界作为一体”的观念之前，不同区域人类社群所抱持的观念，是普遍存在复式世界（worlds）或复数世界体系（worlds-systems）。[38]而现在只有一个以欧洲为坐标的世界体系了。“地理大发现”其实就是一场“文明”大发现。欧洲人在海外探险的过程中，将分布在不同空间的人群的差异整理为历史的差异，也就是把空间的分布诠释为时间的分布，又将时间的差异解释为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39]欧洲列强开化和启蒙半野蛮地区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俄国在中亚所处的地位，是一个不得不与一些半野蛮、不拥有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游牧民族打交道的文明国家所处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不得不为了其边界的安全和商贸关系利益，而对其不安分的、不受欢迎的邻居保持一定的优势。对袭击和劫掠行为必须镇压。为此，边界地区的部落必须保持时刻服从的状态。”[40]

1858年，俄国哈萨克青年军官瓦里汉诺夫作为中亚探险队的一位重

要学者，在中国新疆进行过相当详细的调查。这位接受过“西方”近代知识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中亚就采取了东方主义者的傲慢：“如果这个地区不是古代所说的那种一味的神秘莫测，而关于中亚地区的民族，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现行的社会制度使中亚变得极其忧郁荒凉，呈现出发展中的病态危机……撒马尔罕、塔什干、费尔干纳、希瓦、布哈拉和其他城市的图书馆和撒马尔罕的天文台都一去不复返的毁于鞑靼破坏文物和布哈拉的暴行中了……或确切地说，中亚与文明隔绝，因此，俄国与英国想进一步了解她的不开化的邻居的企图总是难以实现的。”[41]其实，瓦里汉诺夫看到的只是中亚的一面，在一个世纪前，浩罕汗国才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而清朝同样在西部获得了巨大成功，体现出勃勃生机，不仅挡住了俄罗斯的东进步伐，同时对天山南北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这一成功的景象，被传教士用大捷的绘画图像记录了下来。[42]具有嘲讽意义的是，这位游牧民出身的东方学家已经对自己的世居地域感到完全“陌生”，完全没有考虑本土时空的连续性。

地理学家所谈的世界，是他们对世界的主观再现（representation），而不是客观反映，而主观再现的凭借手段只有语言，世界是在语言讲述中浮现出来的。[43]亚洲历史的建构可以看作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产物。现代全球历史是作为时间上彼此有历时性关系的陆续的单独时刻被描述的，在空间上它们只与西方有关，它们与地球其他部分的共时性关系未被考虑。[44]地域作为一种显性的空间、一种隐形的疆界，只是文本的一个背景。但是，当这种书写不是发生在文化中心，而是转移到那些被视为边疆的、蒙昧世界的地带，书写的对象变为某个少数族群那里的时候；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开始强调地域这个概念，这时，它的意思已经悄然转换，变成了“异域”。这个“异域”，正是萨义德所指称的东方主义的两个特征之一。[45]中亚的“异域化”，就是东方主义与东方学的后果，只建立了与西方的单边联系，是空间重新建构的过程，而切断了与周边特别是与中国的共时性关系。必须指出，近代“中亚”的建构是沙皇俄国的“亚洲俄罗斯”的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俄式东方主义色彩，也具有某种地理民族主义的含义。美国学者、中国研究专家拉铁摩尔将被污名化的“鞑靼-蒙古”从东方主义的历史观中恢复出来，给予游牧社会以应有的历史主体性，对于“东方”的历史和亚洲历史予以新的解释，这种开创性的研究视角给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启示。[46]

中国在被动进入世界体系之时，原有的朝贡秩序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近现代的世界整体格局改变了中国的对外视野，逐渐形成了更为明

晰的周边与域外概念。近代中国接受了“亚洲”的概念，也就是接受了欧洲的分类体系。近代民族国家的构筑，关于疆域空间的认识日益深化，传统的“西域”认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分化，转变为对作为国内组成部分的中国新疆地区和作为国外区域的中亚的分类性认知。[47]在东方主义的知识体系中，“中亚”已经不再与中国具有共时性的联系。“中亚”曾经长期作为中国天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被大量记录在清代以“西域”为题的官修私修的史志中，不过这种记录也带有明显的“华夷之辨”特征。

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重新理解作为异域的“中亚”，需要在知识上超越俄式的“东方主义”，同时，也不能简单回到传统的“天下秩序”中去理解“中亚”。而是要基于大量域外民族志研究，通过扎实的社区研究和专题调查，或可更深入地理解中亚的人文与社会，以与中国共时性的视野来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注意的是“丝绸之路”也是一个东方学的概念。不过，它今天可以被赋予新的含义，它是亚洲内陆从不间断的内部空间联系的路网，从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到两河流域经伊朗高原直到地中海，它作为巨大商路网络连接起游牧、农耕与绿洲世界。丝绸之路其实完全可以作为欧亚世界体系的代名词。

总之，中国需要一套超越东方主义的世界体系知识，来理解自身以及周边与域外。

原载《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1] 〔美〕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1页。关于“中亚”（英文通常为Central Asia）至少存在以下三种定义：（1）苏联官方定义，即“中部亚洲”（Средияя Азия），大体包括锡尔河、阿姆河流域，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2）通常的定义，即今天的中亚五国，现行俄文文献写作“中央亚洲”（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包括今阿富汗、中国新疆、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上述前两种定义仅着眼于帕米尔以西地区，可称狭义的“中亚”，而第三种定义包括帕米尔东西广大地区，可称广义的“中亚”。参见潘志平、石岚《新疆和中亚及有关的地理概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李琪《“中亚”所指及其演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 阿来：《地域或地域性讨论要杜绝东方主义》，载氏著《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阿来文学演讲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228页。

[3] 恽文捷：《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4] 杨照：《新世界与老亚洲》，载〔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刘兴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5] 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6] 〔美〕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第4版，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123页。

[7] 《张信刚谈东方学、区域研究、丝路探索》，https：//cul.qq.eom/a/20170406/039483.htm，2018年12月1日。

[8]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85页。

[9] 〔英〕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马雪峰、苏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44页。

[10] 参见〔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第337页。

[11] 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2] 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3] 恽文捷：《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4] 参见〔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第250页。

[15] 〔英〕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郭丹杰、曾小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第443～445页。

[16] 张锡模：《圣战与文明：伊斯兰与西方的永恒冲突》，三联书店，2014，第115页。

[17] 英国学者约·弗·巴雷利在1919年完成的《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中以相当详尽的篇幅介绍了有关从鞑靼利亚地图向亚洲地图的转变过程，如引用了詹金森1562年的鞑靼地图、亚·奥特利乌1570年的鞑靼地图、约·艾恩森1657年的鞑靼地图、戈都诺夫1667年地图、北亚民族志地图（1673）、施莱辛地图（1693）等多幅地图，对“鞑靼地图”如何转变为现代地图进行了讨论。参看据伦敦麦克米伦有限公司1919年版本译出

的氏著《俄国·蒙古·中国》第1册上卷“地理部分”，吴持哲、吴有刚译，胡钟达校，商务印书馆，1981。

[18] 参见〔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第345页。

[19] 参见〔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第347页。

[20] 〔英〕约·弗·巴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260页。

[21] 〔英〕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第443~445页。

[22] 〔俄〕谢苗诺夫：《天山游记》，李步月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23] 〔日〕羽田正：《“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刘丽娇、朱莉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5页。

[24] 参见〔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第350页。

[25] 〔日〕羽田正：《“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第110~111页。

[26] 19世纪的俄国地理学家谢苗诺夫说：“早在16世纪中期，欧洲和亚洲在人种学上的界限，与今天所适用的欧亚两大洲的地理界线全然不同……在发现美洲的时代里，也是喀山陷落的同一时期，欧洲的俄罗斯才开始在欧洲的东边接连不断地开发亚洲，这种殖民化首先使欧洲占据了人种学上的属于亚洲的大片土地，然后从整个北极地区扩展到太平洋。”

[27] 参见〔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第334页。

[28] 恽文捷：《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29] 恽文捷：《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30] 张艳路：《1917年前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3，第46页。

[31] 张艳路：《1917年前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第29页。

[32] Глафного Улравнения Землеусгройства и Земледелия.Атлас Азиатской Рассия.Издание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Петерпург.1914. No.8.

[33] Глафного Улравнения Землеусгройства и Земледелия.Атлас

Азиатской Рассия.Издание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Г.Петерпург.1914. No.25.

[34] 〔苏〕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中亚历史》，载氏著《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张丽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第322页。

[35] 恽文捷：《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36] 恽文捷：《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37] 〔英〕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第86页。

[38] 张锡模：《圣战与文明：伊斯兰与西方的永恒冲突》，第115页。

[39] 刘禾：《今天的世界秩序是从哪里来的？》，载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三联书店，2016，第22页。

[40] Alexis Krausse，*Russian Asia*：*A Record and a Study*，*1558-1899*，Henry Holt and Co.，1899，p.224.

[41] 〔俄〕乔汗·瓦里汉诺夫：《准噶尔概况》，王嘉琳译，载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第50～51页。

[42] 〔美〕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212页。

[43] 唐晓峰、李平：《文化转向与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新版第八章述要》，《人文地理》2000年第1期。

[44] 〔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三联书店，2008，第272页。

[45] 阿来：《地域或地域性讨论要杜绝东方主义》，载氏著《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阿来文学演讲录》，第230页。

[46] 参见以下学者的讨论：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读书》2015年第8期；黄达远《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47] 袁剑：《从“西域”到“中亚”：中国的中亚认知及其历史变迁》，《文化纵横》2018年第2期。

从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看俄罗斯帝国穆斯林的社会阶层状况

汪金国[1] 洪丽萍[2]

1897年的全俄人口普查，无论从其客观性还是准确性来看，都堪称俄罗斯历史上最好的一次人口普查。[3]本文将根据这次普查的相关信息，对有关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俄国穆斯林社会阶层状况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和分析。

一 俄罗斯帝国穆斯林的总体概况

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穆斯林是俄帝国继东正教信仰群体之后的第二大宗教群体，当时其人口已接近139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6%。事实上，俄帝国的穆斯林人口一直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截至1917年，其境内的穆斯林人口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4]

从宗教派别上看，俄帝国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属于伊斯兰逊尼派。从地区分布上看，欧俄地区的穆斯林数量仅约占当地总人口的4%，他们主要生活在乌法、喀山、奥伦堡、阿斯特拉罕和萨马拉诸省；西部各省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人口微不足道；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约占当地居民总数的1/3；而中亚地区则有90%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见表 1、2、3、4、5）。

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资料还显示：整个俄帝国的穆斯林人口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欧俄地区的男、女穆斯林之比为100：95，高加索为100：88，中亚为100：86。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穆斯林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法制度所决定的，因此在人口普查中存在着明显的瞒报妇女人口信息的现象。在农村地区，由于大部分居民是文盲且不懂俄语，所以统计员根本无法与他们直接交流，只能从当地行政机关那里获取人口信息。

表1 俄罗斯帝国欧俄地区的穆斯林人口

省和边疆省	男性（人）	女性（人）	占该省人口总数的比例（%）
阿尔汉格尔斯克	48	7	0.01
阿斯特拉罕	160729	146279	30.60
比萨拉比亚	632	53	0.03
维尔纽斯	2584	1803	0.28
维捷布斯克	647	14	0.04

表1 俄罗斯帝国欧俄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续表1

省和边疆省	男性（人）	女性（人）	占该省人口总数的比例（%）
弗拉基米尔	353	32	0.03
沃洛格达	94	9	0.01
沃伦	4675	168	0.16
沃罗涅日	242	24	0.01
维亚特卡	65186	64342	4.27
格罗德诺	4140	1797	0.37
顿河军外省	2224	861	0.12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1567	331	0.09
喀山	307833	318014	28.75
卡卢加	144	28	0.02
基辅	2818	287	0.09
科夫诺	1299	470	0.11
科斯特罗马	459	298	0.05
库尔兰	572	22	0.09
库尔斯克	413	28	0.02
利夫兰	497	33	0.04
明斯克	2551	1975	0.21
莫吉廖夫	854	781	0.10
莫斯科	4567	995	0.23
下诺夫哥罗德	17438	22968	2.62
诺夫哥罗德	326	151	0.03
奥列尼奥克	53	19	0.02
奥伦堡	190123	172676	22.66
奥廖尔	373	29	0.02
奔萨	26588	31958	3.98
彼尔姆	78940	69520	4.96
波多利斯克	5080	1873	0.23

表1 俄罗斯帝国欧俄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续表2

省和边疆省	男性（人）	女性（人）	占该省人口总数的比例（%）
波尔塔瓦	610	23	0.02
普斯科夫	26	9	0.01
梁赞	2132	2729	0.27
萨马拉	143833	141180	0.37
圣彼得堡	4712	1387	0.29
萨拉托夫	46616	47761	3.92
辛比尔斯克	63958	67915	8.63
斯摩棱斯克	307	52	0.02
塔夫里达	103785	86729	13.14
坦波夫	6897	8781	0.58
特维尔	401	44	0.02
图拉	132	2	0.01
乌法	561205	537777	50.03
哈尔科夫	1305	90	0.06
赫尔松	2003	459	0.09
切尔尼戈夫	471	11	0.02
爱斯特兰	55	14	0.02
雅罗斯拉夫尔	243	61	0.03
合计	1822740	1732869	3.80

资料来源：Арапов Д. 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описания,статистика. С.324 - 327。

表2 俄罗斯帝国维斯瓦河沿岸边区省的穆斯林人口

省和边疆省	男性（人）	女性（人）	占该省人口总数的比例（%）
华沙	1514	59	0.08
卡利什	160	—	0.02
凯尔采	59	4	0.01

表2 俄罗斯帝国维斯瓦河沿岸边区省的穆斯林人口-续表

省和边疆省	男性（人）	女性（人）	占该省人口总数的比例（%）
沃姆扎	461	9	0.08
卢布林	425	3	0.04
彼得罗科夫	288	16	0.02
普沃茨克	240	5	0.04
拉多姆	28	—	0.01
苏瓦乌基	735	74	0.14
谢德尔采	620	26	0.08
合计	4530	196	0.05

资料来源：Арапов Д. 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описания,статистика. С.324 - 327。

表3 俄罗斯帝国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人口

省和边疆省	男性（人）	女性（人）	占该省人口总数的比例（%）
巴库	372584	305768	82.05
达吉斯坦	263567	277394	94.69
伊丽莎白波尔	309170	243678	62.96
卡尔斯	76450	69331	50.16
库班	53371	49942	5.38
库塔伊西	64115	53512	11.12
斯塔夫罗波尔	22219	16176	4.39
捷列克	252381	234081	52.18
第比利斯	104805	84852	17.98
黑海	2080	1030	5.41
埃里温	190097	162254	42.47
合计	1710839	1498018	34.54

资料来源：Арапов Д. 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описания,статистика. С.324 - 327。

表4 俄罗斯帝国西伯利亚地区的穆斯林人口

省和边疆省	男性（人）	女性（人）	占该省人口总数的比例（%）
阿穆尔斯克	532	119	0.54
叶尼塞斯克	142	1760	0.86
外贝加尔	2312	714	0.48
伊尔库茨克	4979	2552	1.48
滨海	1192	89	0.57
萨哈林岛	1625	209	6.52
托博尔斯克	33991	30161	4.47
托姆斯克	22618	18215	2.12
雅库茨克	1269	607	0.70
合计	68660	54426	2.20

资料来源：Арапов Д. 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описания, статистика. С.324 - 327。

表5 俄罗斯帝国中亚地区的穆斯林人口

省和边疆省	男性（人）	女性（人）	占该省人口总数的比例（%）
阿克莫林斯克	230706	208957	64.43
外里海	178720	156211	88.07
撒马尔罕	458415	380254	97.62
塞米巴拉金斯克	330465	285771	89.71
七河	479406	413614	90.18
锡尔河	764294	648820	96.37
图尔盖	217165	195671	90.99
乌拉尔	253131	225564	74.15
费尔干纳	844329	717147	99.09
合计	3756631	3232009	90.29

资料来源：Арапов Д. 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описания, статистика. С.324-327。

此外，尽管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允许穆斯林男性有组建一夫多

妻家庭的权利，但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只有极少数人有能力享受这一权利。识字率低在俄帝国穆斯林中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到1897年，识字的穆斯林仅约100万人，其中2/3为男性。

应该指出的是，1897年的全俄人口普查资料仍然按照中世纪的阶层标准进行划分，既没有考虑到19、20世纪之交俄社会出现的新情况，也没有顾及穆斯林社会制度的传统特征。此次人口普查的分类主要集中在信仰和语言两个方面，而不是居民的民族属性。绝大多数穆斯林在1897年被确定为突厥-鞑靼语居民和高加索山地语居民，他们约占被研究对象总数的90%。

二 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贵族

穆斯林贵族是俄帝国穆斯林的最高特权集团，许多世袭贵族及其他名门望族的后裔身居穆斯林世俗上层高位。1784年2月22日，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法令，赋予鞑靼穆斯林公爵和贵族享有俄贵族的一切特权，但不包括管理基督徒农奴的权力。[5]该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到19世纪末，俄帝国共计约有7万名穆斯林贵族、贵族后裔和高官，占全俄贵族总数的5%左右。[6]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全俄所有的穆斯林贵族都能够享有这类特权，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富裕，有些人甚至连申请加入省城名门贵族谱系的能力都没有。这种情况在塔夫里达省乌拉尔附近和鞑靼-巴什基尔人贵族中非常普遍，他们居住在农村，“既无知识又无职业，无异于庄稼汉”。[7]另外，由于穆斯林贵族绝大多数没有“名门贵族”的出身证明，所以俄帝国于1816年和1840年分别颁布法令，赋予穆斯林贵族确认贵族的权利。[8]事实上，担任军职或文职是穆斯林晋升和巩固贵族阶层的最可靠途径。例如，1814年，乌法省贵族会议一次就承认了64位参加反拿破仑远征军的穆斯林的贵族资格。到20世纪初，欧俄地区的穆斯林贵族，如阿克丘林家族、叶尼科耶夫家族、捷夫科列夫家族等都积极参与了俄帝国的政治生活，为俄帝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立陶宛和波兰的部分领土被并入俄帝国版图，这给那里的鞑靼贵族开创了法律特例，因为俄法律规定穆斯林不允许拥有基督徒的财产。但是，在确信西部鞑靼贵族（约有200个家族）的忠诚之后，俄帝国通过了专门决议（1840年），赋予这部分穆斯林贵族拥有对基督徒农奴特殊的、例外的合法管理权。[9]难怪穆斯林政

论家伊斯玛依尔·伽斯普林斯基认为，20世纪初的西部穆斯林贵族是俄穆斯林社会中最欧化的一个群体。[10]

高加索和突厥斯坦穆斯林贵族的社会状况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高加索、突厥斯坦的农业区和游牧区贵族基本上保持了对土地、牲畜的所有权，他们担任军职或文职，获得赐封的官职、勋章和名誉，最后取得贵族地位。获得享有世袭贵族权利的官职或勋章的那些人，经协调可以参加自己领土之外遴选贵族组织的生活。

穆斯林贵族在俄军队服役是其生活的重要方面。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守卫旅顺的萨马德别克·梅赫曼达洛夫和阿里·阿加·什赫林斯基就以英勇而闻名，两人后来都晋升为将军。[11]可以说，穆斯林贵族基本上成功进入了俄帝国的国家管理机构体系。

三 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商人

在俄穆斯林的传统社会生活中，商业活动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1897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俄帝国约有7000名穆斯林商人。这个数目仅包括官方统计的一等、二等或三等商人，毫无疑问，从事商业活动的穆斯林人数远比这个数目多得多。积极加入这个行列的还有小市民群体（1897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其人数约为30万人）和穆斯林其他阶层的人员。当然，大部分穆斯林的商业活动没有超出传统的小商品交易范围，他们的收入相当微薄。但是，在穆斯林圈内还是可以找到拥有雄厚资本的商人或企业家。18世纪末，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附近就已有近千名拥有几万卢布资本的鞑靼大商人，尤其是那些在俄帝国同中亚地区的贸易中从事中介活动的阿斯特拉罕、奥伦堡、鄂木斯克的鞑靼人。到19世纪末，俄国出现了一些真正的穆斯林商业家族，如奥伦堡的胡赛因诺夫家族（拥有资本约500万卢布）、乌法的捷别尔杰耶夫家族、喀山的阿克丘林家族等。

随着俄工业在民族地区的迅速发展，制革、肥皂制造、饮食和毛制品行业成为欧俄地区穆斯林企业家的主营领域。[12]许多突厥斯坦穆斯林企业家积极参与采摘、加工和销售中亚棉花的组织。[13]穆斯林商人及其雇员的俄国籍，不仅保障了他们的人身、财产权利在俄帝国境内不受侵犯，而且也保护了他们在相邻领土上的权利。俄附庸国布哈拉的商人们千方百计地想取得俄国籍，就是因为拥有俄国籍可以使其人身及财产免受布哈拉官僚的盘剥与压榨。

19、20世纪之交的俄经济领域中，石油开采、冶炼中心巴库的地位非常突出，大量穆斯林石油大亨会集于此。其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首富（拥有资本约1600万卢布）加志·泽伊纳拉布丁·塔吉耶夫。此人从一个穷苦的学徒跻身千万富翁、慈善家和学术艺术庇护人之列。塔吉耶夫被俄帝国当局授予最高勋章、四等文官官衔。1910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升塔吉耶夫为俄帝国世袭贵族。[14]

四 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哥萨克”

哥萨克是俄帝国的一个特殊军人阶层，许多异族和异教徒与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一起加入各种各样的哥萨克军行列中。1897年的全俄人口普查显示，大约有4.5万名穆斯林被编入哥萨克军中服役。高加索山地居民主要在顿河、库班河和捷列克河哥萨克军中服役，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哈萨克人在顿河、乌拉尔、奥伦堡、七河和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军中服务。[15]为此，俄制定了保证哥萨克军队中穆斯林（当然也包括所有在俄军中服役的穆斯林）宗教权利的专门细则，其中规定了征召入伍的穆斯林军人宣誓、祈祷的方式，以及按照沙里亚法仪式安葬的权利等。[16]

五 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平民

毫无疑问，大部分俄帝国穆斯林属于平民百姓阶层。在1897年的全俄人口普查中，90%以上的穆斯林被确定为农民和异族，其中后者包括西伯利亚的吉尔吉斯人、斯塔夫罗波尔省的游牧异族、内盟[17]的哈萨克人以及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七河、乌拉尔和外里海等边区省的异族。这些农民和异族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20世纪初，一部分穆斯林还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主要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附近的制革及肥皂制造工厂、突厥斯坦的净棉企业、巴库的石油作业场等工作。

六 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宗教界

尽管1897年的全俄人口普查基本上厘清了俄帝国穆斯林社会的人口状况，但却忽视了穆斯林最重要的一个阶层，即在官方文件和文献中被称为“穆斯林宗教界”的那个群体。对没有教阶组织的伊斯兰教来说，使

用“宗教界”这个概念无疑是不准确的。但是，在俄帝国伊斯兰学文献中经常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关的社会阶层相提并论，把伊斯兰教的“宗教界”确定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功能包括保存宗教知识并对教友社团实行宗教与道德领导”。[18]18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法律文件的出台，俄逐渐确定了穆斯林宗教机关神职人员（所谓的“法定毛拉”）和供职人员的范围。他们可以获得国家薪俸、免除徭役赋税、免服兵役、有权享受来自相关教区的收入、房屋免受军队宿营等权利。[19]而在登记穆斯林宗教机关名单时未注册的那部分神职人员，则不享受任何特殊权利。据俄帝国异教信仰事务司统计，1912年1月1日，俄帝国正式登记在册的穆斯林教区有24321个，礼拜寺（大清真寺、冬夏清真寺和祈祷堂等）26279座，穆斯林神职人员（伊玛目、毛拉、海推布、穆安津等）45339名。[20]总而言之，随着俄帝国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被纳入其国家管理体系。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穆斯林穆夫提[21]官员荣膺俄帝国功臣称号，不止一次地获得俄帝国最高勋章奖励。如首位穆斯林将军库特尔-穆哈迈德·捷夫科列夫的曾孙谢里木-基列伊·捷夫科列夫于1865～1885年担任奥伦堡穆夫提，他因功勋卓著而荣获安娜和圣斯坦尼斯拉夫一级勋章等。③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俄帝国不断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异域领土被并入其庞大的版图，越来越多的异域穆斯林成为其臣民。与此同时，穆斯林，尤其是穆斯林贵族，在为俄国家建功立业的同时，也获得了与其贡献相当的各种权利和特权，并逐渐融入俄贵族行列和国家管理体系。

原载《世界民族》2006年第1期

[1] 汪金国，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 洪丽萍，时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3] 参见Арапов Д. 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описания，статистика. М.，ИКЦ “Академкнига，” 2001.С.27。

[4] 据В. И. 列宁估计，1910年俄罗斯已有2000万穆斯林，В. В. 巴托尔德援引了该数据。参见Барьольд В. В. Записка о печатном ислам оведческом органе в России. СПФ АРАН，ф.68，оп. I，ед. х.433 л.I。

[5] 参见Арапов Д. 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описания，статистика. С.48。

[6] 参见Арапов Д. Ю.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е дворянств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Мусульмане. 1999. № 2-3. С.48。

[7] Корелин А. П. Дворянство в пореафор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1979. С.48.

[8] 参见Арапов Д. 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описания，статистика. С.68，127，130。

[9] 参见Арапов Д. Ю.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лавянским и неслаянским группам дворянств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ывшей Речи Посполитой.-Межславянск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М. ，1999。

[10] 参见Арапов Д. 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описания，статистика.С.29。

[11] 参见Абасов А. Т. Генерал Мехмандаров. Баку，1977；Ибраимов С. Д. Генерал Али Ага Шихлинский. Баку，1975。

[12] 参见Хасанов Х. 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татарск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нации. Казань，1977. С. 42，92，92，115。

[13] 参见Арапов Д. Ю. Буха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 в русской востовед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ю графии. М. ，1987.С.62。

[14] 参见Ибраимов М. Дж.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Г. З. Таиева。

[15] 参见Казачьи войска//Опыт военно-о описания. СПб. ，1881. С.149-151。

[16] 参见Арапов Д. 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описания，стастика. С.190，262，263，265。

[17] 内盟或布克汗国（Внутренная Орда/Букеевская Орда）是19～20世纪初哈萨克的一个汗国，俄国的藩属，名称取自布克·努拉利莫夫苏丹的名字，由来自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小玉兹的5000户移民组成，后归并于阿斯特拉罕省。

[18] Ацамба Ф. М. ，Кириллина С. А. Религия и власть：ислам в Османском Египте. XVIII-первая четверть XIX вв. М. ，1996. С.137.

[19] 参见Арапов Д. 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описания，стастика. С.190-254。

[20] 参见Рыбаков С. Статистика мусульман в России. Мир ислама. ，1913，т.2，№ 11. С.762。

[21] 指熟谙《古兰经》、“圣训”及其他教法典籍的伊斯兰教教法释解者。

19世纪初俄国对中国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

恽文捷[1]

19世纪前期正是英法俄等欧洲资本主义新兴强国创建亚洲学会和地理学会、培养学者、出版学刊、鼓励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明知识建构、推动全球殖民扩张事业的高峰期。殖民扩张不仅激励了欧洲各国对亚洲内陆地区的探索和考察，更促成东方学的学术发展和转型。在亚洲内陆研究史里，俄国在1810～1820年对中国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和考察活动是促进近代欧洲亚洲内陆研究学术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19世纪初，建立在中世纪晚期旅行者旅行记、伊斯兰突厥蒙古文献和15～18世纪基督教传教士作品基础上的中北亚研究向基于近代“科学主义”（scientificism）的中亚研究转变，欧洲近代地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地缘政治学和军事学等学科成为东方学亚洲内陆知识建构的重要工具，科学实证主义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取代道听途说的旅行记录和传教士的文献翻译。其具体标志，便是欧洲学界指称亚洲内陆的术语从基于蒙古历史文化的“鞑靼利亚”（Tataria，Tartarie，Tartary，Татария）[2]演变为基于近代地理学和政治学的“中央亚细亚”（Asie Centrale，Central Asia）。本文拟对19世纪初俄国的中亚探索考察及其对欧洲东方学学术转型的影响进行研究。[3]

一 1811～1820年俄国对中国新疆伊塔地区和中亚汗国的探索与考察

18世纪初，彼得一世改革把“贸易强国”的理念扎根在俄国精英阶层，富饶的印度和中国成为俄国商人期盼的贸易对象，俄中印之间的广袤地区遂成为俄国军政学界研究与接触的对象。1722年，彼得大帝在阿斯特拉罕说：“尽管吉尔吉斯人[4]是迁徙不定的民族，但南部大草原是通往东方所有国家的锁钥和门户。”[5]其后，俄国在中亚大草原和西伯利亚不断创设哥萨克村落，以之为核心构建往东南方向推进的“堡垒线”（要塞线，ЗасечнаяЧерта），从而建立了一套稳步挺进、压制和分割游牧民的有效扩张方式。[6]1718年，俄国在额尔齐斯河畔修建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堡；1734年，又修建了“通向东方的窗口”——奥伦堡。至19世纪初，俄国势力范围已经扩张至里海西岸、北岸和咸海北部，并向东延伸至巴尔喀什湖。俄军基本完成对哈萨克大草原北部的征服，控制了

哈萨克的中小玉兹和毗邻归附中国的哈萨克大玉兹。[7]阿斯特拉罕、奥伦堡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三座要塞遂成为俄国挺进中亚的大本营。[8]

此时，拿破仑战争的消耗和战后经济的发展急需俄国拓展东方贸易。管理俄国西伯利亚堡垒线的将军们并不满足于《恰克图条约》所规定的俄商从恰克图经库伦和张家口至北京的贸易路线。他们希望开辟塞米巴拉金斯克与中国新疆塔尔巴哈台、伊犁之间的贸易。正在进行高加索战争的俄国总督也希望建立和改善同里海东岸土库曼部落与希瓦汗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保护俄国商队的安全。俄国驻奥伦堡的总督则致力于扩大从奥伦堡经锡尔河的咸海入海口和克孜勒库姆沙漠到布哈拉的马帮贸易，巩固俄国与布哈拉良好的外交关系，并深入了解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汗国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状况。当时，有专家提出构想，如果与中亚汗国的关系保持稳定，俄国商队就有望从阿斯特拉罕渡过里海，沿阿姆河旧河道，或从奥伦堡经咸海走阿姆河新河道，再经希瓦和布哈拉沿阿姆河溯源而上，通过阿富汗进入印度西北部，部分实现彼得一世和保罗一世的印度梦。1811年，俄国军官普提姆雪夫（M.Poutimtsev）受命化装随中亚商队对塔尔巴哈台和伊犁进行秘密调查，意图侦测当地情报并评估开辟俄中新疆贸易的可能性；1813～1814年，因浩罕派赴俄国的使节在归途中去世，菲利普·纳扎罗夫（Philippe Nazarov）受政府之命赴浩罕汗国向爱玛尔汗（Muhammad Umar Khan）解释并递交国书；1819～1820年，尼古拉·穆拉维约夫（Николая Н.Муравьев）受命经土库曼地区赴希瓦汗国，向拉吉姆汗（Mahomed Ragim Khan）递交俄国格鲁吉亚军区总司令叶尔莫洛夫（Алексей Петрович Ермолов）的亲笔信以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1820年，沙皇委派国务顾问内格里（M.de Négri）率团出访布哈拉并觐见该国埃米尔海达尔（Haydar Torabin Shah Murad）以促进两国贸易，同时调查中亚贸易路线和布哈拉汗国及周边地区情形。他们的考察报告刊发后迅速被英法德学者翻译，在欧洲东方学界引发巨大反响。

（一）1811年俄国翻译官普提姆雪夫乔装探查伊塔地区

1811年，为了探索额尔齐斯河上游中俄贸易的前景，西伯利亚堡垒线司令官格拉森纳普将军（Glasenap）命其副官兼突厥语翻译普提姆雪夫化装成西伯利亚鞑靼商人，在斋桑泊附近额尔齐斯河支流布赫塔尔马河畔的布赫塔尔明斯克（Буктырминск）加入鞑靼商人聂尔品（M.Nerpin）的马帮商队赶赴伊犁，沿途搜集新疆的地理、商业和社会

情报。该商队由布哈拉人热希德（Rechid）之子拉希姆伯克（Rahim-bek）管理[9]。

1811年6月4日，商队渡过中俄界河——额尔齐斯河支流纳雷姆河（Nartym），沿着卡尔巴山（Kalbin）经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Oust-Kameogork）走上通往塔尔巴哈台（Tchougoutchak）和伊犁（Gouldja）的道路。6月6日，马帮在被称为“吉尔吉斯巴特”（KirghizBat）和“辉迈喇虎”（Khona-mailkhai）的中国卡伦处交了“十一税”，进入中国国境。

6月19日中午，马帮抵达哈萨克部落卡姆巴尔苏丹（Sulthan Kambar）处。卡姆巴尔为马帮写了一封致塔城“参赞”（Keb）和“协办领队（Batyr）大臣”[10]的推荐信，以朝贡贸易为名推荐商队赴塔城和伊犁。

7月15日，普提姆雪夫打扮成塔什干商人带部分商队前往塔尔巴哈台。到达塔城外的卡伦后，普提姆雪夫把推荐信交给卡伦侍卫。[11]次日，普提姆雪夫和4名塔什干商人入城拜见塔城的两位驻防大臣，并到管理商贸的抚民同知和管理马帮商队的笔帖式（Bachi）处验货缴税，再到巴扎卖货。普提姆雪夫借买卖的机会搜集了塔城的相关情报，调查了城墙的结构、高度和厚度，以及塔城的城市规模、人口构成、民族和商贸状况等。[12]

8月10日，商队离开塔城前往固勒扎。8月22日，商队来到伊犁边界卡伦。他们的货物因未提前申报和当地接到伊犁将军禁止走私的命令而被留在卡伦处，只让牲畜通行。于是，商队成员先到绥定城（Khachemir），再到惠远城（固勒扎古里，Gouldja-kourè；又名将军城，Dziangghiun-khotò）里向各处官员和通事送礼以打通关节。9月3日，普提姆雪夫等人在固勒扎以卡姆巴尔苏丹商队的名义拜见伊犁将军，接受问询并馈赠礼物。不久，他们取回货物进行买卖，利润比中国政府的官营贸易大得多。普提姆雪夫一行在伊犁停留45日，他有完全自由，没有暴露身份。他全力搜集当地各种情报，详细了解伊犁的军府制度、城市建设、社会经济和商业状况。10月14日，商队启程返回俄国。11月6日抵达斋桑泊，同月18日返回布赫塔尔明斯克。据普提姆雪夫计算，商队来回走了两条路，其中一条从布赫塔尔明斯克到塔尔巴哈台的路有446俄里，再有731俄里到固勒扎；另一条长度分别是595俄里和870俄里，后者障碍较少，适合车辆通行。[13]

普提姆雪夫的伊犁之行被整理为考察报告《1811年从布赫塔尔明斯克至中国准噶尔都城伊犁旅行记》出版。

（二）1813～1814年纳扎罗夫出使浩罕汗国

1812年，浩罕汗派遣两位使节赴俄。他们在归途中于彼得巴甫洛夫斯克（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停留，其中一位病死，另一位被谋财害命。为了对此事进行解释以消除误会，俄方翻译菲利普·纳扎罗夫自荐承担赴浩罕说项之使命，并获鄂木斯克（Омск）要塞司令官授权。

1813年5月16日，要塞司令官将俄国皇帝致浩罕汗的书信交给纳扎罗夫，命其携带书信和礼物，在一小队哥萨克士兵的护送下同浩罕使团以及一支驮运了价值20万卢布货物的俄国商队赶赴浩罕都城，以便与浩罕建立商贸关系，并设法获得浩罕汗给俄国皇帝的回信。

纳扎罗夫一行从鄂木斯克出发，经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和中亚大草原前往浩罕。他选择从一条叫作“阿布赉汗”（Ablai-khan）的穿过中玉兹的古道前行。他边走边观察，详细记录了沿途的山川、地形、气候、居民和土产等信息，尤其详细描述了被俄国人称为“吉尔吉斯-哈萨克”的中亚草原游牧民的宗教、风俗、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形态和周边关系等。穿过草原后，商队将经过浩罕的苏扎克（Suzak）、图尔克斯坦、奇姆肯特、塔什干和霍占特等城市。[14]

彼时浩罕国势正蒸蒸日上。浩罕汗四处征战、不断扩张，刚刚吞并图尔克斯坦。俄国商队在向导的帮助下，绕行楚拉克（Tchoulak-achi），翻越卡拉套（KaraTau）山脉，以避免纠纷。自奇姆肯特起，商队由200名浩罕士兵护送至塔什干。塔什干的官员扣下了商队和部分哥萨克护卫，只让纳扎罗夫与浩罕使团成员赴浩罕城。抵达霍占特后，纳扎罗夫沿锡尔河东行，终于在1813年10月初来到浩罕城，在离王宫15俄里的花园中搭起帐篷入住。

浩罕汗的维齐尔在当夜拜访了纳扎罗夫，询问俄方来意。纳扎罗夫向其阐明护送浩罕使团回国、两位使节死因以及与浩罕建立贸易关系三大任务。11天后，他终于得以觐见浩罕爱玛尔汗——“埃米尔·瓦利·米阿尼”[15]。

爱玛尔汗年方25岁。纳扎罗夫向他递交了俄国国书和礼物。他看到

王廷上还有来自“中国、希瓦、布哈拉、萨尔萨乌斯（Sarsaous）和山地波斯的使节”。[16]当时，浩罕北部边界已经与俄国势力范围接壤。爱玛尔汗有意试探纳扎罗夫。觐见后让其留在浩罕，以打猎为由带他到浩罕重镇、与中国相邻的地区和浩罕新征服的国土上旅行，以便向俄国展示浩罕的军力和成就。纳扎罗夫因此得以赴玛尔噶朗、安集延、那木干和亚纳库尔干（Yana Kourgan）等地周游观察。事后，他返回浩罕城，经乌拉退帕、霍占特和治扎克（Tchirtchik）到塔什干。1814年8月1日，纳扎罗夫一行与浩罕赴俄使团会合后，终于在同年10月15日返回彼得巴甫洛夫斯克[17]。

纳扎罗夫的记录被整理为考察报告《1813和1814年浩罕旅行记》出版。

（三）**1819～1820**年穆拉维约夫出使土库曼和希瓦汗国

俄国通过高加索战争扩张到里海西北岸后，需要对里海东岸地区进行调查，以便在东岸设立港口、建筑要塞，供俄国商人和军方使用。同时，俄国也有意拉拢居住在东岸地区的土库曼部落以制衡希瓦并扩大俄国的利益。1813年，俄国驻格鲁吉亚总督拉提谢夫（Николай Федорович Ртищев）派遣杰尔宾特（Дербент）商人、亚美尼亚人伊凡·穆拉托夫（Армянин Иван Муратов）出访正率领土库曼各部与波斯作战的苏丹汗，意图提供支持并建立关系。苏丹汗立即组建由数部首领和长老组成的访俄使团赴高加索寻求俄国的支持和庇护。然而，彼时俄方刚与波斯国王全权代表签署和平条约，明确承诺不与土库曼部落发展政治关系。总督遂将土库曼使团遣回。此举使土库曼人陷入被动，被迫对波斯让步，并寻求希瓦统治者拉吉姆汗的保护。俄国与土库曼的关系陷入危机。

1819年6月，曾担任驻波斯大使的俄国驻格鲁吉亚总督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叶尔莫洛夫正在指挥高加索战争。他决定尽快发动对波斯的战争，还打算将领土扩大至阿拉斯河一线，并准备占领埃里温和纳希切万。[18]为了牵制波斯并扩大里海东岸的贸易，他派遣伊丽莎白托波尔（Елисаветпол）的指挥官珀诺马列夫上尉（Майор Пономарев）重启与土库曼人的政治谈判。其参谋官即懂得鞑靼语的格鲁吉亚军区总参谋部上尉穆拉维约夫负责协助其对里海东岸进行测绘，由伊凡·穆拉托夫担任翻译。不久，穆拉维约夫受命只身赴希瓦汗国，尝试通过破冰之旅

与希瓦汗结盟，并沿途秘密搜集所经土库曼人居住区和希瓦汗国的情报，争取希瓦与俄国互派使团并建立外交关系。[19]

穆拉维约夫于6月18日离开第比利斯，20日抵达伊丽莎白托波尔。7月1日，他和珀诺马列夫上尉启程。7日抵达港口巴库，率1名军官和30名士兵搭乘装备18门炮的海防舰喀山号和商船圣波利卡尔普号沿着里海西岸向南航行。他们在里海南岸一带对土库曼地区进行了详细调查和测绘。9月10日，航行至里海东岸克拉斯诺沃茨克（Krasnovodsk）湾。15日，俄方与巴尔坎湾一带土库曼部落首领们缔结互助协议。

9月17日，穆拉维约夫携带叶尔莫洛夫和珀诺马列夫致希瓦汗的两封信启程奔赴希瓦城，请希瓦汗派遣访俄使团，并保护穿过土库曼到巴尔坎湾登船赴阿斯特拉罕的俄国和希瓦商队。他从巴尔坎湾北部出发，经过铁木真（Demour-djem）、图尔（Touer）、贝什-迪奇克（Bech-Dichik），穿过乌浒河旧河道，于10月5日抵达希瓦城附近。10月6日，有传言说俄国正派军队为曾被希瓦人杀死的亚历山大·比科维奇-切尔卡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Бекович-Черкасский）复仇，穆拉维约夫可能是间谍，希瓦汗遂命手下将穆拉维约夫安置在和卓马尔加姆（Khwaja Margam）的亚尔·卡尔迪堡（Yal Kaldi）内软禁。

穆拉维约夫被软禁了一个半月，饱受惊扰，多次面临被处死的危险。他通过观察和交流获取了大量有关希瓦的信息并记录下来。11月4日，珀诺马列夫派人给希瓦汗和穆拉维约夫各送了一封信。11月15日，穆拉维约夫计划逃跑。次日，他得到希瓦汗要召见他的消息。

1819年11月20日，穆拉维约夫在希瓦城觐见拉吉姆汗。希瓦汗身高超过1.8米，胡须短而红，嗓音甜美，吐字清晰、流畅，颇有威严。穆拉维约夫呈递了总督的信件，表达了俄方希望与希瓦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开辟从阿斯特拉罕至克拉斯诺沃茨克湾，再到希瓦的贸易路线的意愿。希瓦汗回答说，尽管里海东北岸经曼格什拉克的传统商道缺水且绕路，但周边部落都臣服于希瓦，而巴尔坎湾至阿斯特拉巴德的沿岸部落则受卡贾尔人（Kajars）支配。新商道无法保证浩罕商队的安全。穆拉维约夫遂建议两国结盟。希瓦汗同意派遣使团赴俄协商。[20]

11月21日，穆拉维约夫和希瓦使团启程返回高加索。12月14日，使团在里海边与珀诺马列夫和俄国船只会合。1820年1月21日，希瓦使团在杰尔宾特与叶尔莫洛夫总督会面。2月24日使团抵达第比利斯。4月

22日希瓦使团启程返回。[21]穆拉维约夫随之再度访问希瓦，意图解决俄国奴隶问题，未获成功。

穆拉维约夫此行的记录和研究被整理入《1819至1820年土库曼与希瓦旅行记》一书。

（四）**1820**年俄国使团出访布哈拉汗国

18世纪后期，俄国与布哈拉之间的贸易关系得到大幅拓展。1775～1819年，布哈拉先后向俄国派遣了11个使团。1820年，访问圣彼得堡的布哈拉使团以布哈拉统治者的名义向俄方表达了邀请俄国使团访问布哈拉的意愿。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不仅想巩固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更想进一步了解布哈拉的相关信息，获取更多情报，于是命其国务顾问内格里（M.de Négri）担任使团秘书率团出访布哈拉。内格里为希腊人，曾在叶尔莫洛夫使团中担任翻译。内格里使团成员还包括：皇家学院议员雅克甫列夫（M.de Jacovlew）、著名自然学家医生潘德尔（Pander）、三名奥伦堡的翻译、负责搜集地理和统计数据的瑞典裔男爵梅彦多夫（Его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Мейендорф/Georg Wolter Konrad von Meyendorff）上校及其助理参谋副官福尔孔斯基（M.M.Volkonsky）、谢莫斯伊尔夫（Simosryrf）等人。因受沙皇钦点，且路途对后勤补给要求较高，还可能受到哈萨克和希瓦游牧部落的抢掠，所以俄国组建的使团规模较大，包括200名哥萨克士兵、200名步兵、25名巴什基尔骑兵、2门炮、358匹驮运行李的骆驼和400匹马。[22]

1820年10月10日，使团在奥伦堡大广场受总督检阅，整装出发。使团所走的奥伦堡和布哈拉城之间的商道分为3段。第1段是从奥伦堡到穆戈贾尔山之间的山脉和森林地带；第2段是从穆戈贾尔山到锡尔河的戈壁地带；第3段是从锡尔河到布哈拉的沙漠地带。使团必须穿越克孜勒库姆大沙漠。

1820年12月20日，使团进入布哈拉城。布哈拉埃米尔海达尔携其两子在宫廷中接见了俄国使团。内格里用波斯语同布哈拉人交流，呈递了俄皇致布哈拉汗的信件。海达尔大约45岁，黑眼睛、橄榄色面庞，蓄了全须。看外貌甚为虚弱、缺少智慧。整个觐见过程持续大约20分钟。

俄国使团在布哈拉城停留至1821年3月10日。3月25日离开布哈拉

国境。[23]其间，俄国使团对布哈拉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调查研究，相关资料被整理入《1820年奥伦堡至布哈拉旅行记》一书。

二 俄国考察报告对中国新疆和中亚汗国的研究及其影响

上述俄国使团的出访目的地虽各有不同，其使命却有诸多交集：首先，是开辟俄国与相关地区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其次，是全面搜集这些地区的人文地理信息；最后，是考察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局势与军事防御状况，探讨俄国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他们的考察报告不仅极大丰富了俄国人对中国新疆和中亚汗国的了解，为日后俄国征服中亚奠定初步知识基础，更因其出版和翻译引起英法东方学界的兴趣，激发了英属印度和欧洲学界加强中亚探索的愿望。

就内容而言，俄国考察报告除了刊布调查搜集的中国新疆和中亚汗国山川地理与人文社会信息外，还特别对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评论。这些信息和评论属于当时欧洲东方学亚洲内陆研究最前沿的学术领域，也展现了19世纪初期俄国对中亚地区知识建构的特点。它们与17和18世纪的传教士东方学有很大不同，是英法学界迫切需要了解的实用知识。于是，在俄国学术的启发下，英法东方学界开始构建“中央亚细亚”的自然地理、地缘政治、民族文化和社会经济知识体系。19世纪30年代，英属印度和印度事务部的专家阅读了俄国报告后，开始发掘英国早期中亚探索者如摩尔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等人的档案文件，着手建立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中亚战略。

因此，俄国对中国新疆和中亚汗国的研究报告展现了19世纪初欧洲对相关地区的认识水平，其关注点亦颇富时代色彩，值得深入探讨。

（一）俄国考察报告对中国新疆的调查研究

普提姆雪夫和梅彦多夫的报告均提供了有关新疆天山南北直接或间接的信息。他们搜集的信息集中在以下几点：（1）新疆内外的商道和商贸信息；（2）南北疆诸城社会经济状况；（3）诸城驻军与军事防御情报；（4）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体系。兹简述如下。

普提姆雪夫调查得知，塔城城墙用砖石构建，设有角楼和由两条河流改道而成的护城河。城里有600间房屋，整座城市就是一个大兵营。大多数居民因贸易从中国各地而来，主要为商人、工匠和农民。他们只

是暂时居住，唯有流犯是常住居民。塔城的商人主要是中国的卡尔梅克、土尔扈特和厄鲁特臣民。普提姆雪夫认为，清政府对这些游牧民族并不放心，每年都从伊犁调兵1500名以守卫边疆。

塔城与科布多、乌鲁木齐、南疆等地保持贸易关系。货物主要以牛车和马车运输。到科布多要走20天，到乌鲁木齐则要走32天。科布多的贸易量较小，乌鲁木齐则因生产纺织品和日用品而非常富裕。塔城商人还经常赴喀什噶尔、和阗和叶尔羌贸易，贸易额也非常可观。普提姆雪夫在塔城和伊犁都没有找到好茶，只看到被俄罗斯称为“克尔比乔伊”（Kirpitchno）的砖茶。塔城附近种有大麦、小麦、小米以及质量不佳的稻米。他只看到很少的苹果树，但当地每年收获的蔬菜和烟草较多。[24]

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固勒扎古里）坐落于伊犁河畔，为新疆首府。汉人（Kara-Kitai-Nogo-ntouk[25]）和“东干人”（汉回，Tougean）聚居在突厥语名为“克什米尔”的绥定城，满人聚居在巴彦岱。宁远城距离惠远城50俄里（53.34公里），是维吾尔人聚居的城市，由伊犁将军和阿奇木伯克管理。

伊犁将军总统伊犁、叶尔羌和其他各商业都会事务。喀什噶尔驻扎了另外一个由五个翼长（Galai-da）辅佐的“将军”，下辖三位大臣，分别负责处理汉人、维吾尔人和“东干人”事务。大事由将军和大臣会议决定。伊犁军府里，汉人负责军事、商业、财政和礼仪等事务。他们拥有文官品级，却并非皇帝任命。

除了满人外，伊犁及周边的驻防军人大部分是游牧民族出身。这些驻军施行屯田政策，一小部分驻在城中，大部分驻扎在周边村庄里。伊犁的军队是与哥萨克类似的骑兵部队，有满洲四旗（Khocho），每旗十甲喇，每甲喇百人。普提姆雪夫据此推算伊犁的驻军数量：满洲4000人、厄鲁特6000人、察哈尔6000人、索伦6000人、锡伯6000人，总计28000人。这些军队驻在塔城、伊犁与博罗塔拉的边界，还在帖克斯（Tekest）山和塔勒奇山巡逻。该部队没有制式装备。多数人配有弓箭、鞍鞯和长矛，所有人都有刀。和平时期，每个人管理自己的马匹和武器，战争时期则由政府配给。驻军军饷用银两支付。满洲兵每月军饷是1.67～2.22两白银，蒙古兵是1.11两。此外，他们每月还有30斤粮食配给。伊犁军队的火炮只在迎接高级官员来访以及天明和天黑的时候发射，以便通知开关城门。这些铁炮太小，无法瞄准。使用的时候只能放

在地上直接开炮。[26]

伊犁惠远城约有一万座房屋，均不甚大。城中庙宇辉煌壮丽。该城人口不多，却非常富裕，贸易和服务业十分繁荣。来自中国内地、西亚、布哈拉、浩罕、玛尔噶朗、安集延、塔什干、印度和克什米尔的商人都会聚于此。除买卖人外，还有金匠、炉匠、铁匠、锁匠和木匠等。伊犁有喀什、和阗与阿克苏所产的纺织品销售。外国商人们多做丝、棉混合织品生意，汉人从事批发贸易和其他各种工作，“东干人”从事农业、零售贸易、旅店业并开设茶馆和赌场，蒙古人畜牧种地，从南疆六城地区迁来的“塔兰奇人”耕种并从事手工业。绥定到惠远城之间都是内地遣犯们的屯垦之地。在伊犁，牛马是大宗商品。除了部分卖给哈萨克人，还供给各地驻防军队，也用于与乌鲁木齐居民的贸易。多余的马匹送往政府马厂（Toumourada）畜养。伊犁的俄国货物主要是皮张，但并不如哈萨克人的皮毛货物那样被允许进入伊犁。这些皮张一部分供给军用，一部分卖给北京来的驻扎大臣。[27]

伊犁对入境货物所收税率不固定。丝绸之路上，从西亚诸国经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和阿克苏等城贩入伊犁的商品通常每种被抽取1/30的份额以抵应纳之税。马匹和骆驼免税。伊犁居民并不免税，每月都要根据各自的职业以货币形式向政府缴税。“塔兰奇人”在20～50岁要负责耕种国有土地。他们以实物形式缴税，每人每年向政府上缴8袋粮食。[28]

出访布哈拉的梅彦多夫特别调查了连接俄国、中亚汗国、中国新疆和印度北部的商道信息。他记载到，布哈拉人称“中国新疆地区”（Le Turkestan Chinois）为“阿力提斜合尔”（Alti-Chakan），即六城之地，包括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和伊犁二城大小固勒扎。[29]从叶尔羌到克什米尔的通道上还坐落有“大土拔特”（Le Grand Tibet）和“小土拔特”（Le Petit Tibet）两城，即拉达克和德拉乌斯（Draouse）或德尔瓦齐（Dervazéh）。他将自己搜集的信息与格鲁吉亚旅行者拉斐尔·达尼贝格（Raphael Danibeg）的数据、布哈拉地理学家沃鲁格伯克（Oloug-beg）的地理表格、学者格拉维亚斯（Gravius）1652年著作里的地理数据进行比较，确定了伊犁和喀什噶尔的经纬度。他还参考了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Carl Ritter）的著作和森科夫斯基（J.Senkowski）翻译的布哈拉文献，计算了各城距离：克什米尔距离“土拔特”200俄里，需走20天；从拉萨到“土拔特”需走3个月；从“土拔特”到叶尔羌要走40天；叶尔羌到阿克苏要13天；阿克苏到乌什吐鲁番（Tourfan）要3

天；从乌什到塞米巴拉金斯克要3个月；从喀什噶尔到阿克苏要12天，到伊犁要25天，到塞米巴拉金斯克要55天。[30]此外，从布哈拉和浩罕经鄂什（Uch）到喀什噶尔要翻越绵延的阿赖山脉（Ala-Tagh）。从鄂什通往喀什的铁列克（Terek）地区气候常年寒冷。有三条商道穿过阿赖山脉：一条经贝劳里（Belawli）或塔里格（Tallig）通向山北；一条从中间穿过铁列克地区；一条向南经过查尔特（Chart）。三条山路是浩罕汗国通往中国新疆南部的必经之地。[31]

经过调查，梅彦多夫认识到，布哈拉、浩罕汗国与中国新疆、俄国的贸易对其国家财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两国商人在中俄之间进行转手贸易牟利。他们在伊犁、阿克苏和喀什噶尔贩卖的俄国商品包括布匹、珊瑚、珍珠、洋红染料、金箔、丝绒、金线、银线、德国水獭皮、貂皮、皮张、糖、大镜子、红铜、铁犁、黄铜、针、玻璃珠和俄制南京棉布等。他们从喀什噶尔购买大量茶叶、瓷碗、丝绸、生丝、大黄和马蹄银等。中亚汗国商人用马蹄银在大小土拔特购买羊绒，再运到克什米尔制成羊绒披肩并转卖。[32]

普提姆雪夫和梅彦多夫的报告明确表达了中国开辟新疆市场，使之成为俄国与中国内地、印度贸易通道的强烈愿望。此后，通商中国新疆成为俄国政府对华政策追求的目标。

（二）俄国考察报告对中亚汗国的研究与评估

除了搜集和整理地理信息外，俄国考察报告对布哈拉、希瓦和浩罕汗国的种族构成、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军事力量和文化习俗进行了详细研究，为俄国政府及其驻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的总督们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俄国对中亚汗国的征服奠定了知识基础。

中亚地区的民族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是俄国报告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经穆拉维约夫和梅彦多夫调查，希瓦汗国臣民总计约30万人，由四大种族和奴隶构成（见表1）。布哈拉种族更多，人口总数约250万人，其中150万人住在城镇里，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另100万人为游牧民。在布哈拉汗国，骁勇善战的乌兹别克人是征服者（150万人），文雅好学的塔吉克人（65万人）则是统治者，两者似乎是粟特人的后裔。除此之外，布哈拉还有土库曼人（20万人）、阿拉伯人（5万人）、卡尔梅克人（2万人）、吉尔吉斯和卡拉卡尔帕克人（6000人）、阿富汗人（4000人）、莱斯吉斯人（Lesghiz，2000人）、犹太人（4000人）和

吉卜赛人（2000人）。浩罕的种族构成与布哈拉相似，也是由乌兹别克人进行统治。因丝绸之路的影响，中亚地区种族构成的多元化特征非常明显，乌兹别克人在中亚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33]

表1 俄国报告所载1820年希瓦汗国主要种族及其特点

阶层	一	二	三	四	五
种族	萨尔特人	卡拉卡尔帕克人	乌兹别克人	土库曼人	奴隶
俄文	Сарты	Каракалпаки	Узбеки	Туркмены	Невольники
法文	Sarty,Tat Boukhares	Kara-kalpaks	Ouzbeks	Turcomns	Esclave
最初身份	贵族	农奴	征服者	客户	各国臣民
当前身份	商人	农牧民	贵族	战士	奴隶
来源	土著	阿姆河流域咸海南岸	外地	中亚	抢掠的波斯人、俄国人、库尔德人
数量	超过10万人	超过10万人	少于3万人	超过1.5万人	约4万人
特点	狡黠、阴柔，善于经商，大多富有	半游牧、半农耕，受乌兹别克人奴役，贫困	统治者，分为四部，在城镇中担任高级行政长官、地主。掠夺成性	突厥属，贪财好货，喜抢掠、盗窃。精于骑射和战斗。从事游牧和农耕	希瓦现有3000俄国奴隶、3万波斯奴隶和大量库尔德奴隶

资料来源：Н.Н.Муравье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в ТуркмениюиХивув 1819 и 1820 годах, гвардейскогогенеральногоштабакапитана Николая Муравьева, посланноговсиистраныдляпереговоров, Ч.2, с.25–29; M.N.Muraviev, Revu par MM.J.B.Eyriès et J.Klaproth, *Voyage en Turcomanie et à Khiva, fait en 1819 et 1820*, Paris: Chez Louis Tenré , Libraire- éditeur, 1823, pp.255–263。

政治体制方面，三汗国均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其中，布哈拉汗国的政教制度相对成熟，最具典型性。其最高统治者“汗王”理论上是蒙古黄金家族后裔，又称“爱玛尔”，受到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册封。[34]汗王有专制之权。伊斯兰教团宗教学者（Ulema）虽然可以对汗国事务尤其是宗教法庭施加影响，但实权掌握在汗王手中。汗国的政府架构并不规范，独裁统治的特征非常突出。梅彦多夫评论道：

> 布哈拉看起来还没有达到将服务于汗王个人与服务于整个国家全然分开，以及把被宫廷雇佣与在政府工作进行彻底区分的文明成熟度。该国没有与土耳其“大维齐尔”（Grand-Visir）类似的职务，尽管“大伯克”（Couch-Beghi）实际上掌握了相当权力。所有事务都由汗王决定，这可以用该国行政机构简约和国土狭小来解释。被尊称为汗王岳父的“阿塔里克”（Atalik）[35]，其封号为“席萨尔（Hissar）汗”，如同“大维齐尔”那样，成为布哈拉汗国汗王之下的第一人。[36]

“阿塔里克”之下是“军队司令”（Dad-khah或Perwanatchi），再往下是教长（Cheikh-ul-Is-lam），还有主管汗王顾问会议的“伊纳克”（Inak）和主管礼仪与财政的“德斯塔尔汉特奇”（Destar-hantchi）。“大伯克”职掌宫廷和公共事务，下辖管理宫廷内务、财务和禁卫的官员。海达尔汗的后宫有大约200名女子，但只有4位妻子。汗王

的特别顾问团被称为“迪瓦恩”（Divan），为处理紧急事务建立，并非常设。它由汗王钦点的5～20人构成，负责制定汗国的军政大策。

汗国伊斯兰教团的等级体系如下：教长之下是“阿拉木”（A'lam），再下是“马夫提”（Mufti），然后是“大毛拉”（Dana-molla），最后是“阿訇”（Akhoun）。布哈拉的教团人数超过2000人。伊斯兰教团权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基石是每个大城镇都设立的“宗教法官”（卡孜，Cazi），以及小城镇的“宗教警察”（Reis）。布哈拉的宗教法官被称为“大法官”（Cazi-i-kalan）。这些宗教司法机构负责依照伊斯兰法维持社会秩序、处理纠纷。[37]

军政方面，布哈拉施行军事封建制度。军队实质上是汗王的私人雇佣军：

> 在布哈拉，军队组织、财政管理和汗王的收入紧密联系。土地被认为是征服者的财产，因此征服者想方设法从中榨取更多财富。统治者为了拥有军队，被迫遵守伊斯兰法规并给予必要的奉献。这几乎就是地租和封建体系下的军功土地封赏制。[38]

获得汗王封地的贵族必须履行为汗王征战的义务，因而构成汗国的中坚力量。汗王则提供军费和土地来养兵以维持统治。他在各个城镇和地区任命阿奇木伯克，对土地进行管理和收税。阿奇木以向汗王支付田租，或把税收和物产的3/5上缴的方式获利。汗王则派遣官员“以阿萨乌尔”（Iassaoul）、“迪瓦恩伯克”（Diwan-Beghi）和“书吏”（Mourza）到阿奇木的领地评估收成并收取物产分成。汗国税务官“麦赫特尔”（Mihter）一般只负责收税。据梅彦多夫估算，除去养兵和行政开支外，布哈拉汗每年能增加约100万卢布财富。布哈拉汗所养的常驻军只有骑兵，大约25000人，必要时可征召超过6万人，组建有12000～13000人的远征军。[39]希瓦汗虽然好战，但并未设立常备军。战时临时从乌兹别克和土库曼部落召集人众，最多不超过12000人。必要的话，汗王也抓萨尔特人和卡拉卡尔帕克人的壮丁参战。希瓦所有战士都是骑兵，使用冷兵器，只有少数几门保养极差的火炮和鸟铳。这样的临时军队往往只热衷于抢掠，缺乏战斗意志、现代化的组织、武器和训练[40]。

社会经济方面，布哈拉、希瓦和浩罕的国民经济都以农牧业和商业为支柱。希瓦汗国每年毛收入约400万卢布，主要是从萨尔特人和卡拉卡尔帕克人处征收的税赋[41]。布哈拉和希瓦出产牛、马、羊、小麦、

大麦、稻米、芝麻、硬豆、葡萄、苹果、梨、杏、樱桃、桑葚、石榴、甜瓜、西瓜，各种果干以及洋葱等各色蔬菜。希瓦的手工制品等以自用为主。三国还进行奴隶贸易。

因农牧经济所限，中亚三汗国的国内贸易均不发达，但过境贸易和跨国转运贸易则非常兴旺。长久以来，处于丝绸之路中段的中亚贸易联通东西南北。布哈拉、希瓦和浩罕的商队转运着中国、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的商品，并以此牟利。他们的商业路线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Transoxane）为中心，向东经浩罕、奥什、喀什噶尔到叶尔羌和伊犁，向南经布哈拉、撒马尔罕、喀布尔、白沙瓦到阿塔克（Attock），向西经希瓦到里海沿岸的阿斯特拉巴德、巴库或阿斯特拉罕；向北经奥伦堡、下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中亚商队转运的商品包括茶叶、丝绸、毛毯、披肩、大黄、布匹、棉花、皮货、珠宝、染料、干果、金银、金属制品和枪械等。中亚汗国的商人们在上述商埠长期居留，设有商总，负责侨民事宜。[42]

综上所述，俄国人认为中亚汗国政府的宗旨在于为汗王个人和家族牟利。因此，不管政府官员地位有多高，本质上都是汗王的奴隶，他们以获取汗王的欢心和信任为荣。结果，政府就落到某个家族影响之下的一群奴隶和宠臣手中。这样的庇护传统使政府腐败丛生。官员贪婪无比、生活放纵，对民众的盘剥如狼似虎。因此，中亚汗国的民众缺乏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

梅彦多夫认为，曾经跻身世界知识中心的布哈拉文化没落，教条主义盛行，社会发展仍处于低级阶段，需要用欧洲文明来启蒙，并通过布哈拉带动中亚的进步。“俄国文化启蒙的发展进步使这个大国有责任促使那慷慨的观念成为现实。俄国有义务给中亚各汗国带来有益的促进，在这些国家推广欧洲文明的成果。”[43]穆拉维约夫则认为，“如果希瓦能够纳入俄国治下，必然会促进工业发展，为俄国贸易带来巨大优势。亚洲腹地（Haute Asie）直到印度的贸易商队都可经希瓦通往阿斯特拉罕”。“妨碍贸易发展的中亚游牧部落对商队的袭扰和抢掠也会因畏惧俄国的力量而终止。这样一来，就能够建立经印度河与阿姆河到俄罗斯的贸易路线，全亚洲的财富就会流向俄国，就能够实现彼得大帝的伟大计划。在俄国的庇护下，希瓦就能成为防止中亚荒原上的分散部落袭击商队的护卫者。这个沙海中央的绿洲就能成为全亚洲贸易的联结点，这将会撼动印度拥有的主宰海洋商道之巨大优势的中心地位。”[44]从19世纪

30年代起，穆拉维约夫的主张成为俄国中亚扩张的战略目标之一。[45]

三 俄国报告推动欧洲东方学亚洲内陆研究学术转型

19世纪初俄国使团对中国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考察，对中亚的历史走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些考察实为沙皇俄国向印度和中国扩张史的重要一章。它们使俄国统治者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新疆和中亚汗国在其大陆霸权构建中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为俄国在19世纪中后期对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的鲸吞蚕食进行了必要的知识准备。这已为后续历史所证明，在此不予详谈。

就俄国考察活动及其报告而言，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其对欧洲东方学中亚研究的学术方法与理论构建的重要影响。俄国报告清晰地展现了欧洲东方学（汉学、突厥学、蒙古学）从侧重语言、历史和民族志的研究模式向对中亚区域自然状况、政经制度和社会文化进行多学科全面实用研究的演进趋势。其具体标志，便是在纳扎罗夫、穆拉维约夫、梅彦多夫、克拉普罗特（Jules-Henri Klaproth）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等人的推动下，术语“中部亚细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Middle Asia，Asiedu Milieu）和“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Central Asia，Asie Centrale）开始取代流行了数百年的“鞑靼利亚”，成为俄国和欧洲学界用以称呼亚洲内陆地区的地理和地缘政治概念。

苏格兰著名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平可顿（John Pinkerton）在1807年出版的《现代地理》第2卷和1811年出版的《世界各地精彩旅行总纂》第7、9卷[46]里提出了“中亚”（Central Asia）的地理概念。他尝试对中亚地区的自然地理和宗教、政体、法律、人口、军队、外交、习俗、语言、文学、城市、商业等人文知识进行汇总研究，但终因信息极度缺乏，每类介绍仅有一至数段而已。[47]在此条件下，俄国报告就成为英法学界的重要参考资料。根据学者斯维特拉娜·郭舍妮娜（Svetlana Gorshenina）的研究，纳扎罗夫在其报告中首先使用了“中部亚细亚”（СредняячастьАзия）这个词。该词在穆拉维约夫的报告中被简化为“中亚”（СредняяАзия）。[48]梅彦多夫更是明确指出当时欧洲指称亚洲内陆的术语Tataria，以及18世纪初开始流行的相关政治地理术语如Tartarie russe（俄属鞑靼利亚），Tartarie indépendante（独立鞑靼利亚），Tartarie chinoise（中属鞑靼利亚）、Grande et Petite Boukharie（大小布哈拉）、Grand et Petit Tibet（大小土拔特）等概念

都非常不准确，因为“鞑靼人”的势力范围从来没有延伸至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他于是指出：“在地理学里，我们以某一民族之名命名某地，至少该民族应居于此地，否则定义就模糊而容易造成错乱。因此，应以‘中央亚细亚’来取代‘鞑靼利亚’这个术语，我认为这将更准确，更具备地理特性。”他遂将“中亚”定义为：额尔齐斯、阿尔泰、塔尔巴哈台、慕士塔格（Mousart/Mous-tagh）[49]、博洛尔（Belour）、兴都库什山和噶尔（Ghaour）之间的区域，地接波斯北疆、里海和乌拉尔东岸，向北直到吉尔吉斯大草原[50]北界，向东直到蒙古地区。中亚包括吉尔吉斯（哈萨克）地区、希瓦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土库曼地区、大小土拔特、中国的新疆。[51]

著名东方学家克拉普罗特在法国仔细研究、翻译、注释和出版了俄国报告后，在梅彦多夫定义的基础上把“中亚”的地理范围进一步扩大，提出了类似于今天美国人所谓“亚洲内陆”（Inner Asia）的大中亚概念——从顿河到太平洋之间，被乌拉尔山脉、高加索山脉、里海、乌浒河、兴都库什山、喜马拉雅山、中国内地、长白山、兴安岭、贝加尔湖、萨彦斯克、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包围的地域。[52]尽管仍存在很多问题，克拉普罗特在英法德俄东方学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使欧洲学者们日益重视“中亚”这个概念并对其进行建构。不久，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将中亚定义为以天山和昆仑山为中心的位于东经62°到119°、北纬27°到52°之间的长方形地域。[53]“中亚”一词遂成为使用至今的重要地理和政治概念。

此后，在资本主义推动下，欧洲学者们打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大旗，加强了对中亚地区地理与人文状况的考察，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和统计分析以获取精确的信息数据并建构理论体系。英俄法德等国皇家学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日益加强。各国地理学会和亚洲学会在商业拓展、领土扩张和霸权争夺中逐步构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亚洲文明与世界文明阐释体系。欧洲东方学成为西方近代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

原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 恽文捷，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 鞑靼利亚（拉丁文为Tataria）词根是Tatar，Tatar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的《阙特勤碑》。据考证，中世纪犹太拉比和旅行家图德拉的便雅悯（Benjamin of Tudela）于1173年在其著作中首用Tatarie一词称呼蒙古人及其地方。13世纪前期蒙古西征后，欧洲开始以拉丁文Tartares称呼蒙古人，以Tataria称呼东方蒙古人发源地及其势力范

围。此后，该词在英、法、德等文字中的变体被欧洲学界普遍使用，并进行相关知识建构，直至19世纪中期被“中亚”取代。参见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第401页；J.P.Baratier，translated and enriched the notes，*Voyages de Rabbi Benjamin*，*fils de Jona de Tudèle*，*en Europe*，*en Asie et en Afrique*，*depuis l'Espagne jusqu'à la Chine*，Tome1，Amsterdam，1734，p.190；Marcus Nathan Adler（ed.），*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Critical Text*，*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7；Eccard，Corpus Historic.，ii，1451，referred in Henry Yule，trans.et al（ed.），*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Vol.1，London：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p.175；Svetlana Gorshenina，*L'invention de l'Asiecentrale*：*Histoire du concept de la Tartarie à lEurasie*，Genève：Rayon Histoire de la Librairie Droz，2014等。

[3] 我国学界对“俄罗斯馆”、中俄《恰克图条约》所规定的俄国派赴北京的使团与传教团的活动、近代浩罕等国与新疆的关系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中亚近代史和19世纪中期俄国征服中亚的历史著作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翻译和讨论。不过，对19世纪早期俄国与中亚汗国和中国新疆的关系，对中亚汗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考察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参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人民出版社，2006；叶柏川《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潘志平《浩罕国与西域政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王治来、丁笃本编著《中亚国际关系史》，湖南出版社，1997；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马曼丽《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1995；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庄鸿铸等《近现代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史》，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

[4]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俄文、法文和英文文献中，“吉尔吉斯人”（киргизы）和“哈萨克人”（казах）两术语时常混用，直到沙俄占领中亚汗国并进行民族识别后才分开。

[5] An Indian Officer，*Russia's March towards India*，Vol.1，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 Company，1894，p.36.

[6] Jules-Henri Klaproth，*Magazin Asiatique*，*ou Revue Ge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Tome1，Paris：La Librairie Orientale de Dondey-Dupré Père et Files，1825，p.3.

[7] Martha Brill Olcott，*The Kazakhs*，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7，pp.28-58；Paul Georg Geiss，*Pre-Tsarist and Tsarist Central Asia*，*Communal Commitment and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e*，Routledge Curzon，2003，pp.179-185.

[8] Michael Khodarkovsky，*Russia's Steppe Frontier*，*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1500-1800*，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pp.132，168-171.

[9] “Voyage de Boukhtarminsk a Gouldja ou Ili，Capitale de la Dzoungarie Chinoise.Entrepris en 1811 par M.Poutimstev，interprête du gouvernement Russe，” Jules-Henri Klaproth，*Magazin Asiatique*，*ou Revue Ge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Tome1，pp.173-176.

[10] 此处为普提姆雪夫的道听途说。参赞大臣满语为Khebeiamban，办事大臣为Baita icihiyara amban。1811年3～10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为那彦实。参见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1796～1911》，文海出版社，1979，第161页。

[11] 相关卡伦信息参见《大清一统志》卷589《塔尔巴哈台》，《四部丛刊续编》第29册，上海书店，1984，第4页。

[12] Jules-Henri Klaproth，M*agazin Asiatique*，*ou Revue Ge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Tome1，pp.184-188.

[13] Jules-Henri Klaproth，*Magazin Asiatique*，*ou Revue Ge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Tome1，pp.210-229.

[14] “Voyage à Khokand，entrepris en1813 et 1814，par Philippe Nazarov，interprête au service du gouvernement Russe”，Jules-Henri Klaproth，*Magazin Asiatique*，*ou Revue Ge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Tome1，pp.1-35.

[15] 原文拼为Amir Valliami，克拉普罗特根据阿拉伯字母拼法改为Amir Valimiani，意为“中央的王公守护者”（Prince Protecteur du Milieu），这里指浩罕爱玛尔汗。

[16] 克拉普罗特认为，纳扎罗夫所见之人并非中国皇帝的钦差，应是伊犁将军为处理中国西部藩属事务而派往浩罕的官员。见Jules-Henri Klaproth，*Magazin Asiatique*，*ou Revue Ge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Tome1，p.45。

[17] Jules-Henri Klaproth，*Magazin Asiatique*，*ou Revue Ge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Tome1，p.79.

[18] Count Meyendorff，*Journey of the Russian Mission from Orenbourg to Bokhara*，trans.by Colonel Monteith，Madras Engineers，Madras：Printed at the Spectator Press，1840，p.74.

[19] Н.Н.Муравьев，Путешествиев Туркмениюи Хивув 1819 и 1820 годах，гвардейскогогенеральногоштабакапитана Николая Муравьева，посланноговсиистраныдляпереговоров，Ч.1-2，Москва，Вь Типографiи Августа Семена，1822，c.I-VII.

[20] Н.Н.Муравьев，Путешествиев Туркмениюи Хивув 1819 и 1820 годах，гвардейскогогенеральногоштабакапитана Николая Муравьева，

посланноговсиистраныдляпереговоров，Ч.1-2，с.131-138.

[21] N.N.Muraviev，*Muraviev's Journey to Khiva through the Turcoman Country*，*1819-1829*，trans. from the Russian （1824） by Philipp Strahl，Ph：Doc：& C.，Bonn；and from the German （1871） by Captain W.S.A. Lockhart，F.R.G.S.，Calcutta：The Foreign Department Press.

[22]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revu par M.Le.Chevalier Amédée Jaubert，Paris，Dondey-Dupré Père et Fils，1826，Préface de L'Auteur，pp.ix-xii，235.

[23]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réface de L'Auteur，pp.84-87.

[24] Jules-Henri Klaproth，*Magazin Asiatique*，*ou Revue Ge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Tome1，pp.190-193.

[25] 中亚地区常称汉人为“喀喇契丹”，该称呼源自对“西辽”的称呼Kara Kitai。参见克拉普罗特对普提姆雪夫《伊犁旅行记》的注释。Jules-Henri Klaproth，*Magazin Asiatique*，*ou Revue Ge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Tome1，p.209.

[26] Jules-Henri Klaproth，*Magazin Asiatique*，*ou Revue Ge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Tome1，pp.219-222.

[27] Jules-Henri Klaproth，*Magazin Asiatique*，*ou Revue Ge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Tome1，pp.214-219.

[28] Jules-Henri Klaproth，*Magazin Asiatique*，*ou Revue Ge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Tome1，pp.215-218.

[29]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réface de L'Auteur，p.121.

[30] Professeur J.Senkowski，“Sur la route commerciale de Sémi-Palatynsk à Cacheire，par les villes d'Eiléh，d'Aksou，de Iark-end et de Tibet，”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revu par M.Le.Chevalier Amédée Jaubert*，pp.329-345.

[31]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p.119-129.

[32]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p.120，247-248.

[33]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p.189-197.

[34]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p.273-277.

[35] Ataliq（Atalik），阿塔里克，中亚地区官职，意为"导师、摄政"，一般授予比汗王年长的维齐尔，其印玺的作用与汗王近似。Chahryar Adle and Irfan Habib（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V，UNESCO Publishing，2003，p.78.

[36]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259.

[37]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p.263-265.

[38]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p.266-267.

[39]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p.268-271.

[40] M.N.Mouraviev，Revu par MM.J.B.Eyriès et J.Klaproth，*Voyage en Turcomanie et à Khiva，fait en 1819 et1820*，pp.274-315，350-367.

[41] Н.Н.Муравьев，Путешествиев Туркмениюи Хивув 1819 и 1820 годах，гвардейскогогенеральногоштабакапитана Николая Муравьева，посланноговсиистраныдляпереговоров，Ч.2，с.84.

[42]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p.227-247；M.N.Mouraviev，Revu par MM.J.B. Eyriès et J.Klaproth，*Voyage en Turcomanie et à Khiva，fait en 1819 et1820*，pp.331-345.

[43]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p.302-303.

[44] M.N. Mouraviev，Revu par MM.J.B. Eyriès et J.Klaproth，*Voyage en Turcomanie et à Khiva*，*fait en 1819 et 1820*，pp.344-345.

[45] И.Н.Захарьин（Якунин），Зимнийпоходв Хиву Перовского в1839годуи Первоепосольствов Хиву в 1842 году，СПб.，ИзданіеП.П.Сойкина，1898；И.Н.Захарьин（Якунин），ГрафВ.А.Перовскийиегозимнийпоходв Хиву，Ч.1-2，СПб.，ИзданіеП.П.Сойкина，1901.

[46] John Pinkerton，*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and Travel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Vol.9，London：Printed for Longman，Hurst，Rees，Orme，and Brown，1811，pp. 320-386.

[47] John Pinkerton，*Modern Geography*：*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s*，*Kingdoms*，*States*，*and Colonies*，Vol.II，Asia，London：Strandand Longman，1807，p.387.

[48] Svetlana Gorshenina，*L'invention de l'Asiecentrale*：*Histoire du concept de la Tartarie à l'Eurasie*，p.286.

[49] 此西文地名来自《马可·波罗行纪》，指帕米尔高原一带。

[50] 即哈萨克大草原。

[51] Georges de Meyendorff，*Voyage d'Orenbourg à Boukhara fait en 1820*，*à travers les steppes qui s'étendent à l'Est de la mer d'Aral et au delà de l'ancien Jaxantes*，pp.91-93.

[52] Jules-Henri Klaproth，*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Depuis la Monarchie de Cyrusjusqu'à nos Jours*，*Accompagnés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et Ethnographiques sur cette partie du monde*，Paris：Schubart，1826，p.161.

[53] Alexander von Humboldt，*Asie Centrale*：*Recherches sur les chalnes de Montagnes et la Climatologie Comparée*，Tome.1，Paris：Gide，1843，p.xxi.

转型中的“中亚研究”

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1]

——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

杨成[2]

导言

历史回顾与反思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进入21世纪，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同步，中国的俄苏研究[3]迎来了代际变化的新阶段。老一代学者逐渐退出学术研究的第一线，中青年学者开始发挥主体作用。但问题在于我们很可能既未能继续保持（遑论弘扬）老一代学人的优良传统，又染上了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的浮躁之气，进入了一个学术与社会一同“平庸化”的时代，[4]使得我们的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的空间日趋萎缩，日益难以在本土及国际性的学术共同体中寻求认同和交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俄苏研究的过往做一个深刻的反思，进行严肃的检讨。这不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早晚躲不过去的学术问题。这种反省思考，既是为了当下，更是着眼于将来。

作为20世纪从业人员最多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国际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俄苏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一步步推动相关知识的积累和进化。[5]相对而言，中国俄苏研究学界尽管尚缺乏类同于西方同人的大部头反思性学术史的书写，但对此问题也不乏深刻的短小精悍之作。中国俄苏研究的重量级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的刘克明先生早在1984年就对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做过简要的学术史回顾，并着重阐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的“大大活跃”与“很大进展”。[6]李静杰研究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参加了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召开的亚太地区苏联研究学术

会议，介绍了中国苏联问题研究的主要议程设置及进展。[7]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范新宇曾专门撰文总结中国的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既要研究苏东经济，又要联系我国实际”“既要研究现实，又要预测未来”“既要提出问题，又要探求对策”的三大“需要加强研究的薄弱环节”。[8]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黄定天副研究员则从中俄关系史学史在中国的发展的视角，分门别类地叙述了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中俄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基本状况和主要成果。[9]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教授在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第六届全国理事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呼吁中国俄苏学界积极开展内外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的研究。[10]冯绍雷教授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俄苏研究的三十年断代史做了精彩梳理。他强调，中国的俄罗斯研究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同步并行的进程，同样经历了由起步、深化到走向国际的三个十年；中国的俄罗斯、中东欧、东南欧与中亚问题研究在进入第三个十年的最后阶段后，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和新挑战，需要认真思考做出回应。[11]王军、但兴悟合著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一书花了少量篇幅评述了中国的中俄关系研究情况。[12]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等最近亦以图书首发式讨论会综述的形式，对苏联史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强调研究苏联问题必须秉持正确的方法和求实的作风。[13]其他一些专业性期刊也曾对中国的俄苏研究的个别领域如苏联解体问题、欧亚主义问题等进行过总结和回顾。与此同时，国外学术界对中国苏联东欧研究同样给予了一定关注，尤其在80年代中期。在前文所述亚太地区的苏联问题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一般每个国家的俄苏研究只有一篇相关论文，连美国也不例外，唯有中国受到了特殊优待，共有两篇相关论文。[14]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罗兹曼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尤为推崇，除撰写长篇论文外，还出版了专著予以详尽剖析。[15]

上述前辈学人的追溯都有积极意义，但在解决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取向这一更加根本的问题方面仍需要新的求索。尤其是最近20年来的中国俄苏研究往往只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去理解对方，因而在结论上很可能会无意识地忽略掉一些关键点，并因此无法传递俄苏问题的本质，所得到的也多为伴随着扭曲和不可能显露真理的叙述。这使人不能不产生一种紧迫感和忧虑意识。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迄今为止的中国俄苏研究是不是最优的？现有的研究范式和智识谱系是什么？中国俄苏研究和国外俄苏研究的异同点在何处？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是要在现有的知识系统下延续既往的模式还是要开拓创新走出一条新

路径？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不仅迎来了发展最快的时期，同时在学术上也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冲击。但与此同时，中国显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我们有可能推陈出新、开拓境界。当前，中国的俄苏研究已经到了一个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在现代学术的知识语境下重构我们的学术观念与方法，使我们对未来中国俄苏研究的潮流和去向有所自觉。中国俄苏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既坚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至少是亚洲的俄苏研究知识语境中建设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俄苏研究论述。提出这样的学术追求，是因为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俄苏研究领域，我们与世界主要大国，甚至像芬兰那样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即便与亚洲邻邦韩国相比较，也日益暴露出国际影响力多有不如的尴尬。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理应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不能在历史惯性的支配下，重复既往的研究范式。在未来，中国的俄苏研究既要向人们提供知识的飨宴，也要训练学人的智力，同时还要为建立与提升我们在世界民族和国家中的地位提供一种智识认同。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言以蔽之，中国的俄苏研究不应该是国外俄苏研究的效仿者、追随者，而应该是同行者。暂时的效仿、追随，是为了达到最终相互为师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是中国俄苏研究的建树与开拓，而非洋化改造。这是最根本的要义。

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国俄苏研究予以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并将之与国外俄苏研究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其结构安排如下：导言部分在对国内外已有文献做基本梳理后，提出问题；第一部分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着重梳理中国构建俄苏研究范式和智识体系的简要谱系；第二部分介绍美国苏联学的神话与败落及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复活；第三部分侧重描述作为方法的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第四部分提出中国新俄苏研究的可能方向；结束语部分做简短总结。

一 中国构建俄苏研究范式和智识体系的简要谱系

要论述当前和今后中国俄苏研究的取向问题，就必须从其历史说起。应该说，俄国[16]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研究客体。从国际学界看，几

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别研究像俄国研究这样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和争议，特别是对苏联时期的研究。需要提出的是，中国的俄苏研究学术史仅仅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为重心进行论述是不够的，应将其回归到更长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来认识。为了便于叙述，本文将中国俄苏研究的学术历程划分为“中国俄苏研究的史前史”“起步阶段”“加速阶段与黄金时代”“危机阶段”。

（一）“中国俄苏研究的史前史”（从明末清初至民国）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中俄两国很早就相互关注。1619年，明朝万历皇帝曾致函沙皇瓦西里·苏伊斯基，表示沟通的愿望。同样，从16、17世纪开始，沙俄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也陆续向中国派遣外交使团和传教士团。[17]这种悠久的人员往来催生了两国对彼此的想象，也促成了中国知识界了解俄国的需求的增长。

早期中国的对俄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当时共有两种形式：一种可以称为“记载”，另一种则可以称为“传译”。清人对俄罗斯的记载就其资料来源而言大致有三类：一是图里琛、张鹏翮、钱良择、松筠等直接参与中俄事务处理的官员所写的行纪或纪略；二是官修书籍及其修撰过程中产生的著作；三是林则徐、姚莹、徐继畬、魏源等江南沿海具有“筹办洋务”经历的官员学者的记述。[1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人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在这一阶段的俄国研究中是具有风向标和转型意义的重要作品，其特点在于高度重视域外史料的价值，而不仅是对中国文献的编撰和考证。《朔方备乘》将此前有关俄罗斯的文献做了一次较彻底的梳理，并采用了文献互证的方法，对前人的研究颇多超越，也因此受到清廷关注，其本人也因“通达时务、晓畅戎机”而被擢升为员外郎。[19]

至于“传译”，则是在两种不同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是早期因战争和交往的实际需要，二是清中晚期开展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需求。在早期两国交往史中，战争曾是一种特殊的形态，经过两次雅克萨战争和尼布楚谈判，清政府有力地遏制了沙俄的军事滋扰。但由于少有接触，两国在尼布楚谈判之际只能使用拉丁语作为中介。此后，康熙帝从两国交往较前密切、往来文书频繁的实际需要出发，于1708年下旨创办俄罗斯文馆，培养俄语翻译人才，中国从此开始了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学习。[20]至同治年间，1862年京师同文馆正

式创立，其中俄文馆于次年设立，从历年参加外语大考的人数看，当时学习英语的人数最多，法语次之，俄语居第三。[21]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俄文馆的学员已经参与翻译有关俄国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编译的29种外国文献中，除法律、数学等学科外，国别和地区研究作品中俄国颇受重视，共计有《俄国史略》（*History of Russia*）、《中亚洲俄属游记》（*Russian Central Asia*）、《西学考略》（*A Resume of Western Education*，由俄文馆学生贵荣等译）数种。而同期关于其他国家的译著仅有《法国律例》（*Code Napoleon*）、《新加坡刑律》（*Panel Code of Singapore*）、《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外语原著名称不详）三种。[22]广东同文馆则自1897年起增设俄文等三馆，拥有两名俄国教习。[23]此后，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893年在湖北创办自强学堂，设立了专门的翻译处，并与其他外语教育机构做了功能性的区分，即侧重于对商务、铁路、种植、畜牧等“厚生之书”和对西方“治国养民之术，由贫而富，由弱而强之陈迹”的可资参考的文献的翻译。[24]在自强学堂，学习俄文的人数一度仅次于日语。从1899年该校汉、洋教习名录看，当时的俄文外教最多，共三名，相比之下，专事日语教学的外教只有1名，其余两名是担任普通学兼体兵操科目的老师。[25]整体看，当时的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学习在洋务外国语学堂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除上海广方言馆和台湾西学院没有俄语教学外，其余的京师同文馆、广东同文馆和湖北自强学堂均有此科目，而新疆俄文馆和珲春俄文书院则进行单一的俄国学教学。[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心，都十分重视对国际关系的观察和研究，其中就包括对苏联问题的分析和书写，由此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汇编资料。比如，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杂志之一《东方杂志》设有专门的国际外交栏目，对俄苏问题多有论著。到20世纪30年代初，几乎没有哪种刊物不谈论苏联、不发表关于苏联问题的文章，其时连篇累牍地刊登苏联研究文章。[27]对于30年代的思想论战，有学者指出，中国各派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同时，当时的思想界也试图从苏俄的社会改造工程中汲取营养。[28]据统计，直接以俄苏为研究对象编纂、译介西方（包括日本）学者的俄苏研究作品，或者是编译俄苏学者的国际问题研究成果，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当时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分量。[29]

（二）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的中国俄苏研究（起步阶段）

应该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俄苏研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特殊现象，并伴随着中苏关系的起伏跌宕而发生主题和话语的转换。

从1949年直至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俄苏研究与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整体布局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极度缺乏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因此当时的主要研究任务是介绍苏联和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并相应地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及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和对华态度，明显偏重于实际应用。仅在1949～1952年的短短几年时间内，中国共翻译出版了3000多种在苏联出版过的著作，发行总量高达1200万册，在全国范围内还创办了多种介绍苏联理论和建设经验的译丛类刊物。[30]

从机制建设上看，由原来的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而成的中共中央直属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机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于1953年成立，其主要任务为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翻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和中央重要文献，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收集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图书文献资料。[31]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在稍后的1956年成立，加上《俄语教学与研究》在1954年创刊，《俄语学习》在1959年创刊，《国际问题研究》也在同年创刊，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俄苏研究。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新中国俄苏研究的初创期，其重要意义在于从指导思想上、干部准备上以及对苏东国家知识的掌握上，为中国后来开展苏联东欧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必须强调，该阶段的苏联问题研究是在“中苏友好”的大框架下推进的，多为对策研究，受苏联的影响颇大。这除了是因为制度上学习苏联的国内需求外，还配合了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的现实需要。[32]这一时期的重大学术贡献主要反映在对马列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上。其中《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翻译工作从1953年开始，到1959年全部出齐，共38卷（当时俄文版第39卷尚未出版），总计1500万字；《斯大林全集》第1卷于1953年11月正式出版，到1958年全部出齐，共13卷，340多万字。[33]

随着中苏“蜜月期”的终结，中共和苏共两党围绕国际形势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方针和策略等问题分歧日增，矛盾逐渐激化，且日

趋公开。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将苏共定为修正主义，并将“反修防修”作为重要政策。相应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和支援世界人民革命。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依据这一文件，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外国问题研究机构，逐渐招收专业学生，开设专业课程，培养国际问题的专门人才。在这一阶段，苏联东欧研究所于1964年7月开始筹建，1965年3月正式成立。最初该所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此后不久又归属中联部。此外，为了配合国际范围内的反帝反修要求，其他地区性和国别性研究也有所增加，而苏联在其他地区的政策走向同样是被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学术界彼时不再一味褒扬苏联，大幅减少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介绍，并开始转向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与修正主义思想和行为。

60年代末到1978年，中国的俄苏研究并未被“文化大革命”所阻断，尽管总体而言受到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冲击，但相关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大量以苏联问题为主题的译著陆续出版。[34]但受到当时国际斗争和国内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简单化”“片面性”的缺点。[35]

整体上讲，我们不能不承认，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期，中国俄苏研究的教学和科研机构缺乏，科班出身的俄苏问题研究人员较少，大多数是从语言和文学研究学科转型而来。从问题意识看，这一阶段的俄苏问题研究因带有强烈的“政治导向”而高度“意识形态化”，“革命”“反修”“反帝”等政治话语成为主要基调，不带浓厚价值判断的实证性研究几不可见。从研究范式看，这类研究正是资中筠先生曾尖锐批评过的80年代之前的政策解释型研究范式：

> 我国当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对外政策不可分，……专业工作者（其中也包括学者）的任务是提供材料在先，撰文诠释在后，谈不到独立思考。[36]

（三）改革开放后“长十年”的中国俄苏研究（加速阶段与黄金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直至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长十年”，是中国俄苏研究的一个黄金发展期。刚刚从内乱中脱身的中国俄苏研究界，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俄苏问题的研究中。冯绍雷教授对这一情形进行了描述。

> 每一个曾经身处那个时代氛围的中国人，都会感受到那个伟大时代的开拓创新的勇气和拼搏精神。从外部环境来看，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已经将如何向外部世界学习的任务放到了知识界和决策界，乃至于全国有志人士的面前。邓小平率先访问日本和美国，毋庸置疑地提供了一个向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借鉴和学习的范例，而几乎在同时，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动向是把对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察和研究作为这一过程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由于50～60年代的留苏、留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管理精英都处于党和国家以及研究机构的关键岗位上，所以，很短的时间里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迅速打开局面，也获得了不少关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变化的新的认识和知识。[37]

冯绍雷教授的描述道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俄苏研究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背景，即中国当时的智识辩论主要是围绕三个国家展开的。第一是苏联，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旧的社会主义模式与新的以改革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一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波兰学者布鲁斯、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奥塔·锡克、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等人都曾是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座上嘉宾，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议程设置产生过重要影响，广受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和俄苏问题研究界的关注。[38]但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进程后，俄苏研究的重心迅速转移到当代苏联的改革问题上，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则成为重要的补充。苏东国家改革的成败利弊对中国改革直接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1）战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系以苏联为楷模建立，其基本框架和苏联传统的经济模式没有本质区别，双方改革的出发点接近，面临的任务相同；（2）双方基本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商品经济均不发达，在深化改革中，都必须把改革和发展很好结合起来；（3）苏东一些国家改革比中国起步早，他们走过的弯路和历经的曲折，有助于中国认识经济改革的内在规律性，避免重蹈覆辙；（4）苏东国家改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这对探索和选择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模式大有裨益。[39]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是最受中国高层领导关注的，也被学者所重视。第二是美国，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问题，因为政治敏锐性，这些争论多为内部研讨，“自由化”问题在后期成为对美国模式的批评所在。第三是日本，中国学术界对日本问题的兴趣点在于传统与开放的关系平衡问题，既能迅速地推进现代化进程，同时又不破坏本身的传统，在打开窗户的同时把苍蝇蚊子带进来。整体而言，从苏联和东欧国家中，中国希望能够汲取改革的经验，避免改革方向的误差；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中国更希望学习现代科学和技术，谋求在国际劳务分工

中的庞大利益；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中，中国则希望能够在对西方开放的同时保持传统的延续。围绕上述三种类型的国家和社会模式的讨论，是中国80年代俄苏研究的宏大知识语境。当时中国学者尤其关注苏联的经济改革。这种经世致用的态度也是出自上层的决策需求。当时相关研究人员在接待国务院各部委干部的过程中，往往被希望提供“本部门改革可以借鉴的东西”。[40]

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在整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专业性研究机构日益增加，专业性研究学会逐步创建，人才培养机制初步确立。

自改革开放以来，按照邓小平同志有关加强世界政治研究的意见，国内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俄苏研究界也不例外。这一时期新成立的研究机构主要有：社科院东欧中亚所（因中联部内部机构改革，于1980年1月起由中联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苏联研究室（1980）、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0）、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1981）、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1984）、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1984）、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1987）等。与此同时，各类研究学会也纷纷成立。（参见表1）

表**1**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俄苏问题研究学会名录（不完全统计）

学会类型	学会名称	成立时间	首任会长（理事长）
全国性的综合性学会	中国苏联东欧学会	1982	钱俊瑞
全国性的专门学科学会	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	1978	钱俊瑞
	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	1979	余绳武
	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	1980	叶水夫
	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	1981	胡孟浩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	1985	陈之骅
	中苏比较文学学会	20世纪80年代	李明滨
地区性综合研究学会	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学会	1978	不详
	西北地区中俄关系史学会	1979	不详
	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学会	1982	不详
省市级研究学会	吉林省苏联研究学会	1981	李树藩
	吉林省中俄关系研究会	1982	礼长林
	上海市苏联东欧学会	1986	施平

注：本表内容为笔者调查统计所得，不排除受访者记忆失误的可能。

尽管这一时期，研究队伍的扩大仍主要是依靠从历史学、语言学等方向转入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人员，真正接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国际关系学科训练的人较少，但对于整个俄苏研究界而言，搭架子的战略意义将在此后数十年中逐渐显现出来。

第二，专业性刊物的创设和发行。

众所周知，学术期刊对学科和专业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府对出版物的管理依然很严格，相关专业杂志较为稀缺。但在这一时期，众多的俄苏问题研究杂志（包括公开发行的和当时的内部刊物）开始创办。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共有20多家学术期刊的名称中包含有“苏联”“俄国”“俄苏”“远东”或“西伯利亚”等字样（见表2）。

表2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杂志名录

期刊名称	首次出版年份	主办机构	备 注
《西伯利亚与远东》	1974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所	1974~1980年不定期，1981~1987年为双月刊，1988年起更名为《西伯利亚研究》
《苏联与东欧文学》	1979	吉林师范大学外语系苏联与东欧文学研究室	年刊，共出版2次
《苏联与东欧》	1980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	
《苏联文学》	1980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	继承自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苏联文学研究室（1973~1979）编辑发行的《苏联文学资料》，1980年更名为《苏联文学》；1980~1981年为季刊，1982~1993年为双月刊，1990年第4期起吸收《当代苏联文学》与《俄苏文学》，1994年起更名为《俄罗斯文艺》
《苏联问题参考资料》	1980	上海外国语学院苏联问题研究室	季刊，1981年起有总期标示，1984年第2期起编辑出版者改为上海外国语学院苏联问题研究所，1987年第5期起开始有国内统一刊号（内部刊物），1990年起改名为《苏联研究》，1993年正式更名为《国际观察》
《苏联哲学资料》	1980	吉林大学哲学系苏联哲学研究室	

表2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杂志名录-续表1

期刊名称	首次出版年份	主办机构	备　注
《苏联文艺》	1980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79~1980 年不定期发行《苏联文学》，1980 年 4 月起更名为《苏联文艺》季刊，1981~1984 年为双月刊，1985 年改名为《当代苏联文学》
《苏联科学与技术》	1980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双月刊，1981 年起国内发行并有总期标示，1988 年第 5 期起由该所出版
《苏联东欧问题》	19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	双月刊，1982 年第 2 期起有总期标识，1992 年第 2 期起改名为《东欧中亚研究》，2003 年更名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今日苏联东欧》	1981	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	双月刊，1992 年起改名为《今日前苏联东欧》，2000 年更名为《俄罗斯研究》，季刊，2007 年起改为双月刊
《苏联中亚研究资料》	198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不定期，1983 年改名为《中亚研究资料》
《苏联问题研究资料》	1981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	1981~1983 年为季刊，1984~1992 年为双月刊，1993 年起改名为《俄罗斯研究》，季刊，1994~1998 年调为双月刊，1999~2001 年重新改为季刊，2000 年休刊，现已停刊
《中俄关系问题》	1981	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	继承《中俄关系研究会通讯》，1981~1984 年为季刊，1985 年休刊，1986~1990 年为年刊
《东欧》	1982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	季刊，1988 年起有总期标示，1999 年起改名为《国际论坛》
《苏联历史问题》	1982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苏联史教研室	季刊，继承《苏联史译文选辑》，1989 年起有俄文并列题名，1991 年起有俄文要目，1993 年终刊
《中国俄语教学》	1982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2~1983 年为季刊，1984~1990 年改为双月刊，1991 年至今复为季刊，1993 年第 3 期起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

表2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杂志名录-续表2

期刊名称	首次出版年份	主办机构	备　注
《苏联问题研究资料》	1983	中国苏联东欧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辑，具体出版单位为三联书店	前身为1979年8月创刊的《苏联问题译丛》，共出10辑，从1982年8月起改名为《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1983年不定期，曾一度更名为《苏联东欧研究资料》，1985年下半年改为此名。1988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单独主办并公开发行。1985~1992年为双月刊，1992年第2期起改名《东欧中亚问题译丛》
《苏联历史》	1983	兰州大学历史系苏联史研究室	1983~1984年为季刊，1986年起为半年刊
《中亚学刊》	1983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	不定期，1984~1986年休刊，有英文目次
《苏联哲学》	1984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苏联心理学》	1984	中国心理学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苏联心理学研究组	年刊
《苏联经济》	1985~1986	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	1985年出版《苏联经济1983》，1986年出版《苏联经济1984》
《研究与借鉴》	1985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苏联和远东问题研究中心	季刊，1988年起主办单位改为黑龙江省苏联与远东问题研究中心
《苏联社会科学研究》	1985	吉林大学苏联研究所	季刊，1990~1991年休刊，1992年曾出1期
《远东经贸导报》	1988	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周报，1999年11月1日起由黑龙江大学单独主办

本：本表内容为笔者根据上海图书馆数据统计而得。

从这些期刊的地理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俄苏研究的力量分布以及旨趣所在。比如，近一半俄苏研究期刊主办地在北京，其余的分布在三个地区：一是东北，包括黑龙江和吉林；二是西北，包括陕西、新疆和甘肃；三是华东，包括上海和安徽。而且各地的研究分工不同，比如黑龙江主要从事对与其接壤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方面的研究，西北地区则更多以苏联所属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作为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华东地区俄苏研究的规模在当时要相对逊色一些。最早的期刊是《西伯利亚和远东》，1974年开始发行，其他期刊多在1980和1981年问世。最早的杂志相当一部分是人文领域的，比如文学和艺术，且当时多以译介为主。最权威的期刊被美国学者认定为《苏联东欧问题》、《今日苏联东欧》和《苏联文学》。[41]上述刊物直到80年代中期仍多以内部资料方式发行，在1985年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苏联文学》和《中国俄语教学》公开发行。此外，当时中国还有许多内部刊物，尽管不都是集中于讨论苏联和东欧问题，但俄苏问题在这些学术刊物上也都有相应的阵地，几乎1/4甚至更多的内容与苏联问题相关。[42]

根据美国学者罗兹曼的研究，当时中国学术界每年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资料不少于500篇，同时还有不少有关苏联问题的研究作品系从其他

语种译介到国内，且多为内部资料的形式。这些材料使中国学者可以及时了解有关苏联问题的最新成果。1979年，内部刊物对于苏联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尚不明显，当时平均每个月的相关作品少于50篇，而到1983年和1984年，有关俄苏问题的文章平均每个月都有150～200篇，过半内容是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大约3/4被定为“内部参考”。[43]同期还有不少图书翻译，大部分为苏联图书，但也有部分译自英文。

第三，研究领域和内容的拓展及研究成果的激增。

尽管仍不时受到时代政治风潮的影响，但整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围不再过于政治化，而是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哲学、教育、艺术等各领域拓展。各类作品急剧增加，成绩斐然（见表3）。一些有创见的代表性作品开始在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形成重要的影响力，对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表3 1980～1991年中国俄苏研究的论文数及类别调查

单位：篇

内容	主题词检索				题名检索			
	俄罗斯	苏联	东欧	中亚	俄罗斯	苏联	东欧	中亚
政治・军事・法律	458	9390	1537	99	4218	3353	557	12
经济・管理	222	9667	1949	296	21	3875	721	27
教育・社会科学综合	829	10421	758	524	72	2550	146	62
文史哲	1867	9061	344	715	184	1957	47	78
合计	3376	38539	4588	1634	4495	11735	1471	179

资料来源：安成日「中国におけるロシア（ソ連）・東欧・中央アジア研究」『比較経済体制研究』16号、88頁。

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俄苏研究是中国俄苏问题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即便放在全世界范围看，中国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当领先的。这显然得益于这一时期研究者的功底较好。此时俄苏研究队伍的骨干大致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曾以俄语为第一外语并经过20世纪60年代国际政治专业训练的前辈学人，另一部分则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经过全国性选拔的优秀留苏（包括东欧）学生（见表4）[44]。

表4 中国派赴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留学生人数变化（1950～1963）

年度	留学生数量
1950	35
1951	381
1952	231
1953	675
1954	1518
1955	2093
1956	2410
1957	不详（400~500 名）
1958	不详（400~500 名）
1959	不详（400~500 名）
1960	不详（400~500 名）
1961	不详
1962	不详
1963	不详
1964	不详
1965	停止派遣

资料来源：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 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刘克明等人估计，1951～1964年中国共派遣了8000多人到苏联留学。[45]同时，自1982年中苏恢复教育领域的交流后，我国派往苏联东欧国家的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多，有的已经学成回国并成为科研战线的骨干力量。[46]另据美国学者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少有13000名大学生留苏，也可能有38000名左右，这取决于对“学生”的定义。大约2/3集中在理工科，剩下的以学习社会科学为主。[47]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学者基本功普遍非常扎实，又是第一波思想解放浪潮的受益者，因而具有时不待我的拼搏精神。他们对于经典文献的阅读能力是当今大多数俄苏研究从业人员所难以企及的，而在对所研究问题的把握方面，也因经过历次运动的考验而更显成熟。

此外，特殊的历史时期也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批判意识和自我反省精神，研究态度十分端正。我国经济学权威刘国光先生在1983年7月发表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强调了这一因素对中国苏联经济问题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过去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片面性”，一是因为对苏联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跟着苏联学而“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研究”，中苏关系的恶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得资料来源十分有限，这同样影响到研究工作；二是因为“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具体表现为学苏联的时候只看到苏联好的一面，在开展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时，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则只看到苏联坏的一面，研究工作“往往主要不是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分析，而是为了配合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相应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俄苏研究界“逐步纠正了过去在苏联问题研究

上的片面性，树立起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因而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48]

我国俄苏文学文艺研究大家刘宁先生在《我的学术之路》中的一段回忆也反映了这种认知和反省：

> 回顾这50年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我所走过的学术研究之路也是弯弯曲曲的，其中不少遗憾和欠缺，也有不少值得总结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我不仅像许多我的同时代人一样，由于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中断学术研究去搞一些与学术无关的事情，消耗了大好青春年华，而且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仍然……无法静下心来搞学术研究。虽然这一时期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有些是“奉命”“应景”之作。选题也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缺乏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深入、持久的钻研精神。[49]

刘先生十分谦虚，这是那个时代学人特有的一种气质，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他们还是以无畏的勇气在俄苏研究领域大踏步前进。

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其实是在和西方类似的条件下进行的，双方都缺乏对苏联东欧问题进行现代“科学”研究的可能。美国学界在苏联解体后反思“苏联学”研究的弊端，认为主要的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术客观性被政治偏见所遮蔽，或过“左”（对苏联毫无敌意）或过右（对苏联太多敌意）；其二，苏联区域研究从方法论上看因隔绝于核心社会科学学科而相当脆弱；其三，专家们缺乏对在地语言和历史，尤其是苏联内部非俄罗斯族地区的深度介入；其四，试图在苏联进行深入内部研究的人员遭遇一系列困难，比如不可靠或干脆缺失的数据、无法获得的或有意无意被歪曲的信息；其五，职业的、个人的或政治上的竞争使得苏联或东欧移民学者难以保证不偏不倚的立场，使得苏联学无法从他们那里获得内在的视角；其六，顶尖学者受到媒体的诱惑，使得他们无法集中精力于严密的实证研究；其七，对政府基金的依赖使得情报部门或军方可以轻易地设定学术研究议程。[50]同时代的中国俄苏研究尽管不是在每一条上都与美国同行有相似的情况，但很多问题是有共性的，比如对于一手资料的获取，在地研究的缺失等。换言之，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同的是意识形态背景。恰巧在意识形态这一点上，中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具有优势。当克里姆林宫学在西方大行其道之际，中国的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并没有被西方落下多少距离，甚至在某些问题、个别领域还要超出。这是基于曾经的盟友关系以及对共同但有分歧的意识形态的趋近解读，在同样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苏联问题研究不乏精彩之作。赵常庆先生

明确提出当时“与国外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相比，我国的研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水平不在其他国家之下”。[51]其原因之一或许正如沈志华教授所说的：“西方人对苏联的理解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隔膜，它们那个文化、那个政治制度跟苏联相差太远。而我们一般都能知道苏联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背后包含着什么东西，我们能看得懂，因为大家的话语语境是相同的。”[52]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静杰出席亚太国家苏联研究的研讨会的情况看，当时中国是国际苏联研究学界的重要一员，完全可以平等地参与国际对话。[53]当时，中国学者应邀出国访问和外国学者来华交流非常频繁，仅大型学术交流活动就包括：中美学者关于苏联问题的讨论会、中日学者关于苏联问题及亚太安全问题和苏联政策问题的讨论会、中英学者关于苏联经济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的讨论会等。[54]

20世纪80年代的俄苏研究另一个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其强烈的问题意识。《苏联问题参考资料》在其1980年首期的发刊词中明确写道：

> ……试图通过这本刊物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有关政策，以及社会问题作一些探索，并尽可能结合我国四化建设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来选择研究课题。[55]

而到1984年在北京召开的有关座谈会上，与会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业已形成了“研究苏联东欧问题就是研究我们自己”等共识，强调俄苏研究学界有责任把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应该采取更加客观的态度，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好的服务。[56]

以《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为例，1982～1986年，苏联东欧问题始终占据了该内部刊物的重要部分（参见表5），并且其讨论问题的深度、开放性直至今日重开其卷时仍能体会到。无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还是苏联模式，无论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凡是涉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都可以在这本内部刊物上找到相关的讨论。

表5 《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苏联东欧问题论文篇目统计（1982～1986）

单位：篇

年份	苏联	东欧	合计	总篇目	所占比例
1982	74	15	89	183	48.6%
1983	56	24	80	186	43.0%
1984	42	20	62	174	35.6%
1985	44	13	57	168	33.9%
1986	44	17	61	170	35.9%

注：本表内容为作者统计所得，文摘内文章未纳入计算。

改革开放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了一个巨大、开放同时也是令人振奋的大舞台。尽管表5同样透露出一个重要信号，即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征途上，不仅仅有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用于咨鉴，前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日本同样扮演了重要的参照者，并且随着改革的越发深入而日益受到重视，但不得不承认，这一代的研究者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在强烈的问题意识指引下，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资政参考。身处特殊年代的这一代学人善于学习，勇于创新，能够把握好吸收与转化的节奏，懂得意识形态并能巧妙回避意识形态乃至超越意识形态，注意兼听，从而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许，今天的我们显得更加训练有素，也许有不少人对这“长十年”的俄苏研究学者及其作品很不以为然，但事实能够证明这种观点有失偏颇。[57]

在追求客观真理和服务中国改革的意识指导下，中国的俄苏研究取得了相当快速的发展。美国学者罗兹曼对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东欧研究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指出，一个尚未引起其他国家注意的全新而重要的俄苏研究学派突然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就规模而言，中国对苏联问题研究的出版物数量仅次于英语世界。逾20家专业性刊物增加了作为世界上第二大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学术体的持久发展的可能。罗兹曼强调说，中国专家将因对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度理解而赢得尊敬。中国苏联东欧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于对苏联文献的娴熟运用，对苏联东欧经济改革进程的持久兴趣，以及比较社会主义的宏观视野。罗兹曼甚至乐观地认为，中文可能会成为研究苏联问题中仅次于俄语和英语的有效工具。[58]

（四）后冷战时期的俄苏问题研究（危机阶段）

苏联解体后的两个十年，就中国俄苏问题研究学界而言，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期。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部分领域、个别命题上，中国的研究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另一方面，更大的问题在于俄苏研究成果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方法应用和理论总结的双重失范，从而使得整体上中国的俄苏研究落后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西方俄苏研

究，甚至面对亚洲邻国韩国研究界的后发式赶超，我们也感到应对乏力。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同样给中国俄苏研究界以深刻震撼。20世纪80年代这一领域研究的繁荣，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经验”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意识因为借鉴的对象瞬间消失而面临重构的难题，刚刚起步的中国的苏联东欧地区研究突然面临着迷失方向的可能。

在短暂的“休克”之后，中国俄苏研究学界很快为苏联解体带来的研究空间而兴奋。如果说苏联解体给西方的俄苏研究带来了巨大挑战的话，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恰恰是冷战结束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种火山爆发式发展的可能正在出现。具体而言，这一学科的新的增长潜力将因以下因素而变得更有可能：其一，苏联各加盟国纷纷独立，使得国别和区域研究对象增加；其二，过去高度保密或蓄意虚报的社会和经济数据得以问世，档案资料的大量解密，提供了全新的信息空间；其三，俄罗斯本国以及其他国际学术机构大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扩展；其四，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束缚日益淡化。

后苏联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在议程设置上受到了汪道涵先生的影响。汪老在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时就十分关注苏联问题研究。苏联解体后，他又直接推动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理论探讨。从90年代中期开始，汪道涵先生推动全国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学者相聚于华东师范大学，研讨苏联东欧地区的发展演变和历史经验教训，探讨俄罗斯转型期的内外事务走向，也研究如何进一步提升和推动中俄关系的全面发展。[59]据邢广程研究员回忆，1997年汪老在与时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会长徐葵谈话时就表示，愿意帮助学会每年在上海召开一次内部学术讨论会，首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即苏联解体的原因。[60]此处应该强调的是，90年代中期汪老建议由中国俄罗斯东欧学会主办，具体委托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承办此会，俄罗斯研究中心成立后又由该中心出面组织。汪老当年所创设的会议机制，在教育部领导、中国俄罗斯中亚东欧学会和各地同行的大力襄助之下，延续至今。[61]

从全国俄苏问题内部讨论会历次的议程看，后冷战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

——90年代早期至中期的主要研究课题是苏联解体问题；

——90年代中期以后至21世纪前期，更多地集中讨论俄罗斯的转型问题；

——2004年以后围绕俄罗斯重新崛起的话题进行了多项研究；

——贯穿整个20年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特别是中俄关系。

这一时期中国俄苏研究的增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业性研究机构的更名改组和新设同步进行，研究队伍继续壮大。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体制崩溃后，中国俄苏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相应地，各地的苏联东欧研究所以及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学会都进行了相应的更名改组。

这一时期新成立的研究机构主要有：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1994）、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1999，次年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2000）、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所（2001）、北京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2001）、对外经贸大学俄罗斯与独联体研究中心（2003）、中国政法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2003）、哈尔滨工业大学中俄经济技术合作研究所（2004）、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中亚研究所（2005）、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所（2006）、哈尔滨师范大学俄语教育研究中心（2007）、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2009）、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2010）、辽宁大学俄罗斯东欧经济政治研究所（2010）、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研究中心（2011）等。

第二，研究作品数量保持高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00~2007年，中国俄苏研究界共出版320种以上有关俄罗斯、东欧和中亚以及苏联问题的个人和集体专著，相关译著超过90种。论文数量则更为庞大（见表6）。

表6 1992~2007年中国俄苏研究的论文数及类别调查

单位：篇

内容	年份	主题词检索				题名检索			
		俄罗斯	苏联	东欧	中亚	俄罗斯	苏联	东欧	中亚
政治·军事·法律	1992~2000	8422	8690	2262	727	2838	1048	516	310
	2001~2007	11303	7534	984	1231	1825	1095	188	503
经济·管理	1992~2000	11780	5767	2327	2275	4135	509	630	406
	2001~2007	17615	2863	1337	2147	2767	257	303	822
教育·社科综合	1992~2000	5937	6902	1091	635	1814	719	196	159
	2001~2007	9747	6394	705	963	1200	815	97	327
文史哲	1992~2000	6461	7348	561	950	1315	927	105	194
	2001~2007	10259	7160	473	919	902	1040	65	207
合计	1992~2000	32600	28707	6241	4587	10102	3203	1447	1069
	2001~2007	48924	23951	3499	5260	6694	3207	653	1859
总计	1992~2007	81524	52658	9740	9847	16796	6410	2100	2928

资料来源：安成日「中国におけるロシア（ソ連）· 東欧 · 中央アジア研究」『比較経済体制研究』16号、90頁。

由表6可见，国内俄苏研究界同人对苏联问题的关注度在21世纪前后基本持平，若以10年为一个周期，则2001以来苏联问题的论述比20世纪90年代更多；中亚问题的热度上升，而对东欧问题的关注度明显呈下降趋势。

笔者认为，近20年来的俄苏问题研究，如果单从数量上看，似乎已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但如果从定性的角度看，可能除了偶尔局部开花外，退化的势头要大于进化的态势。以往的大师名家，多半已年老凋谢，学术衰敝之状渐次显现。这20年俄苏研究所谓的繁荣实际上只体现为数量的膨胀，我们不仅在国际学术界中日益被边缘化，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也同样被日益边缘化，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导致这种“双边缘”格局的现实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发展的大局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路径转向和对外关系重点的变化，使得对俄苏研究的需求日益萎缩。一个可供观察的指标是，中国俄苏研究的专业学术刊物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急剧萎缩，目前连同90年代新创的刊物只剩下不足10种（参见表7）。

表7 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专业刊物名录

杂志名称	曾用名	创刊年	所属机构	现任主编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苏联东欧问题》《东欧中亚研究》	1981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	吴恩远
《俄罗斯研究》	《今日苏联东欧》《今日前苏联东欧》《今日东欧中亚》	1981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冯绍雷
《西伯利亚研究》	《西伯利亚与远东》	1974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曲伟
《俄罗斯文艺》	《俄苏文艺》《苏联文学》	1980	北京师范大学	吴泽霖
《中国俄语教学》		198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刘利民
《俄罗斯学刊 》	《远东经贸导报》	1988	黑龙江大学	靳会新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东欧中亚市场研究》	1996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	常邠
《转型国家经济评论》*		2008	东北财经大学	郭连成

注：*为集刊，本表内容为笔者根据调查资料统计而得。

第二，与形形色色的研究机构不断建立[62]相比，中国俄苏研究人才储备不足的弊病日益显现。目前接受俄苏研究训练的中国学者，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语言出身，属于典型的半路出家，对于俄苏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内容了解不多；一种则是其所学外语并非俄语，在政治学或其他学科方面有积累，但对俄国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等在地知识所知甚少。这两类人要在短短几年的硕士或博士学习中，同时掌握语言、历史文化和所在学科的理论架构，实在是非常艰难。

即使仅从俄语教育的角度看，像黑龙江等省份，俄语专业的本科生就业形势很好，但这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边贸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对经贸翻译等从业人员的刚性需求造成的，并不意味着相关的研究人才储备较前增多。[63]

第三，中国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差距不仅未能缩小，反而在加大。80年代，相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俄苏研究界，我们的优势地位在俄罗斯急剧转型的背景下重新转化为劣势。可以说，中国俄苏研究学界本可借着80年代与西方同行基本平等对话之势，在冷战结束之后延续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抢占国际俄苏研究的前沿高地。遗憾的是，我们错过了这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对此，回顾美国学者罗兹曼的评论是有益的。他认为，80年代妨碍中国在苏联问题研究上全面繁荣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其一，交流的隔绝使得只有少数中国学者能有机会在苏联进行部分实证性研究。大部分学者不得不采用二手材料，而非一手资料；其二，中国俄苏研究的成果

绝大多数用中文撰写，很难让苏联学术界了解和熟悉，基本上没有作品直接用英文撰写或翻译成英文；其三，当时对内部资料的严格控制也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学术圈和国外（非苏联）学术圈的互动。罗兹曼认为，这些问题也是由历史造成的，至今都没有得到全部的解决。[64]

当西方学者，包括日本等亚洲同行，利用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信息大爆炸良机作为验证各种理论的试验场之际，中国的俄苏研究仍然基本保持了一种自娱自乐的小宇宙状况。不仅对英语世界的广泛材料利用不足，即便是俄语材料的使用也不够充分，鲜见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国际刊物上基本上看不到国内俄苏学界的大作。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有学者以苏联经济研究为案例，注意到中国俄苏研究这种不进则退的危险趋势：

> 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此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工具：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等。可惜，迄今为止，这些工具还殊少用于国内的苏联经济研究中（如果说在国内问题的研究中已经开始了运用这些工具的过程，那么在苏联问题研究中，还看不到哪怕是一点这样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沿用过时的定性描述取代需要定量的分析就成为必然。不论谈到什么问题，经济形势分析也好，增长速度预测也好，消费者福利评价也好，研究者皆“以不变应万变”，用体制弊端、结构困难、劳力短缺为“定式”，一、二、三、四地“分析”一番，做出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断语。由于缺乏分析不同问题所适用的特殊工具（诸如增长理论用于增长速度的预测，投入产出知识用于结构分析，生产者行为理论用于体制研究），结论难免贻笑方家。不仅如此，计算机模型分析和技术预测的失效，还不时被当作反对采用这些工具的理由。这就不仅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而且是研究者观念的问题了。这里应该指出，国外苏联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用分析取代描述，用逻辑结构取代简单罗列，用定性定量的结合取代纯粹定性分析，意味着研究的进步而不是相反。[65]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俄苏研究刊物至今也没有完成国际化的进程。而赵常庆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提出俄苏研究学刊面向海外发行的问题：

>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种刊物可向国外发行，这与我国苏联东欧研究地位很不相称。在我国出版的国际问题刊物中有很多是可以向国外发行的，如《国际问题研究》《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研究》《日本问题》等。苏联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刊物《远东问题》也用四种文字（俄、英、日、西）公开向国内外发行。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出版一份可向国外发行的苏联东欧问题专业刊物，这对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扩大国际影响，推动国际学术

交流是大有裨益的。

学术刊物的国际化是教育部近年来才开始大力推动的。上述建议充分表明中国俄苏研究学者是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问题是，这一20余年前的富有前瞻性的建议始终未能落到实处。

另外一个层面是，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程度明显不足。以2010年7月底8月初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中东欧研究会五年一度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为例，亚洲国家中日本有70名余名专家与会，韩国学者有15名，中亚国家学者有数十名，印度作为学会执委会观察员也首次派出2名学者参会，中国作为一个研究俄苏问题的学术大国只有4名学者到会。在会议组织方专门辟出的“亚洲视角”圆桌会议上，该学会第一副主席松里公孝介绍情况时，将韩国和中国放到一起谈，称中国和韩国共有约20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显然有保护中国人面子的用意。

第四，从学科分野来看，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世界历史等一级学科中，俄苏研究往往因无法提供所谓普遍的知识贡献而在各自所属的学科内得不到认同。

上述种种俄苏研究之现状，不能不令人深感焦虑。如果长期得不到改进，很可能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二 从“苏联学”到“后苏联学”：以美国为例的参照

美国对俄国问题的关注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最早有关俄国和东欧的学术兴趣可以回溯到19世纪，[66]但严肃的研究则开始得比较晚。直至1914年，美国只在3所重要大学中开设了俄罗斯语言与文学课程，而俄罗斯历史只有2所大学教授。[6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只有少数的专家接受过专业的俄苏研究训练，且主要是为了适应美国国务院培养驻苏外交官和一些媒体培养高水平记者的需要。当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在1938年设立斯拉夫研究委员会时，美国学术界并没有对其予以很多关注，也不认为俄苏研究领域有多少前景，更多的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直接赋予了美国的俄苏研究以强大的活力，并直接影响了冷战期间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尤其是当时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设立的研究与分析分部工作的数名学者，此后成长为苏联东欧问题研究领域的巨擘。[68]

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仍然受美国公众的普遍关注。加上冷战的铁幕迅速落下，“国家需要”和“国家利益”催生了第一批有关苏联研究的专项课题和研究中心。后来美国学术界将这种俄苏问题研究称为“苏联学”，特指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针对苏联内政和外交展开的研究活动，它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是冷战的产物。相当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官和其他政府官员投入这场研究，创造了大量苏联学的作品和文献。

冷战结束后，世界体系理论的缔造者、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等学者共同撰写了《冷战与大学：战后知识分子史》一书，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就冷战时期的大学、大学内部的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研究与美国国家政治，尤其是军事的密切关系，做了详尽的描述。该书认为，美国冷战时期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度源自二战期间的战时学术安排，即在一切为了赢得战争的国家动员中，知识分子被调集和组织起来。这种战争赋予的学术配合政治的合法性，在二战结束后不仅没有终结，反而逐渐定型为美国最为稳定的学术界与政府间相互联动与协作的国家科研体制。在一切为了抗衡苏联的前提下，这种特有的战时科研体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大学师生以激进方式表示抵制后，才略有改观。[69]

当时，首批成立的是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在二战结束后的头十年，一批研究生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多在二战期间学习过俄语，也因为曾经常驻过苏联或东欧国家而对这一国别和区域研究深感兴趣，由于经历过二战或者有过其他工作经历，他们对于学习和研究生活更为投入。这一时间段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基本上都成了美国苏联东欧研究或实务的主力（见表8）。部分学生后来逐渐升迁至美国派驻苏东地区的大使，部分则成为层出不穷的各项俄苏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则在美国政府内部担当处理苏联东欧事务的官员。坦率地说，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战后头十年美国的苏联研究仍处于一个夯实基础的阶段，总体质量不高，静态研究多，动态研究少，平铺直叙多，理论总结少。但也应承认，其最大的价值和功劳在于收集和积累资料，为以后的“苏联学”的拓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表8 美国俄苏区域研究研究生就业情况调查（1946～1957）（以哥伦比亚、哈佛、印第安纳和华盛顿大学为例）

工作岗位与俄苏有关	人数（人）	占总就业的比例（%）
教学	84	20
学术或个人研究	53	13
以学术为业总人数	137	33
政府研究部门	50	12
其他政府部门（包括联合国）	112	27
政府部门就业合计	162	39
行政	8	2
商业和法律	7	2
新闻业和广播	28	7
非俄苏领域	78	19

注：研究生和非研究生总数约670人；继续接受研究生训练的学生数量为75人；第一份工作情况明了者为420人。

资料来源：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n*, p.65。

科尔顿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发表过题为《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的演讲，他当时透露：

> 在冷战开始的最初十几二十年，当时苏联是美国的敌人，苏联研究是美国国家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印象后来加以强化，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1957年苏联的卫星上天。这使得当时美国感到苏联研究更加有必要性。可以说政府对俄罗斯研究的支持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还包括物质上和资金上。当时的苏联研究，包括现在的俄罗斯研究，在整个学科研究和教育中受到了政府的特别照顾。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军方、情报部门对俄罗斯研究人才有很大需求，我所指的人才是了解一些俄国的情况并且懂俄语的人。当时美国政府花了几百万美元来翻译关于俄罗斯的情况资料，让美国的官员了解运用。后来这些关于苏联的资料慢慢流向民间，让学者加以运用研究。美国当时也建立了一些智库，主要是从事战略和军事研究。当时最著名的是兰德公司，主要研究苏联以及他们眼中的苏联威胁。毫无疑问，这些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个人在50、60、70年代经常可以走向政府的高位。布热津斯基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尔布赖特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赖斯曾经也是研究苏联问题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是苏联俄罗斯研究出身。[70]

科尔顿道出了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战后在美国迅速崛起的“公开秘密”，即这显然跟政府的推动有关。

第一，美国意识到，在苏联1957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可能会陷入一个被苏联超越的风险，这种恐惧感推动了美国加大对苏联东欧研究的投入，以求深刻了解和理解冷战期间的最大敌手。艾森豪威尔政府借此说服了美国国会在1958年紧急通过了《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按照该法相关规定，美国将对所有地区研究中心进行超过25年的资助。[71]苏联问题显然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即便不是唯一也是重点予以关注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很多经济学、政治学、国际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除了研究自己的基本学科外，还沉浸在研究作为对手的苏联，包括其语言、历史和文化之中。

第二，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实施和福特基金会不遗余力的财政支持，从整体上推动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作为一门学问的形成和增长。这同样是“苏联学”发展的战略机遇。

“区域研究”受到美国学术界、政界乃至各项基金会的广泛扶持，主要是它的学术旨趣符合了用西方的方式理解非西方的尝试和努力。为了突破过去局限于欧洲大陆的世界观，同时更是为了适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雅尔塔体系建立起的霸权地位，一种结合了国家资源、私人基金和学院体制的“美国式区域研究”开始在美国学院体制中占据显著位置。这种区域研究从被推广伊始就带有浓厚的现实关怀，“主要的重点指向那些阻碍美国试图准备成为世界领导的地区”。[72]其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努力用一种整合的学科融合，而非用单一学科甚至是多学科的方式去理解一个他者社会。在此过程中，各种专业学科的细化和相互之间的孤立状况将被打破。相应地，知识的整体性将得到展现，由此可以催生新的学术立场、新的洞察力，新的技巧也将会形成。（2）由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框架是基于北大西洋共同体的现实提炼，对其他非西方地区可能并不适用，因此，需要借助区域研究提供非西方世界的信息和比较数据，从而克服美国学者狭隘的地方主义立场。（3）通过整合性的知识尝试去认识、分析、诠释异文化社会，也有助于外部研究者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反省。[73]由于苏联体制的特殊性，要认识其本质，了解其运作规律，厘清其利益所在，只能借助于区域研究的方式，而不能依靠传统的分科知识。

随着冷战的逐步展开，美国愈加重视对于苏联的研究。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和机构投入到对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一批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相继成立，一些大学开设了关于苏联历史和政治的专业课程，各类智库也将其关注点转移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SRC）1991年的一份报告总结道：“冷战的意识形态成为推进美国苏联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部门成为苏联学专家的重要雇佣者。同时，很多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本身就是来自苏联东欧的难民。毫无疑问，上述力量的结合快速地推动了这一领域，但同时也扭曲了政策研究的智识议程。”[74]

值得注意的是，对美国研究苏联第一代政策的专家的来源分析可以彰显出早期美国俄苏研究的两面性：

> ……对苏联政策的解释，基本上为一批原来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前共产党人或至少是当年的同路人所独占，这些人对马列主义造诣颇深，而且数十年来一直密切注视着苏联以及国际共运的发展。他们彼此在看法上未必能取得一致，再说他们的见解也不见得都正确。然而，他们毕竟都具有相当的感性认识，使他们对苏联内部的动向、对斯大林及其信徒们的意图，能够把握住实质，能够猜测到苏联所可能作出的反应。很明显，这批老一代的专家有他们自己的意图，因此对问题的看法往往带有倾向性，而且偏激得厉害。尽管如此，这种偏见丝毫也没有妨碍他们对问题有精辟的真知灼见……[75]

到20世纪50年代的后半期和60年代，一批以苏联东欧作为研究对象的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开始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呼风唤雨，其成员主要来自布朗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堪萨斯大学、密歇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斯坦福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研究型高校。

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文学。而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从研究范式上看，人类学的路径优势较为明显。这并非偶然。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就是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该中心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即哈佛难民项目，同样是由人类学家领衔。关键问题是，由于冷战无形的铁幕隔断了苏联与西方阵营，使得研究俄苏问题无法采取像研究法国或者英国那样的方式。为了研究俄苏问题，或者说为了接近俄苏问题的“真相”，学者们不得不更多地采取人类学的方式，即通过某些“线人”、来自苏联的个别社会成员的知识的传导。这样的研究所获得的信息显然是有偏向性的，“非客观性”的一面难以避免。[76]同样，由于美国学者当时几无可能赴苏联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在地调研，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很快就被其他方法所挤斥。

20世纪60年代，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并最终在70年代初期铩羽而归，这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也影响了美国的中国研究。作为共产主义体制研究的一部分，这种影响又波及了苏联东欧研究。这一时期苏美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赫鲁晓夫解冻政策的推行，苏联社会

展开非斯大林化，苏联报刊相对来说自由度变大，这就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同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东西方交流特别助理莱西和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扎鲁宾于1958年经过两轮谈判后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苏美文化交流协议。此前一直冰封的苏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得以正式推进，许多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可以到苏联进行一到两年的实地研究，不少苏联学者也有机会前往美国。据统计，从1958年到1985年底，大约有2000名美国学者和2000名苏联学者通过相关项目到对方国家访学交流。[77]同期，美国在比较政治科学和行为科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一些新观念、新方法、新概念应运而生。[78]

在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学术进展两股浪潮夹击下，美国学术界对区域研究的理念和方法提出了质疑，出现了修正主义学派。这股浪潮最早出现在亚洲区域研究领域。一些专家在1964年召开的亚洲学研究学会年会上提出了如何处理中国研究和传统分科之间关系的问题。此后，一些杂志也开始刊登区域研究与学科导向关联性的文章。美国的苏联东欧研究界迅速参与了这一场大辩论，开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79]一部分学者甚至专门修正对苏联研究的方法，对过去近20年苏联研究进程中积累的工具、研究模式开始抱怀疑态度，希望进行修正。有学者公开宣称，是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研究，为研究共产主义体制提供了更具想象力的概念和方法。[80]当时出现了对俄罗斯研究、中国研究以及拉丁美洲研究进行整合的趋势。这种整合更多地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展开。

20世纪70年代时，大批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和部分德意志移民迁居到西方国家，这给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沉寂一时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重整旗鼓，展开了大规模的访谈研究，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80年代初，里根政府觉得苏联研究做得还不够，特别是不能深入很多苏联现象中，因此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整个80年代是美国的苏联研究相当火热的时期。[81]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苏联的改革更激起了美国学者的研究兴趣。

整体而言，冷战时期美国的苏联研究围绕着苏联的政治特征、苏联变革的可能性、苏联政治统治的代际变化、苏联文化及历史等核心问题，最终分成三块壁垒森严的阵地：文学和历史研究者集中精力钻研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文化和革命、内战以及二战前后的历史；政治学和经

济学研究者试图厘清后斯大林时代及与此相关的问题；而“苏联学”专家则转变为对苏联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被戏称为“克里姆林宫学”的知识成为这批学者的主业，他们一门心思研究苏联高层的人事变化、权力斗争等问题。[82]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在整个过程中相对处于边缘位置。在学科导向与区域导向的争论中，二者最终分道扬镳。基于社会科学背景、运用相应理论对苏联问题进行研究，后来被归纳为“套模型”（model fitting）。极权主义模型、结构功能模型、政治文化模型、发展模型、多元模型、利益集团模型、合作主义模型、政策网络模型、官僚政治模型、主从关系模型等纷至沓来，不一而足。正如王绍光所批评的，这些理论中没有一种是从研究共产主义制度自身运作规律中产生的。基本上是什么理论在学术界时髦，什么理论就会被用于共产主义研究。外来模型也许对认识共产主义制度不无启发，但问题在于，简单地套模型就不免有点粗糙、有点生硬、有点勉强。[83]但总体而言，“苏联学”，包括后来的“克里姆林宫学”，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保持与美国当局的紧密合作，从而确保了对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主导地位。

但正在“苏联学”处于鼎盛之际，苏联突然解体了。整个世界对此毫无准备。除了《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等基于帝国的成长规律，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出发，对此早有预测外，美国学术界对苏联的解体大多十分茫然。美国研究俄苏问题的专家也是如此。科尔顿教授在1991年9月还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苏联政治的活力”。但正在他向学生们传授苏联体制的超稳定性并强调这一体制的活力时，存续了73年的苏联（含苏俄）一夜之间红旗坠地。科尔顿教授自嘲说，“结束课程讲解后，苏联就不复存在了，这显然很滑稽”。

苏联的崩溃毫无疑问带来了美国俄苏问题研究的危机。按照科尔顿的论述，这场危机从以下几个层面可以感知。

首先，苏联研究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学眼中变得不再特殊，不再受照顾。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迅速进行亲西方的制度改造，进入了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蜜月期。冷战的敌人消失了，意味着美国的俄苏研究界再也不能用对敌人研究的重要性来塑造自己的研究身份。

其次，有志于从事苏联研究的学生人数急剧减少。以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为例，其成立伊始开设的苏联政治课程有60个学生听课，而

到科尔顿1989年开设这一课程时已经增加到历史最高纪录75人。但在苏联解体后两年的1993年，选修和专修这门课程的学生人数降到了25人。

再次，苏联研究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开始“碎片化”。曾经有近两亿人的大国一朝分裂为15个国家，连俄罗斯都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遑论其他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碎片化的一些国别研究变成了俄罗斯研究的简单衍生品。

最后，上述演变是在美国整个苏联研究人员代际更迭的敏感时刻发生的。当时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学者在苏联解体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科尔顿感慨说：

> 我们不知道如何替代他们，也不知道新的一代应该继续研究什么。还有就是对社会科学领域做研究的人来说，实际上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也处于急剧变化之中，用美国的一句话说，我们在追一个本身在移动的目标，其挑战之大可想而知。[84]

所以苏联解体后的10年，基本上是一个美国俄苏研究“失落和反思的十年”。如前文所述，美国学术界曾集中讨论为什么美国的“苏联学”非但没有能够预测到苏联的解体，相反却成了西方意识形态僵化的一个例子。但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建立“后苏联学”的重要阶段。经过了深刻反思的美国学术界抓住了苏联解体带来的空前机遇，社会科学利用其学科优势迅速主导了对俄苏研究的议程设置，并利用传统学科的理论强势将“让人迷茫、有时显得矛盾重重”的俄罗斯当作各种理论的试验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新的俄罗斯本身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兴奋点。美国学术界当时受到激励，不断研究新的问题，拿出新的模型，设立新的范式，收集新的资料。冷战时期被批评为“套模型”的研究方式，此时因为大量一手资料的获得而具备了证实或证伪的可能，有了用武之地。其中转型理论的发展最为引人关注。到90年代末期，美国对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产生研究兴趣的学生人数，已经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21世纪以来，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西方有多少俄罗斯问题的作品问世。最近一段时间围绕新冷战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火花四射。就这样，“正常化”而非“特殊化”的“后苏联学”在美国学术界成功复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俄苏研究的复活，尤其是政治科学，是付出了代价的，即不得不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纯粹的学术根本不存在。英国学者波波·罗对此批评到，在西方，对于俄罗斯的研究日益以政策为导向。大学、研究机构和智库不断向基金机构、政府、多边组织（欧盟、

联合国等）以及企业部门寻求资助。为了获得资金，他们需要展示他们的研究是“意义重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的老套。因此，有关俄罗斯这样充满争议和分歧的议题，往往反映出特定的思想、政治甚至是商业的观点。当今大部分有关俄罗斯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更注重提出特定的观点，而不是进行客观的分析。由于过去几年中俄罗斯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发展，这种趋势得到了强化。[85]

三 作为方法的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一项以北海道大学 斯拉夫研究中心为基础的案例分析

如果说美国的俄苏研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86]的产物，日本的俄苏研究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选择。作为与俄罗斯隔海相望的东亚大国，日本对俄罗斯、独联体、波罗的海以及中东欧国家在内的斯拉夫—欧亚区域的研究具有相当雄厚的研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根据日本学者木村汎（Hiroshi Kimura）的研究，按从业专家人数计，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大国，超过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等传统的俄苏研究大国，更不用说瑞典和芬兰这样的北欧国家。[87]统计数据表明，最新一期的斯拉夫—欧亚研究人员名录共收录了1529名日本国内学者，比2003年增加了30名。[88]与这种积极发展的态势相呼应的是，近年来日本学者在国际俄苏问题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也在增加，每5年召开一次的世界俄罗斯东欧研究国际学会会议将于2015年在日本举行，这也是该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在亚洲召开这样大规模的国际会议。

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则是日本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的代表，它不仅是日本国内公认的本领域顶级研究水准的学术机构，在国际上也得到了高度认可。调查数据显示，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该中心的研究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见图1）。

上述调查表明，如果将共同研究员和其他研究员的数据累计相加，认同斯拉夫中心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的高达75%，其在日本国内已达到一流水准更是毋庸置疑。本文接下来将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取向为例，揭示其组织学术研究的特点、方法，通过介绍其代表作以及今后的发展思路等，看看其可以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哪些参照和借鉴。

（一）斯拉夫研究中心前史（1953～1978）

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研究机构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二战前，从日本的总体战略需要出发，斯拉夫问题研究学术机构曾一度被废止，日本国内从事斯拉夫地区研究的学术机构在二战前集体失声。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的成立，标志着在日本高等教育体制框架内的斯拉夫问题研究传统得以重新恢复。

早在1947年，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开始在法律文学部中设立俄罗斯语言文学讲座，这也使其成为日本国立大学中最先设立这类研究设施的学府。这一年，执教于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者木村彰一成了该校斯拉夫研究室以及斯拉夫研究机构的奠基人。与其他研究机构较为相似的是，斯拉夫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独立身份。根据外川继男的描述，此时的斯拉夫研究室不但研究人员数量很少，而且并非一个独立组织。该机构之所以能够诞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北海道大学文学部教授木村彰一（斯拉夫研究室主任、斯拉夫研究所首任主任）和同为文学部副教授的鸟山成人（斯拉夫研究所第二任主任）想在该校设置从语言、文学以及历史的角度进行斯拉夫研究的场所。幸运的是，当时的北海道大学校长杉野目晴贞以及法学部教授尾行典男同样希望成立一个集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于一体的斯拉夫地区研究组织。同时，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也非常乐意向日本国立大学中唯一设立俄罗斯文学专业的北海道大学提供成立苏联和东欧研究机构的资助。这三股力量最终催生出了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前身——斯拉夫研究室。洛克菲勒财团在斯拉夫研究室正式成立前向该研究室捐赠了价值约500万日元的图书和文献资料，这也成为后来著名的斯拉夫研究中心丰富藏书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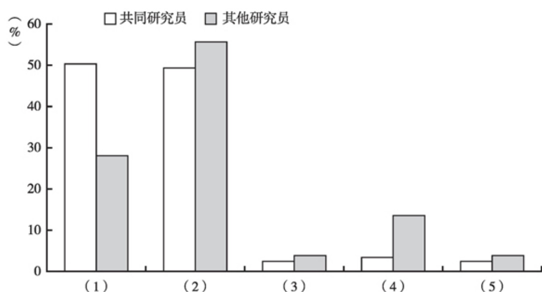


图1 对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活动的整体评价

说明：（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

资料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1999、25頁。

根据笔者对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访谈，尽管现存资料并未详细说明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的成立背景。但自成立之日起，斯拉夫研究室的功能已经被确定为以下几点，并成为该机构此后50多年发展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多学科研究理念。斯拉夫研究主要的方向和领域是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

第二，坚持开放原则组建研究团队。换言之，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成员可以超越北海道大学的范围，面向日本所有高校和从事斯拉夫—欧亚研究的学术机构。

第三，坚持从事纯粹的学术性共同研究。也就是说，有意识地不从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决策角度和战略学角度进行研究，而以学术性为基本导向。

1953年成立之初，斯拉夫研究室的成员主要是大学内外的兼职研究员，既没有固定编制，也没有固定预算，活动经费全部来自日本文部省下拨的科学研究经费。这种状况在1955年改制之后并没有明显变化。当时研究室的正式编制为1名副教授和1名助手，其余均为大学内外的兼职研究员。

这一时期的斯拉夫研究室学术活动和研究的组织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研究室的管理和运转实行首长负责制，主要由主任研究员负责；每年召开两次教授会议，借此对研究设施的运转、组织人事和其他重要事项进行审议。由于无法作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单独活动，当时斯拉夫研究室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附属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

借助校内外相关专家的集体力量进行合作研究是斯拉夫研究机构成立之初即开始遵循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一机构当时的规模非常有限，但仍然从政治史、思想文化、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有意义的共同研究课题：关于俄国和苏联社会中间阶层作用的研究（俄罗斯平民主义，1953～1958）、俄国革命研究（1957～1959、1968～1969）、俄国社会现代化研究（1964～1965）、东欧的联邦主义研究

（1965～1966）、俄国和东欧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1970～1973）、苏联社会的变迁和对外关系（1973～1975）。

从经费来源看，以上所列课题的研究经费主要出自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补助经费。从使用途径看，大部分用于购买必备资料和支付差旅费用。从组织形式看，这些共同研究主要通过研究报告会[89]和1970年开始组建的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会[90]进行讨论和发表。从成果载体看，各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主要刊载于1957年创刊的研究纪要《斯拉夫研究》[91]上。

经过研究人员的努力和日本国内相关人士的帮助，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设施的规模不断扩大，开始逐步完成由虚体化到实体化的转变过程，即由原本的讲座形式转变为研究实体的形式。1957年设立了经济研究方向，1964年设立了历史研究方向，1977年设立了政治研究方向，最终形成了拥有6名专职研究员、1名客座教授和包括法律研究方向在内的6个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望月哲男教授认为，总体而言，当时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的规模并不是很大，而且极度缺乏进行持久的合作研究和实地调查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的经费。无论是从研究人员的数量，还是从所藏资料的规模来看，都远远比不上1964年在东京外国语大学设置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以及1965年在京都大学设立的东南亚研究中心等区域研究机构。[92]

造成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在各个方面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整个社会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该区域的综合性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时，在行政上隶属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而非独立研究机构的事实，也是妨碍斯拉夫研究机构成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改善这种局面，1969年，百濑宏设施长（主任）试图将斯拉夫研究机构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独立出去，并成立新的“苏联东欧研究中心”，这样就拉开了近10年的“独立运动”的帷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斯拉夫研究机构成立20多年后，经过外川继男和木村汎等历届主任向北海道大学以及文部省的多次呼吁，作为北海道大学校内共同教育研究设施的斯拉夫研究中心终于于1978年春成立了。

（二）校内共同教育研究设施时代（1978～1990）

新成立的斯拉夫研究中心采取大讲座的方式，从事文化、经济和政治等三个方向的斯拉夫区域研究，编制规模也扩展为7名教授、1名客座

教授和2名访问学者。为使中心保持高效运转，特别设置了由专职教职员工和校内文科各专业的若干名教师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事、预算等与中心管理有关事项的审议工作。虽然此时差旅费等中心经费的数量仍然相对有限，但较之于头20年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也使得该中心具备了一定进行合作研究和海外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1981年，北海道大学法学部进行了扩建，扩建后的法学楼中有3层分配给斯拉夫研究中心进行研究及图书资料的保存，使得中心办公条件明显改善。

上述一系列措施大大促进了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这一时期，在保留合作研究、研究报告会、各种交流会、在其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出版《斯拉夫研究纪要》等传统的研究活动之外，中心增设了以下研究活动：

（1）出版《斯拉夫研究中心新闻》（1979年3月创刊，第一年共发行3期，随后以季刊形式发行）；

（2）出版“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系列”（1979年创办，主要刊行研究报告会、各种研究会的报告和讨论集）；

（3）出版*Acta Slavica Iaponica*（1983年创刊，系外文年刊）；

（4）出版《公开讲座》（1985年前为试刊，1986年后每年刊行一次，每次7～8讲）；

（5）设立“铃川基金奖励研究员制度”（1987年开始实行，利用铃川正久的捐赠资金资助研究生以上学历的青年学者的访问研究）；

（6）签署“学术交流协定”（与巴黎第三新索邦大学国立东洋语言文化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等五个国家的六个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协定）；

（7）出版《苏联东欧研究文献目录》（该目录从1978到1989年每年出版一次，主要收录了《斯拉夫研究》卷目的国内研究文献与信息，1990年以后建立了数据库）；

（8）出版《书籍杂志信息》（主要收集了从70年代以来中心以及国内外的图书杂志和图书馆信息）；

（9）制订“基本图书整备计划”（从1981年起按照当时拥有藏书约55万册的伊利诺伊大学苏联东欧研究中心的1/5的规模，利用特别经费进行基础文献的收集）。

由于访问学者在中心进行长期研究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会议的国际化色彩逐渐增强，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得到了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国际学术研究经费和驻札幌美国中心的援助之后，这一特征尤为明显。

正是在这一时期，该中心组织的夏季研究报告会多以国际会议的形式举行，一部分成果收录在“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系列”里，另一部分收录在外文论文集中。

而以午餐交流会的形式进行学术讨论成为这一时期的惯例。中心的休息室里设置了苏联卫星电视的接收装置，利用该设施，中心研究人员一边观看苏联的新闻报道，一边同来访的外国学者就戈尔巴乔夫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学术讨论。

望月哲男教授是日本国内研究俄国文学的“顶梁柱”，他于1986年加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据他回忆，他当时对中心与其他大学文学专业不同的学术氛围深感诧异，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特别是与自己专业不同的外国学者接触的机会非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各类研讨会非常频繁，且大部分研究会不但使用日语，也使用外语进行。

第二，学术批判精神浓厚。在研究会（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会进行激烈的相互批判。

第三，集体意识和团队意识很强。每周一下午例行的教师会议，有边喝酒边交流的惯例。同时，关于斯拉夫研究中心的预算、人事等管理方面的问题，组织的扩充、研究生院的设想等问题，报告会的日程和研究费的申请，出版物的编辑，以及各种学会信息和海外学者的研究动向、外国学者的接待等与中心有关的一切问题，都经由全体讨论的形式研究解决。“不参与自己专业之外事务的做法在中心行不通”。比如，在访问学者的人选问题上，在从与自己专业不同的A教授和B博士中选择一位合适的人选时，中心的研究人员被要求根据访问学者提供的申请资料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理念不同，通常下午一点半开始的会议到傍晚七

点还没有结束。望月哲男教授说，这可能使刚到来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感觉不适应，觉得这简直就是中小企业的业务会议。但是现在日本的大学改革要求大学老师具有跨专业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同时具有企业家的创新思想。现在回忆起当时，还是很怀念的。[93]

（三）打造全国核心研究机构的努力

随着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日益扩大以及在日本国内影响力的逐步提高，其发展目标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如果说截至20世纪70年代的目标是将斯拉夫区域研究确定为一门学科，同时将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作为研究载体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加强与日本各专业的斯拉夫研究机构的合作，同时提高中心研究的国际水平，并以斯拉夫研究中心为基础确立全国规模共同研究、共同利用的学术机构，就成为中心孜孜追求的战略目标。

1982年，伊东孝之担任中心主任期间，斯拉夫研究中心提出了建立“苏联东欧研究所”的设想。按照伊东孝之的思路，这一研究所的目标是不仅在日本，还应在东亚及环太平洋地区的斯拉夫区域研究领域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伊东孝之呼吁，在充实合作研究、各类讨论会和学术会议、共同研究员制度、资料的收集和共同利用等传统的研究活动之外，斯拉夫研究中心应致力于定期进行海外学术调查、青年学者的实地培训、以国内青年学者为对象的夏季讨论会（seminar），并开展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和研究梯队的建设。他认为，“苏联东欧研究所”应成为以文化、政治、经济等三个研究方向为主体，并设置共同利用部门、信息资料部门和事务部（办公室），拥有教授会议及其他管理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总人数达42人的大型学术机构。要实现这一宏伟设想，斯拉夫研究中心必须克服研究经费不足和人才不足两大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心在各界支持下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推动日本斯拉夫研究现状的调查。在此之前，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已经分别于1957年及1975～1976年进行了两次关于日本的斯拉夫研究的专家问卷调查，并出版了研究者名录。1986年，中心获得了北海道大学教育研究校内特别经费，利用这一资源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通过调查（名称为“对日本的苏联东欧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改进措施建议的基本调查”），最终编制了包含研究主题、研究成果、所属学会等信息的1202名日本俄苏问题研究专家名录。同时，在这一摸

底普查前，外川继男、伊东孝之和长谷川毅等学者已经就日本斯拉夫研究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发表了相应的文章进行论述。[94]

第二，推动对国外斯拉夫研究状况的调查。中心研究人员利用自己的留学经历和同外国研究人员在不同场合进行交流的机会，努力了解国外的斯拉夫研究情况。1987年，在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国际学术研究课题“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和“西欧苏联东欧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框架内，木村汎教授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外调查，分两次对法国、以色列、比利时、英国、联邦德国、美国等国的共32个从事斯拉夫问题研究和教育的机构进行了访问，并对各个机构的特征和未来发展的空间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此前，斯拉夫研究中心负责文献资料管理的秋月孝子已经对欧美的与斯拉夫研究相关的图书馆进行了实地调查。

第三，推动日本斯拉夫研究的研讨。在进行上述调查的同时，中心还定期举办日本全国各专业的专家出席的关于促进斯拉夫研究的讨论会。1984年7月和1985年2月举行中心研究报告会期间，中心专门组织了题为“我国苏联东欧研究的现状”的学术交流会。与会学者分别对日本的斯拉夫研究与欧美的研究、教育现状进行了比较，并对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后，日本学者又在1987年7月和10月、1988年1月分别于札幌和东京召开了几次关于促进斯拉夫研究的专题讨论会。

在1984年7月的会议上，长谷川毅提出建立一个囊括当前所有学会的组织、促进国际交流、有计划地开展梯队建设、促进图书的统一购买等10项措施。这些提议后来被称为“长谷川毅倡议”，成为1987年一系列研讨会的基础。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987年10月在神田学士会议馆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提出了各专业学术带头人的“问题意识”问题。比如，气贺健三（苏联东欧学会）、佐藤经明（社会主义经济学会）、山口严（JSSEES）、越村勋（东欧史学会）、和田春树（俄国史研究会）、佐藤纯一（日本俄罗斯文学会）、盐川伸明（苏联史研究会）等就学会组织问题，加藤一夫（国立国会图书馆）、秋月孝子（斯拉夫研究中心）、松田润（斯拉夫研究中心）等就图书馆信息体制问题，藤本和贵夫（大阪大学）、下斗米伸夫（成蹊大学）等就教育问题，川端香男里（东京大学）、竹浪祥一郎（桃山学院大学）等就国际交流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研讨会后，与会学者联名起草了两个倡议书——《关于

设立斯拉夫区域杂志中心的倡议书》《关于基于日苏文化交流协定的政府留学生交换制度的倡议书》，并提交相关政府部门。

随后，在1988年1月斯拉夫研究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伊东孝之提出了设置“日本斯拉夫协会联合会”“斯拉夫区域文献中心”“斯拉夫区域杂志中心”“日本斯拉夫学委员会”，以及开设“国际交流窗口”等措施，作为改善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的主要方法。他同时提出，为了实现这些措施，需要强化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中心的职能，对中心进行根本上的体制改革，使其成为全国性的研究设施。

中心的这些活动得到了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当然，这也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举世震惊的变化分不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扩大了日本一般社会人士和普通学生对斯拉夫区域的关心，同时信息的多元化、实地研究可能性的增加、国际交流的进展、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也迫使斯拉夫研究中心对现行研究体制进行根本变革。

在这一阶段，由于与斯拉夫国家文化学术交流的障碍被打破，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也逐渐暴露出日本在斯拉夫研究领域的封闭性、资料收集的延时性、研究机构与学会之间交流的缺乏、教育研究的专业与对象区域的不平衡性（即偏好某一地区的研究）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并非日本所独有，但相对于积极引进苏联东欧地区的专家学者、招收当地学生、大规模进行资料搜集的欧美各国学界而言，日本的研究体制仍然显得较为僵化。在此背景下，在日本建立全国规模的进行研究、信息收集、国际交流和专家培养的研究中心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为了改变上述不利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每年都向日本政府提出拨付改制经费的请求，最终于1990年6月在原晖之出任主任期间，斯拉夫研究中心成为“全国共同利用设施”。

（四）作为全国共同利用设施的斯拉夫研究中心

重组后的斯拉夫研究中心下设地域文化、国际关系、生产环境、社会体制四个方面的研究部门和信息资料部门，以及事务部（办公室），同时还设立了审议组织人事、预算等相关事宜的协议委员会（校内组

织）和审议研究各种课题计划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包括校外的各界代表）。1993年在皆川修吾担任主任期间，中心增设了民族环境研究部门，编制增加为11名专职教授、3名客座教授、3名访问学者、1名信息资料部副教授、2名助手、3名事务部（办公室）成员。1994年斯拉夫研究中心所在办公楼进行了改、扩建。

利用这次改制，斯拉夫研究中心开展了新的研究活动，加大了国际化方面的投入和努力。其1990年同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部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1991年同苏联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约定每年互派学者到对方机构访问。同期该中心还与法国巴黎第三新索邦大学国立东洋语言文化研究所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延长了于1983年9月25日签署的共同研究协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签署了新的合作协定。[95]

中心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的考评工作。1991年起，该中心通过由专职教授和外部评论员组成的专职教授讨论会（seminar）的方式来考查中心研究人员发表的各类论文，并对其相关的学术活动进行考核。这一时期，斯拉夫研究中心成为日本文部省管辖的全国性研究组织“文部省所辖及国立大学附属研究所主任会议”的成员。在该组织内部，成立了专门讨论斯拉夫研究中心存在的问题及同其他研究机构进行合作问题的平台。从1993年开始，对中心的研究活动进行综合考核的自我评价体系确立起来，并且每两年发表一次自我评价报告书。

日本的斯拉夫研究现状问题的讨论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延续。1992年2月冬季报告会期间，在伊东孝之主持下，川端香男里、木户蓊、和田春树和佐藤经明参与的题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我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反思和问题”圆桌会议上，学者们从苏联解体的角度对日本的斯拉夫区域研究史进行了反思。会上，伊东孝之提出了信息系统欠缺等体制问题、长期以来日本存在斯拉夫研究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对象设定的保守主义倾向问题，以及研究方法论的僵化等问题。

1994年，作为斯拉夫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以原晖之为总主编，共8卷的斯拉夫区域研究论文集《“斯拉夫世界”讲座文库》由弘文堂出版发行。共有105名学者参与了该论文集的编撰，这是日本最早的综合介绍斯拉夫区域的文献。

1995年，以皆川修吾为课题负责人的三年重点领域研究项目“斯拉

夫—欧亚的变迁：自存与共存的条件”启动。该课题有数十名专家和十余个研究团队参与，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现状与历史进行分析。这个综合性的区域合作研究在展示斯拉夫世界现状的同时，也为中心今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得到了日本国内学界的高度评价（见图2）。

1995年，中心成为日本文部省“核心研究机构支援项目”的支援对象。从此，中心开始利用“提高研究水平经费”“访问学者经费”“非常勤研究员经费”等，开展一系列新的研究活动。

中心作为核心研究机构得到日本国内各界的公认。特别是中心举行的国际会议，在主题的选定、报告人的遴选、会议的组织等方面得到了国外与会学者的好评（见图3）。有关情况被刊登在欧美相应的学术期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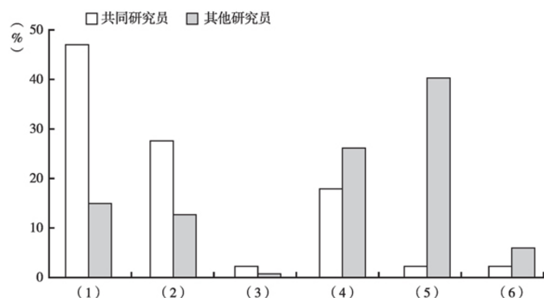


图2 对皆川修吾重点研究领域的评价

说明：（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按，原图如此，不知（6）何意。——编者

资料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2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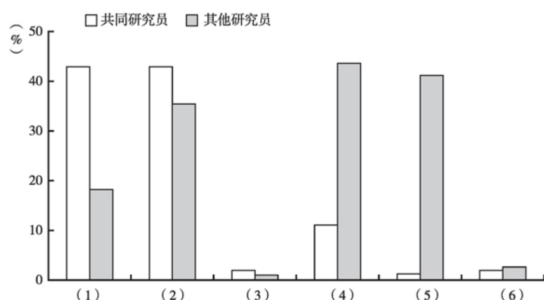


图3 对斯拉夫研究中心夏季/冬季国际会议的评价

说明：（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按，原图如此，不知（6）何意。——编者

资料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26頁。

尽管如此，斯拉夫研究中心自我评价认为，当时的中心管理与研究活动的方式还没有完全达到理想的状态。尤其是考虑到斯拉夫—欧亚世界幅员辽阔，按照区域的综合研究理念，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部门的组成及编制，无论是从专业方面还是从个别的研究对象区域来说，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五）**21**世纪以来的斯拉夫研究中心：朝向世界一流的目标

21世纪以来，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中心进入了一个新的加速发展阶段，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国内斯拉夫研究的领先地位，同时逐渐增强了在国际斯拉夫学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从2000年开始，中心在北海道大学文学专业框架内进行研究生教育，开设了历史区域文化学专业。2009年度、2010年度共有17名博士研究生、15名硕士研究生在读。而且，斯拉夫中心培养的研究生来源非常国际化，除了本国学生外，还有来自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捷克、韩国、蒙古、新西兰和巴西等国的学生。

2003年，斯拉夫研究中心在日本文部省举行的“21世纪卓越研究机构计划”（21st Century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的选拔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该计划2003～2008年度的基金资助。斯拉夫研究中心申报的课题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野心”的研究计划——“斯拉夫欧亚学科体系的构建”（Making a discipline of Slavic Eurasian Studies：Meso-areas and Globalization），其目标设定为“在欧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新历史环境下为振兴和推动国际斯拉夫区域研究做出贡献”。

2008年，中心获得了日本文部省新学术领域研究重大课题“欧亚区域大国的比较研究（2008～2012年度）”项目。这也标志着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范围的日益扩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苏联东欧地区，而是将中国、印度乃至土耳其等大欧亚地区的国家都纳入研究之中，试图运用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进行地区层次的剖析，通过该项研究对国际秩序、世界体系等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帝国的崩溃和重组，以及民族纠纷、宗教对立等影响全球格局的地区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2009年，中心再接再厉，主任岩下明裕主持的“边境研究核心机构的养成：斯拉夫—欧亚与世界”研究课题入选日本文部省“全球卓越研究机构项目（GCOE，2009～2013年度）”。该课题计划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基础，组建全国性的边境问题研究学会，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形成竞争力。

2008年，松里公孝教授主持的青年学者国际培训计划获得了日本学术振兴项目2008～2012年度的资助，打开了日本斯拉夫研究中心一直呼吁的加强日本斯拉夫研究国家化和培养青年学者的构想的新途径。根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的斯拉夫研究尽管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仍局限于日本国内层次，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公开展示非常有限，尤其是用英文撰写的一流论文严重不足。[96]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斯拉夫研究中心借助上述计划，每年从日本国内选拔三四名已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包括博士后和讲师），赴欧美一流的斯拉夫研究机构——如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等访学，加强学术素养。

2009年6月25日，斯拉夫研究中心在“全国共同利用设施”的基础上又被认定为共同利用·共同研究机构（2010～2015年度）。

2010年，斯拉夫研究中心继续进行体制改革，原先的管理委员会被改组为机构管理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前者作为中心主任的咨询机构，审议中心的共同利用、共同研究的各项活动；后者负责审查中心进行的各种共同利用、共同研究的招投标工作。

整体而言，斯拉夫研究中心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2009年2月，该中心组织召开了东亚首届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会议，来自中、日、韩、俄、美、蒙等国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俄罗斯的振兴及影响问题。同年，日本获得2015年俄罗斯东欧研究国际学会5年举行一次的国际会议的主办权。这也是此类会议首次在亚洲地区举行。

（六）“北海道经验”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成功给中国的俄苏研究和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学术绝对优先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从成立伊始即将此视为一条不可撼动的基本原则。50多年来，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斯拉夫研究中心由弱变强，最后成为东亚最佳、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斯拉夫区域研究机构。与此相比，我们国内的斯拉夫研究，尤其是俄苏问题研究，仍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客观性有所不足。

第二，坚持微观研究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秉承了日本学术界一贯的扎实风格，对于一手资料的占有尤其关注。在进行各项研究时，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实地调研和田野调查，从而确保了对研究课题的深度把握，不会空洞无力。比如，松里公孝教授在做后苏联空间内的“不被承认的国家”现象的研究时，为加深对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的研究，数次深入当地走访民众、学者和政府官员。这种做法在日本学者中较为普遍。

第三，坚持国际化的发展模式。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逐步重视国际化，国际学术交流日渐频繁，在海外发表的文章数量也逐渐增加。即便如此，日本学界仍然有着严重的危机感，认为甚至与韩国相比，日本的斯拉夫研究在国际论文的发表指标上仍有差距，并试图改善这一局面。这也是斯拉夫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青年学者国际培训计划的重要原因。

第四，坚持跨学科、多语言研究的研究路径。多学科、跨学科和比较研究始终是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法，这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思路不谋而合。但在多语言的要求方面，我们显然与该中心有较大的落差。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要求至少精通英、俄两种外语，不少青年学者甚至通晓3～4门外语，这也是确保其国际交流无障碍的基础。为提高英语表达和写作水平，该中心每年都组织为期两周的讲习班，聘请外国资深教授讲解英文表达的技巧。在这一方面，中国学术界有必要参照“北海道经验”。

第五，坚持资料优先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拥有丰富的藏书。截至2009年，约有15.7万册图书、6万份缩微文献、1600种报纸和期刊出版物，其中含有大量有关俄国革命、日俄战争、共产国际问题的珍贵史料，以及以乌克兰语言学为中心的大量斯拉夫文献学的资料等。同时，

截至2008年，中心还收藏了5144份西方出版的有关斯拉夫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斯拉夫研究中心对研究资料的重视使得他们的研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些文献资料也为来自日本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专家提供了便利，得到了高度评价。

与该中心相比，国内尚没有任何一家学术机构能够拥有如此庞大的研究资源。所以有必要继续增加在这一方面的资金支持，扩大图书资料的占有量，为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研究基础条件。

第六，坚持开放性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所有课题的组织均是通过全日本范围内的专家合作网络实施的，这一方面确保了研究的高效，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日本斯拉夫研究界的团结，提高该中心的影响力。斯拉夫中心每年为来中心访学的日本学者提供一周左右的费用，供其查阅和使用中心资料。同时，斯拉夫中心坚持严格的考评制度，对考评不合格的人员予以辞退，“有进有出”既增强了机构的活力，也迫使所有研究人员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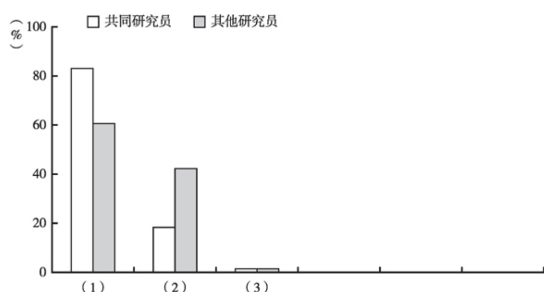


图4 斯拉夫研究中心资料（报纸/杂志/图书等）使用的情况

说明：（1）使用过；（2）未使用；（3）无回答。

资料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3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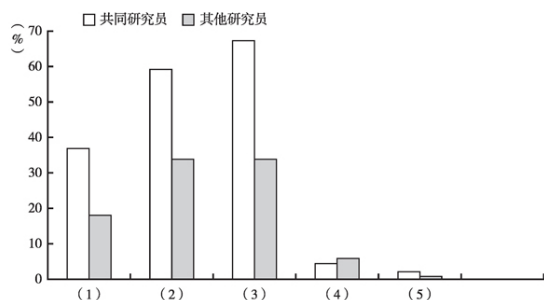


图5 对斯拉夫研究中心资料使用类别的评价

说明：（1）报纸；（2）杂志；（3）图书文献；（4）其他；（5）无回答。

资料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31頁。

第七，构建强大的辅助班底。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活动非常频繁，但并不紊乱，这与其配备的强大办公室班底有很大关系。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人员均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而博士后制度以及GCOE项目研究员制度的推行，也确保了中心始终有三四名高学历的青年研究人员参与学术活动的组织，极大节省了专职教授的时间与精力，使专职教授可以更加省心省力地开展学术研究。

总体来看，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中国同类型的学术机构提供了宝贵的“北海道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需要尽快地提高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的水平，争取尽快与国际学术前沿进行同级别的对话。

四 他山之石：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智识革命

通过前文对中国俄苏研究学术史的梳理，美国苏联学的产生、后苏联学的复活的剖析，以及对亚洲邻国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研究经验的总结，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的视野清晰地看到一个针对某一大国及区域研究的知识体系何以兴何以衰，而最终目的则是试图为中国的俄苏研究发展提供建议。

显而易见的是，冷战结束以后的诸多变化中，除了国家关系的传统研究领域外，文化、文明以及其他范畴已经或正在或行将纳入研究视野。而苏联解体以来各种被发掘出来的政治、经济、人文、社会、宗教、历史、艺术资料，不仅在挑战我们过往的知识、工具和方法，也在丰富着我们此后的视野、理论和领域。因此，在中国俄苏研究的学术转型中，必须要从视野、资料、工具、方法、范式上做出重大变化，逐渐进入前人所未涉足的新领域，以超越前人的治学方法，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周边邻国在俄苏研究问题上的新挑战，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范式重构和智识革命，即在全新语境、全新时代背景之下，对俄苏研究从方法到知识提出全面的中国式回应。为此，我

们的俄苏研究界首先应该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在过程中努力克服下文将详细说明的几组张力阻碍。

（一）“退出苏联”的宏大背景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先生不久前撰文提出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是一个“去苏联化”的进程。[97]沈志华教授与左凤荣教授联合为《中国改革》撰写的文章也强调了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98]这个观点无疑很有道理，但还有加以补充的空间。实际上中国在中苏冲突过程中已经逐渐和苏联模式拉开了距离——不仅仅是相互关系上。国外学者曾有论述，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没有像苏联那样牢不可破。[99]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进程则很难用“去苏联化”来简单地加以概括，这其中包含有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内容。用冯绍雷教授的话说，“这是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在全球化的崭新条件下不光是重获生机，而且是重新立足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过程；这是一个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人类先进文明在中国这样复杂背景之下的大国得以具体化为革新体制的伟大创新过程；这也是一个国内体制变迁与外部国际环境互相激励、互相影响之下的一个互动的学习进步过程”。[100]

当然，“改革即去苏联化”的观点有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即它点出了中国1978年以来日益明确的“退出苏联”和“进入世界”的两大任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兹曼曾撰文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俄苏研究界并未否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中国的改革仍然希望从中汲取养分。[101]前述赵常庆先生关于中国俄苏研究期刊的情况介绍中也披露了当时中国高层对于学术界提供苏联各领域改革相关信息的期盼，这样从反面证明了“退出苏联”至少在80年代中期前还没有成为一个定论。苏联模式的某些内容我们在批判，但同时在改革中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为参照拟定中国的改革开放议程。所以，中国在真正意义上参与全球化，接触现代性，进而开始融入世界的过程是在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至少在经济上迅速地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话语和学术研究也快速地完成了“退出苏联”的书写，尽管现在还有一些痕迹，但已经不甚浓厚了。但同时要注意的是，我们似应避免将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史进行“格式化”论述：从最初的“以俄为师”，到“兄弟之邦”，再到谁是正统的“社会主义”之争，最后到冷战结束后的中国优

越论，以至于近来出现了所谓俄罗斯“以华为师”之说。这种模式化叙事的背后，是一种所谓中国“超越”俄罗斯的缺乏根据的乐观主义和某种程度的自大主义的表现，忽视了俄罗斯发展的独立人格。也因为如此，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重新认识”俄苏问题的基本智识系统和心智结构的需求。因为我们以往对于俄苏问题的很多看法，以及根据这些看法而形成的种种对策思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需要重新检讨。有的观点、看法甚至已经固化，比如在相当长时期内“俄罗斯不行了”的论断非常流行，但事实上未必正确乃至根本就是错误的。[102]

由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被“世界”体系外在化，所以中国人“加入世界”的愿望分外迫切，相关的争论和建言不绝于耳，这可能也是一个中国学术界在整体上日益“退出苏联”的非常特殊的学术氛围。尤其是在中国连续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的话语环境很大程度上不是是否崛起的思辨，而是已经转换到如何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103]在这种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中国显然更迫切地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更希望东方文化的复兴。与这种中国“进入世界”的渴望相伴生的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排斥和畏惧。这一语境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俄苏研究，使得很多研究伴随着对俄苏问题一厢情愿的或过度的诠释。

今天中国俄苏研究所要关注的问题，和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都要求关心下列几个问题。一是世界学术潮流如何？二是中国在此学术潮流中的位置如何？三是在弄清世界文化发展阶段和现代思潮的走向，并将中国智识与世界潮流进行对比的前提下，探寻一种合适的方式将中国纳入现代世界思潮之轨，并逐渐使其融入世界文化。[104]

（二）中国俄苏研究范式转换和智识革命的战略机遇

尽管中国俄苏研究的现状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仍然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的俄苏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如果不抓住这次机遇，我们在国际知识界的竞争之中将会非常被动。

这种机遇期首先和中国整个国际问题研究界所面临的机遇一样。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译述、90年代的发展、21世纪在危机感刺激下的追赶，我们确实有平等参与国际对话的可能。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们可以跳过一些历史的厚重积累，在最近的话题中与西方学者同等竞争。国际体系的转型、欧亚大陆的巨大变迁、俄罗斯自身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崛起等都为俄苏问题研究的知识系统变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我们有机会创新，我们有机会迎来一场新的革命，我们只要能够敏锐地发觉冰山的另一面，就有可能建立起中国在国际俄苏问题研究领域的话语体系。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特质。新的俄罗斯让人迷茫，有时显得矛盾重重，且往往是非常规的发展。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它本身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兴奋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研究新的问题的过程中，拿出新的模型，设立新的范式。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的极大丰富。科尔顿曾经讲过，美国人一开始做苏联问题研究时，得一个人一个人访谈，冷战期间为了获取丰富的资料，美国政府花了许多经费，动用了许多人力资源。而我们现在处于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丰富的资源。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都订购了各种数据库，各种分析文章铺天盖地，俄罗斯问题的文章同样多如牛毛。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为例，其花了相当多的经费购买了两个专业的电子数据库，每年还至少拿出10万元人民币购买最新的俄苏问题研究的纸质资料。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国俄苏问题研究界的代际转化。年青一代的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在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更为自由的学术环境、更为广泛的学科背景下不断成长。他们站在前辈巨人的肩上，没有理由不做得更好。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国内俄罗斯研究学科的现状。毋庸讳言，俄国问题研究同其他国别或地区研究相比，或者同其他国际问题研究相比，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位。可能是因为研究的人员少，研究不够深入，俄苏问题才会有无数的题目可做，才有无限的发展空间。[105]

（三）在克服张力过程中实现涅槃

机遇总是垂青于有所准备的人。中国的俄苏研究界仅仅看到这种机遇还不够，更关键的是要克服长期存在且不单单在中国出现的一些张力障碍。

1.学术/政治（问题/主义）

中国的俄苏研究当前最重要的一组张力就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其主要表现为把政策价值当作判断俄苏研究的核心的乃至唯一的标准，似乎学术研究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决策层出谋划策，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价值。

应该注意到，中国俄苏研究的体制背景并非这门学问所特有，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并不是一切问题都由作为个体的学者所造成。[106]梁启超曾经说过，“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107]自20世纪初期以来，这一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王逸舟曾经形象地将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圈的特征称为“基辛格症候”，即“一个国际政治学者的权力背景（或者说与权力的联系渠道）越明显有力，他的思想和学说的影响越大，在学界和政界的地位也越高”。[108]资中筠先生对于这种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咨询的现象同样有过精妙的论述。

> ……再从高层次上讲，开放以来的美国的“思想库”体制对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大。这刚好与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合拍，即使不直接做官，也只有向当政者出谋献策而被采纳的学问才算“有用”……
>
> ……至少有一点，他们的（指美国的“思想库”——引者注）实用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充分言论自由、多家争鸣的基础上的，方面很广，学派林立，与现行政策相左的论述也可以广为传播，今天不用，明天可能证明其正确。这一条件在中国尚不存在，所以即便在实用层面，“思想库”的作用也变质为与“注六经”差不多。不过在这一风气下也吸引不少士子入彀，正好符合“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给独立的人文探索留下的空间就更有限了。

李永晶博士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他指出，至少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不具备“学术研究”的性格，它们不过是出于特定功利与现实目的的政治活动。[109]

很明显，这种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以政治取向代替学术分析的做法并不仅见于中国的日本研究，它同样阻碍了中国俄苏研究的深入和学理的发展。当然，出现这样的局面绝不仅是学者的问题，也因为需求方的引导，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110]正是改革开放打破了政府力量对社会的直接干预和经济的全面计划，正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隆重登场，正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强化

了“应用型”研究的“路径依赖”。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学者的我们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说真话，而不能随波逐流。我们最迫切的工作可能在于回归学术性研究。如果说学术研究要为政治服务，那也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真正反映实际情况和事物本质的研究才是有用的，才符合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那种“注六经”式的“研究”，不仅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往往会产生误导的作用。现实的需要与政治的正确性，并非绝对意义上决定学术价值的基本尺度。西方世界的俄苏研究，无论是冷战期间，抑或是冷战结束后，的确有一部分研究（这部分研究直接对应于我们定义的“政策解释型”和“政策建议型”研究）是在意识形态对立的驱动下进行的。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多数俄苏研究作品还是尽量秉承了韦伯所孜孜以求的“价值中立”原则。[111]学术和政治之间诚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价值中立”可能更多是一种永远无法企及的理想状态，但作为学术人，我们仍然应该遵循应有的学术底线。或许，可以将对策或战略研究与学术研究区分开来，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使学术成为政治的从属。

比如关于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论述。这是一种政治性论述，中俄关系友好是大局，成就是主要的，这些都毋庸置疑。但这种表达不应成为一种学术性证实的命题，更不能将其视为不能挑战的公理，不应该成为一种中俄关系唯一的叙事模式。学问之道在于寻求问题。笔者相信，所有提出问题的学者都是出于对中俄关系的爱护，出于对中俄关系未来继续向好的一种期盼，这恰恰是一种负责任的爱国立场。中俄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成就可以由官方做充分总结，而学者的责任则要求我们对存在的问题做深入分析，否则讳疾忌医，积累的问题可能某一天突然爆发。

比如所谓“‘中国机遇论’在上升，‘中国威胁论’在下降，机遇大于挑战”等习以为常的表述，其实是罔顾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从来都是很有影响力、很有市场的。笔者在2004～2006年，以两周为一个周期，对俄罗斯媒体上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做过统计分析。基本上，只有在两国领导人互访前后较短的时间内，俄罗斯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较多是正面的，其余时间负面报道最少占30%，最高时可达到70%～80%。至少从媒体以及大众的视野看，“中国威胁论”是一个切实的存在，尽管这可能根本与俄罗斯精英的中国观截然不同。

坦率地讲，中国的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虽不敢说与

西方并驾齐驱，但至少是一个相距不远、可彼此平等对话的境况，甚至在某些问题、个别领域还要超出，确实不乏精彩之作。尽管其时的研究目前看来同样具有“奏折化”等特征，但这一代学人追求真理的精神、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使命感，乃至对所从事研究工作的热情，都是当下所不及的。正因如此，美国学者罗兹曼才会对中国当时的苏联问题研究表示高度的赞扬，认为西方不应忽视这一庞大研究群体的研究成果。[112]

应该认识到，崛起的中国，不能仅仅是财富意义上的成功，更应在于思想的健全，[113]文明意义上的发展，[114]同时学术上的贡献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即我们也应该与国际学术界共同创造和分享学术上的“公共产品”。尽管只是学术上的研究，但绝不孤立于国家和公众的共同需求。我们的责任在于放弃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先行的论述，在不丧失政治伦理底线的前提下，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一个尽可能客观、尽可能中立、尽可能扎实、尽可能丰富、尽可能多元的实证性的智识供应。这是时代的机遇，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一定要避免当前整个学术体制的“美国化”，或者准确地说是“伪美国化”倾向，即形式上或皮毛上的美国化，但忽视或无视其创新精神、自由思想的另一面。

2.学科导向/区域研究导向

在学科导向还是区域研究导向的问题上，西方语境下的俄苏研究同样也有过很多论争，但在苏联解体前，一直是区域研究占据了俄苏研究的主流。尽管这一时期取法于区域研究的“苏联学”成了政治学等形形色色学科理论的跑马场，但两者之间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有意思的是，“苏联学”的创建者和消费者们一方面不断地从各个学科借用种种理论，比如，极权主义模式以及现代理论等就曾在西方的俄苏研究界大行其道，直到今天依然可以从当代西方的俄苏研究作品中看到即便冷战已经结束也未能抹去的深厚痕迹；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在地知识将自我与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隔离开来。同时，“苏联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也因研究对象的“非西方性”而被遵循学科范式的研究者们视为无用之物而日益边缘化。除了一些共有的概念外，两者似乎“老死不相往来”。

但当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区域研究的取向被抛弃，而学科导向开始占领原属于地区研究的领地。这种格局的出现是美

国国内学术论战的结果，主要是针对苏联在一夜之间突然瓦解、冷战骤然结束的大背景。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国“苏联学”，遵循了典型的区域研究范式，主张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其基本要求包括：强化型的当地语言学习；利用本地语言进行深度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对在地的历史、观念、物质乃至解释予以近距离的关注；检验、推敲、批判、发展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而不仅仅是细节观测；学科的交叉，经常越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边界。[115]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美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集中研究最大的对手苏联，以“区域研究”作为主流方法的“苏联学”造就了全世界最庞大的苏联问题研究队伍，也创造出了规模最大的苏联研究作品。但问题在于，这样一支专业的学术队伍竟然没有能够预测到苏联的解体。从此，“苏联学”褪去了“显学”的外套，成了一段被灰尘遮蔽的黯淡历史、一个少人问津的美丽传说。

显然，将苏联解体解释为偶然很难令人信服。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迫使美国俄苏问题研究界寻求新的出路。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对“苏联学”的既有范式进行了深刻检讨。[116]其中，方法论的问题又被视为重中之重。正因为如此，苏联解体的一大学术影响就是区域研究在美国逐渐式微，9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共同组织的各地区研究委员会甚至终止工作，可以说一直到2001年“9·11事件”之前美国的区域研究已经逐渐让位于学科研究。有学者总结称，苏联解体对“苏联学”的拥趸们是一个震撼性的打击，对学术界而言，至少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作为一门职业，它不得不重新解释自己的身份，被迫认清自身的优劣；另一方面，直到80年代末期还甚少关注共产主义体制世界的带有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开始介入新的研究议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那些可能花费了平生时间和精力研究这一地区和这一制度的研究者。[117]

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研究中心前主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科尔顿2009年9月2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演时曾明确表示区域研究被学科研究所挤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科学领域，不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经济学，单纯了解一个国家不是一条好路子。这样一些新派学者认为有数学模型，有量化指标，用这些东西来研究就够了，没有必要亲自去研究对象国家采访调查，学习他们的语言。这种观点不奇怪，在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加普遍，很多人有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错的，我们要加以回应。[118]

我们承认，“后苏联学”的理论范式显然是基于西方的知识谱系，而且往往将苏联和俄罗斯视为一种欠发达的类型，以此对俄（苏）进行种种指责。这种立场最大的问题在于，要用某种理论范式去解释俄苏的历史或现实，总会产生一种削足适履的效果。任何理论都有其假设、前提，都有其适用性，而非具有普遍性，因为其解释力总会相对有限，必然有不足。在研究和揭示各种现象时，绝不能奉行理论先行的做法，这很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误解，从而使得所研究的对象与研究结果之间出现想象的鸿沟。

即便如此，也得承认美国学者对于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诉求，其错误可能就在于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但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套模型，而可能在于如爱德华·汤普森所说的“理论的贫困”。[119]中国的俄苏研究似乎非常抗拒理论，而理论的重要性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如同挪威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托布约尔·克努成所指出的，学术从业者与其他议论、阅读和撰写国际政治的人的区别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方法”，学者用方法论为自己压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获得特定科学技术哲学和学术规范的指导；二是“理论”，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能自觉地沿着一条前人已经走过几个世纪的道路来探究战争、财富、权力和和平问题。[120]

于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与国外俄苏研究同行的对话似乎有点像聋人之间的对话（且不说这种对话目前依然很少）。[121]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曾这样描述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互动。[122]实际上中国学者与外国同行的对话可能比布罗代尔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聋人对话还要严重。布罗代尔所强调的是，不同的学科拥有各自的语言、价值、心态和思维方式，并不断被各自的训练进程或“社会化”所强化，并因此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山头主义”，而且相互挑剔对方的缺点。与西方日益重视理论和中国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发生的理论转向相比，中国俄苏研究界长期对理论予以漠视，视之为无用之物。资深的中亚问题研究专家赵常庆先生早在80年代中期就撰文透露过中国俄苏研究界轻视理论的风向，他在比对了各专业刊物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各类论文的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很多文章是资料性的或情报性的。有些文章则是内部报告略加扩展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内部报告痕迹。努力提高理论水平是形成苏联东欧问题中国学派的关键的一环。”[123]遗憾的是，这一状况迄今仍未有明显的改善。多数论文仍然保持了一种“回顾—现状—展望”的八股文模

式，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研究的“两张皮”现象仍很突出。

形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的俄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已经拥有了相对较为发达的学科体系或研究范式，而是仍处于一种较低水平，某种意义上是材料的累积，甚至连中长期的问题导向都算不上。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兼曾指出，中国理应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正是因为问题意识的缺乏，导致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学者只有材料可以参考。这类似于萨义德所说的，东方的学者在他的老伴——欧洲或美国的东方学家——眼中，永远只能充当一个“本地信息提供者”。此外，需求方的引导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者适应其要求，久而久之，遂形成新八股。

当然，本文所说的理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套用，即依靠一种现成的理论模型去解释俄罗斯的历史或现实，也不是单纯地借用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借来的概念或方法，做一种工具主义式的应用，而是立足于俄罗斯事实，以政治学或其他学科为背景，对俄苏历史或现实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对既往的理论进行校正，要提出属于俄苏研究的特殊范畴、概念等。

在笔者看来，单纯强调学科导向和单纯强调地区研究导向都失之偏颇。前者往往沉溺于概念和理论框架的争辩，沉溺于构建高度抽象的模型，而对于需要得到解释的复杂的行为模式或事件却无法提供真正的洞察。后者则显示出“对社会科学理论怀有敌意”，对于发展和运用超越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和陈述不感兴趣，且缺乏概念上的先进细致和方法上的严格精密。[124]以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因为未能预测苏联解体就被学术界抛弃，这是否明智呢？只有经世应用之道才有用吗？其实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过往所有的研究知识都出了问题，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美国的俄苏研究专家散见于各学科，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有了学科知识的支撑，就更具解释力和前瞻性了呢？其实以理论为预设去探讨俄苏问题，必然只是一种单面镜子的观察，不能深入其内部；且各种理论都有假设、前提，西方学科的理论应用到俄罗斯身上往往并不一定适合，所谓“橘生淮北则为枳”也。应该承认，是实践成就了理论，而非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俄苏研究面临的学科建设任务非常艰巨。一种理想的状况是，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在地知识，还要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包括语言、历史、宗教、文化等各种背景知识。

3.宏观研究/微观研究

由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引发的张力，其实质是复杂性和简单性的分野。复杂性和简单性之间的张力古已有之。简单性一般在两种意义上加以使用，一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认为事物都是由简单的东西构成，因而可以根据构成要素描述整体系统；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为可以运用尽可能少的概念、公式等构成的理论，对客观世界进行统一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他认为“最精确的学术是那些特重基本原理的学术；而所包含原理愈少的学术又比那些包含更多附加原理的学术更精确”。[125]但到了20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的发展开始经历了从简单性向复杂性的转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自然科学的这种转向也影响到了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也正在越来越重视国际系统、国际格局乃至一组组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问题。[126]美国学者杰维斯依据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些案例详细论证了国际系统的复杂性问题。[127]杰维斯强调，在分析系统的过程中，希望能够在美国社会科学中架设桥梁或者避免进行大的划分，比如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在聚焦行为体和检查结构之间，在研究个体和检查更大的单元和整体之间。[128]杰维斯通过自己的著作，对美国社会科学界多数人或明或暗地支持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杰维斯本人是在对个体行为有着精深研究造诣的基础上，进行更复杂的系统效应的研究的，其复杂性包含在简单性之中。

事实上，国际学术界对俄苏的研究已经步入了，或很久之前就步入了微观研究阶段，或者说在大战略等宏观研究的背景下，更多侧重于对俄苏问题的局部细节剖析，并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中国的俄苏研究就目前的文献看，更偏向于从宏观层次上去理解俄苏，是一种系统性的研究法。一种显而易见的弊病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俄苏历史或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这使得相关作品往往充满了简单判断，好似烟囱和电线杆那样笔直，而不像有主干有枝叶的大树。[129]

中国学人擅长宏观研究是有历史传统的，我们喜欢抓住主要矛盾，抓住最核心的东西，这是我们的长处所在。但这种宏观把握能力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要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之中抽出最本质的东西，可能只有部分学者具备这种深厚的功底，而大多数学者力有不逮。这种注意大面的做法的缺点在于，由于在具体操作上中国俄苏学界的研究没有能够深入

进去，没有能够做到像杰维斯那种立足于简单性基础之上去研究复杂性，由此我们的认识支离破碎，甚至可能忽视了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细节，只能看到俄罗斯的表层，只能展示出俄苏真实面貌的轮廓，而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摸清其细部。这尽管有其正面的意义，但时代发展到今天，这种粗放式的研究方法已经绝不能再作为中国俄苏研究的唯一度量衡。

中国的俄苏研究亟须融入国际斯拉夫—欧亚研究界。以目前这种大而化之的研究路径，必然会出现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各说各话，甚至互相听不懂的尴尬局面。一条可能的路径是，中国学者将自身熟悉的或者具有传统优势的宏观研究，与西方学术界通行的微观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宏观研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能在中国学派的旗帜下回避学习国外俄苏研究的长处。为了中国俄苏研究的整体推进，我们可能需要在相当长时期内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深入、系统地学习国外的俄苏研究成果。无可争议的是，西方俄苏研究在全球范围的俄苏研究知识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强势地位。我们不能忽视或无视这种情况，既不要妄自菲薄，也要迎头赶上。

4.功利实用/基础研究

这一张力实际上是第一组张力，即学术与政治之间张力的伴生物。中国的俄苏研究，史学作品相对好一些，而对于当代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则具有非常明显的时尚性和功利性，即什么时髦研究什么。这种时尚化的研究必然导致浅尝辄止。一些命题从诞生之日起就声势熏天，但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却相当鲜见。过一段时间，一个新的热点产生了，研究者再一次一哄而上，开始扎堆研究某一热门课题，而原先的那个问题就慢慢演变为一个冷门话题，难以引起学界的跟踪和关注。

造成中国俄苏研究困境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非常功利的实用主义态度。一批又一批学人前赴后继地进行各种政策解释型研究和政策建议型研究，没有深入俄苏问题的灵魂深处。实际上每一个西方“苏联学”的训练者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学习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历史、文化、艺术、法律、宗教等各方面知识的过程。一位西方学者在回忆自己作为苏联问题的研究生的经历时曾经反躬自问：为什么要学习这些无关的科目？为什么不能直接投入对作为研究客体的区域的相关研究？当他后来接受了政治学的专业训练后，再度从事苏联东欧问题研究，他又提出了

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不能直接从事对苏联政治的研究，而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研究俄国史、俄苏文学、俄国艺术、经济、地理以及其他科目？[130]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界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其背后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果没有上述诸如历史、地理、文化等所谓“其他”方面的背景知识，我们会不会出现对俄苏问题的曲解？换言之，这些背景性知识是不是我们通往俄苏政治或其他本质性问题的一座必要的桥梁，由此使得我们在这些基础性问题上花费再多的时间也是值得的？

基础的意义在这里得到凸显。假如我们对于俄苏的基本知识结构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扎实，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对俄苏问题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呢？

比如说，关于普京对俄罗斯部分战略资源实现“重新国有化”的解读，历史学家派普斯等美国学者马上从俄国历史上的“产权观念”缺失角度入手批评普京当局。中国国内一些评论和分析也会对这种“去私有化”或“逆私有化”的过程给出一种“纠正叶利钦时代私有化政策”的定位。问题在于，我们可能忽视了在“国有化”进程的同时，普京政府每年始终不断加大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国内学术界多没有计算在18家俄罗斯特大型公司中，真正意义上的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只有3家；更没有从“私有产权”背后隐藏的俄罗斯经济组织制度的历史渊源进行深入的分析。实际上，与西方通过“买-卖”关系构建交换运行的市场经济不同，俄罗斯历史上更常见的经济组织方式是基于“缴纳-分配”原则的。如果对这些基础性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我们可能在解释当代俄罗斯以及其他俄苏问题时能更有说服力。

从构建中国俄苏研究知识结构的需求出发，对俄苏经典文献的译介以及对俄罗斯文化、文明模式的研究已经日益迫切。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开了好头，但需要更大的投入。这种研究可能短期内不会有资政上的功能，也不会直接和国家发展的需求关联，但对于我们把握俄罗斯问题的实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俄苏的经典作家、重要的思潮和流派，应当像我们研究孔子一样，不绝如缕，一代又一代地积累，形成传统，并且每一代都有所推进。这才能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5.感性/理性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俄苏问题研究常常会受到情绪的左右，或者说很难摆脱从业者个人的好恶感情，也常常受制于现实中的国家立场。俄苏研究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人素来有一种特殊的俄罗斯情结，这是一代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迷思。尤其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情结对于中国对俄国的认知，对于中俄关系，对于中国所构建的外部世界图景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已经习惯用俄罗斯作为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习惯于将其作为中国所需要寻找的外部思想文化的源泉。五四时期，俄被认为是能帮助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的正义之国。从20世纪30年代起，俄是能从精神上正确指导中国抗日的盟国。1949年以后是中国可资借鉴的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样板和最值得信赖的盟国。20世纪60年代起它又成了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俄不再是值得中国仿效的国家了。[131]

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精英们对俄罗斯的审视同样成了国内政治话语的争夺对象并日益意识形态化。一方面，这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度量工具。一部分知识分子把俄国看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政治合法性的最大来源之一，俄转型的阶段性失败则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好的反面教材；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则对俄政治生态的保守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向历史回归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并以此从侧面说明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各界受西方智识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构建的“俄罗斯形象”对中国的俄国认知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俄苏问题研究中的“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化”，构成了中国近二十年来对俄认知的宏大叙事背景。

有意思的是，这种对俄的正反感情纠葛似乎是全世界俄苏研究者的一个共同特质。科尔顿曾将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俄苏问题研究专家对各自研究客体的态度做了精彩的表述。他承认研究一个国家往往会使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对象国怀有感情，之所以有汉学家对中国产生强烈的好感，是因为“美中关系密切，美国当时有很多传教士在中国，有跨太平洋的贸易”。余英时先生在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汉学家费正清博士最后一本书《中国新史》的台湾译本作序时也提到这种研究中的感情因素，正好可以作为科尔顿先生观点的补充。余先生强调：“一般而言，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解释中共的兴起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带上一层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132]科尔顿的理解是，俄苏问题研究者不存在

类似的强烈感情。

> 因为在研究的起步时，许多研究者采访的对象是移民或难民，或者这些人的后代（美国哈佛大学最早设立了关于对苏联社会制度的研究项目，由于无法到苏联实地调查，只能采访那些曾经在苏联居住后来出走的难民或者移民，包括去奥地利、德国的原苏联公民——引者注），而这些人在苏联曾经有过艰难的遭遇。通过这样的研究所获得的信息是有偏向的。所以，在我们的领域中，相当常见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对苏联或俄罗斯怀有特别热烈的好感。
>
> 在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兴盛麦卡锡主义，此时苏联问题专家受到监控。如果流露出对苏联的感情，会受到处罚。
>
> 另外，比较复杂的是，对于美国的俄罗斯研究而言，没有很多俄罗斯人在美国进行游说。但是亚美尼亚、乌克兰人、华人等会有游说。没有俄罗斯人的游说，很容易使得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和俄罗斯政策走入另外一个极端。
>
> 如果在这个研究中，要体现出一些正面的感觉，人们往往会这样想，我把政权和社会分开，所以我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政权，但是对于这个社会还是抱有一定同情心的。对于政权的话，也可以有更深的理解：一方面，你可以说这个政权有过集中营，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战胜过希特勒等。总之，要看在政权研究方面采取什么样的观点。[133]

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有中国学者注意到中国的俄苏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类同于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这一现象。

> 由于日本同中国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切身利益太多，“学生”“先生”几经变化，因而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往往难于超脱，其间参杂了不少个人感情，故而大褒大贬、大扬大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则不象日本人囿于各种成见，其对中国的研究也客观、公允得多。……中苏两国乃咫尺近邻，山水相连，中苏关系史上有过血与火的刀光剑影，也有过诗与歌的宁静和平，有过同一战壕的并肩作战，也有过互不相让的反目成仇。中苏交往史的这些恩恩怨怨，不可能不深深地影响着甚至是亲身经历了这些变故的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恐怕也难“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感情色彩代替了理性判断，自我中心的主观估价代替了客观公正、言之有据的经济评价。[134]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俄苏研究者所表现出来的，的的确确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正反感情并存症”，加上中苏关系史上的复杂情况，尤其是涉及领土等的历史记忆和感情纠葛，我们一方面习惯于为俄罗斯的一些政策辩护，另一方面又对俄罗斯的行为过度诠释。有学者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联问题就是中国问题，或者说，如何看待苏联向来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多年来，在

中国无论苏联问题还是中苏关系问题的研究，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受政治影响很大，没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很多涉及苏联及中苏关系的问题，广大群众受传统宣传的影响很大，在认识上存在很大偏颇。”[135]这也是近年来以沈志华为代表的一代研究者致力于通过档案还原历史的动力所在。显然，中俄现在各有各的历史记忆，不同的历史记忆和立场始终会影响我们对俄苏问题的研究，当上述意识、立场和感情内在地渗入研究者的思考之中时，如何超越这种过多的非理性因素和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结语 中国俄苏研究的再出发

笔者认为，中国的俄苏研究完全有可能，而且理应成熟起来，从一个国外俄苏研究的“消费领域”（依赖外来概念和理论）转变为一个“生产领域”（有能力生产出独创的分析框架并有助于启发其他领域学者的研究）。中东欧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相比，曾经被东西方对立的格局所阻碍，与既往的与西欧同出一源的学术传统形成了“大分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政治上以“回归欧洲”为身份指向，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开始转型，并在学术组织、学科范式、基金扶持等各方面融入欧洲，形成了迅速“赶超”的新局面。[136]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参照，加入追赶国际俄苏研究先进水平的行列，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至少实现个别问题、个别范畴、个别领域的突破，进而全方位地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

诚然，西方俄苏研究种种理论范式背后往往隐含着一些“未经明言”的假设，我们对此应有清醒认识，不能动辄奉为神明，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而要有所取舍。因为如果这些基本预设本身存在问题的话，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任何再花哨的理论框架必然是随时可能崩坏的空架子、假把式。[137]特别是，对俄罗斯这样一个特殊的“非西方”文明体，基于西方现实发展起来的某些理论是否还适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笔者的个人感觉是，我们现在的状况甚至还够不上国外俄苏研究的“消费领域”。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所形成的大量的成果中，有意义的寥若晨星。换言之，中国的俄苏研究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我们要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以自信的姿态积极参与各国俄苏研究学者间的对话，力争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

参与国际俄苏研究范式的重构。所以，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和智识革命绝不意味着我们仅仅充当国外俄苏研究的概念、范畴、范式、方法消费者和进口者的角色，我们的最终目标指向应该是将中国的俄苏研究转变为一个“生产领域”。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即就文化、知识和学术生产而言，中国的俄苏研究和其他国外同行相比仍然处于明显的劣势。事实上，如果参照相关的统计材料，甚至俄国人自身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也并非主流，或者说全世界斯拉夫—欧亚研究圈内没有人能够忽视美国和欧洲的学术刊物、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相关情况。此外，即便是中国本土存在一些相当有分量、相当有价值的俄苏研究成品，可能正是因为使用中文出版，才难以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所以，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任务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快速地融入西方的俄罗斯—欧亚问题研究学术圈，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我们需要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而非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惯性下进行俄苏研究，否则就有可能陷入萨义德所描述的“东方学生的东方学困境”，即东方的学生跑到美国投入东方学家的门下，然后回到本土重复美国东方学教条的陈词滥调。

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的新俄苏研究，可能的路径选择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呈现出某种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至少是西方俄苏研究界所不能呈现的对俄苏问题研究的范式；二是与西方学术界保持亦步亦趋的关系，先从模仿做起，逐渐融入、内化到西方的俄苏研究路径上去；三是平衡上述两种取向，既学习西方的特点，也有中国自身的观察；四是就事论事，既不追求与西方同步，也不追求中国的个性。我认为这几个路径之间并非零和关系，而是有可能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风貌的。比如说，早期我们可能会进行就事论事的事实研究，然后更多吸纳西方的俄苏研究知识，熟悉之后就有可能在中国与西方的俄苏研究范式和知识谱系之间进行平衡，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俄苏研究新格局。也可能在同一阶段呈现出每个范式的部分要点，甚至在同一阶段形成相互竞争的格局，这同样有助于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发展。

在笔者看来，所谓“新俄苏研究”，其特征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对象的时间结构不再是厚今薄古。对早期俄国、帝俄、苏联以及当代俄罗斯的研究不应该平均分配精力，但不能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所谓的现实问题研究中，要甘于坐冷板凳。

——研究对象的空间结构不能仅仅是俄罗斯当局，应该打破地方、全国、地区的局限而兼容并蓄，形成“从俄罗斯地方看俄罗斯”、“从俄罗斯看俄罗斯”、“从地区看俄罗斯”和“从世界看俄罗斯”齐头并进的格局。

——在知识系统上，当代政治经贸知识与传统的俄罗斯文化文明等相关知识，应该有较为完整的塑造。

——在语言工具方面，对古俄语、当代俄语、俄罗斯境内及其境外原加盟共和国的国家语言，以及英语等，都要运用，不能单一化，要尽可能做到占用各种语种资料，至少要能在汉语、俄语和英语之间相互转换。这对于我们增进对俄苏问题的理解以及积极参与国际对话都有好处。

——在研究方法上，不能依然停留在“前实证”阶段，[138]传统的人文考证方法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应该相辅相成；应该打破学科细化的樊篱，而不仅仅是做到像马赛克一样将其拼接在一起，要重在学科的交叉融合，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同时，应该构造出一个把俄罗斯视为直接对话者，把其他国家的俄苏研究界作为间接对话者的情境，让我们自身成为俄罗斯进程的“不断参与的观察者”。

——在研究旨趣上，不仅要研究与俄国相关的热点问题，也要研究基础命题。不仅要研究宏观问题，也要研究中观和微观命题（微观问题与微观情境，往往因为我们强调政治格局、社会结构、文化模式、思想潮流等，而一向处于容易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不仅要研究单一的学科领域，还要研究边缘的，或者说“之间”的问题。

——在思维方式上，不仅要有正向思维，更要有逆向思维，要强调反思性研究，对于我们在俄苏研究领域知识谱系中的一些定见、成见、偏见都要做深入的探索，要勇于尝试我们未曾思考过的思想范畴（对边缘、边界与异例的研究，往往可能突破我们自身的学科偏见）。

——在学术追求上，应该将与国际俄苏研究学界的平等对话作为一个中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则是提出属于中国立场的问题和概念、范畴，在某些领域达到先进水平。

——在学术组织上，要克服长期以来俄苏研究界潜流涌动的门派意识，打破以地域甚至小到以单位为区隔的画地为牢，砸碎各自的边界和壁垒，以学术共同体的方式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对于今天的俄苏学界，孤独的天才和英雄似乎很难独存。

——在学术氛围上，必须构建起健康的、建设性的学术批评意识和环境。必须牢记，批评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裁断，也不是一种平复怨恨之心的补偿性行为，应该消除自己的偏爱，不怀成见地投入作品的“世界”。[139]但相较于国内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文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国际关系学界缺少比较充分的学术批评”，[140]这确实是制约俄苏研究进步空间的一个重要因素，理应加以克服。

总之，与我们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或其他国际问题研究的同事们不同，包括俄苏问题在内的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要求我们先在理论和在地知识之间搭建起一个可以使人自如地在二者之间自由来往的桥梁，在不知疲倦地往来过程中还要不断调停二者的固有矛盾，我们的梦想才能在此放飞。所有的有志者都感到从事俄苏研究的难度。我们也不必惊讶于中国的俄苏研究已经处在国际范围内的同类研究的重心之外，承认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俄苏研究再出发已经时不我待。通过范式重构以及相应的智识革命，通过国际化、实地化和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交叉融合研究重新赋予中国俄苏研究活力，它就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学术的广阔舞台上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这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而这本身就孕育着无穷的机遇。尤其是在一个中国日益崛起于世界东方的历史关头，发展包括俄苏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的战略机遇期正在来临，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兴旺意味着不断扩展的利益，所以需要更多和更好的地区研究”。[141]

原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编号：08BGJ003）、上海市教育基金委员会2007年度晨光计划项目“中俄毗邻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编号：2007CG37）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1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杨成，本文发表时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

[3] 本文所指的“俄苏研究”是一个有着一系列学科背景作为支撑的学科和教学领域，旨在揭开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兴衰成败的进程、原因及相关知识。尽管包含了历

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学、文化学和宗教学等学科领域，但在政府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之下，它渐渐演变为对有关俄罗斯问题的决策，与包括当代问题研究在内的内容始终紧密关联，并进而生成一种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这种研究突破了过往俄苏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等纯学术性经典俄国问题研究与政策性研究分离的格局，进入相互交流与融合并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阶段，日益成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专门分支。

[4] 陈春声：《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载苏力、陈春声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三联书店，2009，第35页。

[5] 相关代表作品主要包括：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eds.），*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59；Philip E. Mosely，“The Growth of Russian Studies，” in Harold H. Fisher（ed.），*American Research on Russi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59；Frederic J. Fleron（ed.），*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Rand McNally & Company，1969；Arnold Buchholz（ed.），*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Organization*，*Financing and Political Relevance*，Transnational Publishers，INC，1982；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eds.），*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Resource System Institute and East-West Center，1986；Frederic J. Fleron and Erik P. Hoffmann（eds.），*Post-Communist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in Sovietology*，Westview Press，1993；Daniel Orlovsky（ed.），*Beyond Soviet Studies*，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1995；Michael Cox（ed.），*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Sovietology*，*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London and New York，1998。

[6]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6期。

[7] Li Jingjie and Mei Yan，“Soviet Studies in China，”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eds.），*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89-98.

[8] 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评述》，《世界经济》1989年第3期。

[9] 黄定天：《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0] 李慎明：《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研究应该有一个大发展——在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第六届全国理事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5年第3期。

[11] 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的一项观察》，《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

[12] 王军、但兴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174～178页。但在该书中，整个苏联东欧地区问题研究都被“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区问题研究”一章乃至全书所忽略。

[13] 吕瑞林、左凤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苏联问题——〈苏联真相〉首发式暨苏联问题研讨会综述》，http：//www.cntheory.com/news/Llythllythjy/2010/126/10126171629HK4D30D1379B6EDCF27G.html。

[14] 除李静杰研究员提交的论文外，还包括Douglas P. Murray，“China’s Soviet Studies Programs，”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pp.67-68。

[15] Gilbert Rozman，*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1978-1985*，Preston University Press，1987；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1980s：A New Era in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1985，pp.435-474.

[16] 此处用“俄国”涵盖其整个发展时期，包括基辅罗斯以降的各种形态的俄国，帝俄、苏俄、苏联直至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都在其中。下文在使用“俄国”时同样针对着某一种形态或多种形态的混合。有关“俄国”的丰富含义及其在不同语境下各种指称的具体分析参见Ewa M. Thompson，*Imperial Knowledge*：*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Inc.，2000，pp.16-20。中译本可参见〔美〕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5~25页。

[17] 参见B. Г. Дацыше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Братство святых Первоверховных апостолов Петра и Павла. Гонконг，2010；Н. Ф. Демцбова，В. С. Мясников.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М.Наука.1966；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第61页；叶柏川《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3~105、209~282页。

[18]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第263页。

[19]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264~276页。

[20] 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第47~48页。另可参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中华书局，2006。

[21] 其中1879年参加外语大考的俄文学生为15人、1888年为17人，1893年为11人（初级2人、高级11人），1898年为22人（初级15人、高级7人）。参见Knight Biggerstaff，*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 p.129，转引自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第85页。

[22] 参见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第103~106页。

[23] 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第160、162页。

[24] 《张文襄公全集》卷100，北平文化斋刊，1928，第26页。

[25] 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第188～189页。

[26] 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第230页。

[27] 郑大华、张英：《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世界历史》2009年第2期。

[28] 冯峰：《“国难”之际的思想界——1930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思想论争》，三秦出版社，2007，第233～282页。

[29] 参见王军、但兴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附录1，第392～404页。

[30]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6期，第1页。

[31] 相关信息见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部的介绍，http：//www. cctb.net/zzjg/mlb/jj/。

[32] 李琮、刘国平、谭秀英：《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5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2期。

[33] 相关资料见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部的介绍（http：//www.cctb.net/zzjg/mlb/jj/）。此外，尽管不是直接的俄苏问题研究，但对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翻译也从1955年开始，历时30年，至1985年全部出齐，共50卷，总计3200余万字。据笔者所知，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出版了21卷。

[34] 相关书目可参见王军、但兴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14页。

[35]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6期。

[36] 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序言第4页。

[37] 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的一项观察》，《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

[38] 关于东欧改革经验对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影响参见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63～70、279～306页。

[39] 参见高铁生、张晶《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今昔》，工人出版社，1988，前言；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评述》，《世界经济》1989年第3期。

[40] 赵常庆：《苏联东欧问题国内期刊述评》，《苏联东欧问题》1986年第3期。

[41] 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1980s：A New Era in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1985，p.439.

[42] 最常见的刊物名录如下所示：《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国外社会科学动态》《国外社会科学》《哲学译丛》《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参考资料》《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国外社会主义情报》《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社会学与现代化》《国外社会学参考》《民族译丛》《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外国史知识》《史学月刊》《国外法学》《外国法学译丛》《国际问题研究》《外国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外国教育》《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研究》《经济学动态》《外国经济学参考资料》《外国经济管理》《计划经济研究》《现代经济译丛》《外国经济管理》《国外金融动态》《世界经济译丛》《世界经济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外贸调研》《财政研究资料》《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合作》《世界农业》《农业经济译丛》《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动态》《参考资料专辑》《共运资料选译》《国际共运参考资料》《国际共运史研究》《中央联络部资料》《国家体改委资料》等。

[43] 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1980s：A New Era in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1985，p.442.

[44] 关于留苏学生的社会学分析系经冯绍雷教授指点，在此特表感谢。

[45]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6期，第1页。

[46] 参见文夫《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世界知识》1989年第3期；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评述》，《世界经济》1989年第3期。

[47] David M. Lampton et al.，“The Scope of U.S.-China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Exchange，” draft report，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985，Chapter 2；Douglas P. Murray，“China’s Soviet Studies Programs，”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pp.67-68.

[48] 刘国光：《进一步深入开展对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1983年在“苏联经济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3年第9期。

[49] 刘宁：《我的学术之路》，《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4期。

[50] Peter Rutland，“Sovietology：Who Got It Right and Who Got It Wrong？And Why？” in Michael Cox （ed.），*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Sovietology*，*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p.37.

[51] 赵常庆：《苏联东欧问题国内期刊述评》，《苏联东欧问题》1986年第3期。

[52] 沈志华：《发现曾经真实的苏联》，《中国改革》2009年第12期。

[53] Li Jingjie and Mei Yan，“Soviet Studies in China，”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pp.89-98.

[54]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6期。

[55] 杨希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国际观察〉发刊100期有感》，《国际观察》2009年第4期。

[56] 舒岩：《把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京部分苏联东欧问题专家、学者座谈会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4年第11期。

[57] 80年代学术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正在并将继续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比如，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甘阳《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九十年代转型（代序）》（《古今中西之争》，三联书店，2006）强调的是“文化研究”的突出意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各类学科“群起性”爆发的时代。

[58] 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1980s：A New Era in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1985，p.473.

[59] 冯绍雷：《宗师风范》，《老先生》，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363页。

[60] 邢广程：《长者风范，智者气度》，《老先生》，第295～296页。

[61] 参见冯绍雷《三十年改革开放和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的一项观察》，《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在原有资金用完之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自2006年起仍然与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后又增加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联合主办该项年度内部会，同时，迄今为止已举行三次全国青年骨干研究人员的高级培训班。

[62] 有不少机构是非实体性的，其科研人员往往分散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从而使得俄苏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域缺乏认同感。

[63] 与俄语毕业生需求升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语生源招生至今还未走出低迷的状态。以黑龙江省为例，2006年该省高考俄语卷数量是7000余份，到2009年降至约5000份，占全部考生的1/40。参见《人才需求增加，生源萎缩，俄语人才培养面临窘境》，http：//www.mostgroup.Com/html/NewsCenter/20091124/9D2B79445EDBB88E.html。

[64] Gilbert Rozman，“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1980s：A New Era in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1985，p.474.

[65] 王跃生：《走出摇篮——读〈今日苏联〉谈当今的苏联研究》，《读书》1989年第9期。

[66] 徐葵：《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发展概况——访美考察记之一》，《苏联东欧研究》1983年第1期。

[67] 参见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eds.），*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59；Philip E. Mosely，“The Growth of Russian Studies，” in Harold H. Fisher（ed.），*American Research on Russi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59；徐葵《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发展概况——访美考察记之一》，第18页。

[68] Arnold Buchholz（ed.），*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Organization，Financing and Political Relevance*，pp.11-12.

[69] 阎光才：《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读书》2010年第10期。

[70]〔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2009年9月27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由冯绍雷教授主持，笔者为评论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梅俊杰先生担任翻译，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冯冲笔录。

[71] 於荣：《冷战中的美国大学学术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55页。

[72] Fersh Seymour H.，“Teaching of Area Studies，” in Lee C. Deighton（ed.），*The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The Macmillan and the Free Press，1971，p.261；於荣：《冷战中的美国大学学术研究》，第152页。

[73] Cyrillic E. 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eds.），*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pp.50-51.

[74] Daniel Orlovsky，“Judging the Past，Charting the Future：On Aquariums and Fish Soup，” *Beyond Soviet Studies*，p.7

[75]〔美〕沃尔特·拉克：《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陈玮译，《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1984年第2期。

[76] 拉克指出：“一般认为，移民在评价自己的原籍国家方面未必是最出色的评判员。他们缺乏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他们的评价往往带有夸大的成分。苏联移民尤其如此。”参见〔美〕沃尔特·拉克《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1984年第2期。

[77] Yale Richmond，*U.S.-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1958-1986：Who Wins？*，Foreword by Marshall D. Shulman，Westview Press，1987，p.32.

[78] Robert A.Dahl，“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Epitaph for a Monument to a Successful Prote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1961，pp.763-769.

[79] “Soviet Area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Studies，” in Frederic J. Fleron （ed.），*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p.1.有趣的是，在美国召开研讨会从方法论角度讨论共产主义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时，位于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召开了圆桌会议，讨论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如博弈论，是否适用于苏联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参见Allen Lynch，*The Soviet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43。

[80] Robert C.Tucker，“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unism，” *World Politics*，1967，p.49.

[81] 日本学者长谷川毅在《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1984年第2期的文章中曾涉及80年代以来美国大力促进苏联问题研究的种种举措。参见〔日〕长谷川毅《美国的苏联学危机》，《今日苏联东欧》1985年第2期。

[82] Daniel Orlovsky，“Judging the Past，Charting the Future：On Aquariums and Fish Soup，” *Beyond Soviet Studies*，p.8.

[83]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载苏力、陈春声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第318页。

[84]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苏联》。

[85] 〔英〕波波·罗：《西方俄罗斯研究方法论》，张红译，《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

[86] 福特基金会一位主管苏联东欧研究领域的项目负责人盖尔（Felice D. Gaer）曾精辟地披露了这种现象及其严重的后果。参见Felice D. Gaer，“Russian and Sovie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University Scene，” unpublished memorandum，1980，p.6；Arnold Buchholz （ed.），*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Organization*，*Financing and Political Relevance*，p.29。

[87] Hiroshi Kimura，“Slavic Area Studies in Japan：Features and Tasks，” in Osamu Ieda （eds.），*Where are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Headed in the 21st Century*？，Sapporo：Slavic Research Center，2005，p.49.

[88]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名簿』（第7版）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2003；『スラブ·ユ ーラシア研究名簿』（第8版）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2006。

[89] 每年举行两次，与教授会议同时举行，每次共三天。

[90] 该会成员主要是北海道从事斯拉夫—欧亚研究相关领域的专家，基本上每月都举行研究成果的发布和讨论活动。

[91] 1957年创刊的《斯拉夫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杂志，至1983年《外文纪要》创建为止，一直是各种语言的论文混载。这一纪要不仅展示了北海道大学斯拉

夫研究中心的历史，而且是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变迁的重要资料。

[92] 『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の40年』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1995、5頁。

[93] 『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の40年』6頁。

[94] Такаюки Ито，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в Японии：история，учрежденияипроблемы，『スラブ研究』No.25，1980；Takayuki Ito，“Slavitik und Osteuropa-Kune in Japan，” *Osteuropa*，Vol.33，No.5，1983；Цугуо Тогава，Славистикав Японии：история，развитиеисегодняшнеесостояние，Обозрение，1984，No.8；Tsuyoshi Hasegawa，“Soviet Studies in Japan：History，Problems，and Prospects，”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eds.），*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1986.

[95] 『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の40年』153頁。

[96] Hiroshi Kimura，“Slavic Area Studies in Japan：Features and Tasks，” in Osamu Ieda（eds.），*Where are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Headed in the 21st Century*？，pp.49-51.

[97] 李凤林：《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苏联——读〈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1期。

[98] 沈志华、左凤荣：《改革即去苏联化》，《中国改革》2011年第1～2期。

[99] 比如Susan L. 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另一位美国学者弗朗茨·舒曼则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撰写专著论证了中国和苏联政治体制的差异，尤其是有关毛泽东时代摆脱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论证较为精彩。关于这部分内容可参见甘阳《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第23～36页。

[100] 2008年在申请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课题委托项目“中国改革与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时，冯绍雷教授对该课题学术意义的修改定稿中的相关表述。

[101] 参见Gilbert Rozman，*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1978-198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102] 笔者自2003年起开始使用常喆、卢冠霖、陈扬等笔名为《环球时报》等媒体撰写评论或深度分析类文章，当时遇到的一个极为困惑的问题就是要不厌其烦地向责任编辑解释，俄罗斯的实际情况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糟糕。2003年笔者开始使用“重新崛起”描述当时的俄罗斯发展态势，但这种立场至少彼时在媒体看来多少有些“难以想象”，当时主流的描述仍然是磨难重重的“颓势”俄罗斯形象。事实是，俄罗斯变了，而且当时在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变化着，但我们由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对俄罗斯的变化表现出一种无知乃至偏见。

[103] 时下对于“中国模式”“和平崛起”的各种讨论已经不绝于耳，相关的评论、论文和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104] 相关表述见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第1页；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86页。

[105] 2008年4月，外交部时任副部长李辉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冯绍雷教授和笔者，听取我们汇报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未来的设想。他反复强调一点：研究俄罗斯问题具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106] 王军、但兴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379、384页。

[107]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第5页。

[108]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94页。

[109] 李永晶：《告别“对日工作式”研究》，《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10月31日。

[110] 包括俄苏研究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不景气，在学术圈内多被归咎于学术界和学者本身的“学术文化”，但实际上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绝不能忽视。可参见唐世平、张洁《中国东南亚研究现状：制度化阐释》，《当代亚太》2006年第4期。笔者对二位学者有关制度性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论断不完全认同，这样的看法可能忽略了学者独立人格的重要性。确切地说，是学界/学者与政界/政客双方紧密的有意识的互动和中性含义上的互相“利用”造成了当前异常复杂的“政-学关系”。

[111] 这种“以学术为业”的情怀，可能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学者在现实的研究过程中无法真正对政治无动于衷。科学家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还要以事实为据，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这大概是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的底线原则了。参见阎光才《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读书》2010年第10期。

[112] 参见Gilbert Rozman，*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1978-1985*。

[113] 冯绍雷：《强国之道在于思想的健全》，《解放日报》2005年8月27日。

[114] 范昕：《许纪霖论析“富强与文明：现代中国的文明梦”》，《文汇报》2010年8月23日。

[115] David L. Szanton，“The Origin，Nature，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Vol.3，http：//files.us.splind er.com/7e7e185d69201623a24f809208230bc2.pdf.

[116] 代表性作品包括Michael Cox（ed.），*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117] Ron Hill，“Social Science，‘Slavistics’ and Post-Soviet Studies，” in Michael Cox（ed.），*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Sovietology*，*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p.203.

[118]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

[119] E. P.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London，1978.

[120]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第1页。

[121] 一种更让俄苏研究界感到尴尬的流言是，我们的理论水平如此低下，以至于其他学科都可以跑到国际关系学科来客串，甚至是普罗大众谈起跟俄苏问题相关的话题时，其讨论的水平未必比我们学者低。

[122] F. Braudel，“History and Sociology，” *On History*，Chicago，1980，pp.64-82.

[123] 赵常庆：《苏联东欧问题国内期刊述评》，《苏联东欧问题》1986年第3期。

[124] Mark Tessler，Jodi Nachtwey and Anne Banda，“Introduction：The Area Studies Controversy，” in Mark Tessler（ed.），*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转引自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2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4页。

[126] Neil E. Harrison（ed.），*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Robert M. Cutler，“Complexity Science and Knowledge-Cre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stitutional and Infrastructural Resources，” *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Oxford：EOLSS Publishers for UNESCO，2002.

[127] 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128] 〔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v页。

[129] 此处借用了罗志田对于中国史学研究忽视历史丰富性和史料有限性的批评。参见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第26页。

[130] Frederic J. Fleron（ed.），*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p.vii.

[131] 参阅林精华《俄罗斯问题的中国表述——关于20世纪中国对苏俄认知的研究》，《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5期。

[132]〔美〕费正清：《中国新史》，薛绚译，正中书局，1995，余英时序。

[133]〔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

[134] 王跃生：《走出摇篮——读〈今日苏联〉谈当今的苏联研究》，《读书》1989年第9期，第102页。

[135] 吕瑞林、左凤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苏联问题——〈苏联真相〉首发式暨苏联问题研讨会综述》，《新远见》2011年第2期。

[136] Ilona Pálné Kovács and Dagmar Kutsar（eds.），*Internationalis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The ‘catching up’-A Myth or a Strategy*，Routledge，2010.

[137]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载苏力、陈春声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第322页。

[138]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139]〔比利时〕乔治·布莱：《批判意识》，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4页。

[140] 王逸舟：《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与建议》，《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

[141]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1]

杨成

导言

关于国家之命运，尤其是国家构建的各类形式一直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者所关注。[2]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已死”的声音不断出现，但对于国家及国家构建的争论从未停止。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催生了一系列新独立国家，更使得以民族/国家构建为核心的研究一时成为国际学界的显学。每一个新独立国家都成了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的典型案例。中亚五国在此意义上尤为重要。

本文所使用的中亚新独立国家的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其中个体身份指的是从苏联晚期开始萌芽并在苏联解体后的多重转型过程中处于演化状态的民族/国家认同，它的首要任务是在意识形态上将中亚各国的主体民族用全新的信念、神话和历史建构成一个现代民族，以利于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动员。而本文所说的集体身份是指中亚国家对于自身所在地区的认同，即从中亚的“地区性”视角入手，由中亚国家在一个被卡赞斯坦描述为“地区构成的世界”（A World of Regions）[3]中对其所属地区的忠诚度与凝聚力构成。这种集体身份塑造着成员国的利益预期、政策取向与共同意识，往往体现为因地区组织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乃至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相互认可和相互依赖的不断递增而造就的日益固化的特殊归属感。

在笔者看来，研究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形成与巩固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时代背景。

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产生于同此而生的国际范围内的权力转移与体系变迁的时空结构的转换过程中。1990年前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骤然崩毁无疑是中亚国家民族/国家认同被激发的最重要外部动力之一。[4]换言之，两极格局的突然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国际和地区权力格局，共同为中亚国家新的民族/国家/国际身份的转换准备了全新的外部环境。自独立伊始，中亚国家就再也不是完全处于莫斯科庇护之下的微不足道的国际和地区

角色。鉴于这些国家所处的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空间，外部力量蜂拥而至并相互竞合的实际状态也决定了中亚新独立国家拥有前所未有的博弈地位。[5]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彼此的铁幕和樊篱已被拆除，横亘于过往时代的冷战意识形态疆界即便不是完全不复存在，也被高度稀释。中亚五国从此深深嵌入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议程之中，成为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6]这种新的历史现实对中亚各国民族/国家构建及其个体与集体身份产生了显性/隐性的制约。

第二，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所有在苏联解体后获得主权的国家都面临着重新构建民族与国家的迫切任务。这种双重使命规制下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双重任务内在地决定了中亚国家身份认同获得的艰巨性。中亚国家一方面需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名义上古老，实质上崭新，既区别于沙俄，又不同于苏联时期民族界定的新的民族与国族，另一方面还需要使植根于该民族和国族基础上的新独立国家实现现代化。这种双重性先验地蕴含着一定的内在两难困境，因为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历史和传统资源，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民族/国家的主体性；而现代化则更强调摆脱传统，学习先进的现代文明，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找寻到属于自我的现代性。可以说，这种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平行进行的双重进程塑造了中亚新独立国家身份认同养成中的矛盾、困惑、变奏与演化。

第三，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的突出背景在于它们是在一个“后现代”和“全球世界”生成的时代建设现代国家。[7]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并于90年代加速发展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同样构成了中亚国家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外部要素。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国家的边界，这对于新近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中亚国家来说无疑具有挑战性，不利于其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巩固；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包含的开放性、国际化、趋同性都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中亚国家的国家性格之中，成为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构建的力量源泉之一。整体而言，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协调民族/国家认同与地区乃至全球认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刺激了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培育进程。

第四，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养成与巩固是与这些国家的多重转型相伴相生的，至今仍处于进行之中。[8]一方面，外部大国更多关注自身在中亚的存在及本国利益的实现，而较少致力于推动中亚国家的真

正转型。[9]尤其是俄罗斯，作为原先欧亚地区的制度提供者，受制于自身实力和本身作为转型国家的身份，以及由此决定的与中亚各国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处于同一层次的现实，并没有足够资源帮助中亚新独立国家实现“转型”，也不足以提供经验样板。[10]另一方面，中亚国家囿于苏联制度遗产、部落文化传统等自身的非正式制度的制约，缺乏足够的内生转型动力，其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与其他新独立国家相比更为艰难，始终处于各种内外威胁之中。比如塔吉克斯坦持续数年的内战、费尔干纳盆地的流血冲突、吉尔吉斯斯坦的数次政权更迭、引起广泛国际关注的安集延事件……这些具有强大破坏力的突发事件显然影响了中亚各国个体与集体身份的养成。

此外，中亚发展的不稳定状态和转型的不确定性，与其日益成为新的全球边缘地带的现实密切相关。中亚—里海地区能源丰富，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相关国家贡献了较多的经济增长，但也因此进一步固化了原材料依附型经济模式和单一化的贸易结构，寻租及与之相伴相生的腐败问题成为“资源诅咒”的显性调整，牵制甚至是绊住了中亚各国转型的制度优化进程。[11]

第五，中亚各国复杂的地缘文明环境在苏联解体之后得以释放，中亚因成为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四大文明的交会地带，所以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面临着一定意义上的选择困境和整合困境。可以说，处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东西方文明交融与竞争的接合部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是决定中亚新独立国家的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基本出发点，是规制其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包括国家身份养成的长程要素。从文明变迁的角度来看，中亚新独立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个体与集体身份构建进程中发生的波折、冲突、混乱与转机，与该地区的地缘文明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六，一般而言，单一国家都是在个体身份已经基本定型的情况下通过参与地区一体化而获得新的集体身份，而中亚遵循的却是另外一种逻辑，即通过“去一体化—再一体化”的方式重新生成后苏联时期的集体身份。

诚然，中亚国家在后苏联时期的转型已经深深嵌入欧亚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转型的大格局中，受到外部大国和外部环境的强烈塑造。[12]但中亚作为国际和地区事务行为者的主体性已经越发鲜明地呈现出来，这一点不容忽视。[13]由于中亚国家的转型迄今尚未最终完成，而

帝国及其传统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内也难以彻底消除，时下的中亚各国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集体身份问题上都包含着难以超越和摆脱的多元性，即各种身份认同——前苏维埃主义、苏维埃主义和后苏维埃主义——处于相互交织、彼此杂糅、互相竞争的混沌状态。前苏维埃主义对中亚国家而言是一种历史记忆，苏维埃主义则是一个历史遗产，而后苏维埃主义则是一种历史综合征，体现为新独立国家对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的孜孜以求。[14]

苏联解体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中亚新独立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问题的讨论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献积累，但其路径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多未能就各国个体身份和集体身份的生成与巩固方式，尤其是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国内研究则更多关注大国博弈议题，较少把中亚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作为研究客体。[15]在这种学术语境下，如同一般意义上的地区与国别研究，由于其通常将现代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所以会把本来十分不稳定的国家身份因素视为不变的因素，并将之具体化。[16]本文试图克服这一缺陷，尝试以身份认同作为核心概念，就中亚各国国家（个体）身份和地区（集体）身份的养成问题建立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在具体案例中做一个较为细化的分析。

长期以来，有关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范式。一是本质主义的，它认为民族/国家认同是某种自然的、原生性的东西，是历史的自然单位和人类经验的整合性要素，能够以客观标准——如人种、血缘、语言、宗教、风俗、文化、聚居地——来衡量。对于个体而言，这些身份是被直接赋予的基因，无法被否认和改变。二是结构主义的，它认为集体认同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结构，剥夺了一群人应有的政治权利、经济资源、文化表现或是社会地位，因而将原本松散的他们凝聚为族群甚至民族。三是建构主义的，它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是人类社会形成时原初的产物，而都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建构。其基本假设是：第一，民族/国家是心灵建构出来的，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第二，民族/国家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由语言和其他象征符号系统生产、再生产、转型和解构；第三，民族/国家认同永远与差异建构、特殊性建构相关；第四，并不存在单一的或唯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它不是恒定不变的，往往受具体情势的制约而呈现动态性、脆弱性、不一致性。[17]从当前的国际学术潮流看，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特征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本文的研究主要也是在这一理论范式的指导下进行的。

本文框架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论，介绍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目的；第二部分在分析政治身份与身份政治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整合的分析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框架，提出“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三位一体的国家身份建构路径；第三部分从历史教科书的重新书写入手，第四部分从政治空间的变迁着眼，第五部分从教育改革视角、第六部分以宗教复兴为主线具体论证中亚五国如何通过“时间-空间-人”的再造建立起本国的个体身份；第七部分集中讨论中亚地区国家的集体身份；结论部分将对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构建中的问题以及前景予以总结和展望。

通过这样的分析，笔者希望国内学术界和决策层能进一步意识到，中亚国家的主体性在构建中亚各国的个体与集体身份的过程中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更加重视建立坚实的中亚地方性知识，以期准确把握中亚国家及中亚地区的发展趋势。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成为我们推进新的中亚研究的前提与基础。

一 中亚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一个整合的理论分析框架

身份（identity）原本是一个哲学、心理学概念，是指建立在共同体成员相同特性基础之上的区别于他者的共有形象与归属感。[18]这是一系列关于自我的观念，其核心问题在于“我或我们是谁”“他或他们是谁”，涉及在一个以他者为参照的背景下如何认识自我并进而将自我与他者进行严格区分的知识体系。就其影响因素而言，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观念、宗教文化、历史记忆、生活习惯等都可以包含在内。

国际学术界一般意义上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politics of identity）传统上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19]它最早是指一国内部居于少数和弱势地位的民族、种族、族群、社群等，因可能受到歧视而致力于赋予自身特定身份并获得社会认可与包容，进而拥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政治实践过程。[20]目前这一定义依然有效，但同时其内容更多地转向了寻求对外在于本属群的其他社会群体对自身差异性的接受或承认。[21]这是一个国内政治的范畴，加拿大等国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就是其典型案例。但过于追求某一群体的认同也可能导致社会撕裂的态势加剧。换言之，身份政治已经成为新的政治客体在诉求被他者承认其所异以及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里新的替代性发展过程中的自组织机制。身份

政治中包含的努力是一项集体和公众行为，而不是一种个体与私人作为。应该意识到，身份政治实质上是一场理论和社会政治的，而不仅仅是争取根据利益形成的群体性集合的抗争；是一场打破往昔的合法性承认和寻求新的合法性甚或是执政权力，而不仅仅是围绕自我表达和自主管理的可能性的斗争。现代政治学中的身份政治主要与国家其他政治进程的主体相关，它是价值导向、民族/国家构建及巩固以及其他类型的政治实践与手段的集合体。这样的身份认同首先是国家和利益集团的相关行为及彼此互动的客体，也是民族/国家发展取向的形成和构建的客体。国家是这一层次的政治认同的关键行为体。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它拥有教育、军役等社会化机制和相应的公共政策设计，以便养成特定的身份归属感。在地区框架内则表现为通过各种一体化或去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并经由实际合作的开展形成一种集体的区域意识。

目前，身份这一概念在政治学领域中已被引申为由此而产生的对共同体的忠诚。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身份则是一种使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组由特定群体，首先是执政精英予以定义的，在某一时空范围内形成的本国文化等特征与国家地位的本质属性。

一般认为，国家具有两种基本身份。一种就是国家本质上固有的、使国家成为国家而独立于国际体系的内在身份。国家行为体只有一个这样的身份，这就是国家的个体身份；另一种则是形成于国家间互动之中，也就是内生于国际体系之中的、由国家间合作进程及其衍生的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社会身份。一个国家可以具有多种社会身份。[22]当国家的社会身份构建的前提在于认定某一特定地区或特定集体时，这种身份就变成了国家的集体身份。显而易见，无论是国家的个体身份，还是国家的集体身份在本质上都必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没有“他者”的存在，国家身份的意义就会消失。正如意大利学者安娜·特里安达菲利多指出的：

> 国家身份还暗指差异性。国家身份的存在预设了“他者”（others）、其他国家和其他个人的存在，他们不属于我们这一集团，我们集团必须与他们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国家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既包括共性意识，也包括差异性意识。它既涉及对团体的自我感知，也涉及对国家寻求与其相区别的他者的感知。这意味着，国家身份本身是无意义的，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才有意义。[23]

笔者认为，国家的个体身份可以经由政治道路等政治范畴、宗教与语言等社会文化范畴和发达程度等国力范畴予以评估，而国家的集体身

份则主要通过地区边界等空间范畴内的相互依赖加以衡量。（见表1）

表1 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要素构成

本我与他我（国家的个体身份）				
政治范畴				
体制性质	政治道路	意识形态	政治文化	组织形式
社会文化范畴				
文明	宗教	民族	社会习俗	语言
国力范畴				
规模大小	武力强弱	发达程度	创新能力	国际地位
本我与他我（国家的集体身份）				
空间范畴				
领土	地区	地方	超国家	边界

那么，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作为一种属性到底是如何生成和巩固的呢？由于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内在地具有双重特性和双重功能，它既要求共同体成员内向地产生一种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在相同地理环境、相近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作用下界定谁是共同体的成员；又要求共同体成员外向地识别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区别，界定谁不属于本共同体。这样一来，一个有意义的内在他者和外在他者的存在就成为必要条件。就经验层面来说，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居民都认同一个民族的主观理念时，不同族群间的冲突才会减少，民族和国家的个体身份才会接近。而且，内在他者和外在他者一般是不同的。在民族/国家构建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国家中个体身份的构建和经营，往往表现为其能否以及如何从一个民族型的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转化为公民型的国家身份（civic identity）。著名学者林茨曾经对此做出了明确区分：

> 所谓民族-国家政策，我们是指这么一种政策，国家领导人追求一种罗格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所说的“民族化的国家政策”，以提供文化的同质性。这些领导人有意或者无意地发出这么一种信息，国家应该成为民族的和为了民族的国家（of and for the nation）。由此，在他们撰写的宪章以及出台的政策之中，主体民族的语言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有时候甚至成为国家事务和公立学校教育（可能也包括私立学校）唯一通用的语言，主体民族的宗教享有特别的待遇（即使没有必要被确定为官方宗教），而主体民族的文化象征也往往在所有国家象征（如国旗、国歌，甚至包括某些类型的军用符号），以及所有国家控制的社会化方式，如电台、电视和课本之中，都享有特殊地位。相反，在国家构建过程之中，民主政策是指那些强调更为广泛、更不具有排他性的公民资格的政策，这种政策认为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的个体权利。[24]

显而易见的是，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陷入了一场身份危

机。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在被迫接受了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文明离婚”后，各国主体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与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从而适应苏联解体后全新的内外形势，特别是本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来凝聚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进而继续保持经济上的整合力和政治上的向心力，是一个关乎民族/国家构建生死存亡的核心命题。相应地，本文语境中的中亚国家个体身份主要是对内层面上的国家对自身特性的一种自我领悟和自我理解，相当于民族/国家认同。它主要是内生的，反映了本国大众在精英的引导下获得、完善、变更或丧失集体认同的过程；而其集体身份等同于地区认同，主要是由中亚五国在彼此的互动交往中，随着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被塑造出来的较为稳定的共有观念，且被其他成员理解和认同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它是中亚各国基于地理范围对本地区多层面共同体的认同，主要体现在将本国作为地区一员，成为其不可分割整体中的一部分的区域连带身份。换言之，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在此意义上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即中亚五国自我的个体身份在与其他中亚国家交往过程中不断得到反馈和认同，这种个体身份的成长显著地影响着中亚集体身份的塑造，而集体身份定位的强化也促进了中亚五国个体身份的深层领悟。

关键在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曾经从属于同一个单一制国家——苏联，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也催生了大规模的新国家。我们可以假定，这些国家和西方学术界侧重探讨的已经完成国家和民族构建并在巩固和深化民主建设的国家，在个体和集体身份的塑造方面有着不同的逻辑。在笔者看来，其区别主要在于以下几点。其一，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与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再造是同步进行的。无论是整合国内的各项秩序，还是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都可能不得不在一个另起炉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基础上展开。其二，由于殖民帝国的大量人口以及其他物质和非物质因素遗留在殖民地，这种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使得前宗主国同时扮演了新独立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养成中的内在和外在他者的双重角色。其三，相对于那些已经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的主权行为体，相对于霸权国、主导国以及其他中等影响的国家，新独立国家往往属于小国，因而为了在心理上弥补军事、经济等国力方面的劣势，其对于国家威信的自尊心十分敏感，对于外来干涉，特别是侵蚀其“主权”、破坏其“独立”的行为显示出激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尤其是在那些将执政当局和国家命运等同起来的小国，它们对于主权问题的重视与敏感程度更高。从这一意义上讲，新独立小国对于新的国家个体和集体身份的塑造往往是狂风暴雨式的，以

抛弃历史上耻辱的身份为优先方向。

因此，这些新独立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构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构成一体两面、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见图1）。

图1 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生成路径

中亚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与巩固正是经过上述“去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三重路径予以实现的。这三重路径都是中亚各国身份形成必经的方向，它们彼此影响、互相塑造、共生共长：各国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甚至经济政治基础都与“俄罗斯（苏联）化”有着密切联系，进而注定要首先通过“去俄罗斯化”摆脱历史包袱，借助于“在地化”与“国际化”的重要支持构建中亚国家的个体身份；而“在地化”与“国际化”的推进在强化了中亚国家新的“本我”之后实际上也必然导致它们与前宗主国俄罗斯的相对疏离，使得“去俄罗斯化”进程在一般意义上越发难以逆转。此外，小国主体性的伸展、大国的纷纷介入与中亚权力场的特殊文明交汇点构造出两种身份互相影响的环境，集体身份塑造也需要个体身份在外交和国家互动上的配合。正是如此，三重路径作为一种重要工具得以反映个体与集体身份互动的实质。

下文我们将分议题对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生成过程中上述三种路径隐含的内在关联和复杂互动关系进行剖析。我们试图突出的是，中亚新独立国家正是借由“去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的交互作用实现了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空间与符号）和人（教育与宗教）的三重重构，并在此进程中塑造了新的国家身份。

二 族史/国史重构与中亚国家的身份认同

建构主义的民族理论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都是一种近现代现象，是可以制造与再造的；它并没有表达或反映一种自然的、原始的真实生存；作为现代思想的独特形式，民族主义者的观念不仅鼓动了政治运动，而且塑造了个体和族群的文化身份。[25]民族主义者制造/再造民族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民族历史的重新书写。而认同政治同样存在于指向当下的历史之中。过往在此意义上被依据当下情势和历史书写者的愿望而构建。[26]这样一来，族史/国史的重新书写就化为新独立国家获取新的国家身份的关键路径。很多情况下，新独立国家族史重构框架下的民族叙事往往突出本民族有一个不朽的过去，对于世界文明进程曾经起到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并由此衍生出一个不容争议的命题——该民族势将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离开历史的书写与重新书写都无法进行。

中亚新独立国家的族史/国史重构同样未能脱离上述逻辑的窠臼。这首先是因为中亚新独立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在于树立“文化自信”，并把这种最初更多是自上而下灌输的“文化自信”内化为一种潜意识的“文化自觉”，在文化传统的脉络中找寻重塑本民族精神家园的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从而在巩固主体民族优势地位、弘扬其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塑造了新时期的民族/国家身份。

这种族史/国史重构以及其背后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最大牵引力恰恰在于“去俄罗斯化”的书写取向。它与沙俄和苏联的长期统治及其历史叙述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一般来说，殖民者会采取各种措施清除被殖民民族的历史记忆，以此消解某一特定群体的身份认同，使通常居于帝国边陲地带的他们更易被帝国中心所同化。正如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指出的，为了使自身对殖民地的征服行为及在此建立起行政-指令体系合法化，殖民话语的目标是在种族来源基础上将殖民地解释为一个人口退化类型的单元。[27]这样一来，在一种难以言明的非正常逻辑指引下，歪曲、丑化、破坏被殖民者的历史成为殖民政策的重要手段，旨在说服当地民众相信殖民者能为之驱走黑暗、带来光明。[28]

苏联官方对包括中亚在内的众多边缘带的加盟共和国主体民族历史的重构显然潜藏着这种近似的逻辑。为了利用历史重构来整合新成立的中亚加盟共和国内部居民，苏联统治者引入了全新的历史话语，集中关注这些共和国主体民族的族源、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以激发相应的民族自豪感。各种历史读物经过苏联高层的认可后被编纂、生产出来并通

过教育体系等渠道派送到中亚，以确保每一个居住在中亚的人能够自孩童时期就熟悉、掌握本民族的历史。问题在于，苏联史学编纂对于包括中亚各主体民族在内的非俄罗斯族的塑造包含着以下几个必备要素：

——展示“大俄罗斯人”作为天然领袖和“老大哥”的优越性；

——说明俄罗斯族人和非俄罗斯族人之间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都没有民族敌对；上述神话将有助于创建新的苏联（俄罗斯）爱国主义；

——强调非俄罗斯人不是被占领土，他们是通过联盟（unions）或再联盟（re-unions）的方式加入沙俄或苏联帝国的；

——指出这种联盟或再联盟只会带来正面利益或至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换言之，对中亚国家而言与俄的再联盟要比被大英帝国征服好）；

——认为大规模的中央集权是一种正向发展；

——强调非俄罗斯族人针对帝国的民族主义煽动行为与渴望和俄罗斯“老大哥”统一的非俄罗斯族人的愿望相悖；

——强调非俄罗斯族人无创建独立国家之能力；

——强调俄罗斯承担着有益的文明教化使命。[29]

同样，作为一种普遍的反向运动，后苏联国家的精英开始将原统治者长期向自身灌输的难以独立管理本国事务的“金科玉律”抛之脑后，转而试图以“去帝国”的方式重获民族自信，消除在沙俄和苏联统治者压制下生成的一以贯之的自卑心理。[30]因此，后苏联的执政精英往往要求历史学家在族史/国史重构过程中强调原住民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不如是，则后殖民国家将被动使用前宗主国的历史话语，因而也难以摆脱被殖民者塑造的身份认同。[31]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记忆的复苏和民族史学的回归意味着作为前帝国“他者”的新的民族/国家身份的新生。[32]可以说，中亚国家重构族史/国史的过程中对于“历史民族”曾经辉煌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一种特殊的姿态反映曾经在苏联治下遭受屈辱的群体的内在尊严。如同安东尼·史密斯所强调的：

> ……现实的耻辱和压迫是尊严的对立面，并且通过解放才能带来尊严，但是压迫、耻辱本身却并不产生对尊严的热望。尊严必须从内部被“重新发

现”。由此出现第二种意思：尊严成为被外部缺陷所掩盖的“真正的价值”。民族主义的目标就是找到内在的价值，实现真实自我的尊严。[33]

中亚各国执政当局借此给予受压迫者和被边缘化者以地位和角色反转的政治承诺和现实体认，通过与自己当下的升级状态和对前统治者角色的矮化的比较寻求内在的集体尊严，进而实现并提升了真正的民族自我。此时，昔日的统治者，无论是沙俄还是苏联，都不再是“进步的灯塔”和“文明的传播者”，而曾经被视为“落后土著”的中亚各主体民族摇身一变同样被赋予了“伟大民族”的称号。[34]当然，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和重新主张将会被所有后殖民国家的主体民族所欢迎，尽管同时也可能造成一种少数民族的被背叛感。这样一来，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历史重构的主线就变成了与“去俄罗斯化”相伴相生的“在地化”，即着力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它隐含着新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条件下主体民族的主体性问题，等同于寻找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的主要源泉。也正因为如此，中亚国家执政当局在独立伊始就投入了无限的精力与激情于族史/国史的重新书写之上。他们乐此不疲地突出本国人民及其成长史对于人类发展的贡献，与其他民族，尤其是与当下在物质和精神意义上都足够发达而先进的民族相比，足以平分秋色、等量齐观。[35]他们希望通过承续主体民族的传统的象征符号体系来激发国民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在共同的史诗叙事、共同的祖先信仰、共同的英雄崇拜和表征中寻获本民族安身立命的坚实依据。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各国民族/国家永续存在并可持续发展的合法性、正当性由此产生。事实上，早在苏联晚期，构建一个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主体民族的民族身份的诉求与努力就已经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后苏联时期中亚各国延续了这一思潮，并更为系统地重新表述了民族史、国别史与地区史，以此作为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

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在所有中亚国家中，除了哈萨克斯坦情况稍好外，其他各国在族史/国史重构问题上几乎都秉持了民族主义立场，并且多将俄国和俄罗斯人视为不共戴天的外敌。比如，吉尔吉斯斯坦在历史教科书中直接酣畅淋漓地指责了俄罗斯帝国对吉尔吉斯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潜在威胁，强调正是出于对种族灭绝的恐惧，吉尔吉斯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祖国而逃亡中国并将这一大规模的逃亡以及期间造成的近20万人丧生的历史称为“大慌乱”。[36]类似的表述在其他几个中亚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俯拾皆是。就内容而言，中亚五国在独立后的头十年中，历史重构的重点首先集中在对本国本族历史名人的研究中，一

段段面貌不清的过往经由时髦的各类传记及史学作品而变得鲜活起来。比如，哈萨克斯坦出版了杜拉托夫（Mir Jakub Dulatov）[37]、巴依托尔逊诺夫（Ahmed Baitursunov）[38]、阿乌佐夫（Mukhtar Auezov）[39]等人的作品，乌兹别克斯坦对别赫布迪（Behbudi）[40]以及土库曼斯坦对库里（Makhdum Quli Qutub Shah）[41]的研究，等等。

新时期哈萨克斯坦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对前苏维埃时期（沙俄时期）的游牧民族传统的再造。哈萨克族人被描绘成自由和自豪的牧民，其历史祖国是广袤无边的哈萨克大草原。大量的国家预算被用于普及这一历史传统。2005年，一部名为“游牧民”的史诗电影在哈萨克斯坦和世界范围内发布。为此，哈萨克政府划拨了4000万美元的制作费用，使之成为哈独立以来最昂贵的一部影片。影片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18世纪，描述的是一位年轻的牧民如何为统一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三个互相混战的部落而奋斗的故事。

乌兹别克斯坦在苏联解体后同样采取了回归前苏维埃时期身份认同（pre-Soviet identity）的各项举措。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正本清源的口号指引下被重新思考、品读、诠释，一系列前苏维埃时期的象征符号被重新启用。首先，苏联官方史学中讳莫如深的帖木儿大帝作为伟大的乌兹别克帝国的开创者被重新发现。新独立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新史学将这位历史人物描述为将欧洲从奥斯曼帝国和将俄国从蒙元帝国的铁蹄中解放出来的大救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努力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在巴黎召开了帖木儿大帝诞辰660周年的庆祝活动。欧洲知名政治家，包括法国总统希拉克及其他公众人物出席。乌兹别克历史学家多认为这是整个世界朝着消除对帖木儿大帝错误陈见、还原其在世界历史中真实作用的重要步骤。[42]其次，历史记忆，尤其是将乌兹别克人的起源上溯至13世纪的沙曼王朝，这不仅是历史学家的兴趣所在，更是一个乌官方极力推动的政治工具。最后，20世纪初期曾一度风起云涌的贾迪德运动被视为追求突厥斯坦独立与统一的重要象征。很多贾迪德运动的参与者被重新解读为“祖国的伟大儿子”。

族史/国史重构也是吉尔吉斯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吉尔吉斯人被描绘成“英勇、强大、尚武、尊崇财富、充满爱的共同体”，被塑造为一个尽管面临外敌威胁依然捍卫民族团结且崇尚自由和独立的民族。[43]与此同时，吉尔吉斯人急于找到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的承载者，古代口传文学中吉尔吉斯人的无畏战士、英雄玛纳斯由此

被塑造为民族之父。一时间，玛纳斯几乎处处可见。货币上、图书中、电影里、歌剧内，甚至是饮料瓶上、香烟盒上都有玛纳斯的形象。这显然是吉尔吉斯当局将玛纳斯渗入吉尔吉斯人民族意识的巨大努力。

原生论是塔吉克斯坦塑造民族/国家认同的主要工具。塔执政当局反复强调，塔吉克族不是一个新的民族，而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为此，塔吉克斯坦重新书写了历史，将当代塔吉克人的族源上溯至公元9～10世纪的萨曼王朝。伊斯玛伊尔·索莫尼（Ismail Somoni）被认为是萨曼王朝最具权势的领袖。为了强化索莫尼作为塔吉克斯坦关键历史人物的象征意义，塔吉克斯坦官方将国家货币以其命名，将本国的最高峰用他的名字命名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土木建造他的纪念碑。

土库曼斯坦第一本历史教科书为叶卡耶夫（Oraz Polat Ekayev）编写的《土库曼斯坦史（10～16世纪）》，旨在向八年级学生讲授新的族史/国史。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对土库曼斯坦历史的重新书写，在此过程中该历史时期的所有突厥人的历史都被视为土库曼族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换言之，无论是喀拉汗王朝（Karakhanids）还是奥斯曼帝国（Ottomans）都变成土库曼人建设的国家。在导言中，作者强调土库曼人的历史可分为形成、扩张与被占三个阶段来研究。第一阶段主要讲述国家与部族问题，比如伽色尼王朝（Ghaznevids）、乌古斯土库曼部族（Oghuz Turkmen）及其在塞尔柱王朝（Seljukids）形成中的作用。作者将国际学术界普遍视为松散部落联盟的乌古斯土库曼人描述为伟大的乌古斯土库曼国家，其国民半游牧半定居，而治理方式则为协商。第二阶段讲述了土库曼人向小亚细亚、伊朗、高加索、印度等地扩展的历史，认为土库曼人在发现这些新地区后成立了各种封国并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奥斯曼人即被归为这一类，该书将之称为“奥斯曼土库曼国家”并视之为土库曼人建立的诸多封国之一。第三阶段则陈述了土库曼人因各种原因丧失独立的历史过程。这一部分的主体为外来统治者，对土库曼人的相关描述几不可见。行文至16世纪末，作者方又开始将土库曼人重新拉回到历史重构的中心位置，旨在为陈述以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为标志的新国史做铺垫。[44]

由此可见，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后的历史重构，彰显出民族主义意识支配下的历史编纂中常见的神话学取向，其典型特征如下所述。其一，确认本民族在当下领土疆域内，即便不是自古以来，也是非比寻常的悠久性。此为原生性神话。其二，致力于将当下的种族政治边界投射

至可以上溯的历史最深处，竭力扩大本族群历史上迁居之领土，旨在争夺历史土地。此为民族发源地神话。其三，将本民族与固有的特定语言联系起来。如果曾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则一般认定是其他族群所为，以免这一事实降低族群的历史地位。此为语言延续神话。其四，认定本族群历史领土上除了自己以外，还生活着其他相近或由自己衍生出的子族群，其后他们迁居他处。本族群在此意义上成为其他族群的“老大哥”，从而获得某些特权并使之自然化、合法化。此为族群家庭神话。其五，将本族群的祖先定位为某一个历史典籍或口述文学作品中为人熟知、享有盛誉的伟人。此为荣耀祖先的神话。其六，强调历史上本族群超越相邻民族的文化（书面的）或政治（国家性）成就，从而事实上实施了文明输出的功能。此为文化传播者神话。其七，夸大历史上本族群的团结程度并有意识地忽视部族-宗族的功能与作用和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多样性。此为族群均质性神话。其八，经常构建外部敌人的形象，与之进行的斗争进一步固化了该族群，提高了其团结程度。此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神话。[45]

实际上，在历史重构方面，“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的重要来源是“国际化”带来的新思维。其实，中亚各国对苏联解体后的族史/国史/地区史的重新书写，从学术源头上受到了苏联著名学者巴托尔德的影响，其作品曾以全集形式在1963～1979年于莫斯科出版，共9卷10册（第二卷有两个分册）。巴托尔德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是其对中亚问题的区域研究及由此形成的译注古地理文本和诠释史学两种学术传统，并由此拥有了一批追随者，如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布列格尔（Yuri Bregel）、托甘（Zeki Velidi Togan）等。后一种学术传统的影响力远播海外，并被发展为一种基于西方学术理念的方法论，即对地方知识的追求不仅要利用地方性的资源，更要放在全球视野内进行。苏联解体后，中亚史学的新趋势开始形成。与苏联时期着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中亚历史不同，中亚新史学转而强调民族的自我认同。在这种国际化的学术视野的影响下，中亚研究的主流范式被转换为各国对本国主体民族的特定传统的研究。这种新范式将各类传统放在当下的国土疆域内予以重新解读。乌兹别克斯坦在这方面着力最多。而独立后的第二个十年，中亚国家的族史重构开始将重心从国家转向人民。[46] 换言之，如果说头十年的中亚历史重构中的人民，是以某一民族、部族的英雄人物作为代表的，那么这一新传统在第二个十年依旧在延续，但这一时期的中亚史更着重发现普通民众，更在意地方史（Local History），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以国界为历史研究边界的简单做法，比

如各国对苏菲主义（Sufism）以及对文化认同背景下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即为明显例证。[47]

三 政治空间的变迁与中亚国家的身份认同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空间政治的重构同样构成了其国家身份建设的一个关键内容。这首先与空间本身具备的政治性质紧密相关。正如法国学者亨利·勒菲弗所指出的：

> 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如果空间的形态相对于内容来说是中立的、公平的，因而也就是“纯粹”形式的、通过一种理性的抽象行为而被抽象化了的，那么，这正是因为这个空间已经被占据了、被管理了，已经是过去的战略的对象了，而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它的踪迹。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空间的意识形态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似乎是均质性的空间，这个在它的客观性中，在它纯粹的形式中，又显得似乎是由某个政治集团（bloc）造成的空间，就像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是一种社会的产物。[48]

正是城市等空间所具有的政治含义，使得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中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历史上，新政权登上权力舞台之后，往往会大规模建造或重修旧日的政治空间。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此时此际，城市等空间表述的核心内容正是有关国家身份的想象。在这一意义上，空间不再是一种静态结构，而是一种动态结构，国家的身份认同在这种看上去变动不居的时空中实现了转型。

政治地理学家阿伦（John Allen）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用以解释地点、行为和权力间的复杂关系。他定义了四种基本的权力类型：强制力（coercion）、权威力（authority）、操纵力（manipulation）和诱惑力（seduction）。这几种权力的差异主要在于其达成的方式及跨越实体空间与社会网络的能力强弱。在这四种权力中，强制力最直接，最容易实现在实体空间和社会空间内的穿越；权威力需要客体的顺从，容易在传输过程中逐渐弱化；操纵力，包括故意隐藏动机的行为，可以使人们将特定的安排视为永恒的、自然而然的事实，因而具有较长期的影响力；而诱惑力则往往被用于研究民族主义问题。[49]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将纪念碑、历史教科书和地图等民族/国家的表征视为诱惑力的一

种形式。但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更强调运用强制力和即将到来的权威力塑造民族认同。借用阿伦的空间权力的种类细分，笔者认为，正是上述四种权力形式经由空间塑造着新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前三种权力往往是施动者外在赋予的，而最后一种则是经由施动者的推动，而被受动者最终接受的内生权力。“去俄罗斯化”被中亚政权利用自身的“权威”而强制执行，直接操控着中亚各国国家身份的积淀和成长；“在地化”以较高速度有序进行，反映了各国执政当局的权威力和操纵议题影响他们的能力；“国际化”则给久处于孤立和隔绝状态下的中亚国家巨大的诱惑力。

经由空间的重新改造构建新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比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除了另立国民公会，颁布新法令之外，还建造了崭新的广场、建筑物和纪念碑，宣示有别于传统王权的新的共和理想。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迅速下令拆除沙皇的雕像，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街道和广场上竖立向马克思、恩格斯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者、承载者致敬的纪念碑，创造了与过往坚决断裂的新的政治空间。同样，中国共产党在打败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也致力于在全国各地建立全新的政治空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立、天安门广场的兴建和人民大会堂、北京历史博物馆等富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建筑物的建造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德政权瓦解并被并入西德，新柏林参议院急切地对共产党政权留下烙印的城市进行“消毒”，大量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地理空间被改造。种种案例显示，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以城市为代表的政治空间的重塑是其中的必有之义。

阿斯塔纳作为哈萨克斯坦新首都的诞生和发展，是新独立国家凝聚多民族国家国力之理想政治形态，以及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致力于推动哈萨克民族/国家身份构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所处地区气候恶劣，但阿斯塔纳还是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跃成为中亚地区最具现代性的城市之一，在各方面都显示出与独立身份相匹配的特征。[50]这种迅速获得的都城成长固然与其自身独特的政治象征意义相关，但更主要的可能还是与作为新独立国家的哈萨克斯坦在后苏联时期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都市空间以及都市中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演变成具有综合意义的符号系统这一政治意愿，乃是阿斯塔纳发展的独特之处，这与欧洲历

史上诸都城均经过历史性改造方才具备此特点形成了鲜明对照。换言之，阿斯塔纳从成为哈萨克斯坦新首都的时刻就有意识地被赋予了民族-国家空间之表征。正像欧洲诸都城那样，“由一条河流或一条中心轴线穿越的都城往往能够将具有国家历史象征意义之纪念场所集中于其两岸或附近，有利于设计出一条既体现历史纵深感又有市政建设发展恢宏前景的旅游观光必由之路，并由该河流似镜像一般折射出来”。[51]阿斯塔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来安排地理空间的，这一新的权力中心所在地四周的街区都呈现出专业化倾向。治国所必需的行政管理机构与大众生活居住的建筑群交相呼应。

显然，新首都的市政建设与改造具有明显的国内政治功能，尤其是一批政治纪念性建筑和地标性公共建筑，更是凸显了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国家身份意识。于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中亚新独立国家哈萨克斯坦的都城试图模仿其欧亚前辈，而且这也是苏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惯常做法——广为兴建象征其主体民族文化特性之纪念性建筑。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位于阿斯塔纳中心的巴伊杰列克观景塔（见图2）。这一新的地标建筑体现了强烈的哈萨克主题，蕴含了当地“生命树”的传说，由于这个传说中有一个金蛋，于是在这栋建筑的顶部安放了一个金色的圆球。如今，这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的象征符号，被广泛用于各种广告和宣传材料中。[52]

另一个例证是2010年在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建成开放的、名为“可汗金帐”（Khan Shatyr）的大型购物中心（见图3）。它的外形参照了游牧民族的传统帐篷，被认为体现了与哈萨克历史上传统游牧民族建筑形式的伟大共鸣。[53]哈萨克斯坦政府为这一标志性建筑付出了3亿美元的建设费用。同样是为了突出哈萨克民族文化，位于阿斯塔纳的中央音乐厅外形被设计成哈萨克斯坦传统乐器的样子（见图4）。

另外，阿斯塔纳的建设充分反映了哈萨克斯坦当局民族/国家构建及城市建设的勃勃雄心，并且由于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瞄准了国际性都市的定位，其开放的形象也正在通过持续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向国际舞台传输。比如，哈萨克斯坦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亚信峰会等国际活动的契机不断提高其新首都的国际知名度。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所描述的那样：

> 今天的阿斯塔纳是一个政治精英会晤的知名场所，许多世界级的文化、

政治和体育活动在此举行。这些活动包括欧安组织（OSCE）峰会、哈萨克斯坦担任伊斯兰会议组织（OIC）轮值主席期间召开的第38届外长理事会会议、亚洲冬季运动会以及各类经济论坛等。它意味着全世界都在通过阿斯塔纳了解哈萨克斯坦……[54]



图2 巴伊杰列克观景塔



图3 “可汗金帐”大型购物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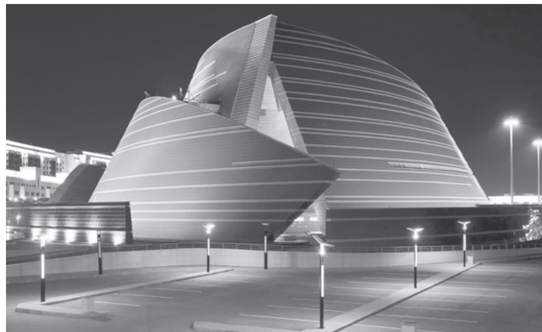


图4 阿斯塔纳的中央音乐厅

从某种程度上讲，阿斯塔纳被赋予的哈萨克斯坦国家身份比其他任何一个哈国内城市，包括阿拉木图，都能更为出色地实现全国整合。它不仅担负起政治中心的重任，而且在文化和社会进步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这也是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现代化程度最高国家的国际化的最充分体现。

人们对阿斯塔纳这一新的地域空间的眷念，以及对哈萨克斯坦国民集体记忆的认同难以一蹴而就。这需要长时间的熏陶、指引和精心培育，才能使民众情绪升华并自发将民族/国家认同凝聚于新的政治地理空间及其上的以象征符号为核心的地标建筑。旅游指南、游记、雕塑及各种绘画作品、小摆设饰件等，经由平面的和电子媒体的报道、社交网络的传播而将新都的象征意义广而告之。

与阿斯塔纳相比，中亚其他四国的首都在后苏联时期的发展同样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国家身份的绝佳样本。沙俄和苏联的连续统治给这些城市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无论是诸如音乐厅、图书馆、体育馆等大型公共建筑，还是纪念碑、雕塑或道路名称都成为至少持续数十年的“俄罗斯化”的层层积淀的历史遗产。然而，苏联时期的英雄崇拜等行为规范在中亚等新独立国家已经过时，并且与它们的民族/国家身份的构建内容构成直接矛盾与冲突。中亚各国独立后为了尽快塑造新的民族/国家认同，而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一系列“告别苏联”的记忆重塑工作。

这首先是包括首都在内众多城市及街道名称的改变。地名虽然只是一种象征符号，但它从来不是客观的、自然的，而是共同体生活价值的载体。不同的个人和群体通过地名的变迁赋予生活环境不同的意义。换言之，地名的变化反映的是民族国家的认同、价值观的重塑、历史的书

写与重新书写等更深层次的权力博弈。[55]在中亚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于再造民族/国家身份的迫切需要，各国执政当局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地标更名的政治运动。新的地名反复被本国国民以及外来人口不经意地阅读、记忆和传播，使隐含于其内的强烈的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以一种不易抗拒的方式被自然化、内在化，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形成中的中亚各国的国家身份。中亚国家正是意识到了地名的更替对国家身份变迁的塑造作用，才不惜成本进行国家地理的重建工作。

显然，近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中亚的城市空间留下了浓厚的历史烙印，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使城市及其各类空间的称谓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政治化的地名命名现象十分严重。中亚版图上曾出现了一大批以苏联和中东欧乃至西欧共产党的国务活动家、国际共运领袖以及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战斗英雄或劳动模范等姓氏命名的地名。如图5中展示的塔什干旧街道名就以1925～1937年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著名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伊克拉莫夫命名。

苏联解体后，这种城市叙事开始被逐步清除，无数的地名由此面目全非，或被其历史命名所取代，或被冠以与新生的独立国家身份更加吻合的名字。作为国家首都，无论是塔什干还是比什凯克，无论是最早的阿拉木图还是其后的新首都阿斯塔纳，无论是杜尚别还是阿什哈巴德都弃用了充满浓重共产主义色彩的城市符号。新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多重转型为这些后社会主义都城打下了崭新的意象印记。[56]所有的名称改变都是一种旨在清除俄罗斯和苏联影响的“去俄罗斯化”行为。比如，苏联时期的切利诺格勒（Tselinograd）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先是被改为阿克莫拉（Akmola），然后在建立新首都后又被命名为阿斯塔纳（Astana）。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从原先的伏龙芝（Frunze）改为前苏维埃时期的比什凯克（Bishkek）。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沃茨克（Krasnovodsk）变成了土库曼巴什（Turkmenbashi）。而哈萨克斯坦几乎所有地方行政中心的城市名字都被更替为更具民族特色的称谓，如古利耶夫（Гурьев）变为阿特劳（Атырау），舍甫琴科（Шевченко）变成阿克套（Актау），江布尔（Джамбул）变成塔拉兹（Тараз）。大多数城市名字的写法也从俄式变成哈式，比如阿克纠宾斯克（Актюбинск）变成阿克托别（Актобе），克孜尔-奥尔达（Кзыл-Орда）变成柯泽洛尔都（Кызылорду），等等。[57]



图**5** 塔什干街道标识

新的命名政治学显示了两种路径。一类是“在地化”，即将旧制度下的与俄罗斯（苏联）相关的城市、街道、工厂、公园等公共空间名称，替换为与主体民族及其英雄叙事相关的名称，以实现“告别苏联”的心灵再造。问题在于，尽管国家和城市的新领导人对此积极性十足，但旧制度的符号和记忆是如此之多，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消失。民族/国家重建初期的千头万绪，也使得中亚各国政府最初的更名运动遗留了不少历史问题。这首先表现为初步实现了多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联的街道、学校、工厂和其他建筑实体名称的“去俄罗斯化”，但“本土化”和“民族化”还不够纯粹。[58]因此，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经历过好几波地名更新浪潮。另一类则是“国际化”，主要是突出对于新独立国家的新的国际合作伙伴的尊崇和敬意。比如，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基洛夫大街就被替换为以土耳其现代国家之父凯末尔命名的凯末尔大街。

除了“无形”的地名外，跟苏联有关的雕塑等有形的象征符号也被大量清除。这是一场旨在抹杀“前朝遗迹”的记忆之战。原本中亚国家对各种形式的旨在突出“俄罗斯化”特征的纪念符号有着特殊偏好，但苏联解体后，不少社会主义英雄的大小雕塑或建筑物外墙上的纪念名牌都一并消失了。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1992年的夜晚，塔什干市中心10层楼高的列宁铜像被秘密从中心广场移走，取代列宁的则是拉西多夫和纳沃依（Navoi，中世纪乌兹别克诗人）等人的塑像。[59]这一举动显然是试图彻底抹去社会主义时期的地标建筑及其承载的象征意义，并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民族化的或国际化的新的象征物。为了突出显示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与众不同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分别在各自首都建造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和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一直担任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的塑像（见图6）。



图6 阿斯塔纳的凯末尔塑像与安卡拉的纳扎尔巴耶夫塑像

历史学家雷吉娜·罗宾（Regina Robin）曾有一段精彩评述论及柏林的记忆改造：

> 尘埃落定之后回望这一切，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反差：一方面，一个号称无敌的国家垮台的过程居然那么和平，未费一枪一弹，也没有任何人真正试图挽救它，但另一方面——这两方面或许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事过之后，清算东德遗产的过程却又那么歇斯底里，任何和这个消失的国家有着或远或近的牵扯的事物，它的象征物、它的价值观，从道路名称、纪念物、雕像到诞生在那一时期的建筑和机构，从博物馆到文学，从工厂到城市结构，都要赶尽杀绝，1990～1995年间尤其如此，之后虽然不再表现得那么激烈，但实际上至今仍绵延不绝。这仿佛是要把民主德国从历史长河中一刀切除似的，清理纳粹遗产的过程都没有这么不留余地。联邦德国代表了战后历史的正轨，而民主德国只是一场注定要被遗忘的历史事故。[60]

无疑，我们只要将罗宾口中的“东德”（民主德国）换成“苏联”就可以很好地揭示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类似的作为其国家身份构建重要内容的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工程的实质。当然，相对于德国新政权所操持的“反东德话语暴力”，中亚各国的做法相对要温和得多。今天，有历史情怀的游客可以在中亚各国首都的中心地带，驻足瞻仰各种类型的建筑，有的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歌颂，有的则反映出对反抗共产党政权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怀念，有的追溯了历史上曾被沙皇镇压的悲剧命运，有的则倾诉了对独立国家身份的向往与珍视。这些实际上是对中亚国家层层叠加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伴生的国家身份的最好诠释。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亚国家在独立之后设立的各种新的节日和国家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实则是把集体记忆与民族/国家认同重新在时间和空间上联系起来。这些纪念，尤其是具有特别的历史含义的纪念活

动和民族/国家的认同结构是互相连贯的。它们具体体现为新的纪念日、纪念碑、纪念馆乃至街道、城市的命名等。共有记忆的时间和空间由此被打通，中亚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就成了其中的应有之义。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国家和其他新独立国家一样，纪念物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有急剧的变化，并被大量地生产，与带有苏联时期各种象征符号的纪念品共存。一直到当下，中亚国家国家级的纪念/共有记忆仍在扩张，新的神性的加注依旧持续。凡此种种，都旨在构建起新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

四 教育改革与中亚国家的身份认同

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开始欢呼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期待已久的胜利，学术界到政界多认为被亨廷顿描绘为“第三波”和被阿奇·布朗等人界定为“第四波”的民主化浪潮势将席卷全世界，[61]而包括中亚在内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定会成为不遗余力地移植“西方道路”的新边疆。[62]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西化新教育体系的转变，改革口号中充斥着“民主化”、“分权化”、“自由化”“多元化”和“学习的人性化”等词语；[63]与此同时，以学生为中心的各项具体改革措施也得以推行，新的课程标准开始建立，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和管理部门的去行政化渐次实施，高等教育的私有化、教材出版的自由化等各类举措先后被推出。[64]有些教育政策更是直接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指导下制定的。抛弃落后状态、赶超先进国家的国际化诉求成了中亚新独立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主流思想。加强与土耳其和欧盟的合作在这一领域成了“去俄罗斯化”和“国际化”的代名词。

中亚国家独立后，“土耳其模式”一度成为西方学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土耳其模式”之于中亚的正向意义在于，这是一个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而且也是在民主和经济发展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的突厥语国家，与中亚新独立国家在文明、种族、语言等诸方面具有同质性，且地缘上接近，有可能成为中亚各国的发展样板，从而既使这些国家与伊斯兰世界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又力求尽快消除苏联继承国俄罗斯的持续影响，巩固冷战胜利成果。[65]

土耳其高度重视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教育领域的合作，在土耳其看来，密切的教育合作可以达到双重目的：第一，培养和教育

中亚青年学生可以造就一批将来致力于推进中亚国家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型的精英群体；第二，可以形成一批精通土耳其语言文化的社会群体，充当各自所在国家与土耳其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66]换言之，土耳其将与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视为帮助原苏联突厥语国家现有和潜在精英塑造自由主义导向的“伊斯兰-突厥认同”（liberal Islamic-Turkic Identity）的强大政策工具[67]，以求进一步巩固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国家的相互关系。目前，双方的教育合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土耳其官方向中亚国家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提供各类奖学金项目，使其能够赴土耳其就读。这已经成为土耳其对中亚政策的最优先方向之一，并被贴上了“伟大的学生交流项目”标签。二是通过土耳其教育部以及土耳其著名宗教学者法土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68]创建的“光明共同体”（Nurcu community）等各种基金会，在中亚国家开办各类教育机构。[69]

葛兰学校采用了与中亚各国当局合作的方式，由当地政府提供校舍等基础设施，葛兰共同体提供教师以及校长等行政管理人员，在中亚国家的发展较为顺利（见表2）。由于葛兰学校相对于公立学校而言，主要使用英语授课，兼及土耳其语和当地主体民族语言，集中于科学、伦理和自我修养的训练，能够提供更好的知识训练和深造机会，[70]因而深得中亚国家青少年的青睐。中亚国家独立初期，葛兰学校实行免费教育，不论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只考虑学生本身的素质；但到了21世纪初期已经开始收费，完成了从平民学校到精英学校的转变。[71]

表2 中亚的葛兰运动学校一览（**1997/1998～2006/2007**学年）

国别	学校数量（所）		学生数量（人）		公司名称
	1997/1998	2006/2007	1997/1998	2006/2007	
哈萨克斯坦	29	23	5644	5613	Feza et Şelate
乌兹别克斯坦	18	×	3334	×	Slim
吉尔吉斯斯坦	12	15	3100	4287	Şebat
塔吉克斯坦	5	7	694	1874	Şalola
土库曼斯坦	13	16	3294	×	BaŞkent

注：× 表示无相关信息。

资料来源：Iveta Silova, “Reclaiming the Empire: 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in Linda Chisholm and Gita Steiner-Khamsi (ed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p.178。

对中亚国家领导人而言，与葛兰学校的合作也是重构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辅助之路。因此，中亚各国几乎都对与土耳其的教育合作保持较高的热情，并相信此举有助于降低俄罗斯在这些国家过高的影响以及

加速新的国家身份构建进程。[72]事实上，中亚各国的青年学子在葛兰学校的就读过程中不仅学到了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的民族认同知识，而且一直受到“突厥主义”理念（the concept of “Turkism”）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这些学校因此将土耳其和中亚的突厥语国家联系在一起，推动了共同的突厥身份认同的形成。[73]毫无疑问，葛兰共同体、土耳其政府以及中亚国家执政当局的一个共同目标是创造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并降低俄罗斯的广泛影响，这也是葛兰学校在中亚地区得以顺利进入并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因。[74]土耳其的教育输出在中亚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客观推动力在于，苏联解体大大削弱了过往的统一教育空间的庞大吸纳力，多重转型的种种艰难导致了公共教育体系的堕落、腐败和教育质量的急速降低。在此意义上，以葛兰学校为代表的土耳其教育变成了中亚地区教育的“示范样本”。与此同时，中亚各国受限于自身实力，尤其是在转型初期难以投入足够的教育基金，以非政府组织方式进入中亚教育市场的土耳其学校实际上为中亚领导人纾解了执政困境。此外，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包含了民族/国家构建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也强化了新独立国家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中亚国家与“博洛尼亚进程”[75]的互动可以视为它们在后苏联时期经国际化的路径重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典型案例。中亚五国都没有签署《博洛尼亚宣言》，但已开始在一些具体领域引进“博洛尼亚进程”的规则，如建立三级学位制度、实施学分制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博洛尼亚进程都首先是一种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强有力手段。从欧盟方面看，博洛尼亚进程在中亚的引入意味着可以吸纳更多的中亚国家生源进入欧盟教育市场，提高其竞争力。对中亚国家而言，加入或参与博洛尼亚进程的互动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积极成效。一是获得促进高等教育内部改革的外部推动力，提高本国教育体系的吸引力。中亚各国中，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成为博洛尼亚进程的成员国尤为积极，塔吉克斯坦某种程度上也较为热切。[76]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已然部分按照博洛尼亚进程要求改进了本国的教育体系。2009年4月，两国代表均获邀参加博洛尼亚政策论坛的部长级会议。二是借此提升与欧洲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水平，取得实现从苏联边缘地带到欧洲中心辐射地区的身份转换的可能性。欧盟—中亚教育倡议（见表3）则成为新时期中亚国家借助于国际化力量进一步突出各自国家身份中开放特征的重要工具。

表3 欧盟—中亚教育倡议

欧盟—中亚教育平台	专项合作	信息和交流项目
高层次会晤	欧盟与周边国家开展现代化高等教育合作的计划（TEMPUS）	联合活动
技术工作组	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rasmus Mundus）	联合出版
国家层面的对话	博洛尼亚进程	
	欧盟训练基金（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	
	中亚研究与教育网络（CAREN）	

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的现任最高精神领袖阿迦汗四世与中亚国家领导人的合作同样可以视为中亚国家在后苏联时期经由在地化的路径重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典型案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政府与阿迦汗四世合作共建专有高教机制，以推动高山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本地区国家开展的诸项教育改革政策不同，这一地区性合作背后最主要的驱动力，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关注高山人口和传播伊斯兰价值观的新的地区学术共同体。

中亚新独立国家在后苏联时期的教育改革的另一个关键内容，是将新的独立的国家身份作为课程体系的重点灌输给各级学校的学生。以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教学为例，卡里莫夫政权自乌独立以来就强烈支持乌兹别克语的发展，专门通过立法规定在每年十月的“语言日”当天，全国大小学校举行庆典，朗诵乌兹别克语的诗歌，介绍乌兹别克语的历史，号召习惯使用俄语的乌兹别克族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使用母语。这些做法显然是试图经由母语的使用来恢复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此外，前文提及的族史/国史的重新书写是历史教科书反复强调的重中之重。主体民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玛纳斯》这样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口传史诗都被纳入日常的教育内容。中亚各族的传统游戏在课程中的体现也有所加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在高等教育领域，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及其标准仍然为中亚国家所效仿或移植。但俄的绝对优势地位正在不断遭到挑战，其典型标志为就学于俄的中亚学生绝对数量增长下的相对比例的下降。近年来，自中亚赴美国、欧洲、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日本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留学的人员总数持续增长。笔者在较早的一项研究中注意到，按照哈萨克斯坦驻美国和加拿大使馆教育与文化处的统计数据，美国已经成为哈青年学子海外就学的首选目的国，每年超过1000人。而在2007～2008学年，“未来”奖学金获得者中

46.6%的人选择了欧盟国家，29%选择了美国，俄罗斯仅占9.5%。调查显示，在可选择的留学对象国中，欧盟和美国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如，哈萨克斯坦想去俄就读的占18%，欧盟占17%，美国占14%；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应的数据是32%、17%、14%以及37%、12%、14%。这说明，在此消彼长之间，俄在文教领域对中亚的吸引力正在不断下降。[77]

五 宗教信仰的复苏与中亚国家的身份认同

在被沙俄并入其版图之前，中亚尚未形成现代国家，只是隶属于各个汗国和部族的松散集合体，中亚人的群体意识当时极少在民族/国家层面上予以体现。正如豪根（Arne Haugen）所指出的，中亚的民众在当时首先将自己视为穆斯林，其次才是某一个特定的地区的居民。对他们而言，是否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根本无足轻重。[78]

十月革命后，中亚地区广大穆斯林居民在接受无神论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同时，宗教信仰自由并未被完全剥除。随着布尔什维克的角色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以及其无产阶级专政地位的巩固，苏维埃政府在中亚地区的宗教政策也变得日趋强硬。宗教教育改革、妇女解放、文字改革、关闭伊斯兰教活动场所等一系列措施的推行，标志着苏共高层日益加强对中亚伊斯兰教的控制和防范。[79]卫国战争时期，由于特殊的国内形势和建立强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需要，斯大林政权曾一度放松了对伊斯兰教的管制。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宗教运动，利用各种措施不断强化无神论宣传教育。勃列日涅夫在位期间，伊斯兰教的应有地位也未得到尊重。直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党和政府对宗教和宗教组织几十年来一贯采取的严格管理与监督政策才出现了明显的松动，并在不久后趋于失控。中亚各国内部的宗教能量得到巨大释放，长期受压抑的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呈现复苏态势。[80]整体而言，穆斯林身份是中亚人个体和集体认同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我们无法否认，即使是在苏联时期，尤其是苏联晚期，以穆斯林公民为主的中亚地区的苏联空间事实上也存在着双层政治文化结构：表面上，它同苏共中央努力推进的“苏联人”建设的社会实验与工程相一致；而隐性上，它又深刻地受传统的宗教和部族网络影响，具有独特的社会动员渠道。[81]到苏联解体前，长时间的无神论宣传和教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亚人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尽管中亚人的宗教信仰没有被根除，一些清真寺仍然在秘密活动，[82]但多数人直至

苏联晚期只是有名无实的伊斯兰教信徒，只有极个别的人始终如一坚持积极参加宗教活动。

对于中亚的新独立国家而言，伊斯兰是民族主义自身的一个要素。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教迅速在中亚国家得以复兴，不仅被视为地方民众的宗教信仰，同时也是各国执政当局促成新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形塑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使伊斯兰信仰深入中亚五国民众的内心深处，不仅将之视为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可以填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消散所形成的真空，另一方面也争取降低转型的机会成本，减轻整个社会的心理负担。对于后者，正如一名中亚学者指出的：

> 当其他价值体系崩溃时，人们只能开始紧紧抓住宗教价值观——它履行了一种社会治疗的功能，使得生活的艰难更易于忍受……信仰伊斯兰教还被视为一种提升社会道德健康水平的路径。在大众意识中，道德和伊斯兰教被认为有必然关联，而伊斯兰的教化功能也正在得到确认。与后苏联转型期的衰退伴生的贫困和失业，以及可以自食其力者因失业导致的自暴自弃，强化了伊斯兰教作为向失去生活意义的受难者提供实际帮助的手段的功能。[83]

可以说，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条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84]

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曾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书记的卡里莫夫在1991年第一次总统直选前夕不断以一种虔诚、恭敬的态度谈到伊斯兰教及其在乌兹别克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在一次接受用乌兹别克语出版的《人民言论日报》（*Khalq Sozi*）采访时他明确表示，“伊斯兰教就是我们许多同胞的良心、本质和生活”。[85]他在苏联解体后出任新独立国家总统的就职典礼上，不仅专门提及伊斯兰信仰，而且一手执新宪法，一手持《古兰经》，显示了伊斯兰因素在新的乌兹别克国家身份构建中的重要地位。[86]而在中亚五国中，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国旗都使用了象征着伊斯兰教的新月符号（见图7），其余三国尽管在国旗等重要象征载体上没有直接的伊斯兰标示，但与乌、土一样通过引入纳乌鲁斯节（春节）、肉孜节、古尔邦节等伊斯兰传统节日，强化了作为国家宗教的伊斯兰信仰。



图7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国旗

作为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内容，伊斯兰因素越来越多地介入中亚国家的转型进程，担当了“去俄罗斯化”的前驱。伊斯兰和中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就这样形成了相生相长的组合：伊斯兰意识帮助中亚新独立国家塑造“去俄罗斯化”的国家和地区身份，“在地化”的民族主义在有选择地融入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化”进程中进一步强化伊斯兰意识。笔者认为，在宗教领域，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去俄罗斯化”首先体现为对无神论的抛弃，“在地化”的标志则在于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复兴，而“国际化”的重要表征，则是中亚各国的伊斯兰教徒得以前往麦加等穆斯林圣地朝拜等。

中亚国家的“再伊斯兰化”（re-Islamization）经历了相同或相近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认同的复苏。这实际上是一个身份认同导向（identity-oriented）的阶段。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历经约70年时间灌输的无神论在思想领域轰然崩塌，政治话语中充斥着宗教表征，与伊斯兰历史相关的古迹被重建，宗教学校得以建立，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圣的通道被开辟。第二阶段具有明显的知识导向（knowledge-oriented）特征，即对伊斯兰的深层理解被列入正式议程，《古兰经》和伊斯兰教规变得至关重要。中亚各国民众不再仅仅参与宗教祈祷仪式，同时还试图理解这一过程中阿拉伯文诵经的含义。这意味着一个穆斯林从外在到内在皈依伊斯兰的进程得以初步完成。第三阶段可以被视为“行为导向”（action-oriented）的历程。在这一时期，部分虔诚的穆斯林要求中亚各国执政当局按照伊斯兰教规实行国家治理。这并不意味着世俗化的政权模式受到广泛质疑，但至少使其面临着较大的合法性挑战。

身份认同导向的阶段在中亚是以一种暴风骤雨的方式迅速完成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新思维”和“公开性”为中亚的伊斯兰复兴打开了大门，中亚五国独立后只是顺应“民心民意”继续推进这一历史进程而已。为了巩固新的国家身份及执政当局的正当性，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伊斯兰教育。

这种伊斯兰教育表现为“在地化”和“国际化”两个平行发展的向度。中亚国家纷纷创建官方认可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在中学高年级和高等院校中开设了相应的伊斯兰宗教课程，向新一代中亚各国的公民传授有关伊斯兰深层理解的知识体系（见表4、表5）。

表4 中亚国家伊斯兰教育状况

国别	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sas）	高级教育机构	合法的替代性学校	私立学校／非法的小型研究室（Hujras）
吉尔吉斯斯坦	大约40所独立和1所官办伊斯兰宗教学校	1所伊斯兰大学和6所伊斯兰学院	数个非政府组织	许多
塔吉克斯坦	18~20所混合性别的伊斯兰宗教学校	1所伊斯兰学院	清真寺学校	许多
乌兹别克斯坦	8所男性和2所女子伊斯兰宗教学校	1所伊斯兰学院	无	许多

资料来源：Abramson, “Foreig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the Central Asian Islamic Revival,” *Silk Road Paper*, 2010, p.47。

表5 中亚世俗伊斯兰教育的正式机制

国别	公立学校课程	本科院系	研究生院系
乌兹别克斯坦	世界宗教课程	伊斯兰大学和东方学学院	伊斯兰大学和东方学学院
吉尔吉斯斯坦	法令草案规定将在中学9~10年级开设世界宗教课程	神学和其他学院	神学和其他学院
塔吉克斯坦	中学8年级开设伊斯兰知识课程	哲学系	哲学系

资料来源：Abramson, “Foreig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the Central Asian Islamic Revival,” *Silk Road Paper*, 2010, p.47。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教育体系的构建远未完成以及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各国对伊斯兰教育的需求还在持续增长，特别是那些经济和政治上均日益边缘化的地区。官方对伊斯兰教义的解读已经难以满足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现实需要，地下宗教学校的泛滥也就变得自然而然。[87]问题在于这种地下的宗教教育在很多时候都为宗教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滋长提供了富足的社会土壤，成为中亚地区潜在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因此，近年来甚至被认为是中亚发展速度最快、国内局势最稳定的哈萨克斯坦，也受到再伊斯兰化“行为导向”历程的影响，恐怖袭击开始频频发生。[88]

另一方面，从表6和表7可以看出，中亚国家独立以后在国外学习伊斯兰教义的留学人员为数不少，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巴

基斯坦等国是中亚学生习得伊斯兰知识的主要来源国。

表6 中亚人在国外学习伊斯兰教的人数（2009）

	埃及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伊朗	巴基斯塔
吉尔吉斯斯坦	100~200	100~150	100~200	不清楚	20+
塔吉克斯坦	500~1000	350~700	微不足道	200+	300
乌兹别克斯坦	100~600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资料来源：Abramson, "Foreig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the Central Asian Islamic Revival", *Silk Road Paper,* 2010, p.48。

表7 2008/2009学年埃及爱兹哈尔大学（Al Azhar University）登记注册的中亚学生数量

来源国	学生人数
哈萨克斯坦	93
乌兹别克斯坦	43
吉尔吉斯斯坦	38
塔吉克斯坦	156
土库曼斯坦	33

资料来源：Abramson, "Foreig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the Central Asian Islamic Revival," *Silk Road Paper,* 2010, p.48。

中亚国家民众伊斯兰知识的养成和伊斯兰意识的深化还可以从这些国家信徒的朝圣活动从国内化到国际化的转变中窥见一斑。在苏联时期，只有极少数的穆斯林能被获准前往圣地，而且多为官方伊斯兰机构的高官，每年少于100人。[89]苏联治下的穆斯林逐渐发展出一种信念，即足够数量的对本地圣地的朝拜将等同于一次远赴阿拉伯世界的朝觐。布哈拉、撒马尔罕以及奥什附近的圣地最受尊崇。这种被称为“小朝圣”的现象，在整个中亚地区都很盛行。甚至一些共产党员都参与其中。戈尔巴乔夫晚期的苏联《文学报》曾专门刊文讨论这一问题。[90]1989年3月，“中亚与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大会”在塔什干召开，并任命了年仅37岁的穆罕默德·尤素福（Muhammad Yusuf）出任新的穆夫提，取代过于亲苏共的波波汉（Shamsutdin Bobokhan）。尤素福上任后很快组织了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穆斯林朝圣，结果是1990年整个中亚共有1400人得以踏上神圣的宗教之旅。[91]中亚穆斯林这一历史性的朝圣，改变了苏联境内伊斯兰信徒朝圣活动国内化的常态，书写了苏联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史的新篇章。[92]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领导人进一步意识到利用伊斯兰信仰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几乎全部以贵宾身份去麦加朝觐。[93]

值得注意的是，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和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国家一样，其伊斯兰实践并不以念功（口诵安拉）、拜功（礼拜）、斋功（斋戒）、朝功（朝觐圣地）和课功（法定施舍）等五功为中心，也并未将

此视为与伊斯兰认同的矛盾之处。调查显示，97%的受访者至少谨守五功中的一种，如表8所示。

表8 中亚国家城市与农村的穆斯林五功遵行状况

单位：人，%

	主要城市		农村地区	
念功	236	73.8	163	58.2
斋戒	150	46.9	161	57.5
朝觐	29	9.1	33	11.8
不食猪肉	179	55.9	106	37.9
不饮酒	109	34.1	105	37.5

资料来源：Y. Ro'i and A. Wainer, "Muslim Identity and Islam Practice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Survey*, Vol.28, No.3, 2009, p.316。

此外，自独立以来，中亚国家同时谨守斋戒和朝功的人数在不断增长，即使乌兹别克斯坦多有限制，但前往圣地朝觐的人数依然在增加。比如，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宗教事务委员会只批准了总数超过6000名朝圣申请者中的4200名前往沙特。而土库曼斯坦的管制更为严格，2005年和2006年总数只有188人。[94]哈萨克斯坦2003年即已达到5000人。[95]那些前往麦加圣地朝觐过的穆斯林归国后备受尊崇，一般会成为地方上协调社会、政治甚至是经济事务的邻里自治机构“长老会”（aksakal）的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96]

同时，上文提及的“小朝圣”现象在后苏联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拥有诸多中亚圣地的布哈拉为例，“小朝圣”已经成为伊斯兰信徒展示其对真主安拉的虔诚信仰的主要和常见的手段之一。[97]一些伊斯兰信徒每年要到中亚地区的圣地朝觐数次。调查数据显示，39%的受访者或本人，或其家庭成员经常进行“小朝圣”活动，这其中30%的人一年一次，超过40%的人一年两到三次，近10%的人一年四到六次，大约15%的受访者在七次及七次以上。[98]

总之，经过20余年的发展，曾经深受苏联“无神论”影响的中亚社会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一项调查显示，46.9%的受访者认为中亚社会变得更具宗教性，仅有7.3%的人认为并无任何变化，0.6%的受访者认为中亚各国的社会出现了负面变化，0.3%的人认为社会的宗教化程度在降低。就宗教仪式而言，城市居民中18.1%的受访者每周五去清真寺做礼拜，3.8%的人在工作日同样参拜清真寺，33.8%的人在主要宗教节日前往清真寺，一年只去一次的占11.3%；农村居民中，6.8%的人平时会参拜清真寺，18.2%的人只在周五主麻日去，18.6%的人选择在主要的穆斯林传统节日参拜，13.2%的受访者一年只去一次。[99]这至少意味

着，中亚新独立国家的个体身份中的伊斯兰定位正在不断巩固。

六 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生成与巩固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地区向度的转向。[100]美国著名学者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明确使用了“地区构成的世界”（a world of regions）这一术语来描述地区秩序之于国际格局的重要作用。[101]后冷战时期，各个地区正在通过不同程度的地区治理，日益主张自身的行为体和利益攸关者的属性，“地区性”（regionness）、“地域性”（regionhood）、“地区认同/地区身份”（reginonal identity）等概念与“国家”“国际社会”等传统概念地位趋于同等重要甚或过之。各个地区开始煞费苦心地寻求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本我形象，试图将自己和其他地区做严格区分。这样一来，地区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地区构成的世界”中的重要内容。

1993年1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举行会晤，并宣布五国作为一个集体应被视为“中亚”（Central Asia）。这意味着苏联时期通常使用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Middle Asia and Kazakhstan）被新独立中亚国家弃用。国际政治舞台中一个新的地区由此诞生。不久之后，中亚五国领导人试图建立一个类似独联体且包含俄罗斯的中亚地区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中亚的出现与生成是后苏联时期最根本的变化之一；这一特别重要的现象在国际舞台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这样，一个围绕“中亚”的话语体系被逐渐构建起来，它包含了旨在建构和解构中亚作为一个独特地区的一组构想、表述和论证，前者强调中亚需要地区一体化和合作架构，后者则质疑中亚地区性的存在及地区一体化的可行性。

地区通常有三种定义方式：第一种是物质主义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定义，其核心是领土问题；第二种是理念主义的批判地缘理论的定义，其中心思想在于地区是由政治因素造就的；第三种是行为主义理论的定义，集中讨论地区是怎样被政治实践活动塑造和再造的。[102]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形成及被认可的过程同样体现了权力分配。这一过程往往由地区事务的主导者或国际体系中的强权、霸权国家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意愿来推动。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视角。此外，虽然在以实力等传统要素为指标的评估体系中，小国的位置明显很低，但当代国际生活中

小国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上升态势，并有诸多机会去营造本身的优势而影响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103]这意味着有可能存在自内而外的内生性地区概念。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较为典型：一方面，新独立的五国在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过程中，也参与了地区身份的生成；另一方面，外部大国和国际组织始终在参与着由新独立国家组成的新的地区身份的塑造进程。

本文希望结合上述三种地区定义以及内生和外向两个视角，寻求一种“折中主义”。一般来说，单个国家的集体身份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于地理基础的归属认同，主要是指意识到本国属于自己所在的地理范围。这是最低层次的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第二个层次是在第一个层次的基础上产生一种区域国家优先合作的意识，即中亚国家主动寻求建立、扩大并发展某种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进而在合作的过程中加强成员国的相互信任与认同。第三个层次则是超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即主动接受区域内的超国家机构或治理结构对本国国内事务的管辖，把对区域利益的认同置于民族国家利益的认同之上，在一个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发展等广泛领域中，从一个相对异质性较多、相对缺乏一致性的结构，向相对的趋同，利益上相互交织、嵌入、依赖和共同认同结构的转化过程。[104]

就中亚而言，冷战的终结、苏联的解体使得中亚新独立国家可以卸除冷战的压力和阴影，摆脱莫斯科的直接监管，在一种更加多元的国际和地区格局中加强自身的地位。但中亚国家在集体身份生成与巩固的过程中，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特征和社会的相对同质性造成了两种不同向度的冲击：一种力量将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推向更大的地区环境；另一种力量则将其压缩至本国国土疆界甚至更小的地方范围内。这是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往往跟执政当局及与体制安全相关的利益所受的保障和威胁程度有正相关。[105]

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地区认同构建与地区一体化/去一体化进程中具有同步性。中亚作为一个地区往往与中亚地区一体化紧密相连，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人人皆知的不言自明的公理。而其意识形态支柱似乎主要在于中亚各国的历史、种族、文化、地理共性及其民族/国家认同中的穆斯林和突厥成分。一般而言，地区一体化的实质是所在地区的国家从一个较低向较高程度的相互依赖的发展，从一个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向有组织的共同体的变迁。[106]它经常被地区凝聚力

（regional cohesion）、地区共同体（regional community）或高度整合的地区市场（a highly integrated regional market）等指标所衡量。这为塑造新的地区认同创造了前提条件。地区一体化程度越高，地区认同的质量和层次就相应越高。由此，中亚国家的集体身份可以定义为由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内不同国家构建的、跨问题领域的、高度行为相互依存状态的共同属性，这是其区别于其他外部“他者”的根本特征。[107]换言之，中亚国家的集体身份或者说中亚的地区身份[108]既表现为一种地区内部的趋同性，又表现为一个相对于外部世界的差异性以及在此差异性基础上的求同性。

问题在于中亚的地区一体化与被当今世界普遍视为一体化样板的欧盟不同，这是一个与之逻辑迥异、进程迥异的另一种类型的集体身份构建。一般而言，一体化的前提条件首先是承认存在独立的主权国家。但除了欧洲之外，全球范围内还有不少曾经共存于一个殖民国家或帝国体系之中的新独立国家，它们之间的一体化进程往往是与主权获得同步的。中亚五国显然属于此类。俄罗斯学者、独联体一体化研究的佼佼者亚历山大·利布曼（Alexander Libman）注意到了这一差异，并假定后殖民国家所在的地区一体化与欧盟教科书式的一体化逻辑有很大差异。利布曼将欧盟框架内的地区整合命名为“聚合式一体化”（coming-together integration），而将后苏联空间内的一体化命名为“维系式一体化”（holding-together integration）。在他看来，维系式一体化是一个由一组曾经共属一个单一政治-经济体（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地区一体化。[109]换言之，地区共同体不仅是未来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曾经过往的历史，这就给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再造提供了不同于欧盟的起点。

如表9所示，维系式一体化与聚合式一体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维系式一体化从推进伊始各成员国间就保持着高度的相互依赖，其程度一般要高于从零起点推动的聚合式一体化。第二，维系式一体化往往和其参与者的国家构建进程同步进行。在极端情况下，成员国不得不在通过建设一个政治体系、公共管理系统、有望发展的经济和相应的民族/国家认同以“创造”自己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展开互动。第三，二者在一体化和去一体化的成本-收益比方面截然相反。尽管二者都是从打破现状中获益，但维系式一体化进程中去一体化的成本高于维持现状，而在聚合式一体化进程中一体化的成本高于维持现状。第四，维

系式一体化因其参与者共属同一政治经济实体的历史，而可能使部分机制在前帝国解体后仍然发挥功能，不必在零起点上构建合作进程。在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下，各加盟共和国形成了从产业到技术分工精确的经济生产-消费链条，它们彼此之间高度依赖，缺一不可。这样一来，苏联解体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浑然一体、能实现自循环的经济机器从此难以为继，这给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新独立国家带来了巨大震荡。这样一来，中亚地区维系式一体化的初始和首要目标正在于维持这些新独立国家之间一定程度的经济和政治整合，以免苏联解体造成的代价过于巨大。

表9 “聚合式一体化”和“维系式一体化”之区别

	聚合式一体化	维系式一体化
起点	一组已有的主权国家	一组在前政治实体消亡后新产生的独立国家
目标	至少在长期意义上更大程度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整合	在原有联盟框架之外，或维持曾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或提高其水平
单个国家间的相互依赖	相对较低	相对较高

表9 “聚合式一体化”和“维系式一体化”之区别-续表

	聚合式一体化	维系式一体化
一体化工具	新建	新建，但过去的某些机制仍发挥作用
一体化／去一体化成本	一体化成本高于维持现状成本	去一体化成本高于维持现状成本
成员国的国家构建方案	已完成，对地区主义不产生影响	仍在进行中，和地区主义形成强烈互补

资料来源：根据A. Libman and E.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pp.15–16 表2.1制作，略有调整。

利布曼认为，维系式一体化的目标应该在于维持由去一体化走向再一体化的U形发展这一过程。[110]也就是说，在这一逻辑的指引下，单一制国家的解体势必在一段时间内使得去一体化在所难免，但曾经拥有的集体身份认同将在随后推动各国出于种种目的再度形成种类繁多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最终促进再一体化的实现。在笔者看来，利布曼的本意是在为俄罗斯重新主导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提供一种理论解释，这一探索注意到一体化初始的零起点和非零起点导致的不同逻辑，但有关再一体化的推演可能有着明显的不足，与中亚地区所发生的复杂纷乱的实际发展存在明显的鸿沟。

应该承认，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所要面临的最大外部因素就是俄罗斯。这些新独立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需要借助于“他者”来构建新的“本我”。而将他者的功能赋予前宗主国通常是最简单、最

诱人的战略。如同前文在论证中亚国家个体身份形成的部分所言，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很多新独立国家都致力于塑造一个外来侵略者和民族自我解放的神话。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中亚国家尽管已经独立20余年，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深深镶嵌于俄罗斯的帝权体系之中。[111]这种关联正在变为矛盾的疏离与整合并存的复杂权力结构上。俄对中亚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包括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比如认为在中亚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主角并起组织作用的自然当属俄罗斯。于是，我们看到在国际层面，俄罗斯关注建立与保持同其他大国的平等地位。然而俄罗斯对于近邻地区的态度仍然是等级制的，注重权力因素并且主张干预主义。[112]俄罗斯的帝权既反衬了中亚地区或多或少的排俄和防俄主义以及与之共生的亲俄主义，又不由自主地使该地区国家在表面上“去俄罗斯化”和实质上可能的“再俄罗斯化”[113]之间摇摆不定。

在笔者看来，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利布曼定义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putting-together integration）；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民族/国家构建与一体化本身之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

苏联解体后，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成员国曾对独联体抱有幻想，认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历史上形成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联系，能使其迅速演变为“完全意义上的一体化联合体”。直至1994年9月，俄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尚未被完全切割，彼此采用统一的货币单位——卢布进行经济结算。随后，以卢布区的瓦解为标志，独联体经济“去一体化”达到了第一波高峰。从1995年开始，俄罗斯根据独联体一体化多层次的特点，试图“在自愿基础上，深入分阶段地吸收独联体国家参与一体化进程”。[114]这实际上启动了俄罗斯主导的捆绑式一体化的进程。当年1月，俄罗斯首先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建立三国海关联盟的联合备忘录。1996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海关联盟，四国签署了加深经济和人文领域一体化条约，规定四国要实行比独联体其他成员国更为紧密的经济一体化。[115]1999年，塔吉克斯坦正式加入该联盟，海关联盟因而扩大为五国。[116]但是，1998年金融风暴的突然发生不仅对俄

罗斯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也使得新一轮以俄罗斯为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进程陷入新的困境，独联体国家与俄“去一体化”的倾向再度抬头。21世纪以来，中亚五国逐渐成为世界主要力量在军事战略、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竞争的平台。普京为了适应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国际权力转移的新态势，于2011年正式推出“欧亚联盟”战略，试图重新整合并主导包括中亚在内的“近邻外国”空间。[117]

中亚五国独立之后曾数度致力于推进各种维系式和聚合式地区一体化方案。如上文所述，1993年，中亚领导人于塔什干宣布其所在地区将使用“中亚”而弃用苏联时期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1994年1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签署了两国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的协定，吉尔吉斯斯坦随即加入。1994年4月，上述三国总统决定建立旨在推动地区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口自由流动的中亚经济联盟，并建立了国家间委员会和中亚合作开发银行。结束内战不久的塔吉克斯坦于1998年加入了中亚经济联盟。此时它已被改称为中亚经济共同体。2001年，该组织再次被更名为中亚合作组织，其目标也更多是为中亚地区合作提供公共产品而非成立地区经济联盟。但中亚作为一个同质地区且有可能实现区内一体化的理念自21世纪初开始受到严重挑战，其中俄罗斯于2004年加入中亚合作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于2005年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的负面作用最大。由于中亚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在各方面都有相似性，各成员国领导人最终决定合并两组织。这也意味着，基于中亚各国自身的区内一体化构想最终宣告失败。在中亚本土专家看来，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中亚国家无力构建一个成功的地区合作框架，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各国自愿臣服于与本地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旧宗主国——俄罗斯。乌兹别克学者托利波夫（Farkhad Tolipov）指出：

> 俄罗斯以全权成员身份加入中亚合作组织及其在塔吉克斯坦军事基地的开启，与其说是俄罗斯的进攻行为，不如说是中亚国家的臣服。……不幸的是，地区国家既不能展示其完全的独立性，也不能表现其期待已久的团结，相反证明了它们在容易产生冲突的地区事务中对于调停者的需求，因而破坏和忽略了只限于中亚国家参与的一体化的自我价值。[118]

由此可见，当下的中亚仍属于一个有限的自由流动状态，并因深嵌于俄罗斯帝权体系之中而受其制约。当俄罗斯当局看到中亚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遭遇外来挑战或内在风险时，在其国家实力许可的情况下，它就会支持各种由其主导的地区一体化方案，或与中亚地区内个别大国

构建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地区表现出高度矛盾的特征，它既可以在适当时候变大[119]，也可能缩小[120]；它可能表现出封闭性[121]，也可以表现出开放性[122]。无论如何，我们在讨论中亚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时绝不能忽略俄罗斯的特殊角色。当然，我们也不必夸大俄的影响，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中，尤其是在中亚地区权力范围广泛，但似乎同样缺乏深度和后劲，它非常壮观，但仍不够充盈。俄罗斯如果试图重新主导中亚，重新将自己的秩序观强加于一个权力结构日益复杂、难以独立驾驭的中亚，那么它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相应地，如果新独立国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寻找到足以替代或补充莫斯科的新伙伴，去一体化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在新的复杂地区权力结构下难以实现再一体化。与欧洲、东南亚甚至是至今仍然存在大量冷战残余结构的东北亚相比，中亚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程度似乎相对较低。一方面，这与中亚新独立国家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进程的时间较晚相关；另一方面，中亚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意识本就不强，最早属于维系式一体化的一部分，试图构建自己的地区合作方案，以避免在新的后苏联秩序中被进一步边缘化，但受制于种种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而停滞不前。[123]这直接导致部分国家对进一步的合作，尤其是这种聚合式一体化的前景丧失信心。

应该承认，当下的中亚首先是由苏联解体塑造和被原来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一体化努力再造的政治空间和政治过程，并受到了国际与地区权力转移的强烈影响。它不是自然给定的物质，而首先是基于国际—国内联动性发生的社会建构。此时，内生性的发展动力尤为重要，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问题在于，尽管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后有一个相似的经济社会变革，但中亚国家由于其民族/国家身份的再造时间较短，对于领土、主权等问题的意识依然非常敏感，没有明确的整合中心点和共同传统，各国具体的差异以及彼此国际合作的结构直接影响其集体身份的生成与巩固。以“俄罗斯化”为动力的维系式、捆绑式和以“在地化”为动力的聚合式一体化之间的相互博弈前景并不明朗。而作为对“俄罗斯化”的一种反动，中亚各国在对外合作的“国际化”方面不遗余力。从这一意义上讲，中亚作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分析中的一个概念，实际上仍是一个自我与他者共建的、形成中的、叠加的范畴（见表10）。

表10 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国家的复合集体身份

	作为独立地区	作为后苏联空间的一部分	作为欧亚大陆一体化的一部分（中部欧亚、大中东、大中亚等）	作为意识形态的欧亚主义的承载者	作为碎片化的地区
组成要素来源	苏联解体	苏联遗产	形成中的经济联系	文化、历史和地缘政治共性	语言/文化差异；历史纠纷等
对欧洲的认知	排除在外	排除在外	包含在内	排除在外（作为欧洲中心论的他者）	排除在外
对俄罗斯的认知	前宗主国	天然盟友	排除在外	包含在内	包含/排除双重性
对亚洲人的认知	排除在外	排除在外（可能包含蒙古和中国新疆）	包含在内	部分包含在内	包含/排除双重性
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认知	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尽早实现现代化，进而加强独立地区的集体身份	成为西方一部分的有限可能性	学习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战略；较少关注意识形态而更多关注经济合作	拒绝通过西方化实现现代化，寻求特殊道路	赞同/反对/中立
身份性质	地理和政治定义	地理和政治定义	外交或经济外交政策组合	意识形态	×
定义方式	自内而外	自外而内	自外而内	内生/外生	内生/外生

注：× 表示不存在。

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国内政治分析与预测处的哈吉姆（A.R.Khakim）研究员甚至认为：

> 在各种利益争夺进一步激化、中亚内部问题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今后是不是还会存在一个中亚地区完整的政治概念，我们也还是抱有疑问的……如果看一下中期前景，本地区的地缘图景很可能会发生深刻、根本的变化……随着各种各样的内外摩擦进一步升级，我们将很难再把中亚视为一个统一的地区、一个整体。今后中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或者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也许会从国际政治问题中消失。[124]

在笔者看来，中亚作为一个地区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历史上，中亚曾经被视为丝绸之路上一度繁荣昌盛并深度融入世界体系的地区。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中亚作为陆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重要性不断降低，逐渐自我孤立于外部世界。在沙俄及随后的苏联统治时期，中亚的地区属性进一步被弱化，几无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独立联系，且因被划分为数个加盟共和国而日益碎片化。苏联骤然解体一度被视为中亚国家重新获得地区统一性并通过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打破社会经济孤立的历史机遇。国际学界在中亚五国独立初期基本上认为这五个新

独立的“脆弱”国家因共享很多种族、文化、语言、地理和宗教联系，且面临诸多相同或相近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地区治理、地缘政治转型等挑战而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国家组合。但事实的发展似乎与此相悖：土库曼斯坦从最初阶段就更多地游离于中亚其他四国的集体之外；而哈萨克斯坦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中也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越发不愿意自列于“不发达”的中亚国家之林，而倾向于使用类似苏联时期的历史称谓“中亚与哈萨克斯坦”界定自身的地区身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亚国家的集体身份首先基于各国国内的民族/国家构建，然后才是在全球化、国际化、地区化的三重议程中试图再造一个新的集体身份与地区秩序。这种地区认同并没有取代更为浓重的民族、次民族和地方认同，而只是起到补充作用。在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内部国家引领构建的情况下，分歧多于共识、竞争多于合作、矛盾多于一致可能会是中亚地区秩序的常态，碎片化的中亚国家集体身份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但不管如何，“后苏联空间”业已终结，其标志是独联体作为地区性国际组织功能的日益弱化、新独立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变迁、外部力量在后苏联空间内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增长，由本地区国家和其他超出后苏联空间的行为体共同参与的新的地区组织不断涌现。[125]随着这些国家自身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的加速，对一种新的地区构建需求势必日益迫切。

结语

在沙俄征服中亚并将其并入帝国版图之前，中亚并无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布哈拉、希瓦和撒马尔罕汗国以及此前的各类汗国都只是由某一个统治者统领的部落联盟。中亚五国的现有国界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民族政策。毫无疑问，中亚五国是当今国际社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后来者。

苏联时期，经过联盟中央国家机器的强力推动，辅之以数十年的共同生活、标准化的教育体系以及共有的生活形态，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民众，包括当地的主体民族都养成了“苏联人”的身份认同。[126]这种统合苏联境内所有个体、各种民族/种族及宗教的强大意识形态体系促使人们首先认可自己是超级大国苏联的公民，并在相当程度上防范和阻遏着独立民族/国家身份的滋长。

与苏联一朝崩解相伴的必然是苏联认同的消弭，这意味着所有新生的中亚国家在多年来享受苏联治理的稳定后不得不应对如何建构新的国家身份的重要任务，而这正是当政者的合法性、正当性以及统治力的来源。它刺激了中亚国家，尤其是其主体民族对本国的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新理解。

在此背景下，新生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重构（重新打扮民族历史）、空间重构（城市和符号建设）以及人的重构（宗教与教育）等方式，在“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以及“国际化”的三重路径中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推动民族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各国统治者有意识地对先前存在的价值观、象征物、历史记忆进行了重新选择、重新组合和重新构造，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向本国民众释放出国家应该由主体民族所有和主体民族所享的相关信号。无论是在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章程中的书写中，还是在实际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中都在践行着上述原则：主体民族的语言变成了国语，并在行政、立法、司法、教育、公共传播等事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主体民族的文化在国家象征符号（国旗、国歌等）和国家控制的各类社会化工具（如电视、广播、教科书等）中占有特殊地位。依据这些标准，我们可以确认，中亚国家的民族/国家身份作为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前者显然是各国政府的绝对优先方向，国家认同从属于民族认同的构建。

这种以主体民族为优先的民族/国家身份构建迅速填补了苏联认同被放弃后的意识形态真空，而代之以新的、更实际和更实用的民族/国家身份和地区认同想象，从而使得中亚国家能快速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但正因为如此，一种过于偏向主体民族，忽视其他人口、民族结构的逻辑导致了在多数“民族化政策”下必然产生新的身份认同难题。比如，在政治实践方面，民族化的公民资格法律可能导致在政治官员选举之时，主体民族具有过分代表性（over-representation）；在社会方面，学校和大众媒介将被强制要求使用官方语言，这无疑侵蚀了其他民族语言的公共空间；在公共产品领域，向单一官方语言的快速转变将在事实上减少其他民族向国家提供服务的参与；在经济发展方面，假定为民族国家主人的主体民族一般被赋予特殊的（甚至具有排他性的）权利进行土地分配或者资金分配。这样一来，本应成为统合各国民众重要手段的民族/国家身份，反而可能导致中亚各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地，种族、宗教、语言、社会地位乃至出生地都变成了横亘在民族团结之间的难题。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特定地区的集体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看起来可能是不可或难以改变的，但问题在于地理和心灵边界总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重建。中亚在这一问题上并不例外。在集体身份的生成与巩固方面，中亚五国也面临着种种困难。一方面，地理学意义上的“中亚”直接影响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生成与巩固；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和地区进程内在地规定了中亚地区国家集体身份的内涵和外延。后苏联时期的中亚不再是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外部大国和地区性组织，如美国、俄罗斯、欧盟、土耳其、中国，以及一些伊斯兰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加深。[127]加上苏联遗产的持续影响，包括各国之间的矛盾、分歧和冲突，使得这种国家的个体身份与地区集体身份之间的张力日益突出，也导致中亚五国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认知。这些构成了当前中亚国家身份认知的基本状况。

在笔者看来，未来中亚的集体身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治重建和融入世界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进展。我们应该注意到，中亚国家的集体身份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亚身份来替代各国的国家身份。国家的个体身份并没有因民族国家在特定地区或特定领域的集体认同而失去其精髓。多数情况下，民族国家的个体身份能够和新的地区认同和睦相处。经验表明，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中亚化在不同的国家中发展程度是不平衡的。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化程度较高，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处于中间，而土库曼斯坦则相对较低，几乎游离于整个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之外。与此同时，一个新的现象是，哈萨克斯坦开始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苏联传统，将之与中亚并列，从而强调其特殊地位，与“不发达的中亚”实行政治切割。

我们也要看到，同样作为转型国家，俄罗斯的发展与中亚国家都先验地存在“去苏联化”的内容，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都在呼唤国际化，都在理论和实践上“告别苏联”“走出苏联”。这意味着中亚国家一方面对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始终抱有警惕，另一方面过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决定了它们难以与俄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切割。俄罗斯作为中亚的外部大国始终是影响中亚转型的最大因素。

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于中亚国家而言，俄罗斯不是一个纯粹的国家，而首先是一个隐喻。无论是国家的个体还是集体身份的构建，都可以从这个隐喻中找到源泉。在官方干预和扶持下，中亚国家对先前存在的价值观、象征物、历史记忆等进行了重新选择、重新组合和重新构

造。旧有的苏联认同被逐步放弃，而新的、更实际和更实用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想象正在以一种快速产生和渐渐积聚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尽管上年中亚国家均以不同方式隆重庆祝本国独立20周年，然而它们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迄今尚未终结。可以说，中亚新独立国家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包括新的国家身份生成的过程，是一个消除苏联骤然解体的冲击、克服这一历史进程带来中亚人民的彷徨与茫然，并孕育着新的发展内在能量的必由之路。尽管转型迄今已20年有余，但中亚各国当下依然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发展状态之中，相应地，各国转型进程仍在持续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经过初期的紧张不安后，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巩固和发展之路远未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好比罗马的双面神，一方面它代表着自由、友爱以及其他积极目标的达成，另一方面它又象征着分裂、暴力和毁灭。[128]进一步说，这意味着中亚国家的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的生成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作为一个通常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产品，需要经过精巧的设计和精确的决策，否则这不仅不能带来整个国族与地区的统一与整合，相反会成为撕裂它们的工具。

原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

[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1）、“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GJW039）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08BGJ00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早期版本曾于2012年6月22日提交给新疆大学-清华大学中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一届中亚发展论坛“后危机时代的中亚：转型与建构”。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封帅、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孙超等参与了相关讨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2] 参见Каспэ С.И. Центры и иерархии：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е метафоры власти и запад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орма. М.2007；Ильин М.В.Формул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Полития.2008，No.3。

[3] Peter J. 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中译本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冯绍雷、邢广程等知名学者在近年来的一批文章中强调了欧亚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格局转换和全球权力转移对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内外政策的强烈影响。参见冯绍

雷《多重三边关系影响下的中亚地区》，《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冯绍雷《十年后的展望——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定位与空间的思考》，《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邢广程《中亚的利益取向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及中亚的权力制衡：融合还是竞争？》2009年第6期；Yang Cheng，“The Shanghai Spirit and SCO Mechanisms：Beyond Geopolitics，” in Michael Fredholm（ed.），*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Eurasian Geopolitics*：*New Directions*，*Perspectives*，*and Challenges*，NIAS Press，2012。

[5] 参见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

[6] 参见Pauline Jones Luong，*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sia*：*States and Societies from Soviet Rule to Independ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7] Бляхер Л. Е.，Казима С. 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между Тамерланом и Ататюрком.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эпоху Постмодерна// Полития.2009，No.1. С.94-95.

[8] 转型依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核心命题。在此问题上形成了“转型终结论”和“转型进行时”两种范式。前者如Boris Z. Rumer《结束转型的中亚》一书认为，中亚各国的系统转型进程（the process of systemic transformation）大部分已经完成，中亚的基本结构从政治到经济已基本建立，在此意义上，转轨阶段（the period of transition）已走向终结（参见Boris Z. Rumer，*Central Asia at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M.E.Sharpe，Inc，2005，pp.3-5）。而“转型进行时”的论点显然有更多的支持者，其基本共识是：中亚各国在转型指标谱系中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吉尔吉斯斯坦相对在民主转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其他四国则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或多或少掺杂着“威权体制”的要素，国家和当局介入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痕迹较为明显，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甚至演变为专制体制。作为一个进程，中亚国家远未完成设定的初始任务，今后仍将需要较长时间。笔者认为，中亚国家尽管转型迄今已二十年有余，但各国当下依然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发展状态之中，各国转型进程仍在持续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9] 以美国为例，安集延事件之后的美乌关系已经充分展示出，中亚国家的体制类型尽管是美国长期关注的问题，但美更在意的是获取现实的安全和能源等利益。笔者个人的感觉是，西方在话语上强调民主扩展，但在实际的体制嬗递方面更多是顺其自然，而非一味强力推动。

[10] Olivier Roy，*The New Central Asia*：*The Creation of Nation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p.viii.

[11] 德国学者对此问题有较为精辟的分析。参见〔德〕J.库兹涅尔：《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精英及其对能源政策的影响》，孙溯源译，《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12] 参见Yang Cheng，“The Shanghai Spirit and SCO Mechanisms：Beyond

Geopolitics，” in Michael Fredholm （ed.），*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Eurasian Geopolitics*：*New Directions*，*Perspectives*，*and Challenges*。

[13] 参见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杨成《小国主体意识增强 地区价值日益凸显 中亚地区复合权力架构正在形成》，《文汇报》2012年10月16日；杨成《“马上叼羊”还是“姑娘追”？中亚维稳须抛弃“大博弈”老调》，《文汇报》2012年10月16日。

[14] Farkhod Tolipov，“Pre-Soviet，Soviet and Post-Soviet Central Asia：The Case of Uzbekistan，” in Suchandana Chatterjee and Anita Sengupta （eds.），*Communities*，*Institutions and ‘Transition’ in Post-1991 Eurasia*，Shipra Pubilications，2011，p.106.

[15] 以《俄罗斯研究》为例，2001年至2012年第4期共发文662篇，其中部分涉及或专论中亚的文章有65篇；以《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为例，2001年至2012年第4期共发文1240篇，其中有关中亚的文章160篇。上述刊物发表的中亚研究文章主要的议题集中在大国关系、能源政治、上海合作组织，少量论及中亚的宗教、民族等问题。笔者用“中亚”“身份”，以及“中亚”“认同”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期刊中进行检索，结果为0。

[16]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第3页。

[17] 此处借鉴了De Cillia等人的研究，转引自翁秀琪《集体记忆与认同构塑——以美丽岛事件为例》，《新闻学研究》第68期，2001年。

[18] James M. Baldwin，*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Vol.1，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98，p.504；王彦智：《地区认同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论析》，《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

[19] 身份/认同政治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早为研究社会-政治变迁时建构主义范式的分析范畴，后来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借用。

[20]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политика идентичноси：в2т. Т.1：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как катег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Словарь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Отв. ред. И. С. Семененко. М.：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ПЭН），2011，С.162.

[21] Engin Isin and Patricia Wood，*Citizenship and Identity*，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1999，p.14；Roger Coate and Markus Thiel （eds.），*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Boulder：First Forum Press，2010，p.2.

[22] 李慧明：《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身份》，《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

[23] Anna Triandafyllidou，“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ther’，”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1，No.4，1998，p.599；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8年第3期。

[24]〔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第25～26页。

[25]〔美〕罗伊德·克雷默：《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的意义》，邱文平译，载陈启能、倪为国主编《历史与当下》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18～19页。

[26] 参见Jonathan Friedman，“Myth，Histor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7，No.2，1992，p.207。

[27] Homi K.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4，p.70.

[28] Fran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Grove Press，1963，pp.210-211.

[29] L. R. Tillet，*The Great Friendship*：*Soviet Historians on the Non-Russian Nationalitie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p.4；Anatole G.Mazour，*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London：Greenwood Press，1975；T. Kuzio，“Hsitory，Memor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Post-Soviet Colonial Space，” *Nationalities Papers*，Vol.20，No.2，2002，p.275.

[30] Rupert Emerson，*From Empire to N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381-382.

[31] Partha Chatterjee，*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1986，p.37.

[32] T. Kuzio，“Identit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Ukraine：Defining the ‘Other’，” *Ethnicities*，Vol.1，No.3，2001，pp.343-365.

[33]〔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32～33页。

[34] 参见Shirin Akiner，“Melting Pot，Salad-Bowl or Cauldron？Manipul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Ethnic，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Central As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0，No.2，1997，pp.362-398。

[35] 包括中亚在内，所有后苏联国家都在寻找本国以及主体民族“失去的”前帝国时期的历史，以确定其拥有无可争议的黄金年代，进而可以使新独立国家拥有历史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参见Edward Shils，“Nation，Nationality，Nationalism and Civil Societ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1，No.1，1995，p.100；Thomas H. Eriksen，*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London：Pluto Press，1993，p.69。

[36] Данилов А. А.，Филиппов А. В. （Ред.）. Освещение 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и народо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 в школьных учесбниках истории новых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дарств. М.，2009，С.94-96.

[37] 米尔贾库布·杜拉托夫（哈语Міржақып Дулатұлы，1885-1935），哈萨克著名诗人、作家和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被公认为现当代哈萨克文学的先驱。1928年被苏共以鼓吹哈萨克民族主义的罪名逮捕，最初被判死刑，后处以流放，1935年10月在集中营去世，1988年获得平反。参见Tomohiko Uyama，“The Geography of Civilizations：A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Kazakh Intelligentsia's Activities，From the Mid-Nine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Kimitaka Matszato （ed.），*Regions*：*A Prism to View the Slavic-Eurasian World*，Sapporo：Slavic Research Center，Hokkaido University，2000，pp.70-99。

[38] 阿赫梅特·巴依托尔逊诺夫（哈语Ахмет Байтұрсынұлы，1872-1937），哈萨克著名突厥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国务活动家，1937年大清洗中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称号而遭杀害。

[39] 穆赫塔尔·阿乌佐夫（哈语Мұхтар Омарханұлы Әуезов，1897-1961），哈萨克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语言学博士，1946年获得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阿乌佐夫的成长受到了哈萨克民族诗人阿拜的强烈影响，他花费15年时间编撰了多卷本《阿拜之路》，获列宁文学奖。

[40] 别赫布迪系马赫穆德·霍加（Mahmud Khoja，1875-1919）的笔名。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宗教领袖穆夫提，是贾迪德运动的精神领袖与理论家，1919年被布哈拉埃米尔阿里姆汗杀害。

[41] 马赫杜姆·库里（1565-1611），土库曼著名诗人。苏联著名突厥学家巴托尔德（V.V. Barthold）认为，库里是土库曼人拥有的自己的民族诗人，库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用通俗的语言写作，让所有人都能理解。

[42] Тимур，его роль в судьбах России и Европе，www.centrasia.ru，17.01.2012；Farkhod Tolipov，“Pre-Soviet，Soviet and Post-Soviet Central Asia：The Case of Uzbekistan，” in Suchandana Chatterjee and Anita Sengupta （eds.），*Communities*，*Institutions and 'Transition' in Post-1991 Eurasia*，Shipra Pubilications，2011，pp.98-99.

[43] T. Koichuiev，“Kyrgyzstan：The Road to the Future，” *Eurasian Studies*，Vol.3，No.2，1996，pp.19-20.

[44] Isenbike Togan，“Twenty Years After：New Histories Emerging，” in Anita Sengupta，Suchandana Chatterjee，and Susmita Bhattacharya （eds.），*Eurasia Twenty Years After*，Maulana Abul Kalam Azad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Kolkata：Shipra Publications，2012，pp.56-59.

[45] Шнирельман В.А. Войны памяти. Мифы，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политик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М.，2003.转引自Данилов А. А.，Филиппов А. В. （Ред.）. Освещение 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и народо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 в школьных учесбниках истории новых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дарств. М.，2009. С.15-16。

[46] Isenbike Togan，“Twenty Years After：New Histories Emerging，” in Anita Sengupta，Suchandana Chatterjee，and Susmita Bhattacharya （eds.），*Eurasia Twenty Years After*，pp.53-54.

[47] Isenbike Togan，“Twenty Years After：New Histories Emerging，” in Anita Sengupta，Suchandana Chatterjee，and Susmita Bhattacharya （eds.），*Eurasia Twenty Years After*，p.55.

[48]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46～47页。

[49] Shonin Anacker，“Geographies of Power in Nazarbayev’s Astan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45，No.7，2004，p.516.

[50] Shonin Anacker，“Geographies of Power in Nazarbayev’s Astan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45，No.7，2004，pp.515-533.有关哈萨克斯坦迁都及纳扎尔巴耶夫的战略考虑可参见Natalie Rochelle Koch，The City and the Steppe：Territory，Technologies of Government. And Kazakhstan’s New Capital，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olorado，2012。

[51] ［法］克里斯托夫·夏尔勒：《19世纪欧洲国家之都城》，载端木美、于格·戴和特主编《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49页。

[52]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研究员Kim Gelman 2012年6月15日在韩国汉阳大学以“公共外交与韩国、中亚关系”（Public Diplomacy and Korean-Central Asian Relations）为主题的第五届“韩国—中亚”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与笔者的交谈。

[53] http：//www.khanshatyr.com/pages.php？l＝01.

[54] “Congratula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N.A.Nazarbayev on the Day of Capital，” 2011；Low KCP & Makhabbat Yermekbayeva，“City-Branding of Astana，the Capital of Kazakhstan and the Oasis of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versity*，No.2，2012，p.186.

[55] 有关地名与政治关联度的问题可参见王炎《命名政治——以色列地名与话语霸权》，《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

[56] Нелли Бекус，Кульшат Медеуова. Смена эпох как смена столиц：Астана как глобальный центр//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 запас，2011. No.6，p.80.

[57] Игорь Лесев. Исчезнувшие города СНГ. http：//obozrevatel.com/

abroad/73806-ischez nuvshie-goroda-sng.htm.

[58] Алексей Волосевич. Гимн национализму.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семнадцать лет в Ташкенте переименована половина улиц. http：// fergananews.mirror.tengu.ch/article843b.html？id＝5574.

[59] 钱克：《中亚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以乌兹别克斯坦为焦点》，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2007，第68页。

[60] 〔瑞士〕阿兰·克拉维安：《柏林，都城及其记忆》，载端木美、于格·戴和特主编《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第82～83页。

[61] 参见冯绍雷《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相关性视角的一项考察》，《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封帅《观念、体制与领袖——阿奇·布朗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3期。

[62] N. B. MacFarlane，*Western Engagement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London：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9，p.1.

[63] I. Silova，“Varieties of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The Post-Socialist States of Central/South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R. Cowen and A. Kazamias（ed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Dordrecht：Springer，2009，pp.295-320.

[64] V. Tomusk，*Globalization on the Margins*：*Education and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in Central Asia*，Charlotte：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Inc.，2011，p.3.

[65] 有关讨论可参见Anita Sengupta，“The ‘Turkish Model’ and the Turkic World，” in Suchandana Chatterjee and Anita Sengupta（eds.），*Communities*，*Institutions and ‘Transition’ in Post-1991 Eurasia*，New Delhi：Shipra Pubilications，2011，pp.122-145。

[66] Iveta Silova，“Reclaiming the Empire：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in Linda Chisholm and Gita Steiner-Khamsi（eds.），*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2009，p.174.

[67] Iveta Silova，“Reclaiming the Empire：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in Linda Chisholm and Gita Steiner-Khamsi（eds.），*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pp.174，180.

[68] 法土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1941年出生于土耳其东部的埃尔祖鲁姆（Erzurum），是一位伊斯兰学者、思想家、诗人及高产作家。由于从小接受扎实的宗教传统教育，葛兰思想奠基于纯正的独一神信仰；加之深受苏菲主义精神的影响，他怀有广阔的胸襟，其中充满了爱、宽容与慈悯等人文主义精神，包容其他宗教的信

仰者，并向需要帮助者伸出援手，关怀弱势。另一方面，葛兰也深谙西方自然、人文科学的原则，因此能够敞开胸怀而拥抱现代性，并致力于调适伊斯兰信仰于多元的现代世界中，以帮助穆斯林在其中安身立命。葛兰运动是基于葛兰思想内涵的一个由下而上的穆斯林社会运动，借由文化教育机构的设立，进而形塑出理想的穆斯林公民特质，正统伊斯兰信仰、人文主义精神与现代性是其主要原则。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兴起以来，其已发展为当代土耳其境内最具有影响力的伊斯兰运动之一，具备了国际性的规模，覆盖范围达90多个国家。

[69] 参见L. K. Yanik，“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al Exchange：Turkish Education in Eurasia，” *Europe-Asia Studies*，No.2，2004，pp.293-307。

[70] 据统计，土耳其在中亚兴办的各类学校的大学入学率超过90%，远超过各国的公立学校。参见Iveta Silova，“Reclaiming the Empire：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in Linda Chisholm and Gita Steiner-Khamsi （eds.），*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p.184。

[71] Iveta Silova，“Reclaiming the Empire：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in Linda Chisholm and Gita Steiner-Khamsi （eds.），*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pp.178-179.

[72] Iveta Silova，“Reclaiming the Empire：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in Linda Chisholm and Gita Steiner-Khamsi （eds.），*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p.181.

[73] Iveta Silova，“Reclaiming the Empire：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in Linda Chisholm and Gita Steiner-Khamsi （eds.），*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p.181.

[74] Iveta Silova，“Reclaiming the Empire：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in Linda Chisholm and Gita Steiner-Khamsi （eds.），*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p.181.

[75] 博洛尼亚进程源自1999年欧洲29个国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签订的《博洛尼亚宣言》，这是欧洲诸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实现一体化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促进欧洲成为社会政策富有活力、人力资源强势增长的地区；另一方面，使欧洲的高等教育在智力、资金和声誉上更具竞争力。该体系对愿意参加的相关国家开放。这是数个世纪以来欧洲高等教育最根本的结构变革。有关后苏联国家与博洛尼亚进程的互动的讨论可参见杜岩岩、张男星《博洛尼亚进程与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的空间》，《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1期。

[76] V. Tomusk，“The Geography and Geometry of the Bologna Process，” in *Globalization on the Margins：Education and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in Central Asia*，p.48.

[77] 参见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

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

[78] Arne Haugen，*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Republics in Soviet Central Asia*，New 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3，p.35.

[79] 参见Shoshana Keller，*To Moscow*，*Not Mecca*：*The Soviet Campaign Against Islam in Central Asia*，*1917-1941*，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s，2001。

[80] 有关苏联官方二战后的伊斯兰政策及其在中亚的具体表现可参见Yaacov Ro'I，*Islam in the Soviet Union*：*From World War* II *to Perestroika*，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2000，pp.550-589；Ghonchen Tazmini，"The Islamic Revival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0，No.1，2001，pp.64-67。

[81] 1998～2000年笔者受外交部公派赴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人文大学突厥语言文学系求学期间，笔者的老师们不止一次提及他们在苏联时期悄悄举行穆斯林礼拜等官方禁止的行为。

[82] 苏联时期，中亚原有的近24000所清真寺一度被改为各种俱乐部和社团活动中心，严禁《古兰经》的印刷和传播，但依然有少量"非官方"清真寺展开地下活动。以塔吉克斯坦北部为例，该地区就有超过200所"非正式"清真寺长期教授伊斯兰教义。参见Abdullahi A. An-Na'im，*Islamic Family Law in A Changing World*：*A Global Resource Book*，London：Zed Books，2002，p.27。

[83] Farideh Heyat，"Re-Islamistion in Kyrgyzstan：Gender，New Poverty and the Noral Dimension，"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3，No.3-4，2004，p.281.

[84] Ahmed Rashid，*The Resurgence of Central Asia*：*Islam or Nationalism*？，London：Zed Books，1994，p.224.

[85] 这一访谈后来被俄语报纸《东方真理报》刊印。参见Ислам Каримов. У нас есть свой путь//Правда Востока.20 Декабря 1991г，С.2.

[86] Ghonchen Tazmini，"The Islamic Revival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0，No.1，2001，p.72.

[87] Рахнамо А.Х. Частно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проблемы и выводы//Ислам в Содружестве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No.4，2011，http：//www.idmedina.ru/books/islamic/？4174.

[88] 有关中亚地区的恐怖活动统计数据，可参见杨成《上海合作组织政治与安全形势综述——以金融危机以来中亚成员国为案例》，载冯绍雷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50～52页。

[89] Markus Kaiser，"Forms of Transsociation as Counter-Processes to Nation

Building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Survey*，Vol.22，No.2-3，2003，p.330.

[90] Shahram Akbarzadeh，“Islamic Clerical Establishment in Central Asia，” *South Asia*：*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Vol.20，No.2，1997，p.78.

[91] Shahram Akbarzadeh，“Islamic Clerical Establishment in Central Asia，” *South Asia*：*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Vol.20，No.2，1997，pp.83-84.

[92] Markus Kaiser，“Forms of Transsociation as Counter-Processes to Nation Building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Survey*，Vol.22，No.2-3，2003，p.325.

[93] Svante E. Cornell and Regine A. Spector，“Central Asia：More than Islamic Extremis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2，p.195.

[94] www.forum18.org.

[95] Казахстанская правда.25мая2004г.

[96] G. A. Bakiyeva，“Islam as a socio-cultural code，” in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UNESCO International Forum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Central Asia”*，Kyrgyzstan：National Commission of the Kyrgyz Republic for UNESCO，1999.转引自Farideh Heyat，“Re-Islamistion in Kyrgyzstan：Gender，New Poverty and the Noral Dimension，”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3，No.3-4，2004，p.281。

[97] 转引自Y. Ro’i and A. Wainer，“Muslim Identity and Islamic Practice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Survey*，Vol.28，No.3，2009，p.310.

[98] Y. Ro’i and A. Wainer，“Muslim Identity and Islamic Practice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Survey*，Vol.28，No.3，2009，p.310.

[99] Y. Ro’i and A. Wainer，“Muslim Identity and Islamic Practice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Survey*，Vol.28，No.3，2009，p.314.

[100] 新的研究范式倾向于认为，国际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被地区动力所操控，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冲突与合作主要镶嵌在各地区事务之中。后冷战时代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地区主权（regional sovereignty）的回归，而国际政治架构将取决于地区结构，地区在理解未来的国际秩序问题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参见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

[101]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第14页。

[102]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第6页.

[103] 笔者首次对作为小国的中亚五国在地区秩序形成中的作用做出较为粗浅的

讨论，是在《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中。作为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共建项目（第一期）成果，笔者提交了长文《小国行动的逻辑与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兼论上海合作组织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合作模式》，从理论上进一步梳理了小国在国际和地区格局中的行为逻辑与作用。

[104] 本段表述借鉴了张度的论文《比较视角下的东北亚区域意识：共同命运对集体认同的关键影响》（《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

[105] 有关体制安全对中亚国家发展的影响参见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

[106] 参见Либман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2005，No.3，C.142-156；A. Libman and E. Vinokurov，*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2012，pp.11-12。

[107] 这一概念借用了卡赞斯坦对于地区的界定。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第14页。

[108] 本文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

[109] A. Libman and E. Vinokurov，*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pp.11-16.

[110] A. Libman and E. Vinokurov，*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p.13.

[111] 俄罗斯当下的中亚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基于昔日的宗主国/边缘依附关系而设计的，在战略上并未放弃“势力范围”的窠臼。相对于其他大国，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仍然保持着优势地位，中亚国家短期内难以也无力完全摆脱俄的影响：中亚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阶层多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等地获得学位，中亚领导人迄今仍与俄精英网络藕断丝连；相当一部分中亚军事和情报机构人员同属于苏联统一体系的统一塑造；经济领域的国家俘获等都源自苏联的历史遗产；文化领域中亚民众仍然依赖于俄语和俄文节目开眼看世界。参见Marlène Laruelle，“Russia and Central Asia，” in Emilian Kavalski （ed.），*The New Central Asia*：*The Regional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Actors*，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2010，p.150。

[112] John Gaddis and Andrew Hurrell，*Order and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06；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80页。

[113] 后苏联时期中亚各国的“去俄罗斯化”政策并不能掩盖其在某些领域“再俄罗斯化”的结果，比如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方面中亚国家与苏联时期的区分度相对不大。

本来中亚国家民族意识的伸张主要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即在亨廷顿所谓“民主的第三波浪潮”之关键一环中启动的。换言之，中亚国家独立之初的领导人都是将民主构建（democracy-building）作为原始任务的，但这一政治议程很快发生了偏转，并先后经历了从普遍民主（universal democracy）过渡到国家特色的民主（national democracy）再到开明专制（enlightened authoritarianism）的发展阶段。相应地，第一阶段的指导意识形态是民主理想主义，第二阶段调整为民主相对论，第三阶段则变成民主蒙昧主义。

[114]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23 сентября 2006 г.

[115]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Республикой Белоруссия，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азакстан и Кирги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об углублении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областях от 29 марта 1996г//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30 марта 1996г.

[116] Договор о Таможном союзе и Един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т 26 февраля 1999г.

[117] 参见杨成《西接欧盟东扩之招、东拓邻国合作空间：普京“欧亚联盟”构想雄心勃勃》，《文汇报》2011年10月10日；王树春、万青松《试论欧亚联盟的未来前景》，《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

[118] 2012年6月25日笔者在韩国汉阳大学参加中亚论坛会议期间与乌兹别克学者的交谈记录。

[119] 比如，在美国领导的北约部队即将从阿富汗撤军的情况下，阿富汗已经被俄纳入中亚地区事务的议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多次讨论这一问题。

[120] 比如，俄白哈海关同盟以及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的统一经济空间和欧亚联盟的建设就没有包含全部中亚五国。

[121] 2011年底在上海召开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会第二次会议期间，俄方学者在提交大会讨论的报告中明确对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联盟可能导致中俄关系的潜在紧张表示担忧。参见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另据自2006年起即连续参加“瓦尔代”会议的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透露，俄总统普京在2012年9月召开的“瓦尔代”辩论俱乐部上明确表示上合组织和欧亚联盟是两个功能不同的制度设计，暗示中国无权加入后者的一体化进程。

[122] 如禁毒等非传统安全合作，尽管与西方在恐怖主义等概念的认定上并不相同。

[123]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尔坦诺夫（B. Sultanov）2012年10月1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亚：大国的交汇与合作”国际会议上指出：“很遗憾的是，尽管中亚五国领导人都一再重申拥有共同的

历史、文化、语言、民族和宗教的共性，但是推出的很多很好的一体化项目，目前还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尽管哈萨克斯坦一直非常努力致力于推动中亚五国之间的集体合作，但问题依然非常复杂，也许在短时间内还很难得到解决。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曾提出成立中亚国家联盟的倡议，但没有获得另外四国的支持。”

[124] 哈吉姆2012年10月1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亚：大国的交汇与合作”国际会议上的评论发言。

[125] Росси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конце XX-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том первый.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Наука.2005г，С.306-307.

[126] 尽管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领导人的中亚政策都旨在加强莫斯科对该地区的控制而非创造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在此进程中伴随着祖国的归属感产生和发展的还有民族自觉意识。这种现象在所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都较为普遍，但相较于波罗的海、高加索和俄白乌斯拉夫三国而言，中亚的当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发展相对较为缓慢。可能正因为如此，中亚国家对苏联解体的反应以及宣布国家独立的过程都要晚于上述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参见Robert Kaiser，*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399。

[127] Valery V. Tsepkalo，“The Remaking of Eurasia，” *Foreign Affairs*，Vol.77，No.2，1998，pp.107-126.

[128] Tom Nairn，*Faces of Nationalism*：*Janus Revisited*，New York：Verso，1997.

身份变换与权威再造：苏联解体后中亚“东干人”精英的社会组织化过程

李如东

“教授（伊玛佐夫，Имазов Мухаме Хусезович）一直担心‘东干学’研究做不下去，因为没有年轻人愿意去工作，工资太低了……”吉尔吉斯斯坦（以下简称“吉国”）科学院东干学与汉学研究中心研究者苏菲娅在聊到“东干族”的“科学人”（学者）时这样说道。[1]苏菲娅所言不虚。苏联解体后，吉国科学与教育工作者的工资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研究者要么转业，要么在从事科研的同时兼职其他工作，其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和在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相较于商人、国家公职人员和宗教人士等经济回报较高或更易获取社会威望的职业，科学研究已不是人们择业的首选。此种职业选择倾向在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中亚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明显。苏联解体至今，吉国东干学与汉学研究中心仅吸收了两名年轻研究者（除苏菲娅外尚有一位男性）；而为维持家庭和其他社会事务的支出，这两位年轻人不得不将更多时间投入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中，科研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副业。

显然，部分科研工作者经济和社会声望的衰减与中亚的政治、社会、经济以及观念变化有关。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亚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宗教复苏等关涉政治、经济与社会面相之事宜的展开，个人和群体的生活状况、社会身份与权威也随之受到影响。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就很难理解昔日备受尊重的“科学人”在当前中亚社会的境遇。笔者认为，苏联解体后“东干人”精英群体发生了重组，商人和宗教人士成为主要的精英群体；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虽仍具有社会影响力，但人数已经相对较少；部分处于较低社会层级的个人和群体借助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转换，成功跻身精英行列；部分在苏联时期处于较高社会层级的“东干人”中，有的通过重组社会与文化资源巩固其权威，有的则依靠个人的品行或学识赢得人们的尊重，但也有一部分在社会重组过程中滑落到较低的社会阶层。东干精英权威的社会组织化过程正是在不同群体的相互合作与竞争关系中展开和完成的。这种“合作-竞争”关系是“东干人”各精英群体权威组织过程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和苏联解体后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及其彼此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密不可分。

一 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苏联解体后中亚“东干人”精英身份的变化及其权威再造的社会组织化过程。“东干人”的主体是1877～1884年因西北“回民起义”和中俄划定伊犁边界（《中俄伊犁条约》）迁往中亚的陕甘回民之后裔。此外，受1962年“伊塔事件”影响而迁往中亚的部分中国新疆籍回民及其后代也被登记为“东干人”，并成为其时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者。“东干人”主要居住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楚河流域以及乌兹别克的塔什干等地区，人口大约为13.2万人。[2]从定居中亚至今，“东干人”已在中亚生活和发展了140年。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亚各国以“主体民族”为担纲的民族国家建设逐渐加深，“东干人”的政治参与和民族文化发展呈现出“边缘化”趋势。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东干人”借助中国与中亚的商贸和文化网络增加了与祖籍地的互动频率。这些新变化在本文讨论的“东干人”精英社会转变诸面相中都有所呈现。

本文所涉及的东干精英群体主要有知识分子、宗教人士、政府公职人员和商人等，笔者将这些“东干人”精英分为知识精英、宗教精英、官僚精英和商业精英等来讨论。此分类既参考了“东干人”对其内部不同群体的表述，也参考了苏联解体后精英变化的一般社会学语境。在具体社会生活中，“东干人”将商业精英表述为“巴依人”“有钱汉”等，将宗教精英称为“教门人”、阿訇、伊玛目等，将知识精英表述为“科学人”或“写家”（即作家）等，将官僚精英称为“做官活的”（“东干人”将官僚体系中的工作称为“官活”）或“官家人”等。而在社会学语境层面，前述各群体乃是苏联解体后中亚社会转型过程中较为常见的精英类型。需说明的是，苏联解体后多数“东干人”知识精英转入其他行业，持续从事科研工作者多为吉国“东干学与汉学研究中心”的学者，故本文所论知识精英以该群体为主，但也兼顾其他知识群体（如教师）。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以“实地调查”为主，文献研究为辅。文章所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笔者2014年9月至2015年7月在吉国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Село Александровка，也译亚历山大乡）、托克马克市（город Токмок）、比什凯克市（город Бишкек）、奥什市卡拉苏（Кара-Суу）等地区的实地调查，以及2017年7月中下旬在哈萨克斯坦（以下简称“哈国”）马三青乡（Село Масанчин）、阿拉木图（Алматы）等“东干人”群体中的田野访谈资料。笔者将在这些田野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讨论“东干人”不同类型的精英在因应中亚“新语境”过程中

的身份变换和权威构建。

二 相关研究与概念界定

苏联解体后，来自汉语和英语世界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对“东干人”的研究，这改变了此前东干研究俄语世界一枝独秀的局面。[3]从研究议题上看，多数中国学者将研究集中于东干人的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等方面，[4]这些研究逐步奠定了中国“东干学”的格局。[5]此外，尚有部分学者（尤其是民族学者）将“东干人”的民族认同作为核心议题，[6]并和国外人类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对话。[7]这些出自不同学科和学术（国别）传统的研究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东干人”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等提供了基础，但多数学者的研究未涉及苏联解体后东干精英群体的社会变迁。

事实上，部分学者在研究苏联解体后的中亚社会时已从不同角度对精英群体进行过考察。在梁·鲍林琼斯（Pauline Jones Luong）所编的一本著作中，个别作者从国家-社会（state-society）关系视角对中亚各层面的精英在世俗主义价值观影响下与国家和社会展开的互动进行了研究。[8]2007年，托马索·特维萨尼（Tommaso Trevisani）反思了既往学界对苏联解体后的乌兹别克斯坦社会所采取的静态分析模式（这种研究常将人的活动置于部族与其他庇护关系中去讨论），并以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研究路径考察了集体农庄废除后乌兹别克斯坦农村精英在棉花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彼此竞争的面向。[9]2013年，劳伦斯·马科维茨（Lawrence P. Markowitz）以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中心展开比较研究，重点考察了经济、权力和精英活动彼此交织的关系对中亚国家资源开发、保护和管理（尤其是不动产）的影响。[10]这些研究虽然凸显了精英群体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社会和经济变迁中扮演的角色，但均有意无意忽略了精英身份和权威再造的社会组织化过程。本文对苏联解体后“东干人”社会精英群体的变化及其社会权威的组织过程的考察，将对中亚精英研究以及东干人研究中“人的忽视”这一缺憾做些许补充。

在展开进一步论述之前，有必要说明本文使用的几个概念。首先是两个描述性概念“身份变换”与“权威再造”。前者主要描述个人或群体社会身份的变迁和转换过程，用以表明其身份变迁的社会延续或断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层级变换；后者则用于描述个人或群体利用政治和社会

文化资源巩固、提升或获取权威的过程，以及此过程中的竞争状态。其次需说明本文的分析性概念“社会组织化过程”。该概念受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讨论文明互动时所使用的“传统的社会组织化”（social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启发。雷德菲尔德用其来描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11]意在呈现文明互动的社会过程性。笔者将借用此概念作为“东干人”、“身份转换”和“权威再造”的过程性分析概念。此外，文中将根据具体语境使用“东干人”与“东干族”，无论在何种语境下，其所指皆为同一群体。

三 东干精英群体之变换

2005年，由吉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伊玛佐夫先生所编的《东干族百科全书》出版。该书人物部分按照“科学与教育人物”“文学与艺术人物”“公共与国家人物”“军事人物”“生产工人与服务业人物”“医生”“宗教人士”“运动员”的分类，将“东干人”中涌现出来的精英进行介绍。[12]这份精英名录有几处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排在名单前列的是从事科学、教育与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公职人员，而位于名录后三类的则是医生、宗教人士和运动员。其次，在这份名录中，人数较多的是“科学与教育人物”（96人）、“军事人物”（55人）、“生产工人与服务业人物”（45人），人数较少的则是“医生”（9人）、“宗教人士”（3人）和“运动员”（17人）。再次，入选者绝大多数是在苏联时期获得其荣誉的。最后（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东干族”精英的分类与苏联时期的阶级划分互为表里，它意味着编者在进行精英分类时受到阶级观念的影响。显然，这份名录虽然出版于苏联解体后14年（2005），但编者对“东干人”的精英分类仍有明显的苏联印记，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联时期阶级归属与精英类别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后中亚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东干人”的社会精英群体的状况已不能和苏联时期同日而语，商业精英和宗教精英的大量涌现以及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相对减少才是其现状。

（一）商业精英

苏联解体后，中亚经济转型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商业活动（尤其是跨境贸易）中。“东干人”也不例外。据200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对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驻西安代表的访谈，其时大约有30%的“东干人”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从事边境贸易。[13]

虽然该数据非严格统计所得，但它仍足以说明苏联解体后“东干人”从事商业者日渐增多的趋势。2017年7月21日，哈国东干协会原会长安胡塞在接受访谈时也说道：

> 现在大量“东干人”的收入是靠边贸……光阿拉木图市场里，做生意的“东干人”就有一万多人。包括新渠，包括营盘，每个家庭（家族）都有一个人在这阿拉木图巴拉赫尔卡（Барахолка）（市场）做生意……以前我们做生意，都是一个家族一块做生意，之后把钱挣上了，我们就再投资一些钱建工厂。[14]

可以看到，苏联解体后，大量“东干人”从其他职业转入商贸行业。在此过程中，不少商业精英从商人群体中涌现出来。

在城市，不少“东干族”的工人、学者乃至公职人员放弃此前职业，转而从事跨国贸易。早在苏联解体初期（1996），丁宏在中亚“东干人”群体中做实地调查时就发现：

> 城市中更多的“东干人”已经放弃了“铁饭碗”，专门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在与中国市场的贸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东干人”频繁地往返于中国与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之间，把中国的商品运来后，成批在本国销售，或转运到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销售。一些“东干人”由于起步较早，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资金，其贸易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常年往返于中亚与中国、印度、土耳其、俄罗斯及欧洲各国之间，有人甚至包租飞机运货。[15]

时至今日，城市中不少“转业商人”已成为大商人，他们中的部分甚至开始将其资本转移投资到工厂、物流、旅游和服务等围绕边贸展开的其他行业。

从其他职业变换为商人者并非仅有城市“东干人”，农村亦然。因绝大多数“东干人”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故由农转商者也就成为东干商人的多数。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东干人”在转入商业的同时多继续从事农业，“弃农从商”者并不多见。此外，由于相当部分农村商人以农产品买卖为主，因此其商贸活动受自然条件影响的风险较大，这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资本累积和转移投资等后续商业活动。凡此种种，均使多数“由农入商”的“东干人”身份变换显得不够彻底，尤其是在相较城市商人和“弃农从商”者而言时更是如此。

这也意味着虽然“东干人”中从事商业者人数众多，但他们并非都能跻身商业精英行列。一般而言，只有那些深谙经商之道，在商业活动中

积累大量财富，并将其财富优势转化为社会影响力者才可能被认为是商业精英。故此，那些放弃其他职业，专职从商的“城市商人”和弃农从商的“农村商人”往往更有机会成为商业精英。因为身份转换越是彻底，其职业性特征越是明显，商业意识也就更为敏锐，这使他们无论在资本累积还是转移投资等方面，都能快人一步。

（二）宗教精英

迁居中亚初期，宗教精英在“东干人”群体中曾享有较高威望，但苏联时期实行限制宗教的政策，“东干人”的宗教活动逐步转入地下；宗教从业者人数随之减少，影响力也相对有限。苏联解体前后，随着宗教政策的改善，伊斯兰教的实践在中亚地区逐步公开化，宗教人士的重要性随之凸显出来。苏联解体初期，“东干人”中宗教人士较为紧缺。在此背景下，陕西籍“东干人”曾组织教民到祖籍地陕西搬请阿訇，并最终于甘肃平凉请到一位“老教”（格底目派）阿訇到托克马克（Токмок）一带的东干村庄主持宗教事务和培养宗教人士。时至今日，该阿訇已为陕西籍“东干人”培养出二十多位阿訇。这些阿訇多在哈国和吉国东干村落的清真寺主持宗教事务，从事伊斯兰教学。[16]

差不多同时，甘肃籍“东干人”则选择派送有志于从事宗教工作的年轻人到中亚和埃及等地伊斯兰学校学习宗教知识。据吉国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甘肃籍“东干人”所提供的信息，苏联解体初期，少数从沙特阿拉伯学经归来的瓦哈比派伊玛目因会说阿拉伯语，吸引了部分教众，这引起了“东干人”长者的不安，经集体商议，遂决定派年轻人去国外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经典知识与教义教法。该村大寺W.阿訇及几位宗教人士正是在此背景下被选送到中亚布哈拉、埃及和中东等地伊斯兰学院（或大学）学习的。[17]与此类似，哈国亚曼派（新教）“东干人”也选派部分年轻人到中亚、埃及和中东等地学习宗教知识。[18]这些学成归来的阿訇如今都在相应的东干村落主持宗教事务并从事伊斯兰教的教学工作。

不难看出，除从中国请来的阿訇外，苏联解体后“东干人”群体中涌现出来的第一批宗教人士多是具有世俗教育基础，并在完成规范的伊斯兰教育后成为宗教从业者的。在成为宗教人士之前，他们要么是大学毕业生，要么是退伍军人（如阿列克桑德洛夫卡的W.阿訇），要么是农民。虽然2005年出版的《东干百科全书》仅仅收录了三位宗教人士，但时至今日，“东干人”中的宗教人士数量较之苏联解体初期已不可同日而

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仅吉国“东干人”聚居点就有清真寺35座，哈国“东干人”聚居点的清真寺为38座。[19]另据笔者田野调查所获信息，当前整个吉国“东干人”中在任和退任阿訇大约有100多人，其中仅阿列克桑德洛夫卡村就有阿訇20人。[20]有意思的是，这些宗教从业者几乎没有一位出自苏联时期的科学、教育和文艺工作者群体。

（三）知识精英

苏联时期，“东干人”精英大部分由知识分子（学者、文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等）组成。王国杰的研究资料显示，截至1976年，其时总人口4万余人的“东干族”中拥有副博士学位（我国教育部认定为博士学位，其学制介于硕士与博士之间）者40人，博士学位者4人，“这种比例（1万名‘东干人’中1名博士，1000名‘东干人’中1位副博士）在全苏120多个民族中位居第一位”。[21]这些知识精英创制东干文字、东干文报纸、广播电台，编著大量东干语教材，并以本民族历史文化及其他素材写作学术与文学作品；在他们的努力下，“东干人”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体性得到发展与提升。与此同时，国家也给予知识分子较高待遇。据伊玛佐夫提供的信息，苏联时期政府给每位教授提供的科研与生活待遇相对丰厚，除为他们在城市里提供一套公寓外，还在郊区给其建造一栋别墅。此外，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也有较高影响力。

时过境迁，随着中亚各国民族政策的调整以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新变化，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与社会地位都明显下降。部分“东干族”知识工作者转而从事其他更有“钱途”的职业。随着老一代知识分子逐渐退休或老去，而年轻人又多选择从事商业或其他更有经济回报的职业，“东干族”知识分子的总数逐渐下降，甚至出现了文章开始描述的青黄不接的现象。尽管如此，不少东干智识工作者仍在坚守其职业，其中以吉国科学院的学者为典范。在吉国科学院东干学与汉学研究中心的九位东干研究者中，有七位从苏联时期工作至今。此外，在教育领域，虽然多数男性教师迫于生计转而从事其他职业，但坚守者也不乏其人。事实上，因教育行业受人尊重，也不乏年轻人完成学业之后选择教育工作的情况，但需要补充的是，这些年轻人多以女性为主，因为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多数男性青年还是更愿意选择有“钱途”的职业。

（四）官僚精英及其他

苏联时期，不少“东干人”曾在集体农庄和国家权力机构中担任领导者。时至今日，仍有部分村落、街道或学校以担任过集体农庄领导的“东干人”名字命名。[22]苏联解体后，由于新独立的国家实行国语政策，且法律明文规定公职人员须能使用“主体民族”的语言（吉尔吉斯语或哈萨克语等）开展工作，这使很多不会或不能熟练使用“主体民族”语言的“东干人”对“官活”望而却步。整个东干群体对“官活”的参与度较之前明显降低。

和知识精英的境况相似，在公职系统中较有影响力的“东干人”多延续其在苏联时期的职业。虽然也有部分熟悉“主体民族”语言的年轻人进入官僚机构，但他们多位于官僚系统的底层，很少有位居权力上层的精英。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干人”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没有机会跻身“官僚精英”之列。事实上，仍然有部分东干商人或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者，通过竞选东干协会主席职务或国会议员进入较高权力层级。此外，在“东干人”聚居的村落，村长的职务也成为有志竞逐权力者通向较高权力层级的渠道。

相较商人、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通过其他职业跻身社会精英的机会并不多。苏联时期的很多职业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社会中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这些职业包括工程师、艺术家等。如在数家中资企业担任管理者的伊斯哈尔所说的那样：

> 在苏联时，有些工程师，他（们）可能很有影响力，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变成普通人了，现在我们社会对他们已经没什么需求了。但有两种人在社会上，不管苏联（时候）还是苏联解体以后，一直受人们的尊重，一种就是大夫（医生），一种就是老师。像其他的，比如工程师，我的岳父，他在苏联时期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管水的工程师，但在苏联解体以后，我们那边不需要这种人了，他（们）就变成了普通百姓了，种地啊，或者干其他的……对，就是种地，后来他也跟着我们跑边贸了。有很多人，包括画家，现在不需要这种画家了，他（们）也是去种地了，也是去做边贸了……包括其他，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也就在社会中消失了，变成普通老百姓啦，除了医生和老师。[23]

不难看出，在苏联解体后中亚政治、经济和宗教语境变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东干人”投入跨境贸易和宗教事业。在此过程中，部分农业生产者通过投身贸易逐渐成长为商业精英；部分具有一定宗教基础或其他职业的人则通过学习宗教知识而转变为宗教人士。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的人数较商业和宗教精英要少，这是因为这些群体面临着“代际断

层”的困境。除部分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延续其职业外，年轻人更多地投入商业和宗教领域中去追逐经济回报和社会声望；[24]工人、工程师和艺术家等要么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要么投身于贸易和其他职业。尽管如此，部分和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职业从业者（如医生和教师）虽人数不多，却依然享有社会声望。

四 权威再造的几种路径

前文对“东干人”精英社会身份变换的论述虽已足窥苏联解体后该群体社会组织化过程之一斑，但若欲理解前述不同类型的精英何以能产生社会影响力，则还需对其权威构建过程进行考察。不同精英群体的权威构建路径不尽相同。通常而言，商业精英主要通过慈善事业和权力竞逐来赢取或加强其社会权威；宗教精英主要通过宗教品级（学识与实践）来提升其权威；知识精英则通过其个人品性以及对本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而赢得声望（因为其研究恰好因应了人们的民族情感诉求）。相较而言，官僚精英权威构建的方式显得比较单一，尽可能多地获得权力是其巩固和提升权威的主要路径。

（一）经典知识与宗教实践

苏联解体后，伊斯兰[25]成为中亚社会中的主要思想之一，这无论在主体民族还是同为穆斯林的“少数民族”群体中都一样。在此语境中，宗教人士想要赢得声望并建立起权威，除精通伊斯兰经典与宗教仪轨诸事项之外，还须严格实践伊斯兰，做到知行合一——前者是其主持宗教事务的资质，后者则是他们获得信众认同的基本品行。正如“东干人”在评价阿訇群体时所常说的那样：“你不要光听他（们）说呢，还要看他（们）怎么做。”在信众看来，一个“好阿訇”不仅要宗教知识好，而且更重要的是能身体力行地践行伊斯兰。

绝大多数具有良好口碑的阿訇在主持宗教事务之前都有着长达十多年的求学（或游学）经历。他们要么到巴基斯坦、埃及和中亚等地著名的伊斯兰学校求学，要么追随本地学识较好的阿訇学习；有的则在追随本地阿訇学习数年之后再到国外宗教学校进修，抑或反之。一位宗教人士在获得主持宗教事务的资质之后，往往先从坊民较少的清真寺开始其职业生涯，在讲授伊斯兰经典和处理宗教事务方面积累足够丰富的经验之后，其声望与权威方可得到寺坊内穆斯林的认可。此时，他便获得了

前往坊民更多的清真寺主持宗教事务的资质，而在这样的大寺坊中主持宗教事务反过来又会提升其宗教权威。

在此基础上，如果某位阿訇出生宗教世家，且又在官方宗教机构获得认可，则其声望与权威也就相应更高。以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的W.阿訇为例，其叔父是当地有名的阿訇，而他不仅是苏联解体后最早一批被送到布哈拉伊斯兰学校学习的人，而且在主持宗教事务之后，又被吉国官方宗教机构委任统管该乡五个清真寺的官方宗教事务。W.阿訇不仅在经典知识与宗教实践方面获得教民的认可，而且因其家庭背景和官方宗教机构的支持，进一步提升和巩固了其声望与权威。这使他不仅经常被邀请去主持“东干人”的日常与集体宗教活动，而且也被请去调解很多坊民之间的纠纷。其声名远播东干乡庄之外，有时甚至连周围村落的吉尔吉斯人也前来找他调解日常生活中的分歧与纠纷，[26]其声望与权威由此可见一斑。

（二）公益活动与权力竞逐

正如不是每位宗教人士都能跻身精英行列一样，积累了财富的商人也不一定都能赢得社会声望与权威。如伊斯哈尔在接受我们访谈时所说的那样：“我觉得啊，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国家，或者不分什么民族，他们肯定会受到尊重，但顶多也就是尊重，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力。”[27]从事商业者要跻身社会精英队伍之中，除财富基础之外，还需在社会事务或权力竞逐等方面有所作为。将部分财物用于社会公益活动和作为参与政治的资本是东干商人获取其社会影响力常见的两种方式。

扶弱济贫、资助宗教和民族事务是东干商人最常见的公益活动。很多东干商人的社会救济活动是通过清真寺来完成的。通过商业积累丰厚财富的“有钱汉”（东干语）通常将其部分资金或物品捐到清真寺，由清真寺对这些资金与物品进行再分配（这通常也被这些商人作为践行伊斯兰教“五功”之“缴纳天课”的基本方式）；通常，它们会被置换为油、米和面等，发放给有需要的个体或家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钱物并非仅限“东干族”群体或村落共同体内部使用，而是面对所有需要帮助者。如2015年1月14日，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邻村萨多沃耶（Садовое）某位参与物资分发的乡佬所说的那样：

> 萨多沃耶有些老回有些难，这些米面是阿列克桑德洛夫卡的（清真）寺给萨多沃耶发的，每个（困难）家户一袋米、一袋面、一壶清油，一满（总

> 共）有17户。里头有一个车臣人老婆子（老妇人），男的没有（没有丈夫），娃娃也没有（没有孩子）。我们穆民（穆斯林）一个把一个帮，让大家都不作难。[28]

除公开捐赠外，也有东干商人暗中给清真寺送去相应的救济物品。阿列克桑德洛夫卡的W.阿訇告诉我：很多次，部分捐赠者夜里将米、面、油等物品放到清真寺，至今仍不知何人所为。这种不公开的捐赠行为虽然不能落实到具体商人之上，但却更能使商人群体获得口碑。

相较扶弱济贫这种更易达成的社会公益活动，部分经济基础更为雄厚的东干商人通常选择资助宗教事务。这些资助包括为清真寺修缮房屋，修建水房，提供礼拜大殿的地毯，在某些纪念日出资以村落或民族的名义举办大型宗教活动（过也贴）以及修建清真寺等。据R.王提供的信息：

> 2015年6月中旬，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郊外的东干村米粮川，一座由在比什凯克朵拉多衣（Дордой）市场从事贸易的四兄弟出资修建的清真寺投入使用。在清真寺开学的当天，除各东干村有名望的阿訇和秋伊州（Чуйская область）穆夫提派来的代表之外，朵拉多衣集团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东干人”群体中部分有名声的人也参加了当天的仪式。[29]

从出席仪式的宗教、商界及其他领域的代表来看，修建清真寺的四兄弟之“社会影响力”已被认可。R.王提供的信息还表明，通过修建该清真寺，兄弟四人集体成为寺董，并获得提名该清真寺阿訇人选的权力；他们选择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阿訇主持该寺的宗教事务。这意味着四兄弟所在家族将对该村落社会（宗教）产生实际影响。

如果说资助宗教事务所获得的社会影响力尚集中于寺坊之内，那么部分更为富裕的商人通过竞逐权力获得的影响力则广泛得多。这点在吉国托克马克市某位“东干族”议员的经历中有充分体现。2015年2月16日，该议员接受了笔者的访谈。以下是根据访谈资料整理的该议员参政的基本情况：

> 该议员是陕西籍“东干人”。苏联解体后，最初种植蔬菜往俄罗斯销售。1997年前往乌鲁木齐做生意，从边疆宾馆批发市场往中亚“打发”鞋子。2005年，他开始与浙江温州某位商人接触，并去该商家的工厂实地考察。考察后决定成立物流公司，从新疆直接发货到朵拉多衣巴扎。2007年，他当选为托克马克市的议员，5年后（2013年）再次当选。当我问他议员的身份有无对其生意产生直接影响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并说，大家选举他当议员，主要是想让他帮忙说话，为当地人服务。他每年都做慈善，帮扶穷人，为市民

谋利（如帮助修整市区的道路等）。但他认为政治身份的好处是使他更好地融入大的关系网中。用他的话来说："把人知道得更好了。"（即认识了更多的人）[30]

显然，东干商人通过商业所积累的财富成为其竞逐权力的资本，而在获取权力后，在实行社会公益活动的过程中，其权威反过来被巩固。与此同时，跻身官僚精英之后，东干商人的商业活动也受益于其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但这样的案例毕竟是少数。因中亚各国宪法规定，参政者须能使用"国语"（主体民族语言）开展公务活动，在政治竞逐中，那些不能熟练使用"国语"的东干商人通往权力上层的机会并不多。

（三）学习国语与跨族联姻

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权力体系中，"主体民族"无论是在参政人数还是权力等级上都远优于其他民族。在此语境中，"东干人"参与政治角逐者并不多。"东干人"民间社会甚至流传着"老回做不了官，猪毛赶不了毡"这样的顺口溜。故此，"东干人"参与权力竞逐除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之外，尚需更多的社会资本。学习"国语"，同"主体民族"联姻以及成为本民族在国家政治机构国民大会（Ассамблеянарода）中的代表，是那些已经或有意跻身权力系统中的"东干人"竞逐或巩固权力的社会资本。[31]

部分参与竞逐权力的东干人通常能够熟练使用"国语"。在他们看来，"做官活"主要看个人，跟民族身份没有关系，"老回做不了官"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只要能把"国语"学好，任何人都能"做官活"。在一次访谈中，供职于吉国国家检察院的A.苏莱曼（化名）对此观点的表述颇具代表：

那会（苏联时期）你只要脑子有，官家（政府）收的呢。哈子（现在）啥大问题？你要知道吉尔吉斯话呢，吉尔吉斯话再不知道，难做（官家）活。因为啥难做活？一满写的吉尔吉斯话，你不会念不会翻（译），你做不上活嘛！……哈子（现在）年轻娃们一满（都）不懂（吉尔吉斯话）。

老回咋做不上（官家活）？老回（娃）好好把书不念，他们不当事，把书，他们光念（古兰）经。谁再把书念好，官家活做的嘛！吉尔吉斯话学上，要学吉尔吉斯话呢，这难些。

一满都是看人怎么样，他要是连（同）吉尔吉斯人一模一样，把他不收。他要是头（知识）比吉尔吉斯高些，（官家）把他收的呢。[32]

时任（2015）吉国东干协会主席的苏莱曼·巴哈德看法与此类似。不同的是他认为“东干人”不仅要学国语，而且要学英语和中文，如果“老回把好少话（很多语言）知道得好，官家把他喊的呢”。[33]A.苏莱曼与苏莱曼·巴哈德所言不虚，在吉国奥什地区，“东干人”因本地化程度较深而导致民族语言失落，但他们却因“把吉尔吉斯话知道得好”而获得了较多进入公职系统的机会（尽管很多位于权力体系的底端）。[34]

此外，与“主体民族”联姻也成为那些身处（或有意进入）权力系统的“东干人”巩固和竞逐权力的社会资本。这种联姻至少从两个方面直接或间接为“东干人”参与政治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它为“东干人”流利地说吉尔吉斯语提供了语境，而这正是在“衙门”（政府部门）工作的必备条件。其次，某些姻亲对象的家族本身在吉国政府就拥有势力，联姻显然有助其增加政治资本。事实上，在吉国，笔者所接触到的较有影响力的“东干族”官僚精英，多与吉尔吉斯族有联姻关系。他们中有些自己娶了当地望族的女子，有些则让自己的儿（女）娶（嫁）具有一定政治背景之家族的吉尔吉斯族女（男）子。

除联姻外，吉国与哈国“东干人”竞逐权力的途径还有成为各自国家东干协会的主席，并在此基础上竞选国会议员。在东干人聚居的吉国与哈国，人数较多的“非主体民族”多拥有本民族的协会，“东干族”也不例外。多数有关该民族的事务由协会主席负责。协会主席通常有资质参与竞选国会议员，成为协会主席，也就意味着获得了跻身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之一的机会。故此，部分有志于“权力游戏”且具有一定政治和社会资源的“东干人”会竞逐此职位，以期获得通往更高权力的机会。2015年，为争取连任议员，时任吉国东干协会主席的苏莱曼·巴哈德组织了一个团队，在吉国大多数东干聚居点进行竞选活动。这些竞选活动包括主麻日到各乡庄清真寺进行演讲，在五一劳动节于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组织足球比赛，出资赞助于米粮番（Милянфан）举行的“五九”卫国战争胜利日纪念活动等。几乎每一次活动，苏莱曼都发表了竞选演讲。[35]2015年10月4日，苏莱曼最终如愿当选议员。[36]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各国，国会议员似乎是目前东干精英所能到达的最高权力阶层。

（四）书写“民族”

前已论及，苏联解体后“东干族”知识精英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不仅后来者鲜有选择科研工作，就连部分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也迫于生计

而转行或身兼数职。即便如此，在吉国东干学与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伊玛佐夫教授的带领下，仍有少数几位知识分子坚守着他们的职业。虽生活境况不甚如意，但他们仍继续研究“东干族”的语言、历史、文化与文学等。这种坚守为他们赢得了声誉，也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在民间，当提及伊玛佐夫教授时，有人甚至说：“他是咱老回的脸面！”[37]

正如苏联时期东干知识分子通过书写，让“东干族”的文化在俄语世界乃至更为广泛的世界被人所知一样，今天的“东干族”知识分子也继续以本民族作为书写对象。在“主体民族”知识分子创作的大批充满民族主义话语的语言、历史与文学作品中，“东干族”知识分子坚持书写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工作显得弥足珍贵。在和“东干族”知识分子交流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位工作者都告诉我，虽然他们知道工作报酬很低，但如果他们不写，就没有人再写。遗憾的是，由于出版经费紧缺，这些学者写下的大量书稿尚未出版。

除去研究本民族的语言、历史与文化，这群知识精英也为传承民族文化而四处奔走。每年夏天，吉国科学院的语言学家都会将那些在教育一线工作的东干语教师召集起来培训，以此应对中小学教育中日渐式微的东干语教学；很多“东干族”学者还将自己写作或收藏的学术著作捐赠给中学的图书馆。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向世界各国的人们讲述“东干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然而，坚韧如东干学与汉学研究中心这样的知识精英，在“东干族”知识分子中毕竟屈指可数。因生活境况或商业潮流的影响，多数“东干人”选择了其他职业，本就为数不多的“东干族”知识精英正在淡出人们的视线。如伊斯哈尔所观察到的那样：“像依玛佐夫，他不管钱多少，他就一直做他的事。像其他的，不管他（们）过去是博士也好，是啥也好，都消失在社会中，他（们）很少再继续干他（们）过去的职业。”[38]

余论

“东干人”在苏联解体后的语境中经历的身份变换和权威（声望）再造是其精英社会组织化过程（social organization of elites）的主要面相。在此社会组织化过程中，“东干人”的“能动性”虽有较好发挥，但也受中亚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各种相互交织之关系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中亚社会从此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到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尽

管部分中亚国家的自由与民主仍未得到充分实践），这使苏联时期以阶级为基础的精英体系转而成为具有社会流动性的精英体系。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精英体系中，精英作为阶级代表，其权威与声望的获得取决于国家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而在处于转型过程的中亚社会中，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精英生成的核心要素。

如前文所论，在财富累积的基础上，东干商业精英通过社会公益活动、资助宗教或民族事务，以及竞逐权力等方式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宗教精英通过宗教经典知识和严格的宗教实践来获取其声望。官僚精英则凭借较为熟练的“国语”能力以及政治联姻等方式巩固和提升其权力。与此同时，知识精英则在写作（尤其是对本民族的书写）过程中赢得声望。如果我们对前述四类精英群体的权威基础稍加观察，则不难发现宗教精英与知识精英的权威是建立在个人品格和声望之上的。官僚精英的权威基于官僚制度的权力体系，而商业精英则同时朝声望与权力两个方向构建其权威基础。不难看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精英的身份转换与权威再造互为表里，越是要完成身份转换，则其权威再造显得越为必要。反之亦然。而在此过程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越是充分，则个体跻身精英行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东干精英的社会组织化过程之另一面向是在身份变换与权威构建过程中，各类精英为赢得社会声望与权威而展开的交互竞争与合作。在具体社会过程中，商业精英要获取社会声望与权威，除承认宗教和知识精英的声望影响之外，还需要与官僚精英展开合作。宗教与知识精英虽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但在处理村落或民族事务之时，也需要商业精英与官僚精英的支持；而来自商业精英与官僚精英的支持反过来又能进一步确认和提升其社会声望。官僚精英在展开权力竞逐时，不仅需要相应社会群体的支持，而且还会借用本民族的象征资本（如卫国战争的荣誉以及集体农庄的成就等）作为政治资本。[39]故此他们也需要和商业精英、宗教精英及知识精英合作。那些能够争得其他类型精英合作的权威竞争者往往能够在本群体内部建立起较高的声望或权威。反之，在本群体内部积累了相当权威与声望的社会精英也更容易获得其他类型精英群体的支持。但与此同时，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又加强了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精英之间声望与权威组织过程的竞争性。

“东干人”声望与权威组织过程中相互依赖与竞争的关系在村落内部权力、商业精英和宗教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哈国新

渠东干乡庄的R.玛玛子（化名）所描述的村落权威构建过程对此有生动呈现：

> 国家的干部，还有这个伊玛目，（富人）比不了。为什么？你是国家（干部），你有国家的那个（权力）手段，你有枪，你有警察，你肯定（影响力）大。比如说，国家机构，肯定有这样的人，这些人，在他们的背景下，你叫我干啥，我肯定得干，那我没有办法。可是，只要我能不听你话，我就不听你话。伊玛目，他没有这些手段，他就靠自己的威望，他靠自己的干办，就看他在自己的（这个）坊上，他干的好事多不多，他讲的话，和做的事，是不是一致，这就（行了）。比如说，有的清真寺的伊玛目，他做的和说的不一致，人民对他就不太尊重。可是好的伊玛目，如果发生什么事，（发动）起这个坊上的人，他能（发动）起来。比如说现在，你要政府人去清真寺去说让我干什么，如果我没有责任和义务，我就可以不去。因为这个国家是比较自由的，我是自由人，我又不是你的干部，又不是在你那里打工的人。比如说，你求我，让我为这个村干点好事，你得求我，我愿意，是为了这个村，而不是为了你。如果说，你对我不好，我完全可以不干。明天，你这个村长啥也干不了。为什么？你这个村长，你车也没有，钱也没有多少，这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多少。他就说，我要翻斗车啊，我就说，翻斗车轮胎坏了，装载机也开不了，挖掘机也不行，推土机也不行，你去找去。你去找区上，区上给你这个钱吗，谁也不给。然后村民一看，这个路磕磕绊绊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然后这个村民就会对你有意见。这很大的影响，你还能当村长吗？你为了保持你的脸（面），为了当好你的村长，你还得和这些（有钱人）好好沟通，好好支持（他们）。[40]

从R.玛玛子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在村落权威的组织过程中，各种类型的精英之间存在相互依赖与竞争的关系。这种既依存又竞争的关系之形成，与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的社会力量从旧制度中重新释放出来不无关联。[41]在新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各类型精英的声望与权威基础大多植根于社会之中（“东干人”这种政治参与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尤甚）。职是之故，各精英群体虽各有其获得声望与权威的基本路径，但其权威的“合法性”又需要有社会的认同。这也就意味着除横向组织之外，精英们还需要自下而上的组织其声望与权威。R.玛玛子在访谈中对此也有精彩的描述：

> （现在）不像原来社会主义制度下，你是村长，就是有那个农场，你是组织干活的那个人。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所以现在，村长他的那个影响，他下台以后（可能就没有影响了）。所以说，他的影响，今天大，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你下台以后，可能什么事都办不了了。我可以做到，（让）什么事都做不了了，你可能要摆一个样子，可是，我（们老百姓）可以做到让你样子也摆不了。所以说，这个村长和伊玛目，他的影响是老百姓说了算。我（们）说了让你有名，你就有名，让你丢脸，你就丢脸。好多人不懂

这个，老百姓有大的力，力量很大。[42]

这种彼此竞争而又依赖的权威组织过程并不仅出现在村落之中，在整个“东干人”（乃至中亚）社会中皆如此。中亚“东干族”社会精英的声望与权威组织过程较好地呈现了苏联解体后中亚“新语境”中宗教、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诸要素对人们生活相互交织的影响。这些因素的交互关系在观察其他民族（含主体民族）的精英群体之权威组织过程和人们的“新生活”时也同样值得重视。如本文第一部分指出的那样，已有中亚社会精英的研究要么过于注重结构变迁的分析，要么过度强调精英的“能动性”而忽视其权威组织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宗教与文化因素。但是，如同不能忽视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社会制度、观念和政治经济网络等方面的延续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样，如果不考察新语境里个人或群体身份变换与权威重构中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社会、权力与文化等要素的组织过程以及人们在过程中的诸多活动，就很难理解当前“中亚人”的日常生活。显然，在观察中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之时，我们不能忽略社会精英的社会组织化过程。反之，对“人的研究”也将有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亚的社会转型。

原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

[1] 田野日志，2014年11月9日。出于学术规范以及保护访谈人的考虑，除公众人物与学者之外，文中出现的受访者或信息报道人皆为化名。

[2] 据2009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口普查数据、2014年哈萨克斯坦人口数据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东干文化研究中心提供的该国“东干人”数据等资料综合计算而得。参见National Statistical Committee of the Kyrgyz Republic，*Main Soci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nd Number of Housing Units*，Bishkek，2009，p.52；“Demographics of Kazakhstan，” 2016. 2.21，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Kazakhstan。

[3] 俄语世界的东干人研究主要出自苏联时期研究者之手；初期阶段，其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东干人”的族源、文学、语言和习俗等方面；20世纪50年代后，该群体的“东干人”研究逐渐从汉学、东方学传统转向民族学与民俗学。参见〔苏〕苏三洛《苏联东干学现状》，郭兆林译，《回族研究》1991年第3期；丁宏《东干学与东干学研究》，《回族研究》1998年第2期。

[4] 海峰：《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林涛：《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丁宏：《东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常文昌主编《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东干文学论纲》，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10。

[5] 这种研究格局在胡振华编著的《中亚东干学研究》中有明显体现。参见胡振华主编《中亚东干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6] 杨文炯：《跨国民族的族群认同——“东干”与回族：族源、族称与族群认同的人类学讨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丁明俊：《中亚东干人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回族研究》2011年第3期；李如东：《地域观念与民族认同：以中亚回族（东干人）为中心的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7] 有关英语世界“东干人”研究的相关著述，可参见李如东《英语世界的东干人实地研究述评》，《回族研究》2014年第4期。

[8] Pauline Jones Luong（ed.），*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sia：States and Societies from Soviet Rule to Independ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9] Tommaso Trevisan，“After the Kolkhoz：Rural Elites in Competi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6，No.1，2007，pp.85-104.

[10] Lawrence P. Markowitz，*State Erosion：Unlootable Resources and Unruly Elites in Central Asi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

[11] Robert Redfield，*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67-104.

[12] М.Х.Имазов（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Дунган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ишкек. Илим.，2005，С.267-356.

[13] Marlène Laruelle and Sébastien Peyrouse，“Cross-border Minorities as Cultural and Economic Mediato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Vol.7，No.1，2009，p.106.

[14] 安胡塞访谈，阿拉木图安胡塞办公室，2017年7月21日。访谈人：丁宏、李如东、玛依努、巴里根。

[15] 丁宏：《东干文化研究》，第125页。

[16] 据笔者田野日志，尤其是2015年6月26日田野日志。

[17] W.阿訇访谈，阿列克桑德洛夫卡某清真寺，2015年1月10日。访谈人：李如东。

[18] 丁宏：《东干文化研究》，第225页。

[19] 尤素福·刘宝军：《悲越天山——东干人记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第145～147页。

[20] 此信息由W.阿訇提供。

[21] 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第350页。

[22] 如吉国南部城市奥什辖下的卡拉苏塔西洛夫村就是以苏联时期担任集体农庄主席的“东干人”赫·塔西洛夫（Хайтахун Таширов）的名字命名的；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的一所中学也以该乡此前“友谊农庄”主席伊斯玛仪（Йсмаев Арсмане Мухамеевич）的名字命名。

[23] 伊斯哈尔访谈，阿拉木图，2017年7月24日。访谈人：丁宏、李如东、巴里根。

[24] 本文对“社会声望”的讨论受马克斯·韦伯著作的启发。值得一提的是，张亚辉教授最近对马克斯·韦伯声望社会学中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进行了专门论述。详见张亚辉《习俗与声望——马克斯·韦伯论种族与民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10期。

[25] 此处“伊斯兰”指作为思想与生活方式的伊斯兰，而如果用“伊斯兰教”则与语境不符；下同，不赘注。

[26] 2015年1月10日，笔者在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W.阿訇工作的清真寺对其进行访谈时，恰好目睹了他调解周围村落一对吉尔吉斯夫妇离婚案件过程。在其调解下，原本准备离婚的一对夫妇重归于好。

[27] 伊斯哈尔访谈，阿拉木图，2017年7月24日。访谈人：丁宏、李如东、巴里根。

[28] 田野日志，2015年1月14日。

[29] 田野日志，2015年1月14日。

[30] 综合2015年2月16日田野日志和访谈录音整理。访谈地点：比什凯克北京餐厅。

[31] 在中亚五国中，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均设有国民大会。

[32] A.苏里曼访谈，A.苏里曼车上（从比什凯克到阿列克桑德洛夫卡途中），2015年5月24日。访谈人：李如东。

[33] 吉尔吉斯斯坦东干协会主席（时任）苏莱曼·巴哈德访谈，东干协会主席办公室，2015年7月23日。访谈人：李如东、丁宏。

[34] 田野日志，2015年6月14日。

[35] 据田野日志整理。

[36] 《吉尔吉斯斯坦东干（回民）协会主席再次当选议员》，http：//chinanews. com/gj/2015/10-05/7555500. shtml，2015年10月5日。

[37] 语出笔者在阿列克桑德洛夫卡调研时所住“东干人”家庭的家长A.伊斯玛。

[38] 伊斯哈尔访谈，阿拉木图，2017年7月24日。访谈人：丁宏、李如东、巴里根。

[39] “象征资本”的概念出自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术语，此种社会资本拒绝经济资本的理性计算原则，在经济资本不被承认的情况下完成其累积。详见〔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第177～192页。其中，第186页记载内容尤其重要。

[40] R.玛玛子访谈，阿拉木图天山宾馆大厅，2017年7月28日。访谈人：李如东、丁宏。

[41] 关于此点，可参见李如东《制度、观念与网络：苏联对中亚社会影响诸面相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

[42] R.玛玛子访谈，阿拉木图天山宾馆大厅，2017年7月28日。访谈人：李如东、丁宏。

附录

从朝贡体系到地缘体系：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历史关系概述[1]

黄达远 李如东

论及中国与中亚地区关系，首先要从历史说起。中国与中亚地区关系源远流长，本文不是对长达几千年历史的冗长叙说和烦琐考证，而是把这种历史关系放在亚欧大陆地缘政治变化的大背景下，宏观地把握二者关系在历史中的情势及其呈现出的某些特点。

一 中亚地区的地理环境

中亚，在古汉语文献里称“西域”。在欧洲（与非洲、美洲很多区域名称一样），中亚（Central Asia）被世人所熟知与19世纪以来欧洲探险家、博物学家、考古学家甚至是间谍等在他们的旅行日记、调查研究著述和谍报中使用该词有很大关系。随着上述各种著作在欧洲各群体中的传播，中亚逐渐被世人所知，但因最初涉足“中亚”的探险家、商人、考古学家、间谍等多来自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中亚在法语、英语、俄语等语言中的定义与所指也不尽相同。经过一个多世纪之后，中亚一词所指的层次逐渐清晰化，成为一个具有地理、政治与文化指涉的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中亚通常被用来指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相对而言，21世纪初美国提出的“大中亚计划”囊括的国家与地区就要广泛得多。该计划“打算从土耳其和阿富汗两头使劲儿，像穿糖葫芦一样将土耳其、高加索三国、中亚五国、阿富汗串在一起”，“建立一个华盛顿主宰的‘大中亚’”。[2]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中亚所指就更为广泛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的讨论，作为文化和历史概念的中亚“囊括了由古代文化、经济和政治纽带维系起来的拥有共同历史的众多地区”。[3]从这个宽泛的定义来看，中亚包括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北

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中亚五国、俄罗斯东南部等历史上通过商贸、人口迁徙、战争等方式互动较多的地区。从地理区位的角度来看，中亚大概指北纬40°到50°之间、东经50°到80°之间的“内陆亚洲”。本文中的“中亚”大体上指的是现今的“中亚五国”。

（一）诸要素分析

关于中亚的地理形貌，中亚研究专家潘志平曾经写道：“提起中亚，一般印象中恐怕更多的是茫茫戈壁和寸草不生的荒漠。但是，如果在高空俯瞰时，却能见到大大小小如宝石般的绿洲镶嵌在这迷茫的大陆腹地，其中锡尔河上游的天山西部山区中的费尔干纳盆地最引人瞩目。它像一只巨大的椭圆形花篮，为崇山峻岭拥抱。其北面、东北面、西北面是高达一万英尺的恰特卡尔山、费尔干纳山和库拉明山，南面则是更加雄伟巍峨的阿赖山脉。”[4]如潘氏所言，在荒凉的外表之下，中亚地区的地理诸要素体现出较多的丰富性。

这一位于北纬40°到50°之间、东经50°到80°之间的“内陆亚洲”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东北部的帕米尔高原与天山山脉，海拔在4000～5000米，西北部平原丘陵地区海拔在100～300米。在广袤的地理范围之内，分布着费尔干纳盆地、塔什干绿洲以及咸海等。从地貌上来看，中亚地区呈现出高山、平原、盆地、荒漠、草原相间的形态；深居内陆亚洲的中亚地区在气候类型上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平均降雨量不到300毫米，日照充足，蒸发量大，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夏季与冬季温差也较大；区内多内陆河，塔里木河、锡尔河、阿姆河等最为著名；石油、煤、铁等矿藏丰富。

亚洲内陆的灌溉农业与草原游牧业较为发达。塔里木河绿洲、费尔干纳盆地、塔什干绿洲等地的灌溉农业与天山北部、中亚北部地区的游牧业成为这一区域最为重要的经济形态。此外，该地区棉花的种植也较多，棉纺织业发达，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其人文历史地理环境相映成趣。历史上，中亚地区内部游牧地带与绿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和战争成为该区主要历史图景之一；横贯东西的天山山脉成为区内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互动的过渡地带，意义非同寻常。

（二）天山山系在中亚地区的特殊历史意义

作为亚洲中部最大的山系[5]，天山就是中亚南北的一道地理分界

线。道光年间思想家魏源记述道：

> 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北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6]

天山作为天然地理分界线的作用被恰如其分地表达，即内部“南回北准”——南北的分界线。天山南部和北部各由一个地理政区名词来表达：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乾隆时官修的《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安西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而核心则是记述后两者。嘉庆年间伊犁将军松筠撰修的《西陲总统事略》，按照“新疆南路”“新疆北路”来记述；徐松撰写的《新疆赋》，由《新疆南路赋》与《新疆北路赋》组成，实际上新疆南路即天山南路，新疆北路即天山北路。洪亮吉将流放见闻撰写成《天山客话》，有时天山就作为新疆的代名词。

天山在我国的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在《山海经》中已经有“敦薨之水”（塔里木河）、“敦薨之山”（天山）的记载。另一部先秦时期的著作《穆天子传》则有周穆王到天池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汉代关于西域的地理空间进一步清晰化，《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7]清代嘉庆年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写下《天山歌》，“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8]清末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楠在《哈密道中》写道：“汉家明月入胡天，塞外中秋一样圆。立马天山看北斗，故乡回首独凄然。”[9]在时人的观念中，地脉、天涯、明月、胡天、北斗、青松等使天山“绝域”的意象跃然纸上。

新疆的沙漠、绿洲、戈壁、河流、高山、草原、湖泊、冰川等构建了多样化的空间，形成巨大的地理落差。天山山系就如一道巨大的索带将这些地理空间联系起来，天山作为新疆的地理重心，就是这幅历史画卷的“轴心”；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在其名著《古代天山的历史地理学》中，[10]形象地把天山山脉比喻为“天山半岛”：“长长地浮现在沙海上的所谓‘天山半岛’，在其南北两岸把很多的绿洲象珠子或肉串似地串连起来。这些绿洲实在可以看作是设在‘天山半岛’岸边的停泊场，看一看历史，可以说确实如此。”[11]绿洲是“停泊场”和“港口”，绿洲之间的道路是“航路”，驼队是“沙漠之舟”，天山是“半岛”，一幅“陆上地中海”的商

业交通景象已经被勾勒出来。清代天山沿线的城镇，常被称为“旱码头”，骆驼被称为“旱龙”。不过，“陆上地中海”的繁荣主要是由于蒙古草原上归化城到天山腹地的古城商路的开辟。“燕晋商人多联结驼队，从归化城沿蒙古草地以趋古城”。[12]从归化城通往新疆的商路也有三条：北路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古城；中路由武川、白灵庙西行，经阿拉善、额济纳草原至古城，再西行至乌鲁木齐；南路经包头、宁夏、兰州、凉州等地达古城。

（三）中亚地区的三个组成部分

西域史地学者羽田亨认为，从历史地理学的视野来看中亚，中亚区域并非一个单一的中心，而是多个中心。他指出，中亚有三个较为重要的中心：天山北路和俄属七河省地方；葱岭以西，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地方；天山南路地方。中亚北方，是典型的游牧文明形态。麦高文根据考古与历史文献的研究表明，中亚北方游牧的塞西安人与萨尔玛西安人向欧洲与中国传播了他们的骑马术、裤子、弓箭等骑马民族的器物与技术。而其多色型艺术（即在一金板上镶嵌各种颜色的彩石，构成一幅图画）则对后世的印度、波斯和欧洲的艺术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13]而据俄国著名学者巴托尔德（旧译巴尔托里德——笔者注）的研究，伊犁地区的乌孙与阿姆河的大月氏（也称大月支，大小月支也被统称为吐火罗）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间进入中亚，考古与语言学的资料证明了他们对该区域历史及东西方文明产生的影响。[14]

葱岭以西，以锡尔、阿姆两河之间为中心的中亚文明受两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影响颇多。除此之外，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则为这一地区带来了希腊文明因素。“这个马其顿世界帝国，虽在亚历山大死后不久即告崩溃，然而希腊的影响，却仍成为土耳其斯坦地方最为重要的因素，如此逾二百年；至其间接影响中亚细亚之文化生活，则更多若干世纪。”[15]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开通了古希腊与古印度文明的通道，古代印度文明也传入该地区，佛教曾一度成为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宗教。

天山以南的中亚大抵与中国新疆南部一致。这一区域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深居内陆，远离海洋。青藏高原、东西向的昆仑山系与横亘新疆中部的天山山系之间，是塔里木盆地。由于深处亚欧大陆，加之高山环绕，来自大洋的湿润的气流难以进入盆地，区域内降雨较少。一方面，高山阻挡了水汽，使得其区域内连片干旱；另一方面，高山上巨大的冰

川一到夏季，涓涓融水从高山汇到山麓地带，形成一条条季节性的河流，水源充足时，它们还冲出河道，形成一块块河扇冲积平原及绿洲。如日本西域史家松田寿男指出的那样，汇集无数峡谷溪水倾泻下来的众多河流，大多是流到在靠近山脚的沙漠时便立即被干燥的沙粒所吸收而失去了河道，形成所谓的“没有尾巴的河流”，它在沙漠中消失的地方就成了绿洲。这些绿洲就形成了此区域内早期人类赖以生活的基础，没有绿洲，就不可能有人类的活动。[16]

二 中国新疆与中亚的分合变迁——以绿洲史为视角

从空间环境上看，中亚与中国新疆的空间形态是绿洲；从地理位置看，中亚与中国新疆是亚欧大陆的枢纽。天山南北以及天山自身丰富的地理要素，均给予中国新疆与中亚历史和文明演进巨大的影响。正如昝涛指出，理解中亚有两个重要坐标轴，一是地缘（空间的横轴），二是文明（时间的纵轴）。从地缘角度说，中亚既是周边或外来政治/文明体扩展的极限与终点，又是它们相互角力之地，中国就是这样的政治/文明体之一；从文明的角度说，中亚的文明几经变异、转型，萨满、佛教成为历史深处的积淀，突厥化、伊斯兰化与俄罗斯化共同塑造了当代中亚。[17]中国边疆问题的知名学者拉铁摩尔指出，中亚“徘徊于草原特性与中国特性之间。它也受到由印度、伊朗和西藏经艰苦山地侵入的次要势力的影响”。[18]塑造中亚与中国新疆的力量主要来自外部（中国或是草原）；其次才是中国西藏、伊朗、印度。这一见解十分深刻。从地缘关系视角下，中国新疆与中亚颇似一个“历史共同体”。不过，正是由于地缘关系影响的不同，导致了中国新疆与中亚归属的不同。

（一）中原、草原与西域的互动关系

从空间环境的视角看，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同属于一个“绿洲世界”，而绿洲的分散性使中亚地区与中国新疆没有一个核心绿洲能占据该区域政治经济的中心地位。从中亚自身来说，历史与地缘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主体性不稳固的、依附性较强的存在。[19]

正如羽田亨指出，中亚三个中心之间天山南路、两河流域、天山北路与七河地区构成了“西域”历史空间。天山北路和七河地区都是草原绿洲，天山南路和两河流域是沙漠绿洲。从欧亚大陆历史上的“南北关系”看，他们分属于北部的游牧社会和南部的农耕社会。这两个社会的分

界线大体沿着中国的长城、天山，穿咸海、里海至遥远的欧洲。这是一条自然地理界线，农耕民为保护自己的文化区域不受所谓“蛮族”游牧民的侵扰，耗费巨资和人力沿着它修筑了防御线，这条防御线在中国就是长城，在中亚则是壕堑和墙垣。[20]但这种关系并非是割裂的，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曾经考察过中国内陆边疆的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提出了新疆历史的分析架构，认为新疆与其他内陆边疆地区最为不同的地理和社会空间就是“绿洲”，并以此为中心来分析新疆历史。如其所言：“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它是独立的，而不是孤立的。”[21]新疆的历史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地域史，而是在中原、绿洲、草原势力的冲突、交流、融合、调适中的动态历史。同时，拉铁摩尔将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综合因素聚焦在古代绿洲上，并兼以一种跨区域的宏大眼光，指出“新疆以西，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地区、波斯、近东，有着与新疆类似的地理形态；新疆以东，甘肃、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这两个地区对于新疆的影响犹如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关系”。[22]

他认为沿“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商路的形成。约在公元7世纪，长城—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23]天山既作为“长城—天山”整体形态的一个部分，又具有新疆内部游牧民与绿洲居民的“过渡地带”的双重性质，“天山北麓地区及南准噶尔地区，位于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民族的过渡地带”。[24]这对他认识新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中原、草原和绿洲关系中，绿洲属于“侧翼势力”。“在他们（草原与中国）的侧翼是中亚绿洲地带，其间的沙漠绿洲由于精耕农业的背景，与中国的关系较深。”[25]侧翼战争属于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的一部分。“汉代，汉族与匈奴的战争可以称为是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有时与它们同时，有时与之交替发生的，是新疆绿洲地区的侧翼战争。这里优势徘徊于游牧民族容易接近的草原绿洲和汉族易于接近的沙漠绿洲之间。”[26]在草原、中原、绿洲关系之间，绿洲虽然很重要，但并不在中心位置。新疆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草原与中国[27]，其次才是印

度、伊朗和西藏等其他地区势力，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关系的组合。一是游牧民族控制绿洲以对抗中原王朝；二是中原王朝控制绿洲以对抗游牧民族；三是在草原与中原王朝力量都不能到达绿洲时，绿洲的自我崛兴；四是“过渡地带”与草原、中原王朝、绿洲之间关系的平衡。这几种力量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新疆历史剧情发展的主线。

绿洲犹如“细胞组织”，因为干旱地区的阻隔，无法成片发展，这使汉人无法复制内地大规模的生产与社会组织（拉铁摩尔称为“汉族环境”）；同时，这也使绿洲无法联合起来，“在他们的同一性上很难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统一体”。[28]因此，“新疆绿洲总的历史，要受到外来势力侵入整个绿洲地区深浅程度的左右，受到统治势力联合各个绿洲程度以及将各个绿洲之间进行联合的程度的支配”。[29]不过，相较于游牧力量，中国（中原王朝）力量在沙漠绿洲居于优势。中国（中原王朝）通过丝绸、茶、瓷器与绿洲的玉石、干果、马匹之间进行交换，使得绿洲的统治者与中国之间建立一种互惠的体制，但是与普通绿洲民众的关系却不大。汉人对绿洲农业生活比较熟悉，“这种生产与习俗的相同，比语言及服装的不相同更为重要”。[30]并采取一种类似自治的管理模式，“当地的经济性质还是照旧。当地社会的价值与法令，虽然有政治统属上的变化，但并无实质内容的改变”。[31]

绿洲的特殊环境对于游牧民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先进入草原绿洲，然后又发展到沙漠绿洲的游牧民族，要经历一个逐渐“非游牧化”的转变。在草原边境北部绿洲中，游牧民族的迁移与征服当然会常常压倒绿洲的农业及社会，也许或早或迟将它们推翻。[32]但他们进入沙漠绿洲时，自身的机动性就会受到限制。其社会面临着游牧与农耕生活的取舍，不得不脱离游牧制度的规范。彻底脱离草原生活，无论是对绿洲社会还是对其自身，都会导致更为激烈的矛盾。

拉铁摩尔由此集中分析了新疆历史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一是新疆绿洲社会在草原与中原之间摆动的性质，可称为“集权化”（Centralization）和“去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循环态势，新疆维持社会变化是在强大帝国统治下的“集权化”和新疆内部固有的“去集权化”之间不断摆动。在“集权化”和“去集权化”的反复变化中，新疆社会呈现出一种缓慢进化的封建主义。其二是新疆历史是一部草原、中原及绿洲交替崛兴的循环历史。其原因是，“这种模式是与草原和绿洲生活之不能协调有关系的。在草原经济与汉族及绿洲农业经济之间是混合和

粗耕经济。草原居民、汉族、绿洲居民都不能向这种混合经济'进化'，因为这种混合经济乃是立于单纯经济制度上的'退化'"。[33]其三是南疆与北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草原绿洲易于被游牧势力控制，生活倾向于草原，而沙漠绿洲的生活则易于被中国（中原王朝）控制，生活接近于农区。草原绿洲具有开放性、变动性，沙漠绿洲具有稳定性。[34]这是拉铁摩尔对新疆历史特点的深刻洞见。

拉铁摩尔提出"长城—天山"过渡地带的启发性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打破了新疆（绿洲）历史的孤立性和静止性，"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它是独立的，而不是孤立的"。[35]将其放在绿洲、草原、中原的关系互动中去观察，也正是这种力量打通了绿洲之间彼此的联络。从地理环境看，两河流域（沙漠绿洲）与天山南路（沙漠绿洲）相似；天山北路（草原绿洲）与七河流域（草原绿洲）环境相似，可以从拉铁摩尔提供的绿洲史视角理解这一历史过程。其次，通过"过渡地带"突破了"儒家中国观"和"游牧中国观"，从更为广阔的"长城—天山"视角解读欧亚大陆的历史特点。再次，通过天山南北的互动，解释了这一地带的"双重过渡性"，从而使天山史内部区域特点得以表达，它既从属于欧亚大历史的一个部分，也有内部区域历史的特色。最后，天山这一"过渡地带"人群与长城"过渡地带"人群相似，兼有定居民和游牧民的特点。

20世纪初，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考察新疆北部边疆城市伊宁的商业状况时，看到汉、满、回、维吾尔、锡伯、索伦、厄鲁特、哈萨克，以及俄国喀山州的伊斯兰教徒、柯尔克孜、安集延、塔什干、浩罕、犹太人等在聚集交易买卖的场景时，发出"实乃天下一大奇观"的感叹。[36]而在考察南疆喀什回城时，他不仅看到回城的商业繁荣，为全省第一，更注意到"俄属突厥人、阿富汗、克什米尔人等，身着各种服装，在市场上往来奔走，那情形宛如参观东西人种博览会"。[37]1968年，美国著名的中亚史学者约瑟夫·F.弗莱彻就明确指出："那种认为喀什噶尔人和维吾尔居民同属一个民族的观点——更不用说他们都是维吾尔人的看法了——主要出自20世纪民族主义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38]

两河流域（沙漠绿洲）和七河地区（草原绿洲）同样是绿洲形态，与新疆绿洲本无具体的差别，它们都在中原王朝和游牧力量之间游移。但两河流域和七河地区处于天山的末梢，中原力量不易到达，而游牧力

量比较容易到达。因此，这一地区的绿洲政权周旋于中原力量与游牧力量之间。汉人对中亚不是“为征服而征服”，而是一种政策性的考虑，“或者是控制中亚的绿洲及部落，以建立对抗草原游牧民族的同盟；或是对绿洲进行防御性占领，以免游牧民族利用它们作为根据地”。[39]中原王朝往往采取笼络的姿态，其政治目的正如拉铁摩尔指出，“中国政治家们真正需要的，即其真正的目的，是造成一种情势，使绿洲小国们认为依附中国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40]

法国学者莫理斯·古朗在分析清朝对中亚的政策时写道：“中国的外交政策愿意对这些遥远的入贡者发号施令……它明智地满足于拥有皇朝最高权力遍及世界边缘的名声。它实际的作用，除了在浩罕比较其它所有地方更活跃外，只限于保持藩属入贡者之间的和平，要求他们尊重并保护帝国的领土。”[41]如清朝乾隆皇帝明诏对待布鲁特的政策，“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亦惟尔便。但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朕亦不加兵骚扰”。[42]

一言以蔽之，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主要对中亚采取和平交往的政策原则，使其倒向中国而不是草原。中原王朝与西域之间建立了以藩属关系为中心的朝贡制度。

（二）中国新疆与中亚的文化变迁

中国新疆与中亚在欧亚大陆的腹地枢纽位置成为各种力量交汇与冲突的焦点。如胡秋原先生所言：

> 在海通之前，这里天然是东西世界的孔道、走廊……此地成为东西城郭国家与商业文化之交流点（中国、波斯、印度及更西），而此地是南北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民族，即北面游牧民族与东西南农耕民族之间……海通以前，民族的争霸与移动，实以西域、中亚为枢纽。所以此地自古即是为兵家必争之地，游牧帝国与农业帝国之间的必争之地……因此二因，此处也就成为商业的聚散区、民族和宗教的博览会……如果我们以沧海桑田等形容兴亡变幻，那么，没有比新疆与中亚更为合适的了。[43]

来自东西不同方向的希腊—波斯—印度—汉—伊斯兰—突厥—蒙古等如同波浪式的多层次的力量席卷中国新疆与中亚。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这离不开绿洲分散性的特点。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中国新疆与中亚都是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权，不仅很少能形成以中亚为中心的大帝国，而且往往是割据争霸。即使在局部统一时期，如

喀喇汗、西辽等西域政权一般也只能采取分封制度。中亚史学者魏良弢先生指出，中亚“分封制”由于长期存在，它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演变：由根据职务颁赐的封地，即临时的封地，演变为终身的封地，再演变为世袭的封地。这一演变过程，也就是封地拥有者极力扩大自己权力的过程。他们在获得封地世袭权后，常竭力扩大自己的势力，时时想摆脱中原政权而独立，造成王朝纷争和封建地主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严重延缓了中亚社会的发展，阻碍了中亚地区统一国家和统一民族的形成。[44]唯一例外的是由蒙古黄金家族后裔建立的曾经横跨欧亚大陆盛极一时的帖木儿帝国（1370～1507）。但是，帖木儿帝国同样无法克服绿洲的分散性，阻止了帝国进一步的集权，它很快就和历史上其他中亚王朝一样，陷入四分五裂的分崩离析状态。

尽管希腊、波斯、印度、汉、突厥、伊斯兰等多种文化力量都给绿洲以强大的影响，但是在绿洲自身的“集权化”与“去集权化”之间，这些文化不是简单的彼此取代，而是相互渗透、碰撞、吸收、涵化。因此，这种混杂的文化交流模式可以称为“中亚化”式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中亚史家魏良弢先生明确指出了阿拉伯式的伊斯兰化与中亚式的“伊斯兰化”的区别，后者是建立在粟特、波斯、希腊、突厥、汉多层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伊斯兰化”。10世纪末，回鹘又征服了河中地区，在中亚建立起喀喇汗王朝，大批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涌进中亚，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当地土著居民深受他们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语言方面开始了所谓的突厥化。当然这种突厥化也是在中亚已有文化积淀（首先是在中亚式“伊斯兰化”）的基础上实现的。已有多层文化积淀的中世纪中亚，又经历了阿拉伯和突厥这两个游牧民族带来的两化：“伊斯兰化”和“突厥化”。[45]潘志平先生即指出，中亚突厥化真正的含义是突厥语化，而不是被突厥人同化。中亚伊斯兰化也是具有中亚特色的伊斯兰化。[46]

此外，中亚绿洲对“丝绸之路”[47]也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丝绸之路”是以古代中国长安为起点，经过中国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地区，进而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非洲的一条陆路通道。它既是这一地区古代各国、各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大道，又是这一地区古代各国各民族密切交往、休戚与共的友好关系和优良传统的象征。“丝绸之路”代表的是一种“接力棒”式的转口贸易方式，关税是沿途绿洲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中亚、印度、波斯是“丝绸之路”商品运行的几个重要接力点和集散地。“丝

绸之路”沿途大国的形成、兴盛和发展，也有赖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这正是沿“丝绸之路”各大国发展有一定同步现象、共振现象、连锁现象的内在原因。[48]中国的河西走廊、新疆与两河流域、波斯高原上的一些城市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在经济与文化方面具有联动性。

在这种变异之中也生成了另外一种趋同：中国新疆与中亚成为一个兼有东西方社会文化特点的特殊区域，“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必然表现出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既不像游牧民族，又不像定居民族的一些自己独具的特点”。[49]在松田寿男看来，这种过渡性受到了天山地理环境的巨大影响，“（天山）混有北部草原和南部绿洲的双重色彩，应当把它看作是呈现出中间色彩的界限”。[50]

（三）地缘关系[51]与中亚、中国新疆的分化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新疆与中亚的分化出现在14世纪30年代，“另一个主要的地缘历史分水岭出现在14世纪30年代……1333～1334年新疆从河中分离出来，新疆已经初具其现代轮廓特征”。[52]近期公布的一批波斯文史料说明，“喀什噶尔”一直是中国地理概念的一部分，“喀什噶尔属于秦斯坦，但是位于亚格玛（Yaqmā，古代称‘样磨’）、吐蕃（Tabat）、吉尔吉思（Kharkhīz，古称黠嘎思）和中国的边界上。喀什噶尔的长者们古时可能是从葛逻禄（Khallukh）或者样磨来的”。[53]在伊朗穆斯林历史学家泰伯里（MuhammadJarīr Tabarī）写的权威历史著作《诸先知与国家史》（Tārīkhal-Rasulvaal-mulūk）中，第一次把喀什噶尔称为“进入中国之门”，这本巨著在公元11世纪由萨曼王朝一位官员翻译成波斯语。[54]据潘志平先生考察，1679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佩特林经中亚出使中国，返回后向俄托波尔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大概从那时开始俄人将塔里木盆地一带称作“小布哈拉”，与中亚的“大布哈拉”相区别。[55]这已经开始把两河流域与天山南路逐步区别开来。

两河流域、七河流域与天山南路、天山北路都属于绿洲形态，而且都处于欧亚的“十字路口”。米华健在《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一书中做了一些解释，他指出新疆成为一个困扰中国中原政府的关键性问题始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朝，清廷对新疆地区的军事政治行动成为当时清朝政治机构和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而这些政治机构和

社会改革又连带地对未来的清代政治军事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朝对“最后的草原帝国”准噶尔的军事行动成为清朝一举解决西北边疆问题的关键之一。在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归属”于中国，使其地理依存度与中原关系更为密切。乾嘉时期清政府对西域史地高度重视，通过派遣人员多次勘测西域的经纬度，编纂大型的官方志书、舆图。朝野上下对西域史地比较关注，刺激了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对新疆地理空间的认识亦逐步清晰化。

帕米尔高原这一天险对中亚与中国新疆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从清王朝的立场看，要越过天山与昆仑山交界之处的帕米尔高原，以军事力量抵达费尔干纳盆地还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清藩属浩罕国长期庇护大小和卓木的后裔，屡屡掀起叛乱，侵入天山南路，烧杀掠夺，常常陷清廷于尴尬境地。清朝若劳师远征，浩罕军已经远遁；如当地驻军少，则被浩罕所灭；驻军多，则清王朝的财政不堪重负。[56]清王朝的被动局面主要受限于财政情况，19世纪中期（清代道光时期）出现了被学者称为“道光萧条”的财政危机，[57]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清廷远征浩罕的军事行动。从政治上看，以帕米尔分界的“东新疆西属国”藩属体系暴露的是中原王朝处理新疆与外藩的地缘关系原则，这也是清廷不得已的做法。

中国学者对此问题也有所体会，1944年，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阐述道：

> 从地理环境来说，新疆与中央亚细亚并无自然的确定疆界。北疆准噶尔盆地之北部，有阿尔泰山脉，成东北西南向；南部有天山山脉大体为东西向，二山之间的塔尔巴哈台山，犹如扬子江口的孤岛，不能与南北诸山发生紧密之联系。因此，在塔尔巴哈台山之南北成为准克（噶）尔盆地之二个开敞门户。由北户溯伊尔提什河而上，与南西伯利亚之鞑靼族交通。由南户溯巴尔喀什湖区而西，可与中亚之吉尔吉斯族、乌孜别克族，及里海东部之土耳其斯坦诸族畅通无阻。南疆塔里木盆地口向东，为接受内地汉族之天然门户。
>
> 西陲虽为帕米尔及兴都库什山所障绝，然溯喀什噶尔河而上，西逾旦文关（Terek Davan Pass），自古为中西之交通要道。由此而西，直达乌浒河（即阿姆河）滨与诸突厥族交通；由此而西南，经阿富汗、波斯而可直达印度，由疏勒北行，经阿林斯克雅山地，再经巴尔喀地方之Bactra古国，而至中央亚细亚及南西伯利亚，当希腊、罗马时代，为中国驮（驼）队运丝出口之要路，亦为中印近东民族文化交通之枢纽。[58]

马长寿先生对新疆史地分析是基于交通的视角，“南疆塔里木盆地口向西（东），为接受内地汉族之天然门户”。他也注意到帕米尔高原及兴都库什山对于交通的阻碍作用。塔里木盆地西高东低的地势实际上为新疆归属于中国版图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地理朝向优势。英国学者加文·汉布里也说：“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地区分成两半，这条山链起于阿富汗的赫拉特附近，终止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附近。除了新疆的维吾尔人和中国的东干人（回族）外，伊斯兰教的影响被限制在山链以西，而山链以东，则强烈地受到西藏佛教和汉文明的影响。”[59]这一观点得到潘志平先生的认同，潘氏这样写道：

> 新疆地貌大致可概括为三山夹两盆，其中天山和昆仑山巍峨高耸，这两座大山都是东西走向，天山由东向西南倾斜，昆仑山由东向西北延伸，山交汇帕米尔高原。这好比一个巨型口袋，袋底在帕米尔，而袋的开口朝东，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内地相接，交通相对方便得多，这就是新疆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内地连成一体的重要原因之一。[60]

帕米尔高原以东西分界，成为清王朝所能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区域间的分水岭和临界点。俄罗斯帝国进入中亚以后，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另一殖民帝国英国则从南面向中国新疆施加压力。清在内忧外患的交织中，国力虚耗，甚至已经难以保全伊犁将军辖下的西域版图，更无法顾及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各藩属国的利益了。在上述内外压力之下，中亚最终被俄罗斯帝国所吞并。

三 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

“西域”被用来统称今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始于汉代。据《汉书》所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不过，从传统中国到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变中，中亚诸国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彼此互为“方位”到彼此互为地缘毗邻之国的变化。在进入“世界国家之林”的历史过程中，西域作为帝国边疆的地缘政治态势被更多的认识和表述。

这些内部差异明显的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原王朝来说战略意义也不相同。相应的，中原王朝对西域不同区域采取的经营策略也因具体的历史情境有所不同。本部分探讨的正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时所采取的各种策略及其变化过程。对中原王朝经营西域战略的历史演变论述最为

集中的著作是民国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尽管这部为因应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危机”而作的论著，因不能逐一对地方史事与正统史料（主要是二十四史）进行考辨而存在不少缺憾，但仍值得参考。在该书中，曾问吾在论述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关系时，将西域分为山北（天山以北）、山南（天山以南）和岭外（葱岭以西）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中原王朝在不同区域的经营策略。[61]曾氏对西域的这一划分与上述日本西域史地学者羽田亨、松田寿男的思路基本一致，[62]在讨论中原王朝的西域经略时，本部分将借用以上述学者的划分。

（一）基本战略：通过宗藩关系建立朝贡体制

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和岭外各部的战略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处在战争状态之时，则其着力处在天山南路，若处于和平时代，中原王朝则试图对天山北路形成实际控制，进而统摄天山南路。但无论是处于战争状态还是相对和平的年代，中原王朝对岭外地区的西域均没有实际控制，而这些地区只有在感受到中原王朝的威仪之时，方选择内附。

中原王朝长期面临北方草原匈奴政权的威胁。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杀父自立，在其统治的35年间（冒顿卒于公元前174年），汉王朝忙于政权的续替、整合，匈奴势力得到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匈奴之强，空前绝后”。[63]冒顿死后，其子稽洲续立为单于，匈汉之间进入和亲与相峙的斗争格局。而与此同时，匈奴开始对天山北路的大月氏、乌孙等国用兵，迫使这些民族西迁。[64]武帝时，汉对匈奴的斗争进一步加强，除了对匈奴正面作战之外，也积极派使者沟通西域诸国，联合夹击匈奴。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张骞通西域。张骞前后三次出使西域，第一次走的是北路，被匈奴所俘获，第二次试图从中国西南经印度到达葱岭以西，联合被匈奴威胁的大月氏，乌孙等国。张骞除与西南滇国取得联系之外，并未达目的地。第三次通西域虽没有劝说乌孙国迁回陇西故地，达到牵制匈奴的目的，但乌孙献马数十匹，并遣使到长安，同时张骞也从乌孙遣使到葱岭以西的西域诸国。所有这些，均为后来汉朝联合西域诸国抗击、牵制匈奴打下了基础。[65]张骞所欲通的西域集中在葱岭以西，这主要是因为其时葱岭以东、敦煌以西的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匈奴，而“葱岭以西的西域诸国，在这个时候，虽可能与匈奴有联系，然并不受匈奴的控制，所以西汉要想越过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而与葱岭以西的西域诸国相联络”。[66]对葱岭以东役属于匈奴的部分西域国家，西

汉采取了征伐的策略。此后，东汉对西域的经略，也多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如曾问吾所言：“汉朝之经营西域，其进取方略，不外是派使节、遣将帅两大端。”[67]

汉朝的西域经略，主要根据其与匈奴的战和关系及力量对比，而采取远交近攻的手段。联合葱岭以西和天山南路的西域诸国夹击、牵制匈奴，同时打击葱岭以东、天山北路的西域诸国，以此直接削弱匈奴的力量。其经略西域的策略方式对汉以后的不少王朝产生了较为持久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时期，天山北路被鲜卑、柔然、突厥等草原游牧政权所占据。但即便如此，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在贸易、文化上的往来仍没中断。[68]其经营西域策略也继承了汉朝的远交近攻思路。对天山南路及葱岭以西采取联合策略，对天山北路诸国则采取打击态度。不过由于魏晋南北朝及隋立朝较短，没能建立起对西域的有效控制。曾问吾对此阶段中原王朝的西域经略的总结很能说明问题。兹录于下：

> 综观上述历朝之统一或割据政府，当其国势稍振时，必征讨北族，且常有事于西域；然必须先制山北之游牧强族，然后山南及岭外之诸国始能畅通无阻。如汉代至通西域，必先克伐匈奴之情形完全相似。然历朝建号不长，势力不充，经营时间亦暂，论其成绩无大起色也。如当时有强大持久如匈奴者雄踞于山北，吾恐历朝不能伸张其势力于西域诸国矣！[69]

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及其交通所达的范围极为广阔，其政治制度与文化不仅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要素，也吸纳了西域诸国政治、文化的一些成分。[70]唐朝在西域诸国中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其时中亚诸国“即以‘唐家子’称中国人”。[71]不过，与汉朝一样，唐也经历了一个与北方游牧政权长期斗争的过程。唐初，太宗在攻克东西突厥之后，又平服了天山南路的高昌、焉耆、龟兹等国，使岭外诸国纷纷来朝。[72]在相当一段时期，唐似乎实现了对天山北路、天山南路、葱岭以西的全盘经略，唐太宗也被称为“天可汗”。不过，随着突厥在天山北路重整旗鼓，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夺取天山南路部分城邦，以及大食对葱岭以西诸国的威胁，唐朝全盘经营西域的局面受到破坏。安史之乱后，唐虽借回纥兵稳住政权，但回纥居功自傲，骚扰不断，在内忧外患之下，唐最终失去了西域。

五代十国与辽宋夏金时期，中原处在一个战乱纷争的年代，但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却一直得以维系。在此期间，西域主要的政权是喀喇汗王

朝、高昌回鹘政权与于阗李氏政权；五代十国、辽、宋、夏、金与三者之间通过派驻官吏、册封或者朝贡等方式保持政治或外交上的联系。[73]

真正对中亚形成全面统治的帝国是起于草原的蒙古帝国。在完成蒙古草原的统一之后，成吉思汗开始着手中国北部边疆的统一征战。1218年成吉思汗击败契丹首领屈出律之后，塔里木河、伊犁河、伊塞克湖、楚河和恒罗斯河流域归并于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死后，其后裔拔都、窝阔台、察合台、旭兀烈、忽必烈等完成了对中亚、南俄、伊朗和中原等地区的征服，建立起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74]在美国学者巴菲尔德看来，蒙古征服中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它打破了中原与其北疆周邻的惯常关系类型”，使得传统的草原与中原的二元关系进入一个北方草原、中原农耕与东北森林的三角关系。[75]这样一来，原本在中原、草原和西域互动中完成的中国朝代循环就开始不同于此前的历史状况了。

的确，有明一代在处理边疆关系时更多注意草原以及东北满族力量的兴起，其对西域的影响不再波及葱岭之外，而是转移到东疆哈密一带，并在哈密建立卫所统辖相关地区。而与此同时，西域吐鲁番政权甚至一度侵入哈密，以至于明朝在对西域采取羁縻之策的同时，也不得不处理北部关系。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对北方残元势力的‘备御’、对其他边疆地区各民族的‘抚绥’以使王朝达到‘长治久安’，构成了明朝前期总的安边思想”。[76]清朝入主中原后，在西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政策，一方面通过朝贡贸易维持与新疆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适时出兵征服准噶尔的叛乱，同时还对厄鲁特蒙古在新疆的统治表示支持。弗莱彻认为，清朝西域政策的这种灵活性主要表现为满族皇帝在对传统“天朝上国”观念表达文化认同的同时，自己又悄悄按照草原的对外关系惯例来处理与西域诸国的关系。[77]

检视历代对西域经略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与草原游牧政权之间的关系密切，很大程度上，西域成为草原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必争之地。若游牧政权控制了西域，则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常常是远交近攻。对天山北路附属于游牧力量的西域诸国采取打击，而对天山南路、岭外诸国采取联合，在从侧翼围攻游牧力量的同时，也确保了东西之间的通道。反之，在游牧力量内附或西迁的情况下，中原王朝通常试图对西域采取全盘经略，而这种全盘战略，除了保障东西贸易通道之外，主要还是防范游牧力量的回迁。中原政权对西域经营的不稳定及其具体策略，体现的正是亚洲内陆作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过渡

地带在各自的王朝兴衰中扮演的重要作用。[78]但在这些政权中，兴起于草原的蒙古政权又不一样——其是先定西域，后击中原。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草原游牧力量与西域力量结合得最好的一次，同时也是草原力量第一次彻底统治中原地区。元以后的明清两朝在处理自身与西域关系时的策略有所改变，起初是明朝的三元关系——中原、草原与西域，后来是清的朝贡贸易与实际控制的同步实行。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关系在草原力量彻底征服中国之后，似乎开启了一些新变化。

总的说来，中原王朝对西域的基本战略是通过宗藩关系建立朝贡体制。

宗藩关系出于分封制度，是封建社会一种最主要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此种制度的出现可追溯到夏、商。随着服事理论、华夷观念的出现以及“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分封制的大规模实行”，宗藩制度在周朝时得以建立。[79]秦汉之后，随着中原一统王朝的出现，分封制只在所谓的“异族”地区执行，在所谓的“华夏”地域，则实行郡县制。随着王朝兴衰的历史进程，这一制度也有相应的改变，到中国最后的两个王朝——明清时期，宗法制度中“藩”的内涵被扩大，超越了传统宗藩关系，宗藩关系的礼仪制度也更加严密。[80]通过宗藩制度，中原王朝与各藩国之间建立起朝贡关系。

可以说，各藩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朝贡制度是宗藩关系的主要内容及形式。其本质则是以中原为中心建立和维系宗主国与各藩国之间在礼仪上的等级关系。除此之外，在这一套宗藩制度下，根据各藩国对中原文明的浸染程度和礼仪遵守程度的不同，也存在内藩（也即熟藩）与外藩（也即生藩）的划分。内藩与外藩的划分，与内服与外服的观念有紧密的关系。[81]在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以朝贡制为基本形式的宗藩关系成为中原王朝处理自身与周边关系的主要形式。在历史上，较早与中原王朝建立起宗藩关系的正是西域诸国与东方的朝鲜。有研究认为，公元前51年，随着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朝贡制度的内涵逐渐明晰。就汉匈关系而言，匈奴须朝觐、进贡、纳质；汉朝则对其上层给予相应的册封和赏赐”，[82]而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则始于隋唐时期。[83]在清朝，随着新疆地区的农业高度发展、地方贵族的衰落以及地缘政治的压力，清与西域的宗藩关系逐渐被改造为具有行省性质的政治制度，或直接行省化。随着新疆建省，新疆除少数地区之外，其余地区“率先实现了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新疆也因此成为清代唯一完成改制建省的藩部地

区”。[84]

（二）具体的制度

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不仅体现在战略思想中，也有具体的制度相辅。具体而言，这些制度和措施主要包括宗藩制度、羁縻与册封制度、通婚制度、边关贸易、人质、征伐、设关置守和以夷制夷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同朝代对西域的具体制度设置有不同，相同的制度在不同朝代的执行度也有不同。在申明这一点之后，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对这些具体制度的讨论。

在宗藩制度之外，中原王朝对西域以及其他周边所谓的“蛮族”采取羁縻与册封制度。据杨联陞的研究，羁縻策略最先被提出来讨论是在汉朝，其主要目的是处理与匈奴的关系，而“随着唐代边界地区羁縻府州的建立，羁縻成为专指一个特殊制度的用语”。[85]羁縻政策背后的观念是夷夏观念，强调“以夏变夷”的一面，在中原王朝处于统一安定的状态下此论最为流行。换句话说，羁縻政策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的儒家民族观，“正是以上述儒家民族观为理论基础，二千多年来，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关系中，统治民族（无论是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执行的民族政策的核心，就是怀柔和羁縻”。[86]此种儒家民族观与传统的“大一统”政治观念相互配合，使得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没有发生断裂。[87]不过，在清代，这个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在建构自身时遭遇到同样在建构自身世界体系的大英帝国的挑战。在一个围绕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外交礼仪争端的研究中，何伟亚指出了以儒家“怀柔远人”为核心价值观的东亚外交礼仪等级性的一面。[88]随着一种基于殖民思想的欧洲帝国殖民地体系的东进，原本与中国建立宗藩关系的国家，如朝鲜、越南、尼泊尔等纷纷从朝贡体系中脱离出去。[89]不完全彻底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羁縻政策多少以土司制度、伯克制度等在西南和西北地区残留。但随着新疆建省，这一制度在西域的历史基本上告终。

1.通婚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统治者与周边诸部落或国家的联姻似乎早在神话时代就已经存在，且通常以公主外嫁的方式与周边部落缔结婚约。但更通常的说法认为，和亲作为对外关系的方式出现在西汉，与朝贡体系的建立几乎是同时的，并相互配合。的确，在很多时候，通婚不仅是中

原王朝与西域诸国建立的一种有效的止战方式，而且也是一种相互示好的方式。

汉初，北匈奴对刘邦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据陈序经的研究，冒顿时期的北匈奴，其人口达到了150万以上，其中士卒有30万～40万人。[90]刘邦初立朝时，屡屡受到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并曾经历"白登之围"，在"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能氏，岁奉匈奴絮增酒米食物多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的条件下，终得解围。此后，和亲作为一种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帝国及西域诸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在不同时期均得到应用。在隋唐两朝，和亲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之间交好和缔结朝贡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隋唐两朝期间，分别有隋朝的光化公主与西域的吐谷浑王、华容公主与高昌王，唐朝的弘化公主与诺碣钵、唐宗室李氏与于阗王尉迟胜等建立婚约关系。[91]作为帝制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部分，和亲政策一直延续到清朝。

当然，和亲不仅发生在帝制中国与草原帝国或西域诸国之间，在草原帝国和西域诸国之间，缔结婚姻联盟也是一种常态。据相关研究，古代中国和亲有三种类型：一为中原王朝处于被动地位的消极和亲，二为中原王朝处于主动地位的积极和亲，三为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92]毫无疑问，这些婚姻关系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带来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无论是从神话传说时代算起，还是从和亲融入朝贡制度时算起，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通婚都有着观念与制度的相互配合。一方面，和亲被中原王朝认为是止战、建立朝贡关系、维持必要的礼仪外交的一种制度；另一方面，西域诸国则通过和亲获得了大量经济回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通婚，中原与西域的和平有了制度性的保障（另外一项为质子，详见下文），东西方的商道得以维持，贸易又反过来促进了彼此的文化交流。

2.关榷贸易

在中原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中，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关系是关榷贸易。一般而言，此种贸易由敌对双方选择贸易场所，然后进行贸易。此种贸易通常发生在草原政权与农耕政权战争频发的时期，大约始于唐末。五代十国以后，两宋政权与草原的辽、夏、金等都有较为频繁的关榷贸易。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关榷贸易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同时又体现了

南北在物资上彼此互补的内在本质。[93]事实上，关榷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草原政权与农耕政权之间彼此依赖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东西之间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不过，这种贸易出发点是用经济交换为政治利益服务，以有效保持中原在西域的优势地位。明朝就曾通过与西域的朝贡贸易阻止和分化蒙古贵族与西域诸国的结盟，从而减轻北部边防压力。与西域的朝贡贸易是明朝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其基本国策之一。这种性质的商业贸易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外交策略。清朝继承了明代的政策，发展与中亚的贸易关系实质上是清王朝羁縻中亚、稳定边疆的需要，因此，其政策亦多以此为出发点。清与西域诸国关榷贸易是清王朝管制下的贸易，贸易地点主要集中在与外藩毗邻的喀什噶尔（今喀什）、叶尔羌（今莎车）和阿克苏等地，而如喀喇沙尔（今焉耆）、库车、和阗等地则是不允许的。中亚属国与清朝修好时，清朝则采取开放的姿态，甚至给予关税的优惠。嘉庆时，“外藩商人在回部贸易者，三十分抽一，皮毛二十分抽一。回部商人自外藩贸易者，二十分抽一。皮毛十分抽一”，成为定制。[94]甚至有时还给予外藩以免税的优惠。中亚属国与清廷交恶时，清廷则停止关榷贸易，作为惩罚警示的手段。

3.质子

关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中的人质问题，杨联陞有过精彩的论述。据杨氏的研究，人质制度“一直存在到17世纪中叶”，其大概分为以保障两国或两个集团之间友好的“交换人质”，[95]以及为了“保障顺从和忠诚”的“单方人质”。而“单方人质”又分为“外部人质”与“内部人质”两种，前者为了保障属国的忠顺而向其索取人质，后者则主要对驻边或远征大臣索取人质，以保其忠顺。若据杨联陞的研究，中国与西域诸国之间的质子关系，无疑是属于“外部人质”，而这也是中原为保障其西域属国忠诚的有效手段之一。[96]有趣的是，在很多表述里，这种质子关系并不是索取，而是西域诸国“率子入质”。如向达在研究唐与西域关系时就写道：“贞观以来，边裔诸国率以子弟入质于唐，诸国人流寓长安者亦不一而足，西域文明及于长安，此辈预有力焉。”[97]可见，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质子作为中原与西域诸国之间关系的一种保障，在唐朝时已为双方所熟知，并有一定的共识。

4.设关置守

“设关置守”是古代中国在西域统治中另一个重要举措。公元前60

年，为抗衡匈奴在西域的力量，汉武帝成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通道，并在西域设置都护府，以此为基地补给西征汉军。“西汉西域都护，从第一任都护开始到王莽末年李崇任都护止，连续80多年，计历任都护18人……”，“上述诸官负责边防，共同维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98]而在唐代，则在西域同时设都护府与督抚州，分管天山南北绿洲与草原地带。在西域设关置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尽管明朝对西域管辖的范围大大缩小，但其也在哈密设置卫所。相关的研究表明，在西北边疆设置的卫所，似乎可成为西北城市形态的一种。[99]真正对新疆有实际控制的关守设置出现在清朝。1755～1759年先后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为了统治这片辽阔的疆土”，清朝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正式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从额尔齐斯河、斋桑泊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天山南北直至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100]不难看出，自汉代开始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以来，中原王朝一直没有放弃统辖或管理西域的制度设计。根据历史情况的不同，这些边关治所对西域的实际控制也不尽相同，有清一代，中原王朝在西域设置的机构对该地区的控制似乎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清朝设置的边疆治所在清末似乎演化为某种特别的边疆城市形制。[101]

5.“以夷制夷”

在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策略中，“以夷制夷”也是一个较为重要的观念，此种观念无疑与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关系密切。但作为一种具体策略提出来，则是在汉时朝臣讨论如何应对匈奴的时候。有研究指出，“以夷制夷”的政策大概在秦始皇统一时就开始应用，其时始皇帝“对少数民族人民及酋领给予与内地官民不同的优待”。[102]另据陈序经的研究，汉朝晁错在讨论如何抗击匈奴时，提到利用投降的匈奴将领及其他“蛮夷”来对付匈奴，陈氏认为这应该也可以算作一种以夷制夷的办法。而在隋唐时期，根据不同的情况，中原王朝分别使用了“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及“以夷治夷”等策略。[103]事实上，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历朝对边疆地区所实行的‘羁縻政策’或‘土司制度’，实质上就是‘以夷制夷’政策”。[104]“以夷制夷”的策略在有清一代似乎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举例言之，清朝在新疆哈密设置的盟旗制度，尽管看起来是为了褒扬地方政府的内附，但“更主要的还是根据边情边势的需要和哈密的实际社会状况来考虑如何治理哈密，使其日后成为统一新疆的稳固的桥头堡”。[105]显然，作为治理边疆属国的一种有效策略，“以夷制夷”得到了

历朝的重视，晚清“开眼看世界”的郭嵩焘在谈及“洋人”时，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以夷制夷”的思想，只不过“除了羁縻的老话外，在他收录自己大量诗文和奏折的文集里，似乎没有一个把洋人或外夷比成畜牲的例子”。[106]

总而言之，传统中国在处理与西域的关系时，采取了宗藩制、通婚、设关置守、贸易、质子以及“以夷制夷”等多种具体策略。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策略大多是在朝贡制度的逻辑或架构下展开的。此外，尽管上述策略呈现出一种延续，但每一个王朝根据其所面对的具体情况，采取的策略或侧重点不尽相同。而到了明清之后，部分策略要么得到强化（如设关置守），要么被废除（如清代的伯克制度改革），要么使用得更为灵活，其具体情况不一而足。

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绿洲）的态度是使其倾向于中原，而不是草原。因此，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政策上主要是以“宗藩关系”——“朝贡制度”展开，辅以变相的经济策略，基本上未对其文化和基层社会进行干预，采取非常宽松的治理方式，这也争取了大多数时期绿洲国家倾向于中原的态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草原势力。但是，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这种态度“倾向”是可变的：一是在草原强势压力下，二是在吏治腐败引发绿洲社会不满时。中原王朝在西域遇到外敌入侵等到重大事件时，常常要依靠这些绿洲国家（社会）的支持，如果这些国家不支持或者反叛，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力量就会陷入绝境之中。这反复被历史经验所证实。

到清朝道光朝时，朝廷已经开始考虑改变这一状况，一些熟悉边务的大臣提出设置民官治理的建议。但是随着国力下降，这一建议没有实施，一直等到晚清新疆时局糜烂，清廷才不得不进行行政体制的改革。

四 近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关系

1840年中西之间的海上接触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观念深受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的影响。[107]不过，即便是在以海洋交通网络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亚依然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与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通道。但随着19～20世纪俄罗斯的南下中亚、英国从印度北上中亚，中亚地区逐渐被卷入地缘政治的角逐之中。[108]而在差不多同时，清廷也在平定准噶尔盆地的叛乱以及抵抗来自中亚浩罕国的威胁，[109]并最终卷入与由英俄支持的阿古柏的战争之中。

在商讨如何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清廷朝野围绕“海防”与“塞防”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远在北京的中国皇帝及大臣发现，用“天下观”来理解西北边疆的变局，已经有很多不适宜之处，一种地缘政治的边疆意识也开始兴起。尽管有学者认为，西北边疆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朝贡体制”的想象得以延续，[110]但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以及新疆的建省，从事实上将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导向一种地缘政治关系。换句话说，在卷入英俄逐鹿中亚的斗争之后，近代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已经不同于此前的朝贡关系，而是开启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关系格局。

（一）俄罗斯、英国对中亚的竞争与中国西北边疆危机

自深谋远虑的彼得大帝掌控俄罗斯之后，俄国一直追赶着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进程，积极寻找出海口以及控制通往印度、中国的交通要道。事实上，为了控制中亚地区，确保通往印度和中国的通道，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时期就已将夺取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列入侵略扩张和夺取出海口计划的一部分，只不过其时条件不够成熟而未付诸实践。[111]直到18世纪末，为了能够较为顺畅地前往印度和中国，俄罗斯商人仍然不得不时刻提防游牧人的袭击与抢劫，并向这一地区的中亚汗国缴纳比穆斯林商人高四倍的税款。[112]在取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打通黑海等通道之后，沙俄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中亚的争夺之上。在征服浩罕国，夺取土库曼斯坦之后，沙俄基本上控制了中亚地区。[113]

显然，沙俄不是觊觎中亚的唯一帝国。早在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在海外扩张殖民地时，英国就开始谋划加入其中。在葡萄牙、西班牙等老牌帝国衰落时，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在海上争夺中崭露头角。在击败法国，夺取海上霸权之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其海外殖民地分布在美洲、亚洲、非洲，横跨东西。毫无疑问，在印度建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大英帝国在亚洲进行殖民活动的主要机构。1757年，东印度公司参与了对孟加拉的征服，“从征服孟加拉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从商人组织转化为殖民政权（同时继续是商业公司），在商业体制之外，建立了一套政治统治体制，把贸易经营和政治统治结合为一”。[11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海外殖民的英国人并不全然是商业冒险家，他们中有不少是因宗教的缘故参与海外冒险活动的。[115]

随着俄罗斯在中亚的拓展，坐镇印度的英帝国感到了威胁，为了维

系其印度的北部防线，英国积极参与中亚的竞争。19世纪，英俄两国的竞争主要围绕阿富汗展开，但20世纪初，二国之间的竞争扩大到中国西藏。[116]英国与俄国在亚洲的竞争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西亚波斯，中亚五国，中国新疆。英俄在中亚的争夺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的竞争围绕印度北部的中亚地区展开，这一阶段的竞争主要是保卫印度的北部边境。第二阶段，双方主要围绕中国新疆展开。可以说，英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大角逐，正是围绕中国新疆展开的。在喀什地区，至今还保存有两个国家建立的领事馆旧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西北边疆危机日益突出。有研究指出，在英俄对中亚的争夺中，被卷入争夺的伊朗由于在战略选择上的失策而加速了自身的衰落；[117]而在中国新疆，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清廷在疲于应对西北边疆危机的同时，却能逐渐把边疆做实。

明朝末期，天山南北的统治者均为蒙古贵族。在天山北路的统治者是厄鲁特蒙古贵族，天山南路则是察合台蒙古贵族。厄鲁特蒙古贵族与察合台系蒙古贵族对新疆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叶，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兴起才使天山南北的政治格局有较大变化。17世纪中叶，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不过在厄鲁特蒙古人及其他当地民族的支持下，乾隆帝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事实证明，在准噶尔噶尔丹的叛乱中，沙俄曾进行了挑拨。[118]此后，沙俄加紧了对中国西北边境的威胁或直接侵略。差不多同时期，英国也加紧了对中国新疆的争夺。在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入侵中国新疆后，英国与俄罗斯对其展开了争夺，试图借助阿古柏进入中国新疆。可以说，“虽然在阿古柏入侵新疆的早期，英俄双方对阿古柏的政策都不明朗，都在等待和观察，但是实际上对阿古柏的争夺却从来一点也没有放松”。[119]阿古柏在中国新疆建立的政权破坏了俄国在该地已经取得的利益，而且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阿古柏所统治的南疆与英国的印度之间似乎更有直接合作的可能。在这种背景下，阿古柏似乎也乐于和英国合作。1876年，当俄国情报搜集者到达南疆时发现“阿古柏利用英国人参与他的事务善自为谋，近年来大大改善了他的军队组织、装备和训练工作”。[120]

在俄国和英国的中亚博弈背景下，清政府先后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伊犁条约》《中俄改定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一系列条约签订后，清朝逐步进入以“条约体系”维系的国际关系网络中，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开始受到挑战，清廷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对边疆的认识及与边疆朝贡国之间

的关系。[121]19世纪末，在面对海上威胁与亚洲中国西北边疆危机时，清廷上下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要保疆卫土，但在对“海防”与“塞防”孰先孰后的认识上，朝廷上下没有达成一致。与李鸿章为首的一派人主张海防优先，而以左宗棠为首的不少人则力主西北边疆的根本作用，并最终获得清帝的支持。[122]这场辩论的展开，多少标志着中国朝野上下对边疆的认识开始具备了一种地缘政治的眼光，尽管关于这种地缘政治的认识在清朝中后期兴起的舆地学中似乎已有所表述。[123]地缘政治边疆观的兴起，与西部朝贡体系的崩溃差不多处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

（二）西部朝贡体系瓦解

传统中国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曾经形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朝贡制度。这一朝贡体系不仅兼具贸易功能，还有政治功能，同时也是维系以中原为中心的礼仪外交体系。这一源自上古的外交制度，在清朝时显得更为具体，清政府成立理藩院，分别负责管理东南部和西北部的朝贡国。[124]在清政府上述具体制度安排下，原本以象征性礼仪外交和贸易为主的朝贡制度被纳入其宗藩制度的体系之下。[125]事实上，相关研究也指出早在清代初期，朝贡制度就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满足“天朝上国”心态的虚幻外交制度了，清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其防御性的功能，使其成为维系边疆稳定和安全的制度保障。[126]与此同时，随着清代贸易通道的正常化，朝贡体系与贸易体系之间混淆的状态有所改变，朝贡制度更多体现出其政治功能的一面。[127]但在清末，朝贡制度开始逐渐瓦解。一方面，以“天下观”为基础的朝贡制度受到西方以国家为主导的外交思想的“冲击”，传统中国开始摸索加入世界之林的方式。[128]另一方面，随着海上贸易的逐渐开放以及一个以条约体系为主导的外交体系的建立，朝贡制度瓦解了。[129]

不过，上述关于朝贡制度瓦解的研究，或多或少突出了来自海上殖民帝国的影响，同时在论及朝贡体系的瓦解时，也多从考察东南或东北部的朝贡国与清朝的关系变化开始。但在西部，朝贡体系的瓦解除了受到上述诸背景因素影响之外，还有其较为特殊的原因。

清政府朝野对西部从“西域”到边疆的转变有一个系统的背景知识体系，此即发轫于清初，兴盛于道光、咸丰年间的西北史地学。在这些研究中已经涉及清对边疆的测量、防务讨论等。[130]除了从天下观向边疆

观的认识转变之外，对西域的一系列战争也使得西域诸国与中原的宗藩关系瓦解；如上文所述，在经历海防与塞防的大辩论之后，清廷朝野对西域的认识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体现出很浓的“地缘政治”色彩。与此同时，与俄国的边疆交涉不仅是清政府最早接触西方条约外交的开始，而且成为其处理海疆的经验。随着新疆建省，朝贡体系在西部基本完结。

（三）“外藩尽失”与苏联对中国新疆的影响

魏源对新疆的描述把清末西域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貌展现无遗，其将西域分为天山南北以及葱岭以西三部分的框架，在民国时期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中几乎被完整采纳。曾氏去魏源不逾百年，其思想与魏源相去也不甚远，在二者那里，西域的形象均是一个充满边疆危机的地方。的确，正如我们在上文讨论的那样，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的大博弈转移到中国新疆之后，中国新疆的确成了清廷“危险的边疆”。在清廷部分朝臣的认识中，新疆与中原的关系远胜于已经建立通商口岸的沿海诸地。与魏源同时代的左宗棠直接道出了这一批人的心声。在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写道：

>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131]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清廷遂在该处建立行省制度。新疆建省一方面是清政府面对西北边疆危机取得的一种胜利，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的清廷，在西域已经“外藩尽失”。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之后，清廷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此后中华民国的基本版图。只不过此后接管清朝疆域的民国政府与中亚面对的不再是沙俄旧帝国，而是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1.中亚成为苏联渗透中国新疆的战略桥头堡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清廷在新疆的统治也被推翻，新疆开始了其军阀当政的年代。概略来说，自1912年从旧制度中“解放”到1949年，新疆大概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杨增新统治时期（1912～1928），金树仁统治时期（1928～1933），盛世才统治时期（1933～1944）和国民党

统治时期（1944～1949），[132]总计37年。在这37年间，中国新疆周边的形势极为严峻，东面面临外蒙古的“独立”，西面则是相继建立的中亚五个苏联加盟国（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其间还有来自中亚的难民流入，成为一个“孤悬塞外”的区域。[133]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立后，英俄在中国新疆的博弈也被继承下来，其时英国希望在南疆建立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伊斯兰国家，而中亚国家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也试图以“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分裂苏联。在此种背景下，尽管苏联内部对是否趁机占领新土地，还是维持中亚旧有的边界意见不一，但出于务实的考虑，苏联选择了维持现状，借中国新疆地方势力继续与英国在中亚展开博弈。[134]在一定程度上，苏联的中亚邦国成为其向中国新疆渗透的桥头堡。

杨增新统治新疆初期，民族起义、秘密会社以及其他团体的武装活动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沙俄在北部策动蒙古的独立，“并于1913年9月借口中国士兵刺伤其阿勒泰领事事件，出兵1500余进驻承化寺，继而向该地区强行移民300多户，妄图造成对阿勒泰的实际占领”。[135]为了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杨增新在建立政权初期选择了中立，但自1920年后开始与苏联合作。尽管杨增新对苏俄中亚政策的应对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情境，[136]但在客观上使得苏联渗透到中国新疆内部成为可能。金树仁登台掌管新疆之时，正是北伐战争胜利之际，金树仁不仅要处理与杨增新政权之间的延续性问题，也要处理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英国在阿富汗、印度以及苏联在中亚的博弈局势也未改变。[137]在此背景下，金树仁选择与苏联加强合作，使得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渗透更为深入。与苏联的合作政策在盛世才时期也得到延续，盛氏甚至以结盟的方式来加强与苏联的关系。[138]1944年国民党进入新疆之后，在经过意识形态的协调和长期谈判后，也与苏联建立了同盟关系。[139]不过，正如沈志华的研究指出的那样，1944～1950年，尽管中苏在友好同盟条约的基础关系有所强化，但苏联对中国新疆实际政策的变动不居，本质上就是要确保其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影响。[140]综观苏联成立后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不难看出在清末就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得以继续延续。尽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才完全意义上取得对中亚的绝对优势，但在此期间，出于各种政治目的，苏联以其中亚加盟共和国为桥头堡，积极在中国新疆渗透其影响力，并最终使中苏关系恶化。

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新疆：美苏大国外交的“棋子”

二战期间，同盟国阵营中的美国与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渗透使该地区成为二者亚洲政策的一个外交“棋子”。美国在中国新疆的直接渗透始于1943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建立领事馆。美国领事馆建立后，在中国新疆的主要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协助运送从印度经新疆到内地的美援物资，以支持中国抗战。二是广泛结交联系新疆党政军要员和社会各族上层人士，利用驾车到南北疆各地旅行之机，搜集中国新疆，尤其是苏联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141]虽然抗战期间美国在中国新疆的活动总体上说是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但无疑会触及苏联在这一区域的经济与战略利益。1944年，三区革命爆发后，苏联展示了其在中国新疆长期渗透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强势的一面。[142]对此，美国一方面表明其不干预中国领土的态度，另一方面也积极派专业间谍进入中国新疆，加强对苏联在该地活动的情报搜集，除此之外，还派大使到莫斯科与俄罗斯交涉。[143]

当然，美苏二战期间对中国新疆的重视与该地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意义密切相关。中国新疆不仅是沟通二战中欧亚战场的通道，也是同盟国援助中国抗战的通道，还是苏联和中国战场的后方，其战略意义非同小可。[144]在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格局，美国与苏联在中国新疆的博弈更是体现无遗，随着中国的加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新疆地区出现了“三国四方”博弈的局面：

> 美国通过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新疆的影响，将新疆作为搜集苏联情报的前哨基地，并在国共内战后期，国民政府势力倾颓之时，准备自行扶持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建立起反苏反共的前沿阵地，其努力最终并未得逞。中共的人民解放军在解放西北的过程中，得到了出于前述多重目的、特别是要壮大与美国冷战对抗阵营的苏联的协助，最终提前进入并和平解放了新疆，维护了国家对新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45]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这种博弈，就不难发现在中国新疆出现的此种“三国四方”博弈的局面与此前英俄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博弈所促成的地缘政治格局颇有关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迅速崛起使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此时英国在中亚的力量已极大衰落。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利用中美同盟关系进入中国新疆制约苏联无疑是最好的时机。在中美苏的博弈中，中国新疆成为三方外交中一枚重要的棋子。

五 历史关系的总结

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关系史可大概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两个阶段。传统型关系主要指1840年前历代王朝与中亚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阶段，中国与中亚的关系主要是以和平友好的关系为主流，各方围绕建立朝贡贸易而展开礼仪、经济与政治外交。而“现代型”关系则是指在中国卷入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的地缘政治关系。在此阶段，各国间根据政治经济利益而展开合作或竞争，甚至伴随有局部战争或冲突。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种关系类型之间并非完全断裂，而是有着内部的延续性，类型的划分只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传统中国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与中亚之间关系的不同之处。事实上，中国与中亚地区关系史的延续性及层次性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将结合前文的论述对之稍做总结。

古代中国与西域之间关系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和西亚诸国之间商贸、文化交流等诸方面的互通有无的内在需求使得一条畅通的东西交流通道成为必要；二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交替的拉锯使西域诸国对草原和农耕文明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能否获得西域诸国的支持成为中原王朝与草原政权关系的节点。对中原王朝来说，与西域诸国建立一般性联系或者制度性的关系的出发点均是保证内地的安全与维系东西之间的通道。

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中原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在文化上呈现出一种以“天下观”为主导的朝贡等级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原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中配套有通婚、质子以及册封、贸易、赏赐、进贡等诸种关系。在具体策略上，儒家的外交原则是以羁縻为主，打击为辅。这种朝贡关系体现出和平主义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很强的文化等级主义，它预设朝贡国在文化上的低级以及中原王朝的至高无上，把周围的“民族”视作野蛮之人。如周伟洲所言，这种思想的“核心是以兼容并包戎狄，用夏变夷为依据，怀柔羁縻各族（四夷）。这与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政治观是相辅相成的”。[146]

此外，古代中国与西域诸国的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对西域诸国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这种区别对待主要体现在文化与政治两个方面。在文化上，儒家在处理与周边诸国关系时采取五服制度，划定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接受儒家文化较多之群体被称为内藩，反之则被称为外藩。内藩与外藩之分，虽有一定的地理因素在其中，但主导的还是儒家所持的文化等级主义；在战略上，儒家对周边民族政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远方的国家，打击地理距离更近的国家，以此牵制和防

御草原政权的发展与威胁。这种在文化上和外交策略上“内外有别”的思想，几乎成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观念。

现代型的关系出现在19世纪以降。在西方近代化的冲击之下，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社会势力和农业社会势力范围逐渐被压缩，特别是草原势力受到的削弱最大。至20世纪初，新的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出现，农业、草原、绿洲之间的多重关系逐渐变化，地缘政治取代了朝贡体系。左宗棠的名言“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即此种地缘政治观的体现。代替草原力量崛起的是俄罗斯帝国和其后的苏联。中苏之间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边界线也清晰起来。长城沿线的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和新疆天山、阿尔泰山连起来，就是中国内陆边疆的天然屏障，“以上所说诸区，地理上并无截然的界线，乃系犬牙交错之地……上述诸地带，有一种地理上的协调：即一区有变动，其他地区都受其影响”。[147]中国内陆边疆在地理空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近代中国与中亚地缘政治关系的建立，其动力有内外两个方面：首先是俄、英、美在中亚地区建立起的大国博弈格局，其次是传统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变。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围绕西亚、阿富汗以及中国新疆，英俄在中亚展开了较为持久的博弈。与此同时，由这些大国博弈所挑拨起来的地方政权的叛乱波及中国新疆，清廷进而将其改建为行省。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整个中国新疆孤悬塞外，落入军阀之手，其在英俄中亚博弈之下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也未有大的改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才转为美苏中三方的博弈。1944年，拉铁摩尔指出，19世纪英、俄竞争到20世纪中叶的冷战初期，中国新疆成为亚洲新的重心，在亚洲起着枢纽作用。[148]在此后的美苏中三方博弈中，苏联希望对亚洲输出革命，美国则希望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传入亚洲，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新疆正好处于冷战的前沿。此外，印巴北部边疆、伊朗、中国西部边疆、蒙古和苏联中亚边疆地区，还存在着民族边疆的交错、宗教及文化边疆的纷争。连同上述的国际政治边疆交互影响，其形势处于极为复杂的演变中，而中国新疆在此变化中亦居于关键地位。从亚欧腹地的地缘政治的转换来看中国新疆，其从传统的“侧翼势力”一跃而成“亚洲的枢纽”。[149]半个多世纪前这一基于冷战思维的观点在今天似乎依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亚政策的基石。

在民族国家作为主体参与的国际秩序中，国家与国家的边界成为十

分敏感的线条。它一方面维系着人们对国家整体的想象，另一方面又使得这种想象的文化整体与边界框定之下的国家难以一致。地缘政治的背景下，国家边界不断地被明确且加以监控，原本彼此重叠的文化有时可能会被切割在政治边界的两端。职是之故，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实际交通过程中，边疆总给人一种阻碍的感觉，尽管这不是事实。事实上，我们考察近现代史上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各层面时，最好的视角或许如潘志平所说的那样，是用一种区域史的眼光，[150]同时，在考察中亚这一地区时，应该从地缘政治、地域文化、地缘经济以及全球背景、区域背景和本土层面来考察。[151]

通过对中国与中亚地区关系史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历史上，中亚地区均是东西方交通的必经之地。通道的堵塞一般伴随有地区性的战争。反之，通道的通畅，则中亚地区也就相对平静，文化、物质的交流也就更频繁。在地缘政治主导中亚局势的今天，如果我们将中亚放在全球背景下来看，若位于亚欧大陆腹地的这一区域处在和平状态，则整个亚欧大陆的东西、南北通道的畅通将得以持续。在此基础上，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也当会更“通畅”。

原载潘志平等《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1] 本文系潘志平教授主持的2010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子项目之一。

[2] 潘志平、石岚：《新疆和中亚及有关的地理概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3] 〔法〕A.H.丹尼、〔法〕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芮传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第9页。

[4] 潘志平：《浩罕国与西域政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第1页。

[5] 天山山系全长2500千米，跨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中国境内有1700千米，西起乌恰县克孜河谷，东至哈密星星峡，南北宽100～400千米，总面积25万平方千米。地势东高西低，多冰川，最高峰托木尔峰在阿克苏地区，海拔7453米。

[6] 魏源：《圣武记》卷4，清道光刻本。

[7] 《汉书》卷96《西域传第六十六》。

[8] 修仲一、周轩编注《洪亮吉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第87页。

[9] 李彩云：《论清代西域诗中的天山意象》，《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10] 松田寿男（1903～1982），日本学者，专攻中国古代中西交流史及历史地理。1953年以《魏晋史书中所记载的天山各国的论证》获文学博士学位。著有《干燥亚洲文化史论》《东西亚洲的楔子》《中央亚细亚史》《亚细亚史论》《中国》《东西文化的交流》《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等。

[11] 〔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第22页。

[12] 钟广生：《新疆志稿》卷2《新疆实业志·商务》。

[13] 〔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第80页。

[14] 〔俄〕维·维·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第4～5页。

[15] 〔美〕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章巽译，中华书局，2004，第77～78页。

[16] 〔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页。

[17] 昝涛：《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http：//www.guancha.cn/zan-tao/2011_10_07_69695.shtml。

[18]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322页。

[19] 昝涛：《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http：//www.guancha.cn/zan-tao/2011_10_07_69695.shtml。

[20] 〔苏〕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242页。

[21]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10页。

[22]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01页。

[23] 〔美〕拉铁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田嘉绩译，载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135页。

[24] 〔美〕拉铁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载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

[25]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06页。

[26]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22页。

[27] 本文使用的“中国”是“中原王朝”的代名词，不是近代的民族国家概念。

[28]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21页。

[29]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21页。

[30]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20页。

[31]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20页。

[32]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20页。

[33]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27页。

[34]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50，pp.3-4.

[35]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10页。

[36] 〔日〕日野强：《伊犁纪行》，华立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第149页。

[37] 〔日〕日野强：《伊犁纪行》，第188页。

[38] 〔美〕约瑟夫·F.弗莱彻：《1368～1884年间的中国与中亚》，载〔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24页。

[39]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15页。

[40]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15页。

[41] 〔法〕莫理斯·古朗：《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亚细亚：是卡尔梅克帝国还是满洲帝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民族研究所历史室编《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第14辑（内部参考），1979。

[42] 《清高宗实录》卷555。

[43] 胡秋原：《世界史上之新疆》，载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协会编《新疆研究》，编者印行，1963，第221页。

[44] 魏良弢：《中亚封建社会特点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45] 魏良弢：《中亚封建社会特点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46] 潘志平、王智娟：《鸟瞰中亚宗教、民族之历史与现状——兼评亨廷顿的“文明模式”》，《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47]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在他所著《中国》（1877）一书中首次把“（汉代）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其实，“丝绸之路”不仅是单纯的商贸之路，也是政治之路与宗教之路。

[48] 杨建新：《论丝绸之路的产生、发展和运行机制》，《西北史地》1995年第2期。

[49] 魏良弢：《中亚封建社会特点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50] 〔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5页。

[51] 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和交往产生的人际关系。如同乡关系、邻里关系、故土观念、乡亲观念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现代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包括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明关系。本文所指的地缘关系是依照地理便利性，不同地理单元之间形成的结构关系。

[52] 〔美〕弗雷得里克·斯塔尔主编《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第二章，新疆社会科学院内部译本，第46页。该章由米华健和彼得·帕杜撰写，内容是关于19世纪末之前的新疆地区政治文化的历史。

[53] 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73页。

[54] 〔伊朗〕穆罕默德·巴格尔·乌苏吉：《波斯文献中关于喀什噶尔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的记载》，林喆译，王一丹校，《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55] 潘志平：《“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民族分裂的黑纛》，《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

[56] 潘志平：《浩罕国与西域政治》第六章“长龄、那彦成与南疆之乱”。

[57] 中国经济在19世纪出现重大逆转，从18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中国社会也出现了“19世纪的危机”。这个逆转始于道光朝，因此被称为“道光萧条”。这一概念最早由中国经济史家吴承明先生提出，对此详细进行研究的是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参见李伯重《“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58] 马松龄（长寿）：《现代新疆之民族》，转引自王欣《马长寿先生的边政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59] 〔英〕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6页。

[60] 潘志平：《归属于中华文化圈的新疆》，《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1]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7。

[62] 可参见〔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

[63]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86页。

[64]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205～211页。

[65]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256～268页。

[66]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46页。

[67]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46页。

[68] 马志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69]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89页。

[70]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第1～5页。

[7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5页。

[72] 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92～103页。

[73] 赵荣织：《纷乱时期中原封建王朝对西域的管辖》，《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74]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项英杰校，商务印书馆，2010，第301、323～366页。

[75] 〔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293页。

[76] 侯丕勋：《哈密国："三立三绝"与明朝对土鲁番的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77] 〔美〕约瑟夫·F.弗莱彻：《1368～1884年间的中国与中亚》，载〔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32页。

[78]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02～323页。

[79]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第11～15页。

[80]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第19页。

[81] 〔美〕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美〕费正清编《中国的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19页。

[82]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第16～17页。

[83] 付百臣主编《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84]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第316～318页。

[85] 〔美〕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6～27页。

[86] 周伟洲：《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87] 周伟洲：《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88] 〔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89] 谢俊美：《宗藩政治的瓦解及其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90]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189～190页。

[91] 崔明德：《汉唐和亲史稿》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第83～98页。

[92] 朱振杰：《中国历史上和亲的类型及作用》，《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93] 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9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转引自贾建飞《浅析乾嘉时期中亚与南疆的贸易》，《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95] 〔美〕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彭刚、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39～40页。

[96] 〔美〕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第39～40页。

[97]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6页。

[98]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第48页。

[99] 张友庭：《晋藩屏翰：山西宁武关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100]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第416页。

[101] 黄达远：《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演化及其当代启示》，《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102] 李干芬：《略论历代封建王朝的“以夷制夷”政策》，《广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103]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215页。

[104] 李干芬：《略论历代封建王朝的“以夷制夷”政策》，《广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105] 黄达远：《试论清代哈密回旗》，《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106] 〔美〕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8页。

[107]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里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108] 王治来：《中亚史》，人民出版社，2010，第208～225页。

[109] 潘志平：《归属于中华文化圈的新疆》，《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年第1期。

[110] 林孝庭：《朝贡制度与历史想像：两百年来的中国与坎巨堤（1761～196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

[111] 王治来：《中亚史》，第214页。

[112] 王治来：《中亚史》，第207页。

[113] 王治来：《中亚史》，第14～15章。

[114]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1页；包奕诚：《从贸易到征服——论1813年以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活动》，《南亚研究》1989年第3期。

[115] 邵政达、姜守明：《近代早期英国海外殖民的宗教动因》，《历史教学（高校版）》2012年第12期。

[116] 韩建萍：《试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与俄国在中亚争夺中的印度因素》，《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17] 张传琳：《论19世纪前期英俄中亚争霸中的伊朗战略》，《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118]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编《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第46～58、102～107页。

[119] 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黑龙江出版社，2014，第107页。

[120] 〔俄〕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转引自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第141页。

[121]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第336～342页。

[122] 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刘新华、秦仪：《略论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以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23]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贾建飞：《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124] J.K. Fairbank and S.Y.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6，No.2，1941，pp.158-168.

[125] 参见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

[126] 陈尚胜：《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27] 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128] 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29] 详见喻常森《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272～284页。

[13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转引自贾建飞《浅析乾嘉时期中亚与南疆的贸易》，《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131]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清光绪刻本。

[132] 白振声、〔日〕鲤渊信一编著《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191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前言，第4页。

[133] 潘志平：《新疆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载氏著《亚洲腹地地缘政治文化研究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第201～203页。

[134] 刘丹：《论苏联时期中亚与中国新疆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35] 白振声、〔日〕鲤渊信一编著《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第55页。

[136] 谢承国：《论杨增新对苏俄中亚政策的演变》，《江汉论坛》2001年第8期。

[137] 白振声、〔日〕鲤渊信一编著《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第151～153页。

[138] 朱杨桂、赵广平：《苏联与盛世才结盟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汉文版）1997年第3期。

[139] 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40]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41] 袁澍：《美国驻新疆领事馆始末》，《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14辑——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2008。

[142] 徐玉圻、顿时春：《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

[143] 许建英：《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中国新疆政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44] 陈香苓：《试论新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145] 史宏飞、白建才：《论20世纪40年代中美苏三国在中国新疆的博弈》，《史学集刊》2012年第4期。

[146] 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古》，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第238页。

[147]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30页。

[148]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pp.3-4.

[149] 许建英：《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150] 潘志平：《地区史或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载氏著《亚洲腹地地缘政治文化研究文集》，第255～270页。

[151] 潘志平：《考察中亚局势的理论模式——考量的因素、分析的层面、“博弈”、“大三角”》，载氏著《亚洲腹地地缘政治文化研究文集》，第115～128页。

第一批探险家

欧文·拉铁摩尔[1]著 李磊鑫[2]译

译者导言

本文《第一批探险家》（*The First Explorers*）是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与其夫人埃莉诺·拉铁摩尔合著的《丝绸、香料与帝国：从探险家眼里看亚洲》（*Silks，Spices and Empire：Asia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Discoverers*，以下简称《丝绸、香料与帝国》）一书的第一章。该书收入“伟大的探险家系列”（The Great Explorers Series），1968年由Delacorte Press在美国出版，又于1973年在英国由Universal-Tandem Publishing Co. Ltd出版印行。本文根据1973年Universal-Tandem Publishing Co. Ltd版翻译。

《第一批探险家》为全书的总括，带有绪论性质。拉铁摩尔在此章中由一次在蒙古的实地踏勘经历引出对“发现和探索亚洲”的讨论。他首先简要介绍了早期人类“发现亚洲”的活动与文本记录的形成。接着特别指出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失真”，由此强调文本与实地考察对照的必要性。随后他回顾了历史上中西两个方向对亚洲的“发现”记载，交代了该书选择的文本记录的来源、主题与选择标准。最后，对“亚洲”的定义做了一定阐释和限定。整篇文章贯穿了作者对历史连续性、变化性的思考与强调，同时对全书的安排及基本情况做了交代。

《丝绸、香料与帝国》一书是拉铁摩尔夫妇的第二部合著。[3]在写作分工上，欧文·拉铁摩尔撰写了第一章和其他章节的导语部分，埃莉诺·拉铁摩尔则负责各章节摘录材料的挑选、组织、汇编。[4]该书正文分为六章，各章基本由拉铁摩尔的导语及前人有关亚洲的著述选段组成。

从写作背景来看，19世纪60年代的拉铁摩尔刚踉跄走出麦卡锡时代的阴影，无论是对自身学术还是对人生都有了进一步的思考。经历了四十年的亚洲内陆边疆研究，业已奠定学术地位的拉铁摩尔，再次审读当年阅读过的经典作品，在很多方面应当都有新的见解，因此他们夫妇选择在《丝绸、香料与帝国》一书中与读者分享，使得这本书更像是一本内容丰富、点评深刻、刺激人思考的“亚洲探险家精选集”。

拉铁摩尔的学术经历是向后来者强调田野考察重要性的绝佳范例，但由《丝绸、香料与帝国》一书的编排形式、内容可以看出，拉铁摩尔依然强调经典著作的阅读，强调与前人的对话。他在该书“后记”中提醒读者说：“我们得到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建议——在阅读有关旅行的老故事时，我们不仅可以从了解人们曾经认为他们知道的事情中得到乐趣，而且还可以从了解我们现在知道的不真实或部分真实的事情中得到乐趣；但我们也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以应对偶然的冲击和刺激，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原来是错误的，或者是需要一些新的思考的。”[5]这或许就是拉铁摩尔夫妇写作编订这本书的初衷之一——向更多人介绍遥远的亚洲和伟大的探险家们，鼓励人们既要有敢于探索的精神并从中享受乐趣，又要进行思辨。

从学术背景来看，拉铁摩尔的学术研究是亲身游历与广泛汲取前人学术成果的结合。在谈到第一次进行亚洲内陆旅行时，他说：“我们的行装极简单……读了斯坦因（Sir A. Stein）的《中国沙漠废墟记》、亨廷顿（E. Huntington）的《亚洲的脉搏》、贾鲁瑟（D. Carruthers）的《未知的蒙古》……以及其他书籍。”[6]无疑，这些经典著作部分奠定了拉铁摩尔的学术基础，其早年的历史视野也在阅读中形塑。但如果仅止于此，拉铁摩尔同样难以突破由中世纪以来的东方旅行者、传教士译介的历史文献所“搭建”起来的西方“亚洲知识体系”与固化的“亚洲想象”。在与前人“对话”、参看各家著作，最重要的是长时间亲身游历以后，拉铁摩尔夫妇感到“某些问题的资料并不完全正确”，[7]“尚待研究与发现的东西还有很多”，[8]而这些正是拉铁摩尔此后从事亚洲内陆研究的动力源。他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序中回忆写作过程说：“有一部分内容是先有旅行见闻，之后又参考各家著作而成。有些部分则是先从读书受到启发，进而在旅行中更加留意去观察。”[9]可见，互参正是拉铁摩尔治学的重要方法与心得。从《丝绸、香料与帝国》的具体内容来看，以时间为顺序，以不同的主题划分章节，内容均摘录自“亚洲探险家们”的经典著作中，不少书正是拉铁摩尔早年阅读的、构建其“亚洲知识体系”的一些著作。而摘引这些经典作品的目的正是要传达“作者对发现的第一手叙述比后期的二次写作（Rewritten）更为有趣——尽管在时间和地理空间上相距甚远”[10]这一主题。

通过拉铁摩尔的学术著作纵观他的学术历程，其最早的《通向中亚的荒漠道路》《高地鞑靼》是其学术生涯的开端，更多的是游历见闻的提炼，创见多在地理学等方面，且较具区域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沿着他

所仰慕的探险家们的足迹，将文本与田野相印证而产出的成果。拉铁摩尔于1932年出版的《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则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拉铁摩尔在该书的写作中跨出了一定区域范围，由各国互竞的现实情况引出了对亚洲东部地缘政治的思考，可谓其历史视野阔度的一次飞跃。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或可称作其边疆学说的大成之作，在该书中拉铁摩尔已明显地开始进行理论总结，较为完整地阐释了他的边疆观，提出了“过渡地带”等经典论断，并从“边疆反观中国”。在该书中，拉铁摩尔一是将之前曾分区域探讨的新疆、蒙古、满洲等地统括在中国的长城边疆之下，既分析各地区的独特性，又关注整个长城边疆的整体性及各边疆地区间的交互性，从而对整个中国的边疆地带、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边疆发展情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二是把整个中国放在亚洲之内，从陆、海两个方向审视中国、亚洲，以世界史上交替出现的大陆和海洋时代来解释中国与其大陆边疆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地关系的新表现，[11]由陆权、海权两种概念分析最近的亚洲局势，[12]这种方法在其之后的著作中有进一步探讨。由此两点观之，一为统合，一为放大，由区域到整体，自中国到亚洲，内亚视角已然形成，视域范围进一步扩展。该书出版恰逢其时，“被纳入当时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地缘政治语境中加以解读”，[13]政界、新闻界、学界对其学说的热烈反应或进一步促进了拉铁摩尔将自身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国际形势的研判相结合。随着战争的进行，拉铁摩尔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评论，强调必须重视亚洲（特别是中国）对于二战的重要性。此后陆续出版的《亚洲的决策》（1945）、《亚洲的局势》（1949）、《亚洲的枢纽：新疆与中国和俄国的亚洲腹地边疆》（1950）等著作均体现了拉铁摩尔在亚洲地缘政治大变动的背景下对内陆亚洲未来走向的再思考，拉铁摩尔在著作中更是做出了一些富有预见性的判断，对当时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提出了建议，反观这些论断，或有助于认清美国亚洲政策的一些根源。这时，拉铁摩尔的关注重心便有转移到新疆、蒙古的迹象，[14]而后更是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蒙古研究。考其原因，一是由于麦卡锡风波的影响，拉铁摩尔很难有继续研究中国的条件；[15]二是在中国局势的变动，英、日传统势力的退出，美、俄大国博弈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中亚（外蒙古、新疆）等地再次成为内陆亚洲地区的枢纽、核心，吸引了已较多从地缘政治角度思考问题的拉铁摩尔；三是作为“蒙古通”的拉铁摩尔一直致力于蒙古史地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为举世所公认之权威”[16]，有强烈的研究情结与深厚的学术积淀，因此他在最艰苦的情况下选择继续从事中亚（特别是蒙古）研究。拉铁摩尔晚年仍时常前往中

亚、蒙古等地游历，并当选为蒙古科学院外籍院士，获“北极勋章”，蒙古研究一直是他学术研究最后阶段的主题。

拉铁摩尔一生的核心关切从未离开亚洲，而对亚洲的关切没有离开过中国。他曾说“如果中国的情况好起来，那末亚洲的情况也会好起来；如果中国的情况坏下去，那末亚洲的情况也会坏下去”。[17]对于这样一位与中国关联极深而又充满学术创见的“边疆人”，我们应当有更深入的了解与研究。拉铁摩尔是一名著作颇丰的学者，即便是被视为其代表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也只能部分代表他在边疆研究方面的成就，更遑论他研究地缘政治、国际问题走向的诸多著作。他的作品具有变化性、阶段性的特点。因此要认识其学术成果的全貌，仍需更努力的译介工作。

长于中国的拉铁摩尔，青年时追寻着数千年来亚洲探险家的脚步开启了内陆亚洲研究之路。而在该书中，他和夫人再次品读这些熟悉的文字，将学术成果向读者分享以待来者。由丝绸之路始，又似乎再次回到起点，拉铁摩尔凭借他的学术成就完全有资格加入他所敬慕的“伟大的亚洲探险家”队伍之中。

正文

由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建造的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18]，其遗址就坐落在离鄂尔浑河[19]源头不远的地方。这里还有稍晚一些的额尔德尼召佛寺遗址[20]，在蒙古帝国灭亡后被中国人所摧毁。在当地人的视线范围内，今天的中国人根据一项对蒙古的经济援助计划修建了一座大坝，用于供电和引水灌溉，这也恢复了这片广袤的牧地上的、在中世纪曾环绕这座古城的农业绿洲。这个地区历史悠久。突厥人曾在8世纪时统治鄂尔浑，这里到处都可以找到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匈奴人或早期匈奴人的墓葬。

不过，这片土地也有更古老的历史。在大坝下方不远的地方，这条河流环绕的一处隆突处，上面是一块自然平整的台地。1961年夏天，我和我的妻子与蒙古国科学院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纳·色尔-奥德札布（Ser-Ojav）[21]，以及苏联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奥克拉德尼科夫（A. P. Okladnikov）[22]进行了交谈，后者拥有从中国、蒙古到北极的田野经验。奥克拉德尼科夫说，这里是他所见过的古生物学发现最丰富的遗址，虽然还没有发现人类的骨骼，但其中一些工具可以与大约50万年前

的北京人的工具相媲美。它们也能和另一个方向（的发现）匹配上。“这里，看看这些，”奥克拉德尼科夫说道，“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放到一家法国博物馆的展架上，甚至馆长本人都不能断定它们不是当地所发现的。”

我问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遗址的。“这很容易，”奥克拉德尼科夫说，“在欧洲的冰川时期末期，蒙古或西伯利亚东部的地面尚未被冰雪覆盖。相反，这里曾经降水丰沛，河流也比现在要大得多。旧石器时代的人，更多的是渔民而非猎人，而这个三面都临河的平台，显然是一个钓鱼平台和营地。随后我们发现了别的迹象。来看看吧。”他带着我们走了大约50码（1码约为0.9米——译者注），来到一条小溪汇入鄂尔浑河的地方。河岸上密布的灌木丛上绑着白色的碎布——这是萨满教崇拜的残余。“就在那些灌木丛下面，”奥克拉德尼科夫说道，“有一汪矿泉。直到现在，当地的蒙古人还认为它有魔力，饮用泉水来治病。也许自旧石器时代起，它就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从其他遗址可以得知，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像我们一样对矿泉和普通泉水的区别有所了解。因此，当我们在50码的范围内发现一汪矿泉和一处天然渔场营地，我们便知道只需挖就行了。”

蒙古北部的这些新发现提醒着我们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许多环节已经丢失或尚未被重新发现，但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连串的关联。开始寻找北京人的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由所发现的一颗牙齿开启了他的探索之旅。[23]在描述并分析其特征后，他以自身科学声誉作保，宣称这是原始人，而非某种类人猿的牙齿。原因是其具有现代男性罕见，但在中国北方更常见的一个特征（该牙齿为铲形门齿[24]）。

由于来自四方的征服，除北京猿人之外，今天的北京人还有许多祖先，但事实是北京猿人是他们的祖先之一，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历史中的两个因素——连续性和变化性。“欧洲”“亚洲”“旧世界”“新世界”是基于观念而相对较新的定义。早在这些思想存在之前，原始人类就遍布整个世界。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狩猎、捕鱼和采集可食用的植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做出了革命性的改变，从采集野草的颗粒状种子（小麦、黍类和稻的前身）变为种植和收获谷物。

第二个革命性的改变是从猎杀野生动物到驯养它们，这使得人类能够选择某一些动物屠宰作为食物，另一些动物则提供奶，还有一些动物用来运输人类自己和他的动产。随着这些变化，“发现和探索”变得愈加

复杂。曾经，为了寻找更好的狩猎场或有水果、浆果、可食用的根茎或草籽的地方，人类群体间有过偶遇。到了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社会组织更为复杂，更大群体的人类有秩序地流动，驱赶着他们的牧群，用牲畜或马车运送他们的物品，然后发现他们迁徙的道路在各处被已定居下来的农业社区挡住了。后者的村庄和城市强大到可抵御外敌，工匠们在此生产陶器、纺织品和后来的金属制品，这些东西可用于贸易而不必再进行战争。相反，随着人口的增长，定居下来的人类扩大了他们的领土，并将其发展为王国和国家。一个国家的规模、繁荣程度和历史持续时间是由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相互影响而成的。

最终出现在历史上的地理概念，来自从内、从外对它的模糊边界的发现。从内部来说，史前中国人是亚洲最早的探险家之一，他们从黄河大峡谷的家园中出发，发现并占领了南部和西部的土地，并通过战争和贸易占领了西北部的土地。

从考古记录来看，很明显亚洲的其他人也很早就开始“发现亚洲”了，亚北极和远东南亚的产品在沿海地区被相继发现，说明他们是从那里深入遥远的内陆。不仅有贸易货物的流动，还有人类本身的流动。偶尔在中国沿海地区能发现一些人的体貌特征（包括卷曲的头发），表明他们与印度洋的马来半岛和安达曼群岛的一些人有密切关系。

当“发现与探索”开始有记录时，它首先并非书面记录。而是关于旅行者故事的传说、商人之间口口相传的有用知识，以及远征战士的自夸，或失败的悲剧和灾难；然后出现的书面记录，不仅保存了所有这些类型的知识，还加入了新知识、新报告和新传闻的章节。不论早期还是后期的内容，在这些记录中都保留了其独特之处。有时，被传递的“知识”是错误的信息，这是因为它在从一个又一个说话者传递给一个又一个听者的过程中被误解或歪曲了。但有时它是误导性的，信息被刻意模糊了，因为有很多知识是“知情者”（比如商人、战士、牧师、统治者）想要以一种只有“知情者”才能完全理解的形式来保存和传递。

早期中国人发现亚洲新地区的记录有几种。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在现存最古老的中国文字“甲骨文”上，列出了中国人显然认为“非中国人”的部落名称。有时有线索暗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比如当部落的名字上有“羊”的标志时，表明他们是牧羊人。一个悠久传统从此开始：中国人经常以“狗”或“昆虫”标记他们不喜欢或鄙视的民族名字。到公元前4世

纪，出现了关于蒙古游牧民族的描述，以及不容易确定年代的、神话般的关于西北之旅的模糊的早期传说。然后，在西汉王朝的伟大帝国时期，出现了被称为“中国希罗多德”和“中国历史之父”的司马迁的历史回忆录（《史记》）。他重述了他所知道的历史传说和记录；他亲自在中国境内到处游历，参观历史名胜，收集并保存了其他比他走得更远的人的记述，比如中国向中亚扩张的先驱——张骞。

从西方来看，对亚洲最早的约略提及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25]，他写过“居住在亚洲的游牧的斯基泰人”，及关于亚历山大征服最远地方的记录。后来的罗马作家则有更全面的记述。

第二章和第三章涉及两个早期的发现流向——分别始于中国和罗马。在后来的几个世纪，特别是12世纪之后，随着贸易和外交的增长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的热情，记录变得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从这些丰富的文学作品中选择摘录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选择引用的记录时，我们试图按时间顺序涵盖有记载以来的，从公元前到20世纪初的所有时间，并在地理上覆盖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我们也尽量收录各种各样的主题和风格的作品。因此，虽然有些读者可能不会对我们的全部选段都感兴趣，但我们相信大家会喜欢其中的许多选段，而且多数读者会对大部分的选段感兴趣。

我们必须对“亚洲”做出自己的定义。这样的定义一直都是武断的。我们仍然谈论“小亚细亚”（Asia Minor），但“大亚细亚”（Asia Major）这个术语已经不再使用了——除了作为学术出版物的标题。“近东”（Near East）、“中东”（Middle East）和“远东”（Far East）首先是表示与地中海东端距离增加程度的术语。其次，它们是可变术语。有些人谈到“中亚”（Central Asia）时，其实包括了其他人认为在“中东”一词下所包含的一些领土。“南亚”（South Asia）和“东南亚”（South east Asia）也是不精确的术语。再次，所有这些术语都是相对的。例如，从中国看，近东可以被称为远西（Far West）的开端。

就本书而言，我们的定义部分地受以下事实的支配：它是“伟大的探险家”系列中的一本。亚历山大·莱恩（Alexander Laing）[26]关于太平洋的书涵盖了除东南亚以外的地区。瑞斯·卡本特（Rhys Carpenter）[27]的书介绍了希罗多德（Herodotus）以及他以后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亚历山大时代的人对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接近印度的地区的

了解。本书中我们定义的亚洲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包括中国和俄属中亚以及中亚和印度之间的山区。它还在较小程度上包括了日本。

尽管在本书中我们将仅处理书面记录，但当我们开始时最好回忆一下，即使是最早的书面记录也只是数千年前开始的一个过程的延续——早在那时候人类就有了在言语中交流知识，情感和思想的能力。我们所处的时代开始于中国和罗马已经是伟大帝国的时代。那时，伟大的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作为部落迁徙和商人交换货物的路线，货物的交换如此频繁，但最遥远的买家和卖家却互不相识。当时丝绸贸易还尚未成为主导。丝绸是一种商品，其商业价值在外交上和经济上都得到了广泛的体现。这就是我们叙事的开始。

[1]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边疆史学家。有在中国北方三大边区、中亚地区长期游历的经历。通过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实地踏勘考察，拉铁摩尔针对边疆问题发表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一套边疆理论。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拉铁摩尔其人及其边疆理论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介绍其人其说的有陈君静《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章永俊《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黄达远《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张友庭《民族与历史——读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读书》2015年第8期等。另有不少对拉铁摩尔边疆思想相关理论、学说具体展开研究的文章，兹不赘述。

[2] 李磊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3] 夫妇二人的第一部合著作品为《现代中国的形成》（修订版即《中国简明史》）。参见袁剑整理的《拉铁摩尔著述目录》，载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13～243页。

[4] J.杭锦、U.鄂敏《欧文·拉铁摩尔年谱简编》称，《丝绸、香料与帝国》一书是从《亚洲》《欧洲人的“亚洲发现者”》两书中选编内容而成。该文原载国际蒙古学协会《通讯》1990年第2期，徐维高之译文刊于《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2年第2期。

[5] Owen and Eleanor Lattimore，*Silks*，*Spices and Empire*：*Asia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Discoverers*，London：Universal-Tandem Publishing Co. Ltd，1973，p.331.

[6]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1页。

[7]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页。

[8]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页。

[9]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页。

[10] Owen and Eleanor Lattimore，*Silks*，*Spices and Empire*：*Asia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Discoverers*，Introduction，p.ix.

[11]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4页。

[12] 拉铁摩尔认为陆权与海权的概念最多只能用来分析强权政治，历史的真正根源还需要真正探讨（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5页）。但在涉及最近局势、地缘政治、国际格局走向等问题时他依然使用两种概念来分析，这与他强调从历史的地理条件、各区域差异等方面探讨长城边疆历史的根源并不相悖。

[13] 袁剑：《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以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14] 这里是指有这样的表现，并非认为拉铁摩尔的“内亚观”从“中国中心论”转向“以蒙古为中心”，研究重心不同于研究中心，重点论不等于中心论。

[15] 拉铁摩尔曾同时受到冷战双方的指控，即使在指控撤销后也长时间笼罩在阴影之下，这时他自然不适合继续研究中国问题等敏感领域。

[16] 林超：《拉铁摩尔论蒙古史之地理因素》，《边政公论》1947年第4期。

[17] 〔美〕拉铁摩尔夫妇：《中国简明史》，陈芳芝、林幼琪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3页。

[18] 简称和林。元太宗窝阔台于1235年建，原为大蒙古国都城。位置在今蒙古国西南前杭爱省哈拉和林。

[19] 为今蒙古色楞格河支流之一，发源于今蒙古杭爱山东段，流入贝加尔湖。其上游地区历代为漠北游牧民族活动之中心。

[20] 按：原文作Erdeni Tso，结合前后文此寺似应为额尔德尼召（Erdene Zuu）。该寺建立在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的废墟上，位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384公里，据乌云毕力格先生考证建于1585年。

[21] 纳·色尔-奥德札布（Namsaraigiin Ser-Odjab，1923-1990），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突厥考古。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致力于蒙古高原突厥文物考古研究和发掘工作。其与多国学者一道在蒙古国开展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成果丰硕。60年代他与捷克学者合作挖掘阙特勤墓地，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著作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突厥文物》《蒙古古代史》等。按：原文中作者仅提到这位历史、考古学家名为Ser-Ojav，蒙黄达远教授多方查找，方能对这一位蒙古人民共和国老一辈学者的姓名、简要生平做出解释，特此致谢。

[22] 奥克拉德尼科夫（A. P. Okladnikov），苏联考古学家，主要从事贝加尔湖

沿岸至东面沿海地区的考古研究。

[23] 步达生，本名戴维森·布莱克（Davidson Black），1926年受瑞典人安特生委托研究一颗古人类的前臼齿。次年，他参加周口店挖掘工作，又发现一颗人类臼齿，他随后在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北京中国人”这一学名。

[24] 门齿的一种类型。其形态特征是门齿齿冠舌侧面近中缘与远中缘各有一明显的唇形嵴，致使齿冠舌侧面出现一个明显的窝，形如铁铲，故称铲形门齿。铲形门齿在蒙古人种中的出现概率较高，故被视为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之一。

[25] 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4 ~ 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后世称其为“史学之父”。

[26] 亚历山大·莱恩（1903 ~ 1976），美国作家、学者、编辑，因其关于海洋的著作而著称。

[27] 著有《越过赫拉克勒斯的柱子》（*Beyond the Pillars of Hercules*），同样收入“伟大的探险家系列”。

后记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长期以来深受“欧洲中心观”的影响。1978年，世界史奠基者之一的武汉大学吴于廑先生在《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一文中指出这一弊端：“中古时代早、中、后三期的划分，就完全是按西欧封建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来规定分期的界限。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历史，从公元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一千二百年的世界历史，都按照这个三阶段的框框，一块一块地给镶嵌进去。……这样做法之不足取，举一个例即可以说明……能不能把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这一规模广阔的扩张活动恰好框在西欧封建社会发展中期的那个格格里。关于这一扩张活动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和意义，我怕我们今天的认识并不完整。”[1]我们必须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分期来思考蒙元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以中国经验讨论和认识世界史的“历史过程论”。[2]40多年过去了，吴先生的意见至今还有巨大的启示性。

中亚史、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一直纠缠于“西北与中亚”的关系问题，二者近代以来分属不同的主权国家和话语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下，如果要打通中国西北与中亚之间的历史关联，迫切需要在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中总结和归纳出新的理论和概念工具。随着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与进步，前贤与时贤的学术成果已经对欧洲中心观与中原中心观进行了“清理”，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011年，昝涛的《地缘与文明：建立对中亚的常识性认识》（收入本书）不再使用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定义中亚，也突破了将中亚放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下的“均质化”面向，在时间、空间、文明、政治多维的互动过程中，将“中亚”嵌入欧亚历史空间中，中原只是作为其中一个分析维度。这一成果，在对欧亚史视野下的中亚“历史过程论”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突破，这是对吴于廑先生提出的世界史问题的一个回应。此外，杨成、施展、袁剑等一批中青年学者从概念史、区域史、全球史、人类学、历史哲学等方面联通“西北与中亚”的工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产生了一批有冲击力、影响力的成果，充分体现了学界的努力与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吴于廑先生提出的世界史的“历史过程论”问题的当代回应。

目前学界同时在积极推进对中亚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帝国史、王朝史的断代研究，或者对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研究，也在不断推出新的成果，这些成果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中亚的历史认识。新的中亚“历史过程论”与这些中亚研究成果有机结合，有可能会对“中国世界史”的“历史过程”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尽管每一步的学术探索都非常艰辛，可谓筚路蓝缕，但在全球化不断拓展的前提下，我们不能总是借助于西方早期的社会科学概念工具来认识自己和世界，因此，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和必要的。另外，在中亚史，中国西北边疆史、西北民族史之间，也需要学科融通与问题意识的联通。历史与当代问题之间也亟待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由于传统的学科边界，我们在给研究生上课时也备感吃力。因此，就有了选编本书的想法。

本书的作者是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从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等不同的知识领域和学科范畴出发进行研讨，学科虽然跨界，问题意识却是相通（或相似）的，一些论文也在不同学术会议上进行过交流讨论。这些论文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在收入本书中都做了相应的说明。在选编本书的过程中，各位作者慨然允诺提供相关成果，短期内完成了组稿工作，在此向各位作者一并表示感谢。但由于各位作者的学科背景和话语范式并不一致，定书名时颇感踌躇。因为在采用区域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上，尚有某种共识，故书名定为《区域视野下的中亚研究：范式与转向》。这还不能完全含纳各位作者的观点和立场，尚祈读者见谅。因个别论文发表时间较早，无法做整体修改，另外限于篇幅，还有很多学术上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未能选入，深感遗憾。

陕西师范大学相关单位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社长郑庆寰和编辑陈肖寒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谨致谢忱！我们期待读者和相关专业人士对本书提出批评意见。同时，我们也想请读者一起来思考1978年吴于廑先生提出的“新世界史”的问题：破除自古以来就有的各种中心论，必须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史的编写，当然离不开国别史、地区史以及各类专史，离开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研究成果，世界史的编写就将失去必要的依据，但是也必须看到，世界史并不等于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3]尽管中国西北边疆与中亚周边的关系在“新世界史”中具有优先地位，但由于还有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工作尚待完成，这还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本书也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1] 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

[2] 王学典指出，传统的五阶段的社会形态说存在着不可替代的缺陷，抛弃这些不准确的概念不能把“概念化”也抛弃，而应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理论与方法，重新抽象出一套概念，以建立中国的“历史过程论”。参见王学典《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39～43页。

[3] 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视野下的中亚研究：范式与转向/黄达远，李如东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

（九色鹿）

ISBN 978-7-5201-6724-6

I.①区… II.①黄…②李… III.①中亚-历史-研究 IV.①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91963号

·九色鹿·

区域视野下的中亚研究：范式与转向

主编/黄达远 李如东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宋超 陈肖寒 梁赟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9 字数：377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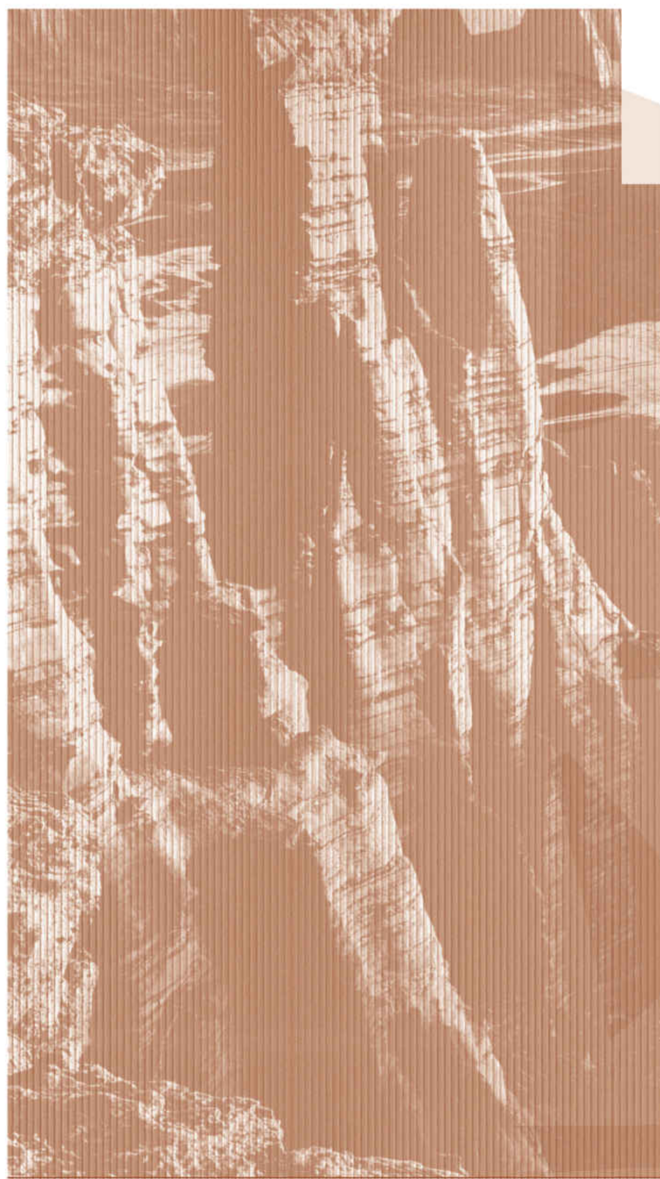
版次/2020年7月第1版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724-6

定价/108.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区域视野下的中亚研究

范式与转向



出版社官方微信

九色鹿



www.ssap.com.cn

ISBN 978-7-5201-6724-6



定价：108.80 元

九色鹿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
帖木儿朝时期的
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
中亚诸地

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

[英]G.勒·斯特兰奇（G.Le Strange）著
韩中义 译注 何志龙 校订

THE LANDS OF EASTERN CALIPHATE:
Mesopotamia, Persia and Central Asia
From the Moslem Conquest
To the Time of Timu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斯特兰奇，著名东方学家，1854年7月24日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出版译著、编著与著述等10余部，不少著作至今为学者所用。其主要著作有：《穆斯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Palestine Under the Moslems: A Description of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from AD. 650 to 1500*）、《叙利亚、巴勒斯坦的记载》（*Description of Syria, Including Palestine*）、《阿巴思王朝统治下的报达城》（*Baghdād under the Abbasid Caliphate*）、《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Qulūb*）、《西班牙民歌》（*Spanish ballads*）、《克拉维约东使记》（*Embassy to Tamerlane, 1403-1406*）。从这些著作来看，斯特兰奇涉及了东方学，尤其是阿拉伯、波斯方面的诸多领域，特别是对阿拉伯、波斯历史地理有独到的研究，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权威的学术地位，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杰出东方学家之一。//

大食东部
历史地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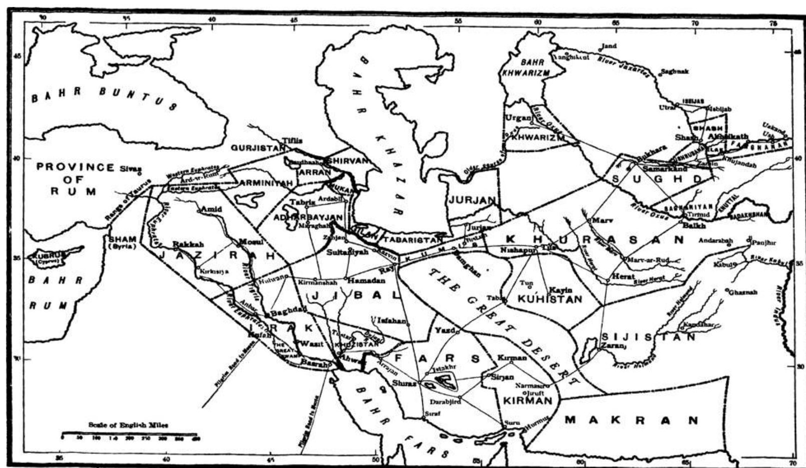
——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
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诸地

The Lands of Eastern Caliphate: Mesopotamia, Persia, and Central Asia From the Moslem Conquest to the time of Timur

[英] G.勒・斯特兰奇（G. Le Strange）著

韩中义　译注　何志龙　校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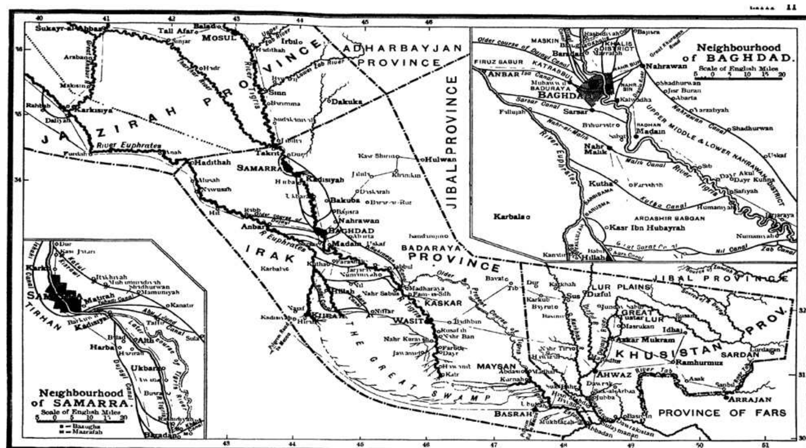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E PROVINCES OF THE ABBASID CALIPHATE, SHOWING THE CHIEF HIGH ROA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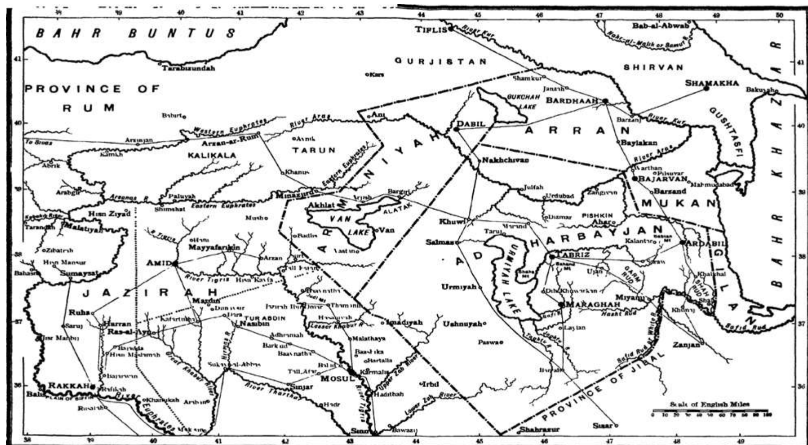
图一



PROVINCES OF IRAK KHUZISTAN AND PART OF JAZIRA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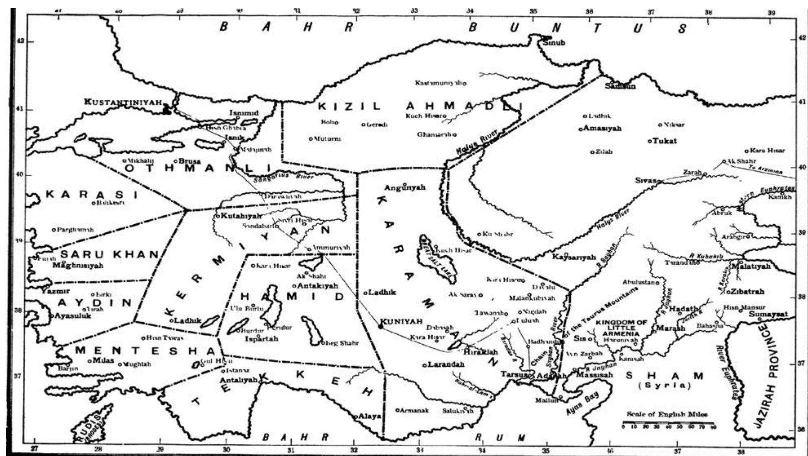


图二



PROVINCES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WITH JAZIRAH AND ADHARBAYJAN

图三



PROVINCE OF R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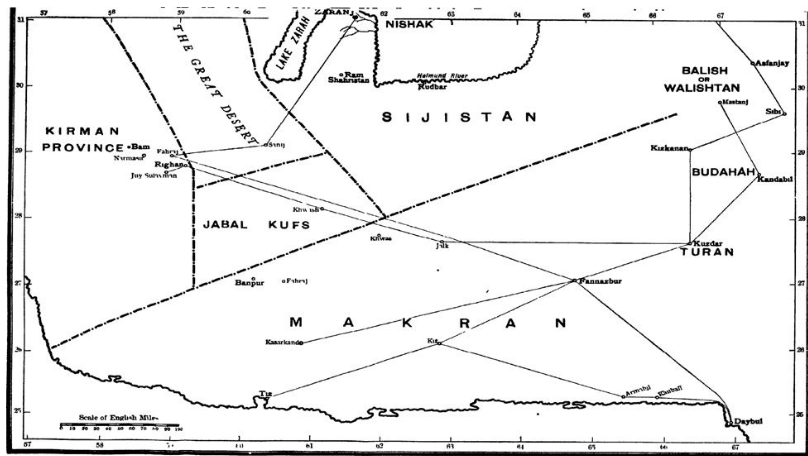
图四

PROVINCES OF JIBAL AND JILAN, WITH MAZANDARAN, KUMIS, AND JURJ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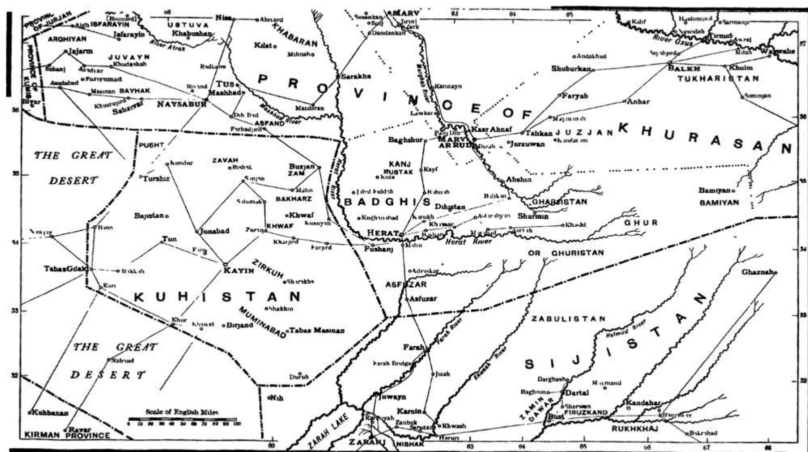
图五

PROVINCES OF FARS AND KIR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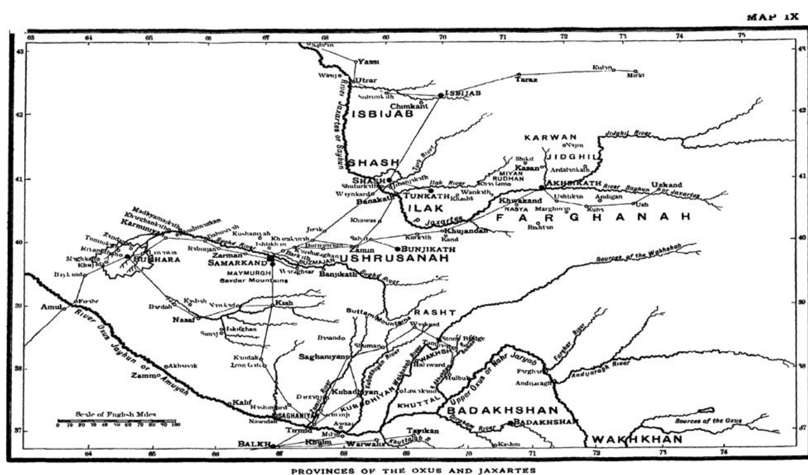
图六


PROVINCE OF MAKRAN, WITH PART OF SIJISTAN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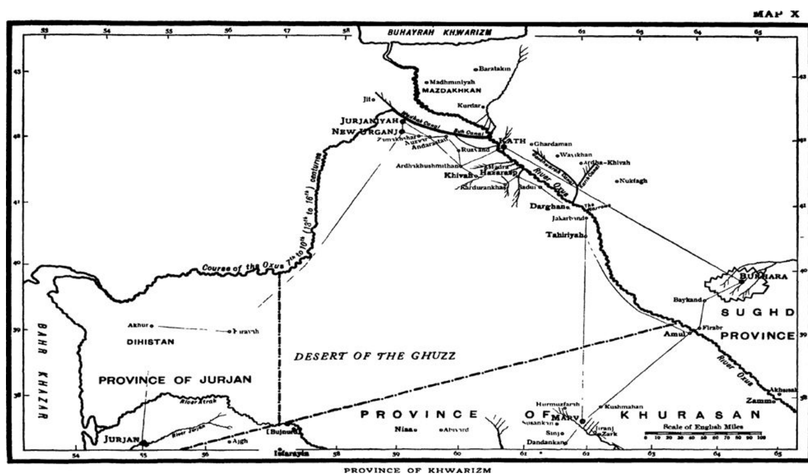

PROVINCES OF KUHISTAN, KHURASAN, AND PART OF SIJISTAN

图八



PROVINCES OF THE OXUS AND JAXARTES

图九



PROVINCE OF KHWARIZM

图十

译者序言

一 斯特兰奇（**Guy Le Strange**）生平与著作

斯特兰奇，是英国著名的研究阿拉伯、波斯的东方学家，1854年7月24出生于英国东英格兰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地区诺福克（Norfolk）郡亨斯坦顿（Hunstanton）镇，1933年12月24日去世，享年79岁。青年时期，他立志成为一位语言学家，并主攻阿拉伯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斯特兰奇出版译著、编著与著述等十余部，不少著作至今为学者所重视。其主要著作有以下数种：1870年出版了《穆斯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Palestine Under the Moslems*：*A Description of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From A.D. 650 to 1500*），该书主要摘编、翻译了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对巴勒斯坦的记载，是斯特兰奇的代表作之一。该书曾于 1890年、1965年、1975年、1993年、2006年、2007年再版，可见其影响之大。1882年他与哈格德（W. H. D. Haggard）合译出版了法斯赫·阿里（Fath `Alī Ākhund-zādah）的《兰库兰的宰相—一出波斯戏剧》（*The Vazīr of Lankurān*，*a Persian Play*）。1883年他和爱德华·亨利·帕尔默（Edward Henry Palmer）合编，在特吕布纳公司（Trübner & Co.）出版了《简明英语波斯语辞典》（*A Concise Dictionary*，*English-Persian*；*Together with a Simplified Grammar of the Persian Language*）。1892年出版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记载》（*Description of Syria*，*including Palestine*），主要翻译和注释了穆喀达斯（Mukaddasī）著作中的相关记载。1893年出版了《穿越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旅行记》（*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Syria and Palestine*），主要翻译和注释了纳思儿·忽思罗（Abū Mu`īn Nasīrb Khusrau）所著《旅行记》（*Safar Nameh*）中对叙利亚、巴勒斯坦的记载。1900年由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出版了《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报达城》（*Baghdād under the Abbasid Caliphate*）。这部著作是斯特兰奇的代表作之一，影响深远，并先后于1924年、2001年、2004年、2005年再版。1905年出版了《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诸地》（*The Lands of*

Eastern Caliphate：Mesopotamia，Persia，and Central Asia From the Moslem Conquest to the Time of Timur）。这就是现在要奉献给读者的书，在后文中将进行详细介绍。1919年翻译出版了《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Qulūb*）。1920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班牙民歌》（*Spanish Ballads*）。1921年他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合作，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里黑（Ibnul-Balkhī）的《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波斯语）。1926年伦敦路透出版社（G. Routledge）出版了由他翻译的兀鲁支伯（Uruch Beg）的《波斯的唐璜：1560~1604年什叶派出身的天主教徒》（*Don Juan of Persia，a Shi`ah Catholic，1560-1604*）。这部书主要记述波斯的历史、社会生活、作者的旅行经历。1928年伦敦路透出版社出版了由他翻译的《克拉维约东使记》（*Embassy to Tamerlane，1403-1406*）。除了上述著作外，还有一些其他著述，此处略之。

从这些著作来看，斯特兰奇的研究涉及东方学，尤其是阿拉伯、波斯方面的诸多领域，其在阿拉伯、波斯历史地理方面有独到的研究，这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权威地位，他也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之一。直到今天，凡是在阿拉伯、波斯历史地理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均要参考他所撰写或翻译的著作，由此体现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广泛影响。

二 翻译说明

1.历史地理研究最为切要的是地名。本书翻译中，凡是第一次出现的专有名词在括号内均保留了原文名称，以备查阅。有些与希腊语对应的专有名词，原著中只出现一次的，不做音译，仅保留原文转写。对每个专有名词，尤其是王朝、著名人物、生僻名词做了注释。注释采用简注和详注两种方式。简注的目的是便于一般读者了解本书的内容，这类注释力求简明扼要，通常不注明所参考的文献；详注主要是为了补充文献和进行学术性考证。这些文献包括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希腊语等文献，以及其他新出版的文献。本书通过使用这些文献来补充原著中不大注意的材料，并与其他文献比勘，起到对原著做适当补白的作用。

2.原著的引文。译者力求做到充分核对原著所采用的原始文献，尤其是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献。为此，译者收集了原著所使用的绝大部分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等文献。译者虽业力有限，但力求通过核对原始文献，使译文更加准确，尤其是地名。

3.专有名词的翻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此，学术界已做过探讨，且主张有所不同。有的主张所有的专业术语或专有名称均译为现代通用的名称。这种翻译方法为一般读者的确提供了不少方便，但不符合传统的翻译方式，也无法与我国文献中记录的内容相对应参照。因此，学术著作的翻译一般不采用这种方法。也有的主张，所译文献须遵法前人，拟古而译。这种翻译方法对古代文献，尤其对汉文文献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今天大部分汉译学术著作，尤其是与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献相关的著作多采用后一种翻译方法。但这种翻译方法过于拟法古人或前人，甚至在遇到今天出现的名称时也采用生僻字或古名称。显然，这种做法容易引起混乱，也不符合真实的历史。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名从主人的原则，也就是今名采用现在通行的翻译方法；古代名称，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名称尽量采用古名，但这些古名在不同时代的文献里写法不一定一致。出现这种情形时，尽量采用常见的古名称，而将其他名称罗列于注释里，以便读者查阅或核对。如果在我国文献中没有原著中出现的古名称，则根据古代汉文文献或以前学者习惯采用的字词音译，而不采用现代通行音译所使用的字词。有些古名称沿用至今的，仍采用古名称，但在注释和索引中将今名体现出来。采用古名称而不采用现代通行名称的目的是：让读者在中国古代文献的语境和时代特点中去了解当时大食东部的历史地理状况；使读者了解这一区域与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之间的关系；继承前人成果，以示对冯承钧、韩儒林、张广达等先生的敬仰。但有些地名没有按中国古代文献所见进行音译，其原因是对这些名称的对译，学术界存在异议，或有疑问。为了谨慎起见，译者将按原文音译出来，再将相关汉文文献在注释中列出，方便学者进一步研究。

4.为便于读者核对，将译文与原著相对照，译文中将原文页码放入［ ］内。为了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有些句子的语序做了适当的调整，以使语句文理更为通顺。

5.原著作者使用里程单位时，有些混乱。有时采用波斯语名称单位，有时采用阿拉伯语名称单位，有时采用英制名称单位。面对这种状况，译者一般将第一次出现的原文里程单位保留于译文括号内，并做简要的注释和公制单位换算，以便于读者了解。原著使用的英里（mile）译成通行的名称，但通过作者引用的文献来看，英里和阿拉伯里是等同的。按照一般规则，原始文献中的专有名称是不应该改动的，但作者做了改动，因此在作者所使用的阿拉伯语文献中使用了英里或英制单位。

这似乎不符合学术研究的通行规则，但为了保持该书的原貌，译者没有擅自改动原著中的里程单位，请读者留意。

6.原著作者在使用历法时，按西方学者的传统做法以伊斯兰历为主，以公历为辅。笔者在翻译时以作者的纪年为准，并在括号内标注公元纪年。在译文注释中一般使用公元纪年。如使用其他纪年方式，则注明公元纪年。

7.转写原著的专有名词时，一般保留了原著的转写形式，但在原著中有些字母之下加了点，为了方便，译者则将加点改变成加横线。此外，在有些阿拉伯语、波斯语字母的转写方面，作者所处的时代与现在有些差异。

8.阿拉伯名词（al）中大部分的冠词没有进行翻译，但有些冠词翻译了，如凡·埃思·思乐赫（Fam-as-Silh）。凡是注释中注明“译者”字样的为译者所注，其他为原著作者所注。

9.阿拉伯人或者波斯人的著述中对最大的地方行政单位名称的记录是不一致的，有的使用Walāyat、Bilad、Astān或其他名称，原著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献时，翻译成Province（省），但原始文献中不是采用一种名称来称呼最大的地方行政单位的。阿拉伯帝国时代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食东部行政区划与我国古代相似，分州、郡县（区）、村（乡）。因此译者将Province（省）译成了“地区”，而没有译成“省”。

10.原著中保留了部分阿拉伯语、波斯语专有名称的原来名称。如原著第5章第70页的Nahr Nasr，译者翻译为“纳赫儿·纳儿思运河”。其实，Nahr就有“运河、河流”的含义，比较合适的翻译应是“纳儿思运河”，但为了与原著的转写相符，译者就采用了这种“床上架床”的办法。译者对有些专有名词做了意译，但将原文附在括号里，以便查阅，如原著第5章第71页的“磨坊运河”（Nahr Abu Rahā）。有些专有名词所指和时间很不明确，如Caliphate（哈里发王朝），这给翻译带来了困难。

11.有些无法查找或不能与现今地名对应的地名，只能存疑。

三 原著注释人名、书名省称简补

具体为：

1.A. F. 即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

2.A. G. 即Abu-l-Ghāzī（阿布·勒·噶兹），著有《突厥世系》（*History of the Turks and Mongols*），英译本于1838年在伦敦出版。汉译本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3.A. Y. 即`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

4.Balādhurī（巴拉祖里）著有《征服诸地》（*Kitāb Futuh al-Buldān*），也译为《征服各地史》（*Book of the Conquests*），由德·古耶教授编辑，1866年莱登出版。希提在英译本中将其译为《穆斯林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State*），1916年纽约出版。1987年在贝鲁特又出版了阿拉伯语文本。

5.EI即《伊斯兰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旧版），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

6.Fakhrī，更准确的名字为Ibn-at-Tiktakā（法赫里），著有《法赫里论统治者的道德和伊斯兰王朝的兴废》（*al-Fakhrī fi`l-Adab al-Sultānīya wa`l-Dowal al-Islāmīya*），由阿赫尔瓦尔德特（Ahlwardt）编辑，格达出版（Gotha，1860）。英译本名称为《法赫里》（*Al-Fakhrī*），于1947年在伦敦出版。

7.F. N. 即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

8.Hamzah Isfahānī（哈木札·亦思法汗尼）著有《编年史》（*Tārīkh Payāmbarān ash-Shāhān*），由哥特沃尔德（I. M. E. Gottwaldt）编辑，1844年莱比锡出版。

9.Hfz. 即Hāfiz Abrū（哈菲兹·阿卜鲁），著有《地理学》，此书只有抄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引的就是大英博物馆的东方抄本，编号为1577。此外，他还著有《诸史精华》（*Zubdat at-Tawarikh*）。2001年德黑兰出版了四卷本的《诸史精华》。

10.Ibn-al-Athīr（伊本·阿喜儿），著有十卷本《全史》（*al-Kāmil fī at-Tārīkh*），由多伦博格（Tornberg）编辑，1867～1876年莱登出版。1965年贝鲁特出版了十一卷本的《全史》。

11.I. B. 即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

12.Ibn Bībī（伊本·比比），著有《塞尔柱史》（*Recueil de Text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s Seljoucides*，III），收入《有关塞尔柱历史文本选集》（*Recueil de Textes Relatifs a l`Histoire des Seljoucides*）的第三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886年出版。

13.Ibn Ibrahīm，又称作Muhammad Ibrāhīm，或Muhammad ibn Ibrāhīm（伊本·易卜剌欣），著有《塞尔柱历史》（*Histoire des Seljoucides du Kerman*），收入豪茨麦（Houtsma）教授编辑的《有关塞尔柱历史文本选集》的第一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886年出版。

14.Ibn Khaldūn（伊本·赫尔顿），著有《历史绪论》（*Muqaddimah*），伊斯兰历1284年（1867年）由埃及布拉克（Bulaq）出版社出版。196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历史绪论》。201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

15.Ibn Khallikān（伊本·哈里坎），著有《人物词典》（*Wafayāt al-A`yān wa-Anbā`Abnā `az-Zamān*），由乌斯坦菲尔德（Wüstenfeld）编辑，1837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英译本由德·斯兰（De Slane）翻译完成，东方翻译基金资助，1843年伦敦出版。

16.Ibn Mashkuwayh（麻实库维）著有《麻实库维历史》，收入德·

古耶教授编辑的《阿拉伯部分历史文献》（*Fragmenta Historicorum Arabicorum*），1871年莱登出版。

17.Idr. 即Idrīsī（伊德里思），著有《诸地风土记》（*Kitāb Nuzhat al-Mushtāq fī Ikhtirāq*）（直译为《远足者渴望穿越世界各地的快乐》），伊德里思的著作由 A.于贝尔特翻译为法文，于1836年在巴黎出版。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引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所藏阿拉伯文抄本（Manuscrits Arabes），编号为2221和2222。此书于1970年、1984年由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编辑出版。

18.I. F. 即Ibn-al-Fakīh（伊本·阿勒·法吉赫），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五卷。

19.I. H. 即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

20.I. J. 即 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i`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

21.I. K. 即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

22.I. R. 即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

23.I. S. 即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

24.Ist. 即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1]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

25.J. N. 即*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

26.J. R. A. S.即*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lreland*，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27.J. R. G. S.即*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

28.Kaz. 即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

29.Khwāndamīr（赫万达密尔）著有波斯语历史著作《旅程的喜悦》（*Habīb as-Sayār*），伊斯兰历1273年（1857年）于孟买出版石印本。2004年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译本。

30.Kud. 即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2]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

31.Mar. 即*Marāsid*［《观察》（*Al-Marāsid-al-Ittilā*）］，是亚库特所著《地理学词典》的摘要本，由优博尔（Juyboll）编辑，1852年莱登出版。

32.Mas. 即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3.Mirkhwānd，或Amirkhwand（密儿哈万）著有波斯文历史著作《纯洁的花园》（*Rawdat-as-Safā*），伊斯兰历1266年（1850年）于孟买（Bombay）出版石印本。

34.Mst. 即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

35.Muk. 即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

36.N. K. 即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

37.Sanī`-ad-Dawlah（萨尼·道剌），著有《地区之鉴》（*Mirāt-al-Buldān*），德黑兰石印本，伊斯兰历1294年（1877年）出版。

38.Tabarī（塔巴里），著有多卷本历史巨著《诸使徒和诸王的历史》（*Tārīkh al-Rusul wa al-Mulūk*），由德·古耶教授编辑，1879～1901年莱登出版。该书已翻译成英文出版。

39.Yak. 即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

40.Ykb. 即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3]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

41.Z. D. M. G.即*Th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德国东方学会杂志》）。

四 主要内容

《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诸地》一书是G.勒·斯特兰奇的代表作之一，也可能是其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由作者参考第一手的穆斯林地理学家著述撰写而成，至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在翻译成的中文译稿使用了1905年初版、1930年重印的版本。该书的第一章是绪论，对阿拔斯王朝统治的伊拉克（亦剌可）地区、朝觐道路、呼罗珊道、巴格达（报达）以东地区、巴格达北部地区做了概述。第二章到第五章详细考察了伊拉克地区，即下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特征、城市历史演变、城市状况、人文环境、道路交通、河流分布、水利状况、经济贸易、物产分布等。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考察了贾兹剌地区，即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区域划分、城市分布、河流状况、山脉走向、自然特征、人文环境、道路体系、地区物产等。第八章重点叙述了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的自然环境、河流分布、主要城市、道路交通、名胜古迹、地区产品、商业往来等。第九章和第十章主要考察了小亚细亚（鲁迷）的地理环境、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与疆域、塞尔柱人与突厥蛮统治、主要城市、道路交通、名胜古迹、人文状况、河流分布、物产状况等。第十一章主要考察了阿塞拜疆（阿札拜占）的地理状况、河流分布、湖泊特征、城市分布、人文环境、道路交通、物产分布、商业往来等。第十二章主要考察了歧兰、木干、阿兰、设里汪、格鲁吉亚（谷儿只）、亚美

尼亚（阿剌蛮）等地区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城市分布、道路交通、人文景观、河流分布、山脉走向、物产状况等。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主要考察了吉八儿（伊朗西部）地区的自然特征、区域划分、城市分布、商业状况、河流分布、山脉走向、运河体系、城市防御、道路交通、物产状况等。第十六章主要考察了胡齐斯坦（忽兹思田）不同区域的河流分布、城市状况、名胜古迹、运河体系、道路交通等。第十七章至第二十章主要考察了法儿思（法尔斯）地区的地理特征、主要城市、湖泊分布、河流状况、道路交通、名胜古迹、物产状况等。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二章主要叙述了克尔曼（起儿漫）地区的区域划分、城市分布、名胜古迹、道路交通等。第二十三章主要考察了“大沙漠”和麻可兰的地理特征、主要城市、波斯湾沿岸的港口、商业活动、道路交通、地区产品等。第二十四章主要探讨了昔吉思田（伊朗东南部、阿富汗西南部）地区的城市分布、河流与运河、矿产资源、道路交通、物产状况等。第二十五章主要考察了苦黑思田（伊朗中东部）地区的地理特征、城市分布、名胜古迹、河流与湖泊、道路交通、物产状况等。第二十六章主要研究了苦密思（塞姆南）、陀拔思单（马赞德兰）和朱里章（戈尔甘）地区的地理环境、城市分布、河流分布、道路交通、里海及其沿岸的港口等。第二十七至三十章主要考察了呼罗珊地区的地理特征、所属地区的专区、主要城市、名胜古迹、河流分布、商业往来、人文环境、物产与矿产、道路体系等。第三十一章主要考察了阿姆河（乌浒水）流域（上游）地区的重要河流、城市分布、名胜古迹、山脉分布、商业贸易、道路交通、物产状况、乌古思河特征等。第三十二章主要研究了花剌子模（阿姆河、锡尔河下游）地区的自然特征、城市分布、运河体系、道路交通、物产状况等。第三十三章主要考察了粟特（塔吉克斯坦北部、乌兹别克斯坦中东部）地区的主要城市、防御长城、粟特河状况、河水灌溉、道路交通、物产状况等。第三十四章主要探讨了锡尔河（药杀水）流域地区的主要河流、城市状况、湖泊分布、商业贸易、道路交通、物产状况等。

[1] 多位阿拉伯地理学家采用过《道里邦国志》之名。

[2] 《道里邦国志》和《税册》有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这两本书的汉译本由宋岘翻译，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

[3] 《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这种书名的著作很多，直译就是《各地区之书》，是阿拉伯舆地书籍乐于采用的名称。

引文作者或著作简称及编撰时间

简称	人名	伊斯兰历	公历
I. K.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250	864
Kud.	Kudāmah（库达玛）	266	880
Ykb.	Ya`kūbī（雅忽比）	278	891
I. S.	Ibn Serapion（伊本・塞剌皮昂）	290	903
I. R.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	290	903
I. F.	Ibn-al-Fakīh（伊本・阿勒・法吉赫）	290	903
Mas.	Mas`udi（马苏迪）	332	943
Ist.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	340	951
I. H.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	367	978
Muk.	Mukaddasī（穆喀达斯）	375	985
N. K.	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	438	1047
F. N.	*Fārs Nāmah*（《法儿思志》）	500	1107
Idr.	Idrīsī（伊德里思）	548	1154
I. J.	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	580	1184
Yak.	Yākūt（亚库特）	623	1225
Kaz.	Kazvīnī（可疾云尼）	674	1275
Mar.	*Marākid*（《观察》）	700	1300
A. F.	Abu-l-Fidā（阿布・勒・费达）	721	1321
Mst.	Mustawfī（穆思套菲）	740	1340
I. B.	Ibn Bakūtah（伊本・白图泰）	756	1355
Hfz.	Hāfiz Abrū（哈菲兹・阿卜鲁）	820	1417
A. Y.	`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	828	1425
J. N.	*Jahān Numā*（《世界志》）	1010	1600
A. G.	Abu-l-Ghāzī（阿布・勒・噶兹）	1014	1604

前言

本书试图将散见于中世纪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1]等历史地理著作者的记述搜罗起来，并做适当编排。这些内容主要记述了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及其邻近的中亚地区的历史地理情况。本书所引用文献的作者生活在从早期穆斯林到帖木儿（最后一位中亚征服者）去世时期，即通常所说的15世纪亚洲中世纪结束之时这段时间，记述了各地历史地理的状况。

现在付梓的这部著作是我对1900年出版的《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报达城》（*Baghdād Under the Abbasid Caliphate*）一书的补充，同时也是对撰写《穆斯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Palestine Under the Muslems*，1890年出版）一书所收集地理文献的延展。

为了让本书保持适中的篇幅，我略去了阿拉伯地理文献所记载的两座圣城，即麦加和麦地那的相关内容，但两城在阿拔斯王朝[2]境内是最为重要之地。此外，学者也已关注到了这一内容，且比我了解更丰富的资料，同时业已撰写了有关法蒂玛哈里发（Fātimid Caliphs）王朝[3]统治下，包括埃及在内跨红海地区的阿拉伯历史地理著作；还完成了有关北非穆斯林诸地及西部短暂而辉煌的西班牙哈里发王朝[4]的文献的收集工作。

如果有人对穆斯林史产生兴趣，并想有深入了解，那就必须全面掌握中世纪近东的历史地理。我企图初步尝试，但首先必须承认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做得比现在这部著作更好。为此，我给将来的研究者已打下了前期基础；本书中每段引用的文献都做了脚注；对先前著述者的讹误做了校勘，此书绪论部分全方位叙述了阿拔斯王朝各地的地理状况。但我的著作仅是个概要，也未达到研究殆尽的程度；同时，为了保持适当的篇幅，我仅简略地翻译了穆斯林著述者所写的各地道里志。在这（道里志）方面，有部新本子，其参考了新近校勘的阿拉伯文献，值得参阅，这就是斯普林格尔（Sprenger）的《东方的邮传与干道》（*Die*

Post und Reise Routen des Orients）[5]。在道里志内容翻译中，尽管德·古耶（De Goeje）教授（编有《阿拉伯舆地丛刊》）在附录中收录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dbih）和库达玛（Kudāmah）的法文译本，但其中仍有诸多不足。

我的著作提到了文献论述中有关每个地区贸易和产品的信息，但这些内容相当分散；至于对中世纪东部穆斯林地区物产方面进行全面研究的有A. 冯·科勒摩尔（A. von Kremer）所著的《东方文化史》（*Culturgeschi-chte des Orients*）[6]一书，其在《产品与贸易》（*Handel und Gewerbe*）这一专章中做了深入的讨论，就我所知是这方面研究最好的。

穆斯林地理学家的名称用首写字母按年代顺序注明于目录之后的附表，以备参考。其他参考文献第一次引用时就会在注释中注全其名称和作者，因此，后文中如果想查找相关信息，检索前文的注释，就可找到首次提到的文献名称。

本书绪论中简要介绍了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作，但相关的内容我已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一书中做了详细的讨论。

本书日期采用伊斯兰历（Hijirah）[7]，并在括号内注出了相应的公元纪年。无需赘言，本书所采用的转写方法是常规方法，但要注意的是阿拉伯语中的w音在波斯语中常发v音；除了重音z外，阿拉伯文字母dh和d在现代波斯语中均发z音，而阿拉伯语字母th在波斯语中发s音。

在引用东方文献的著作中无疑会发现很多谬误，同样，本书因使用了大量参考文献，一些疏漏不可避免，因此我由衷希望方家批评指正，或指出我所忽视的问题。

我希望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果本书被更全面的研究著述取而代之，那么本书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即为更进一步研究准备了条件。

G. 勒·斯特兰奇（G. Le Strange）

意大利佛罗伦萨

1905年5月

[1] 察合台语、文，或奥斯曼突厥语、文，后文同。译者。

[2] 阿拔斯王朝（Abbasids，750～1258年）是由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后裔阿布·阿拔斯建立的，我国史籍称之为黑衣大食。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达到全盛时期，9世纪中叶以后，阿拔斯王朝大权旁落，中央权力削弱，导致政治上的分裂。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报达城，该王朝名存实亡，哈里发仅是其他王朝的荣誉首脑。1258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末代哈里发被杀。译者。

[3] 法蒂玛王朝（Fātimid，909～1171年）为北非封建王朝，我国史籍称之为绿衣大食。西方文献又名南萨拉森帝国，是以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之名命名的。909年，伊斯兰教什叶派首领奥贝都剌（Ubayd Allah）在突尼斯以法蒂玛和阿里的后裔自居，自称哈里发，建都马赫迪亚，攻打摩洛哥的伊德里斯王朝，征服摩洛哥，并进而占领整个马格里布（即北非）。969年哈里发穆伊兹（Ma'ad al-Muizz）派部将乔海尔征服埃及，973年迁都开罗。1171年法蒂玛王朝大臣萨剌丁在近卫军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阿迪德，建立阿尤布王朝，于是法蒂玛王朝灭亡。译者。

[4] 后倭马亚王朝（756～1031年），建都于西班牙科尔多瓦城。建立者为被阿拔斯王朝推翻的倭马亚王朝家族的剌赫曼（Rahman）。译者。

[5] 1864年莱比锡出版。译者。

[6] 1877年维也纳出版。译者。

[7] 伊斯兰历（Hijirah）是穆斯林使用的一种历法，以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移（Hajrah）到麦地那为元年。伊斯兰历是一种纯粹的阴历，以公元622年7月16日为伊斯兰教历的元年1月1日，完全以月相为准，每当新月出现定为每月的第1日，12个月为1年，不设闰月，闰年于第12个月后加1天，平均每年只有354天8小时48分，每隔2. 7年和公历相差1个月，因此换算比较复杂。伊斯兰历曾被称作回回历、回历、穆斯林历，如今这些名称已废弃不用。译者。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亦剌可（`Irāk）地区
- 第三章 亦剌可（`Irāk）地区（续）
- 第四章 亦剌可（`Irāk）地区（续）
- 第五章 亦剌可（`Irāk）地区（续）
- 第六章 贾兹剌（Jazīrah）地区
- 第七章 贾兹剌（Jazīrah）地区（续）
- 第八章 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The Upper Euphrates）
- 第九章 鲁迷或小亚细亚（Rūm or Asia Minor）地区
- 第十章 鲁迷（Rūm）地区（续）
- 第十一章 阿札拜占（Adharbāyjān）地区
- 第十二章 歧兰地区和西北诸地（Gīlān and The North-West Provinces）
- 第十三章 吉八儿（Jibāl）地区
- 第十四章 吉八儿（Jibāl）地区（续）
- 第十五章 吉八儿（Jibāl）地区（续）
- 第十六章 忽兹思田（Khūzistān）地区
- 第十七章 法儿思（Fārs）地区
- 第十八章 法儿思（Fārs）地区（续）
- 第十九章 法儿思（Fārs）地区（续）
- 第二十章 法儿思（Fārs）地区（续）
- 第二十一章 起儿漫（Kirmān）地区
- 第二十二章 起儿漫（Kirmān）地区（续）
- 第二十三章 “大沙漠”和麻可兰（The Great Desert and Makrān）地区
- 第二十四章 昔吉思田（Sijistān）地区
- 第二十五章 苦黑思田（Kūhistān）地区
- 第二十六章 苦密思（Kūmis）、陀拔思单（Tabaristān）和朱里章（Jurjān）等地区
- 第二十七章 呼罗珊（Khurāsān）地区
- 第二十八章 呼罗珊（Khurāsān）地区（续）
- 第二十九章 呼罗珊（Khurāsān）地区（续）
- 第三十章 呼罗珊（Khurāsān）地区（续）
- 第三十一章 乌浒水（Oxus）地区
- 第三十二章 花剌子模（Khwārizm）地区
- 第三十三章 粟特（Sughd）地区
- 第三十四章 药杀水（Jaxartes）诸地
- 索引
- 译者后记

第一章 绪论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Caliph）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地区和波斯（Persia）地区。概述该地区的西北部和东北部。从报达（Baghdād）城通往穆斯林边疆的道路。穆斯林的地理学家及其著述。阿拉伯、突厥（Turk）、波斯等语的地名。

萨珊（Sassan）王朝[1]的萨珊王（Chosroes）曾统治过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波斯地区，但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人最终征服了这些地区，并让这里的居民皈依了伊斯兰教；穆斯林也曾征战另一大国拜占庭（Byzantines）帝国[2]，虽偶有得手，并占领了一些富庶的地区，尤其是地中海南岸、东岸的沿海地带，但拜占庭帝国皇帝在其他地区有效地顶住了哈里发的进攻，而且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如此，不断地消解哈里发王朝施加的压力。因此，罗马（Rome）[3]皇帝与哈里发最终共存了200余年。

与之相比，阿拉伯人却完全推翻了萨珊王朝，并征服之。因这一王朝末帝伊嗣埃（Yazdajird）[4]在追捕过程中被弑杀，结果穆斯林接手了整个伊朗之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说，哈里发帝国整体接管了古老波斯王朝所管辖的地区，同时在政府管理体制上也仿效了萨珊王朝所建立的制度形式，尤其是阿拔斯王朝。先知穆罕默德去世100多年后，阿拔斯王朝推翻其宿敌倭马亚王朝（Omayyad）[5]而建立起帝国，将统治中心从叙利亚转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并在底格里斯（Tigris）河[6]岸边修建了首都报达（Baghdād）城[7]，此城距离南边的萨珊王朝冬都泰西封（Cteciphon）[8]仅有几英里远。[9]

就东部而言，报达城旋即成为穆斯林帝国的中心，但从阿拔斯王朝第一代哈里发起，该王朝就连名分上都不再是统一的王朝。因倭马亚王朝灭亡后，其哈里发后裔[10]占领了西班牙，并立都于科尔多瓦（Cordova）城[11]，进而和定都于报达城的阿拔斯王朝分庭抗礼。阿拔斯王朝建立政权一个多世纪后，科尔多瓦的倭马亚王朝自称是“信士的领袖”[12]，自号哈里发的法蒂玛王朝吞并了失守的埃及，同时与报达交

恶。叙利亚大部分地区重蹈埃及的覆辙（被法蒂玛王朝吞并）；于是阿拉伯（半岛）成为上述两个王朝争夺不休的地区；更遥远的东部很多地区实际上虽已独立，但未成为与阿拔斯王朝相抗衡的强大对手。因此一般说来，这些在伊斯兰教兴起前曾属于萨珊王朝统治的广大地区仍虚意臣服于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地域辽阔，东边到达中亚沙漠、阿富汗山区，西边到拜占庭帝国边境，并划分成很多地区，这些地区的相关内容将在本书以后的各章节中做详尽的叙述。阿拉伯人统治时期，这些地区的绝大部分（和目前所知的）名称和疆界，与萨珊王朝统治时期基本一致；因此东部地区的名称和疆界几乎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而且绝大部分名称和疆界一直保留至今。但众所周知，这一地区的政治状况，尤其是经济或物质条件在1300年里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详尽叙述相关内容之前，有必要对上述各地区的状况做一概述，以便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并在以后的章节中按次加以详述。

希腊人所称的美索不达米亚大平原地区是两河—幼发拉底河（Euphrates）[13]和底格里斯河赠送的礼物；阿拔斯王朝时代，底格里斯河下游所流经的并非现在的河道（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二章做详细的阐释）。如果对地图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荒芜的阿拉伯沙漠逼近幼发拉底河西岸，因而这条河流的右（西）岸并无支流汇入。底格里斯河则与之不同；该河东边有一条相当长的地带背靠着波斯高原，很多河流就发源于这里的山脉，这些河流形成了底格里斯河左岸的诸多支流。穆斯林继承了萨珊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灌溉体系，因此这一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种灌溉体系在后文中将做详尽考察；但这里需做简要说明的是阿拉伯人更加有效地灌溉着两河之间的地区，方法就是截流幼发拉底河的富余水源，并通过一系列横向的运河输入到底格里斯河；而底格里斯河灌溉区再向东延伸就到了波斯高原的山麓，此地一部分灌溉用水来源于波斯山区的河流，另一部分则是从一条条回流到底格里斯河左岸的运河中获得的，而这些运河回流时，又接纳发源于东部山区的众多小河。

阿拉伯人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分为上下（即南北）两部分，南美索不达米亚形成了富饶的冲积平原，古称巴比伦（Babylonia）地区。阿拉伯人称南美索不达米亚为亦剌可（Al-`Irāk）地区，其北界（不同时期边界发生不同变化）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分界线，分别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岸边，这里是这两条河流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相距较近的

地方。阿拔斯王朝时期，亦剌可地区最大的城市无疑就是报达城了；但该王朝建立前的一个世纪，穆斯林最先征服南美索不达米亚，并建立了三座大城，即瓦夕的（Wāsit）城[14]、苦法（Kūfah）城[15]和弼斯啰（Basrah）[16]城，这些城市连续繁荣了好多个世纪；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统治时期，这三座城市和位于幼发拉底河岸边与报达城处同一纬度的安八儿（Anbār）城[17]（在萨珊时代已经存在）一样，是亦剌可地区的人口集中之地。

冲积扇北界延伸到北（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里是坚硬且略带沙砾的平原，此地曾是古尼尼微（Nineveh）王国[18]故地。阿拉伯人称北美索不达米亚为"贾兹剌"（Al-Jazīrah）[19]，意为"岛屿"，或"半岛"，或"属岛"，因这里各大平原几乎被一条条河流分割环抱，这些河流就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河道，以及在沙石平原之南汇入上述两条河流的各条支流或运河。贾兹剌地区向北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发源的山区；此地区又分为三个部分，并以萨珊王统治时期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部落之名命名。这里的主要城市有古尼尼微遗址附近的毛夕里（Mosul）城[20]；底格里斯河上游岸边的阿迷得（Āmid）城[21]；幼发拉底河大拐弯处的剌噶（Rakkah）城[22]此城靠近沙漠边缘，与大马士革（Damascus）城遥遥相望。

接下来的章节要探讨山区之地，这里发源有两条河流，是幼发拉底河的源头。此地区为哈里发王朝和拜占庭帝国争夺之地。在连绵不绝的战争中，穆斯林和基督徒对这里的城市和关隘展开争夺。但阿拉伯人没有永久占据这一地区，早期文献对这里的绝大部分地方也缺乏详细记述。此时的著述一般将该地称为"鲁迷"（Rūm）[23]地区，意为"罗马人的土地"，直到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后半叶，鲁迷仍是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在该地区和哈里发王朝之间以陶鲁思（Taurus）山脉[24]为大屏障形成了一条分界线。穆斯林差不多每年越过陶鲁思防线进入到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还有几次曾困围过君士坦丁堡（Constaninople），但无功而返；阿拉伯人曾几度突袭，占领了小亚细亚高原上的一些要塞重镇。但除了这种暂时的夺占外，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并未完全征服这一高原地区；尽管穆斯林多次袭击过小亚细亚，但并未获得土地，他们也没有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统治，直到阿拔斯王朝没落之际，塞尔柱人（Saljūk Turk）[25]夺去了拜占庭帝国的这些高原地带，并定居下来，于是小亚细亚，或鲁迷最终成为穆斯林的领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贾兹剌”（Jazīrah）地区，即北美索不达米亚向东到阿札拜占（Adharbāyjān）地区，曾称阿特罗帕特纳（Atropatene）[26]，此地南北分别以阿剌可思（Araxes）河[27]和萨费·鲁得河[28]（Safīd-Rūd，即白河）为界，这两条河均注入里海（Caspian）[29]。该地区最显著的自然特征是有大盐湖，现被称为乌鲁米耶（Urmīyah）湖，靠近此地区的大城有帖必力思（Tabrīz）城[30]和麻剌噶（Marāghah）城[31]，阿儿答必儿（Ardabīl）城[32]则是另一座大城，距东边的里海岸边不远。本章之后要叙述西北边界的各个小地区。首先是里海沿岸的歧兰（Gīlān，或Jīlān）[33]地区。在这里，穿越伊朗高原山区屏障阿勒不儿兹（Alburz）山脉的萨费·鲁得河流经了自身形成的冲积平原，而后注入里海沿岸的一个小三角洲。其次是木干（Mūghān）地区，位于阿剌可思河与居鲁士（Cyrus）河交汇的河口地带。再次是向西的阿兰（Arrān）地区，位于上述两条河流之间。还有居鲁士河北边的设里汪（Shirvān）地区，其源头为谷儿只思田（Gurjistān，Goergia）[34]。最后为穆斯林所属的阿剌蛮（Aramenia）[35]地区，位于阿剌可思河源头，这是凡（Vān）湖周边的山区之地。

阿札拜占的东南延伸到富饶的米底（Media）地区，阿拉伯人很恰当地称此地为“吉八儿”（Al-Jibāl），即山脉，因这一地区的山脉逼近南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地区，同时这些山脉一重又一重地向东延伸到波斯中部的“大沙漠”之界。后来，吉八儿地区的西部以居住着强悍的曲儿忒（Kurd，又译“库尔德”）人而有名，因而被称作曲儿忒思田（Kurdistān）；中世纪后半叶，吉八儿地区常被误称亦剌可·阿贾米（`Irāk `Ajamī），即波斯的亦剌可，并与阿拉伯的亦剌可（Arabian `Irāk），即南美索不达米亚相对应，这一误称将在正文中做适当辨析。吉八儿地区有很多大城市：西边有乞里茫沙杭（Kirmānshāh）城[36]和哈马丹［Hamadān，古称伊科巴塔纳（Ecbatana）］城[37]；东北有剌夷（Ray，Rhages）城[38]，东南有亦思帕寒（Ispahān）城[39]。后来，蒙古人在波斯北部平原修建了孙丹尼牙（Sultānīyah）城[40]，并成为伊利汗国（Āl-Khān）[41]的都城，曾一度替代了报达城，该汗国统治的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等地。吉八儿山区是很多河流的源头，其中有喀伦（Kārūn）河[42]，阿拉伯人称作都加伊勒（Dujayl）河，或小底格里斯河，该河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最后注入波斯湾的顶端，这里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汇合的河口以东不远的地方。

在米底地区之南，南美索不达米亚之东就是忽兹思田（Khūzistān）

地区[43]，此地区位于支流众多的喀伦河，或都加伊勒河下游。这一地区极其富庶；其主要城市有途思塔儿（Tustar）城[44]和阿合瓦兹（Ahwāz）城[45]；这里灌溉水源充沛，物产丰富。忽兹思田地区的东边，毗邻波斯湾的是法儿思（Fārs）大区[46]，即古波斯（Persis），这里是波斯君主制度的发源地。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法儿思地区仍分成五个忽剌（Kūrah）[47]，即五个区，这原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的划分方法。法儿思地区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市，最主要的城市有：首府昔剌思（Shīrāz）城[48]、亦思塔赫儿［Istakhr，古称珀儿斯珀里斯（Persepolis）］城[49]、亚兹得（Yazd）城[50]、阿剌建（Arrajān）城[51]、答剌卜吉儿（Dārābjird）城[52]。波斯湾的诸岛也可视为法儿思区的一部分，忽里模子（Hurmuz）港[53]兴起之前，凯伊岛（Kays Island）是重要的商业中心。法儿思地区的主要自然特征就是有八合乞干（Bakhtigān）大盐湖[54]，以及在辽阔的高原谷地还有几片湖泊水域，这些高原谷地是由前文已提及的吉八儿地区的山脉延伸到该地区的余脉形成的。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蒙古人统治时期，将法儿思地区所属的答剌卜吉儿（Dārābjird）划作一个独立的地区，称作沙班喀剌（Shabānkārah）[55]地区；中世纪之后，亚兹得（Yazd）地区划入吉八儿地区。

法儿思地区的东边是起儿漫（Kirmān）[56]地区，这里并不富庶，且靠近“大沙漠”，几乎没有河流。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此地区有两座首府：思儿建（Sīrjān）城[57]和起儿漫（Kirmān）城。该地区还有两座极为重要的城市，即靠海的忽里模子城和内陆的商业中心吉鲁夫忒（Jīruft）城[58]。位于波斯中部的“大沙漠”，其最显著的自然特征就是有海拔很高的伊朗高原。这个广袤的盐碱荒原从可以俯瞰里海的山脉脚下的剌夷（Ray）城向东南倾斜，斜穿珀儿斯（Persia，即波斯）地区，像哑铃形的凹部延伸到更辽阔的地带，而后会合于靠近印度洋的麻可兰（Makrān）山区地势较低的一端。“大沙漠”几乎没有绿洲；荒芜的地表绝大部分覆盖着盐碱地，但在冬季，经过“大沙漠”并不困难，带路标性质的众多水井则连接着两端的各座城市。另外，“大沙漠”又是一道阻隔西南的法儿思地区、起儿漫地区与东部诸地之间的天然屏障，但东部诸地，即呼罗珊（Khurāsān）和东南的昔思田（Sīstān）地区，却不受此限制，在整个波斯历史上这一沙漠屏障曾起到过重要作用。“大沙漠”章节除了涉及穆斯林地理学家记述该沙漠的内容外，还要谈及向东延伸到印度的麻可兰地区，登上其高原可以俯瞰印度河河谷，今天这一地区的一部分被称作俾路支斯坦（Balūchistān）[59]。然而，对于这些地区，

我们并没有非常充分地了解。

麻可兰[60]地区之北，在起儿漫地区的对面，穿过大沙漠的狭窄部分就是昔吉思田（Sijistān），或昔思田（Sīstān）地区[61]，其位于宽而浅的札剌（Zarah）湖[62]的东边。此湖接纳了合儿门（Helmund）河[63]及其他众多河流，这些河流发源于喀布尔与哥疾宁（Ghaznah）[64]北部的阿富汗高山地区，并流向西南。这个地区的坎答哈（Kandahār）城[65]位于合儿门河两条支流之间的平原上，昔吉思田首府疾陵（Zaranj）城[66]修建于合儿门河流入札剌湖处。札剌湖的西北，靠近“大沙漠”的地方就是多山地带，被非常贴切地称为苦黑思田（Kūhistān）地区[67]，即山地，这里的主要城市有屯（Tūn）城和哈因（Kāyin）城，马可波罗将两座城合称为秃讷哈因（Tunocain）；因此昔吉思田地区和苦黑思田地区形成了珀儿斯（即波斯）东部大区呼罗珊的南界。

在叙述最后一部分内容之前，值得关注的是苦密思（Kūmis）[68]、陀拔思单（Tabaristān）[69]、朱里章（Jurjān）[70]等三个小区的相关章节。苦密思地区首府为担寒（Dāmghān）城[71]，此地区从剌夷城之东的“大沙漠”北部边缘延伸，包括从里海一直到波斯高原的阿勒不儿兹山脉南麓区域。特别是这些山脉的北侧逼近到里海岸边，形成了陀拔思单（Tabaristān）地区，又称杩咱答儿（Māzandarān）[72]，此地区西边起自歧兰地区边界和萨费·鲁得河三角洲，然后到达里海的东南角。这里与陀拔思单地区接壤的是朱里章（Jurjān，或Gurgān）地区，古称黑儿坎尼亚（Hircania）地区，该地区的河谷地带靠阿塔剌（Atrak）河[73]与朱里章（Jurjān）河[74]灌溉，朱里章（Jurjān）城[75]建于朱里章河岸边。朱里章地区从里海向东延伸到沙漠地带，这里是呼罗珊地区与乌浒水（Oxus，即阿姆河）三角洲农耕区，即花剌子模（Khwārizm）[76]地区的分界线。

现代的呼罗珊地区只是过去辽阔地区的一部分，从阿拔斯王朝到中世纪时代，此地区还包括今阿富汗的西北部；中世纪的呼罗珊地区之东以巴达哈伤（Badakhshān）地区为界，其北部边界延伸至乌浒水和花剌子模沙漠。穆斯林地理学家将呼罗珊地区划分为四个专区，并以四个首府之名命名，即乃沙不儿（Nīshāpur）[77]区、马鲁（Marv）[78]区、哈烈（Herāt）[79]区、巴里黑（Balkh）[80]区。从地理环境来看，呼罗珊地区显著的特征是有马鲁（Marv）河[81]与哈烈（Herāt）河[82]，这两

条大河发源于今阿富汗（Afghanistān）的山区，而后折转向北，到达花剌子模的沙漠荒原，最后并未注入海洋或湖泊。

而后的章节主要讨论乌浒水上游流域及一些小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从乌浒水之北、巴达哈伤向西延伸到该大河右岸的各支流流域。接着要对咸海南边形成花剌子模地区的乌浒水三角洲，以及此地区的旧首府玉龙杰赤（Urganj）城[83]做一叙述，同时，在本章中要费一些笔墨着意探讨有关流入里海的乌浒水古河道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过了这条大河，在乌浒水和药杀水（Jaxartes）[84]之间是粟特（Sughd）[85]地区，即古代的粟格底亚那（Sogdiana），该地区有两座著名的城市，即撒马儿罕（Samarkand）城[86]和不花剌（Bukhārā）城[87]，这两座城均位于粟特河岸。这是本书倒数第二章的内容。该书最后一章主要考察药杀水沿岸地区，这些地区包括靠近中国边疆，首府为阿思柯提（Akhsīkath）城的拔汗那（Farghānah）地区和现代塔什干城所处的柘支（Shāsh）地区，以及西北的亦思必吉阿卜（Isbījāb）[88]地区，这里是药杀水的发源地，该河流经上述各地区后，再经过荒芜的原野，最后注入咸海的顶端。至于位于中亚以外更东的北部地带，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仅做了简要的记述。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所称的突厥之地只是到了蒙古西征以后，才显得重要起来；很可惜，关于西征这段时期，缺乏详细记载，阿拉伯地理学家对绝大数地区未做多少有价值的记述，后来的波斯语和突厥语文献家提供了相关地区的记述，但不够准确。

按先知的教导，穆斯林（条件允许）在一生中要到麦加（Mecca）朝觐[89]一次。阿拔斯王朝时代，穆斯林帝国达到了全盛时期，高效的道路网络使得朝觐更加便捷，这些道路从报达城辐射到各地，来自遥远东方的朝觐者穿过报达城的底格里斯河，可到达希贾兹（Hijāz）地区[90]。其中关于该（东部）道路网络（阿拉伯人继承了过去波斯帝国道路的遗产）在当时文献中有详尽的记述；关于各条干道所经过的地区将在后文叙述，此处仅对各干道加以概述。

最著名的干道就是呼罗珊大道，它连接着首都（报达）与东边位于中国边境的药杀水边陲城镇。此道也可能是在所有道路中文献记述最详细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起于报达东城呼罗珊门，越过平原及建造优良桥梁的诸多河流，然后到达通向波斯高原关隘脚下的忽儿宛（Hulwān）城[91]。该道从这里进入吉八儿地区，接着经过一段陡坡高地后，到达曲儿忒思田首府乞里茫沙杭（Kirmānshāh）城[92]。此道经

哈马丹（Hamadān），东北斜穿吉八儿地区到达剌夷城。从剌夷城起，该道朝差不多正东方向，经苦密思地区—其北边为陀拔思单山区，南为“大沙漠”，接着在必思坦（Bistām）城[93]附近进入呼罗珊地区。该道继续向前，到达乃沙不儿城，而后到途思（Tūs）城[94]，接着到达马鲁城，再穿过沙漠到达乌浒水岸边的阿木（Āmul）城[95]，此后（过河）相继到达粟特地区的不花剌城和撒马儿罕城。在撒马儿罕城稍东的扎敏城，该道分为两支：左手（北）道路通往柘支（即塔什干）城[96]，最后到药杀水下游讹塔剌（Utrār）城[97]附近的渡口；另一条道路，离开扎敏城后，转向右手（东），通向拔汗那地区和药杀水上游，而后到达该地区首府阿思柯提（Akhsīkath）城[98]，最后到达靠近中国沙漠边界的乌兹干（Ūzkan，讹迹邗）城[99]。

这就是整条呼罗珊道；直到今天横跨伊朗（Persia）的邮政道路也修建在这条线路上，其中心在旧剌夷城附近的德黑兰城，这条道路和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述的路线相同。阿拔斯王朝灭亡后，蒙古人统治下的伊利汗国定都孙丹尼牙（Sultānīyah）城[100]，原有的道路体系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形成了一条从北边的哈马丹城直通孙丹尼牙城的支道，于是在有段时间里，孙丹尼牙城替代了剌夷城的地位，成为这一地区的道路枢纽。

阿拔斯王朝早期，以呼罗珊道所经的主要城市为中心，形成了诸多左右（南北）分开的交叉支道，并连接着波斯各地。这样，有一条从乞里茫沙杭城附近起向北的道路，通向兀儿密牙（Urmīyah）湖[101]附近的帖必力思城和其他城市，再到达阿答必儿城和阿剌可思河沿岸诸地。有一条从哈马丹城起向东南的道路，通向亦思法杭（Isfahān）城[102]；从剌夷城起的道路，向西北几程之后，到达赞章（Zanjān）城[103]，从此地又有一条路通往阿答必儿城。呼罗珊地区的乃沙不儿城是诸多支道会合的枢纽；有一条路从此城向南到达苦黑思田地区的塔八辛（Tabas）城[104]，该城位于“大沙漠”边缘；另一条道路（从乃沙不儿）到达哈因城；向东南的道路则通往哈烈城，从这里到达昔吉思田地区的疾陵（Zaranj）城。从马鲁城起的一条道路沿马鲁河而上到达小马鲁（Marv-ar-Rūd）城，并在此地与哈烈城来的道路会合。此后，这条道路继续通往巴里黑（Balkh）城[105]和乌浒水外的东部边地。最后，有一条从不花剌城起的道路，向西北直通花剌子模地区的玉龙杰赤城，向西南到达巴里黑城对面、乌浒水岸边的忒耳迷（Tirmid）城[106]。

叙述了上文的呼罗珊道路体系后，现再返回到中心起点报达城，来陈述其通向其他方向的道路。（从报达城）向南有一条到达底格里斯河下游的道路，文献按水路和陆路记载了其里程和驿站，该道经瓦夕的城到达波斯湾的贸易大港弼斯啰城。此道经瓦夕的城和弼斯啰城后，到达忽兹思田地区的阿合瓦兹（Ahwāz）城，而后朝正东到达法儿思地区的昔剌思城。该城是诸道会合的枢纽。昔剌思城的北道，通往亦思法杭城，再到达剌夷城；（昔剌思城的）东北道经亚兹得城和“大沙漠”到达塔八辛城，这里与去往乃沙不儿城的道路相连接；（昔剌思城）向东通向思儿建（Sīrjān）城和起儿漫城的道路不只一条，从那里再向东穿过“大沙漠”可达昔吉思田地区的疾陵城；从昔剌思城起，有两条向东南和南边可到达波斯湾沿岸各港的道路：一条道路经答剌卜吉儿（Dārābjird）城到达忽里模子（Hurmuz）城附近的速鹿（Sūrū）港[107]；另一条道路到达尸罗围（Sīrāf）港[108]，该港一度曾是法儿思地区的枢纽港口。

再回到（道路）中心点报达城，就可发现通向麦加城和麦地那城的（第一条）朝觐大道以报达西城为起点，向南到达阿拉伯沙漠边缘的苦法城，而后该道笔直地越过沙漠到达希贾兹地区。第二条朝觐道从弼斯啰城出发，起初与第一条道几乎是平行的，最后在麦加城北边两程远的地方与第一条道路会合。此外，还有一条从报达城起程，向西北的道路，通到安八儿城附近的幼发拉底河河岸，再沿河北上到达剌噶城，此城是越过叙利亚沙漠通往大马士革诸道和向北到达希腊人边陲城市各道的中心枢纽。最后是几条从报达城起程。向北的道路，这些道路沿底格里斯河两岸而上到达毛夕里城，此后有一条道路从该城到达阿迷得城；（毛夕里城的）另一条道路向西南到达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吉利吉思押（Kirkīrsiyā）城[109]。有几条道路从阿迷得城起，通往希腊人的各边陲城镇。

简而言之，上述道路形成了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以报达城为中心的道路网络体系，并通过一种邮传驿站体制将都城和帝国外围的地区连接起来。阿拉伯地理学家极其详尽地记述了这些道路系统。为了便于了解，现按时间顺序，对当时的著述做一简要介绍，提到的这些著作在以后的章节里会引用到。[110]

较早的阿拉伯地理学著作编撰于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中叶，起初这些地理著作是以道里志的形式出现的。这些著作里详细地记述了各

地的道里行程，其内穿插着简要介绍了所经城镇的状况，以及按顺序记述了每个地区的收入和物产等。其中留存至今的四本道里志著述，极具参考价值，而流传至今的这些本子，多为残本，因此这些著作可相互被证。这些道里志的作者为：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dbih）、库达玛（Kudāmah）、雅忽比（Ya`kūbī）和伊本·鲁斯塔（Ibn Rustah）。

前两本著作的内容大体相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是吉八儿地区的邮政长，库达玛则是一位财税记账官；他们的道里志是沿呼罗珊大道和其他主干道按站点逐一记录的，这些著作的开头部分还简要介绍了以报达城为中心所辐射的地区。可惜的是，雅忽比著作的全本并未流传下来，但因其著及伊本·塞剌皮昂（Ibn Serapion）的著作记载了报达城，我们才有可能全面、详细地了解阿拔斯王朝首都的地理形胜。雅忽比也关注了其他很多城市，其记述颇有价值，而且只有他的著作详细、全面地记载了各条穿越亦剌可地区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伊本·塞剌皮昂的著作仅有一部分流传至今，这部分内容除了记载报达城外，尤其重要的是还记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河流和运河网络体系；其也简要记述了其他地区的河流。伊本·鲁斯塔的著作有点类似雅忽比的，他特别关注了很多城镇；但颇为重要的是他详尽叙述了远到麻失哈（Mashhad）附近的途思（Tūs）城的呼罗珊大道及其支道，尤其是通往亦思法杭城、哈烈城的道路；还记载了从报达城向南到苦法城和弼斯啰城的道路，及再继续向东到昔剌思城的道路。在上述干道的记述中，他不仅记载了道里和驿站，还准确地描述了所经地区的自然状况；这些道路要么在崎岖的山地行进，要么在平原上前行；伊本·鲁斯塔的这些记述对准确判断道路所经的地区及确定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很多地望，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还有一位与伊本·鲁斯塔同时代的著述者伊本·阿勒·法吉赫（Ibn-al-Fakīh），他撰写了一部十分离奇的地理杂录，可惜这部著作流传至今的仅是一个简本。在此著中所提及的一些地方有助于弥补或修订早先的记载。[111]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出现了系统记述地理知识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这些地理学家按穆斯林帝国的分区，对相关地区做了很全面的记述，并附带着分区记载了各条道路。显而易见，这些著作的写法大大优于道里志；在以后的章节里，可以阅读到他们详细、全面的地理记述，这里先列出三位作者，即伊斯塔赫里（Istakhrī）、伊本·豪喀尔（Ibn Hawkal）和穆喀达斯（Mukaddasī），这些著述使我们在资料

上获益颇多。伊本·豪喀尔的著作只是一个新编本，且大部分内容是对伊斯塔赫里著作的扩充和修补；伊斯塔赫里是珀儿斯珀里斯（Persepolis）城人，他对自己家乡法儿思地区的记述比伊本·豪喀尔的著作要详尽、全面。伊本·豪喀尔为了使其与著作中其他章节的篇幅相匹配，对法儿思地区的记述有所减损。和上述两位作者同时代的穆喀达斯的地理学著作完全是独立完成的，而且主要取材于他个人对不同地区的考察。他的著作应是最出色的，可以肯定该著作与同时代编著的阿拉伯地理学著作相比，保留了最原始的文献；他在著作中记载了各地的地名、风土、物产、产品等，并细心概述了各地区所具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这部著作是中世纪阿拉伯地理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最好著述。

尤其重要的是上述三位系统记述地理知识的地理学家的著作里还附有地图，可以较准确地确定大部分地名的方位。他们在每个章节的末尾均制作了一个里程表，记述各主要道路的站点和路程，如前所述，其记载了这些道路所经的地区，此外还大量补充了邻近城市间相距的里程。通过文献中所标出的已知点及距离，借助书中的地图，并利用三角测量法，就可以大致确定久已毁灭的城市和已消失的很多遗址的位置。比如法儿思地区的塔瓦吉（Tawwaj）城，尽管至今还未找到其遗址所在地，但现在可以确定其大体的方位。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期的另一位作家就是马苏迪（Mas`ūdī），其有两部著作传世：第一部著作主要记述历史，名称为《黄金草原》（*the Golden Meadows*）；第二部著作是一本辑录，通常被称作《劝诫》（*At-Tanbīh*），这部著作的内容和注释极其详细。[112]

到了伊斯兰历5～6世纪（11～12世纪），有两位著名旅行家和朝觐者的著作问世，其对所经地区的描述是相当重要的。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有萨珊王（Khusraw）之子之称的波斯人纳思儿（Nāsīr）从呼罗珊出发到麦加朝觐，他在回程途中访问了埃及和叙利亚，并经过了阿拉伯（半岛）地区，他的日记是用波斯语撰写的，这是今天所见的最早的波斯语著作之一。一个世纪后（即12世纪，译者），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伊本·朱拜儿（Ibn Jubayr）从格林纳达（Granada）城[113]起程到麦加朝觐；他在著作中对美索不达米亚，尤其对报达城进行了记述，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流传至今的所有著作中最有意义的文献之一。伊斯兰历6世纪初（12世纪），另一部波斯语著作《法儿思志》（*Fārs Nāmah*）问世，该书较详细地记述了法儿思地区，极具参考价值。该世纪（12世纪）中叶，伊德里思（Idrīsī）完成了一部全面系统的地理学著

作，他曾生活于西西里（Sicily）诺曼王鲁戈尔二世（Norman King Rooger II）的宫廷里。他用阿拉伯语写作，并采用很麻烦的“气候带（区）”来描述已知的地区，所谓“气候带”就是按所处纬度武断地对各个地区进行划分，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部分被划为第三“气候带”，另一部分则被划为第四“气候带”。很可惜，他自己对波斯，或地中海东部地区并没有多少了解，但他曾访问过小亚细亚，这里当时还是（东）罗马帝国的一个地区，他对这一地区的记载，很有参考价值，但文本中很多地名（抄本讹误之因）无法辨认，或讹误太多，至今很多内容不可释读。[114]

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蒙古西征和阿拔斯王朝灭亡之时，亚库特（Yākūt）编写的多卷本《地理学词典》（*Geographical Dictionary*）问世，该书虽是对早期著作的汇编，但须说明的是亚库特本人游历了许多地区，并根据自己的经历做了恰当的取舍，这是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亚库特的词典条目均是按字母顺序编排的，并充分引用了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前贤地理学家的著述，其中有些著述如旅行家伊本·阿勒·穆哈勒哈勒（Ibn-al-Muhalhal）于伊斯兰历330年（942年）所完成的著作，只能从亚库特的摘录中得以了解。这部了不起的词典面世75年后，有人对其加以节录，并将其命名为《观察》（*Al-Marāsid*），节录者是美索不达米亚人，节录本依照第一手材料对很多内容，如对报达城周边地区的地名做了很有价值的订正。同一时期的著作家还有可疾云尼（Kazvīnī），他撰写了一部由两部分组成的天文学著作，其内对各地的城市、物产和商业做了有趣味的关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早期，全面系统地论述地理知识的地理学家为叙利亚统治者阿布·勒·费达（Abu-l-Fidā），其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摘编了前贤的著述，但也补充了一些他所访问过的地区的内容。[115]

同一时期的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上半叶，伯伯尔（Berber）人伊本·白图泰（Ibn Batūtah）的旅行记问世，他旅行的范围可与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相媲美。他的著作是用阿拉伯语撰写的；与他同时代的穆思套菲（Mustawfī）则用波斯语撰写了一部地理学著作，该书记述了当时统治波斯地区的蒙古王朝伊利汗国（统治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的情况，并反映了蒙古人入主此地后发生的变化。穆思套菲还撰写了一部叫《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的历史著作，这部书除了记述蒙古时代有价值的历史外，还包含了地理学方面的重要内容。[116]

帖木儿王朝时期，首先要关注的就是阿里·亚兹底（`Alī Yazdī）撰写的历史著作，其次为哈菲兹·阿卜鲁（Hāfiz Abrū）撰写的《地理学》（*Geography*）。这两部著作都是在伊斯兰历9世纪（15世纪）上半叶用波斯语撰写完成的。最后提及的就是帖木儿入主（伊朗等地）后两位突厥语作者的著作：一部用东部突厥语[117]撰写；另一部用奥斯曼突厥语写成。这两部著作都是在伊斯兰历11世纪（17世纪）初完成的，一部为花剌子模统治者阿布·勒·噶兹（Abu-l-Ghāzī）撰写的《突厥世系》（*History of the Turks and Mongols*），另一部是著名目录学家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完成的《世界地理》（*Universal Geography*），也称作《世界志》（*Jahān Numā*）[118]。

很多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著述对详尽阐释本书的内容，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因早期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常是合二为一的，故其著述也大致相同。其中的一个例证就是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由祖里（Balādhurī）撰写的《征服各地史》（*Book of the Conquests*）[119]。这部书按次记述了有关穆斯林征服东、西各地的活动，并全面反映了穆斯林建立国家后，伊斯兰教第一次作为主导性宗教的状况。编年史方面，除了前文提到的雅忽比所著的历史著作外，还有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麻实库维（Ibn Mashkuwayh）的著作，这部著作中只有第六部分刊行于世。伊斯兰历4世纪中叶（10世纪），由哈木札·亦思法汗尼（Hamzah Isfahānī）完成的编年著作同样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这部著作虽是用阿拉伯文撰写的，但该书参考了很多现已散佚的波斯语著述，这部著作中保留的内容已无法在其他著作中找到。

但全面完整的阿拉伯编年史到了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初才出现，并得以发展，此时的代表人物是塔巴里（Tabarī），他的著作为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文献。有关阿拔斯王朝晚期的历史文献，有必要参考伊本·阿喜儿（Ibn-al-Athīr）的著作；以法赫里（Fakhrī）之名所著的穆斯林趣闻史概要，也值得参考。伊本·赫尔顿（Ibn Khaldūn）所著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补充了伊本·阿喜儿著作中所缺失的纪年，这是其很有价值的部分；伊本·哈里坎（Ibn Khallikān）的杰出著作《人物词典》（*Biagraphical Dictionary*）也补充了一些细节内容。上文提及的著述均是用阿拉伯语写作完成的。有必要提及的是用波斯语撰写的两部著作，即密儿哈万（Mirkhwānd）和其孙赫万达密尔（Khwāndamīr）分别撰写的《纯洁的花园》（*Rawdat-as-Safā*）和《旅程的喜悦》（*Habīb as-Sayār*），这两部著作提供了关于波斯地区的有价

值的地理信息。另外两部波斯语编年著作记载了塞尔柱王朝在小亚细亚地区和起儿漫地区的统治情况，作者分别是编年史学家伊本·比比（Ibn Bībī）和伊本·易卜剌欣（Ibn Ibrahīm），这两部著作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且在本书后文中要多次引用到。[120]

为了能全面叙述所研究的内容，在绪论结尾处要花一点笔墨大致说明一下以后章节和地图上出现的地名的情况。南、北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地区的地名多数为阿拉伯语或阿拉美语（Aramaic），但在穆斯林征服前，阿拉美语是当地人民的共同语言。阿拉伯语的城市名称在现在或过去一般有特定的含义，如苦法（Al-Kūfah）城、弼斯啰（Al-Basrah）城和瓦夕的（Wāsit）城等。阿拉美语的地名一般可通过拼写形式加以辨识，即尾音多带长音ā，如Jabultā；同时，这种语言的地名含义也不难解释，如`Abartā意为"地段或跨越地"，即用船只搭建的浮桥；Bājisrā等同于阿拉伯语的拜特·吉思儿（Bāyt-al-Jisr），意为"桥屋"。古波斯语地名如Baghdād（神赐之地）已很罕见，但该地区偶尔也保留有希腊语的地名，如乌剌（Al-Ubullah）城[121]是阿珀罗高斯（Apologos）的转音。

小亚细亚地区曾是希腊人活动过的地带，如前所述只是到了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后半叶，该地区被塞尔柱人征服后才变成穆斯林的领土。由此可知出现的希腊地名有两种形式—早期的（阿拉伯语）和后来的（突厥语），如塞琉斯雅（Seleucia）最初被称作塞琉古（Salūkīyah），后来又称瑟乐福克（Selefkeh）[122]；又如赫拉克里亚（Heraclia）起初被称作喜剌可剌（Hiraklah），现代称为阿剌可利牙（Arākliyah）[123]。塞尔柱王朝在该地的统治结束后，奥斯曼帝国继续统治，突厥语地名自然替代了早期的希腊名称。但就正字法而言，应该了解的是操突厥语的人对阿拉伯语发音很陌生，同理希腊人对操突厥语人的发音也很陌生，因此突厥语词汇（如每部突厥语词典里查到的那样）的拼写常会发生变化，地名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可以找到喀喇·喜萨儿（Karā Hisār）和喀喇·喜萨儿（Karah Hisār），喀喇·斯（Karah-sī）和喀喇斯（Karāsī），喀喇满（Karamān）和喀喇满（Karāmān）以及其他很多（发音相似的）地名，加以印证。

如果浏览一下波斯地区的地图，就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地名并没有几个源于阿拉伯语。除了阿札拜占的麻喇噶（Marāghah）地区和法儿思地区的拜扎（Bayzā，或Al-Baydā，即白）城外，几乎找不到用阿拉

伯语命名的城市。穆斯林夺取萨珊王朝的领土后，他们实际上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改变（地名）名称。[124]很多村庄和邮传驿站是以自然特征和显著标记取名的，如爱神木（Myrtle）村、骆驼村、盐村等，用波斯语依次称作底合·木耳得（Dih Murd）、底合·兀实土儿（Dih Ushturān）、底合·纳麻（Dih Namak）。在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常发现这些地名已经做了翻译，分别称作喀儿雅·阿勒·阿思（Karyat-al-Ās）、喀儿雅·阿勒·加马儿（Karyat-al-Jamāl）和喀儿雅·阿勒·米勒赫（Karyat-al-Milh），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波斯（Persia）地区的地名任何时期都采用波斯语名称。此外，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说到黑森林（Schwarz-Wald）或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时，是依据说话者的语言（来确定地名含义的），但在书籍和地图中这些名称通常会发生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有时候在阿拉伯语文献中记载了一个阿拉伯语的驿站名称，但与之对应的波斯语名称却没有流传下来，比如“犬首”（Rās-al-Kalb）可能就是后来所称的西模娘（Samnān）。阿拉伯人有时也用绰号来称呼波斯地区的城市名称，且正名和别名同时使用，比如康古瓦儿（Kanguvār），因穆斯林的骡子曾在此地被盗，因此早期穆斯林将这座城市称作“盗贼堡”（Kasr-al-Lusus），于是波斯语的“康古瓦儿”之名，最终以阿拉伯语别名的形式保留下来。甚至穆斯林征服者兴建新的地区首府如昔剌思城时，他们很快就不再使用亦思塔赫儿［Istakhr，即珀儿斯珀里斯（Persepolis）］的旧名称了，而是用原来的波斯村庄名来命名新城，并长久地留存下来。像其他很多地名一样，昔剌思之名的来源与语源，已无法探清，原因是萨珊王朝时代的古地理学著作几乎没有流传至今，这是很可惜的。

很自然的，地名的发音是随着岁月的嬗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如图莱思思（Turaythīth）写作土儿失兹（Turshīz）；哈马赞（Hamadhān）城的名称在后来的书籍中写作哈马丹（Hamadān）[125]；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当时出现了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两种语言拼写（或读音）同一地名的现象，这样阿拉伯语的柯伤（Kāshān）用波斯语写作柯伤（Kāshān）；萨黑（Sāhik，波斯语）后来写作察黑（Chāhik）；支汗那（Saghāniyān）写作赤鄂衍那（Chaghāniyān，波斯语）。阿拉伯语需要遵从“三字母”词根[126]的语法规则，于是波斯地名巴某（Bam）在阿拉伯语中必须写作巴某（Bamm）；苦木（Kum），在阿拉伯语中要写作苦木（Kumm），这仅是遵循了阿拉伯

语的正字法规则而已，但在波斯语中从来不遵守双辅音结尾的语法规则。有时，一个地名不知为何废弃不用了，（阿拉伯人）就用另一个名称代替了，但波斯人仍喜欢使用原来的名称，如最初称为吉儿麻辛（Kirmāsīn）或吉儿密辛（Kirmīsīn）的地名，后来称作乞里茫沙杭（Kirmānshahān），今天简称乞里茫沙杭（Kir-mānshāh）。但我们尚不清楚这些名称的真实来历和变化的原因。

在地名中，阿拉伯语前缀冠词“Al”的使用显然是极其随意武断的。依据严格的语法规则，冠词只能附加在阿拉伯语地名之前，但不能附加在外来词之前。但这一规则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绝大部分地名当然源于闪米特（Semitic）语，流经这里的底格里斯河被称作底吉剌（Dijlah，无冠词），而幼发拉底河（加了冠词）被称为夫剌（Al-Furāt），该词和前一词一样都是外来词。[127]在波斯地区，随着时间推移，阿拉伯语地名的冠词逐渐消失，如思儿建（as-Sīrajān，阿拉伯语）变成了思儿建（Sīrjān，波斯语）。但这种使用方法很随意，如古剌格思（Rhages）在阿拉伯语中变为剌夷（Ar-Ray），原因不明，亦思法杭（Isfahān）地区的一个古地名贾亦（Jay），不知何因，常不加冠词。[128]

阿拉伯人所采用的地名术语有些贫乏，这种贫乏往往会造成极大的混乱。按阿拉伯人的习惯，一个地区的首府是用该地区之名来称呼的，即便是其自身有名称，也是如此。这样大马士革城至今通常被称作沙木（Ash-Shām）城，即“叙利亚（的首府）”；昔吉思田地区的首府疾陵城[129]常被称为麻地那·昔吉思田（Madinat-Sijistān），即“昔吉思田地区之城”，一般简称为昔吉思田（Sijistān）城。一旦一个地区有两个首府，那自然就会引起很多混乱。有一个例证就是起儿漫地区（的首府），该地区的起儿漫（Kirmān）城在早期书籍里是指第一首府思儿建城，后来又指现在的克尔曼城，但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城市，思儿建城被毁后，（起儿漫城）才成为首府。将中世纪地理学家所留存的地图和现在地图相比较，可发现被毁灭的城市名称仍保留在现代的地区里，如仍以已毁的思儿建城的名字来命名现代的思儿建地区；同样的例证就是八儿答思儿（Bardasīr）城和吉鲁夫忒（Jīruft）城，这两者均是先前的重要城市，后来其名字也保留在同名的地区名称中。总之，当时的地区之名和其首府名称完全有可能是同一名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个名称就废弃不用了。与前面相反的例证是古阿剌敦（Aradūn）地区的名称，现在用来称呼小城阿拉墩（Aradūn）城，该城在古代称作（剌夷

的）胡瓦耳（Khuvār）城。

阿拉伯人所使用的自然地理术语也并不丰富。著名的独立山峰一般有专门的名称［如Damāvand（达马万德山）；Alvand（阿儿宛）］，但对连绵的山脉通常未给出专门的名称。阻断拜占庭之地的陶鲁思（Taurus）大山脉一般被（不恰当地）称作吉八儿·鲁昆（Jabal Lukkām），但准确地来说，其所指仅是陶鲁思山脉的分支；阿勒不儿兹山脉是一条将里海和波斯高原分割开来的著名山脉，但阿拉伯地理学家没有专门为这条绵长山脉的各座山峰命名。大的湖泊通常有其专称，如麻哈鲁（Māhālū）湖、札剌（Zarah）湖和赤查思（Chīchast）湖等，但更多的湖泊通常以湖边的主要城市命名，如兀儿密牙（Urmīyah）湖、凡（Vān）湖，也称阿儿吉失（Arjīsh）湖。海的命名无特别之处，其名称取自沿海的地区和主要城市之名。里海通常称为陀拔思单（Tabaristān）海，或歧兰（Gīlān）海、朱里章（Jurjān）海、八苦（Bākū）海，后来又称作可萨（Khazar）海[130]，因中世纪早期可萨王国位于其北岸。按照同样的方式，咸海（Aral）称为花剌子模海，波斯湾以同样方式称为法儿思（Fārs）海。

总之，需要说明的是以后的章节里只选用了部分文献资料；其涉及的各城镇和乡村、各地区的名称，以及对各地方位的报道等方面的内容很多，且超过本书索引分类内容的两倍。但索引词不一定是按出现次数列出的，那些在正文中仅出现过一次的少量名称在索引里就省略了。有关地图方面，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地图仅是大致的勾勒图，便于理解文本，但并不表明这是某个地区特定时期的地图。因此那些曾彼此相继的城市常标在一起，好像是一定时期或同一时期它们同时存在似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本书将对其变化做详细的解析。[131]

[1] 萨珊王朝（Sassan，226～651年）是波斯在3世纪至7世纪的统治王朝，因其创建者阿儿答希儿（Ardashīr）的始祖萨珊而得名，亦是波斯自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的首个统一王朝，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该王朝首都设在泰西封。当时萨珊王朝与中亚和印度的贵霜王朝、东亚的东汉及欧洲的罗马帝国并称四强，雄霸欧亚。萨珊王朝在最强盛之时，曾多次威胁与之毗邻的贵霜王朝及东罗马帝国，后来由于王朝连续两位国王被刺杀，帝国中心逐渐崩溃，末代君主伊嗣埃三世的儿子俾路斯逃亡至大唐，任右武卫将军，当时唐朝由唐高宗当朝。译者。

[2] 拜占庭（Byzantine Empire），即东罗马帝国（Eastern Roman Empire），是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依然存在的位于原罗马帝国疆域东半部的帝国。拜占庭帝国通常被认为开始于395年（实际始于8世纪），结束于1453年。在其近千年的存在期内，一

般被人简单地称为“罗马帝国”，但到17世纪，西方历史学家为了区分古代的罗马帝国与中世纪的罗马帝国（实际上两者差别很大），便引入了“拜占庭帝国”这一名称，这来源于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前身—古希腊的殖民地拜占庭城。译者。

[3] 即拜占庭，我国文献中将其记载为大秦、黎轩等，《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北史·西域传》称：“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后来的大食文献称其为鲁姆或鲁迷，也即拂菻，特指小亚细亚半岛。译者。

[4] 伊嗣埃（三世），为萨珊王朝末代君主（632～651年在位），是沙亚尔（Shahryar）之子，幼年登基。他在位时期该王朝处于极度衰微状态，642年在与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中战败，651年在木鹿被一个磨坊主杀死。译者。

[5] 倭马亚王朝（Omayyad，661～750年），即我国文献中的白衣大食，是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木阿威雅）建立的，该总督出自麦加的倭马亚家族，并以此家族之名来称呼该王朝，都城设在大马士革城。在倭马亚王朝统治者的不断征服下，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大帝国得以建立。译者。

[6] 底格里斯（Tigris）河，古波斯语作Tigra，希腊语作Trigres，阿卡德语作Idiklat，《圣经》中称Hiddekel，阿拉伯语作Dijla，土耳其语作Dicle。《隋书·波斯传》作达曷水；《新唐书·波斯传》作达遏水。其全长1950公里，流域面积37. 5万平方公里，年径流量近400亿立方米，发源于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流经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其下游经过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岸土地肥沃、运河纵横，是主要的农业区之一。该河与幼发拉底河汇合后，注入波斯湾。译者。

[7] 即今巴格达，是伊拉克的首都。报达城，《新唐书·地理志》作缚达；《岭外代答》和《诸蕃志》作白达；《西使记》作报达；《元史·宪宗本纪》作八哈塔；《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八吉打。今巴格达城，是伊拉克首都，位于伊拉克中部，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面积860平方公里，人口560万（2002年），是伊拉克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巴格达一词来源于古波斯语，意为“神赐的地方”。译者。

[8] 亦译“忒息丰”，今伊拉克著名古城遗迹，位于今巴格达城东南40公里处，滨底格里斯河左岸。此地初为希腊抵御塞琉古王朝的驻军之地。后渐有城池，采取两河流域常见的城市建筑形制，城墙呈圆形。该城由安息王初建于公元前2世纪，当时与河对岸的塞琉古城形成双城。129年，安息（帕提亚）强盛，立为冬都，后屡遭罗马和萨珊波斯的侵犯。萨珊王朝占领该城后立为首都，这里也是景教的活动中心。阿拉伯帝国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执政时派兵征服亦剌可，637年阿拉伯军打败萨珊王朝军队后进驻该城，并以此为基地向东征服波斯全境。倭马亚王朝时在该城建有多座清真寺、宗教学校，为军事要地。阿拔斯王朝时期，建新都报达城，此城渐衰，现城池已不复存在，尚存萨珊王朝君主接见外国使臣的大殿遗址。大殿名为塔克·基斯拉，今称泰西封拱门，曾一度改建为清真寺。现泰西封为小镇，遗址多已覆盖于镇中花园和住宅之下，镇内有博物馆，收藏有遗址文物。该地还有圣门弟子赛勒曼的陵墓，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奉其为“圣墓”。译者。

[9] 此为原书页码。译者。

[10] 倭马亚王朝的后裔阿卜·刺赫曼（Abd ar-Rahman I，756～788年在位）建立政权后，其政权一直延续到喜苫（Hisham III，1027～1031年在位）。译者。

[11] 西班牙南部城市，科尔多瓦省首府。在莫雷纳山麓，瓜达尔基维尔河畔。人口32. 4万。原为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古城，公元前2世纪为罗马人殖民地，6世纪西哥特人侵入，破坏甚烈。8～11世纪曾为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的都城，城市繁荣。12世纪起是西班牙王国的重要军事基地。现在是西班牙重要的铁路枢纽。附近产铜和铝。有食品、化学、电子等工业。多罗马和摩尔人遗迹，有8世纪时建造的清真寺（现为天主教堂），还有横跨瓜达尔基维尔河的摩尔桥。市郊10公里处，有珍贵的阿拉伯白金建筑遗址。译者。

[12] “信士的领袖”，即我国文献所称的“噉密莫末腻”（《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莫门都”（杜环《经行记》），是阿拉伯语之“Amīr al-Mu`mminī”的音译。此称号表示其法统的合理性与正统性。译者。

[13] 幼发拉底（Euphrates）河，苏美尔语作Buranunu，阿卡德语作Purattu，古波斯语作Ufrat，希腊语和拉丁语作Euphrates，《圣经》中作Perath，阿拉伯语作Furat，土耳其语作Firat。《新唐书·地理志》作弗利剌河。其全长2800公里，是西亚最长的河流，流域面积67万平方公里，发源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流经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其下游经过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岸土地肥沃、运河纵横，和底格里斯河下游一样，是重要的农业区。该河与底格里斯河汇合后，注入波斯湾。该河是水路要道，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译者。

[14]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为瓦西特，其所在省也称瓦西特（1976年前称库特省），是座小城，位于所在省东南部底格里斯河分出来的支流旁。这座城市兴起于7世纪初，曾是伊拉克地区的首府和政治中心，但15世纪以后逐渐衰落，16世纪时已废弃。现瓦夕的城遗址在北纬32度11分、东经46度18分，位于今海伊（al-Hayy）城东北25公里处，瓦西特省省会库特（al-Kut）城东南70公里（《伊斯兰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旧版），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v. XI，p. 165）处。它曾是大食帝国的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通衢。译者。

[15]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也译为库法城，伊拉克南部古城，距离今天的纳杰夫城有8公里，即现在的小城库费镇。其始建于618年，修建于幼发拉底河支流欣迪亚赫河岸，当时为一要塞小镇。637年阿拉伯帝国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634～644年在位）派兵征服伊拉克全境后，于638年兴建苦法城，主要作为防御工事和驻军城镇。656年，阿里继任第四任哈里发，定苦法为都城。661年，阿里于苦法清真寺附近被刺身亡，遗体葬于该城附近。此后，这里成为什叶派反抗倭马亚王朝的一个根据地。阿拔斯王朝建立后，苦法城发展为文化中心。8～10世纪曾为伊斯兰文化和学术的中心，涌现了大批著名学者，也成为伊斯兰教苏非派、什叶派的传道中心。阿拉伯文艺术“苦法体”就发源于该城。建于638年的苦法大清真寺经历代修葺现仍完好。该城为古代大食的交通要道。译者。

[16] 《诸蕃志》称：“弼斯啰国地主出入，骑从千余人，尽带铁甲，将官带连环锁子甲。听白达节制。人食烧麦饼羊肉。天时寒暑稍正，但无朔望。产骆驼、绵羊、千

年枣。每岁记施、瓮蛮国常至其国般贩。”《新唐书·地理志》作末罗；《通典》“大秦国”条作秋萨罗；《文献通考》卷三三九作秧萨罗。即今伊拉克的巴士拉城。该城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和石油化工中心，也是伊拉克最大的港口城市，位于伊拉克东南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的阿拉伯河（Shatt al-Arab）西岸，南距波斯湾120公里，是连接波斯湾和内河水系的唯一枢纽。此城始建于公元前636年，之后逐渐成为文化和贸易中心。该城为古今道路通衢，是海陆丝绸之路上的要道。译者。

[17] 即安巴尔，位于今巴格达城西62公里的幼发拉底河岸边。安巴尔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人居住，在萨珊王朝时期成为战略要地。634年被阿拉伯人占领。752年阿拔斯王朝将该城作为首都。巴格达城建立后，该朝随之迁都于巴格达，但安巴尔城在整个阿拔斯王朝时期仍为重镇，到14世纪后半叶逐渐衰落，到19世纪末完全废弃。该城遗址在今费卢杰（al-Falūdja）城西北5公里（《伊斯兰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旧版），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v. I，pp. 484，485）。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安巴尔省仍保留着该名称，是伊拉克最大的省，也是伊拉克逊尼派聚居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战争在安巴尔省内最为激烈。特别是拉马迪和费卢杰两座城市，以其居民强烈的部落和宗教情节而闻名，甚至前总统萨达姆·侯塞因的政权都对该地区保持高度的警惕。该城为去往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18] 尼尼微（Nineveh）王国，即古代亚述帝国，其都城为尼尼微城，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译者。

[19] 贾兹剌（Jazīrah，又译为“加兹拉”），宋岘先生认为此为《经行记》之亚俱罗，见《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唐）杜环〈经行记〉新证之一》（《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和《亚俱罗考》（《中国海上丝绸之路》1998年第2期）。译者。

[20]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为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三大城市，尼尼微省首府，人口有150万，位于首都巴格达以北362公里，底格里斯河上游西岸。其为阿拉伯历史上的文化名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连接小亚细亚和波斯，是去往巴格达、小亚细亚、叙利亚、伊朗等地的要道。译者。

[21] 《亚美尼亚史》（*The Armenia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第63页（原文第111页）中以阿迷达（Amida）的形式提到了阿迷得城，并记述606年该城向波斯军队投降（part 1，Trans by R. W. Thomson & James Howard Johnston，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0）。该城从16世纪末开始称作迪亚巴克尔（Diyārbakr，即低雅儿·八吉儿），而阿迷得之名则废弃不用（《伊斯兰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旧版），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v. II，pp. 345，346），在奥斯曼帝国时代这里是重要的文化中心。迪亚巴克尔城人口有54万，是迪亚巴克尔省的首府，也是土耳其东南部的最大城市和该国重要的交通中心。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库尔德人。该城为丝路重镇和交通要道。译者。

[22] 叙利亚古城，也称剌失德城，今为拉卡城，位于幼发拉底河左岸，人口有19万，是拉卡省的首府，该城距西边的大城160公里。原为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修建，后成

为拜占廷帝国的前沿哨卡。经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修缮后，成为避暑胜地。803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诃论·剌失德统治时期作为夏都，并兴建了宏伟的和平宫和清真寺等建筑。13世纪蒙古旭烈兀军队西征时，城市被毁。现存古迹包括古城墙和著名的巴格达大门，还有诃论·剌失德的皇宫及12世纪奴儿丁·赞吉算端建造的清真寺。该城是去往小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23] 鲁迷（Rūm）似是汉至南北朝之大秦，唐宋之拂菻。《明史·世宗本纪》和《陕西通志·西域土地人物图》作“鲁迷”。即今小亚细亚半岛。译者。

[24] 斯特拉波（Strabo，前54～公元25年）撰写的《地理学》（*Geography*，Book XI，chapter I，p. 216）中载：“陶鲁思（Taurus）山像一条带子自西向东从这个洲（亚洲）中间穿过，并将其分成南北两个部分。”（trans by H. C. Hamilton，Esq.，W. Falconer，M. A.，London，1857）今为托罗斯山，是土耳其南部的山脉，由东南、中、西三段组成，成雁行式排列，全长约1200千米。西段宽75～150千米，海拔2000米；中段为山脉主体，宽50千米，有3000米以上高峰，北侧的埃尔济亚斯山海拔3916米，为中段最高峰；东南段最长，向东北直达大阿勒山。译者。

[25] 这部分塞尔柱人是塞尔柱王朝的后裔，11世纪后半叶，该王朝开始解体，于是该朝王室速莱蛮在小亚细亚建立了鲁迷塞尔柱王朝（1077～1308年），这是后塞尔柱王朝中实力较强的王国，1308年被蒙古人所灭。译者。

[26] 《亚美尼亚史》中阿特罗帕特纳作阿忒儿帕塔干（Atrpatakan），并多次提到，如第60页（原文第109页）。即阿塞拜疆。译者。

[27] 今为阿拉斯河，全长1072公里，流域面积10. 2万平方公里。该河发源于今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山脉，其下游河道为亚美尼亚与土耳其、伊朗、阿塞拜疆的界河，这一地区是重要的农业区，但水流湍急，不利航运，该河最后在阿塞拜疆境内汇于库拉（苦儿）河，后注入里海。译者。

[28] 即萨菲德河，历史上曾称作马尔杜斯（Mardos）河，上游也称大红水（Qizil uzun）河，是伊朗北部最大的河流，总长650公里，流域面积5. 8万平方公里。河流穿过厄尔布尔士（Elburz）山脉时，形成长37公里的峡谷，此峡谷为德黑兰到岐兰平原的主要通道。而后该河流入岐兰平原，形成三角洲，注入里海。该河所形成的河谷是伊朗重要的农业区和水利资源开发区。译者。

[29] 《元史·速不台传》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等作宽田吉思海。南岸为伊朗，北岸为南俄草原。译者。

[30] 《元史·唵木海传》作桃里寺。《陕西通志》卷十作帖乩列思。今为大不里士，是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的首府，人口约100万。译者。

[31] 今为马拉盖，位于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人口约30万。这里是伊利汗国最初的都城，后由此迁都帖必力思城，在麻剌噶城建有著名的麻剌噶城天文台。该城是去往伊拉克、伊朗东部、小亚细亚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32] 今为阿尔达比勒市，是伊朗北部阿尔达比勒省的首府，人口34万。该城位于

加拉河上游谷地，萨瓦兰山（萨卜蓝·苦合）东麓，海拔1675米，始建于5世纪，在大不里士通往里海的道路上，距里海70公里，主要居民为阿塞拜疆人，是丝路古城。译者。

[33] 《唐会要》卷一百、《新唐书》卷三十四《地理志》作岐兰国。今为吉兰，位于里海南岸，多雨，是伊朗的鱼米之乡，也是里海南岸的交通要道。译者。

[34] 见《元史·曷斯麦里传》，即今格鲁吉亚。译者。

[35] 即今亚美尼亚。译者。

[36]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乞里茫沙杭。即今克尔曼沙阿（即有些地图上标的巴赫塔兰）城，是同名省的省会，人口有85万，主要居民为操波斯语的伊朗人和库尔德人。这里附近有古代萨珊王石刻。译者。

[37] 今在伊朗的中西部，人口约55万，是伊朗著名古城和多个朝代的首都。这里埋葬着中世纪学术泰斗阿维森纳和著名神秘主义诗人巴巴·塔黑尔。此外，这里还有很多古代遗迹。该城是通往伊朗、伊拉克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38] 今雷伊（Ray）城，也称沙赫尔（Shahr），在德黑兰城南，为德黑兰省雷伊县的县府，是伊朗现存最古老的城市，也是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古今多条道路在此交会。这里人才辈出，著名的医生拉齐就出生在此城。译者。

[39] 今伊斯法罕城，位于伊朗中部，人口150万，是伊朗第三大城市，也是一座古都，有很多文化遗迹，是丝路重镇。译者。

[40]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陕西通志》卷十作锁力旦城，并载："有缠头回回，种田，出黑狐子。"此为伊利汗国的新都，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交通中心。今为苏丹尼耶，是赞詹省阿卜哈尔州苏丹尼耶区区府所在地。这里是伊朗西北部的重要通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41] 伊利汗国（Īl-Khān）是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统治波斯的蒙古汗国，为元朝西北宗藩国，由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建立。旭烈兀及其继承者自称伊利汗。初定都于帖必力思城，后迁都于孙丹尼牙。该汗国同元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译者。

[42] 今为卡伦河，是伊朗最长的河流，也是伊朗境内唯一可通航的河流，位于伊朗西南部，为阿拉伯河支流，发源于扎尔德峰（Zard Kuh）北坡，过扎格罗斯山地与胡齐斯坦平原，在霍拉姆沙赫尔（Khorramshahr）附近注入阿拉伯河，长950公里，流域面积65230平方公里，最大流量2100立方米/秒，最大支流为迪兹河。沿岸最大城市是阿瓦士。译者。

[43] 今为胡齐斯坦，是伊朗十三省之一，位于伊朗西南部，面积64746平方公里，人口约438万，省会阿瓦士。该省油气资源丰富；水资源丰富，占全国1/3；是伊朗重要的农业省。译者。

[44] 今为舒什塔尔（Shushtar或Sustar），位于伊朗西南的胡齐斯坦（忽兹思田）省，人口约9万。该城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已是要塞城市，在阿拉伯征服时期的早期经常被提到。该城是丝路古城和交通要道。译者。

[45] 今为阿瓦士城，位于伊朗西南部，人口约90万，是去往伊朗、伊拉克等地的要道。译者。

[46] 今为法尔斯，是一个省，面积12万平方公里，在伊朗所有省份中排行第四。人口约432万，省会为设拉子市。该省与伊斯法罕省、恰哈马哈勒-巴赫蒂亚里省、科吉卢耶-博韦艾哈迈德省、布希尔省、霍尔木兹甘省、克尔曼省及亚兹德省接壤。该省有很多名胜古迹，是波斯语化的发祥地。译者。

[47] 阿拉伯语意为“区”。译者。

[48] 见《元史·太祖本纪》；《元史·郭侃传》作石罗子；《西使记》作失罗子国；《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泄剌失；《陕西通志》卷十作失剌思城，并载：“有缠头回回，出鱼牙把刀，有院，有乐人，有各色果品，有长流水。”《明史》作失剌思。今作设拉子城，是伊朗中部最大的城市，法尔斯（法儿思）省省会，也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距首都德黑兰919公里，海拔1600米，现有人口150万，位于扎格罗斯山脉南部。该城道路四通八达，是去往波斯湾、伊朗中部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49] 今为波斯波利斯，又称塔赫特贾姆希德（Takht-e Jamshid，贾姆希德御座），位于法尔斯省设拉子市东北60公里，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宫和旧都，兴建于公元前6世纪，遗迹至今尚存，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伊朗著名的旅游景点。该城曾是丝路重镇。译者。

[50] 今为亚兹德，位于伊朗中部，是铁路、公路的交通中心和亚兹德省的省会，人口约75万。丝路重镇。译者。

[51] 阿剌建城名已不存，现在位置大致位于伊朗西南，靠近伊拉克的拜巴汗（Behbahan），是去往伊拉克的要道。译者。

[52] 今已毁，新城达拉布（Darab）位于旧城东北。译者。

[53]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为霍尔木兹，是阿巴斯港所在地。此外，该名也是阿巴斯港附近的岛屿、区、城的名称。《瀛涯胜览》作忽鲁谟厮；《星槎胜览》作忽鲁谟斯。该港是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要道。译者。

[54] 该湖至今犹存，但由于库尔（苦儿）河上游修建水坝、灌溉等，其面积已大为减少，现为35万公顷。译者。

[55] 位于今伊朗西南，靠近波斯湾与俾路支省。译者。

[56] 今为克尔曼。《辽史·天祚本纪》作起儿漫；《西使记》作乞尔湾；《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条作乞里马泥；《明史》作乞力麻儿。克尔曼城是同名省的省

会。面积18万平方公里，该省在伊朗所有省份中排行第二，人口约240万，北与亚兹德省和南呼罗珊省为邻，东与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交界，西与法尔斯省接壤，南面连接霍尔木兹甘省。克尔曼城距首都德黑兰东南约1076公里，人口约为53万。始建于3世纪，长期为波斯湾、呼罗珊、马克兰之间的贸易中心。克尔曼城是丝路要道和伊朗名城。译者。

[57] 今为锡尔詹城，是克尔曼省锡尔詹州州府所在地，人口18万。该城是通往设拉子、克尔曼、波斯湾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58] 今为吉罗夫特，位于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的哈兰河岸边，人口29万，这座城市的历史长达4500年，最近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该城为古今交通要道。译者。

[59] 今俾路支斯坦位于伊朗东南部，与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译者。

[60] 今为马克兰，没有专门的行政区域，其大致在今巴基斯坦与伊朗交接处的海岸地带，东起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松米亚尼湾，西至伊朗东南海岸阿曼湾的库赫角，南濒阿拉伯海，北部迫近高原。巴基斯坦境内的马克兰地区又称凯奇莫克兰，是去往南亚的通道。译者。

[61] 见《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作昔思丹。今为锡斯坦，位于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在阿富汗与伊朗之间。每年春季，赫尔曼德河经过下游分流，即锡斯坦河与比亚班河在盆地西部泛滥（5月泛区最大面积可达3000平方公里），部分河水又从泛区经过沙拉格河注入南面的高德济里洼地。此后，泛区水位下降，留下几个淡水湖（赫尔曼德湖、萨比里湖等）、沼泽与作为牧场使用的陆地。该地区曾为发达的灌溉农业区，14世纪时灌溉设施遭破坏。现以冬作物为主，种植小麦、大麦、豆类、饲料。为恢复与发展锡斯坦经济，伊朗与阿富汗1977年签订条约就赫尔曼德河水分配问题达成协议。译者。

[62] 今为伊朗和阿富汗的界湖，分成几个湖泊，其中较大的湖称作萨比里湖、赫尔曼德湖。译者。

[63] 《大唐西域记》作罗摩印度川。今为赫尔曼德河，发源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以西约40公里，是条内陆河流，也是该国境内最长的河流，有很多支流，全长1300公里（其中最后60公里在伊朗境内），流域面积达38万平方公里，年径流量约120亿立方米。流域内水资源较为丰富，阿富汗政府很早就注意该流域的开发。1947年开始对赫尔曼德水系进行水文研究，1949年11月成立了赫尔曼德流域管理局（HVA），综合发展赫尔曼德河流域的经济。目前在赫尔曼德河流域兴建了多处水利水电工程。该河的河谷地带是阿富汗的重要农业区，也是古今交通要道，从坎大哈到喀布尔的道路就经过这一河谷。译者。

[64] 《北史·西域列传》作伽色尼；《大唐西域记》第十二卷作鹤悉那；《岭外代答》第三卷“大食诸国”条和《诸蕃志》卷上均作吉慈尼；《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哥疾宁。今为加兹尼，是加兹尼省的省会，人口15万，居民中塔吉克族占50%，普什图族占25%，哈扎拉族占20%，另有少部分印度人。此城是去往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南北部、中亚等地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65] 即坎大哈，位于阿富汗西南部，是坎大哈省的省会，人口32万，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与名城，是连接喀布尔与赫拉特的要道。译者。

[66] 见《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波斯国”条。今为扎兰季，位于赫尔曼德河下游、阿富汗西南，靠近伊朗边界，是尼姆鲁兹省（Nimruz）的省会，人口有5万人。译者。

[67] 今此名不存，大致在北呼罗珊省西部、中呼罗珊省西北部、塞姆南省东北部。译者。

[68] 大致在今天的塞姆南省，同名的苦密思城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此城毁于856年的地震，大致位置在达姆甘与塞姆南之间，曾是安息王朝的都城之一。译者。

[69] 《新唐书·西域传》作陀拔斯单，或曰陀拔萨惮，载：“其国三面阻山，北濒小海。”文中的小海应为里海；《新唐书·地理志》作陀拔思单。今称马赞达兰，是伊朗的一个省，在里海南岸，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译者。

[70] 今为戈莱斯坦，位于里海东南角，是伊朗的一个省，1997年从马赞达兰省分出，西濒里海，南邻塞姆南省，西南与马赞达兰省为邻，东边是呼罗珊省，北边是土库曼斯坦，面积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该地区在里海东岸，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71] 见《西使记》；《元史·曷思麦里传》作德痕。即今达姆甘（Dāmghān）城，位于伊朗塞姆南（西模娘）省（苦密思地区已并入塞姆南），人口有7万。该城是呼罗珊大道的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译者。

[72] 今为马赞达兰，是伊朗十三个省之一，位于伊朗北部；东与戈莱斯坦（古朱里章）省交界，南连德黑兰省和塞姆南省，西与可疾云省和吉兰省接壤，北濒里海。《西使记》作杩咱苍（答）儿，《元史·郭侃传》作杩楼答而。译者。

[73] 今为阿特拉克河（Rud-e Atrek、Atrak或Etrek），发源于伊朗北呼罗珊山区，全长669公里，流域面积为27000平方公里。由于上游大量引水灌溉，该河下游经常断流，只有洪水季节，才流入里海。这条河的下游河段是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界河。译者。

[74] 即戈尔甘河，发源于博季努尔德（Bojnurd）城附近的阿拉达格（Aladaq）山脉，全长200公里，两岸土地肥沃，是伊朗主要的农业区。此河流经戈尔甘城后，流入里海。译者。

[75] 也曾称作阿斯特拉巴德（Astarabad），即今伊朗东北部里海岸边的戈尔甘（Gorgān），是戈莱斯坦（Golestān）省的首府，人口26万。该城是里海东南岸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76] 《魏书》作呼似密；《大唐西域记》卷一作货利习弥伽；《新唐书·西域传》作火寻；《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花剌子模。今天是土库曼斯坦西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西部阿姆河下游地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州还保留着花剌子模的名称。

译者。

[77] 见《元史·曷思麦里传》；《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作匿察兀儿；《元朝秘史》作亦薛不儿；《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乃沙不耳。译者。

[78] 《后汉书·安息传》和《新唐书·大食传》作木鹿；《隋书·西域传》作穆国，载："都乌浒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与乌那曷为邻。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种类也，字阿滥密。都城方三里，胜兵二千人。东北去安国五百里，东去乌那曷二百余里，西去波斯国四千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圣武亲征录》作马卢；《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麻里兀；《元史·太祖本纪》和《元朝秘史》作马鲁。该城已毁，新城修建在老城西边25公里，称作马雷（Mary，Merv，Meru，Margiana），是土库曼斯坦马雷州的同名省会，人口有12万。该城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和驿站，很多历史文献对这座城市进行了记载。该城现在是去往土库曼斯坦首都和中亚其他城市的重要通道。译者。

[79] 《元史·太祖本纪》作也里；《圣武亲征录》作野里；《皇明四夷考》和《明实录》作黑娄；《陕西通志》卷十作把黑里城；《明史》作哈烈，或黑鲁。即今阿富汗赫拉特省。详注见后文。译者。

[80] 即今阿富汗巴尔赫省及其周边地区。译者。

[81] 即今穆尔加布河，详见后文注释。译者。

[82] 即今哈里河，详见后文注释。译者。

[83] 《元史·太祖本纪》作玉龙杰赤（Urganj）；《新唐书·西域传》作奥建；《西游录》作玉里犍；《元朝秘史》作兀笼格赤。即今天的库尼亚·乌尔干奇（Köneürgenç）或库赫纳·古尔干奇（Kuhna Gurgānj），也就是古代的花剌子模城，位于土库曼斯坦达绍古兹（Dashoguz）州，人口3万。此城是中亚文化名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我国文献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记载。译者。

[84] 据《新唐书·西域传》载，石国"西南有药杀水，入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曰质河"。"药杀"系中古波斯语（Jaxarte）的对音，意为"珍珠"；我国文献也称叶河。《大唐西域记》"赭时国"条中记载，"西临叶河"；同书"窣堵利瑟那国"条载："叶河出葱岭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浑浊，汩淴漂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作"叶叶河"；《元史·郭侃传》作忽章河；《长春真人西游记》作霍阐没辇，并载"由浮桥渡，泊于西岸"，"其河源出东南二大雪山间，色浑而流急，深数仗，势倾西北，不知其几千里，河之西南，绝无水草者二百余里"。《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2页载："另一条河就是讹迹邗（Ūzgand）河，发源于葛逻禄山区，流经讹迹邗、八卜（Bāb）、阿思柯提、忽毡（Khūjandah）城、八纳柯提（Banākath）等城的郊区，然后进入察赤（Chāch）城之界。再到粟特干（S. tkand，米诺斯基还原为Sutkand，第210页，引者）、法剌卜（Pārāb，即Fārāb）、毡的（Jand）、贾洼剌（Javāra，疑为Khavāra的笔误），最后流入花剌子模海（即咸海，引者）。"《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31页载："细浑（Saihūn）河，是突厥

思田（Turkestān）的一条河流。这条河也称作忽章河（Ābi-i-Khojend）、法纳柯提河（Ābi-i-Fenāket）和沙合鹿法河（Ābi-i-Shahrukhfah）。”（《威廉·乌斯利爵士集编》，J. C. 译，伦敦，1932年）今为锡尔河，全长3019公里，流经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是中亚的著名河流之一，也是这一地区重要的灌溉水源。该河的河谷地带是交通要道和丝路通道。译者。

[85] 大致在今撒马尔罕以北、塔什干以南，包括今锡尔河中游与泽拉夫尚河中游的地区，分属于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译者。

[86] 今为撒马尔罕，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西南270公里的泽拉夫尚河谷地，面积51. 9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为撒马尔罕州首府，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很多王朝定都于此。该城是丝路上最为著名的城市之一，扼守丝路要道。译者。

[87] 今为布哈拉，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大城市，位于泽拉夫尚河畔，已有2500多年历史，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诸多王朝以此为都。该城为文化名城，人口约25万，是丝路上最为著名的城市之一，扼守丝路要道。译者。

[88] 《新唐书》和《旧唐书》作白水。译者。

[89] 朝觐是穆斯林的“五功”（念、礼、斋、课、朝）之一，是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凡是条件允许的穆斯林，一生中要到麦加朝觐一次，获得“哈只”（Hajj）称号。因此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五功章》中说：“朝者，太聚天下万国之人，以全约信也。”译者。

[90] 在阿拉伯半岛西部、红海沿岸，麦加就在这一区域。译者。

[91] 今已毁，大致在伊朗西部靠近伊拉克边界的Qasr-Ishīrīn城东南33公里处。曾为丝路重镇。译者。

[92] 今为克尔曼沙阿，是同名省的省会，位于德黑兰西南525公里处，是伊朗西部古城，也是丝绸之路重镇，人口85万。该城古迹较多。译者。

[93] 今为巴斯塔姆，位于伊朗塞姆南省最大城市伊玛目鲁德城北6公里处，属于沙赫鲁德（Shahrud）县的一个乡，人口7000，这里以著名苏非圣徒白依扎德·必思坦的陵园而闻名伊朗，成为著名的旅游圣地。译者。

[94]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此城今已毁，大致位置在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城附近。译者。

[95] 也译为阿姆，是阿姆河南岸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城市，呼罗珊大道由此穿过，是丝绸之路向西的必经之地之一，1999年更名为土库曼纳巴德，现为土库曼斯坦列巴普（Lebap）州州府，是该国第二大城市，人口26万。译者。

[96] 《汉书·西域传》作窳匿城。《隋书·西域传》作石国，“居于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远而

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石国“南去□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魏书·西域传》作者舌。《大唐西域记》作赭时，其“周千余里，西临叶河（即药杀水），东西狭，南北长”。“城邑数十，各别君长，既无总主，役属突厥。”《经行记》作石国，“其国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新唐书·西域传》作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周千余里，右涯素叶河（即今楚河）。王姓石，治柘折城，古康居小王窳匿城地。”《册府元龟》作石国。《长春真人西游记》有别石兰，《元史·郭宝玉传》有别失兰（疑是Binkath，或Bīkath对音），从丘处机行进的路线与前人的研究判断应是柘折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的察赤。《西域番国志》作达失干城，其“在塞蓝之西，去撒马儿罕七百余里，城周回二里，居平原上四面皆平冈，多园林，广树木，流水长行。土宜五谷，居民稠密，负载则赁车牛”。《陕西通志》卷十作他失干城。《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32页载：“柘支（察赤的阿拉伯语名称）是突厥思田的一个地区，其主要城市为町吉忒（Tingit，这个名称似是宾柯提Binkath的笔误，引者）。”今为塔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也是塔什干州首府，人口230. 9万，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东北部、锡尔河上游支流奇尔奇克河岸边，是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该城是中亚文化名城，也是丝路上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译者。

[97] 今已毁，位于哈萨克斯坦南哈萨克斯坦州，在锡尔河岸边，靠近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古代重要的农业和手工业中心，近年考古发现大量的文物，如钱币等。译者。

[98] 也译为阿赫斯卡特，此城已毁。其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锡尔河支流上。译者。

[99] 今为乌兹根城，也称奥兹根或欧兹根。译者。

[100] 今已毁，其遗迹在赞詹省境内，位于德黑兰城西北240公里处，伊利汗国时代的陵园、宣礼塔保留至今，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译者。

[101] 今为乌尔米耶湖，是伊朗西北部最大的内陆湖，面积为5200～6000平方公里。该湖西岸土地肥沃，是伊朗重要的农业区。该湖盐分很高，最深处达16米，最长处为140公里，最宽处为40公里，水源主要来自注入该湖的三条河流。译者。

[102]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明史》作亦思弗罕、伊思把罕。今为伊思法罕，是伊朗历史名城，有很多古迹，人口224万，是伊朗第三大城，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要道，在伊朗历史上具有显要的地位。曾是萨法维王朝的首都，声名远播。译者。

[103] 今赞詹，是伊朗同名省的省会，位于伊朗西北，人口37万，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是去往德黑兰、小亚细亚、里海南岸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104]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为塔巴斯城，是南呼罗珊省塔巴斯（Tabas）州州府，古代属于苦黑思田地区。现在该城有6. 3万人，产枣与其他水果，气候干旱。译者。

[105] 斯特拉波撰写的《地理学》（*Geography*，Book XI，chapter IX，pp. 253-254）称："巴克特里亚（Bactriana）地区的有些部分沿着也里（Aria）地区向北，但大部分地区在也里地区以东。这是辽阔的地区，产除油料以外的所有产品。"该书还说此地有巴克特拉城（Bactra，即巴里黑），也称作扎里阿思帕城（Zariaspa，扎里阿思帕河从城中流过，并注入乌浒水），后来的巴尔赫之名就是从巴克特里亚（Bactriana）、巴赫塔尔（波斯语Bākhtar或 Bhalakh）、巴里黑（Balkh）演变而来的。《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8页称："巴里黑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先前曾居住着萨珊王朝的国王（Khirsravān，原文如此）。城里有萨珊国王修建的绘着画的建筑物，是杰作，这些建筑已经毁了。这个地方叫瑙·八哈儿（Nau-Bihār 即Naw Bahār，引者）。（巴里黑）是商人聚居地，很舒适、很繁华。这里是印度货物（Hindūstān）的集散地（bār-kadha）。巴里黑有条大河，发源于梵衍那，在巴里黑的附近地区形成了十二条支流。该河流经此城，并灌溉着所属地区的土地。巴里黑产圆佛手柑、酸橘、甘蔗、睡莲。巴里黑城有座内城（shahristān），其有高大的城墙。该城郊区有很多沼泽。"《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作薄提城。《大唐西域记》卷一作缚喝国。《圣武亲征录》作班勒纥城。《元史·地理志》作巴里黑。《陕西通志》作把黑里城。今在马扎里沙里夫（Mazār-i-Sharīf）城，即麻扎·沙里夫城附近。该城是阿富汗第三大城市，位于巴里黑旧城东约20公里，人口69万，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106] 今为铁尔梅兹，又译"捷尔梅兹"和"泰尔梅兹"，有学者考证其粟特语意为十字路口。该城为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城市，是苏尔汉河州首府，在阿姆河北岸、苏尔汉河入口处，邻近阿富汗边境，人口14万。该城是塔什干—铁尔梅兹干线公路的终点。历史上这里是去往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西亚的通道，玄奘等僧人就是经过此地西天取经。我国文献中对该地有很多记载，见后文。译者。

[107] 此名不存，但其位置为今伊朗阿巴斯港所在地，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和货物集散地。译者。

[108] 元人吴鉴《清净寺记》（《闽书》卷七《方域志》）载："宋绍兴元年（1131年），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Najib Muzahir ud-Dīn，引者）者，自萨那威（Sīrāf）从商舶来泉（州）。"《桯史》作尸罗围；《诸番志》作施那帏。此港已废，但地名仍保留，即撒那威，是伊朗布什尔（Bushehr）省坎甘（Kangan）州波斯湾沿岸的小港口，人口3500，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在这里曾发现大量唐宋元钱币、瓷器碎片，是古城遗址所在地。译者。

[109] 即后文的喀儿吉思雅。译者。

[110] 有关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进一步详情可以参考《穆斯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Palestine under the Moslems*，London，1890）一书的绪论；这些地理学家的详细介绍也可以参考雷诺德（M. Reinaud）翻译的阿布·勒·费达（Abu-l-Fida）著述的前言，巴黎出版（Paris，1848）。

[111]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dbih）、库达玛（Kudāmah）、雅忽比（Ya`kūbī）、伊本·鲁斯塔（Ibn Rustah）和伊本·阿勒·法吉赫（Ibn-al-Fakīh）的著

作，德·古耶（De Goeje）教授将其编入《阿拉伯舆地丛刊》（*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的第5～7卷，莱登出版（Leyden，1885-1892）；第6卷还附有一个法文译本，前两部著作还附有很多重要的注释。至于伊本·塞剌皮昂（Ibn Serapion）的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见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刊》（*Jour. R. Asiat. Soc.*）第9页，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雅忽比除了撰写地理学著作外，还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该历史著作为《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M. T. Houtsma）编辑，莱登出版（Leyden，1883），其中有很多地理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

[112] 伊斯塔赫里（Istakhrī）、伊本·豪喀尔（Ibn Hawkal）和穆喀达斯（Mukaddasī）的著作收入前文提到的《阿拉伯舆地丛刊》（*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的第1～3卷，莱登出版（Leyden，1870-1877）。马苏迪（Mas`ūdī）的《劝诫》（*At-Tanbih*）一书则由德·古耶教授编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8卷，莱登出版（Leyden，1894），该著的法文译本是由巴伦·卡拉·德·沃卡斯（Baron Carra de Vaux）翻译的，巴黎出版（Paris，1896），书名为《劝诫之书》（*Le Livre de l`Avertissement*）。马苏迪的历史著作叫《黄金草原》（*The Golden Meadows*，阿拉伯语名称为*Murūj-adh-Dhahab*）已在巴黎出版（Paris，1861），该书的阿拉伯文本附有米斯尔斯·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的法文译本。后两部著作由法国亚洲协会（*French Société Asiatique*）赞助出版。

[113] 是西班牙格拉纳达省的同名首府，人口23.7万，曾是著名的伊斯兰文化名城，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114] 纳思儿·忽思罗（Nāsīr-i-Khusraw，萨珊王）著作的波斯语本是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的，该本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巴黎出版（Paris，1881）。伊本·朱拜儿（Ibn Jubayr）著作的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莱登出版（Leyden，1852）。《法儿思志》（*Fārs Nāmah*）只有抄本，本书中引用的就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伊德里思（Idrīsī）的著作被于贝尔特（A. Jaubert）翻译为法文，巴黎出版（Paris，1836），但翻译得不够准确。本书所引的该文献的阿拉伯文本，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阿拉伯抄本书籍（*Manuscrits Arabes*），编号为2221和2222。

[115] 亚库特（Yākūt）的大词典—《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由乌斯坦菲尔德（F. Wüstenfeld）以阿拉伯文编辑，莱比锡出版（Leipzig，1866-1873）。有关波斯地区的条目在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 Barbier de Meynard）的《地理学词典波斯条目》*Dictionnaire de la Perse*，［巴黎出版（Paris，1861）］中可以找到，这部词典也收录了穆思套菲和后来著述者的相关内容。《观察》（*Al-Marāsid-al-Ittilā*）是亚库特所编辞典的摘要，由优博尔（Juyboll）编辑，莱登出版（Leyden，1852）。可疾云尼（Kazvīnī）的两卷本《天文志》（*Cosmography*）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哥廷根出版（Gottingen，1848）。阿布·勒·费达（Abu-l-Fidā）的《地理学》（*Geography*）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巴黎出版（Paris，1840），雷诺德将这部著作在巴黎翻译成法文，巴黎出版（Paris，1848），其前言由

古雅尔德（S. Guyard）翻译完成，巴黎出版（Paris，1883），其中有与阿拉伯地理学家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

[116] 《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文与法文译本的合刊本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巴黎出版（Paris，1874-1879）。穆思套菲（Hamd Allah Mustawfī）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波斯语）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出版于孟买（Bombay）。本书所引的《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为大英博物馆所藏抄本，编号为22693、7630，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历史精选》的一部分现已出版，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巴黎出版（Paris，1903）。

[117] 即察合台语。译者。

[118] 阿里·亚兹底（`Alī Yazdī）撰写的有关帖木儿历史的波斯语著作被称为《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加尔各答出版（Calcutta，1887）。法文译本由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的名称于巴黎出版（Paris，1772）。哈菲兹·阿卜鲁（Hāfiz Abrū）的著作只有抄本，本书所引的就是大英博物馆的抄本，东方抄本编号为1577。突厥文（即土耳其文，译者）的《世界志》（*Jahān Numā*）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这部著作的一部分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成拉丁文，在伦德出版（Lunde，1818）。阿布·勒·噶兹（Abu-l-Ghāzī）所著蒙古史的突厥文和法文合刊本由巴伦·德斯麦森（Baron Desmaisons）编辑，圣彼得堡出版（St Petersburge，1871）。

[119] 希提英译本名为《穆斯林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State*）。译者。

[120] 巴拉祖里的著作由德·古耶教授编辑，莱登出版（Leyden，1866）。他也为我们提供了麻实库维（Ibn Mashkuwayh）的著述，并将其编入《阿拉伯部分历史文献》（*Fragmenta Historicorum Arabicorum*）的后半部分，莱登出版（Leyden，1871）。哈木札·亦思法汗尼（Hamzah Isfahānī）所著历史著作由哥特沃尔德（I. M. E. Gottwaldt）编辑，莱比锡出版（Leipzig，1844）。塔巴里（Tabarī）的多卷本历史巨著由德·古耶教授编辑成三编丛书，莱登出版（1879～1901年）。伊本·阿喜儿（Ibn-al-Athīr）的编年史由多伦博格（Tornberg）编辑，莱登出版（1867～1876年）。法赫里（Fakhrī，或更准确的名字为Ibn-at-Tiktakā）的著作，由阿赫尔瓦尔德特（Ahlwardt）编辑，格达出版（Gotha，1860）。本书引用的伊本·赫尔顿（Ibn Khaldūn）的著作是由（埃及的）布拉克（Bulak）出版社于伊斯兰历1284年（1867年）出版的。伊本·哈里坎（Ibn Khallikān）的著作由乌斯坦菲尔德（Wüstenfeld）编辑，哥廷根出版（Gottingen，1837），英译本由德·斯兰（De Slane）翻译完成，东方翻译基金资助，伦敦出版（London，1843）。密儿哈万（Mirkhwānd，或Amirkhwand）和赫万达密尔（Khwāndamīr）的波斯语历史著作有石印本，《纯洁的花园》（*Rawdat-as-Safā*）在伊斯兰历1266年（1850年）、《旅程的喜悦》（*Habīb as-Sayār*）在伊斯兰历1273年（1857年）出版于孟买。塞尔柱王朝的两部历史著作已

收入豪茨麦（Houtsma）教授编辑的《有关塞尔柱历史文本选集》（*Recueil de Textes relatifs a l`Histoire des Seljoucides*）的第1卷和第4卷中。第一部著作是伊本·易卜剌欣（Ibn Ibrahīm，又称作Muhammad Ibrāhīm，或Muhammad ibn Ibrāhīm）完成的，其大概完成于伊斯兰历1025年（1616年）；第二部著作由伊本·比比（Ibn Bībī）撰写于伊斯兰历680年（1281年）。也可以参阅豪茨麦教授发表于*Zeit. Deutsch. Morg. Gesell*（1885年）第362页的一篇文章。

[121] 见《新唐书·地理志》。此城今已不存，大致位置在巴士拉城东北，靠近底格里斯河岸边。译者。

[122] 今为锡利夫凯（Silifke）城，位于梅尔辛（Mersin）省，靠近地中海沿岸高科苏（Goksu，即清水）河的河口，是古代通往罗马的水陆要道，至今仍是土耳其地中海沿岸重要的水陆交通中心之一。此城是美丽的海滨城市，人口5万。译者。

[123] 今埃雷利（Ereğli），是科尼亚（Konya）省东南的一座城市，人口9万。历史上这里是通往罗马的重要通道。译者。

[124] 据说由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有很多富庶的城市，其中只有一座城市冠以阿拉伯名称，即麦里雅（Almeria），也就是Al-Marīyah的当地读法，意为“灯塔”。像喀剌塔玉得（Calatayud）城是另一个例子，其最初不是“城”的名称，而仅仅是城堡——喀剌·阿优卜（*Kal`at Ayyūb*），即约伯（Job）堡，在城堡南兴建起城市。很多源于古利比里亚（Iberian）、罗马（Roman）或西哥特（Visigothic）的名称，因缺乏资料，无法深入了解。至于格林纳达（Granada）之名也是如此。在波斯地名的细节方面同样要进行修订。

[125] 需要说明的是dh在现代波斯语发音为z（如Azarbāyjān，曾写作Adhar-bāyjān），但有时候显然不发z音。因此哈马赞（Hamadhān）现在称作哈马丹（Hamadān），但一定不会发音为Hamazān。波斯语中一般来说阿拉伯字母w发v音，但不是通例，如可疾云（Kazwīn或Kazvīn）。

[126] 阿拉伯语词汇多半是由三个字母组成一个词根，往往会按语法在三个字母的前后附加字母，构成新词。译者。

[127] 因此我们在乌剌（Al-Ubullah）城（来源于希腊名称）一词前要加上冠词，这种情况在其他部分也出现过。纯粹的阿拉伯城市名称有时候带有冠词，有时不带冠词。如苦法（Al-Kūfah）城，据说其意为“芦苇棚”；另一个例子是瓦夕的（Wāsit）城，常不带冠词，意为“中部城”，但此处看来两者所占的比例差不多相等。

[128] 没有任何规则证明麦加（Mecca）附近的港口吉达（Jiddah），在早期著述中写作朱达（Juddah或Al-Juddah）。后文有些地名，阿拉伯著述者在前边加一个冠词，如同本书在前文第一个提到的加冠词的例证那样。但后文中为了简洁或标示地图，一般将地名的冠词省略了。使用或不使用冠词，不同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有不同的习惯，如同他们拼写外来地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一样。

[129] 《新唐书·波斯传》和《唐会要》作疾陵城。译者。

[130]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53页载："另一个就是可萨海。该海的东边是沙漠，靠近古思（Ghūz）和花剌子模。其北边（靠近）古思和可萨的部分地区。其西边靠近可萨和阿札拜占（Àdharbādhagān）诸城。它的南边邻近岐兰（Gilān）、低廉（Daylamān）、陀拔思单（Tabaristān）、朱里章（Gurjān）。这个海没有海峡（khalīj）。它的长度是400法儿萨（farsang，即6. 24公里左右），宽为400法儿萨。此海只产鱼，不产其他。"（Trans and explained by V. Minorsky，London，1970）译者。

[131] 后文由于堆积的脚注中文献出处出现紊乱，可能造成一些遗憾，但对于研究者无疑希望求证真实，而不将它看成是一种讹误。这似乎是所有的，或不是所有的文献采用的唯一办法。众所周知，穆斯林著述者，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和操突厥语的人经常抄袭他人的文献，但很少承认抄袭中所犯的失误。另外，每位地理学家，或历史学家在抄袭前人文献（不承认抄袭）时通常会增加一些自己的东西，因此考订一个事件或确定一个地名肯定要综合很多著述者的大量材料才可以做到。此处借用一个苦密思（Kūmis）地区（文献上）不太重要的城市忽儿干（Khurkān）城的例子加以说明。这个城市的方位不十分清楚，苦密思地区的这个忽儿干城尽管今天从地图上消失了，但看来这个城市并不是说不重要，它与吉八儿（Jibāl）地区（用阿拉伯语书写）的忽剌干（Khurrakān）城是有区别的。所有了解苦密思（Kūmis）城位置的人都知道它的所在，但需要确定方位：（1）可疾云尼提到了这座城市，并说距离必思坦（Bistām）城有4里格；（2）亚库特补充的材料说该城位于去往阿思塔剌八（Astarābād）城的道路上；（3）穆思套菲进一步说在他那个时代忽儿干（Khurkān）是一个很重要的村庄，这里有一座圣徒墓，水源丰富，因此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邮传站。然而，与之相关的记录很少，因此三位著述者的记录都要引用。

第二章 亦剌可（`Irāk）地区

美索不达米亚分为南北两个部分。亦剌可或巴比伦地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河道的改变。各大灌溉运河。报达城。马达因（Madāin）城，和底格里斯河沿岸，而后向南到凡·埃思·思乐赫（Fam-as-Silh）城。

辽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天然地形成了两部分，幼发拉底河[1]与底格里斯河则流经该平原。北半部的绝大部分［古亚述（Assyria）王国］是带有砂砾的平缓草原；南半部分（古巴比伦）是盛产椰枣的丰饶冲积扇平原，这里的土地可以靠人工灌渠灌溉，就整个东部而言，此地极其富饶，被称作人间的四大天堂之一。阿拉伯人将美索不达米亚北半部分称作阿勒·贾兹剌（Al-Jazīrah），意为“岛屿”；美索不达米亚南半部分[2]则被称为亦剌可（`Irāk），意为“峭壁”，或“海岸”，但该词最初是如何使用的，令人生疑；很可能其有一个更古老的名称，现已不复存在，或者最初另有不同的含义。阿拉伯人通常将这片冲积平原称为“黑土地”（As-Sawād），广义上说，撒瓦（As-Sawād）一般指亦剌可地区，即整个巴比伦地区[3]。

亦剌可地区和贾兹剌地区的分界线因时而异。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通常以北边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安八儿（Anbār）城到底格里斯河岸边的塔可里忒（Takrīt）城[4]一线为界，这两座城市均属亦剌可地区。后来的文献多以塔可里忒城正西为界线，这样，安八儿城北边幼发拉底河岸的诸多城市也划入亦剌可地区；就自然环境来说，这种划分使得两地区之间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经过幼发拉底河南岸的阿纳（`Ānah）城，在这里幼发拉底河向南形成了一个大拐弯。阿拉伯人称幼发拉底河为夫剌（Al-Furāt）河；底格里斯河则被称为底吉剌（Dijlah，无冠词）河[5]，这一名称在《塔具木译本》（*Targums*）[6]中记载为底格剌忒（*Diglath*），与喜底可儿（*Hiddekel*）一词的后部分是对应的，采用这种书写形式的底格里斯河之名在《圣经·创世纪》中已提及。伊斯兰历1世纪（7世纪）中叶，穆斯林征服亦剌可地区时，他们将位于底格里斯河岸的泰西封（Ctesiphon）城称作马达因（Madāin）城，此城是该地区首府，也是萨珊王朝的冬都。但阿拉伯统治者需要为

其民众建立城市，并使其成为永久驻地，于是不久以后就在亦剌可地区建立了三座城市，即苦法城、弼斯啰城和瓦夕的城，这些城市很快成为穆斯林在新征服地区的主要城市，特别是苦法城和弼斯啰城在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统治时期成为亦剌可地区的双首府。[7]

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之后，需要建立一座新都，该朝第二任哈里发[8]在位时期于底格里斯河岸边修建了新都报达城，其与南边的泰西封（或马达因）城相隔只有几英里。原来的倭马亚王朝首都大马士革城很快失去了往日辉煌，而报达城成为阿拔斯王朝的中心城市，自然也成为亦剌可地区的首府，这一地区则成为穆斯林帝国东部的腹里和中心。

中世纪时期，亦剌可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原因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河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大量灌溉运河被废弃，在哈里发统治早期这些河流曾让亦剌可地区成为富饶的伊甸园。今天，底格里斯河主要流向东南，并在报达城之南250英里的苦儿纳（Kurnah）城[9]与幼发拉底河汇合。汇合后的河流现在被称作阿拉伯河（Shatt-al-`Arab），而后流入波斯湾，其宽河道或潮汐河口直线距离约为 100多英里。这可以从现代的地图中查到；但如前所述，穆斯林早期时代，很可能晚到伊斯兰历10世纪（16世纪）中叶，当时底格里斯河在报达城南100英里处，转向南，也就是现存的河床，现被称为沙塔·亥河（Shatt-al-Hayy，即蛇河）的河道，再流经瓦夕的城。瓦夕的城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在此城南约60英里处，该河通过灌渠分流其大部分河水后，再继续流，直到最后消失在大沼泽中。

整个中世纪，大沼泽宽达50英里，长约200英里，一直到弼斯啰城附近。幼发拉底河注入沼泽西北端，距离苦法城南数英里，因在那时幼发拉底河的干流经过苦法河道，而流经喜剌（Hillah）城[10]的河道称作纳赫儿·速剌（Nahr Sūrā）河[11]，当时仅是一条灌溉大运河（现在是主河道）。沿着大沼泽低洼部分的北边有一些潟湖，与宽阔的河道相连，使得通航成为可能；船只经过底格里斯河，并在喀塔儿（Al-Katr）城[12]进入沼泽水域，这里（现代的古尔奈城）的沼泽大量接纳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后通过阿卜·阿萨得（Abu-l-Asad）运河排入阿拉伯河河口。通过这条水道，货船可以从报达城畅通无阻地到达弼斯啰城，该城是连接报达城的海港，位于一条小运河顶端，此运河向西贯通潮汐河口—“盲”底格里斯河（Dijlah-al-`Awrā），这条河当时通常被

称作阿拉伯河。

如现代地图所示，现在的底格里斯河河道在今天的库特·阿马拉（Kūt-al-`Amārah）村[13]，即中世纪的马儿咋儿（Mardharāyā）城，在这里该河向东转向沙塔·亥河河道；这条现在流到古尔奈城的河道（东河道），很显然也就是萨珊王朝时期的河道，据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那时还没有形成大沼泽。历史学家巴拉祖里将大沼泽最初形成的时间确定为5世纪末苦八兹（Kubādh）一世[14]在位时期。在他统治时期，底格里斯河沿岸已经修建了防护堤，但因年久失修，河水猛涨，造成多地决口，于是洪水淹没了南边和西南的所有低洼地带。苦八兹之子和继承人“公正者”阿奴设里万（Anūshirwān）[15]在位时期，修复了一部分防护堤，那些被淹没的土地也得到了复耕；但和先知穆罕默德同时代的忽思罗·派儿维兹（Khusraw Parwīz）[16]在位时期，即伊斯兰历7或8年（629年），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又一次暴涨，洪水很猛，前所未见。两河沿岸多处防护堤决口，最后这一地区成为一片泽国。巴拉祖里记载，派儿维兹（Parwīz）不惜以物力和生命为代价亲自督导重修防护堤，但太迟了，“因仍有一个河堤在决口，洪水无法控制，他一天就钉死了40位修河堤的人”（巴拉祖里的记载）。洪水没有退去，于是就形成了永久的沼泽；由于萨珊王朝连年朝政混乱，穆斯林军队推进到美索不达米亚之后，萨珊王朝就灭亡了，而仍然留存的防护堤自然不会有人去关注，“而且所有的河岸均决堤，因无人管理和迪罕[17]（Dihkān，即拥有土地的波斯贵族）无力修复河堤，造成沼泽不断扩大”。

上文主要探讨了大沼泽形成的有关情况，伊本·鲁斯塔提到了萨珊王朝晚期底格里斯河发生第一次大改道的情况，当时该河从东河道经马儿咋儿（Mardharāyā）城转移到西河道（沙塔·亥河），西河道流经后来穆斯林所建立的瓦夕的城所在地。伊本·鲁斯塔说这次改道让原来东河道毗邻的所有地区变成了沙漠，因此在他写作的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沙漠依然存在。他记载回水有6里格[18]长（大约在古尔奈城北边），向北到达阿卜达喜（`Abdasī）城和马咋儿（Madhār）城[19]，这里河道被一水坝拦截；由此充分说明该处（古尔奈城）就是底格里斯河东支过去和现在与（西）河道的汇合点。伊本·鲁斯塔说该河坝在萨珊王朝时代并不存在，并且在他那个时代该河坝上游已停止了所有航运（应指东河道，译者），当时该河（旧东）河道一直到阿卜达喜城和马咋儿城之北，再向右转，在瓦夕的城北部地区（在马儿咋儿城）重新与（他

那个时代的）底格里斯河河道汇合，因此从汇合处逆河而上，能很顺畅地到达马达因城。他接着说："过去从印度驶来的海船能航至底格里斯河（后者的河口）沿岸的弼斯啰城，海船航行到（现在的）凡·埃思·思乐赫（Fam-as-Silh）城[20]以北（后来在此河南边）就进入通向报达城的底格里斯河河段。"

因此今天底格里斯河下游所经过的主河道，也就是萨珊王朝时期的河道。但在阿拔斯王朝统治的几个世纪里，该河经瓦夕的城的西河道流入沼泽，这样问题就来了，什么时候河道返回到现在的东河道了呢？答案无疑就是由于西河道淤沙不断聚积，而后逐渐造成改道；不管怎么说，直至伊斯兰历9世纪（15世纪）初，帖木儿朝时代的所有穆斯林文献仍记载，底格里斯河下游仍流经瓦夕的城，这一点也可从哈菲兹·阿卜鲁在伊斯兰历820年（1417年）完成的著作中得到证实。第一位谈到东河道可以航船的旅行家就是约翰·纽贝尔（John Newberie），他在1581年访问了报达城后乘船顺河而下，6天后到达弼斯啰城，在航程中的第5天他经过苦儿纳城，"这里就是富罗河（Furro，即幼发拉底河）与八格达惕河（Bagdet，即底格里斯河）的汇合处，并建有一座城堡"。接下来的世纪（即17世纪），法国人塔维尔尼尔（Tavernier）顺底格里斯河而下，经过了同样的路线。他1652年离开报达城，并说在该城南边很远的地方，底格里斯河分成了两支。西河道（经瓦夕的城）在他那个时代是不能航行的，但该河道有水流，如他所说，该河道是"美索不达米亚汇合点的另一支"。这位法国旅行家乘船经过了现在的东河道，该河流经库特·阿马拉村后，经过"古迦勒底（Chaldée）地区很长距离"；他说就在到达弼斯啰城不久之前，经过了苦儿纳城，这里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汇合处。[21]

哈里发王朝统治时期，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地理环境所表现的主要特征是有大沼泽以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不断改道；但差不多同样重要的是阿拉伯人征服萨珊王朝后，从波斯人那里接管了这一地区，并继承了其运河灌溉体系。简而言之，如前文所述，可以发现向东连接底格里斯河的一系列运河如同一把门闩横插于沼泽北部的整个亦剌可地区及两河之间；底格里斯河的东边则有一条长200英里被称作纳赫儿剌宛（Nahrawān）的运河[22]，该运河由塔可里忒（Takrīt）城之南的底格里斯河分流出来，又在瓦夕的城北50英里处回流到底格里斯河，这条运河灌溉着底格里斯河波斯方向或更远地区的土地。关于这个庞大水道网络体系的相关细节将在正文中做全面叙述，但若浏览一下所附地

图，并结合当时文献的记述，就可得出结论：阿拔斯王朝时期，作为天府之地的亦剌可地区对水资源的利用是极其节约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几乎所有土地都是由从幼发拉底河引出的向东运河灌溉的，沿底格里斯河左岸向东到波斯高原山麓的土地，靠纳赫儿剌宛运河的灌溉而变得很肥沃，因该运河将底格里斯河富余的河水很经济地输送到东部地区，同时这条运河还接纳了从曲儿忒思田山区流下来的大量河水。

报达城的地理状况在以前的著作[23]里已做了探讨，此处有必要对一些最为重要的内容做一概述，目的是理清首都与亦剌可地区其他城市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详细阐释报达城在道路体系中（第一章中已做了探讨）的枢纽作用。

第一条从幼发拉底河分流出来，并流入底格里斯河的大运河是纳赫儿·爱薛（Nahr ‘Īsā）运河[24]，而在该运河与底格里斯河交汇处的北边就是伊斯兰历145年（762年）哈里发满速儿（Mansūr）所建成的团城，其为报达的内城。团城有四座距离相等的城门，各城门之间彼此相距1阿拉伯里（Arab Mile）[25]，一座城门就是一条大道的起点。大外城区一度就修建在这四条道路上，不久以后这些外城区和大内城区的边缘重合了。团城的四座门为：（1）东南为弼斯啰门，该门连接着底格里斯河沿岸的外城区，该城区交错分布着纳赫儿·爱薛（Nahr `Īsā）运河[26]的多条支流；（2）西南为苦法门，该门是通向南边的道路的起点，这条道路就是通往麦加的朝觐之路；（3）西北为叙利亚门，从此门起始的道路分为两支，一支向左到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安八儿城，另一支向右到报达城北边、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各城；（4）呼罗珊门，从该门起始的道路要跨过底格里斯河的主浮桥，经过这座桥就是报达城的东城区，这里最初被称作马赫迪（Mahdī）营房，马赫迪[27]是哈里发满速儿之子，也是他的继承人，马赫迪曾在此处修建过宫殿，也建造了报达城东岸的聚礼清真寺。报达城东城区分为三个居民区。附近桥头的被称作鲁萨法（Rusāfah）区[28]；该区北边是沿着河岸分布的沙马思押（Shammāsīyah）区；鲁萨法区之南是木哈林（Mukharrim）区[29]。东报达城的这三个区修建有半圆形的城墙，从沙马思押区之北的底格里斯河河岸一直再延伸到木哈林区南部的河岸边；经过东报达城区中部狭窄处，可到团城的呼罗珊门，这里是呼罗珊大道的起点，此后该道跨过主桥到达东报达城的（第二座）呼罗珊门，如前章所述，此干道向东到达穆斯林帝国的边陲地区[30]。

前文提到的团城苦法门，向南延伸有苦法道，或朝觐道，从团城（苦法门）城墙向南1格里的大外城区，被称作喀儿赫（Karkh）城区[31]。该城区的木哈洼儿（Muhawwal）门位于团城的西边，从苦法门和叙利亚门起始的道路，在此处汇合，形成一条经木哈洼儿（Muhawwal）城[32]到达安八儿城的西行大道。叙利亚门的北边是哈儿比雅（Harbīyah）城区（与之相应的团城南边为喀儿赫城区），经哈儿比雅城区，可到达一处被底格里斯河拐弯两面包围的地方，这就是西报达城区的北公墓，后来这里以喀兹迈因（Kāzimayn）[33]而知名，该名称源自此地修建有两个什叶派依麻木（Shī`ah Imām）的陵园。

报达城[34]位于四个区的中央，并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35]。西边的喀塔剌不儿（Katrabbul）区位于爱薛（`Īsā）运河之北；巴都剌雅（Bādūrayā）区位于该运河之南；东岸的纳赫儿·卜可（Nahr Būk）运河区[36]位于呼罗珊道的北边，南岸为喀剌洼扎（Kalwādhā）区；喀剌洼扎（Kalwādhā）城[37]位于东报达城最南端城门之南不远的（底格里斯）河岸边。作为帝国道路中心的报达城有向南和向西的两条道路，其在团城的苦法门附近分开（前文已述）；还有向北和向东的两条道路，以主浮桥一端作为起点经过东报达城。去往苦法城（和麦加）的南道，经过喀儿赫城区不久后，到达纳赫儿·萨儿萨儿（Nahr Sarsar）运河[38]岸边的萨儿萨儿（Sarsar）城[39]，这是从幼发拉底河到底格里斯河的第二大运河，其与位于南边的纳赫儿·爱薛运河平行。西路或安八儿道离开苦法门后，经过八剌萨（Barāthā）城区，再经约1里格，到达位于纳赫儿·爱薛运河岸边的木哈洼儿城。东道或呼罗珊道离开位于东报达城木哈林（Mukharrim）城区北的呼罗珊门（前文已述）后，到达的第一座城镇是纳赫儿剌宛（Nahrawān）大运河流经的纳赫儿剌宛（Nahrawān）桥城[40]，该城因此处有座横跨大运河的桥梁而得名。最后就是北路，其经过沙马思押（Shammāsiyah）城区到达东报达城的八剌丹（Baradān）门，不久以后又到达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八剌丹（Baradān）城[41]；此后该道沿着底格里斯河左岸到达萨麻剌（Sāmarrā）城[42]以及北美索不达米亚诸城。

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统治的5个世纪里，报达城的内城及其外城区的布局随着该城的兴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从前文概述可知，诃论·剌失德（Hārūn-ar-Rashīd）[43]在位时期内城已建成，但他去世后便爆发了内战，结果团城被毁。伊斯兰历221年（836年），哈里发王朝的国都迁往萨麻剌城，共历经7位哈里发，于是报达城降格为一个地区性的城

市。到伊斯兰历279年（892年），都城萨麻剌城被废弃，哈里发还朝旧都，并在东报达城建起了许多宫殿，多次被毁坏的团城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现在团城已经被毁；但直至蒙古破城前的4个世纪里，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城区一直是各位哈里发的长期驻跸之所。

晚期诸哈里发修建的宫殿靠近木哈林城区的南边，这是三个（东）城区中最南的城区，该城区还有诃论·剌失德时期就已建成的东报达城墙旧迹。实际上当时（修建宫殿时）这三个区已是废墟，但新修的王宫很快被新城区合围，不久又被绵长的半圆形城墙围了起来。包括旧木哈林城区一部分城墙在内的东报达新城墙，从王宫北的河畔起一直沿河岸南下（接近喀剌洼扎区），此城墙是由哈里发穆阿塔兹儿（Muatazhir）[44]在伊斯兰历488年（1095年）修建的。这个曾多次修葺的城墙，在伊斯兰历656年（1258年）阻挡蒙古人的攻城战中，并未发挥作用，最终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灭亡了。今天这个残破的城墙依然存在，空荡荡的城墙之内几乎没有留下阿拔斯王朝时代的城市遗迹，但其仍保护着现代的报达城，至今该城是亦剌可地区的首府，也是（奥斯曼）土耳其总督府所在地。

报达城南7里格就是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的马达因城（Al-Madāin，即诸城）[45]，这是阿拉伯人对两座古都—泰西封（Ctesiphon）城[46]和塞琉古（Seleucia）城[47]的统称。塞琉古城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塞琉古王朝（Seleucids）[48]初期。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塞琉古城的名称取自塞琉古·尼喀陀儿（Seleucus Nicator）[49]之名。阿拉伯人将泰西封简称为泰萨封（Taysafūn），其语源尚不清楚；尽管此城名看似源于希腊语，但很可能是古波斯语名称的讹误，因为我们不了解萨珊人是如何称呼其帝国首都的。[50]540年“公正者”阿奴设里万占领了奥龙特斯（Orontes）河岸边的叙利亚安都（Antioch）城[51]和塞琉古城，按照波斯帝王的旧规，阿奴设里万将塞琉古城的居民迁移到其首都泰西封。这样，他将这些移民安置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新城区，因此（泰西封）正对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塞琉古城址所在地；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该地区时这个城区还存在，称作鲁迷密牙（Rūmīyah），即罗马城（或希腊城），有些记载还说该城是按照安都城的布局形式修建的。

穆斯林著述者记载，马达因城是由7座城组成的，在各种文献中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这些名称，但其拼写存在差异。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雅忽比在著作里只记载了存在的5座城，并说有居民居住。“老

城”（Al-Madīnah-`Atīkah）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即泰西封城所在地，老城南1英里就是阿思般不儿（Asbānbur）城，其附近是鲁迷密牙城。底格里斯河的对岸是巴胡剌喜儿（Bahurasīr）城[52]，是必合·阿儿达喜儿（Bih-Ardashīr）之名的讹拼，意为“国王阿儿达喜儿（Ardashīr）之良城”，此城南1里格为萨八忒（Sābāt）城[53]，据亚库特记载，波斯人称这座城为八剌萨哈（Balāsābād）城。

阿拉伯人称宏伟的萨珊宫殿为阿亦万·吉思剌（Aywān-Kisrā），意为“萨珊王（Chosroes）宫”，其遗址在今底格里斯河东岸，据雅忽比记载，此宫殿位于阿思般不儿城；另一座高大的建筑就是“白宫”（Al-Kasra-al-Abyad），其从老城北1英里的地方就可看到。但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初，后一座宫殿肯定已不复存在，因在此之后的所有文献尽管都提到了“白宫”和“萨珊王（Chosroes）宫”的名称，但无一例外都是指大拱形建筑（萨珊王宫），这是今天唯一存在的萨珊王朝时期的建筑遗迹。伊斯兰历2世纪（8世纪）中叶，满速儿在修建报达城时，这座建筑却万幸地逃过了遭到完全破坏的一劫。当时，这位哈里发打算拆掉萨珊王宫，用其材料来修建新城。波斯八儿麻可家族（Barmecide）[54]出身的宰相（Wazīr）哈里得（Khālid）力谏这位哈里发放弃此种蛮行，却无果，哈里发仍一意孤行，可就在他传旨之时，该宰相提出使用拆除旧建筑的材料修建新城比购买还要昂贵，于是亚库特所称的萨珊王拱形[55]得以保留。在以后的时间里，萨珊王拱形的很多石材被拆除，用来修建东报达城塔吉（Tāj）新宫的雉堞墙，该宫由哈里发阿里·木克塔菲（`Alī Muktafī）[56]修建于伊斯兰历290年（903年）。

今天已完全被毁的马达因城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是座繁华的小城，这里自穆斯林征服后便修建有一座优美的聚礼清真寺；该城附近有波斯人萨儿满（Salmān）的陵墓，他是先知穆罕默德最知名的圣门弟子之一。砖块修建的马达因城市场提供着上乘的服务。附近的鲁迷密牙城里，哈里发满速儿一度居住于自己修建的王宫中，底格里斯河对岸的萨八忒（Sābāt）城也曾是哈里发马蒙（Mamūn）[57]的王宫。阿拉伯地理学家详细记述了宏伟的萨珊王古王宫。雅忽比说，大拱形，顶高80腕尺（ell）[58]；亚库特称，精美的烧砖，每块砖近一个腕尺长，宽快接近一乍（约20厘米，译者）。穆思套菲记载了马达因城及其宫殿，并称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马达因城和鲁迷密牙城已是无人居住的废墟，但其对面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村庄仍有人居住。除了上述内容外，他记载的最重要内容是前文提到的巴胡剌喜儿（Bahurasir）城，亚库特

曾经过该城，并称其为鲁麻坎（Ar-Rūmakān）城。巴胡剌喜儿城之南就是扎里兰（Zarīrān），这是朝觐之路上的一处驿站，再向西就是前文提及的萨儿萨儿运河沿岸的萨儿萨儿城，该运河在马达因城北不远汇入底格里斯河。从底格里斯（上、下）剌赞（Rādhān）地区，亚库特提到了该地区许多村庄的名称，而穆思套菲盛赞这里有产量很高的农作物。[59]

答亦儿·阿苦儿（Dayr-al-`Ākūl），即“环形河流”城[60]，此名称是对当地底格里斯河河道的描述，该城位于马达因城南10里格的底格里斯河东岸，在地图上已标出。这里（答亦儿·阿苦儿）有座基督教修道院，周边有一座很大的城市，这座大城是中部纳赫儿剌宛（Nahrawān）地区的首府，城中市场不远处有一座聚礼清真寺（Friday Mosque）[61]。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末，伊本·鲁斯塔记载此处设有经过底格里斯河的收税关卡，并有税官把守。他记载道：“收税关卡（*Al-Maasir*）就是底格里斯河一些地方的名称，这里有两条船停泊在河的一边，远处对岸也有两条船，同样固定地停泊着。而后，他们拉起横跨河上的绳子，并将绳子的两端系在对岸的船只上，这样可以防止夜晚不纳税而过河的船只。”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记载答亦儿·阿苦儿城是底格里斯河岸地区最优美的城市之一，此城以南的底格里斯河河道发生了改变。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亚库特称大修道院位于距底格里斯河1英里的平原中部，是荒芜之地。但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记载答亦儿·阿苦儿城仍是一座大城市，他还说由于周边有大片的椰枣林，天气潮湿。

答亦儿·阿苦儿北3里格的底格里斯河东岸就是阿思·西卜（As-Sīb）小城[62]，为了便于区别，该城被称作八尼·苦麻·西必（Banī Kūmā-i-Sīb）城，这里的橄榄林很有名，此地因伊斯兰历262年（876年）哈里发木塔米底（Mu`tamid）[63]率领军队打败萨法儿（Saffar）王朝的雅苦卜（Ya`kūb）而名垂史册。答亦儿·阿苦儿城南不远就是麻儿麻力（Marmārī）修道院，别名为（耶稣的）“使徒”修道院，又称答亦儿·苦纳（Dayr Kunnā，或Kunnah）修道院[64]，其位于底格里斯河以东1英里，距离报达城有16里格。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亚库特所引），据历史学家沙布斯提（Shābustī）记载，这是一座大修道院，周边有一道又高又大的院墙，像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堡。其院墙内有100多处供教士居住的院落，右边的一处院落售价仅为200～1000 迪纳（dīnār，合100～500镑）[65]。每处院落均有自己的花园，靠小运河灌溉，里面种

植着果树，每年的收成可获利50～100迪纳（合25～50镑）。

在答亦儿·苦纳修道院对面，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岸边的萨菲雅（As-Sāfīyah）小城[66]，亚库特记载在他那个时代这里已成废墟；小城对面的河西岸为胡满尼雅（Humānīyah，或Humaynīyah）城[67]，在地图上还可以找到，其东南距答亦儿·阿苦儿城有2里格。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初，胡满尼雅城是一座相当重要的城市，哈里发阿敏（Amīn）[68]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和母亲祖拜答（Zubaydah），即诃论·剌失德的皇后，有段时间曾被马蒙关押于此；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据亚库特记述，胡满尼雅是一个大村庄，周边是耕地。[69]

贾剌剌牙（Jararāyā或Jarjarāy）城[70]位于答亦儿·阿苦儿城东南4里格，至今犹存。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穆喀达思记载，这是一座大城，其聚礼清真寺靠近底格里斯河岸，城区横跨河两岸。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雅忽比称该城的居民主要是波斯贵族，此城也是下纳赫儿剌宛地区的首府。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据亚库特记载，与纳赫儿剌宛地区的其他大多数城市一样，该城已完全被毁。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南距贾剌剌牙城4里格，现在被称作塔勒·奴满（Tall-Nu`mān）的遗址就是奴满尼雅（An-Numānīyah）城[71]所在地，亚库特称该地在报达城和瓦夕的城之间的道路上。奴满尼雅城是上扎卜（Zāb）地区的首府，其聚礼清真寺位于市场内，但雅忽比记载在此城附近有一座叫答亦儿·喜兹吉儿（Dayr Hizkil）的修道院，这里的教士照料着精神病人。伊本·鲁斯塔记载，奴满尼雅城以其织机而享有盛名，因这里产的地毯可与喜剌（Hīrah）城[72]的地毯相媲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提到奴满尼雅城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其周边有椰枣林。贾不儿（Jabbul）小城[73]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在贾剌剌牙城南9里格处，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伊本·鲁斯塔记载这里有官办的面包房。该城的聚礼清真寺位于市场内，穆喀达思说此城和答亦儿·阿苦儿城一样大，但亚库特记载说贾不儿已衰落成一个大村庄。[74]此外，当地还有一个很大的村庄。

马咋儿雅城所处的位置就在今天的库特·阿勒·阿马拉（Kūt-al-`Amārah），这里是沙塔·亥河向东分流的地方，这个东河道就是现代底格里斯河的河道，现在底格里斯河向东南流到了苦儿纳（Kurnah）城。马咋儿雅城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其居民主要是波斯贵族。此处，纳赫儿剌宛大运河汇入底格里斯河；马咋儿

雅城南不远就是木八剌（Mubārak）城[75]，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纳赫儿·萨卜思（Nahr Sābus）城[76]的对面。纳赫儿·萨卜思城位于纳赫儿·萨卜思（Nahr Sābus）运河的河口，该城在后文还要谈及，它是下扎卜（Zāb）区的首府，文献记载其与贾卜儿（Jabbul）城[77]相距5里格。（纳赫儿·萨卜思）河对岸，南5里格有条叫思乐赫（Silh）的运河，其河口（*Fam*），或起点，有凡·埃思·思乐赫（Fam-as-Silh）城，位于瓦夕的城北7里格。据伊本·鲁斯塔记载，凡·埃思·思乐赫城在底格里斯河岸边，这里有很好的市场、有座聚礼清真寺。因在穆斯林历史上马蒙的宰相哈散·伊本·萨尔赫（Hasan Ibn Salh）曾在此地修建宏伟的宫殿而闻名，这些宫殿是为该宰相之女布岚（Būrān）与哈里发举行婚礼之用，婚宴和彩礼的花费甚巨，在马苏迪（Mas`ūdī）的历史著作中可以找到相关记载。后来，凡·埃思·思乐赫城被毁，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亚库特曾访问过该城，他发现此城和运河附近的大部分村庄已无人烟。[78]从凡·埃思·思乐赫城可以看到南边地平线上瓦夕的城内高大的清真寺。

[1]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6页记载了幼发拉底河。译者。

[2] 今天美索不达米亚南半部分的一些地区属于伊朗。译者。

[3] 萨洼（Sawād）的第二层含义是一座城市附近的“地区”，因此我们可以说报达（Baghdād）地区、苦法（Kūfah）地区、弼斯啰（Basrah）地区，即通常用来称呼相应城市的周边地区。

[4] 今为提克里特，是萨拉赫丁（Saladin）省的首府，在底格里斯河的岸边，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西北方140公里处，人口约26万。是去往小亚细亚、叙利亚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5] 英文地图中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分别写为Dijlah和Al-Furāt。译者。

[6] 也称《阿拉美文塔具木》（*Aramaic Targums*），即《希伯来圣经》译本，Targum的希伯来语含义为“翻译”，和阿拉伯语的tarjamah是同源词。译者。

[7] 如苦法城和弼斯啰城被称作亦剌刊（Al-`Irākān，通俗称法为 Al-`Irākayn），意思是“亦剌可（Al-`Irāk）的两座首府”。后来，苦法城和弼斯啰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亦剌刊（Al-`Irākān），或“两个亦剌可”开始被不准确地使用。它的含义为亦剌可（Al-`Irāk）两省，即阿拉伯与波斯的亦剌可（Al-`Irāk），后一个地区就是指吉八儿地区。这将在第十三章专门阐释。

[8] 即满速儿（Mansūr，又译“曼苏尔”），《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作“恭（此字应是荼字之误）拂”，全名为Abu Ja'far Abdallāh ibn Muhammad al-Mansūr，754～775年在位。译者。

[9] 今为古尔奈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下游的汇合处，属于巴士拉省。译者。

[10] 今为希拉城，是巴比伦省（1971年前称希拉省）的首府，位于首都巴格达以南的幼发拉底河东边支流希拉河岸边，人口约50万。译者。

[11] 这是从幼发拉底河的东岸分出来的一条运河，今天被称作希拉河（Shatt al-Hillah），因穿过希拉城而得名，于1914年得到疏浚，沿纳赫儿·速剌河的河道伸展，约长400公里，最后又汇入幼发拉底河。这里从古至今都是两河流域的重要农业区和文明区，古巴比伦城在该运河东岸，位于希拉城北不远。译者。

[12] 今此名不存，其位置在伊拉克小城夫胡德（Al-Fuhud）附近，曾是底格里斯河汇入沼泽的节点，在水陆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底格里斯河的改道，其重要性逐渐下降。译者。

[13] 库特·阿马拉（Kūt-al-`Amārah）村在《迦勒底旅行记》（*Travels in Chaldœa*，London，1829）第7页中简称库特（Koote）村，“是一个荒芜村庄，村舍是用泥巴砌成。村周围有一道泥巴的土墙。这个村庄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东岸”。“村庄对面是一条叫海伊（Hye）的运河，在苏吉什乌赫（Soogishiookh）之北流入幼发拉底河。”“因此一直到胡德（Hud）河（即底格里斯河）河口，阿拉伯人将这个漂亮的运河叫作阿马拉（Amarah）河。”今称作库特（al-Kut al-`Amārah），简称库特，是瓦西特省省会，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人口有37万。译者。

[14] 苦八兹（Kubādh）一世第一次在位时间为487～498年，他企图利用玛兹克运动抑制贵族专横，498年被贵族推翻。后他靠嚈哒人的支持复位，第二次在位时间为499～531年。译者。

[15] 阿奴设里万（Anūshirwān），也称忽思罗一世，于531～579年在位，此时萨珊王朝处于极盛时期。译者。

[16] 忽思罗·派儿维兹于591～628年在位，他于602年，对拜占庭发动战争，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洗劫叙利亚，占领安都、大马士革、耶路撒冷，最后于619年占领埃及，他因此得到派儿维兹（Parwīz，意为“胜利者”）的称号。译者。

[17] 迪罕一词在维吾尔语中指“农民”。译者。

[18] 1里格约等于3英里，和波斯长度单位1法尔萨赫（Farsakh）相当，即6. 24公里，因此本书作者常将里格与法尔萨赫混用。译者。

[19] 今天这两个城市已不复存在。马咋儿城在古尔奈北约16公里处，位于幼发拉底河岸边，曾是伊拉克的重镇。译者。

[20] 此名今不存，其位置大致距今库特伊马拉（Kūt al-Imara，简称Al-Kūt）城南不远，在底格里斯河故道的岸边，历史上是水陆交通要道。译者。

[21] 巴拉祖里，第292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

（*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9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卷1，第669页。1583年，约翰·埃尔德利德（John Eldred）从报达城南下到弼斯啰城，据他记载，经过1天的路程到达后一座城市之前，“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汇合，那里有一个城堡叫库儿纳（Curna）”，此人的航海记见于哈路亚特（Hakluyt）本《大航行》（*Principal Navigations*），格拉斯哥城出版（Glasgow，1904），第6卷，第6页；第5卷，第371页。1563年凯撒·费德里克（Cœsar Frederick）也走过同样的路线，并使用相似的词语提到“库儿纳（Curna）城堡”。约翰·纽贝尔（John Newberie）的行记，见于《珀切斯与他的朝觐之路》（*Purchas*，*His Pilgrimes*，原稿第1625～1626页），第5卷，第1411、1412页；《塔维尔尼尔六次到突厥行记》（*Six Voyages en Turquie de J. B. Tavernier*），荷兰乌得勒支城出版（Utrecht，1712），第1卷，第240页。其他旅行者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最早提到底格里斯河西支流（当时）可以航行的是一位无名的葡萄牙旅行者，其抄本手稿由少校休谟（M. Hume）保存（见*The Athenœum*，1901年3月23日，第373页），他说苦儿纳（Kurnah）城堡在弼斯啰城北6里格处，这里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汇合处。从文献内容来看，他航行的时间约在1555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从穆罕默德时代（7世纪，译者）到以后的9个世纪里，底格里斯河的西支流入沼泽，16世纪初以后，河水转入东支，这是伊斯兰教兴起以前的萨珊波斯时代底格里斯河曾流经的河道，而且这条河道也是今天该河的主河道。

[22] 这条运河起于今道尔城附近，终于今库特城，逶迤长达300余公里，开凿于萨珊王朝时期，鼎盛于大食王朝时期，并得到进一步疏浚，被充分使用，是两河流域的著名运河。该运河地区支流纵横，曾是伊拉克的重要农业区，该运河也是重要的交通通道，沿河两岸有很多城市。今天大部分河段已废弃不用。译者。

[23] 《阿拔斯哈里发统治时期的报达》（*Badgdād during the Abbasid Caliphte*），牛津出版（Oxford，1900）。需要说明的是有关亦剌可地区、城市和乡村方面流传下来很多史料，应撰写一部著作来说明阿拔斯王朝首都地区的这些情况。有关伊本·塞剌皮昂所绘制的地图的研究论文（*Jour. Roy. Asiat. Soc.*，1895，p. 32），虽然考察了沿河流和运河的所有地方，但没有罗列地图上的所有地名。因此读者可以参考斯特里柯（M. Streck）教授撰写的《巴比伦地区研究》（*Die alte Landschaft Babylonien*），莱登出版（Leyden，1901）。他对这些地名做了详细的研究，笔者撰写的这一章节中就不再罗列这些地名。

[24] 纳赫儿（Nahr）在阿拉伯语中有“河流”与“运河”两层含义。爱薛（`Īsā）是阿拔斯王朝的王子，他开凿了这条运河。

[25] 1阿拉伯里约等于1. 6公里，即1英里，因此正文中的英里等同于阿拉伯里。译者。

[26] 今天这条运河称作萨格拉维亚赫（as-Saqlāwīyah）运河，因该运河在费卢杰城北的萨格拉维亚赫城从幼发拉底河分出，向东南流向巴格达城，最后汇入底格里斯河，全长约170公里。该河沿途是伊拉克的重要农业区，也是重要城市分布之地，在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译者。

[27]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作“米地”，阿拔斯王朝第三位哈里发，775～785年在位。译者。

[28] 今天指巴格达城河东大区。译者。

[29] 这两个区都在巴格达东区，靠近底格里斯河。译者。

[30] 《迦勒底旅行记》（*Travels in Chaldœa*）第95页称，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巴格达城中最恢宏、最壮丽的城门就是塔里斯木（Talism）门，很值得一看，该门有56英尺，直径长51英寸。城有城墙”。译者。

[31] 这个城区名至今仍保留着，位于巴格达西区，靠近底格里斯河岸边。译者。

[32] 此地现在成为巴格达西区的一部分，且名称没有保留下来，也指代整个河西区。译者。

[33] 该城在巴格达北边，底格里斯河南岸的拐弯处，现在是巴格达的九个区之一，是什叶派的圣地之一，埋葬有很多什叶派人物，也有很多什叶派遗迹。译者。

[34]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4章第39页载：“报达城纺织丝绸金锦，种类甚多，是为纳石失（Nasich）、紫锦同不少别种奇丽织物。”译者。

[35] 《迦勒底旅行记》（*Travels in Chaldœa*）第101页载：“底格里斯河上有32只船组成的浮桥。”译者。

[36] 今为巴格达河东区萨德尔城区所在地。译者。

[37] 此城名今不存，但应该在巴格达城东区东南角与迪亚拉河汇合处。译者。

[38] 今为萨尔萨尔运河，位于巴格达城之南，从幼发拉底河向东流入底格里斯河，中途分出很多支运河。译者。

[39] 此城名今不存。译者。

[40] 今在巴格达东区的东北部，是座小城，当时在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译者。

[41] 此城名今不存，但大致在巴格达东区西北角的突尼斯区。译者。

[42] 今为萨迈拉，是伊拉克萨拉赫丁省的一座城市，在首都巴格达西北125公里处，位于伊拉克中北部、底格里斯河东岸。9世纪时曾是阿拔斯王朝的首都，现在是什叶派穆斯林朝圣地。人口约为35万。译者。

[43]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作“诃论”，阿拔斯王朝第五位哈里发，786～809年在位。译者。

[44] 阿拔斯王朝第二十八位哈里发，1094～1118年在位。译者。

[45] 今天该城仍称马达因，但只保留了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部分，在古波斯时期到大食王朝时期，该城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是通往波斯湾的重要通道。译者。

[46] 《迦勒底旅行记》（*Travels in Chaldœa*）第69～71页载，泰西封遗址有很多陶片，还有“萨珊王花园”（Garden of Kisra）、40英尺高的城墙、曾经的河道。译者。

[47] 普林尼撰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trans by Philemon Holland，Wernerian Club，1847～1848年，第6卷，第26章，第141页）载：“塞琉古城位于幼发拉底河的新河道与底格里斯河交汇的地方。”“据报道这个城市常住人口有60万。”译者。

[48] 塞琉古王朝（Seleucids），又译塞琉西王朝，是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塞琉古一世创建的，以叙利亚为中心，包括今伊朗和亚美尼亚（初期还包括印度的一部分）。统治的时间为前312～前64年。译者。

[49] 塞琉古·尼喀陀儿（Seleucus Nicator），即塞琉古一世（前312～前281年在位），他是马其顿人。前305年正式称王，并向东扩张到波斯，最远至印度河，并与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月护王）订立和约，后转而西进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前281年，他渡过今达达尼尔海峡，企图占领马其顿；同年，被刺身死。译者。

[50] 有人推测认为泰西封（Ctesiphon）城就是《圣经·以斯拉（Ezra）记》中的迦西斐雅（Casiphia，第8卷，第17页），该地在巴比伦与耶路撒冷之间，在犹太古本《圣经》中色普托根特（Septuagint，意为“70”，译者）被称作“银色城”。马达因（Madāin）仅仅是阿拉伯语麦地那（Madīnah）的复数，意为“城市”；迦西斐雅（Casiphia）应由波斯语迦勒底（Chaldee）转变而来，此地名现已不存，其曾是萨珊王朝萨珊王（Chosroes）的首都。译者按：此城就是《魏书·西域传》“波斯”条中的宿利城，其文曰“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

[51] 《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第6卷，第26章，第141页）中载：“接着就是叙利亚安都（Syria Antiochena）的海岬；海岬上有独立的城市，即安都城，曾经被称作伊皮达费纳（Epidaphnè）；奥龙特斯（Orontes）河从城中流过。但海岬上还有独立的塞琉古（Seleucia）城，也被称作皮尔利亚（Pieria）。”《魏书·大秦国传》和《诸蕃志》“大秦”条作安都城。译者。

[52] 此城名今不存。译者。

[53] 此城名今不存。译者。

[54] 八儿麻可（Barmec），或巴尔马克（Barmak）家族是阿拔斯王朝初期的名门望族，最早的族长就是哈里·本·八儿麻可（Khalid bin Barmak），他为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支持诃论·剌失德夺取了王位，本书正文中提到的哈合牙（Yahyā）曾担任诃论·剌失德的太傅和宰相，历史上此家族有很多人担任过阿拔斯王朝的宰相或其他高级官员。译者。

[55] 《迦勒底旅行记》（*Travels in Chaldœa*）第58～59、72页载，萨珊王拱形（Tauk Kesra）“是泰西封城里一座残破的拱形，其位于沙漠正北，与底格里斯河的直线距离为14英里，由于河道太弯曲，距离有40英里”。今天仍可看到这个高大的建筑。译者。

[56] 阿里·木克塔菲，阿拔斯王朝第三十一位哈里发，1136～1160年在位。译者。

[57] 马蒙，阿拔斯王朝第七位哈里发，813～833年在位。此时该王朝达到鼎盛时期。译者。

[58] 1腕尺为27或45英寸。本书中是以前一尺种寸为准，因此与阿拉伯人的度量单位腕尺相当，即0. 6米。译者。

[59]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20、321页。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25、426、768、809页；第2卷，第729、929页；第3卷，第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9、140页。

[60] 此城名今不存，但应该在底格里斯河岸边的阿齐济耶附近，曾是通往巴格达的水路要道。译者。

[61] 这种称呼方便实用，是对阿拉伯语麦思只·贾米（Masjid-al-Jāmi`）不准确的翻译，其又可称作大清真寺。穆斯林有两种清真寺。小清真寺（Masjid）是通常五时礼拜的地方，常等同于一所麻坎（Makām）或麻失哈（Mashhad），后者为一位圣徒的“圣墓”、“殉教之地”；麻萨剌（Masallā），即礼拜堂，特指重大节日做礼拜的地

方。据说大清真寺是每周聚礼的地方，此时还要念诵虎图白（Khutbah，布道）。因此这种清真寺叫作麦思只·贾米，即聚礼清真寺，这个词常翻译为“大清真寺”，或“聚礼清真寺”。有无贾米（*Jāmi`*）或敏八儿（*Minbar*，念诵虎图白之地）通常是一个城市或村庄大小的标志。阿拉伯地理学家常提及这一点。比如伊斯塔赫里谈到了法儿思（Fars）地区很多地方是否有敏八儿（Minbar，用来判断地方的大小）。据说这种办法同样适用于基督教地区，即看某一个村庄是否有大教堂。后来麦思只·贾米一词变为麦思只·厨麻（Masjid-al-Jum`ah），意为“每周五的礼拜寺”，但这不是传统的用法。

[62] 此城名今不存。译者。

[63] 阿拔斯王朝第十五位哈里发，870～892年在位。译者。

[64] 此地名今不存。译者。

[65] 即大食帝国时期的金币，后来为一些国家的货币名称。译者。

[66] 此城名今不存，应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位于今阿齐济耶东南。译者。

[67] 此城名今不存，应在底格里斯河西岸的祖拜达小城，河对岸的西北就是阿齐济耶。译者。

[68] 阿拔斯王朝第六位哈里发，于809～813年在位。译者。

[69]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5、186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21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2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第14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676、687页；第3卷，第362页；第4卷，第98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9页。伊本·阿喜儿，第6卷，第207页。

[70] 此城名今不存，其址在努马尼耶（Numānīyah）的北边、底格里斯河东岸，现在已完全变成田地。译者。

[71] 今为努马尼耶，属瓦西特省，是底格里斯河西岸的重镇，也是去往巴格达和希拉的交通要道。译者。

[72] 此城似是《后汉书·安息传》之于罗国。译者。

[73] 此城名今不存，其址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对面为努马尼耶。译者。

[74] 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3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21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5、18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23、54页；第4卷，第796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30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1页。

[75] 此城名今不存，其址距在库特·阿马拉西南从底格里斯河分出的盖拉夫（Gharraf）运河岸边的法伊萨利亚赫（al-Faysaliyah）城不远。译者。

[76] 此城名今不存，其址距库特·阿马拉西南不远。译者。

[77] 此城名今不存，其址在努马尼耶东北，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现在已完全变成田地。译者。

[78]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21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4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903页；第3卷，第917页；第4卷，第381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7卷，第65页。

第三章 亦剌可（`Irāk）地区（续）

瓦夕的（Wāsit）城。大沼泽。马咋儿（Madhār）城和苦儿纳（Kurnah）城。“盲”底格里斯河。弼斯啰（Basrah）城及其运河。乌剌（Ubullah）城和阿八丹（`Abādān）城。八剌丹（Baradān）。报达城以北的底格里斯河。都加伊勒（Dujayl）河地区。兀乞八剌（`Ukbārā）城、哈儿八（Harbā）城和喀底思牙（Kādisīyah）城。

瓦夕的城，被称作“中城”，因其与苦法城、弼斯啰城和阿合瓦兹（Ahwāz）城距离相等（约50里格）。该城是喀思喀儿（Kaskar）地区的首府，前文已述，在报达城未建成前，其是亦剌可地区三座主要的穆斯林城市之一。

瓦夕的城是伊斯兰历84年（703年）哈贾吉（Hajjāji）[1]修建的，他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卜得·灭里（`Abd-al-Malik）[2]在位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著名总督。该城位于底格里斯河两岸，一座浮桥连接着两个城区，并在河岸的两边各建有一座聚礼清真寺。雅忽比称瓦夕的东城在哈贾吉时代之前就是一座城市，直到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这里的居民多数还是波斯人。该城的西边有哈贾吉修建的绿宫，名为拱北·哈达剌（Al-Kubbat Al-Khadrā），其以巨大的穹顶而闻名，从该穹顶可以看到其北边7里格处的凡·埃思·思乐赫城。瓦夕的城周边的土地极其肥沃，一旦报达城出现缺粮的情况，该地就会供粮；伊斯兰历358年（969年）伊本·豪喀尔访问了瓦夕的城，并称当地每年输入国库的税收库银达100万底儿罕（dirham，约4万英镑）[3]。穆喀达思说瓦夕的城东边的清真寺也是哈贾吉修建的。该城有宏伟的市场，各种货物齐全，在浮桥的两端还建有两座停小船的小港，这为到港停泊的卸货船只提供了便利。

整个阿拔斯王朝时期，瓦夕的城都是亦剌可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但很显然瓦夕的城的东区首先被毁，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后半叶，担任瓦夕的城法官的可疾云尼提到该城只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伊本·白图泰访问了此地[4]，并盛赞

该城优美的建筑，特别是一座宏伟的学院（Madrasah），该学院有300间校舍供学生居住，和他（伊本·白图泰）同时代的穆思套菲谈到该城周边有大片的椰枣林，因而该地气候很湿润。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在帖木儿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中，作为战略要地常提到瓦夕的城，因帖木儿曾安排一支大军驻扎于此；但如上一章开头部分所述，约在伊斯兰历9世纪（15世纪）后，底格里斯河不再流经瓦夕的城，而是经东河道流到苦儿纳城，此后该城完全被毁。伊斯兰历11世纪（17世纪）初，哈吉·哈里法所写的著作里提及该城位于沙漠之中，但他说该地的运河因盛产制笔的芦苇而闻名。[5]

亚库特记载，在瓦夕的城之南，从底格里斯河分出的五条可通航水道流入大沼泽，并列出这些可通航水道的名称，这一记载还可通过早期地理学著作的记载，得以印证。伊本·塞剌皮昂提到位于瓦夕的城以南和喀塔儿（Al-Katr）城以北的（底格里斯河）干流岸边有很多城镇，但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里已开始形成沼泽。干流岸边的第一座城镇就是鲁萨法（Ar-Rusāfah，即堤道），位于（底格里斯）河的左岸，距离瓦夕的城有10里格，在鲁萨法城附近向东流入沼泽的运河叫纳赫儿·班（Nahr Bān）运河，在河口有与运河同名的纳赫儿·班（Nahr Bān，也拼成Nahr Abān）城。该城之南依次为法鲁思（Al-Fārūth）城、答亦儿·兀麻儿（Dayr-al-`Ummāl，即总督修道院）城[6]。这两座城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其对面是向西流入沼泽的三条运河：首先为纳赫儿·孤列（Nahr Kuraysh）运河，岸边有同名的大村庄；其次为纳赫儿·阿思·西卜（Nahr-as-Sīb）运河，其河岸有贾瓦米得（Al-Jawāmid，即干地）城和乌可儿（Al-`Ukr）城；最后为纳赫儿·八儿杜达（Nahr Bardūdā）运河，其岸边有沙底底牙（Ash-Shadīdīyah）城。所有这些主要城市均在贾瓦米得（Al-Jawāmid，复数），又叫贾米得（Al-Jamidah）城周边的沼泽中；穆喀达思又记载称这一地区有一座叫萨利（As-Salīk）的大城[7]，位于一个开阔潟湖的岸边，其周边有很多村庄和大片的良田。在这些地方对面，位于底格里斯河干流东岸的是哈瓦尼（Al-Hawānīt，即客栈）城[8]，这里有一个与前文答亦儿·阿苦儿城一样（原文第36页）的过河收税站，靠近该城的是喀塔儿城，其位于鲁萨法城南12里格处，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据伊本·鲁斯塔记载，在喀塔儿城附近，底格里斯河分成三条河道，最后流入大沼泽。[9]

大沼泽被称作巴泰（Al-Batāih，复数为*Al-Batīhah*，意为潟湖），其历史前文已述（原文第26页）。大沼泽所在的整个区域，城市、乡村

星罗棋布，且均位于运河两岸，这里尽管天气酷热，但排干水后的土地极其肥沃。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末，伊本·鲁斯塔的著作里记载大沼泽到处长满了芦苇，且河道纵横，盛产鱼类，这里的鱼用盐腌制后被运往邻近各地区销售。至于底格里斯河，看来其从喀塔儿城向东可能到了现在的幼发拉底河河道处，并通过一系列的开阔潟湖，将底格里斯河的水道与阿卜·阿萨得（Abu-l-Asad）运河连通起来，且经过该运河将沼泽里的水排到弼斯啰（Basrah）三角洲。阿拉伯人称这些没有生长芦苇的开阔潟湖水域为“豪儿”（hawr或Hawl），连接潟湖的河道可以通行小船。据伊本·鲁斯塔记载，大河的商船不经过喀塔儿城南，而是在该地将其货物转运到码头上，以减轻装载量来通过潟湖航道。所有航道沿岸的码头均建于高台上，用芦苇修建的茅草屋抬升高度后可以躲避蚊虫的叮咬，这里驻扎士兵的目的是确保河道畅通，并保护旅客的安全，因大沼泽的深处是不法之徒天赐的躲藏地。

伊本·塞剌皮昂记载了通往弼斯啰城的水路所经过的四大潟湖（hawr或Hawl）[10]：第一个称作八哈思（Bahassā）潟湖；第二个为八堪思（Bakamsī）潟湖；第三个为八斯剌雅思（Basrayāthā）潟湖；第四个为哈儿·木哈马底雅（Hawr-Muhammadīyah）潟湖。第四个是最大的潟湖，其岸边有米纳·哈散（Minārah Hansān）塔，名称源自（麦加附近）纳八散（Nabathæan）部落的哈散（Hassān），他是倭马亚王朝总督哈贾吉雇来排出大沼泽地区的水，并开垦土地的人。河水通过最后一个潟湖后，经哈剌（Al-Hālah）村和喀瓦尼（Al-Kawānīn）村后，汇入阿卜·阿萨得（Abul-Asad）运河，这条运河最后将河水引入底格里斯河三角洲的顶端。阿卜·阿萨得运河与今天的苦儿纳城北幼发拉底河河道最后一段大体一致，而这位阿卜·阿萨得（Abul-Asad）是哈里发满速儿时期的一个自由民，当时他统率弼斯啰城的军队开凿了也可能是拓宽了该航道，因为亚库特称该航道无疑在萨珊王朝时期已经存在。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都未曾提及位于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交汇之地的苦儿纳城，该城堡第一次被提及是在伊斯兰历11世纪（17世纪）初问世的土耳其语著述《世界志》（*Jahān Numā*）中。

底格里斯河东河道的最后一段—萨珊王朝时期和今天的河道一样—如前文所述，中世纪时这里存在回水，其北端筑有一座拦堵回水的大坝。该回水流经的河道被称作纳赫儿·马咋儿（Nahr-al-Madhār）运河，长6里格，一直延伸到阿卜达喜（`Abdasī，或`Abdāsī）城和马咋儿城；这两座城的确切位置尚不清楚。当时底格里斯河东部干涸河床沿岸的周

边区域被称作朱哈（Jūkhā）地区，其向西北一直延伸到瓦夕的（Wāsit）地区的喀思喀儿（Kaskar）区。在穆斯林早期征服时代，马咋儿城曾是一座十分重要的城市，此后成为麦三（Maysān，又名Dast-Maysān）地区的首府。文献记载马咋儿城距离弼斯啰城有4天的路程，该城以华美的清真寺和受人敬仰的哈里发阿里之子阿卜·阿剌（`Abd-Allah）的墓地而闻名。据亚库特记载，（与马咋儿城）邻近的阿卜达喜城是源于波斯语的地名，该名称在较早的阿拉伯文中书写为阿福达萨黑（Afdāsahī），在阿拉伯人征服前，此城曾是喀思喀儿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喀思喀儿和麦三是大沼泽东部的两个地区，据可疾云尼记载，喀思喀儿地区盛产外销的优质稻米。其草原上放牧的水牛、黄牛、山羊，皆膘肥体壮；栖息在芦苇荡里的野鸭等水禽猎获后可销售到附近城镇的市场，运河里盛产鲱鱼（*Shabbūt*），捕捞并腌制后，可大量外销。麦三地区有先知乌载儿（`Uzayr，又名Ezra）的坟墓，可疾云尼称此地居民全为犹太人，是守墓人。该墓在乡下很有声名，并成为朝拜者祈福之地，该地也因信众祈愿而变得富有。[11]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汇合后的河流形成宽阔的三角洲，长近100英里，始于阿卜·阿萨得运河河口，而后在阿八丹（`Abbadān）城[12]附近流入波斯湾。这个三角洲有不同的名称，如“盲”底格里斯河（Dijlah-al-`Awrā）、弼斯啰三角洲（Fayd）等，波斯语称作八赫满失儿（Bahmanshīr）；今天称其为阿拉伯河（Shatt-al-`Arab）。波斯湾的潮汐顺此河北上，远至马咋儿城和阿卜达喜城处的河道，潮汐也会填满或腾空弼斯啰地区的各条运河，这些运河灌溉着三角洲东、西边的土地。弼斯啰港作为亦剌可地区的商业大港，靠近沙漠，且距离西边的三角洲不远。这里有两条运河连接着港口。弼斯啰城南北部的诸多运河由大沼泽低洼处的水域流出，并注入“盲”底格里斯河，此外在三角洲东边还有几条运河流入，一条较宽的人工河道叫纳赫儿·八彦（Nahr Bayān）运河，位于阿八丹城北约30英里处，其最后汇入底格里斯河三角洲与都加伊勒（Dujayl）河，即喀伦（Kārūn）河三角洲，都加伊勒河是发源于忽兹思田（Khūzistān）地区的河流，在撒里茫（Sulaymānān）城[13]附近注入波斯湾。[14]

据说弼斯啰城的名称含义为“黑卵石”，始建于奥马儿（`Omar）[15]在位时期的伊斯兰历17年（638年），该地在穆斯林征服萨珊帝国后分给驻防的阿拉伯部落，此后他们就居住于此。这座城和苦法城一起很快成为亦剌可地区的新首府；伊斯兰历36年（656年），在弼斯啰城附近

发生了著名的骆驼之战[16]，起因是（有些人）要求哈里发阿里对哈里发奥斯曼之死负责，但战争的结果是阿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役中两位著名的圣门弟子塔里哈（Talhah）和祖拜儿（Zubayr）被杀。弼斯啰城与底格里斯河三角洲的直线距离约有12英里，由两条运河相互连接：东北有纳赫儿·马吉儿（Nahr Ma`kil）运河，从报达城方向来的船舶经过此地；纳赫儿·乌剌（Nahr-al-Ubullah）运河，由弼斯啰城流向东南，并在阿八丹城附近与波斯湾水域连接。这两条运河以及东部的三角洲水域形成了称为大岛的区域；乌剌（Ubullah）城位于大岛的东南角，该城之北的乌剌（Ubullah）运河与三角洲相连接。[17]

弼斯啰城最长的城区位于前文提到的两条运河交汇处的岸边，该城的居民区向西伸展，形成一个半圆形，且与沙漠接壤，那里有一座独门叫八卜·八底牙（Bāb-al-Bādiyah）门，即沙漠门，以备出入。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该城从运河岸边到独门的宽度有3英里，长度要大于宽度。该城的房屋多数是用烧砖建成的，城墙外围是流淌着众多小运河的肥美的草原牧场，越过草原就是连片的椰枣林。穆喀达思称弼斯啰城有三座聚礼清真寺：第一座位于靠近沙漠的西门，这是最古老的聚礼寺；第二座在大市场内，该寺最为华美，建有漂亮的廊柱，这是“整个亦剌可地区无与伦比的清真寺”；第三座在该城的居民区内。这里有三条商业大街，商铺货栈众多，完全可与报达城的街市相媲美。西门的密儿八（Mirbad，骆卧之地）区很著名，这里是沙漠驼队歇脚之地，也是该城最繁忙的地方之一。此处附近有塔里哈和祖拜儿圣墓，但穆喀达思当时记述称弼斯啰的多数城区已毁。[18]关于弼斯啰城的其他设施方面，穆喀达思提到了一座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还存在的公共图书馆，这是一位叫伊本·萨瓦儿（Ibn Sawwār）的人捐资修建的，他在忽兹思田地区的蓝忽里模子（Rāmhurmuz）城也捐建了同样的一座图书馆。图书馆为求学的学生和誊抄者提供生活费；弼斯啰城的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的图书。

文献记载在阿拔斯王朝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战乱和起义，弼斯啰城屡遭劫难。伊斯兰历257年（871年）赞吉（Zanj）大起义达到高潮，其领导人宣称自己是哈里发阿里的后裔，起义军攻入弼斯啰城，烧毁了包括大清真寺在内的大部分城区，而且在城内抢劫三日。此后，伊斯兰历311年（923年）弼斯啰城又被喀儿麻忒（Carmath）派[19]的首领洗劫，时间长达17天。但此城曾有一段时间几近恢复到往日的繁华。伊斯兰历443年（1052年），波斯旅行家纳思儿·忽思罗访问了弼斯啰城，并

记载称该城极其繁华，尽管该城的有些城区已被毁，但城墙修缮完好。在大清真寺附近，哈里发阿里的宫殿还在，这使人们回想起阿里于此地居住时的各种往事，这里还保留了13座圣墓。纳思儿也详细列举了该城周边的20个地区。

伊斯兰历517年（1123年），法官阿卜得·萨兰（Kādī `Abd-as-Salam）在旧城墙基础上重修了半里格长的城墙，蒙古西征后的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曾到过弼斯啰城，当时这里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20]。他称阿里清真寺是拥有7个宣礼塔（minaret）的高大建筑，但该寺只是到星期五聚礼时才开放，且距离该城居民区有2英里远，其周边为废墟。旧城墙距离阿里清真寺有2英里远，遗迹尚存，旧城墙附近就是塔里哈和祖拜儿的圣墓；但主城区内仅有三个居民区。14世纪，穆思套菲长篇记述了弼斯啰城。他称该城的清真寺是哈里发阿里重建的，是伊斯兰地区最大的寺院，其他清真寺试图超过它，但没有做到，同时阿里清真寺恰好正对着麦加（Kiblah）的方向[21]。这里还有一座宣礼塔，在其面前发誓时，根据塔的摇晃不定或静止不动可判断誓言的真假：这是修建该寺的哈里发阿里所显现的永恒奇迹。穆思套菲也用较多的笔墨记述了弼斯啰城的圣墓，而后他高度盛赞了该城周边优美的花园和椰枣林，“种植得很密，因此无法看到一百步远的地方”，这里产的椰枣品质绝佳，大量出口到印度和中国。

弼斯啰城长期以来以其运河名冠天下，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记载的运河超过100000条，其中20000条适合船只航行。前文提及的纳赫儿·马吉儿（Nahr Ma`kil）运河是从报达城方向来的（底格里斯河）主河道分流出的，这是奥马儿在位时期圣门弟子马吉儿·伊本·亚斯儿（Ma`akil ibn Yasar）开凿的。这条运河和乌剌运河从弼斯啰城流向东南，且各长4里格，沿大岛南边流淌的乌剌运河岸边分布的花园是人间的四大天堂之一[22]。

乌剌城是希腊名称阿珀罗高斯（Apologos）的阿拉伯音读形式，该名称始于萨珊王朝甚至更早，但其位于三角洲地区，气候炎热，穆斯林修建的新城弼斯啰城位于靠近沙漠的内陆地区。如前文所述，乌剌城在（乌剌）运河口北边，并靠近大岛。此运河对面的南岸有史克·奥斯曼城（Shikk `Othmān，意为奥斯曼的裂口，据说这是第三代哈里发奥斯曼孙子的绰号）[23]；越过该运河口，在三角洲的东边有一个经底格里斯河去往忽兹思田地区方向的驿站。这个驿站叫阿思喀儿·阿卜·加法儿

（`Askar Abu Ja`far，即阿卜·加法儿兵营），也称作哈里发满速儿兵营。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乌剌城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有自己的聚礼清真寺，如同史克·奥斯曼城一样（有自己的聚礼清真寺），穆喀达思称这两座城市建筑优美。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后半叶，纳思儿·忽思罗也谈到了这两座城的优美宫殿、市场、清真寺，但几个世纪后这里遭蒙古人洗劫，殃及当地所有地区，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可疾云尼称尽管史克·奥斯曼城曾以大荷莲（Sidr）而名闻天下，但此城已被毁。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称乌剌仅是一个村庄，现在的（乌剌）城和当今的弼斯啰城情形一样，是在旧址上建起的新城。

纳赫儿·乌剌运河流入底格里斯河三角洲的地方，形成了一处危险的漩流，早期船只往往会在此处遇险。据伊本·豪喀尔记载，阿拔斯王朝的一个王妃（有人说是祖拜答皇后）排除了这个让所有船员可能遇到的危险，办法是将装满石料的船只沉到漩涡中，从而将其填死。伊本·塞剌皮昂详细罗列了从底格里斯河三角洲西边流入的9条运河，即纳赫儿·马吉儿运河北有三条；弼斯啰城南有四条，介于乌剌运河和三角洲之间。这些运河中只有一条十分重要，叫纳赫儿·阿卜·哈思卜（Nahr Abu-l-Khasīb）运河，其名取自哈里发满速儿时期的一个自由人，该运河附近有一座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中叶赞吉起义时修建的大堡垒。他们将这座堡垒叫穆哈塔剌（Al-Mukhtārah）城[24]，其十分坚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阻挡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派去攻打他们的军队，此起义延续了15年，最后被镇压下去。[25]

据伊本·塞剌皮昂记载，底格里斯河三角洲的东边主要有如下运河。第一条为剌阳（Rayyān）运河，河岸或附近有马夫塔（Al-Maftah）城和达思喀剌（Ad-Daskarah，即平地）城[26]。尽管第一座城对三角洲十分重要，常称为底格里斯河的马夫塔（Al-Maftah）城，但这两座城的确切位置尚不清楚。该运河南是纳赫儿·八彦（Nahr Bayān）运河，此运河河口有八彦（Bayān）城[27]，该城距三角洲对面的乌剌城有5里格。哈法儿（Haffar）运河岸边有木汗纳剌（Muhannarah）港，就在今天港口的位置上。该运河将底格里斯河三角洲上游的河水和都加伊勒（即Kārūn）河上游的河水连通起来。晚于伊本·塞剌皮昂75年的穆喀达思说这条运河长4里格，是奉白益王朝（Buyid）[28]阿都得·道剌（`Adud-ad-Dawlah）[29]国王敕命拓宽而成的。但此前一个世纪，库达玛提到了该运河，当时叫新运河（An-Nahr-al-Jadīd）。这条运河是从阿合瓦兹

（Ahwāz）城驶到弼斯啰城的货船经过的航道，阿都得（`Adudī）运河（穆喀达思所称）未拓宽前，货船必须南下到都加伊勒（Dujayl）河三角洲，然后出海，再北航到底格里斯河三角洲，过了八彦城才能到乌剌城。[30]

两个三角洲之间是座大岛，亚库特（用波斯语）称其为迷阳·如丹（Miyīn Rūdīn，即两河之间），穆喀达思则称作萨卜哈（*Sabkhah*，即盐滩），其靠海滨的一角有阿八丹城；另一角有撒里茫城，位于都加伊勒河三角洲。阿八丹城尽管存在至今，但其现在位于今波斯湾海岸以北20多英里的三角洲上，因海岸线已被大河三角洲推到较远的地方。但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称只有经过了阿八丹城才是开阔的海域。这里居住的是织席人，他们经营岛上的哈儿法（Halfā）草；该城周边有重兵把守的卫所，保护着河口。伊斯兰历438年（1047年），纳思儿·忽思罗到过这里，他说在他那个时期退潮后，阿八丹城和海之间有几里格是干涸无水的地带，在此处建有一个提醒过往船员的导航塔，该塔是用大柚木条搭起来的支架，下宽上窄，通高40码，称作“木工房”（Khashāb）。塔的顶端是守塔更夫的居室，用一个拱形支撑着用石板砌成的平台，其上有一只夜晚用来照亮灯塔的火盆。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阿八丹城仍然很繁华，且有很多的清真寺和卫所，但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经过此地时，该城已变为一个村庄，离海边有3英里。但和伊本·白图泰同时代的穆思套菲则称阿八丹城是一座大港，并说按他那个时代流通的货币计算，该城缴纳给弼斯啰城的年度财政收入达441000 迪纳（dīnār）。离阿八丹城东几里格远的撒里茫（Sulaymānān）港通常被看成是忽兹思田地区的港口，从所有相关的记载来看，该港是一个叫搠里蛮·伊本·贾比尔（Sulaymān Ibn Jābir）的人修建的，他的绰号为“禁欲者”。[31]

回到报达城的同一纬度，现对沿底格里斯河到首都之北，远到亦剌可地区边陲，以及纳赫儿宛大运河沿岸的各城市，做一叙述。如前文所述（见原文第32页），从报达城到毛夕里（Mosul）城和北部城市的主要道路沿底格里斯河左岸或东岸而行。该道从东报达城沙马思押（Shammāsīyah）区的八剌丹（Baradān）门出发，约经过4里格到达八剌丹（Al-Baradān）小城，该城至今存在，但只是名称略微发生了一些变化，叫八兰（Badrān）。靠近八剌丹（Baradān）城有两个重要的村庄：巴祖噶（Bazūghā）村和距报达城北3里格的马扎法（Al-Mazafah）村。哈里思（Khālis）运河在八剌丹城附近的剌失迪雅（Ar-

Rāshidīyah）城[32]汇入底格里斯河，对此后文还要进一步阐述；今天此城稍北的地方是底格里斯河向东大拐弯的终结处，这个拐弯开始于报达城北60英里的喀底思牙（Kādisīyah）城[33]。但在中世纪该河道从喀底思牙城到八剌丹城差不多呈直线，在东边干涸的河道上还可见到其遗迹，在伊本·塞剌皮昂的著作和早期其他著述中曾提及，其名称也标记在地图上。

底格里斯河在这里确实不止一次发生过改道。今天底格里斯河的河道（东河道）在伊斯兰历700年（1300年）马拉斯（Marāsid）撰写的著作里称作“小河道”（Shutaytah）；河道变化较大的一次出现于哈里发穆思坦思儿（Mustansir）[34]在位时期，即伊斯兰历623～640年（1226～1242年），因文献记载他开凿了许多运河来灌溉那些由于主河道变化而抛荒的土地。早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马苏迪提到报达城北东西两岸的土地主人之间发生了诉讼案，起因是底格里斯河的河道发生了变化。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城市中（这些城市的遗址现在位于今底格里斯河东边的干涸河道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就是兀乞八剌（`Ukbarā）城[35]，其附近就是阿瓦纳（Awānā）城[36]，及位于底格里斯河较南位置的不思剌（Busrā）城[37]。这三座城市距报达城约10里格。这些城市周边均为花园，这里是来自首都的寻欢作乐者的逗留之地，穆喀达思曾特别赞美兀乞八剌城周边产的葡萄，并说该城是一座又大又繁华的城市。兀乞八剌城北边不远就是阿剌思（`Alth，或Al `Alth）城，尽管该城我们在地图上标出来了，但现今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穆喀达思说该城是一座又大又繁华的城市，位于从底格里斯河分出来的一支运河的岸边。阿剌思城西北，今天底格里斯河拐向东形成大弯的地方有位于该河岸边的喀底思牙城，其名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城市同名，但不可混淆。喀底思牙城以其玻璃器皿名扬各地。该城的对面为从底格里斯河分出来流向南边的都加伊勒（Dujayl）[38]运河。[39]

如下章所述，都加伊勒运河［注意不要将此河与都加伊勒（Dujayl）河，即喀伦（Kārūn）河相混淆］本是一条从幼发拉底河流向底格里斯河的运河，但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初，其西端被淤塞，东段和下游被在喀底思牙城稍南从底格里斯河开凿出来的新运河疏通了。都加伊勒（意为小底格里斯河）运河灌溉着位于西报达城北除喀塔剌不儿（Katrabbul）地区以外的麻思斤（Maskin）地区的所有富庶之地。因此，后来都加伊勒运河成为底格里斯河的环形运河，其分出很多分支运河，后在兀乞八剌城的对面汇入底格里斯河，有些支流则一直

向南，将河水输送到西报达城北郊的哈儿比雅（Harbīyah，见原书第31页）。都加伊勒（Dujayl）地区，又名麻思斤地区，包括很多的村庄和城镇，位于兀乞八剌城和底格里斯河河道的西边，该地区的首府为哈儿八（Harbā）城[40]，伊斯兰历580年（1184年），伊本·朱拜儿（Ibn Jubayr）访问过这座至今存在的城市。今天还可以看到横跨运河的大石桥遗迹，据历史学家法赫里（Fakhrī）的记载及存世的碑记可知，该大桥由哈里发穆思坦思儿修建于伊斯兰历629年（1232年）。哈儿八城附近是哈兹拉（Al-Hazīrah，意为“封闭”）城[41]，这里产一种叫吉儿八思（Kirbās）的棉织品，大量外销。亚库特还提到很多村庄的名称，超过100个，这些村庄多在这一地区，其中很多村庄，如靠近哈儿八城的八剌得（Al-Balad，意为“小”）村[42]在地图上还能查到。晚至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说都加伊勒地区及其首府哈儿八城极其富庶，这里产的石榴在报达城的市场上很畅销。

这个地区还有其他的很多城镇。喀底思牙城北大约10英里的地方就是萨麻剌（Sāmarrā）城，将在下一章里述及，马梯剌（Matīrah）城[43]在喀底思牙城和萨麻剌城之间的中部，该城稍北从底格里斯河左（东）岸分出三条小运河。马梯剌城和喀底思牙城之间的中途，即三条运河出口之南是八儿苦洼剌（Barkuwārā，又名Balkuwārā，或Bazkuwār）城[44]。据亚库特记载，马梯剌（Al-Matīrah）之名取自萨班（Shaybān）部落一个叫马塔儿（Matar）的人，他是哈里吉（Khāriji）派的贵族，该地最初叫马塔力雅（Al-Matārīyah），后来讹读为马梯剌。[45]萨麻剌城北十英里是喀儿赫·费鲁兹（Karkh Fīrūz）城[46]，又称喀儿赫·萨麻剌（Karkh-i-Sāmarrā）城，以别于西报达南部的喀儿赫（Karkh）城和位于都儿（Dūr）地区北边的喀儿赫（Karkh）城[47]，最后一座城是纳赫儿宛运河从底格里斯河分出的起点。此处（都儿地区的喀儿赫城）的底格里斯河右（西）岸是伊思哈吉（Ishākī）运河的起点，该运河在马梯剌城对面形成一个小圈，接着又汇入底格里斯河。所有这些地方的位置均可根据其相对运河的方位来确定，其中一些地方的废墟犹存，但除了知道这些地方的名称外，其他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1] 哈贾吉·本·优素福（Hajjaj ben Yusuf，661～714年），生于希贾兹的塔伊夫，原为教师，后投笔从戎，成为倭马亚王朝著名的总督，权倾一时。其部将在中亚、南亚扩充军事势力。译者。

[2] 倭马亚王朝第五位哈里发，685～705年在位。译者。

[3] 即银币，是阿拉伯、波斯地区使用的两种主要货币之一。译者。

[4] 《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3页载："该城（瓦西特，即瓦夕的）地区宽阔，花园树木很多，居民是伊拉克的善良人士，也可以说是最好的人士。"译者。

[5]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22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7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18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20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1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40页；第2卷，第517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463页。看

来，新近的探险家并没有对瓦夕的城的遗址进行考察。该城在沙塔·亥（Shatt-al-Hayy）河岸边，按照道里志的记载应位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切斯内 [Chesney，《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探险报告》（*Report of 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Expedition*），第1卷，第37页] 称奥尔斯贝（Ormsby）和艾略特（Elliott）于1831～1832年访问过此城的遗址，但没有确定其方位。

[6] 今纳赫儿·班、法鲁思、答亦儿·兀麻儿三城均难觅，大致在盖拉夫运河及其支流沿岸，也就是古底格里斯河西支下游，靠近潟湖。译者。

[7] 今不存，位于古底格里斯河西支下游。译者。

[8] 贾瓦米得、乌可儿、沙底底牙、萨利、哈瓦尼等城今已难觅，应位于古底格里斯河西支下游。译者。

[9]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9、20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4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4、18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1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0、553页；第3卷，第209、415、840页；第4卷，第217、758页。

[10] 这些潟湖的名称很难查实，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下游形成的大片湖区至今依然存在。译者。

[11]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94、185页。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28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40页。巴拉祖里，第293、342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97、31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669页；第3卷，第603页；第4卷，第468、830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

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455页。

[12] 今为阿巴丹，位于伊朗西南端、阿拉伯河中的阿巴丹岛北岸，东南距波斯湾53公里。是伊朗胡齐斯坦省港口城市，人口约50万，伊朗第五大城市、最大港口，伊朗石油输出的集散地，伊朗国营石油公司总部所在地，世界最大炼油中心之一。译者。

[13]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此城名今不存，应在伊朗胡齐斯坦省阿巴丹城东边。译者。

[14]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28页。阿瓦剌（`Awrā）一词的含义是“独眼”，用来指被泥沙淤塞的河道和无法通行的道路。盲底格里斯河最初是指阿卜达喜（`Abdasī）河道，后来指该河下游的三角洲。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第5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70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454页。最后，底格里斯河最下游河段叫作阿拉伯河（Shatt-al-`Arab）。

[15] 阿拉伯历史上的四大哈里发（Rashidun Caliphate，632～661年）中的第二任哈里发，634～644年在位。译者。

[16] 骆驼之战（Ma‘rakah al-Jamal），又称骆驼战役，是伊斯兰历史上第一次内战中的战役。656年6月，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被刺身亡后，阿里在麦地那被其追随者拥立为第四任哈里发，这遭到倭马亚家族和一些阿里旧敌的反对。麦加穆斯林领袖泰勒哈（Talhah）和祖拜尔（Zubayr）以“为奥斯曼复仇”为借口，纠集反对派力量与阿里兵戎相见，结果引发大规模内战，此战役以反对派败北宣告结束。因战斗进程中，乘坐驼轿的阿伊莎不断发出反对阿里的号召，又因大部分战斗围绕这头骆驼进行，史称骆驼之战。译者。

[17] 巴拉祖里，第342页（v.2，p.53）载：“乌思八·本·哥疾万（Uthbah Ibn Ghazwan）奇袭了乌剌（Ubullah），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之，并致函乌玛尔（‘Umar）告之此情，说乌布剌是通往八哈剌因（al-Bahrain）、瓮蛮（‘Uman）、印度（al-Hind）、秦（as-Sin，中国）的港口。”译者。

[18] 祖拜儿（Zubayr）墓遗址尚存，这里曾是中世纪弼斯啰城所在地。现代的巴士拉城在底格里斯河三角洲上，位于乌剌（Ubullah）运河河口处。

[19] 今译卡尔马特派，是什叶派中伊斯玛仪派的分支派别之一。亦称卡拉米特派、卡尔马特运动，创始人为哈姆丹·卡尔马特（Hamdān Qarmat，？~约899年），890年发动起义，一度占领过麦加，并建立卡尔马特国（899~1077年），其势力可达叙利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中亚一些地区，后融入伊斯玛仪派。译者。

[20]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45页称："巴士拉（弼斯啰，译者）城是伊拉克主要城市之一，名闻远近，城区辽阔，布局精巧，花果遍地，真是光泽鲜艳，土地肥沃，地处海河汇流处，是咸水和淡水的交汇点。枣椰树之多为世界之冠。"今巴士拉城为伊拉克巴士拉省省会，是伊拉克第一大港，该城人口约为190万。译者。

[21] 礼拜朝向的方向，即天房。译者。

[22] 一般文献（但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说法）称另外三座天堂为：大马士革的"人间花园"（Ghawthā）；法儿思地区的八万河谷（Sha`b Bavvān），此地将在第18章叙述；粟特河谷（Wādī-as-Sughd，Soghdiana），其位于撒马儿罕城和不花剌城之间，此地将在第32章提到。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9、160页与注释c。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17、130、413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85~8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636页；第4卷，第845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8、13、1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7页。

[23]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巴士拉东南。译者。

[24]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巴士拉南的祖拜尔（az-Zubayr）城附近。译者。

[2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1页。巴拉祖里，第36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0、16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18、135页。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29、30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89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9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675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17页。Tabar，第3卷，第1982页。

[26] 两城今已不存，大致在巴士拉南底格里斯河三角洲。译者。

[27] 今已不存，大致在伊朗霍拉姆沙赫尔城附近。译者。

[28] 即布伊或布韦希王朝，932年由里海南岸的什叶派低廉（Daylam）人建立，1055年被塞尔柱人所灭，统治范围包括伊朗、伊拉克等地。译者。

[29] 白益王朝（布伊王朝）第二代君主，949～983年在位，在他统治时期该王朝达到鼎盛。译者。

[30]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30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

（*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2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9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19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第5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586页。

[31] 巴拉祖里，第36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9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18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80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89、9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708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1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

选》，第137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第230页。亚库特（第1卷，第645页）称弼斯啰（Basrah）城人有将专有名称尾部加ān音变成地名的习惯，如塔里哈坦（Talhatān），即"塔里哈（Talhah）运河"。这可以解释撒里茫（Sulaymānān）和阿八丹（`Abbādān）的地名形式，后一个地名由人名阿八得（`Abbād）演化而来。底格里斯河三角洲河口处的海岸线每年以约72英尺的速度向前推进，100年约推进1. 5英里，因此当时阿八丹（`Abbādān）城位于内陆。

[32] 今为拉西迪亚（Rāshidīyah），是巴格达东城北部的一个小区。译者。

[33] 今城名不存，大致在今萨迈拉城所在位置。译者。

[34] 穆思坦思儿，阿拔斯王朝第三十六位哈里发，1226～1242年在位。译者。

[35]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该城已毁，大致在巴格达北边约60公里的底格里斯河西岸。译者。

[36] 今城名不存，大致在古代兀乞八剌附近。译者。

[37] 今城名不存，大致在古代兀乞八剌之南。译者。

[38] 《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tūta*，trans by C. Defremery and B. R. Sanguinetti，Reproduced by Hakluyt Society in 1962，v.2，p. 346），第183页载："我离开巴格达，至杜斋河站寄宿，这是底格里斯河的支流，它灌溉许多村庄。"译者。

[39] 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2、123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

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第22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395、552、606、654页；第3卷，第705页；第4卷，第9、520页。*Marāsid*［《观察》（*Al-Marāsid-al-Ittilā*）］，是亚库特所著《地理学词典》的摘要本，由优博尔（Juyboll）编辑，1852年莱登出版，第2卷，第270、429页。

[40] 今已不存，大致在伊拉克萨拉丁（Saladin）省拜莱德区（Balad）区府拜莱德附近，即在萨迈拉城西南的底格里斯河西岸。译者。

[41] 今不存，应在拜莱德城附近。译者。

[42] 今拜莱德城。译者。

[43] 今不存，应在萨迈拉城之南。译者。

[44] 今不存，应在喀底思牙城附近。译者。

[45]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65页。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4页。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ī`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第23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78、605页；第2卷，第235、293、555页；第4卷，第529、568页。琼斯（J. F. Jones）主持的《孟买政府档案》（*Records of the Bombay Government*，新丛书，第53卷，第252页，1857年）中有一幅哈儿八（Harbā）桥的草图。他还将八儿苦洼剌（Barkuwārā）写为贝兹瓜瓦拉（Bez-guara，第47页）。

[46] 今不存，应在喀底思牙城之北，道尔（Al-Dawr）城之南。译者。

[47] 今不存，应在道尔城之北，提格里特之南。译者。

第四章 亦剌可（`Irāk）地区（续）

萨麻剌（Sāmarrā）城。塔可里忒（Takrīt）城。纳赫剌宛（Nahrawān）运河。八苦八（Ba`kūbā）城和其他城市。纳赫剌宛（Nahrawān）城和呼罗珊道。贾鲁剌（Jālūlā）和哈尼斤（Khanikīn）。班丹尼建（Bandanījān）城和八牙（Bayāt）城。从哈第撒（Hadīthah）城到安八儿（Anbār）城幼发拉底河岸的各城。爱薛（`Īsa）运河。木哈洼儿（Muhawwal）城、萨儿萨儿（Sarsar）城和纳赫儿·灭力（Nahr-al-Malik）运河。苦萨（Kūthā）运河。

从伊斯兰历221年到279年（836～892年）的半个多世纪里，阿拔斯王朝的7位哈里发曾定都于萨麻剌城，阿拉伯人征服此地前，这里已是一座城镇，征服后经过很长时间，其从曾经的名镇发展为一座都会城市。该城之名以阿拉美语（Aramæan）称为萨麻剌（Sāmarrā），哈里发木塔欣（Mu`tasim）[1]居住于此地之时，其名正式更改为速剌·蛮·剌（Surra-man-raa），以求“吉利”，其阿拉伯语含义为“谁看到了它，谁就会欣喜”。在这种情形下，该地发展为铸造阿拔斯王朝钱币的城市，但其名有很多不同的发音方式，伊本·哈里坎引证了6种书写形式，但萨麻剌（Sāmarrā）是最常用的一种[2]，在亚库特词典的词条中也使用了这种书写形式。

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末，雅忽比在其著作里长篇、详细地记述了萨麻剌城及其宫阙等的情况，这一时期先后有7位哈里发在这里生活，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被突厥侍兵软禁起来，只好在宫殿或附近的御乐苑里消磨时光。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主城区以及宫殿在河岸绵延7里格。河西岸也建有很多宫殿，每个继位的哈里发都要挥霍大量的金钱来修建新御乐苑。伊斯兰历221年（836年）哈里发木塔欣（即诃论·剌失德的幼子）到达萨麻剌城，其居住之地建立第一座宫殿的地方原来曾是一座基督教修道院（Dayr），这位哈里发用4000迪纳（约合2000英镑）购得此地，并称其为达儿罕（At-Tirhān）。他的突厥侍兵在喀儿赫城附近获得沿底格里斯河向上远至都儿（Dur）地区的大片采邑地，而有些采邑地在马梯剌城方向的萨麻剌城之南；此外，这位哈里发还在底

格里斯河东岸修建了第一座聚礼清真寺和宫殿。其工匠来自帝国各地，并且进口了大量的柚木（*Sāj*），也输入了弼斯啰城的椰枣木板，从安都（Antioch）和老底思牙（Laodicea）则运来了各色大理石。底格里斯河岸边修建了一条叫“大道”（Ash-Shāri-al-A`zam）的道路，连接着新宫殿和采邑地，而后此道从马梯剌城起，向右北上到达喀儿赫城，并有很多支路和商业街道。新财政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得以修建，还修建了叫达耳·阿马（Dār-al-`Āmmah，意为公共朝堂）的上朝大殿，每周星期一和星期四哈里发在这里临朝听政。

哈里发木塔欣除了修建萨麻剌城的宫殿外，还在新都对面的底格里斯河西岸建造御乐苑，通过浮桥将其与新都连接起来，御乐苑里种植着从弼斯啰城移植来的椰枣树及从远至叙利亚、呼罗珊等地进贡来的各种域外植物。如前所述，（底格里斯河）西边的这些土地是靠纳赫儿·伊思哈吉（Nahr-al-Ishākī）运河[3]的支道灌溉的，这条主运河是由木塔欣的总警长伊思哈克·伊本·易卜剌欣（Ishāk Ibn Ibrāhīm）开凿的，该运河所流经的地区被专称为达儿罕（Tīrhān）区，雅忽比将其称作萨麻剌（Sāmarrā）的“平原”。伊斯兰历227年（842年）哈里发木塔欣去世时，萨麻剌城的恢宏宫殿和公共设施已可以和报达城一比高低。木塔欣的两个儿子瓦喜可（Wāthik）[4]和木塔瓦吉儿（Mutawakkil）[5]依次继位，成为哈里发，继而完成其父遗留的工程。诃论·瓦喜可（Hārūn-al-Wāthik）所建的宫殿以其名称命名为喀喜儿·诃论匿（Kasr-al-Hārūnī）宫，其位于底格里斯河岸边，在宫殿的东西两端均有一座巨大的平台。瓦喜可还在底格里斯河岸边修建了港口，以便于从报达城驶来的货船在此卸货。伊斯兰历232年（847年）瓦喜可之弟加法儿·木塔瓦吉儿（Ja`far-al-Mutawakkil）继位，他最初就住在诃论匿（Hārūnī）宫，但在伊斯兰历245年（859年），他于喀儿赫城北3格里处给自己修建了新宫，叫木塔瓦吉力雅（Al-Mutawkkilīyah）宫，或称喀喜儿·加法力（Kasr-al-Ja`farī）宫，为此，他拓宽了“大道”，此后围绕着新宫形成了新城。加法力宫的遗址至今仍存在于纳赫剌宛（Nahrawān）运河支道所形成的弯角上，并与麻忽扎（Al-Māhūzah）旧城连为一体。

因旧寺院太小无法满足新都人们礼拜的需要，木塔瓦吉儿还修建了一座崭新的、更为辉煌的聚礼清真寺来替代其父修建的清真寺，同时在这一时期居民区也不断扩大，从马梯剌城一直到都儿地区的宫殿和花园连成了一片。伊斯兰历247年（861年）木塔瓦吉儿在木塔瓦吉力雅宫，又称加法力雅（Ja`farīyah）宫里，被其子蒙塔思儿（Muntasir）[6]弑

杀，接着发生了宫廷内讧，此后依次继位的四位哈里发居住于萨麻剌城对面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喀喜儿·娇撒（Kasr-al-Jawsak，即亭榭）宫，这是木塔欣修建的宫殿之一。木塔瓦吉儿之子木塔迷（Mu`tamid）[7]是最后一位居住于萨麻剌城的哈里发，其最初居住于娇撒（Jawsak）宫，而后自建新宫于底格里斯河之东岸，号曰“仁爱宫”（Kasr-al-Mu`shūk），他于还都报达城之后不久的伊斯兰历279年（892年）去世。其他宫殿的名称在阿拉伯文献中均有记载。比如伊本·塞剌皮昂提到了木塔欣在亦思哈（Ishākī）运河岸边修建有辉煌的喀思儿·吉思（Kasr-al-Jiss，即石膏）宫，亚库特提到了很多宫殿，并详细记述了每座宫殿修建时所支出的巨额费用，共计2亿400万底儿罕（dirham），差不多相当于800万纯银英币（Sterling）。

然而，随着哈里发还都于报达城，萨麻剌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其宫殿很快被毁。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盛赞萨麻剌城精巧的花园，尤其是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的花园，穆喀达思说在他那个时代底格里斯河北边的喀儿赫城比萨麻剌城要繁华。当时，萨麻剌城的聚礼大清真寺依然存在，穆喀达思称该寺与大马士革的清真寺一样辉煌。清真寺的围墙墙面装饰着琉璃瓦（mīnā），其通道铺设着大理石，寺顶用大理石柱支撑着。该寺的宣礼塔以高大而闻名，亚库特说这是清真寺里修建的第一座宣礼塔，是木塔欣修建的，他（修建宣礼塔的目的是）希望让全城人均能听到礼拜的唤礼声。该塔从周边约1格里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很显然这座古宣礼塔至今犹存，称作马儿委牙（Malwīyah），通过外边的旋转梯可到达其顶部，此塔位于现代萨麻剌城北半英里的地方。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穆思套菲的记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他称和聚礼清真寺一起尚存的宣礼塔高170腕尺（*Gez*），“塔外有通道可登其顶部，这在别处任何地方都未见过”，他还说哈里发木塔欣修建了该宣礼塔。

以后的文献对萨麻剌城的情况记载很少，而且后来这里成为什叶派的主要聚居地；因该地有第十代依麻木阿里·阿思喀里（`Alī-al-`Askarī）和其子第十一代依麻木哈散（Al-Hasan）的墓地，著述者尤其提到此地带有地下室的清真寺，这个地下室是第十二代依麻木喀伊木（Imām Al-Kāim）在伊斯兰历264年（878年）的隐遁之所，据传，他将在世界末日以马赫迪（Mahdī，救世者）的身份复临人间。萨麻剌城的这些什叶派圣墓，位于叫“木塔欣兵营”（`Askar Mu`tasim）的地方，因而第十代依麻木被冠以阿思喀儿（`Askar）的称号。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

初，穆思套菲的著作里记载了此地的什叶派，尤其提到了这些圣墓，并说这些圣墓旁建有聚礼清真寺，寺旁就是前文提及的大宣礼塔，清真寺里有一个著名的石盆，叫法老之杯（Kās-i-Fa`awn），其周长23步，高7腕尺，厚半腕尺，置于寺院内，供礼拜者洗浴（小净）之用，这个石盆是奉木塔欣的敕命修造的。但穆思套菲说在他那个时代萨麻剌城的大部分城区已毁，只有一小部分城区有人居住，这点可以从和他同时代的伊本·白图泰的记载中加以证实，因伊斯兰历730年（1330年）伊本·白图泰曾到过这里。[8]

塔可里忒城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的萨麻剌城北30英里处，通常被认为是亦剌可地区的最后一座城市，以从其坚固城堡上俯瞰底格里斯河而闻名。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称此城的主要居民是基督徒，他们在此地修建有一座很大的修道院。穆喀达思说此城的制毛业很有名，其附近地区种植着大量的芝麻；穆思套菲说这里产的西瓜也很有名，他还称塔可里忒城气候较为凉爽，但农作物一年可三熟。伊斯兰历580年（1184年），伊本·朱拜儿到过塔可里忒城，并说这座城的城墙周长为6000步，还称此城的塔保存完好，伊本·白图泰则盛赞该城的市场和许多清真寺。[9]

如前文所述，纳赫剌宛大运河在都儿（Dūr）地区南不远从底格里斯河分流出来，其上游称作喀土儿·吉思老卫［Al-Kātūl-al-Kisrawī，意为萨珊王（Chosroes）之分割］，因该运河最初由萨珊国王开凿。这条运河灌溉着底格里斯河东岸从萨麻剌城北到报达城南约100英里的所有土地，伊本·塞剌皮昂提到了该运河沿岸的很多城市及桥梁、导流坝，其流经的路线至今在地图上还可以查到，但沿岸大部分的城镇和设施现已不复存在了。为了区别以都儿命名的其他同名城市，（按习惯）这个地区（主要城市）未采用都儿[10]城之名，而是称为都儿·阿剌八牙（Dūr-al-`Arabāyā）或都儿·哈里思（Dūr-al-Hātith）城[11]，前文提及的运河，从该城流到木塔瓦吉里雅城和萨麻剌城北的其他地区，同时该运河要经过一座石桥。接着此运河到达一个叫亦塔黑雅（Ītākhīyah）的地方，这是一个村庄和采邑地，此名来自突厥人亦塔合（Ītākh），他曾是哈里发木塔欣的侍卫长；这里曾有一座叫阿卜·速夫剌（Dayr Abu-Sufrah）的修道堂，以及一座萨珊王（Kantarah Kisrawīyah）桥。这座修道堂的名称取自哈里吉（Kharijite）派的阿卜·速夫剌（Abu Sufrah）。接着，纳赫剌宛大运河流经一座叫木哈马底牙（Muhammadīyah）的小城[12]，此处运河经过“小舟”桥（Jisr

Zawārīk）[13]，亚库特称这座木哈马底牙城就是后来的亦塔黑雅（Ītākhīyah）城，因为木塔瓦吉儿以其子木哈马·蒙塔思儿（Muhammad-al-Muntasir）之名来称呼该城，蒙塔思儿弑杀其父后，继任哈里发之位。在这些地方稍南，纳赫剌宛大运河相继与三条喀土儿（Kātūl，即小运河），即竹忽底（Yahūdī）、马蒙尼（Mamūnī）与阿卜·军得（Abu-i-Jund）等运河汇合，这三条运河都是在萨麻剌城南的马梯剌城附近从底格里斯河左岸分流出来的，灌溉着该城（马梯剌）南部的富饶地区。在与这些运河汇合处的北面，纳赫剌宛大运河的岸边修建有很多导流坝（Ash-Shādhurwān），其中第一个导流坝位于叫马蒙尼雅（Mamūnīyah）的大村庄，在这里流入了第一条运河。这条竹忽底（Yahudi，即犹太）[14]运河在马梯剌城和马蒙尼雅村之间经过了一座叫坎塔剌·瓦思夫（Kantarah Wasīf）的石桥，该桥的名称取自哈里发木塔欣在位时期突厥侍卫长之一的瓦思夫（Wasīf）；第二条是马蒙尼（Al-Mamūnī）运河，其在坎塔儿（Al-Kanātīr，即桥）村南流入纳赫剌宛大运河；第三条运河是阿卜·军得（Abu-i-Jund，即军队之父或军队的补给）运河，其名源于该运河灌溉的土地所收粮食用作军粮。它是三条运河中最大的一条，是哈里发诃论·剌失德开凿的，他在督造运河时还在此修建过一座宫殿。阿卜·军得运河岸边有塔费儿（Taffir）城[15]，在这里运河流经了一座浮桥。亚库特亲自访问过塔费儿城，并称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这里是无水、无草的平原，介于八苦八（Ba`kūbā）城[16]和答苦喀（Dakūkā）城[17]之间，有野兽出没。亚库特从报达城到亦儿别儿（Irbil）城[18]途中，曾路过此城；他称在这里没有遇到居民，还说驼队晚上经过这个平原时，他的向导“靠北极星来辨别方向，一直到白天才穿过平原”。

三条运河中的最后一条运河与纳赫剌宛大运河汇合处南4里格是速剌（Sūlā）[19]，或萨剌洼（Salwa）城，又名八卜·萨剌洼（Bāb Salwā），或八萨剌洼（Bāsalwā）城。该城南部是八苦八城，其距报达城北约10里格，是上纳赫剌宛大运河地区的首府。在八苦八城，喀土儿（Kātūl）大运河变更了名称，叫作塔麻剌（Tāmarrā）运河，冠以此名的运河一直到达八吉剌（Bājisrā）城[20]，接着到达一座叫吉喜儿·纳赫剌宛（Jisr Nahrwān）的城市[21]，越过此城，运河主干道通常专称为纳赫剌宛运河。八吉剌（阿拉美语形式为Bayt-al-Jisir，即石房）城附近是良田分布的地区，城周边为椰枣林。从塔麻剌运河右岸分出来一支叫纳赫儿·哈里思（Nahr-al-Khālis）的运河，这条支河在报达城北的八剌丹（Baradān）城汇入底格里斯河，东报达城的很多运河从哈里思

（Khālis）运河获取水源。

吉喜儿·纳赫剌宛（即桥河）城是起自报达城的呼罗珊道所经之地，现对该地做一叙述。这里有一条叫纳赫儿·宾（Nahr Bīn）的运河，是从纳赫剌宛运河右岸分出来的，最后在喀剌洼扎（Kalwādhā）城汇入底格里斯河。各条从东报达城以下诸城区流经的运河从此运河（纳赫儿·宾运河）获得水源。在吉喜儿·纳赫剌宛城南1英里，底牙剌（Diyālā，又译迪亚拉）运河[22]从主运河向南分流，灌溉东报达城外的花园后，在首都南3英里处汇入底格里斯河。

吉喜儿·纳赫剌宛城南的大运河专称为纳赫剌宛运河，经过上导流坝（Shādhurwān）后，到达吉喜儿·卜岚（Jisr Būrān）桥，此桥以哈里发马蒙妻子的名字命名。该桥南有牙儿扎乞雅（Yarzātiyah，或可能是Barzātiyā）城，继而又有阿儿八塔（`Abarta）镇[23]，亚库特认为该名来源于波斯语，这里有很多重要的市场。过了阿儿八塔（`Abartā）镇就是下导流坝，接着为“八尼·朱乃得（Banī Junayd）的亦思喀夫（Iskāf）或兀思喀夫（Uskāf）城”，这是座横跨河之两岸的城市，亚库特称八尼·朱乃得城是该地区的重要城市，以其热情好客而闻名。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据亚库特记载，这里周边的土地已完全撂荒，因塞尔柱王朝时期的算端常忙于征服活动而无暇顾及疏浚纳赫剌宛运河河道和修复河堤，该运河在亚库特以前的两个世纪里已逐渐淤塞。亚库特说：“而且，他们（塞尔柱王朝）的军队在这条运河河道上修建了一条道路。现在该地区和运河已被毁。”

纳赫剌宛运河经过兀思喀夫（Uskāf）城，在纵横交错的乡村和田野之间流经60英里后，南下到达马咋剌雅（Mādharāyā）城，在这里该运河最终又汇入底格里斯河。如前文所述，马咋剌雅城位于贾不儿（Jabbul）城之南、木八剌（Al-Mubārak）城[24]之北，在纳赫儿·萨卜思（Nahr Sābus）城的对面。据亚库特记载，当时的马咋剌雅城已被毁，而且在现在地图上也未标出其名称，但应在现在的库特·阿马拉村之南。如前文所述，库特·阿马拉是现在底格里斯河从沙塔·亥（Shatt-al-Hayy）河分流之地。[25]

伊本·塞剌皮昂说纳赫剌宛运河的三段河道（即喀土儿运河、塔麻剌运河和纳赫剌宛运河本身）及流经东报达城后流入底格里斯河的三条支运河（哈里思运河、纳赫儿·宾运河和底牙剌运河），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水道网络。在后来的时间里，人们已不再依伊本·塞剌皮昂所称之名称呼

这些运河。大略查阅一下现代地图就会发现，200英里长的纳赫剌宛运河接纳了从波斯高原流下的所有河水，如果没有开凿该运河，这些河流（在洪水期）将流入底格里斯河的左（东）岸。塔麻剌运河河段最初是这些河流中的一支，据亚库特记载，人们开凿了7里格长的人工河道，以防沙地吸收河水，还记载该运河的河水分成几条支流，灌溉着东报达城的若干地区。亚库特称哈里思运河与底牙剌运河是塔麻剌运河的支河（不管怎么说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的哈里思运河不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哈里思河，因今天这条河在八苦八城西北不远处），在亚库特时期，哈里思也是该地区的名称，位于呼罗珊道之北，其中的一边直到东报达城的城墙。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伊本·鲁斯塔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均称纳赫剌宛（Nahrawān）河为山区河流的名称，这条河在萨剌洼（Salwā）城流入喀士儿大运河；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说纳赫剌宛河就是对底牙剌（Diyālā）河的称呼，该河发源于曲儿忒思田的山区，并由两条河流汇合而成：一条为设里汪（Shirwān）河，其下游叫泰麻剌（Taymarrā）河；另一条为忽儿宛（Hulwān）河，向南流经喀思儿·喜琳（Kasr Shīrīn）城[26]和哈尼斤（Khānikīn）城[27]。这两条河汇合于八苦八城北，并在那里流入纳赫剌宛运河。

至于纳赫剌宛城，又名吉喜儿·纳赫剌宛（Jisr Nahrawān，意为“桥河”）城，是起自报达城的呼罗珊道所经的第一站，这里曾是一座重镇，现在却是斯夫瓦（Sifwah）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据伊本·鲁斯塔记载，纳赫剌宛城位于纳赫剌宛运河的两岸；该城的西边有很多大市场、一座聚礼清真寺和很多灌溉用的水车；而该城的东边另有一座聚礼清真寺，以及很多市场和位于清真寺周边的旅馆，这些旅馆供去麦加朝觐的人和旅客住宿。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称该城周边土地肥沃，穆喀达思则称在他那个时期该城东边最为繁华，且仅有一座聚礼清真寺供使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称纳赫剌宛城已被毁，呼罗珊道已不经此城，而是经过北边的八苦八城。由于这里土地肥沃，仍称呼罗珊道地区（Tarīk-i-Khurāsān），但穆思套菲说八苦八城是该地区的首府，周边是连片的果园和椰枣林，园中盛产优质的柑橘和柚子。[28]

八剌子·卢兹（Barāz-ar-Rūz，即稻谷场）城，现称作比剌得·卢兹（Bilād-ar-Rūz）[29]，位于纳赫剌宛城东北，亚库特常提及此城。哈里发木塔兹得（Mu`tadid）[30]曾在此修建过一座宫殿；该城属于塔麻剌运河地区，城东有呼罗珊道经过，曾引起穆思套菲的关注。呼罗珊道离

开纳赫剌宛城，到达的第二站就是答思喀剌·灭力（Daskarah-al-Malik，即国王的答思喀剌）城[31]，据伊本·鲁斯塔记载，这是一座大城，有一座萨珊时代带城墙的大城堡，进入该城堡的唯一通道就是西城门。从答思喀剌·灭力城的位置判断，该城显然应是著名的答思塔吉儿（Dastagird）城，忽思罗·帕儿韦兹（Khusraw Parwīz）在此曾建有宏大的宫殿，历史文献记载628年该宫被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32]劫掠，烧毁后，被夷为平地。这座宫殿的遗址似乎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尚存，被称为答思塔吉儿·忽思罗雅（Dastagird Kirsrawīyah，即萨珊王的答思塔吉儿），旅行家伊本·木哈儿哈儿（Ibn Muhalhal，亚库特引用）曾亲眼见过，并说该宫由一组优美的建筑群组成，有很多的大殿和穹顶建筑，雕刻精细，极其优美，每一面墙都是用一整块石料建成。关于阿拉伯时期的城市，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说答思喀剌城有一座坚固的城堡，无疑是穆斯林修建的，穆喀达思提到此地是一座商业小镇，还有一座有优美穹顶的聚礼清真寺。距离答思喀剌城不远就是沙剌班（Shahrābān）村，亚库特和穆思套菲均提到了该地，穆思套菲说这座城附近有80个村，该城是由名叫古剌班（Gulban）的公主修建的，她是一位萨珊王的女儿。

呼罗珊道到达的下一站为贾鲁剌（Jalūlā）城[33]，其周边有很多树木，但无城墙。该城不远处就是诃论尼雅（Hārūnīyah）村，这里有一座萨珊王修建的铅浇铸古石桥，据亚库特记载，经过桥的船只南下，可将货物运送到八苦八城和八吉剌城。历史上，贾鲁剌曾因伊斯兰历16年（637年）穆斯林在此大胜波斯人而闻名，此役最后的结果就是打败了伊嗣埃（Yazdajird）国王，并使其逃遁。在以后的时代里，穆思套菲将该地称为卢八·贾鲁剌（Rubāt Jalūlā），即贾鲁剌卫所，由塞尔柱王朝的灭里·沙（Malik Shāh）[34]所建；贾鲁剌城的位置应在现代的吉兹儿·卢八（Kizil Rubāt，即红色哨所）驿站。贾鲁剌城的东边是哈尼斤城，穆喀达思关注到这是通往忽儿宛（Hulwān）城之路上的一座城市。伊本·鲁斯塔说这里有一座多拱的跨河大桥，由优质的胶泥及烧制的砖块砌成。哈尼斤城附近有一眼石脑泉，其给当地带来丰厚的收入，亚库特说前述的桥梁在他那个时代有24拱，并说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呼罗珊道经过此桥。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穆思套菲记载，哈尼斤城已被毁，仅是一个大村庄，但其所属地区仍极为富庶。

过了哈尼斤城6里格，去往忽儿宛城的中途就是吉八儿（Jibāl）地区的第一座城，即喀思儿·喜琳（Kasr Shīrīn，即喜琳的宫殿）城，喜琳

是忽思罗·帕儿韦兹（Parwīs）的皇后。这里有一个带城墙的大村庄和萨珊王朝的王宫遗址，据伊本·鲁斯塔记载，在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此地有用砖块修成的宏大拱形大殿和宫室，宫殿的围墙则是用坚固的石料建成的。同时在拱形大殿前有一个巨大平台，用大理石条铺设而成。亚库特和穆思套菲均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喀思儿·喜琳宫，其遗址至今仍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流传着很多有关王后喜琳与情人法儿哈（Farhād）、音乐家帕哈儿八（Pahalbādh）、国王帕儿韦兹的名马沙卜底兹（Shabdīz）等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在附近很多地方流传。[35]位于伊朗高原偏远地区的大山脉俯瞰喀思儿·喜琳城并成为巨大屏障，呼罗珊道的下一站就是忽儿宛城，其地处山脉垭口，但通常划归亦剌可地区，有关忽儿宛城，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进行叙述。

在呼罗珊道之南的忽兹思田边界地区，有两座值得关注的重要城市—班丹尼建（Bandanījīn）城[36]和八牙（Bayāt）城[37]。班丹尼建城在地图上无法找到，它是八得剌牙（Bādarāyā）地区和八苦萨牙（Bākusāyā）地区的首府。班丹尼建城应在现在的八苦萨牙（Bākusāyā）村附近。这两个地区位于纳赫剌宛运河对岸的西北边，拥有很多富庶的村庄。据亚库特记载，其首府班丹尼建城在波斯语中称作万答尼干（Wandanīgān），穆思套菲当时说该首府之名应称班答尼干（Bandanīgān），属于里夫（Lihf）地区，这里是曲儿忒思田山脉的“山根”，并称流经该城的河流发源于阿里瓦建（Ariwajān）地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将班丹尼建城称作与地区同名的八剌子·卢兹（Barāz-ar-Rūz）城。八牙（Bayāt）古城尚存，穆思套菲曾提到此城，他说流经该城的河流发源于曲儿忒思田山脉，在到达底格里斯河前消失在平原上，尽管这是条盐碱河，但灌溉着很多肥沃的地区。看来，八牙城和伊本·豪喀尔提到的乞卜（At-Tīb）城[38]实际是同一地，该城生产的皮带像阿剌蛮皮带一样精美。阿拔斯王朝时期，乞卜城是一座相当重要的城市，它的遗址就在后来的八牙城附近。亚库特说在他那个时代乞卜城的居民是纳八三（Nabathæan）人，操阿拉美语，这些人是亚当（Adam，阿丹）之子瑟忒（Seth）的直系后裔。[39]

幼发拉底河岸边与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纵横交错的运河岸边分布着亦剌可地区的很多城市，现对这些城市做一叙述。如前文所述，一条从塔可里忒城附近的底格里斯河向西到达幼发拉底河的分界线位于阿纳（`Ānah）城[40]稍南，就在该城之南幼发拉底河形成了大拐弯，就像穆思套菲标出的那样，这条线是贾兹剌地区和亦剌可地区

的天然分界线。该界线的南边从巴比伦冲积扇（Sawad）平原起，向北到达上美索不达米亚的砾石平原。在幼发拉底河岸边，位于阿纳城南约35英里的哈第撒（Al-Hadīthah）城[41]是这条线上最北端的城市。其城名意为“新城”，为了与底格里斯河岸边的哈第撒城相区别，前一座城被称作哈第撒·奴剌（Hadīthah-an-Nūrah，即哈第撒的白垩坑）城。据亚库特记载，哈第撒城是一座有坚固城堡的城市，被幼发拉底河环绕着，是穆斯林征服该地后不久，奥马儿在位时期修建的。穆思套菲说此城和塔可里忒城相比，不论位置还是气候均相反。位于哈第撒城和喜忒（Hīt）城[42]之间的幼发拉底河南岸有阿鲁萨（Alūsah）城与瑙萨（An-Nawūsah）城[43]，两城靠近该河岸边，相距7里格，阿鲁萨城尚存，亚库特称这是一座小城。在记载穆斯林对外征服历史的文献中常提及这两座城，并将瑙萨看成是喜忒城所属的一个村庄，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喜忒城有城墙和一座坚固的城堡，并以椰枣林而闻名。伊本·豪喀尔说喜忒城是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的穆思套菲则称喜忒城除了吉八（Jibbah）村外还有30多个村庄。此地产热带和寒冷地区的大量水果，核桃、柑橘、茄子均可丰产，但该城并不宜居，因附近的沥青泉常散发着恶臭。

穆斯林征服时期，著名的国王萨珀尔（Sapor）二世（即Khandak Sābūr）的壕沟还在。这个壕沟是4世纪被阿拉伯人称作撒卜儿·祖儿·阿可塔夫（Sābūr Dhū-l-Aktāf）的人开凿的。此壕沟从喜忒城起，向南在乌剌城（靠近后来的弼斯啰城）通到波斯湾。起初，它是输水河道，后来变成了下美索不达米亚肥沃地区抵御沙漠部落的一道防线；这条河道的部分干涸河床作为其遗迹仍然存在。阿因·塔木儿（`Ayn-at-Tamr，即椰枣泉）城位于喜忒城正南的沙漠里，穆喀达思说此地是一座小要塞，一条从这里发源的河流在喜忒城南汇入幼发拉底河。该地产外销的椰枣和蔗糖，尤其在邻近阿因·塔木儿城的沙法撒（Shafāthā）城周边，蔗糖产量更大，但这两座城市的确切位置仍不清楚[44]。

喜忒城南12里格就是剌卜（Ar-Rabb）村，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前，（早期的）都加伊勒（Dujayl）运河就是在这里从幼发拉底河分流出来；该运河灌溉了麻思斤地区和喀塔剌不儿（Katrabbul）地区后，流向正东，到达西报达城的北城区。如前文所述，都加伊勒运河的西段很快淤塞；伊斯兰历340年（951年），伊斯塔赫里称当时都加伊勒运河已从喀底思牙城对面的底格里斯河引水，这在前文叙述麻思斤地区时已谈及。安八儿（Al-Anbār，即粮仓）城[45]位于幼发拉底河的左

岸，是阿拔斯王朝时期亦剌可地区的大城市之一。该城的历史可追溯到穆斯林征服之前，波斯人称其为费鲁兹·撒卜儿（Fīrūz Sābūr，或Fayrūz Sābūr，希腊语为Perisabor），由国王撒卜儿（Sāpūr）[46]修建；阿拉伯人统治时期，费鲁兹·撒卜儿成为安八儿城周边地区的名称。据说该城之所以叫“粮仓”，是因为过去这里储藏着波斯国王的军队使用的谷物、大麦、草料等。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萨法（Saffāh）[47]一度曾居住于安八儿城，并崩于他在此地建造的宫殿里。其弟满速儿也曾居住于安八儿城，并从这里迁到了阿拔斯王朝修建的新都报达城。据穆思套菲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曾将从耶路撒冷迁往巴比伦的犹太人囚禁在安八儿城，并称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该城城墙周长有5000步。

安八儿城的重要性缘于其地理位置，这里是从幼发拉底河流出到底格里斯河的第一条可通航大运河的起点，这条运河经“港口”（Al-Fardah），流到西报达城团城的南边。这就是纳赫儿·爱薛（Nahr `Īsā）运河，其名称取自一位叫爱薛（`Īsā）的阿拔斯王朝王子，可能是满速儿的侄子爱薛·伊本·木萨（`Īsā Ibn Mūsā），或可能是满速儿的叔父爱薛·伊本·阿里（`Īsā Ibn `Alī，是此人的说法更可信）。不管怎么说，这条运河因爱薛（`Īsā）而得名，因他重新开凿了这条运河，于是该河成为从幼发拉底河到报达城的航运通道。这条从幼发拉底河分出的运河，在安八儿城稍南穿过了一座叫坎塔剌·底米麻（Kantarah Dimimmā）的宏伟大桥，该桥之名取自底米麻（Dimimmā）村，此村在幼发拉底河岸边，靠近夫鲁贾（Al-Fullūjah）村[48]。纳赫儿·爱薛运河流经费如兹·撒卜儿（Fīrūz Sābūr）地区的很多村庄和农田，最后到达距西报达城区1里格的木哈洼儿（Al-Muhawwal）城。在快到木哈洼儿城之前，从纳赫儿·爱薛运河左岸分出了撒剌忒（Sarāt）运河，这条运河成为西报达城北边的喀塔剌不儿（Katrabbul）区和西报达城南边的巴都剌雅（Bādūrayā）区之间的分界线。撒剌忒运河和纳赫儿·爱薛运河差不多平行着逶迤流动，就在团城的弼斯啰城门稍南流入底格里斯河，西报达城所有河渠的水除了一小部分取自都加伊勒运河外，其余均源自这两条河。

木哈洼儿城的城名意为“卸货场”，该城因从幼发拉底河诸城到报达城的船只在这里将货物卸下装入小船转运而得名，由此这些小船可以通过位于木哈洼儿城南、贯穿喀儿赫外城区的纳赫儿·爱薛运河上的很多桥梁。木哈洼儿城是一座优美的城市，以其市场和花园而闻名，晚至伊斯

兰历8世纪（14世纪），这里已有一些恢宏的建筑，穆思套菲当时记载了哈里发木塔欣修建于山丘顶上的一座宫殿，宫殿里写满了有法力的咒语，以此来躲避蚊虫之害。木哈洼儿城的确切位置现已不得而知，但肯定位于称作阿喀苦夫（`Akarkuf）山[49]的古代巴比伦山丘的东北，阿拉伯地理学家常提到此山丘，穆思套菲将此地和残暴的尼木罗（Nimrod）传说联系起来，据传就是他将易卜拉欣（Abraham，亚伯拉罕）扔进了炽热的火炉中。[50]

底米麻（Dimimmā）村南3里格就是第二条横贯的大运河—纳赫儿·萨儿萨儿（Nahr Sarsar）运河，其流向底格里斯河，并在马达因城北4里格处汇入该河。这条运河的下游穿过位于西报达城南的巴都剌雅区，伊本·塞剌皮昂记载了该运河沿岸修建有大量水车（*dāliyah*）和应用杠杆（*shadūf*）灌溉土地的情况。在扎里兰（Zarīrān）城[51]稍北，此运河流入底格里斯河，差不多可以望见马达因城萨珊王白宫的地方是该运河岸边繁华的萨儿萨儿（Sarsar）[52]城，这里的运河上修建有一座连接苦法道的大浮桥。萨儿萨儿城距离西报达城南的喀儿赫大外城区，只有几里格远；伊本·豪喀尔称萨儿萨儿运河可以通航，并说萨儿萨儿城隐没在椰枣林之中。穆喀达思认为其建筑式样可与巴勒斯坦诸城相媲美；萨儿萨儿城直到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仍具有重要的地位，帖木儿占据报达城时，就曾驻兵于其周边地区。

第三条横贯的运河就是纳赫儿·灭力（Nahr-al-Malik）运河，即国王运河，其始于纳赫儿·萨儿萨儿运河源头南5里格的法鲁贾（Al-Fallūjah）村[53]，在马达因城南3里格处流入底格里斯河。这条“国王运河”很古老，希腊人称作纳赫儿·马儿差（Nahar Malcha）运河。亚库特称，传说该运河是速莱满（Solomon，即所罗门）王或亚历山大大帝开凿的。横跨此运河两岸的城市叫纳赫儿·灭力（Nahr-al-Malik）城[54]，其在萨儿萨儿城南7里格处，并有一座浮桥与苦法道相连。据伊本·豪喀尔记载，纳赫儿·灭力城比萨儿萨儿城要大一半，其附近以种植粮食和拥有椰枣林而闻名；穆喀达思说该城周边地区有300多个村庄。

第四条横贯的运河就是纳赫儿·苦萨（Nahr Kūthā）运河，其位于纳赫儿·灭力运河南3里格处，始于幼发拉底河，并在马达因城南10里格处流入（底格里斯河）。纳赫儿·苦撒运河灌溉着纳赫儿·苦撒（Nahr Kūthā）地区，也称作阿儿达喜儿·八卜甘（Ardashīr Bābgān，以萨珊王朝第一位国王命名）[55]地区，但该地区的一部分属于位于一条支运河

沿岸的纳赫儿·角八儿（Nahr Jawbar）地区。建有浮桥的苦撒·剌巴（Kūthā Rabbā）城[56]位于主运河的两岸，据说这一名称源自《圣经》中的库萨（Biblical Cuthah），在其第17章（《列王纪下·约拿书》）第24页曾提及此名，该城是巴比伦附近的一座重要城市。按穆斯林的说法，苦萨（Kūthā）城就是残暴的尼木罗将易卜拉欣扔进热火里的地方；又据穆斯林的说法，该城名取自易卜拉欣的祖父苦萨（Kūthā）。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里有双城—苦萨·塔里（Kūthā-at-Tarīk，即苦萨之道）城和苦萨·剌巴城。苦萨·剌巴城比八比儿（Bābil，即巴比伦）城的规模要大，他还说此地附近有大灰烬山丘，传说是尼木罗炽热火炉的所在地；穆喀达思说靠近大道（苦法道）可以看到一座古塔，这里流传着很多有关古塔的传说。道里志记载苦萨城在纳赫儿·灭力城南4英里，此地在地图上标为“塔儿·易卜拉欣”（Tall Ibrāhīm），即“亚伯拉罕山”。

纳赫儿·苦萨运河北约几英里处为法剌沙（Al-Farāshah）大村，是报达城和喜剌（Hillah）城之间的驿站，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末去往麦加的朝觐者沿这条道路南下可达苦法城。伊斯兰历580年（1184年），伊本·朱拜儿曾到过这里，并称此地是个人口稠密、灌溉良好的村庄，这里还有一个围有堞墙、供旅人居住的大客栈。穆思套菲在其道里志中也曾提到法剌沙，并称其在萨儿萨儿城南7里格处。[57]

[1] 阿拔斯王朝第八位哈里发，833～842年在位。译者。

[2] 《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tūta*，（v.2，p.34）载，速剌·蛮·剌（Surra-man-rā`a）城，也称作萨麻剌。“有些人称其为萨麻·剌（Sām Rāh），波斯语的含义就是‘萨麻的道路’。”译者。

[3] 这条运河从塞尔萨尔（Ath-Thathār）湖先向南，然后向东流入由底格里斯河引出的运河，是伊拉克比较大的运河，至今还在发挥作用。译者。

[4] 阿拔斯王朝第九位哈里发，842～847年在位。译者。

[5] 阿拔斯王朝第十位哈里发，847～862年在位。译者。

[6] 阿拔斯王朝第十一位哈里发，861～862年在位。译者。

[7] 阿拔斯王朝第十五位哈里发，870～892年在位。译者。

[8] 巴拉祖里，第297、298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

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55～268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94页。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2、123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28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14～22、82、675页；第4卷，第110页。伊本·哈里坎，第8卷，第1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9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132页。

[9]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3页。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i`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第23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

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8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133页。

[10] 都儿（Dūr）意为“房屋”或“居民点”，是一个常见的地名，其复数形式为“家园”（Dārah）。

[11] 今为道尔，是伊拉克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小城，距该河西岸的提克里特城不远。译者。

[12] 今不存，应在巴格达城附近。译者。

[13] 需要注意的是在传统用法中“吉思儿”（Jisr）是指“浮桥”，“坎塔剌”（Kantarah）是指“石拱桥”。沙祖儿宛（Shādhurwān）译为“堰堤、导流坝”，但更确切的应该是指运河的一部分，或河床。修筑的这种“堰堤”是用来拦截河道中的河水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吉思儿”（Jisr）无疑有时也指石拱桥，如著名的瓦利桥（Jisr-al-Walīd），该桥横跨在阿答纳（Adana）城与摩普索斯提亚（Mopsuestia）城之间的萨鲁思（Sarus）河上。该桥是由东罗马皇帝犹斯汀安（Justinian）修建的。“坎塔剌”（Kantarah）一词有时也指“拱形结构”，如间道、高架桥（viaduct）和沟渠、导水管（aqueduct）。该词是从拜占庭人那里借用的，他们用κεντρο（拉丁文Centrum）一词来表示桥中央的拱形，广义上指整体结构。

[14] 见《元典章》，《元史·文宗本纪》作术忽。译者。

[15]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巴古拜城之北。译者。

[16] 今为巴古拜（Ba‘qūbah），伊拉克东部城市，迪亚拉（Diyālā）省省会。人口50万，位于迪亚拉河河畔，在巴格达东北约50公里处，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去往巴格达和伊拉克北部的要道。译者。

[17]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基尔库克附近。译者。

[18] 今为埃尔比勒，是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省的省会。人口有150万，居民主要是库尔德人。译者。

[19] 今此城名不存，在巴古拜城之北。译者。

[20] 今此城名不存，在巴古拜城之南，今那赫尔万之北的那赫尔万运河岸边。译者。

[21] 今简称那赫尔万（Nahrwān）城，南边有与之同名的运河，但很多处已被废弃。译者。

[22] 《迦勒底旅行记》（*Travels in Chaldœa*）第86～87页中载：第拉（Diala，即底牙剌）河上"有座船搭成的浮桥。河口宽60码，此时河水湍急，说明山上下了雨。河水很小时，当地人不喝其水，因水质太咸"。译者。

[23] 这两座城今已不存，原址应在那赫尔万城之南。译者。

[24] 今已不存，其址大致在库特城之南。译者。

[25] 牙儿扎乞雅（Yarzātiyah）可能就是现在的拉扎齐亚（Razatiyah）或扎塔里亚（Zatariyah），位于阿儿八塔（`Abartā）城之北。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21页。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9、20页。巴拉祖里，第297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90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75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第5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52、454页；第3卷，第539、604页；第4卷，第16、381、430页。

[26] 今为席林堡（Qasr-ī-Shīrīn），是伊朗克尔曼沙阿省席林堡区区府，人口有1.5万，是进入伊朗或伊拉克的桥头堡，也是丝路重镇，可通往巴格达、克尔曼沙阿、基尔库克等地。译者。

[27] 今为哈奈根（Khānikīn），是伊拉克东北靠近伊朗的迪亚拉省的一座城市，靠近迪亚拉河支流阿勒万（Alwan）河，人口有20万，主要是逊尼派的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这里是丝绸之路干道经过之地，也是丝路古城，交通地位与席林堡相同。译者。

[28]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90、163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

《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75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812页；第2卷，第390、63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9、141、216页。

[29] 今称鲁兹堡（Balad Rūz），是迪亚拉省的小城，靠近伊朗边界。译者。

[30] 阿拔斯王朝第十六位哈里发，892～902年在位。译者。

[31] 今此城名不存，其址在今沙赫拉班（Shāhrebān），或穆卡达迪亚（Al-Muqdādiya），是迪亚拉省的一座大城，人口29.8万，在杰卢拉城之南，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2] 东罗马皇帝，在位时间为610～641年。译者。

[33] 今杰卢拉，是伊拉克东北靠近伊朗迪亚拉省的一座城市，靠近迪亚拉河，人口有10万，主要是逊尼派的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这里有丝绸之路的干道经过，是丝路古城，可通往巴格达、克尔曼沙阿、基尔库克等地。译者。

[34] 也译为马立克沙，是塞尔柱王朝君主，1072～1092年在位，其为苏丹艾勒卜·艾尔斯兰之子。生于波斯伊斯法罕。他在位期间，塞尔柱王朝达到鼎盛，统治着以波斯为核心的广大地区，当地文化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译者。

[35]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6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1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9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

（*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34页；第2卷，第107、393、573、575、813页；第4卷，第11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7、138、139、193页。

[36] 今不存，在瓦西特城以东40余公里处，距库特东南70公里。是去往伊朗胡齐斯坦省和波斯湾的重要通道，也是丝路古镇。译者。

[37] 此城名称现已被其他名称代替，难以查到。在乞卜城西北不远。译者。

[38] 今此城名不存，在八牙城东南，是去往图斯塔尔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39]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6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7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30、459、477、745页；第3卷，第566页；第4卷，第35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7、138、220页。不能将班丹尼斤（Bandanjīn）城所在的八得剌牙（Bādarāyā）区与巴都剌雅（Bādūrayā）区混淆，后一个区是西报达南区的名称。

[40] 今为阿奈（`Ānah），属安巴尔省，在幼发拉底河南岸，人口3.7万，其东南为哈迪西耶（Al-Hadīthah）湖。古代是通往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干道上的重镇，也是丝路要道。译者。

[41] 今为哈迪塞（Al-Hadīthah）城，属安巴尔省，位于幼发拉底河南岸，其北为哈迪西耶湖，人口有10万，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是通往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干道上的重镇。译者。

[42] 今为希特，位于安巴尔省，是座小城，在幼发拉底河南岸，自古以来是通往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干道上的重镇。译者。

[43] 这两座城今已不存，在幼发拉底河岸边。在古代，是重镇和交通要道。译者。

[44]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0、13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07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7页。巴拉祖里，第179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17、123、13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352页；第2卷，第223页；第3卷，第759页；第4卷，第734、99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5、141页。

[45] 今为安巴尔，是座小城，在幼发拉底河东岸，古代曾是名城，是通往叙利亚和罗马的要道，也是黑衣大食的临时都城，在费卢杰城附近。译者。

[46] 撒卜儿（Sābūr）是波斯语沙普儿（Shāpūr）或沙赫普儿（Shāhpūr）的阿拉伯语书写形式，希腊语写为萨珀尔（Sapor）。

[47] 萨法（Abu al-`Abbās `Abdu'llāh as-Saffāh），意为“屠杀者”，是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750～754年在位。译者。

[48] 今为费卢杰，已成为一座大城，在幼发拉底河东岸，距巴格达69公里，城中有清真寺200余座，被称为“众寺之城”。是古今交通要道。译者。

[49] 《迦勒底旅行记》（*Travels in Chaldœa*）第102～107页称，从巴格达往正

西行三个小时，“有个很高的土堆遗址，阿拉伯人称作陶尔·阿科尔库夫（Tull Akerkouf，即阿喀苦夫山），讹为阿格尔高夫（Agerkoaf），土耳其人称作尼木鲁德·特坡斯（Nemroud Teppesy，即尼木罗土丘）。这些名称的含义为尼木鲁德土堆，而不是曾翻译的尼木鲁德塔”。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古代城市的遗迹。译者。

[50]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0、14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7、72、74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7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5、16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3、13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367页；第2卷，第600页；第3卷，第697页；第4卷，第43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6、138、140、141页。纳赫儿·爱薛运河（Nahr `Isā）与撒剌忒（Sarāt）运河下游属于报达的地区的地貌，在笔者以前的著作中已做了充分的叙述。安八儿城应在苏费拉（Sufayrah）村废墟的附近，或者在这个村庄北边，皮特尔斯（J. P. Peters）先生在《尼普尔》（*Nippur*，第1卷，第177页）一书中提供了遗址草图。

[51]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费卢杰东南的宰丹（Az-Zādān）。译者。

[52] 今此城名不存，距底格里斯河西岸不远，东北对岸是马达因城。译者。

[53] 这就是凯撒·弗里德里克（Cesar Frederick）游记和伊丽莎白时代商人所记载的富鲁奇雅（Feluchia）、费鲁格（Feluge），或费鲁基亚（Felugia），当时他们从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来到这里，弃船后，经陆路到达报达城，如在哈路亚特（Hakluyt）本《大航行》第5卷，第367、455页；第6卷，第4页，格拉斯哥出版（Glasgow，1904）。按：此地即今费卢杰。译者。

[54]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费卢杰东南的宰丹（Az-Zādān）。译者。

[55] 即阿儿达喜儿一世，是萨珊王朝的创立者，224～241年在位，于224年攻占泰西封城，灭亡安息王朝，在他统治时期，将袄教定为国教。译者。

[56]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巴比伦（Babil）省伊斯坎德里耶（Al-Iskandariya）城附近。此地是古代两河流域著名的遗址，近代以来，这里发掘出新巴比伦文明的遗物。译者。

[57]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5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2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5、8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6、16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1页。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ī`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第21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68页；第4卷，第317、846页。*Marāsid*［《观察》（*Al-Marāsid-al-Ittilā*）］，是亚库特所著《地理学词典》的摘要本，由优博尔（Juyboll）编辑，1852年莱登出版，第2卷，第363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3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1、193页。纳赫儿·爱薛运河的河道大致上

就是现代的萨克拉瓦亚（Saklawāyah）运河河道所在的位置。萨儿萨儿城显然位于阿卜·古莱卜（Abu Ghurayb）运河沿岸。纳赫儿·灭力运河就是现代地图上的拉扎瓦尼亚（Radhwānīyah）运河，而纳赫儿·苦萨运河就是现在的“亚伯拉罕的绳索”（Habl Ibrāhīm）。这些仅是大致的方位，因从阿拔斯王朝起经过1000多年后，冲积扇（Sawād）平原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五章 亦刺可（`Irāk）地区（续）

幼发拉底河的分流。苏剌（Sūrā）河道。喀思儿·伊本·忽拜剌（Kasr Ibn Hubayrah）城。尼罗（Nīl）城及其运河。纳赫儿·纳儿思（Nahr Nars）运河。八荅（Badāt）运河和庞拜底塔（Pombedita）城。苦法（Kūfah）河道。苦法（Kūfah）城。喀底思牙（Kādisīyah）城。麻沙得·阿里（Mashhad `Alī）城和喀儿八剌（Karbalā）城。亦剌可地区的12区（Astān）。贸易。亦剌可地区的诸道。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幼发拉底河在苦萨运河起点南约6里格处分成两支：向右的西支曾被认为是幼发拉底河的主河道，流经苦法城，后注入大沼泽；向左的东支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主河道，伊本·塞剌皮昂和其他阿拉伯地理学家将其称作纳赫儿·速剌（Nahr Sūrā）河或苏兰（As-Sūrān）河，该河与其他很多河流一样最后汇入大沼泽。首先就苏剌（Sūrā）河（现在的幼发拉底河河道）而言，（从文献记载）我们知道伊本·塞剌皮昂自己承认该支流在他那个时代比苦法支流宽大。苏剌河从幼发拉底河分流出来后，上游灌溉着苏剌（Sūrā）、八儿必萨麻（Barbisamā）和八鲁思麻（Bārūsmā）等三个次地区，这三区组成了中部必合·苦八兹（Bih Kubādh）地区的一部分；此后该河向南经几英里便到达西边叫喀思儿·伊本·忽拜剌（Kasr Ibn Hubayrah）城[1]的地方，这里的河道上横跨着一座被称为吉思尔·苏剌（Jisr Sūrā，或Sūrān）的大浮桥，此桥有从喀思儿·伊本·忽拜剌城到苦法城的朝觐道经过。

喀思儿（Al-Kasr）城是伊本·忽拜剌（Ibn Hubayrah）堡或宫（Al-Kasr）的简称，以其修建者伊本·忽拜剌之名命名，他在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麦儿旺（Marwān）二世时期担任过亦剌可地区的总督。尽管伊本·忽拜剌在世时并没有完成这座宫殿的修建，但倭马亚王朝灭亡后，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任哈里发萨法居住于此，完成了上述宫殿的修建，并以其先祖哈辛（Hāshim）之名，将其名为哈辛米雅（Hāshimīyah）宫。在哈里发宫殿的周边，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但依然以倭马亚王朝总督之名来称呼该城，在哈里发满速儿修建报达城以前，他一度居住于哈辛米雅宫，而且此城常称作喀思儿·伊本·忽拜剌（Kasr

Ibn Hubayrah）城或伊本·忽拜剌（Madīnah Ibn Hubayrah）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喀思儿·伊本·忽拜剌城是报达城和苦法城之间的最大城市，其位于从苏剌河分出来的被称作“磨坊运河”（Nahr Abu Rahā）的环形运河岸边。穆喀达思记载这座城市异常繁华，有很好的市场，并居住着很多犹太人，市场里还有一座聚礼清真寺。但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早期，随着喜剌城的地位不断上升，喀思儿·伊本·忽拜剌城开始衰落，而后走向毁灭。毫无疑问，对喀思儿·伊本·忽拜剌城，虽可确定其遗迹为古巴比伦（或阿拉伯人称作Bābil）大土丘北数英里处诸多废墟中的一个，但今天已无法断定其确切位置。

喜剌城位于八别儿（Bābil，即巴比伦）遗址南数英里的幼发拉底河岸边，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此河称作苏剌河，喜剌城被称作贾米安（Al-Jāmi`ān），意为“双大寺”，起初该城大部分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东岸。这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其附近地区十分富庶。而后“喜剌（居民点）”修建在了幼发拉底河右（西）岸，这是八尼·麻兹雅（Banī Mazyad）酋长塞弗·道剌（Sayf-ad-Dawlah）约在伊斯兰历495年（1102年）完成的；此地旋即成为重镇，因其浮桥成为从报达城到苦法城的朝觐道跨过幼发拉底河的新通道，于是朝觐道就不再经过喀思儿·伊本·忽拜剌城（后被毁）和苏剌桥。到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和今天一样，苏剌河河道也被视为幼发拉底河的主河道，随后纳赫儿·速剌河之名就逐渐废弃不用了。伊斯兰历580年（1184年），伊本·朱拜儿从喜剌城“一座铁链联结的大浮桥”渡过幼发拉底河，此时该城是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一座大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追随伊本·朱拜儿的足迹来到喜剌城，并详细记述了该城著名的浮桥，还称浮桥两端的两条铁链牢牢固定在大木桩上。他还盛赞了该城的市场，与他同时代的穆思套菲完全证实了他的这些记载，穆思套菲称喜剌城一开始横跨幼发拉底河两岸，城周边均是椰枣林，因此气候湿润。他还说喜剌城的居民均是坚定的什叶派信徒，这里有一座什叶派圣墓（Makām），他们相信在伊斯兰历264年（878年）隐遁于萨麻剌城的救世者马赫迪（Mahdī）将在世界末日之时，复临人间，并让所有人皈依什叶派（见原文第56页）。[2]

再次回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伊本·塞剌皮昂记载，如前文所述苏剌河经过巴比伦或八别儿大废墟的西边。穆喀达思曾称这些废墟位于一座浮桥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穆思套菲则详细记录了居住在八别儿城的很多术士，也记载了当地山顶上的一口井，说这口井里囚禁着两

位堕落的天使哈鲁（Hārūt）和马鲁（Mārūt），并将一直囚禁到世界审判日。

八别儿城北从幼发拉底河流到底格里斯河的诸多运河中的最后一条是从苏剌河分流出来的。这条运河现在称作尼罗（Shatt-an-Nīl，或Nile）河，伊本·塞剌皮昂称其为大撒剌忒（Sarāt）河，该河与西报达城一条著名运河的上游名称相同（见原文第66页），一直到尼罗（Nīl）城[3]西。大撒剌忒河从其发源地向东流经很多富庶的村庄，支流纵横，快到尼罗城时，又形成了一条叫撒剌忒·加麻思（Sarāt Jāmasp）的环形运河，并向左（东）分流，在该城南部汇入主运河河道。这条环形运河是由倭马亚王朝统治亦剌可地区的著名总督哈贾吉重新开凿的，但文献记载其名取自大莫伯（Mobed，即袄正）或袄教祭司加麻思（Jāmasp），此人协助国王谷失塔思（Gushtāsp）在波斯确立了袄教（Zoroaster）的国教地位。尼罗（An-Nīl）城同样也是由哈贾吉修建的；该城为这一地区的首府，其遗迹以尼罗里牙（Nīlīyah）之名标在了地图上；据说尼罗（Nīl）运河之名取自埃及的尼罗（Nile）河，以示对尼罗河的纪念。尼罗城对面的主运河上横跨着一座叫坎塔拉·麻思（Kantarah-al-Māsī）的大石桥。据记载，阿布·勒·费达时期，尼罗城西边的一段运河也叫纳赫儿·尼罗（Nahr-an-Nīl）河，即伊本·塞剌皮昂所称的大撒剌忒河，但伊本·塞剌皮昂所称的纳赫儿·尼罗河特指流经尼罗城东边的河段。

这条到达（尼罗城东）的河流继续前行，灌溉了所经地区后，一直到底格里斯河附近奴满尼雅（Nu`mānīyah）城（见原文第37页）对面一个叫“潟湖”（Al-Hawl）的地方，此处分出一条叫上扎卜（Zāb）的支运河，而后直接汇入（底格里斯）河。此处（“潟湖”）尼罗运河的主河道向南拐，与底格里斯河平行流动一段距离后，在距瓦夕的城北一天路程的纳赫儿·萨卜思（Nahr Sābus）城南1里格处，该运河最后流入底格里斯河，很可能有一部分河水流经了下扎卜（Zāb）运河。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潟湖”以南的下扎卜运河在与尼罗运河汇合前被称作纳赫儿·萨卜思运河，“萨卜思”一名也用来称呼底格里斯河右岸的一座城市，此城在前文已述（见原文第38页）。这些河流的名称随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亚库特说从尼罗城到奴满尼雅城的河段被称作上扎卜运河，其所称的下扎卜运河与伊本·塞剌皮昂所说的纳赫儿·萨卜思河显然是一致的。尽管这两条运河岸边的土地肥沃，但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运河已毁坏严重，差不多被废弃了。

现在再回到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巴比伦古城遗址，此遗址南部的苏剌河上横跨着一座叫坎塔剌·喀米干（Kantarah-al-Kāmighān）的石桥，伊本·塞剌皮昂说：“河水奔涌着穿过此桥。”该桥向南6里格，快到贾米安（Jāmi`ān）城的地方座落着后来的喜剌城，在这里苏剌河分成两支：右支向南经过喜剌城；左支叫纳赫儿·纳儿思（Nahr-an-Nars）运河，转向东南，灌溉了哈麻木·奥马儿（Hammām `Omar）和其他村庄的土地后，到达尼法儿（Niffār）城[4]。这条运河的名称取自纳儿思（Nars，或Narses）[5]，他是萨珊王朝的国王，于292年登基，这条运河是在他的监督下开凿的。纳赫儿·纳儿思运河向南流了一段距离后与苏剌河一同注入穿过大沼泽北端的大八答（Badāt）运河。纳赫儿·八答（Nahr-al-Badāt，或Budāt）运河是从幼发拉底河的苦法支道左岸分出的一条很长的排水河道，距苦法城之北有一天的路程，可能接近坎塔剌·苦法（Kantarah-al-Kūfah）城，又名坎塔剌（Al-Kanātīr，意为“桥”）城[6]。坎塔剌城毫无疑问连接着经过八答（Badāt）城[7]的（朝觐）道路。这座“桥城”位于苏剌大浮桥南27英里、苦法城之北28英里；其可能是在希伯来语所称的庞拜底塔（Pombedita，阿拉伯语*Fam-al-Badāt*，即八答之口）城[8]附近或同一地，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本杰敏·土得剌（Benjamin of Tudela）曾称庞拜底塔城为巴比伦的犹太学术中心。八答运河流经50多英里后，在其左岸接纳了下苏剌河和纳儿思运河的剩余河水，最终在尼法儿城附近汇入大沼泽。[9]

幼发拉底河下游分为两支，即流向东的苏剌河和流向西的主河道，介于这两条河之间的地区被称作上、下法鲁贾（Al-Fallūjah）地区。该地区之南，主河道流经了坎塔剌城，八答运河则到达苦法城，该城位于幼发拉底河浮桥的西边，幼发拉底河南边分流出来的很多河流注入大沼泽。库达玛和马苏迪称幼发拉底河的这段旧河道为阿儿喀米（Al-`Alkamī），其显然与现代的纳赫尔·欣迪耶（Nahr Hindīyah）河为同一条河，在木塞亦（Musayyib）城[10]之南，纳赫尔·欣迪耶河从现在的幼发拉底河分流出来后，经苦法城废墟，再通过阿拔斯王朝时代大沼泽所属沼泽地的一段弯曲河道后，重新汇入现在幼发拉底河的主河道。

苦法城是穆斯林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不久后兴建起来的城市，大约与弼斯啰城修建于同一时期，即伊斯兰历17年（638年）哈里发奥马儿在位时期。苦法城在幼发拉底河北辽阔的平原上，靠近古波斯的喜剌城，阿拉伯人试图将其作为阿拉伯或沙漠边缘、位于幼发拉底河岸的永久营地。苦法城人口增长迅速，伊斯兰历36年（657年），阿里[11]居住于此

城，在位的4年时间里该城是承认阿里为合法哈里发的半个伊斯兰帝国的首都。伊斯兰历40年（661年），阿里被刺杀于苦法城的清真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斯塔赫里称苦法城的规模和弼斯啰城一样，但苦法城的气候更加宜人，其建筑也更宏伟；这里的市场虽然逊于弼斯啰城，但还是很不错。阿里遇难的大清真寺在该城的东边，这座清真寺高大的柱子是从邻近的喜剌城运过来的，由于苦法城日益繁华，喜剌城就被废弃了。苦法城的主城区之一就是苦纳萨（Al-Kunāsah，意为“风口”）区，其位于沙漠边上，周边均种植着优质的椰枣树。伊斯兰历580年（1184年），伊本·朱拜儿经过苦法城，他说该城已是一座差不多已毁掉的无城墙城市，但其聚礼清真寺尚存。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称其寺顶是用柱子支撑的，这些鼓形石柱用铅灌注连接而成[12]。壁龛（Mihrāb）就是阿里被害之地。穆思套菲详细叙述了苦法城，并说该城周长18000步的城墙是哈里发满速儿修建的。这里的甘蔗比亦剌可其他地方的长势都要好，此外这里还出产大量棉花。清真寺里的一根柱子上留有阿里的手印；这里的人们保留着一只炉子（*tannūr*）[13]，自奴赫（即诺亚）洪水时代起，就从炉嘴里喷着水。

苦法城南不到1里格处为喜剌城废墟，在萨珊王朝时期这里曾是一座大城。喜剌城附近就是著名的萨底儿（As-Sadīr）宫和哈瓦儿纳（Al-Khawarnak）宫，相传，哈瓦儿纳宫是喜剌城的统治者努蛮（Nu`mān）为国王缚伽浪·古儿（Bahrām Gūr）[14]修建的大狩猎场。在早期征服美索不达米亚时，穆斯林夺得喜剌城，看到哈瓦儿纳宫及其恢宏的大殿后，均惊叹不已。后来，哈瓦儿纳宫一度曾是哈里发游猎时的驻地，显然现在这座宫殿已荡然无存，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伊本·白图泰经过这里时，宫殿虽已毁，但有些城墙和穹顶尚存。

在沙漠边缘，苦法城西5里格，去往麦加的朝觐道的第一站为喀底思牙（Kādisīyah）村，其周边有椰枣林，伊斯兰历14年（635年），在该村附近，穆斯林第一次大胜波斯人，这次大战使穆斯林取得了对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胜利。穆喀达思称喀底思牙为“苦法的喀底思牙”城，以区别于底格里斯河岸边的同名城市（见原文第51页），并说在朝觐期间这是座特别繁忙的城市。一座带城墙的小堡守护着喀底思牙城，还有两座城门。这里的水源是一条从幼发拉底河引来的运河，这条河流从报达城门流入城内；在沙漠门（Bāb-al-Bādiyah）有座聚礼清真寺，朝觐期间，寺前是一处大市场。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经过喀底思牙时，这里已成为一个大村庄[15]，穆思套菲说这里大部分已

毁。[16]

纳杰甫（Najaf）城[17]位于苦法城废墟以西4英里，直到今天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该城的麻沙得·阿里（Mashhad `Alī[18]，即阿里陵墓）墓，是什叶派最敬仰的圣墓之一。据穆思套菲记载，按什叶派的说法阿里在苦法城清真寺被刺后，料知不久于人世，旋即传谕，一旦去世，就将尸身置于一驼，随意而行，驼跪卧之地，就是其埋葬之所。人们照谕办理，但倭马亚王朝时期，在此处未建陵墓，为了安全起见，此地是保密的。到伊斯兰历175年（791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诃论·剌失德发现了此圣地。有一天他到苦法城附近围猎，追随着猎物进入一片灌木丛，继续追赶之时，这位哈里发发现扈从并没有和他一起赶过来。（于是）他就询问当地的农夫这里是何地，他们告诉他说此地为哈里发阿里埋葬之地，是一个圣洁之所，即使野生动物遇到危险，也可免祸。诃论传谕对此地进行挖掘，结果发现了阿里的尸体，据穆思套菲记载，此处建立起圣墓（Mashhad），很快成为人们朝拜的圣地。圣墓的早期历史含混不清，其历史多是什叶派所述，尽管诃论·剌失德在位时期曾一度支持什叶派，但在阿拉伯历史文献中显然未记载剌失德发现阿里墓地这一事件。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中叶的伊本·豪喀尔是最早关注麻沙得·阿里墓细节的著述者。他说哈马丹王朝（Hamdānid）[19]统治者阿卜·亥牙（Abul-l-Hayjā）[20]［伊斯兰历292年（904年）曾任毛夕里城的总督，去世于伊斯兰历317年（929年）］在麻沙得·阿里墓之上修建了有四根柱子的一座拱北[21]，圣墓里装饰着华丽的地毯和挂毯，他还在该圣墓附近的城市修建了一道城墙。但伊斯塔赫里和伊本·豪喀尔均称在他们那个时代阿里葬地从苦法城大清真寺之角可以看到，这点很多人已注意到了，其他文献也证实了这点，看来是可信的。穆思套菲进一步说在伊斯兰历366年（977年），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Adud-ad-Dawlah）建立了陵园，在他（穆思套菲）所在的时代还存在，此后这里（麻沙得·阿里）变成了周长为2500步的小镇。伊本·阿喜儿的编年史著作里记载，按照遗嘱，阿都得·道剌被安葬在这里（麻沙得·阿里），其子沙剌甫（Sharāf）和八哈·道剌（Bahā-ad-Dawlah）也葬于此地；此后，其他很多名人显贵纷纷效法。那些热衷于迫害什叶派信徒的报达人在伊斯兰历446年（1051年）将圣墓烧毁，并夷为平地。但后来很快重修了该墓，伊斯兰历479年（1086年），塞尔柱王朝的灭里·沙（Malik Shāh）和他的宰相尼扎木·木儿可（Nizām-al-Mulk）拜谒过此墓。

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穆思套菲的著作中记载，与他同时代的伊利汗国统治者合赞（Ghāzān）汗在麻沙得·阿里陵墓附近为圣裔（Sayyid）修建了一所房屋，称作答儿·思雅答（Dār-as-Siyādah），也称游方者（Darvish）的“修道堂”（Khānkāh）。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据亚库特记载，在纳杰甫城有座河堤拦截着从幼发拉底河流到该城的多条河流，但他未提及圣墓。伊斯兰历736年（1326年），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路过麻沙得·阿里城，并说该城是一座优美的城市，他是从“御前门”（Bāb-al-Hadrat）进入该城的，此门直通圣墓。他详细叙述了其大市场和学校，也记载了为阿里墓附设的清真寺和用喀思（Kāshānī）产的琉璃修建的围墙[22]。他称在圣墓中跛子常被治愈，他还详细记述了在圣墓中悬挂的用来照明的很多金银灯具和精美的地毯，说坟茔被一个用银钉铆起来的镌镂金牌做成的栏杆围着，通向圣墓的四门，每门有帘，还有银制的门框，墙壁上挂着绣花的丝绸。他又说这里显现过很多奇迹，虔诚的信徒对这些奇迹深信不疑。[23]

喀儿八剌（Karbalā或Mashhad Husayn）城[24]，在苦法城西北8里格处，曾是一古战场，这里是伊斯兰历61年（680年）忽辛（Husayn）及其全家被灭门之地，他是阿里之子，也是穆罕默德的外孙。忽辛殉难之地是今天什叶派的圣地，并胜过麻沙得·阿里。起初文献中并未提到有关建立忽辛圣墓的内容，但在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这里已修建了一些纪念性的建筑，伊斯兰历236年（850年），哈里发木塔瓦吉儿传谕用河水冲毁该地的忽辛圣墓，结果引起了什叶派长久的仇恨，同时他禁止人们朝拜该圣地，一旦朝拜就要严惩。穆思套菲在叙述萨麻剌城的宫殿时称，哈里发木塔瓦吉儿的不义行为遭到报应，因为这位可恶的哈里发毁掉了业已存在的忽辛墓，萨麻剌城过去的所有建筑也都被毁掉。该遗迹在被毁后的很长时间里，并未有文献提及，但到伊斯兰历368年（979年），阿都得·道剌在此修建了恢宏的圣墓，毫无疑问，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和伊本·豪喀尔偶然注意到圣墓的扩建比重修要稍早一些。

伊斯兰历407年（1016年），麻沙得·忽辛（Mashhad Husayn又译马什哈德·侯赛因）圣墓的穹顶烧毁了，但不久又被修复了，伊斯兰历479年（1086年），灭里·沙到这一地区围猎时，访问过麻沙得·忽辛圣墓。可惜的是，亚库特并未记载喀儿八剌城的圣墓，仅意外地提及亥儿（Al-Hāir）之名，意为“花园池”，其通常是指忽辛圣墓的围栏。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称在圣墓周边形成了小城，周长为2400步，和他同时代的伊本·白图泰则称他在这里访问过一座优美的学校

（Madrasah）。他说通向坟茔的华贵门槛是用银铸成的，凡朝拜者进门时均要亲吻此处；圣墓靠很多金、银灯照明，门上挂着丝幔。伊本·白图泰还说因居民间连年不断的教派冲突，小城差不多被毁了，但这里有大片椰枣林，靠从幼发拉底河引来的各条运河的河水灌溉。[25]

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库达玛记载，亦剌可地区当时分为十二个阿思坦（*Astān*），即区，每个区又包括很多答速吉（*Tassūj*），即次区，共有六十个次区。这种划分可能是为了方便收取财税，一个世纪后（10世纪）的穆喀达斯重述了上述划分的一部分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样提到了十二个区，同时也提到了为人熟知的次区（Tassuj）。依据灌溉河道和取水情况，上述十二个区可划分为三组。

第一组的四个区构成了底格里斯河东岸区，水源来自该河和塔麻剌（Tāmarrā）运河。这些区为：（1）设·费鲁兹（Shād Fīrūz）区（Astān），也称沙兹·费鲁兹（Shādh Fayrūz）区，或称忽儿宛（Hulwān）区，其包括塔麻剌次区、哈尼斤（Khānikīn）次区及其他三个次区，共五个次区；（2）报达城周边为设·忽里模子（Shād Hurmuz）区，其包括纳赫儿·卜可（Nahr Būk）、喀剌洼扎（Kalwādhā）、纳赫儿·宾（Nahr Bīn）、麦地那·阿替喀（Al-Madīnah-al-`Atīkah，别名马达因）、上下剌赞（Rādhān）等次区，以及其他两个次区，共七个次区；（3）沙兹·苦八兹（Shādh Kubādh）区，有贾鲁剌（Jalūlā）、班丹尼斤（Bandanījīn）、八剌子·卢兹（Baraz-ar-Rūz）、答思喀剌（Daskarah）和其他四个次区，一共有八个次区，其中后两个区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称法，库达玛则更换了区的名称，将沙兹·苦八兹区称为报达城区，用忽思罗·沙兹·忽里模子（Khusraw Shādh Hurmuz）来称呼附近有七个次区的贾鲁剌·答速吉（Jalūlā Tassūj）区；（4）底格里斯河东岸的最后一个区是八兹建·忽思罗（Bāzījān Khusraw）区，又名纳赫剌宛（Nahrwān）区，库达玛称作阿兰丁·吉儿忒（Arandīn Kirt）区，其包括五个次区，即上、中、下纳赫剌宛［包括八尼·朱乃得·亦思夫（Banī Junayd-i-Iskaf）与贾儿贾儿雅·亦思夫（Jarjarāyā-i-Iskaf）］，八答剌雅·答速吉（Bādarāyā Tassūj）及八苦萨牙（Bākusāyā）。

第二组有两个区，这些区的水源一部分来自底格里斯河，一部分取自幼发拉底河。这一组包括：（5）喀思喀儿（Kaskar）区，又名沙兹·

撒卜儿（Shādh Sābūr）区，其包含瓦夕的城周边的四个次区；（6）沙兹·八赫满（Shādh Bahman或Kūrah Dijlah）区，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其有四个次区，其中的两个次区为麦三（Maysān）与答思替·麦三（Dasti-Maysān），后一个次区在乌剌城周边。

其余的六个区均在底格里斯河的西岸，其靠前文提及的旧都加伊勒运河和从幼发拉底河向东流到底格里斯河的几条大运河灌溉。其中的第一个区为：（7）阿思坦·阿剌（Astān-al-A`lā），即上区，其沿着纳赫儿·爱薛运河有四个次区，即费鲁兹·撒卜儿（Fīrūz Sābūr）或安八儿（Al-Anbār）、麻思斤、喀塔剌不儿（Katrabbul）和巴都剌雅。接下来的区为：（8）阿儿达喜儿·八卜甘（Ardashīr Bābgān）区，其位于苦萨运河与尼罗运河岸边，包括八忽剌思儿（Bahurasīr）与马达因城对面苦萨地区的鲁麻坎（Rūmakān），以及纳赫儿·角八儿（Nahr Jawbar）运河与纳赫儿·都儿吉（Nahr Durkkīt）运河形成的次区等。东边的区为：（9）扎卜（Zab）运河沿岸的区，称作必合·兹兀麻速凡（Bih Dhīvmāsufān）区，包括上、中、下扎卜运河等次区。

最后三个区分别为上、中、下必合·苦八兹（Bih Kubādh）区，其中第一个区为：（10）上必合·苦八兹区，其包括六个次区，即八别儿（即巴比伦周边的废墟）、上下法鲁贾（Al-Fallūjah）和其他两个次区及幼发拉底河西岸不远的阿因·塔木儿·答速吉（`Ayn-at-Tamr Tassūj）。（11）中必合·苦八兹区，其包括四个次区，即八答（Badāt）运河次区、包括八儿必萨麻（Barbīsamā）在内的苏剌河次区、八鲁萨麻（Bārūsamā）运河次区与纳赫儿·灭力（Nahr-al-Malik）运河次区。最后一个区为：（12）下必合·苦八兹区，其有五个次区，这些次区显然是在幼发拉底河下游，该河在此流入大沼泽。从上述的区名来看，这种划分说明阿拉伯人明显继承了萨珊王朝的命名传统。阿儿达喜儿·八卜甘是萨珊王朝的建立者；设·费鲁兹（Shād Fīrūz，或Shādh Fayrūz），其波斯语含义为“命运的荣耀”；必合·苦八兹（Bih Kubādh）意为“苦八兹国王的福地或善良”，以及用忽里模子[26]、苦八兹[27]、沙普儿（撒卜儿）[28]和八赫满[29]等名的“荣耀”（Shādh）来纪念波斯最著名的四位国王。[30]

亦剌可地区的贸易主要表现为输入而不输出，首都地区消费了周边地区所产的产品。穆喀达思曾提到几座著名城市的商品和制造品，尽管这些并不能代表所记载城市生产的全部产品，但值得重视。

报达城的市场以从外埠运来各种奇珍异货而闻名。此地出产纺织绚丽的各种丝绸，特别是著名的阿塔必（`Attābī，或`Tabby）[31]丝绸——该丝绸是以其一个产地的名字命名的，以及优质的耐用布、窗帘与面纱、头巾面料、各种手帕和芦席等。弼斯啰城产各种生丝面料，其市场上的珠宝商闻名遐迩，出售各种别出心裁、款式独特的珠宝；弼斯啰城是各种矿石与矿物、锑、朱砂、藏红花（Mars-saffron）、黄丹[32]和其他前文提及产品的主要集散地。这里输出椰枣、散沫花（henna，俗称指甲花）颜料与生丝，以及蔷薇水[33]与紫罗兰香精。乌剌城则有纺织的优质亚麻布。苦法产的椰枣、紫罗兰香精、制作头巾的丝绸面料很有名；瓦夕的地区输出白羽扇豆和叫欣（*Shīm*）的鱼干；最后为奴满尼雅（Nu`mānīyah）城，此地生产大量的布匹，其生产的各种毛织品也很有名。[34]

正如在绪论章节中所述，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道路网络自然是以报达城为中心，从这里起程的有五条干道，其通向弼斯啰城、苦法城、安八儿城、塔可里忒城和忽儿宛城，最终连接着帝国的其他地区。

从报达城到弼斯啰城的最便捷之路自然是乘船顺底格里斯河而下的水道，伊本·鲁斯塔和亚库特非常详细地记载了这条经过该河左右两岸所有城镇的道路。船只顺着底格里斯河干道南下，到达喀塔儿城，而后经潟湖（Hawl，见原文第42页），再到达大沼泽。阿卜·勒·阿萨得（Abu-l-Asad）运河分流而出，到达底格里斯河河口，从这里通过纳赫儿·马吉儿（Nahr Ma`kil）运河可到达弼斯啰城。乌剌运河回流到河口，顺着这些水道而下可到达阿八丹城和波斯湾。伊本·鲁斯塔记载了这条从报达城沿底格里斯河东岸经马达因城南下到瓦夕的城的陆路，此道途经的城市在地图上已标出，各城彼此的距离以法儿撒赫（Farsakh，即里格长度）为单位；库达玛也详细记述了这条道路，虽然个别之处有脱漏，但完全可以根据阿布·勒·费达的记载进行补正。库达玛称从瓦夕的城到弼斯啰城的陆路沿大沼泽的北边行进，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旅行时，也选择了这条道路。伊本·鲁斯塔和库达玛均记载了从瓦夕的城向东到忽兹思田地区首府阿合瓦兹城的道路；这条道路在距瓦夕的城东边一站的八祖宾（Bādhbīn）城[35]驿站，分出一条支道，向东北到达乞卜（Tīb）城，从该城可到达忽兹思田地区的速萨（Sūs，即Susa）城。[36]

从报达城到苦法城南行的朝觐道始于团城的苦法城门，其经哈儿合

（Kharkh）区到萨儿萨儿城，继而再到喀思儿·伊本·忽拜剌（Kasr Ibn Hubayrah）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该道经过此地后，越过幼发拉底河的东支（现在的干流），当时叫纳赫儿·速剌河，其上面有苏剌（Sūrā）浮桥，然后南下到苦法城。苦法城的对面就是幼发拉底河的西支，其上也有浮桥，可到达该城的东部城区。在苦法城，朝觐道向西南可到喀底思牙城，从那里进入阿拉伯沙漠。早期地理学家记载了这条道路，伊本·鲁斯塔的记载尤为详细，他还记载了从报达城到苦法城部分路段的里数与行程。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在报达城和苦法城中途的喀思儿·伊本·忽拜剌城已毁，喜剌城（见原文第71页）取而代之，结果该道从萨儿萨儿城经法剌沙（Farashah）南下至喜剌城。在喜剌城，幼发拉底河的东支像前文提及的苏剌河一样有一座跨河大浮桥。伊本·朱拜儿和以后的所有旅行家所走的就是这条路线。从苦法城沿大沼泽南界而行到弼斯啰城为80或85里格，伊本·鲁斯塔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了这条道路[37]，并说在喀底思牙城南部沙漠的第二站向左分出了支道。

如前文所述，两条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希贾兹地区的朝觐道均穿越了阿拉伯沙漠，一条始于苦法城，另一条始于弼斯啰城。这两条道路在札忒·亦儿（Dhāt `Irk）驿站会合，此地距麦加东北有两天的路程。文献对这两条著名朝觐道上的各驿站逐一做了记载，对中途驼队休息食宿（Al-Muta`shshā）的小站也做了记载，同时各驿站之间的距离在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的道里志和穆喀达思的著作里也有详细的记载。始自苦法城的道路经过法亦（Fayd）城[38]，该城位于哈雅儿（Hāyil）城[39]稍南的地方，哈雅儿城就是今天贾巴尔·沙马尔（Jabal Shammār）地区的首府。始自弼斯啰城的道路经过答力雅（Darīyah）城[40]，此城曾是瓦哈比（Wahhabi）王国[41]的旧都，该城遗址尚存于利雅德（Ar-Riyād）城之西数英里处，利雅德城[42]是今纳吉德（Najd）地区的首府。始自苦法城与弼斯啰城的朝觐道分别分出了支道，向右可直达麦地那。[43]

第二条始于报达团城苦法门向西的道路，其先到达木哈洼儿城，再沿爱薛运河到达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安八儿城，而后沿该河北上经亦剌可地区的最后一座城市哈第撒（Hadīthah）城，到达贾兹剌（Jazīrah）地区的阿纳城。这是从报达城去往叙利亚道路的第一段（即经幼发拉底河），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库达玛记载了此道；另一条通往叙利亚的道路则沿底格里斯河北上经毛夕里城，远至亦剌可地区边界的塔可里忒

城。这是一条邮政道，其始于东报达城的八剌丹（Baradān）门，沿底格里斯河左岸北上经兀乞八剌（`Ukbarā）城和萨麻剌城，到达塔可里忒城。该道在这里和始于西报达城哈儿比雅（Harbīyah）区的商道会合，这条商道从报达城北上到都加伊勒运河沿岸的哈儿八（Harbā）城，此后经萨麻剌城对面的宫殿所在地，顺着亦思哈（Ishākī）运河到达塔可里忒城。这是伊本·朱拜儿和伊本·白图泰所经过的道路。[44]

最后为起自东报达城呼罗珊门的呼罗珊道，如前文所述，其经过波斯，再到“河外”，最后到达中国边界。伊本·鲁斯塔对这条道路的各站逐一做了详尽的叙述；其他几乎所有的地理学家也记载了这条大道所经各地的道路里程，因此这条道路是所有干道中人们最熟知的道路之一。[45]

[1]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今巴比伦省马哈维勒（Mahawīl）城附近。译者。

[2]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0、16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09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5、8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6、16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322页；第3卷，第861页；第4卷，第123页。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i`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第214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9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8页。

[3] 此城今为尼勒，位于希拉城西北不远处，现有很多道路从这里经过。译者。

[4]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今伊拉克的达格拉赫（Dagharah），约在希拉城西南、纳杰夫正东，曾是底格里斯河下游的重镇。译者。

[5] 萨珊王朝国王，在位时间为292～302年。译者。

[6]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今伊拉克希拉城西的底格里斯河东岸、卡尔巴拉城东南，曾是底格里斯河下游的重镇。译者。

[7]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今伊拉克希拉城西，曾是底格里斯河下游的重镇。译者。

[8]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今伊拉克希拉城西的底格里斯河岸边。译者。

[9]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6页。巴拉祖里，第254、290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1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5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70页；第2卷，第31、903页；第3卷，第4、379页；第4卷，第773、798、840、86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

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6页。《本杰敏·土得剌（制碱者）游记》（*The Travels of Benjamin of Tudela*）第1卷，第112页。德·古耶（De Goeje）的*Zeit. Deutsch. Morg. Gesell*（第10页，1885年）。

[10] 此城今不存，应位于伊拉克基夫勒（Al-Kiful）附近，在纳杰夫正北约40公里处，是座小城。译者。

[11] 阿拉伯历史上四大哈里发（Rashidun Caliphate）中的第四任哈里发，656～661年在位。译者。

[12]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74页载："该城并无城郭。建筑物都用砖修建，市场美好，多数商品是椰枣和鲜鱼。"译者。

[13] *tannūr*，阿拉伯、波斯、维吾尔等语中有时指用来烤馕（烤饼）的馕坑，形状类似倒扣的缸，下大上小，上端有圆形小口，供添加柴薪和烤馕之用；下端有小口，供通风和清除灰烬等。馕坑加热后，内壁可烤馕。译者。

[14] 缚伽浪·古儿（Bahrām Gūr，含义为"野驴"）是萨珊王朝君主，在位时间为430～438年。译者。

[15]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41页称："喀底西亚（喀底思牙）原是一大城池，由赛尔德占领，城不久颓败，现存者不过一大村镇而已。"译者。

[16]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0、16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33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第52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2、16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16、11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492页；第3卷，第59页；第4卷，第32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

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9、140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6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1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9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34页；第2卷，第107、393、573、575、813页；第4卷，第112页。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ī`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第213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1卷，第414页；第2卷，第1、9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3、138、140页。辽阔的浅湖被称作纳杰甫湖（Bahr Najaf），现在向西可到苦法城废墟和纳杰甫（Najaf）城圣墓所在地。这个湖在中世纪是不存在的，而当时苦法城到麦加的朝觐之路经过现在湖床的位置。

[17] 今为纳杰夫，为伊拉克中部城市，是纳杰夫省省会，人口有56万，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11公里处，距巴格达以南160公里，是伊拉克境内伊斯兰教什叶派著名的圣地之一。译者。

[18] 麻沙得（Mashhad）一词意为“殉教之地”，因此，其等同于圣墓。“地

方”（Al-Maām）与该词含义相同。

[19] 哈马丹王朝（890～1004年），是建立于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的王朝。译者。

[20] 即阿卜达喇（Abdallah），904～929年在位。译者。

[21] 穆斯林修建的一种穹形建筑，其内一般埋葬有名人显贵。译者。

[22]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41页载，从喀底西亚来到阿里·伊本·阿布塔里布祠堂（即麻沙得·阿里）所在地纳贾夫（又译纳杰甫），并说：这是一座位于宽阔硬地上的美丽城市，是伊拉克最美、人口最多、建筑最坚固的城市之一，街市干净。伊本·白图泰还提到了胡祖赖城门、菜市、饭馆、烤饼房、水果市场、裁缝市场、香料市场、阿里墓、学校、道堂及其装饰。译者。

[23]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0页。伊本·阿喜儿，第9卷，第13、42、169、394页；第10卷，第10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760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1卷，第414～416页。

[24] 今为卡尔巴拉，伊拉克古城，卡尔巴拉省省会，人口56万，位于巴格达西南100公里处。该城分新旧两部分，旧城有城墙，新城在其南面。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地之一，旧城内有两座陵墓，一座是侯赛因墓，即侯赛因清真寺，有镀金穹顶和高耸入云的三座尖塔。译者。

[2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

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8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4、139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99页。伊本·阿喜儿，第7卷，第36页；第8卷，第518页；第9卷，第209页；第10卷，第103页。

[26] 萨珊王朝第三代君主，270～271年在位，史称忽里模子一世。译者。

[27] 萨珊王朝第二十三代君主，488～496年、498～531年在位，史称苦八兹一世。译者。

[28] 萨珊王朝第二代君主，240～272年在位，史称沙普儿一世。译者。

[29] 萨珊王朝第四代君主，271～274年在位，史称八赫满一世。译者。

[30]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8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35、23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3页。

[31] 似是《册府元龟》卷九九九所记“柘必”。译者。

[32] 即四氧化三铅，又称铅丹、丹粉、朱粉、铅华等，气味辛、咸，微寒，有毒，外用治疮疡。译者。

[33] 《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九载："言出自西域，凡鲜华之衣，以此水洒之，则不黦而馥。郁烈之香，连岁不歇。"《铁围山丛话》卷五称，大食国蔷薇水"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诸蕃志》卷下载："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译者。

[34]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8页。

[35] 今不存，大致在瓦夕的古城正东，今库特城西南方向。译者。

[36]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4、186～188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20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3、225、226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5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305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8页。

[37]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4、175、180、182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08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25、145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85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

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303页。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i`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第214～21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3页。穆喀达思（第252页）估计从弼斯啰城沿沙漠边缘到苦法城有10天的路程（Marhalah），那么两者的最短距离超过250英里。这条道路在历史上因一个叫比剌·本·阿必·卜儿达（Bilāl ibn Abi Burdah）的人骑着速度快的单峰驼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走完而闻名，当时，他到苦法城附近的哈里·喀思里（Khālid-Al-Kasrī）去办一件十万火急的事。这件事发生在伊斯兰历120年（738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喜申（Hishām）在位时期。Tabar，第2卷，第1627页。［从伦敦到约克郡为200多英里，切记迪克·图尔平（Dick Turpin）骑马用18小时走完，两者速度相仿。］

[38] 今此城不存，在哈伊勒城之南，是朝觐的必经之地，也是古丝绸之路、香料之路的重要通道。译者。

[39] 今为哈伊勒，是沙特阿拉伯哈伊勒省的首府，2004年人口为26. 7万，居民多从事农业，主要出产谷物、海枣、水果、小麦等。译者。

[40] 今利雅得城西的迪里耶，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卫星城。译者。

[41] 即今沙特阿拉伯王国。译者。

[42] 今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首都。译者。

[43] 从苦法城到麦加和麦地那的道路在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25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5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e*），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1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07、251页做了记载。弼斯啰城道路

在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46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0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0、182页做了记载。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地理学家一直将纳吉德（Najd）地区的旧首府写为答力雅（Darīyah，首字母带Dād）。哈吉·哈里发（Hājjī Khalfah）第一次将其拼写为现代的发音形式（*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527页），即答儿亦雅（Dar`īyah首字母带Dāl和`Ayn），但他在其道里志（*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527、543页）中偶尔也拼写为答力雅（Darīyah）或喜森·答力雅（Hisn Darīyah）。关于希贾兹（Hijāz）地区和大沙漠（Dahnā）北边的一般地理状况，F. Wüstenfeld教授在《哥廷根皇家科学院协会学刊》（*Abhandlungen der Ko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 zu Gottingen*）发表了系列论文，对这一地区的地理进行了详细的叙述。科普尔特（Kiepert）为这些论文绘制了地图，并做了索引。英国的地理学家显然对此并不了解，关于研究此地地理学的全部著述，罗列如下：《麦地那街区的布局》（*Die von Medina Auslaufenden Hauptstrassen*，Vol. XI，1862），《阿拉伯部落的定居与游弋》（*Die Wohnsitze und Wanderungen der Arabischen Stamme*，Vol. XIV，1869），《从弼斯啰城经扎里贾地区到麦加的道路》（*Die Strasse von Basra nach Mekka mit der Landschaft Dharija*，Vol. IX，1874），《麦地那的区域》（*Das Gebiet von Medina*，Vol. XVIII，1873）。以下著述研究了从苦法城到麦加的朝觐道路：《巴林与叶麻麻》（*Bahrein und Jemama*，Vol. XVI，1871），然后是《麦地那城市史》（*Geschichte der Stadt Medina*，Vol. IX，1860，分次出版），以及《麦加城市史》（*Chroniken der Stadt Mekka*，Vol. IV，Leipzig，1861），该书对麦加的历史做了概述，还附有地形注释。

[44]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72、93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4、216、21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4页。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ī`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第232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13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5页。

[45]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63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69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8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3页。

第六章 贾兹剌（Jazīrah）地区

三个地区。低雅儿·剌必阿（Diyār Rabī`ah）地区。毛夕里（Mosul）城、尼尼微（Nineveh）古城和附近城市。大扎卜（Zāb）河、哈第撒（Hadīthah）城和亦儿别儿（Irbil）城。小扎卜（Zāb）河、欣（Sinn）城和答苦（Dakūk）城。小哈卜儿（Khābūr）河、哈散尼牙（Hasanīyah）城和亦麻底牙（`Imādīyah）城。贾兹剌·伊本·奥马儿（Jazīrah Ibn `Omar）城和朱迭（Jūdī）山。纳思宾（Nasībīn）城和剌思·阿印（Rās-al-`Ayn）城。麻儿丁（Mārdīn）城和都乃思儿（Dunaysir）城。喜儿麻思（Hirmās）河与哈卜儿（Khābūr）河。阿剌班（`Arabān）城和萨儿萨儿（Tharthār）河。欣贾儿（Sinjār）城和哈底儿（Hadr）城。八剌（Balad）城和阿札剌麻（Adhramah）城。

如前文所述，阿拉伯人将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称为贾兹剌（Al-Jazīrah），意为“岛屿”或“半岛”，因其平原被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上游河道包围起来。这一地区通常被分为三部分：低雅儿·剌必阿（Diyār Rabī`ah）地区、低雅儿·木札儿（Diyār Mudar）地区和低雅儿·八吉儿（Diyār Bakr）地区。这三个名称分别取自阿拉伯部落剌必阿（Rabī`ah）、木答儿（Mudar）和八吉儿（Bakr），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萨珊王朝时期，这些部落就居住在这一地区，于是就以各部落之名称呼其居住的“地方”（*Dār*，复数为*Diyār*，译为迪亚尔）。底格里斯河岸边的毛夕里城是低雅儿·剌必阿地区的首府；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剌噶（Rakkah）城是低雅儿·木札儿地区的首府；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阿迷得（Āmid）城则是低雅儿·八吉儿地区的首府，该地区是三个地区中最北的一个。但穆喀达思将贾兹剌地区称为亦可林·阿苦儿（Iklīm Akūr），即“阿苦儿（Akūr）地区”；阿苦儿之名的来源并不清楚，但该名曾有一段时间专指北美索不达米亚大平原。

查阅地图就可发现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无一例外地从左（东）岸接纳了发源于东北或北边的各条支流。但在中世纪，出现了一个例外，即（大）哈卜儿（Khābūr）河[1]的支流喜儿麻思（Hirmās）河，其发源于纳思宾（Nasībīn）地区。喜儿麻思河在与哈卜儿河汇合处稍北的速凯儿·阿八思（Sukayr-al-`Abbās）被拦截，剩余

的小部分河水汇入哈卜儿河，此后哈卜儿河在喀儿吉思雅（Karkīsīyā）城[2]附近汇入幼发拉底河，喜儿麻思河的大部分河水通过纳赫儿·萨儿萨儿（Nahr-ath-Tharthār）运河[3]在底格里斯河右岸的塔可里忒城流入底格里斯河。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这三个地区的界线是按河流流域划定的。靠底格里斯河灌溉的低雅儿·八吉儿地区包括从底格里斯河源头到形成的大拐弯南的塔儿·法凡（Tall Fāfān，意为“法凡山”）城[4]以下，以及向北越过底格里斯河后众多支流流经的地区，这些支流在塔儿·法凡城西从左岸流入底格里斯河。西南的低雅儿·木札儿地区包括从速麦撒（Sumaysāt）城[5]起的所有幼发拉底河沿岸区域，其涵盖从该城南下经高山峡谷到阿纳（`Ānah）城的地区，以及源自哈兰（Harrān）的巴里黑（Balikh）河[6]支流灌溉的平原地区。最后为低雅儿·剌必阿地区，其在木札儿地区的东面，包括发源于剌思·阿印（Rās-al-`Ayn）地区的（大）哈卜儿河和喜儿麻思河流域，如前文所述，喜儿麻思河向东通过萨儿萨儿运河流入底格里斯河；也包括从塔儿·法凡城南到塔可里忒城的底格里斯河沿岸各地，即这些区域包括西到纳思宾地区和东到上、下扎卜（Zāb）河[7]及小哈卜儿河灌溉的平原地区。

毛夕里［曾称莫斯儿（Al-Mawsil），又译摩苏尔］城是低雅儿·剌必阿地区的首府，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由很多潟湖连接的底格里斯河形成一条主河道，因此称作莫斯儿（Al-Mawsil），意为“汇合”，据说该城由此而得名。萨珊王朝时期，此城所在地被称作卜扎·阿儿达喜儿（Būdh Ardashīr）。倭马亚王朝时期，毛夕里城的重要性开始凸现，此地的底格里斯河上横跨着一座浮桥，连接着西边的城市和东岸的尼尼微（Nineveh）遗址。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麦儿旺（Marwān）二世在位时期，毛夕里城是贾兹剌地区的首府，麦儿旺二世还修建了后来称作“老寺”的清真寺[8]。

伊斯兰历358年（969年），伊本·豪喀尔就居住在毛夕里城，他说该城是一座优美的城市，有很好的市场，周边土地肥沃，最著名的胜地就是其附近的尼纳威［Nīnaway，即尼尼微（Nineveh）古城］[9]，这里埋葬着先知尤奴思［Yūnis，即约拿（Jonah）］。伊斯兰历4世纪（10 世纪），这里的居民主要为曲儿忒（Kurd，又译库尔德）人。毛夕里城周边有很多地区，包括整个低雅儿·剌必阿地区，伊本·豪喀尔详尽地记述了这里的各个地区。穆喀达思称赞毛夕里城有许多舒适的旅馆，并说该城修建得极其优美，城市布局呈半圆形，规模是弼斯啰城的三分之一。其城堡称作“广场”（Al-Murabba`ah），位于一条叫纳赫儿·祖拜

答（Nahr Zubaydah）的支流的岸边，城堡内举办星期三集市（Sūk-al-Arba`ā），由此该堡有时也以速可·阿儿八（Sūk-al-Arba`ā）闻名。聚礼清真寺（麦儿旺二世修建的）修建于一座有阶梯的高台上，其距底格里斯河有一箭之地。这座建筑的顶部用石料建成拱形，从清真寺的大殿进入寺院内部的通道上没有修建门楼。毛夕里城街道上的多数市场有顶棚，穆喀达思提到了其中的八条主要大街，居民区沿着底格里斯河，分布距离很长。穆喀达思还说毛夕里城先前的名称叫豪兰（Khawlān），并说"哈里发宫"（Kasr-al-Khalīfah）位于底格里斯河的对岸，距离该城有半里格，从那里可以俯瞰尼尼微古城。这座宫殿过去有厚实的围墙，但后来被风摧毁。在穆喀达思所处的时期，宫殿故址已成田野，经过此地的河流叫纳赫儿·豪萨（Nahr-al-Khawsar）河。

伊斯兰历580年（1184年），伊本·朱拜儿访问并记述了毛夕里城。在萨拉丁到奴儿丁（Nūr-ad-Dīn）麾下任职之前不久，奴儿丁在该城市场里修建了一座聚礼清真寺，但旧的麦儿旺二世聚礼清真寺仍矗立在河岸，其内优美的花纹装饰着宣经台，并安装有铁铸的窗棂。上毛夕里城有大的城堡，其城墙沿底格里斯河向南伸展，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塔楼，城内宽阔的街道连接着上、下毛夕里城。越过城墙就是宽阔的外城区，这里有很多小清真寺、旅馆和澡堂。这里的医院（Māristān）很著名，凯撒利雅（Kaysariyah）[10]大市场的建筑也很有名，此地还有很多学校。可疾云尼记述了很多基督教修道院（Dayr），其修建在毛夕里城的外城区，他还特别注意到了毛夕里城堡很深的沟壕和高大的城墙。他说该城周边全是用水车浇灌的果园。

从穆喀达思时期开始，尼尼微山丘就被称作"忏悔之山"（Tall-at-Tawbah），这里是先知尤奴思，即约拿规劝尼尼微人皈依之地。穆喀达思说此处修建有一座清真寺，其周边是朝圣者的住所，这些住所是哈马丹（Hamdān）王朝统治者纳斯儿·道剌（Nāsir-ad-Dawlah）修建的，距此地半里格有一个叫阿印·尤奴思（`Ayn Yūnis）的著名疗养泉，该泉以先知约拿（Jonah，即尤奴思）之名命名，其附近还有一座清真寺，这里可以看到先知约拿亲自种植的沙迦剌·牙斤（Shajarah-al-Yaktīn）树，即"葫芦树"。亚库特说毛夕里城的大部分民居是用石灰石或大理石建房的，屋顶呈拱形，还说在城内可以看到先知阔里吉思（Jurjīs），即圣乔治（St George）的坟墓。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曾路过毛夕里城，并记载该城有"像德里城一样"的双层城墙及很多城墙塔楼，保卫着城市。其城堡称作"驼峰"（Al-Hadbā），新聚礼（奴儿

丁）清真寺内有一个带喷头的八边形大理石水盆，居中的喷头喷出一股水，高一英寻（约1.829米）。第三座聚礼清真寺是后来修建的，从这里可以俯瞰底格里斯河，这座清真寺可能就是穆思套菲盛赞过的清真寺，他说清真寺的宣经台用石雕装饰得非常精美，可与木雕相媲美。在他那个时期，毛夕里城的周长为1000步，他提到先知约拿圣墓（Mashhad Yūnis）位于底格里斯河对岸的尼尼微遗址中。[11]

毛夕里城以东几英里的地方有两座小城：八儿塔剌（Bartallā）城[12]和喀儿麻利思（Karmālīs）城[13]。亚库特和穆思套菲均提到了这两座城，八什喀（Bā`ashīkā）城[14]位于上述两城稍北的地方，这三城均附属于毛夕里城。穆喀达思称八什喀城以产一种能治疗瘰疬（淋巴结核）和痔疮的植物而闻名。亚库特说这是一座小城，有一条沿岸建有很多磨坊的河流，其灌溉着此地的果园，园中盛产橄榄、椰枣和柑橘等。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或凯撒利雅（Kaysarīyah），以及很好的浴室。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这里的居民虽然大部分是基督徒，但此地的聚礼清真寺已拥有漂亮的宣礼塔。八儿塔剌城位于八什喀城南几英里处，但被划入尼尼微（Nineveh）区。亚库特说这里是一个大商业区，居民绝大多数是基督徒，但也居住着很多穆斯林，还有一座优美的清真寺。八儿塔剌产的莴苣和其他蔬菜以品质优良而闻名，穆思套菲盛赞了这里产的棉花。喀儿麻利思位于八儿塔剌城稍南，据亚库特记载，尽管这是一个大村庄，但其规模差不多和一座城镇一样，也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常有商人光顾。马尔·居亥纳（Mār Juhaynah或Marj Juhaynah，即居亥纳草原）城邻近上述诸城，但在底格里斯河岸边，该城是从毛夕里城南下报达城的第一站。穆喀达思称这里有很多信鸽塔。其城堡是用胶泥和石头建成的，非常坚固，城中央有一座清真寺。

在毛夕里城和塔可里忒城之间的地方，底格里斯河从东岸接纳了两条扎卜（Zāb）河，这两条河南北相距100多英里；伊本·豪喀尔盛赞两河之间异常肥沃广袤的土地。上或大扎卜河发源于阿剌蛮（Aramenia）地区和阿札拜占地区之间的山区，并在哈第撒城附近流入底格里斯河。下或小扎卜河[15]因河流湍急，又称“疯（Majnūn）河”，其发源于沙合剌祖儿（Shahrazūr）地区，在欣（Sinn）城[16]附近汇入底格里斯河。据亚库特记载，大扎卜河河水最初为红色，后又变清，其流经的地区称作木什塔喀哈儿（Mushtakahar）地区和八卜吉什（Bābghīsh）地区。哈第撒城（新城，又称毛夕里的哈第撒城，以别于原文第64页提到的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哈第撒），位于大扎卜河与底格里斯河交汇处北1里

格，是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麦儿旺二世[17]修建的，从此城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沼泽平原；城周边有著名的狩猎场，还有很多果园。该城呈半圆形，有阶梯从底格里斯河通到城中，从石头建成的聚礼清真寺可俯瞰底格里斯河。萨珊王朝统治时期，此城称作瑙吉儿（Nawkird）城，波斯语意为“新城”，毛夕里城兴起前，此城是该地区的首府[18]。

据马苏迪记载，欣（As-Sinn，意为“牙齿”）城在小扎卜河与底格里斯河汇合处南1英里，但穆喀达思称小扎卜河从该城北部流向东边。中世纪时期，此城的居民主要是基督徒，亚库特说这里有很多教堂。该城被称作八利麻·欣（Bārimmā-i-Sinn）城，以别于其他同名的城市，该城附近的八利麻（Bārimmā）山被底格里斯河穿过。欣城的市场内有一座聚礼清真寺，是用石头建成的，城周边有一道城墙。从该城向东，北上4里格就是八洼兹吉［Bawāzīj，伊本·豪喀尔称其为麦地那·八洼兹吉（Madīnat-al-Bawāzīj）］城[19]，位于小扎卜河岸边，但这座城在今天的地图上已无法查到。欣城和哈第撒城的情形也是如此，原因可能是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起，大、小扎卜河[20]河道发生了显著变化。亚库特曾称这座城为八洼兹吉·灭力（Bawāzīj-al-Malik，即八洼兹吉国王城），至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此城仍然存在，当时的穆思套菲称该城向伊利汗国国库上交14000第纳的税收。

欣城南是去往萨麻剌城和报达城的邮道，其沿底格里斯河[21]左岸而行，首先经过八利麻（Bārimmā）村，这是八利麻（又名Jabal Humrīn）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再到达速答喀尼牙（As-Sūdakaniyah）城，最后到贾必儿塔（Jabiltā）或贾卜儿塔（Jabultā）城[22]，至伊斯兰历304年（916年）时，这是一座位于塔可里忒城稍北、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造币城。这些小城现在在地图上已无法查到，但在道里志中其位置记载得非常准确。

欣城正东100多英里处就是答苦喀（Dakūka）或答苦（Dakūk）城[23]，阿里·亚兹底的记载和今天一样，其通常写成陶克（Tāūk，或Tawūk），亚库特和后来的地理学家常提及这座城市。穆思套菲提到了答苦（Dakūk）河（这是他拼写的名称），其发源于“打耳班·哈里发（Darban-i-Khalīfah，即哈里发关）”附近的曲儿忒思田山区，流经答苦城南后，进入沙漠荒原，穆思套菲称这里的流沙最为危险，那些企图越过沙漠的人很容易被其吞噬。他说在洪水期答苦河汇入底格里斯河，其下游现称作“大河（Nahr-al-A`zam）”，但在早期，即纳赫剌宛运河完全

畅通之时，每到春季洪水期，答苦河肯定汇入纳赫剌宛运河。穆思套菲称答苦城是一座中型城市，气候要比报达城宜人，附近有石脑（石油）泉。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并未提及此城。[24]

亦儿别儿（Irbil，又译埃尔比勒）城，即古代的阿儿伯剌（Arbela），位于大、小扎卜河之间的平原上，亚库特说这座城是商人经常光顾之地。修建在山顶上的城堡有着一条很深的沟壕，城堡的一部分被围在城墙内。该城修建有一个大市场，还有一座叫“手掌”的清真寺（Masjid-al-Kaff），因寺内的一块石头上留有手掌印记而闻名。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市场的建筑物重新做了修葺，其外城区已越过城墙。穆思套菲盛赞该地所产的优质农作物，尤其是棉花。毛夕里城以北的亦麻底牙（`Imādīyah）城[25]靠近上扎卜河源头，据穆思套菲记载，其城名源于修建者低廉（Daylam）王朝统治者伊麻·道剌（`Imād-ad-Dawlah），他卒于伊斯兰历338年（949年）。但其他文献称亦麻底牙城之名取自伊斯兰历537年（1142年），以修建者或修复者伊麻丁·赞吉（`Imād-ad-Dīn Zangi）的名字命名，他是上美索不达米亚著名统治者奴儿丁（Nūr-ad-Dīn）之父，萨拉丁就是在奴儿丁麾下开始了自己的传奇人生。据亚库特记载，这里有一座叫阿什卜（Āshib）的古城堡，由曲儿忒人占据。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期，穆思套菲称亦麻底牙城是一座相当大的城市。

哈卜儿·哈散尼牙（Khābūr-Al-Hasanīyah）河[26]发源于邻近的山区，在毛夕里城以北150英里的费撒卜儿（Faysābūr）城[27]正北流入底格里斯河。亚库特说这条河（不要与剌思·阿印地区的Khābūr河混淆）发源于枣赞（Az-Zawzān）地区，该河在哈散尼牙（Al-Hasanīyah）城[28]被一座恢宏的石桥横跨，该遗迹现存于哈散·阿嘎（Hasan Aghā）村，是古城的见证。哈散尼牙城有一座聚礼清真寺，穆喀达思说该城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在城南去往毛夕里城的道路上有一站是麻剌思牙（Ma`alathāyā）小城[29]，这里的山顶上建有一座聚礼清真寺，该地完全被果园环绕。[30]

费撒卜儿城北为重镇贾兹剌（Jazīrah，有岛屿之意）[31]，为便于区别，叫贾兹剌·伊本·奥马儿（Jazīrah Ibn`Omar）城，以修建者哈散·伊本·奥马儿（Al-Hasan Ibn`Omar）之名命名，他是塔利卜（Taghlīb）部人。亚库特说底格里斯河以半圆形绕城而过，此城陆地部分的沟壕灌满了河水，由此形成一座岛。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称

贾兹剌城有城墙，这里出售阿剌蛮运来的产品，如有名的奶酪、蜂蜜等。穆喀达思还说贾兹剌城的房屋是用石头建成的，这里在冬季通常很泥泞。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到达这里，发现该城的大部分已毁，但古清真寺仍矗立于市场内，石砌的城墙依然留存[32]。穆思套菲说该城附属有100多个村庄。在贾兹剌·伊本·奥马儿城对面、底格里斯河西岸就是八吉儿答（Bākirdā）地区的八札卜答（Bāzabdā）城[33]，这里应该是古罗马著名要塞博扎卜达（Bezabda），但文献对此地没有记载。

从贾兹剌·伊本·奥马儿城可以远眺东边的贾八儿·朱迭（Jabal Jūdī）山和其山峰上的奴赫（Naoh）清真寺及山脚下的“80村”（Karīyat-th-Thamānīn）。《古兰经》（Kurān，11：44）中记载：“船（即方舟）停泊在朱迭（Al-Jūdī）山上。”[34]穆斯林称这座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山就是奴赫停靠方舟的山，据说奴赫的80位弟子修建了“80”（Thamānīn）村，该村也由此而得名。穆喀达思称“80”（Thamānīn）城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位于哈散尼牙城北一程之地。穆思套菲称其为“80个市场（Sūk-Thamānīn”城，并说在他那个时期此城已毁。在贾兹剌·伊本·奥马儿城附近，各条支流从底格里斯河的左岸汇入。亚库特记述了其主要支流牙儿纳（Yarnā或Yarnī）河与拜纳塔（Bā`aynāhtā，伊本·塞剌皮昂称作Bāsānfā）河，以及与拜纳塔河同名的一个大村。位于该城南，但在哈卜儿·哈散尼牙河以北的就是发源于枣赞地区的卜牙儿（Al-Būyār）河与都沙（Dūshā）河。[35]

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与贾兹剌·伊本·奥马儿城同一纬度的就是多山的土儿·阿比丁（Tūr `Abdīn，即真主奴仆的）地区，此地居民信仰雅各派（Jacobites），这里是喜儿麻思河与纳思宾地区的哈卜儿河的发源地。

纳思宾（Nasībīn）城[36]位于喜儿麻思河上游，罗马人称作尼思必思（Nisibis），希腊地理学家称作扫考剌思（Saocoras），或迈格多纽斯（Mygdonius），亚库特说这里以种植白玫瑰和有40000座果园而名闻天下。此城是上美索不达米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伊斯兰历358年（969年），伊本·豪喀尔来到此城，他说纳思宾城是贾兹剌地区最优美的城市，其附近产最好的大麦和小麦。这里有座山叫贾八儿·八鲁萨（Jabal Bālūsā）山，其北部有河流发源。此城是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但这里的蝎子让人心惊肉跳。纳思宾城的规模比毛夕里城还要大，穆喀

达思盛赞该城舒适的浴室和温馨的私宅。该城市场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一字排开，且在其中央有一座聚礼清真寺，泥抹石砌的坚固城防守护着此城。伊斯兰历580年（1184年），伊本·朱拜儿访问了纳思宾城，并盛赞这里的果园；该城聚礼清真寺内有两个大水池，流经此城的喜儿麻思河上横跨着一座桥，这里还有一家医院（Maristān）和好几所学校，以及其他著名建筑。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来到纳思宾城，并说此城大部分已毁，但有两座大水池的聚礼清真寺尚在，此城周边的花园产很著名的蔷薇水[37]。穆思套菲称纳思宾城的城墙周长为6500步，他盛赞生长于此地的葡萄和其他水果及当地所产的酒，但他说由于气候潮湿，纳思宾城不适宜人居住，他也谈到该城上品的玫瑰和令人生厌的蝎子，而这些蝎子和蚊子一样可怕。[38]

剌思·阿印（Rās-al-`Ayn，即泉眼）城[39]位于哈卜儿（罗马文献称Resaina，在Chaboras河上）河的源头附近，该城以众多的泉水而闻名，据说该地共有泉水360处，这些泉水让其周边地区变成了一座大花园。据说其中的阿印·札黑利牙（`Ayn-Az-Zāhirīyah）泉，深不可测，流出的泉水汇入哈卜儿河，文献记载通过这条河，游船可以从一座花园航行到另一座花园，并可乘游船从剌思·阿印城向南到达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喀儿吉思雅城。伊本·豪喀尔称剌思·阿印城是有城墙的城市，还有花园，城周边有很多磨坊，农田距居民点超过20里格。据穆喀达思记载，在主泉处有一座小湖，深2英寻，但湖水很清澈，其底部的一块银片都能看得很清楚。剌思·阿印城的建筑是用很好的胶泥与石头砌成的。伊斯兰历580年（1184年），伊本·朱拜儿经过该城，并称城里有两座聚礼清真寺和很优雅的学校及舒适的浴室，均建于哈卜儿河两岸。在他那个时期，此城无城墙，但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城墙可能得以重修了，生活于当时的穆思套菲说该城城墙周长为5000步。他还说这里盛产棉花、谷物和葡萄等。

剌思·阿印城和纳思宾城的中途稍北是麻儿丁（Mārdīn）城[40]的大石堡，其上可俯瞰平原南的都乃思儿（Dunaysīr）城[41]，其位于麻儿丁城南3里格。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麻儿丁城的城堡被称作八兹（Al-Bāz，即猎鹰）堡，这是哈马丹朝统治者统治该地区的门户。大石堡修建于山顶上，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在石堡南部修建了一个城区，后来变得很繁华。这里有很多市场、一些旅店和几所学校，但所有建筑物紧挨着，游廊连接也起到通道的作用。每户人家有水窖，可以接雨水。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伊本·白图泰访问了麻儿丁城，并

说这是一座优美的城市，还有很多毛织品。在那个时期，大关被称作“灰色堡”（Ka1`at-ash-Shahbā），或“山堡”（Kal`at-i-Kūh）。穆思套菲称麻儿丁城从扫儿（Sawr）河获得了丰富的灌溉用水，扫儿河发源于土儿·阿比丁（Tūr `Abidīn）地区与之同名的扫儿山，最后汇入哈卜儿河；他还说该城周边种植着谷物、棉花和各种水果。

都乃思儿城，在麻儿丁城东南，与之有几里格的距离，文献记载不一致，大概为2～4里格，确切的位置不得而知，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期是一座大的商贸城市，也称作苦车·喜萨儿（Kūch Hisar）。据亚库特记载，在他孩提时代，也就是在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末，都乃思儿仅是一个大村庄，到了伊斯兰历623年（1225年）已成为一座大城市。伊斯兰历580年（1184年），伊本·朱拜儿经过该城，他说此城无城墙，但这里是商队会合之地，有新建的学校和很多浴室。这座城东边几英里处就是答剌（Dārā）城[42]，此地在古罗马时代曾是一座大的要塞，伊本·豪喀尔称这是一座小城，穆喀达思记述了每户居民如何用地下管道获取用水的相关内容，这些管道的水最后流入聚礼清真寺的大水池中。穆喀达思说这里的屋宇均是用胶泥与黑石砌成的。该城位于一座山的一侧，亚库特说这里产的带核樱桃干（Mahlab）很有名，果园收获极丰。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伊本·白图泰经过答剌城，但当时这里的城关已变成一处无人居住的废墟。麻儿丁城西南的喀发儿土撒（Kafartūthā）城[43]位于一条小河的岸边，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说这是一座重镇，连接着起自阿迷得（Āmid）城的道路。在他那个时期，此城规模比答剌城要大，但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亚库特说这里只是一个大村庄[44]。

在剌思·阿印城，大哈卜儿河从左岸接纳麻儿丁（Mārdīn）河，再往南又接纳发源于纳思宾地区的喜儿麻思河，如前文所述，喜儿麻思河的小部分河水在其与哈卜儿河汇合处稍北被速凯儿·阿八思（Sukayr-al-`Abbās）水坝截流，喜儿麻思河的大部分河水流入萨儿萨儿运河。哈卜儿河现在有三条大支流，但穆思套菲说该河接纳了300条溪流，并向南流到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喀儿吉思雅城，而后流入幼发拉底河，该城是低雅儿·木札儿地区的首府，这将在后文述及。大哈卜儿河在到达喀儿吉思雅城之前，流经阿剌班（`Arabān）城[45]和麻吉欣（Mākisīn）城[46]，这两座城属于低雅儿·剌必阿地区的哈卜儿（Khābūr）之地。阿剌班（`Arbān，或`Arabān）城遗迹尚存，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这里生产大量的棉织品，在哈卜儿河沿岸的附近

地区种植着棉花。穆喀达思说阿剌班城建于一座高山上，周边是花园。阿剌班城向南，去往喀儿吉思雅城的中途就是麻吉欣（Mākisīn，Maykasīn）城，这里有一座横跨哈卜儿河的浮桥。这里也种植着大量的棉花，其附近有一座深蓝色的小湖叫门哈思利（Al-Munkhsrik）湖，约1/3英亩，据说深不见底。

文献记载喜儿麻思河的源头是纳思宾城北6里格处的一处泉水，此处水源被用铅制网格和砖石砌成的堤坝拦截。据说该坝是希腊人修建的，以防纳思宾城被洪水淹没，哈里发木塔瓦吉儿（Mutawakkil）曾一度传谕拆除此坝，后发现洪水泛滥到纳思宾城，随后火速敕令修复。纳思宾城南100多英里处是称作速凯儿·阿八思的河坝或导流坝，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里有一座很大的城市，还有聚礼清真寺和市场。如前文所述，这是萨儿萨儿河的起点，而后该河流入底格里斯河。该河由于水量不断减少，现已不再是一条河流了，早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该河流量已开始减少，亚库特称降雨多时，洪水经过该河道，但在夏季时，河床上只有一些水坑和咸水泉。亚库特曾亲身沿这条河道旅行，他说据称在过去从哈卜儿河到底格里斯河的船只常经过这条河，在那个时期，该河两岸是连绵不绝的村庄，但亚库特经过之时，这里却是满目沙漠。

萨儿萨儿河在欣贾儿（Sinjār）平原穿过一座叫贾八儿·忽木林（Jabal Humrīn）的山，又称贾八儿·八利麻（Jabal Bārimmā）山，并从北边接纳一条发源于欣贾儿（Sinjār）城[47]的小河。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座城（欣贾儿）有城墙，其周边土地异常肥沃。穆喀达思说该城的木匠很有名；这里盛产柑橘、柠檬和椰枣等，城中心还有一座聚礼清真寺。据穆斯林传说，在洪水时期诺亚方舟首先停靠在欣贾儿城北的山上，接着顺流经该城的河流而行，最后停靠在底格里斯河东边的贾八儿·朱迭山上。亚库特说欣贾儿城因是算端欣贾儿（Sinjār），或称桑贾儿（Sanjar）[48]的出生地，而名闻天下，他是灭里·沙之子，是大塞尔柱王朝的最后一位算端。据可疾云尼记载，欣贾儿城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以其浴室而闻名，浴室内铺有漂亮的马赛克地砖（瓷砖）。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伊本·白图泰经过此地，说这里的清真寺很优美。穆思套菲说此城的城墙周长有3200步，是用泥灰砌的石墙；大多数房屋沿山坡而建，呈阶梯状，其周边的果园里盛产葡萄、橄榄和漆树等。伊本·塞剌皮昂提到的哈底儿（Al-Hadr）城[49]就是罗马所称的哈特拉（Hatra），其位于萨儿萨儿河下游，介于欣贾儿城

和塔可里忒城中途附近该河与底格里斯河交汇处。哈底儿城附近还可以看到一座帕提亚（Parthian，即安息）时期的大宫殿遗迹，亚库特称这座宫殿是用一种叫萨替伦（As-Satirun）的方石建成的，宫殿里有很多房间，其屋顶和房门则是用片石建成的。他说最初此地有60座高塔，同时每塔之间及其附近还有9座塔楼，有一处宫殿对着墙外的各塔。[50]

从毛夕里城到纳思宾城的道路沿底格里斯河右岸北上，在距毛夕里城7里格的八剌［Balad，其应是现在的厄思吉（Eski），或旧毛夕里城］城[51]南部，这条道路分为两支。左路经塔儿·阿法儿（Tall A`far）城[52]到达欣贾儿城。据亚库特记载，八剌城位于波斯古城沙合儿八兹（Shahrabadh）的旧址，这里有一座什叶派圣墓，他还说八剌城之名通常写成八剌（Balat）。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伊本·豪喀尔称八剌城是一座很大的城市，穆喀达思说，这座城的房屋是用很好的泥浆与石头砌成的，市场繁华，城中央还有聚礼清真寺。城附近土地肥沃，产甘蔗。塔儿·阿法儿城西一站之地的孤山上有一座城堡，守望着该城，一条小河流过郊区。亚库特说这座城堡异常坚固，周边是生长着椰枣林的地区，称作麻赫剌比牙（Al-Mahlabiyah），因这里主要产用樱桃制的麻赫剌（Mahlab）香水或樱桃干而得名。

分道的右路，经八剌城到达八阿纳萨（Bā`aynāthā）城[53]，穆喀达思称这座城位于25个肥沃地区的中央，他还称这里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最肥沃、最宜人的地区；注意不要将这里的八阿纳萨城和前文第94页提及的“像一座城市的大村”的同名地相混淆，后者在底格里斯河与贾兹剌·伊本·奥马儿城北部河流汇合处的岸边。去往纳思宾城的道路，经八阿纳萨城，到达八儿喀夷（Barka`īd）城[54]，这里的人因偷窃而臭名远扬，他们常对外来客及商队下手。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时，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有三座城门和200多个商铺，还有多处甘甜的泉水。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前，尽管有些行人仍途经该城，但由于此地人的恶名，很多旅客都尽力绕开该地，于是其衰落成一个大村庄。

八儿喀夷城和纳思宾城的中途为阿札剌麻（Adhramah）城[55]，规模差不多和八儿喀夷城一样大；其所在的地区叫八因·纳赫儿因（Bayn-an-Nahrayn），意为“河流之间”。据说在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时期这里有一座优美的宫殿和一座跨河的石拱桥。这座小城有两道城墙，城周边还有很深的沟壕。哈里发木塔兹得（Mu`tadid）的随从御医曾经过该城，并留下了相关方面的记载。至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

达思称阿札剌麻城位于沙漠之中，是一座很小的城市，附近有几口水井，井周边的建筑呈拱形。[56]

[1] 今为哈布尔河，发源于土耳其，是幼发拉底河上游东岸的重要支流之一，全长486公里。译者。

[2] 今为叙利亚拉卡省的布塞拉（Busaira）小城，人口有7000，位于通往罗马帝国和叙利亚的干道上，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哈布尔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之地，土地肥沃，是发达的农业地区。译者。

[3] 今塞尔萨尔运河的部分河段仍在使用，其在今萨迈拉被拦截，然后河水向西流入1956年修建的塞尔萨尔湖，分流到巴格达周边的两河流域之间，用于灌溉。译者。

[4]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土耳其境内底格里斯河与乌鲁察伊（Ulu Cay）河汇合点附近的拐弯处，距小城亚孜里加不远。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5] 即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土耳其阿德亚曼（Adlyaman）省萨穆萨特小城。这是座古城，人口有7000。曾是丝路古镇。译者。

[6] 今为拜利赫河，是幼发拉底河上游东岸的重要支流之一，发源于土耳其境内，全长约100公里。译者。

[7] 大扎卜河是底格里斯河上游东岸的支流，大扎卜河起自凡湖（Lake Van）以东，沿土耳其与伊朗的边界南流，穿越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拉克北部后，从古亚述城镇尼姆鲁德［Nimrud，即卡拉赫（Kalakh）］遗址附近流过，后汇入底格里斯河，全长426公里。译者。

[8]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6~138页。I. k.，第1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682~684页。*Marāsid*［《观察》（*Al-Marāsid-al-Ittilā*）］，是亚库特所著《地理学词典》的摘要本，由优博尔（Juyboll）编辑，1852年莱登出版，第1卷，第84页。据亚库特记载，莫速儿城的波斯语旧名为八瓦儿达喜儿（Bawardashīr）或纳瓦儿达喜儿（Nawardashīr），但后者显然是音点笔误（即ب写成了ن，译者补）。

[9] 参见威廉·桑迪斯莱、M. A. 沃克斯《尼尼微与波斯波利斯：古亚述和古波斯概要，兼谈对上述两国的最近研究》，伦敦，1851年，第1~11章，第6~36页。

[10] 阿拉伯人尤其是西部阿拉伯人通常将市场的大型建筑称作旅店或客栈（Al-Kaysarīyah 或Kaysārīyah）。凯撒利雅（Al-Kaysarīyah）一词源于希腊语，但显然Κισαραια一词在拜占庭历史学家的文献记载中并未用来指一座城市的皇家市场（Casarian）。不管怎么说，该词几乎不可能源于亚历山大城的著名城区凯撒利温（Casarion），但这可备一说。

[11]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8、139、146页。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i`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第236～23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684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135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47、30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5、167页。

[12] 今为巴尔塔拉，位于摩苏尔以东，是座小城，是摩苏尔去往埃尔比尔的必经之地。译者。

[13] 今为卡尔马利斯（Karmālīs），位于巴尔塔拉东南的岔道上，是座小城。译者。

[14] 今为巴阿什嘎赫与巴赫扎尼（Bā`ashīqāh wa Bahzānī），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东边，是座小城。译者。

[15] 小扎卜河发源于伊郎西部乌尔米耶湖附近，向西南流，约流402公里后进入伊拉克境内，在基尔库克（Kirkuk）以西注入底格里斯河。译者。

[16] 今此城名不存，应该是今天的扎布城。译者。

[17] 在位时间为744～750年。译者。

[1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

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39、14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46、472、567页；第2卷，第168、222、552、902页；第4卷，第267页。Mustawfi（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5、166、214页。

[19]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距扎卜城东北30余公里的小扎卜河岸边。译者。

[20]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6页提到了大、小扎卜河，并称："这两条河流向西南方向，并在欣城和哈第撒之间流入底格里斯河。"译者。

[21]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6页记载了底格里斯河。译者。

[22] 这几座城市今已不存。译者。

[23] 今为塔武格（Tawūq），在与之同名的河流的岸边，是座小城，北边不远处为基尔库克城。为古今交通要道。译者。

[2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3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第52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64、750页；第2卷，第581页；第3卷，第16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

（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9、165、220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60页。亚库特或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没有记载喀儿苦（Karkūk），阿里·亚兹底说该地在陶克（Tāūk）城附近（第1卷，第661页）。贾必儿塔（Jabiltā）或贾卜儿塔（Jabultā）则在底格里斯河岸边，对面是塔可里忒城。需要注意的是该地名常被误读为赫必儿塔[Habiltā，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5页，字母H和J是两个相似的阿拉伯字母，但音点有区别（ح和ج，译者）]。但首字母肯定是J，因在叙利亚方言中该名称常以格必西儿塔（Gebhiltā）形式出现，以这种方式书写，G和H彼此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25] 今为阿马迪耶，是座小山城，人口约6000，主要是库尔德人。译者。

[26] 此河是土耳其境内的红水河（Hezil Çayi，海济尔河）和小哈布尔（Khabur）河汇合形成的河流，发源于土耳其境内，是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重要支流，也是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界河。译者。

[27]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法伊希·哈布尔（Faysh Khabur）城附近。译者。

[28] 今此城名不存，就在代胡克（Zākhū）城址所在地，今属于伊拉克代胡克省，在小扎卜河岸边，人口有35万，主要是库尔德人。其为古今道路要津，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29]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尼尼微省摩苏尔城北边50公里的地方，是丝路要道。译者。

[30]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9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9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86页；第2卷，第384页；第3卷，第717、93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

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5、166页。

[31] 今为吉兹雷（Cizre），位于土耳其南部的锡尔纳克（Sirnak）省，靠近叙利亚边界，人口10万，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2]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86页载：伊本·欧曼尔岛（贾兹剌·伊本·奥马儿），“是一大城池，四面山谷环抱，故名之曰岛”。“居民品德高尚，对外乡人友好。”译者。

[33] 此城现在已成为吉兹雷（Cizre）城区的一部分。译者。

[34] 以马坚所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为准。译者。

[3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2、153、15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9页。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8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55、25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66、472页；第2卷，第79、144、552、957页；第4卷，第1017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13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5、166页。

[36] 今为努赛宾，在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的马尔丁省，人口8万，主要为库尔德人。译者。

[37]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86页载：“［奈绥贝（纳思宾）］城位于广阔的原野上，有清泉流水，茂密花园，成行的树木和种类繁多的水果。”“四周环绕着一河流。”“该河发源于左近的山中，分流各地灌溉花园，河水流入城内，支流遍及各街各户，穿过清真大寺的庭院，注入到两个储水窖中。”“该城有医院一所、学校两座。”译者。

[38]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40、142、143页。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0页。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i`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第24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559页；第4卷，第787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14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7页。

[39] 今为拉斯·阿印，在叙利亚哈塞克省，靠近土耳其南部边界，人口2. 9万，向东南可达叙利亚的哈塞克城。历史上和对面的杰伊兰珀纳尔（Ceylanpinar）城是一座城市，根据1921年《安卡拉条约》，被划为两座城市，叙利亚一边的城市保留了旧

名。这是丝路上的古城，也是要道。译者。

[40] 今为马尔丁，是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马尔丁省的省会，人口8万。译者。

[41] 今此城名不存，应该在马尔丁城东南不远。译者。

[42] 今为达拉城，是座小城，位于马尔丁省，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43] 今此城名不存，应该距马尔丁省克孜勒泰佩（Kiziltepe）城不远，是丝路重镇。译者。

[44] 巴拉祖里，第176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3、7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43、149、15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0页。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ī`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第242、244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7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16、612、733、911页；第3卷，第435页；第4卷，第287、39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6、205、219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14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

（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77页。

[45] 此城名今不存，应该在萨巴与阿尔巴因（Al-Sabā wa Arbain）附近，大致位置在今天叙利亚的哈塞克（al-Hasakah）省哈塞克区沙达迪（al-Shaddadeh）县，是通往叙利亚腹地、伊拉克、土耳其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古镇。译者。

[46]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叙利亚的代尔祖尔（Deir ez-Zor）省，大致位置在今大哈布尔河的岸边，曾是丝路古镇。译者。

[47]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86～187页称宰札尔（欣贾儿）城"是一座大城市，水果丰富，有树木、泉水、河流。该城建立在山脚之下，处处水流，家家花园"。"水流不仅环绕全寺，而且横贯寺中，宰札尔人系库尔德族，性情是英勇豪爽。"又见英译本第2卷第352页。今为辛贾尔，位于尼尼微省，在泰勒阿非尔（塔儿·阿法儿）城西52公里处，人口8万，居民主要为雅兹迪人。译者。

[48] 1118～1158年在位，是塞尔柱王朝统一时期（即大塞尔柱帝国）最后一位君主，来自北部的土库曼人俘获桑贾儿后，该朝也逐渐瓦解了。译者。

[49] 此城至今存在，是尼尼微省的一座小城，可通往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等地，是丝路古城，这里保留有很多古代遗迹，198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哈特拉（哈底儿）古城呈圆形，环城建有双层城墙，城墙上还建有城堡和塔楼。2015年3月，"伊斯兰国"（ISIS）将古城内的文物掳走，并出动推土机破坏了哈特拉古城。译者。

[50] 这座城市的名称写为欣贾儿（Sinjār），后一个字母是长音ā；这位算端的名字通常写为桑贾儿（Sanjar），两个元音均是短音。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2、18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3、7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0、14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64、921页；第2卷，第281页；第3卷，第109、158页；第4卷，第96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

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6、219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141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63页。

[51] 此城名今不存，应在尼尼微省的吉斯克·库普勒（Kisik Kupri，应为砖桥）小城所在地。是丝路要道，可通往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等地。译者。

[52] 今为泰勒阿非尔（Tal'afar），是尼尼微省泰勒阿非尔区区府，有很多古迹，人口约20万，主要为土库曼人，位于摩苏尔以西63公里处，是通往叙利亚的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53] 此城名今不存，应在尼尼微省拉比亚（Rabia）小城附近，地位同八剌城。译者。

[54] 《哈里里集》（*The Assemblies Of al-Harīrī*，Francis Joseph Steingass译，伦敦，1897年）第139页提到了八儿喀夷（Barka`īd），并称“这是低雅儿·剌必阿（Diyār Rabī`ah）地区的首府，距毛夕里17法儿萨”。今此城名不存，应该在八阿纳萨西北去往叙利亚努赛宾城的道路上，是丝路重镇。译者。

[55] 今此城名不存，应该在努赛宾城东南40公里去往摩苏尔城的道路上，是丝路重镇。译者。

[56] 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48、14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9、14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77、472、571、715、863页；第4卷，第428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04页。

第七章 贾兹剌（Jazīrah）地区（续）

低雅儿·木札儿（Diyār Mudar）地区。剌噶（Rakkah）城和剌费喀（Rāfikah）城。巴里黑（Balīkh）河、哈兰（Harrān）城、夷得萨（Edessa）城和喜森·麻思剌麻（Hisn Maslamah）城堡。喀儿吉思雅（Karkīsiyā）城。纳赫儿·赛夷（Nahr Sa`īd）运河、剌赫八（Rahbah）城与答利牙（Dāliyah）城。叙利亚的鲁萨法（Rusāfah）城。阿纳（`Ānah）城。八利思（Bālis）城、吉思儿·满必吉（Jisr Manbij）城与速麦撒（Sumaysāt）城。萨鲁吉（Sarūj）城。低雅儿·八吉儿（Diyār Bakr）地区。阿迷得（Āmid）城、寒尼（Hanī）城与底格里斯河的源头。麦法利斤（Mayyāfarīkīn）城与阿儿赞（Arzan）城。喜森·凯法（Hisn Kayfā）城与塔儿·法凡（Tall Fāfān）城。萨亦儿（Sā`irt）城。

如前文所述，低雅儿·木札儿地区位于幼发拉底河岸边，其首府为剌噶（Ar-Rakkah）城，该城稍北就是巴里黑（Balīkh）河，发源于北部，流入幼发拉底河。该城位于古希腊的卡林尼库斯（Callinicus）城，或尼科夫留姆（Nicephorium）城[1]所在地，其阿拉伯名剌噶（Ar-Rakkah）仅是一种（地貌特征）描述；剌噶（*Rakkah*）一词是指季节性的河流泛滥后形成的沼泽地区，其他地方也有同名的剌噶（Ar-Rakkah，即沼泽），因此这里的剌噶之名又特地加上了别称“扫答”（As-Sawdā，即黑色），以示区别。

伊斯兰历2世纪（8世纪），阿拔斯王朝夺得哈里发大位之时，剌噶城便成为上美索不达米亚在叙利亚边界防卫的重镇之一，为确保该城的安全，伊斯兰历155年（772年）哈里发满速儿敕令在距剌噶城300腕尺（ell）处修建了剌费喀（Ar-Rāfikah，意为“同伴”、“朋友”或“随行”）城，由完全忠于新王朝的呼罗珊军队把守。据说剌费喀城是按报达城的规划样式修建的，这里也有一座团城。诃论·剌失德加固了此城（剌费喀城），并在此给自己修建了叫“安宁”的宫殿（Kasr-as-Salām），当报达城的天气酷热难耐时，他有时在剌噶城或剌费喀城居住。剌噶旧城被毁后，新修的建筑群占据了（两座城之间）所有的空地，并将其围起来，现在的“沼泽”（Rakkah）是一处浅湖，介于剌噶城和剌费喀城之间，而剌噶城逐渐被称作剌费喀城，剌费喀城本是外城区，后来取代了旧城，

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剌噶之名就逐渐消失了。但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伊本·豪喀尔述及了剌噶和剌费喀这两座姊妹城，并说这两座城中各有一个聚礼清真寺，还特别提到两座城市周边有大片树林。穆喀达思只提到一座城市，即剌噶城，并说该城异常坚固，有两道城门；城里的市场极好，邻近的村庄为其提供各种商品；因很多道路会合于此而成为交通枢纽，附近产的橄榄油可制作肥皂。他说聚礼清真寺是一座优美的建筑，位于布匹市场内，剌噶城的每座大宅均有带顶棚的阳台。这里还有舒适的浴室。后来，旧城遗址被称作“被烧毁的剌噶（Ar-Rakkah-al-Muhtarikah）城”。穆思套菲仍用剌噶来称呼外城区，他说该城的聚礼清真寺在“金匠”市场内。外城区周边生长着桑树和枣树，在幼发拉底河的对岸还有一座清真寺。

幼发拉底河对面的右岸，剌噶城以北[2]是著名的隋芬（Siffīn）平原，这里发生过木阿威雅[3]（Mu`awāyah）和阿里两位哈里发之间的战争。什叶派将为阿里战死的人称作“殉教者”，他们的圣墓就在此地，伊本·豪喀尔说，令人非常惊奇的是尽管已距埋葬殉教者的时间很久，但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裹尸布[4]，就像新近放置的一般，却看不到尸体，穆思套菲又补充了伊本·豪喀尔的记载。隋芬战场的对面，即幼发拉底河的北面（左岸），有一个叫喀剌·贾八儿（Kal`at Ja`bar）的城堡，该名取自一位阿拉伯人占据者，他是八尼·奴麦儿（Banī Numayr）部人。最初，这座城堡叫道萨儿（Dawsar）。哈里发王朝[5]后期的历史学家常提及此地，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时期的伊斯兰历497年（1104年），夷得萨（Edessa）城[6]的弗朗人（Frank）占领了该堡。在剌噶城南，幼发拉底河从左岸接纳巴里黑（Balīkh）河，希腊人称此河为必乐查（Bilecha）河。巴里黑河发源于哈兰（Harrān）城[7]以北一处名叫阿因·札八尼牙（`Ayn-adh-Dhahbāniyah）的泉水。文献中对该泉名称有不同的记载，如答满纳（Ad-Dahmānah）或札班纳（Adh-Dhahbānah），而穆思套菲（用波斯语）称作查什麻·达哈纳（Chashmah Dahānah）。[8]

朝南流的巴里黑河及其支流流经很多重要城市，后在剌噶城以南注入幼发拉底河。哈兰（即古之Carrhæ）城靠近该河的源头，这里因是萨比（Sābian，其和Sabæan不是一回事，但有人常将二者混淆）教徒[9]的故乡而闻名，他们信仰易卜拉欣（Abraham，即亚伯拉罕）的宗教，传说哈兰城是大洪水期过后修建的第一座城市。穆喀达思说，由一座城堡守护的哈兰城，是一座用石头砌成的优美、惬意的城市，该城不禁让人

回想起耶路撒冷的石墙。这座城有一座聚礼清真寺。伊斯兰历580年（1184年），伊本·朱拜儿经过这里，并说该城本身有道石砌城墙，他还说该城清真寺的大庭院有19个门，用大理石柱支撑着寺的圆顶。该城的市场顶棚铺着木条，有一家医院和一所学校。穆思套菲说城堡的城墙周长为1350步。该城以南3里格处就是易卜拉欣圣墓（Mashhad），城周边的土地靠无数的小运河灌溉。

夷得萨城，阿拉伯人称作鲁哈（Ar-Ruhā，是希腊地名Callirrhoe的讹误），位于巴里黑河一条支流的源头。穆斯林地理学家对这座城并没有多少记载，因这里的大多数居民信仰基督教，其以众多的教堂而闻名，伊本·豪喀尔估计教堂的数量超过300座。起初，这里曾保存着一件圣物，称作“耶稣餐巾”，为了平息鲁哈（Ruhā）城的暴乱和抢劫，伊斯兰历332年（944年），穆斯林统治者放弃了该圣物，并将其交还给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后半叶，穆喀达思记述了夷得萨城的聚礼清真寺，并称这里宏伟的大教堂堪称是世界四大奇迹之一，教堂的拱形天花板上则装饰着瓷砖。他说耶路撒冷的阿卡萨（Al-Aksā）大清真寺是参照此大教堂修建的。穆喀达思还说这座城很坚固。伊斯兰历492年（1098年）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时，虽然已有阿拉伯军队驻防在夷得萨城内，但其还是被八儿温（Baldwin，即鲍德温）攻占，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又被拉丁公国控制。伊斯兰历540年（1145年），赞吉（Zangi）朝[10]从约瑟琳二世（Jocelin II）[11]手中重新夺回鲁哈城，此城又重新控制在穆斯林的手里。至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人们还能领略到其很多优美的建筑遗迹，穆思套菲记述了一座雕刻精美的石头大穹顶，其矗立在100平方码的庭院旁边。阿里·亚兹底在记述帖木儿的征服活动时，不只一次地提到鲁哈城，该地名一直保留到伊斯兰历9世纪（15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占领该地后，此名一般拼写为乌儿发（Urfah）[12]，有人说这是阿拉伯语鲁哈（Ar-Ruhā）的讹误，夷得萨城今天以乌尔法之名而为人熟知。[13]

哈兰城之南，靠近巴里黑河东，去往剌思·阿印城的道路上就是八贾答（Bājaddā）小城[14]。这里的花园很有名，此城附属于喜森·麻思剌麻（Hisn Maslamah）城[15]，后者离巴里黑河很近。这座大城堡的名称取自麻思剌麻（Maslamah），他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卜得·灭里（`Abd-al-Malik）[16]之子，该城堡位于哈兰城南9里格处，距巴里黑河河岸有1英里半。由巴里黑河引出的一条运河经过该城堡，灌满城堡的蓄水池，这是麻思剌麻建造的，全部用石头砌成，宽200腕尺（ell），深20腕

尺。该蓄水池一年只需灌注一次，同时这条运河还灌溉着喜森·麻思剌麻城周边的土地。城堡的建筑物占地1贾里（Jarīb，1贾里等于1/3英亩），其城墙有50腕尺高。喜森·麻思剌麻城堡南3里格，去往剌噶城的道路上就是八贾儿宛（Bājarwān）城，伊本·豪喀尔称此城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已毁，但曾是一座很优美的城市。亚库特在记述喜森·麻思剌麻城堡时，称八贾儿宛仅仅是低雅儿·木札儿地区的一个村庄[17]。

距剌噶城南约200英里就是喀儿吉思雅城，即古斯儿科修姆（Circesium），位于底格里斯河（作者这里似乎将幼发拉底河误写为底格里斯河，译者）左岸，如前文所述（原文第97页），哈卜儿河的大部分河水从此处流入底格里斯河（应为幼发拉底河，译者）。伊本·豪喀尔说这是座优美的城市，周边有很多花园；但亚库特和穆思套菲均称此城规模比距其6里格的剌赫八（Rahbah）城要小很多，后一座城背靠幼发拉底河西岸。剌赫八城之名意为“广场”或“平原”，为了便于区别，该城称作“叙利亚”的剌赫八（Rahbah-ash-Shām），或以其建立者之名称作剌赫八·灭里·伊本·陶可（Rahbah Malik ibn Tawk），他是哈里发马蒙在位时期生活的人物。这座城附近有荅利牙（Ad-Dāliyah，即水车）小城，上述两城均位于一条叫纳赫儿·赛夷（Nahr Sa`īd）的大环形运河岸边，这条运河在喀儿吉思雅城稍北的幼发拉底河右岸分流出来，又在荅利牙城之北流回幼发拉底河，像剌赫八城一样，为了进行区分，荅利牙城也被称为荅利牙·灭里·伊本·陶吉（Dāliyah-i-Malik ibn Tawk）城。纳赫儿·赛夷运河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卜得·灭里之子赛夷（Sa`īd）王子督凿的；他是一位大善人，被称作赛夷·海儿（Sa`īd-al-Khayr，即善良的赛夷），曾担任毛夕里地区的总督。穆喀达思称剌赫八城是上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岸边最大的城市之一。此城的居民区呈半圆形，一直延伸到沙漠边缘，城很坚固，还有一个很大的外城区。荅利牙城相对较小，但位置很重要，其修建在一处高台上，可以俯瞰幼发拉底河西岸。

剌赫八城和剌噶城之间的沙漠里是“鲁思法（Rusāfah，即堤道）”城[18]，又称作“叙利亚”鲁思法（Rusāfah-ash-Shām，即苫的堤道），或以其建造者之名称作喜苫堤道（Rusāfah Hishām），遗迹在剌噶城南4里格处尚存。哈里发喜苫（Hishām）[19]是阿卜得·灭里众子中的一位，他当时为了躲避肆虐全叙利亚的瘟疫，在此地的沙漠中找到了一处安全之地，并亲自督建了一座宫殿，以作为栖身之所。伊斯兰教兴起以前，此地被噶三（Ghassan）朝[20]统治者占领，亚库特说这里有口古井，深

120腕尺。伊斯兰历443年（1051年），据医学家伊本·卜特兰（Ibn Butlān）[21]记载，鲁思法城有一座教堂，传说是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修建的，教堂外部装饰着金色马赛克（瓷砖），教堂底部有一处和教堂一样大的（用于墓葬的）地窖，教堂的顶部用大理石柱支撑着。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仍是基督徒，他们伙同盗匪抢劫经沙漠到阿剌颇（Allepo）城的商队，从中牟取暴利。在幼发拉底河东岸，介于剌噶城和喀儿吉思雅城之间，距喀儿吉思雅城之北有两天路程的地方就是哈奴喀（Al-Khānūkah）城[22]，伊本·豪喀尔称这是一座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亚库特称该城周边是麻底（Al-Madik）之地。

喀儿吉思雅城南，在贾兹剌地区唯一重要的城市就是阿纳（`Ānah）城[23]，即古阿纳托（Anatho），现在在地图上仍可查到，伊本·塞剌皮昂说该城位于一座被幼发拉底河环绕着的岛上。但伊本·豪喀尔称这座岛被一条从幼发拉底河分流出的小河环绕。亚库特称阿纳城有一座可以俯瞰幼发拉底河的坚固城堡，伊斯兰历450年（1058年），哈里发喀伊木（Kāim）[24]就曾躲避在此堡中，当时低廉（Daylam）王朝的八萨思利（Basāsīrī）[25]夺取了报达城，并强迫该城参加礼拜的人要诵读开罗法蒂玛（Fatimah）王朝持异见的什叶派哈里发的名字[26]。穆思套菲说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阿纳城仍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其椰枣林相当有名。阿纳城正西是富儿答（Al-Furdah）港[27]，为了便于区分，又称富儿答·努木（Furdah Nu`m）港，位于去往喀儿吉思雅城途中的幼发拉底河岸边，可能在幼发拉底河拐弯处的东边，但在现今的地图上已无法查到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站点，此处的道路分为两支：左路经鲁萨法城直接穿过沙漠到达剌噶城；右道沿幼发拉底河北上。[28]

剌噶城以北的幼发拉底河岸边有三座城市，即八利思（Bālis）[29]、吉思儿·满必吉（Jisr Manbij）和速麦撒（Sumaysāt）。这些城市通常被划入叙利亚地区，因其在幼发拉底河的右岸或西岸，但大部分文献中仍将其划入贾兹剌地区。八利思城位于剌噶城正西的隋芬平原边缘，幼发拉底河在此由南向东流去。这座城市就是罗马人所称的八儿八里速思（Barbalissus）城，是由幼发拉底河岸去往叙利亚的大河港，因此这里成为很多商路的汇合点。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八利思城有坚固的城墙，在城墙与幼发拉底河之间有很多果园；这里产的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和大麦。穆喀达思说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该城已有些损毁，但还很繁华；亚库特称由于幼发拉底河发生了一次改道，因此伊斯

兰历7世纪（13世纪）时八利思城距离该河有4英里远，阿布·勒·费达则称当时八利思城处于鼎盛时期。

在中世纪时期，吉思儿·满必吉城是一个要津，这里有一座横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浮桥，还有一条通向阿剌颇（Allepo）[30]地区满必吉（Manbij，即Hierapolis）城[31]的道路。一座大城堡保护着这座桥梁，桥南的幼发拉底河岸边有一座小城。这座城堡被称作“星堡”（Kal`at-an-Najm），也称作“满必吉堡”（Hisn Manjib），位于山顶的制高点，伊斯兰历580年（1184年），伊本·朱拜儿从哈兰城经过“星堡”，他说市场在其城墙以南。阿布·勒·费达说赞吉之子算端奴儿丁重建了该城堡，还说其守备部队随时随地袭击被十字军占领的邻近城市。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后半叶，可疾云尼详细记述了这里的骗子所玩弄的鬼把戏。他说这些人事先和过往“星堡”的富有旅客混熟，然后以同伙为托儿玩把戏以骗光旅客的钱财。可疾云尼称这些人玩弄的把戏非常诡异，陌生人“除内裤（sārawīl）外，会输光所有的衣服和财物”。有时候，这些骗子将自己装扮成典当的可怜受害者，然后让同伙诱使他人将其买下。

速麦撒城，罗马人称作萨摩萨塔（Samosata），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右岸或北岸，此处幼发拉底河向西流。这座城有很坚固的城堡。马苏迪说速麦撒城也被称为“土堡”（Kal`at-at-Tīn），亚库特说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这座城市的一个城区是阿剌蛮人的专门聚居区。木答儿地区最后一座要提到的城市就是现在要讲的萨鲁吉（Sarūj）城[32]，其位于从剌噶城北经沙漠荒野直通速麦撒城的半途上，这条道路沿着幼发拉底河，呈巨大的半圆弧形。萨鲁吉城也在从哈兰城和夷得萨城到吉思儿·满必吉城的商道上，伊本·豪喀尔说这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周边土地肥沃，亚库特未补充新材料，但证实了前人的记载。[33]

低雅儿·八吉儿地区是贾兹剌地区三个分区中最小的一个，这里的城市无一例外均在底格里斯河上游岸边或在该河之北。该地区的首府是阿迷得城[34]，有时候也写成哈迷得（Hāmid）城，罗马人称作阿迷答（Amida）城。后来，该城通常以地区之名而知名，如同今天一样叫迪亚巴克尔（Diyār Bakr）城，也称作喀喇·阿迷得（Kārā Āmid，即黑阿迷得）城，其来历是该城用黑色石头建成。

阿迷得城位于底格里斯河的右岸或西岸，其被高100英寻的山守护着。伊本·豪喀尔说其城墙是用黑磨盘石建成的。穆喀达思称此城的城墙像安都城一样很坚固，其外城墙建有堞墙和城门，中间的一片空地与内

城墙隔开，过了空地就是外城区。城里有很多处泉水，穆喀达思也谈到了这里的黑石，并说该城是用黑石建的。阿迷得城有一座漂亮的聚礼清真寺，沿城墙建有五座主城门，即水门、大山门、希腊门（Bāb-ar-Rūm）、小山门和战争时期使用的“暗道门”（Bāb-as-Sirr）。城墙将山围在里面，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穆喀达思说穆斯林在其边境地区没有比阿迷得城更好、更坚固的城堡来反击希腊帝国[35]了。

伊斯兰历438年（1046年），波斯朝觐者纳思儿·忽思罗经过阿迷得城，其亲见该城，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该城长宽各2000步，黑石砌的城墙环抱着山，从山上可俯瞰城市。城墙高20码，宽10码，在砌城墙时未使用胶泥，但纳思儿估计每个石块重约1000满（Man，约3吨）。沿城墙每隔约100码修建有一座半圆形的城楼，城墙顶部有前文所提及的黑石堞墙，同时每隔一段距离就建有石道，从城墙内侧通到防护墙。（在内城墙）朝东西南北方向有四座铁门，即东边的底格里斯河门、北边的八卜·阿剌蛮（Bāb-al-Arman）门、西边的希腊门和南边的八卜·塔儿（Bāb-at-Tall，即小山）门。经过内城墙就到了外城墙，其高10码，也是用黑石修建的，并形成一个宽15码的圆圈，两座城墙之间的地方还有一个城区。外城墙也有堞墙，沿堞墙有一个防御的通道。外城墙像内城墙一样也有四座铁门。纳思儿还说阿迷得城的城墙是其所见过的最坚固的或较好的城市城墙之一。

城中心有一眼大泉，冒出的水足可推动5只磨盘；泉水水质绝佳，流出的水灌溉着周边的花园。聚礼清真寺是一座漂亮的建筑，和城市的其他建筑一样是用黑石建成的，寺内有一个大的山墙屋顶，还有200根柱子，每根柱子均为整石做成，相邻柱子间用拱形连接着，穹顶依次用一排矮柱子支撑。寺内的天花板装饰着色彩明快的木雕作品。寺院内有一个圆形石盆，其中心有一个铜制喷头，从中流出一股清凉的水流，该盆中的水长年保持在同一水位。清真寺附近还有一座很大的教堂，是用石头建成的，通道则是由大理石铺成，其院墙雕刻精美；纳思儿看到通往教堂内殿的方向有一扇花格铁门，他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锻造得如此精美的铁门。

对阿迷得城气势恢宏的描述，出自伊本·豪喀尔著作巴黎抄本的佚名注释者之手，这位注释者在伊斯兰历534年（1140年）到过此城。他注释称该城的市场建造良好，商品琳琅满目。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的亚库特和可疾云尼所记载的大部分内容均沿袭了前人的记述，但可疾

云尼称阿迷得城沿东流的底格里斯河呈巨大的半圆形，而该城的另一半则被秀丽的花园环抱。14世纪时，穆思套菲称此城是一座中型城市，每年向伊利汗国上缴3000金币的税收。14世纪末阿迷得城被帖木儿攻占。[36]

阿迷得城之北，靠近底格里斯河上游东支的是寒尼（Hānī）城[37]，亚库特称该城因附近有铁矿而闻名，这里生产大量的铁制品，以供外销。穆思套菲也提到了寒尼城。寒尼城西边不远就是底格里斯河的主源，穆喀达思称其源头是从一个黑色岩洞里流出来的一股清水。他说起初河水很小，只能推动一只磨盘，但流到不远处就有很多支流汇合，由此流量大增，汇合后形成的河流的最上游称作“狼河”（Nahr-adh-Dhīb），显然这就是亚库特提到的“犬河”（Nahr-al-Kilāb），这条河发源于欣沙（Shimshāt）城[38]附近的山区，后流到寒尼城之北。亚库特称底格里斯河的源头在距阿迷得城有两天半路程的一个称作哈鲁剌思（Halūras）的地方，“这里是阿剌蛮人阿里（Alī）殉教之地”。他也提到了涌出水的黑色大洞穴。穆喀达思和亚库特均提到了诸多其他支流的名称，但他们所记载的名称却不完全一致，很可能是这些河流的名称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和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阿迷得城以南不远，底格里斯河呈直角转向正东，而后从其北岸接纳一条叫纳赫儿·兰思（Nahr-ar-Rams或Nahr Salb）的河流。但更重要的一条支流是发源于麦法利斤（Mayyāfarīkīn）城[39]北的河流，这条河的一条支流流经该城。底格里斯河的这条重要支流就是萨乞答麻（Sātīdamā）或萨乞答麻（Sātīdamād）河，该河的一条支流叫洼底·祖儿（Wādī-az-Zūr）河，发源于喀儿可（Al-Kalk）地区，萨乞答麻河本身的源头在“犬”关（Darb-al-Kilāb），亚库特说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希腊人遭到一次骇人大屠杀，波斯军队“当时将这些人像狗一样屠杀了”，此时为先知穆罕默德诞生前的萨珊王阿奴设里万（Anūshirwān）在位时期。这条伊本·塞剌皮昂提到的萨乞答麻河就是穆喀达思所称的纳赫儿·麻速里雅（Nahr-al-Masūliyāt）河，现在被称作巴特曼苏（Batman Sū）河[40]，如前文所述，这条河的一条支流发源于麦法利斤城。[41]

阿拉伯语名称的麦法利斤（Mayyāfarīkīn）显然是阿拉美语所称的麦法儿柯提（Maypharkath）或阿剌蛮语牟法儿斤（Moufargin）的讹读，也就是希腊人所称的马儿梯罗皮里思（Martyropilis）城。伊斯兰历

4世纪（10世纪）时，穆喀达思称这是一座有石砌城墙的优美城市，城墙一直到外城区，还有堞墙和很深的沟壕。穆喀达思说其清真寺建造秀美，但花园很少。伊斯兰历438年（1046年），纳思儿·忽思罗访问了麦法利斤城，他说这座城的城墙是用巨大的白石砌成的，每块石头重500满（Man，约1.5吨），如前文所述，阿迷得城的所有建筑均用黑石建成，麦法利斤城的每座建筑均采用醒目的白石。后来此城的城墙得以修葺，其上建有漂亮的堞墙，每隔50码就建有一座白色的石塔。该城只有一座面向西的城门，其有坚固的铁门，建造城门时未使用木料。据纳思儿·忽思罗记载，内城有一座漂亮的清真寺，第二座聚礼清真寺在外城区的市场中央，外城区外面分布着很多果园。他又称麦法利斤城北不远处就是称作木合答萨（Muhdathah，即新城）[42]的第二座城，其有自己的聚礼清真寺，还有很多浴室和市场；距离此城4里格的地方就是纳思利牙（Nasrīyah）城[43]，由绰号为什卜儿·道剌（Shibl-ad-Dawlah）的迷儿答思·异密·纳思儿（Mirdāsid Amīr Nasr）所建。

亚库特和可疾云尼均详细记述了过去麦法利斤城留存的教堂、三座塔和八座城门，亚库特说这座城的希腊名称叫马杜尔萨拉（Madūrsālā），意为“殉教城”。这些建筑可以追溯到狄奥多修斯（Theodosius）皇帝[44]时期，有些建筑的遗迹还存在，尤其是其中的一座古老教堂，据说是“耶稣（Messiah）时期”的建筑，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尚存。在城墙的西南塔顶上有一个大十字架，面朝耶路撒冷方向，据称这个十字架和耶路撒冷复活教堂顶上悬挂的那个大十字架是同一位工匠制作的，这两个十字架形制一样，堪称神奇。在麦法利斤城犹太人居住区附近的犹太教堂（Synagogue）里，可以见到一只黑色的大理石盆，其内保存着一条玻璃带子（可能是一种避邪符），里面保存了努尼（Nun）之子约书亚（Joshua）的一些血，这条带子是从罗马带到这里的，触摸它会使人远离各种疾病的侵袭。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蒙古人统治时期，麦法利斤城仍是一座重镇，穆思套菲盛赞这里气候宜人，水果丰富[45]。

阿儿赞（Arzan）城[46]在麦法利斤城东不远，其位于一条叫纳赫儿·萨儿八（Nahr或Wādī as-Sarbat）的河的西岸。阿儿赞城有坚固的城防，伊斯兰历438年（1046年），纳思儿·忽思罗访问过此地。他记载该城有很好的市场，是繁华之地，周边土地肥沃，果园灌溉良好。亚库特称阿儿赞城［不要与下一章讲到的阿儿赞·鲁迷（Arzan-ar-Rūm）或爱儿泽·鲁迷（Erze Rum）相混淆］在他那个时期已毁；但伊斯兰历8世纪

（14世纪）时，穆思套菲将这座城的城名拼写为阿儿赞纳（Arzanah），并说此城仍很繁华。

在幼发拉底河南岸，发源于麦法利斤城和阿儿赞城之北的两条河流之间有一座叫喜森·凯法（Hisn Kayfā，或Kīfā）[47]的城堡，希腊语称作吉法斯（Kiphas或Cephe）。穆喀达思称这是一座坚固的城堡，其城区内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他还说这里有很多教堂，前文所述的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伊本·豪喀尔抄本的佚名注释者称此处有一座大石桥横跨在底格里斯河上，伊斯兰历510年（1116年）异密（阿米尔）·法赫儿丁·喀喇阿儿思兰（Amīr Fakhr-ad-Dīn Kārā Arslān）[48]对这座桥进行了修缮。那时，城堡南部有一个繁华的城区，还有很多市场、旅店和用灰泥石砌成的优美住宅。城堡周边地区土地很肥沃，但气候很糟，在夏季时瘟疫常肆虐横行。曾到过喜森·凯法城堡的亚库特说这里的城区先前在底格里斯河的两岸，他还认为此处的大桥是他所见到过的最优美的工程之一。这座桥由一个大单拱构成，其建在两个小拱之上，这些拱可能通过一个中心桥墩，将底格里斯河的河道分开。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穆思套菲记载，喜森·凯法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尽管有很多居民居住，但城的绝大部分已毁。

位于底格里斯河的北岸或左岸有座叫塔儿·法凡（Tall Fāfān）的山，其山脚下有与此山同名的城市，该城在喜森·凯法城以东50英里，在这里底格里斯河向南形成了一个大拐弯。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称此城周边是果园，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尽管这里的住宅多用土夯成，但商业街均建有顶棚。发源于凡（Vān）湖西南阿剌蛮山区的八忒里思（Badlīs）河[49]，流经八忒里思（Badlīs，或八忒利思Bitlis）城[50]，并在塔儿·法凡（Tall Fāfān）城附近汇入底格里斯河。一条发源于凡湖之南的大支流汇入这条河（八忒里思河），穆喀达思和亚库特称这条支流为洼底·剌兹木（Wādī-ar-Razm）河，汇入这些河流后的底格里斯河适于船只航行。塔儿·法凡城之北，八忒里思河与剌兹木（Razm）河汇合处稍北，在后一条河的岸边就是萨亦儿（Sā`irt）城[51]，也拼成萨亦儿（Si`ird）和亦思儿（Is`īrt），这座城常划入阿剌蛮地区。亚库特不止一次地提到该城，但未做叙述；而穆思套菲称萨亦儿城是一座大城市，这里的工匠所制作的精美铜器远近闻名；这里还制作酒杯，远销各地。据可疾云尼记载，亦思儿城附近就是小城喜赞（Hīzān），这里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唯一一个大量生长栗树（Shāh-balūt）的地方。[52]

[1] 据普林尼记载，尼科夫留姆城在幼发拉底河岸附近，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因此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敕命下修建了该城，见亨宁（M. Hennin）编著的《古代地名手册》（*Manuel de Numismatique ancienne*），第2卷，第293页，巴黎，1830年。译者。

[2] 按地图应在剌噶城南边，译者。

[3] 倭马亚王朝第一位哈里发，在位时间为661～680年。译者。

[4] 阿拉伯语为卡凡（Kafan），为白色布料，用来裹埋尸体，因穆斯林是不用棺椁的。译者。

[5] 即阿拔斯王朝。译者。

[6] 此城在今尚勒乌尔法（Sanliurfa）城所在地，是著名的古城，也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现此城为尚勒乌尔法省省会，人口52万。尚勒乌尔法（Sanliurfa），简称乌尔法，主要民族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译者。

[7] 今为小城，人口7000，位于土耳其尚勒乌尔法（Sanliurfa）城东南44公里处，是该国重要的遗迹，在古代是通往小亚细亚和罗马帝国的重要通道。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译者。

[8] 巴拉祖里，第179、297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5、7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3、15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1页。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2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90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7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34页；第2卷，第621、734页；第4卷，第112、16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

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6、219页。伊本·阿喜儿，第10卷，第253页。

[9] 萨比（Sabæan或Sabian）一词源于希伯来语词“萨八”（*tsaba*），意为“主人、天主”，后来在闪米特民族中指那些崇拜宇宙天体的人或宗教，于是将萨比教徒称之为星相教徒，或拜星教徒，这种宗教被称之为星相教，或拜星教，其实萨比教并不是崇拜天体本身，而是崇拜天体所蕴含的内在精神。这一宗教相当古老，是亚述人的主要信仰，后来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保留着。《古兰经》中多次提到萨比教徒，并予以指责。译者。

[10] 赞吉朝存在于1124～1250年，是以今叙利亚的阿勒颇为中心建立的王朝，统治范围包括今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北部、土耳其东部。最初是塞尔柱王朝的藩国，代该朝施政，后坐大。译者。

[11] 其为十字军夷得萨城邦国第二代君主，也是最后一代君主，在位时间为1131～1146年。译者。

[12] 《亚美尼亚史》（*The Armenia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第58页（原文第106～107页）中的乌儿发，即鲁哈城，又作乌儿哈（Urha）城，据记载，603年叙利亚地区的军事将领尼儿塞思（Nersēs）在美索不达米亚举兵反叛，攻占乌儿哈城，后萨珊王忽思罗率军攻破该城，尼儿塞思投降。译者。

[13]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1、147页。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i`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第24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231、59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6页。`Alī of Yazd（阿里·亚

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62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166页。基督著名的肖像手帕（Mandīl）一度保存在夷得萨城，这是很多基督肖像（Veronicas）手帕中的一件，但权威的文献对夷得萨城基督肖像手帕现在保存于罗马，还是热那亚（Genoa）城，或者是其他地方，意见不一。最早记载此物的穆斯林著述者马苏迪称，该著名遗物被送到了希腊皇帝那里，并说："该遗物被称为纳扎乐思（Nazareth）之地的耶稣手帕，在此地耶稣自己沐浴洗礼后，用该手帕擦干了自己的身子。"马苏迪在伊斯兰历332年（943年）提到当时拜占庭因获得该手帕而欢欣雀跃。生活在同一世纪的伊本·豪喀尔称，该遗物仅仅是"圣母玛丽亚（Mariyam）之子耶稣（`Isā）的手帕，愿他安宁"。伊本·阿喜儿在"编年史伊斯兰历331年（943年）"条中记载："据说弥赛亚（Messiah，即救世主耶稣，译者）用这个手帕擦过脸。此后他的脸就印在其上面了。"他还记述了哈里发木塔吉（Muttakī）如何被劝诱放弃这个手帕而将其归还给希腊皇帝，以换取被俘的穆斯林战俘，以及避免鲁哈城受到袭击与掠夺。莫瑟·赫拉纳（Moses of Chorene）对夷得萨城基督肖像手帕的基督圣迹做了记载，并说基督的肖像被神奇地印在了一块布上，其被送到夷得萨城的国王阿布噶鲁斯（Abgarus）那里。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卷，第331页。伊本·阿喜儿，第8卷，第302页。

[14] 今此城名不存，应该在拉卡省苏鲁克（Suluq）城附近。译者。

[15] 今此城名不存，应该在拉卡省苏鲁克（Suluq）城西南，靠近拜利赫河岸边。译者。

[16] 倭马亚王朝第五位哈里发，在位时间为685～705年。译者。

[17]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6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5

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53、454、734、809页；第2卷，第278页。

[18] 今为勒萨法（Resafa，罗马人称作Sergiopolis），在拉卡城西南约60公里处，是去往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等地的要道。这里有古代建筑遗迹，曾是丝路古镇，已废。译者。

[19] 倭马亚王朝第十位哈里发，724～743年在位。译者。

[20] 这个王朝从220年建立到712年灭亡，存续了492年，大致相当于从中国的三国时期到唐中叶，统治区域包括整个阿拉伯半岛，北边与罗马帝国为邻。译者。

[21] 大食国聂斯托利派名医，生活于1038～1075年，他著有《健康之道》（*Taqwim al-Sihhah*），此书从12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西方医学的基本教材。译者。

[22] 今此城名不存，应该在达尔祖尔省卡斯拉赫（Al-Kasrah）城附近，靠近幼发拉底河东岸。译者。

[23] 今为阿奈，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安巴尔省，人口约4万。译者。

[24] 阿拔斯王朝第二十六位哈里发，1031～1075年在位。译者。

[25] 八萨思利是信奉什叶派的低廉王朝，即布伊王朝的一位奴隶，该王朝统治者在1055年被塞尔柱人赶出报达城，于是他开始反击塞尔柱王朝的统治，在1058年夺取报达城，并强迫信奉逊尼派的人归宗什叶派，1059年塞尔柱人重新夺回报达城，八萨思利被杀。译者。

[26] 按穆斯林的习惯，在礼拜中诵读当朝统治者的名讳是表示对该统治者的服从，正文中的八萨思利信奉什叶派，强迫报达城人改宗，并要求礼拜者诵读法蒂玛王朝什叶派哈里发之名，以示臣服。译者。

[27] 今不存，大致在叙利亚阿勒颇省的革命城附近。为古今交通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2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7、7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5、15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2页。巴拉祖里，第179、180、332页。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刺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

10、1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394、538、764、784、955页；第3卷，第595、876页；第4卷，第65、560、84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9、166页。

[29] 今不存，故址在今叙利亚阿勒颇省马斯卡纳赫（Maskanah）城南边不远。这里保留有古代遗迹，是丝路重镇和要道。译者。

[30] 今为阿勒颇，为叙利亚北部一个省的省名，面积为16000平方公里，人口370万。同名省会阿勒颇是历史名城，人口114万，超过大马士革城。译者。

[31] 今为曼比吉，位于阿勒颇省东北部，人口10万，主要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是丝路重镇，交通要道。译者。

[32] 即今土耳其尚利乌尔法（Şanlıurfa）省的叙吕奇（Suruç）城，靠近叙利亚边界，人口5.2万，是丝路古镇，保留有很多古代遗迹。译者。

[33]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62、76、7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19、120、154、15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55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第215页。Ibn Jubayr（伊本·朱拜儿），著有《游记》（*al-Kitāb al-Idīb al-Bāri` al-Labīb*）（直译为《机敏精通者的修养》），阿拉伯文本由莱特（W. Wright）编辑，于1852年在莱登出版。英译本《伊本·朱拜儿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于1952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ân，Ibn*

Jubayr, Ibn Battûta et un Auteur Anonyme）中，于1995年在巴黎出版，第25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77页；第3卷，第85、151页；第4卷，第165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233、269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60页。

[34] 即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省省会迪亚巴克尔城。该城是土耳其东南部的最大城市之一，人口93万，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去往罗马的孔道，这里有很多古代遗迹。译者。

[35] 即拜占庭帝国。译者。

[3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0、15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0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66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3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5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82页。

[37] 今为哈尼，位于土耳其迪亚巴克尔省（Diyarbakır），人口8000。译者。

[38] 为土耳其境内的古城，现已不存，学者对其具体位置说法不一。有学者称其原址已因凯班水库大坝的兴建而被淹没，也有学者称其为埃拉泽（Elazığ）省省会埃拉泽城，或在埃拉泽城以东60公里处。译者。

[39] 今为锡尔万（Silwan）城，位于迪亚巴克尔省，在锡尔万湖南岸。现人口有4万，历史上这里是通往罗马道路上的重镇。译者。

[40] 也译为巴特曼河，是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重要支流之一，全长115公里，发源于巴特曼城北部的山区，沿河河谷地带是重要的农业区，分布有很多城市，现在这一河谷地带发现了石油。这里也是重要的丝路通道。译者。

[41]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7、1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88、551、552、563、956页；第3卷，第7、413页；第4卷，第300、97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5页。

[42]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锡尔万城以北不远。曾是一座古城，也是交通要道。译者。

[43]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锡尔万城附近。译者。

[44] 罗马帝国正式分裂前的最后一位皇帝，378～395年在位，其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也译为狄奥多西乌斯。译者。

[45]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703～707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7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

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7页。

[46]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哈散凯伊夫（Hasankeyf）城北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耶纳尔苏·察伊（Yanarsu Çayi）河岸边。译者。

[47] 今为哈散凯伊夫（Hasankeyf），位于土耳其巴特曼（Batman）省，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南岸，是座小城，人口3000。译者。

[48] 在位时间为1109～1144年，是统治着迪亚巴克尔等地的后塞尔柱王朝的统治者，历史上这个王朝也被称作阿尔特克王朝（Artquids或Artuqid），是塞尔柱封建主阿儿忒·别（Artuk Beg）的后裔建立的，存在于1099～1231年，共存在了232年。译者。

[49] 今为比特利斯（Bitlis Çayi）河，发源于比特利斯城北部，向南流，最后汇入底格里斯河。译者。

[50] 《亚美尼亚史》（*The Armenia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第138页（原文第166页）中，八忒里思城作八利喜（Balēsh），并提到八利喜城堡。今为比特利斯（Bitlis），位于底格里斯河支流比特利斯河岸边，在凡湖西南15公里处，景色秀美，是土耳其比特利斯省省会，人口约有5万。丝路要道。译者。

[51] 今为锡尔特（Siirt），是土耳其东南部锡尔特省的省会，人口12万。丝路古城，道路要冲。译者。

[5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7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5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1、145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05页；第2卷，第277、552、776页；第3卷，第68、854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

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4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5、166页。剌兹木（Razm）河的名称在抄本中有扎儿木（Zarm）、剌兹卜（Razb）或扎儿卜（Zarb）等不同写法，但其正确的读音无从得知。

第八章 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The Upper Euphrates）

东幼发拉底河或阿儿萨纳思（Arsanās）河。密剌思吉儿得（Milāsgird）城和木什（Mūsh）城。欣沙（Shimshāt）城和喜森·兹牙（Hisn Ziyād，或Kharpūt）城。西幼发拉底河。阿儿赞·鲁迷（Arzan-ar-Rūm）或喀利喀剌（Kālīkalā）城。阿儿赞章（Arzanjān）城和坎合（Kamkh）城堡。阿卜利（Abrīk）堡或特弗里克（Tephrike）堡。麻剌乞牙（Malatiyah）城和答兰达（Tarandah）城。兹八忒剌（Zibatrah）城和哈达思（Hadath）城。喜森·满速儿（Hisn Mansūr）城、八哈思纳（Bahasnā）城和散贾（Sanjah）桥。上美索不达米亚的物产。各条道路。

幼发拉底河上游东、西两支流（因该河有两个源头）沿岸的城市和地区过去通常被视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并经常包括在贾兹剌地区。东幼发拉底河，是幼发拉底河两大支流中的最南支，有些（穆斯林）地理学家认为该支流是幼发拉底河的干流，这也是塔西佗（Tacitus）和普林尼（Pliny）[1]所称的阿儿三尼阿思·夫鲁门（Arsanias Flumen）河[2]。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塞剌皮昂仍称这条河为纳赫儿·阿儿萨纳思（Nahr Arsanās）河，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亚库特仍用这一名称，并提到这条河的河水极其冰冷。现在该河通常用土耳其语称为穆拉特河（Murādsū）[3]，按一般的说法，这一名称取自算端木剌（Murād）四世，此人在伊斯兰历1048年（1638年）攻占了报达城。

阿儿萨纳思河发源于塔伦（Tarūn）地区，阿剌蛮人将该地区称作答伦（Daron）[4]，希腊人称作塔罗尼（Taronites），这一地区包括位于凡（Vān）湖北部的山区。阿儿萨纳思河岸边的第一座重镇就是密剌思吉儿得（Malāzkird）城，该城的城名在当地的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称法，如麻纳兹吉儿德（Manāzijird）、满兹喀儿忒（Manzikart）、迷剌思吉儿得（Milāsgird）等[5]。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记载密剌思吉儿得城是一座坚固的城堡，其市场中央有清真寺，此地有果园环绕。希腊人将此城称为满兹喀儿忒城，伊斯兰历463年（1071年）

这里曾是拜占庭和穆斯林决战之地，当时拜占庭皇帝罗马努斯·迪奥根尼（Romanus IV Diogenes）四世被塞尔柱人俘获，结果塞尔柱人征服了此地，并在小亚细亚永久地居住下来。亚库特不止一次提到密纳兹吉儿德（Mināzjird）或迷纳兹吉儿得（Mināzkird）城，穆思套菲称此城为密剌思吉儿得（Milāzjird）城，并盛赞其坚固的城堡、宜人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阿儿萨纳思河之南的木什（Mūsh）城[6]在凡湖西边的平原上，该城通常被划归到阿剌蛮地区。亚库特提到过此城，据穆思套菲记载，木什城附近有肥美的草原，此地依靠向北流到东幼发拉底河与向南流到底格里斯河的各条河流灌溉，但在他那个时代，该城已毁。[7]

阿儿萨纳思河从右岸接纳了发源于北边和喀利喀剌（Kālīkalā）地区的两条支流。这两条支流很重要，能使我们确定曾一度很有名的欣沙（Shimshāt）城的大致位置，但现今该城在地图上已无法查到了，且常与前文提到的（原文第108页）幼发拉底河岸的速麦撒（Sumaysāt）城相混淆。伊本·塞剌皮昂将第一条支流称为“狼河”（Nahr-adh-Dhīb），其发源于喀利喀剌地区，在欣沙城稍北流入阿儿萨纳思河；第二条支流为萨儿吉（Salkīt）河，其发源于贾八儿·木罗耳（Jabal Marūr，或Mazūr）山区，在欣沙城南1英里处汇入阿儿萨纳思河。一份地图资料说明这两条支流现在分别称为古那克·速（Gunek Sū）河[8]和皮尔·茶（Perī Chay）河[9]；喀利喀剌地区包括阿儿萨纳思河与西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山区和一直到塔伦地区之西的区域。

欣沙（Shamshāt，即Shimshāt）城是阿儿萨纳思河岸边最为重要之地，伊本·塞剌皮昂也提到了欣沙（Shimshāt）河，该城应在此河的南岸或左岸。欣沙无疑就是希腊人所称的阿尔萨牟萨塔（Arsamosata），亚库特特别提到不可将此城和速麦撒城相混淆，他还说欣沙城位于帕鲁牙（Pālūyah，现代的Pālū）城[10]和喜森·兹牙［Hisn Ziyād，现代的哈尔普特（Kharpūt）］城[11]之间。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据亚库特记载，欣沙城已毁，但根据伊本·塞剌皮昂和亚库特的记载，可将其位置确定在较小的范围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提到喜森·兹牙城堡距离欣沙城不远，在亚库特的著作中记载的是此城的阿拉伯语名称，阿剌蛮语则写作哈儿塔必儿（Khartabirt），现在称作哈尔普特（Kharpūt）。穆思套菲将此城拼写为哈儿必儿（Kharbirt），仅说该城是气候宜人的大城市，但未详述。巴拉祖里和其他早期著述者提到了这一地区的牙剌（Yaghrā）桥，其横跨在一条河上，这条河很可能就是阿儿萨纳思河的一条支流，此桥（*Jisr*）距离欣沙城有10英里；但其确切方位，不得而

知。欣沙城西100多英里处，阿儿萨纳思河即东幼发拉底河最终与西幼发拉底河合流。[12]

西幼发拉底河通常被认为是幼发拉底河的干流，现在一般用土耳其语称为“黑河”（Kārā Sū）[13]，伊本·塞剌皮昂称这条河为纳赫儿·弗剌（Nahr-al-Furāt）。据他记载，此河发源于贾八儿·阿喀剌黑思（Jabal Akradkhis）山区［显然此山被马苏迪记作阿夫剌黑思（Afradkhis），还有其他不同拼写形式］，这个山区属于爱儿泽鲁迷（Erzerum）城[14]之北的喀利喀剌地区。阿拉伯人称这座重镇为阿儿赞·鲁迷（Arzan-ar-Rūm，或Ard-ar-Rūm，即罗马之地）城，阿剌蛮人称作喀林（Karin）城[15]，希腊人称作塞奥多西波利斯（Theodosiopolis）城。该城是喀利喀剌地区的穆斯林城市，也是此地区的首府。早期穆斯林地理著述家常提及喀利喀剌地区之名，但显然不清楚该名称的来源，所有著述家却一致认为这里是西幼发拉底河、阿剌可思（Araxes）河与阿儿萨纳思河各支流的发源地。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对爱儿泽鲁迷城未做详述，仅说这是一座大城。穆思套菲说此城有很多优美的教堂，并特别提到了一座教堂的穹顶，其直径有50腕尺（ell）。这座教堂的对面是一座清真寺，按麦加天房的式样修建。伊斯兰历733年（1333年），伊本·白图泰来到阿儿兹·鲁迷（Arz-ar-Rūm，他所记载的名称）城，并称这是一座大城，属亦剌可地区的算端管辖，尽管此城大部分已毁，但其果园仍很有名，还有三条河流经该城区。阿儿赞·鲁迷城东8里格，阿剌可思河其中一个源头附近的山顶上有阿委尼（Avnīk）大堡，穆思套菲说该城堡脚下的城市叫阿八思忽儿（Abaskhūr，或Abshakhūr）城[16]。此城由阿儿赞·鲁迷城管辖，亚库特说该地区（这些城市所在地区）称作八欣（Basin）地区。伊斯兰历8世纪末，帖木儿经过长期围攻后，占领阿委尼堡，在记载其武功活动的著作中常提到该城堡。

阿儿赞·鲁迷城西约200英里，在幼发拉底河右岸或北岸就是阿儿赞章（Arzanjān）城[17]，亚库特说此城常称作阿儿曾干（Arzingān）。他称这座城是拥有各种产品的优美城市，在他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居民是阿剌蛮人，他们因公开饮酒而引起穆斯林居民的反感。[18]穆思套菲说，其城墙是塞尔柱王朝算端阿剌丁·凯库巴（`Alā-ad-Dīn Kaykubād）[19]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末修复的，还说城墙是用切割很好的石料与灰泥修建而成。阿儿赞章城气候宜人，这里盛产粮食、棉花和葡萄。伊斯兰历733年（1333年），伊本·白图泰经过此地，他说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操突厥语的阿剌蛮人，均是穆斯林。其附近有铜矿，当地工匠

制作的铜制品很有名；市场极好，城里大量纺织各种布料。阿儿赞章城北为八必儿（Bābird）城[20]，亚库特说这是一座大城，绝大多数居民为阿剌蛮人；但穆思套菲称在他那个时期其地位已大为下降。坎合（Kamkh，或Kamakh）城堡[21]在西幼发拉底河左岸或南岸，距阿儿赞章城之南有一天的路程。伊本·塞剌皮昂和其他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常提到该城堡，即希腊人所称的卡马查（Kamacha）。穆思套菲称该城堡是一座大城，其位于（幼发拉底）河南岸，附近有很多富饶的村庄。[22]

从爱儿泽鲁迷城流向西的幼发拉底河，在坎合城堡西60多英里处形成一个大拐弯，而后河水转向南流，在这里该河从右岸接纳了伊本·塞剌皮昂所称的纳赫儿·阿卜利（Nahr Abrīk）河，这条河是以其上游的阿卜利（Abrīk）城堡命名的。该河现在称作察尔塔·伊尔玛（Chaltah Irmak）河[23]，发源于底兀里（Divrīk或Dīvrīgī）地区。穆思套菲和伊本·比比（Ibn Bibi）将此地记载为第弗里吉（Difrīgī）[24]，拜占庭文献中，将其记载为特弗里克［Tephrike，也以阿夫里克（Aphrike）的形式出现于希腊文献抄本中］，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将其简写为阿卜利（Abrīk）。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末，这里以作为保罗（Paulician）派[25]教徒的据点而闻名，该教派是东方基督教的一个古怪教派，教义中搀杂着摩尼教（Manichæan）的成分，因此其受到了信奉正教的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残酷迫害。阿拉伯著述家将保罗派写作拜剌喀尼（Al-Baylakānī），并记载他们占据、守卫着特弗里克之地，由此得到了哈里发的支持和帮助，并多年来成功地抵挡了君士坦丁堡军队的进攻。库达玛和马苏迪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两人均称阿卜利堡是“拜剌喀尼地区的首府”；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阿里·哈烈（`Alī Heratī，亚库特所引）对阿卜鲁（Al-Abrūk，他这样拼写）附近的一处大洞穴和一座教堂做了离奇的记载，称洞里保存着一些殉教者的尸体，并认为这些人就是亦费所（Ephesus）城[26]七眠子中的几位。

在察尔塔·伊尔玛河和底兀里地区稍南，萨里尺切克·速（Sārīchīchek Sū）河[27]流入幼发拉底河，其岸边有阿剌卜吉儿（`Arabgīr）堡[28]。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尽管伊本·比比所撰写的塞尔柱编年史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此堡，但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并未记载该地；在拜占庭历史文献中其以阿剌卜剌可思（Arabraces）的名称出现。阿剌卜吉儿堡有时被误指，但不管怎么说其不应是阿卜利和特弗里克之地。显然，穆斯林地理学家最早将其记载为阿剌卜吉儿（`Arabgīr或`Arabkīr），出现于伊斯兰历11世纪（17世纪）哈吉·哈里法所著的土

耳其语著作《世界志》（*Jahān Numā*）里。他也提到了底兀里（Dīvrīgī，现在还这样称呼该城），但可惜无法找到对保罗派据点的记述。[29]

麻剌乞牙（Malatiyah），希腊人称作美里特纳（Melitene）[30]，是早期穆斯林对抗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城堡之一。巴拉祖里说，军队在距要塞3英里的桥梁处驻守，这里的道路在其与幼发拉底河汇合处附近越过苦八吉卜（Kubākib）河。希腊人称苦八吉卜河为麦剌思（Melas）河，现在的土耳其人将其称作土合麻·速（Tukhmah Sū）河[31]，其发源于麻剌乞牙城之西的偏远山区，从这一山区还发源有贾汗（Jayhān）河[32]，古称派剌木思（Pyramus）河（下一章要讨论），其向西南流入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拉塔（Alexandretta）湾。除阿儿萨纳思河外，苦八吉卜河是幼发拉底河上游众多支流中最重要的一条，苦八吉卜河本身也有很多支流，伊本·塞剌皮昂一一记载了这些支流的名称。伊斯兰历139年（756年），麻剌乞牙城奉哈里发满速儿的敕命重建，在这里还修建了一座优美的清真寺，有4000人的军队受命驻防于此。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斯塔赫里将该城记载为一座山峦环抱的大城，其附近种植葡萄、扁桃（巴丹杏）、核桃树，这里可产寒、热带地区的作物。拜占庭帝国与穆斯林在该地发生过很多次拉锯战，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亚库特称这里仍是希腊人的土地。14世纪时，穆思套菲说麻剌乞牙城是一座优美的城市，拥有坚固的城堡。这里的草原很有名，其附近地区可产粮食、棉花和大量的水果。麻剌乞牙城附近的一座山顶上有一个叫答亦儿·八儿速麻（Dayr Barsuma）的修道院，可疾云尼说该修道院极受基督徒的崇敬，其内居住着很多修士。

答兰达（Tarandah，在《世界志》中就如此称之）堡，即现代的达仑代（Darandah）城[33]，位于苦八吉卜河上游地区，距麻剌乞牙城之北有三站之地。早在伊斯兰历83年（702年），这里就驻防有一支负责守卫城市的穆斯林军队，但在伊斯兰历100年（719年）奉哈里发奥马儿（`Omar）二世[34]之命，此关被废。在拜占庭编年史文献中，此地常被称作塔兰塔（Taranta），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时，这里是保罗派最坚固的城堡之一。[35]

纳赫儿·卡拉吉斯（Nahr Karākīs）河是苦八吉卜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其从南边汇入苦八吉卜河，卡拉吉斯河上游有大兹八塔剌（Zibatrah）关，拜占庭称作索左颇特拉（Sozopetra或Zapetra），其

遗址所在地可能就在委兰·沙合儿（Vīrān Shahr）[36]，靠近算端·速（Sultān Sū）河[37]，即现代的卡拉吉斯河岸边，距离麻剌乞牙城南有几里格。巴拉祖里和伊斯塔赫里均称兹八塔剌是靠近希腊边界的一座大关，数次被拜占庭帝国所毁，但哈里发满速儿和后来的哈里发马蒙进行了重修。亚库特和其他著述家将兹八塔剌关和哈达思（Al-Hadath）关[38]并提，现在需要对前一个关做解释。在阿拉伯和拜占庭编年史文献中，兹八塔剌（Zibatrah，或Sozopetra）关因起先被西奥菲利斯（Theophilus）皇帝[39]夺得，后又被远征阿木里牙（`Amūrīyah）城的哈里发木塔欣（Mu`tasim）重新夺回而声名远播，有关这次远征的内容将在下章做叙述。兹八塔剌关历来是险要之地，但伊斯兰历715年（1315年）阿布·勒·费达访问该地时，该关已毁。此时，旧城墙几乎没有留下多少遗迹，其耕地也完全撂荒，因此阿布·勒·费达在先前曾是农田的橡树林中找到了一处极好的猎场，并说这里的野兔肥大，在其他地方不易见到。他称这里距麻剌乞牙城之南有两程远，距喜森·满速儿（Hisn Mansūr）关也有两程远，该关下文要谈及。[40]

哈达思（Al-Hadath）关，拜占庭称作阿达塔（Adata），奥马儿（`Omar）在位时期，穆斯林夺得此关，并经常在历史文献中提及。阿拉伯语中哈达思（H*adath*）一词意为“消息”，尤指“不幸的消息”，巴拉祖里称那里的道路旧称达儿卜·哈达思（Darb-al-Hadath，意为“不幸道”），穆斯林夺取哈达思关后，将道路名称改为达儿卜·色兰（Darb-as-Salāmah），即平安道。但如下章所述，达儿卜·色兰道通常是指经过思里思（Cilician）门的君士坦丁道。哈达思城有一座清真寺，伊斯兰历162年（779年）哈里发马赫迪重建该城，此后诃论·剌失德进行了重修，并在此派驻了一支2000人的守军。伊斯塔赫里称此城附近土地肥沃，拜占庭和穆斯林曾多次争夺这里的关隘。据亚库特和其他人记载，哈达思城被称为哈木剌（Al-Hamrā），即“红色”，因这里的土地全是红色的，其城堡建于一座叫乌亥答（Al-Uhaydab，意为“小驼背”）的山上。伊斯兰历343年（954年），哈马丹（Hamdān）王朝的塞弗·道剌（Sayf-ad-Dawlah）[41]经过多次争夺，最终从希腊人手中夺得该地，并进行了重建。伊斯兰历545年（1150年），这里落入塞尔柱王朝乞利吉·阿思兰（Kilij Arslān）之子麻速（Mas`ūd）手中。

哈达思城附近的河称作居利思（Jūrīth）河，或忽利思（Hūrīth）河，伊本·塞剌皮昂误将这条河认作苦八吉卜（Kubākib，即Malatiyah）河的一条支流，但亚库特将其记载为忽利思河，并准确地说这条河是纳

赫儿·贾汗［Nahr Jayhān，即派剌木思（Pyramus）］河的一条支流。据伊本·塞剌皮昂记载，哈达思（Hadath）河的源头是一眼叫阿因·札尼思（`Ayn Zanīthā）的泉，并说该河在到达哈达思城之前流经一系列的小湖；居利思河（他所称的河名）汇入阿儿建（Al-`Arjān）河，这些河流发源于贾八儿·利喜（Jabal-ar-Rīsh）山区，哈达思城由阿儿建河引来的河渠提供水源，而后这些河渠又汇入阿儿建河。阿布·勒·费达补充说哈达思城距贾汗河的干流12英里，此河从“阿里（Alī）派关”流过。哈达思城的确切位置无法确定，但无疑其保护着从麻儿阿什［Mar`ash，即戈儿曼尼西亚（Germanicia）］城[42]到不思田（Al-Bustān，即Arabissus）城道路上的关隘，此城应在现今伊尼克（Iniklī）地区附近的阿可·速（Āk Sū）河[43]岸边，这条河实际上是贾汗河的源头之一。[44]

喜森·满速儿关和八哈思纳（Bahasnā，此关现存）关[45]位于河岸边，其对应的两条河流均是幼发拉底河右岸的支流，在速麦撒（Sumaysāt）城南相继汇入幼发拉底河。喜森·满速儿关，现在常称作阿德亚曼（Adiamān）[46]，拜占庭则称作皮儿合（Perrhe）。此关以修建者凯思（Kays）部的满速儿（Mansūr）之名命名，他是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麦儿旺二世在位时期在此驻防的长官，于伊斯兰历141年（758年）被杀。喜森·满速儿关在马赫迪在位时期，由其子诃论·剌失德重建，伊本·豪喀尔说，这是有一座聚礼清真寺的小城。此地灌溉水源充裕，但伊本·豪喀尔称这里和其他边关的命运一样，轮番受到拜占庭和穆斯林的洗劫和破坏。据亚库特记载，该城有一道三座城门的城墙，城外还有一道沟壕，城中有一座双层城墙防护的城堡。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阿布·勒·费达记载，喜森·满速儿城周边的土地还在耕种，但该城已毁。

纳赫儿·阿兹剌可（Nahr-al-Azrak）河，即蓝河[47]，流经喜森·满速儿关西北，该城在幼发拉底河之北的台地上，幼发拉底河则沿着台地边缘向南流。八哈思纳（Bahasnā）关在十字军编年史中称作波赫斯丁（Behesdin），位于喜森·满速儿关之西，其所在地区叫作凯速木（Kaysūm）。八哈思纳堡修建在一座山顶上，在堡南的城中修建有一座聚礼清真寺，那里还有很好的市场，周边的土地很肥沃。亚库特称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堡。其附近是散贾（Sanjah）河，此河显然就是希腊人所称的星噶斯（Singas）河，其岸边有散贾（Sanjah）小城[48]，城附近的小河上横跨着一座著名的石砌桥，其拱形的桥洞很漂亮，可谓杰

作。伊本·豪嘻尔称散贾（Kantarah Sanjah）桥是世界奇迹之一。亚库特谈到了散贾河与凯速木（Kaysūm）河[49]，并称这两条河流均是幼发拉底河的支流，他说该桥是一座单拱桥，横跨于河之两岸，跨度超过200步。他又说此桥是用表面光滑的巨石块建成的，每个石块长10腕尺、高5腕尺，但没有提到宽度，他声称该桥是在护符的护佑下建成的。[50]

贾兹剌或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可供贸易的产品很少。穆嘻达思列举了一些，主要是土产。首府毛夕里地区输出粮食、蜂蜜、木炭、奶酪、黄油、漆树胶、石榴、木蜜、腌肉和乞利合（tirrīkh）鱼，以及铁、手工刀具、箭矢、锁链与高脚杯等；欣贾儿地区产扁桃、石榴、橄榄油、漆树胶和甘蔗等；纳思宾地区产核桃；剌噶产橄榄油、肥皂和制笔的芦苇等。剌赫八产的温柏很有名。哈兰产蜂蜜和叫苦拜（Kubbayt）的著名果酱；贾兹剌·伊本·奥马儿产坚果、扁桃（巴丹杏）和黄油及繁衍于该地草原上的良马。小哈卜儿（Khābūr，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河岸边的哈散尼牙（Hasanīyah）城附近产奶酪、鹧鸪、家禽和干果；其附近的麻剌思牙（Ma`alathāyā）城（及周边）产木炭、葡萄和其他新鲜水果、腌肉、麻籽和麻织品；低雅儿·八吉儿地区的阿迷得城所产的毛制品和棉织品很有名。[51]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诸道是亦剌可道的延续。从报达城到毛夕里城的邮道沿着底格里斯河的东岸北上，并从塔可里忒城进入贾兹剌地区；该道继续沿底格里斯河岸向北，直抵贾卜儿塔城，再经欣城和哈第撒城，到达毛夕里城。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以及后来的穆思套菲记载了这条道路。[52]

从毛夕里城，道路转向底格里斯河的右岸或西岸，向北到达八剌（Balad）城，在这里道路分为两支：左路经欣贾儿城到达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喀儿吉思雅城；右道经纳思宾城到达喀发儿土撒（Kafartūthā）城，这里道路又分为两条—右支到阿迷得城；左支经剌思·阿印城南下到幼发拉底河岸的剌噶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库达玛均记述了这条从毛夕里城到阿迷得城的干道，穆嘻达思也做了记载，还记载了行程；这些文献也记载了到幼发拉底河岸边的交叉道路。穆嘻达思还记述了经哈散尼牙城直达贾兹剌·伊本·奥马儿城的道路，他也提到了经阿儿赞城到凡湖附近的八忒里思城的道路。[53]

沿着幼发拉底河右岸或西岸北上的邮道从阿鲁萨（Alūsah）城经阿

纳城到达该河沿岸的弗儿答（Al-Furdah）港。这里道路分为两支：一路沿幼发拉底河北上到达喀儿吉思雅城对面的法什（Fāsh）城[54]，然后再沿该河的西岸到达剌噶城；另一路，即左支，在弗儿答港附近直接横穿沙漠，再经鲁萨法城，到达剌噶城，这样就可以绕过幼发拉底河的弯道。鲁萨法城是一个重要的驿站所在地，因该处有两条向西横穿叙利亚沙漠的道路，即去往大马士革的道路和去往欣思（Hims，即Emessa）城的道路。如前所述，在喀儿吉思雅城和剌噶城，会合了几条大道：一条是从毛夕里城出发，经欣贾儿城的道路；另一条是从纳思宾城出发，经剌思·阿印城和八贾儿宛（Bajarwān）城的道路；还有一条从剌噶城起程的道路，经八贾儿宛城，后经哈兰城和鲁哈（即夷得萨）城到达阿迷得城。

最后一条是从剌噶城起程的道路，这是一条近道，其绕过了幼发拉底河的大弯道，而后经萨鲁吉（Sarūj）城，到达速麦撒城；此后该道经过喜森·满速儿、麻剌乞牙、坎合（Kamkh）和前面提到的许多关隘等。但很可惜，文献中并没有记载这条道路的里程，因此无法准确地确定哈达思城和兹八塔剌城的位置，尽管穆喀达思还常提到一些涉及边关周边情况的信息，但哈达思城和兹八塔剌城的位置问题仍悬而未决。[55]

[1] 普林尼撰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第5卷，第24章，第75～76页）载："差不多相近的报道称河（幼发拉底河）的源头位于大阿剌蛮地区的卡拉尼提斯（Caranitis）。这条河先流到迪尔克斯尼（Derxene），而后经过阿尼（Ane），从阿剌蛮地区流入卡帕迪亚（Cappadia）地区，再经过距斯米拉（Simyra）75英里的达斯图斯（Dastusee）。而后从此地经50英里到达帕斯图纳（Pastona），再经74英里到达卡帕迪亚地区的美里特纳（Melitene）城。又经10英里到达阿剌蛮地区的厄里基亚（Elegia），在这里有里卡斯（Lycus）河、阿儿三尼阿（Arsania）河与阿儿萨奴思（Arsanus）河汇入。在厄里基亚附近与陶鲁斯（Taurus）山相交。""穿过此山的地方叫奥米拉斯（Omiras），距该地不远，这条河被称为幼发拉底河。"译者。

[2] 《亚美尼亚史》（*The Armenia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第60～61页（原文第109页）中阿儿三尼阿思·夫鲁门河作阿剌忒萨尼（Aratsani）河，7世纪初希腊军队在安哥儿（Angl）村附近渡过阿剌忒萨尼河，集结并驻扎在萨儿科屯（Tsalkotn）地区（该地区现为亚美尼亚的一个省），与波斯军队对垒，最后希腊军队败北。译者。

[3] 即穆拉特河（Murat Nehri），是东幼发拉底河的主要支流之一，全长722公里。译者。

[4] 《亚美尼亚史》第92页（原文第132页）中塔伦作塔仑（Taron）。译者。

[5] “麻纳兹吉儿德（Manāzijird）是靠近哈儿塔必儿［Khartabirt，奥斯曼帝国地图作哈尔普特（Charaput），位于幼发拉底河以东16英里处，在北纬38°26′］的一座城市，不要与满纳兹吉儿得（Mānāzkird）相混淆，后者是哈喇忒城（Khalāt，这座城今在土耳其境内的凡湖最北端）所属地区的一座城堡。”“哈儿塔必儿就是著名的喜森·兹牙（*Hisn Ziāt*）。”见Ibn Khallikān《人物字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德斯兰（De Slane）译，巴黎，1842年，第2卷，第128页。译者。

[6] 今为穆什（Mush），是穆什省的省会，人口8万，位于穆拉特河支流的岸边。译者。

[7]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1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46、25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07页；第4卷，第648、68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5、167页。哈吉·哈里发显然是最早进行记载的作者（*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426页），他在伊斯兰历1010年（1600年）将东幼发拉底河称作木剌·速（Murād Sū），而且他的著作完成于算端木剌四世在位之前，按常规，这可以证明该河不是以此统治者的名字命名的。

[8] 今为加纳克基（Çanakçi Deresi）河，是幼发拉底河上游穆拉特河的重要支流之一。译者。

[9] 今为皮里·苏育·察伊（Pere Suyu Çayi）河，是幼发拉底河上游穆拉特河的重要支流之一。译者。

[10] 今为帕卢（Pālu）。属于埃拉泽（Elazığ）省，位于穆拉特河岸边，是座古镇，人口有8000。译者。

[11] 今为埃拉泽（Elazığ），古代称作 哈儿伯儿（Kharberd或Χάρπετε）、麻木乐图拉孜孜（Mamuretülaziz），后发音发生变化，读成今音。为同名省的省会，人口34.7万，是丝路古城，也是交通要道，多条道路在此相交。译者。

[12]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0、13、30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23页。巴拉祖里，第13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276、417页；第3卷，第31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62页。

[13] 今为卡拉苏（Karasu）河，在埃尔祖鲁姆城以北约23公里的山区，向西南流约470公里，在克班以北8公里处与穆拉特河汇合后，被称为幼发拉底河。卡拉苏河谷地与阿拉斯河谷地是土耳其东部两条东西向的天然交通孔道。译者。

[14] 今为埃尔祖鲁姆，现为土耳其东安纳托利亚地区最大省埃尔祖鲁姆（Erzurum）省的省会，人口36万。此地有很多名胜古迹。译者。

[15] 《亚美尼亚史》中多次提到喀林城，如第7、34、37、63、64、66、67页，分别对应原文第68、89、91、111～114页，并记载了很多发生于该城的重大事件。即现在的埃尔祖鲁姆城。译者。

[16]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埃尔祖鲁姆省同名省会东边约50公里的科普鲁克伊（Koprukoy）城附近。译者。

[17] 今为埃尔津詹，位于土耳其东北部，是与之同名的埃尔津詹（Erzinjan）省的首府，人口8万。译者。

[18] 穆斯林禁止饮酒。译者。

[19] 鲁姆塞尔柱王朝第十八代君主，在位时间为1298～1302年。译者。

[20] 应为土耳其北部省份巴伊布尔特（Bayburt）省省会巴伊布尔特城所在地，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名胜古迹甚多，现人口3. 5万。译者。

[21] 今为凯马赫（Kemah），是埃尔津詹省的一座小城，位于卡拉苏河岸边，人口2000，是古代罗马帝国与大食帝国的边陲重镇。译者。

[22]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0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74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第214页。*Tanbih*，第5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05、206、408、444页；第3卷，第860页；第4卷，第19、304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7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2、163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91页；第2卷，第252、403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93、294页。

[23] 今为察勒提·苏育·察伊（Çalti Suyu Çayi）河，是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重要支流之一。译者。

[24] 今为迪夫里伊（Divrigi），是土耳其北部锡瓦斯（Sivas）省的小城，位于卡拉苏河支流的岸边，人口1万，有名胜古迹，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译者。

[25] 保罗（Paulician）派是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异端教派之一，约产生于5世纪的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7世纪下半叶传播于拜占庭，8～9世纪得到广泛发展。其教义受摩尼教影响，相信善恶二元论。译者。

[26] 今为以弗所，在今土耳其西边靠地中海沿岸的伊兹梅尔（Izmir）省库萨达瑟（Kusadasi）城东不远。这里保存有古罗马时期的著名建筑，是突厥境内的旅游胜地。译者。

[27] 应该就是幼发拉底河上游西边的支流库鲁克·察伊（Koluk Çayi）河。译者。

[28] 今为阿拉普基尔（Arapgir），其旧城在今城以南约3公里处，是马拉蒂亚（Malatya）省的一座城市，人口1.7万，位于东西幼发拉底河汇合处，是丝路古镇，其所在地区也是土耳其重要的农业区。译者。

[29]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1、31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54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卷，第74页。*Tanbih*，第151、18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87页。Ibn Bibi，第210、31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

（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2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24页。也可参阅*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lreland*，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95年，第740页；*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lreland*，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96年，第733页的订正。

[30] 《亚美尼亚史》中提到了美里特纳城，并称萨珊王阿奴设里万于576年到达该城，并与希腊军队发生激战，结果波斯军队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仅阿奴设里万和少数人幸免，并逃回波斯本土（第8～9页，原文第88页）。又称610年波斯军队占领美里特纳城（第66页，原文第113页）。今为马拉蒂亚（Malatya），是土耳其马拉蒂亚省省会，位于幼发拉底河南岸，人口42万，古迹甚多。译者。

[31] 即图赫马·察伊（Tohma Çayi）河，是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马拉蒂亚西南部山区。译者。

[32] 即杰伊汉河，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的托罗斯山，向东南流经埃尔比斯坦，哈尔曼（Harman）河等许多小河汇入，再向南有阿克苏（Aksu）河汇入，后转向西南在伊斯肯德伦湾汇入地中海，全长约509公里。译者。

[33] 是马拉蒂亚省的区名和城市名。达仑代城人口约有1万，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4] 倭马亚王朝第八位哈里发，717～720年在位。译者。

[35]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0、12、13页。巴拉祖里，第185、187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6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2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26、63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3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56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24页。现代的麻剌乞牙城在中世纪城堡南2里格处。这座旧城市的遗址在艾斯吉·沙合尔（Eskī-Shahr）城，靠近一座叫吉儿高兹（Kirkgoz）的古桥，流过该桥的土合麻·速河在此城北不远处汇入幼发拉底河。

[36] 今为马拉蒂亚省的多安谢希尔（Doğanşehir，曾称Muhacir、Viransehir、Viranşehir）城，人口1.1万，是一座古城，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37] 今为苏丹水·察伊（Sultān Sūyu Çayi）河，是库鲁克·察伊河下游南岸的支流，在马拉蒂亚城北边约20公里处汇入库鲁克·察伊河。译者。

[38]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卡赫拉曼马拉什（Kahramanmaraş）省的努尔哈克（Nurhak）城附近，地处东西要道，是丝路古镇。译者。

[39] 拜占庭皇帝，829～842年在位。译者。

[40]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3页。巴拉祖里，第191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6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914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234页。安德森（J. G. C. Andeson）先生曾在《古典评论》（*Classical Review*，1896年4月号）发表论文讨论兹八塔剌城和哈达思城的位置，他的论文题目是《公元872年八思儿一世反击保罗派教徒的战争》（*The Campaign of Basil I against the Paulicians in 873 A. D.*）。

[41] 945～967年在位。译者。

[42] 即卡赫拉曼马拉什省的同名省会，人口44.3万，是座优美漂亮的丝路古城，从古至今都在道路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译者。

[43] 今为阿克苏·察伊（Aksu Çayi）河，希腊人称作克斯托罗斯（Κεστρος），发源于托罗斯山脉，汇入杰伊汉河。译者。

[44] 巴拉祖里，第189～191页。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

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1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6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2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218页；第4卷，第838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263页。

[45] 今为贝斯尼（Besni），是阿德亚曼（Adiyaman）省的一座城市，在阿德亚曼城以西44公里处，丝路重镇，是去往地中海、土耳其各地的要道。译者。

[46] 此城为喜森·满速儿关所在地，1926年前使用旧名，1926年后改为现名。其为阿德亚曼省的同名省会，人口20万，是丝路古城，有多条道路在这里相交，是去往地中海、土耳其各地、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要道。译者。

[47] 即考克苏·察伊（Göksu Çayi）河，发源于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努尔哈克城西南山区，全长约120公里，汇入幼发拉底河，其河谷地带是土耳其重要的农业区，也是丝路要道。译者。

[48] 今此城位置难以确定。译者。

[49] 这两条河的方位难以确定。译者。

[50] 巴拉祖里，第192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6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2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70页；第2卷，第278页；第3卷，第162、860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265、269页。散贾（Sanjah）桥是世界奇迹之一，其他三大奇迹为前文提到的吏得萨城教堂、亚历山大港的灯塔（Pharos）和大马士革的大清真寺（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91页）。令人奇怪的是穆喀达思曾两次混淆散贾（Sanjah）河上的这座桥，因后来的所有记载称该河是幼发拉底河的右岸支流，并在速麦撒城附近汇入幼发拉底河，而这座桥显然在哈散

尼牙（al-Hasannīyah）城附近，其建在小哈卜儿（Khābūr）河上，它是底格里斯河的一条支流。这条河现在被称为博兰·速（Bolam Sū）河，与喀赫塔·茶伊（Kākhtah Chay）河汇合后在速麦撒城北不远汇入幼发拉底河。这条河显然就是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说的纳赫儿·散贾（Nahr Sanjah）河。这座著名的大桥作为世界奇迹之一，现在依然存在。这座大桥是罗马皇帝维斯帕斯安（Vespasian，公元69～79年在位，译者）修建的，112英尺长的单孔横跨在喀赫塔·茶伊河汇合处北边的博兰·速河上。据文献记载，这座桥是“罗马时期最恢宏的建筑遗存之一”，而有关它的图片见于《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1896年10月号，第323页），更详细的内容也可以参看胡曼（Humann）和普切斯坦因（Puchstein）撰写的《小亚细亚旅行记》（*Reisen in Kleinasien*）中插图第41、42和43幅。

[51]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5、146页。

[52]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93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5、148、14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5页。

[53]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95、96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4、215、21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9、150页。

[54] 今此城名不存，应为伊拉克安巴尔省的小城Al-Ribat（即守捉），在幼发拉底河岸边，与叙利亚边界不远。曾是丝路要道。译者。

[55]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96、97、98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

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5、216、21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49、150页。

第九章 鲁迷或小亚细亚（Rūm or Asia Minor）地区

必剌·鲁迷（Bilād-ar-Rūm）或希腊地区。从麻剌乞牙（Malatiyah）城到塔儿速思（Tarsūs）城的诸关防线。陶鲁思（Taurus）防线的两座主要关隘。经思里思（Cilician）门的君士坦丁堡道路。忒勒必棕（Trebizond）城。三围君士坦丁堡。穆斯林奇袭小亚细亚。木塔欣（Mu`tasim）哈里发时期洗劫阿莫廉（Amorion）城。塞尔柱人攻入小亚细亚。小阿剌蛮王国。十字军。鲁迷（Rūm）塞尔柱算端朝的两座主要城市。

拜占庭帝国诸地，穆斯林泛称必剌·鲁迷（Bilād-ar-Rūm），即“希腊之地”；鲁迷（Rūm）一词就是指罗马（Romaioi，或Romans），该词在穆斯林早期时代无论指希腊人还是指拉丁人，其意等同于“基督徒”。地中海通常也称作八哈儿·鲁迷（Bahr-ar-Rūm），即“罗马海”（Roman Sea）。必剌·鲁迷一般简称为鲁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名称专指最靠近穆斯林边疆的基督教地区，因此阿拉伯人通常所指的鲁迷就是小亚细亚，这一辽阔的地区在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末被塞尔柱人夺取，最终纳入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的统治之下。

很可惜，因当时的历史文献缺载，我们对中世纪基督教统治时期，或穆斯林统治时期的小亚细亚历史和历史地理的有关详细内容了解不多。[1]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的那个时代，地理学家对罗马帝国的一个地区知之不多是无可厚非的，但可惜的是塞尔柱突厥人占领此地之后，穆斯林著述者完全忽视了对这一边远穆斯林地区的记载。因而与其他地区不同，关于该地区全面系统的记录留下很少，流传至今的第一部全面记载穆斯林统治下小亚细亚情况的文献是哈吉·哈里法撰写的著作，这部著作成书的时间晚至伊斯兰历11世纪（17世纪）初，此时该地区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版图差不多有200年了。[2]

和倭马亚王朝统治时代一样，在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统治被蒙古人推翻前的一个半世纪里，穆斯林和拜占庭的边界线就在陶鲁思（Taurus）山脉和安蒂陶鲁思（Anti-Taurus）山脉。这条有众多边关

（阿拉伯语称“关”为Ath-Thughūr）的绵长防线，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麻剌乞牙城一直延伸到靠近地中海岸边的塔儿速思（Tarsus）城[3]，划定边界和防守边关均由此来确定；这些边关随着拜占庭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事变化而变化，如同海潮一样，常会易主。这条边界线通常被分成两组：守卫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北边关（Thughūr-al-Jazīrah）和守卫叙利亚的西南边关（Thughūr-ash-Shām）。前一组的边关包括麻剌乞牙、喜森·满速儿、八哈思纳、哈达思等城（堡），这些城（关）在前一章已述及，接着就是麻儿阿什（Mar`ash）、诃论尼雅（Al-Hārūnīyah）[4]、喀尼撒（Al-Kanīsah）[5]和阿因·札儿八（`Ayn Zarbah）[6]等城（关）。后一组关隘靠近伊思坎达利雅［Iskandarīyah，即亚历山大拉塔（Alexandretta）］海湾[7]北部的海岸线，保卫着叙利亚地区，包括麻思撒（Al-Massīsah）[8]、阿札纳（Adhanah）[9]和塔儿速思（Tarsūs）等城。

麻儿阿什城就是拜占庭所称的马拉斯桑（Marasion），据说其位置在戈儿曼尼西亚（Germanicia）之地，是哈里发木阿威雅（Mu`āwiyah）在伊斯兰历1世纪（7世纪）重建的；倭马亚王朝末期，这里是一座坚固的城堡，此地有很多穆斯林居住，因他们在此建有聚礼清真寺。诃论·剌失德用两重城墙和一条沟壕重新加固了该城堡。据亚库特记载，其内城堡称作麦儿旺尼（Al-Marwānī）堡，以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麦儿旺二世之名命名。伊斯兰历490年（1097年），麻儿阿什城被戈弗雷·德·鲍伦（Godfrey de Bouillon）[10]率领的十字军占领，由此其变成了小阿剌蛮（Little Armenia，是后来的名呼）王国[11]的一座重镇，在该王国灭亡之前，小阿剌蛮王国的大部分地区控制在基督徒的手中。阿因·札儿八城堡被十字军称为阿纳札卜思（Anazarbus），至今仍在。伊斯兰历180年（796年），诃论·剌失德重建和加固了该城堡，伊斯塔赫里称此城（`Ayn Zarbah）位于一片平原上，这里生长着棕榈树，周边的土地肥沃，此城的城墙很坚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是一座相当繁华的城市。据说约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中叶，哈马丹王朝的统治者塞弗·道剌（Sayf-ad-Dawlah）用300万底儿罕（约12万英镑）修建了该城的防御工事，但希腊人多次从穆斯林手中夺取此地。11世纪末，十字军夺得该城，并将其摧毁；此后，这里就成为小阿剌蛮王国领土的一部分。阿布·勒·费达称该城在一座山脚下，其山上是一座坚固的城堡，此城距思思（Sīs）城[12]之南有一天的路程，还说贾汗河自城南流过。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阿因·札儿八之名被误读为瑙瓦儿札（Nāwarzā）。

诃论尼雅（Al-Hārūnīyah）城（关）和喀尼撒（Al-Kanīsah）城[13]（堡）的确切位置不得而知，但其应在麻儿阿什城和阿因·札儿八城之间的山区。诃论尼雅城距麻儿阿什城之西有一天的路程，是麻儿阿什城的外围城市，该城之名取自修建者诃论·剌失德，伊斯兰历183年（799年），诃论·剌失德修建了该城。该城位于录坎（Lukkām）山脉之西的一条山谷里，此山应是穆斯林地理学家大致所指的安蒂陶鲁思山。伊本·豪喀尔似乎曾访问过这里，并说这里的村庄人口稠密，过去修筑的城堡很坚固，但已被拜占庭摧毁了。据亚库特记载，伊斯兰历348年（959年）男女穆斯林1500口（在该城）被俘。此后，诃论尼雅城由哈马丹王朝的塞弗·道剌重建，后又被基督徒占领，而后成为小阿剌蛮国王领地的一部分。喀尼撒（Kanīsah）全名为喀尼撒·扫答（Kanīsah-As-Sawdā，即黑色教堂），是一座用黑石修建的古老城堡，巴拉祖里说这是希腊人修建的城堡，还说诃论·剌失德在这里修建了坚固的城墙，且守军精锐。这里有座聚礼清真寺，显然该城在贾汗河之南，因伊斯塔赫里称此城“距离海岸有一段路程”。阿布·勒·费达又说该城距诃论尼雅城只有12英里，在他那个时期，该城和诃论尼雅城一样属于小阿剌蛮王国。

邻近此地的另一城堡就是阿拉伯人所称的木撒喀卜（Al-Muthakkab，意为被刺穿的）堡；据亚库特记载，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该堡位于群山之间，巨大的孔道像被刺穿一般”。其确切位置尚不清楚，但距离喀尼撒城不远，应在录坎山脚下，位于海边的麻思撒（Massīsah）城附近。该城堡是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喜苫修建的；另一说是奥马儿（`Omar）二世修建的；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里保存着一部由倭马亚王朝最虔诚的哈里发奥马儿二世亲手誊写的《古兰经》。巴拉祖里称，来喜森·木撒喀卜（Hisn-Al-Muthakkab）堡开凿壕沟的工程人员发现了一块埋在地下的异常巨大的人腿骨，并将其看成是一种祥瑞，作为珍物献给了哈里发喜苫。[14]

麻思撒（Al-Massīsah，即Mopsuestia）、阿札纳（Adhanah，即Adana）和塔儿速思等三座城均是希腊人修建的，至今犹在。麻思撒城位于纳赫儿·贾汗［Nahr Jayhān，即派剌木思（Pyramus）］河岸边。伊斯兰历1世纪（7世纪），此城被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卜得·灭里（`Abd-al-Malik）之子阿卜·阿剌（`Abd-Allah）攻占，他在此地重建了城墙，并驻扎了一支雄兵，在山顶上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将城墙内的基督教堂改建成了粮仓。不久在贾汗河另一岸边，修建了外城或第二城区，称作喀发儿拜雅（Kafarbayyā）城，在这里哈里发奥马儿二世修建

了第二座清真寺和一个大水池。位于贾汗河东边的第三城区是倭马亚王朝的最后一位哈里发麦儿旺二世修建的，被命名为忽速思（Al-Khusūs）；他用沟壕和城墙将其围起来，城门为木制。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哈里发满速儿将一座古神庙改建为聚礼清真寺，其规模比奥马儿二世修建的老清真寺大三倍。诃论·剌失德重建了喀发儿拜雅城，马蒙又扩建了其清真寺。喀发儿拜雅城和麻思撒城的城区是通过贾汗河上的一座石桥连接起来的；这座城市被称为麻木里雅（Ma`mūrīyah，意为"繁荣"或"建造优美"），据说其与哈里发满速儿有关，因伊斯兰历139年（756年）该地发生地震后，此城部分被毁，满速儿将其修复。后来，麻思撒城和其邻近的城市一样成为小阿剌蛮国王的领地。

邻近的阿札纳城，位于纳赫儿·赛汗［Nahr Sayhān，即萨鲁思（Sarus）］河[15]岸和从麻思撒城起程的道路上，这里有一座大桥，其建造的时间可追溯到犹斯汀安（Justinian）[16]时代，但在伊斯兰历125年（743年）进行了重修，并以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利（Walīd）[17]的名字命名为瓦利桥（Jisr-al-Walīd）。伊斯兰历225年（840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木塔欣重修此桥。伊斯兰历141年（758年），满速儿重修了阿札纳城的一部分，伊斯塔赫里称这是座很惬意的城市，位于赛汗（Sayhān）河的西岸，城墙坚固，人口稠密。据亚库特记载，其城堡在该河的东岸，并用一座单拱桥与城市连接起来。阿札纳城本身靠拥有八座城门的城墙，以及城外很深的护城河保护着。

萨鲁思（Sarus）河与派剌木思（Pyramus）河被穆斯林分别称为纳赫儿·赛汗河与纳赫儿·贾汗河。早期，这两条河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和希腊地区的界河。这两条河同中亚更为著名的乌浒水（Oxus）和药杀水（Jaxartes）名称相近或相似，阿拉伯地理学家将后两条河称为质浑（Jayhūn）河和细浑（Sayhūn）河，这将在后面章节中述及。文献中记载的贾汗河与赛汗河就是萨鲁思河与派剌木思河，均发源于小阿剌蛮王国北部的高原。阿布·勒·费达说贾汗河的大小与幼发拉底河相当，还说在他那个时代该河名称通常拼写为贾汗（Jahān）河，该河流经麻思撒城后，在麻伦（Al-Mallūn，或Mallus，后来的Malo）港[18]之北的阿牙思（Ayas）湾注入地中海。赛汗河水量较小，阿札纳城是该河岸边唯一重要的城市。前文已提及，此河因有一座著名大桥而闻名，马苏迪说贾汗河与赛汗河被看作天堂之河。[19]

但所有边关城市中最重要的是塔儿速思（Tārsūs，或Tarsus）城

[20]，早期，这里有大批骑兵和步兵驻扎，因塔儿速思城控制着陶鲁思防线南边的通道，这个著名的关卡称作思里思（Cilician）之门。伊本·豪喀尔称塔儿速思城有两道石头城墙，驻守有100000骑兵；他还说："此城和希腊地区之间有一条很高的山脉，是贾八儿·录坎（Jabal-al-Lukkām）山的余脉，这座高山是伊斯兰地区和基督教地区的一道屏障。"伊本·豪喀尔解释说，他在伊斯兰历367年（978年）所看到的大批驻军绝大部分是来自伊斯兰各地、反击拜占庭人的志愿者。他还说："这里有来自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之境、阿拉伯半岛、叙利亚、摩洛哥等地大城市的人，没有一座城市能像塔儿速思城这样向城市居民提供住处（*Dār*），这里居住着来自各个特定地区为信仰而战（*Ghāzī*）的战士。他们一旦到达塔儿速思城，就居住在这里，并在驻防部队中服役；这些人对礼拜和功修特别勤勉；他们接受丰富且充足的供给，而且几乎没有一位统帅（Sultān）不派援军来到这里。"

阿拔斯王朝早期，即马赫迪和诃论·剌失德在位时期，对塔儿速思城进行了全面的重修，起初这里驻守着8000人的精锐部队；连年反击基督教的远征活动就是从著名的吉哈门（Bāb-al-Jihād，即征战之门）起程的。哈里发马蒙卒于邻近的八赞敦［Badhandūn，即坡丹朵思（Podandos）］[21]，葬于塔儿速思城大聚礼清真寺的左边。纳赫儿·八剌丹［Nahr-al-Baradān，即赛奴思（Cydnus）］河穿城而过；该城的两道城墙上修建有六座城门，城外还有一条很深的护城河。亚库特还说塔儿速思城直到伊斯兰历354年（965年）仍是穆斯林的边城，当时拜占庭皇帝尼卡福儿［Nikfūr，即尼斯福鲁斯·福卡斯（Nicephorus Phocas）[22]］已占领许多边境要塞，后对塔儿速思城进行了围攻，并最终迫使该城投降。其中，有些穆斯林离开了此城；没有离开的穆斯林被迫缴纳人头税。所有的清真寺均被摧毁，"而且尼卡福儿烧掉了所有的《古兰经》，并将所有武器从武库中取走，塔儿速思城及其邻近地区一直控制在基督徒手中，直到伊斯兰历623年（1226年）"。

前文提到的古赛奴思（Cydnus）河通常称作纳赫儿·八剌丹或八剌答（Baradā）河[23]，伊本·法吉（Ibn-al-Fakīh）说此河也称作噶班（Al-Ghadbān）河。该河发源于塔儿速思（Tarsus）北部山区一座叫阿喀剌（Al-Akra`，意为"光秃"）的山，并在赛汗河口不远处注入地中海。早期，距塔儿速思城西一程远的地方是剌莫思（Lamos）河[24]，阿拉伯人称作纳赫儿·剌密思（Nahr-al-Lamis）河，这里是穆斯林和基督徒经常交换战俘及支付赎金的地方。越过这条河就是希腊城市塞琉古

（Salukīyah，即Seleucia of Cilicia）城，后来土耳其人将此城称为色勒可（Selekeh）城。[25]

陶鲁思防线穿过很多关隘，但其中的两座关隘是穆斯林每年专门用来袭击拜占庭帝国的地方。第一座关隘就是东北的达儿卜·哈达思（Darb-al-Hadath）关，位于从麻儿阿什城向北通往阿卜鲁思田（Abulustan）城[26]的道路上，阿卜鲁思田城后来称作不思田（Al-Bustān，拜占庭称Alastha，希腊人称Arabissus）。达儿卜·哈达思关由哈达思（Hadath，或Adata）要塞防守着，这在上一章节已述及。第二座关隘是早期利用最频繁的关隘，即思里思（Cilician，即西里西亚）门关[27]，它是从塔儿速思城通往北边的关隘，经过此关的道路可通到君士坦丁堡。这条路与邮道、拜占庭皇帝（Cæsar）和哈里发之间定期使臣往来的道路相交，是穆斯林或基督徒无数次大大小小突袭所经过的路线，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于伊斯兰历250年（864年）完成的著作里对这条道路做了详细的记载，他的记载被后来很多著述者所摘录。达儿卜·哈达思关南边就是达儿卜·色兰（Darb-as-Salāmah）关，即平安关，其连接着皮拉·思里思（Pyla Cilicia），即著名的思里思门关。[28]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做了如下记载。尽管他记下了很多地方的名称，但许多地方已无法准确对应希腊名称，这里将大致可以对应的名称放在下文的括号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称：从塔儿速思城起，6英里到兀来（Al-`Ullayk）城[29]，然后行12英里到剌洼（Ar-Rahwah，即洼地，可能是古之Mopsukrene）城[30]和角札（Al-Jawzāt）城[31]，而后行7英里到贾儿答苦（Ar-Jardakūb）城[32]，又行7英里到八赞敦［Al-Badhandūn，即坡丹朵思（Podandos），现在的Bozanti］城，这里有一眼叫剌喀（Rākah）的泉，附近是哈里发马蒙去世之地。从八赞敦再行10英里就来到思里思门关（北边的）尽头，靠近鲁鲁阿［Luluah，即劳隆（Loulon）］城[33]的“国王营地”（Mu`askar-al-Malik），附近有很多温泉和一个叫萨夫萨夫［As-Safsāf，即柳树，靠近福斯汀诺颇里思（Faustinopolis）］的城[34]，也叫喜森·撒喀利八［Hisn-as-Sakālibah，即萨剌沃碾[35]（Sclavonians）］堡。从“国王营地”（这里是皮拉·思里思关尽头）经12英里到洼底·塔儿法（Wādī-at-Tarfā，即塔麻利思红柳河谷）[36]，再行20英里到迷纳（Minā）城[37]，又行12英里到喜剌可剌［Hiraklah，即后来的阿剌可利牙（Arākliyah），希腊语为赫拉克里亚（Heraclia）］城，此城是诃论·剌失德突袭后夺得的。从喜剌可剌城行8英里到力宾（Al-Libn）城[38]，而后行15英里到剌思·噶八（Rās-al-

Ghābah，即森林的起点）城[39]，而后行16英里到麻思喀宁（Al-Maskanīn）城[40]，再行12英里到阿因·卜儿谷思（`Ayn Burgūth，即跳蚤泉）[41]，又行18英里到纳赫儿·阿合撒河（Nahr-al-Ahsā，即地下暗河）[42]，而后行18英里到苦尼亚［Kūniyah，即伊考尼奥斯（Iconius）］城。从苦尼亚城行15英里到阿剌缅（Al-`Alamayn，即双面路牌）城[43]，后行20英里至阿卜鲁阿萨纳（Abruasānah）[44]，再行12英里到洼底·角兹（Wādī-al-Jawz）河[45]，即“核桃河”，再行12英里到阿木利雅［`Amūrīyah，即阿莫廉（Amorion）］城[46]。前文提到的阿剌缅城到阿木利雅城还有一条路，即从阿剌缅城行15英里到克里特人（Cretan）纳思儿（Nasr）村，而后行10英里到八思力云（Al-Bāsiliyūn，即四十烈士）湖[47]顶端，再行10英里到信德（As-Sind）城，而后行18英里到喜森·思纳答（Hisn Sinādah，即Synades）关，又行25英里到麻噶儿（Maghl）城[48]，而后行30英里到阿木利雅城附近的森林。

从阿木利雅城，即阿莫廉城行15英里到哈剌卜（Al-Harrāb）[49]诸村，再行2英里到阿木利雅城的萨嘎利［Sāgharī，即桑噶留思（Sangarius）］河[50]；此地再行12英里到亦利吉（Al-`Ilj，意为“野蛮的”）[51]；而后行15英里到法剌密·噶八（Fālamī-al-Ghābah，即法剌密森林）[52]，再行12英里到喜森·竹忽（Hisn-al-Yahūd，即犹太）堡[53]，又行18英里到三答八利［Sandābarī，即三塔八流思（Santabarius）］[54]，再行35英里就是答罗利雅［Darawliyah，即朵里路木（Dorylæum）］城[55]附近的“国王驴子草原”。从答罗利雅城行15英里到噶鲁卜利（Gharūbulī）堡[56]，再行3英里到喀乃·灭里［Kanāi-al-Malik，即国王教堂，其为安那·孔尼纳（Anna Comnena）地区的八思里喀（Basilica）］[57]，又行25英里到土罗耳（At-Tulūl，意为“山峦”）[58]，再行15英里到阿喀洼儿（Al-Akwār）城[59]，又行15英里到达麻剌吉纳［Malajīnah，即麻剌吉纳（Malagina）］城[60]。从这里行5英里到亦思塔卜儿·灭里（Istabl-al-Malik，意为“国王的马厩”）[61]，再行30英里到灰尘喜森·噶卜剌［Hisn-al-Ghabrā，意为“尘土”，即吉波托思（Kibotos）］，此处有渡口可到爱贾罗思（Aigialos）关[62]，从此关行24英里到哈利吉（Al-Khalīj，意为“海峡”，即现在君士坦丁堡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噶卜剌（Al-Ghabrā）关的对面（即南面）就是尼吉雅［Nikīyah，即尼色牙，或尼瑟安（Nicæa）］城[63]。至此，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对君士坦丁堡路线的记载结束。[64]

早期阿拉伯著述者除了对君士坦丁堡路鲜有记载外，还对小亚细亚的地理概念认识不清，比如伊本·豪喀尔将完全不同的阿利思（Alis）河和萨岐兰（Sāghiran）河与哈利思（Halys）河[65]和桑噶留思（Sangarius）河相混淆。很多希腊城市名称以阿拉伯化的形式出现于早期编年史中，这些名称大部分保留下来，突厥人（即塞尔柱人，译者）征服此地后地名书写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但可惜的是阿拉伯著述者对这些城市的相关记载没有保留下来。这些城市所对应的（希腊语）名称不存在疑问，尽管不多，还是有一些：塔瓦纳（At-Tawānah）对应塔伊纳（Tyana）、达八萨（Dabāsah）对应特巴萨（Thebasa）[66]、麻剌苦必牙（Malakūbiyah）对应麻剌考皮阿（Malacopia）[67]、喜剌可剌（Hiraklah）对应赫拉克里亚（Heraclia）、剌兹（Lādhik）对应老底思牙（Leodicea）[68]、凯撒利雅（Kaysarīyah）对应卡帕多思牙（Cappadocia）地区[69]的色撒里牙·马扎卡（Cesarrea Mazaka）[70]、安塔吉牙（Antākiyah）对应皮斯迪亚（Pisidia）地区的安都（Antioch）[71]、苦乞牙（Kutiyah）对应考乞玉姆（Cotyeum）[72]、安苦剌（Ankurah）对应安高剌（Angola）[73]、阿夫速思（Afsūs）对应亦费所（Ephesus）城、阿必都思（Abidūs）对应阿必多思（Abydos）[74]、尼可木底牙（Nikmūdiyah）对应尼考密底牙（Nicomedia）[75]，以及还有其他一些对应的地名。

据伊本·豪喀尔记载，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忒勒必棕［Trebizond，可书写为塔剌八赞答（Tarābazandah或Atrabazandah）］城[76]是君士坦丁堡销往穆斯林诸地大宗货物的集散港口。货物到港后，阿拉伯商人或其代理商将其运过山区到达幼发拉底河上游岸边的麻剌乞牙城和其他城市。伊本·豪喀尔称，运输业被阿剌蛮人操控，他还说很多穆斯林商人常年居住在忒勒必棕城。他尤其提到了希腊产的亚麻布、毛织品和罗马织锦，所有这些纺织品都是通过哈里吉（Khalīj）或博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经海路运输的。这一时期忒勒必棕城的显要和盛名也可以从黑海的名称得到验证，当时黑海通常称作忒勒必棕海（Bahr Tarābazandah）。但黑海的正式名称为八合儿·本途思（Bahr Buntus或Puntush），希腊人称作庞托思（Pontos）海，很早以前的笔误（因将阿拉伯字母的音点写错了位置）造成了错误的拼写和读音，即尼途思（Nītus，或Nītush）海，这种错误写法还常被波斯或突厥著述者引用，错误变得如此陈腐以至于现在竟无人回想起来。[77]

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后半叶，在塞尔柱人征服小亚细亚之

前，阿拉伯著述者的地理文献中尽管很少记载此地区各城市的相关地理信息，但应该说穆斯林对这一地区是相当熟悉的；因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统治早期差不多在每年的春、秋两季 经陶鲁思防线诸关向希腊地区发动战争，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拿下君士坦丁堡。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时期，穆斯林军队实际上曾三次包围过君士坦丁堡，但每次的结果对进攻者均是灾难性的，这没有什么惊奇的，要知道从阿拉伯人的军事基地塔儿速思城越过小亚细亚高原到博斯布鲁斯海峡，其直线距离超过了450英里。

这三次著名的围攻战如下：第一次是伊斯兰历32年（652年）奥斯曼在位时期，当时尚未成为哈里发的木阿威雅穿过小亚细亚进行突袭，试图拿下君士坦丁堡，其先强攻，接着又合围，当听到哈里发奥斯曼被杀的消息后撤军。（木阿威雅）经过一系列战事后建立了倭马亚王朝。第二次围攻是伊斯兰历49年（669年）木阿威雅在位时期，他派其子和继承人雅兹底（Yazīd）[78]反击皇帝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79]；但由于军事统帅的无能，穆斯林军队遭到重创，雅兹底因其父去世，需继承大位，只好返回本土。第三次是哈里发搠里蛮（Sulaymān）[80]在位时期，也是最著名的一次，这次围攻君士坦丁堡断断续续持续了多年，搠里蛮在伊斯兰历96年（715年）派遣其弟麻思剌嘛（Maslamah）攻打（拜占庭皇帝）里奥（Leo）[81]，别名伊索利亚（Isaurian），此役穆斯林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这在阿拉伯文献和希腊编年史中均有全面、详细的记载；这些战争使得阿卜·阿剌（`Abd-Allah）—一个绰号为“冠军”（Al-Battāl）的人出了名，其事迹在突厥人中广为流传，长久以来人们将其看成是民族英雄，是战无不胜的伊斯兰战士。

尽管（穆斯林）屡遭失败和受到损失，但在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之后，除了在哈里发继位初期有过短暂的停顿外，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阿拔斯王朝）数次围攻君士坦丁堡，并年复一年地发动战争，虽然由于实力有限未夺取该城，但他们不断对整个小亚细亚进行洗劫、抢夺和烧杀。这些征服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诃论·剌失德之子哈里发木塔欣在伊斯兰历223年（838年）攻打阿木利雅（阿莫廉）城的战争，这座城被称作东方最辉煌的城市，“是必剌·鲁迷（Bilād-ar-Rūm）地区最坚固的城堡和基督徒的眼睛”，是役，该城无处不遭劫掠，哈里发将其夷为平地，并满载战利品毫发无损地返回。[82]

拜占庭皇帝统治时期将小亚细亚划成很多地区，对此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做了详细的记载，他的记载还纠正了君士坦丁·珀尔费洛戈尼途思（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83]记述的混乱内容。但在此不准备讨论这一问题，因这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地理学范畴。除了阿拉伯著述者提到的一些城市外，一些文献在叙述穆斯林征服过程中经过的边境地区时，也提到了很多地方，这些地方的名称由于含糊不清或是模棱两可，现在几乎无法考订。文献常提到这里的麻儿吉·兀思苦夫（Marj-al-Uskuf，意为“主教草原”），这也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载的行程站点之一，其距坡丹朵思（Podandos）城之西不远。文献中也常提及麻忒木剌（Al-Matmūrah，复数Al-Matāmīr，意为“地窖”或“洞室”）[84]，可以确定其在麻剌考皮阿（Malacopia）城附近。祖·苦剌（Dhū-l-Kulā`，意为“坚固堡”），也拼写为祖·吉剌（Dhu-l-Kilā`，意为“磐石”）堡，这是一座著名的城堡，巴拉祖里说希腊人称作“星辰堡”，此堡应是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地区的思得儿坡利思（Sideropolis）。

鲁鲁阿（Luluah，意为“珍珠”）城，是阿拉伯人的叫法，拜占庭称作劳伦（Loulon），如前文所述，其位于思里思门关北端。此城更北的地方就是泰纳（Tyana，或Tawānah、Tuwānah）[85]，有一段时间诃论·剌失德在此派重兵把守，这里还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萨夫萨夫（Safsāf，意为“柳树”）城，在鲁鲁阿（Luluah）城附近的君士坦丁堡道上，可能在如前所说的福斯汀诺颇里思（见原文第134页）城附近，距离坡丹朵思城之南不远就是前文提到的萨剌沃碾［即喜森·撒喀利八（Hisn-as-Sakālibah）］堡，据巴拉祖里记载，脱离了拜占庭帝国统治的一些萨剌沃碾人（Sclavonian，即斯洛文尼亚或斯拉夫人）被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麦儿旺二世安排驻守此关。[86]

伊斯兰历223年（838年），哈里发木塔欣发动著名的阿莫廉（阿木利雅）城之战后，穆斯林袭击希腊地区的次数不断减少，因这时报达城局势不稳，阿拔斯王朝越来越无暇顾及攻打拜占庭地区。从伊斯兰历3世纪中叶到5世纪（9～11世纪），（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境内半独立的藩国曾率领穆斯林军队越过这些关隘（进行袭击），同时在不同时期边界线也不断发生变化，但一般说来此时陶鲁思防线外的地区未被穆斯林永久占领。

但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随着塞尔柱突厥人的崛起，小亚细亚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也是十字军东征时期。伊斯兰历

463年（1071年）春，塞尔柱王朝的阿儿普·阿思兰（Alp Arslān）[87]发动了麻刺思吉儿得（Malasjird，或Manzikard）城[88]之战，最终彻底打垮了拜占庭的军队，并俘获了皇帝罗曼努斯四世·戴奥吉尼斯（Romanus IV Diogenes）[89]。在此役之前的伊斯兰历456年（1064年），阿儿普·阿思兰已占领基督教国家阿剌蛮王国首都阿尼（Ānī）城[90]，这一事件导致了古老的阿剌蛮八戈剌（Bagratids）王朝[91]的瓦解，也促使其王族后裔鲁盆（Rupen）在陶鲁思地区建立了小阿剌蛮王国。麻剌思吉儿得城之战的结果是阿儿普·阿思兰派其侄—忽忒录迷失（Kutlumish）之子搠里蛮（Sulaymān）到达小亚细亚；此后，塞尔柱人永久地居住下来，并以高原为中心从事其传统的游牧生活，因此鲁迷（Rūm）王国变成了伊斯兰地区之一。塞尔柱人在第一次闪电战中，攻占了西边遥远的尼瑟安（Nicæan）城[92]，在短暂的占领期间，将其作为临时首都。后来，十字军第一次东征的军队将塞尔柱人从该城赶回到中部高原，伊斯兰历477年（1084年）塞尔柱人占领伊考尼奥斯（Iconius）或苦尼亚（Kūniyah）城[93]，并将其作为政治中心。[94]

以苦尼亚为都城的塞尔柱王朝算端统治从伊斯兰历470年（1077年）到伊斯兰历700年（1300年），长达两个多世纪，但其实际统治结束于伊斯兰历655年（1257年）蒙古人占领苦尼亚城之时，也就是在蒙古人攻占报达城的前一年。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高原建立统治的时期几乎与陶鲁思（Taurus）地区兴起的基督教王国小阿剌蛮王朝同时。思思（Sīs）城，又称思思牙（Sīsīyah）城，约在伊斯兰历473年（1080年）成为鲁盆（Rupen）建立的新王朝[95]的首都。一个世纪后的伊斯兰历594年（1198年）里奥（Leo）[96]被冠以“王”的称号，此后国王统治下的小阿剌蛮王朝不断受到蒙古人的打击，直到伊斯兰历743年（1342年）才灭亡。该王国疆域起自思思城，包括赛汗河流域与贾汗河流域在内的所有山区，南到地中海，其统治的城市有麻思撒、阿札纳（Adhanah）和塔儿速思等城，塔儿速思城以西的绝大部分沿海地区也在其疆域之内。思思城，又称思思牙，是古之法剌维奥坡利思（Flaviopolis），阿拔斯王朝初期其为阿因·札儿八城的外围城堡，其城墙是诃论·剌失德之孙哈里发木塔瓦吉儿重建的，后被拜占庭占领。伊斯兰历721年（1321年），据阿布·勒·费达记载，小阿剌蛮国王、有“大帝”称号的里奥二世（Leo II）继位后不久，对此城进行了重修。其城堡修于山顶之上，有三重城墙，附近的果园一直延伸到贾汗河的一条支流岸边。亚库特还说在他那个时代该城通常写为思思（Sīs）。

塞尔柱王朝算端的领土一直到小阿剌蛮王国的西边界和北边界，在占有小亚细亚高原的最初100多年里，这里受到过十字军的三次扫荡。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发生在伊斯兰历490年（1097年），其结果就是将乞利吉·阿思兰（Kilij Arslān）一世（他就是搠里蛮之子及其继任者，是鲁迷王国的第一位算端）[97]从尼瑟安城赶了出去，经过苦尼亚城的十字军重新夺得塔儿速思城附近的海岸，并从那里乘船到达巴勒斯坦。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LouisVII）[98]作统帅，伊斯兰历542年（1147年）十字军在蒙得儿（Meander）河岸打败了算端麻速（Mas`ūd，即乞利吉·阿思兰之子）[99]，但法兰西人在进军安塔利牙（Antāliyah）港的途中在山区遭到重创。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00]发生在伊斯兰历586年（1190年），据说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皇帝[101]从乞利吉·阿思兰二世（麻速之子）[102]手中夺得塞尔柱人的首都苦尼亚城，但巴巴罗萨于行军途中，在塞琉古（Salūkiyah，即Seleucia of Cilicia）城[103]附近的一条河里意外淹死，这条河可能就是前文提及（原文第133页）的剌莫思（Lamos）河或纳赫儿·剌密思（Nahr-al-Lamis）河，这里是阿拔斯王朝早期穆斯林和基督徒交换战俘或支付赎金的地方。

鲁迷塞尔柱王朝算端国的领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这与拜占庭帝国的兴衰、小阿剌蛮基督教王国的发展，以及附近的穆斯林藩国状况的变化有关。这些地区有些被十字军占领，被占地区的法兰西统治者有时统治着穆斯林臣民。众所周知，鲁迷塞尔柱王朝算端国的主要城市一直存在到伊斯兰历587年（1191年），乞利吉·阿思兰二世在这一年将其国土分封给他的十一个儿子。如上所说，苦尼亚（即Iconnium）城为算端国的首都，该国的第二大城市是凯撒利雅（即Cesarea Mazaka）城。麻剌乞牙（即Melitene）城是东部靠近幼发拉底河的河岸地区的首府。其北部的城市有思瓦思（Sīvās，即塞博思提亚［Sebastia］）城[104]、纳吉萨儿（Nakīsār，或Nīksār，古之Neo-Cesarea）城[105]、土喀（Tūkāt）城[106]和阿马思牙（Amāsiyah，即Amasia）城[107]等，这些地方均是一位塞尔柱王子的封地，西北的城市有安古利牙［Angūriyah，即安高剌（Angola）］城，西部边界有卜鲁噶鲁（Burughlū）城，位于亦格都儿（Egridūr）湖西边，可能是现在的乌鲁·布尔鲁（Ulū Burlū）城[108]。在苦尼亚城之东的南部边界，主要分布有：阿剌可利牙［Arākliyah，即赫拉克里亚（Heraclia）］城、纳吉达［Nakīdah，或尼格答（Nigdah）］城[109]和阿卜鲁思田（Abulustān）城，后来称作不思田（Al-Bustān，此为阿拉伯语书写形式）城。

伊斯兰历616年（1219年），算端阿剌丁（`Alā-ad-Dīn）[110]继位，他是乞利吉·阿思兰二世之孙，其将王朝的统治地区从黑海沿岸到地中海沿岸向北和向南扩展。他攻占了黑海岸边的思奴卜［Sīnūb，即思挪坡（Sinope）］城[111]，在南部海岸（地中海岸边），建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阿剌牙（`Alāyā）港[112]，与塞尔柱王朝强大海军有关的建船石条及其他建筑遗迹至今还可以领略到。在西北，其统治地区延伸到萨里·卜利（Sārī Būlī）城[113]。他在位时期著名的作家有苏非大诗人贾剌丁·鲁米（Jalāl-ad-Dīn Rūmī）[114]，此人生活于苦尼亚城，也卒于此城。阿剌丁去世于伊斯兰历634年（1237年），他去世30年（应为20年，译者）后蒙古军队灭亡了塞尔柱政权；最后的四位算端实际上仅是波斯伊利汗朝的总督而已，伊斯兰历700年（1300年），鲁迷地区被十部突厥蛮（Turkoman）异密（Amīr，即将领或酋长）瓜分，他们最初是塞尔柱王朝算端的藩属。[115]

[1] 拉姆齐（W. M. Ramsay）教授所撰写的《小亚细亚历史地理研究》（*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sia Minor*，下文简称*H. G. A. M.*）一书中已对相关问题做了全面的考察，如想探清这一复杂的问题，该著作不可不读。除参考这部著作外，还要参考拉姆齐教授在《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1902年9月号，第257页；1903年10月号，第357页）发表的重要论文。

[2] 地中海东边的塞浦路斯岛（Cyprus，阿拉伯人称Kubrus）和罗得岛（Rhodes，阿拉伯人称Rūdis）是阿拉伯人所熟知的岛屿。伊斯兰历28年（648年），木阿威雅首次率军袭击这些岛屿，此人后成为（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但著作中对这些地区详细的地理情况未做记载。巴拉祖里，第153、23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832页；第4卷，第29页。

[3] 今为塔苏斯，在土耳其靠地中海东北边的梅尔辛或伊切尔省境内，距地中海20公里，人口2万余，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曾经的战略要地。译者。

[4] 应该在今天的奥斯曼尼耶（Osmaniya）城所在地，因该城由诃论·剌失德所建，因此以其名字命名。译者。

[5] 此城位置不确定，大致在杰伊汉河沿岸。译者。

[6] 即中世纪的阿纳札卜思（Anazarbus），此城已毁，大致在今天的阿达纳省。曾是丝路要道。译者。

[7] 今为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岸边有与之同名的城市，人口18万，属于土耳其的哈塔伊（Hatay）省。是丝路要道。译者。

[8] 此城已毁，大致在今天土耳其南部的阿达纳城与杰伊汉城之间，现仍留存有罗

马时代的著名拱桥。曾是丝路要道。译者。

[9] 即今阿达纳（Adana），是土耳其南部地中海沿岸的阿达纳省的省会，人口约有170万。是去往地中海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10] 戈弗雷·德·鲍伦（1058～1100年）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统帅之一，组织军队占领小亚细亚很多地方，1099年7月15日他率军攻占耶路撒冷，并屠杀当地的穆斯林与犹太人，此后他获得了“圣地圣墓的守护者”的称号，1100年去世后葬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译者。

[11] 小阿剌蛮（Little Armenia，亦称Lesser Armenia）王国，即阿剌蛮第四王朝，位于小亚细亚东南沿海，是12世纪时由亚美尼亚人鲁本（盆）家族在思里思（Cilicia）建立的王朝（Armenian Rubenid dynasty），开始时与拜占庭帝国多次交战，后来与西方发展了联系。它曾受到富浪（Farank，即法国）十字军的影响，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经此地来到东方。1375年被穆斯林王朝的马木路克（Muslim Mamluk）人征服。译者。

[12] 此城在今天的科赞（Kozan）城所在地，其在杰伊汉河支流吉尔根（Kilgen）河岸边，这里是土耳其向北和向西北的重要通道，是古代重镇。现城区人口8万，是阿达纳省的重要城市之一。也有说法称，其在今科赞城东边的卡迪尔利城所在地。译者。

[13] 两城已不存。译者。

[1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55、6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08、121页。巴拉祖里，第166、177、188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第26页；第8卷，第29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927页；第3卷，第761页；第4卷，第314、498、945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235、251页。

[15] 今为塞伊汗河，发源于托罗斯山脉，向南经阿达纳城流入地中海，全长560公里，与杰伊汉河是姊妹河。译者。

[16] 犹斯汀安为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皇帝，527～565年在位。在他统治时期，日益衰落的帝国得以振兴，东边在532年同萨珊王朝签订了和平条约，在533～534年重新将北非的万达尔王国（Vandal kingdom）纳入版图，还征服了西班牙南部与意大利南部，于是地中海成为该帝国的内海。译者。

[17] 瓦利（al-Walīd II ibn Yazīd II），倭马亚王朝第十一位哈里发，743～744年在位。译者。

[18] 此名今不存，大致位置在今阿达纳省地中海岸边的卡拉塔什（Karataş）港附近，曾是水陆要道。译者。

[19] 巴拉祖里，第165、166、168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63、6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22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卷，第356页；第8卷，第29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79页；第2卷，第82页；第4卷，第558、559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50页。这两条河流的名称有时也错误地写成质浑（Jayhūn）与细浑（Sayhūn），与中亚两条河流名称的写法相同。有关萨鲁思（Saurus）河的古代入海口，值得注意的是伊本·塞剌皮昂（抄本，44a叶面）说在那个时代，即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赛汗（Sayhān，即Saurus）河在麻思撒（Massīsah）城以北5里格流入贾汗（Jayhān，即Pyramus）河，因此贾汗河与赛汗河只有一个入海口。今赛汗河的入海口与贾汗河是分开的，在马尔斯那（Marsinah）城以西入海，但旧河床的遗迹尚存。见《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1903年10月号，第410页）。

[20] 即塔尔苏斯（Tarsūs），“距海边有三小时的距离。这里的夏天与秋天很难熬，因此能从城里搬出去居住的人尽量搬出城”。从塔尔苏斯城一直到海边都种植各种漂亮、名贵的树种。这里盛产水果。从塔尔苏斯城去往海边的路上有一些村庄，还设

有一个管理进出口货物的收税站。见Robert Walpole和William George Browne《东方各国行纪》（*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Easts*），伦敦，1819年，第3卷，第129、130页。译者。

[21] 今为波赞特（Pozanti）城，在阿达纳省，人口近0.99万。是通往地中海的要道，也是丝路古镇。译者。

[22] 尼斯福鲁斯·福卡斯（Nicephorus Phocas）是拜占庭帝国皇帝，963～969年在位，在他统治时期，与穆斯林在边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使得帝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译者。

[23] 今为贝尔丹（Berdan）河，也被称作塔苏斯（Tarsus）河，因该河流经塔苏城城。这条河全长172公里，所经区域是土耳其最为干燥的地区之一，沿河建立了很多大坝。译者。

[24] 今为拉马斯苏河（Lamas Su）或里蒙卢加伊河（Limonlu Çayı），该河汇入地中海，有同名的里蒙卢加伊小城，人口3000，是小亚细亚南边靠近地中海的重要通道。译者。

[25]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22页。Ibn-al-Fakīh（伊本·阿勒·法吉赫），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五卷，第116页。巴拉祖里，第169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第264页；第7卷，第2页；第8卷，第7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53、558页；第3卷，第526页。塔巴里（Tabari），第3卷，第1237页。伊本·阿喜儿（第6卷，第340页）的书中将剌莫思河的名称错印为纳赫儿·信（Nahr-as-Sinn）河。

[26] 今为埃尔比斯坦，是卡赫拉曼马拉什省的重要城市，人口9.5万，是历史重镇和丝路要道。译者。

[27] 这个区域大致就是现在土耳其的梅尔辛省、阿达纳省、尼代省、奥斯曼尼耶（Osimaniye）和开塞利省等所属地区。译者。

[28] 这里指的是从地中海平原地区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通道，其为托罗斯山脉

的峪口，位置在梅尔辛省古利克城到波赞特城北的峡谷地带。译者。

[29]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塔苏斯城北边的埃斯基谢希尔（Eskişehir，老城）附近。译者。

[30] 今此城位置难以确定，应该是埃斯基谢希尔北20公里的杰维孜车什米（Cevizliçeşme）。这是古今交通要道。译者。

[31] 今此城名不存，其址在今古利克（Gülek）城，人口2900，是古代的西西里之门，也是道路要道。译者。

[32] 今此城名不存，其址在今阿达纳省的阿克加特克尔（Akçatekir）城，人口2400，是地中海沿岸梅尔辛省、阿达纳省低地平原居民的主要避暑地，也是通往地中海、土耳其中部的要道。译者。

[33] 今此名不存，其址在尼代（Niğde）省乌卢克什拉（Ulukışla）城东边的哈散嘎孜（Hasangazi）村，人口889。在历史上这里是罗马帝国和大食帝国之间的重镇。译者。

[34] 也就是塔瓦纳（At-Tawānah）或塔伊纳（Tyana）。此城今不存，故址在尼代省克梅尔希萨尔（Kemerhisar）城南20公里处，今保留有很多古代遗迹，是丝路重镇、交通要道。译者。

[35] 即斯拉夫人的城堡。译者。

[36] 此地今不存，应在科尼亚省埃雷利（Ereğli）城以南。译者。

[37] 今此城不存，大致位于埃雷利城以东去往科尼亚城的道路上，应在恰克马克（Çakmak）附近。曾是丝路重镇。译者。

[38] 今此名不存，应在去往科尼亚城道路上的撒孜格奇特（Sazgeçit）镇附近，是古丝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39]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去往科尼亚城道路上的卡拉珀纳尔（Karapınar）城东边不远，丝路重镇。译者。

[40] 今此名不存，应在萨孜里珀纳尔（Sazlipınar）城北边去往科尼亚城的道路上，丝路要道。译者。

[41] 今此名不存，应在伊斯米里（Ismil）城西边去往科尼亚城的道路上，丝路要道。译者。

[42] 今此名不存，应在萨克亚坦（Sakyatan）城东边不远去往科尼亚城的道路上，丝路重镇。译者。

[43]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科尼亚城城北去往阿菲永卡拉希萨尔（Afyonkarahisar）道路上的巴格里库尔特（Bağrikurt）镇附近，丝路要道。译者。

[44] 今此名不存，应在去往阿木利雅城的道路上，具体位置难以确定。译者。

[45] 今此名不存，应在去往阿木利雅城的道路上，具体位置难以确定。译者。

[46] 今此名不存，大致在今土耳其阿菲永（Afyon）省北边埃米尔达（Emirdağ）城东13公里的希萨尔阔伊（Hisarköy）村。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47] 此湖应该就是今天的阿克谢希尔（Akşehir Gölü）湖，面积350平方公里，是阿菲永卡拉希萨尔（Afyonkarahisar）省和科尼亚省的界湖，有多条溪水流入该湖，并用于灌溉，但从湖北边开始水的盐分增加。译者。

[48] 信德、喜森·思纳答、麻噶儿等这些地名今不存，也很难确定具体方位。译者。

[49] 此地名今不存，应在埃斯基（Eskişehir）省比勒珀纳尔（Belpinar）小城去往伊斯坦布尔的主干道上。译者。

[50] 今为萨卡里亚河（Sakarya Nehri），发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的中央山地。干流呈“S”状，几经辗转，最后注入黑海，全长821公里。译者。

[51] 此地名今不存，应在马哈茂迪耶（Mahmudiye）城附近。丝路要道。译者。

[52] 此地名今不存，也很难确定具体方位。译者。

[53] 此地名今不存，也很难确定具体方位。译者。

[54] 此地名今不存，应在马哈茂迪耶城的西边。曾是丝路要道。译者。

[55] 此地位于今土耳其西部埃斯基谢希尔省的同名省会，人口68万，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有诸多遗迹。译者。

[56] 此地名今不存，应在埃斯基谢希尔城西边比莱吉克（Bilecik）省的珀尔亚（Porya）镇附近。是丝路要道。译者。

[57] 此地名今不存，应在珀尔亚镇西边的玉卢克杰珀尼（Yürükçepne）附近。译者。

[58] 此地应该是比莱吉克城周边的山脉。今天这里建有穿过山脉的公路隧道。译者。

[59] 此地名今不存，应在比莱吉克省的维孜尔汗尼（Vezirhan）附近。是丝路要道。译者。

[60] 具体位置很难确定，大致在今土耳其西部比莱吉克省奥斯曼内利（Osmaneli）城附近。在萨卡里亚河西岸，曾是丝路重镇。译者。

[61] 此地名今不存，应在布尔萨（Bursa）省伊兹尼克（Iznik）城东边不远。译者。

[62] 此地名今不存，其址大致在今亚洛瓦（Yalova）省的阿尔特诺瓦（Altınova）城，是去往伊斯坦布尔的要道。译者。

[63] 即今土耳其西部马尔马拉海东岸的伊兹尼克（Iznik）城，其在同名湖岸边，是古丝绸之路进入罗马帝国的重要跳板，也是古罗马著名的文化、商业、军事重镇。今此城人口2万。译者。

[64]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00～102、110、113页。对这条道路的其他不同路线，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做了记载（第102、309页），伊德里思增加了里程［于贝尔特（Jaubert）本，第2卷，第308、103页］，还特别与拉姆齐（Ramsay）教授所著的《小亚细亚历史地理研究》（*H. G. A. M.*）相比较（第236、445页）。拉姆齐教授考订认为萨剌沃碾（喜森·撒喀利八）堡就是拜占庭城堡的遗址，该城堡是用黑色大理石修建的，现在被称为安纳沙·喀拉斯（Anasha-Kal`ahsi），修建在一座山顶上，从南边可以俯瞰波赞提（Bozanti，Badhandūn，Podandos）河谷（《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1903年10月号，第383页）。拜占庭的劳伦（Loulon）城堡被阿拉伯人称作鲁鲁阿（Luluah，即珍珠）城堡，他也做了考订（上文所引期刊第401、404页，附了城堡的一张照片）。该城堡位于柳树（As-Safsāf）城的北边，而这座城坐落在河谷以南，这里曾经建有希腊城福斯汀诺颇里思（Faustinopolis）。

[65] 此河今被称作克孜勒（Kızılırmak）河，即红河，是土耳其境内最长的河流，全长1355公里。其发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北部，沿途有很多支流汇入。此河先向西流，然后转向北流，穿过庞廷山地，在巴夫拉（Bafra）以北注入黑海。为海岸与内陆间的天然交通要道，三角洲突入黑海。水位季节变化较大，不能通航，但有发电与灌溉之利。译者。

[66] 此地名今不存，大致在科尼亚省卡拉纳珀尔（Karapınar）城附近，是古今交通要道。译者。

[67] 此地名今不存，其在今内夫谢希尔（Nevşehir）省的代林库尤（Derinkuyu，深井）城，人口1万，是丝路要道。译者。

[68] 位于今科尼亚城西北的拉迪克（Ladik）小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69] 指土耳其中安纳托利亚的阿克萨赖（Aqsaray）、尼代（Niğde）、内夫谢希尔（Nevşehir）、开塞利（Kayseri）所在地区。译者。

[70] 此处似是今土耳其中部开塞利城（Kauseri）所在地，是同名省的省会，人口90万，是一座漂亮的城市。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通道，保留有很多罗马时代的古迹。译者。

[71] 是罗马古城，大致在今伊斯帕尔塔（Isparta）省亚尔瓦奇（Yalvaç）东北1

公里处，人口2万，是罗马帝国的重要通道。不可与土耳其东南部伊斯肯德伦湾东岸靠近叙利亚的安塔基亚相混淆。译者。

[72] 即今屈塔希亚（Kütahya）城，是同名省的省会，人口23万，是座美丽的古城，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有很多名胜古迹。译者。

[73] 即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译者。

[74] 今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东岸恰纳卡莱（Canakkale）和拉普瑟基（Lapsaki）之间，是古罗马时代的重要港口，也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已废。译者。

[75] 《东方各国行纪》（*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Easts*）第106页载："尼考密底牙（Nicomedia）由一位总督（Pasha）的两位子嗣统治，在去往东西道交会的苦乞牙（Kutaieh）城的道路上。"这本书的作者说，从尼考密底牙城三小时就可到达喀剌·木儿萨（Kara Mursal，是以奥斯曼帝国的一位先祖命名的，今土耳其的一个区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岸的一座小城与之同名）。"这是座小城，靠近海峡南岸，位于一条山脉的脚下，地理位置优越。这座城有两座清真寺。周边有很多果树。所产水果批量供应给君士坦丁堡市场。"（第106页）本书作者斯特兰奇并没注意这座城，也许是早期文献没有记载之故。其位置在今马尔马拉海东北角海湾北面的科加厄利（Kocaeli）省伊兹米特（Izimit）城。译者。

[76] 今为特拉布宗（Trabzon），是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特拉布宗省的省会，人口125万，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也是商品的集散地。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保留有很多名胜古迹。译者。

[77]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29、132、245、246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03页。巴拉祖里，第161页。塔巴里，第3卷，第709、710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3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01、499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

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第260页。黑海（应是里海，译者补）有时也称作可萨海（Bahr-al-Khazar），但通常只称里海（Caspian）。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03页。

[78] 即雅兹底一世，是倭马亚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680～683年在位。译者。

[79] 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是拜占庭皇帝，648～685年在位，在他统治时期有效地阻止了阿拉伯人向欧洲的推进。译者。

[80] 搠里蛮是倭马亚王朝的第三任哈里发，715～717年在位。《册府元龟》卷九七一称：“开元四年（716年）七月，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漫（Amīr al-Mu`mminī Sulaymān）遣使上表，献金线织袍、宝装玉、洒池瓶各一。”译者。

[81] 里奥（Leo），别名伊索利亚（Isaurian），是拜占庭皇帝，717～740年在位。译者。

[82] 据阿拉伯文献可知，穆斯林对小亚细亚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布鲁克斯（E. W. Brooks）先生所著的论文—《公元641～750年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The Arabs in Asia Minor*，*641 to 750*，刊于《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Hellenic Studies*），第18卷，1898年］和《公元750～813年阿拔斯王朝初期拜占庭与阿拉伯人》［*Byzantines and Arabs in the Time of the Early Abbasids*，*750 to 813*，刊于《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Historical Review*），第一部分在1900年10月号，第二部分在1901年1月号］等对此做了全面的研究和详细的注释。对于搠里蛮哈里发在位时期对君士坦丁堡的大围攻，他在《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Hellenic Studies*，第19卷，1899年）撰写了单独的文章，题目为《从阿拉伯文献考察公元716～718年的围攻战争》（*The Campaign of 716-718 from Arabic Sources*）。以拜占庭资料全面讨论这次著名战争的是布利（J. B. Bury）所著的《晚期罗马帝国史》（*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第2卷，第401页）。穆斯林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苦思坦匿雅（Al-Kustanīyah），这个名称就是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Istambul）名称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马苏迪（Mas`ūdī）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早期称在那个时代希腊人将他们的首都称作卜林（Būlin，即Polin，也就是πóλιs，意为“城市”），也称作伊思坦·卜林（Istan-Būlin，εlsτήνπóλιsν）。他称希腊人一般不用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称苦思坦匿雅）这一名称，阿拉伯人也是如此。（*Tanbih*，第138页）

[83] 君士坦丁·珀尔费洛戈尼图斯（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为拜占庭皇帝，也称君士坦丁七世，913～959年在位，他撰有一部著作《郡国志》（*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De Administrando Imperio*），由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于1967年出版。译者。

[84] 西班牙语中的Mazmorra（即地牢）的含义等同于苏格兰语中的Massamora。［《文物考古》（*The Antiquary*），第5卷，第33章注释］

[85] 即尼代省克梅尔希萨尔（Kemerhisar）城，人口5000，保留有古代遗迹，是丝路古镇。译者。

[86] 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布鲁克斯（E. W. Brooks）撰写的《阿拉伯文献中的拜占庭各地》（*Arabic lists of the Byzantine Themes*），刊于《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Hellenic Studies*），第21卷，1901年。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02、105页。巴拉祖里，第150、170页。塔巴里，第3卷，第710、1237页。伊本·阿喜儿，第6卷，第341页。拉姆齐（Ramsay）撰写的*H. G. A. M.*，第340、354、356页。

[87] 阿儿普·阿思兰为塞尔柱王朝的第二代君主，1063～1072年在位。译者。

[88] 今为马拉兹吉尔特（Malazigirt），位于凡湖北岸，属土耳其东部的穆什（Muş）省，人口3万。译者。

[89] 罗曼努斯四世·戴奥吉尼斯（Romanus IV Diogenes）于1067～1071年在位，为挽救日益走下坡路的拜占庭帝国，以抬高自己的声名，同穆斯林开战，1071年塞尔柱人将其俘获，同年释放后被暗杀。译者。

[90] 此城今已毁，大致在今土耳其境内卡尔斯（Kars）省靠近亚美尼亚边界的地方，现仍保留有精美的建筑遗迹，是阿剌蛮八戈剌王朝的都城。曾是丝路古城。译者。

[91] 阿剌蛮八戈剌（Bagratids，即Bagratunian）王朝为阿剌蛮第三王朝，886年独立，在该王朝统治时期，阿剌蛮文化达到鼎盛时期，都城设在阿尼（Ani）城，并得到拜占庭帝国与阿拔斯王朝的承认，1045年臣服于拜占庭，1064年亡于塞儿柱王朝之手。译者。

[92] 即伊兹尼克城。译者。

[93] 今为科尼亚，是土耳其南部科尼亚省省会，人口110万，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有诸多名胜古迹。译者。

[94] 伊本·阿喜儿，第10卷，第25、44页；第12卷，第125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21页。有关满兹喀儿忒（Manzikart）城之战可参阅奥曼（C. Oman）所著的《战术史》（*Hitory of the Art of War*，第216～221页）。鲁迷塞尔柱王朝的统治、其继承者十部突厥蛮（Turkoman）异密（将领）以及直到奥斯曼帝国建立前的历史很不幸在所有穆斯林编年史上是最为模糊不清的。波斯史学家密儿哈万（Mīrkhwānd）和赫万达密尔（Khwānamīr）所撰写的有关鲁迷塞尔柱王朝的历史只是对穆思妄菲的《历史精选》（*Tārīkh-i-Guzdah*）做了枯燥无味的概

述，没有补充新材料。对这个王朝记述最全面的应是伊本·赫尔顿所著的《通史》一书（第162～175页），但这本书对人物名称与时间缺乏记载。豪茨麦（Houtsma）教授新近编辑出版的伊本·比比（Ibn Bībī）著的编年史很不幸是从伊斯兰历551年（1156年）乞利吉·阿思兰二世开始写起，有关塞尔柱王朝前70年的统治、征服活动以及在小亚细亚建立政权的情况，我们无从得知。该书只是间接提到了这次满兹喀儿忒城之战的大胜利，而关于战争的结果导致拜占庭从小亚细亚撤出的问题没有做记载。该书也没有提到条约问题，但满兹喀儿忒城之战以后，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拜占庭和塞尔柱人之间肯定签订了条约。要了解有关继承鲁迷塞尔柱王朝的突厥蛮异密的内容可参阅拉恩·普洛（Lane-Poole）教授撰写的论文—《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的继承者》（“*The Succersors of the Sajūks in Asia Minor*”见*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lreland*，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82年，第773页）。

[95] 鲁盆王朝（1080～1252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被称作鲁盆藩国（Rubenid Princes of Armenia，1080～1199年），传十代；第二阶段为鲁盆王朝（1199～1252年），有两代。其共存续172年。因此，与该书作者所述的有关此朝灭亡的内容有差异。译者。

[96] 即里奥二世（Leo II），1187～1199年在位，在他统治时期小阿剌蛮王国文化获得了巨大发展，并得到了罗马教皇与十字军骑士团的支持，其本人曾领导抗击塞尔柱王朝，文献称其为“伟大的里奥”。译者。

[97] 鲁迷塞尔柱王朝的第三代国君，在位时间为1092～1107年，为该朝的实际建立者。译者。

[98] 卡佩王朝（987～1328年）第六代君主。译者。

[99] 鲁迷塞尔柱王朝第五代国君，在位时间为1116～1156年。译者。

[100]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从1096年至1099年，结果于1097年6月占领尼瑟安城，1098年攻下安塔利牙［安都（Antioch）］，1099年7月15日占领耶路撒冷。这是十字军获得的唯一一次真正的军事胜利，也是历次十字军东征中最团结的一次。有些十字军定居在圣地，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维持了九十年之久，直到1187年被萨剌丁（Saladin）夺回。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是在克勒窝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倡议下组织起来的，由法王路易七世（Louis VII）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率领。这次东征从1147年持续至1149年，缘起于夷得萨城在1144年被穆斯林夺回。这次远征碰到一连串灾难，最后十字军遭受重创。过了两年，这支部队土崩瓦解。1187年耶路撒冷落入萨剌丁之手，于是1190年英王理查一世（Richard I，the Lion-Hearted）、法王腓力二世（Philip II）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I Barbarossa）组织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若萨在途中淹死，法王半途而回，唯有英王理查一世到达耶路撒冷，但也只与萨剌丁订立协约，准许基督徒朝拜圣墓。此次东征收复了塞浦路斯，但未能收复耶路撒冷。译者。

[101] 即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I Barbarossa），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年在位。译者。

[102] 鲁迷塞尔柱王朝第六代国君，在位时间为1156～1192年。译者。

[103] 今为塞尔丘克（Selçuk），是位于古城以佛所以北的小城，属于土耳其西边靠地中海的伊兹密尔省，人口3万，为古代小亚细亚地区地中海沿岸的重要通道。译者。

[104] 《亚美尼亚史》第38页（原文第92页）中塞博思提亚写为塞博思梯亚（Sebastea）。今为锡瓦斯（Sivas），锡瓦斯省省会，坐落在克孜勒厄尔马克（Kızılırmak）河河谷中，为土耳其中部的工业和交通中心，人口42万，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古城，有很多古迹。译者。

[105] 今为土耳其北部托卡特（Tokat）省的尼克萨尔（Niksar）城，人口3.2万，是向北通往黑海的要道，历史上多个王朝定都于此。译者。

[106] 今为托卡特（Tokat），是托卡特省的省会，人口12万，是黑海南岸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107] 今为阿马西亚（Amasya），是阿马西亚省的省会，人口9万，是黑海南岸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通往黑海的铁路经过此城和托卡特，到达萨姆松（Samsun）城（港）。译者。

[108] 今为乌卢博尔卢（Uluborlu），属伊斯帕尔塔（Isparta）省，是座小城，在埃伊尔迪尔（Eğirdir）湖之西，人口6000，在古代是通往地中海和罗马的重要通道。译者。

[109] 今为尼代（Niğde），是土耳其南部尼代省省会，人口10万，是古今交通中心之一。译者。

[110] 阿剌丁（Alā ad-Dīn Kayqubād bin Kaykāvūs），鲁迷塞尔柱王朝第十二代国君，在位时间为1219～1237年。译者。

[111] 今为锡诺普（Sinop），土耳其北部锡诺普省省会，为该国最北的城市，人口3.8万，是小亚细亚北部的水陆交通中心之一。译者。

[112] 今为安塔利亚（Antalya）省的阿拉尼亚（Alanya，或Alaiye）城（港），是美丽的海滨城市，人口10万，是土耳其南部的重要港口，也是水陆交通枢纽之一，为古丝绸之路上的要道。译者。

[113] 应为今天的博卢（Bolu），是土耳其西部靠近黑海海峡的博卢省的省会，人口13万，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114] 《东方各国行纪》（*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Easts*）第121～123页详细描述了苦尼亚城贾剌丁·鲁米所属教团的影响，以及建立的道堂，并载："科尼亚（Konieh，即苦尼亚）城的道堂（Tekié）有很多香火田（Wakf）。具体的数量无法统计。这些人一点也不露富，过着极为节俭朴素的生活。"译者。

[115] 巴拉祖里，第17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

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217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257页。伊本·比比（Ibn Bibi），第5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21、622页。伊德里思在伊斯兰历548年（1153年）完成著作，按他自己的说法（于贝尔特本，第2卷，第300页），他在阿莫廉（Amorion）城，于伊斯兰历510年（1116年）造访了七眠子洞。他是一位记载塞尔柱王朝时期小亚细亚状况的穆斯林地理学家。很可惜，在他传到今天的著作中有很多讹误。他记载了多条从不同方向穿越小亚细亚的路线，而这些道路很难确定，虽然其所记载的终点站无可置疑，但中途经过的大多数地方已无法确定。（伊德里思，第2卷，第308～318页）对塞尔柱王朝的疆域，拉姆齐（Ramsay）教授做了清晰的考察。（*H. G. A. M*，第78、382、384页）关于塞尔柱王朝的大清真寺和该朝的其他建筑可参阅华尔特（M. C. Huart）所写的系列论文，题目为《小亚细亚阿拉伯碑铭》（*Epigraphie Arabe d`Asie Mineur*），发表在《闪米特评论》（*Revue Semitique*，1894年，第61、120、235、324页；1895年，第73、175、214、344页）；*Journal Asiatique*（1901年第1卷，第343页）；也可以参考格林纳德（M. F. Grenard）所著的*Monument Seljoukides Siva etc*，发表在J. As.（1900年第2卷，第451页）。还可以参阅拉姆齐教授所写的一篇论文和威尔逊（C. Wilson）及其他人的评注，见《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1902年9月号，第257页。

第十章 鲁迷（Rūm）地区（续）

十部突厥蛮（Turkoman）异密的统治地区。伊本·白图泰和穆思套菲的记载。凯撒利雅（Kaysārīyah）城和思瓦思（Sīvās）城。美索不达米亚的算端。喀喇满（Karamān）部的异密。苦尼亚（Kūniyah）城。忒凯（Tekkeh）部的异密与阿剌牙（`Alāyā）城和安塔利牙（Antāliyah）城。哈迷得（Hamīd）部的异密与亦格都儿（Egridūr）城。吉儿密养（Germiyān）部的异密、苦塔喜牙（Kutāhiyah）城与思兀力·喜萨儿（Sīvrī Hisār）堡。门忒沙（Menteshā）部的异密与密剌思（Mīlās）城。萨鲁汗（Sārūkhān）部的异密与麻格内思亚（Magnesia）城。阿亦丁（Aydīn）部的异密、亦费所（Ephesus）城与思米儿纳（Smyrna）港。喀喇思（Karāsī）部的异密与皮儿噶莫斯（Pergamos）城。奥斯曼（`Othmānlī）部之地与卜鲁萨（Brusā）城。吉兹儿·阿合马（Kizil Ahmadlī）部的异密与思奴卜（Sinūb）城。

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十部突厥蛮（Turkoman）异密统治的地区范围大致相当于以前古代希腊人所统治的小亚细亚地区。其中喀喇满（Karāmān或Karamān）部统治的地区范围最大，所辖区域就是过去的来考尼牙（Lycaonia，即吕考尼亚）地区；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忒凯（Tekkeh）部统治的地区，包括来喜牙（Lycia）地区和潘菲利牙（Pamphylia）地区；位于内陆的哈米得（Hamīd）部统治的地区就是过去的皮斯迪亚（Pisidia）地区与伊索利亚（Isauria）地区；可儿密养（Kermiyān）或吉儿密养（Germiyān）部统治的地区就是过去的菲利吉亚（Phrygia）地区；位于黑海沿岸的吉兹儿·阿合马（Kizil Ahmadlī）部，有时也称亦思凡底牙儿（Isfandiyār）部统治的地区就是曾经的帕菲拉高尼亚（Paphylagonia）地区；位于爱琴海岸边的门忒沙（Menteshā）部统治的地区就是古之喀利牙（Caria）地区；阿亦丁（Aydīn）与萨鲁汗（Sārūkhān）两部共同统治的地区就是曾经的利迪亚（Lydia，即吕底）王国[1]疆域；喀喇思（Karāsī）部统治的地区就是密思亚（Mysia）地区；最后为奥斯曼（`Othmanlī，奥斯曼人最终征服其他九个地区）部所属地区，最初该部只统治着很小的菲利吉亚·伊皮科特途思（Phrygia Epictetus）地区，背靠比思亚（Bythia）高原，不久后，奥斯曼人从拜占庭人手中夺得这一高原。

对这些突厥蛮部异密统治的地区，伯伯尔（Berber）人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做了离奇的记载，伊斯兰历733年（1333年），他从叙利亚乘船到阿剌牙（`Alāyā）港上岸，后来到思奴卜［Sinūb，即思挪坡（Sinope）］城，在此途中访问了很多小王国，此后从思奴卜城乘船经过黑海到达可里密牙（Crimea）[2]，可惜的是他的有些记载显然散失了。他从阿剌牙城沿海岸旅行，到了安塔利牙（Antāliyah）城，而后向北越过山区到达哈迷得部统治的亦格都儿（Egridūr）城[3]，此城位于与之同名的湖的岸边。他从这里经一条通到剌兹（Lādhik，即Leodicea ad Lycum）的偏僻道路，到达门忒沙部统治的密剌思（Mīllās）城[4]，再向右斜穿小亚细亚，沿途经苦尼亚城和凯撒利雅城，到达思瓦思（Sīvās）城与阿儿赞·鲁迷（Arzan-ar-Rūm）城。思瓦思城与阿儿赞·鲁迷城位于一片洼地，接着他到了前文提到的阿亦丁部统治的必儿吉（Birkī）城[5]，此后访问了阿牙·速录［Ayā Sulūk，即亦费所（Ephesus），今以弗所］城。最后，伊本·白图泰向北、向东旅行，在去往黑海之滨的思纳（即思挪坡）城途中访问了卜鲁萨（Brusā）城[6]和其他城市。和伊本·白图泰同时期的穆思套菲在著作里补充了鲁迷地区城市的一些地理细节内容。尽管穆思套菲于伊斯兰历740年（1340年）撰写的著作利用了早期的文献，但需要说明的是他所称的鲁迷地区是指后期塞尔柱人统治的区域，而不是指十部异密统治的地区。

伊斯兰历9世纪（15世纪）初，帖木儿攻入小亚细亚地区，暂时改变了那里的形势，并压制正在崛起的奥斯曼政权超过25年。阿里·亚兹得在记载帖木儿武功活动时，对这一地区又补充了一些内容，更详细的一些记载见于土耳其语著作《世界志》，虽然这部著作撰写于伊斯兰历11世纪（17世纪）初，这时奥斯曼帝国在小亚细亚地区确立统治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该著作却提到了塞尔柱王朝时期留下的重要遗迹。

叙述上述提到的十部突厥蛮异密统治地区状况之前，有必要说明的是位于喀喇满部东境的一些城市，这些城市分布于哈儿亦思［Halys，突厥人所称的吉兹儿·伊尔马（Kizil Irmāk）］河下游一直到贾汗河一线南边的地区。此地区东边的小亚细亚，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属于伊利汗国统治的范围，并且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地区的蒙古诸王派其官吏到此处处理与突厥蛮游牧部落和平共处的有关事宜，因这些部落是蒙古人西征占据这里后才移居来的。喀喇满部东部的主要城市为凯撒利雅（Kaysariyah）城，也拼写为凯撒利雅（Kaysārīyah，即Cappadicia地区的 Cesarea Mazaka），这是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鲁迷地

区的第二大城市，可疾云尼称其为该王朝的都城。此处除可以看到其他圣墓外，还有以倭马亚王朝的英雄八塔儿（Al-Battāl）命名的聚礼清真寺。据穆思套菲记载，凯撒利雅城周边建有石砌城墙，此城墙是塞尔柱王朝算端阿剌丁修建的；这是一座有城堡的大城，位于阿儿贾石山（Arjāish，即Argæus）山麓，穆思套菲称阿儿贾石山海拔很高，山顶常年积雪不化，是许多河流的发源地。这座山的山脚下是答瓦鲁（Davalū）城[7]，此城将在后文述及。山顶上还可以看到一座大教堂。凯撒利雅城有著名的受人朝拜的哈里发阿里之子木哈莫·哈纳菲（Muhammad ibn Hanafīyah）的圣墓。伊本·白图泰访问凯撒利雅（Kaysāriyah，他所写的名称）城时，此城已被亦剌可地区的蒙古算端所指挥的大军占领。伊斯兰历9世纪（15世纪）初，凯撒利雅城是帖木儿军队在小亚细亚地区占领的第一座大城市。

凯撒利雅城之东的阿卜鲁思田（Abulustān，为阿拉伯语书写形式）城，曾是拜占庭时期的边关，在关于帖木儿武功活动的记载中也常提到此城；穆思套菲称阿卜鲁思田城是一座中型城市。在《世界志》中，也提到了此城，现代拼写为不思田（Al-Bustān，意为“花园”）。吉儿沙合儿（Kīrshahr，拜占庭所称的Junstinianopolis Mokissus）城[8]在凯撒利雅城西80英里处，是战略要地，在关于帖木儿武功活动的记载中经常提及。穆思套菲将吉儿沙合儿城记载为一座修建有优美建筑的大城。在《世界志》中，其为喀喇满部地区的城市之一。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阿马思牙（Amāsiyah，或Amāsiyah，或Amasia）城是其行政中心之一；据穆思套菲记载，此城是由算端阿剌丁重建的。伊本·白图泰曾经过此城，并称这是一座大城，街道宽敞，市场优美，周边有秀丽的花园，靠沿河修建的水车灌溉。在他那个时期，此地属美索不达米亚的算端统治，距此城不远就是速奴萨（Sūnusā）城（在《世界志》中拼写为Sūnīsā）[9]，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狂热的什叶派信徒。阿马思牙城北就是剌底［Ladīk，即老底思牙·庞提卡（Laodicea Pontica）］城[10]，在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是一座重镇，伊本·比比著的编年史里常提到该城。据穆思套菲记载，三孙（Samsūn，或Sāmsūn，希腊所称Amysos）港[11]是一座适合船只停泊的大港，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后半叶前，随着其商业贸易的发展，逐渐代替了原来的旧港口三奴卜（Sanūb）或思奴卜（Sīnūb，即Sinope）港。[12]

塞尔柱王朝时期，尼撒儿（Nīksār）或纳吉萨儿（Nakīsār，希腊之Neo-Cesarea）城已是一座重镇，伊本·比比常提及此城；穆思套菲说，

这是一座中型城市，其周边是种植有各种水果的众多果园。土喀（Tūkāt，也拼写为Dūkāt）城在尼撒儿城之西，在通往阿马思牙城的道路上，塞尔柱王朝时期，这里是重要的行政区之一；再往西就是兹剌（Zīlah）城[13]，伊本·比比和后来的其他著述者提及过此城。吉兹儿·伊尔马（即哈儿亦思）河岸边的思瓦思［Sīvās，即塞博思提亚（Sebastia）］城是阿剌丁算端重建的，这座城是用石条和新泥浆建造而成的。穆思套菲称，这里生产的毛织品很有名，而且大部分外销；这里气候寒冷，但可以种植棉花，也盛产粮食。伊本·白图泰说，该城是美索不达米亚算端在这一地区统治下的最大城市。该城有总督府，城市街道整洁、市场极佳，还有一座伊斯兰教学校（Madrasah）或学院。

穆思套菲记述了从思瓦思城通到波斯地区的西边道路：从思瓦思城起经两站可到札剌（Zārah）城[14]，这是一座相当重要的城市，再经两站多到达阿可·沙合儿（Āk Shahr）城[15]，即“白城”，在塞尔柱编年史中常提到该城。阿可·沙合儿城西北为喀喇·喜萨儿（Karā Hisār）堡[16]，即“黑堡”，伊本·比比常提及此地，为了区别，他称该地为喀喇·喜萨儿·道剌（Karā Hisār Dawlah，意为“黑堡国”），像其他地名一样，穆思套菲也提到此地。在《世界志》中，此堡称作喀喇·喜萨儿·沙宾（Karā Hisār Shābīn）堡，因其附近有明矾（*Shāb*）矿。阿可·沙合儿城有道路通往波斯地区，经过三站到达阿儿赞章城，再过三站到达阿儿赞·鲁迷城。从这里，沿道路南行三站到汗奴思（Khanūs，或Khūnās，这是伊本·比比的叫法，现代则称作Khinis）城[17]，再行10里格到达麻剌思吉儿得（即Manzikart）城，此城距凡湖岸边的阿儿吉失（Arjīsh）城[18]有8里格[19]。

喀喇满部[20]地区是十部突厥蛮异密统治地区中的最大区域，该地区名称取自居住在这里的突厥蛮部落，其首府在剌兰答（Lārandah）城，也以地区之名叫作喀喇满（Karamān，或Karāmān）城[21]。剌兰答城的历史可追溯到拜占庭时期，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曾访问过此城，将其名拼写为剌兰答（Al-Lārandah），他称这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周边是花园，供水充足。14世纪末，该城遭到了帖木儿军队的洗劫和蹂躏，但不久以后又恢复了先前的繁荣。剌兰答城南就是阿儿麻纳（Armanāk）城[22]，据穆思套菲记载，此城曾是一座大城，但到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则变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城市。在《世界志》中该城和色乐可（Selefkeh）城被一起提到，后一座城被早期阿拉伯人称作塞琉古（Salūkiyah，即Seleucia of Cilicia）城。奥斯曼人统治

时期，该地区属于叫亦池·伊里（Īch Īlī）的地区，其在土耳其语中意为“腹地”，这种记载根本上不能反映这一地区的实际自然特点，其实此地在沿海地区，这也说明亦池·伊里应是对古希腊名称思里思（Cilicia）的简称，并由此造成一种讹误。[23]

前文已提及，苦尼亚（即Iconius）城[24]是塞尔柱王朝的首都，但在喀喇满异密统治时期沦落为一座二流城市。据穆思套菲记载，此城的宫殿里有阿亦万（Aywān）大殿，该宫殿是算端乞利吉·阿思兰修建的，他也在这里修建了城堡。后来，阿剌丁修建或修复了城墙，这些城墙是用条石砌成的，高30腕尺，城墙外有20腕尺深的护城河。城墙的周长为10000步，修有12座城门，每座门上建有城楼。从附近的一座山里引来丰富的水，储存在一座城门穹顶之下的大水池里，然后用300条水管将水输送到城里。苦尼亚城附近分布着果园，闻名遐迩，园中产的黄色李子颇为有名，该城的周边种植着大量的棉花和粮食。

穆思套菲还称在他那个时代，苦尼亚城大部分已被毁，但城堡南边不远的城区还居住着很多居民。如前所述，该城有苏非神秘主义大诗人贾剌丁·鲁米的陵墓，这是人们的朝谒之地。伊本·白图泰注意到了该圣墓，还对苦尼亚城的优美建筑和完备供水系统大加称赞。他提到了此地的果园和所产的杏子，并称其为“信仰之月”（*Kamar-ad-Dīn*），其大部分出口到叙利亚。这里街道宽敞，市场供应充足，同业者各有专区。伊本·比比著的塞尔柱编年史里不经意中提及了苦尼亚城的三座城门的名称，即马市（Bāzār）门、阿思雅（Assay）屋门和阿合马（Ahmad）桥门。

苦尼亚城的喀喇·喜萨儿（Karā Hisār）堡[25]位于城东不远，穆思套菲曾提及该堡，并说此堡是一位叫八兰·沙（Bahrām Shāh）的人修建的。过了此地就是喜剌可剌（Hiraklah，即Heraclea）城，后来常称作阿剌可利牙（Arāklīyah）[26]，在《世界志》中经常提及。苦尼亚城之北就是剌底·速合塔（Lādīk Sūkhtah）城，也称“被焚毁的剌底［Lādīk，即老底思牙·坎姆布斯塔（Laodicea Commbusta），希腊语称作卡塔特考门纳（Katatekaumena）］”[27]，伊本·比比称其为剌底（Lādīk）村，以别于称作老底思牙（Laodicea）的其他城市（Pontica和Ad Lycum）。《世界志》将老底思牙·坎姆布斯塔称作余儿干·剌底（Yurgān Lādīk）城，又称剌兹吉雅·喀喇满（Lādhikiyah-i-Karamān）城[28]。

在喀喇满部地区之北就是安高剌（Angola，即希腊语Ancyra）城，此名称在早期阿拉伯语文献中拼写为安苦剌（Ankurah），后来的波斯语和突厥语著述者则拼写为安古利牙（Angūriyah）。据穆思套菲记载，此城气候寒冷，但该城附近地区盛产粮食、棉花和水果等。历史上此城因伊斯兰历804年（1402年）帖木儿在激战中俘获奥斯曼算端八亚兹·亦儿的林（Bayazīd Ilderim）[29]而闻名。位于大盐湖东边的是苦石·喜萨儿（Kūsh Hisār）或苦车·喜萨儿（Kūch Hisār）城[30]，穆思套菲称这是一座中型城市，其名称也出现于《世界志》中。该盐湖南端以东不远就是阿可·萨莱（Āk Sarāy）城[31]，即白宫城，是算端乞利吉·阿思兰二世在伊斯兰历556年（1171年）修建的，穆思套菲称这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其周边土地肥沃。阿可·萨剌（Āk Sarā，伊本·白图泰这样拼写）城位于三条溪水边，这里花园优美壮丽，其城墙内有很多葡萄园。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这里的市民用羊毛制作优质的地毯，这些地毯绝大部分出口到叙利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伊本·白图泰还称在他那个时期，阿可·萨剌城是美索不达米亚算端总督府的所在地。

阿可·萨剌城东约50英里为麻兰苦必雅［Malankūbiyah，即麻剌考皮阿（Malacopia）］城，穆思套菲称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这里是一座重镇。此城之北就是另一个喀喇·喜萨儿（Karā Hisār）[32]，穆思套菲称此地在尼格答（Nigdah）地区，喀喇·喜萨儿东为答瓦鲁（Davalū，在《世界志》中拼写为Davahlū）城，此城在前文提及的阿儿贾石山的山脚下。这座城和凯撒利雅城不止一次地出现于伊本·比比的历史著作里。据穆思套菲记载，答瓦鲁城是一座中型城市，其城墙是算端阿剌丁重建的。麻兰苦必雅城南是尼格答［Nigdah，在伊本·比比的著作中拼写为纳吉达（Nakīdah）］城，位于早先的土瓦纳（Tuwānah，Tyanah）之地，是算端阿剌丁修建的。据穆思套菲记载，尼格答城是一座中型城市，伊本·白图泰曾经过此城，据他记载，当时该城大部分已毁。他还说此城属于美索不达米亚算端的统治地；流经该城的河水叫纳赫儿·阿思瓦（Nahr-al-Aswad），即黑河，其上建有三座石桥。尼格答地区的果园产量极高；这里利用水车灌溉果园。尼格答城南是鲁鲁阿城，伊本·比比常提到此地，如前所述，这是一座要塞，并以思里思门关北端为界。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穆思套菲称鲁鲁阿城是一座小城，其周边是肥美的草原。这里虽气候寒冷，但周边则是有名的猎场。[33]

在忒凯部异密之境，最为重要的城市当属阿剌牙城和安塔利牙

（Antāliyah）城，这两座城均以其港口而闻名。如前所述，第一座城是塞尔柱王朝算端阿剌丁在考拉斯思玉姆（Coracesium）城的废墟上兴建的。伊斯兰历733年（1333年），从叙利亚起航的伊本·白图泰在此城的港口登陆，并称阿剌牙港在他那个时期是与亚历山大港有往来贸易的大港。在该城之北，算端阿剌丁修建了坚固的城堡，伊本·白图泰细致地考察了这座城堡，但在他那个时期阿剌牙城显然是由喀喇满地区的算端统治。

第二座港口城市安塔利牙城在阿剌牙城西100英里的海湾顶端，这里曾因是十字军去往巴勒斯坦的中转站而闻名。这是一座优美的城市，亚库特称其为鲁迷地区的第一港口，其有坚固的城墙，周边土地肥沃，还有很多葡萄园。塞尔柱王朝算端乞利吉·阿思兰在此处的山顶上修建了一座宫殿，可俯瞰大海（地中海，译者），伊本·白图泰说这里有很多信仰基督教的商人居住，特别是在南边的米纳（Mīnā）城或港口，其聚居地被用一道墙隔开，他还说各个行业在市场上有自己的专区。这里还有一个犹太人聚居区，在城里，穆斯林居住于自己特定的社区里，那里有清真寺和学校（Madrasah）。安塔利牙城在十字军编年史中称作萨拉里亚（Salalia，或Attaleia），在关于帖木儿武功活动的记载中常以阿答里牙（`Adāliyah）的形式提及。该城西边就是亦思塔奴思（Istānūs）城[34]，其曾被阿里·亚兹底提到，该城在《世界志》中写为亦思塔纳兹（Istanāz）。[35]

忒凯部地区之北是哈迷得部异密的属地，其周边有亦格都儿（Egridūr）[36]、卜儿都儿（Burdūr）[37]、别·沙合儿（Beg Shahr）[38]和阿可·沙合儿（Āk Shahr）[39]等四湖。据伊本·比比记载，在塞尔柱王朝时期，其总督府设在卜鲁噶鲁（Burughlū）城，该城显然就是后来的乌鲁·布尔鲁（Ulū Burlū，在亦格都儿湖西）城，拜占庭称之为索左颇里思（Sozopolis，或Apollonia）。安塔吉牙［Antākiyah，即皮斯迪亚的安都（Antioch of Pisidia）］城在早期穆斯林编年史中经常提到，在使用突厥语的时代，其名称为牙剌瓦赤（Yalāvāch）城，位于亦格都儿湖和阿可·沙合儿湖之间的平原上。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的记载看，此地的首府显然就是亦格都儿［Egridūr，古之普罗斯塔纳（Prostanna）］城，位于与之同名的湖泊的南端。据伊本·白图泰记载，这是一座大城，建筑优美，市场繁华，周边有很多灌溉水源丰富的果园；他还说商人的船只可渡过该湖，这样其商品就可输往周边地区，并可以与阿可·沙合儿湖与别·沙合儿湖岸边的城市进行贸易。

据《世界志》记载，别·沙合儿［Beg Shahr，或Bey Shahr，拜占庭之卡拉利亚（Karallia）］城[40]在与之同名的湖泊的下端，该城是塞尔柱王朝算端阿剌丁修建的。此城石建的城墙有两座城门，城内有聚礼清真寺、舒适的澡堂，一处叫阿剌噶（Alarghah）的地方还有一个市场。亦格都儿城西就是位于与之同名的湖泊岸边的卜儿都儿（Burdūr）城[41]，据伊本·白图泰记载，这是一座小城，这里有很多溪流和花园，其由附近山上的一座城堡守卫。亦格都儿城南是亦思帕儿塔（Ispārtah）城[42]，《世界志》称该城是后期哈迷得部地区首府。伊本·白图泰将其名称拼写为萨八儿（Sabartā），并称这是一座建筑优美、花园密布的城市，其由一座城堡守卫。该城就是拜占庭时期的巴里思（Baris）城，现在通常拼写为萨帕尔塔（Sparta）[43]。

阿可·沙合儿湖就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见原文第135页）所称的八思力云（Bāsiliyūn）湖，拜占庭将其称作四十烈士湖。该湖之西就是喀喇·喜萨儿（Karā Hisār）堡[44]，其与阿可·沙合儿城[45]一起常在关于帖木儿武功活动的记载中提及。据阿里·亚兹底记载，阿可·沙合儿城是不走运的奥斯曼朝算端八亚兹·亦儿的林在伊斯兰历805年（1403年）被帖木儿打败于安高剌（Angora）城[46]后，于郁郁寡欢中死去之地，阿可·沙合儿城和喀喇·喜萨儿堡在穆思套菲的著作中作为著名的地名常被提及。其中的喀喇·喜萨儿，现在的别称为阿芙蓉（Afyūn），[47]因其周边种植大量的鸦片而得名，其位置应是希腊城镇皮里姆内索思（Prymnessos，或Akrenos）城所在地，当地传说称倭马亚王朝早期的斗士八塔儿在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中就战死在此地附近。但最早的著述者塔巴里仅称在伊斯兰历122年（740年），阿剌·八塔儿（Allah-Al-Battāl）被杀于希腊之境，但未说明被杀之地。[48]

哈迷得部地区之北和之西就是可儿密养（或吉儿密养）部异密统辖地，其首府在苦塔喜牙（Kūtāhiyah，即Cotyæum）城[49]。如前文所述，阿拉伯历史文献将其名记载为苦乞牙（Kutiyah），但拜占庭人所筑的城市肯定早已被毁，《世界志》所记载的苦塔喜牙城是后来中世纪的吉儿密养地区的算端建造的。伊本·白图泰则称此城居住着盗匪。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在关于帖木儿武功活动的记载中常提及此地，帖木儿有段时期曾将指挥部设在这座城里。苦塔喜牙城东100英里，桑噶留思（Sangarius）河支流上游附近就是思兀力·喜萨儿（Sīvrī Hisār）[50]堡，帖木儿也曾将指挥部设在此地。其名称在土耳其语中意为“指点堡”（可疾云尼将其拼写为Sībrī Hisār），该城位于罗马·佩思努

斯（Roman Pessinus）城北，此城后来被称作朱思庭尼亚诺颇里思·帕里亚（Justinianopolis Palia）。可疾云尼称，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此处有一座著名的教堂，称作拜牙·坎那努斯（Bay`at Kamnānūs），并说如果遭难的动物绕教堂转七圈，灾难就会消除，并能恢复健康。

思兀力·喜萨儿堡南为前文（原文第137页）已提及的阿木利雅（即阿莫廉，在现代的Assar Kal`ah）城，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的记载来看，此城似乎还是座重镇。他还说不知什么原因，一般人将其称为安古利牙（Angūriyah）城，或安古剌（Angūrah）城，即安高剌城，这种奇异的误称也出现于《世界志》中，在较晚的文献里则称其为安古利牙（安高剌）城，但通常仍称作阿木利雅城。吉儿密养部地区东南方是剌兹（即Laodicea Ad Lycum）城，突厥人称作德尼兹鲁（Denizlū）[51]，意为“有很多河水之地”，因有很多溪流发源于此；现在称作“旧堡”（Eskī Hisār）[52]。据伊本·白图泰记载，这是座大城，有七座清真寺可供聚礼，还有极好的市场。剌兹城的希腊妇女纺织棉布，然后用金线刺绣，其制作精美无比，她们还因穿着这种刺绣衣服而闻名。《世界志》将其名称记载为剌兹吉牙（Lādhikiyah）这种古名称形式。[53]

在门忒沙（Menteshā）部异密统治的地区中，伊本·白图泰访问了三座相邻的城市：木噶剌（Mughlah）[54]、密剌思和八儿斤（Barjīn）[55]。据《世界志》记载，异密居于首府木噶剌（Mughlah，是过去的Mobolla）城，伊本·白图泰称该城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密剌思（Mīlās，或Mylasa、Melisos）城也是一座大城，有众多的花园，产很多水果，且河流纵横。八儿斤（即Bargylia，现称作Assarlik，译为阿萨尔里克）城，距离密剌思城只有几英里，是一座新建的城市，位于山顶上，该城有一座清真寺和优雅的民居。伊本·白图泰访问过在门忒沙部地区东边的苦儿·喜萨儿（Kul Hisār）城[56]，穆思套菲称其为谷儿（Gul），并说这是一座中型城市，在关于帖木儿武功活动的记载中也提到了此城。伊本·白图泰称该城修建在一个小湖之中，四周全是水，水中长满芦苇。唯一一条通向城里的道路就是湖水中的堤道，修建在山头上的城堡很坚固，可以俯瞰全城。位于门忒沙部地区北部的是喜森·塔瓦思（Hisn Tawās）堡，今天称作道纳思（Daonas）[57]，其距剌兹城有一天半的路程。伊本·白图泰称塔瓦思堡是一个大城堡，堡南有带城墙的城市。据传说，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位著名圣门弟子速亥卜（Suhayb）就出生在此地。[58]

门忒沙部地区的北边就是阿亦丁部异密统治的地区，其首府为乞剌（Tīrah，即Teira）城[59]。伊本·白图泰曾在此城拜会过阿亦丁部的异密，并说此城是一座优美的城市，有很多花园和纵横的河流。他也到过必儿吉（即Pyrgion）城，距乞剌城之北有一站之地，并盛赞这里优美的树林。阿亦丁（Aydīn，或Guzel Hisār）城[60]位于拜占庭时期的特拉雷斯（Tralleis）城的旧址上，是该地区第二座重要的城市。亦费所（Ephesus）城位于海岸，为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熟知，并记其名为阿法所（Afasūs或Abasūs）城，这里以有《古兰经》（18：8）提及的七眠子洞而闻名。该城后来被称作阿牙速录（Ayāsulūk，也书写为Ayāthulūkh或Ayāsalīgh）城，是希腊语阿吉奥·托罗戈（Agiou Theologou）之误，其名称得自圣约翰·托罗戈（Saint John Theologou）大教堂，该教堂由犹斯汀安（Junstinian）皇帝所建。伊斯兰历733年（1333），伊本·白图泰访问该城时到过这座教堂。他称此教堂用巨石建成，而且这些石块已经过仔细的打磨，每块长10腕尺。穆斯林征服此地后，此地的另一座教堂被改建为聚礼清真寺，是一座极秀美的建筑，其墙面用各种颜色的大理石砌成，人行通道则用白色的大理石铺成，还有用铅覆盖的11个穹顶。伊本·白图泰称阿牙速录城在他那个时代有15座城门，有一条河（Cayster）经此城入海，该城周边为茉莉花园和葡萄园。

阿亦丁部地区的另一个大港是思米儿纳（Smyrna）港，突厥人称作阿兹米儿（Azmīr，或Yazmīr）[61]，伊斯兰历9世纪（15世纪）初，帖木儿从善堂骑士军团（Knights Hospitallers）[62]手中夺得此城。伊斯兰历733年（1333年），伊本·白图泰来到该城，并称当时该城的绝大部分已毁；在附近的山上有一座大城堡。他还说阿亦丁部的异密从此港派船只袭击拜占庭和劫掠周边基督徒的城市。这一地区的最后一座城市就是夫贾（Fūjah，或Fūchah，Phocia）城[63]，靠近萨鲁汗部地区的海岸，后来记载帖木儿武功活动的文献说这是一座穆斯林的城堡，但在伊本·白图泰的旅行记中则称该城控制在“异教徒”，即热那亚人（Genoese）手中。萨鲁汗部地区的首府是麻噶尼思牙（Maghnīsiyah，或Maghnīsiyā，Magnesia）城[64]，伊本·白图泰称此城是修建在山麓的一座优美城市，周边有很多花园，溪流密布，是萨鲁汗部异密建牙帐之地。在帖木儿征战时期，麻噶尼·思牙（Maghnī Siyāh，麻噶尼思牙城当时的拼写形式）城周边的地区称作萨鲁汗·亦里（Saruhān-Ilī）地区。[65]

萨鲁汗部地区之北是喀喇思（Karāsī，或Karah-Sī）部异密统治的地区，其首府为八力可思里（Balīkesrī）城[66]和八儿噶麻［Barghamah，即皮儿噶莫斯（Pergamos）］城[67]。伊斯兰历733年（1333年），伊本·白图泰曾访问过皮儿噶莫斯城，并说该城绝大部分已毁，其由修建在附近山顶上的一座城堡守卫。他也访问了八力可思里城，该城修建得很坚固，市场良好，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尽管此时八力可思里城没有聚礼清真寺，但喀喇思部的算端独木儿·汗（Dumūr或Tīmūr Khān）通常居住在这里，这座城是其父修建的。在后来关于帖木儿武功活动的记载中常提到此城。

伊本·白图泰从八力可思里城来到卜鲁萨（Brusā）城，此城当时是奥斯曼（`Othmānlī）国的都城，该国已开始影响和吞并其他突厥蛮异密统治地区。这时卜鲁萨（Brusā，或Brūsah，即Prusa）城已是一座大城，有很好的市场和宽阔的街道。城市周边到处是果园，城内有一个储藏水的大池，此池的水被输送到所有居民家里。卜鲁萨城有一家医院，其内分男、女住院部，入住患者可完全免费治疗，这里还有一个热水浴室[68]。伊本·白图泰拜访的奥斯曼算端就是奥儿汗（Orkhān，是Bayazīd Ilderim的祖父，前文提及后者于15世纪初被帖木儿打败），其首都的主要纪念性建筑为奥儿汗的父亲算端奥斯曼的陵墓，陵墓所在地先前是一座教堂。

密哈利吉（Mikhālīj，即Miletopolis，拜占庭称作Michaelitze）城[69]在卜鲁萨城西约50英里，记载帖木儿武功活动的文献和《世界志》常提及此城。但在伊斯兰历733年（1333年），奥斯曼国土上最重要的城市是尼色牙（Nicæa）城，算端奥儿汗从拜占庭手中夺得该城。尼色牙城被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作尼吉雅（Nīkiyah）城，突厥人称作牙兹尼（Yaznīk或Iznīk）[70]。据伊本·白图泰记载，牙兹尼（Yaznīk）湖中长满了芦苇。该城位于此湖的东端，只有一条穿过水域的湖堤通到城里，道路很窄，一次只可以通过一位骑士。他说，该城大部分已毁，但城周边还有很多果园；四道独立的城墙环绕于该城，城墙之间是护城河，并通过吊桥连接。尼色牙城之北是尼考密底牙（Nicomedia）城，早期阿拉伯语文献称作尼可木底牙（Nikmūdiyah）；突厥人称作亦兹可密（Iznekmīd），《世界志》中就是这样记载的，后简称亦兹密（Izmīd）[71]，这种称法一直沿用到现在。伊本·白图泰，或其他作者没有记载这座城市。[72]

吉兹儿·阿合马部地区位于从博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附近到思挪坡（Sinope）城的黑海沿岸。伊本·白图泰从牙兹尼城起程，经过桑噶留思（突厥人称此河为Sakarī）河后，到达该地区的第一座大城市—木土里尼（Muturinī或Mūdurnī，即现代的Mudurlū，古之Modrene）[73]，并称此城相当大，《世界志》中也提到了该城。卜里（Būlī，即Claudiopolis）城[74]在木土里尼城东北，据伊本·白图泰记载，该城位于一条流量相当大的河的岸边；此城向东一站之地就是克勒合得·卜里（Kerehdeh Būlī，或Geredī Būlī）城[75]，这是一座位于平原上的大城，有良好的市场和宽阔的街道，当地居民则按民族居住在特定的区域。伊斯兰历733年（1333年）时，哥里底·卜里（Geredī Būlī）城是异密居住地，显然也是吉兹儿·阿合马部地区的首府。

该地区的东边就是喀思塔木尼牙［Kastamūniyah，或喀思塔木尼（Kastamūnī），即Castamon］城[76]，穆思套菲称，这是一座中型城市。伊本·白图泰说，此城是他游历小亚细亚地区所看到的最大城市之一，并称这里的粮食既便宜又充足。此城的东北部是三奴卜（Sanūb，Sīnūb，Sinope）港，伊本·白图泰从此港乘船到达可里密牙，从他的记载中可以得知思挪坡（Sinope）城三面环海，只有东边的城门可进入城里。这是一座优美繁华的港口城市，城防坚固。此地还有一座优美的聚礼清真寺，其穹顶用大理石柱支撑；这里有一处名胜—著名宣礼员（Muezzin）阿比西尼亚（Abssinia，即埃塞俄比亚）人必剌（Bilāl）的陵墓，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和他的宣礼员，也是第一位召唤穆斯林礼拜的人。

拜占庭时期修建的城市冈剌·日耳曼尼珀里斯（Gangra Germanicopolis）城在喀思塔木尼城南约50英里处，突厥人称作坎可里（Kānkrī）[77]，在早期阿拉伯编年史中称作汗贾剌（Khanjarah），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喜苦在位时期曾发动过一次大的袭击，其军队曾深入到希腊人所属的这座城市。可疾云尼将其名称拼写为干贾剌（Ghanjarah），并称此城位于纳赫儿·麻鲁卜（Nahr Maklūb）河[78]的岸边，“这是条倒流河”，因其与其他河流不同，是从南流向北。他还说伊斯兰历442年（1050年）干贾剌城在一次地震中几乎完全被毁。吉兹儿·阿合马部地区将要叙述的最后城市是《世界志》中记载的苦车·喜萨儿（Kūch Hisār）城。其位于喀思塔木尼城和坎可里城之间，可能就是前文穆思套菲所提及的苦石·喜萨儿（原文第149页），应是与大盐湖同名的城市。[79]

有关经过小亚细亚的道路，除从塔儿速思城到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在原文第134页已述）和从思瓦思城向东到帖必力思（Tabrīz）城的道路（在原文第147页已述）外，其他道路在道里志中并未提及。但在《世界志》[80]中提到了很多条道路，这些道路以思瓦思城为中心辐射开来，沿途各村庄的名称和驿站名均有记载，至今这些地名大多数仍可在地图上查到。可惜，在很多情形下，具体里程被省略了，因此，我们从中得到的关于这些道路的相关信息不是很多。

[1] 即吕底（Lydia）王国，是小亚细亚中西部一古国（前1300年或更早～前546年），濒临爱琴海，位于今土耳其的西北部，其居民的语言为印欧语，以富庶及其宏伟的首都萨第斯（Sardis）而闻名，它大约在前660年开始铸币，可能是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并与周边的地区进行贸易。译者。

[2] 即克里米亚半岛，译者。

[3] 今为埃里迪尔（Eğirdir），属伊斯帕尔塔省，在与之同名的湖的南岸，人口1.6万，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4] 今为米拉斯（Milas），属土耳其西南部靠地中海的穆拉（Muğla）省，人口5.5万，是座古城，有很多遗迹，是古丝绸之路上小亚细亚西南岸的重要通道。译者。

[5]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以弗所城附近。译者。

[6] 今为布尔萨（Bursa），是土耳其西部靠近今马尔马拉海的布尔萨省的省会，人口180万，是座漂亮的古城，有很多遗迹，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7] 今为代韦利（Develi），在土耳其中部的开塞利省，人口3.7万。译者。

[8] 今为克尔谢希尔（Kirsehir），是克尔谢希尔省省会，人口11万，位于土耳其中部，是古代通往罗马的重要通道。译者。

[9] 今此名不存。译者。

[10] 今为拉迪克（Ladik），属萨姆松（Samsun）省，人口8000，位于土耳其北部，是古代通往罗马的重要通道。译者。

[11] 今为萨姆松（Samsun），是萨姆松省省会，也是土耳其位于黑海沿岸的重要港口，人口60万，古代丝绸之路的水陆交通重镇。译者。

[12] 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71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

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87、289、292页。伊本·比比，第26、30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2、163、164、20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270、416、417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599、615、620、622、623页。

[13] 今为济莱（Zile），属托卡特省，人口3.4万，是座古城，也是去往黑海和罗马的重要通道。译者。

[14] 今为扎拉（Zara），属锡瓦斯省，人口1万，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往来的重镇。译者。

[15] 今在苏谢赫里（Suşehri）城。其位于锡瓦斯省，人口1.4万，历史上是去往波斯、罗马和大食的重要通道。译者。

[16] 今为谢宾卡拉希萨尔（Sebinkarahisar），属土耳其黑海沿岸的吉雷松（Giresun）省，人口1.2万，是古代黑海沿岸的重镇。译者。

[17] 今为赫讷斯（Hinis），属埃尔祖鲁姆（Erzurum）省，人口9000，是古代重镇。译者。

[18] 今为埃尔基什（Ercis），属凡省，位于凡湖东北岸，人口8万，是丝绸之路上东西往来的重镇。译者。

[19] 伊本·比比，第26、292、308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8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1、163、164、199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424、622、623页。

[20] 《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39页载："喀喇满（Qarāmān）地区是以一个叫喀喇满的人的名字命名的，该地区包括从小阿剌蛮到鲁迷海（即地中海）的地区。这里的城市有苦尼亚、剌兰答（Lārandeh）、阿可萨莱（Āqserāy）等。以这个地区的名字命名的一个突厥蛮部，叫作喀喇满部（Qarāmānlū）。"译者。

[21] 今为卡拉曼（Karaman），是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的卡拉曼省的省会，人口13万，历史上此城是去往罗马的重要通道，也是一座古城，有很多遗迹。这里因曾是土库曼卡拉曼部落的聚居地而得名。译者。

[22] 今为卡拉曼省的埃尔梅内克（Ermenek），人口1.1万，是丝路古镇，多条道路在这里交会。译者。

[23] 作者的这种解释实在有些牵强，其实土耳其语亦池·伊里（Īch Īlī）意为内（上）地部落，或人民居住地，和外（下）地（Sirt Īlī）部落居住地是对应的，这是突厥诸族通常称呼地名的一种习惯，与靠不靠海无关。译者。

[24] 《东方各国行纪》（*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Easts*）第1卷第123页载："科尼亚（Konieh，即苦尼亚）城的物价比前边经过的一些地方要便宜，甚至低很多，但各种物品很多。""科尼亚大量产做鞋和其他用品的普通黄皮革，这些皮革甚至销售到埃及、叙利亚等地。这里的兵器和衣服很便宜。"这里还有一个已毁了的澡堂，曾经很漂亮。这里还有座雕像，刻有文字。这里的人没有教养。"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各有座教堂。这里也有一些犹太人居住。"译者。

[25] 今难以查找，应在科尼亚城东边。译者。

[26] 阿剌可利牙在《东方各国行纪》（*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Easts*）第1卷第123页中称作Erkali［当代称作埃雷利（Eregli）］，"是有很多花园和树木的城市"。距城市不远是一条山脉，为陶鲁思山的余脉。译者。

[27] 今为拉迪克（Ladik），是位于科尼亚城西北的小城，为去往罗马的重要通

道，和黑海沿岸的拉迪克同名。译者。

[28] 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81、28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2、163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458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11、615、616页。伊本·比比，第8、9、287、324页。

[29] 八亚兹·亦儿的林（Bayazīd Ilderim）为奥斯曼帝国算端，1389～1402年在位。他于1396年征服保加利亚（Bulgaria），并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在1402年被帖木儿俘获，1403年在囚禁中死去。译者。

[30] 今为谢雷夫利科奇希萨尔（Şereflikoçhisar），位于土耳其中部安卡拉（Ankara）省图兹湖东岸，早前被称作科奇希萨尔（Koçhisar），后因此地发生过争取土耳其独立的大战，凯末尔加上了谢雷夫利（尊贵）的称号。现人口2.8万，是东西交通的要道。译者。

[31] 今为阿克萨赖（Aksaray），是阿克萨赖省省会，位于图兹湖东南，人口18万，为古今交通中心，古迹甚多。译者。

[32] 今此名不存，应在内夫谢希尔省的同名省会附近。译者。

[33] 伊本·比比，第5、34、44、279、314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

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85、286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2、163、164、20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635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429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17、620页。

[34] 此名今不存。大致在布尔杜尔（Burdur）省索谷特（Söğüt）小城附近。译者。

[35] 在《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提到了亚大利（Attalia，14：25）。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388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57、258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11、638、639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

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447、449页。

[36] 今为埃伊尔迪尔湖（Eğirdir Gölü），位于土耳其中部大湖地区，面积482平方公里，是土耳其的第四大湖，最大水深为16米，盛产水产品，是土耳其著名的旅游景点，湖岸道路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37] 今为布尔杜尔湖（Burdur Gölü），位于土耳其中部大湖地区，是土耳其最深的咸水湖泊之一，最大深度达110米，面积250平方公里，盆地达6150平方公里，是土耳其重要的湿地之一，在这里有很多候鸟栖息。译者。

[38] 今为阿克谢希尔（Akşehir Gölü）湖，是土耳其中部大湖地区科尼亚省和阿菲永卡拉谢希尔（Afyonkarahisar）省的界湖，面积350平方公里，淡水湖。译者。

[39] 今为贝伊谢希尔（Beyşehir Gölü）湖，位于土耳其中部大湖地区科尼亚省，面积650平方公里，淡水湖。译者。

[40] 今为库尼亚省贝伊谢希尔（Beyşehir）城，人口3.6万，是古今道路中枢，丝路古城。译者。

[41] 今为布尔杜尔（Burdur），是布尔杜尔省省会，人口7万，在布尔杜尔湖的东南岸，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42] 今为伊斯帕尔塔（Isparta），是伊斯帕尔塔省省会，人口22万，在埃伊尔迪尔湖和布尔杜尔湖中途，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43] 萨八儿塔（Sabartā）或亦思帕儿塔（Ispārtah）是希腊语εις *Βάριδα*的讹误，见原文第157页有关亦兹密（Izmīd）和亦兹尼（Iznīk，Nicomediao和Nicæa）的脚注。

[44] 即阿菲永卡拉谢希尔省（Afyonkarahisar）的同名省会，人口18.6万，11世纪以后逐渐发展起来，历史上该城被称作哈帕努瓦（Hapanuwa）、阿卡娄印努（Ακροϊνόν Akroinon）、尼克珀里斯（Nikopolis）等，后来才称作阿菲永卡拉谢希尔（Afyon Kara Hisar），意为“鸦片黑堡”，是丝路古城、交通要道。译者。

[45] 《东方各国行纪》（*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Easts*）第1卷第119页称：“进入阿克希谢尔（Ak-shehr，即阿可·沙合儿）城的道路上有座用精美大理石建的清真寺，但现在已损毁。城市的左边是开阔的平原，土地贫瘠，耕作粗放。”“阿克希谢尔西边不远有条向右的道路穿越山脉，据说直达卡拉曼（Caraman，即喀喇满）城。”（第118页）城里的“客栈（khan）很脏又不舒适。市场里有少许皮制品、铁匠铺、衣服、缰绳、马具，所有这些产品极其粗糙。这座城市的三面是平原，背靠一座山。这座城市有八座宣礼塔（即八座清真寺，引者），这些塔有的用石头砌成，有的用土坯建成，很多塔已呈破败的景象。这座城市很大，但不繁华”。译者。

[46] 即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译者。

[47] 《东方各国行纪》（*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Easts*）第1卷第116～

117页将阿芙蓉·卡拉·黑萨尔（Afium Kara Hissar，即阿芙蓉·喀剌·喜萨儿）记为“古之Apaméa”，并称“这里的建筑有些是用石头砌成，有的是用土坯修成”。“城里很少有商人光顾，除了能制作一些生活必需品外，其他产品很少。”“卡拉·黑萨尔是鸦片的集散地，贫困的种植者拿一块重几盎司的鸦片前来交易，富有的商人以很便宜的价格收购，大量收集后运到沿海的斯米尔纳（Smyrna，又译思米儿纳，即今伊兹密尔）城和其他城市，在欧洲人开的工厂加工。”“这里的房屋与阿拉伯地区一样是平顶屋，还有八九座清真寺。”译者。

[48] 伊本·比比，第5、212、251、283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65、266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2、163、164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18、639、640、641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457、458、489、492页。拉姆齐（Ramsay）：*H. G. A. M.*，第87、139、396、401、406页。塔巴里，第2卷，第1716页。八塔儿（Al-Battāl）的墓在《世界志》中做了记载，该墓在伊斯兰历11世纪（17世纪）时位于思迪·噶兹（Sīdī Ghāzī）城附近，此城在苦塔喜牙城东边的喀剌·喜萨儿（Karā Hisār）北边50英里处。今天该墓的位置在吉儿沙合儿（Kīrshahr）城附近。有关皮斯迪亚（Pisidia）的安都（Antioch）城，在早期的阿拉伯编年史中常将其与同名的其他地方，尤其和叙利亚的安都城相混淆。雅忽比（Ya`kūbī）的《历史》（*History*）提到了“被烧毁的安都”（Antākiyah-al-Muhtarikah），这显然就是皮斯迪亚城的含义。同一作者（第2卷，第285页）还说在伊斯兰历49年（669年）发生了一次袭击，然后提到了“黑色的安都”（Antākiyah-as-Sawd），这可能指的就是伊索利亚（Isauria）的安都。

[49] 《东方各国行纪》（*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Easts*）第115页

称："屈塔希亚（Kutaieh，即苦塔喜牙）城虽很大，但建筑既不宏伟也不漂亮。这里有丰富的用水。此地的粮食和马匹很便宜。城里居民不多。城南的一道山为屏障，山上有已毁城堡的城墙。""距屈塔希亚城有两个半小时，在去往卡拉·黑萨尔（Kara Hissar，即喀剌·喜萨儿）的途中，流向西北的小河上有座小桥，桥边有些树木。这里的土地有些多石，有些有土壤，不宜种植庄稼。"译者。

[50] 今为锡夫里希萨尔（Sivrihisar）城，属土耳其中部埃斯基谢希尔（Eskişehir）省，人口9000。译者。

[51] 今为登尼资里（Denizli），是与之同名的代尼兹利（登尼资里）省的省会，人口57.7万，是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和旅游城市，有很多名胜古迹，多条道路在这里交会，是通往地中海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52] 此城易与波尔苏克河（Porsuk Çay）岸边的埃斯基谢希尔（Eskişehir）省的同名省会相混淆。译者。

[53] 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59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70、271、457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428、429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31、632、634、643页。

[54] 今为穆拉（Muğla）城，为土耳其西南部地中海沿岸的穆拉省的省会，人口6万。是小亚细亚地中海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55] 今为贝津（Beçin），在米拉斯城之南，是座小城，有古城堡，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56] 今为戈勒希萨尔（Golhisar），在布尔杜尔省西南，靠近代尼兹利省，人口1.4万，是通往地中海的要道，也是丝路古镇。译者。

[57] 今为塔瓦斯（Tavas），在米拉斯城西北，人口1.2万，是从地中海通往小亚

细亚中部的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58] 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69、277、278、279、28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3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38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448页。

[59] 今为蒂蕾（Tire），位于艾登（Aydin）省，是座小城，在艾登省省会艾登城北不远，历史上是小亚细亚西南部地中海沿岸的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后被艾登城取代。译者。

[60] 今为艾登（Aydin，或称Güzelhisar、Tralle、Anthea、Antiochi），位于艾登省，人口19.5万，是通往地中海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61] 今为伊兹密尔（İzmir），伊兹密尔省省会，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人口284.7万，在地中海岸边，是漂亮的海滨城市，也是海陆要道和历史古城，有很多名胜古迹，为旅游胜地。译者。

[62] 善堂骑士军团（Knights Hospitallers）的全称为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军团（Knights Hospitaller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也称圣约翰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Knights of Malta），雏形出现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尚未开始的1070年左右，最初任务是进行一些“慈善”工作，比如保护来“圣地”朝圣的西方基督徒，供给朝圣者食宿，医治生病的基督徒等，故得此名。但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结束后，善堂骑士团的宗旨开始发生变化，尽管一部分成员继续为饥饿和染病的朝圣者服务，但其中心任务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骑士军，由此变成了纯粹的封建骑士军事团体，并在

巴勒斯坦地区存在了将近200年。14世纪初，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进逼之下，骑士团于1310年移到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1522年，奥斯曼攦里蛮一世为了解除进犯欧洲的后顾之忧，大举进攻罗得岛，并攻占该岛。153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同意把马耳他岛及其附近的戈佐岛交给善堂骑士团管辖。于是，骑士团正式建立“马耳他骑士国”。此后，善堂骑士团进入鼎盛时期，船帆上标有马耳他八角十字的战船横行于地中海。18世纪，骑士团的势力远达美洲西印度群岛的圣克鲁瓦。1794年，美国独立后不久，这个骑士国就很快予以承认，并同它建立了外交关系。1798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在远征埃及的途中，将骑士团从马耳他岛上赶了出去，直到1834年才在意大利的罗马扎了根。此后，其再度转向经营慈善事业，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名称也改为“耶路撒冷、罗得岛和马耳他圣约翰军事护理人员骑士团。译者。

[63] 今为伊兹密尔省福恰（Foça）城，位于爱琴海岸边，是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人口2.7万，为海陆要道和丝路古城。译者。

[64] 今为马尼萨（Manisa），在斯匹鲁斯（Sipylus）山山麓，马克萨省省会，人口30.9万，为土耳其发展较快城市，是通往地中海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保存有很多古迹。译者。

[65] 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95、307、308、309、31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466、468、470、480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34、636、637页。拉姆齐（Ramsay）：*H. G. A. M.*，第110、22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91页；第2卷，第806页。有关七眠子洞的传说，作者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Palestine under the Moslems*）一书中已做了讨论。（第274页）

[66] 今为巴勒克西尔（Balıkesir），是巴勒克西尔省省会，人口26.7万，是丝路古城，也是通往地中海的要道。译者。

[67] 今为伊兹密尔省贝尔加马（Bergama）城，人口6.1万，是座古城，也是通往爱琴海的要道。译者。

[68] 《东方各国行纪》（*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Easts*）第1卷第108～109页称："在卜鲁萨（Broussa，即布尔萨）著名的是洗浴室：城郊有很多温泉。有的是含铁温泉，有的是硫磺泉。这个洗浴的地方叫Kaplutcha Hammam，位于此城的西北或西北偏北，距城门约有1英里半。水中有轻微的硫磺，水温不超过摄氏100度。宽敞又大的浴室大概不少于100英尺。对门第二间房间也一样宽大。后一个房间温度更高一些。每个房间的当中有华贵大理石装饰的喷泉，涌出一股纯净、清凉的泉水，供人饮用。第三个房间虽空间相对小一些，但还是很大，温度更高，呈圆形，使浴客感到舒服。这个房间中间有个圆形水池（Piscina），直径超过25英尺。池边有两阶大理石台阶。池中水深约4英尺半。这里有个很高的亭子，里面有6室，每室有大理石大浴盆。里边的墙装饰着彩色的瓦，过道铺着大理石。整个环境布置得宽敞舒适。服务人员很多，业务娴熟而热情。"第111页还记述了女性浴室，以及布尔萨城周边的自然环境、所产丰富物产，尤其提到了布尔萨城并不大，但其清真寺很大，还称这座城的大部分于1802年被烧毁。当时这座城有6万人，其中穆斯林有5万。亚美尼亚人有7000，其中120家是富人，做大买卖；布尔萨城的亚美尼亚人中没有特别穷的。希腊人有3000，犹太人有1800。译者。

[69] 今为卡拉贾贝伊（Karacabey），在布尔萨省的马尔马拉海岸边，人口5.5万，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也是土耳其的工农业重镇。译者。

[70]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55页称："尼色牙湖在鲁迷。其周边有居民的耕地。该湖长8法儿萨，宽5法儿。"《东方各国行纪》（*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Easts*）第1卷第108页载："从又长又陡的山坡下来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又平坦又肥沃的平原，现在叫伊兹尼（Iz-nik即亦兹尼）平原，一直延伸到尼色牙湖（Lake of Nicæa，今天称作Iznik Gölö），很多清澈的溪流从有裸露山顶的山中流下来，非常漂亮。"平原上"有一些村庄"。今天伊兹尼城仍存在，是土耳其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也可参见下文注释。译者。

[71] 今为伊兹米特（İzmit），科加厄利（Kocaeli）省省会，一座大型城市，美丽的海滨城市，人口30.2万，是亚洲丝绸之路的最后一站，具有重要的地位，保留有很多名胜古迹。译者。

[72] 亦兹可密（Iznekmīd）是拜占庭名称εls Νικμήδειαυ的讹误：εls Νίκιαυ的亦兹尼（Iznīk）。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315、316、317、32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466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

（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31、656、661、662页。拉姆齐：*H. G. A. M.*，第179页。伊本·白图泰记载了建立著名的土耳其步兵团（Janizary）的奥儿汗算端，他的记载很有意思。伊本·白图泰称这位统帅是所有突厥蛮异密中最有权势的人。他有100座城堡，在任何一座城堡中的居住时间不超过1个月，总是不停地进行征服战争和视察边界。

[73] 今为穆杜尔努（Mudurnu），属博卢省，是座小城，人口5000，是从地中海去往黑海的重要通道。译者。

[74] 即今博卢省省会，见前注。译者。

[75] 今为盖雷代（Gerede），属博卢省，人口2.4万，一座漂亮的古城，自然景色秀丽，各种花卉植物丰富，著名的度假胜地，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今伊斯坦布尔去往首都安卡拉的道路经过此城。译者。

[76] 今为卡斯塔莫努（Kastamonu），卡斯塔莫努省省会，人口9.6万，是黑海沿岸的重要旅游城市，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通道。译者。

[77] 今为昌克勒（Çankiri），昌克勒省省会，人口7.4万，是座美丽的城市，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78] 今天这条河被称作塔特里察伊（Tatli Çay）河，即甘河，这条河穿城而过，其发源于昌克勒城西北山区，全长约40公里，在城南汇入阿吉察伊（Aci Çay）河，即苦水河，而阿吉察伊河汇入铁穆尔察伊（Temere Çay）河，后一条河汇入土耳其境内最长的克孜勒厄马克（Kiziliremak Nehri）河。译者。

[79] 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3、164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325、332、336、338、341、348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

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45、646、648、649、651、65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475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68页。塔巴里，第2卷，第1236页。

[80] *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627、628页。

第十一章 阿札拜占（Adharbāyjān）地区

兀儿密牙（Urmiyah）湖。帖必力思（Tabrīz）城。萨剌瓦（Sarāv）城。麻剌噶（Maraghah）城及其河流。帕思洼（Pasawā）城和兀失奴（Ushnuh）城。兀儿密牙（Urmiyah）城和萨儿麻思（Salmās）城；货夷（Khoi）城和麻蓝（Marand）城。纳合乞宛（Nakhchivān）城。阿剌可思（Araxes）河上的桥梁。萨卜蓝（Sablān）山。阿儿答必儿（Ardabīl）城和阿合儿（Āhar）城。萨费·鲁得（Safīd Rūd）河及其支流。密延尼吉（Miyānij）城。哈儿哈儿（Khalkhāl）城和费鲁札八（Fīrūzābād）城。沙儿（Shāl）河与沙·鲁得（Shāh Rūd）地区。

多山的阿札拜占（Adharbāyjān）[1]地区在现代波斯语中拼读为阿扎尔比疆（Azarbījān）[2]，在（阿拉伯）哈里发王朝统治时期这里并不显要，但在蒙古西征后的中世纪晚期其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早期时代，此地的交通路线是从经吉八儿［即米底（Media）］地区的呼罗珊道分出来的；据穆喀达思记载，阿札拜占的范围有所扩大，这里的山区和高原有70多种语言或方言，但没有很大的城市。

后来的时代里，这里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并形成了地区首府。阿拔斯王朝早期，最先的首府城市就是阿儿答必儿（Ardabīl）城；晚期哈里发统治时期，帖必力思（Tabrīz）城取而代之，成为首府城市，但在蒙古西征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地位让给了麻剌噶（Marāghah）城。伊利汗国统治时期，帖必力思城很快恢复了先前的重要地位，但萨法维王朝前期阿儿答必儿城又一次夺得了首府之位。伊斯兰历11世纪（17世纪），沙·阿八思（Shāh `Abbās）[3]将亦思法杭（Isfahān）城定为波斯全境的首都，于是阿儿答必儿城就衰落了，帖必力思城又一次成为阿札拜占的首府，其地位保持到今天，现在其仍是波斯（伊朗）西北部最为重要的城市。

兀儿密牙（Urmiyah）湖[4]是这一地区最显著的自然地理标志，它是波斯境内最大的永久性水域，其长度从北到南超过80英里，最宽处是其长度的1/3多。该湖位于帖必力思城之西，与该湖同名的西岸城市为兀儿密牙（Urmiyah）城[5]。文献中对该湖名称有不同的记载。在《阿

维斯陀经注》（*Zend Avesta*）中，称其为察伊查思塔（Chaechasta），这个古波斯语名称以赤查思（Chīchast）的书写形式保留下来，在后来的《列王纪》（*Shāh Nāmah*）中仍在使用，并一直延续到穆思套菲时期。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马苏迪和伊本·豪喀尔称此湖为卜亥剌·喀卜赞（Buhayrah Kabūdhān）[6]，其源于阿剌蛮语，意为“蓝湖”（在阿剌蛮语中Gaboid为“蓝色”之意）。伊斯塔赫里称其为兀儿密牙湖（穆喀达思也是这样称呼），其别称为卜亥剌·舒剌（Buhayrah-ash-Shurāt，意为“分裂派”），因该湖周边居住着各非正统派的宗教信徒，据他记载，此湖的水盐分很高。他还说在他那个时代此湖上有往来于兀儿密牙城和麻剌噶城之间的船只，其岸边还有很多极其肥沃的土地。

此湖的中央有一个岛，伊本·塞剌皮昂称作喀卜赞（Kabūdhān）岛[7]，岛上还有船夫居住的小镇。据伊斯塔赫里记载，湖里满是鱼（伊本·豪喀尔则说湖中无鱼），这里还发现了一种叫“水狗”（*Kal-al-Mā*）的奇怪鱼；冬季，暴风会掀起巨浪，对船只航行来说，十分危险。阿布·勒·费达将此湖称为卜亥剌·乞剌（Buhayrah Tilā），其含义不明；可疾云尼说该湖的湖水是咸的，产氧化锌（Tūtiyā，即step石），并大量外销。如前所述，穆思套菲一般将该湖称作赤查思湖，或称作盐湖（Darya-i-Shūr），也称塔鲁吉（Tarūj）湖或塔速吉（Tasūj）湖，其得名于该湖北岸与之同名的重要城市。穆思套菲和哈菲兹·阿卜鲁（Hāfiz Abrū）均称此岛为沙哈（Shāhā）岛（当水位下降时，就成为半岛），这里的山顶上有一座很大的城堡，是旭烈兀（Hūlāgū）[8]和其他蒙古诸王的埋骨之地。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时，文献中已提及沙哈（Shāhā）城堡，因伊本·麻实库维（Ibn Mashkuway）记述诃论·剌失德之孙哈里发木塔瓦吉儿的有关事迹时，提到了沙哈城堡和牙可都儿（Yakdur）城堡，这两座城堡后来被此地反叛的酋长占据。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旭烈兀重建了沙哈城堡，也就是哈菲兹·阿卜鲁所称的兀儿密牙湖的喀剌·乞剌（Kal`ah-i-Tilā）城堡，旭烈兀将从报达城和哈里发王朝（其他）各地区抢劫来的财宝储藏于此堡中。这座城堡后来就成了他的陵寝之地，波斯语称为“坟茔堡”（Gūr Kal`ah），哈菲兹·阿卜鲁称，帖木儿时代这里根本没人居住。[9]

帖必力思城位于（兀儿密牙）湖东约30英里处，在沙哈岛或半岛附近的一条河的岸边。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前，帖必力思显然仅是一个村庄，木塔瓦吉儿在位时期，当时一个叫伊本·牢得（Ibn-ar-Rāwd）

的人就居住在这里，他和他的弟弟与儿子建起了自己的大宅，后在府邸周边又修建了一道城墙，于是形成了城市。一条较晚的穆斯林记录很确定地说帖必力思城是诃论·剌失德的皇后祖拜答（Zubaydah）修建的，但较早的历史文献并未提到这件事，而且在所有文献中也未提到这位皇后到过阿札拜占。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穆喀达思称帖必力思城是一座流淌着多条溪水的优美城市，有聚礼清真寺，周边是繁华的果园[10]。伊斯兰历610年（1213年），亚库特曾到过帖必力思城，并称在那时该城为阿札拜占的首府，可疾云尼还说当地以产阿塔必（`Attābī，或tabby）丝、丝绒和棉织品而闻名。伊斯兰历618年（1221年），蒙古人攻占帖必力思城，但很快被当地人赎回，这样该城躲过了其他城市所遭受的那种劫难；如前所述，在后来的伊利汗国统治时期，此城成为这一地区最大的城市。

穆思套菲详细记述了帖必力思城。他说此城曾两次毁于地震，时间分别是伊斯兰历244年（858年）和伊斯兰历434年（1043年），有40000居民罹难。该城后来进行了重建，其城墙周长为6000步，修建有10座城门，到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合赞汗（Ghāzān Khān）[11]开始在旧城墙外修建面积更大的外城区，这个新城区也建起了城墙。新城墙有6座城门，将瓦里阳（Valiyān）山围在城墙内，其周长达25000步。穆思套菲记述了帖必力思城内、外城门的名称（在抄本中较为详细），并说伊斯兰历703年（1303年）合赞汗葬在苫（Shām）区，这是其生前钦定之地。他的继承人又在内城和瓦里阳山斜坡上的剌失德（Rashīdī）区新修了许多清真寺，还修建了很多公共设施。帖必力思城附近的果园依靠发源于城南萨汗（Sahand）山的米兰·鲁（Mihrān Rūd）河[12]灌溉。帖必力思城周边有7个区，但绝大多数区的区名取自毗邻的河流。穆思套菲对这些区和附近的村庄做了详尽的记述，但其记载的很多名称已无法准确释读。伊斯兰历730年（1330年），伊本·白图泰访问了帖必力思城，并称苫（Shām）区位于城外，合赞汗在这里建有一座优美的学校和小礼拜寺。他从报达门进入城里，并称在合赞（Ghāzān）市场和珠宝市场出售有很多宝石。其附近是麝香市场和龙涎香市场。他说聚礼清真寺是宰相（Wazīr）阿里·沙·歧兰（`Alī Shāh Gīlānī）修建的；其庭院里铺设着大理石，内有一条管道连接的水池。寺院的墙面装饰着琉璃瓦，即柯伤（Kāshānī）瓦，寺院的右边是一座小礼拜寺，左边是一所学校。[13]

这里有两条河：一条是流过帖必力思城区的米兰·鲁河；另一条是流

向西南的萨儿·鲁河（Sard Rūd）[14]，意为“冷河”，这条河与第一条河一样发源于帖必力思城之南的萨汗山。这两条河在城北[15]不远处汇入萨剌瓦（Sarāv）河[16]。萨剌瓦河也称作萨儿哈（Sarkhāb）河，发源于帖必力思城东200英里的萨卜蓝·苦合（Sablān Kūh）山区，这里靠近阿儿答必儿城。萨剌瓦河长而曲折，途中穿过连片的盐碱沼泽，并接纳众多支流，最后在帖必力思城西约40英里处流入兀儿密牙湖。穆思套菲详细记述了萨汗山和萨卜蓝山及发源于这两座山的河流。萨剌瓦（Sarāv，或Sarāb）城[17]之名取自与之同名的河流，其位于从帖必力思城到阿儿答必儿城的道路上，据穆思套菲记载，此城周边有瓦儿赞（Warzand）、答兰（Darand）、八剌古失（Barāghūsh）和萨黑儿（Sakhīr）等四个地区。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将萨剌瓦城拼写为撒剌忒［Sarāt，即萨拉布（Sarāb）］城，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该城为“惬意之地”，这里有很多磨坊，四周有农田和果园，种植着粮食和水果。撒剌忒城有很多旅店和绝好的市场。亚库特将此城拼写为萨剌瓦（Sarāv，或Sarv），并称此城在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蒙古西征时被毁，城中的大部分居民被屠杀。但在14世纪时，穆思套菲说该城已修复，他还说此城距帖必力思城有三天的路程，距阿儿答必儿城有两天的路程。

萨剌瓦河的一条支流的左（南）岸是奥建（Awjān）或兀建（Ūjān）城[18]，这里距从帖必力思城到密牙纳（Miyānah）城[19]的道路有10里格。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亚库特记述兀建城是一座有城墙、有极好市场的城市。但该城在蒙古西征时被毁，在穆思套菲时期，合赞汗进行了重建，并一度驻跸于此。合赞汗将其重新命名为沙合儿·伊斯兰（Shahr-i-Islām，即和顺城），其城墙由泥浆和石头修建而成，周长为3000步。城周边地区的土地异常肥沃，种植着棉花、粮食和多种水果。该地的河流叫阿卜·兀建（Āb-i-Ūjān）河，发源于萨汗山的东部山麓。此山西南，距帖必力思城约60英里，湖4里格之地为答哈剌坎（Dākharrakān）村，这是伊本·豪喀尔和其他阿拉伯地理学家拼写的名称，波斯语文献则拼写为忽洼儿坎（Khuwārkān）。亚库特却拼写为迪·纳黑儿建（Dih Nakhīrjān），并将其含义解释为纳黑儿建（Nakhīrjān）村（*Dih*），意为“波斯萨珊王（Chosraes）的库房”。据穆思套菲记载，这是一座小城，其周边的所属地区和8个村庄盛产水果和粮食。[20]

麻剌噶（Marāghah）城[21]位于帖必力思城南约70英里的萨费（Sāfī）河[22]岸边，这条河发源于萨汗山，南流到该城，再向西流入

（兀儿密牙）湖。麻剌噶是喀里牙·麻剌噶（Kariyat-al-Marāghah，意为“草原村落”）的简称，据说此城被波斯人称为阿弗剌札·鲁兹（Afrāzah Rūdh）。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据伊本·豪喀尔记载，麻剌噶城和那时的阿札拜占首府阿儿答必儿城的规模一样大；他还说麻剌噶城甚至有一段时间曾是该地区的首府，这里设有总督的财务部门和行政机关，后来才将这些机构永久地迁移到阿儿答必儿城。麻剌噶城是座极为惬意的城市，该城建有一道城墙，城墙外是结满果实的果园。这里以盛产一种特别的香瓜而闻名，其皮绿瓤红，味甘如蜜。穆喀达思记述了这里的城堡和城墙，以及城墙外的外城区。据亚库特记载，该城的城墙是诃论·剌失德统治时期修建的，后来的哈里法马蒙进行了重修。

从文献记载可知，蒙古统治初期，麻剌噶城曾为阿札拜占的首府，穆思套菲称这是一座大城，城周边有很多肥沃的地区，他还提到了一些地区的名称，这些地区靠很多水源充沛的河流灌溉。在麻剌噶城外，纳思儿丁·途思（Nāsir-ad-Dīn Tusī）修建了一座大天文台，他还奉旭烈兀之命，在此计算得出并发布了著名的伊利汗天文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穆思套菲说，天文台已毁，但遗迹尚存。可疾云尼提到了一座叫鲁文·底兹（Ruwīn Diz）的城堡，其距麻剌噶城有3里格，在城堡旁边有一条溪水流过，堡内有一座著名的花园，称作兀密答八（Umīdābād），其靠自备的蓄水池灌溉。距离此堡有1里格远就是建八札（Janbadhak）村，这里有一眼拥有很多神奇传说的温泉。

萨费河在麻剌噶城西注入湖中，此河在汛期接纳了贾噶土（Jaghtū）河[23]及其支流塔噶土（Taghtū）河[24]的河水，据穆思套菲记载，这两条河均发源于曲儿忒思田山区；这些河流所注入湖泊的南岸是一大片沼泽。弯曲河流环抱着的南岸有来兰（Laylān，或Naylān）小城[25]，繁华的果园分布其间，在穆思套菲时期，这里的居民主要是蒙古人。来兰城稍南，按道里志的记载应是八儿札（Barzah）村，从思萨儿（Sīsār，在吉八儿地区）城起程的道路在这里分为两条：向右的支道，继续向东北到达麻剌噶城；向左的支道，沿湖的西岸，通往兀儿密牙城。

（兀儿密牙）湖之南岸50英里处就是八思洼（Baswā）城[26]，波斯语拼写为帕思洼（Pasawā），亚库特曾访问过该城，并说在他那个时代这里绝大多数居民是盗匪。穆思套菲盛赞其富饶的果园，此城西北就是

兀失奴（Ushnuh）城[27]，在伊本·豪喀尔时代此地居民为曲儿忒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兀失奴城用马匹和牛羊与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与毛夕里城进行大宗贸易。该地土地异常肥沃，牧羊的草原很有名。亚库特曾访问过该城，并称此地花园优美，穆思套菲将其名称拼写为兀失奴牙（Ushnūyah），并说这是迪·吉牙汗（Dih Kiyāhān）山区的一座中型城市。[28]

兀儿密牙城因与之同名的湖泊而得名，距湖泊西岸不远。传说兀儿密牙城是琐罗亚斯德（Zardūsht或Zoroaster）出生之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该城规模与麻剌噶城差不多，是座惬意之城，四周是葡萄园；其市场商品琳琅满目，这里还有一处布料市场，市场内有一座聚礼清真寺。兀儿密牙城建有城墙和一座用来防卫的城堡，一条溪水穿城而过，南流1里格后注入（兀儿密牙）湖中。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此城发展为一座大城，城墙周长为10000步，城周边还有很多村庄。位于兀儿密牙城之北的道路上，湖泊西北角不远处就是萨儿麻思（Salmās）城[29]。据穆喀达思记载，这是一座优美的城市，有很好的市场，还有一座石砌的聚礼清真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里的居民是曲儿忒人。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亚库特说萨儿麻思城绝大部分已毁，但据穆思套菲记载，14世纪蒙古统治者合赞汗在位时期，宰相阿里·沙重建了周长为8000步的城墙，由此该城重现了往日的风采。这里气候寒冷，有一条发源于西部山区的河流穿城而过，并注入湖中。

该湖（兀儿密牙湖）的北岸有座被称作塔速吉（Tasūj）或塔鲁吉（Tarūj）的城[30]，此城显然就是现代的土尔撒（Tursah）城。如前所述，穆思套菲常提到塔速吉或塔鲁吉盐湖，因此该城与兀儿密牙城一样，都是以附近水域的名称来称呼其城名。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塔速吉城肯定是一座重镇，因其靠近湖泊之故，这里比帖必力思城要温暖且潮湿，该城周边是花园和果园。萨儿麻思城东北是哈委（Khawī）城[31]，亦读成货夷（Khoi），位于一条向北注入阿剌思（Aras）河[32]，即阿剌可思河的河流岸边。亚库特和可疾云尼均称哈委城是座城墙坚固、繁华的城市，城周边土地肥沃，其以产优质的织锦而闻名。这里还有一眼泉水，以冬暖夏凉而著称。穆思套菲说其城墙周长为6500步，该城居民像契丹人（Khatāi，即中国人）一样，皮肤白皙；此城周边有80个附属村庄。

麻蓝（Marand）城[33]在货夷城东，位于一条河流的岸边，该河是货夷（Khoi）河右岸的一条支流，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穆喀达思称此地是一座小城堡，其外城区有一座清真寺和一个市场，城堡外围是花园。亚库特说，该城 被曲儿忒人摧毁，当时他们洗劫了该城，杀掉了当地绝大部分居民。据穆思套菲记载，此处的河流叫祖鲁（Zūlū，或Zakvīr）河，据说这条河的一部分在地下流淌了4里格。穆思套菲称在他那个时代麻蓝城的规模仅是其以前规模的一半，该城以养殖吉儿密兹（Kirmiz）虫（胭脂虫）而闻名，其多用作红色颜料，他还说该城周边有60个附属村庄[34]。

阿剌思河北岸的纳合乞宛（Nakhchivān，或Nakjawān）城[35]通常被划入阿札拜占地区。这座城应是阿拉伯地理学家所称的纳沙瓦（Nashawā）城，其在道里志中经常提到，但未详述。在蒙古统治时代，纳合乞宛城发展为一座重镇，据穆思套菲记载，这是座用砖建成的大城。该城东边是阿兰吉（Alanjik）关，北边则耸立着叫麻思忒·苦合（Māst Kuh）的雪山[36]。纳合乞宛城有座兹牙·木儿可（Diyā-al-Mulk）所建的穹顶建筑，他是塞尔柱王朝灭里·沙的杰出宰相尼扎木·木儿可（Nizām-al-Mulk）之子，阿里·亚兹底记载了著名的兹牙·木儿可（Diyā-al-Mulk）桥（遗迹尚存），该桥修建于喀儿喀儿（Karkar）关附近的阿剌思河上，并连接着通往麻蓝城的道路，此桥距纳合乞宛城有15英里。

阿剌思河稍南是朱儿法（Julfah，又拼写为Jūlāhah）城[37]，伊斯兰历1014年（1605年），此地被波斯统治者沙·阿八思（Shāh `Abbās）摧毁，他将这里的所有阿剌蛮人迁往亦思法木元城之南的新建城市，并以阿剌思河岸边的旧城之名命名新城为朱儿法城。在阿剌思河岸边的其他城市中，穆思套菲提到了兀儿都八（Urdūbād）城（现在仍存）[38]，其位于阿剌思河南岸，在该河与一条支流的汇合处，这条支流的岸边还有底兹麻儿（Dizmār）堡[39]，亚库特也提到了该堡。阿剌思河再往南就是木儿丹·纳夷木（Murdān Na`īm）地区的的赞吉阳（Zangiyān）城[40]，这里有第二座横跨阿剌思河的桥梁，此桥至今依然存在。这座桥在波斯语中称作普儿·胡达·阿法林（Pūl-Khudā-Afārīn，意为“颂主桥”），穆思套菲说此桥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位圣门弟子在伊斯兰历15年（636年）修建的。木儿丹·纳夷木（Murdān，或Murād Na`īm）地区有30多个村庄[41]。

阿儿答必儿城位于与该城同名的河流的上游，穆思套菲称作安答剌（Andarāb）河，在阿儿答必儿（Ardabīl）河[42]稍南的左岸有阿哈儿（Āhar）河[43]汇入，而后该河在胡达·阿法林（Khudā-Afārīn）桥南不远汇入阿剌思河。阿儿答必儿河与阿哈儿河分别发源于大萨卜蓝·苦合（Sablān Kūh）山的东坡和西坡，阿儿答必儿城靠近此山，如前所述，该山南坡发源有萨剌瓦河，其向西注入兀儿密牙湖。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伊本·豪喀尔提到了萨卜蓝山，他错误地认为该山比德黑兰（Tihrān）城北数英里处的秃马温（Damāvand，又译达马万德）山还要高。萨卜蓝山的山麓长满树木，这里还有很多村庄和城市，穆思套菲对此做了记载。他说该山从50里格外就能看到，其山顶积雪常年不化，靠近山顶的地方有一眼泉，一年四季结着冰。萨卜蓝山附近还有两座山峰—阿哈儿河之北有苦合·萨剌汗（Kūh Sarāhand）峰和思牙·苦合（Siyāh Kuh）峰，即黑山，后一座山峰矗立于喀兰塔儿（Kalantar）小城[44]之北，该城有一座隐没于丛林中的城堡，一条河流流经该城附近的连片田野。

如前所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阿儿答必儿城是阿札拜占的首府。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该城有城墙，约为2/3里格。该城的房屋由砖和土建成，在当时此地还有驻军。其周边地区极其肥沃，阿儿答必儿城产的蜂蜜很有名。穆喀达思提到了阿儿答必儿城的一座城堡与十字街上的市场，并说十字街口有一座聚礼清真寺。内城之外是一个很大的外城区。伊斯兰历616年（1220年），阿儿答必儿城遭蒙古人洗劫，沦为废墟；但在此前不久，亚库特到过该城，并称这是一座极其繁华的城市。阿儿答必儿城的古波斯语名称为八赞·费鲁兹（Bādhān Fīrūz）。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穆思套菲称此城尽管不再是阿札拜占的首府，但差不多已恢复往日的辉煌；如前所述，在伊斯兰历10世纪（16世纪）的一段时间里，该城是新建的波斯萨法维（Safav）王朝[45]的首都，不久以后其首都迁到帖必力思城，而后又迁到亦思法杭城。

阿哈儿（Āhar）城[46]在阿儿答必儿城西150英里处，位于阿哈儿河岸边，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已提及该地，据亚库特记载，这是一座修建良好的城市，该城之北是萨剌汗（Sarāhand）山。此城附近的山坡上建有很多小城，亚库特和穆思套菲均记载了这些小城的名称，但现在其地理方位很难考订或确定。这些城市周边的地区称作皮失斤（Pīshkīn，现在的Mīshkīn）地区，该名称来源于这里的统治家族，该家族兴盛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皮失斤（Pīshkīn）城[47]距阿哈儿城有一站之

地，起初称作瓦剌委（Varavi）城。据穆思套菲记载，安答剌（Andarāb）河与阿哈儿河汇合处的正北方横跨着一座优美的桥梁，这座桥为蒙古时代合赞汗的宰相阿里·沙所建。[48]

萨费·鲁得（Safīd Rūd）河，即白河，有众多的支流，该河流域包括阿札拜占东南部的所有地区。该河最长的干流是阿札拜占和吉八儿地区的分界线，这条河经歧兰（Gīlān）地区最终流入里海。伊斯塔赫里和其他阿拉伯著述者称此河为萨必·鲁兹（Sabīd-rūdh）。穆思套菲称在他那个时代该河被蒙古人称为忽兰·木兰（Hūlān Mūlān，更准确的叫法是Ulān Moren），在蒙古语中意为“红河”；今天萨费河的一部分被称作吉兹儿·兀怎（Kizil Uzen），在突厥语中的含义也是“红河”。据穆思套菲记载，萨费·鲁得河发源于曲儿忒思田高原上一座叫盘只·安谷失（Panj Angūsht，波斯语），或别失·帕儿麻（Besh Parmak，突厥语）的山，这两个名称的含义均为“五指”。北流的萨费·鲁得河从右（东）岸接纳了第一条河—赞章（Zanjān）河[49]的河水，其河名取自与之同名的赞章（Zanjān）城[50]，此城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述及；萨费·鲁得河从左（西）岸接纳了密延尼吉（Miyānij）河[51]的河水，该河是发源于西边的很多溪流汇入后形成的。在密延尼吉（Miyānij）城北，萨费·鲁得河向西拐，并从左岸接纳了发源于阿儿答必儿城南的哈儿哈儿（Khalkhāl）地区的桑吉答（Sanjīdah）河与噶底兀（Gadīv）河汇合形成的河水，接着又接纳了发源于哈儿哈儿地区的沙·鲁得（Shāh Rūd）区的沙儿（Shāl）河的河水。然后，萨费·鲁得河从右岸接纳了发源于吉八儿地区（在第十五章将述及）的塔鲁迷（Tārum）河[52]的河水，而后又接纳了发源于“暗杀”派地区的沙·鲁得（Shāh Rūd）河[53]（不要将这条河和与之同名的沙·鲁得区相混淆）的河水，此后萨费·鲁得河经过高山峡谷，最后在歧兰地区的考炭（Kawtam）城[54]注入里海。

前文提到的密延尼吉河是萨费·鲁得河左岸最重要的支流。这条来自西边的河流，发源于兀建城以南的地区（见原文第163页），在噶木·鲁得（Garm Rūd）地区，从左岸接纳了发源于萨剌瓦城南部山区的噶木·鲁得河（Garm Rūd，即热河）[55]的河水。在密延尼吉城以南，（密延尼吉河的）干流从右岸接纳了发源于麻剌噶城东部山区的哈失忒·鲁得河（Hasht Rūd，意为“八条河”）的河水；穆思套菲所处时代，在哈失忒·鲁得河与密延尼吉河汇合之地，横跨着一座三十二孔的大石桥。

密延尼吉，或密牙纳（Miyānah，即中部）城位于上述诸河汇合

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重镇。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伊本·豪喀尔称这座城极为繁华，此地区（后来称作噶木·鲁得）出产大量的水果。穆喀达思将其名拼写为密牙纳，与现代名称一样，他盛赞此地商铺的货品。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亚库特曾访问过此城，并对其地理环境赞赏有加。14世纪时，据穆思套菲记载，该城已沦为一个大村庄，但在蒙古人建立的道路网络中仍是一个重要站点。这里气候炎热，害虫极多（直到现在，密牙纳臭虫还时常骚扰旅客），噶木·鲁得地区还有100多个富庶的村庄，盛产粮食。

桑吉答（Sanjīdah）、噶底兀（Gadīv，在《世界志》中称Kadpū）、沙儿（Shāl）等三条河[56]发源于哈儿哈儿地区，并从该地区北部汇入萨费·鲁得河。哈儿阿哈儿城[57]是这一地区的首府，其位置在道里志中有记载，距阿儿答必儿城之南12里格。费鲁札八（Fīrūzābād）城[58]位于群山之间，其中一座雪山之上有一眼滚烫的、不断冒出气泡的泉水。据穆思套菲记载，先前总督府就在费鲁札八城，后来该城被毁，哈儿阿哈儿城代替了它的位置。但费鲁札八城的确切位置现已无法确定。喀罗耳（Kalūr）[59]和沙儿（Shāl）[60]两座小城在地图上还能查到，位于沙·鲁得（Shāh Rūd）地区的沙儿河（现在称为小沙·鲁得河）岸边，此河发源于沙儿（Shāl）山区。穆思套菲还提到了哈儿哈儿地区的很多其他地名，但现在已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61]

阿札拜占地区的一些产品将在下一章的末尾述及。经过这一地区的道路将在第十五章叙述完吉八儿地区后做一概述，因这些道路均是从呼罗珊道分出来的，并穿过吉八儿地区。

[1] 《亚美尼亚史》（*The Armenia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一书第2、6、20页（原文分别为第66、68、77页）等将阿札拜占作阿塔儿帕塔干（Atrpatakan），即阿塞拜疆，指伊朗西部和今阿塞拜疆的里海西部与西南区域，比今天的阿塞拜疆所指范围要广。译者。

[2] 见本书地图三（原文第87页）。阿札拜占的波斯语旧名称为阿札八扎干（Adharbādhagān），是希腊名称阿忒罗剌帕忒纳（Atraropatene）的讹误。穆喀达思（原文第373页）称阿札拜占、阿兰（Arrān）和阿剌蛮（Armenia）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地区。他称作“高原区”（Iklīm-ar-Rihāb），以区别于米底（Media）山区（Jibāl）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低地（Akūr）。

[3] 沙·阿八思（即沙赫·阿巴斯一世）为萨法维王朝第五代君主，1588～1622年在位，在他统治时期，该朝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是该朝最有作为的皇帝。译者。

[4] 今为乌尔米耶湖，又称乌鲁米耶湖，为咸水湖，位于伊朗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和东阿塞拜疆省之间，靠近伊朗与土耳其边界，形状像一只海马（与里海相似），最长处为140公里，最宽处为55公里，最深约16米，面积曾达4500平方公里，是伊朗最大的湖，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湖泊之一，为世界第三大咸水湖，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生物圈保留区。译者。

[5] 今为乌尔米耶，是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的省会和最大城市。在巴列维王朝时期曾以国王礼萨汗的名字改名为礼萨伊耶（“礼萨之城”），伊斯兰革命后改回原名。乌尔米耶人口约60万，是伊朗第十大城市，也是伊朗阿塞拜疆地区（包括东阿塞拜疆、西阿塞拜疆、阿尔达比勒和赞詹四省）仅次于大不里士的第二大城市。译者。

[6]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54页称：“第二个（咸水湖，引者）是阿剌蛮地区的喀卜赞（Kabūdhān）湖。这个湖长50法儿萨，宽30 法儿萨。这个湖的中央以有喀卜赞村而闻名。湖的周围有居民。由于这座湖的湖水很咸（Shūrī），除了虾米，没有其他动物。”译者。

[7] 今此名依然保留，指湖之东边的大岛。译者。

[8] 兀孛儿只斤·旭烈兀（1217～1265年），为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是忽必烈、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也是伊利汗国的建立者，1258年灭大食帝国。译者。

[9] 兀儿密牙（Urmiyah）湖之名现通常拼为乌鲁米亚（Urūmiyah），而且这种拼写形式已为伊本·塞剌皮昂（Ibn Serapion）所记载（抄本，第25a叶面）。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1、18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39、24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5、380页。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本书作者斯特朗格多使用这本著作，而较少使用下文提到的《黄金草原》），以及《黄金草原与矿物珍宝》（*Murūj adh-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简称《黄金草原》），1861～1877年法国巴黎亚洲协会的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essrs Barbier de Meynard）和帕维特·德·考尔特尔（Pavet de Courteille）翻译出版了法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版本，本书作者斯特朗格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1966～1974年出版了查尔斯·皮拉特翻译（Charles Pellat）的法文本，后又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黎巴嫩大学（Universite Libanaise）出版，共五卷。这是今天通行的版本。《黄金草原》有汉译本，但只翻译了前两卷，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第97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1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

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26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21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94页。Hfz.，第27a叶面。麻实库维（Ibn Mashkuwayh），第539页。在《列王纪》（*Shāh Nāmah*，Turner Macan，Calcutta，1829）第1860页第4行和1927页第6行下中可以见到，因寒贾思（Khanjast，音点有误），可以读为赤查思（Chīchast），两个名称仅仅是字母的音点位置写法不同而已（即将ج写为خ，译者）。

[10] 《马可波罗行纪》第29章第91页载："帖必力思之人，实以工商为业。缘其制作种种金丝织物，方法各别，价高而奇丽也。""居民贫苦，杂有种种阶级之人。其中有阿美尼亚人、聂思脱里派人、雅各派人、谷儿只人、波斯人，并有性恶而崇拜摩诃末、名称帖兀力思（Taurizi）之土人，城之四周，绕以可供娱乐之美丽园林，内产数种良果，果大而味美。"译者。

[11] 伊利汗国第七代君主，1295～1304年在位。他在位时进行了各项改革，汗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译者。

[12] 今此河发源于萨拉汉德山，先向北流，在大不力士城北转向西，在城中与几条小溪汇合后称作库里察伊（Quri Chay）河，即阿吉察伊（Aji Chay）河，后一条河汇入乌尔米耶湖。译者。

[13]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8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822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2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3～155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

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80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129页。

[14] 今此河名仍存，在与阿吉察伊河汇合处，有萨尔德鲁德（Sardruod）城。译者。

[15] 从地图看，应该是在城南。译者。

[16] 今为阿吉察伊河，即苦水河，发源于大不力士东北萨巴兰（Sabalan）山，全长265公里，汇入乌尔米耶湖。译者。

[17] 今为萨拉布（Sarab），位于伊朗东阿塞拜疆省萨拉布县县府所在地，人口4.2万，是从大不里士到阿尔达比尔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18] 《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9页载：“兀建（Ūjān，即Dūjān）城是阿札拜占地区的一座城市。”此城名今不存，应在博斯坦阿巴德（Bostānābād），是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博斯旦阿巴德县县府，人口1.6万，是从大不里士到阿尔达比尔和米亚内，以及波斯东部的三岔路口，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19] 今为米亚内（Miāna），位于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米亚内县县府所在地，人口10.6万，是从大不里士到波斯东部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20]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9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48、25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31、198页；第2卷，第425、636页；第3卷，第64页。Mustawfi（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5、158、204、205、217、218页。

[21] 今为马拉盖，是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拉盖县县府，位于乌尔米耶湖东岸30公里处，在苏非·察伊（Sufi Chay）河岸边。现人口16.3万，历史名城，曾是伊利汗国的都城之一，伊利汗国时期在此建立过天文台，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通道。译者。

[22] 今为苏菲察伊（Sufi Chay）河，发源于马拉盖东部萨拉汉德（Sarāhand）山区，流入乌尔米亚湖。译者。

[23] 今为作扎林尼（Zarrinī-Rūd）河，源于南部伊朗库尔德斯坦省撒盖兹（Saqqez）以南的山区，全长302公里，中途有很多支流汇入，其中莱兰（Lailān）河是比较大的支流。该河沿岸是乌尔米耶湖南岸重要的农业区，也是要道。译者。

[24] 今天这条河分为两支—马哈巴德（Rūdkhāne Mahābād）河与岗达尔（Rūdkhāne Gadār）河，均发源于西阿塞拜疆省南部山区，汇入乌尔米耶湖，但历史上，两河曾在下游汇合为一条河。译者。

[25] 今为莱兰（Lailān）城，是伊朗西阿塞拜疆省马勒坎（Malekan）县莱兰区的区府，人口6000，位于莱兰河的西岸，是西波斯的重要通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26] 今其名不存，或在皮兰沙赫尔（Piranshahr），这是座古城，属西阿塞拜疆省，是皮兰沙赫尔县县府所在地，人口9.5万，是古丝绸之路上去往波斯和伊拉克的重要通道。译者。

[27] 今为奥什诺维耶（Ushnuviyah），位于伊朗乌尔米亚湖西南，属西阿塞拜疆省，人口2.9万，大多数居民为库尔德人。是去往波斯和伊拉克的重要通道。译者。

[2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38、23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84、564、626页；第4卷，第476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50、35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8、159、218页。

[29] 今为萨勒马斯，位于今伊朗乌尔米亚湖西北，属西阿塞拜疆省，人口7.9万，大多数居民为阿塞拜疆人。是去往土耳其、波斯和伊拉克的重要通道。译者。

[30] 今为塔苏季（Tasūj），位于乌尔米亚湖北岸，为东阿塞拜疆省萨贝斯塔尔（Shabestar）县的乡政府所在地，人口7000，大多数居民是阿塞拜疆人。是去往土耳其和波斯的重要通道。译者。

[31] 今为霍伊（Khoyj），位于乌尔米亚湖北边，为西阿塞拜疆省霍伊县县府所在地，人口20万，是伊朗阿塞拜疆地区最大的县级城市，大多数居民是阿塞拜疆人。是去往土耳其和波斯的重要通道。译者。

[32] 即阿拉斯河。译者。

[33] 今为马兰德（Marand），位于乌尔米亚湖东北，为东阿塞拜疆省马兰德县县府所在地，人口17万，大多数居民是阿塞拜疆人。是去往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边疆和伊朗的重要通道。译者。

[3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3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7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1卷，第180页；第2卷，第35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18页；第2卷，第502页；第3卷，第120页；第4卷，第50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6～159、218页。

[35] 今为纳希切万（Naxçıvan），属阿塞拜疆共和国，人口7.4万，是座古城，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6] 今为赞盖祖尔（Zangezur）山，横亘在纳希切万自治区之北，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界山。译者。

[37] 今为伊朗和阿塞拜疆的边境城市，阿塞拜疆称其为朱利法（Culfa），伊朗称其为焦勒法（Julfā），同名异写。焦勒法为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焦勒法县县府，人口

5000。朱利法属于阿塞拜疆纳希切万自治地区，人口1.2万。这两座城市历史上是一座城市，是波斯向北去往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重要通道。译者。

[38] 今为奥尔杜巴德（Ordubad），是纳希切万自治区的第二大城市，人口1万，是座临近伊朗和亚美尼亚的边境城市，历史上是一座重镇。是伊朗与阿塞拜疆之间的要道。译者。

[39] 今此城堡难以查找，但其名称底兹麻儿（Dizmār，又译迪兹马尔）被保留下来，指阿拉斯河东边的高山保护区。译者。

[40]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伊朗东阿塞拜疆省易卜拉欣·萨米（Ibrahim Sami）城附近，位于阿拉斯河岸边，是历史上去往里海的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41] 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262、767、78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7、159、206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98、399页；第2卷，第573页。

[42] 今为巴里克察伊（Baliqly Chay，意为“鱼河”）河，穿城而过，后汇入卡拉苏（Qarah Su，意为“黑河”）河，最后流入阿拉斯河。巴里克察伊河两岸得灌溉之利，沃野百里，村庄棋布，是东阿塞拜疆省重要的农业区。其河谷地区是重要的通道，可经阿尔达比勒城到里海，为丝路要道。译者。

[43] 今为阿哈尔河，发源于阿哈尔城北，向南流，汇入卡拉苏河。译者。

[44]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阿尔达比勒城西南、萨拉卜城东北。译者。

[45] 萨法维（Safav）王朝是从1501年至1736年统治波斯的王朝。这一王朝由伊斯玛仪一世（1487～1524年）于1502年创建，因其先祖苏非派萨法维教团谢合萨菲·丁（Shaikh safi ad-Dīn Ardabilī，1252～1334年）而得名，有些文献称该王朝为吉兹八失（Kizibash，即红头），都城为大不里士（Tabriz）城，其统一了波斯全境，势力扩张到今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东部、伊拉克东部、阿姆河以西。该王朝以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依麻木支派作为国教。该王朝统治者自称是萨珊王的后裔，由此重

新激起人们对古代波斯帝国的向往，是伊朗从中世纪向现代时期过渡的中间时期。1736年萨法维王朝的土库曼将领、摄政王纳迪尔·库利汗（Nadir Kulī）夺取政权，该王朝最终灭亡。译者。

[46] 今为阿哈尔，为东阿塞拜疆省阿哈尔县县府所在地，人口8500，大多数居民是阿塞拜疆人。是去往土耳其和波斯的重要通道。译者。

[47] 今为梅什金沙赫尔（Meshgīn Shahr或Mishgin，先前称作Khiav、Orami、Varavi），是阿尔达比勒省梅什金沙赫尔州州名和首府名，人口8万，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位于萨拉汉德（Sarāhand）山山脚下，也是通往里海的要道。译者。

[4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37、238、240、26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4、37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97、367、409、461页；第4卷，第91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6、157、204、205、217页。

[49] 今为赞詹河（Zanjān Rūd），发源于赞詹城东南部山区，在博纳卜（Bonāb）之南接纳了最重要的支流阿卜哈尔（Abhar）河，后汇入萨菲德河，全长120公里。译者。

[50] 今为赞詹，是伊朗西部赞詹省省会，人口38万，是波斯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多条交通干线经过这里，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51] 这条河今天称作沙哈尔（Shahar Chay）河，是萨菲德河上游西岸最重要的支流之一，由米亚内西部、西南山区的河流汇合而成，全长90公里。

[52] 今此河在地图上难以查到，应在萨菲德河东岸，距赞詹省塔鲁姆（Tarom）县县府不远。译者。

[53] 今为沙赫鲁德（Shāh Rūd），是萨菲德河中下游东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德黑兰西北厄尔布尔士山脉最高峰的西边，西流汇入萨菲德河，全长175公里，其河谷地区是重要的农业区，也是丝路要道，可通往里海。译者。

[54] 此城名已不存，应在拉什特（Lasht）县境内萨菲德河入里海口附近的南岸。这里是里海沿岸的交通要道。译者。

[55] 今仍称热河（Garim Chāyi），在米亚内城东北20公里处汇入萨菲德河上游大红水河，其发源于米亚内西部的萨布兰山区。译者。

[56] 这三条河汇流形成的河就是今天的黑鲁（Hirū Chāyi）河，其源头在厄尔布尔士山脉，靠近赞詹省北部山区，先向西流，然后在伊朗西北阿尔达比勒省哈勒哈勒城西边向西南流，在小城吉维（Kivi）向东南流，在菲鲁扎巴德（Fīrūzābād）城向东南流，于是形成大“几”字形，最后汇入大红水河。其河谷地带是从赞詹城去往阿尔达比勒城、里海等地的要道，也是伊朗西部的重要农业区，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译者。

[57] 今为哈勒哈勒，是阿尔达比勒省哈勒哈勒县县府所在地，全县人口9万，居民绝大部分为阿塞拜疆人，这里是去往里海的重要通道。译者。

[58] 今为菲鲁扎巴德（Fīrūzābād），是阿尔达比勒省库萨尔（Kawsar）县的一个小镇，是去往里海等地的要道。译者。

[59] 今为卡鲁尔（Kalūr），是阿尔达比勒省哈勒哈勒县的一个区及该区区府名，人口2300，是去往里海、阿尔达比勒城等地的要道。译者。

[60] 今为沙勒（Shāl），是阿尔达比勒省哈勒哈勒县的一座小城，在卡鲁尔城东边不远，两城地位相同。译者。

[6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46～25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39页；第4卷，第71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6、158、198、215、218页。N. J.，第383、388页。

第十二章 歧兰地区和西北诸地（Gīlān and The North-West Provinces）

歧兰（Gīlān）诸地。低廉（Daylam）地区和塔里失（Tālish）地区。八儿宛（Barvān）城、都剌卜（Dūlāb）城和哈失木（Khashm）城。歧兰（Gīlān）地区的剌喜建（Lāhījān）、剌失忒（Rasht）和其他城市。木干（Mūghān）地区。八贾儿宛（Bajarvān）城和八儿赞（Barzand）城。木哈木答八（Muhmūdābād）城。瓦儿三（Warthān）城。阿兰（Arran）地区。巴耳札阿（Bardhā`ah）城。拜剌坎（Baylakān）城。干贾（Ganjah）城和苫苦儿（Shamkūr）城。苦儿（Kur）河与阿剌思（Aras）河。设里汪（Shirwān）地区。沙麻黑（Shamākhī）城。八苦牙（Bākūyah）城和八卜·阿卜瓦（Bāb-al-Abwāb）城。谷儿只思田（Gurjistān）或谷儿只（Georgia）地区。第必里思（Tiflīs）城和喀儿思（Kars）城。阿剌蛮（Aramenia）地区。答必儿（Dabīl或Duwīn）城。凡（Vān）湖。阿合剌（Akhlāt）城、阿儿吉失（Arjish）城、凡（Vān）城和必里思（Bitlīs）城。北部各地区的物产。

如上一章所述，曲折的萨费·鲁得河经过阿勒不儿兹（Alburz）山脉后，流入里海南岸西端，并在此地沿岸形成背靠该山脉的宽阔沼泽三角洲。萨费·鲁得河三角洲，以及在南部与西部环绕它的有森林覆盖的山麓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地带，这就是小歧兰（Gīlān）地区，阿拉伯人称此地为吉儿（Jīl）或歧兰（Jīlān）[1]，包括三个非常不同的地区[2]。

冲积扇三角洲地区通常被阿拉伯地理学家专称为内吉儿或歧兰，当他们称呼整个歧兰地区时，采用复数形式歧兰纳（Jīlānāt，即低廉诸地），包括山区；其南部和西部与吉八儿地区的塔里寒（Tālikān）区和塔鲁迷（Tārum）区接壤的山区是低廉（Daylam）地区，这个地区通常以复数形式写为代剌满（Ad-Daylamān）；历史上，这里以是白益王朝或低廉（Daylam）王朝家族的故土而闻名，其酋长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控制着报达城和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权力。从里海的西南角向北，再到里海东面的狭窄海岸地带和山脉斜坡就是塔里失（Tālish）地区[3]，亚库特用复数将这一地区称作塔里珊（Tālishān或Tīlshān）。此地区向东，靠近陀拔思单（Tabaristān）边

界就是鲁班吉（Ar-Rūbanj）山脉，越过此山脉就是山区，这里由喀林（Karin）家族管辖，该家族亘古以来就是此地的统治者，有关该方面的内容将在第二十六章述及。

据穆喀达思记载，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白益王朝的统治达到鼎盛时期，歧兰和东边的山区及里海沿岸，即陀拔思单、朱里章（Jurjān）和苦密思（Kūmis）均被纳入低廉地区，但后来位于东部的这些地区被划分出去。之后低廉之名就废弃不用，人们用萨费·鲁得河低洼三角洲来称呼整个地区，即一般称作歧兰（Jilan）地区。更确切地说，歧兰是指沿海地区，低廉地区则是指靠近山脉的地区，但在不同时期，这两个名称中的任何一个通常可以用来指位于里海西南角的整个地区。[4]

据说低廉地区的首府被称作鲁兹八儿（Rūdhbār）城[5]，但其方位无法确定。穆喀达思却说其首府为八儿宛（Barvān）城[6]，但可惜，此城已不复存在，道里志中也未记载其确切位置。穆喀达思还说八儿宛城既无友善的民居和良好的市场，又无聚礼清真寺。总督居住在沙合剌阿思田（Shahrastān）城[7]，在这里生活的商贾极其富有，因而这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据穆喀达思记载，歧兰地区的首府是都剌卜（Dūlāb）城[8]，他说这是座优美的城市，其房屋是用石头建成的，城里有很好的市场，还有一座聚礼清真寺。据阿布·勒·费达和这一地区唯一流传下来的道里志记载，都剌卜城的规模和喀思喀儿（Kaskar）城一样大，据穆喀达思记载，都剌卜城距拜剌满（Baylamān）城[9]有4站，阿布·勒·费达称这是一个像乡村一样的小城，从记载来看此城似乎应是塔里失地区的重镇之一。距萨费·鲁得河有2站远，距拜剌满城有4站之地的就是哈失木（Khashm）城[10]，这里是什叶派达亦（Dā`ī，即传道师）的居住之所，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下半叶，其统治着这一地区，该地区成为（异端的）独立王国，不承认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哈里发的合法性。据穆喀达思记载，哈失木城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在传道师宫殿附近有一座聚礼清真寺。这里有一条河穿城而过，一座著名的浮桥横跨在河上。所有这些早期城市的方位和所在地已完全无法确定。[11]

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据穆思套菲记载，岐兰地区的主要城市有剌喜建（Lāhījān）城[12]和夫敏（Fūmin）城[13]。阿布·勒·费达提到了剌喜建城，其位于萨费·鲁得河河口的东边。当时，该城是一座中等城市；这里盛产丝，还种植着水稻和其他谷物，也产柑橘和柚子及其他

热带果品。考炭（Kawtam，或Kūtam）城[14]靠近萨费·鲁得河河口，这里是从里海沿岸驶来的船只停泊的港口；（13世纪的）亚库特和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的阿布·勒·费达均说这座城是商业贸易极为兴盛之地，此城距里海海岸实际还有一天的路程。夫敏城和其所在地区位于内陆的萨费·鲁得河西边。该城是低廉山区的首府，据穆思套菲记载，这是一座大城，修建在肥沃之地，这里种植着大量的谷物和水稻。此地也产丝和丝织品。

穆思套菲是最早记载剌失忒（Rasht）城[15]的著述者之一，该城现在是歧兰地区的首府，但没有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提到此城。他称这里气候温暖潮湿，盛产外销的棉花和丝，在他那个时代，这座城市很大，是座重镇。剌失忒以西就是今天的土临（Tūlim）地区，伊斯兰历8世纪（13世纪）时，穆思套菲称土临城是一座重镇。据阿布·勒·费达记载，该城（剌失忒）是歧兰或洼地地区的首府，其所在地区异常肥沃，种植着外销的谷物、棉花、水稻、柑橘、柚子、甜瓜等。穆思套菲同样提到了沙富忒（Shaft，或Shaftah）[16]城，其位于剌失忒城之南，但现在只有沙富忒（Shaft）地区。穆思套菲提到的歧兰地区的最后一座城市是夷思法八（Isfahbad）城[17]，亚库特将其拼写为夷思卜赞（Isfahbudhān），穆思套菲称该城距里海岸边有2英里，但未说明其位置；这里产谷物、水稻和少量的水果，附近差不多有100个村庄。这座城市的名称来源于夷思法八（Isfahbad，或Ispahbid）王朝，其统治者是萨珊王朝治下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国王，在哈里发王朝早期名义上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仍继续统治着陀拔思单地区。[18]

木干（Mūghān）地区

木干（Mūghān、Mughkān或Mūkān）地区[19]是大沼泽平原的名称，该平原从萨卜蓝山山麓一直延伸到阿剌思（Aras）河河口以南和塔里失（Tālish）山区以北的里海东岸。此地有时划归阿札拜占地区，但通常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地区。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木干地区首府是与该地区同名的木干城[20]，其位置难以确定。据穆喀达思记载，木坎（Mūkān）城在两条河之间，其周边是花园，该城的规模和帖必力思城差不多。从他的记载不难判断，木坎城应是八贾儿宛（Bajarvān）城[21]，因穆思套菲称此城是该地区的旧首府，在他那个时代已毁。穆思套菲在其行程中记载，八贾儿宛城距八儿赞（Barzand）城[22]之北有4里格，八儿赞城在地图上至今还能查到。穆斯林传述中将八贾儿宛城和生命之泉相联系，据说此泉是先知黑兹儿（Khidr），又说是先知易剌思（Elias）在该城附近发现的。如前文所述，八贾儿宛城南是八儿赞城，伊本·豪喀尔称这是一座大城，穆喀达思盛赞其市场，因该城是此地区的商贸中心，周边地区所产产品在此集散，并销售到各地。穆思套菲提到在他那个时代八贾儿宛城和八儿赞城已衰落为村庄，其附近地区天气炎热，盛产谷物。[23]

穆思套菲称，木坎（Mūkān）平原上有皮儿速瓦（Pīlsuvār）[24]、木哈木答八（Muhmūdābād）[25]、旱沙合剌（Hamshahrah）[26]等三座城。皮儿速瓦城位于发源于八贾儿宛城附近的一条河的岸边，这两座城相距8里格，据说其城名来历是白益王朝将异密皮儿·速瓦儿（Pīl-Suwār）派到了这里，他的名字意为“伟大的骑士或战士”。木哈木答八城位于靠近里海的高八里（Gāvbāri）平原上，距皮儿速瓦城有12里格，穆思套菲说此城为蒙古统治者合赞汗所建。其附近的旱沙合剌城距里海岸边有2里格，起初被称作阿卜剌沙合儿（Abrashahr），或卜沙合剌（Bushahrah）城，穆思套菲说该城是由古剌儿兹（Gūrarz）之子法儿哈（Farhad）修建的，“他们把自己看作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27]。八贾儿宛城之北在早期就有巴里哈（Balkhāb）驿站，其被记载为一个繁华的村庄，可为旅客提供护卫和住宿；沿着经过此站的道路往北，就是位于阿剌思河南岸的瓦儿三（Warthān）城[28]，这里是阿兰（Arrān）地区的十字路口。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瓦儿三城有城墙、市场，并出售各种商品，还有一

个无城门的外城区。该城极为繁华，位于距河岸2里格的平原上，其聚礼清真寺在外城区；穆斯林传述中称瓦儿三城是奉诃论·剌失德的皇后祖拜答的懿旨修建的。[29]

阿兰（Arrān）地区

阿兰（Arrān）、设里汪（Shirvān）、谷儿只（Georgia）和阿剌蛮（Aramenia）等地区绝大部分在阿剌可思河之北，几乎不属于穆斯林之境，因此阿拉伯地理学家仅做了粗略的记载。早期时代，穆斯林已居住在这里，各个时期的哈里发均委派过总督，但在中世纪末以前，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是基督徒。因此，在蒙古西征前，此地没有外来居民移入，但西征后，尤其是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对谷儿只地区发动了多次战争，这里逐渐成为突厥诸族的永久居住地，伊斯兰教成为主导性的信仰。

阿兰地区包括在大三角形区域内，这一区域在居鲁士（Cyrus）河[30]与阿剌可思河—阿拉伯人分别称作苦儿（Kur）河与阿剌思河—交汇处的西边，因此穆思套菲将其称为“两河之间”（Bayn-an-Nahrayn）。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将其记为兰（Al-Rān，或读成*Ar-Rān*），似是一个阿拉伯语词，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其首府为巴耳札阿（Bardhā`ah）城，该城遗迹尚存。巴耳札阿城，后来写为巴耳打阿（Bardā`）[31]，据伊本·豪喀尔记载，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其城有1里格长，是当时这一地区最大的城市。该城呈方形，距苦儿河约3里格，在其支流萨儿速儿（Tharthūr）河岸边，并由一座城堡守卫。该城附近的苦儿河可捕到萨儿麻黑鱼（Sarmāhī，波斯语又称Shūr-māhī，意为“咸鱼”），这种鱼腌制后外销到邻近的城镇。在瓦儿三城附近的阿剌思河里也有萨儿麻黑鱼。巴耳札阿城周边富庶的地区被称作安答剌缚（Al-Andarāb），该地区的村庄有成片的果园与花园，从该地区的任何一个方向出发均需一天的时间才可穿过，此地盛产水果，尤其是栗子、榛子和无花果。该地区也养蚕。

每个星期日，在巴耳札阿城外的“阿曲儿忒门”（Bāb-al-Akrād）有大集，集市长达1里格。这个集市被当地人称作苦儿吉（Al-Kurkī，来源于希腊语Kuriakos，意为“主日”），如上所述，这里将星期天称为苦儿吉（Kurkī）日。巴耳札阿城还有一座优美的聚礼清真寺，寺顶用木柱支撑，墙用砖砌成，其上抹有灰泥。这里还有很多热水澡堂（Hammām）；倭马亚王朝时期，该地区的赋税存于巴耳札阿城内。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据亚库特记载，巴耳札阿城已毁，但14世纪时，穆思套菲称该城在萨儿速儿河岸边，并说其仍是一座很大的城

市。越过苦儿河，大概在其与萨儿速儿河汇合处之南有一天路程（18里格）的地方是八儿赞吉（Barzanj）城，其位于从巴耳札阿城直达设里汪地区的沙麻黑（Shāmākhī）城的道路上，该城是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常有商人光顾。[32]

阿剌蛮人称拜剌坎（Baylakān）城为费答噶兰（Phaidagaran）城[33]，巴耳札阿城被毁后，该城成为阿兰地区的首府。尽管现在这座城市的遗迹已不复存在，但在阿拉伯道里志中对其大致位置做了较清晰的描述。拜剌坎城位于巴耳札阿城南14里格处，距阿剌思河北7或9里格，在从八儿赞（Barzand）城北上的道路上，伊斯兰历9世纪（15世纪）时，该城尚存，是一座大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是座优美的城市，河岸边有很多水磨，周边有很多花园和果园。此城以制作一种特别的糖浆而闻名。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拜剌坎城遭蒙古人洗劫，攻城之时，因该城周边的平原无法找到抛石机用的石块，于是他们便砍下附近的树木，将树干锯成櫺木，用来摧毁城墙和房屋，该城被破后遭到劫掠，并被焚毁。但不久以后居民返回此城，重建了家园，这座城也恢复了往日繁荣的景象。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此城被帖木儿所围，城破后，帖木儿对该城进行了重建，为了向新城提供充足的水源，从阿剌思河引出了一条长6里格、宽15腕尺的运河。这条运河被称作八儿剌思（Barlāsī）运河，其名称取自帖木儿本人所属的八儿剌思（Barlās）部。

阿兰地区的其他两座城市也曾在文献中提到过，其均在巴耳札阿城西北，位于去往第必里思（Tiflīs）城[34]的道路上。其中的第一座城为干贾（Ganjah，现在一般称为Elizabetpol）城[35]，阿拉伯地理学家记作建札（Janzah），可疾云尼将流经该城的河流称作吉儿得喀思（Kirdkās）河。再往西北就是苫苦儿（Shamkūr）城[36]，其遗迹尚存，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时，此城被称作木塔瓦吉里雅（Mutawakkilīyah）城，因伊斯兰历240年（854年）奉哈里发木塔瓦吉儿之敕命重建而得名。[37]

流入阿兰地区境内的有两条河：希腊人称作阿剌可思河与居鲁士河，阿拉伯人则称作纳赫儿·剌思（Nahr-ar-Rass，或Aras）河[38]与纳赫儿·苦儿（Nahr-al-Kurr，或Kur）河。阿剌思河发源于西阿剌蛮的喀利喀剌（Kālikalā）地区，而后流经阿札拜占北部边界，并在阿兰地区东部的喀喇八噶（Karābāgh）地区汇入苦儿河（按穆思套菲的记载）。苦儿

河发源于谷儿只地区第必里思城的西部山区，即可萨（Khazar）地区，此地包括阿卜哈思（Abkhās）地区和阿蓝（Allān）地区。苦儿河流经第必里思城后，再南流到苫苦儿城，穆思套菲称其在此地分出一条支流或运河，最后流入苫苦儿（Shamkūr）大沼泽（或湖）。苦儿河在巴耳札阿城南不远处与阿剌思河汇合，并在古失塔思费（Gushtāsfī）地区流入里海。[39]

设里汪（Shirvān）地区

越过苦儿河，沿高加索（Caucasus）[40]山脉延伸到里海的地区就是设里汪地区，其首府为沙麻黑牙（Ash-Shamākhiyah）城，现在称作沙麻黑（Shāmākhī），或沙麻哈（Shāmākhā）城[41]。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穆喀达思称这是一座石砌城市，位于山脚下，周边有花园。该地区的统治者—总督，称作设里汪·沙（Shirvān Shāh）。这里大量种植谷物。据穆思套菲记载，穆斯林传述中称此地附近可以看到穆萨（Moses，摩西）磐石（《古兰经》，18：62）和生命之泉，前文提到的八贾儿宛城也有这种泉水。穆喀达思和其他早期著述者提及了设里汪地区的其他两座城市，但其位置还无法确定。其中第一座城为沙八兰（Shābarān）城[42]，其主要居民为基督徒，据说该城距打耳班（Darban）城有20里格；第二座城为设里汪（Shirvān）城[43]，位于平原上，这座城的市场内有一座聚礼清真寺。设里汪城在通往打耳班城的道路上，距首府沙麻黑城有三天的路程。

设里汪地区最北端是八卜·阿卜瓦（Bāb-al-Abwāb，即众门之门）城，阿拉伯人称作打耳班城[44]，是里海沿岸的著名港口。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伊本·豪喀尔说此城规模比后来作为阿札拜占首府的阿儿答必儿城还要大。该港由两条防波堤保护着，并深入到里海中，防波堤的末端是一座水门，用铁链固定，未经允许，船只不得随意出入。防波堤用石条建成，并灌铅固定。该城有一道石墙，还有两座大、小城门，以及前文提到的水门，城墙有城楼。打耳班所产的亚麻布大量外销，在其邻近乡村还盛产用以外销的藏红花。

在八卜·阿卜瓦城的市场内，有一座优美的聚礼清真寺，这里是伊斯兰世界的边陲城市，因此在早期，其周边居民均是异教徒。亚库特详细叙述了居住在高加索西部山区和高原的各个部落，并说这些部落操七十种不同的语言，而且彼此之间不能互通。里海通常以可萨部之名称作可萨海（Bahr-al-Khazar），该部是这些部落中最重要的。亚库特也记载了从打耳班城沿山顶向西修建的长城，该长城是用来防范野蛮人入侵的，据说其为6世纪的波斯王阿奴设里万（Anūshirwān）所建。萨木儿（Samūr）河[45]在打耳班城南不远流入里海，穆喀达思将该河记载为纳赫儿·灭力（Nahr-al-Malik）河，意为“国王河”，又名纳赫儿·萨木儿（Nahr-as-Samūr）河，其上建有一座浮桥（*Jisr*），该桥位于从沙麻黑

城起程的道路上，距打耳班城有20里格。

港口城市八苦［Bākūh或Bākūyah，即现在的巴库（Bākū）］城[46]位于 打耳班城南，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这里有著名的石脑泉。亚库特和其他著述者也详细记载了这些石脑泉，并称其一天内所产石脑产品的价值达1000底儿罕（约40英镑）。因石脑常流不断，于是附近地面被火覆盖。穆思套菲提到了八苦牙（Bākūyah）堡，其修建于城南的高地上，在正午时其影子可罩住城市。八苦城南是古失塔思费地区，靠近苦儿河河口，从该河引出了一条向本地区提供水源的运河，此地盛产谷物和棉花。最后，打耳班城附近的山区有喀剌剌（Kalalah）堡，据穆喀达思记载，这里的山顶上修建有一座清真寺。在关于帖木儿武功活动的记载中不止一次地提及喀剌剌堡，穆思套菲说这里产谷物和丝。[47]

谷儿只思田（Gurjistān）地区

谷儿只思田[48]，即谷儿只（Georgia）[49]地区和阿卜哈思（Abkhās）地区，又称阿卜哈思（Abkhasia），该地区是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征服战争后唯一皈依伊斯兰教的地区。第必里思（Tiflīs）城[50]是谷儿只思田地区的首府，位于苦儿河上游，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为地理学家所熟知。据伊本·豪喀尔记载，此城有两重城墙，特别坚固，还有三座城门。第必里思城拥有天然温泉浴场，流出的温泉汇入河道，其周边地区异常肥沃。据穆喀达思记载，该城横跨苦儿河两岸，有一座浮桥连接着两个城区。

据穆喀达思记载，邻近的阿卜哈思（Abkhās，或Abkhāz）地区属于高加索的贾八儿（Jabal-al-Kabk）地区。这里有约拿（Jonah）村，即尤奴思村（Kariyat Yunis），居民为穆斯林，该地区周边有谷儿只［Gurj，即格鲁吉亚（Georgian）］部、阿蓝（Allān）部和其他部落。据穆思套菲记载，很多河流发源于阿勒不儿兹（Alburz）山区，他还提到喀儿思（Kars）城是谷儿只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51]

阿剌蛮（Aramenia）[52]地区

大阿剌蛮（Aramenia，阿拉伯语拼写为Armīniyah）地区分成内、外阿剌蛮地区，尽管这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基督徒，但很早以前这里就纳入穆斯林的统治之下。这一地区位于凡（Vān）湖[53]和科恰克（Gukchah）湖[54]之间的群山之中，阿剌思河及幼发拉底河的两条支流发源于这一高地。

早期穆斯林统治时代，阿剌蛮地区的首府是答必儿（Dabīl）城，又称都温（Duwīn，或Tovin）城[55]，现在是一个小村庄，其位于靠近阿剌思河岸边的厄里宛（Erivan）城[56]之南。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答必儿城的规模比阿儿答必儿城还要大，是内阿剌蛮地区的首府。该城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有三座城门，聚礼清真寺与教堂紧挨着。阿剌剌（Ararat）山脉的两座山峰耸立在答必儿城南，山脉则越过阿剌可思。如前文所述（原文第94页），穆斯林传述中认为诺亚方舟停泊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贾八儿·朱迭（Jabal Jūdī）山前，即在此山（阿剌剌）山顶。阿剌蛮地区的人将阿剌剌山的大山峰称作贾八儿·哈里思山（Jabal-al-Harīth，劳动山、耕者山，哈里思也可称这是前伊斯兰时代的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他住在这一地区）。阿剌剌山小山峰称作忽歪里思（Al-Huwayrith）峰（即小哈里思山），伊斯塔赫里说这两座山峰又陡又高，无法测量，而且常年被积雪覆盖。答必儿城的居民在山坡上可砍伐柴薪，且山中有很多猎物可供猎取，穆喀达思还说山坡上分布着1000个小村落。答必儿城的毛织品用吉儿密兹（kirmiz）虫（即胭脂虫）染成了红色，很有名。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穆喀达思称答必儿城的居民是曲儿忒人，基督教信仰占绝对优势。其内城之外是一个花园密布的大外城区。阿尼（Anī）城曾是信仰基督教的阿剌蛮地区的首府，伊斯兰历456年（1064年）该城被塞尔柱王朝的阿儿普·阿思兰（Alp Arslān）攻占，并遭到洗劫，穆思套菲称此城是一座山城，附近山区盛产水果。答必儿城西北不远处有个淡水湖，阿里·亚兹底称作科恰克·成吉思（Gukchah Tangīz，即蓝湖）[57]；但在穆思套菲以前，早期穆斯林文献没有提到此湖的名称。[58]

（阿拉伯）早期文献中所称的凡（Vān）或阿儿吉失（Arjīsh）湖是阿剌蛮地区最为著名的湖泊，其沿岸的城市有阿合剌（Akhlāt）[59]、阿儿吉失（Arjīsh）[60]、凡（Vān）[61]、瓦思坦（Vastān）[62]等。据伊

斯塔赫里记载，该湖有20里格长，湖中以产乞利合（tirrīkh）鱼（这是一种鲱鱼，至今在这里可大量捕获）而闻名，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这种鱼腌制后，出口到美索不达米亚，甚至远销呼罗珊地区，亚库特说他在巴里黑（Balkh）城买过这种咸鱼。该湖的湖水又咸又苦。该湖西端的阿合剌或黑剌（Khilāt）城是阿剌蛮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据穆思套菲记载，该城在平原上，周边有很多花园，还有一座守卫的城堡。聚礼清真寺修建在市场里。这里冬季极寒，但城市很繁华；此城分布在一条小河的两岸，河上横跨着一座桥梁；穆思套菲盛赞该城附近地区的花园。阿合剌城之北是称作苦合·思盘（Kūh Sīpān）的大山，穆思套菲说在50里格外就能看到，其山峰总是白雪皑皑。

阿儿吉失城在湖之北岸，在穆思套菲的记载中常用这一名称，并说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奉合赞汗之敕命，宰相阿里·沙修建了坚固的城墙。该城附近以种植谷物的农田而闻名。再往东，靠近班·麻黑（Band-i-Māhī，即鱼坝）有八儿吉里（Bārkīrī，或Barhargīrī）城[63]，位于从阿儿吉失城通往阿札拜占的忽委（Khuwī，或Khoi）城的道路上，据穆思套菲记载，此城有一座修建在山顶上的坚固城堡。流经该城的河流发源于阿剌塔（Alatak）草原，草原腹地建有伊利汗国统治者阿鲁浑（Arghūn）的夏宫，草原得到了精心看护，以供其游猎。凡（Vān）城今天以其城名称呼其邻近的湖为凡（Vān）湖，此城在湖之东岸，文献没有记载。瓦思坦（Vastām，或Vastān）城堡在湖之南岸，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提到过此地，并说此堡附近有一座大城[64]。该湖西南角附近是该地区最后一座城八得利思（Badlis，或Bitlīs）城[65]，穆喀达思称此城位于两河汇合后形成的一条很深的峡谷里。该城由一座石堡守卫，据亚库特记载，这一地区所产的苹果口感极佳，并大量外销到邻近地区。[66]

北部诸地的产品不多，主要产品为用吉儿密兹（即胭脂虫）染成的红色纺织品，吉儿密兹是一种虫子，靠遍布于阿札拜占地区的橡树为生。这种用虫子染成的丝织品叫“深红（Cramoisie）丝”，英语单词“绯红”（Crimson）和“深红”（Carmine）就来源于“深红”（Cramoisie）一词。伊本·豪喀尔和穆喀达思均记载了吉儿密兹虫。伊本·豪喀尔称这是一种像蚕一样的虫子，自身缠绕在茧中，非常像蚕茧；穆喀达思称吉儿密兹昆虫或虫在地上就可以看到，并称妇女到野外去收集这种虫子，然后在火炉上用铜锅焙干。人们用它染制丝、山羊绒织品、亚麻布和绵羊毛织品，用这种方法染色的纺织品在各地很有名。阿剌蛮地区一般以其腰

带、菱纹床罩、地毯、挂毯、垫子和面纱等产品而闻名[67]；这些产品和无花果、核桃及前面提到的凡湖产的乞利合咸鱼干是主要外销品，在答必儿城的大商铺均有销售。巴耳札阿城附近的郊区和乡村也以生产丝织品而闻名，八卜·阿卜瓦城附近饲养有大量的骡子，以供外销；八卜·阿卜瓦城的港口，又称打耳班港，集中了从北方贩来的奴隶。[68]

[1] 见《新唐书·地理志》，今在伊朗北部吉兰省，译者。

[2] 关于歧兰地区，见下一章节开始处的地图五。

[3] 《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15页载："塔里失（Tālish）是奴赫（Naoh）之子牙非特（Japhet）的一个儿子的名字。以他的名字来称呼歧兰（Gilan）地区的一个部落，以这个部落的名称称该地区为塔里失思田（Tālishitan）。阿拉伯人将其名称写为塔里失（Tālish）。"今为吉兰省的一个县，其县府在阿什特帕尔（Hashtpar），此县城也称作塔里什城。译者。

[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04、205、20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67、26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74、812页；第2卷，第179、711页；第3卷，第57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7、191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26页。塔里失（Tālish）之名以软音t或硬音t书写，该词的复数可以写为塔里珊（Tālshān、Tīlshān），穆思套菲将其写为塔洼里失（Tawālish）。

[5] 今为鲁德巴尔（Rūdbār，Rūdhbār），是伊朗西北部里海南岸吉兰省鲁德巴尔县的县府所在地，人口1.1万，在萨菲德河岸边，是通往里海和伊朗腹地的要道。译者。

[6]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里海南岸普尼勒（Pūnil）东南哈勒哈勒城到该城的道路

上，是去往里海的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7] 今为沙赫拉斯坦（Shahrastān），今为吉兰省拉什特（Lasht）县所属的一个村庄，人口800余人。此地曾是一座城市，是里海南岸的重要通道，现已毁。译者。

[8] 今此城名不存，但其名称保留于哈什特帕尔（Hashtpar或Rezvanshahr）县中心区吉尔·杜拉布（Gil Dulab）之名中。译者。

[9]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哈什特帕尔（Hashtpar或Rezvanshahr）县境内。译者。

[10]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今恩泽利（Bandar-e Anzali）县境内。译者。

[1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04、20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5、360、373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29页（此书中将Baylamān错印为Bīmān）。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831页。关于什叶派（Alid）的达亦（Dā`ī）王朝，即哈散（Hasan）王朝，见梅尔古诺夫（G. Melgunof）所著《里海南岸地区》（*Das sudliche Ufer des Caspischen Meeres*，第53页）。

[12] 今为拉希詹（Lāhījān），是吉兰省同名县府所在，人口7.1万，是里海南岸的重要通道。译者。

[13] 今为福曼（Fūman），是吉兰省同名县府所在，人口2.7万，是通往里海与伊朗的重要通道。译者。

[14] 此城今不存。译者。

[15] 今为拉什特，是吉兰省的省会，人口62.3万，是伊朗里海沿岸地区的大城市，是里海沿岸与欧亚贸易的中心，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16] 今为沙夫特（Shaft或Bāzār Shaft），是吉兰省沙夫特县府，人口6.1万，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麓，靠近里海，是伊朗的避暑胜地。译者。

[17] 今此名不存，应在吉兰省东部里海沿岸附近。译者。

[18] 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98页；第4卷，第316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26、429页。Mustawfi（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

《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1、192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43、344页。

[19] 关于木干地区和西北边界诸地，见地图三，原文第87页。

[20] 今为穆甘（Mughān），是阿塞拜疆比利亚苏瓦尔州的一座小城，是通往里海和高加索的要道。译者。

[21] 今此名不存，应在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阿拉斯河南岸的阿勒坦（Oltān）小城附近。译者。

[22] 今此名不存，应在阿塞拜疆阿格贾贝迪（Ağcabədi）州的同名州府附近，位于库拉河东岸。译者。

[23]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6、37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54、562页；第4卷，第686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9、160、198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92页。

[24] 今为比勒赫·萨瓦儿（Bileh Savar），为伊朗东阿塞拜疆省比勒赫·萨瓦儿州州府所在地，人口1.4万。此城东边还有同名异写的比利亚苏瓦尔（Bilasuvar），为里海

岸边阿塞拜疆东部靠近伊朗的比利亚苏瓦尔州州府所在地，位于穆甘（Mugan）平原上，人口2万。这两座城均是进入伊朗、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重要通道。译者。

[25] 此城今不存，具体位置很难确定，大致位置应该在比利亚苏瓦尔城东南边，靠近里海。译者。

[26] 此城今不存，具体位置很难确定，大致位置应该靠近里海。译者。

[27] 有关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王的事迹见《圣经·但以理（*Daniel*）书》。译者。

[28]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阿拉斯河南岸的帕尔萨阿巴德（Pārsābād）附近。译者。

[29]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91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0、198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93页。

[30] 今为库拉（Kura）河，发源于土耳其东部的高加索山脉，向东流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汇入阿拉斯河，最终流入里海，全长1500公里，是里海西岸的重要河流。译者。

[31]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为巴尔达，是阿塞拜疆中部巴尔达地区首府所在地，人口4.1万，是通往里海的通道。译者。

[3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2、183、187、18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40、241、244、251页。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4、37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58、56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0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44页。

[33] 《亚美尼亚史》（*The Armenia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第6页（原文第67页）中将费答噶兰城记载为派塔儿喀兰（P`aytarkaran）城，并称在忽思罗一世在位的第41年（571～572年）之前，“思勿尼（Siwnik）地区的统治者，一个叫瓦汗（Vahan）王子的人起来反叛，并脱离阿剌蛮地区。他请波斯王忽思罗（即忽思罗一世）允许其将思勿尼地区的政府部门（Divan）从底温（Dvin，即答必儿）城迁到派塔儿喀兰城。”第82页（原文第125页）称7世纪初，波斯军队与希腊军队在此城所在地集结，后希腊军队被打败而逃。今为贝拉甘（Beylagan），是阿塞拜疆贝拉甘州州名及首府名，首府人口1.5万，是通往里海和高加索地区的重要通道，是丝路重镇。译者。

[34] 即今第比利斯，是格鲁吉亚的首都，人口111万，是该国最大城市，位于高加索山区一盆地中，是进入里海和地中海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古迹名胜甚多，为著名的旅游城市。译者。

[35] 《亚美尼亚史》第3页（原文第66页）中将干贾城称作干札（Gandzah）城，并称在阿塔儿帕塔干（Atrpatakan，即阿札拜占，此时阿兰地区应是阿塔儿帕塔干的一部分）。《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42～43页载：“干贾城是阿兰地区的一座城市，是该地区的首府。在干贾居住的士兵和居民是突厥人，或突厥蛮人，是喀剌察儿（Karāchār）的后裔，喀剌察儿是喀察儿里·八儿剌思（Kāchārli Berlās）之孙，喀察儿里·八儿剌思是帖木儿·古儿甘（Taimūr Gurkān）的八世祖。察合台汗子孙起兵时，这些突厥蛮部就移居到这里。现在他们被称作喀贾儿（Kājār）人。”今为占贾（Ganja，Elizabetpol），其曾几度易名，此城为阿塞拜疆第二大城市，人口32万，是连接高加索地区和里海、伊朗的重要通道。译者。

[36] 今为沙姆基尔（Şəmkir），阿塞拜疆西部沙姆地区的首府，人口6.7万，和占贾城在同一条道路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译者。

[37] 拜剌坎城遗址没有出现在俄国军事地图中。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

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22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3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7、18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44、25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97页；第3卷，第322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45、351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543、54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0页。

[38] 《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5页载：“阿剌思河（Aras）是设里汪地区的一条大河，发源于阿剌蛮山区。”译者。

[39] 在《世界志》（第396、397页）中详细记载了阿剌思河与苦儿河及其支流。这也纠正了穆思套菲的记载，同时也记述了帖木儿对谷儿只（Georgia）的征服活动，但很多城市的名称现在无法确定。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4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9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1卷，第184页；第2卷，第33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

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13、215页。

[40] 《元史·速不台传》作太和岭。译者。

[41] 今为沙马基（Şamaxı，或Shamakhi），是阿塞拜疆沙马基地区首府所在地，人口3.1万，是去往第比利斯和里海的重要通道。译者。

[42] 今为萨比拉巴德（Sabirabad），是阿塞拜疆萨比拉巴德地区首府所在地，人口2.9万，是去往第比利斯和里海的重要通道。译者。

[43] 今为希尔凡（Şırvan），是阿塞拜疆里海西岸的一座地区城市，人口8.1万，是去往高加索和里海的重要通道。译者。

[44] 见《元史·地理志·地附录》。《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9页载："八卜·阿卜瓦（Bāb-al-Abuāb）是设里汪地区的一座城市，是由奴设里万（Nūshirwān）修建的，靠近答失·钦察（Dasht-i-Kibchāq）之地，也称作迭木儿·喀匹（Demūr Kāpī），意为'迭木儿的官邸或住所'，是此人在这里首先建立了城堡。"今为杰尔宾特（Derbent），位于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境内，是里海岸边的城市，人口12万，是连接欧亚草原和伊朗高原的通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45] 即今萨穆尔（Samur）河，全长216公里，发源于高加索山脉，流经达吉斯坦境内，后注入里海。译者。

[46] 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人口200万，是该国最大城市，也是里海沿岸的最大城市，该国25%的人口居住在此城，这是里海沿岸著名的水陆交通中心，也是著名的石油城。译者。

[4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4、189、19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41、25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6、379、38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37、477页；第3卷，第225、282、317页；第4卷，第3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9～161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89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406页。

[48] 《马可波罗行纪》第22章第34页载：谷儿只“其地多城堡，产丝甚富，制种种金锦丝绸，极丽。产世界最良之秃鹫。百物丰饶，人民以工商为业。”译者。

[49] 即现在的格鲁吉亚。译者。

[50] 《亚美尼亚史》中将第必里思城记为乞普黑思（Tp`khis）城，第19页（原文第76页）。译者。

[5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4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1、20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8、350、857页。穆思套菲常写为吉八儿·阿勒不儿兹（Jibāl Alburz），即阿勒不儿兹山脉，为复数形式，意为山脉，但他使用的这个词的范围很模糊，这些山脉的一部分就是高加索山脉。今阿勒不儿兹山一般拼写为艾勒不儿兹（Elburz或Elbruz，即厄尔布尔士），是高加索山脉的最高峰。在波斯语中，阿勒不儿兹山脉现在是指位于德黑兰北边的大山脉（Damāvand是其最高峰）。译者按：今为厄尔布尔士山脉，位于伊朗北部、里海南岸，全长900公里，最高峰为达马万德山（汉籍称“秃马温山”），此峰高5604米。

[52] 即今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史》中作哈牙思田（Hayastan，如第3页，原文第66页，共出现28次），也作海伊（Hayk`，如第14页，原文第73页，共出现109次，看来这一称谓更常用），但《亚美尼亚史》中均翻译为亚美尼亚（Armenia，或Armenian）。译者。

[53] 《亚美尼亚史》中将凡湖记载为卜兹奴尼（Bznunik）湖，第19页（原文第76页）。译者。

[54] 塞凡湖（Sevana lič），是位于亚美尼亚境内的湖泊，距埃里温60公里，是著名的游览胜地。湖名由亚美尼亚语“黑色寺院”转化而来，因湖西北角小岛上有座4世纪时期用黑色材料修建的古寺院，又称戈克恰伊（Gokchay）湖，突厥语意为“碧水”。湖面海拔1900米。由构造陷落形成，是山中湖之一，最深处83米。面积1242平方公里，蓄水58.5立方公里，为高加索地区的最大湖泊。有28条小河注入。拉兹丹（Hrazdan）河从西北岸流出，流经首都耶烈万（Yerevan），最后汇入阿拉斯河。该湖周边是亚美尼亚重要的农业区，也是主要的道路通道，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

[55] 《亚美尼亚史》中记为底温（Dvin）城，并称波斯军事统帅（sparapet）瓦汗（Vahan）统3万精兵反击萨珊王卑路支（Peroz，459～484年在位），最后取得了胜利。瓦汗“收取了阿剌蛮人的赎金，并修复了瓦剌儿沙帕（Valarshapat）城（该城是安息王朝时期阿剌蛮地区的首府，安息王朝灭亡后，底温城取代其地位，原书译者注）、底温（Dvin）城和密兹赖（Mzrayk`）城，以及阿剌蛮其他很多地区被波斯人毁坏的大教堂。他将这一地区重新兴盛起来（第4～5页，原文第66～67页）。”在忽思罗一世在位的第41年（571～572年），麻密冦尼安藩主（Mamikoneans）瓦儿丹（Vardan）“联合所有阿剌蛮人起来反叛，并拒绝接受波斯人的统治。他们迅速俘获了底温城的（波斯）总督（marzpan）速林（Surēn），将其杀死，且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而后与希腊人联合起来”。见第6页（原文第67页。）在希腊军队的支持下，“他们（阿剌蛮人）攻打底温城；进行围攻后，彻底摧毁了该城，并赶走了驻扎在该城的军队”。见第7页（原文第68页）。后萨珊王Ormizd在位时期，希腊人毁掉了底温城的城墙（第16页，原文第74页）。后来底温城可能被修复了（第42页，原文第95页），仍是阿剌蛮地区的首府（第64页，原文第111页）。今此城已不存。译者。

[56] 即今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Yerevan），人口100万，是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通往里海和地中海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译者。

[57] 即塞凡湖。译者。

[5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8、19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4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

刊》第三卷，第374、377、38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83、54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26、161、164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414、415页；第2卷，第378页。伊本·阿喜儿，第10卷，第25页。

[59] 今为阿赫拉特（Ahlat），位于凡湖西北岸，属土耳其比特利斯省，人口2.1万，历史上是波斯与罗马之间道路上的重镇，今天仍是联系东西的要道。译者。

[60] 即今埃尔吉什（Erciş），属凡湖省，在凡湖北岸，人口8.1万，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61] 凡城是土耳其凡（Van）城省的省会，在凡湖东岸，人口37万，自古以来是交通要道，也是景色秀丽的旅游城市，名胜古迹很多，历史积淀深厚。译者。

[62] 今为土耳其凡城省盖瓦什（Gevaş）城，历史上称瓦思坦，位于凡湖以南，人口1.1万，是丝路要道和古城。译者。

[63] 今为穆拉迪耶（Muradiye），是凡湖省的一个城市，在凡湖东北角，人口1.4万，是东西通道上的重镇。译者。

[64] 即盖瓦什（Gevaş）。译者。

[65] 今比特利斯。见前注释。译者。

[6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8、19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45、24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26页；第2卷，第457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

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5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4、165、205、226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411、41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85、688页。

[67] 《马可波罗行纪》第19章第30页提到，小阿美尼亚（阿剌蛮）“百物丰饶，兼为大猎禽兽之地”。第21章第32页称大小阿美尼亚，“世界最良之毛织物出产于此”。译者。

[68]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4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80、381页。

第十三章 吉八儿（Jibāl）地区

吉八儿（Al-Jibāl）或亦剌可·阿贾木（`Irāk `Ajam）地区及其四个区。吉儿麻欣（Kirmasīn）或乞里茫沙杭（Kirmānshāhān）城。必速屯（Bīsutūn）山及其石刻。康古瓦儿（Kanguvār）城。第纳瓦儿（Dīnavar）城。沙合剌祖儿（Shahrazur）城。忽儿宛（Hulwān）城。呼罗珊大道。吉林（Kirind）城。塞尔柱人统治下的曲儿忒思田（Kurdistān）。八哈儿（Bahār）城。建贾麻儿（Jamjamāl）城。阿兰尼（Alānī）城和阿里士塔儿（Alishtar）城。哈马丹（Hamadān）城及其下属地区。答儿谷曾（Darguzīn）城。哈剌坎纳因（Kharakānnayn）城和北阿洼（Āvah）城。那哈完的（Nihāvand）城。喀喇吉·鲁得剌瓦儿（Karaj-i-Rūdrāvar），和喀喇吉·阿卜·都剌费（Karaj-i-Abu Dulaf）城。法剌汗（Farāhān）城。

希腊人称作米底（Media）的广阔山区，被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之为吉八儿（Al-Jibāl，即山区）地区，其起自西边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直延伸到东边的波斯大沙漠。后来，吉八儿之名便废弃不用了，在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即塞尔柱人统治后期，该地区被误称为亦剌可·阿贾木（`Irāk `Ajamī），意为波斯的亦剌可地区，以此来区别于下美索不达米亚的旧阿拉伯亦剌可地区。[1]

这一名称的变化情况，将在下文做阐述。如前文所述（原文第二章第25页注释），阿拉伯人所说的亦剌可地区除了指下美索不达米亚的穆斯林聚居区外，通常还用双数形式指该地区的两座主要城市：苦法城和弼斯啰城。由此，这两座城市被称作亦剌可（Al-`Irākayn），意为“两个亦剌可（都会）”。这是旧式的传统用法，但至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后半叶，塞尔柱人开始统治整个波斯西部地区，并以哈马丹（Hamadān）城为都城，同时他们也统治着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因此他们接受了哈里发赐给的“两个亦剌可的算端”的称号，这一称号似乎与他们实际的统治情况相符，于是“两个亦剌可”中的第二个（即`Irāk `Ajamī）很快指称吉八儿地区，这里是塞尔柱王朝诸统治者的常居之地，结果该地区被误称为“波斯的亦剌可”。对这一问题，亚库特已有记载，他称在他那个时代波斯人将这一地区不准确地称为“波斯的亦剌可”（Persian `Irāk），到现在仍在使用这一名称。亚库

特自己采用了旧名称吉八儿（Al-Jibāl），和他同时代的可疾云尼也采用这一阿拉伯语名称，此名相当于波斯语中的苦黑思田（Kuhistān，即山区）地区。但吉八儿之名在蒙古西征后显然已被完全废弃，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的记载中没有一处使用过这一名称。他将旧吉八儿地区分为两部分：西边的一小部分是曲儿忒思田；东边的大部分是“波斯的亦剌可”，其亦剌可之名至今还在使用，而位于德黑兰城西南部属于旧吉八儿地区的那部分地区，现在当地人仍称作亦剌可地区。[2]

该地区有四座大城：吉儿密辛［Kirmīsīn，即后来的乞里茫沙（Kirmānshāh）］城[3]、哈马丹城、剌亦（Ray）城和亦思法杭（Isfahān）城。这些城市就是较早时期此地区所辖四区的首府。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白益王朝统治时期，其政府机构就设在剌夷城；11世纪末，哈马丹城成为波斯塞尔柱王朝的都城；但亦思法杭城一直是吉八儿地区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在现存著作里，很容易找到这一地区包括四座大城市在内分成（四个）专区的相关记载，乞里茫沙（Kirmānshāh）城所属的专区位于西边，自塞尔柱王朝时期起，这里通常被称作曲儿忒思田，意为曲儿忒人居住的地区。

与专区同名的首府乞里茫沙杭（Kirmānshāhān）城，一般简称乞里茫沙（Kirmānshāh）城，早期阿拉伯人称作吉儿密辛（Kirmīsīn，也拼写为Kirmāsīn和Kirmāshīn）。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该城是一座惬意的城市，周边有树木，其间流淌着河水，这里水果价廉，各种货品丰富。穆喀达思是第一位以波斯语拼写乞里茫沙杭之名的人，并称该城市场里有一座大清真寺，还说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Adud-ad-Dawlah）在该城主街旁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华美的宫殿。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据可疾云尼记载，吉儿密辛（Kirmīsīn）城距乞里茫沙杭城很近，两城如同姊妹城；亚库特也提到了这两座城市的名字，却未做详述，他主要记述了附近必昔思田（Bihistān）山区的石刻（铭文）和遗迹。至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蒙古西征导致乞里茫沙城被毁，到14世纪，据穆思套菲记载，在他那个时期这里已变成一个村庄，他说在“很多书籍”中该地名被记载为吉儿密辛（从他那个时代起该名称已废弃不用），他还特别关注并记载了必昔思田，或必速屯（Bīsutūn）山的石刻。

这些石刻遗迹的范围从分布有黑色岩石的大山脚下一直延伸到乞里茫沙杭城以东，靠近呼罗珊道，这些石刻遗迹可追溯到阿契美尼德

（Achemen）王朝（公元前5世纪）至萨珊王朝（7世纪）时期。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伊斯塔赫里和伊本·豪喀尔均记载了这些遗迹，他们还记下了必昔思田山和必速屯山之名，称石刻位于萨珊（Sāsāniyān）村附近，该村无疑就是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穆思套菲所称的瓦思坦（Vastām）或八思坦（Bastām），现在被称作塔基·布斯坦（Tāk-i-Bustān，即花园拱门）。这里保存有大琉士（Darius）[4]接受各国国王朝贡场面的著名石刻，其铭文为三种语言书写的楔形文字，伊本·豪喀尔提到了这一石刻，并记载说：该石刻“描绘了一个石建的私塾里有教书先生和男学生；教书先生的手里还有一个像皮带一样的戒具，是用来体罚学生的；在石头上雕刻着几口大锅，是用来煮饭的”。萨珊王朝时期的石刻是1000年之后加上去的，这些石刻主要分布在一个洞穴的内外，大山脚下的这一洞穴里涌出一股泉水，后来的所有波斯语文献重述了伊本·豪喀尔的记载，这些萨珊石刻描绘的是国王忽思罗·帕儿委兹（Khusraw Parvīz）[5]骑乘名马失卜大兹（Shibdāz，或Shabdīz），国王的北边站立着美丽的爱妃喜琳（Shīrīn），她的肖像石刻位于前文提到的洞穴顶上。有些铭文已模糊不清，但这些石刻仍保存至今，而且文献里多次提到和记载了这些石刻。亚库特的记载中引用了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木哈儿哈儿（Ibn Muhalhal）的游记，亚库特与穆思套菲还较详细地谈到了在他们那个时期民间的相关传说。忽思罗、喜琳及她的情人雕刻家法儿哈（Farhād）绝望中自杀的故事已本地化，并在附近很多地区流传；这些故事可以从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和尼扎米（Nizāmī）[6]的杰出诗歌《忽思罗和喜琳的爱情》（穆思套菲引用过此诗）中了解。[7]

经过乞里茫沙城向北，沿呼罗珊道而行，其左边有一座独山，被称作欣·速麦剌（Sinn Sumayrah，即速麦剌之齿）山，以此为起点向北延伸的道路可到达第纳瓦儿（Dīnavar）城[8]和阿札拜占地区。“速麦剌之齿”之名源于一位叫速麦剌的阿拉伯妇女，她以龅牙而知名，当时穆斯林在征服那哈完的（Nihāvand）城[9]的途中经过此山，便诙谐地将其冠以此浑号。经必速屯山，在向东的呼罗珊道上有伊斯塔赫里提到的喜纳（Sihnah）村[10]，至今仍然存在，但不可将此村与后文谈到的现代的思纳（Sihnah）城相混淆。过了思纳村就是康古瓦儿（Kanguvār）城[11]，阿拉伯人称作“盗匪堡”（Kasr-al-Lusūs），其源于当地居民的恶名，因在穆斯林第一次征服时期，此地居民盗走了去攻打那哈完的城的军队的所有驮包。据伊本·鲁斯塔和其他著述者记载，这里有一座巨大的拱形建筑，修建在一个平台上，该平台是用柱子和有灰浆的砖料建成

的，此建筑可追溯到忽思罗·帕儿委兹时期。康古瓦儿城是一座相当大的城市，这里有哈里发木可塔底儿的财政大臣木尼思（Mūnis）修建的一座聚礼清真寺。亚库特称萨珊建筑所在的平台高出地面20腕尺，穆思套菲称该建筑所用的巨石是从必速屯山运来的。[12]

康古瓦儿城之东约25英里就是第纳瓦儿城遗址。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里是哈散纳委（Hasanawayh，或Hasanūyah）小独立王朝[13]的都城，该王朝因在这一地区居住的主要部落曲儿忒人酋长哈散纳委而得名。穆斯林征服波斯后，第纳瓦儿城被称作麻合·苦法（Māh-al-Kūfah）城，“因该地的收入用来支付苦法居民的国家年金”（雅忽比记载）；有段时间，麻合·苦法一名成为该城及其周边地区的共同名称。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伊本·豪喀尔记载，第纳瓦儿城的规模为哈马丹城的2/3，但这里的居民要比哈马丹城人更有教养，更文明。穆喀达思称这座城的市场修建得很好，周边有很多繁盛的果园。（该城的）大清真寺是哈散纳委修建的，位于市场内，寺内修建了一座优美的讲坛，其上有装饰着雕刻图案的穹顶。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穆思套菲记载，第纳瓦儿城还有人居住；这里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并盛产粮食和葡萄。此地可能在帖木儿征服以后成为现在所看到的废墟，因阿里·亚兹底称帖木儿的一部分军队驻守在此地。

大萨儿麻吉（Sarmāj）堡[14]可能就在第纳瓦儿城附近，但其确切位置不得而知，据亚库特记载，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堡，该堡是哈散纳委用条石建成的，他于伊斯兰历369年（979年）卒于该地，他统治的时间相当长，伊本·阿喜儿称有近50年。至11世纪，塞尔柱王朝统治者突哥里儿·别（Tughril Beg）[15]从伊斯兰历441年（1049年）开始围攻萨儿麻吉堡，时间长达4年，最后将其攻破，在此期间，他召集了10万军队才将其兄弟羽纳儿（Yunnāl）从这一坚固的堡垒中赶出去。[16]

第纳瓦儿城遗址北约60英里就是至今仍然存在的重要城市思纳（Sihnah）城[17]，它是现代波斯（伊朗）曲儿忒思田地区的首府，但中世纪的阿拉伯或波斯地理学家却未提到该城。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库达玛的道里志记载，现代思纳城的位置是中世纪思萨儿（Sīsar）城所在地，亚库特说思萨儿（Sīsar）之名的波斯语意为“三十只头颅”，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思萨儿城附近涌出很多处泉水，因而被称作“百间房”（Sad Khāniyah），或称“源头”，以此来表示这些泉水的数目。哈里发阿敏（Amīn）在这里修建过一座城堡，他的弟弟马蒙比他更著名，曾

驻扎于此，并密切关注着居住在草原上的曲儿忒部落，在内战中马蒙利用他们反击其兄，后来马蒙夺得了其兄长的哈里发之位。思萨儿被看成是哈马丹城的24个次地区之一；现代的思纳城可能仅仅是“百间房”（Sad-Khāniyah）的讹读，简称为“三十间房”（Sī-Khānah），但对此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

在第纳瓦儿城向西北行4站为沙合剌祖儿（Shahrazūr）城[18]，位于与该城同名的地区。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称沙合剌祖儿城是一座有城墙的坚固城市，居住着曲儿忒人，他还提到了这些部落的名称；这些部落还居住在该城的周边地区，这里土地极其肥沃。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旅行家伊本·木哈儿哈儿（亚库特所引）称这一地区有很多城市和乡村，并说其首府被波斯人称作“半途房”（Nīm-Rāh）城，因其位于马达因（即泰西封）城和失兹（Shīz）城[19]中间，这里还有两座萨珊时代的大袄教祠。附近的山区称作沙兰（Sha`rān）和札兰（Zalam），据可疾云尼记载，这里生长一种强力春药植物。伊本·木哈儿哈儿访问这一地区时，曲儿忒人有6万帐落，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穆思套菲说沙合剌祖儿城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居民为曲儿忒人。[20]

如第一章所述，呼罗珊道从报达城向东通往穆斯林领地的极边之地，首先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后在吉八儿地区的忽儿宛（Hulwān）城[21]进入波斯山区，但忽儿宛城有时被划入阿拉伯·亦剌可（Arabian`Irāk）地区。伊本·豪喀尔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忽儿宛城规模只是第纳瓦儿城的一半，其房屋是用石头和土坯建成的。这里气候炎热，盛产椰枣、石榴、无花果等，但城北2里格远的山顶在整个夏天都可以看到积雪。穆喀达思又称该城有一座古城堡和一座清真寺，其城墙有8座城门，并记载了每座城门的名称。在城外有一座犹太教堂，受到犹太人的极度尊奉，该教堂是用泥浆和方形石头建成的。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据可疾云尼记载，忽儿宛城已毁，但这里的硫磺泉很有名。14世纪时，穆思套菲盛赞该地所产的粮食，但他称该城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些穆斯林圣徒的圣墓，其遗址附近有30个村庄。

沿着呼罗珊道，在忽儿宛城向北4里格，通往吉林（Kirind）城[22]的方向为马咋鲁思坦（Mādharūstān）城[23]，亚库特称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处平台上的大拱形建筑。这是萨珊王八合兰·古儿（Bahrām Gūr）的宫殿的一部分，这位国王在此附近修建了一座御苑，但在亚库特时代早

已不存。从此城行6里格就是吉林城，显然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才首次提到该城；他将吉林城和附近称作忽苫（Khūshān）的村庄并提，但该村现在已不复存在，据穆思套菲记载，在他那个时代这个村比吉林城更繁华。这两个地方在忽儿宛通路的顶端，位于肥沃的平原上，大体位置应在“草原堡”（Marj-al-Kal`ah）驿站，如前所述，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并未提到过上述两地，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其（草原堡）是一座有城墙的繁华大城，周边地区的土地肥沃。雅忽比称这些草原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用来放养其种马之地。呼罗珊道经这一草原4里格后，到达塔札儿（Tazar）城[24]，据穆喀达思记载，在这里可以看到萨珊王（Chosroes）的宫殿遗址，亚库特称该宫是沙汗（Shahān）之子忽思鲁吉儿（Khusrūjird）所建。塔札儿城有很好的市场，此地显然就是喀思儿·雅兹底（Kasr Yazīd），即雅兹底的宫殿或城堡，这在其他文献中已有提及。过塔札儿城后再行6里格就到达祖拜底牙（Az-Zubaydīyah），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是“一处优美的疗养地”，位于（呼罗珊）大道上，由此可知其位置应在现在的诃论纳八（Hārūnābād）村[25]。在这个地方，呼罗珊道向东转，经麻亦答失（Māyidasht，Māhīdasht）平原[26]，直达乞里茫沙城。据穆思套菲记载，在他那个时代麻亦答失平原上散落着50多个村庄，周边是肥美的草原，这里的土地靠发源于附近山区中的河流灌溉。此地区有哈儿辛（Harsīn）堡[27]，其下方有小城，至今犹存，距乞里茫沙城东南有20英里。[28]

有关曲儿忒思田地区的来源，据说约在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中叶，塞尔柱王朝的算端桑贾儿将吉八儿地区的西部，即乞里茫沙城所属的地区分割出来，将其命名为曲儿忒思田，由其侄子别号为阿卜合（Abūh，或Ayūh）的搠里蛮·沙（Sulaymān Shāh）[29]管辖，后来他继承了其叔父之位，在伊斯兰历554~556年（1159~1161年）任塞尔柱家族族长和“两个亦剌可地区”的算端。据穆思套菲记载，在搠里蛮·沙统治时期，曲儿忒思田地区非常繁荣，其财政收入达200万迪纳（相当于100万纯银英币），约为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蒙古王朝统治该地区时所获收入的10倍，此时穆思套菲任该朝的财政官员。搠里蛮·沙将八哈儿（Bahār）城[30]作为其首都，位于哈马丹城北约8英里处，至今犹存；这里还有一座坚固的城堡。蒙古统治时期，完者都（Uljaytū）[31]算端在算端纳八·建贾麻儿（Sultānābād Jamjamāl，或Chamchamāl）修建了第二座都城，此城靠近必速屯山山脚，据穆思套菲记载，该城位于一处肥沃之地，这里盛产粮食。穆思套菲撰写的道里志中记载了建贾

麻儿（Jamjamāl，或Chamchamāl）城[32]的方位（其距思纳村4里格，距乞里茫沙城6里格），其遗址尚存，并已在地图上标出。阿里·亚兹底在记载帖木儿经过曲儿忒思田地区的内容中，常提到此城。

在关于帖木儿武功活动的记载中还提到了这里的其他两座城市，穆思套菲也注意到了。其中一座是打耳班·塔基·可敦（Darban Tāj Khātūn）城[33]，据穆思套菲记载，这是座"中型城市，绝大部分已毁"。另一座为打耳班·赞吉（Darban Zangī）城[34]，是座小城，这里气候温暖，水草丰美。显然在地图上已找不到这两座城市，但据阿里·亚兹底记载，打耳班（Darban）的含义为"关隘"，他还将第一座城的名称记为打耳班·塔石·可敦（Darban-Tāshī-Khātūn）[35]，这两个打耳班应该位于曲儿忒思田地区的西部边陲（介于沙合剌祖儿城与忽儿宛城之间），这里的群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屏障。

穆思套菲还提到了曲儿忒思田地区的其他四座重要城市，即阿兰尼（Alānī）[36]、阿里士塔儿（Alīshtar）[37]、忽夫乞阳（Khuftiyān）[38]和答儿必儿（Darbīl）[39]等城，这些城市在他那个时代是重镇，但现在这些城市的位置已不易确定了。阿兰尼城在一些抄本中写作阿剌必（Alābī），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该城是这一地区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城市之一，但除了穆思套菲外，其他著述者未提到此城。这里气候宜人，产小麦，周边草原水草丰美，附近猎场的猎物丰富。阿里士塔儿城有一座称作阿儿答黑失（Ardahish、Arūkhsh或Arakhash）的古袄教祠。但很可惜，没有一部道里志记载过该城的位置，而阿里士塔儿（Alīshtar）平原至今仍在，这里的其中一处遗址可能就是穆思套菲所提到的城市（阿里士塔儿城）的所在地。这座城无疑就是伊本·豪喀尔和其他著述者提到的力士塔儿（līshtar，或Lāshtar）城，位于 那哈完的城西南10里格处，距撒卜儿合瓦思（Sābūrkhwāst）城北12里格。另外，必须承认对阿里士塔儿（Alīshtar）的音读仍存在疑问，因很多善本及土耳其语著作《世界志》中均记载为八失儿（Al-Bashr）及其他各种形式。至于忽夫乞阳（在《世界志》中记载为Hakshiyān）城，只知道其有一座坚固的城堡，城周边的村庄位于扎卜（Zāb）河两岸，该城是在上扎卜河还是下扎卜河并未记载，除此之外，其他方面一无所知，甚至其位置也不清楚。和忽夫乞阳城一样，答儿必儿城的位置也不十分清楚，但穆思套菲说，其为"中型城市，气候宜人"，他没有记载该城的确切位置，但从他的记载来推断应在曲儿忒思田地区。[40]

哈马丹［Hamadān，阿拉伯人写为哈马赞（Hamadhān）］城[41]，即古代的伊科巴塔纳（Ecbatana）城，是米底地区的首府。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哈马赞城是一座优美的大城，面积超过1平方里格，是穆斯林征服后重建的。其城墙有四座城门，还有一个无城墙的外城区。该城市场里商品琳琅满目，周边地区土地肥沃，盛产各种作物，尤其是藏红花。穆喀达思称该城拥有三个市场，并说其中的一个市场里有一座大清真寺，这是座很古老的建筑。亚库特特别关注过哈马丹城，并在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蒙古西征毁掉该城前不久到过，他称该城辖有24个次区（Rustāk），并一一列举。14世纪时，穆思套菲对这些区又做了记载，还对每个区所属的村庄做了记述，但绝大部分村庄名称现已无法确定。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穆思套菲记载，该城有2里格长，其中心还有一座用土建成的古堡，称作沙合里思田（Shahristān）。哈马丹城的这座古堡像亦思法杭城（后文将述及）的城堡一样，伊本·法吉（Ibn Fakīh）称作萨鲁（Sārūk），但对该词的含义未做解释。哈马丹城的金匠市场很有名，建在以前的杂民·底合（Zamīn Dīh）村所在地；该城的城墙周长有12000步。穆思套菲说最初哈马丹城包括五座城，即喀剌·可不里（Kal`ah Kabrīt，即硫磺堡）、喀剌·麻斤（Kal`ah Mākīn）、吉儿剌合（Girdlākh）、忽儿失（Khurshīd）和苦剌失（Kurasht）等。他还说："最后一座城先前是座大城，但现在已完全被毁。"哈马丹城所属地区包括了乡村的5个大区，即靠近该城的法利瓦儿（Farivar）区，而后是阿札麻丁（Azmadīn）区、沙剌敏（Sharāmīn）区和阿剌木（A`lam）区，最后为萨儿·鲁（Sard Rūd）与八儿汗·鲁（Barhand Rūd）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区名的读法不易确定，且在抄本中差异甚大。[42]

距哈马丹城3里格是朱哈思塔（Juhastah）村（方位未述，该名称在地图上也无法查到），据伊本·法吉记载，这里有国王缚伽浪·古儿修建的古城堡遗址。这是座巨大的建筑，有大殿、走廊和居室，这些建筑的一部分是用原状岩石凿成的。城堡四角雕刻着女性肖像，此建筑的一面书写着古波斯文（*Farsīyah*），文中记述了萨珊王（Chosroes）的征服活动。距此宫殿半里格远是一座山，那里可以看到所谓的羚羊（Antelope）墓（Nāūs-az-Zabīyah），伊本·法吉详细叙述了此地有关国王缚伽浪·古儿和他的情妇，以及其在附近平原射杀羚羊，由于他的情妇蔑视其箭术，最后恼羞成怒的国王处死情妇的逸闻。

哈马丹城西南耸立着亚库特所记载的大阿儿宛（Alvand，或Arvand）山[43]，从名称写法来看，伊斯兰历729年（1329年），这里是伊利汗国统治者卜撒因（Abu-Sa`īd）铸造银币的造币城。穆思套菲详细叙述了苦合·阿儿宛（Kūh Alvand）山，并说该山周长有30里格，其山峰常年覆盖着积雪。他还说在山顶最高处有一处流量很大的泉水，其从岩石中凿出的建筑物里流出，其他42条溪水也从该山流出。阿萨八答（Asabādād）城[44]位于在哈马丹城西行，经阿儿宛（Alvand）关，去往康古瓦儿城的大道上，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是一座繁华的城市；穆喀达思称从此城1里格外就可以看到穹顶（*Aywān*），其在亚库特所称的麻塔必合·吉思剌（Matābikh-al-Kisrā，萨珊王的厨房）的一处建筑上。阿萨八答城有一座清真寺和很多极好的市场；其所在地区土地异常肥沃，并产蜂蜜。穆思套菲说该城附近有35个村庄。[45]

哈马丹城所在的平原向北和向东伸展，这里有很多河流，汇合后成为高麻哈（Gāvmāhā，或Gāvmāsā）河的上源，有关该河的情况将在谈及苦木（Kum）河时述及。哈马丹城北是答儿谷曾（Darguzīn）区，该区以北为哈剌坎（Kharrakān）区。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称答儿谷曾（Darguzīn）城[46]是座相当大的城市，但先前是个村庄，后为阿剌木（A`lam）区的首府，如前文所述，该区是哈马丹城所属的五个区之一。他还说阿剌木区被波斯人误称作阿木儿（Al-Amr，亚库特证实了这一说法），其位于哈马丹城和赞章（Zanjān）城之间的一处高原上，这里盛产葡萄、棉花和粮食。哈剌坎区通常被称作哈剌坎喀奈（Kharakānayn，意为“两个哈剌坎”），位于阿剌木区以北。这里有很多村庄，穆思套菲曾记载过这些村庄（但在抄本中无法确定其读音），这个区的首府“哈马丹地区的阿洼（Āvah或Ābah-i-Hamadān）”城至今仍在，并用该名来区别于后文述及的“撒瓦地区的阿洼（Āvah-i-Sāvah）”城。北边的阿洼（Āvah）城有时也写为阿瓦（Āvā），亚库特提到了该地，但最早记载该地的是生活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穆喀达思。据穆思套菲记载，春汛时节哈剌坎（Kharrakān）河流入忽失·鲁得（Khusht Rūd）河，忽失·鲁得河最终消失于剌亦（Ray）地区的大沙漠里。但在夏季，由于灌渠河水干涸，哈剌坎河的河水便不会流出自身所在的区域。[47]

那哈完的城在哈马丹城南约40英里处，从萨珊王朝时期起这里就是重镇。穆斯林第一次征服时期军队里的弼斯啰人对这里影响特别大（他们攻占该城后），因该地的收入所得用来支付弼斯啰城人的年金，于是

该城和其所在地区被称作麻合·弼斯啰（Māh Basrah），这与第纳瓦儿城的收入要支付给苦法城人一样（见原文第189页）。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该城的市场里出售丰富的商品，这里也是在附近的鲁札剌洼儿（Rūdhrāvar）区收购的藏红花的集散地。那哈完的城有新、旧两座大清真寺。据亚库特记载，穆斯林传述称来自弼斯啰城的阿拉伯人很早就居住于此；该城以制作香水而闻名。至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穆思套菲记载，在他那个时代这里的主要居民是曲儿忒各部族；其附近各地区盛产棉花，他还特别提到了其中的三个地区：麻来儿（Malāir）[48]、亦思费赞（Isfīdhān）[49]和贾忽（Jahūk）[50]。哈马丹城与那哈完的城之间就是富庶的鲁札剌洼儿区，以产藏红花而闻名；该区的首府是喀喇吉（Karaj）城[51]，这里有一座优美的清真寺。亚库特称此区长3里格，包括93个村庄。穆思套菲一般将该区名称拼写为鲁答鲁（Rūdārūd），并提到了该区中的萨儿坎（Sarkān）城[52]和土委（Tuvī）城[53]，这两座城至今仍然存在。现在常以土委之名来称呼该区。[54]

那哈完的城之东是两个亦噶儿［Īghār，即亦噶兰（Al-Īghārayn）］区，其首府称作喀喇吉（Karaj）城，通常被称作喀喇吉·阿卜·都剌费（Karaj-i-Abu Dulaf）城[55]，以示区别。喀喇吉城的确切位置不清楚，但从道里志所载里程和穆思套菲的记载来看，其位于剌思满（Rāsmand）山的山脚下（差不多可以确定该山就是今天所称的Rāsband山），应在流经萨鲁（Sārūk）城[56]，再汇入现代称作喀喇·速（Karā Sū）河的一条支流的源头附近。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喀喇吉城的规模比卜鲁吉儿（Burūjird）城[57]要小，但位置很重要，并建在一处高地上。该城居民区超过2里格，还有两个市场：一个在“大清真寺门”（Bāb Masjid-al-Jāmi`）处；另一个在朝向称作“大平原”的城门的对面。这里澡堂很多，民居修建得很好，绝大多数房屋是用土坯砌成的；花园很少，但城市周边异常富庶。为了便于区别，喀喇吉城的城名加上了阿卜·都剌夫（Abu Dulaf），该名本是一位著名将领的名字，也是诃论·剌失德和其子马蒙时期的宫廷诗人。阿卜·都剌夫及其后裔居住在卜儿吉（Burj）城[58]附近地区，这里距亦思法杭城12里格，该地区作为“亦噶儿”（Īghār，即永业田）赏赐给了他们，每年要向哈里发交纳固定的贡赋，但可免除其他徭役杂税。亚库特称波斯人将喀喇吉（Karaj）之名读作喀喇（*Karah*），并说法剌曾（Farrazīn）是距喀喇吉（Karaj）城门不远的一座城堡名。穆思套菲提到了这里的喀喇·鲁得（Karah Rūd）河，并称此地的剌思满山从平原起

向北伸展。此山的山脚下有一处流量很大的泉水，称作凯·忽思罗（Kay-Khusraw）国王泉，该泉的泉水流经附近的草原地区，该草原称作麻儿哥札儿·吉忒（Margzār-i-Kītū），长6里格，宽3里格，由法剌曾城堡守卫着。据文献记载，高耸的剌思满山像必速屯山一样是黑色的岩石山，周长有10里格，其山间有很多峡谷。卜儿吉城是亦噶兰（Īghārayn）地区的第二大城市，其确切位置还不清楚。但其大致方位是可知的。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该城是修建很好的优美城市，并称其在去往亦思法杭城的道路上，距喀喇吉城约12里格。[59]

喀喇吉（Karaj）河稍南，在喀喇吉·阿卜·都剌费城之北就是法剌汗（Farāhān）区的萨鲁城，亚库特和穆思套菲都注意到了该城，均称其属于哈马丹地区。文献中曾记载至今仍然存在的道剌塔八（Dawlatābād）城[60]当时在邻近地区很有名；其附近有一处盐碱地，是由湖泊形成的，该湖泊的面积为4平方里格，夏季天热时，湖水就会被蒸干，这里产供外销的优质食盐。据穆思套菲记载，蒙古人将该湖称作贾干·诺儿（Jaghān Nāūr）[61]，意为“盐湖”。毫无疑问，该湖 就是现在的陶拉（Tualā）湖。最后，在哈马丹城东南，约在哈马丹城和那哈完的城中间的城市为剌敏（Rāmīn）小城[62]，据亚库特记载，该城在这一地区（法剌汗区），但其他文献未做进一步的叙述。[63]

[1] 阿贾木（`Ajam，或`Ajamī），阿拉伯人最初用来指一个“外国人”，或非阿拉伯人，如同希腊人所用的“异教徒”或“野蛮人”（Barbarian）。因波斯人首先作为外国人和阿拉伯人取得了联系，很快阿贾木（`Ajam，或`Ajamī）特指“波斯外国人”，含义等同于今天所称的“波斯人”。吉八儿（Jibāl）是阿拉伯语贾八儿（Jabal，即山）的复数形式。阿布·勒·费达（第408页）记为双数名称，并写为“山区地区”（Bilād-al-Jabal），这个地区被人们叫作波斯·亦剌可（`Irāk-al-`Ajam）。

[2] 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5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2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1页。

[3] 今为克尔曼沙阿（Kermānshāh），是伊朗西部克尔曼沙阿省的省会，人口86万，呼罗珊大道经过该城，它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进入伊朗和伊拉克的门户。这里名胜古迹甚多。译者。

[4] 即大流士一世，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前522年～前486年在位，在他统治时期，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最终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此时袄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他将自己的功绩刻在必昔思田山上，后人称之为必昔思田（贝希斯敦）铭文。译者。

[5] 萨珊王朝末期一位杰出君主，591～628年在位。他在位时期萨珊王朝再一次中兴，但更为有名的是他与其爱妃喜琳的传奇故事，成为波斯、大食、突厥等文人笔下经常写到的题材，很多诗人撰写过与之相关的长诗。译者。

[6] 尼扎米（1141～1209年），全名阿卜·麻哈木·亦里雅思·玉素甫·本·扎吉·木阿雅（Abū Muhammad Ilyās ibn Yūsuf ibn Zakī Mu'ayyad），是波斯著名诗人，对后世波斯、阿拉伯等穆斯林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译者。

[7]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66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70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95、20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6、265、26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4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9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250页；第4卷，第6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8、203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451页。必昔思田（Bihistān）是一种较古老的写法。必速屯（Bīsutūn，现在称比索通或贝希斯敦）在

波斯语中含义为“无柱子”，即无支撑，可能是民间用语。

[8] 此城是8～11世纪的名城，现在已毁，大致在克尔曼沙阿城西北，在克尔曼沙阿省萨赫内（Sahneh）州境内。译者。

[9]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新唐书·大食传》作你诃温多。今为纳哈万德（Nehāvand），是哈马丹（Hamadān）省纳哈万德州州府所在地，人口7.2万，是呼罗珊大道经过之地，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10] 今为萨赫内（Sahneh），是萨赫内州州府所在地，全县人口3万，呼罗珊道从此地经过。译者。

[11] 今为坎加瓦尔（Kangāvar），是哈马丹（Hamadān）省坎加瓦尔州州府所在地，人口4.9万，呼罗珊道经过此地，这是一座古城，有很多名胜古迹。译者。

[1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9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6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6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9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50、169页；第4卷，第381页。这个村庄的名称也可以拼写为思纳（Sihnah，或Sihnah）。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8页。

[13] 哈散纳委王朝由哈散纳委于伊斯兰历350年（961年）建立，伊斯兰历406年（1015年）灭亡，共历五位统治者。其统治地区在曲儿忒思田南部乞里茫沙杭（即吉儿密辛）附近地区。克利福德·埃蒙德·博斯沃斯：《伊斯兰王朝新编：历史与王统手册》（*Clifford Edmund Bosworth*，*The New Islamic Dynasties*：*A Chronological And Genealogical Handbook*，*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7*），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58页。译者。

[14] 现在是克尔曼沙阿省比索通州的两个村子的名称。译者。

[15] 突哥里儿·别（Rukn ad-Dunya wa ad-Din Abu Talib Muhammad Toghrul-

Beg ibn Mikail），是塞尔柱王朝的国君主，1037～1083年在位。他在位时期，在其兄弟的协助下，塞尔柱王朝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译者。

[16]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17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6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9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8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520页。伊本·阿喜儿，第8卷，第518页；第9卷，第380页。据亚库特（第4卷第405页）记载，波斯文麻合（Māh）和阿拉伯文喀思八（Kasbah，即首府）含义等同。前缀“麻合”出现更早，以替代第纳瓦儿城（Dīnavar）与那哈完的（Nihāvand）。这个前缀词在古波斯语中写为麻达（Mada），并通过希腊人，以米底（Media）和米底思（Medes）的形式流传到今天。德·摩尔根（De Morgan）新近造访过第纳瓦儿城遗址，并在他的著作《出使波斯》（*Mission en Perse*）中做了描述（第2卷，第95、96页）。

[17] 今为萨南达季（Sanandaj），是伊朗库尔德斯坦的省会，人口37万，是座漂亮的山城，是从伊朗北上去往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等地的重要通道。至今这里生活着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非穆斯林民族，但主体民族为操突厥语的民族。译者。

[18] 今为撒赫拉祖尔（Sahrazur），是伊拉克基尔库克省东边的小城，距西北边的苏莱曼尼亚（Sulaymānīya）城约有70公里，曾是去往波斯的一条重要通道，今天有条连接伊朗和伊拉克的道路经过此地。译者。

[19] 此地在苏莱曼御座（Takht-e Soleymān）处，其在伊朗西阿塞拜疆省塔卡布（Takab）州州府塔卡布城以北不远，这里保留有很多波斯古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译者。

[20]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20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63、26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216、340页；第4卷，第988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66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7页。沙合剌祖儿（Shahrazūr）区至今还保留着这一名称。旧城位于叫作雅辛·塔帕（Yasīn Tappah）的遗址上。

[21]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萨尔波勒·扎哈布（Sarpol-e Zahab）所在地，此地为克尔曼沙阿省萨尔波勒·扎哈布州州府，人口3.4万。古代这里是重镇，是呼罗珊大道进入伊朗的第一站，地理位置重要。今天也是伊拉克与伊朗两国边境的要地。译者。

[22] 今为西克林德（Kerend-e Gharb）城，位于萨尔波勒·扎哈布城之东，是达拉胡（Dalahu）州的州府，人口7800，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23] 今此城名不存，应为萨尔波勒·扎哈布城之北不远的几个村镇中的一个。译者。

[24] 今此城名不存，也无法确定位置，应在西克林德城东边。译者。

[25] 今为哈鲁纳巴德，也称作西伊斯兰堡（Eslamabad-e Gharb），曾是呼罗珊道上的重要村庄，现在是伊朗克尔曼沙阿省西伊斯兰堡州州府所在地，人口8.9万，是伊朗与伊拉克往来的重要通道。译者。

[26] 今为麻黑达什特（Māhīdasht），这里现在已经开发为农业地区，还有与之同名的小镇，是克尔曼沙阿省麻黑达什特州的一个乡。译者。

[27] 今为哈尔辛，克尔曼沙阿省哈尔辛州州府哈尔率城所在地，人口5.1万，是伊朗东西交通的重镇。译者。

[28]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

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8、256、262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65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7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23、135、393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39、30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38、16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537页；第4卷，第382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450页。忽儿宛城遗址现在位于一个叫作“桥头”（Sar-i-Pul）的村庄，此处有一座桥横跨在一条河上。

[29] 塞尔柱王朝第十五代君主，1159～1161年在位，只是名誉上的统治者。译者。

[30] 今为巴哈尔，位于哈马丹省省会哈马丹城北，是巴哈尔州州府所在地，全州人口12万，辖3个区。译者。

[31] 伊利汗国第八代君主，1304～1316年在位。译者。

[32] 今此城不存，大致在克尔曼沙阿省比索通州州府比索通城之南的车黑尔（Chehr）村附近。译者。

[33] 在萨尔波勒·扎哈布（古代的忽儿宛）西边有小城哈屯纳（Khātūne），应是这座城的所在地，但需要进一步考察。译者。

[34] 今此城名不存，现为克尔曼沙阿省的同名州费鲁兹阿巴德（Firuzabad）区的一个小村。译者。

[35] 即石妇关。译者。

[36] 今不存。译者。

[37] 今为阿拉什塔尔（Aleshtar），是洛雷斯坦斯勒斯勒（Selseleh）州州府，人口7.7万，曾是往来伊拉克与波斯的重要通道。译者。

[38] 今不存。译者。

[39] 今不存。译者。

[40]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9、26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76页；第3卷，第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7、19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584、585、599、640页。不论是八哈儿、阿兰尼、忽夫乞阳和答儿必儿，还是两个打耳班（Darband），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均未提及。

[41] 哈马赞就是阿契美尼德石刻（Achemenian inscription）中的哈各马塔那（Hagmatāna），希腊文写为伊科巴塔纳。

[42] J（I）. H.，第256、26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91页。Ibn-al-Fakīh（伊本·阿勒·法吉赫），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五卷，第21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98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1、152页。土耳其语著作《世界志》（第300页）依据穆思套菲的记载，重述了这

些城区和村庄。

[43] 今为阿勒万德（Alvand），是伊朗、伊拉克境内扎格罗斯山脉的支脉，在哈马丹南10公里处。译者。

[44] 今为阿萨达巴德（Asadābād）城，是哈马丹省阿萨达巴德县县府，人口5.1万。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交通干道所经之地。译者。

[45]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6页。Ibn-al-Fakīh（伊本·阿勒·法吉赫），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五卷，第25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25、245页；第4卷，第110、733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36、31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2、202页。

[46]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哈马丹西北。译者。

[47]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5、51、38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316、40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2、217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01、305页。

[48] 今为马拉耶尔（Malāyer），是哈马丹省的一个州，在该省东南部。译者。

[49] 今为伊斯凡丹（Esfandan），是中央（Markazi）省克米建（Komijan）州的中央乡镇，人口1300，是由阿拉克去往伊朗北部的重要通道。译者。

[50] 此地名现已不存。译者。

[51] 今此名已不存，应该在哈马丹与纳哈万德之间。译者。

[52] 今为萨尔坎（Sarkān），是哈马丹省图伊萨尔坎（Tuyarkān）州州府图萨尔坎以北不远的城市，位于该省南部，人口4.5万，历史上是一条通往哈马丹城的重要通道。译者。

[53] 此城应是哈马丹省图伊萨尔坎（Tuyarkān）州州府图伊萨尔坎，人口4.2万，自古以来是重要通道。译者。

[54]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6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8、259、26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9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832页；第4卷，第251、82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2、153页。鲁札剌洼儿区的喀喇吉城遗址无疑在德·摩尔根（De Morgan）所著的《出使波斯》（*Mission en Perse*，第2卷，第136页）一书中记述过，书中称此地为鲁迪拉瓦尔（Rūdīlāvar）。

[55] 《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41页称："喀儿哈鲁（Karharūd）是亦剌可·阿贾木（`Irāk `Ajemī）的一座城市，阿拉伯人称作喀喇赫 [Karahh，即喀喇吉，h（ح）应是j（ج）的笔误，引者]。为了纪念，将其称作阿卜·都剌费·阿吉儿（Abū Delef Ajel）。"今为伊朗中央省的首府阿拉克（Arak），人口52.6万，是丝路重镇和交通要道。译者。

[56] 今为萨鲁格（Sārūq），是中央（Markazi）省法拉汗（Farahan）州萨鲁格（Sārūqi）区区府所在地，人口2100，是连接哈马丹和伊斯法罕两地的重要通道。译者。

[57] 今为博鲁杰尔德，是洛雷斯坦省省会，人口22.7万，是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通往伊斯法罕与伊朗西部、北部、东部的干道经过此地。译者。

[58] 今为布尔吉（Burj），是伊朗中央省沙赞德（Shazand）州中央区的一个村庄名。译者。

[59]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8、26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9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20、548页；第3卷，第873页；第4卷，第250、27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1、204页。

[60] 今为中央（Markazi）省法拉汗（Farahan）州萨鲁格（Sārūqi）区区府中心区的一个村庄，在阿克阔勒（Aq Gol）湖岸边。译者。

[61] 贾干·诺儿（Jaghan Naur），意为“白湖”。今此湖被称作阿克阔勒（Aq Gol），即白湖。译者。

[62] 此地名今已不存。译者。

[63] 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867、887页；第4卷，第68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1页。今天这个地区的首府为苏尔坦纳巴德（Sultānābād）城，现以织地毯而闻名。这个城市于19世纪初由法思·阿里·沙（Fath `Alī Shāh）修建。这座城市通常被称作沙合儿·瑙（Shahr-i-Naw，即新城）。

第十四章 吉八儿（Jibāl）地区（续）

小罗耳（Lur）地区。卜鲁吉儿（Burūjird）城。忽剌麻八（Khurramābād）城。沙普儿合瓦思（Shāpūrkhwāst）城。思剌万（Sīrawān）城和赛麻剌（Saymarah）城。亦思法杭（Isfahān）城及其所在的地区。费鲁赞（Fīrūzān）城；法里凡（Fārifān）城和赞答·鲁得（Zandah Rūd）河。阿儿底思田（Ardistān）城。柯伤（Kāshān）城。苦木（Kum）城、古儿派干（Gulpaygān）城和苦木（Kum）河。阿洼（Āvah）城和撒瓦（Sāvah）城。高麻哈（Gāvmāhā）河。

哈马丹地区之南为罗利支（Luristān）[1]地区，是曲儿忒人罗耳（Lur）[2]部落居住地，流经这个多山地区的河流将其分成两部分：南边的大罗耳（Lur）地区和北边的小罗耳（Lur）地区。小罗耳地区与大罗耳地区以喀伦（Kārūn）河干流上游为界，尽管有些文献将大罗耳地区纳入亦剌可·阿贾密（`Irāk `Ajamī）地区，但将大罗耳地区的各城市纳入忽兹思田地区的章节中加以叙述更合适一些。

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穆思套菲记载，小罗耳地区的主要城市有：卜鲁吉儿（Burūjird）、忽剌麻八（Khurramābād）[3]和沙普儿合瓦思（Shāpūrkhwāst）[4]等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伊本·豪喀尔称卜鲁吉儿城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城有半里格长，此地所产的各种水果外销到喀喇吉城，并盛产藏红花；前文提到的阿卜·都剌夫（Abu Dulaf）家族的宰臣（Wazīr）哈木剌（Hamūlah）就职后，该城的地位显要起来，并修建了聚礼清真寺。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穆思套菲说此城有新、旧两座清真寺，他还说该城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被毁。阿里·亚兹底常将此城的名称拼写为兀鲁吉儿（Vurūjird），他在记述帖木儿武功活动时常提及此城，还说帖木儿敕命修复了被称作喀剌·阿儿密阳（Kal`ah Armiyān）的城堡。[5]

自帖木儿时代起，小罗耳地区的各城市中除了卜鲁吉儿城外，忽剌麻八城是最重要的城市，但其名称未出现于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作里，因而有人常以为忽剌麻八城就是早期文献中常提及的沙普儿合瓦思城，但事实并非如此，因穆思套菲分别提到了这两座城市，而且他还

记述了沙普儿合瓦思城的位置。据穆思套菲记载，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忽刺麻八城是一座优美的城市，但部分已毁，这里盛产椰枣，他还说除了赛麻剌（Saymarah）城[6]外，这里是山区中唯一生长椰枣的地方，但这种说法仍不够确切。

阿拉伯地理学家将沙普儿合瓦思城之名写为撒卜儿合瓦思（Sābūrkhwāst），自伊本·豪喀尔时代起，这里就是以产椰枣而闻名的城市。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撒卜儿合瓦思城、卜鲁吉儿城和那哈完的城均受曲儿忒酋长哈散纳委的统辖，他以第纳瓦儿城作为其都城（见原文第189页），沙普儿合瓦思城的底兹八兹（Dizbaz）城堡的坚固程度可与萨儿麻吉（Sarmāj）城堡相媲美，这里储存着哈散纳委之子八底儿（Badr）的财物，该堡在伊斯兰历414年（1023年）落入白益王朝之手。撒卜儿合瓦思城常在叙述伊斯兰历5世纪（11 世纪）塞尔柱王朝活动的历史文献中被提及。伊斯兰历499年（1106年），阿塔别·满苦八儿思（Atabeg Mankūbars）占据该城，以及那哈完的城与力士塔儿（Līshtar，即Alīshtar）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据穆思套菲提供的资料［《历史精选》（*Guzīdah*）］，在他那个时期小罗耳地区有三座繁荣的城市，即卜鲁吉儿、忽刺麻八和沙普儿合洼思（Shāpūrkhwāst，这是他用波斯语形式拼写的）。据他记载，“最后一城，尽管曾是一座很繁华的大城，有不同民族的居民居住，是王国的都城，但现在已降格为地区性的城市”；有关其位置，他在记述中称，经过卜鲁吉儿城（南）的“道路（从那哈完的城到亦思法杭城的道路）分作两支：向右的分道，可通往沙普儿合瓦思城”，向左（向东）的干道，可到达喀喇吉·阿卜·都剌费城。他记载的这些细节与伊本·豪喀尔和穆喀达思的记载基本一致；伊本·豪喀尔称从那哈完的城（南）经10 里格就到达剌失塔儿（Lāshtar）城，再经12里格就到达撒卜儿合瓦思城，从此地再行30里格就到达（大）罗耳地区—这就是说其位于底兹夫儿（Dizful）城[7]北的平原上，这些内容将在后文的第十六章述及。穆喀达思还说从撒卜儿合瓦思城到喀喇吉·阿卜·都剌费城要行4天，撒卜儿合瓦思城到罗耳地区也是4天路程。[8]

小罗耳地区之西，靠近阿拉伯·亦剌可（Arabian`Irāk）边境就是麻萨八赞（Masābadhān）地区和密剌建苦札（Mihrajānkudhak）地区，其首府分别为思剌万（Sīrawān）城[9]和赛麻剌城。这两座城的遗址尚存，麻萨八赞是指麻亦答失（Māyidasht）平原以南的地区。据伊本·豪喀尔记载，思剌万（或As-Sīrawān）城是一座小城，像毛夕里城一样用

泥浆与石头建成。此地产热带和温带的各种水果，尤其产坚果和称作答思塔卜牙（Dastabūyah）的甜瓜；如前所述，这里的椰枣树很繁茂。可疾云尼提到在麻萨八赞地区有盐、硫磺、矾和硼砂等矿。向东约50英里的赛麻剌城很像思剌万城，但与思剌万城相比，这座城在更晚时期仍是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而且位置很好确定。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该城周边的密剌建苦札地区以有大片肥沃土地而著称；穆喀达思称该地区人口稠密。据亚库特记载，“这里盛产椰枣、橄榄和坚果，降雪也很多”，并称在从赛麻剌城去往附近一个叫达儿汗（Tarhān）的小村庄的道路上有一座神奇的桥梁，“是忽儿宛城与哈尼斤（Khānikīn）城之间桥梁的两倍”。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穆思套菲称赛麻剌城虽已被毁，但（看来）仍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其周边乡村的椰枣林很有名。[10]

在吉八儿地区东南角，距大沙漠边缘不远是亦思法杭城［Isfahān，阿拉伯人将该城拼写为亦思八寒（Isbahān），波斯人则拼写为亦思帕寒（Ispahān）］，这里很早以前就是重镇，[11]因其土地靠水源充足的札因答·鲁得（Zāyindah Rūd）河灌溉而很富庶。今天，亦思法杭城及其郊区位于札因答·鲁得河的两岸，但在中世纪时，其居民区只分布于该河的北岸（左岸）。邻近此城有两座城市，即东边为贾夷（Jay）城[12]，又称沙合里思塔纳（Shahristānah）城[13]，其城墙之上修有100座城楼；该城向西2英里就是竹忽底牙（Al-Yahūdīyah，即犹太）城，其规模是贾夷城的两倍，之所以得名“犹太城”，是因为根据传说，从尼布甲尼撒王时代起，犹太人就居住于此地。

据伊本·鲁斯塔记载，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末，贾夷城有半里格长，面积为2000贾里（Jarīb，约600英亩）[14]，有四座城门：八卜·豪儿（Bāb Khawr，或河流）门，又称为八卜·札林·鲁得（Bāb Zarīn Rūd）门，该名取自早先流经该地的河流；然后是八卜·阿思费吉（Bāb Asfīj）门、八卜·乞剌（Bāb Tirah）门和竹忽底牙（Yahūdīyah，即犹太）门。伊本·鲁斯塔还记述了城墙之上的每座城楼，他也记载了各城楼间的腕尺数（ell）。贾夷城有一座像城堡的古建筑，称作萨鲁（Sārūk），其名称与前文所述的哈马丹城的城堡相同。伊本·鲁斯塔称该城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洪水时期之前。后一个世纪（即10世纪），伊本·豪喀尔和穆喀达思均记载了贾夷城和竹忽底牙城。每座城各有一个供聚礼用的大清真寺，竹忽底牙城的规模和哈马丹城一样大，其为吉八儿地区除剌夷城外最大的城市。亦思法杭城也已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其

丝绸，尤其是阿塔必（`Attābī，即平纹织品）和棉花大量外销各地。该城周边的地区很适宜生长藏红花和各种水果，这一地区是整个吉八儿地区最富庶、最广袤的地方。[15]据穆喀达思记载，在尼布甲尼撒王时代，犹太人最初就居住在竹忽底牙（Al-Yahūdīyah）城[16]，因这里的气候和耶路撒冷的气候相似。他还说，该城有12座门（*Darb*），多半是用未烧制的土坯修建的，城里有露天市场和室内市场。大清真寺在其中的一个市场内，用圆柱建成，面向吉卜剌（Kiblah，即麦加方向）有一座宣礼塔（Minaret），高70腕尺。贾夷城之东毗邻的城市是穆喀达思所称的麦地那（Al-Madīnah）城，其含义相当于波斯语的沙合里思田纳（Shahristānah），即“城”，两城相距只有几英里。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该城南不远有座古城堡，此处的河上横跨着一座浮桥。

伊斯兰历444年（1052年），波斯旅行家纳思儿·忽思罗访问了亦思法杭城，并称该城是他见过的操波斯语地区中最大的城市。这里有200个钱庄和50家客栈；据说该城修建有一道周长3里格半的城墙，还有堞墙，沿其顶部有一条通道。大清真寺是一座恢宏的建筑，兑换钱钞的专门市场为一景，值得一看，其他很多市场有自己单独的大门。据亚库特记载，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竹忽底牙城和贾夷城已毁，但后来贾夷城又繁荣起来。他还说贾夷城的大清真寺是由哈里发满速儿·剌失德修建的。据历史文献记载，伊斯兰历530年（1136年），他被其叔父木哈莫·木可塔费（Muhammad Muktafi）废黜，后在战争中被杀，并埋葬在亦思法杭城的城门外。但竹忽底牙城在蒙古人西征后不久已大致恢复到以前的繁荣程度，据阿布·勒·费达记载，在伊斯兰历721年（1321年）时，这是一座繁华且人口稠密的城市，他还说由沙合里思田城向东1英里就是贾夷城旧址。

与阿布·勒·费达同时代的穆思套菲详细叙述了亦思法杭城及其所属地区，并提到了很多至今还存在的地名；其记载表明，中世纪的竹忽底牙城就是17世纪末夏尔丹（Chardin）所记载的亦思法杭城，当时其已成为沙·阿八思（Shāh `Abbās）所统治的波斯地区的首都，直到今天还可以看出其往日的辉煌。据穆思套菲记载，其城墙的周长有21000步，该城墙的历史可追溯至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它是由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下令修建的。亦思法杭地区先前有4个村庄，其名称保留在该城的城区名中，即喀兰[Karrān，据夏尔丹记载，喀兰（Karrān）门朝向东]、苦失可（Kūshk）、朱八剌（Jūbarah，据夏尔丹记载，此地是东区，朱八剌门朝向东北）和答儿失（Dardasht，以同名命名的城门

在北边，答儿失区位于该城门的西北）等。据穆思套菲记载，在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最繁华的区是朱儿八剌（Julbārah）区（夏尔丹所称的Gulbār区，位于现在的Maydān-i-Kuhnah附近，即旧广场），这里有一所学校和塞尔柱王朝算端木哈莫（Muhammad）的陵墓，这里还可以看到一块重10000满（Man，换算后约为32吨）的巨石，这是块巨大的崇拜物，是上述算端从印度运回来的，放置在学校的大门前。[17]

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攻占亦思法杭城后，将所占据的城堡命名为喀剌·塔八儿（Kal`ah Tabark，后一词在波斯语中意为“小丘”），该堡现已被毁，但遗址尚存，夏尔丹称，当时该城堡位于答儿失门外。从文献记载可知，伊斯兰历500年（1107年），塞尔柱王朝的灭里·沙修建了另一座坚固的城堡—“皇家堡”（Shāh-Diz），其位于靠近亦思法杭城的一座山顶上，可疾云尼还详细叙述了修建该堡的相关传说。伊斯兰历10世纪（16世纪）初，萨法维（Safav）王朝的沙·亦思麦儿（Shāh Ismāīl）[18]开始统治波斯，在该世纪末，沙·阿八思大帝将首都从阿儿答必儿城迁到亦思法杭城，同时他也将阿剌思河岸朱儿法（Julfah）城的所有阿剌蛮人迁移到了该城的新区，这个新区就是他在札因答·鲁得河的南岸（右岸）所建的城区。沙·阿八思还在河之北岸扩建了亦思法杭城的其他新城区和外城区，夏尔丹做了详细记述，17世纪下半叶他在这里居住了很多年。[19]

亦思法杭城周边有8个区，穆思套菲详细叙述了各区，以及至今存在的村庄。同样的区名也出现于雅忽比和伊斯兰历3至4世纪（9至10世纪）的其他早期文献中。其中4个区在河（札因答·鲁得河）之北，其他4个区在河之右岸（南岸）。北岸的第一个区是中心区，位于该城附近，称作贾夷区，是以东边的古城命名的。麻儿宾（Marbīn）区位于亦思法杭城的西边，这里有一座古袄教祠，为传说中的国王塔木剌思（Tahmurath），又称作“伏魔者”（Dīv Band）所建。距该城城门西北不远就是卜儿合洼儿（Burkhwār）区，这里最大的村庄是贾兹（Jaz，即现代的Gaz）村；此城的东北边为喀哈（Kahāb）区，是河之北岸的第四个区。在札因答·鲁得河之南岸，即沙合里思塔纳旧城的东南为八兰（Baraān）区；过了此区就是鲁答失（Rūdasht）区，其距该河南岸有段距离，这里的中心城为法里凡（Fārifān）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这是一座大城，靠近高·汗纳（Gāv-Khānah）大沼泽，但现在其只是一个村庄。喀剌里吉（Karārij）区在八兰区之南；此区的西边，在札因答·鲁得河右岸偏北是汗兰建（Khānlanjān）大区，是该河南岸的第

四个区，其主要城市为费鲁赞（Fīrūzān）城。此城的遗址显然没有保留下来，但据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的文献记载，该城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大城，其位于札因答·鲁得河岸边，伊本·白图泰曾经过此城，并说此城距亦思法杭城6里格。汗兰建区早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就因盛产水果和土地肥沃而闻名。其名称常写为汗兰建（Khānlanjān或Khūlanjān，也称作Khān-al-Abrār，即天赐的商队旅馆）。至于汗兰建（Khānlanjān）城，无疑就是前文所说的费鲁赞城，据道里志记载，这里是从亦思法杭城向南通向昔剌思城的西道的第一站。伊斯兰5世纪（11世纪）时，纳思儿·忽思罗到亦思法杭城时曾路过汗兰建城，并注意到其城门之上有一刻有塞尔柱王朝突哥里儿·别（Tughril Beg）的名字的铭牌。[20]

亦思法杭（Isfahān）河的干流现在一般被称作赞答·鲁得（Zandah Rūd）河，在各文献中将其称作札因答·鲁得（Zāyindah Rūd，或Zarīn-Rūdh）河[21]，但后一个名称现在一般用来称呼该河的一条支流。此河上游干流称作朱亦·萨儿得（Jūy-Sard）河，即冷河，其发源于赞答·苦合山（Zardah-Kūh，即黄山），该山由黄色石灰岩构成，位于亦思法杭城西30里格，距忽兹思田地区的都加伊勒河（或喀伦河）的源头不远；据穆思套菲记载，这里有阿失喀兰（Ashkahrān）山脉，是与大罗耳地区的分界线。在汗兰建地区的费鲁赞城南，赞答·鲁得河接纳了一条与干流流量差不多的支流。这条支流发源于古儿派干（Gulpaygān，即Jurbādhakān）城[22]附近；赞答·鲁得河流经亦思法杭城，并灌溉着该城辖下的8个区。此河流经东边的鲁答失（Rūdasht）城[23]，最后流入位于大沙漠边缘的高·汗纳沼泽。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称，人们普遍认为该河渗入沼泽下面，而后在90里格之外的起儿漫（Kirmān）城重新流出地面，再流入波斯湾；但穆思套菲显然不相信这种说法，因在亦思法杭城和起儿漫城之间有高山峻岭，他还称尽管传说将几片芦苇扔进高·汗纳沼泽，芦苇会重新出现在起儿漫城，“但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24]纳因（Nāyin）城[25]在高·汗纳沼泽之北的大沙漠边缘，该城和向东南去往亚兹得（Yazd）城道路上的所有城市在中世纪时均归入法儿思（Fārs）地区，这将在本书的第十八章进行叙述，但纳因城西北数英里外的阿儿底思田（Ardistān）城[26]则属于吉八儿地区。早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斯塔赫里就说阿儿底思田城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长1英里，有5座城门，城墙坚固。聚礼清真寺位于城市中心，此地盛产丝，是其外销的主要产品。阿儿底思田城东北的祖洼剌（Zuvārah）[27]有一些属于公正的阿奴设里万国王时期的古代遗迹。穆

喀达思还称阿儿底思田地区的土质是白色的，“像面粉，阿儿（*Ard*）在波斯语中的含义为‘饭’”，那么阿儿底思田之意应是“像面粉一样的地方”。亚库特将这一遗址称作兀兹洼剌（Uzvārah），并称这里有很多拱形建筑和一座祆教祠的遗址，在遗址上修建有阿儿底思田城的城堡，据说这里是阿奴设里万国王的出生地。但穆思套菲将此遗址称作祖洼剌，并说包括祆教祠在内的所有建筑是亦思凡底牙儿（Isfandiyār）之子八赫满（Bahmān）国王时期建造的；文献记载阿儿底思田城靠近沙漠，其附近有30个村庄，穆斯林传述中称这些村庄为勇士鲁思坦（Rustam）之弟答思坦（Dastan）所建。

在阿儿底思田城与柯伤（Kāshān）城[28]之间的沙漠边缘是喀儿噶思·苦合（Kargas Kūh）山（即秃鹫山），穆喀达思称该山是波斯大沙漠[29]地区的最高山。其附近为思牙·苦合（Siyāh Kūh）山（即黑山），和秃鹫山差不多一样高，很陡峭，又称“黑色丑陋山”；伊斯塔赫里称这两座山是有名的盗匪藏身之地。秃鹫山的一条山谷里有一股甘冽的泉水，被称作阿卜·班答（Āb-i-Bandah），是从岩石缝隙中奔涌出的。喀儿噶思·苦合山和思牙·苦合山之间的沙漠道路上，有一个叫答亦儿·吉思（Dayr-al-Jiss，即石膏女修道院）的商队客栈，这个客栈完全用砖建成，很坚固，还建有铁门。据伊斯塔赫里记载，客栈里可以找到穿越沙漠道路的向导，这些人是奉算端的敕命居住在这里的。此地还建有储藏水的大池子，穆喀达思称这些储水池里常储备着水，在客栈附近的商店里出售各种食品。穆思套菲称喀儿噶思·苦合山 是座孤山，不与其他山脉相连，其周长约10里格。在山上的岩石间筑有秃鹫筑的巢，这里还栖息着大量不需要水就可以生存很久的朱鹭（*wa`l*）。阿儿底思田城之西是纳坦兹（Natanz，或Natanzah）城[30]，在亚库特以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未提及此城。穆思套菲称该城的城堡叫作瓦沙（Washāk），这座城堡最初称作喀马尔（Kamart），但后来以纳坦兹城的一位总督瓦沙（Washāk）之名命名。靠近纳坦兹城还有一个叫塔儿（Tark）的大村庄，亚库特说该村差不多像一座城市。据可疾云尼记载，这里因人们用象牙和乌木雕刻精美的工艺碗而名闻天下；这些工艺品多数用于外销。[31]

伊斯塔赫里称柯伤城是“一座惬意的城市，像苦木（Kum）城，是用粘土建造的”。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将其拼写为柯伤（Kāshān，带点的k）。此地以生产琉璃瓦而闻名于整个东部地区，于是这种瓦冠以喀失［Kāshī，是柯伤尼（Kāshānī）的简称］之名，直到今天人们还常

以该名来称呼著名的蓝绿琉璃瓦，并广泛使用这种瓦来装饰清真寺。据穆喀达思记载，柯伤城反倒以制造弩炮而闻名；亚库特提到了用喀失琉璃制作的精美绿碗，在他那个时代大量外销；他还说这里的居民都属于狂热的什叶派依麻木（Imām）支派[32]。穆思套菲称柯伤城最初为诃论·剌失德的皇后祖拜答所建；他还盛赞柯伤城附近的费因（Fīn）宫，该宫的水池和曲流的水来源于苦合鲁（Kuhrūd）河。夏季，柯伤（Kāshān）河在流到柯伤城前就已干涸，春季的洪水则常对该城造成威胁，洪水在流经此城后便消失在附近的沙漠里。

苦木（Kum，在阿拉伯正字法中正确的拼写应为Kumm）城[33]，位于柯伤城之北，现在该地以有什叶派的圣墓而闻名，据说这座圣墓就是第六代依麻木阿里·里扎（Imām `Alī-ar-Ridā）[34]之妹法蒂玛（Fātimah）的墓[35]，她和诃论·剌失德是同时代的人，按照什叶派的说法，法蒂玛准备到呼罗珊与其兄会面，但在途经苦木城时被毒杀。伊斯兰历4世纪时，伊本·豪喀尔称这里已是什叶派人聚居地；他说这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其周边有繁盛的果园，以产阿月浑果仁和榛子而闻名。据亚库特记载，苦木城的古名为苦满丹（Kumandān），阿拉伯人简称为苦木（Kumm）。亚库特说，在该城的废墟中还可以看到一座波斯城堡的遗迹，一座古石桥横跨在这里的河上，这条河将穆斯林所建的城市和城市旧址分开。穆思套菲称苦木城的城墙周长为10000步，此地和阿洼（Āvah）城[36]一样，以修建有很多冰窖而闻名，也以柏树和产红葡萄的葡萄园而知名。据穆思套菲记载，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苦木城绝大部分已毁，尽管文献记载这里是什叶派人聚居之地，但穆思套菲和早期的著述者均未提到法蒂玛之墓。[37]

苦木（Kum）河[38]发源于穆思套菲所记载的汗萨儿（Khānsār）山脉附近的古儿派干地区，这条山脉是苦木河与前文提到的亦思法杭河左岸支流的分水岭。朱儿八札坎（Jurbādhakān）是阿拉伯人对古儿派干地区的称呼，其较古的拼写形式为古儿八亦干（Gurbayigān），穆思套菲将此名称的含义解释为“玫瑰地”，并写作古儿·阿八·坎（*Gul-ābād-ikān*），他盛赞这里的富庶和水的甘洌，还记载了附近的50个村庄。穆喀达思称朱儿八札坎城位于喀喇吉·阿卜·都剌费城和亦思法杭城中间，亚库特用朱儿八札坎城附近的汗萨儿（Khānsār）村之名来称呼该区。答里建（Dalījān）城[39]位于苦木河更南的地方；亚库特称该城名应拼写为都来建（Dulayjān，或Dulaygān）。以前，这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但穆思套菲说当时此城已毁。经过苦木城后，苦木河汇入发源于哈马丹地

区的高麻哈（Gāvmāhā，或Gāvmāsā）河中，高麻哈河本身在苦木城稍北，从右岸接纳了阿洼（Āvah）河河水，从左岸接纳了撒瓦（Sāvah）河[40]河水。所有这些河流分成了许多河道和纵横交错的运河，最终消失在苦木城东北的大沙漠中。

阿洼城[41]［为了与哈马丹城附近的阿洼城相区别，这座阿洼城被称为阿洼·撒瓦（Āvah-i-Sāvah），见原文第196页］位于苦木城之西不远。阿洼河发源于塔夫里失（Tafrīsh）区，据穆思套菲记载，该区是一个“四面只有一条通道”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还有很多村庄。穆喀达思曾提到过阿洼城，并称其为阿洼（Āva或Āvah-i-Ray）；据亚库特记载，这是一个村庄或一座小城，并记其名为阿八（Ābah），还说这里的居民是狂热的什叶派信徒。据穆思套菲记载，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阿洼城修建有周长为1000步的城墙，城里的冰窖很有名，因在炎热的夏季需大量冰块来消暑，但这里的面饼很糟糕。他还说在阿洼城与苦木城之间有一座叫苦合·纳麻·劳恩（Kūh Namak Lawn，即盐山）的孤山，这里的土和盐混合在一起。人们无法登上该山的山顶，因该山的表层太松软；山上没有积雪，这里的盐太苦，人不能食用。该山周长为3里格，其山顶较高，在10里格开外就能看到。[42]

撒瓦（Sāvah）城[43]位于哈马丹城和剌夷城之间横穿波斯的商队大道（呼罗珊道）的中途，早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里就是一座重镇，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当时此地以骆驼和骆驼客而闻名，这两者是经该地的朝觐者和旅行者所大量需求的。穆喀达思还说该城有城墙，还有很好的澡堂，聚礼清真寺靠近大道，距离市场不远。撒瓦城的居民是逊尼派（Sunnī），据亚库特记载，在他那个时代该城居民与附近的阿洼城什叶派信徒长期交恶。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撒瓦城遭到了蒙古人的严重破坏，其居民惨遭屠戮，大图书馆等建筑被焚毁，亚库特见过此图书馆，他称在整个波斯的亦剌可地区没有这么大的图书馆。可疾云尼也提到了这座图书馆，他说该图书馆设在大清真寺内，除藏有各学科的图书外，还有一套研究天文学的星盘和浑天仪。城里有一家医院、多所学校和多家客栈；在清真寺大门处有一个巨大的拱形建筑，并让人想到泰西封（即马达因）城中萨珊王修建的拱形建筑。

在穆斯林传说中，撒瓦城曾以大湖而闻名，据传该湖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就已存在，恰在先知穆罕默德降生的那天晚上突然变干了；据穆思套菲记载，“这里的水一听到喜讯，就欢快地流到地下去了”。他还说在

他那个时代撒瓦城的城墙刚用砖重修过，其周长为6200腕尺。撒瓦城西4里格处是先知萨默儿（Samuel）的圣墓，据穆思套菲记载，当时此城居民几乎全是什叶派信徒。他还提到了该城周边很多村庄的名称，还说整个地区盛产粮食、棉花和石榴等。

撒瓦河也称作木兹答坎（Muzdakān）河，是以该河岸边的同名城市命名的。这条河发源于萨曼（Sāmān）村[44]附近，这是靠近哈马丹地区的哈剌坎区边界上的一个大村庄（见原文第196页），此村位于肥沃地区，产粮食和葡萄。该河（木兹答坎河）从萨曼村流到木兹答坎（Muzdakān，也拼写为Musdakān）城[45]，据穆思套菲记载，该城周长为3000步，位于山区，这里气候寒冷。亚库特提到了木兹答坎城附近的一座著名卢八（Rubāt，卫所或修道堂），这里有很多苏非（Sūfī）信徒居住；此城距横穿波斯的大商道有一站之地。据穆思套菲记载，木兹答坎河流经撒瓦城后，分成两支：一部分水渗入地下的一个大深坑，大部分水则汇入高麻哈河。

穆思套菲详尽记载了高麻哈（有些抄本中将其名书写为Gāvmāsā）河，这条河的一部分现在称作喀喇·速河（Kārā Sū，即黑河）。如前文所述，该河的源头在哈马丹平原，那里的水流源自阿萨八答（Asabādād）城、阿儿宛（Alvand）山和法利瓦儿（Farīvār）区。高麻哈河起初向北流，然后向东急转，并从南边接纳了一条发源于喀喇吉·阿卜·都剌费城附近的大支流。高麻哈河经过撒瓦城与阿洼城后，又接纳了前文已述的两条支流，此处建有一座拦河大坝，在夏季干旱之时，截流河水用于灌溉。高麻哈河最终和发源于古儿派干地区的苦木河汇合，穆思套菲说该河多余的河水流经一个叫哈夫塔·普兰（Haftād Pulān，即80座桥）的地方后，消失于大沙漠中。穆思套菲说高麻哈河对其所在区的重要程度如同赞答·鲁得河对亦思法杭城一样，该河是这一地区富裕和繁荣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都未提到这条河。[46]

[1]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新唐书·波斯传》作罗利支。今为洛雷斯坦（Loristan），是伊朗西部省份，首府在霍拉马巴德（Khurramābād），全省人口171万。是丝路要道。译者。

[2]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译者。

[3] 即霍拉马巴德（Khurramābād）。译者。

[4] 此城今不存，应在霍拉马巴德城附近。译者。

[5]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8、26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96页；第2卷，第737页。Mustawfi（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1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587页；第2卷，第515页。

[6] 今此城已毁，城址在今伊拉姆（Ilam）省达勒赫·沙赫尔（Darreh Shahr）州州府达勒赫·沙赫尔城西南。是古代波斯与伊拉克之间的重要通道。译者。

[7] 今为迪兹富勒，是胡齐斯坦省北部迪兹富勒州州府所在地，人口42万，是波斯西南通往波斯湾与伊拉克的重要城市。译者。

[8]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9、26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0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72页；第3卷，第4、82、225页。Mustawfi（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7、191页。伊本·阿喜儿，第9卷，第174页；第10卷，第274页。Mustawfi（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

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1、195页。也见《历史精选》（*Guzīdah*，Gantin）第1卷第622页和抄本159b叶面，就在记述蒙古前的第4章第9节末一段记载了小罗耳的内容。沙普儿合瓦思之名有撒卜儿合瓦思、萨普儿合洼思（Shāburkhwast）等不同写法。该城遗址的确切位置已无法确定。

[9] 今此城已不存，但这个地名还存在，是伊拉姆省东部的斯尔万（Sirvan）州的州名。译者。

[10]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63、26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94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69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7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443、52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1页。

[11]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57页称：“伊斯法罕（亦思法杭）城是一座宽大而美丽的城池，但现在已大部分颓败。因为当地的正统派与腊非祖（Rāfiz）派之间的屡次变乱所致，此种变乱至今尚未平息。”“此地水果甚多。”译者。

[12] 此城现在是伊斯法罕城东部的街区。译者。

[13] 沙合里思田（Shahristān），或沙合里思塔纳（Shahristānah），波斯语的含义为“城市”，是首都（或首府）惯常用的一种名称。

[14] 贾里（Jarīb）一般为容量单位，通常为16、26、29.5公升，蒙古统治波斯时期为130公升；贾里也可作面积单位，1贾里约1592平方米，但不同地区大小各有不

同。译者。

[15] 《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trans by C. E. Bosworth，the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1968）第128页说：亦思法杭“以清新的空气而闻名，这里土地肥沃，水质甘美，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可与之媲美。”该书还提到锑矿、蜂蜜、藏红花、蜡等产品。译者。

[16] 此城现在是伊斯法罕城西部的城区。译者。

[17] 但历史文献没有记载算端木哈莫［他于伊斯兰历498～511年在位（1104～1117年），是灭里·沙之子］征服过印度。穆思套菲很可能将此人与哥疾宁王朝的马合木（Mahmūd）混淆了。

[18] 也译为伊斯玛仪，他是萨法维王朝的开国君主，在位时间为1501～1524年，也称伊斯玛仪一世。译者。

[19]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60、16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6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86、387、388、389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9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95页；第2卷，第181页；第3卷，第246页；第4卷，第452、1045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1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

本，第1卷，第431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65页。关于亦思法杭的记载见《夏尔丹先生波斯行记》（*Voyages du Chevlier Chardin en Perse*，阿姆斯特丹，1771年）第3卷（尤其是第122、126、147、153、212、227、229页，以及相关的段落）。有关现代的伊斯法罕（Isfahān）的记述见豪特曼·辛德勒（Houtum-Schindler）所著的《东波斯亦剌可（*Eastern Persian `Irāk*）》一书中的第18、19、120、122页。

[20]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0、58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52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01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7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89、45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94页；第2卷，第394页；第3卷，第83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3页，其绝大部分内容抄录在*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291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42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92页。汗兰建（Khānlanjān）城因是菲尔多西（Firdūsī）的避难地而闻名，当时他因哥疾宁王朝的马合木震怒而逃离。汗兰建总督接纳他的记载内容保存于大英博物馆藏《列王纪》抄本（东方文献编号：1403，518a叶面）中。该文献内容和译文收录在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的纳思儿·忽思罗著作（附录第4卷，第298页）。

[21] 今此河被称作扎因代（Zāyandé-Rūd 或Zāyanderūd）河，发源于扎格罗斯山脉，逶迤400公里，穿过伊斯法罕城，最后消失在此城东南的盐湖中，近年由于干旱、上游开发等，已完全断流。译者。

[22] 今为戈勒派耶甘（Gulpaygān），是伊斯法罕省戈勒派耶甘州的州府，人口4.7万，是通往哈马丹和德黑兰、伊斯法罕等地的要道。译者。

[23] 今为伊斯法罕省鲁达什特州的一个村子，在伊斯法罕城东边扎因代河入盐湖处的北边，人口500。译者。

[24]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52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01、202、214页。

[25] 今为纳因（Nā'īn），是伊斯法罕省纳因州州府，人口2.4万，是通往库姆、伊斯法罕、亚兹德、东边沙漠诸城等地的枢纽。译者。

[26] 今为阿尔迪斯坦（Ardistān），是伊斯法罕省阿尔迪斯坦州州府，人口1.4万，是通往库姆、纳因、伊斯法罕等地的要道。译者。

[27] 此地名存在至今，是阿尔迪斯坦城以北不远的小城。译者。

[28]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称为卡尚，是伊斯法罕省卡尚州州府，人口24万，通往库姆、德黑兰、伊斯法罕等地的干道经过此地。译者。

[29]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80页提到了“大沙漠”，并载：“这个沙漠被称作喀儿噶思·苦合（Kargas Kūh）沙漠，因其西边有座叫喀儿噶思·苦合山的小山而得名。”译者。

[30] 今为纳坦兹，是伊斯法罕省纳坦兹州州府所在地，人口1.2万，通往德黑兰和

伊斯法罕的干道经过此地。这里产的梨很有名，也是伊朗核设施的所在地之一。译者。

[3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02、228、230、23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88～29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90、490、49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98页；第3卷，第531页；第4卷第79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0、151、206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299页。

[32] 这里主要是指十二依麻木派，译者。

[33] 今为库姆，是库姆省省会，人口107万，是伊朗最大的什叶派圣城和学术中心，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什叶派信徒到这里朝拜，其位于德黑兰以南125公里的库姆河岸边，是通往德黑兰和伊朗南部的重要通道。译者。

[34] 什叶派第八代依麻木，生活于766～813年。译者。

[35] 库姆以有此墓而在什叶派中享有盛名，也成为什叶派的朝拜和学术圣地，该城最有名的学术中心就是库姆神学院。译者。

[36] 即今阿韦季（Avaj或Āvah），位于伊朗中央省萨韦（Sāveh）州西南，靠近库姆西北的边界村子，人口3500，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0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6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

三卷，第39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15、17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0、217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05页。

[38] 今为库姆（Qum）河，全长400公里，发源于扎格罗斯山脉，向东北流，经过库姆，最后汇入纳克湖。译者。

[39] 今为代利詹（Dalījān），为伊朗中央省代利詹州州府所在地，人口3.1万。通往德黑兰、库姆、伊斯法罕、卡尚、阿拉克等地的干道经过此地，其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40] 这些河流汇合后今被称作卡拉河（Qara cay），即黑水河，发源于扎格罗斯山脉北坡，向东流，最后汇入库姆河，全长约200公里。译者。

[41] 《马可波罗行纪》第31章第47页提到了阿洼城和萨洼城。译者。

[4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95、19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5、51、257、386、40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7页；第2卷，第46、392、58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7、150、206、216页。

[43]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为萨韦，为伊朗中央省萨韦州州府所在

地，人口26万。古丝绸之路干道经过此地，其可通往德黑兰、哈马丹、伊斯法罕、卡尚、库姆等地。译者。

[44] 今此名不存，是萨韦州的一个小村庄。译者。

[45] 今此名不存，应在萨韦州瑙巴兰（Nawbaran）附近。译者。

[46]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9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24页；第4卷，第520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5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8、149、152、217页。高麻哈河（Gāvāmhā）堤坝是由苫思丁（Shams-ad-Dīn）修建的，他是旭烈兀（Hūlāgū）之子波斯伊利汗国第三任统治者阿合马（Ahmad）的宰相（Sāhib-Dīvān）。

第十五章 吉八儿（Jibāl）地区（续）

刺夷（Ray）城。瓦剌敏（Varāmīn）城和德黑兰（Tihrān）城。可疾云（Kazvīn）城和阿剌模忒（Alamūt）堡。赞章（Zanjān）城。孙丹尼牙（Sultānīyah）城。失兹（Shīz）或萨图里（Satūrīk）城。忽纳吉（Khūnaj）城。塔里寒（Tālikān）地区和塔鲁迷（Tārum）地区。沙密兰（Shamīrān）堡。吉八儿（Jibāl）地区的物产和贸易。通往吉八儿（Jibāl）地区、阿札拜占（Adharbāyjān）以及西北边疆各地区的各道。

刺夷（Ray）城位于吉八儿地区的西北角，其正确拼写形式为刺夷（Rayy），阿拉伯地理学家常拼写为带有冠词的刺夷（Ar-Rayy），该地名用希腊语书写为刺戈斯（Rhages）[1]。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刺夷城已成为吉八儿地区四大首府之首；据伊本·豪喀尔记载，“除了报达城外，实际上，在整个东部地区该城（刺夷城）是最好的。尽管呼罗珊地区的乃萨卜儿（Naysābūr）城的规模要大一些”，但刺夷城在那个时期面积有1.5平方里格。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统治时期，刺夷城的正式名称叫木哈马底牙（Muhammadīyah）城，取自木哈马（Muhammad）之名，他就是后来的哈里发马赫迪（Mahdī），其父满速儿在位时期他就居住在该城，并对该城进行了重建。马赫迪之子诃论·刺失德就出生于刺夷城，因此刺夷城的正式名称为木哈马底牙城，是吉八儿地区主要的造币城，其名称在阿拔斯王朝的各种钱币中出现过多次。

刺夷城的民居尽管多数是用土夯的，但也使用了大量砖块。该城特别坚固，伊本·豪喀尔提到了该城的五座城门：八塔拱形（Bātāk，西南）门，朝向报达道；八卜·八利三（Bāb Balīsān，西北）门，朝向可疾云（Kazvīn）城；八卜·苦哈（Bāb Kūhak，东北）门，朝向陀拔思单；八卜·喜苫（Bāb Hishām，东）门，朝向呼罗珊道；八卜·欣（Bāb Sīn，南）门，朝向苦木城。城里的市场均在上述城门附近与外边，人们最常去的城区是萨儿班安（Sārbānān）城区和鲁札（Ar-Rūdhah）城区，这些城区的商店和铺面沿着繁华大街的两旁绵延很长的距离，其中的商品琳琅满目。据伊本·豪喀尔记载，有两条河流流经刺夷城：一条是流经鲁

札区的速儿喀纳（Sūrkanā）河；另一条是流经萨儿八南区的歧兰尼（Al-Jīlānī）河。亚库特提到了纳赫儿·木萨（Nahr Mūsā）河（即木萨河），其发源于低廉山区，因此该河应是前文提及的歧兰尼河或歧兰（Gīlān）河[2]。穆喀达思提到了剌夷城的两座大型建筑：一为达儿·八乞合（Dār-al-Battīkh），即所谓的“西瓜棚”，其通常是指该城的水果市场；另一个为达儿·苦士卜（Dār-al-Kuttub），即所谓的“图书馆”，位于鲁札区南的一家客栈（Khān）里，但他称这里没有多少书籍。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伊本·豪喀尔和穆喀达思均称剌夷城大部分已毁，主街在旧城的外城区。高于清真寺的是哈里发马赫迪于伊斯兰历158年（775年）命人修建的一座城堡，其位于一座陡峭的山上，伊本·鲁斯塔称，“从山顶可以俯瞰剌夷城的各个角落”。亚库特对剌夷城的记载不十分清晰，但其著作的有些内容引用了一部古地理学文献对该城的记载，该文献记载剌夷城的内城有清真寺和总督府，其外围是一条护城河，内城区一般称作麦地那（Al-Madīnah），即“城”区；外城有时特指木哈马底牙城，此城区最初有一道城墙。外城修建于一座山顶上，并可以俯瞰“下城”（内城），据亚库特所引的文献，该城的城堡称作祖拜底牙（Az-Zubaydīyah，有些抄本将其名称作Az-Zaybandī），这里曾是马赫迪王子在剌夷城居住时的宫殿，但后来这里改成了监狱，并在伊斯兰历278年（891年）重建。此外，在剌夷城还有一座城堡，叫喀剌·法鲁汗（Kal`ah-al-Farrukhān），也称作亭榭（Al-Jawsak），但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白益王朝君主法赫儿·道剌（Fakhr-ad-Dawlah）并不喜欢山顶上的旧宫殿，于是他让人在自己的花园里修建了一座大宫殿，后将此地称作法赫儿八（Fakhrābād）城。[3]

早期剌夷城周边有很多富庶的地区，其中最著名的地方如下：鲁札（Rūdhah，或Ar-Rūdhah）城[4]及城外同名的一个大村庄；瓦剌敏（Varāmīn）城[5]，该城后来取代剌夷城成为吉八儿地区这部分区域的首府；帕沙委牙（Pashāviyah）城[6]，现在该地称作法沙委牙（Fashāviyah）；最后为苦欣（Kūsīn）城[7]和喀思兰（Al-Kasrān）地区的底札（Dīzah）城[8]等。叫作“两座宫”的底札城有内外之分，这是两大村或城名的合称，即底札·喀思兰（Dīzah-i-Karsran）和底札·瓦剌敏（Dīzah-i-Varāmīn），这里距剌夷城有一天的路程。据伊本·豪喀尔记载，上述村庄及他所提到的其他村庄的规模像小城一样，每个村庄有10000余口[9]。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剌夷城被蒙古军队攻破后遭到洗劫，并被烧毁，遭此大劫后，再也未恢复起来。就在这一时期，

亚库特经过该城，并称其城墙完好，但绝大部分民居已毁。这里的民居最初多数由砖块建成，墙面用蓝色釉瓷瓦装饰，亚库特称，其面“光滑如上釉的碗面”；沙费伊（Shāfi`iyya）派[10]居住的城区是该城最小的城区，只有该区躲过了蒙古人的洗劫，罕伯里（Hanbaliyya）派和什叶派居住的城区完全被毁。[11]

依照上述记载来看，剌夷城完全被毁，穆思套菲称蒙古统治者合赞汗（Ghāzān Khān）传谕试图修复剌夷城，并敕令要重建城市，恢复人口。但此意图未果，因这里的居民已迁到附近的瓦剌敏城和德黑兰（Tihrān）城，尤其是迁到前一座城的居民更多。瓦剌敏城的气候要比剌夷旧城更宜人，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此城已成为该地区最繁华的城市。瓦剌敏城遗址距剌夷城南不远，穆思套菲称瓦剌敏城北面是塔巴里（Tabarik）山，并否定前文提及的那座城堡是哈里发马赫迪命人所建的说法，他还称这里有一座国家从中获利颇丰的银矿。据札黑儿丁（Zahīr-ad-Dīn）的编年史记载，塔巴里城堡是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初由兹牙儿（Ziyār）王朝[12]的麻奴查哈儿（Mamūchahr）建造的。亚库特说该城堡在伊斯兰历588年（1192年）毁于亦剌可地区塞尔柱王朝最后一位算端土哥里儿（Tughril）二世之手，他详细叙述了这一著名关隘被围攻的情况。他还说塔巴里山位于由剌夷城起程的呼罗珊道的右边；剌夷（Ray）山（有人以为在此山上有哈里发马赫迪所建城堡的遗迹）位于从该城（剌夷）城门起程的道路的左边。据穆思套菲记载，依麻木扎达·阿卜得·阿兹木（Zādah Abd-al-`Azīm）的陵墓靠近剌夷城，这个殉教者（Mashhad）的圣墓是现代德黑兰城最有名的圣地；这位圣徒是一位叫忽辛（Husayn）的人，他是第八代依麻木—阿里·里扎（`Alī-ar-Ridā）之子。

剌夷城附近著名的地区中有一个叫作沙合里牙儿（Shahriyār）地区，穆思套菲不经意间提到了位于剌夷城之北，与该地区同名的一座城堡（Kal`ah）。该城堡看来颇为重要，因阿里·亚兹底在帖木儿的武功活动时，将剌夷城记为沙合里牙儿（Shahriyār，或Ray-Shahriyār）城。如前文所述，瓦剌敏城是当时居民的主要聚居区，但在伊斯兰历9世纪（15世纪）初已毁。后德黑兰城取代该城，但据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的文献记载，德黑兰只是剌夷城下辖的最大村庄之一。早期的德黑兰（也用清辅音t拼写为Tihrān）城有很多半地穴式的住宅，据可疾云尼记载，“像跳鼠洞”，这里的12个行政区的居民常发生冲突，相互攻击。据穆思套菲记载，14世纪时，德黑兰城是座中型城市，但该城后来，即

伊斯兰历12世纪（18世纪）末，被喀贾儿（Kajar）王朝[13]的建立者阿喀·木哈马·沙（Ākā Muhammad Shāh）[14]定为波斯的首都。[15]

该地区河流里的河水流经位于平原上的剌夷城、瓦剌敏城和德黑兰城后，流进附近的大沙漠里便消失了。这里的主要河流之一就是前文提到的纳赫儿·木萨河，该河岸边有很多村庄；穆思套菲还提到了喀喇吉（Karaj）河，其上横跨着一座叫普儿·可敦（Pul-i-Khātūn，即皇后桥）的单孔桥，据说这样称呼是为了纪念诃论·剌失德的妻子—祖拜答皇后。该桥的遗址尚存于距德黑兰城不远的地方。可疾云尼还提到了纳赫儿·速林（Nahr Sūrīn）河，并说剌夷城的什叶派信徒会小心翼翼地绕开此河，因被杀的第四代依麻木—阿里·载因·阿必丁（`Alī Zayn-al-`Ābidīn）[16]之孙哈合牙（Yahyā）的尸体曾在此河中净浴，这样该河就永久地成为禁水。据穆思套菲记载，剌夷城的主要河流为贾亦吉·鲁得（Jāyij Rūd）河[17]，其发源于秃马温（Damāvand）城附近的贾亦吉（Jāyij）山脉，流经剌夷（Ray）平原时分成40条支河。

剌夷平原的西边与速吉·不剌噶（Sāūj Bulāgh，突厥语意为“冷泉”）地区接壤，据穆思套菲记载，这一地区在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是一处重地。蒙古人统治时期，该地区每年上缴的财税达12000迪纳，其首府是孙苦儿八（Sunkurābād，至今仍然存在）城，其下附属有众多的村庄，穆思套菲在道里志中称该城是一处重要的驿站。速吉·不剌噶地区靠噶木·鲁得（Garm Rūd）河[18]灌溉，该河发源于可疾云城东边的山脉，也灌溉着剌夷城和沙合里牙儿城所在的两个地区，噶木·鲁得河在到达这两个地区之前还接纳了很多发源于北部山区的支流，灌溉后剩下的河水流入大沙漠。[19]

可疾云（Kazvīn，也称Kazwīn）城[20]在德黑兰城西北100多英里处，坐落于大山脉的山脚下，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重镇，并守卫着经陀拔思单地区到里海沿岸地区的关隘。（该城）西北部的山区在较早时期是低廉地区（这在第十二章已做叙述）的一部分，这一地区有一段时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不受阿拔斯王朝的节制。此时，可疾云城成为攻打这些桀骜不驯的异教徒的重镇，有穆斯林重兵把守。早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哈贾吉（他后来成为阿拉伯亦剌可地区的著名总督）之子木哈马（Muhammad）被其父派到此城，并统率着一支军队来对付低廉山区的异教徒。木哈马驻扎于可疾云城，并在此建立了第一座聚礼清真寺，据亚库特记载，该清真寺位于八尼·朱乃得（Banī Junayd）宫宫门的附

近。该寺称作“公牛”清真寺（Masjid-ath-Thawr），直到诃论·剌失德时期，一直是该城的主清真寺。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说，可疾云城由双城组成：一为外城；一为内城，拥有两座聚礼清真寺的中心（内）城像一座城堡。该城周边的土地十分肥沃，城里的居民区占地1平方英里。这里的人尚武善战，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就是从该城向塔里寒（Tālikān）地区和低廉地区派遣前往讨伐的远征部队。

据雅忽比记载，流经可疾云城的两条主要河流为：洼底·喀必儿（Wādī-al-Kabīr，即大河流）河和瓦底·赛兰（Wādī Sayram）河。可疾云城附近的地区有很多袄教祠遗址，穆喀达思盛赞该城周边果园所产的葡萄。该双城中的两个城区称作麦地那·木萨（Madīnah Mūsā）和麦地那·木八剌［Madīnah Mubarak，也称木八剌吉牙（Mubārakīyah）］。木萨（Mūsā）[21]是哈里发哈底（Hadī，诃论·剌失德之长兄）的名字，他修建了前一个城区，并以其名命名为麦地那·木萨城区，此时为其父马赫迪任哈里发时期。后来登基的诃论·剌失德（他继承了哈底之位）在去往呼罗珊的途中曾于可疾云城停留，还在此地建了新清真寺和城墙。突厥人木八剌（Mubarak）是哈里发马蒙或木塔欣（Mu`tasim）时期的自由民，他在木八剌八（Mubārakābād）城（别称“木八剌城”）的附近修建了木八剌吉牙（Mubārakīyah）城堡。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可疾云城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但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被蒙古人摧毁。出生于可疾云城的穆思套菲在蒙古西征100年后，详细记述了此城，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来源于当地的传说。他说在后来修建的哥疾宁城所在的地方曾有一座国王沙普儿（Shāpūr）所建的波斯古城，被称作设·沙普儿（Shād Shāpūr，即快乐的沙普儿）；在遗址附近，有两座穆斯林城市—麦地那·木萨城和木八剌八城（他说木八剌是哈里发哈底时期的自由民），这两座城是后来相继建立起来的，诃论·剌失德在三座城周边修建了高大坚固的城墙。此城墙直到伊斯兰历254年（868年）哈里发木塔兹（Mu`tazz）[22]在位时期，才由突厥将领木萨·伊本·不花（Mūsā ibn Bughā）完成；伊斯兰历572年（1176年），塞尔柱王朝算端阿思兰二世（Arslān II）[23]的宰相萨底儿丁（Sadr-ad-Dīn）用砖重建了该城墙。穆思套菲还说可疾云城附近有300个村庄，其中在他的道里志中提到的最重要的村庄就是法里思斤（Fārisjīn）村和萨哥萨八（Sagsābād）村。他也提到了灌溉可疾云地区的诸多河流的名称：喀鲁（Kharūd）河，以及卜合·鲁得（Buh Rūd）河与喀儿丹·鲁得（Kardān Rūd）河，后两条河发源于塔里寒地区；发源于

哈剌坎地区（见原文第196页）的土儿坎·鲁得（Turkān Rūd）河。据可疾云尼记载，灌溉城市园林的河流为东边的答剌吉（Daraj）河与西边的阿塔剌（Atrak）河[24]；他还提及了诸多城市和乡村之名，其分布于平原和可俯瞰可疾云城的山上。[25]

答思土洼（Dastuvā）城或答思塔八（Dastabā）城[26]在倭马亚王朝时期是铸币的地方，也是一个大地区的名称，其中亚兹达八（Yazdābād）村是其首要村庄。倭马亚王朝时期答思土洼城所属地区，一部分属剌夷地区，另一部分属哈马丹地区。由文献记载可知，从剌夷城起程的邮道经过该城，直达阿札拜占地区，而不经过可疾云城。答思塔八城在地图上已无法查到，但其肯定位于可疾云城之南，因该城在后来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统治时期附属于可疾云城。

可疾云城西北的山脉作为分水岭，是该地区与鲁得八儿（Rūdbār）地区的分界线，鲁得八儿地区沿着源自陀拔思单地区的沙·鲁得（Shāh Rūd）河的河岸分布，这里有“暗杀”（Assassin，即Ismāīl）派的著名城堡，穆思套菲称总共有50座，其中阿剌模忒（Alamūt）堡[27]是其首堡，麦门·底兹（Maymūn Diz）是最坚固的要塞。据说在陀拔思单语中阿剌模忒的含义为“鹰巢”或“鹰栖之地”，起初在这里修建城堡的人是低廉地区的一位国王，因他的猎鹰曾偶然栖息在巉岩之上而得名。可疾云尼无疑熟知此地，并称城堡周边是又深又宽的沟壑，该堡与四周的山崖完全隔绝，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因这里不在弓箭射程范围之内，故弓箭无法到达，甚至弩炮也一样。阿剌模忒堡距可疾云尼城6里格，后来的城堡是什叶派传道师哈散（Hansan），诨名叫答亦·剌·哈噶（Ad-Dā`ī-ilā-l-Hakk）的人在伊斯兰历246年（860年）修建的。据可疾云尼记载，该堡于伊斯兰历483年（1090年）或446年（1054）落入哈散·萨八（Hansan Sabāh）[28]之手，他的绰号叫“山中老人”，在此后的171年里，此堡成为哈散·萨八信徒的主要据点。伊斯兰历654年（1256年），蒙古旭烈兀汗（Hūlāgū Khān）命人将其拔除，并摧毁了阿剌模忒堡。该堡陷落后，“暗杀”派的剩余城堡也很快被攻占，并被夷为平地。很多旅行家访问过阿剌模忒堡，以及其他很多城堡，他们所提到的这些城堡是依思马因（Ismāīl）派信徒的据点，其遗迹至今存于可疾云城以北的山区。[29]

常和赞章（Zanjān）城并提的阿八哈耳（Abhar）城[30]，位于可疾云城西边的道路上，久负盛名。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

尔提到阿八哈耳城的居民为曲儿忒人，这里土地极其肥沃，水源充足，盛产粮食。一座修建在大平台上的坚固城堡守护着这座城，可疾云尼称这里以水磨和产一种叫阿拔斯（Abbāsī）的梨而闻名，该梨形似柑橘，但味颇甘。据亚库特记载，波斯人将此城之名读作奥哈儿（Avhar）。穆思套菲载，这座城的城堡是塞尔柱王朝时期的阿塔别·八哈丁·海达儿（Atabeg Bahā-ad-Dīn Haydar）重建的，因此称作海达力雅（Haydarīyah）城堡。城市的城墙周长有5500步，阿八哈耳（Abhar）河流经此城，灌溉了这一地区后，流到了可疾云城，而后消失在沙漠荒原中。赞章城位于阿八哈耳城西北约50英里的赞章（Zanjān）河岸边，这条河向西流入萨费·鲁得河。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赞章城规模要比阿八哈耳城大；其在通向阿札拜占地区的大道上。亚库特称该地名被波斯人读作赞干（Zangān），穆思套菲说此城是阿儿达喜儿·八卜甘国王所建的，其最初的名称为沙欣（Shahīn）城。赞章城毁于蒙古西征时期，保留的城墙周长为10000步，该地区土地极其肥沃，其财税收入达20000迪纳。穆思套菲还说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这里所操的语言“几乎还是纯正的帕合剌威语（Pahlavī）[31]”，这一记载表明这种语言无疑是当地的一种波斯方言。[32]

差不多在阿八哈耳城到赞章城的中途，位于西流到萨费·鲁得河水系与向东流入大沙漠水系分水岭的大平原腹地，有蒙古人所建的孙丹尼牙（Sultānīyah）城遗址，这里曾是伊利汗国的都城，阿鲁浑（Arghūn Khān）[33]在位时期开始兴建，并于伊斯兰历704年（1305年）由完者都（Uljaytū）算端[34]完成。阿布·勒·费达说这座城的蒙古名称为坤孤儿兰（Kungurlān），穆思套菲记载该城附属有九座城。其城墙周长为30000步，在中心城堡（内城）中矗立着用雕花装饰的完者都巨幅雕像。当时的穹顶陵墓（或清真寺）遗址尚存，但城区现在荡然无存，穆思套菲说在他那个时代除了帖必力思城外，孙丹尼牙城的建筑比波斯其他城市更精美。孙丹尼牙城东5里格，去往阿八哈耳城的道路上，有苦忽（Kuhūd）村，穆思套菲说“蒙古人称该村为赛音·喀拉（Sāin Kal`ah）”[35]，即“赛音堡”，至今仍在，赛音（Sāin）又称拔都汗（Bātū Khan）[36]，是成吉思汗之孙。坚固的萨儿贾汗（Sarjahān）城堡[37]，位于赛音·喀拉城堡和孙丹尼牙城中间的山脉边缘；这座堡距离孙丹尼牙城有5里格，修建在一座小山的山顶上，可以俯瞰大平原，此平原向东一直延伸到阿八哈耳城和可疾云城。据亚库特记载，位于塔鲁迷（Tārum）地区的萨儿贾汗城堡是他所见过的最坚固城的堡之一；但穆思套菲称当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该城堡已毁，其战时用的辎重和守

备的将士被转移到了赛音·喀拉城堡。

孙丹尼牙城之西有两座毗邻的小城：速合剌瓦儿（Suhravard）[38]城和速贾思（Sujās）城[39]。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到过这两座城，并说其地位仍相当重要，但现在已完全沦为废墟。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称曲儿忒人居住的速合剌瓦儿城的规模和沙赫剌祖儿（Shahrazūr）城一样大；其有城墙，防御坚固，该城在赞章城之南通往哈马丹城的道路上。速贾思（Sujās，或Sijās）城距速合剌瓦儿城不远，据穆思套菲记载，这两座城在蒙古西征时期均已被毁，因此在他那个时期这两座城仅仅是人口众多的大村庄而已。这些城市的周边地区叫贾鲁得（Jarūd）地区和安贾鲁得地区（Anjarūd，现在两地称作Ijarūd和Angurān），速贾思城位于孙丹尼牙城之西5里格，附近有100多个村庄，居民为蒙古人。山麓地区有阿鲁浑汗的陵墓，并按蒙古人习俗建有一座"圣坛"（*Kurūgh*），这里有其女儿完者都·可敦（Uljaytū Khātūn）为迭里迷失（Darvīsh）[40]修建的一座道堂（Khānkāh）[41]。[42]

吉八儿地区西境，靠近萨费·鲁得河其中一个源头的地方，有一处著名的遗迹，叫塔黑特·搠里蛮（Takht-i-Sulaymān，即所罗门王冠），至今仍存，这里还有一座小湖或池，人们常根据自然的虹吸原理将湖（池）灌满水，然后又将多余的水排掉。从该遗迹可以断定，这里应为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提及的失兹（Ash-Shīz）城，穆思套菲也以萨图里（Satūrīk）之名提及该地。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称在失兹（Shīz）城有一座大袄教祠，名为阿札儿居实纳思（Adharjushnas），受到袄教（Magian）徒的特别崇拜。所有的教徒从马达因（泰西封）城徒步来到这里，并在中途的沙赫剌祖儿城驿站停留歇脚，该城在本书第190页已述，萨珊王朝的每位国王（Chosro）即位后，旋即作为朝圣者来朝谒此祠；一个穆斯林的传说称失兹城是琐罗亚斯德的诞生地。据亚库特记载，此城的波斯名应为吉思（Jīs，别名为Gazn），失兹则是阿拉伯人的讹称。接着，他大段引用了伊本·木哈儿哈儿的记载，此人在伊斯兰历331年（943年）记述了失兹城，木哈儿哈儿在探寻传说存在于失兹城附近山脉中的金矿时来过该城。他（木哈儿哈儿）说在失兹城的城墙四周有一个湖，深不可测，面积为一贾里（Jarīb，1/3英亩），尽管从湖中分出了7条河流，但湖面总是保持同一水平面，且河水具有对水中的物质起到钙化作用的性质。木哈儿哈儿还记载了袄教祠，并说圣水从该祠中取得，而后传到波斯其他各地的袄教

祠；他又说700年间失兹城的圣火从未熄灭过。据穆思套菲记载，这座城是安贾鲁得地区的首府，蒙古人称其为萨图里。他称这里有一座大宫殿，并说该宫最初是由凯·忽思罗（Kay-Khusraw）国王[43]修建的，宫里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池子或小湖，尽管有一条小溪从湖中流出，但湖面总是保持在同一水平面，如果将溪水堵住，池中的水也不会外溢。穆思套菲称蒙古统治者阿八哈汗（Abakah Khān）[44]在该地修建有一座宫殿，原因是其附近有肥美的草原。[45]

吉八儿地区的西北角，在从赞章城到阿儿答必儿城的道路上，有商业重镇忽纳吉（Khūnaj）[46]，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称这里以放养良马、羊和牛而闻名。亚库特曾访问过该城，将其拼写为忽纳（Khūnā），但他还说此城一般称作喀噶兹·苦纳（Kāghadh Kunān，即造纸厂），但当地人讨厌使用忽纳（Khūnā）之名，因该名的波斯语含义为“鲜血的”。穆思套菲在其道里志中称喀噶兹·苦纳位于萨费·鲁得河南6里格，距赞章城北14里格，在直达阿儿答必儿城的道路上，他还说该城在蒙古西征时被毁，当时他记载这里仅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村庄而已。灌溉此地的河流是萨费·鲁得河的一条支流。但这里当时还在生产优质的纸张，居住在这里的蒙古人将该地称作“蒙古营”（Mughūlīyah）。显然，忽纳吉（Khūnaj）城的确切位置现在已无法确定。

北边的低廉地区、陀拔思单地区与沿着大山脉南边的吉八儿地区分开来的地方有吉八儿地区的三个区—普失吉儿·达剌（Pushikil-Darrah）区[47]、塔里寒（Tālikān）区[48]和塔鲁迷（Tārum）区[49]，但后两个区是重叠的，其名称没有什么区别，可交替使用。这些区又均分为上、下区；上区为山区，在大多数情形下划入低廉地区。据穆思套菲记载，普失吉儿区在可疾云城之西，在塔里寒区之南，这里有40个村，先前其财税收入用于可疾云城清真寺的修缮。塔里寒（Tālikān）区介于孙丹尼牙平原与北部山区之间，尽管其名称在地图上已查不到了，但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常提到塔里寒（At-Tālikān，这是一般的书写形式）。穆喀达思称这里是极为繁华、富庶的地区；让他感到奇怪的是算端（低廉地区的总督）并不居住在该地区，而是居住在山谷中，他还说，“但其居民不是如此”。可疾云尼提到了塔里寒地区种植着大量的橄榄和优质的石榴，亚库特提到了一些村庄的名字。穆思套菲详细记载了这些村庄，但大多数的村庄在现今的地图上无法找到。他认为塔里寒地区的绝大部分应当划入歧兰地区。

赞章城之北，在山脉的山麓地带就是塔鲁迷区，阿拉伯地理学家通常用双数形式将该区记载为塔鲁麦因（At-Tārumayn），意为“双塔鲁迷”，即上下塔鲁迷，上塔鲁迷地区全部属低廉地区。如前文所述，塔鲁迷河是萨费·鲁得河右岸的一条支流，塔鲁迷河的众多支流灌溉着这一富庶地区。亚库特将其名拼写为塔鲁迷（Tarum，或Tarm无重读的t），并说这里尽管没有大城市，但该地因是瓦合速丹（Vahsūdān）家族的故土而名垂史册，该家族的最后一位酋长被白益王朝君主鲁昆·道剌（Rukn-ad-Dawlah）[50]废除。穆思套菲称费鲁札八（Fīrūzābād）城[51]是下塔鲁迷地区的首府，安答儿（Andar，或Aydī）城[52]是上塔鲁迷地区的首府，这里还有一座叫喀剌·塔基（Kal`ah Tāj）的城堡，他还提到了这里的五个分区，每个分区均包括很多村庄。

穆思套菲提到了下塔鲁迷地区的大沙密兰（Shamīrān）城堡[53]，但其位置现在无法确定，亚库特将该堡名称拼写为萨密兰（Samīrān），并曾亲自访问过这一遗址。亚库特也大段引用了伊本·木哈儿哈儿的记载，此人大约在伊斯兰历331年（943年）经过萨密兰堡，当时该地是低廉王朝国王的重要据点之一，（他记载）这里有大大小小2850幢奇怪的房子。伊斯兰历379年（989年），白益王朝的统治者法合儿·道剌（Fakhr-ad-Dawlah）[54]夺取该地，并剥夺了瓦合速丹家族最后一位年幼成员的权力，将其母亲改嫁给白益王朝的首领。大致就在此时，穆喀达思将该堡的名称拼写为萨密伦（Samīrūm），并称该堡属萨剌万（Salārvand）区，还说其城墙有“金狮和日、月之像”，城堡内的民居仅用泥土建成。11世纪中叶，波斯旅行家纳思儿·忽思罗在去往麦加朝觐的途中，于伊斯兰历438年（1046年）访问了萨密兰（Samīrān）城。他称该城是低廉地区辖下的塔鲁迷区的首府。其位于沙·鲁得（Shāh Rūd）河与萨费·鲁得河汇合处以西3里格，在通往阿札拜占区萨剌瓦（Sarāv）城的道路上。该城以北有座修建于岩石之上的巨大城堡，其三面有城墙环绕，还驻守有1000人的部队，用水则通过地下通道汲取。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亚库特经过萨密兰堡，但发现该堡已毁，原因则与阿剌模忒堡“暗杀”派首领的一道命令有关。该遗迹原是一座有“众堡之母”之称的大城堡，其位于一条大河的岸边，该河发源于塔鲁迷（Tārum）山脉。但其位置尚未被任何现代旅行家勘定。亚库特提及了该地区的另一座城堡，名为吉剌（Kīlāt）城堡，位于塔鲁迷山中，靠近可疾云城与哈儿哈儿（Khalkhāl）城之间的低廉地区边界。该堡修建在山顶之上，山下的河流上横跨着一座多孔石桥，还有一个有很多极好市场的外城区。亚库特说该堡由阿剌模忒堡“暗杀”派首领统辖，但和

萨密兰堡一样，其位置还无法确定。[55]

穆喀达思对吉八儿地区主要城市的商品和产品做了简明扼要的记述。他称剌夷城外销各种纺织品，尤其是称作木纳牙儿（*Munayyar*）的纺织品；这里生产棉花织品，并染成蓝色，剌夷城生产的条形斗篷很知名；此地产外销的针、梳子和大碗，据可疾云尼记载，后两种产品用有纹理的优质硬木制成，这种木材叫哈兰吉（Khalanj），其产自陀拔思单地区的森林中。剌夷地区也以产甜瓜和蜜桃而享有盛名，这里还产一种很有名的具有肥皂性质的粘土，此土常被用来洗头[56]。

可疾云城出产纺织精美的布匹，用来出售，也生产旅行用的皮袋子及钱包；这里生产弓箭上用的箭镞，供外销，还产炉甘石[57]药物。苦木城以生产椅子、缰绳、马镫和各种织品而闻名；此地也盛产藏红花。柯伤地区外销一种晒干的青枣，也输出龙蒿[58]。亦思法杭城的斗篷很有名，还外销一种特制的腌肉，其锁具也颇有名气。哈马丹城及其所在的地区出产奶酪和盛产藏红花；这里产外销的狐裘和貂皮；该城附近的地区有锡矿，还产各种纺织品和优质的皮靴。第纳瓦儿地区所产的奶酪很有名。[59]

贯穿吉八儿地区的主要道路是大商道，即通常所说的呼罗珊道的一部分，这在绪论中已做了叙述，该道起自报达城，通向河中和更遥远的东方。该道在忽儿宛城斜行进入吉八儿地区，首先到吉儿密辛（或乞里茫沙）城，而后到哈马丹城，又下一站到撒瓦城，向北最后到达剌夷城，经此城后向东越过吉八儿地区，进入苦密思（Kūmis）地区，经该地区后到达呼罗珊地区。如前文所述，记述呼罗珊道最全面的早期文献是伊斯兰历3世纪末（10世纪初）伊本·鲁斯塔的著作，他提及了站与站之间所经之路上的河流和桥梁，以及经过的高山、峡谷和平原，还记载了所经过的众多村庄和城市。除了早期叙述这条道路的四位著述者外，穆喀达思还记述了每日的行程（*Marhalah*）。

自蒙古西征，并在波斯建立伊利汗国后，孙丹尼牙城成为都城，此后该城便成为道路网络的中心。因此在穆思套菲的道里志中，这些道路不是从报达城起程向东，而是从孙丹尼牙城起始的，以相反的方向通往报达城。从忽儿宛城到哈马丹城（沿旧道相反的方向行进）的这两种（新旧）道路网络所设驿站实际上是一致的。但在蒙古统治时期，从哈马丹城起程的道路不是经撒瓦城到剌夷城，而是向北经答儿谷曾（Darguzīn）地区和哈剌坎地区直达孙丹尼牙城。据穆思套菲记载，这

条道路并不经过大城市，所经过的驿站多是以村庄命名的，但其记载的这些村庄已完全无法确定。[60]

该道从乞里茫沙杭城附近一个叫欣·速麦剌（见原文第188页）的地方，到达阿札拜占的麻剌噶城，该城之北是呼罗珊道分出的支道，先到第纳瓦儿城，后到思萨儿城（可能就是现代的思纳，见原文第190页）和吉八儿地区的边境。这条道路经阿札拜占地区后继续向前，库达玛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均做了记载，同时伊本·豪喀尔也记述了这条道路的早期路段，在此做一叙述。从乞里茫沙（吉儿密辛）城、康古瓦儿城和哈马丹城起程的道路向右分出支路，向东南延伸到那哈完的城，从哈马丹城直接起程的道路，经卜鲁吉儿城到达喀喇吉·阿卜·都剌费城，而后到达亦思法杭城。穆思套菲记述了从康古瓦儿城到那哈完的城，再经崎岖的山路到达亦思法杭城的驿站；穆喀达思记述了从喀喇吉（Karaj）城经阿洼城和瓦剌敏城直达剌夷城的道路。[61]

现在从亦思法杭城到德黑兰（过去的剌夷）的道路要经过柯伤城和苦木城；但中世纪的早期商道更东一些，接近沙漠边缘，左边的支路向西，依次到达柯伤城和苦木城。但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末，据穆喀达思记载，这条道和今天一样直接经柯伤城和苦木城。据穆思套菲记载，该道经这两座城后，向左转经阿洼城到达撒瓦城，而后再到达孙丹尼牙城，从新都起程的大道在孙干（Sūmghān）[62]驿站与去往剌夷城的道路会合，这将在后文述及。[63]

伊本·豪喀尔和其他著述者记载了从剌夷城西到阿札拜占地区各城市之间的的道路里程数，也记载了从赞章城北到阿儿答必儿城的道路里程数。对这条道路上的驿站，记载最全面的是穆思套菲的著作。孙丹尼牙城和剌夷城之间的道路经阿八哈耳城到达法儿思斤（Fārisjīn）城[64]，再向北到可疾云城，途经一个叫孙干（Sūmghān，这一地名的读法无法确定）的驿站，在这里道路分成两支：呼罗珊道经阿卜得·阿兹木（`Abd-al-`Azīm）圣墓直达剌夷城，然后到达瓦剌敏城；向右的南道，即亦思法杭（Isfahān）道先到萨哥札八（Sagzābād，或Sagziābād）城[65]，然后到达前文所述的撒瓦城。[66]

哈里发王朝统治早期，经阿札拜占地区的道路，如前所述，位于哈马丹城，呼罗珊道分出了向北支道，可到达思萨儿城，再到达阿札拜占地区的八儿札（Barzah）城[67]，该城在兀儿密牙湖以南60英里，在此又分出两支[68]：向右的干道经靠近湖东的麻剌噶城，到达帖必力思，

而后向东经萨剌瓦城到达阿儿答必儿城；在八儿札城分出的左支道经湖西的兀儿密牙城，到达忽委城，再经纳合乞宛（Nakhchivān，即Nashawā）城，到达阿剌蛮地区首府答必儿城。在帖必力思城，该道与一条经麻兰（Marrand）城[69]到忽委城的道路交叉，而后经阿儿吉失城到达凡湖以西的黑剌（Khilāt）城。最后这段路只有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做了记载。[70]

从阿儿答必儿城向北的道路，经麻干地区到达瓦儿三（Warthān）城，在这里越过阿剌可思河，再经拜剌坎（Balakān）城到达八儿赞阿城，有一条道路从该城经苫苦儿城，向西北经苦儿河到达古儿只的第必里思城；另一条右道经八儿赞吉（Barzanj）城，越过苦儿河到达设里汪地区的首府沙麻哈（Shamākhā）城[71]，再到达八卜·阿卜瓦城，别称打耳班城。穆喀达思和其他著述者也记述了一条从阿剌蛮首府答必儿城到八儿赞阿城的道路，但沿途的驿站不易确定。[72]

据穆思套菲记载，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蒙古治下经阿札拜占地区到达西北边陲之地的道路起自新都孙丹尼牙城，而后到达赞章城，在该城道路分为两支。向右的北支经忽纳吉（Khūnaj，或Kāghadh Kunān）城，越过萨费·鲁得河，而后经哈儿哈儿城到达阿儿答必儿城，再到达担寒地区的首府八贾儿宛城。这条从赞章城起程的道路，经一座石桥（叫Kantarah Sabīd Rūdh）越过萨费·鲁得河，与从密延尼吉（Mīyānij）城来的道路交叉，伊斯塔赫里和伊本·豪喀尔记载了这条道路的一部分。穆思套菲是最早注意从八贾儿宛城向东到木哈木八城的支道的著述者，他也提到了始自八贾儿宛城的干道上的驿站，该道经巴耳打阿城和苫苦儿城到达第必里思城。

再返回到赞章城的另一支道，即左路，据穆思套菲记载，沿该道北上可到达阿札拜占地区的密延尼吉城，再经兀建（Ūjān）城后可到达帖必力思城，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对沿途（按相反的方向）做了记载。据穆思套菲记载，该道起自帖必力思城，到达凡湖岸边的阿儿吉失城，而后向左分出道路，沿凡湖岸边，到达黑剌城。他记载了向西北到达麻剌思吉儿得城和从阿儿赞·鲁迷城，即爱儿泽鲁迷（Erzerum）城，经阿儿赞章城到塞尔柱鲁迷地区首府思瓦思（Sīvās）城的道路里程。最后，穆思套菲还记载了从帖必力思城向东北到八贾儿宛城的分道，此道经过阿哈儿（Āhar）城和两座关隘；他称宰相阿里·沙当时沿着这条道路修建了很多卢八（Rubāt，即卫所）。[73]

[1] 斯特拉波所著的《地理学》（*Geography*，trans by. H. C. Hamilton，Esq.，W. Falconer，M. A.，London，1857，Book XI，chapter IX，p.251）载：“依据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前180～前120年）的记载，里海门（Portae Caspiae，即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峡谷）到剌戈斯有500斯塔德（Stade，古希腊距离单位，不同地区计算不一，一般为157米），到安息王朝首都赫喀坦坡罗思（Hecatompylos，意为“百门”）有1260斯塔德。据说剌戈斯因地震频发而得名。”译者。

[2] 这条河流就是今天的加鲁德（Jājrūd）河，或卡拉季（Karaj）河。加鲁德河发源于德黑兰东部的厄尔布尔士山东段，而卡拉季河发源于卡拉季城北部的吉兰山区，然后向东南流，加鲁德河在德黑兰以南约40公里处与卡拉季河汇合，向南流，最后汇入纳马克盐湖，全长约260公里，是德黑兰、卡拉季及其周边地区重要的水源，也是古今交通要道。译者。

[3]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75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6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65、269、27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90、39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53、894、895页；第3卷，第855页；第4卷，第431页。马赫迪修建的剌夷城城堡是否以其子诃论·剌失德之妻的名字祖拜底牙（Zubaydīyah，如果是准确读法的话）命名，尚不清楚。

[4] 今难以查证，应在剌夷城不远。译者。

[5] 今为瓦拉明（Varāmīn），是德黑兰省瓦拉明县的县府，在德黑兰城南边，人口20.8万，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6] 今为皮什瓦（Pīshvā），是德黑兰省皮什瓦县县府，在瓦拉明城东南，人口4.8万，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7] 今不存，应在瓦拉明城附近。译者。

[8] 今不存，应在瓦拉明城附近。译者。

[9] 《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27页载，在剌夷城“有笃热什村（Dūresht），现在叫笃热什（Duresht）村和图勒什特（Turesht）村”。译者。

[10] 今称沙菲仪学派，是伊斯兰教四大教法学派之一。译者。

[11]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

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0、28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72、833、893、894页。

[12] 兹牙儿（Ziyār，又译席亚尔或兹亚尔）王朝（927～1090年）是波斯人在里海沿岸的古尔干（Gurgan）与塔巴里斯田（Tabaristān），即马赞达兰（Māzandarān）地区建立的王朝，其创建者是麻达卫·本·兹牙儿（Mardaviz ibn Ziyār，927～935年在位），他起来反抗萨曼王朝，并占据了波斯北部地区，同时攻占哈马丹城与亦思法杭城，935年被杀，王国一度瓦解。后来在萨曼王朝与白益王朝激烈争夺之时，兹牙儿王朝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其建立了自治地区。哥疾宁王朝建立后，兹牙儿王朝承认了该王朝的宗主地位，并与之联姻。11世纪中叶塞尔柱王朝占领马赞达兰后，兹牙儿王朝的统治者被迫退入里海南岸的山区，并统治到1090年。麻奴查哈儿于1012～1031年在位。译者。

[13] 喀贾儿（Kajar，1785～1925年，恺加）王朝为土库曼古思人喀贾儿部廓万鲁（Qovanlu）氏族所建，其征服了波斯全境，19世纪初沦为英、俄的半殖民地，1925年被英国扶持的巴列维王朝所灭。译者。

[14] 1785～1797年在位。译者。

[15] 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28、25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3、144、20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507、564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583、586、597页。札黑儿丁（Zāhīr-ad-Dīn，Dorn，*Muhammadanische Quellen*，第1卷，波斯文本第15页）说塔巴里（Tabarik）的含义是“小丘”，由表示“小”的后缀加塔巴儿（Tabar）构成，在陀拔思单方言中塔巴儿一词表示“山、山脉”。塔巴里有关亦思法杭城的注释，见第205页。

[16] 阿里·载因·阿必丁是第四代依麻木，680年生于麦加，713年卒于麦地那。译

者。

[17] 即加鲁德（Jājrūd）河。译者。

[18] 此河发源于加兹温周边山区，灌溉了该城附近的土地后，余下的河水最后汇入卡拉季河。译者。

[19] 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1卷，第18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4、148、196、216页，还可见大英博物馆抄本，编号23543，179b叶面。*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292、304页。

[20]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为加兹温省省会加兹温，人口38万，自古以来是通往伊朗东西部、里海、伊拉克、土耳其的要道，也是伊朗的书法之都。译者。

[21]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作“卒（卒，似是木之误，引者）栖”，全名为Abū Abdullāh Mūsī ibn al-Mahdī al-Hadī，是阿拔斯王朝第五位哈里发，786～809年在位。译者。

[22] 阿拔斯王朝第十三位哈里发，866～869年在位。译者。

[23] 1160～1176年在位。译者。

[24] 即突厥河。译者。

[25]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9、263、271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71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

《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9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88、89、454、455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90、193、194、196、244、274、275、29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5、146、196、217页。可疾云尼的名字暗示他是可疾云城人（穆思套菲也出生在该城）。穆思套菲在他的历史著作［《历史精选》（*Guzīdah*）］中详细记载了他的出生地，这些内容被巴尔比尔·德·梅纳德（M. Barbier de Meynard）翻译发表在《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1857年，第2卷，第257页）上。可疾云尼大致描述了这座城市的平面图，城市以城墙为同心圆建成。北城墙里就是沙合思田（Shahristān）城，内城外是大城（Al-Madīnah-al-`Uzām），并称其依次被果园、耕地环绕，而两条河流穿过大城。

[26]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加兹温之南的布因（Buin-Zahra）城。译者。

[27]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在塞尔柱帝国、伊利汗国史料中常见，如《历史精华》、《史集》、《世界征服者》和《历史精选》等。今已不存，应在加兹温城西北山区。译者。

[28] 哈散·萨八（1050～1124年），是木剌亦派的传道师，在厄尔布尔士山脉建立了很多要塞，给塞尔柱王朝造成极大威胁，长期从事暗杀活动，很多塞尔柱高官死于该派人员之手。译者。

[29] 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0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7页。在《历史精选》（*Guzīdah*，第4章第9节第2部分）中，穆思套菲记载了波斯依思马因（Ismāīl，暗杀）派的历史，德福里梅利（Defremery）翻译并注释了这些内容，并发表在《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1849年，第1卷，第26页）。穆思套菲记载了奉旭烈兀之命攻占、摧毁的一系列依思马因派城堡的

名称（第48页），但绝大部分城堡的位置已无法确定。吉儿都怯（Girdkūh）城堡和兰八萨（Lanbasar）城堡最后才陷落。但阿剌模忒城堡显然没有被旭烈兀完全摧毁，也许后来又进行了重建，因在萨法维（Safav）王朝沙·搠里蛮（Shāh Sulaymān）统治时期，这个要塞被当作国家监狱，夏尔丹（Chardin）提到了相关内容［《波斯行记》（*Voyage en Perse*），第10章第20页］。蒙特斯（Monteith）上校在上世纪（18世纪，译者注）造访过这个遗迹，并记述了相关的内容（*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1833年，第15页）。

[30]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即今阿卜哈尔（Abhar），是赞詹省阿卜哈尔县的县府，人口8.8万，是丝绸之路要道和古城，与之同名的河流流经此城，周边是赞詹省的重要农业区。译者。

[31] 帕合剌威语（Pahlavī，即帕拉维、婆罗迷文）属西伊朗语，最初这种语言只是安息人所操的一种口语，但随着安息帝国（前247～前224年）的建立，这种语言很快成为波斯、中亚等地的重要语言，后人将此时的语言称之为安息钵罗婆语。萨珊王朝建立后仍使用这种语言，被称之为萨珊钵罗婆语，学者们传统上将这两个王朝时期使用的语言称之为中古波斯语。钵罗婆文源于阿拉美文，最早的文献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而安息钵罗婆文与萨珊钵罗婆文所采用的字母略有差异。《杂阿含经》作钵罗婆。译者。

[32]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8、271、27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8、382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9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04页；第2卷，第573、574、948页；第4卷，第101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6、147、217页。

[33] 阿鲁浑汗为伊利汗国第四代君主（1284～1291年在位）。译者。

[34] 完者都（即合儿班答）为伊利汗国第八代君主（1305～1316年在位）。译者。

[35] 今为萨茵堡，位于苏丹尼耶和阿卜哈尔之间，是赞詹省阿卜哈尔县中部的一

座城市，人口1.1万，其为里海南岸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6] 拔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又译为钦察汗国）的建立者。他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次子，1243～1256年在位。译者。

[37] 此地名仍然存在，只是拼写略有差异，今为被称作萨尔乌·加汗（Sarv-e Jahān）的小村，有430余人，在阿卜哈尔县，位于前文提到的萨茵堡西边的山顶上，向东可到阿卜哈尔城，这里古代为军事要塞，现已无战略价值。译者。

[38] 此城今天仍然存在，称苏赫拉瓦德，在赞詹省胡大班迪赫（Khodabandeh）州，是座小城，人口5000余，虽不是交通要道，但在此地出现过很多宗教人物，如照明学派的代表人物沙黑布丁·苏赫拉瓦迪（Shahāb ad-Dīn Yahya ibn Habash Suhrawardī，1154～1191年）、苏赫拉瓦迪苏非派创始人阿布纳吉布·苏赫拉瓦迪（Abū al-Najīb Abd al-Qādir Suhrawardī，1097～1168年）。译者。

[39] 即今苏加斯（Sojas），位于赞詹省胡大班迪赫（Khodabandeh）州，人口5500，是去往苏丹尼耶、哈马丹、阿卜哈尔等地的重要通道。译者。

[40] 即苏非派修士，该词本义为“挨门挨户”，后指沿街乞讨、专事修行者。译者。

[41] 道堂（Khānkāh），指苏非派修行的处所，一般修建在著名人物陵园的附近，并有专人管理。译者。

[42]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8、263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6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40、70、203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0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4、145、148、149、196页。速贾思和速合剌瓦儿两城现在从地图上已无法查到，但罗林森（H. Rawlinson）爵士记述说（*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1840年，第66页），速贾思在他那个时期是一个小村庄，距赞章城东南24英里，他还说速合剌瓦儿“现已不存”。

[43] 凯·忽思罗一世（Ghiyath ad-Dīn，Kay-Khusraw I），是鲁迷塞尔柱王朝的国王，第一次在位于1192～1196年，1205～1211年复辟；凯·忽思罗二世第一次在位于1237～1246年，1257～1259年复辟；凯·忽思罗三世在位于1265～1282年。作者在行文中未提到是哪位凯·忽思罗。译者。

[44] 即阿八哈，旭烈兀长子，伊利汗国统治者，1265～1282年在位。译者。

[45]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19页。Ibn-al-Fakīh（伊本·阿勒·法吉赫），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五卷，第286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8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35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8页。罗林森（H. Rawlinson）爵士考订后认为塔黑特·搠里蛮（Takht-i-Sulaymān）或失兹（Shīz）城应是希腊文献中的北埃克巴坦纳（the northern Ecbatana）。（*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1840年，第66页）

[46]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赞詹省西部的阿克坎德（Aqkend）附近。译者。

[47] 今此名不存，大致在加兹温省西北部的厄尔布尔士山南坡，中世纪时期，这里有很多极端派的城堡，后被蒙古人摧毁。译者。

[48] 现为塔里干，为厄尔布尔士（Alborz）省的塔里干县，这个地区是里海和伊朗腹地的分界线和通道，其首府为塔里干城，人口3000余，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军事要塞，曾被木剌亦派占据，后被蒙古人摧毁。译者。

[49] 今塔鲁迷是赞詹省北部的一个州，人口4.2万，其北边和吉兰省接壤，这里有两座城市：阿巴尔（Ab Bar）和察哈尔扎戈（Chavarzagh）。这个地区是阿尔达比勒和加兹温之间的重要通道。译者。

[50] 935～976年在位，是剌夷地区的君主。译者。

[51] 今此地不存，应在加兹温省境内，不要与其他同名地混淆。译者。

[52] 此城难以查证。译者。

[53] 今不存。译者。

[54] 于976～980年和984～997年在位，是刺夷地区的君主。译者。

[55]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6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63、811页；第2卷，第499、500页；第3卷，第148、492、533页；第4卷，第156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6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49、150、198、217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297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5页。

[56] 《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第129页还提到了尖头矛、优质梳子、火红色石榴、光皮石榴、桃干等。译者。

[57] 炉甘石为碳酸盐类矿物菱锌矿的矿石，治目赤翳障，烂弦风眼，溃疡不敛，皮肤湿疮等。译者。

[58] 多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无毛，主根粗大，根状茎粗长。茎直立，多数丛生，略呈紫褐色，高50～150厘米。译者。

[59]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95、396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50页。

[60]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

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65～169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9～22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8～20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6～25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00～40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2页。

[61]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19、120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9、200、21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6、257、25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01、40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5页。

[62] 今此名不存，应在加兹温城以南约16公里处，是十字路口，也是丝路要冲。译者。

[63]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90、191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

出版了汉译本，第58、5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89、29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9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2、25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8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6、198、199页。

[64] 今法里斯金（Farsejin），位于加兹温省塔凯斯坦（Takestan）县的一个小镇，是丝路要津。译者。

[65] 加兹温省布因扎赫拉（Bū’īn Zahrā）县的县府，人口1.8万，在加兹温城以南，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译者。

[66]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2、25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8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

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6、198、199页。

[67] 此城具体位置难以确定。译者。

[68] 见地图三，原文第87页。

[69] 今为马兰德，是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兰德州的州府，人口14万，是伊朗东边通往小亚细亚、高加索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70]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19～121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2、213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9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82、383页。

[71] 今为萨马基（Samaxi），是阿塞拜疆的省名和省会名，历史上就是希尔凡（Sirvan）地区的中心区，现该省省会人口2万，通往里海和高加索地区的道路经过此地。译者。

[72]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21、122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3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92、19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81页。

[73] 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8、199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9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52页。

第十六章 忽兹思田（Khūzistān）地区

都加伊勒（Dujayl）河或喀伦（Kārūn）河。忽兹思田（Khūzistān）地区和阿合瓦兹（Ahwāz）城。途思塔儿（Tusatar）或舒思塔儿（Shustar）城。大坝（Weir）。麻思鲁坎（Masrukān）运河。阿思喀儿·木可兰（`Askar Mukram）城。君代·沙普儿（Junday Shāpūr）城。底兹夫儿（Dizfūl）城。速思（Sus）城和喀儿赫（Karkhah）河。八辛纳（Basinnā）城和麻途思（Mattūth）城。喀儿苦卜（Karkūb）城和都儿·剌思必（Dūr-ar-Rāsibī）城。哈委札（Hawīzah）城和纳赫儿·乞剌（Nahr Tīrā）运河。导剌（Dawrak）城和速剌（Surrak）地区。喜森·马赫迪（Hisn Mahdī）城堡。都加伊勒（Dujayl）三角洲。蓝忽里模子（Rāmhurmuz）城和祖忒（Zutt）地区。大罗耳（Lur）地区。夷札吉（Īdhaj，或Māl-Amīr）城。速三（Sūsan）城。罗耳答干（Lurdagān）城。忽兹思田地区的贸易和产品。诸道。

忽兹思田（Khūzistān，今胡齐斯坦）地区全部位于喀伦（Kārūn）河流域的冲积扇上，阿拉伯人称喀伦河为都加伊勒·阿合瓦兹（Dujayl-i-Al-Ahwāz，即小底格里斯河）河，这条河有很多条支流[1]，由于该河流经阿合瓦兹（Ahwāz）城，就冠上了该城之名，以此来区别于报达城之北从底格里斯河引来的都加伊勒（Dujayl）运河。忽兹思田的含义为“忽兹（Khūz）之地”，也写成忽兹（Hūz或Hūz），忽兹的阿拉伯语复数形式为阿合瓦兹（*Ahwāz*），该城是这一地区的首府；阿合瓦兹（Al-Ahwāz）之名是速可·阿合瓦兹（Sūk-al-Ahwāz）的缩写，意为“胡兹（Hūz）人的市场”。忽兹思田这一地区名称现在几乎废弃不用了，这个波斯地区现今称作阿拉伯斯坦（`Arabistān），意为“阿拉伯地区”。流经这里的大河现在也不再称都加伊勒河，而是称喀伦河，据说这一河名是苦合·朗（*Kūh Rang*，即彩山）山的误称，即认为这条河就发源于该山之中；但中世纪的阿拉伯或波斯地理学家显然对喀伦之名不甚了解。

都加伊勒河或喀伦河的上游，流经大罗耳地区的峡谷，其支流则发源于小罗耳地区和曲儿忒思田山区。都加伊勒河的源头位于苦合·札儿（Kūh Zard，即黄山，见原文第207页）山；从该山的另一侧发源有赞答·鲁得（Zandah Rūd）河，其干流流向亦思法杭城。漫长曲折的都加伊勒河流经了诸多峡谷，与此同时从河的两岸接纳了很多小支流后，到

达了途思塔儿（Tustar）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穆思套菲称该城是忽兹思田地区的首府，于是他称这条河为都加伊勒·途思塔里（Dujayl-i-Tustar）河[2]。该河在途思塔儿城分为两支，又在阿思喀儿·木可兰（`Askar Mukram）城[3]重新汇合，接着流经阿合瓦兹城，并在此城与君代·撒卜儿（Junday Sābūr）或底兹夫儿（Dizfūl）河[4]汇合。底兹夫儿河发源于小罗耳地区的卜鲁吉儿（见原文第200页）城附近，其上游称作喀喇（Kar`ah或Kaw`ah）河；另一条叫喀兹吉（Kazkī）的河汇入底兹夫儿河后，干流流经底兹夫儿（Dizfūl）城，而后如前所述该河汇入都加伊勒河。都加伊勒河的另一条大支流叫速思（Sūs）河，又称喀儿哈（Karkhah）河[5]，位于更西的地方。这条发源于小罗耳山区的河（速思河）接纳了苦儿苦（Kūlkū）河，以及忽剌麻八（Khurramābād）河。这些汇合后的河流流过漫长里程后，经过速思（Sūs）城[6]，到达阿合瓦兹城以西的哈委札（Hawīzah）地区，最后汇入都加伊勒河。在这些支流汇合处的南边不远，都加伊勒河形成了一个大潮汐河口，通过这个河口向东可达底格里斯河河口（在第二章已述及），最终，忽兹思田诸河汇成的河流流入波斯湾。[7]

这一地区的首府阿合瓦兹城，最初称作忽里模子·沙合儿（Hurmuz-Shahr，此名在各种抄本中称法不一，如Hurmuz Awshīr和Hurmuz-Ardashīr等），这是一个波斯地名。据穆喀达思记载，该城在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遭到赞吉（Zanj）起义者的袭击，而且有段时间起义领导人就居住于此。10世纪，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Adud-ad-Dawlah）重建了这座城的部分城区；据穆喀达思记载，在他那个时期该城有很多大货栈，这里储存着从内陆城市运来的货物，这些货物将被运送到弼斯啰城出售或出口。

当时，阿合瓦兹城包括两个城区：都加伊勒河岸边的东城区为主城区，这里有大市场和聚礼清真寺，并有一座桥和河中的岛屿相连，该岛就是此城的西城区。这座桥称作坎塔剌·印度万（Kantarah Hinduwān），用砖块建成，是前文提及的统治者阿都得·道剌重修的，其旁有一座清真寺可以俯瞰该河，城附近的河边有很多水车。在该岛以西的都加伊勒河干流，即阿合瓦兹城稍南的石滩上修建了一座大坝（Shādhurwān），建坝目的是提升水位来灌溉土地。这座城周边的土地靠三条运河灌溉，这些运河都是从该河（都加伊勒河）堤坝之北引来的，所建的水闸起到调节供给水位的作用，在汛期，闸门打开，以防汛期城市被洪水淹没。据穆喀达思记载，阿合瓦兹城的气候恶劣，白天刮

热风，到了夜晚，蚊子和臭虫太多，让人无法入眠，他说，这些害虫“就像恶狼一样咬人”，他还说堤坝嘈杂的水声可传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使他无法很好地休息。他说蛇、蝎遍布于其附近的平原。这里的人食用的米粉饼最不易消化。[8]

与阿合瓦兹城恶名相反的城市就是忽兹思田地区的第二首府，阿拉伯人称其为途思塔儿城，波斯人叫舒思塔儿（Shustar，或Shushtar）城[9]。此城位于阿合瓦兹城北，直线距离有60英里，但由于都加伊勒河河道的弯曲，水道距离可能有直线距离的两倍。据穆喀达思记载，途思塔儿城周边为果园，园中种植着大量的葡萄、柑橘和椰枣等。他说在忽兹思田地区没有比这座城更美，或更适宜人居住的城市，但他也承认夏天这里极其炎热。途思塔儿城市场上的商品供应充足；这里产的织锦与各种绣花棉织品，尤其是途思塔儿城的织锦（Dībāj）很有名；聚礼清真寺在布匹市场的中央；该河（都加伊勒河）之南的“染工”城区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260年，罗马皇帝瓦勒然（Valerian）[10]成为萨珊王朝第二代君主沙普儿［Shāpūr，即萨珀儿（Sapor）一世］国王的阶下囚，据波斯史学家记载，在囚禁的7年里，他曾被发配去修建途思塔儿城南不远，拦截都加伊勒河的大堤坝（Shūdhurwūn）。阿拉伯人称这座大坝为世界奇迹之一，至今犹存。该河在途思塔儿城之西被堤坝拦截，结果一部分河水的流向发生了变化，经途思塔儿城之北流入人工运河中，再转向东边，灌溉所经土地之后，又在该城南边很多英里的地方重新汇入都加伊勒河。据早期文献记载，途思塔儿城的大坝差不多有1英里宽，穆喀达思称坝上有一座浮桥（*Jisr*），连接着途思塔儿城向西到亦剌可地区的道路。现在仍有一座有很多小拱、长度为1/4英里的古桥，连接着经过堤坝的道路，但该桥在中世纪早期显然并不存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称舒思塔儿城有4座城门，还有一座坚固的城堡守卫。和他同时代的伊本·白图泰将都加伊勒（或喀伦）河称作纳赫儿·阿兹剌可河（Nahr-al-Azrak，即蓝河），还说这里的浮桥“像报达城和喜剌城的一样”，其从底兹夫儿（Dizfūl）门横跨到河西的城区。他访问该城时，详细记载了这里的很多圣墓，并说这是一座极繁华的城市。[11]

如前所述，途思塔儿城附近修建的大坝有效地抬高了一条从都加伊勒河引来的、位于该城之北的运河的水位，这样就可以灌溉东边的土地。这条运河现在称作阿卜·噶儿噶儿（Āb-i-Gargar）运河，中世纪初期

称作麻思鲁坎（Masrukān，或Mashrukān）运河[12]。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旅行家伊本·木哈儿哈儿（据亚库特所引）称这条运河的水是白色的，都加伊勒河干流的水则是红色的。都加伊勒河干流（现在的Shutayt河，即小河，在舒思塔儿城南不远）在舒思塔儿城南约25英里，靠近班底·吉儿（Band-i-Kīr）遗址的地方，与麻思鲁坎运河再次汇合。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这个遗址所在地都被称作阿思喀儿·木可兰（`Askar Mukram）城，这是麻思鲁坎运河岸边最重要的城市，该运河穿城而过，并灌溉着人们种植的甘蔗园，据说这里的甘蔗是全忽兹思田地区最好的。

帖木儿征服活动结束后的伊斯兰历9世纪（15世纪）上半叶，哈菲兹·阿卜鲁和阿里·亚兹底记载这里的河流的名称如下：都加伊勒河干流的一条分支向东流到舒思塔儿城北（麻思鲁坎，或阿卜·噶儿噶儿运河），后来被称作都·答尼喀（Dū Dānikah，意为六分之二）河；都加伊勒河的大部分河水经过大坝输送到该城之西，被称作查哈儿·答尼喀（Chahār Dānikah，即六分之四）河。还有一条从主河道分出来叫米瑙（Mīnaw）的运河，流向东南，再流经舒思塔儿堡所处岩石下的涵洞，灌溉着城南地势较高的土地。这条河就是穆思套菲提到的答失塔八（Dashtābād）运河；哈菲兹·阿卜鲁也提到了这条运河，并说查哈儿·答尼喀运河在该城附近分成两支，其中的一支在此城南重新与都·答尼喀河，或麻思鲁坎河汇合。据传说，麻思鲁坎运河最初是由萨珊王朝的创立者阿儿达喜儿·八卜甘开凿的。穆思套菲称麻思鲁坎（Masrukān）城位于与之同名的运河的岸边；该城之南，如前所述的途思塔儿城与阿合瓦兹城中间，即在阿思喀儿·木可兰城附近，麻思鲁坎河汇入都加伊勒河。

麻思鲁坎地区以产一种特别优质的椰枣和前文提到的甘蔗而闻名。

阿思喀儿·木可兰城以“木可兰兵营”（`Askar-i-Mukram）之名命名，木可兰是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亦剌可地区著名总督哈贾吉派到忽兹思田地区镇压起事者的阿拉伯指挥官。木可兰将兵营驻扎在起初叫鲁思坦·苦洼（Rustam Kuwād）的波斯城遗址附近，阿拉伯人将其讹称鲁思塔苦八兹（Rustakubādh）；此后该地就被称作阿思喀儿·木可兰，于是在阿拉伯兵营附近兴起来了这座新城（阿思喀儿·木可兰城），现在该名在地图上已无法查到，但旧城遗址被标为“沥青堤坝”（Band-i-Kīr），这里就是阿卜·噶儿噶儿（即麻思鲁坎）运河汇入喀伦河之地。伊斯兰历4

世纪（10世纪），阿思喀儿·木可兰城是座横跨麻思鲁坎运河两岸的城市，但西城区较大，并有两座大浮桥与另一城区相连。这座城市有良好的市场，西城区还有聚礼清真寺，但该地颇为不足之处就是遍布着大量的剧毒蝎子。据穆思套菲记载，波斯古城被以萨普儿二世国王之名称作卜儿吉·沙普儿（Burj Shāpūr）城，因该国王重建和扩建了此城；穆思套菲说这座城在他那个时代通常用波斯语称作剌失喀儿（Lashkar）城，意为“兵营”，他还称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这是忽兹思田地区所有城市中最为宜人的城市。

据伊本·塞剌皮昂和其他早期著述者记载，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麻思鲁坎运河并没有在阿思喀儿·木可兰城汇入都加伊勒河，而是各流其道，且麻思鲁坎运河与都加伊勒河的主河道平行，并一直南流到潮汐河口。上一世纪（9世纪），据伊本·豪喀尔记载，他亲自沿麻思鲁坎运河河道而下，发现其河床在枯水期水位很低，他所经路线是从阿思喀儿·木可兰城到阿合瓦兹城的道路；他说最初的6里格是乘船，此后的4里格则是干涸的河道，只能骑马而行。麻思鲁坎运河下游的旧河道现在已无踪迹，因经过1000年的时间，其位于冲积扇地区的河道已完全变为平地。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都加伊勒河在阿合瓦兹城南变宽的地方，被称作纳赫儿·思得剌（Nahr-as-Sidrah）河（意为“菡萏河”），其接纳了多条支流后，一直流到喜森·马赫迪（Hisn Mahdī）堡，该堡位于喀伦河潮汐河口的顶端附近。[13]

途思塔儿城西北8里格，在去往底兹夫儿城的道路上有现在称作沙哈八（Shāhābād）的遗址，这就是君代·撒卜儿（Junday Sābūr）或君底·沙普儿（Jundī Shāpūr）城的城址所在地。萨珊王朝统治时期，君代·撒卜儿城曾是忽兹思田地区的首府，晚至哈里发满速儿时期，该城以基督徒医生卜合·亦舒（Bukht-Yishū`）所建的伟大医学院而闻名，其父、子与孙都得到了阿拔斯王朝多位哈里发的支持而获得崇高的地位。此城附近也以产糖而闻名，这些糖外销到呼罗珊和遥远的东方，但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称君代·撒卜儿城由于曲儿忒人的侵袭已毁。这里的刺绣非常有名，还盛产大米；此城中可以看到萨法儿王朝来思（Layth）之子雅苦卜（Ya`kūb）[14]的陵墓，其卒于伊斯兰历265年（878年），他以此城作为他的首都。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穆思套菲记载，君底·沙普儿城还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以产甘蔗而闻名，但今天这里仅留下几乎无人居住的遗址。

底兹夫儿（Dizfūl，即Diz桥，或城堡桥）城，位于君代·撒卜儿城以西的底兹（Diz）河[15]岸边。该城之名取自一座著名的桥梁，据说这座桥是萨珀尔二世修建的，伊斯塔赫里称之为坎塔拉·安答密失（Kantarah Andāmish）桥。其遗迹尚存。这座城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也被称作喀思儿·鲁纳失（Kasr Ar-Rūnāsh）城；穆喀达思有时仅称其为坎塔拉（Al-Kantarah，即桥）城。该城及其桥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因而，伊本·塞剌皮昂则称其为坎塔拉·鲁迷（Kantarah-ar-Rūm，即罗马桥）城，并将底兹河称作君代·撒卜儿（Junday Sābūr）河。伊本·鲁斯塔将该城称作坎塔拉·鲁兹（Kantarah-ar-Rūdh，即河桥）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则记载为坎塔拉·扎卜（Kantarah-az-Zāb）城，他所称的扎卜（Zāb）应是底兹（Diz）河之名称。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穆思套菲记载，这座桥有42孔，长320步，桥面宽15步；他说此桥叫安答儿密失（Andālmishk，或Andāmish）桥。

底兹夫儿城占据了河流的两岸，城北有一条凿穿东边岩石而流过的运河，其河岸有机械装置推动的大水车，水车可将水升高50腕尺，以给城市居民提供用水。底兹夫儿城周边的草原很著名，这里盛产水仙。据阿里·亚兹底记载，该河名为札儿（Zāl）河，并说底兹夫儿（Dizfūl，他用波斯语写为Dizpul）城附近的桥有28个大拱形，还有27个小拱形，每两个大拱形之间有一个小拱形，共计55个。一份现代地图资料显示当今的底兹普儿（Dizfūl）河在班底·吉儿（即阿思喀儿·木可兰）城的对面汇入喀伦河，但在早期这条河肯定在此城稍南汇入都加伊勒河，而且很可能该河的上游河道比今天更靠近君代·撒卜儿城。中世纪时在这条河与都加伊勒河汇合处，可能到阿合瓦兹城以北，有两个称作大、小麻纳兹儿（Manādhir）的肥沃地区，还有其主要城镇，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些城市周边有椰枣树林并盛产粮食。[16]

中世纪初，底兹夫儿城和途思塔儿城北边和东边的地区称作罗耳平原（Sahrā Lur），这里曾居住着罗耳（Lur）部落，后来这些部落迁到多山的大、小罗耳地区，小罗耳地区就位于吉八儿地区，这些内容已在第十四章做了叙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的记载已充分证明（大、小）罗耳地区当时已有居民移入，因他称在附近地区居住着曲儿忒人，还说尽管罗耳地区是崎岖的山地，但极其富庶。[17]

底兹夫儿城的西南是速思（Sūs）城遗址，即古之速萨（Susa），靠近喀儿哈（Karkhah）河岸边。在中世纪时期，速思城是一座繁华的

城市，是拥有众多城市的地区的中心，这里以产生丝和柑橘而闻名，同时也盛产甘蔗。此城由一座古城堡守卫，城里有很好的市场，市场内还有一座用圆柱建成的聚礼清真寺。据说先知但以理（Daniel）的墓就在喀儿哈河的河床上，这条河一直流到速思城边，岸边有一座漂亮的清真寺，距离前文提到的墓地最近。据穆思套菲记载，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这是座繁华的城市，他提到了位于城西的但以理先知墓（显然在陆地上），还说由于该先知之故，没有人去打扰河中的鱼。附近有喀儿哈（Karkhā）或喀儿哈城，现在以此名来称呼流经速思（Sūs）山丘的河流，此城位于该河的右岸或西岸，且与山丘之北还有一段距离。据穆喀达思记载，这是座不大但繁华的城市，在每周的星期日举行集市。该城由一座城堡守卫，城市周边为果园。[18]

早期的地理学家提到了位于喀儿哈河岸边或沿岸附近的很多城市，有的在速思城西，有的在该城以南。这些城市在中世纪很重要，但在现代地图中已无法查到。在道里志中大致提到了这些城的方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八辛纳（Basinnā）城[19]，位于距速思城南一天路程的一条运河的岸边（或可能在喀儿哈河的一条小支流的岸边），这条运河被称作八辛纳（Basinnā）的都加伊勒（小底格里斯）河。八辛纳城是贸易通衢，这里生产的头巾享誉于伊斯兰世界；这里也产漂亮的毡毯，毛纺是这里的主业。两座城堡守卫着该城，聚礼清真寺位于城门边上，离河岸有一箭之地；据穆喀达思记载，修建在驳船上的7座磨坊漂浮在“小底格里斯河”上。靠近八辛纳城，距速思城有一天路程，可能在喀儿哈河之西的就是拜鲁忒（Bayrūt）或必鲁兹（Bīrūdh）城[20]，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亚库特访问过该城。穆喀达思称这是一座大城，周边是椰枣林，由于商业繁荣，被称为“小弼斯啰城”。

麻土（Mattūt）或麻土思（Mattūth）城[21]有一座坚固的城堡，也位于这一附近地区；其距速思城南有9里格，在阿合瓦兹城和苦儿苦（Kurkūb）城[22]之间的道路上。苦儿苦城是颇为重要的城市，在速思城和亦剌可地区的乞卜（Tīb）城[23]中间，其距速思城有一天之程，距八辛纳城有两天之程，这里盛产著名的速三吉儿（Sūsanjird）刺绣。该地区还有一座城就是都儿·剌思必（Dur-ar-Rasibī）城，其位置尽管无法确定，但大致在喀儿苦城以北。据亚库特记载，都儿·剌思必城位于乞卜城和君代·撒卜儿城之间。这个都儿（Dur）城因是剌思必（Ar-Rāsibī）的出生地和居住地而闻名，他曾是哈里发木可塔底儿（Muktadir）[24]在位时期半独立的总督，长期统治着从瓦夕的城到沙祖儿（Shahzūr）

城之间的所有地区，卒于伊斯兰历301年（913年）。他以巨富而著称，死后留下了很多财产和物品，亚库特详细记述了列有这些珍奇财产的清册。[25]

差不多与阿合瓦兹城处于同一纬度的哈委札城（Hawīzah，或Huwayzah，缩写Hūz或Hūz，如前所述此名是这一地区的民族的名称）[26]附近发源了很多河流，这些河流汇入喀儿哈河，据穆思套菲记载，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哈委札城是忽兹思田地区诸城中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这里盛产粮食、棉花和甘蔗等，在那个时期，该城的主要居民是萨比（Sabæan或Sābian）教徒。纳赫儿·乞剌（Nahr Tīrā或Nahr Tīrīn）城位于与之同名的河流或运河岸边，其就在喀儿哈河下游右岸的一条支流的岸边，必定也属于哈委札地区。此城距阿合瓦兹城之西有一天之程，在通往瓦夕的城的道路上，这里产与报达城类似的有名织品。

从西边而来的喀儿哈河在阿合瓦兹城南汇入都加伊勒河，如前所述，这条河的河道可能就在此处变宽，被称作菡萏河（Narh-as-Sidrah）。导剌（Dawrak）河或运河从（阿合瓦兹城）东边稍南汇入（都加伊勒河），岸边有与之同名的导剌城[27]，是速剌（Surrak）地区的首府。这座城的全称为导剌·弗尔思（Dawrak-al-Furs，即波斯人的导剌）；此城很大，城内有商品琳琅满目的、很好的市场，从法儿思地区和起儿漫（Kirmān）地区来的朝觐者大部分要取道该城到麦加朝觐。这里生产的面纱很有名。其聚礼清真寺在市场内，在河岸边有很多小村庄。该地探明有黄色硫磺矿，其附近有硫磺温泉，患者在泉中洗浴，便可治愈。这些对皮肤病有特效的泉水是从一条山涧流出来的，水量可填满两个大池子。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伊本·木哈儿哈儿记载，在导剌城还可以看到萨珊王朝时期的精美建筑及一座祆教祠。

据穆喀达思记载，在这一地区，与导剌城邻近的还有密剌吉阳（Mīrākiyān）城[28]和密剌思阳（Mīrāthiyān）城[29]。密剌吉阳城位于一条潮汐运河的岸边，周边有良田；密剌思阳城有两个城区，每个城区有一座聚礼清真寺和很多繁华的市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忽兹思田地区沼泽南边的大部分水通过导剌城南流的河道，在八思阳（Bāsiyān）城[30]流入波斯湾。亚库特和可疾云尼均提到该城（导剌城）附近有小海湾和导剌吉思田（Dawrakistān）岛，这里是从印度来的船舶抛锚停泊之地。有一座城堡守卫着该城，哈里发的政治犯就关押在城堡里，目的是让这些人远离政治；至迟到伊斯兰历7世纪（13世

纪），船舶能够从这里北上，经过流向都加伊勒河东边的一系列运河或河流，可到达阿思喀儿·木可兰城。[31]

阿合瓦兹城南的都加伊勒河迅速变宽，成为潮汐河口，这就是菡萏河的下游。河口岸边有速可·八哈儿（Sūk Bahr）城[32]，直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中叶哈里发木可塔底儿在位时期，这里还设有收税站，征收繁杂和不合法的税费。速可·阿儿八阿（Sūk-al-Arba`ā，即星期三市场）城在（速可·八哈儿城）附近，位于都加伊勒河以东的一条运河的岸边，这条运河将该城的城区分成两部分，两城区之间有一座木桥相连。速可·阿儿八阿城的东城区较为繁华，这里有一座清真寺。邻近的朱八（Jubbā）城[33]周边以产甘蔗而闻名，该城附近的地区有很多村庄。

都加伊勒河河口宽阔水域的顶端有一座叫喜森·马赫迪的城堡，在该堡卫所（Rubāt）中央建有一座清真寺，据说该堡为诃论·剌失德之父哈里发马赫迪所建。喜森·马赫迪堡以北几英里就是八阳（Bayān）城[34]，该地是都加伊勒河河口的顶端与“盲底格里斯河”的汇合处，向西流的阿祖底（Adudī）运河在这里分出，该城周边就是萨卜哈（Sabkhah）地区，或称盐碱地区（见原文第三章第48页）。法亦·都加伊勒（Fayd-i-Dujayl）河或都加伊勒河河口的河水在撒里茫（Sulaymānān）城[35]流入波斯湾，这段航道对航行的船只来说非常危险，之后的航程显然安全多了，船只经八思阳城北上，途经很多运河和河道，到达导剌城，而后进入菡萏河，再到达阿合瓦兹城。喜森·马赫迪城堡的确切位置尚不清楚，但从已知材料来看应位于很多道路的交汇处，并扼守都加伊勒河河口上游，这里的河面差不多有1里格宽，发源于哈委札地区的很多河流与发源于西北和东部的导剌河在此处稍南汇入（都加伊勒河）。此处以北就是菡萏河的起点，向北可达阿合瓦兹城，距喜森·马赫迪城堡有20里格。[36]

阿合瓦兹城往东3天之程就是蓝忽里模子（Rāmhurmuz）城[37]，至今仍用此名，该城以忽里模子（Hurmuz）国王之名命名，他是阿儿达喜儿·八卜甘（Ardashīr Bābgān）之孙。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该地以养蚕而闻名，生丝大量外销。蓝忽里模子城有一座优美的聚礼清真寺，以及很好的市场，该市场为白益王朝君主阿都·道剌所建。穆喀达思称该城的布商、香水商和织毯者的各种店铺，在夜晚上锁后很安全。他还说这里有一家很有名的图书馆，在这里演讲者可以做演讲，这家图书馆是一个叫伊本·萨瓦儿（Ibn Sawwār）的人捐建的，他在弼斯啰城捐

建了同样的一座图书馆。蓝忽里模子城从塔卜（Tāb）河引来的一条运河中获得供水，但这条河到了夏季往往会干涸，据穆喀达思记载，这座城到处都是蚊子，蚊帐是一件必备品。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称蓝忽里模子之名常简称为剌木兹（Ramuz）；这座城仍是繁华的都市，其所在地区盛产粮食、棉花和甘蔗等。

蓝忽里模子城东南6里格，即在通向阿剌建城的道路上，且距作为法儿思地区边界的塔卜河不远就是豪麻（Hawmah）或祖忒（Zutt）地区，又称印度迁来的贾忒（Jāt）部（据说就是吉普赛人）所在地。祖忒地区从塔卜河获得供水，这里还有两个人口稠密的大村庄，叫祖忒（Az-Zutt）村和哈八兰（Al-Khābarān）村。过了这里，就是阿萨（Asak）小城[38]，其靠近法儿思地区边境，距阿剌建城不到2程，在从阿剌建城到导剌城的道路上，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该地有一个小火山。城市隐没在棕榈树丛中，这里盛产葡萄汁（dūshāb），供外销。阿萨城附近有萨珊王朝的建筑遗迹，有一座大阿亦万（Aywān），即穹顶大殿，高100腕尺，由国王苦八兹（Kubādh）环绕一处泉水而建。阿萨城东，距阿剌建城不到几英里，在横跨塔卜河的桥梁之西，就是位于该地区中央的三必儿（Sanbīl）[39]市场城，而该地区与法儿思地区接壤。[40]

（大、小）罗耳（Lur）地区位于途思塔儿城的东部和北部，包括都加伊勒（即喀伦）河上游与其支流的沿岸地区。该地区一直延伸到喀伦河上游的东部和南部（在这里，该河形成了一个大拐弯，来回折转两次，源头在亦思法杭城西部的山区，位于途思塔儿城以北，最后该河南流，注入波斯湾）。据穆思套菲记载，大罗耳地区一直延伸，并越过法儿思地区边界到达舒里思田（Shūlistān）地区[41]。大罗耳地区首府为夷札吉（Īdhaj）城[42]，别名麻儿·异密（Māl-Amīr）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穆喀达思记载，该城是忽兹思田地区最优美的城市之一；其靠近山区，这里的总督府建在一个叫阿萨八答（Asabādād）的地方。此地冬季降雪充沛，到了夏季可将储存的冰雪运到阿合瓦兹城出售。该处的土地靠雨水灌溉，阿月浑子树产优质的果仁。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伊本·白图泰曾访问过夷札吉城[43]，并说该城通常被称作麻儿·异密（Māl-al-Amīr，即异密的财产），至今这一名称仍在使用，而夷札吉之名现在已很少使用了。

夷札吉城尤以横跨在都加伊勒河上的大石桥而闻名，亚库特称该桥是世界的奇迹之一。这座遗址尚存的桥梁，称为坎塔剌·忽剌·札

（Kantarah Khurrah Zād）桥，是以国王阿儿达喜儿的母后的名字命名的，这是座单孔桥，横跨在深山峡谷中，距水面有150腕尺。该城以南2里格的峡谷中有一处巨大、凶险的漩涡，称作凡·八瓦（Fam-al-Bawwāb，即守门人的口）。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白益统治者鲁昆·道剌的宰相耗时2年才将这座大桥修建完成。其石料由铅与铁合金的铆连接，据说该工程耗资15万迪纳（约75000英镑）。亚库特说夷札吉城附近地区是地震频发地带；这里有很多矿藏，其中有一种叫苦喀里（Kūkalī）的强碱，医治痛风病有奇效。他还说夷札吉城还有一座古袄教祠，诃论·剌失德在位时期该祠常受到袄教徒的朝拜供奉。

位于夷札吉城西北4里格，横跨河之两岸的城市就是称作速三（Sūsan）的小城[44]，别名为阿鲁（`Arūj或`Arūh）城。该城周边有成片的果园，产葡萄、香橼和柑橘等，穆思套菲说该城距山区只有4里格，到了夏季可以看到山上的积雪。阿朱吉或速三城也称作贾八剌（Jabalāk）城，有些文献记载此地是《圣经》里提到的但以理（Daniel）的“舒善（Shushan）宫殿”所在地。麻儿·异密城以东约150英里，靠近苦伦河最东边支流，紧挨法儿思地区边界的就是罗耳建（Lurjān，又称Lurdagān或Lurkān，这些名称均是罗耳之名的全称）城[45]。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该城是萨儿丹（Sardān），或萨儿丹（Sardān）地区的首府，是绿树成荫的宽敞城市。穆思套菲对该城附近出产的葡萄大加称赞，但该城常划入邻近的法儿思地区。[46]

忽兹思田地区的重要产品是蔗糖，因这里几乎所有地方均产甘蔗，穆喀达思说，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整个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等地只能见到从忽兹思田地区运来的蔗糖。他说该区首府阿合瓦兹城以生产独特的方巾而闻名，这种方巾主要供妇女使用；途思塔儿城产闻名天下的织锦（Dībāj）和小毯及上乘的布料。途思塔儿城附近也产供外销的各种瓜果，尤其是香瓜。速思地区是甘蔗的专产地，速思城还外销大量的蔗糖；该地也纺织丝绸和棉织品[47]。阿思喀儿·木可兰城制作一种生丝面纱和手帕，还产布料。八辛纳城以制作窗帘而闻名；苦儿苦城以产毡毯而闻名；纳赫儿·乞剌城以产大幅面纱而闻名。[48]

忽兹思田地区的所有河流和运河均可通航，而且绝大数城市间的交通往来是靠水路。以阿合瓦兹城为中心的道路有：旅行者可从弼斯啰城，或沿阿祖底运河的水路起程，或从乌剌城对面的阿思喀儿·阿卜·贾法儿（`Askar Abu Ja`far）城，越过盐沼（Sabkhah）的陆路，到达喜森·

马赫迪城堡；再经速可·阿儿八阿城到达阿合瓦兹城。[49]

在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的著作中，对忽兹思田地区各城市间的道里做了极其详细的记载。一条从阿合瓦兹城起程的道路向西通往纳赫儿·乞剌城，而后到达亦剌可地区的瓦夕的城。首府往北的道路经阿思喀儿·木可兰城到达途思塔儿城，接着经君代·撒卜儿城和速思城，向西到达乞卜城，从这里又有一道到达瓦夕的城。

穆喀达思记载了从君代·撒卜儿城起程经罗耳山区到达位于吉八儿地区亦思法杭城西北的古儿派干（Gulpaygān）城的道路。另一条从阿思喀儿·木可兰城起程的道路（据库达玛和其他人的记载），向东到达夷札吉城，然后越过山区到达亦思法杭城。[50]

从阿思喀儿·木可兰城和阿合瓦兹城起有两条道路可到达蓝忽里模子城，此后继续沿着法儿思地区边界向东可到达塔卜河河岸，河之对岸就是阿剌建城。库达玛和其他多数著述者记载的道路是从弼斯啰城到昔剌思城的道路的一部分。伊斯塔赫里还记载了另一条道路，主要为水路，此道从喜森·马赫迪城堡到阿剌建城，经过沿海的八思阳城到达导剌城，而后经阿萨（Asak）城，再到达阿剌建城。穆喀达思记载了从蓝忽里模子城向北到夷札吉城的驿站，他也记载了一条从蓝忽里模子城起程，越过罗耳山区到达亦思法杭城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从罗耳（Lur）平原（底兹夫儿城北）经撒卜儿合瓦思（Sābūrkhwāst）城，到喀喇吉·阿卜·都剌费城，这条道路只记载了里程，但其驿站即使现在也很难确定。穆喀达思记载的第三条道路则从阿剌建城起程向北，越过山区，沿着忽兹思田地区和法儿思地区边界，经7天的行程，到达亦思法杭城南的速麦兰（Sumayram，在法儿思地区）城。[51]

[1] 忽兹思田见地图二，原文第25页。

[2]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4页将都加伊勒河称作舒思塔儿河。译者。

[3] 今此城名已不存，卡伦河自舒什塔尔分为两支，大致在今小鲁斯塔尼（Rustani）村重新汇合，该城在汇合处的东岸。译者。

[4] 今为迪兹（Dez）河，发源于扎格鲁斯山脉，流经迪兹富勒城，最后汇入卡伦河，全长400公里，该河下游是伊朗西南部的重要农业区，也是丝绸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5] 今为哈尔赫赫（Karkheh）河，曾是卡伦河西边的重要支流，发源于扎格鲁斯山脉，现在是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界河，发生改道后在阿瓦士西边向西流，注入底格里斯河。译者。

[6] 今在胡齐斯坦省舒什（Shūsh）州州府舒什城附近，这里是向南去阿瓦士和向北到迪兹富勒，以及去往伊拉克的重镇。译者。

[7]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ī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32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90、9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496、55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04、214、215、216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286页。

[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06、41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10～413页；第4卷，第96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9页。

[9]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51页提到了图斯特尔（途思塔儿）城，并称："这是一座风光明媚的城市，花园、菜圃相连，十分秀丽，市街紧凑，是一座古城。""全城由所谓蓝河环绕，该河是一奇景。""该城有一座城门专供商旅进出，其他城门通至蓝河，沿岸皆是花园水车，河水颇深。""图斯特尔的水果很多，资源丰富，市场之美无与伦比。"其中还提到了第四代什叶派依麻木宰尼·阿比丁的墓。今为舒什塔尔，是伊朗胡齐斯坦省舒什塔尔州州府所在地，位于卡伦河岸边，全州人口19万。此城是去往波斯湾的重要水陆通道，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这里留存有很多古代遗迹，尤其是运河体系。译者。

[10] 罗马皇帝，253～260年在位，死于萨珊王朝的监牢中。译者。

[1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9、9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2、174、17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05、40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84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8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4页。有关瓦勒然的事迹和萨珀尔一世修建的大堤坝，见塔巴里的记载（第1卷，第827页），他非常准确地记载罗马皇帝的名字为阿拉里彦努斯（Alariyānūs，希腊语形式为Οὐαλεριανός），马苏迪错误地将这些事件记载为萨珀尔二世在位时期发生的事。

[12]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4页提到了麻思鲁坎河。该书记载："该河从舒思塔儿河分出，流到阿合瓦兹城，灌溉所有的土地；余下的河水在阿合瓦兹城附近流回舒思塔儿河。阿思喀儿·木可兰城就在这两条河之间。"译者。

[13]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

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32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90、9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2、173、17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09、411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588、591、599页。Hfz.，82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9、17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11、412页；第2卷，第676页。哈木扎（Hamzah），第47页。

[14] 雅苦卜（Ya'qūb-i Layth-i Saffārī），萨法尔王朝（861～1003年）的第一代君主，861～879年在位。译者。

[15] 今为迪兹（Dez）河，发源于扎格罗斯山中段，向南流，在阿瓦士城北40公里处注入卡伦河，长约400公里。其岸边有苏萨（Susa）埃兰古城和卡拉（Qaleh）城堡。伊朗纵贯南北的铁路（德黑兰至波斯湾）有一段便沿这条河流的河谷修建。1945年后，在迪兹富勒以北的地方修筑了高大的水坝，形成了长约105公里的水库，用以灌溉该河下游的土地。译者。

[16]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90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176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93、95、19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6、177、259页。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84、405、408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6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30页；第4卷，第11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9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588、591页。名叫卜合·亦舒（Bukht-Yishū`）的医生，“他们很多虽是基督徒，但作为宫廷御医从满速儿哈里发到诃论·剌失德哈里发时期都服务于阿拔斯王朝”。见伊本·阿比·兀赛比阿（Ibn Abi Usaybī`ah）的著作，穆勒编辑（A. Müller），第1卷，第125～143、202页。

[1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8、9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1、17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09页。

[1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88、9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05、407、40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

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69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31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252页［此处将Karajah错印为喀儿哈（Karkhah）］。

[19]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舒什城以南30余公里的胡赛因阿巴德（Husainabad）城附近。译者。

[20]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八辛纳城西北，在舒什城西南30余公里处。译者。

[21]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拜鲁忒城之西北。译者。

[22]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23]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24] 阿拨斯王朝第十八位哈里发，908～932年在位。译者。

[2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71、17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9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05、40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656、786页；第2卷，第616页；第4卷，第65、412页。Hfz.，82b叶面。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313页。

[26] 今为霍韦伊泽（Hoveize），是胡齐斯坦省霍韦伊泽州州府，在与之同名的潟湖东岸，人口1.4万，是东西道路上的重镇。译者。

[27]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阿瓦士城南不远。译者。

[28]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29]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30]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波斯湾霍梅尼港（Bandar-e Emam Khomeyni）附近。译者。

[3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9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07、41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11页；第2卷，第371、618、62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9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30、246页。纳赫儿·乞剌城和麻纳兹儿（Manādhir）城在倭马亚王朝时期肯定是两个重要的地方，因在伊斯兰历90～97年（709～716年）两地是铸造钱币的城市。

[32]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33]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34]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35]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36] 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剌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30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93、9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2、17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12、41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85页；第2卷，第12页；第3卷，第193页。

[37] 今为拉姆霍尔木兹（Rāmhormoz），是胡齐斯坦省拉姆霍尔木兹州州府所在地，人口4.9万。此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伊朗西部的十字路口。译者。

[38]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39]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40]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92、93、9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82、19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1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6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69页。由于一个离奇的错误，亚库特（第2卷，791页）将祖忒（Az-Zutt）村写成了鲁忒（Ar-Rutt）的形式，但他完全熟悉祖忒［吉普赛（Gipsies）］，他还以该名称称呼一条运河。

[41] 《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33页载：“舒里［Shūl，等同于古里（Gūl）］是伊朗的一个部落，后来以这个部落的名字称所在的地区叫作舒里思田（Shūlistān）地区。”译者。

[42] 今为伊泽（Īzēh），是胡齐斯坦省伊泽州首府，人口10.3万，是该省东北部的重镇，也是交通要道，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译者。

[43]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52页载，该城“是阿塔比克苏丹的京城”。城里有很多道堂。译者。

[44] 今为苏散（Susan），是伊泽州苏散区区府所在地，在卡伦河岸边，全区人口1.6万，是东西交通的要道。译者。

[45] 今为洛尔代干（Lordegan），是恰哈马哈勒-巴赫蒂亚里（Chahār-Mahāl-o Bakhtiyārī）省洛尔代干州州府所在地，人口2.2万，是座古城，自古以来是交通重镇。译者。

[4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

卷，第103、12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5、17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07、413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0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16页；第4卷，第18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1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9页。有关速三城，可参照莱亚德（H. layard）爵士和罗林森（H. C. Rawlinson）爵士发表在*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1839年，第83页；1843年，第103页）上的内容。

[47] 《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17页载："徒兹（Tuz，等同于Ruz）是忽兹思田地区的一座城市。这里产一种叫徒兹（Tuzi）的布料，可以做大衣。"译者。

[48]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16页。

[49] 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35页。

[50]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9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

卷，第418～420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7、188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7页。

[51] 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4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8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9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7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01、420、453、459页。

第十七章 法儿思（Fārs）地区

法儿思（Fārs）地区分为5个区（州）或忽剌（Kūrah）。阿儿达喜儿·忽剌（Ardashīr Khūrrah）区。昔剌思（Shīrāz）城。麻哈鲁牙（Māhalūyah）湖。萨坎（Sakkān）河。朱外木（Juwaym）村。答失·阿曾（Dasht Arzin）湖。苦洼儿（Kuvār）城。哈比儿（Khabr）城和欣坎（Simkan）城。喀儿曾（Kārzīn）城和苦八·忽剌（Kubād Khurrah）区。贾合兰（Jahram）城。朱外木·阿卜·阿合马（Juwaym-i-Abu Ahmad）城。满底思田（Māndistān）沙漠。夷剌黑思田（Īrāhistān）城。朱儿（Jūr）或费鲁札八（Fīrūzābād）城。法儿思地区沿海诸区。凯思（Kays）岛。尸罗围（Sīrāf）港。纳歧兰（Najiram）城。塔瓦吉（Tawwaj）城。滚底建（Ghundījān）城。哈里（Khārik）和波斯湾的其他岛屿。

法儿思（又译法尔斯）地区是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的发祥地，也是该朝的政治中心区。希腊人将这个地区称作颇儿思（Persis），并错误地用这个中心地区的名称来称呼整个王国，这个误称传到了整个欧洲并一直沿用至今，我们西方人所使用的波斯[1]（Persia来源于希腊语的Persis）一词习惯用来指称整个沙（Shāh）帝国，而当地波斯人称其国家为伊兰（Īrān，即今伊朗）王国，所谓的法儿思地区，即古颇儿思仅仅是南部诸地区之一。阿拉伯人继承了萨珊王朝的行政管理体制，将法儿思地区分为5个大区，每个区都叫忽剌（Kūrah）；这种划分一直延续到蒙古人统治时代，为了便于理解，对此做一叙述。这5个区为：（1）阿儿达喜儿·忽剌（Ardashīr Khurrah）区，这个区有昔剌思（Shīrāz）城，是法儿思地区的首府和该区的主要城市；（2）撒卜儿·忽剌（Sābūr Khurrah）或沙普儿·忽剌（Shāpūr Khurrah）区，其主要城市为沙普儿（Shāpūr）城；（3）阿剌建（Arrajān）区，其主要城市为与之同名的阿剌建（Arrajān）城；（4）亦思塔赫儿（Istakhr）区，有采用该名［珀儿斯珀里斯（Persepolis）］的古城，这座古城曾是萨珊王朝法儿思地区的首府；（5）最后一个区，即答剌卜吉儿（Dārābjird）区，该区也有与之同名的主要城市。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哈里发王朝时期，法儿思地区还包括了亚兹得

（Yazd）城及其所在的地区和鲁赞（Rūdhān）地区［在现代的阿纳尔（Anār）城和巴赫拉姆巴德（Bahrāmbād）城之间］，这些区域均是亦思塔赫儿区的一部分。但被蒙古人征服以后，亚兹得区划入吉八儿地区，现在该区是克尔曼（Kirmān）地区的一部分，前文的鲁赞地区也是如此。忽剌（*Khurrah*）在古波斯语中含有“荣耀”之意；因此用阿儿达喜儿·忽剌和沙普儿·忽剌作为区名是对萨珊王国的创建者阿儿达喜儿及其子著名的撒卜儿或沙普儿，即希腊语所称的萨珀尔（Sapor）荣耀的纪念。后来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一般将法儿思地区分为两个区，即热（*Jurūm*）区与冷（*Sarūd*）区，并以一条东西走向的线为界；目前，我们发现从高地经关隘到沿海低地划出界线，以划分两个区的方法仍很普遍，两区分别被称为噶儿木思儿（Garmsīr）区，即热区，与萨儿得思儿（Sardsīr）区，即冷区，这种叫法也出现在穆思套菲的记载中。[2]

法儿思地区的首府昔剌思城是一个阿拉伯人建立的，由于哈里发奥马儿在位时期恰是穆斯林对外征服活动时期，昔剌思便成为派去攻打亦思塔赫儿（Istakhr）城[3]的军队的驻扎地。正如穆喀达思所说，昔剌思城作为城镇的先决条件就在于它所处的中心位置，此地距离各区边界均为60里格，距离该地区的四个角落则为80里格。据历史文献记载，昔剌思城于伊斯兰历64年（684年）由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建立，他是倭马亚王朝时期著名总督哈贾吉的弟弟或侄子；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后半叶，该城发展成为一座大城，当时的萨法儿王朝将其作为半独立王国的首都。据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文献记载，昔剌思城差不多宽1里格，并拥有狭窄而拥挤的市场。此城有8座城门：亦思塔赫儿（Istakhr）门、途思塔儿（Tustar）门、班达思田（Bandāstānah）门、噶三（Ghassān）门、萨兰（Sallam）门、苦洼儿（Kuvār）门、满答儿（Mandar）门和麻寒答儿（Mahandar）门。该城的用水是通过地下管道从西北5里格外的朱外木（Juwaym）村引来的。城里还有一家医院（Bīmaristān）和白益王朝的君主阿都得·道剌修建的宫殿，据《法儿思志》记载，他还在该城修建了一座图书馆。

这位白益王朝的统治者阿都得·道剌，别号法纳·忽思罗（Fanā Khusraw），在昔剌思城南半里格给自己修建了另一座宫殿，宫殿周边发展为一座新城，其以自己的名字将该城命名为喀儿·法纳·忽思罗（Kard Fanā Khusraw）城。这里重金打造了很多花园，其长有1里格；该城周边房屋居住着纺毛工、绣花工和其他工种的人员，这些工匠是白益王朝君主从边远各地迁到法儿思地区定居的。每年一次的节庆在喀儿·

法纳·忽思罗城举行，这里有段时间曾是造币城；这座城的辉煌并没有维持多久，至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末前，它就衰落了。该城一个叫速可·异密（Sūk-al-Amīr，异密集市）的外城区为众人所熟知，据说店铺每年的租金收入达20000迪纳（约10000英镑）。

昔剌思城的城墙最初是三三·道剌或算端·道剌（Samsām-ad-Dawlah，或Sultān-ad-Dawlah，分别是前文提到的阿都得的儿子和孙子）修建的，城墙起初厚8腕尺，周长为12000腕尺，城门多达11座。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中叶，该城的城墙被毁，而后木札法儿（Muzaffar）王朝的对手马合木·沙·引朱（Mahmūd Shāh Injū）[4]重修了此城墙，用砖块修建了棱堡。穆思套菲称，当时昔剌思城分17个城区，有9座城门。这些城门为：亦思塔赫儿城门、答剌（Dārak）或答剌·木萨（Darāk Mūsa）门（这是以距昔剌思城2里格远的同名山命名的，山中积攒在坑洼的冬季冰雪融水可供夏季使用）、拜札（Baydā）门、可咱隆（Kāzirūn）门、萨兰（Sallam）门、苦八（Kubā，有些抄本中称Fanā或Kanā）门、八卜·瑙门（Bāb-i-Naw，即新门）、八卜·道剌门（Bāb-i-Dawlah，即国家门）和八卜·萨阿答门（Bāb-i-Sa`ādah，即幸运门）。穆思套菲进一步详细记载说，昔剌思城是一座优美的城市，街市总是熙熙攘攘，但他也承认商业繁荣最终带来的是难以置信的财富。供水是通过著名的鲁昆·纳八（Ruknābād）渠获取的，该渠是前文提及的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之父鲁昆·道剌（Rukn-ad-Dawlah）[5]开凿的，该城还从萨底（Sa`dī）果园运河获得供水。春季从答剌（Darak）山倾泻下来的洪水流经该城，而后注入麻哈鲁牙（Māhalūyah）湖。

该城有三座清真寺：第一座为老寺—贾米·阿乞（Jāmi `Atīk），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后半叶由萨法儿王朝来思（Layth）之子异密（`Amr）[6]所建，穆思套菲称该寺常挤满了礼拜的人；第二座为新寺，由萨儿噶儿（Salghār）王朝[7]君主阿塔别·萨底·伊本·赞吉（Atabeg Sa`d ibn Zangī）[8]在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后半叶所建；第三座为麦思吉·孙苦儿（Masjid Sunkur）清真寺，位于“伯伯儿”（Barber）广场，由萨儿噶儿朝的第一位阿塔别所建。这里的阿都得·道剌医院依然存在，有什叶派信徒朝谒木哈马（Muhammad）和阿合马（Ahmad）的圣墓，他们是什叶派第七代依麻木木萨·喀兹木（Mūsā-al-Kāzim）的儿子。与穆思套菲同时代的伊本·白图泰对昔剌思城的记载也证实了前文的内容。他也谈到了老寺、称作“秀门”（Bāb Hasan）的北门、阿合马圣墓等，并称墓园中还有一所学校。他还盛赞穿城而过的5条河流；其中鲁昆·纳

八（Ruknābād）河发源于山区的“小城堡”（Al-Kulay`ah），河岸附近是诗人萨底（Sa`dī）[9]的陵园，四周是一片优美的果园。萨底卒于伊斯兰历691年（1292年），约比伊本·白图泰访问这里早50年。萨底在阿塔别·萨底（Atabeg Sa`d）之子阿塔别·阿卜·八可儿（Atabeg Abu Bakr）[10]的宫廷里受到礼遇，阿塔别·萨底就是修建该城的新寺和在萨底陵墓周边修建果园的人，这座陵墓常有人造访，陵园内有一个华丽的大理石洗衣池，是萨底修建的，在鲁昆·纳八河岸边。

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昔剌思城幸运地躲过了帖木儿的一次围攻，当时帖木儿在城外的帕乞剌（Pātīlah）平原打败了木札法儿王朝的诸王。据阿里·亚兹底记载，昔剌思城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因帖木儿扎营于名叫塔合忒·喀喇察（Takh-i-Karāchah）的花园里，其位于萨兰城门和萨阿答（Sa`ādah）城门之外，面向亚兹得（Yazd）城（东北）方向。这位作者还称其他8座城门当时是关闭着的，同时他也提到了昔剌思城附近的“红堡山”（Kūh Kal`at Surkh），但其所在方位不详。在昔剌思城附近诸多有名的城堡中，穆思套菲提到了建在一座独山上的喀剌·乞兹（Kal`ah Tīz）堡，其距昔剌思城东南有3里格。这座独山的山顶上还有一处泉水，另一眼泉在山下的平原，从这里行一日之程就是完全无水的沙漠。[11]

昔剌思城不靠大河，但如前文所述有几条小溪流向东边，后流入湖中，该湖位于平原的一个低洼地区，离城有几里格远。伊斯塔赫里称该湖为建坎（Jankān）湖，阿布·勒·费达和伊本·白图泰均称其为贾木坎（Jamkān）湖；在《法儿思志》和穆思套菲的记载中均称作麻哈鲁牙（Māhalūyah）湖，现在称作麻哈鲁（Māhalū）湖[12]。这是个咸水湖，岸边的盐田为昔剌思城提供了必需的食盐，湖中也盛产鱼。该湖周长有12里格，湖南毗邻喀合儿建（Kahrjān）区，东南则为豪里思田（Khawristān）城，别名为萨儿委思田（Sarvistān）城[13]，该城有大片的椰枣林，也产粮食，还产热带和寒带的其他作物。据《法儿思志》和穆思套菲记载，苦般建（Kūbanjān）城[14]是萨儿委思田城附近的一座小城。[15]

法儿思地区最长的河流为纳赫儿·萨坎（Nahr Sakkān）河[16]，其发源于昔剌思城西北30英里处，河水顺着曲折的河道向东南流了150多英里，而后经过一个大拐弯，接着又向正西方向流了150英里，这里河道弯曲，从北边而来的费鲁札八（Fīrūzābād）河的河水汇入，最终河水在

纳歧兰（Najīram）城[17]以南不远处注入大海（即波斯湾）。[18]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萨坎（Sakkān）之名源于萨可（Sakk）村，此村位于该河向西的大拐弯处；但其他文献将该河拼写为不同的名称，因此有思塔建（Sittajān）河、洒坎（Thakkān）河与司坎（Sīkān）河等名目，穆思套菲将该河记为札坎（Zakkān，或Zhakkān）河。《法儿思志》和后来的文献称这条河发源于麻萨兰（Māsaram）地区；伊斯塔赫里却称该河发源于鲁思塔·鲁委寒（Rustāk-ar-Ruwayhān）地区，该地在朱外木村和忽剌儿（Khullār）村南的平原上。这是两个重要的村庄，分别距昔剌思城5里格和9里格，位于通往瑙般建（Nawbanjān）城和答失·阿曾（Dasht Arzin）平原之北的道路上。如前文所述，朱外木村附近是昔剌思城诸溪流的源头之一。据穆思套菲记载，忽剌儿村以产磨盘而闻名，但当地人没有磨坊，于是不得不到别处去加工面粉。这里还盛产外销的蜂蜜。答失·阿曾（即苦杏仁平原）以其丰美的草原（Marghzār）和答失·阿曾（Dasht Arzin）湖而享有盛名，在雨季这个湖宽达10里格，这是个淡水湖，但在夏季湖水时常会干涸。据伊斯塔赫里记载，湖中盛产鱼，穆思套菲称此处附近的森林里有大量狮子出没。[19]

昔剌思城之南10里格，萨坎河流经喀洼儿（Kavār）或苦洼儿（Kuvār）城[20]，该城位于河之左岸。据穆思套菲记载，这里有座拦河的堤坝，用来抬高水位灌溉土地，其附近的草原也很有名。这里种植大量的酸梅和扁桃，还盛产石榴。经过苦洼儿城，在萨坎河的左岸是哈比儿（Khabr）城[21]，该地以有教义学家赛夷（Sa`īd）的陵墓而闻名，赛夷是哈散·八思里（Hansan-al-Basrī）之弟。穆思套菲说哈比儿城的规模比苦洼儿城大，附近有著名的乞儿·胡达（Tīr-i-Khudā，即主之箭）堡，其修建在一座山顶上，因人类所造的箭，射程无法达到那里而得名。在哈比儿城之南，萨坎河南流，弯曲的河道穿过欣坎（Simkān）地区，欣坎（Simkān）城[22]靠近萨坎河的左岸，在这里有一条大支流汇入该河，这条支流发源于东边的答剌卜吉儿（Dārābjird）城[23]附近。[24]

据穆思套菲记载，欣坎城是一座优美的城市，位于萨坎河岸边，河上横跨着一座桥；这里显著的自然特征就是该桥以北的各种果树只产温带的果品，如悬铃木果（Chinār）和坚果；桥以南则产柑橘、柠檬和热带的其他果品。这里酿造的酒的度数很高，饮用前还要与比酒本身质量多两三倍的水混合。该城不远处就是喜剌（Hīrak）村，是欣坎城郊区的一个大村庄。在萨坎河右岸附近，即欣坎地区之南有喀儿曾（Kārzīn）[25]、吉儿（Kīr）[26]、阿卜札（Abzar）[27]等三座城市，这

些城市周边的地区称作苦八·忽剌（Kubād Khurrah，忽八之荣耀）区，是为纪念萨珊王朝一位国王而命名的。伊斯塔赫里称喀儿曾城的规模相当于亦思塔赫儿（即Persepolis）城的三分之一。该城有一座很坚固的城堡，萨坎河的水被引入城堡内，这座城堡修建在一处很高的地方，从上面可以看到远处的很多城堡。[28]

贾合兰（Jahram，或Jahrum）城[29]位于欣坎城以南、喀儿曾城以东，周边是肥沃的平原，该城有时被划入答剌卜吉儿区。该城以名为喀剌·忽儿沙（Kal`ah Khūrshah）的大城堡而闻名，其离城有5里格，该堡最初由忽儿沙（Khūrshah）所建，他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统治时期贾合兰地区的总督，后来塞尔柱王朝著名宰相尼扎木·木儿可（Nizām-al-Mulk）重修该堡。[30]贾合兰城的东南是朱外木·阿卜·阿合马（Juwaym-i-Abu Ahmad，区别于萨坎河源头附近与之同名的朱外木村，见原文第253页）城，据穆喀达思记载，该城在小河岸边，周边是棕榈园，在悠长的街市上还有一座优美的清真寺。该区的西南是夷剌黑思田（Īrāhistān）城[31]，该城附近有座叫萨密兰（Samīrān，或Shamīrān）的坚固城堡，穆思套菲将该堡称作“盗匪和拦路抢劫者的巢穴”。该城周边地区是著名的草原，位于朱外木村和萨坎河河岸等之间的草原尤为闻名。这里还有很多静谧的湖泊和有狮子出没的森林。

由一座坚固城堡守卫的喀里阳（Kāriyān）城[32]，在朱外木村以西一程之地，该城有一座著名的袄教祠，祠内保存的古圣火被袄教祭司传送到各地。修建在山顶上的城堡固若金汤。喀里阳城以西，萨坎河大拐弯向西转的地方就是剌吉儿（Lāghir）城[33]，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称这是座重镇，这里当时距从昔剌思城南下到凯思（Kays）岛的商道有一站之地。剌吉儿城也和喀哈儿建（Kaharjān，或Makarjān）城[34]并提，但后者现在在地图上已无法查到。在剌吉儿城和海岸之间，处在萨坎河右岸和北边之地的就是满底思田（Māndistān）沙漠，其介于纳歧兰（Najīram）城和卜失喀纳（Būshkānāt）[35]城中间；这里没有永久性的村庄和河流，但穆思套菲称有时偶尔会降下大量的雨水，于是整个沙漠就可种植棉花和粮食等农作物，冬季之时，可获利1000倍。[36]

满底思田在中世纪被用来称呼这一地区的沙漠，其意为“满得（Mānd）之地”。这个称呼无疑以满得（Mānd）河之名保留下来，如前所述，该名现在指萨坎河的下游。大致在剌吉儿城和海岸中间，自主

河道的北边汇入一条重要的支流，即费鲁札八河。费鲁札八（Fīrūzābād）城[37]，古称朱儿（Jūr），在萨珊王朝统治时期，该城（后来的昔剌思城所在）曾是阿儿达喜儿·忽剌区的首府。伊斯塔赫里称这里的平原起初是一片湖泊，阿儿达喜儿国王排干了湖水，在人工土山附近修建了城市，称作乞儿八儿（At-Tirbāl，即瞭望）城，这座土山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尚存，其上面有一座建筑，波斯语叫作阿亦万（Aywān，即游廊），位于大平台上。此时，朱儿（Jūr）城的规模和伊斯塔赫里城一样，有城墙和沟壕，还有四座城门，即东面的八卜·密合儿（Bāb Mihr）门，对（西）面的八卜·缚伽浪（Bāb Bahrām）门，北边的八卜·忽里模子（Bāb Hurmuz）门，南边的八卜·阿儿达喜儿（Bāb Ardashīr）门。

朱儿（Jūr）之名，波斯语拼作古儿（*Gūr*），意为“冢”，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见到朝臣们图谋不轨的先兆后，便喜欢到这里来，据说这位异密（Amīr）居住在“墓冢”（Gūr）内。于是，朱儿城被重新命名为费鲁札八（Fīrūzābād，即福地）城，该名一直沿用至今。穆喀达思记载了这件事，并提到了费鲁札八城的大广场（*Rahbah*）和城里幽雅的玫瑰园，也记述了距该城有一程远的沃野良田。城里的用水是通过一条管道从附近的一座山里引来的，据波斯地理学家记载，距该城4里格有一座称作喀剌·萨哈剌（Kal`ah Sahārah，或Shahārah）的大城堡。伊斯塔赫里称费鲁札八河为乞儿札（Tīrzah）河；《法儿思志》和穆思套菲则将其记载为卜剌札（Burrāzah，或Barārah）河。该河发源于忽奈夫干（Khunayfghān）区，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围攻朱儿城时，改变了这条河的原初河道，用河水来淹没该城周边之地，结果这里形成了一个湖，后来，阿儿达喜儿国王在位时期，圣贤卜剌札（Burāzah）排干了湖水。这位圣贤后来修建了一条高架渠道，很便捷地将这条河的水引入城内，以后该河以他的名字称为纳赫儿·卜剌札（Nahr Burāzah）河。可疾云尼说在费鲁札八城有一座著名的袄教祠，他还提到了一股从城门附近涌出的神奇泉水；他还说朱儿城的红玫瑰闻名天下。如前所述，这一地区北部为忽奈夫干（Khunayfghān，或Khunayfkān）区，波斯语拼写为忽纳夫干（Khunāfgān）；该地山区有一个与地区同名的大村庄，道路从这里经崎岖、多石之地南到费鲁札八城。[38]

阿儿达喜儿·忽剌区的海岸，被称作思夫（Sīf，即海岸），而且有三个思夫，都在波斯湾沿岸的热带（Garmsīr）地区。这三个思夫分别称作：思夫·兀麻剌（Sīf `Umārah），位于凯思岛之东；思夫·祖亥儿（Sīf

Zuhayr），在夷剌黑思田城以南的海岸，距尸罗围（Sīrāf）港不远；思夫·木札法儿（Sīf Muzaffar），在那岐兰城之北。兀麻剌（`Urmārah）、祖亥儿（Zuhayr）和木札法儿（Muzaffar）是三个阿拉伯部落的名称，其从波斯湾的另一端跨过海湾到达北边的海岸，并在法儿思地区定居下来。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思夫·兀麻剌（Sīf `Urmārah）港以有一座靠海、名为喀剌·底可丹（Kal`ah-ad-Dīkdān或Dīkbāyah）的坚固城堡而著称，此堡又称喜森·伊本·兀麻剌（Hisn Ibn `Umārah）城堡，在这里有20艘船负责守卫港口的安全，而且只有通过穿过城墙的浮桥才能进入城堡内部。从这里（港口）向西不远就是凯思岛，波斯人将其拼写为吉失（Kīsh）[39]，自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尸罗围港被毁后，该岛成为整个波斯湾的贸易中心，对此现做一叙述。在凯思岛上，修建有一座带城墙的大城，城里修建了很多储水池，附近的海岸以产珍珠而闻名。从印度和阿拉伯来的船舶就汇聚于该岛的港口，全岛到处都是棕榈园。可疾云尼说夏季这里比浴室（Hammām）中最热的房间还要热，但凯思（Kays）城[40]仍是一座人口非常稠密的城市。这座岛距（波斯湾）海岸有4里格，海岸上的装卸港就是忽组（Huzū）港[41]，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该港与一条从昔剌思城向南经剌吉儿城的商道相连。据亚库特记载，虽然当时忽组城绝大部分已毁，但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白益王朝统治时期这里还有一座坚固的城堡，并被当作国家监狱。该城附近有一个叫萨委牙（Sāviyah）的村庄［在不同的抄本中写法不一，有时写为塔八（Tābah）或塔纳（Tānah），准确的读法不明］。[42]

沿思夫·兀麻剌地区海岸向西就是祖亥儿（Zuhayr）[43]海岸地区，其首府为内陆的俱兰（Kurān）城[44]，尸罗围港和纳班（Nāband）港[45]则是其著名港口；这一地区经萨坎河河口延伸，远至纳岐兰城。该地的内陆就是夷剌黑思田（Īrāhistān）区。据伊斯塔赫里记载，俱兰城附近产一种可食土，颜色为绿色，味如甜菜根。穆思套菲将俱兰城划入夷剌黑思田区，并说其地只产椰枣。此地正南就是密满（Mīmand）区和密满（Mīmand）城[46]，其距纳班港不远，该港位于称作豪儿·纳班（Khawr或Khalīj-i-Nāband）[47]的小海湾的顶端。据穆思套菲记载，密满地区盛产葡萄和其他热带水果，这里的能工巧匠很有名。[48]

沿海岸北上在纳班城的西北就是尸罗围港，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座港是波斯湾的主要商业中心，但凯思港兴起后将其取代。伊斯塔赫里说尸罗围城的规模与气势和昔剌思城差不多；这里的民居由从

赞吉［Zanj，即今桑吉巴尔（Zanzibar）］运来的柚木建成，高有好几层，从其上面可瞭望大海。据一位作者记载，他认识的一位商人为修建住宅花费达30000迪纳（约15000英镑），尸罗围城的商人是法儿思地区最富裕的，经商者可获得6000万底儿罕（约200万纯银英币）的财富。该城附近没有果园，水果和其他产品都是从建木（Jamm）[49]山区运来的，此山区有座叫萨密兰（Samīrān）的大城堡。穆喀达思说尸罗围城在商业上可以和弼斯啰城一争高下；这里的民居是他所见过的最优美的民居，但在伊斯兰历366年或367年（977年）发生了一次连续7天的大地震，结果部分城区被毁，后随着白益王朝的灭亡，这里也衰落了。《法儿思志》称该城（尸罗围城）的最终毁灭与凯思岛的异密（Amīr）鲁昆·道剌·忽麻儿特勤（Rukn-ad-Dawlah Khumārtagīn）的影响有关，虽然他命令仍然在尸罗围港建造战舰，但将凯思岛作为港口；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亚库特来到尸罗围港时，这里只有一座柚木柱的清真寺，城市遗址只能从海边附近的峡谷中去寻访。尸罗围港淤塞后，船只向东航行到纳班港避风。亚库特还说在他那个时代尸罗围（Sīrāf）之名被当地人拼读为失剌兀（Shīlāv）。

纳歧兰（Najīram）港是尸罗围港西边一个相当重要的港口，位于萨坎河河口对岸，在木札法儿（Muzaffar）海岸开始的地方，这个海岸地区一直延伸到阿剌建·忽剌（Arrajān Kūrah）区的贾纳八（Jannābah）城[50]。据穆喀达思记载，当时那歧兰城有两座清真寺，还有极好的市场和储存雨水的水池。答思塔坎（Dastakān）区也属于思夫·木札法儿海岸地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里的首府叫萨法剌（Saffārah）城[51]。该区显然在贾纳八城附近，但萨法剌城的确切位置尚不清楚。[52]

靠近阿剌建（Arrajān）区边界，在沙普儿（Shāpūr）河注入的地方，距其河口不远，也可能位于后文所提及的与吉剌（Jirrah）河汇合处的北边是商业重镇塔瓦吉（Tawwaj，或Tavvaz）城[53]。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斯塔赫里称该城规模和阿剌建城差不多；其位于一条地势较低的峡谷里，气候异常炎热，这里长满了棕榈树。塔瓦吉城是贸易大都会，所产的绣有金线的各色亚麻织品很有名。流经该城附近的沙普儿河常称作塔瓦吉（Tawwaj）河[54]；据说该城的居民主要是叙利亚阿拉伯人，是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带到这里的。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塔瓦吉城大部分已毁。该城的确切位置无法确定，但大致应在沙普儿河河岸或附近的峡谷中，离靠近海岸的贾纳八城有12里

格，距从答里兹（Darīz）城[55]向南的关津之地有4里格。在穆斯林征服初期，塔瓦吉城是座名城，这里清真寺的修建时间可追溯到很早；但在穆思套菲所记载的时期，该城已完全被毁。

邻近该城（塔瓦吉城）的重镇是位于答失忒·八临（Dasht Bārīn）区的滚底建（Ghundījān）城[56]。滚底建城的遗迹现在显然已不复存在了，但据《法儿思志》记载，其所在位置距吉剌（Jirrah）城[57]有4里格，距塔瓦吉城有12里格；该著作称吉剌河沿着“滚底建城的一部分”流过。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该城的规模和亦思塔赫儿（即Persepolis）城，或贾纳八城差不多；这里属于热带地区，产地毯和头巾。据穆喀达思记载，滚底建山区有一条冒着毒热气的河流，无人敢接近，飞禽越过这条河就会窒息死亡，但这里还有很多可治疗疾病的矿物温泉。据穆思套菲记载，滚底建城的居民多半是鞋匠和纺织工，在他那个时代，当地人通常称呼这一地区为滚底建区，不称答失忒·八临区。该城附近还有一座叫喀剌·兰·札万（Kal`ah Ram Zavān或Dam Darān，以及其他各种名称）的坚固城堡，这里建有储备水的大水池。卜失喀纳（Būshkānāt）区位于滚底建区与纳歧兰城北的满底思田沙漠（见原文第255页）间的中部。据穆思套菲记载，卜失喀纳区没有城市，但可种植椰枣，这是该地的主要产品，因这里是海湾的热带地区之一。[58]

哈里（Khārik）岛[59]位于沙普儿河河口附近，属于阿儿达喜儿·忽剌区，也是从弼斯啰城到凯思岛和印度的船只停泊的一座港口。亚库特曾访问过这座岛，并说从山上可以看到位于阿剌建区海岸边的贾纳八城和麻合鲁般（Mahrubān）城[60]。这座岛土地肥沃，盛产各种水果，椰枣树的长势也很好，其附近海域是最好的珍珠产地之一。文献记载中将波斯湾的其他很多岛屿纳入阿儿达喜儿·忽剌区；但从商业角度而言，哈里和凯思两岛是最重要的，其他所属岛屿的名称则不易确定。兀洼儿（Uwāl）岛是八哈剌因（Bahrayn）群岛[61]的主岛，位于阿拉伯海岸，在记载穆斯林第一次征服的编年史中已提及。卜沙合儿［Būshahr，即今天的布什尔（Bushire）城[62]所在地］则首次出现于亚库特的记载中，该岛对面靠近大陆的就是巴拉祖里所称的里沙合儿·塔瓦吉（Rīshahr或Rāshahr-i-Tawwaj）岛。叫剌万（Lāwān，Allān、Lān或Lār等不同名称）的一座岛[63]，以里程记载判断应是今天的谢赫·舒爱布（Shaykh Shu`ayb）岛，位于凯思岛以西，阿卜伦（Abrun）岛无疑就是现在的信达拉比（Hindarabī）岛[64]，该岛和秦（Chīn或Khayn）岛都靠近凯思岛。

在波斯湾狭窄处的大岛现在称作吉失木（Kishm）岛[65]，也称长岛（Jazīrah Tawīlah），可能在中世纪就有文献以不同名称提到了这座岛，如八尼·喀万（Banī Kawan 或Ibn Kawān）、阿八儿喀凡（Abarkāfān）和阿八儿苦满（Abarkumān）等，也许仅是因抄本的不同而造成了称呼的不同；亚库特将该岛称作剌夫忒（Lāft）岛。哈思［Khāsik，或查实（Jāsik）］岛是其邻近的岛屿之一，或者可能仅是吉失木岛（即长岛）的另一名称而已。这里的居民是凶悍的船夫，可疾云尼称他们多干着偷盗和抢劫的营生。这些岛屿附近都是珍珠养殖场，但除捕鱼季节外，大部分岛屿无人居住。吉失木岛的东边不远就是忽里模子（Hurmuz，Ormuz）岛[66]，属于起儿漫地区，这个岛将在论述该地区的章节里述及。[67]

[1] 《马可波罗行纪》第32章第48页载："波斯是一极大之国，境内有八国。"该书还对这八国进行了介绍。马可波罗所说的波斯是指整个伊朗地区，而非法儿思地区。译者。

[2] 唯独穆喀达思将法儿思地区分为6个区（Kūrah，代替5个区），昔剌思城周围的地区被划为一个区。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97、135页。巴拉祖里，第38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7页。

[3]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今塔赫特加米斯德（Takht-e Gamisid），这是座古城，其附近就是著名的波斯波利斯古城。此城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伊朗通往波斯湾的要道。译者。

[4] 马合木·沙·引朱（Mahmūd Shah Injū）是引朱（Injū，蒙古语意为"皇家财产"）王朝的建立者，1304～1325年在位。引朱王朝是一个逊尼派王朝（1304～1357年），先后历四位王，统治的地区主要是法儿思地区，都城为设拉子城。译者。

[5] 鲁昆·道剌（Rukn-ad-Dawlah）是哈散（Hasan）的封号，他是白益家族的三子之一，也是白益王朝的建立者之一，主要控制着吉八儿、忽兹思田等地区，945年他与二兄弟占领报达城，阿拔斯哈里发授予他上述封号，后因家族纷争，王朝分崩离析，直到其子阿都得统治时期（949～983年）王朝才得以巩固。译者。

[6] 来思·本·异密（`Amir ibn Layth）是萨法儿王朝建立者来思（意为"铜匠"）之弟（而不是本书所说来思之子）和继承人，879～900年在位。译者。

[7] 萨儿噶儿（Salghār）王朝（1148～1287年）是由突厥蛮人建立的，起初该部其中的一位酋长萨儿噶儿迁入呼罗珊地区，并与塞尔柱王朝的统治者突哥里儿·别一起征战各地，后萨儿噶儿之被任命为塞尔柱王朝的阿塔别（Atabeg）之一。1148年萨儿

噶儿后裔孙苦儿·本·毛都（Sunkur ibn Mawdud）宣称自己是法儿思地区的主人，并建立了萨儿噶儿王朝，于1148～1162年在位，后来该王朝先后臣服于大蒙古国的窝阔台与波斯的伊利汗国，于1287年亡国。译者。

[8] 阿塔别·萨底·伊本·赞吉（Atabeg Sa`d ibn Zangī）是萨儿噶儿王朝第四位统治者，1195～1226年在位。译者。

[9] 萨底（Sa`dī，又译萨迪，1208～1292年）是波斯著名的诗人，在蒙古人西征时期，漂泊各地30年，足迹遍及北非、西亚和南亚，据说还到过今天的喀什。他最重要的作品有《果园》（1257年）和《蔷薇园》（1258年）。译者。

[10] 阿塔别·阿卜·八可儿（Atabeg Abu Bakr）是萨儿噶儿王朝第五位统治者，1226～1260年在位。译者。

[11] 喀剌·乞兹堡的名称读法无法确定。穆思套菲著作的抄本中有乞儿（Tīr）、塔卜儿（Tabr）、八卜儿（Babr）、比儿（Bīr）和塔思儿（Tasīr）或塔失儿（Tashīr），以及其他很多种写法。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9、430、456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1a、b叶面。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349页；第4卷，第25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0、171、179、203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53、77、87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

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437、594、609、613页。塔合忒·喀喇察（喀喇察的御座）花园是以阿塔别·喀喇察（Atabeg Karāchah）的名字命名的。他在伊斯兰历510年（1116年）阿塔别·超里（Atabeg Chāūlī）去世后，成为法儿思地区的总督。据说这个花园现在被称为塔合忒·卡加尔（Takht-i-Kajar）。

[12]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53页载："第八个（咸水湖，引者）是法儿思（Pārs）的建坎（Jānkān），长12法儿萨，宽10法儿萨。湖中产很多有用的产品，湖的周边是有居民的耕地。"《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83页注释说，该湖名也写为建坎（Jankān，即Janagān），而《法儿思志》写为麻哈鲁牙（Māhalūyah），现在突厥化后写为麻哈儿鲁（Māharlū）。今为马哈尔卢盐沼（Daryācheh-ye Mahārlū），位于设拉子东南27公里处，有几条小河流入此湖，面积达600平方公里，湖水呈粉红色，是伊朗重要的产盐地。译者。

[13] 今为萨尔韦斯坦，是法尔斯省萨尔韦斯坦州州府所在地，人口1.6万。该城是座古城，有2000多年历史，自古以来是从设拉子到法尔斯东部和波斯湾的重要通道。译者。

[14] 今此城难以查找，但附近有名称类似的城Koubanjan，不知是否为同一城市。译者。

[15]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2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2、13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2、455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3a、80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2、226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3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

（*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6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93页，该书错误拼写的吉坎（Jīkān）应为建坎（Jankān）。

[16]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4页提到了萨坎（Sakān，即Sakkān）河，并载："这条河发源于山区和鲁押干（Rūyagān，即鲁委寒，引者）区（*rustā*）。在喀洼儿（Kavar）城改变了方向，并在那岐兰城和施那帏港之间注入大海（即波斯湾，引者）。"译者。

[17] 今此名不存，应在曼德（Mānd）河口不远处的波斯湾西岸，大致在布什尔省达什提（Dashti）州沿海港口附近。译者。

[18] 这条河的上游现在被称为黑树河（Kārā Aghch，突厥语）；它的下游被称为曼德（Mānd）河。萨坎（Sakkān）河可能就是尼尔库斯（Nearchus，前360～前300年，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一位吏员，译者）所说的思塔喀思（Sitakus）河，见罗斯（Ross）发表在*P. R. G. S.*的文章（1883年，第712页）。

[19] 朱外木（Juwaym，有时候写为Juwayn）就是现在的果云（Goyun）村。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0、122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44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7b、79b、80b、81a叶面。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45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7、179、214页。

[20] 今为卡瓦尔（Kavār），是法尔斯省卡瓦尔州州府所在地，人口2.2万。自古以来就是从设拉子到波斯湾的重要通道。译者。

[21] 今此名不存，应距卡瓦尔东南的哈夫尔（Khafr）或哈瓦兰（Khavaran）不远。译者。

[22] 今此名不存。译者。

[23] 今为达拉卜（Dārāb），是法尔斯省达拉卜州州府，人口5.4万，是向西到设拉子，向西南达波斯湾的重要通道。译者。

[2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5、105、120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1b、72a、81a、83a、83a、86a叶面。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39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2、173、179页。这个地区现在被称为思马昆（Sīmākūn），而在地图上常错写为阿昆（Akun）。见斯特克（E. Stack）《波斯半年之旅》（*Six Months in Persia*），第2卷，第232页。

[25] 今为卡尔津（Kārzīn，或Fatḩābād），是法尔斯省吉尔与卡尔津州的一座城市，人口7900，交通地位与吉尔相似。译者。

[26] 今为吉尔（Qīr），为法尔斯省吉尔与卡尔津州的州府，人口1.6万，是南下波斯湾、北达设拉子的重要通道。译者。

[27] 今为艾弗扎尔（Efzar，或Marand），是法尔斯省吉尔与卡尔津州的城市，人口2000，交通地位与卡尔津城相似。译者。

[2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2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2a、73a、82b、83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

（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5、179页。据《法儿思志》（第78 a叶面）和穆思套菲记载，显然在阿剌建（Arrajān）城北的塔卜（Tāb）河岸还有一个叫苦剌·忽八·忽剌（Kūrah Kubād Khurrah）的区。

[29] 今为贾赫罗姆（Jahrūm），是法尔斯省贾赫罗姆州州府，人口11.4万，是通往波斯湾和伊朗腹地的重要通道。译者。

[30]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7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9a、82b叶面。这个城堡的名称在抄本中写为忽鲁沙（Khurūshah）、忽剌沙（Khūrashah）、忽儿沙（Khurshah）等，也写为哈儿沙（Kharshah）、哈剌沙儿（Kharashar）等，但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并未提到这一城堡。

[31] 今此地已难以查到，应距法尔斯省鸿吉（Khonj）州州府不远。译者。

[32] 今为卡里杨（Kāriyān），是法尔斯省拉里斯坦（Larestan）州的村庄和小镇，人口2000，是去往波斯湾沿岸港口的重要通道。译者。

[33] 今为拉格尔（Laghar），是法尔斯省鸿吉（Khonj）州中心区的一个村，人口300，是去往波斯湾沿岸港口的重要通道。译者。

[34] 今此名不存。译者。

[35] 今此名不存。译者。

[3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1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7、428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9 b、73b、82b、86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2、173、175、179、180

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268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62页。

[37] 今为费鲁扎巴德，是法尔斯省费鲁扎巴德州州府，人口5.8万，是通往波斯湾沿岸港口和设拉子的重要通道。译者。

[3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5、121、12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2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0a～72b、79b、82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2、179、219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21页。

[39] 今为基什，是波斯湾靠伊朗一侧的重要岛屿，面积为91.5平方公里，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7.5公里。此岛今为伊朗自由贸易区，属于霍尔木兹甘（Hormozgān）省，其岛上主要城市为基什城，人口1万，但每年到这里的游客可达百万。这里是波斯湾重要的海上通道，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译者。

[40] 即基什城。译者。

[41] 今此港名不存，应在基什岛对面的波斯湾北岸。译者。

[4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16、14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8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711页；第4卷，第333、974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

《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4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1、173、180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61页。这个岛的名称被拼写为凯思（Kays）、凯失（Kaysh）或吉失（Kīsh，有点的k和无点的k）。
穆思套菲对从剌吉儿城到忽组（Huzū）城道路的驿站做了记载（第200页），但现代旅行家没有按这条道路旅行，在地图上找不到，而且很多地名也无法确定。他使用的单位为法剌合（Farakh，即里格），据他记载，“从剌吉儿城到法儿牙卜（Fāryāb）地区6里格，再6里格到萨吉（Saj、Sah、Haj、Daj）城，而后5里格到阿卜·安八儿吉纳儿（Āb-Anbār-i-Kinār）城，再5里格到哈兰（Haram、Sīram或Marmaz）城，再南下6里格经很多陡峭的关隘到答鲁（Dārūk、Dārzak、Urak或Dāvrak）村，再6里格到麻汗（Māhān、Hāmān或Māyān）城，再6里格经过剌答（Lardak）关到达沿海的忽组城”。有充分证据显示，穆思套菲所说的法儿牙卜就是八剌卜（Bārāb），在喀里阳（Kāriyān）城与苦兰城之间，穆喀达思对此做了记载（第454页）。
萨吉（Saj）城的位置是一个谜，无人知道其在何区，但其名称可能应读为贾木（Jamm，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6页）。很可惜，这条路线没有出现于《法儿思志》一书中，阿拉伯地理学家也没有记载。根据伊斯塔赫里（第141页）和亚库特（第3卷，第217页）的记载判断，八尼·萨法儿（Banī-As-Saffār）显然应该就在兀麻剌海岸。

[43] 今为祖拜尔，用来称呼布什尔省东边坎甘州的一个小镇和乡，与霍尔木兹甘交界。译者。

[44] 此地今天称Karūn，是法尔斯省靠近波斯湾的一座城市，位于撒那威东北方向。译者。

[45] 今此城名已不存，但这个名称的异写形式被保留下来，即耐班德（Nayband），是布什尔省阿萨卢耶赫（Asaluyeh）州下一个乡的名字，人口3500；阿萨卢耶赫州州府阿萨卢耶赫东南的海湾为耐班德湾。这个地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港口。译者。

[46] 今城名已不存，其位置大致在布什尔省波斯湾沿岸，靠近霍尔木兹甘的察赫·穆巴拉克（Chah Mobarak）城，是通往波斯湾和伊朗腹地的重要通道。译者。

[47] 即阿萨卢耶赫州州府阿萨卢耶赫东南的海湾，为耐班德湾。译者。

[4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4、141、15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19页；第2卷，第489页；第3卷，第212、21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2、173页。

[49] 今为贾姆，是布什尔省贾姆州州府，人口1万，是通往波斯湾和伊朗腹地的重要通道。译者。

[50] 今为加纳韦（Ganāveh），是布什尔省加纳韦州州府和波斯湾北岸的港口，人口5.9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译者。

[51] 今此名不存。译者。

[52] 这个答思塔坎（Dastakān）区可能就是前文提到的八尼·萨法儿（Banī-As-Saffār）海岸地区。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4、106、116、127、141、15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2、426、427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3b、74a叶面。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211、21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2页。史提夫（Stiffe）上尉对施那帏港的遗址做了记载（*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1895年，第166页）。

[53] 今此城已不存，应位于布什尔省达什特斯坦（Dashtestān）州的达拉吉（Dālakī）城附近。译者。

[54] 今为达拉吉河（Rūdkhane-e Dālakī），此河发源于扎格罗斯山脉，最后在达什特斯坦州州府博拉兹詹（Borāzjān）城南边不远处注入波斯湾。译者。

[55] 今此城名不存，但从位置来判断，应为卡泽伦州的科纳尔塔赫泰（Kunār Takhteh）城所在地。这里是通往伊朗腹地和波斯湾的重要通道。译者。

[56] 今为德里斯（Deris），是卡泽伦州中央区的德里斯乡政府所在地，人口2万，在卡泽伦以北，是交通要道。译者。

[57] 今为杰勒赫（Jereh），位于卡泽伦州杰勒赫与巴拉赫（Jereh and Baladeh）区，是通往设拉子和波斯湾的重要通道。译者。

[58] 据穆喀达思和亚库特及很多早期文献记载，答失忒·八临就是城的名称，滚底建是区的名称。但最初，不可能有这样的用法，因为答失忒·八临的含义为八临的“平原”，没有用来指一座城市。在东部，一个区或地区的名称往往是取自首府名，并遵循这一原则，结果滚底建之名就废弃不用了，答失忒·八临取而代之，如穆思套菲后来所说，其被用来指城市或地区名称，但滚底建之名却相反。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6、128、130、152、15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422、423、432、435、445、448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3a、76a、79b、82b、86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1、177、179、21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99、890页；第2卷，第576页；第3卷，第5、820页。塔瓦吉城在早期地理学家的记载中常常被包括于沙普儿·忽剌区内。

[59] 今为哈尔克岛（Khark），在布什尔港西北55公里处，为一小岩岛，长6.4公里，宽3.2公里，面积49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87米，为伊朗最大的油港。译者。

[60]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61] 即巴林岛，是今巴林国所在地。译者。

[62] 《经卡泽伦和费鲁兹巴德到设拉子的旅行记》（*A tour to Sheeraz by the route of Kazroon and Feerozabad*）第2页载："布什尔（Bushire）城位于狭长的陆地上，由于海平面较低，涨潮后常形成一个岛。房屋无论是高低大小均由泥巴或白色软石建成。"第2～8页载："布什尔城有一道城墙和一些城堡，可能就是防御外来军队袭击的哨所。"这个城市还有市场，同时与印度等地贸易。"布什尔附近种植的棉花织成的布料是可以与中国南锦（Nankeen，似是南京云锦之简称）相媲美的面料。"（by Edward Scott Warning，London，1807）布什尔城是今布什尔省首府，也是港口，人口16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译者。

[63] 今为拉万（Lāwān）岛，此岛面积为76平方公里，是伊朗原油出口的四大岛之一，属霍尔木兹甘省伦格港（Bandar Lengeh）州拉瓦区，岛上有机场。在古代，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译者。

[64] 今为亨多拉比（Hendurabi）岛，属伊朗霍尔木兹甘省伦格港州，在基什岛西部，拉万岛东南。面积22.8平方公里，最高处海拔13米。岛上缺水，有天然气资源，但无人居住。译者。

[65] 今为格什姆（Keshm）岛，属伊朗霍尔木兹甘省格什姆州，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波斯湾最大岛屿，面积1491平方公里，长135公里，宽9～12公里，岛形狭长，与大陆海岸平行，中隔胡兰（Khuran）海峡，气候干燥，平均气温为27℃，年平均降雨量183毫米。人口10万，首府为格什姆城，还有很多小城市。格什么姆城是伊朗的免税港。岛上几乎全是丘陵，生长谷物、蔬菜、甜瓜和椰枣等。有些丘陵高达270米以上。东南岸有矿盐，并有多处石脑油泉。有渔业和纺织业。扼波斯湾出口，为伊朗阿巴斯港的天然屏障。译者。

[66] 今为霍尔木兹岛，该岛长7公里，宽7.6公里，面积42平方公里。霍尔木兹岛为沉积岩所覆盖，在其表面有火山物质层。岛上最高点海拔约186米。现人口5000，属于霍尔木兹甘省。历史上这里是伊朗内陆和外来商品的集散地，繁荣一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近代以来逐渐衰落。译者。

[6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2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61页。巴拉祖里，第386、38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395、503页；第2卷，第387、537页；第4卷，第341、34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

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1、222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17页。

第十八章 法儿思（Fārs）地区（续）

沙普儿·忽剌（Shāpūr Khurrah）区。沙普儿（Shāpūr）城和洞穴。剌汀（Ratīn）河。瑙般建（Nawbanjān）城。白堡和沙卜·八万（Sha`b Bavvān）河谷。曲儿忒（Kurd）的札木（Zamm）部。可咱隆（Kazirūn）城及其湖泊。夷合失（Ikhshin）河与贾儿失（Jarshīk）河。吉剌（Jirrah）城和萨卜（Sabūk）桥。阿剌建（Arrajān）区和阿剌建（Arrajān）城。塔卜（Tāb）河。必合八汗（Bihbahān）城。喜琳（Shīrīn）河。拱北·麻剌干（Gunbadh Mallaghān）。麻合鲁般（Mahrubān）城。欣尼兹（Sīnīz）城和贾纳八（Jannābah）城。沙兹坎（Shādhkān）河。

撒卜儿·忽剌（Sābūr Khurrah，如前所述，撒卜儿是波斯名称的阿拉伯语化）区，即“沙普儿（Shāpūr）的荣耀”区，是法儿思地区5个区（Kūrah）中最小的一个，其范围包括沙普儿河上游及其支流流域。

早期，这个区的首府为沙普儿（Shāpūr）城，其名最初称必沙普儿（Bishāpūr）[1]，但更为常用的名称为沙合里思田（Shahristān），意为“城市”，或者“首府”。伊本·豪喀尔称在他那个时代沙普儿城的规模和亦思塔赫儿城一样大，但人口更为稠密，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后半叶，穆喀达思却说该城的绝大部分已毁，其居民迁到邻近的新兴城市可咱隆（Kazirūn）城[2]。但沙普儿仍很富庶，盛产甘蔗、橄榄和葡萄等，还有其他水果和鲜花，如无花果、茉莉花、角豆树等也随处可见。这里（沙普儿）有座叫敦不剌（Dunbulā）的城堡，城墙有4个城门，即忽里模子（Hurmuz）门、密合儿（Mihr）门、八合兰（Bahrām）门，最后为“城市之门”（Bāb-ash-Shahr）。外城有一座聚礼清真寺和一座叫黑兹儿寺（Masjid-al-Khidr），或称易剌思（Elias）寺的清真寺。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据《法儿思志》记载，沙普儿城已完全被毁；几个世纪后，穆思套菲称沙普儿或必沙普儿已归入邻近的可咱隆（Kazirūn）区。

穆思套菲显然了解当时称作沙合里牙儿·鲁得（Shahriyār Rūd）河的沙普儿河，他说该城（沙普儿城）以其第一位创建者之名称为丁达儿（Dīndār）城，他是传说中的“伏魔者”塔木剌思（Tahmurath）王。亚

历山大大帝毁掉这座城后，沙普儿王进行了重建，据穆思套菲记载，当时该城称作八纳·沙普儿（Banā Shāpūr），后来又称作纳沙普儿（Nashāpūr）或必沙普儿（Bishāpūr）。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这里著名的物产有蝴蝶（兰）花、紫罗兰、茉莉花和水仙花等，也盛产丝织品。穆思套菲还提到了遗址附近的山洞里有名的沙普儿王巨型雕像。他记载道：“一尊黑色雕像，比真人要高，屹立在一座圣庙（*Haykāl*）中；有些人说它是避邪物，但还有一些人说它就是一个真人，是真主让他变成了石头。这个国家的国王常去拜谒雕像，并在其上涂油来表达敬仰之情。”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已提到了这个距瑙般答建（Nawbandajān）城有1里格的洞穴。他称高达洞顶的沙普儿王巨大雕像，位于水流奔涌的洞口，洞里还刮着一股狂风。雕像底座雕刻成形似“三片绿叶”状，雕像之足长10拃，通高11腕尺。[3]

阿拉伯地理学家将沙普儿河的上游称作纳赫儿·剌汀（Nahr Ratīn）河，其发源于上忽麦夷建（Khumāyijān）或忽麦夷干（Khumāyigān）地区，据穆思套菲记载，这个地区的重要村庄有底合·阿里（Dīh `Alī）村。下忽麦夷建地区被划入亦思塔赫儿·忽剌（Istakhr Kūrah，即Persepolis区，此区将在下一章叙述）区，位于苦儿（Kur）河[4]岸边的拜札（Baydā）城[5]周边。上、下忽麦夷建地区以产高寒山区的物产，如坚果和石榴等而闻名，同时这里还盛产外销的优质蜂蜜；居民绝大多数是随商队行走的赶骡脚夫。忽麦夷建地区的西边是安卜兰（Anburān）区，这里有瑙般答建（An-Nawbandajān）城，又名奴般答干（Nubandagān）或瑙般建（Nawbanjān）城[6]。据伊斯塔赫里记载，当时这座城规模比可咱隆城大，气候炎热，出产椰枣。穆喀达思称这里有良好的市场和供水充足的花园，他还记载了这座城的清真寺。塞尔柱王朝时期，瑙般建城已成废墟，但至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著名的阿塔别（Atabeg）—异密·超里（Amīr Chāūlī）重建了该城。[7]

距瑙般建城2里格的地方就是叫沙卜·八万（Sha`b Bavvān）的著名河谷，穆斯林称这是人间四大天堂之一，河谷中的河流汇入亦思塔赫儿·忽剌区的苦儿河。这条河谷长3里格半，宽1里格半，富庶无比；据穆思套菲记载，由于河谷两边的山上储存着冬季的积雪，因此在炎热的夏天，其可提供源源不断的用水。瑙般建城东北数里格处有叫作白堡的山地要塞—喀剌·萨费（Kal`ah Safīd）堡，和亦思费·底兹（Isfīd Diz）堡，或称亦思凡底牙儿（Isfandiyār）堡，其位于台地山的平顶上，周长有数英里，四周为悬崖峭壁。穆喀达思可能以喀思儿·阿卜·塔里卜（Kasir

Abu Tālib）之名提到了该堡，他说其应称作阿延（`Ayān）堡。《法儿思志》中称喀剌·萨费堡是塞尔柱王朝初期一个叫阿卜·纳思儿·乞儿·木儿丹（Abu Nasr-i-Tīr Murdān）的人重建的，并说在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由总督控制。此处的山顶，周长有20里格，只有一条道路可通到山顶，山下则由一座叫底兹·尼失纳（Dizak Nishnāk）的城堡守卫。山顶是一片平地，有很多泉水和花园，盛产各种水果。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曾围攻喀剌·萨费堡，由此其在历史上声名远播。当时帖木儿正在从必合八汗（Bihbahān）城[8]向昔剌思城的行军途中，经过2天合围之后，伊斯兰历795年（1393年）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该城堡。[9]

瑙般建城以东一站之地，在去往昔剌思城的途中有一座叫乞儿·木儿丹（Tīr Murdān）的小城[10]，周边有6个村庄，其中最重要的村庄为喀儿建（Karjan，或Jarkan）村，距瑙般建城有5里格。其周边地区灌溉水源充足，土地极其肥沃，这里盛产外销的蜂蜜。瑙般建城以西，在通往阿剌建城的道路上就是这一地区的安卜兰（Anburān）城；八失忒·苦塔（Basht Kūtā）区有至今仍然存在的八失忒（Basht）城[11]。答儿黑（Darkhīd）河与忽卜赞（Khūbdhān）河[12]流经该区。纳赫儿·豪剌洼赞（Nahr Khawrāwādhān）河，又称忽卜赞河，其岸边有与之同名的忽卜赞（Khūbdhān）城[13]，距瑙般建城有4里格，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忽卜赞城很繁华，有一座清真寺和很多不错的市场。距这条河（忽卜赞河）西4或6里格，离瑙般建城有2站之地就是答儿黑（Darkhīd）小城[14]，位于与该城同名的河流岸边，这条河发源于一个小湖，但有些文献说该河最后流入这个湖。前文提及的答儿黑河是一条河水充足、奔腾不息的大河。忽卜赞河是喜琳（Shīrīn）河[15]的一条支流，叙述阿剌建地区时应对这条河（喜琳河）予以关注。一座大桥横跨在答儿黑河或忽卜赞河上，一个叫阿卜·塔里卜·瑙般建（Abu Tālib-i-Nawbanjān）的人修建了该桥，他也曾修建了前文提到的阿延（`Ayān）堡。关于这座著名的桥梁横跨于哪条河上，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的说法不同。后来的文献对这两条河的名称记载也有所不同，结果导致了混乱，因而至今很难或不可能在地图上确定这两条河所在的位置。据穆喀达思记载，在他那个时期此桥已经建成，并说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后半叶，“在整个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没有一座桥可与它相媲美”。至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亚库特称这座桥梁仍存在。阿里·亚兹底在记述帖木儿从必合八汗向昔剌思城行军时，提到了这一地区的很多地名。[16]

法儿思地区的山区，后来被称为贾八儿·吉鲁牙（Jabal Jilūyah），这里有曲儿忒人的5个部落，总称为赞木·阿可剌（Zamm-al-Akrād[17]），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游牧和扎帐于这一山区的草原。穆喀达思称该山区附近有一座属于曲儿忒部落的城堡，这里很宽阔，有很多花园，种植各种果树和椰枣树。[18]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下半叶沙普儿城被毁后，可咱隆城[19]就成为沙普儿区最重要的城市。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在他那个时代该城规模要比瑙般答建城小，但修建得颇好，这里的民居是用灰浆与石料建成的。后来，穆喀达思称该城为“答密厄塔·波斯”（Damietta Persian），并说从商业角度看，这座城可视为亚麻织品贸易的重要中心，还说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当时在该城为过往商人修建了大客栈（Dār），每年所收租金达10000底儿罕（约400英镑）。据穆喀达思记载，城里的宅院就像宫殿，每家每户均有花园；清真寺修建在一座山顶上。穆思套菲称可咱隆最初由附近的三个村庄组成，分别为奴儿得（Nūrd）村、答儿八思（Darbast）村和剌珊（Rāhshān）村，而且以这些村庄的名称命名了修建的供水管道，据说这些管道至今还保留在城区内。可咱隆产优质的椰枣，尤其是一种叫岐兰（Jīlān）的椰枣，品质极佳，这里还产一种叫吉儿八思（Kirbās）的棉布，大量外销。附近的草原叫麻噶札儿·纳儿吉思（Marghzār Narkis）草原，即水仙草原，很有名。据伊本·白图泰记载，可咱隆城周边的地区被称作舒儿（Shūl）地区，在伊斯兰历730年（1330年），他曾经过此地，现在这一地区被称作舒儿思田（Shūlistān）。在可咱隆城东边不远的平原上是可咱隆（Kāzirūn）湖，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该湖称作卜亥剌·木兹（Buhayrah Mūz或Mūrak，因其读法无法确定）湖[20]。该湖长10里格，湖水很咸，有大量的鱼。该湖之北，在去往昔剌思城的道路上，有两座著名关隘，现在的旅行者将它们称作“老妇关”（Kutāl Pīr-i-Zan）和“少女关”（Kutāl-i-Dukhtar），穆思套菲将前者称作忽尚（Hūshang）关，距可咱隆城有6里格；后者称作麻兰（Mālān）关，位于忽尚关之北，十分陡峭。[21]

从可咱隆城南下到海岸的道路要经过答里兹（Darīz）城，再到达苦麻利吉（Kumārij）城[22]，此后经沙普儿河岸边的黑失（Khisht）城[23]，到达塔瓦吉城，这座城在前章已做了叙述（原文第259页）。答里兹城是一座小城[24]，早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里便以制作亚麻织品而闻名；经过该城后就是黑失城，据穆喀达思记载，该城有座坚固的城堡，城堡周边是辽阔的土地。《法儿思志》将黑失城和苦麻利吉城

并提，据穆思套菲记载，这两地的居民多是一些行为卑劣、臭名昭著的抢劫者。

黑失城南不远，沙普儿河从左岸接纳了吉剌河，阿拉伯地理学家将吉剌河称作纳赫儿·贾儿失（Nahr Jarshīk）河，这条河在流入沙普儿河以前的数英里处从左岸接纳了阿拉伯地理学家所称的纳赫儿·夷合失（Nahr Ikhshīn）河。夷合失河发源于答曾（Dādhīn）地区的山谷，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该河里的水为淡水，可以饮用，但在河水中放入任何颜色的布料均可染成绿色。贾儿失河发源于麻萨兰（Māsaram）地区（据穆思套菲记载，这个地区从该河向北一直到萨坎河源头）吉剌（Jirrah）城的南山中，该河未到达吉剌城前经过了一座叫坎塔剌·萨卜可（Kantarah Sabūk）的古石桥。这条河接着流经答曾地区，在接纳了夷合失河后，流入塔瓦吉城以北不远的沙普儿河。《法儿思志》与穆思套菲均称吉剌河的源头，在靠近吉剌城的地方，是滚底建区的一部分，这就为确定答失忒·八林（Dasht Bārīn）区的位置提供了一条线索，如前文所述，该地属于阿儿达喜儿·忽剌地区。据穆喀达思记载，吉剌城位于一座山的山顶上，拥有很多椰枣园。亚库特称在他那个时代当地人将该城的名称拼读为吉剌（Girrah），这可从《法儿思志》和穆思套菲的记载中得到印证；这些文献也提到当地种植粮食和椰枣，因该城周边的土地异常肥沃。[25]

阿剌建（Arrajān）区是法儿思地区五个忽剌（即区）中最西边的一个，其首府为阿剌建城[26]，位于该区最西边的塔卜（Tāb）河[27]的岸边，这条河流是法儿思地区与忽兹思田地区的分界线。阿剌建城的遗址位于现在的必合八汗（Bihbahān）城以北数英里处，后一座城随着人口增加，自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末起成为这一地区的首府。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阿剌建城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其周边有椰枣园和橄榄园。这座城有六座城门，到晚上后城门便奉命关闭，这些城门的名称分别为：阿合瓦兹（Ahwāz）门、里沙合儿（Rīshahr）门和昔剌思（Shīrāz）门，接着为鲁萨法（Ar-Rusāfah）门、麦当（Maydān，即广场）门，最后为八卜·凯牙临（Bāb-al-Kayyālīn，即过磅）门。清真寺和市场街区很宏大。城里大量生产肥皂。阿剌建城附近，在通往忽兹思田地区道路经过的塔卜河上横跨着两座著名的桥梁，其遗迹至今仍存。据说其中的一座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统治时期亦剌可地区总督哈贾吉的医生、一位来自低廉地区的人修建的，据伊斯塔赫里

记载，这座桥为单孔桥，跨度为80步，高度则达到一个人骑在骆驼上举着旗子从桥下自由通行的程度。此桥称作坎塔剌·萨坎（Kantarah Thakān），距阿剌建城有一箭之地，在通往三必儿（Sanbīl）城的道路上。第二座石桥名为坎塔剌·忽思罗雅（Kantarah-al-Kirsrawīyah）桥，即萨珊王桥，长3000多腕尺，其修建时间可追溯到萨珊王朝统治时期。这座桥位于通往答合里赞（Dahlizān）村的道路上。阿剌建城附近有一座山，据可疾云尼记载，山上有个流出一股泉水的山洞，从水中可提取沥青（*Mūmiyā*），其因有医药疗效而闻名各地，阿剌建城内有一口叫必儿·萨黑（Bīr Sāhik）的深不见底的水井，井中的水即便是在最干旱的夏季里也不会干涸。

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穆思套菲称阿剌建城通常被称作阿儿汗（Arkhān，或Arghān）城，14世纪末，阿里·亚兹底称塔卜河为阿必·阿鲁浑（`Āb-i-Arghūn）河。据穆思套菲记载，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这座城遭到了亦思马因（Ismail）异端派（暗杀派，是“山中老人”的信徒）的极大破坏，再也未恢复以前的繁华。附近的山顶上有亦思马因派的据点：一座叫喀剌·乞古儿（Kal`ah Tīghūr）城堡；另一座叫底兹·吉剌（Diz Kilāt）城堡。这些地方的守兵常抢劫该城和附近地区。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下半叶，阿剌建城完全被毁，此后不久，完全被位于塔卜河以南大约六七英里远的必合八汗城替代。阿拉伯地理学家并未提及必合八汗之名，阿里·亚兹底在记述伊斯兰历795年（1393年）春帖木儿从阿合瓦兹城向昔剌思城行进途中的活动时，第一次提到了必合八汗城，此后该城成为先前所称的阿剌建地区的首府。[28]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称的塔卜河[29]，现被称作加拉黑亚（Jarāhīyah）、加拉黑（Jarahī），或曲儿忒思田（Kurdistān，又译库尔德斯坦）河，由于出现了一些混乱，当今的塔卜河则是指欣底延（Hindiyān）河或祖合剌（Zuhrah）河[30]的支流亥剌八（Khayrābād）河，与以前的名称完全不同，在欣底延（Hindiyān）城附近流入波斯湾。如果将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记载的相关内容综合起来，就可以知道中世纪塔卜河的源头在亦思法杭城西南山区的卜儿吉（Al-Burj）城附近，城对面是亦思塔赫儿地区的速麦兰城。而后塔卜河流到忽兹思田地区一个叫萨儿丹（As-Sardan）区的地方，从河的左岸接纳了麻欣（Masīn）河[31]，在汇合处附近有麻欣（Masīn）村，汇合后的塔卜河一直流向阿剌建城。在该城以南，塔卜河流经里沙合儿（Rīshahr）地区，接着急转南流，在麻合鲁般（Mahrūbān）城[32]以西

入海。前文提到的麻欣河也发源于速麦兰城附近的山区，《法儿思志》和穆思套菲均称此河在与塔卜河汇合之前，流经了一处叫思哈（Sīshat）的地方。据说这条河长40里格，河道很宽阔，但不易摆渡。塔卜河上游附近地区是必剌·沙普儿（Bilād Shāpūr）或必剌·萨卜儿（Balā Sābūr）地区，其首府为朱麻（Jūmah）城[33]，该城位于法儿思地区和忽兹思田地区之间的边界上。这个地区的土地曾经异常肥沃，但在穆思套菲记载之时已经抛荒了。据《法儿思志》记载，塔卜河沿岸的地区也称作忽剌·苦八·忽剌（Kūrah Kubād Khurrah），但早期的所有文献都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喀儿曾城周边的地区，有关内容已在原文第254页做了叙述。[34]

如前所述，在阿剌建城以南，塔卜河转向里沙合儿地区（请勿与原文第261页提及的布什尔地区的里沙合儿相混淆）；这里除了有里沙合儿（Rīshahr）城[35]外，还有一座叫答儿延（Daryān，又称Dayrjān或Darjān）的城市[36]，位于阿剌建城与麻合鲁般城之间，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该城坐落于肥沃地区，有良好的市场。塞尔柱王朝时期，里沙合儿城仍是一座重镇，《法儿思志》中提到了该城的城堡，说这里可以建造船只。据穆思套菲记载，波斯人将该地称作八儿必延（Barbiyān），他还说此地原名为里萨合儿（Rīsahr）。这里生产亚麻织品，与波斯湾沿岸的港口从事大宗贸易。夏季城里异常酷热，于是居民迁到1里格外的底兹·吉剌城堡，如前文所述，先前这是座亦思马因派的城堡。里沙合儿城附近的欣底建（Hindījān）城[37]是阿剌建河下游的一座小城，与此城同名的地区也在该河下游，穆喀达思称欣底建（Hindījān，或Hinduwān）城是出售海鱼的大市场，这里还有一座优美的清真寺。欣底建地区还保留着祆教祠遗址和一些古代所建的水车。还有人认为这里与“埃及一样”埋藏着宝物，可疾云尼提到了一口冒着毒气的井，凡是经过的飞禽就会被熏死，落入井内。这个地区最后一座城就是哈卜思（Habs）城[38]，位于去往昔剌思城的道路上，这里有一个塞尔柱王朝时期的收税站。[39]

贾剌干（Jallādgān），又称贾剌建（Jallādjān）地区，介于塔卜河与喜琳河下游之间的邻近地区。喜琳河（甘水河）发源于八兹兰吉（Bāzranj）或八兹郎（Bāzrang）地区叫作贾八儿·底纳（Jabal Dīnār）的山中，流经位于阿剌建城东南4里格的夫儿祖（Furzuk）地区。阿里·亚兹底在记述帖木儿从必合八汗城向昔剌思城进军的内容时，他说帖木儿在离开必合八汗城的当天，就渡过了喜琳河；4天后帖木儿到达哈兀

丹河（Khāvdān，原文第265页称作忽卜赞河），而后行军到达瑙般建城。由此可知忽卜赞河是喜琳河的一条支流，喜琳河的上游现在称作亥剌八（Khayrābād）河（有很多支流），其下游称为祖合剌（Zuhrah）河，在现代地图上标为塔卜河或欣底延河。拱北·麻剌干（Gunbadh Mallaghān）城[40]位于喜琳河的一条支流的岸边，这是从瑙般建城到阿剌建城道路上的重镇，现在被称作都·拱北（Dū Gunbadān），意为“两个穹顶”，至今还可以看到大片的遗迹。此地附近就是底纳（Dīnār）山区和前文提到的八兹郎地区，以及萨兰（Sarām）地区，这里冬季极为寒冷，甚至到夏季山顶上的积雪也不会完全融化。但拱北·麻剌干城位于热带地区，以产椰枣而闻名。其城名也拼写为拱北·麻剌建（Gunbad Mallajān或Malakān），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穆喀达思称这里被毁后成为一个村庄。据《法儿思志》记载，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该小城由一座城堡守卫，里面储存的粮食可供守兵食用三四年。在附近山顶上还修建有很多其他城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喀剌·星（Kal`ah Khing）堡。穆思套菲说其附近的地方叫作普儿·卜鲁（Pūl Būlū，有些抄本中写作Pūl lūlū）地区，异常肥沃，以产杏而闻名；他称拱北·麻剌干城的城堡异常坚固，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41]

距喜琳河（前文提到的现代的塔卜河或祖合剌河）河口不远的地方就是麻合鲁般（Mahrubān）港[42]，靠近法儿思地区西境，是从弼斯啰城和底格里斯河河口起程去往印度的船只到达的第一站。麻合鲁般港是属于阿剌建地区的港口，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里是繁华之地，拥有一座优美的清真寺和诸多很好的市场。据穆思套菲记载，波斯人称该港为麦鲁彦（Māyruyān，或Mahruyān），这里产亚麻织品和外销的椰枣，但这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海上贸易。伊斯兰历443年（1052年），纳思儿·忽思罗到过麻合鲁般城，并称该城位于海湾东岸。这里的市场很好，清真寺是以萨法儿王朝来思之子雅苦卜[43]的名字命名的。这座城的饮用水储存于水池里，城里有三家供那些从此地陆路到阿剌建城的客商居住的大客栈，商贸店铺也很多。接下来的港口是位于海湾南边、麻合鲁般港以东的欣尼兹（Sīnzī，或Shīnzī）港，其遗址在现在称作班达儿·低廉（Bandar Daylam）[44]的小海湾岸边。据伊斯塔赫里记载，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此港要比麻合鲁般港大。这里有一个小海湾（*Khawr*），港口所在的城市距大海（即波斯湾）有半里格；该地气候炎热，盛产椰枣。穆喀达思提到了这座城的清真寺和总督府，以及提供优质商品的很多市场。据亚库特记载，欣尼兹港差不多被喀儿麻忒（Carmath）派毁了，伊斯兰历321年（933年），该派洗劫了这个

港。但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的《法儿思志》和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的穆思套菲均称这个港口仍很繁华，这里产亚麻，并纺织大量的亚麻织品。一座城堡（Hisār）守卫着这个港口，这一地区还大量出口灯油。[45]

欣尼兹港的南边就是贾纳八（Janābah），或贾纳八（Jannābā）港，位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称的纳赫儿·沙兹坎（Nahr-ash-Shādhkān）河河口附近，遗址至今犹存。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贾纳八港异常炎热，其附近的小海湾并不是一个安全的泊船处。港口所在地的城市规模要比麻合鲁般城大，还有很好的市场；同时，这里因是喀儿麻忒派的阿布·塔西儿（Abu Tāhir）出生地而闻名。波斯人称该地为冈法（Ganfah或Āb-i-Gandah），意为“臭水”，海岸邻近的四个村庄附属于该城。沙兹坎（Shādhkān）河[46]发源于八兹郎地区，而后流经答思塔坎（Dastakān）平原，再流入海湾。在现在的地图上已无法确定，哪一条河与之对应，但无疑是从贾纳八港附近流入波斯湾的两条小河中的一条。需要说明的是现在这里不存在大河，但穆思套菲特别提及说有一条“大河不易摆渡，其长9里格”，因而他所提到的这条河应是一条比较大的河流。[47]

[1] 在抄本中，这个名称（Bishāpūr）往往写为纳沙普儿（Nashāpūr或Nishāpūr，但不一定正确）。必沙普儿可写为必合沙普儿（Bihshāpūr），较早的形式为委合沙普儿（Wih-shāpūr），意为“好的萨珀儿（Sapor）”或“优秀的萨珀儿”。这个前缀必合（Bih）也出现在其他地名中。见原文第21章第303页的必合·阿儿达喜儿（Bih Ardashīr），或必合·古瓦失儿（Bih Guwāshir）。

[2]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现为卡泽伦，是法尔斯省州名和州府名。卡泽伦城人口有8.4万，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古代的必沙普儿城就在卡泽伦城附近。译者。

[3]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9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2、444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4b、75a叶面，该书中将这个名称拼写为必合沙兀儿（Bishāvūr）或必合沙普儿（Bīshāpūr）。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5、175页。伯德（C. A. De Bode）所著的《鲁尔斯坦旅行记》（*Luristan Travels in Luristan*，伦敦，1845年）。

[4] 今为库尔河（Rūd Khane Kūr），发源于设拉子西北部，原先流入巴赫泰甘湖（Daryache Bakhtgān），现在河道上修建有几座大坝，下游基本断流。译者。

[5] 今为拜扎（Beyza），是法尔斯省色皮丹（Sepidan）州的一座城市，人口3500，是通往设拉子和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译者。

[6]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卡泽伦西北的努拉巴德（Nūrābād），古代为从伊朗腹地通往波斯湾和伊拉克的要道。译者。

[7] 异密·超里（Amīr Chāūlī常写为Jāūlī）常出现在《法儿思志》中，穆思套菲将他和法儿思地区城市或城堡的重建以及河堤的重建联系到一起。此人曾是塞尔柱王朝算端马合木（Mahammad）统治时期该地区的总督。阿塔别·超里·萨考（Atabeg Chāūlī Sakāuh，最后一词意为“猎鹰”）得到了法合儿·道剌（Fakhr-ad-Dawlah）的称号，卒于伊斯兰历510年（1116年）。他在起儿漫地区和法儿思地区任半独立的总督近20年。

[8] 即胡齐斯坦省贝赫贝汉（Behbahān）州首府贝赫贝汉，人口10万，历史上是从伊朗到伊拉克和波斯湾的重要通道。译者。

[9]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10、111、120、12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4、437、447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6b、78a、81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7、178、219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

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00页。底扎吉·尼失苦蛮（Dizakī Nishkuman）和阿思塔（Astāk）在城堡南，两城名称在抄本中有不同的写法。喀剌·萨费城堡在麦克唐纳·金内尔（Macdonald Kinneir）所著的《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第73页有详细描述。

[10] 此城位置难觅，但其名称以提尔马尔丹（Tīr Mardān）河之名保留下来，此河发源于设拉子西北的麻谢赫（Mashaykh），向西北流，最后汇入法赫里阳（Fahliyan）河（Fahliyan），又汇入佐赫拉赫（Zohreh）河，最后在亨迪哼迪詹南流入波斯湾顶端东北角。译者。

[11] 今为巴什特（Basht），是伊朗科吉卢耶博耶尔艾哈迈迪（*Kohgīrūye-o Būyer-Ahmad*）省巴什特州州府，人口2万，是从伊朗到波斯湾和伊拉克的重要通道。译者。

[12]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4页提到了忽卜赞河，只是写法略有不同，即忽押赞（Khūyadhān）河，可能是笔误造成的。书中记载："这条河发源于法儿思（Pārs）的忽押赞地区。其流经塔瓦吉（Tavaj，即Tawwaj，引者）城，并在噶纳法［Ganāfa，即冈法（Ganfah）］与那岐兰城之间注入大海。"译者。

[13] 今此城名不存，但从方位来看应该在法尔斯省鲁斯塔姆（Rustam）州的阔蓬（Kupin）小镇。此地是去往设拉子、伊拉克和波斯湾的要道。译者。

[14]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加齐布兰不远。译者。

[15] 即今佐赫勒赫（Zohreh）河。译者。

[16] 同一名称有多种写法。豪剌洼赞（Khawrāwādhān）可简化为忽卜赞（Khūbdhān），也写为火卜赞（Khwābdhān）、哈八赞（Khabādhān）和 哈兀丹（Khāvdān），在阿里·亚兹底的著作中则写为哈洼兰（Khāvarān）。答儿必（Darkhīd）也写为答儿呼委（Darkhuwīd），但答呼纳（Dakhūnad，如穆喀达思记载）可能是音点拼写笔误造成的。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10、12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5、440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6a、b，79a，80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

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6、21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905页；第2卷，第487页；第3卷，第838页。伊本·阿喜儿，第8卷，第122、20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00页。

[17] 阿可剌（Akrād）是曲儿忒的阿拉伯语复数。译者。

[1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98、11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821页；第2卷，第176、206页。赞木（Zamm）在曲儿忒语中的含义为“部落”（更正确的写法是Zūmah），但这个词常错写为剌木（Ramm）。见德·古耶（De Goeje）翻译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作第33页脚注。

[19] 《经卡泽伦和费鲁兹巴德到设拉子的旅行记》（*A tour to Sheeraz by the route of Kazroon and Feerozabad*）第21页载：“卡泽伦（Kazroon，即可咱隆）城是一座相当大的城市，但城市大部已毁，城墙残破，有的已倒塌。”译者。

[20]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54页载：“第六个（咸水湖，引者）是法儿思（Pārs）的云湖［Yun，可能是木兹（Mūz）或Mūrak的不同写法，引者］，在可咱隆城附近，长10法儿萨，宽8法儿萨。湖的周边为居民。这里产很多有用的产品（*Manāfi`*）。”今此湖（可咱隆湖）叫作帕里珊（Daryāche Parishān）湖，面积18平方公里，湖中产鱼，被列入国际湿地保护名录。湖的周围有阿亚扎巴德（Ayazabad）、赛伊福阿巴德（Saifabad）、毛拉·阿力赫（Molla Areh）、阿拉·盖米什（Ara-e Gaymishi）等村镇，还有成片的农田。译者。

[2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9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

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6、180、200、226页。可咱隆地区三座城市的名称在抄本中有奴儿（Nūr）、答里思（Darīst）、剌喜班（Rahibān或Rahiyān）等不同写法。《法儿思志》（第80b叶面）清晰地写为木儿（Mūr）。这个湖有时也叫作盐湖（Daryachih Shūr）。

[22] 今为卡尔马基，位于法尔斯省卡泽伦州卡尔马基与库纳尔塔赫特（Kamaraj va Konartakhteh）区，是西南通往波斯湾和西北进入伊朗腹地的重镇。译者。

[23] 今为吉什特（Kesht），是法尔斯省卡泽伦州吉什特区首府，人口1万，是西南通往波斯湾和西北进入伊朗腹地的要道。译者。

[24] 《经卡泽伦和费鲁兹巴德到设拉子的旅行记》（*A tour to Sheeraz by the route of Kazroon and Feerozabad*）第21页载："距卡泽伦（Kazroon，即可咱隆）城2个法尔萨（Fursukh）处是叫作达利兹［Dares，即答里兹（Darīz）］的大城废墟。从城市遗迹仍然可以看出其曾经的辉煌与繁华。"

[2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0、127、15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3、434、435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5b、76a、79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6、177、218、21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36、67页。

[26] 今此城名不存，其位置在今贝赫贝汉所在地。译者。

[27] 今为加拉黑河（Rudkhane-e Jarāhī或Jarrāhi、Garrāhī）或胡齐斯坦（Khuzestān）河，发源于胡齐斯坦省和法尔斯省的扎格罗斯山脉，由上游几条河汇合而成，最后在马赫夏赫尔港西北流入沙代甘（Shādegān）城西边与之同名的潟湖中，后流入波斯湾。这是胡齐斯坦省的主要河流之一，灌溉着沿岸的田地。译者。

[2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8、134、152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9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4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5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94、16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7、178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00页。萨尼·道剌（Sanī`-ad-Dawlah）在其著作《地区之鉴》（*Mirāt-al-Buldān*）中说必合八汗（Bihbahān）最初居住着苦吉鲁（Kūhgilū）游牧部落，奉帖木儿之命，这些部落从苦法迁移到这里（德黑兰石印本，第1卷，第306页，伊斯兰历1294年）。阿剌建城遗址和两座现在被称作夫人桥与女儿桥（Pul-i-Bigam与Pul-i-Dukhtar）的相关内容，见伯德（De Bode）所著的《鲁尔斯坦旅行记》（*Lurstan*，第1卷，第295、297页）。第一座桥的名称在抄本中通常写为坎塔剌·剌坎或塔坎（Kantarah Rakān或Takān）桥。伊本·豪喀尔（第170页）还提到一座横跨在塔卜河上的木桥，其高于水平面10腕尺。

[29]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4页提到了塔卜河，并载："该河发源于苦合·吉鲁［Kūh-Jilū，应是贾八儿·吉鲁牙（Jabal Jilūyah），引者］，位于思法杭（Sipāhān，即亦思法杭，引者），流经忽兹思田与法儿思（Pārs）之间的边界，流入大海。麻合鲁般（Māhīrūbān，即Māhrūbān）城位于这条河的两条支流之间。"译者。

[30] 即佐赫拉赫河。译者。

[31]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4页提到了萨儿丹（Sardan）河，米诺斯基注释说（第214页），这条河就是麻欣河。此书称该河与塔卜河之间就是萨儿丹城。译者。

[32]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霍梅尼港附近。译者。

[33]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3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1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4、425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7b、78a、79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6、177、218页。阿拉伯地理学家显然没有弄清阿剌建（Arrajān）河（即塔卜河）及其支流（麻欣河）和我们已了解的喀伦（Karūn）河上游各支流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阿剌建河下游靠近波斯湾，显然该河道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起发生了变化。穆喀达思说该河流经欣尼兹（Sīnzī）城附近地区，但这显然仅仅是因为对“途思塔儿（Tustar）城附近”河流的音点拼写错误，在其他语句中则称都加伊勒河河口。

[35] 今此城名不存，但从方位来看，应该在拉姆希尔（Rāmshīr），位于佐赫勒赫河的东岸。译者。

[36]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37] 今为哼迪詹（Hindījān），是胡齐斯坦省哼迪詹州州府所在地，人口2.5万，在此城之南，佐赫勒赫河分为两支。这是到波斯湾、伊朗与伊拉克的要道。译者。

[38]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39]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12、113、119、12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2、426、453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8a、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

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7、17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963、993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86页。欣底建（Hindījan）、欣都万（Hinduwān）和欣底延（Hindiyān）显然是同一个地方。哈卜思在抄本中写为哈卜思（Khabs）、吉思（Jīs）、斤思（Jins）以及其他各种形式。如道里志所提及，它是一个驿站。

[40] 此城今天也称作加齐布兰（Gachsārān，或Du Gunbadān，即双陵园），是科吉卢耶-博耶尔艾哈迈迪省加齐布兰州州府，人口8.1万，是伊朗新兴石油城，古代这里是通往波斯湾、伊拉克、伊朗等地的重要通道。译者。

[4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11、112、113、119、12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5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7b、77a、78b、79a、83b、85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6、177、178、179、21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5页；第4卷，第630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00页。Hfz.，31b叶面。见伯德（De Bode）所著的《鲁尔斯坦旅行记》（*Lurstan*，第1卷，第258页）。都·拱北城之北就是今天的喀剌·阿鲁（Kal`ah Arū）城堡。该地可能就是《法儿思志》中所提到的星（Khing）。

[42] 今此港不存。译者。

[43] 雅苦卜全名为雅苦卜·本·来思·萨法儿（Ya`kub ibn Layth as-Saffār），是萨法儿王朝创建者，867～879年在位，在他统治时期，向东征服了呼罗珊，向南征服了法儿思，向西在878年攻入报答城，于879年去世。译者。

[44] 欣尼兹港已不存，但代拉姆港（Bandar-e Deylam 或 Bandar Dīlam）今存，是布什尔省代拉姆州的州府和港口，人口1.8万，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和贸易站。译者。

[4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4、12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6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9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02页；第3卷，第221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8b、79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8页。

[46]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4页提到了沙兹坎（Shādhagān，即Shādhkān，引者）河，其“发源于法儿思（Pārs）的八兹兰吉（Bāzranj）地区，流过塔瓦吉西角，汇入大海”。译者。

[4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2、34、119、12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6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8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8、218页。

第十九章 法儿思（Fārs）地区（续）

亦思塔赫儿（Istakhr）区和亦思塔赫儿（Istakhr）或珀儿斯珀里斯（Persepolis）城。苦儿（Kur）河与普儿瓦儿（Pulvār）河。八合乞干（Bakhtigān）湖及其周边的城市。马鲁答失忒（Marvdasht）平原。拜札（Baydā）城和麻因（Māyin）城。苦失可·札儿（Kūshk-i-Zard）城。萨儿麻（Sarmak）城与亚兹得亦合瓦思（Yazdikhwāst）城。从昔剌思（Shirāz）城到亦思法杭（Isfahān）城的三条道路。阿八儿苦合（Abarkūh）城。亚兹得（Yazd）城及其所在的地区和所属各城。鲁赞（Rudhān）地区及其所属城市。沙合儿·八八（Shahr-i-Bābak）城和哈剌忒（Harāt）城。

亦思塔赫儿（Istakhr）区或忽剌（Kūrah）位于法儿思地区的北部，如前所述在中世纪还包括亚兹得（Yazd）城、沿大沙漠边界的各邻近城镇和地区。这个地区的首府为亦思塔赫儿（Istakhr）城，阿拉伯人沿袭了萨珊王朝时期的城市名称，该城被希腊人称作珀儿斯珀里斯（Persepolis）城[1]。

亦思塔赫儿城位于普儿瓦儿（Pulvār）河[2]岸边，在该河与苦儿河交汇处之北数英里，离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所建的大平台和宫殿遗迹西边不远。穆斯林征服时期，亦思塔赫儿城虽不是萨珊王朝法儿思地区诸城中最重要的城市，却是最大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在投降后被穆斯林占领。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该城宽1英里；他说该城先前修建有一道环城的城墙，但新近已被毁。城门附近，横跨在河上的呼罗珊桥（为什么如此称呼未记载）是一座优美的建筑，这里的居民区越过河一直延伸到周边的区域，这些地方布满花园，并产稻米和石榴等。其他阿拉伯地理学家没有补充关于这一地区的新材料，而且穆斯林著述者也没有提供对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著名建筑和陵墓的富有情趣的记载，只是概括性地记述说这是由贾失得（Jamshīd）和所罗门（Solomon）王所建。穆思套菲说亦思塔赫儿城（现在这里几乎没有留下穆斯林城市的遗迹）的毁灭是由于当地居民发动起义。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后半叶，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之子三三·道剌（Samsām-ad-Dawlah）被迫派遣异密·骨咄禄蜜施（Amīr Kutlumish）

率领一支军队，攻打亦思塔赫儿城，进而将这座城市摧毁，从那时起，亦思塔赫儿城沦为一个村庄，如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的《法儿思志》称这里的居民约有百口。

亦思塔赫儿城西北的山上有三座大城堡，分别称作亦思塔赫儿·雅儿（Istakhr Yār，即亦思塔赫儿城的朋友）城堡、喀剌·失喀思塔（Kal`ah Shikastah）城堡（即破堡）和珊喀万（Shankawān）城堡，这三座城堡合称思合·拱北（Sih Gunbadhān，即三个穹顶）。在山区有一个很深的峡谷，这里修建有一座堤坝，从此坝引出的水先输送到三个城堡中的第一座城堡里，堡中有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修建的很多大水池，水池由20根柱子支撑，其上精心地加上了顶棚，这样即使1000名士兵被围困一年，也可满足用水所需。这里还有一个修建在山顶上的校场（Maydān），是由阿都得·道剌设计修建的。[3]

普儿瓦儿河，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作夫儿瓦卜（Furwāb）[4]，波斯文写作普儿瓦卜（Purvāb），其发源于焦八儿坎（Jawbarkān）地区的兀建（Ūjān）或兀兹建（Uzjān）城[5]之北的夫儿瓦卜（Furwāb）村。该河起初向东流，而后在帕萨噶得（Pasargaede）城[6]以北的居鲁士（Cyrus）墓［穆斯林称该墓为所罗门王之母墓，即麻失哈得·麻答儿·搠里蛮（Mashhad-i-Mādar-Sulaymān）］转向西南，此后流经亦思塔赫儿城附近的峡谷，再经此城后，流入马鲁答失忒（Marvdasht）平原，接着汇入班底·异密（Band-i-Amīr）大坝北边不远的苦儿河。苦儿河[7]发源于兀建城稍南的苦儿万（Kurvān）[8]地区，因而距普儿瓦儿河的源头不远，但该河最初与普儿瓦儿河流向正好相反。流向西北的苦儿河形成了一个环形大沼泽，在兀儿得（Ūrd）地区一座叫沙合里牙（Shahriyār）的桥横跨其上，一条从昔剌思城通往亦思法杭城的夏季道路经过该桥。接着苦儿河南流到达苦剌（Kūrad）村[9]和喀剌（Kallār）村[10]附近，再转向东南，在这里接纳了发源于沙卜·八万河谷（见原文第264页）的一条支流，而后依次流经兰吉儿（Rāmjird）地区[11]和坎费鲁兹（Kāmfīrūz）[12]地区。然后这条河流入马鲁答失忒平原，在此地从左岸接纳了普儿瓦儿河，汇合后的河水流经上、下吉儿八儿（Kirbāl）[13]地区，接着在大忽剌麻（Khurramah）村附近流入八合乞干（Bakhtigān）湖[14]，该湖在南边的贾夫兹（Jafūz）地区和该河左岸的喀思坎（Kāskān）地区之间。

据《法儿思志》和其他波斯语文献记载，苦儿河的上游称作鲁得·阿

思河（Rūd `Āsī，即叛逆河），因该河在没有堤坝（*band*）拦截前，其河水无法用来灌溉。苦儿河上的第一座堤坝是班底·木贾剌坝（Band-i-Mujarrad，即秃坝）。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工程，曾经被毁，但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阿塔别·法赫儿·道剌·超里（Atabeg Fakhr-ad-Dawlah Chāūlī）对其加以修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法赫里思田（Fakhristān）坝，此名一直沿用到哈菲兹·阿卜鲁在世的时代。在普儿瓦儿河与苦儿河汇合处以南筑有著名的班底·异密（Band-i-Amīr）[15]或班底·阿都得（Band-i-`Adudī）堤坝，这座坝在有些文献中称作思吉儿·法纳·忽思罗·忽剌坝（Sikr-i-Fanā Khusraw Khurrah，Sikr意为“堤坝”）。该坝的所有不同名称均源于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当时他修建该坝的目的就是灌溉上吉儿八儿地区的土地。（与阿都得·道剌）同时代的穆喀达思称这座堤坝是“法儿思地区的奇迹之一”。该堤坝的坝基由石料与铅灌制而成，拦截的苦儿河河水在其前方形成一座巨大的水库。在阿都得·道剌水坝旁修建了10部巨大的水车，这些水车将水抬升到一定的高度，用来灌溉300个村庄（的土地），每个水车旁还修建了一个加工面粉的水磨。此后不久，水坝附近兴起了大的城镇。苦儿河最下游的堤坝称作班底·喀萨儿坝（Band-i-Kāssār，即染工坝），提高水位后可以灌溉下吉儿八儿地区的土地。这座水坝是一个古老的工程，曾被毁坏，但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前文提到的阿塔别·法赫儿·道剌·超里对其进行了修复，他也为班底·异密水坝的修复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并让其发挥作用。[16]

苦儿河流经八合乞干大湖周边的地区，今天该地虽已沙化了，但在中世纪时湖边肥沃的土地上有很多村庄和城市。这座湖的水域形成了两个大湖湾，其中南边一个在中世纪称作八合乞干（Bakhtigān）湾；湖之北边的称作卜亥剌·八萨夫牙（Buhayrah Bāsafūyah）或朱八南（Jūbānān）湾。这是座咸水湖，盛产鱼，这些鱼供应给昔剌思城的市场，湖边长满了芦苇，收割后可作为柴薪。贾夫兹地区位于八合乞干湖的西端，这里有忽剌麻（Khurramah）城（至今还存在的一个重要村庄）[17]，位于该湖南岸，在通往起儿漫地区的道路上，距昔剌思城14里格。穆喀达思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忽剌麻是一座城市，周边地域辽阔，还说在山顶上修建有一座城堡；蒙古统治时期，穆思套菲称这座城堡修建得非常好，异常坚固，《法儿思志》中提到了该城堡的蓄水池。[18]

八合乞干湖的东南端为答剌卜吉儿（Dārābjird）地区，这里有亥剌

（Khayrah）城[19]和尼里兹（Nīrīz）城[20]，这些内容将在下一章述及。该湖东部附近现在是无水的沙漠，但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里有两座重要的城市—大、小萨哈可（Sāhak）或萨黑（Sāhik）城，波斯文记为察黑（Chāhik，意为“小坑”或“井”）。大萨黑城[21]，有两条道路在此交会，即一条是从亦思塔赫儿城起程的道路，其沿八合乞干湖北岸延伸；另一条是从昔剌思城起程的道路，沿该湖南岸伸展，而后与上一条路交会于大萨黑城，只有一条从大萨黑城出发的道路可达起儿漫（Kirmān）城。穆喀达思称大萨黑城是座小城，这座城的书法家闻名遐迩，他们书写的《古兰经》抄本十分秀美。据穆思套菲记载，其附近有铁矿，《法儿思志》提到这里制作上乘的宝剑。

中世纪曾有两座重要城市，位于从大萨黑城通向亦思塔赫儿城的道路上，居八合乞干湖之北，在称作卜亥剌·八萨夫牙或朱八南湾的岸边，但现在看来这些城市的所有遗迹在地图上已无法查到。距大萨黑城6或8里格，位于湖之最东端的就是卜丹建（Budanjān）城[22]，曾称作喀里牙·阿思（Kariyat-al-Ās，即爱神木[23]）村，穆思套菲则用波斯文记作底合·木儿（Dih Murd）。该城周边地区盛产粮食，到处生长着爱神木，于是这座城市便以爱神木（Murd）命名。在喀里牙·阿思村西边，距去往亦思塔赫儿城的道路有六七里格远的地方就是喀里牙·阿卜·剌合满（Kariyat `Abd-ar-Rahmān）城，又称阿八答（Abādah）城[24]，这是八儿木（Barm）地区的一座城市。该城有优美的宅院和宫殿，据可疾云尼记载，该城的井水是间歇性的，有时上涨，外溢到地面，但有时井中的水位下降到很低，几乎看不到水。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阿八答城有一座储存兵器的坚固城堡，还有很多大储水池。[25]

苦儿河下游接纳普儿瓦儿河后，流经马鲁答失忒大平原；从亦思塔赫儿城北可以俯瞰平原上的三座城堡，这一平原又分为若干地区。上、下吉儿八儿地区靠近八合乞干湖的西端；哈夫剌（Hafrak）地区和喀里（Kālī）地区在苦儿河之北，喀里（Kālī）草原位于普儿瓦儿河的两岸。哈夫剌（Hafrak，在一些旧抄本中写作Habrak）地区有座坚固的胡瓦耳（Khuvār）城堡，附近是与之同名的村庄。伊斯塔赫里曾提到这个城堡，《法儿思志》也多次提到这座城堡，并记载其位置在苦儿河上的阿都得（`Adudī）堤坝与八合乞干湖岸边的阿八答城中间，与上述两地相距各有10里格。亚库特曾两次提到胡瓦耳城堡，但他没弄清其所在位置。这座城堡从井中汲水，其城墙异常坚固。马鲁答失忒平原以种植粮食而闻名，其利用苦儿河堤坝引来的水进行灌溉。据《法儿思志》记

载，马鲁答失忒之名源于“马鲁（Marv）的村庄”之意，其最初是亦思塔赫儿城的城区之一，后来成为贾失得王的花园，位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故址以南。[26]

马鲁答失忒平原北边就是坎费鲁兹（Kāmfīrūz）地区，其大部分位于苦儿河右岸，这一地区的首府为拜札（Baydā）城。拜札（Al-Baydā），阿拉伯语意为“白色”；这是波斯人（读成*Bayzā*）采用阿拉伯语地名的少数例证之一，并一直保留至今。被称作拜札的原因是这里的土地“远远望去，泛着白光”，伊本·豪喀尔则说该地被波斯人称作纳萨塔（Nasātak），但亚库特记为答儿·亦思费（Dār-i-Isfīd），意为“白宫”。早期穆斯林在围攻亦思塔赫儿城之时，其中一部分军队就驻扎于拜札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该城规模与亦思塔赫儿城一样大，穆喀达思称这是座优美的城市，有一座大清真寺和一座朝谒不绝的圣墓。其周边的草原很著名，这座用白土修建的城市在绿色的田野上“泛着白光”。坎费鲁兹地区包括有很多村庄，伊斯塔赫里提到了这些村庄的名称，在他那个时代橡树（Balūt）林中还有凶猛的狮子出没，这给草原上的牲畜造成威胁。

坎费鲁兹地区的东边和北边就是兰吉儿（Rāmjird）地区，其首府为麻因（Māyin）城[27]。该城和昔剌思城中间是哈札儿·撒卜儿（Hazār或Āzār Sābūr）城，别名乃萨卜儿（Naysābūr），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文献常提及此城。据穆喀达思记载，这是一座小城，但其周边土地辽阔，靠地下河道灌溉；该城是昔剌思城去往麻因城道路的第一站，位于从昔剌思城到亦思法杭城的夏季道或山道上。据穆喀达思记载，兰吉儿地区的首府麻因城是座繁华的城市，周边土地很肥沃，物产丰富。穆思套菲称在蒙古王朝统治时期这里的财税收入达52500迪纳（这些伊利汗钞约合17500英镑）。这座城里有著名的谢赫·古儿·安丹（Shaykh Gul Andām）的圣墓；在关口脚下、道路北边有麻失哈·亦思麻（Mashhad-i-Ismāīl）墓，他是第七代依麻木木萨·喀兹木（Imām Mūsā-al-Kāzim）之子。兰吉儿地区的土地收入颇丰，这得益于苦儿河上的班底·木贾剌坝，从该坝北边引来多条运河灌溉着这一地区。如前文所述，阿塔别·超里曾修复过这个水坝。兰吉儿地区有一座叫萨亦答八（Sa`īdābād）的城堡，修建在陡峭的山上，距山脚下的道路有一里格，旧时称作亦思费巴兹（Isfīdbādh，即白地）堡，在倭马亚王朝时期，该堡常被叛军首领占据，用以对抗官军。最后，伊斯兰历3世纪（10世纪）末，萨法儿王朝来思之子雅苦卜攻占了这座城堡，而后加固了其城

墙，并将其作为一处国家监狱，“关押谋叛者”。亦思费巴兹（Isfīdbādh）之名可能拼写有误，有时也拼写为亦思凡牙（Isfandyār），这显然应是《法儿思志》和穆思套菲所记载的靠近苦密思田（Kumistān）村的亦思费丹（Isfīdān），其附近的山里有一个大洞穴。[28]

苦儿河左岸，在距麻因城不远的地方有阿卜剌吉（Abraj，误拼成*Īraj*）城[29]及其城堡，伊斯塔赫里提到该城位于此地区（兰吉儿地区），至今在地图上还能查到。据《法儿思志》和穆思套菲记载，阿卜剌吉是山脚下的一个大村庄，这里的一些居民点修建在山的斜坡上。该城的城堡为底兹·阿卜剌吉（Diz Abraj）堡，城堡有一部分修建有人工城墙，另一部分则凭靠易守难攻的悬崖峭壁；城堡内有靠井水灌溉的花园。兀建（Ūjān）或兀兹建（Uzjān）城位于麻因城北一程之地，尽管穆思套菲提到过该城，但未详述。兀建城可能就是库达玛所提到的忽思干（Hūsgān，即Hūsjān），这一地名在书中误印为忽思坎（Khūskān），在穆喀达思的著作里又误印为哈儿思坎（Harskān）。[30]

从昔剌思城到亦思法杭城最便捷的道路需经麻因城、苦失可·札儿（Kūshk-i-Zard）城[31]，再经底合·吉儿都（Dīh Gīrdū）城[32]和亚兹得亦合瓦思（Yazdikhwāst）城[33]到法儿思地区边界的苦密沙（Kūmishah）城[34]。起自麻因城的道路经过关隘，继续向北从沙合里牙儿（Shahriyār）桥越过苦儿河，在该桥附近是叫答失忒·伦（Dasht Rūn）或答失忒·鲁迷（Dasht Rūm）平原，这里有萨剌丁（Salāh-ad-Dīn）设立的的卫所，据穆思套菲记载，从这里向北就可到达“母女关”（Garīvah-i-Madār-wa-Dukhtar），而后可达苦失可·札儿（即黄亭）城[35]，这里可能是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所记载的喀思儿·阿因（Kasr Ayin，或A`īn）城。大、小答失忒·伦平原的草原很有名，这里的农作物一年四熟，其灌溉用水源于苦儿河及其支流。苦失可·札儿之名，在《法儿思志》中第一次提到，一般写为苦失可·札儿（Kūshk-i-Zard，即金色亭）；再向北，在苦失可·札儿城和底合·吉儿都城之间是兀儿得（Ūrd）或阿瓦儿得（Āvard）地区，这里的草原更为肥美，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该地区的主要城市有：八贾（Bajjah）城[36]、泰麻里思田（Taymaristān，《法儿思志》中写为Taymarjān）城[37]等。穆思套菲提到了底合·吉儿都城，其显然就是《法儿思志》中记载的底合·高兹（Dīh Gawz，即Dīh Jawz），这两个名称的含义均为“核桃村”。早期阿

拉伯地理学著作中尽管未提及该地名（此名称为上文书写的波斯语形式），但通过道里志所记载的位置及两个亦思塔赫儿城人—库达玛和伊斯塔赫里所记下的方位，可以确定该地应与现在的底合·吉儿为同一地。

沿答失忒·兀儿得（Dasht Ūrd）平原东部边界分布着亦可里（Iklīd）城[38]、萨儿麻（Sarmak）城[39]和阿八答（Abādah）村[40]，而后为舒里思田（Shuristān）城[41]和萨儿委思田（Sarvistan）村[42]，其位于底合·吉儿都城和亚兹得亦合瓦思城中间。据《法儿思志》记载，亦可里城有一座优美的城堡，与萨儿麻城一样，以种植粮食而闻名。萨儿麻之名被穆喀达思拼写为贾儿麻（Jarmak）；这是一座修建很好的城市，其周边种植着各种树木，其中黄李子很有名，其果晒干后可以大量外销到其他地区。阿八答村是现在从昔剌思城到亦思法杭城邮道的一个站点，最初在《法儿思志》中提到，而后又被穆思套菲提及；同样还要谈到舒里思田城，其位于一条自东边流入沙漠的咸水河的岸边。穆喀达思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萨儿委思田村有一座清真寺，该地从附近的山上获得充沛的供水。亚兹得亦合瓦思（Yazdikhwāst）城[43]是这一地区的北部城市，第一次出现于《法儿思志》中，该地无疑是与穆喀达思以地名简称形式提到的阿兹喀思（Azkās）为同一地。穆思套菲将亚兹得亦合瓦思城和底合·吉儿都城并提，但他没有增加特别的内容。但前一名称常拼写为亚兹得亦合思（Yazdikhās）。[44]

如前所述，苦密沙城位于法儿思地区的北部边界，穆喀达思将其拼写为苦密沙（Kūmishah），此地常被看作亦思法杭地区的一部分。穆思套菲称守卫该地的库兰建（Kūlanjān）城堡是用泥土夯筑的，他还说该地周边是富庶地区。亚兹底亦合瓦思城的西边就是速麦兰（Sumayram）城[45]，其靠近塔卜河源头，从昔剌思城到亦思法杭城的西道经过该城。穆喀达思称速麦兰城的市场内修建有一座很好的清真寺。这里盛产温带的坚果和其他水果，一座坚固的城堡守卫着这座城市，城堡里有一处流量很大的泉水。亚库特称这座城堡为护密札（Wahānzād）堡。从昔剌思城到亦思法杭城的西道经马鲁答失忒平原上的拜札城，而后通向密合剌建纳瓦（Mihrajānāvādh，或Mīhrajānābād）城，据穆喀达思记载，该城周边地域辽阔，显然该城位于苦儿河岸边或该河西边的其中一条支流的岸边。该城和速麦兰城之间的要冲就是苦剌（Kūrad）城和喀剌（Kallār）城（前文提到位于苦儿河岸边），这是两座邻近的城市，据穆喀达思和穆思套菲记载，这里因产粮食和温带的水果而闻名。伊斯塔赫里称这两座城市修建有很好的民

居，但显然这些城市的所有遗迹已荡然无存。[46]

从昔剌思城到亦思法杭城三条道路中最短的一条道路，前文已经提及，即经过麻因城和答失忒·伦平原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法儿思志》中称作冬季道。夏季道较长，这是三条道中最东边的一条，该道经亦思塔赫儿城，过喀敏（Kamīn）城[47]和居鲁士墓到达底合·必得（Dīh Bīd）城[48]，从这里向右分出一条道，到达亚兹得（Yazd）城。亦思法杭道继续向西经萨儿麻城和阿八答村，到达亚兹底亦合瓦思城和苦密沙城。喀敏城距普儿瓦儿河东岸不远，据穆思套菲记载，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这是一座相当重要的城市，其周边是产粮食的地区，他还特别提到了沿该河河岸分布的肥美草原。再往北的普儿瓦儿河拐弯处就是帕萨噶达（Pasargadae）城和居鲁士墓，需要说明的是穆斯林将这座墓看作所罗门母亲的墓。这里树立有四边形的石制纪念碑，至今还可以看到，并由一个护符保护着，据《法儿思志》记载，任何试图进入院墙内的人的眼睛会突然变瞎。附近地区的草原称作麻儿噶札儿·喀兰（Marghzār-i-Kālān）草原。底合·必得（Dīh Bīd，即柳村）城是向北道路的第二站，在这里道路岔开了，穆喀达思和其他阿拉伯地理学家称该地为喀里牙·必札（Kariyat-al-Bīdh），再往北，大致在亦思塔赫儿城和亚兹得城中间就是阿八儿苦合（Abarkūh）城。

阿八儿苦合（Abarkūh，或Abarkūyah）城[49]有时缩写为八儿苦合（Barkūh），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是座有城墙的城市，规模是亦思塔赫儿城的1/3，这里有很多大市场，穆喀达思提到该城有一座优美的清真寺。穆思套菲称这里的居民全为工匠，附近的土地盛产粮食和棉花；他还说这座城市的气候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犹太人活不过40天，因此“阿八儿苦合城居民中无犹太人”。据穆思套菲记载，城里有著名圣徒陶·哈剌木（Tāū-al-Haramyn，即两个禁地，也就是麦加与麦地那的孔雀）的墓；需要说明的是这位圣徒生前为人谦卑，其墓上从来就没有顶部。穆思套菲说一旦在陵墓上建起了顶部，就会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将其摧毁，以此来避免圣徒的尸骨变为盲目崇拜者的崇拜物。阿八儿苦合城附近就是麻剌噶（Marāghah），或法剌噶（Farāghah）村[50]，这里有成片的柏树，其比巴里黑（Balkh）城和苦黑思田地区产的吉失麻（Kishmar）柏树还要优质、粗壮，因而在各地享有盛名。[51]

亚兹得城在早期称作喀萨（Kathah），但这座城被专称为亚兹得城时，喀萨之名就指称该城所在的地区，又称豪麻·亚兹底（Hawmah-i-

Yazd）或朱麻·亚兹底（Jūmah-i-Yazd）地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称这座城修建得很好，有坚固的城墙，还有两座铁质城门：八卜·亦札门（Bāb-Izad）与八卜·米思只门（Bāb-al-Masjid），即清真寺门，后一座城门靠近清真寺，该寺位于很大的外城区内。（此地的）一条小溪从城堡山流出，尽管该地四周距“大沙漠”很近，但其土地异常肥沃，这里产的水果还大量外销到亦思法杭城。该城附近有一座产量很高的铅矿。可疾云尼和其他著述者提到了亚兹得城纺织的厚实丝织品，其款式十分漂亮[52]。穆思套菲说这座城是用晒干的土坯修建的，和其他地方的砖块一样经久耐用，这里几乎不下雨，但供水充足，这些水均是通过渠道从山上引来的，且每家每户都建有自己的储水池。

亚兹得城北边的第一站就是安吉剌（Anjīrah，即无花果）村，接下来的第二站就是哈札纳村（Khazānah，常错误拼写为Kharānah）村[53]，这是一个有农田和果园的大村，其附近山上有一座城堡，守卫着该村。第三站是沙漠边上的萨干（Sāghand）村[54]。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一驿站（萨干村）是一个有400人的村庄，由附近的一座城堡守卫，这里的土地靠地下渠道[55]灌溉。亚兹得城西北部的麦卜（Maybud）[56]、兀可答（`Ukdah）[57]、纳因（Nāyīn）等三座城，均在沙漠的边缘，一般将这三座城视为亚兹得城的外围城市，但大多数文献将纳因城划入亦思法杭地区。据穆思套菲记载，一座城堡守卫着纳因城，其城墙周长为4000步。但文献中未详细记述这些城市的情况，仅是提到了它们的名称而已[58]。

亚兹得城以南约75英里，在该城与沙儿·八八（Shahr-i-Bābak）城[59]中间有阿纳儿（Anār）城[60]，其距东南方向的八合剌麻八（Bahrāmābād）城[61]有60英里，这两座城现在均属于克尔曼地区，但中世纪时期这些地方均属于法儿思地区，称作鲁赞（Ar-Rūdhān）地区，其三座主要城市为：阿班［Abān，现为阿纳儿（Anār）］、阿兹坎（Adhkān）[62]和兀纳思（Unās，靠近八合剌麻八）[63]等城。[64]

兀纳思城是这个地区（鲁赞地区）的首府，伊斯塔赫里称该城的规模和阿八儿苦合城一样，穆喀达思说该城有座距离市场几步之遥的优美清真寺，还说城南有澡堂和灌溉良好的花园，但城周边全是沙漠。兀纳思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有8座城门，穆喀达思访问过该城，并悉数列出了这8座城门。该城的染工很有名，他们均居住在内城里，因这里没有外城区。据说鲁赞地区的面积超过60平方里格。这一地区曾属于起儿漫

地区，但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被划入法儿思地区，据《法儿思志》记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塞尔柱王朝阿儿普·阿思兰（Alp Arslān）时期，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中叶，在他征服所有这些地区后，将鲁赞地区重新划入起儿漫地区。[65]

鲁赞地区与沙儿·八八城之间就是小城 底合·兀失土兰（Dīh Ushturān）城[66]，或阿拉伯语所称的喀里牙·贾麻儿（Kariyat-al-Jamāl）城，这两个名称的含义均为“骆驼村”，据穆喀达思记载，该城的清真寺里有一座很高的宣礼塔，城南一条小河的岸边有很多优美的花园。沙儿·八八城的含义就是八八（Bābak，或Pāpak）之城，八八是萨珊王朝第一代君主阿儿达喜儿（Ardashīr）之父，沙儿·八八城常划入起儿漫地区。伊斯塔赫里、穆喀达思和其他著述者曾提及这座至今存在的城市，但没有细述。穆思套菲将该城划入起儿漫地区，并说这里盛产粮食、棉花和椰枣等。沙儿·八八城之西两站，在通往亦思塔赫儿城的道路上就是哈剌忒（Harāt）小城[67]。《法儿思志》中将哈剌忒城和萨黑（Sāhik）城（原文第278页已提及）并提。伊斯塔赫里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哈剌忒城的规模要比阿八儿苦合城大一些；据穆喀达思记载，哈剌忒城附近盛产外销的水果，尤其是苹果和橄榄，这里有很好的市场，清真寺附近有街区分布，有一条优美的河流穿过该城的花园。哈剌忒城仅有一座城门；据穆喀达思记载，哈剌忒城附近有一座小城叫法剌（Far`ā）城[68]。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可疾云尼称哈剌忒城的花园里种植着大量的古拜剌（Ghubayra）植物，可能是薄荷类植物。他说当这种植物开花时，该城的妇女会欣喜若狂，异常激动。萨黑城的东南边，靠近答剌卜吉儿（Dārābjird）地区边界处就是苦忒鲁（Kutruh）城[69]，至今仍然是一座重镇，《法儿思志》和穆思套菲称该城［他们拼写其名称为卡鲁（Kadrū）］附近有很多优质铁矿。[70]

[1] 珀儿斯珀里斯（Persepolis），从构词来看意为“波斯城”，即Perse意为“波斯”，polis希腊语意为“城”。译者。

[2] 今此河仍称普勒瓦尔（Pulvār）河，发源于伊斯法罕南部的山区，最后汇入库拉河。译者。

[3] 巴拉祖里，第38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9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5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

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7b、81b、83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3、174、178、179页。Hfz.，85b叶面。这三个城堡的遗址存在至今，莫瑞尔（J. Morier）曾造访过其中的一座城堡，见《第二次穿越波斯的旅行记》（*Second Journey through Persia*，伦敦，1818年），第83、86页。参见伯德（De Bode）《鲁尔斯坦旅行记》（*Luristan*），第1卷，第117页。

[4]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4页提到了法儿瓦卜（Farvāb，即Furwāb，引者）河，并载："该河在亦思塔赫儿城的东边汇入苦儿河。"译者。

[5] 今此名不存，但据方位判断，大致位于今阿里阿巴德，为法尔斯省埃格利德（Eqlīd或 Iqlīd）州洪杰什特（Khonjesht）乡的一个村子。译者。

[6] 帕萨噶得（Pasargaede）城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居鲁士（前559～前529年在位）在法儿思建立的首都，这里遗存有王朝的宫殿遗址、居鲁士陵墓和御花园等，这些建筑反映了当时建筑艺术的发展与王朝的辉煌。今称作帕萨尔加德（Pāsārgād），也称作玛达尔·苏莱曼（Mādar Sulaymān），为法尔斯省帕萨尔加德州州名和帕萨尔加德镇镇名，帕萨尔加德镇西北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遗址所在地。译者。

[7]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4页提到了苦儿（Kurr，即Kur，引者）河。译者。

[8] 此地今难觅。译者。

[9] 今此名不存，应在法尔斯省埃格利德州中部区忽思罗·席琳（Khosrow Shirin）乡库拉尔（Kūlār）村之南，曾是通往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译者。

[10] 应该就是今埃格利德州中部区忽思罗·席琳乡的库拉尔村，是去往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的重要道路。译者。

[11] 今称拉姆吉尔德（Rāmjird），旧称库什卡克（Kūshkak），是法尔斯省马夫达什特州都罗德赞（Dorudzan）区的区府，人口2000，是去往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的要道。译者。

[12] 今称卡姆费鲁兹（Kāmfīrūz），或南卡姆费鲁兹（Kāmfīrūz-e Jonūbī），是法尔斯省马夫达什特州卡姆费鲁兹区区府，人口2500，位于卡姆费鲁兹之南，是去往

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的要道。译者。

[13] 这个地区的首府为吉儿八儿（Kirbāl）城，今称作马夫达什特（Marv Dasht）城，是法尔斯省马夫达什特州州府，人口12.3万，位于设拉子西北，是古今以来的交通枢纽。译者。

[14]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54页载："第九个（咸水湖，引者）是位于法儿思（Pārs）的必贾干（Bijagān，即八合乞干）湖，长20法儿萨，宽15法儿萨。湖中有盐析出，周边有很多野兽。湖边发源有一股泉水，一直到达答剌卜吉儿的边界，然后入海。"译者。

[15] 莫尔（Thomas Moore，1779～1852年，诗人，译者）在其著作《天使之爱》（*Lallah Rookh*）中提到了"本得米尔（Bendemeer）河"。

[1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44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79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16、218页。Hfz. 32a叶面。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107页。

[17] 今为海拉梅（Kharāmeh、Karameh、Kherāmeh），是法尔斯省海拉梅州州府，位于巴赫泰甘湖南岸，人口2.1万，是通往设拉子和克尔曼的重要通道。译者。

[1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7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80a、82b、87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4、179、225、226页。

[19] 今此名不存，从地理方位看，应该是法尔斯省内里兹（Neyrīz 或 Nīrīz）州的哈吉阿巴德（Hājīābād）村，曾是去往设拉子的重要通道。译者。

[20] 今为内里兹（Neyrīz 或 Nīrīz），是法尔斯省内里兹州州府，人口4.5万，是去往克尔曼和设拉子的重要通道。译者。

[21] 今为查哈克（Chāhak），是内里兹州州府北边的一个小村庄。历史上是去往法尔斯、伊斯法罕和克尔曼的交通要道。译者。

[22] 今此名不存，从地理方位看，应该是内里兹州阿巴代赫·塔什克（Ābādeh Ţashk）城东边的迪赫兹尔（Dih Zīr）。这里是古代巴赫泰甘湖北岸的重要通道。译者。

[23] 爱神木，原产于地中海，又称加州桂，常绿灌木，叶小而有光泽；花米色，具香味，单瓣或重瓣，夏末开花。生长缓慢，可长成大树。叶子可作为烹饪佐料；油用于配制香水；干花用于“百花香”。可入药，用于治疗泌尿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译者。

[24] 今为阿巴代赫·塔什克（Ābādeh Ţashk或 Ābādeh-ye Ţashk），是内里兹州阿巴代赫·塔什克区区府，人口6000，是古代巴赫泰甘湖北岸的重要通道。译者。

[25]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48、53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5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1、13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7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6a，68 a、b，83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

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5、179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60页。除阿八答（Abādah或Abādhah）城外，后来的文献还提到了亦思塔赫儿城到亦思法杭城道路上同名的村庄。

[2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4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7b，67b，80a，83a，86a、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4、175、179、18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99页；第2卷，第480页。

[27]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58页提到了马因（麻因）城，并说："这是一小村镇，村内河流遍地，花园衔接，市场繁华，多胡桃树。"今为麻辛（Mā'īn或 Mahīān、Māhīn、Mā'īnī、Qal'eh Now-e Mā'īn），是法尔斯省马尔乌达什特（Marvdasht）州都鲁德赞（Dorūdzan）区阿巴尔吉（Abarj）乡的一个村，人口530。曾是去往设拉子和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译者。

[28] 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6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11、117、126、13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9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2、437、458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6a，68a、b，83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

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4、175、18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61页；第3卷，第93、838页。萨亦答八（Sa`īdābād）城堡可能就是现代的满素尔巴德（Mansūrbād），如辛德勒（H. Schindler）所记述的那样（*P. R. G. S.*，1891年，第290页）。

[29] 即马尔乌达什特州都鲁德赞（Dorūdzan）区阿巴尔吉（Abarj）乡与阿巴尔吉镇，人口1.1万，交通地位与麻辛相同。译者。

[30] 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6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2、13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7、458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6a、83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4、179页。《法儿思志》所记载的阿卜剌吉（Abraj）无疑是正确的读音，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的文本中印成了亦剌吉（Iraj），这是抄本中的音点笔误造成的，亚库特采用了后一种写法（第1卷，第419页）。这个旧城堡在阿卜剌吉城北，现在被称作伊珊喀万（Ishankavān），参见上文提到的亦思塔赫儿城三个城堡中的珊喀万（Shankavān）城堡（原文第276页）。见辛德勒（H. Schindler）的记述（*P. R. G. S.*，1891年，第290页）。

[31] 今此名不存，方位难以确定，但应该在亚兹德哈斯特之南，曾是通往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译者。

[32] 今此名不存，但应该在舒尔杰斯坦（Shurjstān）之南，大致在今阿巴代（Ābādeh）州巴赫曼（Bahman），这里是通往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译者。

[33] 今为亚兹德哈斯特（Īzad Khast或Yazd-e Khāst），是法尔斯省阿巴代

（Ābādeh）州的一座城市，人口7300。这里有世界文化遗产，是从设拉子通往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译者。

[34] 今此城有两个名称：一是新名，称为沙阿礼萨（Shahrezā）；二是库米沙赫（Qomīsheh）。此城是伊斯法罕省沙阿礼萨州州府，人口10.8万，是伊朗著名的旅游城市，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5] 今此城名不存，方位难以确定，曾是通往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译者。

[36] 今此城位置难以确定，但应该在舒尔杰斯坦之南，曾是通往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译者。

[37] 今此城名不存，方位难以确定，曾是通往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译者。

[38] 今为埃格利德（Eqlīd、Eklīd，或 Iqlīd），是法尔斯省埃格利德州州府，人口4.9万。其位于扎格罗斯山，是座漂亮的高原城市。译者。

[39] 今为苏尔马格（Sūrmak，或Sūrmaq），是阿巴代（Ābādeh）州的一座城市，人口3000，是通往伊斯法罕、设拉子、伊拉克、克尔曼等地的十字路口，是古今交通要道。译者。

[40] 今为法尔斯省阿巴代（Ābādeh）州州府，人口5.9万，是从设拉子通往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以此地命名的地毯是伊朗四大名地毯之一，享有世界声誉。译者。

[41] 今为舒尔杰斯坦（Shūrjestān），是法尔斯省阿巴代州巴赫曼乡的一个村庄，人口600，是设拉子通往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译者。

[42] 今此名不存，应在舒尔杰斯坦之南，曾是通往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译者。

[43]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58页提到了亚兹德哈斯（Yazdukhās，即亚兹得亦合瓦思），并称："这是一小村镇，但房舍坚固，市廛美好，清真大寺的建筑奇特，房顶皆用石块砌成，该镇位于大沟边上，沟内有花园水流。城外有一戍站，供商旅住宿，戍站有一铁门，十分牢固。站内设有许多店铺，出售旅行者所需的杂物。""亚兹德哈斯出产著名的干酪，其味鲜美无比。"译者。

[44]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8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6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3、13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7、458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

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6a，80b，81a，83a、b，83a、b，84a、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4、175、179、20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97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52页。

[45] 今为塞米罗姆（Semīrom），是伊斯法罕省塞米罗姆州的州府，人口2.6万，是通往伊朗西南和伊斯法罕的重要通道。著名的塞米罗姆瀑布就在此州，是著名的旅游景点。译者。

[4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6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6a，84a、b叶面。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89、437、457、45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151页；第4卷，第942页。需要说明的是穆喀达思在其道里志中提到了苦剌（Kūrad）村和喀剌儿（Kallār）村，似乎这两个村庄彼此很近（第458页）。据《法儿思志》记载，苦剌村在喀剌儿村北5里格（第84b叶面）。

[47] 此城今已不存，但其名称保留下来了，是法尔斯省帕萨尔加德（Pasargad）州的名称。从城市的位置来看，距离帕萨尔加德州州府萨阿达特沙赫尔（Sa‘ādat Shahr，Sa‘ādatābād）城不远或者在其附近。此城是去往设拉子、伊斯法罕、亚兹德等地的重要通道。译者。

[48] 今为代比德（Dīh Bīd，Şafāshahr或Khorrambīd），是法尔斯省胡拉穆比德（Khorrambīd）州州府，人口2.2万，是去往设拉子、伊斯法罕、亚兹德等地的三岔路口，具有重要地位。译者。

[49] 今为阿巴尔古（Abarkūh或Abar Qū），是亚兹德省阿巴尔古州州府，人口2万，是通往亚兹德城的重要通道。这里以有古柏树而闻名。译者。

[50] 今为法拉格赫（Faragheh），在法尔斯苏尔马格城东边，是阿巴尔古州中心区的一个乡，人口3000，有20多个村。此地向东经过阿巴尔古城，可到达亚兹德城。译者。

[5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9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7、457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81b、84b叶面。Mustawfi（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4、175、180、200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266页。伊本·白图泰也称无顶墓现象是报达城伊本·罕百里（Ibn Hanbal）圣墓的一个特征（第2卷，第113页）。高尔德兹赫尔（Goldziher）教授在他的著作《伊斯兰教研究》（*Muhammedanische Studien*，第1卷，第257页）中对这一奇怪的崇拜现象做了很有趣的评论。

[52] 《马可波罗行纪》第33章第50页载，耶思德（亚兹得）城“商业茂盛，居民制作丝织物名曰耶思的（yazdi）。由商人运赴各地，贩卖谋利。”译者。

[53] 上述两个村庄的方位已难以确定。译者。

[54] 今为萨甘德（Sāghand，或 Sāqand）。是亚兹德省阿尔达坎（Ardakān）州哈拉纳格（Kharanaq）区的一个村庄，是去往亚兹德城的要道。译者。

[55] 应是坎儿井。译者。

[56] 今为梅博德（Meybod），是亚兹德省梅博德州州府，人口5.8万，是通往亚兹德和伊斯法罕的要道。译者。

[57] 今为阿格达（'Aqdā或Aghda），是亚兹德省阿尔达坎州阿格达区区府。阿格达城人口1500，是去往亚兹德和伊斯法罕的通道。译者。

[5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96、294、29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4、437、496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8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5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694页；第4卷，第711、734页。

[59] 今为沙赫尔巴巴克（Shahr-i-Bābak），是克尔曼省沙赫尔巴巴克州的州府，人口4.39万，是去往亚兹德、锡尔詹（Sīrjān）的要道。译者。

[60] 今为阿纳尔（Anār），是克尔曼省阿纳尔州州府，人口4.35万，是去往亚兹德、锡尔詹、克尔曼的重要道路。译者。

[61] 今更名为拉夫桑詹（Rafsanjān，Rafsinjān，旧称Bahrāmābād），是克尔曼省拉夫桑詹州州府，人口13.6万，是去往设拉子、亚兹德、锡尔詹、克尔曼城的重要道路。译者。

[62]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63]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64] 从文献记载可知，阿班城距法合剌吉（Fahraj）城（在亚兹得城东南5里格）25里格。过阿班城18里格为鲁赞（Ar-Rūdhān）城，兀纳思城距鲁赞城不到一站，或两邮传站（Barīd）的距离。兀纳思城距必满（Bīmand）城有1程和2里格（或1邮传站），后一城在思儿建（Sīrjān）城西4里格。从鲁赞城到沙儿·八八城有3天的路程，第一站到“骆驼村”（Kariyat-al-Jamāl）。从距离估计，现代的阿纳儿城和八合剌麻八城分别就是中世纪的阿班城和兀纳思城。而据推断，鲁赞城应叫阿兹坎城，该城介于前面两城之间，靠近现代的古勒纳巴德（Gulnābād）村。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35、168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4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7、473页。亚库特将问题混淆了，他称阿班城好像应该就是兀纳思城（第3卷，第925页），但从上述的距离来看是不可能的。这里的阿班可能是兀纳思的笔误，他在另一处记载中将其划入起儿漫地区（第1卷，第367页）。

[6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0、12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37、438、462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4b叶面。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830页。Abān城周边地区至今还很肥沃，产大量的粮食，供外销。

[66]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67] 今为赫拉德（Herāt，以前称Tājābād-e Harāt），是亚兹德省哈塔姆（Khatam）州州府，人口1万，是去往设拉子、锡尔詹等地的要道。译者。

[68]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69] 今为卡图鲁耶赫（Qaţrūyeh），是法尔斯省内里兹州卡图鲁耶赫区区府，人口2700，是通往设拉子和锡尔詹的重要通道。译者。

[70] 赛克斯上校［《万里波斯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78页］发现了沙儿·八八城附近的袄教祠遗址。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182页。Mukaddasī（穆喀

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52、423、424、425、436、437、455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6a、68a叶面。哈剌忒（Harāt）村的名称应拼写为哈烈（Herāt），而哈烈城是呼罗珊地区著名的城市。

第二十章 法儿思（Fārs）地区（续）

答剌卜吉儿·忽剌（Dārābjird Kūrah）或沙班喀剌（Shabānkārah）区。答儿坎（Darkān）城和亦哥（Īg）城堡。尼里兹（Nīrīz）城和亦思塔八纳（Istahbānāt）城。法萨（Fasā）城、鲁尼兹（Rūnīz）城和哈速（Khasū）城。剌儿（Lār）城和夫儿哥（Furg）城。塔鲁迷（Tārum）城。速鹿（Sūrū）城。法儿思地区的贸易和产品。经过法儿思地区的诸道。

答剌卜吉儿·忽剌（Dārābjird Kurah）区是法儿思地区五个区中最东边的一个，确切地说这个区对应的是沙班喀剌（Shabānkārah）地区，在蒙古人统治时期，该区从法儿思地区分出，形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区。《法儿思志》记载沙班喀剌（Shabānkārah，但著述者没有用此名称呼答剌卜吉儿地区）源于低廉地区的法兹鲁牙（Fadlūyah）家族所属部落名称，他们属于什叶派亦思麻因（Ismāīl）支派。塞尔柱王朝时期，他们和曲儿忒人一起卓有成效地反抗阿塔别·超里，塞尔柱王朝灭亡后，沙班喀剌部占据了法儿思的东部地区，并以该部名称命名这一地区。马可波罗以宋喀剌（Soncara）之名提到了沙班喀剌地区，这是他记述的八个波斯（Persia）“王国”中的第七个“王国”；但这个名称后来废弃不用了，现在该地称为答剌卜吉儿区。[1]

哈里发王朝统治时代，这一地区的首府为答剌卜吉儿（Dārābjird），或答剌卜即儿（Dārābgird）城，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这是座有城墙和护城河的城市，其有四座城门，城中央有座石山。穆喀达思称这座城呈圆形，到任何一方向均为1里格，这里的果园很繁盛，市场供应充足，穿城而过的河流提供水源。答剌卜吉儿城附近就是著名的拱北·木密牙（Kubbat-al-Mūmiyā），即沥青或石脑油穹顶，用一扇铁门锁着，这个门一年只会开一次，届时算端的一位官员进入里面，放置一个盒子，用十二个月的时间收集珍贵的木密牙（Mūmiyā，即沥青或石脑油，译者），然后将盒子口封起来，运到昔剌思城，以备御用。据《法儿思志》记载，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答剌卜吉儿城大部分已毁，但城中央有一座坚固的城堡。城周边是答剌卜吉儿地区著名的辽阔草原（Marghzār），附近有七彩岩盐，可供开采。据穆思套菲记

载，在答剌卜吉儿城附近有座坚固的关隘，由一座叫唐·兹纳（Tang-i-Zīnah）的大城堡守卫。[2]

沙班喀剌部统治时期，答剌卜吉儿地区的首府迁到了答儿坎（Dārkan），或札儿坎（Zarkān）城[3]，城北有亦哥（Īg），或阿委（Avīg）城堡[4]。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提到了这些地方，记其名称为答儿坎（Ad-Darkan）或答剌（Ad-Dārākān）和亦吉（Īj），据伊斯塔赫里记载，在他那个时期这两个地方均有一座清真寺。穆思套菲一般将答儿坎拼写为札儿坎（Zarkān），并将这里的城堡称为喀剌·阿委（Kal`ah Avīg）城堡。他还说该城周边的土地异常肥沃，产棉花、粮食、椰枣和其他水果。据他记载，阿委城堡最初由塞尔柱王朝时期的哈速牙（Khasūyah）部落修筑，亚库特说这里产的水果甚至远销到吉失（即凯思）岛。

亦哥城堡的东北是乃里兹（Nayrīz）或尼里兹（Nīrīz）城及其同名的地区，位于八合乞干湖东端，有时也以该湖之名来命名这一地区。穆喀达思称乃里兹城的街市里曾有座大清真寺，并说这座寺的遗址直到伊斯兰历340年（951年）还存在。靠近湖边就是黑儿（Khīr，也拼写为Khayār或Al-Khayrah）城，据文献记载，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起，这里是沿八合乞干湖南岸道路的一个驿站，这条道路从昔剌思城通往起儿漫城。穆思套菲与《法儿思志》均将亥剌（Khayrah）城周边的地区称作迷失喀纳（Mīshkānāt），这里产的葡萄干（*Kishmish*）很有名，坚固的城堡守卫着尼里兹城和亥剌城。[5]

位于亥剌城和亦哥城堡中间的城市就是亦思塔八纳（Istahbānāt）城[6]，阿拉伯地理学家将其名称拼写为亦思塔八南（Al-Istahbānān），有时也拼写为亦思八塞纳（Al-Isbahānāt），波斯人将其简称为亦思塔班（Istahbān）。据穆思套菲记载，该城隐没于一片树林中，其附近有座坚固的城堡。阿塔别·超里摧毁了这座城市，但不久后他又进行了重建；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哈速牙部占领了该城堡。

法萨（Fasā）城[7]，波斯人拼写为帕萨（Pasā），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该城是答剌卜吉儿地区的第二大城市，规模差不多和昔剌思城一样大。这座城修建得不错，民居使用了大量的柏木，居住在这里有益于健康。该城的市场很好，城周边有城壕，还有一座城堡守卫，内城门外有外城区。这里的果园里盛产椰枣、坚果、柑橘等。穆喀达思说用砖块建成的大清真寺有两座庭院，其华丽程度可以和麦地那城的清

真寺相媲美。《法儿思志》中说法萨城的规模差不多和亦思法杭城一样大。沙班喀剌部摧毁了该城，阿塔别·超里进行了重建。穆思套菲还说该城在古代称作萨三（Sāsān）城，按规划图的样式建成了三角形。由于城内没有水井，充足的供水是从地下渠道获取的。该城附属有萨可·密思喀汗（Shakk Mīskāhān）城和萨可·鲁得八儿［Shakk Rūdbāl，或鲁得八儿（Rūdbār）］城[8]，城市附近有坚固的合洼丹（Khwādān）城堡，这里有很多储水的大水池。[9]

苦儿木（Kurm）城[10]位于去往萨儿委思田（Sarvistān）城的道路上，距法萨城北有数英里，因此在各种道里志中均提到了该城。据《法儿思志》记载，该城所属地区和鲁尼兹（Rūnīz，或Rūbanz）地区均由法萨城管辖；鲁尼兹地区是哈速（Khasū）地区的一部分，穆喀达思称该区位于距答剌卜吉儿城通往朱外木·阿卜·阿合马城道路西南一站远的地方（见原文第254页）。早期地理学家将该名（鲁尼兹）拼写为鲁尼吉（Rūnīj）或鲁班吉（Rūbanj）城，该地很可能就是现在的哈速（Khasū，或Kusū）城[11]。穆思套菲提到了苦儿木和鲁尼兹两座城，说这里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据穆喀达思记载，哈速（Khasū，或Khashū）地区一直向东伸展，这里除了有鲁尼吉城外，还有鲁思塔·鲁思塔（Rustāk-ar-Rustāk）[12]、夫儿哥（Furg）[13]、塔鲁迷（Tārum）[14]等城。穆思套菲将哈速城划入答剌卜吉儿地区。[15]

鲁尼兹城正南是亚兹底亦合瓦思（Yazdikhwāst）小城[16]，穆喀达思和亚库特均将该城划入答剌卜吉儿地区，这座小城再向南就是剌儿（Lār）城[17]。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都没有提到剌儿城，该名称也没有出现于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的《法儿思志》中。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穆思套菲第一次提到剌儿，并作为靠近海湾的一个地区（*vilāyat*）的名称；他还说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是从事航海贸易的商人，此地产粮食、棉花和椰枣等。和他同时代的伊本·白图泰约在伊斯兰历730年（1330年）访问过剌儿城，并称这是一座有很多花园和市场的大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在木札法儿王朝君主沙·舒札（Shāh Shujā`）[18]统治时期和后来的帖木儿王朝时期，剌儿城成为造币城，于是从那时起，这座城具有了相当的规模，而且地位很显要。

夫儿哥（Furg）城距答剌卜吉儿城东南有三站之地，至今仍是一座相当大的城市。穆喀达思将其拼写为夫儿吉（Furj），并称此城旁边有姊妹城卜儿可（Burk）城，这两个名称仅仅是波斯地名形式的不同变化

而已。这座城之所以叫卜儿可是因其位于“像驼峰一样”的山丘上，山丘距山脉有2里格；该城市场内有一座清真寺，居住在这座优美的城市令人惬意。夫儿哥城附近的山顶上有一座城堡，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其还不是一座大城市，但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很多澡堂，此外，这两座城的水资源供给丰富。很显然，这两座城市的名称常被混淆，并相互替换。《法儿思志》将其记载为普儿可（Purk或Purg），并称其坚固无比的城堡由石头砌成，而且很大。穆思套菲说卜儿可（Burk，他这样拼写）城附近盛产粮食和椰枣。据穆喀达思记载，鲁思塔·鲁思塔城是座有良好市场的小城，位于一个肥沃地区的中央，其向任何一方向均为4里格。该城在去往答剌卜吉儿城的道路上，距夫儿哥城西北一站。[19]

塔鲁迷（Tārum）城，有时也拼写为塔鲁迷（Tārum），这个名称和吉八儿地区一个区的区名相同（见原文第225页），该城位于通往海岸的道路上，距夫儿哥城之东两站。穆喀达思提到了该城的清真寺，并盛赞其市场、花园、椰枣林，该城还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这里盛产蜂蜜，《法儿思志》称该城规模和夫儿哥城相当，有座拥有很多大水池的坚固城堡。从塔鲁迷城起，商道差不多向正南到达海岸，那里有速鹿（Sūrū，或Shahrū）港[20]，对面就是忽里模子（Hurmuz）岛。据穆思套菲记载，该港为徒撒儿（Tūsar）港，但读音无法确定。阿拉伯地理学家称速鹿是一渔村，没有清真寺，所需水资源是从附近山区凿井获取的。穆喀达思称从这里经过海湾可与阿蛮（`Omān，又译阿曼）从事大宗贸易，他还说这是一座小城，其确切位置就在起儿漫地区的边界。[21]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均详细记载了法儿思地区的贸易与产品。如前所述，在这一时期，波斯湾沿岸的主要港口是尸罗围港。此地经海路可输入所有的进口物品，如来自的印度奇珍异货，用阿拉伯语则总称为海货（*Barbahār*）[22]。伊斯塔赫里所记尸罗围港进口商品如下：芦荟木（可燃烧）、琥珀、樟脑、宝石、竹子、象牙、乌木、纸张、檀香、各种印度香水、药品和佐料等。此城（尸罗围）本身可以制造精美的餐巾和亚麻面纱，这里还有一个出售珍珠的大市场。

长期以来法儿思地区以产各种品质的玫瑰油（attar）产品而闻名（阿拉伯语中`*Atar*或`*itr*，意为“香”或“精”），这种玫瑰油专门是从种植于朱儿（Jūr）或费鲁札八城周边地区的红玫瑰中提取的。[23]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些玫瑰油外销到世界各地，既到印度、中国和呼罗珊，又

到马格里布（Maghrib，即西北非洲）、叙利亚和埃及等。朱儿城附近地区除了产玫瑰油外，还产椰树花水和各种特殊香精，这些香精是从青蒿［阿拉伯语称为凯速木（*kaysūm*），即艾菊（*Artemisia abrotanum*）］、藏红花、百合花、柳树花等中提取的。据穆喀达思记载，沙普儿城及其附近的山谷产十多种不同的香精油或香膏，其是从紫罗兰、水莲花（*Nīnūfar*）、水仙、椰树花、普通百合花、茉莉花、爱神木、甜马郁兰、香瓜、柑橘花等中提取的，这些香精油出口到各地，甚至远销东方。

法儿思地区的地毯和刺绣久负盛名，其东边地区所产的"荣誉之袍"常绣印有特殊的标记，尤其是专门的锦缎，仅供算端御用，而且将算端的名字或记号绣在上面。这种方法制作的锦缎被称作塔剌思（*Tarāz*）锦，塔瓦吉城和法萨城纺织的这种锦缎很有名，这里产的孔雀蓝和绿色金丝线刺绣面料织品是皇家御用品。

法儿思地区的其他一些产品集中在其生产地。昔剌思城的织机纺织用来制作斗篷的各种精美布料，同时也纺织各种薄纱、织锦并生产制作丝绸的生丝（*kazz*）等。[24]贾合兰（Jahram）城以产大幅地毯、羊毛制的挂毯及可以带到清真寺礼拜用的小拜毯而闻名。除了上文提到的各种香精油之外，沙普儿城还出口各种药材，以及蔗糖、柚子、核桃、橄榄和其他水果、柳条等。可咱隆城和答里兹（Darīz）城产亚麻织品和细纱，其类似埃及的织锦，称作达必（*dabīk*），以及有边饰的毛巾。答失忒·八临地区的首府滚底建城产地毯、窗帘、座垫和算端御用的塔剌思（*Tarāz*）刺绣织锦等。阿剌建城以产用葡萄制成的一种叫底卜思（*dibs*）或都沙（*dūshāh*）的果汁而闻名。该城也产优质的肥皂，还产厚毛布和餐巾，这里也是印度舶来品（*Barbahār*）的集散地。邻近的麻合鲁般港出口鱼、椰枣和优质水产兽皮。欣尼兹城产一种叫喀萨（*Kassāb*）的特殊纺纱与亚麻布料，贾纳八城也以产亚麻布料而闻名。

亦思塔赫儿城产制作面纱的纺织品，鲁赞地区的各城产优质布料、一种叫欣失（*Shimshik*）的特别檀香、水产兽皮、各种佐料等。亚兹得城和阿八儿苦合城产各种棉布。

答剌卜吉儿城产各种精、中、粗质地的布料，也产刺绣、精美地毯和凉席。这里还产用来出口的茉莉花油、各种香水和野生芳香植物种子。如前文所述，阿剌建城和答剌卜吉儿城产沥青（*Mūmiyā*）。伊斯塔赫里记载了一种无骨鱼，据说其味道极其鲜美，产于答剌卜吉儿城的护

城河。夫儿哥城也产上述很多类似的织品及底卜思（dibs）葡萄汁。塔鲁迷城也产这些织品，还产各种水产兽皮和很耐用的水桶。法萨城因产山羊绒和生丝织品而特别有名，还产地毯、挂毯、毛巾、餐巾和绣花丝绸幔帐，尤其产著名的孔雀蓝和绿色金丝线刺绣幔帐。法萨城产小豆蔻和染布颜料，还大量产毡子，用这种毡做成的帐篷叫哈儿噶（*khargāh*），供大宗出口。最后要说的是伊本·豪喀尔称法儿思地区纳因城附近有银矿；亦思塔赫儿城的山区除发现了铁矿和水银外，还有铅、铜、硫磺和石脑油等，但未发现金矿。在整个法儿思地区普遍产各种染料，因此他说这里到处都是染工和染坊。[25]

阿拉伯和波斯著述者详细记述了法儿思地区的道路交通，而且在各种道里志中一般用里程（即*Farsakh*）记载行程。雅忽比是最重要的道里志作者之一，很可惜他完全没有记下法儿思地区的里程，伊本·鲁斯塔著作中记载法儿思地区道路的大部分内容也没有流传下来，但从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库达玛，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均记载了道里行程，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波斯语著作《法儿思志》详细记载了这一地区的道路，这些记载为地理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遗憾的是该书对法儿思以外的波斯（Persia）地区并没有记载。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另一位波斯著述者穆思套菲记载了蒙古人统治时期该地区的变化，也是在这一世纪（14世纪）末，阿里·亚兹底详细记载了帖木儿从阿合瓦兹城到昔剌思城的行军路线，这条路线是干道之一。

这个地区的道路是从昔剌思城辐射开来的，首先叙述南下通往沿海的各条道路。这些道路南下经过施那帏（又译尸罗围））、凯思岛，最后到忽里模子岛，这些地方后来均成为波斯湾沿岸的主要港口，而现在的商道和邮路则南下到卜失儿（Bushire）港，现在其已取代忽里模子（Hurmuz）港的地位。最东边的道路沿海岸到达忽里模子港，这个港对面就是忽里模子岛，这条东道继续沿海岸前行到靠近陆地的忽里模子城。这两地将在第二十二章做叙述。这条从昔剌思城起程的道路，经萨儿委思田城和法萨城到答剌卜吉儿城、夫儿哥城和塔鲁迷城，然后转向正南到达海岸，早期这里称作速鹿（Sūrū或Shahrū）港，穆思套菲则称作土萨儿港。离该地不远就是萨法维（Safav）王朝时期修建的班答儿·阿八思（Bandar `Abbās）港，至今依然存在，这将在后文述及。关于这条道路将分五部分加以叙述。[26]

另一条从昔剌思城向南延伸的道路，在早期可达尸罗围港。该港被毁后，此商道顺着一条支道向西南，并在半途南下到达海岸，而新道则通往凯思岛对面的港口，穆思套菲记载了这条道路。穆喀达思记载了忽里模子道路上一条从答剌卜吉儿城西南至施那帏港的重要侧道，这条侧道与后来穆思套菲所记述的从昔剌思城到凯思岛的道路相交。从昔剌思城起程的所有这些南下道路经喀洼儿（Kavār）城，就可达朱儿，或费鲁札八城。在该城旧路向右分出，南下可达尸罗围港。据《法儿思志》记载，这条道路在费鲁札八城左转，经喀儿曾城到剌吉儿（Lāghir）城，再经俱兰（Kurān）城，到尸罗围港。据穆思套菲记载，这条道路离开费鲁札八城向东几里格，然后南下，此后与《法儿思志》的记载一样，可达剌吉儿城，并在此分出一条向东南的支道，这条道路向左经法儿牙卜（Fāryāb）城和沙漠，到达忽组（Huzū）港，该港对面就是凯思岛。可惜，这条从剌吉儿城到忽组港的道路只有在穆思套菲的记载中才能找到，而且抄本中绝大部分驿站的名称已无法释读。显然，现代的旅行家都没有经过这条道路，因此现在已无法修正他的记载，而且这也在地图上留下空白。据穆喀达思记载，答剌卜吉儿城的分道经朱外木·阿卜·阿合马城到达法儿牙卜，或八剌卜（Bārāb）城，其距穆思套菲记载的那条道路有一站之地，而后到达《法儿思志》记载的俱兰城，然后直达尸罗围港。[27]

此地区上半部分的道路就是到达海岸的西道，现在这条道路从昔剌思城到卜失儿城，途经可咱隆城和答里兹城，到达塔瓦吉城，这是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重要商业城市，此后该道达建纳八港。据《法儿思志》记载，这条道路的重大变化在于其经过麻萨兰（Māsaram）地区，到达吉剌城，然后经滚底建城到达塔瓦吉城；但在滚底建城向南分出一条支道，并继续南下到达纳歧兰港，该港离尸罗围港西有一段距离。穆思套菲只记载了从昔剌思城向西到可咱隆城的道路，在他那个时代，塔瓦吉城已毁，当时波斯湾的主要港口为凯思岛港。[28]

在法儿思地区所有道路中，记载最详细的是从昔剌思城向西北到阿剌建城和忽兹思田地区的道路，关于这条道路至少有八种不同的记载，而且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对有些站点的记载略有不同；最后是阿里·亚兹底记载的这条道路的内容，他反方向记载了伊斯兰历795年（1393年）帖木儿从阿合瓦兹城经必合八汗城到昔剌思城的行军路线，在行军途中帖木儿袭击了喀剌·萨费（Kal`ah Safīd）堡，即白色大城堡。如道里志所述，从昔剌思城起程到忽兹思田地区的道路，向西北经朱外木

［Juwaym，即高蕴（Goyun）］村，到达瑙般建城，而后经拱北·麻剌干（Gunbadh Mallaghān）城，到达阿剌建城，再经塔卜河上的大桥到达位于法儿思地区边境的卜的思塔纳（Bustānak）城。穆喀达思和早期地理学家记载了从阿剌建城，经麻合鲁般（Mahrubān）港到西南沿海的欣尼兹港，再到建纳八城的道路里程。[29]

中世纪时期，从昔剌思城到亦思法杭城，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最西边的道路先到朱外木村，在这里分出向右（西）去往阿剌建城的支道，干道继续（向西北），到达马鲁答失忒平原的拜答城，然后经苦剌城和喀剌城，到达速麦兰城和亦思法杭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穆喀达思记载了这条道路。中道是经山区的夏季道，其从昔剌思城起程（北上）到达麻因城，而后经苦失可·札儿城和底合·吉儿都城，再经亚兹底合瓦思城，到达亦思法杭城。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后来的波斯语文献均记载了这条道路，站点名称在文献中的记述略有差异。这三条道路中的最东道（冬季道或商道经过平原）从昔剌思城起程，向东北到达亦思塔赫儿城，而后到达底合·必得城。在这里分出一条向右的重要道路，经阿八儿苦合城，到达亚兹得城；从这里（底合·必得城）向左转直达亦思法杭城的干道经速儿麻（Surmak）城和阿八答村，在亚兹底合瓦思城与夏季道会合后，再经苦密沙城到达亦思法杭城。这条冬季道现在通常作为从昔剌思城到亦思法杭城的邮道，穆喀达思和《法儿思志》记载了这条道路，此外，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记载了到亚兹得城的驿站。[30]

从昔剌思城起程，到沙合儿·八八城，然后到思儿建（Sīrjān，起儿漫地区首府之一）城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经八合乞干湖之北；另一条沿该湖南岸。北道先从昔剌思城起程，到达亦思塔赫儿城，从这里有两条道路可达沙合儿·八八城：一条直接经过哈剌忒（Harāt）村，另一条经阿八答城到达萨黑城，在此和湖南岸的道路会合。从昔剌思城起程的后一条道路（南道），向东经麻哈鲁（Māhalū）湖北岸到达忽剌麻（Khurramah）城，而后经八合乞干湖南岸，到达亥剌城。《法儿思志》记载了一条从该城通往尼里兹城和苦忒鲁城的支道，并记述了其里程。如前所述，从亥剌城到大萨黑城的干道，与从亦思塔赫儿城起程，并经湖之北岸的道路会合，此后从大萨黑城起程的道路，经沙漠，向东北到沙合儿·八八城。阿拉伯和波斯道里志中，均全面记载了八合乞干湖南、北岸的道路，但各站点的名称，也即现在已不复存在的村庄的名称仍无法确定，因为从中世纪末起，这些地区的所有土地已不再耕种，人口大为减少。[31]

[1] 《马可波罗游记》（*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裕尔（H. Yule）爵士译编，伦敦，1847年第2版，第1卷，第84页。沙班喀剌在伊本·阿喜儿的编年史中写为阿沙万喀剌（Ashshawānkārah）。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反抗阿塔别·超里的部落首领是法兹鲁（Fadlūh）和他的兄弟哈思鲁（Khasrū）。在《法儿思志》中，哈思鲁更准确的写法可能是哈速雅（Hasūyah，即Hasanūyah）。

[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3、15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8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8b、81a、86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1页。这种沥青穹顶，或相似的建筑，据伊本·法吉赫（Ibn-al-Fakīh）记载，在阿剌建城附近也有（第199页），见原书第269页。

[3] 今此城名不存，但以范围来看应在现法斯州中心区的丁达鲁（Dīndārlū）小城附近。这里是去往法萨、内里兹、达拉卜的要道。译者。

[4] 今称伊吉（Īj），是法尔斯省埃斯塔赫巴纳特（Eşţahbānāt，Estahbān，Savānāt）州中心区的城市，人口6000，是通往内里兹和达拉卜的要道。译者。

[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7、108、132、136、20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3、429、446、455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8b，69a，69a、b叶面。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15页；第2卷，第560页。Lovett上尉著述（*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1872年，第203页）。

[6] 今为埃斯塔赫巴纳特（Eşţahbānāt，Estahbān，Savānāt），是法尔斯省埃斯

塔赫巴纳特州州府，人口3.3万，是通往设拉子、内里兹、锡尔詹等地的要道。译者。

[7] 今为法萨（Fasā），是法尔斯省法萨州州府，人口9万，是通往设拉子和波斯湾沿岸的要道。译者。

[8] 这两座城的名称今不存，但应在法萨附近。译者。

[9]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8、127、13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3、431、448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9a、70a、82b、83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75、179、181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272页。

[10] 此城今已成为村庄，叫堂格·卡拉姆（Tange-e Karam），是法萨城北法萨州中心区库什克·卡孜（Kushk-e Qazi）的一个村庄。是通往法萨和设拉子的重要通道。译者。

[11] 今为霍苏耶（Khosūyeh）或胡苏（Khusu），为法尔斯省扎林·达什特（Zarrin Dasht）州中心区的霍苏耶小镇，人口2700，是通往法萨、达拉卜和波斯湾的重要通道。译者。

[12] 今为鲁斯塔格（Rostāq，Rastagh），为达拉布州鲁斯塔格区鲁斯塔格镇，人口3500，是去往达拉卜、波斯湾的重要通道。译者。

[13] 今为夫尔格（Forg），为达拉布州夫尔格区和夫尔格小城的名字，是去往达拉卜、波斯湾的重要通道。译者。

[14] 今此名不存，但从方位判断，应在霍尔木兹甘省哈吉阿巴德（Hājiābād）州中心区塔鲁姆（Tarom）乡，具体位置应在该乡的格赫坎（Gahkān，Kahkom）小镇。这里是去往达拉卜、波斯湾阿巴斯港的重要通道。译者。

[15]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2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08、116、13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2、423、454、455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9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1页。亚库特著作（第2卷，第828页）中鲁班吉（Rūbanj）的读法显然采用了穆喀达思的本子，而且是由他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抄录拼写的。《法儿思志》和穆思套菲著作的抄本中对鲁尼兹（Rūnīz，更古老的拼写为Rūnīj）的记载完全不同，此名称至今是该地区一个区的名称。因此可能是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的印本中因笔误拼写为鲁班兹（Rūbanz），如果修正音点后就可将鲁班兹（Rūbanz）和鲁班吉（Rūbanj）的地名读为鲁尼吉（Rūnīj）或鲁尼兹（Rūnīz）。（有关音点笔误问题，见前文译者注释）

[16] 今此城名只保留在法尔斯省扎林·达什特州伊扎德哈瓦斯特（Izadkhvast）区，该城就在沙赫尔·皮尔（Shahr-e Pīr），即老城，人口7000，是通往波斯湾和设拉子的重要通道。译者。

[17] 今为拉尔（Lār），是法尔斯省拉里斯坦（Lārestān）州首府，人口5.5万，是通往波斯湾和设拉子的要道。译者。

[18] 沙·舒札（Abu'l Fawaris Djamal ad-Dīn Shāh Shujā`）是木札法儿王朝第二代君主，第一次在位时间是1335～1364年，但在1364年被其兄沙·麻合木（Shāh Mahmūd）在扎剌亦儿王朝（伊利汗国瓦解后建立的蒙古王朝）统治者，其岳父筛合·兀歪思（Shaikh Uvais）的支持下赶出法儿思与亦思法杭城；沙·舒札第二次在位时间是1366～1384年，1375年他重新占领亦思法杭城，再次统一该王朝。他起初将都城设在亚兹得城，1353年后将首都设在设拉子城。译者。

[19]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8、454页和注释n。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9a、83a

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60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40页。卜儿可（Burk）城就是古八赫满（Bahman）城，有三重城墙和护城河，其距现在的夫儿哥（Furg）城有1英里远。见斯特克（E. Stack）《波斯半年之旅》（*Six Months in Persia*），第1卷，第756页。

[20] 此名今不存，被阿巴斯港代替，此港是霍尔木兹甘省省会，也是该省最大港口，人口36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译者。

[2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24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69a叶面。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27、42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1、201页。

[22] 八哈儿（Bahār），阿拉伯语意为“海”；八儿八哈儿（Barbahār），直译为“从海上来的”，即海货，或舶来品。译者。

[23] 《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第127～128页

载，法儿思“出产世界独特的优质玫瑰水”。还提到布匹、斗篷、黑葡萄干、可食土等产品。译者。

[24] *Popular Voyage and Travels*第151～152页称，春天的设拉子（昔剌思）城是波斯气候最好的地方之一。这里生长各种植物，尤其是玫瑰和百合花。（Jamieson，London，1820）译者。

[2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52～15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13～21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42、443页。

[26]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2、53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31、132、17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154、155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80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00页。

[2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8、12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4、455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86a、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

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00页，也见前文第五章第257页注释1。

[2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3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3、454、456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86a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00页。

[29]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43、44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5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89、190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33、13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3、455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85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

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01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00页。

[30] 西道参见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7、458页。夏季道或山路参见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6、197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32、13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8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83b叶面；Mustawfī（穆思妥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00页。冬季道参见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8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84b叶面。通过亚兹得城的道路参见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1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2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7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86b叶面；

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01页。

[31] 经哈剌忒村的道路参见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5、456、457页。经阿八答城和湖北岸的道路参见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3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5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30、131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84b叶面。经亥剌城和湖南岸的道路参见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4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5页；Ibn al-Balkhī（伊本·巴里黑），著有《法儿思志》（*Fārs Nām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的是大英博物馆藏本，编号为（东方）5983。1921年，由斯特兰奇和尼科尔森（R. A. Nicholson）编辑，在伦敦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与简译本，第85b叶面；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01页。以思儿建城为中心的道路，形成了法儿思地区的道路体系，见下一章第302页注释1和第22章第320页。

第二十一章 起儿漫（Kirmān）地区

起儿漫（Kirmān）地区的五个区。两个首府。第一个首府思儿建（Sīrjān）城，其位置与历史。第二个首府八儿答思儿（Bardasīr）城，即现在的克尔曼（Kirmān）城。麻汗（Māhān）城及其圣徒。哈必思（Khabīs）城。札兰（Zarand）城和苦合必南（Kūhbinān）城，即马可波罗记载的忽必南（Cobinan）城。

如伊斯塔赫里所载，起儿漫（Kirmān）地区绝大部分位于热带，只有一个区为山区，产寒带作物，这一地区大部分是沙漠，一座座城市彼此被大片荒原所分割，因此景象不同于分布着连片密集城市的法儿思地区。亚库特称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是起儿漫地区最为繁荣的时期，但到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即他所处时代，该地区已开始衰落，这里的土地已撂荒。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的入侵给这个脆弱的地区带来了永久性的灾难。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将起儿漫地区分为五个区（Kūrah），并以各自首府之名来称呼这些区，即（1）北边的八儿答思儿（Bardasīr）区和哈必思（Khabīs）次区；（2）思儿建（Sīrjān）区，与法儿思地区接壤；（3）靠近沙漠东边的巴某（Bam）区与（4）纳儿麻思儿（Narmāsīr）区；（5）南边的吉鲁夫忒（Jīruft）区，从该区南下可达忽里模子沿海地区。起儿漫地区北边和东边与“大沙漠”为邻，西南边靠近海岸，位于思儿建（Sīrjān）城附近的起儿漫西部边界地区，“像袖筒”一样插进了法儿思地区（如伊斯塔赫里所载），早期文献称沙合儿·八八城也是起儿漫地区的一部分。[1]

这一地区现在的首府是克尔曼（Kirmān）城，与地区名相同，这是东方常见的现象。中世纪时期，起儿漫地区有两座首府，即思儿建城和八儿答思儿（Bardasīr）城[2]，后者就是现代的克尔曼城，其附近的地区至今仍称作八儿答思儿区。

思儿建城是穆斯林统治时期起儿漫地区的旧首府，其早在萨珊王朝时期就已是首府。阿拉伯地理学家常将其名称记为思儿建（As-Sīrjān或

Ashi-Shīrjān，带有冠词），现在这个城市名称已不复存在[3]，但位于克尔曼地区之西的思儿建地区的名称依然存在，其首府为萨亦答八（Sa`īdābād）城。最近在喀剌·桑（Kal`ah-i-Sang）堡[4]一座小山坡上发现的遗址就在去往八夫忒（Bāft）城的道路上，距东边的萨亦答八城约5英里，由此充分证明该遗址就是旧首府思儿建城所在地，因这是一座大城市的遗址，且从中世纪道里志的记载来看，该遗址恰好就在思儿建城的位置上。尽管现代的思儿建地区仅是古代“区”（Kūrah）的一部分，但保留了古名。阿拉伯人征服思儿建城后，这里依然是穆斯林统治下该地区的首府，并一直持续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时波斯南部的所有地区处于白益王朝的统治之下。该王朝将一位叫伊本·易剌思（Ibn Ilyās）的总督派到起儿漫地区，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将自己的总督府迁到了八儿答思儿城（现代的克尔曼城），后来所有的行政部门也都从思儿建城迁往了八儿答思儿城，于是思儿建城沦为二流城市。但伊斯塔赫里称思儿建城当时仍是该地区的最大城市。他称这里修建的民居几乎不用木料，因此所有建筑都建造了穹顶。穆喀达思称白益王朝统治时期，思儿建城比昔剌思城更宏伟、繁华。这座城有新、旧两个大市场，市场里货品丰富，尤其是纺织的布匹和面料很有名。街道修建得很漂亮，大多数院落有花园。此城有八座城门（穆喀达思提到了这些城门的名称，但在抄本中书写得有些模糊不清），在一座叫八卜·哈吉木（Bāb Hakīm，即医师门）的城门附近，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修建有一座大宫殿。聚礼清真寺在新、旧市场之间，其宣礼塔是阿都得·道剌修建的，城里的供水是通过两条地下渠道引来的，这些地下渠道是由伊斯兰历3世纪（10世纪）萨法儿朝来思（Layth）之子异密（`Amr）和塔西儿（Tāhīr）开凿的。

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亚库特称思儿建城是起儿漫地区的第二大城市，这里共有45座大小礼拜寺，在他那个时代这座城叫喀思兰（Al-Kasrān，即双宫殿），但他没有做进一步说明。在伊本·阿喜儿和密儿哈万（Mīrkhwānd）的历史著作里，当叙述有关白益王朝和塞尔柱王朝的历史时，常提到思儿建城之名。蒙古西征以后，穆思套菲称该城有一座坚固的城堡，其周边土地种植着棉花和粮食。后来思儿建城落入木札法儿王朝统治者手中，他们将首都设在昔剌思城，但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其从喀喇契丹（Karakhitay，即西辽）[5]手中夺取了起儿漫地区全境。伊斯兰历789年（1387年），帖木儿率军进入法儿思地区，准备用武力夺取昔剌思城之时，木札法儿朝统治者便纳降臣服，于是帖木儿离开法儿思地区去攻打亦剌可地区，但木札法儿朝又重新要

求起儿漫部分地区纳税。而后降服的木札法儿朝统治者又起来反叛，伊斯兰历795年（1393年），帖木儿再次来到法儿思地区，经过激战后推翻了木札法儿朝的统治，此后帖木儿任命其子奥马儿·谢合（`Omar Shaykh）为法儿思地区和起儿漫地区的总督。

但很多地区，尤其是起儿漫地区拒绝臣服于帖木儿，于是占据思儿建城的总督古答儿兹（Gūdarz）以木札法儿朝之名拥兵自立，最后奥马儿·谢合王子只得派军队包围其据点（思儿建城）。据阿里·亚兹底记载，思儿建城的城堡（Kal`ah）刚修复不久，因此异常坚固，经过一年的围攻，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于是奥马儿·谢合亲自到思儿建城，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但就在这时，他被其父召回，在经过曲儿忒思田，到离帖木儿军营不远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的阿迷得（Āmid）城时，不幸病逝了。这一年是伊斯兰历796年（1393年），此后的两年里思儿建城还固守着，最终军中发生饥荒，而不是缺少武器，最后依照帖木儿的敕令，古答儿兹总督率众投降，总督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士兵全部被残忍杀害，以此警示这些地区所有的图谋不轨者。于是思儿建城变成废墟，但帖木儿继承人在位时期的哈菲兹·阿卜鲁在所撰写的著述里提到了思儿建城，并称这是起儿漫地区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八儿答思儿城），还说这里的一块很高的岩石上修建有一座坚固的城堡，但此后思儿建城之名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如前所述，直到最近，喀剌·桑遗址所在地才被确认为是该城的确切位置。[6]

如前文所述，该地区现在的首府是克尔曼城，尽管这里不是早期穆斯林统治时期就作为首府的，但显然在萨珊王朝早期已是一座重镇。有关这座城市（八儿答思儿城）的来源，按照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一位历史学家哈木札·亦思法杭尼（Hamzah Isfahānī）的说法，萨珊王朝建立者阿儿达喜儿国王修建了一座叫必合阿儿达喜儿（Bīhardashīr）的城市，意为“阿儿达喜儿的福地”；此名被阿拉伯人误读为必合剌思儿（Bīhrasīr，或Bīhdasīr）与八儿答思儿（Bardasīr，或Bardashīr）[7]；但据穆喀达思记载，波斯人将该名称拼读为古瓦失儿（Guwāshīr），其来源于委合阿儿塔合失儿（Wīh-Artakhshīr），这是比必合阿儿达喜儿更古老的书写形式。亚库特又说在他那个时代此名称拼读为朱瓦思儿（Juwāsīr、Juwāshīr或Gawāshīr），所有这些名称都等同于阿拉伯文书写形式的八儿答思儿，用法上也没有什么差别。[8]

白益王朝统治时期，八儿答思儿城成为起儿漫地区的新首府，从各

方面判断，其应是现代的克尔曼城，该城的方位可以通过道里志、阿拉伯地理学家对当时八儿答思儿城建筑物的描述和现存的自然状况加以求证。参阅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历史文献，可充分证明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因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以后的两种史料同时将古瓦失儿称作八儿答思儿城，在这些史料中均记载该城是起儿漫地区的首府，“起儿漫之城”，或简称起儿漫城，这是依照通常的法则，即用地区之名来称呼首府的名称。

穆喀达思详细记述了八儿答思儿城，并称白益王朝时期，其总督将这座城作为新首府，此城异常坚固，但不是一座大城。城外有一座大城堡（Kal`ah），修建于有花园的山上，堡内有一口由总督伊本·易剌思开凿的深水井，如前所述，这位伊本·易剌思总督每晚喜欢到这座地势较高的城堡里睡觉。城门附近是第二座城堡（Hisn），周边为壕沟；通过一座桥连接着，这里还有第三座城堡（Kal`ah），其上可俯瞰城里的居民区，城堡附近有一座大清真寺，气势恢宏。该城有四座城门，前三座城门的名称取自从该城出发的道路所到达的城市，即八卜·麻汗（Bāb Māhān）门、八卜·哈必思（Bāb Khabīs）门和八卜·札兰（Bāb Zarand）门，第四座门为八卜·木八里（Bāb Mubārik）门，即“幸福门”，也可能是取自一个叫木八里（Mubārik）或木八剌（Mubārak）的人的名字。穆喀达思还说这里到处是花园，水井随处可见，地下渠提供着充足的用水。[9]

阿都得·道剌在位时期，伊本·易剌思将政府部门（Dīvān）迁到八儿答思儿城，如前所述此后该城成为起儿漫地区的首府，一般来说这一地区的命运与法儿思地区统治者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初，白益王朝还未灭亡前，正在崛起的塞尔柱王朝统治者在伊斯兰历433年到583年（1041～1187年）间，统治着起儿漫地区。思儿建城虽是塞尔柱王朝时期的地区首府，但八儿答思儿城仍称作“答儿·木儿可”（Dār-al-Mulk），即总督的行政首府。伊本·易卜剌欣在所著的塞尔柱王朝编年史中有时称这个首府为八儿答思儿城，有时也称古瓦失儿城；密儿哈万所著的《纯洁的花园》（*Rawdat-as-Safā*）的相关章节却常将塞尔柱王朝的（起儿漫）地区首府称为“起儿漫（Kirmān）之城”或简称为起儿漫城，根本没有提到八儿答思儿城。因此这两个名称（起儿漫和八儿答思儿）有一段时期同时用来指同一城市和地方。比如，伊本·阿喜儿在伊斯兰历494年（1101年）这一纪年条目下记述了塞尔柱王朝的伊兰·沙（Irān Shāh）[10]是如何“从八儿答思儿城，即起儿漫

之城中”被赶走的。[11]

伊斯兰历583年（1187年），起儿漫地区被古思·突厥蛮（Ghuzz Turkoman）袭扰、抢劫，八儿答思儿城几乎被毁，于是札兰（Zarand）城[12]成为临时首府。塞尔柱王朝处于衰落之时的伊斯兰历619年（1222年），整个起儿漫地区处于一个短命的王朝—通常称作“西辽”（Kārākhitay）的统治之下。据密儿哈万记载，西辽的第一位统治者屈出律[13]汗（Kutuluk Khān）攻占了“起儿漫之城”，同一著作还记载这位统治者被埋葬在书院（Madrasah）里，书院是他亲自在“起儿漫之城外的土儿喀八（Turkābād）区”修建的。另外，穆思套菲所著的《历史精选》（*Guzīdah*）和伊本·易卜剌欣的塞尔柱王朝编年史均称伊斯兰历619年（1222年）屈出律攻占“八儿答思儿城”（《历史精选》中称古瓦失儿城），于是他成为整个起儿漫地区的统治者。最后，与他们同时代的作者亚库特称在他那个时期（13世纪）八儿答思儿城是起儿漫地区的首府。[14]

蒙古西征波斯实质上没有影响到起儿漫地区，西辽最后一位统治者之女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嫁给了法儿思地区的木札法儿王朝统治者，这位统治者在蒙古统治时期掌管着起儿漫地区。穆思套菲提到了首府古瓦失儿城，也就是八儿答思儿城，还称这座城的老清真寺是在伊斯兰历1世纪（7世纪）末倭马亚王朝奥马儿二世统治时期修建的，此人卒于720年。穆思套菲也提到了白益王朝总督伊本·易剌思修建的花园，叫八哥·思儿建（Bāgh-i-Sīrjānī），意为“自己家乡思儿建城的花园”，这座花园在穆思套菲记录时，即伊斯兰历730年（1330年）尚存。穆思套菲还称伊本·易剌思在此处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城堡，穆喀达思对这一座城堡也做了记载，城里还有座叫贾米·帖必力思（Jāmi`-i-Tabrīzī）的清真寺，是塞尔柱王朝的土兰·沙（Tūrān Shāh）修建的，他还修建了著名圣徒沙·舒札·起儿漫尼（Shāh Shujā` Kirmānī）的陵墓。稍晚的著述者哈菲兹·阿卜鲁称伊斯兰历666年（1268年）西辽统治者屈出律之女土儿汗·可敦（Turkhān Khātūn）在起儿漫城修建了一座辉煌的聚礼清真寺（Jāmi`），此外，还有其他清真寺、学校，其中的一座建筑保存至今；伊斯兰历820年（1417年），这一作者同时以八儿答思儿（或古瓦失儿）城和起儿漫城两个名称提到该城。[15]

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穆喀达思到9世纪（15世纪）初的哈菲兹·阿卜鲁，各种文献对八儿答思儿城的记载清楚地说明，当时这里有

很多建筑，但这些建筑在今天的克尔曼城绝大部分已不复存在了。据文献记载可知，穆喀达思说该城以有三座城堡或城关而闻名，而在伊本·易卜剌欣所著的塞尔柱王朝编年史中常提到“山城堡”（Kal`ah-i-Kūh）、旧城堡和新城堡，由此可见这些城堡就是穆喀达思所记载的三座城堡。在现代克尔曼城的山上发现了第一座古城堡，其靠近城的东边，现在一般称为“女儿堡”（Kal`ah-i-Dukhtar），民间传说认为该堡是萨珊国王阿儿达喜儿修建的。距该城稍远的东南是第二座城堡，位于另一座山上，古城堡以城墙和塔楼设防，现在已毁，这座城堡称作喀拉·阿儿达喜儿（Kal`ah Ardashīr），该城堡肯定就是“城门外”的城堡；最后一座较古老的城堡在城内，其无疑位于现在的总督府所在地。[16]

穆思套菲提到了土兰·沙（Tūrān Shāh）清真寺，其至今以麦思只·马里克（Masjid-i-Malik，即国王清真寺）之名保留着；另一处建筑就是恢宏的“绿色（或蓝）穹顶（Kubbat-i-Sabz）”，是起儿漫城称作八儿答思儿城之名时的建筑，这座建筑就是前文所述的西辽时代屈出律之女土儿汗·可敦的陵墓。据历史文献记载，在这位公主的父王去世后不久，她将其兄弟赶下王位，此后的25年里她成为起儿漫地区的摄政者，并以她丈夫（屈出律的外甥）和两个儿子（他们两位名义上可以依次继承王位）之名管理着王国。密儿哈万说她死于伊斯兰历681（1282年），并埋葬在麻答剌萨·沙合儿（Madrasah-i-Shahr，即城市书院）的陵园内。这个建有她陵墓的绿色穹顶内的墙壁上镌刻着铭文，并刻有建筑者的姓名，该建筑建成于伊斯兰历640年（1242年），即在屈出律之子名义上任统治者的时期，后来他被他的姐姐土儿汗·可敦赶下王位。[17]

对八儿答思儿区的其他城市，阿拉伯地理学家总体上做了简要的记述；法儿思地区到处是连片的村庄，但这种景象在起儿漫地区并不存在，而且这一地区城市与城市之间通常被辽阔的沙漠隔开。起儿漫城西南二十几英里就是八亘（Baghīn）城[18]，过此城后差不多相同的距离就是麻失兹（Māshīz）城[19]，这两座城位于从起儿漫城去往思儿建城的道路上。现在，这两座城是这一区仅有的城市，伊本·易卜剌欣所著的塞尔柱王朝编年史在叙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事件时，常提到这两座城市。但令人惊奇的是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没有提到八亘城和麻失兹城，穆思套菲也没有提到，而且记载帖木儿武功活动的波斯语文献显然也没有提到这两座城。起儿漫城东南不到两站的距离就是麻汗（Māhān）城[20]，今天这里以有苏非（Sūfī）圣徒和波斯“预言家”尼麻·阿剌（Ni`mat-Allah）[21]的圣墓而闻名，后者的预言至今还在

亚洲穆斯林中广为传播。他去世于伊斯兰历834年（1431年），享年100余岁，据说他是诗人哈菲兹（Hāfīz）[22]的一位朋友。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穆喀达思记载，麻汗城的主要居民是阿拉伯人。位于该城中央的城堡附近有座清真寺，城堡周围环绕着一条壕沟；该城周边一天路程内均为果园，这些果园靠一条河流灌溉。

古拜剌（Ghubayrā）城[23]和苦滚（Kūghūn）城[24]彼此相距1里格，但今天这两座城显然没有留下任何遗迹，这两座城位于麻汗城南，距剌因城（Rāyīn，至今犹存）[25]西有一站之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称古拜剌城是座小城，周边为村庄，城中央有一座城堡，城外为市场，是上文多次提及的白益王朝总督伊本·易剌思刚刚修建的。该城和苦滚城均有优美的清真寺，其用水是从地下水渠引来的。起儿漫城东约50英里，位于“大沙漠”边缘的就是哈必思（Khabīs）城[26]，其距麻汗城有三站之地。这里海拔较低，因而沙漠的地势远比起儿漫城所处的波斯中部高原要低。如伊斯塔赫里称哈必思城异常酷热，这里种植着大量椰枣树。穆喀达思还说该城有一座城堡和四座城门。该城人口很稠密，盛产丝绸，果园以种植桑树而闻名，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灌溉着果园。这里也产外销的优质椰枣。[27]

起儿漫城西北两站之地就是札兰（Zarand）城，这两座城市中间是中世纪的建札鲁兹（Janzarūdh）城[28]，今天显然没有留下任何遗迹。据穆喀达思记载，建札鲁兹城的市场内有一座清真寺，市场里出售大量的水果，因该城就修建在一条叫建札（Janz）的河的岸边。札兰城至今依然存在，穆喀达思提到此城附近有一座城堡，并说其是总督伊本·易剌思新近修建的。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札兰城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有六座城门，清真寺位于广场（Maydān）附近，广场周边是市场。这里产一种叫必塔纳（*Bitānah*）的优质纱，可以用来纺布。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著名的札兰城产（Zarandī）纺纱，并大量外销到法儿思地区和亦剌可地区。

札兰城北50英里，在“大沙漠”边缘就是剌瓦儿（Rāvar）城[29]，其西边为苦必南（Kūbinān）城[30]，马可波罗曾造访过此城。穆喀达思记载过这两座城市，并说剌瓦儿城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要比苦必南城大，还有一座坚固的城堡，用来保卫边境。他说苦必南，或苦合八南（Kūbanān）城是有两座城门的小城，有一个外城区，此地有澡堂和驼队客栈。这里的清真寺位于其中一座城门的旁边，城周边的果园一

直延伸到附近的山脚下。该城附近是必哈八（Bihābād）城[31]，穆喀达思将其名记为必哈阿兹（Bihāvadh），他将该城和人口稠密的喀洼（Kavāk）村并提，两地相距3里格，均处在寒温带，而且拥有很多果园。必哈八城至今依然存在，但喀洼村在地图上已查不到了。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亚库特称苦合八南城和必哈八城在他那个时代以产不纯的氧化锌（*Tūtiyā*）而闻名，并外销到各地。14世纪，穆思套菲也提到了苦合必南城，和他同时代的马可波罗称其为“忽必南（Cobinan）城”，这位威尼斯旅行家详细记载了这里生产的氧化锌[32]，并称这是“治眼疾之良药也”。早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氧化锌就是起儿漫地区有名的外销品之一，据穆喀达思记载，这里产一种手指状的坩埚，通常称作“管状氧化锌”（*Tūtiyā Murāzībīy*），他说这种“管状”物趁热浇上水就可互相分开，经过熔炉冶炼后，就可提纯，他亲眼见过修建在山麓的这种熔炉，其使用的矿料是从附近的山上开采的。冶铁也采用同样的办法。[33]

苦合八南城西约50英里，位于该城和亚兹得城中间，处在沙漠边缘的就是今天的八夫可（Bāfk）村[34]。起儿漫地区有两个名称相似的城市：一个是前文提到的八夫可城（村）；另一个是八夫可或八夫得（Bāfd）城，该城位于起儿漫城南80英里处，距北边的八夫可城有200英里。很糟糕的是现在常将北边的八夫可村与八夫可或八夫得城相混淆，而且现在拼写为八夫得（Bāfd），因此可以确定八夫得城就是麻失兹（Māshīz）城南边的城市，因为在波斯语中带点的k变成d或t，是很常见的现象。亚库特称八夫得城是起儿漫地区的一座小城，在通往昔剌思城的道路上，这里气候炎热。伊本·易卜剌欣所著的塞尔柱编年史中提到了八夫忒（Bāft）和八夫可（Bāfk），但依据他和亚库特的记载还无法完全确定这些地方的位置。[35]

[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58、163、16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0、46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263页。

[2] 《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5页载：“八儿答思儿（Bardsīr）是起儿漫地区的一座城市，也称作八儿答思儿（Kavāsīr）。”译者。

[3] 此城今存，相关注释见前文。译者。

[4] 喀剌·桑（Kal`ah-i-Sang），又称石堡、白堡（Kal`ah-i-Baydā），位于一座石灰岩山上，山高于平原300英尺，呈卵形，有400码长。城堡遗址被低矮的土坯城墙环绕着，该堡是修建在一处旧址上的，由赛克斯（Sykes）上校发现，他于1900年首次造访该堡，有关详细记述参见其著作《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伦敦，1902年，第431页。

[5] 喀喇契丹（Karakhitay），意为“黑契丹”，即西辽，是由辽朝贵族耶律大石在金朝灭辽后，召集残部建立的，都城在虎斯翰耳朵，后来扩张到中亚，一时成为中亚强国，存在时间为1124～1218年，共历95年，1218年被成吉思汗所灭，但余部存在了较长的时间。译者。

[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4、47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106、26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2页。Hfz.，140a叶面。`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18、667、784页。密儿哈万，第4 部分，第170页；第6 部分，第48、69页。对思儿建城的位置及从各种已知的地方到该城的距离，阿拉伯地理学家做了记载，而且只有一个总里程（Farsakh）。可惜对起儿漫地区一站接一站的历程和所经过地方的详细记载（吉八儿和法儿思地区那样的记载）较缺乏。但下面的著作对该城相关距离做了概述，并且这些著述者认为喀剌·桑堡就是思儿建城所在地。思儿建城西北边是从沙合儿·八八城来的道路，该道是从设拉子城和亦思塔赫儿城起程的道路汇合形成的。思儿建城到沙合儿·八八城有24里格和34里格的不同道路。该城距大萨黑城有38到46里格，或3天的路程。思儿建城距鲁思塔·鲁思塔（夫儿哥城西北不到1天的路程）有4程；距乃里兹城有5程半。从思儿建城向东和东南的道路到吉鲁夫忒城有6程，或54里格；而到剌因（Rāyin）城的距离为5程；到萨儿委思田城（剌因城的东南）45或47里格。最后，从思儿建城到麻汗（Māhān）城的距离为3程；到八儿答思儿城（即克尔曼城）的距离为

2程。有关历程的记载可参考如下文献：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48、49、53、54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5、196页；Ibn-al-Fakīh（伊本·阿勒·法吉赫），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五卷，第206、208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31、135、1678、16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5、456、473页。

[7] 今为巴尔德斯尔（Bardsīr），古称麻什兹（Mashīz 或Deh-e Now-e Mashīz），是克尔曼省巴尔德斯尔州州府，人口3.1万，是克尔曼城与锡尔詹城之间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8] 哈木札（Hamzah），第4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0、46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55页；第2卷，第927页；第4卷，第265页。有时候记载为亚兹答喜儿（Yazdashīr）城，这仅仅是音点笔误，是由于在阿拉伯语拼写中将音点位错置（即将 ب 写为ى，译者）。今天的八儿答思儿（Bardasīr）是一个小地区的名称，位于现在的克尔曼城西南，该地区的首府为麻士兹（Māshīz）城。有关波斯语地名必合（*Bih*）或委合（Wih），见原书第262页注释。

[9]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1页。

[10] 伊兰·沙（Baha`al-Dawlah Irān Shāh）是塞尔柱王朝后期起儿漫等地的统治者，1097～1101年在位，在统治时期推行什叶派教义，引起了塞尔柱王朝其他割据势力的反抗，1101年他被迫逃出起儿漫城，同年被杀。译者。

[11] 伊本·阿喜儿，第10卷，第219页。这段文献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即认为八儿答思儿城就是后来的起儿漫（Kirmān）城。但毋庸置疑从历史文献和地形特点可知这一处文献所记载的证据是不确凿的，因为起儿漫之城（Madīnah Kirmān）仅仅是指起儿漫地区的首府，而且所指是不明确的。但伊本·阿喜儿在前卷（第3卷，第100页）中说哈里发奥马儿（`Omar）在位时期，阿拉伯军队第一次攻占思儿建城，还说“这个城市就是起儿漫地区的首府”，思儿建城肯定不是现代的克尔曼城，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从这段文献中得出。

[12] 今为扎兰德（Zarand），是克尔曼省扎兰德州州府，人口5.4万，是通往克尔曼城的要道。译者。

[13] 这个记载显然有误，屈出律不是西辽的第一位统治者，见上文译者注释。屈

出律（？～1218年），西辽汗，是乃蛮部太阳汗子。1204年，成吉思汗灭乃蛮部，太阳汗死。屈出律经畏兀儿、哈剌鲁，于1208年逃到西辽投靠古儿汗。古儿汗将女儿嫁给他。1211年，他联合花剌子模王朝推翻古儿汗，夺取西辽政权，并实行宗教压迫政策，强迫西辽境内的伊斯兰教徒改信佛教。1218年，成吉思汗命哲别进攻西辽。屈出律逃至八达哈伤后，被当地伊斯兰教徒抓到后送给哲别，后被处死。译者。

[14] 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4章，第10节，卜剌·哈吉卜（Burāk Hājib）在位时期。伊本·易卜剌欣，第4、54、200、201页。密儿哈万，第4部分，第104、105、128、12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256页。

[15] 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2页。Hfz.，139b、140a叶面。

[16] 赛克斯（Sykes）上校记述了起儿漫城市规划图（第188页），也考察了这两座古城堡（第190页）。见其著作《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

[17] 这个“绿或蓝拱北”（Kubbat-i-Sabz）在1896年的地震中完全被毁。赛克斯上校记述了此建筑，他提供的一张图片说明他在地震前看到了这个建筑［《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264页］。赛克斯上校在其著作第194页描述了这个建筑，也记述了土兰·沙清真寺。土兰·沙在位于伊斯兰历466～490年（1084～1097年）。伊本·易卜剌欣，第28、34、177、187、189、190、194页。密儿哈万，第4部分，第129、130页。也见斯特克（E. Stack）所著的《波斯半年之旅》（*Six Months in Persia*），第1卷，第202、204页。辛德勒（Schindler）所著的《波斯旅行记》（*Reise in Persien*），刊于《地理学会杂志》（*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柏林，1881年，第329、330页。

[18] 今为巴金（Baghīn），是克尔曼省克尔曼州中心区巴金乡的小镇，人口8400，是通往克尔曼城、锡尔詹、巴姆、拉夫桑詹的十字路口，也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译者。

[19] 此城就是巴尔德斯尔城。译者。

[20] 今为马汉（Māhān），是克尔曼省克尔曼州马汉区区府，人口1.6万，是通往

克尔曼城、巴姆的要道。译者。

[21] 尼麻·阿剌（Shāh Nūr ad-Dīn Ni`mat-Allah，又译尼玛图拉）出生于阿剌颇（Alepo），早年学习苏非派教义，后到麻汗城，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苏非教团尼麻·阿剌教团，这一教团对伊斯兰世界有广泛的影响。此人于1431年去世，1436年追随者给他修建了圣墓—拱北，由三个大院落组成，存在至今，这里后来成为信徒的朝谒之地。译者。

[22] 哈菲兹（Hafiz）是他的笔名，意为“诵经者”，本名苫思丁·穆罕默德（Shams-ud-Dīn Muhammad，约生活于1320～1389年），出生于设拉子城。哈菲兹早年追随过著名苏非诗人阿塔儿（Attar）。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设拉子城度过的，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多是抒情诗和苏非神秘诗，广泛流传于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并被后来许多苏非诗人所模仿，是伊朗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被称为“设拉子的夜莺”、“隐秘者的喉舌”和“诗人中的诗人”。帖木儿于1387年攻下设拉子城，哈菲兹沦落为贫困的游方僧，于1389年去世，葬在设拉子城郊外，并建有陵园，存在至今，其陵园成为设拉子城的著名景点，各地人们来此参观或朝拜。译者。

[23] 现已成为古白拉小村，人口只有300余，属克尔曼省巴尔德斯尔州中心区内加尔（Negār）乡。此地曾是通往巴姆的要道。译者。

[24]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25] 今为拉延（Rāyen，Rāyīn），是克尔曼省克尔曼州拉延区区府，人口9600，是通往巴姆的要道。译者。

[26] 此城就是今天的沙赫达德［Shahdād，古称哈比斯（Khabīs）］，是克尔曼省克尔曼州沙赫达德区区府，人口4000，是通往克尔曼城和穿越东部沙漠的丝路要道。译者。

[27] 伊本·易卜剌欣，第66、108、109、121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3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2、463页。亚特（C. E. Yate）上校所著《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11页。赛克斯上校［《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41页］在哈必思城发现了一块时间为伊斯兰历173年（789年）的墓碑，同时也发现了一处建筑物遗迹，这个建筑可能是基督教堂，也可能是非穆斯林的圣墓。至于哈必思城附近地区，穆喀达思提到了纳失（Nashk）、纳失得（Kashīd）、苦可（Kūk）、喀思剌洼（Kathrawā）等四座城市（第460页），但没有记载这些城市的详细位置，而且显然这些城市的遗迹已荡然无存。

[28] 此名今不存，应在克尔曼城西北的查塔鲁德（Chatrūd）镇附近。译者。

[29] 今为拉瓦尔（Rāvar），是克尔曼省拉瓦尔州州府，人口2.3万，是连接克尔曼城和克尔曼省东北部的重要通道。译者。

[30] 今为库赫博南（Kūhbanān或Kūh Baneh），是克尔曼省库赫博南州州府，人口1万，是克尔曼省的西北大门，是连接亚兹德和克尔曼的要津。译者。

[31] 今为贝哈巴德（Behābād或Mahābād），是亚兹德省贝哈巴德州州府，人口7000，是通往亚兹德的要道。译者。

[32] 这应是《新修本草》中的绿盐，其云："以光明盐、硇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真者出焉耆，水中取之。状若扁青、空青。为眼药之要。"《海药本草·玉石部·卷第一》记载了"绿盐"，此书引《古今录》称："波斯国在石上生。味咸、涩，注明目，消翳，点眼，及小儿无辜疳气。方家少见用也。""按舶上将来，为之石绿，装色久而不变。中国以铜错造者，不堪入药，色亦不久。"现代药物学认为这是卤化物类矿物氯铜矿的矿石。拉丁矿物名为Atacamite。译者。

[33]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33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2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2、470、49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67页；第4卷，第316页；第3卷，第57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3页。见《马可波罗游记》（*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H. 裕尔译编，第1卷，第127～130页）。关于氧化锌的制造，赛克斯上校［《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41页］在当今的苦合八南城看到了其制作过程，和上述文献《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相吻合。剌瓦儿城之名由于音点笔误，常错写为札瓦儿（Zāvar）。同样，苦合八南（Kūhbanān）由于音点位置的错误经常写为苦八延（Kūbayān）、苦合八延（Kūhbayān）等形式。八南（Banān）是野阿月浑的波斯语名称，因此苦合八南（Kūhbayān）指生长有这种树的山。

[34] 今为巴夫格（Bāfq），是亚兹德省巴夫格州州府，人口3万，是通往亚兹德城和库赫博南城的要道。译者。

[35] 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74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

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336页。伊本·易卜剌欣，第31、43、67、90、158、159、164、172页。斯特克（Stack），《波斯半年之旅》（*Six Months in Persia*），第2卷，第13页。

第二十二章 起儿漫（Kirmān）地区（续）

思儿建（Sīrjān）区。巴某（Bam）区和纳儿麻思儿（Narmāsīr）区。里干（Rīgān）城。吉鲁夫忒（Jiruft）城和喀麻丁（Kamadin）城，马可波罗记载的哈马底（Camadi）城。底儿法里（Dilfarīd）城。八里兹（Bāriz）山和喀夫思（Kafs）山。鲁兹坎（Rudhkān）城和麻奴建（Manujān）城。新、旧忽里模子（Hurmuz）城，即宫卜伦（Gombroom）港。起儿漫地区的商业。诸道。

思儿建区的思儿建城是起儿漫地区的旧首府，这在前一章节中已有叙述，该城也是思儿建区的首府，此区位于八儿答思儿地区的西边，靠近法儿思地区。穆喀达思提到了这个区的很多城市，它们和思儿建城在位置上有关联，但可惜这些城市现在在地图上已无法查到。

思儿建城西4里格，靠近法儿思地区边界就是必满（Bīmand）城[1]，据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文献记载，这里有一座固若金汤的的城堡，还有铁门，其所在地也很重要，从沙合儿·八八城（北）、鲁赞（Rūdhan）城（东北）、萨黑城（西）等起程的三条道路会合于此，而后通往思儿建城。据穆喀达思记载，必满城有一座大清真寺，位于商业街的中央，此城的用水是通过地下渠道引来的。思儿建城向东一天的路程，在去往剌因（Rāyīn）城的道路上有一个叫沙麻忒（Shāmāt）的城[2]，这是座有很多果园和葡萄园的城市，所产果实外销到城郊的村庄。该城的清真寺位于城市中央。其别名为苦黑思田（Kūhistān）城。沙麻忒城再往东一程就是八哈儿（Bahār）城[3]，再行一天的路程就可到达哈纳卜（Khannāb）城[4]，这两处均盛产椰枣。过了哈纳卜城就是古拜剌城，这座城已在叙述八儿答思儿地区时做了介绍。思儿建城东南两天的路程，在去往吉鲁夫忒（Jīruft）城[5]的道路上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瓦吉卜（Vājīb）或纳贾（Nājat）城（还有其他不同的写法）。据穆喀达思记载，这是座惬意、繁华的城市，有很多花园，用水是通过地下渠道引来的，其大清真寺在市场街的中央。[6]

巴某（Bam，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为Bamm）地区位于与之同名的

城[7]（巴某城）的周边，该地区在麻汗城东南，靠近起儿漫地区东界的“大沙漠”边缘。据伊本·豪喀尔记载，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巴某城的规模比吉鲁夫忒城要大，也更为舒适，其周边是椰枣林。巴某城附近是著名的巴某城堡[8]，固若金汤，城里有三座清真寺：哈瓦里吉清真寺（Masjid-al-Khāwarij）、布料（Al-Bazzāzīn）清真寺和城堡清真寺。这里纺织用来外销的大量棉布，也生产手帕、做大衣的棉布和头上戴的称作泰剌散（*Taylasān*）的头巾。据穆喀达思记载，这座城的城墙很坚固，有四座城门，即八卜·纳儿麻思儿（Bāb Narmāsīr）门、八卜·苦思坎（Bāb Kuskān）门、八卜·阿思必坎（Bāb Asbīkān）门和八卜·苦儿斤（Bāb Kūrjīn）门。在内城和外城均有很多大市场，流经城堡的河流的岸边有贾儿建（Jarjān）桥市场。柳街（Zukāk-al-Bīdh）有一个著名的浴室。距巴某城1里格有座叫吉八儿·苦得（Jibal Kūd）的山，那里有很多水磨，周边是一个大村庄，村庄里产大量的棉布。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也提到了坚固的巴某（Bam）堡，并说这里气候极其酷热[9]。

剌因城位于麻汗城正南，在巴某城西北约70英里处。据穆喀达思记载，这是一座小城，清真寺位于市场内，这里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果园。从剌因城到巴某城1/3路程之地有两座相邻的城市—阿瓦里（Avārik）城和密合儿吉儿（Mihrkird，或Mihrījird）城，前一座城现在依然存在，现在拼读为阿巴里克（Abārik）[10]。这两座城之间是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白益王朝总督伊本·易剌思修建的一座城堡。这里的供水取自一条河，民居是用泥土修建的。阿巴里克城和巴某城之间是答哈儿曾（Daharzīn）城，穆喀达思将该城拼写为答儿曾（Dārzīn）[11]，其他文献拼写为答儿斤（Dārjīn）和代鲁曾（Dayrūzīn）等。该城有一座优美的聚礼清真寺，这里宜人、惬意，周边的果园靠附近的一条河灌溉。[12]

纳儿麻思儿（Narmāsīr）地区，波斯语拼写为纳儿麻失儿（Narmashīr），位于巴某地区西南，靠近沙漠边缘；该地区的首府为纳儿麻思儿（Narmāsīr）城[13]，位于巴某和法合剌吉（Fahraj）城[14]中间。法合剌吉城现在依然存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纳儿麻思儿城是一座重镇；穆喀达思称纳儿麻思儿城有很多宫殿，而且人口稠密。从呼罗珊去往阿蛮（`Omān）的商贾就居住于该城，因其位于从昔思田（Sīstān）城到麦加的朝觐道上，是印度货物的集散地。纳儿麻思儿城的规模尽管比思儿建城要小，但很坚固，而且该城有四座城门：八

卜·巴某（Bāb Bam）门、八卜·速儿坎（Bāb Sūrkān）门、木萨剌（Musallā，即礼拜）门和苦失可（Kūshk，即亭榭）门。聚礼清真寺位于市场中央。经十级砖砌台阶通道可达寺门，寺北高耸着一座壮丽的宣礼塔，在周边地区非常有名。该城有称作喀剌·苦失·兰（Kal`ah Kūsh-va-Rān，该名含义无法解释）的城堡，巴某（Bam）门附近有三座叫作阿合瓦（Al-Akhwāt，意为姊妹）的堡。这座城周边是椰枣树和果园。今天在地图上已无法找到纳儿麻思儿城，但它的遗址叫作楚古喀八（Chugukābāg），即“麻雀城”，位于一条缓慢流淌的河流的右岸，这条河蜿蜒穿行于纳儿麻思儿（Narmāsīr）平原，该遗址应是这座中世纪大城的所在地。现在该城所在地已完全变成一片荒野，但晚至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称纳儿麻思儿城还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法合剌吉城正南20英里是利坎（Rīkān）城，其名也拼写为利坎（Rīkān）或利干（Rīghān）[15]，据穆喀达思记载，这座城有城墙。大清真寺在城门附近，城外是椰枣园。穆思套菲称这里很炎热，盛产椰枣和粮食。利干城和巴某城之间是苦儿可（Kurk）城[16]，穆喀达思将该城和邻近的八哈儿（Bahār）城[17]并提（不要将这座城和思儿建地区的八哈儿城相混淆，见原文第311页），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两座城市都很繁华，周边为椰枣林。尼撒（Nisa）城[18]也在纳儿麻思儿地区，但其方位不清楚。据称该城位于平原上，周边有果园，市场里有一座清真寺，这里的用水是从一条河里获取的。[19]

起儿漫地区的整个南半部分直到海岸，属于吉鲁夫忒（Jīruft）地区。中世纪时期，（与该地区同名的）吉鲁夫忒（Jīruft，或Jayruft）城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阿拉伯地理学家称起儿漫地区的唯一一条河流就流经该城。吉鲁夫忒城的遗址（该城名现在只保留在地区名中）现在称作沙合儿·答吉牙奴思[Shahr-i-Dakiyānūs，即德修斯（Decius）皇帝城市]，德修斯被公认为东方的暴君[20]，他在位时期七眠子进入山洞，如《古兰经》（8：18，见原文第155页）中提到了这个故事，并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些遗址附近有现在所称的哈利里（Khalīl Rūd，或Halīl Rūd）河[21]流经，由于水流湍急，阿拉伯和波斯地理学家将其称作底兀·鲁得河（Dīv Rūd），即鬼河。这条河是班普儿（Bampūr）河的一条支流，向东流入沼泽（Hāmūn）。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吉鲁夫忒城是一座大城，周长超过2英里，是“呼罗珊和昔吉思田地区商品的集散地”，

附近土地肥沃，宜产热带和寒温带的作物。这座城市的主要外销品为靛青[22]、小豆蔻、蔗糖和葡萄汁（*Dūshāb*）等。该城周边的地区称作米赞［Al-Mīzān，伊斯塔赫里写作米建（Al-Mījān）］，这里有很多果园，产椰枣、坚果和柑橘等。该城附近山区的积雪融水为底兀·鲁得河提供水源，该河流经岩石时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里的水流可以推动20到50个磨盘。邻近的答儿法里（Darfārid）山谷所产的粮食输入此城，据穆喀达思记载，这里产的甜瓜、用来制作香水的水仙花很有名。该城本身有一道坚固的城墙，还有四座城门，即八卜·沙普儿（Bāb Shāpūr）门、八卜·巴某（Bāb Bam）门、八卜·思儿建（Bāb Sirjān）门和八卜·木萨剌（Bāb-al-Musallā，即礼拜）门。砖砌的大清真寺位于八卜·巴某门附近，距市场街有段距离。穆喀达思说吉鲁夫忒城在他那个时代比亦思塔赫儿城还要大，城里的绝大多数民居是修建在石基上的土坯房。

亚库特说吉鲁夫忒城附近的肥沃地区称作吉儿都思（Jirdūs）。穆思套菲称先前该城周边的森林里有狮子出没，但在他那个时期已变为茂密的椰枣林。伊本·易卜剌欣所著的塞尔柱王朝编年史在叙述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的事件时，常提到喀麻丁（Kamādīn），这是“一处吉鲁夫忒城门附近的地方，是来自鲁迷（Rūm，即希腊）和印度等国的商人修建的货仓，商人经海路和陆路运来的货物就储存在这里”。他在另一处记载中提到这里有“来自中国、河中、契丹、印度、呼罗珊、赞吉（Zanzibār）[23]、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等地的奇珍异品，也有来自希腊、阿剌蛮、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札拜占等地的奢侈品”。销售的所有这些商品都可以在喀麻丁的货仓中找到。作为波斯语名称的喀麻丁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记为哈马底（Camadi）或“哈马底城”。马可波罗在访问该地后称“昔甚壮丽”，“自经鞑靼（Tartar）数次残破以后，今日已非昔比”。这个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吉鲁夫忒城和喀麻丁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末以后不见于历史记载，而且在地图上也找不到这两个地名。吉鲁夫忒城周边就是鲁兹八儿（Rūdhbār）地区，阿拉伯地理学家提到过该地，这个地名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也出现了，记为“老八儿勒思”（Reobarles）[24]。

吉鲁夫忒城东北一程之地，在去往答儿斤（Dārjīn）城道路的中途就是忽里模子·灭里大村（Hurmuz-al-Malik，即忽里模子的国王，以与忽里模子港相区别），也称作喀里牙·角兹（Karīyat-al-Jawz，即核桃）村。据伊德里思记载（但不清楚他依据的是什么记载），这里曾是一座古城，由萨珊波斯国王忽里模子（Hurmuz）[25]在3世纪修建，曾为起

儿漫地区的首府，直至该城被毁，后行政部门搬迁到了思儿建城，并作为起儿漫地区的首府一直到萨珊王朝末期。穆喀达思和早期地理学家均提到了忽里模子·灭里村的方位，但未做详述；伊德里思则称在他那个时代（或很可能他的记载时间应为一个不知名作者的记载时间），这个忽里模子城是一座小城，很漂亮，不同民族杂居一处，水源充足，市场良好，商品丰富。他说该城距巴某城有一站之地。[26]

吉鲁夫忒城遗址向北一站之地就是底儿法里（Dilfarīd）城，穆喀达思称作答儿法尼（Darfānī），伊本·豪喀尔称作答儿法里（Darfārid）。该城位于肥沃的山谷地带，产热带和寒温带的作物，如前所述，这里是吉鲁夫忒城的粮仓。从该城向西北再行一站之地就是贾八儿·麻阿丁山（Jabal-al-Ma`ādin，即矿山），这里有银矿，尤其是在一个延伸到贾八儿·夫答山（Jabal-al-Fuddah，即银山）的峡谷里。[27]

吉鲁夫忒城向东就是叫贾八儿·八日兹（Jabal Bāriz）的山区，据文献记载，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里覆盖着成片的森林，穆斯林第一次征服时期，狩猎的祆教徒（Magian）在该地找到了避难所，以躲避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所派军队的袭击。这个地区只是到萨法儿王朝统治时期，才被穆斯林所掌控；此后，这里便以铁矿而闻名。靠近海岸，在吉鲁夫忒城东南就是称作贾八儿·苦夫思（Jabal-al-Kufs）的山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个山区的周边居住着山民，俾路支（Balūs，或Balūch）部游弋于其东部边界，一直到“大沙漠”南部海拔低的边缘。有关苦夫思（Kufs）山区的劫掠部落会在“大沙漠”章节谈及。这个山区附近的一部分称作哈瓦失（Al-Khawāsh）地区，即取自阿哈瓦失（Al-Akhwāsh）部之名。这些部落民是赶驼人，居住在连接“大沙漠”南端和麻可兰（Makrān）地区之间的一个山区通道的山谷里，这里由于气候炎热，出产蔗糖，这些蔗糖销往昔吉思田地区和呼罗珊地区。这一高山地带分为7个山区，据说每个山区均由其酋长统治，至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攻打并征服了这些部落。此后这些山民没有了马匹，于是被当作曲儿忒人，原因是他们有羊群和牛群，生活于毡帐里，而且没有城市。这一地区海拔较低的地方生长着大片的椰枣树。[28]

吉鲁夫忒城西南约50英里处为古剌失吉儿（Gulāshkird）城，穆喀达思拼写为瓦剌失吉儿（Valāshjird），他说这是座有坚固城墙的城市，由一座称作苦沙（Kūshah）的城堡守卫，该城的花园靠地下渠道灌

溉。麻滚（Maghūn）城位于瓦剌失吉儿城北一站之地，在通往吉鲁夫忒城的道路上，这里的果园种植着大量的柑橘树和蓝靛植物；此城的遗址可能位于现在称作法里牙（Fariyāb，或Pariyāb）的地方[29]。瓦剌失吉儿城南50英里就是重镇麻奴坎（Manūkān），现在称作麻奴建（Manūjān）。穆喀达思称这座城为“起儿漫地区的弼斯啰城”（Basrah-i-Kirmān），以体现它在商业中的重要地位。该城包括两个相向的城区，两者以一条叫喀兰（Kalān）的干沟为界：一个城区叫苦宁（Kūnīn）区；另一个城区叫札满（Zāmān）区，两城区之间有留存至今的城堡，城里有座叫贾米·赛延（Jāmi` Sayyān）的清真寺。距该城一站之地，靠近海岸的沙质平原上就是答剌坎（Darahkān）城，但其遗迹今天已不复存在。该城有一座清真寺，这里的花园盛产蓝靛，其用水是通过地下渠道获取的。

瓦剌失吉儿城和麻奴建城之间是一条有很多支流的河，现在称作鲁得哈纳·都兹底（Rūdkhānah-i-Duzdī），伊斯塔赫里提到了这条河，称作纳赫儿·赞坎（Nahr-az-Zankān）河，亚库特则称作剌干（Rāghān）河。穆喀达思提到了繁华的鲁得汗（Rūdkhān）城，其可能就在鲁得哈纳河岸边，并称该城四周种植着椰枣树和柑橘。麻奴坎城东北，在去往里干（Rīgān）城的道路上就是八思（Bās）与贾斤（Jakīn）两座姊妹城，其距忽里模子港有三站之地，每城均有清真寺与市场。里干城西一站之地就是繁华的纳赫儿·搠里蛮（Nahr或Juy-Sulaymān，即搠里蛮河，或所罗门河）城，据穆喀达思记载，这座城属于吉鲁夫忒地区。这里肥沃的土地靠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灌溉，城中央有座清真寺和一座城堡。最后就是贾八儿·苦夫思山区的北边部分，穆喀达思提到了这里的苦黑思田（Kūhistān）城，为了相互区别，以一个人的名字称作阿卜·噶宁（Abu Ghānim）城。这座城市气候异常炎热，周边到处是椰枣林，城中央有座城堡，旁边是座清真寺。[30]

旧或内陆忽里模子（Hurmuz）城距海岸有两邮递站或半天路程，位于一个叫吉儿（Al-Jīr）的小海湾的顶端，据伊斯塔赫里记载，“从海岸来的船只航行1里格后，就可到达”。这座城市的遗址至今还可以看到，现在称作米纳（Mināb），通常拼写为米瑙（Minao）。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旧忽里模子城曾是连接起儿漫地区和昔吉思田地区的海港，后来在吉伦岛上修建了替代凯思港的新忽里模子（Hurmuz）港[31]，从而成为波斯湾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与凯思港接替先前的施那帏港一样。伊斯塔赫里提到了（旧）忽里模子城的清真寺和大货仓，很多

货仓位于周边距此城2里格的村子里。这里密布着椰枣林，产高粱，以及蓝靛、枯茗、蔗糖等。穆喀达思盛赞忽里模子城的市场，并称其供水是通过地下管道获取的，城里的房屋是用土坯修建的。距海边半天路程的是“营地”（Al-`Arsah）城，可能在忽里模子（Hurmuz）湾的入口处。

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中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提到了（与忽里模子城）邻近的岛屿，并称其名为兀儿木兹（Urmūz，穆思套菲拼写为Urmūs），这座岛无疑就是后来的吉伦（Jirūn）岛。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文献记载伊斯兰历715年（1315年）忽里模子城的国王因不断受到盗匪部落的侵袭，便放弃了这座内陆城市，在前文所说的吉伦（Jirūn，或Zarūn）岛上修建了新忽里模子城，该岛距海岸有1里格。就在此时，伊本·白图泰访问了新忽里模子城，和他同时代的穆思套菲也记载了这座新城，穆思套菲注意到这里大量种植着椰枣树和甘蔗等。伊本·白图泰称旧忽里模子城在他那个时代被称作木吉思田（Mūghistān）城，新城则以所在岛屿名称命名为吉伦（Jirūn）城。该城有一座聚礼清真寺及很多漂亮的市场，并出售信德（Sind）和印度运来的商品。

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曾派一支军队攻打过旧忽里模子城附近的沿海城市，邻近的7座城堡全被占领，并遭焚毁，但这里的守备部队则逃到了吉伦岛。阿里·亚兹底记下了这7座城堡，其名为：旧忽里模子城附近的喀剌·米纳（Kal`ah-Mīnā）堡即小湾城堡、唐·赞丹（Tang-Zandān）堡、卡什卡（Kushkak）堡、喜萨儿·沙密儿（Hisar Shāmīl）堡、喀剌·麻奴建（Kal`ah-Manūjān，麻奴建城在前文已提及）堡、塔儿札（Tarzak）堡和塔兹延（Tāziyān）堡等。一般称作霍尔木兹（Ormuz）的忽里模子城于伊斯兰历920年（1514年），被阿儿卜可儿克（Albuquerque）[32]率领的葡萄牙人占领，他们登陆的港口以宫卜伦（Gombroom）之名而知名。这个地方一个世纪后被沙·阿八思（Shāh `Abbās）[33]重新命名为班答儿·阿八思（Bandar `Abbās）港。今天从这个港口可以去往起儿漫城，其位置可能应是前文法儿思地区章节中所提到的速鹿（Sūrū或Shahrū）港所在地。宫卜伦港据说是古木卜伦（Gumbrum，来自希腊语Κουμερκτ）的讹读，该词在整个东方通常指“海关”。据土耳其语著作《世界志》记载，“古木鲁（Gumrū），即忽里模子城的港口，从此地到（法儿思地区的）剌儿城有四五天的路程”。[34]

从商业的角度来讲，起儿漫地区要远远落后于法儿思地区，阿拉伯地理学家没有详细记载该地区的贸易状况[35]。如穆喀达思所述，就起儿漫地区总体而言，主要产椰枣和作为粮食的高粱；椰枣外销到呼罗珊，蓝靛外销到法儿思地区，瓦剌失吉儿地区所产的谷物南运到忽里模子港，而后用船只运到更远的地区。[36]

伊斯兰历3～4世纪（9～10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没有像关注法儿思地区的道路那样，详细记载起儿漫地区的道路交通。一般来说，只是大致记载了每天的行程（Marhalah），而对一站到另一站的道路里程（Farsakh）则大多没有记载。

从起儿漫地区到法儿思地区的道路在必满城交会，如前所述，这座城位于思儿建城之西4里格处。一条从兀纳思（Unās）城和鲁赞地区起程，南下到必满城（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均做了记载）的东北道路；两条从大萨黑城到必满城（与思儿建城）的道路是以里程（Farsakh）计算的：第一条道路经沙合尔·八八（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有记载）到达必满城；另一条道路直接经沙漠到达必满城，该城还有两条道路相交：一条（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有记载）是经喀里牙·密儿合（Karīyat-al-Milh）村，即盐村；另一条（库达玛和伊斯塔赫里有记载）经卢八·普失·汗（Rubāt-Pusht-Kham）卫，即河湾后卫所。同时，穆喀达思记载了从尼里兹城起程到必满城与思儿建城的道路，穆喀达思和伊斯塔赫里记载了从西南鲁思塔·鲁思塔城北上的道路，这条道路经4天多路程，就可直达思儿建城。[37]

从思儿建城到八儿答思儿（即起儿漫）城有两天的路程。穆思套菲说有20里格远，如前所述，却没有提到 两座城之间的驿站或城市，但麻失兹城和八亘（Baghīn）城可能距这条道路不远，伊斯兰历11世纪（17世纪），伊本·易卜剌欣的著作里常提到这两座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还存在的城市。从八儿答思儿（即起儿漫）城经两天的路程就可达札兰城，建札鲁兹（Janzarūdh）城位于上述两座城之间。从思儿建城经三天的路程可达麻汗城，然后再经三天的路程就可达哈必思城，但中间的几个驿站无法确定[38]。

从思儿建城向东通往麻可兰地区的商道，要经过现已不复存在的很多城镇，而后到达剌因城，再经答儿曾城、巴某城和纳儿麻思儿城到大沙漠边缘的法合剌吉（Fahraj）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库达玛均记载了这条道路上各驿站的里程（Farsakh），除了这两位著述者记载了驿

站间每天的行程（*Marhalah*）外，其他文献也做了记载[39]。

从思儿建城向东南可达吉鲁夫忒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了这条道路的里程，伊斯塔赫里记载了其行程站点，除了答儿法里（Darfārid）之名可确定外，其他提到的地名已无法确定；在地图上除了可查到南边的八夫忒（Bāft）城外，其他地名已无法找到，而且抄本中各种不同名称的实际音读也无法确定。这条道路从吉鲁夫忒城向南，经瓦剌失吉儿城和麻奴坎城，到达旧忽里模子城附近的波斯湾沿岸。伊斯塔赫里称该道在瓦剌失吉儿城分出了一条向西通往法儿思地区边界的支道，并经过很多现已完全不复存在的城镇或乡村，尤为可惜的是这条道路在法儿思地区边界的终点也无法确定[40]。

穆喀达思记载了从旧忽里模子城北上到里干（Rīgān）城和纳儿麻失儿城的道路里程，该道沿途经过八思城和贾斤（Jakīn）城；伊斯塔赫里记载了从剌因城向南经答儿斤（Darjīn）城和忽里模子·灭里城到吉鲁夫忒城的道路行程[41]。

[1] 今此城名不存，应该在锡尔詹城西北的宰达巴德（Zeydābād）不远。古代这座城市是连接锡尔詹与设拉子的重要通道。译者。

[2] 今此城名不存，应距锡尔詹城东边的巴勒瓦尔德（Balvard）不远。译者。

[3]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4]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5] 今为吉罗夫特（Jīroft，以前称Sabzāwārān或Sabzevārān-e Jiroft），是克尔曼省吉罗夫特州州府，人口9.5万，是通往印度、波斯湾、克尔曼城、锡尔詹等地的要道。译者。

[6]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49、5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8、16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4、465页。关于纳贾（Nājat），伊本·豪喀尔拼为纳吉塔（*Nājta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拼写为八合塔（*Bākhtah*）、法合塔（*Fākhtah*）、喀合塔（*Kākhtah*）等不同写法。所有这些拼写可能应是八夫忒（Bāft）的音点笔误所致。八夫忒城在上一章已提及（原文第310页），存在至今，其大致位于前文所提位置。

[7]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为巴姆，是克尔曼省巴姆州州府，人口7.3万，是通往波斯湾、克尔曼城等地的要道。译者。

[8] 《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13页提到了巴某（Bam）城及其城堡，还说这座城堡“也称作Kalāh Haft Vāk”。译者。

[9] 巴某（Bam）古堡存在至今，赛克斯上校（Major Sykes）对此做了记载。［《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216、218页］这个中世纪的城市（巴某城）遗址在古札兰（Guzārān）城附近的河岸上，距城堡有1英里。

[10] 该城位于巴姆城西北，是通往克尔曼城的要道。译者。

[11] 今为巴姆州中心区豪梅赫（Howmeh）乡的甲、乙达尔增（Dārzīn）两个村。译者。

[12]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23、22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5、466、47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700页。答儿曾城，赛克斯上校在《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214页做了记载。

[13] 今为纳尔麻什尔（Narmashir，以前称Rostamābād），是克尔曼省纳尔麻什尔州州府，人口3900，是通往巴姆、波斯湾的要道。译者。

[14] 今为法赫拉季（Fahraj，先前称Narmāshīr或 Irānshahr），是克尔曼省法赫拉季州州府，人口6000，是通往巴姆、西吉斯坦的要道。译者。

[15] 今此名以克尔曼省里干（Rīgān）州州名的形式保留下来，其州府是穆罕默达巴德（Mohammadābād）或称穆罕默达巴德·里干（Mohammadābād-e Rīgān），即过去的利坎或利干城。今此城人口5700，是通往巴姆、西吉斯坦、波斯湾等地的要道。译者。

[16] 此城今称为库尔克（Kurk或Kork-e ‘Olyā），即巴姆州中心区库尔克与纳尔提赤（Kork wa Nartich）乡的库尔克村，人口近400。译者。

[17] 今为巴哈尔，是纳尔麻什尔州西南的一个村庄。译者。

[18] 今此城名已不存，是纳尔麻什尔州的一个村子，不要与呼罗珊的同名城相混淆。译者。

[19]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4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3、464页。穆思套菲著作（第182页）的石印本中写为麻失兹（Māshīz），而根据最好的抄本，其应读作纳儿麻思儿（Narmāsīr），这可以通过突厥语本（*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257页）得到证实。关于楚古喀八（Chugukābād），见赛克斯上校所著的《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220页。

[20] 德修斯，或译为德西乌斯，是罗马帝国皇帝，249～251年在位。他统治时期基督徒受到了巨大的迫害。译者。

[21] 今此河名存，全长约400公里，发源于锡尔詹东部的山脉，并流经吉罗夫特城，最后消失在该城以南约200公里处的戈壁滩中。译者。

[22] 靛青（《邓子禹家抄方》），又称蓝淀（《本草拾遗》）、蓝靛（《本草纲目》）、青靛（《普济方》）等，是十字花科植物菘蓝、草大青，豆科植物木蓝，爵床科植物马蓝或蓼科植物蓼蓝等叶所制成的染料，也可入药。译者。

[23] 即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是古代主要的香料产地。译者。

[24] 沙合儿·答吉牙奴思城的遗址，位于哈利里·鲁得（Halīl Rūd）河右岸，距现代的撒尔贾兹（Sarjāz）城西边不远，见凯特·阿伯特（Keith Abbott）著述（*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1855年，第47页）；赛克斯上校的《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267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6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2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6、47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

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2页。伊本·易卜剌欣，第48、49、83页。辛德勒（Schindler）著述（*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lreland*，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98年，第43页）；《马可波罗游记》（*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H. 裕尔译编，第1卷，第98页）。按：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纪》第35章第53页作别斡巴儿勒（Beobarles）。译者。

[25] 即忽里模子一世，为萨珊王，272～273年在位。译者。

[2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1、18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19、22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3页。伊德里思（于贝尔特本），第1卷，第423页和巴黎阿拉伯藏本，编号2221，第157b叶面；编号2221，第104a叶面。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51页。赛克斯上校（《波斯万里行记》，第444页）认为忽里模子·灭里（Hurmuz-al-Malik，这个名称现在已不存）就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330～395年，罗马历史学家，译者）记载的*Carmana omnium mater*。

[2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5页，这个名称（答儿法尼，Darfani）可能仅仅是因对都儿拜（Durbāy）音点的拼写错误所致。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21、22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7、471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335页。

[28] 哈瓦失（Khwāsh）现在是萨尔哈德（Sarhad）地区的首府，赛克斯上校（《波斯万里行记》，第130、353页）记述这是一个山区，位于纳儿麻思儿（Narmāsīr）城东。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3、164、16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20、221、224页。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148页，喀临（Al-Kārin）应该写为八日兹（Al-Bāriz）。

[29] 赛克斯上校［《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269页］曾提到法里牙（Fariyāb）之名，“这里曾是一座大城，根据当地传说，在一次洪水中被毁了”。

[30]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6、46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330页。

[31] 《马可波罗行纪》第36章第57～58页载：忽鲁模思（忽里模子）“城有港，商人以海舶运载香料、宝石、皮毛、丝绸、金锦与夫象牙暨其他货物数种，自印度来此，售于他商，转贩世界各地。此城商业极其繁盛，盖为国之都城。所属城村不少。”“此地用香料酿海枣酒，甚佳。”“其习食之物，乃为海枣、咸鱼、枸橼、玉葱。”“其地天时酷热，居民不居城中，而居城外园林。园林之间，水泉不少。”译者。

[32] 阿儿卜可儿克（Alphonso d'Albuquerque 或 Afonso de Albuquerque，即亚丰素·雅布基，生活于1453～1515年）是葡萄牙著名的海军将领，1503年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探险，当时他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1506年他得到葡萄牙国王的恩准组织了一支舰队又一次到达东方，这次他占领了阿拉伯统治的非洲海岸。1507年9月，他率领一支舰队来到波斯湾，占领了霍尔木兹（Ormuz）岛，但没有维持多久。1510年，他率军占领印度的果阿（Goa）等地。1513年，他企图占领红海，但未成功。1515年，他第二次攻打霍尔木兹岛，并占领，直到1622年，由葡萄牙人控制。1515年12月16日，他死在航海途中。正文中时间相差一年是公历与伊斯兰历换算所致。译者。

[33] 沙·阿八思（Shāh `Abbās I，即阿巴斯一世）是萨法维（Safav）王朝（1501～1736年）的君主，1588～1629年在位。即位后，面对日益衰落的王朝，他准备振兴国力，1590年，阿八斯一世被迫将谷儿只、亚美尼亚、阿札拜占等地割让给奥斯曼帝国，后依靠波斯封建主和大商人的支持，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由此国力大增。1598年，他从可疾云城迁都亦思法杭城，并建造了宫殿、清真寺、图书馆和宗教学校等。1597年夺得呼罗珊。1603～1612年，多次与奥斯曼帝国交战，先后收复谷儿只、亚美尼亚、阿札拜占、库尔德斯坦、莫速儿和报达等地。1622年打败莫卧儿帝国军队，占领坎答哈，并将葡萄牙人逐出忽里模子城，从而建立了多民族的强大的波斯国家。1629年，阿巴斯一世去世。正文中葡萄牙占领霍尔木兹的时间可能有误。译者。

[34]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62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3、166、16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20、222、22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66、47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2、222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2卷，第230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339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789、809、810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258、260页。这个将首都迁到岛上的国王的名字被记为赡思丁（Shams-ad-Dīn）、古士布丁（Kutb-ad-Dīn）、发合儿丁（Fakhr-ad-Dīn）等。忽里模子（Hurmuz）岛在1622年被英国人占领。关于该岛现在的状况见史提夫（Stiff）的著述［《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Magazine*），1874年，第12页；*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1894年，第160页］。这个名称可拼写为忽里模子（Hurmuz）或火儿模子（Hūrmūz），其实没有区别。

[35]《马可波罗行纪》第34章第51页载，起儿漫产宝石、钢、矿物等，“居民善制骑士军装，如马圈、马鞍、靴刺、剑、弓、箙等物，手艺甚巧，皆适于用。妇女善于女红，善为各色刺绣，绣成鸟、兽、树、花及其他装饰。并为贵人绣帐幕，其妙不

可思议。亦绣椅垫、枕、被及其他诸物”。译者。

[36]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0页。

[37]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48、53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5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31、16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55、47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01页。

[3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01页。

[39]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49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196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3页。

[40]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9页。

[4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6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3页。

第二十三章 “大沙漠”和麻可兰（The Great Desert and Makrān）地区

“大沙漠”的范围和特征。贾儿麻（Jarmak）、纳班（Nāband）和萨尼吉（Sanīj）等三个绿洲。穿越“大沙漠”的道路。麻可兰（Makrān）地区。凡纳兹卜儿（Fannazbur）城和乞兹（Tiz）港。其他城市。信德（Sind）和印度。代卜儿（Daybul）港。满速剌（Mansūrah）城和木儿坦（Multān）城。印度（Indus）河。土兰（Turan）地区和苦思答儿（Kusdār）城。卜答哈（Budahah）地区和坎答必儿（Kandābīl）城。

波斯“大沙漠”[1]从西北到东南直穿伊朗高原，并将富庶的地区分为两部分；“大沙漠”则起自北边可俯瞰里海的阿勒不儿兹（Alburz）山脉南麓，一直延伸到靠近波斯湾沿岸属于麻可兰（Makrān）地区的干旱地带。因而该沙漠长约800英里，但各处的宽度有较大差别；这个干旱的巨大沙漠的形状有点像细颈沙漏，有些地方宽只有100英里，如在昔吉思田地区和起儿漫地区分界处，但在其北边和南边要宽一些，有的地方超过200英里。[2]

中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称这个“大沙漠”为麻夫札（Al-Mafāzah，即荒野），并详细记载了它的范围。该沙漠的西边和西南边与吉八儿地区、亚兹得（Yazd）地区（这里最初是法儿思地区的一部分）和起儿漫地区接壤，它的南边到达波斯湾沿岸的麻可兰地区。沙漠的东边和东北到达呼罗珊及所属地区和邻近的各地区；沙漠北边即到苦密思（Kūmis）地区，此后又到呼罗珊地区；再到苦黑思田（Kūhistān）地区，然后到达起儿漫地区狭长地带对面的昔吉思田地区，并在昔吉思田地区与现在叫作俾路支斯坦（Balūchitān）的沙漠相接，但中世纪时期该地是麻可兰地区的一部分。

伊本·豪喀尔和穆喀达思均从个人的亲身经历出发记载了“大沙漠”，因他们两人曾不止一次经过这一沙漠。伊本·豪喀尔简洁地称这是个“无人区”，不属于任何地区，这里成了盗匪的出没地，除了有三处临时的住所外，显然没有永久的村庄。穆喀达思记下了一些细节，可概括如下：

他说沙漠像海，如果选择了正确的行进路线，就可从任何一个方向穿越沙漠，所经沿途建有水窖，其上修建有大罐子和圆顶建筑，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种水窖在主要道路上被细心保存着，而且彼此相距有一天的路程。穆喀达思曾用70天的时间穿越这一沙漠，他谈到了经过连绵山区的无数陡峭关隘、令人恐惧的陡坡、危险的盐泽（Sabkhal）和严寒酷热地区等方面的经历。他也注意到极细的沙子、椰枣树和一些隐没于很多小山谷中的小块耕地。

在当时，一些游弋的俾路支（Balūs，即Balūchī部落）人恐怖地控制着沙漠，其据点位于起儿漫地区边界附近的苦夫思（Kufs）山区，他们是"一种长着野蛮面孔，心怀不端的人群，既无道义又无修养"。任何人遇到他们就无法逃脱，这些人将被他们用石头打死，"就像对待一条蛇，将人的头部放在圆石上猛击，直到将头颅砸烂为止"；当穆喀达思询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残忍地处死这些人时，他们回答说这些人根本就不值得用剑杀死。穆喀达思时代的白益王朝君主阿都得·道剌采取有效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俾路支盗匪部落受到了约束，并将其中的一个部落作为人质迁到法儿思地区，此后商队如果有向导或有算端要求保护的御函，他们就会稍得安全。穆喀达思还说俾路支人大部分徒步行走，但少数人有单峰驼（Jammāz）。他们虽然名义上是穆斯林，但对待真正的信士比对待基督徒希腊人和异教的突厥人还要残忍，他们赶着这些捕获的囚犯，捆绑着让他们赤着脚一天行走20里格的路程。他们自己吃的食物为纳卜（Nabk）果或莲（Sidr）子，并以忍饥挨饿能力极强而著称。

穆喀达思时期以后约50年，即伊斯兰历444年（1052年）纳思儿·忽思罗在朝觐麦加的返回途中，经过了这个沙漠的北部。他没有用专门的名称来称呼这一"大沙漠"，仅称必牙班（Bīyābān，即无水之地），但他注意到了该沙漠的两种特性和危险，即流动的沙子（Rīg-ravān）和宽度常超过6里格的盐碱地（Shūristān）。他从吉八儿地区的纳因城到了中部的贾儿麻（Jarmak）绿洲，此后继续前行到了苦黑思田地区的塔八辛（Tabas）城，但他记载的这条路线较为模糊，几乎没有提供多少信息，现在对这条路线做一叙述。他提到在他那个时代塔八辛城的异密·吉剌吉（Amīr Gīlakī）的命令在整个沙漠地区十分有效，因此苦夫思（Kufs，纳思儿称作Kufāj）山区的盗匪不能骚扰过往的旅客；他还提到旅客经过的道路沿途每隔2里格就有一个饮水池，其上建有圆顶（gumbad），而且有路标指示的安全路线，以满足旅行者所需。他说如果饮水池没有什么问题，除了担心盗匪外，经过"大沙漠"时会很顺

利，不会遇到很多困难；他的相关记载可以通过对很多商道的其他记述得以证实，这些道路从任何一方向均可通过沙漠，而且在每个驿站的饮水点都可获得充足的饮水，这些相关的内容在伊本·豪喀尔和穆喀达思的道里志中也有详细的记载。[3]

沿着“大沙漠”的中轴线有三个相距很远的绿洲，这些绿洲很自然地成为从东到西穿越沙漠的各条道路交会的地方。中世纪时期，这些绿洲称作贾儿麻、纳班（Nāband，至今还这样称呼）[4]和萨尼吉（Sanīj）；据穆喀达思记载，只有最后一个绿洲里才有沙漠中的唯一一座城镇。

沙漠上半部分的中心地区就是现在称作詹达格（Jandak）[5]或比亚巴纳克（Biyābānak）[6]的绿洲，其位于从亦思法杭城到苦黑思田地区塔八辛城道路的中途，中世纪的阿拉伯人称这个绿洲为贾儿麻，波斯人记为噶儿麻（Garmah）。此绿洲包括贾儿麻（或噶儿麻）、必牙答［Biyādak，波斯人称作皮牙答（Piyādah）］和阿剌八（Arābah）等三个村庄。伊本·豪喀尔将居民点合称为思黑底合（Sihdih，即三个庄）；纳思儿·忽思罗说在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这里有10～20个村庄。皮牙答村有一座小城堡，由异密·吉剌吉的军队把守，以确保沙漠道路的安全。绿洲中有椰枣树，还有一些饲养牲畜用的土地；伊本·豪喀尔说在这三个主要居民点到处可以看见流水，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里的居民有1000多人。后来的文献再没有补充相关细节的内容，到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时期所记的内容应该说实质上几乎照抄了伊本·豪喀尔的记述。

第二个绿洲—纳班（Nāband）绿洲，至今还这么称呼，其位于“大沙漠”狭长部分的北端，在起儿漫地区的剌瓦儿（Rāvar）城和苦黑思田地区的忽儿（Khūr）城[7]之间。据伊本·豪喀尔记载，纳班绿洲有一个哨所（Rubāt），哨所周边有20多户居民，这里水源丰富，足可推动一个小磨盘。这里生长着椰枣树，很多泉水可以用来灌溉土地；距此地2里格就是外围的一处泉水，其周边是椰枣树，这里还有一个带穹顶的池子，该地曾因盗匪在此隐藏而臭名昭著。

第三个绿洲再稍南一些，在“大沙漠”的最狭窄之地，位于从起儿漫地区的纳儿麻思儿城到昔吉思田地区首府疾陵（Zaranj）城道路中途的驿站附近。这里有个有很多泉水的小山谷，现在波斯人称这个绿洲为诺斯拉塔巴德（Nasratābād）[8]，但八鲁池部人至今称其为亦思皮（Ispī

或Isfī）。这个绿洲的名称应读作亦思必兹（Isbīdh），据穆喀达思记载，该绿洲又称作萨尼吉（Sanīj，或Sanīg）。他称萨尼吉是昔吉思田地区的一座城市，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里应属于起儿漫地区。如前所述，据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这是沙漠里仅有的一座城市，穆喀达思说这里人口相当多，还有大片的耕地，并通过地下渠道获取用水，但四周和居民区附近都是无水的荒野。[9]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详细记载了横穿“大沙漠”的道路。从西边的亦思法杭城和纳因城起程的两条道路交会于贾儿麻绿洲；第一条路有8站路程（穆喀达思的记载），纳因城到贾儿麻有5站，沿途每隔几里格就有饮水池和穹顶建筑。

据穆喀达思记载，从贾儿麻绿洲有一条向北直达苦密思地区的担寒（Dāmghān）城的道路；其距离为90里格，这条道路在50里格处要经过一个叫万答（Wandah）的地方[10]，此后再行40里格就可到达担寒城。从贾儿麻绿洲向东经过4天的路程可到达一个叫瑙·汗尼（Naw Khānī）或瑙贾（Nawjāy）[11]的地方，沿途每隔三四里格就有储水的穹顶建筑。在瑙贾，道路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北到达土儿失兹（Turshīz）城[12]，另一支向东南到达塔八辛城，这两地均在苦黑思田地区。瑙贾到土儿失兹城有4站路程，在中途要经班·阿费里敦［Bann Afridun，现在称作第合·纳班德（Dih Nāband），不要与前文叙述的纳班绿洲混淆］[13]；从贾儿麻绿洲还有一条道可达班·阿费里敦，穆喀达思记载了一条用7天时间直接穿越“大沙漠”的道路，这条道路上每站均有饮水池（hawd）。从瑙贾向东南3程可达塔八辛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了土儿失兹城和塔八辛城之间，经班（Bann）城的道路里程；经过“大沙漠”的其他各条道路，相关文献只记载了每天行程（marhalah）的站点。[14]

从亚兹得城到塔八辛城的道路，途中经安吉剌（Anjīrah）城、哈札纳（Khazānah）城直达沙漠边缘的萨干（Sāghand）城，到达萨干城以前的道路已在记述法儿思地区的章节中做了叙述（见原文第285页）。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从萨干城到塔八辛城有6站的里程，伊本·豪喀尔和穆喀达思的道里志中也做了完全相同的记载，还记述了每天的行程，但所经路线有所不同。从萨干城行2站就是“骆驼河”哨所（Rubāt Āb-Shuturān），这里的用水是通过一条地下渠道，引到一个池子中获得的。据穆喀达思记载，这个哨所是用砖块修建的优美建筑，有铁门，

由重兵把守。这个哨所是白益王朝的一位著名将领纳斯儿·道剌·伊本·辛朱儿（Nasīr-ad-Dawlah Ibn-Sīmjūr）修建的，他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任这一地区的总督。过了这个哨所3站就是“大沙漠”尽头；据伊本·豪喀尔（伊斯塔赫里重述）记载，经塔八辛城仅一程可到达一个驿站，这个驿站距塔八辛城南有一站之地，从该驿站向北一程，就可到达班城。[15]

经过“大沙漠”的第二条路线从属于舒儿（Shūr，即盐水）地区的必剌（Bīrah）村起程，这里靠近起儿漫地区边界的苦合八南（Kūhbanān）城。从这里（必剌村）经七八站（每站均有一处供水地），到达苦里（Kurī）村，这是苦黑思田地区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距塔八辛城东南几英里。据伊斯塔赫里记载，在这条被称作舒儿（Shūr）的道路以北约2里格的一个地方，可看到一些奇石，无疑是化石，这些石头像各种水果，如杏子、苹果、核桃和梨等，这里的岩石上还有人、动物，以及其他生物的形象。除了前面提到的这条道路外，穆喀达思还记载了一条从苦合八南城直接到苦里村的道路，里程为60里格，每隔2站就有饮水池。

如前文第十六章所述，剌瓦儿城在位于起儿漫地区边界的苦合八南城以东几里格的地方，从这里有一条经5程到达上文提到的纳班绿洲的道路，而后再行3程就可到达苦黑思田地区的忽儿（Khūr）城。沿这条道路每隔三四里格 就有一个饮水池。哈必思城距起儿漫地区边缘的麻汗城有3程，这里差不多也在“大沙漠”范围之内（见原文第308页）；从此处（哈必思城）有一条道路可达苦黑思田地区的郝思［Khāwst，现代的霍斯夫（Khūsf）］城[16]，两地相距10程。在苦黑思田地区的边界，即到郝思城前2程的苦苦儿（Kūkūr）村是沙漠的末端；就在这条道路上，有一个叫哈里吉（Al-Khārijī）人的坟墓，这附近有奇怪的白、绿色小鹅卵石，“像樟脑和玻璃”，距该道4里格的另一地方，有块表面十分光滑、带小黑点的巨石。[17]

最后一条路线是从起儿漫地区的纳儿麻思儿城到昔思田地区首府疾陵城的道路，这条道路从沙漠的狭窄处穿过，并经过前文已述的萨尼吉（Sanīj）或亦思皮（Ispī）绿洲。这条道路的第一站是沙漠边缘的法合剌吉（Fahraj）城，经4站后，旅行者可到达萨尼吉绿洲。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了这条道路上每站相距的里程，伊斯塔赫里只提到了每天的路程，并且后一位作者还记载了所谓的“新道”，这是到萨尼吉绿洲的第

二条道路，但这条道路相对较长。其从萨尼吉绿洲起，经七八天的路程到达疾陵城，途中经过昔思田地区边境的高尼沙（Gāvnīshak）城[18]，从地图位置判断，高尼沙城距今天的昆都尔（Kundur）城[19]不远。在尼沙城和昆都尔城之间，距疾陵城南三四站的地方有一个哨所（Rubāt），这是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萨法儿王朝君主异密（`Amīr）修建的，伊斯塔赫里称此地为坎塔剌·起儿漫（Kantarah Kirman，即起儿漫桥）；但他很明确地说实际上这里没有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中世纪时期，札剌（Zarah）湖向南延伸到这里，相关内容将在下一章叙述。[20]

麻可兰（Makrān）地区

从一般自然特征而言，麻可兰（Makrān）[21]靠近海岸的干旱山区属于“大沙漠”的延伸，中世纪初期，麻可兰地区比现在要富庶、繁华一些，但该地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富庶之地，或者从政治上说也不是一个重要地区。麻可兰地区的主要产品是蔗糖和阿拉伯人称之为法尼兹（*Al-Fānīdh*，来源于波斯语*Pānīd*）的一种特色白糖，这种糖大量外销到邻近地区。[22]

早期地理学家提到了麻可兰地区很多城市的名称，但没有细述。重要的商业中心是波斯湾沿岸的乞兹（Tīz）港[23]，该地区首府为地处内陆的凡纳兹卜儿（Fannazbūr），或班纳吉卜儿（Bannajbūr）城，这座城现在被称作盘只·古儿（Panj-gūr）[24]。据穆喀达思记载，班纳吉卜儿城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有一座土城堡，修有守卫该城的一条壕沟，其周边是椰枣林。这座城有两座城门：八卜·乞兹（Bāb Tīz）门，面向通往西南的兹港的道路；八卜·土兰（Bāb Tūrān）门，面向东北通往首府为苦兹答儿（Kuzdār）城[25]的地区的道路。一条河流经班纳吉卜儿城；聚礼清真寺在市场内，穆喀达思称这里的居民只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其实为野蛮的俾路支（Balūsīs，即Balūchī）部落民，他们的语言是一种难懂的话。[26]

乞兹大港的遗址位于一个优良港口的顶端，中世纪时可驶入小船。据穆喀达思记载，乞兹港周边是椰枣林，城里有很多大货仓和一座优美的清真寺。和所有的海港城市一样，其居民包括各个民族；到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该港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忽里模子港的贸易，后一港口则走向衰落。[27]

阿拉伯地理学家提到了麻可兰地区其他城市的名称，但没有做详述。其中比较有名的城市有：班普儿（Bampūr）城[28]，和它邻近的法合剌吉（Fahraj）城[29]，穆喀达思将这两座城记为八儿卜儿（Barbūr，即班卜儿Banbūr）城和法合儿·法合剌（Fahl Fahrah）城，亚库特将后一座城记为八合剌（Bahrah）城[30]。乞兹港北边的喀萨儿坎（Kasarkand）城[31]至今还是一座相当重要的城市；该城稍东就是喀吉（Kaj）城[32]，也记为吉基（Kīj）或吉兹（Kīz）；贾儿可（Jālk）或答札（Dazak）城[33]之名偶尔也会出现于文献中；合瓦失（Khwāsh）或

合瓦思（Khwās）城可能就是现在的葛瓦失（Gwasht）城[34]，位于萨儿哈（Sarhad）地区的合瓦失（Khwāsh）区东边（已提及，见原文第317页）。中世纪时期，剌思可（Rāsk）城[35]因位于富庶的哈鲁吉（Al-Kharūj）地区而有名，但从道里志判断该城是否就位于现在的同名城市所在地，仍值得怀疑。阿儿麻必儿（Armabīl）城和坎八里（Kanbalī）城[36]是两座重要的城市，位于或靠近海边，约在乞兹港和印度（Indus）河河口附近的代卜儿（Daybul）城[37]中间。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这两座城市是相当大的城市，两者相距2天的路程，其中的一座城市距海岸有半里格。这些城里的居民均是富商，他们主要和印度人从事贸易。[38]

本书不准备探讨中世纪的印度，而且阿拉伯地理学家对这个地区也没有做系统的记载。他们熟知的印度港口就是越过波斯湾东端后的代卜儿（Daybul）港，当时这是位于印度河主河口的一个优良港口。这里在信德（Sind）地区，其首府为蛮速剌（Al-Mansūrah）城[39]，印度人称作婆罗门纳八（Brahmanabad），是印度河下游支流或运河上的一座大城市。阿拉伯人称印度河为纳赫儿·弥兰（Nahr Mihrān）河[40]，其沿岸有很多城市，尤其是木儿坦（Al-Multān）城[41]，是座大城，该城位于印度河支流—信答鲁兹（Sindarūdh）河以北，这里有一座著名的神庙。伊斯塔赫里将印度河的大小和重要性与尼罗河相提并论，并注意到印度河和埃及的尼罗河一样有鳄鱼。他说印度河的源头位于北部的崇山峻岭中，靠近乌浒水发源地。信德地区有一个民族被阿拉伯人称为祖忒（Az-Zutt）人，波斯人称他们为贾忒（Jat）人，一般认为他们就是现在吉卜赛（Gipsies）人的先祖。[42]

麻可兰地区的东北边陲，即靠近印度边境的地方，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了两个地区，即土兰地区，其首府为苦思塔儿（Kustār）城[43]，和位于北边的卜答哈（Budahah）地区，其首府为坎答必儿（Kandābīl）城[44]。苦思塔儿城也拼写为苦兹答儿（Al-Kuzdār）城，在记述哥疾宁（Ghaznah）王朝[45]算端马合木（Mahmud）[46]早期征服活动的文献中提到了这座城市。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该城位于一条河流（*Wādī*）的岸边，城中央有一座城堡。城周边的平原十分肥沃，产葡萄、石榴和寒温带的其他水果。穆喀达思称该城有两个城区，位于干涸河床的两边；其中的一个城区有算端的宫殿和城堡，另一城区叫卜丁（Būdīn）区，居住着商人，这些人在市场里所开的店铺常有大批呼罗珊人光顾。穆喀达思说这里的民居是用泥土修建的，用水通过地下渠道提供，但水质较

差，且水量不足。

土兰地区是对苦思塔儿（Kustār）地区的称呼，这个地区常包括北部的称作卜答哈的地区。卜答哈地区的首府为坎答必儿城，应是现在的甘达瓦（Gandava）城，位于思必（Sībī）城[47]之南，可剌（Kelat）城[48]之东。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坎答必儿城是座大城市，是位于平原上的一座孤城，这里不长椰枣树。该城附近是吉兹喀南（Kīzkānān），或吉坎（Kīkān）城，从道里志记载判断，其位置应为现代的可剌城所在地。文献记载中这两座城市常划入土兰地区，文献里也提到了其他城市的名称，但无法与现在所处的位置相对应，因文献对这些城市没有做详细的记述，且各种抄本中的写法和校勘本也有很大的出入。[49]这些地区的北边就是八利思（Bālis）或瓦里失坦（Wālishtān）地区，该地区有思必城和麻思坦吉（Mastanj）城[50]；但这些地区被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纳入昔吉思田地区，因此这些内容将在下一章述及。

穿越麻可兰地区的各条道路是前文叙述的“大沙漠”道的延续，这些道路的终点就是印度。可惜对这些道路通常只是做大致的记载，因此一座城到另一座城的所需天数和所经里程几乎无从得知。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尽管详细记载了经过这里的一条道路的里程和站点，但现在无法判定其经过沙漠的准确路线。他所记载的这条道路从起儿漫地区的巴某城和纳儿麻思儿城以东、位于沙漠边缘的法合剌吉城延伸，到麻可兰地区的首府凡纳兹卜儿城，共有14站；而后向东经过3个驿站到达苦思塔儿城。穆喀达思记载了和上述路线差不多平行，但方向相反的一条道路，这条道从苦思塔儿城到朱亦·擲里蛮（Juy或Nahr Sulaymān）城，该城在巴某城东20里格处，经贾儿可（Jālk）城和合瓦思（Khwās）城，直达凡纳兹卜儿城之北。[51]

从乞兹港起，经5程可达吉兹（Kīz）城，再行2程可到凡纳兹卜儿城，该城有一条起自喀萨儿坎（Kasarkand）城的道路，但不是一条直道。从吉兹城和喀萨儿坎城行6站可达阿儿麻必儿城，再经2站到达坎八里城，而后经4站到达印度河河口的代卜儿港。[52]

据文献记载，从凡纳兹卜儿城到代卜儿港有14站的路程。文献也记载了从苦思塔儿城到坎八里城、吉兹喀南（即可剌）城的大致路程，还记载了这些地方与瓦里失坦地区的思必城和麻思坦吉城的大致距离；道里志中概要地记述了从苦思塔儿城、坎八里城、思必城外的瓦里失坦地区边界出发，到印度河岸边的木儿坦城和蛮速剌城的所需天数。[53]

[1] 《马可波罗行纪》第37章第61～62页载："离此起儿漫城以后，必须经行至少七日程之困难路途。""三日之中，不见民居。尽是沙漠干旱，亦无野兽痕迹，盖其不能在其中求食也。"译者。

[2] 大沙漠的总体轮廓参见地图一（原文第1页），北半部分的详细位置可参考地图五（第185页），沙漠的下半部分参阅地图六（原文第248页）、地图七（原文第323页）和地图八（原文第335页）。目前，整个沙漠叫作鲁特（Lūt）沙漠或罗特沙漠（Dasht-i-Lūt 或Lot）。这里的盐泽和干燥的盐碱地专门称作答失忒·喀委儿（Dasht-i-Kavīr），喀委儿（Kavīr）一词偶尔也用来称呼整个沙漠。鲁特［Lūt是《圣经》中罗得（Lot）的阿拉伯语写法］和喀委儿（*Kavīr*）的词源尚不清楚，见赛克斯上校所著的《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32页。

[3]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87、28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88、489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93、9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147页。

[4] 今为奈班德，是南呼罗珊省塔巴斯州代胡克（Deyhuk）区卡维尔（Kavir）乡的一个村，人口500，是去往呼罗珊的重要通道。译者。

[5] 今为伊斯法罕省胡尔与比亚巴纳克（Khur wa Biabanak）州的一座城市，人口3900，是从伊斯法罕到呼罗珊，越过沙漠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要津。译者。

[6] 今天这个名称以胡尔与比亚巴纳克州州名的形式保留下来，也是该州中心区的一个乡名，人口4700，地位与詹达格相同。译者。

[7] 今为胡尔（Khowr或Khūr），是南呼罗珊省霍斯夫（Khusf）州霍斯夫区霍斯夫乡的一个村庄，人口800余，是通往该省省会比尔詹德（Bīrjand 或Birdjand）城的要道。译者。

[8] 今为锡斯坦-俾路支斯坦（Sīstān-o Balūchestān）省扎黑丹（Zāhedān、Zahidan或Zaidān，先前称Dowzdāb、Duzdāb或Duzdāp）州诺斯拉塔巴德区区府，人口55.2万，是通往克尔曼城和扎黑丹城的要道。译者。

[9]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

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89、29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88、494、495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93、9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170页。比亚巴纳克（Biyābānak又称Jandak或Khur）绿洲，曾被17世纪的塔维尼尔（Tavernier）提到［《航行记》（*Voyages*），第1卷，第769页，La Haye，1718年］，麦克格里高尔（Macgregor）上校在1875年造访了该绿洲［《呼罗珊》（*Khorasan*），第1卷，第91页］。纳班（Nāband）和亦思非（Isfī），或诺斯拉塔巴德（Nasratābād）后来都曾被赛克斯上校［《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36、416页］造访过。

[10] 今此名不存，应该在詹达格北的达姆甘州阿米尔阿巴德（Amirabad）区库哈布拉斯塔格（Qohab-e Rastaq）乡的穆阿拉曼（Mo‘allemān）村附近。这里是塞姆南省南部的十字路口，也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译者。

[11]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12] 今为卡什马尔（Kāshmar），先前称土儿失兹（Turshīz）或苏丹纳巴德（Soltānābād），现为中呼罗珊（Razavi Khorasan）省卡什马尔州州府，人口8.1万，是该省的十字路口，也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译者。

[13]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1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3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91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91页。

[15]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1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3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3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91、493页。

[16] 霍斯夫是今南呼罗珊省霍斯夫（Khusf）州州府，人口3100，是通往该省省会比尔詹德（Bīrjand 或Birdjand）城的要道。译者。

[1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32、233、23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92、293、29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91、492页。

[18]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19] 此城在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省会扎黑丹城西北角，是该城的卫星城。译者。

[20]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49、50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37、251、25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96、306、30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92页。戈尔德斯米德（F. Goldsmid）爵士：《波斯东部》（*Eastern Persia*），第1卷，第256页。

[21] 今译为莫克兰，其作为在正式行政区划中的地区名称，不论在伊朗还是在巴基斯坦均已不存，但在民间仍称呼伊朗东南角和巴基斯坦西南角为莫克兰，且这一地区几条山脉仍被称为莫克兰山。这里是伊朗、巴基斯坦最炎热、最干旱的地区，主要居住着古老的俾路支人。译者。

[22]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

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26、232、23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5、47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614页。对麻可兰地区中世纪的各城市，霍尔德希（T. H. Holdich）做了充分的讨论［《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l896年，第387页］，但依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来看，他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23] 今为提斯或提兹（Tīs、Ţīs、Tīz），是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恰赫巴哈尔（Chābahār，先前称Chāh Bahār或Bandar Beheshtī）州中心区卡姆比勒-苏莱曼（Kambel-e Soleyman）乡的村名，人口3700。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今天的港口在恰赫巴哈尔城，应该是提斯港的一部分。译者。

[24] 此城古代名称已不存，现为本杰古尔（Panjgur），是巴基斯坦俾路支（Balōčistān）省本杰古尔区的一座小城，是通往波斯湾、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西部和伊朗的交通要道。译者。

[25] 今为胡兹达尔（Khuzdār），是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胡兹达尔区区府，是通往波斯湾和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西、东、北部和伊朗的交通要道。译者。

[26] 坎纳兹卜儿（Kannazbūr）或坎纳吉卜儿（Kannajbūr）是由于印刷错误造成的，其仅仅是凡纳兹卜儿（Fannazbūr）的音点笔误，因这个词首字母（ف，译者）多加了一个点（ق，译者）。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70、171、17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26、23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8页。盘只·古儿（Panj-gūr，即五座坟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阿拉伯人在第一次征服战争中牺牲了五位烈士。该地位于喀剌·纳嘎（Kal`ah Nāghah）城堡西1程之地，其周围地区也称作盘只·古儿。赛克斯上校：《波斯万里行记》，第234页。

[27]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907页。乞兹港的现存遗址，见赛克斯上校《波斯万里行记》，第101、110页；辛德勒（Schindler）著述（*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lreland*，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98年，第45页）。也见阿富札儿·起儿曼尼（Afdal Kirmānī）所著的史书（Houtsma，*Th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德国东方学会杂志》），1881年，第394、402页）

[28] 今为班布尔，是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班布尔州州府，人口9000，是通往克

尔曼城、扎黑丹、波斯湾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29] 今为伊朗沙赫尔（Īrānshahr，先前称作Fahrej、Fehruj或Qal‘eh-ye Nāşerī），是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伊朗沙赫尔州的州府，人口10万，居民主要是俾路支人，是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古城，在班布尔之东约20公里处，地位比班布尔更显要。译者。

[30] 法合剌吉城在麻可兰地区的班普儿城东几英里处，起儿漫地区纳儿麻思儿（Narmāsīr）城东几英里处有法合剌吉城，两者不可混淆。亚兹得城附近也有法合剌吉城。

[31] 今为甘德堡（Qasar-qand），是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甘德堡州州府，是该省南部的重镇，人口1万，主要为俾路支人。译者。

[32] 今为卡吉（Kaj），应是恰赫沙赫尔州中心区达蒙（Damen）乡的一个村名。译者。

[33] 今为贾勒格（Jāl'q、Jālaq、Jālk、Jālq，也称Kashān、Khooshab、Khūshāb、Khvoshāb），是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萨拉万（Sarāwān）州贾勒格区首府，靠近巴基斯坦，是通往萨拉万城和巴基斯坦的要道，人口1.4万，主要为俾路支人。译者。

[34] 今为高士特（Gosht），是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萨拉万（Sarāvān）州中心区高士特乡的一个镇，位于萨拉万城北，在通往省会扎黑丹的道路上。译者。

[35] 今为拉斯克（Rāsak、Rāsk、Rāzk），是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萨尔巴兹（Sarbāz）州首府，人口6000，是通往波斯湾恰哈沙赫尔和北边伊朗沙赫尔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通道。译者。

[36] 这两座城市应该在今巴基斯坦卡拉奇以西的沿海，具体位置实难确定，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译者。

[37] 在今卡拉奇附近。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位于印度河河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2300万，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和港口，也是古今海陆交通要道。译者。

[3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70、171、177、17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26、23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5、47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69页；第4卷，第332页。将阿儿麻必儿（Armabīl）拼写为阿儿麻亦儿（*Armayīl*）是抄本中常见的音点笔误。阿儿麻必儿城的遗址可能在鲁斯·波剌（Lus Bela）城附近，位于海罗考特（Khayrokot）城附近的坎

八里（Kanbalī）。见霍尔德希（T. Holdich）爵士的著述（*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1896年，第400页）。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对麻可兰地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后来的地理学家也没有补充多少有价值的内容。亚库特只是重复了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前贤的记载。可疾云尼（第2卷，第181页）补充记载了该地区一座神奇的桥梁，其横跨在一条河上，是用一整块石头建成的。他说："他经过这座桥时，肚子里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因此腹内就会空空荡荡。尽管成千的人经过这座桥，但人人会遭遇呕吐。因此这个地区的人一旦想呕吐时，就会经过这座桥。"

[39]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巴基斯坦海得拉巴德（Hyderabad）东北69公里和沙赫达布尔（Shahdadpur）东南13公里处，此处在711～1006年是大食帝国信德省省府所在地，在历史上具有显要的位置，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40]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载：提䫻（似为代卜儿）国"有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即印度河，引者），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䫻国北入海"。译者。

[41] 《大唐西域记》作茂罗三部庐（Mulasthanipura）国，今为木尔坦，是巴基斯坦东部城市、纺织工业中心、木尔坦专区行政中心，位于印度河支流杰纳布河下游，人口380万，是一座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也是该国的交通中心之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道。译者。

[4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71、172、173、175、18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26、227、228、230、234、23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6、479、482、483页。代卜儿港的遗址现在位于岛屿内陆，其在萨塔（Thatta）城西南20英里和卡拉奇（Kurāchī）东南45英里处。蛮速剌城位于印度河三角洲的古河道旁边，在海得拉巴德（Hyderabad）东北40英里处。信德（Sind）当然只是印度（Hind）的古波斯语的书写形式，但阿拉伯人用以泛指麻可兰地区以东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的一部分现在叫俾路支斯坦（Balūchistān），一部分地区包括在现代的信德（Sind）地区。信答鲁兹（Sindarūdh）就是印度（Sind）河。

[43] 今为胡兹达尔（Khuzdār），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格拉德（Galāt）州，是通往奎达、沿海地区、阿富汗和伊朗的要道。译者。

[44] 此城名不存，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称其在今甘达瓦城，位于胡兹达尔东北方向200余公里处，属纳斯尔阿巴德（Nasirabad）州，一度改为布兰（Bulān），后改为卡奇席（Kachhi），是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东部的交通要道。译者。

[45] 哥疾宁王朝，存在于977～1186年，统治区域为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西部、伊朗东部、阿姆河流域南部和西部。译者。

[46] 哥疾宁王朝的第二代君主，997～1030年在位。他在位时期多次进攻印度、中亚、伊朗等地。译者。

[47] 今为锡比（Sībī），是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北部的城市，人口5.2万，是进入印度次大陆、伊朗、阿富汗的重要通道。译者。

[48] 今为格拉德（Qalāt、Kalāt），是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格拉德州州府，位于该省中部，是北上到省会奎达（Quetta），南下到卡拉奇的重要通道。译者。

[49]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6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71、176、17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26、227、232、23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76、478页。

[50] 今为默斯东（Mastūng），是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默斯东州州府，人口18万，是去往省会奎达的要道。译者。

[51]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86页。

[5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7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3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86页。

[53]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7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33、23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486页。

第二十四章 昔吉思田（Sijistān）地区

昔吉思田（Sijistān）或尼木鲁兹（Nīmrūz）地区和札卜里思田（Zābulistān）。首府疾陵（Zaranj）城。札剌（Zarah）湖。合儿门（Helmund）河及其诸运河。剌木·沙合里思田（Rām Shahristān）附近的古代都城。尼合（Nih）城。法剌（Farah）城和法剌（Farah）河。喀失（Khāsh）河与尼沙（Nishak）地区。喀儿宁（Karnīn）城与其他诸城市。鲁得八儿（Rudbār）城与不思忒（Bust）城。杂民·答洼儿（Zamīn Dawār）地区。鲁哈吉（Rukhkhaj）城与八利思（Bālis）或瓦里失坦（Wālishtān）地区。坎答哈（Kandahār）城、哥疾宁（Ghaznah）城和可不里（Kābul）城。银矿。经过昔吉思田地区的诸道。

昔思田（Sīstān）地区，早期阿拉伯人称作昔吉思田（Sijistān）地区，名称源于波斯语的萨吉思田（Sagistān），其位于地势较低的地区，东边为札剌（Zarah）湖，该地区还包括合儿门（Helmund）河及其他一些河流的三角洲地带，这些河均流入札剌湖这个内陆湖。位于合儿门河上游的坎答哈（Kandahār）高原地区被称作札卜里思田（Zabulistan）[1]地区。昔思田，波斯语也称作尼木鲁兹（Nīmrūz），意为“正午”，或称作“南方”，据说使用该名的原因是这个地区位于呼罗珊之南。据伊斯塔赫里记载，昔吉思田地区以其土地肥沃而著称；这里盛产椰枣、葡萄和粮食，也产阿魏（assafetida）[2]，当地人喜欢将阿魏放到各种菜肴里食用。[3]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世纪的札剌湖要比今天的辽阔很多。除了支流众多的合儿门河流入札剌湖外，还有3条大河汇入此湖，即合瓦失（Khwāsh）河、法剌（Farah）河[4]，以及发源于邻近的阿思夫札儿［Asfuzār，即萨卜兹洼儿·哈烈（Sabzivār-i-Herāt）］地区的河流，现在这条河叫作哈鲁得（Harūd）河。在波斯传说中，昔思田和札卜里思田因是札儿（Zāl）的家乡而闻名，他是民族英雄鲁思坦（Rustam）之父，鲁思坦的英雄气概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阿拔斯王朝早期，昔思田因是萨法儿王朝统治者异密家族的起源地而名噪一时，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后半叶，这些异密统治着波斯南部和东部的绝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就是独立王国的统治者。

中世纪时期，这个地区的首府为疾陵（Zaranj）城，该城在帖木儿时代被毁，其遗址尚存，而且占地面积很大。但现在疾陵城之名已不复存在，甚至在中世纪晚期就已废弃不用了，后来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仅称该地区的首府为麦地那·昔吉思田（Madīnah Sijistān），意为“昔吉思田城”，等同于波斯语的沙合儿·昔思田（Shahr-i-Sistān），这一名称一直使用到帖木儿毁掉该城为止。[5]萨珊王朝统治时期，疾陵城已是一座大城，在记载穆斯林第一次征服时期的伊斯兰历20年（641年）的历史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该城。这座城在萨纳鲁兹（Sanārūdh）河附近，该河是从合儿门河分出来的流向西的支流，在洪水期汇入札剌湖中。

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据雅忽比记载，疾陵城周长为4里格，10世纪的伊本·豪喀尔详细记载了这座城。该城异常坚固，有一座带城墙和五座城门的内城，经过内城就是外城的城区，外城也修有城墙，有十三座城门[6]，这些城门外有一条用泉水和运河余水灌满的大护城河。内城的五座城门均是铁门。城门中两座彼此邻近的城门朝向西南的法儿思地区，因此被称作法儿思门，这两座门又分别被称作八卜·贾底（Bāb-al-Jadīd）门，即新门，和八卜·阿乞（Bāb-al-`Atīk）门，即旧门。北边朝向呼罗珊的门称作八卜·喀儿苦牙（Bāb Karkūyah）门，是以邻近的喀儿苦牙（Karkūyah）城命名的；八卜·尼沙（Bāb Nishak）门，连接着东边的道路，朝向不思忒（Bust）城；八卜·塔阿木（Bāb-at-Ta`ām）门，即食物门，这是五座城门中最重要的一座，朝向往南通往市场和疾陵城外果园的道路。

大清真寺（Masjid-al-Jāmī`，即聚礼清真寺）位于外城，在朝向法儿思地区的两座西南门附近，在清真寺附近还有监狱，监狱旁是旧总督府。内城的东北，在尼沙门与喀儿苦牙门之间是国库所在的城堡或储藏地，这是萨法儿王朝第二代君主异密（`Amīr）修建的。该异密之兄、创建这一王朝的雅苦卜亲自修建了一座位于内城两座西南门（法儿思门）和八卜·塔阿木门之间的宫殿，这座宫殿后来成为新总督府所在地。在此附近也有异密的宫殿；这些宫殿和城里的其他住宅一样是用砖瓦修建的，而且均是穹顶式的，这里由于天气潮湿，木板易生虫并很快腐烂，因此无法用木板做屋顶。内、外城有很多旅馆（*Fandūk*），外城或外城区是总督部门的所在地。内城的市场靠近大清真寺。外城的市场极其繁华，特别是一个叫速可·异密（Sūk `Amr）的市场很有名，是萨法儿王朝第二代君主修建的，每天的租金达1000底儿罕（约40英镑），所收的租金分配给当地的大清真寺、城市医院（Bīmaristān）和麦加圣地。

外城的市场差不多长半里格，而且从内城墙的两座法儿思门一直到外城墙的城门有一连串的店铺。整个疾陵城供水充足，这些用水是从萨纳鲁兹运河的很多小运河或水渠分出来，分别经新门、旧门和食物门等引入内城的。这三处水流汇合起来后“足可推动一个磨盘”，其流入清真寺附近的两个大蓄水池内，然后再分配到整个内城。外城的居民也通过管道获得优质的用水，这在气候炎热的地区是必不可少的；每家每户均有一个萨儿答（Sardāb），即地下室，是在炎热的夏季居住的，因为夏季的疾陵城酷热难耐。这座城附近是萨卜哈（Sabkhah，盐碱滩），这里生长着椰枣树，周边是沙丘。这里常年沙暴不断，沙粒流动迅猛，常将整个村庄掩埋，并吞噬耕地。当地人利用这种常年不断的大风来建立风车，风车是这个地区的奇观。但这种“流动的沙子”是造成一系列危害的根源，伊本·豪喀尔约在伊斯兰历360年（970年）详细记载了疾陵城的大清真寺如何完全被沙子吞没的相关内容。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重述了疾陵城的上述内容。他也提到了这里居民的富有和所具有的涵养，还注意到了坚固的城堡（Kal`ah）和大清真寺的两座著名宣礼塔，其中的一座塔是萨法儿王朝君主雅苦卜修建的。这座城市一直繁荣了好几个世纪，甚至到蒙古西征的伊斯兰历619年（1222年），成吉思汗派他的军队攻打昔思田地区时，这座首府似乎躲过了一劫，该城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蒙古监治官的统治之下。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穆思套菲提到了疾陵［Zaranj，波斯人将此名读为札郎（Zarang）］城，称它很繁华；他说这座城市靠大坝（*Band*）阻挡附近沙漠的“流沙”，并称这种办法最初是古代国王古儿沙思（Gurshāsf）发明的，后来亦思凡底牙儿（Isfandiyār）之子国王八赫满（Bahman）[7]又对大坝进行了修复。穆思套菲盛赞疾陵城盛产优质水果的果园，这些果园靠思牙·鲁得（Siyāh Rud）运河，即黑运河灌溉，这条运河是从合儿门河分流出来的。但就在14世纪末，即伊斯兰历785年（1383年），帖木儿率领军队出现在该城之下，如前所述，此后这座城市被称作沙合儿·昔思田城，其命运无疑没有再延续多久，此时帖木儿已占领并摧毁了附近叫喀剌或喜萨儿·札剌（Kal`ah或Hisār Zarah）的城堡，这座城堡可能就在疾陵城之北，靠近湖边。昔思田地区的首府关闭了城门，拒绝投降，帖木儿的军队围攻很短时间后，对其进行了突袭，破城后凡是能找到的居民均被屠杀，而后城墙被夷为平地，城里的房屋被摧毁。自此，疾陵城变成了一处湮没无闻的废墟。[8]

如前所说，札剌（Zarah，或Zirrah，Buhayrah Zarah）湖[9]在中世纪时期比现在的面积要大很多；但在整个历史时期，其面积大小总在发生变化，这与河流的暴涨期和枯水期有关。[10]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称该湖长30里格（约100英里），从苦黑思田地区一个叫苦林（Kurīn）的地方一直延伸到昔吉思田地区边界，靠近坎塔剌·起儿漫（Kantarah Kirmīn）的邮递站，其是从疾陵城到纳儿麻思儿城的第三站（见原文第328页）。湖的宽度相当于一天的路程（Marhalah，约30英里）。这是个淡水湖，湖中长满芦苇，湖里盛产鱼；除靠沙漠一边的湖外，岸边密布有很多的农田和人口稠密的村落，从湖中打捞上来的鱼，晒干后可外销。

札剌湖的湖水主要来自合儿门（Helmund）河，亚库特准确地将此河的特征概括为“千川之河”。他将该河名称拼写为欣满（Hindmand）河，可能由于书写音点笔误，常写成黑满（Hīdmand）河[11]，有时候也写成黑儿满（Hīrmand，或Hīrmīd）河，穆思套菲采用了黑儿满河之名，他有时也称为阿卜·札剌（Āb-i-Zarah）河，即札剌湖河。合儿门河是更为现代的书写形式。这条大河发源于哥疾宁（Ghaznah）城与梵衍那（Bāmiyān）城[12]之间的山区，这里现在是阿富汗领土的一部分，但在中世纪此地称作古儿（Ghūr）地区或古儿王国。这条河向西南流，经过宽阔的杂民·答洼儿（Zamīn-Dāwar）山谷到达不思忒（Bust）城，在该地，此河从左岸接纳了坎答哈（Kandahār）河，坎答哈河流域被称作鲁哈吉（Rukhkhaj）地区。不思忒城是合儿门河流入昔吉思田地区后的第一座大城，在这里此河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大拐弯后向南流，然后再西流，又北流到疾陵城，然后转向西，最后河水注入札剌湖。

距疾陵城一天路程，即约30英里的地方，在合儿门河上修建了一系列的大坝，修建这些堤坝的目的是获取灌溉土地所需的用水。此处，该河干流的大部分水被分流至5条运河，流入疾陵城和札剌湖：第一条或最南的运河为纳赫儿·塔阿麻（Nahr-at-Ta`ām）运河，即粮食运河，其灌溉着前文提到的疾陵城八卜·塔阿麻城门外的土地和村庄，这里的一部分土地属于尼沙（Nīshak）地区；第二条为纳赫儿·八失忒·鲁兹（Nahr Bāsht Rūdh）运河；第三条为萨纳鲁兹（Sanārūdh）运河，其引自距疾陵城1里格的合儿门河干流，这条运河通达首府，因此伊本·豪喀尔说在洪水期旅客从不思忒城到疾陵城一路要靠船只代步；第四条为纳赫儿·沙阿八（Nahr Sha`bah）运河，其灌溉着约30个村庄；第五条称纳赫儿·密剌（Nahr Mīlā）运河。经过截流坝后，合儿门河干流剩余河水所在河

道被称作纳赫儿·喀札（Nahr Kazak）河，除洪水期多余的河水直接流入札剌湖外，该河河水不断被截流，用来灌溉。[13]

据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最初在古代波斯国王统治时期疾陵城并不是昔吉思田地区的首府。其首府在剌木·沙合里思田（Rām Shahristān）城，别名为阿卜剌沙合里牙儿（Abrashahriyār）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座城已被沙漠吞噬，但遗址和一部分民居遗迹现在依然存在，由此可以看出其当时的风貌。文献中模糊地记载这座古首府所在地距离疾陵城有3天之程，就在从该城去往起儿漫道路的左侧，“靠近答剌（Darāk）城，位于剌萨（Rāsak）城对面”，但这两座城的位置不明。据说从古代合儿门河干道分出来的大运河流经此地（古首府），灌溉着周边所有的土地。由于横跨大河（合儿门河），分流这条运河的水坝突然崩塌，结果河水流入另一条河道，于是造成了河流的永久改道。这样，古城周边的整个地区变成一片沙漠，这里的居民也整体搬迁到新建的疾陵城。

札剌湖以西一段距离，在苦黑思田地区边界靠近“大沙漠”的边缘有尼合（Nih或Nīh）城[14]，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将该城纳入昔思田地区。穆喀达思称这是座坚固的城市，这里的房屋是用泥土修建的，用水则通过地下渠道从山上引来。亚库特与穆思套菲也提到了尼合城，但没有详述，只是说这座城市是阿儿达喜儿（Ardashīr Bābgān）国王修建的，今天这里还可以看到大城墙的遗迹和大片的废墟，由此可见在中世纪时期这里应是险要之地。[15]

从北边流入札剌湖的河流中，有条发源于阿思夫札儿（Asfuzār，即萨卜兹洼儿·哈烈）之地的河，现在称作哈鲁得河[16]，阿拉伯地理学家没有提到该河。但他们注意到了发源于古儿（Ghūr）地区山里的法剌（Farah）河。这条洼地·法剌（Wādī Farah）河流过山区后不久，便流到昔吉思田地区和法剌（Farah）城[17]，伊本·豪喀尔说这座城市位于一处平原上，用泥土建的居民区占有很大的面积，附近是有很多农田的六十个村庄，这里盛产水果，尤其产椰枣。据穆喀达思记载，法剌城有两个城区，分别居住着正统的穆斯林（即逊尼派）和哈里吉（Khāriji）派穆斯林。该城南一站之地就是法剌河上的一座叫作坎塔剌·法剌（Kantarah Farah，波斯语读作Pūl-i-Farah）的桥梁，在这里，该桥将位于河流左右两岸的道路连接起来，然后南下到达疾陵城。这座桥附近还有一座城市，距北边的朱外因（Juvayn）城有4天的路程，在两地中

间（伊本·鲁斯塔记载）是一个叫喀汗（Kahan）的地方。喀汗附近，向西1里格就是著名的沙山，此山发出一种奇特的声音；如果水滴或其他小物体落到该山的沙子上，就会“听到一种很大的噪音，像是嗡嗡的声音，听起来很可怕”。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比鲁尼（Bīrūnī）也提到了这座奇怪的鸣沙山，据说发出这种类似声音的“流沙”，今天仍存在于昔吉思田地区和苦黑思田地区之间的沙漠的沙丘地带。现代的拉什·朱外因（Lāsh-Juvayn）双城[18]至今还是相当重要的地方，穆喀达思以苦外因（Kuwayn，也可以书写为Guvayn）的名称提到了这座城市，并说这是座坚固的小城，城里没有聚礼清真寺，因为该城的居民全是哈里吉派；但除了穆喀达思以外，中世纪其他著述者只提到道路上的一个驿站，没有提到该城，相关文献中也无法找到剌失（Lāsh）之名。

约在朱外因城和疾陵城中间，道路经过一座横跨从合儿门河分出来的大运河的桥，桥南数里格的地方是重镇喀儿苦牙（Karkūyah）[19]，这里是疾陵城北的一个驿站，需要说明的是疾陵城北边的城门就是以这个重镇的名字命名的。据亚库特记载，喀儿苦牙城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哈里吉派，这里还生活着很多修行者（苏非），但这座城市主要以祆教祠而闻名，因此受到很多波斯祆教徒的崇敬。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末，可疾云尼详细记载了这座建筑，他说该建筑上面有两个穹顶，据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民族英雄鲁思坦时代。每个穹顶的顶部有一个角，两个弯曲的角彼此分开，如同一头公牛的犄角，这些均是前文提到的英雄遗迹。两个穹顶之下是一座祆教祠，这里的圣火永不熄灭。一位随时随地为信徒解困济难的祭司管理这座祆教祠；他只能站在距圣火20腕尺的地方，嘴前还有一个面纱，以免他的呼吸玷污圣火，他不停用顶上安装有银质钳子的很长的柽柳木棍拨动圣火。可疾云尼还说这座圣祠是祆教徒（Magian）最崇拜的祆教祠之一。距喀儿苦牙城不远，离疾陵城3里格就是苦伦（Kurunk）城[20]，亚库特称这座城通常拼写为苦伦（Kurūn），此名保留至今。亚库特还称这是个惬意的地方，尤其让人高兴的是这里的居民是哈里吉派和纺线工。[21]

哈失（Khāsh）[22]，或合瓦失（Khwāsh，或Khuwāsh）河[23]在法剌河与合儿门河之间流入札剌湖。伊本·豪喀尔称这条河为纳赫儿·尼沙（Nahr Nīshak）河，尼沙（Nīshak）是疾陵城正东一个繁华地区的名称，如前所述，疾陵城的东城门就是以此地名称呼的。这条河发源于古儿山区，其岸边有合瓦失（Khwāsh）城[24]，距疾陵城有一天的路程。伊本·豪喀尔称合瓦失城是此地区最大的城市，这里的椰枣林很有名。亚

库特当时记载的该城名称和现在一样，通常拼写为哈失（Khāsh）城[25]。这一地区最著名的城市是比合瓦失城要小的喀儿宁（Karnīn）或喀儿宁（Al-Karnīn）城[26]，这里是著名铜匠来思（Layth）之子雅苦卜和异密两位萨法儿王朝统治者的出生地。喀儿宁城位于合瓦失城西北的沙漠边缘，距法剌城有一站之地。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这座城里有鲁思坦马厩的遗迹。穆喀达思称喀儿宁城是座小城，但很坚固，还有一条河穿城而过，城里有一座聚礼清真寺，该城还有外城区。穆思套菲也提到了这座城，还说城市附近的土地异常肥沃，产粮食和水果。

喀儿宁城和法剌城中间是吉札（Jizah）小城[27]，规模大致和喀儿宁城一样，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该城位于十分肥沃的地区，通过地下渠道获得丰富的灌溉用水，因此这里有很多村庄和农田。城市的建筑是用土坯修建的；据亚库特记载，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将这座城市的名称拼读为吉札（Gizah）。沿合瓦失河的整个地区称作尼沙地区，如前所述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里是极其繁华的地区。哈鲁里（Harūrī）村位于合瓦失城南、合瓦失河的左岸，现在依然存在，是“属于算端的一个人口稠密的村庄”，从不思忒城起程的道路在该村经过合瓦失河上的一座砖桥。萨鲁赞（Sarūzan）村是去往疾陵城道路的第二站，这两地之间有防护坚固的赞卜（Zānbūk）村，穆喀达思称其规模和朱外因城一样。

疾陵城往北一天路程就是重镇塔可（At-tāk，即拱形）[28]，但道里志没有记载其确切方位。这是座繁华的城市，穆喀达思称这里和附近的乡村盛产葡萄。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阿布·勒·费达引用伊本·赛夷（Ibn Sa`id）的记载说此地被称为喜森·塔可（Hisn-at-tāk）堡，即拱形城堡，并称这座城堡修建于合儿门河一个拐弯处的高山上，还说从该河分出的一条运河流到了疾陵城，但合儿门河干流转向西，最后注入札剌湖；如前文所述，在帖木儿围攻疾陵城之前不久，他首先攻下了塔可城和札剌（Zarah Kal`ah，或Hisār-i-Zarah）堡。穆斯林第一次征服时期的有关文献提到了该地区的另一座城堡，即札里（Zālik）堡，并称其距喀儿苦牙城与疾陵城均有5里格。但关于这座城堡的更详细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而且后来的文献再也没有提到此地。[29]

卜思忒（Bust）城[30]差不多和疾陵城在同一纬度，如前所述，有一条从疾陵城起程的道路经过正东的哈鲁里村和沙漠直达该城。合儿门河在流动过程中朝南弯曲形成半圆形河道，结果使流程增加了两倍，这段

河道沿岸的中途就是鲁得八儿（Rūdbār）城[31]。巴拉祖里在记载穆斯林第一次征服的内容时，显然提到了鲁得八儿城，他说昔吉思田地区朝坎答哈（Kandahār）城方向有一座叫鲁兹八儿（Ar-Rūdhbar）的城市；靠近鲁兹八儿城的是吉失（Kishsh，或Kiss）城，这应是现在的喀吉（Kaj，或Kuhīch）城[32]。其他阿拉伯地理学家只是偶尔提到了鲁兹八儿城；此地和伊斯塔赫里所记载的鲁兹八儿（Rūdhbār）应是同一地，其位于不思忒城附近的费鲁兹干（Fīrūzkand）地区。这里有很多肥沃的土地和农田，但据说该地主要产外销的食盐。此城邻近的另一座城是札里坎（Az-Zālikān）城，又拼写为萨剌坎（Sālakān）或贾里坎（Jālikān）[33]。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座城距不思忒城有一站之地，但没有提到其具体方向，在其他道里志中也没有记载过这个名称。这座城的居民几乎都是纺织工，但城周边地域辽阔，土地肥沃，并靠几条河流灌溉，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该城规模差不多和喀儿宁城一样。

在发源于坎答哈（Kandahār）地区的河流与合儿门河汇合处的岸边有不思忒（Bust，或Bast）城[34]，这座城历来就是险要重镇。伊斯塔赫里说该城的城门是座大浮桥，“如同亦剌可地区的浮桥一样”，并且从疾陵城起程的道路要经过这座浮桥。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不思忒城是昔吉思田地区的第二大城市，居民生活安逸，据文献记载，这里的人们穿着打扮追随亦剌可人的时尚，而且绝大部分商人与印度从事贸易。这座城附近地区的土地异常肥沃，种植 着椰枣和葡萄；不思忒城是昔吉思田地区东部所有山区的首府，这个地区包括杂民·答洼儿（Zamīn-Dāwar）[35]和鲁哈吉（Rukhkhaj）两个大区。穆喀达思说这座城拥有内城、城堡及其周边很大的外城区，其位于哈儿答鲁亦［Khardarūy，现代的阿尔甘达布（Argandāb）］河[36]与黑儿满（Hirmand，即合儿门）河汇合处以北1里格之地。城里有一座秀美的清真寺，市场里的货品琳琅满目。在去往哥疾宁城道路半里格的地方就是阿思喀儿（Al-`Askar，即军营），修建得像一座小城，这里是算端的驻所。据亚库特记载，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不思忒城差不多完全变成废墟，他还注意到这里气候炎热，并称这里有很多果园。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从疾陵城来到这里，洗劫了该地及其毗邻的地区，同时他在行军途中，毁坏了拦截在合儿门河上的一座叫班底·鲁思坦（Band-i-Rustam）的大坝，从这座大坝所引的河水灌溉着整个昔吉思田地区西边的土地。[37]

合儿门河从印度·苦失（Hindū Kush）山脉[38]以南流经宽阔的山谷到达不思忒城，这个山谷至今还叫杂民·答洼儿（Zamīn-Dāwar）地区，阿拉伯地理学家提到了这个地区。这个波斯语名称相当于阿拉伯语的阿儿·答洼儿（`Ard-ad-Dāwar）或八剌·答洼儿（Balad-ad-Dawār），两者含义相同，即进入山区的“地之门”或“通道”。中世纪时期，这里是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地区，有四座主要城市，即答儿塔儿（Dartall）、答儿噶失（Darghash）、八噶宁（Baghnīn）和沙儿万（Sharwān）城[39]，以及众多的大村庄和大片农田。这个地区的首府是答儿塔儿（Dartal），或答儿塔儿，或塔儿（Tall，伊斯塔赫里所拼写）城，其显然应是穆喀达思所记载的答洼儿（Dāwar）城。这是座优美的大城市，有一座城堡，由骑兵防守，是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去往古儿（Ghūr）山区道路上的边境驿站。该城位于合儿门河的岸边，距不思忒城北有3站之地，记载穆斯林第一次征服活动的文献中说该城附近是贾八儿·祖儿（Jabal-az-Zūr）山，这里有尊巨大的佛像叫祖儿（Zūr）或尊（Zūn），阿拉伯人将其作为战利品。这尊雕像全是用黄金做成的，眼睛则用金刚石（*Yākūt*）做成。

沿合儿门河北上一站之地，与答儿塔儿城处于同一岸边的就是答儿噶失城，而由答儿塔儿城往西一站之程就是八噶宁城，此地被称作必失兰（Bishlank）[40]的突厥诸部控制，其间还居住着哈剌只（Khalaj）部[41]。这些部落后来向西迁徙，但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其还很惬意地居住在杂民·答洼儿地区，并“遵奉着突厥人的习俗”。杂民·答洼儿地区的第五座城市是合瓦失城（Khwāsh，如前所述，是用与之同名的河流的名字命名的城市）[42]，伊斯塔赫里称这是座没有城墙的城市，但有一座用来防卫的城堡，很可惜这座城所在的位置没有记载下来，但有些文献将它纳入可不里（Kābul）[43]地区。

在不思忒城和答儿塔儿城之间，位于后一城之南有一站地就是萨万（Sarwān）[44]或沙儿万城，这座城显然不在合儿门河岸边，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该城规模和喀儿宁城差不多，但人口较多，也繁华一些。这里盛产外销的优质水果，尤其是椰枣和葡萄，位于沙儿万地区南边的费鲁兹干（Fīrūzkand）城[45]也盛产优质水果，该城距不思忒城之东有一站之地[46]。

鲁哈吉（Rukhkhaj）地区包括坎答哈（Kandahār）城周边之地，该区在不思忒城以东，现在称作塔尔纳（Tarnak）河[47]与阿尔甘达布

（Argandāb）河的沿岸地区。中世纪时期，鲁哈吉地区的首府为班贾委（Banjaway）城[48]，阿拉伯文书写为盘只·委（Panj-wāy，即五河）[49]，至今此名还用来称呼坎答哈城西边的地区，这里位于塔尔纳河与阿尔甘达布河交汇之处附近。中世纪时期，鲁哈吉地区极其富庶，外销大量优质的羊毛，这为其带来了丰厚的财税收入。班贾委城的具体位置则难以确定。该城应在距不思忒城有4站之地的道路上，在该城，道路分为两支：一支向北12程到哥疾宁城；另一支向东6程到思必（Sībī）城。该城（班贾委城）可能距坎答哈城不远，但文献没有记载两座城之间的距离。班贾委城西1里格就是苦哈（Kuhak）城堡，即山岗堡，其附近有一座城镇。班贾委城本身有坚固的城墙，还有一座漂亮的清真寺。该城从附近的河中取水。

从该城连接思必城的道路上行一站之地就是八可牢洼兹城［Bakrāwādh，可以写为八可剌八（Bakrābād），伊斯塔赫里和伊本·豪喀尔拼写为塔斤纳八（Takīnnābādh），可能是音点笔误］，[50]该城的市场里有座聚礼清真寺；这座城位于坎答哈河与另一条河的交汇处的岸边。

靠近印度边界的坎答哈（Kandahār，或Al-Kunduhār）城在记述穆斯林第一次征服时期历史的文献中常被提及。巴拉祖里说从昔吉思田地区起程经过沙漠的道路可以到达该城，他还说穆斯林通过河上的船只攻打该城，并摧毁了巨大的神（Al-Budd）像，这无疑是一尊佛（Buddha）像。此后，在穆喀达思、伊本·鲁斯塔和雅忽比的记载中只是偶尔会提到坎答哈城，通常称作“信度（Hind）或印度边界的坎答哈城”。很可惜早期的道里志对坎答哈城的里程失载，尽管伊斯塔赫里和伊本·豪喀尔详细记述了这一地区（昔思田地区），但没有记载坎答哈之名。很可能在中世纪初期，班贾委城已取代坎答哈城，因亚库特没有记载该城，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蒙古第一次西征时，该城之名又一次出现于历史文献中，文献记载该城已为蒙古人所毁，而在14世纪末的帖木儿时代，该城再一次遭受劫难。[51]

思必城附近的地区被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作八利思（Bālis）[52]，又称八利失（Bālish），或瓦里失坦（Wālishtān）。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这个地区的首府是思必城，也拼写为思唯（Sīvī）或思洼（Sīwah），但总督一般居住在喀思儿（Al-Kasr，即城堡）城[53]，这是一座距该地区第二大城阿思凡贾亦（Asfanjāy）或思凡贾委（Safanjavī）城[54]有1里

格的小城，但确切位置并不清楚，大致距思必城北2站，在去往鲁哈吉地区的班贾委城道路上。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还提到了麻思堂（Mastang，或Mastanj）城，此外，他们还记载了这个地区的很多村庄，据说共有2200个村庄，但对这些村庄没有做进一步的叙述。[55]

哥疾宁（Ghaznah）[56]，或哥吉纳因（Ghaznayn）城，在伊斯兰历4世纪末（11世纪初），这是座很有名的城市，因为这里曾是哥疾宁（Ghaznah）王朝著名统治者马合木（Mahmūd）的首都，他有段时间是东到印度、西到报达城地区的统治者。很可惜没有相关的文献流传下来，以详细记载当时马合木从印度掠夺来大量财富，用于重建和修缮哥疾宁城的内容。在此前30年，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这座城的规模和梵衍那（Bāmiyān）城差不多，这里有很多清澈的河流，但果园很少。他说在这一地区没有比该城商人更富有、商品更多的城市，因而该城被称作印度的“港口”。穆喀达思详细记载了诸多地区和城市的名字，但绝大多数的地名和现在的名称无法一一对应。他将哥疾宁城记为双数的哥吉纳因（Ghaznayn）城，但没有说明为什么称作“两个哥疾宁城”，而后来哥吉纳因通常要比哥疾宁使用得更多。穆喀达思还说在该城和可不里（Kābul）城之间的所有地区称作可不里思田（Kābulistān）。

约在伊斯兰历415年（1024年），马合木满载从印度抢来的战利品返回故地哥疾宁城，并重建该城，此后这座城市进入最鼎盛时期，并延续了1个世纪。古儿（Ghūr）王朝的算端阿剌丁（`Alā-ad-Dīn），绰号叫贾汗·速思（Janhān-sūs，即世界的纵火者），为了给死于哥疾宁王朝统治者八兰·沙（Bahrām Shāh）之手的兄弟复仇，伊斯兰历544年（1149年）突袭哥疾宁城，并洗劫和烧毁了该城，之后该城再也没恢复往日的辉煌。位于清真寺中的统治者马合木陵墓似乎躲过一劫，或者是被重修了，因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在城里见到过这座陵墓。他称哥疾宁城绝大部分已毁，但以前是一座相当大的城市。和他同时代的穆思套菲说这是一座小城，由于海拔的原因，气候异常寒冷，但没有提到任何重要的细节内容。[57]

据文献记载可知，整个合儿门河上游和可不里河流域的大山脉地区被阿拉伯人称作札卜里思田（Zābulistān），这是一种模糊的称呼，但这一称法特指哥疾宁城的附近地区。此外，可不里思田（Kābulistān）就是可不里（Kābul）地区，其北到梵衍那地区的边界；这种分类法见于记载帖木儿武功活动的文献中。早在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据雅

忽比记载，可不里地区是商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从该地区带回可不里·阿合里剌吉（Kābulī Ahlīlaj），或是一种大诃子或藏青果（myrobalan）。[58]雅忽比说这一地区的首府称作朱儿洼思（Jurwas）城[59]，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斯塔赫里称其首府为塔班（Tābān）城[60]。尽管可不里之名似乎一般也用作城市名称，但更常用来专指地区之名。

该地（可不里地区）附近有一座著名的苦寒底兹堡（Kuhandiz，即城堡）[61]，而且该城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入，十分坚固。该城是印度货品的大集散地，这里外销的靛蓝（*nīl*）的价值可达100万迪纳（约50万纯银英币）；这里还储存着大量来自印度与中国的奇珍异货。早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斯林、犹太人和偶像教者（即佛教徒）便在可不里城[62]各自分区居住，这里的城区、市场和商贾货仓等也很有名。穆喀达思记载了城堡中一眼神奇的水井；他还说可不里地区是诃子（藏青果）的特产地。他又称可不里思田是昔吉思田地区的所属地区。至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可疾云尼称可不里地区以饲养 母驼而闻名，其名为“大夏”（Bactrian，或Bukhtī）驼[63]，这里产的骆驼在中亚范围是最好的。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访问了可不里，并说这里已沦落为一个小村庄，居民是称作阿富汗人（Al-Afghān）的波斯部落。

可不里（Kābul）河[64]是印度河的一条支流，由发源于可不里地区北边山脉印度·苦失山的两条河汇合而成。[65]东边的河流源头是著名的银矿所在地，阿拉伯人称其为般贾黑儿（Banjahīr，当地语中称作Panj-hīr，即“五山”），从这座山上可以开采大量的白银，于是般贾黑儿（Banjahīr）城[66]在伊斯兰历3世纪（10世纪）萨法儿王朝统治时期成为造币城，其所制造的底儿罕当然冠以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讳。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般贾黑儿城在一座小山上，居住着10000矿工，他们是一群刁民恶徒，他还记载了他们的很多不轨行为。邻近该城的是贾儿八牙（Jārbāyah）城[67]，位于般贾黑儿（Banjahīr）河，或可不里河岸处，此后这条河流经有座清真寺的大城—法儿万（Farwān）城[68]，然后到达印度平原。穆喀达思还提到了阿思吉麻失（Askīmasht）地区的失养（Shiyān）城[69]，这座城有一处神奇的泉水和一座优美的清真寺，该寺是阿拉伯军事将领屈底波（Kutaybah-ibn-Muslim）[70]修建的，他在穆斯林第一次征服时期曾统率过军队。亚库特详细记述了这里的很多银矿及居住在这里的狂放不羁的矿工。他说整座山的一边被凿掘

出很多大洞，矿工们举着火把在山洞里干活。这里的人们完全沉迷于各种赌博中，有人一夜暴富，第二天又变成身无分文的叫花子；他们每开凿一个新矿洞，至少要花费30万底儿罕（约12000英镑）。这个地方在成吉思汗的西征中被毁；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到过这里，并称附近一条河的河水是蓝色的，但他没有见到银矿，只是看到了先前开矿用的被废弃的巷道。

昔吉思田地区几乎不产什么产品；穆喀达思称这里编制椰枣筐，叫作札纳必儿（*Zanabīl*），以供外销，还有棕榈绳和芦苇席。[71]

昔吉思田地区各条道路的中枢是疾陵城，其第一条是从纳儿麻思儿城起程的道路，经萨尼吉（Sanīj）城，越过“大沙漠”到达该城，这条道路在上一章已做了叙述；从疾陵城向北有一条到哈烈（Herāt）城的道路，中间经过喀儿苦牙城，而后经合儿门河上的一座桥，到达法剌河岸边的朱外因城；从朱外因城有一条道路北上越过法剌河上的法剌桥（原文第341页已提及）到达法剌城。法剌城北3站之地就是阿思夫札儿（即Sabzivār-i-Herāt）城，是进入呼罗珊地区的第一座城市。很可惜，这条道路的里程没有做记载，只记载了每天的行程站点，主要是伊斯塔赫里与伊本·豪喀尔记载了这条道路。[72]他们所拼写的很多驿站的名称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从疾陵城起程向东的道路，先到合瓦失河岸的哈鲁里村，然后沿一条笔直的道路越过沙漠，经过5站后到达不思忒城。在不思忒城，道路分为两支：一支到合儿门河上游的杂民·答洼儿地区；另一支到鲁哈吉地区的班贾委城，其邻近坎答哈地区。在班贾委城，道路又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北到哥疾宁城；另一支经阿思凡贾亦（Asfanjāy）城到思必城。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些道路也只是记载了每天的行程站点，而且很多站点的名称是无法确定的。[73]

[1]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为“漕矩吒国”，其“周七千余里”。《新唐书·西域传》载：“谢飓居吐火罗西南，本名漕矩吒，或曰漕矩。”译者。

[2] 阿魏，又称熏渠（《唐本草》）、魏去疾（侯宁极《药谱》）、阿虞、形虞（《酉阳杂俎》）、哈昔泥（《本草纲目》）等，多年生草本植物，气味浓烈如蒜，主要分布于伊朗、中亚、我国新疆等地的戈壁滩，可入药。译者。

[3]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

卷，第24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1页。

[4] 法剌（Farah）河，即法拉河，全名达尔亚法拉河（Darya-ye Farah Rūd），阿富汗西部河流，发源于兴都库什山中部，往西南流，在法拉城附近注入锡斯坦（昔吉思田湖区盆地），长645公里，下游于旱季断流，成为一串湖泊，春季汛期常泛滥。译者。

[5] 疾陵城的遗迹位于现代的扎黑丹（Zāhidān）村和沙合里斯坦（Shahristān）村附近，该城在自合儿门河引出的一条主要运河的古河道上，中世纪时这条河道就干涸了。关于这一遗址和其他遗址的内容可以参考罗林森（H. Rawlinson）的著述（*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第280、283、284页，1873年）；戈尔德斯米德（F. Goldsmid）爵士所著的《波斯东部》（*Eastern Persia*，第1卷，第301页）；赛克斯上校所著的《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375、383页）；塞维奇·兰道（A. H. Savage Landor）所著的《穿越向往的土地》（*Across Coveted Lands*，第2卷，第288页）。扎黑丹村附近还可看到一座塔的遗存，高约80英尺，称作米尔·扎黑丹（Mīl-i-Zāhidān），此塔有一个螺旋状的楼梯，两边书写着清晰可见的苦法（Kufi）体的楹联。传说，该塔被帖木儿所毁，见塔特（G. P. Tate）的著述（*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lreland*，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71页，1904年）。纳思拉塔巴德（Nasratābād）城是现代锡斯坦（Sīstān）地区的首府，在这些遗址南边几英里处。此城名最初叫尼思儿八（Nīsirībād），但现在此名已不用。据塞维奇·兰道的说法，此城现在也被称作沙合尔·纳思里亚（Shahr-i-Nasīryah）。

[6]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0页在记载昔思田地区时，提到了疾陵城的5座内城门和13座外城门、穿城而过的河流、地毯、小毯、干枣、阿魏等。译者。

[7] 古儿沙思（Gurshasf）是亦思凡底牙儿（Isfandiyar）之父，亦思凡底牙儿是八赫满（Bahman）之父，他们均是波斯古代传说中的凯延（Kayan、Kays、Kaian）王朝的国王，这个王朝传说是凯苦八（Kayqubad）建立的，这个王朝的传说与“历史”见于《阿维斯陀经》（*Avesta*）和波斯史诗《列王纪》（*Shah Nāmah*）等，据说其统治地区为东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译者。

[8] 巴拉祖里，第392、394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3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39～24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97～299、30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

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3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62页。

[9]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55页载："札剌湖位于昔思田，湖周边除了连接沙漠的一边外，有居民的耕地和村庄。其长30法儿萨，宽7法儿萨。有时候遇到该湖湖水猛涨，从这里流出来的水能流到起儿漫地区，然后形成一座著名的湖。"今天此湖被称作扎拉湖，并分成几个不同的小湖，水域面积大为缩小。译者。

[10] 赛克斯上校（《波斯万里行记》，第364、372页）画出了许多草图，从中可以看到现在合儿门河与札剌湖的状况。这个大湖盆地的南端和一条大河相连，长约50英里，平均宽350码，有50英尺高的悬崖。此河被称为设剌（Shela）河。这条河向东南方向流入皋·札剌（Gawd-i-Zarah，即札剌洞）湖，这是第二座湖的位置，位于合儿门河下游拐弯的正南，这个皋（Gawd，即洞）湖在洪水季节接纳札剌湖多余的水。皋·札剌湖东西有100英里，南北宽约30英里。见赛克斯上校《波斯万里行记》，第365页。

[11]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3页载："另一条河为黑兹满（Hīdhmand）河（即合儿门河），发源于古兹干南（Gūzgānan）边界。在古儿附近，其流经都儿古石（Durghush）、起儿（Til）和不思忒，并在昔吉思田地区附近形成一个沼泽。这条河的一部分河水用于灌溉，一部分流入札剌湖。"现称赫尔曼德河。译者。

[12] 《魏书·西域传》作范阳国；《隋书·西域传》作帆延；《大唐西域记》作梵衍那；《册府元龟》卷九九九作范延。即今阿富汗之巴米扬（Bāmyān），是巴米扬省省会，人口6万，主要是哈扎拉人。这是阿富汗的历史名城，有很多石刻遗迹，著名的巴米扬大佛于2001年被塔利班政权炸毁。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通往南亚、中亚的要道。译者。

[13]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42～24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

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1、30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2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14页；第4卷，第272、992、99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16、226页。穆喀达思以卜海剌·萨纳（Buhayrah-as-Sanat）之名提到了该湖，但可能是音点笔误。

[14]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0页提到了尼合城，并称这是“一座繁华的小城，有很多耕地。这里没有苍蝇”。此城就是今南霍拉桑省内赫班丹（Nihbandān）县县府，人口16万，简称内赫（Nih，即尼合），是去往伊朗腹地的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1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4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87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3页。剌木·沙合里思田城的位置尚不清楚。罗林森（H. Rawlinson）（*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第280、283、284页，1873年）说该城应该在剌木鲁得（Rāmrūd）河附近，该河由附近的设剌（Shela）河分出，这里有很多遗址。这些遗址显然就是现在的沙合儿·鲁思坦（Shahr-i-Rustam，即鲁思坦城），塞维奇·兰道（A. H. Savage Landor）在《穿越向往的土地》（*Across Coveted Lands*，第2卷，第270页）中曾经有过记述，并且画了一张草图。有关尼合（Nih）城的遗址，赛克斯上校已做了记述（《波斯万里行记》，第413页）。

[16] 这条河发源于赫拉特西南部，全长245公里，最后汇入阿富汗、伊朗交界的锡斯坦地区的萨比里（Hamun-e Saberi）湖，其是古代扎拉湖的一部分。译者。

[17]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0页载："法剌城是热区的城市。这里大量产枣和其他水果。"今为法拉，是阿富汗西部法拉省省会，人口约3.7万，位于法拉河绿洲，海拔750米，为进入锡斯坦（昔吉思田）的主要道路与赫拉特（哈烈）—坎大哈（坎答哈）公路的交叉点。译者。

[18] 今为阿富汗西部法拉省拉什·朱外因（Lash o Jawain）州的州府，位于赫尔曼德河下游冲积扇上，全州人口2.8万，主要为普什图人和塔吉克人，各占50%。此地为阿富汗西南边城，是连接阿富汗与伊朗的重要通道。译者。

[19] 今此城名不存在，应在扎兰季城以北，拉什·朱外因城之南。译者。

[20] 此城就是今尼姆鲁兹（Nīmrūz）省康（Kang）州州府康城，在该省西部，靠近伊朗边界。译者。

[21]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4页。有关鸣沙山，见比鲁尼所著的《古代各族年表》[*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沙傲（C. E. Sachau）译，第235页；阿拉伯文本，第246页]。比如今天有一座沙山发出像"风弦琴"一样的的声音，见戈尔德斯米德（F. Goldsmid）爵士所著的《波斯东部》（*Eastern Persia*，第1卷，第327页），他曾经造访过这个特别的山，此山在依麻木扎伊（Imām Zāyid）墓附近，距喀剌·喀合（Kal`ah-i-Kāh）5英里。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4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3、30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6、32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15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6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42、888页；第4卷，第236、269页。喀儿苦牙城的遗址可能会在皮士瓦万（Pīshvarān）城以南的大片遗址中找到。这里有一座两孔古桥，叫塔合忒·普儿（Takht-i-Pūl），见赛克斯上校所著的《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413页。见亚特（Yate）所著的《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118页。这个祆教祠被祆教徒称作麦音爻·喀儿考（Mainyo Karko）。

[22] 哈失（Khāsh、Khwāsh，或Khuwāsh）河，即哈什河，位于阿富汗西南，发源于阿富汗中部，向西南流入赫尔曼德（合儿门）河。译者。

[23] 这一地区这种相同或相似的名称至少有三个，即现在的哈失河与哈失城，然后就是贾八儿·苦夫思地区的同名城市（见原书第317页），最后为麻可兰地区的合瓦失城（见原书第330页）。

[24]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0页提到了合瓦失城所在地的自然河流、地下人工运河、气候等。译者。

[25] 今为哈什（Khāsh或Khās），是尼姆鲁兹省哈什鲁德（Khāsh Rūd）州州府，在该省北部，靠近哈升河岸边扎兰季、法拉等地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26]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0页提到了喀儿宁城，但拼写略有不同，即喀儿尼（Qarnī）。译者。

[27] 此地今不存，应在哈什城与法拉城之间。译者。

[28]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0页称："塔可是一座有坚固城堡的小城，人口很多。"此城现在的具体位置难以确定。译者。

[29] 巴拉祖里，第393、39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1、302、303、304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72、486页；第4卷，第27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ī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5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343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

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70页。

[30]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将此城称作拉什卡尔加（Lashkar Gāh），是赫尔曼德（Helmand）省省会，人口20万，向南达扎兰季城，向东到坎大哈，向西去赫拉特，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1] 今此名不存，应距拉什卡尔加城不远。译者。

[32] 今为卡加（Kaca），位于拉什卡尔加城东北部，是个小村庄。译者。

[33] 今此名不存，应在拉什卡尔加城周边。译者。

[34]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0页载："不思忒城是有道坚固城墙的大城，位于合儿门（Hīdhmand）河岸边，其拥有很多的区（*bā nāhiyatī bisyār*）。印度（Hindūstān）门是其商人集中地。这里的居民勇敢而善战。此地产水果，晒干后外销到其他地方，还产棉布（karbās）和肥皂。"《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第136页载："这里（不思忒）的空气如同伊拉克，这里的水如同幼发拉底河。的确，不思忒融会其他地区所具有的优点。"作者还说不思忒（Bust）最好拼写为复数，即布斯坦（Bustān），意为"花园"。作者还说这里环境优美，健康宜人，粮食、枣、香草、种植的蔬菜丰富。这里的特产李子优于其他任何地方。所谓的昔思田无花果实际上产自不思忒，并远销到呼罗珊和其他地区。译者。

[35]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1页载："杂民·答洼儿是介于古儿与不思忒之间的繁华地区。这个地区有两个城市—乞儿（Til，即Dartal或Tall，引者）和都儿古失（Durghush，即Darghash，引者），这两座城市均是防止古儿进攻的边境城堡。都儿古失盛产藏红花。"译者。

[36] 阿尔甘达布河位于阿富汗东部，发源于阿富汗加兹尼西北，全长400公里，下游与多里河汇合后，在拉什卡尔加城南不远，汇入赫尔曼德河。阿尔甘达布河河谷较为富庶，该河岸边最为著名的城市为坎大哈。译者。

[37] 巴拉祖里，第394、43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44、245、24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2、30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7、30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0、612页；第4卷，第184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

《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70页。

[38] 印度·苦失（Hindū Kush）山脉，即兴都库什山脉，是亚洲中部的褶皱山系，绝大部分位于阿富汗境内，为印度河与中亚阿姆河的分水岭。长约1600公里，宽约320公里。这里主要居住着普什图、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民族。《洛阳伽蓝记》和《大唐西域记》等作大雪山。译者。

[39] 这几座城市的名称难以查找，应该在拉什卡尔加城以北不远。译者。

[40] 作者对必失兰（Bishlank）未做出解释，文献中也没有明确记载，但这显然是一个突厥语词，在《哈剌只资料》（*Khalaj Materials*）一书中提到了Bish一词，意为“五”，但lank一词未提及，但从突厥语可知，该词的含义为“叟、狭长、细长”等，合起来似是“五小部”。参见Gerhard Doerfer，*Khalaj Materials*，Bloomington，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1971年。译者。

[41] 哈剌只（Khalaj）部最初生活在西突厥斯坦，8（或9）到12世纪迁徙至阿富汗地区，在哥疾宁王朝军人中有很多哈剌只部人，他们多是被俘的奴隶；古儿王的统治者出身于哈剌只部奴隶；1290年哈剌只部出身的奴隶在德里（Delhi）建立了哈剌只王朝。其语言属于突厥语族西乌古斯语支，今天主要分布在伊朗等地。译者。

[42] 此城名难以查到。译者。

[43] 《汉书·西域传》作高附，载：“离附翕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新唐书·大勃律传》作迦布罗；《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可不里。即今喀布尔，为阿富汗的首都，人口367.8万，是古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也是历史名城，历史上有多个政权在此建都。译者。

[44]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6页载：“萨万（Sarvān，即Sarwān，引者）是山区。这里的居民长相丑陋，且好战。他们都是职业惯贼，好斗，爱吵架，无诚信，残忍，部族之间常发生仇杀。”第110页又载：“萨万城是座小城。位于热区。这里产枣。这是一个坚固的地方。”译者。

[45] 此城名难以查到。译者。

[46] 巴拉祖里，第39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44、245、24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3、30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

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41页；第4卷，第220页。杂民·答洼儿地区的这些城市现已不存，但首府答儿塔儿城大致在现代的格里什克（Girishk）城所在地。

[47] 塔尔纳（Tarnak）河，流经加兹尼、扎布尔（Zabul）、坎大哈等省，发源于哈扎拉加特（Hazarajat）地区，沿途汇合了一些河流，经过440公里后，在拉什卡尔加城附近注入赫尔曼德河。译者。

[48] 此城名难以查到，应在坎大哈城以东不远。译者。

[49]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1页提到了鲁哈吉（Rukhudh，即Rukhkhaj）地区和盘只·委（Panj-wāy）。译者。

[50] 此城名难以查到，应在今坎大哈省东边斯平布尔达克（Sipinbuldak）小城不远。译者。

[51] 巴拉祖里，第434、445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44、25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1、302、30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331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76页。贝柳（H. W. Bellew）：《从印度到底格里斯河》（*From the Indus to the Tigris*），第305页。

[52]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1页提到了八利思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城市，如思唯、S. F. Njā`vī（应是Safanjavī）城、苦石（Kushk，似是Al-Kasr的笔误，引者），其中总督（amīr）在苦石城居住。译者。

[53]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54] 今此城名不存，但从方位判断，应距今天的奎达城不远。译者。

[5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79、24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

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7页。

[56]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1页载：“哥疾宁（Ghaznīn，即Ghaznah，引者）是位于山坡的一座城市，极其惬意。位于印度思田，先前属于印度，现属于穆斯林地区。该城介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地区之间。这里是商人汇集之地，拥有大量财富。”《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第136页称哥疾宁：“这里有清新的空气、肥沃的土地和甘甜的用水。这里是山区，为北方的气候。这里的人很长寿，很少得病。”即加兹尼。译者。

[5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8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6、297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8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4页。很可惜，乌特比（`Utbī）在其所著的《哥疾宁王朝马合木史》（*History of Mahmūd of Ghaznah*）没有详细记载这个首都城市。有关哥疾宁城（Ghaznah），见裕尔（H. Yule）在《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10卷，第560页）撰写的词条，其介绍了关于这座城市的情况。

[58] 诃子或藏青果（myrobalan）在中世纪用来指一些干果和自然干燥的果仁，这种果品是从印度进口的，在那个时代的药引中具有很高的声名。这个名称来源于希腊语，用作调味品的这种印度果有很多品种，诃子或藏青果中最有名的一种叫可不里（Chebulic），即来自喀布尔（Kābul）的果实，阿拉伯人将这种药（由诃子或藏青果做成）称作阿合里剌吉（Ahlīlaj，或Hahlīlaj），伊本·拜塔尔（Ibn Baytār）在其著作《药物字典》［*Dictionary of Drugs*，桑提摩尔（J. Sontheimer）博士译翻，第1卷，第163页；第2卷，第572页］中写有两条有关诃子或藏青果的词条。也见多兹（Dozy）《阿拉伯字典补编》（*Supplement aux Dictionnaires Arabes*）中的“亦合里剌

吉”（Ihlīlaj）条；《英印专业术语词汇》［*Glossary of Anglo-Indian Terms*，裕尔（Yule）和博尼尔（Burnell）编著］中的“诃子”或“藏青果”条。

[59]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60]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61]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62]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1页载：“可不里城是有座坚固城堡的城市，这座城堡因固若金汤而闻名。这里的居民是穆斯林和印度人。城里还有很多佛寺。”译者。

[63] 安息（Bactrian，或Bukhtī）驼，即双峰驼，分布于我国的新疆、内蒙古，以及阿富汗、中亚、伊朗等地。译者。

[64] 喀布尔（可不里）河，是阿富汗东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河流，全长700公里，其中有564公里在阿富汗境内。发源于喀布尔以西72公里的桑格拉赫（Sanglākh）山脉，向东流经喀布尔、贾拉拉巴德（Jalālābād）城，自开伯尔（Khyber）山口向北流入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西北汇入印度河。这条河有四条主要支流—罗格尔（Lowgar）河、潘杰希尔（Panjshir，即半制）河、库纳尔（Konar、Kunar）河与阿林格尔（Alīngār）河。喀布尔河的大量河水被用来灌溉农田，喀布尔城以西的河道在夏季经常干涸。喀布尔河谷为阿富汗、巴基斯坦间的天然通道。译者。

[65] 印度·苦失，波斯语的含义为“杀死印度人”。伊本·白图泰（第3卷，第84页）是最早记载这个名称的著述者之一，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对这个名称并不了解。他解释说这个山脉如此称呼是因为很多印度奴隶在去往波斯的途中在穿越此山时死去。

[66] 今天此城名已不存，但这个名称以潘杰希尔（Panjshir，意为“五只狮”）省省名的形式保留下来，其省会为巴扎拉克（Bāzārak），人口2400，是座小城，是去往阿富汗西北部的要道，曾是阿富汗反击苏联入侵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之地。译者。

[67]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68] 今此城名难以查找，但这个名称以帕尔旺（Parvān）省省名的形式保留下来。其省会是恰里卡尔（Chārikār），位于喀布尔城北，人口9.6万，是古今道路要冲。译者。

[69]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70] 屈底波（669～715年），倭马亚王朝名将，早年追随该朝著名总督哈贾吉，他在704～710年，先后征服巴里黑、不花剌和花剌子模等地，715年被部将所杀。《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记载了他攻打康国（今撒马尔罕）事。译者。

[71]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

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90、291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8、28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7、32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7、303、304、32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73页；第2卷，第904、905页；第3卷，第454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6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558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85、8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8页。

[72]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48、24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4、30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0页。

[73]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

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49～25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5～30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49、350页。

第二十五章 苦黑思田（Kūhistān）地区

马可波罗将苦黑思田地区称作秃讷哈因（Tunocain）。哈因（Kāyin）城和屯（Tūn）城。土儿失兹（Turshīz）城和普失忒（Pusht）地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种植的大柏树。札洼（Zāvah）城。卜兹建（Būzjān）城和札木（Zam）地区。八哈儿兹（Bākharz）地区和麻临（Mālin）城。合洼夫（Khwāf）城。兹儿苦合（Zīrkūh）城。答失忒·必牙（Dasht-i-Biyād）城。拱北（Gunābād）城和不昔思丹（Bajistān）城。塔八辛（Tabas）城的椰枣。郝思（Khawst）或忽思夫（Khusf）城。必儿建（Birjand）城和穆民纳八（Mūminābād）地区。塔八辛·麻思南（Tabas Masīnān）城和都鲁（Duruh）城。[1]

苦黑思田（Kūhistān）地区和昔吉思田地区一样，阿拉伯地理学家通常将其视为呼罗珊的一部分。苦黑思田意为“山区”，是以其显著的地理特征而命名的，因此苦黑思田山区与其东边合儿门河三角洲上地势平坦的昔吉思田地区形成对比。伊本·豪喀尔说苦黑思田地区由于海拔高，绝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椰枣只能生长于“大沙漠”边缘的塔八辛·吉剌吉（Tabas Gīlakī）地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该地区的游牧居民是曲儿忒人，其饲养着大量的绵羊和骆驼。无疑，这个地区应是马可波罗所记载的“秃讷哈因（Tunocain）王国”，他将两座主要城市（屯城和哈因城）的名字合在一起指称整个地区。[2]

苦黑思田地区的首府为哈因（Kāyin）城[3]，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该城由一座坚固的城堡守卫，城堡周边有沟壕，总督府就在城堡内，还有一座聚礼清真寺。该城供水靠地下渠道，由于这里冬季气候寒冷，果园并不丰产，数量也不多[4]。这座城有三座城门，城里的商人常与呼罗珊进行大量贸易。伊本·豪喀尔还说在距哈因城2天路程，即通往你沙不儿（Nīshāpūr）城的道路上，发现一种叫秦·纳贾黑（*Tīn Najāhī*）的可食土，他说这种土外销到周边所有地区，大部分供人食用。伊斯兰历444年（1052年），纳思儿·忽思罗访问了哈因城，他称其内城由一座十分坚固的大城堡组成，这里的聚礼清真寺内建有屏风（Maksūrah）[5]，若登上清真寺内最大的拱形建筑，就可瞭望整个呼罗珊地区，他说城里的屋顶全为穹顶。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最先注意到哈

因城的枢纽地位，并说该城到苦黑思田地区任何主要地方的距离均为20里格。这是一座优美的城市：所有居民的用水是通过地下管道供给的，有在炎热季节使用的地下室。这里的农作物成熟很快，收割期也早。该城附近地区盛产粮食、水果，尤其是藏红花，在这里的草地上饲养的牲畜很快就会膘肥体壮。穆思套菲还说这里居民的皮肤是深色的。

屯（Tūn）城[6]位于哈因城以西、略偏北，两地相距50英里。穆喀达思称这是座繁华的城市，但比哈因城小一些，并有一座城堡守护，城里有一座漂亮的清真寺。这里产毛织品，纳思儿·忽思罗盛赞当地的地毯，他经过此城时，称这里一个作坊有400台织机。尽管在他那个时代大部分城区已毁，但大城堡还留存着。城东边的郊区有很多优美的果园，里面种植着阿月浑树。穆思套菲说屯城最初是按“一座中国城[7]的样子”修建的，但他对此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他提到了一座大城堡，称其有无水的干涸沟壕；城堡周围是外城的街道和巴扎（Bāzār）[8]。该城周边的土地异常肥沃，他说当地人为防雨水流失，修建了可收集雨水的人工大坝或堤坝（Band），这里种植的西瓜因味道甘美而闻名。由于屯城气候温暖，该地还盛产粮食、水果及丝绸，其地下水渠纵横密布。[9]

苦黑思田地区的西北角是卜失忒（Būsht）、普失忒（Pūsht），或卜失忒·阿剌伯（Busht-al-`Arab）地区，其主要城市为土儿失兹（Turshīz）城和昆都尔（Kundur）城。[10]土儿失兹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旧式写法为土来思思（Turraythith）或兔儿思思（Turthīth），后来拼写为土儿失失（Turshīsh）或土儿失思（Turshīs），但有段时间，该城被纳入你沙不儿（Nīshāpūr）专区（Hawmah）。伊本·豪喀尔称土儿失兹城是座十分繁华的城市，周边土地肥沃，此外在普失忒地区还有7座建有聚礼清真寺的城市。据穆喀达思记载，在他那个时代，土儿失兹城清真寺的辉煌程度可以和大马士革城的清真寺相媲美；城里有一处著名的水池，市场也很有名，因此土儿失兹城被称为“呼罗珊的商铺”，该城与法儿思地区和亦思法杭地区从事商品贸易。邻近的昆都尔城差不多和土儿失兹城一样繁华，其周边地区有226个大村庄。

据伊本·阿喜儿记载，伊斯兰历520年（1126年）塞尔柱王朝算端桑贾儿（Sanjar）的宰相（Wazīr）包围并洗劫了土儿失兹城，后来该城又被亦思马因（Ismāīl，即Assassin）派占据，因为“山中老人”在此时占领了附近大部分要冲，并修建了很多要塞来威慑整个苦黑思田地区。亚库特将亦思马因派最初出现于土儿失兹（Turshīz）城的时间确定为伊斯兰

历530年（1136年），并说该地区的总督召集了突厥部落，以协助他打击异端木剌夷（Mulāhid）[11]人，即亦思马因派，但没有打败木剌夷人，他们（突厥部落）反而抢劫了这座城，造成了土儿失兹城的毁灭。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中叶，蒙古人旭烈兀消灭了“暗杀”（Assassin）派的势力，据说当时其军队攻占了苦黑思田地区70座“暗杀”派的城堡。此后，土儿失兹城很快恢复了其重要地位；不到一个世纪后的穆思套菲称该城是苦黑思田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但其部分城区仍是废墟。他提到在该城附近有4座著名的城堡，即喀剌·八儿答鲁得（Kal`ah Bardarūd）、喀剌·密喀儿（Kal`ah Mīkāl，或Haykāl）、木贾黑答八（Mujāhidābād，即战士之家）和阿乞失噶（Atishgāh[12]，即祆教祠），这些城堡无疑是亦思马因派的据点。他盛赞土儿失兹地区所产的大量农产品，并说这些产品输往你沙不儿北部各地区。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土儿失兹城有高大坚固的城墙，但伊斯兰历783年（1381年）帖木儿来到该城，并将其摧毁，遭此劫难后，只留下了城市的残垣断壁。此后，土儿失兹城从地图上消失了。[13]

穆思套菲说土儿失兹城附近的吉失麻儿（Kishmar）村[14]有一棵著名的柏树，最初是为纪念国王古失塔思（Gushtasp）皈依祆教（Magian），由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栽种。这棵树比其他任何所见到的柏树都要高大，《列王纪》（*Shāh Nāmah*）中说这是琐罗亚斯德从天堂带来的一棵树苗。这棵树有特殊的神力，地震时周边地方常会遭难，但吉失麻儿村都安然无恙。据可疾云尼记载，伊斯兰历247年（861年）哈里发木塔瓦吉儿传谕砍伐这棵大柏树，然后劈成木条，再用骆驼驮着这些木条，经过整个波斯运送到萨麻剌城，作为其新宫殿横梁的材料。这一做法引起了祆教徒（Guebre[15]）的不满和抗议，就在这棵柏树运到底格里斯河岸边时，木塔瓦吉儿被其子弑杀。[16]

土儿失兹地区的东面是札洼（Zāvah）地区。札洼地区，或其一部分地区也称作鲁合（Rukhkh）地区，其首府为必沙（Bīshak）或札洼（Zāvah）城[17]。亚库特当时将鲁合常拼写为里黑（Rīkh）。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札洼城以居住着一位叫海答儿（Haydar）的圣徒而声名远播，他身着毛毡，夏天可入到火里，冬天可站在雪堆中，他创建了海答儿（Haydarīyah）派的支派—迭里迷失（Darvīsh，即苦修）派。他生活于蒙古西征时代，约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前后，后来他被称作谢合·苦土卜丁（Shaykh Kutb-ad-Dīn，即宗教桅杆）。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访问札洼城时，称这位谢合

（Shaykh）的信徒为了苦修悟道，将铁环绑在耳朵、手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以此来证明他们的圣洁。据穆思套菲记载，札洼城是座漂亮的城市，位于富庶地区，该城附近约有50个村庄。此城有座用土坯修建的坚固城堡。这里的灌溉用水丰富；种植着粮食、棉花、葡萄和其他各种水果，也产丝绸。他也提到了前文那位谢合的圣墓，并说在他那个时代这里极受人们的崇敬。今天该地区一般称作札洼地区，札洼城通常称作土儿八·海答儿（Turbat-i-Haydarī，即海答儿的陵墓）城，该圣墓至今还受到人们的朝谒。[18]

札洼地区往东，位于苦黑思田地区东北角，在哈烈（Herāt）河附近就是札木（Zām），或贾木（Jām）地区，其首府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称作卜兹建（Būzjān）城。这是座大城市，附属有180个村庄。卜兹建城被波斯人拼读为卜兹坎（Būzkān），后来该名称被拼写为卜赤坎（Pūchkān）。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将其记为贾木（Jām），并说该城所在地是一个极其富庶、水资源丰富的地区，这里大量种植桑树，因此盛产丝绸。这座城市以其拥有很多圣墓而闻名，这里埋葬着许多圣徒，伊本·白图泰特别提到了圣徒失哈卜丁·阿合马·贾米（Shihāb-ad-Dīn Ahmad-al-Jāmī）[19]，他的后裔在邻近地区占有大量的土地。这位圣徒德高望重，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曾亲自拜谒过他的圣墓，今天这座城市通常被称作谢合·贾米（Shaykh Jām）城[20]，至今还是一座繁华的城市。[21]

八哈儿兹（Bākharz，或Guwākharz）地区位于贾木地区以南，在哈烈河[22]的西边，哈烈河在这里向北流。八哈儿兹地区的首府为麻临（Mālin）城，据道里志记载的里程判断，这座城应位于现代的沙合儿·瑙城（Shahr-i-Naw，即新城）[23]，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里已是一座繁华的城市。这里输出粮食、葡萄等，也生产布料。亚库特说八哈儿兹最初被波斯人称作八得·哈儿札（*Bād-Harzah*），即有风之地，他还称麻临城周边和附近有128个村庄，其中主要村庄为角札坎（Jawdhakān）村。穆思套菲将这座首府的名称记为麻兰（Mālān）城，并称这里土地肥沃，还特别提及该地区产一种在整个呼罗珊地区很有名的“长瓜”[24]。

八哈儿兹地区的西南部为合洼夫（Khwāf，早先称作Khwāb）地区，其首府名称[25]与地区名同。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合洼夫地区以产葡萄干和石榴而闻名。萨鲁麻（Salūmak），后来写为萨兰

（Salām）城[26]，早期曾是该地区的最大城市，这一地区的另外两座重镇为三建（Sanjān，或Sankan）城[27]与哈儿吉儿（Kharkird）城[28]。伊本·豪喀尔以哈儿基儿（Kharjird）之名提到了哈儿吉儿城，他称该城往东1站有法儿吉儿［Farkird，亚库特拼写为法儿基（Farjird或Faljird）］城[29]，法儿吉儿城以北的苦绥（Kūsūy）或苦绥牙（Kūsūyah）城[30]距哈烈河最近。这三座城市中苦绥城最大，规模是邻近的卜失建（Būshjan）城[31]的三分之一，卜失建城位于呼罗珊地区，在后文要述及，后来的很多文献将这三座城划入呼罗珊地区。苦绥城有很多用土坯修建得很好的房屋，另外的两座城虽小，但有漂亮的花园和丰富的灌溉用水。亚库特还提到了在他那个时期合洼夫地区的两个重镇—思剌万（Sirāwand）城[32]和剌兹（Lāz）城[33]，但它们的方位不明。穆思套菲盛赞合洼夫地区的葡萄、瓜、石榴和无花果等，并说该地区盛产丝绸。他称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该地区的人口主要集中于萨兰、三建和枣赞（Zawzan），或祖赞（Zūzan）[34]等三城。穆喀达思说，当时祖赞城已是一座以纺毛工而闻名的城市，并且该城是道路网络的一个枢纽，因该城连接着哈因、萨兰（或写作萨鲁麻）和法儿基儿等三座城。亚库特称祖赞城是商业上的“小弼斯啰城”，并提到该城有一座祆教徒的圣墓。该城周边有124个重要的村庄。[35]

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提到了苦黑思田中部的很多地方，这些地方至今在地图上还可以查到，但在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作里没有出现。他说兹儿苦合（Zīrkūh，即山麓）地区[36]最为肥沃，产粮食、棉花，也大量产外销的丝绸。其名称也是祖赞城南边和哈因城东边的山区的名字，穆思套菲还说这个地区有三座重要城市—沙剌合思（Shārakhs）城[37]、亦思法（Isfad）城[38]和亦思亭（Istind）城[39]，这些城市现在依然存在。哈因城的西北边是名叫答失忒·必牙（Dasht-Biyād）[40]的地区，其意为“白色的平原”，这一名称被今天的波斯人拼读为答失忒·皮亚兹（Dasht-i-Piyāz）。该地区的首府为法里思（Fāris）城[41]，穆思套菲盛赞该地产的核桃和杏，并说这一地区是屯城和朱纳八（Junābād）城等地的夏季牧场（Yaylāk[42]）。

朱纳八城，现在一般称作拱北（Gunābād）城[43]，这是一座大城，位于屯城东北部。伊本·豪喀尔称该城为玉纳必兹（Yunābidh）城，穆喀达思则称作朱纳洼（Junāwad）城，在其他著述中还有不同的写法。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是座大城市，城里的房屋是用土坯修建的，其附近有70个村庄，这里的土地能得到良好的人工灌溉。亚库特通

常将其城名拼写为古纳必兹（Gunābidh），也写为朱纳必兹（Junābidh）。据穆思套菲记载，该城有两座坚固的城堡，分别为喀剌·哈瓦失儿（Kal`ah Khawāshir）堡和喀剌·答儿建（Kal`ah Darjān）堡，城堡的一边靠着山，另一边靠着城，从这两座城堡顶上可以看到附近的村庄，也可将村庄以外的沙漠尽收眼底。他说与苦黑思田地区其他地方不同，这里沙尘吹不进来，也不会侵袭古纳必兹土地上的果园。用水通过地下渠道获取，他称这里的水是从4里格外引来的山涧泉水，他还声称水的源头或水井有时候深达700腕尺（gez）。这里盛产丝绸，所产粮食供外销。拱北城西北30 英里，屯城正北约30英里就是不昔思丹（Bajistān）小城[44]，显然亚库特首先提到了该城，他称在他那个时代这里为村庄；但穆思套菲说，在他那个时代，这座城市的规模和屯城差不多大，但他没有做进一步详述。[45]

苦黑思田地区至今还有两座叫塔八辛（Tabas）的城市，但在阿拉伯地理学文献中此名常用双数形式塔八辛因（*Tabasayn*）记载。尽管塔八辛的名称有时候会错误地用来指称两座城中的一座，并将双数形式用作单数，但阿拉伯地理学家已将两座城很清楚地区别开来：一座叫椰枣塔八辛（Tabas-at-Tamr）城[46]；另一座称枣树塔八辛（Tabas-al-`Unnāb）城。

椰枣塔八辛城位于“大沙漠”边缘，有多条道路从该城经过，因此巴拉祖里称它是“呼罗珊的门户”。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座城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比哈因城稍小一些，但有坚固的城墙。此地区显著的自然特征是生长有椰枣林，由于其在沙漠边缘，气候异常炎热，但通过地下渠道可获得充足的供水。穆喀达思提到了该城漂亮的清真寺和储藏饮用水的大水池。这里还有极好的热水澡堂。“这里是苦黑思田地区唯一有树木和河流的地方；我在有河水流经的村庄和椰枣林走了一天。”（他补充说）

伊斯兰历444年（1052年），纳思儿·忽思罗经过塔八辛（Tabas）城，并称这是一座无城墙的优美繁华城市，但城周边为果园和椰枣林。这座城由一个叫阿卜·哈散·伊本·木哈马·吉剌吉（Abu-l-Hansan ibn Muhammad Gīlakī，即岐兰人）的人任总督，他用强硬手段进行管理，因此邻近的地区十分安全，而且为了与另一座塔八辛城相区别，后来该城就以这位著名总督之名称作塔八辛·吉剌吉（Tabas Gīlakī）城，从纳思儿·忽思罗的记载可以判断，这位总督以其卓有成效的治理而远近闻

名。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下半叶，塔八辛城落入亦思马因异端派手中，伊斯兰历494年（1102年）塞尔柱王朝算端桑贾儿统率军队包围塔八辛城，以打击亦思马因异端派，而后该城部分地区被其军队所毁。亚库特和穆思套菲均将椰枣塔八辛城称作塔八辛·吉剌吉城，穆思套菲在记述苦黑思田地区和“大沙漠”时，也注意到了这座城。这里除了产椰枣外，还产呼罗珊其他所有地区不产的柠檬和柑橘，城市附近的泉水足可以推动两个磨盘。一座坚固的城堡守卫着这座城市，城周边有很多的村庄。[47]

塔八辛城之北的沙漠边缘，在去往土儿失兹城的中途就是班（Bann）村，伊本·豪喀尔称当时这里居住着500人，此地显然应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提到的阿费里敦（Afrīdūn）驿站。伊本·豪喀尔在他的道里志中提到了另一个叫班（Bann，即Bann Ukhrā）的村庄，从他有两站距离的记载来判断，如果不是同一村庄，那么就是两个邻近的村庄同名。现在班村被称作底合·纳班（Dih Nāband）（不要和大沙漠绿洲中的同名地相混淆，见原文第325页）。此地是交通要冲，从贾儿麻（绿洲）去往苦黑思田地区的一条沙漠道路就经过这里。[48]

塔八辛城东南约3里格，位于沙漠边缘的是苦里（Kurī）[49]或苦临（Kurīn）城，从苦合八南（Kūhbanān）城起程的舒儿（Shūr）道经过这里，巴拉祖里说这是塔八辛城的两座城堡之一，此城名（塔八辛）显然可以证明塔八辛因城之名仅指椰枣塔八辛城的说法。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苦里城有多条道路交会，其附近是一个有1000人和很多农田的村庄。穆喀达思将其城名拼写为苦临城，并说该城的规模比塔八辛城要小；其附近（离塔八辛城有12里格，离屯城有20里格）是剌噶（Ar-Rakkah）村。伊斯兰历444年（1052年），纳思儿·忽思罗访问剌噶时，这里已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城里有聚礼清真寺，周边有很多灌溉良好的果园。塔八辛城东南约三程之地为忽儿（Khūr）城和郝思（Khawst）城[50]，这两座城是从起儿漫地区剌瓦儿（Rāvar）城和哈必思城（见原文第327、328页）起程，穿过“大沙漠”的两条道路的终点。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忽儿城要比塔八辛城小，但有聚礼清真寺；但因水资源缺乏，这里几乎没有果园。穆喀达思称这是座没有城墙的城市。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郝思城尽管没有聚礼清真寺，但是座重镇。这座城的城墙坚固，有城堡守卫，城里的房屋是用泥土修建的，周边是小果园，尽管有很多河道，但几乎没有水。穆喀达思说该城比屯

城大，但没有屯城繁华；这里几乎没有树木，城市附近是干燥荒芜的苦黑思田山区。亚库特通常将该城误拼为朱思（Jūsf）城，这是现代的忽思夫（Khūsf或Khūsb）的笔误，穆思套菲最早提到了忽思夫之名。其实，亚库特自己也承认不知如何正确拼写这一名称，他还说该城有时拼写为朱兹夫（Jūzf），但他在引用穆喀达思的一段记载时，却正确地记为郝思。如前文所述，郝思城的现代拼写形式第一次出现于穆思套菲的著作里，他称忽思夫城是一座小城，有一些附属的乡村，这里的土地靠一条河流灌溉，因此所产作物品质优良。[51]

忽思夫城东约20英里是必儿建（Birjand）城，现在其取代哈因城的地位，成为苦黑思田地区的首府。亚库特之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显然没有提到过必儿建，亚库特说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这里是苦黑思田地区最好的村庄之一。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称必儿建城是一座重要的地区性城市，周边有很多肥沃的农田和村庄，除了产葡萄和其他水果外，还盛产藏红花，但这里几乎不产粮食。距必儿建城东1天路程就是至今称作穆民纳八（Munīnābād，即信士之家）的山区，穆思套菲称这里由一座坚固的城堡防卫，该堡先前曾落入亦思马因派手中。这个山区有很多优美的村庄；穆思套菲特别提到了沙斤（Shākin），其位于一条叫法沙·鲁得（Fashā Rūd）的河的岸边，该河现在位于距哈因城东南约3天路程的地方。[52]

必儿建城正东约50英里就是第二座塔八辛城，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作枣树塔八辛（Tabas-al-`Unnāb）城，波斯人称作塔八辛·麻思南（Tabas Masīnān）城[53]。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座城比玉纳必兹城（即哈因城西北的拱北城）要大；城里的房屋是用土坯修建的，但城墙已毁，也没有城堡。穆喀达思称这里生长着大片的枣树。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可疾云尼说该城附近的一座山上有个叫易剌洼（Īrāvah）的村庄，这里有座漂亮的城堡和有很多树木的果园，因该地附近有很多溪流。穆思套菲提到了塔八辛·麻思南城，并说在干旱季节，城区的供水可维持70天，城外的地区只能维持7天。他称这里有一个坑或井，其底部的土有剧毒，如果有人意外误食了哪怕是谷粒大小的毒土，就会立即死去，因此这口水井被精心地封盖着。这里另外有一个坑或井，在冬季将所有水流“吞噬”掉，但在夏季却源源不断地冒出水来，足以灌溉周边的所有土地；还有第三口井，他说如有人往井里观看，自己的形象就会变成鱼的样子。塔八辛·麻思南城这个特别名称使用至今，该城仍是要地，也称作逊尼·哈纳（Sunnī-Khānah，即逊尼派之

屋），因现在这里差不多所有的居民是阿富汗逊尼派信徒。枣树塔八辛城南约60英里就是都鲁（Duruh）村，附近的山顶上有座古城堡。显然，早期地理学家没有提到都鲁村，穆思套菲第一次提到该村，并说喀剌·都鲁（Kal`ah Duruh）城堡很坚固，在城堡旁边流出一股泉水。城堡周边种植着大量的枣树和粮食，但葡萄和其他水果不多。

苦黑思田地区的产品极少。穆喀达思只是简略地说这些高原地区以编织地毯和礼拜用的小毯而有名，也以产类似你沙不儿城的白布而闻名。[54]

对有关穿越苦黑思田地区的道路在后面的章节中与经过呼罗珊地区的道路一并加以考察，会更合适一些。穆喀达思和其他著述者记载了苦黑思田地区各城市间的总里程和每天的行程，但没有记载各站点之间的里程；很显然没有几条道路直接穿过这个多山地区。

[1] 《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40页载："呼罗珊的苦黑思田地区有哈因（Kāīn）城、答失忒·必牙（Desht-i-Biāz）城、必儿建（Birjend）城、塔八辛·麻思纳（Tabas Masīnā）城，以及其他城市和地方。"译者。

[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3、27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4、32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1页。裕尔译编《马可波罗游记》（*Marco Polo*），第1卷，第87、131页。这个名称被阿拉伯人拼写为苦黑思田（带点的Kūhistān），波斯人拼写为苦黑思田（Kūhistān），此处Kūh意为"山"，但名称中的第一个元音不像通常那样写为短音（Kuhistān，或Kuhistān）。

[3]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3页提到了哈因城，并称其是"苦黑思田地区的首府，城周边是护城河（*khandaq*），有一座内城堡（*quhandiz*）和聚礼清真寺（*mazgit-i jāmi`*）。总督府（saray-i sultān）位于内城堡。这里属于冷区。"今为加延（Qāyan），是南呼罗珊省加延州首府，人口3.2万。这里是去往内沙布尔、里海沿岸、比尔詹德等地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古镇。这里以产藏红花闻名于世，因此也被称作藏红花城。译者。

[4]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马可波罗行纪》第39章第64页载，秃讷哈因"境内有环以城墙之城村不少"。"城村百物丰饶，缘其地气候适宜，不甚热，亦不甚寒。"译者。

[5] 屏风（Maksūrah）是指清真寺里介于壁龛（mihrab，是礼拜时的领拜人依麻木所处位置）与演讲台（minbar）之间的一道木质的隔离屏，上面雕刻有各种花饰，其目的是防止参加礼拜的哈里发，或重要人物被人行刺。译者。

[6] 今为费尔道斯，但1929年前称屯（Tūn）城。现在的费尔道斯城是南呼罗珊省费尔道斯州州府，人口5.9万，是古今道路上的重镇。译者。

[7] 这里指的中国城，不一定是指中国内地的城市，这一点从本书使用的阿拉伯文献与其他阿拉伯文献中可明确看出。译者。

[8] 巴扎（Bāzār），即集贸市场，或商业街市。译者。

[9]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4、32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21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9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4页。在哈因（Kāyin）城的清真寺里有一块石碑，碑刻时间是伊斯兰历796年（1394年）。见戈尔德斯米德（F. Goldsmid）爵士《波斯东部》（*Eastern Persia*），第1卷，第341页。

[10] 土儿失兹（Turshīz）地区存在至今，但这个地区没有一座城市叫这个名称。昆都尔小城至今还标在地图上，据伊斯塔赫里记载，土儿失兹城位于该小城西1程之地，那么土儿失兹城的位置应在费鲁札八（Fīrūzābād）城遗址附近，这里距现在的阿卜杜拉巴德（`Abdulābād）村不远。不管怎么说，中世纪的土儿失兹城不是算端纳八（Sultānābād）城，这座城市是土儿失兹地区的现代首府，其位置在昆都尔城的东边［按：《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3页提到了土儿失兹、昆都尔等地，译者］。

[11] 见《圣武亲征录》，《北使记》作没里奚；《西使记》作木乃奚。阿拉伯语意为"迷途者"、"受到真主指责的"或"不纯洁的"，即旁门左道或异端邪徒。我国史籍将以波斯阿剌模忒城堡为中心建立的王朝称为"木剌夷国"，该国长期对周边的王国进行侵扰，并对其统治者或高级官员进行暗杀活动，制造了恐慌；1256年被旭烈兀所灭，

教徒分散到各地，相关内容可参考约瑟夫·哈默尔·普尔斯塔尔（Joseph Hammer-Purgstall）著，伍德（O. C. Wood）译的《暗杀派史》（*The history of Assasins*，New York：Burt Franklin，1835，1968）、皮特·威利（Peter Willey）著的《暗杀派的城堡》（*The Castales of Assasins*，London：George G. Harrap & Co. LTD，1963）。译者。

[12] 阿乞失噶（Atishgāh），Atish意为“火”，Atishgāh意为“火坛”，即指祆教祠。译者。

[13]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95、29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7、31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628页；第3卷，第534页；第4卷，第30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3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44页。伊本·阿喜儿，第10卷，第445页。“山中老人”现在的代表就是阿加汗（Akā Khān，得到英国法庭的认可），他是孟买霍加（Khūjah）（按：也写为Khwājah，在我国文献中音译为“火者”、“虎者”、“华者”或“和卓”等，意为“显贵”、“圣裔”、“教主”或“主人”等，译者）教团的首领，而且令人惊奇的是亦思马因派的信徒至今活动于苦黑思田地区，和其先辈给阿剌模忒要塞首领缴纳十一税一样，他们现在给阿加汗（按：他所领导的就是1256年波斯亦思马因派的要塞被攻破后迁移印度孟买等地，被称为阿加汗派或霍加派的信徒，其每代教主均冠以“阿加汗”的称号，意为“汗先生”，或因该派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及阿里的嫡派血脉，而称霍加派，即自认为是圣裔派，今天该派在印度经济界等有广泛影响，并成立了阿加汗基金会，专门资助伊斯兰学，尤其是什叶派方面的研究。译者）缴纳十一税。在哈因城南的斯赫迪赫（Sihdih）村，赛克斯上校（《波斯万里行记》，第409页）发现了差不多1000家亦思马因派的现代信徒，他们每年将大量的宗教税金交给印度的首领。见裕尔译编《马可波罗游记》（*Marco Polo*），第1卷，第145页。

[14] 今为卡什马尔（Kāshmar），是中等城市，即土儿失兹城。译者。

[15] Guebre是穆斯林对祆教徒的称呼。译者。

[16] 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3页。Turner Macan编《列王纪》，第4卷，第1067页，第8行下。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97页，此处这个名称被错印为吉失麻（Kishm）。可疾云尼（13世纪）的记述当然只是传说而已。在塔巴里（Tabarī）的编年史或早期的阿拉伯编年史中始终没有对吉失麻儿柏树的记载。有关该方面的丰富内容见于《答比斯坦》（*Dabistān*）一书，这是一部16世纪的著作（Shea和Troyer译，第1卷，第306～309页）。琐罗亚斯德的柏树据计算有1450年。这可能是根据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记载："'太阳树'（`Arbe Sol）就是我们基督教徒所称的'枯树'（Arbre Sec）。"见裕尔译编《马可波罗游记》（*Marco Polo*），第1卷，第131页。

[17] 札洼（Zāvah）城，19世纪以后苏非圣徒海答儿（Haydar）将其改名为托尔巴特海达里耶（Torbat-e Heydarīyeh）城，是中部呼罗珊省与之同名的州的州府，人口11.9万，是去往内沙布尔、赫拉特、亚兹德、克尔曼、德黑兰等地的要道，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通衢。译者。

[18]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770、910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56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7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

（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8页。戈尔德斯米德（F. Goldsmid）爵士：《波斯东部》（*Eastern Persia*），第1卷，第353页。

[19] 失哈卜丁·阿合马·贾米（Shihābad-Dīn Ahmadal-Jāmī，1048～1141年）是苏非派教义学家、诗人，他早年学习苏非派知识，并在托尔巴特贾姆（Torbat-e Jām）城附近的山上苦修18年来研读《古兰经》以及宗教方面的学问，40岁开始著书立说，其足迹遍及呼罗珊地区，1141年在朝觐归途中去世，后葬在托尔巴特贾姆城的一座道堂（Khanaqah）中，至今这里仍是众多信徒的朝谒之地。译者。

[20] 今为托尔巴特贾姆（Torbat-e Jām或Torbat-e Sheykh Jām）城，是中呼罗珊省托尔巴特贾姆州的州府，人口8.3万，是通往内沙布尔、赫拉特等地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古镇。译者。

[21]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4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1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7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9、32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56页；第2卷，第909页；第3卷，第89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8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75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

（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211、229页。亚特（C. E. Yate）：《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37页。

[22] 今为哈里河（Harī Rūd），全长1100公里，发源于阿富汗中部的兴都库什山余脉，向西流，接纳了很多支流，经过赫拉特城，沿着阿富汗与伊朗边界，流入土库曼斯坦境内，消失在卡拉库姆沙漠中。此河在进入土库曼斯坦以后被称作捷詹（Tejen或Tedzhen）河。其河谷地带是阿富汗、伊朗、土库曼斯坦等国的重要农业区，也是重要的交通通道。古丝绸之路的干道经过此地。阿富汗90%的藏红花产自赫拉特附近的哈里河沿岸。译者。

[23] 今为新沙赫尔（Nawshahr）或巴哈尔兹（Bākharz），不称麻临（Mālin或Mālān）城。巴哈尔兹城是中呼罗珊省巴哈尔兹州首府，人口6800，是去往内沙布尔、赫拉特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24]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58页；第2卷，第145页；第4卷，第39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7页。

[25] 今称哈夫（Khāf，Khvāf，Qaşabeh-ye Rūd），是中呼罗珊省哈夫州首府，人口2.1万，是去往内沙布尔、赫拉特等地的要道。译者。

[26] 今为萨拉米（Salāmī，Salāmey，Salmān），位于哈夫城西北，是中呼罗珊省哈夫州萨拉米区区府，人口6000，是去往内沙布尔的要道。译者。

[27] 今为桑甘（Sangān，Sangān-e Pā’īn），位于哈夫城东南，是中呼罗珊省哈夫州桑甘区区府，人口8700，是去往内沙布尔、赫拉特等地的要道。译者。

[28] 今为哈尔吉尔德（Khargerd），位于哈夫城东南约5公里处，是中呼罗珊省哈夫州中心区的乡镇，是去往内沙布尔、赫拉特等地的通道。译者。

[29]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4页提到了法儿基城，并称其“是座小城，放牧有牛羊”。今此城名已不存。译者。

[30] 今此城名不存，但从位置来判断，应该在今泰耶巴德（Tāybād）。今此城是中呼罗珊省泰耶巴德州的州府，人口4.6万，是去往赫拉特和内沙布尔的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31] 今此城名已不存，位置应在今古里安（Ghūrīān或 Ghoryan）城附近。古里安人口5.4万。这里是古今交通要道，向东可达赫拉特，向西达伊朗诸地、土库曼斯坦。译者。

[32] 今此城名不存，应距哈夫城不远。译者。

[33] 今为一个叫莱（Lai）的小镇，位于距哈夫城西2公里的主干道上。译者。

[34] 此城今已毁，其址在哈夫州居勒格赫祖赞（Jolgeh Zūzan）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曾是丝路要道。译者。

[3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6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3、319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1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7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8、308、319、32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486、958页；第3卷，第910页；第4卷，第34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8页。关于这些地方的现状，参见亚特《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128、129页。

[36] 今为兹尔库赫（Zīrkūh），即今南呼罗珊省兹尔库赫州，2012年自加延州析出。译者。

[37] 今为沙赫拉赫特（Shāhrakht），是南呼罗珊省兹尔库赫州中心区下属的一个村镇，人口2000，是去往加延的通道。译者。

[38] 今为伊斯法德（Esfād或Esfād-e Jadīd），是兹尔库赫州中心区沙斯库赫（Shaskuh）乡的一个村，人口600。是去往哈夫城的通道。译者。

[39] 今为阿斯腾德（Astand-e Jadīd，Astand，Estend 或 Istind），是兹尔库赫州中心区沙斯库赫（Shaskuh）乡的一个村，人口960。在伊斯法德村西北的主道上。译者。

[40] 今天这个地区名成为赫兹尔·达什特·比亚兹（Khezrī Dasht Beyāz）城城名的一部分。译者。

[41] 今此城名不存，从方位来判断，应在赫兹尔·达什特·比亚兹城附近。这个城曾是连接屯城和哈因城的要道。译者。

[42] Yaylāk是一个突厥语词，词根Yay意为“放牧”，Yaylāk应是夏牧场、草原等，与Qis（h）li（a）q（即冬牧场）是对应的。译者。

[43] 今为古纳巴德（Gonābād，先前称Janābaz），是中呼罗珊省古纳巴德州的州府，人口3.6万，是古今道路上的重镇，可通往马什哈德、比尔詹德、加延等。译者。

[44] 见《圣武亲征录》。今为巴杰斯坦（Bajestān），是中呼罗珊省巴志斯坦州的州府，该州是2004年自古纳巴德州析出的，这里产藏红花、石榴。该城发展迅速，人口1.1万，是古今道路上的重镇，可以通往费尔道斯、古纳巴德、萨卜泽瓦尔等。译者。

[45] 答失忒·必牙或答失忒·皮亚兹是一个由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合成的名称，在波斯语的命名方式中极为罕见。如果后一个词确实是阿拉伯语必牙（Biyād），那么波斯人可能很快忘记了其“白色”的含义，继而将它用为专有名称。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9、320、32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3、18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97页；第2卷，第120页；第4卷，第206页。法里思现在一般称作“旧城堡”（Kal`ah Kuhnah）。贝柳（H. W. Bellew）：《从印度到底格里斯河》（*From the Indus to theTigris*），第329页。

[46]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3页将椰枣塔八辛城记载为塔八辛因城，并载："这座城市在热区。这里的水取自坎儿井（Kārīz）。城位于沙漠的边缘。"这座城就是前文注释的塔巴斯城。译者。

[47] 巴拉祖里，第40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4、32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21、322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9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513、514页；第4卷，第33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3、184页。伊本·阿喜儿，第10卷，第221页。

[48]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52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31、23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95页。

[49]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3页提到了苦里城，并称该地"产棉布"（karbās）。译者。

[50]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3页提到忽儿（Khūr）城和忽思卜（Khusb，即郝思，引者）城，并载："两座城位于沙漠的边缘。两城的水取自地下水道（即坎儿井，引者）。这里居民的主要财富是牛。"译者。

[51] 巴拉祖里，第403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32、27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

《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91、32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21、32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52页；第4卷，第23、270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94页。

[52] 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8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4页。赛克斯：《波斯万里行记》，第305、306页。赛克斯上校将这个名称拼写为沙赫斤（Shahkin），并说在此地附近有一座古城堡，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被暗杀派占领的城堡。

[53]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3页载：“塔八辛·麻思南（Tabas Masīnān）城位于山脉和沙漠之间，是一处惬意之地。”今为塔巴斯·玛斯纳（Tabas Masīnā），是南呼罗珊省达尔米安（Darmian）州的一座城市，人口3700，是该省中部的要道，可以通往比尔詹德、加延等。译者。

[54]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21、32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513、514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0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

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4页。赛克斯：《波斯万里行记》，第396、397页。

第二十六章 苦密思（Kūmis）、陀拔思单（Tabaristān）和朱里章（Jurjān）等地区

苦密思（Kūmis）地区。担寒（Dāmghān）城。必思坦（Bistām）城。必牙儿（Biyār）城。西模娘（Samnān）城和胡瓦耳（Khuvār）城。经苦密思地区的呼罗珊道。陀拔思单（Tabaristān）或杩咱答儿（Māzandarān）地区。阿模里（Amul）城。撒里牙（Sāriyah）城。秃马温（Damāvand）山和法都思般（Fādūsbān）、喀林（Kārin）、鲁班吉（Rūbanj）等地区。费鲁兹苦合（Fīrūzkūh）城和其他城堡。纳乞儿（Nātil）城、萨鲁思（Sālūs）城和鲁养（Rūyān）地区。塔可（Tāk）城堡和鲁思坦答儿（Rustamdār）地区。麻木乞儿（Mamtir）城和塔密萨（Tamisah）城。苦八·贾麻（Kabūd Jamah）地区与尼木·木儿丹（Nīm Murdān）湾。古儿干（Gurgān）或朱里章（Jurjān）地区。朱里章（Jurjān）河与阿塔剌（Atrak）河。朱里章（Jurjan）城与阿思塔剌八（Astarābād）城。阿八思昆（Abaskūn）港。的希思丹（Dihistān）地区与阿忽儿（Akhur）城。经陀拔思单地区与朱里章地区的诸道。

苦密思是个小地区，其沿着后文要述及的阿勒不儿兹（Alburz）山脉的山麓延伸，该地区北与该山脉连接，因此，山麓地带与南边的“大沙漠”之间形成了一个狭长的肥沃地区。呼罗珊道穿过该地区，其起自吉八儿地区的剌夷城，到呼罗珊的你沙不儿城，因此可以说苦密思地区的主要城市是沿着这条道路分布的。现在，苦密思之名已废弃不用。这个地区的绝大部分包括在现代的呼罗珊地区，它的最西端为剌夷（Ray）城或现代德黑兰城的周边地区。[1]

苦密思地区的首府为担寒（Dāmghān）城，阿拉伯人写为阿担寒（Ad-Dāmghān）城，但按他们的习惯用法，也称作苦密思（麦地那·苦密思，Madīnah Kūmis，原文如此），即苦密思城，这就是说其首府名显然取自地区之名。据伊本·豪喀尔记载，担寒是个缺水的地方，因此这里耕地很少，但居民纺织有大量外销的优质布料。穆喀达思说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末担寒城大部分已毁，但城墙保存完好，有三座城门，他提到了其中两座城门的名称：八卜·剌夷（Bāb-ar-Ray）门与八卜·

呼罗珊（Bāb Khurāsān）门。他说这里有上、下两个市场，还有位于主大街上的一座漂亮的聚礼清真寺，这里的蓄水池“像马鲁（Marv）城”的一样。后来的所有文献均称这是座常刮大风的城市。亚库特和其他著述者说风从邻近的山谷中不停地刮来，因此担寒城的树木总是摇曳不定。城里有座高大的建筑（即水利设施，译者），其可追溯到萨珊王时代，这座建筑将流到担寒城的河水引入用来灌溉的120道水渠。城里的果园中产优质的梨。据穆思套菲记载，担寒城的城墙周长有10000步。亚库特称在距担寒城有1天路程（穆思套菲记载为3里格）的山上，有吉儿都怯（Gird-Kūh）大城堡[2]，这座从城里就可看到的城堡曾是“暗杀”派的著名城堡。穆思套菲将该堡记为底兹·拱北（Diz Gunbaddān，即穹顶）堡，其附近地区称作满速剌八（Mansūrabad），非常富庶。穆思套菲还提到了山脉中的一座金矿，其位于担寒城附近的苦合·札儿（Kūh Zar）山，即金山里，但具体方位在文献中没有记载。[3]

苦密思地区的第二大城市为必思坦（Bistām），或八思坦（Bastām）城，即现在的巴斯塔姆（Bustām）城[4]，伊本·豪喀尔说这座城位于该地区最肥沃之地。该城所在地方的果园里大量产水果，穆喀达思说城里有座恢宏的聚礼清真寺，“像城堡一样”矗立于市场内。伊斯兰历438年（1046年），纳思儿·忽思罗访问该城，他显然将其看作是这一地区的首府，因他将这座城市称为苦密思（Kūmis）城。他还提到了这里著名的大苏非（Sūfi）谢合·阿卜·雅兹底（Shaykh Abu Yazīd）的陵墓，此人一般被称作雅兹底·必思密（Bayazīd Bistāmī），于伊斯兰历260年（874年）去世后埋葬于必思坦城，他的陵墓直到今天还受到人们的朝谒。亚库特从自己的亲历出发，盛赞了必思坦城的苹果，并说在邻近的山上有座带城墙的大城堡，据称这是从萨珊王朝时期保留下来的，由沙普儿·祖·阿可塔夫（Shāpūr Dhū-l-Aktāf，即Sapor II）修建。亚库特也提到了该城的市场及其一派繁华的景象，至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证实了这一记载，他也提到了前文那位苏非圣徒的陵墓。[5]

距必思坦城4里格，在去往阿思塔剌八（Astarābād）城[6]的道路上有忽儿干（Khurkān）城[7]，在伊斯兰历7、8世纪（13、14世纪），该城是个相当重要的地方。穆思套菲说该地是一个村庄，气候宜人、供水充足，这里以当地圣徒阿卜·哈散·哈儿卡尼（Abu-l-Hansan Kharkānī）[8]的陵墓而闻名。距必思坦城东南约50英里，在“大沙漠”边缘有必牙儿（Biyār，即井）小城，现在称作比亚尔朱满德（Biyārjumand）城[9]。

据穆喀达思记载，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是座小城，没有聚礼清真寺，却有一座城堡，还有很好的市场，周边的土地肥沃，产葡萄和其他水果。这里有很多骆驼和羊。在城堡内有座“五时”拜[10]的小寺，该城有城墙，其有三座城门为铁门，还有一座单独的城门直通城堡内。穆思套菲盛赞这里气候宜人、粮食质优。约在担寒城与剌夷城中间就是呼罗珊道上的西模娘（Samnān，或 Simnān）城[11]，穆喀达思称该城有座漂亮的聚礼清真寺，位于市场内，城内有很多大储水池。穆思套菲提到了西模娘城有名的阿月浑子（开心果），以及盛产的各种水果。穆思套菲还提到了阿忽万（Ahūwān）小城，其位于西模娘城和担寒城之间，这里以有几位圣徒的陵墓而有名，该城附近盛产粮食和水果。[12]

苦密思地区最西边，剌夷城以东第一个重镇就是胡瓦耳（Khuvār）城[13]，该城也在呼罗珊道上，阿拉伯人则写为胡瓦耳（Al-Khuwār），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称这是座惬意的小城，城区直径距离有1/4英里，很繁华，发源于秃马温（Damāvand）山[14]的多条河流流经该城所在的地区。他还说胡瓦耳城是全苦密思地区最寒冷的地方，但这里的土地异常肥沃。可疾云尼说该地盛产棉花，以供外销；据穆思套菲记载，这里以产谷物和谷子（Shaltuk）而闻名。为了与法儿思地区的同名城市（见原文第279页）相区别，这座城市通常被称作胡瓦耳·剌夷（Khuvār-i-Ray），在记载帖木儿武功活动的文献中提到了后一种名称。穆思套菲还说胡瓦耳城在波斯语中也称作麻哈剌·八吉（Mahallah-i-Bāgh，即花园之地）。

在苦密思地区所产的产品中，穆喀达思提到了一种用来制作手帕的极特别的棉花。这种著名的手帕（*Mandīl*）尺幅有大有小，纺织的款式或平纹，或罗纹，边角五颜六色，做得极其精巧，每块手帕可值2000底儿罕（约80英镑）。苦密思地区也产用来制作长袍的毛料布和叫泰剌散（taylasān）的面纱。[15]

据文献记载可知，呼罗珊道贯穿苦密思地区，这条道路在所有道里志（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到穆思套菲）中均有记载。其从剌夷城起程，经三站到达胡瓦耳城，过了该地后的第一站是喀思儿，或喀里牙·密儿合（Kasr或Karīyat-al-Milh，即盐堡或盐村），据穆思套菲记载，用波斯语称作底合·纳麻（Dih Namak），该地至今还用后一种名称来称呼。道里志中均记载，第二站就是剌思·喀儿卜（Rās-al-Kalb，即犬头），该名在现在的地图上已无法查到，但其位置应在陌生的剌思吉儿（Lāsgird，

该地名在中世纪的所有文献中均没有记载）城堡所在地，现在该堡位于一处可以瞭望沙漠荒野的绝壁上。西模娘城距该堡有一天之程，再向东一程就是担寒（早期道里志中称作苦密思）城。过了担寒城一程为哈答达（Al-Haddādah，意为“铸造”）城[16]，穆思套菲将其记为密满·朵思（Mihmān-Dūst，即客人朋友）城。从这里（东）行一天之程就到达必思坦城，或继续从南边沿支道到达驿站，该地离那座城（哈答达城）有2里格，这里的村庄被称作八哈失（Badhash）村，至今是去往呼罗珊地区你沙不儿城的邮道要经过的地方。穆喀达思还记载了从必思坦城到必牙儿城的道路，其有3天的路程，过必牙儿城后，道路越过沙漠向西反方向行进25里格就可到担寒城。[17]

陀拔思单（*Tabaristān*）或杩咱答儿（*Māzandarān*）地区

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称这个高山地区为陀拔思单（Tabaristān），这里的绝大部分地区位于今天称作阿勒不儿兹（Alburz）山[18]的地区，该山沿着里海南岸一直到苦密思地区的东边和北边。塔巴儿（Tabar）在当地语言中意为“山”，因此陀拔思单的含义应是“山地”。

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约在蒙古西征时期，陀拔思单之名似乎已废弃不用了，而是改用杩咱答儿（Māzandarān）[19]之名，自此通常用后一名称来称呼这一地区。杩咱答儿地区有时包括了邻近的朱里章（Jurjān）地区。亚库特是第一位提到杩咱答儿之名的著述者，并说他不知道这一名称是何时开始使用的；尽管杩咱答儿这种叫法没有在更早的文献中查到，但看来在他（亚库特）生活的时代，该名是这一广大地区普遍通行的叫法。实际上陀拔思单[20]和杩咱答儿是同义词，但起初前一名称主要指高海拔的山区；后一名称则仅指低海拔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带从萨费·鲁德（Safīd Rūd）河三角洲地区一直延伸到里海东南角的海岸，由此可知，杩咱答儿最初显然是指这里的低地地区，后来又包括了山区。今天陀拔思单之名已废弃不用了。

从政治上说，在哈里发王朝统治的早期这个地区并不显要，实际上这里是萨珊王朝故地中最后接受伊斯兰教的地区。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其他地区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当地的统治者（称作亦思帕八·陀拔思单Ispahbad-i-Tabaristān）割据于山区的城堡要塞，直到伊斯兰历2世纪（8世纪）中叶，他们制造的钱币上仍铸有钵罗婆（Pahlavi，即巴列维）先贤像，且袄教（Zoroastrian Faith）是山地森林地区的主流信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穆喀达思记载，该地区的主要产品有大蒜、稻谷、亚麻、水禽和鱼；不像波斯其他地区，这里雨量充沛[21]。再后来，可疾云尼称此地养蚕业很发达，产大量的丝绸供外销。这里也大量产毛料、地毯、面纱、手帕、布匹和用木材加工的各种木制品，尤其产木箱与称作哈兰吉（Khalanj）的木材，用这种木材可制造箭镞、碗和其他用品[22]。陀拔思单地区的房屋是用木料和芦苇建成的，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里冬夏雨水很多。因此，房屋屋顶均建成了穹顶[23]。

阿拔斯王朝统治后期，陀拔思单地区的首府是阿模里（Āmul）城[24]，但在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塔西儿（Tāhir）割据王朝的总督一般居住于撒里牙（Sāriyah）城。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在他那个时代阿模里城的规模比可疾云城要大，而且很繁华。穆喀达思记述说这座城有一家医院（Bīmarstān）和两座聚礼清真寺：其中的老寺位于市场旁的树林中，新寺靠近城墙。每座清真寺都有一个大门廊。阿模里城的商人经营多种贸易。城周边盛产稻谷，一条穿城而过的大河灌溉着这里的土地。亚库特没有补充关于该城的新材料，但穆思套菲称这里气候炎热潮湿，并说当地盛产椰枣、葡萄、核桃、柑橘、柚子和柠檬等，该城制造的香精也十分有名。阿模里（Āmul）港位于一条流入里海的河流的岸边，在一座叫阿因·忽木（`Ayn-al-Humm）的小城内，亚库特称该城为阿合鲁迷（Ahlum），并说城并不大。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洗劫了阿模里城，并摧毁了麻哈纳·萨儿（Māhānah Sār）城[25]的三座城堡，这里距海滨城市阿模里城有4里格。

陀拔思单地区以前的首府，也是第二座大城，为撒里牙城，现在称作萨里（Sārī）城[26]，位于阿模里城的东边。据穆喀达思记载，撒里牙城是座繁华的城市，这里盛产棉布，城里的市场很有名。该城有座带壕沟的城堡，还有座聚礼清真寺，寺里生长着一棵漂亮的柑橘树，该城某座桥的桥边有棵巨大的无花果树。这里的浮桥很有名。但后来的文献对撒里牙城几乎没有多少记载；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蒙古西征时期，此城饱经劫难，穆思套菲称当时尽管这里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但该地盛产葡萄，有大量的粮食出产，养蚕并产丝绸。[27]

高耸的秃马温（Damāvand）山脉[28]贯穿于整个陀拔思单地区，其皑皑雪峰从100英里外的波斯平原和更远的德黑兰南部就可以望到；穆思套菲甚至说从100里格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其山峰，他还说其山峰上一年四季均覆盖着雪。在波斯传说中，敦八万（Dunbāvand，即文献中此山脉的早期写法）山是思儿木儿吉（Sīrmurgh，波斯人所说的凤凰）的故土，这是一种传说中的鸟，曾哺育和保护了鲁思坦的父亲札儿（Zāl），穆思套菲记述称很多爱情故事与这位民族英雄鲁思坦有关。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座高大的山从撒瓦（Sāvah）城就可以看到，它“像个穹顶矗立于高山峻岭之间”，他认为无人能登上其山峰，还说总是可以看到山中冒出的烟云。祆教徒常提到这座山，很多传说故事里也提到该山，特别是有关古代波斯暴君祖哈（Ad-Duhhāk，或Zuhāk）[29]居住在该山深处的传说故事。

秃马温之名既指该山南麓的一座小城，也指山脉两侧分布的广阔肥沃地区，穆思套菲则称其为皮失养（Pishyān）。这个地区的首府为威麻（Wīmah）城，邻近首府的城市为沙兰八合（Shalanbah）城，据伊本·豪喀尔记载，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些城市周边以种植粮食和分布着葡萄园而闻名。亚库特曾到过威麻（Wīmah，或Waymah）城[30]，但发现当时该城已成为废墟，并说从这里可以看到费鲁兹苦合（Fīrūzkūh）城堡。他也访问了这座城堡，穆思套菲称一条发源于城堡附近的河流流经苦密思地区的胡瓦耳·剌夷城，而后流到平原地区。费鲁兹苦合城堡是杩咱答儿地区的城堡之一，据记载，其曾被帖木儿围攻并占领。另一座与该堡齐名的城堡是秃马温山斜坡上的兀思土纳万（Ustūnāvand或Ustunābād）城堡，可疾云尼称这座城堡直到伊斯兰历613年（1216年）才被蒙古人攻占，之前的3000年里没有被攻破过[31]。亚库特说这座城堡也称作贾儿忽（Jarhud）堡，距剌夷城有10里格，并称此堡是该地区古代袄教徒统治者亦思帕八（Ispahbad）[32]的据点。他还说这里最后的袄教徒统治者是被八儿麻可家族的哈合牙（Yahyā）推翻的，他将这一波斯统治者的女儿们囚禁后带到报达城，并将其中一位叫八合里雅（Bahriyyah）的女孩嫁给哈里发满速儿，她就是马赫迪的母亲，马赫迪则是诃论·剌失德之父。后来，伊斯兰历350年（961年）白益王朝君主法赫儿·道剌（Fakhr-ad-Dawlah）重修了这座大城堡，而后其落入“暗杀”派的手中。[33]

中世纪地理学家提到了陀拔思单地区的很多城堡和城市[34]，但在地图上已无法查到，这些地方要么毁于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的蒙古西征，要么毁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征服杩咱答儿地区的活动。这些毁灭的城市和城堡的名称没有出现于道里志中，也就不可能在地图上标出来了，甚至大致的方位也无从得知。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记载了森林密布、土地肥沃的三个山区，其距撒里牙城南约有一天的路程，向西一直到岐兰地区的低廉（Daylam）边界。其中的第一个地区为贾八儿·法都思般（Jabal Fādūsbān），或山区的八都思般（Bādūsbān，为波斯语书写形式），其是以统治该地区的家族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半独立的政权统治该地区近800年，即从穆斯林征服初期到蒙古西征时代。整个山区有很多村庄，其中最大的村庄叫喀里牙·满速儿（Kariyat Mansūr）村，另一个村庄就是上下兀兰·哈思（Uram Khāst），或兀兰·哈思塔（Uram Khāstah）村，这些村庄距撒里牙城有一天的路程，但整个山区没有一座建有聚礼清真寺的大城市。

毗邻法都思般（Fādūsbān）地区的是叫贾八儿·喀林（Jabal Kārin）[35]的山区，其是以喀林（Kārin）家族的名字命名的，据说这个家族是安息（Parthian）人的始祖；不管怎么说，喀林家族的显赫名称出现于萨珊王朝的历史中，在穆斯林时代，这一家族统治着该地区。从萨珊王朝时代起，喀林家族占据的大要塞就位于费临（Firrim）城附近，但该地区人口主要集中于思合麻儿（Sihmār，或Shihmār）城[36]，城里有全区仅有的一座聚礼清真寺。很可惜道里志中没有确切记载费临城的位置。亚库特曾提到过该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的穆思套菲也提到该城，并说其靠近苦密思地区的边界。第三个山区就是贾八儿·鲁班吉（Jabal-ar-Rūbanj）地区，位于剌夷城北边，因而最靠近低廉边界。文献没有记载这个山区的城市或村庄，但据说这里土地异常肥沃，灌溉便利，山坡上有高大的树木和密布的灌木丛。[37]

阿模里城往西1天路程，或5里格，接近里海海岸的平原上就是纳乞儿（Nātil）或纳乞剌（Nātilah）城[38]，该城往西约1程就是萨鲁思（Sālūs），或沙鲁思（Shālūs）城，据穆喀达思记载，该城有座石建的城堡，城堡附近有座聚礼清真寺。这座城市的名称也拼写为萨鲁失（Sālūsh），靠近该城的另外两座城为喀必剌（Al-Kabīrah）城与喀贾（Kajjah）城。在关于帖木儿武功活动的记载中，沙鲁思被拼写为贾鲁思（Jālūs）[39]，显然，该地区全境及南边之地，即鲁养（Rūyān）与鲁思坦答儿（Rustamdār）所在的山区，在帖木儿征服的战争中已被永久地毁灭。[40]

喀剌儿（Kalār）城[41]距沙鲁思城有1程，但位于山区，从喀剌儿城经1天的路程就可到低廉边界，亚库特认为该城应是上文提到的喀贾城。这些城市的名称有些混淆，但如果喀剌儿、喀贾和鲁养等城不是同一座城市，那么显然其应是邻近的城市，鲁养也是陀拔思单地区西部山区中一个大区的名称。阿布·勒·费达说鲁养城[42]也称作沙里思田（Shāristān）城，并称该城位于距可疾云城16里格的山上。据亚库特记载，鲁养城是陀拔思单山区的首府，这就如同阿模里城是低地平原地区的首府一样；该城建筑优美，其果园以丰产而闻名。鲁养（或喀剌儿）城附近为萨亦答八（Sa`īdābād）小城[43]。

低廉边境附近的塔可（Tāk，即拱形）大城堡和哈里发满速儿时期被打败的陀拔思单地区统治者亦思帕八的最后栖身地肯定位于鲁养地区。亚库特和可疾云尼引用了较早的文献，并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这一

地区。塔可城堡应是一座坚固的城堡，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就已存在。这座城堡修建在高山之上，（据说）只能通过一条穿过周围山崖的长1英里的隧道到达堡内。这条隧道通向一个开阔山谷中，山谷周边是有很多山洞的绝壁，其中的一个洞穴里流出一大股泉水，流了很短的距离后，又消失于附近的另一个山洞里。亚库特详细记述了该地的奇观。

大沙·鲁得河（Shāh Rūd，是萨费·鲁德河的东边支流，见原文第170页）的源头在鲁思坦答儿地区，据穆思套菲记载，该地区有近300个村庄，沙·鲁得河的很多支流流经该地，因而其应位于可疾云城与阿模里城之间的鲁养地区之东。如前文（第十四章第221页）所述，沙·鲁得河岸边有亦思马因或“暗杀”派的很多大城堡，喀兰（Kalām）城堡可能也在鲁思坦答儿地区，据亚库特记载，这是陀拔思单地区的一座古城堡，其控制在“暗杀”派手中，后被塞尔柱王朝灭里·沙之子算端木哈马（Muhammad）摧毁。[44]

阿模里城东2里格，在里海海滨道路上就是密剌（Mīlah）城[45]，过该城3里格是八儿吉（Barjī）城[46]，这里距撒里牙城有1程。麻木乞儿（Māmtīr，或Māmatīr）城[47]距阿模里城和撒里牙城各有1程，距里海岸边有6里格，该城应是后来的八儿法儿鲁失（Bārfarūsh）城。亚库特说该城有座聚礼清真寺，其附近的土地极其肥沃。撒里牙城附近，可能在该城以东有个很秀美的地区，这里有座叫纳密牙（Nāmiyah，或Nāmishah）的城市[48]，该城距撒里牙城20里格，距撒里牙城10里格就是密合剌万（Mihrawān）城[49]，这里有座聚礼清真寺，有1000人的军队驻防，但这两座城市的确切位置无法确定。陀拔思单地区东界，距撒里牙城3程，在到阿思塔剌八（Astarābād）城还有1程的道路上有塔米设（Tamīs），或塔密萨（Tamīsah）城[50]，其位于穿越沼泽的堤道上，据亚库特记载，这条堤道是公正的阿奴失儿万国王为承载道路而修建的。[51]

里海的东南角就是阿舒剌答（Ashurādah）湾，至今还这样称呼，这里有一个长条状的沙漠向东伸展，差不多到朱里章（里海）海滨。穆思套菲将这个湾和其所属岛屿或半岛记为尼木·木儿丹（Nīm Murdān）。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这里人口稠密，还有一个供来自里海沿岸各地的船只停泊的港口。该港距阿思塔剌八城仅有3里格，离此城不远就是一座叫沙合剌八（Shahrābād）的贸易活跃的城市。该城附近的地区称作喀卜·贾麻（Kabūd Jāmah），这里产大量的丝绸，还

盛产粮食，分布着葡萄园。这是个十分富庶的地区，但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经过帖木儿的征服战争后，完全被摧毁。文献中在记载帖木儿经过杩咱答儿地区的行军活动时，提到了鲁阿（Rū`ad）或鲁噶（Rūghad）城，其可能在喀卜·贾麻地区。穆思套菲说这是座中型城市，该城周长为4000步，位于大片肥沃土地的中央，这里除了盛产各种水果外，还种植有大量的粮食和棉花。

陀拔思单地区的产品中除了在第369页已提到的以外，穆喀达思还提到了做长袍的精致布料和做泰剌散（taylasān）面纱的纺织品，以及大量生产以供外销的粗亚麻布。物产方面，前文提到的哈兰吉木在被砍伐后，原木运到剌夷城，那里的工匠将其加工成碗和其他器皿。据文献记载，哈兰吉木是一种能产生清香气味的木料，有时这种木料被用来制做穆斯林使用的赞珠[52]，但这种极品木料只产于陀拔思单山区。[53]

朱里章（Jurjān）地区

朱里章（Jurjān）或波斯人读作古儿干（Gurgān）的地区，位于里海东南角，其包括辽阔平原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朱里章（Jurjān）河[54]与阿塔剌（Atrak）河[55]流经的河谷地带。早期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地区，但附属于呼罗珊，自蒙古西征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在政治上隶属于杩咱答儿地区[56]。与里海南岸的其他地区一样，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这一地区遭到蒙古军队的蹂躏和破坏，而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又被帖木儿的军队洗劫。

据穆喀达思记载，朱里章地区河流众多，其平原和山区遍布着产椰枣、柑橘和葡萄的众多果园。这个地区最重要的河流就是与此地区同名的朱里章河，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将这条河也称作泰夫里（Tayfūrī）河。但他没有提到阿塔剌河。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将朱里章河记为阿卜·朱里章（Ab-i-Jurjān）水，他还说朱里章河发源于沙合儿·瑙（Shahr-i-Naw）城[57]，即新城的山谷，而后流经算端·答临（Sultān Darīn）平原，到达朱里章城，经该城后，在尼木·木儿丹湾的阿八思昆（Abaskūn）岛附近注入里海。这条河的河道很深，几乎不能涉水而过，因此有些旅行者在渡河时被淹死；洪水期，其河水分出很多支流，可以用来灌溉，但大部分水还是白白浪费了。

阿塔剌河是一条比朱里章河还要长的河流，发源于尼撒（Nisā）城[58]与哈卜伤（Khabūshān）城[59]之间的呼罗珊平原，其源头位于麻失哈（Mashhad）河附近，同样发源于此地，但流向东南的麻失哈河，与阿塔剌河的流向相反。据穆思套菲记载，阿塔剌河很深，与朱里章河一样几乎不能涉水而过。这条河沿着的希思丹（Dihistān）[60]地区的边界流到朱里章地区的北边，并经过差不多120里格的行程后注入里海。据说阿塔剌（Atrak）之名只是突厥（Turk）一词的复数形式而已，之所以称作“突厥”河是因为突厥人曾居住于该河的两岸。但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并没有记载这条河的名称，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的穆思套菲是最早称该河为阿塔剌河的著述者，此后这个名称才为人所知。[61]

朱里章地区的首府是与地区名相同的城市，今天称作敏·古儿干（Min Gurgān）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伊本·豪喀尔称这是一座用土坯修建的优美城市，这里气候比阿模里城要干燥得多，因为朱里

章地区的雨水比陀拔思单地区要少很多。朱里章城由两部分组成，即分别位于朱里章河的两岸，两个城区由浮桥连接，但用朱里章来称呼河东岸的城区更合适一些。城西有八剌八（Bakrābād）外城区，并与两片城区相连接，伊本·豪喀尔曾到过这座城，并称其规模和剌夷城差不多大。该城附近的果园盛产水果，当地也产大量丝绸。朱里章城的主城区位于河东岸，穆喀达思称作沙合剌思坦（Shahrastān）；这个城区拥有很多优美的清真寺和诸多市场，市场里出售附近产的石榴、橄榄、西瓜和茄子，还有柑橘、柠檬和葡萄等，极为廉价，这些果品都特别甘美。[62]这座城被多条运河分隔开来，通过拱桥或船只连接成的浮桥才能渡过这些运河。“麦丹（Maydān）”，即公共广场面向总督府，东城区有9座城门。朱里章（Jurjān）城的不足之处就是气候极端炎热，苍蝇极多，还有其他害虫，尤其是臭虫极大，通常称作“狼（Gurgān）”。穆喀达思将八剌八（Bakrābād）[63]拼写为八剌八兹（Bakrābādh），这也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有自己的清真寺，其建筑物从河岸向后伸展很长的距离，而沿河之西岸也伸展很长的距离。

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据可疾云尼记载，朱里章城以有被称作古儿·速儿合（Gūr-i-Surkh，即红墓）的什叶派圣墓而闻名，据说墓主人是阿里的后裔之一，穆思套菲认为此人应是第六代依麻木贾法儿·萨底可（Ja`far-as-Sādīk）之子木哈马（Muhammad）。穆思套菲称这座城是塞尔柱王朝灭里·沙之孙重建的，还说城墙周长为7000步。他说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此城大部分已毁，而且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蒙古西征前未被破坏的程度。他还盛赞这里产的优质水果，除了上文提到的水果外，这里还随处生长着枣树，只要两三年就会挂果，每季可收两次。在他那个时代，这里的居民全是什叶派，但人数不多。伊斯兰历795年（1393年），帖木儿洗劫整个杩咱答儿地区和邻近地区时，他曾停留于朱里章城，并于河之两岸为自己修建了沙思满（Shāsman）大宫殿，哈菲兹·阿卜鲁特别提到了这座宫殿。[64]

朱里章地区的第二大城市为阿思塔剌八城[65]，其靠近杩咱答儿地区的边界。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称这是座优美的城市，是周边所有地区中气候最好的地方。生丝是这里的主产品，在他那个时代这里的城堡已毁，因白益王朝攻打兹牙儿（Ziyār）王朝时对全境进行了破坏；穆喀达思说这里有穆斯林第一次征服时期修建的聚礼清真寺，并屹立于靠近城门的市场内。亚库特和穆思套菲仅证实了上述记载，并盛赞阿思塔剌八城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但未补充新的材料。靠

近朱里章城与阿思塔剌八城的里海港口就是阿八思昆（Abaskūn）港[66]，其距上述两座城各有1天的路程，但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港口所在地被里海淹没，接着发生了蒙古西征事件。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斯塔赫里与伊本·豪喀尔称阿八思昆港是一个丝绸交易的大市场，在当时这里连接着通往突厥诸族和古思（Guzz）人地区的边界驿站，也是里海沿岸货物运往岐兰地区的主要港口。这个港口由一座用砖建成的坚固城堡守卫，城里的聚礼清真寺在市场内。据穆喀达思记载，这是朱里章地区的大港，亚库特还说里海本身常称作阿八思昆（Abaskūn）海。历史上，阿八思昆港以是花剌子模·沙（Khwārizm-Shāh）王朝[67]最后一位统治者穆罕默德[68]的最终避难所而闻名，他于蒙古军队到来前逃到这里，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惨死于此[69]。

阿八思昆港向北6天（或50里格）的路程，距朱里章城4天路程的地方就是与其所属地区同名的的希思丹（Dihistān）[70]居民点，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里是通往突厥之地的驿站。伊本·豪喀尔所说的希思丹靠近里海。这些居民点只是些有果园的村庄，人口稀少。附近是里海的一个浅湾，湾中停泊有很多船只，沿岸的居民从里海中可捕捞大量的鱼。这里的主要居民点称作阿忽儿（Akhur），穆喀达思称这是一座城市，周边有24个村庄，“这些村庄是整个朱里章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阿忽儿城有一座塔（Minaret），从附近沙漠很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阿忽儿城向东就是卢八（Ar-Rubāt，即哨所）城[71]，这里是去往花剌子模（Khwārizm）城的沙漠道上的一个重要居民点。穆喀达思称该城有三座城门，在他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城区虽已被毁，但该城仍很繁华，有漂亮的市场，以及一些建得很好的房屋和很多优美的清真寺。穆喀达思说这些清真寺中，老寺由木柱建成，在他那个时代，该寺的一半位于地下。另一座清真寺有一个漂亮的宣礼塔。亚库特提到了的希思丹（Dihistān）地区[72]的这些地方和其他地方，即哈儿乞儿（Khartīr）、噶儿古儿（Garghūl）和哈剌三（Habrāthān）等三村，但没有细述。穆思套菲在从朱里章城到花剌子模城的途中曾取道的希思丹地区，并称这里是穆斯林与异教徒突厥和曲儿忒的边界。此地区气候炎热，有一条河流灌溉着这里的土地，但该地几乎不产水果。[73]

从的希思丹地区的沙漠边缘（这是穿越沙漠到花剌子模的道路的起点）行4站之地就是法剌洼（Farāvah）城[74]，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这

座城是古思（Guzz）沙漠[75]中的一个居民点。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里驻扎着大批志愿兵，还有一个大哨所（Rubāt）以防止突厥人从背面袭击。该城的花园和耕地面积不大，城市或居民点居民只有区区1000户。穆喀达思将法剌洼拼写为阿法剌洼（Afrāvah），亚库特则说这是一个哨所（Rubāt），是哈里发马蒙在位时期的塔西儿王朝君主阿卜·阿剌（`Abd Allah）修建的。从其方位来判断，法剌洼城无疑应是现在的吉兹儿·阿尔瓦（Kizil Arvat），后一名称是吉兹儿·卢八（Kizil Rubat，即红色哨所）的讹称。亚库特只提到了朱里章地区的很多其他地名，这些村庄分别属于朱里章城或阿思塔剌八城。但文献中没有详细记载这些地方，因此它们的位置也无法确定，名称的读音通常也难以确定。[76]

在穆喀达思提到的朱里章地区的驰名产品中，有一种用生丝纺织的独特面纱，在他那个时代，这种纱大量出口到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Yaman）。朱里章地区也大量出产一种质地欠佳的织锦（*dībāj*），这里所产的水果中特别有名的有葡萄、无花果和橄榄等。[77]

经过陀拔思单地区与朱里章地区的道路并不多，因前一个地区为山区，道路几乎无法通行。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喀尔抄录）和穆喀达思记载了从剌夷城向北经过大山脉到阿模里城的道路，其中途要经过阿思（Ask）、卜罗耳（Bulūr，或Pulūr）等，但今天许多站点已很难或无法确定。伊本·豪喀尔和伊斯塔赫里记载了从阿模里城向西沿里海海岸道路的里程，其经过纳乞儿城与萨鲁思城到岐兰（即Daylam）地区，同时也记载了从阿模里城向东到朱里章城与阿思塔剌八城道路的里程。穆喀达思记载了从朱里章城向北到的希思丹地区的站点，穆思套菲在记述从苦密思地区的必思坦城到花剌子模都城的道路时，也记载了这条道路。穆喀达思也记载了从必思坦城经山区关隘，而后经朱亥纳村（Juhaynah，伊本·豪喀尔称这是位于河流岸边的优美村庄）到朱里章城的道路。最后，穆喀达思记载了一条从朱里章城向东进入呼罗珊的道路，其经过5程到达朱外因（Juvayn）平原上的亦思剌因（Isfarāyin）城，途中要经过阿吉吉（Ajgh），现在称作阿士格（Ashk）。这一地区将在下一章叙述。[78]

[1] 这些地区的地图见原文第185页图五。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

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20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1页。阿拉伯文拼写为苦密思（Kūmis，带点的K），波斯文则拼写为苦密思（Kūmis），但穆思套菲称呼此地为底雅儿·苦密思（Diyar Kūmis，即苦密思诸地）。

[2] 《元史·宪宗本纪》作吉儿都怯；《元史·郭侃传》作乞都卜，“其城在担寒山上，悬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筑夹城围之，莫能克。侃架砲攻之，守将火者纳失兒开门降”。《西使记》作乞都不。译者。

[3]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3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0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5、35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39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4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1、204页。

[4] 今为巴斯塔姆（Basṭām），是塞姆南省沙赫鲁德（Shāhrūd）州巴斯塔姆区区府，人口7300，是伊朗著名的苏非圣城，也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向北可以到里海沿岸和戈尔甘。译者。

[5]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

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6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623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82页。沙合鲁得（Shāhrūd）城在必思坦城南几英里处，现在是该地区的贸易和人口聚居中心，但阿拉伯或波斯地理学家没有提到此城，因此萨尼·道剌（Sanī`-ad-Dawlah）承认不知这座城市修建于何时。《地区之鉴》（*Mirāt-al-Buldān*），第1卷，第210页。

[6] 今为戈莱斯坦（Golestān）省首府戈尔甘（Gorgān）城，距里海91公里，人口26万，是里海东岸的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为伊朗里海东部的鱼米之乡。译者。

[7] 今为哈尔坎，在塞姆南省沙赫鲁德（Shāhrūd）州巴斯塔姆区有哈尔坎乡和哈尔坎镇，哈尔坎乡人口1.6万，位于巴斯塔姆城东北，是去往里海的要道。译者。

[8] 阿卜·哈散·哈儿卡尼（Abu-l-Hansan Kharkānī）卒于伊斯兰历425年（1033年），纳格失班底（Naqshbandiya）教团将他视为第七代先知，是著名苏非派人物，被称为“救助者”（*Ghawth*）和“众人的朝向”（*Qiblah*，本意为“礼拜的方向”），平生主要生活于自己的家乡忽儿干城，去世后葬于该城（现在是一个村庄），并建有拱北，存在至今。译者。

[9] 是塞姆南省沙赫鲁德州比亚尔朱满德区的区府，人口2200，在沙赫鲁德城东南，是塞姆南省中部的要道，可以通往其以东的很多城市。译者。

[10] “五时”拜，穆斯林一天五次的礼拜，即晨礼、晌礼、哺礼、昏礼、宵礼等。译者。

[11]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为塞姆南，是塞姆南省省会，人口15.3万，向东可以通往达姆甘，向西可达德黑兰，向北可到里海南岸，向南到亚兹德城，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和重镇。译者。

[12]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6、357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4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

《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42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6、191页。可疾云尼拼写为忽儿干；这个名称（不带元音）和吉八儿地区的哈剌坎（Kharrakān）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两者不能混淆。

[13] 今为哈瓦尔·沙赫尔（Khāvar Shahr），是德黑兰省雷伊（剌夷）州中心区的一个村镇。这里是去往德黑兰、塞姆南、里海南岸、库姆等地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14] 《元史·曷思麦里传》作秃马温。《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27页详细记载了这座山，并载：“这座山所在的地区有几个居民居住区，形成了所谓的秃马温地区。在这里的城市中，主要城市为底弥（Dīmeh）城。”即今达马万德山。译者。

[15]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67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4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1、196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212页。忽瓦儿城就在现在的阿拉敦（Aradūn）城所在地，这座城市周边的地区还保留着旧名称忽瓦儿（Khuvār），这是先前该地区的首府。

[16] 今为塞姆南省达姆甘州中心区达曼库赫（Damankuh）乡哈达德赫

（Haddādeh）村，人口200，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17]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2、23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00、201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69、170页。（对穿越该地区做了详细记载）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15、21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4、27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1、37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6页。有关现代剌思吉儿城堡的一幅插图，见贝柳（H. W. Bellew）《从印度到底格里斯河》（*From the Indus to the Tigris*），第404页。至于八哈失（Badhash），令人奇怪的是亚库特在他的词典里只拼写对了一次，然后将首字母更换为n，拼写为纳哈失（Nadhash）。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30页；第4卷，第773页。

[18] 阿勒不儿兹（Alburz）山现在一般拼写为厄尔布尔士（Elburz），是今天将波斯高原与里海洼地分开的大山脉的名称。但这个名称没有出现在早期阿拉伯文献的记载中，他们没有给这座山脉单独命名。阿勒不儿兹山脉是波斯语的叫法，据沃勒尔（Vullers）的说法，这个词源于《阿维斯陀》中的两个词，含义是“山”[《波斯语拉丁语词典》（*Lexicon Persico-Latinum*），该词词条]。穆思套菲（第202页）可能是第一位提到这个名称的著述者，但使用的含义十分模糊。他在有关波斯山脉的章节中说阿勒不儿兹山脉是一个高山脉，与高加索（Bāb-al-Abwāb）山脉相连，“这些山脉确实是绵延不绝的山脉，形成的山系超过1000里格，从（中亚的）突厥斯坦（Turkistān）到（阿拉伯半岛的）喜贾兹（Hijāz），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假想的）噶夫（Kāf）山（这个山环绕着地球），在西端这些山脉和古儿只（Gurjistān，即格鲁吉亚）的山脉相连”。至于高加索山脉的阿勒不儿兹山峰，见原文第181页。

[19] 《西使记》作杩咱苍（答）儿；《元史·郭侃传》作禡拶答而。杩咱答儿一词在《陀拔思单史》（*History of Tabaristān*）第14页中被解释为：“该词原称作木兹·安答

仑（Mūz-andarūn），因木兹是靠近岐兰（Gīlān）地区的一座山的名称，其一直延伸到剌儿（Lār）城（Qasrān，即剌夷）城和贾贾儿木（Jajarm）城；由于其所在的地区'在木兹山范围之内'，因此称此名（木兹·安答仑）。"《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ī*）第34页载："陀拔思单（Tabaristān），是伊朗或波斯的一个地区，也叫麻曾德兰（Māzinderān，即杩咱答儿，引者）。这里的主要城市为阿模里（Āmul）城；除此之外，还包括萨里（Sārī）城、法剌罕八德（Farrahānbād）城和其他城市。根据有关记载，陀拔思单和Dār-al-Maz是一个意思，是指岐兰、低廉、麻曾德兰、鲁思坦达儿（Rustandār）、朱里章。"译者。

[20] 《陀拔思单史》第28页载，陀拔思单地区的"整个区域包括从底那儿·俱亦（Dīnār-jāy）城的麻剌（Malat）村，以及剌亦（Ray）城、苦密思（Qūmis）城到（里海）海岸的地区，这一地区农业发达，人口稠密。"译者。

[21] 《陀拔思单史》第30页也载，"简而言之，这一地区（陀拔思单地区）唯一不足就是气候潮湿，降雨很多，因离海（即里海）较近"。译者。

[22] 《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第130页载，陀拔思单的"特产包括香木缘（Utrujj）、斗篷、粗亚麻线毛巾、短大衣、棉盖头"。译者。

[23]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0、27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4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7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502页。有关塔巴儿（Tabar）这个词，见原书第217页。

[24] 见《元史·地理志·西域地附录》；《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称岐兰（今吉兰）"之东南二十日行，得阿没，或曰阿昧"。《陀拔思单史》第25页提到最初一户来自低廉地区的人家居住在阿模里附近，后来其女嫁给了巴里黑地区的国王费鲁兹（Fīrūz），应她之请修建了阿模里城，并"用土坯修建了城墙，且很宽，其上足可以让四位骑士并排行进，城墙周边开凿了一条深33腕尺（Arash），宽一箭之远的护城河；城墙有四门，分别被称为朱里章门、岐兰门、山门和海门。这座城市占地面积400贾里（Jarīb）。这位王后阿模剌（Āmula）的宫殿位于现在的洗衣工街（Kūcha-i-Gāzarān）上，其背后是'服装市场'"。今为阿莫勒（Āmol），是马赞达兰（Māzandarān）省第二大城市，是阿莫勒州州府，人口19.7万，距里海20公里，是其南岸的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译者。

[25] 上述港口和小城的名称已不存，应在阿莫勒之北。译者。

[26] 见《元史·地理志·西域地附录》；《新唐书·西域传》作婆里，实为娑里之误。《陀拔思单史》第16～17页载："萨里城是由古代奴札儿（Nūdhar）之途思

（Tūs）修建的，位置在现在（作者所处时代）叫徒散（Tūsān）的地方。”“（后来）在陀拔思单国王大法鲁汗（Farrukhān，唐宋文献之忽鲁汗）时代，奉其贵族八吾（Bāv）之命在奥哈儿（Awhar）村修建了萨里城，选择此址的原因是这里地势较高，河流较多，环境宜人。”“萨里城的清真寺由诃论·剌失德在位时期的异密哈合牙·本·哈合牙（Yahyā b. Yahyā）初建，最后由麻札牙儿·本·喀林（Māzyār b. Qārin）完成。八万丹宫（Bāvandān）对面为四门拱北（Gunbadh Chahār Dar），其在已故（萨珊）国王阿儿达喜儿的私人御花园内。”“亦思帕八·忽萨木·道剌（Ispahbad Husāmu`d-Dawla wa`d-Dīn Ardashīr b. Husayn），在陀拔思单统治35年（大约到13世纪初该书作者时代，引者，第67页）。”“他的都城设在萨里城，这里居住着他的大臣，并设有各部（Dīvān），叫作联合部（Dīvān-i-Wasl）。”（第69页）今为萨里（Sārī或Shahr-i-Tajan），是马赞达兰省首府和第一大城市，是萨里州州府，人口25.9万，在阿莫勒之东，是里海南岸的重镇，向南可达德黑兰、塞姆南等，向东可到戈尔甘，向北通过里海可达南俄草原，向西可达阿尔达比勒，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译者。

[27]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1、272、27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4、35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354、40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09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91、571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37页。

[28] 《陀拔思单史》第36页引用阿里·本·栽因·喀提卜（`Alī b. Zayn al-Kātib）所著的《菲尔多西的箴言》（*Firdawsu `l-Hikimat*）称：秃马温山“从距阿思（Ask）村有两天路程的地方开始升高。其山峰呈圆锥形，除了山顶30贾里（jarīb）的地方冬夏无雪外，其他地方均覆盖着积雪。无雪的地方覆盖着厚厚的沙土（是否是灰？）。无雪的山顶附近及周边有30个火山口和裂口，从中冒出烟，有硫磺味，并发出隆隆的声音，于是人们就知道此山内有火（即火山）。动物不能在这里生存，原因是这里常刮

着狂风，据说这里发现有炼丹石（Asahāb Kīmyā Kibarīyat）”。该峰就是伊朗厄尔布尔士山脉的主峰和伊朗的最高峰达马万德，素有“中东屋脊”和“伊朗第一峰”之美誉，在德黑兰东北约70公里处，海拔5604米，为一死火山锥，主要由安山岩组成。顶部终年覆雪，有冰川。南麓有著名的避暑胜地，即达马万德城。译者。

[29] 祖哈（Ad-Duhhāk，或Zuhāk）传说是和波斯民族英雄法里顿（Farīdūn）同时代的人物，后者征服过都哈，据说此人统治着库尔德人，生性残暴，每天要杀死一位库尔德青年，饮其血，于是不断遭到库尔德人的反抗。《天方夜谭》中有此人的故事。译者。

[30] 《陀拔思单史》第28页提到了威麻城。今此城名不存，应在阿莫勒之南、达马万德城之北。译者。

[31] 可疾云尼所说并不可信，因在《陀拔思单史》中记载大约在哥疾宁王朝马合木统治时期，陀拔思单地区统治者喀卜思（Qābūs）征服了包括兀思土纳万城堡在内的城堡，“这些城堡赐给了他的大臣和贵族”（第231页）。大约11世纪末，兀思土纳万城堡被暗杀派占领。（第243页）译者。

[32] 亦思帕八（Ispahbad）自称是萨珊王的后裔，生活在7世末至8世纪初，他在陀拔思单地区建立了割据小王朝，被称为答卜亦（Dābūy）王朝，后来的统治者名称后多冠以亦思帕八之称号，于是这个王朝有时也称亦思帕八王朝；7世纪末阿拉伯人征服活动时期经过长期的围攻最后推翻了答卜亦王朝，亦思帕八本人纳降，并缴纳赎金，于是他及其后裔继续统治这一地区，在秃马温山区仍有以亦思帕八之名统治的割据势力，自称是大袄教徒（Musmughān），亚库特所指的可能就是这一山区的统治者。译者。

[33]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0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65、270、27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92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9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43、244页；第3卷，第930页；第4卷，第94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1、203、204

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577页。费鲁兹苦合（Firūzkūh）城堡存在至今，但兀思土纳万（Ustūnāvand）城堡的位置不得而知。

[34] 有关陀拔思单地区的城市在《陀拔思单史》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陀拔思单的平原地区有：（1）阿模里（Āmul）城；（2）萨里（Sārī）城；（3）麻木乞儿（Māmtīr）城；（4）鲁八思（Rūbast）城；（5）阿剌兹木（Ārazm，B本作阿剌儿木Ārarm）城；（6）徒里察（Turīcha）城；（7）木撒剌［Muthla是否是密剌（Mīlah）］城；（8）密合剌万（Mihrawān）城；（9）麻楚里［Machūrī，B本作比俱里（Bījūrī）］城；（10）阿合剌木［Ahlam，似是阿合鲁迷（Ahlum）］城；（11）贾鲁思［Jālūs，B本作萨鲁思（Sālūs）］城；（12）YLSAIK［B本读音无法确定（MLSIAK）］城；（13）乞思［Tīs或苦思八）Quhsibah），B本作麻哈思乞牙（Mahastiyah）］城；（14）塔密沙城［Tamīmsha，似是正文中的塔密萨（Tamīsah）］城；（15）古儿干（Gurgān）城。山区有：（16）喀剌儿（Kalār）城；（17）鲁养（Rūyān，最初在法里顿时期修建的，第17页）城；（18）那麻儿（Namār）城；（19）喀俱牙城［Kajūya，应是同一书第132页的喀俱（Kajū），因此地距贾鲁思城不远，可能是译著正文中的喀贾（Kajjah）］；（20）威麻（Wīma）城；（21）沙兰八合（Shalanba）城；（22）瓦八［Wabād，B本作瓦麻（Wamād）］城；（23）阿卜哈麻（Abkhama）城；（24）萨儿麻木（Sārmām）城；（25）法临［Farīm，似是费临（Firrim）］城；（26）哈札儿·伽里（Hazār-garī）城；（27）秃马温（Damāwand）城；（28）剌里建［Lārījān，据说这里曾是陀拔思单古王国的最早居民点，这个居民点的瓦剌喀（Waraka）村是波斯英雄法里顿（Ferīdūn）的出生地，第15页］城。（第28~29页）从这一记载可知：（1）陀拔思单地区与朱里章地区合并在了一起；（2）这部13世纪的文献与其他阿拉伯、波斯文献相比较，对该地区城市的记载有一定的出入，有些城市名称和其他文献的记载无法对应起来，或者有些城市的名称拼写不尽一致，可能的原因是有些地名发生了变化，或者各文献本身拼写出现了差异；（3）实际上这一地区不止这些城市，因在同书其他地方，尤其在第122~123页提到了很多地名，其中有些就是城市之名。不管怎么说，这部记述陀拔思单地区历史的著作对该地区的地理状况做了有益补充。译者。

[35] 《陀拔思单史》中贾八儿·喀林作喀林·苦合（Qārin-kūh，第237页），是波斯语名称，意同，即喀林山区。译者。

[36] 今这两座城的名称不存。译者。

[3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05、20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68、26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

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12页；第3卷，第324、890页。Mustawfī（穆思荅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1页。法都思般（Fādūsbān）由于音点笔误，在伊斯塔赫里和其他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述中被错印，便读为喀都思延（Kādūsiyān），因此这些人常以为该城就是斯特雷波（Strabo，前63～公元21年，古希腊地理学家，著有《地理学》，译者）的古喀都思（Cadusii），见诺尔德克（Noldeke）《萨珊王朝统治时期的波斯与阿拉伯历史》（*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 zur zeit der Sassaniden*），第151页注2。他解释说萨珊王朝统治时期八都思般（Bādūsbān）是文职总督管理的地区，边陲的亦思帕八地区与此相反，是武职统领。也见尤斯提（Justi）《伊朗书目》（*Iranisches Namenbuch*），第156页，“喀林”（Karen）条；第245页，“总督”（Patkospan）条。至于穆斯林时代八都思般地区的主要城市，见梅尔古诺夫（G. Melgunof）《里海南岸》（*Das südliche Ufer des Kaspischen Meeres*），第50页；喀林（Kārin）地区的主要城市，见见梅尔古诺夫（G. Melgunof）《里海南岸》（*Das südliche Ufer des Kaspischen Meeres*），第52页。

[38] 《陀拔思单史》提到了纳乞儿城，以及蛮都儿（Mandūr）村和尼伽里思田（Nigāristān，第40页），还提到了此城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驻防着500人的军队。（第123页）今为马赞达兰省努尔（Nūr）州境内的一村庄，在阿莫勒西北约40公里处。译者。

[39] 《陀拔思单史》载，“贾鲁思（沙鲁思）城是一个特别的城市，在这里居住，人们的皮肤会变白皙，因此如果印度姑娘，或可不里姑娘在这里住上一年，她的皮肤会白净得像希腊人或斯拉夫（Slav）人一样”（第40页）。今为恰卢斯（Chālūs），是马赞达兰省恰卢斯州州府，人口4.4万，是里海南岸的重镇，向东可达阿莫勒、萨里，向南可达德黑兰，向西到巴库，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40]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13、237、504页；第4卷，第726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

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91页。据说沙鲁思（Shālūs）城距剌夷城只有8里格，如果此城在里海岸边或附近，那么这种说法就是错误的。

[41] 喀剌儿城在《陀拔思单史》中多次被提到，并载："喀剌儿城附近有一个叫底兰（Dilam）的村庄，出生在这里的人活不过20岁。"（第40页）"喀剌儿城靠近低廉边界，（阿拔斯王朝）驻防着1000人。"（第123页）从地理方位判断，此城就是今马赞达兰省恰卢斯州凯拉尔达什特（Kalārdasht）区区府，位于恰卢斯西南，人口1.1万，是通往里海与德黑兰的主要通道，也是马赞达兰省中部的重镇。译者。

[42] 《亚美尼亚史》（*The Armenia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中鲁养城作罗延（Ŕoyean）。（第44页，原书第96页）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加兹温城西北的山区。译者。

[43] 《陀拔思单史》说萨亦答八（Sa`īd-ābād）是鲁养城附近有名的村庄，"这里的婴儿一旦夏季出生就会夭折，因而此地的习惯就是怀孕的妇女，如果夏季要生产，就会离开此地，到别处去"（第39页）。译者。

[44]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873页；第3卷，第93、490、504页；第4卷，第240、296、297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38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3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0页。

[45] 今此城名不存，应距阿莫勒城不远，曾是里海沿岸的古镇。译者。

[46] 今此城名不存，据地理位置判断，应与巴博勒城在同一经度，位于萨里城西边。译者。

[47] 《陀拔思单史》称麻木乞儿（Māmtīr）最初叫"麻·瓦·乞儿（*Mā wa tīr*），后来讹误为麻木乞儿。马合木·本·哈里（Muhammad b. Khālid）任总督时，修建了一个市场和其他建筑，在伊斯兰历160年（776或777年），麻札牙儿·本·喀林（Māzyār b. Qārin）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第28页）。现在这座城市更名为巴博勒（Bābol），是马

赞达兰省巴博勒州州府，人口21万，是阿莫勒与萨里之间的通道和大城。译者。

[48] 今此名不存，据地理位置判断，应在萨里城东边。译者。

[49] 密合剌万城在《陀拔思单史》中提到了，据记载，阿拔斯王朝时期，这里驻扎着1000人的军队。（第123页）今此城名不存，从方位来看，应在萨里城东边。译者。

[50]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此名不存，从方位来看，应在萨里城东边的鲁斯塔姆卡拉（Rostamkelā）或嘎鲁嘎赫（Galūgāh）附近。译者。

[51]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503、504、547页；第4卷第398、642、699、733页。八儿法儿鲁失（Bārfarūsh）最早的名称是八剌·法鲁失·底合（Bārah Farūsh Dih）村，即“出卖劳动力”的村，见于阿合马·剌夷（Ahmad Rāzī）所著的《七个地带》（*Haft Iklīm*），这是一部伊斯兰历10世纪（16世纪）的著作，见道尔恩（Dorn）《伊斯兰教的兴起》（*Muhammedanische Quellen*，波斯文本），第4卷，第99页。

[52] 赞珠（tasbih），穆斯林的一种宗教用品，礼拜或赞美真主或先知时使用的珠串，其材质为宝石、玛瑙、琥珀、象牙等，也用角、骨、木、皮革、椰枣核或玻璃等，形状有圆形、锥形、菱形等多种；赞珠串多为33颗或99颗，也有45、51、66、297颗的。译者。

[53]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6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0、191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39、341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

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49页。自14世纪穆思套菲记载时期起，阿舒剌答海湾与半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城市和港口的确切位置尚不清楚。

[54]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6页提到了喜蓝（Hiran）河，即朱里章河。译者。

[55] 即阿特拉克（Atrak）河，发源于伊朗北呼罗珊的北部山区，全长563公里，向西北流，在伊朗戈莱斯坦北部向西转，此地为伊朗与土库曼斯坦的边界，最后汇入里海东南角。其下游的河谷地带是伊朗著名的农业地区。这里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56] 《穆斯林的教派》（*Moslem Schisms and Sects*，*Al-Fark Bain Al-Firak*）第90页称在朱里章与陀拔思单分布着一些和袄教混合形成的教派，其修建有清真寺，幼童学习《古兰经》，但这些人私下不做礼拜，斋月也不封斋。译者。

[57] 今此名不存。译者。

[58] 尼撒（Nisa或Parthaunisa）今已毁，其大致位置在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西南18公里处的巴吉尔（Bagir）村。这里是古代安息王朝最初的都城，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近现代以来在此发掘出很多精美的艺术品。此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译者。

[59] 今此城不存，但名称保留下来，是北呼罗珊省法鲁季（Faruj）州哈布商（Khabūshān）区的名称和该区下属的一个村的名称。这里是古今交通要道。译者。

[60]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译者。

[61]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4、36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12、213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41页。Hfz.，第32 a叶面。突厥被写为（和读为）Atrak，该词第二个元音发短音，突厥（Turk）的复数形式为阿塔剌（Atrāk），因此这个名称的一般解释可能是错误的。

[62] 《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第130～131页

载："朱里章（Gurgān，Jurgān）包括平原和山区，内陆与海岸地区。这里的人们说得出辽阔平原的100多种不同的香草、菜蔬、植物，以及低地和山区的水果与浆果，而且任何人可以随意采摘这些果品。这里的居民极其稀少，从外边来的很多人仅靠采摘果蔬，然后收集，再出售，就能生存。这个地方的产品有石榴籽、棉花（Qatūnā）籽、杏子、香水仙。然而，朱里章地区最著名的水果是无花果和枣；这里的枣是该地区的特产之一，品质无与伦比。如果有人到朱里章的市场马上就会发现，无论是冬夏都有水果蔬菜，如茄子、黄瓜、白萝卜、胡萝卜、豆角、甘蔗。整个冬天可以买到小山羊肉、绵羊肉、鲜奶、香草、鲜花、水果，如薰衣草、桂足香、紫罗兰、香木缘、柑橘。人们也可以在朱里章找到鱼、水禽、山鹑、野鸡。""朱里章的特产有黑色大衣、双线纺织的布料、深红色布料。"译者。

[63] 《陀拔思单史》载，9世纪后半叶，"（乃沙不耳军事统帅）忽吉思田尼（Khujistānī）亲自驻扎在古儿干（Gurgān）地区的八剌八城，并收集粮秣"（第186页）。译者。

[64]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2、27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7、358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3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0页。Hfz.，第32a叶面。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朱里章地区由当地的兹牙儿（Ziyār）王朝统治，其统治地区可达陀拔思单和附近地区。兹牙儿王朝最有名的人物是喀卜思（Kābūs），他卒于伊斯兰历403年（1012年），他的陵墓叫喀卜思拱北（Gunbad-i-Kābūs），至今在朱里章城废墟附近还可以看到。亚特（C. E. Yate）：《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239～241页。

[65] 《陀拔思单史》第28页载，"阿思塔剌八城附近曾是巴里思田地区统治者古林（Gurīn）为喂养牲畜而种植驴饲料（kharbandagān）的地方，随后发展成为城市，其城名源自'骡子'（astar）"。在该书其他地方多次提到了这座城市。译者。

[66] 此名今不存，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托尔卡曼港（Bandar-e Torkman）附近。这是古代里海的重要港口，也是水陆交通要道和重镇。译者。

[67] 花剌子模·沙王朝（1077～1231年），以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的咸海为中心，势力不断扩大，到达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中亚西部等地，最终被蒙古

人所灭。译者。

[68] 即扎兰丁（Jalal ad-Din Mingburnu），1220～1231年在位。译者。

[69]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13、21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3、27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5、242页。伊本·塞剌皮昂（第46b叶面）说阿八思昆城在流入里海的朱里章（Jurjūn）河河岸附近。Mas`ūdī（马苏迪），其著作为《提醒与监督》（*Kitāb at-Tanbīh wa` al-Isshrāf*，简称*Tanbīh*），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八卷，第60、179页。

[70] 今此名不存。译者。

[71] 今此名不存。译者。

[72] 《亚美尼亚史》（*The Armenia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第44页（原文第97页）将希思丹（Dihistān）写为底儿哈思田（Delhastan）。译者。

[73] 这些位于花剌子模（Khwārizm）沙漠边界的城市遗址在米思里延（Misriyān）城附近仍可以看到，其附近的山现在叫寇临·达格（Koren Dāgh）山，这个地区的耕地长期被撂荒，现在是一片无水的沙漠。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7、28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8、35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9、500页；第2卷，第418、633页；第3卷，第880页；第4卷，第94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0、197页。

[74] 今此名不存。译者。

[75]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80页提到了这个沙漠，并载："此沙漠

叫花剌子模和古思（Guz）沙漠。该沙漠有流沙，其从巴里黑之境起一直到质浑河，再到花剌子模海（即咸海，引者）。这个沙漠的宽度从1站到7站不等。”译者。

[7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3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866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7页。至于这些村庄见亚库特记载中所列举的16个村庄。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37、489、782页；第3卷，第323、923、930页；第4卷，第277、376、395、396、555、699、728、926、927页。

[77]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67页。

[7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14～21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4～27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72、37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7页。

第二十七章 呼罗珊（Khurāsān）地区

呼罗珊地区的四个专区。你沙不儿（Nīshāpūr）专区。你沙不儿（Nīshāpūr）城和设牙合（Shādyākh）城。你沙不儿（Nīshāpūr）地区。途思（Tus）城和麻失哈（Mashhad）城以及麻失哈（Mashhad）城的圣墓。拜哈吉（Bayhak）城与萨卜兹洼儿（Sabzivār）城。朱外因（Juvayn）地区、贾贾儿木（Jājarm）城和亦思法剌因（Isfarāyin）城。兀思土洼（Ustuvā）城和苦蝉（Kūchān）城。剌坎（Rādkān）城、尼撒（Nisā）城和阿必洼儿（Abivard）城。喀剌（Kalāt）城。哈八兰（Khābarān）城和撒剌哈夕（Sarakhs）城。

在古波斯语中，呼罗珊（Khurāsān）意为“东边之地”，一般来说这一名称从中世纪早期就开始使用了，该地区包括了“大沙漠”以东的所有穆斯林地区，并远到印度边界。所以从广义上说呼罗珊包括了除昔吉思田地区和靠南的苦黑思田地区以外的位于东北方向的所有河中地区，靠近中国沙漠与中亚的播蜜高原，以及印度的印度·苦失山等广大地区。但后来呼罗珊所包括的地区变小了，因而作为中世纪波斯的一个地区，通常来说其东北的范围最远只达乌浒水，还包括除哈烈（Herāt）以外的高原地区，也就是今天阿富汗的西北地区。中世纪阿拉伯人所熟知的乌浒水上游地区一直到播蜜高原一般也纳入呼罗珊的所属地区。

阿拉伯时期或中世纪的呼罗珊地区通常分为四个专区（Rub`），并以四座大城市之名命名，这四座城市为乃沙不耳（Nayshābūr）城、马鲁（Marv）城、哈烈（Herāt）城和巴里黑（Balkh）城，其分别为各专区的首府，这些专区在不同时期各有分合。穆斯林第一次征服活动后，曾以马鲁城和巴里黑城作为呼罗珊地区的首府。但塔西儿王朝的统治者将政治中心西移，在他们的影响下，乃沙不耳城成为该地区（呼罗珊地区）的首府，其也是四个专区中最西边专区的首府。[1]

在现代波斯语中，乃沙不耳城之名被拼写为你沙不儿（Nīshāpūr）城[2]，阿拉伯语则拼写乃沙不耳（Nayshābūr），但在古波斯语中拼写为尼兀沙普合儿（Nīvshahpuhr），意为“沙普儿（Shāpūr）之善（事、行或地）”，这座城市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4世纪萨珊王朝的沙普儿二

世重修了该城，并以他的名字为之命名，这座城原是由阿儿达喜儿·八卜甘（Ardashīr Bābgān）之子沙普儿一世修建的。如前所述，乃沙不耳地区的绝大部分包括在苦黑思田区，对所属各主要城市，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已做了详尽记载，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城市名称的古老拼写形式，以及很多提到过但现已无法考订的地名。[3]

穆斯林早期时代，乃沙不耳也称作阿卜剌沙合儿（Abrashahr），波斯语的含义为“云城”，也因在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期铸造了早期的底儿罕（dirham）[4]而被称作“造币城”。穆喀达思和其他著述者也将该城记为伊兰·沙合儿（Irān-Shahr）城，即伊朗城，但这种称呼可能仅是官方作为荣誉称号来使用的。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乃沙不耳城已是一座极为繁华的城市，四至从半里格到1里格，还包括城堡或要塞、内城和外城。主聚礼清真寺位于外城；该寺是由萨法儿王朝的君主异密（`Amīr）修建的，面向叫麻阿思喀儿（Al-Mu`askar，即教场）的公共广场。该寺毗邻总督府，朝向另一个叫麦丹忽辛（Maydān-al-Husaynīyīn）的广场，这里距监狱不远，这三处建筑彼此相距不超过1/4里格。

城堡有两座门，内城有四座门。内城的第一座门是八卜·坎塔剌（Bāb-al-Kantarah）门，即桥门；第二座为麻吉儿（Ma`kil）门；第三座为八卜·苦寒底兹（Bāb-al-Kuhandiz）门，即城堡门；最后一座是特勤（Takīn）桥门。过了城堡与拥有诸多大市场的内城后，就到了有很多城门的外城。其中主要的城门是八卜·拱北（Bāb-Kubab）门，即穹顶门，朝西；其对面是八卜·江（Bāb Jang）门，即武门，朝向卜失塔夫鲁失（Bushtafrūsh）地区；朝南的是八卜·阿合瓦萨八（Bab Ahwasābād）门，以及文献记载的其他一些城门。[5]最著名的商业区被称作麻剌八·喀必儿（Al-Murabba`ah-al-Kabīrah，即大方格）市场和麻剌八·萨吉剌（Al-Murabba`ah-as-Saghrah，即小方格）市场，其中“大方格”市场靠近前文提到的聚礼清真寺；“小方格”市场与前一个市场有段距离，位于外城的西边，靠近麦丹·忽辛广场和总督府。一条店铺林立的长街从一个方格伸展到另一个方格；另一条同样是店铺林立的大街经过大方格附近的右角后，继续向南一直延伸到叫喀必儿·忽辛（Kābir-al-Husaynīyīn）的陵园，再向北一直到河边的桥头。

商业街有供商人居住的客栈旅店，每种商品都有自己的专门市场，还分出鞋匠、裁缝和靴匠等区，以及其他行业的很多区域。城里的每户

人家均有自己单独的地下水管道，用水取自洼地·萨噶洼儿（Wādī Saghāvar）河，这条河发源于附近的卜失坦坎（Bushtankān）村，并流经乃沙不耳城。这些输水管道由城里的专门官员管理，其铺设的管道在地下长达100步，管道穿城而过后又回到地面，灌溉着当地的果园。

伊本·豪喀尔说整个呼罗珊地区没有哪座城比乃沙不耳城更舒适或繁华，城里的富商很有名，每天驼队运来各种所需商品。棉花和生丝是该城的大宗输出品，这里纺织各种布料织品。穆喀达思证实了这些记载，还补充了一些细节。他说乃沙不耳城有42个城区，有些城区和半个昔剌思城那么大。通向城门的主街（darb）近50个。大聚礼清真寺建有4处院落，如前所述该寺由萨法儿朝君主异密修建。砖砌的柱子支撑着寺顶，大庭院周边有3个游廊。主体建筑装饰着金色的瓦片，有11座门通向清真寺，每侧均有大理石柱子，寺顶和墙壁装饰得极其华美。如前所述，乃沙不耳（Naysābūr）河发源于卜失坦坎村；这条河的河水可推动70个磨盘，由该河分出了众多的地下渠道，因其本身距城市有1里格的距离。城里和居民家中有很多甜水井。[6]

亚库特说在他那个时代，即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乃沙不耳城之名通常拼写为纳失洼儿（Nashāvūr）。他还说尽管这座城在伊斯兰历540年（1145年）被大地震破坏，接着又在伊斯兰历548年（1153年）遭到古思（Guzz）铁骑的洗劫而毁灭，但在整个呼罗珊地区他未见过比该城更美的城市，其附近的果园以产无核白葡萄（rībās）和其他水果而闻名。在古思人的那次洗劫中，当时的塞尔柱王朝算端桑贾儿被掳去而沦为阶下囚，同时该城也被摧毁，于是绝大部分居民迁往邻近的设牙合（Shādyākh）城区，并进行重建，总督木阿牙（Al-Mu`ayyad）奉被囚禁的算端桑贾儿之命修建了这一城区的城墙，并扩建了城区。这个设牙合（Shādyākh，或Ash-Shādhyākh）城区先前是一处果园，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初曾被塔西儿王朝的阿卜·阿刺占据，他当时将乃沙不耳城作为自己的都城。他修建的宫殿附近最初是他的军营，后成为乃沙不耳城的主外城区，古思人洗劫后，这个外城区取代了原来的首府。约在伊斯兰历613年（1216年），亚库特在乃沙不耳城停留了一段时间，并说他居住在设牙合城区。不久以后的伊斯兰历618年（1221年），如亚库特所听到和记载的那样，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军队占领了该首府，并进行屠城，在此之前亚库特已避难于毛夕里城。据他耳闻，蒙古人将这座城洗劫一空，连一个石子儿也没留下。

但乃沙不耳城肯定很快从蒙古人西征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了，因为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来到此城时，这里很繁华，还有座优美的清真寺，这座寺院周边有4所学校，城市附近的平原因很富庶而被称作“小大马士革”，这里靠发源于附近山上的4条河灌溉。伊本·白图泰还说该城制造一种叫坎哈（*Kamkha*）[7]和纳合（*Nakhkh*）的丝绒，这里的市场经常有外国商人光顾。和他同时代的穆思套菲详细记载了乃沙不耳城及其城区。穆思套菲称在萨珊王统治时代，据说乃沙不耳旧城最初是按棋盘的样式修建的，每边有8个方格。后来，萨法儿王朝统治时期乃沙不耳城区规模扩大而变得繁华富有，并成为呼罗珊地区的首府，直到伊斯兰历605年（1208年）这座城在大地震中几乎完全被毁。穆思套菲称从那次地震后，设牙合城区取代乃沙不耳城其他城区，首次成为居民中心区，这一城区的城墙周长为6700步。不久以后乃沙不耳城又进行了重建，但伊斯兰历679年（1280年）再次毁于地震，此后乃沙不耳城在另一处地方进行了第三次重建，这就是穆思套菲所记载的那个地方（设牙合城区）。该城位于一座山脚下，面朝南。其城墙周长为15000步。该城供水丰富，乃沙不耳（Nīshāpūr）河发源于东边2里格多的群山中，水量较充足，流经此城前可以推动40个磨盘。他还说乃沙不耳城绝大多数居民的家中备有干旱季节使用的水窖。

现在的乃沙不耳城位于三面群山的半圆形平原东边，南边面向沙漠。这个平原靠发源于北边和东边山脉的很多河流灌溉，穆思套菲记载了这些河流的名称，其灌溉了乃沙不耳城附近的土地以后，消失于沙漠中。从这座城往北5里格，在乃沙不耳河源头的山上有个叫察失麻·萨卜兹（Chashmah Sabz，即绿泉）的小湖。据穆思套菲记载，有两条向西和向东的河流发源于该湖。东边的河流到麻失哈（Mashhad）山谷。该湖显然位于叫苦合·古儿珊（Kūh Gulshān）的山上，在这座山里有个神奇的风洞，从洞中常年冒出一股气体和一股水流，水流很大，可以推动一个磨盘。他称察失麻·萨卜兹湖周长有1里格，这个湖还有很多神奇的传说，据说此湖深不见底，而且箭矢不能从湖的一边射到湖的另一边。

乃沙不耳（Naysābūr）平原上的四个地区以富庶著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提到了这些地区，即沙麻忒（As-Shāmāt，即美景）、至今依然存在于乃沙不耳城西边的里万（Rivan）、麻祖儿（Mazūl）和卜失塔夫鲁失（Bushtafrūsh）等区。麻祖儿地区位于北边，其主要村庄是卜失塔坎（Bushtakān，或Bushtankān）村，距乃沙不耳城1里格，这里曾是萨法儿王朝君主异密修建的一个著名花园。这

个地区产的无核白葡萄特别有名。卜失塔夫鲁失地区现在称作普失·法鲁失（Push Farūsh），据穆喀达思记载，这个地区距乃沙不耳城的江（Jang）门东有1天的路程，亚库特说该地区有126个村庄，村庄盛产杏子，并大量外销。据穆喀达思记载，波斯人称沙麻忒地区为塔·阿卜（Tak-Ab），意为“流水之地”，这个地区的土地十分肥沃。里万地区距乃沙不耳城西有1天的路程，这里还有一座与地区同名的小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此城有座用砖修建的聚礼清真寺，城靠近河岸边。该地区的葡萄园很有名，并盛产榅桲树木材。

据穆思套菲记载，乃沙不耳地区的主要河流有舒剌·鲁得（Shūrah Rūd）河，即盐河，这条河与发源于底兹八（Dizbād）地区的河流汇合，在灌溉了各地区后，最终消失于沙漠中。穆思套菲还提到了其他很多河流，但这些河流的名称多拼写有误，现在很难确定。其中有些河流今天则不难判定，如发源于前文提到的察失麻·萨卜兹湖附近的卜失塔坎（Bushtakān）河，以及卜失塔夫鲁失（Bushtafrūsh）河，他说这两条河在春季河水暴涨时汇入舒剌·鲁得河。最后一条叫阿塔沙八（`Atshābād）河，即渴河，尽管春季时这条全长20多里格的河流的河水可推动20个磨盘，但在其他季节连一个人的渴也解不了，由此该河得了这个恶名。[8]

乃沙不耳城东南的呼罗珊道上，有一个被阿拉伯人称作喀思儿·里合（Kasr-ar-Rīh）的城堡，即风堡，波斯人则称作底合八（Dihbād或Dih Bād）驿站，在这里道路分为两支。此地的河流就是前文提到的汇入舒剌·鲁得河的诸河流中的一条。这里的道路正东可去往马鲁城；从驿站转向东南可到哈烈城。这条向东南的道路从底合八（Dih Bād）驿站起程，经过两程到达法儿哈丹（Farhādān）村，亚库特称这个村为法儿哈兹吉儿（Farhādhjird）。该村所在的地区属于乃沙不耳，穆喀达思称作阿思凡（Asfan）地区；在伊本·鲁斯塔的记载中拼写为阿失般兹（Ashbandh）；亚库特则记载为阿失凡（Ashfand），并说这个地区包括83个村庄。这个地区的旧称现在显然已不复存在了，但叫法剌吉儿（Farajird，即过去的法儿哈兹吉儿）的村庄就位于道里志所记载的方位上，在今天的地图上标出来了。[9]

将乃沙不耳城隔开的山脉，是多数流到乃沙不耳平原的河流的发源地，就在此城与山脉分隔的正东坐落着麻失哈（Mashhad，即殉教之地或依麻木的圣墓）城[10]，现在是伊朗呼罗珊地区的首府，从这座城往

北几英里就可看到途思（Tūs）旧城的废墟。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途思城是呼罗珊地区乃沙不耳区的第二大城市，由塔八兰（At-Tābarān）与奴坎（Nūkān）姊妹城组成，距该城两站就是位于萨纳八兹（Sanābādh）村的大花园，花园里有哈里发诃论·剌失德和第八代依麻木阿里·里扎（Imām `Alī-ar-Ridā）的陵墓，诃论卒于伊斯兰历193年（809年），阿里·里扎被马蒙毒死于伊斯兰历202年（817年）。萨纳八兹村也称作巴耳打阿（Barda`），意为“鞍垫”，或称为木撒喀卜（Al-Muthakkab），意为“被刺穿的”，可能是源自圣墓的窗户，或有其他想象的原因。[11]

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雅忽比称奴坎城区是途思城两个城区中较大的一个，但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塔八兰城区却超过了奴坎，并延续到亚库特的时代，那时途思城已被蒙古军队摧毁。早期时代，奴坎城区以用蛇纹岩（Barām）制造大量外销的石缸而闻名；附近的山区还有很多金、银、铜和铁等矿，开采中获利颇丰。途思城附近有绿松石、称作“檀香”（khumāhan）的石头、孔雀石（dahnaj），被运到奴坎城区出售。但途思城的这部分城区（奴坎城区）水资源极缺。塔八兰城区附近的城堡是座巨大的建筑，据穆喀达思记载，“从很远就能见到”，该城区市场上的商品十分丰富。这个城区的聚礼清真寺建造优美，装饰华丽。城附近的萨纳八兹村的圣墓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被围在一道坚固的城墙内，伊本·豪喀尔称这个圣墓中常聚集着朝谒的人群。在阿里·里扎墓的附近，异密·法亦·阿迷得·道剌（Amīr Faik `Amīd-ad-Dawlah）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穆喀达思说：“整个呼罗珊没有比这座清真寺更漂亮的了。”诃论·剌失德墓在依麻木（阿里·里扎）墓旁，在大花园附近建有很多房屋和一个市场。

对上述内容，亚库特在记载中没有补充多少新材料，但他提到了塔八兰城区最著名的陵墓之一——逊尼派大教义学家依麻木安萨里（Imām Ghazzālī）[12]的圣墓，此人卒于伊斯兰历505年（1111年），他曾在报达城的尼扎木（Nizāmīyah）学院[13]任院长多年。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据亚库特记载，途思之名通常用来指该城附近的地区，并说这些地区有1000多个繁华的村庄。但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所有这些地区，包括途思城的两个城区和萨纳八兹村的圣墓在蒙古军队的洗劫中被毁。遭到蒙古人的洗劫后，途思城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但邻近的圣墓在富有的什叶派人士的竭力关照下很快恢复了往日的辉煌；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第一次将萨纳八兹村记载为麻失哈

（Mashhad，即殉教之地），自此这里就被称作麻失哈了。

据可疾云尼记载，哈里发诃论·剌失德墓和阿里·里扎墓在同一座拱北（圆顶建筑）内，而后者只受到什叶派的敬奉，但他们并不知道哪个墓不可以去朝拜，因为奉哈里发马蒙（即诃论·剌失德之子，毒死了阿里·里扎）的敕命，两座圣墓修建得一模一样[14]。穆思套菲称当时麻失哈城已是一座大城市，城市附近是陵园，这里埋葬着很多名人，如前所述，安萨里的墓就在圣墓的东边，这座陵园中还有诗人费尔多思（Firdūsī）[15]的墓。城周边是肥沃的平原，被称作麻儿噶札儿·塔坎（Marghzār Takān），长12里格，宽5里格，这里盛产葡萄和无花果[16]。穆思套菲说途思地区的人“很高雅，对异乡人很友善”。

不久后，伊本·白图泰访问了麻失哈城的依麻木里扎（Imām Riḍā）墓，并做了全面详细的记载。他说麻失哈城是一座大城市，市场商品丰富，城市周边是山。（他还说）陵墓之上有一座巨大的圆顶建筑（穹顶），里面有圣墓，其附近有一座清真寺与一所学校（Madrasah）。所有这些建筑都极其优美，墙上整齐地镶嵌着瓦（Kāshānī）。上文的依麻木墓位于一个装饰有木雕的平台上，银牌镶嵌其中，很多银灯悬挂在四周的柱子上。进入穹顶的门楣镶嵌着白银，门帘是金绣的丝绒，穹顶内的地板上铺着很多精美的地毯。诃论·剌失德墓也覆盖着木雕，其上放置着蜡烛台，但有人对他的墓不够敬重，因伊本·白图泰说：“每个进入拱北里的什叶派信徒都用脚踢诃论·剌失德墓，但对依麻木里扎的墓表示崇敬。”[17]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Clavijo）在伊斯兰历808年（1405年）出使帖木儿的宫廷时，曾路过麻失哈城，隐约提到了这座恢宏的依麻木圣墓。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时基督徒可进入圣墓中，因当时波斯的什叶派不像现在这样盲目崇拜该圣墓。[18]

乃沙不耳城正西行4天路程，就是拜哈吉（Bayhak）地区的萨卜兹洼儿（Sabzivār）城[19]和胡思鲁吉儿（Khusrūjird）城[20]，两城仅相距1里格；萨卜兹洼儿城是该地区（拜哈吉地区）的首府，中世纪时该城通常被称作拜哈吉（Bayhak）城。拜哈吉地区向东一直到里万地区，四至各为25里格，亚库特称这里有321个村庄，他还说拜哈吉（Bayhak）之名源于波斯语中的拜哈（Bayhah或Bahāyin），意为“极慷慨的”。他说该城较准确的名称应是萨卜札洼儿（Sābzavār），人们一般简称为萨卜兹洼儿（Sabzvar）；胡思鲁吉儿城最初是该地区的首府，但在他那个时代各方面都逊色于萨卜兹洼儿城。穆思套菲说该城市场上方覆盖着

木制拱形顶棚，修建得很结实；该城周边地区种植着葡萄和其他水果，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是什叶派。[21]

从苦密思地区的必思坦城到乃沙不耳城有两条道路。较短的邮道沿沙漠边缘经过萨卜兹洼儿城。较长的商道向北穿行于辽阔的朱外因（Juvayn）丘陵平原地区，这个地区通过一个小山脉与“大沙漠”隔开。据穆喀达思记载，朱外因地区也称作古养（Gūyān）地区，十分富庶，盛产粮食，其首府为阿札兹洼儿（Azādhvār）或阿札洼儿（Azādvār）城[22]。该地区的北边为亦思法剌因（Isfarāyin）地区；该地区（朱外因地区）的西端，靠近苦密思地区边界的是贾贾儿木（Jājarm）城[23]，其周边是阿儿吉养（Arghiyān）地区。亚库特称阿札兹洼儿城附近差不多有200个村庄，并说这是座繁华的城市，还有很多漂亮的清真寺，城门外是一个供商人居住的大客栈（khān），该城的市场十分活跃。城周边的村庄有成片的果园，并一直延伸到河谷，灌溉用水是通过地下渠道从南山引来的。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穆思套菲记载，朱外因地区的首府变为法里玉麻（Fariyumad）城[24]，其位于阿札兹洼儿城南数英里处。阿札兹洼儿城向东商道上的重要驿站有忽答沙（Khudāshah）城[25]，这里是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之叔父哈吉·八儿剌思（Hājjī Barlās）被杀之地，阿里·亚兹底在其所著的历史文献中提到了该地。[26]

贾贾儿木城也叫阿儿吉养（Arghiyān）城，后一名称也特指其所在地区名，穆喀达思称这是座有城墙的坚固城市，有一座漂亮的聚礼清真寺，周边附属有70个村庄。据亚库特记载，在贾贾儿木城以东，据说有萨麻儿坎（Samalkan）或萨曼甘（Samankan）[27]、剌万尼儿（Ar-Rāwanīr，或Rāwansar）和班（Bān）[28]等三座城市，这些城市均在阿儿吉养或贾贾儿木（Jājarm）地区，但对其确切位置没有记述。他也提到了萨班吉（Sabanj）或亦思凡吉（Isfanj）城，穆思套菲称作卢八·萨万吉（Rubāt Savanj）[29]，该地至今还位于贾贾儿木城西南去往必思坦城的道路上。据穆思套菲记载，贾贾儿木城是一座中型城市，军队无法攻打该城，因该城周边1天路程范围内的平原上长满了一种动物不能食用的毒草。在该城的城堡脚下生长着两棵梧桐树（*chīnār*），如果星期三早晨嚼其树皮，则能治疗牙痛。穆思套菲还称这种树皮大量外销。该城周边地区的土地十分肥沃，种植着水果和粮食。贾贾儿木（Jājarm）河向南流，消失于沙漠中，他（穆思套菲）称这条河为贾干·鲁得（Jaghān Rūd）河，其源头为三股泉水，每股泉水都可以推动一个磨

盘，这些 泉水汇合后，形成了一条超过12里格的河，河水大部分用于灌溉。[30]

穆喀达思说亦思法剌因（Isfarāyin，或Asfarayn）大平原地区盛产稻米和优质的葡萄。这里的首府是与该区同名的亦思法剌因（Isfarāyin）城[31]，十分繁华，有很好的市场。亚库特说亦思法剌因城的古名叫密合剌建（Mihrajān），他称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以密合剌建之名来称呼该城废墟附近的一个村庄，该城附属有51个村庄。据亚库特记载，亦思法剌因之名最初写为阿思八剌因（Asbarāyīn），意为“持盾者”，这一词是从“盾牌”（Asbar）引申来的。据穆思套菲记载，亦思法剌因城的清真寺里有个他所见过的最大的铜碗，其外边缘周长有12腕尺。该城的北边是喀剌·札儿（Kal`ah-i-Zar）堡，即金堡，城里的用水则从城堡山脚下流过的一条河流中获取。该城周边种植着大量的核桃树；这里气候潮湿，但盛产葡萄和粮食。[32]

沼泽平原是流向西的阿塔剌（Atrak）河的发源地，同时也是相反方向东流的麻失哈（Mashhad）河的发源地，该平原上有苦蝉（Kūchān）城[33]，中世纪称作哈卜伤（Khabūshan，或Khūjān）城。该城所在地区被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作兀思土洼（Ustuvā）地区，并称这是个肥沃地区；据说这个地区名称的含义为“高地”；过了兀思土洼地区向东就是尼撒（Nisa）地区。亚库特说在他那个时代该地区（兀思土洼地区）首府的名称拼写为苦珊（Kūshān）城，并称该城附近有93个村庄。《世界志》中将其名称记载为苦蝉，穆思套菲则说虽在财税册中将该地区登记为兀思土洼地区，但在他那个时代通常不使用这个名称。他盛赞该城（哈卜伤城）附近富庶的平原地区，还说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蒙古统治者旭烈兀重建了哈卜伤城，其孙波斯伊利汗国统治者阿鲁浑（Arghūn）则全面扩建了该城。约在哈卜伤城与途思城中间就是剌坎（Rādkān）城[34]，伊本·豪喀尔提到了该城，亚库特称这是一座小城，这里以是塞尔柱王朝算端灭里·沙大宰相尼扎木·木儿可（Nizām-i-al-Mulk）的出生地而声名远扬。[35]

著名的纳萨（Nasā）或尼撒地区是一个宽阔的河谷地带，现在则被称作达拉·尕兹（Darrah Gaz，即天府之谷）。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尼撒（Nisā）城是座大城[36]，其规模和撒剌哈夕（Sarakhs）城一样，从附近的山上获得丰富的水资源。穆喀达思盛赞其优美的清真寺和很好的市场。他说几乎所有的居民院落均有花园，富庶的村庄星罗棋布于该城附

近的河谷地带。但亚库特说尼撒城是极不适宜居住的城市，主要原因是麦地那龙线虫（亚库特将该虫称作“麦地那虫”）在夏天几乎无法根除，在其侵害下，人们几乎无法生活。可疾云尼说这座城也被称作沙合儿·费鲁兹（Shahr Fīrūz），据说是以建立该城的古代波斯国王的名字命名的。[37]

从尼撒城向东越过山脉，在马鲁（Marv）沙漠的边缘是阿必洼儿（Abīvard）城[38]，此名也拼写为巴瓦儿的（Bāvard）[39]。穆喀达思说该城的聚礼清真寺就在市场中央，这里的市场甚至比尼撒城的还要好，常有商人光顾。穆思套菲盛赞这里产的水果，他还记载了阿必洼儿城所属的苦凡（Kūfan）附近的村庄里有个大哨所（*rubāt*），距该城有6里格。这个哨所是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由塔西儿王朝君主阿卜·阿剌（`Abd Allah）[40]修建的；其有4座门，中间修建有一座清真寺。阿必洼儿城所在的地区称作哈八兰（Khābarān）或哈瓦兰（Khāvarān）地区，其首府为密合纳（Mihnah）或麦哈纳（Mayhanah）城[41]；亚库特称这个地区的重要地方有阿兹贾（Azjah）、八赞（Bādhan）、哈尔瓦·贾八儿（Kharva-al-Jabal）和舒坎（Shūkān）等。但在他记载的时代，麦哈纳城已经被毁。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说哈瓦兰地区有很多优美的果园，他还将这个地区的名称记为哈瓦儿丹（Khavardān），并说诗人安瓦里（Anvārī）[42]曾居住在该地区的首府，此人活跃于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担任过塞尔柱王朝算端桑贾儿的宫廷诗人。[43]

阿必洼儿城与密合纳城之间的山区有巨大的天然城堡，现在称作吉剌·纳底儿（Kilāt-i-Nādir）[44]，是以纳底儿·沙（Nādir Shāh）[45]之名命名的，他是18世纪时波斯著名的国王，并在这里储存过他的财物。这座城堡没有被伊斯兰历3、4世纪（9、10世纪）的任何道里志或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提及过，亚库特也没有注意到。最早提及吉剌（Kilāt）城堡的是乌特比（`Utbī）所著的《哥疾宁的马合木史》（*History of Mahmud of Ghaznah*），他只是不经意地说一位异密（Amīr）“从乃沙不耳城到达吉剌（Kilāt），其阿拉伯语书写形式为喀剌（Kal`ah）”。穆思套菲简明扼要地记述了这一山区，并说这里的主要城市为朱儿木（Jurm）城与麻里南（Marinān）城[46]，并说吉剌（Kilāt）堡所在地区水资源丰富，除了高产的耕地外，城堡周边还有很多村庄。历史上，这个城堡因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被帖木儿包围而出名，后来城堡落入帖木儿之手，他对其做了全面的加固、重建，使其更坚固。

[47]

撒剌哈夕（Sarakhs）城[48]位于从途思城到大马鲁城的直道上，靠近麻失哈河的右岸或东岸，这条河现在被称作塔建（Tajand）河。该河没有被任何中世纪时期的地理学家的著作记载；如前所述，这条河（麻失哈河）发源于苦蝉城附近的沼泽，起初向东南流，流经麻失哈城。过该城约100英里后，从南岸接纳了一条叫哈烈（Herāt）河的大支流，而后向北流经撒剌哈夕城。再稍北，该河流到与阿必洼儿城处同一纬度的地方，在一个叫阿吉麻（Al-Ajmah，即芦苇滩）的地方消失于沙漠中，这里有很多红柳。伊本·豪喀尔和伊斯塔赫里均说塔建河只是哈烈河的一条支流。伊本·鲁斯塔持相同的看法，并说哈烈河（即塔建河的下游）在距撒剌哈夕城2里格处分出一条运河，直达该城（撒剌哈夕城）。从哈烈河分出的其他运河也灌溉着撒剌哈夕（Sarakhs）地区，尤其是一条叫苦失可·鲁得（Kushk Rūd，即干河）的运河，其河上修建有一座大石桥，但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经过撒剌哈夕城的这条干流河道中没有水。

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撒剌哈夕城是一座大城市，气候宜人，其规模是马鲁城的一半。撒剌哈夕地区的草原上放牧着大量的骆驼和绵羊，但其耕地由于经常缺水，收成不佳。穆喀达思盛赞该城的聚礼清真寺和很好的市场，并称在外城区遍布着很多花园。可疾云尼说这是座繁华的城市，并称这里产供外销的长围巾和用金线绣的面纱，极其精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穆思套菲记载，这座城的城墙周长有5000步，由一座坚固的城堡守卫。他说该城的饮水取自“源于途思与哈烈”（他没有提到塔建河）的河流，这是一条秀美的河流，饮用该河的水有助于消化，这条河也用来灌溉撒剌哈夕城周边的土地，这里盛产西瓜和葡萄。[49]

[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53、25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8、309、31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

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5页。

[2]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2页载："你沙不儿（Nīshāpūr）城是呼罗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其占地面积达1法儿萨，有很多居民。这里是商人的光顾之地，是军事统帅（sipāh-salārān）的驻地。这个城有城堡（quhandiz）、内城（rabat）、外城（shaharstān）。该城的绝大多数用水从泉水中获得，并通过地下管道输送。这里产各种纺织物（Jama）、丝绸、棉布。"今为你沙不儿（Nīshāpūr、Nīshābūr、Neyshābūr），是中呼罗珊省的一座重要城市，人口23.9万，为古今道路要冲。这里产的绿松石天下闻名。译者。

[3]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5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3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4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78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1页。你沙不儿（Nīshāpūr）名称中的第一个音节在古波斯语中为"尼兀"（Nīv或Nīk），在现代的波斯语中为"好"（Nīkū），阿拉伯语中的双元音Nay（sābūr）在现代波斯语中变为长元音，于是就有了你沙不儿，而阿拉伯语的b在波斯语中变为p音。见诺尔德克（Noldeke）《萨珊王朝统治时期的波斯与阿拉伯历史》（*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 zur zeit der Sassaniden*，该书全名由译者补），第59页。

[4] 今为迪尔汉姆，是一种圆形银币，重量各地不等，大约4.2克，是阿拉伯、波斯的主要货币之一。译者。

[5] 《人物字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第2卷，第131页）提到了兹雅教场门（Gate of Maidān Ziād），这个教场（Maidān）是以兹雅·阿卜·喇合曼（Ziād Abd ar-Ramn）的名字命名的；教场也是你沙不儿（Nishāpūr）城区的名称之一。译者。

[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54、25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0～31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

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4～316、329页。

[7] 坎哈（*Kamkha*），汉语意为“金花锦”。译者。

[8]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0、316、31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630页；第3卷，第228～231页；第4卷，第391、857、858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80、8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5、206、219、220、226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28页。有关察失麻·萨卜兹（Chashmah Sabz）和风洞，见亚特（C. E. Yate）《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351、353页。这两处地方至今在呼罗珊地区还很有名。

[9]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0、31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80页；第3卷，第88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

（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6、197页。

[10] 即今马什哈德，是中呼罗珊省省会，人口31万，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连接东西交通的干线。译者。

[11] 木撒喀卜是给各种城堡起的一种名称，一座同名的城堡在麻思撒（Al-Massīsah，即Mopsuestia）城附近，在第9章第130页已提到。八儿答（Barda`）的名称来源无从解释。奴坎（Nūkān）读为奴干（Nūgān），至今是现在麻什哈德（Mashhad）城的西北城区和门户，从这里显然可以通到途思城的奴坎，萨纳八德（Sanābād）河至今还为麻什哈德城西北城区供水，见亚特（C. E. Yate）《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316、317页。

[12] 依麻木安萨里（Ghazzal，1058～1111年）是教义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教育家，也是苏非派与正统逊尼派相调和的集大成者。他出生于途思城，早年求学于你沙不儿城等地，1091年起担任尼扎木（Nizamiyah）学院的院长，并致力于研究教法、伊斯兰哲学、苏非学说等学问，1095年突然辞职，以苏非信徒的身份，先后游历了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开罗、亚历山大等地，并于1096年赴麦加朝觐。1106年应塞尔柱王朝新宰相法赫儿·木儿可（Fakhr Mulk b. Nizām-i-al-Mulk，是尼扎木·木儿可之子）的邀请返回你沙不儿尼扎木学院任教，3年后辞职，隐居其故乡途思城，1111年12月去世后，就葬在该城。安萨里一生中著作甚丰，其有名者为《宗教学的复兴》（*Ihya` al-`Ulum id-Dīn*）》和《哲学家的矛盾（*Tahafut al-Falasif*a）等。译者。

[13] 尼扎木学院是以塞尔柱王朝算端灭里·沙的宰相尼扎木·木儿可（Nizām -i-al-Mulk）名字命名的学院，被认为是穆斯林地区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在经费、政治等方面得到了塞尔柱王朝及以后王朝的支持，这所学校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在各地享有盛名，同时在巴里黑城、你沙不儿城、亦思法杭城等地设有同名的学院。译者。

[14] 《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的作者在该书第133页中称："我听到途思的其中一位耆老说埋葬诃论·剌失德的墓其实是里扎的，里扎的墓实际是诃论的。这两个墓彼此很近。这种调换是马蒙安排的。实情如何，真主最清楚。"译者。

[15] 费尔多思（Firdūsī，940～1020年）是波斯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出生于途思城，他精通阿拉伯语、中古波斯语，生活于哥疾宁王朝统治时代，并撰写有《列王纪》（*Shāh Nama*），该诗长达60000双行，叙述内容的时间跨度在4000年以上，从开天辟地写到651年萨珊王朝灭亡，内容包括传说故事、神话、历史等，是波斯民族意识复兴的重要体现。这本书有张鸿年等学者的中译本。译者。

[16] 《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第133～134页载："途思的特产有墨玉，这是运销到世界各地的独特产品，这里的白石被用来制作烹锅、烧锅和香炉；人们用这种石头做任何物件，通常以其制作玻璃，然后再做成酒杯、水壶等。"译者。

[17] 汉译本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没有这段文字。译者。

[18] 这位依麻木的名字被当今波斯人读为里扎（Rizā）。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77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57、25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9、333、35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154、486、560、561页；第4卷，第824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6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6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4卷，第77～79页。《克拉维约东使纪》（*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avijo*，Hakluyat Society本），第110页。“使团参观了清真寺，此后其他地方的人听说他们到过这个圣墓，这些人就亲吻他们的衣服，并说他们是朝拜呼罗珊（Horazan）圣墓的人。”

[19] 即今萨卜泽瓦尔（Sabzevār），也即白海哈吉（Beihagh，Beyhaq），是中呼罗珊省的重要城市，人口20.8万，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译者。

[20]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2页载：“萨卜兹洼儿（Sabzivār）城是去往剌夷道路上的小城（*shahrakī-st khurd*），是一个地区的首府。”“胡思鲁吉儿（Khusrau-jird，即Khusrūjird，引者）城是靠近萨卜兹洼儿的小城。”译者。

[21]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7、31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

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804页；第2卷，第44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6页。有关拜哈吉城的遗址，见亚特（C. E. Yate）《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398页。

[22]《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2页载："阿札兹洼儿城在去往朱里章（Gūrgān）城的道路上，是在沙漠边缘上的一座惬意的小城。"今为阿扎德瓦尔，是中呼罗珊省焦加塔伊（Joghatāy）州赫拉里（Helali）区的一个村镇，人口千余，是去往内沙布尔、里海等地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23]《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2页载："贾贾儿木城是去往朱里章城道路上的边境小城。该城是朱里章，以及苦密思、你沙不儿的商业中心（原文如此）。"今为贾贾尔姆（Jājarm），是北呼罗珊省贾贾尔姆州州府，人口2.5万，是去往里海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泉州发现的碑记中有关于在这里出生的人的记载，他们在泉州生活，并在死后葬在泉州。译者。

[24] 今此城不存，应距阿扎德瓦尔不远。译者。

[25] 此地今天只是北呼罗珊省贾贾尔姆州居勒格赫·散赫瓦斯特（Jolgeh Sankhvast）区的一个村子。译者。

[26]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30页；第2卷，第16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6、196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58页。这个距阿札洼儿城

东有4里格的忽答沙（Khudāshah）城和距阿札洼儿城北差不多4里格的忽剌沙（Khurāshah）城有时会混淆。这两个地名的阿拉伯文写法基本相同。

[27] 此地名以北呼罗珊省麻那赫与萨拉勒干（Maneh o Samalqan）州州名及该州所属萨拉勒干区区名的形式保留。译者。

[28] 这两座城市今不存。译者。

[29]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30]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09、249、485页；第2卷，第4、742页；第3卷，第35、14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6、196、220页。

[31]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2页提到了亦思法剌因城，只是写法稍稍变化，写为思八剌因（sabarāyin，即siparāyin）。今为埃斯法拉延（Esfarāyen先前称 Meyanābād，Mīānābād，Mīyānābād），是北呼罗珊省埃斯法拉延州州府，人口5.1万，为通往伊朗北部、里海、马什哈德等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2]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46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6页。中世纪的亦思法剌因城（以这个名称呼的平原存在至今）可能就是叫沙合儿·必儿吉思（Shahr-i-Bilkīs）的遗址，见亚特（C. E. Yate）《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378、379页。

[33]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2页提到了苦蝉城，写为呼健（Khūjān）。今为古昌（Qūchān），是中呼罗珊省古昌州州府，人口9.6万，是去往马什哈德、里海等地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4] 今为拉德坎（Rādkān），是中呼罗珊省恰纳兰（Chanārān）州中心区的一个乡名，人口1.1万。译者。

[35]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8、31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43页；第2卷，第400、487、73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6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193页。现在的布吉奴尔德（Bujnurd）城位于亦思法剌因城以北，距苦蝉西北60英里，是在几个世纪以前修建的，但这座城附近还有个更古老的必兹赞（Bizhān）城，毁掉的城堡遗址被称作喀剌（Kal`ah），存在至今。见亚特（C. E. Yate）《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195、196页；赛克斯上校《波斯万里行记》（*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第22页。

[36]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3页提到了纳萨城，载：“这里气候很糟，但水资源丰富。”译者。

[3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2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776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11页。尼撒（Nisā）城可能是

现代的穆罕默德巴德（Muhammadābād）城，是达拉·尕兹（Darrah Gaz）地区的首府。

[38] 今此城已毁，位置大致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城以东90公里处的卡赫卡（Kaakhka）镇附近。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和要道，今天也是土库曼斯坦的要道。译者。

[39]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3页提到了巴瓦儿的（Bāvard）城，“其位于山脉与沙漠之间。这里有大片的耕地，气候宜人，人民善战”。译者。

[40] 阿卜·阿剌（`Abd Allah）于830～845年在位。译者。

[41]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3页提到了麦哈纳城，其在沙漠里，位于巴瓦儿的地区。这座城市今天已变为一个村子，位于土库曼斯坦阿哈勒（Ahal）州谢拉赫斯城西北约60公里处。古代是连接纳撒与萨尔赫斯的要道。译者。

[42] 安瓦里（Anvārī，1116～1189年）是塞尔柱王朝著名的宫廷诗人，撰写过大量的颂诗（qasida），并得到了统治者的大量馈赠。此人大部分时间生活于你沙不儿、马鲁、巴里黑等城。译者。

[43]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21、33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11、232、462页；第2卷，第383、395、428页；第3卷，第337页；第4卷，第321、72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9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82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18页。哈瓦兰之名的较古写法为哈儿瓦兰（Kharvarān），意为“西部地区”（与此相对的就是呼罗珊，即东部地区），这个位于马鲁（Marv）城沙漠边缘山脚下的小地区的名称至今还保存

着，最初指不包括呼罗珊地区（东部地区）的所有波斯西部地区。

[44] 今为卡拉特·纳迪尔（Kalāt-e Nadirī），位于中呼罗珊省卡拉特（Kalāt）州，是一个小镇的名称。古代这里是去往纳撒、木鹿等地的重要通道。译者。

[45] 纳底儿·沙·阿夫沙儿（Nadir Shah Afshar，又译纳迪尔·沙赫·阿夫沙尔，1688～1747年）是波斯短命的阿夫沙儿（Afsharid）王朝的建立者。此人出身于呼罗珊无名望家族，以偷盗起家，后组织起3000人的盗匪军，自任头目，并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王朝，于1736～1747年在位，曾劫掠过阿富汗、印度的德里等地，1747年被当地封建势力暗杀，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的军事才能可与拿破仑相比。译者。

[46] 这两座城的名称今已不存。译者。

[47] 乌特比［《右臂》（*Kitāb-i-Yamīnī*），雅敏·道剌（Yamīn al-Dawlah）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赐给哥疾宁王朝著名统治者马合木的封号，意为“国家的右臂”，译者补］，阿拉伯文本（开罗，伊斯兰历1286年），第1卷，第215页；波斯文本（德黑兰，伊斯兰历1272年），第15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7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34、337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23页。波斯语中的吉剌（Kilāt，或Kalāt）等同于亚美尼亚语中的喀剌（Qalaq），意为“城市”，在阿拉伯文中其以熟知的形式喀剌（Kal`ah或Kal`at）出现，意为“城堡”。麦克格里高尔（Macgregor）上校于1875年造访过吉剌·纳底儿（Kilāt–i-Nādir）城堡，并做了详细的记述（《呼罗珊旅行记》，第2卷，第51页）。

[48]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误作“撒剌哈歹”，应是撒剌哈夕的笔误。《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4页载：“撒剌哈夕（Sarakhs）城位于草原中间的道路旁。一条干河道穿过市场。这条河道只有在发洪水时才会有水。这里有很多耕地，人民健壮，好战。骆驼是他们的财富。”今天这个城市有两个名称，在伊朗一边的被称作萨拉赫斯（Sarakhs），是中呼罗珊省萨拉赫斯州州府，人口3.3万；在土库曼斯坦一边的称作谢拉赫斯（Serakhs），人口约1万，属于土库曼斯坦阿哈勒（Ahal）州。

一般学者认为后一座城市是古代的同名城址所在地。这里是去往布哈拉、马什哈德等地的捷径，也是丝绸之路上极其重要的城市。译者。

[49]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3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3、32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2、213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6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9页。现代的撒剌哈夕城位于塔建河西岸。

第二十八章 呼罗珊（Khurāsān）地区（续）

马鲁（Marv）专区。木儿噶卜（Murghāb）河。大马鲁（Marv）城及其村庄。乌浒水岸边的阿木（Amul）城和札木（Zamm）城。马鲁·鲁得（Marv-ar-Rūd）或小马鲁（Marv）城以及喀思儿·阿合纳（Kasr Ahnaf）城。

呼罗珊地区的第二个专区就是马鲁（Marv）专区[1]，是位于木儿噶卜（Murghāb）河或马鲁（Marv）河岸边的地区。这条河发源于哈烈（Herāt）城东北的古儿（Ghūr）山区，然后流经小马鲁（Marv）城[2]，再向北流经大马鲁（Marv）城，在此地，该河分出很多运河，而后这条河消失在古思（Guzz）沙漠中，该河与塔建河或哈烈河的沼泽处同一纬度，但在哈烈河以东约70英里处。

马鲁专区除了在木儿噶卜河沿岸分布着城市外，呼罗珊道沿线也有城市分布，此道经马鲁城向东北，在阿木（Amul）城附近经过乌浒水，然后到达不花剌（Bukhārā）城。

伊本·豪喀尔说木儿噶卜（Murghāb或Marghāb）河最初被称作马鲁·阿卜（Marv-āb），即“马鲁水”[3]；但伊斯塔赫里说木儿噶卜河是以其发源地来称呼的。穆喀达思称木儿噶卜意为“两个马鲁的河”，并说这条河先流经上（小）马鲁城，然后到达下（大）马鲁城。在距大马鲁城南1程的河道上，修建有人工堤坝，其坝面是用木料做成的，以防止河道变形。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座堤坝由专门任命的水利官员异密（Amīr）管理，该官员手下有10000名工人和骑兵，并监管堤坝的安全和调节供水。在堤坝上有一个计量水位高低的标尺；水量充足的年份，其刻度比堤坝低水位要高出60个大麦粒，那么人们就会欣喜，但在缺水的年份仅达6个大麦粒。

在距大马鲁城南1里格的地方，这条河的河水被拦截在一个大圆形池子里，而后4条运河呈放射状流向该城各个内城区和外城区。池子的

高度是按水闸高低来确定的，一旦到了洪水期这一重大时刻，所有的河水将被堤坝拦截，接着按规则分配被拦截的河水。这4条主要的运河分别为忽里模子法剌（Hurmuzfarrah）运河，向西流；向东流的麻建（Mājān）运河，纳赫儿·札儿可（Nahr Zark）或剌兹（Ar-Razīk）运河，纳赫儿·阿萨底（Nahr As`adī）运河。这4条运河中，纳赫儿·麻建（Nahr-al-Mājān）运河看来应是木儿噶卜河的干流，流经该城横跨着很多浮桥的外城区后，又流向沙漠荒原，其多余的河水则最终消失于沼泽中。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亚库特说木儿噶卜河在他那个时代被称作剌兹（Razīk）河（可能就是上文提到的同名运河），还说这个名称常被误拼为札里（Zarīk），在《世界志》中还有第三种拼写，即扎儿八（Zarbak）。穆思套菲也提到过这些名称，但在他那个时代，木儿噶卜河是普遍使用的名称，此名至今为人所熟知。[4]

中世纪时期，大马鲁城[5]被称作马鲁·沙黑建（Marv-ash-Shāhijān）城，以别于马鲁·鲁得（Marv-ar-Rūd）或小马鲁城，沙黑建（Shāhijān）可能仅是古波斯语沙干（Shāhgān）的阿拉伯语书写形式，意为“国王的”或“属于国王的”，但亚库特和其他著述者则称作沙·建（Shāh-i-jān），意为“国王生命的”。伊本·豪喀尔、穆喀达思和伊斯塔赫里均称马鲁城包括有“修建得很高大，本身就像一座城一样大”的内城堡（Kuhandiz），围绕着此城堡的是有四座城门的内城，过了内城就是沿各大运河岸边伸展开来的广阔外城区。内城的四座城门为西南的八卜·麦地那（Bāb-al-Madīnah）门，从撒剌哈夕城起程的道路通向该门；东南的八卜·三建（Bāb Sanjān）门，朝向八尼·麻汗（Banī Māhān）外城区和阿萨底（As`adī）运河；东北的八卜·答儿·麻失坎（Bāb Dar Mashkān）门，从该门起程的道路通向乌浒水；西北的八卜·八临（Bāb Bālin）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马鲁城有三座聚礼清真寺，第一座为城堡内的清真寺，叫八尼·麻汗·贾米（Banī Māhān Jāmi）清真寺；第二座为麦思只·阿乞（Masjid-al-`Atīk）清真寺，即老寺，位于有去往撒剌哈夕城道路通过的八卜·麦地那城门旁边；最后一座为麻建（Mājān）外城区的新寺，位于与外城区同名的城门外，这里有马鲁城的大商业区。

剌兹（Razīk）运河流经该城，经八卜·麦地那城门与老寺，而后河水被拦截下来，并储存于各水池，以供这一城区的居民使用。剌兹运河的西边为麻建（Mājān）运河，向麻建（Mājān）外城区供水，该城区有麦丹（Maydān），即公共广场，其边上就是新寺、总督府和监狱；

所有这些建筑都是阿拔斯王朝的大忠臣阿卜·穆斯林（Abu Muslim）修建的。据历史文献记载，正是由于他的卓著功绩，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才得以荣登哈里发大位。这个城区有一座用砖砌成的穹顶房屋，据伊斯塔赫里记载，其穹顶直径为55腕尺，据说这里是印染阿拔斯王朝第一件黑衣的地方，于是这种颜色成为新王朝显著的服色[6]。

如前所述，纳赫儿·麻建运河的西边就是忽里模子法剌运河，其位于马鲁外城区边上，这条运河的两岸就是塔西儿王朝忽辛（Husayn）[7]修建的居民区和城区，他将很多市场搬迁到这个城区。后来，亚库特提到麻建（Mājān）西外城区，并谈及了该城区的两条主要大街，其位于上麻建城区，通常称作八剌儿建（Barārjān，即八剌答儿·建，Barādar-Jān，意为“兄弟之生命”）街和吐火罗·必合（Tukhārān-bih[8]）街。忽里模子法剌运河最后流经木儿噶卜河沼泽附近的同名城市忽里模子法剌（Hurmuzfarrah）城[9]，这座城市有自己的聚礼清真寺。距忽里模子法剌城1里格的地方有八珊（Bāshān）城[10]，也有自己的聚礼清真寺，彼此相距1里格的哈剌（Kharak），或哈剌（Kharah）和速三坎（As-Sūsankān）两个村庄位于靠近马鲁城的一边，村庄很大，均有聚礼清真寺。

马鲁城向西1站之地就是被叫作辛吉（Sinj，穆喀达思的记载中拼写为Sink）的城市[11]，其位于分布有很多果园的运河岸边，该城有座优美的聚礼清真寺。距该城两站之地，在马鲁城西南通往撒剌哈夕城的道路上，有重镇丹丹坎（Ad-Dandankān）[12]。这是座小城，只有一座城门，但有坚固的城墙，城墙外是热水浴室（Hammām）。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亚库特见过该城的遗址，这座城在伊斯兰历553年（1158年）毁于古思人之手。这里就是马鲁绿洲农业区的西南边界，距马鲁城有1天的路程，而在去往不花剌城道路上的苦失麦汗（Kushmayhan）城[13]则是马鲁绿洲农业区的东北边界。据雅忽比记载，苦失麦汗或苦失麻汗（Kushmāhan）城附近因产一种叫苦失麻汗的葡萄干（*Zabīb Kushmāhanī*）而闻名。这座城有一座优美的聚礼清真寺和很多不错的市场；该城的用水来自一条大运河，这里还有很多旅店和澡堂；其周边的地区分布着果园，并盛产水果。

马鲁城的答儿·麻失坎（Dar Mashkān）城门外不远，在通向苦失麦汗城的道路上矗立着一座马蒙的大宫殿，这里就是他将其兄阿敏从报达城的哈里发之位赶下去之前居住的地方，当时马蒙将宫廷设在马鲁城。

马鲁城的东南城门—八卜·三建门，面向阿萨底（As`adī）运河，其岸边是八尼·麻汗（Banī Māhān，Mīr Māhān）外城区，这里有马鲁·麻儿祖班（Marv-i-Marzubān）府，波斯语意为“总督府”。从城门起程的道路沿木儿噶卜河北上，经喀林因（Al-Karīnayn）城[14]，可直达马鲁·鲁得城。从马鲁城再北行6里格就到达位于木儿噶卜河岸边的岐兰吉（Jīranj，穆喀达思记载为Kīrang）城[15]，过此城1里格就是札儿可（Zark）城[16]。这里有一个磨坊，是萨珊王朝末帝伊嗣埃（Yazdajird）三世逃亡后的避难地，磨坊主人因贪图他身上所佩戴的珠宝而将他杀害。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在札儿可城附近，从木儿噶卜河分出第一条运河，这条运河灌溉着马鲁城附近的果园。这些果园历来以产甜瓜而闻名遐迩，该地产的阿魏根（ushturghāz）也很有名，外销到呼罗珊的其他地区。这里还大规模养蚕，因此马鲁地区出产的丝织品很有名。[17]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后半叶，据穆喀达思记载，马鲁城城区的1/3已毁，城内的城堡也残破不堪。但该城在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的伊斯兰历5世纪（11世纪）进行了扩建，并成为要冲，塞尔柱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算端桑贾儿在伊斯兰历552年（1157年）去世后被安葬于此，至今还可以见到其陵墓的遗迹。伊斯兰历616年（1219年），亚库特来到马鲁城，他说算端桑贾儿的陵墓位于装饰着蓝瓦的高大穹顶（建筑）下，还说这个穹顶很高，从1程远的地方就可望见；从穹顶上的窗户可以看到附近的聚礼清真寺。亚库特又说这座穹顶是算端桑贾儿去世很长时间后，其仆人为纪念他而修建的。距马鲁城2里格的安怛罗缚婆（Andarābah）村，是算端桑贾儿的个人私产，他所建宫殿的遗址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还存在，亚库特说其围墙虽保存完好，但其他部分已毁，他还说附近的村庄也已沦为废墟。

据亚库特记载，在他那个时代，马鲁城有两座主要的聚礼清真寺，各有一道单独的围墙，一座属于哈纳菲（Hanaf）派，另一座属于沙费依（Shāfi`ī）派。为给编撰地理大辞典收集材料，亚库特在马鲁城生活了3年，因在蒙古人西征以前，马鲁城的图书馆很有名；据他记载，“要是蒙古人没有来，我本该一直居住在这座城市，直至老死”，但后来他还是“难以割舍地离开了”。在这些图书馆中，他提到了位于聚礼清真寺的两座图书馆，即藏书有1200多卷的阿兹兹牙（`Azīzīyah）图书馆和喀麻里牙（Kamālīyah）图书馆。这里还有沙剌甫·木儿可（Sharaf-al-Mulk）[18]建于学校（Madrasah）内的图书馆，以及塞尔柱王朝宰相尼

扎木·木儿克修建的图书馆。其中比较古老的图书馆是萨曼（Sāmān）王朝时期修建的一些图书馆和一座位于兀麦底牙（`Umaydīyah）学院内的图书馆，还有可敦尼牙（Khātunīyah）学院里的一座图书馆，以及麻吉·木儿可（Majd-al-Mulk）[19]所建的一座图书馆。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哈纳喀（Khānkāh，即道堂），或迭里迷失（Darvīsh）道堂内的祖麦里牙（Dumayrīyah）图书馆，据亚库特记载，这家图书馆的藏书虽只有200卷，但每卷值200迪纳，因这些书籍均为孤本，是无价之宝。

在蒙古军队到来的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亚库特避难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毛夕里城，蒙古人攻入马鲁城后，所有那些值得称道的图书馆都被付之一炬，这座大城市也遭到洗劫，据说当时暴露于城市废墟中的尸首达900万具。伊本·阿喜儿说算端桑贾儿的陵墓，以及大部分的清真寺与其他公共建筑都被蒙古人一把火烧了。哈菲兹·阿卜鲁还说他们毁掉了木儿噶卜河上的所有大坝和河堤，这些堤坝是在塞尔柱王朝统治初期增修，并精心加以管护，以保证绿洲灌溉的，但自此（堤坝被毁）以后绿洲变成了沙漠盐泽。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经过马鲁城时，这里还是一片废墟。

和他（伊本·白图泰）同时代的穆思套菲记载了马鲁城在伊斯兰历2世纪（8世纪）的辉煌，当时阿卜·穆斯林任这里的总督，正是他将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扶上了宝座，哈里发马蒙在未到报达城以前，就居住在该城。后来萨法儿王朝将呼罗珊的首府迁往乃沙不耳城，塞尔柱王朝时又将首府迁回原来的马鲁城，算端灭里·沙修建了环绕该城的大城墙，其周长为12300步。马鲁绿洲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极高；穆思套菲称第一年播种的作物种子可获100倍的收成，第二年没有收回来留在地里的种子可获30倍的收成，在第三年原地耕种可获10倍的收成。这里气候潮湿，却不宜人，麦地那龙线虫（rishtah）是一种可怕的灾害。附近流动的沙漠在他那个时代已淹没很多肥沃的土地，但这里产优质的西瓜，也产葡萄干和梨，并大量外销。

据穆思套菲记载，当时马鲁城几乎差不多成为一片废墟，但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其应该恢复了往日的一些辉煌，帖木儿在征服战争期间，常驻留于马鲁城。据阿里·亚兹底记载，他常住在一个叫麻汗（Mākhān）的地方，可能是麻建（Mājān）城区的笔误[20]，如前所述，在早期，这是马鲁城西城区的名称，但亚库特提到了该城附近一个叫麻汗村的地方。伊斯兰历812年（1409年），即帖木儿之孙沙哈鲁

（Shāh Rukh）[21]在位时期，马鲁城大部分城区得以重建，可能部分恢复到先前的程度，因此伊斯兰历821年（1418年），哈菲兹·阿卜鲁称这座城比以前更加恢宏繁华。[22]

马鲁城东北约120英里，在乌浒水左岸矗立着阿木（Amul，又译阿姆）城，这里是呼罗珊道通向不花剌城与河外地区的所经之地，再往东行100多英里，在同一河流的上游就是札木（Zamm）城[23]，这里也是一个十字路口。中世纪后期，阿木城也称作阿木牙（Amūyah）城，后来又称为察哈儿·朱夷（Chahār Jūy，即“四条河”，现在依然使用这个名称）城[24]。据伊本·豪喀尔记载，阿木城是座富庶、惬意的小城，这里因是乌浒水以外地区的商队常往来的通道而成为要冲。马鲁城西南的所有道路，在其沿途每个驿站均有水井，但阿木城周边的地区则完全被沙漠包围，并一直逼近该河岸边。穆喀达思盛赞位于阿木城的极好的市场。该城还有座修建在小山上的聚礼清真寺，城距乌浒水有1里格，两者之间是灌溉地，并建有葡萄园。阿木城对面的乌浒水右岸有不花剌（Bukhārā）地区的费拉卜儿（Firabr）城[25]。

为了区分这座阿木城和与之同名的陀拔思单首府（见原文第370页），亚库特将这座城称作阿木·札木（Amul-i-Zamm，即以乌浒水上游的渡口命名），或称阿木·质浑（Amul-i-Jayhūn，质浑河即乌浒水），或称阿木·沙（Amul-ash-Shatt，即乌浒水），甚至称为阿木·麻法札（Amul-al-Mafāzah，即阿姆河沙漠）等。但在他那个时代，阿木城被称作阿木（Amū）或阿木牙（Amūyah）城，在记述蒙古西征或帖木儿武功活动的文献中常提到这一名称。这座城也常被称作喀剌·阿木牙（Kal`ah Amūyah），即阿木牙城堡。伊斯兰历11世纪（17世纪），阿布·勒·噶兹（Abu-l-Ghāzī）在叙述成吉思汗的征服行程时，将该城名称记为阿木牙城，但谈到自己所处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则记为察哈儿·朱夷城，即指乌浒水的河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两个地方实为同一地。札木城也在呼罗珊地区一侧的乌浒水岸边，如前所述，它就是现代的凯尔基（Karkhī）城，其对岸就是中世纪的阿合思萨（Akhsīsak）城，位于通往不花剌城的道路上。伊本·豪喀尔说札木城的规模和阿木城一样大，从阿木城沿乌浒水上行4天的路程，才能到达呼罗珊地区的札木城，原因是札木城与马鲁城之间被无水的沙漠阻隔，无法直行。从札木城向东可达巴里黑（Balkh）城，而后越过乌浒水，可到忒耳迷（Tirmidh）城。穆喀达思很简要地提到了札木城，并说该城的聚礼清真寺在市场里，可见该城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已成为一个相当

重要的地方。[26]

现在回到木儿噶卜河，位于这条河上游、距大马鲁城约160英里的地方就是上（小）马鲁城，木儿噶卜河流经古儿（Ghūr）山区后，在此地向北转，经沙漠到达大马鲁城。穆喀达思和其他著述者所称的小（上）马鲁城就是波斯人所称的八剌·木儿噶卜（Bālā Murghāb），即上木儿噶卜城。这座城在帖木儿手中遭受重创，现在已完全成为一片废墟。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后，该城被称作马鲁·鲁得（Marv-ar-Rūdh）城[27]，或“马鲁河”城，是这里人口极稠密地区的最大城市，城里有4座聚礼清真寺。这座城（马鲁·鲁得城）距木儿噶卜河只有一步之遥，其间是果园和葡萄园，离西边的山脉有3里格，东边距山有2里格。市场里有一座聚礼清真寺，穆喀达思称这是用木柱建成的建筑，库达玛说距上马鲁城（他如此称呼）1里格的山中有座喀思儿·阿木儿（Kasr-`Amr）城堡，其靠近一河谷的出口。亚库特说在他那个时代马鲁·鲁得之名被民间读作马鲁（Marrūd）。由此看来，这座城市在蒙古人西征之时并不像大马鲁城那样遭到洗劫，似是逃过了完全被毁的厄运。不管怎么说，据穆思套菲记载，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这里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其城墙周长为5000步，由塞尔柱王朝的灭里·沙修建。其附近地区的土地极其肥沃，盛产葡萄和甜瓜，物价低廉。[28]

距马鲁·鲁得城1天路程，在木儿噶卜河下游的岸边、去往大马鲁城的方向有叫喀思儿·阿合纳（Kasr Ahnaf）[29]的城堡，名称取自阿拉伯将领阿合纳·伊本·凯亦思（Al-Ahnaf Ibn Kays），他在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时期的伊斯兰历31年（652年）征服了这些地区，并将其纳入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伊本·豪喀尔说这是一座大城，其附近有很多葡萄园和优美的花园，土地和气候也很好，穆喀达思提到了城里位于市场内的聚礼清真寺。今天喀思儿·阿合纳城堡的位置被确定为波斯人所称的马鲁察叶可（Marūchak），或马鲁·库赤克（Marv-i-Kūchik，即小马鲁）村所在地。中世纪时期，马鲁·鲁得城以北4里格处有底札（Dizah）城[30]，其横跨在木儿噶卜河两岸，两个城区是通过一座石桥连接起来的，城里也有一座优美的聚礼清真寺，亚库特还说这座城最初被称作欣万（Sinvan）城。

盘只·底合村（Panj-dīh，即五个村庄）[31]在马鲁察叶可村之南的木儿噶卜河岸边，伊斯兰历437年（1045年）纳思儿·忽思罗在去往麦加的途中路过这里；伊斯兰历616年（1219年），亚库特来到此地，并称这

是座优美的城市。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记述帖木儿时代的文献也提到过该地，当时阿里·亚兹底说这里被称作盘底（Pandī，但读音无法确定，有些抄本中则写为Yandī）。中世纪早期，木儿噶卜河从小马鲁城到大马鲁城河段两岸的所有土地都是耕地，村庄和城市星罗棋布。如前所述，喀林因（Al-Karīnayn）城位于大马鲁城以北4站之地，距小马鲁城南有2站。在喀林因城和小马鲁城的中途是牢喀儿（Lawkar）或牢喀剌（Lawkarā）城[32]，穆喀达思称这是座繁华的城市，与喀思儿·阿合纳城一样大。马鲁·鲁得城以北，从木儿噶卜河北上到噶儿吉思田（Gharjistān）山区的全部地区，有很多繁荣的地区，这些地区将在下一章叙述哈烈（Herāt）专区的古儿（Ghūr）地区时谈及。[33]

[1] 斯特拉波所著的《地理学》（*Geography*，第6卷，第4章，第253页）中常将此地区与哈烈并提，还称马鲁吉亚纳（Margiana，即马鲁，引者）和也里地区一样，“但平原地区周围是沙漠。安都（Antiochus Soter，塞琉西帝国皇帝，前293~前261年在位）赞美过此地的肥沃；他还修建了周长为1500斯塔德的城墙，所建的城市被命名为安都（Antiocheia）城。这里的土地适宜葡萄生长”。译者。

[2] 《元史·太祖本纪》作马鲁察叶可，即今阿富汗巴德吉斯省省会巴拉穆尔加布（Bālā Murghāb）城。或应是巴拉穆尔加布城西边的马鲁恰克（Mūrchāq），是座小城。此城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译者。

[3]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3页载：“另一条河叫马鲁河，发源于噶儿只思田（Gharchistān）的边界，这里是噶儿只思田和古儿地区的分界线。这条河流经八珊（Bashīn，即Bashān，引者），穿过山谷，经过马鲁得（Marūdh，即马鲁·鲁得，引者）、底兹·黑纳（Diz-i-Hinaf，原文如此）、鲁噶儿（Lōgar）、Brkdr（Barakdiz？）、岐兰吉（Girang），到达马鲁城，在这里，其河水被用来灌溉。”今为穆尔加布河，全程850公里，发源于阿富汗中西部山区，起先向西南流，在巴拉穆尔加布城之北不远，向西北流入土库曼斯坦境内，最后消失在卡拉库姆沙漠。巴拉穆尔加布城以南的河谷地带是古今重要的农业区，也是交通要通，连接着丝路干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河下游有多条支流汇入。译者。

[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60、26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30、33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77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14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28页。哈菲兹·阿卜鲁将木儿噶卜河最终消失于沙漠的地方称作麻雅卜（Māyāb）。Hfz.，第32b叶面。至于马鲁城周围的地区，参见地图十，原书第447页。60颗大麦粒（Sha`īrah）约为一腕尺。

[5] 《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第135页载："在伊斯兰时代，该城长期以来是呼罗珊地区总督府所在地，只是到了阿卜达喇·塔西儿（`Abdallāh b. Tāhir）时期才迁往你沙不儿，作为其首都。""马鲁的特产为金线纺织的布料。"《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5页载："马鲁城是座大城，在过去的时代里，呼罗珊的密儿（Mīr）就居住在马鲁城，但现在居住在不花剌城。这是一处惬意、繁华之地，有塔合木剌（Tahmūrath）修建的内城，里面有很多城堡（kūshk，似是街道，引者）。该城是（萨珊王朝）国王（khusravān）驻跸之地。在整个呼罗珊地区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的位置更优越。其市场很好。土地税是从水浇地中征收的。马鲁产优质棉花、阿魏根（ushturghāz）、费剌塔（filāta）糖果、醋、调料（ābkāna）、生丝（qazzīn）织品、木剌汗（mulham）织品。"译者。

[6] 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多穿黑衣，因此在我国文献中称该王朝为黑衣大食。译者。

[7] 忽辛（Tāhir b. Husayn，766～822年）是塔西儿王朝的建立者，他曾支持马蒙打败其兄阿敏，811年攻下巴格达，杀死阿敏，813年拥立马蒙为哈里发，并受命统治亦剌可地区。820年，马蒙任命忽辛为波斯和东方各地的总督，赐呼罗珊为其世袭领地，统辖报达以东广大地区，以马鲁为首府。822年宣布独立，并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塔西儿王朝，独立后当晚去世，该王朝存在了51年（822～873年），统治的地区主要包括呼罗珊地区，直到印度边界。873年，萨法儿王朝军队攻占你沙不儿，塔西儿王朝灭亡。译者。

[8] 吐火罗·必合（Tukharan-bih）的含义似是吐火罗村。译者。

[9]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马鲁城北边不远处。译者。

[10] 今此城名不存。译者。

[11]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5页将辛吉城写为欣格·阿八底（Shing-i `Abbādī），并载："是辖有很多地区的一座舒适的城市。"此城名今不存，应在今马雷（Mary）城位置或附近。译者。

[12] 今此城名不存，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于此。译者。

[13]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今马雷州扎赫迈特（Zahmet）不远处。译者。

[14]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今马雷州萨地卡奇（Sandykachi）不远处。译者。

[15]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今马雷城东北的土库曼堡（Türkmengala）附近，是去往阿富汗的重要通道。译者。

[16]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今马雷城东北的土库曼堡东边不远的药鲁腾（Ýolöten或Iolatan）附近。译者。

[17]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80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58～26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4～31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8、299、310～312、33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34、827页；第2卷，第610页；第4卷，第507页。札儿可城和该地磨房距马鲁城有7里格，此地的水池将来自木儿噶卜河的水流在城市中分为4条运河，纳赫儿·剌兹（Nahr Razīk）运河就是其中的一条，距马鲁城只有1里格。因此剌兹运河与札儿可磨坊不可能相邻，但从音点变化来看，札儿可（Zark）或剌儿可（Rark），与札里（Zarīk），或剌里（Rarīk）非常容易混淆。这个磨坊的名称有时候拼写为祖儿可（Zurk），或祖剌（Zurrak），札里（Zarīk）运河拼写为札儿八（Zarbak），根据一些记载，萨珊国王伊嗣埃就死在这条运河岸边。见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777、925页；第4卷，第508页。据穆喀达思（第33页）记载，距马鲁城2里格，但没说方位，有一个很小的军队卫所，这里有一个坟墓，民间传说这是穆罕默德之孙忽辛（Husayn）头颅的埋葬地，但在其他地方也有这种遗迹，可以肯定，忽辛被杀后，他的头颅没有被送到马鲁城。

[18] 沙剌甫·木儿可（Sharaf-al-Mulk）是塞尔柱王朝统治者灭里·沙（Malik Shah）的财税官（mustawfī），此人在获得100000迪纳后放弃了自己的职位，并在马鲁与亦思法杭城修建了学校与清真寺，属于哈纳菲学派，卒于1101年。译者。

[19] 麻吉·木儿可（Majd-al-Mulk，？～1099年）是塞尔柱王朝算端鲁昆丁·别雅鲁（Rukn ad-Dīn Berk-yaruq，或Barkiyaruq）在位时期（1094～1105年）的宰相，是一位什叶派同情者，在塞尔柱王朝其他割据藩王的反对下，鲁昆丁在1099年杀死了

麻吉·木儿可。译者。

[20] 即将Kh（خ）误拼为J（ج）。译者。

[21] 其实为帖木儿第四子，1405～1447年在位，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译者。

[22] 伊本·阿喜儿，第12卷，第25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373页；第4卷，第378、509、510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63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189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147、150、569页。Hfz.，32b叶面。

[23]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土库曼斯坦阿塔穆拉特（Atamurat）城所在地，这里有去往乌兹别克斯坦卡尔希（Qarshi）的道路，自古以来为阿姆河南岸道路上的重镇。此城稍北修建有从阿姆河引出，到阿什哈巴德的卡拉库姆大运河。译者。

[24] 《布哈拉旅行记》［*Travels into Bokhara*，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著，伦敦，1839年，第2卷，第2页］载："比提科（Betik）城的对面是查尔朱（Charjooee，即察哈儿·朱夷）城，这座城所在地是波斯与突厥斯坦（Toorkistan）之间最大的渡口。所有的人与物都要用船渡到对岸。"今为查尔朱城，也称土库曼纳巴特（Türkmenabat）城，是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列巴普州首府，人口约20万。译者。

[25]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53页载："费拉卜（Firab，即Firabr，引者）是质浑河岸边的城市。河道管理员（*mīr-i rūdh*）就居住在该城。这个地方在沙漠里。"《布哈拉旅行记》（*Travels into Bokhara*，第2卷，第5页）载，在此处的乌古斯河（乌浒水），"两岸很荒芜，长满芦苇"。今称法拉普（Farap）或法拉布（Farab），是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列巴普州法拉普区区府，在土库曼纳巴特城对面，位于阿姆河岸边，是古代阿姆河沿岸最重要的渡口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要津。译者。

[2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81、31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

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9、36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1、29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69页；第2卷，第946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148、334、568页。Abu-l-Ghāzī（阿布·勒·噶兹），著有《突厥世系》（*History of the Turks and Mongols*），英译本于1838年在伦敦出版。汉译本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124、329页。

[27]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5页提到了马鲁·鲁得（Marv-rūd，即Marv-ar-Rūdh）城，并载："这里盛产水果，马鲁河横穿该城。"译者。

[28] 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0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6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1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506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0页。有关八剌·木儿噶卜城的遗址，见亚特（C. E. Yate）《阿富汗北部》（*Northern Afghnistan*），第208页。

[29]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5页将喀思儿·阿合纳（Kasr Ahnaf）城堡称作底札·阿合纳（Diza-i Ahnaf），"是座小城，位于沙漠中，有很多的耕地和水流"。今此名不存，应在马雷州巴依里穆（Baylym）城附近，位于穆尔加布河岸边，靠近阿富汗，曾是丝路要道。译者。

[30]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5页提到了底札（Dizah）城，并载："马鲁河（即木儿噶卜河）穿城而过。这里很舒适，水果很多。"今天此城名不

存。译者。

[31] 今不存，应在劳卡尔（Lawkar）小城之北不远。译者。

[32] 牢喀儿（Lawkar）这个地名仍然存在，位于马雷州塔达巴札（Tagtabazar）区，在穆尔加布河河谷。译者。

[33]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91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9、314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34页；第4卷，第108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53页。至于麻鲁察村，见亚特（C. E. Yate）《阿富汗北部》（*Northern Afghnistan*），第110、120、194页。

第二十九章 呼罗珊（Khurāsān）地区（续）

哈烈（Herāt）专区。哈烈（Herāt）河，或哈里·鲁得（Harī Rūd）河。哈烈（Herāt）城。麻临（Mālin）城与哈里·鲁得（Harī Rūd）河上游的各城。卜珊吉（Bushanj）城。阿思夫札儿（Asfuzār）地区。八吉思（Bādghīs）地区及其城市。坎吉·鲁思塔（Kanj Rustāk）城。噶儿吉思田（Gharjistān）地区与古儿（Ghūr）地区。梵衍那（Bāmiyān）城。

呼罗珊的哈烈专区[1]现今全部位于阿富汗境内，其绝大部分土地靠哈烈（Herāt）河或哈里·鲁得（Harī Rūd）河[2]灌溉。这条河发源于古儿（Ghūr）山脉，最初向西流了一段距离。为了灌溉哈烈河河谷地带，从这条河分出许多运河，有些运河位于哈烈（Herāt）城的南边，有些在该城的北边，其中，穆喀达思特别提到了7条灌溉首府附近肥沃地区的运河。

哈烈河从东向西流，早期河道流经距哈烈城南城门几英里，靠近麻临（Mālin）城[3]的地方。在这里的河道上修建了一座桥梁，穆喀达思说整个呼罗珊地区没有比这座桥更漂亮的桥了，这座桥是一位祆教徒设计修建的，而且他的名字就刻在桥旁的一块碑上，“但有人说他后来成为一位穆斯林，也有人说他自己跳进了这条河里，起因是算端想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那座桥上”。穆思套菲提到了9条主要灌溉运河的名称，其均是从哈烈城邻近的哈里·鲁得河分流出来的。哈里·鲁得河流经哈烈城后，到达夫珊吉（Fūshanj）城[4]，该城位于河流南岸，而后转向北流到撒剌哈夕城，如前章所说，在到达该城前，此河接纳了麻失哈（Mashhad）河的河水。哈里·鲁得河流经撒剌哈夕城北后，就消失于沙漠中。据哈菲兹·阿卜鲁记载，哈烈河也被称作哈贾察兰河（Khajacharān，由于音点拼写位置的上下变化而无法确定，因此实际读音同样也无法确定）[5]，并说这条河的发源地是距合儿门（Helmund）河源头不远的一处泉水。[6]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和穆喀达思均称哈烈［更

准确的记载为哈剌忒（Harāt）］城是座大城市，有座城堡，周边是有4座城门的城墙。这些城门为：北边通往巴里黑城道路的八卜·萨莱（Bāb Sarāy）门，即宫殿门；向西通往乃萨卜儿城的八卜·兹牙（Bāb Ziyād）门；通往南面昔吉思田城的费鲁札八（Fīrūzābād）门，穆喀达思将该门记为八卜·费鲁兹（Bāb Fīrūz）门；通往东边古儿（Ghūr）山区的八卜·忽失（Bāb Khushk）门。这4座城门均为木门，但伊本·豪喀尔说除了八卜·萨莱门是铁门外，其他门为木门；哈烈城的城堡（称作Kuhandiz或Kal`ah）也有与上述城门名称相同的四座城门。哈烈城的面积有半平方里格，总督府位于叫作呼罗珊纳八（Khurāsānābād）的地方，在城外向西1英里、去往夫珊吉城的道路上。内城的4座城门内各有一个市场；每座城门外都是宽阔的外城区。哈烈城的大聚礼清真寺位于主市场的中央，在全呼罗珊地区或昔吉思田地区没有一座清真寺可与之媲美。过了这座寺，西边就是监狱。

哈烈城往北2里格就是山，这里的土地靠近沙漠，无法灌溉。这些山中产磨盘和铺路石，其中一座山的山顶上有座叫思里失（Sirishk）的古祆教祠，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祆教徒常到该祠朝拜。祆教祠与哈烈城的中间还有座基督教堂。从哈烈城向南一直到哈里·鲁得河上的麻临（Mālin）桥南的地方就像一座花园，肥沃的土地靠纵横交错的运河灌溉，并分为很多地区。去往昔吉思田城有1天多路程的道路的两边，绵延分布着很多人口稠密的村庄。

哈烈城的繁华一直持续到蒙古西征时期；伊斯兰历614年（1217年），即约在这一灾难事件（即西征，译者）发生前4年，亚库特就在这座城市，他认为位于极肥沃土地中央的哈烈城是他所见过的最富庶、最大的城市。和他同时代的可疾云尼证实了亚库特的记载，并注意到这里有很多磨坊，这些磨“不是靠水力，而是借用风力推动的”，这对他来讲是不同寻常的景观。但显然可以肯定哈烈城很快从鞑靼（Tartar，即蒙古，译者）人洗劫的影响中恢复过来。据伊本·白图泰记载，除你沙不儿城外，这座城是整个呼罗珊地区最繁华的城市，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的穆思套菲证实了伊本·白图泰的记载。该城城墙周长有9000步，其附近不远有18个村庄，主要的供水来自哈里·鲁得河的一条运河（Nahrīchah）。这里产一种叫法赫里（Fakhrī）的葡萄及无花果，品质极佳[7]。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哈烈城的居民已是逊尼派（Sunnī）。据穆思套菲记载，古儿（Ghūr）王朝统治鼎盛时期的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是哈烈城最为辉煌的时期。城里的市场内有

12000家商铺、6000个热水澡堂和659座学校，居民约有444000人。

哈烈城的北边有座坚固的城堡，当时穆思套菲将其记为沙密兰（Shamīrān）堡，其修建在伊本·豪喀尔提到的思里失古袄教祠遗址上，位于距该城2里格的一座山上。这座城堡也被称作喀剌·阿木喀儿差（Kal`ah Amkalchah）城堡。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攻占哈烈城后，毁掉了该城的城墙，并将绝大部分工匠迁移到他在河中修建的新城—沙合儿·萨卜兹（Shahr-i-Sabz）城，以充实那里的人口。土耳其语著作《世界志》中说伊斯兰历1010年（1600年），哈烈城有5座城门：北边的城门叫答儿洼札·木儿可（Darvāzah-i-Mulk，即总督门）门；西边的城门叫亦剌可（`Irak）门；南边的叫费鲁札八（Fīrūzābād）门；东边的叫忽失（Khush）门；东北的城门叫钦察（Kipchāk）门，最后的这座门为后来兴建。哈烈城周边有10个地区（Bulūk），但没有文献记载这些地区各自所处的位置。[8]

往哈烈城以南行2里格或半天的路程，可能是过了哈里·鲁得河上与之同名的大桥后，就到达麻临（Mālin）[9]或麻兰（Mālan）城，距与此城同名的周边地区有1天的路程。这座麻兰城也称作萨法儿喀（As-Safalkāt），或麻兰·哈烈（Mālan-i-Herāt）城，以区别于苦黑思田八哈儿兹（Bākharz）地区的同名地（在原文第二十五章第357页已提及）。这是座小城，周边有盛产水果的果园，该地葡萄园里产的葡萄颇有名。亚库特曾到过这座城，将其记为麻临（Mālīn），并补充说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将该名读为麻兰（Mālān）。该城所在的地区有25个村庄，他特别提到了其中的4个村庄，即木儿噶卜（Murghāb）、八失南（Bāshīnān）、赞丹（Zandān）和阿卜萨坎（`Absakān）村。

往哈烈城东北行1天路程，就是喀鲁合（Karūkh）[10]，或喀鲁赫（Kārūkh）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说除首府外，该城是哈烈地区最大的城市。这里所产的大量杏子和葡萄干外销到所有邻近的地区和城市；该城的聚礼清真寺位于叫萨必丹（Sabīdān）的城区内，这里的房屋是用土坯修建的。喀鲁合城位于一条长20里格的山谷中，这里均是耕地，很多村庄和大片农田散落于山谷中各条河流的岸边。山谷中的主要河流汇入哈里·鲁得河，看来这条河应是亚库特所称的纳赫儿·喀剌吉（Nahr Karāgh）河。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地理学家提到了哈烈城以东，位于哈里·鲁得河辽阔河谷中的一系列城市，即八珊（Bashān）城[11]，距哈烈

城有1天的路程，而后为凯萨（Khaysār）城[12]、阿思塔剌必养（Astarabyān）城[13]、麻剌八兹（Marabadh）城[14]和奥法（Awfah）城[15]等，每座城市之间均有1天的路程，一直往东经过最后一座城（奥法城）；过了奥法城有2天的路程后，到达属于古儿地区的哈失忒（Khasht）城[16]。在这些城市中，奥法城的规模差不多和喀鲁合城一样大，地理位置重要性也仅次于后一城。其他4座城市差不多被相似地记载为水资源充沛和较繁华；但这些城市的规模均比麻临城要小一些，每座城市周边有果园和肥沃的土地，靠近山区的阿思塔剌必养城附近不生长葡萄，麻剌八兹城附近所产的稻米特别有名，并大量外销。[17]

哈烈城向西行1天路程就是卜珊吉（Būshanj）或夫珊吉大城，其显然就在今天的古莲（Ghurian）城所在地，从哈里·鲁得河左岸到南岸距离不远。据伊本·豪喀尔记载，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卜珊吉城的规模差不多是哈烈城的一半，与哈烈城一样，其位于距山脉有2里格的平原上。这座城市建设得很好，周边是成片的树林，其中刺柏的长势快得惊人，所获木材大量外销。这座城市十分坚固，城外围是一道城墙和一道沟壕。该城有3座城门：朝（西边）你沙不儿城方向的八卜·阿里（Bāb `Alī）门，朝东的哈烈（Herāt）门，朝西南的苦黑思田（Kūhistān）门。亚库特曾访问过该城，看到其掩映于一条长满树木的河谷里，并将其名称记为卜珊吉或夫珊吉城。他还说波斯人将该城名称读为卜伤（Būshang）[18]。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称夫珊吉城附近产的西瓜和葡萄很有名，而这里的葡萄有105个不同的品种。这里有处特别的地方，有很多风车，民间流传说这种风车是摩西（穆萨）时代的埃及法老（Pharaoh）首创或发明的，还说他在远征东方时到过这座城。尽管阿里·亚兹底特别提到了夫珊吉城有高大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但伊斯兰历783年（1381年）该城还是遭到洗劫，并毁于帖木儿之手。由于一些无法解释清楚的原因，自此以后夫珊吉之名不再见于历史记载中，后来的古莲城是在帖木儿洗劫并破坏后留下的废墟上兴建起来的，现在这里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此处需要补充的是法儿吉儿（Fargird）、哈儿吉儿（Kharjird）和苦绥（Kūsūy）三座城，这三座城市在关于苦黑思田地区的章节中已做了叙述（见原文第358页），但常被划入夫珊吉（Fūshanj）地区。[19]

阿思夫札儿（Asfuzār）地区位于哈烈城的南边，在通往疾陵（Zaranj）城的道路上，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个地区除首府阿思夫札儿（Asfuzār）城外[20]，还有4座重要城市，即阿得剌思喀儿

（Adraskar）[21]、苦洼兰（Kuwārān）、苦失可（Kūshk）和苦洼珊（Kuwāshān）[22]等城[23]。现今阿思夫札儿地区的首府为萨卜兹洼儿［Sabzivār，称作萨卜兹洼儿·哈烈（Sabzivār-i-Herāt），以区别于你沙不儿城西边的萨卜兹洼儿城，见原文第391页］城。但在早期，苦洼珊城是这一地区的最大城市，此地区宽有1天的路程，从南到北长有3天的路程。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这里有一个叫喀失坎（Kāshkān）的著名河谷，谷里分布着很多人口稠密的村庄，山谷的河流发源于阿思夫札儿（即萨卜兹洼儿）城附近，现在称作哈鲁·昔思田（Hārud-i-Sīstān）河，流到朱外因（Juvayn）城西边的札剌湖顶端。据文献记载，阿思夫札儿地区的所有城市附近，土地肥沃，果园连片。在道里志中，阿思夫札儿城的第二个名称为哈思坦（Khāstān，或Jāshān，因读音无法确定），但这个名称似乎不可能是苦洼珊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因此可确定为阿思夫札儿（即萨卜兹洼儿）城。阿答剌思喀儿（或有时也拼写为Ardsakar）城至今仍位于阿思夫札儿城的东边，该名称现在被拼写为阿德拉斯坎（Adraskan）。亚库特将阿思夫札儿城列为昔吉思田地区的城市，穆思套菲说这是座中等城市，附近有很多村庄，还有许多种植着葡萄与石榴的果园，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该城的绝大部分居民是逊尼沙费依（Shāfi`ī）学派。但可惜在道里志中没有记载这个地区其他城市的位置。[24]

从哈烈城向北到马鲁·鲁得城的道路经八吉思（Bādghīs，或Bādhghīs[25]）大区，这个地区包括哈烈河以西（到夫珊吉城北）和木儿噶卜河上游以东之间的整个区域，这些河发源于噶儿吉思田（Gharjistān）山区；八吉思地区本身靠木儿噶卜河左岸的很多支流灌溉。八吉思地区东部一直到哈烈城以北，大致有13里格，被称作坎吉·鲁思塔（Kanj Rustāk）区，这个区有3座主要城市—八班（Baban）[26]、凯夫（Kayf）与八吉舒儿（Baghshūr）[27]，其方位所在通过道里志记载大致可以确定。穆喀达思记载了八吉思地区的其他9座城市，但可惜这些城市的位置已无法确定，因在道里志中没有提及这些城市，从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在蒙古西征中遭到破坏，直到今天这一地区还是杳无人烟的荒野。这个地区散落的很多废墟还能反映水资源充沛时期的繁荣，但现代的一些地名在中世纪的文献里并没有记载。

八吉舒儿城遗址所在地曾是坎吉·鲁思塔区的主要城市之一，该城显然就是现在被称作喀剌·贸儿（Kal`ah Mawr）的地方。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八吉舒儿城的规模和卜珊吉城一样

大，其是呼罗珊最优美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这个地区的总督常居住在八卜纳（Babnah）或八班城，这座城的规模曾一度比卜珊吉城大，据文献记载，凯夫城的规模只是卜珊吉城的一半。所有这些城市的房屋均是用土坯修建的，城市周边有多产的果园和农田，这个地区从河流和水井中获取丰富的灌溉用水。伊斯兰历616年（1219年），亚库特访问过这些地方，并证实了上文对八吉舒儿城和其他城市的富庶的记载，但他说在他那个时代该地区的绝大部分已毁，此时蒙古的西征军队还未到来。八卜纳城之名，亚库特写为包恩（Bawn）[28]或八万（Bavan），他在这里停留过；他也访问过另一座城市八密因（Bāmiyīn）或八满吉（Bāmanj）城，该城距八卜纳城不远。他看到该城周边的地区极其肥沃，生长着大量的阿月浑子树，并盛产阿月浑子。[29]

至于八吉思地区南部的地理环境特征，文献称这里先前和坎吉·鲁思塔区的繁荣状况一样，但该区的各城市现今在地图上已完全查不到了，而且中世纪（城市）的名称很难确定，或现存的遗址与历史记载无法对应。所有文献均记载这个地区的首府为的希思丹（Dihistān）城[30]，其位置可能是现今哈烈城东北的火者·的希思丹（Khwājah Dihistān）圣墓所在地；穆喀达思提到了其他7座大城市，即苦干纳八兹（Kughānābādh）、苦发（Kūfā）、卜失忒（Busht）、贾札洼（Jādhāwā）、喀卜伦（Kābrūn）、喀儿温（Kalwūn）和贾八儿·费达（Jabal-al-Fiddah，即银山）等城[31]，这些城市的位置可以大致确定。的希思丹城是八吉思地区的第二大城市，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座城位于一座小山上，其规模是卜珊吉城的一半，房屋用土坯修建，还修建有很好的地下室，供炎热的夏天消暑。这里的花园很少，但有很多的耕地。这个地区的总督居住在苦干纳八兹城，这是座比的希思丹城规模要小的城市。如名所示，贾八儿·费达城是座附近山上有银矿的小城，位于从哈烈城直达撒剌哈夕城的道路上，其显然在苦干纳八兹城以北。此地区生长着大量可用作木柴的树木。苦发城的规模比贾八儿·费达城大，其位于一片平原上，拥有很多优美的果园；穆喀达思提到了这些城市中的其他4座城市，但没有详述，只是说其全部位于从哈烈城向北去往撒剌哈夕城的道路附近。

亚库特提到的希思丹城是八吉思地区的首府，他说这个地区区名的含义为八得·黑兹（*Bād-khīz*），即“起风之地”，因这里常起风暴。穆思套菲关于八吉思（Bādghīs）地区的记载很难被理解，原因是这一地区的很多地名在抄本中讹误甚多。（他说）的希思丹城是首府，还提到了

用波斯语写为苦合·奴可剌（Kūh Nukrah，即银山）的银矿的名称。第三个重要地方为苦合·拱北纳八［Kūh Ghūnābād，为苦干纳八兹（Kūghānābādh）的异写］城，这里居住着总督。第四个地方被称作卜祖儿噶林（Buzurgarīn）城，但读法尚未确定。穆思套菲还提到了一座叫坎儿井（Kārīz或Kārīzah，即地下渠道）的城市，并说这里是哈吉木·卜儿喀亦（Hakīm Burkā`ī，即蒙面医生）的出生地，此人通常被称作“那黑沙不（Nakhshab）的造月者”，又名“呼罗珊的蒙面先知”，他在伊斯兰历2世纪（8世纪）发动过起义，并给哈里发马赫迪制造了很多乱子，后被镇压。

穆思套菲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地方（在文本中有很多讹误），只是抄录穆喀达思和早期地理学家的记载，但没有补充细节。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穆思套菲记载，八吉思地区以主要种植阿月浑子树而闻名，在阿月浑子收获的时节，这里居住着很多人，这些人离开时运走阿月浑子，并销售到附近的各地区。穆思套菲说阿月浑子树很多，“很多人以在收获期收集阿月浑子作为全年的生计，这真是一种奇观”。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八吉思地区最终被毁，原因就是此地为帖木儿军队从哈烈城到马鲁·鲁得城的行军通道。[32]

在八吉思地区东边、木儿噶卜河的源头就是山区，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将其称作噶儿吉·沙儿（Gharj-ash-Shār）。据穆喀达思记载，这一山区的统治者被冠以沙儿（Shār）的称号，噶儿吉（Gharj）在当地语言中意为“山”，因此噶儿吉·沙儿的含义就是“山区的沙儿（Shār）或统治者”。中世纪后期，这一山区通常被称作噶儿吉思田（Gharjistān），蒙古西征时期，大多数情形下仍使用这一名称。亚库特说后来噶儿吉思田常被拼写为噶儿失思田（Gharshistān）[33]或噶里思田（Gharistān），经常与位于其东边的古儿吉思田（Ghūrjistān）或古儿（Ghūr）地区相混淆，有关古儿吉思田地区将在后文进一步做专门的讨论。噶儿吉思田的统治者或沙儿曾被阿拉伯人称为灭里·噶儿贾（Malik-al-Gharjah，即Gharj人的国王），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一地区很富庶，其所属城镇中共有10座聚礼清真寺。

噶儿吉思田地区的两座主要城市为阿卜申（Abshīn）城和舒儿敏（Shurmīn）城[34]，但确切位置不清楚。阿卜申（Abshīn、Afshīn或Bashīn）城在木儿噶卜河上游东岸不远处，距马鲁·鲁得城北有4天的路程。这座城附近有优美的果园，当地所产的大量稻米销往巴里黑城。阿

卜申城有座坚固的城堡和一座聚礼清真寺。舒儿敏（Shurmīn，或Surmīn）城位于阿卜申城以南4里格的山区，从喀鲁合城到哈烈城东也有4天的路程。该城附近产的无核白葡萄销售到附近的地区。如前所述，这个地区的统治者或沙儿不居住在这两座城市里，而是居住于山区一个叫八里坎（Balīkān，或Balkiyān）的大村庄里。亚库特记载了噶儿吉思田地区的另外两座城市，即欣贾（Sinjah）城和拜洼儿（Baywār）城[35]，除了记述"该地区的一个人告诉我"—这两座城市在山区外，他并没有指明这两座城市的位置。[36]

噶儿吉思田地区的南边和东边的山区被称作古儿地区或古儿吉思田[37]，其从哈烈城一直延伸到梵衍那（Bāmiyān）城，以及可不里（Kābul）地区与哥疾宁地区的边界，即在哈烈河南岸。据中世纪地理学家记载，这一地区是很多大河的发源地，即哈里·鲁得河、合儿门河、合瓦失（Khwāsh）与法剌（Farah）河（此河流入札剌湖），木儿噶卜河则发源于靠近噶儿吉思田地区的边界。可惜，对这一辽阔山区地理情况的记载完全是一片空白，在历史上已知的文献也没有提到这里的城市和城堡的位置。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称古儿地区虽有很多穆斯林居住，却是异教徒统治之地。其河谷人口稠密，土地异常肥沃；这里的金、银矿很有名，其位于朝梵衍那城和半制（Panj-hīr）[38]方向的山区（见原文第350页）。其中最丰富的矿被称作哈儿黑兹（Kharkhīz）矿。马合木（Mahmūd）继位之后，哥疾宁王朝开始衰落，他起初委派到古儿（Ghūr）地区的那些酋长开始拥兵自立，最终在费鲁兹苦合（Fīrūzkūh）城堡[39]建立了自己的都城，这是位于山区的一座大城堡，但其位置不清楚。

古儿（Ghūr）王朝[40]的统治者从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中叶开始独立，并一直延续到伊斯兰历612年（1215年），在这一年，其被花剌子模·沙（Khwārizm Shāh）打败，几年后，这一王朝在蒙古西征中被灭。但在这之前的伊斯兰历588年（1192年）古儿王朝征服了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并统治着从德里（Dehli）到哈烈的全部地区，蒙古人灭亡该王朝后，其奴隶国王［古儿朝的麻木路（Mamlūk）将领］以算端之名继续统治着德里，一直到伊斯兰历962年（1554年）。

在古儿王朝萨木（Sām）[41]统治的伊斯兰历543年（1148年）至伊斯兰历612年（1215年）间，古儿或古儿吉思田地区进入其最辉煌和最鼎盛时期。亚库特说这一王朝的费鲁兹苦合（Fīrūzkūh，或Bīrūzkūh，

即绿松石山）是大都会，但没有详述。穆思套菲简略地提到了这座城堡，并说该地区主要城市中的另一座就是鲁得·汗噶兰（Rūd Hangarān）城，但其读法不能确定。伊斯兰历619年（1222年）该地区完全被成吉思汗征服，费鲁兹苦合城遭到洗劫而成为废墟。据文献记载，这一地区还有其他两座大城堡，即喀儿蕴（Kalyūn）和费洼儿（Fīvār），其相距10里格，但具体位置无法确定，这两座城堡给蒙古军队制造了很大麻烦，据说后来成吉思汗完全摧毁了这些城堡。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可疾云尼也说忽思忒（Khūst）城是古儿地区的大城市之一，可能应是靠近哈里·鲁得河源头的哈失忒（Khasht），该地在前文（原文第410页）已经提及。帖木儿时代，文献中提到的古儿地区的唯一地方是叫喀剌·哈思塔儿（Kal`ah Khastār）的城堡，但位置无法确定。[42]

梵衍那城是与之同名的梵衍那（Bamīyān）大区的首府，该区在古儿地区的东部，从久远的古代遗址来看，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该地是佛教文化中心。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斯塔赫里称梵衍那城的规模是巴里黑城的一半，修建在一座小山上，但没有城墙，该城所在地区极其肥沃，靠一条大河灌溉。穆喀达思将其称作剌忽木（Al-Lahūm）城[43]，但读音不能确定，他称这座城为“呼罗珊的商贸港，印度（Sind）的财富库”。这里极其寒冷，降雪较多，因而臭虫和蝎子几乎不能生存。该城有一座聚礼清真寺，各大城区有很多货源充足的市场，（经过）4座城门（的道路）通向各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梵衍那地区有很多大城市，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据说这里的3座主要城市为八思古儿（Basghūrfand）城、萨吉万（Sakīwand）城和剌赫剌（Lakhrāb）城等。[44]

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亚库特详细记载了梵衍那城附近地区的石刻大佛像[45]，这座佛像至今还可以看到[46]。据他记载，登到山的一侧，有一个很多柱子支撑的洞窟，洞壁刻着的好像是“安拉（Allah）创造的各种飞禽，观后令人称奇”的内容。洞窟前是“两尊巨大的佛像，其从底部到顶部是用山边的自然岩石凿刻而成的，这两尊佛像被称作速儿合·佛陀（Surkh Bud，意为“红佛”）和亨·佛陀（Khing Bud，意为“灰佛”），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与其一样大的石刻佛像”。可疾云尼提到了梵衍那城的一座“金屋”，也记载了这两尊大佛像；他还提到了附近的水银（zībak）矿和一眼硫磺泉。梵衍那城及其所在地区，以及前文提到的远至东边半制（Panj-hīr）的各矿区，由于成吉思汗的震怒

而被摧毁，起因是他最喜欢的孙子，即察合台（Jaghatay）之子木秃勤[47]（Mūtūkin）在围攻梵衍那城时被杀。于是，蒙古军队受命将这座城及其城墙和房舍夷为平地，成吉思汗禁止在这里再进行重建，也不允许人们居住，并将梵衍那之名改为麻兀·八里（Mav Balik），这个名称在突厥语中意为“该诅咒的城市”[48]。自此以后梵衍那城便成为一片无人居住的荒野。[49]

[1] 斯特拉波在其所著的《地理学》（*Geography*，第6卷，第5章，第252页）一书中称作“也里”（Aria，即赫拉特）地区，“有些地方山脉环绕，有些地方是居住着人家的平原”。“平原靠也里乌斯河（Arius，应是哈里·鲁得河）与马尔古斯（Margus，即木儿噶卜河，引者）河灌溉。”“（东边）到巴克特里亚（Bactriana，即大夏，今阿富汗巴尔赫省），及其所在的山脚下。（北边）距里海（Hyrcanian Sea）6000斯塔德。”“也里地区长2000斯塔德，平原宽有300斯塔德。这里的主要城市为阿尔塔卡伊纳（Artacaëna）、亚历山大（Alexandreia）和阿盖阿（Achaia），是以城市建立者的名字命名的。这里产优质的酒，在密封的酒器里可以保存三代。”译者。

[2]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3页提到了哈烈河，又载：“哈烈还有很多发洪水时形成的大河，但平时这些河道中不会有流水。”译者。

[3] 此城和原书257页的马临城是同名城市，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城市，该城在赫拉特城之南，位于哈里河岸边，但今此名已不存。历史上是连接锡斯坦和赫拉特的重要通道。译者。

[4] 《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15页将卜珊吉写为“卜尚”（Pushang，等同于Hushang），并载：“这是哈烈地区的一座城市。阿拉伯语写为夫珊吉（Fūshanj）。”此城今不存，应在赫拉特城西南40余公里处的哈里河南岸。这里是丝路要道，也是古今重要的农业区。译者。

[5] 这个拼写显然有误，应是Jajacharān，因此《圣武亲征录》作搠搠兰河；《元史·太祖本纪》作搠搠兰河；《元朝秘史》作出黑扯连。译者。

[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6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29、33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

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16页。Hfz.，32 a叶面。

[7] 《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第134～135页载："哈烈的特产有用各种小白葡萄晒成的叫基石米什（*qishmish*）的葡萄干和塔伊费（*tā`ifī*）葡萄干。这两种葡萄干出口到遥远的地方。""哈烈特产还有各种软羽毛，这是用各种水禽如鹈鹕、鸬鹚（*hawāsīl*）的脖颈羽毛、短羽毛制成的。""哈烈远销到各地的产品中有白棉布、双纱线纺织的布料、锦缎和精致的铜器。"《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3～104页提到了哈烈的内城堡、内城、外城、聚礼清真寺、水源、城市方位、阿拉伯居民，还载："这里产棉布、甘露（*shīrkhisht*）和葡萄汁（*dushāb*）。"译者。

[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64～26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6～31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6、307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958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22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6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7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10～31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

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22、323页。哈吉·哈里发的《世界志》所提供的材料一部分是取自木因丁·阿思夫扎里（Mu`īn-ad-Dīn Asfuzārī）于伊斯兰历897年（1492年）撰写的有关哈烈地区的州志。密儿哈万将该州志放在了《纯洁的花园》（*Rawdat-as-Safā*）一书的跋文中（Khātimah，第7部分，第45～51页），该材料被巴尔比尔·梅纳尔德（M. Barbier de Meynard）翻译，刊登在《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1860年，第2卷，第461页；1861年，第1卷，第438、473页；1862年，第2卷，第269页）上。有关哈烈城的现状，见亚特（C. E. Yate）《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25～28页。

[9]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4页提到了麻临城。译者。

[10]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5页提到了喀鲁合城。今为卡鲁赫（Karukh），是赫拉特省卡鲁赫区区府，人口1.8万，在赫拉特城东北50公里处，是去往巴里黑的重要通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11] 此名不存，应在赫拉特城正东50公里处，与卡鲁赫城处同一经度，位于哈里河沿岸。曾是哈里河河谷地带的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12] 此名不存，应在八珊城东不远，地位同八珊城。译者

[13] 此名不存，应在凯萨城东不远。译者

[14] 今为马尔瓦（Marwa），是赫拉特省奥贝（Obe）区的一个乡镇。译者。

[15] 今为奥贝（Obe，或Owbi，或Obeh），赫拉特省同名区区府所在地，是去往巴里黑城的要道。译者。

[16] 此城应是今赫拉特省齐斯提·舍里夫（Chishti Sharif）区区府齐斯提·舍里夫所在地，此城位于哈里河岸边，是通往阿富汗中部的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1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67、28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8、33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50、298、307、34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70页；第2卷，第950页；第3卷，第605页；第4卷，第247、397、499页。

[18]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4页载："卜伤城大小是哈烈城的一半，城周围是一条护城河并有座坚固的城堡。这里发现有多籽刺柏（*`ar`ar*）和种子植物，其汁（shīr）可用作各种毒蛇和蝎子咬伤的抗毒剂。"译者。

[19]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67、26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58页；第3卷，第92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7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12页。萨尼·道剌（Sanī`-ad-Dawlah）说他最近从你沙不儿城到哈烈城时，经过了卜珊吉城遗址，并看到这个遗址，此地距古莲城不远，但不在此城里。［《地区之鉴》（*Mirāt-al-Buldān*），第1卷，第298页］

[20] 阿斯夫扎儿（Asfuzār）或称萨卜扎瓦尔（Sabzivār）是今赫拉特省新丹德（Shīndand）区区府新丹德曾经的名称。在赫拉特南部，是去往坎大哈和扎兰季的要道，也是丝路古镇。译者。

[21] 是今赫拉特省阿德拉斯坎（Adraskan）区区府阿德拉斯坎的名称，地位与阿斯夫扎儿（Asfuzār）相同。译者。

[22] 后两座城市，今天难以查找，但可确定在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边境地带。译者。

[23]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4页提到了阿思夫札儿及其四座城市，但名称略有差异，即阿思卜札儿（Asbuzār，就是Asfuzār），以及阿剌思坎（Araskan，即Adraskar）、苦洼赞（Kuvāzhān，即Kuwārān）、苦兹得（Kūshk，即Kūshk）和苦洼珊（Jarāshān，即Kuwāshān，可能是笔误），并载："各城之间相距6法儿萨；这里是惬意之地，居民是哈里吉（Kharijite）派，好战。这个地区有很多难以攀登的高山。"译者。

[2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

卷，第249、264、26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5、318、31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8、308、35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4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7页。

[25]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4页提到了八吉思（Bādhghīs）地区，并载："这是个繁华、惬意的地方，大约有300个村庄。"译者。

[26] 此地应是今巴德吉斯省中心区的巴格班（Baghban）。译者。

[27]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4页提到了凯夫（Kīf，即Kayf）与八吉舒儿（Baghshūr）。译者。

[28]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4页载："包恩（Bawn）是座城镇，也是甘吉·鲁思塔（Gan Rustā，即Kanj Rustāk）的首府。这里是有很多河流的舒适之地。此地产葡萄汁。"译者。

[29]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3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6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8、30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61、481、487、694页；第4卷，第333页。有关八吉思地区的现状及其遗迹，见亚特（C. E. Yate）《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67、68页。在古尔兰（Gulrān）城、萨噶尔丹（Sagardān）城、卡拉·巴赫（Kārā Bāgh）城（上书第101页）附近有毁掉的城堡和遗迹，在喀剌·贸儿（Kal`ah Mawr）城（上书第96、103页）、喀剌·塔帕（Kārā Tappah）城也有这些遗迹，其中的一些城堡已被阿拉伯地理学家提及。

[30] 从地理位置判断，应该在今巴德吉斯省省会瑙堡（Kala-Now）西北的奇希拉克·霍加（Qishlaq Khwājah）。这里是通往阿富汗西北部、土库曼斯坦、赫拉特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31] 这七座小城很难查找到具体位置，应在赫拉特西北方向。译者。

[3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68、26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19、32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8、30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61页；第2卷，第63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7、188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14、315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308页。亚特（C. E. Yate）：《呼罗珊与西吉斯坦》，第6页。在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的道里志中，对哈烈城到马鲁·鲁得城的道路已有记载，其经过坎吉·鲁思塔（Kanj Rustāk）区后，被一城一城地加以记载，最南的驿站（八卜纳）距哈烈城有两天的路程。穆思套菲（第198页）记述了有7个站点的另一条路线，即从哈烈城5里格处到寒噶麻八（Hangāmābād）城，然后经5里格到八吉思城（这无疑是底黑思田地区的首府），然后经5里格到八万（八卜纳）城，然后经5里格到“草原之谷”（Marghzār Darrah）城，然后经8里格到八吉赤·舒儿（Baghchī Shūr，即八吉舒儿）城，然后经5里格到兀思鲁（Usrūd）或鲁思鲁（Lūsrūd）城，最后，经4里格到马鲁·鲁得城。这条废弃的商道至今还被清楚地标出来，见亚特《呼罗珊与西吉斯坦》，第194、195、222页。

[33]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5页提到了噶儿赤思田（Gharchistān，即Gharshistān），并称其首府为沙儿（Shār）城。“这个地方产很多

的粮食，有很多的土地，而且很繁华。居民和顺、友善。他们放牧和种地。”译者。

[34] 《穆斯林教派》（*Moslem Schisms and Sects*，*Al-Fark Bain Al-Firak*）第18页提到了阿富申（Afshīn，即阿卜申）与舒剌面（Shūramain，即舒儿敏），并说马合木·伊本·卡兰（Muhammad ibn Karrām）创立的卡兰派（Karrāmiyya）起初是阿富申与舒剌面人的信仰，后来这个派别的信徒迁移到你沙不儿地区。《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5页提到了舒儿敏城。现在这两座城已很难查到。译者。

[35] 这两座城市难以查到。译者。

[3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1、27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9、34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803页；第3卷，第72、163、186、785、786、823页。呼罗珊的噶儿吉思田（Gharjitān）与高加索地区的谷儿只思田（Gurjistān）没有关系（见原书第12章第181页），现在谷儿只思田通常被称作谷儿只（Georgia，即格鲁吉亚），这个名称很容易和阿富汗（Afhanistān）的噶儿吉思田相混淆，如同有些著述者将蒙古西征到木儿噶卜河上游的噶儿吉思田错误地写为谷儿只，但阿富汗没有这个地方。

[37]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0页提到了古儿地区，并做了记载。译者。

[38] 《新唐书·地理志》载：“檀特州以半制城置。”译者。

[39] 此城就是古尔（Ghur）省省会恰格恰兰（Chaghcharān），2014年更名为费鲁兹库赫（Fīrūzkūh），人口15万，是去往喀布尔、赫拉特等地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40] 古儿（Ghūr）王朝存续于12世纪至1215年。其先祖为佛教徒，从阿富汗古尔地区兴起，最盛时控制着印度北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东部、中亚西部等地，后被花喇子模·沙王朝所灭。译者。

[41] 大致在萨木一世到二世之间，萨木一世于1148～1149年在位；萨木二世于1212～1215年在位。译者。

[4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4、32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

（*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823页；第4卷，第930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4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4、188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150页。有关古儿（Ghūr）地区，见裕尔（H. Yule）爵士在《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tannica*，第9版）撰写的词条（第10卷，第569页）。

[43] 今难以查到。译者。

[44] 这三城今难以查找到。译者。

[45] 《大唐西域记》“大立佛及卧佛像”条，载梵衍那国，“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槃卧佛，长千余尺。”译者

[46]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0页提到梵衍那地区及其耕地、河流，还有佛教造像。按：2001年3月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炸毁了巴米扬（梵衍那）大佛。译者。

[47] 木秃勤（Mutukin），或蔑惕干（Metiken），即木阿秃干（Mo`etūken），是察合台长子，1221年战死于梵衍那城。译者。

[48] 有关记载见《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54页。译者。

[49]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7、28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7、32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6、303、30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

版，第1卷，第481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03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8页。Abu-l-Ghāzī（阿布·勒·噶兹），著有《突厥世系》（*History of the Turks and Mongols*），英译本于1838年在伦敦出版。汉译本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114、149页。有关梵衍那大佛石刻的图片，见塔尔伯特（Talbot）和梅特兰（Maitland）的文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lreland*，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323页，1886年）。

第三十章 呼罗珊（Khurāsān）地区（续）

呼罗珊地区的巴里黑（Balkh）专区。巴里黑（Balkh）城和瑙·八哈儿（Naw Bahār）城区。护时健（Jūzjān）地区。塔里寒（Talikān）城和朱儿祖万（Jurzuwān）城。麦满纳（Maymanah）或竹忽底牙（Yahūdīyah）城。法剌卜（Fārāb）城、沙卜儿干（Shaburkān）城、安八儿（Anbār）城和安答忽（Andakhud）城。吐火罗（Tukhāristān）地区。忽儿木（Khulm）城、悉蜜言（Siminjān）城和安怛罗缚婆（Andarābah）城。遏换（Warwālīz）城和台亦干（Tāyikān）城。呼罗珊地区的物产。经过呼罗珊地区和苦黑思田地区的诸道。

巴里黑（Balkh）是对呼罗珊地区第四专区的称呼，也是该地区首府之名，被称作“众城之母”[1]，这个地区分为护时健（Jūzjān）和吐火罗（Tukhāristān）东、西两个大区。

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雅忽比称巴里黑城是呼罗珊地区的最大城市[2]。该城有三重古城墙和13座城门，穆喀达思说该城在早期被波斯人称作巴里黑·八黑牙（Balkh-al-Bahiyyah，即美丽的巴里黑）城。内城外有著名的瑙·八哈儿（Naw Bahār）外城区，其居民区面积超过3平方英里。雅忽比说该城有20座聚礼清真寺。伊斯塔赫里称巴里黑城位于一个平原上，距最近的名为贾八儿·苦（Jabal Kū）的山脉有4里格。城里的房屋是用晒干的土坯修建的，并用同样的材料修建了城墙，城外有很深的护城河。商业区和主聚礼清真寺位于城市中央。向巴里黑城提供用水的河流被称作答哈思（Dahās）河[3]，伊本·豪喀尔说这条河的含义为“10个磨盘”（波斯语）；其流经瑙·八哈儿（Naw Bahār）城门时，推动这10个磨盘，接着流往忒耳迷（Tirmid）城附近的思亚吉儿（Siyāhjird）地区，并灌溉着这里的土地和农田。巴里黑城附近的果园产柑橘、尼鲁法（Nilūfar）百合和甘蔗，还有葡萄，这些产品大量外销。此外，该城的市场常有很多商人光顾。

该城有7座城门：八卜·瑙·八哈儿（Bāb Naw Bahār）门，即新春门或新寺门；八卜·剌赫八（Bāb Rahbah）门，即广场门；八卜·哈底（Bāb-al-Hadīd）门，即铁门；八卜·印度万（Bāb Hinduwān）门，即

印度门；八卜·竹忽（Bāb-al-Yahūd）门，即犹太门；八卜·沙思·班（Bāb Shast-Band）门，即六十堤坝门，八卜·牙合牙（Bāb Yahyā）门。穆喀达思用概括性的语言描述说，巴里黑城是座美丽、恢宏、富庶的城市，其有很多河流，因此这一地区盛产粮食，物价低廉，还有很多宽阔的大街，以及城墙和大清真寺，也有修建华丽的宫殿。巴里黑城的繁荣景象一直延续到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这座城在伊斯兰历550年（1155年）遭到突厥古思人的第一次洗劫，成为废墟。突厥古思人离开后，逃离的居民返回这里，并在城址附近的另一个地方重建了城区。不久，巴里黑城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往日的辉煌，因此亚库特在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记载了该城的盛况，此时距蒙古人带来的第二次劫难已为时不远。

（巴里黑城的）大外城区被称作瑙·八哈儿区，马苏迪称萨珊王朝时期，这个城区的祆教祠是祆教徒（Guebre）的主要祆教祠之一。亚库特还详细记述了这座祆教祠，其内容主要摘自奥马儿·伊本·阿兹剌可·吉儿满尼（`Omar-ibn–al-Azrak Kirmānī）的记载，可疾云尼的记载与亚库特类似。巴里黑城的这座祆教祠的大祭祀为八儿麻（Barmak）—八儿麻（Barmac）家族的祖先，在萨珊王朝时期，这个家族的人一直世袭该城的祆教大祭祀。有关记载瑙·八哈儿[4]祆教祠的相关内容可简要概括为：这个祆教祠最初仿照麦加天房（Ka`abah）的样式修建，并可与其媲美。其墙壁装饰着宝石，墙面到处悬挂着绣锦的帘子，墙壁四季散发清香，尤其春天更是香气扑鼻，因瑙·八哈儿的含义为“新春”或“初春”，在这个季节里人们来朝谒此圣地。其主体建筑之上修建有一个称作兀思屯（Al-Ustūn）的大圆顶，其高有100多腕尺，围绕着这个中心建筑有360间房，是祭祀起居之地，一年中每天均有一位祭祀司职。这个圆顶的顶部是一面丝绸大旗，来自极远方的风不时吹动着这面旗帜。这个主体建筑里到处是画像或偶像，其中主要的朝圣人员来自可不里、印度和中国等地，朝圣者跪倒在大祭祀八儿麻的面前，然后亲吻其手。瑙·八哈儿祆教祠附近7平方里格的土地是这个祠的香火田，这些田地给其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阿合纳·伊本·凯思（Ahnaf ibn Kays）摧毁了瑙·八哈儿圣祠，此人在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时期征服了呼罗珊地区，并让这里的居民皈依了伊斯兰教。[5]

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蒙古人洗劫了巴里黑城[6]，伊本·白图泰称成吉思汗为了寻宝，将该城的大清真寺毁了1/3，结果一无所获。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伊本·白图泰访问巴里黑城之时，该城还

是一片废墟，无人居住，城墙外有很多坟墓和圣墓，受到虔诚信徒的朝谒。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在记载帖木儿武功活动的文献中常提到巴里黑城，可见当时，这座城在一定程度上已恢复往日的辉煌。帖木儿修复了城外被称作喀剌·印度万（Kal`ah Hinduwān）的城堡，即印度城堡，此堡为其总督居住地，后来他又重建了老城的大部分城区。

今天的巴里黑城是现代阿富汗的一座重要城市，以有伟大的麻扎·沙里夫（Mazār-i-Sharīf，即贵人墓）圣墓而闻名，据说哈里发阿里（称作Shah-i-Mardān，即人类之王）可能就埋葬于此。据哈万达密儿（Khwāndamīr）记载（值得怀疑），殉教者（阿里的）圣墓是在伊斯兰历885年（1480年）被发现的，当时帖木儿的一位后裔米儿扎·拜喀剌（Mīrzā Baykarā）是巴里黑地区的总督。如前文所述的那一年，有人送给了米儿扎·拜喀剌一部完成于塞尔柱王朝算端桑贾儿时代的历史著作，这本书里说阿里埋葬于距巴里黑城3里格的火者·海兰（Khwājah Khayrān）村。于是这位总督就到那个村庄，并恰好找到了一块方碑，其上用阿拉伯文写道：“这是安拉之狮、主之奴仆、安拉使者之弟（应是侄子）阿里之墓。”后来在其墓上建造了巨大的穹顶，此后这里成为中亚各族人民朝谒的圣地，至今还受到很多人的朝拜。[7]

护时健（Jūzjān、Al-Jūzajān，或Jūzjānān）[8]地区是巴里黑区的西边部分，一条从马鲁·鲁得城去往巴里黑城的道路经过这一地区。中世纪时期，这里是人口极其稠密的地区，还有很多城市，其中只有3座城市以旧名称保留下来了，但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的其他绝大部分城市的位置可以通过道里志来确定。虽然这些地方的名称发生了变化，但通过遗址可确定其方位。该地区极其富庶，这里产的很多商品大量外销，尤其是皮张，加工后运往整个呼罗珊地区销售。[9]

距马鲁·鲁得城3站之地，在去往巴里黑城的方向就是塔里寒（Tālikān）城[10]，此名在地图上已无法查到，但从察察土（Chāchaktū）城附近的遗址和砖堆推断，其应是这座城的所在地。早在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塔里寒城就是一座极其重要的城市，雅忽比说这里产的塔里寒毡很有名。该城位于群山之中，城里有座气势恢宏的聚礼清真寺。伊斯塔赫里说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塔里寒城的规模和马鲁·鲁得城一样大，这里的气候更为舒适宜人。这里的房屋是用土坯修建的。与该城邻近的地方有个叫君度外（Junduwayh）的村庄，亚库特称这里是伊斯兰历2世纪（8世纪）以阿卜·穆斯林为首，支持阿拔

斯王朝的军队与倭马亚王朝军队大战之地，结果阿卜·穆斯林取得了胜利。亚库特记载这里后不久，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塔里寒城被成吉思汗的军队包围了7个月，城破后，遭到屠城，未留活口，该城的城堡也被夷为平地。

据说，山脉的垭口脚下和山谷颇似麦加的地形，这里有朱儿祖万（Jurzuwān）城[11]，是护时健地区总督消暑度夏之地。阿拉伯人称其为朱儿祖万（Al-Jurzuwān），波斯人称作苦儿祖万（Kurzuwān）或古儿祖万（Gurzuvān），该名有时候也拼写为朱儿祖班（Jurzubān）或古儿祖班（Gurzubān）。该城介于塔里寒城和马鲁·鲁得城之间，并在朝古儿地区边界方向，亚库特说该城人口稠密，居民富有。该城之名在地图上已查不到了，但喀剌·瓦里（Kal`ah Wālī）附近的遗址极有可能是该城所在地。[12]

过了塔里寒城2站之地，在去往巴里黑城的道路上就是满纳麦（Maymanah）城[13]，至今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中世纪初期，这座城被称作牙忽丹（Al-Yahūdān）[14]，或竹忽底牙（Al-Yahūdīyah）城，即犹太城，常作为护时健地区的首府。伊本·豪喀尔说该城的聚礼清真寺有两座宣礼塔。亚库特将该城名称仍记载为牙忽答·苦卜剌（Jahūda-al-Kubrā，即大犹太）城，并说最初居住在这里的以色列人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迁来的。为了讨个好兆头，其名称后来改为麦满纳城，意为“吉祥城”，因为对穆斯林来说，“犹太城”是一个不能被接受的词，麦满纳城现在依然存在。穆思套菲显然也提到了麦满纳城，并说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这是一座中型城市，在热带地区，种植着粮食、水果和椰枣，用水取自附近的一条河流。但这里大概将护时健地区的麦满纳城与札卜里思田（Zābulistān）地区的麦满（Maymand，也可称为Maywand）城[15]混淆了，后一座城位于吉里失（Girishk）城[16]和坎答哈（Kandahār）城中间；这种混淆现象也出现于亚库特的记载中，他记述哥疾宁地区的麦满，或密满（Mīmand）城时，说该城“介于梵衍那城和古儿地区之间”，显然这里指的就是麦满纳或竹忽底牙。距竹忽底牙或麦满纳城1站之地就是坎答兰（Kandadram，或写为Kandram）城[17]，据雅忽比记载，这里是护时健地区的总督居住地。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这是座山城，这里有很多葡萄园和核桃树，其靠各条水量充沛的河流进行灌溉。[18]

中世纪时期，法儿牙卜（Al-Fāryāb）城[19]是护时健地区最重要的

城市之一，这个名称在地图上已完全查不到了，但通过道里志记载的位置判断，其遗址应在今天称作亥剌八（Khayrābād）的地方，其附近是一座周边有很多砖堆的古城堡。伊本·豪喀尔将法儿牙卜之名拼写为法里牙（Al-Fāriyāh），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座城的规模比塔里寒城要小，但比其所在地的土地更肥沃，果园也更优美。这座城市宜人舒适，汇集着各种商品。城里有座漂亮的聚礼清真寺，但没有宣礼塔。亚库特将其名称拼写为费儿牙卜（Fīryāb），在谈及有关塔里寒城和沙卜儿干（Shaburkān）城的内容时只是提到了该城的位置，但未细说。在他记载以后不久的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法儿牙卜城完全被蒙古人摧毁，穆思套菲只是偶尔提到了这座城。据伊本·豪喀尔记载，竹忽底牙城和法儿牙卜城之间有麻儿三（Marsān）城[20]，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该城的规模和竹忽底牙城差不多，其应位于亚库特提到的纳里延（Nariyān）村[21]所在地。在这个山地地区还有座三（San）小城[22]，伊本·豪喀尔称这里有很多繁盛的果园，生长着葡萄和核桃，因这里的河流水资源充沛，流淌不绝。[23]沙卜儿干城，拼写为阿沙卜儿干（Ashabūrkān）或兀沙卜儿干（Ushaburkān），也拼写为舒卜儿干（Shubūrkān）或沙卜儿干（Shabūrghan）等[24]，现在依然存在，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时，这里曾是护时健地区总督府所在地，后来总督府搬迁到当时规模和该城差不多的竹忽底牙（即麦满纳）城。沙卜儿干城附近果园的土地极其肥沃，所产水果大量外销。亚库特将该城名称拼写为舒卜儿干（Shuburkān）、舒夫鲁干（Shufrukān）或沙卜儿干，并说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蒙古西征之时，这是座繁华的城市，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一个世纪后（14世纪），穆思套菲提及与之（亚库特）类似的内容，并将舒卜儿干城与法儿牙卜城并提，还说这里盛产粮食，价格低廉。

舒卜儿干城往南和竹忽底牙城往东均行1天路程就是安八儿（Anbār）城，又名安必儿（Anbīr）[25]，伊本·豪喀尔说该城的规模比马鲁·鲁得城要大。该城是此地区总督冬季居住之所。安八儿城的名称尽管没有保留下来，但这座城可能应在舒卜儿干（Shubūrkān）河上游沿岸的萨儿·普儿（Sar-i-pūl）城[26]之地，这里至今还是一座重镇。这座城市周边是葡萄园，城里的房屋是用泥土建成的。该城常作为护时健地区的首府，纳思儿·忽思罗在去往沙卜儿干城的途中应访问过该城，并称该城为护时健南（Jūzjānān）之城或首府。他还提到了这座城的大聚礼清真寺，并说这里的居民嗜酒。过了平原，在舒卜儿干城的西北就是俺都淮（Andkhuy）城，早期地理学家则将其名称拼写为安答忽

（Andakhud）、安答忽（Addakhūd）、安纳忽（Anakhud）等[27]。伊本·豪喀尔称这是沙漠边上的一座小城市，周边有7个村庄，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里的绝大部分居民是曲儿忒人，他们有成群的羊和骆驼。亚库特也提到了该城，但未详载；此名也常出现于记载帖木儿武功活动的文献中。[28]

巴里黑区的东半部分是吐火罗（Tukhāristān）大区[29]，其沿乌浒水南岸一直到巴达哈伤（Badakhshān）山[30]之境，南边以梵衍那城和半制（Panj-hīr）北边的山脉为界。此地区分为上、下吐火罗地区：上吐火罗地区包括巴里黑城的东边，以及沿乌浒水的区域；下吐火罗地区则往东南，以巴达哈伤山为界。中世纪的地理学家提到了吐火罗地区的很多城市，但没有详载，因此除了道里志中的记载和至今尚存的城市外，大部分城市之名现已无法确定。

巴里黑城往东2天的路程就是忽儿木（Khulm）城[31]，据穆喀达思记载，这是座小城，城附近有很多大村庄和地区，这里气候颇佳。再从忽儿木城行2天的路程就是毗邻的悉蜜言（Siminjān）城和鲁卜（Rūb）城[32]，这两座城在忽儿木城之南，可能位于现在胡勒姆（Khulm）河上游的亥八（Haybak）城[33]附近。穆喀达思说悉蜜言城要比忽儿木城大一些；这座城有聚礼清真寺，这里产优质的水果，亚库特说该城位于一条弯曲的河谷里，这里居住着，或曾居住过阿拉伯塔敏（Tamīn）部。穆思套菲称该城是座大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已毁，但这里大量种植着粮食、棉花和葡萄等。阿里·亚兹底在记述帖木儿从忽儿木城行军到印度边界的内容时，提到了该城，并将其拼写为萨敏干（Saminkān）。

悉蜜言城东南就是上、下缚伽浪（Baghlān）地区[34]，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称与下缚伽浪地区同名的城市就是该区的首府，城里有聚礼清真寺。缚伽浪城，或阿里·亚兹底按地区名称记载为八可兰（Baklān）城，显然应位于去往安怛罗缚婆（Andarābah，或安咀罗缚（Andarāb）城[35]的道路上，据穆喀达思记载，这座城有漂亮的市场，其所在的山谷里覆盖着苍翠的森林。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半制山脉北坡的这些山谷里，有很多银矿，他还提到了流经该地区的两条河流：纳赫儿·安咀罗缚（Nahr Andarāb）河与纳赫儿·柯散（Nahr Kāsān）河。亚库特提到了安咀罗缚或安怛罗缚婆之名，但未细述。[36]

忽儿木河没有汇入乌浒水中，而是在旧城（忽儿木）遗址北边的几

英里处流入沼泽。乌浒水离忽儿木城最近的拐弯处，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有座带城墙的坚固哨所，被称作卢八·密剌（Rubāt Mīlah），从巴里黑城起程行3天路程后，道路在此处跨过大河（乌浒水）进入河中与珂咄罗（Khuttal）[37]地区。忽儿木城向东行2天路程就到达遏换（Warwālīz，或Warwālīj）城[38]，据伊本·豪喀尔和其他著述者记载，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是座大城。该城之名今天没有保留下来，但从道里志记载的位置来判断，应在昆都思（Kunduz）城[39]不远。亚库特显然由于笔误将该名记为洼兹洼林（Wazwālīn），但他未补充新材料。亚库特和其他早期著述者未提及昆都思，该名无疑是苦寒底兹（Kuhandiz）的简称，这一名称在波斯语中是常用词汇，含义为“城堡”，可能人们以该名来称呼遏换城的古堡。[40]

遏换城往东行2天路程就是台亦干（Tāyikān）或塔里寒·吐火罗（Tālikān-i-Tukhāristān）城[41]，现在依然存在（不要将其与护时健地区的塔里寒城混淆，见原文第423页），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该城是这一地区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穆喀达思将这座城的名称拼写为塔里寒（At-Tālikān），但书写为台亦干（At-Tāyikān）会更好一些，他说城里有一座大市场；该城位于距山区一步之遥的平原上，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其规模是巴里黑城的1/3。该城附近的土地靠一条叫忽塔剌（Khuttalāb，有时写为Khaylāb）的乌浒水支流灌溉；洼忒剌（Watrāb，或Tarāb）河（这两条河的读音均值得怀疑）在昆都思城之北流入忽塔剌河，显然该河就是乌浒水的支流之一。该城（台亦干城）邻近地区异常肥沃，极为舒适宜人；据穆思套菲记载，这里盛产粮食和各种水果，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该城的绝大多数居民是纺织工。这里（台亦干城）有座坚固的城堡，附近土地肥沃，盛产葡萄、无花果、桃和阿月浑子等。阿里·亚兹底在叙述帖木儿的武功活动时，常提到台亦干城，据早期地理学家记载，从该城往东行7天路程就是巴达哈伤（Badakhshān）地区，这一内容将在下一章叙述。[42]

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呼罗珊地区最著名的外销产品是乃萨卜儿地区与马鲁地区的丝织品和棉织品。他说这里（呼罗珊地区）羊和骆驼的价格很低廉，年少的男女突厥奴隶售价达5000迪纳（约2500英镑），食品很丰富。穆喀达思做了更为详细的记载。乃萨卜儿（Naysābūr）城主要是制造业中心。这里生产各种白叠布；产用来做长袍的布匹，其被织为平直或十字或对角线的样式。这里还产面纱、细布衬衣面料、毛纺织品、生丝、丝锦、丝棉混合锦、各种亚麻织品、山羊绒毛料等；所有这

些产自乃萨卜儿城的产品均很驰名。这座城也产用各种精线、平纹丝做成的斗篷。这里也生产铁制品，如针和刀等。乃萨卜儿地区的果园以产无花果、菌类和大黄而闻名。在里万（Rīvand）地区的矿山中产著名的你沙不儿（Nīshāpūr）绿松石（Fīrūsāj）[43]。

尼撒城和阿必洼儿（Abīvard）城所属地区以产生丝绸织品和妇女所纺织的布料而闻名。这里也制作狐裘大衣，尤其在尼撒地区分布着一种珍稀的隼，还盛产芝麻。途思城制造的大烹锅是特产，还产小毯，这里生产的粮食大部分外销，也生产精美的腰带和斗篷。哈烈城产各种织锦，还产葡萄干、阿月浑子等干果和各种果汁。哈烈城锻造的钢也很有名。噶儿吉·沙儿（Gharj-ash-Shār）山区产毛毡和地毯，以及鞍垫、鞍鞯。这里还发现有黄金，饲养大批外销的马、骡。

马鲁城是机织丝、混纺丝棉和纯棉纱的重要地区，这些产品可用来制作面纱和各种布匹面料。该城周边产芝麻香油、佐料和香料，以及木蜜。马鲁城产铜锅，这里的面包房烤制各种优质的糕点。巴里黑城附近的地区产芝麻、稻米、杏子、核桃和葡萄干。这里制造的肥皂很有名，该地能从葡萄和无花果中提取一种叫“蜜”的东西，以制作各种糖果，也制作一种石榴壳果酱。该城大量外销果汁和精加工的黄油；该城附近有铅、硫酸盐、砷等矿。巴里黑城的熏香也很有名，这里也产姜黄、油脂和果酱。该地还有皮草、斗篷，以及产自乌浒水对岸忒耳迷城的肥皂、阿魏（一种药用植物，译者）。穆喀达思详细记载了从洼儿洼里吉（Warwālīj）地区到巴达哈伤地区的很多果品，如核桃、巴丹杏、阿月浑子和梨等。这里大量产用来贸易的稻米和芝麻，也产各种奶酪和精加工的黄油，还产兽角和皮张，尤其是狐裘。[44]

穿过呼罗珊地区和苦黑思田地区有如下各条道路。呼罗珊道经必思坦城（在苦密思地区，见原文第365页）进入呼罗珊地区，从该城有两条道路可达你沙不儿城。北道或商道从必思坦城到达贾贾儿木（Jājarm）城，然后经阿札洼儿（Azādvār）城，穿过朱外因平原，南下到达你沙不儿城。穆思套菲全面记载了这条道路，伊斯塔赫里和伊本·豪喀尔只记载了部分路段。南路，也是近道，这是去往乃萨卜儿城的邮道，这条道从八哈士（Badhash）城起程，如前文所述（见原文第368页），该城距必思坦城有2里格。该道沿沙漠右边的山脉边缘，到达阿萨八答（Asabādād）城，接着经过八赫满纳八（Bahmanābād，或Mazīnān）城，从这里分出一条道路向北到达阿札洼儿城。邮道继续向

东经过萨卜兹瓦儿城，最后到达你沙不儿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所有的早期道里志均记载了这条道路。据穆喀达思记载，从阿萨八答城向东南，有一条横穿“大沙漠”之角30里格的道路，到达苦黑思田地区的土儿失兹（Turshīz）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穆喀达思记载了从你沙不儿城到土儿失兹城的道路。穆喀达思记载了从你沙不儿城到尼撒城的道路驿站。[45]

过你沙不儿城1站之地就是喀思儿·里合（Kasr-ar-Rīh）或底兹八（Dizbād），即风堡，在这里，呼罗珊道分为两道：向右的东南道路，南下到达哈烈城，这将在下文叙述；从风堡向左的西北道路到达麻失哈城和途思城，从这里经麻兹答兰（Mazdarān）城，越过塔建（Tajan）河到达撒剌哈夕城，从撒剌哈夕城穿过“大沙漠”，到达大马鲁城，然后这条道路再经沙漠，到达乌浒水岸边的阿木（或察哈儿·朱夷）城，之后离开呼罗珊地区，到达终点站不花剌城。几乎所有的道里志均记载了从你沙不儿城到乌浒水岸边阿木城的呼罗珊道，但略有差异，而且这条道路的绝大部分驿站今天仍保留着古老的名称。[46]

如前所述，呼罗珊道向右分出，经你沙不儿城1站之地后，到达哈烈城。从撒剌哈夕城和马鲁城也各分出向右的道路，这两条道路均可到达马鲁·鲁得城，同时还有一条从哈烈城向北到达该城（马鲁·鲁得城）的道路。从马鲁·鲁得城，干道再向北到达巴里黑城，过了该城，越过乌浒水可达忒耳迷城。从风堡分出来去往哈烈城的道路，其间首先经过4站到达卜兹建（Būzjān）城，再行4站路程到达卜失建（Būshjan）城，此后经过1天的路程到达哈烈城。伊本·鲁斯塔和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地理学家均记载了这条道路，穆思套菲也做了记载。从卜兹建城和卜失建城起程的道路分别向西南和正西，这些道路最终会合于哈因（Kāyin）城，伊斯塔赫里和其他著述者记载了该道经行苦黑思田地区各城市间的里程。哈因城也是从“大沙漠”边缘的塔八辛城与忽儿（Khūr）城起程的道路的会合地。[47]

伊本·鲁斯塔和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三位地理学家记述了从哈烈城向南的道路，其南下到达疾陵城，中途经过阿思夫札儿（Asfuzār）城，并穿过昔吉思田城与法剌城之间的昔吉思田地区边界（见原文第341页）。哈烈城向东的道路沿哈里·鲁得河河谷北上到达古儿地区的边界，上述三位地理学家称沿途经过的城市之间均相距1天路程。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地理学家也记载了从哈烈城经喀鲁合

（Karūkh）城的道路里程，其经1天的路程到达古儿吉思田地区的舒儿敏城和阿卜申城，再沿木儿噶卜河南下到达马鲁·鲁得城。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喀尔、穆喀达思记载了经八吉思地区（经过首府八吉舒儿城）到马鲁·鲁得城或喀思儿·阿合纳［Kasr Ahnaf，或马鲁察叶可（Marūchak）］城的诸道，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的穆思套菲也记载了这些道路。[48]

两条分别从撒剌哈夕城和大马鲁城起程的道路汇合于马鲁·鲁得城：前一条道路穿过两条大河之间的沙漠，后一条道路则沿着木儿噶卜河穿过肥沃的土地，以及该河沿岸各城。只有穆喀达思记载了经过一系列卢八（Rubāt，即哨所）的沙漠道，穆思套菲和土耳其语著作《世界志》仅抄录了穆喀达思的记载。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库达玛记载了从大马鲁城沿木儿噶卜河北上的道路，穆喀达思也做了记载，但这是一条不同的路线。[49]

关于从马鲁·鲁得城起程经护时健地区到巴里黑城的道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早期道里志记载其经过塔里寒城，然后要么经过法剌卜城和沙卜儿干城，要么经过安八儿城和竹忽底牙（即满纳麦）城，然后到达巴里黑城。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记载了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很多站点的里程。穆思套菲记载了一条与前述从马鲁·鲁得城到巴里黑城道路完全不同的路线，其间经过塔里寒（Tālikān）双城西边，这里距向右分开的道路有6里格，法剌卜城距向右分开的道路有2里格，然后可达沙卜儿干城，最后经过贾木儿黑延（Jamūlkhiyān）桥到达巴里黑城。《世界志》中抄录了对这条道路的记载。从巴里黑城起程到对岸忒耳迷城，需经思牙吉儿（Siyāhjird）城有2站之地，然后越过乌浒水。[50]

巴里黑城东边的道路，经过忽儿木城和台亦干城到达巴达哈伤地区的边界，在忽儿木城有一条分道向东南到达安怛罗缚婆城和可不里城北边的半制矿。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简略地记载了从巴里黑城经过山区到梵衍那城，然后向南经哥疾宁城到达苦思塔儿（Kustār）的诸道，也记载了一条从哥疾宁城向东到印度边界的分道，但这些道路上的驿站无法确定，因其地名已无从得知。[51]

[1] 即`Umm Al-Bilād，译者。

[2] 《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第135～136页载：“巴里黑是呼罗珊的重要地区之一。其实这里有四个重要区域，即你沙不儿、马

鲁、哈烈和巴里黑。巴里黑是其中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很多国王喜欢将其作为首都。”“这座城市也与乌浒水相连接，因此有人将这条河叫作‘巴里黑河。’”“这里的特产有石榴石、睡莲、肥皂和很多这里不再提及的其他特产。”译者。

[3]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3页载：“另一条河叫巴里黑河，发源于梵衍那地区，流经麻得（Madr）、吉儿万卫所（Ribāt-i Kirvān）等地，到达巴里黑。这条河的所有河水都用来灌溉巴里黑地区的耕地。”译者。

[4] 瑙·八哈儿（Naw Bahār），据《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城（小王舍）外西南有纳缚，唐言新。僧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惟此伽蓝美业不替。其佛像则莹以名珍，堂宇乃饰之奇宝。”“此伽蓝素有毗沙门天像，灵鉴可恃，冥加守卫。”毗沙门天又名多闻天，是四天王之一，原为印度国土守护神，保护北方。译者。

[5]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87、288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5、278、28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5、326、32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2、302页。Mas，第4卷，第4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13页；第4卷，第817、818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21页。有关因瑙·八哈儿（Naw Bahār）的奇异记载，见巴尔比尔·梅纳尔德（M. Barbier de Meynard）翻译的全文，被收录在《亚库特地理词典波斯条目》（*Dictionnaire Gegraphique de la Perse*），第569页。现存的大小造像、旗幡使罗林森（H. Rawlinson）爵士推断因瑙·八哈儿最初是一处佛教徒的圣墓，这个名称可解释为因瑙·威哈剌（Naw Vihārah），即“新威哈剌或新佛寺”（*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为英国《皇家地理杂志》，第510页，1872年）。

[6] 《马可波罗行纪》第44章第71页载：“巴里黑城是一名贵大城，昔日尤形重要。然历经鞑靼人及他种人之残破，昔之美丽宫殿以及大理石之房屋，已不复存。”译者。

[7] 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

58、59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176页。哈万达密儿，第2卷，第3部分，第238页。亚特（C. E. Yate）：《呼罗珊与西吉斯坦》（*Khurasan and Sistan*），第256、280页。

[8] 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大唐西域记》作胡寔健国，其“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多山川，出善马。”《旧唐书·地理志》作护特（时）健；《新唐书·地理志》作护时犍国。《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5页将护时健写为古兹噶南（Gūzgānān），并载：“这是一个繁华、舒适的地区。那里统治公正、平等和安全。该地区的东边经巴里黑和吐火罗南下到梵衍那之界；其南边到古儿和不思忒之界；西边到噶儿赤思田（Garchitān，即Gharchitān，引者）之境及其首府八欣（Bashīn，即阿卜申），南下到马鲁之界。
北边到质浑河之界。”“这个地区产大批的马匹、毡子、褡裢（haqība）、马鞍肚带（tang-i asp）、兹卢（zīlū）、帕拉斯（palās）。这里还有欣吉（khinj）树，这种树木从来不会变干，很柔软，可以打成结。”今为朱兹詹，是阿富汗的1个省，共有11州（县），人口51.2万。该省位于阿富汗西北，与土库曼斯坦接壤。译者。

[9]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49页。

[10] 见《元史·太祖本纪》，《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塔里干。《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6页载：“塔里寒位于古兹噶南地区边界，受该地区的统治者统治。这是一座惬意的城市，产大量的酒和毡子。”今此城不存，应在法利亚布省凯萨尔（Qaysar）城西边，是丝路重镇。不要与伊朗西部的同名地混淆。译者。

[11] 护时健城，见前文本章护时健地区注释，但从阿拉伯、波斯文献记载来看，显然其地区名与首府名同。《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7页写为古儿兹万（Gurzivān），并载：“过去的时代里，兹噶南的国王就驻跸于此。”今此城名已不存，应在凯萨尔（Qaysar）城西边，位于去往巴拉穆尔加布城的道路上，曾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和重镇。译者。

[12]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87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

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1、32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9、129页；第3卷，第491页；第4卷，第258页。Abu-l-Ghāzī（阿布·勒·噶兹），著有《突厥世系》（*History of the Turks and Mongols*），英译本于1838年在伦敦出版。汉译本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114页。亚特：《呼罗珊与西吉斯坦》，第157、194、195、196、211页。察察土（塔里寒）城附近这些遗址到八剌·木儿噶卜（马鲁·鲁得）城的直线距离为45英里，从八剌·木儿噶卜（马鲁·鲁得）城到塔里寒城的山路需要走3天。阿里·亚兹得在叙述帖木儿的武功活动中提到了察察土（写为Jījakūt）这个名称，但他未提及塔里寒城。喀剌·瓦里（朱儿祖万）附近的遗址距八剌·木儿噶卜城27英里。另外在塔合·可敦（Takht-i-Khātūn）附近可能找到存在的遗迹。这两个遗迹之一就是古儿祖万城所在的位置，需注意的是在花剌子模王朝统治者（Khwārizm Shāh）统治时期，这是一座造币城。

[13] 今为梅马内（Maymana、Meymaneh 或Maimana）城，是法里亚布（Fāryab）省省会，人口14.9万。是连接巴里黑与赫拉特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14]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7页载：“甲忽丹（Yahūdān，即Al-Yahūdān）是一座繁华、舒适的城市，位于山下。古兹噶南的统治者（malik）居住在距该城1.5法儿萨的军营（lashkargāh）里。这个军营叫答儿·安大剌（Dar-i Andara），是一处坚固之地。”译者。

[15] 今为坎大哈省麦万德（Maiwand）区的名称和一个小镇的名称，在坎大哈城西北50公里处，历史上曾是重要的通道。译者。

[16] 今为格里什克，是赫尔曼德省纳赫里·萨拉吉（Nahri Saraj）区的一座城市，在坎大哈西北120公里处，人口4.8万，是连接赫拉特城与坎大哈城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同时其周边地区为阿富汗富庶的农业区。译者。

[17] 今此名不存，应在法利亚布省凯萨尔（Qaysar）城附近。译者。

[18]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87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1、32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68页；第4卷，第719、1045页。Mustawfī（穆思套

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5页。亚特：《呼罗珊与西吉斯坦》，第339页。

[19]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7页提到了法儿牙卜（Pāryāb，即Al-Fāryāb）城。此城名今不存，应在法利亚布省梅马内城西北方向，距东北的希比尔甘（Shibirghān）城不远，曾是丝路之路的要道，1220年蒙古西征军彻底毁掉了这座城市，其再也没有恢复。译者。

[20] 今此城名已不存。译者。

[21]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7页载："纳儿延（Naryān，即Nariyān），是甲忽丹和法儿牙卜之间的小镇。其所在地范围有2法儿萨。"今此城名已不存。译者。

[22]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7页载："三（San）城，是繁华地区的一座城市，这里有很多牛羊。"今此城名已不存。译者。

[23]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1、322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840、888页；第4卷，第775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8页。亚特：《呼罗珊与西吉斯坦》，第233页。护时健地区的法儿牙卜城，被纳思儿·忽思罗称作底合·八儿牙卜（Dih Bāryāb），他从沙卜儿干（Shaburkān）城到塔里寒城时，路过该城。这座城在《世

界志》中也记载为八剌卜（Bārāb，第324页），但这个名称与法剌卜（Fārāb）混淆了，后一地也叫八剌卜（Bārāb），这个地方（法剌卜）就是药杀水（Jaxartes）岸边的讹塔剌（Otār）城，对于此城将在本书第34章述及。

[24]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7页写为兀沙卜儿干（Ushabūrqān），并载，这座城“位于原野的大道旁。这里很宜人，水资源丰富”。《马可波罗行纪》第43章第70页载：撒普儿干（Sapourgan，即沙卜儿干）“百物皆富，尤出世界最良之甜瓜。居民切瓜作条，在太阳下曝干，既干食之，其甜如蜜。全境售此以作商货。其地颇有猎兽飞禽”。今为希尔比甘（Sheberghān、Shaburghān、Shebirghan、Shibarghān），位于阿富汗北部，是朱兹詹省省会，人口17.5万，是连接赫拉特、喀布尔与中亚各城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25]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7页载：“安必儿城是古兹噶南的首府（qasaba），是座很好的繁华的城市，居住着商人，是巴里黑的贸易中转站。该城很舒适，位于一座山脚下。这里产古兹噶南皮，行销天下。”今此城名不存，应位于萨尔普勒（Sar-e Pūl）城所在地。译者。

[26] 今为萨尔普勒，波斯语意为“桥头”，是萨尔普勒省省会，人口13万，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27] 据《西域藩国志》记载，俺都准（淮）“在哈烈之东北，西南去哈烈约一千三百九十里，东北去撒马尔罕约一千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中，村广百里，田土地膏腴，人民繁庶。城周回十余里，略无险峻。虽为哈烈所隶，赋税止入于其本处头目之家。”《陕西通志》卷十作俺的灰。《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7页载：“安答忽（Andakhudh，即Andakhud，引者）是田野（*biyābān*）上的一座城。这里有很多耕地，但不舒适。”《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9页载：“安答忽是呼罗珊一个地名，靠近沙卜儿干和巴里黑之界。”今为安德胡伊（Andkhoy 或 Andkhui），是位于阿富汗北部法里亚布（Fāryab）省的一座城市，人口3.7万。多条道路在这里会合，地位与希尔比甘城相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28]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87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0、27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1、322页。Nāsīr-i-Khusraw（纳思儿·忽思罗），著有《旅行记》（*Safarnāma*），波斯语本由谢菲尔（C. Schéfer）编辑出版，附有注释与法文翻译，收入“东方语言遗存汇编”（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丛书，1881年巴黎出版。英译本由撒克斯顿（Thackston W. M. Jr.）翻译，1986年作为波斯语化遗产系列之一（Persian Heritage Series，No. 36）在纽约出版，第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

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367、372页；第3卷，第254、256、305、84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8、189、190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805页；第2卷，第593页。亚特：《呼罗珊与西吉斯坦》，第346页。

[29]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7页载："吐火罗是舒适的地区，其大部分为山区。这里的草原上居住着葛逻禄突厥人。该地区产马、羊、大量的粮食和各种水果。"又第109页载："哇儿哇里吉［Valvālij，即Warwālīz，或Warwālīj，也即今昆都思（Qunduz，又译昆都士），见米诺斯基注释第340页］城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是吐火罗的首府。这里气候宜人，水流潺湲。这里的人很合群。"译者。

[30] 《往五天竺国传》作蒲持（特）山；《新唐史·地理志》作拔特山。今为巴达赫尚山，这个山区属今阿富汗巴达赫尚省。此地所产的红宝石名闻天下，这里是通往中国、中亚、印度的要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译者。

[31] 《大唐西域记》作忽懔国，"周八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8页载："忽儿木位于巴里黑和吐火罗之间的山脚下的平原上。这里有条河，土地税从水浇地中征收。此地有大片的耕地。"今为胡勒姆（Kholm、Khulm，也称Tashqurghan），原先属于阿富汗北部的萨曼甘（Samangān，悉蜜言）省，现属于巴尔赫（Balkh）省，人口6.9万，是进入南亚次大陆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2] 悉蜜言城与鲁卜城，《大唐西域记》卷一作纥露悉泯健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新唐书·地理志》载："迟散州以悉蜜言城置"。《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8～109页载："悉蜜言（Simingān，即Siminjān）是位于山区的一座城市。这座城所在的山里有种类似大理石的白石，开采后用来建房和修建大厅、亭榭、佛教造像、拴马桩，以及作为亭榭所需的附件材料。亭榭上的人物绘画为印度人的样子。悉蜜言产好酒和大量的水果。"译者。

[33] 冯承钧先生虽未说亥八（Haybak）城与悉蜜言城是同一城市，但前一条列入后一条中，见《西域地名》，第31、86页。但从阿拉伯文献和西方学者的研究看，这两座不同名称的城市应该是同一座城市。今为艾巴克（Aybak，即Haybak），为萨曼

甘省省会，是去往胡勒姆、坎布尔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34] 《大唐西域记》卷一作缚伽浪国，其“东西五十余里，南北二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0页提到了缚伽浪。今为巴格兰（Baghlan），是阿富汗北部巴格兰省的一座城市，人口14.6万，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5] 《大唐西域记》作安呾罗缚，载：“睹货逻国故地，周三千余里。”《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9页载：“安呾罗缚城是位于山中的小城。这里有大片耕地，盛产粮食。这里有两条河。该地的银币（dirham）是用半制（Panjhīr）和贾儿牙纳[Jāriyāna，即贾儿八牙（Jārbāyah），可能是笔误造成的，引者]银矿产的银铸造的。这里的国王叫沙合儿·萨里儿（Shahr-salīr）。”今为安达拉卜，是巴格兰省安达拉卜县（区）的首府，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要城市。这里的主体民族为塔吉克人。译者。

[3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372页；第2卷，第827页；第3卷，第142、518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8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19页。亚特：《呼罗珊与西吉斯坦》，第317页。这些地方的相关位置见地图一，原书第1页。

[37] 《大唐西域记》卷一作珂咄罗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新唐书·地理志》之“骨咄”。译者。

[38] 《大唐西域记》作活国，并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旧唐书·地理志三》载：“月氏都督府，于吐火罗国所治遏换城置，以其王叶护领之。”其为《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9页提到的哇儿哇里吉。即今昆都士。译者。

[39] 见《陕西通志》卷十。今昆都士（Qonduz，Qondūz，Konduz，Kondūz，Kondoz），是阿富汗昆都士省的省会，人口26.8万，是进入南亚与中亚的要道，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40]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6、33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6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518页；第4卷，第926页。

[41] 《大唐西域记》作呾剌健国；《新唐书》作多勒健；《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塔里干。《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0页载：“台亚干（Tāyaqān，即Tāyikān）是介于吐火罗与忽塔兰（Khuttalān，即Khuttal，引者）之间的边界城市。这里沿着山根有大片的的土地。”《马可波罗行纪》第45章第73页载，塔亦寒（Taican，即塔里寒）“有一大市场出售小麦。其地风景甚美。南方诸山甚高，皆由盐构成”。“是为世界最佳之盐，其质硬，须用大铁锄始能取之。”向东3日，“经过甚美之地。广有果实，居民甚少，葡萄及其贱价之物甚多。居民悍恶而好杀人，嗜饮酒”。今为塔卢坎（Tāluqān或Tāleqān），是阿富汗塔哈尔（Takhar）省省会，人口19.6万，是阿富汗西部的重镇，也是丝绸之路的要道，有多条道路在这里会合。译者。

[42]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93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5、276、278、27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6、303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7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501页；第5卷，第2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

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8、189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82、179页。这个名称（有冠词和没有冠词）被拼写为台亦干（Tāyikān）、台亦干（Tāyikān），以及塔里寒（Tālikān），后者和护时健地区的城市名称一样。

[43] 《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第131～132页载："至于绿松石，只有在你沙不儿才可以找到。这种宝石每块的价格为200底纳（dinar）。""这种宝石分奶白色和绿色。""你沙不儿绿松石是最珍贵的宝石。""你沙不儿的特产有精纺（hafī）纺织品、细纺毛巾、纺线（tākhtaj）布、纺（rākhtaj）丝和一色丝。""至于你沙不儿用阿塔必（`āttābī）布、萨噶图尼（saqātūnī）布制作的成套长袍，与报达城、亦思法杭城的一样有名。"译者。

[4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8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3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23～326页。

[45]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3、52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01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67页。（对这条路做了详细的记述）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16、28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275、33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1、352、371、372、49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

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6页。

[46]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4、25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01、202页。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1页。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27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48、35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6页（远至撒剌哈夕城）。

[47]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2页（对道路有详细记载，但没有里程记录）。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83、284、28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32、333、33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51、35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7页。

[48]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173、17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48、249、28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04、305、33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48、349、35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8页。

[49]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32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0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47、34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6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29页。

[50]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32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10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8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

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46、347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7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29页。

[5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8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34、33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46、349、486页。

第三十一章 乌浒水（Oxus）地区

河中地区的一般状况。乌浒水与药杀水（Jaxartes）的名称。乌浒水的上游支流。巴达哈伤（Badakhshān）地区与护密（Wakhkhān）地区。珂咄罗（Khuttal）与镬沙（Wakhsh）。久越得健（Kubādhiyān）地区与支汗那（Saghāniyān）地区，以及这些地区的城市。石桥。忒耳迷（Tirmidh）城。铁门。喀里夫（Kālif）城、阿合思萨（Akhsīsak）城与费拉卜儿（Firabr）城。咸海（Aral）或花剌子模（Khwārizm）海。乌浒水冬季的封冻。

过去的乌浒水[1]是操波斯语地区与突厥语地区、伊兰（Irān）地区与土兰（Tūrān）地区之间的边界；这条河北边的地区被阿拉伯人称作麻洼兰纳赫儿（Mā-warā-n-Nahr），即河外地区（此河可以理解为乌浒水），或者称作挹怛（Haytal）[2]地区。5世纪，挹怛人是萨珊王朝的劲敌，这个民族应为拜占庭文献中记载的嚈费塔（Ephthalites），通常被称作白匈奴。但中世纪的阿拉伯人以挹怛之名泛指乌浒水以北的所有土兰诸族和地域，如穆喀达思就是这么使用的。

这些地方一般划为5个地区。最重要的就是粟特（Sughd）地区，即古代的索格底亚那（Soghdiana），其有两座首府—不花剌（Bukhārā）城和撒马儿罕（Samarkand）城；粟特地区的西边是花剌子模（Khwārizm）地区，现在通常被称作希瓦（Khivah），也包括乌浒水三角洲；粟特地区的东南则是支汗那（Saghāniyān）[3]地区，和珂咄罗（Khuttal）[4]地区及乌浒水上游的各大区，巴达哈伤地区虽也在这一范围内，但在乌浒水的左岸或南岸，除了吐火罗外，差不多在这条河的大拐弯内；最后的两个地区为—药杀水（Jaxartes）流域上游的拔汗那（Farghānah）地区与柘支（Shāsh），现在的塔石干（Tāshkand）地区，后一个地区还包括西北的诸区，直到药杀水注入咸海沼泽处。

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将乌浒水与药杀水分别被称作质浑（Jayhūn）河与细浑（Sayhūn）河，传说这两条河像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一样，是天堂中的两条河。这两条河的名称来源尚不十分清楚，但阿拉伯人所称之名显然借自犹太人，因质浑河与细浑河在《旧约·创世纪》（2：

11，13）中被提到了，即吉浑（Gihon）河与皮笋（Pison）河，其应是这两条河之名的讹音。[5]

中世纪后期，约在蒙古西征之时，质浑河与细浑河之名便废弃不用了；此后乌浒水通常被称作阿木牙（Amūyah）河，或阿木·答里牙（Amū Daryā），细浑河被称作锡儿·答里牙（Sīr Daryā），此河将在下章叙述。阿木牙（Amūyah）或阿木（Amū）一词的来源也不十分清楚。据哈菲兹·阿卜鲁记载，这个名称是取自靠呼罗珊一边的乌浒水岸边的城市和地区名称，最初写为阿木（Amul，即察哈儿·朱夷，见原文第403页）。实际上与这种名称解释可能恰好相反（存在臆测），准确的解释应是以阿木牙（Amūyah）或阿木（Amū）大河（波斯语）之名来命名阿木城，由于这条河的名称被普遍使用，于是就代替了更早的质浑河之名（阿拉伯人称呼）。再进一步考察，按阿拉伯人的习惯，河流之名通常多取自沿岸大城市的名称；因此乌浒水，或阿木·答里牙通常也称作巴里黑（Balkh）河，但巴里黑城距此河南岸有一定的距离。希腊人已知晓乌浒水是条大河，并将此河名称记为镬沙·阿卜（Wakhsh-āb）水[6]，即镬沙（Wakhsh）河，这条河是乌浒水上游的支流，但阿拉伯人没有用镬沙河之名来称呼这条河（乌浒水）的干流。

据伊本·鲁斯塔和其他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乌浒水的源头位于播蜜（Pamir，或Fāmir）[7]高原，为小吐蕃（At-Tubbat）地区的一座湖泊。伊斯塔赫里的记载被后来绝大部分著述者传抄，他提到了乌浒水上游众多支流中四条河流的名称。这些支流虽不易勘定，但以下的几条河流还是比较清楚的：乌浒水上游的干流为纳赫儿·牙儿牙卜（Nahr Jaryāb）河[8]，今天称作喷赤（Panj）河，其从东流经被称作护密（Wakhkhān）[9]的地区，然后到达巴达哈伤地区，牙儿牙卜（Jaryāb）河也称作洼哈卜（Wakhkhāb）河。这条从东边高原流来的乌浒水干流，在巴达哈伤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拐弯，然后北流，再向西，在未到忽儿木城前转向南流，就在此途河道拐弯的3/4处，从该河右岸流入很多支流。第一条支流是安底贾剌（Andījāragh）河，附近有与之同名的城市（安底贾剌城）[10]，其位于该支流与乌浒水汇合处。这条支流显然应是今天的巴尔坦格（Bartang）河[11]。第二条支流由发源于珂咄罗地区的纳赫儿·法儿噶儿（Nahr Fārghar，也拼写为Farghār、Farghān或Farghi）河汇合而成，这条支流应是今天的万吉（Wanj）河[12]。再往下的支流就是阿合沙洼（Akhshawā，或Akhsh）河，流量差不多与乌浒水的干流一样大，该河岸边有忽塔儿地区的首府

忽儿卜（Hulbuk）城[13]。这条河（乌浒水）的支流的源头之一是纳赫儿·八儿班（Nahr Balbān，或Barbān）河，来自这些源头的水汇合形成今天用突厥语称作阿可·速（Ak-Sū，即清水）的河流。这就是伊斯塔赫里提到的乌浒水上游的四条支流，他还说这几条河流在阿儿汗（Arhan）渡口或通道以北汇合于干流中。

这个渡口之北，在乌浒水的左岸有巴达哈伤（Badakhashān）河，现在称作科恰克（Gukchah）河，也称作纳赫儿·底儿干（Nahr Dirghām）河，其流入乌浒水。阿儿汗渡口向南，乌浒水从右岸接纳了一条大支流，即洼哈卜或镬沙河，如前所述，希腊人将这条支流叫作乌浒水；就是这条河将东边的珂咄罗地区与镬沙（Wakhsh）[14]地区和西边的久越得健（Kubādhiyān）地区与支汗那地区分开。洼哈卜河现在称作苏尔哈布（Surkhāb）河，即红河（Kizil-Sū）[15]。乌浒水流经三面环绕巴达哈伤地区的大拐弯后，最终向西流，在这里从河的左岸或南岸接纳了发源于吐火罗，并流经台亦干（Tāyikān）城与昆都思（Kunduz）城的两条河。伊本·鲁斯塔分别称这两条河为纳赫儿·忽塔剌（Nahr Khuttalāb）河与纳赫儿·洼忒剌（Nahr Watrāb）河，有关内容见前一章节（原文第428页）。久越得健地区与支汗那地区的两条河［后一条河流经忒耳迷城，伊本·鲁斯塔将其称作纳赫儿·札密儿（Nahr Zāmil）河］从北边或右岸汇入乌浒水，它们的源头在卜坦（Buttam）山区，这个山区的北部将乌浒水水系与粟特地区的泽拉夫尚（Zarafshān）河水系分开。这些河流是乌浒水最后的大支流，因为在巴里黑城之西，乌浒水再没有接纳其他支流，而且该河向西与西北流经沙漠，直达咸海南边的三角洲。[16]

巴达哈伤地区[17]位于吐火罗地区的东边，如前所述，其三面被乌浒水上游的大拐弯所环绕。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这一地区人口稠密，土地肥沃，有很多河流流经及有数不清的葡萄园。这一地区的首府为同名的巴达哈伤（Badakhashān）城[18]，如前所述，巴达哈伤（或科恰克）河被阿拉伯人称作底儿干（Dirghām）河。至于巴达哈伤城所在的位置，流传下来的道里志并未提供与之相关的信息；但鉴于这一地区绝大部分地方难以到达的特点，这座城市很可能应在今天此地区首府法扎巴德（Fayzābād）城[19]所在的河谷地带。

巴达哈伤地区很早以来就以产宝石，尤其是“鸽血”红宝石[20]，以及发现于剌兹瓦儿（Lāzward）矿中的青金石[21]而闻名。[22]伊斯兰历4世

纪（10世纪），穆喀达思称宝石矿在一个渡口处，这个渡口是诃论·剌失德妻子祖拜答（Zubaydah）修建的，并以她的名字命名。除了红宝石、“鸽血”红宝石与青金石外，巴达哈伤地区的纯色水晶及牛黄石[23]也很有名。这里也发现有石棉，阿拉伯人称作灯芯石（*Hajar-al-Fatīlah*），石棉不能作他用，但可作灯芯。穆喀达思还说这种石棉纤维可以织成餐桌布，当油渍滴上时，将餐桌布放在炉子上烘烤一下，就会净洁如初。他又说，同样的石棉灯芯一旦粘上油渍，在火中放上一个小时就会变新，但灯芯不会有损耗。穆喀达思还提到了荧光石，在黑暗的房间里可以照亮其附近的所有东西，可能是磷光性氟石。

可疾云尼重述了这些细节的大部分内容，并提到了在巴达哈伤地区所发现的“鸽血”红宝石，“像红宝石一样的石头”，并说在他那个时代人们认为石棉石是由鸟类羽毛石化形成的。“鸽血”红宝石（Balkhash）矿主要在淫薄健（Yamkān）城[24]附近；该城附近还有银矿，阿布·勒·费达则提到了吉儿木（Jirm）城[25]，阿里·亚兹底用该城城名来称呼巴达哈伤河。帖木儿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侵入巴达哈伤地区，当时该地区的首府为吉失木（Kishm）城[26]，这里是巴达哈伤地区国王的驻跸之地；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有喀劳干（Kalāūkān）城[27]，但文献没有记载这一地区的城市，因此无法确定这些城市的位置。

在巴达哈伤地区以东、乌浒水上游是护密地区，伊本·豪喀尔称这里有一条通往（小）吐蕃的麝香之路。这个地区是异教徒的土地，他们将附近地区叫作萨吉纳（As-Sakīnah）和屈浪纳（Karrān，或Karrām）[28]，经过这些地区再往迦湿弥罗（Kashmīr）[29]方向就是勃律（Bulūr）[30]地区，“这里由于下雪或降雨，有三个月见不到太阳”。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护密地区[31]的银矿很有名，在河床中还发现有黄金。从中亚来的奴隶贩子将掳掠来的奴隶通过这个地区运到呼罗珊，供应给西边的穆斯林市场。[32]

如前所述，乌浒水最大的支流是瓦合沙卜河，这条大河自乌浒水右岸的北边汇入，在瓦合沙卜河与乌浒水之间犄角处的大山区就是珂咄罗地区[33]，这一地区名称也宽泛地指呼罗珊东边与北边的所有异教徒地区。[34]珂咄罗地区也包括位于北部的镬沙（Wakhsh）地区，这里是瓦合沙卜河的发源地。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这一地区土地异常肥沃，以产良马和驮畜而著名，多条河流的岸边有众多的大城市，附近的粮田和果园产量很高。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珂咄罗地区的首府为忽儿卜（Hulbuk）城，这里是算端的驻跸之地［可能就是现代库利亚布（Khulāb）城所在地附近］，但门可（Munk）城[35]和哈剌洼儿（Halāward）城[36]的规模比忽儿卜城要大。其他大城市为安底贾剌（Andījārāgh，或Andājārāgh）城[37]和法儿干（Farghān），或法儿噶儿（Fārghar）城[38]，分别位于与各城同名河的岸边；还有坦利牙（Tamliyāt）城[39]和剌洼刊（Lāwakand）城[40]，后一座城市在石桥南［现代的库尔干秋别（Kurgān Tappah）城附近］的瓦合沙卜河岸边。据穆喀达思记载，首府忽儿卜城的中央有座聚礼清真寺，该城靠近阿合沙洼（Akhshawā）河岸边，并从此河取水。安底贾剌城靠近乌浒水岸边，这里有一条与该城同名的河流入乌浒水，该城的位置应在今天的喀剌·瓦马儿（Kal`ah Wamar）所在地。门可城是该地区的最大城市，位于忽儿卜城之北，在坦利牙城之东；哈剌洼儿城位于瓦合沙卜河岸边，据穆喀达思记载，这是座比首府忽儿卜城还要优美的城市。坦利牙城介于门可城和瓦合沙卜河的石桥之间，其可能是现在的八儿朱万（Baljuwān）城。阿里·亚兹底在叙述帖木儿的武功活动时已提到了八儿朱万城。[41]

横跨在瓦合沙卜河上的著名石桥（Kantarah-al-Hijārah）至今依然存在。伊本·鲁斯塔、伊斯塔赫里和其他很多后来的著述者在叙述从坦利牙城到久越得健地区的洼矢吉儿（Wāshjird）城的道路时，记载了这座横跨在瓦合沙卜河上的桥梁。此桥北边是伊本·鲁斯塔所称的八剌·喀密兹（Bilād-al-Kamīdh）地区，过了这个地区就是瓦合沙卜河的发源地—剌失忒（Rasht）地区。据伊斯塔赫里记载，石桥横跨镬沙河穿过的一条深峡，这里的河水流量大、水流湍急，据说此地比任何已知的其他河水流经地要狭窄很多。可疾云尼和其他著述者做了类似的记载，阿里·亚兹底也提到了这座桥，用波斯语写为普儿·三斤（Pūl-i-Sangīn），用突厥语写为塔石·苦普儿（Tāsh Kūpruk，这两种名称的含义均为“石桥”）。现代的旅行者不止一次提到这个地方。[42]

镬沙河的西边，靠近乌浒水南岸就是阿拉伯人所称的支汗那地区，波斯人则称作赤鄂衍那（Chaghāniyān）[43]地区。这个地区的东边之地专称久越得健地区，与地区同名的赤鄂衍那［即支汗那（Saghāniyān）］城[44]，位于镬沙河西边，并在汇入乌浒水的第一条支流（即久越得健河）的岸边。据伊本·豪喀尔记载，久越得健（Kubādhiyān，或Kuwādhiyān）城[45]的规模比忒耳迷城要小，这座城也称作法兹（Fazz）城。这里用来作颜料的红茜草很有名，并出口到印

度。流经此城（久越得健城）的久越得健河是条大河，据穆喀达思记载，这一地区有几座重要的城市，其中的一座城市为奥札吉（Awzaj或Uzaj）城，可能是现代的艾瓦季（Aywaj）城[46]，位于忒耳迷城之北的乌浒水北岸，在此河（久越得健河）左岸的卢八·密剌（Rubāt Mīlah）哨所之南。亚库特说这个地区的水果非常著名。

久越得健河的上游，在石桥之西就是洼矢吉儿城，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这座城的规模差不多和忒耳迷城一样大；从这座城向南一段距离是数瞒（Shūmān，或Ash-Shūmān）城[47]的大城堡。数瞒城周边的地区大量种植供出口的藏红花。据穆喀达思记载，数瞒城极其繁华，修建得也很好；亚库特说这里的居民曾起来反抗他们的算端，在他那个时代这里是防御突厥人的前沿。阿里·亚兹底在记述帖木儿的武功活动时，常提到喜萨儿·数瞒（Hisār Shūmān），通常简称喜萨儿（Hisār，或Hisārak），而且至今还称作喜萨儿（Hisār，即城堡，译者）。[48]

支汗那城可能应是今天的萨尔·阿斯亚（Sar-i-Asyā）城[49]，位于支汗那河[50]的上游，这条河也称作纳赫儿·札密儿（Nahr Zāmil）河。伊斯塔赫里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座城的规模比忒耳迷城要大一些，但后一座城更富庶和繁华一些。由一座大城堡（Kuhandiz）守护的支汗那城，横跨于与之同名的河的两岸。穆喀达思将这座城与巴勒斯坦的剌木剌（Ramlah，即今拉马拉）城相媲美，该城的市场里有座聚礼清真寺。城市附近的野禽很多，该地区有6000个村庄，周边的整个地区烤制物美价廉的面包。八三（Bāsand）小城[51]有座很大的广场和很多的花园，其距支汗那城有两站之地，在这条河（札密儿档河）的上游山区。位于札密儿河的下游，在支汗那城与忒耳迷城的中途有答儿赞吉（Dārzanjī）城[52]，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里有个大卫所。这里还可纺织上乘的毛织品，市场里有座大聚礼清真寺。此城再往南，即在札密儿河附近就是萨儿满吉（Sarmanjī），或萨末健（Sarmanjān）城[53]，其同样也有座大卫所。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里施舍的饼很有名，一天的施舍就值一迪纳（约10先令），是由总督阿卜·哈散（Abu-l-Hansan）布施的，他是哈散·麻合（Hansan Māh）之子。

但支汗那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是忒耳迷（Tirmidh，或At-Tirmidh）城[54]，位于巴里黑城去往乌浒水北岸的渡口处，是札密儿河与乌浒水汇合之地。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此城由一座大城堡守护，城堡里居住着总督，内城周围是外城区，内城有一道城墙，外城也有一道城

墙。一座土坯修建的聚礼清真寺位于市场中央，但市场的建筑是用砖修建的，主街也是用同样的材料铺设而成的。忒耳迷城是北边货物输入呼罗珊的集散地。这座城市有三座城门，据穆喀达思记载，这座城很坚固。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蒙古西征军队向南进入呼罗珊之时，毁掉了该城。此后又修建了一座新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伊本·白图泰访问了这座城市，并称新城规模和旧城一样大，位于废墟北边2英里处，其周边建起了很多果园，园中生长着优质的葡萄和柏树。

乌浒水的右岸，忒耳迷城稍南就是纳委答（Nawīdah）城[55]，这里是从巴里黑城起程，跨过乌浒水直达撒马儿罕城的道路的所经之地。纳委答城有座聚礼清真寺，位于居民区内，此城被看成是支汗那地区乌浒水岸边的最后一座城市。忒耳迷城西北一站之地，在去往粟特地区的渴石（Kish）城与那黑沙不（Nakhshab）城[56]的道路上有哈辛吉儿（Hāshimjird）城[57]，这里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是座重镇；道路从此地往北两站之地，就是著名的铁门关。[58]

中国旅行家玄奘（Hwen Thsang）记载了山中的（铁门）关，他在629年到印度求法取经。[59]阿拉伯地理学家也谈到了这里的一座城市，雅忽比将它称作铁门城（Madīnah Bāb-al-Hadīd），他也记载了这座城的波斯语名称答儿·阿汗宁（Dar Ahanīn）。伊本·豪喀尔、穆喀达思、伊斯塔赫里等人的道里志中均将此名记载为八卜·哈底（Bāb-al-Hadīd）[60]，但未详述。帖木儿时代，以波斯语称作打耳班·阿汗宁（Darband Ahanīn）的铁门关很有名，阿里·亚兹底也以突厥语苦合鲁噶（Kuhlughah）之名提到了此地，但没有细述。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Clavijo）在出使帖木儿宫廷的途中，于1405年8月路过这个著名的关隘。他称这个峡谷险关看起来“好像人工切削的一般，而两边耸立着高山，该关道路顺畅，但很幽深。其中央有一个村庄，背后耸立着一座高山。这一关被称作铁门关，这座山的其他所有地方都没有关隘，因此该关成为撒马儿罕地区朝向印度方向的防卫关口。凡从印度方向来的商人必经此关，故铁门关给帖木儿带来了大量的财税收入”。[61]

乌浒水在支汗那地区向南经过沙漠地区，两岸再没有汇入重要的支流，最后到达咸海南岸的三角洲，这里就是花剌子模地区，此地区将在下一章叙述。流经沙漠地区的乌浒水左右两岸有几座城市（一般是成对的），这些城市是从呼罗珊起程的诸道，越过这条河到突厥之地要经过的地方，呼罗珊一边的绝大多数城市已在前一章做了叙述。这段乌浒水

河道的北岸是喀里夫（Kālif，或Kaylif）城（至今犹存）[62]，中世纪时期，其外城区分布于朝向呼罗珊一边的河岸，城周边有卢八·兹·吉夫儿卫所（Rubāt Dhi-l-Kifl）；因此在那时，喀里夫城被看作横跨乌浒水两岸的城市，穆喀达思将这座城和报达城与瓦夕的城相类比。乌浒水北岸的卫所，以亚历山大大帝之名称作卢八·兹·喀儿因（Rubāt Dhi-l-Karnayn）。亚库特说喀里夫城有座很漂亮的城堡，距巴里黑城有18里格，位于从此城（巴里黑城）通往粟特地区那黑沙不城的道路上。穆思套菲提到了喀里夫城附近的一座大山，其周长有18里格，全为黑土，山顶上有水流和优美的草场，他还说喀里夫城在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时是一座又大又坚固的城市。

这座城（喀里夫城）往南，已叙述过的札木（Zamm）城（见原文第404页，过了乌浒水）对面就是阿合思萨（Akhsīsak）城[63]，这里有一条通往那黑沙不城的道路。据伊本·豪喀尔记载，阿合思萨城是一座小城，城里的居民要经过乌浒水到札木城做聚礼，因这座城（阿合思萨城）没有聚礼清真寺。该城周边被沙漠包围的土地极其肥沃，还有放牧牛羊的肥美草场。乌浒水再往下的右岸，在阿木或阿木牙城对面是费拉卜儿（Firabr）城[64]，其位于通往不花剌城的道路上，该城周边的土地肥沃，有很多人口稠密的村庄。据穆喀达思记载，费拉卜儿城距乌浒水北岸1里格，该城由一个建有卫所的城堡守卫。该城的聚礼清真寺位于通向不花剌城方向的城门处，城门外还有座小礼拜寺（Musallā）和一家供旅行者居住的客栈，以及一处施舍点。这里产的葡萄很有名。费拉卜儿也称作喀里牙·阿里（Kariyat `Alī），或卢八·塔西儿·伊本·阿里（Rubāt Tāhir ibn `Alī，即阿里派人的村庄或卫所）。[65]

乌浒水流经费拉卜儿城和阿木牙城后，再经过大约140英里的沙漠河道，到达塔西里牙（Tāhirīyah）城[66]，这里是乌浒水三角洲耕地的起点。从这里开始，这条大河流向咸海，同时从河道分出有近300英里长的多条灌溉运河，灌溉着中世纪时期富庶的花剌子模地区。自阿拉伯人第一次征服以来，三角洲地段的乌浒水河道经常发生改道，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蒙古西征时期，很多大坝决堤，结果造成下游河道的变化，有关此内容将在后文述及。但根据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还是能大致重新勾勒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花剌子模地区的轮廓，从而可以证明在那个时期乌浒水只有一条可以通航的河道，并流入咸海的南岸沼泽，阿拉伯人称这个海为花剌子模海（Buhayrah Khwārizm）。[67]

咸海较浅，长满芦苇，显然 不能通航；其从东北岸接纳药杀水，但乌浒水无法通过水路与它的姊妹河交通。靠近咸海东岸，介于药杀水河口与乌浒水河口之间的地方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或稍晚被称作古思·突厥蛮（Ghuzz Turkoman）沙漠，这一名称更常指东波斯的马鲁（Marv）沙漠。对于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来说，药杀水与乌浒水的神奇就在于其冬季会封冻，负重的驮畜商队可以通过冰面越过这两条河，他们说因河面有坚硬的冰层，冬季厚度达到5拃多，并保持2～5个月。可疾云尼进一步解释了花剌子模人为什么在冬季只得用铁锹凿开一个洞，到冰层下面汲取河水，再通过这些洞给他们的牲畜饮水及从洞中汲水运回家里，储存在大缸中等。伊斯塔赫里提到了咸海岸边一座叫贾八儿·贾合剌噶兹（Jabal Jaghrāghaz）的山，此山下的水常年结着冰。

咸海，特别是其南岸和乌浒水流入的哈里建（Khalījān）湾附近有著名的渔场，但咸海岸边附近没有村庄，甚至连居住的房舍都没有。如前所述，乌浒水流入三角洲的地方，从该河的左右两岸分出大大小小的运河，而且很多运河可以通航；运河水最后均用于灌溉三角洲的土地。花剌子模地区的绝大多数大城市修建在运河的两岸，而不是修建在乌浒水河岸，因乌浒水的河床常发生变迁，险情不断。乌浒水的下游河段全程可以通航，伊本·白图泰说在夏季从忒耳迷城沿这条河南下用10天时间就可将小麦和大麦等货物运输到花剌子模地区的市场去出售。但在冬季封冻期，此河通航却有危险，或不能通航，亚库特说伊斯兰历616年10月（Shawwal），即公元1219年11月，他从马鲁到朱儿章（Jurjānīyah）城时，有段行程是乘船航行在质浑河上的，亚库特和他的同行者在寒冷的冬季遭遇了河流的突然封冻，几近冻死，同时由于河岸边又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他们几乎无法靠岸登陆，他自己失掉了坐骑，也差点丧命。[68]

[1] 《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称妫水。《隋书·西域传》作乌浒水。《大唐西域记》作缚刍水。《酉阳杂俎》和《新唐书·西域传》作乌浒河。《元史·郭宝玉传》和《西使记》作暗木河。《元朝秘史》作阿梅河。《西游录》卷下作阿母没辇（即Amū Moren，是蒙古人对乌浒水的称呼）。《西域行程记》载："至一河边，河名阿木，有小舟七八个。东岸有城池，名迭里迷（忒耳迷）。"即今阿姆河，全长1415公里，是中亚两条主要的河流之一，也是伊朗文化与草原文化的重要分界线。该河下游是重要的农业地区，居住着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阿富汗人、俄罗斯人、伊朗（波斯）人，该河两岸发生过多次战争，战略地位显要。这里是古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有很多重要道路经过这里。译者。

[2]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作挹达、《新唐书·西域传》作挹怛，并载：“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嚈哒，王姓也，后裔以姓为国，讹为挹怛，亦曰挹阗。俗类突厥，天宝中遣使朝贡。”此名与阿拉伯文、波斯文记载相合，即嚈哒，这和拜占庭文献中的夷费塔（Ephthalites），即西方历史上的“白匈奴”音近。译者。

[3] 《大唐西域记》作赤鄂衍那国，“东西四百余里，南北五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伽蓝五所，僧徒甚少。”《册府元龟》卷九七一作支汗那。《新唐书·西域传》载：“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缚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东临乌浒河。多赤豹。开元、天宝中，一再朝献。”译者。

[4] 今为塔吉克斯坦哈特隆（Khatlān）省，历史上该名称所指区域更为广大一些。哈特隆省由库里亚布（Kulob）州和库尔千秋别（Qurghonteppa）州于1992年11月合并而成，面积2.46万平方公里，人口217.3万人。居民以塔吉克人为主，此外还有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俄罗斯人、土克曼人、塔塔尔人等。全省共有24个州、6个市、18个镇、128个村。省会为库尔千秋别城。译者。

[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86、287、29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35、347、34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61～268页。质浑（Jayhān）河和细浑（Sayhān）河之名稍有变化，如前文（第131页）所提派剌木思（Pyramus）河与萨鲁思（Sarus）河，这两条河位于思里思雅（Cilicia）边陲，靠近希腊领土。至于这些河流名称的来源尚不清楚，似乎是外来词，其含义不明确，质浑河与细浑河是对偶词，许多其他外来词也是这种情况，如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哈因（Cain）与阿必儿（Abel）被阿拉伯人称为喀必儿（Kābīl）与哈必儿（Hābīl）；扫儿（Saul）与高剌忒（Goliath）对应为套鲁忒（Tālūt）与贾鲁忒（Jālūt）；高戈（Gog）与麻高戈（Magog）对应为雅主折（Yājūj）与麦主折（Majūj），见由裕尔（H. Yule）撰写，伍德（J. Wood）编辑的《乌浒水》（*The Oxus*），1872年，第22页。

[6] 我国一般学者认为《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的妫水是指乌浒水，但从梵文文献、希腊文献来看，较早时期妫水是指乌浒水的主要支流镬沙·阿卜水，并以这条支流来称呼整个乌浒水，而后来我国文献、阿拉伯语文献、波斯语文献没有以此支流称呼该大河。译者。

[7] 《往五天竺国传》作播蜜；《大唐西域记》作葱岭；《旧唐书·高仙芝传》作播密川。即今帕米尔高原。译者。

[8]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1页载：“另一条河是哈儿纳卜（Kharnāb）河。其发源于喀萨（Qasa）山之西，在巴达哈伤和法儿噶儿（Pārghar）之间流入质浑河。哈儿纳卜河的水量要比质浑河大，但每个人都用质浑河的名称来称

呼后一条河，原因是质浑河的河道里程要长。”哈儿纳卜（Kharnāb）河和牙儿牙卜（Jaryāb）河应是同一条河流，只是由于笔误造成了这种混乱。所以《世界境域志》中米诺斯基注释第208页称更合适的写法应是哈儿纳卜·穆尔加布（Kharnāb-Murghāb）河，但其对笔误未加评论。译者。

[9] 《后汉书》作休密；《洛阳伽蓝记》作钵和；《悟空行记》作护密；《新唐书·西域传》作护蜜，或护密。即今阿富汗的瓦罕地区。译者。

[10] 从方位判断，这座城市应该就是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德赫尚（Gorno-Badakhshan）自治州鲁珊（Rūshān）州州府鲁珊，也称沃玛尔（Vomar），位于巴尔坦格河与阿姆河交汇处。译者。

[11] 巴尔坦格河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其上游称作穆尔加布（Murghāb，这条河与马鲁专区的河流同名），经过萨雷兹（Sarez）湖后从北边接纳了库达拉（Kudara）河，并形成巴尔坦格河，流过132公里后汇入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界河喷赤河。译者。

[12] 现在一般拼写为万池（Vanch），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主要流域在塔吉克斯坦境内，河谷地带是农业区，喷赤河的北岸支流流经此地。该河谷地带也是重要的交通通道。该河下游有与之同名的城市。译者。

[13]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1页载：“另一条河（没有提到名称，引者）从卜坦漫（Buttamān）山山后行进60法儿萨。该河发源于山区，然后到达门可（Munk）城和忽儿卜（Hulbuk）城。而后到达法儿噶儿（Pārghar），并流入质浑河。”这条河应是库拉布（Kulāb）河，即小苏尔哈布（Kchī Surkhāb）河，该河由阿可·速河和红河（Kizil-Sū）组成（米诺斯基注释第208页）。现在这条河也称红河（Kizil-Sū）。古代的忽儿卜城就是今天的库里亚布（Kulyab，或Kulob）州首府库里亚布，人口8.5万。这里是古今交通要道和丝路重镇。译者。

[14] 《大唐西域记》作镬沙国，其“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译者。

[15]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1页载：“另一条河叫镬沙（Vakhshāb）河，发源于镬沙山区，在镬沙城附近流入质浑河。”洼哈卜或镬沙河，今天音译为瓦赫什（Vakhsh）河，仅拼写不同而已。这条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南坡，上游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被称作克孜勒苏河（Kyzylsu、Kizil-Sū，即红水河），也称作苏尔哈布（Surkhāb、Surkhob）河，西流262公里，从南岸依次接纳穆克苏河（Muksu）和奥比辛高（Obihingou）河，形成瓦赫什河。其是阿姆河的第二条大支流，下游长524公里，总长786公里。一般来说奥比辛高支流汇入处以南才叫瓦赫什河。瓦赫什河上游大多穿行在深山峡谷中，最后的150公里河谷变宽，两岸才有农田。译者。

[16]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92、93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

《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33页。Ibn-al-Fakīh（伊本·阿勒·法吉赫），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五卷，第324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7、29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4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3页。Ibn Serapion（Sarabiyun），译为伊本·塞刺皮昂，著有《富庶胜地》（*Kitāb `ajā`ib Al-āqālīm al-Sab'a Ilā Nāhiyāt al-`imara*）（直译为《唯有人类居住的奇异富庶地区》）。该著作中记述美索不达米亚的内容刊登于189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 R. Asiat. Soc.*）上，也可参阅大英博物馆所藏手稿，编号为23379，第25a、44b叶面。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71页；第3卷，第469页。可疾云尼的著述中将牙儿牙卜（Jaryāb）写为贾儿八卜（Jarbāb，第1卷，第177页）和贾儿延（Jaryān，第2卷，第353页），两者均是音点笔误所致。

[17]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灵》。《魏书》作弗敌沙国，并载："故肸顿翕侯。都薄茅城，在钳敦西，去代一万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间。"《北史》也作弗敌沙。《大唐西域记》作钵铎创那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据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迤逦，沙石弥漫。土宜菽麦，多蒲萄、胡桃、梨、柰等果。气序寒烈，人性刚猛，俗无礼法，不知学艺。其貌鄙陋，多衣毡毼。"《册府元龟》卷九九九作勃特山。《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2页载："巴达哈伤是非常惬意的地区，为商人光顾之地。这里有金、银、石榴石、'鸽血'红宝石等矿。"今为阿富汗的1个省，人口约100万，与中国、塔吉克斯坦、巴控克什米尔接壤，以产红宝石而闻名。译者。

[18] 《元朝秘史》作巴惕客薛城，今为巴达赫尚。译者。

[19] 古之巴达哈伤城，今为法扎巴德（Feyzabad，Fazelabad或 Faizabad），是阿富汗巴达赫省省会，人口5万，是阿富汗北部和去往中亚的要道。译者。

[20] 《马可波罗行纪》第46章第75页载："此州（巴达哈伤）出产巴剌思红宝石（rabis balais），此宝石甚美，而价甚贵。采之于若干山岩中，掘大隧以采之，与采银矿之法同。"译者。

[21] 青金石又称天青石，是一种不透明或半透明的蓝色、蓝紫色或蓝绿色的准宝石，主要由天蓝石和方解石组成。我国文献称"金精"、"兰赤"、"金螭"、"金碧"、"点黛"或"璧琉璃"，波斯语、阿拉伯语称作剌兹瓦儿（Lāzward，或Lāzūrd）。青金石主要产地为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多用于雕刻工艺品，也用作颜料与辟邪物件。张星烺先生将青金石指认为琉璃（《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9页注1、第1413页注1），似误。译者。

[22] 剌兹瓦儿（Lāzward，或Lāzūrd）是一种矿石或矿物的名称，该词源于"蓝

色”一词。

[23] 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早期文献中提到的一种石头，但对它的特性没有做记载。据说是宝石中最名贵的一种，用它可以防止身体遭到侵害；拉齐（Muhammad b. Zakariya Razi）说牛黄石：“像也门产的明矾，很脆，掉到地上就会裂成碎片，对这种神奇效果，我感到惊叹不已。”曼达威（Abu 'Ali ibn Mandawayh）说：“其色绿中带白。”哈木札与纳思儿（Hamzah and Nasr）说：“是一种石头，颜色有白、黄、绿等。可以研成细粉。产自起儿漫等地”。见比鲁尼《宝石志》（*Kitāb al-Jamāhirfi Ma`rifat al-Jawahir*，Islamabad，Pakistan，1989，pp.172-173）。也有些文献记载其是神奇的解毒药，因此在阿拉伯药典中常作为解毒药物，实际上是不能解毒的，因1565年著名法国医生皮埃尔（Ambroise Paré）进行科学实验，表明其没有任何解毒效果。我国的有些文献著述将牛黄石比为牛黄，显然有值得商榷之处。译者。

[24] 《大唐西域记》作淫薄健国，其“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山岭连属，川田隘狭”。今为亚麻干，即阿富汗巴达赫尚省亚麻干州，在兴都库什山腹地，是通往中国、中亚、南亚的要道。译者。

[25] 今为朱尔姆（Jurm），是阿富汗巴达赫尚省朱尔姆州州府，人口3000，科恰克河从该城流过。这里是去往阿富汗南部和北部的通道，也是该省重要的农业区。译者。

[26] 《大唐西域记》作讫栗瑟摩国，其“东西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五六里。”《马可波罗行纪》第45章第73页作讫瑟摩（Casem），“其他具有墙垣之城村尽在山中。有一河流尚大，流经此城”。“此讫瑟摩城管理一州，亦名讫瑟摩，居民自有其语言。”今为吉什姆（Keshem 或Kishim），是阿富汗巴达赫尚省吉什姆州的州府，是通往昆都士、喀布尔、法扎巴德等地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重镇，为该省重要的农业区。译者。

[27] 今为拉夫甘（Kalafgān），即阿富汗塔哈尔省卡拉夫甘州州府卡拉夫甘，位于吉什姆城西边不远，地位与吉什姆城相同。译者。

[28] 《大唐西域记》作屈浪纳国，其“周二千余里”。“俗无法度，人性鄙暴，多不营福，少信佛法。”“有山岩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后得之。伽蓝既少，僧徒亦寡。”《新唐书·西域传》作俱兰，“或曰俱罗弩，曰屈浪纳，与吐火罗接。环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鲁河。出金精，琢石取之。”今为库兰与蒙建（Kurān wa Munjān，或‘Alāqahdārī Kirān wa Munjān），是阿富汗巴达赫尚省库兰与蒙建州州府，是通往瓦罕走廊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重镇。译者。

[29]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作罽宾；《魏书》卷一〇二作罽宾国；《大唐西域记》卷三作迦湿弥罗国；《往五天竺国传》作迦叶弥罗国；《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作箇失密，或曰迦叶弥罗，即现代的克什米尔。《马可波罗行纪》第49章第83页也提到了克什米尔，并称这里水草丰美，是天然的牧场。译者。

[30]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作勃律；《洛阳伽蓝记》作钵庐勒；《大唐西域记》作钵露罗。《马可波罗行纪》第49章第83页载：“此地名曰博洛尔（Belor，

即勃律，引者）。居民居住在高山之上，信奉偶像，风俗蛮野，仅以猎兽为生，衣兽皮，诚恶种也。”清代称巴勒提，即今克什米尔的巴尔蒂斯坦（Baltistān），是巴基斯坦控制下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的一个地区。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与兴都库什山脉的交会地，在印度河上游河谷之中，面积27400平方千米。译者。

[31] 《马可波罗行纪》第49章第82页提到了瓦罕地区，并称当地“居民信奉摩诃末，自有其语言。善战斗”。译者。

[3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8、279、29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7、34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03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203、225、328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27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179页。

[33] 《大唐西域记》载，珂咄罗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新唐书·地理志》和《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均作骨咄。译者。

[34] 这个地区的名称很容易让人混淆，有区别不大的珂咄罗（Khuttal）、忽忒兰（Khutlān）和忽塔兰（Khuttalān）。但可疾云尼称（第2卷，第352页）忽塔兰是一个突厥城市名，位于群山之间的一条峡谷中，但确切位置没有记载。阿里·亚兹底在记述帖木儿的武功活动时，一般称之为忽忒兰（第1卷，第464页，及其他地方）。珂咄罗这个名称实际上和挹怛（Haytal）是同一个词，阿拉伯人所称的这个名称在萨珊波斯王朝与拜占庭时代被称作挹达（Ephthalites），或白匈奴。

[35] 此城名今难以查到，应在塔吉克斯坦哈特隆省库洛布城之北，具体方位很难确定。此城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通往中亚、南亚、西亚等地的要道。译者。

[36]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塔吉克斯坦哈特隆省库尔干秋别城之北，曾是丝路重镇。译者。

[37] 今为安达尔巴格，即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德赫尚自治州鲁珊（Rūshān）州州府鲁珊城。译者。

[38] 今此城名不存，现位置在鲁珊城所处州西边的万池（Wanch）城，地位与鲁珊城同。译者。

[39]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塔吉克斯坦哈特隆省库洛布城之北的坎古尔特（Kangurt）城附近，曾是丝路重镇。译者。

[40]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塔吉克斯坦哈特隆省库尔干秋别城附近，曾是丝路重镇。译者。

[4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76、277、279、296、29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26、327、348、34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0、29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40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83页。

[42] Ibn Rustah（伊本·鲁斯塔），其著作为《亲历记》（*Kitāb al-A`lāq An-Nafīsa*），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第92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9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48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53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83、452页。裕尔（H. Yule）撰写，伍德（J. Wood）编辑《乌浒水》（*The Oxus*），第82页。梅耶夫（Mayef）所写的文章，见《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Magazine*），1875年，第337页；1876年，第328页。现在，石桥仅长10步，靠在两块突出的岩石上。苏尔哈布河从桥下流过，两岸是陡峭高耸的悬崖，河水在不到30步宽的河道中流过，于是河水在狭窄山谷中咆哮而下。

[43]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赤鄂衍那是独立的地区。

这里有大片的土地，但该地的农民很懒，是居民很贫穷的地方，然而此地有很多愉悦的礼仪。人民善战、勇敢。这个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饮水可促消化。这里产不少的马匹、毛布、帕拉斯（palās）地毯和大量的藏红花。”译者。

[44]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赤鄂衍那城是山脚下的一座大城。该城是与之同名的地区的首府，流淌着河水，气候舒适，人民贫困。”译者。

[45] 《大唐西域记》作鞠和衍那国，其“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新唐书·地理志》作久越得健；《酉阳杂俎》卷十作俱德健。今为库巴迪扬（Qubādiyān），是哈特隆省库巴迪扬州的州府，曾是丝路要道和重镇。译者。

[46] 今为艾瓦季（Aywaj），是哈特隆省沙尔图兹（Shahtuz）州的一座城市，在阿姆河边，是去往杜尚别、马扎里沙立夫、铁尔梅兹、昆都士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47] 《大唐西域记》作愉漫国，其“东西四五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新唐书·地理志》作数瞒城。《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数瞒城是座坚固的城市，位于一座山的山脚下。城的周边修建有一道城墙，其城堡在一座山的顶上，其内有一眼大泉。这里大量产藏红花。”今为希萨尔（Hisor或Hissar），是塔吉克斯坦中央直属区希萨尔州州府，在首都杜尚别西15公里处，人口22万，主要民族为塔吉克族。这里是去往杜尚别、西亚、印度等地的十字路口，是丝路重镇。译者。

[4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9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5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4、289、290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88页；第3卷，第337页；第4卷，第196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49、52、450、452、464页。

[49] 今为萨里奥斯尧（Sariosiyo），是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Surkhandarya）州萨里奥斯尧区区府，靠近塔吉克斯坦边界，是去往杜尚别、铁尔梅兹等地的要道，是丝路重镇。译者。

[50]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1页载：“另一条河为察干河（Chaghān-Rūdh，即支汗那河，引者），发源于赤鄂衍那地区，在忒耳迷城附近流入质浑河（原文如此）。”这条河今为苏尔汉河（Surkhandarya），全长175公里，主要

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其流域称作苏尔汉河州，是该国的重要农业区。译者。

[51]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八三城是有很多人口的小城，位于通往不花剌和撒马儿罕的道路上。这是个坚固的地方，居民善战。”今此城名已不存。译者。

[52]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答儿赞吉（Dārzangī，即Dārzanjī，引者）城是座有护城河的小城，隶属于赤鄂衍那地区。这里产绑腿（*pāy-tāba*）及各种毛织挂毯、毛织地毯。”此城名今不存，其位置应在铁尔梅兹城北40公里处的苏尔汉河东岸的高兰（Goran）城附近。是丝路重镇，通往铁尔梅兹、布哈拉等地。译者。

[53] 此城名今不存，其位置应在铁尔梅兹城北20公里处的苏尔汉河东岸的阿克塔帕（Aktepa）附近。地位与答儿赞吉城同。译者。

[54] 《大唐西域记》作呾蜜国，其“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西长，南北狭。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新唐书·西域传》“大食”条作怛满，或怛没。《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忒耳迷。《圣武亲征录》作迭儿密城。《西域番国志》作迭里迷，其“在撒马儿罕之西南，去哈烈二千余里，城临阿木（姆）河之东岸，依水崖而立。河水稍宽，非舟楫难渡通，稍略据险要。城之内外居民数百家兹畜蕃息，河水多鱼。旧城相去十余里，河东土地隶撒马儿罕所辖”。《明史·西域传》“迭里迷”条云，其“在撒马儿罕西南，去哈烈二千余里。有新旧二城，相去十余里，其酋居新城，城内外居民仅数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术（阿木）河东，多鱼”。《明史》内容多录自《西域番国志》。《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忒耳迷城是位于质浑河岸边的繁华的城市。其城堡就在该河岸边。这座城市是连接忽塔兰（Khuttalān，即 Khuttal）地区与赤鄂衍那地区的枢纽。这里产很好的肥皂、青席和扇子。”今为铁尔梅兹，又译“捷尔梅兹”或“泰尔梅兹”，是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城市，苏尔汉河州首府。在阿姆河西岸，位于苏尔汉河入口处，邻近阿富汗边境。人口约14万，为铁路要站。塔什干—铁尔梅兹干线公路的终点，有河港。是古今道路要冲，也是丝路重镇，是去往南亚的必经之地。译者。

[55] 此城名今不存，其位置应在铁尔梅兹城西南100余公里的阿姆河西岸的卡尔珀沃（Karpovo）小城附近。其是该河沿岸的重镇。译者。

[56]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卡尔希城。译者。

[57]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哈逊吉儿（Hāshumjird，即Hāshimjird，引者）是附近有很多牛羊的城市。”此城名今不存，其位置应在铁尔梅兹城西北50余公里处的赦拉巴德（Sherabad）城附近。译者。

[58] 《新唐书·西域传》“史国”条载：“有铁门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铁，为关以限二国，以金锢阖。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类先祷乃行。”耶律铸所著的《双溪醉隐集》卷二云：“昔我太祖皇帝出师问罪西域，辛巳岁（1221年）驻跸铁门关。”此地应在苏尔汉河州西边通往卡尔希（Qarshi）道路中途的达坂（Darband）。译者。

[59] 有关玄奘（Hwen Thsang）《大唐西域记》的翻译，见裕尔（H. Yule）撰写，伍德（J. Wood）编辑《乌浒水》（*The Oxus*），第87页。中国的取经者说在他那个时代此关“既设门扉，又以铁锢，多有铁铃，悬诸户扇”。而后来的所有文献对该门失载，显然在伊斯塔赫里之前铁门已被移走了。

[60] 八卜·哈底（Bāb-al-Hadīd），阿拉伯语意为“铁门”。译者。

[61] Ya`kūbī（雅忽比），其著作为《诸地志》（*Kitāb al-Buldān*），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七卷。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Tarīkh*），该史学著作又名《雅忽比史》（*Ibn-Wadhih*，*qui Dicitur Al-Ja`qubi*，*Historiac*），由豪茨麦编辑，1883年莱登出版，第33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98、33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49、350、400、40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3、284、291、292、342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56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49、59页；第2卷，第593页。克拉维约（Clavijo）：《克拉维约东使记》（*Embassy*），第122页。梅耶夫（Mayef）对铁门关的记述，见《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Magazine*），1875年，第336页；1876年，第328页。

[62] 今为克里夫（Kelif），是土库曼斯坦列巴普（Lebap）省靠近阿姆河北岸的小城，位于铁尔梅兹城西边，曾是丝路重镇，可通往阿木城、布哈拉城等地。译者。

[63] 今此名不存，但阿塔穆拉特（Kerki，凯尔基）城对岸有凯尔基奇（Kerkichi）、阿姆达利亚（Amu Dariya）等小城，其应是这些小城中的一座。这里是去往卡尔希、阿姆河南岸的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64] 今为法拉布，见前注。译者。

[6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98、31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

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49、350、363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0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862页；第4卷，第22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89页。

[66] 今此城名不存，大致位于土库曼斯坦列巴普省西部阿姆河南岸的达尔甘阿塔（Dargan-Ata）小城附近。这里是古今通往咸海（花剌子模海）的重要通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67]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53页载："还有一个海就是花剌子模海，其位于花剌子模城西北方向42法儿萨。其周边的地区是古思所在地。海的周长（*gird-bar-gird*）为300法儿萨。"即咸海。译者。

[6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03、30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53、354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0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91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80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91页。

第三十二章 花刺子模（Khwārizm）地区

花剌子模（Khwārizm）地区。两座首府：柯提（Kāth）城和朱儿章（Jurjānīyah）城。新、旧玉龙杰赤（Urganj）城。希瓦（Khīvah）城和哈札剌思（Hazārasp）城。花剌子模的运河：乌浒水左右两岸的城市。流向里海的乌浒水的下游河道。花剌子模地区的产品与贸易。

中世纪早期，花剌子模（Khwārizm）地区[1]有两座首府：一座位于乌浒水西岸或波斯地区一边，被称作朱儿章（Jurjānīyah）城[2]，或玉龙杰赤（Urganj）城[3]；另一座在乌浒水的东岸，或突厥地区一边，被称作柯提（Kāth）城[4]，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座城市为该地区的主首府。

柯提城现在依然存在，但中世纪时期这座大城市可能位于现代同名城市东南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初期，柯提城由于遭到乌浒水洪水的袭击而部分被毁，当时乌浒水宽两里格。距柯提城不远的乌浒水主河道的右岸，分出一条叫贾儿杜儿（Jardūr）的运河，该运河穿城而过，长约一英里的市场就位于运河岸边。早期（10世纪），柯提城也有座城堡（Kuhandiz），后完全被洪水冲毁，城里还有聚礼清真寺和监狱，以及被称作花剌子模·沙（Khwārizm-Shāh）的当地统治者的府邸。但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在他那个时期，由于洪水之故，这座城的城区无人居住，而后不久在旧城东边修建起一座新城，这里有足够的距离可以安全躲避乌浒水的洪水。

穆喀达思说这座新城用波斯语称作沙合里思田（Shahristān，即首府）城，并称其规模与呼罗珊地区的乃萨卜儿城差不多一样大。城里的市场内矗立着用黑石柱修建的聚礼清真寺，每个石柱有一人高，其上是支撑寺顶横梁的木柱。总督府重建于新城，旧城堡却成为废墟。众多小运河穿过城市的街区，穆喀达思说这座城的街道比阿札拜占的阿儿答必儿城还要脏乱，因当地人占道经营，而且有人到清真寺礼拜时，甚至鞋底带着粪便就进入寺院内。但该城市场繁华，货物充足，出售各种商品。柯提城的建筑技艺高超，因此从外观上看是座恢宏的城市。但伊斯

兰历4世纪（10世纪）末，这座城便很快丧失了花剌子模地区主首府的地位；原因可能是其当时不断受到乌浒水洪水的侵袭，不久此城的各个城区被淹没，最终沦为一座普通的二流城市。

到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柯提城似乎并没有遭到西征蒙古人的重创，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伊本·白图泰在从玉龙杰赤城去往不花剌城的道路上经过了这座城，并将其城名写作柯提（Al-Kāt），他说这是座小城，但很繁华。这里有个水池子，在他访问时期，其上结了冰，他还记载该城的孩子在冰面上玩耍。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几乎毁掉了柯提城，但后来又重建了此城的城墙，阿里·亚兹底还常提及这座城，并说在他那个时代，其仍是一座重要的城市。[5]

柯提城衰落后，花剌子模地区的第二首府变成了这一地区的主首府，这就是玉龙杰赤（Gurganj）城，阿拉伯人称作朱儿章（Al-Jurjānīyah）城，后来称作玉龙杰赤城。据穆斯林征服编年史记载，伊斯兰历93年（712年），屈底波率领阿拉伯人攻入花剌子模地区，并将被征服的首府称作费儿（Al-Fīl，即大象），后来又更名为满速剌（Al-Mansūrah）城，意为“凯旋城”。据说这座城位于距乌浒水河岸较远的一边，在后来的朱儿章（Jurjānīyah）城的对面，但不久由于乌浒水泛滥，淹没了满速剌城，于是朱儿章城替代了此城。[6]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朱儿章城（那时此城仅是该地区的第二大城，柯提城仍是首府）已是主要的贸易中心，也是从古思之地来的商队的会集之所，他们用这些商品与呼罗珊地区的商品进行交换。朱儿章城距一条从乌浒水分出来的、可通航的大运河只有一箭之地，这两条河道差不多是平行的，这条运河上修建了一座大堤坝，大堤的两边用木桩加固，由此可以防止此城民居受到洪水的袭击。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称这座城有四座城门，并说城的规模每天都在扩大。在“朝觐之门”（Bāb-al-Hujjāj），矗立着哈里发马蒙修建的宫殿，此宫殿的前面为第二座宫殿，是其子阿里（`Alī）王子修建的。从这两座宫殿上可以俯瞰一处与不花剌城一样著名的里吉思田（Rīgistān）沙漠广场，这里有羊市。随着柯提城的衰落，朱儿章城很快成为第一大城市，后又成为花剌子模地区唯一的首府，此后，这座城通常被称作花剌子模“城”。

伊斯兰历616年（1219年），亚库特到过朱儿章城，或者他所称的

玉龙杰赤城，此时就在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毁灭此城前不久；他还说在此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辉煌、富庶、漂亮的城市。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这座城的所有一切都变为一片废墟。大运河的堤坝被破坏了，如后来所见，乌浒水的河水流入新河道，整个城市成为一片泽国。据亚库特记载，蒙古军队离开时，除了抛下尸体外，未留任何东西，从房屋的残垣断壁可以看出这里曾是一座大城市。但花剌子模地区的首府在后来的几年里从废墟中重新修建起来，且距旧址不远。据当时的编年史著述者伊本·阿喜儿记载，在伊斯兰历628年（1231年），新花剌子模城修建于“大花剌子模城的附近”。据亚库特和其他著述者记载，在蒙古西征前，有座叫小玉龙杰赤的城市，波斯人称为古儿根贾（Gurganjak）城，距首府大玉龙杰赤城有三里格，由此看来，小玉龙杰赤城可能是新花剌子模城的所在地。

新花剌子模城很快取代了大玉龙杰赤城，并成为地区的首府，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和伊本·白图泰均记载了这座首府。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后半叶，可疾云尼称（新）玉龙杰赤城以铁匠和木匠具有高超的技艺而闻名，从事象牙雕刻或骨制碗或其他器皿的工匠也很有名，这些产品的水平可以与亦思法杭城附近塔儿（Tark）之地的工匠制作品一比高下。同时，这里妇女制作的刺绣，以及裁缝也很著名。他说花剌子模地区的西瓜无与伦比，这一点被后来的伊本·白图泰所证实。

穆思套菲通常将这座城称作玉龙杰赤城，又称作新花剌子模城，并说此城距旧玉龙杰赤城有十里格（可能里程有问题）。同时代的伊本·白图泰称花剌子模城（他这样称呼）是座优美的城市，有漂亮的建筑、宽阔的街道和稠密的人口。这里的市场是座优美的建筑，客栈也是如此，其附近是聚礼清真寺与寺院附设的学校。此城还有家公立医院，伊本·白图泰到达此地时，一位来自（叙利亚）萨黑云（Sahiyūn）城的医生管理着这家医院。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新花剌子模城被帖木儿军队围攻三个月后，再一次完全被毁。但后来帖木儿又对该城进行了重建，于伊斯兰历790年（1388年）竣工。花剌子模地区的统治者阿布·勒噶兹记载了他那个时期乌浒水下游河道的状况，并述及有关内容。伊斯兰历11世纪（17世纪）初，他将自己王朝的首都设在这座城里，他通常称此城为玉龙杰赤城[7]，并说这是座优美的城市，因这里有很多花园；但此后不久希瓦（Khīvah）城逐渐取代玉龙杰赤城，并成为此地区的新首府。蒙古西征后所修建的玉龙杰赤城的遗址现在通常被称作库尼亚乌

尔根奇（Kuhnah Urganj，即旧玉龙杰赤）城。[8]

在帖木儿时代以后，月即别（Uzbeg）将领控制的希瓦城[9]成为花剌子模首府，玉龙杰赤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有段时期希瓦（Khīvah）也指称整个花剌子模地区。早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就不止一次地提到希瓦城，并说这是座小城。这个名称的旧拼写形式为希洼（Khīvak），而且这种书写形式一直沿用到亚库特时期。穆喀达思说希瓦城位于沙漠的边缘，从乌浒水左岸分出来的一条大运河为其供水。这座城里有座漂亮的广场，也有座聚礼清真寺，因此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此城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亚库特说这座城的城名也可拼写为亥瓦（Khayvak），他还提到了该城的城堡。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此城的所有居民为逊尼（Sunnīyya）沙费依（Shāfi`iyya）派，花剌子模其他地区的居民为哈纳菲（Hanīfiyya）派。

这一时期，希瓦城因是大谢合·纳吉木丁［Najim-ad-Dīn，又名苦卜剌（al-Kubrā）］[10]的出生地而闻名。他在玉龙杰赤城反击蒙古人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被处死，他的陵墓在玉龙杰赤城附近，并成为虔诚信士的朝谒之地。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曾记载过这位殉教者。阿里·亚兹底提到了希瓦城，并说当时帖木儿还是一位年青人，在一次征服活动中攻打过此城，后来他又重建了希洼（当时的拼写形式）城的城墙。伊斯兰历11世纪（17世纪），阿布·勒·噶兹常提到这座城，他有时候还居住在这里，也居住在柯提（Kāt，或Kāth）城，但不居住于玉龙杰赤城。从他那个时代到现在，希瓦城一直是重镇，至今仍是希瓦（Khīvah）地区[11]的首府。[12]

哈札剌思（Hazārasp，波斯语意为“千马”）城[13]与希瓦城在同一纬度，但更靠近乌浒水左岸，这是座重镇，此名从穆斯林征服时期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变化。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称这座城的规模和希瓦城一样大，有木质的城门，城周边还有条壕沟。伊斯兰历616年（1219年），亚库特到过这里，并说这是座坚固、富庶的城市，有很多优美的市场，城里有富商的货场。哈札剌思城几乎被运河包围，只有一条道路能通往此城，这条道路沿着来自玉龙杰赤城方向的堤道，并横穿从乌浒水河岸起的平原地区。

在塔西里牙（Tāhirīyah）城（三角洲农业区的起始点）与哈札剌思城中间，乌浒水经过一条窄峡谷，现在称作“驼颈”（Deveh Boyun），

其两岸悬崖壁立，其宽度只是一般河道宽度的1/3。伊斯塔赫里称这个狭谷为阿卜沙（Abūkshah，或Būkshah），还说乌浒水船家特别害怕这个地方，因这里有旋涡和峡口瀑布。穆思套菲称此地为“狮口峡”（Tang-i-Dahān-i-Shīr），并说峡谷两边之间的悬崖仅有100码（gez）。该地左岸有个哨所。他说从这里往南几里格，乌浒水成为地下河，完全消失在视野里。

塔西里牙城和哈札剌思城之间的乌浒水左岸有三座中世纪颇为重要的城市：塔西里牙城南一站的大道上有吉喀儿班（Jikarband）城[14]，其周边是果园，这里的运河两岸长满了树木。据穆喀达思记载，此城的市场中央有座漂亮的清真寺；往北一站，乌浒水狮口峡附近有答儿干（Darghān）城[15]，据穆喀达思记载，这座城市的规模和吉喀儿班城差不多。此城恢宏的聚礼清真寺装饰着珍贵的大理石。该城长两里格，城周边差不多有五百个葡萄园。答儿干城是从马鲁城到花剌子模地区道路上的第一座大城市。伊斯兰历616年（1219年），亚库特到过这里，并称这座城位于一处高地，如同在一座山的山麓上，此城与乌浒水岸之间是果园和耕地，两者间的距离有两英里。距这座城不远就是沙漠；在答儿干城和哈札剌思城之间，靠近乌浒水岸边有萨都儿（Sadūr）城[16]，这是座坚固的城市，其聚礼清真寺位于内城中央，周边是外城区。[17]

花剌子模地区的第一条大运河就是从乌浒水右岸或东岸分出来的支流，被称作高忽瓦剌（Gāvkhuwāra，或Gāvkhwārah），意为“饲养员”，其位于答儿干城对面。这是条可通航的运河，深两浔，宽五浔，向北流，灌溉着柯提城周边的所有土地。在距高忽瓦剌运河起点有五里格的地方，从大运河分出一条叫喀里（Karīh）的小运河，这条河灌溉着很多地区。穆喀达思提到了乌浒水东岸四座相当重要的城市，每座城市之间彼此相距一天的路程，这些城市位于柯提城南边肥沃的地区。距柯提城最远的城市被称作奴法（Nūkfāgh）城[18]，其位于运河中段，是座优美的城市，但靠近沙漠边缘。距柯提城较近一点的城市是阿儿札希瓦（Ardhakhīvah）城[19]，此城可能是亚库特所指的喜森·希瓦（Hisn Khīvah）城，他说这座城距乌浒水西岸的希瓦城有十五里格。阿儿札希瓦城是位于沙漠边缘的山脚下的一座城堡，只有一座城门。从此向北再行一站就是瓦亦汗（Wāyikhān）城[20]，也是座城堡，被壕沟环绕，在城门处有射石机；从此城再北行一站就到达噶儿答满（Ghardamān）城[21]，其距柯提城一站，这是座坚固的城市，有两座城门，周边有两箭宽的大护城河。

乌浒水西岸或左岸也分出多条运河：第一条是流经哈札剌思城，并灌溉该城附近地区的运河。这条运河也可通航，但其长度仅是高忽瓦剌运河的一半；顺着这条运河往回航行，有一条曲折的河道，如果继续航行就可到达阿木城。在哈札剌思城北两里格之地，从乌浒水分出喀儿都兰·合瓦失（Kardurān-Khwāsh）运河，由于其流经与之同名的喀儿都兰·合瓦失城而得名，该城位于哈札剌思城与希瓦城之间。这条运河比流经哈札剌思城的那条运河要长一些，喀儿都兰·合瓦失（Kardurān-Khwās，穆喀达思所记载的名称）城[22]被壕沟环绕，有木质城门；从此运河再向北就是纳赫儿·希瓦（Nahr Khīvah）运河，至今还是一条较大的运河，船只可以从乌浒水航行到那座城市（希瓦城）；第四条运河在希瓦（Khīvah）运河北一英里，叫纳赫儿·麻得剌（Nahr Madrā）运河，据文献记载，这条运河比（乌浒水）东岸的高忽瓦剌运河流量大两倍。麻得剌（Madrā）城[23]和附近的地区从这条运河获取用水。

如前所述，（花剌子模地区）东边首府柯提城位于一条从乌浒水分出的，叫贾儿杜儿（Jardūr）的运河岸边，这条从乌浒水干流分出的运河经过一段距离后，到达该城南边。在柯提城北两里格处，从乌浒水左岸或西岸分出瓦札（Wadhāk），也称瓦答（Wadāk），或瓦丹（Wadān）大运河，这条运河可通航，并能够到达朱儿章城附近，该城是花剌子模地区西边的首府。瓦答运河的起点位于麻得剌（Madrā）运河源头北边约1英里处。再往北就是乌浒水左岸的另一条叫纳赫儿·卜瓦（Nahr Buwwah，或Būh或Būyah）的运河，这条运河流经西北边与瓦答运河汇合，汇合点距叫安答剌思坦（Andarastān）的村有一箭之地，离南边的朱儿章城约有一天的路程。瓦答运河要比卜合（Būh）运河流量大，但两条运河均可通航，一直能到朱儿章城，该城附近有座堤坝，阻挡船只继续北上；如前所述，运河岸边最初修建有一座大坝，目的是防止河水淹没该城。[24]

中世纪时期，从希瓦城北行到朱儿章城的道路要经过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几座大城市：距希瓦城一站有阿札忽失密三（Ardhakhushmīthān，或Rākhūshmīthān）城[25]，伊斯兰历616年（1219年），亚库特曾停留于此，并称这是座大城，有漂亮的市场，以及琳琅满目的商品。他说该城比上美索不达米亚的纳思宾城还要繁华和宏大，但在蒙古西征之时被毁。该城以北是鲁兹万（Rūzvand）城[26]，穆喀达思称这是座中型城市，城墙坚固，周边有壕沟。这座城有几处甘美的泉水，聚礼清真寺在市场内。经过瓦答运河与卜合运河汇合处附近

的安答剌思坦村后，就可到达努室瓦儿（Nūzvār）城[27]，距朱儿章城南有一站。据穆喀达思记载，努室瓦儿城是座坚固的小城，有两座铁门，城周边的沟壕上横跨着一座吊桥，桥安放在船只上，夜晚会被吊起。城里的聚礼清真寺在市场内；其无西城门，却有一家颇好的澡堂。这座城显然就是亚库特所称的弩室羯（Nūzkāth）城，他说其意为“新城”，或“新墙”，但在他离开不久后，此城就被蒙古军队完全摧毁。

札麻沙儿（Zamakhshar）城[28]位于努室瓦儿城和朱儿章城之间，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该城的城门前也建有一座吊桥。城里有座聚礼清真寺和一座坚固的监狱，该城有城墙，城门为铁门，还有条壕沟。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时，亚库特称这是个村庄，这里以是杰出的《古兰经》注释者札麻沙里（Az-Zamakhsharī）的出生地而闻名，此人生于伊斯兰历467年（1075年），卒于伊斯兰历538年（1144年）。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伊本·白图泰参访过札麻沙里的陵园，并称札麻沙儿城距新玉龙杰赤城4英里。玉龙杰赤城的北边就是前面提到的纳吉木丁·苦卜剌（Najm-ad-Dīn Kubrā）的陵墓，这里距沙漠边缘的朱儿章城5里格。在乌浒水西岸高耸的悬崖下是吉忒（Jīth或Gīt）城[29]，这是早期地理学家常提到的一个地方。这是座大城，周边有辽阔的土地，距乌浒水左岸有一定的距离，对面有麻兹密尼牙（Madhmīnīyah）城[30]，其距乌浒水右岸4里格。吉忒城的位置正是后来的瓦兹儿（Wazīr）[31]，或沙合儿·瓦兹儿（Shahr-i-Wazīr）城所在地，经历蒙古西征和帖木儿征服活动后，其城名改为瓦兹儿城。阿布·勒·噶兹常提到瓦兹儿城，其也出现于《世界志》中。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可能访问过沙合儿·瓦兹儿城，并做了记载，但其名稍有变化，被书写为塞里祖儿（Sellizure或Shaysure），伊斯兰历10世纪（16世纪）时，其在旅行途中经过了花剌子模地区。[32]

距柯提城北约4里格处，从乌浒水右岸分出来的四条运河中的第一条运河折向北，流经不远距离后又与其他三条小运河汇合，汇合后的运河形成苦儿答儿（Kurdar）运河。据说这条运河的大小相当于乌浒水西岸的瓦答运河和卜合运河之和，其最初为乌浒水的一条河道，向东北流入咸海。乌浒水干流与苦儿答儿运河之间的夹角地区被称作麻兹答合干（Mazdākhgān，或Mazdākhkān）地区，这个地区的灌溉用水来自乌浒水右岸分出的众多小运河。据说该地区有12000个村庄，苦答儿（Kurdar）城[33]是这一地区的首府。穆喀达思称这是座大城市，而且很坚固；周边有很多村庄和放牧牲畜的辽阔草原。距此城两天路程，在

花剌子模地区东北边界处有个叫喀里牙·八剌塔斤（Kariyat Barātakīn，或Farātagīn）[34]的大村庄，其附近石山上开采的石料用于修建花剌子模城的所有建筑物。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八剌塔斤（Baratākīn）有很多漂亮的市场和一座建造优美的聚礼清真寺。从这里向西就是麻兹密尼牙城，距乌浒水右岸4里格，其对面为吉忒城；从此地往南就可到达咸海岸边，但在乌浒水河口，没有耕地，只有沼泽和芦苇荡。[35]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到达亚洲西部，据希腊地理学家记载，乌浒水流入里海，显然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咸海。乌浒水何时改道，并注入咸海，无从得知，今天这条河与药杀水一样都流入咸海，但流入里海的旧河道尚存，而且在地图上已经标出，这是新近探险获得的成绩。如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中世纪初期乌浒水的干流和今天一样（流入咸海）；但穆喀达思提到了流入里海的旧河道，并说以前这条河的干流流经呼罗珊地区尼撒（Nisā）城对面一座叫巴里汗（Balkhān，或Abul-l-Khān）[36]的城市。穆喀达思后约两个半世纪里，大致可以确定乌浒水曾一度流入原来的旧河道。这可以从当时的波斯著述者那里得到印证。因此看来有充分的材料证明从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到伊斯兰历10世纪（16世纪）末，乌浒水的大部分河水除了通过各条运河流入咸海外，还有一部分河水沿着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旧河道注入里海，但从伊斯兰历10世纪（16世纪）末到现在，这条旧河道被废弃了，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干涸的。

如前文所述，伊本·阿喜儿的编年史中说蒙古军队于伊斯兰历617年（1220年）在围攻玉龙杰赤城5个月之后，为了最终能攻下此城，便毁掉了乌浒水的堤坝，并用该河河水及其运河之水来水淹这座城，因此这些河水通过不同的河道流到了城的东边。该城附近地区却成为泽国，泛滥的河水经过一段时间后，开始流向西南，填满乌浒水的旧河道，并流到满吉失剌（Mankishlāgh）之地，此后注入里海。和上述事件同时代的亚库特后来提到陀拔思单（Tabaristān）海（里海）海岸修建有一座坚固的城堡，并说质浑河（即乌浒水）从这里流入里海。这个意外引起关注的问题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的记载中得到进一步充分的证明，他在记载乌浒水河道时说，尽管一小部分河水仍然通过乌浒水右岸分出的运河流入咸海，但其干流经旧玉龙杰赤城后，转向一个叫哈兰（Halam）悬崖的峡谷，这里瀑布发出的水声在两里格以外的地方就可以听到，接着此河经六天的里程，在一处捕鱼点—哈儿哈儿

（Khalkhāl）之地，注入可萨海（Bahar Khazar，即里海）。

穆思套菲说阿喀八·哈剌（`Akabah-i-Halam，即哈兰悬崖）所在的位置，被突厥语称作苦儿剌洼（Kurlāvah，或Kurlādī），他在道里志中做了记载，因新哈兰（Halam）城[37]位于13世纪被蒙古人毁掉的旧玉龙杰赤城与新玉龙杰赤城中间。穆思套菲在记述里海沿岸的地名时，曾述及阿八思昆（Abaskūn）岛上的港口（见原文第379页），还说在他那个时代此岛屿已被淹没于水中，“因质浑河先前流入东湖（即咸海），其对面就是高戈和麻高戈（Gog与Magog）之地，但自蒙古西征时代起，河道发生了变化，现在流入可萨海（Khazar，即里海）；由于可萨海的水没有出口，结果（阿八思昆岛的）陆地现在被淹没在不断上升的水中”。

上述内容可通过伊斯兰历820年（1417年）哈菲兹·阿卜鲁所记载的乌浒水河道的状况加以证实，他是帖木儿之子和继承者沙哈鲁（Shāh Rukh）在位时期的一位政府官员，他本人肯定很熟悉这一地区的地理情况。他记载了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并称在前文提到的这一年（1417）曾通过旧河道流入花剌子模湖（咸海）的乌浒水，现在有了一条新河道，其流经苦儿剌兀（Kurlāvū），又称作阿可兰察（Akranchah）之地，而后注入可萨海，他还说在他那个时代咸海差不多已经消失。此外，伊斯兰历808年（1405年）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Ruy Gonzalez de Clavijo）访问过这些地区，比哈菲兹·阿卜鲁的记载要早一些。这位使臣的说法可以证实：乌浒水“流入八苦（Bākū）海”，八苦海仅指里海。但必须承认的是克拉维约的这一说法只是道听途说来的。

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得乌浒水一度又流入咸海，但该河的河道在伊斯兰历10世纪（16世纪）末前，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前所述，作为玉龙杰赤城当地人的阿布·勒·噶兹说在伊斯兰历984年（1576年），即他出生前约30年，河道已改道。他称在那个时期乌浒水已形成一条自身的新河道，并转向哈思忒·米纳（Khast Minārahsi，即哈思忒塔）之南，然后直接流入咸海，这样玉龙杰赤城和里海之间的土地由于缺水而变成一片沙漠。他著作中的另一处提到先前，即从伊斯兰历928年（1522年）到伊斯兰历937年（1531年）之间发生的事件时，记述了从玉龙杰赤城到里海沿岸的阿卜汗（Abu-l-Khān）之地的整个路途上耕地和葡萄园的分布状况，当时这里仍是乌浒水下游河道流经的地方。但显然阿布·勒·噶兹记载的这个河道变更得相当晚，因伊斯兰历966年（1558年），

安东尼·詹金森经俄罗斯旅行到希瓦地区，并说乌浒水“不像过去那样流入里海”。他当时看到这条大河已直接流入咸海，即“契丹（Kithay）湖”[38]。

花剌子模地区的主要产品就是食品、谷物和水果。该地区的土地异常肥沃，盛产棉花并饲养产毛的绵羊。大量的牲畜放牧在咸海沿岸的沼泽草原上，并外销多种奶酪和凝乳[39]。朱儿章城市场以销售从伏尔加（Volga）河流域的不里阿耳（Bulghār）[40]地区运来的各种名贵兽皮而闻名，穆喀达思和其他著述者详细记载了这些产品。其中有以下各种兽皮：貂皮、黑貂皮、狐皮、两种河狸皮，以及松鼠皮、白貂皮、白鼬皮和黄鼠狼皮等。这些皮张可以缝皮袭和短夹克，这里的市场上还有人工染制的兔皮、山羊皮和野驴皮等。

在各种物产和制造品中有蜡、用于蒙盾面的叫途思（Tūz）的白杨树皮、鱼胶、鱼骨、琥珀、哈兰吉（Khalanj）木、蜂蜜、榛子、剑、铠甲和弓等。花剌子模地区以产猎隼而闻名。这一地区盛产葡萄、葡萄干和胡麻，也产机织地毯、床罩、棉丝混合的锦缎。用棉和丝织品制作的斗篷，以及各种颜色的布匹被用来外销。各城的铁匠制作各种锁具，这里的工匠还凿空原木来制作航行于各条运河的独木舟。但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或稍晚，花剌子模城的主业是奴隶贸易；从游牧大草原贩卖或拐骗来的突厥少男或少女，在这里接受教化后，变为虔诚的穆斯林，然后输入伊斯兰各地，正如历史文献记载，他们常在行政部门担任显官要职。[41]

[1] 《魏书·西域传》作呼似密国，“都呼似密城”。《大唐西域记》作货利习弥伽国，其“顺缚刍河两岸，东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余里”。《新唐书·西域传》作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唐会要》卷一〇〇作火辞弥。《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花剌子模。今为阿姆河下游地区，分属于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译者。

[2]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新唐书·西域传》作急多飓遮城。译者。

[3] 《汉书·西域传》作奥鞬城。《元史·太祖本纪》作玉龙杰赤城；《元史·曷思麦里传》作月亦心（亦心应作“恋”）揭赤；《元朝秘史》作兀笼格赤城；《西游录》作玉里犍城，并载：“梭里檀（Sultan）母后所居，富庶又盛于蒲花（即不花剌）。”译者。

[4]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译者。

[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00、30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51、35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7、288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20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237、263、449页。

[6] 费儿（Fil）的位置很难确定，以此为名的一造币厂的名称出现于倭马亚王朝的钱币上，其中一枚时间确定为伊斯兰历79年（698年）。

[7] 《突厥世系》（罗贤佑译，中华书局，2005年）第196页载，哈桑忽里汗占据玉龙杰赤城时，“尚无城堡（Art），以后直到伊思霍苏丹（算端，引者）时才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城堡”。城外有壕沟，城内的城墙上有为数不少的塔楼。（第197页）译者。

[8] 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于伊斯兰历966年（1558年）逗留于乌儿根策（Urgence，这是他的拼写）城，比阿布·勒·噶兹的记载早半个世纪。詹金森称这是座优美的城市，其“城墙约有4英里”。哈路亚特（Hakluyt）本《大航行记》（*Principal Navigations*），第2卷，第463页［格拉斯哥（Glasgow），1903年］。Bal.，第421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99、300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50、35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4页；第3卷，第933页；第4卷，第261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79页。伊本·阿喜儿，第12卷，第257、323页。Kazvīnī（可疾

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49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7、234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3～6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298、448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45页。Abu-l-Ghāzī（阿布·勒·噶兹），著有《突厥世系》（*History of the Turks and Mongols*），英译本于1838年在伦敦出版。汉译本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11页。《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Magazine*），1874年，第78页。

[9] 此城是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的主要城市，位于阿姆河下游南岸，人口5万，曾是古代、近代几个王朝的首都，历史名城，丝路重镇，从这里可达布哈拉、铁尔梅兹、马雷等地。译者。

[10] 谢合·纳吉木丁（Shaykh Najm ad-Dīn al-Kubra，1145～1221年）是著名的苏非派首领，建立了苦卜临教团（Kubrawiyah，即库布林耶），1221年在抗击蒙古人时战死，葬在旧玉龙杰赤（Kuhnah Urganj）城，其陵墓存在至今，并受到人们朝谒。纳吉木丁一生撰写了7本书，以及苏非诗歌，对苏非派的发展与传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苦卜临教团在察合台汗国时期对西域各地有广泛影响。译者。

[11] 希瓦是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花剌子模州的10个农业区之一，也是该州所属的城市之一，该州首府为乌尔根奇（即玉龙杰赤）城。译者。

[12]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

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12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55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6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62、449页。Abu-l-Ghāzī（阿布·勒·噶兹），著有《突厥世系》（*History of the Turks and Mongols*），英译本于1838年在伦敦出版。汉译本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112、294页。

[13] 今为哈扎尔阿斯布（Hazārasp），即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哈扎尔阿斯布区区府哈扎尔阿斯布，人口1.6万，是历史名城和丝路重镇，也是去往布哈拉、希瓦、乌尔根奇等地的要道。译者。

[14]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塔西里牙城西边不远，是去往花剌子模的要道。译者。

[15] 今此城名以达尔甘阿塔（Dargan-At）的形式保留，位于塔西里牙城西边，是去往花剌子模的要道。译者。

[16]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今花剌子模州阿姆河南岸的皮特纳克（Pitnak）城附近，地位与哈扎尔阿斯布同，是丝路古镇。译者。

[1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0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5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8、28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67页；第4卷，第971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

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8、213页。

[18]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今花剌子模州阿姆河北岸去往布哈拉城的道路上，曾是丝路重镇。译者。

[19]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花剌子模州乌尔根奇以北，即阿姆河北岸不远的地方，曾是丝路重镇。译者。

[20] 今此城名不存，与阿儿札希瓦在同一纬度。译者。

[21] 今此城名不存，与噶儿答满在同一纬度。译者。

[22] 今此城名不存，在哈扎尔阿斯布城西南约20公里处。译者。

[23] 今此城名不存，在乌尔根奇城附近。译者。

[2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01、30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52、35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8、289、292、29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512页；第4卷，第230页。

[25]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希瓦城西北约25公里处。译者。

[26]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土库曼斯坦达沙绍古兹城附近。译者。

[27]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城东南约40公里处。译者。

[28]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城东南约25公里处。译者。

[29]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城西北约60公里处。译者。

[30]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钦博伊（Chimboy）城不远。译者。

[31] 《突厥世系》第190页载：“从前，曾有不少城市属于维泽尔（瓦兹儿，即宰相），这些地方各有一名总督。但后来这片地方动荡不定，经常受到掳掠破坏，在伊勒巴尔汗到来之时（伊斯兰历911年，即1502年），只有三处地方，即维泽尔、仰吉沙尔及达尔塞克还有总督。”伊勒巴尔汗“他本人留住于维泽尔”。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花剌子模的昔班汗后裔以此城作为都城。（第194、219页）译者。

[3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

卷，第30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5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191页；第2卷，第940页；第4卷，第822页。Abu-l-Ghāzī（阿布·勒·噶兹），著有《突厥世系》（*History of the Turks and Mongols*），英译本于1838年在伦敦出版。汉译本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195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46页。哈路亚特（Hakluyt）本《大航行记》（*Principal Navigations*），第2卷，第461页。

[33]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钦博伊城南边。译者。

[34] 今此地名不存，应在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钦博伊城西北方向不远。译者。

[3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299、30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50、35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257页。

[36]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今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译者。

[37] 今此城名不存，方位不很确定，应在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城附近。译者。

[38]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67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7、213、225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60页。Hfz.，第27b、32b叶面。Abu-l-Ghāzī（阿布·勒·噶兹），著有《突厥世系》（*History of the Turks and Mongols*），英译本于1838年在伦敦出版。汉译本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207、291页。克拉维约（Clavijo）：《克拉维约东使记》（*Embassy*），第118页。哈路亚特（Hakluyt）本《大航行记》（*Principal Navigations*），第2卷，第461、462页，《安东尼·詹金森的旅行记》（*Voyage of Anthony Jenkinson*）。德·古耶（De Goeje）教授在《乌浒水的古河道研究》［*Das Alte Bett des Oxus*，莱登（Leyden），1875年］一书中对波斯地理学家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乌浒水在整个中世纪和现在一样是流入咸海的。不管怎么说，证据表明乌浒水的一部分河水沿着古河道流入里海，这显然是不可辩驳的事实。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已故的罗林森（H. C. Rawlinson）作为真正的地理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掌握了第一手的阿拉伯、波斯文献，他坚持认为，有几个世纪里乌浒水无疑流入里海。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争论是由于穆斯林地理学家对里海与咸海名称的不同记载造成的。里海一般被称作可萨海（Bahr Khazar），这个名称取自距其海岸较远的可萨（Khazar）部，但也被称作陀拔思单（Tabaristān）海、杩咱答儿（Māzandarān）海、阿八思昆（Abaskūn）海、朱里章（Jurjān）海，是以其海岸附近的地区或区之名来命名的。有时里海被错误地称作答里牙·忽儿祖木（Daryā Kulzum）海，而忽儿祖木（Kulzum）海是红海的名称。咸海一般被称作花剌子模（Buhayrah Khwārizm）海，或花剌子模（Khwārizm）湖，也被称作朱儿章（Jurjānīyah，花剌子模地区的首府）湖，朱儿章容易误读为朱里章（Jurjān），由此特别容易造成里海（Bahr Jurjān）与咸海（Buhayrah Jurjānīyah）名称的混乱。波斯地理学家也将咸海称作东海（Dary-i-Shark）。但所有这些混乱都不能表明穆思套菲、哈菲兹·阿卜鲁和阿布·勒·噶兹等人的详尽记载毫无价值。

[39] 《萨利比的知识品味》（*The Latā`if al-ma`ārif of Tha`ālibī*）第142页载："花剌子模的特产和商业产品与附近的突厥之地一样多。这里有奴隶、羊、毛皮，尤其产红狐皮和黑狐皮、优质的弓、咸鱼、奶皮奶酪（*rahqīn*），同马鲁的木里（*murrī*）盐水一样是地区的代表性产品。这里的特产还有叫八蓝基（*barānj*）的瓜，在所有瓜中以最甜、最美味而闻名。""花剌子模的另外一种产品是叫阿蓝基（*āranj*）的棉布。""对世界各地来说，花剌子模的气候是最冷的，在冬天乌浒水甚至会结冰，因此大象、驮队和军队从其上可以经过。这种结冰期长达40天到2个月。"译者。

[40]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译者。

[4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04、30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5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

刊》第三卷，第325页。

第三十三章 粟特（Sughd）地区

不花剌（Bukhārā）城和其长城内的五座城市。拜坎（Baykand）城。撒马儿罕（Samarkand）城。卜坦（Buttam）山脉和泽拉夫尚（Zarafshān）或粟特（Sughd）河。喀儿密尼牙（Karminiyah）城、答卜思牙（Dabūsiyah）城和剌宾建（Rabinjan）城。渴石（Kish）城和那色波（Nasaf）城以及周边的城市。粟特（Sughd）地区的物产。越过乌浒水到撒马儿罕城的诸道。

粟特（Sughd）地区[1]，古称索格底亚那（Soghdiana），是指乌浒水与药杀水之间的肥沃地区，这一地区靠两条河流灌溉，即泽拉夫尚或粟特河，其岸边有不花剌城[2]和撒马儿罕城；另一条就是流经渴石（Kish）城和那色波（Nasaf）城的河流。这两条河止于花剌子模地区方向的西边沙漠沼泽或浅湖中。更确切地说，粟特之名指的是撒马儿罕城附近的地区，原因就是不花剌、渴石和那色波各自均属独立的地区。

粟特地区被认为是人间四大天堂之一，在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下半叶萨曼（Sāmān）王朝[3]异密（Amīr）统治时代达到最为鼎盛的时期，在接下来的世纪（10世纪）里，仍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地区，无与伦比，其中有两座主要城市—不花剌城和撒马儿罕城，据说撒马儿罕城是政治中心，不花剌城则是宗教文化中心，但两座城的地位不分伯仲，均是粟特地区的首府。[4]

不花剌城也称作忸蜜（Nūmijkath）[5]。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是座有城墙的城市，城之四至均为1里格，其位于粟特河干流南边不远的平原上。该城附近的地区没有山脉，但其周边有很多城市、宫殿、花园，形成南北长12里格的圆形区域，周边有一条周长为一百多英里的长城。这道长城越过粟特河及从该河分出的运河。[6]

不花剌主城区西北城墙外部与该城的城堡相连接，这座城堡本身就像一座小城。内城里居住着总督，并修建有监狱和金库。内城周边是几个大外城区，其城区一直延伸到该河干流之南岸。主外城区位于城的东边，这里有通往瑙·八哈儿（Naw Bahār）街、撒马儿罕街、剌密萨纳（Rāmīthanah）街及文献提到，但现今地望无法确定的其他大道

（darb）。此城的内城墙有七座铁门：八卜·麦地那（Bāb-al-Madīnah）门，即城市门；八卜·奴儿（Bāb Nūr或Nūz）门（光明门）；八卜·忽夫剌（Bāb Hufrah）门；铁门；城堡门；八卜·密合儿（Bāb Mihr）或八尼·阿萨（Banī Asad）门；八尼·萨阿（Banī Sa`d）门。这些城门的位置并不十分清楚，但城堡（Bāb-al-Kuhandiz）门应在西北边，面朝里吉思田（Rīgistān）广场方向，这就是不花剌城很有名的大沙原或公共广场。

此城的城堡有两座门—八卜·里吉思田（Bāb-al-Rīgistān）门，或八卜·萨合儿（Bāb-as-Sahl，即沙原）门和八卜·贾米（Bāb-al-Jāmi`）门（聚礼门），该门面向大清真寺，此寺位于里吉思田广场，上文提到的城堡门就朝向这一方向。外城区有10条大街相连，每条大街到城门为止，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详细记述了这些内容。还有几座城门将一个外城区和另一个外城区的街区隔离开来，这些城门均是铁门。大清真寺就在城堡附近，这里还有很多小清真寺，以及市场、澡堂和无数的广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末，总督府就在这个城堡外，位于叫里吉思田的大广场处。伊本·豪喀尔详细记载了这里的各主要运河，这些运河是从粟特河左岸分出来的，向不花剌城及城周边的花园供水，这些运河没有一条汇入乌浒水，因此最后都消失在拜坎（Baykand）[7]城附近的沙漠之中，该城位于西南方向去往阿木城的道路上。该河（粟特河）的下游河段被称作萨木·哈思（Sām Khās）[8]或合瓦失（Khwāsh）河。[9]

伊斯兰时期前的不花剌城旧址，位于穆斯林时代所建城市西北边几英里的地方，而且离河岸不远。这个城址叫作阿蓝谧（Rīyāmīthan）[10]，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称，这里可以看到古城的恢宏遗址。在长城内，不花剌城附近的平原上有五座繁华的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忽贾答（Khujadah，或Khujādā）城[11]位于从不花剌城到拜坎城道路之西1里格处，距首府3里格。据穆喀达思记载，这是座惬意的大城，还有一座聚礼清真寺与一座城堡。过了此城就是麻戈坎（Maghkān）城[12]，距不花剌城5里格，距上文的道路3里格，靠近长城的西边。麻戈坎城很坚固，还有座聚礼清真寺，以及很多城区，因这里的土地灌溉用水充足，城周边有不少村庄。

土木吉柯提（Tumujkath，或Tumushkath，通常因笔误写为Bumujkath和Būmijkath）[13]，是位于不花剌城西北4里格处的小城，距上文的道路有半里格，道路向左行1里格就是塔瓦委思（Tawāwīs）城[14]。塔瓦委思（通常写法为At-Tawāwīs）的含义是“孔雀”，这是长城

内五座城中最大的一座。这座城有一个繁华的市场，常有呼罗珊各地的商人到此地贸易，这里产的棉布曾长期外销到亦剌可地区。此城有坚固的城墙，还有一座城堡，聚礼清真寺在市场内。长城内五座城市中的最后一座就是赞丹纳（Zandanah）城[15]，现在依然存在。据文献记载，这座城位于不花剌城北边4里格处。此城有坚固的城墙，城内还有座聚礼清真寺，城墙外则是繁华的外城区；亚库特还说这里纺织布料，以其城名所称的赞答吉（Zandajī）布，远近闻名。

长城外2里格就是拜坎城，存在至今，此城离位于不花剌城通往乌浒水岸边道路上的费拉卜儿（Firabr）城有5里格。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拜坎城仅有一座城门，但有坚固的城墙；城中央有座聚礼清真寺，寺院内装修着精美的大理石，其内有个闪着金光的精巧壁龛（Mihrāb，朝向麦加）。拜坎的外城区有个市场，城周边没有村庄，但有很多的哨所，据称总数达1000个。过了这座城就是松软的沙漠，一直延伸到乌浒水岸边。

整个中世纪早期，不花剌城保持着辉煌，但在伊斯兰历616年（1219年）随着蒙古西征，这座城遭到了洗劫，最终被毁。其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该城都没有从劫难中恢复元气。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伊本·白图泰访问过该城，并住宿于被称作法忒·阿八（Fath-ābād）的城区，这里的寺院、学校和市场绝大部分仍旧是成吉思汗破坏后留下来的废墟。只是到了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统治时期将撒马儿罕城作为国都，其姊妹城不花剌城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往日的辉煌。[16]

距不花剌城正东约150英里，位于粟特河上游的城市是撒马儿罕城；其坐落于离粟特河南岸不远的一个高地上。该城有一道城墙环绕，还有很深的护城河和一座城堡保护，大外城区位于高台与河岸的低地。撒马儿罕城[17]周边地区分布着众多运河灌溉的大片果园、带花园的宫殿，这里盛产优质的柏树。城堡内有总督府、监狱等，但伊本·豪喀尔称，当时这座城堡的绝大部分已毁，亚库特说该城堡有双扇铁门。（撒马儿罕）内城有四座城门，即东边的八卜·秦（Bāb-as-Sīn）门，即“中国门”，这里有从低地到高台的阶梯，从城门可望见粟特河；北边的不花剌（Bukhārā）门；西边的八卜·瑙·八哈儿（Bāb-an-Naw Bahār）门，此门也建在高台上；八卜·喀必儿（Bāb-al-Kabīr，）门，即大门，也称作渴石（Kish）门。

据亚库特记载，撒马儿罕内城占地2500贾里（Jarīb），约合750英亩，城内有很多市场与澡堂。这些设施及民宅使用的水是通过铅锡管引入的，这些管道与一条从渴石门进入的主管道相连，主管道的水取自城外的运河，这里的运河水是靠沿地面而建的一个大堤坝输送的，据记载进入到市场里的铅锡输水管道是用石头来支撑的。撒马儿罕内城的大市场被称作剌思·塔可（Rās-at-Tāk，即拱形顶），这里还有座优美的广场。聚礼清真寺与后来的总督府在城堡之南。内城的房屋是用木头和土坯修建的，城中人口极为稠密。

撒马儿罕城的外城区沿着地势较低的河岸伸展，呈半圆形、长2里格的城墙环抱着外城，并从高台一侧一直延伸到（粟特）河的北边，由此形成一条弧形的防御线。外城区的城墙建有由各条大道相连接的八座城门，这些城门的名称为：第一是八卜·沙答瓦（Bāb Shadāwad）门；第二为阿失八兹（Ashbask）门；第三为速合欣（Sūkhshīn）[18]门；第四为阿夫欣纳（Afshīnah）门；第五为八卜·苦哈（Bāb Kūhak，即土丘）门，此门朝向建有内城与城堡的高地；第六就是瓦儿萨宁（Warsanīn）门；第七为里兀答（Rīvdad）门；第八为八卜·法鲁失（Bāb Farrukhshīd）门。内城区的商业街位于剌思·塔可广场上，街道均用石条铺成。外城区的市场是商业中心，该城（撒马儿罕城）是河中地区的大商埠，因此这里有来自各地的商人和商品。在这些商品中，撒马儿罕城生产的纸张在整个东方都很有名，其造纸术是从中国学习来的。这里气候湿润，不论是内城还是外城的宅院均有花园，因此从城堡高处俯瞰撒马儿罕城，其就像一片林带。苦哈（Kūhak）山在该城的南边隆起，是距该城一天路程的山脉的余续。

如同河外地区的所有地方一样，由于蒙古西征，伊斯兰历616年（1219年）撒马儿罕城几乎被毁，一时成为废墟，因此14世纪伊本·白图泰访问这座城时，称这是没有城墙或城门的城市，只有一些居民居住于一片凌乱的废墟中。他将流经这里的河（可能是从粟特河分出来的运河）称作纳赫儿·喀萨临河（Nahr-al-Kassārīn，织工河），其岸边有很多的水车。但撒马儿罕城遭此劫难后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定都于此，并重建了这座城，还修建了很多大清真寺与商旅客栈。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在伊斯兰历808年（1405年）亲眼见过这些建筑，其中的一些建筑保存至今。尤其是聚礼清真寺，据阿里·亚兹底记载，帖木儿从印度远征回来后修建了这座清真寺，因该寺院是帖木儿用这次远征掠获的财物修建的，所以这座寺院十

分宏伟。据克拉维约记载，此时撒马儿罕城周边有一道土城墙；他还说这座城比他自己国家的塞委乐（Seville）城[19]要大一些。[20]

撒马儿罕城周边的地区主要集中于粟特河的西边和南边，但也分布于该河之北，这些地区的土地极其肥沃。撒马儿罕城向东9里格，在该河之南为班吉柯提（Banjīkath）城［存在至今，被称作彭吉肯特（Penjakant）城］[21]，周边有繁华的果园，盛产杏仁和核桃，大片农田分布于粟特河各运河的两岸。此城与撒马儿罕城之间是大瓦剌萨儿（Waraghsar）村[22]及其所属的地区，在这里，从粟特河分出的绝大多数运河灌溉着撒马儿罕城周边的土地。撒马儿罕城南边就是弭秣贺（Māymurgh）区[23]和里兀答（Rīvdad）村[24]，其距首府1里格，并与三贾法干（Sanjafaghan）区[25]接壤。撒马儿罕城周边地区的土地都不如弭秣贺区肥沃，这里以有繁茂的树林而闻名，还有无数纵横交错的村庄。这个区的南边是叫吉八儿·扫答儿（Jibāl-as-Sāvdār）的山区，这里是全撒马儿罕地区气候最好的地方。据伊本·豪喀尔记载，此地有个叫瓦兹喀儿（Wazkard）的地方，这里有一座基督教（可能是聂斯托里派[26]，即景教）教堂，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且常有很多人参观朝谒。绝大多数山谷的土地都异常肥沃，每条山谷的土地靠河水获得充分灌溉，河边的村庄星罗棋布；这里各种谷物的产量均很高。邻近的达儿干（Ad-Dargham）区[27]绝大部分为草原，这里盛产葡萄，与它接壤的是奥法儿（Awfar，或Abghar）区，这里有很多人口稠密的村庄，每个村庄拥有2里格宽的草原，放牧着大量的牲畜。这是撒马儿罕城与（粟特）河之南的最后一个区。

粟特河的北岸，面向兀失鲁萨（Ushrūsanah）地区的方向就是卜兹麻建（Būzmājan）或卜兹麻贾（Būzmājaz）区[28]，该区的主要城市是八儿柯提（Bārkath）或阿八儿柯提（Abārtath）城[29]，距撒马儿罕城西北有4里格或一天的路程。再往北4里格就是忽舒法干（Khushūfaghan）村[30]，后来被称作“桥头”（Rās-al-Kantarah），这是个重要的村庄。经过该区后就是卜儿纳麻兹（Būrnamadh，或Fūrnamadh）区[31]，靠近兀失鲁萨地区边界。接下来就是最北的牙儿柯提（Yārkath）区[32]。这两个区的草原很有名。

撒马儿罕城正北7里格就是瑟底痕（Ishtīkhān）城[33]，其有座城堡，还有外城区，该城靠近从粟特河分出来的运河的岸边。这里的农田很有名，由于该地很富庶，伊斯塔赫里称其为“粟特地区的心脏”。再往

北7里格就是贵霜匿（Kushānīyah，或Kushānī）城[34]，据记载，这是粟特地区极其繁华的城市，其人民富有，生活安逸。在该河之更北，据亚库特记载，距撒马儿罕城只有2里格的地方就是劫布呾那柯提（Kabūdhanjakath）区[35]与该区所在的城市兰朱柯提（Lanjūghkath）城[36]；和该区毗邻的是山区的委札儿（Widhār）区[37]，其首府与地区同名，这座城市的纺织品很有名。最后一个区就是（以人名称呼的）麻儿祖班·伊本·塔儿柯提费（Marzubān Ibn Tarkasfī）区，位于委札儿区之北，伊本·塔儿柯提费曾是粟特地区的大封建主（Dihkān，即地方贵族）之一。[38]

粟特河或现在被称作泽拉夫尚（Zarafshān，即有金的）河[39]，发源于叫贾八儿·卜坦（Jabal-al-Buttam）的山脉。这条山脉是粟特河水系和支汗那地区河流与瓦合沙卜（Wakhshāb）河水系的分水岭，后两条河流是乌浒水右岸的支流，这已在第三十一章述及。贾八儿·卜坦山脉的山坡虽又高又陡，但仍分布着很多村庄，这一地区有金、银矿，还有生产铁、水银、铜、铅、石脑油和沥青等产品的作坊，同时该地区产松香、绿松石、烧火用的褐煤，尤其产卤砂（sal-ammoniac，即氯化铵）。最后一种产品供大量外销，它由山洞中冒出来的气体收集而成。在出气口上，修建有一所房子，需要时就将门窗关闭。据伊斯塔赫里记载，这里的地下也有自燃火，因氯化铵气体白天像烟，夜晚像一团巨大的火焰，闪着光。他称这种气体是在房间里压缩而成的，人们将氯化铵气体定期取出来，取气时，人要披上湿毡迅速进去，又要快速跑出来，因里面温度极高，如果不采用这种办法，就会灼伤。伊斯塔赫里还说氯化铵气体也从附近的很多岩石裂缝里冒出来，这些岩石缝经过人工凿宽后就变成了新出气口。这种气体只能在房间里进行压缩，以免中毒，否则在山边洞口所获气体就会不纯。[40]

粟特河的源头是一个叫健（Jan或Jay）的地方，这里有个湖，湖周边有很多村庄，其附近的地区叫兀儿噶儿（Wurghar），或八噶儿（Barghar）区[41]。这条河从该湖发源，流经山谷，然后到班吉柯提城，接着到前文提及的瓦剌噶萨儿村，在当地语言中这个村的含义为“坝头”，因在这里（粟特）河水开始分流，并形成灌溉撒马儿罕城周边地区与河北岸各区土地的很多运河。其中流向撒马儿罕城的两条运河水量很大，足可行船；伊本·豪喀尔详细记述了各条运河的名称、每条运河所灌溉的地区，以及其所属村庄等。

撒马儿罕城附近，粟特河流经叫坎塔剌·贾儿（Kantarah Jard）的石桥，这座桥在洪水季节有时候完全被河水淹没。撒马儿罕城以南又分出很多条运河，并到达后文将要叙述的答卜思牙（Dabūsiyah）城[42]和喀儿密尼牙（Karmīnīyah）城[43]附近所在的各区，此后粟特河到达不花剌城附近的地区。在这里，该河的干流通常被称作不花剌（Bukhārā）河，在长城外的不花剌地区开始分流出很多运河，灌溉着不花剌长城内外的土地。伊本·豪喀尔记述了各条运河的名称及沿岸的村庄。有些运河连成网络，又流回干流中，有些运河则消失于西南的灌溉渠中。据载，通到不花剌城的各条主要运河水量很大，足可行船。[44]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在不花剌城与撒马儿罕城之间的粟特河南岸，有三座重要的城市，即喀儿密尼牙城（今存）、答卜思牙城和剌宾建（Rabinjan）城[45]。喀儿密尼牙城离塔瓦委思城东边有1站，位于长城外；这座城要比塔瓦委思城大一些，人口稠密，较为繁华，土地肥沃，周边有很多村庄，这里的土地靠粟特河分出来的各条运河灌溉。亚库特提到了该地秀美的林带。此城再往东1站就是答卜思牙（Ad-Dabūsiyah）大城，位于从粟特河南岸分出来的一条运河岸边，但该城周边没有大村庄或者附属的地区。

忽底满坎（Khudīmankan）小城[46]距喀儿密尼牙城有1里格，但离北边的大道只有一箭之地。忽底满坎城往北1里格就是位于粟特河北岸的麻兹牙麻吉柯提（Madhyāmajkath）大村[47]，此村往南1里格就是喝捍（Kharghānkath）村[48]，也在粟特河北岸，这个村距粟特河对面的喀儿密尼牙城只有1里格。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三个村庄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每个村庄均有自己的聚礼清真寺，亚库特说忽底满坎城因是很多穆斯林圣训学家的出生地而很有名。阿儿宾建（Arbinjan）或剌宾建城位于答卜思牙城东一站之地，但比后一座城要大一些；再往东，在剌宾建城与撒马儿罕城中间，距这座首府7里格就是札儿满（Zarmān）城[49]。至于不花剌城周边之地，穆喀达思提到和记载了很多其他小城市，很可惜这些城市的里程失载，因而无法确定这些城市的位置。[50]

往南，与粟特河平行，最后流入沼泽湖泊的就是现在称作卡什卡·达里亚（Kushkah Daryā）的一条河流，该河的岸边就是沙合儿·萨卜兹（Shahr-i-Sabz）城和喀儿失（Karshī）城。中世纪初期，沙合儿·萨卜兹城（即绿城）被称作渴石（Kish，或Kishsh）城[51]，伊本·豪喀尔称

这座城有座城堡，但城市本身有坚固的城墙，在城门外还有个很大的外城区。过了这个外城区是第二座城，叫作木萨刺（Al-Musallā，礼拜堂）城，可能就是现在的基塔布（Kitāb）城[52]，该城有旅店与总督府。大市场在外城，聚礼清真寺和监狱均在内城。该城占地面积为一平方英里，城里的房屋是用木头和土坯修建的。城市附近的土地极其肥沃，所有热带地区的水果在这里均可生长，并销售到不花剌城。渴石城的内城有四座城门，分别称作铁门、兀拜·阿剌（`Ubay Allah）门、屠夫门（Bāb-al-Kassabīn）和内城门。外城，或外城区有两座城门：八卜·八剌南（Bāb Baraknān）门，其名称取自附近村庄名；外城（Bāb-al-Madīnah-al-Khārijah）门。

这条河的干流现在称作卡什卡（Kushkah）河，但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称作纳赫儿·喀萨临（Nahr-al-Kassārīn，即织工）河；该河的源头在贾八儿·萨延（Jabal-Sayām）山脉，后向南流经渴石城。该城北边是纳赫儿·阿思路（Nahr Asrūd）河，去往撒马儿罕城的道路过该河1里格后，要经过一条叫朱亦·鲁得（Jāy Rūd）的河流。从渴石城去往巴里黑城的道路，往南行1里格经过苦失可·鲁得（Kushk Rūd）河，即干河，再行8里格就经过忽札儿·鲁得（Khuzār Rūd）河。这些河流灌溉了渴石城附近的各地区以后，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河[53]，流过那色波城。据文献记载，从任何方向横跨渴石（Kish）地区均需要四天的路程，这里的土地因极其富庶而闻名。（渴石城）附近的山区有盐矿，也有一种叫塔兰朱宾（Taranjubīn）的甘露，以及外销 呼罗珊的各种草药。后来，渴石城因是帖木儿的出生地而声名大噪，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后半叶，他重建了这座城。这里的阿可·萨莱（Ak-Saray）宫，即白宫，成为他最喜欢的驻跸之地。在这个时期，渴石城改称沙合儿·萨卜兹城（即绿城），至今仍保留着这个名称。[54]

从渴石城，顺着这条河（卡什卡河）往南行一百多英里的西边就是现在被称作卡尔希（Karshī）的城市，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人将其称作那色波城[55]，波斯人将其称作那黑沙不（Nakhshab）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那色波城有座坚固的城堡，内城外还有很大的外城区，并有一道城墙环绕，其有四门，即八卜·纳贾里牙（Bāb-an-Najārīyah）门、撒马儿罕（Samarkand）门、渴石（Kish）门与八卜·古巴曾（Bāb Ghūbadhīn）门。那色波城位于该河岸边，这条河是由发源于渴石地区的许多河流汇合形成的，前文已经述及。其岸边有个叫“桥头”（Rās-al-Kantarah）的地方，这就是总督府所在地。监狱紧挨着总督府，聚礼清

真寺位于古巴曾城门附近，寺院与这座城门之间是大市场。古巴曾城门内是座木萨剌（Al-Musallā，即礼拜堂）。穆喀达思盛赞那黑沙不的优质葡萄，并提到了这里很好的市场；城周边是肥沃的土地与果园，但不像渴石城周边那样，这里没有很多附属地区。

历史上，那色波，或那黑沙不城是著名之地，因这里曾是伊斯兰历2世纪（8世纪）后半叶木坎纳（Al-Mukanna`，即著名的呼罗珊蒙面先知）首先举事之地，他还展示过很多神迹。他每夜命令月亮，或月亮之影从那黑沙不城的一口井里升起，使得观看者惊叹不已。波斯人通常将木坎纳称作麻赫·萨赞答（Māh-sāzandah，即造月者），如历史记载，其追随者的多年反叛给哈里发马赫迪的将领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至于那黑沙不城，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蒙古西征以后，有个叫哈八汗（Kapak Khān）的人在距旧城约2里格的地方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宫殿，“宫殿”一词在蒙古语中叫“喀儿失”（*Karshī*），后来这个宫殿附近的居民区不断扩大，就取代了那色波或那黑沙不旧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伊本·白图泰曾逗留于此，并称喀儿失城是座小城，其周边有花园。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常在喀儿失城过冬，后来他在该城附近修建了城堡（Hisār）。[56]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那色波城附近有两座城市，每座城市均有自己的聚礼清真寺。其中小一些的城市叫八兹答（Bazdah或Bazdawah）城[57]，是座坚固的城堡，位于那色波城西6里格处，在去往不花剌城的道路上；另一座稍大一些的城市为喀斯巴（Kasbah）城[58]，在那色波城西4里格，也就是在去往不花剌城的方向，亚库特称这座城有很好的市场。在那色波城和渴石城之间，距后一城西有一站之地就是努室羯·孤列（Nawkad Kuraysh）大村或城；在那色波城东南一站之地，去往铁门关（见原文第441页）的道路上有速纳吉（Sūnaj）[59]大村，距该村1里格远就是亦思吉夫干（Iskīfghan）城[60]，这两个地方依靠前文提到的忽札儿（Khuzār）河灌溉。[61]

粟特地区的产品，不论是自然物产还是制造产品均极其丰富。不花剌地区产的甜瓜驰名天下，这里的织机可生产地毯、礼拜毯、制衣的精美布料和铺在大客厅里的粗毛大地毯等。监狱中的囚犯制作马鞍；此地还鞣制各种皮张，同时生产各种油脂和植物油，并外销各地。撒马儿罕城[62]尤其以造纸而闻名，这里的织机纺织红布和银白布，以及织锦和生丝织品等。该地的铜匠可制造很大的铜锅，其他工匠则可制作马镫、

马颔缰和肚勒，以及各种水缸与高脚杯等。该城附近的各地区盛产榛子和核桃。不花剌城和撒马儿罕城之间的喀儿密尼牙城生产餐巾，答卜思牙城产各种布料和织锦。剌宾建城外销红毡、礼拜毯和锡制杯等，也产兽皮、麻绳和硫磺等。此外，这个地区还产冬季水稻。[63]

如前文第三十章（见原文第431页）所述，呼罗珊道在阿木牙城越过乌浒水到达费剌（Firab）城，然后到拜坎城，再经长城的城门到达不花剌城。道路从这座首府（不花剌城）沿着粟特河的左岸北上到达撒马儿罕城，其间还经过首府（不花剌城与撒马儿罕城）所在的地区，所有早期著述者所记载的这段道路几乎相同，但伊本·豪喀尔和穆喀达思补充了不花剌城的外围城市与撒马儿罕地区之间的道里。[64]

经呼罗珊地区到巴里黑城的道路（见原文第432页），越过乌浒水到达忒耳迷城，从该城分出很多向北的支道，其经支汗那城和久越得健城，到达洼矢吉儿城，而后经石桥，到达镬沙地区和珂咄罗地区。忒耳迷城西北的另一条道路北上到达铁门关和坎达（Kandak）城[65]，过了此地一站后道路分为两支：右边的道路朝正北方向，经渴石城，然后到达撒马儿罕城；左边的道路朝西北方向，到达那黑沙不城，此后又有一条岔道向东返回渴石城，干道则越过沙漠到达不花剌城。这些道路的绝大多数里程较短，伊斯塔赫里记载了这些道路，穆喀达思也记载了一部分路段。[66]

有一条从呼罗珊一侧的阿木城到达花剌子模地区乌浒水三角洲的道路，这条道路沿着乌浒水左岸到达塔西里牙城，这里是耕地的开始，再继续往前到达哈札剌思城。此地有条经乌浒水左岸的希瓦城，到朱儿章（即玉龙杰赤）城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转向柯提城和乌浒水右岸的各城。伊斯塔赫里和穆喀达思记载了这些道路，也记载了从柯提城向东南经沙漠直达不花剌城的道路。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穆思套菲记载了两条从南边到玉龙杰赤城的道路：一条道路从法剌洼儿（Farāvah，即吉兹儿·卢八，见原文第380页）向北经沙漠到达玉龙杰赤城；另一条道路从马鲁城，也同样越过沙漠，并经过很多流沙之地，最后到达乌浒水岸边的塔西里牙城。最后一条道路在《世界志》中做了记载，这条道路从哈札剌思城起程，沿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载的路线到达花剌子模地区的首府朱儿章城。[67]

[1] 《后汉书·西域传》作粟弋。《大唐西域记》作窣利。《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玄照传》作速利。《新唐书·地理志》作粟特。《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2页载："粟特是一个地区。东部地区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繁华的。这里流淌着河流，树木很多，气候很好。此地人民慷慨、善社交。周围地区环境舒适，很繁华，人民多温和、虔诚。"需要说明的是：从《北史·西域传》记载的方位来看，其所记载的粟特国不应是粟特地区，译者比较赞同张星烺先生的观点（《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1331页）；阿拉伯、波斯人所说粟特地区要比《大唐西域记》所指的地区小。译者。

[2] 《魏书》作忸密，又作安息；《隋书》作安国；《大唐西域记》作捕喝，并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新唐书》作安，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西游录》作蒲华，并载："土产更饶，城邑稍多。"《元史》作蒲华、不花剌、卜哈儿等；《西域番国志》作卜花儿，并载该城"在撒马儿罕之西北七百余里，城周回十余里。居平川中，民物富庶，街市繁华，户口万计。地土下湿，天气温和，冬不附向火。土宜五谷、桑、麻，产丝绵布帛。冬食生菜，牛、羊、鱼、肉、天鹅、鸡、兔，悉皆有之"。《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2页载："不花剌是座大城，在河中地区是最繁华的城市。这里居住着东部的国王（Malik-i mashiriq）。该地潮湿，产大量的水果，水源丰富。
这里的人是弓箭手，他们不断为信仰而战。这里产很好的毛地毯和硝石，外销到各地。不花剌的区域范围为12法儿萨长，12法儿萨宽。整个区域在一道完全封闭的城墙内。所有的卫所和村庄均在这道城墙内。"即今布哈拉城，人口26万，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大城市，也是历史名城，建于公元前6世纪，曾有多个王朝在此建都，名胜古迹甚多，许多历史名人曾生活于此。自古至今，这里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中心。译者。

[3] 萨曼王朝（Sāmānid）是中亚地区建立的地方割据王朝（874～999年），由河中地区总督纳思儿·伊本·阿合马（Nasr ibn Ahmad，874～892年在位）奠基，因其曾祖萨曼而得名。都城设在不花剌城。统治地区包括河中、呼罗珊东部、里海沿岸、花剌子模等地。在该王朝统治时期，波斯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999年被喀喇汗王朝所灭。译者。

[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1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6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61、262、266～26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394页。

[5] 这个名称（Nūmijkath，或Numūjkath）是正确的读音，但（由于音点笔误）常误写为卜密吉喀特（Būmijkath）。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67页注释b。这个名称的读音被中国的取经者（即玄奘，译者）所证实，

他在“捕喝”（Bukhārā）条，提到了“忸密”（Numi）之名（著述者称《大唐西域记》“捕喝”条有“忸密”之名的说法似有误，“忸密”之名较早出现在《魏书》，并称捕喝为忸密，译者）。

[6] 16世纪不花剌附近所属区域称作不花剌地区（Wilāyit），分为10或12个土曼（Tūmān，这是成吉思汗时代留下的一种军事组织形式，即万户）。R. D.麦克切斯尼：《16世纪布哈拉郊区朱孜曼顿地区的乡村》，见www. archnet. org/library/pubdownloader/pdf/3861/doc/DPC0518.pdf。又见R. D.麦克切斯尼：《中亚的教产：一个穆斯林圣墓400年（1480～1889年）历史考察》，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3～118页。译者。

[7] 译者以为此地应该就是《大唐西域记》所载伐地国，其载：“从此西南五百余里，至货利习弥伽国。”也就是说，从伐地国可到花剌子模。这与大食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2页载：“拜坎（Paykand，即Baykand，引者）城是有一千个卫所（ribāt）的城市。城里有拱形陵园，这里葬着来自不花剌的人。”今此城名不存，应在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州卡拉库尔（Karakul）区，这是距阿姆河不远的大块绿洲。此城是从布哈拉渡过阿姆河到阿木（土库曼纳巴特）城的必经之地，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8] 萨木·哈思，即粟特河，《魏书》作萨宝水；《隋书》称那密水；托马斯柯（Tomaschek）所著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一书将“那密”转写为Namik（Nāmiq），第19～20页。《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tion*）一书第82页载，此河在18世纪才被称作札剌夫珊河。译者。

[9]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05～309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55～35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0、281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517页。

[10] 《新唐书》“安国”条作阿蓝谧，“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译者。

[11]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2页提到了忽贾答。此城名今不存，应在布哈拉城西边马汉（Makhan）东北不远。译者。

[12] 麻戈坎城，应是《魏书·西域传》中的牟知城，因《魏书》记载此城与不花剌城的里程数和阿拉伯文献记载基本一致，不到40公里，且两城读音相近，同时两种不同语种的文献均记载其位于不花剌城的西南边，《魏书》载，“土平，多五果”；阿拉伯文献载，其在粟特河流域的平原上，非常丰饶。《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2页提到了该城以及赞丹纳、土木吉柯提、忽贾答、麻兹牙麻吉柯提、喝捍等。今天这个城名以马汉（Makhan）的形式保留下来，在布哈拉城西南，曾是丝路

上的繁华小城。译者。

[13]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2页提到了土木吉柯提。此城名今不存，应在布哈拉城西北约20公里处。译者。

[14]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3页载："塔瓦委思是粟特边界属于不花剌的一座小城。该城于每年的某一天开市，届时会有很多人光顾。"此城名今不存，应在布哈拉城东北约20公里处。译者。

[15] 此城名今不存，应在布哈拉城北约20公里处。译者。

[1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13～31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62～36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1、28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37、874页；第2卷，第952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27页。舒勒（E. Schuyler，即徐楼）：《突厥斯坦游记》（*Turkistan*：*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Khokand*，*Bokhara and Kuldja*），第2卷，第89页。

[17]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3页载："撒马儿罕城是一座繁华、舒适的大城。这里聚集着世界各地的商人。该城有内城（shahritān）、城堡和外城。其市场棚顶上的铅管里流着一股水。在撒马儿罕城有座摩尼静修僧院（*khānagāh -i Mānaviyān*），叫闻道堂（*nighsūhāk*）。撒马儿罕产纸，并销售到世界各地，也产麻绳（*rishta-yi qinnab*）。不花剌河从撒马儿罕城的城门流过。"今为撒马尔罕城，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是中亚最负盛名的城市之一，多个王朝在此建都，名胜古迹随处可见。人口有50万，是多民族居住的城市，为古今道路要冲和丝绸之路上的中心城市。译者。

[18] 速合欣，似是《晋书》卷九七"康居国"条中的苏薤，因波斯人、阿拉伯人多以附近城市的名称命名城门，可能在阿拉伯时代苏薤城已毁，或者改为别的名称，所以在阿拉伯文献中没有记载这座城市，但该名以城门名的形式保留下来。译者。

[19] 塞委乐（Seville，塞维利亚）城，存在至今，位于西班牙南部的瓜土尔吉尔河右岸，是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该国第四大城市，人口65万。译者。

[20]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16～318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65～36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78、279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5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134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5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159页。舒勒（E. Schuyler）：《突厥斯坦游记》（*Turkistan*：*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Khokand*，*Bokhara and Kuldja*），第2卷，第169页。

[21] 彭吉肯特城位于泽拉夫尚（Zeravshan）河岸边，是塔吉克斯坦粟特（苏格特）州彭吉肯特区区府，人口3.3万，是丝绸之路上的古镇和要道，去往撒马尔罕、费尔干纳的道路经过此地。译者。

[22]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3页提到了班吉柯提、瓦剌萨儿。译者。

[23] 《隋书·西域传》作米国，在“都那密水西”。“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兀失鲁萨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大唐西域记》作弭秣贺国，唐言米国，其“周四五百里，据川中，东西狭，南北长”。《新唐书·西域传》作米，或曰“弥末，曰弭抹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此名今不存，应在今撒马尔罕城南郊。译者。

[24] 这个村庄今天以拉瓦纳克（Ravanak）的名称保留下来，在撒马尔罕城东南郊。译者。

[25]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撒马尔罕城南郊。译者。

[26] 聂思托里（Nestorianism）派创始人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思托里（Nestorius，386～451年），该派被视为异端，在欧洲遭到打击，聂思托里教徒们于

是向东发展，逐渐在亚洲生根发芽。唐朝时期，该派传入我国，称之为景教，之后一度在我国消失，到了宋代在西域回鹘地区传播，到了元代景教又一次广为传播，当时称之为也里可温，有关内容可参考日本学者佐伯好郎教授所著的《景教之研究》和《中国之景教遗物》；朱谦之先生所著的《中国景教》（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及其他著作与论文。译者。

[27]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撒马尔罕城东南12公里处，距山区不远。1141年9月西辽与塞尔柱王朝联军在此地附近的卡特万草原决战，最后塞尔柱王朝联军被彻底打败，从此塞尔柱王朝一蹶不振。译者。

[28]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撒马尔罕城东北，以泽拉夫尚河为界。译者。

[29]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撒马尔罕城之北，在泽拉夫尚河岸。曾是丝路重镇，是从撒马尔罕城去往费尔干纳的交通要道。译者。

[30]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撒马尔罕城之北不远，过八儿柯提城。译者。

[31]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撒马尔罕城之东北约60公里处。译者。

[32]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撒马尔罕城之东北约80公里处。译者。

[33] 《魏书·西域传》作色知显国；《新唐书·西域传》作瑟底痕城。《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3页载："瑟底痕是繁华、兴旺，以及非常舒适的地方。"今为伊斯提汗（Ishtīkhān），位于撒马尔罕城西北约40公里处，是撒马尔罕州伊斯提汗区区府，是从撒马尔罕城到布哈拉城的要道，也是丝路古镇。译者。

[34] 《隋书·西域传》作何国；《大唐西域记》作屈霜尼迦国，并载："周千四五百里，东西狭，南北长。"《新唐书·西域传》载："何，或曰屈霜尼迦，曰贵霜匿。"《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3页载："贵霜匿是粟特地区最繁华的城镇。"此名今不存，应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州州府纳沃伊之北，距泽拉夫尚河不远，曾是丝路重镇。译者。

[35]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撒马尔罕城之东北，具体位置难以确定。译者。

[36]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撒马尔罕城之东北，具体位置难以确定。译者。

[37]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撒马尔罕城之东北，具体位置难以确定。译者。

[3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21～32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71～37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7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

第277页；第2卷，第447、890页；第4卷，第234、276、944页。

[39]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3页载："另一条河叫不花剌（Bukhārā）河。由发源于卜坦（Buttam）山脉中部的四条河流组成。这四条河流了6法儿萨，而后所有的河流形成一个沼泽（batīha），叫达利丫扎［Daryāzha，现在称作亚历山大湖（Iskandar-kul），米诺斯基第211页注释］。这个沼泽中流出的一条河流经苏兀失鲁萨（Surūshna，即兀失鲁萨）、撒马儿罕、粟特等区域，而后穿过不花剌城。这条河流的一部分河水用来灌溉不花剌地区的土地，另一部分则流入法坎（Paykand，即拜坎，引者）城的阿洼扎［*Avāza*，即喀拉湖（Qara-kul），米诺斯基第211页注释］。"今为泽拉夫尚河，全长877公里，为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河流，是发源于突厥斯坦山脉的河流，向西流经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最后消失在布哈拉以南的的沙漠中。其河谷地带是中亚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孕育了中亚持久的文明，也是古今交通要道。译者。

[40]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12、32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62、382页。

[41] 上述两个地名难以查找，应在塔吉克斯坦中部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交界的阿赖山区。译者。

[42]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泽拉夫尚河南岸的纳沃伊城附近，为古今交通重镇。译者。

[43]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泽拉夫尚河向南布哈拉拐弯处的布哈拉州吉日杜万（Gijduvon）区区府吉日杜万附近。这里是通往布哈拉、撒马尔罕的要道，也是丝路古镇。译者。

[4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10～31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59～371页。

[45]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3页提到了这三座城市，并载："均在粟特地区。这些城市很繁华、舒适，流淌着河水，生长着很多树木。"今剌宾建之名不存，应在撒马尔罕州卡塔库尔干（Kattakurgan）区卡塔库尔干城附近，曾是丝路重镇。译者。

[46]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布哈拉北的吉日杜万城西北不远，是丝路要道。译者。

[47] 今此名不存，应在今纳沃伊城西北不远，位于泽拉夫尚河北岸，是丝路要道。译者。

[48] 《大唐西域记》作喝捍，即东安国，“周千余里”。《新唐书·西域传》作喝汗城。译者。

[49] 今为扎尔曼（Zarman），位于撒马尔罕城西北45公里处，是座小城，是从撒马尔罕城去往布哈拉城的要道，也是丝路古镇。译者。

[50]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14、316、32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63、365、37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406、925页；第4卷，第268页。

[51] 《三国志·魏书》引《魏略·西戎传》作碣石或坚沙；《北史·西域传》作奇沙国；《隋书·西域传》作史国，“都独莫水南十里”。《大唐西域记》作羯霜那国，“唐言史国”，“周千四五百里”。《明史》作渴石。《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3页载：“渴石城是热区的城市。此城绝大部分已毁。这座城有内城、城堡、外城。流过城门的两条河的河水可用来灌溉。此地所在山区可以找到药物矿。这里产很好的骡子、石蜜和红盐，并外销到各地。”今为沙赫里萨布兹（Shahrisabz），是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沙赫里萨布兹区区府，人口约6万，是丝路重镇。这里是明朝驸马帖木儿的出生地。译者。

[52] 今为卡什卡达里亚州基塔布区首府，人口约4.5万，是丝绸之路上的古镇，在沙赫里萨布兹城东北。译者。

[53] 这条河今被称作卡什卡达里亚（Qashqadaraya）河，也称卡什卡河，全长378公里。译者。

[54]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2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75～377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3卷，第300、301页。

[55] 《新唐书·西域传》作那色波，“亦曰小史，盖为史所役属。居吐火罗故地，

东厄葱岭，西接波剌斯，南雪山”。《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那黑沙不（Nakhshab）。《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那色波是有耕地的很舒适、惬意的城市。一条河穿城而过。”今为卡尔希城，是卡什卡达里亚州州府，人口20万，是去往布哈拉、撒马尔罕、阿姆河岸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5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2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77、37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2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12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28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111页。

[57]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卡尔希城西边的杰伊瑙（Dzheynau）小城附近，是卡尔希城的卫星城。译者。

[58]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提到了八兹答和喀斯巴，并载：“八兹答是一座人口很少的城市，但周边有很多耕地。这里有条干河道，一年中有些时间有水流，但绝大部分用水来自水井和水车。”“喀斯巴是有很多耕地的地方。”今为卡斯比（Kasby），是卡什卡达里亚州卡斯比区的小城，位于卡尔希西部。译者。

[59] 今此地名不存，大致在卡尔希城东南40公里处。译者。

[60]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提到了速八合（Sūbakh，即Sūnaj，是笔误造成的不同写法，引者）城和思吉夫干（skīfaghn，即Iskīfghan，引者）城。今思吉夫干之名不存，大致在卡尔希城东南20公里处。译者。

[61]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62～36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83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

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604页；第3卷，第197页；第4卷，第273、825页。

[62] 有关撒马儿罕城附近的物产，《晋书》载："地和暖，饶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马。"《隋书》载："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骡、驴、封牛、黄金、饶沙、[illegible]香、阿萨那香、瑟瑟、麖皮、氍毹、锦叠。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乐器"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据《新唐书》记载，其向唐朝进贡的物品有金桃、银桃、锁子铠、水晶杯、玛瑙瓶、鸵鸟卵、越诺等，还产石蜜、头巾、金饰物等。《西游录》载，该地"瓜大者如马首"，"以葡萄酿酒，有桑不能蚕"。《西域番国志》载，该地"有金、银、铜、铁、毡罽之产。多种白杨、榆、柳、桃、杏、梨、葡萄、花红。土宜五谷"。译者。

[63]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6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24、325页。

[64] 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5、26页。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03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34、34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8、40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42、343页。

[65] 今此地名不存，大致在卡尔希城东南方向的卡什卡达里亚州迪赫卡纳巴德（Dehkanabad）区区府迪赫卡纳巴德附近，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可通往卡尔希、铁尔梅兹等地。译者。

[66]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37～341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9～40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42～344页。

[67]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

卷，第338、341、342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400、402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43、344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197、198页。*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457页。

第三十四章 药杀水（Jaxartes）诸地

兀失鲁萨纳（Ushrūsanah）地区。首府班吉柯提（Būnjikath）城。杂民（Zāmīn）城和其他城市。拔汗那（Farghānah）地区。药杀水（Jaxartes）或细浑（Sayhūn）河。阿思柯提（Akhsīkath）城和安集延（Andījān）城。倭赤（Ūsh）城、讹迹邗（Ūzkand）城和其他城市。柘支（Shāsh）地区。柘支（Shāsh）城或宾柯提（Binkath）城。八那可提（Banākath）或沙鹿海牙（Shāhrukhīyah）城，和其他城市。亦剌（Ilak）地区，屯柯提（Tuntath）城，和哈失忒（Khasht）的银矿。白水（Isbījāb）地区。白水（Isbījāb）城或赛兰（Sayrām）城。池木干（Chimkand）城，和法剌卜（Fārāb）或讹塔剌（Utrār）城。牙思（Yassī）城和萨卜兰（Sabrān）城。毡的（Jand）城和养吉干（Yanghikant）城。塔剌思（Tarāz）城和密儿吉（Mīrkī）城。突厥诸部的外围城市。药杀水流域各地的物产。通往撒马儿罕城之北的诸道。

兀失鲁萨纳（Ushrūsanah，也写为Usrūshanah、Surūshnah或Sutrūshnah，又译苏对沙那）地区[1]位于撒马儿罕城以东，介于粟特河右岸的地区与药杀水左岸的地区之间，由于兀失鲁萨纳地区水系不发达，因而没有大河流经这里的平原和山区。据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这一地区的东部边界是播蜜（Pamir，或Fāmir）。

该地区的首府是兀失鲁萨纳（Ushrūsanah，或Madīnah Ushrūsanah）城[2]，又称作班吉柯提（Būnjikath，或Banjakath，或Bunūjkath）[3]，其位置在今天的乌拉·秋别（Ura-tepeh）城。[4]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班吉柯提城人口超过1万，该城是用土坯和木材修建的，内城有道城墙，外城也有城墙。内城有两座城门—上门（Bāb-al-A`lā）和内城（Bāb-al-Madīnah）门，内城有城堡、监狱、聚礼清真寺和市场等。一条岸边有很多水磨的大运河经过内城。外城或外城区的城墙内有很多花园，城墙的周长有3里格。外城墙有四座城门，即杂民（Zāmīn）门、麻剌思满答（Marasmandah）门、�billing赤建（Nūjkath）门和喀剌八兹（Kahlābādh）门。六条小河给该城周边的土地提供丰富的灌溉用水，伊本·豪喀尔记载了这些小河的名称。这些河发源于附近的山里，约经过半里格后，穿过班吉柯提城，河岸边有十个水磨。该城以有令人心仪的花园而闻名。

杂民（Zāmīn）城[5]存在至今，其位于班吉柯提城以东，呼罗珊道经过不花剌城和撒马儿罕城之后，最后在杂民城分为两支：其中的一条道路北上到达柘支［Shāsh，即塔什干（Tāshkan）］城；另一条道路向东北通往拔汗那（Farghānah）地区[6]及其以外的地区。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杂民城的规模差不多和首府班吉柯提城一样大；这是座很古老的城市，先前称作速三答（Sūsandah），或萨儿三答（Sarsandah）。其有一座聚礼清真寺和很多很好的市场，城周边是花园，但没有城墙。一条河流流经该城，河上有很多浮桥。萨八忒（Sābāt）城[7]存在至今。该城介于杂民城和班吉柯提城之间，在去往拔汗那城的道路上。据穆喀达思记载，这座城非常繁华，其河流岸边有很多的果园和花园。[8]

关于兀失鲁萨纳地区的其他城市，文献只列出了名称，没有详述，绝大多数城市的位置并不确定。但其中有些城市存在至今，或通过道里志能确定其位置，这些城市如下。底札（Dīzak），也称作吉札（Jīzak）城[9]，其位于杂民城西北；该城以南，在从撒马儿罕城起程的道路上有重镇哈剌喀纳（Kharakānah）[10]。哈瓦思（Khāwas）或哈瓦思（Khāwas）城[11]位于从杂民城向北到柘支城的道路上，苦儿可（Kurkath）城[12]位于拔汗那地区的边陲，在萨八忒城和忽毡（Khujandah）城[13]中间。米纳（Mīnak）和麻剌思满答（Marasmandah）两座[14]小城，因在道里志中失载，其位置也无法准确判定，但根据班吉柯提城的麻剌思满答（Marasmandah）城门之名来推断，应在该首府的附近。麻剌思满答城在山区，气候寒冷，但有很多河流，由于海拔较高，这里几乎没有果园，或花园。穆喀达思称麻剌思满答城有很好的市场，聚礼清真寺位于市场中央，并说这是个繁华之地。米纳城显然应在麻剌思满答城附近，第一次穆斯林远征中的阿拉伯将领屈底波率军征服河外之时，这里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战役。在该城还有座城堡，城堡里曾居住过一个叫阿夫欣（Afshīn）的人，他是哈里发穆塔欣（Mu`tasin）最器重的将领。米纳城和麻剌思满答城附近有铁矿，这里生产外销到呼罗珊所有地区的各种工具，及生产优质的钢材；这些产品甚至还受到报达城人的青睐。[15]

如前所述（见原文第434页），这里的大河—药杀水被阿拉伯人称作细浑（Sayhūn，或Sihūn）河。但这条河习惯上被称作纳赫儿·柘支（Nahr-ash-Shāsh）河，即柘支（Shāsh，即塔什干的旧称）河，名称取自其河岸附近最重要的城市柘支。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据穆

思套菲记载，这里的蒙古人称呼该河为吉儿·札里牙（Gil-Zariyān）河[16]。从那时起到现在，这条河通常被突厥诸族称作锡儿·答里牙（Sīr Daryā），或锡儿·速（Sīr Sū），即锡儿河，阿卜·勒·哈兹也提到了这一名称。

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药杀水发源于突厥之地，由山脉中的很多河流汇合而成，此后在讹迹邗（Ūzkand）城[17]附近流入东端的拔汗那地区大谷地；这条河的上游经过拔汗那地区，南北长达一百多英里[18]。细浑河在从讹迹邗城正东流经拔汗那地区的过程中，接纳了很多支流，即纳赫儿·哈儿珊（Nahr Kharshān）河、兀剌思（Urast）河[19]、苦八（Kubā）河，也称纳赫儿·吉吉儿（Nahr Jidghil）河，这条河应是今天的纳伦（Naryn）河，以及其他河流。细浑河流经该地区首府阿思柯提（Akhsīkath）城[20]的城墙附近后，到达忽毡城，最后从这里流出拔汗那地区。此后，细浑河转向北边，紧接着从该河右岸接纳了亦剌（Ilāk）河与纳赫儿·突厥（Nahr Turk）河，并流经亦剌（Ilāk）[21]地区与柘支地区的西边。细浑河经过这些地区后，到达白水（Isbījāb）地区，然后经古思（Ghuzz）沙漠和突厥（Turk）沙漠之地，在快到咸海时形成很多条河道，最后从东北注入该湖。阿拉伯地理学家说，细浑河像质浑河一样可以通航，但与乌浒水相比，药杀水[22]冬季封冻时间比乌浒水长一些，因此商队可以从这条河的冰面经过。细浑河只是其姊妹河质浑河长度的2/3。[23]

直到最近通常称浩罕（Khūkand）汗国[24]的拔汗那（即今费尔干纳）地区，沙皇俄国政府正式恢复了较古老的名称（拔汗那），其首府在中世纪被称为阿思柯提城，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其他人将其称作拔汗那（Farghānah）城[25]。该城位于药杀水北岸。这座城的遗址依然存在，但在伊斯兰历10世纪（16世纪），八八儿（Bābar）[26]统治拔汗那地区之时，阿思柯提城简称阿思（Akhsī）[27]，并成为这一地区的第二大城市，安集延（Andījān）城[28]则上升为此地区的首府。

伊本·豪喀尔称阿思柯提城是座大城，还有座城堡，其内城有聚礼清真寺、总督府和监狱；内城外有个很大的外城区。内城四至达一英里，这里有很多纵横交错的输水管道，并且所有的管道又和一个大储水池相连；内城和外城均有市场，外城还建有一道城墙。内城有五座城门，即柯散（Kāsān）门、聚礼寺（Bāb-al-Jāmi`）门、剌哈纳（Rahānah）门；接下来的城门名不易确定，应称作八塔儿（Bakhtar）门；最后一

座城门为麻儿答沙（Al-Mardakshah）门。这座城的周边全是花园，其从外城门外绵延好几里格，或更远，到药杀水南岸则是一片肥美的草原。阿思柯提城显然与拔汗那地区的其他城市一样，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其先是遭到木哈马·花剌子模沙（Muhammad Khwārizm Shāh）征服战争的侵袭，紧接着又遭到蒙古西征的破坏，结果该城被毁；后来这个地区的首府移到安集延城。帖木儿时代的阿里·亚兹底将阿思柯提城名记为阿思坎（Akhsīkant）或阿思柯提（Akhsīkat），如前所述在八八儿统治时期，该城简称为阿思城。[29]

据穆思套菲记载，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后半叶，成吉思汗子窝阔台（Ugutay）之孙海都（Kaydū Khān）[30]以俺的干（Andigān，即现代的安集延）城作为拔汗那地区的首府。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在伊本·豪喀尔所记载的城市名称中已出现了俺的干（Andigān或Andukān）之名，亚库特也提到了这个名称，阿里·亚兹底在记载帖木儿武功活动时，也常提到这一名称，但对该城所在的位置没有做任何的记述。从道里志考察，这座城似是在苦八（Kubā）城[31]附近，因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苦八城是一座重镇。伊斯塔赫里说苦八城的规模几乎和阿思柯提城一样大，其有连片的果园。这座城还有座坚固的城堡，其中央广场（Maydān）有座聚礼清真寺；该城还有个外城区，其内有总督府与监狱。外城区周边是一道高大的城墙，其城墙附近是商品琳琅满目的商业街。[32]

兀士乞干（Ushtikān）城[33]位于阿思柯提城和苦八城中间，城内的市场里有座聚礼清真寺；苦八城的东边是倭赤（Ūsh）城[34]，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该城已是一座重镇。倭赤城的城堡和一般城堡一样，有总督府和监狱；内城的城墙外围是一个有城墙的外城区，外城区一直伸展到附近的山坡。这座城有三座城门，即八卜·贾八儿（Bāb-al-Jabal）门，即山门；八卜·麻（Bāb-al-Mā）门，即水门；木喀答（Mughkadah）门。聚礼清真寺位于宽阔的广场（Rahbah）附近，广场周边是市场；该城附近的土地从很多河流中获取充沛的灌溉用水。附近的山顶上是一处志愿兵把守的哨所，以防突厥军队的袭击。经过倭赤城，就是讹迹邗（Ūzkand）城，这是拔汗那地区最东边的城市，据文献记载，该城规模是倭赤城的2/3。讹迹邗城也位于肥沃地区，其有座城堡和一座坚固的内城，还有一个有很多市场的外城区，这些市场里常有突厥商人光顾。一条河流经其中的一座城门，而外城有一道四座城门的城墙，在市场里有座聚礼清真寺。

药杀水南岸的拔汗那地区的一部分被称作纳思牙（Nasyā）或纳塞牙（Nasāiyah）[35]地区，按海拔可分为上下部分，上纳塞牙地区位于山区。下纳塞牙地区有麻耳亦囊［Marghīnān，现代的马尔吉兰（Marghīlān）］城[36]，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虽是一座小城，但其市场内却有一座聚礼清真寺。这座城的东边是里失坦（Rishtān）城[37]，早期是座大城市，也有聚礼清真寺。浩罕（Khūkand）城[38]在后来的时期成为拔汗那地区的首府，因此也用“浩罕”之名称呼该地的汗国，早期文献在提到上纳塞牙地区的各城时，偶尔提到该城，并以忽瓦干（Khuwākand或Khuwākand）的形式出现。

从撒马儿罕城起程的道路经过的拔汗那地区西边第一座城市为忽毡（Khujandah）城[39]，其位于药杀水左岸，距南边邻近的干底（Kand）城的外城区1里格。忽毡城沿河岸延伸很长的距离，但宽度很小；该城有座坚固的城堡，其内有监狱。内城中有座聚礼清真寺，总督府在外城区的广场（Maydān）附近。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忽毡城是座极其惬意的城市，这里的居民拥有往返于药杀水的船只。干底（Kand）城的外城区被专称为坎的把丹（Kand-i-Badhām，即扁桃）城[40]，可疾云尼称这座城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里盛产扁桃，此地产的扁桃外壳很脆，只要放在手上一捏，就能去掉皮壳，因而很有名。[41]

至于拔汗那地区北边，也就是药杀水右岸地区的城市在早期文献中几乎没有多少记载。据穆喀达思记载，万柯提（Wānkath）城[42]有座聚礼清真寺和很多很好的市场。从道里志判断，万柯提城应位于阿思柯提城西7里格处，距药杀水1里格，且离亦剌地区边界不远。万柯提城之北的山区中有亥剌兰（Khayralam，或Khaylām）城[43]，这是密养·鲁赞（Miyān Rudhān，即河中）地区的一座城市，这座城有座优美的聚礼清真寺和很多很好的市场。该城往北就是失吉（Shikit，或Sikit）城[44]，穆喀达思称这里盛产核桃，因而一千个核桃仅值一个底儿罕；该城在市场里同样有座聚礼清真寺。柯散（Kāsān）城[45]存在至今，据早期的地理学家记载，这座城位于与之同名的地区之内。亚库特说该城有座坚固的城堡，还说一条河流过城门，最后在阿思柯提城附近汇入药杀水。再往北就是吉吉儿（Jidghil）地区，其首府为阿儿答兰柯提（Ardalānkath）城[46]。该地区的东边就是喀剌万（Karawān）地区，其首府为纳吉木（Najm）城[47]。穆喀达思约略提到了其他很多城市，但没有说明这些城市所在的具体位置。[48]

拔汗那地区西边就是柘支（Shāsh）[49]地区，如前所述，其位于药杀水右岸或东北岸。现在旧塔什干城的遗址曾是阿拉伯人所称的柘支城，即波斯人所称的察赤（Chāch）城。中世纪时期，这座城是阿拉伯人在外药杀水区域所管辖的最大城市。柘支城也被称作宾柯提（Binkath）[50]，像河中地区的很多其他城市一样，它拥有伊朗语和突厥语两种名称。

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柘支城是一座有多道城墙的城市。先是内城，这里有城堡或城关，互相是分开的，但距离很近，这两地之间建有一道城墙。而后，内城外就是内城区，城区本身又围着一道城墙，过了这道城墙 就是外城区，这里有很多的花园和果园，而且由第三道城墙守卫。最后一道城墙是长城，该长城如同不花剌城的长城一样从柘支城附近之北，形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护卫着整个地区，其范围从东边的突厥（Turk）河岸到西边的药杀水。

现在再返回来谈（柘支）内城和城堡。城堡内有总督府、监狱，还有两座门：一座门朝向内城；另一座门通向外城区。聚礼清真寺修建在城堡的城墙附近。内城四至有1里格，其内有很多相当繁华的市场，以及三座城门：首先是阿卜·阿八思（Abu-l-`Abbās）双扇门；其次是八卜·渴石（Bāb Kish）门，为单门，此门无疑朝向南边，从撒马儿罕城起程的道路就经过这个门；最后为朱奈得（Al-Junayd）门。内城区的城墙有十座城门（穆喀达思说只有八座城门），外城的城墙有七座城门，伊本·豪喀尔详细记述了这些城门。内城区有柘支城的很多大市场。整个城市利用输水渠道从各条运河中获得充沛的用水，并用这些水灌溉着城墙内的很多果园与葡萄园。

长城与外城区城门最近处相距只有1里格。其城墙起点在突厥河岸边叫贾八儿·萨卜剌（Jabal Sāblagh）的山的东边，辽阔的吉剌思（Al-Kīlās）平原被纳入其中。这条长城是阿卜·阿剌·伊本·忽麦（`Abd-Allah ibn Humayd）修建的，目的是保护柘支城免遭北边突厥诸部的袭扰，长城外1里格处是一条很深的壕沟，其从突厥河岸的萨卜剌山一直延伸到药杀水西边。从柘支城向北到白水（Isbījāb）城的道路要经过这一长城的铁门（Bāb-al-Hadīd）。

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柘支城部分毁于木哈马·花剌子模沙的征服活动中，蒙古人的到来又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灾难。但这座城很快从灾难中恢复过来，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帖木儿于该城逗留

时，其已成为一座重镇。阿里·亚兹底在记述帖木儿的武功活动时，常以柘支、察赤，或塔什干之名提到该城；最后一个名称（塔什干）显然是操突厥语诸族将柘支（Shāsh）讹读为塔石（Tāsh），塔什干[51]的含义则为“石城”，该城现在是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52]

纳赫儿·突厥（Nahr Turk）河现在被称作奇尔奇克（Chirchik）河，流经柘支城东南，伊本·豪喀尔称这条河发源于纳伦（Naryn）河北岸的吉吉儿山脉，山脉所在的地区叫八思坎·葛逻禄·突厥（Baskām-i-Kharlīkh Turk）。在纳赫儿·突厥河之南，与该河几乎平行的河流是纳赫儿·亦剌（Nahr Ilāk）河，现在被称作安格连（Angran）河[53]，在柘支地区第二大城八那可提（Banākath）城稍南汇入药杀水。八那可提城，又名八纳吉忒（Banākit）城，波斯语称作法纳干（Fanākant）城，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这座城没有城墙，但在市场内有座聚礼清真寺。该城位于药杀水右岸，从撒马儿罕城起程到柘支城的呼罗珊道从这里越过该河，直到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这座城还是一座重镇，但后毁于成吉思汗之手。一个多世纪后的伊斯兰历818年（1415年），奉帖木儿之孙（应是“子”，译者补）沙哈鲁的敕命，法纳干城得以重建，此后这座城就被称作沙鹿海牙（Shāhrukhīyah）城[54]，阿里·亚兹底常以此名提及该城。

从八那可提城向北到柘支城的道路经过吉南贾柯提（Jīnānjakath）城，该城位于突厥河南岸或左岸，在突厥河与药杀水汇合点之北约2里格处。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该城虽没有城墙，但规模很大，其屋宇是用木材与土坯修建的。经药杀水向西，距吉南贾柯提城一站之地，在去往吉札（Jizak）城的道路上，有小城外因喀儿（Waynkard），伊本·豪喀尔称这是一个基督（景教）徒的村庄。越过突厥河，在该河西角与药杀水汇合处稍南有兀失土儿柯提（Ushtūrkath或Shuturkath）城，即驼城，此城有坚固的城墙。这座城肯定毁于蒙古人之手，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后半叶，该城之名被秦那思（Chīnās，存在至今）取代，阿里·亚兹底常提及后一个名称。伊本·豪喀尔和穆喀达思提到了柘支地区的许多其他城市，但没有详载，因此这些城市的位置现在已无法确定；但有材料证明，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从南边的亦剌地区到北边的白水地区的整个区域是人口稠密之地，这一地区有很多与城镇大小一样的村庄。[55]

亦剌（Ilāk）地区包括亦剌（Ilāk）河南岸与忽毡城以南的药杀水大

拐弯之北的区域；这个地区的首府为屯柯提（Tūnkath）城[56]。该地区与柘支地区接壤，其内有很多重要的城市，伊本·豪喀尔和其他著述者详细记载了这些城市，但位置无法确定，甚至也无法准确判定首府屯柯提城的位置。据伊本·豪喀尔记载，屯柯提城位于亦剌河岸边，距柘支城8里格，据说这座城的规模是柘支城的一半[57]。该城有座坚固的城堡、一座内城和一个有道城墙的外城区。城堡内有总督府，城堡门附近有监狱与聚礼清真寺。内城和外城均有大市场，城周边的整个地区有丰富的水资源。亦剌地区与柘支城之间的地方有很多城市，伊本·豪喀尔记载了这些城市的名称，但如前所述，这些城市所在的位置现已无从得知。繁华的哈失忒（Khāsht，也写作Khāsh、Khās或Khās）城[58]是上述文献提到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该城位于拔汗那地区边界的亦剌（Ilāk）山区银矿附近。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该城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有个铸币厂，铸造大量的金、银币，城周边有很多村庄。[59]

柘支地区之北，以及从药杀水右岸向东延伸的区域就是辽阔的白水（Isbījāb或Asbijāb）地区，其首府与地区同名；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穆喀达思称这个地区有近五十座著名的城市，但现在只能确定其中很少一部分城市的位置。

白水（Isbījāb）城[60]与赛兰（Sayrām）城[61]的位置相同，其距阿里思（Arīs或Badam）河岸边的赤木干（Chimkant）城约有8英里，这条河是药杀水右岸的一条支流。[62]据伊本·豪喀尔记载，这座城的规模是柘支城的1/3，其包括一座城堡或城关、带城墙的内城和有城墙的外城区。据文献记载，白水城的整个周长约有1里格，该城位于一个距最近山脉3里格的大平原上，周边是灌溉用水丰富的果园。这座城市有四座城门，每座城门前修建有一个坚固的哨所（Rubāt）。内城和外城均有市场，内城还有总督府、监狱和聚礼清真寺。穆喀达思提到的速克·喀喇必思（Sūk-al-Karābīs，即棉花商）市场尤为著名，市场内商店一个月的租金达7000底儿罕（约300英镑），这些租金用于慈善事业。白水城应是在蒙古西征以后才更名为赛兰城的，阿里·亚兹底在记述帖木儿的武功活动时，常提到赛兰之名。

赤木干（Chimkant，可写为Chimīkant）城，也常被阿里·亚兹底提到，该城就是穆喀达思所记载的吉木喀（Jimukat）城，他说这是座大城，坚固的内城里有聚礼清真寺，以及几个外城区，城里有很好的市场。[63]

赤木干（Chimkant）河[64]汇入细浑河东岸处稍南的渡口附近有座城市，药杀水流经该城，其最初被称作八剌卜（Bārāb）或法剌卜（Fārāb）城，后来又称作讹塔剌（Utrār）城[65]，这里是伊斯兰历807年（1405年）帖木儿去世之地，当时他正准备去远征明朝。法剌卜或八剌卜是地区与城市的名称，该城一度是白水地区的首府；这座城市的外城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也被称作喀答儿（Kadar）城。穆喀达思说八剌卜城是一座大城，有7万居民；这座城极其坚固，还有座城关或城堡，以及一座聚礼清真寺和很多大市场。城里的货仓中储藏着各种商品。喀答儿外城也有自己的聚礼清真寺，这是一座新城区。据可疾云尼记载，该城位于盐泽中，在历史上这里是阿卜·纳思儿·法剌必（Abu Nasr-al-Fārābī）的出生地，因而很有名，此人卒于伊斯兰历339年（950年），被认为是阿维森纳（Avicenna）之前最伟大的穆斯林哲学家。但伊本·豪喀尔称法剌必的实际出生地应在瓦夕吉（Wasīj）城[66]，这是距法剌卜城2里格远的一座坚固小城，该城的市场内有座聚礼清真寺。后来，法剌卜城被称作讹塔剌城，也拼写为讹塔剌（Utrār）城。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这座城遭到蒙古西征军队的洗劫，不久后进行了重建，如前所述，位于该地的宫殿（Sarāy）就是帖木儿的去世之地。[67]

赛兰城与讹塔剌城中间就是阿儿速八尼柯提（Arsubānīkath）或称速八尼柯提（Subānīkath）城[68]，穆喀达思说，这是座坚固、优美的城市，内城里有座聚礼清真寺，外城很大，却没有城墙。速八尼柯提城周边的地区被称作干吉答（Kanjīdah）地区[69]。讹塔剌城向北行一天的路程，在药杀水右岸有沙瓦噶儿（Shāvaghar）城[70]，据穆喀达思记载，这是座很大的城市，有坚固的城墙，市场内有座聚礼清真寺，城周边土地肥沃。后来的地理学家没有记载过沙瓦噶儿城，但从其方位来判断，应是牙思（Yassī）城[71]，这是阿里·亚兹底常提到的一个地方，该城今以哈兹剌·突厥斯坦（Hadrat-i-Turkistān，即突厥斯坦的圣徒）[72]之名存在。这里埋葬的一位圣徒是吉利吉思（Kirghiz）人[73]的守护者。据阿里·亚兹底记载，此人就是谢合·阿合马·牙思（Shaykh Ahmad Yassī）[74]，是哈里发阿里（`Alī）之子木哈莫·伊本·哈纳菲（Muhammad ibn Hanafīyah）的一位后裔。[75]这位谢合在伊斯兰历6世纪（12世纪）初卒于此地，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末，帖木儿在其墓附近修建了清真寺，其恢宏的遗迹至今犹在，这个圣墓至今还受到来自附近各地的人们的朝谒。

从牙思或沙瓦噶儿城北行一天路程就是扫兰（Sawrān）或萨卜兰（Sabrān）城[76]，其存在至今，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此城被看成是阻挡古思（Ghuzz）人[77]的边关。但和平时期，附近的突厥诸部同穆斯林商人在这里进行物物交换。据穆喀达思记载，扫兰城是座很大的城市，由七个城关和城墙守护，这些城墙是一道接着一道修建的。内城有座聚礼清真寺，内城外的外城区很宽阔。阿里·亚兹底在记载帖木儿武功活动时，常提到萨卜兰城，亚库特称这座城有高大的城关或城堡，以守护边地。[78]

阿里·亚兹底常提到，但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没有注意到的药杀水岸边的其他城市还有萨格纳（Saghnāk）城[79]，据他记载，这是钦察（Kīpchāk）[80]地区的首府，距讹塔剌城之北有24里格。萨格纳城再往北就是毡的（Jand）城[81]，早期穆斯林地理学家和亚库特均提到了该城，这是越过药杀水后突厥斯坦（Turkistān）地区穆斯林的大城市之一。伊斯兰历7世纪（13世纪）初，毡的城被蒙古人洗劫。咸海也常被称作毡的（Jand）海，距药杀水入海口两程之地就是古思人的首都，阿拉伯人将其称作喀里牙·贾底答（Al-Kariyat-al-Jadīdah或Al-Hadīthah）城，即新村，后来被称作养吉干（Yanghikant）[82]或养吉·沙合儿（Yangi-Shahr），突厥语含义为“新城”。[83]

赛兰，或白水城东北约80英里处就是塔剌思（Tarāz）[84]城遗址所在地，其位于现在的奥里亚·阿塔（Aulieh-Ata）城附近。早在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塔剌思或塔罗斯（At-Tarāz）城就是一座重镇，伊本·豪喀尔说这是穆斯林商贾同葛逻禄突厥（Kharlakhīyah Turk）诸部进行贸易的都会。穆喀达思则说这座城有坚固的城墙和很深的壕沟，城外有很多花园，而且城市极其繁华。塔剌思（Taraz）河[85]流经此城四座城门中的一座，市场内有座聚礼清真寺。据可疾云尼记载，塔剌思城的男女以貌美著称。这里气候宜人，土地极其肥沃。同样在突厥之地，塔剌思城正东约100英里就是八儿吉（Barkī）或密儿吉（Mīrkī）城，即现代的梅尔克（Merkeh）城[86]，穆喀达思称这是座中型城市，城市坚固，还有座城堡与一座聚礼清真寺，该寺最初是基督（景教）徒的寺院。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这里有个很大的哨所，是阿迷得·道剌·法亦（`Amīd-ad-Dawlah Fāik）修建的，他是白益王朝的异密之一。上述同一作者（穆喀达思）称俱兰（Kūlān）[87]位于距密儿吉城西一站之地，朝向塔剌思城方向；这是一个大而有坚固城墙的村庄，内有一座聚礼清真寺，他还说这是一个要冲。[88]

阿布·勒·费达概括地提到了突厥诸部地区的很多重要城市，但这些城市的精确位置现在实难确定。其中的八剌萨滚（Balāsāghun）城[89]在伊斯兰历4～5世纪（10～11世纪）时为突厥斯坦诸可汗（Khan）[90]的首都，伊本·阿喜儿在他的编年史中提到了这座城。该城的确切位置现在并不清楚。阿布·勒·费达含糊地说这座城在可失哈儿（Kāshgār）城[91]附近，但要越过药杀水。阿里麻里（Almāligh）城遗址位于依烈（Ilih）河[92]岸边的旧苦儿贾（Kuljah）城附近[93]，这里曾是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Jaghatay）统治的汗国的国都所在地；阿里·亚兹底提到了该地，也提到了也儿的石（Irtish）[94]河与塔剌思（Tulās）河。文献中对上文提到的所有这些城市并未详述，像中国边境的可失哈儿、忽炭（Khutān，即和田）、牙儿坎（Yārkand）[95]和其他城市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献中偶尔提及，可惜从地理学角度看，其参考价值不大。[96]

药杀水所在的地区并不批量生产各种制造品，但奴隶贸易则是这里商人所从事的主业。穆喀达思曾提到苏对沙那（Ushrūsanah）地区的底札（Dīzak，即Jisak）城所生产的精美毡子与斗篷。拔汗那地区的矿产有金矿、银矿、绿松石，还有水银、铁和铜，以及氯化铵、石脑油、沥青等[97]。拔汗那地区的磨盘很有名，这里也广泛分布着取暖烧火用的石炭。果园里产外销的葡萄、苹果与核桃等，还产从玫瑰与紫罗兰中提取的香精。柘支城生产精美的白叠布、宝剑与其他兵器，此外铜、铁作坊生产针、剪刀和锅等。这里也生产野驴皮制作的鞍子，以及弓与箭壶、染制的兽皮、礼拜垫和各种有衣领的斗篷。柘支城附近的地区盛产稻谷、胡麻和棉花等。最后，在突厥之地的塔剌思城附近产山羊皮，突厥斯坦的马与骡向来特别有名。[98]

作为呼罗珊道的延续，这些地区的道路从撒马儿罕城起程向北，越过粟特河，然后到达兀失鲁萨地区的杂民城，在这里，道路分为两支：左路到达柘支城与药杀水下游地区；右路到达拔汗那城与药杀水上游地区。从杂民城起程的道路在八那可提（Banākath）城越过药杀水可直达柘支城；第二条从撒马儿罕城起程的道路要经过底札城，后穿越沙漠到达外因喀儿（Waynkard）城，过该城后越过药杀水到达舒土儿柯提（Shutūrkath）城，在此城与从八那可提城到柘支城的道路会合。有两条道路从柘支城起程：一条向东到达亦剌地区的首府屯柯提城；另一条道路向北到达白水城，在这里道路又分为两支—从白水城向西的一条道路经过药杀水到达法剌卜（即讹塔剌）城，而后沿着该河的右岸到达萨

卜兰城；从白水城右边向东的另一条道路到达塔剌思城，此后到达八儿吉城，或密儿吉城，这是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时穆斯林在突厥之地的最后一座城市，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与库达玛记载了从这座城出发经沙漠到中国边界的奴珊建（Nūshanjān）城的道路及沿途的驿站，奴珊建城可能就是忽炭城。[99]

如前所述，通往拔汗那地区的道路是从杂民城的呼罗珊道分出来的，并经萨八忒城（在这里，道路分出，到兀失鲁萨地区的首府班吉柯提城）到达药杀水沿岸的忽毡城。这条道路从这里（忽毡城）继续沿药杀水的南岸而行，越过药杀水后，到达拔汗那地区的首府阿思柯提城。伊斯塔赫里与伊本·豪喀尔记载了从阿思柯提城到药杀水上游北边各城的里程；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与库达玛也记载了从拔汗那地区的首府向东经倭赤城到讹迹邗城的道路里程。穆喀达思还注意到了从讹迹邗城到突厥之地，最后到中国边境的道路。对这些记载，我们很难探究清楚，但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与库达玛的记载来看，最后一站上的奴珊建城，或八儿思寒（Barsakhān）城[100]，据推测，应是忽炭城。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关注公众号：【奥丁读书小站】

【奥丁读书小站】一个专业推荐各种书籍的公众号，推荐的这些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101]

[1] 《隋书·西域传》作苏对沙那。《新唐书·西域传》作东曹，或作率都沙那、苏都识匿、苏都沙那。《大唐西域记》作窣堵利瑟那国，其“周千四五百里，东临叶河”。这些记载可与阿拉伯、波斯文献相参照。《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窣堵利瑟那（Surūshana，即Ushrūsanah）是很繁华的大地区，这里有座城市和很多区。该地大量产酒（nabīdh），其所在的山上产铁。”今天这个地区包括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北部及塔吉克斯坦粟特州的一部分，是跨界地区。译者。

[2] 《新唐书·西域传》载该城“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东北宁远［即拔汗那（Farghānah）］，皆四百里。南至吐火罗五百里（里数似有疑问）”。《巴布尔回忆录》（巴布尔著，王治来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页载，乌拉提尤城“原名苏对沙那，或称为乌苏鲁什”。今为乌拉·秋别，是塔吉克斯坦粟特州伊斯塔拉夫尚区区府，人口6万，是去往撒马尔罕、苦盏、杜尚别等城市的要道，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3]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班吉柯提城是苏鲁沙纳地区的首府，是其总督（amīr）居住之地。这里有大量的人口，十分繁华和舒适。这里流淌着河流。"译者。

[4] 不可将兀失鲁萨纳地区的首府班吉柯提城与撒马儿罕城东边的班吉柯提（Banjīkath）城相混淆。兀失鲁萨纳地区首府的位置可以通过道里志（见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9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07页；和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43页）及现在对当地的考察［舒勒：《突厥斯坦游记》（*Turkistan*：*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Khokand*，*Bokhara and Kuldja*），第1卷，第312页］确定。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2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7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6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245、278、744页。

[5] 《陕西通志》卷十作杂民。《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杂民是苏鲁沙纳地区的一座城市，位于通往拔汗那和忽毡的道路上。其有座坚固的城堡和大片的耕地。"今扎敏（Zaamin），是吉扎克（Jizzax）州扎敏区区府，人口1.6万，是去往撒马尔罕、费尔干纳等地的要道，是丝路古城。译者。

[6] 《史记·大宛列传》作大宛，并载："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汉书》和《晋书》均作大宛；《魏书·武帝纪》作破洛那；《隋书·西域传》作钹汗（古渠搜国）；《新唐书·西域传》作拔汗那，又称宁远国；《往五天竺国传》作跋贺那国；《慧琳音义》卷八二《西域记》作沛捍国，"亦名跋贺那国"。《大唐西域记》载："沛捍国周四千余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穑滋盛。多花菓，宜羊马。气序风寒……"《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拔汗那地区是非常繁华、舒适的地区。这里有很多的山脉、平原、河流和城市。其为突厥斯坦的门户。这儿有大批从突厥之地运来的奴隶。该地区所在的山脉里有大量的金、银、铜、铅、氨、水银、可燃石（*chirāgh-sang*）、牛黄石（*sang-i pāy-zahr*）、天然磁石（*sang-i maghātīs*）以及各种药物等矿。这里产杂色颜料（*tabarkhūn*）和用来制作奇药的植物。先前拔汗那地区的国王为边疆大员，叫底汗（*dihqān*）。"《巴布尔回忆录》第3页载："费尔干纳，位于第五气候地带，是农业定居地区的边界。东为喀什噶尔，西为撒马尔罕，南接巴达赫尚，北面过去虽肯定有一些城镇，如阿力麻里（这座

城不是伊犁河谷的那座同名城市，而是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尔马雷克城，引者）、阿拉木图和新城（诸书称之为讹答剌），然现在均已荒废。由于蒙兀儿人和乌兹别克人的蹂躏，故不复有定居的居民存在。”第4页又载：“费尔干纳，地方不大，但富产谷物和水果。除西边的忽毡与撒马尔罕地区之外，皆群山环抱。”今为费尔干纳平地或谷地，是位于天山和吉萨尔-阿莱（Gissar-Alay）两大山系间的广阔凹地，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交界地区。盆地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170公里，呈三角形，面积22000平方公里。西北以恰特卡尔（Chatkal）、库拉马（Kurama）两山脉为界，东北以费尔干纳山脉为界，南临阿莱、突厥斯坦两山脉，西面以狭长的苦盏（Khujand）峡谷与饥饿（Golodnaya）草原相接。人口1500万。这里是重要的农业区和多民族聚居区，因而成为民族问题复杂地区。此地是进入中亚的重要通道，有很多丝路古镇。译者。

[7]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提到了该城。今为萨瓦特（Savat），在乌兹别克斯坦杂民城东约26公里处，是丝路古城，为连接撒马尔罕城与费尔干纳的要道。译者。

[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26、32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79、380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77页。

[9] 底札（Dīzak），也称作吉札（Jīzak）城，《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载，底札城“是有条河的小城。其附近有个叫麻剌思满答（Marsamanda，即Marasmandah）的地方，其在每年的某一天举办一次集市，据说那个集市的交易额超过10万底纳”。今为吉扎克（Jizzakh）城，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位于撒马尔罕城西北，是吉扎克州首府，人口12万，是去往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古城。译者。

[10] 今不存，应在吉扎克城西南边的嘎拉沃洛尔（Gallaorol）城附近，是去往撒马尔罕、塔什干、苦盏等地的要道，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11] 《巴布尔回忆录》第14页载，哈瓦思介于沙鹿海牙和乌拉提尤别（乌拉秋别，引者）之间，并说其为一个村庄。今为哈瓦斯特（Khavast），是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Sirdarya）州哈瓦斯特区区府，人口2.7万，为去往塔什干、费尔干纳、扎敏、吉扎克的十字路口，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12]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14页提到了该城，并载：“这是座小城，位于苏鲁沙纳地区，有大片的耕地，很繁华。”今为库尔卡特（Kurkat或Qurkat），在塔吉克斯坦粟特（Sughd，又译索格特）州境内，是斯皮塔曼区（Nahiya-i Spitamen），或以前的瑙（Now）区 的一座城市，人口2.1万，是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要冲，也是丝路重镇。译者。

[13] 《巴布尔回忆录》第7页载，忽毡城“在安集延以西二十五伊尕奇（约为6公里，引者），撒马尔罕以东二十五伊尕奇之地，该城为诸古老城镇之一”。“忽毡城堡位于一个高地上。细浑河从北面流过忽毡，距城堡约有一箭之地。城堡与河流之北有一山，名叫穆图·吉耳山。”译者。

[14] 这两城今已不存，应在吉扎克城不远。译者。

[1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3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81、382、38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7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395、425、710页。

[16] 译者怀疑吉儿·札里牙（Gil-Zariyān）应是锡儿·答里牙（Sīr Daryā）的笔误。译者。

[17]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元史》卷一三三作斡思坚。《巴布尔回忆录》第158页载：“乌兹根（讹迹邗）城过去是费尔干纳的首府，有很好的城堡，位于（费尔干纳）边界。”今为乌兹根（Uzkend，Ozgon，Özgön，Uzkand，Özgön），是吉尔吉斯斯坦奥什（Osh）州的一座城市，人口4.9万，曾是喀喇汗王朝的首都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名城，为通往中国的要道。译者。

[18] 因此，纳伦河尽管是锡尔河（Sīr）上源最长的河流，但事实证明阿拉伯人没有将这条河视为锡尔河的干流。

[19] 这两条河中的一条就是锡尔河东边的大支流喀拉达里亚（Kara Darya）河，即黑河，发源于天山西部费尔干纳山支脉，该河谷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从这里可以到达我国的喀什，即古代的疏勒。译者。

[20] 阿思柯提城，似是《新唐书·西域传》的西鞬城，“在珍珠河之北”，其方位与阿拉伯、波斯文献完全一致，而且该城在唐代是地区首府。冯承钧先生将阿思（柯提）城直接译为西鞬，见《西域地名》，第2页。这座城市在1610年为大地震所毁，其新城在老城附近修建，现被称作纳曼干城，《西域闻见录》作奈曼，“万余户”，是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的首府，人口47.5万。这座靠近锡尔河北岸的城市，是古今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可通往塔什干、贾拉拉巴德、苦盏等中亚几乎所有的大城市。译者。

[21] 此地区在苦盏城以南，位于锡尔河向西流的拐弯处，处于锡尔河与奇尔奇克河汇合的区域，现在此地名不存，应为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临近地区。译者。

[22] 作者按英文表述习惯，不断更换锡尔河的名称，译者照作者的原文译出来

了，但读者要留意其变化。译者。

[23]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2、393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210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15页。Hfz.，33a叶面。*Jahān Numā*（《世界志》），作者为哈吉·哈里发（Hajj Khalfah），此书由易卜拉欣·阿凡提（Ibrāhīm Efendī）编辑，于伊斯兰历1145年（173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出版，该书的一部分内容由诺尔伯格（M. Norberg）翻译为拉丁文，1818年由伦德（Lunde）出版，第360页。Abu-l-Ghāzī（阿布·勒·噶兹），著有《突厥世系》（*History of the Turks and Mongols*），英译本于1838年在伦敦出版。汉译本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13、181、290页。

[24] 浩罕汗国（1709～1876年）是中亚近代三个汗国之一。15世纪后期，帖木儿帝国瓦解，游牧部落乌兹别克人从北方进入中亚，于18世纪初，在锡尔河流域建立封建汗国，定都浩罕城，实行贵族专政的封建统治，发展农牧经济，与我国新疆喀什噶尔等地通商。最强盛时，其疆域东北到达伊犁河流域，北到锡尔河，西达咸海，南接印度。1876年被俄国吞并。译者。

[25] 今为费尔干纳城，在锡尔河南岸。译者。

[26] 今多译为巴布尔（Zahir-din Muhammad Babur，1483年～1530年），或译巴卑尔，意为“老虎”，是莫卧儿帝国的开国君主，生于中亚费尔干纳。1494年继费尔干纳王位，1497年夺取撒马尔罕。1501年被乌兹别克人击败，流窜喀布尔。1510年，其劲敌昔八尼汗兵败阵亡。巴布尔趁机与萨法维帝国结盟，打回撒马尔罕。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巴布尔再次退往喀布尔。1519年进入北印度。1526年在帕尼帕特战役中，大破德里苏丹国军，1527年在阿格拉以西击溃印度诸侯联军。1529年，在巴特那打败比哈尔的阿富汗人首领。其最终建立了莫卧儿帝国。他著有《巴布尔回忆录》（*Babur Name*），已译为汉文、英文等。译者。

[27] 《巴布尔回忆录》第8页提到此名。译者。

[28] 《巴布尔回忆录》第4页载，“（细浑）河南诸城之一为安集延。此城位居中央，为费尔干纳之首府。安集延盛产大量的谷物、水果及优质的葡萄和甜瓜”。“安集

延城堡的规模，在河中地区来说，仅次于撒马尔罕和渴石（塔什干，引者）。城堡有三道门。要塞门在南面。水流分九个渠道流入城内。”“城壕外缘有一条砂石大路环绕城堡，该大路之外就是该城周围的郊区了。”此城名在《陕西通志》卷十、《明史·西域传》中均作俺的干。清代文献作安集延，且有大量记载。
今为安集延州州府安集延城，人口33万，是乌兹别克斯坦在费尔干纳腹地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交通四通八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该城所在地区也是重要的农业区和工业区。译者。

[29]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30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3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3、39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71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156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441页；第2卷，第633页。阿思城在俄国地图上标出来了［舒勒：《突厥斯坦游记》（*Turkistan*：*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Khokand*，*Bokhara and Kuldja*），第1卷，第336页］，其在现代的纳曼干（Namangan）城西南不远。词尾“柯提（Kath或Kāt）”等同于“干”（Kand或Kant）。这两种词尾在中亚很多地名中出现过，如亚库特准确地说，该词在突厥语中意为“城”或“围墙”，如花剌子模地区的弩室羯（Nūzkāth，即新城墙），在原书第454页。

[30] 海都（1235？~1301年），元初西北叛王首领，窝阔台之孙，合失之子。忽必烈即位后，海都以大汗位当属窝阔台后裔为理由，积极谋求自立为大汗。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因伤而死。译者。

[31] 今仍存，称库巴（Kuva），是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省库巴区区府，在马尔吉兰城正西30公里处，人口3.7万，是丝绸之路上的古镇。译者。

[32]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3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4、39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

刊》第三卷，第272页。Mustawfī（穆思套菲）著有波斯文的《地理学》（*Nuzhat-al-Kulūb*），该书石印本于伊斯兰历1331年（1894年）在孟买出版。《地理学》（*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Kulūb*）（直译为《内心的快乐》）已由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翻译成英文，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著作是《历史精选》（*Tārikh-i-Guzīdah*），本书作者斯特兰奇所引用的版本为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编号为校勘本的编号为埃杰顿（Egerton）690号。在本书作者斯特兰奇生活的时代，《历史精选》的一部分已出版了，并附有甘亭（M. J. Gantin）的法文译文（1903年，巴黎出版）。1910～1913年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精选》，第228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375页；第4卷，第24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2卷，第633页。

[33] 此城名今不存，应位于今乌库勒钦（Oqoltin，或Akaltyn）所在地，是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乌鲁戈诺尔（Ulugnor）区区府，人口9800，在纳曼干城南边约41公里处。曾是丝路要道。译者。

[34]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冯承钧先生说倭赤为新疆的乌什，显然是不恰当的。《史记·大宛传》载：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此贰师城就是奥什城，是我国文献最早记载，李广利攻破此城获得“贰师将军”。《陕西通志》卷十作我失城。《巴布尔回忆录》第5页载，奥什（倭赤）城“位于安集延东南偏东，距其地有四伊尕奇（约为6公里，引者）的路程。奥什气候宜人，水流甚多，春天极美”。“奥什地方水流奔腾，春天很好，到处开着美丽的郁金香和玫瑰。在巴拉·库赫山的山脚下，该山和（奥什）城之间，有一座清真寺，名叫交扎清真寺（Twin Mosque）。”今为奥什（Osh），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首府，人口25.6万，是丝路古镇，道路四通八达，可通往中国、乌兹根、苦盏、比什凯克等地。译者。

[35] 今此名不存，大致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马尔吉兰城、费尔干纳城周边的地区。译者。

[36]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巴布尔回忆录》第6页载，马尔格兰（麻耳亦囊）城“在安集延之西，相距七伊尕奇（约6公里）的路程。这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好城。所产杏子和石榴最好”。“马尔格兰的居民为萨尔特人，其善拳击，生性好动。”《西域闻见录》作玛拉嘎朗，“二万余户”。今为马尔吉兰（Margilan），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费尔干纳城西北部约20公里处，人口19.7万，是古今交通要道，也是费尔干纳盆地的重要城市。译者。

[37] 今为里什顿（Rishton），是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里什顿区区府，人口2.3万，距费尔干纳城西约40公里、浩罕城东南约42公里，这里有很多道路会合，是丝路古镇。译者。

[38] 浩罕城是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西部的大城，人口35万。曾是浩罕汗国的都城，古代大宛国的一部分，清代文献对此地有大量的记载。这里的主要居民是乌兹别克族，以农业为主，兼及工业。译者。

[39] 《新唐书·西域传》作俱战提。《西游录》作苦盏城，并载："苦盏城多石榴，其大如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忽毡。今为苦盏，1936～1991年曾被称作列宁纳巴德（Leninabad），塔吉克斯坦粟特州首府，人口17.2万，为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这是丝绸之路上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道路四通八达，可通往撒马尔罕、费尔干纳、塔什干、杜尚别等地。译者。

[40] 见《陕西通志》卷十。《西游录》作芭榄城，并载："芭榄城边皆芭榄园，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叶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盛夏而实。"但《长春真人西游记》则如此记载巴旦杏："壬午（1224年）之春正月，杷榄始华，类小桃。俟秋，采其实食之，味如胡桃。"巴旦杏，《本草纲目》卷二九作巴旦杏，亦作八担杏，又名忽鹿麻（Khurma，即枣）。李时珍称："巴旦杏出回回旧地。"唐代文献作婆淡，亦称扁桃，《酉阳杂俎》卷一八载："扁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扁，故谓之扁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这一记载非常准确。有关此杏的来源，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做了详细的研究。《巴布尔回忆录》第8页载："忽毡有一属地，名杏仁村［Kand-i-Badām，坎的把丹（Kand-i-Badhām），即扁桃村，引者］。虽然这不是一座城，但是一个很好的小镇。其地杏仁极好，因之而得名。所有的杏仁都输往霍尔木兹或印度。其地在忽毡以东五六伊尕奇。"常称干底，此城今不存，应在苦盏城东不远，曾是丝路古镇。译者。

[41]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32、333、34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1、392、394、39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62、272、345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404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98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72页。

[42] 此城名今不存，大致位置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城西边40公里的查达克（Chadak）小城附近，可以通往塔什干、纳曼干、浩罕等城，是丝路要道。译者。

[43] 此城名今不存，大致位置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城西边38公里处，可通往塔什干、纳曼干等城，是丝路要道。译者。

[44] 此城名今不存，大致位置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卡桑赛城西边27公里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可通往塔拉兹、纳曼干、比什凯克等城，是丝路要道。译者。

[45] 《汉书·西域传》作贵山城。《新唐书·西域传》作渴塞城。《西游录》作可伞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柯散城。《巴布尔回忆录》第9页载，卡散（柯散）城“在阿黑昔（阿思柯提，引者）。此城较小”。“卡散空气很好。美丽的花园全都坐落于河岸，故被称作‘羊羔皮做的外套’”。今为卡桑赛（Kosonsoy、Kasansay、Kassan-Sai、Kassansay、Koson），是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卡桑赛区区府，人口4.3万。可通往费尔干纳盆地各城及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城，是丝路要道。译者。

[46] 此地区名、城名今不存，大致位置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城东北方向80余公里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可通往塔拉兹、纳曼干、比什凯克等城，是丝路要道。译者。

[47] 此地区名、城名今不存，大致位置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卡桑赛城东北约60公里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译者。

[48]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34、34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71、272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4卷，第227页。

[49] 《汉书·西域传》作窳匿城。《隋书·西域传》作石国，“居于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远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石国“南去□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魏书·西域传》作者舌。《大唐西域记》作赭时，其“周千余里，西临叶河（即药杀水），东西狭，南北长”。“城邑数十，各别君长，既无总主，役属突厥。”
《经行记》作石国，“其国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新唐书·西域传》作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周千余里，右涯素叶河（即今楚河）。王姓石，治柘折城，古康居小王窳匿城地。”《册府元龟》作石国。《长春真人西游记》有别石兰；《元史·郭宝玉传》有别失兰（是否是Binkath，或Bīkath的对音），从丘处机行进的路线与前人的研究判断应是柘折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的察赤。《西域番国志》作达失干城，其“在塞蓝之西，去撒马儿罕七百余里，城周回二里，居平原上四面皆平冈，多园林，广树木，流水长行。土宜五谷，居民稠密，负载则赁车牛”。《萨迪克地理志》（*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Sādik Isfahāni*）第32页载：“柘支（是察赤的阿拉伯语名称）是突厥思田的一个地区，其主要城市为町吉忒［Tingit，这个名称似是宾柯提（Binkath）的笔误，引者］。”今为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人口215万，是历史名城，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译者。

[50] 这个名称（Binkath）由于音点之误，常写为必柯提（Bīkath），如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1卷，第746页。

[51] 比鲁尼说："柘支（Shāsh）城，其名来自突厥语，被称作塔什干（Tāshkand），含义为石头城，此城名在（γεωγραΦια）一书中被称作石塔。"见al-Birūni，*Alberuni's India*，London，1910，v. I，p.298。译者。

[52] 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84、386～38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76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62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94、101、166页。

[53] 安格连河，现在一般也称作阿汉加兰河（Ohangaron River，即白安格连河），这是锡尔河的一条支流，其岸边为安格连城。译者。

[54] 《西域番国志》载："沙鹿海牙城在撒马儿罕之东，相去五百余里，城筑小岗上，西北临山与河，河名火站（即锡尔河）。""南边山近，三面平川，城广数里，人烟繁庶，依崖谷而居。"法纳干（八那可提）或沙鹿海牙城城名均未保留下来，其位置应在安格连河与锡尔河汇合处的西岸。这里是古代的丝路重镇，可通往塔什干、撒马尔罕、费尔干纳盆地。此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译者。

[55]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28～330、336、34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84、385、388、40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64、276、277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101页；第2卷，第636页。

[56] 译者怀疑T是N的笔误，可以修改为Nunākath，有新城的含义，《世界境域志》（*Hudūd al-'Alam*）正确地写为Nūkath，并载："弩室羯（Nūkath，原文如此，新城）为亦刺地区的首府，有内城、城堡、外城。这里的河叫亦剌河，弩室羯城就在此河岸边。"（第117页）这一记载与我国文献的记载相符。《大唐西域记》作笯赤建国，记述称：该国"周千里。地沃壤，备稼穑。草木郁茂，花果繁盛，多葡萄，亦所贵也。城邑白数，个别君长，进止往来，不相禀命，虽则画夜区分，总称"。《新唐书·西域传》载："新城之国，在石东北赢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国城，后为葛逻禄所并。"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今天的阿尔马雷克（Olmaliq）城。现在这里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有色金属重镇，也是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其属于塔什干州贝卡巴德（Bekabad）区的一座城市，位于安格连河中游的东岸，人口11.2万。历史上是丝路重镇，可通往塔什干、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等地。译者。

[57] 屯柯提由于音点之误写为徒柯提（Tūkath），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31页注释c。柘支城与屯柯提城之间的距离，见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44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404页。

[58] 今此城名不存，应在阿尔马雷克城以东、苦盏以北的山区。今从卫星地图可以看到该地大片开采的裸露矿区。译者。

[59]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31、332、345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86、388、389、404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65、277、278页。

[60] 白水是Isbījāb的意译，《大唐西域记》作白水城，并载："城周六七里。"《资治通鉴》卷一九六作白水胡城。《突厥语大辞典》记载为"白城"。990年，喀剌汗王朝从萨蛮王朝手中夺得此城。译者。

[61] 《西域番国志》载："塞蓝（即赛兰）城在达失干（即塔什干）之东，西去撒马儿罕一千三十里，城周回二三里，四面俱平原，略无险要，人烟稠密，树木长茂，流水环绕，五谷蕃殖。"《陕西通志》卷十作赛兰城。今为赛兰城，为南哈萨克斯坦州赛兰区区府，是希姆肯特（Shymkent，Chimkant，Jimukat）城东边的卫星城，人口3.2万，是哈萨克斯坦境内最古老的城市。这里为丝绸之路上的要冲，是连接中国与中亚的古代贸易通道。译者。

[62] 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

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62～264页。舒勒认为亦思必贾卜城就是现在的赤木干城［《突厥斯坦游记》（*Turkistan：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Khokand，Bokhara and Kuldja*），第2卷，第89页］，这显然是错误的，因在《拉失德史》［*Tārīkh-i-Rāshidī*］伊莱亚斯（N. Elias）与罗斯（E. D. Ross）译，第171页］提到"赛兰城就是古文献中的白水"。该文献的波斯文本抄本在大英博物馆的编号为24090，这段文字在其105b叶面可以找到。［赤木干城今为奇姆肯特（Chimkent），是哈萨克斯坦南哈萨克斯坦州州府，人口85万，为哈萨克斯坦第三大城市，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交通要道。译者补。］

[63] 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33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89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63、272、275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166页；第2卷，第633、636页。

[64] 今为阿雷西（Arys）河，全长378公里，是锡尔河下游西岸的重要支流。该河发源于塔拉斯山（Talas Alatau），由马斯哈特（Mashat）河、阿克苏（Aksu）河、赛兰苏（Sayramsu）河、布拉尔代（Boralday）河、巴达姆（Badam）河汇合形成，在今讹塔剌城西北的克孜伊图（Kyzytu）附近流入锡尔河。沿岸地区是哈萨克斯坦的重要农业区。译者。

[65] 《西游录》作讹打剌城，并载："苦盏西北五百里有讹打剌城，附庸城十数。此城渠酋，常杀命吏数人，商贾百数，尽掠其财货。西伐之举由此也。"《元史·太祖本纪》作讹塔剌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兀提剌耳。《陕西通志》卷十作我撒剌。今为讹塔剌，是一个村庄，位于南哈萨克斯坦州讹塔剌区锡尔河与阿里斯河西南，依靠后一河获取用水。曾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向西可达咸海，向北到俄罗斯，向东通中国，向南可到撒马尔罕、布哈拉，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蒙古西征以后逐渐废弃，最后完全成为一个村庄。译者。

[66] 此城名今不存，应在讹塔剌西南不远的锡尔河南岸。译者。

[67]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0、39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62、273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

卷，第405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93页。Ibn Batūtah（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语与法语译本的合刊本是由德福里梅利（Defrémery）与桑贵尼特（Sanguinetti）翻译编辑的，1874～1879年巴黎出版。1956年出版了由德福里梅利与桑贵尼特编辑的三卷本《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ūta*）。新版法语译本收录于《阿拉伯旅行记》（*Voyageurs Arabes：Ibn Fadlān，Ibn Jubayr，Ibn Battūta et un Auteur Anonyme*），1995年巴黎出版。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第3卷，第23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166、275页；第2卷，第646页。伊本·哈里坎，编号716，第73页。人们容易将锡尔河岸边的法剌卜，或八剌卜（即讹塔剌）与护时健地区的法儿牙卜［Fāryāb，也称八剌卜（Bārāb）］相混淆。

[68] 今此城名不存，其位置应在阿雷西河下游的南哈萨克斯坦州阿雷西（Areis）城附近。译者。

[69] 今此名不存，应在南哈萨克斯坦省帖木儿兰（Timirlan）区所在区域。译者。

[70] 即今突厥斯坦城。其位于今南哈萨克斯坦州希姆肯特区，人口22.5万，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通往咸海、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的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译者。

[71] 《陕西通志》卷十《西域土地人物略》载：“又西七百里为牙思。有缠头回回，出淩（羚）羊角、帖角皮。”今为突厥斯坦城。译者。

[72] 哈兹剌·突厥斯坦城，即突厥斯坦城。译者。

[73] 吉利吉思人，此处实际指的是哈萨克人，19世纪沙皇俄国一般将吉利吉思人称作喀剌吉利吉思（Kara Kirghiz），称哈萨克人为吉利吉思人。译者。

[74] 谢合·阿合马·牙思（？～1167年），出生于赛兰城，早年求学于不花剌，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牙思城，由此其名冠之以牙思维（Yassawi或Yassi））。他一生中写了大量反映苏非派思想的箴言诗（*Hikimāt*），并建立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牙思维教团，这个教团传教于中亚、土耳其、我国新疆等地，尤其在操突厥语民族中有广泛影响。相关内容可参考克普鲁鲁（Mehmed Fuad Köprülü）所著的《早期突厥语神秘主义文学》（*Early mystics in Turkish literature*），路透（Routledge）出版社（伦敦、纽约），2006年。译者。

[75] 这个说法不可信，因中亚、波斯等的苏非派著名人物常将世系（道统与血统）追述到阿里后裔，或阿拉伯早期其他三位哈里发，甚至穆罕默德，关于这一点，

研究苏非派的学者做过广泛讨论。译者。

[76] 今为扫兰（Sawran或Sauran），是南哈萨克斯坦州希姆肯特区的一座小城，位于突厥斯坦城西北42公里处，在锡尔河岸边。曾是丝路要道。译者。

[77]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0～101页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古思人所居方位、生活方式、财富、习俗、物产，以及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地区的关系等。译者。

[78]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0、39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62、273、274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3卷，第336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466、557页；第2卷，第9、636、642页。舒勒：《突厥斯坦游记（*Turkistan*：*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Khokand*，*Bokhara and Kuldja*）》，第1卷，第70页。扫兰或萨卜兰的名称在阿里·亚兹底的《帖木儿武功记》（*Zafar-Nāmah*）中错印为思兰（Sīrān）。

[79] 此城名今不存，但从道里判断应该距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Kyzylorda，意为“红宫”）州州府克孜勒奥尔达不远，位于锡尔河向南拐弯处，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译者。

[80] 《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101页记载了钦察人，或说他们出自吉马克（Kīmāk），但比吉马克要野蛮。他们的国王代表着吉马克人。译者。

[81]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这个城市在涉及塞尔柱王朝的历史时经常提到，塞尔柱人就是从这里崛起的。今此城名不存，大致在克孜勒奥尔达州航天发射中心拜科努尔城附近。译者。

[82] 见《元史·太祖本纪》。此城今不存，应在锡尔河南岸，靠近咸海，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通道。译者。

[83]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3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89页。Yākūt（亚库特），著有《地理学词典》（*Mu`jam-al-Buldān*），阿拉伯语文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

辑，1866～1873年莱比锡出版，第2卷，第127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275、279页。至于毡的城，见舒勒《突厥斯坦游记》（*Turkistan*），第1卷，第62页。

[84] 《大唐西域记》作呾逻私，并载："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西游录》作塔剌思城。《西使记》作塔剌寺。今为塔拉兹（Taraz），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历史上有不同的名称，1936～1938年被称作米尔祖彦（Mirzoyan）；1938～1997年称江布尔（Jambyl/Dzhambyl）城，1997年改为现名。该城是哈萨克斯坦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人口40.6万。该城道路四通八达，可通往中亚任何一座主要城市，也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著名的唐与大食之间的战争就发生在此城附近。译者。

[85]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作多逻思水。《长春真人西游记》作答剌速没辇，并载："水势深阔，抵西北流，从东来截断阴山，河南复是雪山。……乘舟以济。"今为塔拉斯河，发源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塔拉斯山脉，向西流入哈萨克斯坦，穿过塔拉兹城，向北流，消失在沙漠中。这条河的河谷地带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重要农业区，是重要的交通通道，也是丝绸之路的干线。译者。

[86] 这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梅尔克（Merki）区区府，人口4万，可通往塔拉兹、比什凯克、阿拉木图等地，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和重镇。译者。

[87] 此城应为《册府元龟》（卷九六七）、《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俱兰城。但此俱兰城非张星烺先生所说的俱兰、俱罗弩或屈浪纳，后一城"在帕米尔高原东南部，今库兰城（Kuran）在骨克察河（Kokchha）上流，印度库士山麓"（《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1494页注3）。而前一城位置从《新唐书·地理志》所录贾耽道路记程可知俱兰城在塔剌思城之东，与阿拉伯、波斯地理文献所载内容完全相合，因此《新唐书·地理志》的俱兰城与《大唐西域记》的屈浪纳国非同一地，当然俱兰城亦不是张星烺先生所说的库兰城。今为库兰，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图拉尔·里斯库洛夫（Turar Ryskulov）区区府，在梅尔克西边约40公里处，其道路可通往梅尔克、塔拉兹等地，是丝路古城。译者。

[88]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0、391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263、274、275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365页。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497页。舒勒：《突厥斯坦游记》

（*Turkistan*：*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Khokand*，*Bokhara and Kuldja*），第2卷，第120页。

[89] 应是《新唐书·地理志》之裴罗将军城。11世纪以后的大食、中亚文献多提到此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碎叶河）河谷的托克马克（Tokmaq）城附近。这里曾是丝路古道，玄奘等人就是从这里到印度取经的。今天这里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重要农业区和工业区，也是重要的交通通道。译者。

[90] 这里指的是喀喇汗王朝（840～1212年），统治地区包括今库车以西、呼罗珊以东的广大地区，初定都于八剌萨滚城附近的喀剌斡耳朵（虎思斡耳朵），后建都于八剌萨滚城、塔剌思和可失哈儿（今喀什），后来该王朝分为东西喀喇汗王朝，东部王朝以可失哈儿城与八剌萨滚城作为都城，而西部王朝以撒马儿罕城为都城。相关内容可参考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译者。

[91] 《汉书》、《魏书》、《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作疏勒国；《往五天竺国传》将疏勒注为伽师祇离；《元史·世祖本纪》作可失哈儿，即今喀什。译者。

[92] 即伊犁河，《汉书·陈汤传》中称之为伊列。《新唐书·突厥传》作伊丽水。《册府元龟》卷三三六作伊丽河。《通典·北狄·突厥传》作伊列河。《资治通鉴》卷一九五作伊列水，同书卷二〇三作伊丽水。《元史》及《西游录》均作亦列河。《西域行程记》作依烈河。《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第71页载："另一条河叫伊列（īlā）水，发源于亦儿伽吉关（Irghāj-ārt，原文如此），向北流，流入阿比斯库克（*Abīskūk*，米诺斯基确定为Issi-kül）湖（即巴尔喀什湖，引者）。"在其河谷地带曾生活过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突厥人、回鹘人、蒙古人等，现在这里生活着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锡伯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撒拉族等。这条河在我国境内全长442公里，是由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和喀什河等支流汇合形成的，是伊犁地区的主要灌溉水源。译者。

[93] 作者说，阿里麻里城位于"旧苦儿贾（Kuljah）城附近"，即今伊宁城，此说法并不确切，其实阿里麻里城旧址位于今新疆霍城县境内，其含义为"生长苹果的地方"，这里至今保留有成吉思汗七世孙秃黑鲁·帖木儿（Tughluq Temur，1330～1363年）的陵墓，俗称大麻扎（Mazār）。我国元、明文献有记载，《西游录》载："出阴山（今天山之果子沟），有阿里马城。西人目林檎（即野苹果）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葡萄、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长春真人西游记》亦作阿里马城，并载："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西使记》作阿里麻里，其"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唯瓜、葡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同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阿力麻里；《西域行程记》作阿力马力口子。此城已废，大致在今新疆霍尔果斯境内。译者。

[94] 也儿的石河，应是《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的曳咥河［按，张星烺先生认为，曳咥河"在伊丽河东，今绥来（今玛纳斯县）西之玛纳斯河上流龙骨河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第1494页注3），但从《资治通鉴》记载的方位与音读来判断，曳咥河应为也儿的石河，此外张先生所说龙骨河，音读亦不合］，《元史·太祖本

纪》作也儿的石河；《元朝秘史》作额儿的石，即今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全长4248公里，在我国境内流经546公里，由发源于阿尔泰山的多条支流汇合而成，河中产鱼、河狸等，该流域生活着哈萨克族、汉族、回族、蒙古族等。译者。

[95] 即今莎车县，《元史》作雅儿看、也里虔、押儿牵等，清代文献多作叶儿羌。译者。

[96] Abu-l-Fidā（阿布·勒·费达），著有《地理学》（*Taqwīm al-Buldān*），由雷诺德（Reinaud）和德·斯兰（De Slane）编辑，1840年巴黎出版，后雷诺德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法文，1848年巴黎出版，第505页。`Alī of Yazd（阿里·亚兹底），著有波斯语著作《帖木儿武功记》（*Zafar Nāmah*），收入《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ca*），1887年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1722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帖木儿别史》（*The History of Timur-Bec*）。皮特斯·德·拉克鲁克斯（Petis de la Croix）于1772年译成法文，以《帖木儿别史》（*Histoire de Timour Bec*）之名在巴黎出版，后又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了摘要本，第1卷，第485、494页；第2卷，第218、219页。

[97] 《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晋书》载，大宛“土宜稻麦，有蒲萄酒，多善马，马汗血”。《魏书·西域传》载，洛那国（即拔汗那）“太和三年（479年），遣使献汗血马”。《隋书·西域传》载，□汗国“俗多朱砂、金、铁”。《往五天竺国传》载，跋贺那国“所管土地，亦出驼、骡、马、叠布之类。衣著皮裘叠布，食多饼麦”。《经行记》载，拔汗那国“土宜蒲萄、馣罗果、香枣、桃、梨”，“衣羊皮叠布，男子妇人皆著靴。妇人不饰铅粉，以青黛涂眼而已”。《册府元龟》卷九七〇载：“拔汗那王献碧颇黎（即玻璃）及蛇黄。”同书载拔汗那王献马、豹、天狗以及其他方物。译者。

[98] 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7、398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25页。Kazvīnī（可疾云尼），著有《天文志》（*Cosmo-graphy*，两卷本），由乌斯坦菲尔德编辑，1848年哥廷根（Gottingen）出版，第2卷，第405页。

[99]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6～29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03～206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35～337、343～346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

版，第398、399、403～405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41～343页。很可惜，穆思套菲没有记载乌古斯河以东地区的道路。有关到忽炭和中国的道路，见德·古耶（M. J. De Goeje）教授发表在《阿姆斯特丹皇家科学院学报》（*Mededeeling der Koninklijke Academie Amsterdam*，1888年，第123页）上有关高戈（Gog）与麻高戈（Magog）城墙的文章。沙哈鲁使臣阿卜德·刺扎克（`Abd-ar-Rāzzāk）在伊斯兰历822年至825年（1419年至1422年）之间往返中国的道路，见夸特米尔（E. Quatremere）翻译的波斯文本，收入《文献选编集注》（*Notices et extraits de la bibliotheàque du Roi*，第14卷，第1部分，第387页）；也见裕尔（H. Yule）《东域纪程》（*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的注释（第204～209页）。

[100] 今此城不存，但中世纪文献中常提到此城，如《突厥语大辞典》，其位置大致在今伊塞克湖东岸不远，应该不是忽炭（和田）城。译者。

[101] Ibn Khurdād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其著作为《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由博睿（Brill）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译本，第29、30页。Kudāmah（库达玛），著作为《税册》（*Kitāb al-Kharāj*），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汉文本见于《道里邦国志》附录，第207～209页。Istakhrī（伊斯塔赫里），其著作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各地形胜》（*Kitāb Sūra al-Ā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一卷，第335、343～347页。Ibn Hawkal（伊本·豪喀尔），其著作为《大地形胜》（*Kitāb al-Sūrat al-Aradh*）（直译为《土地的面容之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二卷。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第398、399、403～406页。Mukaddasī（穆喀达斯），其著作为《诸地知识的最佳划分》（*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三卷，第341、342页。

索引

（A.代表阿拉伯语，P.代表波斯语，T.代表突厥语）

Āb（P.），water，river，or spring

Āb-Anbār-i-Kinār 257

Ābah，See Āvah

`Abādāh 279，298

Abādah village 282，284，297

Ābādeh Tashk or Ābādeh-ye Ţashk 279

Abakah Khān 224

Abarkāfān，Abarkumān island 261

Abān 286

Abān 40

Abārik 313

Abarkūh，Abarkūyah 275，284，286 ~ 287，294，297

Abārkath（Bārkath） 466

`Abartā 18，59 ~ 60

Abaskhūr or Abashakhūr 118

Ābaskūn 376，379，456 ~ 458

Abasūs，Afasūs（Ephesus）155

`Abbād 49

`Abbadān 39，43 ~ 44，48 ~ 49，82

`Abbās，Shāh，the Great 159，167，204 ~ 205，221，319

Abbasids 9，27 ~ 29，32，35 ~ 37，53，58，73，92，131，163，68 ~ 170，173，191，250，406，435，438

`Abbāsī pear 222

`Abd Allah，Son of Caliph `Abd al-Malik 130

`Abd Allah，Son of `Ali 43

`Abd Allah-Al-Battāl 137，146，152

`Abd-Allah ibn Humayd 481

`Abd Allah，the Tāhirid 380，385，394

`Abdallāh b. Tāhir 397

`Abd-al-`Azim，Imām Zādah 217，229

`Abd-al-Malik 39，105 ~ 106，130

Abd ar-Rahmani 2

`Abd-ar-Rāzzāk ambassador of Shāh Ru`ch 489

`Abd-as-Salām，Kādī 46

`Abdasī 28，42 ~ 43，47

`Abdulābād 354

Abel 472

Abgarus，king of Edessa 104

Abghar 466

Abhar 221 ~ 222 , 229

Abhandlungen der Ko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 zu Gottingen 112

`Āb-i-Arghūn 269

Āb-i-Bandah 208

Abidūs 136

Ābi-i-Fenāket 8

Āb-i-Gandah (Ganfah) 273

Āb-i-Gargar 236 ~ 237

Ab-i-Jurjān 373

Ābi-i-Khojend 8

Ābi-i-Shahrukhfah 8

Abīskūk 487

Āb-i-Ūjān 163

Abīvard 394

Āb-i-Zarah 339

Ābkāna 399

Abkhama 372

Abkhās , Abkhasia 179 , 181

Abraham 67 ~ 68 , 103

Abraj 281

Abrashahr (Mūkān) 176

Abrashahr (Nīshapūr) 383

Abrashahriyār 340

Abrīk , or Abrūk 115 , 119

Abruasānah 134

Abrūn 261

`Absakān 410

Abshīn 416 , 431

Abssinia 157

Abu al-`Abbās `Abdu’llāh as-Saffāh 66 , 71

Abu ‘Ali ibn Mandawayh 436

Abū al-Najīb Abd al-Qādir Suhrawardī 223

Abū Abdullāh Mūsī ibn al-Mahdī al-Hadī 219

Abu Bakr , Salghārī Atabeg 251

Abū Delef Ajel 197

Abu Dulaf 198 , 200

Abu Ghānim 318

Abu Ghurayb canal 69

Abūh , Ayūh 192

Abūkshah 451

Ābi-i-Fenāket 8

Abu-i-Jund 58

Abu Ja’far Abdallāh ibn Muhammad al-Mansūr 30

Abu-l-`Abbās 481

Abu-l-Asad canal 26，41～42，46，69

Abu’l Fawaris Djamal ad-Dīn Shāh Shujā` 291

Abu-l-Fidā 11，15～16，30，138

Abu-l-Ghāzī 16～17，30，274，304～305，307，309

Abu-l-Hansan Son of Hasan Māh 440

Abu-l-Hansan ibn Muhammad Gīlakī 360

Abu-l-Hansan Kharkānī 366

Abu-l-Hayjā 77

Abu-l-Khān 455，457

Abu-l-Khasīb canal 48

Abulustan 122，133，142，146，174，178

Abū Muhammad Ilyās ibn Yūsuf ibn Zakī Mu’ayyad 188

Abu Muslim 399，402，423

Abu Nasr-al-Fārābī 485

Abu Nasr-i-Tīr Murdān 264

Abu Rahā canal 71

Abu-Sa`īd 195

Abu Sufrah，the Khārijite 57

Abu Tāhir , the Carmathian 273

Abu Tālib-i-Nawbanjān ; his kasr ; his bridge 264 ~ 265

Abu Yazid Bistāmī 365

Abydos 136

Abzar 254

Achaia 407

Achæmen ids 275 , 280

Achæmenian sculptures and ruins

Aci Çay

Acoustic sandhill 341 ~ 342

Across Coveted Lands 371

`Adāliyah 151

Adana 128

Adata 121 , 133

Ad-Dabūsiyah 468

Ad-Dā`ī-ilā-l-Hakk 221

Addakhūd 426

Ad-Dāmghān 400

Ad-Dandankān 436

Ad-Dargham 506

Ad-Darkan

Ad-Daskarah 76

Ad-Daylamān 202

Ad-Duhhāk 407

Adhanah 128，130～132，142

Adharbādhagān 159

Adharbāyjān（Atropatene，Atrpatakan） 4，20，159～172

Adharjushnas 224

Adhkān 286

Adhramah 100

Adiamān 123

Adıyaman 84

Adraskan，or Adraskar 412

`Adud-ad-Dawlah，the Buyid 48，77，79，187，204，243，250～251，256，259，266，276～277，301，317，323，333～334

`Adudī canal 48

A`far，hill 99

Afdal Kirmānī 330

Afdāsahī 43

Afghāns 350

Afghanistān 2，7～8，18，23～24，27，228～230，232～234，236～237，239，244，248，259，261，268，270，272，275～284，286，288～291，295～298，300，323

Afhanistān 415

Afium Kara Hissār 152

Afradkhis 117

Afrāvah 380

Afrāzah Rūdh 164

Afrīdūn 326

Afsharid 395

Afshīn the Turk 416，476

Afshīnah 464

Afsūs，or Afasūs（Ephesus） 136，155

Afyon 134

Afyonkarahisar 134，135

Afyon Kara Hisar 152

Afyūn 152

Ağcabədi 175

Agerkoaf 67

Agiou Theologou 155

Ahal 394

Āhar，town and river 168 ~ 169，231

Ahlīlaj，myrobalan 349

Ahlam 372

Ahlat 183

Ahlum 370

Ahlwardt 18

Ahmad Jamī，Shaykh 357

Ahmad son of Imām Mūsā 251

Ahmad Rāzī 375

Ahmad of Yassī 486

Ahnaf Ibn Kays 405，422

Ahsā，river 134

Ahsan at-Taqāsīm fī Ma`rifat al-aqālīm 366

Ahwāz 6，232～234，237，246～247

Aigialos 135

`Ajam，`Ajamī，Persian or barbarian 185

Ajgh 381

Aji Chay 158，162

Ajmah 396

Āk（T.），white

Āk Saray（Rūm）149～150

Āk Saray（Kish）470

Āk Shahr（Sīvās）147

Āk Shahr，lake and town 151～152

Āk Sū（Jayhān）122

Āk Sū (of Khuttal) 435

Āksu 120

Ākā Khān , representative of the ‘old Man of the Mountain’ 355

Ākā Muhammad Shāh 217

`Akabah Halam 456

`Akabah-i-Halam

`Akarkūf 67

Akhlāt 183 , 136

Akhsh (Akhshawā) , river 435 , 438

Akhsīkath , Akhsīkat , Akhsīkat or Akhsī 8 , 477 ~ 478

Akhsīsak 404 , 443

Ākhur 379

Akhwāsh 317

Akhwāt 313

Akrā mountain 133

Akradkhis 117

Akranchah 457

Aksā mosque 104

Āk Sarā 149 , 181

Ak-Saray 149

Aksaray 136 , 149

Ak-shehr 152

Akşehir Gölü 135

Ak-Sū 122 , 435

Aksu 119 , 484

Aksu Çayi 122

Aktepa 440

Akun 253

Akūr region 86

Akwār 135

Al , the Arabic article , use of 21 , 33

Al-Afghān 386

Al-Ahwāz 264

Al-Ajmah 432

Al-Akhwāt 345

Al-Akra` 133

Al-Aksā 134

Al-Akwār 135

Al-`Alamayn 134

Al-`Alkamī 74

Al-Amr 196

Al-Anbār 93

Al-Andarāb 207

Al-`Arsah 319

`Alā-ad-Dīn Kaykubād，Saljūk 118，142，146，148，150 ~ 152

`Alā-ad-Dīn，Ghūrid 348

Alābī 193

Aladaq 8

A`lam 195 ~ 196

`Alamayn 134

Alamūt 221

Alānī 193 ~ 194

Alanjik 167

Alanya，or Alaiye 142

‘Alāqahdārī Kirān wa Munjān or Kurān wa Munjān 437

Alarghah 152

Alariyānus，Valerian 235

Alastha 133

Alatak 183

`Alāyā 142，144 ~ 145，150

Al-Bahrain 26，44，261

Al-Badhandūn 133 ~ 135

Al-Balad 79

Al-Baradān 165

Al-Bashr 194

Al-Bāsiliyūn 135，152

Al-Basrah 229

Al-Baydā 45

Al-Baylakānī 149

Al-Bāz 96

Al-Bazzāzīn 312

Alborz See Elburz

Albuquerque 319

Alburz（Caucasus） 181～182

Alburz（N. Persia） 5，22，172，368

Al-Batāih 69

Al-Burj 302

Al-Bustān（Abulustān） 122

Al-Būyār 94

Al-Dawr 29

Aleshtar 193

Alexander，the Great 68，263，301，308

Alexandreia 89

Alexandretta 120，128

al-Faysaliyah 38

Al-Falūdja 4，38，60 ~ 61

Al-Fallūjah 68

Al-Fānīdh 363

Al-Farāshah 97

Al-Fardah 94

Al-Fāriyāh 424

Al-Fārūth 41

Al-Fāryāb 317，424

Al-Fīl 447，448

Al-Fuhud 26

Al-Fullūjah 66

Al-Furāt 21

Al-Furdah 94，107，137，155

Al-Ghadbān 133

Al-Ghabrā 135

Al-Hāir 79

Al-Hadbā 89

Al-Haddādah 404

Al-Hālah 70

Al-Hamrā 152

Al-Harrāb 135

Al-Hasakah 97

Al-Hasan 123

Al-Hawl 101

al-Hayy 3

Al-Hazīrah 51

al-Hind 44，331

Al-Huwayrith 212

`Alī caliph 45～46，75～78，422

Alī（Armenian） 110

`Alī，son of Caliph Mamūn 448

`Alī-al-`Askarī 56

`Alī-ar-Ridā 388，391

`Alī b. Zayn al-Kātib 371

Al-Īghārayn 229

`Alī Heratī 119

`Alī Shāh，Wazīr 162，166，169，183，231

`Alī Yazdī 16～17，75，82，114，125，136，140，142，145，147，157，168～169，177，187，189～190，206～207，210，221，266，274～276，280，290～291，297～299，301，304～306，314，323，326～329，331；his account of Asia Minor 145

`Alī Zayn-al-`Ābidīn 218

Alid，fort of the 122

Alids of Daylam 174

`Alī Muktafī 34

Alis 135

Al-Iskandariya 68

Alīshtar 193 ~ 194 , 201

Al-Jawāmid 69

Al-Jazīrah 50 , 160

Al-Jīr 350

Al-Jibāl 31 , 53 , 217 ~ 218

Al-Junayd 521

Al-Jurzuwān 460

Al-Jawzāt 166

`Alkamī channel 74

Al-Kabīrah 420

Al-Kalk 141

Al-Kanīsah 160 ~ 161

Al-Kanātīr 86

Al-Karīnayn 436 , 442

Al-Kariyat-al-Jadīdah or Al-Hadīthah 486

Al-Karnīn 379

Al-Kasra-al-Abyad 34

Al-Kasrah 106

Al-Kāt 54，68 ~ 69，85，110

Al-Katr 54，68 ~ 69，110

Al-Kātūl-al-Kisrawī 57

Al-Kawānīn 70

Al-Khābarān 274

Al-Khalīj 167

Al-Khawarnak 103

Al-Khayrah 322

Al-Kitāb al-idīb al-bāri` al-labīb 8

Al-Kiful 74

Al-Kīlās 521

Al-Kubrā 460，490

Al-Kubbat Al-Khadrā 67

Al-Kunāsah 103

Al-Kurkī 207

Al-Kut 3，26

Al-Kuzdār 365

Allah 418，422

Allān（Caucasus） 179，181

Allān island 261

Al-Lahūm 418

Al-Lārandah 148

Allepo 106

Al-Libn 166

Al-Maasir 36

Al-Madīnah-al-`Uzām 220

Al-Madīnah-`Atīkah 34

Al-Maftah 76

Al-Mahlabiyah 129

Al-Māhūzah 55

Al-Mallūn 164

Al-Makām 76

Al-Mamūnī 58

Al-Marāsid-al-Ittilā 15

Al-Mardakshah 477

Al-Marīyah 19

Al-Marwānī 161

Al-Maskanīn 166

Al-Massīsah 160

Al-Matārīyah 80

Al-Matīrah 80

Al-Matmūrah 138

Al-Mawsil 117

Al-Mazafah 50

Almāligh 487

Almeria 19

Al-Mīzān 346

Al-Mu`askar 383

Al-Mu`ayyad 385

Al-Mubārak 88

Al-Muhawwal 94 ~ 95

Al-Mukanna` 414，470

Al-Multān 365

Al-Munkhsrik 97

Al-Murabba`ah 88，384

Al-Murabba`ah-al-Kabīrah 384

Al-Murabba`ah-as-Saghrah 384

Al-Musallā 313，347，368，469

Al-Muta`shshā 83

Al-Mutawkkilīyah 55

Al-Muthakkab 162，424

Al-Muqdādiya 62

Alp Arslān 139～140，183，286

Alphonso d'Albuquerque，or Afonso de Albuquerque 319

Al-Ribat 125

Al-Sabā wa Arbain 97

Al-Shaddadeh 97

`Alth 50

Altınova 135

Al-Uhaydab 152

Al-`Ullayk 134

Al-`Ukr 41

Al-Ustūn 421

Alum mines 147

Alūsa，or Alūsah 64，125

Alvan 227，244

Alvand（Arvand） mountain 22，195，212

Al-Walīd II ibn Yazīd II 13

Alwan 61

Al-Yahūdīyah 461

Al-Yahūdān 461

Amarah 26

Amāsiyah 142，146

Amasya 142

Amber 459

Ambroise Paré 436

Āmid，Amida 4，80，108 ~ 111，124 ~ 125

`Amīd-ad-Dawlah，Fāik 389，487

Amīn，caliph 37，190

`Amīr 328，382，387

Amirabad 326

Amīr al-Mu`mminī 2

Amīr al-Mu`mminī Sulaymān 137

Amīr Chāūlī 264

Amīr Faik `Amīd-ad-Dawlah 389，487

Amīr Fakhr-ad-Dīn Kārā Arslān 113，301，343

Amīr Gīlakī 358 ~ 359

`Amir ibn Layth 251

Amīrkhwānd 17，18，301，306

Amkalchah 409

Amīr 15，143，359，371，425，431，433，500，527

Amīr Kutlumish 308

Ammianus Marcellinus 316

`Amr，castle of 405

`Amr ibn Layth，Saffarid 251，301，328，336，383 ~ 384，387

Amū 406

Amu Dariya 370

Āmul 9，403 ~ 404，431，434

Āmula 370，410

Amul-al-Mafāzah 404

Amul-ash-Shatt 404

Āmul（Tabaristān） 370，381

Amū Moren 433

`Amūrīyah，Amorion 121，134 ~ 135，137 ~ 138，143，153

Amūyah，or Amū Daryā（the Oxus） 404，434

Amysos 147

Ān，termination in place-name 49

`Ānah 25，84，87，106，125

Anakhud 426

Anasha Kal`ahsī 135

Anatho 106

Anatolia 4

Anazarbus 129

Anbār（Eupharates） 65，80

Anbār，or Anbīr（Jūzjān） 426

Anburān 264 ~ 265

Ancyra , See Angora

Andājārāgh , Andījarāgh , river and town 476

Andakhud , Andkhuy , Andakhudh 426

Andāmish 238

Andar or Aydī 226

Andarāb (Ardabīl) 168 ~ 169 , 177

Andarāb river 427

Andarābah (Marv) 401

Andarābahor Andarāb (Tukhāristān) 427 , 432

Andarastān 453

Andigān or Andukān 518

Andījārāgh , Andiragh river and town 435 , 438

Andālmishk , or Andāmish 238 ~ 239

Anderson , J.G.C. 121

Andīgān , Andījān 477 ~ 478

Angran river 482

Angola , Angūriyah , Angūrah , or Ankūrah 136 , 142 , 149

Angora for Amorion 153

Anī 139 , 183

Anjarūd 223 ~ 224

Anjīrah 285

Ankara 95，136，149，152，158

Ankurah 136，142，149

An-Nawbandajān 296

An-Nawūsah 64，65

An-Numānīyah 37，73，82

An-Nahr-al-Jadīd 76

Antākiyah Muhtarikah or Sawda 136，153

Antāliyah 141，145，151

Antelope 195

Anthony Jenkinson 494，497~498

Antiquanry，*The* 138

Antioch（Isauria） 153

Antioch（Pisidia） 136，152~153

Antioch（Syria） 33，153

Anti-Taurus 127，129

Anūshirwān，the just 27，33，180，208，375

Anvārī，poet 395

Aphrike 119

Aphrodisiac seeds 191

Apollodorus 214

Apollonia 151

Apologos 19 , 47

Aqkend 225

Aqueduct 86

Aqsaray 136 , 149

Āqserāy 148

Arābah 325

`Arabānor `Arbān 97

`Arabgīr , `Arabkīr , Arabraces 119

Arabian `Irāk 5 , 25 , 141 , 148

Arabic lists of the Byzantine themes 13

Arabian`Irāk 25

Arabissus 122 , 133 , 142 , 146

`Arabistān 232

Arab Mile 58

Arādān 367

Aradūn 22 , 367

Ara-e Gaymishi 267

Arākliyah 19 , 134

Aral Sea 23 , 443 ~ 444 , 458 ; names of 486

Aramaic 18

Aramaic Targums 25

Aramenia 5

Arandīn Kirt distinct 80

Āranj 458

Arapgir 119

Ararat mountain 182

Aras Araxes river 167 ~ 168 , 173 , 176 ~ 179 , 182 , 205

Araskan 448

Aratsani 114

Araxes 4 ~ 5 , 117 ~ 118 , 166 ~ 168 , 175 ~ 179 , 182

Ārazm 372

Arbela 92

Arbinjan 468

Arbre Solor Arbre Sec 356

Arch at Asadābād 196

Arch of the Chosroes (Madāin) 34

Ardabīl 168 , 229 ~ 230

`Ard-ad-Dāwar 345

Ard-ar-Rūm 113

Ardahish 225

Ardalānkath 480

Ardashīr 306

Ardashīr Bābgān，king 245

Ardashīr Bābgān district 248

Ardashīr Khūrrah district 248

Ardhakhīvah 252

Ardhakhushmīthān（or Rākhūshmīthān） 253

Ardistān 208

Ardsakar 412

Argandāb 345～346

Arghān，Arghūnor Arkhān 269

Arghiyān 392

Arghūn Khān 223

Argæus mount 146，150

Arhan 473

Ārhan fort 435

Aria 8，10，398，407

Arīs river 484

Arius 407

Ariwajān 63

Ark of Noah 98，182

Arjāish 146，150

`Arjān river 122

Ar-Jardakūb 134

Arjīsh 147，183，230，231

Arjīsh lake 22，136

Armabīl or Armayīl 330，333

Armanāk 148

Armeniaor Armīniyah 182～184

Armenia（Little） 129～131，140～141

Armenia belts 64

Armenian Rubenid dynasty 129

Armiyān，Kal`ah 200

Arrajān，town and district，its gates and bridge 6，244，247～248，268～269，273，294，297

Arrān 5，176～179

Ar-Rabb 93

Ar-Rāfikah 101～102

Ar-Rahwah 166

Ar-Rakkah-al-Muhtarikah 132

Ar-Rāwanīr 428

Ar-Razīk 434

Ar-Rūbanj 409

Ar-Rubāt 415

Ar-Rūdhah 215 ~ 216

Ar-Rūdhbar 173，315，344

Ar-Ruhā 103 ~ 104，125

Ar-Rūmakān 35，80

Ar-Rusāfah 40，106，291，320

`Arsah 319

Arsanās，Arsanian Flumen 115

Arsania 115

Arsanias Flumen 115

Arsanus 115

Arsamosata 116

Arslān II 141 ~ 142，149，219

Arsubānīkath 525

Art 449

Artacaëna 407

Artemisia abrotanum 325

Article，use of Arabic，in place names 21

Artquids or Artuqid 113

Artuk Beg 113

Aru，Kal`ah 272

`Arūj or `Arūh 245

Arvand or Alvand mountain 195

Arys 484

Arzan 111 ~ 112 , 125

Arzan-ar-Rūm 113 , 117 , 145 , 147 , 231

Arzanah 113

Arzanjān Arzingān or Arzinjān 118 , 147 , 231

Asabādād (Hamadān) 196

Asabādād (Īdhaj) 245

Asabādād (Khurāsān) 430

As`adī canal 398 ~ 400

Asak 244 , 247

as-Saqlāwīyah 29

Asbānbūr 34

Asbar 393

Asbarāyīn 393

Asbestos 436

Asbījāb (Isbījāb) 484 , 485 , 517 , 523 ~ 524 , 528

Asbuzār or Asfuzār 368 , 376 , 387 , 443 , 446 , 448

Asfan 388

Asfanjāy 347 , 351

Asfarayn 347 , 351

Asfuzār 340，350，412，431

Ashbandh 385

Ashbask 504

Ashabūrkān 426

Ashfand 388

Āshib 93

Ashk 381

Ashkahrān mountains 207

Ash-Shadīdīyah 69

Ash-Shādhyākh 421

Ash-Shām 135 ~ 136，160，209，423

Ash-Shāri-al-A`zam 54

Ashshawānkārah 288

Ash-Shīz 190，224

Ash-Shūmān 440

Ashurādah bay 375 ~ 376

`Āsī，Rūd 277

Asia Minor 127 ~ 158

Ask 381

`Askar（Bust） 345

`Askar Mukram 233，236 ~ 237，242，246 ~ 247

`Askar Mu`tasim 56

Askīmasht 350

Asrūd river 469

Ar-Rūdhān 286

Ass，will，skins 458，488

As-Sadīr 103

Assafoetida 400

As-Safalkāt 446

As-Safsāf 167

As-Sāfīyah 65

As-Sakīnah 475

As-Salīk 69

As-Sardan 302

Assar Kal`ah 153

Assassins，theirs castles 221，226，354～356，360，362，365，372，374

As-Satirun 99

As-Sawād 210，215

As-Sawdā 131，162，185

Assay 181

As-Shamat 311，387

As-Sīb 64，69

As-Sin 44，121，165，167

As-Sinn 121，165

As-Sīrajān 6，10，21 ~ 22，298 ~ 307，311 ~ 315，320 ~ 321

As-Sīrawān 234

As-Sūrān 70

As-Sūsankān 400

Assyria 24

Astān district of Zrak 79

Astān-al-A`lā 80

Astand-e Jadīd or Astand，Estend or Istind 394

Astar 378

Astarābād 375，378 ~ 379，381

Astarabyān 410

Astāk 297

Astolabes 211

Astronomical tables，Īlkhānī 164

Aswad，Nahr 150

Atabeg Abu Bakr 283

Atabeg Chāūlī 263，280，288 ~ 290

Atabeg Karāchah 284

Atabeg Mankūbars 201

Atabeg Sa`d 251

`Atar of roses 293

Ātishgāh 355

Atrabazandah（Tarābazandah） 136

Atrak river（Jurjān） 8，220，376～377

Atrak river（Kazvīn） 220

Atraropatene 159

Atrpatakan 159

Atropatene（Atrpatakan） 159

`Atshābād river 387

At-Tābarān 424

At-Tālikān 257

At-Tarāz 526

At-Tawāwīs 502

At-Tāyikān 428

`Attābī silk，or tabby 81，161，203，429

At-tāk 379，504

Attcaleia，Attalia 151

At-Tanbīh 14

At-Tārumayn 258

At-Tirhān 82

At-Tirmidh 478

At-Tubbat 473

Aulieh-Ata 486

Āvā，Āvah，Āvah-i-Sāvah 210 ~ 212，229

Āvā Āvah or Ābah-i-Hamadān 196

Avaj or Āvah 210 ~ 212

Āvard 282

Avārik 313

Avāza 466

Awānā 50

Awfah 410

Awfar 466

Avhar 222

Avicenna 525

Avīg 289

Awjān（Ūjān） 163，231

Avnīk 118

`Awrā，‘silted up’ 44

Awzaj 439

A.Y.，`Alī of Yazd 68，97，122，127，134，179，181 ~ 189，197，214，221，226，232，237

`Ayān 264 ~ 265

Ayas bay 131 ~ 132

Ayasulūk，Ayāthulūkh，Ayāsaligh（Ephesus） 145，155

Aybak，Haybak 463

Aydī（Andar） 226

Aydīn 144，154

Aydīn 154

`Ayn（A.），a spring

`Ayn-adh-Dhahbāniyah 103

`Ayn-at-Tamr Tassūj 81

`Ayn Burghūth 134

`Ayn Dhahbāniyah 103

`Ayn-al-Humm 370

`Ayn-at-Tamr 65，81

`Ayn Yūnis 89

`Ayn-az-Zāhirīyah 95

`Ayn Zanīthā 122

`Ayn Zarbah 128 ~ 29

Ayūh（Abūh） 192

Aywaj 439

Aywān 196

Aywān（Jur） 255

Aywān-Kisrā 34

A`zam，Nahr 92

Adharbāyjān or Azarbījān 20，159

Azarbījān 159

Āzār Sābūr 280

`Azīzīyah 402

Azjah 394

Azkās 283

Azmadīn 195

Azmīr or Yazmīr 155

Azrak river（Karūn） 235

Azrak river（N.Mesopotamia） 123

`Azure from Lazūrd 436

Az-Zādān 67

Azādhvār 428

Azādvār 427 ~ 428，466

Az-Zubayr 44 ~ 46

Az-Zālikān 344

Az-Zamakhsharī 494

Az-Zawzān 124

Az-Zaybandī，Az-Zubaydīyah 215

Az-Zutt 274 , 365

Bā`ashīkā 90

Bā`ashīqāh wa Bahzānī 90

Bā`aynāhtā ( Jazirah Ibn `Omar) 94

Bā`aynāthā (Balad) 99

Bab (A.) , gate

Bab Ahwasābād 384

Bāb-al-Abuāb 180

Bāb-al-Abwāb 180 , 184

Bāb-al-Akrād 177

Bāb-al-A`lā 475

Bāb-al-Arman 109

Bāb-al-`Atīk 336

Bāb-al-Bādiyah 44 , 76

Bāb-al-Hadīd , the Iron Gate 441 ~ 442 , 472

Bāb-al-Hadrat 78

Bāb-al-Hujjāj 448

Bāb `Alī 411

Bāb-al-Jabal 478

Bāb-al-Jadīd 336

Bāb-al-Jāmi` 461 , 477

Bāb-al-Jihād 133

Bāb-al-Kabīr 464

Bāb-al-Kantarah 383

Bāb-al-Kassabīn 469

Bāb-al-Kayyālīn 268

Bāb-al-Kuhandiz 383 , 461

Bāb-al-Mā 478

Bāb-al-Madīnah 399 , 461

Bāb-al-Madīnah-al-Khārijah 469

Bāb-al-Madīnah 399

Bāb-al-Masjid 285

Bāb-al-Musallā 315

Bāb-al-Rīgistān 461

Bāb-al-Yahūd 421

Bāb-an-Najārīyah 470

Bāb-an-Naw Bahār 421 , 463

Bāb Ardashīr 256

Bāb-ar-Ray 365

Bāb-ar-Rūm 109

Banī Asad or Bāb Mihr 461

Bāb Asbīkān 312

Bāb Asfīj 203

Bāb-as-Sahl 461

Bāb-as-Sīn 463

Bāb-as-Sirr 109

Bāb-ash-Shahr 263

Bāb-at-Tall 109

Bāb-at-Ta`ām 336

Bāb Bahrām 256

Bābak or Pāpak 307，318～319，330，332，334，343

Bāb Bālin 399

Bāb Balīsān 214

Bāb Bam 313，315

Bāb Baraknān 469

Bāb Farrukhshīd 399

Bāb Fīrūz 408

Bāb Ghūbadhīn 470

Bāb Hakīm 301

Bāb Hasan 251

Bāb Hinduwān 421

Bāb Hishām 214

Bāb Hufrah 461

Bāb Hurmuz 256

Bāb-i-Dawlah 250

Bāb-i-Naw 250

Bāb-i-Sa`ādah 250

Bāb-Izad 285

Bāb Jang 384

Bāb Karkūyah 336

Bāb Khabīs 304

Bāb Khawr 203

Bāb Khushk 408

Bāb Kish 481

Bāb-Kubab 384

Bāb Kūhak 314

Bāb Khurāsān 214 , 464

Bāb Kūrjīn 312

Bāb Kuskān 312

Bāb Māhān 304

Bāb Masjid-al-Jāmi` 197

Bāb Mihr 255 , 461

Bāb Mubārik 304

Bāb Naw Bahār 313

Bāb Nūr（Nūz） 421，463

Bāb Rahbah 421

Bāb Salwā 59

Bāb Sanjān 399～400

Bāb Sarāy 408

Bāb Shadāwad 464

Bāb Shāpūr 315

Bāb Shast-Band 421

Bāb Sīn 214

Bāb Sirjān 315

Bāb Sūrkān 313

Bāb Tirah 203

Bāb Tīz 329

Bāb Tūrān 329

Bāb Yahyā 421

Bāb Zarand 304

Bāb Zarīn Rūd 203

Bāb Ziyād 408

Babak，or Pāpak 287

Baban 413

Bābar，Emperor 477

Bābghīsh 90

Bābil（Babel，Babylon） 72，81

Bābird 118

Babnah 413，415

Bābol 374

Babur Name 474

Babylon ruins 72

Babylonia（Bābil） 24，35 ~ 36，38，40，60 ~ 65，69

Bactra 10

Bactrian（Bukhtī） camels 350

Bactriana 10，277，407

Bād-Harzah 357

Badakhshān 8，427 ~ 428，430，432，435 ~ 437

Badakhshān river 435 ~ 437

Badam river 484

Bākusāyā 63 ~ 64，80

Bādarāyā 108

Badāt canal 74，81

Bādghīs or Bādhghīs 412 ~ 415

Bādhan 394

Badhandūn 133 ~ 135，138 ~ 139

Badhash 368 , 430

Bādhbīn 82

Bād-khīz 414

Badlis , or Bitlīs 113 , 125 , 184

Badr 201

Badrān 50

Bādūrayā 31 , 66 ~ 67 , 80

Bādūsbān mountains 372

Bāfd , Bāfkor Bāft 310

Bafra 136

Bāfq 310

Baghban 413

Bāgh-i-Sīrjānī 305

Baghchī Shūr 413 , 415

Badgdād during the Abbasid Caliphte 30

Baghīn 307 , 321

Baghlan 463

Baghlān 427

Baghnīn 345 ~ 346

Baghshūr 413 , 415

Bagir 377

Bagratids (Bagratunian) 140

Bağrikurt 134

Bahā-ad-Dawlah 77

Baha` al-Dawlah Irān Shāh 304

Bahār (Bam) 314

Bahar (Sīrjān) 311

Bahār (Kurdistan) 193

Barhargīrī (Bārkīrī) 183

Bahar Khazar , Bahr Khazar 496 , 498

Bahasnā 123 , 128

Bahassā 42

Bahāyin (Bayhah , Bayhak) 391

Bahmān , king 208 , 337

Bahmān , fort 292

Bahmanābād , or Mazīnān 430

Bahmanshīr 43

Bahr , See Lake

Bahr-al-Khazar 168

Bahr-ar-Rūm 159

Bahr Jurjān 498

Bahr Najaf 76

Bahrah 330

Bahrām Gūr 75，191，195

Bahrām Shāh 149，348

Bahrāmābād 286

Bahrayn Islands 26

Bahr Buntus or Puntush 168

Bahrein und Jemama 84

Bahriyyah 372

Bahurasīr 34～35，80

Bājaddā 105

Bajarvān（Mūkan） 175～176，230～231

Bājarwān（Jazīrah） 105，125

Bajestān 359

Bājisrā 18，59，62

Bajistān 359

Bajjah 282

Bakamsī 42

Bākharz or Guwākharz 357

Bākhtah 312

Bākhtar or Bhalakh 10

Bakhtigān Lake 6，277～279，298

Bākirdā 93

Baklān 427

Bakr 86

Bakrābād Bakrāwādh（Sijistān） 347

Bakrābād Bakrābādh（Jurjān） 377 ~ 378

Bākū 457

Bākū，Bākūh or Bākūyah 180 ~ 181

Ba`kūbā 58

Bākusāyā 63，80

Bālā Murghāb 404

Balā Sābūr（Bilād Shāpūr） 270

Balad（Maskin） 51

Balad（Mosul） 99，125

Balad-ad-Dawār or `Ard-ad-Dāwar 345

Balādhurī 17 ~ 18，31，36 ~ 37，47 ~ 50，55，57，60，65，78，82，84，90，92 ~ 95，108，175

Balakān 230

Balad Rūz 61

Balāsābād 34

Balā Sābūr 302

Balāsāghun 487

Balas ruby 436 ~ 437

Balat 99

Barbān river 435

Baldwin 104

Balīkān or Balkiyān 416

Balīkesrī 156

Balikh river 27，87，101 ~ 102，105

Baliqly Chay 168

Balis 107

Bālis（Bālish） or Wālishtān 332 ~ 333，347，351

Baljuwān 438

Balkh 382，420 ~ 423，429，431 ~ 432

Balkh-al-Bahiyyah 456

Balīkh river 434

Balkhāb 176

Balkhān or Abul-l-Khān 455，457

Balkhash（Balas ruby） 436 ~ 437

Balkiyān or Balīkān 416

Balkuwārā Barkuwārā Bazkuwār 52

Balōčistān 329

Balūch Balūs or Balūchistān 7，317，323，329

Balūchistān 331，357，365

Balūsa hill 94

Balūsīs 357，365

Balūt 121，280

Bam or Bamm 20，299，312

Bāmanj 413

Bāmiyān 338，348～349，416～419，425～426，432，375，385

Bāmiyīn 413，417～419

Bampūr 330

Bāmyān 339，418

Bān（Khurāsān） 392

Bān canal 40

Banā Shāpūr 263

Banākath，Banākit 482

Banān，wild pistachio 309

Banbūr 330

Band，a river dam or weir 277

Bandanjīn 80

Bandanījān 13

Bandar `Abbās 319

Bandar Daylam 273

Bandar-e Anzali 174

Bandar Beheshti 329

Bandar-e Deylam or Bandar Dīlam 273

Bandar-e Emam Khomeyni 242

Bandar-e Torkman 379

Bandar Lengeh 261

Bandāstānah 249

Band-i-Amīr or Band-i-`Adudī 276 ~ 277

Band-i-Kāssār 277

Band-i-Kīr 236 ~ 237

Band-i-Māhī 183

Band-i-Mujarrad 277 ， 281

Band-i-Rustam 345

Bandanīgān or Bandanījīn 633

Banī ‘Asad 461

Banī-As-Saffār 257 ， 259

Banī Junayd 59 ， 219

Banī Kawan (Ibn Kawān) Island 261

Banī Kūmā-i-Sīb 36

Banī Māhān 436

Banī Māhān suburb 399

Banī Māhān Jāmī 399

Banī Mazyad 71

Banī Numayr 102

Banī Sa`d 461

Banjahīr 350

Banjaway 346 ~ 347 , 351

Banjakath (Būnjikath) 474

Banjīkath 465

Bann Afridūn or Bann Ukhrā 326 ~ 327 , 360 ~ 361

Bannajbūr 329

Ba‘qūbah 58

Baraān 206

Bārāb (Fars) 257 , 296

Bārāb (Juzjān) 425

Barab (Utrār) 484 ~ 485

Baradān 32 , 50 , 59

Baradān or Baradā river 133

Barādar-Jān 399

Barāghūsh 163

Bārah Farūsh Dih 375

Barām-stone , jar 389

Barānj 459

Barārah or Burrāzah 256

Barātakīn 455

Barāthā 32

Barayāthā 42

Baraz-ar-Rūz 61，64，80

Barbahār，rarities 293～294

Barbalissus 107

Barbān river 435

Barbarian 167，210，217

Barbier de Meynard，M. 14，16，410，422

Barbisamā 70，81，98，109

Barbiyān 271

Barbūr 330

Bardarūd Kal`ah 355

Bardasīr or Barsir district，medieval and morden 300，302～307，320～321

Bardā`（Mashhad） 388

Bardā` or Bardhā`ah（Arrān） 177～178，184，230

Bardūdā canal 41

Bārfarūsh 375

Barghamah 156

Barghar 507

Bargylia 154

Barhand Rūd 195

Barīd 318，435

Bārimmā 91，98

Bārimmā-i-Sinn 91

Bāriz 316 ~ 317

Barjī 374

Barjīn 154

Barka`īd 99

Bārkath 466

Barkī 487 ~ 488

Bārkīrīor Barhargīrī 183

Barkūh 284

Barkuwārā or Balkuwārā or Bazkuwār 52

Barlāsī canal 178

Barley-corn 398

Barm 279

Barmak and Marmecides 34，421，457 ~ 458

Barsakhān 489

Bartallā 90

Bartang 435

Bārūsamā or Bārūsmā 70，81

Barvān 173

Barzah 165，230

Barzand 175 ~ 176

Barzanj 178，230

Barzātiyā 59

Bās 318

Bāsafūyah lake 277 ~ 279

Bāsalwā 59

Bāsand 440

Bāsānfā 94

Basāsīrī 106

Basghūrfand 418

Bashān（Herāt） 410

Bāshān（Marv） 399

Bashīn Abshīn Afshīn 416

Bāshīnān 410

Basht Kūta 265

Bāsht Rūdh 339

Basilica of Anna Comnena 135

Bāsiliyūn lake 135，152

Bāsīn 118

Basinnā 240，246

Bāsiyān 242 ~ 243，247

Baskām-i-Kharlīkh Turk 482

Basrah 3，25 ~ 26，29，43，45 ~ 50，53，59，65，69 ~ 71，73，138，144 ~ 145，167，172，174，181，183，191；gates and walls，44，46，81，197

Basrayāthā 42

Bast See Bust

Basṭām 18

Bastām city See Bistām

Bastām（Bīsutūn） 187

Baswā 165

Bātāk 214

Batīha 466

Batīhah or Batāih 41

Batman 111，113

Batman Sū 111

Battal，`Abd Allah 137，146，152

Battle of the Commel 44

Bātū Khan 223

Bāv 370

Bavan or Bawn 413，415

Bāvandān 370

Bāvard 394

Bawardashīr 87

Bawāzīj 91

Bayān canal and town 44，48，243

Bayāt 63～64

Bay`at Kamnānūs 153

Bayazīd Ilderim 149，152

Bayazīd Bistāmī 365

Bayburt 118

Baydā，white（Bayzā）19，280，300

Baydā 250

Baydā，Kal`ah 300

Bayhak 391

Baykand 463

Baykarā，Mīrzā 422

Baylakān 178～179，230

Baylakānī（the Paulicians）119

Baylāmān 174

Baylym 405

Bay-an-Nahrayn (Arrān) 177

Bay-an-Nahrayn (Nasībīn) 100

Bayrūt 241

Bāyt-al-Jisr 19

Baywār 416

Bāz 96

Bayzā See Baydā

Bāzār Shaft or Shaft 175

Bāzārak 350

Bazdah or Bazdawah 471

Bāzījān Khusraw 80

Bazkuwār Barkuwārā or Balkuwārā 52

Bāzranj or Bāzrang 271 , 272 , 274

Bazūghā 50

Beaver Skins 458

Beçin 154

Beg (or Bey) Shahr lake 151 , 153

Behābād or Mahābād 309

Behbahān 264

Behbahan 6

Behesdin 128

Beihagh，Beyhaq 391

Bellew，H.W. 347，359，368

Belpinar 135

‘Bendameer’s steam 277

Benjamin of Tudela 74

Berber 144，251

Berdan 133

Bergama 155

Besh Parmak mountains 169

Beylagan 178

Beyşehir 152

Beyşehir Gölü 151

Beyza 264

Bāzabdā 94

Bekabad 483

Beler 437

Bernard of Clairvaux 141

Besni 123

Betik 403

Bezabda 124

Bez-guara 52

Bezoar 436

Biagraphical Dictionary (Ibn Khallikān) 17

Biblical Cuthah 96

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 12

Bibliotheca Indica 43

Bibliotheque Nationale 15

Bīh (P.) ，meaning ‘goodness’，or ‘good-land’，prefix 81，262，303

Bīh-Ardashīr Bīhrasīr Bīhdasīr 303

Bīh-Ardashīr (Bahurasīr) 34

Bīh Dhīvmāsufān 80

Bīh Kubādh，Upper and Lower 70，81

Bihābād，Bihāvadh 309

Bīhardashīr Bīhrasir Bihdasīr Bardasīr Bardashīr (Kirmān) 303

Bihbahān 268 ~ 269，297

Bihistān (Bīsutūn) 187 ~ 188，193

Bihshāpūr 263

Bījūrī 372

Bīkath 480

Bīkath for Binkath 480

Bilāl ibn Abi Burdah 83

Bilād-al-Jabal 185

Bilād-al-Kamīdh 439

Bilād-ar-Rūm 127

Bilād-ar-Rūz 61

Bilād Shāpūr 270

Bilāl，ibn Abi Burdah 83

Bilāl the Abyssinian 158

Bilasuvar 175

Bilecha 103

Bilecik 135

Bileh Savar 175

Bīmān for Baylamān 174

Bīmand 286，311，320

Bīmaristānor Maristān hospital 88，95，156，250，336

Bīn canal 59 ~ 60

Binkath 480

Bīrjand or Birdjand 19，352，361，388，398

Birjend 252

Bīr Sāhik 269

Bīrah 327

Birkī 145，154

Birjand 362

Birūdh（Bayrūt） 241

Bīrūzkūh 417

Bishāpūr，Bishavūr 262～263

Bīshak 356

Bishlank 346

Bistām 9，365～366，382，430

Bisutūn 187～188，193

Bitanah gauze 308

Bitlis，Badlīs 113，125，184

Bitlis 113

Bitlis Çayi 113

Bitumen 63，65，92，180～181，269，289，294

Biyābān 358～360

Bīyābān 358～360

Biyābānak 325

Biyād（A.），white 359

Biyādak 359

Biyābānak 325

Biyārjumand oasis 366，368

Bizhān 394

Black garments of Abbasids 399

Black Amid 108

Black Antioch 153

Black Canal 337

Black Church 130

Black Hills 208

Black Moutain 168

Black Sea 136

Blind Tigris 26，43

Blue enamel See Tiles

Bode，C.A.de 263，270，272

Bojnurd 8

Bolam Sū 124

Bolu 142

Bombay 16

Bonāb 169

Book of the Conquests 17，31

Boralday 484

Borāzjān 259

Bosportis 135 ~ 136

Bostānābād 163

Bozanti See Bdhandun

Brahmanabad 331

Bridge，Kantarah 57

Andāmish（Andālmishk） 238

Darkhīd 265

Dimimmā 66

Dizfūl 238

Farah 341

Hasaniyah 93

Hijārah 438 ~ 439

Hinduwān 234

Hisn Kayfā，or Kīfā 113

Īdhaj 245

Jamūlkhiyān 432

Jard 467

Justinian，bridge of 131

Kāmighān 265

Khūbdhan 265

Khurasan 275

Khurrah Zād 245

Kirman 328，338

Kirsrawīyah（Arrajan） 269

Kisrawīyah (Nahawan) 57

Mālān or Mālin 407

Māsī 73

Rūdh or Rum 238

Sabīd Rūdh 230

Sabūk 268

Sanjah 123 ~ 124

Shahriyār 276 , 282

Stone bridge of Wakhshab 438 ~ 439

Tāb 268 , 270

Thakān 269

Takht-i-Pūl 342

Of Vespasian 123 ~ 124

Of Vamiting 330

Walīd , Jisr 58 , 131

Zāb 238

Bridge of Boats

At Hillah 72

Nahrwān 59 , 61

Zawārīk 57

Brooks , E.W. 138 ~ 139

Brusā，or Brūsah 145，156

Budahah 331，333

Budanjān 279

Budāt (Nahr-al-Badāt) 74

Buddha，Statues 347，418

Būdh Ardashir 87

Būdīn 332

Bugs’ Spring 134

Bugs poisonous，called‘wolves’ 170，378

Būh，Buwwah or Būyah canal 453

Buh Rūd 220

Buhayrah，See Lake or Sea

Buhayrah-as-Sanat 375

Buhayrah Jurjānīyah 498

Buhayrah Khwārizm 481，498

Buhayrah Tilā 160

Bujnurd 394

Būk，Nahr 31

Bukhārā，460 ~ 463，471 ~ 472

Bukhārā river 468

Bukht-Yishū` 238 ~ 239

Bukhtī（Bactrian camel） 350

Būkshah or Abūkshah 451

Bulak 44

Bulgaria 149

Bulghār 498

Būlī 157

Būlin 138

Bull Mosque 219

Bulūk 409

Bulūr country 381，437

Būmijkath（for Nūmijkath） 460

Būmijkath Bumujkath 462

Banjīkath 474

Buntūs or Puntush 136

Bunūjkath 514

Būran priness 38

Būran bridge 59

Buranunu 117，123，434

Burāzah river 256

Burdur 151 ~ 152

Burdūr lake 151 ~ 152

Burdur Gölü 151

Burj（Fars） 270

Burj（Ighars） 198

Burj Shāpūr 237

Burk 292

Burkhwār 206

Būrnamadh（Fūrnamadh） 466

Burnt Antioch 153

Burnt Ladhik 149

Burughlū 142，151

Burūjird 200～202，229，233

Bury，J.B. 138

Bursa 110

Būshahr 261，296

Bushahrah 87

Būshanj or Būshang 411～413

Bushehr 11

Būshire 261，296

Būshjan 358，431

Būsht 414

Busht-al-`Abra 354

Bushtafrūsh 384

Būshtankan，Bushtakān 384，387

Būshkānāt 225，260

Busrā 50

Bust 339，344 ~ 345，351

Bustam，See Bistam

Bustān，Al，for Arabissos 133

Bustānak 297

Buttam mountain 436

Būyar 94

Buyids their original home 172

Būzmājan，or Būzmājaz 466

Būzjān，or Būzkān 336，357，431

Buzurgarīn 414

Bythia 144

Byzantines 1，4，22，103，116，118 ~ 123，127 ~ 143，144 ~ 158，433

Byzantines and Arabs in the Time of the early Abbasids，750 to 813 138

Bznunik 182

Cadusii 373

Cæsar Frederick 37 ~ 38

Cæsar Mazaka 136

Cæsarion 89

Cain 472

Çakmak

Calatayud 19

Caliph 13

Callirrhoe 103

Callinicus 131

Çalti Suyu Çayi 117

Camadi 343，347

Camel village 86，287

Camel Stream 227

Camel’s Neck（Deveh Boyun）451

Camels，Bactrian 350

Çanakçi Deresi 116

Canals，Nahr 29

Aban，Nahr 40

Abū Raha 71

As`adī 398～400

Bān 40

Bāsht Rūdh 339

Bīn 59 ~ 60，68

Būn，Buwwah or Būyah canal 453

Durkīt 80

Fuller’s canal 465

Gāvkhuwāra，or Gāvkhwārah 452

Hazārasp 452

Hindīyah 74

Hurmuzfarrah 398 ~ 399

`Īsā canal 30 ~ 32，66，69，80

Jadīd 48

Jardūr 453

Jawbar 68，80

Kardurān-Khwāsh 452

Kassārīn 465

Kazak 339

Khālis 50，59 ~ 60

Khīvah canal 452

Kuraysh，Nahr 41

Kurdar 455

Kūthā 68 ~ 69，80

Madrā 453

Mājān 398 ~ 399

Ma`kil 44，46

Malik，Nahr 68 ~ 69，81

Mamūnī 58

Mīlā 339

Nahrawān 29 ~ 30，38，52，55，57 ~ 61，92

Nars 73

Nīl 72 ~ 73，80

Razīk 398 ~ 399

Sābus，Nahr 38，73

Sa`īd 105

Sanārūdh 335，337，339

Sarāt（Baghdad） 66

Sarāt Jāmasp 72

Sarsar 32，35，67，69

Sha`bah 339

Sīb 41

Siyāh Rūd 337

Sūrā or Sūran 26，70 ~ 72

Ta`am 339

Tāmarrā canal 59 ~ 60，80

Wadhāk（Wadāk，Wadān） 453

Yahūdī 58

Zāb canal，37 ~ 38，73，80，169

Zark 398 ~ 401

Çankiri 157

Cappadia 114

Cappadocia 168，171，177

Caraman 148

Carmine 214

Caranitis 114

Caria 144

Carmana omnium mater 316

Carmathian 45，273

Carpets 37，294，353，363

Carra de Vaux，Boron 14

Carrhæ 103

Casem 437

Casiphia

Casipian Sea 4，22，180，379，458

Caspian 20，24，31，168，199 ~ 200，202 ~ 206，209，250，354，404 ~ 415，484，495 ~ 498

Castle，Diz，Hisar，Hisn，Kal`ah，Kasr，Kuhandiz

Ahnaf ibn Kays 405

Akhwāt 313

Amkalchah 409

`Amr 405

Ardashīr 306

Armiyān 200

Arū 273

Atishgāh 355

Avīg 289

Bardarūd 355

Baydā (Bayza) 300

Dam Darān or Kal`ah Ram Zavān 260

Darjān 359

Dīkdān or Dīkbāyah 257

Diz Gunbadan 365

Diz Kilāt 269

Dukhtar 306

Duruh 363

Farrukhān 215

Ghabrā 135

Girdkūh (Jibal) 221

Gird-kūh (Kūmis) 365

Haykāl or Kal`ah Mīkāl 355

Hinduwān 422

Ibn `Umārah 257

Isfandiyār 264 ~ 265

Istakhr Yar 276

Ja`bar 102

Kabrīt 195

Kharashar , Kharshah 254

Khastār 417

Khawāshir 359

Khing 272

Khūrshah 254

Khuvār 279

Khwādān 290

Kūh (Kirman) 306

Kūh (Mardin) 96

Kuhnah 359

Kūlanjān 283

Kūsh-va-Rān 313

Kūshah 317

Kushkak 319

Mahdī，Hisn 238，243，247

Mākīn 195

Manūjan 317，319

Maslamah 105，137

Mikal（Haykāl） 355

Mīnā 319

Mujāhidābād 355

Najm 107

Ram Zavān 260

Safīd 264～265

Sahārah，or Shahārah 256

Sakālibah（Sclavonians） 134～135，139

Samīrān，or Shamīrān（Juwaym） 254

Samīrān（Sīrāf） 258

Samīrān，or Samirūn（Tārum） 226

Sang（Sirjān） 300，302

Shahārah or Sahārah 256

Shahbā 96

Shāmīl 319

Shamīrān（Herāt） 409

Shamīrān or Samīrān (Juwaym) 254

Shamīrān (Tarum) 226

Shankavān 276

Shikastah 276

Sih Gunbadhān 276

Sinādah 135

Surkh (Kūh Kal`at Surkh) 251

Tabark (Isfahān) 205

Tabarik (Ray) 216 ~ 217

Tāj 226

Tak (Daylam) 374

Tāk , Hisn (Sijistān) 343

Tang-Zandān 319

Tang-i-Zīnah 289

Tarzak 319

Tawās 154

Tāziyān 319

Tīghūr 269

Tilā 161

Tīn 108

Tīr-i-Khudā 253

Tīz 251

White Castle 264

Yahūd 135

Zar 393

Zarah 338，344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529

Cape of Good Hope 20，319

Caucasus mountains 180～181，368

Cava of Seven Sleepers 119，143，155，314

Cavern of the Winds 387

Cayster 155

C.E.Yate 340，393，414，424～425，441～442

Centrum 86

Cephe 113

Cesarrea Mazaka 136

Cevizliçeşme 133

Ceylanpinar 95

Chābahār 329

Chaboras 95

Chāch 8，480，481

Chāchaktū 460

Chadak 479

Chaechasta lake 160 ~ 161

Chaghāniyān 20，439

Chaghān-Rūdh 440

Chahār Dānikah canal 236

Chahār Jūy 403 ~ 404，431

Chāhak 278

Chāhik 20，278

Chah Mobarak 258

Chaldée 57，61

Chaltah Irmak 119

Chālūs 373

Chamchamāl 193

Chanārān 393

Changhīz Khān 337，385，417 ~ 418，422 ~ 423，448，463，482

Charaput 115

Chardin Chevalier 204 ~ 206，221

Charjooee 403

Chashmah Dahānah 133

Chashmah Sabz Lake 386 ~ 388

Chahār-Mahāl-o Bakhtiyārī 6，246

Chatkal 474

Chatrūd 308

Chāūlī，Amīr 264，277，281，288 ~ 290

Chavarzagh 226

Chebulic myrobalan 349

Chehr 193

Chesney 38

Chess-board plan of Nishapūr 386

Chīchast 22，160 ~ 161

Chimboy 454

Chimkand 514

Chimkant，Chimīkant 484

Chin 261

Chīnās 483

chīnār（plane-tree） 392

chirāgh-sang 475

Chirchik 482

Chishti Sharif 410

Christian physician，under Abbasids 238 ~ 239

Christian，Jacobites 94

Chroniken der Stadt Mekka 84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 378

Chūchaktū 423 ~ 424

Chugukabad 313 ~ 314

Cilicia 148 , 294

Cilician Gates 132 , 134 , 139

Circesium 105

Cizre 93

Claudipolis 157

Clavijo , Ruy Gonzalezde , Ambassador 391 , 427 , 442 , 457 ~ 458 , 465 , 480

Clay , edible 258

Cobinan 309

Cochineal 167

'Cold Land' 249

Commerce See Trade

Conrad III 141

Constantine 136 , 170

Constantine I 106

Constantine IV 138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138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138

Constaninople 4 , 134 , 137 ~ 138

Coracesium 150

Cordova 2

Cosmography（Kazvīnī） 16，30

Cotyæum 136

Crimea 176，189

Cramoisie，crimson dye 184

Crocodiles in Indus 331

Cross at Mayyafarikin 112

Crusades，first，second and third 140~141

C. Schéfer 207

Cteciphon，Ctesiphon 1，24，25，33~34，190，212，224

Culfa 167

Curna 28

Currants（Rībās） 385，387

Custom-house（Gumruk） 319

Cuthah 68

C.Wilson 175

Cydnus river 133

Cypress great 284，355~356

Cypress-wood 290

Cyprus 128

Cyrus 276，284

Cyrus River（Armenia） 5，177 ~ 181

Cyrus river（Fars） 264，275 ~ 277，279 ~ 283

Dabāsah 136

dabīk 294

Dabīl 172，182，184，230

Dabistān 356

Dabūsiyah 460，468，471

Dādhīn 267

Dagharah 73

Daharzīn 313

Dahānah 103

Dahās river 420

Dhahbānah 103

Dahlizān 269

Dahmānah 103

Dahnaj（malachite） 389

Dā`ī missioner 174

Dākharrakān or Khuwārkān 164

Dakūka or Dakūk 92

Dalahu 191

Dalījān 210

dāliyah （*water whell*） 67

Dāliyah town 105

Dam Darān (or Kal`ah Ram Zavān) Castle 260

Damascus 4 ，21 ，125

Damāvand mountain 22 ，168 ，364 ，367 ，371 ；town 218 ，317

Dāmghān 7 ，326 ，364 ~ 365

Dams on the Helmund 339 ~ 340 ，345

Dams on the Kur 277 ，281

Dandankān 400

Daniel tomb of prophet 240 ，246

Daniel 176

Daonas 154

Dār (A. ） house 86

Dār Ahanīn or Darband Ahanīn 441

Dār-al-`Āmmah 54

Dār-al-Battīkh 215

Dār-i-Isfīd 280

Dār-al-Kuttub 215

Dar Mashkān 399 ~ 400

Dār-as-Siyādah 78

Dārā 96

Darab 6，291

Dārābjird 6，248，254，278，287～289，290

Darahkān 318

Daraj river 220

Darāk 340

Darāk Mūsa，hill 250

Darakan or Dārākān 289

Darand 163

Darandah 120

Darawliyah 135

Darb（A.），road or gate

Darb-al-Hadath 122，133

Darb-al-Kilāb 111

Darb-as-Salāmah 122，134

Darband（P.），a pass

Darband or Bāb-al-Abwāb 180

Darban-i-Khalīfah 92

Darban Taj Khatan 193

Darban-Tāshī-Khātūn 193～194

Darban Zangī 193～194

Darbast 266

Darbīl 193 ~ 194

Dardasht 205

Darfānī or Darfārid 315 ~ 316

Darfārid 316

Dargham 466

Darghān 451

Darghash 345 ~ 346

Darguzīn 196 , 228

Darīst 267

Darius King 187

Darīyah or Dara`iyah 84

Darīz 260 , 267 , 294

Darjān , Dayrjān or Daryān town 271

Darjān castle 359

Dārjīn 313 , 321

Dārkan 289

Darkhīd , Darkhuwīd , or Dakhūnad 265 ~ 266

Darrah Gaz 394

Darreh Shahr 201

Dartal 345 ~ 346

Dārūk，Dārzak，Urak or Dāvrak 257

Daryā（P.）river or sea 434

Daryā Kulzum 458

Darya-i-Shark 458

Daryachik Shūr 267

Daryān，Dayrjān or Darjān 271

Dārzanjī 440

Darzīn 313，321

Das Gebiet von Medina 84

Dashoguz 8

Dasht（P.）plain，desert

Dasht Arzin 253

Dasht Bārīn 260，268，294

Dasht-Biyād（Dasht-i-Piyāz）358 ~ 359

Dasht-i-Lūt，Lot or Lūt 322

Dasht-i-Kavīr 322

Dasht-i-Piyāz 358

Dasht Rūm（Dasht Rūn）282 ~ 283

Dasht Ūrd 282

Dashtābād 236

Daskarah（Basrah）48

Daskarah（Jalūla） 80

Daskarah-al-Malik 62

Das sudliche Ufer des Caspischen Meeres 174

Dastabā 220

Dastabūyah melons 202

Dastagird 62

Dastakān 259，274

Dastan 208

Dast-Maysān 43，80

Dastusee 115

Dastuvā or Dastabā 220

Date Tabas 359～360

Davalū or Davahlū 146，150

Dāwar 345

Dawlatābād 198

Dawrak，Dawrak-al-Furs or Dawrakistān 242，247

Dawsar 102

Daybul 330～331，333

Daylam（Daylamān） district 172～174，218，225

Dayār（A.） monastery

Dayr Abu-Sufrah 57

Dayr-al-`Ākūl 35

Dayr-al-Jiss 208

Dayr-al-`Ummāl 41

Dayr Barsuma 120

Dayr Hizkil 37

Dayr Kunnā or Kunnah 36

Dayrjān（Daryān，Darjān） 271

Dayrūzīn 313，321

Dazak 330

De Bode，C. A. 263，270，272

De Goeje，M.J. 13～14，18，74，458，489

De Morgan，，J. 190

De Slane 15～16，18

Deciu 314

Defremery，C. 16，159

Deir ez-Zor 97

Deluge of Naoh 75

Denizlū 153

Denizli 153

Derbent 180

Derinkuyu 136

Derxene 115

Desert the Great 6，207 ~ 208，321 ~ 328

Desmaisons，Baron 17

Deveh Boyun 451

Develi 146

Dh pronounced Z 20

Dhahbāniyah spring 103

Dhāt `Irk 83

Dhīb，Nahr 116

Dhīb，Nahr 110

Dhu-l-Kilā` or Dhū-l-Kulā` 138

Dhurrah Indian Corn 318，320

Dībāj 235，246

Dibs（*dūshāh*）Syrup 294

Dicle（T.）1

Dictionnaire de la Perse 15 ~ 16

Die alte Landschaft Babylonien 30

Die Strasse von Basra nach Mekka mit der Landschaft Dharija 84

Die von Medina auslaufenden Hauptstrassen 84

Die Wohnsitze und Wanderungen der Arabischen Stamme 84

Difrīgī 119

Diglath 25

Dih or Dīh （P.）, village

Dīh `Alī 263

Dīh Bād (Dihbād) 388

Dīh Bāryāb 425

Dīh Bīd 284 , 297

Dīh Gawz or Jawz 282

Dīh Gīrdū 282

Dih Kiyāhān 165

Dīh Mūrd 19 , 279

Dih Nāband 329 , 361

Dih Nakhīrjān 164

Dih Namak 19 , 367

Dīh Ushturān 19 , 287

Dīh Zīr 279

Dihistān (Bādghīs) 414 ~ 415

Dihistān (Jurjān) 377 , 379-381

Dijla (A.) 1

Dijlah Tigris 21 , 25

Dijlah or Shādh Bahman district of 80

Dijlah-al-`Awrā Blind Tigris 43 , 172

Dīkbāyah，Dīkdān castle 257

Dimimmā 66

Dīnār hills 271 ~ 272

Dīnavar 188 ~ 189，201，227

Dīndār 263

Dirham 39，55，129，181，336，350，367，383，484

Dirghām river 435 ~ 436

Dvin 178，182

Divrigi 119

Dīv Rūd 314 ~ 315

Divrīk，Dīvrīgī or Dīvrīgī 119

Diyā-al-Mulk 167

Diyālā 59

Diyālā 59-61

Diyār（A.） habitations 86

Diyār Bakr or Āmid 108

Diyār Bakr district 86 ~ 100

Diyar Kūmis 364

Diyār Mudar 86，108 ~ 114

Diyār Rabī`ah 86，101 ~ 108

Diz（P.），castle

Diz Abraj 281

Diz Gunbaddān 365

Diz Kilāt 269

Dīzah-i-Karsran 216

Dizah of Marv 405

Dīzah-i-Varāmīn 216

Dīzak（Jīzak） 475，488

Dizak Nishnāk，Dizakī Nishkuman，or Astāk 265

Dizbād 387 ~ 388，430

Dizbaz 201

Darbīl 193

Dizfūl or Dizpul 202，238 ~ 239

Dizmār 167

Doğanşehi （Muhacir，Viransehir，Viranşehi） 120

Dog’s Head 367

Dog’s Pass（Darb-al-Kilāb） 111

Dog’s River（Nahr-al-Kilāb） 110

Dorn，B. 375

Dorylæum 135

Dozy，R. 349

Dū Dānikah river 236

Dū Gunbadān 272

Duhhāk or Zuhāk 371

Dujayl of Basinnā 5，240

Dujayl canal，old 65，80

Dujayl canal，later 51，85

Dujayl See Kārūn

Dūkāt 147

Dukhtar，Kal`ah 306

Dukhtar，Kutāl 267

Dukhtar，Pul 270

Dūlāb 173

Dulayjān or Dulaygān 210

Dumūr or Tīmūr Khān 156

Dunaysīr 96

Dunbāvand 371

Dunbulā 263

Dūr（A.），meaning ‘habitatrons’ 57

Dūr-al-`Arabāyā or Dūr-al-Hātith 52，55~57

Dur-ar-Rasibī 241

Durbāy 316

Dūresht 216

Durkīt canal 80

Duruh 363

Dūsha 94

Dūshāb syrup 244，294

Duwīn or Tovin 182

Dykes of Tigris 27

Earthly Paradises 46，264，460

‘East Country’ Khurasan 395

Eastern Persian `Irāk 205

Eastern Roman Empire 1

Ecbatana 194

Ecbatana Northern 224

Edessa 103～104

Edible clay 258，353

Eğirdir 142，151

Egridūr 142，145，151～152

Eighty，（Village of the Thamānīn”） 94

Elazığ 109，117

εις *Βάριδα* 152

ε*ls* Νί*κια*υ 157

ε*ls* Νι*κμήδεια*υ 157

εlsτήνπόλιsν 138

Elburz (Elbruz) mountains 5 , 181 , 214 , 221 , 225 , 368 , 371

Eldred , John 29

Elegia 115

Elias , N. 484

Elias the Prophet mosque of 263

Elizabetpol 178

Elliott 40

Embassy of Clavijo 391 , 442 , 457 ~ 458 , 465

Emessa 125

Emirdağ 134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38

Epidaphnè 33

Epigraphie Arabed`Asie Mineur 142 ~ 143

Ephesus 136 , 154 ~ 155

Ephthalites 433 , 438

Ercis 147

Ereğli 19 , 134 , 149

Erivan 182

Ermenek 148

Ermine 458

Erzerum 113，117

Erzinjan 118

Erzurum 118，147

Esfandan 197

Eskī Hisār 153

Eskī Mosul 99

Eskī-Shahr 121

Eskişehir 134-135，153

Eslamabad-e Gharb 192

Essences，perfume 293

Eastern Persian `Irāk 205

Estuary of 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43

Estuary of the Kārūn 44，243

Euphrates（Buranunu，Purattu，Ufrat，Perath，al-Furat，Firat） 3，27 ~ 28，33，35 ~ 40，45 ~ 47，51，53，59 ~ 61，63 ~ 72，74，78，81 ~ 85，88 ~ 95，99，104，108，135，294；See river

Ezra，tomb of 43

Fadlūh or Fadlūyah 288

Fādūsbān 372

Fahl Fahrah 330

Fahraj of Bam 313，321，328，332

Fahraj of Bampūr 330

Fahraj of Yazd 286

Fāik，Amīr 389，487

Fakhr-ad-Dawlah Buyid 215～216，226，372

Fakhr-ad-Dawlah，Chāūlī 264；See Chauli

Fakhr-ad-Dīn of Hurmuz 320

Fakhr-ad-Dīn，Kārā Arslān 113

Fakhrābād（Ray） 216

Fakhristān 277

Fakhrī historian 17～18，51

Fakhrī grapes 409

Fālamī-al-Ghābah 135

Falcons 429

Falkird，Farjirdor Faljird 358

Fallūjah upper and lower 74，81

Fallūjah（Nahr-al-Malik） village 68

Fam point of origin of a canal 38

Fam-al-Badāt（A.） 74

Fam-al-Bawwāb 245

Fam-as-Silh 28，38

Fāmir（or Pamir） 435，474

Fanā Khusraw Khurrah Weir 277

Fanākant 482

Fandūk 336

Fānīdh Sugar 329

Fannazbūr 329，332 ~ 333

Far`ā 287

Fārāb（Utrar） 484 ~ 485

Fārābī philosopher 485

Farāghah 284

Faragheh 284

Farah 341，351，431

Faran bridge 351

Farāhān 198

Farajird 388

Farank 129

Farāshah harbour of Baghdād 69

Farātagīn 455

Farāvah 380，472

Fardah 66

Farghān or Fārghar 435，438

Farghānah province 477

Farhad son of Gürarz 176

Farhād 63，188

Farhādān，Farhādhjird（Farajird） 388

Fārifān 206

Fāris 358～359

Fārisjīn 220，229

Farīvār 195，212

Fariyāb or Pariyāb 317

Fariyumad 392

Farjird or Farkird 358，411

Farrazīn 198

FarrukhānKal`ah 215

Fārs province 6，248～298

Fārs sea of 23

Fārs Nāmah 14，176～182，185～186，188，190～191，193～204，206～207

Farsakh 28

Farsang 22

Fārūth 41

Farwān 350

Fāryāb（Fārs） 257，296

Fāryāb（Jūzjān） 425，432

Faryābor Pariyāb（Kirmān） 317

Fasā 290，293 ~ 294

Fāsh 125

Fashāviyah（Pashāviyah） 216

Fath-ābād 463

Fath`Alī Ākhund-zādah

Fath `Alī Shāh 199

Fātimah sister of Imān Ridā 209 ~ 210

Faustinopolis 134 ~ 135，139

Fayd 83

Fayd-i-Dujayl Ckārūn 44，243

Fayd（of Basrah） 43

Fayrūz See Firūz

Faysābūr 93

Faysh Khabur 93

Fayzābād 436

Fazz 439

Feluchia，Feluge or Felugia 68

Fiddah Jabal（Bādghīs） 414

Fuddah Jabal（Kirmān） 316

Fig Village 285

Fīl 447 ~ 448

Fīn 209

Firabr 404，443

Firdūsī the poet 207，390；See *Shah Namah*

Fire-temples 190，193，206，208，219，224，242，245，255 ~ 256，271，287，341 ~ 342，421

Firrim 372 ~ 373

Fīrūz King 394

Fīrūz Sābūr 65，80

Fīrūzābād（Jūr） 255 ~ 256，293，296

Fīrūzābād（Khalkhāl） 170 ~ 171

Fīrūzābād（Kūhistān） 354

Fīrūzābād（Tārum） 226

Fīrūzān 206

Fīrūzkūh（Damāvand） 371 ~ 372

Fīrūzkūh or Bīrūzkūh（Ghūr） 417

Fīryāb 425

Fish a boneless 294

Fish not Caught，for sake of Prophee Daniel 240

Fīvār 417

Flaviopolis 141

Fluor-spar 437

Foça 155

Fox，fur 458

Forg 291

Forty Martyrs Lake 135，152

Fountain of Life 175，179

Fragmenta Historicorum Arabicorum 18

Frederick Barbarossa Emperor 141

Frederick，Cæsar，traveller 29，68

Friday Mosque term 35

French Société Asiatique 14

Frontier fortresses Syrian and Mesopotamian 128

Fūchah or Fūjah 155

Fuller’s Dam 277

Full’s River（Samarkand） 465

Fuller’s River（Kushkah Daryā） 469

Fūman 174

Fūmin 174

Furāt 21，35

Furdah or Fardah Nu`m 107，125；See Fardah

Furg or Furj 291 ~ 292，294

Fūrnamadh 466

Furwāb river 276

Furzuk 271

Fūshanj 407，411 ~ 412

Wüstenfeld，F. 15 ~ 16

Gachsārān or Du Gunbadān 272

Gadīv river 169 ~ 170

Gandava 332

Gandah or Ganfah 273

Gandzah 178

Gangra Germanicopolis 158

Ganjah 178 ~ 179

Gantin，M.J. 16，30，148

Garden of Kisra 33

Garghūl 380

Garim Chāyi 169

Garīvah-i-Mādar wa Dukhtar 282

Garm Rūd（Sāūj Bulāgh） 218

Garm Rūd（Miyānij） 170

Garmah Oasis 325

Garmsīr 249

Garnets 437

Gauze of Zarand 308

Gāvāmhā 213

Gāv-Khānah swamp 206 ~ 207

Gāvbāri 176

Gāvkhuwāra or Gāvkhwārah canal 452

Gāvmāhā or Gāvmāsā river 196 , 210 , 213

Gāvnīshak 328

Gawāshīr 303

Gawd-i-Zirrah 338

Gaz 206

Gazn 224

Gebhiltā 92

Genoa 104

Genoese 155

Geographers , the Moslem 11 ~ 18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15

Geographical Journal 123 ~ 124 , 127 , 132 , 135 , 142 ~ 143 , 329

Geographical Magazine 319 , 439 , 442 , 449

Geography 15

Geography 27 , 155 , 255 , 269 , 277

George , Saint. 89

Georgia 5 , 181 , 416

Gerede 157

Gevaş 183

Giresun 147

Geredī Būlī 157

Germanicia 122，128

Germiyān 144，153

Geschichte der Stadt Medina 84

Ghabrā castle 135

Ghadbān river 133

Ghanjarah 158

Ghardamān 452

Gharj-ash-Shār 415 ~ 416，429，431

Gharjistān，Gharistān，Gharshistān 415 ~ 416

Gharraf 38，41

Gharūbuli 135

Ghazzālī，Imān 389 ~ 390

Ghāzān Khān 78，162 ~ 163，176，216

Ghaznah or Ghanayn 7，348 ~ 349，351

Ghubayra town 308

Ghubayra 287

Ghūnābād，Kūh 414

Ghundījān 260，268，294

Ghūr，Ghūristan 339，341 ~ 342，397，407，415 ~ 417

Ghurian 411 ~ 412

Ghuzz Turks 305，385，421，486

Ghuzz（Guzz） 380，397，444，477

Gil Dulab 173

Gihon 434

Gil-Zariyān 476

Gīlakī，Amīr 324 ~ 325，360

Gīlān（Jīlān） 5，172 ~ 175

Gipsies 244，331

Girdkūh（Jibāl） 221

Gird-Kūh（Kūmis） 365

Girdlākh 195

Giresun 147

Girishk 346

Girrah 268

Gīt or Jīth 454 ~ 455

Gizah 343

Glass-work 51

Godfrey de Bouillon 129

Goksu 19

Göksu Çayi 122

Gold mine 224，365，467

Golden Kiosque 282

the Golden Meadows 14

Goldsmid，Sir，F. 328，335，342，354，356

Goldziher，I. 285

Golestān 8

Gombroon 319

Gorgān 8

Gottwaldt，I.M.E. 18，31

Gourd of Jonah 89

Goyun 253

Granada 14，32

Great Island（Basrah） 44，46

Great Wall of Bukhārā 461 ~ 462

Great Wall of Shāsh 481

Great Desert See Desert

Green Dome 306 ~ 307

Green Palace 39

Grenard，M.F. 142

Gūdarz 302

Guinea-worm 394，403

Gukchah（Armenia） 182 ~ 183

Gukchah（Badakhshān） 435 ~ 436

Gul 154

Gul Andām 280

Gul-ābād-ikān 210

Gulāshkird 317

Gulban 62

Gülek 133

Gulnābād 286

Gulpaygān 207，210，247

Gulrān 413

Gulshan，Kūh 387

Gumrū，Gumruk 319

Gunābād or Gunābidh 359

Gunbadh Mallaghān 272

Gunek Sū 116

Gūr 256

Gūr Kal`ah 161

Gūr-i-Surkh 378

Gurbayigān 210

Gurgān

Gurgān 378

Gurganj 446 ~ 449；See Jurjānīyah

Gurganjak 449

Gurjistān（Georgia） 5，181，416

Ghūrjistān（Khurāsān） 416

Gurshāsf 337

Gurzuvān 424

Gushtāsfī 179，181

Gushtasp 355

Guwākharz or Bākharz 357

Guwāshīr 303 ~ 304

Guvayn or Kuwayn（Sijistān） 341

Gūyān 391

Guyard，S. 16

Guzārān 312

Guzel Hisār 154

Guzidah，*Tarikh* 16，30，106，147 ~ 148，158 ~ 159，212

Gypsum Convent 208

Gypsum Palace 55

Habīb as-Sayār (Khwāndamīr) 17 , 18 , 31

Habiltā 92

Habl Ibrāhīm 69

Habrak , Hafrak 279

Habrāthān 380

Habs 271

Hadath or Adata , Darb 133

Hadath fortress 121 ~ 122 , 126 , 128

Hadbā 89

Haddādah 368

Hadī 219

Hadīthah 64 , 84

Hadīthah 90 ~ 91 , 125

Hadr 98

Hadrat-i-Turkistān 485

Haffar 48

Hafiz 307

Hāfiz Abrū 16 , 17 , 37 , 121 , 168 , 194 , 210 , 212 , 259 , 273 ~ 274 , 277 , 295 , 309

Haft Iklim 375

Haftād Pulān 213

Hafrak 279

Hagmatāna 194

Hāir，at Karbalā 79

Hajar-al-Fatīlah 436

Hājj 9

Hājjaj ibn Yusūf 39，72，237，268

Hājjī Barlās 392

Hajjī Khalfah 17

Hakīm Burkā`ī 414

Hakluyat，*Principal Navigations* 29，68，450，454，458

Hakshiyān 194

Hālah 42

Halam 456

Halāward 438

Halfā grass 49

Khalīl Rūd or Halīl Rūd 314～315

Halīlaj，myrobalan 349

Hall of the Chosroes 34

Halūras 110

Halys 135，145

Hamadān or Hamadhān 194～196，227～230

Hamdānids 96

Hamdān Qarmat 45

Hāmid Amid 108

Hamīd Amir 144，151

Hammām `Omar 73

Hamrā 122

Hamshahrah 176

Hamūlah 200

HamzahIsfahānī 17～18

Hangāmābād 415

Hānī 110

Haram（Fārs） 257

Harāt 287，298

Harāt See Herāt

Harbā 51～52，85

Harbīyah 31，51，85

Harī Rūd 396，407～410

Harman 120

Harrāb 135

Harrān 103，124

Harsīn 192

Harskān 281

Harūd 340，412

Hārūn-ar-Rashīd 388 ~ 391

Hārūnābād 192

Hārūnī 54

Hārūnīyah (`Irāk) 62

Hārūnīyah (Rūm) 128 ~ 129

Harūrī 343，351

Hārūt and Marūt 72

Hasan Aghā 93

Hasan，the Dā`ī 221

Hasan Sabāh 221

Hasan 56

Hasan Ibn `Omar 93

Hasan Ibn Salh 38

Hasanawayh or Hasanūyah 189，201，288

Hasangazi 134

Hasanīyah 93，124 ~ 125

Hasankeyf 112

Hāshimīyah 71

Hāshimjird 441

Hasht Rūd 170

Hashtpar or Rezvanshahr 173

Hassān，the Nabathean 42

Hasūyahor Hasanūyah 288

Hatay 128

Hatīth，Jabal 182

Hatra 98

Hawānīt 41

Hawīzah 233，241

Hawl（hawr） 41～42，73

Hawmah-i-Yazd or Jūmah-i-Yazd 285

Hawmah of Zutt 244

Hayastan 182

Haybak 427

Haydar，Atabeg 222

Haydar 356

Haydarīyah 355

Hāyil 84

Hayk` 182

Haykāl（Kal`ah Mīkāl） 355

Haykāl 263

Haytal 433，438

Hayy 3

Hazār or Āzār Sābūr 280

Hazārasp 450 ~ 452 , 472

Hazīrah 51

Hecatompylos 214

Helmund river 7 , 334 ~ 335 , 338 ~ 340 , 343 ~ 345

Hennin , M. 100

Heraclia 19 , 134 , 136 , 149

Heraclius 58

Herāt 407 ~ 409 , 429 ~ 431

Herāt river 396 , 407 ~ 410

Hezil Çayi 93

H.G.A.M. 127

Hiddekel 1 , 25 , 35

Hides 423

Hīdmand 339

Hierapolis 107

High roads , summary of 9 ~ 11 ; See Roads

Hijāz 9 , 84

Hill , See mountain and Tall

Hillah 26 , 71 , 73 , 83

Hims 125

Hind and Sind 331

Hindarabī 261

Hindīyah 74

Hindiyān or Hindijān river 270 ~ 272

Hindmand 339

Hindū Kush mountains 345 , 350

Hindūstān 10 , 344

Hinduwān bridge 234

Hinduwān castle 422

Hinduwān (Hindiyān , Hindījān) 270 ~ 272

Hinis 147

Hīrah 75

Hīrak 19 , 254

Hiraklah 19 , 134 , 136 , 149

Hircania 8

Hīrmand or Hīrmīd 339

Hirmās river 87 , 94 ~ 95 , 97

Hiran 376

Hirū Chāyi 169

Hisār See Castle

Hisār or Hisār Shūmān 440

Hisar Shāmīl 319

Hisarköy 134

Hishām 106，130，158

Hishām III 2

Hisn，See Castle

Hisn Kayfā or Kīfā 113

Hisn Khīvah 452

Hisn Mahdī 238，243，247

Hisn Manjib 107

Hisn Mansūr 123，125，128

Hisn Ziyād 117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sia Minor（*H.G.A.M.*） 127

Hitory of the Art of War 140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138

Hīt 64

Hīzān 114

Holdich，Sir T.H. 329～330

Honey 168

Hospital See Bimaristan

Hospitallers 155

"Hot Lands" 249

Houtsma，M.T. 13，18，330

Huart，M.C. 143

Hud 26

Hudūd al-`Ālam 8，10，22，24，91，156，160，208，233，236，252，265，267，270，274，276 ~ 277，336，338，340 ~ 349，352，354，358 ~ 359，361 ~ 362，376，380，383，391 ~ 395，397 ~ 398，400，404 ~ 405，407，409 ~ 413，415 ~ 416，418，420，423 ~ 428，435 ~ 436，439 ~ 441，443，460，462 ~ 463，465 ~ 466，468 ~ 471，474 ~ 475，483，486 ~ 487

Hūlāgū Khān 161，164，221，355，393

Hūlān Mūlān（Ulān Moren） 169

Hulbuk 435，438

Hulwān 9，61，63，79，191 ~ 192，228

Humānīyah or Humaynīyah 37

Humann and Puchstein 124

Hume，Major 29

Humrīn 91，98

Hūrīth river 122

Hurmuz，king 243，316

Hurmuz city，old and new 6，318 ~ 321

Hurmuz 263

Hurmuz island 292，295

Hurmuz-al-Malik 316，321

Hurmuz Shahr，Hurmuz Awshīr or Hurmuz-Ardashīr 233

Hurmuzfarrah 398 ~ 399

Husayn 78，401

Husayn 217

Husayn，the Tahirid 399

Husayn，Mashhad 78

Husaynīyīn 383 ~ 384

Hūsgān or Hūsjān 281

Hushang 407

Huwayrith 182

Huwayzah（Hūz，Hūz） 232，241

Huzū 257，296

Hwen Thsang 441

Ibex 209

Ibn Abi Usaybī`ah 239

Ibn-al-Athīr 17 ~ 18

Ibn Batūtah 144 ~ 145

Ibn Baytār 349

Ibn Bībī 18，119，142，143

Ibn-al-Fakīh 133

Ibn Hanbal 285

Ibn Hawkal 40

Ibn Hubayrah 70

Ibn Ibrāhīm 18

Ibn Ilyās 300，303 ~ 305，308 ~ 313

Ibn Jubayr 14 ~ 15，51

Ibn Kawān island 261

Ibn Khaldūn 17 ~ 18

Ibn Khallikān 17 ~ 18

Ibn Khurdādbih 12

Ibn Lāwūn 141

Ibn Mashkuwayh 17 ~ 18

Ibn-al-Muhalhal 15

Ibn Muhalhal 62，189

Ibn-ar-Rāwd 161

Ibn Rustah 12 ~ 13

Ibn Sawwār 45，244

Ibn Serapion 12 ~ 13

Ibn-Sīmjūr 327

Ibn Tarkasfī 466

Ibn-at-Tiktakā 18

Ibn `Umārah 257

Ice House 210 ~ 211

Īch Īlī 148

Iconius 134 , 140 , 148

Īdhaj 245 , 247

Idol at Kandahār 347

Idol at Zūr or Zūn 346

Idrīsī 143

Īghārs , the Two 197 ~ 198

Īj 289

Ijarūd 223

Ikhshīn river 267 ~ 268

Iklīd 282

Iklīm Akūr 86

Iklīm-ar-Rihāb 159

Īl-Khān of Persia 5 , 145 , 228

Ilāk 477 , 482 ~ 483

`Ilj 135

`Imād-ad-Dawlahor Dīn 92

`Imādīyah 92

Imām Zāyid 342

India 331

Indigo 349

Indus 322 , 330

Iniklī 122

Īrāhistān 254 , 256 , 258

Iraj 281

`Irak or Al-`Irāk 3 , 24 ~ 85

`Irāk`Ajamī 5 , 185 , 200

` Irākān or `Irākayn 25 , 186

Īrān 248

Irān andTūrān 433

Irān Shāh 304

Irān-Shahr 383

Īrāvah 362

Irbil 58 , 92

Iron Gate , the 441 ~ 442 , 472

Iron mines 109 , 278 , 287 , 294 , 316 , 476

Irtish 487

`Īsā 66

`Isā canal 30 ~ 32 , 66 , 69 , 80

Isauria 144

Istahbānāt 290

Isbīdh 325

Isbījāb 8，477，481，483 ~ 484

Isfad 358

Isfahān，Isbahan or Ispahān 5，10，160，186；quarters，suburbs and gates，202 ~ 207，227，229，247，297

Isfahbad，Isfahbudhān 175，369，371，373，374

Isfandiyār 264 ~ 265

Isfandiyār 144

Isfanj 392

Isfarāyin 381 ~ 382，391，393

Isfī or Ispī 325

Isfīd Diz 264 ~ 265

Isfīdān（Fārs） 281

Isfīdhān（Jibāl） 197

Isfīdbādh 281

Ishāk Ibn Ibrāhīm 54

Ishākī canal 52，54 ~ 55，85

Ishankavān 281

Ishtīkhān 466

Is`īrt 114

Iskāf 59，80

Iskandarīyah（Alexandretta） 128

Iskenderun 128

Iskīfghan 471

Islands of the Persian Gulf 261

Ismāīl 280

Ismāīlīans，See Assassins

Ispahbad princes 175，369，371，373~374

Ispārtah 152

Isparta 142

Ispī 325

Istabl-al-Malik 135

Istahbānān or Istahbānāt 290

Istakhr（Persepolis） 249，275~276，294~295，297

Istakhr Yār 276

Istakhran 282

Istakhrī 13~14

Istambūl or Istam Būlin 138

Istānūs or Istanāz 151

Istind 358

Ītākh，the Turk and Itakhiyah 57

`itr，（Ottar） of Roses 293

Izmir 119

Iznekmīdor Izmīd 157

Iznik 135 , 156 ~ 157

Jabal See Mountain 185

Jabalāk 245

Ja`bar 102

Jabbul 38 , 60

Jabultā 18 , 91 ~ 92 , 125

Jacobites 94

Jādhāwā 414

Nahr-al-Jadīd 48

Ja`farī 55

Jafūz 277 , 278

Jaghān Nāūr 198

Jaghān Rūd 392

Jaghtū 165

Jahān 131

Jahān Numā 145

Janhān-sūz 348

Jahram 254 , 294

Jahūda-al-Kubrā 424

Jahūk 197

Jāyij Rūd 218

Jajarm 392，430

Jakīn 318

Jalāl-ad-Dīn Rūmī 142 ~ 143

Jālikān 344

Jālk 330，332

Jallādjān 271

Jalūlā 62，80

Jālūs 372 ~ 373

Jām 356

Jām，Shaykh 356 ~ 357

Jāmasp 72

Jāmi` 36，305

Jāmi`ān 71，73

Jamidah 41

Jamjamāl 193

Jamkān 252

Jamm 257 ~ 258

Jammazah 83

Jamshīd 272，280

Jamūlkhiyān 432

Jan or Jay 467

Janbadhak 165

Jand 8，486

Jandak 325 ~ 326

Jankān 252

Jannābā or Jannābah 259，273 ~ 274，294，296

Janzah 178

Janzarūdh 308，321

Jarāhīyah 270

Jārbāyah 350，427

Jard 467

Jardakūb 134

Jardūr 446，453

Jarhud 371

Jararāyā or Jarjarāy 37，80

Jarkan or Karjan 265

Jarmak 282，322 ~ 325

Jarshīk 267 ~ 268

Jājrūd 223

Jaryāb 435 ~ 436

Jāshān or Khāstān 412

JāsikIsland 261

Jāt 244，331

Jaubert，A. 15，135

Jāūlī 264；See Chāūlī

Jawāmid 41

Jawbar 68，80

Jawbarkān 276

Jawdhakān 357

Jawsak（Ray） 215

Jawsak（Samarra） 55

Jawz 134

Jawzāt 134

Jaxartes See River

Jay（Isfahān） 21，203，204，206

Jay（Sughd） 467

Jāy Rūd 469

Jayhān，See River

Jayhūn，See Oxus

Jayruft 314

Jaz 206

Jazīrah （A.） 3，24，86，93

Jazīrah 3 ~ 4，84

Jazīrah Ibn`Omar 93 ~ 94，124 ~ 125

Jazīrah Tawīlah 261

Jenkinson，Sir，A. 449，454，457

Jews in Anbār，66；absent in Abarkuh，284；in Isfāhān，203

J. F.Jones 52

Jibāl (A. ） 5，185

Al-Jibāl 23，63，159，185 ~ 186，465

Jibbah 65

Jiddah 21

Jidghil 476，480

Jījakūt 424

Jikan for Jankan，Jankān 252

Jīl，Jīlān，Jīlānāt 172 ~ 175，267

Jīlānī 215

Jilūyah 266

Jimukat 484

Jīnānjakath 482

Jins 271

Jīr 318

Jīranj 400

Jirdūs 315

Jirm 437

Jirrah 259 ~ 260 , 267 ~ 268 , 296

Jirūn 319

Jīruft 6 , 22 , 312 , 315

Jīs (Jibāl) 224

Jīs (Fārs) 271

Jisr (A.) 57 , 58 ; See Bridge

Jisr Manbij 107

Jisr Nahrwān 59 , 61

Jiss 55

Jīth 454

Jizah 343

Jīzak 475 , 488

Jocelin II 104

John Theologou 155

Jonah 88 ~ 89 , 181

Jones , J.F. 52

Joshua 112

Jūbānān 277 ~ 279

Jūbarah 205

Jubbā 243

Juddah 21

Jūdī 94

Juhastah 195

Juhaynah 381

Jujube 378

Jujube，Tabas of the 359 ~ 360

Jūkhā 42

Jūlāhah or Julfah of Araxes 167

Julbārah 205

Julfah of Isfahān 205

Jūmah（Fārs） 270

Jūmah-i-Yazd 285；See Hawmah

Junābād 358 ~ 359

Junday Sābūr or Jundī Shāpūr 233，238

Junduwayh 423

Jūr（Fīrūzābād） 255 ~ 256，293，296

Jurbādhakān 207，210

Jūrīth 122

Jurjān 7 ~ 8，377，378

Jurjān 7 ~ 8 , 173 , 369 , 376 ~ 381

Jurjān 22 , 458

Jurjān river 376 ~ 377

Jurjānīyah , Gurganj or Urganj 448 ~ 449 , 453 ~ 454 , 456 , 458

Jurjīs 89

Jurm 395

Juwaym 249

Jurzuwān 424

Jurwas 349

Jūsf 361 ~ 362

Justi , F·373

Justinian 57 , 131

Junstinianopolis Mokissus 146

Justinianopolis Palia 153

Juwāsīr , Juwāshīr or Gawāshīr 303

Juwaym-i-Abu Ahmad 254

Juwayn or Juwaym (Shirāz) 253

Juvayn (Nīshāpūr) 391 ~ 392

Juvayn (Sijistān) 341 ~ 342

Jūy-Sard 207

Juy-Sulaymān 318 , 322

Juyboll，T.G.J. 16

Jūzf 361 ~ 362

Jūzjān，Al-Jūzajān or Jūzjānān 423

Kabīrah 373

Kabk 181

Kabrīt 195

Kābrūn 414

Kabūd Jāmah 375

Kabūdhān 160

Kabūdhanjakath 466

Kābul 350

Kābulistān 348 ~ 349

Kābul 350

Kābul，myrobalan 349

Kābūs，Ziyār 378

Kadar 485

Kādisīyah of Kūfah 76，83

Kādisīyah or Tigris 50 ~ 52

Kadpū 170

Kadrū 287

Kādūsiyān 373

Kāf，Jabal 368

Kafarbayyā 130 ~ 131

Kafartūthā 97，125

Kāghadh Kunān 225，229 ~ 230

Kahāb 206

Kahan 341

Kaharjān or Makarjān 255

Kahramanmaraş 121

Kahrjān 252

Kāim 106

Kāim 56

Kaj（Makran） 330

Kaj（Sijistan） 344

Kajjah 372 ~ 373

Kākhtah Chay 124

Kal`ah，See Castle and Kelat

Kal`ah for Kalāt or Kilāt 395

Kal`ah Ayyūb 19

Kal`ah-i-Kāh 342

Kal`ah Nāghah 329

Kal`at-an-Najm 107

Kal`ah Mawr 413

Kal`ah Wālī 424

Kal`ah Wamar 438

Kalām 374

Kālān (Fārs) 284

Kalān (Kirmān) 317

Kalantar 168

Kalalah 181

Kal-al-Mā (fish) 160

Kalār 372 ~ 373

Kalāūkān 437

Kālī 279

Kālif or Kaylif 442

Kālīkalā 116 ~ 117 , 179

Kalk 111

Kallār 277 , 283 , 297

Kalūr 171

Kalwādhā 32 , 59 , 80

Kalwūn 414

Kalyūn 417

Kamacha 118

Kamādīn 315

Kamart 209

Kamkh or Kamakh 118，125

Kamar-ad-Dīn 149

Kāmfīrūz 277，280

Kamīdh 439

Kāmighān 73

Kamīn 284

Kamnānūs 153

Kanāi-al-Malik 135

Kanātīr（Kūfah） 74

Kanātīr（Nahrawān） 58

Kanbalī 330，333

Kand 479

Kandābīl 331-333

Kandahār 7，334，344，346~347，425

Kandahār 339

Kandak 472

Kandadram，Kandaram 425

Kānkrī 158

Kangan 11

Kanguvār 20，188 ~ 228

Kanīsah 128 ~ 130

Kanj Rustāk 413 ~ 415

Kanjīdah 485

Kannajbūr or Kannazbūr 329

Kant or Kand 478

Kantarah（A.），a stone bridge 57；See Bridge

Kantarah Kirman 328

Kantarah-al-Kūfah 74

Kapak Khān 470

Karā（T.），black

Kārā Aghch（river） 252

Karā Āmid 108

Karah-sī and Karāsī 20，155

Karamān and Karāmān 20，144，148

Karā Arslān 113

Karā Bāgh 413

Karābāgh 179

Karā Hisār Afyūn 19

Karā Hisār 20，147，149～150，152

KarāHisār Kūniyah 149

Kara Hisar Nigdah 150

KarāHisār Shābīn 147

Kārā Sū 117

Kārā Sū（Jibāl） 197，212

Kārā Tappah 413

Karāchah 251

Karah Hisār 20

Karah-sī 20，155

Karāgh 410

Kar`ah or Kaw`ah 233

Karah，Karah Rūd，Kara（Jibāl） 198

Karaj（Ray） 198，215，218

Karaj-i-Abu Dulaf 197～198，201，229，247

Karaj of Rūdhravar 197

Karajah 240

Karakhitay 301

Karākīs 121

Karallia 152

Karāmān 19，144

Kara Mursal 136

Karapınar 135

Karārij 206

Karāsī 20，155

Karataş 132

Karapınar 135

Karbalā or Mashhad Husayn 78

Kard Fanā Khusraw 250

Kardān Rūd 220

Kardurān-Khwāsh 452

Kargas Kūh 208 ~ 209

Karīh 452

Kārin 173，372 ~ 373

Karin（Theodosiopolis） 117

Kārin for Bāriz 317

Karīnayn 400，406

Kāriyān 255，257

Kariyah or Karyat（A.），village

Kariyat`Abd-ar-Rahmān 279

Kariyat`Alī 443

Karyat-al-Ās 20，279

Kariyat Barātakīn 455

Kariyat-al-Bīdh 284

Kariyat-al-Jadīdah 486

Karyat-al-Jamāl 20，286～287

Karīyat-al-Jawz 316

Kariyat Mansūr 372

Kariyat-al-Marāghah 164

Karyat-al-Milh 20，320，367

Karīyat-al-th-Thamānīn 94

Kariyat Yunis 181

Kārīz or Kārīzah 359，414，282

Karjan 265

Karkar 167

Karkh of Baghdad 31，67

Karkh Fīrūz，Karkh-i-Sāmarrā 52，54～55

Karkhah or Karkha 233，240，170

Karkhī 404

Karkīsīyā 11，87

Karkūk 92

Karkūyah 336，341～342，351

Karmālīs 90

Karmīnīyah 468，471

Karnīn 343

Karrāmor or Karrān（Badakhashān） 437

Karrān（Isfahān） 204

Kars 139，181

Karshī See Nakhshab

Karūkh 410，431

Karūn See River

Karawān 480

Kārzīn 254

Kās-i-Fa`awn 56

Kāsān 480

Kāsān 427

Kasarkand 330，333

Kasbah 189，471

Kāshānor Kāshān 20，208 ~ 209

Kāshānī ware See Tiles

Kāshgār 487

Kashīd 308

Kāshmar 326

Kāskān 277

Kaskar (‘Irāk) 39 , 42 ~ 43 , 80

Kaskar (Jīlan) 174

Kasr (A.) 70

Kasr (Sībī) 347

Kasr , see Kasr Ibn Hubayrah 70 ~ 71 , 82

Kasir Abu Tālib 264

Kasra-al-Abyad 34

Kasr Ahnaf 405 , 432

Kasr`Amr 405

Kasr Ayinor A`īn 282

Kasr-al-Hārūnī 54

Kasr Ibn Hubayrah 70 ~ 71 , 82

Kasr-al-Khalīfah 88

Kasr-al-Lusus 20 , 188 ~ 189 , 228

Kasr-al-Milh 367

Kasr-ar-Rīh 388 , 430

Kasr Ar-Rūnāsh 238

Kasr-as-Salām 101

Kasr Shīrīn 61 , 63

Kasr Yazīd 192

Kasrān (Ray) 216

Kasrān (Sīrjān) 301

Kassāb 294

Kassārīn , Nahr (Samarkand) 465

Kassārīn , Nahr (Kushkah) 469

Kastamonu 157

Kastamūnī 157

Kāt or Kāth 447 , 450 , 478

Kāth (Kāt) 446 ~ 447 , 450 , 452 ~ 453 , 472

Katatekaumena 149

Kathah (Yazd) 285

Kathrawā 308

Katr 26 , 40 ~ 42

Katrabbul 31 , 51 , 65 , 66 , 80

Kātūl 57 , 59

Kātūl 58

Kawānīn 42

Kawsar 169

Kavāk 309

Kavir 325

Kawtam 170 , 174

Kay-Khusraw 198，224

Kaydū Khān 478

Kayf 413

Kayfā or Kīfā 113

Kāyin 7，352 ~ 354，431

Kālif or Kaylif 442

Kays Island 6

Kaysarīyah（Cesarea Mazaka） 136，142，145 ~ 146

Kaysariyah 89 ~ 90

Kayseri 136

kaysūm 293

Kaysūm 123

Kazak 339

Kāzimayn 31

Kāzirūnor Kazroon 261 ~ 262，266 ~ 267，294，296

Kazkī 233

Kazvīnor Kazwīn 21，214，218 ~ 220，227，229

Kazvīnī 15 ~ 16，218，220

kazz 294

Kelat（Afghanistān） 332 ~ 333

Kemah 118

Kemerhisar 134

Kerehdeh Būlī or Geredī Būlī 157

Kermiyān 144 , 153

Khabādhān 266

Khābarān (Khurāsān) 394

Khābarān (Khūzistān) 244

Khabīs 299 , 308 , 321 , 328

Khabr 253

Habs 271

Khābūr 87 , 94 ~ 97 , 105

Khābūr 93 , 124

Khabūshān 377 , 393

Khajacharān 408

Khalaj Turks 346

Khalanj wood 227 , 369 , 459

Khālid-Al-Kasrī 83

Khalid bin Barmak 34

Khalid the Barmecide 34

Khānlanjān 206 ~ 207

Khalīj (Bosporus) 22 , 135 ~ 136

Khalījān 444

Khalīl Rūd 314 ~ 315

Khālis 50，59 ~ 60

Khalkhāl（Adharbāyjān） 169 ~ 171，227

Khalkhāl（Caspian） 456

Kamkha 386

Khān-al-Abrār 206 ~ 207

Khandak Sābūr 65

Khānikīn 61 ~ 62，80

Khanjarah 158

Khanjast for Chichast 161

Khānlanjān 206 ~ 207

Khannāb 311

Khānsār 210

Khānūkah 106

Khanūs 147

Kharak 399

Kharakānah 475

Kharānah 285

Kharshah 254

Khardarūy 345

khargāh 294

Kharghānkath 468

Kharijites 328，341，342

Khārik 261

Kharjirdor Kharkird 357~358，411

Kharkhīz 417

Kharlakhīyah Turk 487

Kharlīkh Turk 482

Kharpūt 117

Kharrakān 23，196，220，228，366~367

Kharshān 476

Khartabirt 115，117

Khartīr 380

Kharūd 220

Kharūj 330

Kharva-al-Jabal 394

Kharvarān 395

Khās or Khās（Ilāk） 483

Khāsh（Sijistān） 342~343

Khashāb 49

Khashm 174

Khasht（Herāt） 410，417

Khāsht (Ilāk) 483

Khashū 291

Khushūfaghan 466

Khāsik 261

Khasrū 288

Khast Minārahsi 457

Khāstān or Jāshān 412

Khastār , Kal`ah Khastār 417

Khasū 291

Khasūyah 289 ~ 290

Khatam 287

Khatlān 433

Khāvarān 253 , 394 ~ 395

Khāvarān 266

Khavardān 395

Khawarnak 75

Khāwas (Ushrūsanah) 475

Khawāsh (Kufs) 317

Khawāshir , Kal`ah Khawāshir 359

Khāvdān 266 , 272

Khawī 166

Khawlān 88

Khawrāwādhān 265

Khawristān 252

Khawsar 88

Khawst 327，352，361 ~ 362

Khaylāb 428

Khaylām 480

Khayn 261

Khayrābād（Khūzistān） 270，272

Khayrābād（Khūrāsān） 425

Khayrah 278，290，298

Khayralam 480

Khayrokot 330

Khaysār 410

Khayvak 450

Khazānah 285，326

Khazar 179 ~ 180

Khazar，Bahr 136

Khazar，Bahr 22，180，456 ~ 458

Khidr 175

Khidr 263

Khilāt 183，230 ~ 231

Khing 272 ~ 273

Khinis 147

Khīr 290

Khisht 267

Khīvah or Khīvak 433，449 ~ 450，472

Khīvah 453

Khodabandeh 223

Khoi 166

Khoi 166，183

Khonj 254

Khoyj 165

Khorramshahr 5，48

Khūbdhān 265，272

Kūchān 382，393

Khudā-Afārīn 167 ~ 168

Khudāshah 392

Khudīmankan 468

Khuftiyān 193 ~ 194

Khujadah or Khujādā 462

Khūjahcommunity in Bombay 355

Khūjān 393

Khujandah 479，489

Khūkand or Khūwakand 477，479

Khulāb 438

Khānlanjān 206 ~ 207

Khullār 253

Khulm 427，432

Khumāhan 389

Khumāyijān or Khumāyigān 263 ~ 264

Kunān，Khūnaj 224 ~ 225，229 ~ 230

Khūnās 147

Khunayfghān or Khunayfkān 256

Khūr 325 ~ 327，361，431

Khur wa Biabanak 324

Khuran 261

Khurāsān 7，382 ~ 432

Khurāsān 275

Khurāsān road 9 ~ 10，12，31 ~ 32，61 ~ 63，85，191 ~ 192，227 ~ 228，364，367，430，472，475，482，488 ~ 489

Khurramābād 200

Khurāsānābād 408

Khudāshah 392

Khurkān 23，366

Khurrah 249

Khurrah Zād 245

Khurramah 277 ~ 278，298

Khurshāh，Kal`al 254

Khurshīd 195

Khūsb or Khūsf 328，361 ~ 362

Khūsf 328

Khūshān（Jibāl） 191 ~ 192

Khūshān or Kūchān 393

Khushk Rūd of Kharrakān 196

Khushk Rūd（Khurāsān） 396

Khushk Rūd（Sughd） 469

Khūskān 281

Khusraw Shādh Hurmuz 80

Khusraw Parwīz 27，62 ~ 63，188

Khusrūjird 192

Khusrūjird（Sabzivār） 391

Khūst 417

Khusūs 131

Khutān 487 ~ 489

Khutlān，Khuttal or Khuttalān 435，438 ~ 439

Khuttalāb 428，436

Khuvār 279

Khuvār of Ray 22，367，371

Khuwāsh of Sijistān 342 ~ 343

Khuvī 230

Khūz 232

Khuzār Rūd 469，471

Khūzistān 6，44，232 ~ 247

Khwāf or Khwāb 357 ~ 358

Khwābdhān 266

Khwādān 290

Khwājah Dihistān 414

Khwājah Khayrān 423

Khwāndamīr 17 ~ 18

Khwārizm，province 8，443，446 ~ 459

Khwārizm，city，Jurjānīyah，Old and New 448 ~ 449

Khwārizm desert 380

Khwārizm lake（Aral） 23，443 ~ 444

Khwārizm Shāh 379

Khwāsh（Kirmān） 317

Khwāsh（Makrān） 330，332

Khwāsh（Sarhad） 330，332

Khwāsh（Sijistān） 342～343

Khwāsh（ZamīnDāwar） 346

Kibotos 135

Kīfā 113

Kīj or Kīz 330

Kilāp，Nahr 410

Kīlās 481

Kilāt See Kal`ah

Kilāt（Tarum） 227

Kilāt，Diz 269

Kilāt-i-Nādir 395

Kilgen 128

Kilij Arslān I 141，148，151

Kilij Arslān II 141～142，149

Kinneir，Macdonald 265

Kīpchāk 486

Kiphas 113

Kīr 354

Kīrang 400

Kirbāl 277，279

Kirbās 51，267

Kirdkās 178

Kirind 191

Kirkgoz 121

Kirkīrsiyā 11 See Karkisiya

Kirmān 6，207，249，299 ~ 321

Kirmān city 302 ~ 307，320 ~ 321

Kirman，Kantarah 328，338

Kirmānshā，Kirmānshahān，Kirmāsīn，Kirmīsīn Kirmāshin，or Kirmisīn 5，21，186 ~ 187，228

Kirmiz 167，182，184

Kīrshahr 146，152

Kishor Kishsh（Shahr-i-Sabz） 441 ~ 443

Kish，Nasaf 460

Kīsh 257

Kishm（Badakhshān） 437

Kishm 261

Kishm 356

Kishmar 355 ~ 356

Kishsh（Sijistān） 344

Kisrā，Aywān 34

Kisrawīyah，Kantarah（Arrajān） 269

Kisrawīyah，Kantarah（Nahrawān） 57

Kiss or Kishsh 344

Kitāb 469

Kitchens of Chosroes 196

Kītū 198

Kīz 333

Kizil（T.） 62，135，169，380，436

Kizil Ahmandlī 144，157

Kizil Arvat 380，472

Kizibash 168

Kizil Irmāk（Halys） 135，145，147

KizilRubāt（Jalūlā） 62

Kizil Rubāt（Dihistān） 380

Kizil Uzen 169

Kīkān or Kīzkānān 332

Kocaeli 157

Koçhisar 150

Koluk Çayi 119

Komijan 197

Köneürgenç 8

Koote 26

Koren Dāgh 380

Κουμερκτ 319

Kozan 129

Kū，Jabal 420

Kubā 476，478

Kubādh I 244

Kubād Khurrah（Arrajān） 270

Kubād Khurrah（Dārābjird） 254

Kubādhiyān 435，439 ~ 440

Kubākib 120 ~ 122

Kūbanjān 252

Kūbanān or Kūbaynān 309；See Kūhbanān

Kubbat-al-Khadrā 39

Kubbat-al-Mūmiyā 289

Kubbat-i-Sabz 306 ~ 307

Kubbayt 124

Kūbinān 309

Kubrus 128

Kūch Hisar（Dunaysīr） 96

Kūch Hisār（Karamān） 149

Kūch Hisār (Kizil Ahmadlī) 158

Kūchān 393

Kūd 312

Kudāmah 12

Kūfā 414

Kūfah 74 ~ 75

Kufāj 324

Kūfān 394

Kufs 317 , 323

Kūghānābādh 414

Kūghūn 308

Kūh , Kuh or Kuh 352 ; See Mountain

Kūh , Kal`ah (Kirmān) 306

Kūh , Kal`ah (Mārdīn) 96

Kuhak (Banjaway) 347

Kūhak (Samarkand) 464

Kuhandiz of Herāt 408

Kuhandiz of Kābul 349

Kuhandiz of Kunduz 428

Kūbinān , Kūbanān (Kūhbayān) 309 ~ 310 , 327

Kūhgilū 269

Kuhīch 344

Kūhistān 7 ~ 8，352 ~ 363

Kūhistān（Shāmāt） 311

Kūhistān of Abu Ghānim 318

Kūhistān or Jibāl 186

Kuhlughah 441

Kuhnah，Kal`ah 359

Kuhnah Urganj 449

Kuhrūd 209

Kuhūd 222

Kūk 308

Kūkalī 245

Kūkūr 328

Kul Hisār 154

Kūlān 487

Kūlanjān 282

Kulay`ah 251

Kuljah 487

Kūlkū 233

Kulob 433

Kulzum，Daryā 458

Kum or Kumm 20，209，227，229

Kūmis 7，23，173，228，323，364～368

Kūmis，Dāmghān 264

Kūmis city，Bistām 365

Kūmishahor Kumissah 282～283，297

Kumistān 281

Kunār Takhteh 259

Kunāsah 75

Kunduhār 347

Kunduz 428

Kundur（Kuhistān） 354

Kundur（Sijistān） 328

Kungurlān 222

Kūnīn 317

Kūniyah 134，140～142，145

Kupin 265

Kur or Cyrus（Arrān） 5，177～181

Kur or Cyrus（Fārs） 264，275～277，279～283

Kūrad 277，283，296

Kūrah on Fārs 248

Kurān 257～258，296

Kuran 487

Kurasht 195

Kuraysh , Nahr 41

Kurd 5 , 88

Kurdar 455

Kurdistān 5 , 186 , 190 , 192

Kurdistān 270

Kurds 88 , 93 , 190 , 191 , 197 , 221 , 223 , 266 , 317 , 352

Kurgān Tappah 438

Kurī or Kurīn 327 , 361

Kurīn 338 , 361

Kuriakos 177

Kurk 314

Kurkath 475

Kurkī 177

Kurkūb 241 , 246

Kurlādī , Kurlāvah or Kurlāvū 456 ~ 457

Kurm 291

Kurnah 26 ~ 29 , 42

Kūrah 6 , 248 , 262 , 264 , 275 , 299

Kurūgh 223

Kurun or Kurunk 342

Kurvān 276

Kurzuwān 424

Kusadasi 119

Kustār 331 ~ 333

Kūsh Hisār 149

Kūsh-va-Rān 313

Kūshah 317

Kushānīyah or Kushānī 466

Kūshk (Asfuzār) 412

Kūshk (Isfahān 205

Kushk-e Qazi 291

Kūshk-i-Zar or Zard 282

Kushkah Daryā 469 ~ 471

Kushkak 319

Kāshkān 412

Kushmāhan or Kushmayhan 400

Kūsīn 216

Kustanīyah 138

Kusū or Khasū 291

Kūsūyor Kūsūyah 358 ，411

Kūt-al-`Amārah 27，38，60

Kūtahiyah 136，152 ~ 153

Kutāl Pīr-i-Zan and Kutāl-i-Dukhtar 267

Kūtam or Kawtam 174

Kutaybah-ibn-Muslim 350，447，476

Kutb-ad-Din，Haydar 356

Kutb-ad-Dīn，Hurmuz 320

KūthāRabbā，Kūthā-at-Tarīk and Kūthā canal 68 ~ 69，80

Kütahya 136

Kutaieh，Kutiyah，Kutiyah 136，152 ~ 153

Kutlumish，Amīr 276

Kutuluk Khān 305

Kutruh 287，298

Kuwādhiyān 439

Kuvār 253

Kuwārān 412

Kuwāshān 412

Kuwayn 341

Kuzdār 331 ~ 333

Kyzylsu，Kizil-Sū 436

Lādīk（Laodicea Combusta） 136，149

Lādhik or Lādhikiyah (L.ad Lycum) 145 , 153 ~ 154

Ladhik (L.Pontica) 146

Lady’s Bridge , the 270

Lāft island 261

Lāghir 255 , 257 , 296

Lāhījān 174

Lahūm 418

516

Lakes and Seas (Bahr , Buhayrah)

Lakes , names of 22

Bakhtigān 6 , 227 ~ 279 , 298

Bāsafūyah 277 ~ 279

Buntus (Pontus , Black Sea) 136

Chashmah Sabz 386-388

Jūbānān 277 ~ 279

Kāzirūnor Kazroon 261 ~ 262 , 266 ~ 267 , 294 , 296

Khazar (Black sea) 136

Khazar (Caspian) 22 , 180

Māhalūyah 22 , 252

Mediteranean 127

Mūz or Mūrak 267

Najaf 76

Nīrīz 289

Oxus，lake at source of 435

Rūm 127

Sāveh 212

Shīz 224

Tarabazandah 136

Zarafshān，lake at source of 467

Zarah or Zarrah 7，22，147，328，334，338 ~ 339

Lakhrāb 418

Lamos，Lamos river 133，141

Lān island 261

Lanbosar 221

Landor，A.H. Savage 335，340

Lane-Poole，S. 146

Lanjūghkath 466

Laodicea，See Ladhik

Lapis lazuli 436

Lapsaki 136

Lār town 291

Lār island 261

Lārandah 148

Lardak 257

Lārestān 255

Lāsgird 367 ~ 368

Lāsh-Juvayn 341 ~ 342

Lashkar（`AskarMukram） 237

Lasht 174

Lāshtar 193

Lāwakand 438

Lāwān island 261

Lawkar，Lawkarā 406

Layard，SirA.H. 246

Laylān 165

Lāz 358

Lāzward 436

Lead mines 285

Lebap 7

Leg，huge，found 130

Leo I and II of Little Armenia 141

Leo the Isaurian，Emperor 137

Libn 134

Libraries at Marv 250

Light-house at `Abbadān 49

Lihf 63

Līshtar 193，201

Long Island 261

Lotus channel 237，242 ~ 243

Lotus tree fruit 324

Louis VII of France 141

Loverr，Captain，Lovett 290

Luluah，Loulon 134 ~ 135，139，150

Lukkām mountain 22，129，132

Luminous stone 437

Lur，Luristān，Great 233，244 ~ 245

Lur，Luristān，little 200 ~ 202，233

Lur mountains 247

Lur plain 239

Lurdagān，Lurjān or Lurkān 246

Lus Bela 330

Lūsrūd 415

Lūt，Desert of 322

Lycaonia 144

Lycia 144

Lydia 144

Ma`ādīn，Tabal 316

Ma`alathāyā 93，124

Maasir or toll-barriers 36，41

Macdonald Kinneir 264

MacGragor，Colonel 326，395

Madāin 25，33~35，67，190，224

Madhār 28，42~43

Mādharāyā 27~28，38，60

Mādharūstān 191

Madhmīnīyah 454~455

Madhyāmajkath 468

Madik 106

Madīnah，meaning capital city304；See Medina

Madīnah `Atīkah 34，80

Madīnah Bāb-al-Hadīd 441

Madīnah Ibn Hubayrah 71

Madīnah Sijisān 22，335

Madrā 453

Madūrsālā 112

Mafāzah，the Great Desert 322

Maftah 48

Maghkān 462

Maghl 135

Maghnīsiyah，Magnesia 155

Maghūn 317

Māh，Mede 190

Māh Basrah 197

Māh-al-Kūfah 189

Mahallah Bāgh 367

Māhalūyah lake 22，250，252

Māhān，Hāmān or Māyān 257，302，307，321

Māhānah Sār 370

Mahawīl 63

Mahdī，Caliph31，122，132，214～217，243；his mother 372

Mahdī，promised，his shrine 72

Māyidasht 192，202

Mahlab，Mahlabiyah，cherry-stone paste 96，99

Mahmūd of Ghaznah 205，207，331，348

Mahmūd Shāh，Injū 250

Muhmūdābād 176，230

Mahmudiye 135

Mahrubān 270 ~ 273 , 294 , 297

Māhūzah 55

Maiden’s bridge 270

Maiden’s fort 306

Maiden’s pass 267

Mainyo Karko , fire-temple 342

Maitland and Talbot 419

Mājān 398 ~ 399 , 403

Majd-al-Mulk 402

Majnūn river 90

Makābir-al-Husaynīyīn 384

Makām , shrine or place of martyrdom 35 , 76

Makarjān 255

Mākhān 403

Ma`kil canal 44 , 46

Mākīn , Kal’ah 195

Mākisīn or Maykasīn 97

Maklūb river 158

Makrān province 6 , 317 , 322 , 329 ~ 333

Māl Amīr 245

Malachite 389

Malacopia 136，138，150

Malāir 197

Malajīnah，Malagina 135

Malakūbiyah or Malankūbiyah 136，138，150

Mālan（Herāt） 407～408，410

Mālān（Bākharz） 357

Mālān pass 267

Malatiyah 120～121，128，136，142

Malasjird or Malāzkird（Manzikart） 115～116，139～140，147，231

Malekan 164

Malik-al-Gharjah 416

Malik Shāh，Saljūk 62，77，79，205，402，405

Malik ibn Tawk 105

Malik，See Nahr

Mālin，See Mālān 357

Mallūn，Mallus，Malo 132

Malwīyah minaret 56

Mamikoneans 182

Mamtir or Māmatīr 374

Mamūn，Caliph 35，37～38，121，131，133～134，164，

190，198，390，400，448，469

Mamūnīcanal 58

Mamuretülaziz 117

Mamūnīyah village 58

Ma`mūrīyah 131

Manādhir，Great and Little 239，242

Manbij 107

Mānd river and Māndistān 252，255

Mandil，Napkin of Christ，103 ~ 104

Mankishlāgh 456

Mankūbars，Atabeg 201

Mansūr，Caliph 30，34 ~ 35，66，71，75，101，120 ~ 121，131，239，372

Mansūr of the Kays tribe 123

Mansūr，Hisn 123，128

Mansūrābād（Fārs）281

Mansūrah（Khwārizm）448

Mansūrah（Sind）331

Mamūchahr 217

Manuel de Numismatique ancienne 100

Manujan，Manukan 317，319

Manzikart，see Malasjird 115

Marabadh 410

Marāghah town 164 ~ 165 , 228 , 230

Marāghah village 284

Marand 166 , 230

Al-Marāsid-al-Ittilā 15 ~ 16

Mar'ash 122 , 128 , 133

Marasion 128

Marasmandah 475 ~ 476

Marbīn 206

Marco Polo , the Book of Ser 288 , 309 , 316 , 352 , 355 ~ 356

Mārdīn 96

Mardos 4

Murghāb 397

Marghīlān or Marghīnān 479

Marghzār Darrah 415

Marghzār Narkis 267

Marhalah 83

Marinān 395

Maristān , hospital , See Bimaristan

Mariyam 105

Mār Juhaynah or Marj Juhaynah 90

Marj-al-Kal`ah 192

Marj-al-Uskuf 138

Marmārī monastery 36

Marsān 425

Marsinah 132

Marten fur 227，458

Martyropolis 111

Marūchak 405 ~ 406

Marūr mountains 116

Mārūt and Hārūt 72

Marv 8

Marv，Great 401 ~ 403，429，431 ~ 432

Marv，Little，Marv-ar-Rūd or MarRūd 404 ~ 405，415，431 ~ 432

Marv（Fārs） 280

Marv Kūchik 405 ~ 406

Marv river or Marv-āb 397 ~ 400

Marvdasht 280

Marvdasht plain 276 ~ 277，279

Marwān II，Caliph 87 ~ 88，91，123，129，131，139

Marzpan 182

Marzubān district 406

Masābadhān 202

Masūliyāt river 111

Māsaram 253，268，296

Mashhad，place of martyrdom 35，76

Mashhad（in Khurasan） 388 ~ 391，431

Mashhad `Alī 76

Mashhad Husayn 78

Mashhad of Ismāīl 280

Mashhad Yūnis 89

Mashhad river 377，393，395 ~ 396

Māshīz 303，307，314，321

Mashrukān 236 ~ 237

Ma’shuk palace 55

Māsī bridge 73

Masīn river 270

MasjidJāmi`，Friday Mosque 36

Masjid-al-Kaff 92

Manjid-ath-Thawr 219

Maskanīn 134

Mankin 51，80

Manlamah 105，137

Masrukān 236 ~ 237

Massīsah 128 , 130 ~ 132 , 141

Māst Kuh 167

Mastanj or Matang 332 ~ 333 , 347

Mas`ūdī 14

Masūliyāt river 111

Matābikh-al-Kisrā 196

Matmūrah , Matāmīr 138

Matar or Matārīyah 52

Matīrah 52 , 54 ~ 55 , 58

Mattūth 241

Mav Balik 418

Mā-warā-n-Nahr (Transoxiana) 433

Mawsil See Mosul

Māyāb 398

Maybud 285

Maydan (A.) , plain or square 399

Maydān-al-Husaynīyīn 383 ~ 384

Maydān-i-Kuhnah 205

Mayef , M. 439 , 442

Mayhanah 394

Māyidasht 192，202

Māyin 280，282 ~ 283，297

Maykasīn 97

Maymanah 424 ~ 425

Maymand or Maywand 424 ~ 425

Māymurgh 465

Maypharkath 111

Māyruyān or Mahruyān 273

Maysān or Dast-Maysān 43，80

Maywand or Maymand 424 ~ 425

Mayyāfarīkīn 111 ~ 112

Māzandarān province 7，368 ~ 376

Mazār-i-Sharīf 422

Mazdākhkān or Mazdākhgān 455

Mazdarān 431

Mazīnān 430

Mazmorra 138

Mazrafah 50

Mazūl 387

Mazūr mountains 116

Meander river 141

Mecca and Medina road from Baghdad 11，83 ~ 84

Media and the Medes 4，185，194

Medical school of Junday Sābūr 238 ~ 239

‘Medina worm，’or Guinea-worm 394

Mediterranean Sea 127

Melas river 120

Melgun of，G. 174，373

Melisos 154

Melitene 120

Melons 357，449，471

Menteshā 144，154

Merkeh 487 ~ 488

Mersin 19

Meshgīn Shahr or Mishgin 169

Mesopotamia，Upper and Lower 2，24

Messiah 105

Messrs Barbier de Meynar 14

Miāna 164

Michaelitze 156

MihmānDūst 368

Mihnah 394

Mihrajān 393

Mihrajānāvādh or Mīhrajānābād 283

Mihrajānkudhak 202

Mihrān （Indus） 331

Mihrān Rūd 162～163

Mihrawān 375

Mihrkird or Mihrījird 313

Mījān 314

Mīkāl，Kal`ah 355

Mikhālīj 156

Mīl-i-Zāhidān 335

Mīlā canal 339

Mīlah 374，428

Mīllās 145，154

Milasjird See Malazkird

Miletopolis 156

Mīmand （Fārs） 258

Mīmand （Ghaznah） 425

Mimbar（A.），pulpit 36

Min Gurgān 377

Minā（Cilician Gates） 134

Mīnā，Kal'ah 319

mīnā，enameled tiles 55

Mināb 318

Mīnak 475 ~ 476

Minao 318

Minārah Hansān 42

Minaret，with outside stairway 56

Minaret，shaking 46，204，379

Mīnaw canal 236

Mināzjird or Mināzkird 116

Mīr Māhān 400

Mīrākiyān 242

Mirāt-al-Buldān 269，366，412

Mīrāthiyān 242

Mirbad 45

Mirkhwānd 17 ~ 18

Mīrkī 487 ~ 488

Mīshkānāt 290

Mīshkīn 169

Misriyān 380

Mission en Perse 190

Miyīn Rūdīn (‘Irāk) 48

Miyān Rudhān (Farghānah) 480

Miyānah or Miyānij 169 ~ 170 , 229 ~ 231

Mīzān 314

Mobolla 154

Modrene 157

Moḩammadābād or Moḩammadābād-e Rīgān 314

Mongols , *History of the* 17

Monteith , Colonel 221

‘Moon-maker , ’the Veiled Prophet of Khurasan 414 , 470

Moore , Lallah Rookh 277

Mopsuestia 130

Mopsukrene 134

Morier , J. 276

Moses , rock of 179

Moses of Chorene 104

Mosque , Great and Small 35

Mosul 4 , 86 ~ 89 , 124 ~ 125

Mother and Daughter pass 282

Moufargin 111

Mountains (Jabal , Kuh)

Name of mountains 22

Bāriz 316 ~ 317

Buttam 436 , 466 ~ 467

Dīnār 271 ~ 272

Fādūsbān 372

Fiddah (Bādghīs) 414

Fiddah (Kirmān) 316

Ghūnābād 414

Gulshan 387

Hindū Kush 345 , 350

Jilūyah 266

Kafs 311

Kargas 208 ~ 209

Kārin 173 , 372 ~ 373

Kū 420

Kūd 312

Kufs 317 , 323

Kūhgilū 269

Lukkām 22 , 129 , 132

Ma`ādin 316

Namak Lawn 211

Nukrah 414

Rang 232

Rūbanj 173，373

Sāblagh 481

Sablān 63，168，175 ~ 176

Sahand 162 ~ 164

Sarāhand 168 ~ 169

Sāvdār 465

Sayām 469

Shammār 84

Sliver Hill（Kirmān） 414

Sliver Hill（Bādghīs） 316

Sīpān 183

Siyāh Kuh（Ardabīl） 168

Siyāh Kūh（Great Desert） 208

Taurus 4，22，128

Zar 365

Zard or Zardah 207，233

Zūr 345

Moving sands of Desert 324 ~ 337，341

Mu`askar（Nīshāpūr） 383

Mu`askar-al-Malik 134

Mu`awāyah，Caliph 102，128，137

Mu`ayyad 385

Mubarak，the Turk，and Mubārakīyah or Mubārakābād 219 ~ 220

Mubārak（Wasit） 38

Mudar 86

Mūdurnī or Mudurlū 157

Mudurnu 157

Mu`īn-ad-Dīn Asfuzārī 410

Mūkān，Mūghān or Mughkān 5，175 ~ 176，230 ~ 231

Mūghistān 319

Muğla 145

Mughlah 154

Mughūlīyah 225

Muhammad，Prophet，miracle on night of his birth 212

Muhammad，Khwārizm Shāh 379，424，478

Muhammad，Sultan，Saljuk 205，264

Muhammad，brother or son of Hajjaj 219，249

Muhammad ibn Hanafīyah，shrine 146

Muhammad（ibn）Ibrāhīm 18

Muhammad，son of Imam Ja`far 378

Muhammad，son of Malik Shah 374

Muhammad，son of Imam Mūsā 251

Muhammadābād 394

Muhammadīyah lagoon 42

Muhammadīyah（Nahrawan） 57

Muhammadīyah（Ray） 214～215

Muhannarah 48

Muhawwal 31～32，66

Muhdathah 112

Muhtarikah，Burnt Rakkah 102

Mu`jam-al-Buldān 16

Mujāhidābād 355

Mukaddasī 13～14

Mukanna`，‘the Veiled Prophet’ 414，470

Mukharrim 31 ，33

Mukhtarah 48

Mukram 237

Muktadir，Caliph 188，241～242

Muktafī，‘Ali，Caliph 34

Muktafī，Muhammad，Caliph 204

Mulāhids 354；See Assassins

Mules 184

Müller，A. 239

Multān 331，333

Muninābād 362

Mūmiyā 269，289，294

Munayyar，stuffs called 227

Mūnis the Chamberlain 189

Munk 438

Munkharik lake 97

Muntasir，Caliph 55，58

Mūz lake 267

Murabba`ah（Nīshāpūr） 384

Murabba`ah castle 88

Muradiye 182

Murat Nehri 115

Murād Sū 115

Murād IV，Sultan 115 ~ 116

Murād or Murdān Na`īm 167

Mūrak lake 267

Murghāb river 397 ~ 400，404，406，416

Murghāb village 410

Musa river 215，218

Musa，son of Bughā 220

Musallā（A.），praying place 36，443

Musallā town 469

Musayyib 74

Muzdakān 212

Mūsh 116

Mushtakahar 90

Musk 437

Muslim Mamluk 128

Mustansir，Caliph 50～51

Mustawfi 16，145，220

Muatazhir，Caliph 33

Muta`shshā，‘supper-station’ 83

Mu`tadid，Caliph 61，100

Mutawakkil，Caliph 54～55，78，141，355～356

Mutawakkilīyah 179

Mu’tamid，Caliph 53～57，67，121，131，137，139

Muthakkab castle 130

Muthakkab（Mashhad） 388

Muttakī，Caliph 104

Mūtūkin，I’rince 418

Muturinī 157

Mūzlake 267

Muzdakān 212

Muzaffar coast 256～259，274

Muzaffarids 301

Mylasa（Mīlās or Melisos） 154

Myrobalan 349

Myrtle village 20

Mysia 144

Nāband，Oasis 258

Nāband，Dih 329

Nabathaean language 64

Nabk tree 324

Nadhash for Badhash 368

Nādir Shāh 395

Nahar Malcha 68

Nahr 30；See Canal and River

Nahr Bīn 80

Nahr Būk 31，80

Nahr Durkīt 80

Nahr Jawbar 68

Nahr-al-Malik town 68，69，81

Nahr-al-Malik Samūr river 180

Nahr Sābus 38，60，73

Nahr Sulaymān 318，332

Nahrawān Bridge，town 29 ~ 30，38，52，55，57 ~ 61，92

Nahrawān districts 37

Najaf 76

Nājat 312

Najd 84

Najib Muzahir ud-Dīn 11

Najīram 258 ~ 259，296

Najm 480

Najm-Kal’ah 107

Najim-ad-Dīn Kubrā，Shaykh 450，454

Nakhīrjān 164

Nakhkh velvets 386

Nakhchivān or Nakjawān 167，230

Nakhshab，Nasaf or Karshī 414，441 ~ 443，469 ~ 472

Nakīdah 142，150

Nakīsār 142，147

Namak，Dih 19，367

Namak Lawn hill 211

Namangan 478

Nāmiyah or Nāmishah 375

Naphtha springs See Bitumen

Napkin of Jesus 103，104

Napkins of Kūmis 367

Narcissus perfume 315

Nariyān 425

Narmāsīr 299，313，321，328

Narrows of the Oxus 451

Nars canal，Narses 73

Naryn，river 476

Nasā 394

Nasaf See Nakhshab

Nasaf and Kish river 460

Nasāiyah 479

Nasātak 280

Nashāpūr（Shāpūr city）262，263

Nashawā 167

Nashāvūr 385

Nashk 308

Nasībīn 87，94，95，97，124，125

Nāsir-ad-Dawlah（Hamdānid）89

Nasīr-ad-Dawlah Ibn-Sīmjūr 327

Nāsir-ad-Dīn of Tūsi 164

Nāsīr-i-Khusraw 14 ~ 15

Nīsirībād 335

Nasiyā 479

Nasr the Cretan 134

Nasr the Mirdasid 112

Nasratābād（Sistān）335

Nasratābād（Sanīj）325

Nasrīyah 112

Natanz 209

Nātil 373

Nāūs-az-Zabīyah 195

Naw Bahār of Balkh 420 ~ 422

Naw Bahār of Bukhārā 8，397，404，433，460，461，463，466，468

Naw Bahār of Samarkand 463

Nāwarzā 129

Nawardashīr 87

Nawbandajān or Nawbanjān 263 ~ 265

Nawīdah 441

Nawjāy or Naw Khānī 326

Nawkad Kuraysh 471

Nawkird 91

Nawūsah 64 ~ 65

Naxçıvan 167

Nāyin 207 , 285 , 294 , 326

Naylān 165

Nayrīz 289

Naysābūr （Nīshāpūr , of Khurāsān） 382 ~ 388 , 429 ~ 430

Naysābūr （Fars） 280

Nazareth 105

Nearchus 252

Nebuchadnezzar 66 , 176 , 203 , 424

Neo Caesarea 142 , 147

Nersēs 105

Nestorian Christians 465 , 482 , 487

Nestorians 465 , 482 , 487

Nevşehir 136

New Canal 48

New Halam 456

Newberie，John 28 ~ 29

Nicæa 140 ~ 141，156 ~ 157

Nicephorus Phocas 133

Nicomedia 136，157

Niffār 73 ~ 74

Nakīdah 142，150

Niğde 142

Nīh 340

Nihāvand 196 ~ 197，201，228 ~ 229

Nikfūr 133

Nikīyah 133，156

Nikmūdiyah 136，157

Nīksār 142，147

Nīl town and canal 72 ~ 73，80

Nīl，indigo 349

Nīlīyah 73

Nīm Murdān 375 ~ 376

Nīm-Rāh 190

Ni`mat-Allah Saint 307

Nimrod 67 ~ 68

Nīmrūz 334

Nīnaway，Nineveh 3，87 ~ 89

Nippur Or Explorations and Adventures on the Euphrates 67

Nīrīz 278，289，298，302，320

Nisā（Khabūshān） 377，393 ~ 394，429 ~ 430

Nisā（Narmāsīr） 314

Nishak 339，343

Nishak river 342

Nīshāpūr 8，383；See Naysābūr

Nīshāpūr（Shāpūr city） 262 ~ 263

Nisibis 94

Nītusor Nītush for Pontus 136

Nīv-shahpuhr 383

Nizām-i-al-Mulk 77，188，254，394，402

Noah，Ark of 98，182

Noah，Mosque of 94

Noldeke，T. 373

Norberg，M. 17

Norman King RoogerII 14

Nostradamus，a Persian 307

Nūbandagān 263 ~ 265

Nūkān 388 ~ 390

Nūkfāgh 452

Nūgān 389

Kūh Nukrah 414

Nu`mān，Prince of Hīrah 75

Nu`mānīyah 37，73，82

Numi，Chinese name for Bukhārā 460

Nūmijkath 460

Nūr 267

Nūr-ad-Dīn，son of Zang 88，93，107

Nūrd 266

Nurhak 121

Nūshanjān，Upper and Lower 288，489

Nut Village（Fars） 282

Nut Village（Kirman） 316

Nuzhat-al-Kulūb 16

Nūzkāth or Nūzvār 454

Oak forests（Balūt） 280

Oases of Great Desert 324 ~ 325

Observatory，Astronomical 164

Oils，perfumed 293

‘Old Man of the Mountain，’ 221；See Assassins

Old Town，Ctesiphon 34

Old Woman’s Pass 267

Oltān 175

Oman，C. 140

‘Omar I，Caliph 121

‘OmarII，Caliph 120，130 ~ 131

`Omar-ibn–al-Azrak 421

‘Omar Shaykh，Prince 301 ~ 302

Orkhān，Sultan 156 ~ 157

Ormuz 319

Osmaniya 128

‘Othman，Sultan 156

Osmaneli 135

`Othmānlī，Amir 156

`Othmānlī or Ottomans 144 ~ 145

Ottar of roses 293

Oxus，lake at source of 435

Oxus provinces 433 ~ 445

Oxus See River

Pahalbādh，the musician 63

Pahlavī，or Old Persian 222，370

Palestine under the Moslems 11，155

Pālū，Pālūyah 117

Pamir，or Fāmir 435，474

Pamphylia 144

Pandī 406

Pānīd sugar 329

Panj river 435

Panj Angūsht mountains 169

Panj-dīh 405

Panj-gūr 329

Panj-hīr mines 350，417 ~ 419，427

Paper，manufacture of 225

Paper，of Samarkand 464

Paphlagonia 144

Paradise，river of 132

Paradises，the four Earthly 46，264，460

Pariyāb or Fariyāb 317

Pasā 290

Pāsārgād 284

Pasargadae 276，284

Pasawā 165

Pashāviyah 216

Pastona 114

Pātīlah 251

Paulicians 119，121

Pavet de Courteille 14

‘Peacock of the Two Sanctuaries’ 284

Pearl fisheries 257，261

Penjakent 465

Penny-royal 287

Perfumes 293

Pergamos 156

Perī Chay 116

Pere Suyu Çayi 116

Perisabor or Fīrūz Sābūr or Fayrūz Sābūr 66

Perrhe 123

Persepolis 6，13，20，88，248，254，260，264，275；See Istakhr

Persia，Persis 6，10，20，88，149，248，253，276，287～288，292，295，300，306～310，312～315，317，322，326，328，335，342，354，356，394

Persian Empire 264

Persian Gulf 261

Persian’Irak 25，185

Pessinus 153

Peters，J.P. 67

Petis de la Croix 17

Petrifactions 327 ~ 328

Phaidagaran 178

Pharaoh，builder of windmills 411

Pharaoh’s Cup 56

Phocia or Fūjah or Fūchah 155

Phrygia 144

Pilgrim road to Mecca 31 ~ 32，35，82 ~ 83

Pīlsuvār 176

Pīshvarān 342

Pīshkīn 169

Pīshvā 216

Pishyān 371

Pisidia 144

Pistachio nuts 415

Piyādah 325

Place-names，Arabic and Aramaic 18；Greek，Turkish，and Persian 19；in Moslem Spain 19；of mountains，lakes and seas 22

Plane-tree（*chīnār*） 392

Podandos，Bozanti or Badhandūn 133～135

Poisonous earth 363

Poisonous grass 392

Poisonous vapours 260，271

Polin，or Būlin（πόλις）138

Pombedita 74

Pontos 136

Popular Voyage and Travels 294

Porter’s mouth，whirlpool 245

Portuguese traveler，anonymous 29

Pozanti 133

Product See Trade

Prostanna 151

Prusa or Brusā，Brūsah 156

Prymnessos 152

Pūchkān 357

Pul or Pūl（P.），bridge

Pūl-i-Bigam 270

Pūl-i-Khatun 218

Pul（Kantarah）-i-Farah 341

Pūl-i-Sangīn 438～439，472

Pulūr or Bulūr 381

Pulvār river 275 ~ 277 , 279 , 284

Purchas His Pilgrimes 29

Purg , Purk 292

Purvāb , Purvab 276

Pushikil-Darrah 225

Pūsht district 354

Pusht Frūsh 387

Pylæ Ciliciae 134

Pyramus river 131 ; See Jayhān

Pyrgion 154

Qara cay 210

Qasr-ī-Shīrīn 61

Qizil uzun 4

Qalaq , Kal’ah 395

Qaţrūyeh 287

Qohab-e Rastaq 325

Qomīsheh 282

Qovanlu 217

Quatremere , E. 489

Quicksilver mines 294 , 418

Qurghonteppa 433

Quri Chay 162

Rabb 65

Rabī`ah 86

Rabinjan 468，471

Rādhān，Upper and Lower 35，80

Radhwānīyah canal 69

Rādkān 394

Rāfikah 101～102

Rafsanjān，Rafsinjān 286

Rāghān river 318

Rahbah 105，124

Rahibān or Rahiyān 267

Rāhshān 266

Rahwah 134

Raids，Moslem，into Greek county 136～138

Rākah 134

Rakān，Takān or Kantarah，bridge 270

Rākhūshmīthān or Ardhakhushmīthān 453

Rakkah 101

Rakkah（Euphrates）101～103，124～125

Rakkah （Kūhistān） 361

Rām Shahristān 340

Rām Zavān or Dam Darān castle 260

Rāmhurmuz 243，247

Rāmīn 199

Rāmjird 277，280

Ramm for Zamm 266

Rāmrūd 340

Rams river 111

Ramsay，Professor W. M. 127，143

Rāmshīr 271

Rāmuz 244

Rang，Kūh 232

Rās-al-`Ayn 87，95～96，125

Rās-al-Ghābah 134

Rās-al-Kalb 20，367

Rās-al-Kantarah （Karshī） 470

Rās-al-Kantarah village 466

Rās-at-Tāk 464

Rāsak 340

Rāsmand mountain 197

Rīshahr（Bushire）261

Rashīd，Mansūr，Caliph 204

Rashīd，See Hārūn

Rashīdī suburb 162

Rāshīdīyah 50

Rasht town 174 ~ 175

Rasht district 439

Rāsibī Governor 241

Rāsk 330

Rass 179；See Araxes

Rāsmand mountain 197 ~ 198

Ratīn river 263

Rāvar 309，325

Rāwanīr，or Rāwansa 392

Rawdat-as-Safā（Mirkhwānd）17 ~ 18

Rawlinson，Sir H. C. 223 ~ 224，246，335，340，422，458

Ray（Rhages）214 ~ 217，227 ~ 229

Ray，plain of 218

Ray Shahriyār 217

Rāyīn 302，312，321

Rayyān canal 48

Razavi Khorasan 326

Razb river 113

Razīk or Razk 401

Razīk canal 398 ~ 399

Razm river 113

Records of the Bombay Government 52

Red Castle hill 251

Red River 169

Reeds for pens 40

Reinaud，M. 11，16

Reise in Persien 305

Reobarles 315

Report of 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Expedition 38

Resafa 106

Resaina 95

Rhages 21，214

Rhodes 128

Rībās currants 385，387

Rice-flour bread 234

Ridā，Imām Imam 388，391

Rīgān 321

Rīghān 313

Rīgistān 461 ~ 462

Rihāb district 159

Rīkān 313 ~ 314

Rīkh 356

Rīsahr 271

Rīsh mountains 122

Rīshahr （Arrajān） 270 ~ 271

Rīshahr （Bushire） 261

Rishtah or Guinea-worm 403

Rishtān 479

Rīvand 387

Rīvdad 465

Rivers （Ab，Nahr，Rūd）

Ahsā 134

Āk -Sū （of Jayhan） 122

Āk -Sū （Khuttal） 435

Akhsh，Akhshawā 435，438

Andarāb 427

Andījārāgh 435，438

Angran 482

Aras，Araxes 4 ~ 5，117 ~ 118，166 ~ 168，175 ~ 179，182

Argandāb 345 ~ 346

Arīs or Badam 484

Asrūd 469

Aswad 150

Atrak 8，376 ~ 377

`Atshābād 387

A`zam 92

Azrak （Kārūn） 235

Azrak （Mesopotamia） 123

Badakhashān 435 ~ 437

Badam 484

Barbān or Balbān 435

Barārah，Burrāzah 256

Bartang 435

Bukhārā river 468

Burāzah 256

Chirchik 482

Dahās 420

Darkhīd 265 ~ 266

Dhīb （of Arsanas） 116

Dhīb （of Tigris） 110

Dijlah 21；See Tigris

Dirghām 435 ~ 436

Dīv Rūd 314 ~ 315

Dujayl see Kārūn 5，39，44，48，51，65，232

Euphrates （Al-Furāt） 3，25

Changes in course of 26 ~ 29

Lower course of，uppe 70 ~ 74；Easten 115；western 117

Farah river 341

Fārghār or Farghān 435，438

Fashā Rūd 362

Fuller’s river or canal（Samarkand） 465

Fuller’s river（Kassārīn） 469

Gāvmāhā or Gāvmāsā river 196，210，213

Ghadbān 133

Gukchah 435 ~ 436

Halīl-Rūd 314 ~ 315

Harūd 340，412

Hasht Rūd 170

Helmund 7，334 ~ 335，338 ~ 340，343 ~ 345

Herāt river 396，407 ~ 410

Hindiyān 270 ~ 272

Hirmās 87 , 94 ~ 95 , 97

Ikhshīn 267 ~ 268

Ilak river 477 , 482

Indus 331

Irtish 487

Jaghān Rūd 392

Jāij Rūd 218

Jarahī or Jarāhīyah 270

Jarshīk 267 ~ 268

Jaryāb 435 ~ 436

Jāy Rūd 469

Jayhān （Pyramus） 120 , 122 , 129 ~ 131 , 141 , 145

Jaxartes （Sayhūn , Sir , or Sir Darya） 8 , 131 ~ 132 , 434 ; mouth of 444 , course of 476 ~ 477

Jidghil river 476

Jīlānī river 215

Jirrah river 268

Jūrīth 122

Jurjān 376 ~ 377

Kābul river 350

Kadpū 170

Karāgh 410

Karah Rūd 198

Kar`ah or Kaw`ah river 233

Karaj river 218

Karkha 233，240

Kārūn or Dujayl of Ahwāz Dujayl of Basinna 5，200，232～236，245～247，270；44，48，207，242

Kāsān 427～291

Kassārīn（Samarkand）465

Kassārīn（Kushkah）469

Kazkī river 233

Khābūr，Great 87，94～97，105

Khābūr，Little 87，93

Khalīl-Rūd or Halīl Rūd 314～315

Kharshān 476

Kharūd 220

Khāvarān 266

Khawrāwādhān 265

Khawsar 88

Khuttalāb 428

Khayrābād 270，272

Khūbdhān 265，272

Khushk Rūd of Kharrakān 196

Khushk Rūd （Khurāsān） 396

Khushk Rūd （Sughd） 469

Khuttalāb 428，436

Khuzār Rūd 469，471

Khwāsh 342

Kilāb 410

Kish and Nasaf river 460

Kubā river 476

Kubādhiyān 439

Kubākib 120～122

Kūlkū 233

Kur or Cyrus river（Amenia） 177～181

Kur（Fārs） 264，275～277，279～283

Kurdistān river 270

Kushkah Daryān（Dayrjān or Darjān） 469～471

Maklūb 158

Malik，Nahr （Samūr river）180

Mashhad river 377，395～396

Masīn 270

Masūliyāt 111

Mihrān （Indus） 331

Mihrān Rūd 162 ~ 163

Murghāb 397 ~ 400，404，406，416

Mūsā，Nahr 215，218

Naryn 476

Nasaf and Kish river 460

Nīshāpūr rivers 386 ~ 388

Oxus（Jayhun，Amuyah or Amu Darya） 8，131 ~ 132，433 ~ 445；Uprer affluents 435；Lower Oxus 444 ~ 445；Narrows of，451；lower course to Cospian 455 ~ 458

Panj 435

Pulvār 275 ~ 277，279，284

Rāghān 318

Rams 111

Rass 179；See Araxes

Rūdkhānah-i-Duzdī 318

Sāfī 164 ~ 165

Safīd Rūd 4 ~ 5，169 ~ 170，172，223，230

Saghāniyān 440

Sāgharī 135

Sāghiran 135

Saghāvar 384

Salb，or Nahr-ar-Rams 111

Salkīt 116

Samūr 180

Sanjīdah 169 ~ 170

Sarāt or Sarāv river 163

Sarbat 112

Sard Rūd（Hamadān） 195

Sard Rūd（Tabrīz） 163

Sawr 96

Sayhān （Sarus） 131 ~ 132，141

Sayrām 219

Shādhkān 273 ~ 274

Shāh Rūd，Great 170，221，374

Shāh Rūd，Little 169，171

Shahriyār Rūd 263

Shāl 169 ~ 171

Shāpūr river 259 ~ 263，267

Shīrīn 265，271 ~ 272

Shirwān 61

Shūrah Rūd 387

Sidrah 237

Sindarūdh 331

Shughd river 466 ~ 468

Sūrīn 218

Sūrkanā 215

Surkhāb 436，439

Sus river 233

Tāb（medieval）144，168 ~ 172

Tāb（modern）270，272

Taghtū river 165

Tajand 395 ~ 396，407

Tāmarrā 59 ~ 60，80

Tarāb，or Watrāb 428

Tarnak 346

Tayfūrī 376

Tharthār 87，97 ~ 98

Tharthūr 177 ~ 178

Tigris（Dijlah）49

Tīrāh or Tīrīn 241 ~ 242，246

Tīrzah 256

Tarās 487

Turk river 477，481 ~ 482

Turkān Rūd 220

Urast 476

Wakhkhāb 435

Wakhsh or Wakhshāb 434 ~ 436

Wanj 435

Watrāb 428，436

Zāb Great and Little 87，90 ~ 92，194

Zāmil 436，440

Zandah Rūd 203 ~ 207，233

Zanjān river 169

Zankān 318

Zarafshān 436，460，466 ~ 467

Zarb 114

Zarīn Rūd，or Zāyindah Rūd 207

Zarm 114

Zubaydah river 88

Zuhrah 270，272

Zūlū 167

Zūr 111

Riyād 84

Rīyāmīthan 462

Rizā 391；See Ridā

Road Books 11

Roads centring in Baghdād 31，82 ~ 84

Roads

The Constantinople road 134 ~ 135

Through Adharbāyjān，North-west Provinces and Jibāl 227 ~ 231

Desert，the Great 326 ~ 328

Fārs 295 ~ 298

‘Irāk 82 ~ 85

Jaxartes provinces 488 ~ 489

Jazirah and Upper Mesopotamia 124 ~ 126

Khurāsān 430 ~ 432

Khūzistān 246 ~ 247

Khwārizm 472

Kirmān 302，320 ~ 321

Kūhistān 430

Kūmis 367 ~ 368

Makrān 332

Rūm 158

Sijistān 351

Sughd 472

Tabaristān 381

Robes of honour 293

Rock crystal 436

Rome 1

Romanus IV，Emperor 116，139

Roofless tomb 284 ~ 285

Roses，ottar of 94 ~ 95

Ross，Professor E. D. 484

Round City，Baghdād 30

Rū`ad 375

Rūb 427

Rūbanj mountain（Tabaristān）173，373

Rūbanj or Rūnīj（Fars）291

Rubāt（A.），guard-house

Rubāt（Dihistān）379

Rubāt Āb-Shuturān 327

Rubāt Dhi-l-Karnayn 442

Rubāt Dhi-l-Kifl 442

Rubāt Mīlah 428，439

Rubāt Pusht-Kham 320

Rubāt Savanj 392

Rubāt Tāhir ibn `Alī 443

Ruby mines 436 ~ 437

Rūd of Rūdh （P.），river

Rūdārūd 197

Rūd Hangarān 417

Rūdasht 206 ~ 207

Rūdbar （Kazvīn） 220

Rūdbar （Sijistān） 344

Rud-e Atrek or Atrak，etrek（Atrak） 8

Rūdh bridge 238

Rūdhah 215 ~ 216

Rūdhan district and city （Fārs） 249，286，294

Rūdhbar （Daylam） 173

Rūdhbar （Jiruft） 315

Rūdhbar （Sijistān） 344

Rūdhrāvar or Rūdīlāvār 197

Rūdis 128

Rūdkhān 318

Rūdkhānah-i-Duzdī 318

Rūdkhāne Mahābād 164

Rūdkhane-e Dālakī 259

Rūdkhāne Gadār 164

Rūghad 375

Ruhā 103 ~ 104，125

Rukhkh 356

Rukhkhaj 339，345

Rukn-ad-Dawlah 226，245，250

Rukn-ad-Dawlah Khumārtagīn 258

Ruknābād 250 ~ 251

Rūm，meaning Romans，Romaioi 127

Rūm province 4，127 ~ 158

Rūm，Bahr 127

Rūm bridge 238

Rūmakān 35，80

Rūmīyah 34 ~ 35

Rūnīj or Runiz 291

Rupen，King 140 ~ 141

Rusāfah of East Baghdād 31

Rusāfah Hishām 106，125

Rusāfah of Wasit 40

Rustāk-ar-Rustāk 291，320

Rustāk-ar-Ruwayhān 253

Rustakubādh 237

Rustam 335，342 ~ 343，371

Rustam 265

Rustam Kuwād 237

Rustamdār 373 ~ 374

Rustani 232

Rutt for Zutt 244

Rūyān 373 ~ 374

Ruwīn Diz 164

Rūzvand 453

Sa`ādah 251

Sa‘ādat Shahr，Sa‘ādatābād 284

Sabaeans 103，241

Sabanj 392

Sabartā 152

Sābāt（‘Irāk）34 ~ 35

Sābāt（Transoxiana）475，489

Sābians 103，241

Sabīd-rūdh 230

Sabīd-rūdh 169

Sabīdān 410

Sabirabad 179

Sabkhah of Tigris estuary 243

Sabkhah of Zaranj 337

Sāblagh mountain 481

Sablān mountain 163，168，175~176，132

Sable-fur 458

Sabrān 486，488

Sabūk bridge 268

Sābūr for Shāpūr 66

Sābūr Khurrah 248

Sābūrgan 426

Sābūrkhwāst 194，200~202，247

Sābūs，Nahr 38，73

Sābzavār or Sabzivār or Sabzvar（Herāt）340，412

Sabzavār（Nīshāpūr）391，430

Sachau，C. E. 342

Sacred Fire at Shīz 224；See Fire-temples

Sad Khaniyah 190

Sa`d ibn Zangī 251

Sa`dī，poet 250~251

Sadir palace 75

Sadr-ad-Dīn 220

Sadūr 452

Safalkāt 410

Safanjawī 347

Saffāh，Caliph 66，71

Saffār coast 358 ~ 359，246

Saffārah 259

Saffārids 335，343，350，386

Sāfī river 164 ~ 165

Safīd，Kal’ah 264 ~ 265

Safīd Rūd 4，169 ~ 170，172，223，230

Safīyah 37

Safsāf 134 ~ 135，139

Sagardān 413

Sāghand 285，327

Saghāniyān 20，435，439 ~ 440

Sāgharī river 135

Saghavar，Wadi 384

Sāghirah 135

Saghnāk 486

Sagistān 334

Sagsābād or Sagzizbad 220，229

Sagzābād，or Sagziābād 229

Sahand mountain 162～164

Sahārah，Kal’ah 256

Sāhik 269

Sāhik or Sāhak，Great and Little 20，278，298，302，320

Sahiyūn 448

Sahneh 188

Sahra Lur 239

Sahrazur 190

Sa`īd-al-Khayr 105

Sa`īd，brother of Hansan-al-Basrī 253

Sa`īdābād（Sīrjān）281，300

Sa`īdābād（Tabaristān）374

Sāin Kal`ah 222

Sāin，Bātū Khāan（Bātū Khan）223

Sā`irt or Si`ird 114

Sāj 257

Sakālibah，Hisn 134～135，139

Sakarya Nehri 135

Sakarī river 157

Sakhīr 163

Sakīnah 437

Sakīwand 418

Sakk 252

Sakkān river 252 ~ 255

Saklawīyah canal 69

Sakyatan 134

Sal-ammoniac 467 , 488

Salāh-ad-Dīn guard-house 282

Sālakān 344

Salalia , or Attaleia 151

Saladin 25

Salām 357 ~ 358

Salāmī , Salāmey , Salmān 357

sal-ammoniac 467

Salārvand 226

Salb river 111

Salīk 41

Salkīt 116

Saljūk Turks 4 ; their rise 139 ; in Persia 186 ; in Asia Minor 116 , 128 , 140

Saljūk Chronicle 18

Salkit river 116

Salmān the Persian 35

Salmās 166

Salt mountain 211

Salt village （Kirman） 320

Salt village （Kumis） 367

Salt in seven colours 289

Salūkīyah 20，19，133，141；See Seleucia

Salūmak 357 ~ 358

Sālūs Shālūs or Sālūsh 373

Salwā 59，61

Sām dynasty 417

Sām Khās or Khwāsh 462

Samalkan or Samankan 392

Sāmān 212

Sāmānid 460

Sarmanjī or Sarmanjān 440

Samarkand 8，460；walls and suburbs，463 ~ 465，471 ~ 472；bridge at 467

Sāmarrā 53 ~ 56，78，84，355

Sām Rāh 53

Şamaxı or Shāmākhī 179

Samīrān，castle（Irahistān）254

Samīrān，castle（Sīrāf）258

Samīrān Samīrūm or Shamīrān castle（Tarum）226

Samnān 20，366

Samosata 108

Samsām-ad-Dawlah or Sultān-ad-Dawlah 250，276

Samsūn or Sāmsūn 142，145

Samuel，shrine of prophet 212

Samūr river 180

Sān 425

Sanbīl 244

Sanābādh 388，390

Sanandaj 189

Sanārūdh canal 335，337，339

Sanāt（Zarah）lake 339

Sanbīl 244，269

Sandhill，acoustic 341～342

Sandābarī 135

Sandykachi 400

Sang，Kal’ah 300～301，210

Sangān or Sangān-e Pā’īn 357

Sangarius river 135，153，157

Sanglākh 350

Sanguinetti，B. R. 16

Sanī’-ad-Dawlah 269，366，412

Sanīg or Sanīj 325，328

Sanīj 325，328

Sanjafaghan 465

Sanjah bridge and river 123 ~ 124

Sanjān 357 ~ 358

Sanjīdah 169 ~ 170

Sanliurfa 104

Santabarius 135

Santalum stone 389

Sanūb 142，144 ~ 146，157

Saocoras 94

Saponaceous clay 227

Sapor 236

Sapourgan 426

Saqātūnī 430

Saqqez 16

Sarāb 163，168，230

Sarāhand mountain 168 ~ 169

Sarakhs 395 ~ 396，407，431 ~ 432

Sarām 272

Sarāt canal （Baghdad） 66

Sarāt canal，Great，Jamasp 72

Sarāv or Sarv 163，168，230

Sarāwān 329

Sarāy 484

Sarbānān 215 ~ 216

Sarbat river 112

Sardis 143

Sard Rūd （Hamadān） 195

Sard Rūd （Tabrīz） 163

Sardāb，cellars 337

Sardān 246，270

Sardruod 162

Sardsīr 249

Sarhad 317

Sar-i-Asya 440

Sārī Būlī 142

Sar-i-pūl （Hulwan） 192

Sar-i-pūl（Khurāsān） 426

Sārī or Shahr-i-Tajān 370，375

Sārī Būlī 142

Sārīchīchek Sū 119

Sariosiyo 440

Sarjahān 223

Sarjaz 315

Sarkān 197

Sarkhāb river 163

Sarmāhī fish 177

Sarmāj 189，201

Sarmak 282，284

Sārmām 371

Sarmanjī or Sarmanjān 440

Sarpol-e Zahab 191 ~ 192

Sarsandah 475

Sarsar town and canal 32，35，67，69

Sarūd 249

Sarūj 108，125

Sārūk（Farāhān） 198

Sārūk（Hamadān） 194

Sārūk （Isfahān） 203

Sārūkhān or Sārūkhān 144，155

Sārūq 197

Sārūqi 198

Sarus river （Sayhān） 131 ~ 132，141

Sarūzan 343

Sarv （Sarāv） or Sarāb 163，168，230

Sarv-e Jahān 223

Sāviyah 257

Sarvistān （Shīrāz） 252

Sarvistān village 282

Sarwān 346

Sāsān （Fasa） 290

Sāsāniyān 187

Sassanids 1

Sassanian kings names of districts 81

Sassanian sculptures 187 ~ 188

Sātīdamā or Sātīdamād river 111

Sātirūn 99

Satūrīk 224

Sāūj Bulāgh 218

Sāvah 210～212，228～230

Sāvdār mountains 465

Sāviyah 257

Sawād of ‘Irāk 24

Sawdā，Rakkah 101

Sawr river 96

Sawrān Sauran 486

Sayam mountains 469

Sayf-ad-Dawlah（Bani Mazyad） 71

Sayf-ad-Dawlah（Hamdān） 122，129

Sayhān（Sarus） 131～132，141

Sayhūn，Jaxartes See River

Saymarah 201～202

Sayrām 484

Sayrām river 219

Sayramsu 484

Sazgeçit 134

Sazlipınar 134

Schefer，C. 15

Schindler，General，H. 205，281，307，330

Schismatics，lake of the 160

Schuyler，E. 463，474，478，484，486 ~ 487

Schwarz –Wald 20

Saocoras of Nasībīn 94 ~ 95

Seas，names of 22；See Lakes

Sebastia 146

Sebinkarahisar 142

Selefkeh 19

Seleucia 19，133，148

Seleucia （Madain） 33

Seleucia （on Orontes） 33

Sellizure or Shaysure 454

Selseleh 193

Semitic 21

Sepidan 264

Şereflikoçhisar 150

Sergiopolis 106

Seven Sleepers，cave of 119，143，155，314

Shāb，alum 147

Sha`b Bavvān 264，277

Sha’bah canal 339

Shābarān 180

Shabānkārah 6，288

Shabbūt 43

Shabdīz or Shibdāz 63，188

Shabestar 165

Shaburkān，Shubūrkān Shabūrghan，Shufrukān 426，432

Shābustī 36

Shad，fish 43

Shād or Shādh （P.），‘fortune，’ 81

Shādh Bahman or Kūrah Dijlah 80

Shād-Fīrūz or Shādh-Fayrūz 79 ~ 80

Shād-Hurmuz 80

Shādhkān river 273 ~ 274

Shādh Kubādh 80

Shādh Sābūr 80

Shādh-Shāpūr 219

Shādhurwān 57 ~ 58

Shādhurwān，Ahwaz 234

Shādhurwān，Upper 59

Shūdhurwūn，Tustar 235

Shadīdīyah 41

Shadūf 67

Shādyākh，or Ash-Shādhyākh 385 ~ 386

Shafāthā 65

Shāfi`iyya 215，450

Shaft or Shaftah 175

Shāh ‘Abbās 167，319

Shāh-balūt 65

Shāh-Diz 205

Shāh Ismāīl 205

Shāh-Namah 161，188，207，355 ~ 356

Shāh Rūd，Great 170，221，374

Shāh Rūd，Little 169，171

Shāh Rukh 403，482，488

Shāhrukhīyah 482

Shāh Shujā` 291

Shāh Shujā` Kirmānī 305

Shāh Sulaymān 221

Shāhā 161

Shahān 192

Shāhābād 238

Shāhārah castle 256

Shahar Chay 169

Shahbā 96

Shāh-balūt （chestnut） 114

Shāhijān Shāh-i-jān or Shāhgān 398

Shahīn 222

Shahr （P.） , town or city 121 , 147 , 152 , 163 , 233 , 275 , 286 , 357 , 376 , 383 , 409 , 454 , 469 , 486

Shāhrakht 358

Shahrābādh （Balad of Mosul） 99

Shahrābād （Tabaristān） 375

Shahrābān 62

Shahrastān or Shahristān 206

Shahrastān 174

Shahrastān （Barvān） 173

Shahrastān （Jurjān） 377

Shahrastān （Kāth） 447

Shahrastān （Zazwīn） 335

Shahrastān （Zaranj） 335

Shahrazūr 90 , 190 , 224

Shahr-e Pīr 291

Shahrezā 282

Shahr-i-Bābak 286 ~ 287 , 298 , 300 , 302 , 320

Shahr-i-Bilkīs 393

Shahr-i-Dakiyānus 314 ~ 315

Shahr Fīruz 394

Shahr-i-Islām 163

Shahr-i-Naw （Bākharz） 357

Shahr-i-Naw （Jurjān） 376

Shahr-i-Naw （Sultānābād） 199

Shahr-i-Nasrīyah 335

Shahr-i-Rustam 340

Shahr-i-Sabz 409，469 ~ 470

Shahr-i-Sīstān 335，338

Shahr-i-Wazīr 454

Shahristān （Kazwīn） 220

Shahristān （Shāpūr） 262

Shahristānah of Isfahān 203 ~ 204

Shahr-i-Sistān 335

Shahr-i-Nasīryah 335

Shahrisabz 468

Shahriyār of Ray 217 ~ 218

Shahriyār bridge 276，282

Shahriyār Rūd 263

Shahrū 292，295，319

Shahrūd（Bistam）366

Shahtuz 440

Shāh Rūd 169

Shāh Shujā` 291

Shaikh Uvais 291

Sha’irah 398

Shajarah-al-Yaktīn 89

Shākhin or Shahkin 362

Shakk Mīskāhān 290

Shakk Rūdbāl or Rūdbār 290

Shāl 171

Shāl river 169

Shalanbah 371

Shaltūk rice 367

Shālūs 373

Shām，Syria or Damascus 21

Shām，suburb of Tabriz 162

Shāmākhā or Shamākhīyah 179，230

Shāmāt（Kirmān）311

Shāmāt（Naysābūr）387

Shamil castle 319

Shamīrān（Herāt）409

Shamīrān（Irahistan）254

Shamīrān（Tarum）226

Shamkur 178 ~ 179，230

Shammar，Jabal 84

Shammāsīyah 31 ~ 32，50

Shams-ad-Dīn，Sāhib-Dīvān 213

Shams-ad-Dīn of Hurmuz 319

Shams-ud-Dīn Muhammad 307

Shamshāt 116

Shankawān castle 276

Shāpūr Shāhpūr or Sapor 66

Shāpūr（King SaporI）263

Shāpūr，Dhu-l-Aktaf（SaporII）235，237 ~ 238，366，383

Shāpūr city 262 ~ 263

Shāpūr river 259，261 ~ 263，267

Shāpūr，Bilād 270

Shāpūr Khurrah 200 ~ 202，248，262

Shāpūrkhwāst 200 ~ 201

Shār of Gharjistān 415

Sharaf-ad-Dawlah 77

Sharaf-al-Mulk 402

Shārakhs 358

Sharāmīn 195

Sha`rān 190

Shāri-al-A`zam 54

Sharistān 374

Sharwān 345 ~ 346

Shāsh（Tashkand） 8 ~ 9，480 ~ 483，488

Shāsh river （Jaxartes） 476

Shaskuh 358

Shasmān palace 378

Shatt-al-‘Arab 26，43

Shatt-al-Hayy 26 ~ 28，38，40

Shatt al- Hillah 26

Shatt-an-Nīl，or Nile 72

Shāvaghar 485

Shaykh Jām town 357

Shaykh Shu’ayb island 261

Shaysure 454

Shazand 198

Shea and Troyer 356

Shela 338，340

Shibl-ad-Dawlah 112

Shibdāz，or Shabdīz 112

Shibirghān 425

Shihāb-ad-Dīn Ahmad-al-Jāmī 357

Shihmār 372

Shikastah，Kal’ah 276

Shikit 480

Shikk ‘Othman 47

Shīlāv 259

Shim，fish 82

Shimshāt 116 ~ 117

Shimshik，sandal 294

Shīnīz 273

Shirjan 300

Shīrāz 248 ~ 252，293，295 ~ 298

Shīrīn river 265，271

Shīrīn，Queen 63，188

Shirvān province 5，179 ~ 181

Shirvān river（Kurdistan） 61

Shirvān Shāh 179

Shiyān 350

Shīz 190，224

Shuburkān，Shufrukān，Shaburkān，Ashburkān，Ushburkān or Saburghān 426，432

Shūkān 394

Shūl，Shūlistān 245

Shūmān or Ash-Shūmān 440

Shūr 327

Shūr-māhī，fish 177

Shūrah Rūd 387

Shurāt，Buhayrah 160

Shūrī 160

Shūrīstān 282

Shurmīn or Surmīn 416，431

Shushan，the palace 246

Shustar or Shushtar 233 ~ 236

Shutaytah 50，235

Shutūrkath or Ushtūrkath v482

Sīb of Banī Kūmā 36

Sīb canal 41

Sībī 332 ~ 333，346 ~ 347

Sicily 14

Sideropolis 139

Sīdī Ghāzī 152

Sidr tree (Lotus) 47 , 324

Sidrah river 237

Sīf (A.) , shore 256

Sīf of bani-as-Saffar 257

Siffīn plain 102 ~ 103

Sīfs of Muzaffar , `Urmārah , and Zuhayar 256 ~ 258

Sifwah 61

Sih Gunbadhān castles 276

Sihdih (Jarmark) 325

Sihdih (Kūhistān) 355

Sihnah town 190 , 228

Sihnah village 188 ~ 189

Sihun (Jaxartes) 476

Sihmār or Shihmār 372

Sī`ird or Sā`irt 114

Sijās 223

Sīstān province 7 , 334 ~ 351

Sijistān for Zaranj 21

Sīkān 252

Sikkit 480

Sī-Khānah 190

Sikr-i-Fanā Khusraw Khurrah 277

Silh canal 38

Silifke 18

Silk 243，246，285，369~370，401

Silver Hill（Badghis） 414

Silver Hill（Kiraman） 316

Silver mines 294，350，417，483

Silwan 111

Sīmākūn 253

Siminjān，Saminkān 427

Simkān 253

Simnān 20，366

Simyra 114

Sinādah castle 135

Sind （Asia Minor） 135

Sind（India） Sindarūdh or Sind river 331

Singas river 123

Sīnīiz 271，273，294

Sinj 400

Sinjah 416

Sinjār 98 ~ 99 , 124

Sinjār , Sultān 98 ; See Sanjar

Sink 400

Sinn 90 ~ 91 , 125

Sinn river for Lamis 133

Sinn Sumayrah 188 , 228

Sinope 142 , 144 ~ 146 , 157

Sīnūb 142

Sinvān 405

Sīpān mountain 183

Sipylus 154

Sīr Daryā or Sīr Sū 434 , 476 ; See Jaxartes 476

Sīrāf 11 , 258 ~ 259 , 293 , 296

Sīrajān 21 ~ 22

Sīrān for Sabrān 486

Sīrawān 202

Sirāwand 358

Sirishk fire-temple 408 ~ 409

Sīrjān district 299 , 311

Sīrjān city 300 ~ 302 , 320

Sīrmurgh 371

Şırnak 93

Şırvan 179

Sīs or Sīsīyah 128 , 141

Sīsār 165 , 190 , 228 , 230

Sīshat 270

Sīstān 7 , 313 , 331 , 334

Sitakus river 252

Sittajān 252

Sīvās 142 , 145 , 147 , 231

Sīvī or Sīwah 347

Sīvrī Hisār or Sībrī Hisār 153

Sivrihisar 153

Sīwah 347

Siyāh Kūh (Ardabil) 168

Siyāh Kūh (Great Desert) 208

Siyāh Rūd 337

Siyāhjird 420 , 432

Skīfaghn 471

Slane , MacGucken , de. 16 , 18

Slav 372

Slaves and the slave trade 184，429，437，459 ~ 487

Smyrna 155

Sogdiana 8 ~ 9，460

Söğüt 151

Sojas 223

Solomon，King 68

Solomon，shrine of mother of 326，276，284

Soncara 288

Sontheimer，Dr J. 349

Sozopetra 121

Sozopolis 151

Spain，Mosiem，place-names 19

Sparta（Asia Minor） 152

Stack，E. 253，292，307，310

Steel 429，467，476

Stiffe，Captain 259，320

Stone Bridge of Wakhsh river 438 ~ 439，472

Streck，M. 30

Subānīkath 485

Sūbakh 471

Sūdakaniyah 91

Sufayrah 67

Sufi Chay 164

Sugar 236，238，246，329

Sughd province 8 ~ 9，460 ~ 473

Sughd river 466 ~ 468

Sujās 223

Suhayb 154

Suhravard 223

Sūk（A.），market 150

Sūk-al-Ahwāz 232

Sūk-al-Amīr 250，336

Sūk-al-Arba`ā castle 88

Sūk-al-Arba`ā town 243

Sūk-al-Karābīs 484

Sukayr-al-`Abbās 87，97 ~ 98

Sūk Bahr 242

Sūk-Thamānīn 94

Sūlā 59

Sulaymān，Caliph 137 ~ 138

Sulaymān，the Saljuk 140

Sulaymān，Shah 192

Sulaymān，Ibn Jābir 49

Sulaymān See Solomon

Sulaymānān 44，48 ~ 49，243

Sulaymānīya 190

Sulphur springs 242

Sultān of the Two ‘Irāks 186

Sultān Darīn 376

Sultān-ad-Dawlah 250

Sultān Su（river） 121

Sultān Sūyu Çayi 121

Sultānābād Jamjamāl or Chamchamāl Sultanabad，Jamjamal 193

Sultānābād（Kūhistān） 354

Sultānābād，Shahr-i-Naw 199

Sultānīyah 222 ~ 223，228 ~ 229

Suluq 105

Sumayrah’s tooth 188

Sumayram 247，270，283，297

Sumaysāt 87，107 ~ 108，116 ~ 117，123 ~ 125

Sūmghān 229

Sūnaj 471

Sunkur，Atabeg 251

Sunkur ibn Mawdud 250

Sunkurābād 218

Sunnī 409

Sunnīyya 450

Sunnī-Khānah 363

Sūnusā or Sūnīsā 146

Sūrā bridge and canal 26，70～72

Surin river 218

Surēn 182

Sūrkanā river 215

Surkhāb river（Surkhob） 436，439

Surkhandarya 440

Sūrmak，or Sūrmaq 282

Surmīn 416

Surra-man-raa 53

Surrak 242

Surēn 182

Sūrū or Shahrū 11，292，295，319

Suruç 106

Surūshanah 474～476

Sūs （Susa） 82，240，246～247

Sūs，river 233

Sūsan 245

Sūsandah，Sarsandah 475

Sūsanjird embroideries 241

Sūsankan 400

Sutrūshanah 474 ~ 476

Swamps of Euphrates and Tigris 26 ~ 29，40 ~ 43，74，83

Sykes，Major 287，300，306 ~ 309，312 ~ 317，326，329 ~ 330，335，338，340，355，362 ~ 363，394

Synades 135

Synagogue 111

Ta‘ām canal 339

Tāb river（medieval）244，268 ~ 272

Tāb river（modern）270，272

Tābah 257

Tābān 349

Tabar，meaning mountain 369

Tābarān 388 ~ 390

Tabarī 17 ~ 18

Tabarik（Isfahan）216

Tabarik（Ray）217

Tabaristān province 7，173，175，368 ~ 376

Tabas Gīlakī or Tabas-at-Tamr 10，324 ~ 326，352，359 ~ 361，431

Tabas-al-`Unnāb or Masīnān 362 ~ 363

`Tabby silk 81，161，203，429

Tabrīz 161 ~ 163，230 ~ 231

Tabrīz mosque 305

Taffir 58

Tafrīsh 211

Taghtū river 165

Tāhīr ibn Layth 301

Tahmurath，King 206，263

Tāj palace 34

Tāj，Kal ‘ah 226

Tajand river 395 ~ 396，407

Tāk fortress（Daylam） 374

Tāk fortress（Sijistan） 343

Tāk town 343

Tak-Ab 387

Tāk-i-Bustān 187

Takān bridge 270

Takān，Marghzar 390

Takestan 228

Takht-e Jamshid 6

Takh-i-Karāchah 251 ~ 252

Takht-i-Khātūn 424

Takht-i-Pūl 342

Takht-i-Sulaymān 224

Takīn bridge 383 ~ 384

Takīnnābādh 347

Takrīt 25 ，57 ，84 ，87

Talbot and Maitland ，Messrs 419

Talhah 44 ~ 46

Talhatān 49

Tālikān （Jibāl） 172 ，219 ~ 220

Tālikān （Jurjān） 423 ~ 424 ，432

Tālish or Tālishān 173 ~ 174

Tall or Dartal 345

Tall （A.） ，hill 37 ，69 ，87 ，89 ，99 ，109 ，113

Tall A’far 99

Tall Fāfān 87 ，113

Tall Ibrāhīm 69

Tall-Nu`mān 37

Tall-at-Tawbah 89

Tālūt and Jālūt 434

Tamarisk valley 134

Tāmarrā river or canal 59 ~ 60 , 79

Tamīn Arabs 427

Tamīs 375

Tamliyāt 438

Tānah 257

At-Tanbīh 14

Tang-Zandān 319

Tang-i-Zīnah pass 289

Taqwim al-Sihhah 106

Tarāb river 428

Tarabazandah 136

Tarandah , Taranta 120 ~ 121

Taranjubīn , manna 469

Tarāz embroideries 293 ~ 294

Tarāz town 486 ~ 488

Tarfā , Wādī 134

Tarhān 202

Tārikh-i-Guzīdah 16

Tarik-i-Khurasan 61

Tarikh-i-Rashid 484

Tark 209，449

Tarm 226

Tarnak river 346

Tarom 169

Taron 115

Taronites 115～117

Tarragon 227

Tārum，Tārumayn（Jibāl）170，172，225～226

Tārum or Tārum（Fārs）291～292，294～295

Tarūn 115～116

Tarzak castle 319

Tāsh Kūpruk 439

Tash or Tāshkan 433，475，482

Tasūj，subdistricts of ‘Irak 79

Tasūj 160，166

Tate，G. P. 335

Tatli Çay 157

Tāū-al-Haramyn 284

Tāūk 92

Taurizi 161

Taurus range 4，22，128

Tavernier，J. B. 28 ~ 29，326

Tawūk，or Tāūk 92

Tawālish 173 ~ 174

Tawānah 136

Tavas 154

Tawās，Hisn 154

Tawāwīs 462

Tawwaj or Tavvaz 14，259 ~ 260，267，293，296

Tayfūrī river 376

Tāyikān（Tukhāristān）428，432

Taylasān scarfs 312，367

Taymaristān or Taymarjān 282

Taymarrā 61

Taysafūn 33 ~ 34

Tazar 192

Tāziyān castle 319

Teakwood（*Sāj*）54

Tihrān 216

Teira 154

Tekkeh，Amirate 144，150

Temere Çay 157

Ten Thousand Miles in Persia 287

Tephrike 119

Thakān bridge 269

Thakkān 252

Thamānīn 94

Tharthār river 87，97 ~ 98，177 ~ 178

Thatta 331

The Assemblies Of al-Harīrī 100

Thebasa 136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sia Minor 127

Themes of Asia Minor 138

Theodosiopolis 117

Theodosius，Emperor 112

Theophilus，Emperor 121

Thirst river 387

Three Domes，castles 276

Thughur（frontier fortresses） 128

Tīb 64，82，241，247

Tibet，Little 435，437

Tiflīs 178，181，230

Tīghūr castle 269

Tigris 1

Tihrān or Tihrān 216 ~ 217 , 229

Tilā , castle and lake of 160 ~ 161

Tiles , enamelled , called Kashani , blue or green 55 , 78 , 162 , 200 209 , 216 , 390 ; golden 385

Tīlshān 173 ~ 174

Tire 154

Tirmid 10

Timour Bec , *Histoirc de* 17

Timur , his birth-place , 470 ; death of 484 ; 40 , 68 , 118 , 145 ~ 146 , 148 ~ 149 , 151 ~ 156 , 177 ~ 178 , 181 , 189 , 193 , 200 , 205 , 217 , 236 , 251 , 265 ~ 266 , 269 , 271 , 291 , 295 , 297 , 299 , 301 ~ 302 , 319 , 335 , 338 , 343 , 345 , 347 , 355 , 357 , 370 ~ 373 , 375 ~ 377 , 391 , 395 , 403 ~ 404 , 406 , 409 , 411 , 415 , 417 , 422 , 427 ~ 428 , 437 ~ 438 , 441 ~ 442 , 447 , 449 ~ 450 , 454 , 463 , 465 , 470 ~ 471 , 484 ~ 486

Tin mines 227

Tīn , Kal`at 108

Tīn Najāhī , edible clay 353

Tīr-i-Khudā castle 253

Tīr Murdān 265

Tīrā river 241 ~ 242 , 246

Tīrah 154

Tirbāl 255

Tirhān 54

Tīrīn See Tira

Tirrīkh fish 124，183～184

Tīrzah，river 256

Tīs，Ţīs，Tīz

Tīz castle（Fars）251

Tīz port（Makran）329～330，333

Tohma Çayi 120

Tokat 142

Toll-barriers on Kārūn river 243

Toll-barriers on Tigris 36，41

Tooth ache，bark for 392

Tornberg，C. j. 18

Tovin 182

Trade and products of Adharbāyjān and North-west province 184

Fārs 293～295，297～299，301，304～305，307～308，311，319～321，323，327，336，354，367

‘Irak 3，5，12，24～25，29，33，39，43，45，49，57，63～65，70，72，75，79，81，84，118，124，146，185～186，191～192，200，202，211，215，219，235，237，241，246，268，301，308，344，409，462

Jaxartes provinces 487

Jazirrah or Upper Mesopotamia 124

Jibal 5 ~ 6 , 9 , 12 , 22 , 63 , 169 , 171 ~ 172 , 185 ~ 186 , 191 ~ 192 , 202 ~ 203 , 208 , 214 , 223 ~ 224 , 227 , 247 , 249 , 292 , 312 , 322 , 364 , 465

Jurjān 7 , 22 , 173 , 367 , 375 ~ 377 , 379 ~ 381

Khurāsān 429

Khūzistān 6 , 10 , 44 ~ 45 , 47 , 49 , 82 , 200 , 207 , 232 ~ 234 , 236 , 241 , 245 ~ 246 , 268 , 270 , 297

Khwārizm 8 , 10 , 16 , 23 , 379 ~ 381 , 417 , 434 , 442 ~ 444 , 446 , 448 , 450 ~ 451 , 453 ~ 454 , 458 , 459 ~ 460 , 472 ~ 473 , 478 , 481

Kirmān 6 ~ 7 , 11 , 18 , 22 , 207 , 242 , 261 , 278 , 286 ~ 287 , 290 , 292 , 298 ~ 300 , 302 , 305 ~ 306 , 310 ~ 311 , 314 , 316 , 320 , 322 ~ 323 , 325 , 327 ~ 328 , 332 , 338 , 340 , 361

Kūhistān 10 , 186 , 285 , 311 , 318 , 323 ~ 324 , 326 , 338 , 340 ~ 341 , 352 , 354 , 356 , 358 ~ 359 , 361 , 363 , 382 ~ 383 , 411 , 420 , 430 ~ 431

Kūmis 9 , 173 , 228 , 323 , 326 , 364 ~ 365 , 367 ~ 368 , 371 , 373 , 381 , 391 , 430

Sijistān 314 , 318 , 325 , 332 , 334 ~ 335 , 338 , 340 , 344 , 349 , 351 ~ 352 , 382 , 408 , 431

Sughd 471

Tabaristān 7 , 9 , 22 , 173 , 175 , 214 , 218 , 221 , 225 , 227 , 364 , 368 ~ 370 , 372 , 374 ~ 375 , 377 , 381 , 404 , 456

Tralleis 154

Transoxiana 433

Trebizond 136

Trench of Sapor 65

Tsaba 103

Tualā lake 199

Tubbat（Tibet） 435

Toghrul-Beg the Saljuk 189，207

Tughril II，Saljuk 217

Tūkāt 142，147

Tūkath for Tunkath 483

Tukhārān-bih 399

Tukhāristān，Upper and Lower 426～427

Tukhmah Sū 120～121

Tulas river 487

Tūlim 174

Tulūl 135

Tumujkath，Tumushkath 462

Tūn 7，353

Tūnkath 483，488

Tunocain of Marco Polo 7，352

Tūr `Abdīn 94，96

Tūrān （Makrān） 331～332

Tūrān and Irān 433

Tūrān Shāh，Saljuk 306

Turaythīth 20

Turbat-i-Haydari 356

Turk river 477，481 ~ 482

Turks，river of the（Atrak）377

Turkābād 305

Turkan Rūd 220

Turkhān Khātūn 305 ~ 307

Turkoman Amirs in Asia Minor 140，142，144 ~ 158

Turpin，Dick，his ride 83

Turquoises，and Turquoise mines 389，429，467，488

Tursah 166

Turshīz，Turshīsh，Turshīs or Turthīth 20，326，352，354 ~ 355，360，430

Tūs 9，12，382，388 ~ 390，396，429，431，459

Tustar 6，232 ~ 236，238 ~ 239，244，246 ~ 247，249

Tūsar 292

Tutiya，Tutty 160，309

Tuvī 197

Tuwānah，Tyana 136，139，150

Tuyarkān 197

Tuz poplar bark 459

Two Domes，castle 272

Ubullah（Apologos） town and canal 19，44，46 ~ 47，81

Uhaydab 122

Ūjān （Ardabil） 163，230

Ūjān （Fars） 276，281

`Ukbarā 39，50 ~ 51 ，84

`Ukdah 285

`Uk r 41

Ulān Moren 169

Uljaytū Sultan 193，222

Uljaytū Khātūn 223

`Ullayk 134

Ulū Burlū 142，151

Uluborlu 142

Ulu Cay 84

‘Umar 46

`Umārah coast 256

Umīdābād 165

Universal History（Ibn Khaldūn） 17

Unās 286，320

Unguents 293

Ura-tepeh 474

Uram Khāstah 372

Urast river 476

Ūrd 276，282

Urdūbād 167

Urfah 104

Urgence 449

Urganj 8，446，448 ~ 450；See Jurjaniyah

Urmīyah lake 5，22，160

Umīyah city 165，230

Urmūs or Urmūz 319

Urūmiyah 161

Ūsh 478 ~ 479，489

Ushaburkān 426

Ushnuh or Ushnūyah 165

Ushnuviyah 165

Ushrūsanah province 474 ~ 476

Ushtikān 478

Ushturghaz（assafoetida） 400

Ushtūrkath 482

Uskāf，Banī Junayd 59

Usrūd 415

Ushrūsanah 474 ~ 476

Ustūn 421

Ustunābād，Ustūnāvand 371 ~ 372

Ustuvā 393

`Utbī 348，395

Utrār 9，484 ~ 485，488

Uwāl，island 261

Uzaj 439

‘Uzayr，tomb of 43

Uzjān 276，281

Uzkand Ūzgand 8，476，479，489

Uzvārah 208

Vahan 182

Valerian，Emperor 235

Vandal kingdom 130

Vardan 182

Varāmīn 216

Veiled，Prophet of Khurasan 414，470

Vezirhan 135

Velvets 386

Veronica of Edessa 103

Vespasian，bridge of 123 ~ 124

Vocano at Asak 244

Vomiting，bridge of 330

Voyages du Chevlier Chardin en Perse 205

Vullers，J. A. 368

Vulture hills 208 ~ 209

W pronounced V in Persian 20

Wadhāk canal 453

Wādī（A.）331；See River

Wādī-al-Jawz 134

Wādī-al-Kabīr 219

Wādī-ar-Razm 113

Wādī as-Sarbat 112

Wādī Sayram 219

Wādī-at-Tarfā 134

Wādī-az-Zūr 111

Wahānzād 283

Vahsūdān 226

Vājīb 312

Wakhkhāb，river 435

Wakhkhān 435，437

Wakhsh country and Wakhsh-āb river 434 ~ 439

Valāshjird 317，321

Walīd，Caliph 58，131

Wālishtān 332 ~ 333，347，351

Valiyān 162

Vān lake 5，22，113，115，125，147，172，182，184，230 ~ 231

Vān city 183

Wandah 326

Wandanīgān 63

Wanj river 435

Wānkath 480

Waraghsar 465，467

Varāmīn 216 ~ 217，229

Varavi 169

Warthān 176 ~ 177，230

Warwālīz 420，428

Warzand 163

Washāk 209

Wāshjird 439，472

Wasīf bridge 58

Wāsit 39 ~ 40 , 42 , 81 ~ 82

Vastām （Bisutun） 187

Vastām or Vastān （Van） 184

Water-dog , fish 160

Wāthik , Caliph 54

Watrāb river 428 , 436

Wāyikhān 452

Wīmah 371

Waynkard 482 , 488

Wazīr town 454

Wazkard 465

Wednesday Matket 88 , 243

Weir at Ahwāz 234

Weir at Tustar 235

‘West Country , Khavardān 395

Whirlpool in Karun 451

White Castle 264 ~ 265 , 300

White Huns 433 , 438

White Palace 34

White River 435

Widhār 466

Wih （P.），meaning ‘good’ 262，303

Wīh-Artakhshīr 303

Wih-shāpūr 262

Willow village 284

Wīmah 371

Wind at Dāmghān 365

Windmills 337，409，411

Vīrān Shahr 121

Wolf river （affulent of Tigris） 110

Wolf river （afflulent of Arsanās） 116

Wonders of the World，the Four 104，123

Wood，Captain 434，439，441

Wright，W. 15

Wurghar 467

Vurūjird 200

F.Wüstenfeld，F. 16，84

Yaghrā bridge 117

Yahūd，Hisn 135

Yahūdān 424 ~ 425

Yahūdī canal 58

Yahūdīyah （Isfahān） 203 ~ 204

Yahūdīyah （Maymanah） 424 ~ 425

Yahyā，son of `Alī Zayn-al-`Ābidīn 218

Yahyā，the Barmecide 34，371

Yājūj and Majūj 434

Yakdur 161

Ya`kūb ibn Layth 36；his tomb 238，273，281，336 ~ 337

Ya`kūbī 12，17，34，37，39，53，152，189，192，206，219，295，335，347，349，389，400，420，423，425，441

Yākūt 401

Yalāvāch 151

Yalova 135

Yamkān 437

Yanarsu Çayi 112

Yandī 406

Yanghikant，Yanghi-Shahr 486

Yārkath 466

Yarnā，Yarnī 94

Yarzātiyah 59

Yasīn Tappah 191

Yassī 485，486

Yate，Colonel 308，342，357 ~ 358，378 ~ 389，391，393 ~

394，405 ~ 406，409 ~ 410，413，415，423 ~ 427

Yazd 249

Yazdābād 220

Yazdajird III，King 1，62，400 ~ 401

Yazdashīr 303

Yazdikhwāst（Dārābjird） 291

Yazdikhwast（Istakhr） 282 ~ 283，297

Yazīd，Caliph 137

Yazmīr 155

Yaznīk 156 ~ 157

Yerevan 182

Yellow Kiosque 282

Yellow Mountains 207

Yule，Sir H. 288，309，315，349，352，355 ~ 356，417，434，439，441，489

Yunābidh 359

Yūnis（Jonah，prophet） 88 ~ 89

Yunnāl 189

Yurgān Lādīk 149

Yürükçepne 135

Zāb canal，upper，middle and lower，and districts 37 ~ 38，73，80

Zāb river，Great and Little 87，90 ~ 92，194

Zāb for Dizfūl river 238

Zābulistān 334，349

Zafar Nāmah 17

Zāhedān，Zahidan，or Zaidān 325

Zahidan 335

Zāhīr-ad-Dīn 217

Zāhirīyah，`Ayn 95

Zakkan 252

Zakvir river 167

Zal，father of Rustam 335，371

Zāl river 239

Zalam 190

Zalik 344

Zalikan 344

Zam 356，397

Zamakhshar and Zamakhshari 454

Zaman 317

Zamil river 436，440

Zamin 9，475，488 ~ 489

Zamin Dawar 339，345 ~ 346，351

Zamin Dih 195

Zamm 404

Zamm-al-Akrad 266

Zanabil，date baskets 351

Zānbūk 343

Zandah Rūd 203 ~ 207，233

Zandajī stuffs 462

Zandan 410

Zandanah 462

Zangezur 167

Zangi 93，104

Zangiyan 167

Zanitha 122

Zanj，capital of the 45，48，104，233，258，315

Zanjān 9，169，196，221 ~ 225，229 ~ 231

Zanjān river 169

Zanjān Rūd 169

Zankan river 318

Zapetra 121

Zar castle 393

Zar mountain 365

Zarafshan river 436，460，466 ~ 467

Zarah lake 7，22，147，328，334 ~ 335，338 ~ 340，342 ~ 343，412，416

Zārah castle 147，338，334

Zarand 305，308 ~ 309，321

Zaranj or Zarang 335 ~ 340，431

Zarb river 114

Zarbak 398，401

Zard Kuh 5

Zarin Rūdh or Zāyindah Rūd 207

Zariran 35，67

Zark canal and town 398 ~ 401

Zarkan 289

Zarm river 114

Zarmān 468

Zarūn island 319

Zavah 356

Zāvar for Rāvar 309

Zawārīk，Jisr 57

Zawzan（Jazirah） 93 ~ 94

Zawzan（Kuhistan） 358

Zāyandé-Rūd or Zāyanderūd 207

Zayindah Rūd 203 ~ 207

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305

Zeydābād 311

Zhakkan 252

Zibatrah 121 , 126 , 128

Zilah 147

Zīrkūh 358

Ziyarids 217 , 378

Zoroaster 72 , 165 , 224 , 355 ~ 356

Zubaydah , wife of Harun-ar-Rashid 37 , 47 , 161 , 176 , 209 , 215 ~ 216 , 218 , 436

Zubaydah river 88

Zubaydiyah (Kurdistan) 192

Zubaydiyah (Ray) 215 ~ 216

Zubayr 44 ~ 46

Zuhāk 371

Zuhayr coast 256 ~ 258

Zuhrah river 270 , 272

Zulu river 167

Zumah , Kurdish tribes 266

Zun or zur mountain 345

Zur river 111

Zurk or Zurrak 401

Zutt , gipsies 244 , 331

Zuvarah 208

Zuzan 358

译者后记

《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是译者从2005年初开始着手翻译的，前后已经进行了12年。在此期间，译者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本书的注释和原文核对上，并通过各大图书馆和网络资源收集到了原文中出现的几乎所有文献。因此，译者在译稿和注释上颇费了一番功夫，仅译者注释就10余万言，其目的就是让读者更好地了解相关的内容。西域历史地理，尤其是帕米尔以西的历史地理，我国学者不很熟悉，汉文文献记载也是只言片语，很难了解全貌，而域外文献，尤其是希腊、大食文献对这些地区的记载较详细。通过注释，译者将汉文文献与域外文献对应起来，从而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地认知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举世闻名的文化之路、商业之路、交往之路、经济之路，中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在这条道路上发生的，而大食地区（中东各地）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环，具有中介的地位，因此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地理尤显重要。但长久以来，由于视野所限，我国学者主要研究帕米尔以东地区的历史地理，坦率地说，很多成果有重复的嫌疑，且学术价值不很高。而帕米尔以西地区的历史地理，我国学者虽有涉猎，但主要关注阿姆河以东地区的历史地理，阿姆河以西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不多，且处于初创阶段。这部译著及其注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些缺憾，并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做铺垫工作。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时代，重振丝绸之路辉煌的伟大事业已经开启。历史的记忆多留存在各种文献之中，而地名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驿站，是文明交往遗留的痕迹，研究历史地理，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历史上中亚、西亚的风土人情、多元文化，为当下相互交往打下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相互了解添砖加瓦。

这部译著在完成过程中得到了多方的帮助。此处感谢所有支持过我的老师、朋友、同学、学生，尤其感谢王欣先生给予了出版方面的帮助。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高振华先生为编辑此书付出的心血；感谢我的学生唐智、谭振超、龙国仁、徐磊等付出的劳动。还要感谢我的

妻子马玲女士、女儿韩紫芸给予的帮助。

尽管花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多时间，投入了很多精力，但翻译好一部书，做到信、达、雅是一件很难的事。因此，呈现给读者的这本译著必定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归结于译者学力所限。在此，译者诚恳希望得到读者善意的学术批评。

韩中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

2017年11月7日于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寓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诸地/（英）G.勒·斯特兰奇著；韩中义译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The Lands of Eastern Caliphate：Mesopotamia，Persia，and Central Asia From the Moslem conquest to the time of Timur

ISBN 978-7-5201-0434-0

I.①大… II.①G… ②韩… III.①历史地理-研究-世界 IV.①K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7802号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

——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诸地

著者/〔英〕G.勒·斯特兰奇

译者/韩中义

校订/何志龙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高振华

责任编辑/高振华 楚洋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010）593671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54.5 字数：742千字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0434-0

定价/9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韩中义　1966 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西北、中亚、西亚等地历史、宗教、民族的研究工作，出版了《西域苏非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欧亚与西北研究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两部专著，发表 60 余篇相关的论文，承担国家级课题 1 项，省部级课题 4 项。//

何志龙　1964 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院长，长期从事中东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著作多部，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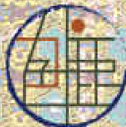
010-59367109

本书的叙述时期起于阿拔斯帝国建立，终于帖木儿帝国时期，时间跨度近800年，记述的地理范围，以报达城（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东部地区，东至与中国接壤的中亚荒漠地区，西达今叙利亚、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南濒波斯湾与印度洋，北抵高加索山脉，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及中亚诸地。

书中直接和间接引用了记述该地区的多种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历史地理文献资料，并分别从自然环境、城乡聚落、农田水利、商业贸易、道路交通、风俗物产、名胜古迹等多个方面记述各地区的历史地理情况。

本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本书所引原始文献进行了精细的梳理，对书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注释，其中的很多注释是对原文记载的补充或是译者所进行的学术考证，这一方面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内容，另一方面对原书内容进行了补正。


出版社官方微信



九色鹿

www.ssap.com.cn



定价 98.00元